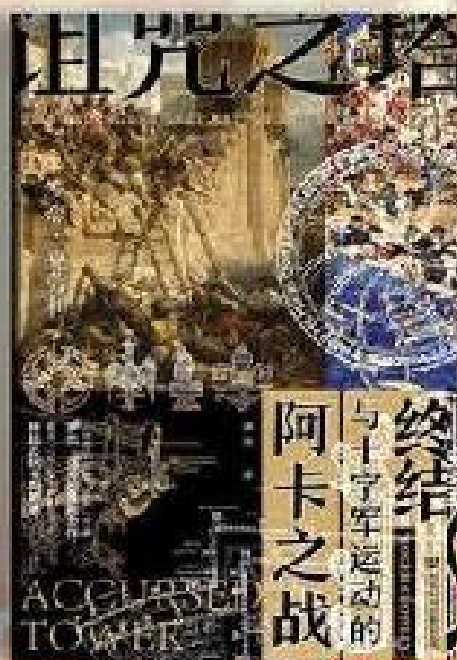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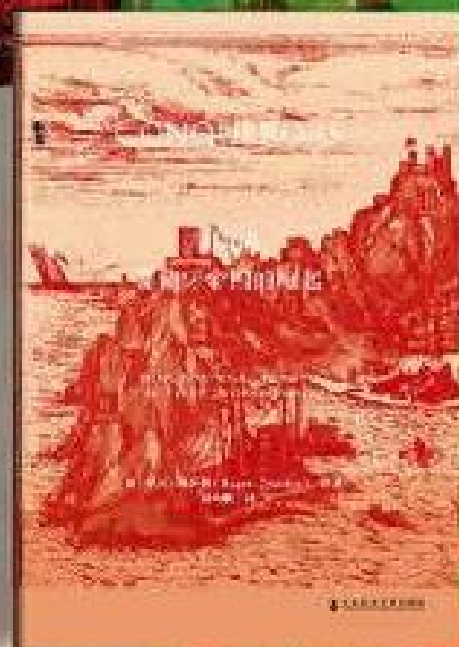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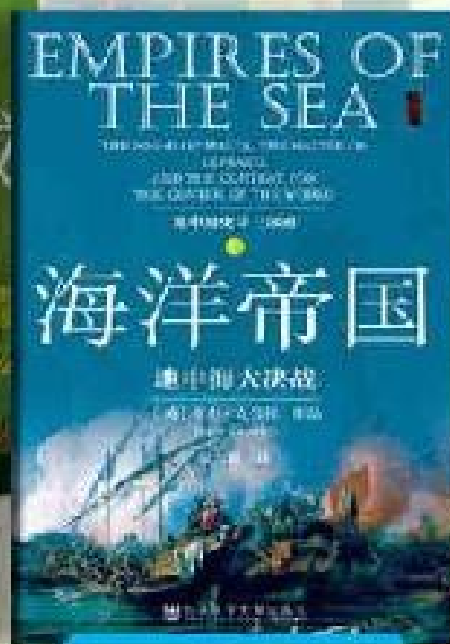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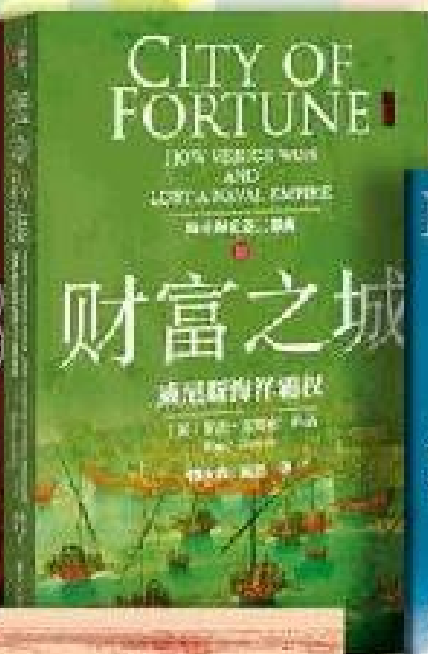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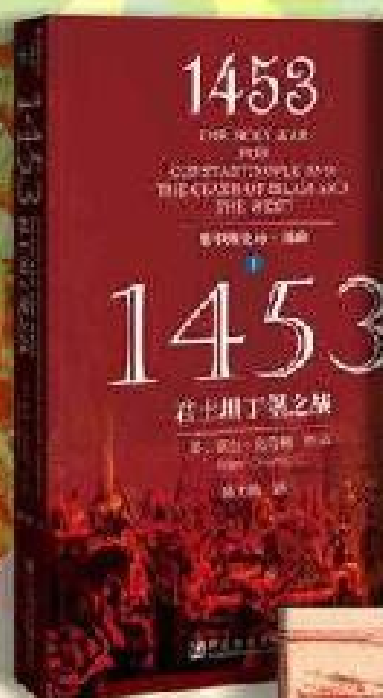


甲骨文
ORACLES

罗杰·克劳利 合集

(全5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总目录

- [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
-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
- [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
- [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
- [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阿卡之塔

THE CRUSADERS' LAST BATTLE FOR THE HOLY LAND

罗杰·克劳利



终结及阿卡的陷落

重现1189年十字军东征的

罗杰·克劳利最新力作

地中海十字军东征二作

谭琦 译

阿卡之战

与十字军运动的

终结

ROGER CROWLE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杰·克劳利 ROGER CROWLEY

出生于英格兰的历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专业，后在伊斯廷布尔教授英语。他在多年时间里广泛游历了地中海世界，对其历史文化以及航海史和东正教历史有着广泛兴趣。他著有“地中海史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庞贝之城》）以及《征服者》。现居英国格洛斯特郡。

译 琦

哈尔滨理工大学语言文学类硕士，专职翻译，译有《大征服：马耳他 1565》《拜占庭的失落之城》。

Civitas Aretus siue Pictomacydia.



Accursed Tower: The Crusaders' Last Battle for the Holy Land (US
Title: The Accursed Tower: The Fall of Acre and the End of the
Crusades) by Roger Crow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Lownie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1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英〕罗杰·克劳利 著 谭琦 译

ROGER CROWLEY

ACCURSED
T O W E R

诅咒

咒

之

塔



THE CRUSADERS' LAST
BATTLE FOR THE HOLY LAND

终结
与十字军运动的
阿卡之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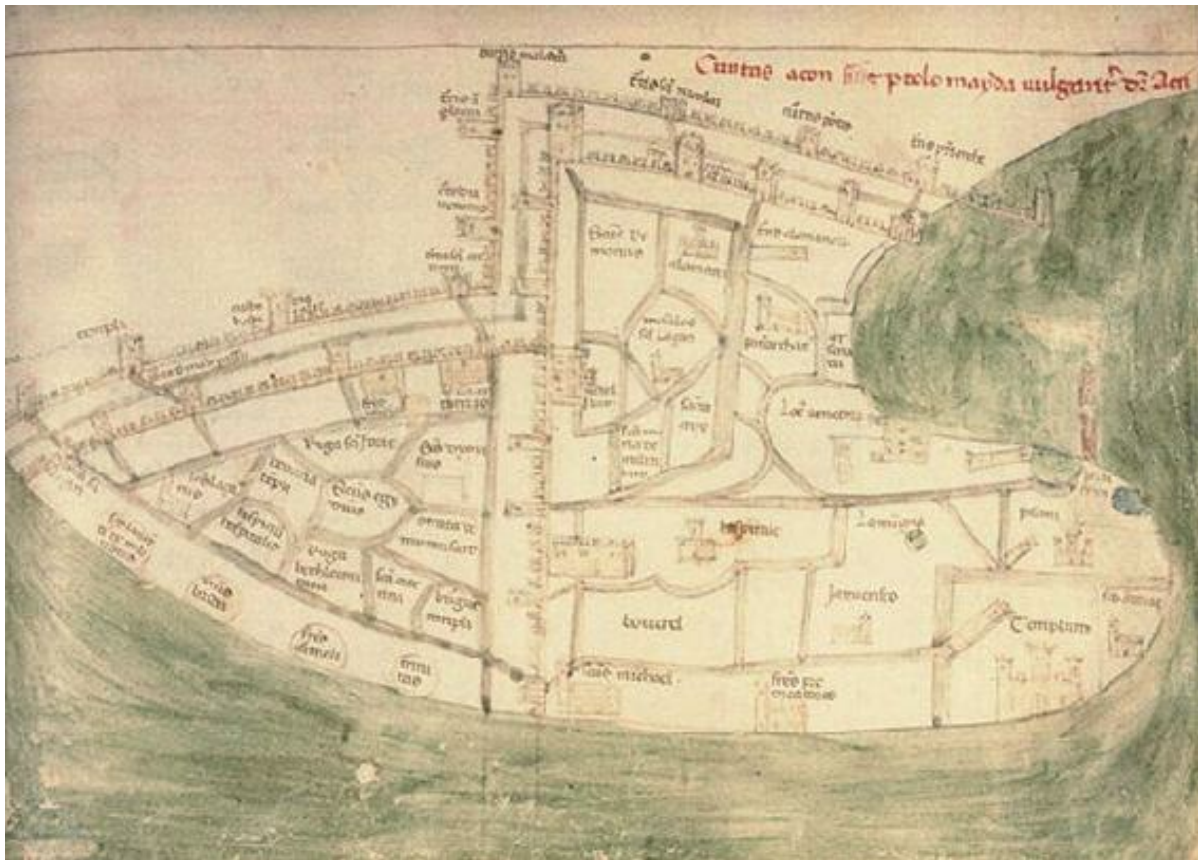
2009.05 定价: 49.00元 (C) 1999-2009



001//阿卡围攻战，1189—1191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部队使用一台威力巨大的配重式投石机来粉碎这座城市的城墙。



002//这幅13世纪中期马修·帕里斯绘制的地图，以平面示意图的形式展现了阿卡的总体布局。诅咒之塔在地图中以圆形塔楼的图像处于外城墙显著的位置；左侧的蒙穆萨尔郊区与老城区被一道内城墙隔开。



003//这幅完成时间大约为**1320**年的地图，是根据马里诺·萨努多·托尔塞洛在**1286**年造访阿卡时的叙述绘制的，提供了有关最后一次围攻战之前阿卡城市布局的宝贵信息。该地图展示了阿卡的双层城墙和蒙穆萨尔郊区。塔楼、城门、城市区域以及知名建筑物都在地图中被标出。



004//头戴黄金王冠、笼罩在圣人光环下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从法兰西本土扬帆起航，前往埃及，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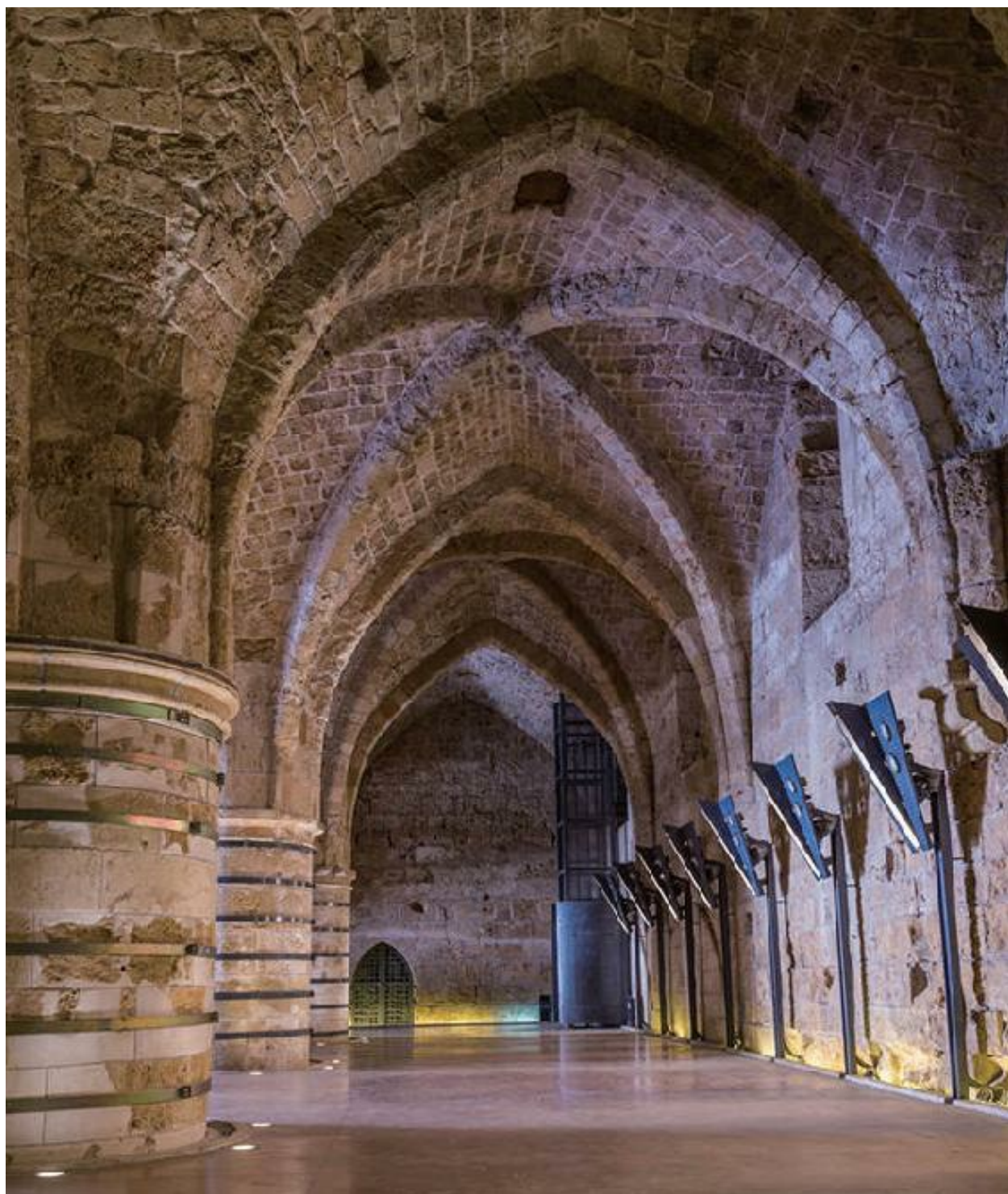
005//蒙古骑兵与马穆鲁克骑兵。画面左侧的蒙古骑兵执弓戴盔，正在追击一队撤退的马穆鲁克骑兵，后者手执长枪，高举伊斯兰星月大旗。



006//身穿颜色鲜艳长袍的马穆鲁克骑兵，这是一本马术与军事训练手册上的插图。这些关于战争的论述表明了伊斯兰世界的军事科学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007//这个抬起前足呈行走态的狮像是马穆鲁克王朝创始人、苏丹拜巴尔一世的纹章，这种纹章多在公共建筑和硬币上出现。



008//阿卡城里医院骑士团总部的食堂大厅，巨大的圆柱和高耸的拱廊是骑士团在这座城市中所拥有财富的遗存。



009//这条长达**300**余米的、从阿卡地下穿城而过的神秘隧道，由圣殿骑士团总部城堡直达港口区。其确切用途目前尚无法断定，但它可能是由圣殿骑士团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建造的，以便让货物绕过敌对城市派系的争议区域。



010//战争的胜利品：一座阿卡教堂的大门被重新安装在开罗一所宗教学校的入口处。



011//洛桑大教堂中的一位幸存者的雕像：奥托·德·格朗松，英格兰骑士的指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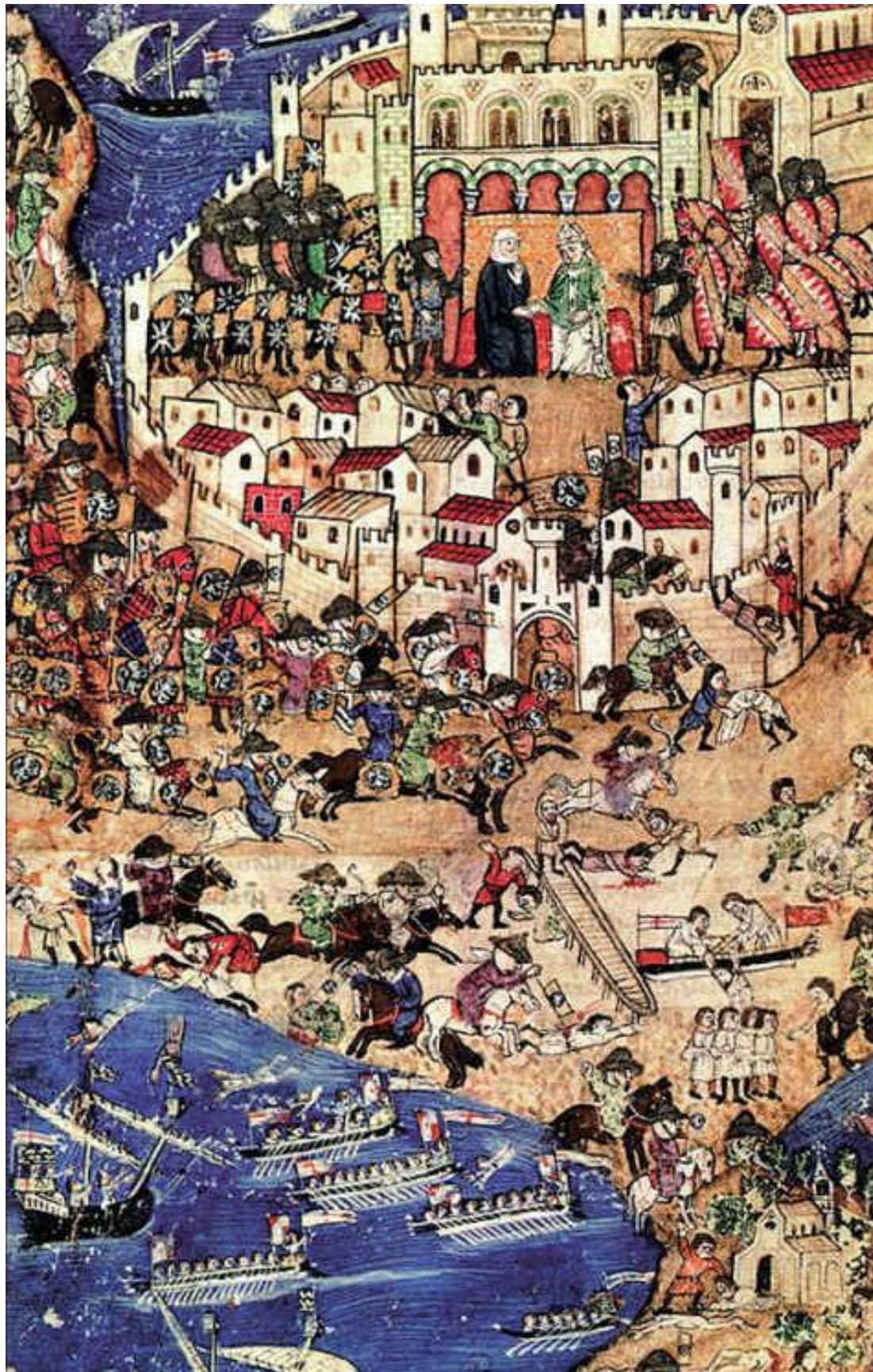
012//出土的物证：一块显示骑士形象的上过釉的陶器碎片，发掘自十字军时代阿卡毁灭时的地层。



013//今天阿卡旧城区的鸟瞰图。港湾区右侧的石块基座就是苍蝇之塔的遗迹。前景中浅浅的绿色水池是现已消失的圣殿骑士团城堡所在的位置；医院骑士团的总部则在绿色清真寺圆顶左侧长方形建筑物的位置。



014//在阿卡老城区城墙外的一次考古发掘活动中发现了**18**个被精心打磨成形的球形石弹，这些石弹专为一台很可能是架设在这里的马穆鲁克投石机配备。在该地区发现的石弹重**50—165**公斤。许多石料是从数英里之外运来的。



015//马穆鲁克攻陷的黎波里城，**1289年4月**。这是十字军东征接近尾声时中的一场战役，战场位于现代的黎巴嫩。



016//1291年，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大元帅马修·德·克莱蒙守卫阿卡城墙。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说我们的主，当他行走于叙利亚海滨之时，并没有进入这座城市，而是诅咒了这座城市中的一座塔楼——如今被城里的居民称为诅咒之塔。但我更相信这座塔楼的名字另有出处。当我们的战士围攻此城的时候，它是防守最顽强的地方，由此他们便将其称为诅咒之塔。^[1]

维尔布兰特·范·奥尔登堡（Wilbrand van Oldenburg），1211年
游历阿卡时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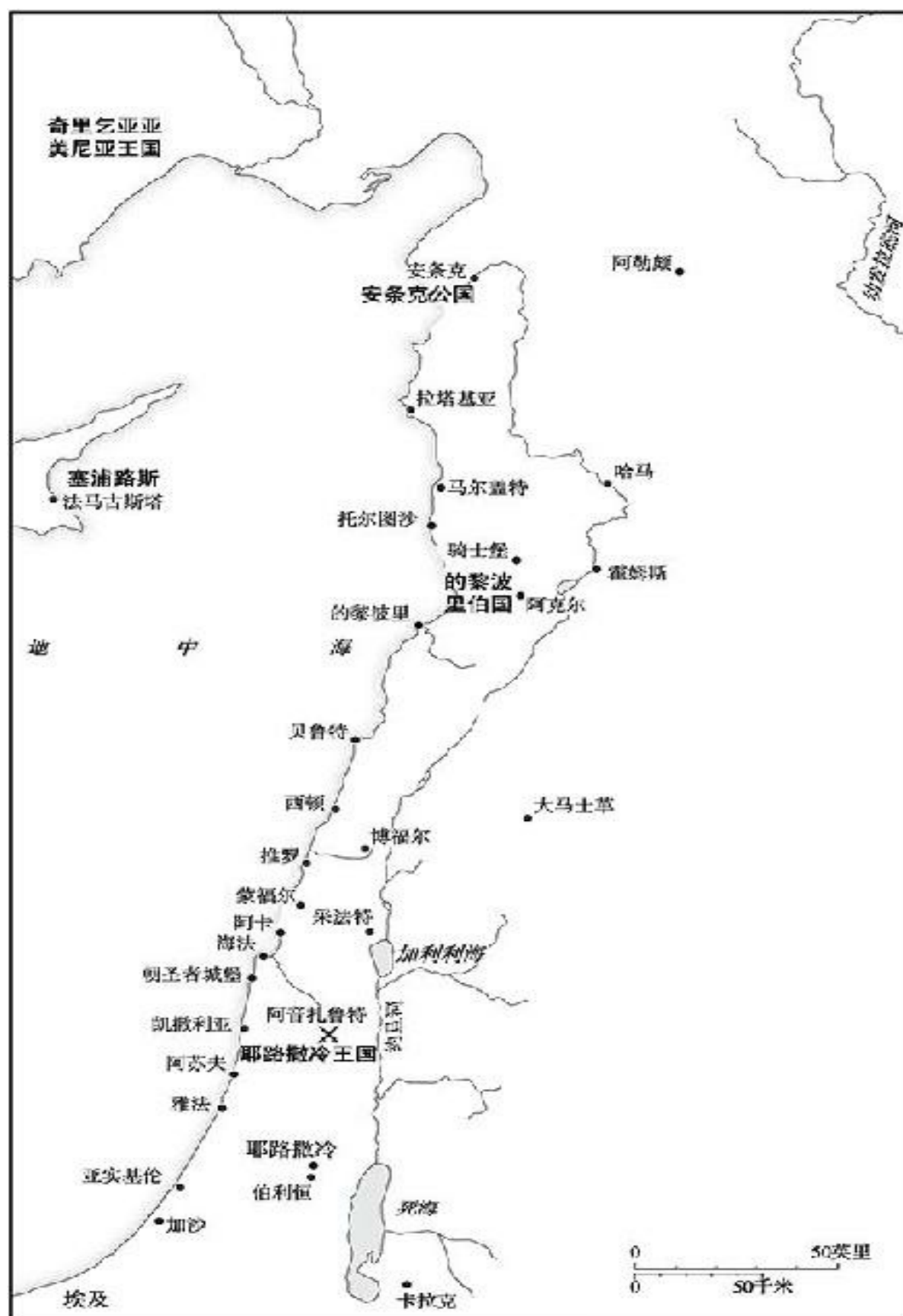
^[1] Pringle, Deny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and the Holy Land, 1187-1291*, London, 2012, p.127.

- [致谢](#)
- [地图](#)
- [序曲 诅咒之塔](#)
- [第一章 天国复立](#)
- [第二章 尼罗惨案](#)
- [第三章 双雄对决](#)
- [第四章 埃及狮王](#)
- [第五章 小犬吠獒](#)
- [第六章 征讨敌国](#)
- [第七章 求战心切](#)
- [第八章 红篷大帐](#)
- [第九章 “电闪雷鸣”](#)
- [第十章 偷袭敌营](#)
- [第十一章 求和未成](#)
- [第十二章 看这伤口](#)
- [第十三章 悲惨时日](#)
- [第十四章 “一无所有”](#)
- [尾声 蛇之居所](#)
- [圣地十字军运动简要大事记](#)
- [阿卡陷落之实证考](#)
- [关于人名的说明](#)
- [参考书目](#)
- [注释](#)
- [图片来源](#)
- [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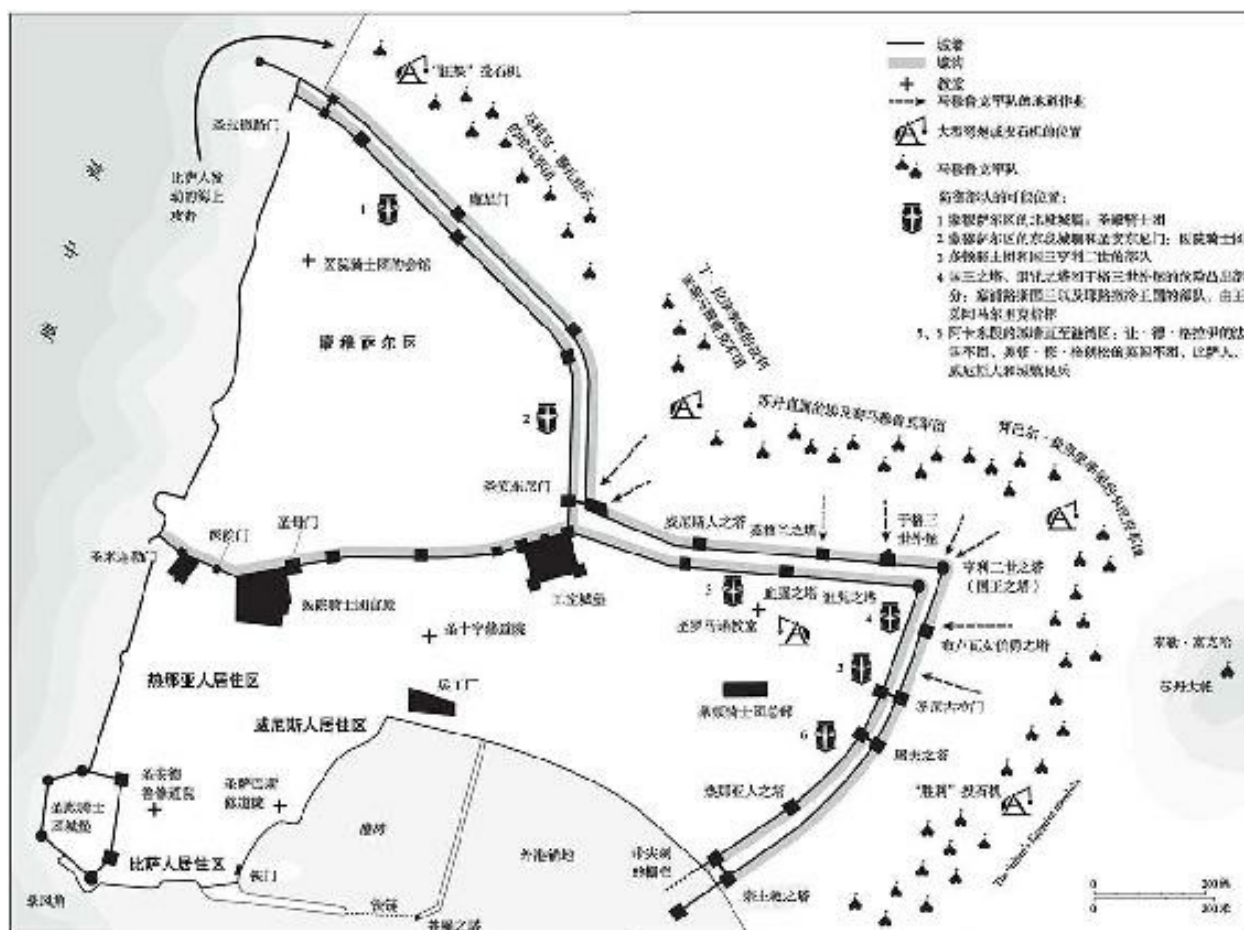
致谢

在创作《诅咒之塔》这本书的过程中，很多人给予了慷慨帮助，我对此感激不尽。首先，感谢组织出版这本书的Julian Loose和耶鲁大学的团队，他们自始至终的专业水准、工作热情和乐于助人的态度才使这本书变得更好。在他们背后鼎力相助的还有一批顾问和内容贡献者。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位出色的翻译：Martin Dow让我接触到我本无法企及的阿拉伯语史料并提供了建议，Steve Elliott为我翻译了德语史料。Ron Morton、Stan和Tom Ginn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评论了我的原稿，而两位匿名的学术读者则尽力纠正我在十字军东征这方面所犯下的一些教义上的错误。在阿卡，我要感谢以色列文物管理局的Danny Syon，他为我付出了宝贵的时间，给了我很好的建议，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尚未公开发表的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和照片。Joseph Gable和他的家人热情好客，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阿卡一起相处的日子里，他们让我对这个城市生活中最不寻常的一面有了深刻的了解。Andrew Abado作为向导带我在城里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迷宫之旅。Mike Fulton回答了我关于配重式投石机的问题，并且和缓了我对中世纪弩炮技术的威力最狂热的想象。Denys Pringle向我解释了关于诅咒之塔所有已知的得名由来。Andrew Lownie作为我的经纪人，继续大力宣传我的作品。最后，我要一如既往地感谢Jan为我提供的睿智见解。

地图



地图一 13世纪时的十字军国家



地图二 阿卡围攻战，1291年

序曲 诅咒之塔



1291年的春天，一支浩荡的大军正在向阿卡（Acre）城进发，这是穆斯林势力在圣地（Holy Land）与十字军交手以来所集结起来的最大规模军队。综合所有史料的记载，这支气势如虹、集结起千军万马的雄师，连同他们的帐篷、行李、补给，如一道洪流，冲向基督教势力在圣地最后的立足之处，志在发起全力一击。

各路部队从中东各地前来会合，他们分别来自：南面500英里之遥的埃及；从黎巴嫩开始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北方，远至幼发拉底河之畔，伟大的城市开罗、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些地区的军事资源都齐集一处。其中的精英力量是来自遥远的黑海之滨、讲突厥语的奴隶武士。这支大军不仅包括骑兵、步兵和专门的后勤部队，还有狂热的志愿者、毛拉和托钵僧。这场征战已经激发起一股圣战狂热，以及一股带有不诚之嫌的赏金热。

一派雄壮威武的军容之中，各式各样的服饰装束、机关器械和戎装护甲引人注目：气派不凡的埃米尔头裹白巾；步卒们头戴锥顶铁盔，身着连环锁甲和皮鳞外套；骑兵们则佩带短弓，他们的骏马披着彩色的布，鞍座上绣有纹章徽记；骑在骆驼上的乐手们击鼓奏乐，号角连连。金旗之下，是五花八门的兵器：钉头锤、标枪、长矛、利剑、攻城弩、石弹、用于制造希腊火（Greek fire）的石脑油和土罐油掷弹（clay grenades）^[1]。精疲力竭的牛群拖拽着满载木材的货车负重前行，这些木材来自黎巴嫩的群山之中，在大马士革的作坊里被制作成弩炮（catapult）的预制构件。弩炮在伊斯兰世界被称作投石机（manjaniq），而对于欧洲人来说则是配重式投石机（trebuchet）^[2]。轰鸣作响、缓慢前进的大车群所运载的这类武器，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的，一些器械的尺寸尤为巨大，专门用来击碎阿卡的城墙。它们代表着火药时代到来之前最具威力的炮兵武器。

这支大军将要进攻的城市历史悠久，并且在区域性强权政治中持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有很多名字：希伯来语里的阿科（Akko），阿拉伯语里的阿卡（Akka）；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托勒迈斯（Ptolemais）；十字军拉丁语里的阿肯（Accon）；法国人则将其称为圣·让·德·阿卡（St Jean d'Acre）。它在埃及象形文字、亚述（Assyrian）诸王编年史和《圣经》记述中皆有迹可循。青铜时代（Bronze Age）的先民占据了该城附近的山丘，而这座山丘在后来即成为围攻阿卡者的大本营。阿卡曾被数代法老攻占，曾在波斯人征讨希腊的计划中被启用。亚历山大大帝兵不血刃即破城而入，而后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又将其选作罗马军团的登陆场；克丽奥帕特拉（Cleopatra）^[3]也曾将此城归于治下。公元636年，阿卡落入穆斯林之手，仅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四年之后。

阿卡之所以很早便有人类居住且颇具利用价值，原因就在于其坐享地利之便又身处战略要害。这座城市背靠地中海，坐落于一个鱼钩状的

海岬之上，其地势造就了一个虽然不大却恰到好处的避风港湾。其南部是沿海平原和绵长海湾，那里的沙土品质上乘，自腓尼基人

（Phoenicians）的时代起就因有助于玻璃制造业的发展而备受重视。纳曼河（Naaman）流经此处，滋润着城市的农地。在相隔10英里的下一个海岬上遥遥可见的是另一个同样古老的城市——海法（Haifa）。由于其位于黎凡特海岸沿线的中部，阿卡是理所应当的停泊处——海上贸易的中枢，埃及通往黑海的南北航线和穿越地中海的东西航线都在此经过。阿卡故而一直是商品交换和转运的口岸，陆通海达，与海滨地区和中东核心区域的贸易线路紧密相连。在这一过程中，在战争的表象之下，它成为一扇门，各种作物、货物、工业生产、语言、宗教和民族得以通过它丰富了经贸往来，促进了文明发展。

对于十字军来说，控制阿卡一直以来都是头等大事。1095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在法兰西克莱芒（Clermont）附近的一片田野上进行的煽动性布道中，号召信徒们拯救基督曾居住与死亡之地——圣城耶路撒冷，激发起西方基督教徒的想象力，效果惊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侵）中，大批平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前往东方，并悲惨地死去。随后，在欧洲各大贵族的领导下，一支更为职业化的远征军被组织起来，数以千计的士兵长途跋涉2000英里，绕过欧洲，深入中东。他们出乎意料地于1099年7月占领耶路撒冷，踏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尸体一路杀向圣殿山（Temple Mount）。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就，通往圣地的第一次长征却伤亡巨大。在离开欧洲的3.5万人大军中，很可能只有1.2万人看到了耶路撒冷。这一惨痛现实很快就教会了军事行动计划者们用船只运输军队，以及使用阿卡这样的港口接收军队的必要性。阿卡在一开始是由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logne），也就是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位十字军国王^[4]率军攻占的，它随即成为朝圣者和保护他们的军队登陆的主要地点。这座城市是如此宝贵，以至于十字军即使付出惨重代价也要加以守护。当十字军高级领主、加利利（Galilee）亲王热尔韦·德·巴佐什（Gervais de Bazoches）在四年后的一次袭击中被

俘时，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企图以这位战俘交换该城及海岸线上的另外两座城市——海法和太巴列（Tiberias）^[5]。而鲍德温选择了牺牲这位贵族。于是热尔韦的头皮被缝到一个旗杆上作为穆斯林的旗帜，而他的头骨则成了埃米尔的酒杯。

法兰西人将他们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于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海滨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公国称为海外之地（Outremer），而守住阿卡对维系这些国家的存续至关重要。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伊斯兰世界夺回了这座城市：1187年7月，在一支十字军部队于哈丁（Hattin）战役被摧毁的余波中，阿卡迅速投降，其基督教居民被允许毫发无伤地离开。

以阿卡的陷落为前奏，圣地十字军运动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一场军事对抗就此拉开序幕。1189—1191年，一支基督教军队浴血奋战了683天以图收复阿卡。当世人杰们在这座城市的争夺战中相会：阿尤布（Ayyubid）王朝的君主萨拉丁（Saladin），以及与他一较高下的欧洲君主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和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Richard I）；此外还有耶路撒冷国王居伊·德·吕西尼昂（Guy de Lusignan）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部队。这是一场大规模战争，围城的十字军亦不时陷入敌方包围，海战、野战、突围战和遭遇战交错其中。城墙饱受投石机和攻城槌重创，攻城塔迭遇猛击，地道屡遭破坏，守卫者则用石块、箭矢和燃烧弹予以回敬。士兵们被利剑、铁锤和长矛砍为肉泥，被希腊火活活烧死。参战各方都因饥饿、疾病和绝望而濒临崩溃。

这场鏖战最终缩小到一个特定的点上。中世纪的旅游者往往采用生动的比喻来形容阿卡的城市布局。他们将其刻画成各种形状：一柄斧头或一名十字军战士的盾牌；或者更粗糙地将其描绘为一个以大海为底边的三角形，另外两边则是城市北侧和东侧的单层城墙，城墙上还有城门和

塔楼，在其前方还有低矮的前护墙和壕沟。两道城墙在三角形的顶点会合，此处最为脆弱，戒备也最森严。正是在此处，争夺阿卡的战斗最为激烈。顶点处由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塔楼拱卫着，这座塔楼是整座城市防御体系的关键之处，被十字军战士们称为诅咒之塔（Turris maledicta）。

对于这一名字的起源，目前尚无任何明确解释。围绕着这一不祥之塔从生出各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基督在走过圣地时诅咒了这座塔楼，于是其从未进入过这座城市。还有一种说法是它在背叛基督的勾当中难辞其咎：犹大（Judas Iscariot）出卖基督而获得的三十枚银币，据说就是于塔楼所在之处铸造的。这个名字可能在围城之前就存在，但是在围城结束后不久到访此城的教士维尔布兰特·范·奥尔登堡，则对这些凭空杜撰的解释提出了合理的质疑。他的看法很简单：“当我们的战士围攻此城的时候，这座塔楼是防守最顽强的地方，由此他们便将其称为诅咒之塔。”^[6]

争夺这座防御工事的战斗变得血腥残忍。整个1191年的春夏，火力强大的投石弩炮对城墙进行狂轰滥炸。守卫者也还以颜色。这座塔的根基被破坏了，他们又利用地道反击；士兵们在乌漆墨黑的坑道里短兵相接，随后又达成了地下停火协议。当与塔楼相邻的一段城墙坍塌时，追求荣耀的法国人跃过碎瓦砾堆发起正面突击，结果惨遭屠戮；一位名门显贵，即勒梅兹（Le Mez）的领主，同时也是第一位法国元帅

（Marshal of France）^[7]的阿尔贝里克·克莱芒（Albéric Clément）在这次尝试中丧生。也正是在这里，当工兵们最终于1191年7月11日将塔楼放倒时，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守军才向在所难免的城陷命运屈服并投降。

十字军以巨大的代价重新夺回了阿卡。这座塔楼可能代表了整个过程所经历的严峻考验，单其名字就表达出这支军队在阿卡城墙面前所受的所有挫折、痛苦以及磨难。阿卡易手确保法兰克人（Franks）与撒

拉森人（Saracens）——双方对彼此的称谓——将继续恶斗下去，他们之间的连绵战争将延续另一个百年。

围城的余波留下了一笔苦涩的遗产。1191年8月20日，阿卡的穆斯林守军在献城投降后不久，就被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一世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城外的平原上引颈受戮。被斩首的有大约3000人，根据（十字军）与萨拉丁达成的协议，他们原本应该是用于交换俘虏的。在争夺阿卡的针锋相对中，双方都犯过错误，但是萨拉丁错过了一次将异教徒彻底赶入大海的绝佳良机。他最终被追求和并交出城池。当十字军认为他违反了交出这座城市的和议条款时，理查依照军事会议做出的决定，揭穿了他的虚张声势并采取了残酷的行动。

以围攻阿卡为开端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没能完成收复耶路撒冷的目标。理查在距离终极战利品不足15英里时因判断风险太大抽身而去，而萨拉丁此时已经准备弃城而走。两个伟大对手之间的较量就此以僵局告终，上帝之城未被夺回，而十字军却顽强扎根于巴勒斯坦海岸。此役过后，阿卡成为后继十字军冒险活动的枢纽和中心。1191年之后，海外之地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阿卡。城市的人口很快就重新密集起来，部分是由于十字军的入驻，部分是由于一个言辞虚构——它被赋予了耶路撒冷第二王国（The Second Kingdom of Jerusalem）首都的称号，而耶路撒冷除了一小段时间之外，一直是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阿卡的基督教君主因耶路撒冷国王头衔而欣喜，这一头衔也因事关重大而屡被争抢；当地的最高宗教权威因只听命于教皇，也被冠以耶路撒冷宗主教的尊称。



狮心王理查的印章

狮心王理查处决穆斯林降卒的行为成了十字军历史上一段争议不决的插曲，尚无明确解释能自圆其说。“真主洞悉最甚”^[8]，萨拉丁的谋臣巴哈·丁（Baha al-din）在当时如是说。恰好百年之后，被处决守军的命运将被人重新记起。1291年，这回换成是一支伊斯兰军队炮击阿卡，而基督徒则守卫重建之后的诅咒之塔。本书记述了那年春天在那条通往这座城市大门的路上所发生的一切——二百年生死斗的最后一幕，这场大戏被阿拉伯历史学家称为法兰克战争（Frankish Wars），在欧洲同行的眼里则是圣地十字军运动（Holy Land Crusades）。

[1] 一种内部装满石脑油的黏土罐，在作战时由士兵点燃后掷出，其中的油脂可渗入敌军盔甲猛烈燃烧。——译者注（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原文中的catapult、mangonel和trebuchet实际上是在兵器发展史上先后出现的对抛掷石弹的器械的称谓。catapult和mangonel曾专指希腊、罗马时代的扭力式投石

机，依靠扭绞绳索产生的力量实现弹射，在中文里又称作石弩或弩炮；trebuchet则专指中世纪才出现的利用配重物的重力产生投射力的配重式投石机。

[3] 历史上著名的“埃及艳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女）法老。

[4] 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位统治者布永的戈弗雷并未称王，而是采用了“圣墓守护者”的称号。

[5] 以色列国东北部城市，位于加利利海西岸，始建于公元前20年，后成为犹太教的圣城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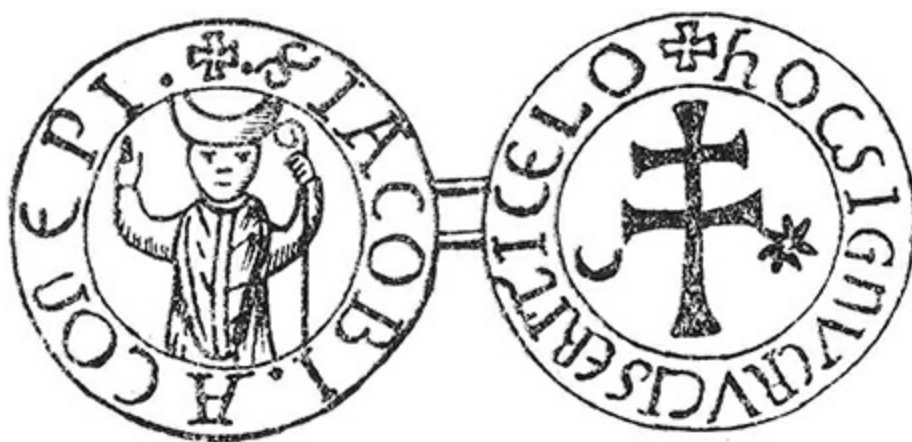
[6] Pringle, Deny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and the Holy Land, 1187-1291*, London, 2012, p.127.

[7] 法国的一种军事头衔。

[8] Asbridge, Thomas. *The Crusades: The War for the Holy Land*, London, 2010, p.452

第一章 天国复立

1200—1249年



法国教士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于1216年11月在阿卡登陆，接任那里的主教职位。抵达伊始，他就惊骇莫名。此行的目的是重振此处基督信众的精神活力，为新的十字军东征做好铺垫。这里毕竟是通向耶稣曾经行走和逝去之地的门户，圣洁之城的形象在西方神职人员中深入人心。然而，现实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他发现阿卡“就像一只怪物或一头野兽，九头攒动，内斗不休”。^[1]各类标榜基督名号的旁门左道都寄生在这里，他们离经叛教、信仰各异。讲阿拉伯语的雅各教派（Jacobites，指西叙利亚人），他们“以犹太人的方式”对儿童施行割礼，在做十字圣号^[2]时只用一根手指；而东叙利亚人，维特里认为他们是“一群叛徒，腐化已深”，其中一些人只要略施贿赂就会“将基督教的秘密泄露给撒拉森人”，而那些已婚牧师的“发型竟效法粗鄙之辈”。同时还有那些意大利商人群体——热那亚人（Genoese）、比萨人

（Pisans）和威尼斯人（Venetians），维特里试图将他们逐出教会，而这些人却无所畏惧，不仅平日里极少聆听上帝的福音，“甚至拒绝出席我的布道”。然后还有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教徒^[3]，格鲁吉亚人（Georgians）和亚美尼亚人（Armenians），以及“完全沉溺于肉欲之欢”的普拉尼人（Pullani，指叙利亚出生的东方化欧洲人）。毫无疑问，东方基督徒的异国风貌——男子像穆斯林一样蓄须且身着长袍，女子则以面纱示人——使维特里的不安又加深了一层；当他试图纠正他们教义上的错误时，却不得不借助一位阿拉伯语翻译。维特里正在经历到达中东后的种种迷失——还身处一个教堂、房屋、塔楼和宫殿都莫名其妙带有欧洲风格的城市。

使维特里陷入文化冲击中而心烦意乱的不只是千差万别的基督徒风俗，还有这个地方本身：“当我进入这座可怕的城市时，发现遍地都是不计其数的可耻行径和邪恶勾当，让我困惑不已。”浮现于他脑海的是恐怖的邪恶巢穴，充斥着“因为犯下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罪行而成为不法之徒，从家乡逃到这里来的外国人”；这里邪法滥行、谋杀成风；这里丈夫勒死他们的妻子而妻子又毒杀她们的丈夫；这里“不仅普通信徒，甚至教士还有一些修道士都将他们的住所租给全城的公娼。这就是第二个巴比伦（Babylon）^[4]，罪恶累累，谁人能书？”

维特里对阿卡的恶名昭彰可能多有夸张，但它确实有负他的期望而使他迷惑。这种迷茫感在带着圣战抱负而又初来乍到的基督徒中屡见不鲜——在七十年之后阿卡的最终危机中，这种困惑将产生悲剧性的后果。

在耶路撒冷落入萨拉丁之手而狮心王理查又未能收复之后，十字军诸国已经缩减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立锥之地，被逼退到地中海的边缘：北面的安条克公国（Principality of Antioch）、的黎波里伯国（County of Tripoli），以及所谓的耶路撒冷第二王国，形成一条狭窄的沿海地带，

南北约180英里，从贝鲁特（Beirut）延伸到南面的亚实基伦

（Ascalon）和雅法（Jaffa）。阿卡已成为天国王朝（Holy Kingdom）在丢城失地后实际上的首都和政治中心，所有的世俗及宗教行政权力都被授予此城：阿卡是王室宫廷和耶路撒冷王室城堡所在地，后来又成为王国宗主教——教皇钦定代表的居所。强大的十字军军事修会如圣殿骑士团（Templars）和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s），也将他们的总部移往阿卡，在那里建造了令人印象深刻而又望而生畏的宫殿和堡垒。富可敌国的军事修会构成了东方拉丁世界最有效的防御力量。13世纪初，这些骑士团加倍增建他们的城堡以确保道路安全并保护剩余的十字军领土。在阿卡，大批其他的小型军事修会加入他们的事业，包括原旨在于照顾麻风病人而创立的圣拉撒路骑士团（Order of St Lazarus）和新成立的模仿者，有些衍生自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包括德意志条顿骑士团

（German Teutonic Knights）和英格兰人倡立的坎特伯雷圣托马斯骑士团（Knights of St Thomas of Canterbury）。与此同时，很多宗教团体，或是因被萨拉丁驱逐，或是出于安全考虑，纷纷将他们的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院迁移到阿卡城里。

雅克·德·维特里到达的不是虚构出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替代品；他犹如醉汉般踏上海岸后，目眩神摇而又惊恐异常地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种族多元、热闹非凡的地中海港口，这一景象意味着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诱人之处蕴藏其中。阿卡是一片广大地域中进行货物交换的商品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国际化的都市。多种语言的族群和文化在这里百家争鸣，各自都有区域划分和宗教体系。全城81座教堂中，有一座献给了基尔代尔（位于爱尔兰）的圣布里奇特（St Bridget of Kildare）；另有一座献给布列塔尼的圣马丁（St Martin of the Bretons）；还有一座献给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圣雅各（St James）。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商人群体——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比萨人——出类拔萃，他们与来自马赛

（Marseille）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商人一道为了地中海的各处市场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些商人群体中的很多人都从王室当局得到恩

准，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经商权。城里还有一个犹太人小社区，来自埃及的科普特人（Copts）^[5]，大马士革、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港的穆斯林商人都会定期来这里做生意。他们交流的主要语言是法语，但在大街小巷听得到德语、加泰罗尼亚语、欧西坦语（Occitan）^[6]、意大利语和英语，与黎凡特地区的语言混杂在一起。在春季和秋季，随着商船从西方驶来，海港里挤满了船只，数目高达1万的朝圣者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数量暴增，他们抱定决心、踏上旅途，志在一睹圣地的风采。小贩和导游还有出租房都受益于这些蜂拥而至的游客。当巴勒斯坦内地的局势不稳使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不再畅通时，阿卡尽管与耶稣的生活毫无关联，却还是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一个朝圣地点。在当地神职人员的指引下，阿卡提供了一条包含40座教堂的参观线路。每一座教堂都有各自的圣物和神圣纪念品，可以教皇赐予的名义赦免朝圣者的罪过。

通过吸纳来自巴勒斯坦地区各处的避难者，以及吸引欧洲的商人和朝圣者前来，阿卡在13世纪初期欣欣向荣。作为黎凡特拉丁世界的一个重要港口，阿卡不仅与地中海西部保持贸易往来，更是地中海东部所有地区进行商业交流的一个轴心——从黑海和君士坦丁堡向南最远可至埃及。这就涉及与伊斯兰世界调和关系并且无视信仰的障碍：使教廷大为不满的是，阿卡采用了穆斯林邻居的货币体系。当地铸造的金银货币是法蒂玛王朝（Fatimid）^[7]和阿尤布王朝货币的仿制品，上面刻有阿拉伯文字。当教皇在1250年禁止使用伊斯兰刻文和日期形式时，该城的铸币厂仅仅是将其铸币上的文字替换成基督教文字，但仍然保留阿拉伯字母，并添加了十字架图案。基督教商人与穆斯林商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使得两方都没有强烈的意愿去干扰这种现状。

在13世纪的进程中，阿卡在港口吞吐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上足以与伟大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匹敌，甚至超过了后者。康沃尔伯爵（Earl of Cornwall）^[8]曾于13世纪40年代早期来过这里，据他估算，该城当时的收入应有5万英镑，相当于西欧一个君主的王室收入。丝绸、亚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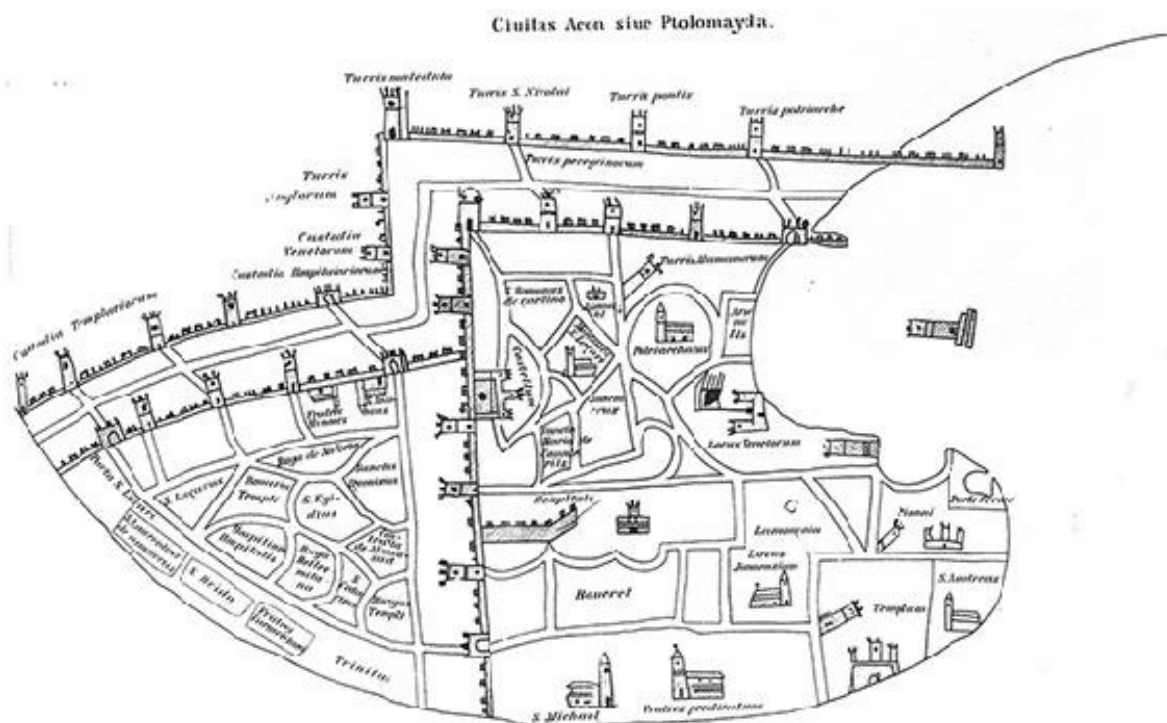
棉布等纺织品作为原材料或布料制成品，连同玻璃器皿、糖类和珍稀宝石，从伊斯兰世界经由此处输入欧洲。从欧洲出口过来的商品有羊毛，由拉丁商人载往穆斯林控制之下的大马士革进行交易，连同铁器、食品（香料、盐、鱼），以及战马和支持十字军运动所需的其他各类补给品。购自遥远的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商船的货舱中作为压舱物进入阿卡，而每天穿过城门的骆驼和驴子满载供养大量人口的农产品：来自拿撒勒（Nazareth）^[9]的葡萄酒，来自约旦河（Jordan）河谷的海枣，以及由东方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当地种植的小麦、水果和蔬菜。阿卡还是一个工业中心：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在城外建有自己的磨坊和熔炉，他们在那里生产玻璃和精制糖；而在拥挤的盖篷市场中，除了制革厂和肥皂制造商，还有专门制造玻璃、金属和陶瓷器皿以及朝圣者纪念品的作坊。

如果接连几任教皇都因阿卡铸造伊斯兰制式的钱币而心生反感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油水丰厚的贸易更令他们颇为困扰：大批战争物资——用于造船、打造兵器和制作军用器械的木材和铁，以及用于制作燃烧类武器的石脑油——经由阿卡的意大利商人之手，被卖给了开罗的阿尤布苏丹。对于罗马教廷（Holy See）而言，干系更加重大的是人口买卖。来自黑海北方大草原的突厥军事奴隶搭乘拜占庭帝国或意大利的商船，取道君士坦丁堡，源源而来，而阿卡不仅是奴隶运输的一个中途停留点，本身也是一个奴隶市场。教皇虽反复颁布禁令，但往往遭到无视。1246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对城里的所有三个意大利商人团体均予以谴责，因为它们将奴隶从君士坦丁堡运输到埃及，使苏丹的军队得到了扩张。自13世纪60年代起，奴隶贸易日益发达，这给残余的十字军诸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阿卡注定将被通过自身港口招募的军队包围。

维特里可能夸大了阿卡的罪孽，但这座城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一个罪犯流放地：欧洲的法庭有时会将罪人遣送到圣地定居，作为刑事判决中的减刑措施。而他对于此地群龙盘踞、争斗无止的本质可谓判

断精准。耶路撒冷国王的王位不仅有名无实，还总是空缺，导致贯穿整个13世纪的派系倾轧和自相残杀。在这种统治体制之下，阿卡由一些不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的利益群体组成，这些群体为了财产权和进入港口的权利而你争我夺。城市内的各个社群都享有历史悠久的特权、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以及自己的法律体系，后者经常妨碍司法管理的有效运行。互相竞争的军事修会只听命于教皇，是当地社会中最富有和军事效率最高的组成部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各自在阿卡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且兴建了宏伟的宫殿群和有围墙保护的建筑群，成为这座城市最耀眼的存在。

城市的布局反映出许多迥异的派系和宗教社群彼此联系紧密。阿卡的城市规划包括一个拥挤的市中心，各大商人团体在那里都拥有自己的密集居住区域。这些居民区俨然小型的设防意大利城镇——通过路障隔栏与他们的邻居划清界限，并由城门和瞭望塔严密保护，镇中有仓库、商店和住宅。蜿蜒曲折的街道网（很可能源于年代更久远的阿拉伯时代的城市布局）通向一个个小集市广场，这些集市广场也是每个社区的中心所在，而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教堂、宗教活动室和公共机构。港口附近的活动最为密集，因为这里是货物卸船的地方。直通港口的路径因而成为激烈竞争的根源。



一幅用现代字体重绘的阿卡中世纪地图，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总体布局、双层城墙、位于左侧的蒙穆萨尔郊区以及港湾。图中标记了主要的教堂和建筑物，紧临海边的圣殿骑士团城堡（**Templum**），医院骑士团的建筑群（**Hospitale**），以及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所占据的区域。这幅地图给人一种这座城市的本质就是迷宫的感觉。奇怪的是，诅咒之塔在这幅地图中仍旧被置于外城墙的右角，尽管当时它的实际位置是在内城墙的同一点

阿卡可能是一个邪恶巢穴，它也格外肮脏。游客和朝圣者对此地卫生条件之恶劣感到震惊。希腊朝圣者约翰·福卡斯（John Phokas）于1177年来到此处，抱怨道：“这里的空气由于大量陌生人的拥入正受到污染，各种疾病滋生导致这些外来人口中时常有人死去，进而散发出恶臭气味并污染了空气。”^[10]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朱巴伊尔（Ibn Jubayr）^[11]来自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那里的广大地区属于文明程度更高的世界，所以他对基督徒自然是嗤之以鼻，认为这个地方不过一个猪圈而已：“道路和大街上人满为患……臭气熏天且肮脏不堪，遍地都是垃圾和粪便。”^[12]医院骑士团在他们宏伟的总部大院内拥有一个极为高效的公共厕所和排污系统，其流出物与这座城市的很多其他污物（包

括鱼市和屠宰场的垃圾）被排放到封闭的港湾里，港湾因而被戏称为“污秽之海”（Lordemer）。为了防止不洁之物被吹到圣坛上，威尼斯人被迫将他们的圣迪米特里厄斯（St Demetrius）教堂面向港口的主窗封死。

城墙以外，那里有花园和更多的开阔地，尽管这些地方的面积在13世纪不断缩小。在更远处，肥沃的平原上，葡萄园、果园和开垦的田地不光为城区提供食物，也为其拥挤且经常令人紧张的环境提供了一个舒缓之处。随着人口增长，又一个名为蒙穆萨尔（Montmusard）区的城郊居民区在老城区以北发展起来，并在后来融合为城市的一部分。

当十字军于1191年夺回阿卡时，此城只有一道城墙围护，诅咒之塔已然垮塌，周围的工事也已严重损毁。狮心王理查对其进行了修复，但在1202年，由于一次地震，大片城防工事再度被夷为平地。之后阿卡城肯定又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重建工作，因为不出十年城墙被再度重建，并将蒙穆萨尔区也围护起来。这堵城墙现在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防线——总长度超过1英里，起止皆与海岸相连，将整座城市围锁其中。诅咒之塔本身则由大量的外围工事加以巩固。维尔布兰特·范·奥尔登堡为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而于1211年来此实地考察，他对于这座城市及其防御设施印象颇深：

这是一座固若金汤、富甲一方的名城，屹立于海滨，因此，其方形格局的其中一角的两条边由大海构成——它被海约束，又被海保护。其余两边由宽沟深壑和双层城墙包围，护城壕沟砌有护墙，及至根部。城墙由塔楼群强化，布法精妙：第一道城墙，其塔楼不超过父墙（parent wall）^[13]本身的高度；另一道内墙上的塔楼更高，而且火力强大，俯瞰并保护着第一道城墙……这座城市有一个状况良好且风平浪静的港湾，由一座坚固的塔楼守卫，在那里，苍蝇之王被离经叛道的异教徒们

顶礼膜拜，我们将其称为巴力西卜（Baalzebub）^[14]，而他们却把他叫作阿卡翁（Akaron），于是该城由此得名阿肯或阿克翁（Accaron）。^[15]

从阿卡的城门起，各条道路通向十字军王国的剩余领土——沿海路线通往上加利利（Upper Galilee）和采法特（Safed）的圣殿骑士团城堡，以及推罗（Tyre）^[16]和蒙福尔（Montfort）的条顿骑士团城堡。

带有围墙的建筑群形同蛛网、乱如迷宫，折射出社会黏合力的匮乏和政治统治体系的一盘散沙。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使得决策机制无法正常运转。围绕着耶路撒冷国王头衔的纷争无止无休，将军事修会和意大利商人社群撕扯成对立的派系，使得阿卡的王室城堡中足有六十年没有长期在位的国王入住。1250年，市民们临时宣布该城为独立于王国其他地区的行政区。一个潜在的使其团结起来的人是耶路撒冷宗主教，他所主持的圣十字教堂（Holy Cross）实际上是阿卡的城市大教堂和集会场所。

13世纪上半叶，耶路撒冷王国内部动荡不安，残存的十字军飞地危若累卵，此种情形使得穆斯林势力只要再度发难便可一击致命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但进一步的打击从未发生。库尔德人萨拉丁作为一个外来者，于短期之内在伊斯兰世界创立了一种宗教共识，并缔造了一个逊尼派（Sunni）大一统帝国，其疆域从埃及和北非海滨横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延伸至伊拉克北部和底格里斯河河岸。萨拉丁发行的金币上刻有“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的苏丹”的传奇字句，在他的统治下，践行圣战（jihad）^[17]精神的运动如火如荼：穆斯林圣战者们在1187年的哈丁战役中终于有机会得偿所愿，他们将俘获的十字军逐一斩首——尽管这项任务完成得十分拙劣，令人瞠目结舌。但是这种被萨拉丁用以团结其内讧不已的家族的宗教战争，在他于1193年去世后便烟消云散了。中东的穆斯林政权分裂成一群喜好争吵的阿尤布公国，只有埃及尚能保持统

一，却全无驱逐法兰克人的意愿。每个统治者都与西方入侵者谈判达成各自的条约，有时甚至与他们结盟以对抗敌对的王公。绥靖主义和对新的十字军冒险的恐惧取代了好斗情绪。耶路撒冷虽然曾以一座圣城的形象使穆斯林团结了起来，但在战略上渐渐变得无足轻重。让人震惊的是，1229年，未经一刀一枪，经协议约定它被还给了基督徒——这是一种对穆斯林尊严不可想象的背叛。尽管穆斯林于1244年又重新夺回该城，但耶路撒冷仍旧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埃及的阿尤布王朝末代统治者马利克·萨利赫（al-Malik al-Salih），给自己的儿子图兰沙

（Turanshah）提出了世俗的建议：“如果他们（法兰克人）向你索取沿海土地和耶路撒冷的话，只要他们同意不在埃及立足的条件，不要犹豫，给他们就是了。”^[18]阿尤布王朝在1221年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军从埃及逐走之后，便下定决心尽可能让步，以免此事重演。

在虔诚的信徒眼中，这种现实政治（realpolitik）^[19]的做法无异于懦夫行径，引得挞伐之声铺天盖地。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对于这种现象痛心疾首：“在穆斯林统治者中，我们看不到有谁愿意发起圣战或是护.....教。他们都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生活，并且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臣民。对于我来说这种做法比敌人更可怕。”^[20]而十字军诸国不过是这种敌我变幻模式中的另一位玩家罢了。耶路撒冷王国甚至在阿尤布王朝的内战中站在了大马士革统治者的一边，结果在1244年的拉佛比（La Forbie）战役中遭遇惨败，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派出参战的分遣队几乎全军覆没。

经贸往来也缓和了敌对关系。十字军国家从经济角度来讲，对伊斯兰世界还是有用的；尤其是阿卡和推罗，在13世纪上半叶里从这些交流中获利颇丰，为此，这两座城市受到罗马教皇的严厉批评，就像他们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伙伴被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批评一样。然而，对于穆斯林的内部分裂，法兰克人从来没有善加利用，以重新夺回丢失给萨拉丁的大片领土。双方休战期间不时穿插着来自欧洲的小规模十字军冒险。第

五次十字军东征在尼罗河三角洲以失败告终。随后的其他一连串毫无章法的行动，也未能改变权力的平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在被教皇革除教籍的情况下，于1228年来到黎凡特，尽管就短期内收复耶路撒冷进行了谈判，他却在王国内部激起了更深层次的对立。当他次年乘船离开阿卡时，送他走的是市民们投过来的垃圾废物。香槟伯爵特奥巴尔德（Theobald）在1239—1240年领导了一次无关大局的十字军作战行动，康沃尔伯爵理查随后也效法组织了另外一次。

阿尤布王朝和十字军诸国的功能性不足维持了这种现状。如果穆斯林各势力不能一致对外，驱逐法兰克人的宏愿必定永无实现之日；如果基督徒各派系不能团结一心，重夺耶路撒冷的目标则是白日做梦。在西方，对海外之地的关注也在慢慢消散。欧洲大陆的人们正在见证各个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合并与巩固。教廷与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者在西西里统治权上的长期争斗，正在将力量和资金从东方拉丁国度转移过来。信徒在其他地方——在西西里，或在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又或是在普鲁士的密林里——履行他们的圣战誓言也变得可行，或者甚至通过购买赎罪券来豁免他们的罪过。圣殿骑士团诗人里科·伯诺梅尔（Ricaut Bonomel）抱怨道：

他（教皇）为钱宽恕了夺走吾教十字架之人

以及任何愿意交换圣地之人。

至于意大利的战争，

是我们的教廷使者策动使然，

他为了钱出售上帝和赎罪券。[\[21\]](#)

然而，在亚洲的中心地区，权力版图开始发生变化。13世纪初期，

蒙古人开始踏上横扫西方的征程，而在他们的兵锋抵达之前，其他的游牧民族就被逐出了家园。很快，伊斯兰世界就尝到了苦果。蒙古人摧毁了现存的波斯王朝并将其突厥部族统治者花刺子模人（Khwarazmians）驱赶到了巴勒斯坦境内。（正是这批带有类似中亚血统的好战狂徒在1244年洗劫了耶路撒冷。）

在这群被蒙古西征所冲击的民族中，另一个来自中亚大草原的突厥部族是钦察人（Kipchaks）。同蒙古人一样，钦察人也是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民族，依靠放牧和劫掠邻近部落而生，他们笃信万物有灵，以萨满（shamans）为灵媒，崇拜天地。同样的，他们也是马背上的天骄，技艺高超的战士，专长于威力强大的复合弓和骑兵战的流动战术。在被（蒙古人）驱逐到更远的西方直至黑海北面的一个地区后，年轻的钦察人被敌对的部落袭击并俘获，又被运往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奴隶市场，改宗逊尼派伊斯兰教，然后被卖给看上他们的买家。

游牧民族的战斗素养很快就得到认可。巴格达的哈里发早在9世纪就将游牧战士作为军事奴隶招募进自己的军队。他们因独一无二的骑兵战技巧而受到赞赏：“突袭、猎捕、马术、与敌酋小规模冲突、搜刮战利品和入侵其他国家。他们为这些行动倾尽全力，为获取军中职位全力以赴。”钦察族男孩们很可能在4岁就开始学习箭术。“因此，”据说，“他们在战争中的地位可与希腊人在哲学上的地位比肩。”^[22]

这些第一代逊尼派穆斯林仍旧保留了不少部落习俗，但他们为自己的新宗教信仰带来了皈依者的热诚。回首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将突厥人的出现视作天赐，意在复兴衰颓的伊斯兰世界。“久坐的民族，”他写道，“已经习惯了懒惰和安逸。他们自以为在城墙环绕之中、坚壁保护之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游牧民族）没有城门和城墙。他们只能匆忙打盹……当他们身在马鞍之上时。他们留意每一声轻微的犬叫和杂音。坚忍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性格品质，而勇气

则成为他们的本性。”伊本·赫勒敦将他们视为真主赐予的福音，“来重振奄奄一息的伊斯兰世界并恢复穆斯林的团结”。^[23]

萨拉丁，作为一个库尔德人，率领着呈现突厥风貌的军队。在中东那些风雨飘摇的王朝里，招募此类军事奴隶的传统早已有之，他们在阿拉伯语里被称作马穆鲁克（Mamluks），意为“私兵”^[24]。由于与互相竞争的派系没有世袭联系，他们全身心地效忠于自己的主人。正如一位政治家所言：

一个忠心耿耿的奴隶

要好于三百个儿子，

因为后者只会企盼父亲早死，

而前者希望主子长寿。^[25]

军事奴隶在伊斯兰世界里的概念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奴隶。马穆鲁克更类似于为主子尽忠的精英雇佣军，而非被迫工作的农奴。他们可以通过层层提拔，升迁至埃米尔这样的权力高位；他们领取军饷，职位却不可传承，即他们的子孙不能继承他们在苏丹军队里的位置，因而总是对来自黑海以北草原上的新鲜血液有需求。

当阿尤布君主马利克·萨利赫于1240年在埃及掌权后，他开始购买钦察军事奴隶并将他们进口到埃及。在位期间，萨利赫招募了一支拥有大约1000名马穆鲁克战士的部队，其中有很多人驻防在尼罗河内的一座岛屿上，这些人因此得名为巴赫利亚（Bahriyya）——“河洲军团”。另外一支较小的部队叫作贾姆达里亚（Jamdariyah），用作萨利赫的私人卫队。马穆鲁克战士被封闭在军营之内，接受高强度训练，习得马术、箭术和白刃战技巧，培养出一种强烈的团队精神，使他们在战斗中无往不利——但也使他们成为愈发依赖他们的主人的潜在威胁。

在1244年失去耶路撒冷之后，十字军的号召又在欧洲响起。这次的回应来自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为了重新夺回耶路撒冷，他着手组织起计划最严密、资金最雄厚的军事远征。这一宏伟使命注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将见证阿尤布王朝的垮台，而巴赫利亚马穆鲁克将从奴隶变为苏丹。而且这次十字军东征将会开启一系列连锁事件，最终于1291年回转到阿卡的城门前。

[1] Jacques de Vitry. *Lettres de Jacques de Vitry*, ed. R.B.C.Huygens, Leiden, 1960, pp.77-97.

[2] 一种礼仪手势，就是通俗意义上的“画十字”。

[3] 与主流基督教派存在理念冲突的东方教派，持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开的观点，因而被认定为异端。

[4] 在《圣经》传说中，巴比伦是一座淫恶之城，被先知预言必将遭受毁灭。

[5] 埃及的一个少数民族，多信仰基督教。“Copt”一词由阿拉伯语从古希腊语转译而来，即“埃及”（Egypt）的意思。

[6] 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主要通行于法国南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谷以及西班牙部分地区。

[7] 北非伊斯兰教王朝，中国史籍称之为“绿衣大食”，以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得名。公元909年建国于摩洛哥，信仰伊斯兰教伊斯玛仪什叶派教义，969年征服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973年迁都开罗，1171年亡于阿尤布王朝。

[8] 即本书后文中的康沃尔伯爵理查，英格兰国王“长腿”爱德华一世的叔父。

[9] 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相传为耶稣的故乡。

[10] Jacoby, David. ‘Aspects of Everyday Life in Frankish Acre’, in Benjamin Z.Kedar and Jonathan Riley-Smith with Michael Evans and Jonathan Phillips (eds), *Crusades: Volume 4*, London, 2005, pp.82-3.

[11] 伊本·朱巴伊尔（1145—1217），阿拉伯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和诗

人，出生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曾在格拉纳达市学习法律和文学，后来成为该市市长的秘书。在这段时间中，他创作了很多诗篇。1182年，他决定去麦加朝圣，以完成瓦伦西亚总督交给他的使命，经过这次长途跋涉，伊本·朱巴伊尔对旅行着了迷。在从麦加返回的途中，他游历了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西西里，并于1185年回到西班牙。1189—1191年，伊本·朱巴伊尔又回到东方。1217年，在最后一次返回东方时，他于亚历山大城病逝。他在《游记》一书中，对所去各地的地理人文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这本书还是一部关于朝圣故事的杰出作品，里面有很多真实的描述，比如如何与穆斯林和遵循基督教体统的官员们打交道。

[12] Ibn Jubayr. *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J.C.Broadbent, London, 1952, p.318.

[13] 指塔楼所依附的墙体。

[14] 又译作“别西卜”，原为腓尼基人的神，在《圣经》中被称为鬼王，名列七宗罪中的贪食。

[15] Pringle, Deny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and the Holy Land, 1187-1291*, London, 2012, pp.62-3.

[16] 原为腓尼基古城，在《圣经》中被多次提及。

[17] 吉哈德（jihad），伊斯兰教宗教学概念，常被宗教极端主义者以偏概全地利用并引申为“圣战”，其法学定义是：以言语、财产和生命为主道奋斗；为捍卫宗教信仰、生命财产、反抗侵略而努力奋斗。译者在本书中根据语境将其译为“圣战”。

[18] Hillenbrand, Carol.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 1999, p.222.

[19] 德语单词，源自19世纪德国，由德意志第二帝国（普鲁士）铁血宰相奥顿·冯·俾斯麦所提出，主张当政者应以国家利益作为从事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而不应受到当政者的感情、道德伦理观、理想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左右，所有的一切都应为国家利益服务。

[20] Hillenbrand, Carol.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 1999, p.204.

[21] Nicholson, Helen. *The Knights Templar*, London, 2010, p.85.

[22] Irwin, Robert. *The Middle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arly Mamluk Sultanate*, London, 1986, p.6.

[23]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vol.2, trans. Franz Rosenthal, London, 1958, pp.257-8.

[24] 英文原文为“the owned ones”，意为“被拥有的人”，在此将其意译为“私兵”。

[25] Thorau, Peter. *The Lion of Egypt*, London, 1992, p.17.

第二章 尼罗惨案

1249—1250年



1249年6月5日，周六拂晓，一支十字军舰队准备在邻近尼罗河东部支流和达米埃塔（Damietta）城镇的埃及海岸登陆。三十年前，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在同一地点登陆，所以这一次东征军的动向不难预料。“我们发现苏丹的大军在海岸上严阵以待，”法国骑士让·德·茹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在审视眼前的场景时写道，“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些精兵强将，因为盾牌上的苏丹徽章是金色的，所以当阳光照上去的时候他们光彩熠熠。他们的铜鼓和撒拉森号角发出的声音让人听上去不由心生恐惧。”^[1]随着朝阳升起，数以千计的士兵乘小船上岸。

在有组织的抵抗下进行滩头登陆作战是极度危险的，但是十字军的纪律水准尤为高超，而且骑士和步兵都有猛烈的弓弩火力掩护。茹安维

尔刚一登陆就迎面撞上一队穆斯林骑兵。“他们一看见我们登陆，就立刻策马朝我们冲了过来。看到他们冲来，我们将长矛斜插在沙土里，矛尖指向敌骑。他们一看长矛阵势已经准备好要将他们开膛破肚，便调转马头四下逃走了。”^[2]在他的左侧，这位骑士可以看到一艘巨大的桨帆船，有300人为其划桨摇橹，上面紧密排列着层层盾牌，盾牌上纹徽鲜明，三角旗在微风中飘扬。

当它靠近海岸的时候，桨手们用尽全力划桨，推动其向前，于是这艘桨帆船看起来像是在水面飞驰。旌旗破风、鼓角争鸣，这艘伯爵大人的战船犹如天降霹雳。一待这艘桨帆船接触沙滩，在岸上高企船首，伯爵大人和他麾下的骑士们便从船上一跃而下，他们全副武装、手执精兵利器，赶到这里与我们并肩作战。^[3]

在海滩各处，法兰西各大名门望族的旗帜被竖立起来作为各路部队的集结点，以直面对手的骑兵攻击。在这些旗帜中尤为显眼的是法兰西国王的金色火焰军旗（oriflamme）^[4]，也就是王家军旗，据说是被殉道者圣德尼（St Denis）^[5]的鲜血染红的。当此次远征的领导者、组织者和融资人——国王路易九世从他的巨舰“蒙茹瓦”（Montjoie）^[6]号举目望去，发现自己的军旗已经被插在海滩上时，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跳进海里，肩挑盾牌、头戴护盔，不顾海水漫到腋下，一路跋水蹚浪，登上岸头。他血气上涌，平举长枪、竖起盾牌，随时准备冲入敌军阵列，旁边的人不得不拉住他。

路易的准备工作细致而又周密。这次十字军东征以法国人在精神上 and 部队组成上为主导，包括大约2.5万名士兵——骑士和骑马军士、步兵和弩兵。国王的三个弟弟以及法国的骑士精英都在其中，而且这一工作耗时四年才终告完成。这是一支完全职业化的军队：路易将那些自发出现在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港口的志愿者都留下了。驱动他的

是对自己臣民严苛的责任感和对基督教理想的虔诚感。1244年，他曾与死神擦肩而过，那时他便立下誓言并以此激励。然而，他所发动的战役的初始目标，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开罗。



十字军进攻达米埃塔。这部中世纪手抄本上所展示的攻防战实际上并未发生。这座城镇已被守军抛弃

精明的军事思想家，例如理查一世，已经意识到萨拉丁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胜利靠的是埃及的财富。“通往耶路撒冷的钥匙，”正如理查所说，“将在开罗找到。”^[4]这种想法已经流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灾难性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后以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遭受洗劫而告终，但起初是打算秘密地对尼罗河三角洲发动突袭。十年之后，当雅克·德·维特

里到达阿卡着手准备新一轮十字军东征时，目标十分清晰：“我们计划直趋埃及，那里一片沃土，是东方最为富饶之地，也是撒拉森人力量与财富的源泉，他们凭此占据我们的土地。所以当我们占领那片土地之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兴整个耶路撒冷王国。”^[8]不过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也不幸以失败告终。十字军花费了18个月才夺下开罗以北100英里的滨海城市达米埃塔，然后又在那里犹豫不决地蹉跎了18个月，其间两次拒绝阿尤布苏丹（他甚至提议归还耶路撒冷）提出的和约。而后，十字军便在尼罗河复杂的季节性洪流泛滥及其河道网的迷宫中一头扎进敌军埋伏。在历经封锁、陷入绝境、被迫在齐腰深的泥水中艰难跋涉之后，这支军队不得不可耻地投降。

路易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持有相同的战略目标、更清晰的目的，以及从前辈那里汲取到的知识，这些知识与尼罗河特有的水文地理状况相关。起初的一切都是前景光明的。根据茹安维尔的记载，达米埃塔的守军飞鸽急报开罗，却没有收到回复。苏丹萨利赫正处于垂死状态。“他们都以为苏丹已经死去，于是便放弃了达米埃塔。”^[9]这是基督徒阵营中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这里曾将他们的先驱者拖住9个月并且经过一场漫长而可怕的围攻才告陷落，而今路易的军队一天之内就已入城，发现指挥官——埃米尔法赫尔·丁（Fakhr al-Din）早已带着守军逃之夭夭。惊惶的居民也随之一并逃离。这看起来是天意——上帝降下吉兆保佑路易的圣战马到功成——却使国王的自信心灾难性地爆棚。战役的规划者们注意到了阿尤布政权的脆弱性，它由于派系倾轧而分化，现在正处于缓慢的衰落之中。这一现实为攻略埃及提供了一定的理由。达米埃塔的补给和防御都足以经受住长期的围攻，所以它的不战而降似乎证实了十字军正在推开一扇虚掩的大门。这一事件在伊斯兰编年史中被描述为“一场可怕的灾难，类似之事以往从未发生过”，^[10]而且是埃米尔和他的军团所表现出的不光彩一面。但十字军不知道的是，法赫尔·丁未经交战就弃城而逃，只不过是為了在苏丹去世后争夺权力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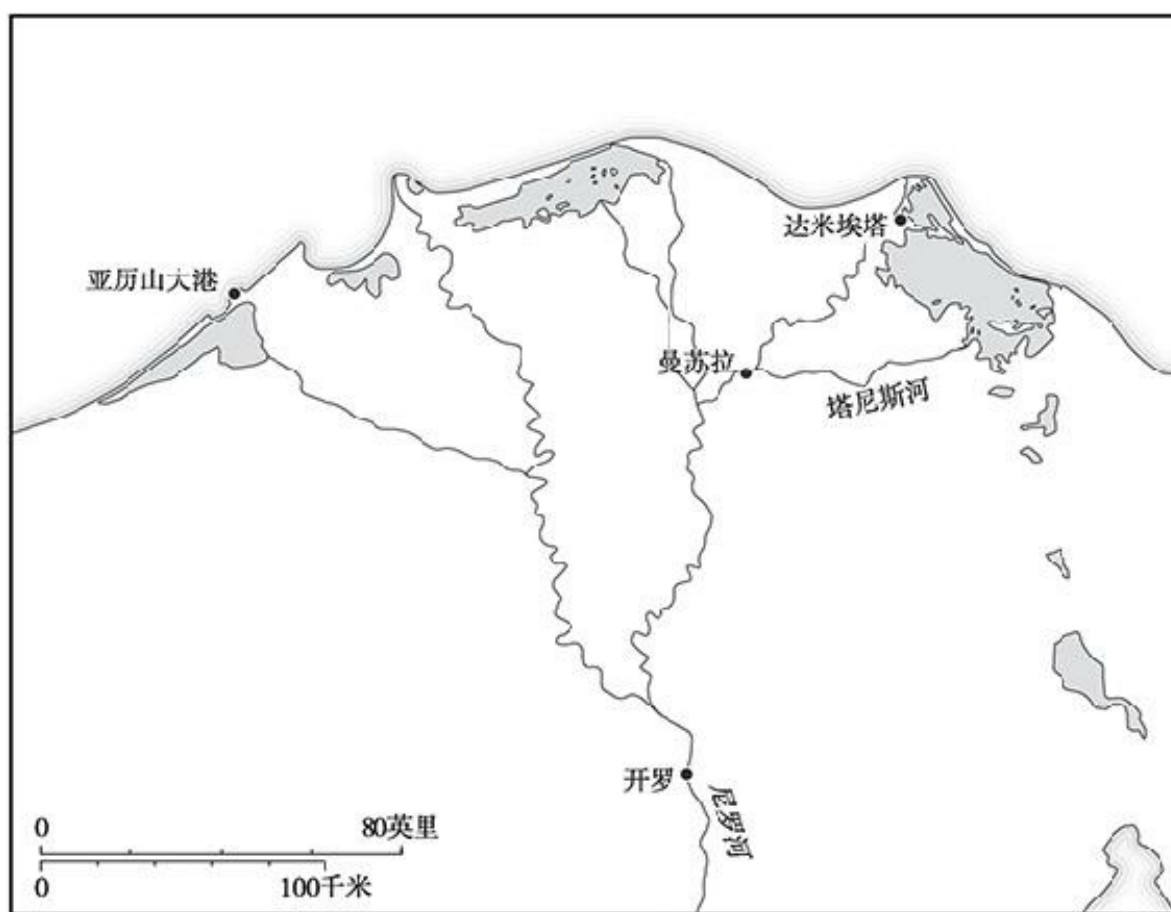
随后发生的事就是缓慢的行军以及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重演，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让·德·茹安维尔以生动的细节将这些事件娓娓道来。路易以毫不妥协的纪律约束部队，但是在前期的遭遇战中总是有个别骑士受作战欲驱使而冲向敌军并因此丧生。他本人在滩头登陆战中也成为一个无法克制自己的坏榜样，而标榜在单打独斗中展现个人勇武的骑士准则是一个反复发生的问题：贵族们因蛮勇而产生的鲁莽行为被证明很难克制。

一个更令人沮丧的现实很快就出现了。尽管达米埃塔已被攻下，十字军营地还是屡屡遭受贝都因（Bedouin）马贼和杀手的夜袭。“他们潜入并杀害了库特奈（Courtenay）领主的哨兵，将他的尸体扔到桌子上，砍下他的头颅并带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苏丹以一个拜占特（bezent）^[11]的价格悬赏每一个基督徒的头颅。”^[12]出于同样的原因，据说贝都因人砍下被吊死之人的头颅而且挖出已下葬的尸体。十字军很快就被迫在达米埃塔城外掘壕设营并且昼夜不停地守卫。他们为下一步行动展开激辩：是夺取西面120英里远的战略港口亚历山大港以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还是进军开罗。路易的弟弟阿图瓦伯爵（Count of Artois）强硬地要求进攻开罗，他的理由是“欲杀巨蟒，必先斩首”。^[13]但整支军队不得不等到尼罗河的季节性洪水退去，直到11月才出发，循着第五次十字军的路线，沿着河边向南行进，目标是夺取战略重镇曼苏拉（Mansurah），苏丹的军队也已撤退到那里。受达米埃塔不战而降的鼓舞，全军上下弥漫着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拿下这座城镇，埃及马上就会崩溃。

这种可能性诱发了穆斯林之中的广泛警觉：“只要曼苏拉的守军后退一步，整个埃及就会在最短时间内被征服。”^[14]开罗陷入一片恐慌。曼苏拉的军队在临终的苏丹的陪伴下，为坚定的立场而战。

向南行军40公里是一项联合作战行动，十字军沿着尼罗河东岸行

进，桨帆船舰队沿途运送食品给养。远征军相当了解这条大河的水文地理知识，但其关键性的败笔在于未能注意到迈哈莱（Mahallah）运河的重要性。这条运河看上去一潭死水，却在距离他们目标的路途中点之处连接着河对岸。敌人可能会封锁这条运河的想法看起来太不值一提了。然而，迈哈莱运河在三十年前击败第五次十字军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在即将再度出场。当路易的人马接近曼苏拉时，他们发现道路被另一条支流阻隔，基督徒称之为塔尼斯（Tanis）；他们的对手在对岸扎营，于是十字军现在停留在了尼罗河和塔尼斯河之间的分岔口上。



地图三 埃及与尼罗河三角洲

11月22日，当路易还在行军中时，苏丹驾崩。萨利赫之前对法赫尔·丁撤出达米埃塔的举动心怀疑虑，已将所有逃跑的守军吊死。现在他

的这些担心似乎得到了证实。法赫尔·丁与苏丹遗孀中的一位勾结，向其子民封锁死讯，皇位继承的权力之战山雨欲来。他在文件上伪造萨利赫的签名，号召人民加入保家卫国的事业中来。在流言蜚语中，他派遣阿克泰（Aqtay）——马穆鲁克巴赫利亚军团的首领——前往遥远的希恩凯法（Hisn Kayfa）执行任务，那是土耳其东南部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城镇。阿克泰的使命是请已故苏丹的儿子穆阿扎姆·图兰沙（Muazzam Turanshah）回来登基，但法赫尔的居心很可能是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回来。

尽管再三保密，萨利赫的死讯还是泄露了出去，但是人们因太过害怕而不敢表达他们的怀疑。埃米尔们都确信“法赫尔·丁志在独揽大权、专擅朝政，马利克·穆阿扎姆（图兰沙）不可能回来了”。^[15]无论如何，图兰沙，这位苏丹最年幼也是唯一存于人世的儿子，也没有激发出人们对他的信心。他更多表现出的是成为一位学者而不是军事领袖的倾向，而据说萨利赫曾对他的继承人满腹担心：“当死神降临吾身的时候，不要将图兰沙从希恩凯法召唤回来，不要将国运寄托于他，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善终。”^[16]

与此同时，塔尼斯河成为十字军的严重障碍。渡过此河事关重要，可是水流湍急，而且河水太深，不利于士兵涉水而过，对面的阿尤布军队则下定决心要挡住任何渡河的尝试。路易九世和他的指挥官们决定建造一座堤道，为了保护受命施工建造这座堤道的工兵，还另外制造了两座“猫堡”——可移动的木质塔楼，并部署了弩炮来轰击埃及的军营。穆斯林军队也用弩炮还以颜色并将希腊火投掷向这两座塔楼。为了解决掉猫堡形成的保护屏障，穆斯林还采取了将他们的箭“射向云端以使这些箭直接落入我们士兵头上”的手段。^[17]守卫这些木质结构的任务变得危险重重，士兵们害怕自己不是被活活烧死就是丧生于埃及军队隔河射出的箭雨之下。面对一片“熊熊烧向我们猫堡的火海”，^[18]茹安维尔和他的战友们被迫从木塔里面跑到开阔地上，试图将火熄灭，“于是撒拉森人

从对面河岸投射箭矢，痛击我们所有人”。^[19]在他准备接替守卫任务之前，他负责保卫的塔楼就已经起火燃烧，对此，茹安维尔无法掩饰住自己如释重负的心情：“上帝给予了我和我的骑士们莫大的关怀，因为那个晚上我们本来需要执行万分凶险的守卫任务。”^[20]

除了进攻本身，建造堤道对于十字军来说也相当棘手。湍急的河流总是将筑堤材料冲走，而他们的对手则在另一边河岸进行挖掘作业，将河道持续拓宽。无论十字军倾倒泥土石块的速度有多快，都没有多大改观。这迫使路易认识到这一策略是在做无用功。十字军的士气也因此低沉。如果他们无法度过塔尼斯河的话，本次十字军东征就只能偃旗息鼓了。这个时候，一个贝都因人来到大营献策，他给十字军指出一处可以渡河的浅滩，以换取合适的报酬。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就此制订：从浅滩渡河，在对岸集结并整顿好队伍，然后攻击敌军大营。建立桥头堡的任务将由骑兵独自完成，因为让步兵在第一阶段渡河比较困难。

1250年2月8日，在忏悔日（Shrove Tuesday）这一天，“我们在破晓时分以各种方式做好了准备”，^[21]茹安维尔如此记述道。浅滩比那个贝都因人所断言的要深上许多。“当万事俱备，我们便开始下河，而我们的马匹不得不游泳……当抵达河流中段的时候，我们发现马蹄能够接触到河底。”一些马匹失足，将骑手掀入河中。他们被300名撒拉森骑兵监视着，“但是当我们完成渡河时这些突厥人就逃跑了”。^[22]圣殿骑士团作为先锋部队的成员，目标是在南岸稳住阵脚，不主动介入战斗，以便国王和主力部队在此期间渡河并重整队伍。

就在这个当口，纪律遭到破坏；国王的弟弟罗贝尔·德·阿图瓦（Robert d'Artois），鲁莽地决定向穆斯林营地发起一次冲锋——而圣殿骑士团的指挥官吉尔修士（Brother Giles）无力阻止。罗贝尔和他的手下就这样向毫无戒备的敌军冲去。

他们进攻了宿营在那里的撒拉森部队，后者根本没有预料

到会被攻击。一些人仍在熟睡，其他人躺在床上。撒拉森哨兵在一开始就被击败，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剑下亡魂。我们的人马冲入突厥人的营房，杀尽所有人，不留活口；无论男女老少、贵贱贫富，都被砍杀了……看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场景确实让人难受，可谁让他们是基督信仰的敌人呢。^[23]

在这场屠杀中被砍倒的人里就有埃米尔法赫尔·丁本人，他在清晨沐浴的时候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信鸽带着曼苏拉大战的急报飞回开罗。这场大战的重要性备受关注。“这条信息让我们大为震动，正如它使所有穆斯林都感到震惊一样，”一位编年史作家写道，“每个人都想象着伊斯兰教的毁灭。”^[24]

如果先锋部队在摧毁敌军营地后就此止步的话，一切都会很美好。吉尔修士再次试图阻止罗贝尔继续深入，却白费力气。受大获全胜的诱惑，而且很可能是想起了攻陷达米埃塔时的轻而易举，罗贝尔反而指责圣殿骑士团畏敌如虎。“我的大人，”吉尔修士回答道，“我和我的弟兄们并不害怕。我们不会畏缩在后面，将与您并肩作战。但是我要告诉您，不要指望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会全身而退，无论是您还是我们。”^[25]即使是来自国王的明确命令，也无法阻止他的弟弟冲入城镇。在曼苏拉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可怕的马穆鲁克巴赫利亚军团。

圣殿骑士们早就预料到这是一场灾难。在狭窄的城镇街道里，入侵者们很快便走散了。发生在己方营地的屠杀激起了穆斯林的刻骨仇恨，马穆鲁克“横劈竖砍，将他们五花大绑拖入俘虏营中。一些人逃向河边以逃脱被杀的命运，但是撒拉森人紧随其后，用丹麦斧（Danish axes）^[26]、钉头锤和利剑将他们放倒，即使有人到达了河边，由于河面宽阔，流速很快且河水很深，跳入河里的人都被淹没了”。^[27]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单单一次对法兰克人的攻击就会“动摇他们的根基，粉碎他们的体系并且颠覆他们的十字架。突厥人加诸他们身上的刀剑锤斧，

使他们死亡和受伤，让他们在曼苏拉的狭窄街道里四处横尸”。^[28]当消息传到开罗时，人们为真主的仁慈欢欣鼓舞。

这一插曲中有一意义重大之处，程度远远超过此次灾难的规模。这是基督教十字军士兵第一次体验到了马穆鲁克突厥人比他们更为强悍的战斗素养。在回顾这一事件时，阿拉伯编年史承认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突厥雄狮大胜多神教走狗的第一场战斗”。^[29]对于十字军运动的总体命运来说，这次遭遇战注定将产生始料未及的影响。曼苏拉的胜利保障了阿尤布王朝在埃及的生存，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开始向世人表明真正的力量在于何处。在那些将落入彀中的十字军砍倒的马穆鲁克中，有一个年轻人叫作鲁克·丁·拜巴尔（Rukn al-Din Baybars）。

对于路易九世来说，直接后果很严重。600名骑士驰入城中，而活着回来的寥寥无几。罗贝尔和吉尔都在屠杀中倒下。十字军失去了宝贵的有生力量，又助长了敌军的士气。国王的军队还没来得及在河的南岸立稳脚跟便遭到猛烈的反攻，铁骑纵马践踏，箭弩呼啸破空。正如编年史家所载：

号角齐鸣，鼓声大作，人喊马嘶……他们完全包围了我们的部队并射出密集的箭雨；遮天蔽日、黯淡无光，此种声势非寻常雹雨可比……国王和我们的战士并无弩手在旁护持；所有跟随国王渡河的弩手已作为先锋部队战死沙场，因为撒拉森人毫不留情地杀掉了他们遇见的每一个弩手。当国王和我们的战士看到己方人马正在被敌军摧毁时，不得不策马向前发起一次密集冲锋以避免突厥人的箭雨。^[30]

由于茹安维尔本身处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提供了可能是对十字军东征中激烈战事最发自肺腑的目击证言——尽管可能无法避免对他自己的英勇行为和国王的事迹有添油加醋的倾向。他回忆道，一个穆斯林

骑兵“用他的长枪刺向我两个肩膀之间，将我钉在坐骑的马头之处，把我压迫在那里动弹不得，无法拔出腰带上的剑”。在不知何故从这一击中逃脱性命后，他前去营救另外一名被击落到地上的骑士。在返回途中，他又遭到骑马武士的长枪攻击。“我的坐骑由于承受不住重压而跪倒，将我越过马耳向前抛出。我以最快的速度站了起来，用盾牌护住颈部，把利剑握在手里。”正当他艰难地站起身时，第二波骑兵又“将我猛地撞倒在地，从我身上飞驰而过，并将我颈部的盾牌带飞”。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的他被其他骑士领到一栋被毁坏的屋子，并在那里进行抵抗。“在那里，突厥人从四面八方攻击我们，一组人马杀入这栋被毁坏的房屋并用他们的长枪居高临下地攒刺我们。”^[31]他看到一名战友先后三次被长枪刺伤了脸部，另外一位被长枪刺穿两肩中间的战友由于伤口太大“以致血涌如流，就像开塞的酒桶一样”。与此同时，“我的领主大人埃拉尔·德·西弗里（Érard de Siverey）被利剑刺中面部，以致鼻子悬荡在嘴唇上”。当看上去刀枪不入的茹安维尔正在向圣雅各（St James）紧急祷告时，西弗里这时候还有力气说话（尽管他随后就死了），他冷静地建议可以向邻近的其他人求助，但只是“大人，如果您认为我和我的继承人都不会为此受到指责的话”。^[32]骑士们的荣誉准则以及担忧被人指责为懦夫的心理一直持续到死亡的边缘。

路易九世一整天都在奋战以维持他在塔尼斯河南岸的立足点并阻止他的士兵逃跑。穆斯林在某种程度上难以相信，阿图瓦竟如此愚蠢地被诱入曼苏拉的圈套之中。现在他们吼叫着、呐喊着，以紧密的队形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喇叭声、铜鼓声和撒拉森号角声响震天”。^[33]被塔尼斯河困住的茹安维尔眼睁睁地看着形势恶化下去：“当我们来到下游时，我们看到河里全是长枪盾牌，遍布溺毙和垂死的人与马。”^[34]6名撒拉森骑兵拉住了路易九世坐骑的缰绳，但是国王“用自己的剑对他们施以重击，单枪匹马地解救了自己”。^[35]箭矢如洪流一般破空袭来，希腊火也从弓弩中发射出来。一名战士“将一罐希腊火挡在了自己的圆盾上，如果任意一点儿火星落到他身上，那么他就会被烧死”。^[36]茹安

维尔现在已没了自己的盾牌，只好捡起一件穆斯林的棉甲衣作为临时替代品，“这可帮了我大忙，因为我只受了五处箭伤而我的坐骑有十五处伤”。不管怎样，路易终于设法稳住了阵线，鼓舞起己方士兵的斗志并以极大的勇气去战斗。到了下午晚些时候，一支新的弩兵分队被部署到前线，而穆斯林就此撤退。这一天结束时，贝都因人，这些战场上的拾荒者和割喉者都冒了出来，他们洗劫了穆斯林废弃的营地，将其搜刮得一干二净。

对于十字军来说，这场战斗就其自身而言，是一场勇气和耐力的大胜，但仅仅是最短暂的喘息罢了。穆斯林确信他们可以扫除塔尼斯河南岸的营地。在第二天黎明前，茹安维尔再次被要求武装的号令叫醒。由于受伤太重而无法穿上盔甲，他干脆将那件棉甲衣往背上一披就准备战斗了。在随后的几天里，路易的士兵经受住了敌人反复的攻击。他们设法从穆斯林的攻城武器上收集了木材并围绕自己的营地建起一道栅栏和壕沟，还横跨塔尼斯河建起一座舟桥以连接两个营地，但是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尽管有这种意志坚定的抵抗，形势还是令人绝望。路易九世固执己见，仍然盲目地相信阿尤布苏丹国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上帝终将赐予他胜利。然而，证据显示出的则不是这样。在不愿承认十字军东征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他不敢从塔尼斯河撤退，但营地里的状况已经开始恶化。在第一场战斗过去九天之后，阵亡者的尸体在河面漂荡，并且堵塞了连接路易九世两个营地的舟桥。“那里这么一大片尸体，以至于整条河从一个河岸到另外一个河岸都堵满了尸体，绵延的长度有一块小石头能抛出的那么远。”^[37]他们雇来苦力，将行过割礼的穆斯林尸体倾倒在桥的另一侧，令其顺水流漂至下游，而基督徒的尸体则被埋在一条长长的壕沟中。此时正值大斋期（Lent）^[38]，幸存者只能从河里捕淡水鳕鱼来充饥，“而淡水鳕鱼正在吃尸体，因为这些鱼很贪吃”，^[39]茹安维尔回忆到此处，不禁作呕。他将开始肆虐的“营地热病”（十有八九是坏血病）

归咎于此：“由于我们士兵的牙龈上有很多腐肉，理发师^[40]不得不将这些腐肉刮掉，以让这些士兵可以咀嚼并吞咽食物。”当理发师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时，营地里到处都是士兵的哀号声：“因为他们尖叫起来就像分娩的娘们一样。”^[41]茹安维尔的牧师在做弥撒的中途昏倒。茹安维尔抓住他的手臂并让他清醒过来。牧师到底还是完成了仪式，“但他自此之后再唱不了圣歌了”。^[42]这支军队现在的生存取决于从达米埃塔顺流而下输送的补给，但是十字军的困境即将发生戏剧性的恶化。

在2月25日这一天，已故苏丹唯一在世的儿子、有学者风范的图兰沙从希恩凯法抵达，接管政权。从一开始，他就误判了局势。苏丹之位的变化通常意味着行政体系的改变，但一个明智的统治者通常是循序渐进地完成这一转变。图兰沙并没有这样做。他疏远了主要的埃米尔和军队指挥官。很可能是因为他无法从财政上奖赏那些在曼苏拉奋战的将士；他似乎没能履行之前的承诺，将亚历山大港的税收给予马穆鲁克军团的领导者阿克泰，而且他用自己的人取代了主要的埃米尔。新上任的埃米尔对于一线士兵来说很陌生，因而也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各种耸人听闻的段子四处散布图兰沙如何堕落，据说“喝醉的时候，他会将蜡烛收集到一起，用他的剑砍掉（这些蜡烛）的头部并将这些蜡烛都剪断，同时说道，‘这就是我将对那些巴赫利亚采取的措施’，然后他会逐一提及他父亲的马穆鲁克的名字。出身微贱的人被提拔到高位而那些优秀的官员则被免职。他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他父亲手下的马穆鲁克主要军官”。^[43]图兰沙没能意识到阿尤布王朝如此对待自己的突厥奴隶是在玩火自焚。

尽管己方阵营暗流涌动，穆斯林还是获得了一股新的助力，迈哈莱运河的重要性曾在十字军到达尼罗河时被他们忽视，此时却凸显出来。十字军在曼苏拉的营地和海岸附近的达米埃塔都有船只，而图兰沙现在却切断了两地之间的联系。他派出50艘桨帆船在骆驼的协助下穿越陆地，在迈哈莱运河的上游河段（虽然是死水但水量充足）下水，又返回

驶入十字军营地上的尼罗河段。十字军的补给船队从达米埃塔沿河南下时，遭到埋伏，物资被掠夺，船员要么被杀要么被押到俘虏营。穆斯林耍的花招与三十年前他们对付第五次十字军时设的圈套如出一辙，但路易九世和他的士兵们却被彻底打了一个出其不意。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一艘十字军小船设法突破封锁，驶入他们的营地。“突厥人着手通过饥饿使我们屈服，这让很多人大吃一惊。”^[44]茹安维尔记载道。严峻的形势使粮食价格上涨到了异常高的水平。绝望笼罩在营地里每一个人的心头。病号成倍增加。每一个人都渴望一死了之。

从那一刻起，路易九世的十字军就在劫难逃，但他仍旧心存犹豫，不情愿放弃自己的圣战迷梦，直至为时已晚。他试图协商出一份合理停战协议的努力也告失败。直到1250年4月5日国王才最终承认失败并下令向达米埃塔撤退。路易坚持将伤员和病号安置在船上，而他本人将留守至最后，然后走40英里的陆路回到达米埃塔。此时，他已患上痢疾，但拒绝登船。从南岸秘密撤走的计划在执行时变得一团糟。受命砍断舟桥绳索的人由于惊慌失措而未能完成任务，结果穆斯林部队也跟着渡了河。井然有序的撤退演变成一场噩梦。受了伤的茹安维尔，“由于口腔和腿部都染上了营地热病”^[45]而且虚弱得走不动路，与那些伤病号一起上了船。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可以看见，在熊熊火光之中，穆斯林将那些踉跄来到或是爬到水边希望被带到船上的病号杀死。一场溃退发生了，穆斯林追击并杀掉那些在陆上行军的士兵。茹安维尔所在的船由于一场逆风而减慢了速度，在一片死水中迷失方向、停滞不前，又受到了岸上弓箭连发和希腊火齐射的轰击。护航船队随后也被苏丹的舰队截击。向前望去，茹安维尔看到其他船只上的战友被杀害后扔进水里。当他们等待命运，将船只抛锚在河道中间时，茹安维尔将自己随身的珠宝和圣物扔进了河里。随着一艘桨帆船的接近，一个水手向茹安维尔乞求道：“除非你让我说你是国王的堂弟，否则他们会把你们杀尽，我们这些水手也会陪着送命。”^[46]他答应了。当敌人登上他们的船时，茹安维尔的喉部中了一刀，摔倒在地等死，这时有人喊道：“他是国王的堂

弟！”^[47]茹安维尔立刻就成了一件可以索要赎金的无价之宝。其他人就不那么走运了。茹安维尔看见自己的牧师被杀掉，尸体被扔进河里，而他的文书早就昏了过去，仍被人拿着石碗猛击头部。“我被告知船上的这些人毫无价值，因为他们的病状使其毫无自理能力。”

成为俘虏使路易九世本人颜面尽失。他所患的痢疾病情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的随从不得不将他臀部上感染的肉割下来。他在一间村屋里被俘时已经半死不活。一切都结束了。十字军一败涂地：“在这里，金色火焰军旗被撕成碎片，包森特旗（bauséant，意为圣殿骑士团黑白相间的旗帜）任人踩踏，这样一番景象还从未有人见过。在那里，世大家族的旗帜——自古以来就令异教徒闻风丧胆的圣物——被人马的鲜血所溅污……被视如草芥，以最卑劣的方式毁弃。”^[48]

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胜利真是大快人心。“真主赶走了他们，使埃及得到了净化，”^[49]一位编年史家记述道，“我们对俘虏进行了统计，人数超过了2万；淹死或者被杀的人数达到7000。我看到了那些死去的人，他们尸横遍野……这是穆斯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天。”^[50]达米埃塔的守军也投降了。在被成群驱赶至战俘营的途中，没有价值的俘虏以每天300人的速度被斩首；剩下的则被留着索要赎金。尽管曾跪在斧头前等着被人处决，茹安维尔最终还是幸免于难。路易同意为1.2万人支付一笔巨额赎金——80万拜占特。他先支付了一半赎金作为预付款，然后乘船驶往阿卡（茹安维尔也在船上），去筹措剩余的赎金，以使仍在战俘营的军队成员获得自由。

他在1250年5月7日离开埃及前往阿卡，但在此五天之前他亲眼看见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王朝权力的一场剧变，这恰是他所发动的十字军于不经意间触发的。图兰沙之前就疏远马穆鲁克部队成员，而且战后对他们既没有晋升官衔也没有分享战利品。5月2日，马穆鲁克的指挥官阿克泰袭击苏丹并且重伤了他。虽被刺中但还一息尚存的图兰沙承诺要将亚历

山大港的利益返还给阿克泰，但为时已晚。苏丹没有注意到正在进行中的权力转移。据说他是由鲁克·丁·拜巴尔终结了性命。阿克泰挖出图兰沙的心脏，用血淋淋的双手拿给精疲力竭的路易看。他举起这可怕的战利品并说道：“我杀掉了你的敌人，你将会给我什么回报呢？这个本来要杀你的人，他可还活着？”^[51]国王惊骇万分，说不出话。

在欧洲，路易九世惨败的消息使人们备受打击。在教皇写给路易的母亲——法兰西王太后布朗歇（Blanche）^[52]——的信中“多是忧伤之词，笔调不胜哀痛”。^[53]对原因的考问直击灵魂深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路易的事业，初心如此虔诚，准备如此周密，竟然全军覆没。“我们必须思索原因，”为曼苏拉之殇所做的一场布道沉思如是，“为何主能允许这样一场人间悲剧降临到基督子民的身上……那么，主又是如何能容忍购买奴隶的行为……这些恶魔的奴隶如此污秽不堪，竟能杀死这样高贵的战士，这些上帝的强大伙伴和全体基督子民的捍卫者？”^[54]马穆鲁克奴隶的角色和社会地位尤其让人困惑不解。而得出的原因首先还是人们犯下的罪恶使然，然后就是严厉的教训，再就是上帝神秘的正义与爱的其他表现。

杀死图兰沙的那一刀是否真由拜巴尔刺出，抑或这不过是一段事后虚构的逸事，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管怎样，图兰沙死于马穆鲁克之手这件事在重塑整个中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预示着四分五裂、虚弱不堪的阿尤布苏丹国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在其土地上将会诞生一个马穆鲁克的王朝，其将冷酷无情的军事技能带入与基督教世界的战争中。耶路撒冷王国命运的钥匙依然在埃及，并且将在适当的时候被交到雄心勃勃的拜巴尔手中。

^[1]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82.

^[2]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86.

[3]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88.

[4] 金色火焰军旗（拉丁文为[aurea flamma](#)，意为“金色火焰”），是查理曼、圣德尼的军旗。

[5] 法国的主保圣人，为巴黎首任主教，于公元3世纪末殉教。

[6] 意为“欣悦之丘”，名称来自赴耶路撒冷朝圣者接近圣城时看到的第一处景物。

[7] Crowley, Roger. *City of Fortune*, London, 2012, p.37.

[8] Asbridge, Thomas. *The Crusades: The War for the Holy Land*, London, 2010, p.552.

[9]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90.

[10]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31.

[11] 西欧国家对于拜占庭货币的指称，在十字军王国内有仿制，集中见于10—13世纪的史料。

[12]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98.

[13]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00.

[14]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41.

[15]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39.

[16]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39.

[17]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12.

[18]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15.

[19]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15.

[20]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16.

[21]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18.

[22]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18.

[23] *Crusader Syria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Rothelin Continuum of the History of William of Tyre with Part of the Eracles of Acre Text*, ed. and trans. Janet Shirley, Aldershot, 1999, p.95.

[24] *The Seventh Crusader*, p.144.

[25] *Crusader Syria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Rothelin Continuum of the History of William of Tyre with Part of the Eracles of Acre Text*, ed. and trans. Janet Shirley, Aldershot, 1999, p.96

[26] 又名维京阔斧，长度由最短的0.9米到最长的2米，是中世纪欧洲最常见的兵器之一。

[27] *Crusader Syria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Rothelin Continuum of the History of William of Tyre with Part of the Eracles of Acre Text*, ed. and trans. Janet Shirley, Aldershot, 1999, p.96.

[28]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44.

[29]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45.

[30] *Crusader Syria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Rothelin Continuum of the History of William of Tyre with Part of the Eracles of Acre Text*, ed. and trans. Janet Shirley, Aldershot, 1999, p.97.

[31]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p.120-2.

[32]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24.

[33]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26.

[34]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28.

[35]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30.

[36]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32.

[37]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58.

[38] 亦称“封斋节”，是基督教的斋戒节期，指的是从耶稣受难前40天的“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到受难日的前一天“圣星期四”（Holy Thursday）这一段时间。

[39]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60.

[40] 原文“baber”原义为“理发师”，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军营里，理发师还兼任外科医生。1215年举行的第十届拉特兰大公会议裁定“任何从事外科手术的牧师不得担任教会的高级职位”。这个决定推翻了已经实行400年的敕令，该敕令由查理大帝颁布执行，规定所有修道院和教堂的下设医疗机构只能聘用牧师。自此，僧侣们将外

科手术和修剪须发等服务都转移给地方上那些帮人们刮胡子的理发师，后者已经掌握使用手术刀和剪刀的技巧。

[41]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66.

[42]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64.

[43]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61.

[44]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60.

[45]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64.

[46]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74.

[47]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76.

[48]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02.

[49]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44.

[50]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60.

[51]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92.

[52] 又译作“布兰卡”，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的第三个女儿，1223年成为法兰西王后。1226年其夫路易八世病逝，由其子路易九世年幼继位，她遂出任法兰西王国摄政10年。法国政局不安，野心的贵族图谋反抗王室，幸赖太后调度有方，

撤换不忠诚的贵族，亲自领兵讨伐叛乱，在全国各地建立护国民兵。法国人不仅尊称她为“仁慈的布兰卡太后”，也称她为“贤母布兰卡”。

[53]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67.

[54]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p.170.

第三章 双雄对决

1250—1260年



随着图兰沙鲜血淋漓的心脏被扔到路易的脚下，尸身被扔进尼罗河中，阿尤布王朝的生命正在流失殆尽。正是图兰沙的父亲马利克·萨利赫一手创建的马穆鲁克军团，在曼苏拉大肆屠戮基督徒并拯救了埃及。这一职业化军事集团成为阿尤布王位背后的力量所在，并且在13世纪50年代取代了旧王朝。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持续了十年之久，伴随着各色傀儡的粉墨登场以及马穆鲁克各派系之间的钩心斗角。先前的奴隶士兵们在开罗掀起内乱纷争，让市民们开始担心起突厥人在他们中间的存在。巴赫利亚军团的首领阿克泰被竞争对手忽都斯（Qutuz）谋杀，而巴赫利亚军团以及影响力日渐增长的拜巴尔则被迫于1254年从埃及出走。在这个十年剩下的时间里，拜巴尔在叙利亚为不同的阿尤布王公效力，锻炼了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战斗技巧。在埃及，忽都斯控制数位

王位继承人登基后，于1259年自行加冕为苏丹。

对于自己失败的十字军事业所带来的后果，路易九世并没有逃避责任，这一点让他广受世人尊重。他没有回到法国，而是在圣地待了四年，赎回因惨败而滞留埃及的囚犯，强化阿卡、凯撒利亚

（Caesarea）^[1]、雅法和西顿这些硕果仅存的十字军立足点，甚至自掏腰包、投入重金。他在阿卡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法国军团——一支规模虽小但价值很大的职业军队，并且开始寻找对抗穆斯林势力的潜在盟友。

很长时间以来，蒙古人的锋芒所激起的阵阵回音（尽管有些失真）就传到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一厢情愿的想法也随之而生：他们的王公们没准会成为基督徒，甚至就是基督徒。然而，证据却与此相悖。到了13世纪40年代，东欧已经被蒙古人的突袭重创。1249年，当路易还在塞浦路斯准备发动十字军东征时，他接见了波斯的蒙古人派来的使者。作为回应，他派出两位多明我会修士〔其中的一位，安德烈·德·隆格瑞莫（André de Longjumeau）能说与蒙古语相关的语言〕，鼓励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信仰并“向鞑靼人（蒙古人）演示和教导他们应当信奉的教义”。^[2]这两位传教士对潜在皈依者的游牧生活展现出一定的想象力，他们随身携带着可以四处移动的帐篷式礼拜堂，上面绣着耶稣生平各个场景，以及圣餐杯、书籍和一切做弥撒所需要的物件。他们的旅行耗时两年之久，其间还踏上了深入中亚心脏地区的旅程，到达了蒙古宫廷。隆格瑞莫回来后在凯撒利亚找到了路易九世，后者于尼罗河惨败之后正在督造这座城市的防御强化工程。隆格瑞莫的报告略有几分含混不清，但简单明了地纠正了盲目乐观的想法。两位修士亲眼看见了毁灭：一座座城市化为残垣破壁，尸骨成堆。他们被遣回是为了传达警告之语，所有胆敢反抗者必丧命于蒙古汗王剑下：“特此申明，诫告汝辈，两国之间，非和即战。故奉劝尔等，岁岁纳贡。缴足金银，方可以友邦待之。如若不从，必遭亡国灭种之祸，亦如他国破灭之往事。”^[3]要么

投降，要么等死：这是一个中东诸国很快就会面临的抉择。路易九世对此并没有回信。

1253年，成吉思汗（Genghis）的孙子旭烈兀（Hülegü Khan），也就是蒙古帝国大汗蒙哥汗（Möngke Khan）的弟弟，受命率军西征，“最远要打到埃及的边界”。^[4]其目标是以粉碎穆斯林势力作为重要一步，使蒙古成为世界主宰。到了1256年，旭烈兀已经驻军波斯。

两年之后，蒙古人就对伊斯兰世界施以沉重打击，带来的影响在其后回荡了数个世纪之久。1258年1月，旭烈兀兵围巴格达。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巴格达一直是阿拔斯王朝（Abbasid）哈里发的御座所在地，一座学术研究与文化资源的宝库，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中心。在汉人攻城技师的帮助下，蒙古大军于2月上旬攻破了城墙。守军的投降毫无用处。这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清真寺、宫殿、图书馆以及医院被尽数摧毁。各方对于死亡人数的估计差别极大，从9万到80万不等。底格里斯河被不计其数的书册的墨汁浸染，这些书籍的封面竟被撕扯下来用以制作凉鞋。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被蒙古人裹在毯子里，在骑兵的马蹄下被践踏至死。巴格达之劫严重动摇了伊斯兰教的根基。

1259年9月，旭烈兀率领一支人数大概12万的大军通过浮桥渡过了底格里斯河，他的目光落在了叙利亚。海外之地的基督教诸国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海屯一世（Hethoum I）是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Cilician Armenia）^[5]的基督教国王，他将蒙古人奉为宗主；众所周知，旭烈兀的大将怯的不花（Kitbuqa）已从聂斯托利派改宗基督教，海屯一世因而天真地认为蒙古人打算为基督徒收复耶路撒冷。他试图说服其他的基督教飞地也投靠蒙古人，但只有他的女婿博希蒙德六世（Bohemond VI），小小的安条克公国和的黎波里伯国的统治者有所回应。当阿勒颇陷落后，那里的穆斯林死于刀剑之下；亚美尼亚基督徒将大清真寺烧成一片白地。在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后，大马士

革于1260年3月直接向蒙古人开城投降。看到穆斯林邻居们羞辱难堪的情形，这座城市里的东方基督徒们按捺不住幸灾乐祸的心情，敲响了他们教堂的大钟，还在斋月（**Ramadan**）期间把酒相庆——这种羞辱的记忆在穆斯林的心中可不会磨灭。不久，随着众多阿尤布王公纷纷投诚，叙利亚全境几乎都落入蒙古人手中，他们已向南奔袭到埃及边境。伊斯兰世界面临着灭顶之灾。

阿卡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13世纪50年代的后期，这座城市成了热那亚与威尼斯进行商业角力的“风暴中心”，两方的竞争愈演愈烈，最终在城内爆发了一场全面的战争，世人称之为圣萨巴斯之战（**War of St Sabas**），表面上是争夺以那位圣人命名的修道院（恰好位于这两个意大利人社区的边界上）的所有权，实际上折射出双方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对地中海和黑海贸易霸权的争斗。这场战争将这座城市内几乎所有的派系以及周边的十字军国家势力都卷了进来。医院骑士团支持热那亚人，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则为威尼斯人撑腰；比萨人先是与热那亚同仇敌忾，随后又见风使舵倒向威尼斯；海外之地有权有势的贵族们也有样学样地选边站队。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年之久，穿插着海战、封锁战以及近距离接触的攻城战。在阿卡城里，交战双方在近距离用弩炮互相轰击，将石块抛过设防定居点的围墙，砸在他们邻居的居住区内。编年史有载：

在1258年的整整一年里，至少有六十台弩炮被投入战事中，每一台都将炮弹投射入阿卡城里，那些炮弹落到了房屋上、塔楼上和炮台上，它们将接触到的每一栋建筑都打得粉碎、夷成平地……这意味着阿卡除了宗教建筑之外，几乎所有的塔楼和坚固房屋都被摧毁了。双方各有2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命……阿卡的城区完全毁于战火，此情此景，仿佛是基督徒与撒拉森人之间的战争。[\[6\]](#)

死亡人数很可能被夸大了，但是这场战争给大部分城区造成了破坏是确定无疑的。虽然热那亚人最终被逐走，他们的居住区也被铲平，但城内的房屋、仓库、船只和防御塔楼也被破坏殆尽。热那亚人沿着海岸搬迁到了推罗。阿卡亟须大规模重建；它的贸易受损，派系分裂加剧，人力资源也减少了。

与此同时，耶路撒冷王国也开始感受到了蒙古人扩张所带来的压力。旭烈兀的真实意图在他于1257年下达给手下将军的一份命令中表露无遗：“前进到海岸，越远越好，把沿途的那些国家从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黄口小儿手中抢过来。”^[7]阿卡曾拒绝响应海屯一世加入蒙古大军的号召。当年这座城市就收到直截了当的劝降。在此驻扎的军事修会做出了毫不妥协的决定：“那就让这些鞑靼人——塔耳塔罗斯（Tartarus）^[8]的恶魔们——尽管放马过来吧，他们会发现基督的仆人们已经安营扎寨并准备好大战一场了。”^[9]1260年2月，旭烈兀的将军怯的不花专横地命令拆除这座城市的城墙。阿卡的领导层对此置之不理并强化了防御设施，为了寻找合适的建筑材料甚至将城外公墓的墓石都掠为己用。蒙古人实在没有理由对阿卡会自愿臣服或结盟感到乐观。亚美尼亚和安条克都被降格到封臣的地位。当西顿的领主没能约束属下发动了一次袭击后，蒙古大军予以报复，洗劫了该城并将其夷为平地。蒙古人对其他势力根本就不屑一顾。求援信立刻发往欧洲，这不仅仅是出于对蒙古人的恐惧，更是出于希望：在穆斯林势力衰退以及蒙古人的注意力被埃及吸引之际，可能会存在着扩张势力的机遇。求援信内容如下：

我们充分相信，蒙天主襄助，如果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能迅速而有力地支援我们，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王国全境将会轻易被收复，因为大部分撒拉森人现在已不复存在。至于鞑靼人，如果他们遇到拉丁人的抵抗，我们相信，只要他们担忧自己遇到的抵抗越多一分，那么他们就会越早地将自己浸满鲜血的利剑入鞘。^[10]

但是没有任何十字军冒险行动因此发动，阿卡将自身置于一场充满怀疑和等待的游戏中。

当蒙古人的打击降临时，十字军诸国不过一群围观者罢了。1260年初，蒙古使者们带着一个令人熟知的消息来到了开罗：

东方与西方诸国的万王之王、蒙古大汗，致函东躲西藏、逃吾剑芒的马穆鲁克首领，忽都斯。

你应当考虑一下其他国家的遭遇.....然后归顺我们。你已经听说我们是如何征服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如何使那片乱象丛生的大陆焕然一新。我们开疆辟土，杀人无数。军威恐怖，让你无处可逃。你能逃往何处？何路堪使，助你窜逃？我们的骏马轻灵迅捷，我们的弓箭无坚不摧，我们的刀剑快如雷电破空，我们的心志坚如巍峨群山，我们的士兵多如漫天黄沙。兵戈难挡、城堡无阻，纵使祷告真主，也奈何不了我们。泪水打动不了我们，哀歌也感染不了我们。只有摇尾乞怜，才能饶你性命。

速速回信，免得战火烧身.....胆敢抵抗，那就等着大祸临头。我们将会把你们的清真寺夷为平地并将你们真主的羸弱不堪公之于世，然后将杀光你们男女老少。

目前，你是我们唯一需要讨伐的敌人。[\[11\]](#)

此时，忽都斯掌权才三个月。虽然他的政权还不稳定，但是他的回应却毫无转圜余地。他将蒙古使者们砍成两半，悬首城门。他准备寻敌决战而非坐守待围。巴格达的教训记忆犹新。

即便忽都斯尽其所能地招兵买马，他的军队在人数上也处于一比十的劣势，但是运气却站在他这一边。在前一年的8月，蒙古大汗蒙哥的

驾崩，昭显了蒙古帝国的一处结构性缺陷。每一次大汗位继承的争夺战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为首的汗王们返回中亚。当死讯传到身在叙利亚的旭烈兀那里时，他决定将为数大约10万的主力部队撤回，大将怯的不花率领1.1万人左右的部队留守。在写给路易九世的一封信中，旭烈兀宣称自己将主力部队以及数以万计的马匹撤回是出于后勤需要。叙利亚北部的饲料已经用尽，而蒙古人的习惯就是在夏天撤往气候更温和的地区。蒙古人一旦越过幼发拉底河就处于用兵的极限，这种可能性是马穆鲁克日后将善加利用的弱点。

蒙古大军在深入叙利亚的时候迫使很多穆斯林难民和阿尤布王朝的士兵背井离乡，他们现在集结到忽都斯的帐下听命。这其中就包括拜巴尔和巴赫利亚马穆鲁克军团，十年来他们在群雄割据的叙利亚不停地转换阵营，身经百战、久经沙场。他们的冒险经历中不乏奔袭入侵埃及本土之举。巴赫利亚军团因为他们的首领阿克泰被刺一事与忽都斯积怨已久，但大敌当前，两方的分歧暂时被搁置一边。蒙古人的威胁使这些往日的对手结盟。忽都斯对拜巴尔的安全通行予以保证，后者率领手下的马穆鲁克来到开罗，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他的部队成为深受欢迎的增援。

1260年7月，兵力约为1.2万人的埃及军队出征，其规模可能要比怯的不花的军队稍微大一些。埃及军队的组成包括马穆鲁克小队、埃及本土士兵和难民征召兵。忽都斯在沿海平原上朝阿卡方向进军时，决定寻求基督徒的合作。阿卡城内，何去何从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很多人都倾向于支持忽都斯。蒙古人对西顿的洗劫及其不知餍足的威胁让基督徒们忧心忡忡。忽都斯是六年里埃及的第三个苏丹，没有理由认为他能成为一个持久的威胁。此时，基督徒还很难将这个最近才冒出来的统治者与那些容易相处的阿尤布王公加以区分，而后者曾是有价值的贸易伙伴。与忽都斯联手也可能会缓解蒙古人带来的压力。然而，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汉诺·冯·桑格豪森（Hanno von Sangershausen）却言辞激烈地反对

任何形式的合作，并最终说服当局拒绝了此事。用基督徒的生命去冒险是不明智的，而且，在穆斯林取胜之后，忽都斯可能会将目光转向他们；更好的策略就是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

基督徒可能选择了中立，但为了防止有所损失他们两面下注，允许忽都斯安全通过他们的领土。这使他在经过基督徒领地时不必担心受到攻击。一连三天，埃及军队在城墙外的果园宿营，并得到了补给。城里的气氛紧张不安。一些身居显位的埃米尔进入了阿卡城并达成了某种协议。根据基督徒方面的史料，这些高官之中有“一位叫本多卡

（Bendocar）的伟大的埃米尔，后来成了苏丹”。^[12]阿拉伯方面的史料则宣称拜巴尔伪装成一名间谍，获取信息以图将来有机可乘。在阿卡城墙外扎营期间，忽都斯向他手下日渐踌躇的各个分队（现在他们对蒙古人的力量愈发恐惧）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以激起他们的勇气：伊斯兰教的未来在微妙的平衡中命悬一线。拜巴尔被派去打头阵，与先锋部队一起去侦察敌军的部署。

1260年9月3日，忽都斯和他的军队在阿卡东南方30英里处与蒙古人相遇，此处名为阿音扎鲁特（Ayn Jalut，“歌利亚之泉”），据说大卫就是在这里手刃了那位巨人，这一地名对于一场在世界历史上被断言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战来说恰如其分。两军布阵情况相似，中军都是由盟友军队以及不可靠的仆从军支持。这是一场突厥-蒙古骑兵弓箭手分队之间的对决，双方都是来自欧亚大草原，采用的战术也大体相同：马队突击、佯装撤退、机动包围。拜巴尔率领前锋直冲蒙古大军，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蒙古人有两次机会差点儿击败忽都斯的军队。当战斗进行到最高潮时，形势变得极为险恶，忽都斯脱下头盔，让手下的士兵看到自己的面容并大喊道：“啊伊斯兰，啊真主，请助你的仆人忽都斯反抗蒙古人吧！”^[13]随着马穆鲁克分队的红黄战旗集结起士兵，他得以止住己方溃退，重整阵容，并重创敌军。怯的不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被杀，蒙古人惨遭屠戮。那些侥幸逃脱的人被拜巴尔紧追不舍并再次被击

败。

这不是蒙古人遭受的第一次失败，他们在叙利亚的野心也并没有终结。他们的失败在于一支规模相对较小的军队很不明智地低估了与自身相似的对手。旭烈兀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地区性挫败，打算挽回局面。马穆鲁克还不曾面对过蒙古军事力量的全力一击，但蒙古人下一步的还击不可避免。然而，这场胜利自有其不可预料的结果。忽都斯的集结呐喊预示了这群来自亚洲大草原、讲着突厥语的游牧民族有能力统一伊斯兰世界。阿音扎鲁特之战赋予这群外来户以声望及合法性。

但忽都斯注定不会品尝到胜利的果实。大概是他对手下的高级埃米尔们做出了过于慷慨的承诺——包括将阿勒颇的总督权许给拜巴尔——却无法履行。阿音扎鲁特一战过后，忽都斯所代表的马穆鲁克派系与巴赫利亚军团之间的信任危机再次出现，后者从未忘记忽都斯刺杀阿克泰的宿仇。现在很可能是谁先出手的问题。在穿越沙漠返回开罗的路上，忽都斯下旨让大军停下，并进行他最喜爱的猎兔运动。他在手下埃米尔们的陪同下转入另一条道路。当野兔被抓到时，巴赫利亚军团看似开始行动了。关于这一事件，最贴近真相的版本是这样描述的：拜巴尔接近苏丹，好像有事相求的样子，并上前去亲他的手。这是一个信号。拜巴尔牢牢地抓住忽都斯不让他拔出武器来，另一位埃米尔用利剑刺中了他。忽都斯最后死于乱箭之下。拜巴尔并非单独行动，也不是最有可能先下手的那一个。正如图兰沙的刺杀案一样，史学家很可能出于对拜巴尔的偏袒而改写历史。在随后于埃米尔之间开始的选举过程中，拜巴尔宣称他应当排在首位，因为是他打倒了忽都斯。尽管马穆鲁克苏丹的地位取决于首要埃米尔们组成的支持者同盟，但拜巴尔即将开始建立起不受束缚的个人统治。

从阿卡的角度来看，忽都斯的遇刺看起来不过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紊乱（他们乐于看到这种状况）的又一表征罢了——一个又一个统治者倒

在血泊中，留下四分五裂的小王国。基督徒由此大感欣慰：蒙古人大败，伊斯兰世界又依然保持分裂状态。他们所不知道的是，随着拜巴尔的崛起，一个新的突厥王朝将会一统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并毫不妥协地承诺要进行萨拉丁时代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动过的圣战；他们也不知道，蒙古人尽管又发动了数次侵袭，却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意愿重返叙利亚、制衡拜巴尔，或是为阿卡创造出可以挑拨两虎相争、从中渔利的局面。对阿卡尤为不利的是，蒙古人引起的混乱以及马穆鲁克的崛起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影响。随着巴格达化为一片废墟，过去曾经以阿卡和的黎波里为终点的远程贸易线向北移动。经济繁荣的光辉时代一去不复返，海外之地的领主们也不再富有。越来越多的领主将自己的城堡及领主权或是出租，或是卖给军事修会，后者将成为基督教在圣地唯一可行的守卫者。而拜巴尔将会慢慢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直到令其窒息。他潜入阿卡侦察的秘密行动将会派上用场。

拜巴尔本人永远不会忘记一些基督徒曾向蒙古人效忠，也不会忘记阿勒颇的大清真寺被烧成焦土。剩余的十字军国家很快就将发现他们要面对一个稳定团结的伊斯兰王朝，以及拜巴尔这个不屈不挠的敌人，后者将会统治十七年之久。新苏丹据说身材矮小、胸部宽阔且声音洪亮。在他那一对蓝眼睛中，有一只眼中有一个不寻常的白斑。他第一次被变卖为奴时只卖出了一个低价——一位买家立刻就将他作为变质物品退货给卖家。据说他的眼中带有一丝邪恶。他也很少眨眼。

[1]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古城，现属以色列，居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毗邻哈代拉。

[2] Joinville, p.178.

[3] Joinville, p.267.

[4] Tschanz, David. 'History's Hinge: 'Ain Jalut', *Saudi Aramco World*, July/August 2007, p.24.

[5] 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也称小亚细亚或新亚美尼亚。中世纪中期，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古亚美尼亚王国地区（外高加索地区），部分亚美尼亚人逃亡到奇里乞亚（今土耳其东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了新的亚美尼亚国家。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是欧洲十字军的重要盟友，自视基督教在东方的堡垒，通过与后者的交流，吸收了很多西方元素，包括服饰、法语头衔、若干法语词汇和西欧式的封建制度。

[6] *Crusader Syria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Rothelin Continuum of the History of William of Tyre with Part of the Eracles of Acre Text*, ed. and trans. Janet Shirley, Aldershot, 1999, p.117.

[7] Jackson, Peter. 'The Crisis in the Holy Land in 1260',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95, no.376, 1980, p.495.

[8] 在希腊神话里是地狱的代名词。

[9] Mathew Paris, vol.3, p.251.

[10] Jackson, Peter. 'The Crisis in the Holy Land in 1260',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95, no.376, 1980, p.505.

[11] Tschanz, David. 'History's Hinge: 'Ain Jalut'', *Saudi Aramco World*, July/August 2007, p.24.

[12] Thorau, Peter. *The Lion of Egypt*, London, 1992, p.76.

[13] Amitai-Preiss, Reuven. *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anid War, 1260-1281*, Cambridge, 1995, p.41.

第四章 埃及狮王

1260—1269年



一百五十年以来，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在面对蛮不讲理闯入巴勒斯坦海岸的法兰克人时，由于内部的四分五裂而无法团结一致，除了萨拉丁统治的时期算是少见的例外。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可能谈论过圣战，但只是嘴上说说，少有实践，而与欧洲进行长途贸易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却凌驾于任何想要结成统一战线进行圣战的号召之上。更有甚者，十字军国家早已在大体上被吸纳进联盟与调停模式之内，这种模式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大行其道。随着拜巴尔及其所属的来自亚洲大草原上的突厥民族的横空出世，世道也随之改变。

拜巴尔属于皈依伊斯兰教的第一代突厥人，他曾在曼苏拉浴血奋战，救埃及于水火。在1260年10月返回这个国家时，他带来了更强硬的意识形态：恪守他对一位正统逊尼派哈里发的承诺，将埃及与叙利亚统

一在战争的大旗之下。随着蒙古人带来的毁灭，伊斯兰世界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现在开始团结穆斯林民众，力抗东方与西方的劲敌——蒙古人和法兰克人。他心无旁骛、独断专行且又如同苦行僧一般打造出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

他抵达开罗后所遭遇的是一片惊恐不安。这座城市的人民原本期待看到忽都斯在一场高奏凯歌的队列中入城，不想却面对了新一轮腥风血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丹之位再次易手。对于正统的伊斯兰世界来说，突厥人是外来者——潜在的篡位者——而拜巴尔正是通过暗箭伤人和操纵选举而上位的。这里的人民胆战心惊，唯恐一切又回到13世纪50年代，马穆鲁克在那时给开罗街头带来了混乱、暴力和恐惧。拜巴尔迅速行动起来以平复他们的疑惧。他减税降费，并着手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合法的逊尼派统治者形象——萨拉丁和阿尤布王朝的继承人。他上马虔诚的宗教工程——兴建清真寺、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在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他修复了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Dome of the Rock）清真寺和阿克萨（al-Aqsa）清真寺，以及开罗荒废已久的大阿扎尔（al-Azhar）清真寺，并认真地培养宗教阶层。他目光远大，同时又冷酷无情。他采取手段使自己在刺杀事件中的同谋被边缘化，拆除了忽都斯的陵墓以防那里成为圣地。他通过文字和图像向世人的心中投射自己的个人崇拜。他的纹章符号即狮子，出现在硬币上和公共建筑——大门、堡垒和桥梁——的正面。这头狮子举起右爪，作势欲扑，或者是做出用爪子碾碎一只受困老鼠的举动，而老鼠喻示伊斯兰教的敌人。

拜巴尔扮演起一位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领导者的角色，恢复了逊尼派哈里发的世代相传；末代哈里发已经在巴格达被杀，但拜巴尔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他的一位后代，并向其宣誓效忠。这位哈里发也投桃报李，在庄严的仪式上册封拜巴尔为普世苏丹。头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黑色头巾，身着紫罗兰色长袍，被受赠旗帜、宝剑和盾牌，拜巴尔承诺要征收公正的税负，重塑哈里发的古老荣耀，并发起圣战。在当时阿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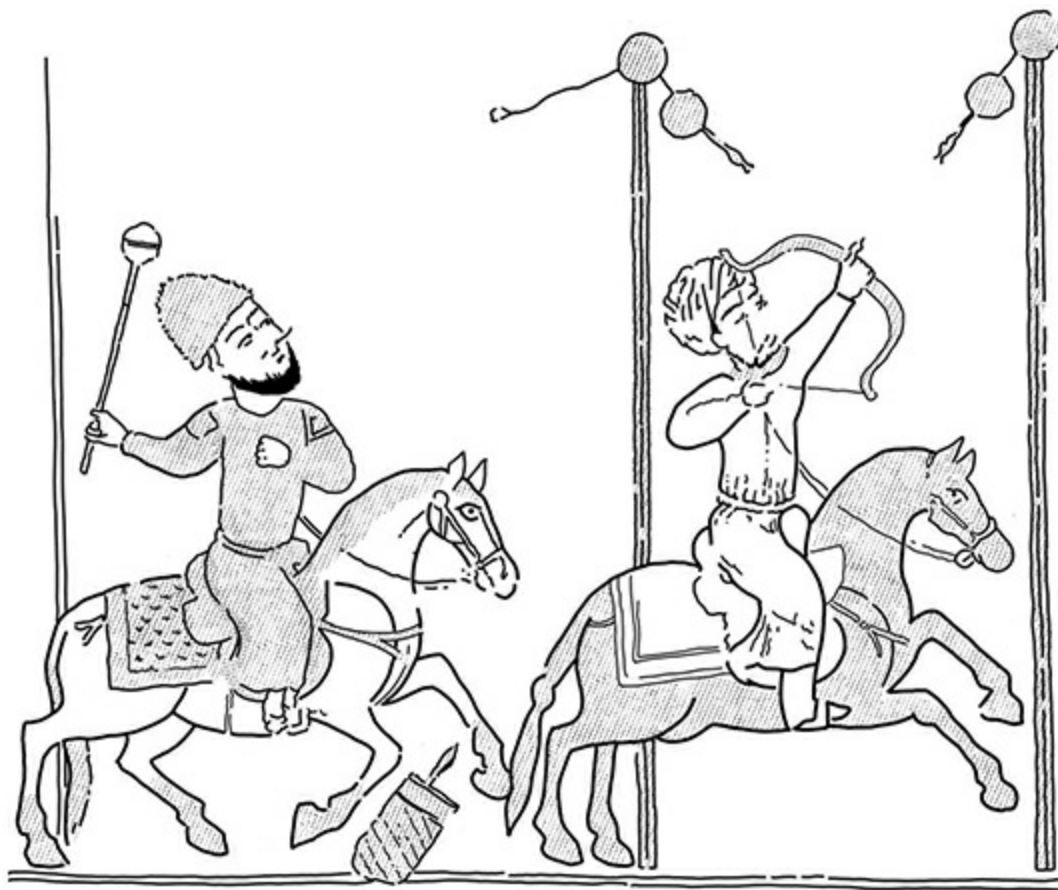
伯历史学家的笔下被称为突厥苏丹国的政权也因此被赋予了合法性。不久之后，这位哈里发便受到怂恿，带上一支小部队开始了收复巴格达的自杀性使命，结果很快就被蒙古人不费吹灰之力地消灭。接任的哈里发实际上是一个傀儡，而后哈里发的延续便将渐渐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传承融为一体。

建设一个军事化强国是拜巴尔的头等要务，他雷厉风行地进行着这项工作。第一步是加强埃及的防卫。此前路易九世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令人刻骨铭心，沿海要塞、瞭望塔楼以及疏浚体系都破土动工，以确保尼罗河有充足的防御工事，而下一步就是将大马士革以及其他城市被蒙古人夷平的城墙重新修建好。充实马穆鲁克军团少不了军事奴隶的输入，这就需要来自黑海那边的定期船运；从13世纪60年代起，身为基督徒的热那亚人承担起这项任务，他们所提供的这些人力资源将注定在今后岁月里与他们的教友为敌。

与此同时，拜巴尔着手对军队进行结构性改革。奴隶身份的马穆鲁克说的是突厥语，主要在他们的军官指挥下行动，以本族语言交流。拜巴尔建立起一支由大约4000名马穆鲁克武士组成的核心部队，其中的一些是他直接管辖的精英部队，其他的则由他手下的埃米尔统领。另外还有一支出身自由民的骑兵部队。与这些部队并肩作战的就是步兵，主要来自叙利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训练不足的志愿兵。尽管他的敌人经常高估马穆鲁克军队的总体规模，拜巴尔还是能够为特定的战役行动召集起多达4万名作战人员的部队。

此外，他还悉心培育军事训练机构，新建了两座练兵场（maydans）^[1]，用作士兵们练习军事技能和增强身体素质的竞技训练场地。马穆鲁克在这里练习射箭、击剑以及使用狼牙棒和骑兵长矛进行战斗等科目，还有格斗和模拟骑兵决斗训练——尤其是对短轴距、弯曲性好的复合弓的运用——无论是下马还是在马背上。训练有素的弓箭手

应该具备在1.5秒的时间内射出3箭，并在70米远处射中1米宽的目标的能力。马穆鲁克还使用了数目繁多的燃烧类武器，并且在射击比赛中训练他们的骑兵。在训练过程中，马背上的机动动作将这些武器的运用包括在内，以提高骑手的技能并使他们的坐骑养成不受噪音和火焰惊扰的性情。



马穆鲁克骑兵训练：一名骑兵挥舞着狼牙棒，另一名骑兵在策马狂奔中瞄准一个目标

为了统一埃及和叙利亚，拜巴尔开始系统性地削弱或摧毁独立的阿尤布小诸侯，并通过一个非凡的通信网络将他的苏丹国最远处连接在一起。他建立了一个高效的邮政系统，包括快马骑手、中继驿站、配套服务和烽火信号塔，并架设桥梁为部队调遣和信使往来提速。情报搜集工作是他进行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他总是以快速反应的能力让对手大

吃一惊。他的驿使直接向他报告，待遇优厚。他们从大马士革向开罗传递信息，信使能够在四天之内走完600英里的行程。只有他本人才能开启并阅读这些信件，无论白天黑夜他会第一时间予以回复。有一次，旁人观察到“当他还在帐篷里沐浴的时候，从大马士革来的信使刚好抵达。苏丹没作片刻等待，也没有给自己寻找衣物来遮蔽裸露身体的时间，就已将这封信读完”。^[2]四天之后他的回信便已传递回大马士革。

拜巴尔既是苏丹又是军事统帅，他夙兴夜寐，朝乾夕惕。纵观其十七年的统治生涯，他从马鞍上治天下，驰骋7万英里，历经大小38场战役，其中21场是与法兰克人对决。甚至在严冬时节，他也能兴兵作战。他行事诡秘，就连麾下最忠诚的埃米尔也因其变幻莫测的行踪而烦恼不安；他隐姓埋名，在自己治下的城市街头微服私访；他守口如瓶，出师讨伐从不提前泄露目标。出奇用诈是他作战的制胜法宝。如果说作为一个突厥血统的篡位者，他要与本土民众保持距离、高高在上的话，他手下的埃米尔也感觉到他们被时刻监视，他的敌人也会一直猜测。停火协议从来都只能暂行一时，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就变为一张废纸。这样一位躁动难安、精力充沛、控制欲极强的人物，对忠勇虔诚之士不吝赏赐，同时又大兴酷刑、杀一儆百——刺瞎双目、钉尸十字架以及腰斩——营造恐怖气氛，驯服官吏平民。

外部威胁是独裁统治的正当性理由；拜巴尔的政策全部都是以与蒙古人和法兰克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为架构而制定的。安条克和亚美尼亚帮助蒙古人的举动引导他认定所有基督教王国都是敌人，而且他对西方发动新一轮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保持警惕。蒙古人入侵的威胁在1260年后迫在眉睫、令人忧虑，但是由旭烈兀发起的大规模入侵从未发生。蒙古帝国已经扩张到其地理极限，开始分化离散。旭烈兀作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的大汗，与其邻近的蒙古汗国，也就是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大汗别儿哥（Berke）一直不和，后者作为一位伊斯兰教皈依者，因为巴格达毁于蒙古人之手而大发雷霆。到了1263

年，两个汗国正式开战。拜巴尔得以与别儿哥汗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从而将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威胁消弭于无形。拜巴尔放眼西方，他注意到罗马教廷正在向蒙古人提出外交建议，于是他也与教皇的对头——西西里的统治者霍亨施陶芬家族（the Hohenstaufens）——殷勤往来，随后又与霍亨施陶芬的敌人拜占庭皇帝建立联系，因为运载来自黑海的军事奴隶的货船不得经过后者控制的水域。

到1263年为止，拜巴尔已经巩固了他作为埃及和叙利亚苏丹的地位，并且让军队做好了对法兰克人采取行动的准备。训练、士气和纪律至关重要。他命令士兵们必须确保自己的装备齐全：每个人都负责自备盔甲。大马士革的武器市场空前繁荣。为了确认自己的命令得到服从，拜巴尔举行了一场检阅，让麾下军队的各团组在自己面前鱼贯而过，以确保士兵们没有交换装备。在这些军事动员中，圣战精神尤为突出，话语口号毫不妥协：这些部队收到命令，“要消除所有回避圣战的借口”。^[3]他禁止酿造和饮用啤酒，并且威胁要将那些胆敢酗酒的作奸犯科之徒吊死。

然后拜巴尔开始了一系列打打停停的作战行动，震慑敌对势力并削弱十字军在萨拉丁统治时期幸存下来的零星领土（雅法、凯撒利亚、阿卡 and 的黎波里），但是他的怒火直指安条克和的黎波里的统治者博希蒙德六世，以及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蒙古人。拜巴尔发起的是非对称战争——一种围城战与袭扰战的奇怪结合体。他的军队会突然出现，在城郊乡间大肆破坏，在城堡墙外举旗炫耀一番然后又迅速消失。他运用这些战术来施加政治压力，胁迫敌人同意有利于己方的条约和妥协条件，以及给敌方造成经济损失。目标总是被隐藏起来，动机也秘而不宣。蒙古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正当理由。几乎每年都有他们越过幼发拉底河入侵的传言，造成一片风声鹤唳，不过传言却很少成为现实。但为了安全无虞，叙利亚北部的牧场被定期焚烧，不给蒙古骑兵留下因粮于敌的机会。蒙古人将一无所得。他们的威胁使得攻击十字

军国家既合情理，又势在必行。

拜巴尔对黎凡特地区贸易的优势不屑一顾，尽管正是这些好处诱使阿尤布王朝与法兰克人合作。他采取鼓励措施将贸易路线重新导向埃及。在此期间，尽管穆斯林在加沙以北的地中海海岸上没有任何港口，但他想方设法使一些法兰克人控制的港口为自己所用。当法兰克势力沿岸港市中最靠南的雅法向他屈服时，他利用这座港口进口谷物以救济饥荒。当其不再被需要时，雅法就被摧毁了。在一些地区，阿尤布王朝曾明确地将当地基督徒视作受保护的少数群体，如今较大程度上的排斥心理却普遍存在。拜巴尔没有忘记大马士革陷落于蒙古人之手时基督徒们的庆祝活动。他采取了带有惩罚性质的行动，封锁了去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拿撒勒的圣玛丽（St Mary）教堂被认为是天使报喜（Annunciation）^[4]的原址，地位尊崇，拜巴尔命令他的部队将其夷为平地。

他施诸阿卡的压力使得十字军诸王国愈发惊恐，他在前往阿音扎鲁特的途中曾秘密进城侦察，如今这座城市频繁受到他的光顾。1263年4月，他的军队突然于城外出现并攻击了该城的一些外围防御工事。激烈的战斗迫使守军回撤。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留下了一段生动却可能有所偏袒的描述：

法兰克人溃不成军地撤向阿卡，穆斯林将周围的塔楼和城墙焚毁，砍倒树木并将其果实烧尽，除了烟雾滚滚、尘土灰云、刀光剑影和矛尖闪耀之外，什么都看不到。穆斯林大军纵马驰向阿卡城门，追杀掳俘……剩余的法兰克人在那时匆忙赶往城墙各处的城门并守卫它们。他们所有人都在一起大喊进攻“关上城门！关上城门！”，生怕下一波进攻降临在自己身上。与此同时，苏丹正站在泰尔山（Tell，附近的一座山丘）的最高点面向阿卡一侧，分赐礼品、封官许愿。^[5]

然后，正如来得突然一样，拜巴尔撤得也突然。这并不是一种以占领城市来发动联合攻击的企图，而更像是一种弱化策略，扰乱农业作业，使对手处于紧张状态。每当他的军队有所移动，焦虑便开始在海外之地扩散。阿卡几乎年年都受到这种方式的袭击，它的果园产业被连根拔起，粮食作物也被焚烧殆尽。拜巴尔1265年重返阿卡，1266年再一次出现在附近。1267年5月，他的军队悬挂着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旗帜，通过骗术一路直驱城门。他将还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打了个措手不及，捕捉并杀害了其中的500余人。1269年他又来了一次。

这类袭击往往是转移注意力的插曲，旨在分散敌军兵力，为更重要的针对十字军城堡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服务。1266年奔袭阿卡只不过是那一年为数不少的佯攻之一。拜巴尔拥有的军事资源使他有能力同时派出突击部队，对推罗、西顿和条顿骑士团位于蒙福尔的城堡发动攻击，在基督徒守军的眼中布下迷阵，而他的主力军队则在此期间围攻采法特的圣殿骑士团城堡。类似这种袭扰，的黎波里和安条克在13世纪60年代都各自经历了三次。1270年，医院骑士团的要塞骑士堡（*Krak des Chevaliers*）^[6]，即十字军时代以来所修建的最强大的城堡，由于其外围农业经济区域被毁弃而大为弱化。拜巴尔正在烧掉最后的十字军国家的经济基础。阿卡的农业用地所遭受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穆斯林作家被迫为这种破坏寻找宗教方面的正当理由。在的黎波里的周边地区，他摧毁了历史可以上溯至罗马帝国时代的灌溉管道和引水渠。这种毁坏良田沃土的焦土战略抑制了敌国发展，使其士气低落、经济凋敝，给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沿海地带留下的创伤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法兰克人无法自救。由于没有能力投入足够的兵力，他们不敢冒险进行野战，于是便诉诸以牙还牙的反击战——既缺乏战略前瞻，又不能协同一致。在1263年的袭击战过后，双方勉强达成停火协议。这并没有阻止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在两个月后发起新一轮突袭。随后不久，一小队急于有所作为的法国部队抵达阿卡。他们立

刻就袭击了附近的穆斯林村落，抢掠平民家畜，火烧民居。拜巴尔是带着战略意图执行这些战术的，而基督徒这些互不协调的盲动除了释放压抑已久的挫败感之外，毫无清晰目的可言，只会疏远当地的穆斯林民众并激怒拜巴尔。

十字军诸国根本没有能力采取联合行动。每个国家都与马穆鲁克签订零散的协议，以求喘息片刻，往往还得接受不利条款。当阿卡试图与拜巴尔安排交换俘虏时，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再次双双拒绝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持有的俘虏都是熟练的工匠，如若交换则代价太过高昂。这种行为使他们招致基督教同袍越来越多的非议，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他们本应当执行这次交换，看在上帝的分上，理应拯救那些可怜的基督徒奴隶”^[7]——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严厉的批评意见。但是如果事关己方内陆城堡的周边领土控制权，骑士团与拜巴尔达成各自协议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而法兰克贵族们却也有能力做出破坏这种协议的鲁莽之举。所有这一切使得突厥苏丹国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拜巴尔自命为逊尼派苏丹和解放者的合法性。

然而，基于实力的话语要比外交上的巧舌如簧更为响亮。拜巴尔对于自己开出的条件可以随意挑选。1267年他拒绝了阿卡的停战提议，而此时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却签订了一份含羞忍辱的协议，以十年为期，换取对方不再进犯他们在黎巴嫩的城堡，而苏丹则有权在他乐意的时候废止这项协议。拜巴尔经常以微小的技术性违约或仅仅是未经证实的指控为由，取消与法兰克诸国签订的停战协议。

对于拜巴尔来说，地中海沿岸的法兰克人定居点在战略上意义重大。它们威胁着从开罗到大马士革的直接路线并且占据了最好的农业用地。一连串的城堡坐落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北部的群山之上，居高临下地主宰着这片地区。从那里它们控制着周边领土，然而现在它们再也无法构成一套连贯的防御体系；相反，它们不过是由各自为政的

封地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而这些封地又归属于各大军事修会和法兰克贵族。随着十字军对领土的控制力因萨拉丁发起的一系列战役而减弱，这些城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哈丁发生的灾难使法兰克人的热情骤减，他们不愿与穆斯林军队在大规模野战中较量。在13世纪，军事修会日渐成为唯一拥有资源进行大规模兴建或改造城堡的实体。它们投入重金、煞费苦心，以营造出精密复杂的同心圆式堡垒群，其防御特点是将进攻一方暴露在密集的反击火力之下，减缓工兵和攻城武器的运作速度。在阿卡的南面，圣殿骑士团在高耸于海面的一处海岬上建造了坚不可摧的多面堡群——朝圣者城堡（Chateau Pèlerin）；在山谷上方180米处一个难以接近的断崖之上，条顿骑士团的总部——蒙福尔城堡拔地而起；在叙利亚北部，医院骑士团在一次地震后将骑士堡改造成海外之地最难以对付的城堡。这些要塞群弥补了人手的不足，并允许小股守军支配周边地域，震慑当地居民和可能的攻击者。

这些城堡的弱点在于拜巴尔的消耗战使它们日益孤立。现在，随着埃及与叙利亚的重新统一，以及拜巴尔的军队较高的战备程度，苏丹感觉可以腾出手来认真对付这些分离的封地以及它们的城堡。马穆鲁克的传统战斗技巧是以骑兵战术起家，但是从1265年起，他们有效利用了攻坚战的技术，并最终借助这些技术将法兰克人驱逐出圣地。他们继承了早期伊斯兰王朝的攻城技术，但是在拜巴尔的领导下，他们培养出运用复杂技术和满足后勤需求的能力，能够包围并且攻取要塞，而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从1265年秋季开始一直持续到1271年的一系列攻城战，摧毁了十字军国家大部分的军事实力。

开战的借口源于蒙古人扬言要进攻叙利亚北部。随着拜巴尔紧急召集军队去拦截并袭扰蒙古侵略者——这一过程因其便捷的信使网络而加快——他认为法兰克人现在已从他当初进军阿音扎鲁特时的中立立场转变，向蒙古人通风报信，泄露了马穆鲁克骑兵因季节缘故而分散各处的情报。快速动员阻止了蒙古人的大规模进犯，但是这件事给一直密切观

察对手动向的拜巴尔敲响了警钟，使他注意到了（法兰克人与蒙古人）结盟的危险。他给雅法的司厩长（Constable）^[8]写信，抱怨法兰克领导者们“犯下了诸多错误，有负于我，例如他们写信唆使蒙古人进攻我的领土”。^[9]

拜巴尔的第一批目标是巴勒斯坦南部海岸线上的两座城市：凯撒利亚和阿苏夫。马穆鲁克将诸多资源和手段引入与十字军的战争之中，这些资源和手段在他的运用下大显身手：布设骗局、罔顾条约、专精技术、深谋远虑、鼓吹圣战以及压倒性的人力资源。他以举办猎狮活动为幌子，侦察了这两座城市的防御工事。与此同时，他开始就地砍伐树木以提供制作攻城武器所需的木料，下令让一支由熟练的石匠、地道挖掘工和工程师组成的工兵部队开赴前线。石弹已准备齐全，之前集结好的部队也投入制作云梯的工作中。由预制构件组成的攻城器械也在大马士革赶工，这些器械在完工后可以被拆解并由驼队运输或人员携带。

2月27日，拜巴尔的军队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凯撒利亚的城门前，将其团团围住并发起进攻。历史记载对苏丹本人亲自参加战斗的行为不吝溢美之词：军队的士气需要苏丹出现在能被看得到的地方。凯撒利亚的居民完全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外部城墙的占领显然是巧妙的即兴之作，而云梯则没派上用场。如同登山者将岩钉敲入山体的岩壁一样，“通过使用铁质的马掌钉、拴链和缰绳攀附在城墙上，他们从四面八方爬上城墙并在那里竖起他们的旗帜。城门被焚毁，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也被破坏殆尽”。^[10]凯撒利亚在一周后投降，幸存者乘船驶向阿卡。拜巴尔随即着手将这座城市彻底摧毁；同时，他派出突袭部队不断袭扰阿卡（以及其他各处），以分散基督徒的兵力并阻止可能的救援。当一个基督徒代表团被派来质询这次攻击的原因时，他们受到的热情接待打消了他们的疑虑，而苏丹却静悄悄地准备着下一步行动。

3月19日，拜巴尔离开了凯撒利亚。两天后他的军队再次出人意料

地出现在南面25英里海岸处的设防城市阿苏夫附近。对于拜巴尔来说，一纸协定只不过在他想使之成为协定的时候才有效。1263年，他曾向医院骑士团抱怨对方强化阿苏夫防御力量的行为破坏了双方的协议。为了平息其怒火，医院骑士团遣使向他奉上礼物，从而得到这座城市不会遭到攻击的保证。而现在阿苏夫却遭到了攻击。

阿苏夫固若金汤，守军坚决抵抗，但是继而发生的攻坚战反映出双方在数量上的不对称，以及马穆鲁克所能动用的技术和资源日新月异。熟练的工兵进行了大量的坑道作业和壕沟挖掘工作，尽管医院骑士团采取了同样专业的反制措施——点燃成桶的油脂并借助风箱使火势更旺以摧毁这些地道——但是围攻工程的规模之大使得攻方最终破坏了外部城墙的根基。马穆鲁克在阿苏夫城前部署了各式各样的投射——抛掷类炮兵，弩炮的轰炸强度相当可观。据说拜巴尔也亲自拉下了发射石弹的炮绳。宗教狂热则成为马穆鲁克动员和承诺的特征的另外一个因素。士兵们公开祷告，而拜巴尔本人也有一座随行的帐篷式清真寺。在拜巴尔的请求下，一个“由虔诚信徒、苦行者、法律学者和贫苦苏菲教徒”^[11]组成的宗教团队出现在前线，以鼓舞将士们奋勇杀敌，为圣战献身。拜巴尔本人一直身处临近战斗的地方：

他时而.....屈尊于战壕，时而冲锋在（敌人防线上）被撕开的缺口处，时而在岸边拉下投石机的炮绳并向法兰克人的船只开火.....他会爬上掩体的上端以便从那里射击，向所有人展示他所扮演的角色，命令他们发挥出自身力量，感谢那些值得赞赏的将士，并将象征荣誉的战袍授予那些做出功勋行为的优秀人才.....^[12]

苏丹在阿苏夫城前的身先士卒，他所展现出的精力和个人勇气，在随后进行的战役行动中鼓舞了士气并提供了动力。

准备好最后的总攻——冲击城墙、夺取外城，然后以狂暴的弩炮轰

击和漫天箭雨迫使内城城堡屈服——用去了五周时间。4月29日，城堡的外堡场由于地道破坏或是轰击所致而崩塌。拜巴尔提出了保证守军生命的劝降条件，守军接受了。他们无法通过海路逃离：港口太小并且位于拜巴尔炮兵的火力射程之内。与凯撒利亚的遭遇一样，这座历史可追溯至古典时期的城市被拆毁，此后再未有人定居。

5月29日，拜巴尔在一场入城仪式中进入开罗。在他的队列里，阿苏夫的法兰克俘虏们也一同随行，他们脖子上挂着破碎的十字架，他们的旗帜也被倒转过来。而后，拜巴尔不失时机地对这次征服的宣传价值大加利用。对于雅法领主让·德·伊贝林（Jean d'Ibelin）而言，十字军贵族们很快就会熟悉这种气势汹汹的恫吓：

我们绝不容忍任何压迫：如果有人侵占了（我们的）一块土地，我们会占领一座巍峨的城堡来代替这块土地，而如果掳走我们任意一个农民，我们会抓来一千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如果他们毁坏了一座房屋的墙壁，我们会摧毁数座城市的城墙。仗剑在手，杀伐由我；持辔在握，驭马由缰。一手割敌颈，一手潜门廊（宫阙之内）。（与我）妄起边衅者必先有自知之明；贪（我）厚利者终将自食苦果（比如灾祸缠身）。^[13]

阿苏夫之战中两方的数量对比极不匹配。守军所能召集的力量不过270名训练有素的医院骑士团骑士，再加上一些辅助部队以及市民们的从旁协助；而拜巴尔可以动用成千上万的兵力，除了那些熟练于制造和操作弩炮的专家之外，他的部队里还有工程师、石匠、地道挖掘工、木匠以及所有的后勤支援兵种。然而阿苏夫是一个防守严密的据点，入口处因其临海的位置而受到限制，并且由胸中有数的士兵把守。法兰克人对其高度精密的要塞化防御寄予厚望，以弥补人手短缺的劣势。但这些被证明还是不够的。

阿苏夫一战证明，马穆鲁克已经迅速掌握并完善了攻城技艺的各类要素。这一场围城战是随后海外之地所遭受的连续打击的原型，其中采用的各项策略屡试不爽：隐藏实力、缜密的作战计划和后勤部署、宗教动员、鼓舞人心以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领导力，集中优势兵力，坑道作业与炮兵轰炸的有机结合，以及狂风暴雨般的快速猛击。在不可避免的形势下，这些围城战通常以守军投降告终，而很少会发生全方位进攻和大屠杀。拆除可能为新的十字军东征计划提供滩头堡的海岸设施已成为标准做法。迷惑性突袭和经济战是拜巴尔在其一系列战役中祭出的一大利器。孤立并分割出防守牢固的城堡，将其一个接一个地拔除则是另一大利器。在随后几年，拜巴尔步步紧逼，将法兰克诸国逼上绝路，而这两大撒手锏将一直发挥作用，直到1291年阿卡城墙前的决战。

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拜巴尔在他的一系列尊号中加上了“蒙古人与法兰克人的克星”^[14]这一称号。铭文中将他颂扬为当代的亚历山大，“战无不胜的君主，世界与宗教的柱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苏丹，异教徒和多神论教徒的杀手，叛徒与异端的驯服者，两个世界^[15]中正义的复兴者”。^[16]

次年，也就是1266年春季，拜巴尔开始了他的下一场战役，大肆蹂躏的黎波里周边地区并出现在阿卡、推罗和西顿的城墙之外。然而这些袭扰不过是意图吓阻和迷惑敌军的次要行动，他的真正目标是圣殿骑士团的采法特城堡。这座城堡是基督徒在巴勒斯坦内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而且其战略位置威胁到大马士革的交通线。在一个通常适用于基督徒要塞和城市的比喻中，它“对于叙利亚来说犹如肿块在喉，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更是梗阻在胸”。^[17]与此同时，拜巴尔还忙于建造跨越约旦河的桥梁以改善帝国境内的交通状况。这种袭掠模式起到了分散和惊扰敌军的效果，甚至他自己的指挥官们也晕头转向——他们随身携带着密封好的命令，对他的目标一无所知，直到最后一刻——在此期间，准备围城器械的工作也在大马士革紧密进行。当他突然抵达采法特城墙之外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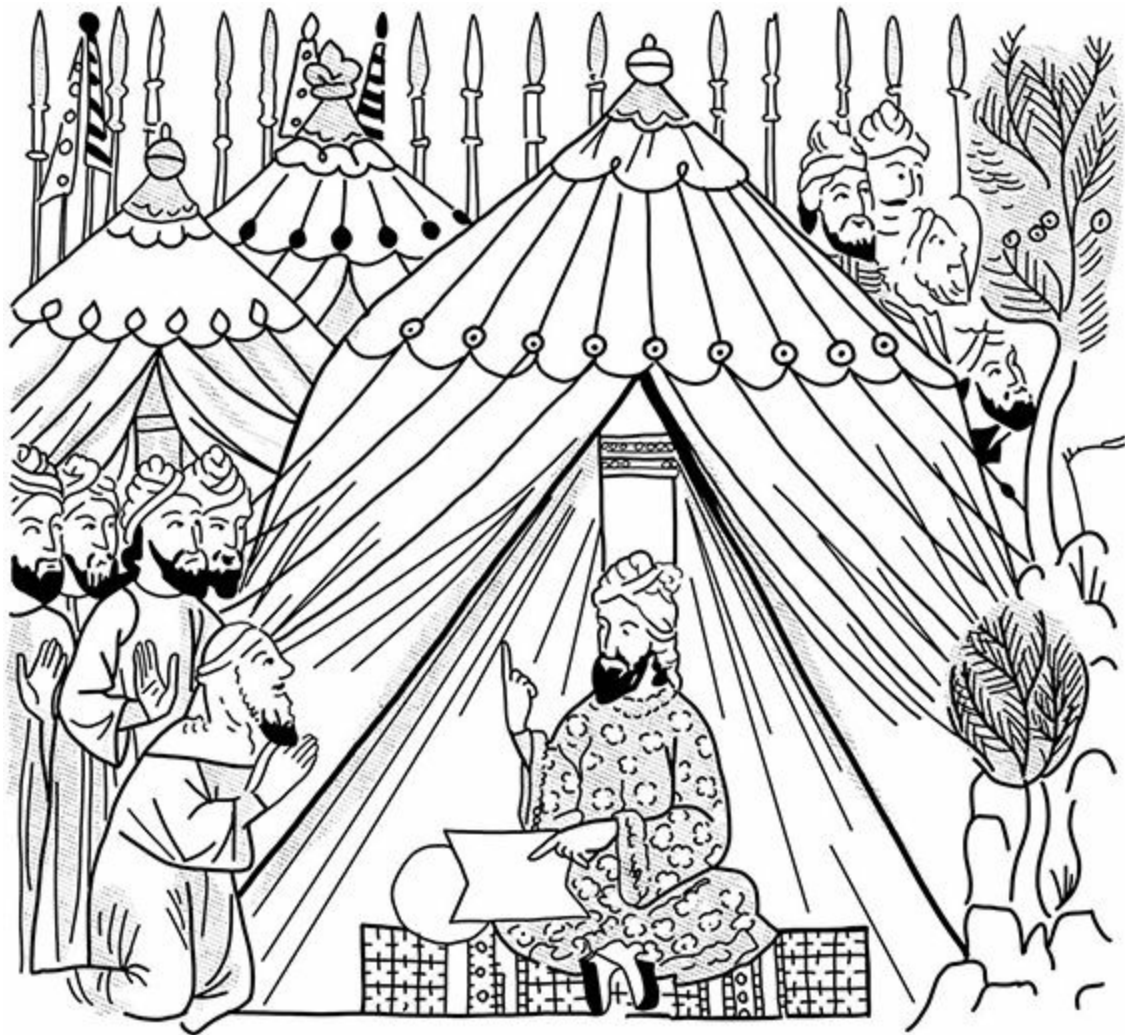
一大批来自其他被抢劫地方的使节也迅速出现，寻求缔结协议并献上礼品。他们所有人都被打发走。推罗的统治者被指控违反条约，他的代表受到责备：“如果你希望我给予安全保障，那就把我的法兰克敌人从你们中间赶走。因为我们的誓言中有一条，那就是我的敌人就是你的敌人。”^[18]

围攻开始的时间被定在斋月禁食结束的开斋节当天。他的部队严格地执行着虔诚的宗教习俗：凡是喝酒庆祝的人都会被绞死。需要全心全意投入的热忱毫无商量余地可言。当第一次正面进攻在守军的坚决抵抗下失败后，拜巴尔以未竟全力的罪名将手下的四十名埃米尔关了临时禁闭。攻陷阿苏夫的围城技术渐渐发挥出威力，然后，他的军队突破外墙，守军撤入内城城堡并试图交涉投降条件。结局以带有争议的不同版本呈现——或是拜巴尔再次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毁约，或是基督徒打破了自己的誓言。

守军原以为他们已经协商好了安全通行的协议，然而他们却被关押起来，原因是拜巴尔宣称他们因试图携带藏匿的武器离开而违反了协议。很明显，在十字军时代，穆斯林对各大军事修会深恶痛绝。圣殿骑士团的士兵们被押往附近的一座小山，那里是他们之前处决穆斯林囚徒的地方，然后全部1500人都被斩首。根据基督徒编年史家的记载，他们的遗体被留在那里作为一个冷酷的警告：“他在这些遗体周围建起一道围墙，他们的遗骨和头颅也许仍然能被看见。”^[19]只有两个人幸存：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亚美尼亚人，正是他参与谈判达成了协议（也有可能是他与敌人串通导致了圣殿骑士们的悲惨命运）；另一个被送往阿卡作为人证，告诉那里的人们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拜巴尔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如果对方不肯无条件投降，就不留活口。与之前那些失陷后即被摧毁的沿海要塞的命运不同，拜巴尔分兵驻守采法特城堡并且对其加以改建，以守护通往叙利亚的道路。

1268年，拜巴尔的战役再度打响，使用的是同样的战术和动员方式。3月，他攻击了雅法，这座城市在其城主于1266年去世后变得脆弱不堪，陷入了灰飞烟灭的命运。4月，这回轮到了圣殿骑士团位于博福尔（Beaufort）的城堡，这座城堡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悬崖之上。两场战斗之间还穿插着对的黎波里和阿卡的袭扰。这些战役中的每一场不仅扫除了大量的防御建筑，还诱使其他的小堡垒自愿投降，随之而来的还有妥协让步、绥靖进贡以及包含对其居民或守军日益不利的条款中的新条约。

但是拜巴尔最猛烈的怒火还是倾泻在了安条克，其统治者博希蒙德六世与蒙古人结盟的旧账仍旧让他耿耿于怀。苏丹包围了这座人口密集的大城，其宽阔的外围大部分都有城墙保护。他要求全体居民每年都要上缴一个第纳尔（dinar）^[20]的人头税——这是一笔巨款，但还没有超出他们当年上缴给蒙古人的金额。考虑到其防守面极为宽广而守军人数却不充裕的劣势，安条克对这一要求的拒绝显得很不明智。拜巴尔下达了最后通牒。守军没有回应。1268年5月15日，他的军队突破城墙，攻占了这座城市。苏丹下令关闭所有城门以确保无人逃脱，然后便纵兵屠城并将其洗劫一空。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城里。没有被杀的人沦为奴隶，而这座城市的财富为他的战士们带来了丰厚的战利品。军队里的每个士兵都被赐予了一个奴隶；奴隶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市场上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奴隶价格也大幅下降。然后，大部分城区被付之一炬。



令人望而生畏的拜巴尔在他的帐篷里接见一位访客。从背景里，可以看得到他的军队长矛如林，军旗招展

安条克，一座在《圣经》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在十字军的记忆中具有标志性的地位。它曾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通向圣地的门户。在历时八个月的岁月里浴血奋战，在胜算概率很小的情况下苦守初心，十字军最终近乎奇迹般地占领了安条克，为夺取耶路撒冷铺平了道路。但它仅仅支撑了一天就失陷于拜巴尔之手。这次沦陷之后，安条克再未恢复过往日的荣光。随着它的失守，圣殿骑士团的前哨据点也被一一抛弃，只留下了位于拉塔基亚（Latakia）的一个沿海小港。法兰克人在叙利亚的势力土崩瓦解。

博希蒙德六世在洗劫之日恰好离开了自己的首都，他后来收到拜巴尔的一封信，祝贺他苟全性命。信中极尽嘲讽之能事，夹杂着恐吓与炫耀之词，勾勒出一幅幅末世劫难降临在异教徒身上的图像：

我们在斋月的第四个星期六（5月19日）的第四个时辰，用刀剑夺取了这座城市。所有你精心挑选用来守卫和保护这座城市的人都被我们杀死了.....你可以看见你的骑兵被扔在马的两腿之间（遭受胯下之辱），房屋在烧杀抢掠的淫威下呻吟.....你的财产以百公斤（qintar）^[21]计，你的女人们以四人一组被卖到市场，然后从你自己的财产里出钱，以一个第纳尔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手。

如果看到你的教堂里十字架被破坏得支离破碎，伪经被撕剥得书页尽散，宗主教们的坟墓被盗抢得惨不忍睹，圣殿被你的穆斯林敌人践踏蹂躏；如果看到圣坛上被宰杀献祭的修士、牧师和执事.....如果看到火海在你的城堡中燃烧蔓延，死者的躯壳被尘世的烈焰吞噬，你的宫殿楼宇在变换形状，.....教堂.....摇摇欲坠，最终坍塌成一片废墟——如果你把这些一一收入眼中，你应该会说：“我要是一抔尘土就好了。”.....

那么，这封信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帝恩赐给你的性命苟全了，你的阳寿也得以延长了，因为此时你不在安条克.....苟且偷生之徒看到死者时会庆幸自己的性命得以保全。也许你对过去亏欠上苍的顺服和奉献有所弥补，上帝可能是看在这个分上准许你晚点儿上路.....既然没有人逃出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我们只好代劳。^[22]

到了13世纪60年代末，拜巴尔可以暂停一下他的战役行动了。马穆鲁克的黄色旗帜在一座又一座被攻占的城堡上空升起，但是这些胜利也来之不易。无论是冰冷雨天还是夏日酷暑，苏丹仍然一往无前，将自己

的战役进行到底。1268年，在初春的大雪中翻越黎巴嫩群山时，据记载，他的军队“除了雪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食物），他们不光自己吃雪，喂给自己坐骑的也是雪”。^[23]拜巴尔后来向其恨之入骨的博希蒙德六世吹嘘说，没有一处十字军堡垒能让他无法部署攻城炮兵，没有一个季节能让他无法进行作战。他描述了1271年为进攻黎巴嫩北部由十字军把守的阿克尔（Akkar）城堡时是如何作战的：

我们将投石机运过高山，那里的地势险峻到飞鸟都认为难以筑巢；我们在拖拽这些器械时是如此小心，在一片泥泞中艰难行进，在大雨滂沱中奋力跋涉；我们将投石机设立在连蚂蚁路过都要打滑的位置；我们深入峡谷，如果阳光能够穿透出层层积云散射出一线光芒的话，那么视野之内除了悬崖峭壁之外无路可走。^[24]

尽管有所夸张，但围城战绝非易与之事，而是一个漫长而又可怕的过程，即便是埃及狮王对此也小心翼翼——他从来没有尝试过将攻城部队拖到阿卡城墙下。在伊斯兰世界几近崩溃之后，他的战役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一次只挑拣出一个敌人捶打是有必要的，最重要的是避免引起蒙古人与基督徒之间形成协调一致的同盟，或刺激欧洲发起一次新的大规模十字军东征。

1269年7月，拜巴尔前往麦加朝圣，他对此行严格保密，确保埃米尔中的异己分子不会发生叛乱。精心策划的行程安排隐瞒了他的离开，对外放出的风声是他去狩猎了。他的机密信使继续送信；他的回信也正常送出，如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当他在8月底从麦加返回时，他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大马士革，然后是阿勒颇。他的目的是让他的省区总督们时刻处于一种忐忑不安的恭顺状态中，意识到他一直在监视着他们，并且随时会出人意料地下令要他们汇报政务。

[1] 原文为maydan，但查无此词，疑为maidan（广场、空地的意思）的误写，在此根据语境将其译为“练兵场”。

[2] Thorau, Peter. *The Lion of Egypt*, London, 1992, p.105.

[3] Hillenbrand, Carol.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 1999, p.237.

[4] 在基督教典籍中指天使加百列奉告圣母玛利亚她将诞下圣子耶稣一事。

[5]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p.58.

[6] 当今世界上现存的最重要的中世纪城堡之一，被评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2013年在叙利亚战争中虽被多枚炮弹、炸弹直接命中，但主结构并未遭受严重破坏。

[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756.

[8] 司厩长的官职起源于罗马帝国，最初是管理马匹的官员，后来在中世纪欧洲演变成负责国王的军械保管及维护的官员，再后来变为军队的重要指挥官甚至总司令。这与中国古代的官职“司马”演变历程类似。

[9] Amitai-Preiss, Reuven. 'The Conquest of Arsuf by Baybar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9, no.1, 2005, p.68.

[10]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p.70.

[11] Amitai-Preiss, Reuven. 'The Conquest of Arsuf by Baybar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9, no.1, 2005, p.73.

[12]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p.75.

[13]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pp.77-8.

[14]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p.78.

[15] 指的是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

[16] Hillenbrand, Carol.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 1999, p.230.

[17] Hillenbrand, Carol.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 1999, p.231.

[18]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pp.89-90.

[19]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764

[20] 源于罗马帝国的一种被称为Denarius的银币，随后其演变为金币的含义。

[21] 原文qintar疑为quintal（公担，公制重量单位，相当于100公斤）的变体。

[22]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pp.123-5.

[23]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p.116.

[24]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p.148.

第五章 小犬吠獒

1270—1288年



待到拜巴尔于1269年启程前去朝圣（Hajj）的时候，他已经沉重打击了十字军国家，把它们城堡一个接一个地拔掉，剥夺它们的财政收入和作物收成，破坏它们的农业腹地，使它们愈发依赖来自西方的资源。海外之地的贵族世家派系间的纷争以及意大利商人群体间的不和依然无止无休。很多人对最终崩溃的可能性视而不见，但对于那些意识到政治和军事现实的人来说，他们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那些富有的军事修会因为要守护基督教的立足点而承受着日益沉重的负担，他们对于这种前景至少是持比较现实的态度。早在1261年，“如果王国沦陷”^[1]这种不吉利的限定语已经开始出现在他们关于财产和土地的契约中。

热那亚人在圣萨巴斯之战后被驱逐出阿卡，这进一步削弱了这座城市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而蒙古人的闯入使得商队路线改道至更远的北

方。它作为地中海世界里最富庶城市的光辉日子似乎就要到头了。阿卡城内官方权威的解体以及耶路撒冷王国内部的派系争斗，阻碍了这座城市对不断恶化的局势采取任何步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到了13世纪60年代中期，阿卡城内唯一拥有真正领导力的人是拥有耶路撒冷宗主教头衔的阿卡主教，他不仅是这座城市的精神领袖，实际上也是它的临时领主。教皇授予宗主教管辖王国事务的无限权力——只要所有公民和派系都服从教皇权威的话。作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他被授权去处理争辩不休的各个军事修会，拨款给部队并支出资金去修复要塞，制造用于战争的器械和交换俘虏。正是宗主教注定要在阿卡的终极危机中成为领导人物。

人们对拜巴尔终将带来灭顶之灾的警觉也开始渗透回欧洲。尽管教廷与霍亨施陶芬家族斗得难解难分，圣地日益严重的危机却不可避免，但内政足够稳定、能响应新的十字军号召的国家只有英格兰和法兰西。教皇的积极性断断续续，但全盘皆输的可能性还是促使克雷芒四世

（Clement IV）筹集资金并发出了组建新十字军的号召。法兰西的国王与他们讲法语的邻居——英格兰的历代国王（他们在法兰西也有土地）——之间的角力，形成了不断延续的十字军冒险的背景故事。双方都深受起源于法兰西的十字军传统的熏陶，但是狮心王理查与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之间的相互猜忌，使得十字军在1191年对阿卡的围攻战受到不利影响。当路易九世在1249年向尼罗河发起命途多舛的十字军东征时，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本已发誓前去参战，却未能成行，结果大失脸面；更严重的是，他违背了自己的神圣誓言。现在，本就对曼苏拉之败耿耿于怀并沉迷于耶路撒冷的金色梦想之中而无法自拔的亨利三世再次响应了号召。如果英格兰王室第二次未能履行承诺的话，其尴尬必将加倍。

响应号召的是亨利三世的长子——爱德华。这位英格兰王子已年近三十，金发碧眼，风度翩翩。他的绰号是“长腿”：以6英尺2英寸的身高笑傲当世，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男人的身高还不到5英尺6英寸。而且

他作为一名战士深谙骑士的侠义之道，并且在各类骑士比武大赛和模拟战斗中磨炼了自己的作战技巧。他的血液里沸腾着在圣地成就一番英雄事业的渴望——自从孩提时起他就对十字军的故事耳熟能详。狮心王理查是他的叔祖父；另外一位十字军战士康沃尔伯爵理查，是他的叔叔。他还将曾追随路易在曼苏拉作战的老一辈法国骑士们招纳到自己的侍从队伍。

爱德华也很早就积累了第一手的战争经验。他曾率领父王的军队在1265年的伊夫舍姆（Evesham）之战中与叛军头子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交手，在这场战斗中交战双方都将十字架标识缝到他们的外衣上。爱德华胜出，但他没有向企图投降的叛军贵族们索要赎金，而是在战场上将他们就地正法。在修道院和教堂里寻求庇护的人都被砍倒在祭坛上。此事被称作“伊夫舍姆谋杀案”^[2]——史无前例地违反了侠义之道。爱德华和他的骑士们可能感觉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参加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一场骑士的行侠仗义，更是对已有罪过的自我救赎。

1268年6月，在一场精心安排的仪式上，教皇派出的红衣主教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的圣墓（Holy Sepulchre）大教堂布道，号召仁人志士参加十字军东征，引起在场听众的共鸣。这座教堂是由一位参加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仿照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建成的。当日，爱德华和他的弟弟埃德蒙（Edmund）一同宣誓参加十字军，与他们一道起誓的还有数百位其他贵族及其追随者。在人群里有两位骑士注定将会在阿卡的命运中发挥领导作用。奥顿·德·格朗松（Othon de Grandson）时年30岁，仅比爱德华年长一岁，而且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格朗松出身于瑞士萨伏伊（Savoy）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而且他同样与十字军渊源颇深：他的祖父就是在圣地离世的。他为人可靠、英勇无畏且多才多艺，既是一名战士又是一位技巧娴熟的外交家，注定要为英格兰王室长年效力。他参加了爱德华在内战中的各大战役并且因功受

封骑士爵位和土地。另外一位骑士让·德·格拉伊（Jean de Grailly）也来自萨伏依，更为年长一些，是爱德华的谋臣之一；他也因可靠的服务受到了王子的封赏。

路易九世为他的第二次十字军所做的融资和组织工作的效率堪比第一次——他再一次展现出组织一次井然有序的战役行动所需要的官僚管理、情感激发和金融理财技巧。十字军运动耗费巨大。当爱德华发现组织起一支英格兰军团十分困难时，路易借给他1.7万英镑。很明显的是，忠诚的茹安维尔拒绝了这次邀请，不打算再与死神打交道。

即便准备工作仍旧是无可挑剔的，结果却还是不尽如人意。出于政治原因和错误的战略考虑，路易并未启程前往圣地，也没有重蹈尼罗河的覆辙，而是转向了突尼斯，因为他认为一旦占领了那里，就能打开通往埃及的门户。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国王和他的军队被痢疾击倒了。这次十字军东征陷入了僵局，不得不与对手签订和约，就此昙花一现。

1270年8月，路易在迦太基附近去世，据说他在临死前还低声说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3]尽管他的大多数士兵都返回了法兰西，部分远征军服从了他的这一命令并坐船驶向东方，但是舰队的大部分船只还是在西西里岛的一场风暴中沉没。只有英格兰王子爱德华的分队成功到达了圣地。

“长腿”于1271年5月率领一支小部队抵达阿卡，他的部队总人数大约1000人，其中有250名骑士。教士特奥巴尔多·维斯孔蒂（Teobaldo Visconti）也在他的部队里，在阿卡停留期间收到了他被选为教皇的消息。如果说有谁能对法兰克诸国的严峻形势有所了解的话，则非维斯孔蒂莫属；他在乘船离开前所做的最后一场布道里这样说道：“如果我忘记了你，啊耶路撒冷，那就让我的右手忘掉自己的技能！如果我记不起来你，那就让我的舌头粘在我的上颚。”^[4]从来没有教皇对海外之地的困境做出比这更深切的承诺。

十字军国家的政治和商业现实让爱德华大感震惊。他用自己的双眼就能看到：意大利商业共和国在阿卡港口的船只满载着武器、食品供给和马穆鲁克军队所需的奴隶资源，启程前往亚历山大港。连续好几任教皇反复宣布这些贸易属于非法行为并威胁要施以绝罚；1202年，英诺森三世十分多疑，以至于他就此事向威尼斯人发出了无条件的威胁，即使他们正准备加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我们）严禁你们，在革除教籍的严厉警告下顶风作案，以售卖、赠予或以物易物的方式向撒拉森人提供铁、麻、锋利器具、易燃物、武器、桨帆船、货运帆船或木材。”^[5]这些措辞仔细的禁令在整个13世纪以不同版本反复出现，定期宣贯，但到头来还是收效甚微。甚至当共和国的国家机构迫于压力重申教廷的禁令时，非法贸易——走私、通过外国商船寄运货物——仍然屡禁不绝。

阿卡作为一个跨地中海贸易的大型枢纽的地位可能已经下降，但它仍是一个重要的运输和中转的地区性中心，一个将黑海的奴隶，土耳其的生铁、木材和沥青，从欧洲到亚历山大港的小麦和武器，以及开罗的国家兵工厂连接到一起的供应链上的一环。木材用作制造战争器械、弓弩、舰船和矛杆；沥青用来制作希腊火；小麦用来补充埃及的食品短缺并安抚开罗不满的民众；生铁用来打造刀刃，有时还会用于武器的精加工；奴隶负责挥舞或操作攻击阿卡自身城墙的武器。

从爱德华的角度来看，阿卡在反噬自身的过程中难辞其咎，然而就在这座城市内部，上述贸易活动还引起了某种程度上的自鸣得意。人们认为这座城市的价值如此之大，不可能被轻易摧毁。十字军国家内互不相让的贵族们，一心追求自身的特权和利益，却看不出彼此之间的分歧已经为走向灾难铺平了道路。

爱德华未能及时赶到予以阻止，或者也未必能有机会阻止日后被证明是拜巴尔最辉煌的围城战役。在摆脱了蒙古人的威胁之后，拜巴尔可以将他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拔除十字军的军事要塞上。1271年3月，他

率军向医院骑士团的壮观城堡——骑士堡开拔。这座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城堡战略意义重大。它俯瞰着霍姆斯峡谷（Homs Gap），这是一条穿越山脉的重要通道，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由此便能掌控周边领土并征收税赋。匈牙利国王安德拉什二世（Andrew II）^[6]曾于1218年来到此处，将其称为“通往基督领土的钥匙”。在巅峰时期，它曾拥有2000人的守军并可作为攻势作战的基地，但是到了13世纪下半叶，医院骑士团的财力和人力都处于衰减状态。他们的英格兰裔大团长休·雷维尔（Hugh Revel）曾在1268年抱怨，整个海外之地只有300名医院骑士团骑士。拜巴尔发起的经济消耗战已经夺去了其有价值的收入并且摧毁了农地。到1271年时，这座城堡已经处于孤立的境地，而且防守力量薄弱。

尽管如此，这座城堡仍然举世无双——十字军有史以来所建造的最强大的城防要塞。它位于一个海拔650米高的陡峭悬崖上，只能由南侧水平方向上的一条通道进入，堪称巧夺天工之作。坚硬的玄武岩地基之上，高质量的石灰岩块层层堆砌，彼此之间的契合如此完美，以至于砂浆几乎毫无用武之地，内城堡主楼高达50米，外墙也高达9米。这座城堡因而得到了“山堡”的绰号。包括护城河（水源来自南侧两面城墙之间的泉水）在内，城堡的防御体系严密而又复杂：墙壁上悬伸出的石质盒状堞口，允许防御良好的守军向陡峭城墙底部的攻城部队头顶投掷炮弹，箭垛错开以限制射击死角的面积，以及一条包含着数个隐藏拐角的长达140米的曲折甬道，将迫使任何来犯者都不得不在来自上方的火力覆盖下发动总攻。倘若守军意志坚决，攻占这座城堡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拜巴尔一马当先，率领1.2万名士兵在料峭春雨中将围城装备拖上崇山峻岭。巨型投石机的木质组件由于受潮引发的膨胀而无法组装，弓箭手的弓弦也无法使用。这支军队等待了足足18天，天气才有所好转。一俟气候条件平稳，拜巴尔便施展出他在过去十年里所练就的全部攻城技艺。在城堡的南侧，他的部队迅速占领了以木质栏杆为主的外围工

事。他随后下令架设好投石机并发动地道工兵开始作业。当投石机将重达100公斤的石弹投掷向城墙，使得守军弓箭手自顾不暇时，工兵们终于将外城墙西南角的一座塔楼摧毁了。此时，拜巴尔仍然面临着护城河这道阻碍，地道无法突破这道防线，而山堡本身也高耸其上，虎视眈眈；与摧毁城堡的惯常做法不同，这次他想不经战斗便拿下完好无损的城堡。



山堡：骑士堡的复原图

兵行诡道是他作战的一大法宝。1268年，他成功截获一封送给处于围困之中的博福尔守军的信件，并用一封伪造的文书调包，以之破坏守军士气。现在，在骑士堡，他很可能故伎重施，伪造了身在的黎波里的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的一封信件，告诉守军没有任何增援并允许他们投降。城堡守将于是寻求缔结条款，守军于4月7日停止抵抗，将大体上没有受到损坏的骑士堡交给了拜巴尔。无论伪造信件之事到底发生与否，

抑或这一事件只不过给了城堡守将一个方便投降的理由，很显然，十字军堡垒的孤立以及人力的缺乏，使得即使是他们最坚不可摧的要塞，在马穆鲁克全面战争的战术下也成为明日黄花。

拜巴尔信守了让他们安全离开的诺言，并以时人熟知的口吻给阿卡的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写了一封充满嘲弄奚落的信：

致休修士——愿上帝使他成为那些不违背命运、不悖逆那为他的军队存留得胜之力的主的人之一……告诉他，蒙受上帝恩宠的（骑士堡）就这么被我们征服了，虽然经过了你们的加固改造和精雕细琢……虽然守卫它的是备受你们信赖的同胞。可他们还是辜负了你们的厚望；你让他们生活在那里就是毁了他们，因为他们失去城堡的同时也失去了你（的信任）。我的这些部队有能力攻下任何堡垒，并且守卫它们抵挡住你的这些同胞发起的反攻。^[7]

虽说他有自吹自擂之嫌，却也离事实不远。骑士堡是对拜巴尔的终极考验，而这座城堡的失陷使得任何要塞抵挡马穆鲁克攻城技艺的能力都受到了质疑。在骑士堡典雅廊道里的一根柱子上，医院骑士们曾刻下了一首拉丁文短诗，这首诗可能是作为一种警告：“这里富可敌国，这里智慧充盈，这里美轮美奂。但一定要时刻警惕骄傲自满，因为它一旦溢出就会破坏所有美好事物。”^[8]而拜巴尔则是在毫不留情地打击着十字军剩余的骄傲。他继而挥兵攻打霍姆斯峡谷北端的阿克尔城堡，将他的攻城机器通过马车运输到那里，据说他亲自在队伍中驾驶着马车。马穆鲁克大军在外城墙打开的一个缺口很快就迫使阿克尔守军求降。

从那里起，拜巴尔决心将的黎波里伯国从地图上抹去。博希蒙德六世逃过了吞噬安条克的地狱烈火，但苏丹仍然有一笔旧账要与的黎波里的伯爵们清算，那就是他们与蒙古人结盟的事。博希蒙德六世又收到了拜巴尔的来信，警告他即将发生的事并且建议他这回通过海路逃跑，因

为监狱的枷锁等着他。然而，爱德华王子抵达阿卡的消息使苏丹暂时中止了行动。他唯恐还会有由王室指挥官率领的新十字军接踵而来，而且也无法确认英格兰王子带来的威胁有多大，于是便同意与黎波里伯国讲和，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停战协议。

爱德华的出现提升了士气，但是他麾下的士兵过少，不足以对阿卡的战略态势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拜巴尔迅速移师，出现在阿卡附近，给英格兰王子来了一个下马威。然后他又掉头向北，去对付条顿骑士团的蒙福尔城堡，这座易守难攻的城堡位于向东12英里处的一个峡谷边缘。尽管地形不利于投石机和工兵的运作，他还是在一个月之内就迫使守军在得到安全离开的保证后投降。他有意使爱德华目睹了这些守军在阿卡城墙前被释放那令人沮丧的情景，以及一支马穆鲁克军队的规模之庞大。圣地的严酷现实让爱德华猛然觉醒。

但是爱德华也看到了其他的可能性。他刚到达阿卡，便立刻派遣使者向伊朗的蒙古汗王阿八哈（Abaqa）提议对马穆鲁克采取联合行动。在等待回信期间，他满腔热情地开始了袭扰敌方腹地的行动，并与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一道对附近的一个马穆鲁克据点展开攻击。他的作战行动给敌方造成了损失，但也给英格兰骑士们提供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教训，即在夏季的高温期进行军事行动的风险——由于穿着沉重的链甲，他手下的许多士兵都死于口渴和中暑。这种武装巡游行业已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一个屡见不鲜且不时恶化的问题。新近抵达的十字军——渴望采取行动，但通常都不会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去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惹下了麻烦，却没有对双方达成和解做出任何妥协，而海外之地正是依靠微妙的折中才生存下来的。这种趋势将会加剧阿卡的最终危机。

蒙古人给爱德华的回信在数月之后才姗姗而至，但还是鼓舞人心的。他们发起了一次新的战役，将马穆鲁克驱逐出阿勒颇，迫使拜巴尔率军向北方转移。在这段时间里，爱德华开辟了第二战场，试图夺取马

穆鲁克的卡昆（Qaqun）城堡。这座位于阿卡以南40英里处的城堡拱卫着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他的小部队再一次蹂躏了周边地域，但是城堡得以坚守下来，“非常坚固，四周环绕着灌满了水的沟渠”。任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希望，都因蒙古人在拜巴尔兵锋所指下撤出阿勒颇的消息而受到了挫伤。至于卡昆之战，苏丹轻蔑地评论道：“如果这么多人马连一栋小屋都拿不下，那么他们似乎不太可能会征服耶路撒冷王国的故土。”^[9]让这些圣地的初来乍到者更加困惑难解的是，他们是带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不两立的先见之明来到此地的，却发现卡昆的居民竟然习惯了在阿卡的市场上定期售卖他们的农产品。

1271—1272年的冬天，爱德华筹借资金来加强阿卡的防御，在外城墙的一个关键地段建起一座新的塔楼，并在这座塔楼前方建起一座低墙以保护其底部。此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小型军事修会：忏悔者圣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10]兄弟会，专门用来守卫这座“英格兰之塔”。与此同时，拜巴尔也在仔细思虑爱德华的存在所带来的持久威胁。1271年12月，他再次佯攻这座城市，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实施扰乱和破坏的尝试。

诡计多端的拜巴尔对付英格兰的王位继承人还有第二种策略，而这有赖于狡诈和耐心。关于这一事件的准确细节众说纷纭，但最有可能的是，他的计划里包括派遣一位忠诚的埃米尔带领一批随行人员去往阿卡的城门。这位埃米尔携重礼而来，并且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他特地来背主求荣，转换门庭。人们小心翼翼地接待了这位埃米尔和他的手下。爱德华本人虽然对于用诈之道并不陌生，但在较大可能性的鼓舞下也不由接受了。随着时日渐长，他放松了警惕。6月17日，这位埃米尔的一位随从以提供重要情报为由，争取到了与王子和其翻译私下会见的机会。当接近王子时，他拔出匕首便刺了过去。爱德华在反击中杀死了刺客，但已经受了重伤，而且伤他的武器被认定涂上了毒药。虽然在传说中，不是他的妻子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Eleanor of Castile），就是他的朋

友奥顿·德·格朗松将毒液从伤口中吸出，但次日，感染的扩散还是使爱德华写下遗嘱并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最后，他因彻底而痛苦的外科手术——医生将受到感染的肉割掉——而得救。

爱德华的十字军东征就这样黯然收场，他随后不久就启程前往英格兰，心中满是挫败感的他决心有朝一日重返圣地，却从未实现。但是，他的两个亲密伙伴，奥顿·德·格朗松和让·德·格拉伊却做到了。二十年后，他们俩与纪尧姆·德·博热（Guillaume de Beaujeu）一道组成了一个战时委员会，后者曾于13世纪70年代初在附近的黎波里担任圣殿骑士团指挥官，三人携手指挥了阿卡的最后一次保卫战。

爱德华的短暂介入至少为这座城市争取了一些时间。13世纪70年代初期，拜巴尔本已准备好对的黎波里和阿卡发起最后的攻击，但是由于爱德华的策动，蒙古人发起了攻势，这让苏丹忧心不已，转而寻求其他的方法来平息十字军的压力，以便腾出手来解决更大的问题。1272年4月，在刺杀事件发生前不久，他与阿卡签订了停战协议，期限按照伊斯兰教的表述方式被定为十年十个月十日十小时。爱德华再次因黎凡特的现实政治形势而大失所望，拒绝出席签字仪式，但停战协议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他的计划。当纪尧姆·德·博热在1275年作为圣殿骑士团大团长重返阿卡时，他写信给当时已继位成为英格兰国王的爱德华，描述了海外之地的态势，言辞间尽显悲观沮丧。他担心拜巴尔将会发动更多的攻击，而后者之前已经把海外之地的资源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曾经拥有的土地收入难以为继：耶路撒冷王国已经一贫如洗，而圣殿骑士团面临着城堡维护成本的不断攀升。

看起来只有蒙古人带来的反向压力才能维持住十字军国家的一线生机。联盟包围圈的幽灵让拜巴尔寝食难安。如果这种担忧使他想要消灭法兰克人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的话，这种考虑也始终居于次位。在1272年之后的时间里，这位苏丹转而将战火带到了蒙古人的领土。1277年，

他率领一支大军穿过叙利亚进入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南部——他在那里重创了一支蒙古军队，但得知第二支蒙古军队正在前来的消息后，他认为撤退才是明智之举。

在欧洲，十字军冒险的热情正在消失。曾经陪伴爱德华前往阿卡然后成为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的特奥巴尔多·维斯孔蒂开始意气风发地争取多方支持。1274年，他召集会议，讨论组建一支新的十字军。会上只有一位加冕君主出席，而且对于这项议题，会场里弥漫着意兴阑珊的气氛。埃拉尔·德·瓦莱里（Érard de Valéry）作为参加过路易九世两次十字军征战的资深老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抵抗马穆鲁克所面临的现实了然于胸，做出如下评论：仅凭现在所能聚集起来的微不足道的资源去对抗异教徒的话，基督徒无异于一只正在向獒犬咆哮的小狗。

这是对十字军冒险所面临的困难直言不讳的评价。随着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在1276年去世，他的这项十字军计划也胎死腹中。第二年，拜巴尔本人在大马士革观看一场马球比赛时喝了发酵的马奶后死去。有人认为他死于毒杀，但是，任何一位苏丹死后通常都会传出死因是谋杀的谣言。

尽管马穆鲁克王朝的帝位继承从传统上来说，是一场在领头的埃米尔中进行部落选举的过程，并无世袭罔替的说法，拜巴尔还是试图确保自己的儿子能在自己死后成为苏丹，然而事与愿违。取得苏丹之位需要组建起一个支持者同盟，而这经常是一个血腥的过程。经过若干年的混乱之后，拜巴尔最信赖和最成功的将军们中的一位，曼苏尔·嘉拉温

（al-Mansur Qalawun）在1280年成为苏丹。嘉拉温时年60岁左右，并且在拜巴尔的数次战役中担任首席指挥官。他与拜巴尔出身同一个钦察部落，由于被贩卖为奴时年岁已长，所以阿拉伯语说得不是很流利。与拜巴尔登基时一样，他最开始在开罗也不受欢迎。起初他连续几个月不敢走到大街上，而一旦他在那里露面，人们就会通过向他投掷动物内脏这

种传统方式表达对他的蔑视。不过，他精明地效仿拜巴尔的先例，实施了公共工程的建设并向正统逊尼派伊斯兰教表示出虔诚的态度，即便他从来都没有甩掉根深蒂固的突厥风俗。据说他保留了一些源于草原的萨满式习俗，比如通过羊的肩胛骨来预测未来之事。

然而，嘉拉温是一位机敏的常胜将军，在充分注意到蒙古人是更大的威胁的同时，对于他们可能会与基督徒结为同盟一事也十分警觉。1276—1291年，蒙古人前后派出六批使节前往西方的宫廷却一无所获。遥远的距离、耗费时日的通信以及西方民众对于大规模十字军冒险的希望幻灭，使得这些合作方案都成了天方夜谭。而拜巴尔的去世（无论多么短暂）业已缓解了阿卡的压力。

在黎凡特海岸的各块飞地之内，内讧有增无减。的黎波里伯爵博希蒙德七世^[11]与圣殿骑士团开战；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与塞浦路斯王国的几代国王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国王的头衔而在1277—1285年互相较量，热那亚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摩擦也导致双方齟齬不断。这些裂痕在阿卡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塞浦路斯国王于格三世（Hugh III）是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他于1276年离开这座城市返回塞浦路斯，认为这个地方难以控制。1286年，阿卡的法国军团拒绝承认他的儿子亨利二世拥有成为管辖阿卡的国王的权力，并且短暂地封锁了王室城堡，拒绝他进入。第二年，随着形势再次紧张起来，热那亚人封锁了港口并与比萨人在城市街道上大打出手。

解决蒙古人的威胁成为嘉拉温的当务之急，这使得他热衷于让法兰克人在他的后方保持中立。他与医院骑士团在位于黎巴嫩的马尔盖特（Margat）城堡达成停战协议，同时与的黎波里伯爵博希蒙德七世在1281年握手言和，目的就是专心应对蒙古人的威胁。他在那一年追击蒙古人并在叙利亚的霍姆斯与对方展开决战——这是一次有名无实的胜利，他损失的人马跟对手一样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内镇压贝都

因人和持不同政见的派系所发起的叛乱，因而无暇顾及海外之地，遑论威胁。

1283年，嘉拉温与阿卡签订了另一份为期十年的停战协议，他在其中还特意添加了约束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条款。作为无须对阿卡的市民公社负责的独立实体和这座城市中最有效率的军事力量，对于没有亲身参与签订的协议，这两个军事修会都有着推诿抵赖的历史。这项协议的一个签字方是纪尧姆·德·博热，圣殿骑士团的现任大团长，他将在仅仅几年之后就寻找借口重新审议这份协议的措辞准确性。

嘉拉温若想在多重威胁下保持还击能力，关键在于要建立起一支马穆鲁克的核心队伍，并将其发展成一个可靠的军事干部团队，忠心于苏丹和他的埃米尔群体。奴隶贸易在13世纪下半叶蓬勃发展，从黑海海滨引入被绑架的或是无家可归的部落民，通过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船只或是土耳其南部的港口进行交易。他在黑海有自己的代理人，肩负着推进这项贸易的重要使命。由此他比拜巴尔招募了更多的马穆鲁克武士，总数在6000~12000人，而且兵源地分布在更偏远的地方。一些被奴隶贩子抓走而进入他麾下军队服役的奴隶甚至还有希腊人或普鲁士原住民的血统。他在霍姆斯对蒙古人的胜利可能只是一次皮洛士式（pyrrhic）的胜利^[12]，但稳定了叙利亚边界的局势。而且，嘉拉温及时地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了法兰克人。尽管伊斯兰圣战自有尚武精神蕴含其中，但让伊斯兰世界摆脱欧洲人的侵略的愿望在总体上而言还是防御性的。从西方而来的新一轮侵略的可能性从未消失，受到钳形攻势的恐惧也一直存在——伊斯兰世界可能在基督徒和蒙古人的夹攻下无路可退。1285年，嘉拉温包围并占领了医院骑士团重兵把守的马尔盖特城堡，这进一步动摇了基督徒的士气。1287年，他占领了沿海港口拉塔基亚。现在，留在基督徒手中的全部领土就只有的黎波里、阿卡，以及像推罗和西顿这样的要塞化海岸飞地。

尽管马穆鲁克步步进逼，但基督徒治下的阿卡却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绽放出璀璨光芒，然后才逐渐凋零。随着安茹的查理于1285年1月去世，漫长的耶路撒冷王位（尽管王国本身的领土一直在缩减）争夺战终于告一段落。1286年8月，查理的对手，塞浦路斯王国16岁的亨利二世在推罗举行了加冕仪式。亨利随后来到阿卡，在医院骑士团大院内的大礼堂参加了长达两周的欢庆活动。据编年史所载：

这是一百年来人们所看到的最美好的节日盛宴，主办方安排了娱乐节目和使用钝头长矛进行的骑马比武大赛。戏团再次重现了圆桌骑士的故事……骑士们打扮得如同群芳斗艳一般。然后是打扮有如苦行僧一般的修士谈经论道，之后演员们又扮演了兰斯洛特（Lancelot）、特里斯坦（Tristan）和帕拉墨得斯（Pilamedes）的角色，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可爱好玩又有趣的场景。^[13]

这是一种面对已知事实却仍然贪图享乐的幻想，但是在争吵、打斗、纷争和炮火之下，阿卡仍旧维持了一段时间的中世纪文化的繁荣。

路易九世在其灾难性的十字军东征失败后，他暂居阿卡的时日促进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尽管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学术中心^[14]——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行政中心、一块十字军行动的跳板和一个坐贾行商的仓储基地——这座城市依然活力四射，生机勃勃。随着各行各业的人流往来，它吸引了有文化的游客、杰出的教士以及王公贵族慕名前来。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15]曾经在此布道，而且阿卡在其最后五十年里，见证了一个集书籍制作、绘画作图和书稿画饰之大成的流派的发展，其涉及的范围从《圣经》的复制品到各种版本的古典文学以及十字军时代的历史著作无所不包。在这些书卷的空白之处，插画师们描绘出他们所知的世界：披坚执锐的十字军战士、武器、船只和城堡、丝绸帐篷和各位国王。一种源于东方的精细化元素使这个十字军的世界变

得柔性了许多。房屋窗户中普遍采用的玻璃，精美的地毯和纺织物，新奇的口味和烹调风格——橄榄油、柑橘类水果、方糖和香料——所有这些都营造出一种异国情调的感觉。

在其陷落近半个世纪后，德国旅行家鲁道夫·冯·苏德海姆（Ludolf von Suchem）构想出一幅伤感而又浪漫的图像，描绘了阿卡的壮丽景色，不过这其中可能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他是如此描述这座城市的，尽管看到的只有废墟：

（阿卡）屹立于海滨之处，由超出寻常尺寸的方形石块雕凿堆砌而成。巍峨的塔楼高耸入云，环绕城墙，彼此之间相距不远。每两座塔楼之间都有一座城门，城墙是如此宽阔以至于在其上对向而行的两辆马车可以同时通过，甚至在今日依然如此。在面向陆地的另外一侧，这座城市也被引人注目的城墙和极深的壕沟围住，配置了各种各样的外围工事和防御设施，而且便于瞭望哨观察。

他想象着宫殿里“装饰着玻璃窗和画作”，房屋“不光是为了满足住户需求，更是为了顾及奢华与享乐……城市的大街上覆盖着丝绸缎子或者其他的上等遮阳物，以遮挡太阳的照射。每一条街道的角落里都矗立着非常坚固的塔楼，用铁门和链条防护起来”。他描绘了一场宫廷仪式的场景，其中“各位君主、公爵、伯爵、贵族和男爵们以皇家仪态在街道上款款而行，头戴金色冠冕，仿佛每一个人都是国王，带着自己的骑士、随从、商人和仆人，每一个人的服装和战马上都令人称奇地装饰着花花绿绿的金银之物”，此外还有军事修会的总部和卫戍部队，许许多多的教堂，还有“天下最富有的商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汇聚到此处”，而且“世上所有能找到的玲珑奇巧之物都曾被买到这里”。^[16]显然，这样奢侈铺张的场面曾经发生过。当霍姆斯的苏丹于1252年来到阿卡时，他们“在阿卡就用这样的荣耀来招待他：他走到哪里，金线绸缎就铺到哪

里”。^[17]

一代又一代的石匠——其中很多人是穆斯林奴隶——建造了这座兼具壮丽与污秽的城市，以及罗马式与哥特式教堂、修道院与礼拜堂、双层城墙与恶臭难闻的港口，还有香料巴扎。那里毫无疑问美轮美奂。一位穆斯林作家如此形容其中一座教堂的大门：“这是出自人类之手最绝妙的事物之一，因为它由白色大理石制成，造型精美、工艺上佳……底座、柱身和柱顶出自同一石块。”^[18]圣殿骑士团的壮观城堡栖于海边，是到达船只的地标。靠近城墙的是医院骑士团同样富丽堂皇的庭院，占地广阔，内有柱厅地堡、庭院楼塔，集宫殿、要塞、医院和教堂的功能于一身。阿卡在其如日中天之时作为一个伟大的商业中心可与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媲美。在这里生活就是为了探知更大世界的可能性。在安德烈·隆格瑞莫的中亚之旅结束后，法王路易九世又派出了另外一位大使——佛兰芒籍方济各会传教士威廉·范·卢斯布鲁克（Willem van Ruysbroeck）[卢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他作为马可·波罗的先行者，历经两年旅程来到了蒙古大汗在哈拉和林

（Karakorum）的宫廷，然后带着自己的笔记回到阿卡。尼科洛·波罗和马菲奥·波罗（Niccolò and Maffeo Polo），马可的父亲和叔叔，曾在这座城市买卖交易，并追随了他的足迹。他们在为期九年的第一次中国之旅后于1269年返回这里。1271年，他们再次从阿卡出发，这回是带着马可一道。



一座献给阿卡的某石匠的纪念碑：“噢，经过这条街的人们，请您大发慈悲，为我的灵魂祈祷——埃布勒·法兹勒（**Ebule Fazle**）大师，这座教堂的建造者。”

贵族们在用钝矛比武的同时，也在尽其所能地加固这所城市的防御。13世纪下半叶，城墙经历了多方联合的强化工作，并按个人意愿，出资增添了新的塔楼，这一工作由于马穆鲁克的逼近而加大了力度。路易九世在尼罗河惨败之后，于1250年完成了新郊区——蒙穆萨尔区一带的防御工事的修建；爱德华于1271—1272年建造了英格兰之塔，塞浦路斯国王于格三世又在附近兴建了一座外堡——通过一段甬道与主城墙连接起来的外围防御结构。1286年，他的儿子亨利二世，耶路撒冷王国的新国王在外城墙的东北角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圆形塔楼。这座塔楼的非正式名字叫国王之塔，其设计目的是用来加强关键地点——诅咒之塔的防御。这座塔楼的前方又建起一道防御性的护墙。第二年，布卢瓦女伯爵（**Countess of Blois**）艾丽丝出资在邻近之处修建了一座以她名字命名的塔楼，同时还向保护蒙穆萨尔区的城墙加固工程捐钱。一年后，1288年，教皇推动商人向新任宗主教兼教廷使者尼古拉·德·阿纳普（**Nicolas de Hanapes**）贷款，实施护城河及城墙的修复工程，并重建了一座门楼——宗主教之塔，用以监视东段城墙靠海的一端。这场防御建筑的井喷式发展有一位见证者，那就是威尼斯政治家和地理学者马里诺·萨努多·托尔塞洛（**Marino Sanudo Torsello**）。萨努多在地中海世界以及伊斯兰

教与基督教对峙的前线广泛地旅行和观察。在1286年末，他在阿卡驻留了数月之久，为这座城市的城墙和塔楼制作了一份极有价值的现代平面图，以及这座城市内部规划的一份示意图。

除去萨拉丁曾经占据此城两年并将圣十字大教堂改建成一座清真寺之外，阿卡是一座有着将近200年历史的基督教城市。城市人口大约为4万，其中的很多家庭已经深深扎根于圣地，并且数代人都在那里生活。拜巴尔尽管对阿卡屡有袭扰，并大肆破坏其乡村农地，却从来没有将攻城器械和工兵团队带来，真刀实枪地威胁到它的防御设施。它的意志和城墙等待着最终的考验。

[1] Prawer, Joshua. 'Military Orders and Crusader Politic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XIIIth Century', in Josef Fleckenstein and Manfred Hellmann (eds), *Die geistlichen Ritterorden Europas*, Sigmaringen, 1980, p.217.

[2] Morris, Marc. *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 London, 2008, p.69.

[3] Asbridge, Thomas. *The Crusades: The War for the Holy Land*, London, 2010, p.641.

[4] Psalm 137, verse 5.

[5] Crowley, Roger. *City of Fortune*, London, 2012, p.27.

[6] 安德拉什二世（1175—1235），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的国王，曾参加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7] *Arab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 ed. Francesco Gabrieli, London, 1969, pp.318-19.

[8] Kennedy, Hugh. *Crusader Castles*, Cambridge, 1974, p.162.

[9] Morris, Marc. *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 London, 2008, p.99.

[10] 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王朝君主（1041—1066年在位），征服者威廉一世的

表亲，因为对基督教信仰有无比的虔诚，而被称作“忏悔者”，其死后无嗣的问题引发威廉征服英格兰。

[11] 博希蒙德六世之子，因为继承问题遭遇的黎波里伯国内实力派贵族抵制，圣殿骑士团则支持他的反对派。

[12] 皮洛士式的胜利或惨胜，指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皮洛士（Pyrrhus）是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曾率兵至意大利与罗马交战，付出惨重代价，打败罗马军队，由此即以“皮洛士式的胜利”一词来借喻以惨重的代价而取得的得不偿失的惨胜。

[13]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793.

[14] 原文leaning，但根据上下文语境猜测是learning的误写。

[15] 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也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

[16] Ludolph von Suchem. *Description of the Holy Land, and of the Way There*, trans. Aubrey Stewart, London, 1895, pp.50-3.

[17]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p.277-88.

[18] Pringle, Denys. *The Churches of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vol.4, Cambridge, 2009, p.24

第六章 征讨敌国

1288年冬至1290年秋



1288年末，两个人来到亚历山大港请求觐见嘉拉温，他们来自的黎波里伯国。到现在为止，这个十字军王国的领土已经缩减到黎巴嫩海岸边的一块狭小飞地，除了这座城市本身别无所有，不过其仍然作为一座有价值的港口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使用着。在其统治者博希蒙德六世死后，各大派系为了统治权力激烈争吵，导致这个国家的机能受阻，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形势之下，热那亚人看上去将会占上风。这将有可能让热那亚人同时控制利润丰厚的黑海奴隶贸易和北部叙利亚的商业往来。

这两位访客力陈己见：热那亚人在的黎波里策划的一场政变将会使他们支配这一地区的贸易，而这将会损害苏丹的利益。没有热那亚人的

话，的黎波里只有武装起十到十五只桨帆船的能力；

但是现在，既然热那亚人将其收入囊中，他们就有能力武装起三十艘桨帆船，因为他们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的黎波里；而如果他们拥有了的黎波里，他们就会成为海上霸主，结果是那些打算来到亚历山大港的人不得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港口内外往来人士皆是如此，这对那些在您的王国做生意的人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1]

这些话语是由阿卡一位消息极为灵通的人士记录的，他的真实身份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证实。他可能是一位名叫杰拉德·德·蒙特利尔（Gérard de Montréal）的骑士，也可能不是这个身份，但他在历史上更多地是以其化名——“推罗的圣殿骑士”（Templar of Tyre）出现。他看起来是耶路撒冷王国处于主导位置的家族里的一个小贵族，而在为圣殿骑士团服务时，他本人的身份却不是圣殿骑士。由于会说阿拉伯语，他曾担任圣殿骑士团大团长纪尧姆·德·博热的翻译、谋士，且很可能是他的情报官员。这位圣殿骑士团编年史作家大约35岁，一直近距离地接触着耶路撒冷王国的各种事件——而且他将会留下1291年春季阿卡围攻战的目击者记述。这是基督徒一方关于此事最生动的记录，即使他的价值判定很可能倾向于他所服务的圣殿骑士团。

他显然知道嘉拉温的这两位访客的国籍——“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谁”^[2]——但是他没有说。他们十有八九是威尼斯人：如果热那亚人在的黎波里发动政变的话，受到不利影响尤为严重的就是他们本国的商人群体。三个意大利城邦国家之间的敌意在圣萨巴斯之战后并没有减少，威尼斯人与比萨人大体上是同一阵营，而热那亚人则奋力重建他们在海岸上失去的地位。这两个人很可能是去亚历山大港将威尼斯与马穆鲁克的贸易特权协议最终敲定，这些特权在当年的11月被授予了他们，但诋毁热那亚人的机会也不能错过。这就为嘉拉温提供了向的

黎波里进军的动机，因为与的黎波里的停火协议只是他与博希蒙德个人之间的协议，在博希蒙德死后自然失效。持续不断的派系纷争也有助于分裂海外之地。

1289年1月，马穆鲁克军队开始在开罗附近集结，而战役的后勤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拜巴尔的做法被保留了下来：苏丹并没有公布战役目标。但在阿卡，纪尧姆·德·博热很快就得知的黎波里将是兵锋所指。所有从马穆鲁克宫廷泄漏出来的情报来源都指向嘉拉温麾下的一位埃米尔——巴德尔·丁·别克塔什·法赫里（Badr al-Din Bektash al-Fakhri），操着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推罗的圣殿骑士”对这些安排毫不讳言：“这位埃米尔就是武备官（Emir Silah^[3]，意为负责武器的埃米尔），他已经习惯于在苏丹妄图做出伤害基督教利益的事时，将对基督徒有利的事情通报给圣殿骑士团的团长，而团长每年都向他送去价值不菲的礼物。”^[4]敌我双方都在玩这种间谍游戏。嘉拉温在阿卡内部也有自己的线人，包括一个名叫贾万·坎达克（Jawan Khandaq）的男人，他将十字军的动态汇报回埃及方面。

但当纪尧姆·德·博热向的黎波里发出警告时，他的话无人采信。这位大团长因擅于玩弄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而臭名昭著。他的预警被认定是一个花招。与此同时，马穆鲁克以其惯常的决然气势向前推进；军需品补给点已经沿着进军路线设立完毕，攻城器械和防护掩体所需木材也已采伐，志愿者们踊跃参军。博热派出了第二名信使，但是的黎波里内部派系的尔虞我诈仍未消停，直到1289年3月下旬，苏丹的军队几乎快进入了这座城市。

阿卡直到最后一刻才决定派出援军沿着海岸前去增援。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分别派出由己方元帅若弗鲁瓦·德·旺达尔（Geoffroi de Vendac）和马修·德·克莱蒙（Matthieu de Clermont）率领的支队，由让·德·格拉伊指挥的一支法国分队加入其中。耶路撒冷与塞浦路斯国王亨

利二世也派出自己的弟弟，当时只有17岁的阿马尔里克（Amalric）率领骑士和4艘桨帆船驰援。

如果没有一支舰队的话，的黎波里很难被完全包围，可是嘉拉温就是没有舰队。根据当时身在围城现场的叙利亚贵族阿布·菲达（Abu al-Fida）的描述，“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城区都被大海包围，除了东侧之外再没有其他适合地面进攻之处，而那里（可供施展）的空间很小”。^[5]然而，马穆鲁克熟练的攻城技术势不可当，而且苏丹召集了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据圣殿骑士团编年史所载，“苏丹准备好他的攻城器械，大小型号都有，并且在城前架设起他的木障（buches，意为木制的防护掩体）和卡拉巴哈斯（carabohas，意为较小的攻城器械），他摧毁了周边的乡村地区，并通过挖掘地道突破了第一道防线的战壕”。^[6]

尽管的黎波里的守军顽强抵抗，马穆鲁克的技艺和资源却无可匹敌，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这座城市防守最为薄弱的一处——年代久远的主教之塔（Bishop's Tower）。“攻城器械打击它的火力是如此猛烈以至于这座塔楼被轰得粉碎，”“推罗的圣殿骑士”如此记载道，“同样地，医院骑士团的塔楼，虽然是刚刚建成而且十分坚固，还是被轰击得分崩离析，以至于一匹马都可以从中穿过。苏丹手下的士兵非常之多，他在每一个地点都部署了二十名撒拉森弓箭手进行射击，使我们的弩手们无一敢冒头发射弓弩。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的话，很快就会被击中。”^[7]

随着这座城市的形势不断恶化，很大程度上要为这场惨剧负责的威尼斯人率先逃跑了。他们将物资装载上船，然后迅速驶离，他们的对手热那亚人紧随其后。城内士气因一落千丈。4月26日，嘉拉温下令发起总攻并且击垮了的黎波里的抵抗，“因为它缺少足够的守卫者，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放弃了防守岗位”。^[8]守军溃败并奔向港口。贵族们都逃走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军官们，的黎波里名义上的统治者露西娅女伯爵（Countess Lucia），让·德·格拉伊和阿马尔里克王子。穷

苦大众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大多数人惨遭屠杀，妇女和儿童沦为俘虏。很多无路可退的人划着小船或者游泳至离岸小岛圣托马斯（St Thomas）以寻求避难，他们躲在岛上的教堂里，却仍然没有逃脱。“我是这场围城战的一位见证者，”阿布·菲达写道，“当的黎波里被攻陷的时候，一大批法兰克男女逃往那座小岛并躲进岛上的教堂。穆斯林军队冲入海中，骑马游到岛上。他们杀死了所有男人并将妇女儿童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在他们结束掠夺之后，我乘船渡海来到岛上，发现岛上尸横遍野，因为尸体散发出阵阵恶臭，以致无人能在岛上停留。”^[9]

嘉拉温将的黎波里夷为平地并在内陆的几英里处重建了一座新城市。他的意图很明确：将巴勒斯坦海岸的异教徒彻底消灭，让他们永无归期。同时，城陷后的劫掠也刺激了穆斯林对新的征服的欲望。阿布·菲达虔诚而又仔细地记录了占领者们的黎波里的统治时间，尽管有些并不准确。“法兰克人于伊斯兰历的12月（Dhu'l-Hijjah）^[10]11日（1110年7月1日）占领了的黎波里，这座城市一直保留在他们手中，直到688年（1289年）的年初。据此，法兰克人占据这座城市的时间间隔为185年零几个月。”^[11]1200人沦为苦力并被押往亚历山大港，在那里建造苏丹的新兵工厂。

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意识到的黎波里陷落的意义所在。它是法兰克人在巴勒斯坦保有时间最长的领地。它的失陷看起来像是一场游戏终局的前兆，这一消息在欧洲大地上往复震荡。现在只剩下耶路撒冷王国的海岸狭地留存下来，阿卡为其中的一处据点。1283年，嘉拉温与这个王国签订了停火协议，期限为“十个整年，十个月，十天加十小时，从希腊人腓力之子亚历山大的纪元第1594年6月（Haziran）3日的这个星期四开始”。^[12]穆斯林总体上会虔诚地遵守这种法律协议，并以真主的名义起誓，但是这些协议的持续时间总是有限的，而且总是有漏洞存在。停战协议可能常有，但永久和平绝对没有。秉承着伊斯兰教终将“普世大同”的神学信仰，与异教徒民族处于潜在战争状态是穆斯林法

学家的基本信条。

然而，在1283年的谈判过程中，嘉拉温私下里承认了与耶路撒冷王国维持和平关系所能带来的持续经济利好：“因为阿卡是一个我们的商人得以落脚的地方，一个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选择的地方”^[13]；这种想法在阿卡也很盛行，人们沾沾自喜地认为穆斯林将会容忍法兰克人在阿卡的存在，因为它为伊斯兰世界带来的商业利益使其价值太过于宝贵而不能被消灭。而现在，的黎波里的命运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马穆鲁克的军队里，进攻阿卡的热情高涨。圣战精神与赏金诱惑为这一主张注入了无穷动力，而雅克·德·维特里笔下这座腐化堕落、穷奢极侈的城市里自满的商人则被幸存者讲述的悲惨故事所震撼。对于那些愿意看清事实的人来说，大难就要临头了。

的黎波里失陷三天之后，国王亨利二世亲自从塞浦路斯来到阿卡，嘉拉温的一名使节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抗议他从这座城市向的黎波里派出援军的行为破坏了1283年的停战协定。他在一项技术性细则上被击溃了：停战协定只适用于耶路撒冷王国。如果其适用范围将的黎波里也包含在内的话，那就会是嘉拉温首先破坏了协定。亨利的例证逻辑是无可非议的。他将使者派回了身在大马士革的嘉拉温身边，请求为这项停战协定再延期十年，苏丹同意了。此时的苏丹正在平息此前因处理努比亚的棘手问题所引发的质疑声浪。嘉拉温为了发起最后的攻击需要更好的正当性理由。在这一年里，他的秘书将会获得一个更有利的机会来仔细审查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穆斯林商人的商业利益将再次濒临险境。

亨利二世在9月乘船返回塞浦路斯，留下他17岁的弟弟——推罗领主阿马尔里克——作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司厩长和阿卡的摄政王。与此同时，他委派让·德·格拉伊前往欧洲，警告西方统治者当前形势的严重性。格拉伊抵达罗马，面见刚刚当选的教皇尼古拉四世。尼古拉四世非常热衷于发动一次新的大规模十字军东征，将欧洲各国君主动员起来一

同参战，但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欧洲此时完全陷入了阿拉贡国王海梅二世（James II）与意大利南部的安茹王国的战争中，后者在教廷的支持下与前者争夺西西里的统治权。这场所谓的西西里晚祷战争（Wars of the Sicilian Vespers）将欧洲从中间撕裂成两半。人们对爱德华一世寄予厚望， he 现在是英格兰的国王，而且是唯一拥有十字军圣战经验的君主，还曾经承诺过要将圣战进行到底。他在1287年再次承诺加入十字军，意图向东方进军，结果被征服苏格兰的事务困住了手脚。其他君主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就在尼古拉四世正努力集结起一支十字军的当口，来自阿拉贡的使者们正在开罗宫廷做客，与嘉拉温签订了一份协议。至于阿卡是否应该得到协助这个问题上，一条关键性条款记述道：

如果阿卡、推罗、沿海地区或其他地方的法兰克人中的任意一方，在与我主苏丹停战期间，破坏了我主与他们达成的停战协定里的条件，从而废除停战协定的话，阿拉贡国王和他的兄弟们、骑兵们、骑士们以及他领土内的人民将不得以马匹、骑兵、武器、财宝、援助、补给品、船只、桨帆船战舰或其他形式协助他们。[\[14\]](#)

与此同时，热那亚人在气急败坏地对亚历山大港发动一次袭击后，又重新修补了他们与马穆鲁克之间的关系，并与嘉拉温签署了一份新的商业协议。这项协议给双方带来的贸易利益，包括战争原料的供应，都是十分巨大的。热那亚人自从圣萨巴斯之战后已经大体上被驱逐出了阿卡，在这座城市里并没有多少商业利益。然而，威尼斯人却在这里下了血本。他们相当乐意看到热那亚人丢掉的黎波里的基地，而且他们的身影也在导致其失陷的阴谋中浮现。但阿卡就截然不同了。教皇试图劝诱欧洲的王室君主们和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海军支援力量加入大规模十字军东征的努力，注定要在短期内付诸东流，但是形势的紧迫性急需一些回应，即使范围有限也聊胜于无。在的黎波里失陷四个月后，教廷在威尼斯、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极力鼓动群众响应十字

军的号召。刚刚被任命为阿卡主教的尼古拉·德·阿纳普，被授予监管总体行动的权力，其中包括将阿卡城中冥顽不灵的人革除教籍。教皇交托阿纳普处理的资金被用来修复和强化城墙及外围工事，采购军火和武器，以及制作火力强大的巨型投石机。更多的资金从教堂的税收和银行家的募集里得来。来自蒙古的使者们也再次造访罗马，为教皇发动一次广泛的反马穆鲁克战役增添了希望。然而这些宏大的计划无一开花结果。1290年1月，教皇颁布了一份普遍范围的教宗通谕，劝诫人们参加十字军东征。

这项谕令收效甚微。围绕十字军计划将基督教世界的领导人联合在一起已经不可能。威尼斯人提供了20艘桨帆船，由总督的儿子尼科洛·蒂耶波洛（Niccolò Tiepolo）指挥。仍然希望能够参加十字军的爱德华一世最终派来了深受自己信任的助手奥顿·德·格朗松，此人既是一个颇具才干的组织者又是一个技艺精湛的斗士，但他随行只带了60名骑士——英王的意图是格朗松将会负责起指挥阿卡的圣托马斯英格兰骑士团的重任。在当时占有西西里的阿拉贡国王海梅二世曾经提出要提供30艘桨帆船和1万名步兵，但是与教廷在政治上的争吵最终使他将这个数字削减为只有5艘桨帆船和一小支西班牙部队——海梅二世本人则留在了国内。

民众对于十字军号召的反应同样不乐观。意大利北部地区是唯一参与此次行动的地区，而那些可能会贡献出职业士兵并鼓舞平民参与的大贵族无一报名。新兵的主力大多数来自托斯卡纳（Tuscany）和伦巴第（Lombardy）地区，由城市民兵、雇佣兵和市民混杂在一起，连同纪律性较差的农民和失业人员组成了援助部队。宗教虔诚与冒险思想以及求财的心态交织在一起。这样一支部队没能激发信心。

教皇对他投入重金的舰队的准备情况非常关心，然而对自己所了解到的信息却不以为然。舰上装备严重不足，武器（尤其是弩）的供应存

在很大缺口。尽管上述资源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但这些船只还算可用。1290年1月，教廷认为这支最多可运载3000人的舰队已经做好了起航的准备。蒂耶波洛担任舰队司令，而十字军的指挥权则由尼古拉·德·阿纳普、让·德·格拉伊和的黎波里主教伯纳德分担，后者刚从那座城市的灭顶之灾中逃出生天。阿纳普是远征军的核心人物，并在日后被证明是阿卡城内唯一能够号令各方的角色。他的三重职位——主教、宗主教和教廷使者（后者赋予他以教皇名义管理军事修会的权力）——使他在阿卡地位超然。教皇已经给城内的所有派系——阿马尔里克，各大军事修会的大团长，威尼斯和比萨社区的领导人，以及阿卡的市民公社的全体成员——写信，敦促他们要以坚定的立场来保卫圣地，并对阿纳普鼎力支持、建言献策。但是，这位宗主教刚一到达就发现，尽管他手握禁乱除暴的权柄，享有身兼三重职责的威望，控制这座城市的能力却着实有限。他所受到的待遇并没有比八十年前的雅克·德·维特里好到哪儿去；而且他很快就意识到，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风暴，这座城市缺乏统一的行动计划和战略。他关于阿卡内部四分五裂的报告让教皇大为震惊，后者在回信中对那里的当局严词斥责。

这支远征军与海梅二世国王的5艘桨帆船在西西里会合——显然他为这次远征提供的象征性援助没有受到之前协议的禁止，因为阿卡与嘉拉温的停战协定没有正式破裂。这支最终由13艘船只组成的舰队在春天抵达阿卡，而且蒂耶波洛和海梅二世的桨帆船队很快就离开了。一些目击者随后记录道：“1600名朝圣者和士兵在阿卡城门前登陆，威风凛凛。”^[15]他们很可能是在1290年4月2日复活节那天进入码头的。此时是朝圣者和西方商人来到耶路撒冷王国的传统时节，而穆斯林商人也将从大马士革前来造访，如同参加一场商品交易会一般，连同当地的穆斯林农民将农产品带来售卖。新近到来的朝圣者带着高昂的宗教热忱登上海岸，决意为信仰而战，却发现自己身陷雅克·德·维特里所描绘的错乱喧嚣的都市之中，周围都是身着东方服饰的陌生面孔，而且要面对这一座海港城市的各种诱惑和城镇里的穆斯林异教徒。当他们发现眼下没有来

自马穆鲁克的任何进攻时，很多十字军战士选择返航回家，将远征军中那些比较贫困的成员留下，这些人身无分文，漫无目的。这就埋下了麻烦的种子。

在这个交易季节的某个时候，最有可能是8月，在情况未明下，纪律散漫的冒险者们，据说是来自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平民”^[16]，袭击了一些穆斯林商人并将其杀害。“推罗的圣殿骑士”当时很有可能在场，做出了如下记录：

当这些人来到阿卡，国王与苏丹达成的停战协议正在两方之间得到有效执行，而且可怜的撒拉森农民也来到阿卡，一如既往地出售他们的货物……不幸之事发生了，来自地狱的恶魔在善人中间挑动恶念，本意是来修行善业、手执武器准备相助阿卡的十字军战士们，却导致这座城市走向毁灭，因为有一天他们在阿卡街头横冲直撞，所有来到阿卡卖货（小麦和其他一些农产品）的可怜农民都惨死在他们剑下。这些死者都是来自阿卡周边农村的撒拉森人，狂徒们还杀死了一些希腊（希腊东正教会）教律管辖下的叙利亚人。他们之所以惨遭杀害是由于蓄须而被当成了撒拉森人。^[17]

无所事事、落魄失意、醉生梦死、拖欠薪饷、宗教狂热、渴望行动——人们将他们的行为归因于多种动机。其他史料的记述稍显不同，“他们在阿卡城内的交易所附近一个叫作拉方达（Lafunda）的地方砍倒了十九个撒拉森商人”，^[18]此处正是穆斯林商队落脚的王室市场。一些阿拉伯的史料暗示这些罪犯是受贪念驱使：这些商人正带着来自黑海的军事奴隶前往开罗，恶人们对他们的货物起了歹意而将其谋杀并偷走了奴隶。城镇的市民和当局试图营救被暴民袭击的受害者，并尽其所能地将他们安置在王室城堡保护起来。然而在另外一个版本里，这些暴民“在清晨动身，市民们无法约束他们，他们本身也不担心会遇到什么

危险，就这样全副武装、大张旗鼓地离开城市，直奔山上的农场和村庄而去。他们毫无怜悯之心、不加区分地杀掉路上遇见的每一个撒拉森人——这些人都以为他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然后满载战利品而归，尽情狂欢”。^[19]“呜呼，何其哀恸，”编年史家在结尾写道，“那场狂欢之舞使阿卡城和圣地陷入了悲伤的凶险境地和凄惨的不幸之中。”^[20]

无论惨案是如何发生的，阿卡当局与其常住居民们都惊骇不已，他们立刻就意识到潜在的后果。消息马上就通过间谍传到了嘉拉温耳边，肉眼可见的证据随后也纷至沓来。遇害穆斯林的亲属带着血衣来到开罗，并在清真寺里参加公共祷告的人群前将其高高举起。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遗物使穆斯林民众群情激愤。嘉拉温怒不可遏。在基督徒的眼里，这正好为他意欲所为之事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因为苏丹早已计划好要侵犯阿卡，他立即就向阿卡的各位领主派去使者，明确表示他已经与基督徒签订了停战协议，但基督徒还是破坏了协议，杀害了他的撒拉森农民，”“推罗的圣殿骑士”写道，“于是他要求他们做出补偿，并且将那些犯下罪行的人绳之以法。”^[21]“推罗的圣殿骑士”的记录暗示了阿卡当局对嘉拉温的用意心知肚明：的黎波里伯国覆灭之后，嘉拉温蓄谋已久、路人皆知。他既有宗教上也有经济上的原因要将十字军国家的最后残余抹杀掉。当1283年签署停战协议时，他承认了通过阿卡进行贸易的好处，然而现在他再也不需要它了。马穆鲁克已经占领了安条克和的黎波里，而阿卡是现在唯一一个横亘于巴勒斯坦海岸陆路交通线上的巨大阻碍。嘉拉温早已与热那亚、阿拉贡和威尼斯签订了协议，可以安心地将西方货物输送回亚历山大港，远离那些穆斯林商人无法安全经商的基督教港口。他有充分的理由摧毁阿卡。

在阿卡，年轻的阿马尔里克将城中的头面人物召集到一起，讨论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众人皆知现在这种情况将会演变成一场灾难。那么，对苏丹做何解释？做何回应？显然，无人愿意移交这批罪犯。纪尧姆·德·博热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推罗的圣殿骑士”由于不在场，就这

场讨论提供了一个道听途说的版本：

在众议纷纷之际，我的主人、圣殿骑士团团长献计说他们应该将关押在王国监狱以及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比萨人和威尼斯人的监狱里的所有囚犯提出来，这些囚犯因为之前犯下的罪行已被判决死刑，可以将他们指认为破坏停战协议、杀害撒拉森人的罪魁祸首。“所以，把他们明正典刑——既然他们无论如何都难逃一死——既能对苏丹有所安抚也能阻止他做出伤害我们的举动。”有些人同意了这个方案，但也有很多人完全不同意。于是乎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起草了一封看起来措辞得体的回信给苏丹。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信息，他们向苏丹传话说做出如此行径的十字军是来自海外的外国人，不在他们的管辖之下，所以他们也无法插手。^[22]

博热让基督徒囚犯死在嘉拉温手上的计划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其他来源的资料甚至表明还有更不合理的借口被提了出来：死亡事件是基督徒和穆斯林在一次酒后斗殴的结果；或是再次搬出来一位基督徒妇女与一个穆斯林男子有不正当行为时被她的丈夫抓了现行的故事，这位丈夫将二人杀掉的行为引发了一场暴乱；或是老调重弹，是穆斯林们自己引发了打斗。对于嘉拉温来说，所有这些解释都完全不能令其满意。阿卡的统治者无法果断地采取行动或是控制自己领土内的人民，这只不过是凸显出了这座城市的弱点而已。

但是耶路撒冷王国破坏协议了吗？单单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远征军的存在就可能已经违反了一项技术性细节：相关条款要求在“假如法兰克沿海的国王或其他国王中的一位企图通过海上行动损害我主苏丹的利益”^[23]的情况下，阿卡当局有义务提前两个月通知，而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谁对这项条约的规定必然有着精明见解的话，那就是博热本人。他是1283年签署原始文件时的签字人之一。

在开罗，官员们也在忙于审视协议上十分灵活的用词，尽管还不清楚是哪一個版本——1283年的版本，还是近年来重新签订的1289年的版本。但无论哪一个版本，停战协议都构成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且牢不可破的契约，嘉拉温曾以最神圣的形式——将真主的名字重复三次，每次重复三遍——对其起誓，

安拉、安拉、安拉，以安拉、安拉、安拉之名，蒙安拉、安拉、安拉见证，他超绝万物、舍身求法，他惩治奸佞、赐福万民，他广作善功、消除恶业，他深知何所揭晓、何需封藏，他洞悉奥秘、明察万物，他悲天悯人、宽宏大量。以《古兰经》和受传并宣示《古兰经》的先知阿卜杜拉之子穆罕默德的名义，愿真主保佑并拯救他；以经书要义的名义，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以斋月的名义：我本人与阿卡市民公社和居住在那里的各位骑士团大团长达成停战协议，我承诺要维护这份蒙真主保佑的停战协议。[\[24\]](#)

这些话语将最严厉的正义标准施加于苏丹。同时，嘉拉温似乎也渴望为一个有利于己的答案寻求正当性理由，而他的理由不仅仅是对圣战的追求。阿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也是购买武器的地方。它位于南北贸易路线上的要津，而正是这条贸易路线将亚历山大港与更北部的港口以及来自黑海的重要奴隶供应联系起来。然而，谋杀商人对贸易的威胁极其严重。嘉拉温也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他的埃米尔议事会成员和国务秘书一起讨论要如何应对事态。

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与会的埃米尔都认为这些条款并未遭到违反——既然这一事件是意外斗殴的结果——而且他们受到神圣的誓言约束要维护这一协议。可能他们也厌倦了战争及其带来的负担。嘉拉温明显不悦。他传召他的通信主管大臣法特赫·丁（Fath al-Din）入内，这位大臣肩负着发言力挺苏丹的重任。马穆鲁克王朝对外协议的起草工作是一

项家族事务：等待出场的是他的父亲穆希·丁（Muhyi al-Din），据说是停战协议原始文本的作者；以及他的侄子沙菲·伊本·阿里（Shafi ibn Ali），此人留下了一份关于此次决策过程的目击者论述。法特赫·丁被问道：

“停战协议里是否有（行动的）余地？”

法特赫·丁匆匆浏览了一下协议，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利用的）余地，于是他便找到我以及协议的作者，他的父亲穆希·丁，并将之前的会议经过向我们转述了一遍，然后把停战协议读给我们听。他的父亲说道：“里面没有任何余地，情况就是这样。”

我没有说话。法特赫·丁转向我说：“你有什么可说的？”

沙菲小心翼翼地发言，斟酌着自己的言辞，揣摩苏丹的意愿。

然后我说：“我们要支持苏丹。如果他倾向于废除协议，那么协议就得废除。而如果他倾向于让协议存续的话，那么协议就得维持下去。”于是法特赫·丁对我说了些话，大意是：“埃米尔们已经变得既傲慢又懒惰；苏丹倾向于废除协议。”

我对他说：“我们与苏丹一致。”我指着停战协议里的一段话：在这种条件下，当陌生人带着伤害穆斯林的意图抵达时，当局和总督必须尽全力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如果无法做到，应仔细调查并弄清原委。

他们（阿卡的当局）已经承认此次对穆斯林的伤害源自海外的法兰克人。法特赫·丁对我的这一发现非常高兴，并向苏丹汇报此事，而苏丹立刻着手备战工作。他从大帐里走出来，

召集部队，准备直捣敌巢。^[25]

[1]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2.

[2]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2.

[3] 原文Silah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为“武器”。

[4]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p.802-3.

[5]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4.

[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3.

[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p.803-4.

[8]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4.

[9]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5.

[10] 都尔黑哲月（Dul Hijjah）意为“朝圣月”，是伊斯兰历中的第四个圣月，向麦加朝圣的月份。

[11]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5.

[12] Holt, P.M. *Early Mamluk Diplomacy (1260-1290) : Treaties of Baybars and Qalāwūn with Christian Rulers*, Leiden, 1995, p.91.

[13] Holt, P.M. *Early Mamluk Diplomacy (1260-1290) : Treaties of Baybars and*

Qalāwūn with Christian Rulers, Leiden, 1995, p.73.

[14] Holt, P.M. *Early Mamluk Diplomacy (1260-1290) : Treaties of Baybars and Qalāwūn with Christian Rulers*, Leiden, 1995, p.135.

[15]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49.

[1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5.

[1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5.

[18] Sanudo Torsello, Marino. *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the Faithful of the Cross*, trans. Peter Lock, Ashgate, 2011, p.367

[19]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50

[20]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50

[21]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5.

[22]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5.

[23] Holt, P.M. *Early Mamluk Diplomacy (1260-1290) : Treaties of Baybars and Qalāwūn with Christian Rulers*, Leiden, 1995, p.84.

[24] *Arab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 ed. Francesco Gabrieli, London, 1969, p.331.

[25] Shāfi ‘b.‘Alī, pp.285-6.

第七章 求战心切

1290年秋至1291年3月



嘉拉温原本打算前往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秋季朝圣之旅，但现在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转而筹划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为保护10月启程的朝圣者们安全做了虔诚的安排，其间也启动了攻打阿卡的准备工作：

他组织了一支军队前往汉志（Hijaz，位于阿拉伯半岛上的一座城市），保护通往麦加的朝圣之路，还组织了另外一支讨伐军用以解决阿卡的逆民。很多骑手被遣往汉志给每一个需要的人运送饮水和食品，也有很多骑手被派往军营给每一位战士运送武器装备。他制作了一面旗帜准备送往圣旗无数的真主庇佑之城麦加，还制作了一面旗帜准备带到法兰克人的土地。^[1]

与此同时，苏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尽管如此，他仍在继续动员马穆鲁克的战争机器：收集粮秣和原料，招募兵马，向他的埃米尔和附庸国发号施令。快马信使被派往各地，信鸽也飞向四方。他的要求既有人力方面的也有物资方面的。穆希·丁记载道：

他下令所有的部队要在指定的日期集结，并向各位埃米尔支出了不计其数的款项，而这些埃米尔的献金数目也无法估计。他还调拨了大的兵工厂的一大部分物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有可能超出了以往的任何入侵行动。他命令手下快马加鞭，于是他们马不停蹄。他从铁匠铺和木匠作坊征用了一大批石匠和手工艺者，并给予所有人补贴。他向叙利亚的所有地方官员写信要求生产制造投石机、器械、装备和武器，为（运输）投石机提供牛马，每一座城镇都尽其所能动员民夫携带自己的口粮参战。^[2]

储存有食品和饲料的补给站被布设在穿越西奈（Sinai）沙漠逆巴勒斯坦海岸而上的500英里行军路线上，以资来自开罗的军队及其浩浩荡荡的畜群使用。在阿卡以南40英里处的阿特利特（Atlit）海岬，几乎就是在圣殿骑士团的要塞朝圣者城堡的眼皮底下，埃米尔鲁克·丁·塔克苏·曼苏里（Rukn al-Din Taqsu al-Mansuri）发动自己的手下伐林锯木，以备野战工事所需，不过对外则宣称是在为非洲的一场战役做准备。

阿卡的人们本不应该上当受骗。纪尧姆·德·博热安插在马穆鲁克宫廷的间谍法赫里早就通知了大团长，说嘉拉温正在备战。但阿卡的执政议事会却重蹈的黎波里的覆辙，不肯相信这一情报。博热惯耍政治阴谋的斑斑劣迹，他与马穆鲁克间谍和双面间谍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阿卡人很可能是过去多次经历了“狼来了”的闹剧——马穆鲁克自己的假情报策略也在作祟——意味着这些可靠的警告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忽视。

愈发担心的博热一度派出了自己的非正式代表团前往开罗，试图将这场战争消弭于无形。嘉拉温却漫天要价——阿卡的全体居民每人都要缴纳一西昆（sequin）^[3]来赎身。这一蛮横要求正如他所料想的一般，被执政议事会愤怒地拒绝了，而博热则在枉费心力之后反而被人指控叛国。

似乎战争威胁的现实需要一再上演，阿卡以西35英里处杰宁（Janin）的穆斯林守军很快接到任务，保护通向大马士革的贸易路线并迫使阿卡的人退回到他们的城墙以内。据阿拉伯方面的史料记载，埃米尔桑库尔·马萨（Sunqur al-Massah）受命“每日侦骑四出，率兵监视阿卡要塞的动向并保证海岸的安全，使商人不必担心会受到阿卡暴民的骚扰。每次与阿卡之间的战争或冲突中，他总是胜利者”。^[4]

到10月末为止，嘉拉温已经万事俱备，“他只需足踏马镫，纵马出城……宛若命运之星，战神天降。”^[5]他在开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出城仪式，“阵势雄壮，盛况空前，千军万马，威震天下。列王的使者们簇拥在其周围，他在胜利之门宿营——他已习惯在此扎营——剩下的只有旅程。”^[6]然而，战争的势头却出人意料地停滞不前。嘉拉温的病情加重了。他日渐衰弱，很可能是被痢疾击倒的。穆希·丁写道：

进军的计划一再延期，这是因为我们的主人被一种疾病困扰着，他一直与病魔顽强斗争却还是败下阵来。他的痛苦有增无减，帐篷的绳索已被割断^[7]，《古兰经》谕示他大限已至。他的军队没能护住他，纵有能臣勇将、金戈铁马、雄城要塞，也无济于事。在他的众多杀人机器中，只有他被命运带走了。就这样，丛林万物因失去守护的狮王而害怕，伊斯兰世界为失去他的支撑而悚惧。^[8]

嘉拉温最终于1290年11月10日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苏丹，至少在与蒙古人和基督徒作战的胜绩上与拜巴尔不相上下，而且在与他的朋友

和敌人打交道时，比他的前任更值得敬佩。

精心设计的战役计划因苏丹之死陷入了一片混乱。“推罗的圣殿骑士”记述道，当这一消息传到阿卡时，人们“喜笑颜开，确信自己得救了”^[9]。他们推断，鉴于马穆鲁克王朝在以往的苏丹继位过程中屡屡发生权力斗争的先例，嘉拉温的继承者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嘉拉温的儿子马利克·阿什拉夫·哈利勒（al-Malik al-Ashraf Khalil）在父亲病重之际就为其处理政务，十分活跃。嘉拉温去世的第二天，27岁的哈利勒就继位成为苏丹并且公告天下。

嘉拉温的遗体被运回开罗，等待合适的陵墓建成之后再另行下葬。哈利勒发誓将战役继续下去。无论如何，鉴于马穆鲁克王朝狂热的政治本质，以大一统的征服战争推动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对他而言再合理不过了；除此之外，马穆鲁克的战争机器一旦开启就势难停止，而且一位新继位的苏丹若是就此罢手，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马穆鲁克王朝苏丹的继承体制从来就不是世袭制，领导权要通过实力赢取。这取决于有影响力的埃米尔们的支持，而苏丹之位很可能在电光石火间就易手，失败就意味着血腥的下场。

哈利勒是嘉拉温的次子，他并非最受宠爱的那个，而且还有政敌。很多人选择与他的兄长萨利赫·阿里（al-Salih Ali）进行利益捆绑，但萨利赫不幸英年早逝，其支持者们发现自己已然失宠，埃及总督图伦泰（Turuntay）便是其中一位。（一些人将阿里之死归咎于哈利勒下毒，其背后的原因不在于毒杀的可能性有多大，而在于哈利勒相对来说更不受欢迎。）图伦泰本人十分担心哈利勒的判断力，而且不希望其继承苏丹大统。图伦泰曾说过：“我不会交给穆斯林一个像哈利勒这样的统治者。”^[10]

然而，这位新任苏丹勇猛果敢、富有活力而且冷酷无情。与其父亲

不同，他擅长阿拉伯语的会话与写作，而且因熟练掌握骑术和弓术这样的马穆鲁克传统军事技巧且在作战时身先士卒而深得军心。哈利勒也自有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他精力充沛，从不浪费时间：“他每天都从自己的城堡出来，深入军营，了解自始至终的所有事项、整顿人事，直到深夜才返回自己的城堡。”^[11]

11月18日，他逮捕了埃及总督图伦泰并判决其死刑。哈利勒还派出快骑，在阿卡城墙外的一场遭遇战中将埃米尔桑库尔·马萨擒获——哈利勒捏造证据，指控这位埃米尔通敌，但后者很可能因为是已被处决的图伦泰的支持者而获罪。哈利勒要想作为苏丹生存下来就必须先发制人。其他一些埃米尔也被关押起来，而另外一些人则被提升到权力极大的职位，并被赐予荣誉战袍。不过，在这位新苏丹的圈子里和军队指挥层内，反对者仍然大有人在，在随后进行的整个战役过程中，这些人窃窃私语，颇有微词。

在修改了战役时间表后，新苏丹勒令军队和叙利亚附庸国在来年3月之前为春季战役做好准备，并要提供巨型投石机、石匠、木匠、地道工兵和士兵。阿卡收到了攻打即将降临的警告。“推罗的圣殿骑士”将大团长纪尧姆·德·博热收到的一封信迅速翻译成法语。这封信消除了人们对哈利勒的野心挥之不去的怀疑，内容如下：

苏丹至尊，万王之王，天下共主，马利克·阿什拉夫，强大者，可怖者，讨逆者，法兰克人、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之猎杀者，从罪大恶极之人手中夺取城堡之征服者，两海^[12]之主，圣地双城^[13]守护者，哈利勒·萨利赫。高贵的圣殿骑士团大团长，向正直而又睿智的您致以问候，并传达我们的善意。鉴于您曾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们向您致信告知我们的意图，请您务必明白，我等前来贵方领土是为了匡扶正义、惩奸除恶。因此，我们不希望阿卡市民公社向我方递送任何信件或

礼物，因为我们绝不会接受。^[14]

“我翻译了这封信，”“推罗的圣殿骑士”继续写道，“并将这封信呈阅给我的主人大团长和阿卡所有的贵族——宗主教兼教廷使者，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让·德·维利耶（Jean de Villiers）修士，以及条顿骑士团的指挥官……我还将此信传阅给比萨的领事官和威尼斯的行政官，他们都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苏丹即将来袭的信息，直到他几乎兵临城下的时候。”^[15]鉴于过去几个月的明显迹象——砍伐围城工作所需的木材，以及城墙外的遭遇战——如此闭目塞听就是罔顾证据所致。

尽管苏丹已经断然下令不得再有进一步的外交斡旋，阿卡方面还是决定为延缓不可避免的战事做了最后一次尝试。1月，四名勇士被派往开罗陈情：会说阿拉伯语的菲利普·德·门博夫爵士（Sir Philip de Mainboeuf），“阿卡的本地骑士”；^[16]巴塞洛缪·比萨（Bartholomew Pisan），圣殿骑士；加泰罗尼亚人洛佩·德·利纳雷斯（Lope de Linares），医院骑士团的修士；以及一位名叫乔治的抄写员。但这么做为时已晚。“他们来到苏丹面前，但苏丹拒绝接收信件和他们带来的礼物，并将这些使者投入大牢。”^[17]（“推罗的圣殿骑士”记载道，“他们后来都悲惨地死去”，但是显然他并不清楚他们的命运，因为其中的几个人在若干年后依然活着。利纳雷斯于1306年也就是十五年后被释放。门博夫于1319年重新出现，他做了二十八年俘虏。）

与此同时，嘉拉温之前下令进行的备战和物资采集工作在整个冬季一直持续着。至少从萨拉丁的时代起，穆斯林军队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后勤技能，分配财政资金来提前制造大型投石机的部件并将其按部分运往围城地点，而不是使用产地派发过来的木材在围攻现场就地制造。大马士革作为叙利亚境内的兵工厂和武器制造中心，业已成为投石机原料采集、制造和分配的中心，而拜巴尔又推动这些技术上升到更高的发展层面。然而，收集和运输原材料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马穆鲁克通过后

勤工作赢得的大胜代价高昂。在1265年的阿苏夫围攻战中，投石机的组件不得不靠民夫肩扛才得以通过崎岖不平的地方。拜巴尔本人也记述了1271年进攻阿克尔时，运送攻城器械的车队在黎巴嫩北部一路翻山越岭，遭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的情景。但投石机是攻城部队里的核心组成部分，而马穆鲁克有资源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地形上运送大型器械。

埃米尔沙姆斯·丁（Shams al-Din）被嘉拉温派往穆瓦毕卜河谷（Wadi al-Murabbib）收集用于制造攻城器械的长块木材时，正值寒风刺骨的凛冬时节。这条河谷位于阿卡与巴勒贝克（Baalbek）^[18]之间的黎巴嫩山区，那里的树木高达十米。本就是天寒地冻之时，工作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当地被征发的民夫身上，他们不仅要缴纳税金，还要被强制劳动。沙姆斯·丁本人“几乎死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里。为了救自己一命，他被迫仓皇出逃，将行李和帐篷都抛之身后。一切都被大雪掩埋，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夏季，因此很大一部分辎重丢失了”。^[19]尽管如此，他的工作队在饱受折磨之后仍然设法将木材运到了巴勒贝克，马穆鲁克所制造过的最大型投石机将在那里诞生。在拆卸之后，这些零部件通过山区在12月底被运到了大马士革。

在跨越遥远距离进行人员和物资的调度上，马穆鲁克的军事筹划能力令人生畏。哈利勒拥有拜巴尔和嘉拉温在过去五十年里不断完善总结出的一整套战争组织方案。部队和战争物资的集合点被设定在大马士革，但是冬季的严寒天气持续妨碍着备战工作的进展。第二年年初，一支分遣队被派往库尔德堡（Hisn al-Akrad）^[20]——也就是骑士堡——接收在那里制作的一台巨大的投石机，将这个庞然大物被拆解后的零部件装载到马车上。

在那些参加运输工作中有一位年轻的叙利亚王公，名叫阿布·菲达，他说道：“我们在那里接到了运送一门大型投石机（配重式投石机）的任务，它的名字叫作‘曼苏里（al-Mansuri，意为胜利）’，它的零

部件足足装满了一百辆马车。这些马车被分流到哈马（Hama）^[21]军团，其中有一辆马车由我负责，因为当时我是一名十夫长。”^[22]他们先是将这些零部件拖运到大马士革，然后是阿卡，全部行程80英里，这是一项残酷的工作：

我们的马车之旅赶上了严冬时节的末段，从库尔德堡到大马士革，一路上雨雪交加。我们因而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拖拽陷入泥泞的马车，拉车的牛在严寒下变得虚弱继而死去。拖运这些马车所耗费的工夫，导致我们用了一个月才从库尔德堡走到阿卡——如果骑马的话通常八天就到了。苏丹马利克·阿什拉夫对其他各处要塞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将所有地方的投石机运送到那里。^[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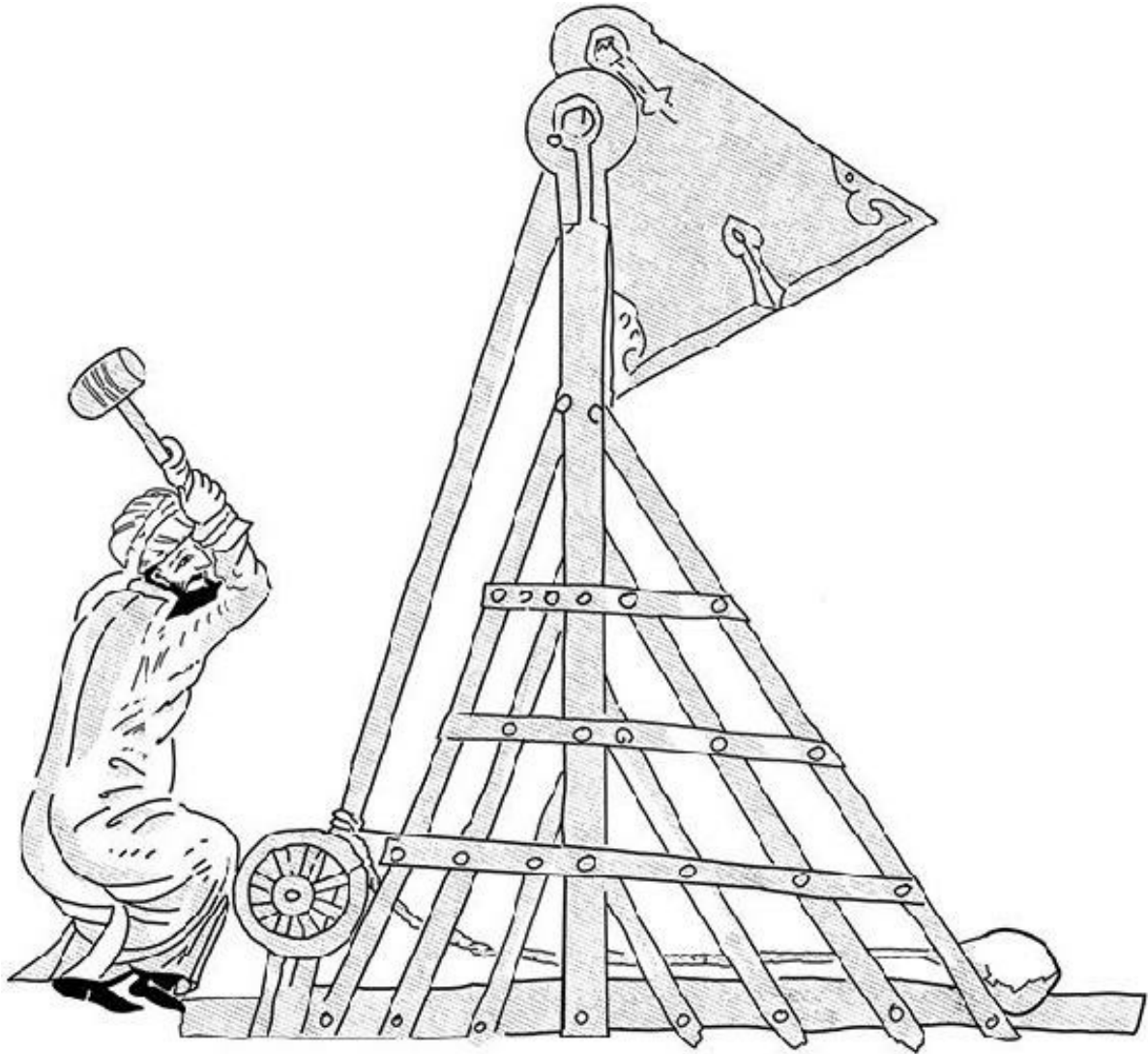
拖运攻城器械这种使人筋疲力尽的工作在一直继续。2月，哈利勒委派自己的代表埃米尔伊兹·丁·艾伯克·阿夫拉姆（Izz al-Din Aybak al-Afram），前往大马士革监督巨型投石机和其他攻城装备的制造以及运往阿卡的过程。艾伯克是苏丹的高级军事工程师，也是一位拥有二十五年戎马生涯的老臣，他的从军经历可以追溯至拜巴尔的早期战役，从那时起他就负责攻城器械的制造、监管和运输。

与此同时，哈利勒精心策划了一场宣传运动以掀起宗教热潮，将他的战役与人们对自己父亲的虔诚记忆联系起来，并将黎凡特团结在神圣事业的口号下。1291年1月4日，伊斯兰历新年的第一天，嘉拉温的遗体由庄严肃穆的队列护送，这支队伍由宗教人士——谢赫（sheikh，即长老）、托钵僧和卡迪（qadi，即法官）组成，先是被送往开罗的阿扎尔大清真寺，然后又被送到他宏伟的陵墓里新修建好的墓室下葬。在哈利勒预定率自己的军队主力出发前的一周，他在父亲的墓前精心组织了一场狂热的仪式和庆祝活动。3月2日晚间至3日的凌晨，信徒们整夜诵读《古兰经》。第二天清晨，在总督和维齐尔（vizier）的陪同下，哈利

勒慷慨地向穷苦大众、《古兰经》的朗诵者和宗教机构发放钱财和衣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苏丹在其父陵墓举行的告别仪式上，因为他已经决定启程，前去围攻阿卡。”^[24]

如今席卷伊斯兰世界的宗教狂热与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整体趋势恰好形成了对称的曲线。两百年前，同样的情绪促使欧洲的基督徒拥入圣地，而彼时的伊斯兰世界则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现在则是基督教世界对教皇发动十字军的恳请充耳不闻，而穆斯林参加圣战的声浪如火如荼。圣人们纷纷预测出违背正道的基督徒所将遭受的命运。通过清真寺里的布道，加入圣战的呼吁得以深入人心。志愿者们既受到圣战精神的鼓舞，又被的黎波里战役所带来的丰厚战利品激励，受到了物质回报前景的引诱。

3月6日，哈利勒率军出征，穿越西奈沙漠。在启程时，担任卡迪的穆希·丁祈求上天向阿卡降下诅咒并警告大祸即将来临：“噢，你们，金发圣人（基督）的子孙们，上帝的复仇之雨马上就会降临到你们身上，鸡犬不留！马利克·阿什拉夫已经驾临你们的海岸。准备迎接他所发出的摧枯拉朽般打击吧！”^[25]一位谢赫据说在梦中看见一位陌生人在吟唱：“穆斯林已经攻下阿卡并砍下异教徒的头颅。我们的苏丹率兵将敌军碾碎在脚下的群山中。突厥人在出发时发誓不留一寸土地给法兰克人。”^[26]空气中旋绕着预言和狂热的气息。



打击即将降临：用一架巨型投石机发射炮弹

拜巴尔·曼苏里（Baybars al-Mansuri）的热情回应体现出了兴奋和热切的期待，他是战略地位重要的卡拉克（Kerak）城堡的城主，萨拉丁于1188年从十字军手中夺得了这座城堡。曼苏里受命为战役提供人员和装备。虽然（苏丹）并未期待他亲身参与，但是圣战的熊熊烈火正从上到下燃遍整个社会。正如他本人所记述的：

当收到这次进攻的命令时我正在卡拉克，一同传达到我手中的还有苏丹颁布的准备武器和军械的法令，我的灵魂渴求圣

战，向往之情有如干渴大地渴求其应尽责任。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去求见苏丹，询问我是否应当为这次进攻分担一些任务并且随军参战，他允许我参加并赐予我许可。于是我就像一个胜利地得偿所愿的人，眼前的夜色豁然变得如清晨般明朗。我筹措了防护性装备（木质屏障和遮蔽物）、有用的器械，招募有奉献精神的战斗人员、射手、石匠、突袭者和木匠。在苏丹驾临加沙时，我前去觐见并来到他的大营。我受到了热情招待，苏丹向我微笑以示喜悦之情，然后我随他的禁卫骑兵一同前往阿卡。^[27]

人员和物资的征集工作正在提速：攻城弩炮、石弹、石脑油、防护掩体所需的木材、挖掘地道用的矿坑支撑木、食品补给、骆驼和马，以及特种部队——地道兵、石匠、燃烧类武器专家、弩炮操作手、突击队、弓箭手和后勤部队。3月初，一支前卫部队出现在阿卡城外，迫使欧洲定居者们放弃自己的村庄并将果园砍伐清空，以备修建防线和军事营地之用。现在，对于阿卡的民众来说，哈利勒的意图昭然若揭。聚集于此的各个附庸国和省级总督的部队不仅来自开罗和大马士革，更是来自远至北面250英里处的阿勒颇；来自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之间的路线上的哈马和霍姆斯；来自黎巴嫩山区的阿克尔；来自卡拉克、的黎波里和库尔德堡。之前被派往大马士革去监督攻城器械的运输工作的埃米尔艾伯克·阿夫拉姆，已于3月3日抵达。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哈利勒率军穿越西奈半岛，在加沙收编了由卡拉克城主拜巴尔·曼苏里率领的军团。他们沿海岸一路向北，在其辎重队伍里又增添了一批于开罗预制的巨型投石机组件。1291年的春天，一支庞大军队正在集结。

大马士革上上下下都沉浸在战争的狂热气氛之中，铁锤敲击和刀锯切割之声响彻全城：木匠们制造巨型投石机；铁匠们锻造刀刃、链甲和马掌；为一场大型战役征集所有相关的物品——食物和饲料、盾牌、帐篷和旗帜、马车和挖掘工具；越来越多的士兵、马匹、骆驼和驴也被集

聚在一起。3月9日星期五，在城中雄伟的倭马亚（Umayyad）清真寺举行的祷告中，神职人员向信徒们宣告：“那些想在阿卡为信仰而战的人，应当在伊斯兰历三月（Rabi I，作为先知诞生的月份而尤为吉祥）的头十天挺身而出，将那些投石机拉出工厂，运过桥梁。”^[28]

这一宣告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一种情绪高涨的气氛中，巨大的攻城武器被拆成零件，拖出城门，穿过桥梁。志愿者们“在天亮时就动身，直到中午祷告时才回来。甚至连法学专家、教师、宗教学者和虔诚的信徒都在搬运物资并帮助拖运投石机的木质构件”^[29]。到了3月15日，巨型投石机的所有零部件均被运出，埃米尔达瓦达里（al-Dawadari）指挥的车队带着第一批物件开始了长达80英里的行程。

几乎在同一时间，大批其他军团也在大马士革集结。23日早晨，这座城市的总督埃米尔胡萨姆·丁·拉津（Husam al-Din Lajin）首先率领自己的部队出城前往阿卡。当天晚上，哈马的领主，埃米尔马利克·穆扎法尔（al-Malik al-Muzaffer）到达大马士革，他的部队和攻城装备将于三天后到达。27日星期一，埃米尔塔巴希（al-Tabahi）在黎波里的部队前方打头，连同库尔德堡、阿克伦城堡、霍姆斯以及叙利亚中部地区其他城市的部队也抵达了这座城市。该地区见证了穆斯林军队及人民几乎史无前例的动员。据说群众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志愿军的人数超过了正规军。这些分遣队一支接一支地向海岸前进，并开始破坏阿卡的周边地域。

基督徒方面的史料在对这支军队规模进行评估时编造了不真实的数字，并对这种军事炫耀致以不情愿的敬意，对这支尚在行军中的军队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生动而又有几分虚构的描述。他们将这些纵队描绘成“渴饮基督徒鲜血的恶魔”，^[30]世界末日的可怕预兆——野蛮、令人生畏，但又有几分壮观：

苏丹率领着史上最为庞大的异教徒军队向阿卡推进，他的

军队中会聚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个种族、民族和讲着不同语言的异教徒，其准确数目无人能够数清。兵马未到，便已传来阵阵喇叭声、铙钹声和鼓声，震天撼地。当军队经过的时候，他们的盾牌在阳光下金光闪耀，继而又将阳光反射回群山。他们擦亮的矛尖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宁静的夜空中闪耀的群星。当军队行进时，由于长矛的数量众多，仿佛就像一片森林在地表移动。这支军队的人数足有40万之众，目睹异教徒如此人多势众，很难不让人心生钦佩，因为他们覆盖了整个大地、平原和山丘。^[31]

无论其规模和外表的真实情况如何，这支渐渐逼近的军队代表了马穆鲁克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

1290年底，阿卡城内终于产生了紧迫感，开始反复呼吁各方派遣部队增援。亨利二世国王从塞浦路斯派来了一些援军，同时从耶路撒冷王国的边远地区，从朝圣者城堡、推罗、西顿和贝鲁特召回士兵。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布尔夏德·冯·施瓦登（Burchard von Schwanden）在率领40名骑士和400名其他十字军战士抵达后，迅速辞职并乘船返回欧洲，无论其增援行动有何积极影响，他的这一行为大大削弱了士气。教皇托付给尼古拉·德·阿纳普的资金被用于修补和加固城墙及外围工事，购买军火和武器装备，以及制造火力强大的巨型投石机。宗主教通过在城市大教堂——圣十字教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在维持士气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随着马穆鲁克各路纵队逼近阿卡，这座城市仍在手忙脚乱地完成备战工作。

[1] Ibn‘Abd al-Zāhir, Muḥyī al-Dīn. *Tashrīf al-ayyām wa-al-‘uṣūr fī sīrat al-Malik al-Manṣūr*, Cairo, 1961, p.177.

[2] Ibn‘Abd al-Zāhir, Muḥyī al-Dīn. *Tashrīf al-ayyām wa-al-‘uṣūr fī sīrat al-Malik al-Manṣūr*, Cairo, 1961, p.177.

[3] 中世纪威尼斯铸造的著名金币——杜卡特的别称。

[4]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55.

[5] Ibn‘Abd al-Zāhir, Muḥyī al-Dīn. *Tashrīf al-ayyām wa-al-‘uṣūr fī sīrat al-Malik al-Manṣur*, Cairo, 1961, p.178.

[6] Ibn‘Abd al-Zāhir, Muḥyī al-Dīn. *Tashrīf al-ayyām wa-al-‘uṣūr fī sīrat al-Malik al-Manṣur*, Cairo, 1961, p.178.

[7] 帐篷的绳索如被割断就会倒塌，作者借此喻示苏丹已经病入膏肓。

[8] Ibn‘Abd al-Zāhir, Muḥyī al-Dīn. *Tashrīf al-ayyām wa-al-‘uṣūr fī sīrat al-Malik al-Manṣur*, Cairo, 1961, p.178.

[9]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7.

[10] Nicolle, David. *Acre 1291: 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 2005, p.22.

[11] Ibn‘Abd al-Zāhir, Muḥyī al-Dīn. *Tashrīf al-ayyām wa-al-‘uṣūr fī sīrat al-Malik al-Manṣur*, Cairo, 1961, p.178.

[12] 指地中海和红海。

[13] 指麦加和麦地那。

[14]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7.

[15]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7.

[1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7.

[1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7.

[18] 黎巴嫩东北部城镇。

[19] Ahmad ibn‘Alī al-Maqrīzī. *Histoire des sultans mamlouks*, trans. M.Quatremère, 2 vols, Paris, 1837-45, p.109.

[20] 骑士堡最早由11世纪时的库尔德人掌控，因此它被称为Hisn al-Akrad，意思是“库尔德人的城堡”。

[21] 叙利亚西部城市。

[22]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6.

[23]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6.

[24] Little, Donald P. ‘The Fall of Akka in 690/1291: The Muslim Version’, in M.Sharon (ed.),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Jerusalem/Leiden, 1986, p.170.

[25] Schlumberger, Gustave. *La Prise de Saint-Jean-d’Acre en l’an 1291 par l’armée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 1914, p.29.

[26] Schlumberger, Gustave. *La Prise de Saint-Jean-d’Acre en l’an 1291 par l’armée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 1914, p.29.

[27] Baybars al-Manṣūrī. *Zubdah al-Fikra fī al-Tārīkh al-Hijrah*, ed. D.S.Richards, Beirut, 1998, p.278.

[28] Al-Jazari. *La Chronique de Damas d’al-Jazari*, ed. and trans. J.Sauvaget, Paris, 1919, p.4.

[29] Al-Jazari. *La Chronique de Damas d’al-Jazari*, ed. and trans. J.Sauvaget, Paris, 1919, p.4.

[30]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64.

[31]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64-5.

第八章 红篷大帐

1291年4月1—9日



苏丹哈利勒于1291年4月初抵达阿卡。据一名基督徒记载：“他歇息了三天，其间与他的指挥官们和军队里的贤达之士在一起商议军情，休整军队。在第四天，马穆鲁克大军拔营向着邻近城市的方向移动了1英里，然后在那里扎营，其间伴随着一阵阵恐怖的喇叭声、铙钹声、鼓声，还夹杂着许多种不同声音的可怕嘶吼声。”^[1]在4月5日星期四，他正式宣布围城。

他选择了一座高出平原30米、位于城东约300米的小山作为他个人宿营的地点。综合各方面的史料记载，这是个怡人之处，曾经有“一座可爱的塔楼，以及数个花园和葡萄园，为圣殿骑士团所有”^[2]，而且视

野开阔。穆斯林将其称为塔尔福克哈（Tal al-Fukhar），基督徒则把它叫作勒图伦（Le Tournon），这个地方对双方来说都具有历史意义。一个世纪之前的1189年夏季，耶路撒冷国王居伊·德·吕西尼昂也是在这座小山上指挥十字军围攻萨拉丁占据的阿卡。现在，命运之轮循环往复，回到原点^[3]。从这里，哈利勒可以越过田野和果园，俯瞰正下方的一片狭长沙湾，纳曼河从那里穿过一片又一片沼泽地。再往南10英里处的海岬上是废弃的海法城堡，它是被拜巴尔摧毁的。向北就是阿卡的双重城墙和交错的塔楼，呈现出“斧头形状”^[4]的布局（根据一位史学家的描述），以及它的港口和紧凑拥挤的市中心，它的教堂和显眼的宫殿，耶路撒冷国王的城堡、各大骑士团和意大利社区的要塞在平顶房屋中鹤立鸡群。他还可以看到他的军队在城市前方集结。

苏丹大帐的选址和搭建是一场仪式。哈利勒遵循马穆鲁克的习俗，将自己华丽的帐篷——统帅大帐（dibliz）设在面对自己目标的方向。这座帐篷“通体赤红，大门面向阿卡城敞开”^[5]——这一朝向表明了他的意图。“这是马穆鲁克苏丹的仪式性惯例，统帅大帐大门的朝向让每个人都知道苏丹的兵锋所指。”^[6]可能就在同一天，苏丹的代表们走近这座城市，向守军提出安全保障（aman）^[7]，这是在城市自愿投降的情况下对居民人身安全和通行许可的担保。在十字军的据点连续崩溃以及的黎波里大屠杀发生之后，这一做法不过是对伊斯兰教律一种形式上的认可。背后是茫茫大海，巴勒斯坦海岸再无其他重要据点，守军知道这一定是一场殊死搏斗——要么就是他们身负骂名地离去，在基督教世界里痛遭世人唾弃。法兰克人不肯纡尊降贵，而是以一场箭雨回应了代表们的提议：拒绝，这就意味着围攻战将在第二天正式打响。这是一个星期五，在穆斯林的一周中是最神圣的一天，苏丹选定这一天来强调这项事业的神圣性。

这位无名的“推罗的圣殿骑士”是马穆鲁克军队部署的见证者之一，他宣称苏丹的军队里包括7万名骑兵。在哈利勒的时代，马穆鲁克禁卫

军的人数可能有7000~1.2万人，这还要算上各级埃米尔统辖的马穆鲁克士兵以及一支自由民组成的公民骑兵部队。后来于1315年估算的数据表明，单是埃及本土的军队就拥有2.4万名骑兵（尽管其中许多人除了一两匹驮着行李的骆驼之外，还有两匹马随行，因此，在测算一大群人和动物时，有相当大的误差空间）。在整个围攻战过程中，很明显，马穆鲁克的营地日夜都有大批骑兵巡逻。除了骑兵，“推罗的圣殿骑士”估计步兵的人数有15万，包括受过训练和未经训练的步兵，而大量的平民志愿者和辅助部队使总人数暴增。在所有马穆鲁克和十字军之间的遭遇战中，人数上的完全不对等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推罗的圣殿骑士”对哈利勒的军队规模的估计有多夸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场战役大受穆斯林欢迎，因而在这种情况下集结起的一支庞大军队，其规模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尽管双方的人数相差悬殊，但结果并非板上钉钉。阿卡的人口比马穆鲁克所攻陷过的任何一个设防据点都要多。拜巴尔攻下的城堡中，能容纳超过一千兵力的地点寥寥无几；而保卫阿卡的人数则超出这个数字十倍。“推罗的圣殿骑士”估计，阿卡的人口总数在3万~4万，包括妇女和儿童，有700~800人的骑马骑士，以及1.3万人的步兵。这是一支混编部队，各大骑士团全副武装的重甲骑士和他们的侍从军士组成了精锐的骑兵部队。每一个骑士团都可由其独特的服饰被辨识出来：圣殿骑士的白色外衣上绣有一个红色十字，医院骑士的红色外衣上有一个白色十字，而条顿骑士的黑色外衣上绣有一个白色十字。阿卡的步兵由来自塞浦路斯的部队、雇佣兵和欧洲来的分遣队组成。这些人中包括经验丰富的弩兵（对于围攻战的防守一方至关重要），以及一小批技术专家——工程师、矿工和木匠——他们在建造防御掩体、制造和修理弩炮，以及反地道作战（如果马穆鲁克将地道挖到离城墙下方足够近的距离）中的作用十分关键。城里的比萨人都是特别擅长制造和操作弩炮的实用型的水手。此外，还有最近抵达的平民朝圣者和冒险家，正是他们的行为导致了这场战争。

从城墙上，“推罗的圣殿骑士”可以看到帐篷与帐篷“之间的距离非常小，从图伦一直延伸到苏迈利亚区（Sumairiya，就在城市的北部），所以整个平原上都被帐篷覆盖”。^[8]马穆鲁克军队整个包围了阿卡不靠海的两边，从中东各地征调过来的部队面向城墙排列，阵容严整：在北端一片岩石嶙峋的海岸上，作为全军侧翼的是阿尤布附庸马利克·穆扎法尔的部队，他是叙利亚中部地区城市哈马的统治者；在战线中央，面对阿卡的主城门圣安东尼门（坐落于一座塔楼之内），是总督胡萨姆·丁·拉津指挥下的大马士革军团；在他们的左边，是拜巴尔·曼苏里指挥下的卡拉克军团，此军团的营地正好位于苏丹帐篷所在小山的正下方，而苏丹自己麾下的埃及马穆鲁克部队则威胁着城墙到港口之间的区域。

另外一个对马穆鲁克军队的围城部署进行密切观察的人是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让·德·维利耶，他所记述的苏丹接近阿卡的日子比“推罗的圣殿骑士”早了几天。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以夸张的笔法描述了哈利勒在4月1日戏剧性的到来。哈利勒“在日出和祈祷的第三个小时（大约上午九时）之间，全面包围了阿卡，其阵线从海的一端延伸至另外一端，而其队伍长度向东直抵幼发拉底河（目力所及之处）。他带来了所有的攻城武器。就这样，他带领大批人马和众多军械在阿卡城前安营扎寨”。^[9]

如果说马穆鲁克军队的规模总是被高估的话，那么对于城墙之上的观察者来说，马穆鲁克大营仍是一幅令人生畏的景象。他们可以观察到一派气势恢宏的场景。成千上万的动物，有驮载帐篷的骆驼，拖拽攻城武器的牛，马穆鲁克的战马；以及军队所有的人员，有骑兵和步兵、木匠、石匠、厨师、神职人员；还有携带饲料、饮用水和食物的后勤部队。繁多的色彩，各式各样的服饰，还有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盔帽、头巾、护身铠甲、盾牌和利剑。阿卡的人们可以听到一支大军安营的嘈杂声音：动物的嘶叫声、传令兵的吼声、祷告的朗诵声、挖壕的铲土声、搭设帐篷和安装攻城武器的劳作声、黄旗的飘动声、喇叭声和鼓响声。“当我们在那里扎下大营后，”拜巴尔·曼苏里记述道，“他们就被

围了个水泄不通。”^[10]

哈利勒的士兵抬头望去，看到“一座由主城墙、外城墙、塔楼、护城河和坚固的外堡保护起来的城镇……呈现出三角形盾牌的形状”，^[11]就像一位游客在几年前描述的那样。双层城墙不受阻断地从海岸经过陆地再延伸到海岸——总长超过1英里——城墙沿线有多处开辟了城门和暗道，每隔一定距离就建有高大的方形塔楼。城墙前方是一道护城河，其内侧陡峭，边缘砌有石块，河沟宽达12米。塔楼的名字表明了一些琐碎细节——它们是由个人捐赠或倡议所筹资建造的：威尼斯之塔、英格兰之塔、亨利国王之塔以及布卢瓦女伯爵之塔。其他的一些塔楼的名字则较为不祥，反映出阿卡的动荡过往以及依附于其上的传奇故事。诅咒之塔的侧方是血腥之塔。再往西去是包括魔足门（Gate of Evil Step）在内的外城墙防御工事。

然而，在后世添加这些额外防御设施的很久之前，像维尔布兰特·范·奥尔登堡这样的访客就对阿卡的城防赞誉有加：“宽沟深壕，两侧砌有石墙，直至根部，上方则是双层城墙，布局精妙。第一道城墙，其塔楼不超过主城墙本身的高度，被第二道城墙，也就是内城墙所俯瞰并保护着，而且高耸于第二道城墙上的塔楼火力强大。”^[12]两层城墙之间是大约40米宽的杀戮空间，中间也设有一道壕沟。带有斜度的壕沟由切割好的石块筑成，营造出的陡峭斜坡使得攻击者不得不通过攀爬才能到达城墙的底部。高度较低的外城墙上也有大致是方形的塔楼群，这些塔楼相距50米，“环绕城墙，彼此不超过一箭之地”^[13]，还配有额外的小型凸出部分以提供掩护火力；城门也设置在塔楼群中。内城墙上塔楼与塔楼的间隔由半圆形的外堡保护着。在鲁道夫·冯·苏德海姆的描述中城墙固若金汤，“宽度足够两辆马车在城墙上轻易地互相经过”；而在离外部护城河更远的地方还有其他“若干外部防御工事”；平原上布设有木质栅栏，栅栏的前方又另有壕沟，以求进一步迟缓敌军前进的速度。阿卡的城防可谓坚不可摧。

关于围城实施准则，根据公认的伊斯兰世界的军事智慧〔这些智慧的结晶在一个世纪后由易卜拉欣·安萨里（Ibrahim al-Ansari）编纂汇总成军事手册〕，一位指挥官应该投入时间去“了解要塞的状况，知道难以进入的地点和可以轻易进入的地点，无法开展行动和能够行动的地点……（而且要进一步明确）……可以挖掘地道（以破坏城墙）的地点以及部署攀墙绳索、攻城云梯和抓钩的地点”。^[14]通过在有利地势进行观察以及多次实地探索，哈利勒有足够的机会来审视阿卡的防御体系并筛选自己的策略选择。有两处地点格外引人注目。阿卡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围绕港口的老城区，以及新发展起来的蒙穆萨尔郊区，这两部分区域现在都被一道双层城墙围护起来。一道内城墙，也就是老城区的外城墙，将这两部分区域分隔开。在两道城墙的交会处，外部城墙向内凹陷形成一个战略地位重要的城门楼——圣安东尼门。在东侧大约600米处，城墙弯折成一个更为锐利的直角，转向大海。这里是阿卡城防最为薄弱之处。正是在这里，一个世纪之前的十字军击毁了诅咒之塔。

重建之后的诅咒之塔不仅由一道外城墙保护，而且有其他防御工事的火力支援。这些防御工事包括于格三世建造的外堡场——一个从外城墙凸出的外部防御结构，并与诅咒之塔通过甬道相连——以及由亨利国王在附近建造、正好位于直角顶点处的塔楼，为通往城市核心地区的入口，即诅咒之塔提供更深层次的防护。对哈利勒来说，重要的是在城墙全线保持压力以分散守军兵力，使其各处的防守力量变得稀薄，但他最初的注意力却放在了于格三世外堡和圣安东尼门。

尽管他已经集结了庞大的军队，而且在过去三十年里马穆鲁克在进攻十字军城堡的战斗中连续不断地取得成功，哈利勒的此次战役行动依然存在风险——而他作为苏丹的合法性有赖于这次战役的成功。一个不受欢迎的统治者被重臣们赶下台的过程可能既迅速又血腥。他没有舰队，也无法封锁阿卡，这使其无法通过海路获得再补给和增援部队。尽管如此，对这座城市了解颇深的穆斯林商人或间谍已经为他提供了充分

的情报，使他对阿卡可能采取的防守策略和外界对阿卡求援的回应了然于胸。春季的大海让人难以预测，而天气极有可能干扰塞浦路斯所提供的任何救援的到达。

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表现出密切的个人兴趣，这点对苏丹来说极为重要。由易卜拉欣·安萨里撰写的马穆鲁克军事手册规定，“军队指挥官或是他委任的军代表每隔一天或者两天就应该巡视包围要塞的阵地”，并且应该“监督投石机的安装进程和弹药的配备”。^[15]而且萨拉丁和拜巴尔都深知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的必要性。拜巴尔在1265年的凯撒利亚之战中在一辆轮式防护车的掩护下深入到接近城墙的前线，视察地道作业的进展，而在随后的阿苏夫之战中，他差点儿在战壕里丧生。苏丹应该站在军队能看到他的地方并且要不吝赏赐。如果要让士兵为自己战斗乃至献身的话，士气至关重要。

时间是一个关键因素。马穆鲁克的战略是集中压倒性力量对一座城镇发动快速而又致命的一击。如果在拜巴尔的时代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崩溃的基督教据点中没有一座据点能撑过六周以上的話，那么这一时限很可能就是意志比较脆弱的地方军和志愿兵保持可靠性的最大时间长度。萨拉丁在1188年试图攻下安条克的努力最终功亏一篑的原因就在于“他麾下的军队，尤其是那些来自边远地区的部队的决心已经动摇，他们对圣战的热情已经消退，他们只想返回自己的家园，舔舐战争带来的创伤”^[16]。疾病则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在卫生保障和营地管理方面——饮用水的供应、清洗设施、尸体埋葬、食物补给——穆斯林军队远胜于他们的基督徒同行，但哈利勒的军队人数众多，随着春季到来，升高的气温和低洼的平原地形给这支军队带来了诸多挑战。阿卡周围的沼泽散发出瘴气，后来的旅行者多梅尼科·拉菲（Domenico Laffi）证实了这一点。他将阿卡称作“一个不健康的地方……因为周围环绕着沼泽……我们（的船）无法在那里待上一整年，因为雨季的糟糕空气和恶劣条件”。^[17]在1189—1191年的漫长围城战中，阿卡城里城外的两支军队都

饱受疾病的摧残。

虽然马穆鲁克军队的后勤技术水准很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长时间围城的各项指标上还是逐渐堆积起不利的数据。据估计，一支由2.5万人组成的中世纪军队每天需要9000加仑的水和30吨的牲畜饲料才能满足自身的补给需求。一场60天的围城战需要清除掉人和牲畜所产生的100万加仑废水和4000吨固体生物废料。哈利勒的军队将要产生的数字至少是上述数据的3倍。别的不说，驱使苏丹的士兵在城墙外等待和牺牲的动力就很有限。人数众多的志愿兵不仅受到宗教热情的鼓舞，而且也受到能获得战利品的前景的激励。他们不会无限期地在阿卡城外的平原上坚持。

从他的营地望去，这座城市的备战状况一览无余：哈利勒“发现城头布置了各式各样的装备和反攻城武器”。^[18]守军在可以利用的时间内做了一切能做的事。让·德·维利耶后来写道：“我们和城内所有能干的基督徒为对抗侵略者做了准备，充分武装了自己，所有用来保护和守卫这座城市和人民的装备和器械都已准备就绪。”^[19]士兵们准备好了自己的装备：给铠甲（链甲束腰外衣）上油、清理头盔、磨利刀剑和矛尖、为战马钉上马掌、调整盾牌把手和弩机器件、储存弹药。“推罗的圣殿骑士”也描述了守军准备他们的反攻城武器的情况。他们“合理部署防守岗位，并开始发出警报，就像一个人发现敌人时必须做的那样”。^[20]

这座城市在靠海一侧没有防御设施，因为近海的岩石和沙洲地貌使得两栖登陆进攻无法实现。相反，在蒙穆萨尔区的北端，防御工事延伸至岩石海岸的地方，一座巨大的圆形塔楼守护于此；在东端，城墙止步于沙滩的地方有一座小塔楼，另外还有直插入水中的带刺铁丝网，以防骑兵通过浅滩发动迂回攻势。在港湾，比萨人拥有能够使用安装在甲板上的弩炮轰击海岸的舰船。在岸上他们也有十五台类似的弩炮，布置在刚好可以在内城墙里开火的地方，很可能还装备有从城垛上指挥操作的

测距仪。

紧靠内城墙的是大型圆拱形厅室，在战时被城镇的普通民众用作军火库，他们来到这里准备战争物资，“运来大量的石块、弩机、弩箭、长矛、弯刀（单刃剑）、头盔、胸甲、鳞状棉甲、带有金属饰扣的盾牌以及所有其他种类的盔甲”^[21]。旌旗在城头上飘扬，而当城门最终封闭关死时，守军很有可能采用传统策略，在外城墙上悬挂沉重的防护物——固定在木梁上的成捆羊毛或皮革片——用于减轻弩炮发射的石弹所带来的冲击效果。

城中的军事力量按照防区划分各自的防守责任。蒙穆萨尔区的最北面防区由大团长纪尧姆·德·博热和大元帅皮埃尔·德·塞夫雷（**Pierre de Sevrey**）指挥下的圣殿骑士团把守，并得到了圣拉撒路麻风病人骑士团的帮助；在他们的右方，医院骑士团据守着通向圣安东尼门的一块关键防区，由他们的大团长让·德·维利耶和大元帅马修·德·克莱蒙指挥。医院骑士们与圣托马斯英格兰骑士团轮流换岗上阵；再往右的防区由胡戈·冯·博兰（**Hugo von Boland**）率领的条顿骑士团负责。作为防守关键的国王之塔、诅咒之塔和外堡凸出部分，也就是城墙急转弯之处，由塞浦路斯王国的军队负责把守，由年轻的王弟、推罗领主兼阿卡摄政阿马尔里克指挥。最后一个防区，一直延伸到港口区，被委托给让·德·格拉伊率领的法兰西军团和奥顿·德·格朗松率领的英格兰军团，他们得到了新近抵达的朝圣者和市民的协助。

精通海战的意大利人分散在防御阵线上。威尼斯人和比萨人在多个地点为守军提供支持；热那亚人则犹豫不决，然后宣布保持中立。他们在1290年5月与嘉拉温签订了一份商业协议，因此无意破坏这份协议。意大利商人群体的承诺由于威尼斯人也签署了类似的协议而一直备受怀疑，尽管比萨人一直在全心全意地付出。

城墙的守卫工作实行严格的轮换制度——每八小时轮一次——由每

一防区的两支部队进行岗位交接，具体事宜由两位防区司令官管理。历史资料表明，总体的防守责任由战时委员会的八位主要人物分担，包括阿马尔里克，三个最大骑士团的大团长（维利耶、博热和博兰），“法兰西军团的指挥官兼耶路撒冷王国总管”^[22]让·德·格拉伊，英格兰军团指挥官奥顿·德·格朗松和宗主教尼古拉·德·阿纳普。

尽管有这些表面上合乎逻辑的安排，实际上令人满意的统一防御计划并不存在。针对围城的防御组织反映出这座城市本身的派系分裂历史和人文地理特征，不同的群体在各自的飞地内据守并设置路障，他们往往将保卫自家地盘视为首要任务。十字军骑士团是强大的自治实体，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只对自身和教皇负责，作为教廷代表，阿纳普只有名义上的统辖权。意大利航海共和国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他们曾在这座城市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对圣战的承诺并不在他们的优先考虑范围之内，而向埃及的马穆鲁克政权出售战争物资则被常常排在首位。

除此之外就是在这里立地生根的常住居民和宗教团体，对于他们来说阿卡就是他们的家园，还有来自的黎波里和其他沦陷城镇的弱势难民，以及由新近抵达的十字军和朝圣者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毫无军事经验，其行为还导致了战争。耶路撒冷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29岁的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二世，将他对这群喜好争吵的人民的权力委托给他年轻的弟弟，大约18岁的阿马尔里克，但是他的权力也很有限。在整个围城过程中，不和谐的音调此起彼伏，无法压制：任务分配不均，关于特权和等级的争论，以及混乱的指挥体系。在围城期间，阿卡作为黎凡特罪恶之窟的声名竟然挥之不去，据说许多人对日益严重的危机视而不见，而更喜欢享受港口生活，在酒馆和妓院里寻欢作乐。

穆斯林军队对围城战有着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深刻的理解。早在9世纪，阿拉伯人的军事手册就制定了一套攻陷城堡的流程，得到了普遍认

可。到了中世纪中期，围攻城堡的技术和作战行动管理已经高度精细化。尽管穆斯林的胜利中不乏诸如萨拉丁的哈丁战役这样惊人的野战胜利，但圣地却是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通过一系列气势如虹的高强度攻坚战从法兰克人手中一块又一块地夺回来的。13世纪见证了一连串坚不可摧的要塞一个接一个地失守，如亚实基伦、凯撒利亚、萨福特（Saphet）、安条克、查斯特布兰克（Chastel Blanc）、骑士堡、马尔盖特、的黎波里。所有这些城堡都是在六周之内陷落的。

传统程序中的第一步是要确保马穆鲁克的营地针对敌方袭营做好准备，设置好防御性的栅栏和壕沟。安萨里写道：

必须强调的是，围攻敌军的部队在某种意义上说亦是被围攻的对象，其本身在敌军出城袭营之时便有危险之虞，而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机会闪现，敌军必然急于利用，因为他们渴望胜利的程度不亚于围城者。因此，指挥官有责任对自己和所率领的军队持以慎之又慎的态度。如有需要，他就应当利用好战壕，而挖掘战壕是可行的，因为这是消灭敌军和征服对手的最有力（要素）之一。[\[23\]](#)

为了保护己方营地不受敌军炮火和反攻的损害，马穆鲁克军队在其前方筑起一道土垒。随时保持警惕乃必要之举，而且骑兵也被部署在离城墙一箭之遥的地方以防敌军袭营。一旦立足已稳、安全无虞，下一步就是在有掩护的情况下前进，想方设法尽可能接近城墙，让己方弩炮和投射火力发挥出最大效果并且开始地道作业。从心理上瓦解敌军的斗志是另外一项重要战术。山崩地裂般的响声——弩炮反复发出的嘎吱声和撞击声，骑在骆驼上的鼓手发出的整齐奏鸣声，整个战场上传来的哭声、喊叫声和有节奏的诵经声——可能会让守军深感沮丧。

通过弩炮来削弱城墙并且凭借投射火力扫除城墙上的抵抗是准备阶段的重头戏。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工兵可以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墙下并

将塔楼炸塌。一旦攻方创造出合理的突破口，守军经常会承认进一步抵抗是徒劳的并会要求投降。很多被拜巴尔和嘉拉温攻击的十字军要塞仅仅是在一处战略地位重要的堡垒或护墙崩塌后就屈服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随之而来的就是攻方在黎明前发动一场血腥的总攻，战场上杀声震天。这需要填平所有壕沟以便士兵通过，牺牲打头阵的志愿兵或是从后面驱使囚徒向前充当炮灰，继而就是最后的屠城。

哈利勒军营的组织建设工作很显然颇耗时日。维利耶观察到这些准备工作开展的时间超过了九天：“于是从到来的那一天起直到周一（4月9日）之后，他们不停地圈用地面，一些用于存放器械，一些用于修建防御工事，一些用于挖掘壕沟，一些用于设置栅栏，还有一些用于其他工作。他们围绕城墙架起所有攻城武器、布设防护掩体，并将发射方向对准我们。”^[24]

哈利勒对阿卡城防的一番苦心研究使他得以将最大的弩炮用在最有希望达成突破的目标上。这些庞然大物——从开罗拖出并经过黎巴嫩山区，在充满爱国热情和宗教热忱的人们的帮助下被拉出大马士革的城门，然后再一次被拆卸，又经过80英里的拖运才在阿卡城门前重新组装起来——不仅代表了马穆鲁克军事组织能力的一次胜利，也表明了各种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可观投入。这些弩炮不可替代，而且在面对反炮兵作战时使用的希腊火十分脆弱。这一点马穆鲁克将领也心知肚明。哈利勒的军队在部署这些武器时遵循了安萨里的建议：“安装它们用来攻击一座城堡的人应当将他们设置在敌军（火力）无法企及的地点。”^[25]每一台投石机的安装、定位以及调试到可以操作的状态都用去了两天时间。它们组成了一支穆斯林军队迄今为止所调集到的最大的投石机集群，象征着十字军时代机械炮兵的终极发展成果。

在最初的这段武器安装过程中，战场上出奇的平静。从穆斯林这边来看，拜巴尔·曼苏里注意到守军中洋溢着一种坚定不移的自信：“他们

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对于即将到来的攻城战毫不在意，甚至都没有关闭城门，也没有在城门前悬挂（减轻轰击效果的）防护性屏障。”^[26]显然，趁着敌军营地尚未建成、仍然处于易受攻击的状态时，守军曾发动了突袭和试探性进攻。“推罗的圣殿骑士”注意到苏丹的军队“在阿卡城前静坐了八天，除了参加双方之间的零星冲突外无事可做，这些冲突给双方都造成了一些伤亡”。^[27]穆斯林方面的历史文献给出了一种偏袒倾向更为明显的记述，敌我之间仿佛在进行骑士间的比武大赛：

基督徒开始出城来到穆斯林营前，向他们发出决斗的挑战。来自公民骑兵和苏丹属下的马穆鲁克部队的战士骑马向他们冲去，时而进攻，时而撤退，时而互相戳刺。这种状态持续了若干天，穆斯林大获全胜，敌兵死伤无算，每天都是败阵而归。他们发现穆斯林拥有一种他们所缺失的心境。他们停止了争斗，只是停留在城门处以求自保，再也不敢出来放肆。^[28]

更有可能的是，基督徒只不过是寡不敌众而已，所以常识占了上风。守军因此将大门紧闭。

^[1]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68.

^[2]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8.

^[3] 原文典出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李尔王》：The wheel is come full circle（命运之轮又循环过来了）。

^[4] Dichter, B. *The Maps of Acre, an Historical Cartography*, Acre, 1973, p.32.

^[5]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8.

^[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8.

[7] “aman”在阿拉伯语里意为“安全”。

[8]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8.

[9] King, E.J.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1931, p.301.

[10] Baybars al-Manṣūrī. *Zubdah al-Fikra fī al-Tārīkh al-Hijrah*, ed. D.S.Richards, Beirut, 1998, p.278.

[11] Dichter, B. *The Maps of Acre, an Historical Cartography*, Acre, 1973, p.45.

[12] Dichter, B. *The Maps of Acre, an Historical Cartography*, Acre, 1973, p.47.

[13] Ludolph von Suchem. *Description of the Holy Land, and of the Way There*, trans. Aubrey Stewart, London, 1895, pp.50-51.

[14] ‘Umar ibn Ibrāhīm al-Awsī al-Anṣārī. *A Muslim Manual of War*, ed. and trans. George T.Scanlon, Cairo, 1961, pp.116-17.

[15] ‘Umar ibn Ibrāhīm al-Awsī al-Anṣārī. *A Muslim Manual of War*, ed. and trans. George T.Scanlon, Cairo, 1961, p.118.

[16] Kennedy, Hugh. *Crusader Castles*, Cambridge, 1974, p.100.

[17] Dichter, B. *The Maps of Acre, an Historical Cartography*, Acre, 1973, p.33.

[18] Chevedden, Paul E. ‘Black Camels and Blazing Bolts: The Bolt-Projecting Trebuchet in the Mamluk Army’,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8, no.1, 2004, p.250.

[19]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7.

[2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7.

[21]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60-1.

[22] Marshall, Christopher J. *Warfare in the Latin East, 1192-1291*, Cambridge, 1992, p.82.

[23] ‘Umar ibn Ibrāhīm al-Awsī al-Anṣārī. *A Muslim Manual of War*, ed. and trans. George T.Scanlon, Cairo, 1961, p.118.

[24] King, E.J.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1931, p.301.

[25] ‘Umar ibn Ibrāhīm al-Awsī al-Anṣārī. *A Muslim Manual of War*, ed. and trans. George T.Scanlon, Cairo, 1961, p.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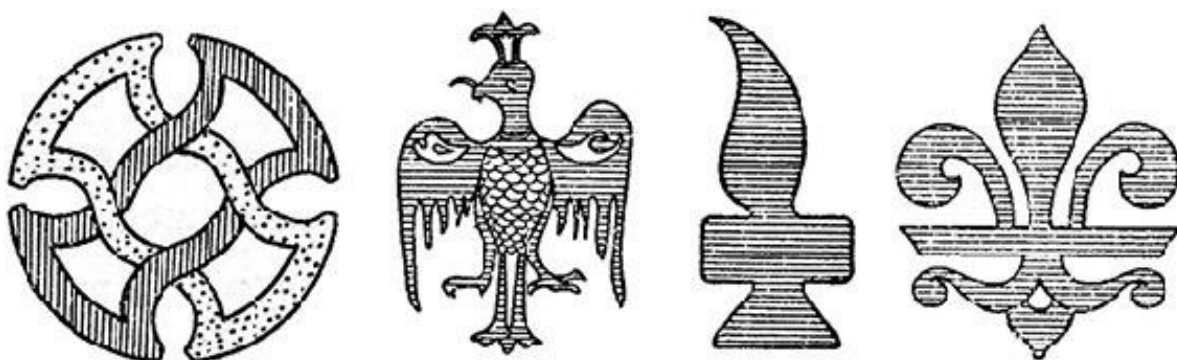
[26] Chevedden, Paul E. ‘Black Camels and Blazing Bolts: The Bolt-Projecting Trebuchet in the Mamluk Army’,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8, no.1, 2004, p.251.

[2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8.

[28]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p.57-8.

第九章 “电闪雷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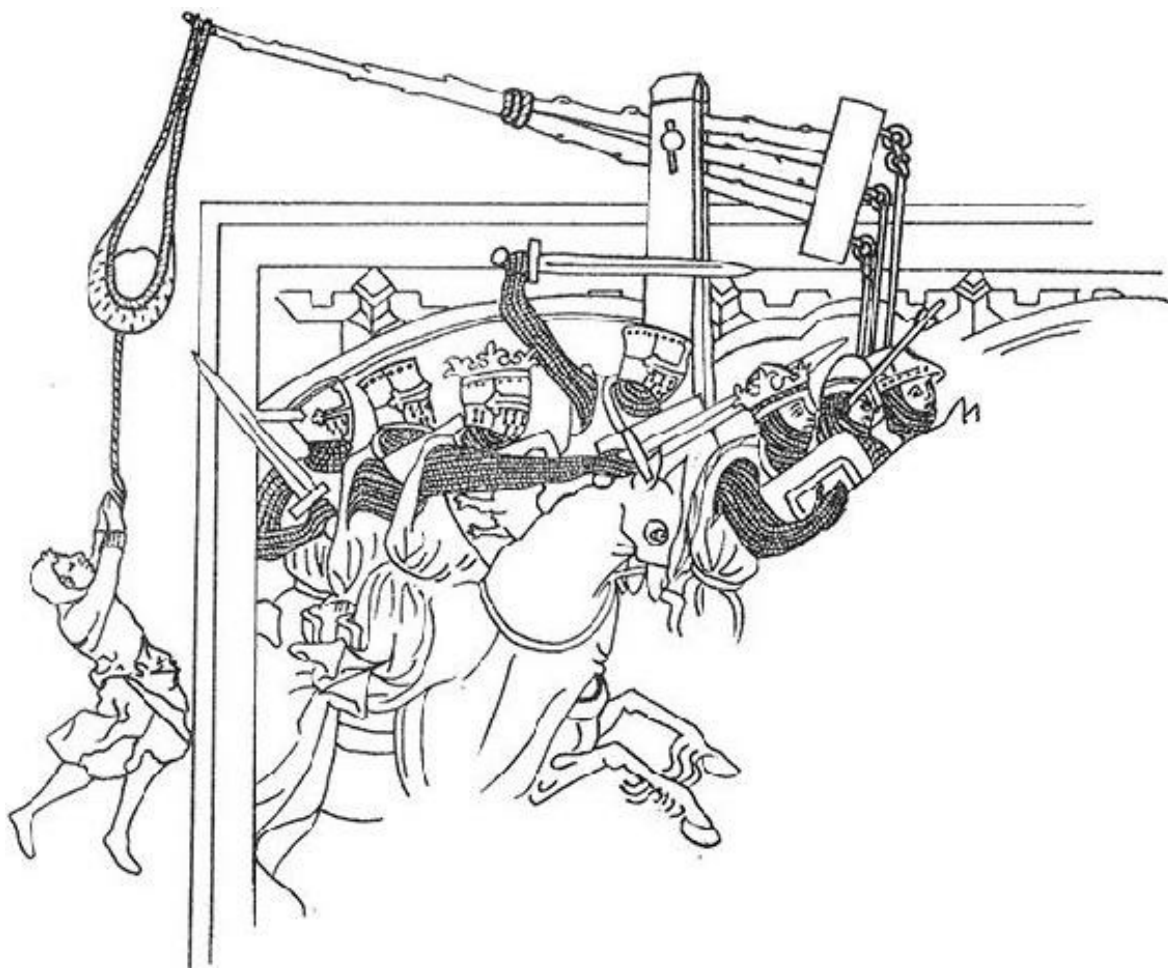
1291年4月10—13日



哈利勒的军队在来到阿卡的城墙之前对于攻坚战就已经是行家里手了，对于其可以部署的战术已经游刃有余，这都汲取自一些可以追溯至伊斯兰教开宗立教之初的传统智慧。尽管其宗教信仰发轫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之中，但占领设防城镇一直是传播穆罕默德箴言教义的中心工作。先知本人就曾在围攻城镇中使用过投石机^[1]，这种技术可能起源于公元前数个世纪的中国，并通过拜占庭人或波斯人传播到中东。这些机器利用一根两端长度不等的抛杆围绕着支点进行旋转所产生的动力，将沉重的投射物抛射到很远的距离。配重式投石机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发明的最强大的机械类炮兵武器。它们曾是拜巴尔攻城部队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嘉拉温的时代它们以大规模集群的形式被部署至战斗中。“它们被调集起来对付阿卡，”阿布·菲达写道，他本人就曾经帮忙运输这些武器，“大大小小的投石机都被征用了，以往攻打其他地方时从未使用过如此多的数量。”^[2]两年后，在19台投石机的帮助下，的黎波里被攻

陷。现在，在城墙上观察者的注视下，正在进行组装的投石机至少有72台，而且很可能多达92台。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马穆鲁克军事规划能力的胜利，也证明了其资源的深度。

哈利勒准备释放在阿卡石墙上的武器威力及其种类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武器分为两种类型。在这两种类型中，通用的结构是一根两端长度不等的抛杆固定在一个枢轴上转动，其两端重量分配不均，由一根坚固的木质支架或是单杆支撑。抛杆较长的一端系有吊兜，吊兜内装有投射物——一块石弹或是一枚燃烧弹——然后发射。最开始，这一过程是由人力完成的。原始的配重式投石机是一台牵引式机器，依赖一队炮手协同运作，将炮索迅速而有力地拉下，使抛杆末端向上翻动，从而将投射物从吊兜中抛出——拜巴尔本人就曾在阿苏夫围城战中参加过这种发射工作。到了12世纪末，配重式投石机的工效和威力有了显著改善，人们创造出一种更大的装置，利用重力旋转抛杆，进而抛掷投射物。这种装置舍弃了用人体的肌肉力量甩动抛杆的方法，而是在抛杆较短的一端装上一块沉重的配重物——装在布袋或木箱里的石块或铅砣。抛杆被加长到10米，而沉重的木质支架也在其两侧使用大量的支撑物加固，以抵挡投石机发射时带来的更大的冲击力。进一步的改进措施还包括增加装弹吊兜的长度，从而提高速度并且扩大射程；一些投石机用铰链将配重物悬挂而不是固定在抛杆上，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抛射动力。这些投石机的装弹和发射速度远远低于依靠牵引产生抛射动力的投石机。^[3]它们通过绞车或人力将抛杆的较长一端拉到地面，将配重物的一端升到空中，然后将抛杆锁死在发射位置。一块石弹被拖入吊兜中，吊兜被放置在投石机底座的木质导轨上，同时通过挂钩与抛杆连接在一起。抛杆随后将以预估好的最佳弹道发射石弹，击中给定的目标。炮手将发射绳系在锁紧装置上，向后退到安全距离以内，用力猛拽扳机，然后配重物就会由于重力的作用向下急速坠落，将抛杆的发射臂猛抛向天空，以惊人（40米每秒以上的）的速度抛射出石弹。



中世纪手抄本上的一个片段，演示了一枚炮弹是如何从一台牵引式配重投石机中发射出来的。悬挂在吊兜上的主炮手利用自身的重量使抛杆弯曲，从而增大炮弹的速度和射程。被冲锋中的骑士挡住的炮手正在等待主炮手的命令，以向下猛拽炮索，从而将他手中的炮弹发射出去

这两种类型的投石机所涉及安装、测距以及发射等方面的技术非常广泛，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验且长期衍化所产生的结果。设计中存在着很多变量：石弹的尺寸，抛杆的长度和弹性，抛杆在枢轴两端相对长度的比例，以及吊兜的长度和位置调整量。射速更快的牵引式配重投石机还另需不同的资源和技术。为了创造出连续轰炸的效果，大批士兵以团队形式轮流工作，每次最多十人一组，以整齐划一的行动拉拽炮索。其中的主要角色是指挥团队并为投石机准备炮弹的主炮手。担纲主炮手的人需要兼具勇气、知识和良好的判断力。这个人负责在发射之前将炮弹放

入吊兜中，他可能双脚离地悬挂在空中将炮弹向下拉，以便使抛杆在发射的时候弯曲，或者站在地面上将吊兜和炮弹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吊兜和炮弹的位置至关重要，如果角度不对，炮弹就不会垂直向上飞出，或者根本发射不出去。这时，主炮手发令给自己的队员，让他们拉紧松弛的绳索，然后猛拽。抛杆受力猛然甩出，将炮弹从他的手中向上拉出，从吊兜中以选择好的弹道发射出去。配重式投石机的操作还需要大量的后勤资源和制造技术支持：木匠和手工艺者，采石工人，切凿的石匠，以及将投石机拖运到阿卡的运输部队。

在100年前的阿卡围城战中这些投石机就已经大发神威，令人生畏，其中一些最大型的很可能就是相对较新的机械式配重投石机。据基督徒编年史家的记载：

穆斯林守军在城内部署了很多台配重式投石机，但其中一台因其庞大的体形以及投掷巨大石弹的杀伤力和效率而无与伦比。它的巨大威力无可匹敌，当发射巨大的石弹时.....如果这些石块在下落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那么就会在地面上砸出1英尺的深坑。这台投石机击中了我方的一些投石机，要么将它们打得粉碎，要么至少使它们不堪再用。它的炮弹还摧毁了很多其他的攻城武器，或者使其击中的物体支离破碎。它发射出的炮弹力量如此之大，打击效果如此有力，以至于没有任何一种材料或物体能够承受住这难以承受的冲击而不受损伤，无论它们本身有多么坚固或者制造质量有多么好。^[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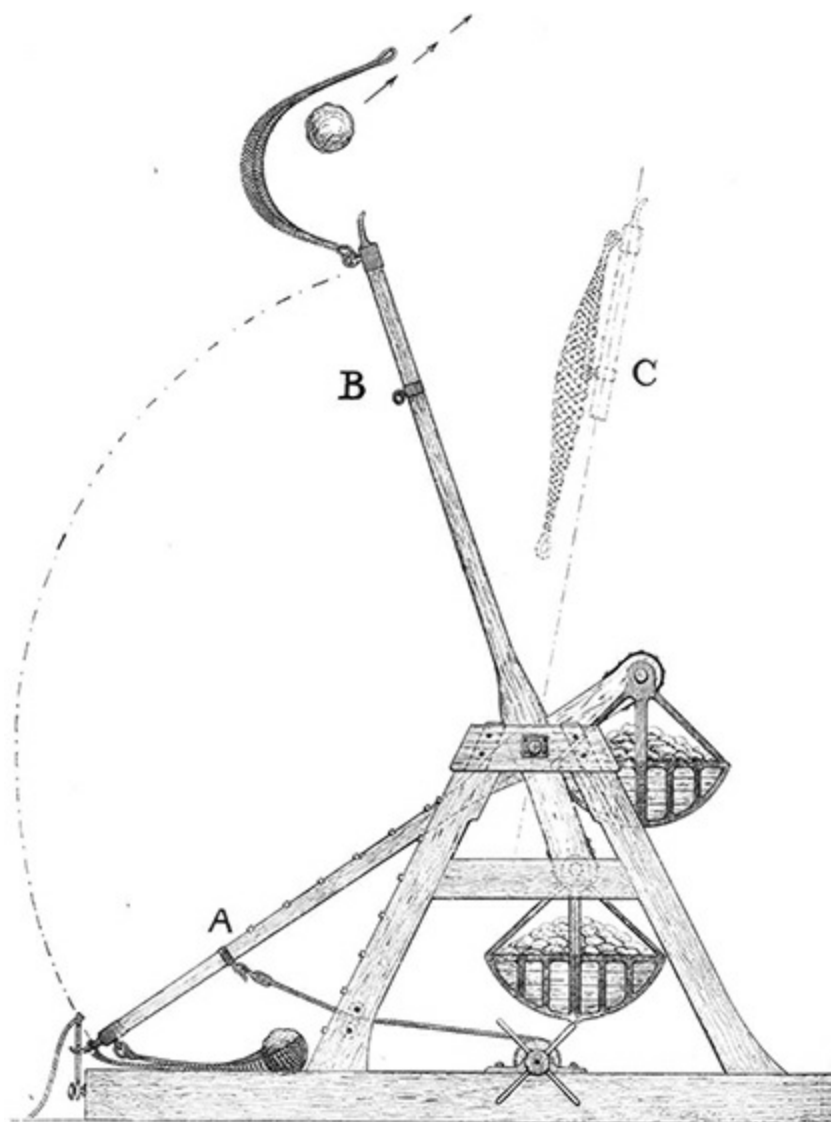
攻方也相应地部署了一台名为“上帝之投石手”的投石机，位置正对诅咒之塔，而且据说附近的城墙顶部被这台投石机击碎的面积将近3平方米。重力给炮弹的推力带来了相当大的加速度，即便这些描述通常都对投石机的破坏力有所夸张。除了它们的实际功能以外，脱缰野马般甩向天空的抛杆，在配重石箱的作用下有如巨大的钟摆一般来回摇荡，空

落落的吊兜飞旋狂舞，石弹如人预期地撞击着城墙、房屋和敌军营地，这种壮观场面对守军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辞藻华丽的阿拉伯诗句令人浮想联翩，将配重式投石机描绘成为真主效力的利器，将抛杆的大起大落比拟为祷告者的顶礼膜拜：“弩炮伏地祈祷，吾人归心安拉。”^[5]

凭借12个人产生的拉力，一台大型牵引式配重投石机能够抛射出重达50公斤的炮弹，尽管它们通常只是抛掷较小的炮弹以求快速的发射速率。机械式配重投石机则能够将更重的炮弹投射到更远的距离。在重量、弹道、发射初速度和射程之间，以及所有这些要素与发射速度^[6]之间存在着权衡利弊的问题。在骑士堡，拜巴尔的投石机发射的石弹重达100公斤。在几个月后的蒙福尔一战中70公斤的石弹被抛射到200米远的距离。大型投石机需要大而重的配重物——最重的可达10吨。配重式投石机还具有一定的精准度，这使得他们对付诸如城墙这样的静止目标时极为有效。他们可以反复打击同一地点。一台中型投石机在向185米远的一堵城墙射击时，能够可靠地将其打击面限定在6平方米以内。而使用火药的炮兵武器还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超过这些机械装置的效力。

哈利勒于1291年的阿卡之战中随军携带了好几种不同大小的弩炮：较为轻便、发射速度更快的弩炮，设计目的是向守军倾泻弹雨，以及击碎城墙的重型弩炮。阿拉伯方面的史料列举出四种不同的类型：“法兰克人”式（ifrangi）投石机，这种类型的武器哈利勒拥有15台，这是一种机械式配重投石机，用于击碎雉堞和护墙顶部，安装在炮架之上，能够发射重达185公斤的巨型炮弹，使用的配重物也达数吨之重；然后就是稍微轻一些的人力牵引式投石机——“黑公牛”式（qarabugha）和“鬼怪”式（shaytani）投石机——可能也是安装在炮架上。一份历史文献称后者的数量有52台。另外还有安装在杆架上的小型杀伤性武器，马穆鲁克将其称为“玩具”式（lu’bah）弩炮，它可以向任何方向旋转，使用小型炮弹打击守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部队使用手持式弹弓来投掷石

弹。



机械式配重投石机的操作过程。这台投石机所使用的配重物是悬挂在抛杆上的一篮石块。**A.**通过绞盘将配重物向上转动至工作位置。装有炮弹的吊兜置于投石机底座，等待炮索被拉下；**B.**释放出的配重物在重力作用下猛冲向地面，抛杆向上弹起，以选定的弹道将炮弹从吊兜中射出；**C.**抛杆带着空吊兜在空中疯狂地来回摆动

“法兰克人”式投石机的安装和操作，以及为其配备坚实的炮架和大而重的配重物，都很耗费时间和人力。最大的一台可能需要半小时来调整配重物高度、装载炮弹和发射，而且它们不能快速地转移位置。因

此，从一开始就明智而又审慎地选择目标很重要。较为轻便的人力牵引式投石机可以较快地安装和重新部署。当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一支分遣队于1147年围攻穆斯林控制下的里斯本时，两台牵引式配重投石机被投入作战，每一台都由100人以10人小队的形式轮流工作，在10小时的时间内发射了5000枚石弹——每台投石机每小时发射250发。在阿卡，哈利勒当然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发动一场高强度轰炸。

炮兵武器的后勤需求也包括供应大批量尺寸合适的石弹，以及采石、运输和将这些石块切割成形的劳动力。从自身积累的经验之中，马穆鲁克掌握了炮兵弹药的地质要求。阿卡的城墙采用的石料取自当地一种名叫库尔卡（kurkar）的多孔海滩砂岩。虽然这种岩石为杀伤性武器提供了合适的弹药，但如果目标是城墙的话，采用比这种岩石更坚硬的材料制作石弹会更有效得多。狮心王理查据说在第一次围攻阿卡时曾随军带来了西西里岛的花岗岩。为了得到合适密度的岩石，哈利勒从其他地层寻找石灰岩并将其运到发射地点。更坚硬的海滩岩石来自距阿卡11英里之遥的矿层，熟练的石匠将其制作成外表美观的圆形石弹，这种石弹很可能是在车床上加工的，大小和重量各不相同，以适应各式型号投石机的需要，最大的巨型石弹直径58厘米，重达165公斤。对于配重式投石机来说，提供大小相等的球形石弹是保持始终如一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和精度的关键。

为了对付阿卡的城墙，马穆鲁克还引入了很多其他类型的围城技术和技能。这其中包括高度发达的燃烧类武器，由经过特殊训练、擅长操作希腊火——一种原油和松脂粉末的混合物（这赋予了它黏结的性能）——的部队使用，可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它可以被装在陶罐里由弩炮发射，恐吓士兵和平民，摧毁木质的攻城武器和防御设施，或者被装在小型的土罐油掷弹里用手抛过城墙。经过特殊改造的弩机也能将希腊火“蛋形体”和火箭发射到更远的距离。马穆鲁克可能也将真正的爆炸物应用到了阿卡的城墙上：一部描述硝酸钾提炼过程的专著的作者，在围

城期间就住在大马士革。为了接近城墙，攻城战术的运用还包括盾车（mantlet，意为移动式攻城掩体车）的部署，使用骑兵巡逻来防止偷袭，以及地道作业。巧用噪声——吟诵，鼓、喇叭和铙钹奏出的军乐，以及放声高喊——也是一种标准的战术，目的是让防守者处于持久的恐惧状态。

据一些伊斯兰的史料记载，组装这些战争机器耗时两天，整个过程要在弓箭手的射程之外进行，但是须处于城墙的开阔视野内。这一活动本身也是马穆鲁克心理瓦解策略的一部分：根据建议，这种行动“不应该暗地里进行，因为通过（公开）实施，恐惧和害怕就会在他们的心里产生，削弱他们的意志”^[4]。仅仅是目睹到一台巨大的投石机，就能让陷入重围的城堡守军的士气一落千丈：当王子时期到过阿卡的英王爱德华一世于1304年在斯特灵（Stirling）城堡前组装出一台名为“战狼”（Warwolf）的巨型投石机时，苏格兰人在它一弹未发时就试图投降。（在下令制作完这台机械巨兽之后，爱德华不打算轻易放过苏格兰人——他想看到这台投石机在实际运作中的表现。他将代表团赶回城内，这样他就可以亲眼看见石弹的破坏力了。）

会说阿拉伯语的“推罗的圣殿骑士”从城墙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他显然能够获得有关哈利勒军队部署的一些详细信息，因为他不仅记录了四台尤为巨大的配重式投石机（其中一些的制作原料来自黎巴嫩的高大树木）的位置，而且还记录了它们的绰号。每一台投石机的出世都代表了大量的人力劳动成果，穆斯林在其中倾注了宗教热情和对胜利的期待。在城墙北端附近，由圣殿骑士团把守的防区，穆斯林部署了一台名为“狂怒”（Furious）的巨型投石机。在靠近大海的最南端，由比萨人把守的战区，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Victorious），阿布·菲达曾在冬季的冰雨中帮忙运送过这台投石机。另外两台——“推罗的圣殿骑士”并没有记下它们的名字——被部署在其他战略地位重要但防守薄弱的地点：一台被部署在正对医院骑士团防区的地点（城墙在那里向内转

弯），威胁着邻近圣安东尼门——进入城市的主要大道——的区域；而另一台则被部署在城墙直角转弯处的凸出部分，那里由一座外堡加以保护，哈利勒认为那里是最有希望的突破点，而那里的内部防御设施诅咒之塔，更是守卫着可以直接进入城市中心的通道。

这些投石机从海岸的一边分布到另外一边，这表明哈利勒打算向守军全线施压，即便他的深层计划是在中心区域实现突破。守军拥有一些较小的、数量不详的投石机，其制造和操作都由比萨人来执行。他们显然有一些“大型投石机”——配重式投石机——很可能部署在内城墙后面，分布于市区的各个区域，目标是哈利勒的那些怪物，但随着围城战的继续，它们可能会慢慢耗尽合适的弹药。

到了4月11日，马穆鲁克的所有投石机已经组装完毕并部署到位：收集好的石弹堆积成山，牵引团队跃跃欲试，机械式配重投石机蓄势待发。哈利勒的战略是快速行动，不给守军一丝喘息之机。“一旦攻坚战开展起来，”安萨里的军事手册建议道，“投石机射击他们的行动就不应有任何停顿，无论白天黑夜，无论何时何地，（火力强度）不应有任何削减。停止攻击就会让他们平息恐惧，内心坚定。”^[8]当弩炮集群释放出一轮恐怖的炮火之后，苏丹的军队向着外围的护城壕沟不分白天黑夜地缓步前进，一路拆除所有遇到的外围防御工事。带着愈发恐惧的心情，“推罗的圣殿骑士”观察到对方以异常严明的纪律执行着既定方案，这使得他们的前进看起来不可阻挡：

第一天晚上，他们设置了巨大的屏障和柳条编制成的掩蔽物，方向正对着我们的城墙。第二天晚上，他们就开始向前移动这些屏障。第三天他们离我们更近了。他们就这样一直向前推进，一直来到护城壕沟的边缘。在这些屏障后面，是手执弓箭的骑兵，他们下了马，全副武装。如果你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推进到离我们如此近的距离而我军无法阻止，让我来告诉你为

什么。

这些骑兵人人身披重甲，坐骑也有马铠保护，值勤范围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也就是说，从海的一边到另一边，人数超过了1.5万，每天轮换四次，所以没有过度劳累之虞。我们的士兵没有出城去攻击屏障后面的敌人，因为后方的敌军（在敌军第一道阵线的后方）会保护他们，不论我们的人在任何时候出去攻击他们，那些人马俱装的骑兵都会保护他们。

所以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一样，他们最后终于推进到了护城壕沟的边缘，而那些骑兵在马颈上挂着四五捆木柴，从屏障后面将木柴扔下去，然后等夜幕降临时，他们将木柴堆放在掩体前方，用绳子将其从上面绑紧。这堆木柴就像一道铜墙铁壁，没有任何弩炮能够破坏。我方的一些中型投石机发射弹丸并击中了屏障上部，但一点效果也没有。那些石弹只是被反弹回壕沟里。^[9]

对于那些试图摧毁这些屏障的守军来说，问题在于敌人现在已经足够靠近外城墙，使得动用他们的重型配重式投石机不太可能——弹道的角度太大，而且存在误击的概率和破坏城墙的可能性。这些屏障免于受到基督徒火力最强大的炮兵武器的轰炸，因而安然无恙。相反，十字军被迫使用他们的轻型牵引式投石机从内城墙里向外射击，其火力显然不够强大到摧毁木质护墙。现在，在距离城墙不到35米远的地方，在掩体的保护下，进攻一方已经到达了护城壕沟的边缘，准备下一步行动：

在此之后，敌军将他们的卡拉巴哈斯（黑公牛式投石机）推上前线，这是一种可以用手操作的小型突厥弩炮，射速非常快，对我方士兵造成的伤害比大型的投石机还要大，于是在遭受卡拉巴哈斯轰炸的区域，没人敢在开阔处露面。而在卡拉巴哈斯的前方，敌人筑起了又高又坚固的屏障，没有人能够攻击

或射中那些操作（卡拉巴哈斯）的敌军士兵。^[10]

哈利勒的目标是瓦解守军的防御，这样一来士兵们就只能蜷缩在他们的城垛后面，无法还击——或者被全部逐走。外堡和脆弱的国王之塔受到重点关注。据一部史料记载，一些弩炮“向国王之塔投掷了巨大的石弹，以至于没有人敢留在塔楼的顶部”。^[11]

防御者还受到了弓箭手的进一步骚扰，他们以小队为单位，装备着短而有力的复合弓，射出一阵又一阵“数不清的尖利锐箭，箭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像暴雨一样打在守军的头上。这些连续不断的火力袭击不仅造成了死亡，还使空气中弥漫着凶险的气氛。部署在城墙上保卫城市的士兵虽然全副武装，但还是受到了致命伤害，而没有盔甲的人则根本无法登上城墙”。^[12]在基督徒的修辞中，甚至上帝的天庭也被污染了。箭雨的密度之大，使天空为之黯淡无光，如同一种气象学现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说法很可能来自奥顿·德·格朗松，多年之后，他于隆冬时节在苏格兰边境为爱德华一世而战，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坦言就像是下了一场暴风雪，“被他们称为蝗虫的小箭在空中飞舞，比雪花还厚”。^[13]在城墙外，在拜巴尔·曼苏里的眼中，“他们向阿卡发射出雷击般的石弹和闪电般的快箭”。^[14]

这种猛烈的轰炸是协同策略的一部分。通过让守军低头躲避寻找掩护，重型的机械式配重投石机得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以较慢的射速打破塔楼和城墙，并将城墙上的雉堞摧毁。重型弩炮给守军在心理上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巨大的石灰岩石弹一次又一次地击中同一个地方，这种影响“就像天降霹雳一样”，^[15]使得基督徒的记述带上了天启的意味。一位作家把马穆鲁克归类于反基督（Antichrist）的代理人，并将攻城投石机的数量虚构为666台，这个数字是从海里奔出来的野兽的数量，而他们所想象出的野蛮形象，与他们的对手意图在整个围城过程中激发出的恐惧感如出一辙：

他们每次向城市发起的冲击长达六小时，以至于市民们日夜不得安宁……有像牛一样咆哮的声音，有像狗一样吠叫的声音，而其他的声音像狮子一样狂啸，发出可怕的声音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用扭曲的棍子敲打大量的战鼓来恐吓敌人。有些人投掷标枪，有些人投掷石头，有些人用弓弩向那些守卫在城墙薄弱环节的基督徒们发射箭矢和方镞箭（方头的箭）。[\[16\]](#)

对于守军来说，让哈利勒的军队远离城墙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失败了。持续不断的轰炸现在使哈利勒能够启动第二项秘密战术——挖掘地道。

挖掘地道需要技术娴熟的工作者，而且危险性高、耗时长，却是穆斯林军队围攻战战术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使防御工事崩塌这方面比炮击更有效。为此，哈利勒从阿勒颇征召了1000名精通各种专业技能的地道工兵，其中包括挖掘矿井的隧道工人，为地道设立支撑柱的木匠，从地道中移走废土的苦力，以及埋设爆炸物和点火来炸毁地基的爆破专家。工程在防御掩体的保护下开始。阿卡多孔砂岩和滩岩的地质条件使得地道掘进相对容易，但也带来了一些其自身的特殊问题。小心翼翼地设置好支撑木是防止地道坍塌的关键。工兵们手持单嘴镐，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或在冒着烟的火把的照耀下辟路穿行，把挖出的土石传给后面的人。在他们的头顶上，轰炸仍在继续。



无间断轰炸：穆斯林军队用石弹和弓箭攻击城墙。代表着突厥部落勇士的马尾标志在配重式投石机上显得尤为突出

他们的目标是在尽可能靠近城墙的地方挖一条地道，为了减少工程量，地道被挖得很窄，通常不超过1.5米宽，刚好能让两个人并排工作。这条地道的功能很简单，它为到达一座塔楼或一段城墙边缘下的确切位置提供一条通道，在那里工兵们将挖掘空间扩大成一个地下室，用于点火起爆。

关于1291年春天在阿卡进行的地道挖掘工作并没有详细的记述，但是人们可以从一个好奇的穆斯林士兵在1115年参加围攻一座十字军城堡时的描述中还原出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

我突发奇想，打算进入地道去探察一番。于是，我下了战壕——此时箭矢和石块如同狂风骤雨一般砸在我们头上——然后进入地道。在那里，我被挖掘工作所展现出的伟大智慧所震撼。地道从战壕一直挖到巴舒拉（bashurah，意为外城墙）。隧道的两边立着两根柱子，柱子上横着一块木板，防止上面的泥土掉落。整个隧道都是这样的木质结构，一直延伸到巴舒拉的地基。突击队在巴舒拉的城墙下面挖地洞，并将其支撑住，然后挖到塔楼的地基。地道很窄，这只是通往塔楼的一条通道。突击队一挖到塔楼下面，就把地道扩展到与塔楼的墙壁等宽，用木柱将地道支撑起来，然后开始一点点儿地把钻凿产生的碎石运出来。由于挖掘造成的灰尘，隧道的地面变得泥泞不堪。探索历程结束后，当我离开时，呼罗珊（Khurasan）的部队（工兵）已经认不出我了。如果他们认出我来，就不会让我走，除非交一大笔罚款。^[17]

一旦目标地点下面的“地下室”被挖好，就轮到引爆者点燃可燃物、炸塌城墙：

然后他们开始砍伐干燥的木头，用其填满地道。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把这些木头点着了。我们当时刚刚拿起武器，冒着像倾盆大雨一样的石块和飞箭向战壕进发，以便等塔楼一倒下来就立即进攻。当大火初见成效时，墙石之间的灰泥层就开始脱落。然后一道裂缝出现了。裂缝变得越来越宽，然后塔楼就倒塌了。我们原以为塔楼倒了以后就能杀进去与敌人短兵相接。然而这只是城墙的外表面塌了，而内墙却完好无损。我们

就站在那里，直到日光变得毒辣起来。守军向我们投掷石块，给我们造成了惨重损失，最后我们不得不退回到自己的营帐里。[\[18\]](#)

尽管这次尝试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地道爆破产生的效果可能比投石机更显著，正如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er of Chartres）在记述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藏身的一座城堡于1123年遭到穆斯林军队进攻一事中所描述的那样。

围攻该城堡的穆斯林将领下令将城堡所在的岩石层从根基处破坏掉，支柱将沿着地道放置以支撑上面的工程。然后他让士兵把木头搬进地道，并放火焚烧。当支柱被烧毁时，下方被挖空的地面突然塌陷，离火最近的塔楼发出一声巨响，轰然倒塌。起初，烟雾和灰尘一同升起，因为塔楼的残骸碎片掩住了火焰，但当大火吞噬了下面的物质时，冒出来的火光开始清晰可见，这一意外事件使城堡的防守陷于瘫痪，导致国王被擒。[\[19\]](#)

地道作业是很难掩饰住的——建立防护掩体，清除废土——而且很容易遭到偷袭，因此以石块和投射物形成密集炮火以扫除城墙的还击火力至关重要。哈利勒的阿勒颇工兵开始行动起来，目标是最初就被苏丹认定具有战略意义的塔楼和城墙：方形塔楼的四角是主要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知道，当地基被破坏时，方形塔楼比圆形塔楼更容易倒塌。除了外堡和国王之塔，哈利勒似乎还有足够的资源将地道向外延伸到附近的布卢瓦女伯爵之塔、圣尼古拉之塔以及靠近圣安东尼城门楼的城墙。

进攻的无情本质使守军的处境岌岌可危，这也正是其目的：一队队士兵协同一致地拉拽牵引式投石机的炮索，抛杆不停地起落，石块撞击着城墙，永不停息的噪声，遮天蔽日呼啸而来的箭雨，步步推进的防护屏障，地底之下酝酿的未知危险。饱受轰炸的心理影响以及沿着整个城

墙日夜不停地守卫工作都大大消耗了人们的精力和士气。不能有丝毫松懈。数量优势起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运用部队进行纪律严格的轮换，哈利勒能够奢侈地施加不间断的压力。正如“推罗的圣殿骑士”所观察到的一样：“撒拉森人每天都焕然一新地上阵，因为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20]到4月中旬，已经有太多的不利因素让这座城市的保卫者们感到担忧。很明显，在阿卡坚固的城墙后面坐视局势恶化是不大可能拯救这座城市的。他们将不得不展开反击。

^[1] 作者在本文中广泛用到trebuchet一词，有时泛指所有种类的投石机，有时专指配重式投石机，本书中已根据具体语境加以区分。

^[2]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6.

^[3] 为了与本文中的“牵引式配重投石机”相区分（两种类型投石机的英文名称都是trebuchet），将这种新型配重投石机译为“机械式配重投石机”。

^[4] Chevedden, Paul E. '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 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Dumbarton Oaks Papers*, no.54, 2000, p.96.

^[5]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61.

^[6] 指的是在不损坏投石机、不影响射击精度和保证投石机安全的条件下，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最大允许发射弹数的速度。

^[7] 'Umar ibn Ibrāhīm al-Awsī al-Anṣārī. *A Muslim Manual of War*, ed. and trans. George T.Scanlon, Cairo, 1961, p.117.

^[8] 'Umar ibn Ibrāhīm al-Awsī al-Anṣārī. *A Muslim Manual of War*, ed. and trans. George T.Scanlon, Cairo, 1961, p.117.

^[9]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p. 808-9.

^[1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9.

[11] *Chroniques d'Amadi et de Strambaldi*, ed. René de Mas Latrie, Paris, 1891-93, p.221.

[12] Thadeus. *Ystoria de desolatione et conculcatione civitatis Acconensis et tocius terre sancte*,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101-2.

[13] *The Chronicle of Lanercost, 1272-1346*, ed. and trans. Sir Herbert Maxwell, Glasgow, 1913, p.79.

[14] Baybars al-Mansuri, p.279.

[15] Thadeus. *Ystoria de desolatione et conculcatione civitatis Acconensis et tocius terre sancte*,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101.

[16]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65.

[17] Usāmah Ibn-Munqidh. *An Arab-Syrian Gentleman and a Warrior*, trans. Philip K.Hitti, New York, 1929, p.100.

[18] Usāmah Ibn-Munqidh. *An Arab-Syrian Gentleman and a Warrior*, trans. Philip K.Hitti, New York, 1929, pp.102-3.

[19] Kennedy, Hugh. *Crusader Castles*, Cambridge, 1974, pp.104-5.

[2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0.

第十章 偷袭敌营

1291年4月13日至5月初



马穆鲁克出其不意，狠狠地打击了阿卡的守军。他们的军队组织有序，进展神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这座城市被动防守、处处挨打，失败的惨象有目共睹。敌军炮兵的凶残轰炸，前线掩体令人恐惧地推进到了护城壕沟的边缘，以及对手可能早已将地道挖掘到城墙下方的现实，需要阿卡守军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巨型弩炮的作用对于攻方来说不可替代。如果能摧毁这些投石机并将盾车也一并烧毁，那么无间断轰炸的力度就会减小，并且阿卡的弓箭手可以开始狙杀弩炮的操作人员，地道工兵也将暴露于攻击火力之下。即便一事无成，反击也可以让守军释放一下被压抑的挫败感，提振士气。看起来是城中的领头人物做出了集体决策。他们将沿着城墙的所有

战区向敌军发起全面反击，让折磨他们的人也感到不安和沮丧。内部决策圈的一个主导人物是尼古拉·德·阿纳普，耶路撒冷王国的宗主教。他时年65岁，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是一位老者，凭借着在教会服务的毕生经验，阿纳普创作了一本颇受欢迎的启发性教义读本——《圣经典例选》（*The Book of Examples from Sacred Scripture*），这本书从《圣经》中摘取例证，为信徒讲解如何用一生去自我修行，直至离世。他是一位威风凛凛的人物，作为教皇的代表义无反顾地为城市守军提供道德和精神上的鼓励：这位宗主教是守军心理防御的中流砥柱，以他不屈不挠的热情来坚定守军的意志，鼓舞他们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他也积极地参与到战略决战的决策当中。

守军决定发动一系列相互协调的袭营作战，关键是出其不意，而第一次行动的战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马穆鲁克完全猝不及防。4月13日至14日晚，一小队满载士兵的舰船从城市港口弃锚起航。这些舰船中包括一艘作为浮动火炮平台的驳船，配备了一台牵引式投石机。这艘别出心裁的炮舰是由比萨人建造的，并且为其配备了一队炮手随行。弓箭手、弩兵和步兵挤满了其他的船只，这些船只已经做好了保护措施以防备燃烧弹的袭击。这支小型舰队绕着阿卡的海堤，拖着驳船航行，逐渐接近了北岸，迂回到马穆鲁克军队的右翼——哈马军团宿营地的侧方，正如阿布·菲达所描述的那样，“营地位于海边，正对阿卡，大海在我们的右侧”。^[1]

他所在的营地在这次两栖攻击下措手不及。“那些用牛皮覆盖着的木拱顶船向我们驶来，向我们发射羽箭和方镞箭。”^[2]阿布·菲达回忆说。登陆部队冲上海岸并不断攻击营地，而营地的防御工事是朝向城市布置的，这致使右翼部队自己的配重式投石机由于对准城墙而在短时间内无法重新部署，因此无力还击。与此同时，守军的第二波突击部队又从城门杀出。本就有点儿招架不住的马穆鲁克右翼部队突然发现自己受到了各方火力的联合攻击。来自四面八方的投射物如雨点般飞进他们的

营地：来自投石机的石弹，以及来自岸上突击队和海上舰队两个方向的火箭。菲达经历了“营地前方与城里来敌的厮杀，又受到海上敌军从右方发动的侧袭。他们带来了一艘搭载着投石机的舰船，从大海这边向我们开火。这让我们不免顾此失彼”。然而，运气并不在比萨人的这边。春天的大海性情难以捉摸。菲达以得救的语气记述道：“当时吹来一阵狂风，于是那艘船被抛到巨浪上，它所搭载的投石机也被打坏，化为齏粉，再也没有被安装起来。”海上奇袭计划就此功尽弃。

守军领袖们计划继续于4月15—16日的夜间在城墙两端同时展开协同进攻。其中的一项计划是对哈马军团的营地再次发动攻击。这次攻势将是一次联合行动，由纪尧姆·德·博热率领的圣殿骑士、让·德·格拉伊率领的法国军团和奥顿·德·格朗松率领的英国军团组成。300名士兵，包括重甲骑士和步兵，从邻近城墙末端的圣拉撒路门杀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用希腊火烧掉绰号为“狂怒”的巨型配重式投石机——显然，摧毁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尽管月光明亮，奇袭的要素还是在一开始就达成了。“推罗的圣殿骑士”记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

大团长命令一个有普罗旺斯（Provençal）血统、负责管理阿卡村镇的子爵去放火烧毁苏丹的大投石机。他们在那天晚上出城，接近了那座装置，然而负责投掷希腊火的人在执行任务时过于害怕，结果燃烧弹没被扔出多远就落在地上，然后就在那里燃烧起来。所有在那里的撒拉森人，包括骑兵和步兵，全部被烧死。^[3]

过度紧张导致的失手使这次进攻计划被搞砸了，士兵们不知所措，乱成一团。阿布·菲达描述了他们的哨兵起初由于受到奇袭而四下奔逃，但是很快又集结起来。圣殿骑士们和其他的骑兵们由于袭营成功在望而激动得忘乎所以，“但是我们的士兵，无论是教团同袍还是世俗骑士，在帐篷区里深入得太远以至于他们的战马被支索绊住而摔得七荤八

素，随后便被撒拉森人取了性命”。^[4]一个不走运的骑士，“跌进了一位埃米尔的厕所并在那里被杀”。^[5]“推罗的圣殿骑士”以这样的笔法继续记述道：

我们那天晚上损失了18名骑兵——既有圣殿骑士团的弟兄也有世俗骑士——但是我们带走了几面盾牌和撒拉森小圆盾，以及一些喇叭和战鼓，然后我的主人和他的手下便掉头回到阿卡。他们回城的途中遇到一些准备伏击的撒拉森人，但他们将这些撒拉森人全部杀掉，因为月光皎洁如白昼，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而正如我之前告诉你的那样，哈马的领主也驻扎在那片区域。他召集手下的兵马并向我方杀来，将我军在沙滩海岸截住。他们向我军投掷标枪并且击伤了一些士兵，但他们却不敢与我军贴近交战。你要知道他们看起来有2000人左右，而即便把我方这一边的骑士和其他士兵——军事修会的弟兄们，瓦雷斯（valés，侍从军士）和土科波（turcopoles，地方骑兵）——都算在一起，也只有300人。^[6]

穆斯林史料的叙述则大有不同。阿布·菲达记载的是法兰克人被打得溃不成军。在另外一份可能更为可信的阿拉伯版本史料里，一位名叫哈拉比（al-Halabi）的埃米尔率军伏击回城的袭营部队但失败了。突袭者们显然已经嗅到了陷阱的气息并且将计就计，胜出这位埃米尔一筹：“他们意识到哈拉比率军潜伏了起来，于是避开了他埋伏的道路而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他们在路上发现了哈拉比的一些鸢盾（kite shield）^[7]和方盾，于是便顺手牵羊地拿走了。”^[8]哈拉比和他的士兵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直到黎明破晓。然后他们听到了城墙上传来的嘲笑声，看到他们被偷的盾牌作为战利品挂在那里。

与此同时，另外一场战斗正在城市东端进行，参战部队负有相同的使命：放火烧毁木质围城屏障和投石机。这一区域的指挥官恰好是博热

在马穆鲁克军中的情报来源——埃米尔法赫里。据穆斯林史料记载，他看起来早已料到了守军的这次进攻：“他与自己的侍从骑兵队位于营地的外面。当法兰克人到达并接近营地时，他们想把随身携带的大批希腊火燃烧弹投掷出去。随着他们来到大路中间，突然杀声四起，暗夜里箭雨兜头而下，他们急忙掉头就逃，无暇顾及自己的同伴，将大约20名骑士抛在了身后，然后我军的一支部队出营将他们俘获。”^[9]“推罗的圣殿骑士”显然不是这场战斗的目击者，他只是记述道：“撒拉森人早已注意到了他们并保持着警惕的状态，如此猛烈地向基督徒冲锋以至于这支部队没能取得任何成果就被迫撤回了。”^[10]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夜晚。各方都在清点自己的战利品和阵亡人数。“当黎明来临时，哈马的领主马利克·穆扎法尔，将很多法兰克人的头颅挂在战马的脖子上，这些战马都是他的部队从它们原主人那里俘获的，并带着他的战利品前去面见苏丹。”^[11]毫无疑问，这些头颅随后在阿卡全城的目光下被悬挂在木杆上。同时，阿卡城头上展示的盾牌对于所有围城的军队来说不啻于肉眼可见的反讽。哈利勒对于这种当众羞辱的行为大发雷霆：如此挑衅，有损士气。他“开始将埃米尔们召唤过来并斥责他们将围城时间拖得太久，然后他们一致同意弩炮（需要加派守卫的人手）”。^[12]在苏丹的注视下，埃米尔们有如芒刺在背，因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从守军的角度来说，袭营作战在事实上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就，而且袭营的失败也引发很多疑问。敌军看起来像是早就在等着他们一样。第一次构思巧妙但运气不佳的两栖攻击必然引起了马穆鲁克的注意。或者，前人谆谆教诲的至理名言“围城者同时也是被围者”^[13]也在马穆鲁克军中得到贯彻，哈利勒已经谨慎地布置了骑兵部队日夜巡逻以防遭到进一步的偷袭，或有人预先向他示警，或是两者皆有之。而且，在这些袭击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总是严重失衡。

双方都担心士气、手下的忠诚度和情报的泄露。哈利勒不能确定所有的埃米尔都支持他。让他尤为担心的是叙利亚军团的指挥官、大马士革总督、实力派人物——埃米尔胡萨姆·拉津。此外，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纪尧姆·德·博热在城外绵延的帐篷群里也有自己潜在的盟友：他的情报员法赫里是拉津的一位贴身侍从，现在被派驻在马穆鲁克攻城部队的左翼。法赫里也因此成为苏丹怀疑的对象。他对守军最近袭营的坚决抵抗也许是为了向苏丹表明他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哈利勒也从被围困的城市中得到了秘密情报，他已经从一支射过城墙的箭收到了警告。包裹这支箭的是一封用阿拉伯语写的信，这封信被送到苏丹那里。信中写道：

以真主之名，慈悲为怀的主。愿真主保佑我们的主人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在真主眼中，唯一真正的信仰是伊斯兰教。哦，穆斯林们的苏丹，保护好你的军队免受今晚的袭击，因为阿卡的人民已经一致决定，他们打算攻击你；也要留意你的埃米尔们，因为阿卡人提到其中有一些人与他们书信往来，密谋造反。[\[14\]](#)

这封信来自阿卡城内一个秘密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此人显然消息灵通。他的来信加剧了哈利勒的疑虑。“苏丹转念一想，便将他的亲信埃米尔贝达拉（Baydara）和舒杰耶（al-Shujai）叫来，把这封信念给他们听。他们一致认为，勤务兵和卫队长应该在埃米尔们中间传阅这封信，并告知他们此事为绝密，彼此之间也要严守秘密。每位埃米尔都应该忠于职守。”[\[15\]](#)至少目前是这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处于监视之中，即要么以忠诚感约束他们安分守己，要么就让反对派无所遁形。

他们的建议奏效了。苏丹的注视让法赫里如坐针毡。他不是变成了双重间谍，就是受到信中怀疑的压力而被迫以身作则，通过坚决抵抗基

督徒的进攻来表现出忠诚的样子。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人的忠诚具有复杂的多面性。几天后，压力重重的他突然离开了围城的营地，返回大马士革。哈利勒对他的疑虑更深了。

在经历了伏击以及未能达成奇袭敌军的目的之后，间谍将情报越过城墙送达敌营的可能性显然也引起了博热和这座城市的其他主要人物的注意。他们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阿卡城内的所有力量应当再次联手发动一次突袭，尝试摧毁那些折磨人的投石机并挫伤敌军的士气，而这一次的突击地点选在了敌营脆弱的中央区域，城墙在那里向右拐了个弯，而且叙利亚军团也已将指挥权移交给苏丹的埃及军团。城墙的这段防区被托付给了医院骑士团，而正是由他们在圣殿骑士团的支援下领导了这次突袭。袭击发生在4月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由于担心情报泄露，所有参战的人都不知道此次任务，直到最后一刻才被通知。夜色漆黑，正好对行动有利。“推罗的圣殿骑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尽管和以往一样，他倾向于夸大敌人的数量：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阿卡的所有领主和骑兵将在半夜从圣安东尼门发起突袭，出其不意地袭击撒拉森人。这一计划由于保密程度很高以至于无人知晓，直到他们接到了命令“上马！”。当我们的部队骑上马飞奔出城门时，月光几近于无。天色十分阴暗。但撒拉森人似乎已经提前收到警告，敌营中灯光大作、亮如白昼，一支敌军分队猛扑向我们的部队——他们的人数很可能有将近1万——他们向我们发起猛烈的冲锋，投掷的标枪犹如暴雨一样厚重。我们的士兵抵受不住，撤回到城里，有几位骑士挂了彩。^[16]

现在的形势已经显而易见，不管怎样，马穆鲁克用一阵火焰照亮了暗夜，对这些袭营行动完全处于警惕之中。

复活节临近了，为了在这个神圣的日子到来之前鼓舞士气，同时也

是意识到一味躲在城墙后面终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灾难，守军领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打算通过一次孤注一掷的进攻来挣断敌人对这座城市的绞索。在一个可能由奥顿·德·格朗松讲述的情节中，他们决定在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17]尝试一种新的策略：

他们看到敌人正在逐步征服城墙，守卫这座城市变得再也不可行之后，便一致决定用忏悔的武器赢得上帝的帮助，在经过告解并进行心灵交流之后，他们将战俘置于己方战阵的前面，然后在我们普世救赎的那天冲出城去，杀身成仁，就如同造物主以身涉险那样。他们以无畏的决心和振奋的精神做出这一决定后，就派人前往宗主教那里，凭借着他的权威和祝福，他们有可能达成起初的目的。^[18]

在复活的基督鼓舞下，他们将把他们的穆斯林奴隶和囚犯当作人体盾牌驱赶到己方部队前面，然后发动一次协同进攻。然而，这项计划被尼古拉·德·阿纳普直截了当地禁止了，这位宗主教“已然心如死灰，所依靠的尽是一些不忠不义之辈，对他们的建议听之任之。他回复说任何人都不得做这种尝试，也不得打开任何城门，除非是想承受绝罚的痛苦”。^[19]

总体而言，各方史料都对宗主教积极投身于阿卡防御工作的表现给予了正面评价。因而，格朗松对阿纳普的指责未免有些捕风捉影。在耶稣受难日使用人盾可能是对《圣经》的一种冒犯。但更有可能的是，之前的突袭已经证明再次出击是徒劳无益的人力浪费，这让他揪心不已，而且他决定让自己的教廷权威凌驾于各派系之上。而（格朗松的）这种批评充分说明了守军阵营中心的不和谐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主动出击了。守卫者们心情沉重地等待着复活节的到来。与此同时，哈利勒既担心自己统治的安全性，也不放心那些在围城号召下群聚在一起而形成同盟的埃米尔，他责骂这些埃米尔没有付出足

够的努力。

如果说对城墙的轰炸力度没有削减的话，地下的工作也是如此。地道工兵们一刻不停地挖掘，从木质屏障掩护下的开阔地向城墙稳步推进。与一个世纪之前的十字军一样，他们的目标是脆弱的城墙凸出部分的顶点，诅咒之塔在那里守护着城市的心脏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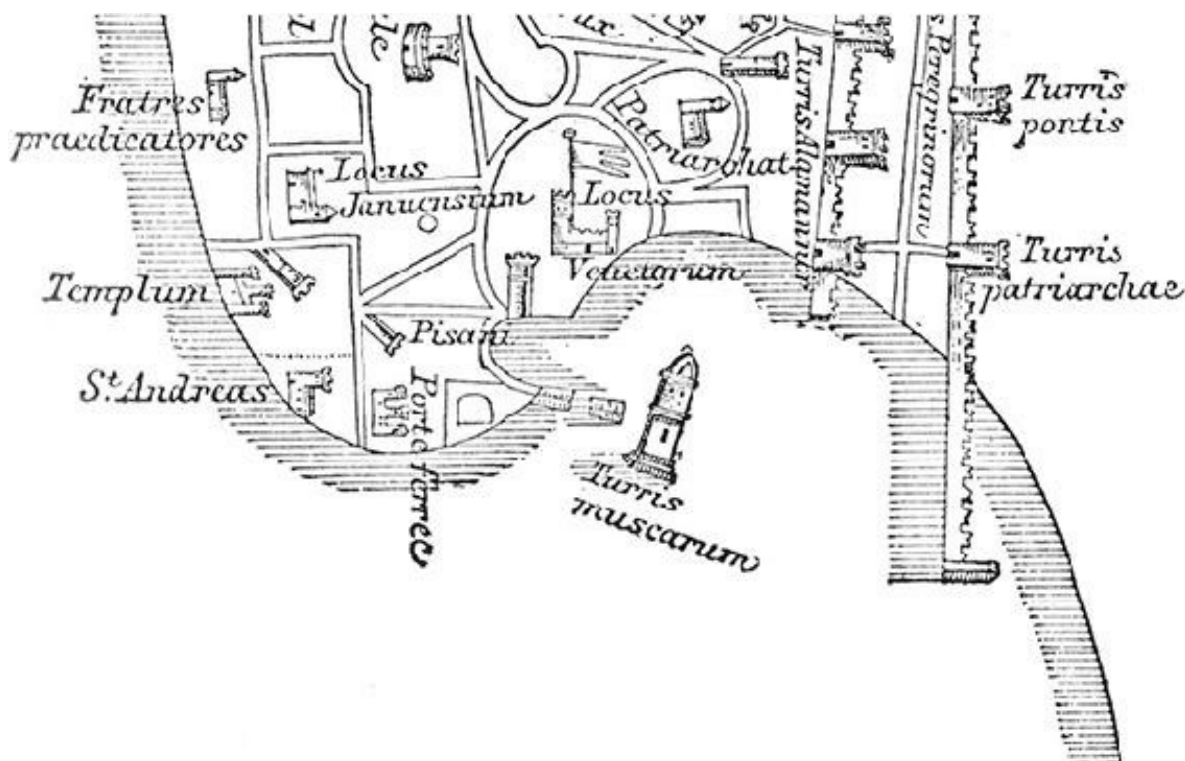
在城内，守军也愈发注意到敌军工兵的活动，并且对其采取了反制措施：他们发现并确定了地道的位置处于布卢瓦女伯爵之塔的下方——或是由于地道附近能听到开凿工作所发出的沉闷的叮当响声，或是置于附近地面上的水桶里的水面呈现出的波纹能让地道现身。守军开始挖掘反地道来拦截阿勒颇的地道工兵们。黑暗中发生了噩梦般的战斗，基督徒们推倒了地道的支柱以使入侵者窒息。“推罗的圣殿骑士”记述道：“我们的士兵通过反地道战术来对付他们，并且凶狠地予以还击。”^[20]然而，这项工作令人疲惫不堪且需要大量的熟练人力。他在记述中反复强调双方在人数上的不对等。在地道作战方面，撒拉森人可以轮换他们的人马：通过轮班工作，他们能够挖掘出的地道要比守军能够拦截的多得多。而且反地道战存在危险，挖掘反地道的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危及守军本来要保卫的工事地基。所以尽管守军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没能阻挡住敌军工兵的前进，而炮弹也继续如倾盆大雨般落下。

随着4月的时间渐渐消逝，城内的恐惧慢慢增长，阿卡的人民看着海面，望眼欲穿。他们的安全不会受到来自海上进攻的威胁。马穆鲁克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海军力量，而塞浦路斯岛的主要港口法马古斯塔（Famagusta）距此不过170英里远——在有利的气候条件下也就是两天的航程——所以船只可以在其间穿梭往返，为十字军国家提供补给。人们热切地盼望着阿马尔里克的兄长、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王国国王亨利二世，能够随时带来一支援军。还有一些来自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的富有市民以及精明的意大利商人，他们正在盘算着自己的机会，以便花

钱买到一张船票出城登上过往的船只。阿卡是黎凡特海岸的主要贸易港口，是季节性贸易船队的定期目的地，这些船队每年都要在春季和秋季各来一次，而且军事修会拥有自己的船只或包租船只，根据需要跨越地中海来运送物资和人员。

然而，春季的海上气候也可能十分狂暴，而且阿卡的港口对于大型船只而言并不够理想，尤其是在恶劣天气下。船只的避难处由防波堤环绕的内外双港构成。港湾入口由位于防波堤末端的一座被称为“苍蝇之塔”的岗楼居高临下地守卫着，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海湾。由防波堤围成的闭环内，有一个外港和一个较小的内港，由一条像人的手臂一样粗的铁链保护着。这条防御拦障本身就是十字军冒险的遗迹。它曾在君士坦丁堡封锁住金角湾（Golden Horn）的入口，在1204年十字军不光彩地洗劫了这座基督教城市之后，这条铁链被送往阿卡。就是在这个被链条保护着的内部小港里，运到阿卡的货物在此被卸下。上岸后，所有的新来者通过铁门进入这座城市，他们在那里缴纳关税，并获得使用仓库的权利。阿卡的海军兵工厂也设在这里。

尽管港口的封闭设施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进入阿卡的海路也非常难对付。从西方驶来的船只，寻找作为地标的圣殿骑士团城堡和圣安德鲁教堂，要经过这座城市的最西南角——它有一个不吉利的名字：风暴角（Cape of Storms）——沿着南面的防波堤前进。然后，它们不得不笨拙地来个急转弯，通过只有85米宽的海港入口，在苍蝇之塔的注视下向右侧驶去。



阿卡港口的困难之处。这幅中世纪的地图显示了苍蝇之塔及其左侧的狭窄入口，船只勉强可以通过。然而，这幅地图上并没有显示可能从苍蝇之塔一直延伸到海岸将内港封闭起来的防波堤

阿卡港口的名声好坏参半。虽然编年史家推罗的威廉（William of Tyre）^[21]对设置成内外双港的船只避难处赞誉有加，认为“双港坐落于城墙内外，为船只提供了一个安全、宁静的锚地”，^[22]可是进入港口所需的船舶操控被公认为一个难题，并且在同时代的一本意大利航海手册中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其中包含了详细的建议。虽然阿卡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港口，但是这本指导手册中的建议——通过城市的地标引导方向——表明进入这里要特别谨慎：

当你接近这个港口时，先与该城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与圣殿骑士团总部和圣安德鲁教堂保持四个缆绳的距离，因为沙洲位于圣安德鲁教堂的上方。当你看到苍蝇之塔右侧那栋属于当地治安官的房屋时，你就可以操纵船只笔直地驶向港

口。当你进入港口时，在此过程中要保持海法城位于你船尾中部偏东的方向，苍蝇之塔位于船首中部的方向，这样你就能避开上述的沙洲顺利进入港口。^[23]

问题是，当海面波涛汹涌时，这种方法是有风险的。早在一个世纪前，朝圣者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就曾宣称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当风从南面吹来，海岸处因海浪不断的冲击而乱流湍急时，入口处的通道很危险”。^[24]三个世纪后来到这里的意大利旅行者多梅尼科·拉菲认为，这个港口“很不安全，而且对来自西方的疾风毫无阻挡，这样往往会导致狂风巨浪”。他所乘坐的船只的船长们更喜欢海法的港口，因为那里可以躲避恶劣的天气，“而阿卡的情况恰恰相反，海床上布满了锋利的岩石，足可以割裂缆绳，不管这些缆绳有多坚韧”。^[25]阿卡当地的状况是如此凶险，以至于在贸易和航海方面一向谨慎的威尼斯人于1288年，为外派到阿卡的己方船只额外又配备了三四十个铁锚，作为附加的预防措施。

实际上，当海上风急浪高之时，船只若想停泊在阿卡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比萨人的舰载投石机毁于风浪之中的事故也表明，当外部救援力量对城市进行再补给时，或是当形势恶化到需要疏散平民时，无法预测的春季天气可能会给这两种行动造成困难。阿卡海上条件本已存在不便之处，由于外港也相对较小的缘故，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较大的船只更喜欢停泊在港外，因此货物和人员必须用较小的船只被来来回回地运送——这可是一个缓慢和低效的过程。

4月下半月的时候，随着城内人心浮动，很多人都动了通过海路逃离的心思，而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萦绕在人们的心头。食品补给似乎源源不断地被从塞浦路斯输送到阿卡，而据传亨利国王不日就将抵达该城。但从5月初开始，似乎有一些能够支付旅费登上来访船只的人开始与在此停泊进行贸易的船只接触，就此离开。最初的信心变成了焦

虑。“我们在阿卡的人民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推罗的圣殿骑士”沮丧地总结道，“但据报告称，亨利国王将从塞浦路斯带来巨大的援助，于是他们每天都期盼着他的到来。”^[26]

“他们总是把脸转向大海，”希腊修士阿西尼厄斯（Arsenius）回忆道，“看看西风会不会带来他们日思夜想的船帆。”^[27]

[1]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p.16-17.

[2]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7.

[3]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0.

[4]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0.

[5]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7.

[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0.

[7] 鸢盾长将近150厘米，上部是椭圆，下部变尖，由轻、厚又有弹性的木材精制，四周包裹铁片，中央把手处有半球型的金属突出。因其防御面积大，所以往往由重步兵和骑兵使用，在13世纪前都很流行。

[8]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60.

[9]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59.

[1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ans, vol. 2, Paris, 1906, p.810.

[11]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7.

[12]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60.

[13] ‘Umar ibn Ibrāhīm al-Awsī al-Anṣārī. *A Muslim Manual of War*, ed. and trans. George T.Scanlon, Cairo, 1961, p.118.

[14]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 59.

[15]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 59.

[1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ans*, vol. 2, Paris, 1906, p.810.

[17]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18] *The Chronicle of Lanercost, 1272-1346*, ed. and trans. Sir Herbert Maxwell, Glasgow, 1913, p.80.

[19] Thadeus. *The Chronicle of Lanercost, 1272-1346*, ed. and trans. Sir Herbert Maxwell, Glasgow, 1913, p.80.

[2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ans*, vol. 2, Paris, 1906, p.810.

[21] 推罗的威廉，于1130年前后出生于黎凡特，后成为推罗大主教。大约在1174—1184年，他撰写了一部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海外之地历史的重要史书。

[22] Dichter, B. *The Orders and Churches of Crusader Acre*, Acre, 1979, p.102.

[23] Jacoby, David. ‘Crusader Acr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Urban Layout and Topography’, *Studi Medievali*, vol.3, no.20, 1979a, p.11.

[24] Jacoby, David. 'Crusader Acr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Urban Layout and Topography', *Studi Medievali*, vol.3, no.20, 1979a, p.11.

[25] Dichter, B. *The Orders and Churches of Crusader Acre*, Acre, 1979, pp.32-3.

[2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p.810-11.

[27] Bartolomeo de Neocastro. *Historia Sicula, 1250-1293*, ed. Giuseppe Paladino, Bologna, 1921-22, p.132.

第十一章 求和未成

1291年5月4—17日



5月4日，星期五，亨利的舰队，由40艘舰船组成，悬挂着红色狮子和金色十字架的王室旗帜，终于出现在西边的海平面上。人们又重新生出希望来。亨利二世，虽然名义上是耶路撒冷王国的领主，实际上却毫无权力管束城内各派系之间永无休止的党争，但他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街小巷点起了篝火，连围城的敌军都能看到。人们纵情欢宴，教堂钟声响亮。国王年方二十且患有癫痫病，所以看起来是疾病拖延了他从法马古斯塔启程的脚步，但他还是带着所能招集的全部人马前来支援，还带来了尼科西亚（Nicosia）主教作为精神上的支持。他的部队总共只有一小部分骑士和步兵——总数最多700人——还不足以对力量的平衡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他评估了形势，为守军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士气上的些许提升很快就被哈利勒的迅速反应给打消了。

在注意到城内的欢乐喧闹声越过城墙传到他的士兵耳中可能会降低他们的士气后，苏丹加大了轰击的力度。渐次增强至高潮的炮弹投射量——由弩炮发射或是抛投过城墙的土罐油掷弹里的一团团希腊火，纷飞的箭雨，被弹射出的岩石块与石墙的撞击——有增无减。“黑公牛”式牵引投石机也抛射出装满粪便的容器、燃烧的木块和炙热的大锅。在他们的屏障后面，无论地上还是地下，马穆鲁克的士兵都在始终如一地埋头苦干，步步进逼。城中的食物供应充足，但守军自己的配重式投石机所配备的大型炮弹存量正在缩减，而且他们被迫用木料和棉花团来修补城墙。持续不断的炮击，重建城墙的努力，以及扑灭大火的辛劳，让守军筋疲力尽，神志开始溃散。编年史作家对城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一致行动的缺乏给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他们根据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利益将内部纷争的责任摊派出去。身处安全距离之外、事后追责的希腊修士阿西尼厄斯将他最猛烈的批判矛头对准了意大利商人：“比萨人以及从旁协助他们的威尼斯人无法忍受（教廷代表的）宗教权威。”^[1]尽管威尼斯人几乎可以确定无疑地被断定没有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场战事，可比萨人却不遗余力地操作着他们的投石机参战。没人能逃得了阿西尼厄斯尖刻的审判。他构绘出一幅人们在悬崖边手舞足蹈的狂热画面：“那些十字军战士，我们曾经期望他们为了信仰舍生取义，他们却自甘堕落、纵酒贪杯。当召唤士兵操戈上阵的号角响起时，他们却沉溺于物欲之中，置战斗于不顾，不肯将他们的胸膛和手臂从女神的怀抱中松开。比这更恶劣的是，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兄弟们对携手合作嗤之以鼻，居然轮流（站岗值勤和）承担战斗的任务”^[2]——尽管这两个骑士团至少还曾联手发起了夜袭敌营的作战行动。战后各类史料在叙事上的分歧只能反映出阿卡的党派之争。阿西尼厄斯对“卓越的亨利国王”大肆颂扬，而《阿卡灭城记》（*Destruction of Acre*）的无名作者却对其多有抨击，德意志旅行家鲁道夫·冯·苏德海姆则只会褒奖自己的同胞——条顿骑士团，但他的作品面世已是此战发生很久以后的事了。

无论之前在城内存在着何种摩擦，急剧恶化的形势让亨利的任务从

一开始就无法实现。他可能在起初抵达的时候大张旗鼓，彰显出一副王者气派，但这位年轻的国王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很快就得出结论：在无可匹敌的对手面前，他的增援部队远不足以影响大势所趋。即便想放手一试，他也缺乏愈合城内紧张关系的至尊权力。另外，他也无法阻止人们乘船离开这座城市。于是他决定求和。

考虑到马穆鲁克内部权力圈中有一股反对势力正在酝酿，哈利勒很可能对通过谈判来取得成果也有一番兴趣。于是双方安排了一次停火。5月7日，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战争机器安静了下来，炮击也随即停止。在这相对静寂的气氛中，哈利勒从他的山顶营地移驾，在城墙外靠近海边、正对着一座城门塔楼——宗主教之塔的位置搭建起一座小帐篷。两位没带武器的使节出现了：一位是名叫纪尧姆·德·维利耶的骑士，以及一位出身于博热侍从队中的圣殿骑士纪尧姆·德·卡弗兰（Guillaume de Cafran）。他们在苏丹面前伏拜三次。哈利勒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给我带来了城市的钥匙吗？”^[3]信使们回答说阿卡不可能轻易地被放弃，但是他们此番前来是为了请求饶恕它的人民。看起来他们的提议是用岁贡的条件来保全阿卡。

哈利勒的回应旨在获取一场兵不血刃的胜利，故而包含了一丝宽宏大量。通过谈判达成的投降协议通常意味着城里的人民在得到安全通行许可的条件下离开，但几乎不能携带任何财物。哈利勒提供了更为优厚的条件：“我将赐予你们一份大礼，你们只需将城市的石头送给我，然后你们可以将所有其他的物品都带走，远走高飞。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你们的国王好，他作为一个年轻人来到了这里，而我曾经也一样是个年轻人。但除此之外我不会再为你们做出其他宽宥的事。”^[4]

哈利勒的谋臣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胜利看起来马上就要到手——将异教徒驱逐回大海指日可待。他们乞求他不要放弃他父亲的神圣事业，因为“这座堡垒堪称异教徒世界里几个伟大堡垒中

的一个，而在所有的海岸土地上只有这里的异教徒还在苟延残喘。征服它是殉道者，也就是阿什拉夫（哈利勒）的父亲不可动摇的决定。而苏丹在其执政伊始就决定按照自己父亲的决心去征服它。为此，有的穆斯林受了伤，有的被夺去了生命；和平毫无用处，因为我们已经快要征服它了”。与此同时，随着苏丹议和的条件散播出去，穆斯林的营地中爆发出巨大的吼声。圣战所激发出的大众狂热，以及毫无疑问受到了战后掠夺的吸引，使得投身于这项事业并追随军队而来的普通民众——平民百姓、城市暴民和骆驼骑手以及士兵们——都在叫喊着继续攻城：“噢我们的主人，殉道者墓前的那个苏丹绝不会与那些被诅咒的异教徒达成协议！”^[5]

已被告知其职权范围的使者们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亨利二世已经清楚地与献城投降划清了界限。他们意识到苏丹的条件不啻一场耻辱，将会导致基督教世界失去在圣地的最后立足点，便回复道他们无法同意，“因为海外之地的人民会将我们视作叛徒”。“那么你们就应该离开了，”哈利勒最后对他们说，“因为我不会再给你们任何条件！”^[6]

就在那时，所有离别时的细致安排都被一枚大号石弹的巨响破坏掉了，这枚炮弹是宗主教之塔附近的一座投石机发射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外导致这场事故发生的，”“推罗的圣殿骑士”写道，“这发炮弹的落点离苏丹和使者们所在的帐篷如此之近，以至于苏丹出于本能地想要虚张声势，却又不想伤害他们，于是他一跃而起，伸手去拿他的剑，将剑从剑鞘中拔出一个手掌宽的长度，大喝道：‘呔！你们这帮肮脏的猪猡，砍下你们的人头易如反掌，谁能挡我？’”^[7]

他手下的一位埃米尔桑贾伊·舒杰耶（Sanjar al-Shujai）提示他手下留情：“陛下，真主禁止您用猪猡的血去玷污铸就您手中宝剑的真铁！逆贼是那些发射炮弹的人。您应该放这两个人走，因为他们和您在一起。”^[8]既然使者们来进行谈判前双方就已约定好条件，并同意他们免

受任何责罚，这不过是对双方确认好的事表现出诚意罢了。

于是，推罗的圣殿骑士疲惫地总结道：“信使们回到了阿卡，双方又开始了他们的战斗，用投石机向对方发射炮弹，就像敌人之间的惯常做法一样。”^[9]谈判的短暂机会来之即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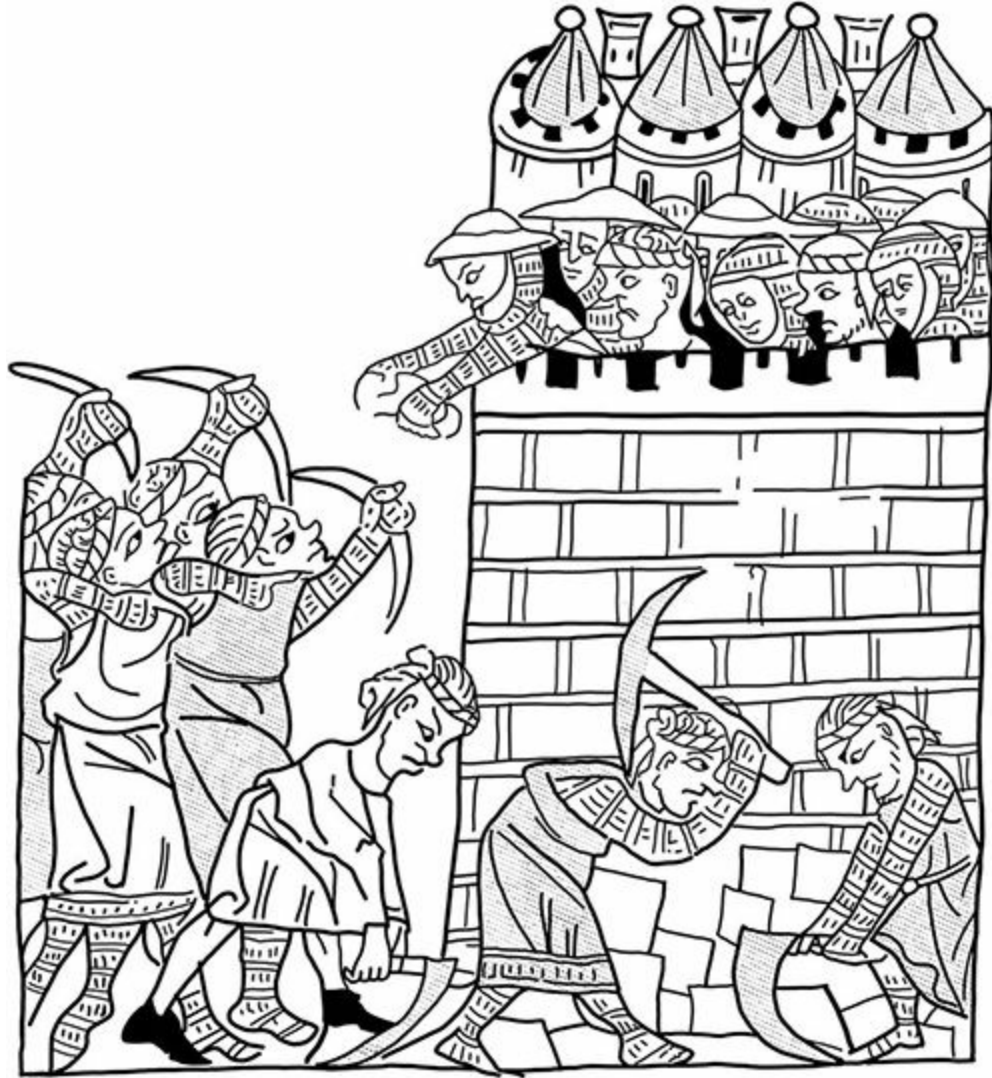
如果说基督徒阵营这边的士气和希望正在衰竭的话，哈利勒手下一些埃米尔的怀疑仍然没有解除，尤其对其中的阿拉马尔·哈马维（Alamal-Hamawi）和胡萨姆·丁·拉津，他们都是被处死的图伦泰——哈利勒在嘉拉温驾崩后继承苏丹大统的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拉津的侍从法赫里从阵前逃回大马士革的举动，显然把事态推到了危急关头。就在谈判失败后的那一天，军营里有人闹事的传言再次让全军骚动不安。哈利勒已经派遣快马前往大马士革代理总督处去逮捕法赫里。他的个人财物被没收，本人正在被武装押运回阿卡的途中。

拉津得知他也受到牵连，有人前来警告苏丹打算逮捕他。他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于是趁着夜色收拾行李，准备潜逃。他离开时被另一位在附近扎营的埃米尔阿拉姆·达瓦达里（Alam al-Dawadari）发现，此人对苏丹的大业忠心不二，立刻快马急鞭地去追赶逃走的拉津，在追上拉津后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不要离开：“不要种下苦果，导致穆斯林的事业受损。因为如果法兰克人知道你逃跑了，他们就会变得更强大，这样对我们不利，现在正是我们要攻占这个城镇的节骨眼儿。”^[10]拉津回到了营地。第二天，苏丹下令拉津前去觐见，授予他荣誉战袍，并对他好言抚慰。这一息事宁人的态度持续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他便将拉津逮捕起来，并将其发配采法特城堡严加看管。从长远来看，哈利勒对拉津的猜疑终将在致命的情形下得到验证。

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充满信心的呼喊和说服拉津回来的理由看起来是完全正当的。在不间断的轰炸之下，地道进一步向前延伸，随着地道一同前进的还有柳条屏障——保护着埃米尔桑贾伊·舒杰

耶的部队。他们向着城墙的关键点和于格三世外堡的凸出部分缓缓前进。在谈判失败后的一周里，马穆鲁克取得进展的迹象变得明显了。5月8日，星期四，由于地道的破坏而无法防守，外堡被守军放弃了。他们在外堡放起大火，摧毁了其与外部城墙连接在一起的甬道，然后退入后方的国王之塔。“这座城市的情况很糟糕，”“推罗的圣殿骑士”记录道，“因为.....（外部）城墙已经被地道破坏，塔楼（外堡）也是如此。”^[11]圆形状的国王之塔既是外城墙防御的关键点，又掩护着内部城墙上的诅咒之塔，现在后者完全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下。

这对阿卡的守军来说是灾难性一周的开端。在他们沿着这一区域建造的地下室里，勤勉的阿勒颇工兵点燃起火焰，削弱了好几个地方的地基。一个接着一个，塔楼的外壁颓然坍落，城墙轰然垮塌。国王之塔一边的沿线城墙，以及布卢瓦女伯爵之塔都分崩离析；在其另外一边，英格兰之塔也落得同样的下场；在其两边更远处，至关重要的圣安东尼门和圣尼古拉门附近的外城墙也都支离破碎。破砖碎石坠向城外壕沟里的不祥声音使城内的士气更加低落。舒杰耶的士兵也正在进行着挖掘地道破坏国王之塔本身的工作。



一部手抄本插图上的阿卡攻城战。拿着锹镐的工兵在弓箭手的保护下，挖掘地道，破坏城墙的根基

随着形势恶化的消息传开以及士气的一落千丈，更多的基督徒努力离开这个千疮百孔的城市。春天是商船进港的季节；那些付得起船费的人，来自意大利社区的富有商人和贵族阶层的成员，已经在城墙倒塌时离开了。到了5月中旬，已经有3000人离开。许多年老体弱的人、妇女和儿童，连同珍贵的圣物、城市的财富和公民们的财产一起被疏散。这些行动是在天气尚好、阿卡港口的入口处还很容易进出的时候完成的。大多数人乘船前往塞浦路斯。根据一些史料所载，亨利国王本人在随后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加速了这一逃亡过程，确切时间和真实性尚不清楚，但很明显，到了5月15日，该城的士气已经低迷不振。

在那一天，哈利勒的工兵的努力得到了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回报。位于外城墙东角凸出部分、保护着诅咒之塔的国王之塔，由于之前就已经暴露，现在也被地道破坏了。它也有可能是由于守军自己的反地道作业而受到破坏，对于带着沮丧心情进行观察的“推罗的圣殿骑士”来说，这座塔楼如此脆弱以至于“其正面的外壁塌成一堆碎石，落进前方的壕沟里，于是人们根本无法从石堆上方通过”。^[12]这为攻城部队提供了一个重大机遇，但也带来了挑战。在壕沟及其附近的土地上，现在到处都堆满了杂乱的砖石，若想控制塔楼，攻破外城墙绝非简单地发动进攻就能办到，而那些没有暴露危险的区域的守军仍然意志坚决，拼命地防守着。马穆鲁克军队实用的工程技术和丰富的资源使他们临机应变，构想出一个新颖独特的解决方案。苏丹手下的一位埃米尔拜巴尔·曼苏里，开始思考如何为一场全面进攻建造出一条堤道：

在这一筹莫展之际，我在寻找一个叩开机遇之门的地方，一个施展计谋的角落，但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可能之处。当我殚精竭虑而放任目光和感知四处游走之时，突然间注意到被投石机摧毁的一座塔楼现在正好处于我方兵力的投放范围之内。在这座塔楼与城墙之间已经暴露出一片开阔地，但是，这片开阔地被其上方的守军弓弩火力覆盖，使得我军无法穿过，除非我们能建起一片覆盖整个区域的屏障来保护突击进去的士兵。于是我找来一些毛毡，让人把它们全都缝在一起，制成又长又宽、如同一朵大云的形状。在正对着那座坍塌塔楼的两根柱子之间，我放置了一个用绳子绞紧的滑轮，类似船上升帆的那种。在那里，我将云状毛毡升起，犹如一座水坝。这些工作都是在夜色的掩护下完成的，阿卡人全然不知，当他们在第二天早上登上城头发现了这片大毛毡后，立刻用投石机和弓箭攻击

它。当一块石头落在这块屏障上时，其下方的毛毡会松弛下来，减缓石弹的冲击力，而弩兵则无法用箭穿透它。我们就这样设法通过了那片开阔地，找到了一条突破的道路，然而又一道城墙把我们和敌人隔开了。我们开始用装满泥土的马粮袋（nosebag）^[13]填平两道城墙之间的壕沟，再加上所有能用得上的木料使之平整，于是便创造出一条可以通行的坦途，这真是一幅可喜的景象。^[14]

从城内，“推罗的圣殿骑士”也可以观察到马穆鲁克人因时制宜的速度和效率，这反映了他们的进取心、组织水准和大量的人力资源。“撒拉森人用麻布做成小袋，将其装满沙子，每个骑兵都在他的战马脖子上挂上一个这样的小麻袋，扔给屏障里的士兵。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些士兵拿起麻袋，放置在石堆上，使其平整得像铺好的路一样。”^[15]通往受损塔楼的道路现在敞开了。

按照沾沾自喜的拜巴尔·曼苏里的说法，苏丹因他的计策而龙颜大悦。哈利勒决心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发动全面进攻，目标是两处地点：摇摇欲坠的国王之塔，以及它西侧连接着主城门——圣安东尼门——的城墙。

亨利国王的部队从被摧毁的外堡撤出之后，被部署在这段城墙与条顿骑士团并肩作战。在5月15日这一天，马穆鲁克对这一防区的坚决进攻被守军打退。结果防区各处的守军都疲于奔命、人困马乏。第二天早晨，这一防区的士气崩溃，进而影响到全城，对其何以发生的解释不一而足，混乱不清；相互矛盾的时间尺度与可能是以事件发生顺序为因果的指责渐渐出现在基督徒撰写的各类编年史里。

亨利国王的士兵与他们合作对象之间的关系似乎不佳。5月15日日落时分，他们按照8小时轮班制，将该防区的控制权交给了在其大团长统领下的条顿骑士团。亨利的部队定于第二天拂晓再次接管防区。《阿

《卡灭城记》的无名作者在参考了目击者的记录之后，宣称这些人在16日的黎明时分已经无处可寻了。他指控亨利国王在发现既不能促成和平的结果，也无法获得对城内各派的支配权之后，就悄悄地登上自己的船舰，带着自己的人马逃跑了，与其同行的还有城内的一大部分贵族。考虑到形势如此绝望，而保卫者之间又是如此不和，也许亨利二世已经相当合理地决定，他作为耶路撒冷国王继续活命将是更好的选择。他被指控为彻头彻尾的胆小鬼。“噢！但愿狂风巨浪把尔等打入海底！”^[16]编年史家诅咒道。这一事件的真伪无法证实，但是“推罗的圣殿骑士”——总体上作为一个冷静的目击者——声称两天后亨利国王仍然在阿卡。他可能是出于忠诚而袒护国王吗？更有可能的是，要揭开事实真相既需要一个解释，也需要一只替罪羊。这场围攻的幸存者所效忠的对象错综复杂，留下的记述也各有偏袒，《阿卡灭城记》的无名作者从中选取了对国王怀有敌意的材料加以利用。

无论当时情况到底如何，随着天色大白，苏丹对这一防区的目标城墙（接近圣安东尼门的城墙）发动的进攻似乎正好落在了防守薄弱之处。叙利亚军团（不再由拉津统领）在一堵盾墙的保护下向前冲杀，弩箭和标枪如雨点般飞上城墙。这次进攻事先计划周详，守军人数又不足以抵挡如潮的攻势。随着这股人潮奔涌向前，一队士兵将手上所有能派上用场的材料都用来填满壕沟：柴捆、石块、泥土、木料、死去的战马尸体，所有这些都被投入壕沟，以便填出一条平整的道路，顺着陡坡直通往高耸在上的城墙。云梯也已抵住城墙。守军向进攻者发射弩箭，投掷石块和标枪。双方在城墙上展开白刃战，士兵们用刀剑、棍棒和长矛互相厮杀，“就像铁匠敲打着高温的铁水……于是，许多人惨死于对方的重击之下”。在喧闹声和大屠杀中，守军无法顶住“大批弩兵、标枪和投石兵”^[17]的进攻。兵力稀薄的防区最终被攻破，幸存者们在弩箭的掩护下扔下伤者和死尸逃往城内。至关重要的圣安东尼门楼，这个通往城市中心的入口，现在已落入马穆鲁克之手，尽管城门本身仍然紧闭。

随着从前线逃离的人群涌入，骚乱蔓延到城内。各大派系和军事修会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一些群体不愿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没有参与最初的毁约行为；另一些群体则宁愿在自己的社区设置路障、闭门自守，但城墙被突破的消息最终激起了全民皆兵的号召。医院骑士团的大元帅马修·德·克莱蒙召集了一些骑士披挂上阵。他们迅速上马，从医院骑士团防区附近的城门驰骋而出，在一位编年史家的笔下，他们“全副武装，戴着磨光锃亮的头盔保护头部，臂甲圆箍在胳膊上，稳坐于战马之上，高举长枪”，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被裹挟进一群溃兵游勇中，这群“身上无伤却已被吓坏了”的人大大妨碍了他们的行进速度。克莱蒙向那些抛弃城墙、惊慌失措的人们狠狠地转过身来，大喊道：“你们疯了吗？你们的盔甲完好无损，你们的头盔和盾牌完整无缺，你们的身体毫发无伤，结果你们却临阵脱逃？我为教会的信仰恳求你们，回到战斗中来！”克莱蒙将马刺扎进马背，冲入乱军丛中，希望能与苏丹面对面单挑。克莱蒙选中一个埃米尔——“看起来是穆斯林中最勇敢的一位”——用长矛刺穿他的胸膛，把他从马背上扫落在地。然后克莱蒙伸手拔剑、横劈竖砍、碎骨斩头，在穿着轻便铠甲的穆斯林中左冲右突，穿透敌阵杀出一条血路。心理上的势头由此逆转。穆斯林们停止了前进，“像羊躲避狼一样”^[18]掉头逃跑。

然而，哈利勒有足够的资源在同一时间来发动另一场协同进攻。在更远处的城墙，他现在利用先前拜巴尔·曼苏里策略性堆建起来的沙土袋堤道对受损严重的国王之塔展开攻击。至晚祷时分（日落），他的人马长驱直入。“推罗的圣殿骑士”看到“塔楼面向城内一侧的半边部分依然完好如初”并由大批士兵顽强防守，“但结果却没什么不同，撒拉森人还是攻下了塔楼并在上面升起了苏丹的旗帜。作为回应，我们为弩炮装上炮弹，将其瞄准塔楼并向那里开火。我们击杀了一些撒拉森人却无法将他们逐回”。国王之塔就此陷于敌手。孤注一掷的守军为了阻止敌军继续向前推进，搭建了“一个覆盖着皮革的木质结构体，将其称作猫堡，由士兵进入猫堡内部据守，这样占领塔楼的撒拉森人就不能再向前

推进了”。^[19]这个坚固的防御工事阻止了穆斯林前进的步伐，但是诅咒之塔暴露在了敌军面前，守军战线被挤压到圣尼古拉门和圣安东尼门之间的一长段内城墙的区域里。现在，守住诅咒之塔是阿卡生死存亡的关键。

与此同时，克莱蒙在一小部分医院骑士的支持下于圣安东尼门发起的冲锋，起到了提振士气的效果。自觉羞愧的士兵重整旗鼓，返身再战；在这些骑士们的身后，步兵们挺身向前，将他们手中的利剑刺入进攻者们坐骑的马腹。这些进攻者回身逃走，从一个街道窜到另一个街道。那些试图强行撬开仍然紧拴着的城门的敌人，也被基督徒驱散。

随着夜幕降临，苏丹放弃了在当天夺取阿卡的希望，通过号声下令全军撤退。“胜利！胜利！”的呼喊在大街小巷里回荡着。在一场鼓舞士气的表演中，守军派遣披挂着重甲的部队，从各处城门杀出，旌旗漫卷。垂死的穆斯林被就地杀死；守军之中，有些人受了伤，有些人躺在地上，因为筋疲力尽而无法动弹，被人抬回了家。基督徒的尸体被带走下葬，敌人的尸体则被扔在一边。克莱蒙为守军注入了活力。当顽强抵抗的消息传开后，城内响起一片欢庆凯旋的喜悦之声，人们为携手抗战的精神而欢欣鼓舞。

直到深夜，城内的居民还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帮助守军修补城墙。人们用大车运来木材和石块，堵住缺口，筑起栅栏。武器被堆放在塔楼上。这些武器包括装在支架上、配备绞盘和曲柄的大型攻城弩，它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是一种采取脚踏机括来装填弩箭、需要双脚并用的型号，以及较为轻便的弩，还有大量的方镞箭和羽箭。弓箭手被派到各个岗位，与一个守卫士兵结为一组。经过漫长一天的战斗和修复工作，大部分士兵疲惫不堪，他们被命令回家休息几个小时，然后又接到命令在黎明前一小时到医院骑士团防区集合。

在短暂的狂喜表象之下，是黯淡的形势。伤亡率居高不下，而且，

尽管已经付出了最大努力，守军现在被压制在内城墙里——从倒塌的圆形国王之塔到圣安东尼门一段长为550米的范围内。在夜里，当他们竭尽全力地修补防御工事时，可以听到攻城槌在击毁一段段外城墙时所发出的有节奏的撞击声，以及英格兰之塔坍塌的声音，而他们却无力阻止。到了早上，外城墙的缺口已达60米宽。“当这座塔楼被敌人占领的时候，”“推罗的圣殿骑士”回忆道，“每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并且开始将他们的妻子儿女安置到船上。”^[20]毫无疑问，富有的家庭霸占了船上的空间。穷人将不得不从别处寻求救助。“人们茫然自失，如同木雕泥塑一般，不知所措。”^[21]

5月17日，星期四，又是一个黯淡日子的开始，昏天暗地，恶浪滔滔。在天亮前的一个小时，各位主要的队长、司令官和宗教权威齐集到医院骑士团防区来讨论他们的困境。现场的气氛很阴郁。哈利勒现在已经控制了外城墙沿线一大片宽广的区域，而不断削减的人员使城市防御变得不堪一击。守军最多只有70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驻守着方圆1英里多的范围，对抗着似乎无穷无尽的攻击浪潮。

在医院骑士团防区的会议上，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尼古拉·德·阿纳普站了起来，双手示意肃静，并以基督的名义发表了一场关于信仰、反抗和勇气，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布道演说。现在投降，就是把自己交到异教徒的手中。他还强调了敌人大规模强奸和奴役妇女以及儿童的可能性。“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被天主选中以维护他的荣耀，与一个或多个敌人战斗，毫无疑问，我们所有人都因为寄托在耶稣身上的信仰而与他紧密相连，凭借这份信仰我们必将得救。”他以“彼此忏悔你们的罪恶，希望因主的怜悯而使你们获救并得到永生”^[22]结束了自己长时间的演讲。



使用弩和长弓的欧洲弓箭手

他讲完话后是一场简短的弥撒，人们的精神得到了升华。他们接受圣餐，忏悔，互相拥抱，行亲吻礼，然后恸哭。这些仪式对守军产生了振奋人心的效果。那些在偷偷寻找上船逃跑机会的人决定回到战场，“他们磨好了剑，挥舞着长矛，并互相鼓励”^[23]。直到深夜，阿纳普还在不知疲倦地巡视前线，激励人们为信仰而战，或为信仰而献身。

城墙四周有些沉寂。很可能是因为哈利勒在目睹自己的士兵从圣安东尼门全线溃退后有所忌惮。考虑到自己的权力正在受到威胁，以及大量志愿兵的热情可能会消退的可能性，不再重蹈城墙前受阻的覆辙是极为重要的。另外，他的战场优势非常稳固：他已经控制了外城墙的一大片区域。他利用这一天来保障进行最后突破的物质条件并且提高他的士兵的作战热情。他的主要顾虑是内城墙与外城墙之间又深又陡、足有10米宽的壕沟，他的士兵要想冲击最后的防御体系就必须越过这道沟堑。他组织了小规模牵制性进攻，下令弩炮不停地开火，不给守军以喘息

之机，并限制了他们对他的计划进行干扰。任何能够用来作为一条通往城墙底部的稳固通道的材料都被骆驼拉到内城墙壕沟的边缘。动物的尸体和倒下的战士随着泥土、石头和木材被粗暴地扔进壕沟里。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气味从城墙上飘过。与此同时，哈利勒让士兵们为最后的攻击做好准备。营地中，毛拉们在人群中奔走相告，激发起士兵们的宗教热情。祈祷的时间段以特别虔诚的方式得到遵守，而苏丹则以提供金钱回报来鼓励士兵们在最后的总攻中的英勇表现。

在城内，基督徒也在做着他们的备战工作。作战武器被设置成对准国王之塔和英格兰之塔的缺口的方向。他们磨利刀剑，收集盾牌和弹药，分配守卫任务；敌人的尸体不断被扔出城墙，将一切可用的材料填塞缺口的工作也在继续。诅咒之塔必须守住。居民们受到鼓舞，着手准备自己的民防。迷宫般狭窄蜿蜒的街道，以及死胡同、内部通道、小广场和坚固的塔楼——实际上是城市结构中的一系列设防核心——为巷战（最后的手段）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作为战略要地的十字路口被木造的路障封锁起来，由武装人员组成的分遣队把守；人们把石头堆叠在屋顶上，打算给予入侵者迎头痛击。

试图用船把妇女和儿童运走的努力因恶劣的天气而受阻。阿卡的港口很容易受到风浪的影响，不适宜停船，而且运气不在城市的这一边。“天气很糟糕，”“推罗的圣殿骑士”回忆道，“海上掀起惊涛骇浪，船上的妇女和儿童无法忍受，于是他们下了船，回到了自己的家。”^[24]在黑暗中，守军各就各位，平民各回各家。每个人都知道决定性的进攻将在黎明到来。

[1] Bartolomeo de Neocastro. *Historia Sicula*, 1250-1293, ed. Giuseppe Paladino, Bologna, 1921-22, p.132.

[2] Bartolomeo de Neocastro. *Historia Sicula*, 1250-1293, ed. Giuseppe Paladino, Bologna, 1921-22, p.132.

[3]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1

[4]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1

[5] Little, Donald P. 'The Fall of Akka in 690/1291: The Muslim Version', in M.Sharon (ed.),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Jerusalem/Leiden, 1986, p.174.

[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1.

[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1.

[8]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1.

[9]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1.

[10] Al-Jazari. *La Chronique de Damas d'al-Jazari*, ed. and trans. J.Sauvaget, Paris, 1919, p.5.

[11]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1.

[12]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1.

[13] 挂在马颈上的饲料袋。

[14] Baybars al-Mansuri, pp.279-80.

[15]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1.

[16]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69.

[17]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71.

[18]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73.

[19]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p.811-12.

[2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2.

[21]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76.

[22]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78-80.

[23]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80.

[24]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2.

第十二章 看这伤口

1291年5月18日，拂晓至中午



5月18日，星期五，天气依旧阴沉不定，大海依旧风号浪吼。哈利勒的军队在日出前就准备完毕，苏丹本人坐在马背上，让全军都能看见自己，以此激励部队。圣人和苦行僧们在营地中激起大家对神圣事业的热情，而哈利勒的传令官们则往来传告，允诺给予信众更务实的回报。“推罗的圣殿骑士”听到了发起进攻的信号。随着战鼓在暗夜中发出的隆隆巨响——“那是一种天震地骇的声音——撒拉森人在各处向阿卡发动了进攻”。^[1]如果最初的策略是逼迫守军将有限的人数沿着全线分散布置，那么哈利勒真正的重点仍然是从圣安东尼门到圣尼古拉门之间的那段区域，那里的外城墙已经归他所有。正对着已经倒塌的英格兰之塔和国王之塔之间的城墙缺口——暴露出了关键的诅咒之塔——守军已经部署好他们的投石机，决心坚决保卫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区。



声浪之墙：金鼓齐鸣，威慑宵小，振我军心

前进中发出穿云裂石般的声音是伊斯兰军队的一项震慑战术，目的是将恐惧注入守军的内心而将其从己方士兵的心中驱除，这种噪声是巨大的，好似一堵强有力的声浪之墙：300名骑着骆驼的定音鼓鼓手用重槌敲击出一段猛烈急促的鼓声，配合着铙钹的撞响、喇叭的刺耳长鸣和数以千计的人狂呼厉吼。

在城墙上，守军等待着敌人进入射程以内，投石机和弩机均已上好弹药，石弹、弩箭和普通箭支都已堆好；市民们站在屋顶上随时准备好

投掷石块，并且在木质的街垒处驻守。宗主教不知疲倦地告诫着守军要以基督的名义下定决心：“用您的铜墙铁壁将我们围护起来，噢主啊，用您的武器来保护我们！”^[2]教堂的钟声敲响。

哈利勒的军队以整齐有序的队形向前推进，每一排都由150~200名专精具体格斗技巧的士兵组成。队列前方的是狂热的托钵僧和苦行僧，他们高喊着真主的名字，在圣战的热情和对天堂的憧憬的驱使下，狂奔向前直至死在城墙下，为后续前进的士兵提供了一座人桥。而随着他们一起被推搡向前的是一群肉盾牌，由随军的基督徒组成，来自苏丹领土上臣服的基督教群体。他们在威逼利诱下被迫参加了这场战役：如果他们幸存下来，而阿卡没有被占领，他们要缴纳的税负将增加一倍；如果阿卡陷落，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永远免于纳税。

在这些或是不情不愿或是狂热自戕的部队后面，是一个防护严密的步兵方阵，这支部队装备着高大坚固的木盾以承受第一波打击。再后面是火器部队，士兵们携带着油壶和燃烧的火把，火光在黑暗中闪耀，并且将装有希腊火的土罐油掷弹抛过城墙。他们制造出一道烟与火的屏障，后排的弓箭手透过这道屏障发射出冲天箭雨，弩兵也随后上前发射方镞箭；他们之后是近距离格斗部队，装备着短剑和皮盾，专门应对白刃战。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带着锄头、锹镐和铁爪钩，推着云梯和攻城槌的士兵，这些士兵冲上前去，或是攀登，或是拆除城墙。持盾部队则肩并肩地向前推进，形成一堵气势汹汹、坚不可摧的墙形阵。手无寸铁的志愿兵们使用简易的弹弓向城墙上的守军不停地射出小石子。再往后，投石机继续将石块投掷进城内。

然而，守军拥有高度上的优势，还能凭借木桶和临时搭建的城垛得到一些保护，而且他们对于城墙上的战斗显然已是驾轻就熟。随着敌军大队近前，弩箭给前排的士兵以重大的杀伤力，几乎是垂直瞄准那些在陡峭城墙底部的敌军，“他们一次向前排士兵发射出三支方镞箭，射穿

了盾牌并将其与持盾者钉在一起，他们还用普通的弩机和威力强大的攻城弩发射出大量的方镞箭，这些方镞箭直接穿透了很多根本没有防护的士兵”。与此同时，守军还扔下大石，砸在那些试图破坏城墙地基的士兵身上，“于是他们像蛤蟆一般被压在自己的盾牌下面”。^[3]在这场杀戮中——混杂着用法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德语、突厥语、英语、加泰罗尼亚语和希腊语呼喊基督和穆罕默德名字的声音——守军在前进的人群中撕开一个又一个大口子。

马穆鲁克在最开始时发动的全线进攻只不过是障眼法，意图拉长守军的战线而使其兵力愈加稀薄。阿卡城内本就没有整体性的战略指挥，这种策略将具有可观战斗能力的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牢牢地束缚在蒙穆萨尔郊区。随着守军初步给马穆鲁克的军队造成了大量损失的同时，哈利勒启动了他的第二阶段计划。他的目标是在选定的薄弱地点以人数优势压垮勉强维持的防御体系，且阻止敌军在这些地点集中兵力，不给他们以喘息之机。这肯定是一次预先策划好的战斗转移，他悄无声息地将部队逐步撤出外围区域，“命令他们带着所有的装备向受损的城墙秘密移动”。^[4]当他们整理好队形，听到号角发出的信号声时，便排成一个紧密的方阵，带着铁锹、十字镐和铁爪钩，毫无畏惧地向前冲锋，或是突入缺口，或是攀过城墙。

在城墙上，守军被迫躲避弹雨、射击、装填弹药然后再射击，不断重复这些动作使他们疲惫不堪。马穆鲁克的资源似乎无穷无尽。他们的士兵轮流上阵。一旦攻势受阻“他们就会重整队形，投入生力军，而且随着基督徒被耗尽力气，他们向防线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图强行冲入城内。通过这些策略，他们可以在眨眼之间就剥夺基督徒片刻喘息的机会”。^[5]声浪和混乱主宰着整个局面。“（敌军中）那些投掷希腊火的部队攻击频率如此之高，燃烧弹如此密集，”“推罗的圣殿骑士”回忆道，“使得烟雾浓厚到相邻的两人看不到彼此的地步。”^[6]一旦燃烧弹被引燃，那么由此产生的烈火就不可能被扑灭。被这些翻滚的火球活活烧

死的担忧总是让人心生惧意，而其滚动过来的声音却又清晰入耳。骑士让·德·茹安维尔曾生动地描述了希腊火的声音：“它袭来时的声音有如天雷滚滚，看上去好似火龙腾空。”^[7]“推罗的圣殿骑士”还目睹到敌军弓箭手施加了同样的压力：“透过烟幕，弓箭手们射出的羽箭如织，使我们的士兵和坐骑都受到了痛苦的伤害。”^[8]人力、物力开始慢慢枯竭。普通箭支和方簇箭存量即将告罄。弓弩火力变得稀疏起来。阿卡的守卫者们用刀剑、钉头槌、石头和手边的任何东西继续战斗。

在争夺诅咒之塔的激烈战斗中，马穆鲁克取得了突破。足足有好几个小时，守军阻止了马穆鲁克军队从外城墙上被摧毁的塔楼之间拥入内城墙的缺口，他们针对这些缺口部署了己方的投石机加以火力封锁。但是随着炮弹量不断减少，进攻一方的数量优势还是逐渐占据上风。木质的猫堡承受了高强度的轰炸，伴随敌方炮火而来的是被活活烧死的恐惧。进攻者们“全部徒步前进，人数多得数不清。在最前面的一排士兵持着巨大的盾牌。在他们后面的是投掷希腊火的士兵，而在火器部队后面的是投射标枪和羽箭的士兵，火力密集得好像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我们在猫堡内部的士兵放弃了阵地”。^[9]随着这道额外防御工事的丢失，士兵们撤出诅咒之塔，退回到城里狭窄的巷子里。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现在通向阿卡心脏地区的道路打开了。

一些隶属于塞浦路斯国王的军队在内城墙里向圣安东尼门撤退。攻方部队现在能够席卷内外两道城墙之间的空间并开展行动。“推罗的圣殿骑士”描述道：

他们选择了两条路线，既然他们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的两道城墙之间，也就是说，在第一道城墙和壕沟，也就是被称为外堡场的地方，与这座城市本身的巨型（内）城墙和壕沟之间。一些敌军通过名为诅咒之塔的巨大塔楼的城门进入，向着圣罗马诺（San Romano）教堂移动，比萨人在那里部署了他们

的大型配重式投石机。其他的敌军继续沿着这条路（两道城墙之间）移动，向圣安东尼门冲去。^[10]

丢失诅咒之塔带来了极其危险的后果。一群马穆鲁克士兵杀向比萨人的投石机，对城市的中心地区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靠近海边的圣安东尼门和圣尼古拉门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号角声响彻全城，人们绝望地请求增援。在圣安东尼门，两天前那里的防守战就打得异常激烈，现在双方更是杀得难解难分。为了争夺城墙而爆发了血腥的白刃战，守军拼尽全力抵抗。有一段时间，守军似乎已将攻方的大队人马逼退，但是很多人从诅咒之塔那边的防线撤了回来。形势的恶化让人忧心不已，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急忙奔向城门，试图阻止敌方的前进势头，这场战斗变得越来越混乱。博热如此匆忙，只来得及穿上轻甲。

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正在他的会馆（*auberge*，即总部）与手下一起守卫防线时，听到急促的鼓声，便知道撒拉森人已经猛扑过来了。大团长带领10或12名同僚骑士以及他的部队出发前往两道城墙之间的圣安东尼门。他经过医院骑士团的防区时叫上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与他同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也随即率领自己的一些同袍，以及塞浦路斯和当地的若干骑士，还有一些步兵一同前往。他们来到圣安东尼门，发现撒拉森人正在徒步前进，于是展开反击。^[11]

这段记录由“推罗的圣殿骑士”书写，着重强调了博热和他手下骑士的英雄主义奉献精神，但他很可能对最后防守贡献的整体性评价进行了扭曲。其他的史料则更具有批判性——“他姗姗来迟”^[12]——一位作家坚持这样的看法，而大团长在事发时未及披甲，思想准备不足，似乎最关注的还是防守远离城墙的己方大本营，这一事实也表明派系的利己主义思想给城市的防御造成了何等程度上的妨碍，即便这座城市已经到了危

急关头；话虽如此，博热本人很可能已年近六十，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已经过了战斗的年龄，而他此时却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

马修·德·克莱蒙，作为医院骑士团的大元帅，“武艺娴熟，战斗能力盖世无双”^[13]，再一次在城门的战斗中大显身手。穆斯林被一再击退。“我们和我们的（医院骑士的）教团，”让·德·维利耶记述道，“在圣安东尼门抵抗他们，那里的撒拉森人多得数不过来。尽管如此，我们三度将他们逐回那个通常被叫作诅咒之塔的地方。”^[14]很明显，医院骑士们正试图堵住这道城门及其后面的防线。

将入侵者从诅咒之塔赶回去并且守住内层防御圈至关重要，“但是他们无能为力”，“推罗的圣殿骑士”解释道，“因为撒拉森人太多了。当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两位大团长赶到那里并投入战斗时，看起来他们好像撞到了一堵石墙上”。马穆鲁克训练有素的战斗技巧在狭小空间内非常有效。现在涌进狭窄巷子的敌军人数证明他们是不可能被驱逐出去的，守军的力量正在被逐步削弱。让·德·维利耶讲述了“在（试图夺回诅咒之塔）的行动中以及其他地方的作战中，我们教团的兄弟们为保卫这座城市、他们的生命和国家而战斗，我们一点点儿地失去了我们的教团，然后命运最终走到了尽头”。^[15]

战斗在一系列混乱和血腥的快照式场景中展开，全部都是以基督徒的视角，其中的任何顺序和叙述都是杂乱和不连贯的。希腊火对阿卡的守军来说尤为恐怖，其效果骇目惊心。“推罗的圣殿骑士”目睹了“一个可怜的英国军士被撒拉森人投掷的希腊火燃烧弹重重地击中，以至于他的外衣迅速燃起火焰。没有人帮助他。他的脸被烧伤了，接着是全身。他像一口烧着沥青的大锅，惨死在那里。当这一切发生时，他正在徒步行走，因为他的坐骑刚刚被杀死在他的脚下”。^[16]

其他的史料则提供了关于白刃战的血腥描述：

你可以看到许多人的头从他们的脖子上和肩胛上落下，手从胳膊上断开，其他人则是被当胸劈开、深可见骨，或是被长矛或刀剑刺穿，或是被砍成两半。士兵们满身是血、奄奄一息，或是痛得打滚，或是眼珠在头上滚动。一个人的头颅扭曲向后；另一个人躺在他的腹部；还有一个人舌头伸出，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而其他人一次又一次地，虽然受了致命伤，仍微弱地尝试再次起身并战斗。双方的死伤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踩在尸体上是不可能走到任何地方的。[\[17\]](#)

关键人物的死亡或撤退可能是士气最后崩溃的原因。维利耶和其他医院骑士试图阻止马穆鲁克的前进，显然他们已经被逼退到了城内的街垒后面，但在这里，他“被一支穿过街垒的长矛刺中，差点儿死在当场”。[\[18\]](#)在诅咒之塔附近，守军遭受了另一次心理打击，“推罗的圣殿骑士”可能是目击者之一：

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使撒拉森人更加容易地杀进城内，并使我们的人民士气低落。事情是这样的，当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正在举起左手时，一支标枪瞄准了他。他没有盾牌，只是右手拿着一支长矛，这支标枪击中了他腋窝下的部位，枪杆嵌入他的身体里足有一掌尺那么深。它扎进的地方恰好是板甲没有连接的一个缺口处。此时穿在他身上的不是他本人厚重的胸甲，而是他一听到警报就赶紧穿上的轻型铠甲。

当他意识到自己受了致命伤以后，便转身就走。还在那里战斗的一些人认为他离开是为了保全自己。他的旗手看见他转身后也跟在他后面，然后是他所有的侍从部队。在他撤离的时候，有20名来自斯波莱托河谷（Valley of Spoleto，位于意大利）的十字军战士看到他离开，喊道：“噢，阁下，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走！否则，这座城市一定会失陷！他大声回答他

们，所有人都能听得见：“诸位，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我要死了。看这伤口！”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还插在他身体上的标枪。而他说完这些话后，手里的长矛就掉在地上，他也垂下了头，快要从马上摔下来了。但他的侍从们从坐骑上跳下来接住了他，把他从马上抱下来，将他放在他们在地上捡到的一面又大又宽的盾牌上。

根据“推罗的圣殿骑士”的描述，他们似乎是在内墙和外墙之间将博热抬走的，

打算穿过圣安东尼门入城，但是他们发现那里城门紧闭。他们在（内城墙）找到了一扇小门，通过一座桥越过壕沟进入了安条克的玛丽亚女士（Lady Maria of Antioch）的住宅.....他人在那里将他的盔甲卸去，将他肩膀处的板甲割除，但也只能做这么多了，因为伤势实在太严重了。他的垫肩（*épaulières*，即肩部保护物）仍被保留，他们给他盖上一条毛毯，然后抬着他向海岸走去，到达了他们宰杀牲畜的屠场和推罗领主的官邸之间的海滩。

他们的目的是用船把他运走。现在，马穆鲁克向城内的推进已无法阻挡。在狭小的空间内，他们持盾部队践行的战术是维持成一道无法攻破的墙形阵。“撒拉森人会稍做停顿，然后举起他们的盾牌，向前移动一小段距离，当对方士兵向他们冲来时，就立刻将盾牌锁在一起并停止前进。他们整天不停地投掷希腊火和标枪。这种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十点左右。”^[19]他们把那些企图在屋顶上向他们投掷石块的人拉下来，然后继续推进。

在博热因伤撤退后，圣安东尼门的防守也完全崩溃了。马穆鲁克成功地在城门的外表面点燃大火，而那些在城门上方塔楼的守军士兵则继

续往下投掷石块并发射弩箭，但这种防御无法持久。“最后，”用基督徒编年史家的话来说，“城门坍塌了，一大群令人窒息的异教徒从拱门冲了进来，横枪跃马，冲破了基督徒的防线。”^[20]

穆斯林们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攀上城墙，打开城门，侵掠如洪水滔天。“随着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又看到大团长被抬走后，每个人都开始放弃自己的岗位，夺路而逃。至于撒拉森人……他们穿过了诅咒之塔，长驱直入圣罗马诺教堂，烧掉了比萨人的大型投石机。”^[21]

对于负伤的让·德·维利耶个人来说，局势十分凶险：

人数众多的撒拉森人从四面八方、从陆路和海路（沿着海岸）杀入城中，沿着支离破碎的城墙、穿过城里的街道直闯到我们的街垒……我和弟兄们——之前在战斗中就有比较多的人受创乃至死亡——只能尽量地抵挡他们，越久越好。我们中的一些同伴就这样半死不活而又无助地躺在敌人面前。我们的军士和贴身仆从赶来，冒着丢掉性命或因伤致残的极大危险，将重伤垂死的弟兄们都救走了。^[22]

医院骑士们被逐退了。维利耶被担架抬到港口。克莱蒙和其他被困在城市街道里的小分队仍在组成后卫部队进行作战。在其他地方，有组织的抵抗都已经演变为溃逃。

当一部分马穆鲁克部队快速突入城市中心的时候，另外一些部队则猛烈地攻击通往港口的城墙和沿途的城门。圣尼古拉门被穆斯林从里面打开，“他们顺着笔直的街道直捣条顿骑士团的修道院，一路上逢人便杀”^[23]。在圣尼古拉教堂附近的收容所，条顿骑士团全军覆没，而在附近的圣伦纳德（St Leonard）教堂，圣托马斯的英格兰骑士团也不敌败亡。

当他的随从试图在浪涛翻滚的海面上将受伤的博热救走时，有人惊呼道，附近由格朗松和格拉伊把守的宗主教之塔的门楼倒塌了，因此港口本身面临着即将被攻击的危险。博热的随从们惊慌失措：“他的一些卫兵跳入海中以图游到原先在那里的两艘三桅帆船上。港湾里只剩下这些船了，因为大海是如此狂暴，波涛巨浪使得船无法被操控，而且正因如此，许多人都被淹没在了海中。”^[24]现在，撤退已成为一场个人生存的冲刺。

鉴于形势时刻都在恶化，他们决定放弃将博热带走的努力。丧魂落魄的侍从们顾不上任何礼节了，“他的侍从们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将他抬到圣殿骑士团的城堡，众人把他送入城堡内部——但不是通过主城门，因为他们不想打开，而是通过一个堆满粪肥的庭院”。^[25]

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四下逃窜，火焰蔓延到城市的中心：“撒拉森人放火焚烧投石机和木质街垒，于是大地都被火焰照亮了。”^[26]在一些地方，反抗还在继续。有些人英勇地战斗到最后，尽管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赞扬还是责备取决于个别史料的倾向。

在圣殿骑士团的城堡内，濒临死亡的博热发现远处传来的战斗声渐渐在他的耳边消失，人们向他隐瞒了事实：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整天都没有说话，在他们把他从马上接下来之后，他就再没有说过话，除了在听到人们逃避屠杀时的喊叫时向圣殿骑士团的同袍问了一句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告诉他士兵们在战斗，然后他就吩咐他们不要惊动自己。此后，他不再说话，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他被安葬在他的礼拜堂前，也就是他们作弥撒的圣坛。上帝接纳了他的灵魂。他的死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啊！^[27]

圣殿骑士团的总部是一处安全的堡垒，因而成为那些寻求避难所的

人们的一个聚集点。“那里有大元帅皮埃尔·德·塞夫雷，以及其他一些圣殿骑士团的兄弟，一些受了伤躺在那儿的弟兄们，还有一些世俗骑士、妇女、市民和许多其他人。”^[28]

然而，仍然有一场殿后的战斗需要为之献身。在那些面对马穆鲁克的无情进攻而退到圣殿骑士团总部的人中，有医院骑士团的大元帅马修·德·克莱蒙。他看到博热躺着死去后，决意再发动一次不成功便成仁的突击以扭转局面，于是便“回到了战斗，收拢他周围所有的同胞，因为他不会放弃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一些圣殿骑士也与他一同前往，他们来到热那亚人聚居区的一个广场，那里已是人去房空，马修在那里投入了战斗”。^[29]在这个封闭的小竞技场里，克莱蒙骑着自己的战马，一直与敌人厮杀到他生命停止的那一刻。他的结局引发了对英雄主义的讴歌以及对人与兽在最后一刻的描述（很可能是艺术创作性的）：“他的战马全然没了力气，再也不能向前冲了。它抗拒着马刺的驱策，站在街道中间一动不动如同在那里生根了一般，然后被一支长矛刺中，跪伏在地上。随着他的战马倒下，他被长矛刺穿。于是这位忠诚而又勇武的基督骑士把他的灵魂交给了造物主。”^[30]

在海岸上，马穆鲁克骑兵已经设法撬开了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带尖刺的铁栅栏，这一工事设置在那里的目的就是防止骑兵沿着海滩进入城内。他们策马向前，从后面包围了守军：

随后一大群撒拉森人骑马而来。让·德·格拉伊爵士和奥顿·德·格朗松爵士以及法兰西国王的战士们顽强抵抗，以至于那里死伤众多。但让·德·格拉伊爵士和奥顿·德·格朗松爵士还是经受不住撒拉森人带来的压力，只能从那里撤离以求自保，途中让·德·格拉伊爵士负伤。当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二世看到这场灾难的程度如此深重时，他找到了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一起商量，他们清楚地看到，任何策略或援助现在都起不

了什么作用，他们只能登船自救。 [31]

维利耶很可能是乘这些船离开的。在阿卡陷落后的指责游戏中，编年史家们安全地待在修道院和图书馆里，利用目击者的证词，将谁战斗谁逃跑的问题记录了下来，根据对民族和宗教的忠诚来指配批判和赞扬的对象。但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

[1]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2.

[2]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84.

[3]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82.

[4]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83.

[5]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86.

[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2.

[7]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p.112.

[8]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2.

[9]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2.

[1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2.

[11]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2.

[12]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89.

[13]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90.

[14] King, E.J.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1931, p.302.

[15]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2.

[1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p.812-13.

[17]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88-9.

[18] King, E.J.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1931, p.302.

[19]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3.

[20]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86.

[21]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4.

[22] King, E.J.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1931, p.302.

[23]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4.

[24]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4.

[25]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4.

[2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4.

[2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p.813-14.

[28]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p.8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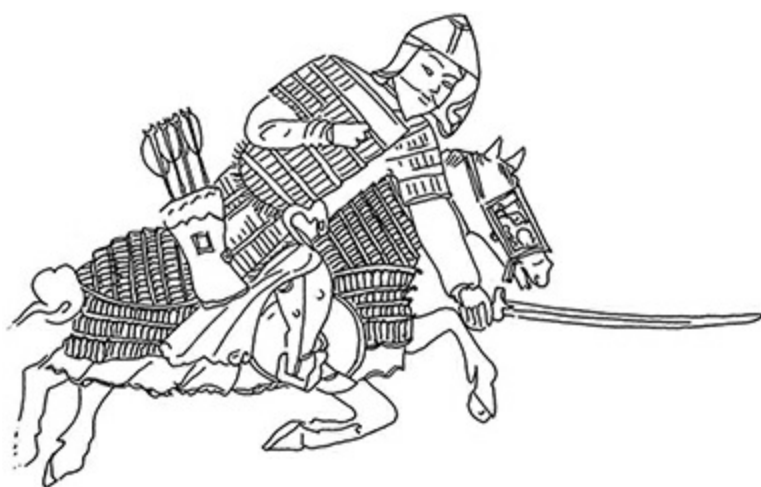
[29]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91.

[30]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91.

[31]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4.

第十三章 悲惨时日

1291年5月18日中午至5月28日



“往日不堪回首。”“推罗的圣殿骑士”苦涩地回忆道。一个不曾投降的城市怎可奢望敌人的怜悯？现在，随着苏丹的大军深入城区、肆意纵火，有组织的抵抗全似兵败如山倒。人们沿着狭窄的小巷向港口狂奔：“贵族小姐们、市民百姓们、未婚少女们和其他平民们从街头奔逃出来，他们将孩子抱在怀里，哭声大作，绝望地跑向水手们，恳求他们将其从死亡中拯救出去。”^[1]据维利耶的记载，在低阶的医院骑士团部队中，有秩序的撤退荡然无存。“我们的军士、侍从、雇佣兵和其他的人都开始彻底绝望了，他们扔下武器和盔甲，向船只飞奔而去。”^[2]

船只太少而海面在狂风的搅动下并不平静，阿卡港湾的固有缺陷使得任何组织有序的疏散都无法进行。离岸的近海还有几艘帆船和威尼斯

人的运输桨帆船，以及属于教廷和塞浦路斯国王的六艘桨帆船。巧合的是，两艘热那亚桨帆船刚刚抵达，准备在指挥官安德烈亚·珀洛

（Andrea Peleau）的率领下进行交易，他们一反热那亚一贯不佳的声名，“大行义举，这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他们把人们从海岸救上来，并把他们安置在帆船和其他船只上”。^[3]这项工作既危险又困难，考虑到当时的天气条件，转移人员需要搭乘摆渡船在汹涌的海面上来回颠簸。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似乎都没在事先就为疏散做足准备，尽管圣殿骑士团有一艘大帆船就停泊在岸边。这艘名为“猎隼”（Falco）的帆船被形容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舰”，^[4]可能最多能容纳1500人。它由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指挥，此人尽管身为骑士团的一名成员，却因雇佣兵的冒险经历和海盗行为而屡遭指控、备受争议。

这座城市已是火光熊熊、血流成河，能够逃离的主要是富人和贵族。亨利国王和阿马尔里克、受伤的维利耶、格拉伊和格朗松以及他们的随从登上他们的船，驶往塞浦路斯。“猎隼”号战舰的罗杰·德·弗洛尔“带走了小姐、少女、大量财富和许多重要人物”。^[5]这些财富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似乎已经塞进他自己的腰包，这使他随后陷入了从人道主义灾难中渔利的指控：在这些富有的贵族妇女乞求他将她们从这座燃烧中的城市救出时，他向她们索要其随身携带的珠宝和黄金作为赎金，并拒绝贫民登船。^[6]严厉的批评也落在了许多能够靠花钱买命逃路的名流身上。只有热那亚桨帆船的船长们因廉洁无私地把不太富裕的市民们送到帆船上和救死扶伤而受到赞扬，但是恶劣的天气和可用的运输船只之少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人逃出生天。

在海边，场面变得狂乱起来：富人们跑到码头，将身上有价值的物品拿出来，以求船主能把自己带走；穷人们则带着孩子乞求怜悯。在汹涌的大海，水手们试图将难民摆渡到停泊在近海的商船上，但场面一片混乱。人们在渔船和小船上争抢位置。一些超载的船只在巨浪中倾覆。有些人试图游向大船，其他人则在被杀、被强奸的前景与被大海吞

噬之间，选择了后者。妇女们把婴儿抱在胸前，向水中走去，然后纷纷溺死。海面被死难者的鲜血染红。那些留下的人面临着悲惨下场。



海中的死亡场景，来自一部手抄稿中关于阿卡围攻战的插画

关于全城大屠杀的描述存在于一系列杂乱的叙述中，这些都是有关恐怖和自我牺牲的故事。和其他一样可怕的是惨绝人寰的声音：“那些被剥夺了逃跑机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惊恐万状、发出哀号——有些人正在吃饭的当口，就被困在广场、街道、房屋和城市的角落里。”^[7]所有的秩序都崩溃了。在很多情况下，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编年史

家的言辞与《圣经》中的一些语句相呼应：“自然虔诚的纽带被打破了。父亲不顾儿子安危，兄弟不思手足之情，丈夫不念夫妻恩爱。人们不肯对自己的邻居施以援手。”^[8]

到处都是触目惊心、兵荒马乱的场景：大火肆虐，尖叫声响彻大街小巷，“无主之马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嘈杂噪音和狂乱嘶吼的惊吓，它们穿过广场到处乱撞，张大双眼、绝望地四下搜寻，好像这样就能找到它们的主子和所有者，直到缰绳套在它们的脖颈上，然后就被敌人捕获带走”。^[9]很多人在试图逃往港口时，不幸被裹挟在拥挤的人群中窒息而死。“推罗的圣殿骑士”回忆起“小孩子们惨不忍睹的样子，他们被乱马撞倒后又被踩踏得肚破肠流。世上再没有人能铁石心肠到看见这场屠杀而不凄然泪下。我确信所有的基督徒看到这些场景都会流泪。我们后来发现，甚至连撒拉森人也不禁生出恻隐之心，为之哭泣”。^[10]在这场暴行的狂欢中，一些穆斯林因被这些孩子的命运打动而流下了眼泪，但随着几乎所有有组织的反抗活动的消失，大规模的屠杀和洗劫取代了那一天的秩序。进攻者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将守军士兵斩草除根。“奴隶、杂兵和暴民们开始烧杀抢掠。”^[11]妇女和儿童成了战利品，被锁链带走或是被强奸。胜利者之间爆发了争夺俘虏的打斗：

当撒拉森人遇见落难的市民们，一个士兵抓住母亲，另一个士兵抓住孩子，把他们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个地方，然后便是骨肉分离。有一次，两个撒拉森人为了一名女子的归属发生了争吵，结果这名女子被他们杀死；又有一次，一名女子被掳为俘虏，她怀里的婴儿被摔在地上，然后马群飞踏而过，将其踩死。在拥挤的人群中，有一些孕妇连着还在子宫内的胎儿窒息而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位妇人的丈夫或孩子或是病卧在床，或为箭所伤滞留在宅屋里，这位妇人就撇下亲人们独自逃跑，当撒拉森人来的时候他们全部被杀。^[12]

打家劫舍的过程变得狂热猖獗而又声势浩大。尽管城中的大部分财富显然在围城之前就已经被转移走，但穆斯林方面的史料记录道，除了掠夺人员作为战利品之外，城中仍有大把油水可捞：“各类财宝，镶嵌有金子和珍珠的水晶器皿，堪称价值连城，与之类似的还有金银器皿”，以及大量的威尼斯货币和铸锭形式的金块。在抢夺战利品的狂热中，有不少美丽的艺术品被打碎以求得其原材料，很多穆斯林竟然在争夺战利品的过程中被杀。唯有凶残狡诈之辈方能夺得最大的回报：“一大批平民通过买卖奴隶、骆驼骑手、暴民还有其他的军队人员及其追随者的所得物来获利。”^[13]

随着守军放弃城墙，苏丹的军队在越来越多的地点完成突破，急不可耐地参与到洗劫当中。当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调动他们的部队试图夺回诅咒之塔时，蒙穆萨尔区的防守空虚，部署在右翼的哈马军团乘势而入。圣拉撒路的麻疯病人骑士团是这段城墙的唯一守护者，他们全员战死。

教堂和修道院成为被特别关注的目标，这既是由于它们积蓄的财富，也是出于穆斯林对基督教的仇恨。烈士们为信仰殉道的故事广为流传。在多明我会的修道院内的防线瓦解之后，30名修士拒绝逃离，他们与其他大批修士一道，在做弥撒时被杀。据说，除了7名多明我会修士之外，其他人无一幸存。在方济各会修士中，只有5人幸存。同样，据记载，多明我会修女在教堂唱赞美诗时惨遭屠戮。其他关于光荣献身的更多杜撰体故事以不同的版本在世间流传。

城中仍然存在一些零星的英勇抵抗。一群群十字军战士继续战斗：“他们被完全困在城市的广场和角落里，对入侵的敌人进行武装抵抗，把这些敌人击退……来自宗教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虔诚信徒们在这场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中坚持了两天之久，他们的人数逐渐减少，受身披的重甲所累，又因口渴、饥饿和压力而日渐虚弱，直到都以基督的名

义壮烈战死。”^[14]他们被教会授予了烈士的身份。

尼古拉·德·阿纳普以自身行动诠释了他自己的《圣经典例选》一书中关于在死亡之际如何作为的劝诫。他继续团结抵抗力量并决心舍身殉难，在被人强行架往港口的途中，他大声抗议道：“你让我怒发欲狂，违背我的意志将我拖走，让我照管的羊群在面临屠杀之际被我抛弃。”^[15]他被渡船转移到一艘威尼斯商船上，但是他的命运已注定他无法独存于世。史家对他死亡的记述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了他的圣洁与阿卡最后的败亡中常见的低劣行为形成的鲜明对比：要么是这位善良的高级教士，在最后一刻依然挂念苍生，让如此多的难民爬上了他的小船，以致小船倾覆，使他落水而亡；要么就是如“推罗的圣殿骑士”所载，“一个水手抓住了他的手，但他滑了一跤，掉进海里淹死了。目前还不清楚是那个拉着他手的人故意放开了他，因为他把自己的贵重物品放在了船上，还是因为他抓不住而使自己的手滑脱。无论如何，这位大善人还是被淹死了”。^[16]阿纳普不大可能去关心如何将他的俗世财物打捞上来。

许多人被困在城内迷宫般的街道网中，无法到达港口，只能在城市的堡垒中——圣殿骑士团的城堡，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的城堡，威尼斯和比萨居住区的要塞塔楼，可能还有王室城堡——寻求庇护。圣殿骑士团的城堡坐落于海滨之处，那里挤满了幸存者。被困在那里动弹不得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救援船只离开：“当所有的船只升起船帆，在圣殿骑士团城堡中避难的那些人发出震天哭声。那些船只解开缆绳，启程前往塞浦路斯，留下那些进入圣殿骑士团城堡的善良民众等待命运的裁决。”^[17]

这些堡垒一个接着一个被包围，或是被攻陷，或是投降。医院骑士团的城堡位于城市的中央，在获得赦免的条件下于5月20日投降，连同条顿骑士团的城堡，很可能还有王室城堡一起。那些幸存者的命运尚不

确定，一些贵族被作为活口留了下来，以充当未来索要赎金的宝贵资产，但阿布·菲达暗示穆斯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斩首行动：“苏丹下达命令，在阿卡城周围将他们斩首，不留一人。”^[18]很多人都对英王理查一世在一个世纪前对待穆斯林守军的行为记忆犹新。

然而，圣殿骑士团的城堡仍在坚守。“推罗的圣殿骑士”留下了一份关于这座坚固而宏伟的堡垒的详细记述：

大部分的市民——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圣殿骑士团的城堡里避难。那里有1万多人，因为圣殿骑士团城堡在城内的堡垒中是最坚固的一座，坐落在海边的一大片土地上。在它的入口处有一座坚固的塔楼，其墙壁厚度达23英尺，塔楼的每个角上都有一座角楼，每座角楼上都有一个抬爪狮身像，狮像全身镀金，实际大小犹如一头驴子。这四座狮像的镀金工程以及包含其中的工艺耗费了1500撒拉森拜占特。这是一幅壮观的胜景。在城堡朝向比萨人居住区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一座塔楼，这座塔楼的附近，圣安妮大街（St Anne）的上方耸立起一座非常漂亮的宫殿，那是大团长的居所……圣殿骑士团城堡里另有一座俯瞰大海的塔楼，是萨拉丁在一百年前建造的。它就在海边，承受着海浪的拍击。圣殿骑士团城堡里还有其他的精美建筑物，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19]

圣殿骑士团的强大防御能力和它在海边的位置确保了敌军无法将其包围，且只有克服极端的困难才能占领。在城堡里避难的人数可能被有所夸大，但根据所有史料的记载，城堡是一个可以容纳相当多的人的大型建筑群。尽管城堡固若金汤，幸存者的现状却仍然无望。圣殿骑士团城堡位于一个暴露的岩石海岸上，如果没有安全通行的保证，大规模的疏散是不可能的。随着博热因伤去世，骑士团匆忙选举了蒂博·戈丹

（Thibaud Gaudin）作为他的替代人选。在他的领导下，皮埃尔·德·塞夫

雷，圣殿骑士团的大元帅，于5月20日利用现有条件争取到了赦免令。苏丹同意了。他们可以在得到安全通行保证的条件下离开，在不携带武器且每人一套衣物的前提下登船驶往塞浦路斯。圣殿骑士团接受了这一条件。他们得到一面白旗，将其悬挂在城墙上作为凭证，而400名马穆鲁克骑兵，在埃米尔赛义夫·丁·阿奎布哈·曼苏里（Sayf al-Din Aqbugha al-Mansuri）的率领下进入城堡，监督难民的撤离。

赦免令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但事情却变得糟糕透顶。埃米尔的属下士兵受到城堡里面妇女和儿童的诱惑，而他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这些穆斯林士兵看到那里的人很多，就想抓住那些讨他们喜欢的女人并凌辱她们。基督徒们无法忍受这种行为，拔出他们的武器，袭击了撒拉森人，杀死并斩首了入城部队的所有人，于是没有人能活着逃脱。”^[20]城堡大门紧闭，尸体被抛出城墙，“然后基督徒们决定誓死保卫他们的人身安全”^[21]。他们毁弃了休战的旗帜，把它从塔楼上扔了下去。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被困在里面的穆斯林都被基督徒杀死了。一位匿名的士兵对于谁该受责有不同的说法，他活了下来，并讲述了这个故事：

苏丹通过他的特使向基督徒传达了赦免令，其中有埃米尔赛义夫·丁·巴克塔穆尔·西拉达尔（Sayfal-Din Baktamur al-Silahdar），艾力克·法里西·哈吉布（Aylik al-Farisi al-Hajib，秘书），在这座塔楼里殉难的埃米尔赛义夫·丁·阿奎布哈·曼苏里·西拉达尔，以及伊本·卡迪·塔基·丁·伊本·拉津（Ibn al-Qadi Taqi al-Din Ibn Razin），他们将向法兰克人宣誓，保证其在安全通行的条件下撤离。但是贪婪的人群扑向他们，还杀死了一名特使（赛义夫·丁·阿奎布哈）。法兰克人随即关上了城堡大门，驱逐了穆斯林。当骚乱开始爆发时，埃米尔们离开了，从

而性命得保。我和一个名叫卡拉布哈·舒凯里（Qarabugha al-Shukri）的同伴身在来到塔楼的人群之中，当大门关闭时，我们和许多人留在了塔楼里面。法兰克人杀了很多，然后来到了包括我的同伴和我在内的一小部分人避难的地方。我们和他们打斗了一个小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的同伴，都被杀死。但我和十余人一起逃脱了。我们寡不敌众，纵身跳入海中。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残废了，有些人活了一段时间。^[22]

双方都利用这个机会指责对方不守信用——基督徒被指控不仅屠杀了派去监督投降的代表团，还心肠歹毒地弄残了马匹和骡子——尽管总体而言穆斯林方面的史料承认破坏停火的起因是本来被派去管理基督徒撤离的那些人，“大肆抢劫并向那些与圣殿骑士们在一起的妇女和孩子下手”^[23]。

在这次弄巧成拙的赦免行动之后，双方陷入了僵持。“推罗的圣殿骑士”叙述道：“苏丹因基督徒的这种行径而怒火中烧，但是没有表现出任何发怒的迹象。相反，他再次派人去告诉基督徒们，是他手下的愚蠢和他们犯下的暴行导致了这场屠杀。他对基督徒们没有恶意，他们可以相信他的话，安全离开。”^[24]穆斯林方面的史料则记述道，尽管前一天发生了恶性事件，但基督徒再次要求赦免，因为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处境令人绝望。

在某一时刻，一艘小船成功地靠近了城堡的海墙，大元帅说服了新当选为骑士团大团长的蒂博·戈丹带着财宝和几名非战斗人员离开。戈丹一直不愿抛弃这座城堡，任其听天由命。“他看到自己担任大团长时骑士团正遭受敌军攻击，所以认为自己不应该在任期开始时就放弃城堡。他与弟兄们商议，在他们的同意下才前往塞浦路斯，许诺从那里派人去帮助他们。”^[25]他先沿着海岸逃到西顿的圣殿骑士团城堡——这似乎是“推罗的圣殿骑士”对由他直接目击的事件的最后一次记录。作为在

所有描写阿卡陷落编年史家中笔法最为生动的一位，他显然是一个对骑士团很有价值的人，所以很可能和戈丹一起，带着有关这座城市命运的故事，乘船安全离开了。

关于阿卡最后一刻的说法各不相同。苏丹重申了和以前一样的赦免提议。5月21日，皮埃尔·德·塞夫雷和其他一些骑士一起出城商量投降的事宜。他们立即就被五花大绑，在城堡守军的众目睽睽之下被斩首，此举是报复先前埃米尔们被杀之事。穆斯林方面的史料记载，许多骑士和非战斗人员陪同着他，伤员被留在城堡里面。当他们出现时，“超过2000人被处决，妇女和儿童沦为战俘”。^[26]更有可能的是，塞夫雷只是带着一个小型代表团，与苏丹重新协商最后撤离前的条件。

无论事情的确切经过到底怎样，哈利勒，“当他将大元帅和圣殿骑士们擒住时，就把所有教团弟兄和其他人的头都砍了下来。那些还在塔楼里的兄弟，那些还没有病到不能伸出援手的人，当听到元帅和其他人被处决的消息时，决心坚守下去”。^[27]他们又从塔楼里扔出五名穆斯林俘虏，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防守。尽管守军的数量减少了，但是攻陷坚固的堡垒对苏丹来说仍然是严峻的挑战。他命令他的地道工兵着手拆除防御工事。随着城墙的倒塌，守卫者们撤退到最后一座塔楼。到了5月28日，马穆鲁克工兵们在这座最后的堡垒四周都挖好了地道，并用木柱支撑起来。接下来所需要做的就是下面点燃火焰。看到进一步的抵抗毫无意义，幸存者要么投降，要么被俘。大多数人被斩首，而苏丹留下其中最有价值的人以索要赎金。妇女和儿童则沦为奴隶。

来自德意志爱尔福特（Erfurt）的圣彼得修道院编年史给出了不同的记载，这部史料成书于阿卡城陷落的几个月之后，对最后的反抗记述道：“但当圣殿骑士们和其他逃到那里的人意识到他们已经弹尽粮绝，在毫无得到他人帮助的希望后，他们做出了弘扬美德的必要之举。在专心祷告、虔诚忏悔之后，他们就将自己的灵魂交与耶稣基督，全力以赴

地向撒拉森人冲去，坚定地杀死了许多敌人。但最后，他们还是都死于撒拉森人之手。”^[28]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在伊斯兰史书里，“当法兰克人走出来且里面的大部分物品都被拿走时，塔楼在一群围观者和还在里面的抢劫者头上轰然倒塌，将他们全部压死”。^[29]“推罗的圣殿骑士”得到了一个关于此事件的叙述版本，大意是当“那些在塔楼里面的人放弃抵抗后，一大群撒拉森人进入塔楼里面，以至于（塔楼下方地道的）支撑物承受不住，于是塔楼坍塌，那些圣殿骑士团的兄弟和在里面的撒拉森人都死于非命。另外，在塔楼倒塌时，它倾倒在街道上，将2000多名骑在马上的人压死”。^[30]可是他当时不可能在那里看到这一切。所以无论具体细节如何，圣殿骑士团伟大城堡的垂死挣扎具有戏剧性的象征意义，因为基督教世界在这片耶稣曾经生活和死亡的土地上历时200年的冒险最终崩溃了。

^[1]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4.

^[2] King, E.J.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1931, p.302.

^[3]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5.

^[4] Muntaner, Ramon. *The Chronicle of Muntaner*, trans. Lady Goodenough, London, 1921, p.468.

^[5]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4., pp.468-9.

^[6] 此人后来创建了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并成为首领，受雇于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柯二世，在小亚细亚与土耳其人作战，后因功高震主而被拜占庭人诱杀。弗洛尔在此战过后被圣殿骑士团悬赏通缉，但竟然逃过骑士团的追杀并创建了巴塞罗那佣兵团。

[7] Thadeus. *Ystoria de desolatione et conculcatione civitatis Acconensis et tocius terre sancte*,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102-3.

[8] Thadeus. *Ystoria de desolatione et conculcatione civitatis Acconensis et tocius terre sancte*,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103.

[9] Thadeus. *Ystoria de desolatione et conculcatione civitatis Acconensis et tocius terre sancte*,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125-6.

[1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5.

[11]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61.

[12]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4.

[13]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p.61-2.

[14] Thadeus. *Ystoria de desolatione et conculcatione civitatis Acconensis et tocius terre sancte*,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108-9.

[15] Thadeus. *Ystoria de desolatione et conculcatione civitatis Acconensis et tocius terre sancte*,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90.

[1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5.

[1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05.

[18]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7.

[19]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p.814-15.

[2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6.

[21]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6.

[22] Nicolle, David. *Acre 1291: 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 2005, p.83.

[23] Little, Donald P. 'The Fall of Akka in 690/1291: The Muslim Version', in M.Sharon (ed.),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Jerusalem/Leiden, 1986, p.175.

[24]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6.

[25]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7.

[26] Little, Donald P. 'The Fall of Akka in 690/1291: The Muslim Version', in M.Sharon (ed.),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Jerusalem/Leiden, 1986, p.175.

[2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7.

[28] Nicholson, Helen. *The Knights Templar*, London, 2010, p.86.

[29] Nicolle, David. *Acre 1291: 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 2005, p.84.

[30]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6-17.

第十四章 “一无所有”



不久之后，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的基督徒国王海屯一世收到一封充满炫耀和威逼胁迫的信：

我，苏丹哈利勒·阿什拉夫，一代雄主，贤明刚正，年富力强……为饱受压迫和蹂躏的人民伸张正义，诸王国创建者，阿拉伯、突厥和波斯的苏丹，法兰克、亚美尼亚和蒙古军队征服者……向睿智可敬、勇如雄狮的基督血脉海屯致意……

谨此知会，我军已征服真十字架（True Cross）所在之地阿卡。我们仅用数天便包围此城，因为敌方士兵即便倾尽资源也无法守住，而我们通过围攻便让他们的大军无处可逃，然后便将其聚而歼之。他们无法抵挡我军攻势，死伤惨重，即便有再多的贵族和骑士也无济于事，于是在整整一个小时内他们所

有人要么被俘获，要么被扫荡。我军刀剑闪耀，尽情畅饮敌寇之血，所有的医院骑士、圣殿骑士、阿卡城的逆贼及其城内的法兰克人.....都无法逃脱被毁灭的命运，条顿骑士团也不例外。我们将他们的教堂夷为平地，他们在自己的祭坛上引颈就戮，宗主教本人也蒙尘落难。而且您可以看到大量的财富已经落入我军士兵的手中.....俘获的妇女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女子只能卖上1德拉克马（drachma）的价钱。您还可以看到阿卡的座座塔楼都已经被荡平为一片荒地.....

从我信函里罗列的证据您应该知道，死者的尸体已被我军的攻城机器化为齑粉，烧成尘埃。曾经高高在上的骑士们和男爵们已经束手就擒，锒铛入狱。至于您，噢国王，如果您对阿卡的下场铭记于心的话，那您就会安然无恙。如不然，您就将与他们一样血流如注.....如果您了解他们的遭遇，那么作为一个重视个人和王国安危的人，请您不要试图逃避我的雄壮军威，应亲自率领您手下的领主并备足两年的贡品来到我的巍峨殿门之下，这对你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弊。您大可放心，在阿卡被摧毁后，没有什么能逃脱我的摆布。我建议您在落入捕鼠夹之前，最好有相应的思考和行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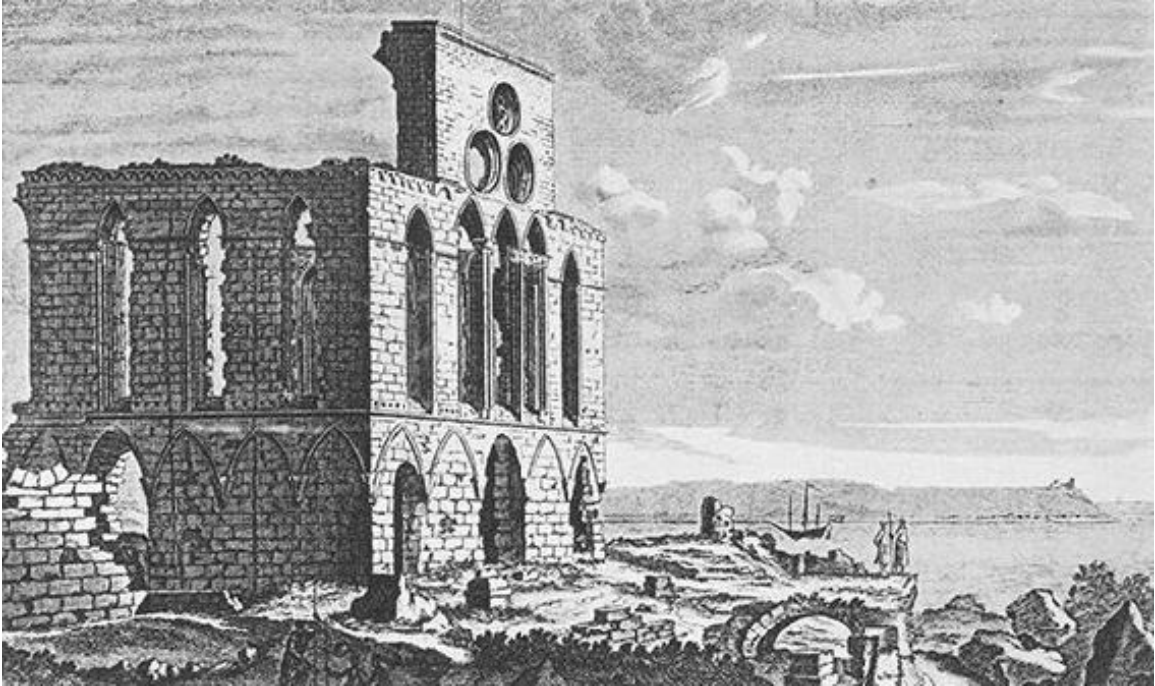
这是拜巴尔曾经大力宣传的“狮抓老鼠”的一个映照。

海屯一世接连不断地收到急报。此后不久他就收到了另一封同样口吻的信，宣称推罗城已被摧毁。推罗对于十字军及其对手来说意义同样重大。一个世纪之前它可能代表了萨拉丁最大的战略失误。在哈丁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之后，他选择绕过这座城市进军，给十字军留下了一个海岸立足点，使他们借此夺回领土后又在圣地停留了一个世纪。哈利勒决心不再重犯前人的错误。他着手消灭基督徒在巴勒斯坦海岸和黎巴嫩所有剩余的飞地。5月18日，推罗的小股守备部队远在25英里之遥就能看

到南部地平线上浓烟滚滚，那是阿卡在熊熊燃烧。第二天，一支军队出现在推罗的城墙前。这座城市的防御设施虽然坚固，但守备力量不足；守军未经一战便弃城而走，乘船逃往塞浦路斯。接下轮到了驻守在西顿的圣殿骑士团，该城位于推罗的北方，现在那里的守军由蒂博·戈丹指挥，他随行带来了圣殿骑士团的财富。埃米尔舒杰耶带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出现了，圣殿骑士们撤退到一座远离海岸的岛屿上。他们英勇地抵抗，但当马穆鲁克开始建造一条堤道时，他们便乘船退到塞浦路斯。沿海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失陷：贝鲁特、海法，以及圣殿骑士团的朝圣者城堡（于7月30日陷落）和托尔图沙^[2]（Tortosa，于8月3日失守）——所有据点都被放弃了。到了8月，基督教在圣地的唯一处阵地就只剩下圣殿骑士团在小岛鲁阿德（Ruad）的据点，位于托尔图沙2英里之外的海上。

哈利勒实施了最大程度上的毁灭。城堡被毁弃，港口设施也被摧毁。肥沃的沿海平原遭到蹂躏，果园或是被烧掉或是植物被连根拔起，磨坊被拆除，灌溉系统被破坏殆尽。可以作为发动新十字军东征的滩头阵地无一保留。他对阿卡予以重点关照，但它的大部分城区都被付之一炬，留存下来的城墙也倒塌了。“真主大悦！”卡迪阿布·蒂纳（Abu al-Tina）写道，“在阿卡的城墙被摧毁之后，（大洋彼岸的）异教徒们在我们的海岸将再也找不到任何东西。”^[3]

双方都深知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圣地上的一切都结束了。“因此，”“推罗的圣殿骑士”写道，“如你所能了解到的那样，叙利亚的所有都失去了，撒拉森人夺走并摧毁了它的全部.....这一次，一切都失去了，所以基督徒在叙利亚连一掌尺的土地都不再拥有。”^[4]穆斯林也知道这一点。“正是因为您，”历史学家伊本·弗拉特（Ibn al-Furat）为哈利勒歌功颂德，随后写道，“没有一个城镇能留下来让异教徒修复，基督教再无任何希望。”^[5]苏丹被赞誉为“世界与宗教的正义化身.....十字架的降伏者，沿海地区的征服者，阿尤布王朝的复兴者”^[6]。



在科尔内留斯·德·布鲁因（**Cornelius de Bruijn**）的一幅画作中，圣安德鲁教堂的墙壁在17世纪仍然矗立，尽管哈利勒已经摧毁了阿卡

此战的死亡人数无法计算。对于阿卡城内的居民来说，大约3万的数字在基督徒的记录中反复出现，但是这个数字可能过高了。许多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每人价值1德拉克马”在穆斯林征服的记载中是一种常见的比喻，但毫无疑问暗示着许多俘虏的存在。在中东旅行的多明我会修士里科洛·德·蒙特·克罗切（**Ricoldo de Monte Croce**）听说有些修女被掳到埃米尔和哈利勒军队军官的后宫里，还有一些军事修会的成员作为俘虏幸存了下来，其中一些人还被赎回。有些人由于毫无价值，甚至连奴隶都当不了。“我看到了老人，”他写道，“年幼的女孩、儿童和婴儿，体形瘦小、肤色苍白、弱不禁风，乞讨着他们的面包，而且他们宁愿成为撒拉森人的奴隶，也不愿被饿死。”^[7]不少幸存者皈依了伊斯兰教。1323年，有一位名叫皮埃尔（**Pierre**）的骑士被史料提及，他成了马穆鲁克苏丹的侍从。穆斯林唯一记录下来的伤亡数字少得令人难以置信：7位埃米尔，6位其他职衔的指挥官和83名正规军，尽管这个数字中军官与士兵的比例高得异乎寻常。攻城战肯定对正规军和大批志愿军都

造成了损失，但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推测。

胜利者对最后的屠杀行为几乎很少有良心上的自我反省。一个世纪前发生的那些事件被穆斯林铭记在心，穆斯林作家捕捉到了它们的回声。“在我看来，”阿拉伯历史学家尤尼尼（al-Yunini）写道，“这是对他们从殉道者、苏丹萨拉丁手里夺取阿卡之后所作所为的回报。虽然他们赦免了穆斯林居民，但在胜利后背叛了他们，杀死了除少数高阶埃米尔外的所有人。幸存的这些人被他们卖了很多钱，一位埃米尔被卖出5万迪拉姆（dirham）甚至更多。因此，异教徒对穆斯林所犯下的恶行由真主予以报复。”^[8]“噢，你们这些黄脸的基督徒，”一位诗人写道，“真主的复仇降临到你们身上了！”^[9]

一些不可思议的信件被发现，强调这是针对狮心王理查的大屠杀所讨还的公道。阿布·菲达参与了围攻战，充分意识到最后的总攻发生在1291年5月18日（根据基督教历法），试图强调相关事件的对称性，通过将日期推移两个月至1291年7月：“通过一个奇怪的巧合事件法兰克人占领了阿卡，在周五的中午把它从萨拉丁手中夺了过来，这一天是主马达月17日（17 Jumada II^[10]，即1191年7月12日），他们俘虏了城里的穆斯林并且将他们杀掉。全能的真主在他的预知中下令，在今年主马达月的17日（1291年6月17日），星期五，该城将被苏丹马利克·阿什拉夫·萨拉赫·丁（哈利勒）征服。所以这次征服就像法兰克人占领它的那天一样，同样，两个苏丹的称号也如此相像。”^[11]

在伊斯兰世界，这场围城战催生了种种虚构的故事。一位负责拆毁阿卡城的埃米尔据传发现了一块用希腊语写成的铅板。它在大马士革被人译解，表面上读起来是这样：

写于公元222年。上面记载说，阿拉伯人先知所在的族群将会践踏此地。他是一位先知，对他而言宗教和法律一目了然，他的宗教是所有宗教中最伟大的，他的法律是所有法律中

最伟大的，他清理了世上的不信教者，他的法律将一直存续到时间的尽头。他的族群将拥有波斯人、法兰克人以及其他人的所有地区，如果他们来到公元700年，他的族群将拥有法兰克人的所有土地。[\[12\]](#)

更有可能的是，这位“翻译者”向埃米尔兜售了一件伪造的纪念品。

哈利勒对海屯一世关于自己战利品的吹嘘可能有些夸张——很多财宝都被偷偷带走了——但这场掠夺确实很疯狂。许许多多关于有人因为财宝和奴隶而发家致富的传说不脛而走：“其中有些人获利总计达2000个第纳尔，而更多的收入来源于将这些不义之财卖与普通人的做法。一个名叫萨拉杰·丁·扎维扬（Sarraj al-Din Zabyan）的人在阿卡获得了大约1700第纳尔和2.2万迪拉姆的利润。他在三列满载货物的骆驼队的陪同下到达了城镇。”[\[13\]](#)还有大量的大理石柱和建筑材料也被掠走，包括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圣安德鲁教堂的大门，它被开罗的一所伊斯兰大学挪为己用。

6月7日，哈利勒离开阿卡前往大马士革。他在那里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整座城市都被装饰得焕然一新，绸缎铺在贯穿城内通往总督宫殿的凯旋大道上。这位尊贵的苏丹身后的队列中跟随着280名戴着镣铐的战俘。一名战俘举着一面倒转的法兰克旗帜，另一名战俘则举着一面旗帜和一支长矛，长矛上面悬挂着被杀同袍的头发。阿什拉夫受到了大马士革全体居民和沿途乡民的欢迎，乌里玛（法律学者）、清真寺官员、苏菲派谢赫、基督徒和犹太人，所有人都手持蜡烛，即使入城游行是在中午之前进行的。[\[14\]](#)

在开罗，人们又一次为这位所向无敌的英雄举行了凯旋仪式，比第

一次更加奢华盛大。哈利勒在他六个月前出征的起点结束了这场仪式——他父亲的墓前，他在那里为自己获得的胜利而感恩。再一次，哈利勒需要通过广泛宣传，对这些事件进行归因论证，将自己与萨拉丁的伟大事迹联系起来。这些论调甚至含蓄地批评了那些对哈利勒来说大有利用价值的前辈——拜巴尔和嘉拉温。“真主将阿卡从异教徒的手中拯救出来，”拜巴尔·曼苏里写道，“通过马利克·阿什拉夫·萨拉赫·丁（哈利勒）之手，一如萨拉赫·丁·优素福·伊本·阿尤布（萨拉丁）第一次征服它一样，而阿卡落入异教徒的手中已经一百零三年之久。没有一位阿尤布王朝的王公或于其后继承他们的突厥苏丹国的统治者能挺身而出，收复阿卡。”^[15]

那些满身泥污、逃到塞浦路斯的难民一贫如洗，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有什么随身携带的物品。难民的涌入引起了岛上的通货膨胀：“食物非常缺乏，甚至连原来每年以10个拜占特出租的房屋，价格也上涨到每年100个拜占特。”^[16]他们同时也成为慈善——亨利国王提供了一些贫困救济的措施——和蔑视的对象。“他们在塞浦路斯的所有朋友都与他们断绝了关系，提起他们时也没有任何好话”^[17]，“推罗的圣殿骑士”写道，他本人可能也遭受过这种痛苦。圣殿骑士团的新任大团长蒂博·戈丹似乎在岛上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

正是那个希腊修士阿西尼厄斯，一个无意中被卷入阿卡围攻战的朝圣者，在8月给教皇尼古拉四世带来了这个可怕的消息。他对于事实做出了一个戏剧性的叙述，而且责怪的对象十分广泛：与异教徒进行交易的威尼斯人和比萨人，自私自利缺乏合作精神的军事修会，临阵脱逃的亨利国王。甚至连教皇因执迷于西西里的所有权问题而分心，也受到了他当面的批评：“圣父，如果您没有听到我们的悲痛，我将出于内心的痛苦而把它向您坦露。向上帝祈祷，希望您在过去没有如此专注于收复西西里。”这不仅是平民百姓的罪孽，也是因梵蒂冈自身未能好好地对圣地的事业进行援助。他接着说：“上帝没有允许塞浦路斯被异教徒占

领，这真是个奇迹。”^[18]而这恰恰是那位野心勃勃的苏丹很快就开始考虑的策略。

多年来，阿卡陷落的可能性一直徘徊在成为事实的边缘。在消息灵通的圈子里，这被视为一种挫折，而非最终的结局，所以这一事件并没有激起一个世纪以前失去耶路撒冷所带来的那种程度的悲痛感。如果这是上帝对常人罪恶的惩罚，那么这种现状可能还会有补救的办法。而那些距离此类事件更近且更为现实的人，比如“推罗的圣殿骑士”，则了解更多。他对马穆鲁克令人生畏的军事技能有第一手的经验。这一次，基督教世界在圣地的海岸上失去了所有的立足点，每一个都被抹去了。教皇尼古拉四世曾计划在1293年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但没过一年他就去世了。在伊拉克旅行的里科洛·德·蒙特·克罗斯也充分认识到伊斯兰教的力量，透过这些事件解读出世界末日来临的可能性，“如果撒拉森人继续为所欲为，重复他们这两年来对的黎波里和阿卡犯下的罪恶的话，那么几年内基督徒将在整个世界都不复存在”。^[19]

幸存者有罪说不可避免地盛行起来，对他们的指控也纷来沓至。殉教烈士的称号被加诸那些战斗到底的人，如马修·德·克莱蒙。尼古拉·德·阿纳普则成为圣地十字军运动历史上被教皇封为圣徒的唯一一人。与此同时，怀疑的矛头直指那些活下来的领导人物。像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一样，奥顿·德·格朗松和让·德·格拉伊被控诉“盔甲毫无损伤”^[20]就逃之大吉。格朗松还被指控携带大量钱财潜逃，尽管有证据表明他受了重伤。在塞浦路斯，格朗松穷困得连教皇都不得不出面，以便让伦敦圣保罗教堂的主持司铎付给他一笔津贴。让·德·维利耶写完了他的信，他在信中简要地描述了医院骑士团所发挥的作用，并以哀痛的语气暗示他为自己最后幸存下来而满怀歉意。他们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天可明鉴”，他写道，接着解释了他个人生存下来的情况。这并非出于他自愿，而是上天的意愿：他负伤濒死，被他的仆从们抬上了一艘船。“于是，我和一部分弟兄大难不死，正是出于上帝的选择才如此。在这些弟

兄中间大部分人受了重伤，没有康复的希望，我们就这样随船来到了塞浦路斯岛。我们一直留在那里，直到这封信写完的日子，都还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21]当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博热在战斗中牺牲时，他却活了下来，这对这位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来说也许是一种耻辱。在这种气氛下，亨利二世国王也因与此事有关联而感到内疚，觉得有必要向教皇寻求宽恕。

对于围城期间的行为如何判断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并经常折射出党派利益。总体而言，编年史家们在这方面倾向于支持医院骑士团，将克莱蒙的战死描绘得英勇无畏，这与博热较为迟缓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如果追溯过往，那么这两个军事修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两个团体之间的互不协调和自私自利都占了很大的分量。两者都与圣地十字军运动有着独特的联系，尤其是圣殿骑士团，他们作为军事修会的起源，在圣地连续为十字军事业服务了172年而没有中断。随着那片土地消失，他们存在的理由受到了质疑。军事修会是十字军东征事业的核心。他们现在很脆弱，很容易受到来自各方关于其自私和虚伪的指责。

在阿卡陷落之后，很多新的十字军东征战略方案被抛出：将军事修会合为一体；动用基督徒在海上的全部力量打击马穆鲁克，通过经济封锁亚历山大港，切断其接收货物的途径，减少其香料贸易、军事奴隶和战争原料的税收收入；放弃以职业化佣兵部队为主进行十字军圣战的总体号召，转以军事修会为核心，佐以欧洲各王室首脑提供的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些方案中内容最详尽的当属马里诺·萨努多·托尔塞洛的专著，这位威尼斯政治家曾于1286年造访阿卡。他对滋养着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路线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深思熟虑，周密地设计出一套战略，包括回到路易九世的伟大十字军计划上来——首先攻打埃及。教廷征收教会税来资助这些事业，历任教皇都为此召开会议。有一段时间，普罗大众对十字军征战的热情高涨。1309年，成千上万来自欧洲各地的农民和市民

前往地中海各处港口，乞求发动一场全面的十字军东征，但由于缺乏教皇的支持，这些呼吁很快就消失了。

十字军运动需要伟大国王们的领导。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和法兰西的腓力四世都曾做出承诺，但都没能履行。总是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国家优先事务需要处理：敌对势力需要铲平，地方战争需要取胜，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都对合并的想法不屑一顾。一项海洋战略能否实施最终取决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参与与否，而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放弃与伊斯兰世界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为十字军计划征收的税金消失在教皇的金库里。协调一致的世俗领导力和政治意愿的缺乏，以及惊人的成本，都妨碍了实际行动。一位编年史家曾对14世纪初的教皇克雷芒五世（Clement V）尖刻地评论道：“教皇横征暴敛，而他的侄子侯爵大人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法兰西的）国王和其他一道领取十字架的君主并没有出发，而撒拉森人依然在那里安然生活，我想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一直睡下去。”^[22]到了1370年，所有关于收复圣地的具体计划都夭折了。

然而，耶路撒冷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就破灭的。在塞浦路斯岛上，贵族妇女们身着黑衣、为圣地的沦丧哀悼，竟长达一个世纪。这座城市继续在欧洲贵族的骑士幻想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收回耶路撒冷的理论计划也在数百年里层出不穷。在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第一次航行到印度时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是一个沉溺于救世主的梦想而无法自拔的人，他设想出一个对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的马穆鲁克王朝进行钳形攻势的计划。他试图说服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国王通过地中海向圣地发动一次海上十字军东征，而与此同时，一支葡萄牙舰队将从印度洋发起进攻。他雄心勃勃，设想对麦地那发起一次突袭，劫走穆罕默德的尸体，并以其作为交换赎回耶路撒冷。这样的计划通通悄无声息地破产了。到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成为基督教所有军事力量的焦点，重新夺回圣地的希望已经悄然溜走。

面对着威胁自身存在的挑战，医院骑士团精明地对其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塞浦路斯撤退后，他们包围了希腊岛屿中的罗德岛，并于1308年占领此地，他们设法将自己包装成基督教再征服运动的急先锋，对穆斯林发动了海盗战争，并一度在土耳其海岸的博德鲁姆

（Bodrum）站稳了脚跟。作为“基督教之盾”，他们又生存了五百年，先是在罗德岛，然后在马耳他，与奥斯曼帝国奋战不止。条顿骑士团则退回他们的第二前线，与欧洲东北部的异教徒作战。而圣殿骑士团则不那么灵活变通。他们不再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国中之国，他们不受信任，而且也富有得令人艳羡。在法兰西，这个教团的心腹区域，国王腓力四世对他们虎视眈眈。他们的覆亡是如此的突然而富有戏剧性，在偶像崇拜、异端巫术和滥行鸡奸的罪名指控下，王国开始于1307年对其成员展开围捕。公开审判和刑讯逼供确保了他们的毁灭。他们在阿卡进行英勇抵抗的证据则毫无价值。到了1314年，他们的命运走到了终点，最后一位大团长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发出最后一声挑衅的吼叫：“上帝自知谁是谁非，何人有罪。错判吾等之人，必将厄运临头！上帝将为吾等复仇！”^[23]不到一年，腓力四世与教皇都离开了人世。

圣殿骑士团的消亡——他们的地位在日渐整合成各个民族国家的欧洲显得冗余而又问题繁多——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意识形态逐渐改变的一种征候。在宗教人士中，圣地的崩溃标志着某种精神危机。认为基督教将最终战胜伊斯兰教的信念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信仰正在发生缓慢的转变。人们不再那么容易被早期引发大规模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单一热忱打动，也不再那么相信赎罪的承诺。无论如何，十字军圣战的冲动可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得到满足：在普鲁士和立陶宛的森林里对付异教徒，或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平原和山区对付摩尔人。指向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已经成为由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船队搭载前往那里的职业军队的业务，然而这项事业所需的士兵和船只都无处可寻。欧洲的君主们忙于自己的战争。英格兰和法兰西正被卷入一场持续百年的战争。而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他们总是受到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的诱

惑而违背自己的诺言，继续投身于旷日持久的贸易竞争。教廷本身也因支持其在西西里的十字军代言人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和兜售赎罪券的盈利行为蒙上了污点。

13世纪的世界与11世纪时的相比已经大为不同。欧洲正在逐渐从谋求生存的悲观主义中脱身而出。一场商业革命见证了货币流通代替了以物易物，封建依附关系缓慢衰落，城市人口日益增长，新金融工具——银行、保险和汇票——的发明花样迭出，这些发明促进了贸易扩张和物质繁荣，其蓬勃之势唯有黑死病（Black Death）^[24]大流行方能减缓。在波斯，蒙古王朝皈依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世界失去了一个潜在的盟友。二百年来，由教皇乌尔班最开始点燃的星星之火一直在闪闪燃烧。争夺圣地的吸引力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它融合了令人神往的中世纪骑士精神，通过“为基督而战”的口号合法化的武装入侵，对救赎和赎罪的承诺，对耶稣曾经奔走过的土地的生动再塑，凡此种种。但从长远来看，十字军东征是不可持续的。补给线过长，外部支援太过分散，以及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分歧太大而无法确立长期性战略并建立常备军。最终，失败不可避免。

哈利勒寄给亚美尼亚基督教王国的信并非空洞的威胁。第二年他就入侵并洗劫了海屯一世王国的部分地区，但是国王本人避免了信中预示给他的命运。同时，苏丹膨胀的自信和狂妄的野心注定会给他带来灾祸。他构想出一场从蒙古人手中夺取巴格达的宏大战役，并下令建造100艘舰船来征服塞浦路斯。这两个计划都没有任何结果。这样的方案疏远了主要的埃米尔们，他们对他的缺乏判断力感到震惊，认为哈利勒对他们自己和马穆鲁克这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危险。他在阿卡围攻战期间对拉津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1293年12月，包括拉津在内的一群埃米尔密谋杀害了他。此时流落到塞浦路斯的“推罗的圣殿骑士”得到了一些相关描述，这一事件给阿卡陷落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碰巧的是，在一天外出打猎的时候，他们袭击并杀死了哈利勒。首先发难的是他的舅舅贝达拉（Baydara），也就是他母亲的兄弟，但这次刺杀的效果不佳，因为并不是致命的一击。然后一个叫作拉津的埃米尔又给了他一刀，并对贝达拉说：“你杀人的样子不像是一个想成为苏丹的人，但我会让你看看这富有男子气概的一击。”他挥向哈利勒的一刀是如此凶狠，以至于后者被劈成两半，基督就是这样为哈利勒犯下的罪恶向他复了仇。^[25]

随着哈利勒遇刺身亡，马穆鲁克苏丹国陷入了一个混乱血腥的时期，使得拜巴尔和嘉拉温那稳定而又残酷的统治时期更像是个黄金时代。苏丹的大位在五年内易手了三次。拉津本人成为苏丹后，在1296—1298年执政，直到他也死于刺客的刀下。在所有参与了阿卡围攻战的埃米尔中，博热的双面间谍法赫里看起来是最幸运的一个。尽管哈利勒对其疑心重重，他似乎在1306年平静地在自己的床上去世。“推罗的圣殿骑士”消失在塞浦路斯，直到最后也寂寂无闻。他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在1314年中止。

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最后幸存的主角之一是奥顿·德·格朗松。他于1328年以90岁的高龄在瑞士与世长辞。他代表自己的主人和亲密朋友——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在圣地出生入死了一辈子。1271年，将近六十年前，他追随爱德华左右，在阿卡四处出击。之后，他又同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道深入亚美尼亚基督教王国^[26]进行了一次时运不济的冒险，后于1292—1293年抵抗马穆鲁克军队的入侵。他被下葬在洛桑大教堂（Lausanne Cathedral），其墓前的披甲人像是那些曾经在阿卡战斗过的人中唯一留存于世的肖像。耐人寻味的是，在阿卡陷落五十年后，朝圣者鲁道夫·冯·苏德海姆偶然邂逅了两个住在死海附近、会说法语的砍柴老人。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是圣殿骑士。他们为苏丹工作，娶妻生子。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被带回欧洲，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

教皇宫廷受到款待，他们在那里茫然失措，言辞间夹杂着异国音调，仿佛是来自一块失落世界的活化石。

[1] Bartholomei de Cotton. *Historia Anglicana*, ed. Henry Richard Luard, London, 1859, pp.215-17.

[2] 现为叙利亚西部地中海港口城市塔尔涂斯，也是叙利亚第二大港口，该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腓尼基人在塔尔图斯西部的艾尔瓦德岛上建立殖民地，便称此地为“安塔拉德斯”（Antaradus），意为“面向艾尔瓦德岛的城镇”。它拜占庭时期被称为“托尔图沙”。该地曾为十字军的一个重要的供应港口和军事基地。

[3] Nicolle, David. *Acre 1291: 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 2005, p.89.

[4]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8.

[5] Shagrir, Iris. 'The Fall of Acre as a Spiritual Crisis: The Letters of Riccoldo of Monte Croce', *Revue bei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vol.90, no.4, 2012, p.1, 118.

[6] Nicolle, David. *Acre 1291: 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 2005, p.89.

[7] Prawer, Joshua.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London, 1973, p.456.

[8] Little, Donald P. 'The Fall of Akka in 690/1291: The Muslim Version', in M.Sharon (ed.),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Jerusalem/Leiden, 1986, p.177.

[9] Nicolle, David. *Acre 1291: 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 2005, p.89.

[10] 原文Jumada II是回历六月的意思。

[11]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p.17.

[12]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p.62-63.

[13]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p.62.

[14] Nicolle, David. *Acre 1291: 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 2005, pp.87-8.

[15] Baybars al-Manṣūrī. *Zubdah al-Fikra fī al-Tārīkh al-Hijrah*, ed. D.S.Richards, Beirut, 1998, p.280.

[16]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8.

[17]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18.

[18] Schein, Sylvia. *Fideles Crucis: The Papacy, the West,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1274-1314*, Oxford, 1991, p.113.

[19] Schein, Sylvia. *Fideles Crucis: The Papacy, the West,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1274-1314*, Oxford, 1991, p.126.

[20] King, E.J.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1931, p.302.

[21] King, E.J.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1931, p.302.

[22] Housely, p.30.

[23] Jones, Dan. *The Templars*, London, 2017, pp.3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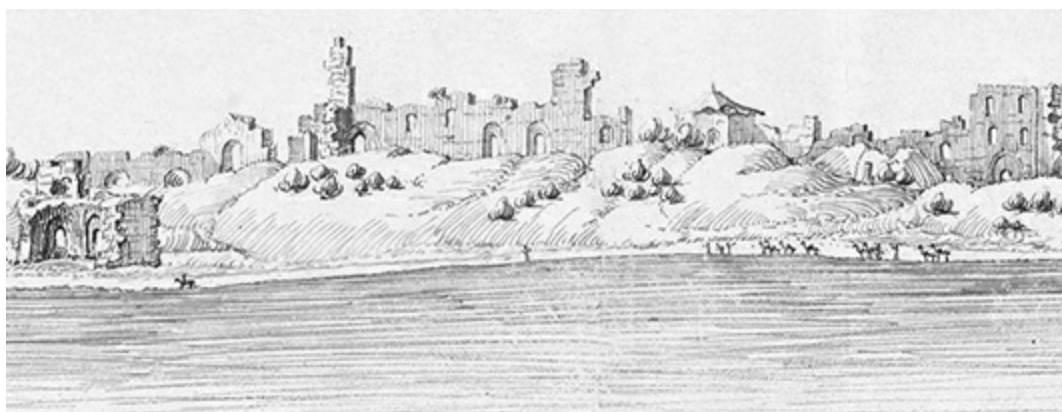
[24] 黑死病是1347—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25]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p.821.

[26] 13—14世纪，各十字军国家逐渐崩溃，蒙古汗国伊斯兰化，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最终失去盟友。在内部宗教冲突和马穆鲁克王朝的不断进攻下，该王国最

终于1375年灭亡。

尾声 蛇之居所



根据叙利亚贵族阿布·菲达的记载，阿卡的教堂和城墙都被拆毁了。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大量的石块被倾倒在港湾里使其无法再被船只使用。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不给将来的十字军留下任何立足点，但破坏远没有穆斯林声称的那么彻底。基督教朝圣者和游客仍然能够前往圣地和耶路撒冷，而阿卡也不断有人造访。

当鲁道夫·冯·苏德海姆于1340年经过此地时，很多建筑依然清晰可见，尽管撒拉森人试图“将所有的城墙、高塔、城堡及其塔楼完全推倒，地基以上片瓦不留，以免基督徒重建它们。然而，他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能将这些建筑拆除到只有一人高的程度，所有的教堂、城墙和塔楼，以及许多城堡和宫殿几乎完好无损，而且如果上帝乐意的话，只需多加细心便可将它们修复到以前的状态”。^[1]他能够详细地描绘出城墙和塔楼，并在他的脑海里重现这座城市在其鼎盛时期的怀旧景象。一支小规模の守备部队驻扎在这里，依靠栖息在废墟中的鸽子和鹁鸽为

生。奇怪的是，早在1304年，威尼斯人就与当地总督签订了在阿卡定居和从事贸易的协议，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将此协议付诸实践。慢慢地，这座城市大部分的残垣断壁被从海滩吹来的沙子覆盖，但数百年来，它的教堂和宏伟宫殿的废墟如同幽灵般存在，仍然是过往船只的地标。就像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2]的画像一样，它的残迹让过往的游客心驰神往，魂牵梦萦。

维罗纳的詹姆斯（James of Verona）于1335年来到此处，为其过往“哀叹不已”。现在这里成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只有毒蛇和野兽在此安家”，一些撒拉森人也定居于此，但他仍然能够看到“许多精美的塔楼、宫殿和大型建筑”^[3]。关于城墙，络绎不绝的游客留下了宝贵的、有时却是相互矛盾的描述。弗朗西斯科·苏里亚诺（Francesco Suriano）在1460年这样描述道：“有三段城墙，互相之间留出劲弩（攻城弩）发射的空间，护城壕沟以切割好的石块筑成绝壁的形状，壕沟内的高塔相距40步远，并配有非常坚固的堡垒。”围城战的证据仍然随处可见。他看到“离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半英里长的土堤，是用来防御敌军炮火的。直到今天，当年炮击留下的石弹看起来就像大地上的羊群一样”。^[4]1697年来到这里的亨利·蒙德雷尔（Henry Maundrell）也注意到这些“至少13或14英寸”直径的石弹分布在地面上，“这是当年用来轰炸这座城市所用的弹药的一部分”。^[5]尽管在另外一位英国游客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看来，这个地方已是满目疮痍，但他也将其描述为“坚固的双层封闭空间，以壁垒和塔楼加以强化；每道城墙前都有一条由石块整齐排列筑成的壕沟，下方有各式各样的秘门暗道……但是，那几段巨大的城墙都坍塌成石堆，横七竖八地堆叠在地基上”。^[6]理查德·波科克（Richard Pococke）于1738年在此游览，认为阿卡的防御工事非常现代化：“双层城墙的设计加上一条石块堆砌成的壕沟；内城墙由半圆形的棱堡守护着。”^[7]不过这是一座鬼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建筑。房屋的地窖里积满了雨水，于是整个地方散发出一股可怕的恶臭。时不时地，这个地方就会被浓重的瘴气掩盖起来。从17世纪晚期开始，

艺术家们开始到这里来寻找浪漫的东方元素。1682年，荷兰艺术家科内利斯·德·布鲁因（Cornelis de Bruijn）画出了一些现存的建筑。三年后，法国艺术家格拉维耶·德·奥迪耶尔（Gravier d'Ortieres）被路易十四派到阿卡，在一艘船的甲板上创作了一幅整个城市的全景图。狭长的画卷中着重描绘了海岬上的一座教堂遗迹，还有医院骑士团的主体建筑群——依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殿、塔楼和残破的拱门，以及城墙外零零散散、支离破碎的废墟，一直延伸到哈利勒搭建起他那顶红帐篷的山脚下。

到了18世纪末，这些建筑大多已经消失，或是被重建，或是被改作他用。中世纪城墙的剩余部分被拆毁，其石料用来建造新的建筑以及1799年击退拿破仑的防御工事。新的清真寺和商队旅馆拔地而起；教堂、意大利人的仓库和塔楼的地基已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当中。

如今，从老城区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墙俯瞰，你可能会在现代阿卡城区的街道中想象出防御设施和城外扎营的军队，但是这种表象极具欺骗性，因为这些城墙建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中世纪城墙连同沿线的塔楼、石砌沟渠和带有不祥名字的塔楼都已不复存在。只有一段城墙下延伸出的一小段还能有迹可循。昔日的十字军城市已变成一系列诱人的碎片，隐没在后世在其原址上建造的奥斯曼帝国建筑之中，但通向各处小广场的蜿蜒小巷可能追随着十字军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又遵循着早期的阿拉伯布局。海墙边的一大块岩石是比萨人港湾建筑留下的印记；而另外一根孤零零矗立在海边的残柱，则是所谓的苍蝇之塔残留下来的全部，它在过去曾经守卫着港口的入口。阿卡是一个蜂窝状的历史建筑群，各个时期的建筑后来居上，推陈翻新。阿拉伯时代的建筑建立于希腊罗马遗址之上，随后被十字军时代的建筑取而代之，而后者又被奥斯曼帝国的建筑所代替。地面之下，别有洞天，一层叠着一层。许多房屋都有拱形的地窖和地宫，还有一些中空的墓室尚未被发掘，这是人类的居住生活在日积月累之下形成的证据。在圣殿骑士团城堡曾经屹立之处

街道对面，有一扇门通向幽暗之处，那里有一座他们全盛时期的财富纪念碑。一条300米长的石头隧道，光影朦胧，流水潺潺，从地下穿城而过。行走于地下深处，隧道靠近港口的另一端豁然开朗。沿着如今的城墙向上而行，可以看到医院骑士团总部大院的部分建筑矗立不倒，这是一个由柱厅、拱室和庭院组成的大杂院，入口处躺着一些巨大的石球，很可能是由哈利勒的弩炮发射过来的。



海上视角的阿卡，由格拉维耶·德·奥迪耶尔创作的画作，展现出医院骑士团要塞的大部分以及圣约翰教堂的骨架

那座令人印象深刻、圣殿骑士们曾在其中背水一战的城堡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浅海滩涂，在那里，城堡的地基轮廓还清晰可见。这是一个坐看风生水起、船来船往的好去处，在这里，守卫者们曾经徒劳地向西看去，望眼欲穿。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教堂的钟声和祈祷的召唤。人们来到此处海墙，在灯塔边啜饮咖啡，在海滨漫步，相约会友。载着游客踏浪逐波、环绕海湾疾驰如飞的快艇上传出一阵阵爆发力极强的阿拉伯流行音乐。它们在急转弯时翻腾起惊涛骇浪。冲浪者尖声呼啸。天黑以后，万籁俱寂，只剩下浪涛拍岸之声，水果摊依然灯火通明，灯塔与明月交相辉映。

[1] Ludolph von Suchem. *Description of the Holy Land, and of the Way There*, trans. Aubrey Stewart, London, 1895, p.60.

[2] 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希腊语名字，其执政时期是埃及新王国最后的强盛年代，他在埃及各地都留下了自己的雕像。诗人雪莱曾写下传世名篇《奥兹曼迪亚斯》，其中的意境与本文所述颇为相符，为便于理解，读者可参考杨绛先生的译文。

[3] Pringle, Denys. *The Churches of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vol.4, Cambridge, 2009, p.25.

[4] Pringle, Denys. *The Churches of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vol.4, Cambridge, 2009, p.27.

[5] Maundrell, Henry. *A Journey from Aleppo to Syria*, London, 1810, p.106.

[6] Maundrell, Henry. *A Journey from Aleppo to Syria*, London, 1810, p.106.

[7] Maundrell, Henry. *A Journey from Aleppo to Syria*, London, 1810, p.28.

圣地十字军运动简要大事记

1095年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布道，号召进行十字军东征。
1096—1099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099年	十字军围攻并洗劫耶路撒冷。
1104年	鲍德温国王攻占阿卡。
1147—1149年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71年	萨拉丁成为埃及统治者，开创阿尤布王朝。
1171—1185年	萨拉丁巩固了阿尤布王朝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统治。
1187年	萨拉丁在哈丁击败一支十字军军队，攻占阿卡并重新夺回耶路撒冷。
1189—1192年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和英格兰的理查一世率领。
1189—1191年	十字军围攻阿卡。
1192年	理查与萨拉丁议和，理查未能收复耶路撒冷，

启程回国。

1202—1204年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大军从威尼斯出发，但中途却改道攻占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

1217—1219年 第五次十字军进攻埃及，但在尼罗河三角洲被击败。

1228年 腓特烈二世通过协议重新收回耶路撒冷。

1239—1241年 香槟的特奥巴尔德和康沃尔的理查发起小规模
的十字军冒险活动。

1244年 花刺子模人洗劫耶路撒冷。圣城最终沦陷。

1245年 教皇英诺森四世向蒙古帝国派遣特使。

1247年 法兰西的路易九世计划发动十字军东征。

1248—1254年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1248年 路易入侵埃及。他的军队在尼罗河三角洲被击败，本人被俘。

1248—1250年 阿尤布王朝灭亡。军事奴隶马穆鲁克夺得埃及
的统治权。

1250年代 拜巴尔作为马穆鲁克巴赫利亚军团的领袖开始
崛起。

1258年 蒙古大军洗劫巴格达。

1259年 马穆鲁克首领忽都斯取得埃及控制权。

1260年 蒙古大军在旭烈兀的率领下洗劫阿勒颇并占领大马士革。马穆鲁克在阿音扎鲁特击败蒙古军队。忽都斯被刺杀，拜巴尔成为马穆鲁克苏丹。

1260—1264年 拜巴尔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并对军队进行改革。

1265—1271年 拜巴尔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摧毁十字军城堡。阿卡多次遭到袭击。

1268年 拜巴尔占领安条克。

1270年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路易九世进攻突尼斯并死于当地。

1271年 英格兰的爱德华参加十字军并来到阿卡。拜巴尔占领骑士堡。

1277年 拜巴尔死亡。嘉拉温取得马穆鲁克苏丹国的统治权。

1289年 嘉拉温占领的黎波里。

1290年 阿卡发生的屠杀穆斯林事件为嘉拉温提供了战争借口。马穆鲁克军队进行动员。嘉拉温去世，哈利勒继位。

1291年 哈利勒进攻并摧毁了阿卡。海外之地的十字军据点全部沦陷。

1293年 哈利勒被一群马穆鲁克埃米尔刺杀。

阿卡陷落之实证考

本书有赖于两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十字军的研究成果。1291年的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孜孜不倦地搜寻报告、信件、编年史、教堂和国家的记录，以基督教的视角来看，这些史料都涉及海外之地最后的崩溃。尽管如此，来自目击者的事实描述的文献数量依然少得可怜。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出自所谓的“推罗的圣殿骑士”之手，我对他的记述也多有引用。“推罗的圣殿骑士”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情报人员兼阿拉伯语翻译的神秘角色，使他能够有渠道了解一些内幕，包括阿卡统治集团核心层的决策过程以及马穆鲁克世界的信息。他时而透露内情，时而故作谨慎：“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谁。”他所描述的一些事件，比如一名英国士兵被希腊火击中后惨死，以及博热受到了致命伤害，都表明他当时是作为目击者在场的。然而，他并没有暗示他本人曾参与其中。他参加战斗了吗——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参战——还是他只不过是一个文书？他是怎么从燃烧中的城市里逃出来的？他从现场消失在黑暗中。他的记载是现存于世的史料中最详细的，不过这一优势可能会歪曲史实的客观性，使之对圣殿骑士团有利，并且夸大了博热的致命伤势对最后崩溃的重要性。

除了“推罗的圣殿骑士”之外，我对另外两部匿名作家的编年史也颇为倚重，这两部作品似乎收集了许多幸存者的记述：一部名为《阿卡灭城记》（*Excidium Aconis*），另一部直接以作者的名字命名为《撒迪厄斯》（*Thadeus*）。此外，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文书，如医院骑士团大

团长让·德·维利耶的信件，希腊修士阿西尼厄斯向教皇的报告，以及其他编年史和记录中具有启发性的细节。

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伊斯兰版本的史料我则很少选用。西方对这些材料的开创性分析始于唐纳德·利托（Donald Little）的论文，他回顾了所有可用的资料，创建了一套真实可靠、归属明确的系谱图。我发现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指南，可以帮助我寻找阿拉伯方面的资料并了解那些史学家对1291年事件的观点。不过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些史料对围城“前后”的政治、决策和后果提供了大量信息，但在军事问题上却没有多大帮助。这其中有一些珍贵的自传性质的目击者描述，包括阿布·菲达所描述的将投石机拖运到围城阵地的过程，拜巴尔·曼苏里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屏障以阻挡守军弩炮对围城工作的攻击火力，以及一名在战役最后被困在圣殿骑士团塔楼里的匿名士兵为了生存而困兽犹斗的故事。在伊斯兰方面的史料中，对围城期间各个事件的叙述和排序是混乱且令人困惑的。我们从基督徒的史料里了解到更多关于马穆鲁克的战斗技巧——特别是在最后的总攻中——远比我们从阿拉伯的史料那里了解到的要多。尽管如此，通过将这些史料中描述的事件与“推罗的圣殿骑士”和其他人的事件描述进行交叉引用，我相信有可能给出一个平衡合理的解释。

除了纸面记录之外，地面之上和之下也均有史据。在阿卡城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住民遗迹层层堆积、界限模糊，这正是一个迷人之处，但正如我在尾声中指出的那样，若想将其分辨清楚是异常困难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在所有关于1291年事件的史料记载中，对于那些被不断提到的塔楼和外堡，内城墙和外城墙，以及壕沟和凸起的作用，我们没有足够可靠的信息来确定它们的准确位置和外貌，只能基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之上：它们所遵循的设计理念与其他许多位于圣地的十字军要塞所采用的城防结构和防御策略是共通的。

至于城墙和塔楼的相对位置和识别，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里诺·萨努多·托尔塞洛的著作，他在1286年造访了这座城市，当时那里正赶在马穆鲁克大军杀来之前拼命地进行着最后阶段的塔楼建造工作。不同版本的地图根据他的叙述被绘制出来，其中的一幅在本书第XX页，使我们能够定位那些主要的建筑，尽管这样也有可能产生误导。萨努多地图的一个版本把诅咒之塔放在了外城墙上，尽管它很明显应该是在内城墙上，萨努多自己肯定知道这一点，因为当他身处阿卡的那段日子里，为了保护诅咒之塔而兴建的国王之塔正处于施工阶段，就在阿卡城陷落不久之前。诅咒之塔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正如马修·帕里斯

（Mathew Paris）的地图（见彩插2）所表现的那样，有时会碾压现实。在这幅地图上，诅咒之塔是圆形的，在本书扉页也是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时存在着在战略重要的位置上选择圆形防御结构的偏好；尽管建造这种建筑要比方形塔楼更费力，但工兵们认为通过地道使它们坍塌要比后者更困难。不幸的是，现在还没有考古实据来佐证这种说法。

大部分城墙，连同一些塔楼和石块堆砌成的壕沟，在18世纪还能清晰地被看到；而且游客对遗址观光的描述，以及艺术家的描绘，都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即使这些证据多少有些矛盾。例如，我们从弗朗西斯科·苏里亚诺的观察记录中了解到，哈利勒的军队建造了一道长长的土垒以保护其营地，并且数个世纪后仍然有惊人数量的炮弹散落在遗址上，“像是一大群羊”，这为投石机的大规模运用提供了切实证据，但城墙和塔楼本身，以及阿卡外城墙的准确走向，我们仍然难以掌握。在我游览阿卡的时候，以色列文物管理局（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的丹尼·西翁（Danny Syon）将18世纪城墙底部的一小段石头建筑指给我看，那是十字军时代的原始建筑在地面上仅存的部分。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发掘出了惹人注目的城墙、壕沟和塔楼、商店、街道和房屋，但由于新阿卡的城市发展，现代城区已经覆盖了一个世纪前还能在航空照片上看到的地面部分，这样一来，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蒙穆萨尔郊区和城墙线

已经完全消失了。

这种现象的后果之一就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十字军时代的阿卡面积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它的外墙向东延伸到距离图伦（哈利勒就是在这座小山上运筹帷幄）有多远，以及这些城墙都在什么地方与海岸交会。关于这一问题各类观点或趋于最大面积，或偏向最小面积。1997年，本杰明·科达尔（Benjamin Kedar）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主张，证明阿卡的规模远远超出此前的想象。除了一些考古证据外，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还参考了格拉维耶·德·奥迪耶尔于1689年绘制的加长全景图，其中部分截图转载于本书第243页和第246页。这幅图似乎显示出建筑废墟离图伦非常之近，尽管有人反驳说城外原本就有独立的建筑、桥梁等，而且格拉维耶的视角也未必准确。在决定如何简化但保留必要的地图信息来帮助读者理解书中所描述的事件的过程中，我最终遵循了多数派的立场，以丹尼斯·普林格尔（Denys Pringle）绘制的一幅地图为基础，这幅地图基于科达尔的研究，使阿卡朝东向图伦的足迹延伸了，虽然无法完全确定，但在缺乏考古证据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最完整可靠的版本了。总而言之，本书前页的地图是合理且没有争议的，关于城墙的迂回曲折，塔楼和城门的相对位置，以及马穆鲁克军队各单位的部署，这些都与当时的史料记载相符。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在工程建设以及抢救性发掘过程中，一些当时发生的战斗的证据得以重见天日：城墙最北端的一座圆形塔楼的地基（比萨人必定是由此出发，开始了他们在围城初期的两栖奇袭作战），护城壕沟的几段残迹和偶尔在其他处发现的塔楼碎片。1991年，在新阿卡建造一座法院的过程中，一座方形塔楼的遗迹被人们发现并发掘，其地基部分的墙体厚度达3米，这座塔楼在过去应是毁于大火之中。一堆堆烧焦的梁柱和破碎的陶器见证了其最后的毁灭。有人认为这座塔位于城墙的外围，靠近最易遭受敌军攻击的凸起部分，它很可能就是威尼斯人之塔。2004年，在18世纪的城墙内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考古

发掘，考古人员发现在马穆鲁克军队最后总攻的直接路线上有大量的建筑物被烧毁，这些证据表明了“这片土地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如“推罗的圣殿骑士”所讲述的那样。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地点都发现了这种遭受破坏的地层，散落着被打碎的13世纪的陶器和玻璃、硬币、碳化的木头和倒塌的屋顶——时光封存的证据表明十字军时代的阿卡在1291年5月突然完全停止了城市发展的脚步。这些被遗弃的废墟随后被风沙掩埋了数百年，直到奥斯曼帝国时期，新的建筑在原址上拔地而起，这座城镇才得以复兴。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箭头、可能是陶罐油掷弹的碎片，以及大量各种尺寸的炮兵石弹。在不同的地点都发现了被集中存放的石弹，有的地点位于城内，有的地点可能位于原城墙外，这些地方似乎是为炮击准备的弹药库。有一张照片以截面的形式展现了其中一处地点的发掘工作。对这些投射物的仔细检查揭示了它们的不同尺寸和地质学信息，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马穆鲁克军队是从遥远的地方征集石料的。其中一些石弹的尺寸相当大，但许多更小的石弹（肯定是用来轰击城墙的）可能没有留存下来或已经被建筑物当作石料取用。在这座城市被大火吞噬后，在那些仍能为世人所见的残迹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数医院骑士团总部大院的建筑群，包括其大厅和地下室以及在城市下方修建的隧道，这条隧道可能连接着圣殿骑士团城堡和海港。关于十字军时代的阿卡及其最终的毁灭，仍有许多秘密被深埋在地下。

关于人名的说明

在这本书中，关于个人名字的习惯问题，我走了一些捷径，目的是让读者在翻动书页间能更容易地识别人物角色。基督徒的人名里通常都包括一个个人的名字，比如“雅克”，然后是他们的家族出身地，比如“德·维特里”（“维特里的”）。人们通常用他们的个人名字或全名来称呼他们，而不是仅用他们出身的城镇。然而，在瞬息万变的事件节奏中，用这种方式来称呼人名往往显得很笨拙，有时甚至令人困惑，所以你会发现尼古拉·德·阿纳普、奥顿·德·格朗松、让·德·格拉伊等人的名字经常被缩减到只剩下他们的出身地。于是维特里、阿纳普、格朗松和格拉伊不时地出现，笔者希望借此能让读者于电光石火之间跟上节奏。另外，我决定尽可能避免使用英语化的名字，于是采用了马修·德·克莱蒙（Matthieu de Clermont）而不是克莱蒙的马修（Matthew of Clermont）的形式，以求将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在这一点上我无法宣称自己做到了完全一致。将理查称为*Cœur de Lion*（狮心王的法语形式）可能会更加准确，因为他几乎不讲英语，这可能会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个人是谁，但我当然还是坚持使用了Lionheart（狮心王的英语形式）。塞浦路斯的亨利后来成为阿卡的统治者，而不是亨利·德·塞浦路斯（Henri de Chypre）^[1]，诸如此类。我自始至终的目标都是试图在可读性与过往情怀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至于穆斯林的名字，情况就更加让人晕头转向了。我确信，在看到像赛义夫·丁·巴克塔穆尔·西拉达尔这种人物介绍时，西方读者包括我自己的目光一定会变得呆滞沉重的。拜巴尔的全名叫作马利克·扎希尔·鲁

克·丁·拜巴尔·邦杜克达里（al-Bunduqdari）。这一大长串名字经常包括他们父亲的名字（如“伊本”——某某人之子）、职业名称（“西拉达尔”——掌管军备的埃米尔）、尊称（“鲁克·丁”——信仰支柱）、出身的名字或是他们主人的名字（“曼苏里”——出自常胜之王，曼苏里·嘉拉温的军团）。本书中有好几个人的名字中都带有曼苏里——甚至一台配重式投石机的名字也叫曼苏里！

马穆鲁克经常有一个源于突厥语的名字。埃及狮王拜巴尔，实际上是“大黑豹”的意思。一如基督徒名字的处理方法，我决定对穆斯林的名字进行缩减。在第一次介绍之后，我就尽可能地将这些名字简化为一个词，如拉津、拜巴尔等，希望读者能够将书中的旅程继续坚持下去。

（不幸的是，我们确实在书中找到了两个带有拜巴尔的名字：苏丹拜巴尔和拜巴尔·曼苏里）。至于萨拉赫·丁，我很快就将其改为萨拉丁。我选择在主文本中弃用阿拉伯名字的变音符号，因为它们会使行文语言变得更加复杂。总的来说，我对名字的处理方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我希望这样能够帮助读者对书中人物和他们的出身有一个连续性的了解。

[1] Chypre是塞浦路斯在法语中的名字。

参考书目

原始文献

Abu'l-Fida. *The Memoirs of a Syrian Prince*, ed. and trans. P.M.Holt, Wiesbaden, 1983.

Ahmad ibn'Alī al-Maqrīzī. *Histoire des sultans mamlouks*, trans. M.Quatremère, 2 vols, Paris, 1837-45.

Al-Jazari. *La Chronique de Damas d'al-Jazari*, ed. and trans. J.Sauvaget, Paris, 1919.

Albert of Aachen. *Historia Ierosolimitana*, ed. and trans. Susan B.Edgington, Oxford, 2007.

Arab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 ed. Francesco Gabrieli, London, 1969.

Badr al-Dīn al-Ainī. *Iqd al-Jumān fī Tārīkh Ahl al-Zamān*, ed. Muhammad Amin, Cairo, 1987.

Bartholomei de Cotton. *Historia Anglicana*, ed. Henry Richard Luard, London, 1859.

Bartolomeo de Neocastro. *Historia Sicula, 1250-1293*, ed. Giuseppe Paladino, Bologna, 1921-22.

Baybars al-Manṣūrī. *Zubdah al-Fikra fī al-Tārīkh al-Hijrah*, ed. D.S.Richards, Beirut, 1998.

Cartulaire général de l'ordre des Hospitaliers de S.Jean de Jérusalem, vol.3, 1261-1310, ed. J.Delaville Le Roux, Paris, 1899.

Chroniques d'Amadi et de Strambaldi, ed. René de Mas Latrie, Paris, 1891-93.

Crusade and Christendom, ed. and trans. Jessalyn Bird, Edward Peters and James M.Powell, Philadelphia, 2014.

Crusader Syria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Rothelin Continuum of the History of William of Tyre with Part of the Eracles of Acre Text, ed. and trans. Janet Shirley, Aldershot, 1999.

Excidium Aconis, as *Excidii Aconis Gestorum Collectio*,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46-96.

Fulcher of Chartres. *A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Jerusalem, 1095-1127*, trans. Frances Rita Ryan, Knoxville, 1927.

Ibn al-Athir. *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ir*, trans. D.S.Richards, Aldershot, 2006-08.

Ibn al-Furat. *Ayyubids, Mamlukes and Crusaders*, trans. U. and M.C.Lyons, Cambridge, 1971.

Ibn‘Abd al-Zāhir, Muḥyī al-Dīn. *Tashrīf al-ayyām wa-al-‘uṣūr fī sīrat*

al-Malik al-Manşur, Cairo, 1961.

Ibn Jubayr. *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J.C.Broadbent, London, 1952.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vol.2, trans. Franz Rosenthal, London, 1958.

Jacques de Vitry. *Lettres de Jacques de Vitry*, ed. R.B.C.Huygens, Leiden, 1960.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ed. and trans. M.Natalis de Wailly, Paris, 1874.

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ed. and trans. Caroline Smith, London, 2008.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2, Paris, 1906, pp.651-872.

Les Registres de Nicolas IV, vol.2, ed. Ernest Langlois, Paris, 1905.

Ludolph von Suchem. *Description of the Holy Land, and of the Way There*, trans. Aubrey Stewart, London, 1895.

Matthew Paris. *Matthew Paris's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Year 1235 to 1273*, 3 vols, trans. J.A.Giles, London, 1852-54.

Maundrell, Henry. *A Journey from Aleppo to Syria*, London, 1810.

Muntaner, Ramon. *The Chronicle of Muntaner*, trans. Lady Goodenough, London, 1921.

Rashīd al-Dīn Tabīb. *The Illustrations to the World History of Rashid al-Din*, Edinburgh, 1976.

Sanudo Torsello, Marino. *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the Faithful of the Cross*, trans. Peter Lock, Ashgate, 2011.

Shafi‘b.‘Alī. *Ḥusn al-Manāqib al-Sirriyyah al-Muntaza‘a min al-Sīrah al-Ẓāhiriyyah*, Riyadh, 1974.

Thadeus. *Ystoria de desolatione et conculcatione civitatis Acconensis et tocius terre sancte*, in *The Fall of Acre, 1291*, ed. R.B.C.Huygens, Turnhout, 2004, pp.97-164.

The Chronicle of Lanercost, 1272-1346, ed. and trans. Sir Herbert Maxwell, Glasgow, 1913.

The Chronicle of the Third Crusade: The Itinerarium Peregrinorum et Gesta Regis Ricardi, trans. Helen J.Nicholson, Aldershot, 2001.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and the Third Crusade, ed. and trans. Peter W.Edbury, Aldershot, 1998.

The Seventh Crusade, 1244-125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d. and trans. Peter Jackson, Aldershot, 2007.

The‘Templar of Tyre’: Part III of the‘Deeds of the Cypriots’, trans. P.Crawford, Aldershot, 2003.

‘Umar ibn Ibrāhīm al-Awsī al-Anṣārī. *A Muslim Manual of War*, ed. and trans. George T.Scanlon, Cairo, 1961.

Usāmah Ibn-Munqidh. *An Arab-Syrian Gentleman and a Warrior*,

trans. Philip K.Hitti, New York, 1929.

Walter de Hemingburgh. *The Chronicle of Walter of Guisborough*, ed.
Harry Rothwell, London, 1957.

现代文献

Amitai-Preiss, Reuven. *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anid War, 1260-1281*, Cambridge, 1995.

—‘The Conquest of Arsuf by Baybar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9, no.1, 2005, pp.61-84.

—‘Diplomacy and the Slave Trad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Oriente Moderno*, vol.87, 2008, pp.349-68.

Asbridge, Thomas. *The Crusades: The War for the Holy Land*, London, 2010.

Barber, Malcolm. *The Trials of the Templars*, Cambridge, 2012.

Boas, Adrian J. *Archaeology of the Military Orders*, Abingdon, 2006.

Chevedden, Paul E. ‘The Hybrid Trebuchet: The Halfway Step to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 in Joseph F.O’allaghan, Donald J.Kagay and Theresa M.Vann (eds), *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Medieval Institutions*, Leiden, 1998, pp.179-222.

—‘Fortific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fensive Planning during the Crusader Period’, in Donald J.Kagay and L.J.Andrew Villalon (eds), *The Circle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Woodbridge, 1999, pp.33-44.

—‘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 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Dumbarton Oaks Papers*, no.54, 2000, pp.71-116.

—'Black Camels and Blazing Bolts: The Bolt-Projecting Trebuchet in the Mamluk Army',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8, no.1, 2004, pp.227-78.

Chevedden, Paul E., Les Eigenbrod, Vernard Foley and Werner Soedel.'The Trebuchet', in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1995, pp.66-71.

Clifford, Esther. *A Knight of Great Renown*, Chicago, 1961.

Cobb, Paul. *The Race for Paradise*, Oxford, 2014.

Concina, Chiara.'Unfolding the Cocharelli Codex: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about the Text, with a Theory about the Order of the Fragments', *Medioevi: Rivista di letteratura e culture medievali*, no.2, 2016, pp.89-265.

Crowley, Roger. *Constantinople: The Last Great Siege*, London, 2005.

—*City of Fortune*, London, 2012.

D'Souza, Andreas.'The Conquest of 'Akkā (690/1291)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ristian and Muslim Sources', *The Muslim World*, vol.80, no.3-4, 1990, pp.234-49.

DeVries, Kelly. *Guns and Men in Medieval Europe, 1200-1500*, Aldershot, 2002.

Dichter, B. *The Maps of Acre, an Historical Cartography*, Acre, 1973.

—*The Orders and Churches of Crusader Acre*, Acre, 1979.

—*Akko: Sites from the Turkish Period*, Haifa, 2000.

Ellenblum, Ronnie. *Crusader Castles and Modern Histories*, Jerusalem, 2009.

Favreau-Lilie, Marie-Louise. 'The Military Orders and the Escape of the Christian Population from the Holy Land in 1291',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19, no.3, 1993, pp.201-27.

Folda, J. *Crusader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at Saint-Jean D'Acre, 1275-1291*, Princeton, 1976.

France, John (ed.) . *Acre and Its Falls*, Leiden, 2018.

Fulton, Michael S.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Artillery during the Crusades', *Journal of Medieval Military History*, vol.13, 2015, pp.51-72.

—'Mining as a Medieval Siege Tactic: The Siege of Edessa', *Medieval Warfare*, vol.7, no.1, 2017, pp.48-53.

—*Artillery in the Era of the Crusades*, Leiden, 2018.

Hamblin, William J. 'Perspectives on the Military Orders during the Crusade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Studies*, vol.40, no.4, 2011, pp.97-118.

Hartal, Moshe et al. 'Excavation of the Courthouse Site at 'Akko', *'Atiqot*, vol.31, 1997, pp.1-207.

Hill, Donald R. 'Trebuchets', *Viator*, vol.4, 1973, pp.99-104.

Hillenbrand, Carol.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 1999.

Holt, P.M. 'Qalāwūn's Treaty with Acre in 1283',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91, no.361, 1976, pp.802-12.

—'The Treaties of the Early Mamluk Sultans with the Frankish State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43, no.1, 1980, pp.67-76.

—*Early Mamluk Diplomacy (1260-1290) : Treaties of Baybars and Qalāwūn with Christian Rulers*, Leiden, 1995.

Hosier, John D. *The Siege of Acre, 1189-1191*, London, 2018.

Housley, Norman. *The Later Crusades, 1274-1580*, Oxford, 1992.

Humphreys, R.S. 'The Emergence of the Mamluk Army', *Studia Islamica*, no.45, 1977, pp.67-99.

—'Ayyubids, Mamluks, and the Latin East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2, 1998, pp.1-18.

Irwin, Robert. 'The Mamluk Conquest of the County of Tripoli', in Peter W. Edbury (ed.), *Crusade and Settlement*, Cardiff, 1985, pp.246-9.

—*The Middle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arly Mamluk Sultanate*, London, 1986.

—*Mamluks and Crusaders*, Aldershot, 2010.

Jackson, Peter. 'The Crisis in the Holy Land in 1260',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95, no.376, 1980, pp.481-513.

Jacoby, David. 'Crusader Acr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Urban Layout and Topography', *Studi Medievali*, vol.3, no.20, 1979a, pp.1-45.

—'L'Expansion occidentale dans le Levant: les Vénitiens à Acr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treizième siècle', in idem, *Recherches sur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du XIIe au XVe siècle*, London, 1979b, pp.225-64.

—'Montmusard, Suburb of Crusader Acre: The First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in B.Z.Kedar, H.E.Mayer and R.C.Smail (eds),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Jerusalem, 1982, pp.205-17.

—*Studies on the Crusader States and on Venetian Expansion*, Northampton, 1989.

—'Three Notes on Crusader Acre', *Zeitschrift des Deutschen Palästina-Vereins*, vol.109, no.1, 1993, pp.83-96.

—'Pilgrimage in Crusader Acre: The Pardons d'Acre', in Yitzhak Hen and Amnon Linder (eds), *De Sion exhibit lex et verbum domini de Hierusalem: Essays on Medieval Law, Liturgy, and Literature in Honour of Amnon Linder*, Turnhout, 2001, pp.105-17.

—'Aspects of Everyday Life in Frankish Acre', in Benjamin Z.Kedar

and Jonathan Riley-Smith with Michael Evans and Jonathan Phillips (eds) , *Crusades: Volume 4*, London, 2005, pp.73-105.

—‘Ports of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Eleventh-Fourteenth Century: Jaffa, Acre, Alexandria’, in Michele Bacci and Martin Rohde (eds) , *The Holy Portolano: The Sacred Geography of Navig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Munich, 2014, pp.51-71.

Jones, Dan. *The Templars*, London, 2017.

Kedar, B.Z., H.E.Mayer and R.C.Smail (eds) .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Jerusalem, 1982.

Kedar, Benjamin Z.‘The Outer walls of Frankish Acre’, ‘*Atiqot*, vol.21, 1997, pp.157-80.

Kennedy, Hugh. *Crusader Castles*, Cambridge, 1974.

Khamisy, Rabei G. and Michael Fulton.‘Manjaniq Qarabugha and Thirteenth-Century Trebuchet Nomenclature’, *Studia Islamica* vol.111, no.2, 2016.

Killigrew, Ann E. and Vered Raz-Romeo (eds) . *One Thousand Nights and Days: Akko through the Ages*, Haifa, 2010.

King, E.J.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in the Holy Land*, London, 1931.

Little, Donald P.‘The Fall of Akka in 690/1291: The Muslim Version’, in M.Sharon (ed.) ,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Jerusalem/Leiden, 1986, pp.159-81.

Marshall, Christopher J.‘The French Regiment in the Latin East,

1254-91',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15, 1989, pp.301-7.

—*Warfare in the Latin East, 1192-1291*, Cambridge, 1992.

Mas Latrie, M.L.de. *Histoire de l'île de Chypre*, Paris, 1861.

Mayer, L.A. *Saracenic Heraldry*, Oxford, 1933.

Meyvaert, Paul. 'An Unknown Letter of Hulagu, Il-khan of Persia, to King Louis IX of France', *Viator*, vol.11, 1980, pp.245-60.

Michaud, M. *Histoire des croisades*, vol.5, Paris, 1828.

Morris, Marc. *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 London, 2008.

Morton, Nicolas. *The Teutonic Knights in the Holy Land*, Boydell, 2009.

Musarra, Antonio. *Acri 1291: La Caduta degli stati crociati*, Bologna, 2017.

Nicholson, Helen. 'Images of the Military Orders, 1128-1291',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1989.

—*Templars, Hospitallers and Teutonic Knights: Images of the Military Orders, 1128-1291*, Leicester, 1993.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Woodbridge, 2001.

—*The Knights Templar*, London, 2010.

Nicolle, David. *The Mamluks, 1250-1517*, Oxford, 1993.

—*Medieval Siege Weapons* (2) , Oxford, 2003.

—*Acre 1291: Bloody Sunset of the Crusader States*, Oxford, 2005.

—*Crusader Warfare*, 2 vols, London, 2007.

—*Fighting for the Faith*, Barnsley, 2007.

—*Mamluk‘Askari, 1250-1517*, Oxford, 2014.

Northrup, Linda. *From Slave to Sultan*, Stuttgart, 1998.

Prawer, Joshua.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London, 1973.

—‘Military Orders and Crusader Politic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X IIIth Century’, in Josef Fleckenstein and Manfred Hellmann (eds) , *Die geistlichen Ritterorden Europas*, Sigmaringen, 1980, pp.217-29.

Pringle, Denys.‘Town Defences in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in Ivy A.Corfis and Michael Wolfe (eds) , *The Medieval City under Siege*, Woodbridge, 1995, pp.69-121.

—*The Churches of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vol.4, Cambridge, 2009.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and the Holy Land, 1187-1291*, London, 2012.

Rey, Emmanuel Guillaume. *Étude sur la topographie de la ville d’Acre au X III siècle*, Paris, 1879.

Riley-Smith, Jonathan. *The Knights of St John in Jerusalem and Cyprus, c.1050-1310*, London, 1967.

—*Knights Hospitaller in the Levant, c.1076-1309*, London, 2012.

Riley-Smith, Jonathan (ed.) . *The Atlas of the Crusades*, London, 1991.

Röhricht, Reinhold. *Geschichte des Königreichs Jerusalem, 1100-1291*, Innsbruck, 1898.

Runciman, Stephe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3 vols, 1964.

Sadeque, Syedah. *Baybars I of Egypt*, Dacca, 1956.

Schein, Sylvia. 'The Patriarchs of Jerusalem in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in B.Z.Kedar, H.E.Mayer and R.C.Smail (eds) ,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Jerusalem, 1982, pp.297-305.

—'The Image of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Jerusale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Revue bei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vol.64, no.4, 1986, pp.704-17.

—*Fideles Crucis: The Papacy, the West,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1274-1314*, Oxford, 1991.

Schlumberger, Gustave. *La Prise de Saint-Jean-d'Acre en l'an 1291 par l'armée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 1914.

Shagrir, Iris. 'The Fall of Acre as a Spiritual Crisis: The Letters of Riccoldo of Monte Croce', *Revue bei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vol.90, no.4, 2012, pp.1, 107-20.

Smail, R.C. *The Crusader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London, 1973.

Stickel, Edwin. *Der Fall von Akkon*, Frankfurt, 1975.

Thorau, Peter. *The Lion of Egypt*, London, 1992.

Tschanz, David. 'History's Hinge: 'Ain Jalut', *Saudi Aramco World*, July/August 2007, pp.24-33.

Tyerman, Christopher. *God's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London, 2006.

Ziadeh, Nicola A. *Damascus under the Mamluks*, Norman, 1964.

注释

书中所有的引文均来自第一手资料。引文的来源见“参考文献”部分列出的书目。使用的缩写如下：

GDC: *Les Gestes des Chiprois*, in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vol. 2, Paris, 1906.

图片来源

正文插图

第1页，穆斯林骑兵。From David Nicolle, *Horse Armour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Middle East*,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cy/3293>.

第8页，狮心王理查的印章。From Guy Laking, *A Record of European Armour and Arms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vol. 1 (London 1920) .

第10页，阿卡主教雅克·德·维特里的印章。From N. Makhoul, *Guide to Acre* (Jerusalem 1941) .

第18页，一幅阿卡的中世纪地图。From B. Dichter, *The Maps of Acre, an Historical Cartography* (Acre 1973) .

第27页，路易九世的印章。From Frederick Perry, *St Louis* (London 1901) .

第30页，十字军进攻达米埃塔。From M. Natalis de Wailly (trans.) , *Jean, Sire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Paris 1874) .

第47页，马穆鲁克与蒙古人的马上白刃战。From David Nicolle, *Horse Armour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Middle East*,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cy/3293>.

第59页，抬爪的狮子。From Leo Mayer, *Saracenic Heraldry: A Survey* (Oxford 1933) .

第63页，马穆鲁克骑兵训练。 Artist Oliver Poole from *Kitab al-makhzun*, Oriental Institute Library, Academy of Sciences, St Petersburg.

第77页，在自己帐篷中的拜巴尔。 Artist Oliver Poole from the *Cantigas de Santa Maria*, thirteenth century.

第82页，十字军发起袭击作战。From T. A. Archer, *The Crusades: the Story of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London 1894) .

第89页，山堡。From Emmanuel Rey, *Étude sur la Topographie de la Ville d' Acre au XIII siècle* (Paris 1879) .

第101页，一座献给阿卡某石匠的纪念碑。From B. Dichter, *The Orders and Churches of Crusader Acre* (Acre 1979) .

第104页，热那亚的纹章。From B. Dichter, *The Orders and Churches of Crusader Acre* (Acre 1979) .

第121页，穆斯林骑兵。From David Nicolle, *Horse Armour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Middle East*,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cy/3293>.

第132页，打击即将降临。 Artist Oliver Poole from Rashīd al-Dīn Tabib, *The Illustrations to the World History of Rashīd al-Dīn* (Edinburgh 1976) .

第136页，一名马穆鲁克士兵。 Artist Oliver Poole from Abu Ma' shar al Balki的论文,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第151页，马穆鲁克的各类纹章。From Leo Mayer, *Saracenic Heraldry: A Survey* (Oxford 1933) .

第153页，中世纪手抄本上的一个片段。From Philip Warner, *Siege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64) .

第157页，机械式配重投石机的操作过程。From Ralph Payne-Gallwey, *A Summary of the History, Construction and Effects in Warfare of the Projectile-throwing Engines of the Ancients* (London 1907) .

第165页，无间断轰炸。 Artist Oliver Poole from Rashīd al-Dīn Tabib, *The Illustrations to the World History of Rashīd al-Dīn* (Edinburgh 1976) .

第169页，正在冲锋中的骑士们。From Guy Laking, *A Record of European Armour and Arms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vol. 2 (London 1920) .

第181页，阿卡港湾区的困难之处。From T. A. Archer, *The Crusades: the Story of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London 1894) .

第184页，全副武装的骑士们。From Guy Laking, *A Record of European Armour and Arms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vol. 2 (London 1920) .

第191页，阿卡攻城战。 Artist Oliver Poole from J. Folda, *Crusader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at Saint-Jean D' Acre, 1275-1291* (Princeton 1976) .

第199页，欧洲弓箭手。From Ralph Payne-Gallwey, *The Crossbow* (New York 1903) .

第201页，圣殿骑士团的印章。From B. Dichter, *The Orders and Churches of Crusader Acre* (Acre 1979) .

第202页，声浪之墙。 Artist Oliver Poole from Rashīd al-Dīn Tabib, *The Illustrations to the World History of Rashīd al-Dīn* (Edinburgh 1976) .

第215页，穆斯林骑兵。From David Nicolle, *Horse Armour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Middle East*,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cy/3293>.

第217页，海中的死亡场景。 Artist Oliver Poole from J. Folda, *Crusader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at Saint-Jean D' Acre, 1275-1291* (Princeton 1976) .

第227页，从一座塔楼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陶瓷碎片。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第230页，圣安德鲁教堂的墙壁。From Cornelis de Bruijn, *Reyzen door de vermaardste Deelen van Klein Asia* (Delft 1698) .

第243页，17世纪阿卡地区荒凉的废墟。From Gravier d' Ortière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第246页，海上视角的阿卡。Gravier d' Ortière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彩色插图

1.阿卡围攻战，1181—1191年。

2.马修·帕里斯绘制的地图。The Parker Library,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3. 1320年的阿卡地图。这幅阿卡地图选自马里诺·萨努多·托尔塞洛的著作《十字架信徒的秘密之书》（约1320—1325年），彼得罗·维斯孔特（活跃于1310—1330年）以不透明颜料作于羊皮纸上。British Library, London, UK. All Rights Reserved. Alamy Stock Photo

4. 路易九世离开本国发动十字军东征。选自14世纪史籍《圣路易的生平与奇迹》。 Alamy Stock Photo

5. 蒙古人与马穆鲁克人。 Alamy Stock Photo

6. 马穆鲁克骑兵。 Alamy Stock Photo

7. 拜巴尔的狮子纹章。 Alamy Stock Photo

8. 医院骑士团总部的食堂。 Lev.Tsimbler/CC-BY-SA-3.0.

9. 圣殿骑士团建造的隧道。（由罗杰·克劳利本人提供）

10. 一座阿卡教堂的大门。 Martyn Smith/CC-BY-3.0.

11. 奥托·德·格朗松的雕像。 AJ Marshall/CC-BY-SA-4.0.

12. 陶器碎片。 Courtesy of the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13. 阿卡的鸟瞰图。 israeltourism/CC-BY-SA-2.0.

14. 从阿卡发掘出的炮兵石弹。 Courtesy of the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15. 马穆鲁克攻陷的黎波里城，1289年4月。 Alamy Stock Photo

16.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大元帅马修·德·克莱蒙守卫阿卡城墙，1291年。 Collections de Versailles.

地图

地图一 13世纪时的十字军国家

地图二 阿卡围攻战，1291

地图三 埃及与尼罗河三角洲。

（此书地图系原文插图）

索引

（索引中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aqa 79

Abbasid Caliphate 42, 52

Abu al-Fida

fall of Acre 197, 206, 216

siege of Acre (1291) 150, 151, 152

siege of Tripoli 93, 94

trebuchets 133, 141

Abu al-Tina 204

Accursed Tower

final Acre attack 178, 182-3, 184-5, 186, 187

layout of Acre 14, 123, 124-5

siege of Acre (1189) 5

siege of Acre (1291) 128, 137, 141, 167, 173, 177

Acre

architecture and defences 15-16, 86-9, 123-5, 127-9

crusade of Pope Nicholas IV 98-9

early crusades 3-4, 6

economy 50, 71-2

Edward I's crusade 79, 80-1

ethnicities 8-9, 10-11

geography and layout 2-3, 4-5, 13-16, 119-20, 158-61

internal conflict 99-100

military power 121-2

politics 10, 16, 72, 83-4

port of 11, 158-61, 191-2, 218, 219

raids by Baybars 57-8, 65, 67

ruins of 216-19

society and culture 8-9, 10-11, 85-7

threat of war 105-7, 109-10, 117-18

trade 10-13, 75

truce with Qalawun 95-6, 101-4

War of St Sabas 43-4, 71, 91, 97

see also siege of Acre (1189) ; siege of Acre (1291)

Akka *see* Acre

Akkar 69-70, 78, 111, 115, 116

Alam al-Dawadari 116, 166-7

Alam al-Hamawi 166

al-Ansari, Ibrahim 124, 125, 130, 132, 142

al-Aqsa Mosque (Jerusalem) 52

al-Ashraf Khalil *see* Khalil, al-Ashraf

al-Azhar Mosque (Cairo) 52

Aleppo 42-3, 49, 70, 80, 115, 145

Alexander the Great 2

Alexandria 28

Qalawun's reign 90, 91, 96

trade 11, 12, 75

Turanshah's reign 35, 38

al-Fakhri, Badr al-Din Bektash 92, 106, 153, 154, 155, 215

al-Halabi 152

Alice, Countess of Blois 89, 123

al-Muzaffar, al-Malik 116, 122, 152, 153

al-Salih, al-Malik 17, 20-1, 24-5, 27-8, 40

al-Salih Ali 108-9

al-Tabahi 116

al-Yunini 206

Amalric, Lord of Tyre 93, 96, 98, 101, 128, 129, 192

aman 120

Anatolia 82

Andrew II, King of Hungary 76

Angevin Empire 96

Antioch 9, 11, 126

Baybars's conquest 67-9

Mongols alliance 42, 44, 55

raids by Baybars 58

Aqtay 27, 35, 38, 40

Aragon 96

Armenian Kingdom of Cilicia 42, 44, 55, 214, 215

Armenians 9, 43

armour

of Christian forces 127, 128

of Islamic forces 1-2, 119, 191

see also weaponry

Arsenius 161, 163, 208-9

Arsuf 61, 62-3, 64, 125, 134

Ascalon 10

as-Sumairiya 122

Atlit 106

Avignon 215

Aybak al-Afram 112, 115

Aylik al-Farisi 198-9

Ayn Jalut, battle of 48-9

Ayyubid dynasty

 battle of Mansurah 31

 civil wars 17

 collapse of 21, 35, 39, 40

see also Saladin

Baalbek 111

Baghdad 42, 50, 53, 56, 214

Baha al-Din 6

Bahriyyah Mamluks

 al-Salih's army 20-1

 Aqtay 27, 35, 38

 battle of Mansurah 31

 conflict with Mongols 46-7

 conflict with other factions 40

 dynasty commences 39, 49

see also Baybars, Rukn al-Din; Khalil, al-Ashraf; Qalawun, al-Mansur

Baldwin I , King of Jerusalem 3-4

Baldwin II , King of Jerusalem 147

Barbican of Hugh III (Acre) 124-5, 128, 143, 167

battle of Mansurah 29-34

 aftermath of 34-9

battle of Ayn Jalut 48-9

battle of Evesham 73

battle of Hattin 4

battle of Homs 84

battle of La Forbie 17

bauséant 37

Baybars, Rukn al-Din 31, 38, 67

 battle of Ayn Jalut 48

 conflict with Edward 179, 80-1

 conquest of Antioch 67-9

 conquest of Krak des Chevaliers 75-8

 conquest of Safed 65-7

death and succession 82-3

emblem of 51, 52

invasion of Palestine 61-5, 125

Mecca pilgrimage 70

qualities as Sultan 55-6

raids on Crusader States 56-61

rise to power 49-50, 51-5

tension with Qutuz 40, 46-7

Baybars al-Mansuri

celebration of Khalil 208

preparations for Acre siege 114-15

siege of Acre (1291) 122, 123, 132, 144, 169-70, 173

Baydara 154, 215

Bazoches, Gervais de 3-4

Beaujeu, Guillaume de 81

death and legacy 189, 210

final Acre attack 183-4, 186-7, 188

siege of Acre (1291) 128, 129, 151, 154

threat of Acre war 106-7, 109-10

Tripoli conflict 91, 92

truce with Qalawun 84, 101-2

Bedouins 25-6, 29, 34, 84

Beirut 10, 117, 204

Bendocar 47

Berke 55-6

Bernard, Bishop of Tripoli 98

Bible, The 150

Bishop of Acre 72, 97

Bishop of Nicosia 162

Bishop's Tower (Tripoli) 91-4

'black bulls' (catapults) 138, 143, 163

Black Death 214

Black Sea 84

Blanche of Castile, Queen of France 38

Bohemond VI, Prince of Antioch 42, 56, 67, 68-9, 79

Bohemond VII, Prince of Antioch 83, 84

Boland, Hugo von 128, 129

Book of Examples from Sacred Scripture, The 150, 196

Brother Giles 30-1, 32

Bruijn, Cornelis de 205, 218

Byzantine Empire 13, 56, 133

Caesarea 41, 61-2, 125

Cafran, Guillaume de 164

Cairo 28

Baybars's reign 52-5

Khalil's reign 110

Khalil's victory reception 207-8

Mamluk rise 40

Mongol advance 45-6

Qalawun's reign 83, 96, 106, 107

Seventh Crusade *see* crusades trade 75

Caliph of Baghdad 19

caliphate, office of 52-3

Cape of Storms 159

Carthage 74

Catalonia merchants 11

catapults

- ammunition for 139-40

- attacks on Acre 131-2, 163

- battle of Mansurah 29

- construction of 111, 122

- defence of Acre 127, 149, 173

- types of 137-9

- War of St Sabas 43-4

- see also* trebuchets

Charles I of Anjou 83, 85

Château Pèlerin 60, 106, 117, 204

Chinese siege engineers 42

Chronicle of St Peter's monastery 201

churches 10, 195

Holy Cross Church (Acre) 118

St Andrew's Church (Acre) 159, 160, 205, 207

St Demetrius's Church (Acre) 15

St John's Church (Acre) 217

St Leonard's Church (Acre) 188

St Mary's Church (Nazareth) 57

St Nicholas's Church (Acre) 188

St Paul's Cathedral (London) 210

St Peter's Monastery (Erfut) 201

St Romano's Church (Acre) 187

Cilician Armenia 42, 44, 55, 214, 215

Clément, Albéric 5

Cleopatra 2

Clermont, Matthieu de 92, 128, 172-3, 209

final Acre attack 183-4, 188, 189-90

combat styles *see* military strategies

Constantinople 13, 24, 84, 159

Copts 11

criminals 13

crusades

First Crusade 3-4

Second Crusade 139

Third Crusade 4-6, 136-7

Fourth Crusade 24, 75

Fifth Crusade 18, 24, 25, 26, 36

Sixth Crusade 18

Seventh Crusade *see* battle of Mansurah; siege of Damietta (1249)

Eighth Crusade 72-4

Ninth Crusade 74-5

Pope Nicholas IV's crusade 96-9

aftermath of Acre's fall 211-12

Cyprus

aftermath of Acre's fall 209, 214

evacuations to 169

forces from 121, 125, 158, 161

Hugh III's reign 83

Louis IX's crusade launch 41

refugees from Acre 208

Damascus

Ayyubid civil wars 17

Baybars's rule 53, 70, 82

defeat to Mongols 43

Khalil's victory reception 207-8

trade 11, 12, 99

war preparations 116

weapons manufacturing 111, 112

Damietta 22, 24-6, 28, 37

defences of Acre 15-16, 86-9, 123-5, 127-9

Destruction of Acre, The 163-4, 171

dihliz 120

disease 16, 126

Dome of the Rock (Jerusalem) 52

Dominicans 195

Eastern Christians 9

Eastern Syriacs 8

Edmund, Earl of Lancaster 73

Edward I, King of England

aftermath of Acre's fall 211

commitment to crusading 73, 96, 97

Ninth Crusade 74-5, 79-81

Othon de Grandson and 215

trebuchet attack on Stirling Castle 140-1

Egypt

Damietta 22, 24-6, 28, 37

Fifth Crusade 17

slaves 13, 20

wealth of 24

see also Alexandria; Cairo

Eighth Crusade *see* crusades

Eleanor of Castile 81

Erfurt 201

espionage 92, 106, 125, 153, 154, 155, 166-7

ethnicities, in Acre 8-9, 10-11

Euphrates 42, 122

Fakhr al-Din 25, 27-8, 30

Falco, The 192

Famagusta 158, 162

Fath al-Din 103-4

Fazle, Ebule 87

Fifth Crusade *see* crusades

First Crusade *see* crusades

Flor, Roger de 192

Fourth Crusade *see* crusades

Francis of Assisi 86

Franciscans 195

Frederick II , Holy Roman Emperor 18

Fulcher of Chartres 147

Gama, Vasco da 212

Gate of Evil Step (Acre) 123

Gate of St Anthony (Acre)

- Christians' defence strategies 128, 155, 173, 174

- conquest by Mamluks 171, 172

- final Acre attack 178, 182, 183-4, 187

- Khalil's attack strategy 141, 148, 167, 170

- layout of Acre's defences 124

- Mamluk siege arrangements 122, 125

Gate of St Lazarus (Acre) 151

Gate of St Nicholas (Acre) 167, 173, 178, 183, 188

Gaudin, Thibaud 198, 199-200, 204, 208

Gaza 115

Genghis Khan 42

Genoa

- conflict with rivals 83-4

- siege of Acre (1291) 128, 191-2

- slave trade 53, 84

- trade with Islam 96, 211, 213

- Tripoli conflict 90-1, 93

- War of St Sabas 43-4, 71, 91, 97

- see also* Italian merchants

Georgians 9

Golden Horde 56

Golden Horn (Constantinople) 158-9

goods *see* trade

Grailly, Jean de

- commitment to crusading 74

- criticism of 210

- defence of Acre 81, 128, 129

evacuation from Acre 192

Pope Nicholas IV's crusade 96, 98

siege of Acre (1291) 151, 188, 190

siege of Tripoli 92, 93

Grandson, Othon de

commitment to crusading 73-4

criticism of 210

death of 215

defence of Acre 81, 128, 129

evacuation from Acre 192

Pope Nicholas IV's crusade 97

siege of Acre (1291) 144, 151, 156, 157, 188, 190

Greek fire 140, 163, 182, 185

Haifa 120, 160, 204 Hama

Lord of 116, 122

troops from 115, 150, 151, 195

Hanapes, Nicholas de

death and martyrdom 196, 209-10

defence of Acre 89, 117-18, 129

Pope Nicholas IV's crusade 97, 98

siege of Acre (1291) 149-50, 156-7, 175-6

harbours *see* port, of Acre

Hattin 4, 60

Henry II, King of Cyprus

and Acre's French contingent 84

aftermath of Acre's fall 208, 209, 210

arrival at Acre 161, 162

coronation of 85

defence of Acre 89, 117

delegation to brother 129

evacuation from Acre 190, 192

siege of Acre (1291) 163-4, 169, 171

siege of Tripoli 92-3

tower of 23, 125

truce with Qalawun 95-6

Henry III, King of England 72

Hethoum I, King of Armenia 42, 44, 56, 202, 203, 214

Hijaz 105

Hisn al-Akrad *see* Krak des Chevaliers

Hisn Kayfa 27, 35

Hohenstaufens 56

Holy Cross Church (Acre) 118

Holy Sepulchre Church (Northampton) 73

Homs 84, 115, 116

Homs Gap 76, 78

Hospital 10, 13, 14, 88, 218

siege of Acre (1291) 172, 175, 196-7

Hospitallers

aftermath of Acre's fall 210, 211, 212, 215

Ayyubid civil wars 17

compound of *see* Hospital

conflict with Baybars 59-60, 62-3, 64, 79

defence of Acre 128

fall of Acre 192, 197

final Acre attack 183-4, 188, 191

industrial activities 12

Krak des Chevaliers 58, 60, 75-8

Lope de Linares 110

Margat 84, 85

siege of Acre (1291) 121, 155-6, 163, 172-3

Tripoli conflict 92

War of St Sabas 43

see also Villiers, Jean de

Hugh III, King of Cyprus 83, 88-9, 124-5

Hülegü Khan 42, 44, 46, 55-6

Ibelin, Jean d'64

Iberian Peninsula 213

Ibn al-Athir 17

Ibn al-Furat 204

Ibn al-Qadi 198-9

Ibn Khaldun 19-20

ifrangi (catapult) 138

Iran 79

Iron Gate (Acre) 159

Italian merchants

- evacuations from Acre 158

- quarrels between factions 71, 129

- siege of Acre (1291) 128, 163, 168

- threat of excommunication 8, 75

- trade 10-11, 12-13, 74-5

- Tripoli conflict 90-1

- War of St Sabas 43-4, 71, 91, 97

- see also* Genoa; Pisa; Venice

Jacobites 8

Jaffa 10, 41, 57, 61, 64, 67

Jamdariyyah 21

James II , King of Aragon 96, 97

James of Verona 216

Janin 107

Jerusalem, city of

- al-Aqsa Mosque 52

-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17, 18

- destruction by Mongols 19

- First Crusade 68

- legacy in Europe 212

- Seventh Crusade 21, 24

- Third Crusade 6

Jews 11

jiḥād17, 56, 113, 165

Joinville, Jean de

- aftermath of Mansurah defeat 36-7, 38

- battle of Mansurah 29-30, 32-5

description of Greek fire 182

siege of Damietta (1249) 22-3, 25

Jordan 12, 65

Jubayr, Ibn 14-15

Julius Caesar 2

Karakorum 88

Kerak 114, 115, 122

Khalil, al-Ashraf

accession to Sultan 108

arrival at Acre 119-25

conquering the Temple 200-1

death of 214-15

destruction of the Holy Land 204-5

espionage 125, 154, 166-7

letter to Hethoum 202-3

negotiations 164-6

strategy for Acre siege 141-2, 153-4, 176-7, 178, 181-2

victory reception 207-8

war preparations 109-18, 125-7, 131-2

Khandaq, Jawan 92

Khwarazmians 19

King of Jerusalem, title of 10, 13, 16

King's Tower (Acre) 125, 128, 143, 167, 169, 173, 174, 177

Kipchaks 19, 83

Kitbuqa 42, 44, 46, 47, 48

Knights of St Lazarus 128, 195

Knights of St Thomas 10, 97, 128, 188

Krak des Chevaliers 58, 60, 75-8, 115, 116, 137

kurkar (sandstone) 139

Laffi, Domenico 126, 160

Lafunda (Acre) 100

Lajin, Husam al-Din 122, 154, 166-7, 214-15

Latakia 68, 85

Lausanne Cathedral 215

layout, of Acre 2-3, 4-5, 13-16, 119-20, 158-61

Lebanon 59, 60

Akkar 69-70, 111

Beaufort castle 67

Linares, Lope de 110

Lion of Egypt *see* Baybars, Rukn al-Din

Lisbon 139

Lithuania 213

Longjumeau, André de 41, 88

Lordemer 15

Louis IX, King of France

battle of Mansurah 29, 32, 33, 34

capture and release of 37-8

commitment to crusading 21

Eighth Crusade 72-4

fortification of strongholds 41, 88

seal of 22

siege of Damietta (1249) 23, 24-5

Louis X IV, King of France 218

lu'bah (catapult) 139

Lucia, Countess of Tripoli 93

Lusignan, Guy de, King of Jerusalem 4, 119

Mahallah canal 27, 35-6

Mainboeuf, Sir Philip de 110

Malta 212

Mamluks

al-Salih's army 20-1

Aqtay 27, 35, 38

Bahriyyah dynasty commences 39, 49

Bahriyyah regiment at Mansurah 31

battle of Ayn Jalut, 1260 48-9

Baybars's reforms to army 53-4

conflict between factions 40

conflict with Mongols 46-7

heraldic devices 133, 145

sultanate after Khalil's death 215

see also Bahriyyah Mamluks; Baybars, Rukn al-Din; Khalil, al-Ashraf; Qalawun, al-Mansur

Mansurah 26-7, 28

see also battle of Mansurah

Manuel I, King of Portugal 212

Marco Polo 88

Margat 84, 85

Maria, Lady of Antioch 187

Marseille merchants 11

Maundrell, Henry 217

Mecca 105

Medina 212

merchants *see* Italian merchants; trade

Mesopotamia 55

military orders 10

construction of fortifications 60, 71

criticism of 210-11

legacy of 212-13

Nicolas de Hanapes and 98

see also Hospitallers; Templars; Teutonic Knights

military strategies

army formations 23-4, 120-2, 180

Bahriyyah combat styles 31

cavalry 1, 19, 105, 135, 190, 191

Mamluk training 21, 53-4

sound, as intimidation 2, 23, 179

see also siegecraft

mining 145-8, 157-8, 167-8, 169, 200-1

monasteries *see* churches

monetary systems 11-12

Möngke Khan 42, 46

Mongols

alliance with Christians 79, 80, 83

attacks on Islamic world 42-3, 45-6

Baghdad 53, 214

battle of Ayn Jalut 48-9

during Baybars's reign 55-6, 57, 61

conflict with Qalawun 84

conversion to Islam 214

defeat of Turkish tribes 19

horse warfare 40

raids on Christian lands 41, 44-5

Monte Croce, Ricoldo de 205, 209

Montfort 16, 58, 60, 79

Montfort, Simon de 73

Montjoie (ship) 23

Montmusard 15

conquest by Muslims 195

defence of 88, 89, 127, 128, 181

location of 14, 124

Montréal, Gérard de *see* Templar of Tyre

Moors 213

Muhammad, Prophet 2, 212

Muhyi al-Din 103-4, 106, 107-8, 113

Naaman 120

Nazareth 12

Nestorians 8-9

Nile 26, 27, 28, 53

Nile Delta 18, 24, 28

Ninth Crusade *see* crusades

Nubia 95

Oldenburg, Wilbrand van 15-16, 123

Order of St Lazarus 10

oriflamme 23, 37

Ortières, Gravier d' 218

Ottoman Empire 212

Palestine 11, 59, 61-5

Patriarch of Jerusalem, title of 16, 72, 179

Peleau, Andre 192

Persia 19, 41, 42, 133, 214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4, 72

Philip IV, King of France 211, 213

Phokas, John 14

pilgrims 11

Pisa

Pope Nicholas IV's crusade 98

siege of Acre (1291) 122, 127, 128, 141, 150-1, 196

threat of Acre war 110

trade 209

Tripoli conflict 91

War of St Sabas 43-4, 91

see also Italian merchants

Pisan, Bartholomew 110

Pococke, Richard 217

Polo family 88

Pope Clement IV 72

Pope Clement V 211, 213

Pope Gregory X 74, 82

Pope Innocent III 75

Pope Innocent IV 13, 38

Pope Nicholas IV 96, 208-9

Pope Urban II 3

port, of Acre 11, 158-61, 191-2, 218, 219

potassium nitrate 140

pottery 202

Prophet Muhammad 2, 212

Pullani 9

Qalawun, al-Mansur

accession to Sultan 83

conflicts with Mongols and Christians 84-5

death and succession 107-9, 113

threat of Acre war 105-7

Tripoli conflict 90, 91-4

truce with Acre 84, 95-6, 96, 101-4

Qaqun 80

qarabugha (catapult) 138, 143, 163

Quran 113

Qutuz 40, 46-9, 52

Revel, Hugh 76, 78

Rhodes 212

Richard, Earl of Cornwall 12, 18

Richard I, King of England

and Cairo's significance 24

massacre of Muslims 206

restorations in Acre 15

seal of 7

siege of Acre (1189) 4, 6, 72, 139

Robert I, Count of Artois 26, 30-1, 32

Rome 97

Ruad 204

Rukn al-Din Taqsu al-Mansuri 106

Ruysbroeck, Willem van 88

Safed 16, 58, 65-7, 167

Saladin

- attempt to take Antioch 126

- legacy of 208

- siege of Acre (1189) 4, 6

- and Turkish armies 20

- union of Islamic world 16-17

Sandys, George 217

Sangershausen, Hanno von 47

Sanjar al-Shujai 154, 166, 167, 168, 204

Sanudo, Marino 89, 211

Sarraj al-Din Zabyan 207

Savoy 73, 74

Sayf al-Din Aqbugha 198-9

Sayf al-Din Baktamur 198-9

Schwanden, Burchard von 117

Scotland 96

Second Crusade *see* crusades

Seventh Crusade *see* battle of Mansurah; siege of Damietta (1249)

Sevrey, Pierre de 128, 189, 198, 200

Shafi Ibn Ali 104

Shams al-Din 111

shaytani (catapult) 139

Sicily 18, 56, 74, 96, 99, 213

Sidon 41, 44, 58, 65, 117, 200, 204

siege of Acre (1189) 4-6, 136-7

siege of Acre (1291) 145-8

Christian reflections on 208-11

Christian strategies 127-9, 149, 177

destruction of the city 191-6

espionage 125, 153, 154, 155, 166-7

evacuations 174, 177, 188, 191-3, 198, 199-200

final attack 178-90

first attack 141-8

Khalil's arrival 119-25

King's Tower conquest 169-73

Mamluk strategies 125-7, 130-2, 176-7, 181-2

maritime options 158-61

mining 157-8, 167-8, 169, 200-1

morale in the camps 162-4, 168-9, 173-4, 175-6

negotiations 164-6

siegecraft of the Mamluks 133-41

sorties 150-7

Temple's last stand 196-201

siege of Arsuf 111

siege of Damietta (1218) 24

siege of Damietta (1249) 22-6

siege of Tripoli 91-4

siegecraft

of Islamic forces 64-5, 110-11, 122, 130-2, 133-41

mining 145-8, 157-8, 167-8, 169, 200-1

weapons and equipment 140

see also catapults; trebuchets

Siverey, Érad de 33

Sixth Crusade *see* crusades

slaves

captives from Acre 205, 207

military slaves 20-1

trade in 12-13, 19, 53, 75, 84

Spoletto, Valley of 186

St Andrew's Church (Acre) 159, 160, 205, 207

St Demetrius's Church (Acre) 15

St Denis 23

St John's Church (Acre) 217

St Leonard's Church (Acre) 188

St Mary's Church (Nazareth) 57

St Nicholas's Church (Acre) 188

St Paul's Cathedral (London) 210

St Peter's Monastery (Erfut) 201

St Romano's Church (Acre) 187

St Thomas's Island (Tripoli) 93

Stirling Castle 140-1

Suchem, Ludolf von 86-7, 123, 164, 215, 216

Sunqur al-Massah 107, 109

Suriano, Francesco 217

Switzerland 215

Syria

armies from 109, 116, 155, 171

battle of Homs 84

Baybars's exile to 40

Baybars's rule 54, 56

conflict in northern Syria 57, 61

conquest by the Muslims 204

Crusader States 4, 51, 68

Krak des Chevaliers 58, 60, 75-8, 115, 116, 137

Mongols' conquest of 42, 43, 46

Sunni Empire 16-17

see also Damascus; Aleppo

Tal al-Fukhar 119

Tanis 27, 28-9, 33, 34

Tartars *see* Mongols

Templar of Tyre 91

on aftermath of Acre's fall 208, 209, 214-15

on barricades of Khalil's forces 142-3

on Beaujeu's fatal wound 186-7

on defences of Acre 127, 167, 169

on deployment of Khalil's army 120-1, 122, 132, 148

on espionage 92

on evacuations from Acre 174, 177

on fall of Acre 191, 196, 197, 199, 200, 201

on final Acre attack 182, 183-4, 185

on Henry III, King of Cyprus 161, 171

on Khalil's ambitions 109-10

on murder of Acre Muslims 99-101, 101-2

on Muslim conquest of Syria 204

on Muslims' advance into Acre 170, 173

on negotiations with Khalil 165-6

on siege of Tripoli 93

on sorties by Christian army 52, 153, 155-6

on trebuchets of Khalil's forces 141, 151

Templars

aftermath of Acre's fall 211, 212-13, 215

Ayyubid civil wars 17

Bartholomew Pisan 110

battle of Mansurah 30, 30-1

Beaufort castle 67

Château Pèlerin 60, 106, 117, 204

compound of *see* Temple

conflict with Baybars 59, 65-7, 68, 79

defence of Acre 128

fall of Acre 192, 196-201

fall of Sidon 204

final Acre attack 183-4, 189-90

industrial activities 12

Safed castle 16, 58, 60, 65-7

seal of 178

siege of Acre (1291) 121, 151-2, 155-6, 163

Tripoli conflict 92

War of St Sabas 43

war with Charles of Anjou 3

see also Beaujeu, Guillaume de; Templar of Tyre

Temple 10, 14, 88, 189, 196-201

Teutonic Knights 10

aftermath of Acre's fall 212

defence of Acre 121, 128

Grand Masters 47, 117

Montfort 16, 58, 60, 79

siege of Acre (1291) 164, 170-1, 188, 197

War of St Sabas 43

Theobald, Count of Champagne 18

Theodoric, the pilgrim 160

Third Crusade 4-6, 136-7

Tiepolo, Niccolò 97, 98

Tigris 27

Tortosa 204

Touron, Le 119, 122

Tower of Blood (Acre) 123

Tower of Flies (Acre) 158, 159, 160, 219

Tower of St Nicholas (Acre) 148

Tower of the Countess of Blois (Acre) 148, 167

Tower of the English (Acre) 123, 167, 174, 177

Tower of the King *see* King's

Tower

Tower of the Patriarch 164, 165, 188

Tower of the Teutonic Knights (Acre) 197

Tower of the Venetians (Acre) 123

trade

Acre as a trade hub 3, 10-13, 75, 158

Acre's decline in 50, 71-2

Christian trade with Islam 18, 57, 74-5, 101, 103, 211

slaves 12-13, 53, 75, 84

War of St Sabas 43-4, 71, 91

see also Italian merchants

trebuchets 2

in action 114, 136-7, 143-5

construction of 97, 118

logistics and formations 110-11, 112, 115, 116, 140-2, 178

mechanics of 133-9, 138

of the Pisans 163, 183, 187

see also catapults

Tripoli 9

destruction by Qalawun 91-4

Islamic troops from 115, 116

raids by Baybars 58, 65, 67

trade in 50, 90-1

truces with Islam 79, 95

Tunis 74

tunnelling *see* mining

Turanshah, al-Muazzam 17, 27-8, 35, 38-9, 40

Turkey 27, 82, 84, 212

Cilician Armenia 42, 44, 55, 214, 215

Turkish Mamluks *see* Mamluks

Turris Maledicta see Accursed

Tower

Turuntay 108-9, 166

Tuscany 98

Tyre 16

conquest by the Muslims 203-4

coronation of King Henry II 85

Genoese in 44

raids by Baybars 58, 65

trade in 18

troops from 117

Umayyad Mosque (Damascus) 116

Upper Galilee 16

Valéry, Érard de 82

Vendac, Geoffroi de 92

Venice

Pope Nicholas IV's crusade 98

and port of Acre 160

Sanudo, Marino 89, 211

siege of Acre (1291) 123, 128, 191, 196

St Demetrius's Church (Acre) 15

threat of Acre war 110

trade interests in Acre 11, 97, 217

trade with Islam 75, 209, 211, 213

Tripoli conflict 90, 91, 93

War of St Sabas 43-4, 91, 97

see also Italian merchants

Villiers, Guillaume de 164

Villiers, Jean de

aftermath of Acre's fall 210

evacuation from Acre 191, 192

final Acre attack 184, 185-6, 188, 190

siege of Acre (1291) 122, 127, 128, 129, 131

threat of Acre war 110

Visconti, Teobaldo 74, 82

Vitry, Jacques de 8-9, 10, 13, 24, 95

Wadi al-Murrabib 111

War of St Sabas 43-4, 71, 91, 97

War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96

Warwolf (trebuchet) 140-1

weaponry

of Christian forces 127-8, 174, 775, 180-1

of Islamic forces 2, 53-4, 123, 140, 143-4, 145

trade in 12, 75

see also armour; catapults; trebuche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著；谭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1

书名原文：Accursed Tower: The Crusaders' Last Battle for the Holy Land

ISBN 978-7-5201-8690-2

I.①诅... II.①罗...②谭... III.①十字军东侵-研究 IV.①K5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44723号

地图审图号：GS（2021）4491号

诅咒之塔

——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

著者/（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

译者/谭琦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李洋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0.375 插页：0.5 字数：232千字

版次/2021年11月第1版 2021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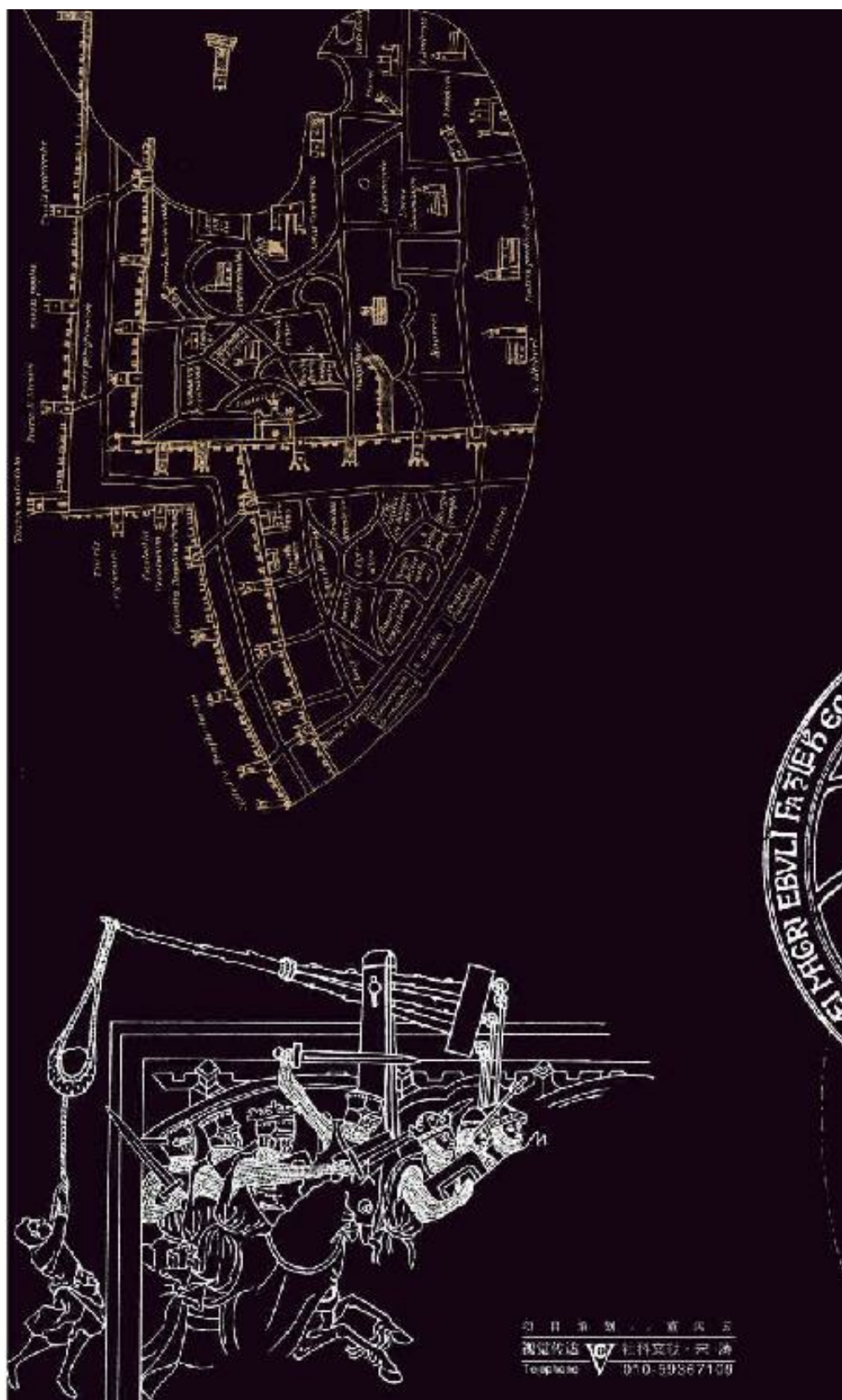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201-8690-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1-1250号

定价/6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项目策划：董佩云
 视觉传达：V 社科文化·网络
 Telephone 010-59367109

这是一位大师级历史学家振奋人心的作品，阐释了这一里程碑事件的“戏剧性象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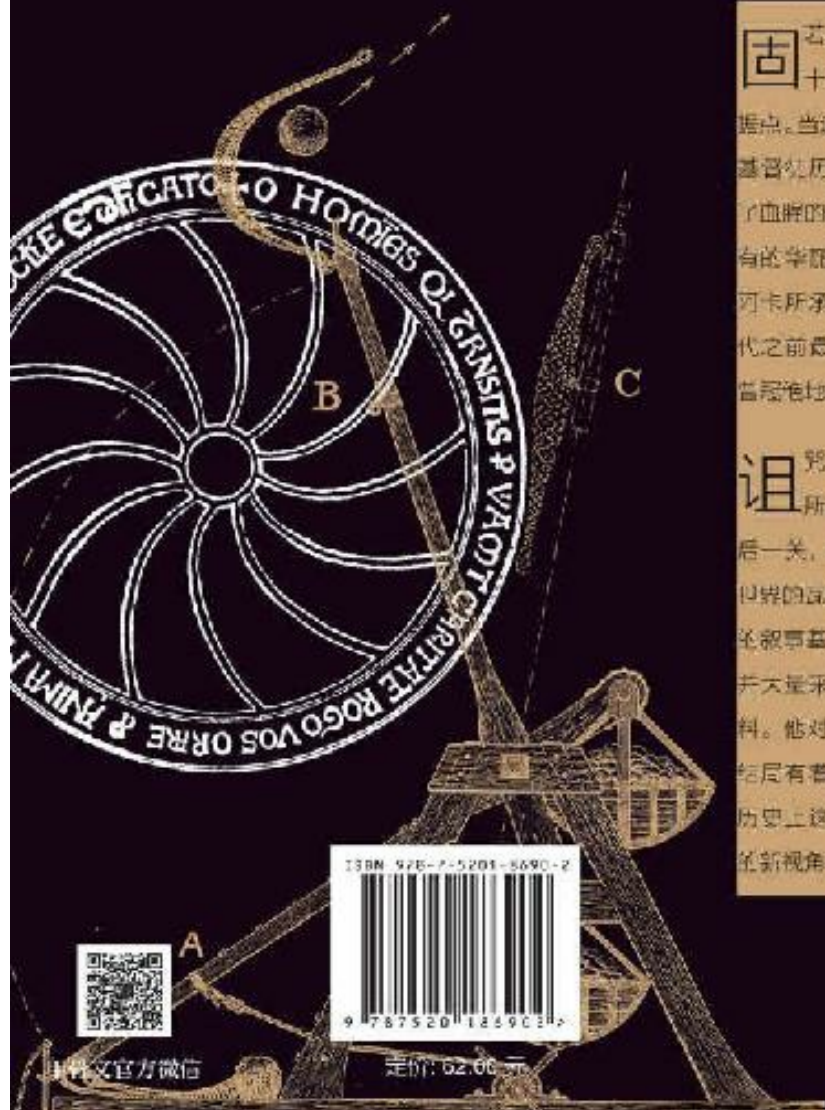
——《科克斯书评》

罗杰·克劳利再次找到了一个值得他施展中众才能的主题。他对阿卡陷落的描述激动人心，令人无法抗拒。这是一本让人欲罢不能的杰作。

——西恩·麦克米金 (Sean McMeekin)，《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作者

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最好的历史叙事作品：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充满了在史诗般的冲突中挣扎、生活和献死的真实人物。

——帕特里克·怀曼 (Patrick Wyman)，哲学博士，《历史潮流》播客主持人



固若金汤，战备充足的阿卡是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的最后据点。当这座城市于1291年陷落时，基督教历时二百年的圣地征战走向了血腥的终结。罗杰·克劳利以俄罗斯有的华丽语言和直观叙事，记述了阿卡所承受的凌厉打击——火药时代之前最猛烈的狂轰滥炸，使这座曾经地中海的城市化为一堆废墟。

诅咒之塔即此次围攻战的焦点所在。作为十字军防线上的最后一关，这座塔楼的得失象征着旧世界的瓦解和新时代的来临。克劳利的叙事基于大量取证的正式研究成果，并大量采用了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他对十字军时代那些戏剧性的结局有着精彩的分析，为理解世界历史上这一关键转折点提供了重要的新视角。



人文官方微信



定价: 62.00 元

王冠文

地中海
历史
三部曲

1453

ROGER CROWLEY

[英] 罗杰·克劳利 / 著

陆大鹏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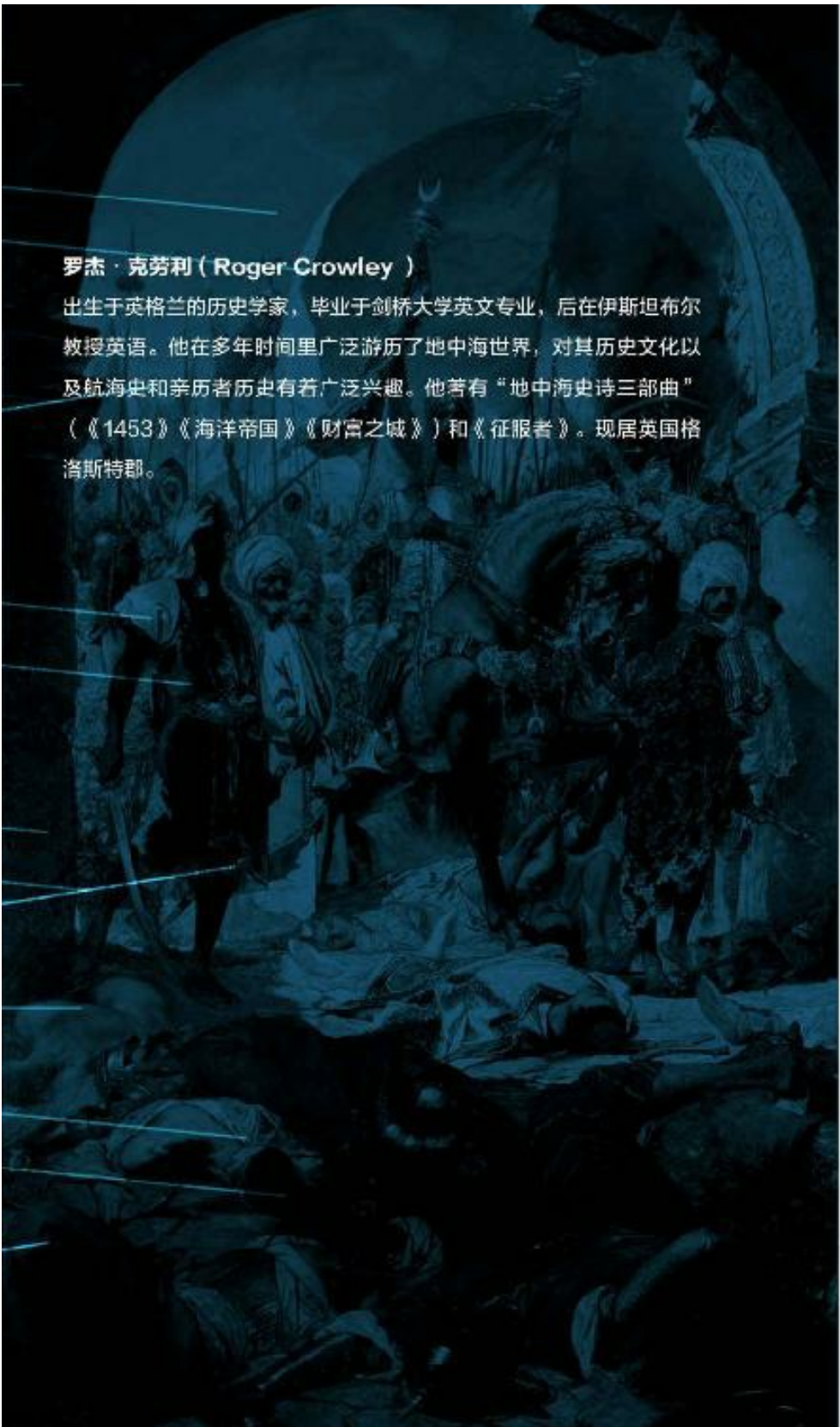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君士坦丁堡之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SSAP)



罗杰·克劳利 (Roger Crowley)

出生于英格兰的历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专业，后在伊斯坦布尔教授英语。他在多年时间里广泛游历了地中海世界，对其历史文化以及航海史和亲历者历史有若广泛兴趣。他著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和《征服者》。现居英国格洛斯特郡。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AUTHOR: ROGER CROWLEY

Copyright © 2005 BY ROGER CROW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LOWNIE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地中海
历史
三部曲

1453

君士坦丁堡之战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ROGER CROWLEY

〔英〕罗杰·克劳利 / 著

陆大鹏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一幅15世纪绘制的由城墙环绕的君士坦丁堡地图。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赛马场在右侧，主路从左侧的陆墙处延伸出来。金角湾港口北方是热那亚人的城镇佩拉（或称加拉塔）。



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景象。加拉塔在右侧，金角湾之外。铁链封锁着金角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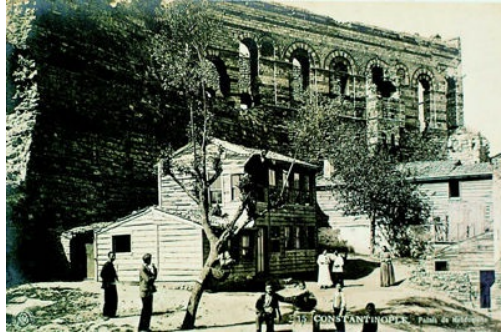


奥斯曼细密画，晚年的穆罕默德二世，表现的是他热爱自然和学术的一面。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宏伟中殿，这是古典时

代晚期最神奇的建筑。



19世纪布雷契耐皇宫的照片，这是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守城期间的指挥部，位于金角湾附近单层陆墙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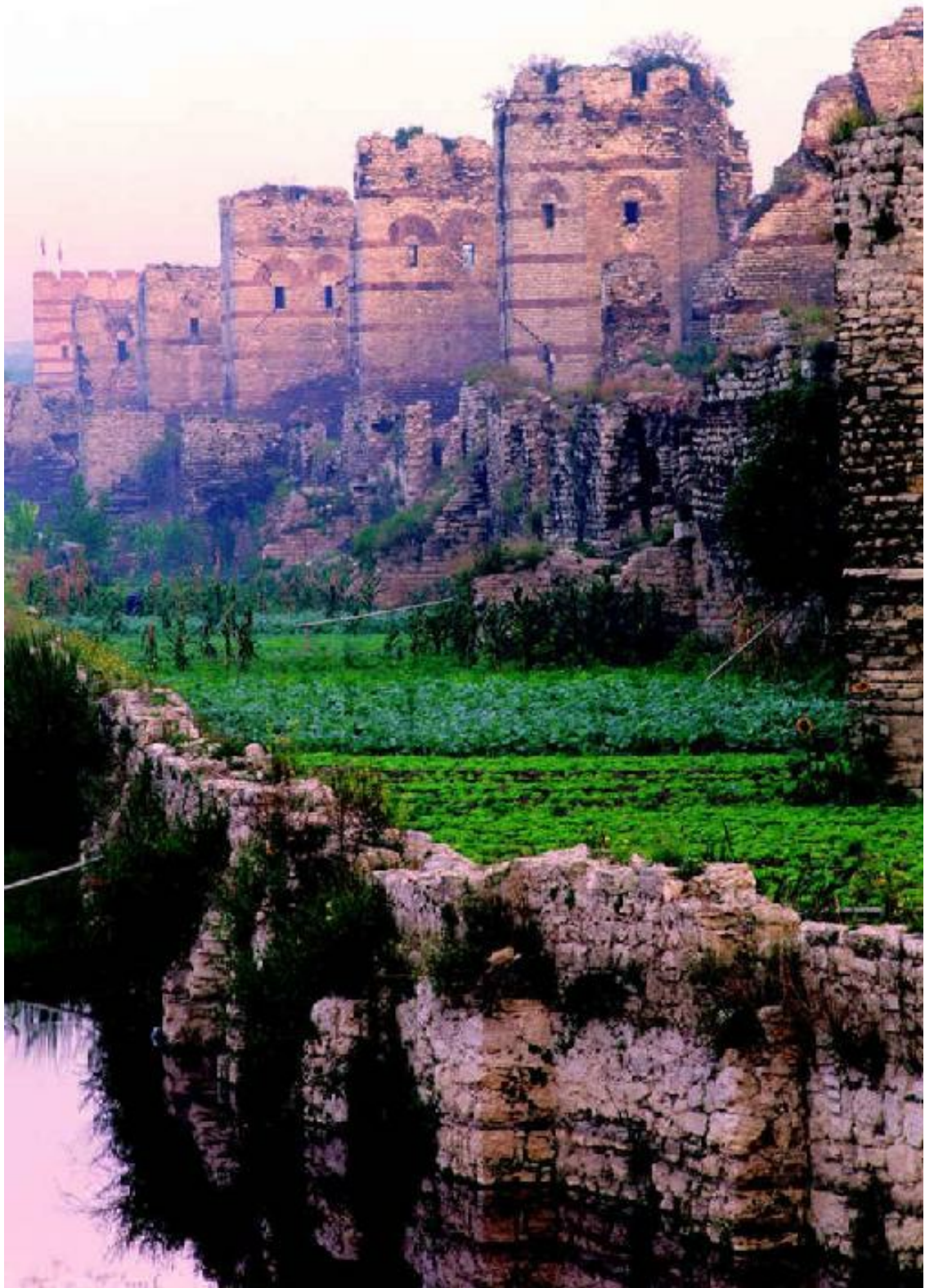
在现代，三道陆墙的一段遗存。首先是内层塔楼一线，然后是被炮火严重破坏的外层塔楼。中间是壕沟，今天已经大部分填平了，但当年深达**10英尺**，沟壁上砌着砖，在攻城战中给奥斯曼人带来了很大麻烦。越过壕沟之后，攻城者必须先守军劈头盖脸的火力之下冲过开阔的平台，然后才能攀爬外墙。



金角湾的巨大铁链，每个铁环长**18英寸**。这幅照片是在**19世纪**拍摄的，说明历经数百年之后，铁链的许多部分仍然散落在城市各处。



乌尔班的攻城巨炮早已销声匿迹，但有几尊较小的大炮在伊斯坦布尔被保存至今。
这尊巨大的铜炮长**14**英尺，重**14**吨，发射的是重达**500**磅的石弹。



今日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城墙，可见其塔楼和壕沟。



今日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现在的名字叫做圣索菲亚清真寺，其穹顶令人惊叹。



贝利尼的画作，描绘的是一名近卫军士兵，头戴标志性的白帽，身配箭筒、弓和剑。这位意大利艺术大师能够在平面的纸上创作出栩栩如生的立体人像，据说迷信的穆罕默德二世对他的这种神奇本领既着迷，又很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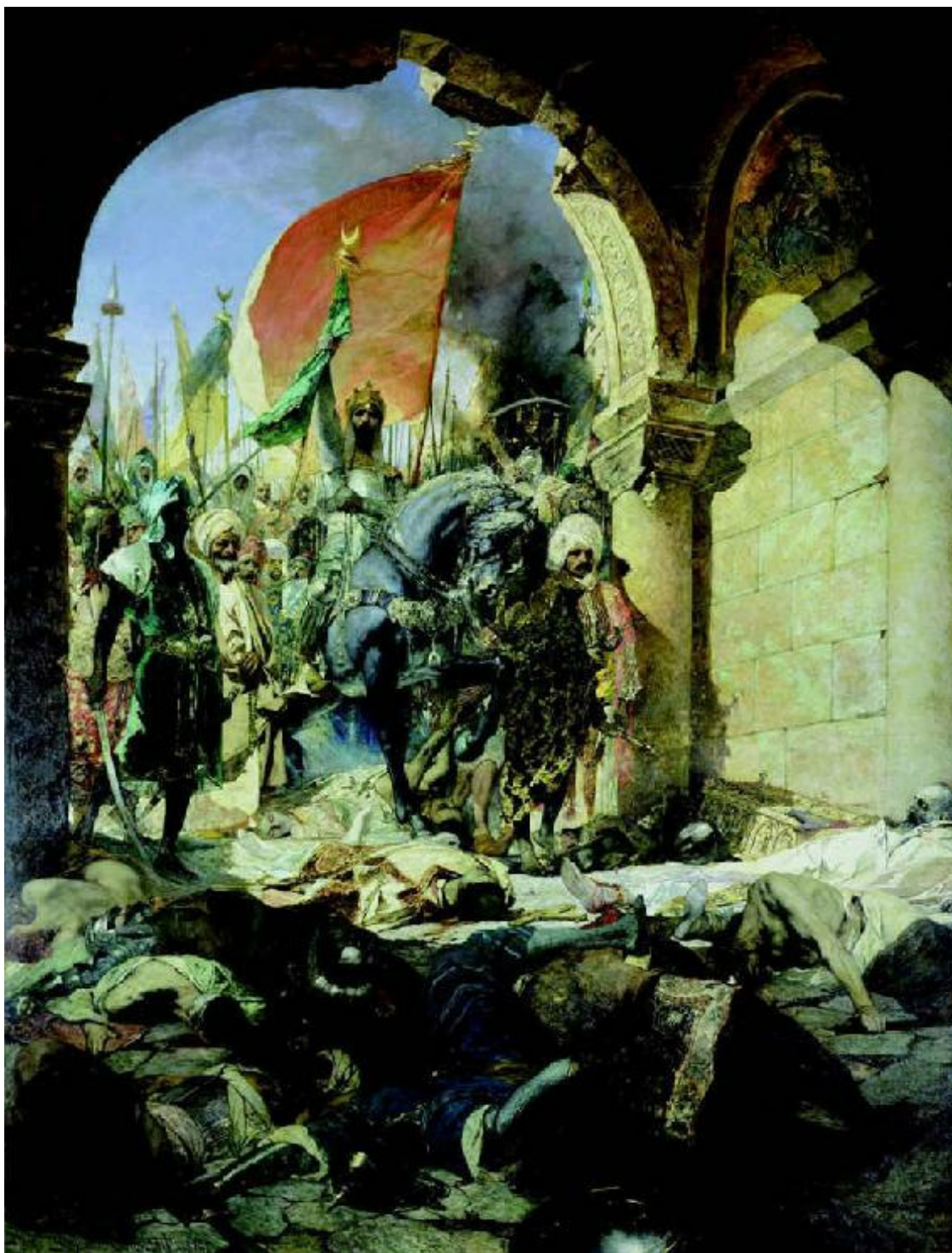
16世纪的近卫军士兵像，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名精英战士，帽子上配有羽饰，肩扛火枪。



1453年后不久欧洲人创作的攻城图，表现了战役的许多关键事件。在下方是苏丹的大帐，旁边是他的大炮。君士坦丁堡城在上方。金角湾入口处的铁链被画成一座桥。



现代人创作的最后总攻图：前景中是巨炮。士兵们用云梯爬城。塔楼上有一名奥斯曼士兵挥舞红旗，但塔楼前方仍然悬挂着拜占庭的双头鹰旗帜。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兰战士的簇拥下入城。前景地面上是守军的尸体。



贝利尼的著名穆罕默德二世肖像，处在皇室穹顶的框架之下，文字是“世界的征服者”，但穆罕默德二世看上去有些憔悴消瘦，可能身体不适。



16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建为清真寺，由著名的奥斯曼建筑师希南添加了尖塔。



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宫殿，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米斯特拉斯，被称为“小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精神的一个寓意深远的纪念。

《今日美国》夏季最佳图书 《旧金山纪事报》夏季最佳图书

克劳利引人入胜的叙述.....读之更像生动的小说。人物.....描摹极其细致，全都是基于历史文献，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洛杉矶时报》

克劳利对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重述极富戏剧性，激动人心。

——《旧金山纪事报》

出神入化.....罗杰·克劳利为一个古老而永远引人入胜的故事注入了新活力。《1453》融合了军事史的令人着迷的细节和对宗教意象的丰富指涉，这些意象对战争的双方都有极大影响。

——《经济学人》

节奏轻快，是了解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长期敌对关系的入门必读书。

——《科克斯书评》

君士坦丁堡是一座美名远播的都市，愿大慈大悲和慷慨大度的真主将它变为伊斯兰的都城。

——哈桑·阿里·哈拉维，12世纪阿拉伯作家^[1]

我要讲述的是弥天大祸的故事……君士坦丁堡的故事，皆是我亲眼所见。

——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2]

^[1] quoted Stacton, D., *The World on the Last Day*, London, 1965, p.153

^[2]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12

中文版序

《1453》《海洋帝国》和《财富之城》这三本书互相关联，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部曲，叙述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读者可以从其中任意一本读起。这三本书涵盖的时间达四个世纪之久，从1200年到1600年，这是不同文明和互相竞争的各大帝国为了领土、宗教信仰和贸易控制而激烈地冲突的年代。这场冲突的参与者包括拜占庭帝国（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继承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们复兴了伊斯兰“圣战”的精神），以及西班牙的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朝。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从一个泥泞的潟湖崛起为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城市，宛如令人叹为观止的海市蜃楼，从水中呼啸而起。威尼斯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当年和今天一样，在异邦人眼中非同寻常、精彩纷呈。

在这个时期，各国为争夺地中海爆发了激烈战争。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各族群——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北非人和法兰西人——认为自己是在为争夺世界中心而战。但与真正的大洋相比，地中海其实是很小的。各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只有投石之遥，于是大海成了一个封闭的竞技场，大规模的厮杀就在这里上演。在这个年代，火药武器开始彻底地改变战争的面貌。大海是史诗般攻城战、血腥海战、海盗行径、人口劫掠、“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圣战”的场所，也是利润丰厚的贸易和思想交流的途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漫长而残酷的竞争从本三部曲涵盖的时期开始，将大海分裂为两个迥然不同的区域，双方沿着海上疆界进行了激烈较量。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9·11”事件之后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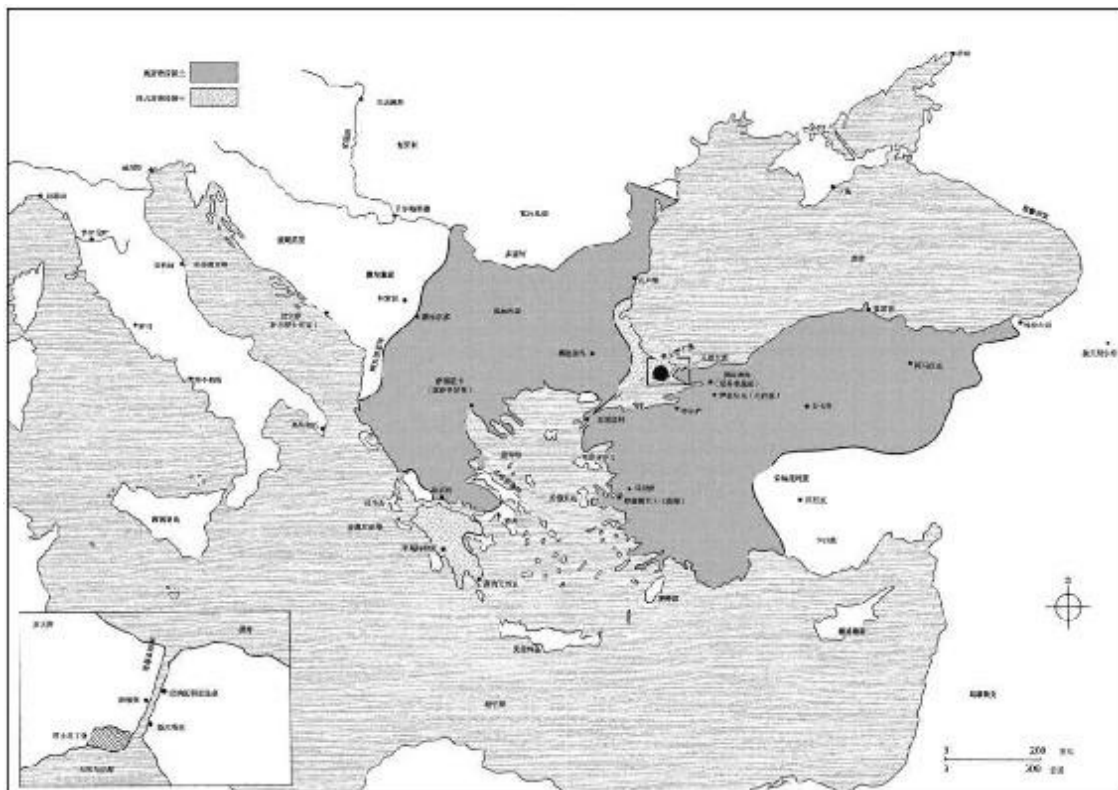
幸运的是，大量关于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目击资料留存至今，尤其是从大约1500年开始，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刺激了文字材料的爆炸式增长，所以我们得以感同身受地重温这段历史。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我们常常能够近距离观察当时的事件，审视那时的人们如何生活、死亡、战斗、从事贸易，以及礼拜上苍。我尽可能地引用当时人们自己的话，让他们为自己发言。

这三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场所”。在地中海地区，我们在游览威尼斯、伊斯坦布尔，或者克里特、西西里和塞浦路斯等大岛屿的时候，仍然能够触及过去。许多纪念建筑、城堡、宫殿和遗址依然完好。借用伟大的地中海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这片大海耐心地为我们重演过去的景象，将其放置在蓝天之下、厚土之上，我们能亲眼看见这天与地，它们如同很久以前一样。只消集中注意力思考片刻或者瞬间的白日梦，这个过去就栩栩如生地回来了。”^[1]我希望这三部曲能够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地中海历史以及那里发生的事件（它们至今影响着我们的世界）的重要意义，对其产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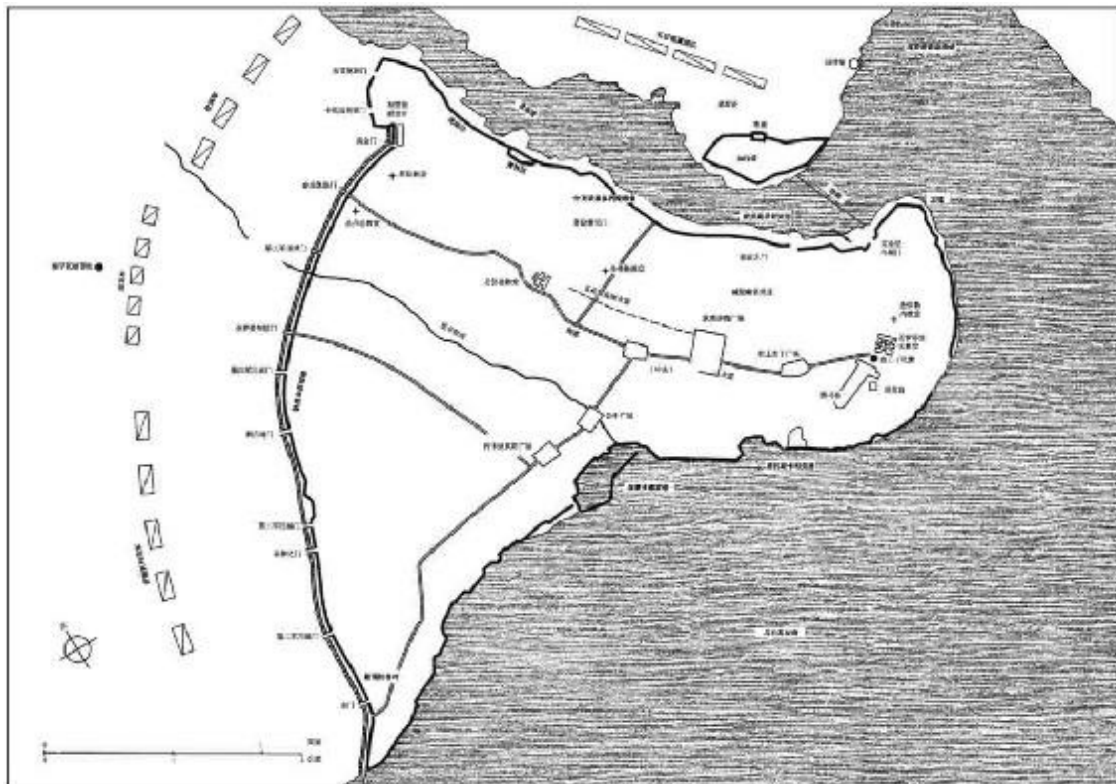
罗杰·克劳利

^[1]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 trans.Sian Reynolds, London, 2001.

- [序言：红苹果](#)
- [1.燃烧的海](#)
- [2.伊斯坦布尔的梦想](#)
- [3.苏丹和皇帝](#)
- [4.割断喉咙](#)
- [5.黑暗的教堂](#)
- [6.城墙和大炮](#)
- [7.浩瀚如繁星](#)
- [8.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
- [9.上帝的神风](#)
- [10.鲜血的螺旋](#)
- [11.恐怖的机械](#)
- [12.不祥之兆](#)
- [13.“铭记这一天！”](#)
- [14.紧锁的城门](#)
- [15.一捧尘土](#)
- [16.世界的梦魇](#)
- [尾声：安息之地](#)
- [资料来源](#)
- [鸣谢](#)
- [译名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译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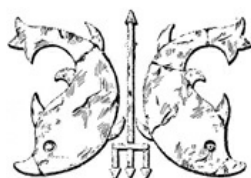


地中海东部，1451年



君士坦丁堡，1453年

序言：红苹果



红苹果惹人摘。

——土耳其谚语

初春。一只黑鸢在伊斯坦布尔的天空中随风翱翔。它在苏莱曼清真寺周围懒洋洋地划着圈，似乎被束缚在尖塔上。从这里，它可以俯瞰这座1500万人口的城市，泰然自若地静观光阴流逝。



1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想象图，图中右侧远处为加拉塔

如果这只猛禽的先祖1453年3月的寒冷清晨在君士坦丁堡上空盘旋，就会发现，城市的布局与今天相差无几，但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熙熙攘攘。这座城市的形状非常奇特，大致呈三角形，东边的角有些向上翘，像头凶猛犀牛的尖角，三角形的南北两边都得到大海的保护。北边是有屏障保护的金角湾深水港；南面毗邻马尔马拉海。马尔马拉海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向西奔涌，注入地中海。从空中俯瞰，可以轻松地辨认出三角形沿海的两边岸上连绵不绝的防御工事。海潮则以每小时7海里的速度从犀牛角尖端旁汹涌流过。这座城市既有天然屏障，也有人工防御。

但这个三角形的西面底边最为不同寻常。那是一个复杂的三重城墙系统，设有许多间隔很近的塔楼，城墙外开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壕沟。城墙从金角湾一直延伸到马尔马拉海，封闭了城市，阻挡住外来的入侵。这就是历经千年的狄奥多西城墙，中世纪世界最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对14和15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它是“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对他们的雄心予以嘲讽，是个心理阴影，阻碍了他们宏图霸业的实现。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它是抵抗伊斯兰教的壁垒，保护他们免遭伊斯兰世界的入侵，让他们志得意满。

如果你在1453年春季俯瞰这座城市，还能辨认出筑有防御工事的热那亚城镇加拉塔，这是位于金角湾北侧的一个小小的意大利城邦，那里就是欧洲疆域的尽头。博斯普鲁斯海峡割断了欧亚大陆，像一条大河一样穿过覆盖森林的丘陵，一直到黑海。海峡的另一边是小亚细亚，或者叫安纳托利亚，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东方”。奥林匹斯山白雪皑皑的峰顶就在60英里外，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在朝向欧洲的那一侧，大地较为平坦、起伏和缓，延伸到西面140英里处的奥斯曼城市埃迪尔内^[1]。就在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在连接两座城市的崎岖道路上，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行

军。大群的白帽和红头巾在移动；劲弓、标枪、火绳枪和盾牌在低角度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成队的前驱骑兵在经过时掀起烟尘；链甲如同涟漪，叮当作响。随后是长长的辎重队伍，有大群骡子、马匹和骆驼，驮着各式军需物资和相应人员——矿工、厨师、军械匠、毛拉^[2]、木匠和被战利品吸引而来的冒险家。队伍更后方还有一些东西。大群公牛和成百上千的劳工正在无比艰难地将大炮拖过松软的土地。整个奥斯曼军队都在行动。

如果你能看得更远，就能发现这次军事行动的更多细节。一群划桨船正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方向艰难而缓慢地顶风驶来，活像是中世纪绘画的背景。高舷运输船正从黑海运来木材、粮食和炮弹。成群的牧人、圣徒、随军商贩、营妓以及流浪汉从安纳托利亚的高原走来，直奔博斯普鲁斯海峡，响应奥斯曼帝国的号召。这些参差不齐的人员和装备组成了一支协调有力的大军，而这支大军只有一个目标：君士坦丁堡，即古老的拜占庭帝国在公元1453年的残余部分的都城。

即将交锋的中世纪各民族是非常迷信的。他们相信预言，追寻征兆。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古老的纪念碑和雕像都是魔法的源泉。人们相信，对世界未来的预言就隐藏在罗马石柱的铭文中，尽管这些铭文的最初故事已经被人遗忘。他们从天气中也能读出迹象，并感到1453年的春季非常令人不安。天气非常湿冷。3月，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笼罩着浓雾。有地震发生，而且还在反常的季节下了雪。在充满期待的城市内，这都是不吉利的预兆，或许甚至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正在逼近的奥斯曼军队也有自己的迷信。他们把此次征伐的目标简单地称为“红苹果”，因为它是世界霸权的象征。攻克这座城市是一个可以上溯800年的热忱的伊斯兰梦想，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关于这座城市有着太多的传说、预言和伪经言论。在正在行进的士兵们的想象中，苹果在城内有个具体的位置。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外100

英尺高的石柱上矗立着查士丁尼皇帝的青铜骑马像，这是一座与早期拜占庭帝国威势相称的宏伟纪念碑，也象征着拜占庭扮演的角色：抵御东方侵袭的基督教堡垒。根据6世纪作家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这座纪念碑非常震撼人心。

骑马像面向东方，仪态高贵。骑着马的皇帝雕像全身披挂像阿喀琉斯一样.....胸甲是英雄的风格；头上的头盔似乎在上下晃动，非常耀眼。他眺望东升的旭日，纵马奔驰，似乎要冲向波斯。他左手拿着一个球，雕刻家以此表示，整个地球和海洋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尽管除了球上有一座十字架，他没有剑或矛或任何其他武器，但仅凭十字架的力量，他就获得了自己的帝国，赢得了战争。^[3]

土耳其人想象中的红苹果就是查士丁尼手中的带十字架的球。土耳其人也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极具传奇性的古老基督教帝国的威望，以及它似乎蕴含的世界霸权的可能性。



查士丁尼像

拜占庭人的记忆中有根深蒂固的对围城的恐惧。恐怖的围城威胁着他们的图书馆、大理石房屋和饰有马赛克的教堂。但他们对围城非常熟悉，因此绝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在公元1453年之前的1123年里，君士坦丁堡被围攻了大约二十三次。但它只被攻破过一次，不是被阿拉伯人或者保加人^[4]，而是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基督教骑士占领，这是基督教历史上最诡异的事件之一。城市的陆墙从未被攻破过，但在5世纪时曾因为地震而坍塌。除此之外，城墙一直固若金汤，因此当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在1453年4月6日终于兵临城下时，守军是很有希望生存下去的。

这个时刻之前和之后的故事便是本书的主题。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勇气与残忍、技术上的聪明才智、幸运、怯懦、偏见和奥秘的故事。它也涉及一个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世界的其他很多方面：火炮的研发、攻城战的艺术、海战策略、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纪人们的神话和迷信。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地理的故事，关于海流、山岭、半岛和天气，关于土地的起伏和海峡如何将两个大陆分割开——但两个大陆又如此接近，“几乎能够互相亲吻”，强大的君士坦丁堡就屹立于此，受到险峻的岩石海岸的保护，但地质的特殊条件使得它在攻击面前又特别脆弱。这个故事讲述了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无限可能，它给贸易、防御和生计带来的好处，正是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命运的关键所在，也吸引了诸多军队来到它城下。“罗马帝国的都城是君士坦丁堡，”特拉布宗的乔治^[5]写道，“罗马人的皇帝同时也是全世界的皇帝。”^[6]

现代民族主义者将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解读为希腊民族和土耳其民族之间的斗争，但这种简单化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双方都不会接受甚至无法理解这样的标签，尽管双方都用这样的说法来指代彼此。奥斯曼人，或者按照字面意思，就是“奥斯曼的部落”，都自称为奥斯曼人，或

者简单地称自己为穆斯林。“土耳其人”（Turk）是西方各个民族国家使用的一个词，总体上是贬义的。1923年，为了建立共和国，奥斯曼人才从欧洲借用了“土耳其”（Turkey）这个词。在此之前，这个说法在奥斯曼帝国并不为人所知。1453年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将它征服的各民族都吸纳进来，而很少考虑他们的种族身份。帝国的精锐部队是斯拉夫人，主要将领是希腊人，海军将领是保加利亚人，苏丹可能有一半塞尔维亚或者马其顿血统。另外，在中世纪复杂的附庸封建体制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士兵也伴随苏丹从埃迪尔内开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前来的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讲希腊语的居民，我们现在把这些居民称为“拜占庭人”，这个词第一次在英语中使用是在1853年，也就是这场伟大攻城战发生400年之后。拜占庭人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因此自称罗马人。统领他们的皇帝却有一半的塞尔维亚血统和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而且守军的很大一部分是西欧人，也就是拜占庭人所说的“法兰克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加泰罗尼亚人，还有一些土耳其人和克里特人，甚至还有一个苏格兰人。如果说很难确定攻防战参与者的民族身份，有一个因素却是所有同时代的史学家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信仰。穆斯林将他们的对手称为“可鄙的异教徒”“可怜的不信真主的人”“信仰的敌人”；基督徒则称穆斯林为“异教徒”“野蛮人”“无信义的土耳其人”。君士坦丁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漫长距离上进行的斗争的最前线。在这里，对真理的不同解释在战争与和平中对抗了800年。1453年的春天，两大一神教将在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在此地激烈碰撞。

[1] 埃迪尔内旧称哈德良堡或阿德里安堡，因罗马皇帝哈德良所建而得名。现在是土耳其埃迪尔内省省会，位于邻近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境。著名的阿德里安堡战役就发生在此地：公元378年，罗马帝国军队与哥特人交战，遭到惨败，皇帝瓦伦斯阵亡。另外，1365~1453年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2] 毛拉是伊斯兰教内对学者或宗教领袖的称呼，特别是在中东和印度次大陆。原意为“主人”，在北非也用在国王、苏丹和贵族的名称前。现称毛拉者，多为宗教

领袖，包括宗教学校的教师、精通教法的学者、伊玛目（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和诵经人。

[3] Procopius, *Buildings*, London, 1971, p.35

[4] 保加尔人是发源自中亚的游牧民族，为突厥人的一支，从公元7世纪起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定居下来，为巴尔卡尔人与保加利亚人、楚瓦什人和中国的塔塔尔族的先祖。保加尔人后来逐渐斯拉夫化，现已消亡。

[5] 特拉布宗的乔治（1395～1472/1473），希腊哲学家与学者，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一。他生于克里特岛，但因其先祖来自特拉布宗，因此被称为“特拉布宗的乔治”。他青年时来到意大利，很快成为知名学者。1420及1433年分别任维琴察大学和威尼斯大学希腊语教授，成为文艺复兴的首要人物。他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动物志》、柏拉图的《法律篇》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译成拉丁文，虽错误很多，有时受到批评，但丰富了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内容。

[6] Mansel, Philip,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1924*, London, 1995, p.1

1.燃烧的海

629～7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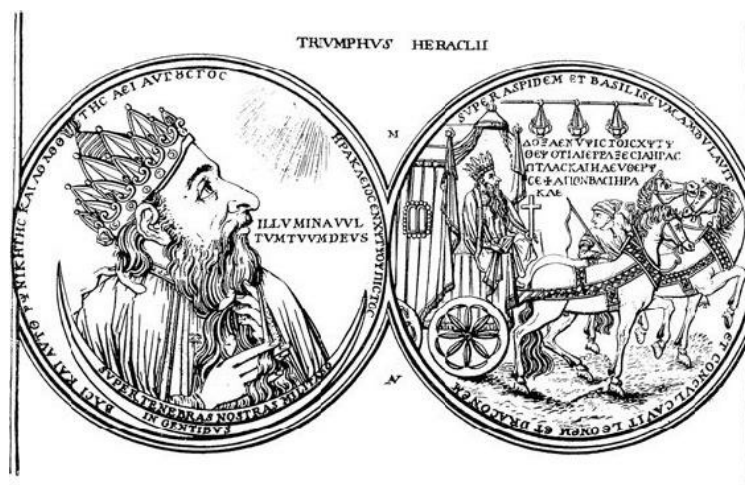
哦，基督，世界的统治者和主宰，此刻我将这座城市、这些权杖，以及罗马的强力奉献于你。^[1]

——君士坦丁堡城内，君士坦丁大帝石柱上的铭文

伊斯兰世界对这座城市的渴望几乎和伊斯兰教本身一样古老。争夺君士坦丁堡的圣战由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在一个偶然事件中最先发起。这个故事的真相，就像这座城市历史的大部分一样，已经无法辨明真假。

公元629年，希拉克略——“罗马人的君主”和拜占庭的第二十八位皇帝——徒步前往耶路撒冷朝觐。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荣耀的时刻。他在一系列战役中大败波斯人，夺回了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圣物——真十字架。现在，他要带着胜利的荣耀将真十字架返还圣墓教堂。根据伊斯兰方面的记载，他在抵达耶路撒冷城时收到了一封信。信中简单地说：“以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名，穆罕默德，真主的奴仆和他的使徒，向希拉克略，拜占庭人的君主致意。愿遵循真主教导的人都得平安。我邀请你向真主投降。接受伊斯兰，真主将给你双倍的报偿。但如果你拒绝这个邀请，就将误导你的人民。”^[2]希拉克略完全不知道写这封信的是什么人。但据说他派人进行了探寻，并郑重地对待这封信的内容。穆罕

默德发送给波斯“万王之王”的类似的信则被撕得粉碎。穆罕默德对这个消息的回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的宗教和我的统治将达到霍斯劳^[3]的王国从未涉足的疆界。”^[4]对霍斯劳来说这个警告来得太晚了，因为他已经在前一年被一箭一箭地慢慢射死。但这封后人附会的信预示着，可怕的打击即将降临基督教拜占庭和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头上，将让希拉克略皇帝的功业全都化为泡影。



希拉克略带着真十字架凯旋

在此前的10年内，穆罕默德成功地将阿拉伯半岛互相混战的各部落团结在伊斯兰的朴素信条周围。在真主圣言的鼓舞下，在集体祈祷的训诫下，成群结队的游牧劫掠者变成了一支组织有力的军队。它征服的欲望超越了沙漠的边界，投向正被不同信仰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区域的外部世界。一边是伊斯兰世界，一边是“战争的世界”，即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世界。到7世纪30年代，穆斯林军队如同从沙尘暴中冲出的幽灵一般，开始出现在拜占庭边境（那里也是有人定居的土地和沙漠的边界）。阿拉伯人敏捷灵活、足智多谋，而且吃苦耐劳。他们把叙利亚境内笨重的拜占庭雇佣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进攻之后又撤回了沙漠，将对手诱出要塞，进入荒芜之地，将其分割包围，全部消灭。他们穿过荒无人烟、条件恶劣的地域，途中宰杀自己的骆驼，从它们的胃中取水，随后再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后方。他们围攻城市，学会了攻城战

术。他们攻克了大马士革，然后是耶路撒冷；埃及于641年俯首称臣，亚美尼亚在653年举手投降。20年内，波斯帝国就轰然垮台，并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征服的神速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入乡随俗的本领也非同寻常。在真主圣言和神圣征服的驱动下，来自沙漠的人民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的帮助下，于当地的造船厂建造了自己的舰队，以“在海上开展圣战”^[5]。他们于648年占领了塞浦路斯，然后在655年的“桅杆之战”^[6]中击败了一支拜占庭舰队。最后，在669年，也就是穆罕默德去世不到40年之后，哈里发穆阿维叶派遣了一支庞大的海陆混合部队前去猛攻君士坦丁堡。在一连串胜利之后，他自信能够顺利拿下这座城市。

对穆阿维叶来说，这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计划的巅峰，此前他为了这个计划的运筹和执行已经投入了极大心血。669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对岸的亚洲海岸。次年，一支拥有400艘舰船的舰队驶过达达尼尔海峡，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库济库斯半岛建立了一个基地。在这里，阿拉伯军队囤积了补给物资，建造了干船坞和用于长期围城的维修设施。穆斯林在君士坦丁堡以西渡过海峡，首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在这里，他们占领了一个港口，从那里围攻城市，并在其腹地周围发动多次大规模袭击。君士坦丁堡的守军躲避在厚实的城墙之后，同时他们的舰队停泊在金角湾，准备对敌人发起反击。

在674~678年的连续5年时间里，阿拉伯人坚持不懈地围攻城市。每年春秋之间，他们攻打城墙，并在海峡内发动海战，与拜占庭舰队持续交锋。双方使用的是相同类型的桨帆船，船员也大体是一类人，因为穆斯林的航海技术是从业已征服的黎凡特^[7]的基督徒那里学来的。冬季，阿拉伯人重新集结在他们的库济库斯基地，修理船只，准备在次年更进一步。他们对君士坦丁堡进行长期围困，坚信胜利终将属于他们。

但在678年，拜占庭舰队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他们向穆斯林舰队发动进攻，时间可能是作战季节的末尾，进攻目标是穆斯林的库济库斯

基地。这次攻势的细节要么不甚清楚，要么被故意隐瞒了。拜占庭舰队的先锋是一群快速的德罗蒙战船，这是一种轻型快速的桨帆船。关于当时的战况，没有同时期的文献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根据后来的记载进行推测。进攻的拜占庭舰船逼近敌人时，除了放出常规的箭雨之外，还从船首高高的喷嘴里射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烈火的激流。互相逼近的两军之间的海面登时熊熊燃烧起来，然后穆斯林船只也被大火吞没，火焰“就像闪电般降落下来”^[8]。火焰爆炸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黑烟遮天蔽日，蒸汽和毒气让阿拉伯战船上心惊胆寒的水手们窒息倒毙。这火雨似乎能够违抗自然规律：它可以根据操作者的意志向任何方向移动，可以向两侧转移方向，也可以从任意角度向下喷射。它接触到海面之后，海水也会燃烧起来。它似乎还有黏着性，能够粘在木制船体和桅杆上，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将它扑灭。于是舰船和船员都迅速被狂飙突进的火流吞没，那看上去像是天神在大发雷霆。这片非同一般的火海“烧毁了阿拉伯人的船只，将他们的船员活活烧死”^[9]。阿拉伯舰队遭到灭顶之灾，饱受摧残的幸存者“损兵折将，伤亡严重”^[10]，放弃了围城，返航回乡。冬季的风暴又摧毁了大部分幸存的船只，而阿拉伯陆军则在亚洲海岸遭到伏击和全歼。穆阿维叶灰心丧气，不得不在679年接受了条件非常不利的三十年和约，就此一蹶不振，在次年死去。穆斯林的事业第一次遭受了严重挫折。

史学家们将这场战事付诸笔端，认为它明白无误地证明了“罗马帝国自有神助”^[11]，但事实上，拯救拜占庭的是一种新技术：希腊火。甚至直至今日，这种神奇武器的故事仍然是激烈争论和推测的主题。它的配方被拜占庭视为国家机密。据传说，大约在围城的那个时期，一个名叫卡利尼克斯的希腊逃犯从叙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带来了一种用虹吸管喷射液态火的技术。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他应当是对当时在中东广为人知的火攻武器技术进行了改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希腊火的核心成分就是黑海天然油井产出的原油，混以粉末状的树脂，以赋予它黏着性。在漫长的围城期间，君士坦丁堡的秘密军工厂完善了喷射这种

物质的技术。拜占庭人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应用工程技能，似乎研发了一种技术，用密闭的铜容器加热这种混合物，用手压泵对铜容器加压，然后将混合物从喷嘴释放出来，在喷嘴处就可以将这种液体点燃。在木船上操作易燃物、压力设备和火焰，着实需要精准的生产技术和技艺高超的操作人员。于678年打破阿拉伯人斗志的希腊火的秘密就在于此。

40年间，在君士坦丁堡遭遇的挫折让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们耿耿于怀。令伊斯兰神学界不可思议的是，人类竟然没有渐渐全部皈依伊斯兰教或者屈服于穆斯林的统治。717年，伊斯兰世界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更坚决的一次尝试，一心要克服这个阻碍伊斯兰信仰向欧洲传播的障碍。阿拉伯人进攻时，拜占庭帝国内部恰好发生了动乱。新皇帝利奥三世于717年3月25日登基；5个月后，他发现，一支8万人的阿拉伯大军在君士坦丁堡陆墙全线掘壕据守下来，同时还有1800艘战船控制着海峡。阿拉伯人的战略比上一次进步了不少。穆斯林军队的统帅马斯拉玛很快意识到，攻城武器奈何不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一次必须对城市进行彻底封锁。他的军队带来了小麦种子，准备播种，这印证了他进行长期围困的决心。717年秋天，他们在城墙外开垦土地，播下种子，次年春天的收成将为军队提供粮食。然后他们安营扎寨下来，静观其变。拜占庭人用装备希腊火的战船发动突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未能打破封锁。穆斯林对一切都做了精心准备，一心要打垮异教徒。

但随后，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不可避免也无法逃脱地逐步降临到了阿拉伯人头上。根据他们的史学家记载，利奥三世通过超乎寻常的、按照拜占庭人的标准也算非常突出的外交欺骗手段蒙蔽了他的敌人。他说服了马斯拉玛，他说如果阿拉伯人销毁自己的储粮，并给守军一些谷物的话，他就能让城市投降。马斯拉玛照办之后，利奥三世就稳坐在城墙后面，不肯出来谈判。上当的阿拉伯军队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遭到了严冬的摧残。大雪覆盖地面达100天之久；骆驼和马匹逐渐被冻死。越来越绝望的士兵们别无选择，只能把死牲口吃掉。一向偏颇的希腊史学

家暗示，阿拉伯军营里发生了更恐怖的事情。忏悔者狄奥法内斯^[12]在100年后写道：“据说，他们甚至将死尸放在炉子上烘烤，将它们吃掉，还吃了发酵的粪便。”^[13]紧随饥荒而来的是瘟疫，还有成千上万人被冻死。阿拉伯人对博斯普鲁斯海峡令人震惊的寒冬毫无经验：地面被冻得铁板一块，无法挖坑安葬死者；他们不得不将几百具尸体海葬。第二年春天，一支庞大的阿拉伯舰队运载粮食和装备抵达，准备接应受到严酷打击的陆军部队，但也未能挽回败局。阿拉伯海军深知希腊火的厉害，卸载货物后就躲在亚洲海岸。不幸的是，有些船员是埃及基督徒，他们逃到拜占庭皇帝那里，将阿拉伯舰队的位置报告给他。帝国派出一队火船，袭击了毫无防备的阿拉伯舰队，将其全歼。从叙利亚赶来救援的阿拉伯陆军则遭到拜占庭步兵的伏击和屠杀。同时，意志坚定、诡计多端的利奥三世在和不信基督教的保加尔人谈判。他说服了保加尔人，让他们进攻城墙外的异教徒；2.2万阿拉伯人在随后的战斗中丧生。718年8月15日，也就是哈里发的军队兵临城下差不多一年之后，他们放弃了攻城战，从海陆两路溃不成军地撤退。败军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一路遭到袭扰，还有一场新的灾难在等待穆斯林的事业。有些船只在马尔马拉海被风暴摧毁；其他船只则被爱琴海的一次海底火山爆发毁灭，火山爆发令“海水沸腾，船只龙骨上的沥青融化后，他们的船只与水手一起坠入深海”^[14]。当初起航时的庞大舰队只剩下5艘船返回了叙利亚，“宣告了上帝的伟业”^[15]。拜占庭在伊斯兰世界的进攻下承受了压力，但并没有崩溃。由于技术革新、娴熟的外交、个人的突出表现和强大的防御工事，以及好运气，君士坦丁堡生存了下来。随后的很多个世纪里，这样的故事一再上演。当然，拜占庭人在这种情况下有着自己的解释：“上帝和圣母保佑着这座城市和基督教帝国……真诚地呼唤上帝的人不会被彻底抛弃，尽管我们由于自己犯下的罪孽在短期内受到了惩罚。”^[16]

伊斯兰世界在717年未能攻克君士坦丁堡，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假如君士坦丁堡陷落，伊斯兰世界向欧洲扩张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这或许就会改变西方世界的整个未来；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假如”之一。这

次失败打击了伊斯兰圣战的首次强大攻势。这场圣战将在15年后、地中海的另一端达到高潮：一支穆斯林军队在卢瓦尔河畔、在巴黎以南仅150英里处被打败。

对伊斯兰世界来说，在君士坦丁堡的惨败主要是神学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伊斯兰教问世的最初100年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伊斯兰信仰的最终胜利。圣战的法则指向了必然的征服。但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伊斯兰教被与它非常相似的另一种信仰击退了。基督教是与伊斯兰教竞争的另一种一神教，同样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获得更多信徒的欲望。这两种宗教是真理的两个紧密联系的版本，君士坦丁堡划定了它们之间漫长斗争的前线，这场斗争将持续几百年。在此期间，穆斯林思想家们被迫承认，伊斯兰世界和“战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实际的变化。对非伊斯兰世界的最终征服不得不推迟，或许要一直延期到世界末日。某些伊斯兰法学家为了表达最终胜利的延迟，设想出了第三个世界，即“停战的世界”。圣战的时代似乎结束了。

拜占庭被证明是伊斯兰教最顽固的敌人，君士坦丁堡对穆斯林来说既是一个伤疤，也是一个渴望的源泉。伊斯兰教的很多烈士都牺牲在它的城墙下，包括先知穆罕默德的旗手艾优卜^[17]，他于669年阵亡。烈士们的牺牲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伊斯兰的一个圣地，并给占领它的事业赋予了一种救世意义。对它的两次围攻留下了大量神话和民间传说，一代代传承下来。圣训（它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言论的集合体，预言信仰的战士必将经历失败、死亡和最终胜利的轮回）中有这样的话：“在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圣战中，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将被战胜，这是真主不能宽恕的；三分之一将英勇牺牲，成为伟大的烈士；还有三分之一将最终得胜。”^[18]这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斗争。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之间的冲突规模如此宏大，历时如此漫长，以至于此后的650年之中，君士坦丁堡城墙下再也没有飘扬过穆斯林的旗帜。这个时间跨度比1453年到今天的跨度还要大，但预言宣称，穆斯林还会回来。

在马斯拉玛的军队狼狈撤退的1000年前，人们就在传说中希腊人拜占斯^[19]设立居民点基础之上建造了君士坦丁堡；马斯拉玛撤退的400年前，君士坦丁堡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皇帝选择这座城市作为他的新的基督教都城。它所处的位置具有极佳的自然条件。5世纪，陆墙修建之后，只要敌人的攻城武器仅限于投石机，城市就几乎固若金汤。在12英里长的外墙之内，君士坦丁堡在一连串陡峭山峰上屹然矗立，居高临下地俯视周围的大海；东面的金角湾形似弯弯的鹿角，是一个安全的深水港。唯一的缺点是，君士坦丁堡所在的海岬非常荒芜；拥有先进水利工程技术的罗马人建造了一系列复杂的高架渠和蓄水池，解决了缺水的问题。

这个地点位置特殊，处于贸易商道的汇聚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早期历史回荡着行军脚步声和泼溅海水的划桨声。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们曾乘船经过这里，前往第聂伯河口寻找金羊毛。波斯国王大流士率领70万大军走过船只搭建的桥梁，渡过这里的海峡，去讨伐斯基泰人^[20]。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前往黑海之滨的流放地的途中曾满腹忧愁地抬眼眺望“两片大海的巨大门廊”^[21]。在这个十字路口，这座基督教城市渐渐掌控了广大腹地的财富。在东方，中亚的财富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流进帝都的仓库：来自俄罗斯的蛮族的黄金、毛皮和奴隶，来自黑海的鱼子酱，来自远东的蜂蜡、食盐、香料、象牙、琥珀和珍珠。在南方，条条大路通往中东的城市：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巴格达。在西方，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航道连通整个地中海：通往埃及和尼罗河三角洲、富饶的西西里和克里特、意大利半岛，以及一直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各个角落。在更近的地方有足以建造恢宏城市的木材、石灰岩和大理石，以及供养它所需的全部资源。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奇特海流每年都带来大量鱼群，而欧洲的色雷斯的田地和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肥沃低地为它提供大量的橄榄油、粮食和葡萄酒。

在这里崛起的繁荣城市彰显了帝国的光辉灿烂，统治它的是一位罗

马皇帝，居住在这里的是讲希腊语的人民。君士坦丁建造了带有柱廊的街道网络（大街两边是带露台的公共建筑）、气势恢宏的广场、花园、高柱和凯旋门。这些建筑既有异教的色彩，也有基督教的特征。城内屹立着从古典世界劫掠来的雕像和纪念碑（包括可能是希腊雕塑家留西波斯^[22]为亚历山大大帝雕刻的无比雄壮的青铜马，现在已经成为威尼斯城的标志物）、足以与罗马赛马场媲美的赛马场、皇宫以及“数量比一年中的日子还要多的”^[23]教堂。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座大理石、斑岩、锤扁黄金与辉煌马赛克的城市，人口在巅峰时达到50万。前来做生意或者觐见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外乡人无不被它深深震撼。蒙昧的欧洲的野蛮人被这座“全世界觊觎的城市”^[24]惊得目瞪口呆。沙特尔的富歇^[25]于11世纪到访，他的反应在很多年的来访者中非常典型：“哦，多么绚丽多彩的城市，多么庄严，多么美丽，有如此之多的修道院，在宽阔的大街上凭借劳力修建起了多少宫殿，有多少震撼人心的艺术品：如果要列举所有美好的事物，能把人累垮；金银珠宝，形形色色的服饰，以及如此神圣的遗迹。无论什么钟点，总有船只在这个港口停靠。人所想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26]

拜占庭不仅是罗马帝国最后的继承者，还是史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27]。从建城开始，这座帝都就被设想为天堂的复制品、基督胜利的体现，它的皇帝则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随处可见基督教信仰的迹象：教堂的高高穹顶、教堂钟声和木铎声、修道院、数量众多的僧侣和修女、大街和城墙上没有尽头的圣像游行。虔诚的市民和他们的皇帝始终生活在持续的祈祷声和基督教仪式中。斋戒、瞻礼日和整晚的守夜构成了生活的日历、时序和基础。这座城市储存着从圣地收集来的基督教的众多圣物，令西方基督徒非常眼馋。施洗者约翰的头骨、耶稣临终前戴过的荆棘王冠、十字架上的钉子、圣墓上的石块、诸位使徒的遗留物和上千种其他的神奇物品被盛放在黄金打造的圣物匣内，匣子上镶嵌了珠宝。东正教通过马赛克和圣像的鲜艳色彩、点有油灯的昏暗教堂内不断跪拜起伏的礼拜仪式的神秘之美、焚香以及复杂的仪式（正是这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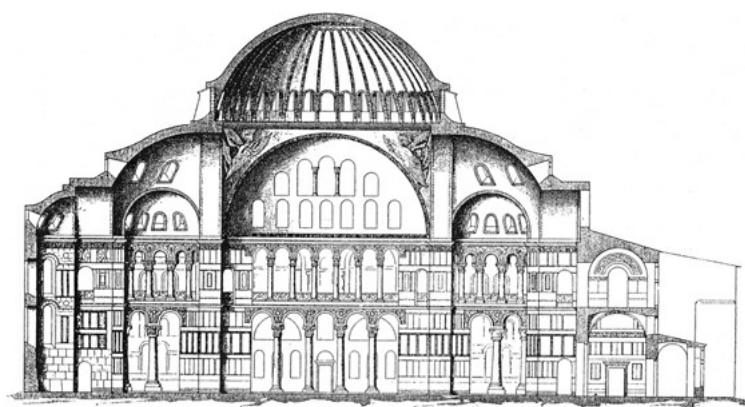
使教会和皇帝都沉浸在一种迷宫般的美丽气氛中，用天堂的比喻陶醉人的感官）对群众的情感施加了极其强大的影响。一位于1391年目睹皇帝加冕礼的俄罗斯访客被仪式的缓慢和奢华深深震撼：

在此期间，赞礼员吟唱了一曲美丽惊人的乐曲，完全超越人的理解力。皇室队伍前进得极其缓慢，从大门走到皇座所在的平台花了足足三个钟头。十二名从头到脚覆盖链甲的武士环绕在皇帝周围。在他前面走着两名黑头发的旗手。旗杆、旗手的服装和帽子都是红色的。在旗手前面是若干传令官，他们的权杖包着白银……皇帝走上平台，穿上紫色皇袍，戴上饰有圆锯齿的皇冠……然后礼拜仪式开始了。谁能将这全部的光辉灿烂描述出来呢？^[28]

在城市中心矗立着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像一艘巨舰停泊于此。查士丁尼在仅仅6年内就将它建成，并于537年将它向公众开放。这是古典时代晚期最了不起的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无比壮美。没有廊柱支撑的高高穹顶让亲眼看见的人也啧啧称奇，认为它是个无法理解的奇迹。普罗科匹厄斯说：“它似乎不是建在坚固的砖石之上，而是漂浮在半空中，遮盖着下方的空间。”^[29]穹顶覆盖的空间如此之广大，足令初次看到它的人目瞪口呆。拱顶装饰着面积达4英亩的黄金马赛克，如此之金碧辉煌，按照示默者保罗^[30]的说法，“金光流水般倾泻而下，让人们眼花缭乱，几乎无法直视”，同时大量的彩色大理石让观者陶醉。它们看上去如同“撒满星辰……像牛奶被泼洒在闪耀的黑色平面上……或者像大海或祖母绿，抑或碧草中的矢车菊，间或有点雪白”^[31]。10世纪，从基辅前来寻求真理的俄罗斯人目睹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内礼拜仪式的壮美，最终导致俄罗斯皈依了东正教。俄罗斯访客们如此记述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因为人间不可能有如此的辉煌和美丽，我们不知道如何描述。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上帝就居住在凡人中间。”^[32]东正教无比精细的繁华壮美与伊斯兰教的简单质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斯兰教提供的是沙漠地带的抽象的朴素，一种在任何看得见太阳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的膜拜，以及与神的直接交流；

东正教则富有形象、色彩和音乐，以及将灵魂引向天堂的神秘力量的令人陶醉的隐喻。两种宗教同样执着地要让全世界皈依他们的信仰。

拜占庭人的宗教热诚在基督教历史上达到了鲜有匹敌的高度。有时会有太多的军官出家修道，以至于威胁到帝国的稳定；人们在大街上也会激烈地探讨神学问题，有时甚至导致暴乱。“这座城市的工匠和奴隶个个都是神学家，”一个为此感到恼火的外乡人说道，“如果你找人兑换钱币，他会告诉你，圣子和圣父如何不同。如果你询问一块面包的价钱，他会争论说，圣子低于圣父。如果你问洗澡水准备好了没有，会有人告诉你，圣子由虚无而生。”^[33]基督是一个神格还是多个神格？圣灵生自圣父，还是生自圣父与圣子？圣像是亵渎神明的还是圣洁的？这些问题可不是闲扯：得到拯救还是遭天谴，就取决于如何回答它们。在帝国的生活中，关于正统教义和异端的争执就像内战一样激烈，而且和内战同样严重地威胁着帝国的统一。



圣索菲亚大教堂截面图

奇怪的是，拜占庭基督教同样又是宿命论的。万物皆由上帝决定，任何不幸，从丢失钱包到城市遭围困，都被认为是个人或集体罪孽招致的。皇帝是由上帝指定的，但如果他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推翻——被密谋者乱刀砍死，或者在浴室内被刺杀，或者被勒死，或者被拴在马后拖死，或者被刺瞎双目、流放远地（皇帝的命运毫无稳定性可言，这一点

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上帝的旨意,说明皇帝犯下了某种隐匿的罪孽。因为可以预测人的命运,拜占庭人极其迷信,对预言特别痴迷。缺乏安全感的皇帝常常会随意翻开圣经,寻找能够指示他们命运的线索;占卜是一种主要职业,虽然常常被教会谴责,但根深蒂固,无法将它从希腊人的灵魂中驱逐。有些占卜的方式非常怪异。9世纪,一位到访的阿拉伯人目睹了拜占庭人用一匹马来预言远方战役的进展:“马匹被带进教堂,那里悬挂着马笼头。如果马咬住笼头,人们就说:‘我们在伊斯兰的土地上获得了一场胜利。’有时马会走近笼头,嗅一嗅它,调转身子,再也不接近笼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就会心情沉重地离去,预料将遭到失败。”^[34]



帝国高层事故: 皇帝罗曼努斯三世在浴室暴毙, 1034年

好多个世纪里,拜占庭和它的都城形象如同太阳一样灿烂,就像万有引力一样吸引着它疆界之外的世界。它给人的印象是无比富饶、万古长青。它的货币“拜占特”印有皇帝的头像,在中东也是硬通货。拜占庭仍然享有罗马帝国的威望;在伊斯兰世界,拜占庭被简单地称为“罗马”;和罗马一样,它也引来了大门之外的半野蛮游牧民族的贪欲和嫉妒。从巴尔干半岛到匈牙利平原,从俄罗斯的森林到亚洲大草原,一波波游牧部落敲打着它的防线:匈人和哥特人、斯拉夫人和格皮德人^[35]、鞑靼阿瓦尔人^[36]和突厥保加尔人,以及野蛮的佩切涅格人^[37],都

在拜占庭世界横冲直撞。

在鼎盛时期，帝国统治着从意大利到突尼斯的地中海地区。但在这些邻居的压力之下，帝国不断地扩张或者收缩，就像一张巨大的地图，边边角角无时无刻不在卷曲。一年又一年，帝国陆海军从马尔马拉海岸的大型港口出征，旌旗招展、号角齐鸣，要么是去收复某个行省，要么是去稳定某段边疆。拜占庭是一个永远在战斗的帝国，而君士坦丁堡由于它十字路口中心的地理位置，不断受到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压力。在帝国的最初500年中，不知有多少支异族军队曾沿着君士坦丁堡的陆墙安营扎寨，阿拉伯人不过是其中最为坚决的一支。波斯人和阿瓦尔人于626年兵临城下；保加尔人在8、9、10世纪曾发动多次进攻；俄罗斯的伊戈尔王子于941年来到这里。对希腊人来说，围城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他们最古老的神话：除了圣经，人们还熟知荷马讲述的特洛伊的故事。这让希腊人既讲求实际，又非常迷信。城墙的维护是公民们的一项长期义务；粮仓内总是储有大量粮食，蓄水池总是蓄满，但东正教会认为精神上的防御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圣母是城市的主保圣人；危急时刻，人们高举她的圣像沿着城墙游行。人们相信，717年的围城战中，君士坦丁堡就是因为圣母的佑助才得救的。这些圣像赋予的自信心可与《古兰经》媲美。

在陆墙之外安营扎寨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打破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防御。任何一个企图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野心家都没有攻城拔寨的技术、海上封锁所需的海军力量，或是通过饥饿让守军屈服的耐心。拜占庭帝国虽然常常走到崩溃的边缘，却显示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城市坚固的基础设施、帝国机构的力量以及在危急时刻机缘巧合地出现的杰出领袖，都使得东罗马帝国得以顽强地延续下去。在它的公民和敌人看来，它似乎将万古长青。

但阿拉伯人攻城的经历对君士坦丁堡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认识

到，伊斯兰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对抗力量，从本质上与其他敌人迥然不同；拜占庭人关于撒拉森人（这是基督教世界对阿拉伯人的称呼）的预言表达出了他们关于世界未来的不祥预感。有一位作家声称，阿拉伯人就是《启示录》中的第四头野兽，它“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38]。^[39]11世纪末，拜占庭遭到伊斯兰世界的第二次打击。它发生的如此突如其来，当时无人能够理解它的意义。

^[1] quoted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p.11

^[2] quoted Akbar, M. J., *The Shade of Swords: Jiha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London, 2002, p.45

^[3] 即波斯萨珊王朝的国王霍斯劳二世（？～628），绰号“不可战胜者”，中国的《隋书》称他为“库萨和”。他曾占领拜占庭的大片领土，但后来被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击败，不久之后被篡位的儿子杀死。霍斯劳二世死后，萨珊王朝陷入内乱，随即被阿拉伯帝国灭亡。

^[4] Tell him that ...', quoted Akbar, M. J., *The Shade of Swords: Jiha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London, 2002, p.44

^[5]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2 vols., trans. Franz Rosenthal, London, 1958, p.40

^[6] 公元655年，阿拉伯海军与一支拜占庭舰队（由皇帝君士坦丁二世亲自指挥）交战，这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决定性海战，确立了穆斯林随后几个世纪在地中海的霸权地位。在此役中，拜占庭人在桅杆上升起十字架，穆斯林则在桅杆上悬挂新月旗，故名“桅杆之战”。

^[7]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其指代并不精确。它一般指的是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中东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Levant）即“东方”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黎凡特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将印度洋的香料等货物运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威尼斯

和热那亚的商人从黎凡特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

[8] Comnena, Anna, *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 trans. E. R. A. Sewter, London, 1969, p.402

[9] quoted Tsangadas, B. C. P., *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1980, p.112

[10] quoted Tsangadas, B. C. P., *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1980, p.112

[11] 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1997, p.676

[12] 即圣狄奥法内斯（758/760～817/818），拜占庭僧侣和史学家，出身贵族世家，在帝国宫院长大，后来成为僧侣和修道院长。在著名的圣像争端中，他主张崇拜圣像。他根据前人的记载整理撰写了一部拜占庭历史，虽然有很多讹误，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都敬奉他为圣徒。

[13] 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1997, p.546

[14] 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1997, p.550

[15] 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1997, p.550

[16] 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1997, p.546

[17] 即阿布·艾优卜·安撒里（576～674），先知穆罕默德的重要门徒和追随者，伊斯兰教早期的重要领袖和将领。他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仍然参加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并在那里战死。他后来被安葬在城墙脚下。他的安葬地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注意关于他的死亡年份，此处原文有误。

[18] quoted Wintle, Justin, *The Rough Guide History of Islam*, London, 2003, p.245

[19] 拜占斯是来自希腊多利安的城市墨伽拉的殖民者，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指示他在“盲者之国”对岸定居，拜占斯领导一群墨伽拉殖民者于公元前667年建立拜占庭，完成了神谕的使命。

[20] 斯基泰人（Scythians），中国《史记》《汉书》称之为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4世纪在亚欧草原中部广袤地区活动的伊朗语族游牧民族，其居住地从今日俄罗斯平原一直到中国的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沙漠，是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善于养马，据信骑术与奶酪等皆出于其发明。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威胁西亚近七十年，其骑兵驰骋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大肆劫掠；其后逐渐衰落，分为众多部落。5世纪中期随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阿提拉王入侵欧洲，一度抵达巴黎近郊的阿兰人，即为其中之一部。斯基泰人没有文字，但善于冶金打造饰物，留下了许多金器。

[21] Ovid, *Tristia*, 1.10

[22] 留西波斯（公元前4世纪），希腊著名雕刻家，为希腊化时代的雕刻艺术带来了革新。

[23] quoted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p.12

[24] quoted Mansel, Philip,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1924*, London, 1995, p.3

[25] 沙特尔的富歇（1055/1060～约1127），法兰西教士与史学家。他对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克莱蒙会议上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演讲的记载是保存至今的这一重要事件的唯一文字记载。富歇后来追随布洛涅的鲍德温（后来的埃德萨第一任伯爵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撰写了关于东征和耶路撒冷王国的史书。

[26] quoted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p.12

[27] 第一个承认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应为亚美尼亚，时间为3世纪末至4世纪初。

[28] quoted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p.51

[29] quoted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p.27

[30] 示默者保罗（？～约575至580），拜占庭诗人。他担任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宫廷的官员，负责维持肃静，因此被称为“示默者保罗”。他创作的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长诗为后世描绘了教堂曾经的光辉灿烂。

[31] quoted Norwich, John J., *A History of Byzantium*, 1 vols., London, 1995, p.202

[32] quoted Clark, Victoria, *Why Angels Fall: A Journey through Orthodox Europe from Byzantium to Kosovo*, London, 2000, p.17

[33] quoted Clark, Victoria, *Why Angels Fall: A Journey through Orthodox Europe from Byzantium to Kosovo*, London, 2000, p.14

[34] quoted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p.74

[35] 古代东日耳曼部落，与哥特人有血缘关系，一度在波罗的海地区活动，4世纪时被纳入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后于454年击败匈人，独立建国，最后被拜占庭消灭。

[36] 阿瓦尔人是古时欧亚大陆的一个游牧民族，约在6世纪迁徙到欧洲中部和东部。阿瓦尔人起源于亚洲中部，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属于泛蒙古—突厥族，一说他们就是中国典籍中记载的古代游牧民族柔然的残部。

[37] 佩切涅格人是来自中亚的一支突厥部落，10世纪时到达顿河和多瑙河下游，在11世纪时与拜占庭帝国发生冲突，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几场战争中他们被拜占庭帝国所败，后来在匈牙利定居下来，逐渐融入当地居民中。

[38] 《旧约·但以理书》第7章第23节。《新约·启示录》中也提及这个隐喻。

[39] quoted Wheatcroft, Andrew, *Infidels: The Conflict between Christendom and Islam 638-2002*, London, 2003, p.54

2.伊斯坦布尔的梦想

1071～1422年



我看见，真主令帝国的阳光照耀突厥人的家宅，将天堂环绕在他们的领地周围，为他们取名为“突厥人”，赋予他们权柄，让他们成为时代的帝王，让他们统辖当时的人民。^[1]

——喀什噶里^[2]

突厥人的粉墨登场再次唤醒了昏昏欲睡的圣战精神。他们最早于6世纪出现在拜占庭的地平线上，当时他们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与其结盟，共同对抗波斯帝国。对拜占庭人来说，他们不过是连续不断奔向伟大帝都的众多民族中的一个。突厥人的家园在黑海以东，一直延伸到中国。他们是居住在一望无垠的中亚大草原上的异教徒。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波游牧劫掠民族从中亚出发，蹂躏远方的定居民族。他们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ordu”（后来演化为英语的“horde”，意思是：部落、一大群人）这个词，给我们的记忆留下了印迹，就像是沙地上轻微的马蹄印。

早在拜占庭人知道这些突厥游牧民族的名字之前，就已经饱受他们的摧残。最早侵袭定居的希腊人的突厥民族可能是匈人，他们在5世纪横扫了基督教世界；紧随其后的是保加尔人。每一波侵袭者都像蝗灾一

样不可解释，大肆蹂躏拜占庭的国度。拜占庭人把这些侵袭归于上帝对基督徒罪孽的惩罚。就像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一样，突厥诸民族也是生活在马鞍上，头顶苍天，脚踩大地，通过萨满的中介膜拜天地。他们天性好动，不肯安分，以部落为单位群居，以放牧和劫掠邻人为生。他们生来就是要劫掠战利品，城市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使用的复合弓和乘骑的机动战术使得他们在军事上远远超过定居民族。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3]认为这是历史进程的关键。“定居民族习惯于懒惰和安逸，”他写道，“他们以为有了环绕他们的城墙和保护他们的堡垒就能高枕无忧。贝都因人没有城门，也没有城墙。他们总是随身携带武器。他们警惕地观察道路的各个方向。他们只会坐在马鞍上匆匆地打个盹，不会放纵地呼呼大睡……他们对远方微弱的犬吠和其他噪音都高度警觉。坚忍不拔是他们的特征，英勇无畏是他们的天性。”^[4]这个主题很快将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再次回荡。

中亚的持续动荡迫使这些突厥部落向西迁徙。到9世纪，他们已经与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居民建立了联系。巴格达的哈里发认识到他们卓越的战斗技能，招募他们进入他的军队，作为奴隶士兵。10世纪末，边疆地带的突厥人已经完全皈依伊斯兰教，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种族身份和语言，很快就将从他们的主子那里篡夺权力。到11世纪中叶，巴格达出现了一个突厥人作为苏丹统治的王朝——塞尔柱王朝。11世纪末，从中亚到埃及的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由突厥人统辖。

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迅速崛起不仅没有受到阿拉伯人的怨恨，反而被普遍认为是天意的奇迹，真主如此决定“是为了让奄奄一息的伊斯兰起死回生，恢复穆斯林的和谐统一”^[5]。当时埃及出现了一个什叶派王朝，因此选择了逊尼派信仰的突厥塞尔柱人获得了真正“加齐”（反对异教徒和伊斯兰异端的信仰的圣战者）的合法地位。积极进取的伊斯兰精神和突厥人的好战天性水乳交融；对劫掠的渴望在为真主效劳的名义下而被合法化。在突厥人的影响下，伊斯兰教恢复了阿拉伯人征服战争早

期的热情，再次展开了针对基督教敌人的大规模圣战。尽管萨拉丁本人是个库尔德人，但他和他的继承人率领的军队却具有突厥人的精神风貌。拉旺迪^[6]在13世纪写道：“赞美真主，伊斯兰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在阿拉伯人、波斯人、罗马人和俄罗斯人的土地上，突厥人手持利剑，对他们的利剑的恐惧深深植入人们的内心。”^[7]

沿着安纳托利亚南部的边界，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已经平静地酝酿了几百年；在这股新力量的驱动下战争迅速爆发。巴格达的塞尔柱统治者被一个不服管教的游牧部落——土库曼人深深困扰。土库曼人渴望劫掠，在伊斯兰腹地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于是塞尔柱苏丹鼓励这些部落战士把他们的力气发泄到西面的拜占庭——罗马人的帝国。到11世纪中叶，四处打劫的圣战者以伊斯兰的名义频繁地袭击基督教的安纳托利亚，迫使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采取果断措施。

1071年3月，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第欧根尼斯御驾亲征，挥师东进，力图挽救时局。8月，他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遭遇了敌人，但这股敌人不是土库曼人，而是一支塞尔柱大军，指挥官是卓越的统帅艾勒卜·艾尔斯兰苏丹，绰号“英雄的雄狮”。当时的局势颇为奇怪。苏丹并不愿意交锋。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与基督徒作战，而是消灭深受憎恶的埃及什叶派政权。他提出休战，但被罗曼努斯四世拒绝。在随后发生的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典型的游牧民族伏击战术以及拜占庭雇佣兵部队的叛变决定了战局。罗曼努斯四世本人遭生俘，被迫亲吻踌躇满志的苏丹面前的泥土。苏丹一只脚踩在罗曼努斯四世屈服的脖颈上，以彰显他的胜利和敌人的降服。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君士坦丁堡来说则是一个灾难。

对拜占庭人来说，曼齐刻尔特战役这一天是“恐怖之日”，这场惊天动地的惨败将深刻影响他们的未来。战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君士坦丁堡的人们当时还没有立刻理解它的严重程度。土库曼人蜂拥进入安

纳托利亚，丝毫不受阻挡。先前他们只是劫掠一番就撤退，现在则站稳了脚跟，不断向安纳托利亚西部这个被誉为雄狮头颅的地区挺进。在经历伊朗和伊拉克的炽热沙漠之后，这些来自中亚、以帐篷为家、以双峰驼为友的游牧部落终于找到了一片适合自己的绵延起伏的高原。与他们如影随形的是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以及更为狂热的教派：苏非派、德尔维希^[8]以及云游圣人（他们既鼓吹圣战，也宣扬对圣人的神秘主义的崇敬，这后一点对基督徒来说也很有吸引力）。曼齐刻尔特战役的仅仅20年后，突厥人就抵达了地中海海岸。成分混杂的基督徒平民大体上没有作任何反抗，有的人改宗伊斯兰教，其他人则因为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的苛捐杂税和压榨剥削而心满意足。伊斯兰教认为基督徒是“有经者”^[9]，因此基督徒得到了法律保护和信仰自由。从正统东正教分裂出去的一些派别甚至热烈欢迎突厥人的统治。“由于突厥人统治得公正和井井有条，他们更愿意受突厥人统治，”叙利亚的迈克尔^[10]如此写道，“突厥人对神秘的信条一无所知，因此与希腊人（他们是一个邪恶和离经叛道的民族）完全相反，不会探究信教行为，也不会迫害宗教异己。”^[11]拜占庭国内的纷争鼓励突厥人更进一步，他们很快就受邀参加把拜占庭闹得四分五裂的内战。突厥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小亚细亚，受到的抵抗又是如此微不足道；到1176年，又一支拜占庭军队遭到惨败，此时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希望将突厥入侵者打退了。曼齐刻尔特战役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到13世纪20年代，西欧作家已经将安纳托利亚称为“土耳其”。拜占庭永远丧失了这个粮食与人力的来源。几乎同时，另一场同样严重的灾难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降临君士坦丁堡。这一次的敌人是基督教西欧。

十字军东征的初衷是遏制伊斯兰教突厥人的军事征服。1095年，在克莱蒙^[12]，教皇乌尔班二世作了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布道，提倡反对塞尔柱人，“一个受诅咒的种族，与上帝彻底隔绝的种族”，鼓吹“将这个邪恶种族从我们的土地上完全驱逐出去”^[13]，就此发动了长达350年的十字军东征。尽管拜占庭人对西欧的基督徒兄弟提供了支持，但十字军

东征对拜占庭人来说却是一场漫长的磨难。从1096年开始，一波波四处劫掠的西欧骑士先后来到拜占庭，跌跌撞撞地穿过帝国疆土，南下前往耶路撒冷，期待着从他们的东正教兄弟那里获得支持、给养和感激。双方的接触带来了互相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双方都有机会对东西方风俗习惯和信仰方式的差别进行观察。在希腊人看来，这些身披重甲的西欧兄弟比粗鲁野蛮的冒险家强不了多少，他们的圣战使命也不过是虚伪地伪装成虔诚举动的军事征服。“他们骄横跋扈，生性残忍……而且对拜占庭帝国抱有根深蒂固的仇恨，”^[14]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15]如此抱怨道。事实上，拜占庭人对已经定居下来的穆斯林邻居更有好感。在伊斯兰圣战最初爆发之后的几百年内，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一直近距离互相接触，双方非常熟悉，也互相尊重。“尽管我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同，我们必须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16]君士坦丁堡的一位牧首曾这样写信给巴格达的哈里发。十字军则把拜占庭人视为堕落的异端分子，有非常危险的东方化的世界观。常有塞尔柱和突厥士兵为拜占庭人作战；十字军还震惊地发现，供奉给圣母的君士坦丁堡城里居然还有一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因富庶而傲慢，行为阴险狡诈，信仰腐败堕落，”^[17]十字军战士德伊的厄德^[18]如此宣称。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镶嵌宝石的圣物更是让十字军战士们目瞪口呆、垂涎三尺。这是一个凶险的预兆。十字军战士们发回诺曼底和莱茵河畔小城的信中渐渐出现了一种隐晦的嫉妒。“自世界开端以来，”香槟军务官^[19]写道，“从没有如此多的财富聚集在一座城市中。”^[20]这是难以抵制的诱惑。

西欧对拜占庭帝国军事、政治和商业上的压力已经积聚了很长时间，但到12世纪末期，这种压力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已经非常具体和明显了。城内建起了一个很大的意大利贸易社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得到了一些特权和利益。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意大利人不受拜占庭人欢迎；热那亚人在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一座有城墙的城镇）设有自己的殖民地；威尼斯人的殖民地“极其富庶和繁荣，也极其傲慢无礼，甚至蔑视帝国的权威”^[21]。君士坦丁堡市民中掀起了一股排外情绪。1171

年，希腊人攻陷并摧毁了加拉塔。1183年，拜占庭将领“可怖的”安德罗尼库斯^[22]命人血洗了整个意大利社区。

1204年，互相猜忌和暴力流血的历史再次在君士坦丁堡上演，爆发了一场可怕灾难，让希腊人永远无法完全原谅天主教西欧。作为基督教世界历史中最怪异的事件之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乘坐威尼斯船只，名义上是出征埃及，实际上却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此次行动的幕后黑手是恩里科·丹多洛——80岁高龄、据说双目失明^[23]的威尼斯执政官，他诡计多端，亲自领导了此次远征。庞大的舰队搜罗了一个自称有权继承皇位的人，打着他的旗号，于1203年6月在马尔马拉海北上。十字军战士们看到左舷前方出现的是君士坦丁堡，一座具有极其重要基督教意义的城市，而不是埃及海岸时，想必自己也吃了一惊。威尼斯战船粉碎了保护金角湾的铁链，冲到前滩，企图突破海墙，但失败了。80岁的执政官手执圣马可的旗帜，跳上海滩，鼓励威尼斯人奋勇作战。士兵们冲上了城墙；觊觎皇位的亚历克赛^[24]被推举为皇帝。

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钩心斗角、玩弄诡计之后，逐渐焦躁不安起来的十字军于次年4月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彻底的洗劫。随后发生了耸人听闻的大屠杀，城市的很大一部分被付之一炬。“被烧毁的房屋比法兰西王国三座大城市的房屋总数还要多。”法兰西骑士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如此宣称。君士坦丁堡伟大的艺术遗产遭到可耻的野蛮破坏，圣索菲亚大教堂惨遭亵渎和洗劫。“他们把骡马牵进教堂，”史学家尼西塔斯写道，“以便更好地运走圣器，以及从宝座、讲道坛、门、家具和其他地方拆下的雕刻金银器物；有些牲畜跌跤倒下，他们就用剑刺杀它们，污血和粪便污染了教堂。”^[25]威尼斯人劫走了大量雕塑、圣物和其他珍贵器物，用来装点他们自己的圣马可教堂，其中包括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来就矗立在赛马场上的四座青铜骏马。君士坦丁堡成了一座黑烟滚滚的废墟。“哦，城市，城市，所有城市的眼睛，”史学家尼西塔斯哀叹道，“你饮尽了上帝的愤怒之杯。”^[26]这个回应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

将灾难归于上帝的惩罚。但不管这场灾难是人为还是天定，结果是一样的：君士坦丁堡一蹶不振，以往的光辉灿烂如今只剩一个鬼影。随后的将近60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由佛兰德伯爵及其继承人统治。拜占庭帝国被肢解为一连串分散的法兰克国家和意大利殖民地，很大一部分平民则逃往希腊。拜占庭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尼西亚建立了一个流亡政权，比较成功地抵挡住了突厥人的后续入侵。1261年，拜占庭人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发现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接近全毁，其领地已经锐减为若干分散的碎片。拜占庭人努力重整旗鼓，抵御来自西欧的新的危险，因此暂时忽略了伊斯兰教的安纳托利亚。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安纳托利亚持续受到东方人口迁移的冲击。君士坦丁堡遭十字军洗劫两年后，一个名叫铁木真的部族领袖成功地将蒙古腹地互相厮杀的游牧部落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军队，并获得了“成吉思汗”（意思是“普世君主”）的尊号。肩披长发、崇拜天的蒙古人以可怕的迅猛速度杀入了伊斯兰世界。波斯陷入一片混乱，背井离乡的人们潮水般向西迁徙，涌入安纳托利亚。这片大陆是不同民族命运的大熔炉：希腊人、突厥人、伊朗人、亚美尼亚人、阿富汗人、格鲁吉亚人。1243年，蒙古人打败了这一地区最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塞尔柱人建立的鲁姆苏丹国，随后安纳托利亚四分五裂为若干小国，如同马赛克一般。四处游荡的突厥部落发现西方没有土地可以供他们迁徙；再也没有异教邻国可以作为伊斯兰征服战争的对象。他们抵达海岸时，有些人得到船只，开始劫掠拜占庭海岸地区；其他人则互相厮杀起来。安纳托利亚一片混乱、四分五裂、险象环生，完全是遍布强盗、土匪和宗教狂人（他们信仰的是神秘主义的苏非信条和正统逊尼派教义的混合体，非常激进和狂热）的狂野西部。土库曼人仍然坐在他们饰有刺绣的深马鞍上，在绵延的天际漫游，寻找可供劫掠的财富，遵循圣战者的传统，不断行进。但只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即奥斯曼部落，还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异教徒土地（即拜占庭）有所接触。

我们今天将这些人称为“奥斯曼人”，但没人知道他们的真正起源。1280年前后，他们从默默无闻的众多土库曼游牧部落中迅速崛起。他们是一群目不识丁的战士，居住在帐篷里，用树木点燃篝火，骑在马背上统治，把拇指印当作签名。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制造神话，重建了奥斯曼的历史。根据传说，部族领袖奥斯曼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看见君士坦丁堡“坐落在两片海域和两块大陆的连接点，看似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绿宝石之间的钻石，因此成为一大片统治疆域上的宝石，而这片疆域囊括了整个世界”^[27]。奥斯曼继承了圣战者的衣钵，他的部落对此加以利用。一半靠运气，一半靠机智，奥斯曼从区区小国演化成了梦想中的世界霸权。

奥斯曼的领地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与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外围防御圈接壤。对面就是尚未征服的异教土地，因此这里变成了吸引圣战者、冒险家和渴望拥有自己土地的难民的磁石，这些人都打算在奥斯曼统领下试试自己的运气。奥斯曼是一个与人民紧密联系的部族领袖。同时，奥斯曼人由于邻近拜占庭国家，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可以研究拜占庭，并模仿它的结构。奥斯曼部落的确是“在马背上”学习的，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吸收了拜占庭的技术、礼仪和战术。1302年，奥斯曼首次打败拜占庭人，赢得了巨大的威望，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他的大业。他率军继续推进，打击摇摇欲坠的拜占庭帝国的防御阵线，成功地将布尔萨城^[28]分割包围。他没有攻城的技术，因此耐心地围城达7年之久，最后他的儿子奥尔汗一世在1326年攻克了这座城市，并将其作为他的小王国的都城。1329年，奥尔汗一世在佩雷卡诺斯^[29]击败了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终止了拜占庭支援安纳托利亚的剩余城市的企图。这些城市接二连三地迅速陷落了：尼西亚于1331年被占领；尼科米底亚在1337年陷落；斯库塔里^[30]于1338年被占领。穆斯林战士现在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纵马奔驰，一直驰骋到海边，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欧洲。他们可以看见远方的君士坦丁堡：绵延的海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穹顶、塔楼和宫殿上招展的皇旗。

征服者一路将攻克的城市希腊名称换为元音和谐的土耳其语名字。士麦那变成了伊兹密尔；尼西亚（尼西亚信经^[31]的诞生地）被改称伊兹尼克；“普鲁萨”变换了辅音，变成了“布尔萨”。至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虽然继续沿袭阿拉伯语的说法，在官方说法中称其为“君士坦丁堡”，但日常的俚俗土耳其语把它变成了“伊斯坦布尔”，具体的演化过程时至今日仍然不清楚。“伊斯坦布尔”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简单讹误，或许是通过别的途径变化而来的。讲希腊语的人将君士坦丁堡亲昵地称为“波利斯”，即“城市”。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人会说，他要“eis tin polin”（进城），土耳其人也许会把这个短语误听成“伊斯坦布尔”。



布尔萨的奥斯曼及奥尔汗陵墓

奥斯曼人征服的速度就像7个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一样，如有神助。1331年，伟大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32]拜访了奥尔汗一世的王国，为此地的生机勃勃深感震撼：“据说他（奥尔汗一世）从未在任何城镇停留一个整月。他一刻不停地与异教徒作战，持续攻打他们。”^[33]早期的奥斯曼人以圣战者自诩；他们使用“信仰的战士”的称呼，就像用伊斯兰的绿旗包裹自己一样。很快，他们也成了苏丹。1337年，奥尔汗一世在布尔萨建起了一块石碑，自称为“苏丹、众位圣战者的苏丹之子、圣战者、圣战者之子、天际之主、世界英雄”^[34]。这着实是穆斯林征服事业的一个新的意气风发的年代，加快了伊斯兰军事运动的脉搏。“圣战者是真主的利剑，”史学家艾哈迈迪在1400年前后写

道，“他是信众的保护者和避难所。如果他以真主的方式牺牲，不要相信他已经死去。他生活在安拉的至福中，享受永生。”^[35]无论是对于自由驰骋的游牧劫掠者，还是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神秘托钵僧（这些人相伴穿过了安纳托利亚灰尘满天的道路），这些征服都激起了狂野的雄心。空中到处弥漫着预言和英雄的赞歌。他们记起了关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圣训和红苹果的传说。14世纪50年代，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邀请奥尔汗一世的人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帮助他打赢持续不断的拜占庭内战。于是，穆斯林自718年以来第一次踏上了欧洲土地。1354年，加里波利^[36]的城墙被地震摧毁，奥斯曼人当即宣布，这是真主发出的讯号，要穆斯林占领该城。大群战士和圣徒持续不断地跟随他们涌进欧洲。1359年，伊斯兰军队在阔别650年后再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空气中弥漫着千禧年预言的气氛。“圣战者为什么最后出现？”艾哈迈迪自问自答，“因为最好的总在最后出现。就像最终的先知穆罕默德跟在其他先知后面，就像《古兰经》在《托拉》^[37]、《诗篇》和《福音书》之后从天堂降临人间，圣战者同样也是最后出现在世界上。”^[38]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梦想似乎已经在实现的边缘。

奥斯曼人推进的速度简直快得出奇，似乎确有天定。借助地理、风俗的有利条件和好运，奥斯曼人得以利用拜占庭国家的瓦解，迅速繁荣昌盛起来。早期的苏丹们亲民、亲自然，对周围的环境和可能出现的政局变化保持关注。一千年的礼仪和传统让拜占庭人非常保守和偏狭，而奥斯曼人却机智灵敏、灵活变通、思想开放。伊斯兰教法要求善待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奥斯曼人对臣民的统治是相当温和的，常常要比欧洲的封建制更受人欢迎。奥斯曼人并没有致力于让基督徒（奥斯曼国家的大部分平民都是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事实上，具有帝国霸业雄心的奥斯曼皇朝总的来讲认为让基督徒改宗不是件好事。伊斯兰教法规定，对异教徒可以征收沉重的赋税，对穆斯林就不能这样。但其实异教徒的赋税负担不算重。巴尔干的农民很高兴能够从沉重的封建奴役中解放出来，因此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统治。同时，奥斯曼人的朝代延续体制有着

内在的优势。和其他的突厥小王国不同，早期的奥斯曼苏丹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王国分割；他们也不会指定继承人。所有的王子都接受统治国家的训练教养，但只有一人能够继承王位。这种残酷的方法意在保证最强者的生存。最让西方人震惊的是，奥斯曼人丝毫不重视通过婚姻的继承。拜占庭皇帝就像欧洲所有王室一样，费尽心思地去安排门当户对的婚姻，通过足够尊贵、得到认可的血统延续皇朝，奥斯曼人却根本不管这一套。一位苏丹的父亲当然是前一任苏丹，但他的母亲却有可能只是个嫔妃或者女奴，或许只是个半路改宗的穆斯林，可能来自十几个被征服民族中的一个。这种基因上的包容性将给奥斯曼人带来非同寻常的好处。

奥斯曼人的所有创新举措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常备军。激情澎湃但纪律涣散的大群圣战者已经不能满足奥斯曼苏丹们日渐增长的雄心野望。攻打防御得当的城市需要耐心、方法和一整套特殊的工艺技能。14世纪末，苏丹穆拉德一世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其成员是从巴尔干国家掳掠来的奴隶。每隔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就征召一批基督徒青年，令其皈依伊斯兰教，并教他们说土耳其语。这些新兵远离家人，只对苏丹本人效忠。他们是苏丹的私人军队——“城门奴隶”。他们被编入步兵单位（即“近卫军”）和骑兵，组成了自古罗马以来欧洲的第一支领军饷的职业常备军。这支军队将在奥斯曼国家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奴隶军队的习惯其实来自奥斯曼人自己的历史：突厥人自己也曾作为奴隶士兵，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疆服役，并以此为敲门砖，飞黄腾达。但在作壁上观的基督徒看来，奴隶军队的体制令人毛骨悚然。基督徒想当然地设想出了奴役压迫的不同景象，并认为让被俘的基督徒儿童去反对其他基督徒的做法是邪恶和丧失人性的。这将成为“野蛮的土耳其人”这个神话的重要因素。

西方很早就开始使用“土耳其人”这个概念。总的来讲，这是欧洲人的人为建构，是个与西方的种族身份相似的术语。奥斯曼人自己很少使

用这个概念，认为它是贬义的。他们使用的称呼既不代表种族，也不代表地域；既能体现不受固定地域限制的游牧民族的传统，也能显示多民族的构成。身份认同主要是宗教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渐渐开始用越来越花哨的头衔自诩，如“伊斯兰的君主”；将他们的国度称为“信众的避难所”或“受庇护的土地”；他们的人民则被称为“穆斯林”或者“奥斯曼人”。奥斯曼国家是不同元素和民族的独特混合体：突厥的部落生活方式，逊尼派伊斯兰教，波斯的宫廷制度，拜占庭的行政管理、赋税制度和礼仪，以及将土耳其语结构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混用的典雅的宫廷语言。奥斯曼国家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

在奥斯曼人逐渐崛起的同时，拜占庭却持续不断地衰败下去。14世纪在欧洲被称为“多灾多难的世纪”，东罗马帝国也是命途多舛。分裂、内战、人口锐减和贫困严重困扰着君士坦丁堡。有一些历史时刻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1284年，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做出了自杀式的决定：解散帝国海军。失业的水手们叛逃到奥斯曼人那里，帮助他们建造了一支舰队。1325年前后，帕里奥洛格斯皇朝的皇帝们选择双头鹰作为自己的纹章。它并非像人们有时推测的那样，代表一个震慑东西方的强大帝国，而是象征着当时同一个皇室的两位争吵不休的皇帝之间权力的分割。双头鹰具有预言性。1341~1371年，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内战，帝国领土还遭到奥斯曼军队以及强大的塞尔维亚国的入侵，另外还有宗教纷争与瘟疫火上浇油。君士坦丁堡还是第一座遭遇黑死病的欧洲城市：1347年，携带病菌的老鼠从停泊在黑海港口卡法^[39]的船只跳板登陆。君士坦丁堡人口锐减到10万多一点。一系列地震严重破坏了城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于1346年坍塌，“纯金”的城市越来越贫困和凄凉，市民陷入宗教的悲观情绪。到访的异乡人注意到了此处的悲凉景象。伊本·白图泰看到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由田地分隔开的十三座村庄。西班牙人佩罗·塔富尔^[40]来访时，发现甚至皇宫也“破败不堪，皇宫和城市的惨景清楚地显示出人民曾经遭受，而且现在仍在忍耐的种种磨难……城市人口稀少……市民衣着寒酸，悲伤而贫穷，命运艰难”。然

后塔富尔又加上了真正基督徒的“慈悲”：“但这还没有他们应得的命运那么糟糕，因为他们是一个邪恶的民族，罪恶滔天。”^[41]城市在城墙内萎缩，就像老人还穿着年轻时的衣服一样。皇帝们在自己的宫廷里也不过是穷人。1347年，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加冕时，目击者注意到，皇冠的宝石是用玻璃制成的，宴会桌上的盘子是陶土和白镏的。黄金盘子已经被变卖，以支付内战所需的开支；珠宝则被典当给了威尼斯人，现在保存在圣马可教堂的宝库内。



帕里奥洛格斯皇朝的双头鹰纹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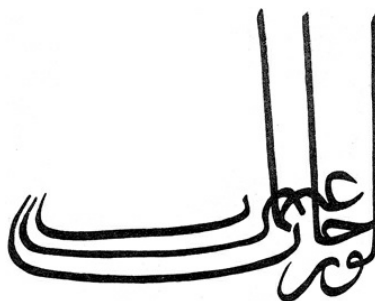
在拜占庭的混乱局面下，奥斯曼人向欧洲的进军势如破竹，不曾受到任何抵挡。1362年，他们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西的阿德里安堡（它的土耳其语的名字是“埃迪尔内”），实际上已经从背后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并迁都欧洲。1371年，奥斯曼人打败了塞尔维亚人，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与基督教世界的支持就完全隔绝了，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苏丹的附庸，按照苏丹的命令提供军队，任命官员也要得到苏丹许可。奥斯曼军队似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到14世纪末，他们的国家已经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土耳其人或者异教徒的扩张就像是大海，”塞尔维亚人、“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写道，“永远不会安顿下来，永远汹涌前进……除非你打碎蛇头，形势会越来越糟。”^[42]1366年，教皇发布诏书，号召发动针对奥斯曼人的十字军东征，并威胁要将向奥斯曼人提

供武器的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地区的贸易城邦处逐出教会，但无济于事。随后50年中，基督教世界发动了三次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都是由匈牙利领导，因为它是东欧最受奥斯曼人威胁的国家。这三次东征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最后的天鹅之歌，均以惨败告终，战败的缘由也不难找寻。欧洲四分五裂，非常贫困，内部争斗不休，而且被黑死病大大削弱了。欧洲的军队行动迟缓、持续争吵、纪律涣散，而且战术愚钝；相反，奥斯曼军队却具有极强的机动性，组织严密，而且为了同一项事业团结一致。少数得以近距离观察奥斯曼军队的欧洲人不得不暗自赞叹“奥斯曼人秩序井然”。15世纪30年代，法兰西旅行者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43]写道：

他们非常勤奋，主动地早早起床，生活朴素……他们对在哪里睡眠没有什么讲究，通常直接睡在地上……他们的马匹很好，消耗饲料很少，速度和耐力都很优异……他们对上级绝对服从……讯号发出后，前锋士兵就静悄悄地出发，其他人也同样沉默地跟随其后……10万土耳其大军行军发出的声音比100名基督徒士兵还要小……我必须承认，在我的很多经历中，土耳其人总是坦率、忠诚，需要勇气的时候从来不会让人失望。^[44]

在这一背景下，15世纪的开端对君士坦丁堡来说颇为惨淡。奥斯曼军队的攻打已经是司空见惯。1394年，皇帝曼努埃尔^[45]废弃了对奥斯曼人的效忠誓言。苏丹巴耶济德一世对君士坦丁堡连续多次发动进攻，直到1402年，巴耶济德一世自己被突厥—蒙古人帖木儿（就是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剧中的主角）击败，才算罢手。随后，拜占庭皇帝们越来越绝望地从西方寻求帮助——曼努埃尔甚至在1400年来到了英格兰。与此同时，他们还玩弄外交伎俩，并支持争夺奥斯曼皇位的人。1422年，为了惩罚拜占庭对觊觎奥斯曼皇位者的支持，苏丹穆拉德二世围攻了君士坦丁堡，但未能得手。奥斯曼军队既没有可以封锁城市的舰队，也没有能够迅速突破厚重岸墙的技术。已经耄耋之年的曼努埃尔仍然是一位极其精明的外交家，他搜罗出了一个新的奥斯曼皇位争夺者，使得奥斯曼国家面临内战的威胁。奥斯曼军队放弃了攻城，但君士坦丁

堡已经奄奄一息。奥斯曼军队再次大举进攻、兵临城下，似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因为害怕欧洲联合起来发动十字军东征，他们才暂时没有轻举妄动。



奥尔汗的花押——帝王的密码，他是围攻并占领布尔萨城的苏丹

[1] quoted Lewis, Bernard,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2 vols., New York, 1974, pp.207-8

[2]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约11世纪20年代～11世纪末期）是出生于中国喀什的维吾尔族大学者。1072～1077年，他在巴格达用阿拉伯文编纂了举世闻名的《突厥语大词典》一书，并献给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3] 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史学家、哲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在突尼斯、非斯和格拉纳达的宫廷任职，1375年从政坛退隐后，撰写了他的杰作《历史导论》，书中研究了社会性质和社会变迁，发展了最早的非宗教性的历史哲学。他还写了一部有关穆斯林北非历史的著作《训诫书》。1382年，他前往开罗，被指派为教授和宗教法官。赫勒敦被公认为是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一位伟大学者。

[4]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2 vols., trans. Franz Rosenthal, London, 1958, pp.257-8

[5] Ibn Khaldun, quoted Lewis, Bernard, “Politics and War” in J. Schacht and C. E. Bosworth (eds.), *The Legacy of Islam*, Oxford, 1979, p.197

[6] 穆罕默德·本·阿里·拉旺迪（约12～13世纪），波斯史学家，撰写了关于塞尔柱帝国覆灭及花刺子模王朝入侵的史书。

[7] quoted Lewis, Bernard,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2 vols., Oxford, 1987, p.208

[8] 德尔维希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成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调通过狂喜、舞蹈和旋转表达献身的情感。德尔维希可以集体生活，也可以在俗；云游四方的德尔维希叫作托钵僧，常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圣人。多数穆斯林将他们视为非正统和极端分子，但该运动已持续至今。

[9] 伊斯兰教所说的“有经者”指的是受神启示者，具体常指犹太人和基督徒。有经者的特征：信仰唯一神；有共同的先知，如摩西（天主教称梅瑟，伊斯兰教称穆萨）；信世界末日、死后复活、审判、天堂、天使；相信创造说。由于《古兰经》对有经者的态度并不一致，故穆斯林对犹太人及基督徒的态度时有不同。在伊斯兰国家，有经者属于受保护的次等公民，至于多神教与无神论者则不在受保护之列。

[10] 叙利亚的迈克尔（1126～1199），叙利亚正教的牧首，著有鸿篇巨制《编年史》，从创世一直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尤其是十字军东征等史实。

[11] quoted Cahen, Claude, *Pre-Ottoman Turkey*, trans. J. Jones-Williams, London, 1968, p.213

[12] 法国西南部城市。

[13] quoted Armstrong, Karen, *Holy War: 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 on Today's World*, London, 1992, p.2

[14] quoted Norwich, John J., *A History of Byzantium*, 3 vols., London, 1995, p.102

[15]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约1155～1215或1216年），拜占庭史学家，著有记载1118～1207年拜占庭历史的著作，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对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记述。

[16] quoted Mango, Cyril,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2001, p.128

[17] quoted Kelly, Laurence, *Istanbul: A Traveller's Companion*, London, 1987, p.35

[18] 德伊的厄德（1110～1162），法兰西教士和史学家。他作为法兰西国王路

易七世的神父，追随国王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并撰写了此次征伐的历史。在该书中，他指责是拜占庭人的背叛造成了东征的失败。

[19] 即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1160～约1212），法兰西骑士与史学家。“香槟军务官”是他的封号。他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目睹了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他的著作《征服君士坦丁堡》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法文散文作品。他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

[20] quoted Morris, Jan, *The Venetian Empire: A Sea Voyage*, London, 1980, p.39

[21] quoted Norwich, John J., *A History of Byzantium*, 3 vols., London, 1995, p.130

[22] 即后来的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科穆宁（约1118～1185，1183～1185年在位），科穆宁皇朝的末代皇帝，他的两个孙子建立了特拉布宗帝国。安德罗尼库斯是精明强干的名将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传奇式的风流情圣和残酷的暴君。下文会讲到，他的下场极其悲惨。

[23] 据说他早年行商时曾在君士坦丁堡被迫害下狱并被弄瞎双眼，当时正是君士坦丁人排斥威尼斯商人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他后来血洗君士坦丁堡的私人原因。

[24] 即亚历克赛四世·安格洛斯（约1182～1204，1203年8月～1204年1月在位）。他的父亲是皇帝伊萨克二世。伊萨克二世的兄弟亚历克赛于1195年篡权（史称亚历克赛三世），并将伊萨克二世与其子亚历克赛囚禁。1201年，意大利商人将亚历克赛救走，送到神圣罗马帝国。亚历克赛得到西方人的支持，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改为君士坦丁堡，希望借助十字军的力量夺回皇位。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已经被戳瞎双目的伊萨克二世与亚历克赛四世共同统治。亚历克赛与他的父亲以及十字军的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导致十字军对都城的洗劫。最后亚历克赛四世被廷臣刺杀。

[25] quoted Norwich, John J., *A History of Byzantium*, 3 vols., London, 1995, p.179

[26] quoted Morris, Jan, *The Venetian Empire: A Sea Voyage*, London, 1980, p.41

[27] quoted Kinross, Lord, *The Ottoman Centuries*, London, 1977, p.24

[28] 今土耳其西北部，古称普鲁萨。公元前3世纪建城，在罗马及拜占庭时期颇为繁华。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陷后，该城是拜占庭的抵抗中心。14世纪初，奥斯曼人夺取该城，建为最早的国都。15世纪初为帖木儿征服，后又被奥斯曼人夺回。其后奥斯曼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但布尔萨仍持续繁荣。现为农业中心，以生产地毯闻名，城里还有很多15世纪遗留下来的清真寺。

[29] 克里特岛西部的一座港口城市。

[30] 今称于斯屈达尔，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市区，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安纳托利亚一侧。

[31] 尼西亚信经是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制定的有关基督宗教信仰的一项基本决议。它主张圣子是“出于真天主而为真天主，被生而非受造”，与天主父本质相同，确定了圣父、圣子、圣灵为三位一体的天主，本质相同。接受并且信奉此信经的有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英国圣公会、路德宗以及新教的主要教派。

[32] 伊本·白图泰（1304～1368/1369），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他曾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受过传统的伊斯兰法律和文学教育。1325年到麦加朝觐后，他决定尽可能地走访世界各地，而且发誓“不走回头路”。他用了27年时间漫游非洲、亚洲和欧洲各地，总旅程长达12万千米。在返回后，他口述撰写了回忆录《游记》，该书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著作之一。

[33] quoted Mackintosh-Smith, Tim, *Travels with a Tangerine*, London, 2001, p.290

[34] quoted Wittek, Paul,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1963, p.15

[35] quoted Wittek, Paul,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1963, p.14

[36] 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海港城市，今称盖利博卢。它位于一个狭长半岛上，达达尼尔海峡经此通往马尔马拉海，东北方就是伊斯坦布尔。加里波利最初为希腊殖民地，后成为拜占庭要塞，1356年前后成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第一个征服地。它是防卫伊斯坦布尔的战略要地，被用作海军基地。

[37] 即《摩西五经》。“托拉”是犹太教名词，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道。狭义上专指《旧约》的首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与

《申命记》。传统看法认为《托拉》是摩西所著，但研究旧约的学者认为它是在远晚于摩西的时期被编写完成的，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9世纪到前5世纪，尽管它引用了更为久远的传统典籍。在犹太教中，“托拉”也常用来指全部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旧约》的全部）。从更广义上讲，这一术语也指犹太教的宗教文献和口头圣传。

[38] quoted Wittek, Paul,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1963, p.14

[39] 今称费奥多西亚，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1347年，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围攻卡法，蒙古人把鼠疫病人的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卡法城，后来一名热那亚商人把鼠疫带回意大利，从而引发欧洲黑死病的大爆发。

[40] 又名佩德罗·塔富尔（约1410～1484），西班牙旅行家和作家。他在1436～1439年间游历了欧亚非三大洲，到过摩洛哥、耶路撒冷、拜占庭、特拉布宗、埃及、罗得岛等地，并撰写了游记。

[41]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p.146

[42] Mihailovich, Konstantin, *Memoirs of a Janissary*, trans. Benjamin Stolz, Ann Arbor, 1975, pp.1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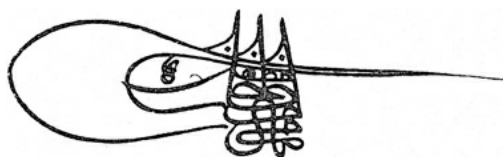
[43] 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约1400～1459），勃艮第骑士和旅行家。1432～1433年，他前往耶路撒冷朝觐，游历了拜占庭、匈牙利等地，并写下了一部游记。

[44] Broquière, Bertrandon de la, in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 ed. T. Wright, London, 1848, pp.362-5

[45] 即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格斯（1350～1425，1391～1425在位）。

3.苏丹和皇帝

1432～1451年



穆罕默德·切列比，苏丹，愿真主保佑他的权威永固，加强他的力量直到最终审判日！[\[1\]](#)

——穆罕默德二世母亲的墓志铭

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信奉基督的真正皇帝和罗马人的君主。

——君士坦丁十一世、第八十八位拜占庭皇帝的正式头衔

君士坦丁堡命中注定的克星出生于穆拉德二世攻城后的第十个年头，他将收紧君士坦丁堡脖子上的穆斯林绞索。根据土耳其传说，1432年是充满了预兆的年份。这一年，很多母马生了孪生马驹；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正午时分，君士坦丁堡上空有长尾巴的彗星掠过。3月29日夜间，苏丹穆拉德二世正在埃迪尔内的皇宫内等待孩子降生的消息。他无法入眠，于是开始阅读《古兰经》。他刚读到《胜利章》（这是许诺穆斯林将战胜异教徒的诗节），一名信使送来喜讯：生了个男孩。这个孩子被命名为穆罕默德，那是穆拉德二世父亲的名字，也是伊斯兰教先知的名字。

和很多其他预言一样，这个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同样也带有事后捏造的成分。穆罕默德是穆拉德二世的第三子；他的两个异母兄长年纪都比他大不少，而且穆罕默德从来就不是最受宠的皇子。他长大成人、登基为苏丹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关于穆罕默德的出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母亲的身份扑朔迷离。虽然有些土耳其史学家声称她是个纯血统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但她很有可能其实是个来自西方的奴隶，在边疆劫掠中被俘或者被海盗绑架；她可能是个塞尔维亚人或马其顿人，极有可能生来是个基督徒——这种可能性让穆罕默德矛盾的性格显得更加奇怪。不管穆罕默德的基因是如何混杂，他的秉性与父亲穆拉德二世迥然不同。

到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早已不是大字不识一个、骑在马上打天下的部落领袖。追求圣战和战利品的澎湃激情已经让位于冷静的深谋远虑。苏丹仍然享有伊斯兰土地上最伟大圣战领袖的崇高威望，但这越来越变成皇朝政治的工具。奥斯曼统治者现在自称“罗马的苏丹”，这个头衔对古老基督教帝国的遗产提出了主权要求；或者自称“帕迪沙阿^[2]”，这是一个非常高雅的波斯词语。他们效法拜占庭人，越来越喜欢张扬皇室威严的礼节和仪式；皇子们受到良好教育，为执掌权柄做准备；皇宫有高墙围绕；人们和苏丹的直接接触受到严格管理。由于害怕下毒、阴谋和行刺，统治者和臣民越来越隔阂。1389年的第一次科索沃战役之后，穆拉德一世被一个塞尔维亚使节刺杀，此后苏丹们就越来越远离普通人的视野。穆拉德二世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签名时仍然自称“贝伊”（这是突厥贵族的古老称谓），而不是更尊贵的“苏丹”；他很受民众爱戴。匈牙利僧侣乔治对他的朴素颇感意外：“苏丹的服饰和马匹没有任何特别的标记让他与众不同。在他母亲的葬礼上，我对他作了观察。如果不是有人把他指出来的话，我绝对无法认出谁是苏丹。”^[3]与此同时，苏丹和外界之间开始拉开了距离。“他在公共场合从不饮食，”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写道，“很少有人能夸耀说，自己曾经看见苏丹说话，或者看见他吃喝。”^[4]后续的苏丹们

渐渐退居托普卡帕宫^[5]，在高高的宫墙和复杂的礼仪包围下，过着隐士般与世隔绝的生活。

奥斯曼宫廷冷酷的气氛影响了穆罕默德二世的童年。皇位继承的问题给皇子们的抚养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子承父位的直接继承对帝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后宫制度保障了足够数量的男童，以维持皇室的延续——却也构成了帝国最大的弱点。皇子们互相竞争，争夺皇位的继承权。奥斯曼人并没有规定长子继承的法律；老苏丹驾崩时，皇子们需要通过斗争来决定帝国的归属。这场斗争的结局被认为是真主的意愿。“如果真主决定，我死后由你继承皇位，”后来有一位苏丹这样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活人能够阻碍。”^[6]在现实中，继承皇位常常变成奔赴帝都中心的竞赛，最先抵达的胜利者就能控制都城和金库，获得军队的支持；这种继承制度要么能够保证适者生存，要么就会导致内战。15世纪初，由于皇子们争夺权力、互相残杀，再加上拜占庭人在这场斗争中插了一手，奥斯曼国家险些垮台。利用奥斯曼帝国最脆弱的时刻支持奥斯曼皇位的竞争者和争夺者，几乎成了君士坦丁堡的基本国策。

为了保护皇子们免遭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也传授他们治国之道，苏丹们在诸位皇子非常年幼时就将他们送离京城，去治理行省，并仔细挑选教师来监督他们。穆罕默德人生的最初岁月在埃迪尔内的后宫度过，但两岁时就被送往安纳托利亚的区域首府阿马西亚，准备早早开始接受国君的教育。他的长兄艾哈迈德当时12岁，被任命为阿马西亚总督。在随后的10年中，黑暗的力量始终伴随着这两位皇子，直至登上王座。1437年，艾哈迈德突然在阿马西亚病逝。6年后，当穆罕默德的另外一位异母兄阿里成为阿马西亚总督时，城里上演了奥斯曼版本的“塔楼内的王子”^[7]的神秘惨剧。一位重要贵族卡拉·赫兹尔帕夏被神秘人物派遣到这座城市。他在夜间潜入宫殿，将阿里扼死在床上，并杀死了他的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一夜之间，皇室的一整个支系就灰飞烟灭

了。穆罕默德成了唯一的继承人。在这些晦暗不明事件的背后像黑影一般涌动的，是奥斯曼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加强了由奴隶组成的近卫军，并将一些前基督徒提升为维齐尔^[8]，意在建立一支足以与传统的土耳其贵族和陆军抗衡的力量。这场内斗将于9年后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落幕。

阿里是穆拉德二世最宠爱的儿子，他的死让苏丹万分悲痛。但有人说是穆拉德二世发现阿里在搞阴谋诡计，于是自己下令将他处死，这也并非绝不可能。但他意识到，现在别无他法，只能将年轻的穆罕默德召回埃迪尔内，亲自对他进行教导。此时，11岁的穆罕默德代表了奥斯曼皇朝唯一的未来。穆拉德二世再次看到儿子时十分震惊。穆罕默德生性执拗、任性，听不进任何说教。穆罕默德曾经公开和先前的教师作对，拒绝接受处罚，也不肯学习《古兰经》。穆拉德二世招来了著名的毛拉——艾哈迈德·古拉尼，命令他严厉管教年轻的皇子，使他屈服。毛拉手持用来体罚的棍棒去见皇子。“您的父皇，”他说，“让我来教育您，但如果您不听话，也要处罚您。”^[9]穆罕默德听到这威胁不禁放声大笑，于是毛拉把他狠揍了一顿。穆罕默德迅速屈服，开始乖乖地学习。在这位铁腕教师指导下，穆罕默德开始努力学习《古兰经》，然后是更大范围的其他知识。事实证明，这个少年聪颖过人，而且具有非成功不可的钢铁意志。他精通多种语言，根据各方面的记载，他通晓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还会说希腊语、一种斯拉夫方言和一些拉丁语；他还非常热衷于历史、地理、科学、实用工程学和文学。他的独特个性使他崭露头角。

15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时刻。在安纳托利亚，一个土库曼人附庸——卡拉曼^[10]贝伊正在兴风作浪；与此同时，在西方，匈牙利人正在准备新的十字军东征。穆拉德二世通过一项10年的和约消除了基督教的威胁，然后前往安纳托利亚，去处置棘手的卡拉曼贝伊。他出征之前，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退位了。他害怕发

生内战，因此希望在自己去世前就巩固穆罕默德的地位。心力交瘁、看破红尘或许也是他退位的原因之一。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负担是沉重的，穆拉德二世或许因为心爱的儿子阿里被杀害而沮丧。在埃迪尔内，12岁的穆罕默德在值得信赖的首席大臣哈利勒辅佐下登上了苏丹皇位，史称穆罕默德二世。根据苏丹的特权，从此货币上铸有他的名字，人们在每周的祈祷中也会为他祈福。

穆拉德二世的这个试验酿成了灾难。乳臭未干的年轻苏丹是一个不可抵御的诱惑，教皇立即特许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11]解除与奥斯曼帝国的和约，于是新的十字军大举出动了。9月，十字军渡过了多瑙河；一支威尼斯舰队受命前往达达尼尔海峡，阻挡穆拉德二世返回。埃迪尔内城内颇为动荡。1444年，一个属于什叶派异端的宗教狂人出现在城内。人们蜂拥而至，听取这位波斯传教者的教导；他许诺能弥合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仇隙。穆罕默德二世本人也被他的教导吸引，欢迎此人进入自己的宫廷。宗教当局震惊了，群众对这个异端分子的热情支持也让哈利勒感到惊恐。当局尝试将此人逮捕。当这个传教者寻求宫廷庇护时，哈利勒不得不努力说服穆罕默德二世，将此人交出。他最终被拖到公共祈祷场所，被活活烧死。他的信徒惨遭屠杀。拜占庭人也决定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混乱局面。先前有一位争夺奥斯曼帝国皇位的奥尔汗王子被拜占庭人关押在监牢内。现在拜占庭人将他释放，让他在奥斯曼帝国煽动反叛。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也发生了起义。埃迪尔内城内一片恐慌；城市的一大部分被烧毁，土耳其穆斯林开始逃回安纳托利亚。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穆拉德二世与卡拉曼贝伊通过谈判达成了和约，匆匆赶回都城，去面对威胁。威尼斯战船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但威尼斯人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人以每人1杜卡特^[12]的高价让穆拉德二世和他的大军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穆拉德二世随后快速进军，于1444年11月10日在黑海岸边的瓦尔纳^[13]迎战十字军。奥斯曼军队在此取得了压倒性

胜利。瓦迪斯瓦夫三世的头颅被插在枪尖上送往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布尔萨，作为穆斯林得胜的凯旋标志。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圣战的一个重要时刻。在瓦尔纳的战败使得西方在350年的十字军东征之后彻底丧失了东征的胃口。从此以后，基督教世界再也没有做过团结一致将穆斯林逐出欧洲的努力。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得以确立，君士坦丁堡彻底成为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的孤立飞地。这样的局面让君士坦丁堡在面临奥斯曼帝国的攻击时难以得到西方的支援。更糟糕的是，穆拉德二世把1444年的混乱归咎于拜占庭人。他的这种观点将很快影响奥斯曼帝国的战略。

瓦尔纳战役之后不久，尽管穆罕默德二世的早期统治是失败的，穆拉德二世还是返回了安纳托利亚。哈利勒帕夏仍然担任首席大臣，但对穆罕默德二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两位重臣：宦官总管谢哈布丁帕夏（同时担任欧洲诸行省总督）和一个强有力的前基督徒——扎甘帕夏。这两人都主张把攻打君士坦丁堡的筹划工作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觊觎皇位者奥尔汗仍然躲在君士坦丁堡；占领这座城市将巩固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并给年轻的苏丹带来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很显然，甚至在幼年，穆罕默德二世就已经被攻占这座基督教城市、成为罗马帝国继承人的计划深深吸引。在一首诗中，他如此写道：“我最热切的愿望是消灭异教徒。”^[14]但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既是帝国霸业的体现，也带有宗教意义，同时还有一个非伊斯兰教的来源，这一点倒很令人意外。他对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丰功伟绩无比神往。中世纪的波斯和土耳其史诗已经把亚历山大改造成伊斯兰英雄。穆罕默德二世应当从孩提时期就熟知亚历山大的业绩；在宫中，每天他都命人为他朗读罗马作家阿利安^[15]用希腊文写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的传记。在这些影响之下，他自视拥有两个身份：既是穆斯林的亚历山大，必将征服天下，直至世界边缘；也是征讨异教徒的圣战领袖。他决意逆转世界历史的方向：亚历山大向东征伐，他则要征服西方，给东方和伊斯兰带来荣耀。这是个醉人的梦想，受到谋臣们的激励；这些谋臣看到，征

服的浪潮将对他们的个人晋升大有帮助。

早在1445年，早慧的穆罕默德二世就在导师们的支持下开始制订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此时他只有13岁。哈利勒帕夏对此颇感惊恐。他不赞成年轻苏丹的计划。在1444年的乱局之后，他担心新的军事行动会招致更多灾难。奥斯曼帝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内战险些崩溃的历史在人们的记忆里还很清晰；而且哈利勒和很多人一样，担心全力进攻君士坦丁堡会促使西方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采取大规模反制措施。他反对战争也有一份私心：他担心，好战的前基督徒们发动新的战争，会损害他自己，以及传统的穆斯林—土耳其贵族的权力。他决定唆使近卫军叛变，借此废黜穆罕默德二世，并请求穆拉德二世返回埃迪尔内，再度掌权。果然，穆拉德二世返回都城时受到了热烈欢迎。高傲而冷漠的年轻苏丹并不受人民和近卫军的爱戴。穆罕默德二世带着他的谋臣隐居到了马尼萨^[16]。这是一个可耻的挫折，他永远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将来有一天，哈利勒将因此丢掉性命。

在穆拉德二世的余生，穆罕默德二世一直生活在父皇的阴影之下，尽管他继续以苏丹自诩。1448年，他陪伴父皇参加了第二次科索沃战役，匈牙利人在这里做出了最后一次挫败奥斯曼帝国的努力。穆罕默德二世在此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奥斯曼军队虽然损失很重，但再次取得了一次像瓦尔纳战役一样的决定性胜利，并进一步强化了奥斯曼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忧郁的悲观情绪开始在西方蔓延。“土耳其人的战术远胜于我们的战术，”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写道，“如果你追击他，他就逃跑；如果他追击你，你是逃不掉的……鞑靼人曾多次击败土耳其人，但基督徒屡战屡败，尤其是在正面交锋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未能阻止土耳其人包围他们并从侧面进攻。”^[17]

穆拉德二世的最后岁月是在埃迪尔内度过的。老苏丹似乎已经对新的军事冒险失去了兴趣，更喜欢和平和稳定，拒绝战争的不确定性。他

在世的时候，君士坦丁堡虽然心惊胆战，但还享受着和平；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去世之时，朋友和敌人都同样哀悼他。希腊史学家杜卡斯^[18]宣称：“那些凭借神圣誓言与基督徒签订的协议，他是始终恪守的。他的愤怒都是短暂的。他厌恶战争，热爱和平，因此和平的天父赐给他平静的死亡，而不是让他死于刀剑。”^[19]假如这位希腊史学家得知穆拉德二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的建议，就一定不会这么满口溢美之词了。15世纪40年代拜占庭对奥斯曼帝国内战的干涉让穆拉德二世确信，只要君士坦丁堡还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一块基督教飞地，帝国就永远不能稳固。“他给卓越的继承者留下的遗产是，”奥斯曼史学家萨阿德丁^[20]写道，“树立起圣战的大旗，目标是占领那座城市……有了那城市，他就能保护伊斯兰人民的繁荣，打断可悲的异教徒的脊梁。”^[21]

苏丹的驾崩对奥斯曼国家来说永远是个危险时刻。根据传统，而且为了阻止任何武装反叛，苏丹驾崩的消息被严格保密。穆拉德二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叫小艾哈迈德的婴儿，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继承没有直接威胁，但觊觎皇位者奥尔汗还在君士坦丁堡，而且穆罕默德二世并不受民众欢迎。苏丹驾崩的消息被装在密封的信封内，快马加鞭地送给穆罕默德二世。哈利勒在这封信中建议穆罕默德二世不要耽搁，务必火速抵达埃迪尔内，任何延误都有可能导致叛乱。根据传说，穆罕默德二世收到信后立即命人备马，并向侍从们说道：“爱我的人，都跟我来。”在家丁家将的陪伴下，他仅花了两天时间就渡海抵达了加里波利。他纵马穿过大平原前往埃迪尔内的路上遇见了一大群官员、维齐尔、毛拉、总督和平民，这些人前来恭迎他的驾到，这种风俗可以一直追溯到突厥部落在亚洲大草原的时候。欢迎的人群离穆罕默德二世的队伍还有1英里时，就下了马，在一片死寂中徒步走向他们的新主子。离穆罕默德二世的队伍还有半英里时，人群开始号啕大哭，哀悼驾崩的老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侍从们跳下马，加入了哭丧的人群。冬季的土地上回荡着悲戚的哭喊。主要官员向新苏丹鞠躬，然后所有人重新上马，继续向皇宫前进。

次日，文武百官正式觐见新苏丹。这是个气氛紧张的场合，老苏丹的维齐尔们将听候命运的发落。穆罕默德二世端坐在宝座上，两侧站立着深受信赖的谋臣们。哈利勒帕夏躲在后面，等着看穆罕默德二世会如何决断。少年苏丹说道：“我父皇的维齐尔们为何不上前？叫他们近前来，让哈利勒到他惯常的位置上去。”^[22]哈利勒恢复了首席大臣的职位。这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典型决策：先维持原状，同时暗自酝酿计划，等待时机。

新苏丹年仅19岁，既满怀自信，又踌躇徘徊；既野心勃勃，又生性内敛。他的幼年经历显然对他影响极大。他很可能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与母亲分离，主要凭借运气才在奥斯曼宫廷的阴暗世界里生存下来。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深藏不露，对他人疑心很重；他独立、傲慢、缺乏人的温情，而且野心极大。他的性格充满了矛盾，错综复杂。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将他描绘为极度残忍和心理变态的怪物，他也是个秉性矛盾重重的人。他精明机敏，英勇无畏，极其冲动，诡计多端，擅长欺骗，有时是个残忍的暴君，有时却能做出令人意外的善举。他喜怒无常，无法预测；他是个双性恋，不肯与任何人结成亲密关系；他睚眦必报，但因为开创了很多虔诚的慈善事业而深受爱戴。他的性格已经成熟，一些关键特征显露出来：既是暴君，也是学者；既是热衷战争的军事战略家，也热爱波斯诗歌和园艺；既是后勤管理和实践筹划工作的专家，又极端迷信，需要宫廷星相家来帮他作军事上的抉择；虽然是伊斯兰的战士，但对非穆斯林臣民也慷慨仁慈；他还喜欢与外国人和离经叛道的宗教思想家做伴。

他一生不同阶段绘制的几幅肖像很可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画像中最早的一批。从这些肖像可以看出一些一贯的特征：鹰隼一般的侧脸轮廓，鹰钩鼻突出在颇富肉感的嘴唇上方，“如同鹦鹉的喙停歇在樱桃上”^[23]（这是一位奥斯曼诗人写下的令人难忘的诗句），突出的下巴上覆盖着微红的胡须。在一幅风格化的细密画上，他用戴着珠宝的手指捏

着一朵完整无缺的玫瑰，轻柔地将它拿到自己鼻子前。这是常规的表现手法，把苏丹描绘为审美家、园艺爱好者和波斯四行诗作者，但画中的苏丹目光凝滞，似乎在眺望世界的尽头。在其他壮年时期的肖像中，他脖颈粗壮，非常富态；在贝利尼^[24]创作的那副著名的晚期肖像（它今天悬挂在伦敦的国家画廊）中，他神色严峻、面带病容。所有这些画像都包含一份沉着的威严，因为他是“真主在人间的影子”，自然而然地掌控大权，世界自然而然地就在他手中，因此这算不得傲慢。但画中也有一种冷森森的忧郁，让人想起他冰冷而险象环生的童年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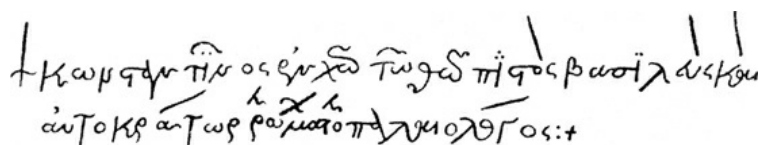
意大利人贾科莫·德·兰古斯琪对年纪轻轻就性格复杂的穆罕默德二世作了一番生动的描绘，与这些画像相得益彰：

统治者苏丹穆罕默德贝伊非常年轻……身材强健，体格魁梧，精通武艺，令人生畏的相貌难以让人心生敬意，很少有笑意，极其小心谨慎，非常慷慨大方，执行自己的计划时无比执拗，在所有事业中都大胆无畏，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渴望荣耀。每天他都让人朗读罗马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著作给他听。他会说三种语言：土耳其语、希腊语和斯拉夫语。他努力学习意大利的地理……了解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居于何处，以及欧洲有多少王国。他拥有一副欧洲地图，上面标注了各个国家和省份。他最热衷和喜爱的是世界地理和军事。他渴望统领天下；他审时度势，非常精明。我们基督徒要对付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宣布，他将从东方进军西方，就像西方人曾经向东方进军一样。他说，世界上应当只有一个帝国、一个信仰和一个君主。^[25]

这生动鲜明地显示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雄心壮志：他要举着伊斯兰的旗帜进入欧洲，逆转历史的大潮。但在他登基时，西方人总体来说还不了解他的野心和智慧。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乳臭未干、毫无经验的青年，其早年的统治以耻辱告终。

穆罕默德二世登基前两年，君士坦丁堡也迎来了一位新皇帝，尽管具体的情况大不相同。注定要在即将拉开大幕的斗争中与穆罕默德二世对抗的那个人与建城者同名——迷信的拜占庭人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

君士坦丁十一世是自1261年以来帕里奥洛格斯皇朝的第八位皇帝。这个皇族是靠篡权上台的，在他们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不可阻挡地坠入混乱和纷争之中。皇帝本人具有非常典型的多民族背景。他说希腊语，但很难说他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塞尔维亚人，君士坦丁十一世使用了她的娘家姓——德拉伽塞斯；他的父亲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像所有拜占庭人一样，他自称为罗马人，并用先辈们骄傲而古老的头衔自诩：“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信奉基督的真正皇帝、罗马人的君主。”

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Greek script, which is the signature of 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 The scrip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historical style. The text of the signature is: "Κωνσταντῖνος ὁ ἕνδεκάτος πᾶσι βασιλεὺς Ῥωμαίων".

君士坦丁十一世签名

这是个空洞的礼仪称号，但日渐衰落的拜占庭人就是这样对仪式和礼节体系死死抱住不放。皇帝属下有一位海军司令，但没有舰队；有一位陆军总司令，士兵却屈指可数。在宫廷的微型世界里，达官显贵们拼命争抢夸张得可笑的庄严头衔，比如内廷总管大臣、大法官或御橱总管。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确是一位没有权力的皇帝。他的帝国疆域已经缩减到只有都城和周围郊区、少数几个岛屿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若干领地。希腊人非常有诗意地将伯罗奔尼撒半岛称为摩里亚，即“桑树叶”。这座半岛的丝绸生产很有名，它的形状也很像蚕的食物。

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皇冠并不值得羡慕。他继承的是破产的国家财政、热衷内战的皇室、被宗教狂热分裂的城市和赤贫而动荡不安的贫民阶层。帝国是皇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毒蛇坑。1442年，他的兄弟德米特里引领奥斯曼军队进逼城市。拜占庭帝国作为奥斯曼皇帝的附庸苟延残喘，随时都可能遭到奥斯曼人的围攻。君士坦丁十一世个人的权威也并不十分稳固：他于1449年的登基有些不合常规。他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米斯特拉斯^[26]登基的——这对一位皇帝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后来也从没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过。拜占庭人不得不请求穆拉德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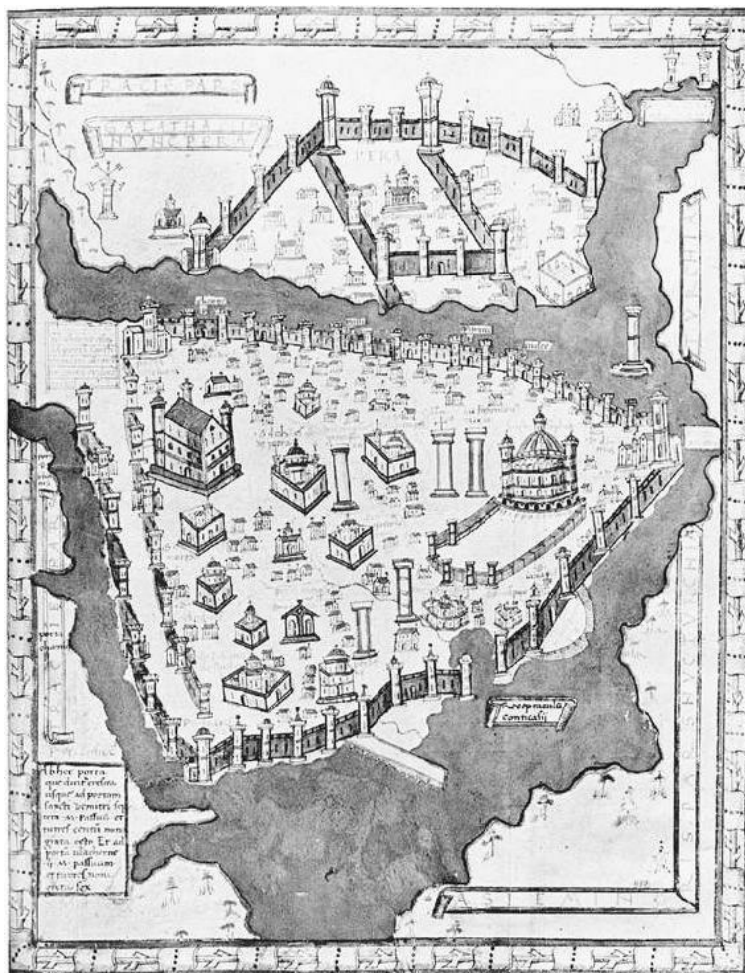
批准他们的新皇帝即位，却没钱送皇帝回家。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哀求一艘加泰罗尼亚船只送他到都城。

1449年3月，他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对于都城当时的情况，没有同时期的记载流传下来。年代较早的一份意大利地图显示，君士坦丁堡城内有很多空地，而在金角湾对岸，热那亚的贸易殖民地加拉塔（或称佩拉）却一派欣欣向荣之景。旅行家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称：“那是一座很大的城镇，居住着希腊人、犹太人和热那亚人。”^[27]他说加拉塔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港口。这位法兰西骑士认为君士坦丁堡颇具魅力，但破烂潦倒。教堂建筑群还是震撼人心的，尤其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他在那里参观了“圣劳伦斯^[28]在上面被烤死的烤架，以及一块形似脸盆架的巨石，据说天使在去毁灭索多玛与蛾摩拉的路上时，亚伯拉罕曾经在这块石头上请天使吃饭”。查士丁尼皇帝的骑马像（布罗基里埃误以为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像）依然矗立：“他左手执掌权杖，右手指向亚洲的土耳其和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的方向，似乎在显示，那片土地也是他的领地。”但真相是再明白不过的：拜占庭皇帝在自己家里也做不了主。

这座城市里到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商旅，其中最强大的是威尼斯人，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官来管理自己的全部事务，完全独立于皇帝及其大臣。土耳其人也设立了一名官员来监管他们的贸易，和威尼斯人的市政官一样，也是独立于皇帝司法权的。他们甚至拥有这样的特权：如果他们的一名奴隶逃走，躲在城内，他们可以要求皇帝将逃奴交出，皇帝必须服从。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土耳其苏丹，因为我听说，他每年要向苏丹缴纳1万杜卡特的贡金。

德·拉·布罗基里埃注意到，城内到处是往昔辉煌的遗迹，最显眼的就是赛马场的三座空空如也的大理石基座：“基座上曾经矗立的三匹镀金骏马像目前在威尼斯。”奥斯曼军队兵临城下似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老百姓很可能会主动开门献城。1430年，塞萨洛尼基^[29]拒绝向穆拉德二世俯首称臣，奥斯曼军队仅花了三个小时就冲上了城墙，随后对

这座城市蹂躏和洗劫达三天之久；7000名妇女儿童被贩卖为奴。这对君士坦丁堡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一幅关于君士坦丁堡15世纪初面貌的意大利地图，描绘了陆墙外面巨大的护城河，图的上方是加拉塔

我们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相貌知之甚少。雕像上他的面部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似乎继承了父皇曼努埃尔二世的端正面貌和仪态，但当时帝国内外交困，不曾雇佣艺术家为新皇帝留影。黄金国玺上的鹰隼般的清瘦头像也过于简略，不能说明什么。但各方面的记载对他的性格有着一致的描摹。在曼努埃尔二世的所有儿子当中，君士坦丁十一世是最精明强干和值得信赖的，“慈悲为怀，全无恶意”^[30]，果断坚定、勇敢无畏，非常爱国。与他那些热衷于争吵、毫无原则的兄弟们不同，君士坦丁十

一世非常坦诚直率；他似乎有一种魅力让身边的人都对他忠心耿耿。各方面的观察者都同意，他是个擅长行动的人，而不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管理者或有深度的思想家；他精通骑术和兵法，勇敢而有进取心。最重要的是，他面对挫折也坚忍不拔。他对拜占庭的遗产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一生都在努力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

君士坦丁十一世比穆罕默德二世年长27岁，于1405年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从其幼年经历来看，他应当对都城的困境心知肚明，不抱多少幻想。1422年，他17岁时经历了穆拉德二世对城市的围攻；次年，他的兄长约翰八世周游基督教列国，请求它们支援拜占庭的事业（这样的求援努力做过多次，但都徒劳无益），在此期间，他被任命为摄政王。1449年，他登基之时，已经44岁，经历了20年的戎马生涯。这段战争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努力恢复拜占庭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控制，有胜有败。到1430年，他肃清了外国人在半岛上建立的大部分小王国；15世纪40年代，作为摩里亚的统治者，他将伯罗奔尼撒的疆域推进到了希腊北部。对穆拉德二世来说，他一直是个刺儿头，一个桀骜不驯、需要好好教训的附庸。1446年，在瓦尔纳的十字军战役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做出了决定性的严惩。一支奥斯曼军队横扫摩里亚，将乡村彻底摧毁，将6万名希腊人贩卖为奴。君士坦丁被迫签订一项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向苏丹俯首称臣，并缴纳沉重的贡税。在希腊重振拜占庭帝国的事业失败了，他的三个兄弟德米特里、托马斯和西奥多要么自私自利、卖国求荣，要么耽于争吵、优柔寡断，设法阻挠挽救帝国残余部分的事业；他却截然不同，仍然表现出昂扬的斗志、更高一筹的军事技巧和坦诚直率的性格。他们的母后海伦娜坚决支持君士坦丁对皇位的继承权：只有他有资格继承这份遗产。



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徽章

根据后来的拜占庭传说，君士坦丁十一世命途多舛。他在摩里亚的军事冒险虽然用意良好而且大胆无畏，但运气非常糟糕。在瓦尔纳的惨败之后，威尼斯舰队返航回乡，热那亚人没有兑现诺言前来援助，他仍然孤军奋战。但他的坚持不懈给希腊人民带来了相当大的苦难。他的私人生活同样不幸。他的第一位妻子于1429年去世，没有留下一男半女；第二位妻子于1442年去世。15世纪40年代末期，他多次努力与外国王室联姻，希望借此支撑起破碎的帝国，并有一位继承人延续皇族的香火。但在穆罕默德二世登基前夕政治气候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1451年2月，穆罕默德二世住进了埃迪尔内的皇宫。他的第一个行动令人震惊，也极其果断。穆拉德二世驾崩后留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小艾哈迈德，即穆罕默德二世的异母弟。几天后，小艾哈迈德的母亲正式觐见新苏丹，表达对他父皇去世的缅怀。穆罕默德二世派遣一名宠臣阿里贝伊到后宫去，将小艾哈迈德溺死在浴缸内。第二天，他以谋杀罪将阿里贝伊处决，然后把那位伤心欲绝的母亲嫁给了一位贵族。这个残忍而精明的举动将奥斯曼宫廷的权力斗争推向了符合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人能统治；为了避免分裂和内战，只有一个皇子能存活。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比令拜占庭衰败不堪的无休无止的内战要强得多。穆罕默德二世一下子就澄清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规则，后来还把这个兄

弟相残的手段写进了法律：“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他都应将其兄弟处死。大多数法学家都对此表示认可。今后将按此执行。”^[31]从此以后，每位新苏丹登基之时，都将大开杀戒。这种残酷手段在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这位新苏丹的十九位兄弟全部被处死。尽管如此，这种兄弟相残的法律未能阻止内战的爆发：受威胁的皇子们常常会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穆罕默德二世本人就将受到这种悲剧的摧残。君士坦丁堡人应当从小艾哈迈德之死了解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本性，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1]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59

^[2] 波斯文中，“帕迪”意为“伟大”，“沙阿”意为“国王”。“帕迪沙阿”是波斯帝王的称号，后来奥斯曼帝国苏丹和莫卧儿帝国皇帝也使用这个头衔。

^[3]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18

^[4] Broquière, Bertrandon de la, in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 ed. T. Wright, London, 1848, p.351

^[5] 托普卡帕宫是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一座皇宫，1465~1853年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在首都的官邸及主要居所，也是昔日举行国家仪式及皇室娱乐的场所，现今则是主要的观光胜地。“托普卡帕”的字面意思是“大炮之门”，昔日城堡内曾放置大炮，由此得名。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9年下令动工兴建托普卡帕宫。

^[6] quoted Inalcik, Halil, *Fatih Devri üzerinde Tetkikler and Vesikalar I*, Ankara, 1987, p.59

^[7] “塔楼内的王子”指的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爱德华（被加冕为爱德华五世）和理查（受封约克公爵）。爱德华四世去世时，这两位王子年仅12岁和9岁，由爱德华四世的弟弟理查（格洛斯特公爵）摄政。但这位摄政王随后攫

取王位，史称理查三世，并将自己的两个侄子囚禁在伦敦塔。后来这两位王子就销声匿迹了。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是被谋杀的。幕后元凶有可能是理查三世，但没有过硬的证据。这个谜团至今没有解开。

[8] 维齐尔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执行一切与臣民有关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尔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时代，称首席大臣为维齐尔，但加一“大”字。大维齐尔为苏丹的全权代表，下文中译为“首席大臣”。

[9]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24

[10] 卡拉曼王朝是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土库曼人统治的一个国家，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南部，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卡拉曼省。该国的统治者称号为“卡拉曼贝伊”，一度具有独立地位，1468年（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时）被奥斯曼帝国吞并。本书故事发生的时候，执政的卡拉曼贝伊是易卜拉欣二世（在位：1424～1464）。

[11] （瓦尔纳的）瓦迪斯瓦夫三世（1424～1444），波兰国王（1434～1444年在位）和匈牙利国王（也称乌拉斯洛一世，1440～1444年在位），他因在瓦尔纳战役中阵亡，得到一个绰号“瓦尔纳的”。

[12]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

[13] 今属保加利亚。

[14] Granville Browne, E. (ed.), *A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 London, 1904, vol.2

[15] 阿利安（86～146），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史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于尼科米底亚，曾在罗马军队服役。在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期间，阿利安曾担任卡帕多细亚总督，并于公元147年担任雅典的执政官。阿利安在退休后专注于文学研究，著有一部描述亚历山大大帝功勋的《远征记》与描述军官尼阿卡斯跟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的著作。

[16] 在今天的土耳其西部，也是同名省份的首府。

[17] Mihailovich, Konstantin, *Memoirs of a Janissary*, trans. Benjamin Stolz, Ann Arbor, 1975, p.171

[18] 杜卡斯（约1400～1462），拜占庭史学家。他对拜占庭帝国最后几十年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记载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他坚决主张拜占庭与西方联合。

[19]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28

[20] 即霍加·萨阿德丁·埃芬迪（1536或1537～1599），奥斯曼帝国学者、官员与史学家。他曾是苏丹穆拉德三世年幼时的教师，著有奥斯曼帝国历史《历史的皇冠》。

[21]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41

[22]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27

[23]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24

[24] 真蒂莱·贝利尼（1429～1507），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艺术家，以其关于宗教的画作而闻名。他曾在拜占庭帝国宫廷中工作过3年。1479～1481年，他为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画像。这幅画在19世纪被修复；画家的姓名是后来被写上去的，因此无法确定原画家就是真蒂莱·贝利尼本人。

[25]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112

[26]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城市，十字军曾在此建有城堡。

[27] Broquière, Bertrandon de la, in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 ed. T. Wright, London, 1848, pp.335-41

[28] 圣劳伦斯（？～258），罗马殉道士。在教皇圣西克斯图斯二世时期，他是罗马的七个助祭之一。在罗马皇帝瓦莱里安迫害基督教、处死圣西克斯图斯二世后，罗马当局要劳伦斯把各教堂的财富交给国家。他反而把钱散发给穷人，为此被判死刑。他临刑前的大无畏精神感召了许多人改信基督教。根据一种传说，他是被放在烤架上烤死的，他对刽子手们说：“我的那一侧烤好了，把我翻过来，吃掉。”

[29] 又称萨洛尼卡，希腊马其顿地区海港城市。

[30]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67

[31]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7

4.割断喉咙

1451年2月～1452年11月



博斯普鲁斯海峡用一把钥匙开启和封闭两个世界、两片大海。^[1]

——皮埃尔·吉勒^[2]，16世纪法兰西学者

穆拉德二世的去世让整个西方世界长舒了一口气。在威尼斯、罗马、热那亚和巴黎，人们都过于轻信意大利人弗朗切斯科·菲莱尔福在穆拉德二世驾崩一个月后写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的信中的描述：穆罕默德二世年幼无知、缺乏经验、头脑简单。菲莱尔福得出的结论是，发动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将奥斯曼人“这群腐化败坏的奴隶”^[3]彻底逐出欧洲的时机业已成熟。欧洲君主们或许对他的这个结论不是很感兴趣。1444年在瓦尔纳的血腥惨败已经完全败坏了欧洲人在近期发动十字军东征的胃口。欧洲君主们对乳臭未干的穆罕默德二世登基表示欢迎，却不知这预示着怎样的灾难。

更熟悉苏丹的人就乐观不起来了。穆拉德二世去世时，君士坦丁十一世最信赖的大使乔治·斯弗朗齐斯^[4]已经从格鲁吉亚国王的宫廷出发，正要穿过黑海去拜见特拉布宗^[5]皇帝。他在进行一连串无休止的外交活动，希望为鰥夫君士坦丁十一世寻找一门合适的亲事，借此改善他

内外交困的处境、获得一名继承人，同时获取一笔嫁妆来填充他的金库。在特拉布宗，皇帝约翰·科穆宁欢欣鼓舞地将穆罕默德二世登基的消息告诉了斯弗朗齐斯：“来吧，大使阁下，我有喜讯与您分享。您一定要祝贺我。”斯弗朗齐斯的回应令人震惊：“这消息让我万分悲痛，就好像听到了我最亲近的人的死讯，我哑口无言地站在那里。最后，我颇为沮丧地说：‘陛下，这消息没有带来任何喜悦；恰恰相反，它令人万般悲痛。’”随后斯弗朗齐斯阐述了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了解：新苏丹“自幼就是基督徒的死敌”^[6]，热衷于攻打君士坦丁堡。另外，君士坦丁十一世缺少资金，需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稳定，以挽救城市的财政。

君士坦丁堡方面匆匆派出使节前往埃迪尔内，向年轻的苏丹致意并寻求安全的保障。使节们受到的接待让他们又惊又喜。穆罕默德二世非常通情达理。据说，他以先知、《古兰经》“和天使与诸大天使的名义起誓，他将与君士坦丁堡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永结盟好”^[7]。他甚至从斯特鲁马下游河谷一些希腊城镇的税收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年金赠给拜占庭人，尽管这些地区在法律上属于觊觎皇位的奥尔汗王子。这些金钱将用来供养仍然被扣押在君士坦丁堡的奥尔汗。

纷至沓来的使节们都得到了和平的保证。9月，在埃迪尔内有商业利益的威尼斯人与穆罕默德二世再次缔结和约；同时，奥斯曼人将塞尔维亚君主杜拉德·布兰科维奇的女儿（她先前嫁给了穆拉德二世）以及一些城镇归还给了他，对他做了一番安抚。穆罕默德二世还请求布兰科维奇牵线搭桥，与匈牙利人缔结和约。匈牙利的卓越领袖匈雅提·亚诺什摄政王是基督教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最大威胁。匈雅提需要粉碎匈牙利国内的一些阴谋，因此很乐意与苏丹缔结为期三年的和约。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希俄斯岛^[8]、莱斯博斯岛和罗得岛的诸领主，以及特拉布宗、瓦拉几亚^[9]和拉古萨^[10]（杜布罗夫尼克）派出的使节都得到了和平的保障，而且条件合情合理。到1451年秋季，西方世界已经普遍认为，

穆罕默德二世被他的温和的维齐尔——哈利勒帕夏牢牢掌控在手心里，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在君士坦丁堡，很多不像斯弗朗齐斯那么谨慎或者有经验的人似乎也同样被蒙蔽了。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都乐于相信，一切正常。穆罕默德二世非常小心地隐藏着自己的真实意图。

并不是只有基督徒误读了穆罕默德二世的人格力量。1451年秋季，难以驾驭的卡拉曼贝伊再次试图从奥斯曼帝国控制下夺回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领土。他占领了一些要塞，重新任命了部族领袖，并入侵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二世派遣将领去镇压此次叛乱，在埃迪尔内缔结了各项和约后，亲临前线，当即产生了极大影响。叛乱被迅速粉碎，穆罕默德二世班师回朝。在布尔萨，他遇到了新一轮的挑战，这一次闹事的是他自己的近卫军。“他们站在道路两侧，全副武装，站成两排，向他呼喊：‘这是我们的苏丹的第一次战役，他应当按惯例赏赐我们。’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不得不让步。十麻袋的钱币被分发给哗变的士兵。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是一场关系重大的意志的考验，他决心非赢不可。几天后，他召集了近卫军统领，对他严词斥责，削去他的官职；多名军官遭到类似的惩罚。”^[11]这是穆罕默德二世经历的第二次反叛。他认识到，如果要成功占领君士坦丁堡，首先必须保证近卫军的绝对忠诚。于是他对近卫军进行了改组；他将自己的7000名亲兵补充到近卫军队伍里，并任命了一位新统领。

就在此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谋臣们开始了他们自己的行动，这恰恰说明他们对穆罕默德二世的理解是多么贫乏。除苏丹本人之外唯一对奥斯曼皇位提出要求的人——奥尔汗王子住在君士坦丁堡，供养他所需的经费来自夏季与苏丹商定的税收。拜占庭人派遣大使去布尔萨与哈利勒会面，提出了一个专断的要求：

罗马人的皇帝不接受30万阿斯普尔^[12]的年金。因为，与阁下的主公同为奥斯曼后裔的奥尔汗现已成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他身边，奉他为主公和领袖。他本人没有财力对追随者慷慨赏赐，因此他请求皇帝帮助。但

皇帝也缺乏资金，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因此我们有两个请求供您选择：将年金翻倍；否则我们就将释放奥尔汗。[\[13\]](#)

言外之意是再清楚不过的：如果年轻的苏丹不肯掏腰包，就将有一个皇位竞争者自由活动，在奥斯曼帝国煽动内战。

这是一个经典的计谋。在拜占庭历史上，对邻国的王朝继承权之争加以利用一直是拜占庭外交政策的基石。这项政策常常能够弥补军事上的弱势，但拜占庭因此得到了阴险狡诈的恶名，这个臭名不值得羡慕也无人可比。在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在位期间，奥斯曼人就已经吃过这条计谋的亏，当时曼努埃尔二世狡猾地推动奥斯曼帝国的内战，导致奥斯曼帝国险些垮台，穆罕默德二世对此事是非常清楚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显然把奥尔汗看作一张王牌（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张牌），决定对其善加利用。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是个弥天大错，也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宫中毕竟还有斯弗兰齐斯这样经验丰富、对奥斯曼宫廷政治相当了解的外交官。或许，君士坦丁十一世如此决断，主要是因为帝国财政已经山穷水尽，而不是因为他真的指望能够借此煽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争斗。无论如何，这使得奥斯曼宫廷的主战派更加坚信，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的这个提议几乎是刻意要破坏哈利勒维持和平的努力，并且危及了哈利勒自己的地位。年迈的维齐尔大发雷霆：

你们这些愚蠢的希腊人，你们的刁滑已经让我受够了。已故的苏丹对你们宽大为怀，是你们的真诚朋友。现在的苏丹可不是那样的。如果君士坦丁十一世目前还没有被苏丹大胆而威严的铁手抓住，那仅仅是因为真主仍然对你们的奸诈和邪恶计划视而不见。你们如果以为凭借这些妄想就能吓倒我们，只能说明你们自己的愚蠢。况且我们最近缔结的和约墨迹未干。我们可不是没有力量或者没有理智的孩童。如果你们自认为能耍什么把戏，就去耍吧。如果你们想在色雷斯推举奥尔汗为苏丹，悉听尊便。如果你们想把匈牙利人带过多瑙河，就让他们尽管来好了。如果你们想收复早就丢失的领地，那就尽管尝试吧。但一定要知道：你们在这些事情上都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只会丢掉现在还有的那么一点点东西。[\[14\]](#)

穆罕默德二世听到拜占庭人的提议时面无表情。他“和蔼可亲”地让使臣离去，许诺在返回埃迪尔内之后会斟酌此事。君士坦丁十一世给了他一个非常珍贵的撕毁和约的借口，时机成熟时就可以使用。

在返回埃迪尔内的途中，穆罕默德二世发现，根本无法像他预想的那样渡海前往加里波利。达达尼尔海峡被意大利船只封锁了。于是，他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北上，来到安纳托利亚堡垒。他的曾祖父巴耶济德一世在1395年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建造了这座要塞。在这里，分隔亚洲和欧洲的海峡只有700码宽，是渡过海流汹涌、险象环生的海峡的最佳地点，2000年前的古代波斯国王大流士对此了然于胸，曾在此处用船只连接作为桥梁，让他的70万大军通过。穆罕默德二世的小型舰队在海峡上来回穿梭，将士兵运往欧洲时，他的足智多谋的头脑审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似乎已经有了几个结论。海峡对奥斯曼军队来说是个脆弱地域：如果不能保障欧亚之间的通航，就不可能稳固地统治这两大洲；同时，如果他能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就能切断从黑海上的希腊殖民地通往君士坦丁堡的粮食和援兵补给线，并剥夺该城从航运获得的海关税收。他设想在欧洲海岸、属于拜占庭人的土地上建造第二座要塞，以控制海峡，“封锁异教徒船只的航道”^[15]。同时他很可能也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以对抗占据海上优势的基督徒。

返回埃迪尔内之后，他立刻开始处置拜占庭人提出的最后通牒，没收斯特鲁马河城镇的税收（这些款项原定用于供养奥尔汗），并将希腊人从这一地区逐出。君士坦丁十一世或许已经能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于1451年派遣一名使节前往意大利，此人先去了威尼斯，希望能从威尼斯人的殖民地克里特招募弓箭手；然后使节又去了罗马，给教皇送去书信。君士坦丁十一世很有可能仍然希望能够对新苏丹发起积极主动的攻势。他发送给意大利各城邦的信件中并没有显现出形势已经十万火急。

1451年的冬天快到了，穆罕默德二世在埃迪尔内一刻不停地制订计

划。他身边聚集着一大群西方人，尤其是意大利人。他和他们讨论古典时代的伟大英雄亚历山大和恺撒，这两人是他为自己选定的榜样。他对秋季发生在布尔萨的近卫军哗变还记忆犹新，于是对军队和政府机构作了进一步改革。他为某些行省任命了新的总督，增加了皇宫卫队的军饷，并开始储存武器装备和给养。他可能还启动了造船的计划。同时，建造新要塞的计划也在他脑中渐渐成形。第二年春天，他从帝国的各个行省征募了成千上万的石匠、劳工和烧窑工人，并安排建材——“石料、木材、铁和所有有用的物资”^[16]——的收集和运输……“用来在君士坦丁堡以北的神圣河口建造一座新城堡”^[17]，也就是已经废弃的圣米迦勒教堂附近。

苏丹大兴土木的命令迅速传到了君士坦丁堡、黑海上的希腊殖民地以及爱琴海诸岛屿。人们陷入深深的悲观情绪之中；他们又记起了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现在你们能看得到我们国家的毁灭迫在眉睫的征兆。敌基督的日子已经降临。我们将会有的怎样的遭遇？我们该怎么办？”^[18]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内，人们焦急地祈祷，希望上帝能拯救他们的城市。1451年底，君士坦丁十一世又派遣了一名使节前往威尼斯，带去了更紧急的消息：苏丹正在集结大军，准备攻打君士坦丁堡，如果得不到援救，它必死无疑。威尼斯元老院以自己的议事速度做了斟酌，于1452年2月14日给出了答复。威尼斯人的回应是非常典型的小心谨慎；他们可不想影响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利益。他们建议拜占庭人去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不是仅仅依赖威尼斯人；但他们的确批准向君士坦丁十一世提供他索要的火药和胸甲。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别无选择，只能与穆罕默德二世直接对话。他的使臣再次翻越色雷斯的群山，去觐见苏丹。使臣指出，穆罕默德二世没有与拜占庭商议就威胁要建造这座新城堡，是在撕毁和约；苏丹的曾祖父在建造安纳托利亚堡垒的时候是征得了拜占庭皇帝同意的，“就像儿子请求父亲一样”^[19]。穆罕默德二世的回答简短而到位：“一座城市里面的东西是它自己的；它在护城河之外就没有任何管辖权，也不拥有任何东西。如果我要在神圣河

口处建造一座要塞，它也没有权力禁止我。”^[20]他提醒希腊人，基督徒曾多次阻挠奥斯曼人渡过海峡，并以典型的直率总结道：“去告诉你们的皇帝：现在当政的苏丹和他的前任不一样。前任苏丹做不到的事情，现任苏丹可以轻松地即刻完成。前任苏丹不愿意做的事情，现任苏丹是肯定愿意的。再有使臣如此进言，就会被活活剥皮。”^[21]苏丹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

3月中旬，穆罕默德二世从埃迪尔内出发，启动了建造要塞的工程。他先去了加里波利，从那里派遣6艘桨帆船和一些较小的战船——“做好了海战的准备，以防万一”^[22]，以及16艘运载装备的运输驳船。然后他率领陆军走陆路来到预定的地点。整个工程都是他雷厉风行作风的典型写照。穆罕默德二世在后勤工作上的天才保证了人力和物资都能及时到位，并且数量极其庞大，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工。欧洲和亚洲各行省的总督们征集了劳工，前往施工地点。数量庞大的工人——“石匠、木匠、铁匠和烧石灰工人，以及工程所需的其他各种劳动力，完全不缺人手，携带着斧子、铲子、锄头、鹤嘴镐和其他铁制工具”^[23]——抵达施工地点，开始干活。笨重的运输驳船将建材从海峡对面运来：石灰和烧石灰用的炉子、安纳托利亚的石料、黑海沿岸森林和伊兹密特^[24]的木材。与此同时，他的桨帆战船在海峡外围巡逻。穆罕默德二世亲自骑马巡视工地，并和两名建筑师（都是前基督徒）一道规划要塞的布局细节：“从外围塔楼到主要炮塔和城门的距离，以及其他一切细节，他都在脑子里仔细地计算着。”^[25]他可能在前一年冬天就在埃迪尔内对新城堡的设计作了筹划。他监督了地界的划定，并为城堡奠基。工匠们杀死了一些公羊，将羊血与第一层砖石的白垩与砂浆混合，以求得好运。穆罕默德二世非常迷信，受占星术影响极大。有人说，这座城堡的布局形状之所以如此怪异，是因为受了喀巴拉^[26]的影响；或者代表了先知圣名（及穆罕默德二世自己的名字）的阿拉伯文首字母的交织图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城堡的布局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岸陡峭险峻的地形决定的，因为这一带包含“迂回的扭曲处、覆盖茂密树林的海

岬、内缩的海湾和弯曲部”，并且从海岸到工地最高点的海拔高度足有200英尺。^[27]

工程于4月15日（星期六）正式启动，遵循了仔细制定的互相竞争、计件工作的原则。穆罕默德二世恩威并施，奖优罚劣，这也是他的典型做法。全部劳动力，从地位最高的维齐尔到最低贱的搬砖工人，全都行动了起来。城堡有四条边，最重要的三个角上各建有一座强大的塔楼，互相之间由高大雄厚的城墙连接，西南角还建有一座较小的塔楼。建造外层塔楼并为其出资的责任被交给了四位维齐尔——哈利勒、扎甘、谢哈布丁和萨勒贾。苏丹鼓励他们互相竞争，尽快完成各自的任务。当时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而且苏丹本人亲临现场，“一刻不肯停歇”^[28]地监督他们的工作，因此四位维齐尔都受到了极大的鞭策。穆罕默德二世自己则负责主持修建连接各座塔楼的城墙和较小的塔楼。劳工队伍一共有6000多人，包括2000名石匠和4000名石匠帮工，以及各个工种的其他工匠。整个队伍按照军事原则仔细地分为若干分队。每名石匠都有两名帮工在他身边帮忙，每天建成城墙的长度是有任务指标的。来自帝国各地的监察官负责维持纪律，对工人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执法和军事保护由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负责。同时，穆罕默德二世“公开悬赏，鼓励工匠们又快又好地干活”^[29]。根据杜卡斯的记载，在这种竞争和恐惧的高度紧张气氛下，甚至贵族们也感到，有必要亲自去搬运石头和石灰给汗流浹背的石匠们，以此鼓舞士气。这里一半像是临时搭建的小型城镇，一半像是巨大的工地。在邻近的废弃的希腊村庄阿索马通，成千上万的帐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船只在波浪滔天的海峡上来回穿梭。微微燃烧的石灰坑喷吐出浓烟；锤子在暖和的气氛中叮当作响；人们不时高声呼喊。施工昼夜进行，火把一直燃到深夜。被木制脚手架环绕的城墙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在工地周围、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春天已经降临：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紫藤和紫荆树正在吐艳；栗树的花朵像白色的星辰；在宁静的夜色中，当月光照过熠熠发光的海峡时，有夜莺在松树丛中歌唱。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人们目睹奥斯曼人的准备工作，不禁越来越恐慌。前所未闻的奥斯曼舰队出现在海峡上已经让希腊人目瞪口呆。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屋顶和斯芬多恩（赛马场南端未被摧毁的地势较高的部分）的顶端，他们可以瞥见上游6英里处奥斯曼人忙碌的景象。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大臣们不知如何是好。穆罕默德二世百般挑衅。在施工早期，奥斯曼工人就开始拆毁城堡附近的一些破败的修道院和教堂，以获取建材。居住在附近的希腊村民和城内的市民仍然把这些地方看作圣地。同时，奥斯曼士兵和工匠开始劫掠他们的田地。夏天一天天过去，庄稼快要成熟，奥斯曼人的这两项挑衅越来越激烈。奥斯曼工匠从被毁的大天使米迦勒教堂拆除石柱，一些市民企图阻止他们，却被俘虏和处死。如果穆罕默德二世是想把君士坦丁十一世引出城来交战，那他就没有得逞。皇帝本人或许想出击，但被说服放弃了。他决定稳妥地解决问题，主动提出给奥斯曼建筑工人送粮，以阻止他们抢劫希腊人的庄稼。穆罕默德二世的回应是鼓励他的部下将牲畜随便放到田地里啃食庄稼，同时不准希腊农民予以阻止。最终，农民们看到自己的庄稼惨遭蹂躏，忍无可忍，把牲畜赶了出去，于是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死亡。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的指挥官卡拉贝伊惩罚肇事的村民。次日，农民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一队骑兵向他们发动突然袭击，将他们全部杀死。

君士坦丁十一世听到这场屠杀的消息后，将城门封闭，扣押了城内的所有奥斯曼公民，其中包括穆罕默德二世的几名年轻宦官，他们正在游览城市。在被扣押的第三天，宦官们恳求君士坦丁十一世释放他们，声称如果他们不回去的话，他们的主人会生气。他们哀求，要么将他们放走，要么立刻将他们处决，因为回去太晚的话还是会被苏丹处死。君士坦丁十一世回心转意，把这些人释放了。他还派遣了一名使臣，向苏丹呈上了既听天由命又大胆挑衅的书信：

既然你舍弃和平，选择战争，我无论用誓言还是恳求都无法让你重新回到和平道路上来，那么就遵循你自己的意愿吧。上帝是我的避难所。如果他已经决意将城市交给你，谁又能反抗他或者阻止这命运呢？如果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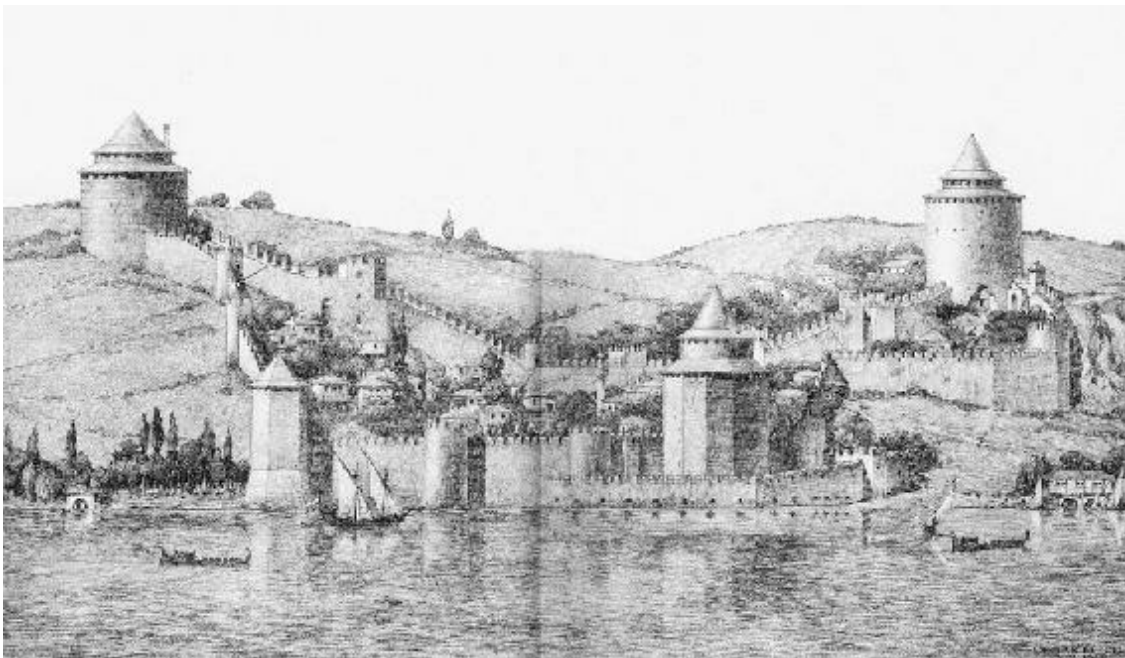
让你心生和平的意愿，我会很乐意地赞同。目前，既然你已经背弃了我为之起誓的和约，那么就让和约失效吧。从今天起，我将封闭城门。我将竭尽全力，为保卫市民而战。你可以随心所欲，直到公正的最后审判者裁决你我二人。[\[30\]](#)

君士坦丁十一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穆罕默德二世却将使节处死，并送回简短粗暴的回答：“要么开门献城，要么做好战斗准备。”一支奥斯曼军队被派去劫掠城墙外的地域，并劫走牲畜、掳掠人口，但君士坦丁十一世已经将附近村庄的大部分居民以及收割好的庄稼都撤入了城内。奥斯曼史学家们记载称，他还企图贿赂哈利勒，希望促成和平，但这种说法更有可能是哈利勒的政敌的诋毁。从仲夏起，城门一直是关闭的，双方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1452年8月31日（星期四），穆罕默德二世的新要塞竣工了，从安放第一块石头到竣工只花了四个半月的时间。新要塞非常庞大，用克利托布罗斯[\[31\]](#)的话说，“不像是要塞，倒像是一座小城镇”[\[32\]](#)，并且掌控着海峡。奥斯曼人称之为“切断海峡的城堡”或“割喉堡”，但后来它的名字变成了如梅利堡（意思是“欧洲城堡”）。城堡布局大体呈三角形，拥有4座大型塔楼和13座较小的塔楼，城墙厚达22英尺，高50英尺；塔楼的屋顶铺有铅皮。这座城堡在当时是建筑学上的一大伟业。穆罕默德二世以惊人的速度协调和完成大型工程的能力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持续地让他的对手瞠目结舌。

8月28日，穆罕默德二世率军策马绕过金角湾的顶角，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安营扎寨，此时这座城市已经彻底封闭，阻挡他的前进。他花了三天时间细致入微地观察防御工事和地形地貌，做了很多笔记和草图，对防御工事的潜在弱点进行分析。秋天的脚步已经临近，于是他在9月1日返回埃迪尔内，对自己在夏季的工作非常满意。舰队也返回了位于加里波利的基地。400名士兵进驻了割喉堡，指挥官是菲鲁兹贝伊，他受命扣押所有在海峡上航行的船只，向其征收过路费。为了加强割喉堡的

威慑力，奥斯曼人还建造了若干火炮，并将其拖曳到城堡处。城垛上安放了小型火器；还有一个连队的重炮“像口吐烈火的巨龙”^[33]，被安置在城堡外墙下方的海岸上。这些火炮的位置和角度不同，因而可以覆盖广阔的攻击范围；它们可以发射重达600磅的巨型石弹，弹道平直、紧贴水面，与过往的船只齐平，就像石子掠过池塘水面一样。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城堡”也配有火炮，于是“连一只鸟儿也不能自由地从地中海飞往黑海”^[34]。从此时起，无论白天黑夜，没有一艘船只能够不受检查地通过海峡。奥斯曼史学家萨阿德丁记载道：“就这样，帕迪沙阿（他是世界的避难所）封锁了那条海峡，切断了敌船的航道，灼烧了懦弱盲目的拜占庭皇帝的肝脏。”^[35]



如梅利堡，即“割喉堡”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君士坦丁十一世正在集合资源，为这场看来不可避免战争做准备，并派遣使节向西方发送越来越十万火急的求援信。他写信给正在摩里亚的两位兄弟托马斯和德米特里，请求他们立刻返回都城。他做出了慷慨的许诺，不论谁来援救，都会得到大片土地的报偿：他为匈牙利的匈雅提提供了黑海沿岸的塞林布里亚或墨森布里

亚；他向阿拉贡和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36]许诺的是利姆诺斯岛。他向希俄斯岛上的热那亚人求援，向杜布罗夫尼克和威尼斯呼救，并再次向教皇求助。实际的援助还没有到来，但基督教欧洲的统治者们很不情愿地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阴影正在笼罩君士坦丁堡。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做了大量交流。教皇尼古拉五世说服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让后者在3月份给苏丹发去了措辞严厉（但空洞无物）的最后通牒。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向爱琴海派遣了一支拥有10艘船的小舰队，但后来又把它们撤回了。热那亚人在加拉塔和黑海的殖民地也受到了威胁，但他们无力提供实际的帮助。他们命令加拉塔市长，假如君士坦丁堡陷落，务必与穆罕默德二世妥善协商。威尼斯元老院也给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指挥官们发出了含糊其辞的指示：他们必须保护基督徒，但同时不能得罪土耳其人。在割喉堡完工前，他们就已经知道，穆罕默德二世威胁了威尼斯在黑海的贸易。很快，威尼斯间谍们就会发回割喉堡及其火炮的详细布局图。威尼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非常关注：8月，元老院进行了投票，大部分人都不同意听任君士坦丁堡自生自灭，但未能就更果断的反制措施达成一致。

在埃迪尔内，穆罕默德二世可能是猜测到，或者是从某种途径得知，君士坦丁十一世正向他在摩里亚的兄弟求援，于是迅速采取行动，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1452年10月1日，他命令年迈的将军图拉汗贝伊进军伯罗奔尼撒半岛，进攻德米特里和托马斯。图拉汗蹂躏了乡村，深入半岛南方，使得那里的拜占庭军队无法驰援君士坦丁堡。同时，从黑海到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渐渐枯竭。秋季，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派出了新使节。11月16日，威尼斯元老院做出的答复和以往一样含糊，但威尼斯人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发生在更东方的事件吸引了过去。

到11月，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航行的意大利船主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是向割喉堡缴纳过路费，还是置之不理、甘冒风险？向南的海流很迅猛，南下的船只很有可能快速通过检查站，而不至于被大炮击中。

11月26日，一名威尼斯船长安东尼奥·里佐驾驶着粮船（粮食是送往君士坦丁堡的）从黑海南下，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接近割喉堡时，他决定赌一把。岸上的驻军发出警告，命令他落帆停船，但他置之不理，继续前进。一轮炮弹从海面上低低地掠过，其中一枚巨型石弹击中了他的桨帆船的轻型船体，将它打得粉碎。船长和其他30名幸存者乘坐小艇登岸，随即遭到逮捕，被戴上镣铐，押往埃迪尔内附近的迪迪莫特孔城，听候苏丹的发落。他们在监狱里煎熬的时候，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匆匆赶往苏丹皇宫，请求饶恕这些水手。他来得太晚了。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决定严惩这些威尼斯人，以儆效尤。大多数人被斩首。里佐则被“一根尖木桩插入肛门”。然后所有的尸体都被抛弃在迪迪莫特孔城墙外，作为警示。“几天后，我去那里时看见了他们的尸体，”^[37]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回忆道。少数水手被送回君士坦丁堡，以确保那里的人们都听闻了这个恐怖的故事。此外还有一个人活了下来：穆罕默德二世对里佐的书记的儿子很喜爱，将这个男孩送入了后宫。

这个野蛮行径收到了苏丹所希望的效果。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当即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同时，尽管君士坦丁十一世发出了很多求援的呼声，西方还是没有任何联合一致发起救援的迹象。只有教皇能够超越欧洲山头林立的商业利益以及各王室间的宿怨和战争，以基督教世界的名义发出求救，但天主教教廷本身与东正教教会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盘根错节的纷争，这给所有的求援行动都投下了阴影。这将严重影响君士坦丁十一世组织有效防御的努力。

^[1] quoted Freely, John, *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 Woodbridge, 2000, p.269

^[2] 皮埃尔·吉勒（1490～1555），法兰西自然科学家、翻译家和测绘学家。他曾游历地中海和东方，1544～1547年曾在君士坦丁堡寻找古代手稿。

^[3]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68

[4] 乔治·斯弗朗齐斯（1401～约1478），拜占庭晚期史学家和官员，亲身经历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撰写的关于这段时期拜占庭历史的著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5] 特拉布宗是从拜占庭帝国分裂出的三个帝国之一，创立于1204年4月，持续了257年。特拉布宗帝国的第一代君主阿列克赛一世是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皇朝最后一位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的孙子，他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预见十字军将攻取君士坦丁堡，便占据特拉布宗独立建国。在地理上，特拉布宗的版图从未超过黑海南岸地区。146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消灭了特拉布宗。

[6]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59

[7]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28

[8] 爱琴海的一个岛屿，距土耳其西岸仅8000米。有种说法称，盲诗人荷马就出生在这里。

[9] 在中世纪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地区，位置大约在今日的罗马尼亚东南部。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

[10] 1358～1808年的一个城邦共和国，以杜布罗夫尼克城为核心，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

[11] Tursun Beg, *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 Minneapolis and Chicago, 1978, p.33

[12] 当时拜占庭的一种金币，单数称“阿斯普隆”，复数称“阿斯普尔”。

[13]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p.234-5

[14] quoted Nicol, Donald M., *The Immortal Emper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us, 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 Cambridge, 1969, p.52

[15]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11

[1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19

[17]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p.237-8

[18]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38

[19]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39

[20]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39

[21]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45

[22]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21

[23] Mihailovich, Konstantin, *Memoirs of a Janissary*, trans. Benjamin Stolz, Ann Arbor, 1975, p.89

[24] 土耳其西北部城市，是交通枢纽和主要港口。

[2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22

[26] 喀巴拉是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发展于12世纪。本以口述为传统，主要传述《托拉》的神秘智慧。正统犹太教认为这是异教及泛神论的主张。

[27]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22

[28] Tursun Beg, *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 Minneapolis and Chicago, 1978, p.34

[29]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22

[30]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45

[31] 即米海尔·克利托布罗斯（约1410~1470），希腊政治家、学者和史学家。

他在奥斯曼帝国保护下撰写了五卷本的史书，记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将此书献给穆罕默德二世，在书中对这位君主表示了敬仰，同时哀叹拜占庭的灭亡，但认为这是天意。

[32]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22

[3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11

[3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11

[35]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12

[36] 即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同时是那不勒斯国王（称阿方索一世）。

[37]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48

5.黑暗的教堂

1452年11月～1453年2月



让一个国家受伊斯兰教统治，远胜于让它落到不肯承认天主教会权力的基督徒手中。^[1]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年

逃离天主教派，就像逃离毒蛇和火焰一般。^[2]

——圣马可·尤金尼克斯^[3]，15世纪希腊东正教的神学家

君士坦丁十一世从西方获得援助和有效地组织城防的主要困难可以上溯到将近400年前一个夏天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尽管它的真正原因甚至更为古老。

1054年7月16日，下午3点左右，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当教士们在准备下午的礼拜仪式时，三名高级教士身着全套圣服，从西面的一扇大门走进了教堂，刻意地走向祭坛。聚集在教堂内的信徒们注视着他们。这三人是罗马教皇派来的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任务是与东方教会的兄弟们解决神学争端。其中为首的教士名叫穆瓦昂穆蒂耶的安贝尔^[4]。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但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后，

在这一天的下午，他们终于丧失了耐心，决定采取行动。安贝尔手中文件的内容将对基督教的统一产生爆炸性效果。他走入圣殿，将绝罚诏书放到主祭坛上，敏捷地转过身来，扬长而去。这位生性执拗的红衣主教高视阔步地走进夏日的明媚阳光，甩去脚上的灰尘，大声宣布：“愿上主临鉴，评判我辈！”^[5]一名教堂执事手里挥舞着诏书，跑上大街，追上安贝尔，恳求他将诏书收回。安贝尔拒绝了，继续往前走，不再理会诏书的存在。两天后，三位红衣主教乘船返回罗马；君士坦丁堡大街上爆发了激烈的宗教暴乱，东正教会宣布将教皇代表团逐出教门，才把暴乱平息下来。教皇的绝罚诏书被当众烧毁。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所谓东西教会大分裂的源起，它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严重的伤痛——两大教会的互相绝罚直到1965年才被撤销，但伤痕是不可磨灭的。对于1452年冬天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

事实上，1054年的事件不过是两种信仰方式酝酿了几百年的漫长分离过程的总爆发。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有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在东方，教会的语言是希腊语；西方则是拉丁语。信仰形式不同，教会组织方式不同，对教皇角色的看法也不同。一般来讲，拜占庭人将他们的西方邻居视为粗鲁的野蛮人；拜占庭人与邻近的穆斯林的共同点要比与大海对岸的法兰克人多得多。但东西方矛盾的中心是两个关键问题。东正教会愿意接受教皇在诸位牧首中占据特殊地位的观点，但对教皇尼古拉一世于865年表达的观点——教皇拥有统领“整个世界，也就是整个教会”^[6]的权力——非常恼火。东正教会认为这是专制暴君的傲慢。

第二个问题是信条上的。天主教會的绝罚诏书指控东正教会将信条中的一个重要的词忽略了，这个问题对热衷于神学问题的拜占庭公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貌似单纯无害的拉丁词语“filioque”（意思是“和圣子”）其实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最初的尼西亚信经是这样的：“我信圣灵，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所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西方天主教会在信条上增加了一个词“filioque”，使得信条变

成了“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后来罗马教会甚至开始指控东正教会省略这个词是弥天大错。东正教会则反驳称，增加这个词在神学上是说不通的；圣灵仅来自圣父，增加“圣子”是异端思想。就是这些问题引发了君士坦丁堡街头的暴乱。

随着时间流逝，东西方的隔阂越来越深，尽管也有人努力弥合双方的矛盾。1204年，基督教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教皇英诺森三世称此次洗劫为“毁灭的例证、黑暗力量的行径”^[7]），更使得拜占庭人对所有与西方有联系的东西都深恶痛绝。由于这次洗劫，意大利各城邦从拜占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让拜占庭人咬牙切齿。1340年，卡拉布里亚的巴尔拉姆^[8]向教皇本笃十二世进言：“让希腊人反对您的并非宗教信条的分歧，而是对拉丁人的仇恨。这种仇恨已经深入希腊人的骨髓，因为希腊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了拉丁人的很多残酷的侵害，并且今天仍然受到这种侵害。”^[9]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宗教信条对君士坦丁堡平民的信仰方式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自己的历代皇帝也曾多次改变信仰方式，但平民一直予以阻挠，死守自己的古老信仰，这种执拗和固执己见已经成为拜占庭历史这块马赛克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15世纪，奥斯曼帝国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连续多位拜占庭皇帝不断奔向西方，展开一系列令人心力交瘁的求援行动。15世纪20年代，皇帝约翰八世访问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匈牙利的天主教国王提议，如果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联合，并向教皇及其信条宣誓效忠，就更容易得到西方的支持。对拜占庭皇室来说，与西方联合一直是潜在的政策工具，也是信仰问题：基督教世界联合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威胁曾多次遏制住了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入侵（约翰八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在临终前给了他的孩子们一条典型拜占庭式的建议：“土耳其人开始惹是生非的时候，就立刻派遣使臣到西方，主动提出愿意与西方联合，并尽可能地拖延谈判，拖得越久越好。土耳其人非常害怕我国与西方联合，会变得通情达理；但由于拉丁各国的敌意，这种联合是不会实现的！”^[10]）。

这条建议在过去非常有用，但随着奥斯曼人越来越强大，拜占庭人的计谋常常取得与他们的意愿完全相反的效果：与西方联合的努力越来越刺激奥斯曼人的武装干预。但对约翰八世来说，虽然他害怕得罪奥斯曼人，同时对自己的臣民又不信任，但敌人敲打城门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当教皇尤金四世提议在意大利召开会议，共商东西方教会联合事宜时，约翰八世于1437年11月乘船前去开会，让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担任摄政王，管理都城。

这次佛罗伦萨会议非常拖沓，与会者互相充满敌意，一直开到1439年6月才结束。会议最终宣布，东西方教会已经正式联合。整个欧洲的教堂都敲响了大钟，甚至远至英格兰也敲钟庆祝。与会的东正教代表只有一人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的文本经过了精心设计，特意对一些关键问题做了模糊处理：教皇对至高无上权力的主张以及“filioque”的概念都得到了认可，但并不要求东正教会在自己的信条里加上这个字。但是，协议墨迹未干，希腊人就开始摒弃对它的认可。君士坦丁堡城内，东正教信众充满敌意地迎接了返回的代表团；在协议上签字的很多代表马上翻脸不认账。东正教牧首们拒绝接受代表团的决定；下一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格列高利·玛马斯是支持与西方联合的，他非常不受民众欢迎，也根本无法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庆祝联合的成功。联合的问题让城市分为两个敌对阵营：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信任的绝大部分贵族、军官和公务人员都支持联合；教士和平民只有少部分人支持联合。群众认为这个联合是奸诈的法兰克人强加给他们的；而且他们的永恒灵魂也因低贱和物质至上的动机而受到了威胁。民众极其仇视天主教会：他们已经习惯于将教皇和敌基督画等号，将教皇称为“恶狼、毁坏世界者”^[11]；市民们喜欢给他们的狗取名叫“罗马教皇”。市民们组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无产阶级：赤贫、迷信，容易受人煽动去制造哗变和混乱。

君士坦丁十一世登基伊始就继承了无休无止的宗教纷争，这在拜占庭的漫长历史上也是非常典型的。一千一百年前，君士坦丁大帝也曾受

到宗教信条纷争的困扰。君士坦丁十一世是个军人，而不是神学家，他对东西方教会联合的态度完全是务实的。他只有一个执着的目标：挽救这座城市，因为它的古老遗产被交到了他的手中。如果与西方联合有助于这个目标，就这么办好了，尽管市民们因此对他颇为不满。他的皇权和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他在米斯特拉斯登基时并没有接受过正式加冕。加冕仪式本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但人们强烈地感到，如果由一位主张联合的牧首为一位赞同联合的皇帝加冕，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暴乱。于是加冕仪式就被悄悄地搁置了。很多市民拒绝在祈祷时为新皇帝祈福，佛罗伦萨会议上的一名主要的反对者乔治·斯科拉里奥斯退隐到一座修道院，改名为真纳迪奥斯，开始组织反对联合的教士会议，进行抵抗。1451年，牧首格列高利厌倦了这些无休无止的敌对，前往罗马，在那里将反对联合派的活动情况全都告知教皇尼古拉五世。君士坦丁堡城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格列高利的牧首职位。于是从此刻起，君士坦丁堡既没有完全合法的皇帝，也没有牧首。

与穆罕默德二世爆发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大，君士坦丁十一世向教皇发出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求救；他不甚明智地在书信中加入了反对联合派提出的召开新的宗教会议的要求。格列高利报告的教会联合在君士坦丁堡的执行情况让教皇尼古拉五世更加强硬，他也不愿意继续忍受故态复萌的希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支吾搪塞。尼古拉五世的回复是非常冰冷的：“如果你，你的贵族，以及君士坦丁堡人民接受教会联合，你们会发现，我们和我们可敬的兄弟们，即神圣的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们，永远愿意支持你的荣誉和你的帝国。但假如你和你的人民拒绝接受联合的诏令，我们将被迫采取对你们的灵魂得救和我们的荣誉必需的措施。”^[12]教皇的威胁只是让拜占庭的反对联合派更坚定了决心，他们继续活动，暗地破坏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城内的地位。1452年9月，一名反对联合分子写道：“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仍然没有加冕，因为教会没有领袖，而且由于虚假的联合造成的动荡和混乱，教会也乱作一团……这个联合是邪恶的，受上帝憎恶，分裂了教会，驱散了教会的孩

子们，把我们完全摧毁。实话实说，这是我们所有其他灾难的来源。”^[13]

在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决心采取措施，强制执行佛罗伦萨会议的决议。他决定派遣一名教皇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确保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庆祝联合的成功。他选择的特使是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前任基辅主教。伊西多尔是拜占庭人，对当前问题的微妙性有着最直接的了解。在佛罗伦萨会议上，他是主张东西方教会联合的。他返回基辅之后，他的东正教信众抛弃了他，并将他囚禁起来。1452年5月，他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随行的有200名弓箭手（军饷由教皇支付），作为他此次神学使命的军事支持。途中，他遇见了莱斯博斯岛的热那亚人主教——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此人对后来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有积极投入但偏见很深的评论。反对联合派已经得到了此二人即将到来的预警，君士坦丁堡城内也因此更加动荡。真纳迪奥斯公开发表了攻击联合的恶毒演说，从正午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到晚上。他恳求民众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寄希望于价值甚微的物质上的援助。但在1452年10月26日，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在君士坦丁堡登陆时，护卫他的一小队弓箭手让民众产生了敬畏之情。这一小队人马或许只是强大援军的先遣部队。于是，很多人一下子又见风使舵地转为支持联合。在一段时间内，这座反复无常的城市的民意发生了拉锯战。反对联合派被指责为不爱国，但人们看到没有更多船只运载援军抵达，于是又重新回到了真纳迪奥斯的阵营。反对联合派发动了暴动。莱奥纳德尖锐地要求君士坦丁十一世逮捕暴乱的幕后元凶。他悲哀而愤怒地抱怨道：“除了……少数僧侣和俗人，所有希腊人都被骄傲迷了心窍，因此没有人会被对真正信仰的热忱或他自己的灵魂得救而驱动，去第一个摒弃自己原先固守的成见。”^[14]君士坦丁十一世拒绝听取他的建议；他担心城市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混乱。相反，他还召集了反对联合派人士到宫中，听取他们的反对意见。

十天后，割喉堡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城里。里佐及其船员的悲惨命运

被公之于众后，群众陷入了新一轮的恐慌。联合派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真纳迪奥斯再次慷慨陈词，抨击墙头草：西方的援助会让他们丧失自己的信仰，援助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他自己不愿和西方扯上任何关系。有一件事情比城市陷落更让真纳迪奥斯担心：他真真切切地相信，世界末日已经迫在眉睫。他希望东正教会能够以纯洁无瑕的灵魂迎接最后审判。街头爆发了更多的骚动。僧侣、修女和俗人跑来跑去，争相呼喊：“我们不要拉丁人的帮助，也不要和拉丁人联合；让我们彻底清除异端崇拜。”^[15]虽然真纳迪奥斯在煽风点火，但战战兢兢的民众似乎渐渐地决定（虽然很不情愿）接受佛罗伦萨会议的决议，至少是暂时接受。拜占庭人以货真价实的诡辩术对自己的行为作了辩解（他们这种狡辩的本事也算是“优良传统”了）：变通教义。这条教义允许信徒为了保证生存而暂时接受非正统的神学观点。天主教会对此种神学手段火冒三丈。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则认为强制执行联合、拯救希腊人受威胁的灵魂的时机业已成熟。

在这种充满恐惧和宗教狂热的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庆祝联合的礼拜仪式于1452年12月12日（这是深冬的一个冷寂日子）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正式举行。“教士们极其庄严，可敬的俄罗斯红衣主教（即伊西多尔）也在场，他是被教皇派来的；还有最崇高的皇帝和他的所有显贵，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全体人民。”^[16]联合诏令被当众宣读，祷词中加入了为教皇以及不在场的牧首格列高利祈福的环节，但礼拜仪式的细节对很多在场观看的希腊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礼拜语言和仪式是天主教的，而不是东正教的；圣体包含了未发酵的面包（这在东正教看来是个异端），冷水被倒进杯子，与葡萄酒混合。伊西多尔写信给教皇，报告了自己使命顺利完成的情况：

君士坦丁堡全城与天主教会联合了；礼拜仪式中为您祈福；而最可敬的格列高利牧首在君士坦丁堡期间，任何教堂都不曾为他祈福，甚至他自己的修道院都没有；现在，联合完成后，全城也为他祈福。从最低贱的到最高贵的，包括皇帝本人，全城人都团结一致，信奉天主教。感谢上

帝。[\[17\]](#)

据伊西多尔说，拒绝参加联合的只有真纳迪奥斯和其他八名僧侣。这很可能是伊西多尔一厢情愿的想法。一位在场的意大利人记载道，那一天全城陷入了哀恸之中。礼拜仪式期间显然没有发生暴乱。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东正教信众硬咬着牙参加了礼拜，然后成群结队地前往全能之主修道院，去找真纳迪奥斯咨询。真纳迪奥斯已经成为东正教事实上的精神领袖和等待登位的下一任牧首。但他退回了自己的小房间，保持缄默，不肯出来。

从此以后，东正教徒摒弃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认为它“比犹太会堂或古代异教神庙好不到哪儿去”[\[18\]](#)。他们只在城内正儿八经的东正教教堂做礼拜。没了牧首和信众，巨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陷入了黑暗和沉默。持续不断的祈祷声消失了，曾经照亮穹顶（那就像“整个浩瀚夜空，装点着闪闪发光的星辰”[\[19\]](#)）的成千上万盏油灯也噼啪作响，相继熄灭了。联合派的礼拜仪式很少有人参加，聚集在圣殿前的人寥寥无几。鸟儿哀戚地在教堂中殿周围振翅。东正教徒们感到，真纳迪奥斯的严词谴责被证明是正确的：并没有强大的援救舰队从马尔马拉海驶来，保卫基督教世界。从此以后，联合派和东正教徒之间、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隔阂比以往更深，基督教方面对围城战的所有记载都反映出了这一点。东西方的大分裂将给君士坦丁十一世守城的努力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

1452年11月1日，真纳迪奥斯在自行与世隔绝之前，在全能之主修道院大门上贴了一份宣言。它读起来像是预言，充满了世界末日降临的阴郁和自我辩解：

可悲的罗马人，你们竟如此误入歧途！你们背离了希望——因为只有上帝才能给人希望——而信任法兰克人的力量。你们的城市很快就将毁灭殆尽。除了城市之外，你们还丧失了真正的宗教。哦，上帝，怜悯我吧。我在你面前发誓，我在此事上是纯洁无辜的。悲惨的公民们，小心注意你

们今天所行之事。你们将面临奴役；你们否认了先祖传下来的真正的信仰。你们供认了自己的不虔诚。你们接受最后审判时必将遭受磨难！[\[20\]](#)

在150英里之外的埃迪尔内，穆罕默德二世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避免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哈利勒帕夏因此主张继续实行和平政策：任何攻打君士坦丁堡的企图都可能使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将保卫君士坦丁堡的事业变成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契机。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君士坦丁堡城内传来的消息给了他希望，鼓励他大胆行事。

在冬季的短暂白天和漫长夜晚，苏丹一直在思忖自己的征服梦想。他对此十分执着，但又犹豫不决。他在埃迪尔内的新宫殿开始动用帝国权威，继续对亲兵部队进行改革，并操纵货币的含银量，以支付所有行动的开支。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了一群意大利谋臣，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西方时局以及军事技术的情报。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关于防御工事和攻城战的插图版专著。他焦躁不安、兴奋狂热而又踌躇不定。他咨询占星家，在自己脑子里设计打破君士坦丁堡城防的方法，与宣称不可能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年迈维齐尔们的保守智慧搏斗。同时，他研究奥斯曼历史以及此前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极其仔细地检查这些战役失败的原因。他在夜间无法入眠，就整夜地绘制君士坦丁堡防御工事的草图（夏天时他曾亲自对其做过观察），并设计攻打这些工事的策略。

史学家杜卡斯对苏丹的这些如痴如狂的黑暗日子作了生动的描绘。他笔下出现的是一位行事诡秘、疑心极重、被野心吞噬的苏丹，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可能为了他的基督徒读者而作了夸张处理。据杜卡斯记载，穆罕默德二世常常在夜间乔装打扮为一名普通士兵，在大街上游荡，在市场和客栈里聆听人们关于他的闲聊。如果有谁认出了他，并愚蠢地按照礼节高呼万岁，穆罕默德二世就会把这人刺死。这种故事口口相传，有无数版本，迎合了西方人对嗜血暴君的想象。根据传说，一天夜里，将近凌晨时分，苏丹派遣宫廷卫兵去传唤哈利勒。他或许把哈利

勒视为他的宏图大略的最大障碍。年迈的维齐尔听到传唤，不禁浑身战栗。在这个时间被叫去觐见“真主在人间的影子”可不是什么好的预兆。他拥抱了妻子儿女，似乎在做最后一次道别，然后跟随卫兵前去，手里端着一个装满钱币的托盘。杜卡斯暗示，哈利勒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曾接受了希腊人的很多贿赂，劝说穆罕默德二世不要开战，尽管这一点是真是假，永远不可能澄清了——哈利勒自己富可敌国，曾经借钱给老苏丹，即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哈利勒来到苏丹寝宫时，发现穆罕默德二世已经起床，穿戴整齐。老人匍匐在地，举起托盘。“这是什么？”穆罕默德二世问道。“陛下，”哈利勒答道，“根据惯例，一名贵族在非同寻常的钟点被主公传唤，是不能空着手来的。”“我不需要礼物，”穆罕默德二世说，“把那座城市给我就行了。”哈利勒被此次奇异的传唤和苏丹狂热的面容吓得毛骨悚然，表示全心全意地支持苏丹的计划。穆罕默德二世最后说道：“我们将信任寄托于真主的许可，以及先知的祈祷，我们将占领那座城市。”然后允许魂不附体的维齐尔回家。

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大约在1453年1月前后，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了大臣，发表了决意开战的演说。希腊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把这份演说记载了下来。苏丹将君士坦丁堡问题放置到了奥斯曼人崛起的整个历史背景中。他十分清楚，50年前，奥斯曼帝国羽翼未丰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煽动了帝国的灾难性内战，给帝国带来了极大损害；他也明白“君士坦丁堡从未停止向我们进军，不断地挑动和教唆我们的人民互相残杀，推动混乱和内战，损害我们的国家。”^[21]他担心，君士坦丁堡将来仍然会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国家之间无休止战争的动因。一旦将其占领，它将成为帝国的中心，“但如果没有它，或者让它继续当前的状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随时可能丧失，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22]。大臣们也一定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前，君士坦丁十一世还企图利用奥尔汗来破坏帝国的稳定。苏丹努力推翻可以一直上溯到阿拉伯人攻城时期的旧观念：要攻破君士坦丁堡是不可能的。他对城内近期事态了如指掌；他知道，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市民们“正像不

共戴天的死敌一样为了宗教信念的分歧而互相斗争，他们的内部组织因此充满了煽动和动荡”；并且，和往昔不同的是，今天基督徒已经不再控制海上航道。苏丹还谈及了圣战传统——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今天的穆斯林有义务开展圣战。穆罕默德二世还特别强调了尽快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要求务必迅速地集中全部可用资源，决战决胜：“为了这场战争，我们要投入全部力量，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金钱、武器或其他物资，都不能吝惜；直到我们占领或者摧毁城市，其他任何事情都算不得重要。”^[23]这是开展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召唤，似乎已经说服了所有人。战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

正如阿拉伯人在717年经历的那样，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冬天可能会惊人地严酷。从地理位置上讲，君士坦丁堡突入海峡，暴露在从黑海刮来的猛烈北风之下。这里空气潮湿，气温会降到零下，寒风刺骨。一连几周的绵绵苦雨将街道化为泥坑，地势陡峭的小巷可能会突然暴发洪水。暴风雪突如其来，将半英里之外的亚洲海岸完全抹平，然后又迅速消逝。有时浓雾会笼罩城市很多天，诡异的死寂似乎控制了整座城市，教堂钟声传不远，公共广场上的马蹄声也十分模糊，似乎马蹄上包裹着毛毡。1452～1453年的冬天，君士坦丁堡的天气尤其恶劣和多变。人们观察到“罕见而奇异的地震和大地颤动，天上降下电闪雷鸣，十分可怕，以及狂风、洪水和瓢泼大雨”^[24]。恶劣的天气让大家的心情更加糟糕。没有任何基督教船只前来救援，以兑现联合派的诺言。城门仍然紧闭，从黑海来的粮食供应也由于苏丹的遏制而逐渐停止。普通市民整天聆听东正教教士们的宣讲，在酒馆里狂饮没兑水的葡萄酒，并向圣母像祈祷，求她保佑城市，就像当年在阿拉伯人围攻时那样。人们陷入狂热，对自己灵魂的纯洁极其关注，无疑是因为受到了真纳迪奥斯谴责的影响。参加联合派主持的礼拜仪式，或者从一位曾参加联合礼拜的教士那里接受圣餐（哪怕他仅仅是仪式的旁观者）都被认为是罪孽。君士坦丁十一世骑马走过大街时受到公开的嘲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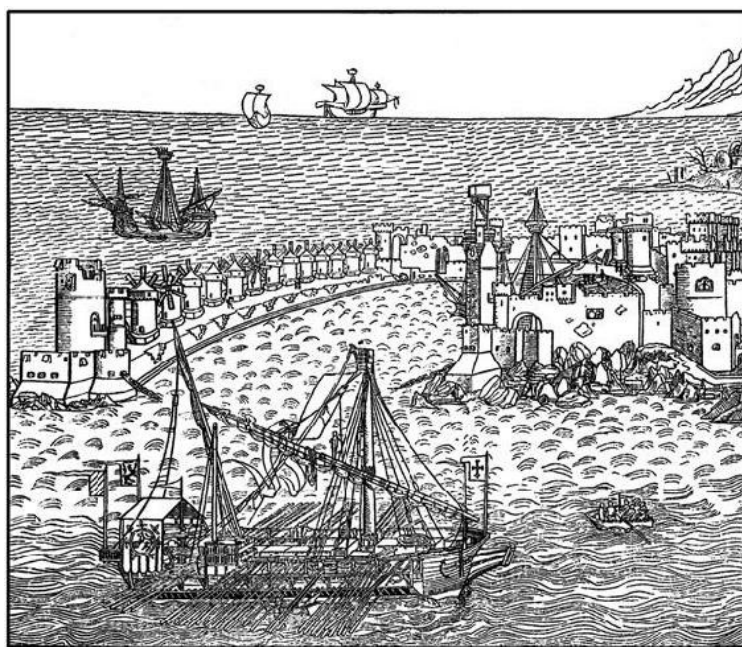
虽然大环境不理想，皇帝还是竭尽全力地准备城防。他派遣使节去爱琴海岛屿及更远方收购食物：“小麦、葡萄酒、橄榄油、干无花果、鹰嘴豆、大麦和豆类。”^[25]同时开始修补防御工事（陆墙和海墙）中年久失修的地段。他们缺少优质石料，也没办法从城外的采石场获取原料，于是不得不从废弃的建筑物和被抛弃的教堂上拆取建材；甚至古老的墓碑也被加以利用。陆墙前方的壕沟被清理干净；虽然民众有所保留，但君士坦丁十一世还是说服他们参加劳动。通过公开募集行动，朝廷从个人、教堂和修道院筹集了款项，用以购买粮食和武器。城内所有可用的武器（数量极少）被收集起来，重新分配。另外还向城墙之外仍然被拜占庭控制的少数几座堡垒派驻了士兵，包括：马尔马拉海北岸的塞林布里亚和埃皮巴托斯，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岸、割喉堡远方的希拉比亚，以及王子群岛^[26]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作为最后的挑战姿态（尽管它虚弱无力），君士坦丁十一世派遣桨帆船劫掠了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奥斯曼村庄，将俘虏带回城内，卖为奴隶。“这使得土耳其人对希腊人大发雷霆，并发誓一定要给希腊人血的教训。”^[27]



描绘圣母马利亚的印章

这段时间里，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除了劫掠奥斯曼村庄之外的唯一一个亮点是，一群迷途的意大利船只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说服（或者说强迫）他们参加城防。12月2日，威尼斯的一艘大型运输桨帆船从黑海之滨的卡法出发，在贾科莫·科科指挥下，谎称自己已经在上

游付了过路费，骗过了割喉堡的大炮封锁线。这艘船接近割喉堡时，船员们向奥斯曼炮手们热情呼唤，称他们为“朋友，向他们致意，吹响喇叭，发出欢天喜地的声音。我们的人发出第三次致敬时，已经驶离了城堡，海流把我们带往君士坦丁堡”^[28]。同时，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将真实的局势报告给了各自的共和国当局。两个共和国开始缓慢地采取行动。在里佐的船被击沉之后，威尼斯元老院命令共和国的海湾副统领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前往君士坦丁堡，将威尼斯的商船队从黑海带回。此次前来的威尼斯人当中有一位名为尼科洛·巴尔巴罗的随船医生，他在日记中对随后几个月的事件作了极其生动的记述。



威尼斯大型桨帆船，地中海上的散装货船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威尼斯殖民地，大家越来越焦虑。威尼斯市政官米诺托是个富有进取心且意志坚定的人，他一心要把三次大型商用桨帆船和特里维萨诺的两艘轻型桨帆船留下，参加城防作战。12月14日，米诺托、特里维萨诺、其他威尼斯船长和皇帝进行了会晤。米诺托恳求船长们留下，“首先是为了上帝的爱，其次是为了基督教的荣誉和我们威尼斯政府的荣誉”^[29]。漫长的谈判后，船主们同意留下。但是，就他

们应当将货物留在船上还是将它们留在城内作为他们守信的抵押，双方争执了一番。君士坦丁十一世怀疑，一旦货物被装上船，这些船就会扬长而去；最后船主们不得不亲自向皇帝起誓，才被允许将他们的货物（成捆的丝绸、蜂蜡和其他物资）装上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2月26日夜间，其中1艘威尼斯船只和6艘来自克里特岛的甘地亚城的船只偷偷起锚，借助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溜走了。“很多富人乘坐这些船只逃走，一共有700人左右，这些船只安全抵达了特内多斯^[30]，没有被土耳其舰队俘虏。”^[31]

虽然发生了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但也有喜讯传来。加拉塔的热那亚市长的呼救召唤来了具体的援助。2月26日前后，两艘大型盖伦帆船^[32]抵达君士坦丁堡，带来了“很多作战所需的精妙装备和机器，以及英勇而自信的精锐士兵”^[33]。这些船只隆隆驶入帝国港口，“甲板上站着四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34]，这幅景象当即对民众和皇帝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这些援兵的指挥官是一名与热那亚共和国的名门望族有联系的职业军人，名叫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自愿发起这次远征，并且自己承担开支。他一共带来了7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其中400人是在热那亚招募的，另外300人来自罗得岛和热那亚控制下的希俄斯岛（那里是朱斯蒂尼亚尼家族的权力基地）。君士坦丁十一世很快认识到此人的重大价值，向他提出，如果能够击退奥斯曼人，就将利姆诺斯岛赏赐于他。在随后几周内，朱斯蒂尼亚尼将在防御战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士兵陆续赶到。来自热那亚的博基亚尔多三兄弟安东尼奥、保罗和特罗伊洛带来了一小队人马。加泰罗尼亚人提供了一支队伍。一名卡斯蒂利亚贵族——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也响应了号召。除此之外，向基督教世界的求援带来的就只有不和谐的回响。市民们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罗马给我们的援助和开罗的苏丹提供的一样多，”^[35]乔治·斯弗朗齐斯悲愤地回忆道。

[1] quoted Mijatovich, Chedomil,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1448-1453*, London, 1892, p.17

[2] quoted in an article on the *Daily Telegraph* website, 4 May 2001

[3] 即以弗所的马可（1392~1444），希腊以弗所的大主教。他认为西方天主教会是异端，坚决反对与西方联合。他是佛罗伦萨会议上唯一一个拒绝签字的东正教代表。东正教会尊崇他为圣徒。

[4] 穆瓦昂穆蒂耶的安贝尔（约1000~1061），法兰西本笃派僧侣，后来升为红衣主教。据说他是第一个担任红衣主教的法兰西人。他在1054年的行动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教会大分裂。有趣的是，他公布教皇利奥九世的绝罚诏书时，教皇已经去世，所以严格来讲，这份诏书已经失效。

[5] quoted Ware, Timothy, *The Orthodox Church*, London, 1993, p.43

[6] quoted Ware, Timothy, *The Orthodox Church*, London, 1993, p.53

[7] quoted Clark, Victoria, *Why Angels Fall: A Journey through Orthodox Europe from Byzantium to Kosovo*, London, 2000, p.27

[8] 卡拉布里亚的巴尔拉姆（约1290~1348），出身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学者、教士、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和神学家。他早年信奉东正教，参与了很多神学争端。晚年逃往西方，皈依天主教。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伟大学者。

[9] quoted Norwich, John J., *A History of Byzantium*, 3 vols., London, 1995, p.184

[10] quoted Mijatovich, Chedomil,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1448-1453*, London, 1892, pp.24-5

[11] quoted Gill, Joseph,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Cambridge, 1959, p.381

[12] quoted Runciman, Stephe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1965, pp.63-4

[13] quoted Nicol, Donald M., *The Immortal Emper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us, 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 Cambridge, 1969, p.58

[1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25

[15] quoted Gill, Joseph,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Cambridge, 1959, p.384

[1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1

[17]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92

[18] quoted Stacton, D., *The World on the Last Day*, London, 1965, p.165

[19] quoted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p.34

[20]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54

[21]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0

[22] Kritovoulos, (in English)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Westport, 1970, pp.29-31

[2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2

[24]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7

[25]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57

[26] 王子群岛位于马尔马拉海中，在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10公里处，一共有九个岛。拜占庭时期，皇室将获罪的王子或其他王室成员流放至此；随后的奥斯曼土耳其亦依循此例，王子群岛因而得名。

[27]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

[28]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

[29]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

[30] 今称博兹贾岛，属土耳其，在爱琴海上，邻近土耳其西部海岸。

[31]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13

[32] 盖伦帆船是至少有两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在16~18世纪期间被欧洲多国采用。它可以说是卡拉维尔帆船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船身坚固，可用作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比克拉克帆船便宜，生产3艘克拉克帆船的成本可以生产5艘盖伦帆船。盖伦帆船被制造出来的年代，正好是西欧各国争相建立海上强权的大航海时代。所以，盖伦帆船的面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但1453年时，应当还没有盖伦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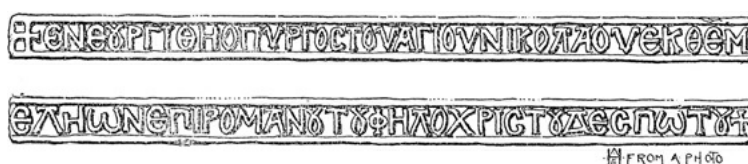
[33]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65

[34] Kritovoulos, (in English)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Westport, 1970, p.39

[35]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 72

6.城墙和大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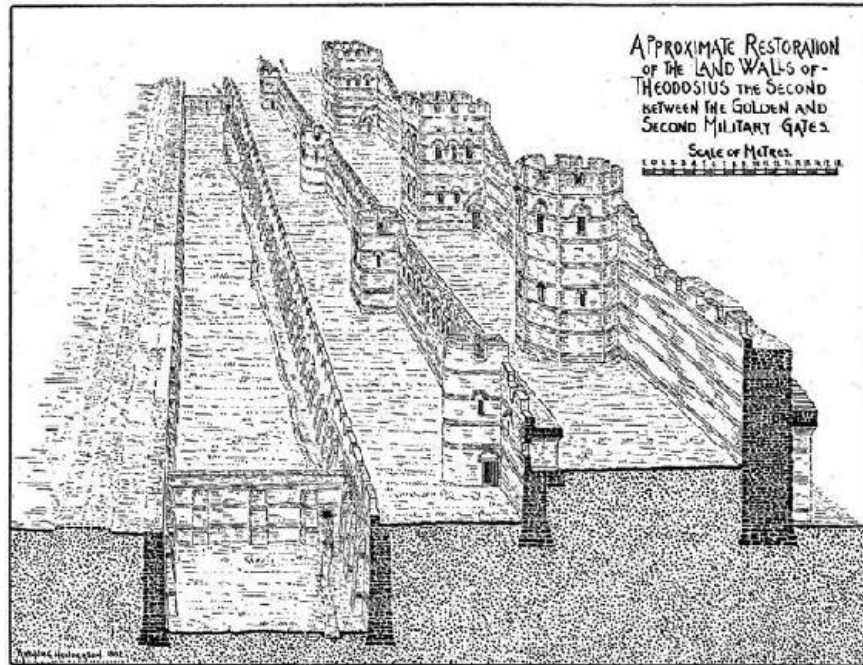
1453年1~2月



某些可燃物质能够产生火焰、闪光和巨响，它们造成的恐惧能够引发奇妙的后果，没人能够抵御或者忍受……如果将少量此种粉末（尺寸不超过人的手指大小）裹在羊皮纸内并点燃，它就会爆炸，生成炫目的闪光和令人震惊的巨响。如果用量更大，或者使用更坚固的东西包裹，爆炸就会更加猛烈，闪光和巨响将令人无法忍受。^[1]

——13世纪英格兰僧侣罗哲尔·培根如此评论火药的效果

热那亚援兵抵达之后，城防工作得以加速进行。朱斯蒂尼亚尼是个“城墙作战的专家”^[2]，他冷静地对城市的防御工事作了评估，并采取了适当措施。在他指挥下，守军在2月和3月间“疏浚护城河，修补和加高城墙，修复城垛，加固内外塔楼，并加强了整段城墙，包括面向陆地的和朝向大海的地段”^[3]。



城墙截面图显示三层防御结构：内墙、外墙及护城河

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虽然破败，但仍然是令人生畏的。拜占庭帝国能够生存这么久，都城防御的固若金汤一直是个主要原因。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如此得天独厚。城市周界总长度为12英里，其中8英里面向大海。城市的南面与马尔马拉海相接，此处海流极其迅猛，风暴常常骤然降临，因此从海上登陆进攻的风险极大。1000年中，没有一个侵略者认真地尝试从这个地段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海岸得到一道延绵不断的城墙的防护，城墙高度至少有50英尺，沿线分布有188座塔楼和一些较小的设防港口。这道城墙受到的主要威胁不是敌船的攻击，而是海浪对其地基无休止的侵袭。有时大自然会特别凶残：在764年的寒冬，巨大的浮冰冲上胸墙，将海墙摧毁。马尔马拉海沿岸的整段城墙上到处是纪念历代皇帝修理这段城墙的大理石铭文。水流湍急的大海绕过这一海岸，一直到古卫城处，然后北上进入较平静的金角湾。金角湾本身为帝国舰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安全锚地；这一地段的城墙上设有110座居高临下的塔楼，还有数量众多的水闸以及两个相当规模的港口，但此处的防御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薄弱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

威尼斯人乘战船从这里的前滩登陆，登上城墙，攻破了城市。自717年的阿拉伯人围攻以来，守军在战时为了封锁金角湾的入口，就习惯于在入口处升起一条铁链。铁链长达300码，由铸铁打造，每个铁环长20英寸，整条铁链被安放在坚固的木制浮筒上。如果得到热那亚人的支持，就可以将铁链的一端固定在金角湾对岸加拉塔城海墙的一座塔楼上。冬季，守军将铁链和浮筒都准备就绪，以防备敌人的海上进攻。

城市的西端（也就是三角形的底边）得到长4英里的陆墙的保护，也就是所谓“狄奥多西城墙”。这道城墙横亘从马尔马拉海到金角湾的狭窄陆地，保护君士坦丁堡城，使它免受任何传统的陆路攻击。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很多最重大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座非同寻常的城墙沿线。它的历史几乎和城市本身一样悠久，在地中海世界一直是个亘古不变的传奇。穿过色雷斯平原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人或朝觐者、从巴尔干某个宫廷前来的使节，或者有着征服野心、四处劫掠的军队，从远方首先看到的就是巅峰时期的君士坦丁堡那阴森森的巨大陆墙。它横越轻微起伏的大地，从一道地平线到另一道地平线，壁垒和塔楼连绵不绝。在阳光照耀下，石灰岩打造的城墙的表面化为一片灿烂的雪白，罗马红砖的接缝构成延续不断的水平线条，城墙上还有外形相似、带有穹顶的射箭孔。众多塔楼有的呈方形，有的是六边形，还有的是八边形，偶尔也有圆形。它们互相簇拥，间距极近，据一位十字军战士说：“一个七岁男孩能够把一个苹果从一座塔楼投掷到另一座。”^[4]它们分成若干层次，一直向上延伸至内墙最顶端的高度，皇帝的鹰旗就在那里骄傲地迎风招展。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重兵把守、阴森森的城门，和平时期，人畜就从这些城门出入。在城墙南端，靠近马尔马拉海的地方，一座饰有金板和大理石与青铜雕像的大门在阳光中熠熠生辉。这就是“黄金门”，一座庞大而华丽的拱门，两侧各建有一座磨光大理石打造的恢宏塔楼。在拜占庭的鼎盛时期，得胜归来的皇帝们会带着胜利的象征物——身披枷锁的被征服的外国国王、重新夺回的圣物遗迹、大象、身着奇装异服的蛮族奴隶、堆满战利品的马车，以及威武雄壮的帝国军队——从这里盛

装经过。到1453年，黄金门的黄金和很多装饰物都已经没了踪影，但城门作为一座伟大的纪念碑，仍然昭示着罗马人的光荣。

陆墙划定了城市发展成熟后的界线，它虽然被冠以孩童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名字，但主持建造陆墙的其实是5世纪初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安特米乌斯，“当时最睿智的人之一”^[5]。城市之所以能延续上千年，要无限感激他的高屋建瓴。于413年建成的第一道城墙震慑了匈人的君主阿提拉（绰号“上帝之鞭”^[6]），令他在447年放弃攻打城市。阿提拉蹂躏邻近的色雷斯的同一年，城墙因为严重地震而坍塌，全城人立刻行动起来应对这个危机。1.6万名市民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惊人地完全重建了城墙，不仅恢复了安特米乌斯的最初设计规模，还增加了一道同样带有一连串塔楼的外墙、一道防护性的胸墙，以及一道砖砌的壕沟（即护城河），构成了一道极其复杂、令人生畏的可怕障碍。此时，城市西部的防御体系包括了192座塔楼，分为5个独立防区，纵深200英尺，从壕沟底部到塔楼顶端的高度为100英尺。这项丰功伟业被记载在一道充满夸耀的铭文中：“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君士坦丁^[7]成功地建起了这些强大的城墙。甚至帕拉斯^[8]也无法如此迅速地建成如此强大的堡垒。”^[9]

建造完备的狄奥多西城墙凝聚了火药时代之前希腊—罗马世界关于城防的军事工程学的全部智慧。防御体系的核心仍然是安特米乌斯建造的内墙：内墙内部是混凝土，然后在内外两面都覆上附近采石场出产的大块石灰岩，并插入砖块，以便让整个结构更加巩固。城墙顶端的作战平台得到城垛的防护，从下面有阶梯通往顶端平台。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塔楼并不是与城墙连为一体的，这就可以保证塔楼与城墙可以各自稳固沉积下来，而不至于破裂。塔楼高达60英尺，包括两个房间；楼顶是平的，可以在上面安放投掷石块和希腊火的机械。哨兵们在塔楼顶端持续不断地扫视着地平线，夜间则与城墙沿线其他塔楼的哨兵互相呼喊，以防止入睡。内墙的高度是40英尺；外墙要低一些，只有大约27英尺，所以外墙上的塔楼也比内墙塔楼要低。内外两道城墙之间有宽60英

尺的平台，防守外墙的士兵就集结在那里，随时准备与敌人短兵相接。在外墙脚下，还有一道宽60英尺的平台，任何越过壕沟的侵略者都将在这里惨遭屠戮。砖砌的壕沟又是一道宽60英尺的屏障，内侧沟边筑有一道护墙；1453年的时候，壕沟是部分有水还是完全干涸，我们不得而知。防御体系的纵深之大和复杂程度、城墙的坚固以及居高临下的优势使得狄奥多西城墙几乎坚不可摧，中世纪的只拥有传统攻城武器的军队奈何它不得。

陆墙上开有一系列城门。有些城门通过建在壕沟之上的桥梁通往周边的乡村，这些桥梁在围城之前就会被摧毁；其他城门仅供军用，将各层城墙之间连接起来，方便部队在防御体系内部迅速调动。城墙上还有一些辅助性的边门，但拜占庭人时刻牢记这些边门对城市的安全构成的威胁，因此对它们的管理非常严格。总的来讲，城墙沿线的民用和军用城门是间隔分布的，军用城门用数字编号，民用城门则取了名字。比如，“泉源之门”得名自城外的一处圣泉；还有“木竞技场门”“军靴匠门”“银湖门”，等等。有些城门名字的最初含义已经被遗忘，于是人们给它们取了新名字。第三军用城门也被称为“红党门”，得名自君士坦丁堡早期历史中的一个赛马场派别；而“查瑞休斯门”（查瑞休斯是另一个派别——蓝党的领袖）也叫“墓地门”。防御体系内部还建造了一些值得一提的建筑，体现了拜占庭内在的矛盾。在靠近金角湾的地方，布雷契耐皇宫就偎依在城墙后，据说这座宫殿曾经极其华美，到访的外国人找不到言辞来形容它；布雷契耐皇宫旁边是阴暗而悲戚的阿尼玛斯监狱，这是一座恶名昭彰的地牢，拜占庭历史上一些最恐怖的插曲就发生在这里。约翰五世在这里把他的儿子和3岁的孙子的眼睛戳瞎；拜占庭最臭名远扬的皇帝之一——“可怖的”安德罗尼库斯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然后被一匹生疥癣的骆驼背着，在群众的嘲讽中被押往赛马场，然后在那里被头朝下地吊挂在两根廊柱中间，继而在戏谑声中惨遭屠戮。

城墙的历史如此悠久，不少地段都与厚重的历史、神话和半被遗忘

的传说紧密联系。几乎所有地点都曾经历过这座城市历史的一些戏剧性时刻——可怕的背叛、神奇的解救，以及死亡。628年，希拉克略通过黄金门带来了真十字架。967年，离心离德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在泉源之门被愤怒的暴民用乱石击毙。1261年，市民们从城内打开了泉源之门，迎接东正教皇帝的归来，摆脱了拉丁人的统治。450年，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城外山谷坠马负伤，奄奄一息地被人从第五军用城门抬进城。12世纪，有预言称，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将利用木竞技场门来攻打城市，于是人们将这座城门封闭了。

除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外，没有任何一座建筑能比城墙更强烈地体现君士坦丁堡人民的精神生活。如果说教堂是他们对天堂的憧憬，城墙则是他们抵御敌对力量攻击的盾牌，并且得到圣母的亲自佑助。在围城期间，人们会持续祈祷，并把圣母的遗迹圣物抬到城墙上巡游；信徒们认为，这比军事准备更有效。这些活动笼罩在强大的精神能量场之下。圣母的袍子被保存在城墙附近布雷契耐的教堂。人们相信，就是它的神奇力量在626年逐退了阿瓦尔人，在860年打跑了俄罗斯人。军事工程的作用则是次要的。人们看到守护天使出现在城墙上的幻象，皇帝们将大理石十字架和祈祷词嵌入外城墙表面。在城墙中心附近有一个简单的护符，表达了君士坦丁堡最深的恐惧：“哦，我主基督，保佑你的城市免于苦难、远离战争吧。征服敌人的狂暴。”

同时，对城墙的维护保养是城市最关键的公共工作，每一位公民都有义务参与，没有任何例外。不管拜占庭国家财政多么糟糕，总是能够募集到金钱来修补城墙。朝廷为维护城墙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总体负责城墙事务的官员拥有“城墙伯爵”的威风凛凛的头衔。流逝的岁月和不断的地震持续令塔楼破裂、石料崩塌，人们不断地进行修理，城墙上留下了大量纪念修理工作的大理石碑文。这些碑文中最早的是在447年的首次重建中留下的，最晚的则是1433年对外墙全面翻新时的纪念。1453年围城前的最后几次维修时留下的碑文表达的意思是，人神共同努力来维

护城市之盾。碑文写道：“1438年5月，在最虔诚的两位君主约翰^[10]和玛利亚·帕里奥洛格斯治下，由曼努埃尔·布兰尼乌斯·莱昂塔里合作和出资，对这座赋予生命泉水、受上帝保佑的城门进行了重建。”^[11]

或许没有任何防御工事比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更能总结出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攻城战的真相。这座城市几乎一直处在围攻之下；它的防御反映了城市的内在特征和历史——君士坦丁堡混合了自信与宿命论、神圣的灵感和务实的技能、悠久历史和保守心态。和城市本身一样，城墙长期以来一直傲然屹立；地中海东部的人们估计，这城市和城墙将永远如此屹立下去。防御工事的结构在5世纪就已经成熟，后来的变化极小；建筑技术非常保守，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时代。筑城技术没有特别的理由去发展，因为攻城战术的演化一直处于停滞。基本的攻城技术和装备——封锁、挖地道和爬城、攻城锤、投石机、攻城塔、地道和云梯——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守城一方永远占据优势；君士坦丁堡靠近海岸的地理位置更是一大优势。曾经兵临陆墙之下的敌军都不曾成功地突破多层防御体系；同时，城市为了应付不时之需，总是把蓄水池装满淡水，粮仓储满粮食。阿瓦尔人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投石机，但它们的抛射轨迹过于弯曲，破坏力微不足道，无法打破城墙。阿拉伯人则被大批冻死。保加尔人克鲁姆汗^[12]尝试了魔法——他用活人祭祀，并向他的士兵们抛洒海水，也无济于事。甚至君士坦丁堡的敌人们也渐渐相信，这座城市得到了神助。只有拜占庭人自己曾经成功地从陆墙一面攻破城市，而且总是依靠诡诈的奸计。最近几个世纪乱七八糟的内战中，多次发生里应外合、在夜间打开城门的事情。

陆墙只有两个地点具有潜在的弱点。在中段，地势沿着一条长长的山谷下降，一直到里卡斯河，然后在河对岸又逐渐升高。因为城墙是建在地势下降的山坡上的，那一段的塔楼就不再是制高点，比远方山峰要低。敌人如果占据了那山峰，就掌握了制高点。另外，里卡斯河通过涵洞被引入城内，因此在那个地段没办法把壕沟挖得很深。几乎所有的攻

城军队都发现这一地区是个薄弱环节，虽然从未有人成功过，但还是给进攻者带来一线希望。城防体系的第二个异常环节位于北端。内外三层的城墙的规则体系在接近金角湾时突然发生中断。城墙的周界突然向外拐了一个直角，把一块额外的突出地域包含在内。从这里到金角湾海边的400码距离上，城墙变成了形状不一的堡垒和墙段的大杂烩，虽然是非常巩固地建在露出地表的巨岩之上的，但在大部分地段只有一道防线，而且没有挖掘壕沟。这一段城墙如此建造，是为了将布雷契耐的圣母神龕包含在城内。起初，包含神龕的教堂处于城墙之外。拜占庭人最初认为，圣母的保佑已经足以保护教堂，这真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逻辑。626年，阿瓦尔人几乎将教堂烧为平地——神龕则被圣母自己救下——于是拜占庭人修改了城墙的走向，把教堂纳入城墙之内，布雷契耐宫也建在这一块土地上。1452年夏季，穆罕默德二世侦察地形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这两个薄弱环节。两段城墙呈直角相交的地点将吸引他特别的注意力。

君士坦丁堡市民在朱斯蒂尼亚尼指挥下修补城墙，并抬着圣像在城墙顶端游行。他们对城墙的防护力信心十足，这是可以理解的。亘古不变、威严宏伟而坚不可摧的城墙一次次证明，一支小规模守军就足以阻挡庞大的攻城军队，直到后者的意志力被围城战的后勤负担压垮，或者士兵因为痢疾溃散，或者军心涣散。城墙虽然有些部分有所损坏，但基本上还是巩固的。于15世纪30年代访问君士坦丁堡的布罗基里埃发现，甚至较薄弱的直角处也“受到坚固高墙的防护”^[13]。但守军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为之准备的战争发生在一场技术革命的巅峰时刻，这场革命将深刻地改变攻城战的规则。

没人确切地知道，奥斯曼人究竟在何时获得了火炮技术。火药武器大约在1400年前后通过巴尔干传入奥斯曼帝国。按照中世纪的标准，这种新技术的传播极其迅速，最早的关于火炮的书面记载是在1313年，到1326年就有了最早的描绘火炮的图画，而到了14世纪末，欧洲全境就已

经在大量制造火炮。在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生产铁制或铜制火炮的小型工坊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与之相关的工业也迅速发展。硝石“工厂”大量兴建起来；中间商进口铜和锡；熟练工匠们将他们的金属铸造技术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从实际效果上讲，早期火药武器的好处是值得怀疑的：在阿金库尔战役^[14]中，英军除了长弓之外还部署了野战火炮，但后者对战局影响甚微。这些武器非常笨重，准备起来无比烦琐，瞄准精度极差，对己方炮手的危险和对敌人一样大。但炮火无疑具有一种震撼的心理效果。在克雷西战役^[15]中，英王爱德华三世“以五六门火炮让法军大乱，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些发出隆隆巨响的机器”^[16]。1382年，菲利普·范·阿尔特维尔德^[17]的荷兰巨炮“开炮时发出如此巨响，似乎地狱中的所有魔鬼都在喧闹”^[18]。这些早期的记载常常用地狱的比喻来描述火炮。这种“战争的恐怖工具”^[19]的雷鸣般巨响让人不禁联想到地狱：火炮打乱了自然秩序，彻底断送了骑士风尚。早至1137年，教会就禁止将火药用于军事用途，还彻底禁止使用弩弓，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魔仆已经出瓶了。

到1420年，除了攻城战之外，火炮对作战的贡献还是极小的，但此时奥斯曼人开始对火炮兴趣盎然。他们攻入巴尔干后，缴获了相关的资源，俘虏了一些工匠，开始制造自己的火炮。他们兴办了铸炮厂，开采铜矿，建立了火药厂；雇用了技能熟练的铸造工人、石弹切割工人和硝石制造工人。奥斯曼人学习得非常快。他们极其擅长吸收新技术，并将有技术的基督徒吸纳进他们的军队，同时训练自己的士兵。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建立起了炮兵的基础设施，在近卫军中组建了炮兵部队和炮车车夫的队伍。与此同时，虽然教皇禁止向异教徒出口火炮，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还是将武器运往地中海东部。兜售技术的工匠们也热衷于将自己的一身本事卖给正在崛起的苏丹，于是纷纷来到奥斯曼宫廷。

1422年，穆拉德二世攻打君士坦丁堡，让后者首次尝到了奥斯曼人

新技术的厉害。根据希腊人的记载，穆拉德二世带来了巨型“射石炮”（由德意志人指挥），轰击城墙，但炮击大体是无效的：70枚炮弹击中了一座塔楼，但没有造成显著的破坏。24年后，穆拉德二世再次用大炮攻打另一段城墙时，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15世纪40年代，君士坦丁十一世试图保护帝国所剩不多的几个行省之一——伯罗奔尼撒免遭奥斯曼人的侵袭，于是在科林斯地峡建造了一道长6英里的城墙（被称为“赫克萨米利翁”，意思是“6里”），从西海岸一直到东海岸，将半岛完全封锁。这是一项规模相当宏大的军事工程，被认为足以抵挡长期进攻。1446年12月初，穆拉德二世用长身管火炮攻打这道城墙，仅仅5天时间就将其突破。君士坦丁十一世险些丢掉了性命。



用火药填充大炮

在1422年和1446年之间，奥斯曼人对火炮的认识大大加深了，而这个时期恰恰是火炮制造和火药技术演化的关键时刻。大约在15世纪20年代，欧洲的火药制造技术有了一个重要进展，大大增强了它的威力和稳定性。在此之前的普遍做法是将火药的原配料——硫黄、硝石和木炭分别储存在不同的桶内，要使用的时候才在现场将它们混合起来。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火药燃烧较慢，容易受湿气影响，而且各种原料很容易互相分开。15世纪初，人们通过实验发现，更好的生产方法是将原料混合

成糊状，然后将其烘干，做成饼形，需要的时候就根据具体的用量从饼上取下颗粒。这种所谓“粒状”火药燃烧较快，威力比以往提高了30%，而且不容易受到潮湿环境的影响。有了新式火药，就能够以惊人的力量向一堵城墙发射重型炮弹。此时，长达16英尺、能够抛射750磅重的炮弹的巨型攻城炮也问世了。1412年，根特的巨型射石炮“疯女格丽特”^[20]开火时的巨响似乎是“地狱的复仇女神发出的”，打垮了布尔日的城墙。但是，新式火药也增加了对炮手的风险，并影响了铸炮技术：炮管被铸造得更坚固也更长，新的趋势是将火炮整体铸造，因此炮身就必须用青铜铸造，于是造价也飙升了。铜炮的造价是锻造铁炮的三倍，但好处的确很多，昂贵的造价显然是值得的。自从号角的轰鸣令耶利哥的城墙^[21]崩塌以来，优势首次转移到攻城的一方手中。在15世纪的欧洲，攻城大炮的怒吼此起彼伏，石弹不断轰击石墙，此前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众多堡垒骤然坍塌。

奥斯曼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技术进步。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境内的铜矿可以自给自足，而且拥有天然硝石。帝国通过征服或者贸易掌握了火药技术，然后建立起一些机构，将技术在自己的军队中推广。奥斯曼人很快就精通了火炮制造、运输和射击技术，而且在火药战争必需的深度后勤补给工作上首屈一指。要在指定时间将一个有战斗力的炮兵连部署到战场上，对中世纪的补给链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除了要运输笨重的火炮外，还要及时供应与火炮口径相符的足够数量的石弹以及火药。奥斯曼人从帝国全境搜寻人力和物资——从黑海获取炮弹，从贝尔格莱德获取硝石，从凡城^[22]获得硫黄，从卡斯塔莫努^[23]弄来青铜，通过海外贸易获取锡，将巴尔干的教堂铜钟熔化用于铸炮——并通过由大车和骆驼组成的陆路交通网分配和输送这些物资，这个运输网的效率是无与伦比的。深度的计划是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因此奥斯曼人在提出特殊要求的火药时代得心应手。

奥斯曼人吸收火炮技术的速度如此之快，到了15世纪40年代，显然

就已经掌握了在战场上利用临时设施铸造中型炮管的技术。穆拉德二世将铸炮所需的金属原料运到了赫克萨米利翁，在那里就地铸造了很多长身管火炮。这使得奥斯曼人在攻城战中能够做到特别灵活机动：他们不是将现成的火炮拖到前线，而是更方便快捷地将火炮配件运往前沿，在那里组装；攻城结束后，如果需要，还可以将火炮拆解。在使用过程中炸膛的火炮（炸膛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可以快速得到修复，重新投入作战。在当时，现有的炮弹的口径与火炮可能并不完全相符，于是可以根据手头的弹药，对炮管量身定做（17世纪，在攻打克里特岛上的威尼斯城市甘地亚的史诗般大战中，奥斯曼军队仍然用到了这种方法。在21年的征战中，奥斯曼军队收集了3万发威尼斯制造的炮弹。奥斯曼人的火炮无法使用这些炮弹，于是他们铸造了新的炮管，来适应敌人炮弹的口径，并把它们派上了用场）。

对奥斯曼人来说，攻城炮似乎满足了游牧民族灵魂深处的一种特别需求：它迎合了他们对设防定居点的根深蒂固的敌视。草原游牧民族的后裔已经证明了自己在运动战中的持续优势，只有在面对定居民族的城墙时，他们才觉得棘手。有了火炮，他们就有可能速战速决，避免漫长的围城战。热爱科学的穆罕默德二世在观察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的城墙时，立刻想到了大炮。他登基不久就开始试验铸造重型火炮。

拜占庭人也认识到了火药武器的潜力。在城内，他们也有一些中型火炮和火枪，君士坦丁十一世竭尽全力地储存相应的资源。他成功地从威尼斯人那里获得了火药供应，但他的帝国穷得叮当响，无力在昂贵的新式武器上大量投资。大约在1452年之前，一个名叫乌尔班的匈牙利铸炮工程师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在帝国宫廷飞黄腾达。像他这样四处兜售技术的人越来越多，在整个巴尔干到处寻找买家。他表示愿意为拜占庭人效劳，为他们铸造一体化的重型铜炮。囊中羞涩的皇帝对此人很感兴趣，但没有资源让他施展拳脚；皇帝给乌尔班发了一笔微薄的津贴，希望把他留在城内，但这津贴没有按时发放。这位不幸的工艺大师生活

越来越拮据；大约在1452年，他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前往埃迪尔内，寻求觐见穆罕默德二世。苏丹欢迎了这个匈牙利人，赏赐他锦衣玉食，并仔细询问他。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对两人的会面作了生动的还原。穆罕默德二世问他，能否铸造一门足够强大的大炮，它能够抛射足够大的石弹，以摧毁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比画了一下他估计的石弹的尺寸。乌尔班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如果陛下需要的话，我可以铸造一门能够发射这种石弹的铜炮。我对城墙作了仔细观察。我的大炮不仅能把这些城墙炸为齑粉，巴比伦的城墙也不在话下。铸造这样的大炮所需的工作，我是完全胜任的。但是，”他急于对自己能打的包票加以限制，“我不知道如何让这样的大炮发射，所以不能保证一定能发射成功。”^[24]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铸造大炮，并宣布他将亲自研究大炮的发射。

不管这次觐见的细节究竟如何，乌尔班大约在1452年夏季，也就是割喉堡施工期间，开始铸造他的第一门巨炮。大约这个时期，穆罕默德二世一定已开始大量储存制造大炮和火药所需的物资：铜和锡、硝石、硫黄和木炭。他可能还颁布圣旨，命令石匠们在黑海沿岸的采石场制造花岗岩弹头。三个月内，乌尔班就铸造出了他的第一门大炮。它被拖到割喉堡，用来监视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是这门炮在1452年11月摧毁了里佐的桨帆船，并第一次将奥斯曼大炮的威名传遍了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对这一结果颇为满意，命令乌尔班将现有火炮的尺寸翻一倍，铸造一门真正恐怖的大炮，也就是后世巨炮的原型。

在乌尔班以前，奥斯曼人可能就已经在埃迪尔内铸造火炮了。乌尔班的贡献在于，他能够制造尺寸大得多的模具，并控制关键的变量。1452年冬季，他开始铸造很可能是史上最大的巨炮。希腊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对这个无比艰苦、非同寻常的过程作了详细描述。首先，用陶土混合剁得很细的亚麻布和大麻，制造一个大约27英尺长的炮管形模具。模具分成两个部分，用来容纳石弹的前端的口径是30英寸；用于容纳火药的后端尺寸较小。然后需要挖掘一个巨大的坑，并将已经烧制完毕的

陶土模具放入坑内，炮口朝下。然后在模具外再覆盖一层陶土，“就像剑鞘一样”^[25]，并固定妥当，两层陶土之间留有空隙，用于注入熔化的金属。然后在整个结构的外围紧紧地堆砌“铁和木料、泥土和石块，从外面压紧”^[26]，以支撑青铜的巨大重量。最后在模具上泼洒潮湿的沙子，将整个结构覆盖起来，只留下一个可供注入熔化金属的孔洞。同时，乌尔班建造了两座砖砌的熔炉（它的内外壁覆有烧制好的陶土，并用大石块固定），它们足以抵抗1000摄氏度的高温，并用小山一样的木炭将熔炉埋起来，“埋得非常深，只露出炉口”^[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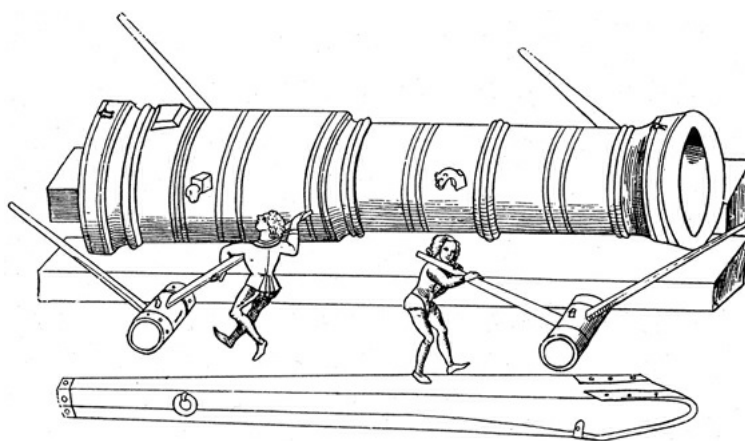
中世纪铸造厂的运作险象环生。后世的奥斯曼旅行家艾弗里雅·切莱比参观了一座铸炮厂，把铸炮工作中人们的恐惧和蒙受的风险描绘了下来：

铸造大炮的日子，厂主、工头和铸造工人，以及炮兵总管大臣、主监察官、伊玛目^[28]、宣礼员和计时员，全都聚集起来；在“安拉！安拉！”的呼声中，人们将木柴投入熔炉。熔炉烧了二十四小时之后，铸造工和司炉工都脱得赤条条的，只穿着拖鞋和保护胳膊的厚厚衣袖，戴着一种遮蔽面部而只露出眼睛的奇怪帽子；因为熔炉在烧了二十四小时之后，那高温让人无法接近，除非作这样的打扮。想看看地狱烈火是什么景象的人都应当看看这个场面。^[29]

人们判断熔炉内温度达到正确值的时候，工人们开始向坩埚内投入铜块，以及一些碎铜（对基督徒们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边角料可能是从教堂大钟上弄来的）。这项工作的危险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工人们需要将铜块一块块地投入沸腾冒泡的大锅，用金属长柄勺捞去在表面漂浮的废渣；锡合金发出有毒气体；如果金属碎片是湿的，它带入的水分就会化为水蒸气，导致熔炉破裂，站在附近的人全都得完蛋。重重危险让工人们非常迷信。艾弗里雅说，在需要投入锡块的时候，维齐尔、穆夫提^[30]和谢赫^[31]们都应招前来^[32]；除了铸造厂人员之外，到场的一共只有四十人。其他随从人员都不得入内，因为熔化中的金属是容不得恶眼注视的。厂主们会请求坐在离熔炉很远处沙发上的维齐尔和谢

赫们一刻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一切权力和力量都属于安拉！”然后，工匠师傅们用木制铲子将好几英担^[33]的锡投入熔化的黄铜的海洋。领头的铸造工向维齐尔和谢赫们说：“请以真正信仰的名义，向铜的海洋中投入一些金银币，作为施舍！”人们用船上的帆桁那么长的竿子将金银混入铜锡合金；竿子被熔化后，就立刻换上新的竿子。

一连三天三夜，若干组铸造工人一刻不停地操纵风箱，对点燃的木炭进行过热处理，直到目光敏锐的铸造师傅判断出，合金已经变成正确的炽热红色。连续好几星期的艰苦工作在这一周到达了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做出精准的判断。“时限已到……铸造师傅和其他工匠师傅们穿上笨拙的毛毡防护服，用铁钩子打开熔炉口，并高呼‘安拉！安拉！’。液态金属开始流出，足以照亮百步之外的人脸。”^[34]熔化的金属就像岩浆一样沿着陶土管道缓缓流动，进入大炮模具的孔洞。汗流浹背的工人们用非常长的木杆戳着黏滞的金属，把气泡戳破，因为气泡可能会导致金属在烧制时破裂。“青铜从管道中流入模具，直到将其注满，还溢出了一腕尺^[35]。大炮就这样铸成了。”^[36]紧压在模具外围的湿沙子会减缓冷却的速度，并阻止青铜在这一过程中破裂。金属冷却之后，人们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大炮（它就像是包裹在陶土茧里的幼虫）从地里挖出来，并用牛群将它拖到地面上。这是一个神奇的变化过程。



15世纪的射石炮

工人们将模具敲碎拆除，并对金属进行刮擦和打磨之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头恐怖而超凡的怪兽”^[37]。原始的炮管在冬日阳光下呈现黯淡的光泽。它长达27英尺。由坚固的青铜铸就的炮管壁厚达8英寸，足以抵御火药爆炸的冲击力；炮管口径为30英寸，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手脚并用地钻入，能够发射圆周长达8英尺、重量超过半吨的超重型石弹。1453年1月，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在位于埃迪尔内的新宫外进行一次试射。巨大的射石炮被拖曳到城门附近的指定位置。全城人都得到警告，次日“炮声将有如雷霆，大家务必多加小心，免得毫无准备、耳朵被震聋，或者孕妇被惊吓导致流产”^[38]。这一天早上，炮手们给大炮装填了火药。一群工人将一块巨大的石弹抬入炮口，将它滚进炮管深处，稳妥地安放到火药室前方。炮手将点燃的火把伸向点火孔。一声巨响，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巨大的石弹呼啸出膛，在开阔的原野上飞了1英里，最后坠入松软的泥土，一直钻到6英尺深的地下。杜卡斯本人可能也目睹了这次试射。据他说，“这火药的威力如此巨大”^[39]，甚至10英里外也能听得见爆炸声。穆罕默德二世则特意让人们将关于恐怖巨炮的消息传回君士坦丁堡：巨炮不仅是实用的武器，也是心理战的利器。在埃迪尔内，乌尔班的铸造厂继续生产尺寸各异的更多火炮；它们都没有第一门那么庞大，但也有不少身管长度超过了14英尺。

2月初，奥斯曼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将乌尔班巨炮从埃迪尔内运往君士坦丁堡（路程为140英里）的巨大的实际困难上。大批人员和牲畜被分配去执行这个艰巨任务。人们用铁链将许多大车锁在一起，艰难地将巨大的炮管装载到车上，然后用60头公牛拖曳大车。大车嘎吱作响地在起伏延绵的色雷斯乡间蹒跚前进，200人专门负责扶着炮管，还有一队木匠和劳工负责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巨炮以每天2.5英里的速度向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缓缓前进。

^[1] quoted Hogg, Ian V., *A History of Artillery*, London, 1974, p.16

[2]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0

[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7

[4] Gunther of Pairis,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The Hy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 of Gunther of Pairis*, ed. and trans. Alfred J. Andrea, Philadelphia, 1997, p.99

[5] quoted Tsangadas, B. C. P., *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1980, p.9

[6] quoted Van Millingen, Alexander,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London, 1899, p.49

[7] 指的是当时的高官弗拉维乌斯·君士坦丁，他在狄奥多西二世命令下主持了城墙的修复工作。

[8] 即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

[9] quoted Van Millingen, Alexander,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London, 1899, p.47

[10] 即皇帝约翰八世·帕里奥洛格斯。

[11] quoted Van Millingen, Alexander,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London, 1899, p.107

[12] 即“可怖的”克鲁姆（? ~814），保加尔大公。他巩固了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的联合，并颁布了一部旨在确立封建制度的法典。克鲁姆大大地扩展了保加尔的版图。他与拜占庭帝国交战达5年之久，曾大败拜占庭军队。814年，克鲁姆围攻帝都君士坦丁堡，被拜占庭皇帝利奥五世击败。克鲁姆在这次战斗中死去，保加尔人被迫与拜占庭议和。

[13] quoted Mijatovich, Chedomil,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1448-1453*, London, 1892, p.50

[14] 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10月25日，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以少胜多

的战役。在英王亨利五世的率领下，以步兵弓箭手为主力的英军在法兰西的阿金库尔击溃了由大批贵族骑士组成的法军，为随后在1419年收服整个诺曼底奠定了基础。这场战役成了英国长弓手最辉煌的胜利，在战争史上影响深远。此役还成为后世大量文艺影视作品的主题，包括莎士比亚的名剧《亨利五世》。

[15] 英法百年战争早期的一次战役，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军队凭借长弓手的强大火力和坚固的防御阵地，在法兰西的克雷西以少胜多，大败法王腓力六世的军队。这使得英格兰在战争早期占了上风。

[16] quoted Hogg, Ian V., *A History of Artillery*, London, 1974, p.16

[17] 菲利普·范·阿尔特维尔德（约1340～1382），佛兰德贵族。1381年，他率领根特市民发动起义，反抗佛兰德伯爵路易二世，起义先小胜后大败，阿尔特维尔德本人战死。他的父亲“智者”雅各布·范·阿尔特维尔德是佛兰德的著名政治家。

[18] quoted Cipolla, Carlo M., *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London, 1970, p.36

[19] quoted DeVries, Kelly, *Guns and Men in Medieval Europe, 1200-1500*, Aldershot, 2002, p.125

[20] 这门大炮得名自佛兰德民间传说中的“疯女格丽特”，据说她曾率领一支娘子军攻打地狱。

[21] 根据《旧约·约书亚记》，约书亚率领希伯来人攻打耶利哥城，在上帝保佑下吹响号角，城墙就坍塌了。

[22] 土耳其东部城市。

[23] 土耳其北部城市。

[24]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p.247-8

[2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4

[2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4

[27]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4

[28]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社会的重要人物。在逊尼派中，伊玛目等同于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指定政治继承人。逊尼派认为伊玛目也可能犯错误，但假如他坚持伊斯兰教的仪式，仍要服从他。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拥有绝对宗教权力的人物，只有伊玛目才能明晓和解释《古兰经》的奥秘含义，他是真主选定的，不会犯错。这里指的是主持礼拜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是一种荣誉称号。

[29] Chelebi, Evliya, *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 ed. Alexander Pallis, London, 1951, p.90

[30]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法的权威，负责就个人或法官提出的询问给出意见。穆夫提通常必须精通《古兰经》、圣训、经注以及判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穆夫提是伊斯兰国家的法学权威，总管律法和教义方面的所有事务。随着伊斯兰国家现代法律的发展，穆夫提的作用日益减小。如今，穆夫提的职权仅限于遗产继承、结婚、离婚等民事案件。

[31] 谢赫是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常见尊称，意指“部落长老”、“伊斯兰教教长”、“智慧的男子”等。

[32] Chelebi, Evliya, *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 ed. Alexander Pallis, London, 1951, p.90

[33] 1英担相当于50.80千克。

[34] Chelebi, Evliya, *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 ed. Alexander Pallis, London, 1951, p.91

[35] 古代的一种长度计量单位，相当于从中指尖端到肘部的长度。

[3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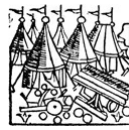
[37]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48

[38]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49

[39]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49

7.浩瀚如繁星

1453年3~4月



它前进时，枪矛如林；它止步时，营帐遮盖大地。^[1]

——穆罕默德二世的史官图尔松贝伊如此描绘奥斯曼军队

穆罕默德二世的计划要想完成，不仅需要火炮优势，还需要兵力优势。他决心以压倒性的强大兵力迅速猛攻君士坦丁堡，抢在基督教世界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就把君士坦丁堡彻底打垮。奥斯曼人素来深知，攻城战中兵贵神速。像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他是当时为奥斯曼人作战的一名战俘）这样得以观察奥斯曼军队的外国人也对此心知肚明：“土耳其皇帝不惜重大代价，快速猛攻和占领城市以及要塞，为的是避免长期围城。”^[2]成功取决于能否在巨大规模上快速地动员人力和装备。



马尾旗：奥斯曼帝国威严的象征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在年初发布了传统的征召令。按照古老的部落习俗，苏丹将他的马尾旗树立在皇宫庭院内，宣布即将发动战役。这个讯号发出后，“传令官被派往各行省，命令所有人都前来参加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役”^[3]。奥斯曼帝国的两支军队——欧洲军和安纳托利亚军的指挥结构确保了征召令能够得到即刻回应。根据一整套复杂的契约和征募规则，整个帝国都动员起来。外省의 骑兵（他们将组成军队的主力）作为地主，对苏丹负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必须应征前来，每个人都必须带来自己的头盔、链甲和战马护甲，以及自己的扈从（扈从的数量由他的地产规模决定）。在骑兵之外，还“从手艺人 and 农民”^[4]中征募一支季节性的穆斯林步兵部队，军费由全体公民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这些士兵将成为君士坦丁堡战役的炮灰。“两军交锋时，”一个意大利人冷嘲热讽道，“他们就像猪群一样被毫无怜悯地驱赶上前，然后成群地倒毙。”^[5]穆罕默德二世还从巴尔干征召了基督徒辅助部队，主要是斯

拉夫人和瓦拉几亚人（他们是帝国的附庸封臣，按照法律规定，有服兵役的义务）。另外他还准备好了精锐的职业军队——著名的近卫军步兵，以及若干骑兵团和相应的炮手、军械匠、卫队和宪兵部队。这些精锐部队能按期领到军饷（三个月发放一次），其武器装备的开支由苏丹个人承担；他们全都是前基督徒，大部分来自巴尔干，幼年时就被掳掠并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只忠于苏丹一个人。虽然他们人数很少（步兵可能不超过5000人），却构成了奥斯曼军队恒久的核心。

战役的动员工作惊人地高效。在穆斯林地区并不需要强拉壮丁，人们会主动报名参军，其积极性让匈牙利的乔治（他此时也是身在奥斯曼帝国的战俘）这样的欧洲人瞠目结舌：

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他们立刻前去报到，如此积极和迅速，就好像他们被邀请去参加婚礼，而不是战争似的。他们按照征召的顺序在一个月内就集结完毕，步兵和骑兵分开，各自有指定的首领，集结的编组也被用于扎营；在备战时……人们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地报名，愿意代替邻居去服役，那些被留在家里的人感到自己受了冤屈。他们说，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要比在家里寿终正寝强得多……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不会被哀悼，而是被颂扬为圣徒和胜利者，成为世人的榜样，受到极大的景仰。^[6]

“人们听说这次战役将是攻打君士坦丁堡，全都蜂拥而至，”杜卡斯补充道，“包括少不更事的孩童和耄耋之年的老人。”^[7]对获得战利品和飞黄腾达的憧憬以及圣战的使命感让他们激情满怀，这些主题密不可分地结合在《古兰经》中：根据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律，凡是通过武力攻克一座城市之后，可以在三天之内合法地进行掳掠。辉煌的目标更是让人们更加斗志昂扬：穆斯林普遍相信（尽管这种想法或许是错误的），君士坦丁堡的红苹果拥有神话般的大量金银珠宝。很多没有受到征召的人也主动来了：志愿兵和自由劫掠者、显贵们的追随者、德尔维希和被古老预言感召的圣徒，他们用先知的训诫和殉道的光荣前景煽动群众。整个安纳托利亚激情如火，记起了，“先知曾许诺和预言，这座巨大城市……将成为信士们的居所”^[8]。

人们从安纳托利亚的各个角落蜂拥前来，“从托卡特、锡瓦斯、科马契、埃尔祖鲁姆、甘噶、巴伊布尔特和特拉布宗”^[9]赶往位于布尔萨的集结点。欧洲地区的集结点则是埃迪尔内。一支大军逐渐成形：“骑兵、轻步兵、重步兵、弓箭手、弹弓手和长枪兵。”^[10]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后勤机器也隆隆开动，对铠甲、攻城武器、火炮、帐篷、船只、工具、兵器和粮食进行收集、修理或生产。骆驼队在绵延的高原上来回穿梭。奥斯曼人在加里波利维修船只。部队被运送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割喉堡。从威尼斯间谍那里获取了情报。在战役的组织工作上，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与奥斯曼军队相提并论。

2月，奥斯曼人的欧洲军在卡拉加贝伊指挥下开始肃清君士坦丁堡的腹地。君士坦丁堡在黑海沿岸、马尔马拉海北岸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还控制着一些设防的前哨阵地。附近乡间的希腊人撤进了各个要塞。奥斯曼军队将拜占庭的每座要塞都围了个水泄不通。投降的人被释放，没有受到伤害；但也有一些人，比如马尔马拉海边埃皮巴托斯附近一座塔楼的守军则选择了抵抗。奥斯曼军队猛攻了这座塔楼，将守军斩尽杀绝。有些要塞很坚固，没办法迅速攻克；奥斯曼军队就绕过它们，但对其加以监视。关于这些战斗的消息传回了君士坦丁堡，令因为宗教仇隙而内斗不休的市民们愈发惶恐。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十一世率军冲杀出城、扰乱准备工作，奥斯曼军队已经派遣了三个团的兵力对城市进行严密监视。同时，工兵部队在加固桥梁、平整道路，为火炮及重装备（它们在2月份已经在穿越色雷斯）的运输做准备。到3月，一队战船从加里波利起航，驶过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将安纳托利亚部队的主力运往欧洲。大军开始集中。



一名土耳其近卫军士兵

最后，在3月23日，穆罕默德二世耀武扬威地“率领他的军队，包括骑兵和步兵，穿过乡间，大肆破坏、恣意袭扰，一路带来极大的恐惧和痛苦”^[11]。这一天是星期五，对穆斯林来说是一周中最神圣的日子，穆罕默德二世特意选择这一天开拔，就是为了强调此次战役的神圣性。伴随他的有很多宗教人士：“众多乌理玛^[12]、谢赫和先知后裔……不断重复祷言……与大军一道前进，策马骑行在苏丹身旁。”^[13]穆罕默德二世身边可能还有一位叫作图尔松贝伊的官员，他将记载围城战的始末，这是极其罕见的来自奥斯曼帝国方面的关于此次战役的第一手资料。4月初，这支大军在君士坦丁堡城下集结完毕。4月1日是复活节，东正教日历中最神圣的一天，市民们带着虔诚与恐惧的复杂心情庆祝了这个节日。午夜，在教堂内，人们用烛光和焚香来宣示复活的基督的神秘。在被黑暗笼罩的城市内，简单但富有魔力的复活节连祷的声音以神秘的四分之一节拍不断升降起伏。教堂大钟被敲响。只有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片沉寂，没有东正教徒前来做礼拜。在前几周内，人们“哀求上帝，不要让城市在复活节的神圣一周内遭到攻击”^[14]，并从圣像中寻找精神力量。按照习俗和传统，最受尊崇的一幅圣像——“指路圣母像”，这是一幅能够创造奇迹的圣母像——被抬到布雷契耐皇宫，在那里度过复活节的一周。

第二天，奥斯曼先遣部队已经出现在城墙外。君士坦丁十一世派兵出击，与这些敌人对抗。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一些奥斯曼劫掠者被杀死。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士兵出现在地平线上。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定将部队撤入城内。壕沟上的桥梁全部被摧毁，城门紧锁。城市被彻底封闭，静候它的命运裁决。苏丹的军队开始排兵布阵，这些阵势都已经操演熟练，既小心谨慎，又深谋远虑。4月2日，奥斯曼主力部队在离城5英里处停下脚步。它被分为若干部分，每个团都有自己的阵地。随后几天内，大军分批逐步前进，这无情的步步紧逼让观察者想起“奔流入海的大河”^[15]。很多史学家都使用了这个比喻来描绘奥斯曼军队难以置信的强大和一刻不停的运动。

围城的准备工作进展神速。工兵们开始将城外的果园和葡萄园夷为平地，以便为火炮开辟出开阔的射击场。他们还挖掘了一条与陆墙相距250码、沿着陆墙全线与之平行的堑壕，堑壕前方筑起了土墙，以抵御炮火。堑壕顶部覆盖了木制框架，以提供防护。在这道防线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他的主力部队部署到离陆墙1英里处的最终阵地上：“按照惯例，在伊斯坦布尔城外扎营的那天，全军各团分别列队。他在中军，身边簇拥着头戴白帽的近卫军弓箭手、土耳其和欧洲裔弩手、火枪手和炮手。戴红帽的步兵部队排列在他左右两侧，骑兵压阵。全军以这样的队形进逼伊斯坦布尔。”^[16]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指定位置：安纳托利亚军在右翼（奥斯曼人以右为尊），指挥官是土耳其将军伊沙克帕夏，他的副将是一名叛教的前基督徒马哈茂德帕夏。基督徒和巴尔干部队则在左翼，由卡拉加帕夏指挥。另外一支庞大队伍则在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扎甘帕夏统领下，前往金角湾以北的沼泽地带铺设道路，并控制一直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山地，监视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居民点的动静。4月6日（又是一个星期五），穆罕默德二世抵达了精心选择的前沿指挥部所在地——居高临下的马尔特佩山，位于大军的中间，对面就是他认为最脆弱的城墙地段。1422年，他的父皇穆拉德二世也是在这里指挥了攻城

战。

城墙上的守军目睹城外平原迅速建起一座帐篷的城市，不禁惊恐万状。据一位作家称，“苏丹的军队人数众多，就像无数沙粒……遮蔽了两片海岸之间的地域”^[17]。奥斯曼帝国的战役准备执行得井井有条，而对具体目标秘而不宣，这种低调更是令人恐惧。拜占庭史学家哈尔科孔蒂利斯^[18]承认：“穆罕默德苏丹的军队和营地秩序井然，粮草充足，扎营时的秩序颇具美感，没有任何混乱和尴尬局面。除了苏丹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君主能做得得到这些。”^[19]锥形帐篷安排得非常整齐清爽，每一群帐篷的中间都是指挥官的营帐，它的主杆上飘扬着显眼的旗帜。在整个营地的中间，人们郑重其事地搭建起穆罕默德二世本人的金红两色刺绣营帐。苏丹的营帐是其尊贵和威严的视觉象征——使苏丹权力具象化，折射出苏丹作为游牧领袖的汗国起源。每位苏丹登基时都会命人为他制作一顶华丽的帐篷，以表现他作为君主的特别之处。穆罕默德二世的营帐位于拜占庭守军弩箭射程之外；按照惯例，在营帐周围建起了木栅，挖掘了壕沟，安放了盾牌；以苏丹营帐为圆心，如同“光晕环绕月亮”^[20]一般部署着他的最为忠心耿耿的部队——“最精锐的步兵、弓箭手和支援部队，以及他的其他私家兵卒，这些士兵是全军的佼佼者”^[21]。这些士兵的任务是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苏丹，整个帝国的安全就寄托在他们身上。

整个营地的组织工作非常细致。帐篷如海洋一般，顶部飘扬着各色大小旌旗：苏丹本人的金白两色皇旗、他的近卫骑兵的红旗、近卫步兵的绿红两色或红金两色旗帜。旗帜是中世纪军队中权力和秩序的标志。城墙上的观察者还能看得见众位维齐尔和主要指挥官的色彩鲜艳的帐篷，以及不同部队的独特帽子和服饰：近卫军戴着非常突出的白色拜克塔什教派^[22]的帽子；步兵头缠红色头巾；骑兵戴着尖顶的头巾式盔帽，身披链甲；斯拉夫人则穿着巴尔干式服装。目睹奥斯曼大军盛景的欧洲人对他们的士兵和装备做了评述。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

声称：“他们中的四分之一穿着链甲或者皮甲，其他很多人的装备是法兰西式的，还有匈牙利式的，还有人戴着铁盔，配备土耳其弓弩。其他士兵除了盾牌和弯刀——这是一种土耳其式的剑——没有任何装备。”^[23]让站在城墙上的观察者愈发震惊的是，敌人拥有的牲畜数量惊人。“我承认，在军营里的牲口数量常常比人多，以便运输补给和粮食，”哈尔科孔蒂利斯写道，“但是这些人……不仅带来了足以满足运输需求的骆驼和骡子，还把牲畜作为一种娱乐工具，所有人都热衷于展示最好的骡子、马匹或骆驼。”^[24]

守军看到敌人忙忙碌碌、用意明显，不禁心生畏惧。黄昏将近时，宣礼员们从营地的数十个地点发出召唤祈祷的呼声，这呼声萦绕回荡在营地。人们点燃篝火，准备一天中的唯一一餐（因为奥斯曼军队在作战时生活非常节俭），炊烟随风飘散。两军仅仅相隔250码，城墙上的守军可以听得清敌营的种种声响：喃喃低语声，木槌敲击声，打磨刀剑的声音，马匹、骡子和骆驼的响鼻和嘶鸣声。更糟糕的是，他们或许还能听见敌军中由欧洲人组成的那一翼传来的基督教祷告声。奥斯曼帝国虽然决意打一场圣战，对他们的附庸却非常宽容：“尽管他们是苏丹的臣民，他并没有强迫他们摒弃基督教信仰，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信仰和祈祷。”特塔尔迪如此写道。奥斯曼军队从基督徒臣民、雇佣兵、叛教者和技术专家那里得到的巨大帮助成了令欧洲史学家们再三哀叹的主题。“我可以作证，”莱奥纳德大主教咆哮道，“土耳其人那边有希腊人、拉丁人、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西米亚人和来自其他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人……如此背弃基督，是多么可憎！”^[25]他的咒骂并不完全公正，因为很多基督徒士兵是作为苏丹的附庸，被强迫参战的。“我们不得不骑马前往伊斯坦布尔，去为土耳其人效力，”^[26]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回忆道，因为如果拒绝服役，就只有死路一条。在被迫参加攻城战的士兵中有一个名叫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年轻的俄罗斯东正教徒。他在俄罗斯南部边疆靠近摩尔达维亚的地区被一支奥斯曼军队俘虏，被迫接受了割礼，以准备皈依伊斯兰教。他所在的部队接近君士坦丁堡

时，他开了小差，溜进城市，对后来发生的事件做了生动的描述。

穆罕默德二世麾下的围城军队究竟有多少兵力，没人能说得清。奥斯曼帝国在极其宏大的规模上动员正规军和志愿兵的天赋一次次令他们的对手瞠目结舌、胡乱猜测。为苏丹歌功颂德的奥斯曼史学家简单地将（这种规模）比喻为“钢铁洪流”^[27]“浩瀚如繁星”^[28]。目睹这支大军的欧洲人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但都是很大的粗略数字。他们的估算从16万一直到40万都有。得以在近距离观察奥斯曼军队的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的说法更务实一些：“土耳其皇帝为正面交锋动员的兵力不可能有人们传说的那样雄厚。有人说土耳其军队数不胜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统治者都希望知道他的军队究竟有多少人，以便进行组织。”^[29]特塔尔迪的估计数字似乎最为现实，他冷静地计算出：“在围城战中，一共有20万人。其中大约6万人是士兵，其中3万~4万人是骑兵。”^[30]在15世纪，这已经是惊人的数字了，因为阿金库尔战役中英法两军的总数只有3.5万人。如果特塔尔迪的估算接近实际情况的话，奥斯曼军队带来的马匹的数量非常庞大。在6万士兵之外，奥斯曼大军的其余部分是辅助和随军人员：补给队伍、木匠、铸炮工匠、铁匠、军械匠以及“裁缝、糕点师、手艺人、小贩，以及其他为了获利或掳掠战利品而追随军队的人”^[31]。

君士坦丁十一世要统计自己的兵力就简单得多，只需要数一数就行了。3月底，他命令对各城区做一次人口统计，记录“有多少身体健全的人，包括僧侣，以及每个人拥有多少可以用于城防的武器”^[32]。在得到统计结果后，他就把计算的工作托付给了他忠心耿耿的大臣和毕生挚友乔治·斯弗朗齐斯。斯弗朗齐斯回忆道：“皇帝召见了，我说：‘这项任务属于你的职责范围，只有你最适合，因为你有本事进行必需的计算、监督城防的准备工作，并保守秘密。请把这些清单带回家研究，做出精确的评估：我们究竟有多少手持武器、盾牌、弓和火炮。’”^[33]斯弗朗齐斯尽职尽责地进行了计算。“我执行了皇帝的命令，向他呈报了我方

资源的详细估算，计算的结果相当让人灰心丧气。”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城市虽然面积辽阔，守军却只有4773名希腊人和仅仅200名外国人。”^[3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没有利益瓜葛的局外人也主动前来参战，包括“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那些偷偷从加拉塔前来帮助守城的人”，这些人的总数“不到3000”^[35]。因此，全城守军只有不到8000人，却要防守长达12英里的城墙。在这不到8000人的守军中，“大部分希腊人不擅长作战，他们使用盾牌、利剑、长枪和弓箭作战时完全是凭本能，而没有任何军事技能”^[36]。守军严重缺乏“擅长使用弓弩的人”^[37]。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东正教群众能帮多少忙，也很难说。君士坦丁十一世担心兵力如此匮乏的消息如果传播出去，会严重影响士气，因此决定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真实的数字被当作秘密保守起来，只有皇帝和我两个人知道。”^[38]斯弗朗齐斯回忆道。很显然，这场战役的攻防双方力量悬殊。

君士坦丁十一世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开始着手最后的准备工作。4月2日，也就是城门最后一次紧闭的那天，他派遣船只将金角湾的铁链升起，铁链从城内卫城角附近的尤金尼乌斯门一直拉到加拉塔海墙内的一座塔楼上。这项工程由一位名叫巴尔托拉米奥·索利戈的热那亚工程师负责。之所以选择他，或许是因为他能够说服在加拉塔的热那亚同胞，让他们同意将铁链固定在他们的城墙上。这个问题是很有争议的。加拉塔的热那亚居民允许拜占庭人这么做，就可以算是破坏了自己的严格中立性。如果战事不利，这肯定会招来穆罕默德二世的怒火，但热那亚人还是同意了拜占庭的请求。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只要有足够的海军力量保护铁链，金角湾沿岸的4英里城墙就几乎不需要部署兵力了。

穆罕默德二世在城外排兵布阵的同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召开了作战会议，与朱斯蒂尼亚尼和其他指挥官共同商议如何将他的小小军队部署在12英里长的战线上。他知道，只要铁链巩固，金角湾一带就是安全的；他也不是很担心其他地段的海墙。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流非常迅

猛，敌人无法轻易地乘船在那里登陆。马尔马拉海沿岸同样有强大的海流，而且岸边浅滩也不利于敌人的登陆作战。最需要关注的是陆墙，尽管它们貌似固若金汤。

双方都知道陆墙的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是城墙的中段，即两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门——圣罗曼努斯门和查瑞休斯门之间的那段城墙（被希腊人称为“中墙”）。在这两座城门之间，地势向着里卡斯河谷的方向下降了大约100码。在那里，有涵洞将里卡斯河从城墙下方引入城内。奥斯曼军队在1422年的攻势就聚焦在这一地段。穆罕默德二世将指挥部设在这一段城墙对面的马尔特佩山上，显然是有所图谋。第二个弱点是金角湾附近的那段仅有一层、没有壕沟保护的城墙，特别是两段城墙以直角相接的那个地点。3月底，君士坦丁十一世说服威尼斯桨帆船的船员沿着这段城墙紧急开挖了一道壕沟，但这个地段仍然令人忧心忡忡。

君士坦丁十一世根据具体问题，对自己的部队做了具体部署。他把全城的14个区分为12个军区，并相应地分配了资源。他决定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里卡斯河谷，于是皇帝和苏丹几乎能隔着城墙直接面对面。他把最精锐的主力部队（约2000人）部署在这里。朱斯蒂尼亚尼最初驻扎在北面山岭处的查瑞休斯门，但后来把他的热那亚士兵调往中部，与皇帝会合，并接管了这个关键地段的日常指挥工作。

然后对陆墙的各个地段进行了分配，由“君士坦丁堡的重要人物”^[39]指挥。在皇帝的右侧，查瑞休斯门的指挥官可能是卡里斯特斯的西奥多，“一个老当益壮的希腊人，箭术娴熟”^[40]。再往北的地段，一直到直角处，被托付给了热那亚的博基亚尔多兄弟，他们“自费前来参战，带来了自己的装备”^[41]，包括火枪和威力巨大的大型弩箭；布雷契耐皇宫周围较薄弱的单独一道城墙也大体被交给意大利人防守。威尼斯市政官米诺托亲自住进了布雷契耐皇宫；皇宫塔楼上，圣马可的旗帜和皇帝的旗帜一起飘扬。皇宫的大门之一卡里加利亚门由“来自德意志的约翰”指

挥，他其实是苏格兰人，是个职业军人和“能干的军事工程师”^[42]。他还有一项任务是管理城内希腊火的供应。

君士坦丁十一世统率的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多国部队，但由于宗教、民族的不同和商业竞争，仍然存在矛盾。为了减少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间、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间的摩擦，他特意将士兵们混编，希望能加强他们之间的互相依赖。他左翼的那段城墙的指挥官是他的亲戚“希腊人西奥菲勒斯，一个来自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贵族，精通希腊文学，而且是几何学专家”^[43]。西奥菲勒斯对《伊利亚特》耳熟能详，但对如何防守特洛伊城墙却知之甚少。在接近黄金门的地段，城墙由一群希腊、威尼斯和热那亚士兵防守，陆墙在马尔马拉海岸与海墙相接的那个点则由一名来自拜占庭的坎塔库泽努斯望族的名叫德米特里的贵族镇守。

马尔马拉海岸的守军更加混杂。雅各布·孔塔里尼率领一支队伍驻扎在斯图狄翁村；邻近的那段城墙是敌人不大可能进攻的地段，由一群东正教僧侣负责监视。君士坦丁十一世把一支由叛教的土耳其人（由觊觎苏丹位置的奥尔汗王子指挥）组成的队伍部署在远离陆墙的埃莱夫塞雷港，尽管这些人的忠诚度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假如城市陷落，苏丹一定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城市北端的海岸由一支加泰罗尼亚队伍驻防，卫城则被托付给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和他麾下的200人。尽管这一地段有大海的保护，君士坦丁十一世还是决定给每座塔楼配备两名神射手——一名弓箭手和一名弩手或火枪兵，这说明他对这一带守军的战斗力是多么不放心。金角湾则由热那亚和威尼斯水手防守，指挥官是威尼斯军官特里维萨诺；停在港内的两艘克里特船只的船员则负责把守铁链附近的一座城门——美丽之门。阿卢威克瑟·迪艾多负责保护铁链本身和港内的船只。

为了给他的薄弱“大军”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定保

留一支快速反应的预备队。有两支队伍被保留在离城墙较远的地方，随时待命。其中一支由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指挥，他是一名技艺娴熟的军人，“在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仅次于皇帝本人”^[44]，驻扎在佩特拉区，拥有一百名骑兵和一些轻型火炮。第二支快速反应部队由尼科弗鲁斯·帕里奥洛格斯指挥，驻扎在已经废弃的圣使徒教堂附近的中央山岭上。这些预备队一共有大约1000人。

君士坦丁十一世在这些部署上倾注了他一生的作战和调动军队的经验，但或许他自己也没想到，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些互相竞争的队伍将会打得多么顽强。他把很多关键地段交给外国人防守，因为他是主张东西方教会联合的，不知道城内的东正教信众会不会忠于他。他把四座主要城门的钥匙托付给了重要的威尼斯指挥官，并确保城墙上的希腊指挥官都是宗教上的联合派。卢卡斯·诺塔拉斯可能是反对联合的，所以皇帝特意把他安排在后方，免得他防守城墙时被迫和天主教徒合作。

在君士坦丁十一世努力将他的薄弱兵力部署到4英里长的陆墙上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决断。当初设计三道城墙系统时的设想是有兵力强大得多的部队，可以进行纵深防御，较高的内墙和较低的外墙上都能部署守军。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同时防守两道城墙，因此不得不选择在哪一道城墙上抵抗。城墙在1422年的围攻中遭到了炮击，外墙得到了大体修复，内墙却没有修理。在过去的围城战中，守军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抉择，他们都选择了防御外墙，并且都取得了成功。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围城战专家朱斯蒂尼亚尼选择了同样的战略。在有些地段，这个决定引起了争议。“我一直是反对这么做的，”永远持批评态度的莱奥纳德大主教写道，“我极力敦促不要放弃较高的内墙的防御。”^[45]但他的建议可能是过于强人所难了。

皇帝决心竭尽全力去鼓舞士气。他知道穆罕默德二世害怕天主教国家会援救这座东正教城市，于是决定做一次自己的小规模武力展示。

按照他的请求，威尼斯桨帆船的船员于4月6日上陆，穿着他们显眼的欧洲式铠甲，在陆墙全线游行，“队伍前面举着旗帜……让市民们颇感安慰”^[46]。这是明白无误地让敌人知道，法兰克人也参加了守城。同一天，那些桨帆船也做了作战准备。

穆罕默德二世则派遣一小队骑兵旌旗招展地来到城门前，与守军谈判。按照《古兰经》教法的传统要求，他们先邀请拜占庭人自行缴械投降。《古兰经》称：“派遣使者之前，我不惩罚（任何人）。当我要毁灭一个市镇的时候，我命令其中过安乐生活者服从我，但他们放荡不检，所以应受刑罚的判决。于是我毁灭他们。”^[47]按照这个模式，基督徒守军可以皈依伊斯兰教，举手投降，缴纳人头税，或者选择抵抗，一旦城市被攻破，就将遭到三天的掳掠。拜占庭人早在674年就听到过这种程序化的警告，后来还经历了好几次。他们的回复一直是：“我们不接受人头税和伊斯兰教，也不会将我们的堡垒拱手让出。”^[48]在投降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奥斯曼军队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攻城得到了神圣法则的批准，于是传令官们在军营中到处宣布，攻城战正式开始了。穆罕默德二世继续将他的大炮运往前线。

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定尽可能多地亲临战场，让士兵们都能看得见他。他的指挥部就是圣罗曼努斯门后的一个大帐篷，每天他都从那里出发，骑着他的阿拉伯种小母马，与乔治·斯弗朗齐斯和西班牙人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一起，“鼓舞士兵，检查岗哨，搜寻擅离职守的人”^[49]。他无论走到何处，都会在距离最近的教堂做弥撒，并确保每队士兵都有自己的僧侣和教士，以便听取告解和在战场上为临终者做最后的圣礼。他还命令日夜不停地做礼拜，为城市的救赎祈祷；晨祷结束时，人们要抬着圣像在大街小巷以及城墙上游行，以鼓舞士气。城外的穆斯林能看得清基督徒的长胡子，听得见圣歌在春季的空气中回荡。

恶劣的天气对守军的斗志造成了进一步打击。当时发生了一系列轻

微地震，还下起了倾盆大雨。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下，很多人自以为看到了预兆，记起了古老的预言。“教堂内的圣像以及廊柱和圣徒雕像出了汗，”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回忆道，“有人被恶灵附体，受到不吉利幻象的感召，占卜者预言了很多灾难。”^[50]预言没有给君士坦丁十一世本人造成很大困扰，更让他头痛的是敌人大炮的到来。1446年，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在五天之内就摧毁了他精心建造的赫克萨米利翁城墙，随后大开杀戒，他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穆罕默德二世凭借卓越的后勤保障能力对装备、物资和雄厚的人力进行了调度协调，现在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的炮弹、硝石、坑道挖掘装备、攻城武器和粮食都已经收集齐备，做了清点和部署。奥斯曼军队对武器做了清理，将大炮拖曳到指定位置，士兵们（骑兵和步兵、弓箭手和长枪兵、军械匠、炮手、劫掠轻骑兵和坑道工兵）都已经集结完毕，摩拳擦掌。奥斯曼帝国苏丹们对奥斯曼人作为游牧部族的往昔还记忆犹新，非常理解如何去驱动士兵，把他们的热情引导到共同的目标上去。穆罕默德二世熟知如何激励人们的圣战狂热。乌理玛们在军营中来来往往，背诵圣训中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古老预言，以及它对伊斯兰教的重大意义。穆罕默德二世每天都在金红两色帐篷前的地毯上当众朝向东方的麦加方向（也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方向）祈祷。同时，他还许诺，如果能攻克城市，士兵们将得到无限的战利品。信众受到了红苹果的巨大诱惑，满心期待。在为真主的意志效劳的同时还能捞到大量战利品，这种双重诱惑对以劫掠为生的游牧民族来说是不可抵御的。穆罕默德二世就在这双重许诺的基础上开始准备攻城。

他知道（他的年迈的维齐尔——哈利勒帕夏对这一点的认识更为深刻），必须速战速决。攻城拔寨需要人的牺牲。对攻城的热情和期待，以及用横遭践踏的尸体填满沟壑的意志力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意想不到的挫折能够很快导致士气消沉；在如此集中的一大群人中，谣言、异议和不满情绪能够像草原劲风一般快速席卷所有的帐篷；如果战役一直拖

到酷夏，哪怕是井井有条的奥斯曼军营也很容易流行伤寒。这次冒险对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他通过威尼斯间谍的网络得知，不管基督教各国是多么耽于争吵和四分五裂，西方最终还是会从陆路或海路驰援君士坦丁堡。他从马尔特佩的小山上仰视起伏的陆墙和排布紧密的塔楼以及三道防御体系，回忆起它们在历史上表现出的固若金汤。他在公共场合或许会宣称自己坚信士兵们的英勇，但他的最终希望还是寄托在大炮上。

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时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守军的图谋非常绝望而简单。他们无力发动反击来解除围困。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等待西方的援军强行打破封锁。他们在678年曾经抵挡住了阿拉伯人，现在也必须坚守。

如果说君士坦丁十一世有一张王牌的话，那就是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这个人。这个热那亚人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前，市民们就早已熟知他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51]的威名。他懂得如何对防御工事的明显弱点进行评估和弥补，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投石机和火枪这样的防御武器，以及如何让有限的兵力发挥最大的效力。他将守城战的高超本领传授给守军，并考虑了从城市的侧门发动反击的可能性。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的残酷战争造就了朱斯蒂尼亚尼这样才华横溢的军事家和技术型雇佣兵，他们把城防当作一门科学和艺术来研究。但朱斯蒂尼亚尼此前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炮击。即将发生的事件将在最大限度上考验他的本事。

[1]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15

[2] Mihailovich, Konstantin, *Memoirs of a Janissary*, trans. Benjamin Stolz, Ann Arbor, 1975, p.177

[3]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62

[4] quoted Imber, Colin,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Basingstoke, 2002,

p.257

[5] quoted Imber, Colin,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Basingstoke, 2002, p.277

[6] quoted Goodwin, Jason, *Lords of the Horizons: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1999, p.66

[7]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62

[8]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16

[9] Chelebi, Evliya, "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d'après le Seyahatname d'Evliya Chelebi, " trans. H. Turkova, *Byzantinoslavica*, vol. 14, 1953, p.2

[10]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8

[11]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9

[12] 乌理玛的阿拉伯文原意为学者，是伊斯兰教学者的总称。任何一位了解古兰经注疏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及有系统的宗教知识的学者，都可被称为乌理玛。它被用来泛指伊斯兰社会中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阿訇、毛拉、伊玛目等。

[13]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17

[14]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62

[15] quoted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xx

[16] Tursun Beg, *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y, Minneapolis and Chicago, 1978, p.34

[17]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47

[18] 拉奥尼科斯·哈尔科孔蒂利斯（约1423~1490），拜占庭史学家。他的著作是研究拜占庭末期和奥斯曼帝国崛起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19] quoted Goodwin, Godfrey, *The Janissaries*, London, 1994, p.70

[2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16

[21]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1

[22] 拜克塔什教派是伊斯兰教的一派，受到苏非派的影响，混合了逊尼派、什叶派和苏非派的神学观点，具有神秘主义特点，历史上主要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流行。这一派在奥斯曼近卫军中势力很大。1826年，奥斯曼帝国发起改革，裁撤了近卫军，拜克塔什教派也一度被禁止。

[2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76

[2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5

[25]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30

[26] Mihailovich, Konstantin, *Memoirs of a Janissary*, trans. Benjamin Stolz, Ann Arbor, 1975, p.91

[27] quoted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xx

[28] quoted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xx

[29] Mihailovich, Konstantin, *Memoirs of a Janissary*, trans. Benjamin Stolz, Ann Arbor, 1975, p.175

[3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175-6

[31] quoted Mijatovich, Chedomil,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1448-1453*, London, 1892, p.137

[32]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49

[33]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p.49-50

[34]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69

[35]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38

[3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46

[37]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38

[38]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70

[39]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p.19

[4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48

[41]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7

[42]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110

[4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48

[4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19

[45]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152-4

[46]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p.19-20

[47] *Koran, The*, trans. N. J. Dawood, London, 1956, p.198

[48] Chelebi, Evliya, “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d'après le Seyahatname d'Evliya Chelebi, ” trans. H. Turkova, *Byzantinoslavica*, vol. 14, 1953, p.3

[49]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75, p.217

[50]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7

[51]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0

8.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

1453年4月6～19日



何人的口舌能够言说此等灾难与恐惧？[\[1\]](#)

——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

大炮被装在圆盘轮的大车上，在从埃迪尔内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泥泞道路上冒着春雨缓缓前进，花了很长时间才抵达前线。老远之外就能听见它们行进的嘈杂。拖曳大车的公牛艰难地挣扎，大声吼叫；赶车的人们呼喊；嘎吱作响的车轴发出持续不断、音节单调的音乐，如同恒星放射出的诡异声波。

大炮抵达前线后，又花了很长时间用起重机械将每一门大炮从车上卸下，部署就位，并调整好射角。到4月6日，只有一些轻型火炮准备就绪。它们对城墙发动了第一轮炮击，但显然收效甚微。在战斗打响后不久，一支热情高涨的奥斯曼非正规部队向里卡斯河谷的薄弱城墙地段发动了一次零乱的进攻。朱斯蒂尼亚尼的士兵从城墙上冲杀出来，把入侵者打得抱头鼠窜，“杀死了一些敌人，还打伤了一些”[\[2\]](#)。奥斯曼军队不得不发动一次相当规模的反击，迫使守军回到城墙上，才恢复了秩序。这次最初的失败让苏丹更加坚定了决心——等待炮兵完全部署就绪，而不是贸然进攻，损耗士气。

在此期间，他开始执行奥斯曼军队攻城战术的另一套策略。工兵们隐藏在泥土壁垒之后的地堡内，开始在城墙中段之外挖掘地道；他们的目标是挖掘一条长250码的地道，一直通到城墙脚下，然后从地下将城墙炸塌。苏丹还命令士兵们开始“将石头、木料、泥土送往前线，并聚集所有其他种类的物资”^[3]，选择合适的地点，尝试将城市的壕沟填平，为大规模攻势铺平道路。这项工作非常危险，甚至是致命的。壕沟离有人据守的城墙只有40码远，没有任何防护，城墙守军可以对壕沟处的人随意扫射，除非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住城墙守军。双方将为争夺每一个立足点或可供推进战线的地域而展开激烈厮杀。朱斯蒂尼亚尼对地形做了研究，开始采取措施，扰乱奥斯曼人的行动。守军多次发动突袭，并在夜色掩护下进行伏击；他们“冲出城门，袭击城墙外的敌人”^[4]。他们从壕沟中跳出，有时会被打退，有时则能俘虏土耳其人，从他们口中榨取情报。争夺壕沟的这些小规模战斗很有效，但守军很快就无法接受兵力损失的交换比了。不管能杀死多少土耳其人，己方死亡的每一名战士都是严重的损失，于是在战役早期守军就决定尽量不再出击，而主要从城墙上防守，“有的人用弩箭射击，其他人用普通的弓”^[5]。争夺壕沟的战斗将成为这场战役的一场激烈角逐。

4月7日之后的时间里，苏丹一面焦躁不安地等待重炮送抵，一面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奥斯曼军队横扫色雷斯时，将途经的村庄全部占领，但还有少数孤立的要塞仍然在坚守。穆罕默德二世绕过了这些要塞，只留下少量兵力予以监视。大约在4月8日，他派遣了一支相当规模的队伍和一些火炮去攻打希拉比亚要塞（位于割喉堡远方、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山上）。希拉比亚要塞抵抗了两天，直到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将防御工事全部摧毁并杀死了大部分守军。剩余的人“无力继续抵抗，举手投降，表示愿意听从苏丹发落。于是他把这40人全部穿刺在尖木桩上”^[6]。马尔马拉海岸边斯图狄乌斯处的一座类似的城堡也很快被炮火摧毁。这一次，有36名不幸的俘虏被穿刺在城墙外的尖木桩上。

几天后，穆罕默德二世的海军统帅巴尔托格鲁率领部分舰船占领了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群岛，拜占庭皇族在动荡时期常常选择在这里躲避。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王子岛上有一座巩固的要塞，驻有“30名重武装士兵和一些当地人”^[7]，他们拒不投降。炮火未能让他们屈服，于是巴尔托格鲁的部下在要塞城墙外堆积了大量柴火，放火烧城。在沥青、硫黄和大风的助威下，大火侵袭了塔楼，城堡本身很快起火。没被烧死的人只得无条件投降。投降的士兵被就地处决，村民则被卖为奴隶。

到4月11日，穆罕默德二世返回了金红帐篷，此时全部大炮都已集结完毕。穆罕默德二世把它们分组为14或15个炮兵连，部署在城墙沿线较为薄弱的关键点上。乌尔班的大炮之一（“一门恐怖的大炮”^[8]）被部署在金角湾附近布雷契耐的单一城墙前，这段城墙“没有壕沟或外墙的保护”^[9]。另外一门大炮被安置在两段城墙的直角相接处，第三门则在更南面的泉源之门处。其他大炮则被拖曳到薄弱的里卡斯河谷沿线的关键地点。乌尔班的超级巨炮（希腊人称之为“皇家大炮”）被部署在苏丹营帐前方，直接威胁圣罗曼努斯门——“全城最薄弱的城门”^[10]。苏丹从他的营帐处就可以对巨炮的表现做出评估。每门重炮都得到一些较小的火炮的支持，组成一个炮兵连，奥斯曼炮手们亲切地把它称为“带着小崽子的大熊”。这些火炮发射的石弹的重量从200磅到1500磅不等，乌尔班的超级巨炮配备的就是1500磅的巨型石弹。根据一位目击者的估测，最大的两门炮所发射炮弹的高度“分别有人的膝盖和腰那么高”^[11]。另外一名观察者则声称，最大的炮弹“周长达到我手掌长度的11倍”^[12]。虽然目击者谈及了“不计其数的作战机械”，但穆罕默德二世可能一共拥有约69门大炮——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一支极其庞大的炮兵部队，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更为古老的投石机械，比如杠杆抛石机，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攻城武器。杠杆抛石机在300年前穆斯林军队攻克十字军城堡的战斗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现在却已经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旧事物。

安装大炮和准备射击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炮管是独立式的，没有成套的炮车。运输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将炮管捆绑在坚固的大车上。奥斯曼军队在前线有土墙保护的地段修建起倾斜的木制平台，并在其前方树立木栅栏，以抵御敌人的火力，木栅栏上有带铰链的门，开炮前要将门打开，炮弹就穿过这个门飞出；炮管运抵前线后，要搭建一个巨大的滑车装置将炮管安放到平台上。

大炮需要极其繁杂的后勤支持。在黑海北岸，奥斯曼人开采了数量巨大的黑色石料，并将其制作成炮弹的形状，然后用商船将它们运往前线。4月12日，这样一支船队抵达了双柱港，送来了“大炮所需的石弹、栅栏和木料，以及军营所需的其他弹药”^[13]。如果要长期射击，还必须征用相当数量的硝石。穆罕默德二世命令扎甘帕夏修建一条绕过金角湾尖端、通往港口的道路，应当就是为了加快这些补给物资的运输。运输大炮本身需要大型的木制大车以及大量人员和公牛。和乌尔班一起在埃迪尔内铸造大炮的工匠同时也是炮手。他们亲自运送自己的劳动成果，将其部署到位，装填炮弹，发射，并就地维修。乌尔班巨炮虽然是在150英里之外制造的，奥斯曼军队却把大量资源带到了前线，足以对现有的火炮进行改造，甚至可以锻造或铸造新的火炮。所以，除了攻城士兵之外，工匠们也非常活跃。大量的铁、铜和锡被带到了前线；劳工们挖掘了半球形的木炭坑，建造了砖砌的熔炉。军营内的一个单独区域被改建成临时的工业作坊，那里黑烟滚滚，铁匠们锤音叮咚。

为大炮做战斗准备需要时间和对细节的高度重视。火药被装入炮管，然后向炮管内填入木制或羊皮制的炮塞，用铁棒压紧，以确保“无论何种情况，除了受到火药爆炸的冲击力外，炮塞绝对不会飞出炮膛”^[14]。然后炮手们将石弹抬到大炮前端，小心翼翼地填入炮膛。炮弹被设计成与炮膛匹配，但口径很难做到完全相符。炮手们通过“某些技术和对目标的计算”（在实践中其实就是试射并不断调整）进行瞄准；通过用木楔垫高炮台来调整俯仰射角。另外还要用巨大的木梁将大炮垫

放到位，同时用石块压住木梁，以吸收后坐力，“以免火药爆炸的冲击力和猛烈的后坐力使得大炮偏离正确位置，导致射偏”^[15]。起爆火药被填入火门，射击准备就完成了。4月12日，在4英里的正面上，苏丹的炮手们将火把凑近火门，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中炮击拉开了帷幕。

如果说在战争史上有这样一个时刻能够让人们真切地对火药的强大威力心生敬畏的话，那就是1453年春季奥斯曼大炮开始轰鸣的时刻。根据当时的记载：

火药被点燃后，瞬间就发出一声可怕的轰鸣，脚下的大地猛烈颤动，一直传播到远方，那噪音是闻所未闻的。然后是恐怖的雷鸣般巨响和可怖的爆炸，火焰照亮和炙烤了周边的万物，木塞子被干燥空气的炽热爆炸冲出，石弹被强大的冲击力推出。难以置信的力量驱使着石弹呼啸而去，击中了城墙，当即将城墙撼动和击毁。石弹本身则被炸裂为无数碎片，碎片四处乱飞，附近站着的人无不死于非命。^[16]

巨大的石弹击中较薄弱地段的城墙时产生的效果是毁灭性的：“有时它能将整段城墙摧毁，有时能打垮一半，有时能或多或少地摧毁部分塔楼，或一堵胸墙。没有任何一段城墙足够巩固或厚实，能够抵挡这威力，或者完全不受石弹力量或速度的影响。”^[17]起初，守军感到，攻城战的整个历史都在他们眼前展开了。狄奥多西陆墙是两千年来防御工程演化的结晶，是人类智慧所能构建的工程学奇迹，而且得到上帝的保佑；而现在，城墙在遭到一连串瞄准精确的炮弹轰击后就开始坍塌了。莱奥纳德大主教在皇宫附近观察了大炮对单一城墙进行轰击的效果：“他们用炮弹将城墙炸为齑粉。尽管它非常厚实和坚固，还是在这可怕机械的轰击下倒塌了。”^[18]

轰击城墙的超级大炮发射的炮弹可以穿越1英里的距离，直接射进君士坦丁堡的心脏，以可怕的力量摧毁房屋或教堂，将平民成群地打倒，或者将他们活埋在萎缩了的城市的果园和田野上。一名目击者震惊地发现，一发炮弹击中了一座教堂的墙壁，令它当场土崩瓦解。还有人

说，方圆2英里内的大地都在震颤，甚至安全地系牢在金角湾港口的桨帆船的坚固木制船体也受到了这震动的影响。波斯普鲁斯海峡对岸5英里远的亚洲也听到了炮声。与此同时，抛射轨迹更为弯曲的杠杆抛石机也开始将石块投掷到城墙后方的屋顶上，并射中了皇宫的部分建筑。

最初，炮击对守军的心理效果甚至比实际效果更为强大。大量集中的火炮产生的噪音和震动、浓厚的烟雾和石弹撞击石墙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让久经战阵的老兵也不禁胆寒。对于平民来说，这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预告和对他们罪孽的惩罚。按照一位奥斯曼史学家的说法，炮声“如同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19][20]}。人们跑出自己的房屋，锤击胸膛，画十字架，呼喊：“主啊，怜悯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有妇女在街上晕倒。教堂内挤满了信徒，他们“请愿、祈祷、哀号和高呼：‘主啊！主啊！我们远离了你。我们的遭遇和你的圣城遭到的苦难，全都是对我们罪孽的公正惩罚。’在忽闪的烛光下，人们跪在最神圣的圣像前，持续不断地祈祷着：‘在最后关头，不要把我们抛弃给你的敌人；不要灭杀你的有德的人民；不要取走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在这时节虚弱。’”^[21]

君士坦丁十一世竭尽全力，通过务实的工作和宗教的慰藉去维持城内的士气。他每个钟头都要巡视城墙，鼓舞指挥官和士兵们的斗志。教堂钟声响个不停，他告诫“全体人民，教导他们不要放弃希望，坚持不懈地抵抗敌人，全心地信任全能的上帝”^[22]。

守军尝试了很多方法来减轻石弹的冲击力。他们向城墙外表面泼下了白垩和砖灰混合而成的灰泥，给城墙增加一层保护。他们还在一些地方悬挂了带有成捆羊毛的木梁、成片皮革，甚至珍贵的挂毯，以吸收石弹的部分冲击力。但火药的推进力十分强大，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守军尽了最大努力，尝试用自己的少量火炮去摧毁敌人的大炮。但他们缺少硝石，而且奥斯曼军队的大炮有木栅的保护。更糟糕的是，他们发现，

城墙和塔楼不适合做炮台。它们不够宽阔，无法承受大量火药爆炸产生的后坐力；也不够坚固，无法抵御震动，因为“开炮时城墙会撼动，大炮对己方城墙的破坏要比对敌人的杀伤更为严重”^[23]。他们最大的火炮很快炸膛了，这让饱受折磨的守军怒不可遏，他们怀疑炮长是苏丹的卧底，想把他处死，“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他应得这样的处罚，于是把他释放了”^[24]。最重要的是，守军很快发现，在战争的新时代里，狄奥多西城墙在结构上是不完善的。

希腊史学家们努力将他们目睹的情形付诸笔端，但甚至找不到合适词汇来描述大炮。“这种装置没有自古就有的名称，”头脑专注于古典时代的克利托布罗斯宣称，“除非把它称为某种攻城锤或攻城器。但在日常语言中，大家都把它称为‘器械’。”^[25]其他名字也四处传扬：射石炮、破城者、攻陷城市者、梦魇，不一而足。在压力极大的时刻，一种新的可怕现实（大炮轰击的地狱般场景）改变了人们的语言。

穆罕默德二世的战略是打一场消耗战，尽管他自己也颇为焦躁。他决定用炮火日夜轰击城墙，并不断发动没有规律可循的小规模攻击，以拖垮守军，为最后的总攻打开缺口。“袭击日夜进行，没有间歇，有两军交锋，有爆炸，以及石块和炮弹对城墙的轰击，”梅里西诺斯记述道，“我们兵力远逊于他，因此苏丹希望用持续炮击炸死我们，拖垮我们的精神，用这种方法轻松地拿下城市。于是不给我们一刻休息的时间。”^[26]炮击和争夺壕沟的战斗从4月12日一刻不停地持续到18日。

大炮虽然在最初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但操纵它们却是非常艰难的工作。皇家大炮的装填和瞄准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所以每天只能发射七次，黎明前会先打一发，以警示敌人，这一天的炮击开始了。火炮的表现难以预测，容易误伤炮手。在春雨中，要把大炮固定在阵地上都很困难。后坐力非常大，大炮就像狂暴的犀牛一样向后猛冲，常常脱离炮台，陷入泥浆。如果不多加小心，附近的人就可能被大炮压死；如果炮

管炸膛，站在周边的人就极有可能粉身碎骨。皇家大炮很快就让乌尔班忧心忡忡。火药爆炸产生的高温开始在不够纯净的金属上产生发丝般的裂纹。显然，铸造如此庞大的火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对这个技术问题非常感兴趣，回忆说，为了控制这个问题，在炮弹发射出去之后，炮手就立刻用温热的油浸泡炮管，以阻止较冷的空气进入、扩大裂纹。

但炮管可能会像玻璃一样炸得粉碎的危险继续困扰着乌尔班。根据传说，这个基督徒技术雇佣兵很快就遭到了报应。他仔细检查后发现，炮管裂缝的确非常严重，于是希望把这门大炮撤走，重新铸造。一直在前线观察大炮表现的穆罕默德二世急于求成，命令继续射击。与火炮炸膛相比，乌尔班更害怕苏丹的不悦，于是重新装填了大炮，并请穆罕默德二世站远些。点燃火药后，皇家大炮“开炮时炸得四分五裂，碎片乱飞，打死打伤附近多人”^[27]，包括乌尔班自己。有很有力的证据表明，乌尔班不是这么死的（基督徒史学家们恨不得他早死早好），但很显然，他的超级大炮在战役初期就毁坏了。奥斯曼军队迅速用铁圈对它进行了加固，重新投入作战，但它很快又炸膛了，这令穆罕默德二世暴跳如雷。这门超级大炮显然超越了当时冶金技术的极限。它的主要效果是对拜占庭人的心理震慑；造成实际破坏的是尺寸较小但仍然威力惊人的其他射石炮。

不久，匈牙利人匈雅提·亚诺什派来了使者，使得穆罕默德二世速战速决的需求愈显突出。穆罕默德二世的政策一直是对他的各个敌人分而治之；因此他与当时的匈牙利摄政王匈雅提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和约，以确保在他攻打君士坦丁堡期间不会遭到西方的陆路进攻。匈雅提的使者来到奥斯曼宫廷，向苏丹宣布，他们的主公匈雅提已经辞去了摄政王职位，还政于他的被监护人——国王拉斯洛五世，和约不再有效。因此匈雅提希望将和约文本返还，并收回苏丹手中的那份和约。狡猾的匈牙利人以此向奥斯曼帝国施压，并且可能是受了梵蒂冈方面的唆使。

苏丹不得不考虑，匈牙利军队有可能会渡过多瑙河，前来援救君士坦丁堡，这在奥斯曼军营中也掀起了不安的波澜。这消息当然加强了守军的信心。

不幸的是，匈牙利人的来访也让拜占庭人产生了猜疑，于是流传开了这样一条无法证实的谣言：到访的匈牙利人向奥斯曼帝国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一名到访的匈牙利使者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大炮的发射。当他看见一发炮弹击中了城墙的某个地段，同时炮手们装填第二发炮弹，准备轰击同一地段时，他因为对炮兵技术感兴趣，大笑炮手们的幼稚。他建议炮手们将第二发炮弹瞄准“离第一发炮弹的弹着点30~36码的地方，但高度相同”，第三发炮弹则瞄准前两发的弹着点中间的位置，以便“让三发炮弹的弹着点形成一个三角形。那段城墙就会倒塌”^[28]。这种射击策略能够加快摧毁城墙的速度。很快，“带崽子的大熊”就开始紧密协调和配合。由较小的火炮在已经削弱不少的中段城墙上打出三角形的两个底点，然后由一门乌尔班巨炮完成这个三角形：“魔鬼般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动力将炮弹射往城墙，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29]史学家们围绕匈牙利人的这条良策编织出了一个奇怪的解释：一位塞尔维亚预言家曾宣称，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基督徒的苦难不会终结。关于匈牙利人来访的故事凸显了基督徒的几个固执观念：奥斯曼军队只有得到了欧洲人的优越技术知识，才能得胜；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基督教世界的衰败；宗教预言仍然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大炮的瞄准有困难，而且射速很慢，炮击还是从4月12日一刻不停地进行了6天之久。现在最凶猛的火力被集中到里卡斯河谷一带的城墙和罗曼努斯门。每天能向城市发射约120发炮弹。城墙不可避免地开始坍塌。一周之内，外墙的一段、两座塔楼以及它背后内墙的一座炮塔就崩溃了。但是，尽管守军起初被炮击吓得肝胆俱裂，但在火力之下却渐渐恢复了信心：“我们的士兵每天感受苏丹战争机器的强力，已经见怪不怪，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或怯懦。”^[30]朱斯蒂尼亚尼毫不松懈地

修理破碎的城墙，很快就想出了有效解决外墙坍塌问题的办法。他命人用尖木桩建起了临时壁垒，然后守军在此基础上堆砌手头能搞得到的任何东西。石块、木料、木柴、灌木和大量泥土被运去封锁城墙的缺口。为了防止木制的临时壁垒被火箭烧毁，还在它的外表面覆盖了兽皮；临时壁垒达到足够高度后，守军在它顶端每隔一段距离就安放一些装满泥土的木桶作为城堞，以保护守军免受奥斯曼军队弓箭和火枪的扫射。为了修补城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天黑之后，男女市民前来干活，整夜搬运木料、石块和泥土，努力填补白天被打破的防御工事。这种持续的夜间劳动让越来越疲惫的市民愈发劳顿，但他们建成的泥土工事抵御石弹的毁灭性冲击力却惊人地有效。石弹落到泥土工事上，就像石子被抛到烂泥里一样，失去了效力：炮弹“被埋在松软和易变形的泥土中，不像撞击坚硬的石墙那样能够打开缺口”^[31]。

同时，争夺壕沟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奥斯曼军队在白天努力将壕沟填满。他们在火力掩护下，将手头能搞得到的所有东西——泥土、木料、瓦砾甚至（根据某种记载）他们自己的帐篷——都拖运到无人地带，然后倾倒入壕沟。夜间，守军从小门出击，将壕沟里的东西清理出来，使它恢复原先的深度。城墙前的小规模战斗非常惨烈，而且是近距离的白刃战。有时土耳其人会试图用网将滚入壕沟的珍贵炮弹回收；有时他们会对被削弱的城墙发动试探性进攻，确保承受极大压力的守军没有任何机会休息。他们还试着用带钩子的木棒将临时壁垒顶端的装满泥土的木桶拽下来。

在近距离交战中，铠甲质量更好的守军比较占便宜，但就连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也对敌人在战火下的英勇印象深刻。“土耳其人在近距离作战中打得非常勇敢，”莱奥纳德回忆道，“所以他们全都死了。”^[32]城墙上的守军用长弓、劲弩和火绳枪扫射下方，令土耳其人损失惨重。守军发现自己的火炮无法发射重型炮弹之后，就把它们改装成巨型霰弹枪。他们给一门火炮装填五或十个胡桃大的铅球。这些炮弹在近距离攻击中

的效果是惊人的：它们“穿透力极强，如果一发铅弹击中一名身披铠甲的士兵，能够直接击穿他的盾牌和身躯，然后击穿站在他身后的人，然后还能再打死一个人，直到火药的力量耗尽。一发铅弹能同时杀死两三个人”^[33]。

奥斯曼士兵遭到如此凶悍的火力袭击，伤亡非常惨重；他们去回收己方死者的尸体时，又给守军提供了一个大开杀戒的良机。威尼斯外科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被自己亲眼所见的情景惊呆了：

有一两人被击毙后，随即就会有其他土耳其人上前，将死者尸体搬走。他们会将尸体扛在肩上，就像扛猪一样，也不管自己离城墙是多么近。但我们在城墙上的人用火枪和弩弓向他们射击，瞄准搬运战友尸体的土耳其人，把他打倒在地，然后会有其他土耳其人来搬运尸体，丝毫不畏惧死亡，宁愿死去十个人，也不愿让一具土耳其人的尸体留在城墙前，因为那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耻辱。^[34]

守军尽了最大努力，但奥斯曼士兵还是在无情炮火的掩护下，将里卡斯河谷的一段壕沟填平了。4月18日，穆罕默德二世判断，对城墙的破坏和对敌人的消耗已经使得发动集中总攻的时机成熟。这一天春光明媚。暮色降临时，奥斯曼军营回荡起召唤人们祈祷的呼声，带着一种平静的确定性；在城墙内，东正教徒们来到教堂参加守夜，点燃蜡烛，向圣母祷告。两个钟头之后，在温和的春季月光下，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的一支相当规模的精锐部队开始前进。士兵们敲响骆驼皮制成的战鼓，奏响笛子和铙钹（这是奥斯曼军队以音乐为武器的心理战），火光照耀，呐喊连连。穆罕默德二世开始鞭策“重步兵、弓箭手、标枪手和全部近卫步兵”^[35]前进。他命令部队进攻里卡斯河谷里的一个薄弱点，那里的陆墙有一段已经崩塌。市民们第一次亲耳听到奥斯曼军队大举进攻时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不禁惊慌失措。“我无法描述他们向城墙冲锋时发出的呼喊声。”^[36]巴尔巴罗后来战栗地写道。

君士坦丁十一世高度紧张。他害怕敌人会发动全线总攻，并且深知

他的部下准备不足。他命令敲响教堂大钟。惊恐万状的群众跑上大街，士兵们则匆匆赶回自己的阵地。奥斯曼军队在大炮、火枪和弓箭的猛烈火力的掩护下越过了壕沟。他们的火力非常强大，守军根本无法在临时搭建的土墙上立足，因此奥斯曼近卫军得以携带着云梯和攻城锤抵达城墙脚下。他们把城墙上的防护城堞都拆除，让守军进一步暴露在地毯式火力之下。同时他们还尝试将木制栅栏烧毁，但未能成功。城墙缺口很狭窄，而且地势倾斜，进攻者的冲锋很不顺利。根据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说法，在黑暗中双方厮杀成一团，非常嘈杂和混乱：

大炮和火绳枪的轰鸣声、教堂大钟的咆哮、兵器碰撞声混成一片，枪口焰如同闪电，人们（城内的妇女儿童）的哭喊和呜咽让人相信，天与地已经相接，都在颤抖；如此吵闹，完全听不清别人的说话声。哭泣和尖叫、人们的哀号和抽噎、大炮的怒吼和教堂钟声混合成雷鸣般的巨响。很多地方起火，浓烟滚滚，再加上大炮和火绳枪发出的黑烟，双方阵线上的浓烟都越来越厚，遮蔽了整座城市。两军都看不见对方，也不知道自己在打的是谁。^[37]

在皎洁的月光下，双方在小路的狭窄空间内互相砍杀。甲冑较好的守军在朱斯蒂尼亚尼的勇敢指挥下占了上风。进攻者的势头渐渐衰弱了：“他们被砍成碎片，兵力在城墙上消耗殆尽。”^[38]四个小时的鏖战后，城墙上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躺在壕沟内的垂死者的呻吟打破这平静。奥斯曼军队“完全不管丢弃的尸体”，收兵回营了。守军则在持续六天的死战之后终于“像死人一样瘫倒在地”。次日清晨，君士坦丁十一世及其随从前来视察城墙。壕沟及其两岸堆满了“残缺不全的尸体”。攻城锤被抛弃在城墙下，火焰还在燃烧。军队和市民都已经筋疲力尽，君士坦丁十一世没法让他们去安葬死去的基督徒，于是这个任务被交给了僧侣。和以往一样，各方面估计的伤亡数字相差极大：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声称奥斯曼军队有1.8万人死亡；巴尔巴罗给出的数字（200人）更为现实。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不准阻挠敌人回收他们的死者尸体，但烧毁了攻城锤。然后他带领教士和贵族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

向“全能的上帝和最纯洁的圣母感恩，希望邪恶的异教徒在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之后，能够自行退去”^[39]。城市获得了一个喘息之机。穆罕默德二世的回应则是进一步加强炮击。

[1]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45

[2]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1

[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6

[4]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66

[5]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66

[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7

[7]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8

[8]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30

[9]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18

[10]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30

[11]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43

[1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30

- [1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5
- [14]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5
- [1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5
- [1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5
- [17]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5
- [18]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30
- [19] 典出《古兰经》第36章。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在末日审判时，死人将复活。这个说法与基督教类似。
- [20]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21
- [21]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p.33-5
- [22]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35
- [23]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46
- [24]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47
- [2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6
- [26]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48

[27]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p.48-9

[28]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p.273-4

[29]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45

[30]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103

[31] Kritovoulos, (in English)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Westport, 1970, p.49

[32]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38

[33]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66

[3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2

[35] Kritovoulos, (in English)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Westport, 1970, p.49

[3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15-16

[37]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37

[38]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39

[\[39\]](#)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39

9.上帝的神风

1453年4月1~20日



海战比陆战更危险和激烈，因为在海上没有任何退路，别无他法，只能死战到底，听凭命运安排，每个人尽其所能。^[1]

——让·傅华萨^[2]，14世纪法兰西史学家

4月初，在大炮轰击陆墙的同时，穆罕默德二世也开始首次部署他的另一个新式武器：舰队。他很快就认识到了一个事实（从阿拉伯人围困君士坦丁堡以来，所有意图攻打这座城市的人都很容易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牢牢控制大海，攻城很可能会失败。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在1422年攻城时无力阻滞拜占庭的海上航道，因为奥斯曼舰队于6年前在加里波利被威尼斯人歼灭了。如果不能封锁住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以及地中海的其他基督教国家就能轻易地从海上为君士坦丁堡提供补给。正是为了控制海峡，穆罕默德二世才在1452年夏季兴建了割喉堡，并为其配备了重炮。从那以后，没有任何船只能够不经检查就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出黑海。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修理舰船，扩充海军。1452年冬天，奥斯曼帝国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在加里波利的奥斯曼海军基地，或许还在黑海沿岸的锡诺普以及爱琴海畔的其他一些船坞大量建造新船。

根据克利托布罗斯的记载，穆罕默德二世“认为在围城战以及日后的战斗中，舰队的影响将比陆军更大”^[3]，因此特别重视造舰工作。帝国在沿着黑海和地中海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造船匠、水手和领航员（既有希腊人也有意大利人），这支技术力量可以运用于造舰事业。穆罕默德二世还拥有造舰所需的大量自然资源：木材和大麻纤维、用于船帆的布、用来制作锚和钉子的铸铁，以及用来堵缝防漏和涂抹船体的沥青和油脂。这些资源来自帝国各地，甚至国外。穆罕默德二世借助卓越的后勤保障能力将这些资源集中起来，用于战争。

就像大炮一样，奥斯曼人很快就从基督教敌人那里学会了造船和海战的技术。中世纪地中海的主要战船是桨帆船，它是古典时期希腊和罗马桨帆船的天然继承者。桨帆船从青铜时代开始，一直到17世纪，不断演化发展，雄霸整个地中海。克里特岛米诺斯文化的印章、埃及的纸莎草纸和古典时期希腊的陶器上都留下了对桨帆船基本外形的描绘。桨帆船在地中海历史上的地位就像葡萄酒和橄榄树一样重要。到中世纪晚期，典型的桨帆战船外形狭长、行动迅捷，长度一般在100英尺，宽度不到12英尺，较高的船首可作为作战平台或者强行登上敌船的桥梁。海战的战术和陆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桨帆船上载满了士兵，两军交锋时先使用投射武器，然后士兵们就会尝试冲上敌船，展开凶残的白刃战。

桨帆船的出水高度极小，因此船体显得非常低矮。为了将划桨的机械优势最大化，满载的桨帆船的船体超过水面的高度可能仅有2英尺。桨帆船也可以用帆，但在战斗中的速度和灵活性还是主要依靠划桨。桨手只有一排，坐在甲板上，因此在战斗中非常暴露；每个桨位上通常有两到三人；每名桨手操纵一支桨，桨的长度由他所在的位置决定。桨位上非常拥挤；每名桨手坐的空间只有现代的客机座位那么大，划桨时的侧面空间是极其宝贵的；桨手必须用肘部力量将船桨笔直地向前推，在这过程中要从位置上起身，然后再坐回到位置上。因此，划桨需要技术熟练的桨手节奏协调一致地工作；一支桨可能长达30英尺，重量约100

磅，所以需要相当大的肌肉力量。桨帆船的优势就是战斗中的高速和灵活性。一艘龙骨得到充分润滑的桨帆船在人力驱动下可以维持每小时7.5海里的冲锋速度达20分钟左右。如果划桨超过一个小时，桨手很快就会疲惫。

桨帆船在平静海面上速度很快，但也有特别突出的缺陷。出水高度太小使得它的适航性惊人地差，甚至在虽然波浪滔滔但距离较短的地中海也是如此，因此桨帆船的航行主要限制在夏季，而且偏好在近海航行，而不适合长期远航。不合时令的风暴常常将整支桨帆船舰队摧毁。只有在风从船尾方向吹来时，桨帆船的帆才能派上用场；如果有猛烈的逆风，船桨也就没用了。而且，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速度，桨帆船的设计导致船体非常脆弱，而且出水高度太低，在进攻舷侧较高的船只（比如风帆商船或较高的威尼斯大型桨帆船）时就会吃很大的亏。在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桨帆船的优缺点都将受到严峻考验。

穆罕默德二世集结了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他修复了一些旧船，还建造了一批新的三层桨战船（即每个桨位的上下三层分别有一名桨手的桨帆船）以及一些用于快速袭击的轻型桨帆船，即“有完整甲板的快速长形桨帆船，配备30~50名桨手”^[4]，欧洲人称其为“弗斯特战船”。他很可能亲自监督了很大一部分造船工作，精挑细选“来自欧亚所有海岸地区的经验丰富的水手、技术特别熟练的桨手、非熟练船员、舵手、三层桨战船船长、其他船只的船长和海军统领，以及各种类型的船员”^[5]。这支舰队的部分船只早在3月份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运兵，但直到4月初，舰队主力才在加里波利集结就绪。舰队司令是巴尔托格鲁，“一位伟人，是拥有丰富的海战经验而且技术娴熟的海军统领”^[6]。在奥斯曼军队的七次攻城战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带来一支舰队攻打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变革。

加里波利被誉为“信仰守护者的家园”^[7]，对奥斯曼军队来说是座充

满神奇魔力的城市，也是非常吉利的远征出发点。1354年，在一次带来好运的地震之后，奥斯曼军队在这座城市获得了在欧洲的第一个立足点。充满圣战热情和渴望征服的舰队从达达尼尔海峡起航，开始驶入马尔马拉海。据说，在出发时，船员们“高声呐喊，欢呼雀跃，吟唱祷文，呼喊互相鼓励”^[8]。事实上，这支舰队的欢呼声可能没有那么高昂，因为很大一部分桨手很可能是被强征来的基督徒。根据一位后世史学家的说法，“真主佑助的神风推着他们前进”^[9]，但真实情况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个季节刮的主要是北风，因此在马尔马拉海北上的航行既不顺风，也不顺水。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航道长达120英里，对桨帆船来说是一次缓慢而艰难的旅途。奥斯曼舰队到来的消息沿着航道不脛而走，激起了人们的震惊和恐慌。穆罕默德二世深知，和陆军一样，海军的优势兵力也具有心理上的优势。海面被密密麻麻的船桨和桅杆遮蔽的景象让两岸的希腊村民惶恐不已。旱鸭子更容易被这景象震撼，所以对奥斯曼舰船的数量所做的估计过于夸张；像贾科莫·特塔尔迪和尼科洛·巴尔巴罗这样有经验的基督徒航海家的估计就比较可靠。按照他们二人的说法，奥斯曼舰队约有12~18艘桨帆战船（三层桨和两层桨的战船混编）、70~80艘较小的弗斯特战船、约25艘重型运输驳船、一些轻型双桅帆船和小型传令船，总计约140艘大小船只。这支舰队浩浩荡荡地出现在西方海平线上，一定是幅宏伟的盛景。

在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很久之前，守军就得知了穆罕默德二世雄壮海军的情况，因此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精心制定自己的海军策略。4月2日，他们用铁链封闭了金角湾，为自己的船只建立了安全锚地，并有效地保护较弱的海墙。这种策略在君士坦丁堡的历史上曾多次运用。早在717年，拜占庭人就用一条铁链封锁了海峡，以阻挡攻城的穆斯林海军。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在4月6日，“我们让来自塔纳的三艘桨帆船和另外两艘狭长形桨帆船做好了战斗准备”^[10]，然后船员们在陆墙全线游行，以夸耀自己的兵力。4月9日，守军在港内所有可用的海军资源都得到了组织，准备就绪。他们的船只种类混杂，能够聚集到一起也是被

不同的动机驱使。在场的有来自意大利各城邦及其殖民地（威尼斯、热那亚、安科纳和克里特）的船只，还有1艘加泰罗尼亚船、1艘普罗旺斯船，以及10艘拜占庭船只。守军的桨帆船尺寸不一，有3艘“大型桨帆船”，这种船是意大利海上贸易的主要工具，比普通的桨帆战船慢，但是更为坚固，舷侧更高；还有两艘“狭长形桨帆船”，船体细长，出水高度很小。1453年4月初停泊在金角湾的大部分船只都是风帆商船——侧舷较高、以风为动力的“圆船”，也就是船尾及艉楼较高、坚固耐用而带有桅杆的克拉克帆船^[11]。理论上，这些船只都不是战船，但在当时的地中海，海盗活动猖獗，因此很多商船都配有武器，所以商船和战船的区别是很微妙的。这些克拉克帆船出水很高，甲板和桅杆瞭望台居高临下，因此如果配备武器和善战的士兵的话，对低矮的桨帆战船有天然优势。在海战史的这个时期，帆船常常能有效地自卫，打退最坚决的进攻。桨帆船才刚刚开始搭载火炮，口径很小，而且位置太低，很难对克拉克帆船构成威胁。直到50年后，威尼斯人才设计出能够装载在桨帆船上的大威力火炮。另外，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城市共和国的生存和繁荣完全依赖海上霸权）的水手精通所有航海问题，自信满怀。他们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于是在4月9日，他们把10艘最大的商船开到铁链前方，“队形紧密，船首向前”^[12]。巴尔巴罗对各艘船的尺寸和船长姓名都做了忠实的记载：热那亚人佐尔齐·多里亚的船是2500桶，还有一艘是600桶^[13]。他还记录了其中3艘的船名：来自甘地亚的“菲罗玛蒂”号和“古罗”号，以及来自热那亚的“加塔罗科萨”号。这些商船旁边部署着最坚固的桨帆船。这些船只“全副武装，秩序井然，似乎求战心切，全都非常优秀”^[14]，占据了从君士坦丁堡到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的整段铁链的距离。内港还有17艘配有横帆的商船和更多的桨帆船担任预备队，包括皇帝本人名下的5艘船（它们的武器可能已经被拆除，以便加强铁链处的防御）。还有几艘多余船只被凿沉，以防它们被炮火击中、蔓延火势。在队形密集的舰队中，水手们最怕的就是火。船长们对自己的防御措施

和航海技术非常自信，并且还在前滩部署了火炮作为额外的保障，于是在海上静候奥斯曼舰队的到来。守军可能总共有37艘船，敌人舰队则拥有140艘。从表面上看，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是意大利水手深通海战的精髓。操纵船只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活动，依赖于训练有素的船员，因此海战的结局并不由数量决定，而是更取决于经验、决心以及风向和海流带来的偶然运气。“我们看到自己拥有一支如此强大的舰队，感到非常自信，一定能打败异教徒土耳其人的舰队。”^[15]巴尔巴罗自鸣得意地如此写道，流露出威尼斯人对奥斯曼帝国航海技术一贯的低估。

4月12日下午1点左右，君士坦丁堡守军终于看到奥斯曼舰队顶着北风徐徐接近。海平线逐渐被桅杆遮蔽，海墙上一定挤满了争相观看的市民。奥斯曼舰队“坚定无比地”^[16]驶来，但看到基督教船只已经在铁链处摆开了阵势，就驶向了海峡的另一侧，在对岸排开队形。观看的拜占庭人听到“热切的呼喊声、响板和手鼓的奏乐。敌人用这些声音威慑我们的舰队和城内的人，让我们心生恐惧”^[17]，受到了极大震撼，城内气氛愈加阴郁。下午晚些时候，整个奥斯曼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上2英里，来到欧洲一侧海岸的一个小港（希腊人称之为“双柱港”，就是今天的多尔玛巴赫切宫所在地）。这支威武雄壮的庞大舰队无疑让意大利人也颇为沮丧，因为铁链处的船只全天在那里待命，一直到夜间，“等待了一个又一个钟头，以防敌人攻击我们的舰队”^[18]，但奥斯曼舰队没有发动进攻。一场消磨意志的猫鼠游戏拉开了帷幕。为了尽可能减小遭到突袭的风险，中立的加拉塔城的城墙上一直部署有两名哨兵，从那个有利地势可以紧密监视博斯普鲁斯海峡远方双柱港的奥斯曼舰队。哪怕是一艘奥斯曼船只在海峡中有所动静，马上会有人跑过加拉塔的道路，奔向金角湾，去向港口指挥官阿卢威克瑟·迪艾多报告。然后作战号角会被吹响，在船上待命的人立刻站起身来，准备战斗。他们就这么神经紧绷地日夜等待，他们的舰船在金角湾平静的水面上轻轻摇曳。

穆罕默德二世给他的新舰队下达了三个明确的任务：封锁城市、尝

试冲进金角湾、阻击任何有可能从马尔马拉海驶来的援救舰队。起初，巴尔托格鲁只是派遣巡逻船在城市周边水域游弋，目的是阻止船只进出城市在马尔马拉海那一边的两个小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另外一队奥斯曼船只满载着炮弹和其他弹药从黑海赶到。这些补给物资的运抵似乎让奥斯曼军营里展开了新一轮的忙碌。

穆罕默德二世急于加紧对君士坦丁堡的遏制，于是命令巴尔托格鲁尝试进攻铁链。如果奥斯曼军队能够冲进金角湾，君士坦丁十一世就将不得不从陆墙抽调宝贵的兵力去防守海岸。双方为这个时刻都小心翼翼地做了准备。穆罕默德二世对炮兵技术革新的胃口是无止境的。显然是在他的鼓动下，奥斯曼军队将小型火炮装上了他们的桨帆船。他们在桨帆船的作战平台上挤满了重步兵，并给船只配备了大量武器：石弹、羽箭、标枪和易燃物。加拉塔城墙上的瞭望员紧密地观察着这些准备工作，好让拜占庭舰队的指挥官卢卡斯·诺塔拉斯能有足够的时间为大型克拉克帆船和桨帆船配备人员和弹药。

大约在4月18日，也就是奥斯曼陆军向圣罗曼努斯门处的陆墙发动首次总攻的同时，巴尔托格鲁发动了奥斯曼新海军的第一次攻势。舰队从双柱港大举出动，绕过金角湾的尖端，快速向铁链推进。桨手们拼命划桨，向停泊在铁链前方的高大船只的战线冲去，奥斯曼水手们高声呐喊并发出战斗口号，以此互相激励。他们进入了弓箭射程之内，然后放慢速度，用弓箭和火炮向拜占庭舰队发出一轮齐射。石弹、金属炮弹和火箭呼啸着掠过海面，扫荡了拜占庭舰船的甲板。在最初一轮齐射之后，奥斯曼战船继续向停泊不动的敌舰冲去。两军相接时，奥斯曼军队努力按照常规战术强行登上敌船，展开近距离作战。他们投掷抓钩和梯子，企图爬上高大的敌船；他们还尝试砍断这些商船的锚缆。标枪和矛枪像冰雹一样飞向守军。奥斯曼海军的进攻固然非常凶猛，但优势还是在守军更为高大也更为坚固的克拉克帆船那边。奥斯曼桨帆船上的火炮发射的石弹太小，不足以损坏克拉克帆船结实的木制船体，而且奥斯曼

水手们是从低处向上仰攻的，就像从壕沟底部攀爬陆墙一样，非常吃亏。基督教船只上的水手和士兵可以从船首和船尾平台，以及更高的桅杆瞭望台上向下投掷武器。带有稳定翼的铁制标枪、羽箭和石块像大雨一样倾泻到努力攀爬船舷、毫无防护的敌人头上，“打伤很多人，还杀死了相当多的人”^[19]。商船的水手们接受过海上近距离作战的训练，而且配有相应的装备；他们早已准备好了水罐，随时可以扑灭火焰；桅杆上安装的简易吊车装置可以抛掷沉重的石块，将它们投向外壳脆弱的大群狭长桨帆船，“以这种方式给敌人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20]。争夺铁链的战斗非常激烈，但最终基督徒占了上风。他们成功地从侧翼包抄了奥斯曼桨帆船舰队。巴尔托格鲁害怕失败受辱，于是选择撤退，返回了双柱港。

第一轮海战的获胜者是拜占庭守军。他们对自己的船只了如指掌，而且深深懂得海战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船员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严阵以待的商船完全能够抵挡住一大群低矮的桨帆船的进攻。穆罕默德二世在海上运用火炮的希望也落空了。桨帆船的船体比较脆弱，只能安装小型火炮，而这些火炮对大帆船的坚固侧舷没有什么效力；而且火炮操纵的条件（火药很容易吸收海上的湿气，而且在颠簸的甲板上很难有效瞄准）更使得成功的概率大打折扣。到4月19日，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在陆路和海路都受到了挫折，而守军斗志不减。围城战越拖越久，这让穆罕默德二世越来越焦躁，而西方援救君士坦丁堡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成功的防御依赖于基督教欧洲的援助。战前的无数次外交活动都是为了向西欧哀求或者租借兵员与资源，以捍卫基督教世界。市民们每天都会向落日的方向眺望，期待能看到一支新的舰队——一群威尼斯或热那亚桨帆战船，带冲角的船首从马尔马拉海的波涛中出现，战鼓齐鸣，号角吹响，圣马可的雄狮旗或者热那亚的旌旗在带咸味的海风中招展。但大海上一直空荡荡的。

事实上，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完全被意大利各城邦错综复杂的内政所决定。早在1451年底，君士坦丁十一世就派遣使者到威尼斯，告诉他们，如果没有援助，君士坦丁堡必然陷落。威尼斯元老院对这一问题作了漫长讨论；热那亚人对此支吾搪塞；罗马教皇深表关切，但要求拜占庭人拿出教会联合确已完全执行的证据来。何况，没有威尼斯人的帮助，教皇也没有实际的资源来援助拜占庭。热那亚和威尼斯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紧盯着对方，却什么也没做。

君士坦丁十一世向西方求援是基于宗教上的考虑，这种思维是典型中世纪的；但他求援的对象却是被经济因素驱动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思维惊人地现代化。威尼斯人对拜占庭人支持还是反对东西方教会联合并不感兴趣，对保卫基督教信仰也没有兴趣。他们是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商人，忙于订立商业协定、保障自己航道的安全，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他们更担心海盗，而不肯为神学费脑筋；更关心商品，而不是宗教信条。他们的商人仔细研究可供买卖的商品（小麦、皮毛、奴隶、葡萄酒和黄金）的价格、桨帆船舰队人力的补给，以及地中海季风的模式。他们靠贸易和大海生存，依赖折扣、利润和现金。威尼斯指挥官和苏丹关系极其融洽，和埃迪尔内的贸易利润很高。另外，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之前的二十年里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威尼斯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利益。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1452年8月，少数元老甚至投票主张任凭君士坦丁堡自生自灭。第二年春天，威尼斯人得到报告，奥斯曼帝国控制了通往黑海的贸易航道，而且有威尼斯船只被击沉，他们才开始改变对拜占庭的冷漠态度。2月19日，元老院决定组建一支拥有2艘武装运输船和15艘桨帆船组成的舰队，于4月8日起航。这次远征的组织工作被托付给了艾尔维索·隆哥，并给了他谨慎的指示，其中有一条有益的命令：避免在海峡内与奥斯曼军队发生冲突。他最后于4月19日起航，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城墙首次遭到总攻的第二天。其他国家也做出了类似的缺乏

协调的救援努力。4月13日，热那亚共和国政府请求“在东方、黑海和叙利亚”^[21]的公民、商人和官员尽一切努力帮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摩里亚的君主德米特里。仅仅在5天之前，热那亚政府还在批准贷款为船只提供武装，以对抗威尼斯人。大约在同一时期，教皇写信给威尼斯元老院，表示希望从威尼斯租借5艘桨帆船去援救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在追讨债务方面永远是算盘打得很响，他们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请求，但是回信提醒教皇，教廷在1444年为了瓦尔纳的圣战（这场战役以失败告终）建造桨帆船而欠威尼斯的债务尚未还清。

但教皇尼古拉五世已经自费采取了一项果断措施。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深感忧虑，在3月份雇用了3艘热那亚商船，为其提供了粮食、人员和武器，派遣它们去援助君士坦丁堡。到4月初，这些船只已经抵达了安纳托利亚海岸之外的希俄斯岛（属于热那亚），但无法继续前进。让奥斯曼舰队步履艰难的北风把这些热那亚人困在希俄斯岛达两周之久。4月15日，风向转为南风，3艘商船再次起航了。到19日，它们抵达了达达尼尔海峡，与拜占庭帝国的一艘重型运输船一起继续前进。这艘运输船满载着拜占庭皇帝从西西里买来的粮食，船长是一个叫弗朗切斯科·利卡奈拉的意大利人。这4艘船在达达尼尔海峡北上，未受阻挡就经过了加里波利的奥斯曼海军基地，这是因为奥斯曼舰队已经全部开往双柱港。这4艘船很可能与几天前在金角湾铁链处抵抗奥斯曼海军的那些商船类似：舷侧很高的帆船，可能是克拉克帆船，奥斯曼史学家图尔松贝伊称其为柯克船^[22]。在南风的吹拂下，它们在马尔马拉海的前进速度很快，到4月20日早上，船员们已经看得清东方海平线上巍然屹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圆顶。

君士坦丁堡市民如痴似狂地坚持瞭望，等待援军抵达。大约上午10点，人们看到了这些船只，认清了船上飘扬的热那亚白底红十字旗。这个消息让市民们当即骚动起来。几乎就在同时，奥斯曼海军的巡逻船也发现了这些船只，把消息报告给正在马尔特佩的营帐内的穆罕默德二世。

他纵马狂奔到双柱港，向巴尔托格鲁发布了清楚而专断的命令。穆罕默德二世无疑是因为舰队在铁链处的挫折和陆军在陆墙下的失败而恼羞成怒，给指挥官和舰队发出了毫不含糊的命令：“将这些帆船俘虏，把船员带来见我，否则就不要活着回来。”^[23]奥斯曼桨帆船舰队紧急作了战斗准备，配备了满员的桨手，挤满了精锐士兵——重步兵、弓箭手和近卫军。轻型火炮再次被抬上战船，还有燃烧武器和“其他很多武器：圆盾和方盾、头盔、胸甲、投射武器、标枪、长矛，以及其他适合这种战斗的装备”^[24]。舰队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去迎战擅自闯入的热那亚船只。为了维持士气，他们必须胜利。但这第二次海战的战场在海峡中离城市更远处，博斯普鲁斯海峡反复无常的风向和当地的海流更加难以捉摸，对船只的要求也更严酷。热那亚商船顺风前进，奥斯曼舰队则是顶风，所以无法使用风帆，于是降下了船帆，在波浪汹涌的大海上划桨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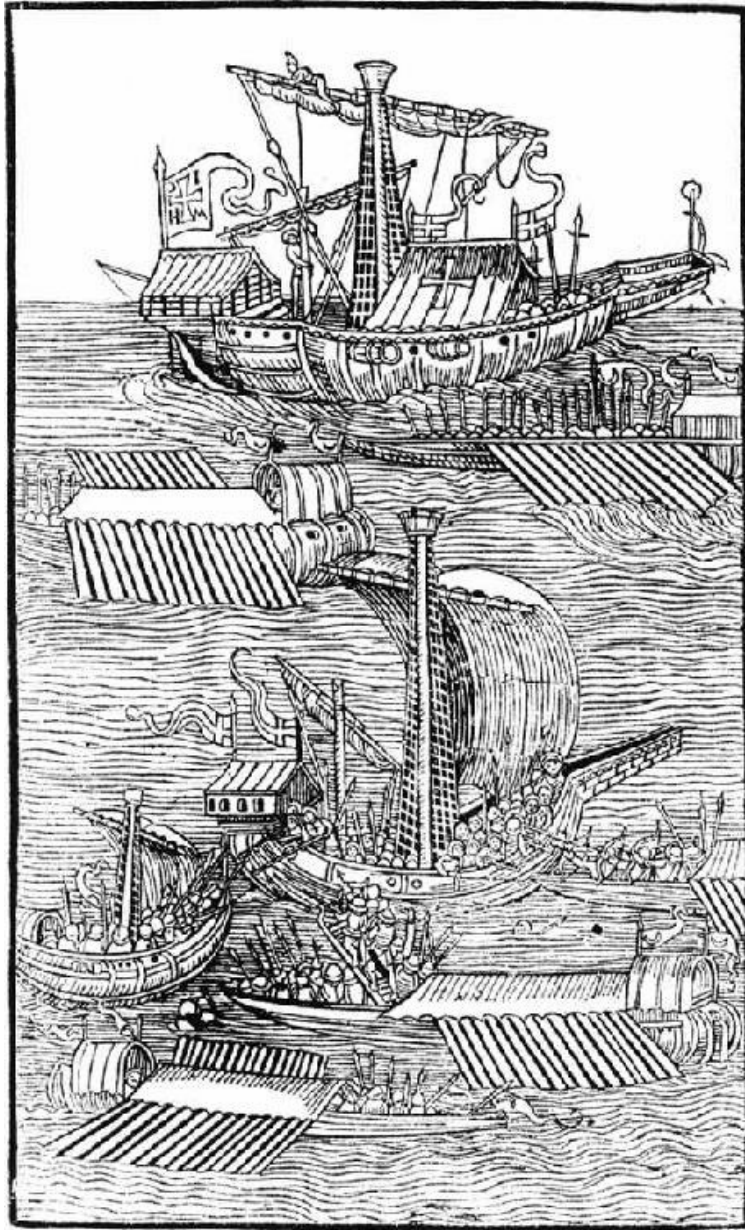
到下午早些时候，4艘救援船已经抵达城市东南方，稳步驶向德米特里大帝塔，那是君士坦丁堡卫城的一个显著地标。它们离海岸较远，准备掉转方向驶入金角湾入口。双方力量的巨大悬殊让巴尔托格鲁的部下“充满必胜的信心”^[25]。他们稳稳地接近，“敲响了响板，并向那4艘船高呼，快速划桨，就像渴望胜利的人一样”^[26]。奥斯曼桨帆船舰队接近对方时，鼓点和唢呐的乐声飘过了海面。100艘战船的桅杆和木桨汇聚在4艘商船周围，结局似乎是不难猜到的。市民们蜂拥到城墙上、屋顶上或者赛马场的斯芬多恩，以及其他能够俯瞰马尔马拉海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的高处。在金角湾的另一侧、加拉塔城墙的远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随员从一座小山上观看海战。巴尔托格鲁的三层桨战船逼近了最前方的热那亚商船，双方都紧张焦虑而又抱有希望地注视着。巴尔托格鲁从舰楼上专横地命令热那亚商船落帆。热那亚人置之不理，继续前进，于是巴尔托格鲁命令他的舰队向这些克拉克帆船猛烈开火。石弹从空中掠过；弩箭、标枪和火箭从四面八方射来，但热那亚人岿然不动。这一次，优势仍然在高大的帆船那边：“他们居高临下地作战，从桁端

和木制塔楼上射下箭矢、标枪和石块。”^[27]汹涌的浪涛使得桨帆船很难稳定地射击，也难以在克拉克帆船周围准确地运动。热那亚船只在南风劲吹下仍然在破涛斩浪地前进。战斗演变成一场运动战，奥斯曼战船在惊涛骇浪中努力接近对方，以便登船或者烧毁对方的船帆，而热那亚船只则从有城堞的舰楼上使用投射武器猛击敌人。

由高大帆船组成的小船队毫发未伤地抵达了卫城处，准备拐弯驶入安全的金角湾，这时灾难降临了。风突然停息了。船帆毫无生气地垂挂在桅杆上，城市已经近在咫尺，但这4艘船却无力继续前进，开始在金角湾开阔入口处诡异难测的反向海流上无助地漂浮，逐渐飘向加拉塔海岸——穆罕默德二世及其陆军就在那里观战。帆船一瞬间就丧失了优势，主动权转移到了划桨船那一边。巴尔托格鲁聚拢了他较大的战船去包围热那亚商船，再次用投射武器猛击它们，但效果并没有改进多少。奥斯曼桨帆船上的火炮口径太小，安放位置也太低，无法损伤对方的船体，也不能摧毁对方的桅杆。基督徒船员们能够用成桶的水将船上的火焰扑灭。巴尔托格鲁看到猛烈火力也没有奏效，于是“声如洪钟地呼喊”^[28]，命令舰队逼近敌人，强行登船。

成群的桨帆船和长船将笨重而丧失行动力的克拉克帆船团团围住。大海上，桅杆和船体纠缠成乱糟糟的一团，按照史学家杜卡斯的说法，“看上去有如陆地”^[29]。巴尔托格鲁的三层桨战船的船首撞上了4艘基督教船只中最大但武装最弱的那艘——拜占庭帝国的重型运粮桨帆船。奥斯曼步兵从登船桥梁上蜂拥而去，用抓钩和梯子拼命努力接舷，用斧子砍对方的船体，或者努力用火把将其烧毁。有些士兵沿着锚缆和绳索爬了上去；其他人向木制壁垒投掷长矛和标枪。战斗在近距离演变成了一场残酷的肉搏战。基督教船员穿着优质铠甲，从高处用棍棒猛击爬上船舷的进攻者的脑袋，用短弯刀砍断爬船的敌人的手指，向下方拥挤的人群投掷标枪、长矛、长枪和石头。他们从居高临下的桁端和桅杆瞭望台上“用可怕的投石机向下轰击，石头像雨点般坠落到队形密集的

土耳其舰队头顶上”^[30]。弩手小心瞄准，将选定的目标一一杀死；船员们用起重机将沉重的石块和水桶升起，然后砸向敌人长船的薄弱船体，将很多敌船打伤或击沉。各种嘈杂声混成一团：呼喊和嚎哭声、大炮的轰鸣声、身着铠甲的人身体后仰落水溅起的波浪声、船桨断裂声、石头撞击木头的破裂声、钢铁撞击声、箭雨的呼啸声（箭矢降落如此之快，以至于“无法把桨插进水里”^[31]）、刀剑砍刺人肉的声音、火焰爆裂声，以及伤者的痛苦哀鸣。“四面八方尽是呼喊和混乱，士兵们互相激励，”克利托布罗斯记载道，“人们砍杀敌人，也被敌人砍杀；屠戮他人，也被他人屠戮；互相推搡、咒骂、威胁和呻吟。这噪音可怕极了。”^[32]



奥斯曼帝国桨帆船攻击基督教帆船

一连两个小时，奥斯曼舰队与无比顽强的对手激烈搏斗着。莱奥纳德大主教不情愿地承认，奥斯曼士兵和水手们打得非常勇敢，而且充满激情，“像魔鬼一样”^[33]。渐渐地，虽然奥斯曼人损失很重，但他们毕竟兵多将广，开始占了上风。1艘基督教船只被5艘三层桨战船包围，还有一艘被30艘长船团团围住，第三艘则被40艘满载士兵的驳船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像一大群蚂蚁在围攻一只巨大的甲虫。一艘奥斯曼长船因为船

员精疲力竭而后撤，或者被击沉，披甲的士兵被海流卷走，或者紧紧抓住船柱，同时更多的战船补充上来，撕咬对手。巴尔托格鲁的三层桨战船顽强地死咬着最大但武装最弱的拜占庭运输船，后者“英勇地自卫，船长弗朗切斯科·利卡奈拉跑来援助”^[34]。但热那亚船长们渐渐认识到，如果短期内得不到援救，那艘运输船就完了。他们用操演过的战术设法将自己的船只靠到运输船侧面，并用缆绳将4艘船连接在一起，于是（按照某位观察者的说法）它们就像4座塔楼一样在黑压压一大群奥斯曼战船之间巍然屹立。海面上拥挤的船只如此之多，甚至“几乎看不见海水”^[35]。

蜂拥在城墙上和铁链后方、金角湾港内船只上的人们只能无助地观看，只见4艘基督教船只在卫城脚下缓缓地漂向加拉塔海岸。随着海战的战场越来越近，穆罕默德二世策马跑到前滩，激动万分地向英勇奋战的士兵们发出命令、威胁和鼓励，然后催马走进浅水，希望亲自指挥战斗。巴尔托格鲁已经能听得见苏丹呼喊出的命令，但对其置之不理。暮色降临了。战斗已经持续了三个钟头。奥斯曼舰队看来必胜无疑，因为“他们轮流上前战斗，不断接替战友，生力部队取代伤亡者的位置”^[36]。基督徒的投射武器迟早要耗尽，他们的力气迟早要用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瞬间又扭转了战局，基督徒认为唯一的解释是上帝伸出了援手。南风又刮了起来！4艘克拉克帆船的巨大方形帆慢慢被吹动起来，逐渐饱满，船只在不可阻挡的劲风吹动下开始一起向前运动。它们逐渐加速，冲破了脆弱的桨帆船组成的包围圈，向金角湾入口冲去。穆罕默德二世向他的指挥官和战船大声诅咒，“狂怒之中撕坏了自己的衣服”^[37]，但此时夜色已经降临，要追击敌人已经太晚了。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的穆罕默德二世只得命令舰队返回双柱港。

在没有月光的黑暗夜色中，两艘威尼斯桨帆船从铁链后方驶出，每艘船上吹响了两三次号角，船员们则高声呐喊，以欺骗敌人，让他们以为“至少20艘桨帆船”^[38]正在前来迎战，不敢继续追击。在教堂钟声和市

民们的欢呼声中，这两艘桨帆船把帆船拖进了港内。穆罕默德二世“目瞪口呆。他一言不发，狠狠抽动马鞭，狂奔离去”^[39]。

^[1] quoted Guilmartin, John F., *Galleons and Galleys*, London, 2002, p.22

^[2] 让·傅华萨（1333? ~1400/1401），法兰西诗人和宫廷史官。他作为学者四处游历，生活在若干欧洲宫廷的达官显贵之中。他的《闻见录》是叙述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佛兰德、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大事。《闻见录》是封建时代最重要和最详尽的文献材料，也是对当时骑士与宫廷生活的真实记述。他也写谣曲、回旋诗和寓言诗，赞颂典雅的爱情。

^[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8

^[4]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8

^[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8

^[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43

^[7]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p.256

^[8]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39

^[9]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p.256

^[10]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19

^[11] 克拉克帆船是15世纪盛行于地中海的一种三桅或四桅帆船。它的特征是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大斜桅。克拉克帆船体型较大，稳定性好，是欧洲史上第一种可用作远洋航行的船只。

^[12]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29

[13] 古时常用船只能够容纳木桶的数量来衡量船的尺寸，类似于今天说某船能够搭载多少个集装箱。

[1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0

[15]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0

[16]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1

[17]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5

[18]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2

[19]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1

[20]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1

[21]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lxxxvi

[22] 柯克船是10世纪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种单桅帆船，汉萨同盟在北欧的海上贸易中大量使用这种船只。

[2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3

[24]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3

[2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3

- [26]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3
- [27]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3
- [28]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3
- [29]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69
- [30]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30
- [31]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69
- [32]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4
- [33]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21
- [3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40
- [35]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33
- [3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4
- [37]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22
- [38]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4
- [39]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5

10.鲜血的螺旋

1453年4月20～28日



战争就是欺骗。[\[1\]](#)

——先知穆罕默德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战产生了深远的直接影响。短短几个钟头就猛烈地逆转了整个战役的局面，出人意料地让守军重新获得了心理优势。春季的大海如同巨大的礼堂，公开展示了奥斯曼舰队的战败之耻，城墙上人头攒动的希腊人和金角湾对岸的奥斯曼陆军右翼及穆罕默德二世本人都目睹了这一场景。

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庞大的奥斯曼舰队出现在海峡的时候虽然对基督徒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但在航海技术上无法与西方人相提并论。西方人凭借优越的技术和装备、桨帆战船内在的缺陷以及很好的运气赢得了这场海战。奥斯曼帝国未能牢牢地占有制海权，不管苏丹的大炮在陆墙处能够取得什么战果，攻城战都将举步维艰。

城内的情绪突然间又高涨起来：“苏丹的野心遭到了挫折，他那威名远播的力量遭到削弱，因为他的这么多三层桨战船甚至无法俘虜一艘

船。”^[2]新来的4艘船不仅带来了急需的粮食、武器和兵员，也给守军带来了宝贵的希望。这支小舰队说不定只是一支更强大的救援舰队的前驱。如果4艘船就能抗衡奥斯曼海军，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十几艘装备精良的桨帆船或许就能决定战局？“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重新点燃了他们胸中的希望，给他们带来了鼓舞和非常乐观的情绪，他们对未来有了美好憧憬。”^[3]在这场弥漫着宗教狂热的冲突中，这种事件绝不仅仅是人和物资的较量，或者偶然的风向变化，它们被认为是上帝伸出援手的明证。“他们向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祷告，但徒劳无益，”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写道，“而我们的永恒上帝却听到了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祈祷，所以我们才赢得了这场战斗。”^[4]

大约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十一世可能是受到这场胜利的鼓舞，或者是因为打败了奥斯曼军队的早期陆路进攻，感到求和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可能提议向奥斯曼帝国纳贡，给穆罕默德二世一个台阶下，好让他能够体面地撤军；求和的建议可能是通过哈利勒帕夏发出的。在攻城战中，进攻者和防御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君士坦丁十一世完全清楚，城外的穆斯林军营陷入了一种危机情绪。自战役开始以来，奥斯曼人第一次开始表示严重的疑虑。君士坦丁堡依旧岿然不动，是一块“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就像十字军建造的城堡一样。对于有伊斯兰信仰的战士们来说，这座城市不仅是个军事难题，也是个心理障碍。他们原本对战胜异教徒、扭转历史大潮信心十足，因为他们拥有技术和文化上的优势，但现在这信心突然间脆弱起来，人们又回忆起了八个世纪以前先知的旗手艾优卜（Ayyub）在城墙下阵亡的故事。“这个事件，”奥斯曼史官图尔松贝伊写道，“在穆斯林队伍中产生了绝望和混乱.....军心大乱。”^[5]

对奥斯曼人圣战事业的自信心而言，这是个关键时刻。在4月20日晚上，从务实的角度来看，漫长围城的惨淡前景似乎触手可及，而随之而来的将是后勤困难和士气低落、疾病流行（这对中世纪的攻城军队来

说始终是个大灾难），以及士兵们开小差的可能性。这对穆罕默德二世的个人权威也是个明白无误的威胁。近卫军已经处在公开叛乱的边缘。与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不同，穆罕默德二世从来没有赢得过常备军的爱戴。近卫军此前曾两次反叛暴躁任性的年轻苏丹，这一点并没有被人们淡忘，首席大臣哈利勒帕夏记得尤其清楚。

那天晚上，穆罕默德二世接到了他的精神导师和奥斯曼军营中的主要宗教领袖——谢赫阿克谢姆赛丁的一封信，信里集中体现了当前的严重局势。它描绘了军队的情绪，并提出了警告：

此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痛苦，沉重地打击了士气。机遇没把握住，导致了一些负面的发展：首先.....异教徒欣喜若狂，大肆喧哗地夸耀；其次，有人认为，陛下在发号施令中判断失误，能力欠缺.....陛下需要进行严厉处罚.....如果不即刻施加严惩.....需要填平壕沟、最后总攻命令发出之时，部队就不会竭尽全力。^[6]

谢赫还指出，这次失败很可能会打击士兵们的宗教信仰。“有人指责说，我的祷告都失败了，”他继续说道，“还有人说，我的预言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陛下必须对此善加处置，免得最终我们不得不满面羞耻、灰心丧气地撤退。”^[7]

在此鞭策下，穆罕默德二世于次日（4月21日）清晨“率领1万骑兵”^[8]，从位于马尔特佩的军营出发，前往双柱港，他的舰队就停泊在那里。巴尔托格鲁被召唤到岸上，为这次惨败做出解释。在前一天的激战中，这位不幸的海军司令一只眼睛被己方士兵投掷的石块严重击伤；他匍匐在苏丹面前的时候，一定是魂不附体。根据一位基督徒史学家的生动描述，穆罕默德二世“从内心深处发出呻吟，怒火中烧，气得七窍生烟”^[9]。他暴跳如雷地质问，为什么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没能俘虏敌船：“如果你连这几艘船都对付不了，怎么能消灭君士坦丁堡港内的舰队？”^[10]海军司令回答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俘虏基督教船只。“陛下明察，”他为自己辩护道，“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我的桨帆船的冲

角一直死死咬住拜占庭皇帝船只的舰楼。我一直浴血奋战，大家都很清楚，我的很多部下都阵亡了，其他桨帆船上也损失了很多。”^[11]穆罕默德二世怒火中烧又心烦意乱，命令将海军司令钉死在尖木桩上。群臣大为震惊，匍匐在穆罕默德二世面前，替巴尔托格鲁求情，说他确实是勇敢地死战到底，眼睛负伤就是努力奋战的明证。穆罕默德二世发了慈悲。死刑被撤销；作为惩罚，巴尔托格鲁在舰队和骑兵部队目睹下接受了100下鞭笞。他的官衔和财产全被剥夺，财产被分给近卫军。穆罕默德二世深知这种决策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宣传价值。巴尔托格鲁从此消失在了茫茫史海中，海军司令的苦差事被重新交给了哈姆扎贝伊，他在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治下曾担任海军司令。目睹巴尔托格鲁受辱的士兵和水手们，以及苏丹身边的维齐尔和谋臣们都得到了一个深刻教训。他们对苏丹不悦的可怕后果有了第一手的观察。

关于这个事件，还有一个不同版本，是希腊史学家杜卡斯记载下来的。他讲述的关于攻城战的故事非常生动有趣，但常常令人难以置信。根据他的版本，穆罕默德二世命人将巴尔托格鲁按在地上，他亲自用“重达5磅的金棒（这位暴君命人制作了这根金棒，专门用来打人）”^[12]抽打了巴尔托格鲁100下。然后，一个希望获得苏丹宠信的近卫军士兵用石块狠砸巴尔托格鲁的头部，并挖出了他的眼睛。这个故事很生动，但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不过它反映了西方人对穆罕默德二世的普遍看法：东方暴君、富裕的野蛮人、虐待狂，并且有一支奴隶大军对他绝对服从。

穆罕默德二世严惩了海军司令，以儆效尤之后，立即召集近臣，对君士坦丁十一世前一天提出的议和请求进行讨论。这许多事件发生得如此之快，已经互相交叠，对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经历重大挫折和首次异议与骚动之后，苏丹面临的问题很简单：是继续打下去，还是寻求以有利条件媾和。

在奥斯曼帝国最高层有两个派系，长期以来一直在苏丹反复无常的统治下为了生存和争夺权力而斗争。其中一派是首席大臣哈利勒帕夏，他是纯血统土耳其人和奥斯曼帝国传统统治阶级的成员，在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治下就担任过维齐尔，并在年轻的苏丹动荡的早期统治中对他进行了引导。哈利勒帕夏亲身经历了15世纪40年代的危机岁月和近卫军在埃迪尔内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反叛。他深知，假如穆罕默德二世在希腊人的城墙下失败受辱，生存的机会将颇为堪忧，因此他非常谨慎。在整个战役期间，哈利勒的战略一直受到政敌的破坏。他们称他为“异教徒的朋友”^[13]，并指控他接受了希腊人的贿赂。

另外一派是奥斯曼帝国的暴发户：一群野心勃勃的军事领袖，他们大多是外来者，即来自不断开疆拓土的帝国的五湖四海的新穆斯林。他们一向反对任何和平政策，并鼓励穆罕默德二世去梦想征服世界。他们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与攻克君士坦丁堡息息相关。他们中领头的是第二维齐尔——扎甘帕夏，他是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希腊人，“最令人生畏，影响力和权威也最大”，并且他还是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官。这个派别得到了宗教领袖和圣战宣扬者，比如学识渊博的伊斯兰学者乌理玛艾哈迈德·古拉尼（穆罕默德二世的严厉教师）和谢赫阿克谢姆赛丁的坚决支持，这些人代表了伊斯兰世界长久以来占领这座基督教城市的狂热梦想。

哈利勒提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以有利的条件体面地撤军。他指出，海战的失利已经揭示了攻城的困难；如果战役继续拖下去，匈牙利军队或者意大利舰队前来救援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他表示自己坚信红苹果注定有一天会落入苏丹手中，“就像成熟的果实从树上掉落”^[14]，但红苹果尚未成熟。如果他们对拜占庭强加一个条件苛刻的惩罚性和约，胜利的一天就会来得更快。他提议向拜占庭皇帝索要每年7万杜卡特的天价贡金，作为撤军的条件。

主战派坚决反对议和。扎甘回答说，必须加倍努力，坚持打下去；热那亚船只的到来只是突出了对敌人施以决定性打击的必要性。现在是关键时刻。奥斯曼帝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但争论的激烈性也反映出，领头的维齐尔们深知，争夺在苏丹面前的影响力，最终也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穆罕默德二世端坐在宝座上，观察着群臣为谋求晋身而互相争斗，但他的天性一直是个主战派。这次会议上以明显多数决定继续打下去。他们向君士坦丁十一世发去了回复：只有立即献城投降，和平才可能降临；苏丹将会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割让给君士坦丁十一世，并补偿半岛目前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两个兄弟。苏丹刻意提出了一个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君士坦丁十一世很自然地拒绝了这个条件，因为他深明自己的历史责任，必须把父皇的衣钵延续下去。1397年，奥斯曼军队兵临城下时，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曾喃喃地说：“我主耶稣基督，不要让众多基督徒听到，在曼努埃尔皇帝统治的时期，君士坦丁堡以及城内的基督教信仰的神圣与可敬之物被拱手交给异教徒。”^[15]君士坦丁十一世要秉承父亲的精神，死战到底。于是战役继续进行，奥斯曼主战派感到压力巨大，于是决心加紧攻城。

3英里之外，奥斯曼军队继续攻打城市，执行了一个秘密的综合进攻计划，计划的内情只有穆罕默德二世及其将领知晓。从前一天开始，奥斯曼军队开始大规模炮击，一刻不停地轰击了一整夜，持续到苏丹作战会议的那天。炮火主要集中在里卡斯河谷内圣罗曼努斯门附近的城墙上，也就是攻防双方都知道的城墙最薄弱的地段。

在持续炮火之下，一座主塔——巴克塔提尼安塔楼轰然倒塌，好几码宽的外墙也随之坍塌。城墙上一下子打开了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守军骤然暴露了。“城内和舰队上的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尼科洛·巴尔巴罗记载道，“我们丝毫没有怀疑，他们想立刻发动全面总攻；所有人都相信，戴头巾的土耳其人很快就会冲进城。”^[16]在足够的火力集中到一个

点上之后，哪怕是看上去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也会在奥斯曼军队的炮口下快速瓦解，这严重地挫伤了守军的士气。“有很长一段城墙被炮火打坏，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完蛋了，因为敌人在区区几天内就摧毁了这么长的城墙。”^[17]从大缺口向外张望的守军清楚地明白，哪怕“只有1万人”^[18]从这个地段发动集中攻势，城市也必然会陷落。他们在等待不可避免的浩劫，但此时穆罕默德二世和全部高级将领正在双柱港商讨是否继续作战，所以没有发布进攻的命令。基督教守军派系众多，防御作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的主动性；而奥斯曼军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只有在接到了中央的指令之后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奥斯曼军队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利用和扩大炮击的战果，守军得到了重新排兵布阵的时间。

在夜色掩护下，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部下开始对损坏的城墙进行紧急抢修。“他们用装满石块和泥土的木桶修补城墙，在城墙后方开挖了一条非常宽的壕沟，壕沟的一端建有石坝，石坝上覆盖着葡萄藤和多层枝叶，并用水浸透，让它们变得像城墙一样坚硬。”^[19]这道用木头、泥土和石块堆积而成的壁垒仍然非常有效，能够让巨型石弹的威力大打折扣。守军的这些抢修是在敌人的持续火力之下进行的，敌人的“巨炮和其他火炮，以及很多火枪、不计其数的弩弓和很多手枪一刻不停地射击着”^[20]。巴尔巴罗在对这一天战事的记载的结尾处描绘了敌人的恐怖形象。大群装束颇具异国情调的敌人蜂拥而上，让这位随船医生心生恐惧：城墙前的地面“根本看不见，因为完全被土耳其人遮盖住了，尤其是近卫军，他们是苏丹麾下最勇敢的士兵，还有苏丹的很多奴隶，他们戴的是白色头巾，而普通土耳其人戴的是红色头巾”^[21]。但敌人没有再进攻。显然，在这一天，君士坦丁堡凭借好运气，以及“我们大慈大悲的救主耶稣基督”^[22]的保佑，躲过了噩运。

4月21日的战局发展极其迅速和错综复杂，似乎双方都意识到，一个关键时刻来临了。守军持续地采取措施应对敌人的进攻；他们没有兵力可供出击，只能从古老城墙组成的三角之内观察敌情，把希望寄托在

防御工事的坚固上。他们等待敌人的进攻，匆匆地应付每一个危机，堵塞防线上的缺口，同时还在互相争吵。他们有时听到敌人即将总攻的传闻，就灰心丧气；有时听说援军即将抵达，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如此周而复始。他们一刻不停地拼命努力去守住防线，并遥望西方的海平线，寻找船帆的迹象。

近几天的事件似乎让穆罕默德二世愈发焦躁，疯狂地大肆活动。海军的战败、对西方援军的畏惧和部队的悲观情绪，他在21日这一天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困扰。他在城市外围焦躁不安地转来转去，从金红两色营帐到双柱港，又前去视察加拉塔以北的奥斯曼部队，亲自进行实地考察，研究问题，从不同角度观察“红苹果”，脑子里运筹帷幄。他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从幼年时他从远方眺望这座城市，一直到1452年冬天在阿德里安堡^[23]街道上辗转徘徊，他一向对君士坦丁堡痴迷不已，所以专心研究了关于攻城战的西方著作，对地形进行了初步勘察，还绘制了城墙的详细地图。穆罕默德二世为了占领这座城市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耻下问、搜集资源、招募技术人才、讯问间谍、积攒信息。他将对君士坦丁堡的痴迷深藏起来（在奥斯曼宫廷的危险世界里，他在少年时期就学会了保守秘密），自己的计划在没成熟之前绝不会示人。据说，曾有人询问穆罕默德二世关于未来一场战役的情况，他不肯直接回答，而是说：“请君谨记，假如我的一根胡须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就会把它拔下来，丢进火焰。”^[24]他下一步将如何行动，也是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

他推断，主要问题在于保护金角湾的铁链。它的存在使得苏丹的海军无法从三角形的这一边对城市施压，因此守军可以节约兵力，集中力量防守陆墙，奥斯曼军队的巨大兵力优势因此大打折扣。当初在科林斯地峡，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在一周之内就摧毁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护墙。虽然此时大炮已经在古老的狄奥多西城墙上打开了一些缺口，但进度比他预想的慢得多。从外界看，城墙系统过于复杂、层次太多，壕沟也太

深，很难速战速决。另外，朱斯蒂尼亚尼是个天才的战略家。他极其高效地调动了有限的人力和物资：石墙被打破，土墙却岿然不动，防线坚守了下来。

被封闭起来的金角湾为可能抵达的基督教救援舰队提供了安全的锚地，并为基督教海军的反击提供了基地。金角湾还导致穆罕默德二世的各支陆军部队与海军之间的交通线大为延长，部队要从陆墙前往双柱港就不得不走很远的路，以便绕过金角湾的顶部。铁链的问题非解决不可。

没人知道穆罕默德二世的妙计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酝酿了多久，但在4月21日，他提出了加快解决铁链问题的方案。他推断，如果无法强行突破铁链，就必须绕过它；要绕过它，就必须从陆路把舰队运走，让它在铁链防线的内部进入金角湾。当时的基督教史学家对这个策略的来源有着自己的解释。莱奥纳德大主教确信，这又是背信弃义的欧洲人给苏丹出谋划策，并用他们的技术帮助苏丹；给穆罕默德二世献计的是“一个毫无信义的基督徒。我相信，那个人是从威尼斯人在加尔达湖的策略中学到了这个把戏，并将它传授给土耳其人”^[25]。早在1439年，威尼斯人就从陆路将若干桨帆船从阿迪杰河搬运到了加尔达湖，但中世纪的战史中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穆罕默德二世非常热衷于钻研军事史。在12世纪，萨拉丁曾将桨帆船从尼罗河运到红海；1424年，马穆鲁克^[26]军队把桨帆船从开罗运到了苏伊士。不管穆罕默德二世是从哪里得到这条良策的，其计划显然在21日前就已经开始执行；战事的不利迫使他加紧实施这项计划。

穆罕默德二世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他感到，必须对金角湾对岸加拉塔城的热那亚殖民地施压。加拉塔在这场战役中暧昧的中立让攻守双方都颇为不满。在战前，加拉塔和君士坦丁堡及奥斯曼人都有贸易往来，生意兴隆。在此期间，它在两大势力之间起到了渠道的作用，物资

和情报都通过加拉塔来往穿梭。有谣言说，加拉塔市民白天在奥斯曼军营里公开活动，为其提供冷却大炮所需的油料，以及其他有利可图的货物；夜间则溜过金角湾，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站岗放哨。铁链的一端固定在加拉塔城墙内，奥斯曼人无法直接对付，因为穆罕默德二世不愿意与热那亚撕破脸皮。他深知，假如与加拉塔发生直接的冲突，热那亚城就可能会派来一支强大的舰队。同时，他也认识到，加拉塔市民当然会同情基督徒。朱斯蒂尼亚尼就是个热那亚人。前来支援的热那亚船只或许也打破了加拉塔人的暧昧态度。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记载道：“此前加拉塔人非常小心谨慎……但他们现在却急于提供武器和兵员，但只能是秘密提供，以防对他们假装友好的奥斯曼人发现。”^[27]热那亚人的脚踩两只船意味着，信息在拜占庭与奥斯曼人之间的传递并不是单向的，这将很快产生悲剧性后果。

加拉塔城外原先遍布葡萄园和灌木丛，这一地域已经完全被扎甘帕夏指挥的奥斯曼部队占领。苏丹可能在攻城战的早期就做出了决定，要修建一条道路，具体走向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靠近双柱港的某个点出发，沿着一座陡峭的山谷爬升，来到加拉塔城外的一座山岭，然后从另一座山谷下降，来到热那亚殖民地之外金角湾沿岸一个叫作泉源谷的地方，那里处于加拉塔城墙之外，设有热那亚人的墓地。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就用这条道路来搬运船只。这条道路的制高点大约有海拔200英尺，对搬运船只的工作来说将是个严峻的挑战。但穆罕默德二世有的是人力。他素来高瞻远瞩，而且口风很严，早就为这个行动收集了物资：用来修建简易轨道的木材、用来承载船只的滚轴和支架、成桶的油脂和大量公牛与劳工。奥斯曼人先把这一地域的灌木丛清除干净，并尽可能将地面铲平。4月21日，搬运舰队的工作开始加速进行。成群劳工将木制轨道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铺向山谷，预备好滚轴并涂抹了油脂，还建造了支架，用来将船只抬出水面。为了转移守军的注意力，穆罕默德二世把一个连的大炮调到了加拉塔城以北不远处的一座山上，然后命令扎甘轰击保卫金角湾的基督教船只。

守军能够从加拉塔这个渠道或者奥斯曼军营内的基督徒士兵那里得到情报，却未能发现敌人在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工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早先，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可能认为奥斯曼军队是在做简单的修路工作。后来，他们要么是被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无法严密观察；要么（按照威尼斯人的说法）他们与奥斯曼人暗地勾结。穆罕默德二世很可能也明令确保他的基督徒士兵不得参加此项工程。不管真相如何，君士坦丁堡守军对敌人的新动向一无所知。

4月22日（星期日）清晨，奥斯曼人的炮火仍在咆哮，基督徒们前往教堂去做礼拜。第一具支架被放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中。奥斯曼人将一艘轻型弗斯特战船放入支架，然后借助滑轮将它搬到轨道之上的木制滚轴上，滚轴事先已经用油脂做了润滑。始终亲临一线的苏丹在那里观看和鼓励士兵们的努力。“滚轴上已经捆绑了绳索，他将长长绳索的另一端固定在战船的边角上，命令士兵们去拖曳。有的人直接用手拽拉，有的人借助某种绞车和绞盘装置。”^[28]成群的公牛和劳工将战船拖上了斜坡，同时两侧还有更多的工人和士兵扶着战船。战船在轨道上前进一段距离之后，劳工们在它前方铺设更多轨道。在大量人力畜力资源的支持下，战船在陡峭的斜坡上缓缓前进，走向200英尺之上的山岭。

海上吹来了怡人的晨风，穆罕默德二世灵机一动，命令正在被搬运的各艘战船的基本人员登船。“有些人高呼着升起船帆，就好像他们要扬帆远航一样。海风把船帆吹得鼓鼓涨涨的。还有的人坐在桨位上，手里抓着船桨，前后划动，就好像真的在划船一样。指挥官们在桅杆基座旁跑来跑去，吹着口哨，大呼小叫，向桨手们挥动皮鞭，命令他们划船。”^[29]船上五颜六色的旌旗迎风招展，战鼓擂响，小型乐队在船首上吹响喇叭。这是一幅即兴表演的狂欢景象，非常离奇和梦幻：旗帜飘扬、乐队大吹大擂、船桨划动、船帆在清晨的清风中鼓动、牛群低吼着使劲。土耳其人在战争中期做出的这个姿态给对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这个故事也将成为土耳其民族征服神话的重要元素。“这景象非同

寻常，”克利托布罗斯记载道，“除非亲眼所见，没人会相信。战船被运过陆地，就像在海上航行一样，船员和全部装备都在船上，船帆也张挂了起来。”^[30]在附近的高地上，扎甘帕夏继续炮击下方的港口。2英里之外，大炮在轰击圣罗曼努斯门处的陆墙。

第一艘被搬运的战船从山岭顶端开始艰难地向下运动，前往泉源谷。特别注重细节的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把第二个炮兵连调到岸边，以防止船只入水时遭到攻击。离正午还有一段时间，第一艘船水花四溅地进入了金角湾的平静水域，船员已经做好了抵挡突袭的准备。其他战船很快也陆续入水。当天一共有约70艘船接二连三地在泉源谷附近入水。这些船都是弗斯特战船，也就是快速的轻型两层或三层桨战船，“配备15~20个，甚至22个桨位”^[31]，船身长度在70英尺左右。尺寸更大的桨帆船则留在双柱港海域。

此次行动的所有微妙细节（时间安排、路线以及动用的技术）仍然神秘莫测。事实上，要在24小时内完成整个工程，可能性是极小的。从人体工程学角度来看，搬运距离至少有1.25英里，斜坡角度为8°，要先上坡，然后再稳妥地下坡，哪怕有大量人力畜力以及绞车的帮助，也肯定需要长得多的时间。奥斯曼人很可能在4月22日之前很久就把大型船只拆解，然后在靠近金角湾的地方重建起来，其他船只的搬运也肯定早就开始了。穆罕默德二世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把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刻是很符合他秉性的，但所有的史学家都同意，在4月22日早上，战船接二连三地进入了金角湾。整个行动在战略和心理上都是了不起的杰作，筹划巧妙，执行有力。甚至后世的希腊史学家也不情愿地予以称赞。“这是一项丰功伟绩，也是杰出的海战策略。”^[32]梅里西诺斯如此写道。这将给守军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加拉塔和金角湾：双柱港位于右上方，泉源谷位于左侧风车下方

由于金角湾沿岸的海墙得到了铁链的保护，而且陆墙承受了极大压力，所以海墙上几乎没有守军。肯定很少有基督徒士兵亲眼看到第一艘敌船从对面山上出现，然后下坡入水。他们发现这个新变化之后，恐慌很快不脛而走。人们从陡峭的街道上跑来，在城墙上战战兢兢地看着奥斯曼舰队陆续进入金角湾。这是奥斯曼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战败之后在战略和心理上做出的巧妙还击。

君士坦丁十一世立刻就认识到，这对他那已经承受了极大压力的部队意味着什么。“现在金角湾沿岸海墙也处于前线，他们不得不派兵驻

守，并从其他防区抽调兵力去那里。从城墙其他地段抽调兵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些地段现有的兵力已经屈指可数，无法有效地防守。”^[33]作为海战指挥官的威尼斯人同样忧心忡忡。这条封闭的海峡只有几百码宽，奥斯曼舰队就在不到1英里之外；金角湾曾经是躲避敌人的避难所，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没有喘息之地的狭窄杀戮场。

我们舰队的船员们看到那些弗斯特战船时无疑非常害怕，因为他们确信这些敌舰当晚就会联合在双柱港的舰队，内外夹击地攻打我们的舰队。我方舰队在铁链之内，土耳其舰队在铁链内外都有战船，所以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极大的。我们还担心敌人发动火攻，烧毁在铁链处的我方船只。我们被迫在海上昼夜守备，对土耳其人万分畏惧。^[34]

守军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消灭金角湾内的敌人舰队。第二天，威尼斯市政官和皇帝携手在威尼斯人的圣马利亚教堂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心“烧毁敌人舰队”^[35]。这次会议只有12人参加，而且是秘密的闭门会议。除了君士坦丁十一世，与会者大多是威尼斯的指挥官和船长。威尼斯人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务，但也允许了一个外人参加：热那亚人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在所有事务上都值得信赖的人”，他的意见受到普遍尊重。会议各方进行了漫长而激烈的辩论，提出了多种不同方案。有人主张整个舰队在白天大举出动，发动全面进攻，这就需要热那亚船只的配合。但这个方案被否决了，因为与加拉塔谈判就会非常复杂，而战局已经十万火急。还有人主张出动一支陆军部队去消灭保护敌人舰队的火炮，然后将敌船烧毁。但守军的兵力非常薄弱，这么做风险太大，因此也被否决了。最后，一艘特拉布宗桨帆船的船长贾科莫·科科，“一个果断坚决、沉默寡言的人”^[36]，强烈支持第三种方案：在夜间发动一次小规模海战，通过出其不意的奇袭烧毁土耳其舰队；行动必须秘密筹划，不通知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并立即执行，因为时间就是生命。他提议由他自己来指挥此次突袭。与会者进行了投票表决，最后这个计划得以通过。

4月24日，科科开始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他选择了两艘坚固的高舷商船，在其船舷上堆积了大量装满羊毛和棉花的麻袋，并填塞平整，用来抵御奥斯曼火炮发射的石弹。还有两艘桨帆船将伴随商船前进，击退敌人的反击，而真正挑大梁的将是两艘快速的轻型弗斯特战船，每艘船上配有72名桨手。这两艘弗斯特战船上装满了希腊火和其他易燃物，用来火攻敌人。每艘大船还有一艘运载其他物资的小船伴随。计划很简单：有防护的风帆商船将作为肉盾，保护快速的弗斯特战船，直到后者接近敌人。弗斯特战船将冲出己方的保护圈，向队形密集的奥斯曼战船发动火攻。参战船只将在日落一小时后集合，于午夜发动突袭。事先做了周全的准备；但是，当指挥官们聚集在港口指挥官阿卢威克瑟·迪艾多的桨帆船上听取战前的最后指令时，计划却出人意料地受到了阻挠。城内的热那亚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打探到了这个消息，也想参加突袭。他们坚决要求暂缓行动，好让他们的船只做好准备。威尼斯人不情愿地同意了。进攻被推迟了。

热那亚人的战斗准备花了四天时间。在此期间，陆墙遭到持续轰击。威尼斯人等得不耐烦了。“从这个月的24日一直等到28日，”巴尔巴罗记载道，“4月28日，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他们终于决定尝试将奸诈的土耳其人的舰队烧毁。”^[37]为了安抚敏感的热那亚人，进攻舰队做了一些微调：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各自提供了1艘有防护的商船；2艘威尼斯桨帆船分别由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和扎卡里亚·格廖尼指挥；运载易燃物的3艘快速弗斯特战船由科科指挥；另外还有一些运载更多沥青、木柴和火药的小船。

4月28日，离拂晓还有两个小时，进攻舰队从金角湾东北角加拉塔海墙的庇护下安静地驶出，绕过通往泉源谷的黑暗海岸的弯曲处，路程不到1英里。打头阵的是两艘商船，朱斯蒂尼亚尼就在其中的热那亚商船上。其他船只紧随其后。海面上波澜不兴，没有任何动静。唯一能够显示有人存在的迹象就是热那亚人的加拉塔城楼上短暂闪烁的光亮。他们

接近奥斯曼舰队时，听不到任何声响。

尺寸较大的商船在使用人力划桨时速度较慢，而理应接受商船保护的弗斯特战船的桨手更多，速度很快。不知道是受了缓慢接近时的沉寂和紧张情绪的刺激，还是因为进攻被推迟而恼火，或者是由于渴望“扬名天下”^[38]，贾科莫·科科突然间摈弃了精心制定的计划。他自作主张，率领他的火攻船脱离了舰队，全速向停泊着的敌人舰队冲去，抢先发动了进攻。一瞬间周遭万籁俱寂。然后敌人向没有防护的火攻船开了炮。第一发炮弹很接近目标，但没有命中。第二发炮弹击中了一艘弗斯特战船的中部，将其击穿。“这艘弗斯特战船坚持的时间还不够念十遍主祷文，就沉没了。”^[39]巴尔巴罗记载道。一瞬间，披甲的士兵和桨手们坠入夜色下的大海，很快无影无踪了。

夜色漆黑，跟在后面的船只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状况，继续前进。更多的火炮在近距离开火。“大炮和火枪发出如此之多的浓烟，大家什么都看不见，双方都在大喊大叫。”^[40]基督教船只上前时，特里维萨诺的大型桨帆船冲入了火线，当场被两发炮弹击穿了船体。海水迅速灌入船体，但躺在甲板下方的两名伤员沉着冷静地采取了措施，避免了船只沉没。他们用储存在舱内的斗篷堵住破口，总算阻止了海水灌入。被严重击伤的桨帆船虽然已经被海水淹了一半，但仍然漂浮在水面上，桨手们艰难地把船划回了安全地带。其他船只试图继续进攻，但敌人猛烈开炮，投掷石块和其他武器，火力非常凶猛，再加上特里维萨诺的桨帆船严重受损，于是它们选择了撤退。

天渐渐亮了，但在混乱之中，两艘大型商船仍然停留在战场上，按照原计划摆开了防御阵势，竟没有发现其他船只已经撤退。看到这两艘船出人意料地落了单，奥斯曼舰队从锚地出发，意图将它们包围和俘虏。“爆发了一场可怕而凶残的战斗……看上去着实有如地狱；子弹和箭如同倾盆大雨，大炮不时轰鸣，火枪不断脆响。”^[41]70艘小船蜂拥上

去攻击基督教船只，穆斯林水手们高呼安拉的尊名。但那两艘商船侧舷较高，而且有防护，再加上船员们作战经验丰富，因此抵挡住了进攻。近距离激战一连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最终双方脱离接触，各自鸣金收兵。奥斯曼舰队损失了一艘弗斯特战船，但赢得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土耳其军营中欢呼雷动，因为他们击沉了贾科莫·科科的弗斯特战船，”巴尔巴罗回忆道，“而我们满心恐惧地哭泣，害怕土耳其人用他们的舰队打败我们。”^[42]意大利人对损失做了清点：一艘弗斯特战船被击沉，全体船员和一些士兵随之坠入深渊；一艘桨帆船严重受损；意大利人在海战中的优势地位被打破了。阵亡者的名单很长，包括不少有名望的人：“贾科莫·科科，船长；科孚岛的安东尼奥，合伙人；安德烈亚·斯泰科，大副；朱安·马拉尼奥，弩手；特罗伊洛·德·格雷齐，弩手……”；等等。“那艘被击沉的弗斯特战船上的人全都葬身大海，愿上帝怜悯他们。”^[43]

4月28日^[44]上午，守军发现，他们不仅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蒙受更恐怖的苦难。原来，失踪的人并非全部被淹死，有大约40人从下沉的战船泅水逃生，在黑暗和混战中游到了敌占海岸，被俘虏了。穆罕默德二世命令将俘虏全部钉死在尖木桩上，并展示给君士坦丁堡全城人看，以儆效尤。海战的幸存者在城墙上战战兢兢地看着敌人的准备工作。一位名叫雅各布·德·坎皮的热那亚商人（他在奥斯曼帝国做了25年的生意）将这可怕景象描绘如下：

苏丹命令将他想要惩罚的人按倒在地；一根削尖的长木桩被插入此人的肛门；刽子手用双手举着一个大木槌，使出全身力气向下锤击，木桩被钉入人体。按照木桩插入位置的不同，这个可怜人要么当场死亡，要么还要忍受一段时间。然后刽子手将木桩抬起，将它插入地面。于是受刑的可怜人就只能这样苟延残喘，很快就会死去。^[45]

“木桩就这样被安插在那里，受刑者在城墙卫兵众目睽睽之下悲惨地死去。”^[46]

当时的欧洲作家对这种死刑方式的残暴大肆口诛笔伐，并认为它是土耳其独有的刑罚。刺刑（尤其是作为一种震慑被围攻的城市的心理战工具）其实是奥斯曼军队从基督教巴尔干学来的。后来，奥斯曼人自己也经受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一次暴行：据说，弗拉德·德古拉^[47]于1461年在多瑙河平原将2.5万名奥斯曼人钉死在尖木桩上。目击者称：“无数尖木桩被安插在地上，上面挂的不是水果，而是死尸”^[48]，而在这些刑具的正中央有一根较高的木桩（以彰显这名受刑者的地位）钉着曾经担任海军司令的哈姆扎贝伊的尸体，还穿着红紫两色的官服。假如穆罕默德二世听到这个描述，一定也会大为震惊、心惊肉跳。

4月28日下午，意大利水手被刺穿在尖木桩上的可怕景象收到了苏丹希望的效果。“城内为这些青年发出的哀恸无法描述。”^[49]梅里西诺斯写道。但悲痛很快变成了狂怒。为了取得一点心理平衡，也为了发泄进攻失败的挫折感，他们以牙还牙，自己也做出了暴行。自围城开始以来，城内就扣押着约260名奥斯曼俘虏。次日，很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之下，守军进行了血腥的报复。“我们的人暴跳如雷，在城墙上当着奥斯曼全军的面野蛮地屠杀了土耳其俘虏。”^[50]俘虏被一个一个地带上城墙，在奥斯曼军队的注视下被吊死。众多绞架围成一个圆圈。莱奥纳德大主教哀叹道：“就这样，由于不虔诚和残忍的行为，这场战争变得愈发野蛮。”^[51]

悬挂在绞架上的俘虏和被钉死的水手隔着战线相望，这真是一种无言的讽刺。但在这一系列暴行之后，战役主动权显然已经再次回到了进攻方那一边。金角湾内的奥斯曼舰队实力几乎毫发无损，守军也清楚地认识到，具有关键意义的金角湾彻底丧失了。这次笨拙的夜袭严重地损害了君士坦丁堡的实力。他们对此进行思考，寻找失败的原因，并控诉负有责任的人，尤其在意大利人之间发生了争吵。很显然，科科的进攻被推迟是个致命错误。敌人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风声，在海上守株待兔。穆罕默德二世此前把更多的火炮调到了内港，准备伏击基督徒的突

袭舰队。加拉塔城楼上的光亮显然是热那亚殖民地内部有人在向苏丹通风报信。意大利人各个派系之间的互相指责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丧失理性。

[1] Lewis, Bernard,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1 vols., Oxford, 1987, p.212

[2]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18

[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5

[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p.23-4

[5] Tursun Bey, quoted Inalcik, Halii,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 *Speculum* 35, p.411

[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01

[7]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301-2

[8]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34

[9]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56

[10]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5

[11]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5

[12]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14

[13]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4

[14] quoted Mijatovich, Chedomil,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1448-1453*, London, 1892, p.161

[15] quoted Nicol, Donald M., *The Immortal Emper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us, 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 Cambridge, 1969, pp.127-8

[1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6

[17]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6

[18]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36

[19]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36

[2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7

[21]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7

[2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6

[23] 即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首都埃迪尔内。

[24]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75, p.258

[25]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28

[26] 马穆鲁克王朝在约1250~1517年统治埃及和叙利亚。“马穆鲁克”是阿拉伯语，意为“奴隶”。自9世纪起，伊斯兰世界就已开始起用奴隶军人。奴隶军人往往利用军队篡夺统治权。马穆鲁克将领在阿尤布苏丹萨利赫·阿尤布（1240~1249年在位）去世后夺取王位。1258年，马穆鲁克王朝恢复哈里发的地位，并保护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残余的十字军被赶出地中海东部沿岸，而

蒙古人也被赶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上，他们在史书撰写及建筑方面成就辉煌。最后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打败。

[27]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134-6

[28]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6

[29]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6

[30]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6

[31]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8

[32]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56

[3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7

[3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9

[35]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9

[36]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111

[37]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0

[38]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1

[39]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1

[40]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2

[41]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3

[42]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3

[43]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p.31-2

[44] 原文为“4月29日”，有误。

[45]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29

[46]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5

[47] 即瓦拉几亚大公弗拉德三世·采佩什（1431～1476），即后世传说中“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

[48]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75, p.260

[49]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31

[5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44

[51]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44

11. 恐怖的机械

1453年4月28日～5月25日



围城战需要机械：各种类型和形式的龟甲撞城锥……可移动的木制塔楼……不同形式的梯子……挖掘不同类型城墙所需的不同工具……不用云梯登城所需的机械。^[1]

——10世纪关于围城战技术的手册

“呜呼，最有福的圣父，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海神的狂怒竟然一击将他们灭顶！”^[2]夜袭失败之后，守军当即就为失败的责任爆发了尖刻和激烈的争吵。威尼斯人在这次惨败中损失了80～90名亲密战友，找出了他们认为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可憎的来自佩拉的热那亚人是叛徒，是背弃基督教信仰的逆贼，”尼科洛·巴尔巴罗宣称，“他们借此向土耳其苏丹邀宠。”^[3]威尼斯人声称，加拉塔的某人溜到了苏丹军营，将夜袭的消息报告给了他。威尼斯人还提出了具体的指控：他们认为是加拉塔的市长自己派人去向苏丹报告的，或者是一个叫做法尤佐的人。热那亚人则反驳，威尼斯人应当为这次惨败负全责。科科“是个沽名钓誉之徒”^[4]，无视命令，给整个行动造成了灾难。另外，他们还指责威尼斯水手偷偷将物资装上船，准备逃离城市。

双方大吵特吵起来，“互相指责企图逃跑”^[5]。意大利人内部的深层

敌意浮出了水面。威尼斯人声称，他们已经服从皇帝的命令，将船上的货物卸载上岸，并要求热那亚人也“将你们船只的舵和帆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安全地点”^[6]。热那亚人反驳说，他们绝无逃离城市的企图；与威尼斯人不同，他们的妻儿老小和财产都在加拉塔，“我们将保卫加拉塔，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并且拒绝将“我们的高贵城市、为热那亚增光添彩的珍宝交给你们”。加拉塔的热那亚人的暧昧态度使得他们受到了各方面的指控，大家都控诉他们是欺骗盟友的叛徒。热那亚人与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都是贸易伙伴，但他们天性是同情其他基督徒的，而且他们允许拜占庭人将铁链固定在他们的城墙上，就已经破坏了自己的中立性。

君士坦丁十一世很可能亲自干预了互相猜忌的意大利人之间的争吵，但金角湾本身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基督教舰队害怕敌人的夜袭或者两面夹击（金角湾内部、泉源谷附近有一支奥斯曼舰队；金角湾之外、双柱港附近还有另一支舰队），丝毫不敢松懈。水手们昼夜处于戒备状态，小心谨慎地捕捉火攻船接近的声响。在泉源谷附近，奥斯曼军队的大炮严阵以待，准备应对基督教舰队的第二次进攻，但奥斯曼舰队没有采取行动。在科科阵亡之后，威尼斯人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了重组。一位新指挥官多尔芬·多尔芬（Dolfín Dolfín）受命接管科科的战船，同时他们还在考虑可否用其他方法消灭金角湾内的奥斯曼战船。在4月28日的失败之后，海路进攻显然是太危险了，于是他们决定用远程手段来骚扰敌人。

5月3日，两门尺寸相当大的火炮被部署到金角湾沿岸某一座水门处（700码外的对岸就是奥斯曼舰队的锚地），并开始炮击奥斯曼船只。起初炮击的效果很可观。他们击沉了一些弗斯特战船，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我们的炮击打死了很多敌人”，但奥斯曼军队迅速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威胁。他们把舰船调离基督徒火炮射程范围内的区域，并用他们自己的三门大炮还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双方的大炮在随后10

天内隔着海面互相轰击，但都无法摧毁对方，“因为我们的火炮在城墙后，他们的大炮则得到了堤岸的良好保护，而且双方的距离达到半英里”^[7]。于是，这场炮击竞赛逐渐陷入僵局，但金角湾的压力还在，而且穆罕默德二世在5月5日回敬以自己的炮击计划。

他那不知疲倦的头脑一定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既然加拉塔城墙处在火线上，如何才能炮击铁链处的基督教船只呢？解决方案是建造一门弹道更为弯曲的大炮，让它从加拉塔城的后方射击，炮弹就可以从加拉塔城头顶上越过，不至于误击这座中立城市。于是他命令铸炮工匠们开始研制一种原始的臼炮，“能够将石弹射得很高，石弹落下来之后就能够正中敌船，将其击沉”^[8]。新的大炮已经制造成功，准备就绪。它从加拉塔后方一座山上向铁链处的基督教船只开了火。加拉塔的城墙正处于这门炮的火线之内，但这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有个好处：向态度可疑的热那亚人施压。这门臼炮的第一批炮弹从加拉塔市民们的屋顶上呼啸而过，市民们一定感到奥斯曼帝国勒紧了他们脖子上的绞索。当天的第三发炮弹“从山顶上轰鸣着飞下”^[9]，没有命中敌船，却击中了一艘中立的热那亚商船的甲板。该船“容积为300桶，装载着丝绸、蜂蜡和其他商品，总价值1.2万杜卡特。它当场就沉底了，桅顶和船体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船上有人被淹死”^[10]。于是，守卫铁链的所有船只都转移到了加拉塔城墙之下，寻求庇护。臼炮继续轰击，射程略有缩短，炮弹开始落在城墙和城内房屋上。桨帆船和其他船只上不断有人被石弹击毙，“有时一发炮弹能打死4人”^[11]，但城墙提供了足够的防护，因此没有更多船只被击沉。加拉塔的热那亚人第一次遭到直接炮击，尽管只有1人死亡（“一位名誉极佳的妇女，当时站在大约30人的人群中间”^[12]），奥斯曼人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

加拉塔城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苏丹的大营，向他抱怨此次攻击。一位维齐尔面无表情地抗议说，他们以为被击沉的船属于敌人，并平静地向代表们保证，最终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欠他们的钱都会还

清”^[13]。“土耳其人就用这种侵略行径报答加拉塔人民向他们表现的友谊，”^[14]杜卡斯讥讽地宣称。他说的“友谊”指的是加拉塔人向土耳其人通风报信，导致科科夜袭的失败。在此期间，石弹继续以弯曲的弹道越过金角湾。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到5月14日，奥斯曼军队的臼炮已经发射了“212发石弹，每一发石弹至少有200磅重”^[15]。基督教舰队一直被压制在原地，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在14日之前很久，基督徒们就已经失去了对金角湾的有效控制。陆墙处战事吃紧，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资，这更加深了水手们之间的矛盾。穆罕默德二世的压力消解了不少，于是命令在金角湾上修建一座浮桥，位置就在君士坦丁堡城外不远处，以缩短他的交通线，并保证人员和大炮能够自由运动。

在陆墙处，穆罕默德二世也在施加更大的压力。他的战术是消磨对方的力量，并越来越重视心理战。现在守军的兵力更加薄弱，他决定用持续炮火把他们拖垮。4月底，他把一些大炮调到圣罗曼努斯门附近的城墙中段，“因为那里的城墙比较低，也比较弱”^[16]；当然，他同时还在加紧炮击皇宫一带仅有一道城墙的地段。大炮昼夜轰鸣；奥斯曼军队还随时可能会发动小规模袭击，检验守军的决心，然后一连几天都不进攻，让守军自己松懈下来。

快到4月底的时候，一次大规模炮击把城墙顶端炸塌了大约30英尺。天黑之后，朱斯蒂尼亚尼的部下再次开始抢修，用泥土封堵缺口，但次日奥斯曼大炮又开始了狂轰滥炸。但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其中一门大炮的火药室破裂了，可能是因为炮管的缺陷，尽管俄罗斯人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声称这是被守军的火炮击中所致。这个挫折让穆罕默德二世火冒三丈，命令立即发动一次攻势。奥斯曼军队向城墙发起了冲锋，令守军措手不及。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交火。城内敲响了警钟，人们冲向城墙。“兵器碰撞、火光夺目，所有人都感到城市已经被连根拔起。”^[17]冲锋的奥斯曼士兵被成片地打倒在地，又被后面疯狂冲上来的其他士兵踩在脚下。对俄罗斯人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来说，这个景象

极其恐怖：“死尸几乎将壕沟填满，土耳其人踏过己方士兵的尸体，就像在大草原上冲锋一样，继续战斗，死者的尸体成了通往城市的桥梁或者楼梯。”守军最终无比艰难地打退了这次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夜色降临。成堆的死尸被抛弃在壕沟内；“从突破口附近一直到山谷，流血漂橹”^[18]。守军士兵和市民们精疲力竭，倒头就睡，任凭伤者在城墙外呻吟。第二天，僧侣们再次开始他们的忧伤工作：埋葬战死的基督徒，并清点敌人尸体。君士坦丁十一世已经被消耗战拖得身心疲惫，现在看到伤亡数字，显然非常烦恼。

疲惫、饥饿和绝望开始给守军带来严重的损失。到5月初，粮食已经短缺；此时已经很难和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做生意，划船去金角湾捕鱼也变得非常危险。在战斗间歇，很多防守城墙的士兵会离开岗位，为家人搜寻食物。奥斯曼军队知道这个情况后，不断发动突然袭击，用一端带钩子的木棍将城墙上装泥土的木桶拉下来。他们甚至能够大摇大摆地接近城墙，用网兜回收炮弹。城内的争吵愈演愈烈。热那亚人的大主教莱奥纳德控诉擅离岗位的希腊人是懦夫。希腊人反驳说：“如果我的家人挨饿，城防关我什么事？”^[19]莱奥纳德感到，还有很多希腊人“对拉丁人满腹仇恨”^[20]。有人被指控囤积粮食、怯懦畏敌、投机倒把和妨碍城防。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信条和血统出身不同的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朱斯蒂尼亚尼和诺塔拉斯互相争夺军事资源。莱奥纳德严厉谴责“某些人的丑恶行径，他们是喝人血人膏的恶魔，囤积粮食，或者哄抬粮价”^[21]。在围城的巨大压力之下，脆弱的基督教联盟开始瓦解。莱奥纳德责怪君士坦丁十一世没能控制住局面：“皇帝行事过于宽大，抗命不遵的人既没有受到言语训斥，也没有受到刀剑的惩罚。”^[22]城墙外的穆罕默德二世很可能也得知了这些争吵和矛盾。“守城军队陷入了分裂，”^[23]奥斯曼史官图尔松贝伊在这个时期记载道。

为了防止士兵去搜寻粮食而玩忽职守，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向士兵的家属平均分配粮食。形势已经非常险恶，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征用了

教堂的圣餐盘，将其熔化、铸成钱币，分发给士兵们，让他们去购买粮食。皇帝的这个举措很可能是颇有争议的，不大可能受到虔诚的东正教徒的支持，后者认为城市蒙受的苦难是罪孽和错误应得的惩罚。

拜占庭指挥官们在加紧商讨战局。敌人舰队进入金角湾，严重打乱了守军的计划，他们被迫根据新局势重新部署部队和划分防区。城墙守军昼夜不停地瞭望西方大海，但海平线上没有任何动静。大约在5月3日，守军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指挥官、民政要人和教会人士共商国是。敌人的大炮还在轰击城墙，守军士气越来越低落，大家感到敌人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在充满不祥预感的气氛下，有人提议让君士坦丁十一世离开城市，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在那里重整旗鼓，招募新兵，以图东山再起。朱斯蒂尼亚尼表示愿意提供他的桨帆船送皇帝逃离。史学家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答复作了非常煽情的记述。他“沉默许久，泪如雨下，然后说道：‘我赞赏和感激你们的建议，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因为这建议符合我的利益，一定是这样的。但我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离开教会、上帝的教堂、帝国和所有人民？请告诉我，如果我逃走的话，全世界会怎么看我？不，众位大人，不行。我要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殒身报国。’他向他们鞠躬致敬，哭得伤心欲绝。牧首和在场的其他人都开始默默流泪”。[\[24\]](#)

平静下来之后，君士坦丁十一世提出了一个务实的建议：威尼斯人应当立即派遣一艘船到爱琴海东部，寻找救援舰队的迹象。要突破奥斯曼人的海上封锁是非常危险的，但当即就有12人自愿报名，于是准备了一艘双桅帆船来执行这个任务。5月3日快到午夜时，这12人乔装打扮成土耳其人，登上了这艘小船。船被拖曳到铁链处。帆船张挂着奥斯曼帝国的旗帜，升起船帆，骗过了敌人的巡逻队，丝毫没有被人察觉，然后在夜幕掩护下向西进入马尔马拉海。

虽然大炮有一些技术问题，穆罕默德二世仍然继续炮击城墙。5月6

日，他判断，发动致命一击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命令陆军全军再次向城市推进，全天猛攻。”^[25]城内传出的消息可能让他确信，守军的斗志已经在崩溃；或许还有其他情报警告他，意大利人正在缓慢地组织一支援军。他感到，城墙中段的薄弱环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他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5月6日，大炮再次猛烈开火，较小的火炮也加入合唱，此时炮手们对射击模式已经驾轻就熟。炮击还伴随着“呐喊声和响板的敲击声，以威慑城内的人”^[26]。很快，又有一段城墙倒塌了。守军要等到夜间才能修补城墙，但这一次，奥斯曼人在夜间也继续炮击，所以守军无法封闭这个缺口。次日早上，大炮继续对城墙基部狂轰滥炸，又打垮了相当长的一段。奥斯曼军队持续炮击了一整天。晚上7点左右，他们向城墙突破口发动了一次排山倒海的进攻，像往常一样大呼小叫、鼓乐喧天。远方港口内的基督徒水手们听到了狂野的呼喊声，担心奥斯曼舰队也会相应地发动进攻，于是做好了战斗准备。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士兵越过壕沟，冲向突破口，但此处非常狭窄，兵力优势发挥不出来，他们在强行猛冲的过程中踩倒了不少自己人。朱斯蒂尼亚尼冲上去迎战，突破口处爆发了一场绝望的肉搏战。

一个名叫穆拉德的近卫军士兵引领着第一波攻击。他凶猛地冲向朱斯蒂尼亚尼砍杀，朱斯蒂尼亚尼险些丧命，但这时有一个希腊人从城墙上跳下，用斧子砍断了穆拉德的双腿，才将朱斯蒂尼亚尼救下。率领第二波攻击的是奥斯曼帝国欧洲军的旗手奥马尔贝伊，迎战他们的是朗加比斯指挥下的一大队希腊兵。在大肆砍杀和冲刺的混战中，双方的指挥官在各自部下面前展开了一对一单挑。奥马尔“拔出利剑，向对方猛攻，两人疯狂地互相劈砍。朗加比斯走到一块石头上，双手握剑，砍到奥马尔的肩膀，将他劈成两段，因为朗加比斯的臂力极强”^[27]。奥斯曼士兵们看到指挥官战死，不禁火冒三丈，将朗加比斯团团围住，把他砍倒在地。就像《伊利亚特》的场景一样，双方都冲上去争抢指挥官的尸体。

希腊人急于夺回城门外的尸体，“但未能成功，自己损失惨重”^[28]。奥斯曼士兵们将残缺不全的尸体砍成肉泥，把希腊兵赶回了城内。这场鏖战持续了三个钟头，但守军坚守住了战线。战斗渐渐平息下来，大炮又开始咆哮，以阻止守军封闭缺口。同时奥斯曼军队发动了一次牵制性攻击，企图将皇宫附近的城门烧毁，但也被击退。朱斯蒂尼亚尼和疲惫不堪的守军士兵在黑暗中努力重建临时壁垒。由于城墙遭到轰击，他们不得不在比原先位置更靠后的地方修建土木壁垒。城墙仍然坚挺着，但非常勉强。在城内，“希腊人因为朗加比斯的战死而万分悲痛和恐惧，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武士，非常英勇，而且受到皇帝的敬爱”^[29]。

对守军来说，炮击、进攻和修补城墙的循环越来越模糊不清。就像描绘堑壕战的日记一样，史学家的记载也越来越单调和重复。“5月11日，”巴尔巴罗记载道，“除了陆墙遭到相当规模的炮击，陆上和海上都很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13日，一些土耳其人来到城墙下，发动了小规模袭扰，但除了不幸的城墙遭到持续轰炸之外，白天和夜间都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30]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对时间的把握开始出错，他记载的事件的顺序开始紊乱，甚至有重复记录。士兵和平民都厌倦了战斗、修理、埋葬死者和清点敌人的死尸。奥斯曼军队对营地内的卫生状况高度重视，总会把己方阵亡者抬走安葬，但壕沟内还是堆满了腐烂的死尸。激烈残杀威胁着饮用水的安全：“河流溪涧中的污血污染了水源，发出恶臭。”^[31]城内的市民越来越沉迷于教堂礼拜和圣像创造奇迹的神力，忙于思考罪孽和对局势进行神学解释。“全城到处可以看见所有男女群众组成神秘的游行队伍前往上帝的教堂，泪流满面，赞美和感恩上帝与最纯洁的圣母。”^[32]奥斯曼军营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召唤祈祷的呼声，借此计时。德尔维希们在士兵中间来回穿梭，告诫信众要坚定信心，牢记圣训中的预言：“在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圣战中，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将被战胜，这是真主不能宽恕的；三分之一将英勇牺牲，成为伟大的烈士；还有三分之一将最终得胜。”^[33]

守军的伤亡持续增多，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指挥官们焦急地到处搜寻人力物力来填补缺口。他们虽然竭尽全力，还是无法让所有守军精诚团结。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与朱斯蒂尼亚尼争吵不休，威尼斯人则大体上独立行动、自行其是。目前唯一尚未动用的人力资源就是桨帆船的船员，于是皇帝向威尼斯社区求援。5月8日，威尼斯十二人议事会召开了会议，投票决定将三艘威尼斯大型桨帆船上的武器卸下，将船员调往城墙，然后在造船厂内将桨帆船摧毁。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万难之策，目的是确保船员们一心一意地参加守城，但这个措施招致了激烈反对。卸载武器的工作正要开始，船员们手执利剑挡住了跳板，宣称：“我们倒要看看，谁敢从这些桨帆船上卸货！……我们知道，一旦我们把这些桨帆船上的货物卸下，在造船厂内把它们击沉，希腊人就会用武力把我们扣押在城内，当作他们的奴隶。而我们现在还是来去自由的。”^[34]船长和船员们害怕自己安全撤离的交通工具被摧毁，封锁了他们的船只，严阵以待。这一天，奥斯曼人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轰击陆墙。形势危急，议事会不得不在第二天再次开会，对计划做了修改。这一次，两艘长型桨帆船的指挥官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同意将他的船只上的武器卸下，并带领400人加入圣罗曼努斯门的防守。花了四天时间才说服船员们合作并搬运装备。他们在5月13日抵达圣罗曼努斯门时，几乎已经太晚了。

虽然穆罕默德二世的炮火主要集中在圣罗曼努斯门地段，但还有一些火炮在轰击皇宫附近、狄奥多西城墙与单独一道城墙相接的地点。到5月12日，大炮已经摧毁了这里的一段外墙，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在这个地点发动一次集中夜袭。午夜将近时，一支庞大的队伍开始向突破口前进。守军措手不及，被安纳托利亚军旗手穆斯塔法指挥的一支队伍从城墙上打退了。守军从城墙的其他地段迅速调来援军，但奥斯曼军队将他们一一逐退，开始在城墙上搭起云梯。皇宫周边小巷里的人们仓皇失措。市民们从城墙逃走，很多人“在那天夜里相信城市已经陷落了”^[35]。

按照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说法，就在此时，在3英里之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廊上正在召开一场气氛肃杀的作战会议。大家必须直面严峻的形势。守军的兵力一天天减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全都必死无疑，他们就会占领城市。”^[36]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君士坦丁十一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系列选择，供指挥官们斟酌：他们可以在夜间冲杀出城，尝试通过奇袭打败奥斯曼军队；或者死守到底，寄希望于匈牙利人或意大利人的救援，同时等待不可避免的噩运。卢卡斯·诺塔拉斯建议继续死守，其他人则再次恳求君士坦丁十一世离开城市。就在这时，他们得到消息，“土耳其人已经在爬城和屠戮市民”^[37]。

君士坦丁十一世策马奔向皇宫。在黑暗中，他遇见了一些从突破口逃跑的平民和士兵。他徒劳无功地努力让他们返回前线，每过一分钟战局都愈发恶化。奥斯曼骑兵已经开始冲入城内，城墙内已经爆发了激战。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卫队的到来总算稳定住了希腊兵的军心：“皇帝抵达前线，向他的士兵们呼喊，鼓励他们英勇奋战。”^[38]在朱斯蒂尼亚尼的帮助下，他打退了侵入城墙的敌人，把他们困在迷宫般的小巷内，将其分割为两个部分。四面受敌的奥斯曼士兵发动了勇猛的反击，企图杀死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毫发未伤，激情满怀地将敌人一直驱赶到突破口处，甚至还打算继续纵马冲杀出去，“但内廷贵族和他的德意志卫兵拦住了他，劝说他骑马回城”^[39]。没能逃走的奥斯曼士兵全被杀死在黑暗的小巷内。次日，市民们把奥斯曼士兵的尸体拖到城墙上，丢进下方的壕沟，让他们的战友来拖回尸体。君士坦丁堡在这次危机中幸存，但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让城市的生存希望减小了一分。

这是穆罕默德二世向皇宫段城墙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虽然没能得手，但他一定能感觉到，胜利已经在望。现在他似乎下了决心，要把全部火力集中在最薄弱的地段——圣罗曼努斯门。5月14日，他得知基督徒已经将部分桨帆船的武器拆除，并将大部分船只撤入远离铁链的一个小港，于是得出结论：在金角湾的奥斯曼舰队已经相对安全。然

后他把加拉塔附近山上的大炮也调到了陆墙前。起初，他命令这些火炮轰击皇宫附近的城墙，效果不佳，于是他又把它们调到了圣罗曼努斯门。现在炮击战术越来越改为集中所有火炮射击一个点，而不是把各门火炮平摊在宽大正面上。炮火比以往更为凶悍：“这些大炮昼夜不停地轰击我们可怜的城墙，把大段城墙炸塌。我们城内的人日夜劳作，用木桶、柴火、泥土和其他所有必需的东西抢修被摧毁的城墙。”^[40]特里维萨诺指挥下的桨帆船水手们就驻扎在这里，“配备了优质大炮和火枪，以及大量弩弓和其他装备”^[41]。

同时，穆罕默德二世不断对守卫铁链的基督教船只施压。5月16日22时，有人发现部分双桅帆船从停泊在海峡中的奥斯曼主力舰队脱离，全速驶向铁链。负责瞭望的基督徒水手们推测，在奥斯曼舰队服役的基督徒在逃离，“我们在铁链处的基督徒欣喜地等待他们”^[42]。但这些船只接近的时候，向守军开了火。意大利人立刻出动了他们自己的双桅帆船，将敌人打得抱头鼠窜。基督教战船只差一点就追了上去，但“他们开始拼命划桨，逃回了他们自己的舰队”^[43]。次日，奥斯曼舰队出动了5艘快速弗斯特战船，再次发动试探性进攻。守军用“70多发炮弹”^[44]的暴雨将其击退。

5月21日黎明前，奥斯曼舰队向铁链发动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这一次整个舰队大举出动。他们划着桨逼近铁链，“手鼓和响板的声音震耳欲聋，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45]，然后停了下来，审视对手的实力。铁链处的基督教船只全副武装，做好了战备，一场大规模海战似乎一触即发。就在这时，城内传来宣示全面进攻的警报声。金角湾内的所有基督教船只都迅速开往战斗岗位，而奥斯曼舰队则踌躇不决。最后他们调头返回了双柱港，于是“天亮两个小时之后，双方都十分平静，就好像海路进攻根本不曾发生过”^[46]。这是奥斯曼人进攻铁链的最后一次尝试。奥斯曼舰队的桨手大多是基督徒，现在可能士气已经非常低落，无力真正挑战基督教船只，但这些活动让守军精神紧绷，无法休

息。

在其他地方，穆斯林非常忙碌，这对守军来说是不祥之兆。5月19日，奥斯曼工兵建成了一座浮桥，将它架设在城墙外不远处的金角湾海面上。这又是一个临场应变的杰作。浮桥由1000个大酒桶（显然是从加拉塔城内喜好葡萄酒的基督徒那里弄来的）组成，每两个木桶首尾相接，上面铺设木板，形成了一条足够宽的车道，足以让五名士兵并肩行走，同时又足够坚固，可以承载大车的重量。修建浮桥的目的是缩短陆军两翼之间的交通线（在此之前要绕过金角湾顶部）。巴尔巴罗提出，穆罕默德二世准备浮桥是为了发动一次总攻，好让他的士兵能够快速运动。但浮桥直到围城战末期才在最终位置上架设就绪，“因为假如在全面进攻前就把浮桥在金角湾上架好，只需一发炮弹就能将其摧毁”^[47]。在城墙上可以对这些准备工作一览无余。守军再次被穆罕默德二世向攻城战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所震撼。但还有一项工程没有暴露在基督徒眼前，它很快就将让他们魂飞魄散。

到5月中旬，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把守军消耗到了极限，但其防线仍然完整。他已经充分使用了陆海军的资源，动用了中世纪攻城战的三项关键战术——突袭、炮击和封锁。还有一项非常经典的技术还没有尝试：挖地道。

在塞尔维亚的奥斯曼附庸国境内有一座叫作新布尔多^[48]的城市，它是巴尔干内陆最重要的城市，凭借它的银矿带来的财富驰名全欧洲。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斯拉夫部队中包括了一群来自新布尔多的熟练矿工，有可能是萨克森移民，“精通挖掘和开凿坑道的技术，对他们的工具而言，大理石就像蜂蜡一般柔软，黑压压的群山不过是一堆尘土”^[49]。在战役早期，他们就尝试在城墙中段下方挖地道，但由于地形不合适，计划被放弃了。5月中旬，其他的方法都已经失败，围城战进入了第二个月，坑道工兵展开了一个新工程，这一次是在皇宫附近的单道城墙附

近。挖地道虽然非常艰苦，却是摧毁城墙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穆斯林军队使用这个手段已经有几个世纪，屡建奇功。到12世纪末，萨拉丁的继承人已经精通了这门技术，通过炮击和地道双管齐下，在6周内就占领了十字军的多座大型城堡。

大约在5月中旬，在木栅和碉堡的掩护下，萨克森银矿工人开始从奥斯曼军队战壕后方挖掘地道，目标是250码外的城墙。这是需要熟练技术的工作，非常辛苦，特别困难。在冒烟的火把照明下，矿工们挖掘了狭窄的地下坑道，前进的过程中不断用木料支撑地道。奥斯曼军队在历史上也曾经尝试挖地道来破坏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但都没有成功。年老的市民们都坚信，挖地道是行不通的，因为城墙下面大部分是坚固的岩石。5月16日深夜，守军瞠目结舌地发现，这个老观念是错误的。城墙上的士兵偶然听见城墙内的地下传来鹤嘴镐的敲击声和模糊的说话声。地道显然已经从城墙底下穿过，奥斯曼工兵们将要在城内挖出一个秘密入口。守军很快将这个信息报告给了诺塔拉斯和君士坦丁十一世。他们慌忙召开了一次会议，然后在城内寻找有采矿经验的人，来应对这个新的威胁。临危受命的是个奇人：“约翰·格兰特，德意志人，优秀的军人，精通军事问题”^[50]，追随朱斯蒂尼亚尼的队伍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其实是个苏格兰人，显然曾经在德意志工作过。他在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前有哪些经历，已经很难揣测。他显然是个武艺高强的职业军人、攻城战专家和工程师，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曾在这场战争最奇异的支线情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格兰特显然非常熟悉坑道作业。他根据敌人挖掘地道的声响判断出了地道的位置，然后偷偷地快速挖掘了自己的地道。守军有着出其不意的优势。他们在黑暗中冲进敌人的地道，烧毁了支撑地道的木料，导致地道崩塌，奥斯曼工兵被困在黑暗中，最后窒息而死。地道带来的威胁让守军彻底丧失了城墙带来的安全感。从此以后，守军特别小心谨慎地寻找敌人挖地道的迹象。格兰特一定是开创了当时防御地道的标准战

术。他在城墙附近地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放置一碗或一桶水，人们观察水面，如果有涟漪的话，说明地下有震动。确定敌人地道的位置并快速和秘密地予以拦截需要更多技术。随后的日子里，双方在地下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斗争。这场地下战斗需要特别的技术和纪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争夺城墙和铁链的斗争之外的第三条战线。5月16日之后的几天内，基督教工兵们没有发现敌人的任何新动向。21日，他们发现了一条新地道。它同样从城墙地基下穿过，目的是在城内打开一个入口，好让部队溜进城来。格兰特的部下拦截了这条地道，但没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奥斯曼士兵从地道撤退，将支撑木梁烧毁，于是地道就坍塌了。

后来双方就在黑暗的地下进行了一场猫鼠游戏，打得非常惨烈。次日，“晚祷时分”^[51]，守军在卡里加利亚门附近发现了敌人的又一条地道，对其予以拦截。他们用希腊火把地道内的工兵活活烧死。几个小时后，有震动表明，附近还有一条地道，但这条地道很难拦截。但是，地道内的支撑木梁自行垮塌，在场的工兵全部死亡。

萨克森矿工们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每天双方都要在地下交锋。贾科莫·特塔尔迪回忆说，每一次“基督徒都挖掘自己的地道，然后仔细监听，找到敌人地道的位置……他们用烟把土耳其人熏死在自己的地道内，或者有时用恶臭的东西。在有些地方，他们向地道内灌水，还常常与敌人工兵展开肉搏战”^[52]。

在地道战继续进行的同时，穆罕默德二世的工兵们在地上还实施了另一项不同寻常而且完全出人意料的工程。5月19日拂晓，查瑞休斯门附近城墙上的哨兵们开始准备一天的战斗，越过敌人的帐篷海洋眺望，被自己目睹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在他们前方十步远的地方，也就是壕沟边上，屹立着一座巨大的攻城塔，“其高度超过外堡的城墙”^[53]，一夜之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奥斯曼军队非常快速地建起了这座带轮子的攻城塔，在夜间将它运到城墙前，现在居高临下地面对着城墙。敌人的

效率让守军无比震惊，也百思不得其解。攻城塔的骨架由坚固的木梁组成，覆盖着骆驼皮和双层木栅，以保护内部的人员。塔楼的下半部分装满泥土，外面一圈筑有土墙，“所以大炮或者火枪的弹丸奈何它不得”^[54]。这座活动攻城塔内的各层之间有梯子相连，梯子也可以用作连接攻城塔和城墙的桥梁。一夜之间，大量劳工还在攻城塔背面修建了一座有防护的堤道，“这堤道有半英里长……上面铺着两层木栅，然后又覆盖了骆驼皮，士兵们就可以安全地从攻城塔走到军营，而不用害怕子弹、弩箭或小型火炮发射的石弹”^[55]。守军士兵争相跑上城墙去观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攻城塔是源自古典时期战争的古老事物，尽管莱奥纳德大主教认为“就连罗马人也很难建造出这样的装置”^[56]。奥斯曼人设计这座攻城塔是专门为了填满城墙前棘手的壕沟。在塔内，众多士兵在挖掘泥土，并通过防护层的小口子将泥土抛入前方的壕沟。他们一整天都在这么苦干。同时，攻城塔高层的弓箭手向城内射箭，为下面的人提供掩护。弓箭手们似乎“斗志非常高昂”^[57]。

这是典型的穆罕默德二世风格的工程——秘密筹划、规模宏大，执行起来速度奇快，就像搬运战船那样。攻城塔给守军造成的心理震慑也是极大的。奥斯曼军队的足智多谋和资源的取之不尽对守军来说一定是个不断再现的噩梦。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指挥官们匆匆来到城垛，应付新的危机，“他们看到它时，无不呆若木鸡。他们非常担心，这座攻城塔将使得城市失守，因为它的高度比外堡还要高”^[58]。攻城塔的威胁是非常明显的。它就在守军眼皮底下把壕沟渐渐填平了，弓箭手的掩护火力则使得守军难以做出回应。到黄昏，奥斯曼军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们用木材、干树枝和泥土填平了壕沟。攻城塔内的人推动它继续接近城墙。手足无措的守军决定必须当机立断：如果这座居高临下的攻城塔再运作一天，后果将不堪设想。天黑之后，守军在城墙后准备了成桶的火药，点燃引信后将其从城墙上推向攻城塔。发生了一连串的大爆炸：“大地突然像雷鸣一般咆哮起来，攻城塔及其人员被掀上云霄，就像被猛烈暴风卷起一样。”攻城塔开裂爆炸了：“人和木料从高处

飞落下来。”^[59]守军向下方正在呻吟的伤者倾倒了成桶的燃烧着的沥青。守军还从城墙出击，对幸存者大肆屠戮，将死尸和被推到城墙附近的攻城武器（“长长的攻城锤、带轮子的云梯、附有防御塔的大车”^[60]）一起烧毁。穆罕默德二世从远处目睹了这次失败。他怒火中烧地命令士兵们后撤。接近了城墙其他地段的类似的攻城塔也被撤下，或者被守军烧毁。攻城塔面对火攻显然太脆弱，于是奥斯曼军队没有再重复对它的试验。

地道战越打越激烈。5月23日，守军发现并进入了又一条地道。他们借助闪烁的火光沿着狭窄的坑道前进，突然一下子迎头撞上了敌人。他们投掷希腊火，把地道顶部弄塌，将敌人的工兵活埋，还俘虏了两名军官，把他们带回地面。希腊人对这两名奥斯曼军官严刑拷打，直到他们招供了其他地道的位置；“他们招供之后，就被斩首，尸体被从城墙上抛下。土耳其人看到自己的人被从城墙上丢下，非常恼火，对希腊人和我们意大利人恨之入骨。”^[61]

次日，银矿矿工们改变了战术。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挖掘穿过城墙的地道以打通进入城内的通道，而是在离城墙还有十步远时就改变方向，挖掘与城墙平行的地道。他们用木料支撑地道，并做好将其烧毁的准备，希望借此使一段城墙坍塌。守军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发现了敌人的新动向；奥斯曼工兵被击退，守军用砖块堵住了城墙下的地道。这个事件在城内引起了极大的不安。5月25日，奥斯曼人做了挖地道的最后一次尝试。工兵们再次在很长一段城墙下挖掘了地道，并支撑起来，做好了点火准备，但又一次被守军发现和击退。在守军眼中，这是他们所发现的地道中最危险的一条；它被发现宣告了地道战的结束。萨克森矿工们一刻不停地苦干了10天；他们挖掘了14条地道，但全被格兰特摧毁。穆罕默德二世承认攻城塔和地道都失败了，只得让大炮继续射击。

在君士坦丁堡以西，远离大炮轰鸣和夜袭嘈杂的地方，上演了另一

场规模虽小但同样重要的戏剧。在爱琴海东部一个岛屿的港口，一艘帆船正在锚地摇曳。它就是从君士坦丁堡溜走的那艘威尼斯双桅帆船。5月中旬，它游遍了各个岛屿，寻找救援舰队的迹象，却一无所获，从过往船只那里也没有获得任何好消息。现在他们知道，没有任何船只前去援救君士坦丁堡。事实上，威尼斯舰队正在希腊外海，谨慎地搜寻关于奥斯曼海军意图的情报，而教皇从威尼斯租借的桨帆船还在修建过程中。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寻找援军的水手们完全理解自己所处的局面。他们在甲板上激烈地争论，下一步该怎么办。一名水手强烈主张驶离君士坦丁堡，返回“基督教的土地，因为我很清楚，此时土耳其人肯定已经占领了君士坦丁堡”^[62]。他的伙伴们转向他，回答说，皇帝把这个任务托付给了他们，他们必须完成使命。“所以我们必须返回君士坦丁堡，不管它在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的手中，不管我们此行是生是死，我们都必须返回。”^[63]大家进行了民主表决，决议无论如何都要返回。

双桅帆船借着南风在达达尼尔海峡北上，重新假扮成土耳其船只，在5月23日破晓前不久接近了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奥斯曼舰队没有上当。他们害怕威尼斯桨帆船舰队前来救援，所以在仔细地巡逻，把这艘小帆船当作了援军舰队的先驱。奥斯曼战船逼近过来，进行拦截，但双桅帆船把它们抛在了后面。铁链及时打开，放它入港。当天，船员们前去觐见皇帝，向他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援军舰队。君士坦丁十一世感谢他们义无反顾地返回城市，随后“失声痛哭起来”。他最终认识到，基督教世界连一艘救援船只都没有派出，这让得到援救的希望彻底断绝了。“有鉴于此，皇帝决定完全听从最仁慈的救主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以及帝都的保护者圣君士坦丁的安排，但愿能够守住城市。”^[64]这是围城战的第48天。

^[1] *Siegecraft: Two Tenth-century Instructional Manuals by Heron of Byzantium*, ed.D.F.Sullivan, Washington DC, 2000, p.29

[2]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36

[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0

[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42

[5]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42

[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3

[7]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4

[8]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p.51-2

[9]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32

[10]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p.35-6

[11]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6

[12]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32

[13]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79

[14]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78

[15]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9

[16]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43

[17]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45

[18]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45

[19]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44

[20]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46

[21]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44

[2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52

[23] Tursun Beg, *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 Minneapolis and Chicago, 1978, p.36

[24]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49

[25]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53

[26]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6

[27]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55

[28]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57

[29]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57

[30]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9

[31]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47

[32]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47

[33] quoted Wintle, Justin, *The Rough Guide History of Islam*, London, 2003, p.245

[3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7

[35]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9

[36]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57

[37]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59

[38]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61

[39] quoted Mijatovich, Chedomil,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1448-1453*, London, 1892, p.181

[40]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0

[41]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0

[42]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0

[43]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1

[4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1

[45]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4

[46]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55

[47]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3

[48] 今属科索沃共和国。

[49]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p.262

[5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34

[51]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55

[52]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5

[53]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2

[5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3

[55]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3

[56]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22

[57]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53

[58]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2

[59]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51

[60]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22

[61]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p.4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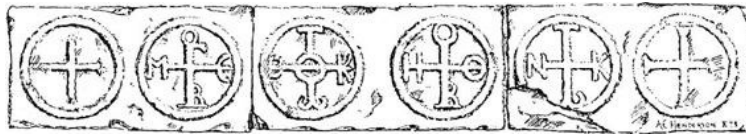
[6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6

[6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26-7

[6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35

12.不祥之兆

1453年5月24～26日



我们从人们的回答和问候中看到征兆。我们注意家禽的鸣叫和乌鸦的飞翔，并从中总结出预兆。我们研究梦境，相信它们能够预示未来……就是这些罪孽，以及其他的类似罪行，使我们应得上帝的惩罚。^[1]

——约瑟夫·布里恩尼奥斯，14世纪拜占庭作家

预言、启示和罪孽：围城战进入了5月的最后几周，君士坦丁堡的人们陷入了宗教的恐惧中。拜占庭人一向迷信征兆。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就是由于神迹的感召：1240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在米尔维安大桥的关键战役前夕目睹了十字架的幻象。人们积极地追寻和阐释各种预兆。随着帝国不可阻挡地日渐衰败，这些预兆越来越与深度的悲观主义如影随形。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拜占庭帝国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帝国，它的最后100年于公元1394年前后开始。人们记起了早期阿拉伯人攻城时留下的古老预言书，广泛地诵读着它们晦涩玄妙的诗节：“七山之城，当第二十封信在你的城墙上宣示时，灾难将降临在你头上。你的陷落和你的君王们的毁灭就不远了。”^[2]拜占庭人把土耳其人看作世界末日的民族，标志着最后审判，是上帝惩罚基督徒罪孽的工具。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持续不断地审视有可能预示帝国末日（或者世

界末日)的征兆:疫病、自然现象、天使降临等。君士坦丁堡的古老超越了居民们的理解力,城市本身笼罩在传奇、古老预言和超自然寓意中。城内那些历经千年的古老纪念碑的最初意义已经被人遗忘,被人们认为是魔法密文,隐含着对未来的预示:公牛广场雕塑基座上的雕刻檐壁据说包含着密文写就的关于城市末日的预言,而查士丁尼大帝指向东方的巨型骑马像不再表示对波斯人的自信满怀的统治,而是预示着最终摧毁城市的敌人前来的方向。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随着围城战一天天继续下去,人们对末日审判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有违常理的天气和持续不断的炮击造成的恐怖让东正教信徒确信,末日将在爆炸和黑烟中降临。敌基督将以穆罕默德二世的形象逼近城门。城内广泛流传着预示未来的梦和征兆:有个小孩看见守卫城墙的天使抛弃了自己的岗位;有人打捞到了滴血的牡蛎;一条大蛇越来越逼近,蹂躏大地;对城市造成破坏的地震和冰雹清楚地宣示“全世界的毁灭越来越近”^[3]。所有迹象都表明,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圣乔治修道院有一份预言文件,分割成方块,显示了历代皇帝,每个方块里有一位皇帝:“随着时间流逝,方块逐个被填满,他们看到,只有一个方块仍然是空着的”^[4],也就是即将由君士坦丁十一世占据的那个方块。拜占庭人有一种观念,认为时间是环形循环和对称的。第二个关于皇室的预言更印证了这种观念:建立和丧失城市的皇帝都叫君士坦丁,他们的母亲都叫海伦娜。的确,君士坦丁一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母亲都叫海伦娜。

在这种狂热的迷信气氛下,市民的斗志似乎在瓦解。城内各处不断举行代祷礼拜。不论白天黑夜,教堂内一直有人在持续不断地祈祷,只有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直空空荡荡。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看到,“所有人都聚集在上帝的神圣教堂内,哭泣、抽噎、举起双臂向苍天呼吁,恳求上帝的恩典”^[5]。对东正教徒来说,祈祷也是城防工作的关键部分,和每天夜里搬运石头和树枝去修补工事一样重要。祈祷能够支撑起环绕城

市的神佑的能量场。更乐观的人记起了一系列相反的预言：圣母马利亚亲自保佑着君士坦丁堡，而且真十字架的遗迹就在城内，所以它永远不可能被攻破；就算敌人打进了城，他们也顶多能前进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柱廊前，天使就会手执利剑，从天而降，将他们驱散。

尽管有这样的心理安慰，威尼斯双桅帆船在5月23日带回的坏消息还是让大家对世界末日的恐慌更加强烈，这种恐惧在满月之夜持续增强。满月之夜可能就是第二天，即5月24日，但具体的日期无法确定。在君士坦丁堡市民的心中，月亮有着一个特殊地位。月亮会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铜制穹顶上升起，照耀着金角湾风平浪静的海面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自古代以来，月亮就是拜占庭的标志。每天夜里，月亮就像是从亚洲群山上挖出的金币，高高悬挂；月圆月缺象征着城市的古老以及它曾经经历的无止境的时光轮回——波动沉浮、永恒而不祥。人们认为地球在最后1000年中将由月亮统治，“生命将转瞬即逝，财富变幻莫测”^[6]。到5月底，人们有着一个特别的恐惧：在月亮渐满过程中，城市绝对不会失陷；但在24日之后，月亮要开始亏缺了，凶吉难卜。这个日期让群众心生恐惧。君士坦丁堡的整个预言的历史似乎即将抵达一个关键点。

因此，在等待5月24日黄昏来临时人们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和焦灼的。在一整天的狂轰滥炸之后，夜晚突然变得万籁俱寂。各方面的记载都同意，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夜，君士坦丁堡最美丽的时节，最后一缕暮光仍然在西方闪烁，远方传来海浪拍击城墙的声音。“空气清新，没有云彩，”巴尔巴罗回忆道，“天空纯净得像水晶。”^[7]但在日落之后的第一个小时，月亮渐渐升起，城墙上的瞭望者看到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景象。月亮原本应当是一轮完整的金盘，他们看到的却是“只有三天的新月，几乎看不见”^[8]。一连四个钟头，月亮一直阴沉苍白，只露出极小的月牙，然后才“一点点艰难地恢复整个圆盘，夜间的第六个小时，才形成了完整的圆形”^[9]。这次月偏食让守军感受到了预言的力量。新月

难道不是奥斯曼人的标志吗？穆罕默德二世军营上空飘扬的旗帜上就有这个新月标志。据巴尔巴罗说，“皇帝以及所有的王公贵族对这个迹象都非常害怕，但土耳其人看到这个迹象，在营地内欢呼雀跃，因为胜利似乎属于他们了”^[10]。对正在竭力维持民众士气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次日，君士坦丁堡朝廷（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十一世的鼓动下）决定再一次直接向圣母求救，以鼓舞民众。人们对圣母的超自然神力笃信不疑。她的最神圣的一幅圣像——“指路圣母像”，被认为具有神力。据说福音书作者圣路加本人创作了这幅圣像，它在历史上曾多次在成功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战争中扮演了光荣的角色。626年，阿瓦尔人攻城时，守军就抬着这幅圣像在城墙上游行。据说在718年阿拉伯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它再次拯救了城市。于是，在5月25日早上，一大群人聚集在存放圣像的神龛处——科拉神圣救主教堂（就在城墙附近），向圣母求援。指路圣母像被放在木制托盘上，由圣像协会的成员扛在肩上。悔罪的游行队伍按照传统顺序从陡峭狭窄的街道走下：最前方的引路人举着十字架；然后是摇动香炉的黑衣教士，最后是俗家信徒，男女都有，还有儿童，大家很可能是赤着脚走路的。赞礼员引导大家咏唱圣歌。令人魂牵梦萦的圣歌的四一拍音律、人们的哀恸之声、焚香的烟雾以及向佑护世人的圣母发出的传统祈祷，都在这个清晨冉冉升起。市民们一次又一次重复对神力保佑的强烈恳求：“请拯救你的城市，如你所知和所愿。你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壁垒、我们的盾牌、我们的统帅：为你的人民而战吧。”^[11]据说这次游行的具体路线由圣像自己发出的力量决定，就像占卜法杖的牵引力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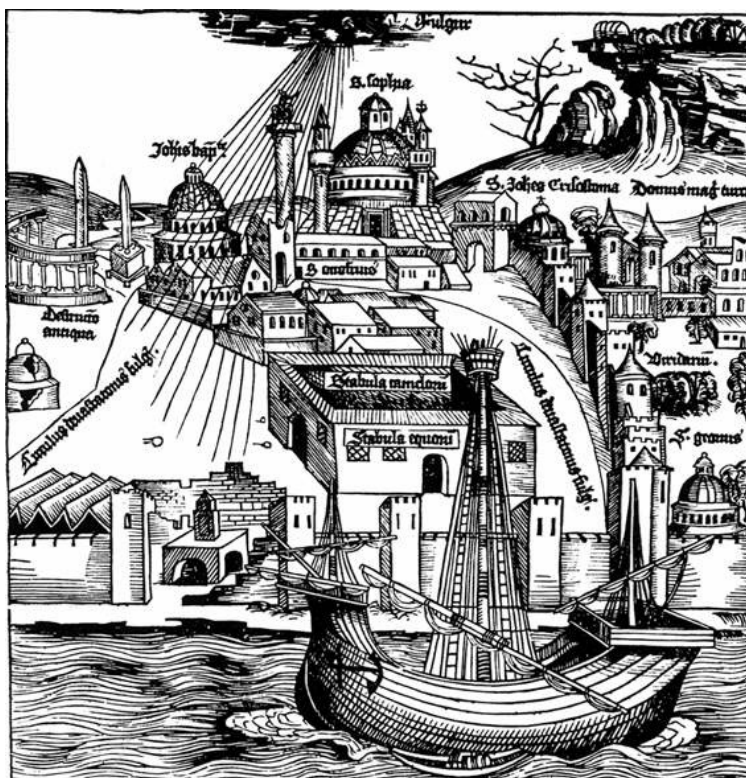
指路圣母像印章

在这种充满恐惧和虔诚的紧张气氛中，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圣像突然间无法解释、“毫无缘由、不受任何有形力量干预地从人们手中脱落，掉在了地上”^[12]。人们不禁毛骨悚然，狂喊着冲上前去，要把圣母像捡起。但它紧紧贴在地上，怎么也拿不起来，就像被铅块压在地上一样。教士和扛圣像的人叫嚷着、祈祷着努力了很长时间，想把圣像从泥地上捡起。最后圣像终于被捡了起来，但所有人都被这个不祥之兆震惊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人们战栗着重新组成了游行队伍，还没走多远，突然下起了雷暴雨。一时间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和冰雹狠狠敲打着狼狈不堪的队伍，人们“既不能站直身子，也无法前进”^[13]。圣像摇摇晃晃地停住了。洪流从狭窄的街道上猛冲下来，势头非常凶猛，几乎要把街上的孩童卷走：“跟在后面的很多孩子都面临被可怕的洪水卷走和被淹死的危险，好在有人迅速抓住他们，艰难地把他们拖出了奔涌而下的洪水。”^[14]人们不得不放弃游行。人群作鸟兽散，心里带着对此次困境的明白无误的解释。圣母拒绝听取他们的祈祷；暴雨“一定预示着万物迫在眉睫的毁灭，就像凶猛的洪水一样，它将把万物都彻底摧毁”^[15]。

第三日，人们一觉醒来，发现城市被浓雾吞没了。一丝风也没有；空气沉寂，大雾全天笼罩着城市。一切都影影绰绰、沉默、无形。这诡异的气氛让人们更加歇斯底里。似乎天气也在和守军作对，消磨他们的意志。这样不合常理的大雾只有一个解释。它表明“上帝离开了城市，

彻底背离和抛弃了它。因为上帝隐藏在云雾中，偶然露面，旋即再次消失”^[16]。将近黄昏时，空气似乎越来越浑浊，“一片黑暗开始在城市上空聚集”^[17]。还有人目睹了更奇怪的事情。最初，城墙上的哨兵看到君士坦丁堡被火光照亮，似乎敌人正在放火烧城。人们惊恐万状地跑去看个究竟，大声叫嚷，这时他们抬头去看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发现它屋顶上闪烁着一种奇怪的光。生性容易激动的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如此描绘他亲眼所见的景象：“一大团火焰从窗户顶端喷涌而出；它环绕教堂的整个颈部很长时间。火焰成了一体；它发生了变化，其光亮无法描摹。它一下子飞向天空。看见它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开始哀号，用希腊语喊道：‘上帝宽恕我们！光明飞向天堂了！’”^[18]信徒们认为，上帝显然已经抛弃了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军营，不自然的大雾和诡异的光亮对士兵们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奥斯曼人看到这些奇异景象，同样手足无措、惊恐万状。穆罕默德二世在营帐内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看到城市上空的光亮时，起初感到非常不安，于是召唤毛拉们阐释这个预兆。他们应召而来，宣称这些征兆对穆斯林的事业大吉大利：“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君士坦丁堡的末日快到了。”^[19]

第三日（可能是5月26日），教士和大臣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觐见君士坦丁十一世，表达了自己的不祥预感。他们描述了神秘的光亮，试图劝说皇帝去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对穆罕默德二世进行有效的抵抗：“陛下，请考虑关于这座城市的所有传言。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上帝给了我们这光亮，用来保护伟大的神圣教堂和这座城市。但在今夜，它离开了城市，飞往天堂。这表明，上帝的恩典和慷慨已经离我们而去：上帝想要将我们的城市交给敌人……我们恳请陛下离开城市，免得我们全都灭亡！”^[20]君士坦丁十一世情绪非常激动，再加上过于疲劳，昏倒在地，失去知觉很长时间。他苏醒后，仍然坚持己见：离开城市将令他的名字永远蒙羞；如果形势无望，他宁愿留下，与臣民共存亡。此外，他还命令他们不得在群众中传播沮丧的言论：“不要让他们陷入绝望、丧失斗志。”^[21]



“上帝佑护之城”

其他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5月26日夜间，一位名为尼古拉斯·朱斯蒂尼亚尼的威尼斯船长（他与守军的英雄人物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没有亲戚关系）驾船从铁链处溜走，在夜幕掩护下逃走了。还有一些较小的船只从马尔马拉海的海墙沿线的几个小港出航，避开了奥斯曼人的海上封锁，驶往希腊人控制的爱琴海的港口。一些比较富裕的市民躲在金角湾内的意大利船只上，认为如果最后的浩劫降临，待在意大利人的船上能给他们最好的生存机会。还有的人在城内寻找安全的避难所。大多数人对战败的后果都不抱任何幻想。

在中世纪充满神秘主义的大环境下，天象的预兆和不合情理的天气变化沉重地打击了君士坦丁堡市民的斗志，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清晰表现。其实，这些恐怖现象的真正原因在遥远的太平洋，能与人们对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最骇人的想象匹敌。大约在1453年初，澳大利亚以东1200英里处一个叫作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了大爆炸。8立方英里的熔岩被射

入平流层，其爆炸力是广岛原子弹的200万倍。这是中世纪的喀拉喀托^[22]，对全世界的天气造成了影响。火山灰被全球暴风裹挟到世界各地，造成气温下降，对从中国到瑞典的农业收成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气候原本和佛罗里达一样温和，却连续下了40天的雪。在英格兰，当时对树木年轮的记录表明它们的生长严重受挫。来自库威岛的富含硫黄的颗粒物很可能就是1453年春季困扰君士坦丁堡的不合情理的寒冷以及反复无常的大雨、冰雹、浓雾和降雪的罪魁祸首。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物还造成了耀眼的落日以及奇怪的光学现象。在5月26日笼罩圣索菲亚大教堂铜屋顶的可怖的光带很可能就是火山灰颗粒物造成的，或许还有圣艾尔摩之火（大气放电造成的闪光）的影响。就是这个奇异现象让守军以为上帝抛弃了他们（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导致的耀眼光芒令纽约人同样惊慌失措，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更发达的时代，他们更容易误以为那是失火所致，所以去呼叫消防队）。

对预兆充满狂热的不仅仅是君士坦丁堡人。到5月最后一周，奥斯曼军营也面临着士气瓦解的严重危机。在伊斯兰的旗帜之间，人们小声地表达不满。按照阿拉伯阴历，此时是当年的第5个月份，他们从海陆两路攻打城市已经长达7周。他们忍受着春季的糟糕天气，在城墙下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不知有多少惨遭踩踏的死尸被从几乎填满的壕沟处抬走。火葬柴堆的黑烟一天天在平原上空升起。但当他们从帐篷的海洋中仰望时，城墙仍然屹立；在被大炮摧毁的城墙地段，长长的泥土壁垒（顶端放置木桶）堵住了缺口，无言地嘲讽固执的敌人。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旗仍然在城墙上飘扬，皇宫上方的圣马可雄狮旗则表明，拜占庭得到了西方人的支持，援军很可能就在路上。没有任何一支身披坚甲的大军能够像奥斯曼军队这样高效地维持一场漫长的围城战。他们对军营生活的基本规则的理解远胜于任何一支西方军队。迅速焚烧死尸、保护水源、以卫生的手段处理粪便，这在奥斯曼军队里都是关键的纪律。但他们面对的困难也越来越大。据估算，在中世纪，每天需要运来9000加仑的水和30吨草料，才能维持一支2.5万人的攻城军队（这规模是攻打

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军队的三分之一）的生存。在60天的围城战中，这样一支军队还需要处理掉100万加仑的人畜尿液和4000吨固态生物垃圾。很快，夏日的酷暑将大大增加穆斯林在物质上的不便，疾病的威胁也会日益增长。奥斯曼人的决心也在一分一秒地软化。

事实上，在7周的激战之后，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人们认识到，是要决出胜负了。人们的神经已经达到崩溃的临界点。在此背景下，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斗争已经演化为穆罕默德二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维持部下士气的对决。君士坦丁十一世目睹城内斗志逐渐瓦解的同时，奥斯曼军队也神秘地遭到了类似的打击。这些事件的具体顺序和日期已经无法确定。5月23日，那艘威尼斯双桅帆船抵达城市，带回了没有任何救援舰队的坏消息；奥斯曼军队或许把这艘船当作了基督教救援舰队的前驱。次日，奥斯曼军营中迅速传播开了这个传言：一支强大的舰队正在接近达达尼尔海峡，而一支匈牙利十字军在匈雅提·亚诺什（“可怕的白骑士”）的率领下，已经渡过了多瑙河，正在向埃迪尔内进军。很可能是君士坦丁十一世把这个谣言散播了出去，希望借这最后的努力打击奥斯曼人的士气。这个谣言当即取得了很大成功。平原上蔓延着犹豫踌躇和惊慌失措的情绪。按照史学家的记载，奥斯曼士兵们想起，“很多国王和苏丹都曾有志于占领君士坦丁堡……并集结和装备了庞大的军队，但没人能抵达要塞的脚下。他们都带着满身伤痛心灰意冷地撤退了”^[23]。灰心丧气的情绪笼罩着军营。如果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的说话真实可靠的话，“土耳其人开始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苏丹”^[24]。疑虑和危机感又一次扣紧了奥斯曼统帅们的心弦，关于围城战的旧分歧也开始再次浮出水面。

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是个危急关头。如果不能占领城市，他的威望将遭到致命打击，但他的军队的时间和耐心都已经所剩无几。他必须重新赢得部下的信任，当机立断。月食给他提供了一个提高部队士气的天赐良机。前来参战的毛拉和德尔维希们的宗教热情确保了对月食的

乐观解释在军营中传播开来，但继续攻城的决定还不能轻易做出。苏丹依其固有的精明和狡猾，决定再一次向君士坦丁十一世劝降。

大约在5月23日前后，他派遣了一名使者，一个叛教的希腊贵族，名为伊斯玛仪，去向拜占庭人描绘他们可能面临的命运。他强调了他们处境的无望：“希腊人，你们已经命悬一线。那么你们为什么还不派一名使者去和苏丹讲和？如果你们把这个使命托付于我，我会妥善安排，请他向你们提出讲和的条件。否则，你们的城市将遭受奴役，你们的妻儿将被卖为奴隶，你们自己会彻底灭亡。”^[25]守军谨慎地决定对敌人的提议进行探察，但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派去了一个“身份并不高贵”^[26]的人，而不是拿一名领袖的生命去冒险。这个倒霉的人被带到了金红两色营帐，匍匐在苏丹面前。穆罕默德二世简明扼要地给出了两个选择：君士坦丁堡要么缴纳每年10万拜占特的巨额贡金；要么全城人都离开城市，“可以携带自己的财物，每个人想去哪里都可以”^[27]。这个提议被转述给了皇帝和他的议事会。赤贫的君士坦丁堡显然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贡金；放弃城市、乘船逃走的设想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他的答复是，他愿意交出除了城市之外的一切财产。穆罕默德二世反驳说，他的选择只有这么几个：举手投降、死于非命或者皈依伊斯兰教。城内的人感觉到，穆罕默德二世的和平提议没有诚意，他派伊斯玛仪来“只是为了检验希腊人的精神状态……看看希腊人对自己的处境是怎么看的，他们的位置有多安全”^[28]。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能够自己投降，就再好不过了。他是打算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首都的，如果拜占庭人能主动投降，就能保全城市；如果通过武力占领了它，按照伊斯兰教法，他就必须允许士兵们对城市自由洗劫三天。

没有人知道，当时君士坦丁堡只差一点就自行投降了。有人提出，热那亚人（他们在加拉塔的殖民地也间接地受到了威胁）向皇帝施压，让他拒绝投降，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向坚决主张抵抗的君士坦

丁十一世是不大可能去认真考虑投降的。对双方来说，要议和已经太晚了。仇恨实在是太深了。在50天时间里，双方隔着城墙互相嘲讽和残杀，在对方面前屠杀战俘，和平解决已经不可能了。对奥斯曼人来说，要么撤军，要么征服城市。杜卡斯可能把握住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答复的深层意思：“你尽可以索要贡金，不管数额多大都行，然后签署和约并撤军，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取胜。如果不这么做，你就只能失望了。我不会，任何一名市民都不会把城市交给你。我们全都宁愿死战到底，也不苟且偷生。”^[29]

如果西方援军即将抵达的谣言确实是君士坦丁十一世散布出去的，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奥斯曼人颇为踌躇，但敌人援军的威胁令他们的决策大大加快。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明确答复让奥斯曼军营内的争论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大约在次日，即5月26日，穆罕默德二世召开了作战会议来决定问题：要么放弃围城；要么继续下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这次会议的争论焦点与4月21日海上战败之后的那次危机会议相似。年迈的土耳其裔维齐尔——哈利勒帕夏再次发言。他非常谨小慎微，担心年轻苏丹的草率之举会带来恶果，并刺激基督教世界采取联合行动。他曾目睹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统治下的风云变幻，深知焦躁不安的军队的危险性。他激情洋溢地主张和平：“陛下的权威已经雄霸天下，通过和平能够比战争更有效地增加陛下的权威。因为战争的结局是难以揣测的，与它相伴的往往是灾祸，而不是繁荣昌盛。”^[30]他指出，匈牙利军队和意大利舰队都可能前来援救君士坦丁堡；他敦促穆罕默德二世向希腊人索取高额罚金，然后班师回朝。叛教的希腊人扎甘帕夏再一次坚决主张战争，指出双方兵力悬殊，而且守军力量日渐衰弱，已经接近彻底的精疲力竭。他对西方可能援救拜占庭的说法嗤之以鼻，表现出对意大利政治的了若指掌：“热那亚人分裂成好多派系，威尼斯人正遭到米兰公爵的攻击。他们都不会提供任何援助。”^[31]他感召穆罕默德二世对光荣的渴望，要求“发动一次短暂而猛烈的总攻，如果仍然失败的话，再听从陛下的发落”^[32]。其他将领，比如欧洲军的指挥官图拉汗贝伊，仍然支持

扎甘。以谢赫阿克谢姆赛丁和毛拉古拉尼为首的强有力的宗教人士集团也支持他。

辩论非常激烈。奥斯曼宫廷内两大派系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已经持续了10年，在这一刻达到了一个关键点。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对奥斯曼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但双方也很清楚，他们也是在为自己的性命而斗争。一旦他们的派系失败，他们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上绞架，要么被刽子手用弓弦勒死。最终，穆罕默德二世决定追求军事上的光荣，而刻意无视战败或者兵变的可能性。在最终做出裁决之前，他很可能派遣扎甘去巡视军营，将官兵们的态度报告给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扎甘的报告自然是毫不含糊的，他“发现”，军队斗志昂扬，摩拳擦掌地等待最终的总攻。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前思后想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确定总攻的日期吧，扎甘。让军队做好准备，包围加拉塔，让它不能帮助我们的敌人。准备工作要尽快展开。”^[33]

军营内迅速传播开了这个消息：近几天之内将准备总攻。穆罕默德二世知道他必须紧抓机遇，鼓舞部队正在衰竭的士气，为最后的总攻做好准备，并迷惑敌人。5月26日黄昏时，传令官们在帐篷之间四处奔走，呼喊发布苏丹的命令。每座帐篷前都必须点燃10只火把和篝火。“军营内所有帐篷处都点燃了两堆篝火，火势非常大，亮如白昼。”^[34]守军从城垛上惊愕和迷惑地向下俯瞰，只见火光逐渐以圆形向外扩展，遮蔽了整个地平线，从城墙前的营地一直蔓延到加拉塔周围的山地，对岸的亚洲海岸上也火光冲天。火光非常明亮，甚至可以辨认清楚各个帐篷。“这奇特的景象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杜卡斯记载道，“海面像闪电一样耀眼。”^[35]特塔尔迪回忆说：“似乎大海和陆地都着了火。”^[36]在夜空被篝火照得通亮的同时，奥斯曼人敲响了战鼓和铙钹，这声响缓慢地逐渐增强，信徒们越来越快地不断重复“真主永远无处不在，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37]。这呼喊震耳欲聋，似乎“苍穹也要被震裂”^[38]。在奥斯曼军营内，人们欢呼雀跃，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最后总

攻。城墙上的有些守军起初过于乐观地以为敌营失了火。他们争先爬上城墙顶端去观看这盛景，然后才明白那火光冲天的地平线和疯狂呼喊声的真正含义。火光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它让守军魂飞魄散，“看似半死，既不能呼气，也不能吸气”^[39]。他们起初对敌人的宗教狂热感到震惊，然后陷入了恐慌。基督徒们狂热地向圣母求救，持续不断地祷告：“救救我们吧，上帝！”^[40]很快，敌人以行动对这呼喊和火光的含义做了证实。在黑暗掩护下，苏丹大军中的基督徒士兵偷偷向城内射箭，箭上缚着的信件对即将开始的进攻做了概述。

奥斯曼军队在借着火光做总攻准备。蚂蚁般的人群冲上前去，将木柴和其他东西运到最前沿，准备将壕沟填平。大炮在此前一整天的时间内对里卡斯河谷的朱斯蒂尼亚尼的临时壁垒进行了猛烈轰击。那一天很可能就是浓雾笼罩的日子，守军已经被这可怕的征兆吓破了胆。石弹如冰雹般一刻不停地落下。防御工事上开始出现裂口。“我无法描述大炮在这一天对城墙造成的破坏，”巴尔巴罗记载道，“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心惊胆寒。”^[41]夜幕降临了，朱斯蒂尼亚尼麾下精疲力竭的士兵们准备再去修补工事，但在明亮火光的照耀下，城墙被照得透亮，敌人的炮击一直持续到深夜。将近午夜时分，篝火和火把突然间全部熄灭了，奥斯曼人狂喜的呼喊声也骤然消失，炮击也停止了，令人丧失意志的沉默统治了这个5月的黑夜。这沉默和狂欢一样令守军呆若木鸡。朱斯蒂尼亚尼和市民们继续劳作，争分夺秒地利用所剩不多的黑夜时光，抢修城墙。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城墙的逐渐崩塌迫使守军对城防安排做了一个新的小调整。过去他们常常从外围防御工事的门里杀出，发动突袭，以打乱敌人的活动。随着城墙逐渐被摧毁，被临时土木壁垒取代，从他们自己的战线发动偷袭越来越困难了。有些老人知道，皇宫下方有一个隐蔽的边门可供出击，目前是被木栅遮蔽了起来。那个地点就是狄奥多西城墙与较为不规则的科穆宁城墙相接形成的直角处。这个古老的城门被

称为“竞技场门”或“木头门”，因为它曾经通向城外的一座木制竞技场。这座小城门被坚固的城墙遮蔽，但士兵们仍然能从这里出击，对外面台地上的敌人进行袭扰。君士坦丁十一世下令将这座门的通道清理干净，继续从这里突袭敌人。另外一个古老的预言似乎已经被大家抛在脑后。669年，阿拉伯人第一次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出现了一本奇异的预言书，即所谓的《伪美多迪乌斯启示录》^[42]。在该书的很多预言中有着这样一段：“你，拜占庭，将蒙受灾祸，因为伊斯玛仪（阿拉伯）将占领你。伊斯玛仪的每一匹马都会到来，领头的那匹将在你面前搭起帐篷，然后开战，打破木竞技场门，一直走到公牛那里。”^[43]

^[1] quoted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p.167

^[2] Yerasimos, Stephane, *Les Traditions Apocalyptiques au tournant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 Paris, 1999, p.59

^[3]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129

^[4]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14

^[5]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69

^[6] quoted Yerasimos, Stephane, *Les Traditions Apocalyptiques au tournant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 Paris, 1999, p.70

^[7]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56

^[8]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6

^[9]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6

[1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26-7

[11] quoted Tsangadas, B. C. P., *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1980, p.304

[12]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8

[1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8

[14]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8

[1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p.58-9

[1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9

[17]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81

[18]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63

[19]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81

[20]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63

[21]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65

[22] 喀拉喀托是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巽他海峡中心一个岛上的火山。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大喷发，造成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都能听到爆炸声，大量的火山灰洒落到8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它引起海啸，浪高36米，造成

爪哇和苏门答腊3.6万人死亡。喀拉喀托火山于1927年再次喷发，至今仍在活动。

[2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09-10

[24]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50

[25]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p.47-8

[26]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48

[27]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48

[28]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48

[29]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86

[30]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50

[31]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50

[32]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6

[33]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50

[3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7

[35]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81

[3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81

[37]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54

[38]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8

[39]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as, Detroit, 1975, p.221

[40]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81

[41]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7

[42] 7世纪末出现的一本类似启示录的预言书，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最早用古叙利亚语写成，对穆斯林对近东的征服做出评论。因为被错误地认为是4世纪的教士奥林匹斯的美多迪乌斯所作，所以被称为《伪美多迪乌斯启示录》。它预言了世界末日，包括一位类似救世主的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的出现。

[43] quoted Yerasimos, Stephane, *Les Traditions Apocalyptiques au tournant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 Paris, 1999, p.157

13.“铭记这一天！”

1453年5月27～28日



这些磨难是真主有意为之。伊斯兰的利剑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忍受这些磨难，我们就不配圣战者的名号，在最终审判日将会羞于站在真主面前。[\[1\]](#)

——穆罕默德二世

塞尔维亚史学家“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讲述了一个关于穆罕默德二世征服手段的传说。按照他的说法，苏丹召集了王公贵族，命令“抬来一张巨大的地毯，铺在大家面前，然后在它的中心位置放了一个苹果，然后给大家说了一个谜语：‘你们当中谁能够不踩到地毯就拿到苹果？’他们就商议起来，想这怎么能办得到呢，没有一个人能想出办法来。穆罕默德二世自己走到地毯前，双手抓住地毯，把它卷了起来，一边卷一边往前走；然后他拿到了苹果，又把地毯原样展开”。[\[2\]](#)

穆罕默德二世现在认为夺取胜利果实的时机已经成熟。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最后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苏丹希望能够通过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一举将守军打垮，就像摇摇欲坠的城墙在炮火下终于倒塌一样。君士坦丁十一世通过间谍，或许还从哈利勒本人那里得知，如果他们能

熬过这次攻势，奥斯曼军队一定会撤退，庆祝胜利的教堂钟声就一定会响起。双方的统帅都在为最后决战竭尽全力。

穆罕默德二世开始疯狂地忙碌。在战役的最后几天内，他似乎一刻不停歇地四处奔走，骑马在部队里穿梭，在金红两色营帐内接见部下，鼓舞士气，发布命令，许诺奖赏有功之臣，威胁严惩作战不力者，亲自监督最后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让全体将士都看到他。帕迪沙阿的亲临现场激励了士兵们的斗志，让他们准备好去战斗和死亡。穆罕默德二世知道，这就是他命运的关键时刻。光荣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否则就是不可想象的失败。他决心亲自监督每一个细节，战备工作务必做到尽善尽美。

5月27日（星期日）早上，他命令大炮再次开火。这次炮击很可能是整个战役中最猛烈的一次。一整天时间里，大炮持续轰击着城墙中段，目标是打开一个足够宽的缺口，以便发动大规模进攻，并阻止守军进行有效的维修。巨大的花岗岩炮弹锤击城墙三次，才将相当长一段城墙打倒。在光天化日之下，再加上奥斯曼人的火力非常凶猛，守军根本无法进行抢修，但奥斯曼人此时也没有尝试进攻。巴尔巴罗说，整整一天时间，“他们炮击可怜的城墙，把很多段城墙炸塌，有一半城墙严重受损。除了炮击之外，他们什么也没做”^[3]。缺口越来越大，穆罕默德二世确保守军的抢修工作越来越困难，守军在总攻之前得不到任何喘息之机。



城市废墟：赛马场残迹与城市的空旷区域

白天，穆罕默德二世在他营帐外召集了军官会议。所有的各级指挥官都聚集在此，聆听苏丹的训示。“行省总督、将军、骑兵军官、军长、高级指挥官，以及千夫长、百夫长或五十夫长、近卫骑兵、船长、舰队司令，全都到场。”^[4]穆罕默德二世向听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君士坦丁堡神话般的财富，现在这财富已经触手可及：皇宫和宅邸中藏匿的黄金，教堂内的还愿财物和“用黄金白银、宝石和无价珍珠制成的”^[5]圣物，可供换取赎金、占为己有或者奴役的贵族、美女和男孩，还有美丽的高宅大院和花园将供他们居住和享用。他不仅强调了占领世界上最著名城市将带来的不朽荣耀，还指出了攻克它的必要性。只要君士坦丁堡还在基督徒的手中，就一直对奥斯曼帝国构成明显的威胁。将它占领之后，就可以把它作为新的征服战争的跳板。他认为，当前的任务是非常轻松的。陆墙已经严重受损，壕沟已经被填平，守军所剩无几而且士气低落。他还特意贬低了意大利人的决心，因为意大利人参加守城对他的听众来说仍然是个心理障碍。几乎可以肯定（尽管希腊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没有提及这一点），穆罕默德二世还强调了圣战的意义：伊斯兰世界对君士坦丁堡的长久渴望、先知的圣训以及殉教的诱惑。

然后他阐述了具体的战术安排。他相信，守军已经被持续不断的炮击和小规模厮杀拖得精疲力竭。事实的确如此。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

以用兵力优势压倒对方了。部队将分成若干批，轮番进攻。一支队伍疲劳之后，另一支将迅速替换它。他们将用一波波的生力部队轮番猛攻，直到疲惫的守军支撑不住。需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刻也不停歇：“我们开战之后，战斗将一刻不停，不睡觉、不吃喝、不休息，不做任何停顿，持续地向敌人施压，直到战胜他们。”^[6]他们将做好协调，从各个地段同时发起进攻，让守军无法调兵遣将去救援特别危险的地点。虽然苏丹作了慷慨陈词，但无休止的进攻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实践中，全面进攻是有限制的，压缩在几个小时之内。顽强的守军能够给猛冲上来的进攻方造成严重损失；如果进攻方不能迅速压倒守军，撤退就不可避免。

每位指挥官都收到了具体的命令。双柱港的舰队将包围城市，牵制住海墙上的守军。金角湾内的战船将协助架设金角湾上的浮桥。浮桥架好之后，扎甘帕夏的部队将从泉源谷开进，进攻陆墙的末端。卡拉加帕夏的部队将攻打皇宫附近的城墙。在陆墙中段，穆罕默德二世、哈利勒和近卫军将进攻里卡斯河谷的破损城墙和土木壁垒，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段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右翼，伊沙克帕夏和马哈茂德帕夏将尝试攻打通往马尔马拉海的那段城墙。苏丹特别强调确保部队严守纪律。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服从命令：“长官命令他们安静地前进时，他们必须一声不吭；命令他们呐喊时，他们必须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怒吼。”^[7]他重申了此次进攻如果取胜对奥斯曼民族未来的重大意义，并许诺将亲自指挥战役。于是，他解散了与会的军官们，让他们各自返回自己的部队。

随后，在头戴显眼的白头巾的近卫军卫兵护卫下，苏丹策马巡视了军营。传令官也伴随着他，大声宣布攻势即将发动。在帐篷的海洋中呼喊出的消息点燃了士兵们的激情。攻克城市后，士兵们将按照传统得到奖赏：“你们知道，在亚洲和欧洲还有很多空缺的总督职位。最好的职位将被赏赐给第一个冲过敌人木栅的人。我将给他应得的荣耀，用高官

厚禄报答他，让他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无比幸福。”^[8]奥斯曼军队在发动所有主要战役之前都会向官兵们许诺等级不同的荣誉，以鼓励大家奋勇直前。同时还有相应的惩罚的威胁：“但如果让我看见有人躲在帐篷里，不去城墙下作战，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9]奥斯曼军队在征服战争中的这种激励手段保证了特别英勇的表现会得到相应的荣誉和利益，以此激发士兵的斗志。苏丹的传令官们在战场上督战，直接向苏丹本人汇报，以执行奖惩制度。他们对某名士兵的英勇表现的记录能够使这个幸运儿当场得到晋升。士兵们知道，伟大的行为会得到奖励。

穆罕默德二世在这方面更进一步。他宣布，既然君士坦丁堡没有投降，那么按照伊斯兰教法，破城之后，士兵们可以自由劫掠三天。他以真主之名，“以四千先知，以先知穆罕默德，以他父亲与儿女的灵魂，以他佩戴的宝剑的名义起誓，他会把城市的一切赏赐给士兵们，包括所有男女市民，所有财物和地产。他将信守这个誓言，绝不违逆。”^[10]

对象征着无尽财富和奇观的红苹果的憧憬，是游牧劫掠者灵魂的直接诉求，是马背上的民族对城市财富渴望的一个原型。在绵绵春雨中吃苦受累7周之后，士兵们一定已经对红苹果望眼欲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想象中的富得流油的城市其实并不存在。穆罕默德二世描绘的无比富庶的君士坦丁堡早在两个半世纪前就被基督教十字军洗劫一空。它的神话般的财富、黄金饰品、镶嵌珠宝的圣物在1204年的灾难中大部分已经流失，被诺曼骑士们熔化或者和青铜骏马像一起被运到了威尼斯。1453年5月的君士坦丁堡已经一贫如洗，先前的光辉只剩一个缩小的鬼影，主要的财富就是它的人民。“曾经是智慧之城，如今是废墟之城，”^[11]真纳迪奥斯如此描述奄奄一息的君士坦丁堡。少数富人可能在自家宅邸藏匿了一些黄金，教堂内还有一些贵重物品，但奥斯曼士兵们仰望城墙时憧憬的阿拉丁传说般的巨大财富早已不复存在。

不管怎么说，苏丹的宣讲还是让聆听的士兵们陷入了狂热的兴奋。

他们的高声呼喊传到了在城墙上观察的守军耳边。“哦，如果你听到他们的声音飞向天堂，”莱奥纳德记载道，“你一定会呆若木鸡。”^[12]穆罕默德二世或许并不愿意承诺放纵士兵劫掠，但为了彻底赢得嘟嘟哝哝的士兵们的支持，他不得不这么做。他本人是希望避免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的，如果议和的话就能够保护城市。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红苹果不仅仅是可供劫掠的一堆战利品；它将成为他的帝国的中心，因此他特别希望把它完好地保存下来。因此，在许诺战利品的同时，他还发出了这样的告诫：城市的建筑物和城墙将成为苏丹本人的财产；大军进城之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破坏或摧毁这些建筑。占领伊斯坦布尔绝对不能像1258年蒙古人纵火焚烧和洗劫巴格达（中世纪最繁华的城市）那样。

总攻的日期定在第三天，即5月29日，星期二。为了激荡起士兵们的宗教狂热，消除任何负面思想，苏丹宣布，5月28日全天将被用作赎罪。人们将在白天斋戒，进行仪式化的沐浴，祈祷五次，并请求真主帮助他们占领城市。随后两夜将按照习俗点燃蜡烛。这火光、祈祷和音乐混合而产生的神秘和敬畏感对穆斯林和他们的敌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这种心理效果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与此同时，奥斯曼军营内在热情百倍地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收集了大量泥土和木柴，用来填平壕沟；制作了云梯；收集了成堆的箭矢；带轮子的防护盾被推到前沿。夜幕降临之后，城市再次被明亮的篝火环绕；对真主之名的有节律的呼唤声从营地沉稳地升起，战鼓隆隆敲响，铙钹和唢呐齐鸣。据巴尔巴罗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安纳托利亚海岸上也能听得见这喊声，“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战战兢兢”^[13]。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这一天是东正教的万圣节，但教堂也给不了慰藉，有的只是悔罪和持续不断的呼救祈祷。

这一天晚上，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部下仍然着手抢修破损的外墙，但在火光照耀下，敌人的大炮仍然持续轰鸣。守军的身形在火光下非常

暴露。按照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说法，就在这个时候，朱斯蒂尼亚尼个人的幸运开始枯竭了。在他指挥行动的时候，一块石弹碎片，可能是一发跳弹，击中了这位热那亚指挥官，穿透了他的钢制胸甲，插入了他的胸膛。他当场倒地，被抬回家中床上。

朱斯蒂尼亚尼对拜占庭人的事业具有关键意义。从1453年1月他率领700名身披闪亮铠甲的优秀士兵戏剧性地登上码头的那一天起，朱斯蒂尼亚尼就一直是防御战的标志性人物。他是自愿且自费前来参战的，“为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利益和全世界的荣耀”^[14]。他精通守城技术，作战英勇无畏，在守卫陆墙的战斗中不知疲倦，只有他一个人同时受到希腊人和威尼斯人的忠诚爱戴，他们原先对热那亚十分仇恨，但在朱斯蒂尼亚尼身上是一个极大的例外。朱斯蒂尼亚尼指挥建造的土木壁垒是一项聪明绝顶的紧急措施，对奥斯曼军队的士气造成了很大打击。按照他的同胞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的看法（尽管这说法不太可靠），穆罕默德二世把朱斯蒂尼亚尼视为主要对手，对他火冒三丈又颇为敬佩，企图用一大笔钱贿赂他。但朱斯蒂尼亚尼不为所动。在这位鼓舞人心的领袖负伤之后，守军一下子绝望起来。他们放弃了城墙的修补工作，任凭它一片狼藉。君士坦丁十一世得到消息后，“立刻丧失了决心，陷入沉思”^[15]。

午夜时分，奥斯曼人的呐喊又一次突然停息，篝火也被熄灭。沉默和黑暗骤然间笼罩了帐篷、旗帜、大炮、马匹、战船、金角湾风平浪静的海面以及破败不堪的城墙。医治负伤的朱斯蒂尼亚尼的医生们“一整夜都在为他治疗，努力维持他的生命”^[16]。市民们彻夜难眠。

5月28日，星期一，穆罕默德二世对总攻做了最后的安排。刚刚破晓他就起床，命令炮手们做好准备，瞄准城墙上已经破损的部分，当天晚些时候发布命令后，大炮就能对脆弱的守军开火。近卫骑兵和步兵部队的指挥官们应招前来接受命令，并被分为若干分队。在整个军营中，

在喇叭声的伴奏下，命令被发布出去：所有军官都必须坚守岗位，准备第二天的攻势，擅离职守者格杀勿论。

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炮火再次开始咆哮的时候，“如此猛烈，绝非尘世所能有，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炮击”^[17]。虽然炮火非常凶猛，但奥斯曼人没有发动进攻。守军可以观察到的敌人的另一项活动是收集成千上万的长梯（它们被抬到接近城墙的地方）以及大量木栅栏（它们将在士兵们爬上土木壁垒的时候为其提供防护）。骑兵的战马被从牧场带到了前沿。这是一个晚春的日子，阳光明媚。奥斯曼军营内，人们忙碌地做着准备工作：斋戒和祈祷、磨刀霍霍、检查盾牌和铠甲上的搭扣，或者休息。士兵们在准备最后攻势的时候，陷入了一种内省的思绪，所以安静了下来。这种宗教性的安静和严明的纪律让城墙上的观察者十分焦虑。有些人希望，敌人的安静说明他们在准备撤退；其他人则更为现实。

穆罕默德二世努力鼓舞部队的士气，在几天时间内通过狂热和思考的循环来调节他们的情绪，力图激发斗志，消除人们内心的疑虑。毛拉和德尔维希们在创建正确心态的工作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千上万的云游圣人从安纳托利亚高地的城镇和村庄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带来了狂热的宗教期望。他们满身尘土，在军营内来往穿梭，因为兴奋而目光灼热。他们背诵《古兰经》的相关诗节和圣训，讲述关于牺牲殉教和预言的故事。他们提醒士兵们，他们在追随阿拉伯人首次攻打君士坦丁堡时阵亡的先知友伴的脚步。这些烈士的名字被口口相传：哈兹莱特·哈菲兹、艾布·赛贝特·乌尔-安萨里、哈姆德·乌尔-安萨里，尤其是艾优卜，土耳其人称他为埃于普。圣人们低声提醒他们的听众，让先知预言成为现实的光荣使命落在了他们肩上：

先知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座城市，它的一边是陆地，两边是海洋？”他们答道：“我们听说过，真主的使者。”他说：“在易斯哈格的七万个儿子占领那城市之前，最后审判不会降临。他们抵达那里

时，不会用武器和投石机攻打城市，而是用这样的话语：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安拉至大！”然后第一道海墙会坍塌，他们说第二遍的时候，第二道海墙会垮台，第三次的时候陆墙会崩塌。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进城。^[18]

这些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话可能纯属捏造，但它蕴含的情感却是真切的。完成历史的弥赛亚式循环的使命被交给了奥斯曼大军，它将实现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各个伊斯兰民族的恒久梦想，并赢得不朽荣耀。战死者也将成为有福的烈士，升入天堂：“潺潺溪流浇灌的花园，他们将永远在那里生活，得到贞洁的配偶和真主的恩典。”^[19]这种期望令人陶醉。但在军营里也有一些人，包括谢赫阿克谢姆赛丁自己，对士兵们的真正动机有着非常务实的理解。“陛下明察，”在战役早期他曾写信给穆罕默德二世，“大多数士兵其实都是被武力胁迫才改信伊斯兰教的。为了真主之爱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是极少数。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瞥见了夺得战利品的机遇，哪怕必死无疑他们也会一头冲过去。”^[20]对于这些唯利是图的人，《古兰经》里也有鼓励的话语：“真主以你们所取得的许多战利品应许你们，而将这战利品迅速地赏赐你们，并制止敌人对你们下手，以便这战利品作为信士们的一种迹象，以便真主昭示你们一条正路。”^[21]

穆罕默德二世做了最后一次不知疲倦的巡视。他率领一支相当规模的骑兵部队前往双柱港，向哈姆扎下达关于海战的指令。舰队的任务是绕过城市，驶到海墙下的射击距离之内，牵制住该处守军。如果局势允许，可以让部分船只一直驶到滩头，派人尝试攀爬海墙，但由于马尔马拉海的海流湍急，这么做的成功概率不大。金角湾内的舰队也得到了类似的命令。在返途中，他还在加拉塔的主城门外稍事停留，命令城里的主要官员前来觐见。苏丹严厉地警告这些官员，次日不得向君士坦丁堡提供任何援助。

下午，他再次骑马巡视全军，走过两段海岸之间的4英里路程，鼓舞士兵，与一些军官交谈，呼唤他们的名字，激励他们奋勇作战。他重

申了“胡萝卜和大棒”的承诺：英勇作战就能得到重赏，抗命不遵就要遭到可怕的惩罚。苏丹命令士兵们不折不扣地坚决服从军官们的命令，否则格杀勿论。最严厉的言辞可能是说给扎甘帕夏麾下被强迫参战因而很不情愿的基督徒士兵听的。他对各项准备工作感到满意，于是返回营帐休息。

在城内，守军也在做他们的准备工作。虽然君士坦丁十一世和医生们忧心忡忡，但朱斯蒂尼亚尼在这一夜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对外墙的状况非常担忧，对它的防御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命人将他抬到城墙上，监督抢修工作。守军再次着手封堵城墙缺口，进展颇为顺利，直到被奥斯曼炮兵发现。很快，倾盆大雨般的炮火迫使他们罢手。朱斯蒂尼亚尼的伤情似乎恢复得不错，重新接管了关键的城墙中段的指挥权。

在其他地段，由于不同民族和宗教派别之间的摩擦，最后防御的准备工作很不顺利。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关系和互相矛盾的优先目标、粮食的严重短缺、持续劳作带来的疲惫以及炮击的震撼，都严重影响了守军的团结。在长达53天的围攻之后，守军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快要崩溃的临界点，分歧恶化成公开的冲突。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攻势而做准备的时候，朱斯蒂尼亚尼和卢卡斯·诺塔拉斯为了屈指可数因而弥足珍贵的大炮的部署发生争吵，几乎动手打起来。朱斯蒂尼亚尼要求诺塔拉斯把他指挥下的火炮交出，用于陆墙的防御。诺塔拉斯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相信海墙的防御也许会需要这些火炮。两人激烈争吵起来。朱斯蒂尼亚尼威胁要用剑把诺塔拉斯刺死。

关于陆墙的物资补给，守军内部也发生了争吵。需要在破损的城垛上堆积有效的防护物，以保护士兵免受敌人投射武器的袭击。威尼斯人开始在他们的住宅区（在金角湾附近）的木匠工坊里制作木栅。广场上收集了7辆大车的木栅。威尼斯市政官命令希腊人把这些木栅运到2英里外的城墙上。希腊人说，不给工钱就不干。威尼斯人控诉他们太贪婪。

很多希腊人的家小都在挨饿，而且对傲慢的意大利人满腹怨恨。他们需要在天黑之前弄到食物或者可以购买食物的金钱。这场争吵越拖越久，导致直到天黑之后木栅才被送到城墙上，那时已经太晚了。

这些激烈的对抗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宗教分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君士坦丁堡遭洗劫、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商业竞争：这都导致各方用贪婪、奸诈、懒惰和傲慢这些罪名互相谴责，尽管城市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在这纷争和绝望的表象之下，有证据表明，在5月28日，各方总的来讲都在为城防尽其所能。这一天，君士坦丁十一世一直在组织、恳求和鼓舞民众与来源混杂的守军（包括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精诚团结。一整天时间里，妇女儿童一直在忙碌，把石块搬上城墙，以便向敌人投掷。威尼斯市政官发出了真挚感人的恳求：“所有自称是威尼斯人的人都去陆墙，首先是为了我们对上帝的爱，其次是为了城市的利益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荣誉。希望大家全都坚守岗位，视死如归。”^[22]在港口，守军检查了铁链，所有船只排成了作战队形。在对岸，加拉塔市民们注视着最后决战的准备工作，越来越担忧。加拉塔市长很可能向市民们秘密发出了最后一次召唤，请他们偷偷穿过金角湾去加入君士坦丁堡的守军。他现在认识到，他治理下的热那亚飞地的命运取决于君士坦丁堡的存亡。

和奥斯曼军营的平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君士坦丁堡非常吵闹。一整天时间里，教堂钟声此起彼伏，锣鼓齐鸣，召唤人们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前几天的可怕预兆之后，人们更加卖力地持续祈祷、举行礼拜仪式和向上帝呼救。5月28日早上，这些宗教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城内基督徒和城外平原上穆斯林的宗教狂热棋逢对手。这天清晨，由教士、男女群众和儿童组成的盛大游行队伍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外集合。城里所有的最神圣的圣像都被从神龛和小教堂内取出。除了在上一次游行中遭遇凶兆的指路圣母像之外，他们还搬出了圣徒遗骨、包含真十字架碎片的镀金和镶嵌宝石的十字架，以及一系列其他圣像。身穿锦缎法衣的主

教和教士们领头，普通信徒跟在后面，赤足行走以示悔罪，哭泣着，捶击自己的胸膛，请求宽恕他们的罪孽，并加入圣歌合唱。游行队伍穿过城市，沿着陆墙全线行进。在每一个重要阵地，教士们都诵读古老的祷词，恳求上帝保护城墙，把胜利赐予忠实于他的人民。主教们举起他们的权杖，为守军赐福，用捆扎成束的晒干的罗勒草向他们抛洒圣水。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斋戒日，要一直坚持到日落。宗教是鼓舞守军士气的终极手段。

皇帝本人很可能也参加了游行。游行结束后，他召集了最重要的贵族和城内各个派系的指挥官，最后一次号召大家精诚团结、奋勇作战。他的演讲和穆罕默德二世的讲话很类似。莱奥纳德大主教在场聆听了皇帝的演讲，并做了记载。君士坦丁十一世轮流向每一个派别讲话，感召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信仰而战。首先他向自己的人民——城内的希腊居民讲话。他赞扬他们在此前53天内为保卫家园而做的顽强斗争，并请求他们不要害怕“邪恶的土耳其人”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发出的狂野呼喊；希腊人的力量在于“上帝的保佑”，但也在于他们优越的甲冑。他提醒他们，穆罕默德二世撕毁了先前的和约，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修建要塞，同时“侈谈和平”，实际上却挑起了战争。他号召希腊人为了家园、宗教信仰和希腊的未来而战；提醒他们，穆罕默德二世妄图占领“君士坦丁大帝的城市、你们的家园、基督教难民和所有希腊人的避难所，还要把上帝的神圣教堂改为马厩，对它们进行可耻的亵渎”^[23]。

接着，他先后向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发表演说，赞扬他们的勇气和对城市的忠诚：“你们的很多伟大和高贵的勇士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光荣，你们把它视为自己的城市。现在斗志昂扬地迎接新的斗争吧。”^[24]最后他向所有战士讲话，恳求他们坚决服从命令，最后用世俗和天堂的荣耀来鼓舞大家，几乎和穆罕默德二世做的一样：“谨记在心，今天是你们的光荣之日，如果你们在这一天哪怕只洒了一滴血，也会得到烈士的冠冕和不朽的荣耀。”这些言辞对听众产生了预料之中的效果。在场

的所有人都被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演讲振奋起来，发誓坚决地抵抗即将到来的进攻，“若上帝开恩，我们或许能获胜”^[25]。似乎他们都决心捐弃前嫌，携手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战。然后他们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岗位。

事实上，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朱斯蒂尼亚尼很清楚，他们的兵力已经非常稀少。在7周的消耗战之后，最初的8000名士兵现在可能锐减到了4000人，防线全长却足有12英里。穆罕默德二世告诉他的部下，在某些地段，“每座塔楼只有两三人防守，相邻两座塔楼之间的城墙上也只有两三人”^[26]。这个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金角湾海岸长约3英里，只有500名本领高强的弩手和弓箭手把守。而泉源谷处的奥斯曼战船以及从浮桥上调来的陆军部队都可以攻击这一地带。在铁链远方、海墙外围的防线有5英里长，每座塔楼上只有一名受过训练的弓箭手、弩手或火枪兵，负责支援的是一群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市民和僧侣。海墙的某些地段被分配给了特定的人群：克里特士兵把守着某些塔楼，一小群加泰罗尼亚人防守着另外一些。觊觎奥斯曼皇位的奥尔汗王子（穆罕默德二世的叔叔）负责防守俯瞰马尔马拉海的一段城墙。他的部下肯定会死战到底，是无论如何不能投降的。但总的来讲，马尔马拉海的海流能够对海墙起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所有抽调出来的兵员都被送往陆墙的中段。所有人都洞若观火，奥斯曼人最集中最猛烈的攻击一定在里卡斯河谷、罗曼努斯门和查瑞休斯门之间，那里的部分外墙已经被炮火摧毁。总攻前的最后一天，守军对此处的土木壁垒尽可能做了抢修，并派遣部队来增援。朱斯蒂尼亚尼负责防守陆墙中段，他手下有400名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军队的主力，一共有2000人左右。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指挥部也设在这个地段，以确保全力支持。

到下午三四点钟，守军可以看见敌人在城墙外集结。这是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太阳正在西沉。在城外的平原上，奥斯曼军队开始排兵布阵，分为若干个团，不断旋转，升起战旗，遮蔽了两段海岸之间的地平线。在最前锋，士兵们继续填充壕沟；大炮被推到离城墙尽可能近的地

方；士兵们还在继续收集登城器械。在金角湾内，被通过陆路搬运入海的80艘奥斯曼战船正在准备将浮桥架设到接近陆墙的地方。在铁链之外，舰队主力正在哈姆扎帕夏指挥下包围城市，经过卫城，绕过马尔马拉海海岸。每艘船上都运载着士兵、投石机和长度与城墙高度相当的梯子。城墙上的人坐下来等待，因为他们还有一些时间。

下午晚些时候，寻求宗教慰藉的君士坦丁堡市民在5个月以来第一次聚集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遭受东正教信徒抵制的光线昏暗的大教堂此时挤满了人，他们焦躁、懊悔、狂热。自1064年夏天以来，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第一次在城内共同祈祷。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400年的宗教分裂和十字军东征造成的仇隙被搁置到了一边，双方共同参加了求救的礼拜。查士丁尼建造的巨大教堂已经经历了1000年的风风雨雨，此时在神秘的烛光下，回荡着礼拜仪式此起彼伏的祈祷声。君士坦丁十一世亲自参加了礼拜。他坐在祭坛右侧的皇座上，满腹热诚地领取圣餐，“跪倒在地，恳求上帝大发慈悲，宽恕他们的罪过”。然后他向教士与群众道别，向四面八方鞠躬致意，离开了教堂。根据热诚的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记载，“在场的所有教士和群众一下子全都哭喊起来。妇女儿童发出哀号和呻吟；我相信，他们的声音直达天堂”^[27]。所有的指挥官都返回了自己的岗位。部分平民留在教堂内，参加守夜。还有的人躲藏了起来。有人躲进了地下巨型蓄水池的充满回音的黑暗之中，乘坐小船在柱廊间漂浮。在地面上，查士丁尼皇帝仍然骑着他的青铜马，霸气十足地指向东方。

落日之后，斋戒了一整天的奥斯曼士兵开始进食，为这一夜做准备。战前最后一餐是加强团结和视死如归精神的又一良机。士兵们围坐在集体大锅周围，点燃了篝火和蜡烛，火光比前两天夜里更大一些。传令官们在笛子和号角伴奏下又一次在军营中穿梭，重申许诺富足生活和幸福死亡的双重信息：“穆罕默德的孩子们，欢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会俘虏很多基督徒，我们会把他们全都卖作奴隶，两个奴隶卖1杜卡

特，我们都会发大财，全身珠光宝气！我们要用希腊人的胡须做拴狗的绳子，他们的妻小都将成为我们的奴仆。鼓起勇气，准备好，为了对我们的穆罕默德的爱，视死如归！”^[28]一种狂热的喜悦席卷了整个营地，士兵们兴奋的祈祷声缓缓地升起，力度渐渐增强，如同惊涛骇浪。这光亮和有节律的呼喊声让等待中的基督徒毛骨悚然。黑暗中，奥斯曼人又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炮击，如此猛烈，“在我们看来有如地狱”^[29]。午夜时分，沉默和黑暗又笼罩了奥斯曼军营。士兵们“携带所有武器和堆积如山的箭”^[30]，秩序井然地走向各自的岗位。即将到来的激战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梦想着殉道的光荣和触手可及的黄金，一声不吭地等待着最后总攻的讯号。

万事俱备。双方都深知，次日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双方都做了精神上的准备。巴尔巴罗当然相信，基督教的上帝将最终决定战局发展。据他说，“双方都向自己的神祈祷胜利，他们向他们的神祈祷，我们向我们的神恳求。我们在天上的圣父和圣母一起决定，谁将在这场战役中取胜，这将在第二天揭晓”^[31]。根据萨阿德丁（Sad-ud-din）的记载，奥斯曼军队“从黄昏到黎明，摩拳擦掌，殷切求战.....将最值得嘉许的工作联合起来.....彻夜祈祷”^[32]。

这一天的故事还有一点补充。根据乔治·斯弗朗齐斯的一本史书，这天夜里，君士坦丁十一世骑着他的阿拉伯母马在昏暗的街道上奔驰，深夜才返回布雷契耐皇宫。他召集了所有佣人和内廷人员，恳求他们的宽恕。在得到谅解后，“皇帝再次上马，我们离开了皇宫，开始沿着城墙巡视，督促哨兵们提高警惕，不要睡觉”^[33]。他们检查了所有的岗位，发现一切正常，所有城门都已经安全地封闭。在第一次鸡鸣时，他们爬上了卡里加利亚门处的塔楼（从这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平原和金角湾），观看敌人在黑暗中的准备工作。他们可以听到带轮子的攻城塔在黑暗掩护下嘎吱嘎吱地接近城墙，长长的梯子被拖过遭到炮击的地域，很多士兵在忙着填充破损城墙脚下的壕沟。在南面，闪闪发光的博

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上，可以远远地看到大型桨帆船的轮廓，它们像幽灵一般驶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巨大穹顶远方的阵地。在金角湾内，较小的弗斯特战船正在海峡上架设浮桥，并逼近城墙。这对经历了无数磨难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是个百感交集和引发内省的时刻。这位高贵的皇帝和他的忠实朋友们站在外墙塔楼上，听着敌人为最后总攻紧张忙碌，周遭的世界一片黑暗，决定命运的时刻尚未降临。这幅图景令世人难忘。一连53天，他们的微弱兵力挫败了无比强大的奥斯曼军队；他们抵挡住了史上最大的大炮在中世纪发出的最猛烈的轰击（消耗了约5000发炮弹和5.5万磅火药）；他们击退了三次大规模进攻和十几次较小的突袭，杀死了成千上万奥斯曼士兵，摧毁了敌人的许多地道和攻城塔；他们在海上与敌人激战，进行突袭与和平谈判，并不懈地消磨敌人的斗志。他们或许不知道，其实他们已经非常接近胜利。

这幅景象在地理和具体细节上是准确无误的；最高城墙上的哨兵完全可以听得见城墙下奥斯曼军队在黑暗中的活动，也能够俯瞰范围广大的陆地和海洋，但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斯弗朗齐斯是否真的在那塔楼上，我们无从得知。这段记述很可能是虚构的，在100年后由一位因擅长伪造史料而闻名的教士捏造。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5月28日的某个时间，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大臣们挥泪辞别，斯弗朗齐斯对这一天及其意义有着不祥预感。他和皇帝是一生的挚友。斯弗朗齐斯对他的主公忠心耿耿，这种忠诚在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岁月里围绕皇帝的那群人中是非常罕见的。23年前，在帕特拉斯^[34]的围城战中，他曾救过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性命。他曾负伤被俘，戴着脚镣在遍地虫豸的地牢里苦熬了一个月才被释放。31年间，他为皇帝无数次出使外邦，包括花了3年时间在黑海周边为皇帝寻找一位妻子（最后徒劳无功）。作为回报，君士坦丁十一世任命斯弗朗齐斯为帕特拉斯总督；斯弗朗齐斯结婚时，皇帝本人担任他的傧相，还做了他的孩子们的教父。在围城期间，斯弗朗齐斯承担的风险比其他很多人都更大，因为他的家人还在城内。5月28日，不管这两人是在何时道别的，斯弗朗齐斯心里一定是充满了不祥预感。两

年前的这一天，他远离君士坦丁堡，曾经有过一个预感：“1451年5月28日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好像回到了城里；我匍匐在地，正要亲吻皇帝的脚时，他拦住了我，扶我起来，亲吻了我的眼睛。然后我就醒了，告诉睡在我身边的人：‘我刚做了这样一个梦。铭记这一天吧。’”^[35]

^[1] quoted Inalcik, Halil,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1973, p.56

^[2] Mihailovich, Konstantin, *Memoirs of a Janissary*, trans. Benjamin Stolz, Ann Arbor, 1975, p.145

^[3]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9

^[4]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59

^[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1

^[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2

^[7]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3

^[8]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p.48-9

^[9]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49

^[10]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54

^[11]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355

[1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156-8

[13]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9

[1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1

[15]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75

[16]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77

[17]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60

[18]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85

[19] *Koran, The*, trans. N. J. Dawood, London, 1956, p.44

[2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02

[21] *Koran, The*, trans. N. J. Dawood, London, 1956, p.361

[22]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0

[23]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56

[24]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58

[25]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35

[26]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p.61-2

[27]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87

[28]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9

[29]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56

[30]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9

[31]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9

[32]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27

[33]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74

[34] 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城市。

[35]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61

14.紧锁的城门

1453年5月29日凌晨1点30分



战争的胜负没有任何确定性，即便拥有了决定胜利的装备和兵力优势，也未必能取胜。战争中的胜利和优势取决于幸运和偶然。^[1]

——伊本·赫勒敦，14世纪阿拉伯史学家

5月28日（星期一）天黑时，对陆墙的炮轰已经持续了47天。穆罕默德二世渐渐地将炮火集中到了三个地点：在北段，布雷契耐皇宫和查瑞休斯门之间；在中段，里卡斯河周围；在南段，朝向马尔马拉海方向的第三军用城门。这些地段的城墙都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所以在战前动员的时候，苏丹能够夸张地对指挥官们说，“壕沟已经被填平，陆墙的三个地点已经被摧毁，不仅你们这样的轻重步兵，甚至马匹和全副武装的重骑兵也能轻易地冲杀进去”^[2]。事实上，双方都早已心知肚明，集中攻势将会聚焦在一个地点，也就是陆墙中段，圣罗曼努斯门和查瑞休斯门之间的低浅山谷处。这里是整个防御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穆罕默德二世的最强大火力就消耗在这里。

在总攻前夜，外墙上已经有九个较大的缺口，有的缺口长达30码，大部分缺口都在山谷处，朱斯蒂尼亚尼的部下用木栅一点一点地把这些

缺口封堵了起来。朱斯蒂尼亚尼就是这样用临时拼凑的土木壁垒堵住城墙坍塌造成的漏洞的。这种临时壁垒的框架是连接在一起的木梁和倒塌的城墙的石填料，再加上所有手头能找得到的材料：木柴、树枝、成捆的芦苇和碎石，并用泥土填充空隙。与石制城墙相比，这种工事能够更好地吸收炮弹的冲击力。渐渐地，这种土木壁垒显然被堆砌到与原先的城墙一般高度，其顶端也足够宽阔，可以作为很好的作战平台。工事顶端放置装满泥土的木桶和柳条筐作为城垛，为守军提供防护，奥斯曼军队进攻时的首要目标就是拆除这些临时城垛。自4月21日以来，维护土木壁垒一直是守军的当务之急。士兵和平民都一刻不停地拼命劳作，对它进行修补和扩建。参加劳动的有男有女，有儿童，还有僧侣和修女，他们把石头、木料、成车的泥土、树枝和砍下来的葡萄藤搬运到前线。工事遭破坏和抢修显然是一个无休无止的循环，令人精疲力竭。在敌人的炮火和进攻下，他们不分昼夜，不管日晒雨淋，一发现缺口就立马去填补。临时壁垒代表着全城人的集体力量，在朱斯蒂尼亚尼的指挥下，它回报了人们的辛劳，阻挡住了敌人的每一次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士气。

5月28日，春光明媚。下午晚些时候，守军的核心部队在临时壁垒后摆开了阵势。根据杜卡斯的记载，此处有“3000名拉丁人和罗马人^[3]”^[4]，包括与朱斯蒂尼亚尼一同前来的700名精锐意大利士兵的余部、威尼斯桨帆船上的水手，以及拜占庭部队的主力。他们的总兵力很可能只有2000人左右。他们装备精良，身披链甲或板甲，戴着头盔，装备了五花八门的武器：弩弓、火枪、小炮、长弓、剑和钉头锤，既有从远距离扫射敌人的武器，也有在壁垒处近距离作战的兵器。另外，市民们还把大量石块以及燃烧武器（成桶的希腊火和装在罐子里的焦油）搬到了前线。士兵们通过内墙的城门进入内外两道城墙的阵地，然后沿着临时壁垒分散开来，部署到长约1000码的中墙上。内外两道城墙之间的空地宽仅20码，背后就是较高的内墙和一道临时挖出的壕沟（挖出的泥土被用来加强临时壁垒）。在据守工事的士兵们背后，只有足够的骑兵沿着

战线来回奔驰空间。整段战线上，内墙只有四个出入口：圣罗曼努斯门和查瑞休斯门旁边各有一个边门，分别在山头的左右两侧；在小山北坡中央的位置通向空地的雄壮的第五军用门；还有一个边门位置不详，朱斯蒂尼亚尼命令开凿了这个门，以方便进入城市。所有人都很清楚，胜负将在临时壁垒处被定夺，从那里无路可退。因此，守军决定在士兵们进入阵地之后，就把他们背后的几个边门全都锁死，钥匙被托付给他们的指挥官。官兵们将背靠内墙，死战到底。夜幕降临，他们安静下来等候敌人的进攻。黑暗中下起了瓢泼大雨，但奥斯曼军队仍然在把攻城装备运往前线。后来，朱斯蒂尼亚尼进入了阵地，然后是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最亲信的贵族们：西班牙人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皇帝的堂弟西奥菲勒斯·帕里奥洛格斯和对皇帝忠心不二的战友约翰·达尔马塔。他们在临时壁垒和城墙后等待敌人进攻的最初迹象。加拉塔市长曾宣称“必胜无疑”^[5]，虽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么乐观，但大家对挡住这最后一次暴风骤雨还是颇有信心的。

凌晨时分，奥斯曼军队已经准备就绪。在营帐的黑暗中，穆罕默德二世做了例行的小净和祈祷，恳求真主把城市交给他。他本人的准备工作可能包括穿上一件有驱邪神力的衬衫，它上面绣有《古兰经》的诗节和真主尊名，非常富丽堂皇，能够保护他躲避噩运。他戴上头巾，穿上长袍，腰间佩带宝剑。在主要指挥官的陪同下，他策马奔向前线，亲自去指挥攻势。

奥斯曼军队仔细地做好了从海陆两路同时进攻的准备，并严格执行了这个计划。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的战船已经就位；重兵云集，准备攻打陆墙沿线的各个关键地点，焦点还是里卡斯河谷。穆罕默德二世决定投入大量兵力进攻守军的临时壁垒，各支部队按照其效用和战斗力从低到高轮番上阵。他命令第一波攻击由非正规部队发起，包括征募来的普通步兵和外籍辅助兵，即为了挣得战利品而应征的训练不足的部队和被强征来的附庸国的士兵。按照巴尔巴罗的记载，第一波部队中的很多人

似乎是“被强迫参战的基督徒”^[6]；莱奥纳德则说他们包括“希腊人、拉丁人、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来自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人”^[7]。总之是种族混杂、信仰各异，而且装备也五花八门：有的人拿着弓箭、弹弓或火枪，但大多数人只有简单的弯刀和盾牌。这绝不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的作战部队，但穆罕默德二世的目标就是利用这些死不足惜的异教徒来消耗守军的力量，然后才向杀戮地带投入价值更高的部队。第一波部队从城墙北端前来，携带着云梯，准备沿着中墙全线发动进攻，特别重点进攻临时壁垒。成千上万人在黑暗中等待进攻的命令。

凌晨1点30分，号角、战鼓和铙钹齐鸣，宣告攻势开始。大炮开始轰鸣，奥斯曼军队从四面八方水陆并进。非正规部队接到了严格命令，必须稳步前进，不得喧哗。进入射程之后，他们开始射击，“弓箭手、弹弓手开始发威，大炮和火绳枪射出铁制或铅制弹丸”。在第二道命令发出之后，他们向前狂奔，跑过被填平的壕沟，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手执标枪、长枪和长矛”冲向城墙。守军早已严阵以待。非正规部队尝试爬墙的时候，基督徒们把他们的云梯推开，向工事脚下拼命攀爬的敌人投掷火把、倾倒滚油。在黑暗和混乱中，只能看到不甚明亮的手执火把的闪光，听到“狂喊乱叫、亵渎神明的辱骂和诅咒声”^[8]。朱斯蒂尼亚尼调集了他的人马，皇帝亲临战场也让大家斗志为之一振。守军占了上风，他们“从城垛上往下投掷大石块”，向队形密集的敌群射箭和开枪，“很少有人能逃生”^[9]。跟进的奥斯曼士兵开始动摇和后撤。但穆罕默德二世决心要把他的非正规部队用到极限。他在后方部署了一队宪兵作为督战队，他们用棍棒和皮鞭把后退的士兵驱赶向前。在宪兵的背后还有一队手执弯刀的近卫军，随时准备砍倒冲过了宪兵拦截线的人。悲惨的非正规士兵们被夹在前方的火力和背后的持续压力之间，发出了恐怖的呼号，“他们无论向前还是退后都是死路一条”。他们再次转身去进攻工事，顶着劈头盖脸的火力，绝望地拼命树立起自己的云梯，却惨遭屠戮。这些死不足惜的人虽然死伤惨重，但已经达到了苏丹的目的。两个小时内，他们大大消耗了城墙上守军的体力。这时穆罕默德二世才允

许幸存者撤退、一瘸一拐地返回自己的战线。

战斗出现了一个间歇。此时是凌晨3点30分，天色仍然漆黑，但火光照亮了平原。在壁垒上，人们舒了一口气。他们获得了重组部队和抢修城墙的时间。在战线的其他地段，奥斯曼非正规部队的攻击没有这么猛烈；仍然完好的城墙令他们举步维艰。其他地段的进攻主要是牵制性的，让守军在前线都忙得不可开交，无法去接替在中墙承受极大压力的部队。守军兵力部署非常稀薄，在1英里外的使徒教堂附近的中央山岭上待命的预备队已经只剩300人。城墙上的人们向平原眺望，徒劳地希望敌人会到此为止、撤退下去，但敌人终究不会撤退。

猛力攻城时刻到了。穆罕默德二世骑马来到他右翼的安纳托利亚部队，就在圣罗曼努斯门外不远处。这些部队是装备精良的重步兵，身披链甲，作战经验丰富，纪律严明，而且充满穆斯林的圣战热情。他虽然年仅21岁，但作为苏丹，完全可以用这样平白的父亲式口吻向部落子民讲话：“前进，我的朋友和孩子们！证明你们是英雄好汉的时刻到了！”^[10]他们沿着山谷边缘前进，转身面对壁垒，以密集队形逼近，“令人胆寒地呼喊”^[11]安拉之名。根据尼科洛·巴尔巴罗的记载，他们“就像被解开锁链的雄狮一般冲向城墙”^[12]。这坚定的冲锋让守军高度紧张起来。全城教堂的钟声此起彼伏，召唤所有人到作战岗位上去。很多市民跑到城墙上去帮忙。其他人则在教堂内更加努力地祈祷。3英里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外，教士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提供支持。“他们听到钟声后，取出了圣像，走到教堂前，站在那里祷告，用十字架向全城祝福；他们热泪盈眶地诵读着：‘复活我们，天主，佑助我们，免得我们最终毁灭。’”^[13]

安纳托利亚士兵奔跑着越过了壕沟，以紧密队形向前猛冲。守军用弩弓和火炮向他们猛烈射击，“杀死的土耳其人不计其数”^[14]。但他们仍然继续推进，用盾牌抵挡冰雹般的石块和投射武器，努力强行冲到壁垒

上。“我们向他们投掷致命的投射武器，”莱奥纳德大主教写道，“向他们的紧密人群中发射弩箭。”^[15]安纳托利亚部队毕竟人多势众，成功地在壁垒上搭起了云梯。守军又把云梯推倒，很多攻击者被石块砸死，或者被滚烫的沥青烧死烧伤。有一阵子奥斯曼军队开始后撤，但很快又冲杀上来。壁垒后的守军被敌人的勇猛震惊了，这些敌人似乎被一种超越人类极限的力量驱使着拼命冲杀。这些士兵显然不需要额外的激励，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他们“全都是勇士”^[16]。“他们不断高声呐喊，更加急切地展开自己的大旗。你看到这样的野兽一定会无比震惊！他们的部队已经大部被歼，但他们仍然带着无限的勇气继续向壕沟冲锋。”^[17]安纳托利亚部队人数太多，而且地上死尸遍地，因此每一波攻击都受到了很大阻碍。士兵们互相踩踏，在其他人身上升行，形成一个人肉金字塔，拼命想爬到壁垒的顶端。有些人爬上了壁垒，向敌人疯狂地砍杀。泥土平台上爆发了肉搏战，人们互相残杀。那里空间狭窄，安纳托利亚士兵是能够击退守军，还是被抛下壁垒，取决于身体的撞击和近距离的厮杀。在壁垒脚下，人们跌跌撞撞地乱爬，呼喊，诅咒。遍地是死尸和垂死的人，到处都是被抛弃的武器、头盔、头巾和盾牌。

战局瞬息万变。“有时奥斯曼重步兵爬上了城墙和壁垒，硬往前挤，毫不动摇。有时他们又被凶猛地打退。”^[18]穆罕默德二世骑马亲临前沿，呼喊督促他们上前，有时向狭窄的缺口投入更多生力部队，以接替战死和动摇的人。他命令大炮开火。一轮轮石弹锤击着城墙，将守军和安纳托利亚士兵都打倒在地。在这个夏日的凌晨，周围一片黑暗，乱作一团，战斗的嘈杂震耳欲聋，战鼓、笛子、铙钹、教堂钟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再加上羽箭掠过的嗖嗖声、奥斯曼大炮震动大地的巨响和火枪的低沉轰鸣声，“似乎空气都被撕裂了”^[19]。刀剑狠狠地碰撞在盾牌上，发出脆响；刀锋割断喉管、箭头插入胸膛、铅弹打碎肋骨、石块砸扁头颅时的声音则低沉许多。在这些声音的背后还有更可怕的嘈杂的说话声：祈祷和战斗呐喊、鼓励的话语、诅咒、嚎叫、抽噎和濒死者的轻轻呻吟。狼烟和灰尘从前线飘过。奥斯曼士兵们充满希望地将伊斯兰

旗帜在黑暗中高高举起。手持的火把冒着烟，火光照亮了布满胡须的脸庞和甲冑。大炮开火的几秒钟内，火光一下子照亮了炮手们的身形。火枪发出的较小的火舌狠狠地撕裂夜幕；成桶的希腊火呈一个弧线越过城墙，如同金雨一般泼洒而下。

黎明前的一个小时，一门大炮发射的石弹直接命中了临时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烟尘和大炮的硝烟遮蔽了前线，但安纳托利亚士兵迅速做出反应，冲进了突破口。守军还没来得及反应，300名士兵已经冲了进去。奥斯曼军队第一次突破了守军阵地。里面杀得昏天暗地。守军绝望地重新集结，在两道城墙之间的狭窄空间内直面安纳托利亚人。显然，突破口还没大到让一大群人涌入的地步，所以300名攻击者很快被包围起来。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有条不紊地把他们全都砍成肉酱。这300人无一生还。这个局部胜利令守军士气大振，他们把安纳托利亚部队击退了。奥斯曼军队感到沮丧，第一次发生了动摇，开始撤退。这时已经是早上5点30分。守军已经一刻不停地苦战了四个钟头。

到此时为止，在其他地段，奥斯曼军队也未能取得很大进展。在金角湾内，扎甘帕夏在夜间成功架起了浮桥，不少士兵通过浮桥抵达了陆墙末端附近的海岸。与此同时，他把轻型桨帆船调到城墙近处，让船上的弓箭手和火枪兵扫射城墙上的守军。他还把云梯和木制攻城塔送到这些城墙下，试着让他的步兵爬城，但是失败了。哈利勒在马尔马拉海岸边的登陆作战同样失败了。海流湍急，船只无法停稳，再加上海墙居高临下，俯视海面，所以没有前滩能够建立桥头阵地。尽管这里的城墙守军人数稀少，有些地段只有僧侣防守，但登陆部队还是被轻易地击退或俘虏并斩首。在中墙以南，伊沙克帕夏对守军施加了一些压力，但他最精锐的安纳托利亚部队被调走去对付临时壁垒去了。在布雷契耐皇宫区域（穆罕默德二世早就认定从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入城），卡拉加帕夏的部下发动了一次对守军威胁很大的进攻。“此处的防御摇摇欲坠”^[20]，因为城墙破损严重。但负责防守此处的是来自热那亚的博基亚尔多三兄

弟，他们都是本领高强的职业军人。据莱奥纳德大主教记载，“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无论被炮火炸塌的城墙还是炮弹的爆炸，都吓不倒他们.....不分昼夜，他们始终高度警惕，用弩弓和可怕的火炮杀伐敌人”^[21]。有时他们会从竞技场门这个边门出击，袭扰敌人。卡拉加的部下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圣马可的雄狮旗仍然飘荡在黑暗笼罩下的皇宫的上方。

激战四个小时，非正规部队和安纳托利亚部队都失败了，这似乎让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恼火。不仅是恼火，他还非常焦虑。他只剩下一支生力部队了，那就是他自己的5000名精锐卫队，“这些士兵装备极其精良，英勇无畏，比其他人经验丰富得多，也更勇猛。他们是陆军的精锐：重步兵、弓箭手和长枪兵，以及被称为近卫军的部队”^[22]。他决定在敌人得到喘息之机、进行重组之前，立即把这支部队投入战场。一切都取决于这次行动；如果连他们也不能在几个小时内突破防线，战役的势头就丧失了，精疲力竭的部队将不得不撤退，围城战就算结束了。

在两道城墙之间的阵地上，守军没有任何停歇的时间。敌人的第二波攻击造成的伤亡更为严重，守军也越来越疲惫。但抵抗的斗志仍然很坚定。据克利托布罗斯说，他们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饥饿、睡眠缺乏、持续不断的战斗、伤痛和残杀、亲人在自己眼前死去或是其他任何恐怖景象，都不能让他们屈服，或者削弱他们的积极性和使命感。”^[23]事实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死战到底；没有任何人接替他们，因为没有其他部队。但意大利人在朱斯蒂尼亚尼指挥下奋战，希腊人在皇帝的注视下拼杀，这两位领袖对部队的感召力就像苏丹对奥斯曼军队那样。

穆罕默德二世知道，在攻势停顿之前，他必须趁热打铁。领军饷的士兵们奋勇作战、报效苏丹的时刻到了。他骑马向前冲，催促士兵们证明自己是英雄好汉。明确的命令发布了出去，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领士

兵们稳步推进到壕沟边上。此时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但星光已经昏暗，“黑夜逐渐让位于黎明”^[24]。他们在壕沟前停下。在那里，他命令“弓箭手、弹弓手和火枪兵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向守卫壁垒和破损外墙的守军士兵射击”^[25]。烈火的风暴席卷城墙。“枪弹和羽箭数不胜数，遮蔽了天空。”^[26]“箭雨和雪花般的其他投射武器”^[27]迫使守军低头躲在壁垒后。另一个讯号发出后，奥斯曼步兵“发出响亮而恐怖的呐喊”，开始前进，“不像土耳其人，倒像是雄狮”^[28]。他们在震天的鼓乐和呐喊声驱使下冲向壁垒。这声音是奥斯曼军队的终极心理战武器，震耳欲聋，甚至远在亚洲海岸（离他们的军营5英里）的人也能听得见。战鼓和笛子齐鸣，军官们发出呼喊和指令，大炮雷鸣般巨响，士兵们自己也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这些声音既鼓舞了他们自己的勇气，也震撼了敌人的神经，都收到了预想的效果。“他们大声呼喊，夺走了我们的勇气，在全城散布了恐惧。”^[29]巴尔巴罗如此写道。在全长4英里的陆墙全线，奥斯曼人同时发动了排山倒海的进攻。城内教堂再一次敲响警钟，非战斗人员加紧祈祷。

重步兵和近卫军“求战心切，而且状态极佳”^[30]。他们在苏丹的注视下作战，既是为了荣耀，也是为了争夺第一个登上城墙的功勋。他们坚定不移地向壁垒进发，毫不犹豫，“似乎一心要进城”^[31]，心意已决。他们用带钩的木棍拆掉壁垒顶端的木桶和木制炮塔，挖掘壁垒的框架，树立云梯，将盾牌举在头顶上，借此抵挡暴风骤雨般的石块和投射武器，同时努力往上爬。他们的军官站在后面，呼喊发布命令。苏丹本人策马走来走去，喊叫着激励大家。

在他们的对面，疲惫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再一次投入战斗。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部下，以及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全体贵族、主要骑士和最勇敢的武士”^[32]，手执“标枪、长枪、长矛和其他兵器”^[33]向壁垒推进。第一批奥斯曼宫廷卫队士兵“遭到石块的打击，倒了下去，很多人当场毙命”^[34]，但其他人冲上来接替他们。没有人动摇。很快，为了争

夺壁垒，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肉搏战，各自都意志坚定：一方是为了荣誉、真主和重赏，另一方则是为了上帝和生存。在拥挤的近距离搏斗中，可怕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他们互相嘲讽，有的人用长矛戳刺，有的人被戳，有人杀死敌人，有的被杀死，人们在怒火中互相残杀，场面极其恐怖”^[35]。在后面，大炮在发射巨型炮弹，硝烟弥漫了整个战场，有时遮蔽双方士兵的视线，有时又让他们直面对方。巴尔巴罗记载道：“这景象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36]

战斗持续了一个钟头，奥斯曼宫廷卫队进展甚微。守军寸土不让。“我们凶猛地打退了他们，”莱奥纳德记述道，“但我们的很多人现在负了伤，撤出了战斗。然而我们的指挥官朱斯蒂尼亚尼仍然屹立，其他指挥官也坚守着岗位。”^[37]这时出现了一个迹象，起初还很难察觉，然后壁垒内的守军感到奥斯曼军队施加的压力轻了一点。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扭转战局的瞬间。君士坦丁十一世把握住了这个机遇，敦促守军前进。根据莱奥纳德的记载，皇帝向士兵们喊道：“勇士们，敌人的军队正在削弱，胜利的冠冕属于我们。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继续战斗！”^[38]奥斯曼军队站不住脚，退却了。疲惫的守军找到了新的力量。

但这时发生了两件奇怪的事情，再一次扭转了战局。在战线北面半英里处，朝向布雷契耐皇宫的阵地，博基亚尔多兄弟在此之前成功地打退了卡拉加帕夏的部队，还不时地从竞技场门（隐藏在城墙一个拐弯角落里的边门）出击。这座城门将应验古老的预言。一名意大利士兵出击归来之后，忘了把背后的边门关上。天色越来越亮，卡拉加的一些士兵看到了这座敞开的城门，蜂拥而入。50名士兵通过阶梯冲上了城墙，把那里的守军打得措手不及。有些士兵被砍死，其他人则选择跳墙自杀。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太清楚。冲进城的奥斯曼士兵似乎没有来得及造成很大破坏，就被守军成功地隔绝和包围了起来，但他们已经从一些塔楼上扯下了圣马可的旗帜和皇旗，换上了奥斯曼旗帜。

在南面的临时壁垒处，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朱斯蒂尼亚尼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们仍然自信满怀地坚守战线，这时噩运带来了更严重的打击。朱斯蒂尼亚尼再次负伤。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因为上帝拒绝听取他们的祈祷；对穆斯林来说，这是真主听到了他们的祈祷。对爱读书的希腊人来说，这个瞬间简直是从荷马史诗里照搬来的：按照克利托布罗斯的说法，“邪恶而无情的命运”^[39]导致了战局突然逆转，平静而无情的女神带着奥林匹斯诸神的冷漠与超然观战，这时决定拨动战争的天平，将英雄击倒在地，让他的心脏化为齏粉。

当时情况究竟如何，大家众说纷纭，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热那亚士兵在那一瞬间惊恐万状。至于随后发生的事情，各方面的记述非常支离破碎和不一致：朱斯蒂尼亚尼“身披阿喀琉斯的铠甲”，受伤倒地的具体状况有十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的右腿中箭；有人说他胸部被弩箭射中；或者说他在城墙上搏斗的时候腹部被人从下方刺中；又或者一发铅弹击穿了他的手臂后部，又穿透了他的胸甲；或者他的肩部被火枪击中；还有人说，一名友军从背后误伤了他，或者是故意刺杀他。最可能的情况是，他的上半身护甲被铅弹击穿，微小的伤口隐蔽了严重的内伤。

自围城战开始以来，朱斯蒂尼亚尼就在一刻不停地奋战，无疑已经筋疲力尽。他在前一天已经负了一次伤，第二次负伤似乎让他的精神彻底垮了。他站不住脚，伤势远比旁观者能察觉的情况要严重，于是命令士兵将他抬回到船上，接受医治。他们去找皇帝，向他索要其中一座城门的钥匙。君士坦丁十一世知道他的主要指挥官撤离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危险，恳求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军官们留在前线，直到危险过去，但他们不肯久留。朱斯蒂尼亚尼把指挥权交给两名军官，并许诺处理完伤口就回来。君士坦丁十一世不情愿地交出了钥匙。城门被打开了，朱斯蒂尼亚尼的卫兵们抬着他，来到他的停泊在金角湾的桨帆船上。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敞开的城门对其他热那亚人来说是个无法抵制的诱惑；他

们看到指挥官已经撤离，潮水般涌过城门，也跟着撤退了。

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扈从绝望地努力拦阻这人流。他们不准任何希腊人跟着意大利人离开阵地，命令他们排好队形，上前去堵住战线的缺口。穆罕默德二世似乎感受到了守军的松弛，集中兵力发动了又一次进攻。“朋友们，我们必胜！”他大喊道，“再努力一点，城市就是我们的啦！”^[40]

一群近卫军在穆罕默德二世最宠信的军官之一贾费尔贝伊率领下，高呼“真主伟大！”，向前猛冲。苏丹向他们呼喊：“冲啊，我的雄鹰们！前进，我的雄狮们！”他们听到苏丹本人的激励，又记起了在城墙上首先插旗能够得到的重赏，便奋不顾身地冲向临时壁垒。在前线有个名叫乌鲁巴特的哈桑的巨人，他高举奥斯曼大旗，在30名战友护卫下前进。他用盾牌遮住自己的脑袋，冲上了壁垒，击退动摇的守军，稳稳站立在壁垒顶端。他站在那里，高举大旗，鼓舞近卫军士兵们前进。他在那里坚持了一会儿。这位近卫军的巨人终于把伊斯兰的旗帜插到了基督教城市的城墙上，这是彰显奥斯曼人勇气的激动人心的一刻，注定要成为奥斯曼帝国神话的一部分。但没过多久，守军重整旗鼓，猛烈地投射石块、羽箭和长矛，进行报复。他们打退了那30名士兵中的一部分人，然后把哈桑团团围住，把他打倒在地，剁成肉泥。但在周围，越来越多的近卫军士兵爬上了城墙，或者从壁垒的缺口冲了进去。成千上万人就像冲垮堤岸的洪水一般，开始涌入守军的阵地，凭借兵力优势无情地将守军击退。很快，守军就被推向内墙。内墙前方有一条壕沟，是挖土修建壁垒形成的。有些人被推进壕沟，困在那里。他们没法爬出来，全部惨遭屠戮。

奥斯曼军队沿着不断扩大的战线潮水般涌入守军阵地。守军从壁垒上轰击他们，很多奥斯曼士兵被打死，但此时这股洪流已经不可阻挡。据巴尔巴罗说，15分钟内就有3万人冲进了守军阵地，“发出令人毛骨悚

然的呼喊，如同地狱一般”^[41]。同时，人们看见竞技场门附近塔楼上的奥斯曼旗帜（少数奥斯曼士兵冲到那里，插上了他们的旗帜），大喊起来：“城市失守了！”守军完全陷入了盲目的恐慌。他们仓皇失措，转身逃跑，寻找道路逃离封闭的阵地，返回城内。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的士兵们已经开始攀爬内墙，从高处向逃窜的守军射击。

可供逃跑的道路只有一条：朱斯蒂尼亚尼撤离时经过的那座小小的边门。其他门都仍然紧锁着。溃败的守军争先恐后地聚集到边门处，个个都想赶紧逃命，互相踩踏，“门前的活人堆成了一座小山，导致大家谁也逃不掉”^[42]。有些人不慎跌倒，被活活踩死。其他人则被从壁垒处以整齐队形横扫过来的奥斯曼重步兵屠杀。死尸堆积成山，更是把逃命的道路堵死。从壁垒上幸存下来的守军被斩尽杀绝。其他的每一座城门——查瑞休斯门、第五军用城门——同样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因为逃到那里的人也没办法逃离封闭的阵地。在这场令人窒息、惊慌失措、拼命挣扎的混战中，有人最后一次瞥见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身影，他最忠诚的随从仍然护卫在他身边：西奥菲勒斯·帕里奥洛格斯、约翰·达尔马塔、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根据一位不可靠目击者（几乎可以肯定，此人当时并不在场）的描述，皇帝在最后的时刻仍然奋起拼搏，最后倒地，被人群踩踏在脚下，终于从历史中消逝，进入传奇的来世。

一队近卫军爬过死尸堆，强行打开了第五军用门。他们进入城内，一部分人转向左侧的查瑞休斯门，从内部将它打开；其他人向右前进，打开了圣罗曼努斯门。一座座塔楼接二连三地飘扬起了奥斯曼旗帜。“然后大军的其他士兵凶猛地冲进城……苏丹站在宏伟的城墙前

（他的大纛和马尾旗就树立在那里）观看着周遭的景象。”^[43]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冉冉升起。奥斯曼士兵在死人堆之间前进，砍下死人和濒死者的头颅。大型猛禽在他们头顶上盘旋。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就土崩瓦解了。

[1]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2 vols., trans. Franz Rosenthal, London, 1958, p.67

[2] Kritovoulos, (in English)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Westport, 1970, p.62

[3] 此处“罗马人”是拜占庭人的自称，因为他们一直以罗马帝国自居，尽管他们主要是希腊血统。

[4]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83

[5]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42

[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0

[7]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16

[8]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6

[9]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62

[10]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7

[11] Kritovoulos, (in English)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Westport, 1970, p.67

[12]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2

[13]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60

[1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2

[15]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60

[16]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67

[17]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60

[18]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7

[19]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3

[20]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40

[21]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40

[22]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8

[2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8

[2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58

[2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8

[26]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7

[27]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8

[28]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3

[29]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3

[30]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3

[31]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3

[32]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3

[3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8

[3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60

[3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9

[36]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3

[37]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61

[38]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44

[39]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68

[40]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0

[41]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4

[\[42\]](#)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50

[\[4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0

15.一捧尘土

1453年5月29日早上6点



请告诉我，世界末日究竟是何时，又将是何等情形？人们如何才能知道，末日已经临近，已经到了门槛上？末日将有哪些迹象？这城市、新耶路撒冷将往何处去？屹立于此的神圣教堂、受尊崇的圣像、圣徒的遗迹和书籍都将何去何从？请告诉我。^[1]

——埃皮法尼奥斯，10世纪的东正教僧人，如此询问圣愚安得烈^[2]

奥斯曼军队潮水般涌入城市，他们的旗帜飘扬在塔楼上时，市民们陷入了莫大的恐慌。“城市陷落了！”的呼喊声在大街小巷此起彼伏。人们开始四散逃命。在竞技场门附近城墙驻守的博基亚尔多兄弟看到士兵们从他们的阵地旁逃过。他们纵身上马，向敌人冲杀，暂时把敌人打退了。但他们很快也认识到了局势的无望。壁垒上的奥斯曼士兵居高临下地向他们投掷武器，保罗·博基亚尔多头部负伤。他们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被包围。保罗不幸被俘，后来被杀害，但他的两个兄弟杀出了一条血路，带领他们的人马返回了金角湾。在港口处，受伤的朱斯蒂尼亚尼得知防线已经崩溃，于是“命令他的喇叭手吹响讯号，召集他的部下”^[3]。对其他人来说，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威尼斯市政官米诺托、很多显赫的威尼斯人以及离开桨帆船参战的水手们被包围在布雷契

耐宫，全部被俘虏。在陆墙南段接近马尔马拉海的地方，防御还很顽强，但那里的守军士兵很快发现自己腹背受敌。很多人被杀死；其他人，包括指挥官菲利普·孔塔里尼和德米特里·坎塔库泽努斯，都举手投降，被敌人俘虏。

一眨眼的工夫，全城就乱成了一锅粥。前线的瓦解如此惊心动魄又出人意料，很多人都手足无措。从陆墙逃走的部分士兵奔向金角湾，希望能登上那里的船只，其他人则跑向前线。一些平民被战斗的嘈杂声惊醒，主动前往城墙，去帮助部队防守，途中遭遇了第一波冲进城来、沿途烧杀抢掠的奥斯曼士兵。这些奥斯曼士兵“暴跳如雷地攻击他们”^[4]，把他们全部砍倒。最初引发屠城的是奥斯曼士兵对拜占庭人的畏惧和仇恨。他们一下子身处迷宫般的狭窄小巷内，非常迷惑糊涂和惴惴不安。他们原本期待会遇到一支顽强抵抗的大军，而绝不会相信，在临时壁垒处被击溃的2000人居然就是全部守军。与此同时，一连好多周的苦难以及希腊人从城垛上发出的嘲讽让奥斯曼人对敌人恨之入骨。君士坦丁堡曾经拒绝投降，现在必须付出代价了。奥斯曼人的大肆屠戮起初“是为了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5]。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他们手执弯刀，见人就杀，不管男女老幼、健康或是伤残”^[6]。有些市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从高处向他们抛掷砖块和铺路石……向他们投掷火把”^[7]，这可能愈发激怒了奥斯曼人。大街上血流满地，走路都打滑。

陆墙的高高塔楼上飘扬的苏丹大旗把破城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奥斯曼全军。在金角湾沿岸，守军开始逃窜，奥斯曼舰队加紧攻城，水手们将海墙上的一座又一座城门强行打开。很快，邻近威尼斯人住宅区的普拉泰亚门就被打开了，奥斯曼人的队伍开始深入城市中心。在海岸更远方，哈姆扎贝伊和马尔马拉海上的舰队也得到了消息。急于进城掳掠的水手们把战船重新开到岸边，在海墙上搭起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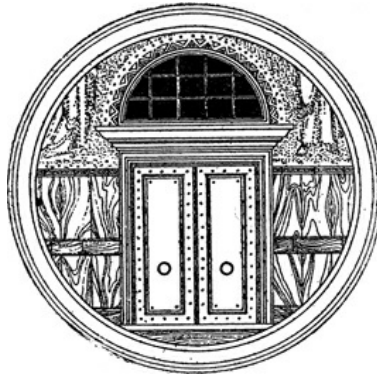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奥斯曼人进行了无区别的恣意屠杀。据哈尔

科孔蒂利斯记载，“全城各处如同屠场，大开杀戒，死尸遍地”^[8]。张皇失措的人们各投生路、寻求自保。意大利人逃往金角湾，登上船只，而希腊人则逃回家中，保护自己的妻小。有些人在半途被俘，还有人好不容易跑回家中，却发现“妻儿已经被绑架，财物被洗劫一空”。还有的人回家之后，“自己也被俘虏，和亲友妻子一起被捆绑起来、戴上镣铐”^[9]。还有很多人抢在入侵者之前回到家中，意识到投降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于是决定死战到底，保护家人。有人躲藏在地下室和蓄水池内，或者稀里糊涂地在城里游荡，等待被俘或者被杀。在金角湾附近的狄奥多西娅教堂的景象特别催人泪下。这一天恰好是圣狄奥多西娅的瞻礼日，对这位圣徒的尊崇礼拜仪式在几百年的热诚信仰中被忠实地传承了下来。教堂的正面装点着初夏的玫瑰。在教堂内的圣徒墓穴处，信徒们按照传统通宵守夜，烛光在短暂的夏夜中闪烁。第二天清晨，信徒的游行队伍向教堂走去，盲目地信任祈祷的神奇力量。他们携带着传统规定的礼物——“装饰华美的蜡烛和神香”^[10]前往教堂，在路上被奥斯曼士兵拦住并掳走。全体信徒一个也没能逃脱。拥有祈祷者供奉的大量许愿财物的教堂也横遭掳掠。圣狄奥多西娅的骨骸被丢给了野狗。在城内其他地方，很多妇女一觉醒来，发现入侵者闯入了她们的闺房。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奥斯曼军队认识到了真相——城内已经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于是他们的屠杀变得更有针对性和选择性。根据萨阿德丁的记载，奥斯曼士兵遵循了教法的训令：“屠戮他们的老人，俘虏他们的青年。”^[11]现在的重点改为活捉俘虏，作为战利品。他们开始捕猎有价值的奴隶：年轻女人、美丽的儿童。“民族、风俗和语言”^[12]五花八门的非正规部队（包括基督徒）冲在最前面，“烧杀抢掠、疯狂破坏、恣意侮辱，俘虏和奴役各色人等，不分男女老少，甚至包括教士和僧侣”^[13]。对奥斯曼军队暴行的记述大多是基督徒写下的，奥斯曼史学家的描写比较隐晦，但毫无疑问，在这一天上午，君士坦丁堡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史料中包含了一系列生动的记载，甚至总体倾向于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作家克利托布罗斯也描绘了“恐怖、凄惨、超过任何悲剧的惨

景”^[14]。妇女们被“凶暴地从卧室拖走”；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夺走；无力逃跑的老人以及“智障、麻风病人和体弱的人”惨遭“无情的屠杀”^[15]。“新生婴儿被扔到广场上。”^[16]妇女和男童遭到强暴。奥斯曼人将形形色色的成群俘虏捆成一串，“野蛮地拖走，对其大肆驱赶、厮打、羞辱、推搡，丑恶可耻地将他们驱赶到十字路口，不断侮辱和虐待他们”^[17]。幸存者，尤其是“出身贵族富户、品行端正、习惯于足不出户而不抛头露面的年轻女子”^[18]遭受的恐怖和折磨是无法想象的。有些少女和已婚女子不愿遭受这样的凌辱，宁愿投井自尽。为了争夺最美丽的少女，奥斯曼士兵发生了争斗，有人因此毙命。

奥斯曼人特别注意教堂和修道院。邻近陆墙的那些教堂或修道院，比如查瑞休斯门旁的圣乔治军用教堂、佩特拉的施洗者圣约翰教堂和科拉修道院，很快就被洗劫一空。被认为具有神力的指路圣母像被砍成四截，分给士兵们，因为它的框架非常值钱。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被砸倒；士兵们打开了圣徒墓穴，去寻找财物，墓穴内的骨骸被撕成碎片、丢弃到大街上。教堂的财物（圣餐杯、高脚杯，以及“神圣的工艺品和绣有金线、装饰着宝石与珍珠的珍贵而华美的长袍”^[19]）全被抢走，贵金属制品被熔化。祭坛被拆毁，“为了寻找黄金……教堂和圣殿的墙壁被搜了个遍”^[20]。据莱奥纳德说，“奥斯曼人在圣徒像前强暴妇女”^[21]。奥斯曼人冲进女修道院，将修女们“掳到舰队那里，恣意蹂躏”^[22]。僧侣们被杀死在各自的房间内，“在教堂内避难的僧侣被拖出去赶走，受尽种种羞辱”。奥斯曼人用铁棒撬开历代皇帝的墓穴，寻找隐藏的黄金。“暴行种种，不一而足。”^[23]克利托布罗斯悲哀地记载道。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延续1000年的基督教君士坦丁堡大体上就无迹可寻了。



圣索菲亚教堂之门

在这股汹涌洪流面前，拜占庭人手足无措，还有能力逃跑的人都想方设法逃走。很多人在本能和迷信的驱动下奔向圣索菲亚大教堂。他们记起了那古老的预言：敌人顶多能前进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柱廊前，也就是大教堂附近，复仇天使就会手执利剑，从天而降，激励城市守军将敌人赶出城市，从“西方世界和安纳托利亚驱逐出去，一直驱赶到波斯边境上一个叫做红苹果树的地方”^[24]。在教堂内，大群教士、信徒（包括妇女儿童）聚集起来，准备做晨祷，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托付给上帝。教堂的巨型青铜门被紧闭起来，并插上门闩。这时是早上8点。

城市的某些外围城区得以与敌人协商，进行集体投降。到15世纪中叶，由于君士坦丁堡外墙之内的人口急剧下降，城市的某些区域已经发展成了单独的村庄，各自有自己的城墙和木栅。其中的有些村庄，例如马尔马拉海边上的斯图狄翁和金角湾附近的渔村佩特里翁，主动献城投降，条件是奥斯曼人不得劫掠他们的住宅。每个村庄的村长被带去苏丹面前，正式投降。穆罕默德二世可能会派遣一队宪兵去保护这些村庄。根据伊斯兰的战争法则，敌人如此投降之后应当受到保护，因此一些教堂和修道院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在其他地方，仍然有小股守军进行了英勇或者说是绝望的抵抗。在金角湾沿岸，一群克里特水手顽强地据守三座塔楼，拒不投降。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在抵抗试图驱逐他们的奥斯曼士兵。在远离陆墙的海墙上，很多人仍然在继续战斗，他们

往往对真实局势一无所知，直到敌人突然从他们背后杀出。有些守军跳墙自杀，其他人则无条件投降。觊觎奥斯曼皇位的奥尔汗王子和他麾下的一小群土耳其人就没有任何选择了，他们只能死战到底。驻扎在牛狮宫^[25]附近海墙上的加泰罗尼亚人也战斗到了最后一息。

在逐渐展开的屠城和劫掠中，奥斯曼水手们做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他们看到陆军已经杀进城，害怕自己会失去抢劫的机会，于是把船开到岸边，弃船进城，“去搜寻黄金、珠宝和其他财物”^[26]。他们急着登上金角湾的海岸，对从城墙迎面逃窜而来的意大利人视而不见。这对败退的意大利人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奥斯曼人在搜寻战利品的过程中越来越疯狂。金角湾岸边的犹太人区很早就被盯上，因为这里是传统的珠宝交易地；意大利商人也是被奥斯曼人高度“青睐”的目标。战利品的搜集渐渐变得更有组织。进入某座房屋的第一批士兵会在屋外竖起旗帜，表示这座房子已经被洗劫一空。其他士兵看到这旗帜，就会去其他地方寻找。“就这样，他们到处插旗，甚至修道院和教堂上也有。”^[27]士兵们分成若干组，将俘虏和战利品运回营地或船上，然后回来继续抢劫。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幸免：“教堂、古老的地下墓穴和墓地、修道院、地下室、密室、墙壁裂缝和大小洞穴。他们还搜索了所有的隐藏角落，如果里面藏着人或者什么东西，就全都拖出来。”^[28]甚至有人偷窃堆放在军营、无人看管的战利品。

与此同时，生存斗争仍然在继续。在上午，几百名市民吉星高照，得以逃生。基辅红衣主教伊西多尔在仆人的帮助下，脱掉了自己富丽堂皇的主教袍，换上了一名阵亡士兵的衣服，又给这名死者穿上自己的主教袍。奥斯曼士兵很快遇见了这具身着主教袍的尸体，砍下头颅，举着它在大街上胜利游行。年迈的伊西多尔也很快被俘，但敌人不知道他的高贵身份，而且他年老体衰，似乎不值得贩卖为奴。于是他当场花了一小笔钱，赎回了自己的自由，登上了停泊在港内的一艘意大利船只。奥

尔汗王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身穿普通士兵的衣服，而且会讲流利的希腊语，希望能够从海墙蒙混过关。但奥斯曼人认出了他，追了上去。他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跳墙自杀。士兵们砍下了他的头颅，献给了穆罕默德二世。苏丹一直在如坐针毡地等待关于奥尔汗王子命运的消息。其他的主要贵族则被活捉。卢卡斯·诺塔拉斯和他的家人都被俘虏，可能是在他们的宫殿内被抓住的。乔治·斯弗朗齐斯和他的全家也被俘虏了。曾领导反对联合派的僧侣真纳迪奥斯在自己房间被抓获。加泰罗尼亚人一直坚持抵抗，直到全部阵亡或被俘。但奥斯曼人无法将死守金角湾附近塔楼的克里特人逐出。最后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穆罕默德二世。他做出了一个典型的堂吉珂德式的侠义姿态，允许他们乘坐自己的船只离去。犹豫一番之后，他们接受了这个提议，自由地逃离了君士坦丁堡。

对很多人来说，金角湾似乎是逃生机遇最多的地方。上午，成百上千的拜占庭士兵和平民潮水般涌过狭窄小巷，希望能登上停泊在港内的意大利船只。海墙大门处一片狼藉，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人拼命逃窜，跳上拥挤的划桨船，导致船只倾覆沉没，船上的人都被淹死。有些守门人的决定更使得这悲剧场面愈发凄惨。他们看到自己的希腊同胞逃向海滩，又记起了那个预言（在君士坦丁大帝雕像处能够击退敌人），于是决定把门封闭，希望能够借此劝说同胞们回去作战。于是他们从城墙顶端丢弃了城门钥匙，阻止难民逃跑。抵达停泊在岸边的意大利桨帆船的途径已经彻底断绝，海岸上的景象越来越悲惨。“不分男女，甚至僧侣和修女都号啕大哭起来，捶胸顿足，哀求意大利人的船只来救他们。”^[29]但桨帆船上的人也是惊慌失措，船长们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前线崩溃两个小时之后，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逃到了岸边，此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游泳去登船，要么坐等“土耳其人的狂暴”。他宁愿冒淹死的风险，于是脱去衣服，游向船只，被拉上了船。他来得正巧。回头望去，只见大约40名拜占庭士兵正在脱去铠甲，准备泅渡逃生，却被奥斯曼军队抓个正着。“愿上帝保佑他们，”^[30]特塔尔迪

写道。加拉塔市长营救了对岸的一些难民，让他们在相对安全的热那亚殖民地避难。“我冒着很大风险把木栅处的难民救到了加拉塔城内；如此恐怖的景象是闻所未闻的。”^[31]

意大利船只上的人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简直像瘫痪了一样。清晨，他们听到宣示抵抗决心的教堂钟声渐渐消逝；当奥斯曼水手驾船抵岸，冲击金角湾海墙时，呼喊声传过了海面。难民们哀求意大利船长把船开到岸边来，或者游向船只，不少人因此淹死。威尼斯人也看到了这凄惨景象，但不敢开船靠岸。他们除了害怕被敌人俘虏外，还担心大群难民蜂拥上船，会让船倾覆。另外，桨帆船的很多船员已经被派去守城，船员严重不足。但奥斯曼水手抛弃了自己的战船，加入抢劫，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难民们得到逃生的一线希望，尽管这幸运不会持续多久。意大利桨帆船舰队必须在奥斯曼海军重整纪律之前当机立断。

加拉塔人也踌躇不决、忐忑不安。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传来时，加拉塔市民陷入了恐慌。“我一直深知，一旦君士坦丁堡被攻破，加拉塔也就完了。”^[32]加拉塔市长安杰洛·洛梅利诺后来写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穆罕默德二世认为热那亚人与拜占庭合谋（大部分身强体健的加拉塔人的确在金角湾对岸参加战斗，其中包括市长的侄子），现在对热那亚人的态度还不明朗。此时加拉塔城内只有600人。很多人想尽快逃走。一大群人抛弃了家园和财产，登上了一艘热那亚船只逃跑。另外一艘船（乘员大多是妇女）被奥斯曼战船俘获。但洛梅利诺决定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坚持留下。他推测，如果他也弃城逃跑的话，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洗劫。

在这些考虑的过程中，威尼斯舰队的指挥官阿卢威克瑟·迪艾多在他的军械师和外科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陪同下乘船来到加拉塔，与市长商议对策：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舰船是否应当联合起来对抗奥斯曼军

队，两个意大利共和国共同向苏丹正式宣战；或者还是逃跑？洛梅利诺恳求他们先等一等，让他派遣一名使节去穆罕默德二世那里。但对威尼斯船长们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停船等待幸存者从遭到浩劫的城市泅渡上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考虑到准备出航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不敢再拖延下去了。迪艾多和他的伙伴们在加拉塔就能看到各艘桨帆船正准备离开金角湾，于是匆匆走过加拉塔街道，打算返回船上。他们惊恐地发现，为了阻止市民大规模逃跑，洛梅利诺已经封闭了城门。“我们左右为难。”巴尔巴罗回忆道，“我们被关在了城里，桨帆船突然开始扬帆收桨，准备起航，要把他们的指挥官丢下。”^[33]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船只准备逃离，而穆罕默德二世一定不会善待敌方舰队的指挥官。他们苦苦哀求市长放他们走。最后他终于准许开门。迪艾多等人总算及时赶到前滩，登上战船。各艘桨帆船被纤夫缓慢地拖向仍然封锁着金角湾入口的铁链。两名船员手执利斧跳入海中，劈砍铁链的木制浮筒，直到把它们砍断。意大利船只一艘接一艘地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海岸上的奥斯曼指挥官们只能暴跳如雷，却无计可施。意大利舰队绕过了加拉塔，在已经空荡荡的双柱港（奥斯曼海军的基地）展开了队形。他们就在那里等待更多（在岸上作战的）船员和其他幸存者前来，但到中午时分，他们已经可以确定，岸上的人已经全部被杀或被俘，他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基督教舰队再次得到了命运的眷顾。4月底曾经吹拂热那亚船只，让它们在海峡内得以快速北上的南风已经转为风速12节的强劲北风。巴尔巴罗承认，要不是幸运地刮起了北风，“我们全都会被俘虏”^[34]。

于是，“正午时分，在我主上帝的佑助下，塔纳舰队的指挥官阿卢威克瑟·迪艾多大人乘坐他的桨帆船，扬帆起航”^[35]。和他一起逃走的还有一小群来自威尼斯和克里特的各型船只。有一艘来自特拉布宗的大型桨帆船此前已经损失了164名船员，人手严重不足，所以起帆非常困难，但因为无人阻挡他们，还是顺利地马尔马拉海南下，从漂浮在海面上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尸体（“如同运河近岸处漂浮的西瓜”^[36]）旁驶

过，奔向达达尼尔海峡。他们既为自己的幸运感到庆幸，又为遇难的船员感到悲哀，“他们中有些人被淹死，有些人在敌人的炮击中牺牲，或者在战斗中捐躯”^[37]，特里维萨诺本人也阵亡了。这些船只载着于最后混乱时刻逃生的400名幸存者，以及在城市陷落前就已经登船的很多拜占庭贵族（其数量相当惊人）。还有7艘热那亚船只也安全脱离，包括负伤的朱斯蒂尼亚尼乘坐的那艘桨帆船。在他们逃离的同时，哈姆扎贝伊把奥斯曼舰队重新集结起来，绕过金角湾入口，俘虏了仍然停泊在那里的15艘船只（分别属于拜占庭皇帝、安科纳和热那亚），其中有些船只满载难民，严重超载，无法航行。还有很多难民站在前滩，凄惨地号哭，向驶离的桨帆船哀求。奥斯曼水兵把这些难民围起来，驱赶到他们自己的战船上。

从陆墙到市中心的距离是3英里。黎明时分，一群群意志坚定的近卫军士兵已经从圣罗曼努斯门沿着通衢大道挺进，向圣索菲亚大教堂进发。除了红苹果的传说外，奥斯曼军营里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一连好多周徒劳无功的围城战中，他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座大教堂矗立在远方地平线上）的地下室里储藏着海量的金银和宝石。近卫军士兵们大踏步穿过一贫如洗的广场和空荡荡的大道，经过公牛广场和狄奥多西广场，沿着通往城市心脏的梅塞大道（意思是“中央大道”）前进。其他的士兵则穿过北面的查瑞休斯门，经过圣使徒教堂。这座教堂没有遭到抢劫，因为穆罕默德二世似乎在这里部署了警卫，以遏制士兵们对城市建筑物的全面破坏。近卫军一路上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抵抗。他们抵达君士坦丁广场，城市的奠基者从宏伟的柱廊上俯视他们，但并没有天使从天而降，挥舞带烈火的利剑将他们逐退。同时，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两支舰队的水手们蜂拥着冲过半岛北端的集市和教堂。到早上7点，近卫军和水手都抵达了市中心，潮水般涌入奥古斯都广场。拜占庭帝国仍然幸存的最恢宏的纪念碑就屹立于此，查士丁尼的骑马像仍然朝向初生的旭日；米利翁（帝国全境计算距离的基石）也坐落在这里。查士丁尼骑马像的一侧是赛马场和君士坦丁大帝当初的

一些战利品，这些战利品把城市与更久远的古代联系了起来：来自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的奇异的三头巨蛇铜像、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战役中希腊人大败波斯人留下的纪念品，甚至还有更古老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石柱。奥斯曼士兵第一次仰视这石柱时，它的打磨花岗岩表面上保存极好的象形文字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在查士丁尼骑马像的另一侧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它“直冲云霄”^[38]。

在教堂内，晨祷仪式已经开始，九扇巨大的木门（表面镶有黄铜，顶端立有保护它的十字架）紧紧关闭。人数众多的信徒在祈祷天降奇迹，救他们免受门外敌人的伤害。女性信徒按照通常的规矩，在二层廊台祈祷，男人们则在一层。教士们在祭坛前主持礼拜。有些人躲藏在巨大教堂最隐秘的角落里，爬到检修管道里或者屋顶上。近卫军士兵冲进内院，发现大门紧闭，于是开始撞击最中间那扇门，即专供皇帝及其扈从进出的皇室之门。在斧子的持续猛击下，4英寸厚的木门终于动摇，轰然打开，奥斯曼军队涌入宏伟的教堂。在他们头顶上，蓝金两色的马赛克基督像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入侵者，右手举起，做出降福的动作，左手捧着一本书，上面写着“祝你平安，吾乃世界之光”的字样。

我们可以说，就在奥斯曼人最后砍倒圣索菲亚大教堂大门的那个瞬间，拜占庭彻底咽气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曾目击帝都的很多戏剧性场面。这个地点最早的教堂屹立了1100年，随后查士丁尼建造的伟大教堂又延续了900年。这座恢宏的建筑反映和亲历了这座城市风起云涌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历代皇帝（除了末代皇帝，这的确是个不祥的例外）都在这里加冕。拜占庭帝国历史上很多决定命运的事件就在“由一条金链从天堂垂悬”^[39]的巨大穹顶下上演。它的大理石地板上曾经有鲜血飞溅；这里曾经发生过暴乱；多位牧首和皇帝曾在这里避难，躲避暴民和阴谋作乱者，或者被从这里强行拖走。穹顶曾被地震摧毁过三次。教堂威风凛凛的门廊曾经目睹教皇特使手持绝罚诏书冲进来。维京人曾在它的墙壁上乱涂乱画。野蛮的法兰克十字军曾经无情地将它洗劫一

空。就在这里，俄罗斯访客被东正教仪式的超脱凡俗之美深深震撼，以致整个俄罗斯民族都皈依了东正教。还是在这里，人们因宗教分歧而争吵不休，前来祈祷的普通信徒的脚将地板磨平。圣索菲亚大教堂（“索菲亚”的意思是“智慧”）的历史就是拜占庭的影子：既圣洁又世俗，既神秘又赏心悦目，既美丽又残酷，高度地不理性，既属神又属人。在1123年又27天之后，它的历史即将落幕。

士兵们破门而入时，畏缩的人群发出一声恐惧的哀号。人们向上帝祈祷，但无济于事。他们被“一网打尽”^[40]，很少发生流血事件。少数抵抗的人，或许还有一些年老体衰的人被杀死，但大部分人“像绵羊一般”^[41]束手就擒。奥斯曼军队的目标是战利品和利润。每名士兵都努力去控制自己的俘虏，对性别不同、年龄各异的俘虏的哭喊充耳不闻。在争夺最有价值奴隶的斗争中，一些年轻女人险些被撕碎。修女和大家闺秀、青年和老人、主人和奴仆被捆绑在一起，然后被拖出教堂。士兵们用女人们自己的面纱捆她们，用绳索捆绑男人。士兵们分成若干组，每个人都带领自己的俘虏走到“一个特定地点，把他们交给别人看管，然后返回教堂去抓第二批，甚至第三批俘虏”。不到一个小时，教堂内的全体信徒都被捆了起来。“无休无止的俘虏队伍，”杜卡斯记载道，“如同成群牛羊，涌出教堂和圣殿，那景象真是非同寻常！”^[42]凄惨的哀恸之声在这个清晨回荡。

然后，士兵们把注意力转向教堂内的宝物。他们把圣像砍成碎片，拆下珍贵的金属框架，“一瞬间就夺走了保管在圣殿内的珍贵而神圣的圣物、金银器具和其他贵重物品”^[43]。然后是其他各种装置和器皿，穆斯林认为它们既是冒犯真主的偶像，也是正当的战利品：金链、枝状大烛台、油灯、圣像屏、祭坛及其饰物、教堂家具、皇帝宝座。很快，所有的东西要么被抢走，要么被就地摧毁，教堂变得“空空如也，万分凄凉”^[44]（这是杜卡斯的说法）。大教堂成了一个空壳。这个对希腊人来说的决定性时刻还产生了一个传说，典型地体现出了他们亘古不变的对

奇迹的迷信，以及对圣城的渴望。根据这个传说，当士兵们走向祭坛时，教士们拿起了圣礼器皿，接近了圣殿，这时墙壁洞开，让他们进去，随后又封闭如初。教士们将停留在那里，直到将来有一位东正教皇帝恢复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传说的基础可能是，教堂与其后方的牧首宅邸之间有一条古老通道，有些教士可能得以借此逃生。不过也发生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奥斯曼军队打开了备受拜占庭人仇恨的威尼斯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的墓穴，就是他在250年前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在墓穴里没有找到财宝，于是将丹多洛的骨骸扔到了大街上，任凭野狗啮咬。

整个上午，穆罕默德二世一直留在城墙外的军营内，等待关于城市投降和遭劫掠的报告。他接到了一连串消息，还接见了多个战战兢兢的市民代表团。加拉塔市长的使节呈上礼物，希望苏丹保证加拉塔中立的条约仍然有效，但苏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士兵们献上了奥尔汗的头颅，但穆罕默德二世最想看的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首级。皇帝的最终命运和他死亡的确认仍然扑朔迷离、不足凭信。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关于皇帝结局的可靠报告。穆罕默德二世可能下令对战场进行了搜寻，寻找他的尸体。当天晚些时候，一些近卫军士兵（可能是塞尔维亚人）向苏丹进献了一枚首级。据杜卡斯的说法，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当时也在场，他确认这就是他主公的头颅。这枚首级被悬挂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的查士丁尼石柱上，以向希腊人宣示，他们的皇帝已经殒命。后来，头颅的皮肤被剥去，在皮肤里面塞满稻草，然后送到伊斯兰世界的各个主要宫廷，在华丽的仪式中昭示天下，作为权威和征服的象征物。

皇帝的真实死因（当然，还有人怀疑，他根本就没有死）仍然无法确定。没有任何可靠的现场目击证人，因此众说纷纭，各种理论互相驳斥，均不足凭信。奥斯曼史学家都对皇帝之死做了贬抑但非常具体的描述，其中很多描述都是在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才写下的，有可能是基于先

前的记载。据他们的描述，“愚钝而盲目的皇帝”^[45]看到大事不妙，企图逃跑。他带领随从，沿着陡峭的街道奔向金角湾或马尔马拉海，去寻找船只，途中遭遇了一群正在抢劫的土耳其步兵和近卫军。“随后爆发了一场绝望的激战。皇帝策马攻击一名负伤的土耳其步兵，不料马失前蹄，这名步兵站起身来，砍掉了皇帝的脑袋。其他拜占庭人看到皇帝已死，斗志顿时瓦解，大部分人都被杀死或者俘虏。皇帝随员携带的大量金钱和珠宝也被抢走。”^[46]

希腊人的说法一般都是，在前线崩溃之时，皇帝率领一群忠实的贵族向城墙处的敌人冲杀，最后英勇牺牲。根据哈尔科孔蒂利斯的说法，“皇帝转向坎塔库泽努斯和还在他身边的少数人，说道：‘那么，大家一起冲，杀掉这些野蛮人！’勇敢的坎塔库泽努斯不幸阵亡，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则被击退，遭到无情的追杀，肩膀负伤，随后被杀死”^[47]。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皇帝要么是在圣罗曼努斯门处的死人堆那里，要么是在一座紧锁的边门附近被杀死。所有的版本都为希腊人提供了一个关于皇帝的永不磨灭的传奇。“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被杀了。”贾科莫·特塔尔迪的记载非常简单直白，“有人说他的首级被砍下，有人说他死在冲击城门的拥挤人群中。这两种说法都很有可能是真的。”“他被杀死后，首级被插在一根长矛上，献给土耳其苏丹。”^[48]驻君士坦丁堡的安科纳领事本韦努托如此写道。奥斯曼人未能明白无误地辨认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尸体，这说明他很可能在最后的鏖战中脱去了皇袍，像普通士兵一样阵亡了。很多死尸都遭到斩首，无头尸体是很难辨认的。离奇的传说比比皆是，有人说他乘船逃走了，但这种说法可以否定。还有人说，穆罕默德二世把他的尸体交给了希腊人，安葬在城市的某地（关于具体地点也有好几种说法），但可靠的地点无法确认。由于皇帝的结局无法确定，希腊人围绕着他编织出了越来越多的传奇，用谣曲和哀歌来寄托他们对往昔光荣的渴望：

哭泣吧，东西方的基督徒，为这可怕的毁灭流泪哭泣吧。1453年5月29

日，星期二，夏甲^[49]的子孙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当君士坦丁·德拉伽塞斯.....听到这消息，他抓起长枪，佩上利剑，纵身跨上他的白蹄母马，狠狠地打击土耳其人，那些不虔诚的野狗。他一连斩杀了10名帕夏和60名近卫军，但他的利剑裂口，长枪折断，他茕茕孑立，孤立无援.....一个土耳其人击中了他的头部，可怜的君士坦丁坠下马来。他躺在尘土与鲜血中。他们砍下了他的首级，将它插在一根长矛的矛尖，将他的尸体埋葬在一株月桂树下。^[50]

“不幸的皇帝”享年49岁。不管他的结局究竟如何，可以确信的是，为了维持拜占庭的香火，他竭尽全力奋斗到了最后一刻。“伊斯坦布尔^[51]的君主英勇无畏，不肯投降”^[52]，奥斯曼史学家奥鲁奇如此宣称。奥斯曼人是很少这样尊重敌人的，看来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确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对手。

当天晚些时候，城内的混乱渐渐平息，秩序有所恢复，穆罕默德二世胜利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他骑马经过了查瑞休斯门（后来被土耳其人更名为埃迪尔内门），众位维齐尔、高级贝伊、乌理玛、指挥官、精锐部队、侍卫和步兵徒步前进，众星捧月地簇拥在他身旁，这个盛大场面后来被传说描绘得更加宏大。队伍叮当作响地穿过拱门的时候，旗手们展开了绿色的伊斯兰旗帜和苏丹的红色旌旗。穆罕默德二世入城的景象很可能是土耳其历史上仅次于凯末尔·阿塔图尔克^[53]肖像的最著名的图景，并成为无数诗歌和绘画的主题，世代传扬。在19世纪的绘画中，蓄着络腮胡子的穆罕默德二世腰杆笔直地骑着骏马，无比自豪地前进，面庞转向一侧。他的两侧簇拥着蓄着小胡子、高大强健的近卫军（他们肩扛火绳枪、长枪和战斧）和胡须雪白的伊玛目们（他们的白胡须象征伊斯兰的智慧）。在背景中，迎风招展的大小旗帜以及森林一般密集的矛枪遮蔽了地平线。在图画左侧有一名黑人战士，肌肉结实得像健身运动员一样，他骄傲地屹立在那里，代表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欢迎众位圣战者来接纳先知曾许诺的遗产。他的弯刀指向苏丹脚下的一堆基督徒的尸体，这些敌人的盾牌上都带有十字架，这是对十字军东征的回

忆，也是伊斯兰教战胜基督教的象征。根据传说，穆罕默德二世停了下来，向真主感恩。然后他转向他的“7万或8万名穆斯林英雄”^[54]，表示祝贺，喊道：“征服者们，不要停步！赞美真主！你们是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就在这个代表性的时刻，他正式启用了“法提赫”（意为“征服者”）这个称号，后来土耳其语中就一直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就在这个瞬间，奥斯曼帝国的霸业正式奠定。这一年，他21岁。

然后，他策马进入城市中心，去查看那些他曾在远方清楚地想象的建筑物，经过使徒教堂和宏伟的瓦伦斯高架水渠，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他或许并没有被看到的景象深深震撼，而是严肃起来。君士坦丁堡更像是一座毁于人手的庞贝古城，而不是黄金城市。放纵的军队忘记了不得破坏建筑的敕令。根据克利托布罗斯的有些夸张的说法，奥斯曼军队“如同烈火或者旋风一般向城市猛扑……全城空空荡荡，惨遭蹂躏，似乎被火烧烤得枯焦……剩下的房屋全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完全成了废墟，这巨大的破坏惨景让所有目睹它的人都心生恐惧”^[55]。虽然苏丹向军队许诺劫掠三天，但城市在一天之内就被洗劫一空。为了阻止更多破坏，苏丹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命令在第一天落日时就停止劫掠。传令官们能够确保官兵们服从这道命令，这说明奥斯曼军队的纪律的确非常严明。

穆罕默德二世策马前行，沿途不时停下，去查看某些标志性建筑。根据传说，他在经过德尔菲的巨蛇柱时，用钉头锤砸断了其中一个蛇头的下颚。他经过查士丁尼雕像，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前门，翻身下马。他匍匐在地，将一捧尘土倾洒在自己头巾上，向真主表示自己的谦卑。然后他走进了惨遭洗劫的教堂。眼前的景象似乎让他既震撼又惊骇。他穿过巨大的教堂空间，凝视穹顶，看到一名士兵在砸大理石地面。他问这个士兵，为什么要拆毁地面。“为了信仰。”那人答道。穆罕默德二世见这人如此堂而皇之地违背保护建筑的命令，拔剑就砍。穆罕默德二世的侍卫们将这个被砍得半死的人拖了出去。一些躲藏在最深远

角落的希腊人走了出来，跪倒在苏丹脚下。一些教士也走了出来，或许就是那些被墙壁神奇地“吞没”的人。性格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的穆罕默德二世大发慈悲，命令士兵保护这些人回家。然后他招来一名伊玛目，让他走到讲坛上，召唤众人祈祷。他自己则爬上祭坛，跪拜下来，向得胜的真主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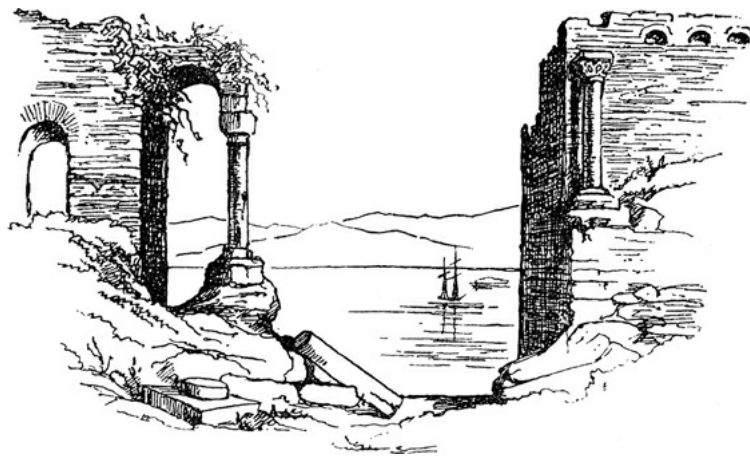
据奥斯曼史学家图尔松贝伊说，穆罕默德二世随后“在真主之灵升上第四层天堂”时，通过教堂的廊台登上了屋顶。从那里，他可以俯瞰教堂和这座基督教城市的古老心脏。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曾经无比辉煌和自豪的帝国的衰败惨景。教堂周边的很多建筑已经坍塌，包括赛马场地势较高的座位区的大部分，以及古老的皇宫。这座皇宫一度是皇权的中心，早已成为废墟，因为它在1204年被十字军彻底摧毁了。在他纵览下方的凄凉景象时，“他想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幻无常，以及它的最终毁灭，”还记起了追忆阿拉伯人于7世纪灭亡波斯帝国的两行诗句：

在霍斯劳的皇宫，如今蜘蛛是卷帘人，

阿弗拉西亚布^[56]的城堡中，猫头鹰发出换岗命令。^[57]

这是幅哀伤的景象。穆罕默德二世的梦想都实现了；在这个奠定了奥斯曼帝国在当时的超级大国地位的光辉日子的末尾，他已经想到帝国的衰落。他骑马穿过惨遭蹂躏的城市，返回军营。长长的俘虏队伍被驱赶着进入壕沟外临时搭起的帐篷。全城5万居民的绝大部分都被押回了战船或者军营。当天可能有4000名基督徒在战斗中丧生。与家人分开的儿童呼喊母亲，男人寻找妻子，“所有人都被这场浩劫惊得呆若木鸡”。在奥斯曼军营，人们点燃篝火，庆祝胜利，伴随着笛子和鼓点载歌载舞。士兵们给马匹披上教士的服装，嘲讽地举着戴有土耳其帽子的十字架在奥斯曼军营内游行。人们用战利品做交易，买卖宝石。据说有人“用几个铜板就能买到很多珠宝”^[58]，“金银贱如锡”^[59]，因此一夜暴富。

如果说这一天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和其他暴行，这绝不是伊斯兰世界独有的。在中世纪，任何一支攻破敌城的军队都会大开杀戒、恣意劫掠。拜占庭历史上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果说是由于宗教原因，也纯属偶然。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并不比拜占庭人在961年对克里特岛上的撒拉森城市甘地亚的劫掠（当时，绰号“撒拉森人的白死神”的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放纵他的军队，对甘地亚血洗了整整三天）更残暴；也并不比1204年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破坏更糟糕；奥斯曼人的行为比1183年拜占庭人毫无理性的排外暴行（拜占庭人当时屠杀了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几乎所有拉丁人，“包括妇女、儿童、老弱，甚至医院里的病人”^[60]）更加有组织有纪律。1453年5月29日的黑夜降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潜入圣索菲亚大教堂穹顶的窗户，完全遮蔽了历代帝王和天使的马赛克肖像、斑岩廊柱、缟玛瑙和大理石地面、被砸碎的家具和地上的一摊摊血迹。拜占庭就这样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马尔马拉海岸的何弥达斯（**Hormisdas**）宫殿残垣

^[1]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p.102

^[2] 圣愚安得烈（？～936），原为斯拉夫人，被卖作奴隶来到君士坦丁堡，因为虔诚、癫狂而被称为“圣愚”。据说他曾看到圣母保护君士坦丁堡、从敌人手中解救城市的幻象，后来被东正教会封为圣徒。埃皮法尼奥斯是他的弟子。

- [3]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96
- [4]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1
- [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1
- [6]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5
- [7]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89
- [8]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51
- [9]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95
- [10]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as, Detroit, 1975, p.228
- [11]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29
- [12]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123
- [1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1
- [14]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p.71-2
- [15]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p.66
- [16]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95
- [17]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2

[18]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 72

[19]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3

[20]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3

[21]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38

[22]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67

[23]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3

[24]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92

[25] 这座宫殿前面曾经有一座小港，其入口处立有公牛和雄狮雕像，因此得名。

[2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4

[27]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67

[28]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4

[29]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96

[3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185-6

[31]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44

- [3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44
- [3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6
- [3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7
- [35]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8
- [3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6
- [37]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6
- [38] Procopius, quoted Freely, John, *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 Woodbridge, 2000, p.28
- [39] quoted Norwich, John J., *A History of Byzantium*, 1 vols., London, 1995, p.203
- [40]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4
- [41]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75, p.225
- [42]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75, p.227
- [43]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92
- [44]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227
- [45]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30
- [46] Tursun Beg, *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y, Minneapolis and Chicago, 1978, p.37
- [47]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214

[48]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184-5

[49] 夏甲是《圣经·创世记》中记载的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一名埃及使女。夏甲为亚伯拉罕生下了儿子以实玛利。伊斯兰教鼻祖穆罕默德自称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大部分穆斯林也视自己为以实玛利的后裔。

[50] Legrand, Emile,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 Paris, 1874, p.74

[51]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语对君士坦丁堡的称呼。

[52] quoted Lewis, Bernard,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London, 1982, p.30

[53]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少年时入军校受训，毕业时成绩优良，后来对帝国的政治渐生不满，加入了一个土耳其民族主义组织——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政府作战，在加里波利打败协约国军队。最后，协约国胜利，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进驻安纳托利亚；凯末尔被指派去维持秩序，他趁机鼓动人民反抗这些入侵者。拜奥斯曼帝国失败之赐而获有土地的希腊和亚美尼亚积极反对土耳其民族主义，但凯末尔击败了所有的反对势力，于1932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1934年，他被尊为“阿塔图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实施西化政策，不再强调宗教，解放妇女，强制使用姓氏，抛弃伊斯兰教的法律制度，以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把积贫积弱的奥斯曼帝国改革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54] quoted Freely, John, *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 Woodbridge, 2000, pp.211-12

[55]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p.74-5

[56] 阿弗拉西亚布是波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国王、巫师和战士。土耳其人吸纳和改编了关于他的传说，使他成为土耳其民族的英雄。

[57] quoted Lewis, Bernard, *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Norman, 1968, *Istanbul*, p.8

[58]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p.219-21

[59]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327

[60] Norwich, John J., *A History of Byzantium*, 3 vols., London, 1995, p.143

16.世界的梦魇

1453～1683年



前狼后虎，左右为难。^[1]

——加拉塔市长安杰洛·洛梅利诺写给兄弟的信，1453年6月23日

奥斯曼人破城不久之后，就开始论功行赏。次日，他们对战利品作了分配。根据传统，穆罕默德二世作为最高统帅，理应享有全部战利品的五分之一。他将自己分得的希腊奴隶安置在城市内靠近金角湾的法纳尔区，这个城区一直到现代都是个传统的希腊人聚居区。大部分普通市民，大约有3万人，被送到了埃迪尔内、布尔萨和安卡拉的奴隶市场。其中有少数重要人物后来被赎买并重获自由，因此我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其中有马修·卡马里奥特斯，他的父兄均在围城中丧生，全家失散。他历经艰难险阻，拼命去寻找家人。“我从一个地方赎回了妹妹，从另一个地方赎回了母亲；然后是我的侄子。让上帝欢欣的是，我让他们重获自由。”但总的来讲，他的经历仍然是十分凄惨的。除了亲人的遇难和离散之外，最让卡马里奥特斯伤心欲绝的是，“我的四个侄子当中有三个，历经磨难，由于青年人的脆弱，背弃了基督教信仰……如果我父亲和兄弟还活着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的生活，如果还能算得上生活的话，充满了痛苦和悲哀”^[2]。基督徒改信伊

伊斯兰教的事情并不罕见，因为他们曾经试图通过祈祷和圣物的力量挽救这座得到上帝保护的都市，不让它被伊斯兰世界征服，这样的努力都彻底失败了。更多的俘虏则融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基因库，借用亚美尼亚诗人安卡拉的亚伯拉罕的哀叹，“如同尘土一般，四散到全世界”^[3]。

幸存的君士坦丁堡显贵很快就受到命运的裁决。穆罕默德二世扣押了所有能找得到的重要人物，包括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及其家人。穆罕默德二世将威尼斯人视为自己在地中海的主要对手，因此对他们的惩罚特别严厉。威尼斯殖民地的市政官米诺托曾在城防作战中起到重要作用。他和他的儿子，以及其他威尼斯显贵全部被处决。还有29名威尼斯人被赎回了意大利。加泰罗尼亚领事及他的一些主要部下也被处死。奥斯曼人还四处搜寻两名联合派教士——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和基辅的伊西多尔，但他们都乔装打扮，安全逃走了。奥斯曼人还在加拉塔寻找幸存的博基亚尔多两兄弟，但也徒劳无功。他们藏匿起来，躲过了这场浩劫。

加拉塔市长安杰洛·洛梅利诺果断地采取行动，努力去拯救热那亚殖民地。加拉塔曾与君士坦丁堡并肩作战，因此很容易遭到苏丹的直接打击报复。洛梅利诺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写道，苏丹“说，我们竭尽全力去帮助君士坦丁堡的防御……他这么说当然是正确的。我们面临灭顶之灾，必须顺从他的意志，躲避他的怒火”^[4]。穆罕默德二世下令立即摧毁加拉塔的城墙（海墙除外）、壕沟和防御塔，并命令他们交出火炮及其他所有武器。市长的侄子和一些拜占庭贵族子弟被送到苏丹的皇宫当差，作为人质。这项政策既能保障加拉塔人的俯首听命，也能为帝国的行政管理提供年轻而受过教育的人才。

就在这一背景下，苏丹对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的命运做出了定夺。诺塔拉斯是拜占庭贵族中等级最高的一位，他在围城战期间的角色颇具争议，意大利人一直对他大肆攻击。诺塔拉斯显然是反对东西方教

会联合的；他常说：“宁愿要苏丹的头巾，也不要红衣主教的冠冕”。意大利作家常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东正教希腊人的顽固不化。穆罕默德二世最初似乎打算任命诺塔拉斯为城市的行政长官，这体现了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筹划的深层次方略，但很可能被大臣们说服，改了主意。根据笔触始终生动鲜明的杜卡斯的记载，穆罕默德二世“酩酊大醉”，命令诺塔拉斯交出自己的儿子，以满足苏丹的欲望。诺塔拉斯拒绝了这个要求，穆罕默德二世就派刽子手去杀他全家。刽子手杀死诺塔拉斯家的所有男性后，“捡起首级，返回到宴会上，将它们献给那嗜血的野兽”^[5]。更有可能的真实情况是，诺塔拉斯不愿意将他的孩子送去做人质，而穆罕默德二世感到，让拜占庭的头号贵族活下去的风险太大。

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的工程马上开始了。工匠们很快建起了一座木制尖塔，用于宣礼（召唤信众前来祈祷）；同时粉刷了墙壁，将华丽的马赛克图案遮盖，但保留了穹顶下的四幅守卫天使像。穆罕默德二世出于对此地魂灵的尊重，决定保留这四幅天使像。古老城市中的其他一些“异教”标志物也在一段时间内得以完好地保存：查士丁尼骑马像、来自德尔菲的巨蛇柱和埃及石柱。穆罕默德二世毕竟还是非常迷信的。6月2日，穆斯林第一次在今天所称的圣索菲亚清真寺进行周五祈祷，“宣读了伊斯兰祷文，诵读了圣战者苏丹穆罕默德汗的名字”^[6]。按照奥斯曼史学家的说法，“全城都听得见重复五次的甜美的穆斯林信仰咏唱”^[7]。在一个虔诚的时刻，穆罕默德二世为城市取了一个新名字——“伊斯兰堡”，这在土耳其语中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遍布伊斯兰”。但这个名字没能打动土耳其人的耳朵。谢赫阿克谢姆赛丁还奇迹般地很快找到了艾优卜的坟墓。这位先知的旗手在669年阿拉伯人首次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牺牲，他的死极大地激励了攻打这座城市的圣战。

穆罕默德二世虽然表现出了穆斯林的虔诚，但他对城市的重建工作在传统伊斯兰教义看来是非常有争议的。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遭

到的严重破坏深感不安。据说在首次视察城市的时候，他曾说：“我们劫掠和毁灭的是怎样一座城市啊。”^[8]6月21日，他骑马返回埃迪尔内时，离开的无疑是一座空空荡荡的凄凉废墟。在他在位期间，对帝都的重建将是一项主要工作，但他仿效的模板却不是伊斯兰的风格。

于5月29日逃离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船只把城市陷落的噩耗带回了西方。6月初，3艘船只抵达了克里特，船上的水手曾经顽强地防守塔楼，迫使穆罕默德二世释放他们。他们带来的消息让全岛无比惊恐。“如此可怕的事情，前所未闻，将来也不会有。”^[9]一名僧侣写道。同时，威尼斯桨帆船群抵达了希腊外海的内格罗蓬特岛^[10]，令岛民陷入恐慌。当地的市政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群众，阻止他们全部撤离岛屿。他向威尼斯元老院送去了十万火急的信件。随着船只在爱琴海上来往穿梭、传递消息，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噩耗很快传遍了地中海东部的各个岛屿和海港，传到了塞浦路斯、罗得岛、科孚岛、希俄斯岛、莫奈姆瓦夏、莫东^[11]、勒班陀。这消息就像一块巨石坠入地中海一样，掀起了恐慌的惊涛骇浪，一直席卷到直布罗陀海峡，甚至更远方。1453年6月29日，这个消息抵达了欧洲大陆的威尼斯。当时元老院正在开会。一艘来自勒班陀的快速单桅帆船停靠在圣马可湾的木制栈桥旁，人们从窗户和阳台上探出身来，急切地询问关于君士坦丁堡、他们的亲属和商业利益的消息。当他们得知君士坦丁堡已经陷落时，“不禁号啕大哭，泪水四溅，呻吟不止……所有人都捶胸顿足，撕扯自己的脑袋和双手，哀悼自己的父亲或儿子或兄弟，或者为了自己财产的损失而伤心”^[12]。元老们听到这消息时，目瞪口呆，投票被暂时搁置。大批信件被快马加鞭地送到意大利各地，报告关于“君士坦丁堡和佩拉（加拉塔）两座城市恐怖而可悲的陷落”^[13]的消息。噩耗于7月4日抵达博洛尼亚，7月6日抵达热那亚，8日抵达了罗马，随后不久又传到了那不勒斯。起初，很多人都不肯相信，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居然也会被攻破；他们确信消息确凿无疑后，大街小巷上披麻戴孝、万分悲痛。恐怖气氛更使得各种飞短流长被大大夸张。有人说，君士坦丁堡年纪在6岁

以上的人全被屠杀，有4万人被土耳其人戳瞎眼睛，所有教堂都被夷为平地，苏丹正在集结大军，即将入侵意大利。人们口口相传，特别强调土耳其人的野蛮残暴和他们对基督教世界的迅猛攻击。这些主题将在欧洲回响数百年。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事件中也有一个瞬间蕴含着现代性的情感的话，那就是人们对君士坦丁堡陷落消息的反应。就像肯尼迪遇刺或者“9·11”事件一样，全欧洲的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在最早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那天，天色阴沉。”^[14]一名格鲁吉亚史学家写道。“我们听到的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是多么可憎！”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15]在给教皇的信中写道，“我写字的时候，手都在颤抖。”^[16]消息传到德意志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三世流下了眼泪。航船、快马和歌谣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一消息传向欧洲的各个角落。它从意大利传向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低地国家、塞尔维亚、匈牙利、波兰和更远方。在伦敦，一位史学家写道，“这一年，基督徒丢失了高贵的君士坦丁的城市，它被土耳其人的君主穆罕默德夺去了”^[17]。丹麦与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将穆罕默德二世描述为《启示录》里从大海中崛起的野兽。欧洲各国宫廷之间的外交渠道持续回荡着消息、警告和对新的十字军东征的设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人们写下了数量惊人的信件、史书、预言、歌曲、哀歌和布道，被翻译成基督教世界的所有语言，从塞尔维亚语到法语，从亚美尼亚语到英语。不仅宫殿和城堡内在讲述君士坦丁堡的故事，十字路口、市场和客栈里也在大谈特谈这个话题。它传到了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和最贫贱之人的耳边：渐渐地，甚至冰岛的路德派祈祷书里也恳求上帝救助他们，避开“教皇的奸诈和土耳其苏丹的恐怖”^[18]。新的反伊斯兰浪潮才刚刚开始。

在伊斯兰世界，虔诚的穆斯林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消息。10月27日，穆罕默德二世的一名使节抵达开罗，带来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还带来了两名希腊贵族俘虏，作为证据。据穆斯林史学家的记

载，“埃及苏丹和所有人都为这伟大的征服而欢呼雀跃；每天早晨，都会高声宣布这一喜讯；开罗城张灯结彩两天.....人们对商店和房屋做了极其奢华的装点，以此庆祝.....我说，应当感谢真主，这了不起的胜利都属于他”^[19]。对伊斯兰世界来说，这是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的胜利。被认为是穆罕默德说出的古老预言终于实现了，伊斯兰信仰向全世界传播的前景一下子又乐观起来。奥斯曼苏丹赢得了超人的威望。穆罕默德二世还按照惯例向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君主送去了捷报，借此宣示自己作为圣战的真正领袖的地位，并启用了“征服者”的称号，“哈里发的呼吸之风”将他与伊斯兰早期的光荣历史紧密联系了起来。据杜卡斯的记载，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塞满稻草”的首级还被送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其他突厥人的领袖”^[20]那里。穆罕默德二世给埃及、突尼斯和格拉纳达的统治者分别送去了400名希腊儿童。这不仅仅是礼物。穆罕默德二世这是在索取信仰捍卫者的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最终战利品：对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这三个圣地的保护权。他专横地训斥开罗的马穆鲁克苏丹：“保持穆斯林朝觐道路的畅通，是你的责任；我们的义务则是提供圣战者。”^[21]同时，他还自称为“两片大海与两块陆地的君主”、诸位恺撒的帝国的继承人。他的雄心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既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全世界只能有.....一个帝国、一个信仰、一个君主。”^[22]

在西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但同时也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那些了解局势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显然是不可能守得住的。它是一块被彻底孤立的飞地，被吞并是不可避免的。就算君士坦丁十一世击退了奥斯曼军队，城市也迟早会被攻破。对那些关心此事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或者说是“伊斯坦布尔被占领”，这取决于不同的宗教角度）总的来讲是对一个既成事实的象征性确认：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世界霸权，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但很少有人对局势如此洞若观火。就连威尼斯人（他们通过间谍和发往元老院的持续不断的外交情报，对时局有相当准确的把握）也大体上不了解穆罕默德二世的军事实力。“我们的元老不相信土耳其人能有一支舰队，去攻打君

士坦丁堡。”^[23]马尔科·巴尔巴罗（Marco Barbaro）对威尼斯人援救努力的迟缓评论道。他们同样也未能认识到火炮的威力和穆罕默德二世的坚定意志与足智多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强调了地中海的权力平衡发生的巨大变化，并让基督教国家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自己受到的严重威胁。在过去，由于有君士坦丁堡的缓冲，基督教国家自认为安全，因而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视而不见。

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的灭亡在宗教、军事、经济和心理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罗马教皇、匈牙利人、瓦拉几亚人和巴尔干各民族一下子清醒地认识到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勃勃。欧洲人对土耳其苏丹的冷酷无情的形象，以及他渴望成为当代亚历山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进行了癫狂的想象。有一份文献称，这位征服者在进入君士坦丁堡时说：“我感谢先知穆罕默德，是他给了我们这次辉煌胜利；但我祈祷，希望他会允许我享有高龄，能够占领和征服旧罗马，就像我已经占有新罗马一样。”^[24]这个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想象中，红苹果的位置已经向西移动了，从君士坦丁堡移到了罗马。奥斯曼军队虽然还远远没有入侵意大利本土，但在战斗中已经高喊：“罗马！罗马！”西方世界将穆罕默德二世视为敌基督的化身。他一步一步、不可阻挡地继续蚕食基督教世界。在1453年之后的岁月里，他将逐个消灭热那亚和希腊人在黑海的各个殖民地：锡诺普、特拉布宗和卡法相继陷落。1462年，他入侵了瓦拉几亚，次年又进攻波斯尼亚。摩里亚于1464年被奥斯曼人彻底征服。1474年，他兵临阿尔巴尼亚；1476年又打到了摩尔达维亚。奥斯曼人滚滚前进的浪潮似乎无法阻挡。在1480年的著名战役中，奥斯曼军队未能攻克罗得岛，但这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威尼斯人受到的威胁最大。他们与穆罕默德二世的战争于1463年爆发，一直持续了15年。但这还只是一场宏大战争的序曲而已。在此期间，威尼斯人丢失了重要的贸易据点内格罗蓬特。更糟糕的是，在1477年，奥斯曼劫掠者蹂躏了威尼斯城的腹地；他们离城市已经非常之近，从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上都能看得见他们的篝火。伊斯兰世界呼吸

的热气已经直接吹拂到了威尼斯的脖颈。“敌人兵临城下！”切尔索·马费伊在给执政官的信中写道，“斧子已经逼近树根。除非上帝伸出援手，基督教之名必然遭到毁灭。”^[25]1481年7月，奥斯曼军队终于在意大利半岛的鞋跟处登陆，进军罗马。他们占领奥特朗托^[26]的时候，将该城的大主教杀死在大教堂祭坛前，还处死了1.2万名市民。在罗马，教皇考虑逃之夭夭，群众惊慌失措。但就在这时，穆罕默德二世驾崩的消息传到了军中，于是意大利战役草草收尾。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之下，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又一次努力煽动宗教圣战。这些宗教战争一直持续到16世纪。1459年，深感整个基督教文化受到严重威胁的教皇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开了一次会议，力图将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给时局定了基调。他慷慨陈词两个钟头，把局势描绘得极其灰暗：

我们放任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我们安闲怠惰地枯坐家中之时，这些野蛮人的大军正在进逼多瑙河和萨瓦河。在东罗马帝国的都城，他们屠杀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继承人和他的人民，褻渎了上帝的教堂，用穆罕默德的丑恶邪教玷污了查士丁尼的高贵建筑。他们毁坏了圣母和其他圣徒的画像，掀翻了祭坛，将殉道烈士的遗迹丢弃给猪，杀死教士，强暴妇女和少女，甚至蹂躏献身给上帝的处女们，在苏丹的宴会上屠戮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将受难的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像抢到他们的营地，对其大加嘲讽和讥笑，并高呼着“那就是基督徒的上帝！”，并用污泥和唾沫玷污它。这一切丑恶行径都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却呼呼大睡……穆罕默德二世要么取胜，要么被彻底打败，否则永远不会放下武器。每一次胜利对他来说都是通往新胜利的垫脚石，他的最终目标是征服西方的所有君王，然后消灭基督的福音，并将他的伪先知的律法强加于全世界。^[27]

教皇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这样激情澎湃的言辞还是没能促使人们付诸实际的行动，就像救援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一样。欧洲各国互相嫉妒和猜忌，一盘散沙（有的国家则过于世俗化，对宗教不感兴趣），永远也不能再次以基督教之名联合起来。一直有传闻说，威尼

斯人秘密帮助了奥斯曼军队在奥特朗托的登陆。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的确被煽动起来。直到200年后的1683年，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前进步伐才被彻底阻挡住。在此之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世界将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既有真刀真枪的热战，也有冷战，这场战争将在各种族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迹，并将两种宗教之间的碰撞的大小事件都串联起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都唤醒了对十字军东征的深度回忆。奥斯曼帝国的危险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的攻击的继续；“土耳其人”取代了“撒拉森人”，成为欧洲人对穆斯林的统称。“土耳其人”这个词的言下之意就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对手。双方都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生存斗争，因为对手执意要毁灭世界。这是全球意识形态冲突的原型。奥斯曼人一直抱有圣战的精神，如今这精神与他们帝国霸业的使命感联系了起来。在穆斯林中心地带，人们又一次对伊斯兰教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红苹果的传说非常流行。在罗马之后，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也先后被认为是红苹果的所在地。除了这些实际的目标之外，红苹果还象征着对伊斯兰信仰最终胜利的弥赛亚式的信念。在欧洲，“土耳其人”与毫无信义和残酷狠毒成了同义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到1536年，“土耳其人”这个词在英语中已经有了“行为如同野蛮人或生番的人”的含义。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典型例证）对这些观念火上浇油：印刷术。



16世纪德意志印刷品中的奥斯曼骑兵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恰好是一场革命的巅峰时刻。在西方，科学探索这列失控的火车开始加速，而宗教却日渐衰落。其中一些力量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表现了出来：火药的威力、帆船的优势、中世纪攻城战的寿终正寝。在之后的70年中，欧洲将会涌现出很多新发明、新事物和新人，比如：黄金补牙术、怀表、星盘、航海手册、梅毒、《新约》的翻译、哥白尼和莱奥纳多·达·芬奇、哥伦布和路德，还有活字印刷术。

谷登堡的发明给大众传播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传播了关于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的新观念。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150年中，欧洲的印刷机生产出海量的关于圣战和反伊斯兰教宣传的文字材料。保存至今的年

代最早的现代印刷品之一就是1451年教皇尼古拉五世批准募款以抵抗土耳其人、援救塞浦路斯的特赦授权书。在全欧洲范围内，类似文件的成千上万个复本得以传播，另外还有对圣战的呼吁和大开本传单（现代报纸的前身）传扬的关于反对“异教徒的苏丹的可鄙威胁”的新闻。接踵而至的是书籍的爆炸：1480～1609年，仅在法兰西就出版了80种关于奥斯曼人的书籍，而同时期以美洲为主题的书籍仅有40种。1603年，理查德·诺尔斯^[28]撰写了他的畅销书《土耳其通史》，将土耳其人称为“世界的梦魇”。此时用英语写成的类似题材的书籍已经数量可观。这些著作的标题都很具暗示性：《土耳其战争史》《撒拉森人的著名历史》《论塞利姆苏丹输掉的血腥残酷的战争》《关于对土耳其人的一场著名胜利的真实消息》《土耳其压迫下基督徒的境遇》。信息的大潮是无止境的。奥赛罗参加的就是当时反对“公敌奥斯曼人”、“戴头巾的恶毒的土耳其人”^[29]的世界大战。居住地与伊斯兰世界相隔遥远的基督徒第一次能够通过一些影响极大的绘本中的木刻画了解到敌人的形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塞洛缪·杰奥尔杰维奇的《被迫向土耳其人称臣纳贡和被其奴役的基督徒的悲惨境遇和苦难》。这些图画表现了身披铠甲的基督教骑士与戴头巾的穆斯林之间的激战，以及非基督教徒的种种野蛮暴行：土耳其人将俘虏斩首，将一长队被俘的妇女儿童押走，长矛尖端插着婴儿，纵马疾驰。人们普遍将与土耳其人的冲突理解为一场更为漫长和久远的与伊斯兰的较量（持续1000年之久的为真理而进行的斗争）的延续。西方人对这场冲突的特征和起因做了详尽的研究。1644年，托马斯·布莱特曼在著作中宣称，撒拉森人是“第一群蝗虫，大约在630年兴起”，继承他们的是“土耳其人，一群毒蛇，比他们的先祖更邪恶，彻底消灭了他们的祖宗撒拉森人”^[30]。与伊斯兰的冲突一直是非同凡响的：更深刻，威胁更大，也更像是一场噩梦。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200年中，欧洲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去畏惧更富庶、更强大、组织也更得力的奥斯曼帝国。但欧洲人对这个强大对手的想象却非常偏颇，建立在宗教思维的基础上。而在当时的欧洲，基

督教已经开始式微。奥斯曼世界的内部和外部完全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面貌，这一点在君士坦丁堡特别明显。

萨阿德丁宣称，在占领伊斯坦布尔之后，“城内教堂中的丑恶偶像和各种污秽腌臢被一扫而净”^[31]，但事实并非如此。穆罕默德二世重建的君士坦丁堡与基督教世界想象中的可怕的伊斯兰堡垒迥然不同。苏丹自认为不仅是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还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此着手重建了一座多元文化的都城，所有的公民在这座城市都享有一定的权利。他以强制手段让希腊基督徒和土耳其穆斯林都在城里安家，保障了在加拉塔的热那亚飞地的安全，并禁止土耳其人在加拉塔居住。曾激烈反对东西方教会联合的僧侣真纳迪奥斯在战后被变卖为奴，但苏丹将他从埃迪尔内赎回，让他重返城市，担任东正教社区的牧首。苏丹对他告诫道：“去做牧首吧，愿你好运，并请放心，我一定会对你友善相待。你将享有在你之前的历代牧首曾享有的特权。”^[32]基督徒居住在自己的社区内，并保留了自己的一些教堂，尽管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们必须穿着显眼的服装，并被禁止持有武器。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宽容的政策。作为对照，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天主教双王于1492年收复了西班牙全境，强迫所有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否则就将他们驱逐出境。西班牙犹太人被鼓励移民奥斯曼帝国——“世界的避难所”。根据犹太难民的经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总的来讲受到了友好的待遇。“在土耳其人的国度，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一位拉比写信给在欧洲的兄弟，“我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手头有很多金银。我们没有被征收苛捐杂税，我们的商业活动也非常自由，不受任何阻碍。”^[33]穆罕默德二世因为这些宽容政策，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很多批评。他的儿子，更为虔诚的巴耶济德二世宣称，他的父皇“受到奸臣和伪善者的蛊惑”，“违反了先知的律法”^[34]。

随着光阴流逝，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色彩越来越浓厚，但穆罕默德二世给这座城市确定了多元文化的基调（这的确令人吃惊），使它成为

典型的黎凡特城市。对那些不受陈腐观念影响、愿意亲自观察的西方人来说，君士坦丁堡有很多让他们意外的地方。1499年，德意志人阿诺尔德·冯·哈尔夫^[35]访问了这座城市，在加拉塔吃惊地发现了两座方济各会修道院，那里仍然在举行天主教弥撒。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异教徒的人们都很清楚他们的宽容。“土耳其人并不强迫任何人背弃自己的信仰，并不特别努力去劝说任何人改宗，而且非常鄙视叛教者。”^[36]匈牙利的乔治在15世纪写道。这与宗教改革期间令欧洲四分五裂的宗教战争形成了鲜明对照。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难民流动总的来讲是单方向的：从基督教国家逃往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更热衷于建设一个世界帝国，而不是让全世界都皈依伊斯兰教。



奥斯曼书法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西方来说是个巨大的伤痛。它不仅挫伤了基督教世界的自信，还被认为是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37]。但它的陷落同样也把这个地区从贫困、孤立和破败中解脱了出来。普罗科匹厄斯在6世纪称颂的被“水的花环”^[38]围绕的城市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富饶的多元文化帝国的首都，跨越两个世界和十几条贸易路线，再一次焕发了生机活力。西方人相信土耳其人是世界末日产生的长尾巴的怪物，“一半是人，一半是马”^[39]。就是这些人建设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城市，与黄金的基督教城市不同，但同样光彩照人。

君士坦丁堡城内带遮阳篷的集市和埃及市场的迷宫般小巷又一次开始经营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骆驼商队和商船又一次把它和黎凡特的所

有主要贸易据点联系起来。但对乘船从马尔马拉海接近城市的水手们来说，君士坦丁堡的地平线旧貌换新颜。在圣索菲亚清真寺身侧，城市的山坡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很多清真寺的灰色铅皮屋顶。城市的地平线上还屹立着许多纤细如针或粗如铅笔的白色尖塔，这些尖塔带有凹槽，多层阳台上雕刻着精美的花饰。一连好多位才华横溢的清真寺建筑师在直冲云霄的穹顶下创作出了抽象而永恒的建筑空间：清真寺内部沐浴在安详的日光下，砖块上刻有精细复杂的几何图形、书法和花朵图案。这些图案的诱人色彩——鲜亮的番茄色、绿松石色和青瓷色，再加上大海深处的清澈碧蓝，制造出了《古兰经》中描摹的“无边无际的乐园的影像”^[40]。

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座赏心悦目、莺声燕语的城市，遍布木屋和柏树，随处可见喷泉、花园、静穆优雅的墓园和地下集市，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工匠们忙得不可开交。每种职业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聚集地，身着五花八门服饰、头戴形形色色帽子的黎凡特各民族在这里劳作或经商。从街角或者清真寺的平台上往往能够突然瞥见大海。十几座清真寺发出的召唤祈祷声从早到晚覆盖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就像当地小贩的叫卖声一样亲切。在托普卡帕宫森严的大墙之后，奥斯曼苏丹们建造了可与阿兰布拉宫^[41]和伊斯法罕城^[42]媲美的恢宏宫殿：一系列纤弱的砖砌楼台亭阁，更像是坚固的帐篷，而不是普通建筑物，坐落在五彩缤纷的御花园内。苏丹们从这里可以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亚洲的群山。奥斯曼帝国的艺术、建筑和礼仪使伊斯坦布尔成了一个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世界，就像之前的基督教君士坦丁堡一样，令西方访客叹为观止。“我目睹了这个小世界的景观，伟大的君士坦丁堡城，”爱德华·利思戈在1640年写道，“它的灿烂辉煌令观察者目瞪口呆……全世界的人对它赞不绝口，人间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其媲美。”^[43]



新地平线：从海上看伊斯兰城市

历代苏丹为庆祝自己的凯旋而命人制作的细密画中对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伊斯坦布尔的旖旎风光进行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描绘。图画中是一个由原色构成的欢欣世界，景致扁平，没有透视效果，就像砖块和地毯上的装饰图案。图画中有宫廷觐见和宴会、战役和围城、枭首、游行队伍和节庆、帐篷和旗帜、喷泉和宫殿、精美的长袍和甲冑，以及美丽的骏马。这是一个酷爱礼仪排场、鼓乐噪音和光彩的世界。图画中还描绘了斗羊比赛、杂技演员、做烤肉的厨师、烟火表演；成群的近卫军士兵敲锣打鼓，无声地在页面上行军；在金角湾，杂技演员从船只桅杆之间连接的绳索上走过；戴白头巾的骑兵队伍策马经过富丽堂皇的帐篷；有的图画就是城市的地图，色泽鲜艳得如同珠宝；所有图画都五颜六色、光彩夺目：鲜红色、橙色、品蓝色、丁香色、柠檬色、栗色、灰色、粉红色、碧绿色和金色。细密画展现的世界似乎表达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成就（仅仅200年间，就从游牧部落一跃成为大帝国）的喜悦和骄傲。这也是塞尔柱突厥人曾经在科尼亚^[44]圣城的一座门廊上写下的文字（“我所创建的，世间无人能及。”^[45]）的回音。

1599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向苏丹穆罕默德三世赠送了一台管风琴，作为友谊的象征。管风琴的制作者托马斯·达勒姆也亲自前往，为奥斯曼统治者演奏。这位大音乐家被人带领着穿过宫殿的连续多个庭院，最后来到苏丹面前。他被富丽堂皇的礼仪深深震撼，“这景象让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46]。自君士坦丁大帝于4世纪建立第二罗马和第二耶路撒冷以来，所有到访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访客都表达了同样的赞叹。法兰西人皮埃尔·吉勒在16世纪写道：“在我看来，其他城市终有一死。而只要人类尚存，这座城市就将一直延续下去。”^[47]

[1]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135

[2] Camariotes, Matthew, “De Constantinopoli Capta Narratio Lamentabilis, ” in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Series Graeco-Latina*, vol. 160, ed. J. P. Migne, Paris, 1866, p.1070

[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p.416

[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pp.44-6

[5]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as, Detroit, 1975, pp.234-5

[6] quoted Lewis, Bernard, *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Norman, 1968, p.8

[7]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33

[8]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p.76

[9] quoted Wheatcroft, Andrew, *The Ottomans: Dissolving Images*, London, 1995, p.23

[10] 即希腊的优卑亚岛，是希腊仅次于克里特岛的第二大岛。威尼斯人将这个岛称为“内格罗蓬特”，这个名字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黑桥”。

[11] 希腊南部麦西尼亚州的港口城市，今称迈索尼。“莫东”是威尼斯人给它取的名字。

[1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xxxviii

[13] quoted Schwoebel, Robert,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1967, p.8

[14] quoted Schwoebel, Robert,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1967, p.4

[15] 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1405～1464，1458～1464年在位），他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诗人和历史学家。

[16] quoted Schwoebel, Robert,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1967, p.9

[17] quoted Schwoebel, Robert,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1967, p.4

[18] Lewis, Bernard,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London, 1982, p.32

[19] Ibn Taghribirdi, Abu al-Mahasin Yusuf, *History of Egypt, Part 6, 1382-1469 A.D.*, trans, W. Popper, Berkeley, 1960, pp.38-9

[20] Doukas,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p.300

[21] Inalcik, Halil, *The Ottoman Empire: Conquest, 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London, 1978, p.56

[22] quoted Schwoebel, Robert,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1967, p.43

[23]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66

[24] quoted Schwoebel, Robert,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1967, p.11

[25]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358

[26] 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与阿尔巴尼亚隔海相望。

[27]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p.170-71

[28] 理查德·诺尔斯（约1545～1610），英国史学家，他的《土耳其通史》是用英语写成的第一部关于奥斯曼帝国军政的史书。他的文笔也受到文豪塞缪尔·约翰逊的赞扬。

[29] *Othello*

[30] quoted Matar, Nabil, *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 Cambridge, 1998, p.158

[31]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p.33

[32] quoted Runciman, Stephe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1965, p.155

[33] quoted Mansel, Philip,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1924*, London, 1995, p.15

[34] quoted Mansel, Philip,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1924*, London, 1995, p.32

[35] 阿诺尔德·冯·哈尔夫（1471～1505），出生于科隆的骑士和旅行家，他曾前往耶路撒冷朝觐，游历了近东很多国家，包括奥斯曼帝国。他在著作中记述了自己在这些国度的见闻。

[36] quoted Mansel, Philip,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

1924, London, 1995, p.47

[37] quoted Schwoebel, Robert,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1967, p.9

[38] quoted Freely, John, *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 Woodbridge, 2000, p.3

[39] quoted Matar, Nabil, *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 Cambridge, 1998, p.159

[40] quoted Levey, Michael, *The World of Ottoman Art*, London, 1971, p.15

[41] “阿兰布拉”的意思是“红色城堡”或“红宫”，位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是古代清真寺、宫殿和城堡建筑群。宫殿为原格拉纳达摩尔人国王所建，现在则是一处穆斯林建筑、文化博物馆。该宫城是伊斯兰教世俗建筑与园林建造技艺完美结合的建筑名作，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建筑的优秀代表，1984年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2] 位于今伊朗，历史悠久，一度是伊斯兰世界辉煌和繁荣的名城。

[43] quoted *Istanbul: Everyman Guides*, London, 1993, p.82

[44] 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

[45] quoted Levey, Michael, *The World of Ottoman Art*, London, 1971, p.18

[46] quoted Mansel, Philip,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1924*, London, 1995, p.57

[47] quoted Freely, John, *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 Woodbridge, 2000, p.14

尾声：安息之地



死亡阻挡了凶悍而顽强的野蛮人，这对基督教世界和意大利来说真是大幸。^[1]

——乔万尼·萨格雷多，17世纪威尼斯贵族

1481年春季，苏丹的马尾旗被插在了伊斯坦布尔对岸的安纳托利亚海岸上，表明这一年的征战将在亚洲进行。除了苏丹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主要大臣，知晓战役的真正目标，这对穆罕默德二世的一贯低调和保密来说是很典型的。新战争的目标很可能是要讨伐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

30年来，苏丹从不懈怠，努力去建设他的世界帝国，事必躬亲地处理国家大事：任命和处决大臣、接受贡礼、重建伊斯坦布尔、强制迁徙人口、对经济进行重新规划、缔结条约、对顽固不化的人进行残酷的惩罚、授予宗教自由，一年年地向东方和西方派遣军队，或者御驾亲征。这一年，他49岁，百病缠身。无情的光阴和自我放纵使得他的身体十分衰弱。根据当时的一份不甚恭敬的报告，他颇为肥胖，“脖子短粗，面色蜡黄，肩膀过高，嗓门很大”^[2]。像收集战役奖章一样收集了大量头衔（“战争的雷霆”“海洋与陆地的权力与胜利之王”“罗马人和地球的皇帝”“世界征服者”）的苏丹有时几乎无力行走。他患有痛风和令身体畸

形的肥胖症，深居托普卡帕宫，远离世人的视线。被西方称为“饮血暴君”“尼禄第二”的苏丹的外貌已经非常可怕。法兰西外交官菲利普·德·科米纳^[3]声称，“见过他的人告诉我说，他的两腿肿胀得可怕，快到夏天的时候，肿块有人的身体那么大，而且无法割破。然后肿胀消退了”^[4]。在宫墙之后，穆罕默德二世从事着对暴君来说不寻常的活动：园艺、手工，以及向新近从威尼斯招来的画家真蒂莱·贝利尼订制淫秽的壁画。贝利尼的名作就是苏丹的最后一幅肖像，它被装裱在一座金色拱形结构下，顶端放置皇冠，暗示了苏丹的某些无法得到抚慰和满足的本质：世界征服者一直到最后都喜怒无常、高度迷信和惶惶不安。

4月25日，穆罕默德二世渡过海峡，抵达亚洲，准备发动这一年的战役，但几乎当即就患了严重胃病，卧床不起。在几天的痛苦折磨之后，他于1481年5月3日在盖布泽^[5]驾崩。历史上的另外一个雄心勃勃要征服世界的人——汉尼拔就在此地服毒自尽。穆罕默德二世的结局笼罩在迷雾中。他极有可能是被自己的波斯御医毒死的。虽然许多年来，威尼斯人多次企图刺杀他，但嫌疑最大的人却是他的儿子巴耶济德。穆罕默德二世设定的兄弟相残的继承法则或许诱使这位王子先发制人，夺取皇位。他成功了。父子的关系并不亲近。虔诚的巴耶济德非常憎恶穆罕默德二世的非正统宗教观点。根据意大利某宫廷的流言，巴耶济德曾说，“他的父皇非常专横霸道，不信先知穆罕默德”^[6]。30年后，巴耶济德也被自己的儿子“恐怖的”塞利姆毒杀。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王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7]。在意大利，人们听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讯，特别欢欣鼓舞。礼炮齐鸣，钟声敲响；在罗马，人们燃放烟火，举行感恩礼拜。将这消息送到威尼斯的信使宣称，“雄鹰已死”^[8]。就连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也长舒了一口气。

今天，法提赫（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陵寝坐落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市区的一座清真寺建筑群内，这个市区和建筑群均以他的称号“法提赫”命名。陵寝的选址不是偶然的。它取代了拜占庭最著名和历史最悠

久的教堂之一：圣使徒教堂。城市的创建者君士坦丁大帝于337年被隆重地安葬在这座教堂中。穆罕默德二世无论生死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他的陵寝后来被地震摧毁，又得到了彻底重建，所以现在的皇陵内部就像19世纪的法国客厅一样金碧辉煌，配有老爷钟、巴洛克式的天花板装饰和悬挂的水晶枝形吊灯，简直就是一位穆斯林的拿破仑的安息之地。装饰华美的墓穴覆盖绿布，顶端有雕刻出来的头巾。墓穴的长度和一门轻型火炮相当。人们来这里祈祷、阅读《古兰经》，或者拍照留念。随着光阴流逝，法提赫逐渐被奉为圣人。对穆斯林信众来说，他渐渐有了圣人的特征，于是他有了双重身份，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和丘吉尔一样，他既是整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卡车的品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一座大桥、纪念邮票或者学校建筑上特别显眼的纵马狂奔的英雄形象，都打起了穆罕默德二世的招牌），也是虔诚的象征。法提赫区是传统而新近自信昂扬起来的穆斯林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地带。这是个安静平和的地区：祈祷结束后，戴头巾的妇女聚集在清真寺庭院内的悬铃木树下聊天，儿童在她们周围转着圈玩耍，流动小贩叫卖着芝麻卷、玩具汽车和动物形状的氦气球。在穆罕默德二世陵墓的门廊处摆放着一发石制炮弹，似乎是许愿的供奉。

这场围城战中的其他重要奥斯曼人物的命运告诉我们，伴君如伴虎。素来反对战争政策的哈利勒帕夏的末日来得很快。1453年8月或9月，他在埃迪尔内被处以绞刑。接替他职位的是扎甘帕夏，那个热切支持战争的希腊叛教者。老维齐尔的命运标志着国家政策的一个决定性转折：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维齐尔都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奴隶出身，而不是门阀贵族阶层的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至于对胜利贡献极大的铸炮大师乌尔班，有言之成理却无法证实的证据表明，他在战役中活了下来，从苏丹那里得到了赏赐：在占领伊斯坦布尔之后，城里有一个区叫作“炮手乌尔班区”，说明这个匈牙利雇佣兵可能在城里定居了，尽管此前他曾花了很大力气来摧毁它的城墙。在阿拉伯人第一次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阵亡的先知追随者艾优卜对圣战者来说是个极大的激励。奥

斯曼人在金角湾北端风景宜人的郊区埃于普（即土耳其语中的“艾优卜”）的悬铃木树林中为他建造了专门的清真寺建筑群。这是朝覲的圣地，几百年来历代苏丹就在这里的清真寺加冕。

成功逃生的守军后来的命运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希腊难民一般都经历了家园沦丧的难民的典型命运：在异邦忍受贫困，对失去了的城市无比思念。很多人在意大利勉强谋生（到1478年，仅在威尼斯就有4000个希腊人），或者在克里特岛，那里是东正教会的一个堡垒。他们散布到全世界，甚至到了遥远的伦敦。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血统逐渐被欧洲的较次要的贵族吸纳。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一两个后人由于思乡心切或者无以度日，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寄希望于苏丹开恩。其中至少有一人，安德鲁，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了苏丹宫廷的一名官员，改名为穆罕默德帕夏。最能体现希腊人悲剧命运的或许就是乔治·斯弗朗齐斯夫妇的经历。他们在科孚岛的修道院了却残生。斯弗朗齐斯写下了一部简短而悲戚的编年史，记述了自己的一生。这部史书是这样开始的：“我是命途多舛的乔治·斯弗朗齐斯，御榻首席总管大臣，现在作为修道士的法号是格列高利。我将讲述我这悲惨一生中发生的事件。如果我从来不曾降生到这个世界，或者在幼年就夭折，一定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请诸位读者知晓，我出生于1401年8月30日，星期二。”^[9]斯弗朗齐斯以简明而哽咽的语调记录了奥斯曼帝国扩张带来的双重悲剧：他个人的悲剧，以及拜占庭国家的悲剧。他的两个孩子都被送入了苏丹后宫；他的儿子于1453年在后宫被处决。他对1455年9月的记述是：“我美丽的女儿萨玛尔在苏丹后宫患传染病而死。她的凄惨的父亲是多么可怜！她享年只有14岁又5个月。”^[10]他一直活到1477年，目睹了希腊全境被土耳其占领，希腊人的自由彻底丧失。他在著作的结尾再次肯定了东正教关于“和圣子”（filioque）的观点，就是这个问题在围城期间带来了那么多周折。“我坚信，圣灵并非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就像意大利人所称的那样，而是全无分隔，从圣父所发生。”^[11]

从围城战中幸存下来的意大利人的命运也同样各不相同。负伤的朱斯蒂尼亚尼返回了希俄斯岛。根据他的热那亚同胞莱奥纳德大主教的说法，朱斯蒂尼亚尼不久之后就死去了，“要么是因为伤重不治，要么是因为失败的耻辱”^[12]，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责怪他造成了最后的失败。他的墓志铭（现已遗失）上写着：“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安息于此，他是一位伟人，热那亚与希俄斯岛的贵族。在君士坦丁堡被攻破时，拜占庭末代皇帝和东方基督徒的勇敢领袖——最尊贵的君士坦丁不幸阵亡。在此期间，朱斯蒂尼亚尼被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打成重伤，于1453年8月8日逝世。”^[13]莱奥纳德则于1459年在热那亚去世。基辅的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当初到君士坦丁堡的使命是促使希腊人与西方教会联合。教皇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缺席），尽管教皇其实并没有这个权力。伊西多尔罹患老年痴呆，于1463年在罗马去世。

君士坦丁十一世本人的结局却始终无法确定，他也没有墓地。皇帝的阵亡宣示了拜占庭世界的彻底灭亡，以及土耳其对希腊的占领。拜伦^[14]在有生之年也看不到土耳其统治的消亡。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神秘命运成了希腊人灵魂深处对沦丧了的拜占庭光荣的渴望的焦点。随着光阴流逝，人们围绕他的名字编织了大量预言。在希腊大众文化中，他成了亚瑟王一般的神奇英雄人物，往昔和未来之王，长眠在黄金门旁的坟墓内，有一天将会归来，穿过那城门，将土耳其人向东驱逐，一直到红苹果树那里，并收复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对皇帝的神奇形象非常畏惧。穆罕默德二世小心谨慎地监视着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兄弟们，另外还用砖石将黄金门彻底封闭。这些传奇故事使得在有生之年命运悲惨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死后有了一段新的悲剧生命。到19世纪末，他的遗产将与希腊的民族主义理想合二为一，即所谓“伟大理想”：将拜占庭的希腊居民重新收纳进希腊国家。这促使希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兵干预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却被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于1922年击败，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士麦那的希腊居民遭到屠杀，后来进行了人口交换。直到这时，重建拜占庭的梦想才彻底破灭。

如果说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精神尚存，那么不是在伊斯坦布尔，而是在1000英里之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他曾以中世纪小城米斯特拉斯为首府，统治摩里亚。200年间，在别处均已衰败的拜占庭文化传统在米斯特拉斯却得以繁荣发展，令人惊异。它仍然是拜占庭灵魂的神龛：在现代，城堡下方的村庄内，每一根路灯柱都带有双头鹰徽记。在帕里奥洛格广场上矗立着君士坦丁十一世挥剑保卫基督教信仰的雕像，尽管他的最终结局无人知晓。雕像坐落在一座大理石柱基前方，柱基上刻有杜卡斯的言辞。在雕像头顶上张挂着拜占庭旗帜，那是一面带有黑鹰的鲜黄色旗帜，在希腊的蔚蓝天空中悬挂着，不起一丝涟漪。雕像后方就是中世纪的米斯特拉斯古城，芳草茵茵的山坡上有很多坍塌崩坏的宅邸、教堂和厅堂，之间有柏树。这是个令人心酸的地方。在这里，君士坦丁堡得以在缩小的规模上重建，成了希腊的佛罗伦萨，尽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在这里，艺术家们创作了光辉灿烂的壁画，展现了人文主义对福音的诠释；人们重拾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教诲，憧憬黄金的未来，直到奥斯曼军队将米斯特拉斯摧毁。君士坦丁十一世可能就是在圣德米特里大教堂（它其实只有英国的乡村教堂那么大）加冕的；他的妻子狄奥多拉则被安葬在圣索菲亚教堂。山顶屹立着摩里亚君主的宫殿，背后就是光秃秃的泰格图斯群山，下方则是延绵不绝的斯巴达台地。这座宫殿的建筑风格与君士坦丁堡城墙附近的皇宫相似。我们可以想象，皇帝当年曾经从通风良好的厅堂的窗洞俯视下方的碧绿平原。斯巴达重步兵曾经在这里操练，为温泉关战役做准备；拜占庭人则在这里种植橄榄和小麦，饲养蜜蜂和丝蚕。每年5月29日，土耳其人都会在埃迪尔内门举行战役重演，以庆祝攻克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克里特岛带有桶状拱顶的乡村小教堂和希腊诸多城市的大教堂内都会举行纪念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活动，尽管在东正教眼中他至死都是个异端分子，因为他支持与西方教会联合。

在伊斯坦布尔，曾经的基督教城市没有留下多少遗迹，尽管人们仍然可以走过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黄铜大门（这些大门在1453年5月29日被

最后一次用武力打开），从举手降福的基督马赛克像下走过，走进教堂的大厅。这座大厅在今天和在6世纪一样，令人叹为观止。城市本身被包容在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形成的两边之内，在外观上仍然保留了这决定历史走向的特殊形状。今天，渡船就像当年援救君士坦丁堡的4艘基督教船只那样，从西方稳步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经过卫城（那里曾经爆发海战），然后和古代的航船一样转弯进入金角湾入口。今天的金角湾没有铁链，却建起了一座通往加拉塔的大桥。在金角湾北上的下一站，渡船可以在卡西姆帕沙（“泉源谷”）停歇，穆罕默德二世的战船曾翻山越岭，一艘接一艘地在那里入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如梅利堡（割喉堡）依然横跨那里地势奇特的山坡，水边的主塔（那是哈利勒建造的工程）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土耳其国旗。

城市的部分海墙，尤其是金角湾沿岸的海墙，今天已经只剩残垣断壁。但三角形的第三条边，宏伟的狄奥多西城墙依然威风凛凛。今天从机场出来的游客一下子就能够看到这一盛景。在近距离观察，就能发现1500个春秋留下的印迹：部分城墙残破坍塌，有些地方已经破败不堪，还有些地方新近做了修补，与古老的墙砖非常不协调；塔楼以奇怪的角度倾斜，被地震或炮弹破坏，或者被岁月磨损；曾给奥斯曼军队制造了很大麻烦的壕沟现在已经长满蔬菜，一派和平景象；主干道穿过了一些地段的防御工事，新的地铁体系对防御工事的破坏比当年的塞尔维亚坑道工兵更厉害。但总的来讲，虽然承受了现代世界的巨大压力，狄奥多西城墙的全段几乎都是完整无缺的。在城墙沿线，人们可以从一片大海走到另一片，沿着起伏的地势，走下里卡斯河谷倾斜的中段城墙，那里的城墙早已被中世纪的炮火摧毁；或者可以站在城墙顶端，想象下方的平原当年遍布奥斯曼大军的帐篷和招展旌旗的景象，如同“郁金香的花坛”^[15]，而桨帆船无声地在闪闪发光的马尔马拉海或金角湾航行。围城战期间的几乎所有城门都保存至今，它们的沉重拱门的阴影仍然令人生畏。但黄金门早就被穆罕默德二世命令用砖石堵死了，这是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十一世重返人间的预言成真。今天通过一条两侧摆放乌尔班大炮

的石弹的林荫大道，可以走到黄金门。对土耳其人来说，最重要的城门是埃迪尔内门，也就是拜占庭时期的查瑞休斯门。这里安放着一块铭碑，记载了穆罕默德二世当年从此正式进入伊斯坦布尔的盛景。但在围城战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几座城门都在北面靠近金角湾的地段，今天已经被彻底遗忘。

在这里，城墙突然转了一个90°的弯。在这拐弯处附近一块荒地的后方，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宫废墟的旁边，有一座不起眼的被砖石堵死的拱门，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改建和修葺造成的典型例子。有人说，这就是预言中的竞技场门，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打开的小边门，第一批奥斯曼士兵就是从这里登上城墙的。或者，竞技场门其实在别的什么地方。关于这场伟大攻城战的事实很容易就演化成了神话。

在1453年春季的战役中居功至伟的大炮仍然可以在现代伊斯坦布尔城内找到。它们散布在全城，安睡在城墙旁边或者在博物馆庭院内。这些原始的带箍的管状火器大体上没有受到500年风吹日晒的影响。有的大炮旁边还摆放着它们曾发射的花岗岩或大理石球形炮弹。乌尔班巨炮如今已经无迹可寻，它可能在位于托帕内^[16]的奥斯曼铸炮厂被熔化了。查士丁尼的巨型骑马像也被送到那里熔化掉了。穆罕默德二世遵循占星家的建议，将这座雕像拆除，但它在广场上待了很长时间，最后才被拖去熔化。16世纪，法兰西人皮埃尔·吉勒曾在那里看到雕像的一部分。“碎片当中包括查士丁尼像的腿，它的长度超过我的身高。还有他的鼻子，超过9英寸长。马腿躺在地面上，我不敢公然去测量它们，但偷偷量了其中一个马蹄，发现它的高度达到9英寸。”^[17]这是世人对伟大皇帝的雕像，以及拜占庭的璀璨辉煌的最后一瞥。很快，它们就被熔炉吞噬了。



被砖石堵死的黄金门

[1]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08

[2]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24

[3] 菲利普·德·科米纳（1447～1511），勃艮第和法兰西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他的回忆录是15世纪欧洲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

[4]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24

[5] 土耳其城市，位于马尔马拉海北岸，伊斯坦布尔以东约30英里处。

[6]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11

[7]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05

[8]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408

[9]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21

[10]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75

[11]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91

[1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162

[13] quoted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II: *The Fif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1978, p.429

[14] 乔治·戈登·拜伦勋爵（1788～1824），英国浪漫派大诗人，曾赴希腊参加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独立战争，结果患热病而死，成为希腊的民族英雄。

[15] Chelebi, Evliya, “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d'après le Seyahatname d'Evliya Chelebi, ” trans. H. Turkova, *Byzantinoslavica*, vol. 14, 1953, p.2

[16] 今天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区。

[17] Gilles, Pierre, *The Antiquities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729, p.130

资料来源



这场战争中发生了诸多事件，无法全部付诸笔端，口舌也不能尽述。[\[1\]](#)

——内希里[\[2\]](#)，15世纪奥斯曼史学家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或者说是奥斯曼人占领伊斯坦布尔，是中世纪一个承前启后的时刻。这个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人们对这个故事兴趣盎然，如饥似渴，这使得海量的文字资料得以保存下来。报道这起事件的文献汗牛充栋，这诚然是一种福气。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将各个部件组合起来并不能得到一个整体。事件的目击者其实是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是基督徒；本书的读者一定已经熟悉了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大主教，他是个脾气火爆的天主教教士；随船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他写下了在日期记录上最为可靠的日记；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俄罗斯东正教徒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图尔松贝伊，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名官员；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比如乔治·斯弗朗齐斯，他的编年史让现代史学家非常头痛。在这些亲历者之后，有一小群人的生活年代与围城战相距不远，他们很可能在战役结束后不久就听到了二手的记述。其中包括情绪激动的希腊史学家杜卡斯，他的著作非常生动形象，然而不太可靠，充满了虚

构的故事，但给故事注入了一种活泼的能量。另外一个希腊人克利托布罗斯是因布洛斯岛上的一名法官，他虽然是基督徒，著作却是倾向于奥斯曼帝国的，这非常独特。这位雄心勃勃的史学家的一个愿望是，“西方所有民族”都会阅读他的作品，包括那些居住在不列颠诸岛的人。随后几个世纪中又涌现了很多来自双方的文献，其中一些是直截了当的重述，有的则添加了一些道听途说、失落了的口头记述、神话以及基督教的或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宣传，产生了大量无法证实、容易醉人的混杂信息。本书就是在这些叙述的基础之上写成的。

在处理这些原始资料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当然，这些困难是历史研究中特有的，尤其是科学时代之前的历史。围城战的目击者在估测军队兵力和伤亡数字时倾向于给出很大的整数，对日期和时间的记录非常含糊，使用的是他们本地的度量衡系统（这让人非常恼火），而且常常为了哗众取宠而夸大其词。各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顺序一般都是事后捏造的，而事实、故事和神话之间的区别非常微妙。宗教迷信和事件难解难分，因此对城市陷落的记述其实是真实事件与人们的信念的混合。当然，记述者们根本没有客观报道的概念。

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视角和动机，因此我必须小心谨慎地分析每位作者的观点和特殊利益。作者常常在宗教、民族和信仰的基础上做出评判。威尼斯人当然会大肆宣扬他们的水手的英勇无畏，并诋毁热那亚人的奸诈。热那亚人也是这么干的。意大利人控诉希腊人的怯懦、懒惰和愚蠢。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在信仰鸿沟的两边互相指责。在基督教阵营内，各派系都在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寻找神学上或者现实中的原因，互相口诛笔伐、大肆攻击。当然，所有的基督教作者都会辱骂嗜血暴君穆罕默德二世，只有克利托布罗斯是个例外，他对苏丹极尽谄媚之能事。奥斯曼人自然对基督徒的攻击以牙还牙。

这些目击者讲述的故事总是非常扣人心弦。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自

已目睹和亲历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各种版本的故事却都有语焉不详的地方。1453年对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意义极其重大，但奇怪的是，很少有当时奥斯曼人对攻陷城市过程的记述，没有目击者的叙述。除了谢赫阿克谢姆赛丁（Akshemsettin）给穆罕默德二世的信件之外，几乎没有对穆斯林士兵的情感与动机的描述。当时的奥斯曼社会总体上还是不识字的，他们依赖口头传播，也没有将个人的故事记录下来的传统。他们唯一的文字记载就是文字简练的编年史，后来奥斯曼人对这些编年史做了重新加工，以帮助构建奥斯曼皇朝的传奇。因此往往需要对基督徒记述的字里行间的东西进行仔细分析，才能解读出奥斯曼人的观点。1453年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历史主要是由失败者书写的。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东正教希腊人也很少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或许是因为很多地位显赫的拜占庭人在最后的洗劫中被杀，或者像乔治·斯弗朗齐斯一样过于悲痛，不肯执念于凄惨的往昔。基督教方面的故事主要是由意大利人和主张联合的希腊人写下的。他们对东正教守军，除了君士坦丁十一世之外，都毫不客气地大肆攻击。因此，故事中包含了很多或许永远无法揭开真相的谜团。土耳其史学家对奥斯曼军队究竟如何搬运战船进行了热烈的辩论。而君士坦丁十一世之死的真相始终笼罩在迷雾中，令人抓狂。不同派别都有自己的解释。事实上，焦躁而情绪激烈的穆罕默德二世在围城战期间似乎无处不在，在他身旁，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形象则显得模糊而虚幻。

我重述“君士坦丁堡的故事”的目标是从这些互相矛盾、困难重重的文献中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间版本，对事实的把握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在迷宫般的文献中谨小慎微地择路前行，有时不免显得笨手笨脚，但总是努力使各种资料协调起来，并寻找最有可能的解释。虽然巴尔巴罗的日记对围城战的过程一天天记录下来，但日期仍然是非常难以确定的。每一份文献在事情经过和事件发生日期的细节上都有自己的说法，很多研究过这个主题的学者在某些微妙细节上或许不会同意我。如

果对本书做一番特别仔细的探究，就会发现事件的时间上有些小小的谜团。我保留了这些谜团，让它们作为无法确知、不可调和的东西的记录。总体上，我尽量选择在我看来可能性最大的时间顺序，并在我的叙述中尽可能避免使用“或许”“可能”“也许”这样可怕的词。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把普通读者拖到各种版本资料的泥沼中，那样对这个轮廓已经雄浑有力且五彩缤纷的故事并无助益。与此同时，如果地理、地形地貌、气候和时间的具体证据非常可靠，我就会走捷径，在某些细节上做大胆的推测。

我创作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捕捉人的声音：第一手地重建故事主要人物的言辞、偏见、希望和恐惧，并讲述“故事中的故事”，即历史人物相信的东西，以及可证实的真相。这些文献的作者往往都是极富个性的人物，几乎和他们讲述的故事一样具有异国风采和神秘感。有些人物，比如巴尔巴罗，只在自己的故事中存在，此外就完全沉默，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其他人，比如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和基辅的伊西多尔，在当时的教会史上还有更重要的角色要扮演。最令人着迷，同时也问题重重的文献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徒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记述，他似乎是作为奥斯曼军队的一名士兵来到君士坦丁堡的。根据推理，他似乎在围城战早期就逃进了君士坦丁堡，目睹和参与了很多事件。他对炮击和城墙上发生的事件的记述特别生动鲜明。后来他逃脱了奥斯曼人的报复，可能是装扮成僧侣躲在一座修道院内。他把传奇、道听途说和第一手的观察混为一体，充满神秘主义气息，常常不可思议，把日期和时间顺序搞得一团糟，很多作家倾向于将他的著作完全摒弃，但它的确包含很多令人信服的细节。在争夺城墙的战斗和处理死尸（他本人可能参加了这项工作）的问题上，他的描述特别具体和细致，这在其他文献中是没有的。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著作几乎是唯一一个写到希腊人战斗情况的资料来源，比如他写到了导致朗加比斯死亡的战斗。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记载中，似乎只有意大利人在战斗，希腊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消极厌战，最糟的情况下（由于宗教分歧）则是阻碍城防、牟取私

利和胆小如鼠。

另外两部编年史，乔治·斯弗朗齐斯和杜卡斯的著作，也注定要在后世有着自己的五彩缤纷的历史。世人皆知，斯弗朗齐斯根据同一个故事写了两个版本，分别称为《小编年史》和《大编年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大编年史》只不过是对《小编年史》的扩充，因为后者对斯弗朗齐斯漫长一生中最重要（尽管非常悲惨）的事件——君士坦丁堡围城战几乎只字不提。《大编年史》文笔生动，细致具体，可信度很高，长期以来被广泛当作关于1453年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但是，学者们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大编年史》其实是100多年后由一个名叫马卡里奥斯·梅里西诺斯的人假冒斯弗朗齐斯的名字，以第一人称捏造的，这的确是别出心裁的模仿。梅里西诺斯这人的履历可没法叫人放心。他是个教士，曾经为了赢得神学争端而伪造御旨。于是，《大编年史》的所有内容都受到了质疑。今天的史学家以不同方法小心对待这本书，因为任何人只要想写关于君士坦丁堡围城战的书，就必须决定好，如何对待《大编年史》。根据细致的文本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编年史》确实是基于斯弗朗齐斯的一部业已失传的较长的史书；它的细节非常具体，如果真的完全是虚构的话，那也说明梅里西诺斯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小说家。斯弗朗齐斯在最后战斗前与君士坦丁十一世一起站在黑暗中塔楼上的那一幕就是梅里西诺斯写的；土耳其历史的一个代表性瞬间的故事——近卫军的巨人乌鲁巴特的哈桑率先将奥斯曼旗帜插上城墙——也源自梅里西诺斯。至少哈桑的故事非常具体和细致，不大可能是虚构的。

杜卡斯的编年史同样奇异——它是一部记录拜占庭陷落的悠长历史的著作。如果说杜卡斯并没有亲历围城战的话，他却目睹了与之相关的很多事件。他有可能目击了乌尔班大炮在埃迪尔内的试射，以及意大利船只在割喉堡被击沉后被俘水手被穆罕默德二世钉在尖木桩上的惨景。他的叙述栩栩如生、态度坚定不移，结尾却非常奇怪：在描述奥斯曼军

队于1462年攻打莱斯博斯时，一个句子还没写完就戛然而止，作者的命运（和故事中的很多东西一样）都悬而不决。对莱斯博斯事件的生动描述给人很强烈的印象，作者本人就在那里，所以有人猜测，希腊守军的最后崩溃使得他无法把史书写完。他和其他守军一样遭受了可怕的噩运（被锯成两截，因为奥斯曼人许诺，不会将他们斩首），还是被贩卖为奴？他就这样一句话没说完就彻底消失了。

对君士坦丁堡故事的讲述也有着自己的丰富历史。本书构建在历史悠久的大量英语作品的基础之上；对这个故事的研究从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开始，然后由两位英国骑士接手，1903年的埃德温·皮尔斯爵士和1965年的伟大拜占庭史学家史蒂文·朗西曼爵士，还有其他语言的大量著作。因布洛斯的克利托布罗斯早在500年前就发现了把故事讲好的困难之处，因此在给穆罕默德二世的献词中加入了一个聪明的免责声明。未曾亲历和目击史实的作者在给世界征服者献词时当然需要审慎。未来的新的史书都可以引用克利托布罗斯的话：“我自己并非事件的目击者，因此，伟大的皇帝啊，我艰辛地劳作，去了解这些事情的确切真相。在撰写这部史书时，我有时咨询了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并准确地分析所有事情的经过……如果我的言辞无力描摹陛下的丰功伟业……在修史的问题上，我将甘愿让位于技艺比我更高超的人。”^[3]

^[1]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p.261

^[2] 奥斯曼史学家，生卒不详。其著作《世界大观》对史学贡献甚大，是奥斯曼帝国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但关于其生平的资料极少。他可能叫作穆罕默德，在布尔萨居住。1481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驾崩时，他在宫廷任职。

^[3] Kritovoulos, (in English)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Westport, 1970, pp.4-6

鸣谢

写作本书的设想已经酝酿了多年，要感谢的人也很多。如今能够成书，首先要感谢我的代理人Andrew Lownie、Faber出版社的Julian Loose和Hyperion出版社的Bill Strachan，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故事能够成功；然后还要感谢两家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高度的专业素养，促成本书的问世。

至于本书的深层次起源，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捍卫者Christopher Trillo永远心存感激，是他在1973年说服我去了那里；我还要感谢一直给我出谋划策的一小群至交老友：Andrew Taylor、Elizabeth Manners和Stephen Scoffham，他们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并审读了手稿。Elizabeth Manners还拍摄了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维查修道院的壁画，作为本书的封面照片。John Dyson在伊斯坦布尔为我搜集书籍，对我帮助极大，还对我盛情款待。Rita和Ron Morton在希腊也对我热情招待。Ron Morton和David Gordon-Macleod带我去阿索斯山，去一睹现存拜占庭传统的风采。Annamaria Ferro和Andy Kirby帮助我做了翻译工作。Oliver Poole拍摄了照片，Athena Adams-Florou帮助我扫描了图片，Dennis Naish提供了关于铸炮的信息，Martin Dow在阿拉伯文方面给出了建议。对所有这些朋友，我都非常感激。最后，我还要永远感激Jan，她不仅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帮助审稿，还在土耳其忍受被狗咬的痛苦，多年来一贯深爱和支持着我。

我还要感谢下列出版社许可我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节选。本书的部

分材料来自《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故事》，由Walter K.Hanak和Marios Philippides翻译和注解，由Aristide D.Caratzas出版社提供（Melissa International Ltd）；还有部分材料来自《征服者穆罕默德和他的时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作者Franz Babinger，得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许可。

译名对照表^[1]

Abraham of Ankara 安卡拉的亚伯拉罕

Afrasiyab 阿弗拉西亚布

Akshemsettin, Sheikh 谢赫阿克谢姆赛丁

Ahmet 艾哈迈德

Ahmet Gurani 艾哈迈德·古拉尼

Ahmeti 艾哈迈迪

Al-Kashgari 喀什噶里 (Mahmud al-Kashgari,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Al-Rawandi 拉旺迪 (Muhammad bin Ali Rawandi, 穆罕默德·本·阿里·拉旺迪)

Alexios 亚历克赛 (Alexios IV Angelos, 亚历克赛四世·安格洛斯)

Alfonso of Aragon and Naples 阿拉贡和那不勒斯的阿方索

Alhambra 阿兰布拉宫

Alp Arslan, Sultan 艾勒卜·艾尔斯兰苏丹

Amasya阿马西亚

Anadolu Hisari安纳托利亚堡垒

Andrew (Mehmet Pasha) 安德鲁 (穆罕默德帕夏)

Andronikos安德罗尼库斯 (Andronikos I Komnenos, 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科穆宁)

Anemas阿尼玛斯 (地牢)

Anthemius安特米乌斯

Antonio de Corfu科孚岛的安东尼奥

Apocalypse of Pseudo-Methodius伪美多迪乌斯启示录

Arrian阿利安

Artevelde, Philip van菲利普·范·阿尔特维尔德

Asomaton阿索马通

Asper阿斯普尔

Aspron阿斯普隆

Ataturk, Kemal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Attila阿提拉

Avars阿瓦尔人

Aya Sofya mosque圣索菲亚清真寺

Ayyub 艾优卜 (Abu Ayyub al-Ansari 阿布·艾优卜·安撒里)

Bacon, Roger 罗吉尔·培根

Bactatnian Tower 巴克塔提尼安塔楼

Baltaoglu 巴尔托格鲁

Barlaam of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的巴尔拉姆

Barbaro, Marco 马尔科·巴尔巴罗

Barbaro, Niccolò 尼科洛·巴尔巴罗

Battle of Agincourt 阿金库尔战役

Battle of Manzikert 曼齐刻尔特战役

Battle of the Masts 桅杆之战

Bayburt 巴伊布尔特

Bayezit I 巴耶济德一世

Bedouins 贝都因人

Bektashi 拜克塔什派

Bellini, Gentile 真蒂莱·贝利尼

Benedict XII 本笃十二世 (教皇)

Benvenuto 本韦努托 (领事)

bey贝伊

Bezant拜占特

Blachernae布雷契耐（皇宫）

Bocchiardo, Troilo特罗伊洛·博基亚尔多

Bourges布尔日

Brankovic, George杜拉德·布兰科维奇（Durad Brankovic）

Brightman, Thomas托马斯·布莱特曼

Broquière, Bertrandon de la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

Brother George乔治兄弟

Bryennios, Joseph约瑟夫·布里恩尼奥斯

Bucoleon Palace牛狮宫

Bulgars保加尔人

Bursa布尔萨

Byzas拜占斯

Cafer Bey贾费尔贝伊

Caligaria卡里加利亚门

Camariotes, Matthew马修·卡马里奥特斯

Campi, Jacopo de雅各布·德·坎皮

Candia甘地亚

Cantacuzenos, Demetrios德米特里·坎塔库泽努斯

Çelebi, Evliya艾弗里雅·切莱比

Chalkokondyles, Laonikos拉奥尼科斯·哈尔科孔蒂利斯

Charisius, Gate of查瑞休斯之门

Chosroes霍斯劳

Christian I克里斯蒂安一世（丹麦国王）

Constantine I（君士坦丁一世，大帝）

Constantine XI君士坦丁一世十一世

Contarini, Jacopo雅各布·孔塔里尼

Contarini, Filippo菲利普·孔塔里尼

Coco, Giacomo贾科莫·科科

cog柯克船

Commynes, Philippe de菲利普·德·科米纳

Cyzicus库济库斯

Dallam, Thomas托马斯·达勒姆

Dalmata, John约翰·达尔马塔

Dandolo, Enrico恩里科·丹多洛

Demetrios德米特里（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兄弟）

Didimotkon迪迪莫特孔

Diedo, Aluvixe阿卢威克瑟·迪艾多

Dolfin Dolfin多尔芬·多尔芬

Dolmabache多尔玛巴赫切宫

Doria, Zorzi佐尔齐·多里亚

Doukas杜卡斯

Dracul, Vlad弗拉德·德古拉

Dragases德拉伽塞斯

Dromon德罗蒙战船

Dulle Griete疯女格丽特（大炮）

Ebu Seybet ul-Ensari艾布·赛贝特·乌尔-安萨里

Edirne埃迪尔内

Edward III爱德华三世（英格兰国王）

Eleutherii埃莱夫塞雷

Epibatos埃皮巴托斯

Epiphanios埃皮法尼奥斯

Erzurum埃尔祖鲁姆

Eugenius, Gate of尤金尼乌斯门

Eugenius IV尤金四世（教皇）

Faiuzo法尤佐

Filelfo,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菲莱尔福

Filomati“菲罗玛蒂”号

Firuz Bey菲鲁兹贝伊

Flavius Constantinus弗拉维乌斯·君士坦丁

Francisco of Toledo, Don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

Friedrich Barbarossa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

Friedrich III弗里德里希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Fulcher of Chartres沙特尔的富歇

Galata加拉塔

Gallipoli加里波利

Ganga甘噶

Gataloxa“加塔罗科萨”号

gazi加齐

Gennadios (Scholarios) 真纳迪奥斯 (斯科拉里奥斯)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 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

George of Hungary 匈牙利的乔治

George of Trebizond 特拉布宗的乔治

Georgevich, Bartholomew 巴塞洛缪·杰奥尔杰维奇

Gepids 格皮德人

Gilles, Pierre 皮埃尔·吉勒

Giustiniani, Nicholas 尼古拉斯·朱斯蒂尼亚尼

Giustiniani Longo, Giovanni 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

Golden Horn 金角湾

Grant, John 约翰·格兰特

Grezi, Troilo de 特罗伊洛·德·格雷齐

Grioni, Zacaria 扎卡里亚·格廖尼

Guro“古罗”号

Hafiz, Hazret 哈兹莱特·哈菲兹

Halil Pasha哈利勒帕夏

Hamd ul-Ensari哈姆德·乌尔-安萨里

Hamza Bey哈姆扎贝伊

Harff, Arnold von阿诺尔德·冯·哈尔夫

Hasan of Ulubat乌鲁巴特的哈桑

Helena海伦娜

Heraclius希拉克略

Hexamilion赫克萨米利翁（墙）

Hodegetria指路圣母像

Horaia美丽之门

Humbert of Moyenmoutier穆瓦昂穆蒂耶的安贝尔

Hunyadi János匈雅提·亚诺什

Ibn Battutah伊本·白图泰

Ibn Khaldun伊本·赫勒敦

Igor, Prince伊戈尔王子

Innocent III英诺森三世（教皇）

Isfahan伊斯法罕

Ishak Pasha伊沙克帕夏

Isidore伊西多尔（红衣主教）

Ismail伊斯玛仪

Izmit伊兹密特

Iznik伊兹尼克

Janissary近卫军

Jason and the Argonauts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

John VI Kantakouzenos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

John VIII Palaiologos约翰八世·帕里奥洛格斯

Justinian查士丁尼

Kaffa卡法

Kallinikos卡利尼克斯

Kara Bey卡拉贝伊

Kara Hizir Pasha卡拉·赫兹尔帕夏

Karaja Bey卡拉加贝伊

Karaman卡拉曼

Kastamonu卡斯塔莫努

Kemach科马契

Khan Krum克鲁姆汗

Knolles, Richard理查德·诺尔斯

Komnenos, John约翰·科穆宁

Konya科尼亚

Kritovoulos, Michael 米海尔·克利托布罗斯

Kuwae库威岛

Ladislav瓦迪斯瓦夫三世（Wladyslaw III）

Lake Garda加尔达湖

Languschi, Giacomo de贾科莫·德·兰古斯琪

Lecanella,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利卡奈拉

Lemnos利姆诺斯岛

Leo II利奥二世

Leonard of Chios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

Leontari, Manuel Bryennius曼努埃尔·布兰尼乌斯·莱昂塔里

Lithgow, Edward爱德华·利思戈

Lomellino, Angelo安杰洛·洛梅利诺

Longo, Alviso 艾尔维索·隆哥

Longo, Giovanni Giustiniani 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

Lycus 里卡斯河

Lysippos 留西波斯

Maffei, Celso 切尔索·马费伊

Mahmut Pasha 马哈茂德帕夏

Maltepe 马尔特佩

Mamluks 马穆鲁克人

Mammas, Gregory 格列高利·玛马斯

Manisa 马尼萨

Manuel Bryennius Leontari 曼努埃尔·布兰尼乌斯·莱昂塔里

Manuel II Palaiologos 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格斯

Marangon, Zuan 朱安·马拉尼奥

Marmara Sea 马尔马拉海

Maslama 马斯拉玛

Mehmet II 穆罕默德二世

Melissenos 梅里西诺斯

Mesembria墨森布里亚

Mesoteichion中墙

Michael the Janissary近卫军士兵米哈伊尔

Michael the Syrian叙利亚的迈克尔

Milvian Bridge米尔维安大桥

Minotto米诺托

Mistra米斯特拉斯（Mystras）

Morea摩里亚

Muawiyyah穆阿维叶

Murat I穆拉德一世

Mustapha穆斯塔法

Negroponte内格罗蓬特

Nestor-Iskander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

Nicene Creed尼西亚信经

Nicetas Chroniates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

Nikephoros II Phokas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

Nicholas I 尼古拉一世（教皇）

Nicholas V 尼古拉五世（教皇）

Nicomedia 尼科米底亚

Notaras, Lucas 卢卡斯·诺塔拉斯

Novo Brdo 新布尔多

Odo de Deuil 德伊的厄德

Omar Bey 奥马尔贝伊

Orban 乌尔班

Orhan 奥尔汗

Oruch 奥鲁奇

Osman 奥斯曼（苏丹）

Padishah 帕迪沙阿

Palaiologos 帕里奥洛格斯

Palaiologos, Nicephorus 尼科弗鲁斯·帕里奥洛格斯

Pantocrator 全能之主

Patras 帕特拉斯

Paul the Silentary 示默者保罗

Pechenegs 佩切涅格人

Pelekanos佩雷卡诺斯

Pera佩拉

Petra佩特拉

Petrion佩特里翁

Phanar法纳尔

Piccolomini, Aeneas Sylvius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即庇护二世）

Pius庇护二世（教皇）

Plataea, Battle of普拉蒂亚战役

Plateia Gate普拉泰亚门

Princes' Islands王子群岛

Prinkipo王子岛

Procopius普罗科匹厄斯

Ragusa拉古萨

Rhangabes朗加比斯

Rizzo, Antonio安东尼奥·里佐

Romanus IV Diogenes罗曼努斯四世·第欧根尼斯

Rumeli Hisari如梅利堡

Sa'd-ud-din霍加·萨阿德丁·埃芬迪（Hoca Sadeddin Efendi）

Sagredo, Giovanni乔万尼·萨格雷多

Saracens撒拉森人

Saruja萨勒贾

Scholarios, George乔治·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真纳迪奥斯）

Scutari斯库塔里（üsküdar于斯屈达尔）

Scythians斯基泰人

Seljuks塞尔柱人

Selymbria塞林布里亚

Shihabettin Pasha谢哈布丁帕夏

Sinop锡诺普

Sivas锡瓦斯

Soligo, Bartolamio巴尔托拉米奥·索利戈

Sphendone斯芬多恩

Sphrantzes, George乔治·斯弗朗齐斯

St Elmo's fire圣艾尔摩之火

St Mark Eugenicus圣马可·尤金尼克斯

Steco, Andrea 安德烈亚·斯泰科

Struma 斯特鲁马河

Studion 斯图狄翁

Studius 斯图狄乌斯

Tafur, Pero 佩罗·塔富尔

Tamburlaine (Timur) 帖木尔

Tana 塔纳

Tenedos 特内多斯

Tetaldi, Giacomo 贾科莫·特塔尔迪

Theodore of Karystes 卡里斯特斯的西奥多

Theophanes the Confessor 忏悔者狄奥法内斯

Theophilus 西奥菲勒斯

Therapia 希拉比亚

Thessaloniki 塞萨洛尼基

Timur 帖木儿

Tokat 托卡特

Trapezuntios, George 特拉布宗的乔治

Trebizond特拉布宗

Trevisano, Gabriel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

Turahan Bey图拉汗贝伊

Tursun Bey图尔松贝伊

Tutmose III图特摩斯三世

ul-Ensari, Ebu Seybet艾布·赛贝特·乌尔-安萨里

ul-Ensari, Hamd哈姆德·乌尔-安萨里

ulema乌理玛

Umayyad倭马亚

Urban II乌尔班二世（教皇）

Varna瓦尔纳

Vladislas瓦迪斯瓦夫

Wallachia瓦拉几亚

Zaganos Pasha扎甘帕夏

[\[1\]](#) 译名对照表收入的是一些对全文的论据（因而不只是对文中的单一领域）有着重要意义的概念。

参考文献

Collections of Sources

Jorga, N., *Notes et extra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Croisades au X^e siècle*, 6 vols, Paris and Bucharest, 1899-1916

Legrand, Emile,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 Paris, 1874

Lewis, Bernard,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2 vols., New York, 1974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 197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Individual Sources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Broquière, Bertrandon de la, in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 ed. T. Wright, London, 1848

Camariotes, Matthew, “De Constantinopoli Capta Narratio Lamentabilis, ” in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Series Graeco-Latina*, vol. 160, ed. J. P. Migne, Paris, 1866

Chelebi, Evliya, *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 ed. Alexander Pallis, London, 1951

——, “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d'après le Seyahatname d'Evliya Chelebi, ” trans. H. Turkova, *Byzantinoslavica*, vol. 14, 1953

Comnena, Anna, *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 trans. E. R. A. Sewter, London, 1969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75

——,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 Paris, 1870

Gilles, Pierre, *The Antiquities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729

Gunther of Pairis,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The Hy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 of Gunther of Pairis*, ed. and trans. Alfred J. Andrea, Philadelphia, 1997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3 vols., trans. Franz Rosenthal, London, 1958

Ibn Taghribirdi, Abu al-Mahasin Yusuf, *History of Egypt, Part 6, 1382-1469 A.D.*, trans. W. Popper, Berkeley, 1960

Khoja Sa'd-u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Kritovoulos, *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 1983; (in English)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 Westport, 1970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 1823

Mihailovich, Konstantin, *Memoirs of a Janissary*, trans. Benjamin Stolz, Ann Arbor, 1975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rocopius, *Buildings*, London, 1971

Pusculus, Ubertino, *Constantinopoleos Libri IV*, in Ellissen, *Analekten der Mittel-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 III*, 1857

Spandounes, Theodore, *On the Origin of the Ottoman Emperors*, trans. and ed. Donald M. Nicol, Cambridge, 1997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1997

Tursun Beg, *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 Minneapolis and Chicago, 1978

Modern Works

Ak, Mahmut and Başar, Fahameddin, *Istanbul'un Fetih Günlüğü*, Istanbul, 2003

Akbar, M. J., *The Shade of Swords: Jiha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London, 2002

Armstrong, Karen, *Holy War: 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 on Today's World*, London, 1992

Atil, Esin, *Levni and the Surname: The Story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Ottoman Festival*, Istanbul, 1999

Ayalon, David,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the Mamluk Kingdom*, London, 1956

Aydın, Erdoğan, *Fatih ve Fetih: Mitler ve Gerçekler*, Istanbul, 2001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Bartusis, Mark C., *The Late Byzantine Army: Arms and Society, 1204-1453*, Philadelphia, 1992

Baynes, Norman H., *Byzantine Studie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55

Bury, J. B.,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395-800*, 2 vols., London, 1889

Cahen, Claude, *Pre-Ottoman Turkey*, trans. J. Jones-Williams, London, 1968

Carroll, Margaret, "Notes on the authorship of the Siege Section of the *Chronicon Maius*, " *Byzantion* 41, 1971

Chatzidakis, Manolis, *Mystras: The Medieval City and the Castle*, Athens, 2001

Cipolla, Carlo M., *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London, 1970

Clark, Victoria, *Why Angels Fall: A Journey through Orthodox Europe from Byzantium to Kosovo*, London, 2000

Coles, Paul, *The Ottoman Impact on Europe*, London, 1968

Corfis, Ivy A. and Wolfe, Michael (eds.) , *The Medieval City under Siege*, Woodbridge, 1995

DeVries, Kelly, *Guns and Men in Medieval Europe, 1200-1500*, Aldershot, 2002

Dirimtekin, Feridun, *Istanbul'un Fethi*, Istanbul, 2003

Emecen, Feridun M., *Istanbul'un Fethi Olayı ve Meseleri*, Istanbul, 2003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1960

Esin, Emel, *Ottoman Empire in Miniatures*, Istanbul, 1988

Freely, John, *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 Woodbridge, 2000

Gill, Joseph,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Cambridge, 1959

Goffman, Daniel,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02

Goodwin, Godfrey, *The Janissaries*, London, 1994

Goodwin, Jason, *Lords of the Horizons: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1999

Granville Browne, E. (ed.) , *A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 London, 1904

Guilmartin, John F., *Galleons and Galleys*, London, 2002

Haldon, J. and Byrne, M.,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reek Fire, "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70, pp. 91-99

Hall, Bert S., *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 Gunpowder, Technology and Tactics*, Baltimore, 1997

Hattendorf, John B., and Unger, Richard W., *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Woodbridge, 2003

Heywood, Colin, *Writing Ottoman History: 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Aldershot, 2002

Hogg, Ian V., *A History of Artillery*, London, 1974

Howard, Michael,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1976

Imber, Colin, "The Legend of Osman Gazi, " *The Ottoman Emirate 1300-1389*, Rethymnon, 1993

——, "What Does Ghazi Actually Mean, " *The Balance of Truth: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Geoffrey Lewis*, Istanbul, 2000

——,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Basingstoke, 2002

Inalcik, Halii,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 *Speculum* 35, pp. 408-427

——, *Fatih Devri üzerinde Tetkikler and Vesikalar I*, Ankara, 1987

——, *The Ottoman Empire: Conquest, 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London, 1978

——,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1973

Istanbul: Everyman Guides, London, 1993

Kaegi, Walter Emil, *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Cambridge, 1992

Kazankaya, Hasan, *Fatih Sultan Mehmet'in Istanbul'un Fethi ve Fethin Karanlık Noktaları*, 2 vols., Istanbul, 1995

Keegan, John, *A History of Warfare*, London, 1994

Keen, Maurice (ed.) , *Medieval Warfare: A History*, Oxford, 1999

Kelly, Laurence, *Istanbul: A Traveller's Companion*, London, 1987

Khadduri, Majid, *War and Peace in the Law of Islam*, Baltimore, 1955

Kinross, Lord, *The Ottoman Centuries*, London, 1977

Koran, The, trans. N. J. Dawood, London, 1956

Levey, Michael, *The World of Ottoman Art*, London, 1971

Lewis, Bernard, *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Norman, 1968

——, “Politics and War” in J. Schacht and C. E. Bosworth (eds.) , *The Legacy of Islam*, Oxford, 1979

——,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2 vols., Oxford, 1987

——,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London, 1982

Mackintosh-Smith, Tim, *Travels with a Tangerine*, London, 2001

Mango, Cyril, *Studies on Constantinople*, Aldershot, 1993

——, (ed,) ,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2001

Mansel, Philip,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1924*, London, 1995

Massingnon, Louis, “Textes Prémonitoires et commentaires mystiques relatifs à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par les Turcs en 1453, ” *Oriens* 6, pp. 10-17

Matar, Nabil, *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 Cambridge, 1998

Mathews, Thomas F., *The Art of Byzantium: Between Antiquity and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998

McCarthy, Justin, *The Ottoman Turks: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to 1923*, Harlow, 1997

McNeill, William H.,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1990

Mijatovich, Chedomil,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1448-1453*, London, 1892

Morris, Jan, *The Venetian Empire: A Sea Voyage*, London, 1980

Murphey, Rhoads, *Ottoman Warfare 1500-1700*, London, 1999

Nicol, Donald M., *Byzantium and Venice*, Cambridge, 1988

——, *The Immortal Emper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us, 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 Cambridge, 1969

——,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1453*, London, 1972

Nicolle, David, *Armies of the Ottoman Turks 1300-1774*, London, 1983

——, *Constantinople 1453*, Oxford, 2000

——, *The Janissaries*, London, 1995

Norwich, John J., *A History of Byzantium*, 3 vols., London, 1995

Ostrogorsky, Geor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ans. Joan Hussey, Oxford, 1980

Parry, V. J., *Richard Knolles' "History of the Turks"*, ed. Salih Özbaran, Istanbul, 2003

Parry, V. J. and Yapp, M. E. (eds.), *Wa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75

Partington, J. R., *A 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 Cambridge, 1960

Pears, Edw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London, 1903

Rose, Susan, *Medieval Naval Warfare, 1000-1500*, London, 2002

Runciman, Stephen, *The Eastern Schism: A Study of the Papacy and Eastern Churches during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Oxford, 1955

——,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1965

Schwoebel, Robert, *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 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 1453-1517*, Nieuwkoop, 1967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 vol. II: *The Fif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1978

Shaw, Stanford,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 *Empire of the Gazis*, Cambridge, 1976

Sherrard, Philip, *Constantinople: 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 1965

Simarski, Lynn Teo, “Constantinople's Volcanic Twilight, ” *Saudi Aramco World*, Nov./Dec., 1996

Stacton, D., *The World on the Last Day*, London, 1965

Tsangadas, B. C. P., *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1980

Vakalopoulos, Apostolos E.,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Nation: The Byzantine Period, 1204-1461*, New Brunswick, 1970

Van Millingen, Alexander, *Byzantine Churches in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12

——,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London, 1899

Vassilaki, Maria (ed.) , *Mother of Go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rgin in Byzantine Art*, Turin, 2000

Ware, Timothy, *The Orthodox Church*, London, 1993

Wheatcroft, Andrew, *Infidels: The Conflict between Christendom and Islam 638-2002*, London, 2003

——, *The Ottomans: Dissolving Images*, London, 1995

Wintle, Justin, *The Rough Guide History of Islam*, London, 2003

Witteck, Paul,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1963

Yerasimos, Stephane, *La Fondation de Constantinople et de Sainte-Sophie dans les Traditions Turques*, Paris, 1990

——, *Les Traditions Apocalyptiques au tournant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 Paris, 1999

译后记

《1453》是我和“甲骨文”合作的第一本书。我也就这样走进了克劳利的海洋世界。

我陆续翻译了他的四本历史著作《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这于我而言是一段愉快的旅程。克劳利的作品不是学术前沿，也没有高深的理论，却是精彩绝伦的叙述史，也是大众读者了解历史的绝佳窗口。

对我来讲，翻译是非常难得的深度学习的机会。人都有惰性，读书的时候，不太明白的地方经常就略过了，不影响理解大意就行。翻译却不容许偷懒，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完全弄懂。要对读者负责，首先得对自己负责。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相继出版之后，得到许多读者的热情支持，同时也有许多读者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借这次精装版推出的机会，我重新审视和修改了自己的译文。修改历时近半年，我刻意做得很慢。首先是知识性错误的修正，比如将阿提拉的部族称为“匈奴”是不妥的，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改为“匈人”；其次，修正了少量译名，希望能在“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再次，修正了地图标示的一些瑕疵和少量错别字及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最后，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也是修改最多的，是删去冗字，

提高密度，希望做到更精炼。当然，新版本最终需要的是读者的检验。我衷心希望，在过去的四年里我的水平有所提高；新版本会是一个更好的版本，是给克劳利先生的一份新礼物，也是给读者朋友的新礼物。

最后衷心感谢“甲骨文”品牌直接参与克劳利作品编辑出版的编辑们，没有他们的悉心帮助与辛勤工作，这几本书在中国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陆大鹏

2017年7月，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453: 君士坦丁堡之战/（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著；
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精装珍藏版）

ISBN 978-7-5201-0792-1

I.①1... II.①罗... ②陆... III.①拜占庭帝国-战争史 IV.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1706号

1453

——君士坦丁堡之战

著者/（英）罗杰·克劳利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冯立君

责任编辑/段其刚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375 插页：0.625 字数：279千字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792-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7-5950号

定价/258.00元（全三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简介 /

陆大鹏，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武士女王》《恺撒：巨人的一生》《奥古斯都》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今日美国》夏季精选图书

《旧金山纪事报》夏季精选图书

克劳利引人入胜的叙述……读来更像生动的小说。人物……描摹极其细致，全都是基于历史文献，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洛杉矶时报》

克劳利对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重述极富戏剧性，激动人心。

——《旧金山纪事报》

出神入化……罗杰·克劳利为一个古老而永远引人入胜的故事注入了新活力。

《1453》融合了军事史的令人着迷的细节和对宗教意象的丰富指涉，这些意象对战争的双方都有极大影响。

——《经济学人》

节奏轻快，是了解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长期敌对关系的入门必读书。

——《科克斯书评》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320-3792-3



9 787520 379211 >

定价：258.00 元（全三册）

历史
人文

海洋帝国

ROGER CROWLEY

[英] 罗杰·克劳利 / 著

陆大鹏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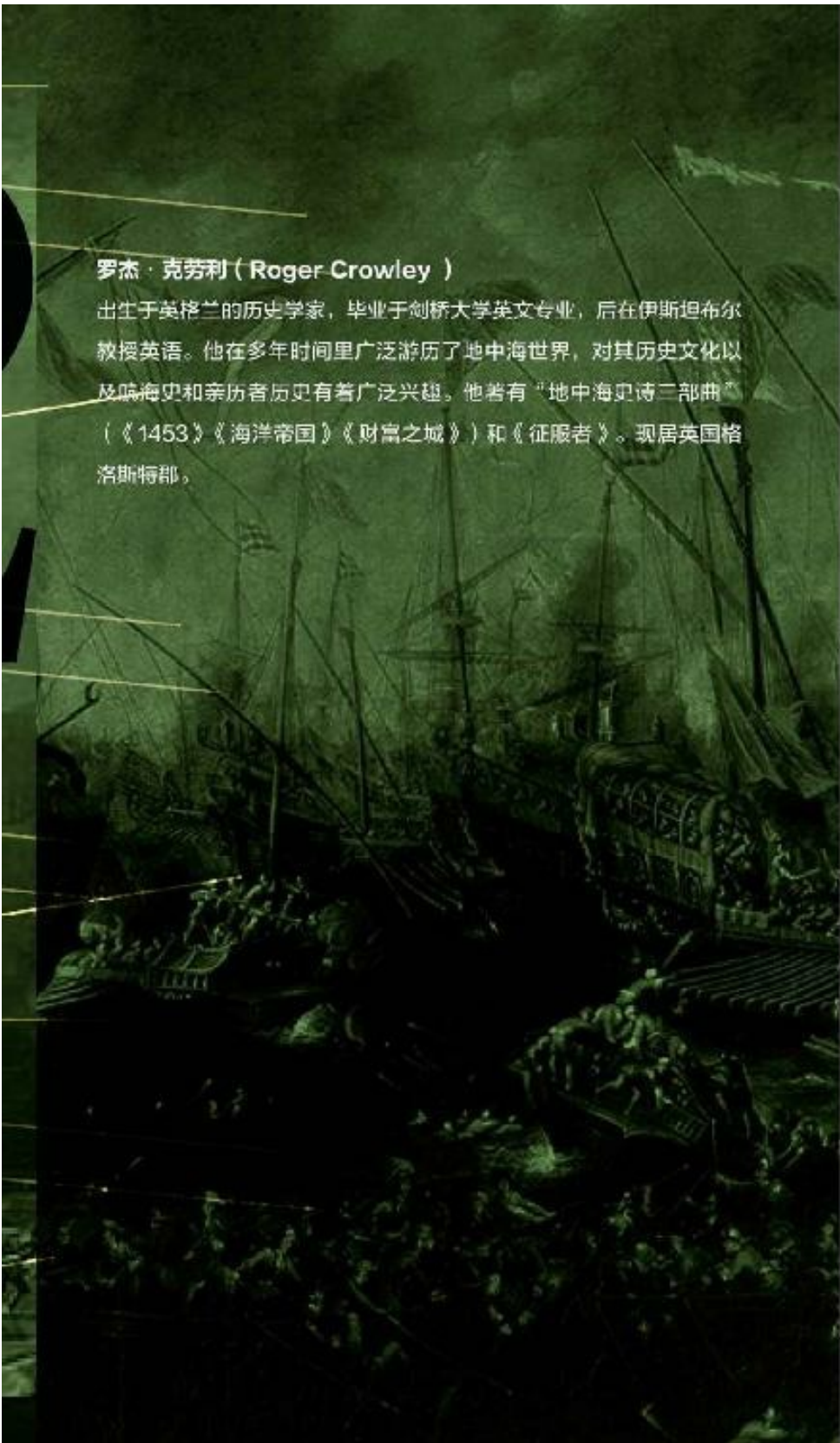
EMPIRES OF THE SEA:

The Siege of Malta,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地中海大决战

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SSAP)



罗杰·克劳利 (Roger Crowley)

出生于英格兰的历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专业，后在伊斯坦布尔教授英语。他在多年时间里广泛游历了地中海世界，对其历史文化以及航海史和亲历者历史有着广泛兴趣。他著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和《征服者》。现居英国格洛斯特郡。

EMPIRES OF THE SEA: THE SIEGE OF MALTA,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UTHOR: ROGER CROWLEY

Copyright © 2008 BY ROGER CROW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LOWNIE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地中海史詩三部曲

海洋帝国

地中海大决战

EMPIRES OF THE SEA:

The Siege of Malta,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ROGER CROWLEY

[英] 罗杰·克劳利 / 著

陆大鹏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对抗：在地中海的较量的背后，是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的漫长历史。



欧洲画作，描绘**1480**年奥斯曼人第一次进攻罗得岛失败的情景。土耳其人戴着头

巾，手持弩弓，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们身穿红色和白色外衣，守候在城墙后。



奥斯曼画作，描绘**1522**年奥斯曼人第二次进攻罗得岛的情景。头戴白帽的奥斯曼近卫军用火枪攻击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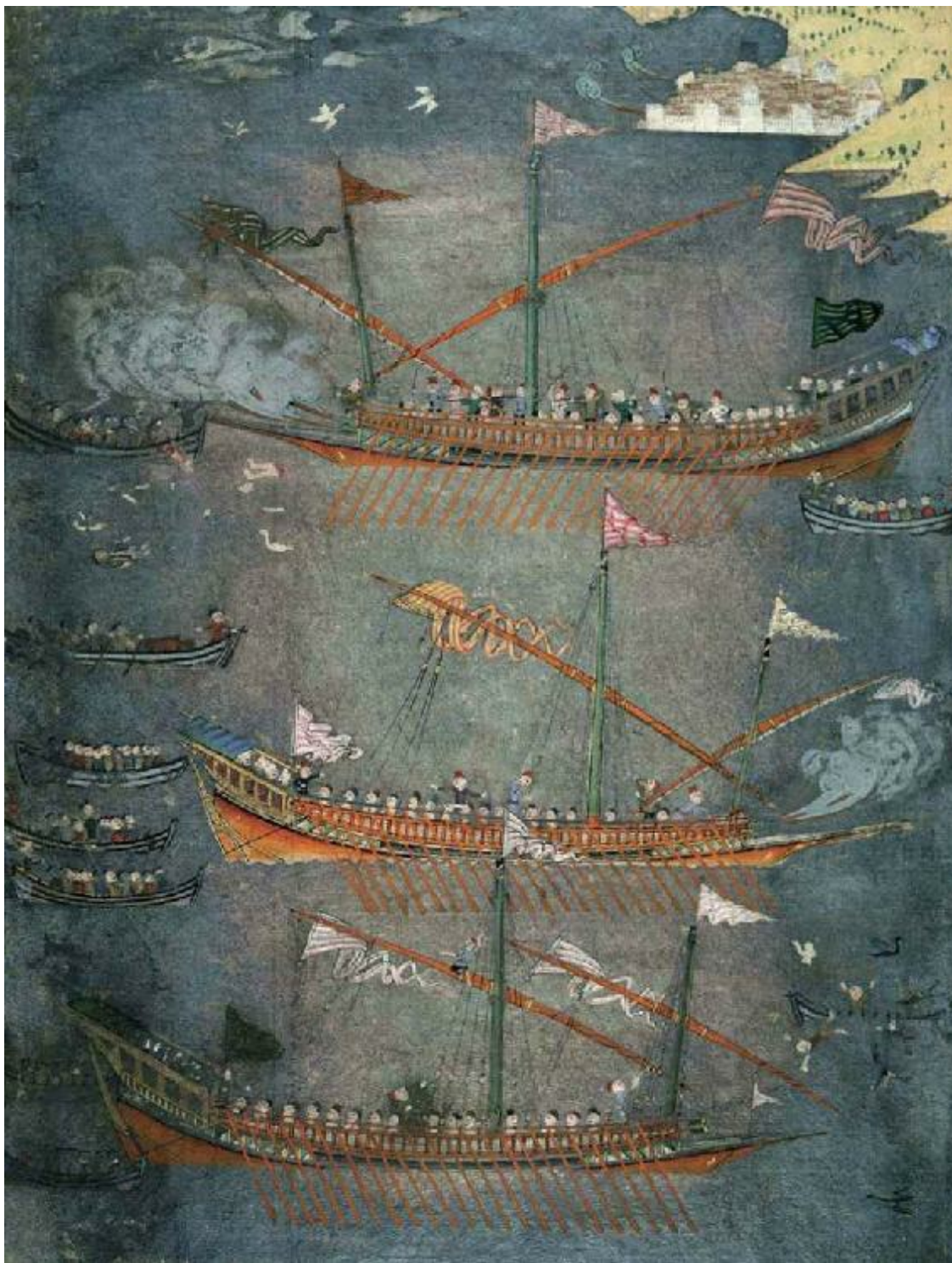
苏丹苏莱曼大帝，戴着巨大的头巾，以增添他的威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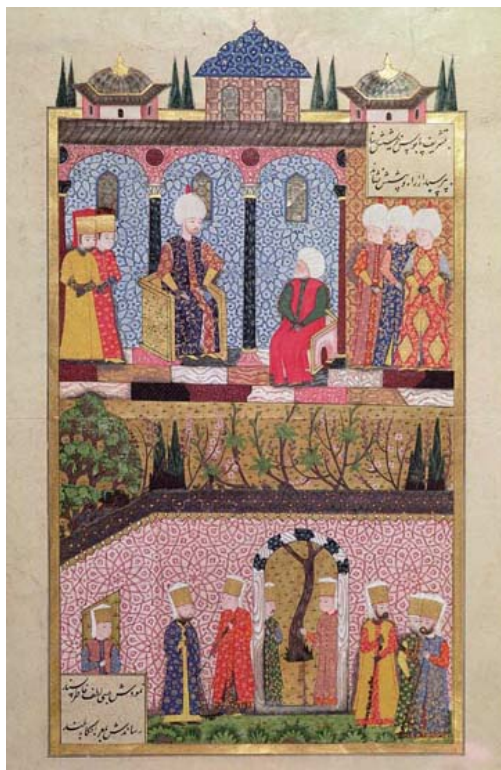
提香所作的查理五世像。查理五世挥金如土，雇用艺术家创作自己的肖像，彰显他的皇权。



欧洲人所做的海雷丁·巴巴罗萨肖像。他是海盗和苏丹的将军统领。**16**世纪地中海最令人畏惧的航海家。



精美的细密画表现了奥斯曼苏丹在海上的辉煌胜利。图中，奥斯曼桨帆船冲向敌人，船首炮轰鸣，旗帜招展。



这幅细密画表现的是海雷丁·巴巴罗萨在伊斯坦布尔，从苏莱曼那里接受重建奥斯曼舰队、袭扰查理五世领土的指示。



两位敌对的海军统帅：年事已高的海雷丁·巴巴罗萨（左）与多里亚（右）。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让·德·拉·瓦莱特，马耳他的守护者



查理五世于**1535**年远征突尼斯，以消灭巴巴罗萨：他的奖帆船一波波进攻，轰击拉格莱塔外港。突尼斯在远景中，巴巴罗萨的舰队被封堵在那里。



19世纪的画作，描绘1538年海雷丁·巴巴罗萨在普雷韦扎湾打败安德烈亚·多里亚。
巴巴罗萨站在自己桨帆船的船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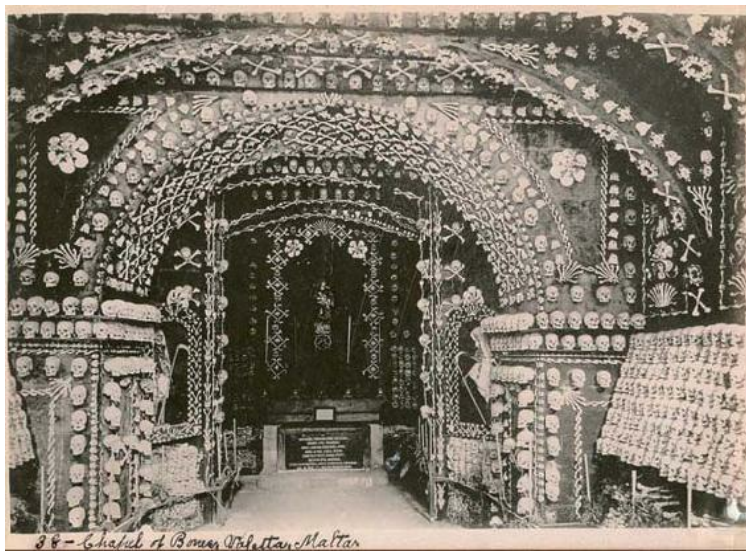
复原图，从奥斯曼战壕的角度看圣艾尔摩堡面向陆地的正面。“骑士塔”在后方耸立，高于主堡。



圣艾尔摩堡，图中有碉堡和中央操场，后方是“骑士塔”，左侧是三角堡。



马耳他的瓦莱塔城鸟瞰图。圣艾尔摩堡在前景中。瓦莱塔城在圣艾尔摩堡后方，建在希伯拉斯山上，是在攻城战后建造的。



这座以人骨装饰的小教堂是马耳他最著名的死亡纪念所，也是**19**和**20**世纪的旅游景点，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弹摧毁。这座小教堂是**1731**年在瓦莱塔建造的，其所用的骨骸，包括**2000**个嵌在墙上的头骨，来自**1565**年在圣艾尔摩堡中与土耳其人英勇奋战而牺牲的基督教军人的遗体。



19世纪描绘法马古斯塔陷落的印刷画作。
布拉加丁被捆绑在一根屹立至今的古老石柱上，准备迎接恐怖的死亡。
拉拉·穆斯塔法帕夏在阳台上观看。



马可·安东尼奥·科隆纳，**1570**年援救塞浦路斯的神圣同盟舰队的威尼斯指挥官。



青年时代的奥地利的堂胡安。



波斯普鲁斯海峡岸上的巴巴罗萨陵墓。



现代人对勒班陀战役期间堂胡安的旗舰的复制，图中是装饰华美的船尾。



阿尔瓦罗·德·巴桑，堂胡安在勒班陀战役期间的谋臣。



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勒班陀战役期间的威尼斯海军统帅。



勒班陀战役的开端。大炮轰鸣，浓烟滚滚，爆炸声震耳欲聋。



威尼斯艺术家维琴蒂诺描绘勒班陀战役的不朽名作，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战场上的浓烟、嘈杂、混乱和巨大的冲击力。在“苏丹娜”号上，阿里帕夏（左侧居中）正在鼓舞部下死战到底。



勒班陀战役的最后阶段。
奥斯曼人跳入大海，却被乘着小船的敌人杀死。

《纽约时报》最佳畅销图书 《经济学人》 年度最佳图书

在整个欧洲史中，没有任何故事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个世界争夺地中海的较量更令人热血沸腾……本书是讲述这个故事的翘楚之作。克劳利先生讲故事的本领令人叹为观止；他的故事像悬疑小说一样精彩……他的分析睿智而极具洞察力，描绘人物入木三分。读了他的书，我们脑海中留下的是清晰而难忘的景象。

——《华尔街日报》

罗杰·克劳利凭借对现代早期战争的敏锐洞察和引人入胜的文笔，对这场冲突进行了绘声绘色和无比血腥的描述。克劳利对大战略的宏观概况和战斗的恐怖细节都有很好的把握，对影响了这场冲突的历史人物的描绘同样精彩。

——《波士顿环球报》

算得上这个夏季最值得推荐的非虚构作品……第一流的通俗历史书，今天的宗教战争的绝佳背景资料。

——《达拉斯晨报》

克劳利的洞见极其精妙，描写波澜起伏。但在描绘战斗场面时，他的文字非常简洁精练，读者不可能不被这毛骨悚然的场景深深吸引。虽然他不会沉溺于血腥描写，但赤裸裸的真相还是会让读者捂上眼睛、心脏猛跳。如果迪克·弗朗西斯写的不是赛马悬疑小说，而是历史书，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很少有一本书能如此鞭策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的评判。克劳利的《海洋帝国》是关于一个被人低估、常被忽视的主题的诚实记载，是一本罕见的奇书。

——《基督科学箴言报》

出神入化……《海洋帝国》值得广大读者一看。它讲的是16世纪的一系列风云激荡、五彩斑斓的历史，涉及文明的碰撞，对我们的今天仍然很有启发意义……它能够同时做到具有娱乐性、知识性和警示性，着实难得。

——《军事评论》

克劳利以大师的手笔融合了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栩栩如生地重现了伟大的战役，以令人手不释卷的流畅文字描绘了战斗场面和残暴行为，但绝不会为了有趣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

——《出版商周刊》（星级评论）

这是一本罕见的具有小说的细节、洞察力和节奏的历史书。

——《坦帕论坛报》

大手笔！准确捕捉了争夺世界中心的激烈斗争的宗教狂热、残暴和大浩劫。

——《科克斯书评》（星级评论）

记载一场宏大而影响深远的斗争的文笔优美的史书。

——《书目》

有一种写军事史的天才，罗杰·克劳利就有这种天才……他对现代早期围城战的所有技术问题游刃有余……你可以像读伯纳德·康沃尔的沙普系列小说一样读克劳利的书，跌宕起伏的情节很容易帮你度过飞机旅途。但它背后有着严肃的研究……克劳利的确很优秀。

——《每周卫报》

令人血脉贲张……《海洋帝国》确立了克劳利地中海历史大师的地位……他渊博而引人入胜地描绘了奥斯曼海盗和十字军航海家，他对这些人的理解就像他们对海潮的精通一样……罗杰·克劳利圆润娴熟地铺垫大战之前的历史。从罗得岛到马耳他，他对历次大战役的描摹既注重细节，也

能掌握战略层面……你能逼真地感受到火绳枪的炽热、海上的危险和一位
奥斯曼帕夏或教皇的挫败无奈。

——《文学评论》

马格里布的居民凭借预言书的权威宣称，穆斯林将打败基督徒，并征服大海远方欧洲基督徒的土地。据说，征服将在海上发生。^[1]

——伊本·赫勒敦^[2]，14世纪阿拉伯史学家

^[1] Brummett, Palmira, *Ottoman Seapower and Levantin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Albany, 1994, p.89

^[2] 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史学家、哲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在突尼斯、非斯和格拉纳达的宫廷任职，1375年从政坛退隐后，撰写了他的杰作《历史导论》，书中研究了社会性质和社会变迁，发展了最早的非宗教性的历史哲学。他还写了一部有关穆斯林北非历史的著作《训诫书》。1382年，他前往开罗，被指派为教授和宗教法官。赫勒敦被广泛认为是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一位伟大学者（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中文版序

《1453》《海洋帝国》和《财富之城》这三本书互相关联，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部曲，叙述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读者可以从其中任意一本读起。这三本书涵盖的时间达四个世纪之久，从1200年到1600年，这是不同文明和互相竞争的各大帝国为了领土、宗教信仰和贸易控制而激烈地冲突的年代。这场冲突的参与者包括拜占庭帝国（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继承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们复兴了伊斯兰“圣战”的精神），以及西班牙的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朝。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从一个泥泞的潟湖崛起为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城市，宛如令人叹为观止的海市蜃楼，从水中呼啸而起。威尼斯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当年和今天一样，在异邦人眼中非同寻常、精彩纷呈。

在这个时期，各国为争夺地中海爆发了激烈战争。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各族群——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北非人和法兰西人——认为自己是在为争夺世界中心而战。但与真正的大洋相比，地中海其实是很小的。各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只有投石之遥，于是大海成了一个封闭的竞技场，大规模的厮杀就在这里上演。在这个年代，火药武器开始彻底地改变战争的面貌。大海是史诗般攻城战、血腥海战、海盗行径、人口劫掠、“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圣战”的场所，也是利润丰厚的贸易和思想交流的途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漫长而残酷的竞争从本三部曲涵盖的时期开始，将大海分裂为两个迥然不同的区域，双方沿着海上疆界进行了激烈较量。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9·11”事件之后的世界。

幸运的是，大量关于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目击资料留存至今，尤其是从大约1500年开始，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刺激了文字材料的爆炸式增长，所以我们得以感同身受地重温这段历史。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我们常常能够近距离观察当时的事件，审视那时的人们如何生活、死亡、战斗、从事贸易，以及礼拜上苍。我尽可能地引用当时人们自己的话，让他们为自己发言。

这三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场所”。在地中海地区，我们在游览威尼斯、伊斯坦布尔，或者克里特、西西里和塞浦路斯等大岛屿的时候，仍然能够触及过去。许多纪念建筑、城堡、宫殿和遗址依然完好。借用伟大的地中海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这片大海耐心地为我们重演过去的景象，将其放置在蓝天之下、厚土之上，我们能亲眼看见这天与地，它们如同很久以前一样。只消集中注意力思考片刻或者瞬间的白日梦，这个过去就栩栩如生地回来了。”^[1]我希望这三部曲能够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地中海历史以及那里发生的事件（它们至今影响着我们的世界）的重要意义，对其产生兴趣。

罗杰·克劳利

^[1]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 trans.Sian Reynolds, London, 2001.

- [序言：托勒密的地图](#)
- [第一部 恺撒们：海上角逐，1521～1560年](#)
 - [1.苏丹驾到](#)
 - [2.求援](#)
 - [3.邪恶之王](#)
 - [4.远征突尼斯](#)
 - [5.多里亚与巴巴罗萨](#)
 - [6.土耳其的海](#)
- [第二部 震中：马耳他战役，1560～1565年](#)
 - [7.毒蛇的巢穴](#)
 - [8.入侵舰队](#)
 - [9.死亡的岗位](#)
 - [10.欧洲的三角堡](#)
 - [11.最后的求援者](#)
 - [12.血债血还](#)
 - [13.堑壕战](#)
 - [14.“马耳他不存在”](#)
- [第三部 大决战：冲向勒班陀，1566～1580年](#)
 - [15.教皇的梦想](#)
 - [16.盘子上的头颅](#)
 - [17.法马古斯塔](#)
 - [18.基督的将军](#)
 - [19.着魔的毒蛇](#)
 - [20.“决一死战！”](#)
 - [21.火海](#)
 - [22.其他的海洋](#)
- [尾声：遗迹](#)
- [鸣谢](#)
- [译名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译后记](#)

序言：托勒密的地图

在金角湾沿岸的写字楼群拔地而起的很久以前，甚至在清真寺群兴建之前，那里矗立着基督教的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在地平线上独自屹立了一千年。在中世纪，如果人们登上大教堂的屋顶，就能鸟瞰整个“环水之城”，视野极其开阔。站在这里，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君士坦丁堡曾经能够统治世界。

1453年5月29日下午，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就这样登上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屋顶。永载史册的一天终于落幕。就在这一天，他的大军攻克了君士坦丁堡，使得伊斯兰教的预言成为现实，摧毁了拜占庭这个基督教帝国的最后残余部分。奥斯曼帝国的史官记载道，穆罕默德二世于“真主之灵升上第四层天堂”^[1]时登上了大教堂屋顶。

苏丹眼前兵火肆虐、哀鸿遍野。君士坦丁堡遭到了严重破坏和彻底洗劫，“惨遭蹂躏，遍地如同被烈火烤黑一般”^[2]。君士坦丁堡的军队土崩瓦解，教堂横遭抢劫，末代皇帝也在大屠杀中丧生。男人、女人和儿童被绳索捆成一串，排成长长的队伍，在土耳其人的驱赶下蹒跚行进。空荡荡的房屋上飘荡着旗帜，这表明，屋内的财物已经被洗劫一空。这个春天的傍晚，召唤穆斯林祈祷的呼声徐徐升起，盖过了俘虏们呼天抢地的哀号。这标志着一个皇朝的彻底终结，以及一个新的皇朝凭借征服者的权利正式粉墨登场。土耳其人原先是来自亚洲腹地的游牧部落，此刻在这座欧洲海岸上的城市（土耳其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巩固了伊斯兰教的地位。攻克君士坦丁堡的丰功伟绩彻底奠定了穆罕默德二世的地

位：他既是拜占庭的继承人，又是伊斯兰圣战无可争议的统帅。

苏丹从他居高望远的有利位置可以追忆土耳其民族的往昔，并憧憬未来。在南面，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南，是安纳托利亚（又称小亚细亚），土耳其人经历了漫长的迁徙，经过安纳托利亚北上；往北面是欧洲——土耳其人开疆拓土雄心壮志的目标。但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却是西方。在午后的阳光里，马尔马拉海波光粼粼，仿佛锤扁的黄铜。它的西面是广阔的地中海，土耳其人称之为白海。征服了拜占庭之后，穆罕默德继承的不仅仅是一大块土地，更是一个海上帝国。

1453年的事件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这两个世界之间此消彼长、潮起潮落的斗争的一部分。从11世纪到15世纪，基督教通过十字军东征，曾一度控制了地中海。在希腊海岸地区和爱琴海诸岛上拔地而起的一系列基督教小国家成了十字军东征事业与西方拉丁世界的联系纽带。1291年，十字军丧失了他们在巴勒斯坦海岸的最后一个主要据点阿卡，于是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逆转。现在，伊斯兰世界要反击了。

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任何人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雄霸整个地中海，但穆罕默德二世自视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他的雄心壮志没有边际。他下定决心，要实现“一个帝国、一个信仰、一个君主”^[3]；他自诩为“两海之王”^[4]——白海和黑海。大海对土耳其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大海不是稳定的平地，没有自然边界，没有地方可供游牧民族安营扎寨。人类无法在海上定居。大海并不记得历史：伊斯兰教在此之前曾经在地中海有过立足点，但后来又丢掉了。但穆罕默德二世已经确立了他的宏图大略；在他麾下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是一支庞大的（尽管还缺乏经验）的舰队，而土耳其人非常擅长学习。

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岁月里，穆罕默德二世命人复制了一张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绘制的欧洲地图，并命令希腊人将它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他像猎食的猛兽般虎视眈眈地审视着地中海的轮廓布局。他用手

指抚摩着地图上的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马赛和巴塞罗那；他追寻着直布罗陀海峡；甚至遥远的不列颠也进入了他的视线。译员们非常谨慎，在地图上把伊斯坦布尔标注得特别突出。穆罕默德二世此时还不知道，在地图的西端，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们正在规划他们自己的帝国伟业。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就像两面巨镜，反射着同一轮太阳的光辉；起初它们相距太遥远，互相还不了解。很快，敌意将会使阳光聚焦。托勒密的地图讹误颇多，画着奇形怪状的半岛和歪曲的岛屿，但即便这些错误也无法掩盖关于地中海的这样一个关键事实：它其实是两片海洋，在中间由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狭窄海峡一分为二，马耳他岛就在这海峡的正中间，形成一个尴尬的小点。土耳其人将很快统治地中海东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将总领地中海西部。这两股势力将在马耳他这个点上相遇。

今天，从西班牙南部起飞，横跨整个地中海飞往黎巴嫩海岸，只需三个小时。从空中俯视，地中海一派安静祥和。航船有条不紊、温和驯顺地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行驶。设有城堞的西班牙南岸绵延数千英里，分布有度假村、游艇码头、时髦的度假胜地，以及为南欧经济提供动力的重要港口及工业区。地中海仿佛是一个波澜不兴的潟湖，人们可以从空中追踪任何一艘船只。古代的可怕风暴曾经摧毁奥德修斯和圣保罗的航船，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船只丝毫不必担心。地中海曾被罗马人称为世界的中心，但在今天我们这个日渐缩小的世界里却显得微不足道。

但在五百年前，地中海给人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海岸地带饥馑遍野，由于农耕和放牧，先是植被遭到破坏，然后土地也变得贫瘠。到14世纪，但丁看到的克里特岛已经是个被生态灾难完全摧毁的地方。“在海中央坐落着一片荒原，”他写道，“它一度是泉水潺潺、树木葱茏的福地，现在却是沙漠。”^[5]就连大海也是荒芜的。地中海是由地质结构的猛烈塌陷而形成的，因此从外界进入的清澈海流会猛地跌落到深海沟壑

中。地中海也没有像纽芬兰或者北海那样的大陆架可以养育丰饶的鱼群。对于沿海居民来说，这100多万平方英里的海面（它被分割成十几个单独区域，各自有自己独特的气流条件、复杂的海岸和星罗棋布的岛屿）是难以驾驭、硕大无朋和险象环生的。地中海是那么大，以至于东西两个海域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天气良好，一艘帆船从马赛到克里特需要两个月时间；如果天公不作美，就需要六个月。当时船只的适航性惊人的差，风暴往往毫无征兆地骤然降临，海盗多如牛毛，所以水手们往往选择在近海航行，而不敢穿过开阔海域。航海过程中险象环生，登船起航往往就意味着要听天由命。地中海是麻烦重重的海。1453年之后，它将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中心。

欧洲史上最激烈最混乱的斗争之一就在地中海上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争夺世界中心的斗争。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战火在海上盲目地肆虐了一个多世纪。仅仅是最初的小规模战争（土耳其人借此取代了威尼斯的主导地位）就持续了五十年。这场斗争形式繁多：消耗经济的小规模战争、以信仰的名义进行的海盗突袭、对海岸要塞和港口的袭击、对大型岛屿堡垒的围攻，以及屈指可数的几场史诗级别的大海战。地中海沿岸的所有民族和利益集团都卷入了这场角逐：土耳其人、希腊人、北非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亚得里亚海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各民族；商人、帝国捍卫者、海盗和圣战者，他们全都时不时地改旗易辙，为捍卫宗教、贸易或者帝国而战。没有人能够长期保持中立，尽管威尼斯人为此付出了艰难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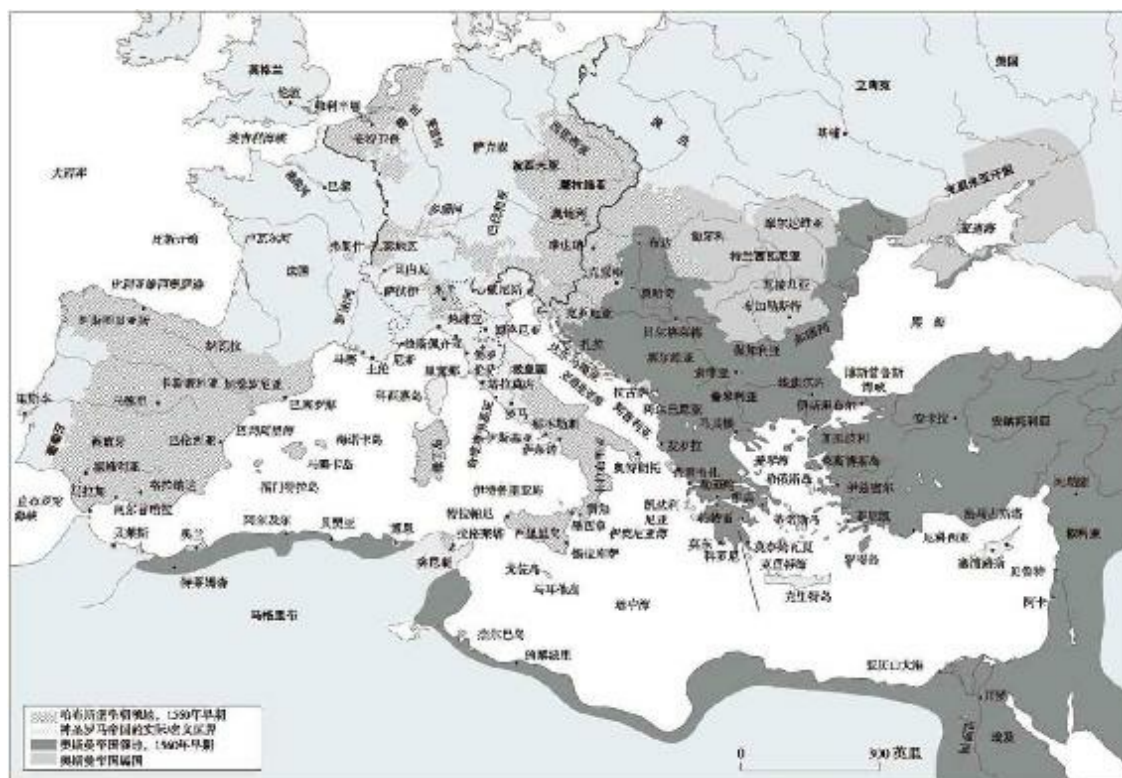
这个被陆地环绕的竞技场为冲突对抗提供了无限机遇。地中海在南北方向惊人的狭窄；在很多地方，只有一条狭窄的水道将不同的民族隔开。劫掠者可以突然出现在海平线上，然后又自由自在地离去。自蒙古人的闪电式突袭以来，欧洲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此骤然兴起的恐怖入侵。地中海成了一个毫无法度的暴力的生物圈，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以无可比拟的残暴互相碰撞。战场就是大海、岛屿和海岸，战局受到风力和天气

的影响，主要的武器则是桨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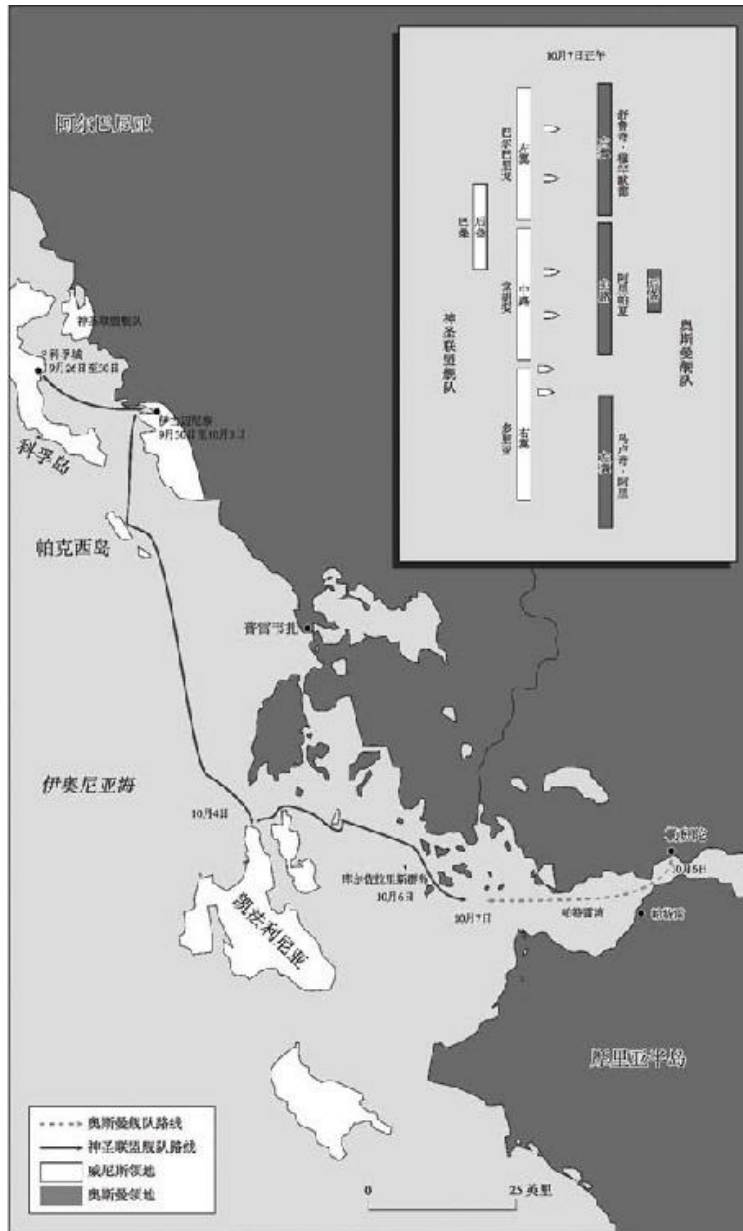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尽管基督教世界将他们简单地称为“土耳其人”、“基督之名最残忍的敌人”^[6]。在西欧看来，这场斗争是终极战争的来源，是巨大的创伤，也是针对黑暗力量的精神斗争。梵蒂冈内部知道托勒密地图的事情。他们将它想象为奥斯曼帝国征服事业的模板，并以惊人的细节绘声绘色地揣测着高高矗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的托普卡帕宫^[7]内的情景。奥斯曼苏丹戴着典型的土耳其式头巾，身着肥大的土耳其式长袖袍子，长着鹰钩鼻，生性残忍，端坐在富丽堂皇然而透着野蛮劲儿的亭台楼阁内，研究着通往西方的海道。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消灭基督教。1517年的教皇利奥十世深感土耳其人为心腹大患。“他手中无时无刻不拿着描绘意大利海岸的文件和地图”^[8]，教皇心惊胆战地如此描绘苏丹，“他的全副注意力都用于集结火炮、建造船只和勘察欧洲所有的海洋和岛屿。”^[9]对土耳其人及其北非盟友来说，对十字军东征报仇雪恨的时机成熟了，扭转世界征服格局和控制贸易的机遇来了。

这场斗争将在宏大的战线上进行，往往远远超越大海的界限。欧洲人在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平原、红海、维也纳城下与敌人激战。但最终，在16世纪，这场斗争的主角的全副力量都将集中于托勒密地图的中心。这将是一场长达六十年的角逐，由穆罕默德二世的曾孙苏莱曼一世策动。战争于1521年正式爆发，于1565~1571年达到高潮，在这六年的无可比拟的血战中，当时的两个巨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皇朝将高举各自信仰的战旗，至死方休。这场战争的结局将决定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并影响各帝国在未来的前进方向。

这一切，都从一封信开始。



地中海，1560



勒班陀之战，1571年10月7日

[1] Crowley, Roger,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2005, p.233

[2] Crowley, Roger,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2005, p.232

[3] Crowley, Roger,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2005, p.240

[4] Crowley, Roger,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2005, p.240

[5] Grove, A.T., and Rackham, Oliver, *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 An Ecological History*, London, 2001, p.9

[6]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2, Philadelphia, 1984, p.292

[7] 托普卡帕宫是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一座皇宫，1465～1853年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在首都的官邸及主要居所，也是昔日举行国家仪式及皇室娱乐的场所，现今则是主要的观光胜地。“托普卡帕”的字面意思是“大炮之门”，昔日城堡内曾放置大炮，由此得名。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9年下令动工兴建托普卡帕宫。

[8]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3, Philadelphia, 1984, p.240

[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3, Philadelphia, 1984, p.174

第一部 恺撒们：海上角逐，1521～1560年



1.苏丹驾到

1521~1523年

1521年9月10日，自贝尔格莱德

首先是一连串威风凛凛的皇室尊号。然后是威胁：

苏莱曼苏丹，蒙真主洪恩，万王之王，众君之君，拜占庭与特拉布宗^[1]至高无上的皇帝，波斯、阿拉伯、叙利亚与埃及的强大君主，欧洲与亚洲的最高领主，麦加与阿勒颇亲王，耶路撒冷之君，世界之海的统治者，向菲利普·德·李尔·亚当，罗得岛的大团长，谨致敬意。

阁下获得了新的职位并业已抵达领地，我对此表示祝贺。我深信不疑，阁下必然会将此地治理得繁荣昌盛，赢得远胜于阁下前任的光荣。我还希望与阁下永结同好。那么，作为最亲爱的朋友，请您与我一同欢欣鼓舞，因为我追随着先帝足迹（他曾征服了波斯、耶路撒冷、阿拉伯和埃及），已于去年秋季攻克了最为固若金汤的要塞——贝尔格莱德。此后，我向异教徒提出决一雌雄，但那些懦夫没有接受挑战的勇气，于是我占领了其他多座美丽而防御坚固的城市，以利剑或烈火消灭了其大部分居民，将幸存者变卖为奴。在安顿我的兵力雄厚、百战百胜的大军进入营地过冬之后，我本人也将胜利返回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宫廷。^[2]

能够读懂字里行间深意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封表达友谊的书信，而是一封宣战书。此时，征服者穆罕默德的曾孙苏莱曼刚刚登基。根据传统和习惯，他必须在登基之后不久就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每一位新的苏丹都必须为他继承的世界帝国再度开疆拓土，以巩固自己“东方与西方土地的征服者”^[3]的地位。此后他就可以将战利品赏赐给臣子，稳固军队的忠诚，并大肆进行仪式化的宣传。捷报（这是皇权的保障）将被发往五湖四海，令伊斯兰世界五体投地，令基督教世界胆战心惊；随后新苏丹就有权建造他自己的清真寺。

新皇登基还必须有死亡相伴。法统规定，新苏丹必须处决自己所有的兄弟，“以天下大局为重”^[4]，换言之，将内战掐灭在萌芽状态。一批令人心酸的儿童棺木将被从后宫抬出，送给怯声呜咽的妇女们；同时，携带弓弦（这是勒死目标的刑具）的刺客将被派往各个省份，去猎杀苏丹的其他兄弟。

苏莱曼登基时没有屠杀自己的兄弟，因为他是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的父亲塞利姆一世很可能在六年前就已经将其他儿子处死，以断绝政变的后患。二十六岁登基的苏莱曼得到的是一份独一无二的遗产。他接手的是一个强大、统一而掌控着无与伦比资源的大帝国。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苏莱曼将给他们带来好运。他的父亲在给他取名时打开了一本《古兰经》，随机选择了一个词，就挑中了“所罗门”（也就是土耳其语中的“苏莱曼”），这预示着他将成为一位像古以色列贤君所罗门那样以智慧和公正著称的伟大帝王。在这个迷信预兆的年代，苏莱曼登基时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认为具有预言意义。苏莱曼是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位苏丹，而且出生于穆斯林纪年法^[5]第十世纪的第十年。“十”是完美的数字。《古兰经》分为十个部分，先知穆罕默德有十个门徒，《摩西五经》中有十诫，伊斯兰占星学里的天界分为十层。他登上世界舞台的时机正是帝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苏莱曼在位的时期与世界上其他一些互相争斗的君主的统治时期有所重叠，苏莱曼将与他们决一雌雄：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子亨利二世；统治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伊凡雷帝；伊朗沙阿^[6]伊斯玛仪一世；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阿克巴。这些君主都没有苏莱曼那么强的开疆拓土的使命感，野心也没有他那么大。

从一开始，他就精心筹划，给觐见的外国使节留下极其深刻的印

象。“苏丹身材颇长，但非常强健，面庞瘦长但结实有力，”威尼斯人巴尔托洛梅奥·孔塔里尼如此描绘道，“据传闻，苏莱曼名副其实……像所罗门那样知识渊博、明察秋毫。”^[7]他面容冷静、目光沉稳，皇袍虽朴素却威风凛凛。他头戴巨大的圆形头巾，低低地压在前额上，这头巾使他显得更加高大，苍白的脸色使得他不怒自威。他凭借自己的威仪和宫廷的富丽来震慑外人。很快，他将索求“恺撒”的称号，并希冀统领整个地中海。

他计划在近期先赢得两场胜利。苏莱曼对自己先辈的伟业耳熟能详，自孩提时代就梦想着完成他的曾祖父穆罕默德二世未能完成的两项征服大业。第一项是攻克贝尔格莱德这座要塞，它是通往匈牙利的大门。苏莱曼即位不到十个月，就已经兵临贝尔格莱德城下。到1521年8月，他已经在贝尔格莱德城内的基督教大教堂内祈祷了。第二个目标将使他成为“白海的皇帝”：占领罗得岛。



年轻的苏莱曼

苏莱曼虎视眈眈的这个岛屿是古时留下的遗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罗得岛是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留下的一个奇异国度，离伊斯兰世界仅有咫尺之遥。在小亚细亚沿岸绵延100英里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多德卡尼斯”的意思是“十二个岛”）是一连串石灰岩岛屿，其中最大也是最肥沃的就是罗得岛。它位于岛群的东南端。而群岛的最北端是建

有灰白色修道院的帕特摩斯岛，这是东正教的一个圣地，圣约翰曾在这里获得天启，写下了《新约》中的《启示录》。这些岛屿与亚洲海岸的港湾和海岬距离很近，难解难分，因此亚洲大陆总是耸立在海平线上。从罗得岛到亚洲大陆仅有11英里，如果风向有利，乘帆船几个小时就能抵达；这的确是投石之遥，以至于在晴朗的冬日，亚洲白雪皑皑的群山在稀薄空气的折射下几乎触手可及。

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基督教国家仍然占据着整个爱琴海，形成一个防御圈。这个防御圈就像一个拱形结构，其力量取决于所有石块的互相支撑。到1521年，整个拱形结构已经土崩瓦解；但作为基石的罗得岛幸存了下来，作为一个孤立的基督教堡垒，威胁着土耳其人的海上航道，制约着他们在海上的扩张。

以教皇的名义守卫罗得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是十字军东征时期三大骑士团的最后残余——圣约翰骑士团（又称“医院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的兴衰反映着整个十字军东征事业的成败。最初组建医院骑士团是为了医治和照料在耶路撒冷患病的朝圣者，但后来医院骑士团像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一样，演化成了教会的武装力量。其成员向教皇宣誓终身保持清贫、贞洁和服从；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永不停歇地与异教徒做斗争。圣约翰骑士团参加了争夺圣地的漫长战争中的每一场重要战役，最后在1291年5月的阿卡城，面对穆斯林军队的猛攻，圣约翰骑士团成员背对大海，死战到底，几乎遭到全歼。被逐出圣地之后，他们寻找一个新的基地以便继续战斗，最后相中了信奉基督教的罗得岛。1307年，圣约翰骑士团攻占了罗得岛。罗得岛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深深插入伊斯兰世界的一根楔子，也是在将来发动新的反击、夺回巴勒斯坦的一个前进基地。

骑士们在罗得城建立了一座小型的封建堡垒，这是西欧十字军东征的最后前哨，只听命于教皇本人。他们的经费来自骑士团在欧洲的大片

地产的地租，全部用于圣战。自称“圣战者”的骑士们对军事要塞了如指掌；好几代人在巴勒斯坦的边境防御战中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曾建造骑士堡^[8]——十字军城堡中最固若金汤的一座；现在他们成竹在胸地加固了罗得城的防御工事，并开始了海盗的营生：他们建造并装备了一支由武备精良的桨帆船组成的小型舰队，借此劫掠奥斯曼帝国的海岸和航道，将俘虏卖为奴隶，将战利品据为己有。

两百年来，医院骑士团一直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进行海盗活动，以多德卡尼斯群岛作为一连串防御基地，遏制土耳其人。他们甚至在亚洲大陆上也掌握着一个立足点：“解放者圣彼得”要塞，土耳其人称之为博德鲁姆要塞。这个要塞既是信仰基督教的奴隶逃亡的中转站，也是骑士团在全欧洲范围内募集经费的宣传工具。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对圣殿骑士团的命运^[9]心知肚明，因此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基督教世界之盾”的形象。

欧洲对医院骑士团看法不一。对罗马教廷来说，罗得岛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因为它是抵抗异教徒的最外层防线；随着拜占庭在伊斯兰力量的步步紧逼面前逐渐土崩瓦解，美丽的岛屿一个个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罗得岛就是逐渐萎缩的海上边疆的重要一环。教皇庇护二世哀叹道：“假如其他的基督教君主都像罗得岛这个小岛那样，坚持不懈地与土耳其人保持敌对，那么亵渎上帝的土耳其人就不会发展得如此壮大。”^[10]即便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罗得岛仍然支持着罗马教廷最大的夙愿：最终重返圣地。但其他人对医院骑士团就不那么客气了：对信仰基督教的航海商人来说，骑士团是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危险事物。骑士团的海盗行径和对西方与伊斯兰世界贸易的封锁威胁着脆弱的和平，而商业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和平。威尼斯人认为，医院骑士团和海盗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视其为仅次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医院骑士团名声在外，但力量其实不大。罗得岛上的骑士从来不会

超过五百人，他们都是欧洲贵族，得到当地希腊人和雇佣兵或多或少自愿的支持。骑士团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精英军人团体，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因此虽然兵力很少，但却能给敌人制造不少麻烦。他们的桨帆船潜伏在亚洲海岸的蔚蓝潟湖和怪石嶙峋的小海湾内，能够迅速地拦截过往船只——乘船从伊斯坦布尔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信众，从黑海运往埃及的木材，从阿拉伯成船运来的香料，以及蜂蜜、鱼干、葡萄酒和丝绸。无论敌友，都对医院骑士团噤若寒蝉。与医院骑士团的桨帆船作战，简直就像与蝎子纠缠。“这些海盗精力充沛、胆大妄为，”奥斯曼帝国的史官记载道，“他们扰乱平静的生活，给商人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还会捕捉旅行者。”^[11]对穆斯林来说，医院骑士团素来是不共戴天的死敌，是“法兰克人的邪恶教派、魔鬼最凶残的儿子、魔鬼后嗣中最腐化的一群”。^[12]萨拉丁曾经坦然地屠杀被俘的医院骑士团成员，而毫无道德顾忌。骑士团对教皇的效忠使得奥斯曼帝国加倍地敌视他们。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在罗得岛上经营奴隶贸易，出售穆斯林奴隶。“先知的孩子中有多少被这些谎言的后嗣俘虏？”穆斯林史官哀叹道，“有多少信徒被迫叛教？有多少妻子和儿女？他们罪大恶极、不可饶恕。”^[13]

连续多位苏丹都将罗得岛视为心腹大患、对帝国权威的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穆罕默德二世曾派遣大军前去讨伐，但惨遭失败。1517年，苏莱曼的父亲塞利姆一世占领埃及之后，处于埃及通往伊斯坦布尔航道正中间的罗得岛的战略威胁更加突出。16世纪初的几十年，地中海东部地区常发生饥荒，因而保证对伊斯坦布尔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上述罗得岛人对苏丹的子民施加了严重的摧残，”^[14]威尼斯人萨努多^[15]于1512年在日记中写道。就在这一年，骑士团俘虏了18艘开往伊斯坦布尔的粮船，导致那里的粮价上涨了一半。民间的怨气直达天听，“医院骑士团阻止前往埃及的商船或朝觐者的船只通过，用火炮击沉船只，将穆斯林俘虏”。^[16]对苏莱曼而言，这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威胁；他作为“穆罕默德信士的长官”^[17]的地位也不稳固了。医院骑士团在他的帝国的大门口将穆斯林俘虏并变卖为奴，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他

决定彻底粉碎“法兰克毒蛇的巢穴”^[18]。

苏莱曼在贝尔格莱德写下夸耀胜利书信的九天之后，收信人踏上了罗得岛。他是个法国贵族，名叫菲利普·维里耶·德·李尔·亚当，刚刚当选为骑士团的大团长。他时年五十七岁，家族中有多位先辈在十字军东征中马革裹尸。就是他的先人指挥了1291年在阿卡城的殊死抵抗。李尔·亚当对他即将执行的任务一定不存幻想。他从马赛出发前往罗得岛上任的途中凶兆不断。在尼斯^[19]外海，他的一艘船失了火。在马耳他海峡，骑士团的旗舰“圣马利亚”号被闪电击中，导致九人死亡，电火花将大团长本人的佩剑毁得只剩下扭曲的碎片，但他毫发未伤地离开了被烧焦的甲板。船队在锡拉库萨^[20]停泊以修复风暴造成的损伤时，他们发现，土耳其海盗库尔特奥卢在跟踪他们。库尔特奥卢率领一队武装到牙齿的桨帆船在外海游弋。骑士团的船队悄悄溜出锡拉库萨港，借助西风航行，迅速甩掉了追踪者。

李尔·亚当读到苏莱曼的信后，做了简洁明了、没有任何客套的回复，也不承认苏丹的众多冠冕堂皇的尊号。“菲利普·维里耶·德·李尔·亚当兄弟^[21]、罗得岛大团长，向土耳其苏丹苏莱曼致意，”他的回信如此开始，“您的使节已经呈上您的书信，我对其用意心知肚明。”^[22]大团长随后记述了库尔特奥卢企图俘获他乘坐的船只的经过，最后冷漠地以“后会有期”结束。与此同时，他向法兰西国王也发了一封信：“陛下，自他即苏丹位以来，这是他写给罗得岛的第一封信，绝非友谊的表示，而是隐晦的威胁。”^[23]

李尔·亚当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洞若观火。骑士团的情报工作非常优秀，而且他们四十年来一直在准备抵御敌人的进攻。16世纪初，他们不断向教皇和欧洲各国的宫廷请求提供经费和兵员。奥斯曼帝国于1517年占领埃及后，土耳其人的威胁达到了空前高度。基督教海域在胆战心惊地等待敌人的下一步行动。教皇利奥十世几乎噤若寒蝉：“可怖的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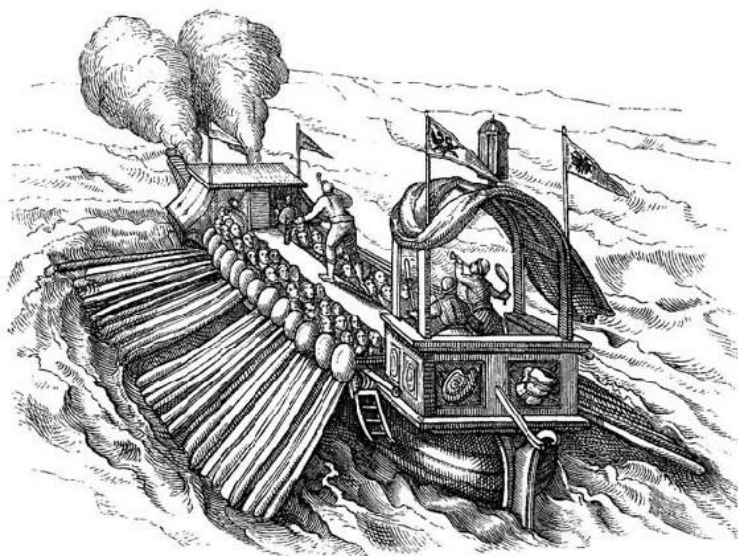
其苏丹如今掌控了埃及和亚历山大港，以及整个东罗马帝国，并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起一支强大舰队，他将鲸吞的不仅仅是西西里和意大利，而是整个世界。”^[24]很明显，罗得岛处于正在聚集力量的风暴的最前沿。大团长再次发出求援的呼声。

基督教世界对他的求救置若罔闻。苏莱曼很清楚，意大利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与法国的瓦卢瓦王室之间交锋的战场；威尼斯在此前与土耳其人的较量中元气大伤，现在选择求和；而路德的宗教改革正在将基督教世界四分五裂。连续多位教皇都竭力刺激欧洲世俗君主们的良心，并幻想新的十字军东征事业，但都毫无效果。在比较清醒的时刻，教皇们放声哀叹基督教世界的紊乱。只有医院骑士团成员从全欧洲范围的各个基地集结起来，准备援救罗得岛，但他们人数极少。

李尔·亚当不为所动，开始为守城做准备。他派遣船只到意大利、希腊和克里特收购小麦和葡萄酒。他监督部下清理壕沟、修理堡垒，监管火药作坊的运作，并努力阻止告密者越过狭窄的海峡向苏丹的国度输送情报。1522年4月，骑士团收割了尚未成熟的小麦，肃清了城外地域，一把火将其夷为平地。港口入口处拉起了一对坚固的铁链。

在450英里之外的伊斯坦布尔，苏莱曼正在集结大军、装配舰队。奥斯曼帝国军事行动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们动员人力和资源的规模远远超过敌人的计算能力。史学家经常会把奥斯曼军队可供集结和投入作战的兵力夸大两倍或三倍，或者干脆放弃计算；遭到围攻的守军躲在城垛后，看到城外漫无边际的人、牲畜和帐篷，常常会将奥斯曼军队的兵力描述为“浩瀚如繁星”^[25]。因此，基督教史学家对征讨罗得岛的土耳其军队的兵力做了很大夸张，声称其拥有20万大军和一支强大的舰队，“加莱赛战船^[26]、桨帆船、平底船、弗斯特战船^[27]和双桅帆船，总数超过300艘”^[28]。李尔·亚当决定不去仔细计算自己的兵力。他们人数太少，如果数清楚了反而会导致士气低落，“而且他担心，进出罗得岛的闲杂

人等会将这情况报告给土耳其苏丹”^[29]。保卫罗得城的守军很可能只有500名骑士和1500名雇佣兵及当地希腊人。大团长决定举行一系列阅兵，以鼓舞士气。在阅兵活动中，各个连队“旌旗招展”，“锣鼓喧天、号角震耳”^[30]。骑士们身穿带有白色十字的红罩袍，景象颇为悦目。



正在开炮的桨帆船

穆罕默德二世在1480年围攻罗得岛的时候并未御驾亲征，而是留在伊斯坦布尔，派遣一名大将前去讨伐。苏莱曼则决定亲自征伐“邪恶的可诅咒的奴仆”^[31]。苏丹的亲临战场令战事风险大增。失败将是不可接受的；一旦战败，指挥官们将被解职，甚至人头落地。苏莱曼此行志在必得。

6月10日，骑士团收到了苏丹的第二封信，这次就没有客套的外交辞令了：

苏莱曼苏丹致罗得岛大团长维里耶·德·李尔·亚当、他麾下的骑士们，以及各色人等。你等对我国人民的摧残令人发指，使我对他们心生怜悯，而对你们义愤填膺。因此，我命令你们立即投降，将罗得岛及其要塞交与我方。我将大发慈悲，允许你们携带最珍贵的私人财物安全离去；如果你们愿意接受我的统治，我将不向你们收取任何赋税，也不会以任何方式限

制你们的自由，更不会妨害你们的信仰自由。如果你们有理智，就应当选择友谊与和平，而不是残酷的战争。因为，你们一旦被征服，就将不得不接受胜利者通常施加的残酷惩罚。你们自己的力量、外部的援助和强大的防御工事都无法保护你们。我将把你们的防御工事夷为平地……我以上天的真主、创世者、四福音书作者、四千先知（他们从天而降，其中最伟大者乃穆罕默德，最值得崇敬者）我祖父与父亲的英灵、我本人的神圣尊贵的帝王头颅的名义，发出如此誓言。[\[32\]](#)

这一次，大团长不屑回信。他的全部精力集中在生产火药上。

6月16日，苏莱曼率军开拔，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沿着亚洲海岸南下，前往与罗得岛隔海相望的集结地。两天后，他的舰队从位于加里波利的基地起航，运载着重炮、补给和更多的兵员。

虽然双方兵力悬殊，但战局并非完全是一边倒的。奥斯曼军队于1480年包围罗得岛上的城镇时，他们仰望的还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要塞。薄薄的高墙是为了抵御云梯和攻城器，但无法抵挡持续的炮火。到1521年，城防已经大大改良。骑士们的精神风貌和使命感或许是过时了，但在军事工程学上，他们却非常前卫。四十年来，他们花费了大量金钱，雇佣最优秀的意大利工程师来加强他们的堡垒。

这项工程恰好处于一场军事建筑学革命的巅峰时期。火药时代已经到来；发射石弹的大型火炮已被淘汰，让位于发射铁制穿透型炮弹、更为精确、体型更小的铜制火炮，这导致要塞设计也发生了革命。意大利军事工程师们将他们的行当发展成了一门科学。他们利用罗盘绘制火炮的射界图纸，并运用弹道学知识设计出激进的解决方案。他们在罗得岛的工程代表了军事工程学的最新成果：巨大的城墙，墙壁极厚、射界更开阔的带拐角的棱堡，用以使炮弹偏转的倾斜胸墙，可供安放长射程火炮的基座，喇叭口状的射击孔，带有隐蔽炮台的内层防御圈，深如峡谷的双道壕沟，以及能够使敌人暴露在狂风骤雨般火力下的壕沟外护墙。防御战的新原则是纵深防御和交叉火力。敌人每前进一步，都将遭到来

自多个角度的袭击，而且前方还可能会有陷阱。1522年的罗得城不仅是世界上最固若金汤的城市，也是攻城战术的试验场。修建工事的劳工主要是穆斯林奴隶；其中有个年轻的水手叫奥鲁奇，他注定将永远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这段经历。

从布局上来看，罗得城呈圆形，像个苹果。但在设防港口与城镇连接的地方，苹果的弧线似乎被咬掉了一大口。骑士们作战时按民族分为若干集群，因此圆形防线被分为八个防区，每个防区各有一座塔楼，每个防区的守军是同一民族的同胞。有个防区由英格兰人防守；意大利人负责另一个区；奥弗涅^[33]人防守最强大的一个棱堡；然后是德意志人、卡斯蒂利亚^[34]人、法兰西人、普罗旺斯人和西班牙人。



罗得岛

虽然没能从西欧得到有力的支援，李尔·亚当还是交了一个好运。他从克里特招募到了当时最优秀的军事工程师之一——加布里埃利·塔蒂尼，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工程师，在军事学上也是一位卓越的数学家”^[35]。塔蒂尼在名义上是受威尼斯人雇佣的，后者坚决反对塔蒂尼为医院骑士团效力，因为这将会被视为破坏了威尼斯的中立。骑士们借着夜色掩护，将塔蒂尼从克里特一个荒无人烟的小海湾接走。这是一场令

人精神大振的冒险。塔蒂尼面容饱经风霜、精力充沛、极富创造力，而且英勇无畏，抵得上1000个人。他立即着手对罗得岛的防御工事进行调整，测量距离和射界，对杀戮地带进行改良。

6月24日是圣约翰的瞻礼日，对医院骑士团来说是最神圣的一天。就在这一天，奥斯曼舰队首次尝试在罗得岛登陆。两天后，舰队在罗得城以南6英里处下锚，随即开始耗时甚久的装备卸载工作，将人员和物资从大陆运到岛上。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大团长将罗得城的城门钥匙放置在圣约翰教堂的祭坛上，“恳求圣约翰保管和保护钥匙，并保卫整个骑士团……仁慈地保护他们免遭正在围攻他们的强大敌人的侵害”。^[36]

土耳其人花了两周时间才把所有人员和物资运到岛上。他们运来了名目五花八门的各式火炮：射石炮、蜥炮^[37]、蛇炮、双筒炮和罐形炮。这些火炮能够发射形形色色的弹丸，在攻城战中各有独特的功能：直径9英尺的巨型石弹和穿透性极强的铁弹丸将被快速投射，轰击和穿刺城墙；铜制的燃烧弹炸裂后会抛洒出燃烧的石脑油，“以杀戮人员”^[38]；还有弹道很高的臼炮弹；甚至还有生物武器——有些火炮被专门用来向城内投射腐烂的尸体。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比奥斯曼人更精通攻城战。拜间谍所赐，他们抵达罗得岛的时候就已经对城防相当了解，因此对自己的任务做了非常务实的评估。他们寄予厚望的不是攻城大炮，而是地下武器：地雷。所以，登上阳光明媚海滩的人员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只装备了鹤嘴镐和铲子。苏莱曼网罗了巴尔干地区富有经验的坑道工兵（主要是基督徒），让他们在城墙下挖地道。有资料表明，苏莱曼麾下坑道工兵的数量高达6万人，相当于全军的1/3，当然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了。他们将流血流汗，一尺一尺地在设计精巧的意大利式棱堡下方挖掘前进。

7月28日，守军可以看见奥斯曼帝国的船只从桅顶悬挂了庆祝条

幅：苏莱曼本人乘坐桨帆船渡过了海峡。当苏丹在炮火射程外安营扎寨并监督了所有准备工作之后，攻城战就正式打响了。

最初的战斗是争夺城墙之外的地域，然后是争夺城墙本身。土耳其坑道工兵首先挖掘一道与罗得城防线平行的堑壕，然后在堑壕的前方树立起木栅栏；第二阶段是挖掘像蜘蛛网一样向城墙延伸的坑道。从一开始，这项工作就非常残酷。可怜的坑道工兵在开阔地上无遮无挡地挖掘作业，惨遭塔蒂尼的精确炮火的屠杀。守军还不时发动突袭，从城中杀出，消灭了更多的坑道工兵。这对奥斯曼帝国的指挥官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有的是人。堑壕挖好后，火炮被拖入防护性屏障的后面，然后就可以开始炮击了。重炮连续不断，日夜轰击城墙，长达一个月之久。臼炮向城市投射燃烧的弹丸，这些弹丸“落地之后旋即破裂，火苗飞腾而出，造成破坏”^[39]。使用火绳枪的神射手尝试消灭出现在城垛上的守军。一名目击者记述说：“手枪的射击声此起彼伏，令人难以置信。”^[40]源源不断的人力供应使得挖掘工作进展神速。坑道工兵从半英里之外搬来“一座土山”^[41]，堆筑了两座巨大的俯视城墙的土堆，随后在土堆上安置了五门大炮，居高临下地轰击城内。

土耳其军队兵力如此雄厚，以至于形成了一道长达1.5英里、横亘全岛的半月形封锁线，正对着罗得城面向内陆的一面。庞大的堑壕系统一天天逼近城墙，堑壕敞开的顶部覆盖有木料和兽皮，坑道工兵就在这掩护下工作。

塔蒂尼积极地采取反制措施。随着敌人坑道的逼近，他建造了巧妙的监听装置：在木框架上紧绷兽皮薄膜，上面悬挂着铃铛。这种装置非常灵敏，来自地下的哪怕是最轻微的震动都能使铃铛响起。他还挖掘自己的防御性地道，拦截敌人的地道，将敌人杀死在黑暗中，用火药将敌人的坑道工兵炸得抱头鼠窜，另外还设置了复杂的陷阱，用凶悍的交叉火力痛击前进的敌人。为了防止漏过敌人的某一条坑道，他在城墙的地

基里开凿了螺旋形的通风口，以分散敌人地雷爆炸的力量。

新建的意大利棱堡能够有效地抵挡炮击，但是年代更久远地段的城墙，尤其是英格兰人的防区，就比较脆弱了。而且土耳其坑道工兵干起活来真是不知疲倦。到9月初，塔蒂尼摧毁了敌人的大约50条坑道，但是到9月4日，英格兰人防守的棱堡下方发生巨大爆炸，撼动了全城；这里的一条地道躲过了守军的注意力，奥斯曼人得以在棱堡下方引爆了地雷，炸出了一个方圆30英尺的大洞。奥斯曼步兵如潮水般涌入；苏莱曼的人马一时间建立了桥头堡，在城墙顶端插上了自己的旗帜，但后来被打退，而且损失惨重。随后几天内，战斗愈发血腥；奥斯曼人引爆了很多地雷，但塔蒂尼开凿的通风口系统发挥了效力，城墙没有受到多大损伤；奥斯曼军队发动了一些正面进攻，但都被击退，几千名不知名的奥斯曼士兵战死。苏莱曼的主炮手被一发炮弹打断了双腿，据说苏丹认为这个损失比任何一名将军的阵亡都更严重。士兵们士气低落，不肯进攻；9月9日，指挥官们需要“用剑砍杀”^[42]才能迫使士兵们投入战斗。守军的伤亡要少得多，但严重得多，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补充兵员。仅在9月4日一天，骑士团就损失了三名主要指挥官：桨帆船分队的指挥官、掌旗官亨利·曼赛尔和高级指挥官加布里埃·德·波莫罗，后者“前去观察堑壕时从城墙上坠落……胸部受伤”^[43]。

苏莱曼在炮火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带观察战事，并在作战日记中以一系列简洁的言辞做了记载。8月底，他简单地写道：“26日和27日，战斗。28日，下令用树枝和石块把堑壕填平。29日，曾被异教徒摧毁的皮里帕夏^[44]的炮台再度开始射击。30日，堑壕被填平了。31日，激烈战斗。”^[45]这些日记充满了如同奥林匹斯诸神静观凡人打仗一般的冷静和超然。苏丹写到的时候都是用第三人称，似乎真主在人间的影子^[46]已经超脱凡人的情感，但从这些日记里还是能够感受到苏丹的期望值的变化轨迹。他麾下的将领穆斯塔法帕夏曾告诉他，攻城战将持续一个月。9月，当一系列地雷的爆炸撼动了城市，缺口被扩大时，似乎

胜利的最后一击已经为期不远。9月19日，苏莱曼记载道，一些部队成功地打进了一段城墙的内部。“这一次得到了情报，城内没有第二道壕沟，也没有第二道城墙。”^[47]9月23日，穆斯塔法帕夏认定，决战的时刻到了。传令官们在全军宣布，即将展开最后总攻。苏莱曼向官兵们发表了演说，激励大家勇往直前。他命人搭建了观战台，从那里亲自观看最后的总攻。

9月24日破晓前，“甚至在晨祷之前，”^[48]土耳其军队就发动了大规模炮击。在烟雾的掩护下，苏莱曼的精锐部队——近卫军开始前进。守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近卫军冲上城头，插起了旗帜。随后是一场血雨腥风的鏖战，双方苦战了六个小时。大团长成功地集结起了守军，各棱堡和外层城墙内的隐蔽阵地中射出冰雹般的枪弹，对入侵者迎头痛击。土耳其人最后发生动摇，撤退了。任何威胁都无法迫使土耳其士兵返回突破口。他们逃离了战场，留下的是滚滚狼烟和满地血污的瓦砾堆。苏莱曼在当天的日记里只写了一句话：“进攻被打退。”^[49]次日，他宣布，将让穆斯塔法帕夏在全军面前游行，然后将他乱箭射死。第二天，他回心转意，饶恕了穆斯塔法帕夏。

罗得岛遭围攻的消息通过窃窃低语传遍了地中海世界。欧洲的帝王们虽然按兵不动，但毕竟还是理解罗得岛的重要性：它是阻挡奥斯曼帝国海上扩张的堤坝。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预计，罗得岛一旦陷落，地中海中部海域将向土耳其人洞开；土耳其人将继续推进，从海上进攻意大利，“最终摧残和毁灭整个基督教世界”^[50]。但对罗得岛来说不幸的是，这个精明的洞见却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10月，只有几艘小船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封锁，带来仅有几名骑士的援兵。在意大利，医院骑士团招募了2000名雇佣兵，这支队伍到达了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随后就止步不前。因为没有武装护航，他们不敢出海。在遥远的英格兰，一些英格兰骑士为远征做了准备。但他们的船只起航太晚，遭遇了恶劣的海况，后来在比斯开湾沉船，无人生还。

攻击在继续。土耳其人坚持不懈地对城墙进行爆破，或者正面攻击。十天内，土耳其人对英格兰人的防区发动了五次进攻，均被打退。到10月初，大部分英格兰骑士非死即伤。10月10日，形势急剧恶化。西班牙人防区的城墙遭到突破，杀入突破口的土耳其人死死咬住阵地，西班牙人无法将其逐出。骑士团仓促修建了一道内层城墙，对这个突破口进行了遏制，但土耳其人稳稳地站住了脚。“对我们来说，这是厄运当头的一天，”一名骑士写道，“这是我们的灭亡的开端。”^[51]次日，更多噩耗降临：塔蒂尼在透过枪眼对防御工事进行观察时，被一名神射手一枪击中面部。枪弹打烂了他的眼窝，从头颅侧面射出。这位勇猛的工程师虽然身负重伤，但顽强地活了下来。在随后六周内他无法参加战斗。同时，可用的火炮数量日渐缩减，火药已经所剩无几。大团长不得不下令，未经批准不得开炮。

城内开始疑神疑鬼地大肆搜捕间谍。当地民族混杂，有拉丁人^[52]、希腊人和犹太人，以及被迫为骑士团效劳、心怀不满的穆斯林奴隶，因此人们很容易怀疑，城内潜伏着通敌的第五纵队。在围城初期，有一些土耳其女奴企图烧毁房屋，这个阴谋被挫败，主谋被处死。虽然受到严密监视，男性奴隶还是不断偷跑；他们趁夜色从城墙爬下，或者溜进大海、游出港口。苏莱曼从逃兵那里得知，在9月29日的战斗中，骑士团损失了300人，其中包括几名重要的指挥官。还是在9月，一名犹太医生（其实是苏莱曼的父亲多年前安插在城内的间谍）用弩箭向城外传递消息，被当场抓获。神经紧绷的居民们开始幻想处处都有间谍；关于背叛的谣言和对末日的预言如野火般传播。10月底，又抓住了一个用弩箭传递消息的犹太人。他是骑士团财务官安德里亚·达玛拉尔的仆人。达玛拉尔是个粗暴阴沉、不受欢迎的人物，他原本有希望成为大团长，但最终未能如愿。骑士们现在什么都肯相信。达玛拉尔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他拒绝承认通敌罪行，但还是被判有罪，先被处以绞刑（一直到濒死，随即解开绞索），然后开膛、阉割、斩首，最后被肢解。他的头颅和分解的肢体被插在城墙的矛尖上。军营中弥漫着恐惧。

随着援兵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骑士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天气上。在地中海作战是要看老天爷脸色的。到了秋末的绵绵淫雨开始的时候，士兵们就无心恋战，一心想返回兵营；应征入伍的人想返回自己的村庄和农场。海况也会越来越糟糕，船身低矮的桨帆船无法应付，在海上待的时间太长的船只将面临灭顶之灾。琢磨日历最认真的就是土耳其人了：传统的作战季节从每年的波斯新年3月21日开始，到10月底结束。罗得岛上10月25日开始下雨。堑壕内灌满雨水，地面化作泥潭。战场变得像索姆河^[53]一样。风向转为东风，将安纳托利亚平原的寒冷驱赶到罗得岛。工兵们的手指被冻僵，难以握住铁铲。开始有人病死。鞭策士兵继续作战也变得更困难了。进攻方开始灰心丧气。

奥斯曼帝国的任何指挥官如果能自行决断的话，都一定会停止进攻，以减小损失。因为他会害怕自己的舰队被风暴和礁石摧毁，担心自己的军队心怀不满、口出怨言，而且因为疾病而虚弱不堪。指挥官宁可以让苏丹雷霆大怒，也一定要率军撤退。但苏莱曼这次是御驾亲征，所以决不能放弃：他志在必得。执掌朝纲不久就遭遇失败，会严重损害他的权威。10月31日的作战会议决定，舰队将开往安纳托利亚海岸的一个安全锚地；苏莱曼命令建造一座石制的“逍遥宫”^[54]，作为他的冬季寓所；攻城战则将继续进行。

战事拖过了整个11月。骑士们现在人数太少，无法面面俱到地防御所有地段，也没有足够的奴隶劳工来修补防御工事或者转移火炮。“我们没有火药了，”英格兰骑士尼古拉斯·罗伯茨爵士写道，“没有任何弹药，除了面包和水之外没有任何粮食。我们已经绝望。”^[55]海上没有任何大规模援军抵达。土耳其人稳稳地控制着西班牙人防区的突破口。此时那个突破口已经宽到足以让40个人肩并肩地骑马通过。骑士团对这个缺口发动了更多进攻，但寒冷的天气和疾风骤雨令士气十分低落：“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无休无止；雨点被冻结；下了很多冰雹。”^[56]11月30日，土耳其人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骑士团虽然

挫败了这次进攻，但再也无法将敌人打退。战事陷入了僵局。城内的现实主义者“感到城市已经守不下去，敌人在一个地段突入了40码^[57]，在另一地段突入了30码。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后退，也无法将敌人击退”^[58]。而苏莱曼每天都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军队蒙受新的惨重损失。现代的要塞设计给防守方加分不少，有效地弥补了攻防双方的兵力悬殊，使得双方的力量更加均衡。他知道自己士兵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12月1日，一名热那亚叛教者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城门前，主动提出为和谈斡旋。他被赶走，但两天后又回来了。以有条件投降为目标的谈判就这么小心翼翼地秘密开始了。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是苏丹本人在寻求谈判。如果世人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也在求和，会令他大损颜面。神秘的信件被送到大团长手中（苏丹当然否认是他发出这些信的），重申了投降的条件。双方渐渐地演化出了一种外交活动的模式。骑士们在闭门会议中对此事做了漫长的讨论。李尔·亚当主张死战到底；将罗得岛拱手交给敌人的想法让他悲痛得甚至晕倒在地。但塔蒂尼知道，从军事上讲，他们已经走投无路；而且城内居民想起了贝尔格莱德居民的悲惨命运，含泪哀求骑士团投降。苏丹提出的条件非常慷慨，令守军非常吃惊，起初甚至还颇有些狐疑：骑士们可以保持体面，携带财产和除了火炮之外的武器离开。平民的人身和宗教自由将得到尊重；奥斯曼人不会强迫平民改宗伊斯兰教，也不会将教堂改为清真寺；五年内不收任何赋税。作为交换，骑士们应当交出所有的岛屿和要塞，包括亚洲大陆上的“解放者圣彼得”要塞。这种慷慨大度说明，苏莱曼也陷入了一个僵局，急于尽快结束冬季战争。他甚至表示愿意提供船只，送骑士们撤离。

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周。李尔·亚当努力拖延时间，于是土耳其人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迫使他回到谈判桌前。最终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苏莱曼非常坚决，不可动摇：“哪怕土耳其民族灭绝”^[59]，他

也一定要得到要塞。但他说服了基督徒，他一定会信守诺言。为了营造互信的气氛，苏莱曼撤军1英里，并与守军交换了人质。骑士团的人质包括尼古拉斯·罗伯茨爵士，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有幸目睹苏丹真容的英格兰人。这经历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土耳其苏丹非常睿智、审慎……言辞与行动皆如此”，他写道，“我们首先被带去向他请安，我们看到……一座极其奢华的大帐篷。”在这里，他向苏莱曼鞠躬致意，后者“坐在纯金打造的椅子上，帐内没有其他人”^[60]。即便身处临时搭建的军营，苏莱曼的气场仍然十分强大。



衰老的李尔·亚当

12月20日，双方最终签订了协议。四天后，李尔·亚当身着“朴素的服饰”（黑色的丧服）前去向苏莱曼俯首称臣。这次会面几乎洋溢着君子之风。满脸络腮胡子、满腹忧伤的李尔·亚当俯身去亲吻苏莱曼的手，这显然触动了后者；骑士们英勇的抵抗也让他心生敬意。通过译员，他用同情的话语抚慰了明显在衰老的李尔·亚当，谈及了世事的难料，“由于人的命运浮沉不定，丧失城市和王国也屡见不鲜”^[61]。他转向他的维齐尔^[62]，喃喃道：“我不得不将这位勇敢的老人逐出自己的家园，这令我非常忧伤。”^[63]两天后，他亲自视察刚刚征服的城市，一路上几乎没有任何卫兵陪同，完全信赖骑士们的荣誉感，这个姿态是非同寻常的。他离开城市时掀起了自己的头巾，向对手表示敬意。

但并非事事都一帆风顺。圣诞节那天，一队奥斯曼近卫军进了城，表面上是担任守卫，却对教堂进行了抢劫和亵渎。在遥远的罗马，发生了一件不祥之事，与基督教堡垒的即将陷落形成巧合。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圣诞节礼拜中，教堂拱顶高处的飞檐上有一块石头脱落，正好落在教皇脚边。信徒们视此为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基督教世界的基石已经崩溃；异教徒通往地中海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在罗得城，穆斯林高呼“安拉！”，胜利入城，近卫军的军旗（伊斯兰世界的胜利旗帜之一）被徐徐升起，皇家鼓点和音乐响起。“就这样，曾经屈从于谬误的城市归入了伊斯兰的土地。”^[64]

1523年新年的黄昏，幸存的骑士，包括能够行走的和必须抬在担架上的伤病员，共计180人，登上了他们的克拉克帆船^[65]“圣马利亚”号和三艘桨帆船“圣雅各号”“圣凯瑟琳号”和“圣波拿文土拉”号。他们带走了骑士团的档案和最珍贵的圣物：盛放在镶嵌珠宝的匣子内的施洗者约翰的右臂骨和一幅珍贵的圣母像。苏莱曼一心想把塔蒂尼招入自己麾下，因此早已将他带走了。

船队从港口起航后，骑士们可以眺望小亚细亚白雪皑皑的群山，回

想四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史。随着罗得岛的陷落和博德鲁姆要塞的投降，十字军东征正式寿终正寝。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对医院骑士团的成员来说，罗得岛将是一个令人憧憬和神往的天堂；收复罗得岛的美好幻想要过很久才会破灭。现在等待他们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在克里特海的上空，黑夜正在向他们疾驰。倚着护栏眺望远方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他叫让·帕里索·德·拉·瓦莱特。他时年二十六岁，与苏丹年纪相同。在岸上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轻的土耳其士兵，他叫穆斯塔法，在此次战役中功勋卓著。

苏莱曼大获全胜，凯旋伊斯坦布尔。登基仅仅十八个月时间，这位沉默寡言的年轻君主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宏图大略。占领贝尔格莱德之后，通往匈牙利和中欧的道路已经洞开；夺得罗得岛，就是剪除了基督教在地中海东部的最后一座军事要塞。“敏捷如蛇”^[66]的奥斯曼帝国战船可以席卷地中海中部了。罗得岛攻防战打响了一场宏大战争的第一枪，这场角逐将从维也纳城下一直打到直布罗陀海峡。

苏莱曼在这些征服事业之后的统治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长久也最辉煌的篇章。被土耳其人称为“立法者”，被基督徒誉为“大帝”的苏莱曼将发动史诗规模的战争，令他的帝国达到全盛的顶峰。第十世苏丹的威严、公正和雄心无人可比。然而苏莱曼的黄金时代却受到圣约翰骑士团的烦扰：四十年后，骑士团将在拉·瓦莱特的领导下再次给苏丹制造麻烦。苏莱曼年轻时在罗得岛的慷慨大度被历史证明是一个代价沉重的错误。在1522年之后，并非只有年轻的苏丹一个人自认为奉天承运。在托勒密地图的最西端，有着另外一位足以与他匹敌的伟大帝王。

^[1] 特拉布宗是从拜占庭帝国分裂出的三个帝国之一，创立于1204年4月，持续了257年。特拉布宗帝国的第一代君主阿列克赛一世是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的孙子，他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预见十字军将攻取君士坦丁堡，便占据特拉布宗独立建国。在地理上，特拉布宗的版图从未超过黑海南岸地区。146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消灭了特拉布宗。

[2] Brockman, Eric, *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 1969, p.114

[3] Finkel, Caroline,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23*, London, 2005, p.115

[4] Crowley, Roger,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2005, p.51

[5] 伊斯兰纪年法以公元622年为元年，在这一年，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众离开麦加，迁移到麦地那，这一事件称为“希吉拉”。伊斯兰纪年法是一种阴历，每年12个月，一共354天或355天。

[6] “沙阿”即国王。

[7] Fisher, Alan, “The Life and Family of Süleyman I” in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p.2

[8] 骑士堡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境内，由十字军建立。1142年，的黎波里伯爵将该城堡封赏给医院骑士团。骑士团经营这个城堡一直到它于1271年被阿拉伯人占领。

[9] 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样，也是基督教三大骑士团之一。它一度享有很多特权，富可敌国，与十字军的命运密切相关。1291年，圣地陷落，圣殿骑士团失去根据地，最终沦为法王腓力四世解决财务问题的牺牲品。1307年，其众多成员在法兰西被捕，遭到残酷审讯后以异端罪名处以火刑。圣殿骑士团就此灭亡。

[10]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2, Philadelphia, 1984, p.372

[11] Rossi, E., *Assedio e Conquista di Rodi nel 1522 secondo le relazioni edite e inedite de Turchi*, Rome, 1927, p.26

[12] Rossi, E., *Assedio e Conquista di Rodi nel 1522 secondo le relazioni edite e inedite de Turchi*, Rome, 1927, p.26

[13] Rossi, E., *Assedio e Conquista di Rodi nel 1522 secondo le relazioni edite e inedite de Turchi*, Rome, 1927, p.27

[1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3,

Philadelphia, 1984, p.122

[15] 马里诺·萨努多（1466～1536），又称“小萨努多”，威尼斯史学家，他的日记详细记述了当时的一些事件，包括意大利战争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16] Rossi, E., *Assedio e Conquista di Rodi nel 1522 secondo le relazioni edite e inedite de Turchi*, Rome, 1927, p.27

[17] Fisher, Alan, “The Life and Family of Süleyman I” in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p.5

[18] Rossi, E., *Assedio e Conquista di Rodi nel 1522 secondo le relazioni edite e inedite de Turchi*, Rome, 1927, p.26

[19] 法国东南部港口城市，今天是旅游胜地。

[20] 西西里岛东岸海港城市。

[21] “兄弟”是修道会和教会属下的骑士团成员互相之间的称呼，因为他们情同手足。

[22] Brockman, Eric, *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 1969, pp.114-5

[23] Brockman, Eric, *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 1969, p.115

[2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3, Philadelphia, 1984, p.172

[25] Crowley, Roger,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2005, p.102

[26] 加莱赛战船是中世纪一种主要由威尼斯人制造、在地中海使用的大型战船，一度颇为流行。加莱赛战船的排水量可达600吨以上乃至接近1000吨，在当时可算真正的巨无霸；动力是划桨和风帆相结合，需要数百名桨手一同运作。较大的船体使它吃水较深，可以很稳定地航行，并可以搭载更多和更强大的火炮以及数量可观的水兵，因此战斗力很强，但搭载大量人员和使用划桨使其不适合远洋航行。随着风帆船的崛起以及火炮在海战中地位的提升，加莱赛战船逐渐被淘汰。

[27] 一种轻型桨帆船。

[28]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p.5

[29]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p.11

[30]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p.12

[31] Rossi, E., *Assedio e Conquista di Rodi nel 1522 secondo le relazioni edite e inedite de Turchi*, Rome, 1927, p.26

[32] Brockman, Eric, *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 1969, pp.115-6

[33] 法国中部的一个地区。

[34] 西班牙中部的一个地区，在西班牙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是现代西班牙的基础。如今卡斯蒂利亚仍是西班牙的政治和行政中心。

[35]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2, Rome, 1594—1602, p.545

[36]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p.17

[37] 中世纪后期的一种重型铜炮。

[38]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p.19

[39]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p.20

[40]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p.19

[41] Porter, Whitworth, *The Knights of Malta*, 1 vols., London, 1883, p.516

[42]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p.28

[43]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p.28

[44] 皮里帕夏即著名的“皮里雷斯”（生于约1465～1470年，卒于1553年），原名哈只·艾哈迈德·穆哈德因·皮里。“哈只”是对曾经前往麦加圣地的朝觐者的尊称。“雷斯”原意是“船长”，后来变为对海军高级将领的尊称。“帕夏”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皮里雷斯是当时著名的将领、航海家、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师。他参加了1522年的对罗得岛的围攻。由于他留存今日的著作《航海书》精确描述了地中海的众多重要港口和海防咽喉，令人不禁猜测，他很可能同时也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情报头子。

[45] Hammer-Purgstall, J.,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vols.5, Paris, 1836, p.420

[46] “真主在人间的影子”是苏丹的一个尊号。

[47] Hammer-Purgstall, J.,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vols.5, Paris, 1836, p.421

[48] Brockman, Eric, *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 1969, pp.134

[49] Hammer-Purgstall, J.,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vols.5, Paris, 1836, p.421

[50]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3, Philadelphia, 1984, p.209

[51]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3, Philadelphia, 1984, p.421

[52] 指信仰罗马天主教、以拉丁语为教会语言的西欧人。

[5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联军于1916年7月对法国索姆河以北的德军发动正面进攻。德军阵地坚不可摧，进攻第一天英军就伤亡近6万人。攻势逐渐变成一场消耗战。10月，倾盆大雨将战场变成无法通行的泥潭，联军不得不放弃战役，此时，联军仅前进了8000米。德军伤亡约65万、英军约42万、法军19.5万。索姆河战役成为徒劳无益和疯狂残杀的代名词。

[54] Porter, Whitworth, *The Knights of Malta*, 1 vols., London, 1883, p.516

[55] Porter, Whitworth, *The Knights of Malta*, 1 vols., London, 1883, p.517

[56] Rossi, E., *Assedio e Conquista di Rodi nel 1522 secondo le relazioni edite e inedite de Turchi*, Rome, 1927, p.41

[57] 码，英制长度单位，通常换算方式为1码=0.9144米。

[58] Caoursin, Will, and Afendy, Rhodgia,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sh War with the Rhodians, Venetians, Egyptians, Persians and Other Nations*, London, 1683, p.516

[5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3, Philadelphia, 1984, p.212

[60] Porter, Whitworth, *The Knights of Malta*, 1 vols., London, 1883, p.516

[6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2, Rome, 1594—1602, p.590

[62] “维齐尔”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处理一切政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尔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奥斯曼帝国的宰相称为“大维齐尔”，是苏丹的全权代表，下文中译为“首席大臣”。

[63] Caoursin, Will, and Afendy, Rhodgia,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sh War with the Rhodians, Venetians, Egyptians, Persians and Other Nations*, London, 1683, p.507

[64] Rossi, E., *Assedio e Conquista di Rodi nel 1522 secondo le relazioni edite e inedite de Turchi*, Rome, 1927, p.41

[65] 克拉克帆船是15世纪盛行于地中海的一种三桅或四桅帆船。它的特征是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大斜桅。克拉克帆船体型较大，稳定性好，是欧洲史上第一种可用作远洋航行的船只。

[66] Brummett, Palmira, *Ottoman Seapower and Levantin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Albany, 1994, p.90

2.求援

1517~1530年

五年前。1500英里以西。另一片大海。

1517年11月，在恶劣天气下，一支40艘帆船的船队正颠簸地穿过比斯开湾。它们是来自荷兰的弗利辛恩的佛兰德船只，目的地是西班牙北岸。这些坚固的克拉克帆船足以抵御大西洋的惊涛骇浪。每艘船都张挂着巨大的帆，主帆在冬季劲风的猛冲下鼓胀起来。狂风骤雨席卷灰色的海域，有时遮蔽了船队，有时又让它们在昏暗的日光下显露身形。海岸线逐渐出现在雨帘中。

甚至从远处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艘船与众不同。“国王”号上载着年轻的勃艮第公爵查理，他是来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国王”号的帆上装饰着代表宗教和帝国权威的复杂徽记：

主帆上绘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像，两侧是圣母马利亚和使徒圣约翰^[1]。整幅图像的外围是赫拉克勒斯的两根巨柱^[2]。国王的箴言“走得更远”^[3]写在缠绕在两根巨柱之间的卷轴上。这一切构成了王室纹章。上桅帆上画着三位一体像，后桅帆上绘有圣尼古拉像。前桅帆上画着环抱圣婴的圣母走在月球上，周围环绕着太阳的光辉，她头戴饰有七颗星的冠冕；最上面是卡斯蒂利亚的主保圣人圣雅各在战斗中斩杀异教徒的场景。

查理年仅十七岁。复杂的王朝继承法统规定，他理应是自查理曼以来欧洲最庞大领地的继承人。他的领地之广大，可与奥斯曼帝国等量齐观，而他的头衔之多也足以与苏莱曼匹敌。书记员要用长长的两页纸才能写下他的全部头衔：阿拉贡、卡斯蒂利亚与纳瓦拉国王，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国王，勃艮第领主，米兰公爵，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弗朗什—孔泰、卢森堡与夏罗尔的统治者，等等。他的领地在全欧洲星罗棋布，

如同象棋上的黑色方块，从东方的匈牙利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大西洋，从阿姆斯特丹一直到北非海岸，甚至包括更遥远的地方——新发现的美洲大陆。

船帆上的徽记是年轻国王的佛兰德谋臣们精心选择的，目的是争取他的新臣民西班牙人的好感，并宣示他们的国王对整个帝国和圣战领导地位的所有权。在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查理领土将远远超出直布罗陀海峡，囊括整个世界。他继承了西班牙王冠，同时也继承了“天主教国王”的头衔和消灭伊斯兰新月、以圣雅各之名击败穆斯林军队的使命。

从一开始，他的谋臣们就宣扬着这种观点：他们的君主是奉天承运，来担任全世界的皇帝的。他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那里继承了这样的箴言：“奥地利理当统领全世界。”^[4]两年后的1519年，通过重金贿赂，他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史称查理五世。这完全是个荣誉称号，并不会带来新的土地或收入，但在那个重视皇帝头衔的年代，它能赋予极大的威望。有了这个头衔，查理五世就成为捍卫天主教欧洲、反对穆斯林和基督教异端的战士。很快，查理五世就将被誉为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君主。就在他当选皇帝的那一年，麦哲伦扬帆起航，后来为西班牙争得了全球霸业。

但不幸的是，在1517年11月，查理五世登上西班牙土地的时候，上演的却是一桩闹剧，此时还无人能预见到他未来的帝国威仪。船队接近西班牙海岸时，佛兰德水手们郁闷地发现，他们抵达的地方位于目的地以西100英里处。他们在无人通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一个叫比利亚维西奥萨的小港口。当地居民没有读懂查理五世的船帆上威风凛凛的徽记，而误以为他们是海盗。居民们大为恐慌，携带财物逃进山里，准备抵抗。“西班牙人，快来参见国王陛下！”^[5]的呼喊也未能澄清事实。众所周知，海盗会使出各种阴谋诡计来蒙蔽不够谨慎的人。过了相当一段

时间，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平民“偷偷摸摸地从灌木丛和树篱中走出”^[6]，这才认出了卡斯蒂利亚的旗帜。查理五世的呆若木鸡的臣民们终于振作起精神，仓促准备了斗牛比赛来为国王接风洗尘。

这不是一个光荣的开端。踉踉跄跄地登上西班牙土地的十七岁国王也没有什么震撼人心的威仪可言。苏莱曼精心设计的威严仪容令所有看到他的人肃然起敬，而查理五世看上去却像个白痴。哈布斯堡皇族世世代代的近亲结婚带来了不良的遗传。他的眼睛圆鼓鼓的，皮肤非常苍白，虽然身材匀称、天庭饱满，但却有个严重的缺陷：长长的下颚非常突出，导致嘴巴经常是张开的。那些过于粗鲁，或者地位极高因此能够言行无忌的人会说，这个年轻人看上去表情茫然，像个傻瓜。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直截了当地说，他活像个异教偶像。面部畸形使得查理五世无法正常地咀嚼食物（所以他一生都被消化不良困扰），并且造成了口吃。这位国王不会说西班牙语。他看上去严肃缄默，智商不高，很难让人预想到，他将来竟能统领天下。威尼斯人认为他对谋臣们言听计从，是后者的傀儡。但表面现象是骗人的。查理五世虽然其貌不扬，却极富独立思考的精神；虽然沉默寡言，却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帝国的政务和保卫基督教世界的使命。“他脑子里藏的东西”，一位教皇使节明智地评断道，“比脸上显露出来的多得多”。^[7]



年轻的查理五世

查理五世初登西班牙土地的不愉快经历预示着他很快就将遇到诸多困难。在这位以法语和佛兰德语为母语的新国王即位之初，西班牙各地纷纷叛乱，据说只有从没亲眼见过他的人们才没有揭竿而起。除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内部问题之外，查理五世几乎马上就卷入了基督教西班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难题中。在查理五世的船帆徽记上非常突出的直布罗陀海峡不仅是通往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门户，也是与敌意日增的伊斯兰世界的边疆，二者之间仅仅隔着8英里宽的海峡。他抵达西班牙不久之后，北非的奥兰^[8]的军事总督科马雷斯侯爵就将向他

详细汇报具体形势。与科马雷斯侯爵一同前来觐见国王的还有一个身穿阿拉伯服装的人。科马雷斯呈上的请愿书很快对国王的雄图大略构成了考验。

科马雷斯申诉的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几个世纪前阿拉伯人对西班牙南部的占领，以及基督徒漫长的反攻，即著名的“收复失地”运动，但也涉及圣约翰骑士团。当时的人们对大转折的年份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首航的那年，还记忆犹新。就在那一年，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征服了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据点——格拉纳达王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安宁生活了八百年的穆斯林一下子丧失了家园。很多人渡过海峡，逃往北非。留在半岛上的几万名穆斯林在基督教社会越来越不宽容的环境下，不得不忍受越来越多的限制。到1502年，卡斯蒂利亚的穆斯林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改宗基督教，要么离开西班牙。于是又有很多穆斯林愤然离去；留下的人，即所谓的摩里斯科人或新基督徒^[9]，往往只是在名义上改信基督教，因此受到愈发焦虑的基督教君主的怀疑。

这些事件越过大海，对欧洲人称之为巴巴利海岸而阿拉伯人称之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在这条海上边界的两侧，海盗活动一向都很猖獗。现在复仇心切的大批穆斯林遭到驱逐，更令他们咬牙切齿。海盗活动不再是全无章法的恣意抢劫，而是变成了一场圣战。从巴巴利海岸的安全港口发起的劫掠活动越来越猖狂。基督教西班牙开始为自己清理门户的举措付出代价。新一代的伊斯兰海盗对西班牙海岸熟悉到了骇人的程度；他们会说西班牙语，能够冒充西班牙人；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能得到地中海北岸心怀不满的摩里斯科人的大力支持。基督教西班牙开始感到自己四面受敌。作为回应，基督徒攻占了巴巴利海岸的海盗要塞，建造了一连串堡垒，作为对抗伊斯兰世界的“马其诺防线”。

事实证明，这项政策考虑欠成熟，执行也很不得力。西班牙堡垒群岌岌可危地矗立在敌人的海岸上，没有得到充足的资源，又受到心怀怨恨的异族平民的包围。西班牙更重大的利益在意大利和新大陆。北非没有唾手可得的财富来刺激西班牙主教们的远征热情，于是成了一条几乎被遗忘的战线。现在西班牙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一群土耳其冒险家正在把整个地中海西部变成一个主战场。科马雷斯向国王申诉的就是巴巴罗萨兄弟的事情。

奥鲁奇和赫兹尔两兄弟被基督徒称为“巴巴罗萨”——红胡子。他们是来自地中海东部的冒险家。他们在罗得岛攻防战之前出生在莱斯博斯岛，那里正处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个世界之间四分五裂的边界上；他们的生活跨越了两个世界。他们的父亲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名骑兵，母亲则是一名希腊基督徒。他们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开展海盗活动，还是拜圣约翰骑士团所赐。在与骑士们的一场冲突中，奥鲁奇不幸被俘，他的另一名兄弟被打死。奥鲁奇成了骑士团的奴隶，披枷带锁地在罗得岛的新堡垒的工地上苦干，然后又在骑士团的桨帆船上充当桨手，直到他锉断了铁链，泅水逃走。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促使他自命为伊斯兰的战士。

1512年前后，兄弟俩突然出现在马格里布海岸。这两个一穷二白的冒险家在奥斯曼帝国的一场内战中站错了队，因此不得不逃离爱琴海。他们身无分文，有的只是水手的高超本领：借助星辰航海的技术、对大海了如指掌以及敢于冒险的精神。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科尔特斯^[10]

（此时科尔特斯即将以基督教的名义征服墨西哥）；和科尔特斯一样，他们也将给他们的西部边疆带来命中注定的转折。“红胡子奥鲁奇开始在我们的海域航行、劫掠我们土地的那一刻起，”史学家洛佩斯·德·戈马拉^[11]后来写道，“我们的西班牙从海盗那里遭受的所有苦难就拉开了帷幕。”^[12]

奥鲁奇团伙的基地设在杰尔巴岛，离今天的突尼斯海岸很近。那是

一个岸边种着棕榈树的多沙小岛，面向内陆的一面有个安全的深水潟湖，非常适合海盗活动。从这里，野心勃勃的海盗们可以轻松出击，抢劫在北非与意大利海岸之间来往的船只。他们很快养成了自己的习惯：春天航海季节开始时，他们乘几艘船出航，通常是一艘由基督徒奴隶划桨的大型桨帆船和几艘较小的划桨船，用来作战和袭击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的航道。最初他们的目标是运送大宗货物（布料、军械、小麦和铁矿石）的商船；他们会在岛屿的背风处伏击商船，展开攻击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安拉！”呼声。他们劫获的所有物资都被用于提高自己在马格里布的地位。他们会将缴获的船只开回杰尔巴岛，将其拆解，在不生树木的岸边利用这些木材打造新的战船。他们和突尼斯苏丹达成了一项协议，获准利用该城的港口拉格莱塔作为基地，并以奴隶和礼物获得了苏丹及平民的好感，同时他们的圣战事业得到了宗教领袖的支持。他们潜行于西班牙海岸，将西班牙穆斯林接到海峡南岸，并利用自己对西班牙地形的知识洗劫基督徒的村庄。意大利南部海岸地带以及各个大岛（马略卡岛、梅诺卡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都开始对这些海盗心怀畏惧。海盗的袭击往往出人意料、迅猛而恐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赫兹尔声称在一个月內就俘虏了21艘商船和3800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

随着海盗们威名远播，或者说臭名远扬，他们逐渐成了传奇人物。奥鲁奇五短身材，粗壮结实，常常大发雷霆，右耳戴着金耳环，头发和胡须都是红色的，令人遐想，也令人畏惧。在马格里布的口头传说与诗歌中，以及在被压迫的西班牙穆斯林口中，他是伊斯兰世界的侠盗罗宾汉，还具有巫师的魔力。传说，他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真主给了他刀枪不入的本领；他和魔鬼定下了盟约，可以让他的船只隐形。对他的残暴的描述同样神乎其神。传说奥鲁奇曾经用牙齿咬开一名基督徒的喉咙，吞吃了他的舌头；他曾用弯刀杀死了50个人；他曾将一名医院骑士团成员的首级系在一根绳子上，然后旋转起来，直到首级的眼珠爆裂。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人们听到他的名字时都要画十字。南欧的

新印刷机火速印出耸人听闻的小册子。基督徒的私掠海盗得到了许诺，一旦抓住奥鲁奇，不管死活，必有重赏。



奥鲁奇

巴巴罗萨兄弟自己也特意推动这些神话的传播。他们在北非海岸寻求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试图为自己建立真主保佑下的圣战者的形象。赫兹尔声称，“真主创造了他，以便震慑基督徒，令他们不敢出航^[13]”，他得到了先知的托梦。恐怖和残暴都是战争的武器。1514年，他劫掠梅诺卡岛时，在岸上留下了一匹马，马尾上缚着一张告示：“我是天堂的雷霆；我的复仇绝不停歇，直到我杀死你们所有的男人，并将你们的妻子、女儿和孩子全部贩卖为奴。”^[14]这种暴行足以威慑基督教世界的海

域。

哥哥奥鲁奇野心勃勃，不甘心一辈子做海盗。他来到马格里布的时候，北非传统的诸王国已经开始分崩离析，分裂为一系列城邦（突尼斯、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尔）以及周边的阿拉伯人及山区柏柏尔人的部落，这些城邦和部落之间混战不休。兄弟俩决心以西班牙征服者般的残酷善加利用伊斯兰世界内陆的权力真空，致力于在这个新世界为自己开辟出霸王基业。1515年，奥鲁奇与伊斯坦布尔的帝国中心取得了联系。他派遣航海家和地图绘制家皮里雷斯带着礼物（一艘被俘的法国船只）去觐见塞利姆一世苏丹（苏莱曼的父亲），恳求他的保护。苏丹投桃报李，封赏了这些雄心勃勃的海盗。他赏赐给他们荣誉性的礼品：头衔、头巾和镶嵌珠宝的佩剑。更实用的礼物是两艘满载士兵、火药和大炮的重型桨帆船。这是个重要的时刻：与帝国中心的首次接触将启动一个进程，最终使马格里布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次年，奥鲁奇在一场令人震惊的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政变中夺得了阿尔及尔的统治权。他亲手将当地的苏丹扼死在浴室内，派遣他新近获得的、装备火枪的奥斯曼士兵席卷全城街道。与此同时，西班牙的私掠海盗正在新大陆使用火药做类似的事情：抢夺殖民地。

此刻，对于奥斯曼海盗、摩里斯科人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这三者的联合，西班牙人惊恐万状。他们在北非海岸的要塞群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奥鲁奇对西班牙人位于贝贾亚的前哨阵地发动了两次进攻，都失败了。西班牙人发动了反击，企图将巴巴罗萨兄弟赶出阿尔及尔，但遭到惨败，船只和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奥鲁奇和奥斯曼篡位者们的地位得到巩固，于是继续向内陆扩张。他们占领了马格里布中部的古老首府特莱姆森，杀害了统治当地的阿拉伯王族的70名成员，并进一步孤立了西班牙军队控制的阿尔及尔岛屿要塞和邻近的奥兰。很快，奥鲁奇就控制了几乎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区域。他对海上交通和海岸的劫掠

极具破坏性，而且愈演愈烈。穆斯林海盗开始将身体残缺的俘虏抛弃在基督教国家的海岸上，并嘲弄地让他们“去报告你们的基督教国王们：‘这就是你们宣扬的十字军东征’”^[15]。西班牙人感到深受威胁。交战几年以来，他们唯一的胜利就是在贝贾亚用火绳枪打残了奥鲁奇的一只胳膊。从此以后，奥鲁奇获得了一个新绰号“断臂”，也有人称他为“银臂”，因为据说他令人用纯银打造了一只前臂和手，接在自己的残肢上。这个传说足以反映，对基督徒而言，他是怎样的一个噩梦。

就在此时，年轻的查理五世收到了科马雷斯侯爵以及他的阿拉伯盟友——被废黜的特莱姆森国王的求援。侯爵解释了北非急剧恶化的形势，以及西班牙在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危险。他恳求年轻的国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科马雷斯认识到，奥鲁奇这一次在特莱姆森走得太远，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所及。这座城市地处内陆，距离海盗位于阿尔及尔的巢穴200英里。他手下的那群土耳其人数量不多，而且激怒了当地的阿拉伯人，让后者几乎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这是基督徒发动反攻、一劳永逸地肃清地中海西部海盗的良机。已经发誓要粉碎异教徒的年轻国王自然不能拒绝这个挑战。他下令发起他在地中海的第一次冒险。

查理五世给科马雷斯提供了1万名士兵以及足够的经费去煽动阿拉伯人大举造反。这一次，西班牙人的行动果断坚决。他们快速行动，切断了通往阿尔及尔的补给线，封锁了特莱姆森，对其进行了长期围攻。城防瓦解后，奥鲁奇没戏可唱了。阿拉伯人高呼“干掉他！”，海盗国王带着一小群随从溜出城市，快马加鞭地逃走。西班牙军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于是开始追击。奥鲁奇将特莱姆森的财物丢弃在尘土漫天的道路上。很多西班牙官兵停下来去捡地上的宝石和硬币，但一群更为坚定的士兵穷追不舍，终于将奥鲁奇围困在一片干旱的丘陵地带。他们呼唤圣雅各相助，围上去进行最后的猎杀。土耳其人战斗到最后一人，奥鲁奇用独臂挥舞着战斧，直到他被一根长矛刺中。他临死之前凶狠地咬了杀死他的那人一口。堂加西亚·费尔南德斯·德·拉·普拉萨的身上就这么留

下了一个传奇的伤口，一直到他去世。西班牙人砍下了奥鲁奇的银臂，作为战利品，并将他的脑袋插在长枪的枪尖上。西班牙人还借着火炬的光亮将奥鲁奇的躯体钉在特莱姆森的城墙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人们的迷信，就像刺穿吸血鬼，阻止他复活一样。奥鲁奇怪诞可怕的带有红胡子的脑袋（眼珠子仍然恶狠狠地瞪着，似乎还不服气）被插在枪尖上送到马格里布各地展示，向大众证明，奥鲁奇确已死亡。最后，已经腐烂的头颅被送往西班牙。人们盯着它，虔诚地画着十字，在这可怕景象前战战兢兢。

对新近登基的查理五世来说，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但它带来的优势几乎当即就丧失殆尽。西班牙一直没有一项解决北非问题的大政方针；军队没有继续向阿尔及尔进军并彻底捣毁海盗巢穴，而是班师回朝了。奥鲁奇的尸骸还钉在城墙上时，他更为狡黠的弟弟就迅速崛起，继续兄长未竟的事业。赫兹尔永远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曾经受到的侮辱和伤害，于是继续在地中海西部坚持圣战。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彻底继承兄长的衣钵和神话：原本是黑发的赫兹尔将自己的胡须染成了红色。他的第二个行动甚至更加精明。

赫兹尔认识到，他在马格里布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如果他这样一个外来入侵者想要在阿拉伯海岸生存下去，需要的不仅仅是兵员和装备，还需要宗教和政治上的权威。他决定放弃兄长的独立建国的梦想。他派了一艘船到伊斯坦布尔，给苏丹献上新的礼物，并正式向后者俯首称臣。他请求将阿尔及尔并入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做出了友好的回应：他正式任命赫兹尔为“阿拉伯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并将传统规定的总督身份的标志物赏赐给他：一匹骏马、一把弯刀和华贵的马尾旌旗。不久之后，塞利姆一世就驾崩了。现在，在阿尔及尔的清真寺里，人们在星期五祈祷中念叨的、城市的货币上铸造的都是苏莱曼的名字。阿尔及利亚一下子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来自地中海东部的野心勃勃的水手们为帝国开拓了广大领土，而几乎没有花帝国国库的

一分钱。于是，赫兹尔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新的资源：火药、大炮和2000名近卫军。还有4000名志愿者也加入了他的队伍，急于在这位神奇的统帅麾下分一杯羹。苏莱曼给这位年轻的海盗授予了一个新的荣誉称号：海雷丁，意思是“信仰之善”。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成了众所周知的海雷丁·巴巴罗萨。

这些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海雷丁正式向苏莱曼效忠，“亲吻圣旨，并毕恭毕敬地将其放置在自己头上”^[16]的那一刻起，斗争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北非就不再仅仅是西班牙和一些惹麻烦的海盗之间的局部问题，而变成了苏莱曼和查理五世之间斗争的最前沿，这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海上的全面战争。

^[1]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3, New York, 1962, p.27

^[2] “赫拉克勒斯的巨柱”是直布罗陀海峡南北两岸上的巨岩，北面一柱是位于英属直布罗陀境内的直布罗陀巨岩，而南面一柱则在北非，但确切是哪座山峰没有定论。根据希腊神话，这两大巨岩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所立，为他捕捉巨人革律翁之行留下纪念。

^[3] 原文为拉丁文“Plus Ultra”，暗示西班牙视赫拉克勒斯之柱为通向新世界之门，而非地中海的门户；西班牙当时在海外还有大片殖民地。而根据历史学家考证，这句铭文来自赫拉克勒斯之柱树立之时，刻在上面的警告铭文“Non Plus Ultra”，意为“此处之外，再无一物”，表示赫拉克勒斯之柱就是已知世界的尽头。而据传是查理五世少年时身边的博士建议他把“Non”删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在自己的纹章上。

^[4]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3, New York, 1962, p.446

^[5]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3, New York, 1962, p.28

^[6]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3, New York, 1962, p.28

[7] Beeching, Jack, *The Galleys at Lepanto*, London, 1982, p.11

[8] 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西北部。

[9] 指改宗基督教的西班牙穆斯林及其后裔。“摩里斯科”在西班牙语中的字面意思是“小摩尔人”，有轻蔑和贬低的意思。

[10]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是殖民时代活跃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以摧毁阿兹特克古文明，并在墨西哥建立西班牙殖民地而闻名。

[11]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1511～1566），西班牙史学家。虽然他从未到过美洲，但根据科尔特斯等人的口述，撰写了关于西班牙征服美洲的著作。有人批评他的著作错误很多，尤其是对科尔特斯的功绩过于夸大。

[12] López de Gómara, Francisco, *Cronica de los Barbarrojas*, in *Memorial Historico Español: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Opusculos y Antigüedades*, vol.6, Madrid, 1853, p.357

[13] Seyyd Murad, *La Vita e la Storia di Ariadeno Barbarossa*, ed.G.Bonaffini, Palermo, 1993, p.96

[14] Achard, Paul, *La Vie Extraordinaire des Frères Barberousse*, Paris, 1939, p.47

[15] Fisher, Sir Godfrey, *Barbary Legend: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rica, 1415-1830*, Oxford, 1957, p.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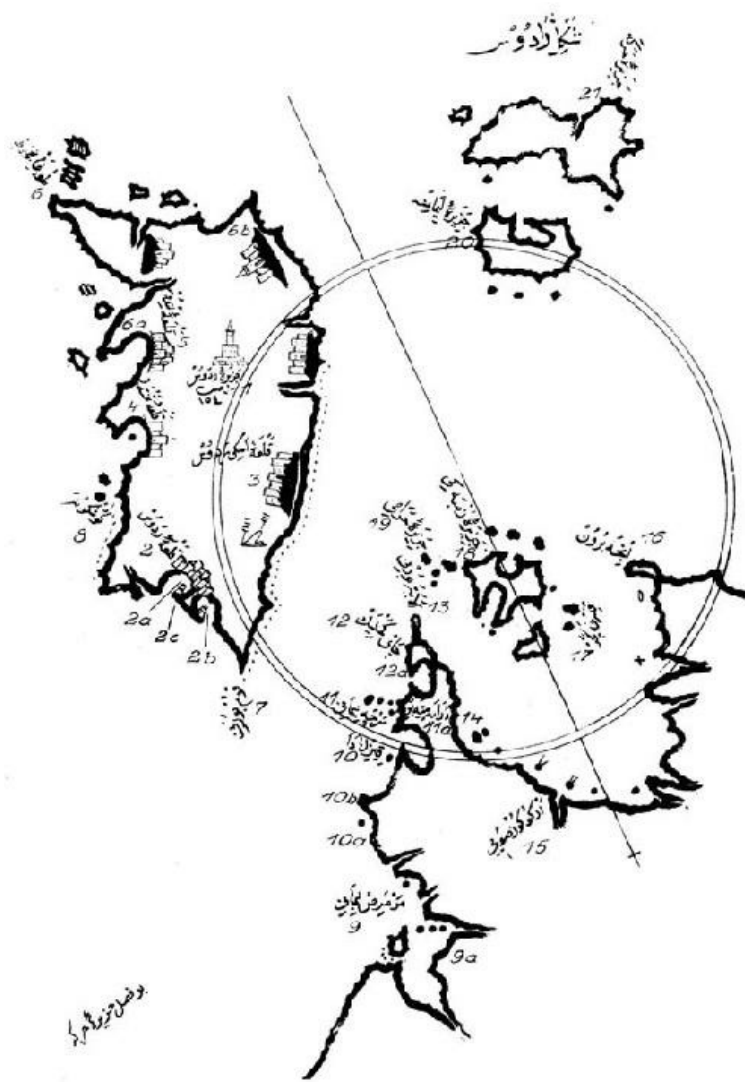
[16] Seyyd Murad, *La Vita e la Storia di Ariadeno Barbarossa*, ed.G.Bonaffini, Palermo, 1993, p.125

3.邪恶之王

1520～1530年

苏丹对托勒密地图所代表的整个世界的覬觐令欧洲君主们不寒而栗，但就在罗得岛陷落后不久，曾参加攻城战的一位船长向苏莱曼进献了一本非同一般的书，假如基督徒们知道这本书的存在的话，一定会魂飞魄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对地理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土耳其航海家，名叫皮里雷斯，也就是皮里船长。此前他已经为前任苏丹们绘制了一套准确度惊人的世界地图，其中包括了哥伦布所用地图的复制品。这次的《航海书》更为实用。它除了对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的发现做了记述外，还包含了在地中海航行的指导手册，资料来自皮里雷斯本人的航海经验。该书包含210幅带有航海指南的示意图，对近海地带做了详细介绍。除了爱琴海外，它还解释了如何在异教徒控制下的所有近海海域航行，远至直布罗陀海峡。对每次只能航行几天就需要上岸补充淡水的桨帆船来说特别关键的是，书里还标示了海岸和岛屿上有泉水的地点。皮里展示了威尼斯方圆百里之内和意大利与西班牙海岸所有可供桨帆船补充淡水的地点。他的著作其实是海战的蓝图。

在后来的岁月里，苏莱曼的海军将会广泛使用《航海书》。但在当时，苏丹对它以及作者本人却不屑一顾，这也体现出了苏丹对大海的态度。在16世纪20年代，他除了声称自己是地中海的主人外，对这片大海并不感兴趣。他的雄图主要体现在陆地上。大海是陌生的，也是荒芜的，就把它留给海盗们好了。只有陆地上的开疆拓土才能带来荣耀、新的头衔以及可供抚慰军队的土地和战利品。攻打罗得岛是苏莱曼在地中海上的唯一一次冒险；1526年，他纵马讨伐的是匈牙利和查理五世在奥地利的领地。最初参加地中海战争的是海雷丁这样身处边疆的人。



《航海书》中的罗得岛和小亚细亚的海岸线

虽然得到了军事上的输血，海雷丁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然而查理五世也无法利用海盗暂时的虚弱，因为他被其他的困难烦扰着。预计到奥斯曼帝国将沿着多瑙河大举进攻，他将奥地利领地交给了自己的兄弟斐迪南，而把注意力转向另一场针对基督徒邻居的战争。他的敌人是因未能当选神圣罗马皇帝而耿耿于怀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这两位君主时断时续地打了一辈子。由于对法战争完全吸引了查理五世的注意力，在奥鲁奇死后的岁月里，西班牙在马格里布的要塞持续地衰败了下

去。一系列协调不力的远征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519年，西班牙军队试图攻打阿尔及尔，不料船只失事，官兵惨遭屠杀。指挥官乌戈·德·蒙卡达躲在海岸上的死尸堆里，不光彩地捡了一条性命。巴巴罗萨因为自己兄长被杀，怒火满腔，不允许对方赎回战俘。查理五世提供一大笔赎金，希望赎回军官们，巴巴罗萨却命令将俘虏处死。查理五世提出付一笔钱，将死者遗体赎回，巴巴罗萨却将尸体投入大海，“如果死者的亲属来到阿尔及尔，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或兄弟埋骨何方，也看不到骨灰，他们能看到的只有浪涛^[1]”。此次重创西班牙舰队之后，海雷丁就能够恣意袭击查理五世的海岸了。

海雷丁的地位潮起潮落。1520年，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合伙把他赶出了阿尔及尔，但西班牙人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壮大自己。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掌握巴巴利海岸复杂的风向，出航总是太晚。1523年，蒙卡达再次率军出征，却遭遇了更严重的事故，导致“26艘大船和数量众多的小船损毁”^[2]。阿尔及尔注定将成为基督教十字军的集体伤心之地。西班牙人利用宏伟的岛屿要塞对阿尔及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在巴巴利海岸的西班牙要塞群的驻军士气却非常低落。北非是一条被遗忘的战线；有更重要的目标和战利品吸引着帝国的注意力。这是一场没人想打下去的战争。西班牙士兵们得到的兵饷少得可怜，有时甚至会受到克扣。要塞的物资补给毫无规律性可言，有时甚至会有驻军饿死。他们听到新大陆传来的消息，无不艳羡不已。“这里可不像秘鲁那样，走出门就能捡得到宝石，”一位军官抱怨道，“这里是非洲，我们看得到的只有土耳其人和摩尔人。”^[3]有些士兵会叛变投敌，背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也有人去美洲冒险，或者买通蛇头，偷偷返回西班牙。西班牙人在北非能够坚持下来，完全是因为马格里布的政治动荡。

对地中海东部的人们来讲，马格里布就是新大陆。随着海雷丁名望日涨，越来越多的海盗向西航行，步他的后尘。西班牙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财富的诱惑。“听到在巴巴利海岸发财致富的传说，人们蜂拥而来。

就是这种狂热驱使着西班牙人奔向西印度群岛的矿产，”^[4]史学家迭戈·德·阿埃多如此写道。到16世纪20年代末期，巴巴利海岸至少有40个海盗头子在活动，在海雷丁的部署下袭扰基督教海域。海雷丁自己的形象也变得令人望而生畏：不可战胜、令人毛骨悚然，又有雄才大略。他将自己打扮为真主意志和苏莱曼皇权的表现；他的未卜先知的梦使得他安然逃过伏击、避开风暴，顺利地攻城拔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出现在基督教舰队中时，“如同太阳的光辉令星辰黯然失色”。^[5]他的旗舰“阿尔及利亚人”号配备的桨手多达108人，桅顶张挂着一面红色大旗，上面画有三弯银月，船尾上带有两句相互交织的阿拉伯文句子。其中一句写着“我将征服”；另一句是“真主的佑护远胜最坚固的铠甲和最雄伟的塔楼”^[6]。在“阿尔及利亚人”号逼近时，基督徒船只往往不战而降，船员们宁可投海自尽，也不愿意忍受海盗桨帆船的漫长折磨。海雷丁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发起火来如同火山爆发。他经历过成千上万次航行，对大海了如指掌；通过俘虏口供和西班牙穆斯林提供的大量消息，他可以获得极其准确的情报，对敌人的意图洞若观火。因此他能够出其不意、肆无忌惮地发起攻击。每年他率领由18艘船组成的小舰队扫荡两三次，拦截商船，烧毁沿海村庄，掳掠人口。十年间，仅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之间长度仅200英里的海岸线上，他就俘虏了1万人。

海雷丁的神通广大和宣传攻势让基督教欧洲的民众为之战栗。奥鲁奇的威名已经渐渐被人们淡忘，于是海雷丁成了唯一一个“巴巴罗萨”和不计其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和歌谣的主角。印刷机持续轰鸣，印出海量的大开本报纸和木刻肖像画，以满足民众对他的好奇心。法国作家拉伯雷在1530年送了一幅这样的肖像画给一位来自罗马的朋友，并向后者保证，这幅画是“根据真人相貌画出的”^[7]。在印制的肖像上，海雷丁威风凛凛，戴着头巾，身着富丽堂皇的长袍，巨大的双手抓着一幅卷轴和一把刀柄带有鹰头装饰的弯刀。他眼窝深陷，目光炯炯，胡须蜷曲如同食人妖，表情显得狡诈又贪婪。新技术使得欧洲人得以端详这位充满神话色彩的海盗，在他身上找到了残暴的样板。“巴巴罗萨，巴巴罗萨，你

是邪恶之王，”^[8]西班牙海岸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海雷丁

追随海雷丁左右、服从他的钢铁意志，并将自己战利品的百分之十二进献给他的其他海盗也在海上谱写着自己的恐怖传奇。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很多人是背叛信仰的前基督徒，由于犯罪或是被海盗俘虏而无法返回家园，于是至少在名义上改信了伊斯兰教。他们在海上生活，在海上死亡，给他们的船只取了美丽的名字：“珍珠”号、“海神之门”号、“太阳”号、“金色柠檬树”号、“阿尔及尔玫瑰”号。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居然是海盗船。他们短暂但丰富多彩的冒险生涯是对当时地中海世界的贫困、暴力和颠沛流离的绝佳概括。曾将俘虏捆绑在炮口上，然后开炮将他们炸得粉身碎骨的萨拉赫船长死于瘟疫。“刀疤脸”卡

拉曼人阿里缺了两根手指；他在意大利海岸深受憎恶，热那亚人曾发誓要把他关在铁笼子里供人观看。“克里特人”莫雷兹会用砍下的一只人臂殴打他的桨手。突尼斯农民在试着判断某人的残暴程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他比莫雷兹还残忍？”科西嘉人埃利是海上伏击战的专家，他的最终归宿是被钉死在自己的桅杆上。绰号“魔鬼猎手”的利古里亚人艾登在阿尔及利亚一条河里溺水死亡。这些人就是海雷丁的圣战中的分队指挥官。他们砍下俘虏的鼻子和手，装满麻袋，作为战利品；他们不顾忌任何规则。

16世纪20年代，海盗活动日益猖獗，但查理五世自己的决策却助长了海盗的气焰。在宗教裁判所横行无忌的年代，西班牙境内剩余的穆斯林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16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次叛乱中，巴伦西亚的摩尔居民对皇帝忠心不二，但皇帝却以怨报德。查理五世天性并不是个宗教狂，但他深知自己作为神圣罗马皇帝对基督教世界负有怎样的责任。1525年，他批准了所谓的《阿拉贡净化宣言》，根据这道敕令，阿拉贡地区的所有穆斯林要么改宗，要么将被驱逐。直截了当的意思是，穆斯林必须在改宗和死亡间做出选择。巴巴罗萨迅速对处于困境中的巴伦西亚地区摩尔人伸出援手。大批穆斯林被海盗船运往马格里布，其中很多人加入了海盗战争，或者向海盗建议可供发动报复性攻击的合适目标。没有一个海湾、海岸村庄或者岛屿不曾遭到海盗的侵袭。西班牙臣民向国王的抱怨越来越强烈。

1529年5月，这些因素终于促使矛盾激化。西班牙对其非洲前哨的忽视导致了决定性的大灾难。对阿尔及尔城及其港口起到遏制作用的阿尔及尔小型岛屿要塞的火药所剩不多了。间谍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海雷丁，后者立即派兵猛攻要塞。要塞司令马丁·德·巴尔加斯被要求要么改宗伊斯兰教，要么死路一条。他选择了牺牲。在土耳其近卫军面前，他被活活打死。这是缓慢而痛苦的结局。不久之后，对此仍然一无所知的西班牙朝廷派来包括9艘船的换防部队，全部被海盗俘虏。

阿尔及尔岛屿要塞的陷落给地中海西部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海雷丁将城堡拆除，建造了一条堤道将城堡所在的小岛与大陆连为一体，于是得到了一个具有不可估量战略价值的安全良港。这极大地加强了海盗的力量。在蔚蓝大海上闪烁发光的白色阿尔及尔城化为海盗的王国和市场，号称马格里布的巴格达或者大马士革。海盗船可以安全地在此停泊，收集战利品和买卖奴隶。这对查理五世来说成了一个长期性难题。阿尔及尔是一直席卷到多瑙河的宏大战场的最西端。在岛屿要塞陷落的十天前，苏莱曼率领7.5万大军从伊斯坦布尔御驾亲征，杀向维也纳。

迎接这场猛攻的是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此时查理五世正在做一件更愉快的事情。在与法国争斗了八年之后，他正在签署一项和约，并希望借此获得长期和平。暂时从戎马奔波的重担下解脱出来，他出发去迎接他一生最伟大的胜利：在意大利接受加冕，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和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在礼炮轰鸣声中，他乘坐皇家桨帆船（船队的指挥官是罗德里戈·德·波图翁多）从巴塞罗那出发了。

这是一个雄霸天下、不可一世的瞬间，查理五世或许可以追求全世界统治者的地位。他的疆土从秘鲁一直延伸到莱茵河，但在西班牙海岸上，他却十分脆弱。1529年夏季，这里没有了舰队的保护，海雷丁很快得到了风声。他立即派遣自己麾下经验最丰富的海盗头子“魔鬼猎手”艾登率领15艘小型划桨船去洗劫巴利阿里群岛和西班牙海岸。报复主要集中在巴伦西亚。在抢劫了大批经过的商船之后，艾登的海盗们突然袭击了一些正在庆祝瞻礼日的老百姓，抓获了大批朝圣者，然后又从同一片海岸上解救了200名穆斯林，最后扬长而去。

波图翁多将皇帝送到了热那亚，正在返航，这时得到了海盗大举出动的消息。在追回穆斯林奴仆即可获得1万埃斯库多^[9]的重赏的刺激下，他立即前去拦截艾登。海盗船正停泊在荒无人烟的福门特拉岛（位于马略卡岛西南方）岸上，被波图翁多抓了个措手不及。波图翁多的9

艘重型桨帆船把海盗的小型划桨船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完全有能力，也应当用大炮把海盗船轰个粉身碎骨，但他麾下的士兵有一半正在热那亚为皇帝保驾护航，而且他如果要拿到1万埃斯库多的赏金，就必须把穆斯林活捉回去。他决定不开炮，在踌躇之间丧失了良机。艾登的小型划桨船舰队得以逃离海岸，从西班牙桨帆船的侧面发起反击。现在轮到西班牙人措手不及了。波图翁多被一发火绳枪子弹击毙；他的旗舰向敌人投降了。其他西班牙战船陷入了恐慌。有8艘桨帆船被俘虏；第9艘得以逃脱并报告了这个噩耗。艾登的战船现在数量翻了一倍，礼炮齐鸣、旌旗招展地返回了阿尔及尔。船上的基督徒奴隶（包括波图翁多的儿子）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挤在一起，完全无法挪动身子”^[10]。

西班牙海军首次在远海与巴巴罗萨海盗舰队的大规模交锋以耻辱告终。“这是西班牙桨帆船舰队史上蒙受的最惨重损失，”^[11]洛佩斯·德·戈马拉戏剧性地写道。这位并不以客观公正闻名的西班牙史学家把被俘船员的命运描绘得惨不忍睹。波图翁多的儿子“和其他很多西班牙人一起，被巴巴罗萨刺穿在尖木桩上……有人说，巴巴罗萨折磨和处决某些俘虏的方式既令人发指，又别出心裁。他命人在乡间平地上挖掘了齐腰深的土坑，将西班牙人放置其中；他把他们活埋在坑里，只露出胳膊和头部，然后命令众多骑兵从俘虏身上狂奔过去”^[12]。巴巴罗萨自己的史书的说法是不同的：“海雷丁在基督徒和摩尔人的各国和各个地区传扬着自己的赫赫威名，并送给苏丹两艘桨帆船，其中一艘载着波图翁多和其他的重要基督徒俘虏。”^[13]海盗大亨的事迹是真是假，难以分辨。

波图翁多如果控制着全部兵力，也许结果会大不相同，但他的一半士兵此时正在博洛尼亚准备查理五世的庆祝活动。1529年11月5日，他进入这座城市，为两个月后的加冕典礼做准备。查理五世的入城式是一场精心导演的皇家戏剧，以古罗马皇帝的凯旋式为蓝本，也是皇帝向全球霸业提出主张的非同一般的宣言。查理五世在教皇和他疆域内所有显贵大员的陪同下骑马走过凯旋拱门。鼓乐喧天，热闹非凡。对盛宴满怀

期盼的老百姓高呼着：“恺撒，查理，皇帝！”^[14]查理五世在4名头戴羽饰头盔的骑士举起的锦缎华盖下庄严地策马前行。他自己的装饰精美的头盔上带有金鹰，他的右手紧握皇帝的权杖。在皇帝与教皇的旌旗的海洋中，有一面十字军的旗帜，上面画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随后几个月的庆典中，艺术大师帕尔米贾尼诺^[15]开始创作一幅巨大的带有寓意的皇帝肖像。画中，婴儿赫拉克勒斯将地球呈献给查理五世，地球面对观众的一面不是西印度群岛或者他的欧洲属地，而是地中海，那是世界的中心，注定要接受恺撒的统治。



阿尔及尔

事实上，十天前皇家桨帆船舰队蒙受的耻辱已经揭露了查理五世加冕这场哑剧背后的空虚。查理五世和巴巴罗萨兄弟交战十二年来，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战利品就是奥鲁奇的骷髅头和他的深红色斗篷，这两件东西此时被陈列在科尔多瓦大教堂内，令虔诚的基督徒心生恐惧。西班牙在马格里布的地位摇摇欲坠；大海从来没有如此危险过。地中海西部处于被奥斯曼帝国先驱部队吞并的危险中。11月15日，查理五世在博洛

尼亚收到了托莱多大主教的一封信，信中以冷峻的言辞概述了当前的局势。现在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除非灾难性的局面得到扭转，”大主教写道，“从直布罗陀到东方的地中海贸易都将丧失殆尽。”^[16]此刻务必当机立断。他敦促皇帝新建一支拥有20艘战船的舰队，“以宏大舰队出航，将巴巴罗萨消灭在他自己的巢穴（阿尔及尔）内，否则纯粹用于防御的金钱将付之东流”。^[17]伊莎贝拉皇后也写了一封内容相仿的信。阿尔及尔是基督教世界获得和平的关键，而巴巴罗萨是阿尔及尔的关键。

查理五世审视这两封信时，心中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相当重要的。在淫淫秋雨中，苏莱曼被迫停止了对维也纳的围攻。到10月初，天气已经转冷。苏莱曼的补给线过长，而适合作战的季节已经过去了。10月14日，他在自己的作战日记中以惯常的简练风格写下了这样的话，仿佛这只是小事一桩：“在城墙上进行爆破，取得新的突破口。会议。徒劳的进攻。下令返回君士坦丁堡。”简短的几句话描绘出了撤退途中的惨淡：“17日。军队抵达布鲁克。下雪。18日。我军在阿尔滕堡附近越过三座桥梁。不少辎重和部分火炮在沼泽地丢失。19日。渡多瑙河时遇到极大困难。雪继续下。”^[18]这是奥斯曼帝国在两百年中首度受挫。苏莱曼不得不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一场自己的庆祝典礼，以在民众面前挽回颜面。

查理五世的第二个考虑更为直接。在托莱多大主教提出建议之前，他就已经准备好了反击的手段。1528年，他成功地从竞争对手——法国国王那里争取到了当时热那亚的卓越海军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效忠。多里亚是热那亚城古老贵族的一员，也是个雇佣兵头领和冒险家。对弗朗索瓦一世的幻想破灭之后，多里亚接受了查理五世的丰厚赏金，转投他的麾下。多里亚的确是本领高超，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忠诚经得起考验。多里亚带来了他自己的桨帆船舰队，并允许查理五世使用热那亚的战略港口，另外他还带来了丰富的海战和反海盗的经验。但多里亚也有弱点。因为他的桨帆船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所以使用起

来非常小心谨慎；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目前皇帝领土内的最精明强干的基督徒海军指挥官。有了他，西班牙及其意大利属地间的航道一下子就安全了许多。热那亚人帮助查理五世控制他自己的海岸地带，并给他奉上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来防御这些海岸。查理五世打算利用多里亚来阻止哈布斯堡家族在地中海的衰落，并积极主动地发动战争。

查理五世还加强了意大利南翼的防御。自罗德岛陷落之后，圣约翰骑士团就一直无家可归，在地中海四处漂泊。李尔·亚当向欧洲的权贵们逐个请愿，希望获得一个新的基地，以便把骑士团的使命——圣战继续下去。亨利八世在伦敦和蔼可亲地接见了这位老人，并为他提供火炮；但只有查理五世有可能给骑士团一个永久性的家园。他提出把马耳他岛（位于西西里岛以南，处在海盗袭扰意大利海岸的必经之路上）赠给骑士团。但这个礼物不是无条件的，查理五世可不会免费赠送。骑士团还有一项义务是保卫皇帝属下的位于巴巴利海岸上的黎波里城的要塞。皇帝的提议对骑士团并不有利，但李尔·亚当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没有一个基地可供开展海盗活动，骑士团一定会土崩瓦解。1530年，查理五世将意义重大的诏书发给了李尔·亚当，“将马耳他岛、戈佐岛和科米诺岛赏赐给骑士团，以便他们能够安宁地执行其宗教义务，保护基督教社区的利益，凭借其力量与武器打击神圣信仰的奸诈敌人。条件是，骑士团应于每年万圣节向兼任西西里统治者的查理五世进贡一只猎鹰”^[19]。这项交易把骑士团推到了地中海正中央的风口浪尖。

[1] Seyyd Murad, *La Vita e la Storia di Ariadeno Barbarossa*, ed.G.Bonaffini, Palermo, 1993, p.121

[2] López de Gómara, Francisco, *Cronica de los Barbarrojas*, in *Memorial Historico Español: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Opusculos y Antiquedades*, vol.6, Madrid, 1853, p.135

[3] Heers, Jacques, *The Barbary Corsairs: 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 1480-1580*, London, 2003, p.171

[4] Haëdo, Diego de, *Histoire des Rois d'Alger*, trans.H.de Grammont, Saint-Denis, 1998, p.26

[5] Seyyd Murad, *La Vita e la Storia di Ariadeno Barbarossa*, ed.G.Bonaffini, Palermo, 1993, p.96

[6] Belachemi, Jean-Louis, *Nous les Frères Barberousse, corsaires et rois d'Alger*, Paris, 1984, p.222

[7] Heers, Jacques, *The Barbary Corsairs: 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 1480-1580*, London, 2003, p.226

[8] Belachemi, Jean-Louis, *Nous les Frères Barberousse, corsaires et rois d'Alger*, Paris, 1984, p.400

[9] 西班牙、葡萄牙的古货币，不同时期的币值差别很大。

[10] Seyyd Murad, *La Vita e la Storia di Ariadeno Barbarossa*, ed.G.Bonaffini, Palermo, 1993, p.164

[11] López de Gómara, Francisco, *Cronica de los Barbarrojas*, in *Memorial Historico Español: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Opusculos y Antigüedades*, vol.6, Madrid, 1853, p.399

[12] López de Gómara, Francisco, *Cronica de los Barbarrojas*, in *Memorial Historico Español: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Opusculos y Antigüedades*, vol.6, Madrid, 1853, p.28

[13] Seyyd Murad, *La Vita e la Storia di Ariadeno Barbarossa*, ed.G.Bonaffini, Palermo, 1993, p.164

[14] Necipoğlu, Gülru, “Ottoman-Hapsburg-Papal Rivalry” in *Süleyman I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p.174

[15] 弗兰西斯科·帕尔米贾尼诺（1503～1540），意大利画家。“帕尔米贾尼诺”的意思是“来自帕尔马的小个子”。

[16] Tracy, James D.,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 2002, p.137

[17] Tracy, James D.,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 2002, p.137

[18] Hammer-Purgstall, J.,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vols.5, Paris, 1836, p.452

[19] Attard, Joseph, *The Knights of Malta*, Malta, 1992, p.12

4.远征突尼斯

1530～1535年

查理五世发动反击的努力不仅限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海岸。到1530年，苏丹和皇帝之间的战争以对角线横亘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自认为在各地都处于下风。马丁·路德的著名新教颂歌《上帝是一座强大的堡垒》的中心比喻不是随意挑选的：当时苏莱曼正在攻打维也纳。土耳其人一心要前进和包围，而基督徒却偏执于防守的心态。匈牙利平原的要塞星罗棋布，其建造和维护都十分昂贵；意大利人忙于在自己脆弱的海岸上大量修建瞭望塔；西班牙要塞群在险恶的马格里布海岸上苦苦支撑。伊斯兰世界的威胁无处不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冲突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16世纪初，帝国权力发生了新的集中：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聚集人力和资源，并且还能找到足以支撑这些运作的经济手段。战争的引擎就是位于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的中央集权式官僚政府，它们能够以相当高的效率征收赋税、招募军队、调度船只、组织补给、制造火炮和生产火药，这种高效在完全依赖手工劳动的中世纪战争中是无法想象的。军队规模越来越大，火炮威力越来越强，后勤和资源分配（在运输所需时间和交通方式的限制之下）越来越复杂和缜密。这是一场两个虎视全球的大帝国之间的斗争；就在16世纪30年代，皮萨罗^[1]征服了秘鲁，土耳其人进攻了印度。各个相距遥远的地点之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联，把世界各地拉得更近了。奥地利人寻求与波斯人结盟，土耳其人希望和法国人联手；德意志路德派的事业因伊斯坦布尔的决策而风生水起；在新大陆开采的金银为在非洲进行的战争提供经费。对圣战的承诺只是帝国霸业的工具，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欧洲，拉丁语的衰落、关于民族认同的新观念和新教反叛在撼动古老的传统。整个地中

海世界都受制于神秘的力量。人口猛增，城市发展迅速，现金交易取代了实物交换。通货膨胀轻易地让人们感到，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不变、值得永远信赖的了。

在16世纪30年代，地中海世界普遍感受到了这种全球性的躁动。民众的想象力大受刺激，对千禧年充满期待；在伊斯兰世界内部，有人认为，穆斯林纪年法的第十世纪将带来历史的终结。在基督教国家，1533年被认为是耶稣受难的1500周年；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世界，都流传着诸多预言。大家普遍相信，苏莱曼和查理五世将决一死战，争夺整个世界。1531年，伊拉斯谟^[2]写信给一位朋友：“此地流传着一个谣言，其实算不得谣言，而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土耳其苏丹将率领他的全部军队入侵德意志，角逐最大的战利品。查理五世和苏丹中必有一人将成为世界之主，因为一个世界的天空再也承受不了两个太阳。”^[3]查理五世的谋臣对世界之主的想法做了很多讨论，但皇帝本人更为谨慎，他必须考虑法国或者信新教的德意志地区会怎样看待这种宏伟主张，因此他对此语焉不详。他是捍卫天主教信仰、反对异教徒（伊斯兰教和新教）的斗士。苏莱曼所处的伊斯兰世界则更为统一，所以他可以直言不讳。“正如天堂只有一个神，人间也只能有一个帝国。”^[4]他的首席大臣易卜拉欣帕夏向来访的外国使节毫不隐讳地宣称，“西班牙就像只蜥蜴，在灰尘里四下啄食一丁点野草；而我们的苏丹像只巨龙，张开大口即可吞下整个世界。”^[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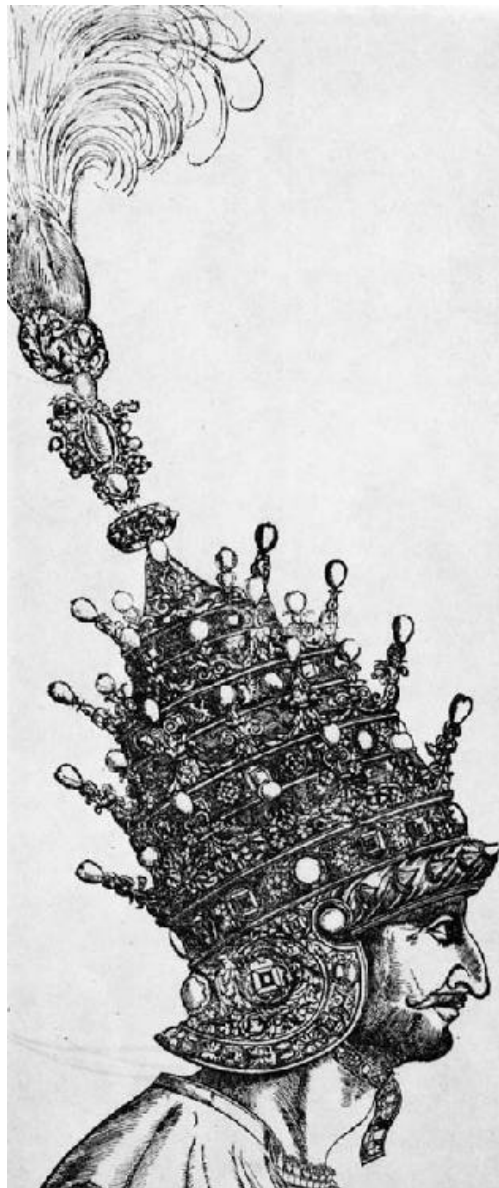
在这豪言壮语的背后，伊斯坦布尔民众其实很害怕查理五世的侵略性意图。由于在匈牙利战败而大大增加的焦虑和悲观情绪弥漫着整座城市。各种征兆口口相传，似乎暗示着，命运之轮将再一次逆转，君士坦丁堡将重归基督教世界。就像瘟疫和粮食紧缺一样，这是动荡年代的表征，但也反映了人们内心的恐惧。如果查理五世梦想着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话，那么苏莱曼则渴望征服罗马。两位帝王都亲临战场，尽管都非常小心地选择安全的地点。到1530年，这场斗争已经日渐成为两位君主之

间的私怨，因为两位竞争对手都向关键性的头衔（恺撒和世界中心的主人）提出了主张。苏莱曼听到对查理五世于1530年举行的加冕典礼的描述，不禁火冒三丈。“他无比憎恶皇帝和他的‘恺撒’头衔；他，土耳其苏丹将夺取恺撒的称号。”^[6]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如是说。苏丹素来将查理五世仅仅称为“西班牙国王”，与他展开了一对一的较量。1532年春季，他准备再次率军沿多瑙河北上，并且发出了电闪雷鸣般的挑战：“西班牙国王长久以来一直宣称与土耳其苏丹作对；但我，蒙真主洪恩，将率大军讨伐他。如果他有勇气，就在战场等我；我们将听从真主的意愿，在适当的时机相遇。但如果他不敢等我，就应当称臣纳贡。”^[7]查理五世的答复是毫不含糊的。他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义不容辞，必须亲自出马，捍卫基督教信仰。”^[8]

双方的竞争聚焦在权威的外部表征上。查理五世在博洛尼亚入城式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报告给了苏丹。苏莱曼在北上的途中也安排了自己的凯旋式，上演了与对手旗鼓相当的盛大场面。他命令威尼斯人为他制作了一整套足以供古罗马皇帝使用的豪华物件：一根权杖、一个宝座和一顶令人叹为观止的镶嵌宝石的皇冠式头盔，意大利人声称这顶头盔曾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战利品。苏莱曼在大批骑兵的簇拥下，在无比宏伟的盛装队伍中进入了贝尔格莱德城，“仪式庄严豪华，鼓乐喧天，堪称奇观；他按照古罗马的风俗，在游行途中沿着街道穿过了凯旋拱门”^[9]。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宣传战争。查理五世和德意志新教诸侯进行了一番令人焦躁的谈判，耽搁了一些时日。他集结了一支大军，准备乘船沿多瑙河南下。最后决一死战的舞台似乎已经就绪。

但这场决定性的大战却没有发生。匈牙利中部一个叫克塞格^[10]的小要塞进行了英勇抵抗，阻挡苏莱曼的进军达数周之久。而且查理五世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很可能本来就打算避免正面对抗的野战。苏莱曼的军队在瓢泼大雨中止步不前，不得不再次撤退。归途要穿过高山隘道和水位猛涨的河流，这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艰难跋涉。“大雨持续不

断.....渡河十分困难.....遭遇浓雾，伸手不见五指”^[11]，苏莱曼的作战日记似乎在重复前一次出征时的记录。苏莱曼返回伊斯坦布尔后，按照惯例又举行了庆祝活动，用凯旋的游行队伍和彻夜不灭的灯火来庆祝对西班牙国王的胜利。官方宣布的说法是“那可悲的西班牙国王为保住性命而抱头鼠窜，弃他那个不信真主的子民于不顾”^[12]。哈布斯堡家族则安排了自己的凯旋仪式，庆祝自己子虚乌有的胜利：艺术家们开始制作表现查理五世从土耳其人的魔爪中解放维也纳城的雕版画。



苏莱曼镶嵌珠宝的皇冠头盔

双方都在堂而皇之地夸大其词，而丝毫不顾事实。真实情况是，土耳其人在一个作战季节内已经达到了前进距离的极限，而查理五世的主要精力投入了地中海。他自己从来没有选择多瑙河盆地作为战场。苏莱曼攻打克塞格的时候，查理五世在200英里之外。这是他们两人距离最近的一个时刻。

与此同时，查理五世选择了这个时机来转移整个战争的焦点。两人在多瑙河沿岸各自虚晃一枪的时候，查理五世批准了一次牵制性攻击。1532年春，他命令安德烈亚·多里亚劫掠希腊海岸。44艘桨帆船从西西里起航东进。多里亚心狠手辣并高效地完成了任务。9月12日，当苏莱曼正在艰难地撤退时，多里亚猛攻了奥斯曼帝国具有战略意义的科罗尼要塞（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并大肆蹂躏了附近的海岸地区。一支队伍为皇帝占领了科罗尼。苏莱曼大发雷霆。次年春季，他匆匆组建了一支舰队，前去收复这座城堡，多里亚对其予以迎头痛击，令苏莱曼的耻辱翻倍。60艘奥斯曼桨帆船封锁了科罗尼，但多里亚轻松地突破了封锁线，把它们打得屁滚尿流。

这些事件令爱琴海东部波澜大起。土耳其人将希腊视为本土海域，但对它的防御却十分疲软。如果多里亚能够占领科罗尼，还有什么能阻止他进攻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正规海军的缺陷暴露无遗；海军是整个帝国的一个可怕弱点。苏莱曼认识到，为了自己的安全和荣誉，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次要战场了。它是一个主要战区，必须牢牢控制。

苏丹迅速做出了反应。他将海雷丁从阿尔及尔召到京城，因为后者是唯一一个有经验、有能力指挥大规模反击的人。1533年夏季，这位传奇海盗率领14艘桨帆船，“在轰鸣不断的礼炮声中”驶入金角湾，前去觐见苏丹。他带来了“18名船长、他的伙伴，以及丰盛的礼物。他有幸得以亲吻苏丹的手，并得到不计其数的赏赐”^[13]。在首席大臣易卜拉欣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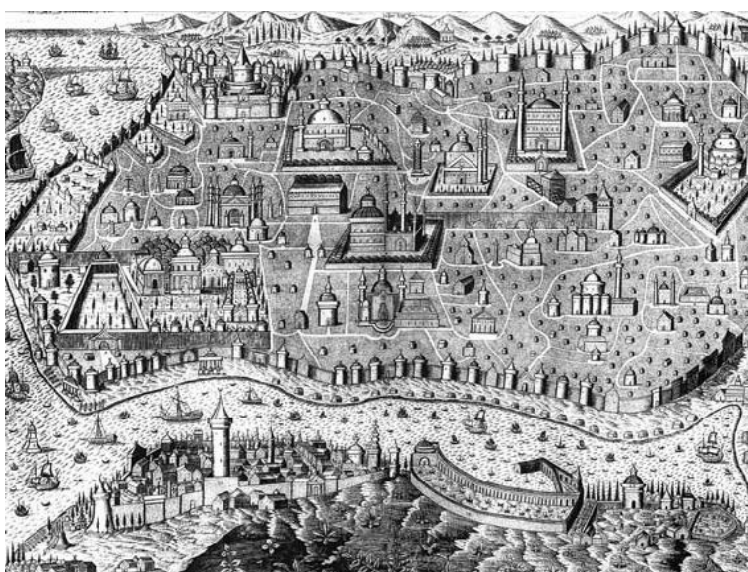
夏的支持下，海雷丁被任命为苏丹的海军司令，任务是建造一支新的舰队，夺回科罗尼，以及反击胆敢放肆的西班牙国王。海雷丁不仅得到了“kapudan-i-derya”（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的正式头衔，苏莱曼还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总督席位，辖有“群岛行省”，即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这足以说明，苏莱曼如今对争夺大海的斗争是多么重视。

海雷丁时年六十七或六十八岁，处于幸运的巅峰，虽然年事已高，但精力仍然十分充沛。1533~1534年冬季，他开始着手在金角湾的造船厂重整奥斯曼海军。他对帝国的所有优越自然条件都予以充分利用。造船需要消耗大量原材料：木材、沥青、油脂、黑铁和帆布。这些物资在帝国本土均可获得；而造船工匠、水手以及桨手（对基督徒海军来说，人力是个永久性的难题）可以由中央集权政府高效地征募，其范围和效率是无可比拟的。有了这些资源，海雷丁毫不停歇地建造一支无愧于白海统治者威名的帝国舰队。欧洲的间谍和外交官们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进展。这种刺探并不困难，因为造船厂周围没有高墙阻隔。“巴巴罗萨长期待在造船厂内，”西欧得到了这样的报告，“为了节省时间，他吃喝都在那里。”^[14]

5月23日，苏莱曼再次跨上战马，御驾亲征，这一次的敌人是波斯国王。此时巴巴罗萨的新舰队在礼炮声中驶出了金角湾。佛兰德使节科尔内留斯·德·斯赫博尔目睹了舰队的出航，给多里亚写了一份忧心忡忡的报告。舰队一共拥有70艘可动的桨帆船，包括3艘船尾带有灯笼的指挥船。海雷丁的装饰华丽的旗舰配备有160名基督徒划桨奴隶。“他一共拥有1233名基督徒奴隶……其他桨手是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所有桨手都被铁链锁住，因为他们是基督徒。”^[15]每艘桨帆船配有发射石弹的铜炮和100~120名士兵，“很多人参加远征是没有任何兵饷的，而是受海雷丁威名的吸引，以及对战利品的渴望”。舰队携带了大量财物，用来支付给领兵饷的官兵：5万金杜卡特^[16]、价值4万杜卡特的宝石和

300匹金线布。苏莱曼调集了数量惊人的资源。

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使节后来对此刻的意义有了深刻的理解。“土耳其人的霸权地位是从海雷丁在伊斯坦布尔的船坞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开始的。”^[17]他在十年后如此写道。这支灵敏地驶向加里波利的舰队代表了土耳其海军实力的猛增。这是大规模海战时代的开端。在随后的四十年中，几乎每年春天，欧洲间谍都会发回关于土耳其庞大舰队准备摧毁脆弱的基督教国家海岸地区的可怕传言。



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和兵工厂（靠前中心处）

海雷丁的新舰队开始踏上复仇之路。当年夏季，他的战船如潮水般袭击了查理五世在意大利南部属地的海岸。苏丹的新海军司令显然得到了精确的情报。他知道亚得里亚海岸建有大量瞭望塔，于是绕过意大利半岛的“脚后跟”，蹂躏了通往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西海岸，烧毁村庄，摧毁船只，将整个居民点的男女都卖为奴隶。他的大规模登陆如此迅捷和恐怖，猛烈颠簸的桨帆船围逼毫无防御的海岸的冲击力如此强大，就像奥斯曼帝国边界上令人毛骨悚然的突袭一样。多里亚舰队位于墨西拿的一支分队只能守在港内，眼睁睁地看着奥斯曼舰队潮水般涌过。西西里

对岸不远处的港口城市雷焦在敌人接近时不得不被放弃；巴巴罗萨在那里捕获了6艘运输船，将城镇烧毁。他将圣卢奇多城堡付之一炬，俘虏了800人。在切特拉罗，他烧毁了18艘桨帆船。他溜过那不勒斯，洗劫了一个叫斯佩尔隆加的渔村，然后登陆，侵入内陆12英里，企图抓捕美貌的丰迪伯爵夫人朱莉娅·贡扎戈，将她作为礼物进献给苏丹的后宫。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将丰迪烧毁，“屠杀了很多男人，并劫走所有的妇女儿童”^[18]。在60英里外的罗马，人们开始逃离城市。返航途中，他又在那不勒斯焚毁了6艘正在建造中的帝国桨帆船。然后，在人们反应过来之前，他的舰队已经离去，消失在南方的蔚蓝大海中，绕过正在闷燃的斯特龙博利岛^[19]，驶往突尼斯。他带走了或许有几百名，甚至有几千名俘虏，其中一部分被送给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

这是一场令人发指的恐怖暴行和血腥报复，但这还只是开始。海雷丁个人的目标在马格里布的海岸上。8月16日，他的小舰队在突尼斯落锚，船上运载的土耳其近卫军上了岸。当地不受欢迎的阿拉伯统治者穆莱·哈桑未发一枪便逃离了城市。土耳其人占领突尼斯，一下子把查理五世的烦恼增加了一倍。突尼斯城位于马格里布的颈部，制衡着整个地中海的轴线。突尼斯和西西里之间的海峡仅有100英里宽，马耳他就坐落在海峡中央。从突尼斯驶往皇帝的领地，只需二十个小时。突尼斯为海盗袭扰甚至入侵意大利提供了一个跳板，最自然的踏脚石当然是先从圣约翰骑士团手中夺取马耳他。这是进入南欧的传统路线；在9世纪，阿拉伯人就是从这条路径进入西西里的。海雷丁已经得到了“真主的启示”，将如法炮制。据说他在袭扰意大利过程中曾被托梦，说他注定将得到西西里岛。

到1534年底，整个地中海西部已经被笼罩在对巴巴罗萨新舰队带来的巨大威胁的恐惧之中。西班牙和意大利海岸被越来越强烈的恐惧不安所困扰。船运保险费猛增；海岸城镇加固了防御工事，村庄则被放弃，另外建造了新的瞭望塔群。多里亚和西班牙海军司令阿尔瓦罗·德·巴桑

追踪着关于巴巴罗萨行踪的每一条传言，让自己的桨帆船舰队时刻待命，随时出击。“从墨西拿海峡到直布罗陀海峡，欧洲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可以安宁地吃饭，或者高枕无忧，”^[20]西班牙人桑多瓦尔^[21]写道。甚至保持中立的威尼斯人在自己安全的潟湖内也惴惴不安，开始建造新的战船。这已经不是胆大包天的海盗袭击，而是两个大帝国之间的战争蔓延到了大海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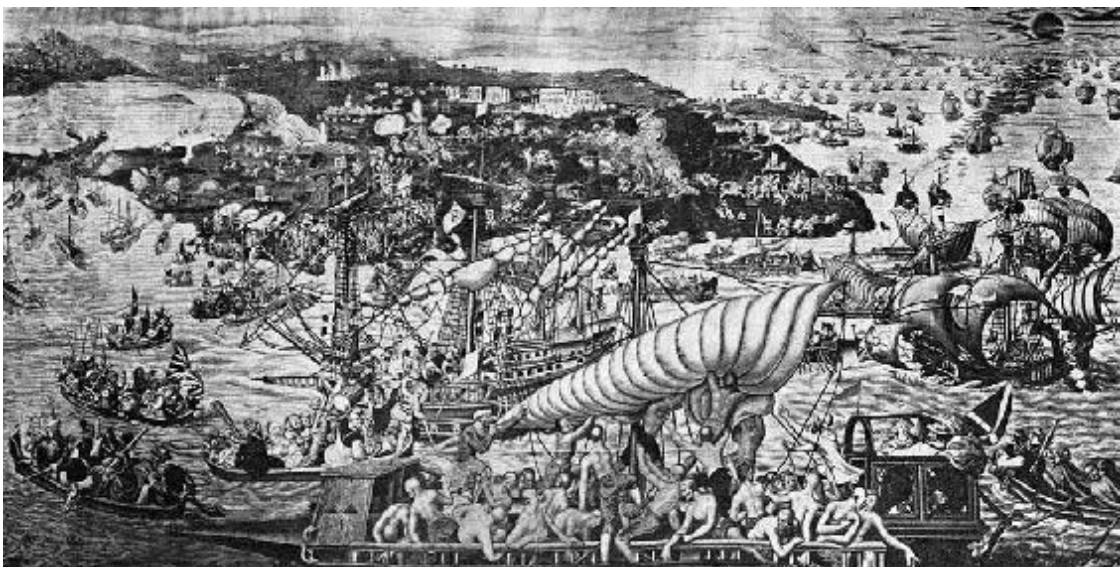
意大利南部遭袭对查理五世来说是个伤害，而来自突尼斯的新威胁更是让他无比震惊。他很确信，这是苏莱曼为自己在匈牙利的战败之耻和希腊遭到多里亚攻击而进行的报复。对苏莱曼的举动不能置若罔闻。对敌人的任何行动都必须给予更大规模的回应。查理五世决心“进攻敌人，将他逐出基督教世界的海域”^[22]。他决定组织一场针对巴巴罗萨的征讨，并御驾亲征，哪怕危及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在所不惜。

1534~1535年之交的冬天，查理五世亲自出马，筹划一场代价昂贵的前往突尼斯的海上远征。他从整个帝国境内征集了兵力和船只。运输船从安特卫普起航，由被铁链锁住的新教徒担任桨手。军队从德意志、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开拔，前往位于海岸的集结地。多里亚在巴塞罗那集结了他的桨帆船舰队；巴桑率军从马拉加^[23]出航。圣约翰骑士团乘坐他们的大型克拉克帆船“圣安妮”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前来参战；葡萄牙人派来了23艘卡拉维尔帆船^[24]和另外一艘克拉克大帆船；教皇也资助了一支队伍。热那亚和巴塞罗那到处是人群和舰船，热闹非凡；成桶的饼干、淡水、火药、马匹、大炮和火绳枪被装上船。事实证明，查理五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筹划者。这次远征规模空前，按照哈布斯堡家族的标准也算协调有力。这一次，舰队的出航赶上了有利季节。1535年6月初，舰队在西西里海岸集结完毕：共有74艘桨帆船、300艘帆船和3万名士兵。皇帝检阅了舰队，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仪式，富有宗教象征意义和皇家的威仪。查理五世下令建造了一艘无愧于他作为基督教世界捍卫者地位的宏伟战舰：一艘四层桨战船，即一艘巨大无比的桨

帆船，每个桨位的上下四层各有一名桨手，镀金艄楼带有城堡状结构和红金两色天鹅绒的华盖，桅杆上飘扬着带有纹章的旗帜。其中一面旗帜上画有耶稣受难像和查理五世的个人箴言“走得更远”，另一面大旗画有光芒四射的星辰，周围环绕着箭矢，写有“上帝为我引路”^[25]字样。6月14日，舰队从撒丁岛盛大出航。桨手们用力划桨，华丽的战船沿着停泊船只中间的航道前行，周边号角齐鸣，人们欢呼雷动。查理五世还带来了他自己的御用画师扬·维尔摩恩，以便记录下唾手可得的胜利。皇帝打算控制好自己在画卷上的形象。

舰队花了不到一天时间就抵达北非海岸。到6月15日早上，舰队已经在古迦太基遗址外围下锚，准备攻打拉格莱塔。这座要塞控制着通往内湖（“绿色之城”突尼斯就坐落在内湖岸边）的航道，被称为“咽喉”。海雷丁不断从突尼斯城袭击帝国军队，因此后者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排除了拉格莱塔这个障碍。7月14日，帝国军队的克拉克帆船和桨帆船一波波逼近要塞，用船首炮猛轰敌人的防御工事。在一番狂轰滥炸之后，步兵突破了城墙，以巨大的代价攻克了要塞。西班牙人在要塞废墟中意外地发现了带有法国王室百合花纹章的炮弹。

海雷丁目瞪口呆地看着帝国军队逼近突尼斯城。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尤其担心数千名被铁链锁住的基督徒奴隶会暴动。他提议把奴隶斩尽杀绝，但受到身边随从的强烈反对。这倒不是出于道德上的顾虑，而是因为奴隶主们不愿意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果然，巴巴罗萨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激烈战斗之后，他率领部队返回突尼斯城的城墙。在城内，一群被迫改宗伊斯兰的俘虏感到局势发生了变化，开始逃脱枷锁。基督徒夺取了军械库，武装起来，冲上大街。巴巴罗萨背后没有安全的基地，只得逃之夭夭。他带领几千名土耳其人逃往阿尔及尔。7月21日，查理五世胜利进入突尼斯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的坐骑在惨遭屠杀的穆斯林尸体上高步踏过。



查理五世的舰队

战役的结局是血腥的。查理五世已经向部下许诺，由于突尼斯城没有投降，所以按照惯例，允许士兵们尽情掳掠。于是，突尼斯城居民遭到了恐怖的大屠杀。清真寺被洗劫一空；成千上万的突尼斯人虽然对海雷丁并不比对穆莱·哈桑更有好感，但仍然在大街上惨遭屠戮。一万多名平民被卖为奴隶。穆斯林对意大利的袭击、基督徒被劫掠和卖为奴隶、巴巴罗萨兄弟对基督教海岸地区二十年来的残酷侵害，都使得帝国军队怒火中烧，刺激他们暴露出原始的野性，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极其残忍的蹂躏。

在血洗突尼斯之后，查理五世在天主教欧洲威望大增。他置生死于度外，亲临突尼斯战场，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决心和军事才华。根据当时的西班牙史料，他曾冲杀在最前线，“手执长矛，像最贫贱的普通士兵一样出生入死”^[26]，子弹曾从他的头边呼啸而过。他胯下的战马被子弹打死，而他的侍从就战死在他身旁。西班牙史学家确保他的英雄事迹广为传扬。查理五世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自称“战争之皇”。

实际的收益也是非常可观的：穆莱·哈桑被重新扶上突尼斯王座，

作为帝国的傀儡，拉格莱塔则驻扎了西班牙军队。最重要的是，前一年春季不可一世地从伊斯坦布尔出航的那支奥斯曼舰队，现在几乎被查理五世烧了个一干二净。在突尼斯的湖内就摧毁了82艘船只。查理五世原打算对巴巴罗萨穷追不舍，占领阿尔及尔，但军中爆发了痢疾。8月17日，他威风凛凛地返回了那不勒斯，深信已经将对手打倒在地。

查理五世在运筹帷幄时从不会因为经费问题而束手束脚，但远征突尼斯的经济代价是惊人的。维持桨帆船舰队是极为昂贵的，而且皇帝还刚刚为在多瑙河上对抗苏莱曼的战事支出了90万杜卡特。按照估算，驶往突尼斯的舰队要花费100万杜卡特，查理五世是没有这么多钱的。针对巴巴罗萨的远征之所以能实现，要感谢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事件。1533年8月29日，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绑架了阿塔瓦尔帕，安第斯山脉卡哈马卡地区的印加王国的末代国王。他在勒索了一大笔黄金作为赎金之后，将人质扼杀。于是，西班牙盖伦帆船^[27]的队伍为查理五世奉上了一笔意外横财——价值120万杜卡特的南美黄金，“用以对土耳其人、路德和信仰异教的其他敌人开展圣战”^[28]。阿塔瓦尔帕的金库为查理五世的圣战付了账。这是新大陆第一次影响了旧大陆的历史轨迹。

对查理五世来说，是上帝帮助他赢得了这场大捷，因此他是以上帝的捍卫者的身份返航的。“在我这样一个基督徒看来，您在突尼斯取得的无比光荣的胜利远远胜过其他流传青史的事件。”^[29]阿谀谄媚的保罗·乔维奥^[30]如此写道。御用画师扬·维尔摩恩设计了一套十二幅挂毯，记录了此次战役中的场景。皇帝本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套挂毯，以见证他的辉煌。这是皇帝军事生涯中的一个巅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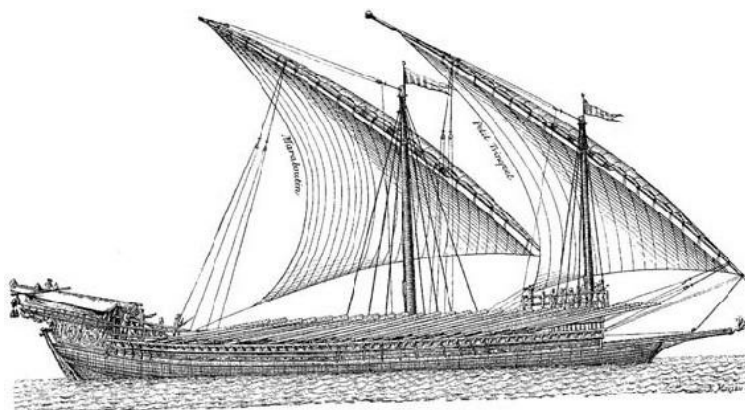
巴巴罗萨的基地被摧毁，马格里布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联系被切断，这在整个地中海西部产生了极大反响。查理五世抵达那不勒斯时得到了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有谣言在流传，声称巴巴罗萨本人已经一命呜呼。海岸地区沉浸在节日气氛中；人们用教堂钟声、礼炮、游行和

宴饮来庆祝喜讯。在托莱多和格拉纳达，信徒们唱着圣歌游行，跪拜在圣母像面前。圣约翰骑士团举行了感恩仪式，在马耳他的夜空中燃放烟花爆竹；而受此事件影响较小且生性比较轻浮的威尼斯人则抓住这个借口，举行了狂欢节和假面舞会。但最为欣喜若狂的是巴利阿里群岛的居民。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以前在海盗手里蒙受了极大苦难。在马略卡岛的帕尔马城，人们欢呼雀跃地重演了海盗的败落。一名罪犯被染红胡须，割掉舌头，穿上土耳其服装，然后被推推搡搡地拥进城市广场。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这个惊恐万状的犯人活活烧死。喜悦、残忍、复仇、宗教救赎、狂欢、神秘的狂热：强烈的感情激荡着整个大海。

10月的一天，在这种狂欢气氛中，一队飘扬着西班牙旗帜的桨帆船驶进了梅诺卡岛的马翁港。从海岸上观察的人们喜悦地高呼，表示欢迎，以为那是多里亚的舰队扫荡北非海岸归来。他们看得清船上水手穿着基督徒的衣服，于是在船队稳步入港时敲响教堂大钟，以示欢迎。停泊在港内的一艘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放了一炮，作为友好的致敬，不料对方还以猛烈炮火。葡萄牙人大吃一惊，赶紧去武装自己，但为时已晚，巴巴罗萨的桨帆船群正向他们猛扑过来。老海盗根本没有死。他安全逃出了突尼斯，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在突尼斯以西的博恩^[31]还有15艘桨帆船。他在那里躲过了多里亚，驶往阿尔及尔，在那里又集结了更多的船只。现在他又回来蹂躏基督教海域了。伪装成西班牙船只的桨帆船群作为真主的复仇，降临马翁。巴巴罗萨俘虏了那艘卡拉维尔帆船，把城镇洗劫一空，掳走1800人，并摧毁了城防工事。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上一时间货物爆满。

基督教海域重新回到原先的噩梦状态。海岸地区的人们不禁为之心惊肉跳，这恐惧由西班牙和意大利各个港口的大小船只传到了没有设防的各个岛屿和海岸城镇。查理五世投入的大量努力和金钱似乎都白费了。他只是伤到了巴巴罗萨，远没有把他彻底消灭。当年年底，苏丹的海军司令回到了伊斯坦布尔。通常对败军之将从不宽容的苏莱曼原谅了

他丢失战船的罪过，并命令他建造一支新的舰队。



扬帆航行的桨帆船

[1]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5～1541）是灭亡印加王国的西班牙征服者。1510年，他开始参加探索新大陆的远征，三年后加入巴尔沃亚领导的探险队，发现了太平洋。他沿哥伦比亚海岸进行了两次发现之旅（1524～1525，1526～1528），并继续向南探索，把新领地命名为秘鲁。1531年，他消灭了印加王国。皮萨罗的余生致力于巩固西班牙对秘鲁的统治。他建造了利马城，后在该地被他背叛过的西班牙同伙杀死。

[2] 伊拉斯谟（1469～1536），荷兰教士和人文学者，被视为16世纪最伟大的欧洲学者，著有《愚人颂》。

[3] Tracy, James D.,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 2002, p.27

[4] Clot, André,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e*, trans.Matthew J.Reisz, London, 2005, p.79

[5] Finlay, Robert, “Prophecy and Politics in Istanbul: Charles V, Sultan Suleyman, and the Habsburg Embassy of 1533-1534” *Th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1998, vol.2, p.12

[6] Necipoğlu, Gülru, “Ottoman-Hapsburg-Papal Rivalry” in *Süleyman I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p.173

[7]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3, New York, 1962, p.114

[8] Tracy, James D.,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 2002, p.138

[9] Necipoğlu, Gülru, “Ottoman-Hapsburg-Papal Rivalry” in *Süleyman I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p.173

[10] 古称君斯，今天在匈牙利西部，与奥地利接壤。

[11] Hammer-Purgstall, J., *Histoire de L’mpire Ottoman*, vols.5, Paris, 1836, pp.480-1

[12] Clot, André,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e*, trans.Matthew J.Reisz, London, 2005, p.86

[13] Kâtip Ç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 London, 1831, p.399

[14] Bradford, Ernie, *The Sultan’s Admiral: The Life of Barbarossa*, London, 1969, p.129

[15] López de Gómara, Francisco, *Cronica de los Barbarrojas*, in *Memorial Historico Español: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Opusculos y Antigüedades*, vol.6, Madrid, 1853, p.522

[16]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

[17] Bradford, Ernie, *The Sultan’s Admiral: The Life of Barbarossa*, London, 1969, p.123

[18] Sandoval, Fray Prudencio de, *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vols.2, Madrid, 1956, p.474

[19] 斯特龙博利岛位于意大利西西里东北方，岛上有活火山。

[20] Sandoval, Fray Prudencio de, *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vols.2, Madrid, 1956, p.487

[21] 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1553～1620），西班牙僧侣和史学家，他的著作对研究查理五世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22] Tracy, James D.,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 2002, p.147

[23] 位于西班牙南部，是西班牙在地中海的仅次于巴塞罗那的第二大港。著名画家毕加索出生于此地。

[24] 卡拉维尔帆船是15世纪盛行的一种三桅帆船，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普遍用它来进行海上探险。

[25]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3, New York, 1962, p.114

[26] Tracy, James D.,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 2002, p.147

[27] 盖伦帆船是至少有两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在16～18世纪期间被欧洲多国采用。它可以说是卡拉维尔帆船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船身坚固，可用作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比克拉克帆船便宜，生产3艘克拉克帆船的成本可以生产5艘盖伦帆船。盖伦帆船被制造出来的年代，正好是西欧各国争相建立海上强权的大航海时代。所以，盖伦帆船的面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

[28] Tracy, James D.,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 2002, p.156

[29] Clot, André,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e*, trans.Matthew J.Reisz, London, 2005, p.106

[30] 保罗·乔维奥（1483～1552），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医生、史学家、传记家。他对当时的多场战争做了记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来源。

[31] 今称安纳巴，位于阿尔及利亚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座城市。

5.多里亚与巴巴罗萨

1536~1541年

查理五世有多里亚，苏莱曼有巴巴罗萨。很显然，在突尼斯战役之后，争夺地中海的两位帝王都选择了自己的斗士，并集结力量。巴巴罗萨是苏丹的海军司令，多里亚则是查理五世的舰队统领。这两位航海家都是各自主公意志的执行者。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海盗争斗的遥远边疆，而变成了像匈牙利平原那样的大帝国角逐的主战场。一年年过去，战事越来越激烈。巴巴罗萨于1536年再次进攻意大利，多里亚以牙还牙，于次年在希腊海岸俘虏了若干奥斯曼桨帆船。舰队的规模也越来越宏大。1534年，巴巴罗萨建造了90艘桨帆船；1535年，建造了120艘。两位指挥官多次在海上擦肩而过，在意大利的海角和海湾周围互相追踪，但从来没有交过手。他们的海战是一系列缺乏协调的猛击，如同患遗忘症的拳击手之间的搏斗。有很多因素导致一直没有发生连续性的大战役：海洋条件的限制、作战季节的掣肘、战役准备的后勤工作的耗时、在没有雷达的时代只能盲目地搜寻敌人以及经验丰富的水手的谨慎天性。双方都深知海战的风险。微弱的劣势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风向的微微转变也可能影响战局。与风险极大的海战相比，安全的劫掠突袭永远是上策。但到了16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帝国野心的持续压力和建造更大舰队的军备竞赛，两人之间的空间在日渐缩小，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

在拉格莱塔发现的法国炮弹对查理五世来说是个凶兆。1536年，他又开始了一场针对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全面战争。对四分五裂的欧洲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天主教国王用来与法国和新教徒作战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要多于对抗苏莱曼的消耗。哈布斯堡家族在人们心中的强大形象令基督教世界恐惧，而不是将后者团结起

来。于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苏莱曼得以巧妙地影响地中海的力量平衡。

法国人多年来一直与奥斯曼帝国眉来眼去，寻求与后者结盟，要么是直接通过秘密的使节，要么是以巴巴罗萨兄弟为渠道。早在1520年，法国就派遣了一名大使到突尼斯，劝说海盗“在皇帝的那不勒斯属地内给他制造更多麻烦”^[1]。他们为海雷丁提供了军事技术的支援（大炮、火药和炮弹）以及关于皇帝的情报。“我不否认，”弗朗索瓦一世向威尼斯大使承认道，“我希望土耳其苏丹实力强大，做好战争准备，但我这么希望不是为了他的缘故——因为他是个异教徒，而我们都是基督徒——而是为了削弱皇帝的力量，迫使他靡费金钱，并给反对这个可怕敌人的各国政府吃上一颗定心丸。”^[2]1536年初，弗朗索瓦一世和苏莱曼签订了一项协议，给予对方贸易权。协议的背后深意是，他们将对意大利发动钳形攻势，打垮查理五世。在苏丹的帝国争霸战中，地中海成了舞台中心。弗朗索瓦一世对苏丹的最终目标显然心知肚明。“土耳其苏丹会发动海上远征，”他告诉威尼斯人，“或许会一直打到罗马，因为苏莱曼苏丹总是在说‘进军罗马！进军罗马！’”^[3]苏丹命令已经返回伊斯坦布尔的巴巴罗萨“建造200艘战船，准备远征阿普利亚^[4]，于是他埋头于这项工作”^[5]。土耳其的海军力量再次升级。

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威尼斯人焦躁不安地关切着这些事件。奥斯曼人远征罗马势必意味着侵犯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领海。威尼斯竭尽全力，想在两个极具威胁性的大帝国之间保持自己的独立。查理五世已经吞并了威尼斯周边的所有意大利土地；苏莱曼的海军威胁着威尼斯的海上领地。威尼斯共和国的唯一野心就是在海上安安稳稳地做生意、挣大钱。它无力在军事上竞争，因此主要依靠娴熟的政治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威尼斯积极地向土耳其苏丹献媚讨好，毫不吝惜地用大笔金钱贿赂土耳其高官，并坚持不懈地对苏丹的一举一动进行刺探。威尼斯人把他们最优秀的外交官派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供养着一大群会讲土耳其语的线人和地图绘制师，并发回无穷无尽的加密报告。这项政策给威尼

斯买来了三十年的和平。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与易卜拉欣帕夏（位高权重的首席大臣）的特殊关系。易卜拉欣生于亚得里亚海岸，原先是威尼斯的臣民。他深受苏丹信任，但随着苏莱曼将炯炯的目光转向大海，这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

1536年3月5日晚上，易卜拉欣像往常一样来到皇宫，与苏莱曼一起用膳。他离开的时候，吃惊地遇见了刽子手阿里和一队宫廷奴隶。野心勃勃的维齐尔行为太过分，几乎认为苏丹的权力就是他自己的，并且招致了苏丹的妻子许蕾姆的嫌恶。次日早上，人们发现了易卜拉欣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从鲜血四溅的墙壁上可以明显看出，易卜拉欣一直反抗到倒地毙命。这个血污的房间被保留下来，多年都维持原状，用来警告所有野心勃勃的维齐尔，只消苏丹一声令下，宠臣也会立刻变成死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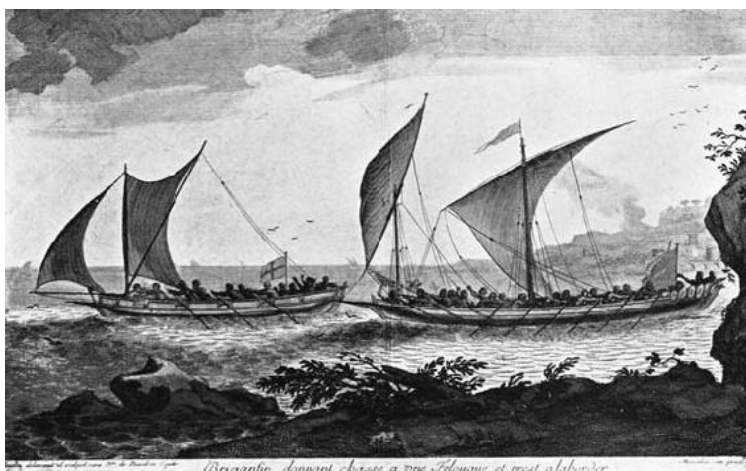
易卜拉欣被处决标志着苏莱曼统治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此以后，苏莱曼更加严峻；伊斯兰教的虔诚取代了原先有志成为恺撒的帝王威仪。易卜拉欣的暴死使得威尼斯一夜之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显然，苏莱曼越来越无法容忍“威尼斯异教徒……这个以巨大财富、广泛的商贸活动和在交易中的狡诈和阴险著称的民族”^[6]。威尼斯桨帆船和土耳其海盗在亚得里亚海发生的尖锐冲突为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提供了一个借口。1537年初，苏莱曼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准备对意大利发动两路夹攻，并将威尼斯位于科孚岛的基地视为入侵的踏脚石。土耳其人极具针对性地要求威尼斯元老院与他们结盟。威尼斯共和国进退两难；土耳其人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显然是个威胁；威尼斯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查理五世和苏莱曼之间做出选择。威尼斯人局促不安地宣布中立，礼貌地拒绝了苏丹的要求，然后武装了100艘桨帆船，因为“据我们观察，世界上其他君主都在这么做”^[7]。他们决定静观其变。

法国国王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1537年5月，苏莱曼派出一支大

军，前往位于亚得里亚海岸的阿尔巴尼亚城镇法罗拉。与此同时，巴巴罗萨也从海上大举出动。170艘桨帆船驶出伊斯坦布尔，向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猛扑。在一个月內，他“如同瘟疫般在阿普利亚海岸肆虐，[\[8\]](#)”焚毁城堡、掳掠人口，令恐慌情绪一直传到罗马。多里亚的舰队规模不足以与这支大舰队抗衡，于是他撤回西西里，继续关注事态发展。8月底，苏丹宣布改变策略，命令巴巴罗萨占领科孚岛。2.5万人在岛上登陆，攻打要塞，但令威尼斯人自己也很意外的是，要塞居然守住了。土耳其人万分期待与法国人会师，但后者始终不见踪影；攻城大炮在淫淫秋雨中陷入泥潭，而且威尼斯人明智地对自己的棱堡进行了加固。三周后，苏莱曼命令放弃攻城，但威尼斯已经不可挽回地卷入了战争，加入了皇帝那一边。1537年冬季，教皇保罗三世从中斡旋，提出了具体的条件，打算建立一个神圣联盟“以反对公敌——暴君土耳其苏丹”[\[9\]](#)。联盟的形式将是一场海上的十字军东征，最终目标是占领伊斯坦布尔，立查理五世为君士坦丁堡皇帝。威尼斯人是务实主义者，私下里更希望能够快速打垮巴巴罗萨，恢复原状，继续与伊斯兰世界进行和平的贸易。

这是一个关键性时刻。南欧感到自己命运未卜。基督教世界如果遭到决定性失败，整个地中海就将任凭奥斯曼舰队无情劫掠。1538年，当盟国正在组织和活动的时候，巴巴罗萨已经出海，让威尼斯人尝到了失败的滋味。除了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之外，威尼斯在爱琴海上还控制着一连串小型港口和岛屿，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纳夫普利翁城和莫奈姆瓦夏城、斯基亚索斯岛、斯科派洛斯岛、斯基罗斯岛、圣托里尼岛，还有其他一些分散的基地，它们都拥有整洁的港口、天主教教堂和阴森森的棱堡，城门上雕刻着圣马可[\[10\]](#)的狮子。海雷丁逐个洗劫了威尼斯的这些基地，将守军全部屠杀，将身体健全的男人掳走当作划桨奴隶，然后继续航行，在炽热的天空下只留下燃烧的废墟。奥斯曼史学家简洁地列举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损失：“本年度內，威尼斯人拥有25个岛屿，每座岛屿都建有一座、两座或三座城堡；这些城堡全被攻克，12个岛屿称

臣纳贡，其他13个岛屿受到劫掠。”^[11]海雷丁正在蹂躏克里特岛南岸，这时一艘小型划桨船送来了消息，基督徒正在亚得里亚海集结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于是他转身北上，前去应战。



海盗追赶基督教船只

神圣联盟在科孚岛的集结非常缓慢。威尼斯人和教皇的桨帆船在5月份就抵达了那里，求战心切。他们在那里足足等了将近三个月，总司令多里亚才缓缓地从热那亚出发，绕过意大利半岛，前来会合。他到9月初才抵达，此时天气已经开始转冷。意大利和西班牙部队之间当即就发生了争执。漫长的等待让威尼斯人焦躁不安。维持桨帆船舰队的代价给共和国造成了很大开销；因此他们急于抢在巴巴罗萨能够进一步破坏威尼斯附属岛屿之前，发起决定性的攻击。欧洲的基督教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各方的决策；各方的战略目标差别甚大，就连颇为乐观的教皇保罗三世也无法掩饰这些分歧。威尼斯参战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在地中海东部的领地。对查理五世而言，海上边界到西西里为止，他对威尼斯在更东方的利益不感兴趣。多里亚之所以行动这么缓慢，很可能是皇帝的授意。对多里亚而言，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几乎是公开的，这源于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宿怨。这一切都很不吉利。

9月初，舰队终于出航，寻找与巴巴罗萨决战的机会。他们拥有数

量优势——139艘重型桨帆船和70艘帆船，而敌人只有90艘重型桨帆船和50艘小型划桨船。但是土耳其人藏在了希腊西海岸的一个小海湾——普雷韦扎湾，得到了岸基大炮的良好保护。将近三周时间里，神圣联盟舰队封锁了普雷韦扎，但无法引蛇出洞，并且天气渐渐寒冷起来；多里亚担心暴风会摧毁他的舰队。9月27日晚，他决定起锚撤退。就在此时，一直严密观察战局的巴巴罗萨看到他的机会来了。多里亚和巴巴罗萨在地中海的猫鼠游戏已经玩了好多年，现在一决雌雄、夺取海权的时刻到来了。

9月28日是个狂风怒号的秋日。土耳其人出动作战时，外海的基督教舰队非常分散；各国的小舰队混杂在一起，桨帆船和帆船也乱糟糟的，缺乏协调。求战心切的威尼斯人高呼“战斗！战斗！”划桨向前冲。多里亚却令人无法理解地将自己的船队留在后方。最前锋的战船被孤立了。威尼斯人的舰队中有一艘重武装的大帆船，面对大群奥斯曼桨帆船的袭击岿然不动。但其他船只被俘虏或者击沉了。多里亚转向战场的时候，依然让自己的战船保持在外海，只进行远距离的炮击。威尼斯大帆船在整个白天打得奥斯曼舰队不能近身，但当夜幕降临、风向转变时，多里亚放弃了战斗，开始撤退，并熄灭了自己的船尾灯笼，以阻止敌人的追击。按照奥斯曼帝国史学家的说法，多里亚“撕扯着自己的胡须，抱头鼠窜，所有的小型桨帆船都跟着他逃走了”^[12]。

巴巴罗萨获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班师回朝。“那天上午和日落之间进行的战斗，此前在海上从未有过。”^[13]后世的史学家卡迪布·切莱比如此写道。苏莱曼得到捷报后，“当众宣布了胜利的消息，所有在场的人都站立起来，向真主表达了感恩和赞美。随后海军司令（巴巴罗萨）得到命令，向主要军官支付10万金币的赏金，向全国各地发送捷报，并在所有城镇公开宣布这个喜讯”^[14]。

事实上，这场战役的规模算是相当小的。传说中的大批桨帆船猛烈

交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神圣联盟可能损失了12艘船，跟几天后70艘奥斯曼帝国船只被风暴摧毁的情况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但这对神圣联盟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基督徒完全被敌人的策略压倒了。基督徒的损失主要在威尼斯人的舰队。多里亚没有支援威尼斯人，这令他们火冒三丈。他们感到，热那亚的海军司令要么是背叛了他们，要么是险恶地刻意为之，要么是懦弱怯战。多里亚或许是对这场战事并不十分热心，或许是看到敌人的航海技术超过自己，于是选择撤退，以减少自己桨帆船的损失。巴巴罗萨很可能是占了上风；他安全地躲在普雷韦扎湾内，可以选择对手处于不利风向的时刻发起进攻，但两人之所以没能决一死战，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威尼斯人不知道的是，查理五世没能在突尼斯消灭巴巴罗萨，于是使出了阴招。1537年，他开始秘密地与这位苏丹的海军司令谈判，引诱他弃暗投明，而就在战役前夜，这些协商仍在进行中。9月20日，巴巴罗萨派来一位西班牙籍信使，与多里亚和西西里总督进行了会谈。巴巴罗萨提出的条件是无法接受的，据说他要求将突尼斯返还给他，但这些协商说明，敌对的两位海军统帅之间有着某种合谋关系。他们两人都是受人雇佣，而且名望都受到了威胁。两人都有足够的理由谨慎行事；对他们来说，如果不顾风向而鲁莽地冒险，损失都将远远大于收益。西班牙人记起了一句谚语：一只乌鸦不会去啄另一只的眼睛。对多里亚来说，还有别的生意上的考虑：很多桨帆船是他的私人财产，他当然不愿意为了帮助可憎的宿敌威尼斯人而损失自己的战船。三十年后，经验不如多里亚和巴巴罗萨丰富的指挥官们将在同一片海域孤注一掷，将对风向的小心谨慎置之脑后。

巴巴罗萨在这番活动中究竟有几分真诚，完全无法确定。或许易卜拉欣帕夏的垮台让他看清了在苏丹的朝廷里伴君如伴虎，或者查理五世许诺帮助他实现在马格里布独立建国的梦想。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在陪着查理五世和多里亚玩，哄骗对手，令其产生狐疑和犹豫。可以确定

的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国间谍罗梅罗医生没有丝毫疑虑。“我可以担保，巴巴罗萨是个比先知穆罕默德还虔诚的穆斯林。”罗梅罗医生写道，“和西班牙人的谈判只是个幌子。”^[15]

乍一看，普雷韦扎战役的军事后果无足轻重，但它在政治和心理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它证明，只有一支团结一致的基督教舰队才能与拥有海量资源的土耳其人匹敌。1538年，对基督教世界来说，任何协调统一的反对土耳其人的海上军事行动都是空中楼阁。神圣联盟土崩瓦解：1540年，威尼斯人与苏丹签订了一项丧权辱国的和约。他们支付了一大笔赎金，并被迫承认被巴巴罗萨夺去的所有领土归苏丹所有。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了土耳其的附庸，尽管没有人使用这个词。整个地中海经验最丰富的海军大国威尼斯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没有再参加任何海战，直到对多里亚家族的猜忌促使他们再次扬帆起航。普雷韦扎战役为奥斯曼帝国统治地中海打开了大门。威尼斯人从这场战役中唯一得到的成果，就是大帆船的优良战斗力得到了实战考验。他们认识到了大型浮动炮台的价值，将在未来学以致用。

查理五世本人再次做了一次努力，试图打破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西部的霸权。他记起了在突尼斯的胜利，于是决定向阿尔及尔发起一次类似的行动。1541年夏季，苏莱曼在匈牙利，而巴巴罗萨在多瑙河上作战。这是发起进攻的一个绝佳机遇。

皇帝颇有些热衷于冒险。到1541年，他的财政受到了极大压力。为了节约经费，他决定在当年早些时候进攻阿尔及尔。因为他很确信，在冬天不会有舰队从伊斯坦布尔起航来阻挡他，所以可以减少投入的兵力，从而减少各方面的开支。多里亚警告他，这样做风险很大，但查理五世决定赌一把。

这次冒险的结局是灾难性的。9月末，他的规模可观的舰队从热那亚起航。参加此次远征的冒险家中包括墨西哥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

斯，他想在旧世界也施展一番拳脚。直到10月20日，各参战单位才在阿尔及尔集结完毕，但天气还算晴朗。军队登陆成功，在等待给养的时候，查理五世的好运气到头了。10月23日夜间，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士兵们无法保持火药的干燥，于是一下子处于劣势。巴巴罗萨先前任命了一名叫哈桑的意大利叛教者在他不在期间代行阿尔及尔总督的职务。哈桑是个勇敢而坚决果断的人。他率军杀出城，将查理五世的军队击溃。全靠圣约翰骑士团的一支小分队拼死抵抗，才防止了全军的溃散。更糟的还在后面。一夜之间，风力猛增；在沿岸巡弋的帆船拖着嘎吱作响的铁锚，一艘接一艘地被大风吹到了岸上。幸存者摸着黑在惊涛骇浪中跌跌撞撞地登陆，惨遭当地人屠杀。查理五世不得不率领败军沿着海岸撤退20英里，多里亚的桨帆船在那里等着接他。然而船只不够，无法把部队主力救走。查理五世乘坐的那艘桨帆船在近海颠簸着，险象环生。他将自己的马匹从船上推下海，告别了巴巴利海岸。被抛弃在海岸上的官兵的恶毒咒骂被狂风送到了他的耳边。他损失了140艘帆船、15艘桨帆船、8000名士兵和300名西班牙贵族。大海令他丢尽了脸面。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货物过剩，以至于在1541年，每个基督徒奴隶只卖相当于一头洋葱的价钱。

查理五世看待这起灾难倒是非常冷静和理智。“我们必须感谢上帝，”他在给弟弟斐迪南的信中写道，“并希望在这次灾难之后，他将善待我们，赐给我们真正的好运。”^[16]而且他不肯接受必然的结论：他出航的时间太晚。关于骤然兴起的暴风，他写道：“没人能够预先猜到它。选择最佳时机比尽早行动更关键。只有上帝知道何时是最佳时机。”^[17]任何熟悉马格里布海岸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话。查理五世此后再没有出海远征过。次年，他前往尼德兰，去处理新教徒起义的棘手问题和一场新的对法战争。

^[1] Heers, Jacques, *The Barbary Corsairs: 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 1480-1580*, London, 2003, p.73

[2] Clot, André,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e*, trans.Matthew J.Reisz, London, 2005, p.137

[3] Necipoğlu, Gülru, “Ottoman-Hapsburg-Papal Rivalry” in *Süleyman I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p.175

[4] 今称普利亚，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大区，东邻亚得里亚海，东南临伊奥尼亚海，南面则邻近奥特朗托海峡及塔兰托湾。

[5] Kâtip Ç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 London, 1831, p.66

[6] Kâtip Ç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 London, 1831, p.56

[7]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2, Philadelphia, 1984, p.410

[8] Bradford, Ernie, *The Sultan’s Admiral: The Life of Barbarossa*, London, 1969, p.152

[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2, Philadelphia, 1984, p.433

[10] 基督教传福音者，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也是威尼斯的主保圣人。

[11] Kâtip Ç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 London, 1831, p.61

[12] Kâtip Ç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 London, 1831, p.64

[13] Kâtip Ç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 London, 1831, p.64

[14] Kâtip Ç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 London, 1831, p.64

[15] Heers, Jacques, *The Barbary Corsairs: 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 1480-1580*, London, 2003, p.163

[16] Brandi, Karl, *The Emperor Charles V*, London, 1949, p.459

[17] Brandi, Karl, *The Emperor Charles V*, London, 1949, p.459

6.土耳其的海

1543~1560年

到了16世纪40年代，局势已经很明朗，查理五世在争夺地中海的战争中处于下风。普雷韦扎的惨败使得各基督教国家无法再次合作；阿尔及尔的灾难确立了这座城市作为伊斯兰海盗活动之都的地位。此时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和叛教者从地中海各个角落蜂拥奔赴阿尔及尔，参加对基督教海岸和航道的劫掠。

在这种气氛下，1543~1544年法国海岸的非同一般的景象尤其令基督教欧洲震惊和惶恐。法国和查理五世又打了起来，于是弗朗索瓦一世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和苏莱曼的联盟。巴巴罗萨受邀与法军合兵一处。他们一起洗劫了尼斯城，查理五世的一个附庸属地；1543年冬天发生了令基督教世界瞠目结舌的事情：巴巴罗萨麾下凶猛的细长型桨帆船安全地停泊在法国港口土伦。土伦城内有3万名奥斯曼士兵；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基督教墓地遭到了亵渎。土伦城被迫使用奥斯曼帝国的货币，城内飘扬着召唤穆斯林祈祷的呼声，每天五次。“看到土伦，你可以想象自己身处君士坦丁堡，”^[1]一名法国目击者宣称。似乎东方国度已经秘密入侵了基督教海岸。自称“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弗朗索瓦一世已经同意为巴巴罗萨的舰队提供过冬的粮草，并加强他的部队，以便“他可以统领大海”，条件是巴巴罗萨应当继续劫掠查理五世的领地。事实上，被迫供养这批不受欢迎客人的是土伦居民。

这种奇异的联盟很快就因为双方的貌合神离而出现裂痕。对于这项令全欧洲震惊的联盟，弗朗索瓦一世是三心二意、支吾搪塞的。巴巴罗萨对盟友的软弱十分鄙夷，于是将整个法国舰队扣押，索要赎金。法国人开始觉得自己和魔鬼结了盟约；弗朗索瓦一世最终不得不付给巴巴罗

萨80万金埃居，请他拿钱走人。赎金当然是土伦居民出的，这让他们成了穷光蛋，但同时也因为土耳其人的离去而松了一口气。

1544年5月，奥斯曼舰队驶往伊斯坦布尔，陪同他们的还有5艘法国桨帆船，后者身负觐见苏莱曼的外交使命。船上有一位法国神父，名叫热罗姆·莫朗。这位醉心于古典^[2]文化的教士自愿参加此次航行，担任船队的神父。他迫切希望看到君士坦丁堡和沿途的古典世界的遗迹。

莫朗在一艘桨帆船的甲板上饱览了地中海的自然和人工奇观，将旖旎的盛景全部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他目睹了海上闪电风暴的可怕景观和桅杆顶端圣艾尔摩之火^[3]的诡异闪烁。他看到了仍然被涂成鲜艳的蓝色和金色的古罗马别墅遗迹，还在黑暗中驶过了斯特龙博利岛的火山，后者“一刻不停地吐出巨大的火焰”。武尔卡奈罗岛的沙滩“黑如墨汁”^[4]，令他叹为观止；他还凝神观看了岛上冒着气泡、带有硫黄气味的火山口，它令人想起地狱的深渊。在希腊南部的奥斯曼帝国港口莫东^[5]，他参观了一座完全由基督徒骨骸搭建成的方尖碑，还登陆游览了特洛伊古城的遗址，最后抵达了“著名的、皇家的、非常伟大的君士坦丁堡城”^[6]。当他乘坐的桨帆船经过苏丹皇宫时，礼炮齐鸣，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一路上，他也很不情愿地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海权的强大。

苏莱曼为巴巴罗萨提供的帝国舰队（120艘桨帆船和一些支援帆船）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在意大利西海岸肆虐。查理五世的海岸防御体系无力抵挡这样武装强大、机动性超强的敌人。听到海盗接近的消息时，人们直接逃之夭夭。空荡荡的村庄被焚毁；有时入侵者会追击逃亡的平民，深入内陆好几英里。如果人们躲进一座牢固的海岸堡垒，桨帆船的船长们就将船头转向海岸，用大炮猛轰城墙，或者把船上的大炮拖曳上岸，攻打堡垒，也不管需要多长时间。他们根本不怕反击。只有少量西班牙士兵把守着孤立的瞭望塔。在海上，多里亚的侄子詹奈托率领25艘桨帆船追踪敌人的舰队，但刚有交锋的迹象，就被迫撤回了那不勒斯。

莫朗一天又一天地观看土耳其舰队的活动。伊斯兰圣战、帝国争霸、私人劫掠和恶意报复杂糅在一起，共同鞭策着土耳其人的劫掠活动。他目击了规模庞大的人口掳掠行动。每次袭击过后，男女和儿童身披锁链排成长长的一队，被驱赶到岸边登船，在海上还要面对与陆上同样大的风险。有时，某些海岸村庄会进行一种残酷的抽彩，抽中的人就要被交给海盗，他们希望这样至少能保住一部分人口。埃尔科莱港愿意交出80人，由巴巴罗萨自己挑选，条件是释放30人。他接受了这个交易，但仍然把村庄付之一炬，只有一间房屋没有被烧毁。在伊斯基亚岛，土耳其舰队烧毁了多个村庄，抓走了2000名奴隶。防御工事当然会被摧毁。他们发现吉廖岛已经人去房空，于是将村镇夷为平地，但城堡还做了抵抗，于是又把城堡炸了个稀巴烂。投降的632名基督徒被卖为奴隶，但他们的指挥官和教士则在巴巴罗萨面前被斩首，以儆效尤。这是一种精心设计、非常有效地打击敌人士气的方法。“这真是非同寻常，”莫朗证实，“仅仅提到土耳其人，就让基督徒不仅失去了力量，还丧失了智慧。”^[7]巴巴罗萨使用的是成吉思汗式的极端残暴手段。

他的某些镇压行动是发泄私怨，甚至对死人也不放过。在海岸城镇特拉莫纳，他命人将前不久去世的巴尔托洛梅·佩蕾蒂的遗体从墓穴中掘出，按照仪式将其开膛破肚、剁成碎片，然后把残尸和他的军官和仆人的尸体一起在公共广场上焚烧。巴巴罗萨离去之后，人肉烧焦的气味还弥漫在空中。战战兢兢的老百姓从藏匿地点溜出来，对这种暴行感到无比震惊。这是对佩蕾蒂前一年袭击巴巴罗萨的故乡莱斯博斯岛、摧毁巴巴罗萨父亲的住宅的报复。

奥斯曼人继续航行。舰队焚烧了伊斯基亚岛上的数个村庄并带走了2000奴隶。他们的舰队如同遮天蔽日的黑翼一般扫过那不勒斯时，那里的居民和守军畏缩在岸炮后面，不敢露头。更南方的萨莱诺只是因为一个奇迹才得了救。桨帆船群逼近萨莱诺时天色已黑，如此接近城市，莫朗甚至看得见城内窗户里的灯光，这时“上帝大发慈悲”，伸出了援手。

突然间刮起了暴风，“西南面的残酷之海漆黑一片，桨帆船甚至互相都看不见，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倾盆大雨，令人无法忍受”。船上挤在露天甲板上的基督徒划桨奴隶被淋成了“落汤鸡”，还遭到残酷的殴打。一艘满载俘虏的小型划桨船在风暴中倾覆，“除了一些游泳逃生的土耳其人外，其他人全部溺毙”^[8]。



在伊斯基亚岛上卸下奴隶

与土耳其人一起航行的法国人越来越为他们的暴行瞠目结舌，最后利帕里岛（西西里外海的一系列火山岛中最大的岛屿）发生的事情终于让法国人忍无可忍了。利帕里岛民已经得知土耳其舰队接近的消息。他们加强了防御工事，但没有将妇女儿童疏散，也没有撤往装备精良的要

塞。海雷丁派遣5000人和16门大炮登陆，准备长期围困。在他狂轰滥炸的时候，守军试图进行谈判；他们提出1.5万杜卡特的赎金，但海雷丁索要3万杜卡特和400名儿童。最终守军以为已经达成了协议，将为每个人都支付赎金。于是他们举手投降，交出了城堡的钥匙，但海雷丁背信弃义，除了支付大量赎金的一些富户外，将所有人都卖为奴隶。普通百姓被命令一个个从凶残执拗的帕夏面前走过。年老体衰和没有价值的人被用木棒狠揍一顿，然后释放。其他人则被用铁链锁住，带到利帕里岛的港口。海盗们发现有些高龄居民躲在大教堂内，于是抓住他们，扒掉他们的衣服，将他们活活地开膛破肚，“借此泄愤”。莫朗完全无法理解这些行为。“当我们问这些土耳其人，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对待可怜的基督徒，他们回答说，这种行为具有极大的美德。这是我们得到的唯一回答。”^[9]莫朗也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会允许如此的苦难发生；他只能得出结论，这是由于基督徒自己的罪孽，因为据说利帕里人“喜好鸡奸”^[10]。

深受震动的法国人自己掏腰包，赎买了一些俘虏，然后看着其他人被带走，目睹“命运悲惨的利帕里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城市，被卖为奴隶。他们泪流满面、发出呻吟和抽噎；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母亲看着自己的女儿，忧伤的眼睛里抑制不住地涌出泪水”^[11]。查理五世血洗突尼斯，海雷丁蹂躏利帕里：争夺地中海的角逐已经成了残害平民的战争。利帕里的城堡、大教堂、墓园和房屋遭到洗劫和焚毁。全城成了冒着黑烟的瓦砾堆。巴巴罗萨安排了暂时停战，主动提出在附近的西西里将新俘虏全都卖掉，这时法国桨帆船编了个借口，自己离开了。

1544年夏季，巴巴罗萨从意大利海岸和附近的海域俘虏了约6000人。在返航途中，超载运送奴隶的船只处于危险中，于是船员们将几百名较虚弱的俘虏投入了大海。他胜利返回金角湾时已是黑夜，港内礼炮齐鸣、灯火通明，欢迎他的凯旋。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岸边，争相一睹“大海之王”^[12]的凯旋。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大远航。1546年夏季，八

十高龄的巴巴罗萨在自己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宅邸内因热病死去，广大群众对他哀悼不已。他被安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一座宏大陵墓内。后来所有出征远航的将士都要来他灵前参拜。葬礼上“枪炮齐鸣，以圣徒应得的礼仪纪念他”^[13]。在几十年的恐怖之后，基督徒几乎不敢相信，“邪恶之王”真的已经死了。基督徒对他的名字的恐惧到了迷信的程度，有种传说一直流传下来：他可以离开自己的坟墓，与亡灵一起在大地上漫游。只有一位希腊魔法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坟墓内埋葬一只黑狗，对焦躁不安的阴灵进行安抚，让它重返哈得斯。

巴巴罗萨的确也不断“回到人间”来威吓基督教海岸。在他身后，有新一代海盗头子继承他的衣钵；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叫作图尔古特（基督徒称他为德拉古特）。他生于安纳托利亚海岸，人生轨迹与导师巴巴罗萨如出一辙：他起先是马格里布海岸的雄心勃勃的私掠海盗，后来参加过普雷韦扎海战，从1546年起向苏莱曼效忠达二十年之久。巴巴罗萨在大海里播种了龙牙^[14]，将有一代代的海盗前赴后继。

巴巴罗萨在1544年的最后一次大远征证明，穆斯林舰队可以在海上随意巡游，指哪打哪。这些规模宏大的扫荡是地中海全面战争的一部分，而土耳其人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掳掠人口是土耳其帝国政策的工具，造成的损害是极大的。从巴巴罗萨于1534年首次率领帝国舰队出航起的四十年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岸损失了大量人口：1535年，梅诺卡岛损失了1800人；1544年，那不勒斯湾损失了7000人；1551年，马耳他外海的戈佐岛损失了5000人；1554年，卡拉布里亚损失了6000人；1566年，格拉纳达损失了4000人。土耳其人有能力以优势兵力向具体的地点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他们能够登陆并恣意摧毁相当规模的海岸城镇，甚至能够威胁意大利的主要城市。1540年，安德烈亚·多里亚的侄子将图尔古特围困在撒丁岛海岸，将其俘虏，并把他卖为划桨奴隶。巴巴罗萨发出威胁，如果不将图尔古特赎回，就将封锁那不勒斯；热那亚人认为服从这个条件是上策。多里亚和巴巴罗萨两人亲自会面来商谈具

体的条件。3500杜卡特的赎金对基督徒来说是笔糟糕的买卖：十一年后，图尔古特自己封锁了热那亚。在普雷韦扎战役之后，基督徒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来回应这样的威胁。查理五世忙于同时进行好多场战争，因此无暇，或者无力，在海上对抗土耳其人。这时多里亚能做的仅仅是施加一些压力。

海盗的袭击也不仅仅是通过大舰队的行动进行的。查理五世和苏莱曼之间的战争此消彼长，取决于发生冲突的时机，但在1547年，苏丹与皇帝签署了一项和约，以便抽出精力来征讨波斯，于是海上的大规模远征暂时就停止了。尽管如此，战争仍然以其他方式继续。马格里布野心勃勃的海盗填补了这个真空，给基督教海岸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苦难。奥斯曼舰队是大大咧咧地打破各地的防御，而这些实力较弱的海盗则诉诸伏击和偷袭。这种恐怖暴行更为狡诈和迂回。偷袭取代了正面猛攻。

海盗的策略很快就为人们所熟知，令人战栗。可能会有几艘小型划桨船在外海游弋，躲在海平线下，熬过白天的炎热。同时他们会派遣一艘俘虏来的渔船去侦察海岸，可能会让一名本地的变节者来指认合适的目标。船队会在凌晨行动，低矮的黑色海盗船在满天星光下劈波斩浪，驶过夜幕下的大海。船上没有灯笼；海盗用木塞堵住基督徒划桨奴隶的嘴，防止他们喊出声来。船首抵岸时，海盗迅速突袭村庄；他们踢开房门，把衣衫不整的居民从床上拖下来，砍断教堂大钟的绳子，以防止村民发出警报；几声尖叫和犬吠在广场上回响，一大群稀里糊涂的俘虏被带到他们自己的海滩上，驱赶上船。然后海盗就消失了。“他们掳走年轻女人和儿童，”一名西西里村民对这样一次袭击回忆道，“他们抢走货物和金钱，然后闪电般回到他们的桨帆船上，定好航向，就消失了。”^[15]恐怖主要在于它的出其不意。

到16世纪中叶，地中海周边的人口失踪已经是家常便饭，在海边劳

作的人会突然间踪迹全无：单独驾船出海的渔夫、在海边放羊的牧人、收割庄稼或者料理葡萄园的劳工（有时甚至在内陆几英里处也不安全）、在岛屿间不定期航行的船只上的水手，全都是海盗绑架的对象。被海盗劫持后，几天之内他们就可能出现在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上，或者被关押在海盗船上，跟随寻找更多战利品的海盗船进行漫长的航行。在途中身体变虚弱或者死亡的人会被丢到海里。

在特别残酷的情况下，俘虏可能会在一两天后就重新出现在自己的村庄。海盗会出现在近海，升起停战旗，展示俘虏，索取赎金。哀痛无比的亲属们会有一天的时间去筹集赎金。有的人家可能会将自己的田地和船只抵押给当地的放债人，于是陷入一个不可逃避的债务漩涡。如果他们没能筹到赎金，人质就会彻底消失。那些非常贫穷且目不识丁的农民很少有机会被赎回，因此很少能再次看到自己的家园。

这种突然袭击让基督教海域陷入了深深的恐惧。那些在海上或者陆地上被掳走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被俘的创伤。“至于我，”法国人杜·沙斯特莱对那个噩梦时刻回忆道，“我注意到一个高大的摩尔人向我走来。他的衣袖一直卷到肩膀上，只有四个指头的大手握着一把军刀；我害怕得说不出话来。这张乌黑的脸奇丑无比，带有两个象牙白色的眼珠，丑恶地转来转去，给我带来的恐惧远远超过人类先民目睹伊甸园门前带火宝剑时的恐惧。”^[16]

这种恐惧因种族差异而加剧。在狭窄的地中海上，两个文明通过突然的暴行和复仇互相接触。欧洲人此时正在西非劫掠黑奴，但在地中海，他们自己却是被奴役的对象，尽管在16世纪，被伊斯兰世界奴役的欧洲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欧洲人掳走的黑奴。而且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是一种冷酷的生意，而在地中海，奴隶贸易却受到互相的宗教仇恨的激发。伊斯兰世界的袭击不仅仅是为了损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物质基础，也是为了打击对手的精神和心理基础。热罗姆·莫朗于1544年目睹的对

墓园的洗劫和对教堂的仪式化亵渎有其深意。意大利诗人库尔蒂奥·马太哀叹“上帝蒙受的凌辱”：圣像被用匕首插在地上，圣礼和祭坛遭到嘲讽。他还为挖掘死尸、捣毁已经辞世的几代人的遗骸的恶行震惊不已：“我们死者的遗体已经入土十多年，在地下也不得安宁。”^[17]海盗在意大利民间传说中成了地狱的代理人，而让人愈发无法忍受的是，这些撒旦的使节往往是为形势所迫或者心甘情愿改宗伊斯兰教的叛变基督徒，而这些人对自己的家园非常熟悉，因此更能够大肆破坏。

在这种大环境下，查理五世在1541年没能收复阿尔及尔，就显得尤其严重。这座城市现在得到了一座防波堤和强大防御工事的保护，成了海盗活动的中心。这是座充满淘金热的城市，任何人在这里都可以梦想变得像巴巴罗萨那样富有。来自贫瘠大海的各个角落的冒险家、私掠海盗和浪荡子，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都争先涌向这座城市，打算在“掳掠基督徒”^[18]的生意上一试身手。这座城市有的地方像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大市场，奴隶和战利品在这里买卖转手；有的地方则像是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成千上万的俘虏被关在奴隶营地里。这些营地由澡堂改建而成，黑暗、拥挤、臭气熏天。每天奴隶们都戴着镣铐，从这里被领出去做苦工。富有的俘虏，比如在阿尔及尔被关押了五年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等待赎金的时间里或许会得到相当程度的善待。贫穷的俘虏就必须搬运石头、伐木、采盐、修建宫殿和壁垒，最糟糕的情况是去船上划桨，直到疾病、虐待和营养不良夺去他们的生命。

1540年之后的岁月里究竟有多少人被卖为奴隶，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并不是只有一方在做的生意。双方在整个地中海都在进行“掳掠人口”活动，如果说伊斯兰世界的贩卖奴隶活动很猖獗的话，基督教世界也进行了小规模的你牙还牙。圣约翰骑士团就是冷酷无情的奴隶贩子，尤其是拉·瓦莱特，那个年轻时曾在罗得岛作战的法国骑士。骑士们以马耳他为基地，派出一小群重型武装的桨帆船，重新回到了他们在爱琴海的旧有活动范围，袭扰着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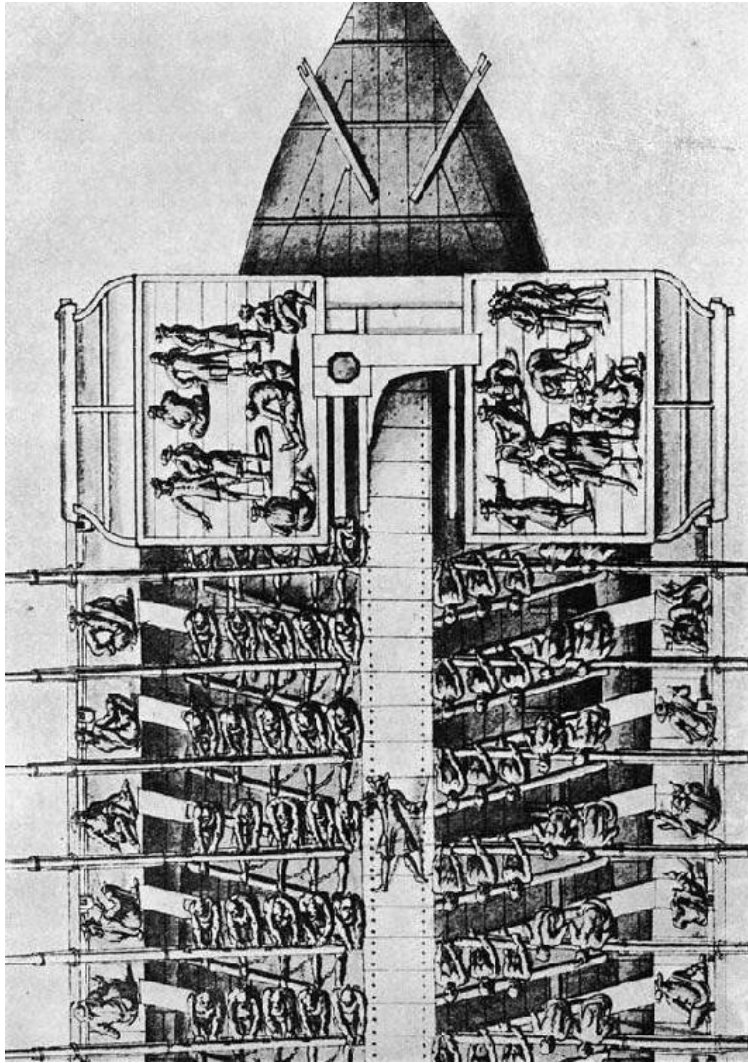
道。骑士们和海上的任何海盗一样心狠手辣、毫无顾忌。热罗姆·莫朗抵达威尼斯所属的蒂诺斯岛时，骑士们刚刚“拜访”过这里。岛民们欢迎了这些“朋友和基督徒”，直到一天早上，岛民们在离开城镇，下地干活时，“这个骑士和他的部下看到城堡里人很少，于是杀了他们，洗劫了城堡，掳走妇女、男孩和女孩作为奴隶”^[19]。这个丑恶行径很快就遭了报应。这名骑士自己被土耳其海盗抓获，送往伊斯坦布尔，莫朗在那里目睹他被处决。命运无常，风水轮流转。

骑士团不是基督教方面唯一的奴隶贩子。任何小规模基督徒海盗都可以一试身手，劫掠地中海东部；意大利海岸上的里窝那和那不勒斯都有生意兴隆的奴隶市场。不少穆斯林被掳走，关进马耳他的奴隶营，或者押上教皇属下的帝国桨帆船，但穆斯林奴隶的数量远少于被抓到马格里布或者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奴隶。关于被卖身为奴的基督徒，留下了海量的文字叙述，但关于穆斯林奴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偶尔有模糊不清的关于个人苦难的记述会打破这普遍的沉默。16世纪50年代末，一个名叫胡玛的女子不断向苏莱曼哭诉，请求追回自己前往麦加朝觐却被圣约翰骑士团掳走的孩子。她的两个女孩已经被劫持到法国，改宗基督教，嫁了人。在伊斯坦布尔，呼天抢地的胡玛成了路人皆知的人物，她坚持不懈地守候在大街上，一旦苏丹骑马经过，就把请愿书塞到他手里。在她的孩子失踪二十四年后，苏丹穆拉德三世仍然写道，“名叫胡玛的女士一而再，再而三地拦住我的坐骑，呈上请愿书”。^[20]据我们所知，两个女孩始终没有被追回来；她们的兄弟可能被卖作划桨奴隶，死在了一艘马耳他桨帆船上。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类似的小悲剧数不胜数，都是关于劫持和丧失亲人的故事。

所有这些暴力活动的工具都是桨帆船。这种快速但脆弱的低矮船只只是地中海的战争机器，是海洋条件造就的。海战如何进行、在何时何地，同样也取决于海洋条件。桨帆船吃水浅，因此可以轻松靠岸，有利于两栖作战；它们可以潜伏在近海，准备伏击；也可以在笨重的帆

船（其机动性完全受制于变幻难测的风向）周围任意旋转。与此同时，桨帆船的适航性惊人的差，而且依赖于不断地补充淡水（以供应桨手饮用），所以只能在近海行动。桨帆船每隔几天就要靠岸一次，因此它们的作战半径有限，部署也受到季节的制约。冬季的暴风意味着，每年10月至来年4月，海战都要暂时偃旗息鼓。最关键的是，海战的发动机是人力；16世纪的掳掠人口活动的所有动机中，抓人做划桨奴隶是重要的一项。

在15世纪，威尼斯海上霸权处于巅峰的时期，桨帆船的桨手都是志愿者。到16世纪，桨手主要是征募来的。奥斯曼海军很大程度上依赖每年从安纳托利亚和欧洲行省征募来的桨手。各国也都使用强制劳役：俘虏、罪犯等。在基督教国家的船上，还有因为生活贫困、无以为继而自己卖身为划桨奴隶的人。这些可怜虫每三四个人被锁在一条约1英尺宽的长凳上，正是他们使得海战成为可能。他们唯一的功能就是苦干到死。他们的手足都戴着镣铐，就坐在桨位上拉屎撒尿，吃少得可怜的黑饼干，忍耐着口渴，有时甚至去喝海水。划桨奴隶的生命常常是悲惨而短促的。他们只穿着亚麻马裤，除此之外一丝不挂，皮肤被烈日炙烤；他们被锁在狭窄的长凳上，长时间无法睡眠，有些桨手因此发疯；在一艘战船努力俘虏敌船或者拼命逃跑时，需要长时间的剧烈劳动，这时保持节拍的鼓点和监工的皮鞭（由晒干的公牛阴茎涂上焦油制成）鞭策着他们拼命划桨，哪怕精疲力竭了也不能停歇。桨手拼死划桨的景象可怕得令人不敢直视。“对被剥夺自由的人来说，划桨是最无法忍受和最可怕的工作。”^[21]英格兰人约瑟夫·摩根描绘了这样的景象，“一排排身子半裸、忍饥挨饿、部分皮肤被晒得黝黑、身体精瘦的可怜人，被锁在木板上，有时一连几个月都无法离开……裸露的皮肉遭到残忍的、持续的鞭打，被催促用力划桨，甚至超过人力可承受的范围，不断地继续最猛烈的动作。”人们从基督教国家的港口起航时，常常听到这样的祝福：“上帝保佑你，不要落到的黎波里的桨帆船上。”



划桨的奴隶们

有时由于疾病蔓延，一支舰队在几周内就能损失惨重。桨帆船是一个死亡陷阱、一条海上泔水沟，它的熏天臭气在两英里外就闻得到。当时的习惯是，隔一段时间就把船体沉入海底，以清洗上面的屎尿和老鼠。但如果船员们没被疾病打倒，活了下来，参加了战斗，桨手们就只能坐在那里，等待被自己的同胞和相同信仰的人杀死。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桨手在名义上都是自由人，但他们的处境好不了多少。苏丹从内陆省份征募大量桨手，其中很多人之前从来没看过大海。他们作为桨手没有经验，效率也不高，由于条件恶劣，往往大批死去。

桨帆船以各种方式消耗着人力，就像消耗燃料一样。每个死去的可怜桨手被抛下海之后，就必须有人接替他，因此总是缺乏足够的人力。西班牙和意大利官方的备忘录总是不厌其烦地报告桨手的缺乏，因此船只建造的速度常常超过桨手配备的速度。1555年，圣约翰骑士团的桨帆船舰队突然遭到了一场灾难，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10月22日夜间，骑士团的4艘战船安全地停泊在马耳他的港口内。桨帆船群的指挥官罗姆加（骑士团经验最丰富的船长）在自己旗舰的尾部睡觉。这时一场诡异的旋风从海上刮来，吹断了船只的桅杆，将船只打翻。破晓时，全部4艘桨帆船都底朝天地漂浮在灰色的海面上。营救者乘小船去寻找生还者，并查看船只的损失情况。他们听见其中一艘船内传出沉闷的敲击声，于是在船体上凿了一个洞，在黑暗中往底下张望。船上的宠物猴子迅速跳了出来，然后是罗姆加，他在一个水淹到肩膀，但是有空气的狭小空间内熬了一夜。直到用浮筒将船只扶正，大家才清楚地看到了全部的可怕景象：300名溺死的穆斯林划桨奴隶的尸体仍然被锁在长凳上，像白色的鬼魂一样在水里漂浮着。对船只的修理和更换还算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寻找新的船员却是真正的难题。教皇打开了那不勒斯大主教属下的监狱，提供了一批划桨奴隶；骑士们随后不得不乘船出海去抓捕更多奴隶，来填满桨手长凳。这对双方都是一样：很多的劫掠仅仅是为了补充人力，以便开展新的袭击。暴力是个恶性循环。桨帆船对人力的需求就是战争的一个动机。

在16世纪50年代，形势越来越明朗，查理五世在一步一步输掉这场战争。德意志和低地国家新教徒造成的麻烦、无休止的对法战争，甚至美洲的金银也无法解决的债务问题：这一切都困扰着皇帝。他忙于维持整个帝国，无心长时间关注地中海局势。与苏莱曼的断断续续的停战也无助于大局。奥斯曼舰队不出动的时候，还有马格里布的海盗在放肆。海盗不断洗劫意大利、西西里、巴利阿里群岛和西班牙的海岸，几乎不受任何阻挡。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口下降对意大利南部影响特别大。有

时当地的总督不得不命令将某一海岸地区的居民全部撤走，以免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掳走，就像1566年的亚得里亚海岸那样。但海盗还是蹂躏了500平方英里的乡村。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的海上贸易不时地处于瘫痪的边缘。西班牙的地中海帝国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受到了这次无情劫掠的威胁。一位法国主教在1561年写道：“图尔古特紧紧掐住了那不勒斯王国的咽喉……以至于马耳他、西西里和附近其他港口的桨帆船受到了图尔古特的严重骚扰和遏制，没有一艘船能从一个地方驶往另一个地方。”^[22]流言再次传遍整个地中海西部，声称这些攻击是大规模入侵意大利的序曲。在罗马，连续多位教皇为之战战兢兢，恳求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在马格里布，西班牙要塞一个个被攻克。圣约翰骑士团为查理五世防守的的黎波里于1551年陷落；此后，的黎波里就像阿尔及尔一样，成了伊斯兰海盗们的淘金地。贝贾亚于1555年被穆斯林占领。已经八十高龄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发动了一些反击，效果不一；他把图尔古特围困在杰尔巴岛的潟湖内，但这名海盗把自己的船只拖上岸，通过陆路把船拖走，轻松地溜出了多里亚的手掌心。次年，图尔古特再次出动，率领苏莱曼的帝国舰队进攻了马耳他。此后西班牙向非洲发起的远征都以灾难和死亡告终。

到16世纪50年代初，查理五世已经是个心力交瘁的老人，被整个帝国的重担压垮了。他极富责任感，对基督教世界的大小政务事必躬亲，积劳成疾，以至精神崩溃。他身患痛风病，财务完全被德意志银行家控制，他执拗地在一个个人的、微小的世界里寻求秩序。“他常常一连几天沉浸在忧郁中，”一名目击者记述道，“他的一只手已经瘫痪，一条腿蜷缩在身下，不肯接见廷臣，很多时间花在拆卸和组装钟表上。”^[23]1556年，他将西班牙王位禅让给了儿子菲利普二世^[24]，隐居在一所修道院内，专心侍奉上帝。除了宗教书籍和他一辈子的日记外，他还带去了自己的世界地图以及尤利乌斯·恺撒的著作。他统治时期内最后一次海上灾难发生在1558年夏季：一支西班牙远征队在马格里布全军覆灭。消息传回西班牙时，查理五世已经奄奄一息。没有人忍心把这噩

耗告诉他。

这时苏莱曼已经心满意足地宣布，他赢得了与主要对手的较量。1547年，他与查理五世及其弟斐迪南签署了一项停战协议。斐迪南同意年年纳贡，以保住自己的匈牙利领地。在苏莱曼看来，斐迪南已经成了一个附庸，而协议文本中将查理五世仅称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查理五世亲自在协议上签了字。苏莱曼自视高不可攀，不肯亲自与异教徒打交道，于是按照惯例让一名官员在协议上加上了皇家花押字。对苏丹来说，协议中的头衔、条件和行文都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从此，他自命为“罗马人的皇帝”：恺撒。

查理五世尸骨未寒，苏丹就在白海迎来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时刻。腓力二世继承西班牙王位时，西班牙海岸的局势正在恶化，他不得当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地中海问题上。北非海盗已经进入大西洋，扰乱了西班牙盖伦帆船往返西印度群岛的交通。1559年，无休无止的对法战争暂时停顿，解决马格里布问题的决定性时刻似乎到来了。

西班牙人拟定了计划，打算夺回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黎波里港，并重新获得地中海轴线的控制权。战役的准备工作就像西班牙所有的海上冒险一样，非常艰苦，而且还受到了腓力二世自己的某种压制。新国王和他父亲并不相像：查理五世喜好冒险，但腓力二世谨小慎微，注定将以“审慎的国王”的雅号留名青史。查理五世常常御驾亲征，腓力二世则稳坐马德里的王宫，通过一系列命令遥控在远方冲锋陷阵的指挥官。他对远征指挥官的选择也颇具争议。安德烈亚·多里亚已经九十三岁高龄，虽然看上去还精神矍铄，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参战；指挥棒被交给了多里亚的侄孙乔万尼·安德烈亚，一个经验不足、年仅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这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1559年12月，拥有50艘桨帆船和6000名士兵的舰队终于起航。对于行动目标，舰队起初还有所迟疑，最后决定兵锋直指图尔古特位于杰尔

巴岛的海盗巢穴。1560年春，西班牙军队轻松占领了杰尔巴岛，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要塞，进驻了部队。但海盗们已经向伊斯坦布尔报告了消息，一支拥有86艘桨帆船的奥斯曼舰队在皮雅利帕夏统领下紧急出动。他们在仅仅二十天内就抵达了杰尔巴岛，创造了一项纪录。奥斯曼舰队的船帆黑压压地出现在海平线上，令乔万尼·安德烈亚的舰队大吃一惊。西班牙人慌里慌张地上船，乱成一团，没有排好作战队形。皮雅利将西班牙战船一艘一艘地逐个消灭。乔万尼·安德烈亚带领他私人的桨帆船群逃之夭夭，留下的是含糊其辞的诺言：他将派来援兵，解救被围困的要塞。援兵始终没有来；腓力二世举棋不定，后来他的这种优柔寡断将成为家常便饭；他先是匆忙地准备救援舰队，然后又害怕在最后关头会损失更多船只，不准它出航。他就这么抛弃了要塞守军。要塞遭到攻打，然后水源被切断，于是陷落了。全部守军5000人，要么战死，要么被处决；只有贵族军官被饶了性命。他们被作为战利品和缴获的桨帆船一起送给了苏莱曼。穆斯林在杰尔巴岛上用死者的骨头搭建了一座金字塔；这座“骷髅要塞”一直保留到19世纪。

对西班牙来说，灾难不仅仅在于损失了若干船只和人员。虽然30艘桨帆船、5000名士兵和6400名桨手的损失很难补充，但这不算是最糟糕的。真正严重的是，他们损失了600名经验丰富的水手、2000名海军火绳枪兵和久经沙场的指挥官：整整一代熟悉桨帆船作战的人，他们的经验是通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来的，这些人的损失是不论多少印加黄金都无法弥补的。杰尔巴岛的惨败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更加无遮无挡。

1560年10月1日，皮雅利帕夏的凯旋舰队围绕在苏丹后宫的下方，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驶入了金角湾。佛兰德使节比斯贝克^[25]目睹了这一“对土耳其人来说是天大喜事，却令基督徒怆然泪下”^[26]的盛况。苏莱曼来到了御花园一端的楼台亭阁，“以便近距离观看庞大的舰队驶入港湾，以及被示众的基督徒指挥官”。舰队的分列式是精心安排的，目的是展现奥斯曼海军的无比强大。奥斯曼桨帆船被涂成鲜艳的红色和绿

色；被俘的基督徒船只则被拆除了桅杆、索具和船桨，“以便让它们在土耳其桨帆船的对照下显得渺小、丑陋和可鄙”。在皮雅利旗舰的艏楼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基督徒指挥官们被押着示众，作为教导大家做人要谦卑的活教材。

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力量达到了巅峰。如果说，某一方在某个时刻能够完全控制不可控制的地中海的话，那就是这一刻。但在那个初秋的日子，能够近距离观察苏丹的人会发现，他的脸上没有胜利的喜悦。他的样子看上去凝重严峻、永不满足。

在热那亚，离九十四岁生日仅有四天的安德烈亚·多里亚将面庞转向墙壁，离开了人世。

[1] Bradford, Ernie, *The Sultan's Admiral: The Life of Barbarossa*, London, 1969, p.197

[2] 指古希腊和罗马。

[3] 圣艾尔摩之火是一种自古以来就被海员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常发生于雷雨 中，在桅杆顶端之类的尖状物上，产生如火焰般的蓝白色闪光。它其实是一种冷光 现象，是由于雷雨中强大的电场造成场内空气离子化所致。

[4]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 1901, p.109

[5] 今称迈索尼，是希腊南部的港口城市。“莫东”是威尼斯人给它取的名字。

[6]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 1901, p.183

[7]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 1901, pp.67-9

[8]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 1901, p.97

[9]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 Paris, 1901, p.129

[10]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 Paris, 1901, p.127

[11]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 Paris, 1901, p.133

[12] Kâtip Ç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 London, 1831, p.69

[13] Haëdo, Diego de, *Histoire des Rois d'Alger*, trans.H.de Grammont, Saint-Denis, 1998, p.74

[14] 根据希腊神话，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杀死了一条巨龙，按照雅典娜的指示，将龙牙播种在地下，生长出许多武士。这些武士互相残杀，其幸存者和卡德摩斯一起建立了底比斯城。

[15] Davis, R.C.,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London, 2003, p.43

[16] Davis, R.C.,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London, 2003, p.209

[17] Davis, R.C.,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London, 2003, pp.41-2

[18] Davis, R.C.,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London, 2003, p.27

[19]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 Paris, 1901, p.165

[20]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840

[21] Davis, R.C.,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London, 2003, p.77

[22]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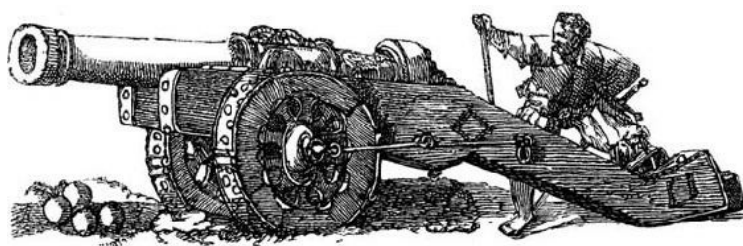
[23]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914

[24] 同时，查理五世将神圣罗马帝国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斐迪南，史称斐迪南一世。

[25] 奥吉耶·吉斯林·德·比斯贝克（1522～1592），佛兰德作家、草药学家和外交官，先后为哈布斯堡家族三位君主效劳。他在1554年和1556年担任斐迪南（后来的神圣罗马皇帝）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对土耳其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政治做了很多记述。据说他是将郁金香从土耳其引进欧洲的人。

[26]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765

第二部 震中：马耳他战役，1560～1565年



GUN AND GUNNER.

7.毒蛇的巢穴

1560～1565年

杰尔巴岛惨败的消息传遍基督教国家的海岸，令人们不寒而栗。很显然，现在地中海中部的局势具有关键意义。1560年7月9日，筹划了杰尔巴岛战役并在此役中幸存的西西里总督给腓力二世写了一封直言不讳的信：“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如果能让陛下成为大海的主宰，哪怕将臣等全部变卖，将我本人第一个卖掉，臣等也在所不辞。只有控制了大海，陛下才能安享太平，陛下的子民才能得到保护。如果不能控制大海，等待我们的只有噩运。”^[1]

西班牙和意大利弥漫着对敌人入侵的恐惧。人们鼓起勇气，等待新的航海季节的到来。现在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挡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入侵。苏莱曼再次大举出击只是时间问题。地中海成了遍布谣言的海：每年春天，都会从伊斯坦布尔传来秘密报告，声称一支强大的舰队即将起航，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甚至对能够接触土耳其宫廷内层的人，这也很难理解。事实上，苏莱曼面临着更紧急的事务和问题。他的几个儿子之间争斗正酣，帝国和波斯之间发生了纠纷，他的众位维齐尔之间进行着权力斗争，并且还有瘟疫和粮食短缺的难题。大海上弥漫着“虚假战争”^[2]的气氛。每一年，腓力二世的领地都要加固海岸防御工事，但每年都又停下来。与此同时，深知西班牙海军脆弱现状的腓力二世开始建造桨帆船。法国人对他紧盯不放。1561年，法国国王收到的一份报告写道：“两个月来，西班牙国王命令巴塞罗那的造船厂劳作不歇，以便将几艘桨帆船和其他海船完工。”^[3]为了迎接不可避免的大摊牌，腓力二世正在迎头赶上。

1564年，地中海中部的上空终于刮起了风暴。那年夏天，圣约翰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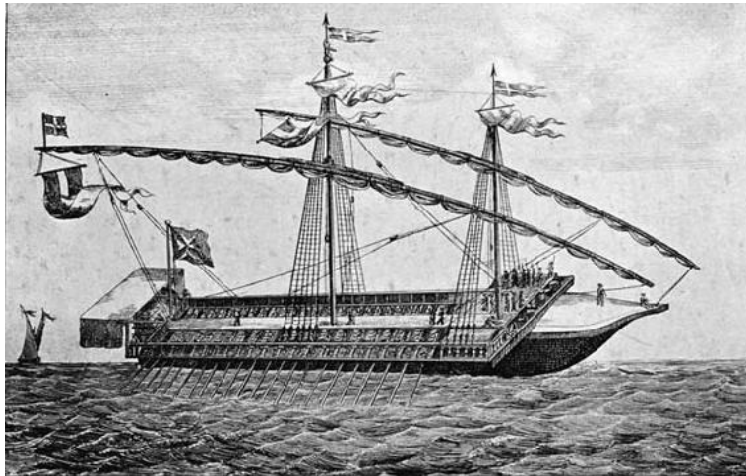
士团触发了一系列事件，一直影响到苏莱曼皇宫的楼台亭阁，并在无意中引发了争夺大海中心的决定性较量。

自骑士团于1530年抵达马耳他以来，他们的桨帆船群几乎每年都出海进行他们自己的海上圣战，以基督教的名义扫荡大海，劫掠伊斯兰世界的船只，并抓捕奴隶。让·德·拉·瓦莱特于1557年当选大团长以后，这种活动愈演愈烈。拉·瓦莱特年轻时曾参加罗得岛防御战，现在对海战激情满怀。圣战和谋求利润的海盗活动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对威尼斯人而言，骑士团不过是“举着十字架游行的海盗”^[4]，与穆斯林海盗是一丘之貉，他们的活动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这些海盗中为首的就是在1555年的旋风中幸存的罗姆加。在倾覆船体下的海水里泡了一整夜之后，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据说在那之后，他的双手抖个不停，喝酒时总会把酒洒出杯子。但罗姆加依然以高超的航海本领、无比的勇气和残忍暴虐而威名远播。穆斯林母亲们会用他的名字吓唬小孩去睡觉，但对士气低落的基督徒来说，他却是希望之源。希腊海岸居民听到罗姆加突然驾到的传言，争相带着水果和家禽作为礼物去海滩上迎接他。

他的袭击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骑士团只能派由5艘重武装桨帆船组成的微型舰队出海，但他们的攻击范围远至巴勒斯坦海岸，攻击力是惊人的。1564年夏天，罗姆加的活动突然间变得非常具有戏剧性。

6月4日，罗姆加率领骑士团的战船群在希腊西海岸外围巡游，遇到了一艘巨大的盖伦帆船“苏丹娜”号，以及护航的一队奥斯曼桨帆船。骑士们感到有利可图，于是冲杀上去，在激战之后将帆船俘虏。这是一个价值极大的战利品。这艘船属于苏丹的太监总管（他是宫廷的一位大员），满载价值8万杜卡特的东方货物，目的地是威尼斯。大帆船被开往马耳他，在那里很快成为羞辱奥斯曼帝国荣誉的一个强有力符号。同时，罗姆加再次出海，按照拉·瓦莱特的命令，对苏丹的航运进行大肆

破坏。他对目标的选择非常准确。在安纳托利亚外海，他用大炮击伤了一艘大型武装商船，在对方的高贵乘客弃船逃跑时将其俘虏。他抓获了开罗总督以及一位一百零七岁高龄的老妇，她曾是苏丹女儿米赫里马赫^[5]的保姆，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三天后，他俘虏了正奉苏丹之名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亚历山大港总督。这些达官贵人值一大笔赎金。罗姆加的桨帆船带着300名其他俘虏返回马耳他时，他每一桩暴行的消息都传到了伊斯坦布尔。米赫里马赫及文武百官的愤怒控诉在苏莱曼耳边回荡。老太太深受米赫里马赫的喜爱，她被劫持尤其令人痛心。她注定将在马耳他了却残生。大家都高声疾呼，要求对侮辱两海之王和信士长官的行为严惩不贷。



圣约翰骑士团的桨帆船

听着这些涕泗横流的哀叹的苏莱曼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在1521年以威仪和骑士风度震撼了基督教人质的年轻苏丹了。他已经七十岁高龄，统治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他向东西方发动了十几次大规模战争，讨伐他的竞争对手们；他的寿命超过了除了伊凡雷帝之外所有曾经与他角逐帝国霸业的君主们。苏莱曼是各个大帝国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帝王。他几乎像他的曾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那样残酷无情，就王者风范而言足可与查理五世匹敌。但就像他的最大对手查理五世一样，他也已经心力交瘁。

在欧洲人绘制的晚年苏丹的肖像上，他形容憔悴、心神不宁、眼窝深陷。他心中有很多悔恨。除了和西方的异教徒以及东方的穆斯林竞争者波斯国王进行了无休无止的战争之外，他还受到了很多奥斯曼体制内部问题的困扰：近卫军的蠢蠢欲动、文武官员的腐败和野心、皇子们的内战、不服从中央的少数民族的反叛、通货膨胀、宗教异端的爆发、瘟疫和饥荒。他在私人生活中则表现出了软弱和判断失误，经历了很多悲剧。在历代苏丹中独一无二的是，他为了爱情迎娶了自己最宠爱的女奴罗克塞拉娜（后来更名为许蕾姆^[6]），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残酷逻辑（只有一位皇子能够存活和统治）让他的家庭四分五裂。他经历了一些伤心欲绝的时刻。他目睹了最宠爱的儿子穆斯塔法被扼死，后者的罪名是密谋反对他。后来他才发现，穆斯塔法是无辜的。另一个皇子贝亚兹德连同他所有的幼小儿女一起被处死。到16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中只剩下了最无能的塞利姆能够继承皇位。苏莱曼年轻时曾经大张旗鼓、展示自己的富丽堂皇以和欧洲君主一争高下，但后来却越来越虔诚和稳重，因为他想强调自己作为哈里发地位守护者和伊斯兰教正统领袖的地位。他的宫廷笼罩在庄严肃穆的阴暗中。罗克塞拉娜死后，苏莱曼开始遁世。他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只透过一扇格子窗沉默地观看国务会议的进程。他只喝水，用陶制盘子用膳。他砸毁了自己的乐器，禁止贩卖酒类，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修建清真寺和慈善机构上。他患有痛风病，关于他身体日衰的传言飞遍了欧洲。在16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事态密切关注的各个欧洲宫廷不时听到苏丹已经垂死的消息。“苏丹还活着，但时日无多。”^[7]1562年，遥远的英格兰就得到了这样的颇有把握的报告。人们越来越相信，苏莱曼被他虔诚的女儿米赫里马赫以及宫内的虔诚人士控制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莱曼于1564年夏末获悉了马耳他骑士团肆虐的消息。基督教史学家相信，后宫圈子蒙受了损失（太监总管的船只被俘虏、米赫里马赫的老保姆被绑架、亚历山大港和开罗的总督被劫持），于是给被病痛困扰、受后宫女眷影响的苏丹灌了迷魂汤，他才决

定入侵马耳他。但是外人很难窥伺到奥斯曼帝国战略的内部运作。罗姆加的放肆袭击并不是苏莱曼决定彻底消灭医院骑士团的原因，而只是导火索而已。



年迈的苏莱曼

当然，如果白海的皇帝无法保障前往麦加的朝觐者的安全，的确有损虔诚苏丹的颜面；米赫里马赫一直在劝告苏丹，占领马耳他这个异教徒巢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但苏丹做出占领马耳他而且是必须在此时占领的决定，却另有深层原因。多年以来，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海军战略家都深信，土耳其人一定会进攻马耳他。巴巴罗萨早在1534年就梦想占领这个岛屿。图尔古特在1551年亲自向苏丹请求攻打马耳他。“在消灭这个毒蛇的巢穴之前，您将不会有任何进展。”^[8]马耳他的战略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制造的麻烦太大了，绝不能无限期地忽视它。有了马耳他，就有可能控制地中海中心；而且它的存在始终威胁着苏莱曼在北非的属地。苏莱曼原先以为医院骑士团在逃离罗得岛之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了，他们却一年又一年地兴风作浪，嘲笑他的威权。间谍向苏丹报告，骑士团计划在稳固的马耳他港口内兴建新的大规模防御工事。苏莱曼在罗得岛的老经验告诉他，如果骑士团在新家站稳了脚跟，将他们逐

出会非常非常困难。

1564年夏季，双方都在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土耳其人没能充分利用杰尔巴岛的大胜来扩大战果。意料之外的喘息之机让西班牙得以重整旗鼓。腓力二世密切注视着地中海，视其为关键战场。他在竭尽全力地建造桨帆船。1564年2月，他任命了一位睿智而经验丰富的老航海家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为海军司令。9月，伊斯坦布尔还在琢磨如何回应罗姆加最近的袭击时，堂加西亚从西班牙南部出发，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非洲海岸上的一个海盗基地——贝莱斯岛屿要塞^[9]。西班牙人在全欧洲范围内对这个小小胜利大肆吹嘘，令苏莱曼怒火中烧。腓力二世和苏莱曼除了分别对地中海之主的霸权地位提出主张外，都在盲目地冲向一场决定性的较量。

双方都深知，马耳他是地中海中部的关键所在。1564年秋，堂加西亚在给腓力二世的信中分析了奥斯曼帝国对西班牙在地中海所有基地的威胁。堂加西亚认为，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就是马耳他。如果守得住马耳他，西班牙就能增援南欧海岸，并最终将土耳其人逐出地中海西部。如果马耳他陷落，“基督教世界将受到严重损害”^[10]。土耳其人将以马耳他为跳板，向欧洲腹地发起更深远的攻击；西西里、意大利海岸、西班牙海岸，甚至罗马城都将在奥斯曼帝国的攻势前不堪一击。

在1564年10月6日的国务会议上，苏莱曼拍板决定入侵马耳他；按照基督教史学家的说法，苏丹此举是为了“开疆拓土、消灭对手西班牙国王的力量……他的舰队，或者至少是一支强大的桨帆船群。一旦占据这个最稳固的地点，非洲和意大利的所有王国都将称臣纳贡，基督徒的所有商业和私人航运都将得到控制”^[11]。这将是指向敌人心脏的一记猛击。

一个月后，苏丹任命了此役的指挥官们，并为此次征讨赋予了更明确的宗教意义：“我打算征服马耳他岛，因此我任命穆斯塔法帕夏为此

次战役的指挥官。马耳他岛是异教徒的一个总部。马耳他人已经封锁了穆斯林朝觐者和商人在白海东部使用的通往埃及的航道。我已命令皮雅利帕夏率领帝国海军参加此次战役。”^[12]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机器轰鸣着开动了。“虚假战争”寿终正寝。

苏莱曼将把整个帝国的资源投入到自早期十字军东征以来地中海上最为雄心壮志的海上冒险中。这是一场极其复杂、补给线漫长的远程作战。马耳他不是罗得岛。罗得岛离土耳其只有咫尺之遥，而马耳他却在土耳其以西800英里处，与基督徒控制的西西里距离很近，肉眼就可以看见，处在基督徒桨帆船大舰队的最远打击范围之内。罗得岛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足以供养一支入侵的军队，值得冒险去进行过冬的长期作战。马耳他却一贫如洗。遭到海风鞭笞和毒日炙烤的马耳他岛和附近较小的戈佐岛位于非洲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峡上，其实只是被侵蚀的山顶的遗留部分，冰河时代末期的大洪水将它们与西西里分隔了开来。马耳他的土地具有新石器时代的严酷：荒芜、干枯、多石且年代久远。岛上没有河流，也没有树木。在冬季，为了获取淡水人们不得不将雨水储存在石刻的蓄水池内。木柴非常稀缺，甚至按磅来出售。夏季气候非常严酷；湿润的海风从海中汲取水分，赤道般的闷热笼罩着全岛，足令身披甲冑的人窒息。整个岛只有20英里长、12英里宽，非常狭小，困难重重。可供登陆的地点很少：岛屿西岸有悬崖峭壁的保护，在东岸有若干小海湾可供部队上陆，还有一个优良的深水港（其自然条件在整个地中海无可匹敌）处于骑士团控制之下。入侵的军队必须自己携带在整个战役期间需要的所有东西：粮食、营帐、木材、攻城物资。土耳其人虽然能够得到北非海盗的有限支持，但主要还是依赖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时间选择也是极其关键的：他们出航既不能太晚，也不能太早。适合远征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他们也不能指望得到当地平民的帮助。马耳他人就像是地中海的巴斯克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民族，是他们居住的岛屿在历史上的特殊

地理位置（它是所有入侵、迁徙和贸易的中心）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马耳他人的血统非常复杂。一波波的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和西西里人被移植到古老的根茎上，形成了一个身份特殊的民族。“西西里人的性格，混杂有非洲人的特征”^[13]，一位在1536年来到马耳他的法国人这样描述当地人。马耳他人和伊斯兰世界关系密切，讲的是一种阿拉伯语（他们把上帝称为“安拉”），但他们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自豪地将自己民族的历史追溯到《圣经》里圣保罗遭遇海难、邻近多个岛屿接受基督教的时代。这些吃苦耐劳的人民依靠贫瘠的土地艰难谋生，忍耐着地中海世界的穷困生活。穆斯林海盗的长期侵袭使得马耳他陷入无法解脱的悲苦中，因此他们不大可能背弃他们的统治者——医院骑士团。马耳他人尤其畏惧享有“伊斯兰出鞘之剑”雅号的图尔古特。图尔古特在1551年发动的侵袭使5000人被卖为奴隶，戈佐岛居民被一网打尽。面对这样的恐怖，骑士团似乎是最好的屏障。

土耳其人对此心知肚明。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征伐都要进行全面彻底的准备工作。虽然有后宫的敦促，但入侵马耳他的决定绝非心血来潮。在此之前，土耳其人已经对马耳他进行了多年的侦察和刺探。奥斯曼帝国的地图绘制家皮里雷斯在《航海书》里已经给出了马耳他的地图，并对其做了描述；图尔古特劫掠这些岛屿达十几次之多，对当地非常熟悉，并将自己的知识广泛传授出去。在战役前不久，奥斯曼帝国的工程师们还装扮成渔民，对马耳他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用鱼竿测量城墙，带回了要塞工事的可靠布局图。据说苏莱曼手中有要塞工事的精确模型。奥斯曼帝国统帅部知道岛上哪里有水源，哪里有安全锚地，守军的兵力如何，又有哪些弱点。在伊斯坦布尔，将领们根据这些情报精心制定了策略：当务之急是夺取安全的港口，以保护至关重要的舰队，然后必须控制城墙；基督教骑士们身穿坚固的铠甲，因此务必要有相当数量的火绳枪兵。岛上缺少木料，这意味着建造攻城武器所需的全部木料都必须用船运来。至于攻城战术，由于当地的石灰岩地形，坑道作业难以

奏效；只能炸出一条路来，因此必须重视火炮。土耳其人希望，猛烈炮击能够打破骑士团的蓄水池，迫使敌人在暑热中无水可饮、迅速投降。

人力和物资的集结与协调需要复杂的筹划和后勤支持，但在战役的后台组织上，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帝国是无可匹敌的。专断的命令被发往帝国各地。士兵们受命到伊斯坦布尔周边和希腊南部的指定地点集结。战役记录中的不依不饶的口吻显示出了整个行动的庞大规模，发给各行省官员和总督的一连串简短命令也体现出一种焦虑：“粮食问题非常重要……缺乏火药……如果由于你的懈怠，炮弹、炮架和黑火药不能尽快送抵我处，以真主之名起誓，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不管在该处能找到何种水果和其他种类的食物，你应帮助商人尽快将它们运送给舰队……我的指挥部抵达时，尽快将船只所需的饼干烘烤完毕，小心谨慎地装上船，送往……切勿懈怠……你必须在当地召集自愿参加马耳他战役的船主。”^[14]整个帝国都忙碌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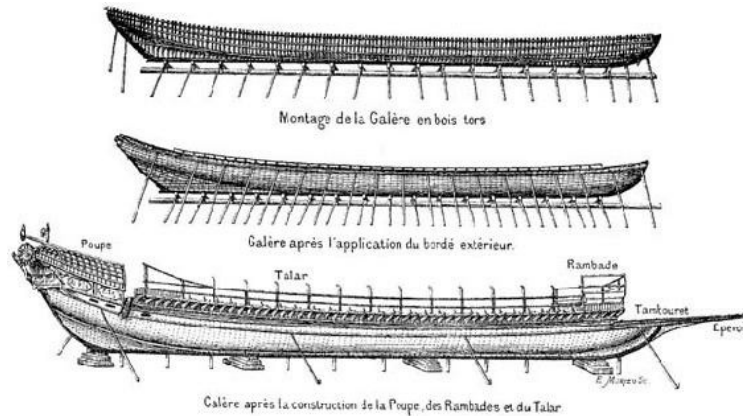
在伊斯坦布尔城内，外国间谍们很快意识到，土耳其苏丹终于准备开战了。战争即将爆发的证据就在他们眼前。所有外国人被禁止在主城内居住。他们必须居住在金角湾（构成伊斯坦布尔深水港的小海湾）对岸的有城墙的小城加拉塔^[15]。加拉塔位于金角湾之上的狭窄山坡，下方海湾里的来往情况尽收眼底，还能鸟瞰金角湾上游仅300码处的造船厂，那里的小海湾周围密密麻麻地坐落着木制仓库和船坞滑道。

造船是一项进展缓慢、噪音惊人的劳动密集型活动。只要认真观察，几乎不可能错过一项大型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中的迹象：笨重的驳船绕过海角，进入港口，满载着来自黑海地区森林的木材、绳索、帆布、焦油和炮弹。运载油脂（用来涂抹桨帆船的船体，以加强防水性）的牛车轰隆隆地在遍布车辙的小路上行进。造船厂除了核心人员——木匠、船缝填塞匠、制桨匠和铁匠外，还涌进了大量短期工人。在1564~1565年之交的冬季，空中持续回荡着刺耳的拉锯声、清脆的锤击声、斧凿声

和在铁砧上打铁的声音。煮沥青的大锅翻滚着冒出的黑烟与腐臭的动物油脂和锯末的气味交织在一起。

在造船厂内的船台上，船体从龙骨开始逐渐成形；木匠们在安装甲板、桅杆，并设置桨位。索具工人在装配船帆。战役准备的后勤工作涉及整个城市，甚至遥远的地方。在铸造工厂和铁匠铺，工人们在铸造或者锻造武器——炮弹、刀剑、标枪和炮架；面包师们在生产烘制两次而成的饼干；帝国的征兵官员在各个行省执行征募人员的命令。不久，大批人员将抵达伊斯坦布尔和加里波利，包括来自海岸平原地区的有经验的水手，以及来自巴尔干或者安纳托利亚的此前从未见过大海的健壮的农村少年，他们将担任桨手。基督徒奴隶们被关押在营地，等待被驱赶上船、与船桨锁在一起。

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飞速进行。一个西班牙人在2月报告称，土耳其人的战备“进展神速”^[16]。图尔古特已经强调，务必尽早出航，以赶上春季的大风。威尼斯人报告称，苏丹本人亲自视察了船只；他“多次表示希望亲自去造船厂，以便亲眼查看事情进展的情况，并不依不饶地催促远征尽快开始”^[17]。战备的成本是巨大的，大约是财政收入的30%，而且其他军事行动都得不到援助了。但将这些情况看在眼里的欧洲人却都说不准，此次战役的目标是什么。有人猜测是马耳他，也有人猜是西西里。西班牙人害怕土耳其人会进攻拉格莱塔——西班牙在突尼斯附近的战略立足点。甚至中立国威尼斯也准备加强自己的塞浦路斯领地的防御。土耳其人按照他们的一贯作风，把牌捂得紧紧的，坚持继续造船。



建造桨帆船的步骤

1564年12月，苏莱曼确定了指挥体系。他不会亲自出征，而是授权穆斯塔法帕夏指挥整个战役，后者是在波斯和匈牙利南征北战的老将，年轻时曾在罗得岛和医院骑士团作战。这位帕夏是久经战阵的将军，但性格暴躁，生性残忍，而且特别仇恨基督徒。协助穆斯塔法帕夏并主管舰队的是杰尔巴岛的英雄——皮雅利帕夏。按照基督教史学家的说法，苏莱曼命令穆斯塔法“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皮雅利；并命令皮雅利像尊崇自己的父亲一样尊崇穆斯塔法”^[18]。对马耳他有着第一手经验的图尔古特也应招从的黎波里赶到马耳他前线，他受命协助和辅佐穆斯塔法和皮雅利二人。“我要仰仗你的军事经验，”苏丹对这位老海盗说，“你必须在海上帮助穆斯塔法帕夏，保护我们的海军，对抗可能从其他国家出发、救援马耳他的敌人的海军。”^[19]后来的基督教史学家认为，权力分散在三个人身上导致了随后的巨大麻烦，但是穆斯塔法显然是战役的最高统帅。

3月，大量桨帆船、小型划桨船和驳船建成下水，并装载了物资。必须预先考虑到攻城所需的所有东西：62门大炮被拖上了船，其中包括2门能够发射巨大石弹的巨型蜥炮，还有10万发炮弹、2000吨火药、火绳枪及枪弹、箭矢及头盔、挖掘战壕和坑道所需的工具（“皮带、绳索、铁锹、鹤嘴锄、铲子、铁棒、木料”^[20]）、用作防御屏障的预制木框架、“用于搭建防御工事的大量兽皮、羊毛制袋子、旧帐篷和旧帆

布”、数量巨大的两次烘制而成的饼干及其他食品、帐篷、炮车、轮子。大规模战役所需的全部物资都经过帝国的财务官员（他们是所有战役的脊梁骨）一一登记在册、检查和清点。

3月30日，大军出征的那天，在土耳其人擅长的盛大仪式中，穆斯塔法帕夏接受了军旗和象征总司令权威的宝剑，然后在喧天鼓乐和欢呼声中登上了他的桨帆船“苏丹娜”号。这艘战船是苏丹本人的赏赐，由无花果木制成，拥有28个桨位，每个桨位从上到下有四名或者五名桨手，船上飘扬着红白两色的军旗。海军司令皮雅利拥有自己的旗舰，那是一艘非常美观的战船，船尾带有海军权威的象征物：三盏船尾灯笼、绿色丝质大旗和一块每边长达10英尺的锤扁白银制成的方形铭牌，其顶端附有新月和拖曳着马鬃的金球，象征帝国威严。第三艘旗舰——皇家桨帆船代表苏丹本人，这艘战船的船尾饰有月亮和金字的《古兰经》经文以及“土耳其风格的不同图景”^[21]。大军开拔是一幅了不得的盛景。晨祷之后，舰队起航了。画有《古兰经》经文、新月和弯刀的五颜六色的旗帜在微风中飘扬。船桨冲撞着金角湾的平静海水。海岸堡垒礼炮齐鸣；铙钹和笛子声震耳欲聋。士兵们腰杆笔直地坐在船上，一动不动，有如磐石。近卫军头戴白色头巾，顶端的鸵鸟羽毛在风中微动；神职人员头戴绿头巾，征募来的士兵戴白头巾。在聚集起来的伊玛目^[22]的喃喃祷告声和桨帆船的计时鼓点声中，庞大的舰队在皇宫草地下方驶出港湾，向白海进发。按照文献记载，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行动就这样“在胜利气氛中拉开了帷幕”^[23]。

但人们心中也有一些忧虑不安。虽然做了深度的筹备工作，但整个行动毕竟是为了赶上春季的有利风向而仓促开始的。奥斯曼人有没有妥善地估测风险呢？他们集结的兵力是否充足？一切是不是都太仓促了？仅仅几天时间，有些船只就不得不进行修理，重新填充船缝，重新给龙骨上油。一艘大船在希腊外海倾覆，损失了几百人和大量珍贵的火药。征募足够的桨手也像往常一样困难。

此次远征也并非深得民心。士兵们，尤其是下了马的骑兵，不喜欢长时间航海，并且有传言说，这次战役将会非常艰苦。有些士兵通过贿赂逃避参战。为了凑齐兵员，不得不赦免一些罪犯。首席大臣阿里的一句话对这些困难做了概括，并暗示了行动的风险和指挥层的严重问题。阿里志得意满地留在苏丹身边，在观看穆斯塔法和皮雅利登船时，俏皮地讥讽道：“这两个生性快活、酷爱咖啡和鸦片的人，将一起在群岛周边观光游览。”^[24]急于出航的舰队还忽略了一项重要的仪式：他们没有按照惯例去参拜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巴巴罗萨陵墓，那可是保佑航海一帆风顺的吉祥物。

^[1]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986

^[2] “虚假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到次年5月德国入侵西欧之间，在法德边境上，双方虽然已经互相宣战，但都按兵不动的现象，又称“静坐战”。

^[3]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10

^[4] Mallia-Milanes, Victor, *Venice and Hospitaller Malta, 1530-1798: Aspects of a Relationship*, Malta 1992, p.64

^[5] 米赫里马赫（1522～1578），苏莱曼一世与宠妃许蕾姆的女儿。米赫里马赫的意思是“太阳和月亮”，因为据说她是在春分日出生的，这一天日夜等长。米赫里马赫积极赞助文艺和建筑事业，周游整个帝国，参与政事，并辅佐她的弟弟塞利姆二世。

^[6] 罗克塞拉娜（1510～1558），据说原是来自利沃夫（当时属波兰，今属乌克兰）东正教家庭的民间女子，在一次克里米亚汗国对当地的劫掠中被掳为奴，并被售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她被选入苏丹的后宫。很快她就获得了苏莱曼一世的宠爱，为他养育了四个孩子，后来更是令人吃惊地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同苏莱曼正式结婚，成为他合法的皇后。在其影响下，终其一生奥斯曼帝国和她的祖国波兰都保持了和平。苏莱曼一世逝世后，罗克塞拉娜的儿子塞利姆二世继承了苏丹宝

座。“罗克塞拉娜”的意思是“乌克兰人”。土耳其人称她为许蕾姆，意为“欢快的人”。她的传奇一生成为许多艺术作品的题材，包括约瑟夫·海顿的63号交响曲等。

[7] Fisher, Alan, “The Life and Family of Süleyman I” in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p.7

[8] Bradford, Ernie, *The Great Siege: Malta 1565*, London, 1999, p.17

[9] 今称戈梅拉，位于地中海西南部，摩洛哥北岸，属于西班牙管辖。现在已经与大陆连为一体，成为半岛。

[10] Guilmartin, John Francis, *Galleons and Galleys*, London, 2002
Guilmartin, John Francis, *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74, p.106

[1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494

[12] Cassola, 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 1995, p.19

[13] *The Grear Siege 1565*, p.4

[14] Cassola, 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 1995, p.325 et seq.

[15] 今天是伊斯坦布尔位于欧洲部分贝伊奥卢区的一部分。它坐落于金角湾北岸，一道水湾将它同老城隔开。

[16]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15

[17]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845

[18]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01

[19] Cassola, 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 1995, p.7

[20]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33

[21]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2003) , fol.47

[22]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社会的重要人物。在逊尼派中，伊玛目等同于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指定政治继承人。逊尼派认为伊玛目也可能犯错误，但假如他坚持伊斯兰教的仪式，仍要服从他。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拥有绝对宗教权力的人物，只有伊玛目才能明晓和解释《古兰经》的奥秘含义，他是真主选定的，不会犯错。这里指的是主持礼拜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是一种荣誉称号。

[23]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34

[24]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288

8.入侵舰队

1565年3月29日～5月18日

伊斯坦布尔城内与西欧通气的土耳其职业眼线们每天都向西方发去报告。“3月29日早上，舰队司令和总司令穆斯塔法亲吻了苏丹的手，接受了授权。”富格尔银行家族^[1]发出了这样扣人心弦的紧急通讯。“舰队驶向何方，尚不明确，但有迹象表明，目标是攻打马耳他。”^[2]在800英里之外的马耳他，拉·瓦莱特在1564年底前就得到了土耳其人备战的消息。骑士团在地中海各个主要的信息集散地都有自己的情报来源。1565年1月，大团长渐渐开始采取措施。

不知是因为多年“虚假战争”的影响（几乎每年春天都有消息称奥斯曼舰队将大举西进），还是因为穆斯林军队的目标也许是拉格莱塔，又或者是因为骑士团缺乏资金，或是因为拉·瓦莱特个人的优柔寡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马耳他几乎所有的防御措施都做得太晚了。



拉·瓦莱特

1565年春，大团长已经七十岁高龄。他为骑士团坚持不懈地效劳了一辈子。他在二十岁时加入骑士团，此后就一直没有回过自己在法国的家，这在骑士们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以基督之名进行的圣战：他曾与巴巴利海盗的斗争中身负重伤；他曾经被俘做了一年的划桨奴隶；他曾经担任桨帆船舰队司令和的黎波里总督。拉·瓦莱特虽然生于15世纪，却具有封建时代十字军的古风：冷峻严肃、不屈不挠、激情如火、具有强烈的基督教使命感——这令威尼斯人颇为恼火。“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西班牙军人弗朗西斯科·巴尔比^[3]写

道，“威风凛凛，很好地保持了大团长的尊严。他生性忧郁，虽然年事已高，但非常强健。他非常虔诚，记忆力惊人，睿智、机敏，在陆地和海上戎马一生，经验丰富。他温和、耐心，会讲多种语言。”^[4]虽然巴尔比对他评价很高，但有迹象表明，拉·瓦莱特毕竟不是个年轻人了：他的签名字很大、笔迹颤抖，至少说明他眼睛近视，而且他在为一场不确定的战争进行代价高昂的准备工作时，显得过于谨慎。现在，岛上开始疯狂地准备防御工事，但几乎已经太晚了。就像罗得岛一样，马耳他的安全依赖于死守堡垒。但在1565年初，这些堡垒还有不少缺陷。

马耳他的关键在于东岸的绝佳天然良港（由一系列复杂的小海湾和小半岛组成），它深入陆地4英里，构成了一系列绝佳的安全锚地。在港湾内的两座邻近的小型海岬上（它们就像被系在岸边的石头桨帆船一样，从大港湾里突出来），骑士们分别建造了一座要塞。第一座要塞比尔古（城镇）是骑士团自己的基地，按照惯例，周围环绕着带有棱堡的城墙和深深的壕沟。这个海岬不大，长1000码，一端逐渐变细，突入海湾的最尖端处建有一座坚固的小城堡——圣安杰洛堡，居高临下地俯视周边海域。第二座要塞森格莱阿与比尔古之间相隔300码宽的海面，建设得没有那么完备，但在朝向陆地的一端建有一座堡垒——圣米迦勒堡。作为一个防御体系，这两个海岬是互相依赖的。两个海岬之间的小海湾构成了一个安全的港口，骑士团的桨帆船群就停泊在这里；1565年春，被俘的奥斯曼帝国太监总管的大帆船也停在这里。小海湾的出入口可以升起铁链，封闭港口；两座堡垒之间有浮桥相连。1565年春，骑士团面临的问题是，比尔古和森格莱阿面向陆地一侧的防御工事都没有完工。

更糟糕的是，这里的地形不利于防守。两座堡垒后方的地域都更高，而且海对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半岛，称为希伯拉斯山，那是整个港口的战略关键所在。希伯拉斯山的一面俯瞰着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另一面则俯视一个与两座堡垒间的小港对称的深水港——马萨姆谢特。多年

来，连续多位来访的意大利军事工程师都建议骑士团在希伯拉斯山上建一座新的要塞，作为自己的首府；那样的话，不仅能够完全控制岛上的安全锚地，还能占据有利地势，固若金汤。但骑士团没有采取多少措施去实践这条良策；他们仅仅在希伯拉斯半岛的一端匆忙建造了一座小型星形要塞——圣艾尔摩堡，为港口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拉·瓦莱特在审视他的防御体系时清楚地认识到，全部三座堡垒——比尔古、森格莱阿和圣艾尔摩堡都是半成品，急需修补和巩固，才有可能抵挡奥斯曼帝国经验丰富的攻城炮兵。1565年初的几个里，骑士团开始缓慢地施工。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骑士团约有600名骑士，比半个世纪前在罗得岛上时多不了多少，而且其中很多人分散在欧洲各地。2月10日，大团长发布征集令，命令所有骑士在马耳他集合。大约500人在围城开始前赶到。在战时，骑士团的惯例是征募雇佣兵和当地平民，以补充兵力。1月，拉·瓦莱特开始安排招兵买马，其中包括西班牙国王派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队伍，以及雇佣兵。但集结这些士兵，并将他们从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运到马耳他的过程非常缓慢，最后及时抵达的兵员寥寥无几。第三个兵力来源——马耳他本地的民兵，在拉·瓦莱特眼里是一钱不值的。他这样描述他们：“几乎毫无斗志，很容易被火绳枪和炮火吓瘫。”^[5]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团长的轻蔑是没有根据的。马耳他人成了战斗主力，而且完全忠诚可靠。

与此同时，骑士团还在大力搜罗给养。在岛上，大量淡水被装在陶罐里，送往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另外还派遣船只到意大利去收购粮食。这并不容易，因为地中海地区爆发了饥荒，粮食非常短缺。于是罗姆加扣押了不幸来到马耳他海峡的运输船，征用了它们运载的货物。骑士团还将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老人、自由穆斯林和娼妓）强行疏散，送往西西里。尽管如此，很多马耳他平民通过请愿，被允许留下来。守城

所需的物资、武器装备和粮食被运到岛上：“锄头、鹤嘴镐、铲子、五金器具、篮子……面包、粮食、医药、葡萄酒、咸肉和其他物资。”^[6]粮食被储存在宽敞的地下室内，并用石头封死大门。援兵陆续抵达：西班牙和意大利步兵，雄心勃勃、有志于保卫基督教的冒险家组织的志愿兵队伍，以及骑士团人员在意大利招募的雇佣兵。马耳他和西西里之间的海峡来往交通非常忙碌。旨在完成森格莱阿围墙和巩固比尔古棱堡群的施工也开始了，但进展很慢，因为建材需要从意大利进口，而且非常缺少劳动力。拉·瓦莱特征募马耳他人（男女都有）来修建防御工事。骑士们自己，甚至大团长本人，每天都要干几个小时的活，给大家树立榜样。同时拉·瓦莱特写信给他的世俗君主——西班牙国王，以及他的精神领袖——教皇，恳求他们提供兵员和经费。

地中海的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土耳其舰队的一举一动。传递情报的船只在海上穿梭来往。对腓力二世而言，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企图显然是间接针对西班牙的。“土耳其舰队此次出动的桨帆船比以往历年都多，”^[7]他在4月7日写道。巴塞罗那的造船厂在日夜运作；在一阵恐慌中，腓力二世命令征集民船，作为最后的抵抗力量。春季，奥斯曼舰队快速行动，绕过希腊，在各个预定的集结点收纳更多的粮食、淡水和兵员。4月23日，舰队抵达雅典；5月6日，抵达希腊南部的莫东；5月17日，西西里岛锡拉库萨港的指挥官派人给西西里总督送去一份十万火急的报告：“凌晨1时，卡西比莱^[8]的岗哨连开了30炮。我担心，连续开了这么多炮，一定是因为土耳其舰队到了。”^[9]

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恐慌情绪如野火般不脛而走。所有人都理解马耳他的重要性，如果敌人的目标真的是马耳他的话。外交官之间的交流回荡着压倒一切的危机感，但欧洲仍然是老样子：四分五裂、互相猜忌。在1565年，基督教国家联合一致抗敌的希望就像1521年在罗得岛和1537年在普雷韦扎一样渺茫。教皇庇护四世高声疾呼，号召各国组成一个新的神圣联盟，对抗异教徒，但得到的回应让他大失所望。他向腓力

二世馈赠了大笔金钱，让他建造桨帆船，但对方没有什么积极反应。西班牙国王“遁入森林了”，教皇抱怨道，“而统治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尽是妇孺之辈”^[10]。^[11]危险极大，支援却极少。他认识到，苏丹“一定要来损害我们或者天主教国王（腓力二世），土耳其的舰队非常强大，士兵勇猛无畏，为光荣和帝国而战，也为他们的荒谬宗教而战”。土耳其人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我们资源匮乏，而且整个基督教世界一盘散沙”^[12]。同时，教皇向骑士团许诺，将竭尽全力支援他们。

腓力二世虽然天性优柔寡断，但并非无所事事。西班牙人在杰尔巴岛惨败后，一直在努力重建自己的舰队。1564年10月，腓力二世任命他的海军司令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为西西里总督。于是整个地中海中部和马耳他岛的防御成了堂加西亚的职责。他“秉性严肃，具有卓越的判断力和丰富的经验”^[13]，对战略局势有着准确的理解，但被无法克服的困难掣肘。他缺少奥斯曼帝国那样的资源协调能力，也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西班牙舰队是四支分舰队（分别属于那不勒斯、西班牙、西西里和热那亚）的联合体，部分力量还要依赖像多里亚那样的私营桨帆船船主。将所有这些部队及其全部桨手、士兵、弹药和给养集结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庞大任务，何况同时还要保护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免受海盗的肆意袭击。土耳其人是在风平浪静的海域航行的，而集结中的西班牙舰队却要忍耐地中海西部更为棘手的大风。到1565年6月，马耳他已经被攻打一个月之久，堂加西亚还是只能集合25艘桨帆船；土耳其人则派来了165艘。腓力二世的海军司令不得不小心谨慎。如果他羽翼未丰的舰队被歼灭，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但他也开始在西西里集结兵力和资源，为抵御奥斯曼帝国的进攻早做准备。

4月9日，堂加西亚率领30艘桨帆船，渡过仅30英里宽的海峡来到马耳他，与拉·瓦莱特会晤。两位指挥官一起视察了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防御工事。然后堂加西亚要求去视察希伯拉斯尖端的星形堡垒——圣艾尔摩堡。精明的西班牙老将立刻准确地指出了这个小堡垒的战略意义。

他认为圣艾尔摩堡是整个防御的关键所在。敌人一定会努力尽早占领此地，以便为其舰队提供安全的锚地，并阻断外界救援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海路。“岛上所有其他要塞的命运都取决于这座堡垒。”^[14]务必“尽一切努力，尽可能久地保卫和守住圣艾尔摩堡”，以便拖住敌人，为集结足够强大的援军争取时间。但圣艾尔摩堡的整个结构还不完善：它规模太小，不能容纳很多士兵和火炮；建筑水平不高，还没有合适的胸墙。堂加西亚对地形进行了仔细勘察，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弱点。在圣艾尔摩堡西侧，大海之上，有一个侧翼非常脆弱：“敌人能够轻松突破此处。”^[15]他建议尽快建造一个侧翼堡垒（用城防工程师的术语，这叫“三角堡”，就是一座三角形的外部堡垒，用于防护那一段城墙），并命令他的军事工程师监督此项工程。

次日，他起航前去视察突尼斯的拉格莱塔港的防务，临走之前向拉·瓦莱特许诺将派遣1000名西班牙士兵前来支援，还留下了自己的儿子，作为信誉的保证。总督没有带来援兵，这让拉·瓦莱特颇为失望，但堂加西亚自己也在四处搜罗人马，以便击退土耳其人。他看到骑士团的5艘桨帆船和拉·瓦莱特私人所有的2艘战船，请求拉·瓦莱特借船给他。如果土耳其人来了，这些战船肯定会被封锁在港内，没有用武之地。骑士团属下的1000名穆斯林划桨奴隶也是珍贵的资源，他们如果留下，在围城战中会有帮助，但也可能造成威胁。拉·瓦莱特礼貌地拒绝了堂加西亚：他的桨帆船还要运输物资，而奴隶劳工正在城墙上做工。两人道别时，堂加西亚给了大团长三点建议：作战会议应仅限于少数几个值得信赖的人，以确保能够秘密而迅速地做出决策；应当禁止鲁莽的骑士们逞强地冲出城墙作战，这样做虽然英勇，却十分愚蠢，因为守军兵力有限，不能轻易损失人员；最后一点是，大团长本人不应当身先士卒，“因为经验表明，在战争中，领袖的死亡常常导致灾难和失败”^[16]。然后堂加西亚就启程了。

岛上的战备工作更加十万火急地进行，但拉·瓦莱特或许还不知

道，敌人进逼的速度是多么快，他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骑士团疯狂地苦干，拼命抢修三角堡（它其实比一座土木工事强不了多少），以加强圣艾尔摩堡的防御。5月7日，一艘桨帆船在森格莱阿和比尔古之间港湾的出入口布设了铁链，将内层海域封锁起来；5月10日，若干连队的西班牙士兵和雇佣兵抵达，令守军精神为之一振。骑士团对人员和装备进行了集结；对马耳他民兵进行了基本的火器射击训练，“每个人都要向目标开三枪，成绩最好的人会得到嘉奖”^[17]；火药作坊在赶制火药，石匠在开采用来修建城墙的石料；在骑士团的军械库内，铁匠们在抡动大锤，修理头盔和胸甲。各个防区和资源（淡水、火药、奴隶）都指定了专人负责；设计了烽火讯号及警告敌人接近、鸣炮为号的方案；还计划向乡间的水井和其他水源下毒、将平民疏散至有防御的避难地、收割庄稼和集合牲口。总之，坚壁清野，用一片荒芜和贫瘠的土地迎接土耳其人。为了鼓舞士气，骑士们身穿威风凛凛的钢甲和红色罩袍，举行了阅兵式。

除了港口之外，还有两三个对马耳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点。其中一处是临近的戈佐岛上的小要塞；另外一处是马耳他岛中心的姆迪纳城堡。姆迪纳被当地人称为“老城”，是马耳他原先的首府。这座拥挤的中世纪城堡内分布着狭窄的小巷和迂回曲折的大道，环绕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壁垒，是岛屿中部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鸟瞰全岛，甚至可以看到9英里外的港口。过去马耳他人遭到袭击时常常会选姆迪纳为避难地，但它的防御工事其实已经过时，无法抵御炮火。拉·瓦莱特任命了一位葡萄牙骑士佩德罗·梅斯基塔为姆迪纳城及马耳他岛其他地域的指挥官。当地居民看到所有的防御资源都被集中到港口，不免紧张不安起来。为了安抚他们，部分士兵被派遣到戈佐岛和姆迪纳。骑士团的骑兵也都集结在姆迪纳，可以从那里出动，突袭敌人。

虽然有了这些准备工作，马耳他岛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5月18日早上，圣安杰洛堡和圣艾尔摩堡的观察哨发现东南方30英里处的海

平线上出现了船帆，在黎明的清澈阳光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时庄稼还在地里没有收割，牛群还在吃草，关于疏散平民的安排还没有解释清楚，各位骑士的岗位分配还没有最终确定，防御工事仍然没有完工，要塞城墙下的房屋（它们有可能为敌人所用）还没有被拆除。奥斯曼帝国战争机器的速度、效率和后勤水准让整个地中海中部目瞪口呆。

要塞大炮发出了三声炮响的警告信号，战鼓擂动，军号吹响，烽火台的火焰将敌人入侵的消息传遍全岛。平民当中发生了恐慌。人们蜂拥向姆迪纳。靠近港口的平民挤进小小的圣艾尔摩堡，或者逃往比尔古，“带着自己的孩子、牲口和货物”^[18]。汹涌的人流聚集在比尔古城门前，拉·瓦莱特不得不派遣一队骑士将部分平民带往邻近的森格莱阿半岛。

到中午时，守军就能了解到奥斯曼舰队是多么庞大。所有的文献记载都表明，这是一幅超乎寻常的盛景。“土耳其舰队离马耳他还有15～20英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白色的棉布船帆遮盖了东方的半个海平线，”^[19]贾科莫·博西奥^[20]记载道。这景象真令人魂飞魄散：数百艘舰船以一个巨大的新月阵形驶过平静的海面——130艘桨帆船、30艘小型划桨船、9艘运输驳船、10艘大帆船、200艘较小的运输船，载有3万名士兵。入侵舰队遮蔽了整个视野，可以清楚看到3艘五颜六色的旗舰，它们的旌旗在风中飘扬。每艘旗舰“都有5层桨，装饰得富丽堂皇；苏丹的旗舰有28个桨位，船帆红白两色；穆斯塔法的旗舰上飘扬着苏莱曼亲自赐予的司令旗，穆斯塔法本人带着两个儿子就乘坐着这艘旗舰；皮雅利的旗舰带有3盏灯笼。3艘旗舰的艏楼上都雕刻着新月图案和复杂的土耳其文字，分别装饰有华丽的丝绸天蓬和奢华的锦缎”^[21]。

有人从圣安杰洛堡的城堞上观看敌人的舰队，也有人在桨帆船里腰杆笔直地翘首眺望。对他们来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刻。四十四年前，相隔大半个世界和人的一生，拉·瓦莱特曾经站在罗得岛的壁垒上，目

睹这样的情景。和他一起在马耳他的一些年老的希腊人也能回忆起年轻的苏莱曼的入侵舰队在东升旭日中从亚洲海岸驶来的景象。穆斯塔法帕夏当年也曾在罗得岛上观看骑士团在一个冬日的清晨起航离去。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争夺地中海的战线一直在向西推进，现在已经到达了大海的中央。在这个明媚5月的清晨，轻轻颠簸的桨帆船内戴头巾的武士们凝视着马耳他港口的石灰岩高地。身穿钢甲和红色罩袍的骑士们也注视着敌人。这是漫长战争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瞬间，就像每年吹动船只航行的有规律的季风一样，富有生命力而不可阻挡。

按照当时的标准，这场战役的筹划者和指挥官都是惊人地年迈。马耳他攻防战汇聚了整整一代帝王、海军统帅和将领的作战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几百次航行、劫掠和战役中慢慢积累起来的。苏莱曼、拉·瓦莱特、堂加西亚和穆斯塔法帕夏都已经七十多岁；正准备从黎波里起航的图尔古特据说已经八十岁。他们的人生都可以上溯到15世纪。似乎整个无踪迹可循的大海上所有的航海和作战经验都汇聚到了一个地点。这幕大戏的主角的命运就像航船在水中拖出的航迹一样，交错混杂；他们都有着胜利与失败、被俘和赎回的共同经验。拉·瓦莱特和图尔古特曾经见过面，当时图尔古特被安德烈亚·多里亚的侄子俘虏，正在基督徒的桨帆船上划桨，等待赎金。在杰尔巴岛春风得意的皮雅利将在此与当年的手下败将——西班牙指挥官堂阿尔瓦罗·德·桑德决一雌雄。尤其对图尔古特来言，马耳他是一个命运汇聚的地方。他曾经七次劫掠这个岛屿，他的兄弟就在戈佐岛上战死。由于未能从当地指挥官那里索回兄弟的遗体，大发雷霆的图尔古特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将全岛居民都卖为奴隶。曾有一个算命的人告诉图尔古特，他将死在马耳他岛上。

拉·瓦莱特派遣了一艘快船前往西西里，向堂加西亚报告消息，并召开了作战会议。前一年夏天被罗姆加俘虏的土耳其太监总管的大帆船仍然停泊在骑士团的内港，似乎在嘲讽敌人。

[1] 富格尔家族是德意志商业和银行业大亨，曾统治15、16世纪的欧洲工商业。家族的创立者汉斯·富格尔（1348～1409）是奥格斯堡的织工。在他的孙子乌尔里希（1441～1510）、格奥尔格（1453～1506），特别是雅各布（1459～1525）的经营下，家族开展国际贸易，包括香料和奴隶贸易，并在开采铜矿和银矿上获得大量财富。富格尔家族给予各国国王和皇帝贷款，并参与教皇免罪符的贩售，使家族在欧洲政治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招致马丁·路德的批评。查理五世因得到富格尔家族的财力支持，得以当选神圣罗马皇帝。16世纪后，富格尔家族逐渐衰落，但三个有爵位的支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

[2]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49

[3] 弗朗西斯科·巴尔比·迪·科雷焦（1505～1589），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科雷焦。除了他作为西班牙军队的一名火绳枪兵参加了马耳他战役之外，我们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他在整个战役期间写了日记，战役结束后出版，成为后世研究马耳他战役的主要文献来源。

[4]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29

[5] Spiteri, Stephen C., *The Great Siege: Knights vs.Turks MDLXV—Anatomy of a Hospitaller Victory*, Malta, 2005, p.117

[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499

[7]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15

[8] 西西里锡拉库萨的一个村庄。

[9]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16

[10]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847

[11] 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年仅十五岁；统治英格兰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苏格兰的是玛丽女王。

[12]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852

[13]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497

[14]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499

[15]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499

[1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499

[17] Bradford, Ernie, *The Great Siege: Malta 1565*, London, 1999, p.48

[18]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50

[19]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12

[20] 贾科莫·博西奥（1544～1627），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史官。他出身意大利贵族家庭，后来撰写了从骑士团起源到拉·瓦莱特的骑士团历史。

[2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12

9.死亡的岗位

1565年5月18日～6月2日

奥斯曼舰队南下绕过马耳他岛，在此过程中，岛上的一连串瞭望塔不断发出警示的炮声和烽火信号，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一支1000人的队伍从比尔古出发，监视敌人舰队向马尔萨什洛克（意思是“南风港”，这是一个宽敞的锚地，很适合登陆）行驶的进度。但基督徒军队出现在海岸上的景象让皮雅利决定不在南风港登陆，于是舰队绕过岛屿的西海岸，在石灰岩峭壁下航行。到黄昏时，舰队已经在一系列小海湾的清澈水域下锚。一整夜里，海岬上的岗哨观察着土耳其船只在锚地颠簸着，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在黑暗中，土耳其人开始上岸。

次日拂晓前，骑士团从姆迪纳派出了一队骑兵，由法国骑士拉·里维埃指挥。他们的任务是伏击侵略军，抓捕一些俘虏。这项行动以惨败告终。拉·里维埃和几名士兵精心隐蔽起来，观察着敌军的前卫部队，等待机会，这时另一名骑士脱离了隐蔽，策马向他冲来。感到困惑的拉·里维埃从藏匿处现身，却被土耳其人发现。已经失去了出其不意的奇袭机遇，于是拉·里维埃别无选择，只能向敌人猛冲过去，但他的坐骑被击毙，他自己被敌人俘虏后被拖向桨帆船舰队。守军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战争中，有价值的俘虏都会遭到毒刑拷打，以榨取情报。骑士团出师不利。

这是个星期日的早上。基督徒平民匆匆赶往要塞内的教堂，祈求上帝的救援，这时奥斯曼舰队快速驶回了马尔萨什洛克，开始大规模登陆。在海岸上远远观察的人能够看到一幅非同寻常的景象，既恐怖，又壮观，同时又陌生，似乎亚洲全部灿烂辉煌的盛景都在欧洲的海岸上绽放。土耳其人的服饰非常新奇，五光十色，帽子也稀奇古怪：近卫军士

兵蓄着令人难忘的大胡子，穿着长裤和长上衣；骑兵身披轻型链甲；狂热信徒穿着白衣；帕夏身着杏色、绿色和金色的长袍；半裸的苦行僧穿着兽皮；巨大的头巾、洋葱形的头盔、鸭蛋青色的圆锥形帽子、饰有微微拂动的鸵鸟羽毛的近卫军帽，以及形形色色的装备。近卫军携带的长火绳枪上镶嵌着象牙，呈阿拉伯式花纹图案。此外，他们还有由柳条和镀金黄铜制成的圆盾，匈牙利样式的尖盾，来自亚洲大草原的弯刀和柔韧的弓，饰有邪恶之眼、蝎子和新月图案的丝绸旗帜，以及用行云流水般的阿拉伯文书写的徽记。士兵们搭建起了钟形帐篷，演奏着音乐，发出各种嘈杂声响。



手持火绳枪的土耳其士兵

到第二天，奥斯曼军队的大部分物资和重炮都已经上陆，并向前推进，在比尔古和森格莱阿这两座堡垒的上方安营扎寨。这景象让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巴尔比感到一种诡谲的惊异。“在圣玛格丽特高地上搭建起了一座井井有条的营地，旌旗招展、五光十色。这景象让我们都惊异不已。他们所有乐器的声响也非常新奇，因为他们按照惯例带来了许多喇叭、号角、军鼓、风笛和其他乐器。”^[1]

喧闹的土耳其军队可能包括2.2万~2.4万名士兵，以及8000名负责支援的非战斗人员，但骑士团的史官总会远远夸大敌人的兵力。土耳其军队的核心是6000名近卫军，即苏丹自己的精锐部队，每人都配备奥斯曼长管火绳枪，欧洲人不熟悉这种枪，它填弹速度比较慢，但比欧洲火枪精确，是用来狙击敌人的，力量足以击穿中等重量的板甲。还有大队乘骑步兵，他们是受到战利品诱惑的志愿兵、水手和冒险家。此外还有一支炮队，以及相应的支援人员：军械士、工程师、坑道工兵、旗手、木匠、伙夫，以及其他随军人员，其中显然包括希望购买基督徒奴隶的犹太商人。这些人来自奥斯曼帝国的五湖四海。其中包括来自埃及的火枪兵，来自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萨洛尼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骑兵。其中很多人是叛教者，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在战斗中被俘后获得自由的前基督徒奴隶，或者受在伊斯兰大旗下作战的机遇吸引的雇佣兵；有些人根本不是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是形形色色的信仰和动机的大熔炉。有些人是为了伊斯兰教而战，有些人则是被强迫参战，或者是为了发财致富。

在骑士团的比尔古城堡内，人们沉浸在宗教狂热中。大团长和马耳他大主教组织了一次忏悔游行。教士和平民在狭窄的街道上行进，“虔诚地恳求上帝保护他们免遭野蛮人的疯狂攻击”^[2]。一位曾经被的黎波里海盜贩卖为奴的嘉布遣会^[3]修士——埃博利的罗伯特站在女修院教堂的祭坛前向群众授予圣餐，长达四十小时，并以激情澎湃的演讲震撼和感召了群众。

危机激起了骑士们最深切的圣战热情。他们在坚固的棱堡后抵抗伊斯兰世界进攻已经近五百年。他们在骑士堡、哈丁^[4]、阿卡和罗得岛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骑士神话：光荣地拼死抵抗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丝毫不畏惧大屠杀、殉道和死亡。这一连串为了基督教事业蒙受的失败恰恰证明了骑士团存在的意义。但拉·瓦莱特很清楚，马耳他将是最后的堡垒。如果战败，不仅会将基督教欧洲的心脏暴露在敌人面前，圣约翰

骑士团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马耳他守军约有6000~8000人。其中欧洲贵族骑士（他们身着坚固的铠甲，头戴尖顶盔，形似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外披带有白色十字的红罩袍，这象征他们对基督的忠诚，但也成为敌人狙击手的绝佳目标）顶多只有500人。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有堂加西亚派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职业军人连队。这些人效忠于西班牙国王，装备精良、斗志昂扬，但他们来马耳他不是为了争得荣耀。他们的期望和绝大多数军人是相同的：他们作战是为了军饷、赏赐和生存。在这方面，他们和很多穆斯林士兵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士兵中包括一位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巴尔比，他已经六十岁，而且穷困潦倒，作为火绳枪兵参加了这次战役，并存活下来，写下了关于这场攻防战的第一手记述。

除了这些职业军人，还有一些来马耳他追寻荣耀的绅士冒险家、一些来自罗得岛的希腊人、被释放的罪犯、划桨奴隶和改信基督教的前穆斯林（这些叛教者很不可靠）。马耳他战事将地中海各民族都聚集到了一个中心点。在这个命运和动机的市场上，有些人会突然改弦易辙；双方都受到叛徒的困扰，这些变节者有的是为了逃脱奴隶的枷锁，有的是为了改回自己原先的宗教信仰，有的是为了加入到更可能取胜的那一边去，也有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基督徒防御力量的基石是3000名坚忍不拔的马耳他民兵，他们戴着简陋的头盔，身穿有衬垫的棉布外衣。在骑士们身旁，这些民兵将证明自己对基督的事业忠贞不贰；笃信天主教的马耳他人愿意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多石的田地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个儿童。

5月20日，土耳其人开始从马尔萨什洛克港向内陆推进，进逼大港^[5]。在敌人前进过程中，拉·瓦莱特派遣若干小分队在破碎复杂的地域（这里有被围墙环绕的田地和灰尘滚滚的道路）伏击敌人。这些早期的交锋已经非常凶残。憧憬着光辉业绩的年轻骑士们在缓缓前进的土耳

其大军寻找水源的路上与他们捉迷藏。他们返回比尔古时，就像阿帕契族印第安武士一样，马鞍前部悬挂着死不瞑目的头颅、敌人的旗帜和从死人身上砍下的珠宝。一名骑士带回了一根戴着金戒指的手指；另一名骑士从一名土耳其军官衣着华丽的尸体上剥下了一只金手镯，上面雕刻着这样的字样：“我来马耳他不是为了财富或荣誉，而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6]土耳其人希望能够把当地居民争取到自己这边的幻想也很快破灭了。马耳他人偷袭敌人，并对其加以羞辱。他们杀死了一个土耳其人，在附近找到一只猪，将其屠宰，把死人放置在一个合适地点，将猪嘴塞进他的嘴里，然后躲在一堵墙后。其他穆斯林看到尸体时，恐惧而愤怒地冲上前去，想将战友从这死后的凌辱中解脱出来，却被伏击者全部击毙。

虽然守军在个别地点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土耳其大军的滚滚前进是无法阻挡的。土耳其人建立了营地，安排了守卫；尖木桩和帐篷上飘扬着旗帜；士兵们用马耳他人抛弃在田地里的牛拖运火炮和补给物资，基督徒的小规模侵袭被打退。穆斯塔法在俯瞰大港的高地上设置了自己的指挥部，并夺取了位于马尔萨的水源，守军曾经试图向水源投放苦草药和粪便。几天之内，整个岛屿的南部被侵略者牢牢控制，燃起了熊熊大火。土耳其人收集了所有能利用的物资——粮食、牲口、木柴，然后将田地付之一炬。从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城墙上也能看到“岛屿的那个部分看来完全陷入火海和浓烟中”^[7]。

安营扎寨之后，穆斯塔法命令将拉·里维埃（两军初次交锋时被俘的法国骑士）带到俯瞰比尔古的山上。他可能已经遭到了拷打。土耳其人命令拉·里维埃指示城防的薄弱环节，并许诺给他自由。拉·里维埃指出了两个地点：奥弗涅人和卡斯蒂利亚人的防区。帕夏决心试试骑士团的防御究竟有多强。

5月21日早上，全军滚滚前进。从城墙上眺望，景象无比神奇和壮

美：“土耳其军队以一个完整的队伍遮盖了整个乡间，队形就像一轮新月；从比尔古看去，这是一幅壮观的景象，只见士兵们穿着华丽和阔气的服装。除了他们光辉耀眼的武器和大小军旗之外，他们还携带着其他五颜六色的三角旗，从远处看去像是一块巨大、闪烁的鲜花海洋，还听得见他们在演奏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乐器，既悦目又悦耳。”^[8]土耳其军队接近时，这些盛景和音乐被“敌我双方大炮的可怕轰鸣和我们火枪的射击声”淹没了。

土耳其军队逼近时，守军敲响战鼓，并展开了圣约翰的红白两色大旗。拉·瓦莱特看到他的部下求战心切，决定测验一下他们的士气。等到敌人进入要塞大炮的射程后，他命令700名火绳枪兵开出城门，敲锣打鼓、旌旗招展，还派出了一队骑兵。他不得不手执长枪，亲自阻止热情澎湃的预备队也一起冲杀出去。如果他没有拦住他们的话，“比尔古就会成为一座空城，因为他们与土耳其人作战的热情如此高涨”^[9]。在五个钟头的激战之后，基督徒撤回城内，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杀死了100名敌人，自己只损失了10人。这是守军斗志高昂的明证。从卡斯蒂利亚人和奥弗涅人的防区射出了暴风骤雨般的枪弹，以至于穆斯塔法本人也遭遇了危险。这位帕夏的结论是，拉·里维埃撒了谎。拉·里维埃被带到一艘桨帆船上，在基督徒奴隶面前被残忍地活活打死。

次日，即5月22日，土耳其人对邻近的森格莱阿半岛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武力侦察。这一次，拉·瓦莱特记起了堂加西亚的建议，禁止部下冲出城门迎战。（堂加西亚的另一条建议——不要以身涉险——显然已经被大团长忽略了；他站在比尔古的城堞上，子弹在他身旁呼啸而过，他身边就有两人中弹倒地。）从此以后，守军将不再随意出击，而是依赖于防御工事。虽然拉·里维埃的欺骗给土耳其人造成了守军很强大的假象，但防御其实非常薄弱。据弗朗西斯科·巴尔比说，壕沟护墙“在某个地段非常低，对敌人来说根本不构成障碍”^[10]。守军日夜紧急施工，增高护墙。

与此同时，在位于马尔萨的新建营地，奥斯曼军队总指挥部在考虑可供选择的方案。甚至对经验丰富的老将来说，马耳他也是个难题，或者说是一连串错综复杂、变数很多的难题。要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复杂的港口设施、陌生的马耳他季风、土地的贫瘠、淡水的需求、从舰队到军营的漫长补给线。在罗得岛，入侵者面对的是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而在马耳他，他们还不得不考虑很多虽然不是那么棘手但非常分散的目标，所有这些目标都需要处理。

连为一体的两座海岬比尔古和森格莱阿构成了基督徒防御的核心，但它们与海对面希伯拉斯山上的圣艾尔摩堡（它是通往最佳港口的门户）是相互依存的。奥斯曼军队的大营在马尔萨，与停在马尔萨什洛克的舰队相隔6英里，而守军初期的袭击已经表明了保护补给线全线的重要性。另外，岛屿腹地的两座城堡——姆迪纳和戈佐岛上的城堡——也必须考虑，因为如果对其置之不理，它们可能成为游击战的中心和守军的集合休整地。这么多目标中，必须选择一个来首先处置；其他的目标必须先予以遏制。有必要兵分几路。这样的话，2.2万名士兵未必够用。

指挥官们还要考虑其他问题。在夏季，马耳他周边的季风比白海东部要难以揣摩得多，这让皮雅利颇为焦虑。他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证舰队的安全。假如船只被风暴摧毁，或者遭到敌人火船的大胆袭击，整个远征军将被困在岛上——而敌人随时可以从近处得到增援——并面对缓慢但不可逃避的集体死亡。马耳他处在信奉基督教的西西里岛的鹰翼庇护下，是西班牙国王的领地；西班牙人迟早会发动反击。漫长的交通线、有限的时间、无法在马耳他过冬：这都是必须再三斟酌的问题。

5月22日，土耳其将领们进行磋商之时，穆斯塔法和皮雅利两人间的关系变得高度紧张。海军司令和陆军统帅之间因为优先权和资历的问题有摩擦；两人都知道苏莱曼在注视他们；苏莱曼的皇旗和旗舰代表他

本人的存在，而且他的传令官也会将前线的一举一动报告给他。穆斯塔法和皮雅利在奥斯曼帝国宫廷内都广交朋友；两人都渴望荣耀，而竭力避免失败的耻辱。唯一能把两人联合起来的是对图尔古特的嫉妒，后者是苏丹设计的指挥层三角中的第三股力量，随时都可能从黎波里赶到马耳他。基督教国家的文献对两位土耳其大将在当天为了推动各自的策略所做的争吵、抉择和投票做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当然这描绘或许是高度虚构的，因为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基督徒奴隶能够涉足帕夏的华丽帐篷。

最后，他们选择的目标就是堂加西亚曾经预测的地点——小小的圣艾尔摩堡，“马耳他其他所有要塞的关键所在”^[11]。这项决定很可能几个月之前在伊斯坦布尔就尘埃落定了，那是出征很久以前的1564年12月5日的国务会议，当时工程师们向苏丹展示了圣艾尔摩堡的布局图和模型，并解释说，他们发现它“位于一个非常狭窄的地域，容易进攻”^[12]。当时在伊斯坦布尔城内的西班牙间谍向马德里发送了一份报告，除了一点搞错之外，准确地预示了后来战事的发展：“他们的计划是先占领圣艾尔摩堡，以便控制港口，让大部分船只在那里过冬，然后通过围攻拿下圣安杰洛堡。”^[13]现在穆斯塔法的工程师们再次勘察了地形，确信拿下圣艾尔摩堡是小菜一碟，估计只需要“四五天时间”；“没了圣艾尔摩堡，敌人得到救援的希望就彻底断绝了”^[14]。如果说他们自信能够迅速攻克圣艾尔摩堡的话，这个决定也有防御性的因素，甚至有一丝畏惧。拿下圣艾尔摩堡之后，“舰队就能够进入马萨姆谢特港内，得到保护，免遭风暴与海上灾害及敌人袭击的威胁，这样就不至于发生所有人被困死在岛上无法逃脱的情况”^[15]。甚至在战役伊始，他们就已经开始考虑离家万里作战的后果。尤其对皮雅利来说，保住舰队是压倒一切的。时间紧迫，将领们决定不等图尔古特来认可这个决定，而是立即开始行动。

对拉·瓦莱特来说，时间也是至关重要的。据说他从逃跑的叛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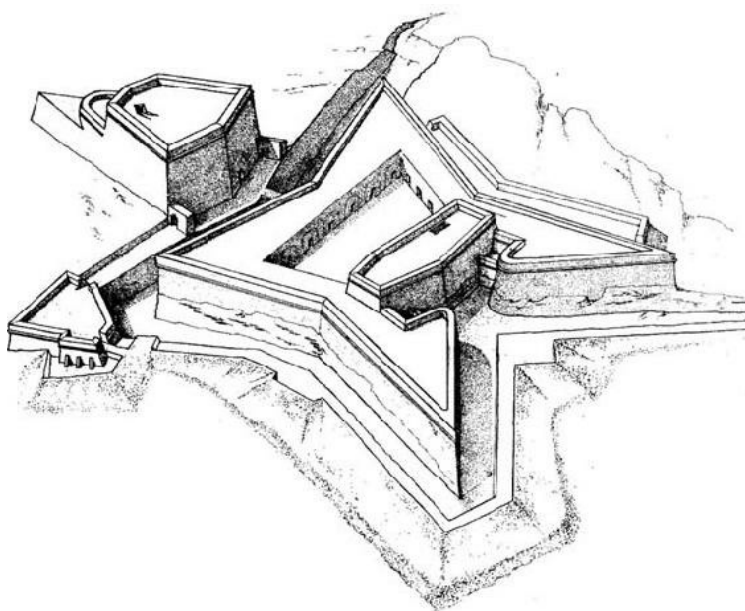
那里得知奥斯曼帝国的计划时，不禁向上帝致谢。敌人进攻圣艾尔摩堡的企图将为骑士团争取到一个喘息之机去修整森格莱阿和比尔古的防御工事，并向堂加西亚、腓力二世和教皇求援。要塞的施工不分昼夜，继续进行；城墙外可能为敌人提供掩蔽的障碍物（树木、房屋和马厩）全被拆除；所有平民都被发动起来，向城内运送大量泥土，以便修补遭炮火破坏的城墙。大团长只能劝导圣艾尔摩堡的守军死战到底，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5月23日，土耳其人开始将重炮（安放在轮式车辆上）从舰队运往希伯拉斯半岛。7英里的道路崎岖多石，非常难走，动用了大量的牲口和人力。旷野里回荡着铁轮子的嘎吱声、牛群的低吼声、精疲力竭的人们的呼喊声。巴尔比从森格莱阿观看着敌人的大炮：“我们可以看到每门大炮由10~12头阉牛拖曳，还有很多人拖着绳子。”^[16]

守军在做自己的准备。土耳其人在希伯拉斯半岛建立阵地之后，圣艾尔摩堡通往外界的唯一安全道路是从怪石嶙峋的前滩乘船穿过港口到比尔古，距离是500码。拉·瓦莱特命令将躲避在圣艾尔摩堡的一些妇女儿童疏散，并送去了给养、100名士兵（指挥官是马斯上校）、60名获释的划桨奴隶以及食物和弹药。圣艾尔摩堡守军一共有750人，大部分是胡安·德·拉·塞尔达指挥下的西班牙士兵。

从面向陆地的一面（土耳其人在此搭建了大炮的射击平台）看，圣艾尔摩堡呈低矮的长条形，就像一艘石头制成的潜水艇浮在多石山岭的一端。城堡布局呈四星形，其中两个尖角面向土耳其人正在建立阵地的山峰。城堡面向敌人的前方有一道在岩石上凿出的壕沟，在背面（即面向大海的一面）有座塔楼^[17]，它在整个城堡上方高高耸立，就像潜水艇的指挥塔。在城堡中心有一块操练场，操练场的前方有一座碉堡、一座蓄水池和一座小教堂，以便给士兵们提供精神慰藉。仓促修建起来的三角堡在城堡外面，由一座桥梁和城堡连为一体；如果遭到敌人的侧翼

袭击，外堡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但对从希伯拉斯山上俯视的经验丰富的攻城工程师来说，圣艾尔摩堡微不足道、弱不禁风。它的缺陷不胜枚举；它的设计不合理，建造得太仓促。它的胸墙太矮，又没有枪眼能保护士兵，所以开枪射击的守军一定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城堡规模太小，因此壁垒上无法安放很多火炮；它没有出击口，所以士兵们无法安全地离开城堡以便清理掉敌人为了填平壕沟而投入其中的东西，也很难发动反击。最糟糕的是，四角星的尖角太锐利，因此城墙下有大片射击死角，守军无法向那些地带开火。奥斯曼工程师对攻城任务的评估看来是中肯的。总的来讲，圣艾尔摩堡是个石头制成的死亡陷阱。



圣艾尔摩堡

圣艾尔摩堡的牢房和中央阅兵广场，士兵布置在后方，三角堡在左侧。

奥斯曼军队对攻城战术有着十足的把握。他们精通应用工程技术，擅长将大量人力分配到具体任务上，战前能够精心筹划，在战役中又能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并迅速设计出巧妙的新方案，他们的这些本领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匹敌的。奥斯曼军队曾在波斯和匈牙利

边境地带攻城拔寨，在罗得岛以惊人的速度挖掘地道，连敌人都承认奥斯曼军队“在土方工程上天下无敌”^[18]。现在他们开始以可怕的娴熟技巧着手工作。圣艾尔摩堡以及海对面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守军都无比敬畏地注视着敌人。这里满地碎石、缺少表层土壤和树木，因此坑道作业非常困难，但土耳其工兵还是“以蔚为奇观的勤奋和速度”^[19]将他们蜘蛛网般的坑道向前推进。由于坑道角度选择很巧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守军都无法向挖掘坑道的工兵射击。土耳其军队还从1英里以外运来泥土，以便搭建炮台。成百上千人排成长队，背着泥土袋子和木板走上山坡。这项行动的精心筹划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们的物资和修建炮台所需的部件都是在伊斯坦布尔预先制造好，然后从那里运来的。坑道不断逼近城墙，对守军虎视眈眈。几天之内，土耳其人就在离圣艾尔摩堡的壕沟仅600步左右的地方掘壕据守下来。很快，他们的前沿就抵达了壕沟边缘。他们建造了两座泥土平台，用以安置大炮，并用三角形的木制壁垒（灌满泥土）保护大炮。他们的前沿阵地上飘扬着鲜艳的旗帜；大炮被步履艰难地拖过光秃秃的山岭，一直拖到顶峰的炮位上。他们还建立了其他阵地，用来轰击一水之隔的比尔古。夜间，运输驳船静悄悄地驶进圣艾尔摩堡下方的马萨姆谢特港，运来成捆的木柴，用来填平城堡的壕沟。海对面的拉·瓦莱特惊恐地观察着敌人的活动，匆忙派人去西西里向堂加西亚紧急求援。

5月28日（星期一），奥斯曼帝国的大炮已经开始从山顶轰击圣艾尔摩堡。到星期四（基督教日历中的耶稣升天节）时，已有24门大炮就位，分成两排，有轮子的大炮发射穿透性的铁弹头，巨大的射石炮（其中一门参加了当年的罗得岛战役）则发射巨大的石弹。在首轮炮击之前，先用火枪进行一轮劈头盖脸的齐射，打得守军在胸墙后不敢抬头，然后大炮开始猛轰。炮群开始猛击圣艾尔摩堡面向壕沟的两个尖角和朝向三角堡的薄弱面。在海对面，拉·瓦莱特为了尽可能地打乱敌人的炮击，在圣安杰洛堡安置了四门大炮，轰击一山之隔能够看得见的敌人炮台。他的炮击取得了一定成效：早在5月27日，皮雅利就被一枚石弹碎

片打成轻伤；但是守军的火药消耗太大，无法继续炮击下去。

从一开始，守军就看不到一点好兆头。他们躲在胸墙后，只要一抬头，在夏日蓝天映衬下就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奥斯曼近卫军的狙击手们手持长管火绳枪待在下方的战壕里，监视着任何风吹草动。他们的耐心真是惊人，一动不动地埋伏起来，能够一口气坚持五六个小时，一直瞄着敌人方向，手指放在扳机上，就像等待猎物的猎人一样。他们在一天之内就击毙了30人。守军尽可能地搭建临时拼凑的防护胸墙；同时还用泥土或者其他任何随手能搞得到的东西来修补坍塌的城墙。几天之内士气就低落了下去：他们若是胆敢站直身子去观察在山上赫然耸现的奥斯曼大炮，就面临被狙击手打死的危险。敌人的战壕近在咫尺、炮弹四处开花和城堡的突出缺陷无不表明，他们的阵地是守不下去的。早在5月26日，圣艾尔摩堡守军就派胡安·德·拉·塞尔达在夜间游过了港湾。他是腓力二世麾下的西班牙军官，对骑士团没有效忠的义务。他向拉·瓦莱特及其议事会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大家对形势的判断，其实这也是大团长心知肚明的事情：圣艾尔摩堡太薄弱、太小，而且没有侧翼防护，“就像患有结核病的躯体，需要持续不断地吃药才能维持生命”^[20]。如果没有援兵，顶多能守八天。必须投入更多资源。

这可不是大团长乐意听的话。他的想法是，圣艾尔摩堡必须死守，以便争取时间让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加强防御，以及让位于30英里外西西里岛的堂加西亚派来救援舰队。他挖苦地“感谢”了胡安·德·拉·塞尔达的建议，并要求圣艾尔摩堡守军信守荣誉，死战到底。同时他许诺派遣急需的支援：梅德拉诺上尉指挥下的120名士兵乘船抵达了圣艾尔摩堡，梅德拉诺将接管心怀不满的西班牙士兵的指挥权；还给圣艾尔摩堡送去更多食物和弹药。伤员被送到了位于比尔古的骑士团医院。在这些果断措施的鼓励下，圣艾尔摩堡守军的士气有所回升，但他们的困境其实没有改观。闷燃的不满情绪将很快再次熊熊燃烧起来。

拉·瓦莱特和身在西西里的堂加西亚之间通过小船来回传递消息，这些船只似乎能够轻松地突破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封锁。总督的消息是非常令人垂头丧气的。他的船只和军队在集结过程中发生了不计其数的耽搁。组建一支特遣舰队的后勤工作极其复杂。有些桨帆船还在巴塞罗那进行装配；在热那亚，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一直在等待来自伦巴底的部队，后来又下了大雨，海况很糟糕，出航的风险太大。在西西里，堂加西亚有5000名士兵，但只有30艘桨帆船；而且土耳其人对此洞若观火。土耳其人可以让自己很多桨帆船的船员上岸干活，只留下70艘战船在海岸巡逻。同时，他们继续炮击。拉·瓦莱特把这些消息只告诉了议事会小圈子的人。

天气越来越热；夜间月色皎洁，但奥斯曼帝国的工兵日夜不停地猛干，他们的坑道像蛇一样蜿蜒前进，离城墙越来越近。他们还用从希伯拉斯山的陡坡搬运来的泥土修建防护墙。“这的确是非同寻常，”骑士团的史官贾科莫·博西奥宣称，“看着土耳其人在这荒芜的地方能够几乎在一瞬间就运来山一样的泥土堆，并用这些泥土建造棱堡和炮台，以便轰击圣艾尔摩堡；他们同时还将坑道和有掩护的交通壕快速地向前推进。”^[21]梅德拉诺发动了一些出其不意的袭击，扰乱土耳其人的工作，杀死他们的劳工。但在5月29日的一次袭击中，土耳其近卫军发动了反击，将他们的军旗插到了护墙上，离城堡的外围工事和三角堡都只有咫尺之遥。在5月31日（耶稣升天节），奥斯曼帝国的炮手以24门炮开始了一轮规模更大的轰击，决心将圣艾尔摩堡的工事炸成石块。炮击持续了一整夜，烈度不减。炮火一刻不停，按照守军的计算，这些大炮在射击过程中都没有得到清理或者冷却，这对大炮和炮手都是非常危险的。次日黎明，一发炮弹打倒了圣艾尔摩堡的旗杆和军旗。土耳其军中发出一声大吼，他们认为这是胜利即将到来的预兆。

圣艾尔摩堡守军争取到的时间在一水之隔的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得到了充分利用。士兵和平民与时间赛跑，疯狂地猛干，建起城墙、搭建胸

墙和作战阵地，因为一旦圣艾尔摩堡陷落，敌人的大炮就将转向他们的工事。夜间的炮火惊得城内的狗狂吠起来；拉·瓦莱特命令将狗全部杀死，包括他自己的猎犬，并不断派遣小船到圣艾尔摩堡。到此时，土耳其人已经开始发现他们计划的漏洞。于是他们在岸边部署了两门轻炮和一些火绳枪兵，希望能扰乱比尔古与圣艾尔摩堡之间的生命线。

6月2日早上，战局继续恶化。拂晓时，圣艾尔摩堡的“骑士塔”的观察哨发现东南方海上有船帆。一时间，守军希望这是堂加西亚救援舰队的先驱，但真相是可怕的。那是图尔古特和他的海盗们从阿尔及尔赶来了，共有约13艘桨帆船、30艘其他船只和1500名伊斯兰战士，而领导他们的是整个地中海上经验最老到，也最为足智多谋的指挥官。图尔古特受到欢迎的情况或许突出显示了他和已经在前线的指挥官们能力的巨大差别。皮雅利决心要让对方肃然起敬，于是率领自己的桨帆船群“以整齐的队形”^[22]迎接新来者。船队在经过圣艾尔摩堡时对城堡发出了一轮齐射。炮弹呼啸着掠过城堡上空，杀死了一些正在战壕内的己方士兵，而城堡的还击炮火将一艘桨帆船拦腰打了个大洞，土耳其人不得不赶紧将它拖走，免得彻底完蛋。

苏莱曼的最终希望可能寄托在了图尔古特这位“睿智而久经沙场的战士”^[23]身上，穆斯塔法和皮雅利对此也心知肚明。“伊斯兰出鞘之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马耳他；他不仅是个本领高强的航海家，还是经验丰富的炮手和攻城专家。这个老海盗登陆之后，很快掌握了前线局势。他不满地撇起了嘴唇。他或许根本就不主张进攻马耳他，而更愿意攻击较轻松的目标——在拉格莱塔的西班牙飞地，这对他自己的北非领地始终是个肉中刺。他或许也不同意先攻打圣艾尔摩堡（基督教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记述似乎都是虚构的），但既然攻城已经开始，越早完事越好。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刻亲自到前线去重新分析地形和炮兵的部署。他认识到兵贵神速：必须尽快把更多火炮送上前线，并且必须尽可能接近敌人。第二门重型射石炮被拖上了前沿，另外四门大炮被安置

在北岸，轰击圣艾尔摩堡脆弱的侧翼。他决心以尽可能猛烈的炮火将要塞炸为齑粉。于是，他在马萨姆谢特港对面的一个地点部署了一个炮队，对三角堡和“骑士塔”进行狂轰滥炸。不久，他又在对面的海岬上设置了另一个炮队。现在圣艾尔摩堡受到了180度的炮击；博西奥声称，炮火如此猛烈，“小小的要塞居然没有被炸成瓦砾堆，真是奇迹”^[24]。

图尔古特的最后一条建议是尽快拿下三角堡，“哪怕损失大量精兵也在所不惜”^[25]。

^[1]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49

^[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21

^[3] 嘉布遣会是天主教方济各修会的独立分支。1525年由玛竇·巴西（约1495～1552）创立。玛竇·巴西认为，方济各会修士的会服不合圣方济各所著原式，于是自行设计尖顶风帽，并蓄须赤足，许多人纷纷效法他的榜样。他们的生活简朴清贫。嘉布遣会在反宗教改革时期积极活动，力图让普通人保持对天主教的忠诚。现在主要从事传教和社会工作。

^[4] 位于巴勒斯坦的城市。1187年7月4日（十字军东征时期），阿拉伯人的著名统帅萨拉丁在此大破基督教军队，耶路撒冷国王和圣殿骑士团团长被俘。基督教军队作战时向来携带的圣物真十字架落入穆斯林手中。

^[5] 大港即比尔古、森格莱阿和希伯拉斯山围绕而成的港湾，它是马耳他岛的一个古老的天然良港，早在古腓尼基时代就是港口。

^[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22

^[7] Cig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ig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2003），fol.52

[8]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23

[9]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53

[10]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48

[1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26

[1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25

[13]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842

[14]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25

[15]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25

[16]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58

[17] 法国人把这种塔楼称为“骑士塔”，一般是指在城堡内部建造的高于城墙的塔楼，用以集中火力向下射击。

[18]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39

[19]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28

[20]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53

[2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p.531-2

[2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32

[23]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31

[24]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39

[25]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33

10.欧洲的三角堡

1565年6月3日～16日

拉·瓦莱特一天天向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发去十万火急的求援信，在信中再三强调马耳他的重大战略意义。一旦马耳他落入敌手，基督教欧洲将成为“一座没了三角堡的要塞”^[1]。欧洲君主们非常理解这个比喻。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基督教帝王和教士们嘴上常常使用意大利要塞工程学的术语。他们将整个基督教地中海视为一个巨大的同心圆防御圈，圆心就是罗马城——上帝的堡垒，它不断遭到大批野蛮人的攻击。外围防御工事一个一个地坍塌了。1453年之后，威尼斯成了欧洲的外墙；土耳其人在仅仅五十年内就突破了这道防御。罗得岛是基督教世界的盾牌。这面盾牌如今也破碎了。随着战线的退缩，土耳其人一步步逼近了圆心。现在马耳他成了欧洲的三角堡。所有人——罗马城的教皇、高坐马德里宫廷的天主教国王、身处与马耳他一水之隔的西西里岛的堂加西亚都理解它的意义：三角堡一旦陷落，要塞本身的末日就不远了。1565年5月底和6月初，对基督教世界防务的关注聚焦在一个点上。如果说欧洲的关键在于马耳他，马耳他的关键在于圣艾尔摩堡，那么圣艾尔摩堡的生死存亡则取决于防护它薄弱侧翼的那个临时拼凑的三角堡。图尔古特像拉·瓦莱特一样，对此一清二楚。他决定采取行动。

在一整夜的猛烈炮击之后，到6月3日早上，奥斯曼军队已经在接近壕沟、离三角堡的护墙仅有几十码的地方建立了掩蔽阵地。很讽刺的是，这一天恰好是圣徒艾尔摩（水手的主保圣人）的节日。

奥斯曼帝国的工程师们决意对前一夜弹幕炮击的效果做一番评估，于是溜进了要塞前的壕沟，接近了三角堡。堡垒内鸦雀无声，没有人呼喊口令，瞭望台上也没人开枪。他们一直走到要塞脚下，也没被守军发

现。守军的哨兵可能已经被一发火绳枪子弹击毙，静静地趴在胸墙上，“看上去好像还活着”^[2]。他的战友（仅有40人）以为他还在站岗。但有人说，三角堡守军是一群胆小鬼，已经躲藏起来。

工程师们悄悄溜走，把情况报告给了穆斯塔法。一队近卫军携带云梯匍匐前进，偷偷地爬过胸墙。他们大吼着冲进了三角堡，将遇见的第一批敌人打倒在地。其他守军拔腿就跑，仓皇之间居然没有拉起通往主堡的吊桥。一小群骑士坚定地冲杀出来，才阻止土耳其近卫军杀进圣艾尔摩堡。守军发起了一次勇猛的反击，想把入侵者赶出三角堡；有两三次，反击眼看就要成功，但更多的土耳其士兵如潮水般涌过壕沟，守军不得不撤退。土耳其人似乎闪电般巩固了自己在三角堡的阵地，搬进了成麻袋的羊毛、泥土和木柴，搭建起了一座壁垒，以防备守军从圣艾尔摩堡内发起反攻。这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上飘起了土耳其旗帜，这是军事占领的关键标识。但这只是随后激战的序曲而已。土耳其士兵们在壕沟内抵着墙壁竖起了云梯，发动临时组织的猛烈攻击，希望能够借此冲进圣艾尔摩堡。他们自认为必胜无疑，但这样的冲锋简直是自杀。守军向他们没有防护的脑袋投掷石块，泼下滚油。战斗的嘈杂震耳欲聋。按照基督教史学家的说法，“大炮和火绳枪不停地轰鸣，人们发出毛骨悚然的惨叫，浓烟滚滚、大火熊熊，似乎整个世界都要爆炸”^[3]。在五个小时的血战之后，土耳其人被迫后撤，在壕沟里丢下了500名精兵的尸体。守军声称自己只损失了60名士兵和20名骑士，其中包括法国骑士拉·加登普，他身负重伤，爬进要塞教堂，死在了祭坛脚下。奥斯曼军队虽然伤亡惨重，但控制住了三角堡。

守军几乎旋即就感受到了三角堡丢失的严重后果。土耳其人发疯地猛干，拼命巩固自己在三角堡的阵地，用灌满泥土的羊皮袋子堆起平台，直到它与城墙齐高。现在他们在离圣艾尔摩堡仅有几码的地方建立了攻击阵地；他们很快就能用两门缴获的火炮轰击圣艾尔摩堡的心脏地带。在下方的壕沟里，土耳其士兵可以一直走到城墙基部，而不必担心

遭到袭击。

到6月4日黎明，土耳其人还在加固三角堡的时候，人们看到一艘小船在接近圣艾尔摩堡下方的多石海岬；壁垒上的哨兵们提高警惕，准备射击，这时黑暗中响起一声叫喊：“萨尔瓦戈！”那是西班牙骑士拉斐尔·萨尔瓦戈。一艘从西西里来的桨帆船把他送来，溜过了港口周围的土耳其封锁线，带来了堂加西亚的口信。和萨尔瓦戈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经验丰富的米兰达上尉。两人爬上岸，在黑暗中简略地查看了一下要塞的情况，然后爬回船上。此时圣艾尔摩堡和比尔古之间的航道已经受到狙击手的威胁。船只已经不能在大白天往返；甚至夜间航行也险象环生。他们静悄悄地划船时，突然遭到一轮齐射，一名船员被打死。

拉·瓦莱特听萨尔瓦戈报告时，陷入了阴郁的沉默。如此粗心大意地丢失三角堡，着实是沉重的打击。西西里来的消息也让人鼓不起劲来：堂加西亚正在努力集结兵力，但估计要到6月20日才能派出援军。问题是，圣艾尔摩堡还能撑多久。米兰达第二次被派往圣艾尔摩堡，对那里的防御工事和守军士气做更细致的评估。他的第二次报告是斩钉截铁的：“如果土耳其人坚持进攻，圣艾尔摩堡是守不了多久的，因为守军的火炮缺少水平回旋的空间，效力很差。而且，守军背后没有任何据点，无路可退。”^[4]但拉·瓦莱特仍然想一探究竟。他派了另外几人专门去研究夺回三角堡的可行性，但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收复三角堡；应当尽其所能，巩固现有的防御。”^[5]从此刻起，岌岌可危的圣艾尔摩堡的每一分钟都是靠外界的输血死撑下来的。每天夜间，援兵和物资都被偷偷运过海湾，躲过敌人的炮火，使圣艾尔摩堡苟延残喘下去。

在三角堡陷落之后，拉·瓦莱特拼命维持圣艾尔摩堡的士气。于是，他任命米兰达为圣艾尔摩堡的实际指挥官。这位西班牙战士不是贵族骑士，但经验丰富、讲求实际，是个理解士兵疾苦的前线指挥官。宗

教的慰藉不能增强士兵们的斗志，看得见摸得着的奖赏却能起到这样的效果。米兰达请求给他金钱，“因为士兵们最喜欢的就是钱”^[6]，以及成桶的葡萄酒。他向士兵们发放了军饷，并在操练场周围有遮蔽的拱廊设立了赌桌和吧台。在短期内，这些刺激手段是有效的。

但土耳其人感到最后摊牌的时刻快到了。他们一刻不停地把三角堡加高，以便俯射圣艾尔摩堡，并向城堡内部猛烈射击。士兵们拼命苦干，用木柴、泥土和成捆的木料填充壕沟。与此同时，部分桨帆船的桅杆被拆下并拖到前线，改装成木桥，然后搭在壕沟上和邻近三角堡的地方，在那里作业的工兵可以得到火绳枪兵的保护。任何胆敢从胸墙上露头的守军会被当场击倒。工兵们还在城墙另一段修建了第二座桥。但架桥的工作激起了守军的猛烈攻击：他们冲杀出来，企图将第一座桥烧毁，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到晚祷时土耳其人就把桥修复了”^[7]。架桥工作继续进行：奥斯曼人建起了一座宽度可容5个人并肩行进的堤道，上面铺了一层泥土，以抵御火攻。蹲在胸墙下的守军完全无法阻止土耳其人的这项工程；整个城堡都遭到火力试探，因此“圣艾尔摩堡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8]。守军感到了自己处境的绝望，而且敌人很可能发动新的袭击，守军的士气再次衰落下去。

圣艾尔摩堡的全体守军，包括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和米兰达上尉，都同意派遣另外一名军官梅德拉诺前往比尔古，向拉·瓦莱特和他的议事会阐明战局。这是他们一致的回应。梅德拉诺宣称城堡无论如何守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防御工事已经被夷平，敌人的桥梁很快就要完工，而且由于三角堡高于整个城堡，土耳其人能够居高临下地轰击他们，根本无法自卫”^[9]。拉·瓦莱特不知用什么手段说服了这个忧心忡忡的西班牙人，让他返回城堡，带回了含糊其辞的抚慰话语，但城堡守军越来越恐慌。土耳其人继续架桥，同时城墙根部鹤嘴镐的敲击声让守军相信，敌人准备布设地雷。同时，炮击继续进行，日夜不停，“他们似乎想把城堡化为齑粉”^[10]。很显然，敌人的总攻近在眼前。6月8日，比

尔古的议事会收到了一封信：圣艾尔摩堡的末日快到了，守军估计自己随时都可能被炸上天；他们已经撤进了城堡中心的教堂，宁愿猛冲出去，死个痛快。这封信上有50名骑士的签名。

拉·瓦莱特的答复仍然是：坚守下去，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派了另外三名骑士到对岸。他们抵达时发现城堡内闹成一团。守军的神经已经崩溃。有人做了仓皇的准备，打算放弃城堡；炮弹和掘壕工具被丢进了水井；有人已经做了爆破准备，计划从城堡内部将其完全炸毁。拉·瓦莱特的三名使节宣称，圣艾尔摩堡仍然可以继续守下去，它是建在坚固的岩石上的，地雷奈何不了它。守军听到这话，不禁火冒三丈。操练场上发生了哗变。他们嘲讽使节，让他们演示一下，究竟怎样防守下去。士兵们紧闭大门，将使节扣押在城堡内。直到有人恢复理智，敲响了警钟，士兵们才回到各自的岗位，三名使节才溜走并返回对岸。在比尔古，议事会讨论了此事；有叛变情绪的守军很快派了一个人游到比尔古，重申了他们的恐惧。在秘密闭门会议上，议事会也踌躇不决，不知如何是好；有人主张将圣艾尔摩堡守军撤出，以挽救士兵的生命；也有人坚持死守。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没有选择；现在港湾已经处于奥斯曼帝国大炮的监视下，根本不可能把这么多人安全地撤出。必须说服守军，让他们死守下去，为其他人争取时间。

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终于将兵变平息了下去。堂康斯坦丁诺，骑士团的使节之一，主动提出召集志愿者参加圣艾尔摩堡的防御。在比尔古的广场上，鼓声召集新兵集合到军旗下。然后议事会冷静地告知哗变的士兵，他们如果想回来也可以，因为“每回来一个人，就有四个人恳求着要取代他在圣艾尔摩堡的位置”^[11]。同时拉·瓦莱特写信给在城堡内的骑士们，提醒他们曾经向基督和骑士团发下的誓言。梅尔希奥·德·蒙塞拉特被任命为圣艾尔摩堡的新指挥官；官兵们斗志猛涨；两个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自愿参战，这让基督徒们刮目相看。激情澎湃的布道师埃博利的罗伯特也来到了圣艾尔摩堡。米兰达上尉用“军人能够理解的话

语”向士兵们做了激动人心的演说，督促他们“英勇作战、在死前尽可能多杀野蛮人”^[12]。圣艾尔摩堡派出了第二个游泳的信使，宣布“守军异口同声，不愿离开城堡，但必须给他们援军和弹药；他们全都愿意在圣艾尔摩堡战斗到死”^[13]。夜间的增援和物资运输在继续；100名士兵渡过海湾来到圣艾尔摩堡，还带来了大量旗帜，插在城墙上，以便给敌人造成守军得到大量援兵的假象。没人再嘀咕说要撤退了。



进攻圣艾尔摩堡（E）；希伯拉斯山（Y）；穆斯塔法帕夏的帐篷，位于左下（Q）；图尔古特的炮台（O）；森格莱阿（D）；比尔古（B）；圣安杰洛堡（A）。

在争夺小小的圣艾尔摩堡的一天天激战中，双方动用了火药时代正在演化中的各种武器。土耳其人肯定拥有，而且也使用了致命的弓箭手，但遭到猛轰的城堡周围回荡的爆炸声给人的感觉是，世界末日的大决战已经爆发了。在远距离上，这是一场狙击手和大炮的战斗；神枪手可以一枪毙敌，铁炮弹能将人开膛破肚，但在争夺城墙的近距离战斗中，双方还使用了一系列巧妙的小型燃烧武器。基督徒拥有原始的手榴

弹和火焰喷射器——罐装的“希腊火”^[14]和成桶的沥青，以及可旋转的大炮和重型火绳枪，它们能够发射鸽子蛋那么大的石弹和用来屠杀以密集队形冲锋的大群敌人的链弹。土耳其人则以牙还牙，使用了爆裂炸弹，它能向身着重甲的守军抛掷火焰。所有这些武器都很粗糙、还在实验阶段，而且非常不稳定。使用这些武器的风险是很大的；关于这场攻防战的记述中经常有使用燃烧武器的人被自己炸死的片段：成桶的火药可能会爆炸；手榴弹在投出之前可能引爆周围的弹药；常常有人被己方的武器烧死或者烧残。但这些武器在起作用的时候，效果是毁灭性的。

在这个燃烧武器的试验场上，基督徒们决定试验一种新装置。6月10日，拉·瓦莱特送去了一些火圈，这种新武器据说是骑士拉蒙·福尔廷发明的。“这种武器包含箍桶用的铁圈，上面覆盖用来填塞船缝的粗麻屑，然后在滚烫的焦油大锅里浸透。然后再铺一层粗麻屑，再次放到焦油里浸泡。这个过程要重复多次，直到它们有人腿那么粗。”^[15]使用方法是将它们抛过胸墙，投向以密集队形冲锋的大队敌人。

这种新武器很快就被投入了实战。一天，土耳其人再次发动了猛攻；身着宽松长袍的近卫军潮水般涌过桥梁，将云梯靠在城墙上。土耳其士兵跌跌撞撞地向前冲锋时，城墙上的守军用火炬点燃了铁圈，然后用火钳夹着它们，伸过胸墙，抛掷出去，火圈在斜坡上蹦跳、旋转着滚下，如同疯狂的火环。它的杀伤效果是惊人的。巨大的火圈能够同时席卷住两三名士兵的衣服；被火焰吞噬的人变成了一个火球，转过身奔向大海，长袍和头巾都熊熊燃烧，身后留下一片恐惧和大火。火圈在精神上的威慑力是巨大的。近卫军撤退了，但只是暂时的。穆斯塔法决心拿下圣艾尔摩堡。天黑之后，土耳其军队再次发起进攻。整个夜空都被大炮的火光和火攻武器（火圈、火焰喷射器和倾盆大雨般泼向城墙下的希腊火）的焰光照得通亮。穆斯林士兵投掷爆裂的手榴弹作为反击，这些手榴弹在胸墙上爆炸，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亮光照亮了守军的身形。战场亮如白昼；从对岸看，圣艾尔摩堡简直像是喷发的火山。比尔

古的炮手们不需要火炬照明也可以准备炮火，用交叉火力扰乱土耳其人的攻势。惨叫声、呼号声、爆炸声和刺眼的火光让大团长坚信，圣艾尔摩堡已经陷落。但它还是守住了。土耳其人再次撤退。

现在已是拂晓，太阳正冉冉升起。守军精疲力竭，只是死撑着才能站住脚，穆斯塔法也知道这一点。他命令再发动一次新的猛攻。生力部队携带着绳索和抓钩涌向前沿，将抓钩抛掷到守军借以抵御火枪射击的胸墙上的临时工事（用成桶的泥土搭建而成）上。土耳其士兵利用抓钩和绳索爬上了城墙，在城墙顶端建立了一个阵地，插上了自己的军旗。棱堡的指挥官马斯上校感觉到了危险，用一门轻炮将城墙上的近卫军轰了下去，一声巨响，“他们坠落到壕沟里，令其他人毛骨悚然”^[16]。攻势垮台了。损失惨重的土耳其人不得不撤退。战场上一片沉寂。穆斯林花了一整天时间收集己方死者的尸体，将他们埋葬在集体墓穴里。但守军兵力损失的速度也是难以承受的。拉·瓦莱特又送去了150名援军、弹药和用来搭建工事的“篮子、床垫和绕成团的绳索”^[17]。奥斯曼人原先预计四天就能攻克圣艾尔摩堡，但现在已经是第十四天了。

战事不利的坏消息开始从奥斯曼军营渗透出来。从土耳其军队逃走的基督徒和被俘的土耳其人向拉·瓦莱特和比尔古的议事会透露了一些关于圣艾尔摩堡防御情况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土耳其人在前一夜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很多久经战阵的老兵也血洒战场。土耳其军营内爆发了疫病，还有很多伤员奄奄一息；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每名劳工每天只能领到10盎司的饼干。几位帕夏和近卫军之间关系不好：“几位帕夏责备说，近卫军平素自夸为‘苏丹之子’，还有其他很多自吹自擂的狂言，却没有斗志攻克一个微不足道、薄弱残破的城堡，尽管已经架好了一座桥。”^[18]与此同时，穆斯塔法和皮雅利之间、陆军和海军之间激烈的竞争气氛进一步影响了士气。鞭策穆斯塔法继续进攻的有两种力量：对战败蒙羞的恐惧和对荣耀的渴望。帕夏们还得到消息，堂加西亚正在西西里集结船只和军队。皮雅利每天都派遣一支桨帆船舰队在马耳他海峡巡

逻。

圣艾尔摩堡守军的士气虽然有所恢复，但也绝谈不上斗志昂扬。6月13日，穆斯塔法获悉了一条鼓舞人心的情报，似乎能最终解决他的难题。一名意大利士兵无疑是认为城堡死期将至，于是溜过城墙，来到了奥斯曼军营。他建议穆斯塔法将三角堡继续加高，以阻止城堡周围的任何兵力运动，并切断从比尔古来的补给线；然后再来最后一次袭击，就能彻底消灭最后残存的守军。第二天，守军听到有人用意大利语向他们喊话。穆斯塔法劝守军投降，“以自己的脑袋担保”^[19]，愿意保证他们的通行安全，允许他们离开城堡后去任何地方；否则就只有无比残酷的死亡。劝降得到的回复是一轮火绳枪齐射和一连串的旋转火圈。守军已经决心死战到底。他们已准备好迎接最后一次进攻。

穆斯塔法开始准备他希望是最后一次的进攻，运用的是屡试不爽的奥斯曼帝国战术：日夜不停的持续炮击、小规模突袭、局部地区的进攻和不计其数的佯攻（目的是让守军得不到任何睡眠，以致精疲力竭），然后才发动最后主攻。劳工们一刻不停地苦干，努力用泥土和成捆的木柴将壕沟填平，同时火绳枪兵轰击着胸墙。守军尽可能地阻挠敌人的行动。他们将壕沟内的木柴点燃，还击毙了衣着华丽的近卫军阿迦^[20]，这大大地震动了奥斯曼军营。6月15日夜间，月光皎洁，土耳其军队发起了又一场猛烈的弹幕轰击。然后是一片沉寂。

6月16日黎明前，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毛拉^[21]们召唤信众做晨祷；两个小时内，毛拉们大声诵经，信徒们以有节律、响度渐强的声音做出回答，做好拼死战斗、牺牲自己的精神准备。守军蹲在临时搭建的壁垒后面，聆听着诡异的吟唱声在远方的黑暗中升起又降下。拉·瓦莱特此前派去了新一批援兵，此时守军们虽然十分疲惫，但秩序井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岗位。他们分成若干个三人小组，每组包括一名火绳枪兵和两名长枪兵。此外有专人负责将死尸拖走，还有三支机动队

伍，负责援助任何危险地段。他们堆积了大量的火攻武器、石块和很多浸透葡萄酒的面包。胸墙后准备好了大桶的水，被黏着性燃烧武器烧着的人可以扑进大桶，挽救自己。

太阳升起时，土耳其人开始了新一轮试探性的弹幕射击，炮火之猛，“大地和空气都为之颤抖”^[22]。随后穆斯塔法发出讯号，命令部队以一个庞大的新月队形前进。苏莱曼的皇旗被展开；一支长矛上挑起了一具头巾；战线的另一端发出了一缕黑烟，作为回应。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旗帜和盾牌开始蜂拥前进，“上面画有非常新奇的图案；有的画着形形色色的鸟类，有的画有蝎子和阿拉伯文字”^[23]。在队伍的最前沿，身披豹皮、头戴饰有鹰羽帽子的士兵们疯狂地冲向城墙，以渐强的声音呼喊安拉的诸多尊名。在城垛上，基督徒们也呼喊基督教人物的名字——耶稣、马利亚、圣米迦勒、圣雅各和圣乔治——“每个人呼喊自己最热爱的圣徒的名字”。土耳其人向桥梁猛冲；云梯被靠上城墙，双方短兵相接。在整个战线上，大群士兵在进行白刃战。有的土耳其士兵被从云梯上抛下，也有人从桥上坠落。在混乱中，有人在向敌人射击时误伤了友军。西风将守军枪炮发射产生的黑烟吹回到他们脸上，让他们短时间内看不清周围。然后，堆在一起的易燃易爆的燃烧武器被点燃，很多人被活活烧死。

在比尔古，观看这场鏖战的人们“肝胆俱裂、不知如何援助友军脱离这巨大危险”^[24]。战斗的一些细节令人刻骨铭心。巴尔比瞥见一名士兵的身形被地平线映衬着，“手里拿着一个火焰喷射器，好像着了魔一般拼死战斗”^[25]。他们还能看见一小群衣衫鲜艳的土耳其人以密集队形向前冲杀。由于陆海军之间的竞争，有30名领头的桨帆船船长发誓“要么杀进城堡，要么同赴黄泉”^[26]。他们借助云梯爬上了圣艾尔摩堡后方的“骑士塔”。拉·瓦莱特命令位于圣安杰洛堡的炮手向入侵者瞄准。不料炮火没有命中，却杀死了8名守军。“骑士塔”的剩余守军沉着地引导对岸的炮手重新校正瞄准。第二轮炮弹落在了一群敌人当中，杀死了20

人。“其他人则被烧死、砍死，尸体被抛了下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走，”^[27]巴尔比如此记载道。守军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身穿华丽长袍的穆斯塔法和图尔古特在敦促部下继续冲锋，但对“骑士塔”的猛攻失败了。火圈在奥斯曼帝国队伍中肆虐，“敌人头上似乎戴了烈火的冠冕，身体也完全被火焰笼罩”^{[28][29]}。有人被从城墙顶端重重推下；壕沟开始被死尸填平。插在胸墙上的鲜艳的奥斯曼帝国旗帜被撕下。梅德拉诺上尉夺走了一面敌人的旗帜；一眨眼的工夫，他头部中弹，但敌人插在城头的两面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旗都被撕烂了。苏丹的皇旗也被俘虏。米兰达负了伤，但仍然让人把他放在一把椅子上，抬到了胸墙旁。他手里一直紧握宝剑。七个小时的血战之后，攻方开始退缩。土耳其人撤退了。胜利的呼喊飘过了海湾：“胜利！基督的信仰胜利了！”^[30]精疲力竭的守军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他们看着敌人撤退，累得几乎站不住脚。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代价很惨重：150人战死，相当于全部守军的1/3。有人用意大利语对他们的胜利欢呼做了最后的反驳：“闭嘴！你们今天没完蛋，明天也会完蛋。”^[31]

煽动土耳其人发动此次猛攻的那个意大利叛徒虽然逃走了，但也没有好下场。几天后，姆迪纳的马耳他平民抓住了这个身穿土耳其服装的叛徒，把他捆在马尾上拖走。一群儿童用棍棒将他活活打死。战争一天天变得愈发丑恶。

^[1] Cig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ig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63

^[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40

^[3]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41

[4]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68

[5]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42

[6]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68

[7]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48

[8]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69

[9]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71

[10]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47

[1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53

[1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53

[13]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74

[14] 希腊火是最早为拜占庭帝国使用的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态燃烧剂，为早期热兵器，主要应用于海战中。希腊火多次为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一些学者和史学家认为它是拜占庭帝国能持续千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希腊火的配方现已失传，其成分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但一般认为是以石油为基础。

[15]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75

[1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56

[17]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76

[18]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79

[19]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58

[20] 阿迦是奥斯曼帝国某些高官或将领的称号。有人认为，“阿迦”与中国清朝对皇室成员的称呼“阿哥”有联系。

[21] 毛拉是伊斯兰教内对学者或宗教领袖的称号，特别是在中东和印度次大陆。原意为“主人”，在北非也用在国王、苏丹和贵族的名字前。现称毛拉者，多为宗教领袖，包括宗教学校的教师、精通教法的学者、伊玛目（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和诵经人。

[2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61

[23]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62

[24]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65

[25]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82

[2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63

[27]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79

[28]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63

[29]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63

[30]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64

[3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64

11.最后的求援者

1565年6月17日～23日

6月17日，遭受了沉重打击的土耳其将领们在穆斯塔法的营帐召开会议，再一次研讨圣艾尔摩堡的棘手问题。图尔古特又一次指出了奥斯曼军队在整个行动中的盲点：未能切断圣艾尔摩堡与比尔古之间的海上补给线，因此圣艾尔摩堡能够不断得到补给。土耳其人开始在岸边挖掘一条新堑壕，一直通到圣艾尔摩堡脚下、从比尔古来的船只通常停靠的地方。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骑士塔”的轰击力度。在这番行动之后，圣艾尔摩堡的末日肯定不远了。据说大团长听到这个消息时感谢了上帝，因为土耳其人直到现在才想到要切断圣艾尔摩堡的生命线。12名骑士自愿增援圣艾尔摩堡，但拉·瓦莱特没有批准。在必败无疑的战斗中损失更多兵力是毫无意义的。他派出了两艘船，分别给堂加西亚和教皇送去了绝望的求援信。其中一艘船被敌人俘虏，但令穆斯塔法暴跳如雷的是，这封信是用密码写成的，他军中没有一个叛教的前基督徒能够破解密码。在比尔古和森格莱阿，骑士团继续加强防御工事。

次日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喜悦时刻。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各方说法不一。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将领们在海边的堑壕内视察一个炮台。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那门大炮射角太高，因此图尔古特命令将炮口降低。但还是太高，于是他命令再调低一点。第三次试射又太低了，炮弹没有飞出堑壕，而是打在了堑壕壁上。石弹碎片在炮台上四下横飞。一枚碎片击中了图尔古特耳朵下面的部位。另一枚碎片击中了陆军后勤总管索利阿迦，导致他当场毙命。图尔古特的头巾起到了一定防护作用，他负了重伤，倒在地上。老海盗躺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舌头拖出嘴角，鲜血从头部喷涌而出。穆斯塔法在一片混乱中沉着冷静地命人盖住图尔古特的身体，将他秘密地抬进他自己的营帐，免得影响官兵的士气。但消息还

是很快泄露了出去。不久就有变节者将这起事故的消息传到了比尔古。图尔古特奄奄一息，昏迷不醒。

土耳其人步步紧逼。第二天，有一座棱堡遭到了极其猛烈的炮击，被炸出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足以让士兵们轻松地登梯上墙。守军几乎没有办法修理破损的工事。他们如果冲出城堡去收集修理工事所需的泥土，就一定会被击毙。于是他们只能用毛毯和旧船帆尽可能地堵住缺口，蹲在胸墙下。当夜，一次巨大的爆炸撼动了整个港湾；比尔古的一座火药作坊发生了事故。土耳其士兵们欢呼起来。为了打击敌人的热情，拉·瓦莱特向对岸开了十几炮，但这消息对圣艾尔摩堡守军来说却糟糕透顶。6月20日，奥斯曼人警戒港口的新炮台建成了。基督徒船只甚至在夜间也无法在港湾航行了。19日，一艘船做了最后的尝试；它很快就被敌人发现；在前往圣艾尔摩堡的途中，有一名船员被敌人的炮弹打掉了脑袋；返航时又有一人被火绳枪击毙。米兰达送来了最后的消息：再派更多人到圣艾尔摩堡送死是不人道的。从此刻起，只有马耳他人能够在夜间游泳往来。拉·瓦莱特勉强同意，目前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6月21日是基督圣体圣血节，基督教日历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我们坚持尽可能隆重和虔诚地庆祝了这个伟大而高贵的节日，”^[1]巴尔比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在比尔古庆祝节日的情形。他们举行了游行（大团长亲自参加），但为了躲避对岸敌人的炮火，游行路线必须精心选择。圣艾尔摩堡守军已经奄奄一息。现在有十几名最精锐的土耳其狙击手已经占据了“骑士塔”一侧的高处，可以从那里向城堡的心脏射击。甚至操练场也处在敌人火力之下。但守军仍然不断尝试将填充在壕沟内的柴火点燃；意大利人佩德罗·德·福尔利在自己背上捆了一个火焰喷射器，用绳索坠下城，企图摧毁威胁极大的桥梁。他没能将桥梁烧毁，因为桥面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泥土；他有没有安全返回城堡内，我们不得而知。炮击仍然在继续。奥斯曼军队的大炮整夜猛击残破不堪的城墙；不时的佯攻

让疲惫的守军不得不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现在他们在胸墙下只能四肢贴地爬行，根本无法离开自己的岗位。教士们不得不带着圣餐爬到前沿士兵身边。

6月22日黎明，穆斯塔法决定一鼓作气拿下城堡。他首先确认已经将圣艾尔摩堡包围得水泄不通；皮雅利将他的桨帆船群调到附近，从海上轰击城堡。挤满火绳枪兵的小船把守着城堡与对岸的比尔古之间的航道。近卫军再一次冲过桥梁；城堡整个一圈都遭到猛攻，数千人将云梯靠上城墙。胸墙上爆发了白刃战，穆斯林试图插上他们的旗帜，基督徒向毫无防护的敌人脑袋上投掷石块和火罐。“骑士塔”上的狙击手从背后袭击守军，身着显眼盔甲的骑士被轻松地打倒。城堡指挥官蒙塞拉特的脑袋被一发炮弹打飞。根据贾科莫·博西奥的说法，当时“赤日炎炎”^[2]。头戴钢盔、身披板甲的基督徒汗流浹背，但仍然一刻不停地拼杀。比尔古的人们战战兢兢又头脑混乱地观看这场厮杀。他们听得见惨叫声和大炮的轰鸣声，看得见厄运当头的城堡“笼罩在熊熊大火中”^[3]。在六个小时的混战之后，对岸传来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呼喊声：“胜利！胜利！”^[4]进攻停滞了。土耳其人不得不撤退。圣艾尔摩堡岿然不动。

在午后阳光炙烤下，幸存者在一片瓦砾的城堡内爬行着。很多指挥官都已经阵亡。其他人（艾格拉斯、米兰达、马斯）则身负重伤，无法站立。胸墙上、操练场上死尸满地。现在已经无法安葬死者，甚至根本无法挪动尸体。城墙被打出了多个缺口；没有任何建材可用来修补城墙。在令人无法忍受的烈日暴晒下，苍蝇肆意飞舞，到处弥漫着石粉与火药的刺鼻气味和死尸的恶臭。这是马耳他攻防战的第二十六天。

还有力气站立的守军聚集在小教堂内。按照史官的说法，“大家众志成城，决心在这里给人生旅途画上句号”^[5]。他们决定做最后一次求援的努力。一名游泳健将溜进海里，最后一艘船也被派出。这艘船遭到了12艘土耳其驳船的攻击，但还是抵达了对岸。船和游泳的信使带来的

是同一条消息：守军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活人已经所剩无几，其中大多数都负了伤；燃烧武器已经用尽，火药濒临告罄。他们毫无希望得到增援。

拉·瓦莱特面色阴沉地听着这些话语。他命令这些人死战到底，现在最后的时刻已经差不多降临了。“只有上帝知道，大团长此刻的感受是什么，”^[6]巴尔比在日记中写道。拉·瓦莱特拒绝了所有派出援兵的请求；那样做只是白白浪费珍贵的资源。但他最后软了心肠，同意派遣一支小舰队，试试突破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向城堡输送物资。5位船长，包括罗姆加，在夜色掩护下起航了。这次尝试是徒劳的；他们遭到岸上的炮火袭击，很快又撞上了潜伏在一侧的皮雅利的80艘桨帆船。

圣艾尔摩堡守军目睹救援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于是“决心为耶稣基督的事业慷慨赴死”。他们没办法离开自己的岗位，于是“他们就像死期将至的人一样，互相忏悔，哀求我主怜悯他们的灵魂”^[7]。为了防止教会圣器遭到敌人的亵渎，教士们将它们埋在了小教堂地下。挂毯、圣像和木制家具则被搬到室外烧毁。奥斯曼军队的大炮持续轰击着城堡。拉·瓦莱特从他的窗口观看了一整夜；在大炮火光的映照下，城堡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6月23日是星期六。巴尔比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施洗者圣约翰（骑士团的同名圣徒与佑护者）节日的前夕，土耳其人在黎明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8]皮雅利的战船逼近了遭到猛烈轰击的城堡，船首炮指向目标，开始炮击。陆军部队云集在城墙前。城堡守军只剩70或100个活人。他们全都精疲力竭，很多人还负了伤。他们翻检死去战友的尸体，寻找最后一点点火药来装填他们的火绳枪。米兰达和艾格拉斯无法站立，只能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剑。他们坚守阵线达四个小时。大约上午10点，土耳其人的进攻明显停顿了。近卫军和乘骑步兵们再次排好队形进攻时，城堡内无人开枪还击。守军的火药已经耗尽。广场上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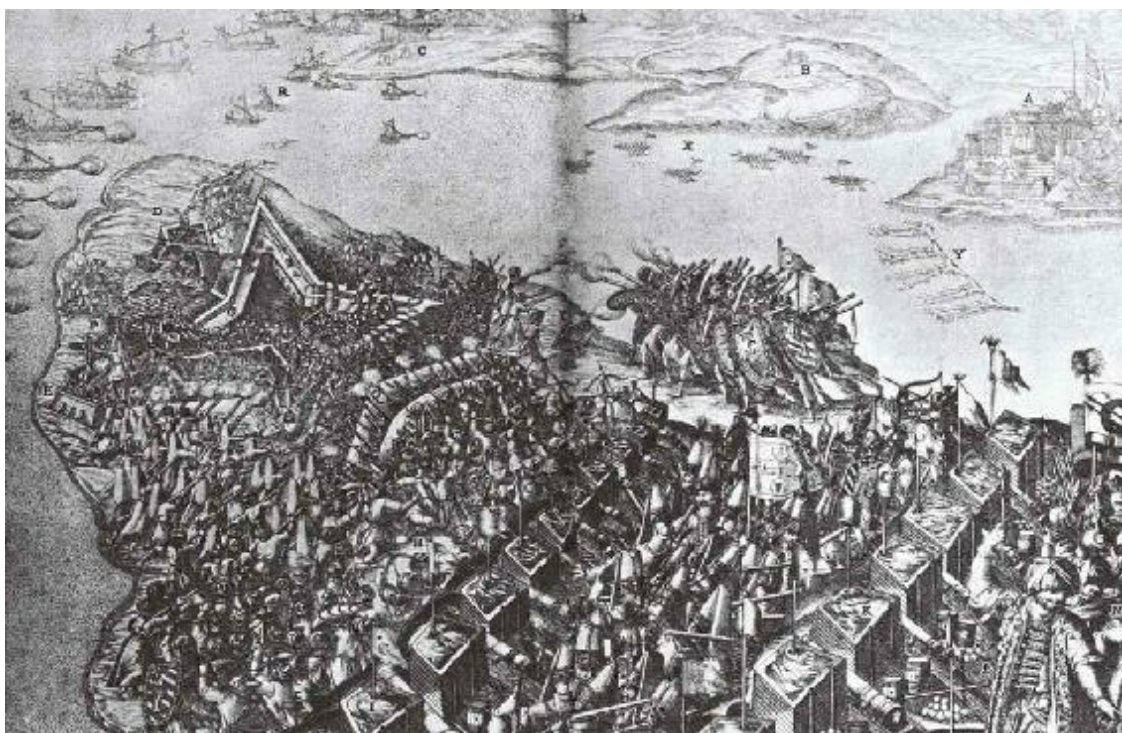
墙下躺着600具死尸。幸存的守军紧握刀剑和长枪，坚守岗位，但火绳枪兵们已经不再隐蔽了。几百名土耳其士兵感到守军的抵抗已经瓦解，潮水般涌过桥梁，翻过胸墙，一路没有遭到任何反抗，见人就杀。战船上的人也开始登陆。米兰达和艾格拉斯被打死在他们的椅子上。还能跑得动的守军撤往广场，在那里做最后抵抗。有人试图敲鼓，与敌人谈判，但为时已晚。前几周徒劳无益的进攻带来的巨大耻辱令穆斯塔法火冒三丈，于是他命令将守军斩尽杀绝。凡是砍下守军头颅的士兵都可以得到重赏。近卫军汇集到广场上，高呼着“杀！杀！”^[9]有些遭到围困的守军逃向教堂，希望敌人会对此有所顾忌，能够饶他们一命，并接受他们的投降，“但他们很快看到，土耳其人在无情地屠杀已经投降的人，于是他们冲到广场中央，死战到底，尽可能多杀敌人”^[10]。

比尔古的人们最后看了几眼垂死挣扎的圣艾尔摩堡：“骑士塔”残破的顶端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在挥舞着一把双手剑；意大利骑士弗朗切斯科·兰弗雷杜齐按照预先约定点燃了宣告城堡即将陷落的烽火；随后“骑士塔”上的旗帜被扯下，奥斯曼帝国的旗帜被升起，“令比尔古守军魂飞魄散”^[11]。

圣艾尔摩堡攻防战最后的可怕一幕上演于操练场。在穆斯塔法的警惕注视下，一些被俘的守军被带到城墙下，站成一排，作为土耳其士兵射箭练习的活靶子，他们很快就被射死；逃进教堂的伤员全部被杀死在里面；骑士们更是极端仇恨的对象，他们被头朝下吊在拱形回廊的铁环上，脑袋被打裂，胸膛被撕开，心脏被挖出。多次蒙受战败羞耻的近卫军开始疯狂报复、大开杀戒。几名幸存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职业军人跪在地上，喊叫着说他们不是骑士，哀求对方“看在你们的真主的面”^[12]饶他们的性命。哀求是徒劳的。一个不幸的人看到土耳其人疯狂屠杀的场面，躲进了一个箱子里。两名变节者发现了这个沉重的箱子，以为里面有什么金银财宝，于是将它扛走，半路上被穆斯塔法拦下。他命令将箱子打开。躲在箱内的人目瞪口呆，被拉出来打死。守军没有一个人能活

下去。

最后的障碍已经被铲除，于是皮雅利舰队的全部船只旌旗飘扬、炮声隆隆地驶进了马萨姆谢特港。船只安全地停在港内，水手们可以仰望圣艾尔摩堡城墙上迎风招展的奥斯曼帝国旗帜。



圣艾尔摩堡鏖战

穆斯塔法想要将圣艾尔摩堡的守军斩尽杀绝，但他做不到这一点。有些守军从城堡逃向海边，没有被急于报复的奥斯曼陆军抓住，而是向图尔古特的海盗们举手投降。他们被作为可以换来赎金的战利品运走了。其中有些人，包括意大利骑士弗朗切斯科·兰弗雷杜齐，在多年后会再次现身，就像从阴间复活一样。另有四或五名马耳他人没有受到盔甲的累赘，溜出了城门，逃到面向比尔古的海边，藏在岸边的洞穴内。天黑之后，他们借着夜色掩护溜进大海，悄无声息地游到了对岸的比尔古，将他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事件报告给了大家。

比尔古的人们被这第一手报告震惊了，但在次日就得到了新的印证。圣艾尔摩堡主要指挥官的头颅被插在枪尖上，展示在整个港口前。然后穆斯塔法命令给一些骑士和一名马耳他教士的尸体——“有些残缺不全，有些没了头部，有些被开膛破肚”^[13]——穿上显眼的红白两色罩袍，钉在木制十字架上，对耶稣受难进行戏仿。随后尸体被丢到圣艾尔摩堡一角的海里，被潮水冲到了对岸的比尔古。土耳其人这样做是想恐吓比尔古居民，剥夺他们继续抵抗的斗志。但这暴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拉·瓦莱特决心不后退一步，绝不让敌人轻易得逞。他向城内居民发表了激荡人心的演说，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出哀恸。他还命令将尸体厚葬。骑士团主保圣人圣约翰的瞻礼日礼拜照常举行。大团长计划即刻对敌人进行报复。所有土耳其俘虏都被押出地牢，在城墙上被全部处决。他还派遣一名信使到姆迪纳，通知那里的指挥官处死所有俘虏，但要缓慢地进行，一天杀一个，每天都要杀。当天晚些时候，圣安杰洛堡的大炮开始轰鸣。它们射出的不是炮弹而是人头，雨点般落向对岸的奥斯曼帝国营地。罗得岛那样充满骑士风度的停战不会再上演了。

据说，皮雅利走进了圣艾尔摩堡，目睹了横尸遍野的惨景，内心感到无比的憎恶。“为什么要如此残酷？”他向穆斯塔法问道。在这场战争的几十年中，这样的问题不时被大声说出，或在人们心头闪现，一次又一次在地中海世界回响。穆斯塔法回答说，这是苏丹的命令：必须杀死所有成年男子，不允许抓俘虏。他当即派船将捷报和缴获的战利品送往伊斯坦布尔。威尼斯人得知这个消息后，束手无策，只能以玩世不恭的心态在大街上举行了庆祝活动。或许是威尼斯官方策划了这个“群众自发的欢庆”，好让奥斯曼帝国的间谍们以为，威尼斯共和国仍然是忠于苏丹的。

圣艾尔摩堡陷落的两个小时之后，图尔古特“饮下了烈士的琼浆玉液，将这个虚荣的世界永远遗忘”^[14]。

[1]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86

[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71

[3]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70

[4]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70

[5]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72

[6]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88

[7]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86

[8]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86

[9]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71

[10]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90

[1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73

[12]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71

[13]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93

[\[14\]](#)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289

12.血债血还

1565年6月23日～7月15日

6月23日（圣约翰的瞻礼日）下午。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守军从他们的防御工事里阴郁地望着对岸圣艾尔摩堡残垣断壁上飘扬的奥斯曼帝国旗帜。天黑之后，土耳其军营灯火通明，欢呼雀跃。“我们万分悲痛，”弗朗西斯科·巴尔比在日记中叹息道，“因为这种庆祝不是骑士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主保圣人而做的活动。”^[1]

但拉·瓦莱特不是唯一一个忧心忡忡的将领。穆斯塔法已经损失了珍贵的时间（整个计划的关键元素）和至少4000人，保守估计也是全军人数的1/6，还包括一大部分精锐的近卫军。他已经消耗了1.8万发炮弹。不管事先在伊斯坦布尔的筹划准备是多么充分，火药并非用之不竭。图尔古特的死亡是另一个打击。穆斯塔法命令海盗们将他的遗体运回的黎波里，并带回所有能找得到的火药。他还派遣一艘小型划桨船火速赶往伊斯坦布尔，带去了缴获的要塞大炮，作为战利品。这一招是很聪明的。他本能地感觉到，长期没有正面消息已经让苏莱曼颇为不悦。他必须将最后的总攻提前。同时，伊斯坦布尔的帝国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6月27日，首席大臣去世了。接替他的是第二维齐——出身波斯尼亚的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历史证明，他将是奥斯曼帝国最有雄才大略的维齐尔之一，也是一位配得上他的伟大君主的卓越政治家。在随后的许多年中，为奥斯曼帝国这艘巨舰领航的主要是索科卢。

在比尔古，拉·瓦莱特不得不面对死守圣艾尔摩堡造成的后果。基督徒方面有1500人死亡，相当于全部战斗人员的大约1/4，按照比例算，损失比敌人还要严重。但这些人的牺牲至少为加强两个半岛的薄弱

防御争取到了一点时间。拉·瓦莱特在公众面前总是表现得坚定不移，但他的内心其实已经接近绝望。他将一连串十万火急的信件送到岛中央的姆迪纳，然后又从那里用小船送往外界。他在给腓力二世（在西班牙）的信中写道：“我已将全部兵力投入圣艾尔摩堡的防御……我们现在人数不多，守不了多久了。”^[2]在给身处西西里的堂加西亚的信中，他一再哀求立即派来大规模的救援舰队，“否则我们必死无疑”^[3]。

大团长拉·瓦莱特和穆斯塔法帕夏年轻时都曾在罗得岛作战，双方都没有遗忘那场战役的经验教训。奥斯曼帝国的工程师们对港口进行勘察，标定炮火射角，安置平台，准备炮击比尔古和森格莱阿——这已成定局，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穆斯塔法决定试试寻找快刀斩乱麻的便捷方法。6月29日，“晚祷时分”^[4]，一小队骑兵举着白旗接近了森格莱阿的城墙。领头的人身穿色泽艳丽的长袍，他向空中开了一枪，表示希望谈判。回答他的是一串炮火，迫使他敏捷地躲到一块岩石后。有一个人被推上前，不得不盲目地冲向城墙，希望自己不会被击毙。这个可怜虫是个年老的西班牙人，在奥斯曼帝国做了三十二年奴隶，会说土耳其语。骑士们将他擒获，蒙上他的眼睛，带他去见大团长。这人被派来的目的是重复苏莱曼在四十年前曾经提出的建议：守军只要投降，就可逃脱必死的命运，“携带你们所有人员、财物和火炮”^[5]安全地前往西西里。拉·瓦莱特当即“用可怕而严厉的声音”^[6]回答道：“把他绞死！”老人战战兢兢地跪倒，“说他只是个奴隶，他来劝降也是被强迫的”^[7]。拉·瓦莱特允许这可怜虫离去，给诸位帕夏带去一条口信，他不接待任何使节，下一个使节将丢掉性命。

拉·瓦莱特这么做，是因为吸取了罗得岛的教训。他明白，1522年的结局的关键因素就是平民的斗志低迷。任何谈判的暗示都会严重影响抵抗的决心。他决心用死亡来惩罚失败主义言论。几天后，一个叛变投敌的马耳他人向城墙上的同胞们呼喊，拉·瓦莱特禁止做出任何答复。回答敌人的只有沉默和炮火。况且穆斯塔法在攻克圣艾尔摩堡之后大开

杀戒，将马耳他教士斩首，又把他的尸体钉在十字架上，让尸体漂浮在海湾上，这早已使得穆斯塔法失去了任何赢得马耳他民心的机会。所有平民，一直到妇女儿童，都对入侵者恨之入骨，恨不得将俘虏撕成碎片。

穆斯塔法劝降守军、快速取胜的念头落了空，于是加紧攻城。他决定封锁两个半岛，但先集中力量对付较弱的森格莱阿，然后再攻打位于比尔古的骑士团主堡。森格莱阿半岛在朝向陆地的一端有一座城堡——圣米迦勒堡，从那个方向保护着半岛以及一个小城镇。这个海岬颇为荒芜，有座小山，上面建有两座风车磨坊；再往外，海岬尖端渐渐变细、伸进港湾的地方，有一座鸟嘴状的作战平台，被称为“马刺”。森格莱阿的所有防御工事几乎都无法令人满意；圣米迦勒堡的壕沟（在岩石地表上凿出）还没有完工，从要塞设计上讲和圣艾尔摩堡一样有缺陷。海岬西岸的尖端只有“马刺”，很容易遭到对岸炮火的侵袭，根本没有像样的防御工事。只有东岸的防御还算比较稳固。东岸面向内港，可以得到对面比尔古的保护；森格莱阿和比尔古之间内港的出入口被一条坚固的铁链封锁了起来。但如果穆斯塔法能够想出办法，从海上进攻森格莱阿的西岸，它很快就将末日临头。

事实上，穆斯塔法已经设计了一条攻打森格莱阿（土耳其人称之为“风车要塞”）的大胆策略。但不幸的是，一起奇怪的变节事件很快就将他的妙计泄露了。奥斯曼军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改宗伊斯兰教的前基督徒，他们之所以改变信仰，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这些人现在和基督徒只有咫尺之遥，因此他们的忠诚很成问题。6月30日早上，弗朗西斯科·巴尔比在森格莱阿尖端的“马刺”上眺望港口对岸时，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身穿骑兵铠甲的人从对岸向这边偷偷挥手。他表示希望守军派条船来接他。任何船只出动都很容易惊动敌人；于是守军通过手势让那人游过来。他卸去铠甲，将衬衫系在自己头上，笨拙地游过港湾。三名水手从“马刺”跳入水中，帮他过来。他们游到那个精疲力竭的人身

边时，土耳其人敲响了警钟，跑向海滩。基督徒们开枪掩护，压制住敌人，直到那个半死不活的逃兵被拉到岸上。

这起变节事件对守军的情报工作来说是意外的成功，对穆斯塔法却是沉重打击。这个逃兵名叫穆罕默德·本·达伍德，原名菲利普·拉斯卡里斯，出身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希腊贵族家庭。他现年五十五岁，孩提时代就被土耳其人抓走，并改宗伊斯兰教；现在，看到圣艾尔摩堡的英勇抵抗，“他的心被圣灵触动”^[8]（这是虔诚的史学家的说法），决定“重拾天主教信仰”。穆罕默德在奥斯曼帝国军中颇有地位，而且是穆斯塔法身边小圈子中的一员。他向拉·瓦莱特逐条解释了穆斯塔法计划的细节。为了能够攻击森格莱阿西翼，同时又避免让船只在基督徒炮口下驶入港口，穆斯塔法计划将他较小的船只从马萨姆谢特港拖上陆地，拖过希伯拉斯山脚，进入森格莱阿远方小海湾的顶端。这条情报的价值不可估量；守军立即开始积极采取反制措施。而穆斯塔法在忙着准备炮台以便猛轰森格莱阿的时候，遭到了又一次打击。

7月3日夜间，长长一队黑影在马耳他乡间秘密行进着。在温暖的夏夜，他们沉默地行军；能听见的只有马匹偶尔的响鼻声、低沉的脚步声和甲冑轻微的碰撞声；他们小心地穿过了奥斯曼军营后方迷宫般错综复杂的灰蒙蒙的小路。

这700名士兵是几天前堂加西亚从西西里派来的小队援军。他们分乘四艘桨帆船渡过海峡，秘密地在马耳他岛北岸登陆。这项救援行动事先做了精心筹划，安排了复杂的烽火信号，还用身穿土耳其服装的马耳他人传递消息。援军在浓雾掩护下被带到了姆迪纳，藏在这座有城墙的城市内。当地人很好地保守了援军抵达的秘密，但也是因为运气特别好。一个小孩在城墙上通过一扇窗户向外望，看见一个人在大雾中鬼鬼祟祟地溜走，于是大呼“土耳其人！土耳其人！”^[9]骑兵抓住了这个逃亡者，将他带回。他是个希腊奴隶，希望能获得自由，于是逃往奥斯曼军

营，准备出卖秘密。他被乱刀砍死。

援军队伍在破晓前抵达比尔古远方的海岸，按照事先安排，在那里等待大团长派出的船只。在20英里的行军过程中，为了避开奥斯曼帝国战线，他们绕了一条巨大半圆形的远路，但一路基本上安全无事。只有一个名叫格拉维纳的吉罗拉莫的“全副武装、非常肥胖”^[10]的骑士和十几名背负辎重的士兵掉了队。他们被敌人俘虏，带到穆斯塔法面前。其他人则乘船进入比尔古，受到了大军凯旋般的热列欢迎。这对拉·瓦莱特来说是个振奋人心的时刻。援军主要是来自西西里驻军的职业军人，指挥官是马沙尔·德·罗夫莱斯。拉·瓦莱特的侄子，还有两个英格兰冒险家约翰·史密斯和爱德华·斯坦利（他们是被放逐的天主教徒）也在援军中。

穆斯塔法从格拉维纳的吉罗拉莫那里得知真相后，既无比震惊，又暴跳如雷。基督徒竟然在他们眼皮底下搬来援军，真是奇耻大辱，穆斯塔法为此和皮雅利大吵了一场。穆斯塔法觉得最好先将他自己的解释送到苏莱曼耳边，于是在7月4日派遣了另一艘船。奥斯曼陆军部队疯狂工作，终于完全切断了比尔古和森格莱阿与外界的联系。从此以后，守军向外传递消息成了一项危险的工作；只能在夜间让马耳他人携带信件游泳出去，信件用密码写成，填塞在牛角内，再用蜂蜡封口。

与此同时，森格莱阿的居民开始亲身经历他们曾目睹圣艾尔摩堡守军遭受的苦难。土耳其军队在两个海岬周围建立了弧形的炮兵阵地，成群的劳工和牛艰难地把大炮从圣艾尔摩堡上方高地拖到新的阵地。大炮安置完毕，准备射击。7月4日，土耳其军队开始大规模轰击圣米迦勒堡面向陆地的城墙和暴露的西岸；火绳枪兵则狙杀守军士兵和加强防御工事的劳工。炮火持续不断。拉·瓦莱特的对策是派遣两人一组、被镣铐锁起来的穆斯林奴隶到暴露地带干活。土耳其人不管这么多。穆斯塔法仍然继续从高地炮击，把这些被强迫的劳工打倒。巴尔比对他们的困境

深感同情。“这些可怜人苦干不停，累得半死，几乎站不稳。他们割掉自己的耳朵，甚至宁愿被打死也不肯继续干活。”^[11]几天后，一对身披镣铐的奴隶被困在炮火中，用土耳其语向城外的同胞们呼喊，让他们发发慈悲，停止射击。马耳他人误以为这些奴隶是在向敌人炮手指引城墙最薄弱的环节。一群妇女呼喊扑向这些奴隶，把他们拖过大街小巷，用乱石将他们打死。

7月6日（星期五），菲利普·拉斯卡里斯的情报被证明是准确无误的。港湾上游突然出现了6艘船只。土耳其人将它们放在涂满油脂的滚轮上，驱赶着牛群，将它们拖运了1000码，穿过希伯拉斯半岛，然后又在港湾上游下水。第二天又运来了6艘。到第十天已经有60艘，第十四天已经有80艘。奇怪的是，港湾内的奥斯曼战船尺寸好像也大了一些：它们的船侧被加高，以便构成一个足以抵御火绳枪火力的上层结构。

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工作。奥斯曼军队持续地进行炮击，发动小规模突袭，只是在7月8日停顿了一天（这给了守军一种诡异的感觉），以便庆祝宰牲节。7月10日，穆斯塔法的过于匆忙造成了一场壮观的事故。火炮在射击间歇没有让炮管冷却一段时间。其中一门大炮发生炸膛；火苗点燃了堆积起来的火药，“发出巨大的闪光和浓烟，将40个土耳其人炸飞，粉身碎骨”^[12]。

在森格莱阿和比尔古的作坊和铁匠铺内，人们在疯狂地准备应对措施。铁匠和木匠们忙着制造火绳枪用的小弹丸和引线，修理枪炮，锻造铁钉，以及搭建木制的防御工事。由于得到拉斯卡里斯的通风报信，拉·瓦莱特启动了两项重大工程。他命令用气密的木桶建造了一座浮桥，随时都可以投放到比尔古和森格莱阿之间内港的指定位置，在两个城堡之间建立联系，以便快速地调动兵力。与此同时，马耳他造船匠们设计出了一个精巧的防御装置，用来保护薄弱的海岸，抵抗敌人的海上攻击。他们在夜间（这是唯一安全的施工时段）涉水走进温暖的近海，在

距岸边约十几步的海床上安插了许多木桩（用船桅制成），排成一条长线。每根木桩上都安装了铁环；他们将一根铁链穿过各个铁环，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障碍物，足以保护森格莱阿的整个西岸，一直延伸到“马刺”处，这样可以阻止船只靠岸。



对圣米迦勒（**I**）和森格莱阿的袭击。风车在最末端处（**G**）；“马刺”在风车的左侧。图前的桨帆船（**K**）；在其左侧，隐藏的炮台；圣安杰洛堡（**A**）；**E**和**M**之间的锁链锁闭了内港。

其中还有：圣艾尔摩堡（**H**）；船被拉入港（**X**）；连接森格莱阿和比尔古（**B**）的浮桥（**L**）；大

这道障碍最初让奥斯曼军队统帅部十分恼火，次日它就成了场非同寻常斗争的焦点。黎明时，四个人从奥斯曼军队控制的海岸上出发，携带着斧子走进海里，潜泳到岸防铁链处。他们爬上木桩，一边在上面保持平衡，一边劈砍铁链。同时，火绳枪兵猛烈射击，掩护这些游泳者。形势危急，必须迅速决断。一群马耳他士兵和水手在赏金的刺激下，脱下衣服，跳入大海。他们几乎全裸，只戴着头盔，牙齿紧咬着短剑。一场游泳者之间的激战爆发了。赤裸的人们在水中笨拙地互相砍杀

和猛刺，一只手拍水，另一只手挥剑。蔚蓝的海水开始被血染成粉红色。一名入侵者被杀死；其他人负了伤，游向对岸。当夜，又一群土耳其人游了过来，尝试一种新战术。他们将船只的缆绳系在木桩上，缆绳的另一端则连接在岸边的绞盘上。成群的士兵转动绞盘，将木桩拔出水。马耳他水手们再次游过去，砍断了缆绳。

穆斯塔法深感受挫，焦躁万分，于是决定发动一次总攻。他的冲动因为图尔古特的女婿哈桑（阿尔及尔总督）的到来而愈演愈烈。哈桑带来了28艘船和2000名士兵，求战若渴，而且对陆军的努力嗤之以鼻。炮火日夜不停，在森格莱阿面向陆地的城墙上打开若干缺口。拉·瓦莱特命令将浮桥抛入森格莱阿和比尔古之间的海面，准备就绪。奥斯曼军队的炮兵做了最大努力，但未能摧毁浮桥。弹药和燃烧武器被分发给守候在岗位上的士兵们。大家都知道敌人即将发起进攻。穆斯塔法的公开计划很简单，就是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发起进攻，压倒守军，但他的计划还有秘而不宣的细节。从土耳其军营叛逃的人告诉基督徒们，穆斯塔法打算把基督徒斩尽杀绝，只留拉·瓦莱特一人，要将他披枷带锁地送到苏莱曼面前。大团长的回应是当众起誓，绝不被敌人生擒。

对神经紧绷地守候在岗位上的守军来说，这是个焦虑不安的夜晚。月光非常明亮；巴尔比带着自己的火绳枪，和其他一些士兵守在“马刺”上。他听得见对岸伊玛目们的吟唱声在黑暗里不断起伏，无休止地歌咏着真主的诸多尊名。

7月15日，星期日，离黎明还有大约一个半小时。森格莱阿后方的山峰上点起了烽火；对岸的圣艾尔摩堡也点燃烽火，作为回应。阿尔及利亚人集结在森格莱阿面向陆地一侧城墙外的壕沟内。奥斯曼军队的火绳枪兵们排队进入森格莱阿对岸的堑壕，调整火枪的瞄准装置。炮兵做好射击准备。马沙尔·德·罗夫莱斯和新近从西西里驰援赶到的士兵们聚集在城墙上。在“马刺”上，弗朗西斯科·巴尔比和他的战友们在西班牙

上尉弗朗西斯科·德·萨诺盖拉指挥下，蹲伏在低矮的土木工事后，准备打退敌人从海上的进攻。黑暗中的港湾对岸，土耳其士兵登上船只，发出很大的嘈杂声。穆斯林呼喊了三次安拉的名字。船桨开始划动，浪花四溅，小小的舰队起航了。

破晓时，岸上的守军可以看见黑压压的大群战船缓缓驶过平静的海域。初升的太阳照亮了一幅不同寻常的图景：舷侧堆有成捆棉花和羊毛的船上载着成百上千的士兵——戴着饰有随风飘舞羽毛的高帽子的近卫军；衣着华美的阿尔及利亚人则身穿鲜红色长袍、“金银线织就的衣服和朱红锦缎”^[13]，戴着稀奇古怪的头巾，装备有“非斯的精致火枪、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的弯刀以及华美的弓”。冲在最前的是三艘满载戴头巾圣人的战船，按照基督徒的记载，这些圣人“穿着奇装异服”，“头戴绿帽，很多人手里拿着打开的书卷，吟唱着诅咒语”^[14]。他们其实是在背诵《古兰经》的诗节，激励士兵奋勇战斗。战船装点着不计其数、五颜六色的各式旗帜，在清晨的海风中飘扬着。响板、号角和手鼓的乐声飘向对岸。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的指挥官是希腊海盗坎德利萨，他高坐在一叶轻舟上，挥舞着一面小旗，活像乐队指挥。对守军来说，这场景真是无与伦比，“如果不是如此杀气腾腾的话”^[15]，真是充满了仙境般的壮美。

船队接近目标时，吟唱声停止了，宗教船只后撤。岸炮开始轰鸣，炮弹在船队中横飞，打死了不少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发起进攻”^[16]，呐喊声和火绳枪射击声夹杂在一起；桨手们拼命划桨，加快速度。在“马刺”上，守军等待着登陆船只冲撞木桩的巨响。

同时，在陆地一侧的城墙前，哈桑率领阿尔及利亚人发起猛攻。他们冲出壕沟，携带云梯翻过壁垒，争先恐后地要证明自己的勇气。守军用暴风骤雨般的子弹迎接他们；侧翼阵地上的西班牙火绳枪兵也发出一

轮冰雹般的齐射。几百人被打倒在地，但他们凭借着兵力的绝对优势，继续冲锋，在胸墙上取得了一个立足点。整个战线一片喧嚣。“我不知道，地狱的图景能否描绘这场可怕的战斗，”史官贾科莫·博西奥写道，“熊熊大火、酷热、火焰喷射器和火圈发出的持续不断的火焰；浓烟、恶臭、开膛破肚残缺不全的死尸、兵器碰撞声、呻吟声、呐喊和吵嚷声、大炮的轰鸣声……人们互相残害、大开杀戒、拼死挣扎、互相推搡、坠落、射击。”^[17]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各民族在混乱的队伍里搏斗着；马耳他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塞尔维亚语和希腊语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挣扎闪动的火光和浓烟中，有时能短暂地瞥见一些人的身形——方济各会修士埃博利的罗伯特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握着利剑，从一个岗位走到另一个；一个暴跳如雷的土耳其近卫军士兵跳上胸墙，在近距离一枪打在一名法国骑士头上；被火团困住的阿尔及利亚人惨叫着奔向大海。但进攻方受到了狭窄地形的阻碍，因此尽管斗志昂扬，哈桑最后还是不得不将他的阿尔及利亚人撤下。近卫军的阿迦旋即命令正规军上前，不给守军任何喘息的时间。第二波部队猛烈地冲击着城墙。

在海岸上，战船加快速度，撞上了木桩防线。木桩承受住了这次冲击，船上的人不得不跳下来，拖着长袍淌水前进，不时喊叫和开枪射击。守军已经严阵以待；他们准备了两门臼炮，准备横扫海滩，但是奥斯曼军队前进得如此迅猛，以至于臼炮根本没有时间发射。攻方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冲向海岬末端的“马刺”，后者唯一的防御工事就是一道低矮的路堤。

“马刺”的指挥官萨诺盖拉集结了部下，命令他们“用长枪、利剑、盾牌和石块”^[18]将入侵者击退，这时他们的防御陷入了骤然的混乱。一名水手对点燃的燃烧武器操作失当，导致它在他手里当场爆炸，将待用的全部武器都点燃了，周围的人都被烧死。在黑烟和混乱中，土耳其人爬了上来，将他们的旗帜插在胸墙上。萨诺盖拉亲自冲上去阻挡潮水般

的敌人。他身穿一整套富丽的铠甲，在胸墙上保持平衡，在蓝天映衬下成了一个绝佳的靶子。一发子弹击中他的胸甲，发出脆响，但没有伤害到他。然后，一个“头戴饰有黄金的黑色大帽子的近卫军士兵在炮台基座跪下，向上瞄准，一枪打中了他的腹股沟”^[19]。萨诺盖拉上尉倒地死去；双方都冲上去争抢他的尸体。下面的土耳其人抓住了他的两腿，上面的守军则抓住手臂。一番恐怖而滑稽的拔河之后，守军夺得长官的尸体，将其拉上胸墙，“但敌人把他的鞋子脱下之后才放弃”^[20]。敌人如此之近，兵力又如此雄厚，巴尔比和他的战友们丢下了火枪，开始用石块攻击敌人。

就在守军从海上和陆地上腹背受敌的时刻，穆斯塔法亮出了他的王牌。他预留了10艘大船和大约1000名精兵，包括近卫军和水兵。这些满载兵员的大船从对岸起航，绕过“马刺”尖端，来到铁链之外、没有得到木桩保护的那一小块海岬上，一路几乎都没有引起守军的注意。这个地点没有任何防御；此处的城墙非常低矮，登陆易如反掌。这些人是来死战到底的；为了加强他们的斗志，穆斯塔法特意选的都是不会游泳的人。船队悄悄躲过海上的血腥厮杀，已经准备好冲上海岸。他们目标的200码之外就是第二个半岛——比尔古的尖端。

但是，土耳其统帅部在筹划这次助攻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在比尔古半岛尖端，也就是这支突击队的登陆点的对岸，守军部署了一个隐蔽的炮台，几乎与海平面同高。土耳其船队接近时，这个炮台的指挥官吃惊地发现，敌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他偷偷地给5门大炮装填了致命的混合葡萄弹——成袋的石块、铁链碎片和带尖钉的铁球，然后打开炮门，屏住呼吸等待敌人接近。敌人还没有发现他，真是难以置信。他一直等到敌人已经非常接近、坐以待毙，然后才开炮。冰雹般凶狠的弹雨呼啸着飞过海面，将船只撕碎。土耳其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要么被暴风雪般的炮火杀死，要么跌进海里。10艘船中有9艘被打烂，当场沉没；没有被击毙的人则在海上淹死。第10艘船勉强逃走。一

瞬间，数百名精兵就成了漂浮在水上的死肉。

城墙下和海滩前的激战仍在继续。在近海，希腊人坎德利萨告诉部下说，哈桑的人马已经突破了陆地一侧的城墙，以此激励他们。城墙并没有被突破，但那里的阵地的确具有关键意义。拉·瓦莱特焦急地从比尔古通过浮桥调来援兵，其中一半人马去扭转城墙的战局。看到城墙上调来了生力部队，近卫军的阿迦开始撤回他的部队。他们携带着己方死者的尸体撤退了，然后开始最后的猛烈炮击，杀死了一些骑士。剩余的援兵去支援海岸守军。西西里总督堂加西亚·德·托莱多的儿子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尽管拉·瓦莱特不允许他以身涉险。他几乎刚赶到战场就被一发火枪子弹击毙。

海滩上的人看到一群年轻的马耳他人赶来，用弹弓向敌船射击，并且高呼“援军到了！胜利！”^[21]他们这才知道，奥斯曼军队已经从陆地一侧的城墙撤退。从海上进攻的土耳其军队突然意识到，形势一下子变得对他们不利了。更糟糕的是，坎德利萨欺骗了他们。他们咒骂着“希腊叛贼”^[22]，转身逃跑。他们恐慌地抱头鼠窜，溃不成军。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船；靠近岸边的少数船只被潮水般涌来、推推搡搡地登船的人群掀翻；不会游泳的人被自己的长袍缠住，淹死在海里。更糟糕的是，大多数船只已经撤离了海滩。登陆部队被切断了。他们发疯一般发出各种讯号，让舰队回来救援他们。

守军抓住良机，冲上海滩，大肆砍杀在浅水里跌跌撞撞的穆斯林。巴尔比和他的战友冷静地站在远处，将可怜的敌人一个个射杀。有些土耳其人宁愿被淹死，绝望地跳入大海；有些人丢弃了武器，跪在地上哀求饶命。守军没有怜悯敌人；圣艾尔摩堡遭血洗的记忆还很清晰，基督徒们冲上前，高呼“杀！杀！圣艾尔摩堡的血债要用血来还，你们这些混蛋！”^[23]其中，还没有长胡子的少年费德里克·桑乔其奥记起自己被血腥残杀的兄弟，带着满腔的怒火，毫无悔意地肆意砍杀。“就这样，他

们铁石心肠地将敌人斩尽杀绝。”

在近海，土耳其船只仍然逡巡不前，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接到了互相矛盾的命令。皮雅利担心他的船只遭受损失，于是骑上马，在岸边狂奔，命令船只原地不动。但在漫天烟尘中，他被一发掠过的炮弹打倒在地，头巾被炸飞，耳朵也被震聋。陆军统帅穆斯塔法看到他的人马遭到屠杀，发出了相反的命令。他命令船只立即到海滩救人。但船队遭到比尔古的炮火袭击，很快又后撤了。

在基督教史学家的笔下，海边的情景酷似《圣经》描绘的大规模屠杀，“如同法老的军队被红海的惊涛骇浪摧毁”^[24]：数量惊人、五颜六色的各式军事用品——旗帜、帐篷、盾牌、长矛和箭筒——密集地漂浮在海面上，看上去更像“厮杀刚刚结束的战场”。还不时有活着和半死的人、身体残缺和奄奄一息的人，就像市场石板上的鱼一样，满身血污，痛苦挣扎着。

马耳他人涉水走进这可怕的“肉汤”，将还活着的敌人结果，剥去死人的衣服。他们从死者身上夺走华贵的服饰和精美的武器。他们缴获了有镶嵌装饰的弯刀和做工精细、饰有金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火绳枪，以及敌人为攻克和占据城堡而准备的各种物资：大量粮食、用来捆俘虏的绳索，甚至还有起草完毕、准备发给伊斯坦布尔的捷报。穆斯塔法先前对此役志在必得。抢劫死尸的人还收回了相当数量的金钱（因为每个土耳其士兵都随身携带自己的财物），以及“大量大麻”^[25]。

只有4个土耳其人被生俘。他们被带到大团长面前，接受讯问，然后被交给平民。俘虏被拖走的时候，“为圣艾尔摩堡报仇！”^[26]的喊声传遍了各条小巷。城墙下躺着的、在海上轻轻随波逐流的尸体共有4000具。随后好多天，一直有尸体被冲刷到岸上。

[1]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p.88-9

[2] Spiteri, Stephen C., *The Great Siege: Knights vs.Turks MDLXV—Anatomy of a Hospitaller Victory*, Malta, 2005, p.606

[3]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96

[4]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81

[5]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97

[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81

[7]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98-9

[8]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87

[9]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86

[10]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89

[11]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104

[1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597

[13]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11

[14]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03

[15]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11

[16]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12

[17]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06

[18]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05

[19]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14

[20]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113

[2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04

[2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04

[23]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05

[24]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05

[25]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16

[2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05

13. 堑壕战

1565年7月16日～8月25日

第二天，苏莱曼向穆斯塔法传了一条旨意：

很久以前，我派遣你前往马耳他，为的是占领这座岛屿。但我没有收到你的任何报告。我已经下了旨意，收到我的命令后，你应立即报告关于马耳他战役的情况。的黎波里总督图尔古特是否已经抵达该处，并协助你作战？敌人海军情况如何？你是否已经征服马耳他的部分地区？你应写信将所有情况报告给我。^[1]

苏莱曼将这封信的一份副本发送给了威尼斯执政官，蛮横地命令“务必即刻将此信转交给穆斯塔法帕夏。另外，你应向我报告那里的情况”^[2]。

苏丹不是唯一一个对马耳他战事心急如焚的人。基督徒们也在关注马耳他岛的困境，愈来愈感到恐惧。地中海西部到处是传递谣言、新闻、建议、警告和计划的往返船只。拉·瓦莱特从位于比尔古的总部一直在和西西里的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保持通信，但在圣艾尔摩堡落入敌手之后，与外界的联络越来越困难。现在的办法是派遣化装为土耳其人的马耳他人游过港湾，溜过敌军战线，前往姆迪纳，然后搭乘小船，取道戈佐岛前往西西里。送信是件危险的工作；有时为了确保消息送出，拉·瓦莱特不得不发送同一封信的四个副本。皮雅利的战船在海峡上巡逻，追击着送信的船只。一旦被敌船抓住，信使们就将信扔进大海，慷慨赴死。即便信件被缴获，穆斯塔法也仍然无法破解密码，因此联络线虽然危机四伏，但一直在坚持运作。

消息越来越糟糕，尤其是在圣艾尔摩堡陷落的噩耗传来后，意大利海岸地区陷入了莫大的恐慌。对于战败的后果，没有人比教皇庇护四世

更心知肚明。“我们深知，”他写道，“假如这个岛屿落入不信真神的敌人魔爪（上帝保佑，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福祉将受到多么大的威胁，基督徒人民又将遭受多么大的灾难。”^[3]大家明白，罗马是奥斯曼帝国征伐的最终目标。在庇护四世狂热的想象中，土耳其人几乎已经兵临城下。他命令，如果西西里传来消息，哪怕是深夜，也要立即将他叫醒。他已经下定决心，宁可死在罗马城，也绝不逃走。

随着全欧洲渐渐认识到马耳他的重大意义，一小群冒险家和来自圣约翰骑士团其他前哨基地的骑士们动身前往西西里，准备加入救援行动。全欧洲都屏住呼吸，焦虑地注视着战局。甚至信新教的英格兰也为天主教的马耳他祈祷。

但救援马耳他的组织工作慢如龟爬。拉·瓦莱特以冷若冰霜的礼貌言辞写信给堂加西亚，越来越急促地催他赶紧行动，私下里则忍不住咒骂他的迟钝。在6月底派出小股援军之后为什么就杳无音讯了？平民的斗志已经接近崩溃；只需一万人就能打垮土耳其军队，因为后者“大部分是乌合之众，对作战完全缺乏经验”^[4]。堂加西亚作为腓力二世国王在当地的代表，被指责优柔寡断、过分谨慎。后来，人们直言不讳地将马耳他遭受的长期苦难归咎于他。

这是很不公平的。问题并不出在西西里，而是在马德里。堂加西亚是个经验极其丰富、非常精明的军事家，对局势有着敏锐的把握。他早就将马耳他的问题上报给腓力二世，讲得一清二楚。奥斯曼帝国对马耳他的进攻是对西班牙在整个地中海的霸权的挑战；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必须当机立断。他恳求国王给他军队和资源来援救马耳他。“如果马耳他得不到援助，”他在5月31日写道，“就必然会陷落。”^[5]他敦促腓力二世正视这个问题。堂加西亚对马耳他的命运并非冷淡的旁观者。他的亲生儿子就参加了战役，还没有给父亲发出什么消息，就阵亡了。腓力二

世的答复是谨慎的。国王受到杰尔巴岛惨败的持续困扰，也很害怕庞大的奥斯曼舰队。在杰尔巴岛战役之后，西班牙舰队以巨大的代价进行了重建，腓力二世不希望再次失去舰队。他给堂加西亚下了明确命令，不准拿他的舰队冒险；没有国王本人的批准，不准采取任何行动。腓力二世命令堂加西亚小心地保护国王的舰队（皮雅利则从苏丹那里接到了同样的命令）：“舰队的损失将比丢失马耳他更为严重……假如马耳他陷落（上帝保佑，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会有别的办法将它收复。”^[6]地中海中部的很多人对国王的观点不敢苟同。审慎的国王批准集结部队，但不准动用他们。

基督教世界的一盘散沙再次残酷地暴露出来。教皇庇护四世对腓力二世的答复火冒三丈。国王舰队的一大部分是得到了教皇资助才建成的；它是用来保卫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他授意西班牙籍红衣主教们提醒腓力二世，“假如教皇没有资助陛下建造桨帆船，今天陛下在海上就没有一船一桨能够抵挡土耳其人”^[7]。国王仍然迂回婉转、谨小慎微。他指示堂加西亚，只要舰队不受到威胁，就可以援助马耳他。信件回复的缓慢更无助于事态的发展：从西西里送一封信到马德里，然后再收到回复，至少要六周时间。同时，总督继续加紧集结兵力和船只，并不断游说腓力二世宫廷的达官显贵。到8月初，他已经准备好发动远征，但仍然没有得到国王动用船只的许可，而此时战局一天天变得更加险恶。

虽然7月15日在“马刺”遭遇惨败，穆斯塔法仍然拼命督促攻城，似乎他能感到苏丹在远方已经对他不满。他放弃了从海上进攻马耳他要塞的计划。从此时起，他将开展一场圣艾尔摩堡风格的消耗战——狂轰滥炸、坚持不懈的坑道作业、出其不意的突袭。他将集中力量，同时对比尔古和森格莱阿朝向陆地一面的短战线发动进攻。

这是比尔古首次遭到猛攻。这个半岛是整个岛屿的城镇中心，也是骑士团的最后堡垒。朝向陆地的一面筑有巩固的防御工事，包括两座坚

固的突出棱堡——圣约翰堡和圣雅各堡，分别得名自骑士团和西班牙的主保圣人。这些防御工事背后的海岬上坐落着一个人口密集的城镇，包括错综复杂的小巷。海岬向大海一面延伸，逐渐变细，尖端筑有圣安杰洛堡。这个牢固的小城堡与大陆之间有一道灌有海水的壕沟相隔，壕沟上有吊桥。它是一个后撤阵地，用于最后的抵抗。

到7月22日，穆斯塔法已经将他的所有火炮集中在俯视港湾的高地上。黎明时分，14个炮台上的64门大炮开始轰击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防御工事。“这炮火持续不断、强度惊人，既震撼人心又令人恐惧。”^[8]在巴尔比看来，这就像是世界末日。西西里居民不需要别人提醒，战争已经来到了他们门槛上，因为他们在马耳他以北120英里处的锡拉库萨和卡塔尼亚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这场炮击的烈度和穿透力都是惊人的；大炮可以射击整个城镇，摧毁房屋、杀死室内的人，将防御工事化为瓦砾堆。21英尺厚的土木工事似乎是安全的了，但躲在工事后的人还是会被炸飞。这场炮击一刻不停地持续了五天五夜。奥斯曼军队的工程师们迅速判明了比尔古陆地一面防线的薄弱环节——卡斯蒂利亚人的防区，即东岸接近海边的那段城墙（守军无法用交叉火力防御这一地段）。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段，进行“特殊照顾”，为总攻铺平道路。

在炎热的7月，势均力敌的两支军队沿着比尔古和森格莱阿面向的陆地防线展开了一场激战。穆斯塔法戎马生涯中攻城拔寨的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拥有本领高强的工程师和奥斯曼帝国的雄厚人力资源。坚韧而严厉的拉·瓦莱特对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对以少敌多的纵深防御战术了如指掌。这位老将知道，这是最后的决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最后决战，也是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骑士团的最后抵抗。穆斯塔法帕夏可以感觉到苏莱曼在注视他；伊斯坦布尔的楼台亭阁似乎近在咫尺。苏丹的皇旗在军营飘荡；苏莱曼的亲信侍从们不断将报告发送给苏丹。两军的统帅都不能承受失败；两人都准备好亲临火线，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两人之间的斗争既是精神意志的角逐，也是军事技能的较量。

穆斯塔法虽然能把防御工事炸成瓦砾堆，但受到了很多困难的烦扰，尤其是战场规模的狭小。比尔古的战线仅有1000码宽，森格莱阿的战线更短。不管他的兵力多么庞大，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能投入作战的兵力是有限的。守军人数虽少，但身披坚甲，而且得到临时搭建的城墙和壁垒的保护，因此并没有什么劣势。同样让他担忧的是，间谍和俘虏传来消息，在30英里外的西西里，军队和船只正在集结。另外，到了盛夏，他的军营内开始流行疫病。在当时各国的军队中，土耳其军队在营地卫生条件和组织工作上算是最小心仔细的了，但马耳他的自然条件很不利。军队不得不在水源周围的低洼沼泽地带扎营，而且骑士团还污染了部分水源。在炎炎赤日下，在到处散布着尚未埋葬的死尸的地域，很多人患上了斑疹伤寒和痢疾。奥斯曼帝国将领们感受到了时间的压力。



炮击比尔古（**B**）；一队头戴羽毛头饰的土耳其士兵（**O**）；穆斯塔法（**L**）和皮雅利（**N**）在马背上观战。

穆斯塔法抓紧时间，寻求突破守军的防线。在“马刺”战败之后的最

初几天内，土耳其军队尝试用船桅架桥，越过森格莱阿的壕沟。守军多次出击，试图将桥梁烧毁。大团长的侄子身穿富丽堂皇的铠甲，目标过于明显，在一次鲁莽的突袭中被击毙，但最后守军把桥烧掉了。穆斯塔法毫不退缩，命令坑道工兵在坚硬的岩石中挖掘地道，准备进行爆破，并用炮火声掩盖坑道作业的声音。好运气拯救了森格莱阿。7月28日，土耳其坑道工兵在地下用一支长矛刺探，想查明自己离地面有多远，这时“由于上帝的旨意”^[9]，城墙上的守军看到矛尖从地下插了出来。基督徒们挖掘了自己的地道，冲进敌人的地道，投掷了燃烧武器，将土耳其坑道工兵赶出。地道被封闭了。这次失败显然让穆斯塔法颇为沮丧，因为这项工程花费了很大力气。但智斗继续进行。土耳其人炮击街道的时候，拉·瓦莱特命令在街上修建了石墙。火绳枪兵开始狙击修补壁垒的劳工时，马沙尔·德·罗夫莱斯用船帆遮蔽他的部下，迫使狙击手只能盲目乱射。土耳其人试图填平壕沟，但守军在夜间出击，将壕沟里的东西清理出去。外层工事在炮火下坍塌时，守军的回应是建造内层防线——用泥土和石块匆忙搭建的障碍物，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前线，还拆除房屋以获取建材。在遍地瓦砾的废墟上，双方都努力维持交叉火力点，并建造障碍物以保护自己的士兵。攻城战需要大量的人力，但土耳其人有的是劳动力。工作的规模是庞大的：挖地道、建壁垒、挖掘不断逼近敌人的堑壕、搬运土方和移动火炮。穆斯塔法动用了五花八门的战术；他将火炮位置不断转移，在吃饭时间或者深夜发动突然袭击，发动旨在拖垮对方神经的毫无规律的炮击，有时候瞄准并射击城墙的特定地段，有时又随意轰击城墙后的城镇，以恐吓平民，又不断地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以转移对方的注意力或打击对方士气。

土耳其人的花招不胜枚举。8月2日，土耳其人发动了一次集中进攻，同时还进行了猛烈炮击。守军被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土耳其人鬼鬼祟祟地逼近，没有受到己方炮火的影响，开始爬墙。以为遭到火力压制的守军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敌人大炮发射的都是空包弹。他们重新集结起来，打退了敌人。

拉·瓦莱特将防御的组织工作牢牢控制在自己的铁腕下。他决心不能被敌人打个措手不及，于是命令晨祷钟在天亮前两个小时敲响，而不是在通常的时间。他规定，敲鼓召集士兵，敲钟则是让大家后撤。所有关键地点都堆放了大量弹药；特制的燃烧武器——表层涂有沥青、装满棉花和火药的麻袋——随时待命。士兵们准备好了成袋的泥土，用于抢修；他们给烧煮沥青的大锅不断添柴，保持沥青沸腾。大团长亲自到各处视察，身边有两名侍从陪伴，分别拿着他的头盔和长枪，另外还有一个小丑跟着他，任务是将各处的形势报告给大团长，并“努力用俏皮话逗他开心，尽管往往没有什么能让人笑得出来的事情”^[10]。

对双方来说，维持士气都是至关重要的。土耳其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依赖一种被众人深深理解的赏罚制度。海军为马耳他战役所做的记录中清晰地记载了士兵们的英勇事迹和他们得到的赏赐：“厄梅尔立下大功，在夜间俘虏了姆迪纳要塞的一名异教徒……穆罕默德·本·穆斯塔法在圣艾尔摩堡战役中缴获了异教徒的旗帜，并砍下多人的脑袋……皮尔·穆罕默德斩杀多名敌人，立下大功……上级传来旨意，他将得到一个官职。”^[11]骑士团奖励英勇事迹的方式没有预先的安排，而是更为即兴。安德雷亚斯·穆尼亚东内斯指挥了冲下地道、驱逐敌人坑道工兵的行动，被赏赐了一条金链；在8月2日的战斗中，三名火绳枪兵立下了战功，每人的军饷增加了10斯库多^[12]；罗姆加许诺，将自掏腰包，向任何从堑壕中活捉一名土耳其人的官兵重赏100斯库多。

抓俘虏是非常重要的；双方都持续不断地努力收集情报。7月18日，一名被俘的土耳其人在遭受拷打后供认，现在奥斯曼军营内对西西里的逐渐兵力集结深感担忧。几天后，皮雅利派出一艘轻型帆船（船员是意大利叛教者）去锡拉库萨看看究竟。关于战事如何继续，两名大将间发生了矛盾。皮雅利不肯为陆地上的围城战负责，命令舰队出海，扫荡航道，寻找敌人舰队集结的迹象。这让陆军十分恐惧，以为海军抛弃了他们。过了几天时间，两人的分歧才弥合。皮雅利在越来越强烈的竞

争气氛中返回，继续参加攻打比尔古；两位帕夏谁能先突破城墙，已经成了荣誉问题。他们此前已经为了个人荣誉、战术和舰队使用等问题摩擦不断。皮雅利认为自己在图尔古特还活着的时候受到了冷遇，并认为在赏赐官兵的时候，穆斯塔法更偏爱陆军，对舰队则很冷淡。这些鸡毛蒜皮的争斗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据史学家波切维^[13]记载，“海军司令在开炮的时候，炮手们得到指示‘现在不要开炮，穆斯塔法将军正在午睡’。”^[14]水手们的回答是耸耸肩。他们对战斗能有多少热情，又能有多大的努力？他们责怪穆斯塔法制造了这些分歧。

关于这些争吵以及奥斯曼军队士气下降的消息对拉·瓦莱特来说是特别有价值的，但他也有自己的麻烦。他已经向平民保证，援军已经在路上；大家普遍相信，援军将于7月25日（西班牙的主保圣人圣雅各的纪念日）那天抵达。到了那一天，援军毫无踪影，拉·瓦莱特不得不向群众发表鼓气的演说，敦促所有人坚信上帝会救他们。淡水供应也让他担心；大街上还发生了暴乱。现在他给堂加西亚的信显得越来越悲观：“我怀疑饮水供应能否持续下去，我们正走向最终的和无法逃避的灭亡。”^[15]后来，淡水短缺的问题如有神助般得到了解决；在比尔古一座房屋的地窖内发现了一个泉眼，足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居民的需求。大团长为此当众向上帝感恩。每次突袭或战役取胜，他都会这么做。但持续的炮击“就像是移动的地震”^[16]，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气氛下，两位帕夏加倍努力地攻城；守军继续后撤和狙击敌人。

在遭围攻的城堡之外，一场游击战正在进行。每天都有一小队基督徒骑兵从姆迪纳出发，伏击敌人的掉队士兵，并刺探奥斯曼军营。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是一名意大利骑士，名叫温琴佐·阿纳斯塔吉。他机智敏锐而雄心勃勃，注定要在战役结束后青史留名，因为格列柯^[17]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但他的结局非常悲惨，二十年后被另外两名圣约翰骑士团成员杀害。阿纳斯塔吉从敌人营地捕捉掉队士兵，以获取情报，并将会说土耳其语的间谍安插到敌营。他每天从远处观察由无数帐篷组成的

巨大敌营，发现它的后方没有设防。“这些营地的状况就像我们多次描述的那样，”他在发往西西里的信中写道，“只在正面有防御工事，用于抵御我军要塞发出的炮火，但后方和侧面没有堑壕，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安排岗哨。”^[18]另外，到7月底，他发现土耳其人在筹划一场一劳永逸的最后总攻。一连七个夜晚，姆迪纳的骑兵队伍躲在离敌营一英里的一个干燥峡谷内，密切观察敌情。在第八天，即8月6日的夜晚，他们听见大队人马在黑暗中出营。阿纳斯塔吉的部下紧拉缰绳，静静守候。

8月6日（星期一）对拉·瓦莱特来说不是个吉利的日子。晚饭时，比尔古的城墙上相对比较安静，这时一个叫弗朗西斯科·德·阿吉拉尔的西班牙士兵侧身悄悄地走到靠近大海的阿拉贡人防区。他戴着火绳枪兵的向上翻起、饰有羽毛的钢盔，肩上扛着火枪。他说，他是来狙杀敌人的。他点燃了火枪的导火线，观察下方壕沟，寻找目标。“那些狗杂种一个也看不见！”^[19]他对岗哨喊道。然后，趁没人注意的时候，他突然跳进了壕沟，开始全速跑向奥斯曼帝国战线。岗哨开枪示警，城墙上射出一轮枪弹，但阿吉拉尔已经跑进了敌人的前沿战壕，受到热烈欢迎，并立即被带去见穆斯塔法帕夏。

这起变节事件极为严重。阿吉拉尔是个受到很高评价和高度信任的人。他消息非常灵通。马沙尔·德·罗夫莱斯和拉·瓦莱特开会的时候，阿吉拉尔经常在场。他听到了很多关于守军困境的秘密讨论——防御工事的真实状况、岗哨安排的日常细节、武器供应和战术。这些信息现在全到了穆斯塔法手里。

拉·瓦莱特立即准备迎接敌人的进攻，深知穆斯塔法会准确地打击城墙最薄弱的环节。他命令在关键地点储备了燃烧武器；钉有铁钉的木板已经就位；大锅的沥青也准备好了。大团长计划和一支机动救援部队一起在城市广场上等候，随时驰援危险地段。

当天夜间，土耳其人对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狂轰滥炸，并做好进攻准

备。营地和船上的所有战斗人员已经倾巢出动。大队人马被船只运过港湾，在比尔古以东登陆。阿纳斯塔吉的骑兵队在两英里外的黑暗中等待，听着大炮的轰鸣，监视着敌营。

破晓前一个小时，穆斯塔法和皮雅利分别向两个海岬同时发动大规模攻势。8000人围攻森格莱阿，4000人攻打比尔古。攻势按照惯常的程序开始：黑暗中的吟唱、击鼓和可怕的呐喊声。火绳枪的枪火以及燃烧武器、火圈、火焰喷射器和大锅里滚烫沥青的闪光将黑暗驱散。混乱的呼喊、教堂钟声和铙钹的脆响混成一片。在渐渐明亮的晨光中，守军可以看得见一个身穿华丽红丝绸衣服的人手举大旗，爬过残破的胸墙。那是希腊人坎德利萨，他在“马刺”的战斗中被直言不讳地指责为懦夫。现在他率领部队进攻，发誓要第一个将旗帜插在城墙上。他的身形太暴露，很容易瞄准。守军很快就用火绳枪将他打倒。随后是司空见惯的争抢尸体的厮打。虽然损失了这员大将，而且伤亡惨重，但奥斯曼军队毕竟兵力雄厚，渐渐占了上风。防御工事越发残破不全。

在邻近的比尔古战线上，皮雅利的人马正杀进卡斯蒂利亚人的阵地，这里的外围防御工事已经被连续数日的集中炮火炸成了瓦砾堆。他们冲上城墙，开始插旗。在广场上等候的拉·瓦莱特得到了前线已经吃紧的消息。他从侍从手中接过自己的头盔和长枪，带领机动部队冲到危险地段，高呼：“今日不死，更待何时！”^[20]卡斯蒂利亚人防区的指挥官们试图把他拦回去，拼命阻止他登上已经被敌人占领的“骑士塔”。拉·瓦莱特“像普通士兵一样手执长枪”^[21]，转到另一个阵地，从一名士兵手中夺过火绳枪，开始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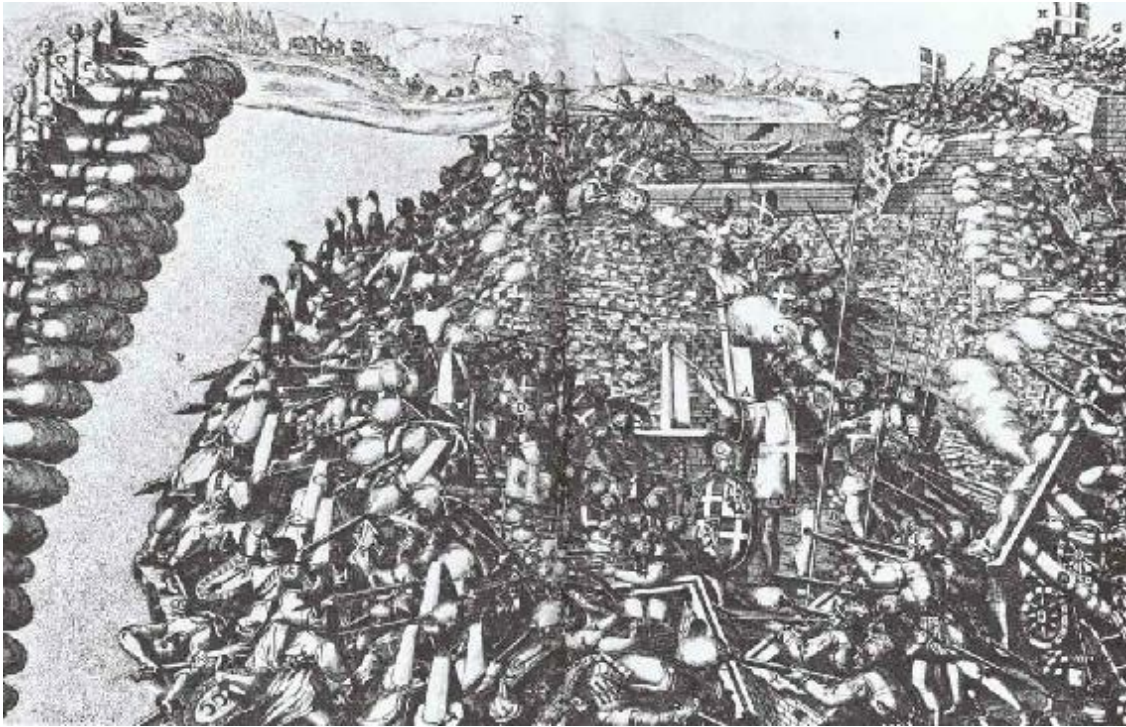
此时土耳其人已经成功地将苏丹皇旗插在了城墙上；这面饰有白色马尾、顶端有个金球的大旗成了激烈争夺的焦点。弗朗西斯科·巴尔比写道：“我们看见了那旗帜，于是抛掷带钩子的绳索，想把它钩住，最后终于成功了。我们在这边拉，土耳其人在另一侧猛拽，旗杆顶端的金

球掉了下来。他们把苏丹皇旗救走了，但是我们已经用燃烧武器烧掉了它的很多丝绸和金质流苏。”^[22]

昏天暗地的血战持续着。奥斯曼士兵每有一波撤退下来，就有新的一波接替。双方的不少关键人物都丧失了战斗力。摧毁敌人地道的英雄穆尼亚东内斯右手负伤，后来死去；罗得岛总督阿里·博尔图齐贝伊阵亡。拉·瓦莱特腿部受伤，在大家的劝说下终于后撤。“这一天的战斗极其凶险，双方都打得极其顽强，血流成河，”^[23]巴尔比写道。战场上的景象非常恐怖；有很多尸体“缺了脑袋，没有手脚，烧得焦黑，或者四肢被撕成碎片”^[24]。阿纳斯塔吉的骑兵队感到战斗已经达到高潮，从原野中择路潜行，来到奥斯曼军营。接近敌营的时候，他们开始冲锋。

两位帕夏都不愿没有胜利就离开战场。两人激烈地竞争，力求取胜。宪兵们用棍棒将从杀戮地带畏缩的人赶回战场。在城墙内，守军实力越来越弱。他们已经连续战斗九个小时，没有得到任何休息。尽管拉·瓦莱特确保战士们能得到面包和掺水葡萄酒，而且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也参加了战斗，但局势还是迅速恶化。奥斯曼军队的将领们能感到，胜利已经唾手可得。

这时，进攻突然间止步不前，似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卡斯蒂利亚人防区前壕沟内的土耳其士兵突然掉头就跑；森格莱阿城下的士兵也加入逃跑的人群。他们潮水般逃离战场，背后遭到守军的射击。任何威胁或是军官们的拳打脚踢都无法阻止这骤然的溃败。城墙上的守军对此大惑不解，穆斯塔法帕夏更是摸不着头脑。他骑着马努力控制住溃军，将部队带出了火枪射程。消息不胫而走：堂加西亚的援军已经登陆，焚毁了大营。隐约能听得见大营方向传来呼喊声，还能看得见帐篷上升起了黑烟。奥斯曼军队一片恐慌；遭围攻的城堡内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都爬上城墙，盯着空无一人的堑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他们喊了起来：“胜利！援军到了！”^[25]



“今日不死，更待何时”

双方都错了。那不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从西西里赶到，而是阿纳斯塔吉的一小队骑兵（或许只有100多人，既有骑士也有马耳他民兵）扫荡了无人把守的土耳其军营。营内只有伤病员和少量哨兵及后勤人员。骑兵们挥舞着马刀冲进营地，大肆砍杀，报仇雪恨。他们横冲直撞，屠杀病员，砍倒哨兵，烧毁帐篷，破坏补给物资。奥斯曼人的盲目恐慌传染了整个大军。然后，阿纳斯塔吉的队伍在穆斯塔法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又安全返回了姆迪纳，让奥斯曼军队统帅部暴跳如雷、丢尽颜面。穆斯塔法和皮雅利又大吵大闹起来。

马耳他在8月7日能够幸存，完全是由于阿纳斯塔吉的幸运一击。马耳他岛虎口脱险。人们在圣劳伦斯教堂内唱起了《感恩赞》，然后举行了宗教游行。大街上有人掩面而泣。但守军看到城墙已经残破不堪，担心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有谣言称，骑士们将撤退到比尔古尖端的圣安杰洛堡，而将平民抛弃。为了粉碎这个谣言，拉·瓦莱特采取了断然

的措施。这位坚忍不拔的老人命令将骑士团的所有珍贵圣像搬到圣安杰洛堡，然后将吊桥升起。骑士团将和所有平民一起在破败的城墙处死战到底，让圣像自己作最后的抵抗好了。

第二天，穆斯塔法决定好好处置姆迪纳的骑兵队。其实他早在攻城战开始的时候就应当做这个决定，现在为这个疏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皮雅利受命将姆迪纳的基督徒骑兵队全部消灭。他精心准备了一场伏击。一队人马被派去袭击姆迪纳城外平原的牧场。骑兵队出城将这支敌人赶走，返回时却发现回城的道路被一大队奥斯曼步兵封锁了。骑兵队经过一场激战，损失了大约30人及其马匹，才逃回城内。有些人徒步撤退，第二天才返回。皮雅利的人马随后进逼姆迪纳城。他们接近时吃惊地发现，城墙上居然有很多士兵；土耳其人原以为姆迪纳城非常薄弱，没有多少守军；现在城墙上却站满了士兵，射出暴风骤雨般的枪弹，敲着军鼓和教堂大钟。皮雅利的前进可能有些机会主义，而不是事先安排的，因为他没有携带重炮。他们现在决定走为上计。土耳其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没有多少精力来认真攻打姆迪纳。于是他们班师回营。姆迪纳城墙上的“大军”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平民，农民和他们的老婆孩子穿着多余的军服，在城墙上走来走去。

在伏击战中抓住的俘虏被带到穆斯塔法面前，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堂加西亚在前一天将堂萨拉萨尔（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派到了岛上进行侦察，为发动大规模救援打前站。穆斯塔法在自己部下面前佯装对这条消息并不重视，但其实深知其重大意义。时间不多了，各个方面都在向他施加压力。8月12日，他收到了苏莱曼在7月16日写的信；送信的传令官还口头描述了苏丹的情绪：苏丹发誓赌咒，如果战败——那将是“对苏丹威名和他不可征服利剑的冒犯”^[26]——将严惩责任人。胜利则会带来相应的奖励。穆斯塔法显然是在保持低调，不愿意给苏莱曼送去坏消息。8月25日，苏丹再次写信给穆斯塔法时，仍然没有收到后者的任何直接报告。这封信的语气更加执着：“侍从官阿卜迪带来了征服

马耳他要塞港口若干塔楼的捷报，现在他已经返回你处。但目前为止，你没有呈上任何报告。我已传旨，你应当向我报告马耳他攻城战的情况。你的士兵是否有足够的给养和武器？征服马耳他要塞的日子是否快要来临了？你有无发现敌人海军？你应当向我报告敌我双方海军的状况。迄今为止我已向你派出7艘补给船。它们是否已经抵达？请向我报告。”[\[27\]](#)

苏莱曼和他的将军都严重关注着堂加西亚大军的集结。8月17日，皮雅利从西西里海岸抓了一些人来，帕夏们意识到，敌人正在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救援行动。皮雅利的桨帆船群不分昼夜地在岛屿周边巡逻，隔着马耳他海峡开炮，借以威吓基督徒。阿纳斯塔吉从岸上追踪着敌人舰队的行踪，发现土耳其海军的警戒工作颇为敷衍了事，他们的士气显然很低落。“我常常留下岗哨，监视敌人舰队的动作……他们总是在子夜一点离去。有时我们看到离海岸10英里的地方有火光，我们相信那是敌人海军点燃的，为的是让自己安心一点；他们的警戒工作仅此而已。”[\[28\]](#)

双方将领都在努力给部队鼓气。拉·瓦莱特告诉部下，援军已经在路上；穆斯塔法宣称，对方援军规模很小，装备很差。但帕夏面临的问题一天天越来越严重。由于战争和疫病，他的部队一天天减员，火药和弹药短缺；驱使士兵们离开战壕、视死如归地冲锋越来越困难。穆斯塔法玩弄的心理游戏越来越巧妙。8月18日夜间，30艘奥斯曼桨帆船在夜色掩护下驶向外海，船上运载了大量士兵。次日他们再次出现，假装是来增援的精锐生力部队。船上的人打扮成近卫军和乘骑步兵的样子，陆地上则开炮欢迎，在希伯拉斯山插上旗帜，将这个重大消息告诉基督徒守军。穆斯塔法从变节者阿吉拉尔那里得知，守军已经接近崩溃。于是他继续攻城。

整个8月，在卡斯蒂利亚人防区周围，艰苦的堑壕战在继续着。土

耳其人努力将战壕往前延伸，准备爆破，发动助攻，攀爬城墙。他们的弹幕炮火有时能一口气持续好几天。基督徒不时发动突袭，并持续监视敌人。双方都在临时搭建的壁垒后部署狙击手，猎杀对方。狙击几乎是一种游戏，“一种有趣的狩猎”^[29]。8月12日，守军最著名的英雄之一马沙尔·德·罗夫莱斯没有戴防弹头盔就鲁莽地从一堵胸墙上探出头来，被土耳其人狙杀。守军开始在子弹上涂抹油脂，这样的子弹击中敌人后会将他们的长袍点燃。穆斯林按照惯例收回己方死者尸体时，成了极好的活靶子。不屈不挠的拉·瓦莱特禁止他的部下冲出去收回友军的尸体，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城墙的废墟上，双方互相狙杀，投掷手榴弹、石块和燃烧武器，在近距离用野战大炮对轰，挥舞着军刀和弯刀跳进对方阵地。他们的距离如此之近，有时只有二十步之遥，能够互相喊话。改宗的前基督教徒开始用暗语向守军喊话，支持他们。有的时候，双方的士兵在同一座路堤的两侧忍受着同样的苦难，甚至产生了一种伙伴感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暴力和死亡、嘈杂和黑烟、基督教堂叮当的钟声、穆斯林每次进攻前在黑暗中的祈祷声，全都混作一团，无法辨清。死亡的方式千奇百怪。有人头部中弹，或者被燃烧武器活活烧死，或者被刀剑砍倒，或者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插旗成了一种执着的疯狂念头。土耳其人在胸墙上升起绿色和黄色旗帜，以及带马尾的红旗，守军则努力将旗帜扯下。围绕这些领土标志的战斗就像争夺阵亡指挥官遗体一样激烈。旗帜能鼓舞士气，丢失旗帜则是个凶兆。8月15日，卡斯蒂利亚人防区的基督教旗帜被打倒；穆斯林认为这是他们即将取胜的预兆。8月18日，土耳其军队被打退，城墙上有个基督徒士兵抓起红白两色的圣约翰旗帜，“完全出于生存的乐趣”^[30]，在整段城墙上奔跑，速度如此之快，“不计其数的火绳枪也打不到他”。没有人愿意被活捉；一旦被俘，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拷打，而且双方都会侮辱敌人的遗体，重演可以上溯到地中海青铜时代的古老仪式——阿喀琉斯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绕着特洛伊的城墙奔驰。

穆斯塔法尽可能地鞭策部下，准备新一次的总攻。从8月16日到19日，连续四天的炮击之后，近卫军竟然闷闷不乐地不愿进攻。他们不肯离开战壕，除非穆斯塔法亲自带队。穆斯塔法可不是懦夫。他身先士卒，并让营地奴仆们穿上近卫军服装（借此给敌人造成有大量精兵出击的假象），并许诺，如果他们作战英勇，就会得到晋升。战斗很激烈，但仍然徒劳。穆斯塔法的头巾被子弹打掉，他自己倒在地上，被震晕了。双方都投入了最后的预备兵力；穆斯塔法开始动用舰队的火药储备。拉·瓦莱特亲自来到医院，要求将伤病员也送上前线；能够走路的人就算是有战斗力。这一天，一支箭被射到城墙上，带有一条只有一个词的消息：星期四。这是在警告即将发起新的进攻。但这场进攻也被打退了。

攻防战渐渐陷入一场残酷的僵局，就像四十年前在罗得岛的僵持一样。穆斯塔法的华丽营帐内的作战会议越来越冗长，气氛也越来越激烈；穆斯塔法主张效法苏莱曼在罗得岛的选择，继续进行冬季作战。皮雅利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舰队离家太远，在冬季无法在马耳他修理船只，而敌人近在咫尺。如果再来一两次进攻还不得手，他们就必须返回伊斯坦布尔。他们考虑到苏莱曼的警告，于是在8月22日计划了一次新攻势。长官们许下诺言，士兵们如果英勇作战、取得胜利，就将得到重赏。8月25日（星期六），岛上开始下雨。

[1] Cassola, 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 1995, pp.26-7

[2] Cassola, 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 1995, pp.26-7

[3]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858

[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855

[5]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4, New York, 1962, p.117

[6]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869

[7]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866

[8]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85

[9]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33

[10]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30

[11] Cassola, 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 1995, p.147 et seq

[12] 从16~19世纪意大利使用的一种货币，币值变化很大。

[13] 易卜拉欣·波切维（1572~1650），土耳其史学家，著有两卷本土耳其历史。

[14]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290

[15]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87

[16]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87

[17] 原名多米尼柯·狄奥托科普洛（1541～1614），西班牙绘画艺术的第一位大师。“格列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希腊人”，因为他出生于克里特岛。他的画作数量惊人，最著名的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等。

[18] Bonello, G., “An Overlooked Eyewitness’s Account of the Great Siege” in *Melitensium Amor,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Dun Gwann Azzopardi*, ed.T Cords, T.Freller, and L.Bugeja, pp.133—48, Malta, 2002, p.142

[19]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137

[20]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44

[21]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44

[22]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44-5

[23]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138

[24]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97

[25]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45

[2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36

[27] Cassola, 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 1995, pp.32

[28] Bonello, G., “An Overlooked Eyewitness’s Account of the Great Siege” in *Melitensium Amor, Festschrifi in Honour of Dun Gwann Azzopardi*, ed.T Cords, T.Freller, and L.Bugeja, pp.133—48, Malta, 2002, p.142

[29]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45

[30]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45

14.“马耳他不存在”

1565年8月25日～9月11日

意大利人称之为“日落风”的北风是在阿尔卑斯山脉酝酿形成的。它从意大利半岛席卷南下，给地中海中部带来瓢泼暴雨和恶劣海况。1565年8月底，北风降临马耳他岛，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冬天到来的最初迹象。

大雨将可怕的灾难场景突显出来。经过三个半月的激战，港湾地区已经化为世界末日般的荒芜之地。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防御工事已经被彻底地化为齑粉；两军之间只隔着成堆的瓦砾。土耳其人悲惨地蹲伏在灌满雨水的堑壕内，基督徒则蹲在临时搭建的壁垒后。标明每条战线的是破破烂烂的旗帜和腐烂的敌人头颅。尽管穆斯林花了很大力气将己方的死者运走，又付出巨大努力在希伯拉斯山的坚固岩石上挖出集体墓穴，以安葬死者，但这仍然是个横尸遍野的人间地狱。狙击手、大炮、利剑、长枪、燃烧武器、营养不良、饮水传播的疾病——这一切都在毫无怜悯地大开杀戒。到8月底，已经有约1万人在赤道般的暑热中死亡。肿胀的死尸在港湾水面上颠簸浮动，发出臭气；每次成功的进攻都在战场上留下大量残缺不全的尸体。位于马尔萨的奥斯曼军营中疫病蔓延，臭气熏天；空气中弥漫着烂肉和火药的恶臭。两军都已经命悬一线。

在基督徒军中，有人感到，敌人再来一次集中进攻，他们就得完蛋。“我军将士大部分已经战死，”骑士温琴佐·阿纳斯塔吉写道，“城墙已经倒塌；外界很容易看到城墙内的情况，我们随时面临被敌人优势兵力压垮的危险。但说这些很不合适。从大团长开始，到全体骑士，无不下定决心，把外面所有窃窃私语的失败主义言论都当耳旁风。”^[1]似乎只有拉·瓦莱特的坚强意志还维系着守军的生命。8月25日，有人提出，

比尔古已经无法防守，大家应当撤到半岛尖端的圣安杰洛堡，做最后的抵抗。拉·瓦莱特听到这话，命令将圣安杰洛堡的吊桥炸毁。守军将破釜沉舟、死战到底。教堂礼拜仪式和为每次成功的防御所做的感恩祷告增强了人们的斗志。

在前沿，守军一旦从胸墙探出头来，就必然遭到射击。有的时候，只有重型的守城用铠甲才能救他们的性命。8月28日，意大利士兵洛伦佐·普奇正和大团长交谈，头部被一发火绳枪子弹击中。他的钢板头盔承受了全部冲击力。他跌倒在地，头晕目眩，捡起被打瘪的头盔，请求大团长允许他出击。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团长拒绝了他。为了减少遭到狙击的风险，守军将多支火绳枪捆扎在一起，用竿子举过胸墙，用系在扳机上的长线来遥控射击。

在有些地段，两军之间只隔几英尺，士兵们分别蹲在自己的壁垒后，忍受着瓢泼秋雨。“我们有时离敌人很近，”巴尔比回忆道，“完全可以和他们握手。”^[2]双方的指挥官都注意到，前线士兵因为一起受苦而对敌人也产生了伙伴情谊。指挥官们对此非常害怕。据报告称，在森格莱阿，“有些土耳其人和我们的人交谈，他们甚至互相信任，一起讨论战局”。这是互相认可的短暂瞬间，双方士兵感到自己就像被踢进无人地域的足球一样。8月31日，一名土耳其近卫军士兵从战壕中走出，给敌人送上“一些石榴和一条用手帕包着的黄瓜，我们的人给了他三块面包和一块奶酪，作为交换”^[3]。在这场毫无骑士风度的冲突中，这是一个罕见的充满人性闪光的时刻。两军士兵交谈的时候，基督徒得知，奥斯曼军营内的士气在下降；粮食供应在缩减，守军填补缺口的速度几乎和土耳其军队打开缺口的速度一样快，因此战事完全僵持下来。这个友好的近卫军士兵给对方的印象是，奥斯曼军营内普遍相信“真主不允许马耳他被占领”^[4]。

绵延秋雨对奥斯曼军队士气的打击似乎更为严重。拉·瓦莱特向他

的部下发放了草垫以抵御湿冷，天气的变化改变了攻防战的面貌。穆斯塔法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帕夏的华丽营帐内召开的会议火药味越来越浓，大家互相横加指责。所有的旧问题又被重新拿出来讨论：他们能在岛上过冬吗？如果他们没有取胜就撤军，苏丹会怎么做？关于基督徒救援舰队的传闻有几分真实？

皮雅利再次坚决反对在岛上过冬，但专断地命令对岛屿周围海域加强巡逻：“有鉴于急需对马耳他岛海域进行警戒和监视，我命令你们建立一个团队，以30艘桨帆船警戒和监视马耳他岛周边海域.....你们应以适当的方式惩罚任何敢于反对或违背你们命令的人。”^[5]与此同时，潮湿的天气也给穆斯塔法提供了一个机遇。大雨使火绳枪和其他火器失效了。现在有机会对付基督徒的防御工事，而不用担心还击火力了。

在8月的最后日子里，帕夏们投入了全部力量，在凄风苦雨中发动了一次次绝望的进攻。坑道工兵在城墙下埋设炸药；攻城塔被搭建起来；全军将士得到了重赏的许诺。帕夏们将他们自己的营帐搬到离前线更近的地方，以此激励官兵；穆斯塔法则亲自上阵。他多次感到，最终的战利品已经触手可及，但就是没法得手。守军仍然在顽强抵抗，挖掘自己的地道，发动突袭，并将穆斯塔法的木制攻城武器打倒。天气太潮湿因而无法使用火绳枪的时候，拉·瓦莱特从军械库调出大量机械弩，发给士兵们。土耳其人的普通弓箭在雨中也无法使用，但弩（这是一种来自中世纪战争年代、与火药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式武器）的杀伤力很强。据巴尔比说，弩的威力非常强大，“它射出的箭能够击穿盾牌，常常还能刺穿盾牌后的人”^[6]。

8月30日，大雨持续了一整个上午，穆斯塔法发动了一次坚决的进攻，目标是清理突破口处的碎石，然后从打开的通道中杀进去。一些马耳他人跑到拉·瓦莱特那里，叫嚷着说，敌人已经进了城。拉·瓦莱特集结了他能召集的全部人马，一瘸一拐地亲自带兵赶到突破口，同时妇女

儿童还向冲杀上来的敌人投掷石块。或许如果不是天公作美，这一次他们就真的完蛋了。雨停了，守军得以使用燃烧武器和火枪，将敌人打退了。穆斯塔法面部负伤，但不肯动摇。根据基督徒方面的记载，“他手握棍棒，愤怒地驱使士兵上前”^[7]。土耳其人从中午一直进攻到天黑，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攻势宣告失败。次日，守军做好迎接敌人新一轮进攻的准备，但敌人没有进攻。“他们没有前进，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精疲力竭，”^[8]巴尔比记载道。整个攻城战戛然而止。此时，穆斯塔法知道，基督徒的救援舰队已经在路上。他向将士们许以重赏（普通士兵可以提升到有丰厚军饷的近卫军的地位，奴隶可以获得自由），但收效甚微。

穆斯塔法不是唯一一个急于完成君命的将领。马耳他战役是争夺地中海的较量，在为主公效力的前线将士背后还有苏莱曼与腓力二世这两位君主在注视战局，他们就好像棋盘两端的最关键棋子一样。在西西里，堂加西亚心急火燎地等待马德里批准他发动救援行动。到8月初，他已经在西西里集结了1.1万名士兵和80艘战船。这支部队大部分是久经沙场、勇武强悍的西班牙士兵，包括长枪兵和火绳枪兵，以及一小群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和一些绅士冒险家（赶来为基督教世界的荣耀而战的自由佣兵）。在未能及时赶到前线的人中有一位“奥地利的堂胡安”，他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子，也就是腓力二世的异母弟。负责指挥援军的是堂阿尔瓦罗·德·桑德（他曾经在杰尔巴岛指挥西班牙军队，后来被俘，被从伊斯坦布尔赎回）和一位威名远播的雇佣军领袖——独眼的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尼亚。科尔尼亚此前因为犯有谋杀、强奸和敲诈的罪行，身陷囹圄。教皇特意将他释放，好让他冲锋陷阵。为了基督教的事业，对这样的罪犯也可以宽大为怀。援军已经做好了出征的准备，堂加西亚也受到各方面的催促，要他赶紧起航。前线的报告一天天变得愈发绝望。“还有400人活着……一个钟头都不要耽搁，赶紧来救援吧，”^[9]姆迪纳的指挥官在8月22日写道。但腓力二世仍然犹豫不决。堂加西亚最终于8月20日得到了批准，但御旨中满是谨小慎微的告诫。腓力二世

的旨意是，“只有在桨帆船舰队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方可发动救援”^[10]；不准和奥斯曼舰队发生冲突。这命令几乎是无法执行的。在耗时甚久的仔细斟酌之后，堂加西亚决定让援军登上60艘最好的桨帆船，冲向马耳他海岸。部队登陆之后，战船将立刻返回。为了尽可能避免被敌人舰队发现，他们将佯装进攻的黎波里，从西面接近马耳他。

8月25日，援军从西西里东岸的锡拉库萨起航，旋即迎头撞上了正在鞭笞马耳他的狂风。28日，脆弱的桨帆船舰队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艰难航行，有时被推上波峰，有时坠入浪谷，再加上大雨倾盆，船员们被“天上和海里的水浸透”^[11]。战船上的冲角被风浪撕下，船桨折断，桅杆被打碎。船只随时面临倾覆的危险，旱鸭子士兵们浑身冰冷，魂飞魄散，只能拼命祷告，向上帝许愿。从桅杆顶端射出的蓝白两色“圣艾尔摩之火”的景观更令他们心惊胆寒。更糟糕的是，这一天是施洗者约翰被斩首的日子，在教会日历中是个特别不吉利的迹象。整个舰队在一夜挣扎后幸存下来，被暴风吹得偏离航向，来到了西西里西海岸的特拉帕尼。舰队出师不利，在随后的一周内更是噩梦连连，错过了预先的约定，先是被风向不利的暴风吹得绕过了马耳他，被奥斯曼舰队发现，然后又被吹回了西西里。士兵们被晕船折磨得面如土色，如果不是堂加西亚强力阻止的话，肯定会全部当逃兵。9月6日，舰队终于再次起航，打算径直冲过海峡，希望能够避开奥斯曼舰队。舰队安静地出发，去跨越这30英里的开阔海域。官兵们收到了严格的命令：船上的公鸡必须全部宰杀，所有命令都口头传达，而不准使用通常的哨声；桨手们被禁止抬起双脚，因为脚镣的撞击声在平静的海上会传播很远。

其实，出其不意的奇袭效果早在9月3日就彻底丧失了。在那一天，海盗乌卢奇·阿里^[12]在马耳他西海岸侦察的时候发现了基督徒援军。穆斯塔法的营帐内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9月初，守军明显地感觉到，土耳其人虽然在继续进攻，但方式却

发生了变化。“他们继续以相同的强度炮击圣米迦勒堡和卡斯蒂利亚人防区，”巴尔比在9月5日写道，“虽然狂轰滥炸打得很热闹，但我们看到他们每天都将物资装上船，并将火炮撤出阵地。这让我们欢欣鼓舞。”^[13]为了防备基督徒援军在岛上登陆，土耳其人将宝贵的大炮撤走了。这个过程耗时甚久，非常艰苦，麻烦重重。两门巨型射石炮尤其造成了特别大的困难。其中一门从轮子上脱落，不得不将其抛弃；另外一门则坠入海中。守军渐渐得到了越来越鼓舞人心的消息。他们了解到，有些海盗已经驾船离去；土耳其人在港湾出入口设置了铁链，以阻止更多人开小差。同时，一个被俘的马耳他人逃回了比尔古。他在广场上当众宣称，土耳其人已经非常薄弱，正在撤退。后来又有两个马耳他人带来了消息：敌人将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还不成功就撤军。9月6日夜间，守军没有听到敌军战线上有任何动静，于是派遣一些士兵爬进了奥斯曼军队的战壕。那里空无一人，只留下了一些铁锹和几件斗篷。全部奥斯曼士兵都临时撤出，登上桨帆船，以应对基督徒援军的进攻。

虽然失败就在眼前，但穆斯塔法还没有放弃虎口夺食的希望。9月6日（星期四）夜间，在穆斯塔法营帐内，奥斯曼将领们做了最后一轮痛苦而激烈的讨论。关于这次会议，只有基督徒方面的资料流传下来，它不甚可靠。据说，穆斯塔法重读了一名宫廷太监送来的苏莱曼的书信（我们对这封信知之甚少）。在信中，苏丹命令舰队不成功便不得离开马耳他。随后众将对苏丹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了激烈讨论。穆斯塔法认为，苏丹天性暴虐，如果他们在没有取胜的情况下就从马耳他撤军，他们的下场将会“悲惨而恐怖”^[14]。或许他记起了十年前的事情：九十岁高龄的地图绘制师皮里雷斯奉苏丹旨意在红海征战，不幸失败，被苏丹下令处决。皮雅利则表示反对（还有一名陆军将领同意皮雅利的看法）：苏莱曼是最睿智和最通情达理的苏丹；他们为了占领马耳他已经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天气太恶劣；头等大事是挽救舰队；如果拿舰队孤注一掷，将会加速全军的覆灭。穆斯塔法宣称，将在次日早上发动最后一次进攻，他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

穆斯塔法已经下达了一道特殊命令，从中可以看出，他在为不可避免的命运做准备。在攻防战开始之前被罗姆加俘虏的苏丹宫廷太监总管的大帆船“苏丹娜”号是奥斯曼人发动战役的一个表面理由。整个夏季，它都在内港轻轻地随风浪颠簸。穆斯塔法在一开始就起誓，要将这艘船带回伊斯坦布尔，作为胜利的证明。9月6日，他下令用炮火将它击沉。第一轮炮弹呼啸着从对岸射来时，拉·瓦莱特命令用缆绳将“苏丹娜”号系在码头上。它被打得千疮百孔，但仍然浮在水面上。

9月7日（星期五）黎明，天气晴好。就像一年中的任何一天一样，这个日子在基督教日历中也有着特殊意义：这是圣母马利亚瞻礼日的前一天。天气恢复了原先的状况：热带的令人窒息的酷热。夜晚也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无人能够入眠。奥斯曼军队回到了战壕，等待进攻的命令。为了加强进攻力量，乌卢奇·阿里的桨帆船分队也被从圣保罗湾的前哨阵地调到了攻城前沿。这是穆斯塔法最后一次倒霉。两个小时之后，堂加西亚的援军浩浩荡荡地驶入了邻近的梅列哈湾。在一个半小时之后，1万名士兵登上沙滩，随后舰队迅速离去。这次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完全是侥幸。

在10英里之外的比尔古和森格莱阿，身穿板甲、汗流浹背的守军蹲在防御工事废墟的烟尘中，准备迎接敌人的新一轮猛攻。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听到奥斯曼战壕传来了一个不熟悉的声响：无数刺耳的声音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就像愤怒蜜蜂的嗡嗡声。原来近卫军和乘骑步兵之间发生了争吵，各自都希望对方先冲进突破口。城墙上的守军瞠目结舌地看到，敌人主动放弃了战壕，开始后撤。他们还在思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听见圣艾尔摩堡传来一声炮响，这显然是向奥斯曼军营发出的讯号。一艘小船从海岬尖端绕过，桨手拼命划桨，向岸边猛冲。一个戴头巾的人匆匆上岸，“从他的服饰和仪态看，显然是个高官”^[15]。他跳上一匹预备好的马，冲向穆斯塔法的营帐。他纵马狂奔，速度过快，以致坐骑绊倒在地。那人大发雷霆，抽出弯刀，将马腿砍断。“随后他跑向

皮雅利帕夏的营帐。在朝向科拉迪诺和圣玛格丽特前线的方向，可以看到三四个土耳其人手握弯刀，纵马疾驰。他们抵达那里之后，整个军营陷入了喧嚣和混乱。他们命令官兵迅速携带所有物资登船。”^[16]堂加西亚登陆的消息让土耳其人疯狂地忙碌起来。他们在希伯拉斯山重新集结，开始以神奇的速度和效率将物资和装备装上船。但穆斯塔法留下了一群火绳枪兵作为伏兵，如果守军胆敢北上，必将遭到血腥屠杀。

但守军没有贸然出击。拉·瓦莱特一直到最后都谨小慎微，不允许任何人擅离城堡。在比尔古的大街上，人们开始欢庆。所有教堂大钟都被敲响，以庆祝即将到来的圣母节。在残破凄凉的大街上，喇叭、鼓点和旗帜带来了鼓舞人心的欢乐气氛。群众以非同一般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激昂。他们跪在地上，双手向天，向上帝感恩。也有人跳起来欢呼“援军到了！援军到了！胜利！胜利！”，疯狂地四下奔跑。韦斯帕夏诺·马拉皮斯纳，一名“以圣洁著称”^[17]的骑士，手持一片棕榈叶爬上城墙，唱起了《感恩赞》。他刚唱到最后一节，被一名奥斯曼狙击手击毙。这对土耳其人来说，想必是一记漂亮的回马枪。

黑夜降临在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在连续几个月的持续炮击之后，笼罩两座城堡的是令人颇为惊异的静谧。搅扰闷热夜空的只有远方车轮碾压石头地面的咯吱声，那是土耳其人在把他们的大炮拖回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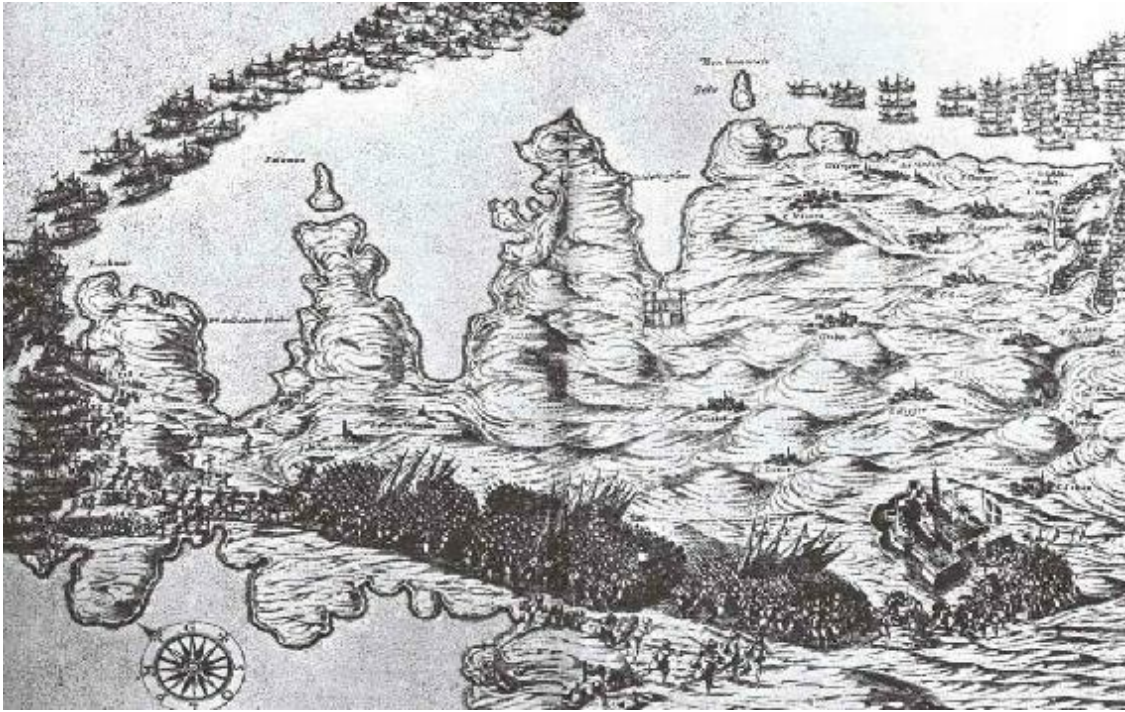
一整天时间，奥斯曼军队在往船上撤，而基督徒援军则从登陆点出发，在乡间缓缓行进7英里，前往姆迪纳。士兵们头戴钢盔，身着胸甲，全副武装，还携带着大量粮食。天气酷热，而且他们经历了一周的艰苦航行，已经筋疲力尽。排成长蛇阵的队伍在遭烈日炙烤的土地上行进，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有些士兵为了轻松一点，抛弃了自己的给养。军官们命令他们将物资捡回来。他们艰难地上坡前往姆迪纳时，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尼亚和阿纳斯塔吉骑马下山迎接他们，当地居民牵来了骡马以运送物资。阿斯卡尼奥担心遭到伏击，无情地催促士兵继续前

进。到当晚，全部1万人已经安全地在姆迪纳及其周边地区安营扎寨下来。

奥斯曼军队原已准备背负着奇耻大辱撤军，但形势再次发生了骤然逆转。9月9日（星期日），基督徒援军的一名士兵叛变，投奔了奥斯曼军营。他是个摩里斯科人，即被强迫改宗基督教的西班牙穆斯林。看到伊斯兰的旗帜仍然在海岸上飘扬，他决心重拾祖先的信仰。他带来了关于基督徒援军的新情报：没有1万人，而是只有将近6000人；他们被风浪折磨得精疲力竭，而且缺少食物，几乎没有力气站稳；另外，他们的多位指挥官在争夺权力。这最后一点几乎可以肯定是真实的，因为西班牙人堂阿尔瓦罗和意大利人阿斯卡尼奥颇有嫌隙；基督徒军队和奥斯曼军队一样权力分散、山头林立。

穆斯塔法仍然无法直面战败的前景，新情报给了他一个机会，或许能从一败涂地的局面中挽回一点颜面。他决定孤注一掷。为了避免自己的意图被基督徒发现，他于9月11日（星期二）破晓前带领1万名士兵借着黑暗的掩护，从桨帆船上登陆，然后开始以作战队形北上，目标是抢在敌人援军恢复战斗力之前，将其一举歼灭。与此同时，皮雅利的舰队从港口出发，向北航行，在圣保罗湾外海停泊。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守军目睹土耳其舰队离去，然后他们登上希伯拉斯山，将圣约翰骑士团的红白两色旗帜插在圣艾尔摩堡的废墟上。现在他们可以看得见土耳其人在行军并将沿途的村庄付之一炬。

事实上，穆斯塔法的计谋很快就被一个变节的撒丁岛叛教者泄露给了基督徒方面。马耳他侦察兵在密切监视土耳其军队的动向。拉·瓦莱特向姆迪纳发送了十万火急的消息，让那里的部队做好准备。清晨，1万名基督徒援军在姆迪纳远方的高地摆开了阵势。他们已经休整了两天，而且得到了新鲜食物，而不是航海饼干：每个连队都得到了一头牛。



前往姆迪纳的援军。

其中很多人是来自腓力二世在意大利的领地的西班牙老兵，包括长枪兵和火绳枪兵，他们惯于野战，对编队作战经验丰富。部队排成了作战队形。西班牙旗帜迎风招展，鼓手敲出激昂的鼓点。头戴钢盔的士兵们排成若干个方阵，如同森林一般屹立，静候奥斯曼军队的冲锋。

土耳其军队接近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指挥官发现很难遏制他们的部下：“所有人都摩拳擦掌，急于交锋，甚至用利剑威胁也控制不了他们。”^[18]双方都认识到制高点的重要性，于是都奔向姆迪纳远方的一座筑有塔楼的小山丘。西班牙人赢得了这场赛跑，在山顶升起了自己的旗帜，开始面对山下的敌人。土耳其人试图站稳脚跟、与敌交锋，但被打退。战斗非常激烈，很多人被火绳枪或者箭打倒在地，而且此时已近正午，赤日炎炎。“在整个攻防战期间，我从没遇见过这么热的天气，”巴尔比写道，“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一样，在疲劳、酷热和干渴的折磨下几乎站不住脚，很多人因此毙命。”^[19]现在事实证明，穆斯塔法的进攻决策是个弥天大错。基督徒军队的兵力比那个摩里斯科人说的要强，身体

状况也远比穆斯林生猛，后者毕竟已经连续苦战了四个月。土耳其人开始动摇。穆斯塔法的火绳枪兵在战线上坚守了一小段时间，但基督徒军队的冲击力是无法阻挡的。西班牙长枪兵猛烈冲杀，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一直到最后都英勇无畏的穆斯塔法努力阻止部队溃败的大潮。他翻身下马，将马杀死，然后跑到最前沿。指挥官身先士卒也是徒劳，他的士兵在快速前进的基督徒威逼下兵败如山倒，溃乱地逃向海边。基督徒军队旌旗招展，战鼓隆隆，身穿红白两色外衣的骑士们奋勇冲杀，西班牙士兵用他们的长枪刺杀敌人。阿斯卡尼奥负了伤，堂阿尔瓦罗胯下的坐骑被击毙，但基督徒军队已经是所向披靡了。奥斯曼军官完全无法控制他们的部下；他们乱七八糟地四散逃跑。穆斯塔法向舰队发送了一条紧急命令，指示将船只驶近岸边，船首炮指向陆地，准备掩护撤退。通往大海的干燥地带变成了杀戮场。天气酷热难当，双方都有人不堪承受铠甲的重压，倒地死去。但西班牙援军兵力更强，战备也更充足。他们杀声震天^[20]，带着复仇的渴望冲向敌人。基督徒对圣艾尔摩堡大屠杀记忆犹新，基督徒指挥官命令不接受任何俘虏。有些土耳其士兵倒地之后就无力爬起，或者丧失了爬起来的意志力。他们就这样被杀死在地上。

马耳他攻防战最后的血腥一幕上演于圣保罗湾的岸边。圣保罗的传奇式海难就发生在这里，对马耳他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意义。而对撤退中的穆斯林来说，这个地点将决定他们的生死存亡。几十艘桨帆船停泊在近海，一大群较小的划桨船冲进海湾，将败军救走。撤退的士兵被驱赶到海滩上和海湾周围的砂岩岩架上，然后又被赶下海。浅水区成了一个屠场。年轻的马耳他人和西班牙士兵浪花四溅地蹚水冲进潟湖，向挣扎的土耳其人奋力劈砍。土耳其人拼命挣扎着上船，却将小船掀翻。死尸在蔚蓝海水里漂浮，拖曳着红缎带般的血迹。最后一批幸存者跌跌撞撞地爬上了船。随后，桨帆船群将大炮瞄准海岸，于是堂阿尔瓦罗和阿斯卡尼奥命令部下撤退。他们站在炎炎赤日下，精疲力竭，注视着敌人舰队离去。在海滩上和海水里，到处是头巾、弯刀、盾牌和不

计其数的死尸。“我们在当时无法准确估算敌人死者的数量，但两三天后，溺死的人的尸体浮到了海面上，”巴尔比写道，“海湾内臭气熏天，没人能够接近。”^[21]

天黑之后，奥斯曼桨帆船返回岸边，装载了淡水，然后分散离去。巴巴利海盗返回北非，帝国舰队则踏上漫漫归途，去直面苏丹的愤怒。他们在马耳他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留下了大约1万具尸体，那或许是整个陆军的一半。舰队的背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岛屿，按照贾科莫·博西奥的说法，马耳他“干旱枯萎、惨遭洗劫和毁坏”^[22]。8000名守军中只有600人还有战斗力，500名骑士中有250人阵亡。马耳他发出死亡的恶臭。基督徒幸存者敲响大钟，感恩上帝。罗马城的大街上点燃了庆祝胜利的篝火；整个欧洲，一直到伦敦，人们发出感恩的祷告。四十年来，苏莱曼第一次在白海遭受了重大失败。虽然在过去有很多基督教城市被土耳其攻克，但这一次欧洲的三角堡坚守了下来，使得基督教海岸躲过了一场巨大浩劫。由于基督徒们的宗教热诚、不可战胜的意志力和幸运，马耳他得以幸存。在这场战役中，拉·瓦莱特激起了整个欧洲的热情。

战败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到了身处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耳边。穆斯塔法和皮雅利小心地先发回报告，然后在夜间悄悄地驶进金角湾。消息传遍全城后，大家陷入了悲痛。基督徒“不敢上街，因为害怕土耳其人向他们投掷石块。土耳其人全都披麻戴孝，有的哀悼兄弟，有的悼念儿子、丈夫或者朋友”^[23]。但苏莱曼的回应却是罕见的沉默。两位将领都保住了性命，尽管穆斯塔法丢掉了官位。皮雅利次年将再次出海，袭击意大利海岸。苏莱曼对在一场残酷激战中幸存下来的近卫军非常慷慨。他下令，所有“参加马耳他攻城战的近卫军士兵都将得到晋升和金钱赏赐”^[24]。帝国的官方史册对马耳他战役的失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此，土耳其人有了一种说法：“马耳他不存在。”就像攻打维也纳的失败一样，马耳他战役也被视为奥斯曼帝国无数胜利中的一个可以忽略的小

小挫折。

虽然基督教世界敲响了胜利的钟声，点燃了欢庆的篝火，但在地中海中部，没人认为马耳他战役宣告了奥斯曼帝国野心的终结。在土耳其舰队返航之后，基督教各国的外交报告中仍然充满命悬一线的危机感。马耳他已经是一片废墟；它的防御工事化为瓦砾堆，居民负债累累、贫穷无助。幸存的骑士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再战斗。毫无疑问，1565年的惨败伤害了苏莱曼的自尊，他在重建舰队，必然会再次征伐。“他已经下达旨意，”当年10月从伊斯坦布尔发出的一份报告称，“到明年3月中旬，必须有5万名桨手和5万名士兵就位。”^[25]欧洲仍然处在恐慌中，毫无安全感可言。他们几乎没有时间集结军队、收集金钱和重新武装马耳他岛。人们在希伯拉斯山上开始疯狂地修建一座新城堡，并将其命名为瓦莱塔，以纪念骑士团的大团长。人们紧张地注视着东方。

但是，除了对意大利发动了一次不痛不痒的袭击外，土耳其人放弃了大海。奥斯曼帝国的征服转向了匈牙利。第二年，苏莱曼御驾亲征。这是他的第十三次出征，也是他近十二年来第一次出征。苏丹已经七十二岁高龄，身体状况不佳，不能骑马，只能乘坐笨重的马车。他率领的是他一生中征集的最庞大军队。这将是施展帝国威严的时刻。在马耳他战役之后，苏莱曼希望重新确立自己圣战领袖的地位，以显示“众苏丹的苏丹、向世间诸君主分配王冠者”^[26]的力量仍然能够撼动世界，伊斯兰征服的力量将是不可穷尽的。

土耳其大军花费了很大力气才攻克了位于沼泽地带的锡盖特堡，一小支匈牙利军队在那里像圣艾尔摩堡守军那样死战到底，让土耳其人付出了巨大代价。9月初，苏丹班师回朝。皇家马车在一望无垠的平原上颠簸前行。六名侍从跟随在车轮旁，背诵着《古兰经》的诗节。长着鹰钩鼻、面色苍白的苏莱曼腰杆笔直地坐在车内，遮蔽在帐幕后。士兵们能够隐约瞥见“真主在人间的影子”的身形，得到一些安慰。

但车内的人并非苏莱曼，只是皇室的一个替身。苏丹其实已经驾崩。他的尸体被除去内脏、涂上防腐香油，秘密运回。苏莱曼于1566年9月5日或6日去世时，锡盖特堡还在坚守。对敌人的顽抗感到不耐烦和恼火的苏丹在去世前几个小时写道：“这座烟囱还在冒烟，征服的连续鼓点还没有敲响。”^[27]伟大苏丹的戎马一生以攻克贝尔格莱德的辉煌胜利拉开帷幕，又以这句话为尾声。他的临终话语暗示了他的失望、痛心和挫败感。不管占领了多少岛屿，攻克了多少城堡，伊斯兰世界帝国的梦想就像沙子一样从他手心流去，再也无法实现了。这时他离莫哈奇有37英里远，1526年他曾在那里大败匈牙利军队。在广阔平原上，基督徒的头骨还在泥土里缓缓褪色。

在地中海，所有人都知道奥斯曼帝国的攻势将持续下去。马耳他是个未完成的故事，还缺个结局。这一次南欧只能算是侥幸过关。

[1] Bonello, G., “An Overlooked Eyewitness’s Account of the Great Siege” in *Melitensium Amor,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Dun Gwann Azzopardi*, ed.T Cords, T.Freller, and L.Bugeja, pp.133—48, Malta, 2002, p.147

[2]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165

[3]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114

[4]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fol.114

[5] Spiteri, Stephen C., *The Great Siege: Knights vs.Turks MDLXV—Anatomy of a Hospitaller Victory*, Malta, 2005, p.635

[6]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160

[7]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78

[8]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158

[9]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4, New York, 1962, p.118

[10] Fernandez Duro, Cesareo, *Armada Española desde la Union de los Reims de Castilla y de Aragon*, vol.2, Madrid, 1896, p.83

[11]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78

[12] 原名乔万尼·迪奥尼吉·加利尼（1519～1587），原是意大利人，少年时被穆斯林海盗绑架，后来改宗伊斯兰教，成为海盗，凭战功获得提升，参加了马耳他战役、勒班陀战役等，战功卓著，一度担任阿尔及尔总督和土耳其海军司令。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提及过他。

[13]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165

[14]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87

[15]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93

[16]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93

[17]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694

[18]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184

[19]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184

[20]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701

[21]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pp.185-6

[22]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705

[23]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20

[24] Cassola, 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 1995, pp.36

[25]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21

[26] Fisher, Alan, “The Life and Family of Süleyman I” in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p.4

[27] Hammer-Purgstall, J.,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vols.6, Paris, 1836, p.233

第三部 大决战：冲向勒班陀，1566～1580年

15.教皇的梦想

1566～1569年

基督教欧洲花了大约150年时间才真正理解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真正特点。为了将内战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苏丹驾崩消息的发布总是事先安排好的。这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人们虔诚地希望，新苏丹或许会更容易顺从劝导、不像前任苏丹那样好战，就好像开战与否取决于苏丹的个人选择似的。甚至连戎马三十年的穆罕默德二世（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最初登基时也被欧洲人认为是乳臭未干、不构成威胁。塞利姆二世于1566年9月登基的时候，欧洲人总体上已经摒弃了这样的观念：统治者的更迭必然意味着新的战争。

在选择储君的残酷过程中，新苏丹的更有才干的兄弟们已经死去或者被处决，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下来。没有人对塞利姆二世有很高的评价。他相貌平平，生性懒惰，与军队的关系也不好。近卫军称他为“公牛”。据说他嗜酒如命。外国使节发回了充满负面评价的报告：“塞利姆二世生性暴躁嗜血，沉溺于各种肉体享乐中，尤其酷爱饮酒。”^[1]但到16世纪中叶，欧洲人已经理解，君主的个人秉性和国家大事几乎没有关系。征服的宏图霸业对苏丹的地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与苏丹作为伊

伊斯兰世界领袖的身份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权力的外部标志中也不断地体现出来：高贵的头衔宣示了对世界的主权；富丽堂皇的作战营帐和旗帜，镶嵌宝石的利剑和高贵典雅、镶有《古兰经》中胜利章节文字的头盔都强调了苏丹作为伊斯兰战士的身份。只有伟大的征服才能巩固苏丹的地位。战争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帝国霸业，受到伊斯兰教的佑护。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国家机器都需要战争；如果征服战争受挫，就像在马耳他那样，也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很快就能克服。“土耳其人的扩张就像是大海，”一个塞尔维亚人在一百年前曾如此评论，“永远不会安顿下来，永远汹涌前进。”^[2]在过去的日子里，苏丹要亲自指挥所有的战役。现在，苏丹不需要亲临战场，只需用他的马尾旌旗和精巧美丽的旗舰代表他的存在，自有前线将领代替他冲锋陷阵。由于远离战场，塞利姆二世对战败的可能性不屑一顾；对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研究很透彻的威尼斯人认为塞利姆二世“自视甚高，蔑视世界上其他君主；他自认为能够向战场投入无穷无尽的军队，不肯听取任何不同意见”^[3]。

塞利姆二世很快就认识到了战争对帝国的必要性。在他通过埃迪尔内^[4]门（征服之门）盛装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近卫军发生了哗变。他们封锁了宫门，不准新苏丹进入，向他索取惯例的赏赐。此时仍然担任海军司令的皮雅利帕夏被从马背上打了下来。塞利姆二世不得不匆忙向士兵们分发金币，才解决了事端，但他从中吸取了教训。常备军就像只老虎，每一位苏丹都必须学会驾驭它。要驾驭它，就需要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战利品和土地的赏赐。害怕政变的塞利姆二世是第一位从未御驾亲征过的苏丹，在这方面，他的统治算是一个分水岭。但征服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地中海仍然是个让他非常感兴趣的目标。



塞利姆二世苏丹

以娴熟的手腕安排塞利姆二世登基的是波斯尼亚出身的首席大臣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就是索科卢在御医的帮助下隐瞒了苏莱曼的驾崩，并平息了近卫军在伊斯坦布尔的反叛。他身材高瘦，城府极深，容易受到贿赂的腐蚀，但对每一位苏丹都绝对忠诚（他在垮台之前一共侍奉过三位苏丹），而且他才华横溢。他在苏莱曼治下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才干，先后担任过将军、法官、行省总督，甚至在巴巴罗萨死后还担任过海军司令。他在1565年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又成为塞利姆二世的驸马爷。在马耳他的失败之后，索科卢对地中海明显持谨慎态度。他更看好在匈牙利开展陆战。但是，有其他人在与他竞争苏丹的信任。威尼斯人对他的长处和弱点也做了分析：“在外交谈判方面他技艺高超，有极深

的理解力.....苏丹将全部国家大事都托付于他.....尽管如此，穆罕默德对于持久地保持苏丹的宠信仍然缺乏信心，也不敢在苏丹面前直言不讳.....他曾说，他虽然享受着苏丹赋予的极大权力，但在苏丹命令他装备2000艘桨帆船的时候，他还是不敢告诉苏丹，帝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办到这一点。他的胆怯一方面是由于苏丹的暴虐性格.....一方面是由于他不断受到其他帕夏的嫉妒。”^[5]索科卢的主要目标是牢牢地攀住权力的巅峰，但从塞利姆二世登基伊始，他就受到野心勃勃的竞争者的挑战，其中最强劲的对手便是塞利姆二世幼年时的教师拉拉·穆斯塔法帕夏^[6]和皮雅利帕夏。苏丹始终待在京城，他身边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将对奥斯曼帝国在白海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所有争夺苏丹宠信的人同时也牢牢记住标志着易卜拉欣垮台的溅血宫墙。为苏丹办事，失败是不可接受的。

塞利姆二世登基的同时，还发生了另一起重要的权力更迭。在欧洲权力政治的复杂矩阵里，罗马教廷一贯最坚决地反对苏丹。罗马和伊斯坦布尔分别是两个世界的中心，势不两立、不共戴天。1565年12月9日，在马耳他攻防战的恐怖时期领导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庇护四世在他位于博吉亚塔的寓所去世。在仲冬时节的短暂白天里，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们召开了秘密会议，选举一位新教皇。

1566年1月8日，表示新教皇选举成功的白烟从梵蒂冈的烟囱里冒出，新教皇的人选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米凯莱·吉斯莱里和他的前任迥然不同。庇护四世头脑冷静，在新教兴起的风暴中仍然保持高度宽容，是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人。他出身豪门，深知为政之道，温文尔雅而老于世故，是个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吉斯莱里则出身贫寒，少年时在皮埃蒙特的山上以放羊为生，完全是靠教会的抚养和提携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在为教会效力时的热忱令人惊叹，前不久还担任过异端裁判所的大法官。新教皇选择了庇护五世的称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选择不太恰当，因为他的前任对他非常憎恶。吉斯莱里不是一个能够

和罗马或佛罗伦萨的权贵们一起觥筹交错的人。庇护五世已经秃顶，白胡子迎风飘扬，固执己见、严格自律、坚定不移，更像是《旧约》里的先知，而一点不像博吉亚教皇^[7]。他不懂政治手腕，生活简朴，对上帝满腔热忱，日夜工作，不肯停歇。他只有两件质地粗劣的羊毛衬衫，轮流穿着和换洗，但充满了虔诚的能量。他满腔热情地保卫和弘扬天主教会，坚决反对教会的敌人——新教徒和穆斯林，这种热诚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庇护五世将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逐出教会，称她为“恶灵的奴仆”^[8]。他无论走到何方，总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一种气势汹汹而毫不宽容的能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看法也颇有分歧。腓力二世在梵蒂冈的使节报告称，庇护五世“是个善良的人……具有极强的宗教热情……在当前时局下，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红衣主教成为教皇”^[9]。更务实的人对他的评价就没有这么高了。“假如当前在位的圣父离我们而去，我们会更高兴，不管他是多么伟大、无法描摹、独一无二和非同寻常，”^[10]在新教皇即位的这一年，有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谋臣如此冷淡地写道。

庇护五世这位老人熠熠生辉的眼睛被复兴十字军东征的梦想所吸引。欧洲人在马耳他战役中得胜，更多靠的是运气，而不是谋略。围城战之前，欧洲各国没有统一的目标；关于救援马耳他的指责在战后也让大家心存芥蒂。从匈牙利边疆到西班牙海岸，基督教世界仍然受到严重的威胁。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成功地抵御奥斯曼帝国。“任何人单枪匹马都无法抵抗敌人，”^[11]他坚持道。庇护五世决心完成多位前任教皇未竟的事业：将基督教各国从危险的沉睡中唤醒，建立一个长期性的神圣联盟来弥合各国的利益分歧，共同对付异教徒。他以宗教法官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即位四天之后，他命令教廷重新开始向腓力二世提供资金援助，用以建造桨帆船，保卫基督教海域。这是小小的第一步，但在16世纪60年代晚期的动荡岁月里，庇护五世将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以及驱动反对伊斯兰教的圣战的强大力量。



庇护五世

在1566年，他的任务的艰巨性是不言自明的。欧洲是强烈感情的漩涡，被不同的利益、帝国野心和宗教冲突撕扯得四分五裂。腓力二世有十几件互相矛盾的事业需要关注：新大陆的殖民地、[\[12\]](#)西班牙位于北非海岸的前哨基地的安全、国内针对残余穆斯林的圣战、土耳其人的威胁、与法国的互相猜忌、尼德兰新教徒的反叛余孽。这些事情先后吸引了高坐在马德里阴郁宫廷的天主教国王的注意力。他的帝国疆域分散，满是裂纹，深处困境。只有不断从南美运送白银到西班牙的大帆船队才能维持西班牙的帝国霸业。尽管如此，财政方面仍然捉襟见肘。腓力二世对地中海并无总体的战略计划，只能对成千上万的纷繁问题逐个做出反应。1566年，低地国家的不满情绪终于演变成公开的反叛，腓力二世

不得不让他最精锐的部队行军穿过一个高度紧张、满腹狐疑的欧洲。总的来讲，他在地中海没有力量采取行动。法国人也不能更好地慰藉教皇。他们和土耳其人还有盟约，而且法国国内爆发了宗教战争。1566年，法国南部的新教徒反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至于一贯自私自利的威尼斯人，没人信任他们。为了向土耳其人发起协调统一的回应，庇护五世至少需要将教皇国、威尼斯和西班牙三方的资源拧成一股势力。耗时五年，加上特殊事件作为契机，他的事业才最终成功。

在马耳他战役之后的几年内，腓力二世不断抵制教皇关于建立神圣联盟的要求，同时继续接收教皇慷慨解囊的圣战经费。他正被尼德兰的反叛困扰，无意发动新的战争。腓力二世有时非常讲求实际，令人惊讶；他甚至私下里考虑和塞利姆二世正式缔结停战协定。同时，腓力二世没有忘记杰尔巴岛的教训；他低调地谋划着，继续在巴塞罗那建造桨帆船；到1567年，他已经拥有100艘桨帆船，虽然还不能单独与土耳其人作战，但足以威慑敌人，令其不敢发动远距离攻击。

但总的来讲，土耳其人仍然没有涉足地中海。1566年，皮雅利率领130艘桨帆船出现在亚得里亚海，再次令基督教世界颤抖。西西里、马耳他和拉格莱塔的全部防御力量都整装备战，但皮雅利只是三心二意地对意大利海岸劫掠一番就撤走了。在随后多年内，这种先是威势逼人、后来却无声无息的闹剧上演了很多次。土耳其人很安静，他们的行为不可捉摸。地中海再次成为谣言之海，一个充满来源不明情报的阴影世界。在地中海北岸的各大港口，间谍们大发横财，将零碎的飞短流长作为情报传播。威尼斯在杜布罗夫尼克^[13]的间谍从情报工作中大获其利。双方都故意散布假情报，又都耐心地筛选、甄别收到的情报。当时有很多窃窃私语、暗示和威胁：土耳其人正在准备进攻十几个地点中的某一个——拉格莱塔或马耳他，塞浦路斯或西西里；或者并不打算进攻任何地点。双方虚虚实实地你推我挡，土耳其人会派出一支巡航舰队，然后又将它撤回，以折磨敌人的神经。双方都扫视着海平线，寻找船帆

的踪迹，但都没有找到。威尼斯人被夹在双方之间，越来越如坐针毡。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克里特和塞浦路斯领地担心。而土耳其人似乎在摆出和平姿态；他们在1567年与提心吊胆的威尼斯人签订了一项新协定，在次年又与匈牙利签订了和约。这种和平假象至少争取到了时间：马耳他得到重建；西班牙则清剿了其领海内的海盗。

在马德里、威尼斯、热那亚和罗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人们提出了上百种假设。有人说，新苏丹对战争不感兴趣。“苏丹唯一的兴趣是尽情享乐，饕餮宴饮；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了几名重臣，”^[14]西班牙人的一份报告如此写道。还有人说，土耳其人正在东方忙活，或者还在等待时机。

奥斯曼帝国大政方针的策源地隐藏在外国势力的视线之外，不管潜伏在伊斯坦布尔的外国间谍多么努力地刺探。况且，没有人能够对整个大海一览无遗。1566~1568年，还有更重要的天命在地中海起作用，干扰了凡人的计划：庄稼歉收、人口暴涨的城市缺少粮食、瘟疫和饥荒爆发。1566年，埃及和叙利亚发生饥荒，哀鸿遍野；1567年，西班牙间谍报告称，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那里还爆发了瘟疫，导致很多人死亡，法国间谍佩特罗莫尔就于1568年在该城病死。人类生存如此艰难，战争的话题只能暂时搁置。

在此期间，精力充沛的索科卢·穆罕默德正被更东方的问题困扰。土耳其人早就认识到了治理阿拉伯地区的困难；巴士拉以北的沼泽地带发生了叛乱，也门则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同时，索科卢还在谋划富于想象力的计划，为新的征服扫清道路。他下令在苏伊士地峡开凿运河，这样奥斯曼帝国的船只就能直接进入印度洋；另外还计划开凿第二条运河，将黑海和里海连接起来，从水路进攻波斯。这两个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它们的失败影响重大。奥斯曼帝国的航海家不再有新世界可以探索。由于被自然障碍包围，他们只能继续开拓旧世界。

16世纪60年代末期，新的全球化力量在发挥作用，给人们的各种动机和意图带来了制衡。地中海是巨大的动荡地域的中心，只有从空间地域的角度才能够真正理解它内部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在也门、尼德兰、匈牙利和北非发生的事件错杂纠结，互相影响。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给腓力二世施加的压力助了北欧的新教革命一臂之力。新大陆也第一次对欧洲产生了影响。1564年，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的卡洛琳堡屠杀法国定居者之后，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秘鲁波托西^[15]的银矿既在支持，也在破坏旧世界的经济。从16世纪40年代起，南美的金银被运过大西洋，给西班牙王室提供战争经费。西班牙国王因此能够建造船只、雇佣职业军队，开展规模空前的宏大战争。但财富的流入产生了一种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哈布斯堡家族无法理解的。战争一直是代价高昂的；在16世纪，战争的经济代价急剧增长。航海饼干（海战中的一项关键开支）的价格在六十年间增长了三倍。经营西班牙桨帆船舰队的费用也相应地增长了两倍。物价上涨蔓延到整个欧洲，也影响到了奥斯曼帝国。战争成了一种极端昂贵的游戏。“要想打仗，必须有三样东西，”特里武尔奇奥元帅^[16]在1499年颇有先见之明地评论道，“金钱，金钱，还是金钱。”^[17]

现在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土耳其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大规模战争，而且它们势均力敌。在帝国时代，双方都能够以前无法想象的规模开发资源、征收赋税和聚集物资。到16世纪中叶，权力已经集中到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规模庞大、精明强干的官僚机构以令人啧啧称奇的娴熟技艺管理着遥远省份的战争后勤工作。在地中海，比拼数字的巨大压力已经快要把较小的玩家压垮。在15世纪，威尼斯才是海上霸主；到1538年的普雷韦扎战役，威尼斯的舰队虽然已经扩张了五倍，仍然远远比不上土耳其海军。舰队规模的扩大让空间变小了。过去地中海的海战都是局部性质的，现在却可以席卷整个地中海。在巴巴罗萨和多里亚之后的三十年间，西班牙和土耳其一直在盲目地搏斗。它们在马耳他造成了僵局。争夺世界中心的大决战还没有拉

开帷幕。

在两个大国的阴影下求生存的威尼斯人非常谨慎。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之间逐渐缩小的边疆地带挣扎着。威尼斯仍然被贸易和战争的矛盾所困扰。它的地位非常暧昧模糊，处于两个世界之间晦暗不明的地带，既不是陆地国家，也不算海上强权；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在两个世界间充当中介，被双方当作双面间谍。没有哪个国家像威尼斯那样投入了如此多的精力去观察和琢磨“土耳其苏丹”，或者与他共谋。在威尼斯执政官宫殿下方迷宫般的走廊里，一个忙碌的幕僚一直在一丝不苟地监视奥斯曼帝国的意图。威尼斯人就此写下了成千上万页的备忘录、报告和国际通报。与此同时，威尼斯共和国的外交官们不知疲倦地努力安抚凶残的邻居——谄媚、哄骗、向苏丹溜须拍马、贿赂苏丹的大臣们、提供信息和丰厚的礼物，并刺探情报。在伊斯坦布尔的威尼斯人不断向执政官宫殿发回大量密码写成的情报，报告关于划桨商船和快速双桅帆船的情况，并解读苏丹宫廷政治、舰队动向和战争传闻。他们厚颜无耻地分别向西班牙和土耳其报告另一方的情况，正如一位经验老辣的政治家建议的那样：“最好把所有敌方君主都当作朋友，而把所有朋友都当作潜在的敌人。”^[18]威尼斯完全按照这条久经考验的箴言行事。对教皇，威尼斯人自称是基督教世界的前线；对苏丹，他们将自己打扮为贸易伙伴和朋友。1568年，腓力二世任命他的异母弟奥地利的堂胡安为新建舰队的总司令，威尼斯送去了满是甜言蜜语的贺信，但又把堂胡安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伊斯坦布尔。

威尼斯的牌打得非常小心，但在马耳他战役之后，这种微妙的走钢丝游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虽然在1567年和塞利姆二世签了新和约，虽然1568年海上非常平静，但威尼斯人还是心神不宁。土耳其人为什么这么好说话？他们隐藏了什么秘密吗？新和约只是为了欺骗吗？他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情报表明，伊斯坦布尔造船厂有新的项目正在实施；同时塞利姆二世正在塞浦路斯对岸低调地修建一座要塞。对大海

经验丰富的人不得不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外殖民地捏一把汗。拉·瓦莱特显然知道些风声，他在1567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将圣约翰骑士团在塞浦路斯的地产全部变卖出手。威尼斯元老院采取了试探性的措施：适当加强兵力，并在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修建大炮铸造厂。但战争是昂贵的，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威尼斯人不愿意为不确定的事情花钱。他们仍然小心翼翼。

在1568年，对罗马教廷来说，要让威尼斯和西班牙组成一个共同对抗土耳其的神圣联盟，仍然像以往一样难于上青天。腓力二世还在忙着镇压低地国家的叛乱，无意再发动一场积极主动的对外战争；而且，如果自私自利的威尼斯人在塞浦路斯或克里特遭到攻击，西班牙也没有理由去帮助他们。西班牙人在杰尔巴岛遇险的时候，威尼斯人去帮助了吗？圣艾尔摩堡陷落之后，威尼斯人不是公开庆祝了吗？至于威尼斯人，在遭到打击之前，仍然乐于和伊斯兰世界继续贸易往来，直到战争真正爆发才会向基督教世界求救。走一步算一步吧。

明眼人能看得出，战争的条件其实都已经具备：塞利姆二世需要一场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庇护五世激情满怀地煽动圣战，两个超级大国都在聚集资源，地中海的空间越来越小。某个导火索必将引爆战争，这只是时间问题。在1567年底，西班牙发生的事件开始加快战争的步伐。

由于尼德兰新教徒发动叛乱，西班牙的宗教狂热气氛变得更加激烈。天主教会觉得自己四面受敌，尤其是在天主教国王自己的国家。异教徒并不遥远，就在直布罗陀海峡对岸，仅有投石之遥。异教徒包围着西班牙，甚至已经深入它的腹地。摩里斯科人，也就是被帝国强迫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南部穆斯林，仍然是个未解决的问题。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将他们同化到主流社会中。随着土耳其人的阴影在整个地中海上越来越咄咄逼人，西班牙人越来越担心，摩里斯科人仍然在秘密地信奉伊

伊斯兰教，他们是奥斯曼帝国圣战在西班牙国内安插的第五纵队。基督教西班牙对自己国内的人群越来越警惕。一年年越来越严厉的法令试图查证这些受到怀疑的新基督徒的宗教热情。1567年1月1日，腓力二世发布了一道敕令，旨在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留下的最后文化痕迹：不准使用阿拉伯语，禁止戴面纱，公共浴场也被禁止。对一直遭受猜忌和刺激的摩里斯科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打击。他们被不宽容和顽固不化的宗教教条逼到了死角。1567年圣诞夜，来自阿尔普哈拉的摩里斯科山民登上了格拉纳达的阿兰布拉宫^[19]的宫墙，以安拉的名义号召起义。

西班牙南部山区到处有人揭竿而起。天主教西班牙骤然陷入了内部的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此时它的最精锐部队却仍然在几百英里外的尼德兰。叛乱让西班牙人对土耳其人的恐惧大大增加。摩里斯科人七十年来一直在恳求伊斯坦布尔的援助。在16世纪60年代晚期，他们发出了求救的呼喊，向伊斯坦布尔派出了代表。1570年初，塞利姆二世从阿尔及尔派出了士兵和武器；火绳枪被运过海峡；很快就有4000名土耳其和巴巴利士兵来到了西班牙南部山区。西班牙人害怕，土耳其人在筹划远距离作战，入侵西班牙本土。据说，土耳其人将在1570年出航“以激励和援助格拉纳达的摩尔人”^[20]。索科卢·穆罕默德公开请求法国国王允许土耳其军队使用土伦港作为基地。在混乱的局面中，海盗乌卢奇·阿里推翻了西班牙在突尼斯的傀儡政权，重新占领了突尼斯。查理五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一下子就被粉碎了。距离骤然缩短：伊斯坦布尔不再位于东方1000英里处，土耳其人的幽灵已经近在咫尺。

摩里斯科人的叛乱迫使腓力二世将注意力集中到地中海。他召回了在意大利的部队；又在卡拉布里亚招募了更多的士兵。国王的异母弟奥地利的堂胡安受命镇压叛乱。这是一场肮脏丑恶的战争。长期遭到压迫、心怀不满的摩里斯科人和抱着极大恐惧的基督徒都使出了残酷的招数。被文化和信仰的鸿沟阻隔的双方不共戴天，战争的残酷预示了戈雅^[21]的枪决行刑图，以及20世纪西班牙内战的冷酷无情的屠戮。土耳其

人的干预让摩里斯科人信心倍增；他们在阿尔普哈拉冰天雪地的山隘上进行了绝望而可怕的斗争。西班牙军队以极大的残暴镇压叛军。1569年10月19日，腓力二世授权军队从摩里斯科人那里劫掠战利品。烈火熊熊、血流成河的战斗在1570年持续了整整一年。1570年11月1日，腓力二世又采取了极端措施，命令将低地的全部摩里斯科平民驱逐，罪名是暗自帮助叛军。堂胡安认同这种逻辑，但感到这种做法过于残酷。“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景象，”他在11月5日写道，“在出发的时候，下着疾风苦雨或是鹅毛大雪，穷人们只能挤在一起，哭天抢地。没人能否认，将一个王国的居民尽数驱逐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凄惨的景象。”^[22]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土耳其人许诺派出的舰队始终没有来；或许土耳其人从来没有真正打算派出舰队：索科卢有可能在利用摩里斯科人来转移西班牙人的注意力，以掩护自己更深层的意图。索科卢运筹帷幄的基石是，在不激起基督教各国联合行动的前提下，确保奥斯曼帝国的计划能够正常进行。

但这一次，索科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或许希望用西班牙国内的叛乱牵制住腓力二世，却事与愿违。叛乱使腓力二世明白了一个战略真相：除非在地中海中部打垮土耳其人，否则西班牙会一直受到威胁。摩里斯科人的叛乱使得腓力二世更趋于接受教皇关于基督教各国联合抗敌的号召。

在地中海另一端发生的一个小事件揭示了奥斯曼帝国的真正意图。1568年9月初，一支拥有64艘桨帆船的奥斯曼舰队出现在了塞浦路斯东南外海，指挥官是维齐尔阿里帕夏。在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岛的威尼斯统治者紧张了起来，派出一艘船，“携带盛在一个银碗里的1000皮阿斯特^[23]，作为厚礼”^[24]，前去拜访。维齐尔宣称，威尼斯人大可不必惊慌；他只是去安纳托利亚海岸运载木材而已，现在只是想雇用一名领航员；威尼斯人不应当相信关于伊斯坦布尔在进行军事集结的谣言；土耳其人准备舰队是为了援助西班牙的摩里斯科人，陆军则将进攻波斯。威

尼斯人当然有理由对这种“访问”提高警惕；1566年，皮雅利就这样“友好”地访问过热那亚控制的希俄斯岛^[25]，却一举将它占领。但礼貌起见，威尼斯人还是邀请一群土耳其军官参观了法马古斯塔的防御工事。阿里帕夏本人则在次日乔装打扮后登陆。他带来了一名为苏丹效力的意大利工程师约瑟菲·阿唐托，要求允许阿唐托在岛上自由行动，以便寻找四根古典石柱，用于正在为塞利姆二世建造的一座建筑。阿唐托恪尽职守地查看了全岛。虽然法马古斯塔以北几英里处就是萨拉米斯，那里的古建筑遗址上有大量的廊柱，阿唐托却莫名其妙地没有找到任何适合的柱子。但他对法马古斯塔和尼科西亚^[26]的防御工事却做了细致的观察。

阿里的舰队离去了。几天后，塞浦路斯方面得知，这支舰队根本没有去运木材，而是径直返回了伊斯坦布尔，从法马古斯塔起航时还劫走了一船的威尼斯士兵。

[1]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56

[2] Crowley, Roger,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2005, p.35

[3]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56

[4] 埃迪尔内旧称哈德良堡或阿德里安堡，因罗马皇帝哈德良所建而得名。现在是土耳其埃迪尔内省省会，位于邻近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境。著名的阿德里安堡战役就发生在此地：公元378年，罗马帝国军队与哥特人交战，遭到惨败，皇帝瓦伦斯阵亡。另外，1365~1453年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5]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p.57-8

[6] 注意，他与指挥马耳他战役的穆斯塔法帕夏不是一个人。

[7] 指的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原名罗德里戈·德·博吉亚，1431~1503，1492~1503在位），他出身西班牙，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教皇之一。一方面，他生活腐化、利欲熏心、心狠手辣；另一方面，他大力赞助文艺，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都曾

受他庇护；同时他同情被压迫的犹太人，反对奴隶贸易。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切萨雷·博吉亚就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高度赞扬的理想君主。

[8] Beeching, Jack, *The Galleys at Lepanto*, London, 1982, p.135

[9]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29

[10]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29

[11]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12

[12]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45

[13] 克罗地亚港口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岸的南部、萨拉热窝西南方。

[14]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45

[15] 当时属于秘鲁总督辖区，今属玻利维亚，在西班牙殖民时代是重要的银矿。

[16] 特奥多罗·特里武尔奇奥（1458～1531），意大利贵族和佣兵领袖，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为法国效力，被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封为元帅。

[17]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103

[18] Mallett, M.E., and Hale, J.R.,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 Venice, c.1400 to 1617*, Cambridge, 1984, p.216

[19] “阿兰布拉”的意思是“红色城堡”或“红宫”，位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是古代清真寺、宫殿和城堡建筑群。宫殿为原格拉纳达摩尔人国王所建，现在则是一处穆斯林建筑、文化博物馆。该宫城是伊斯兰教世俗建筑与园林建造技艺完美结合的建筑名作，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建筑的优秀代表，1984年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66

[21] 弗朗西斯科·戈雅（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他的画风奇异多变，从早期巴洛克式画风到后期类似表现主义的作品，他一生总在改变。虽然他从没有建立自己的画派，但对后世的现实主义画派、浪漫主义画派和印象派都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后，他创作了多幅画作，反映拿破仑军队的暴行。

[22]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72

[23] 欧洲古代多国使用过的货币，币值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差别很大。

[2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34

[25] 爱琴海的一个岛屿，距土耳其西岸仅8000米。有种说法称，盲诗人荷马就出生在这里。

[26] 塞浦路斯的一座城市，今天是塞浦路斯共和国首都。

16. 盘子上的头颅

1570年

或许威尼斯人对此早有预料。或许在三十年的和平之后，他们已经不敢正视奥斯曼帝国霸权的真相。在罗得岛陷落之后，塞浦路斯居然还能保全下来，是个不正常的现象。它是基督教世界在穆斯林海域的前哨阵地，位置孤立、土地肥沃，离威尼斯有几百海里之遥，对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来说既是个恼人的刺激，也是个巨大的诱惑。“一个深入虎口的岛屿，”^[1]一个威尼斯人如此描述塞浦路斯。

和马耳他一样，塞浦路斯始终生存在帝国争锋和圣战的阴影下。从空中俯视，它形似某种原始的海洋恐龙，带着一个剑鱼般的尖嘴和鳍足，深深插入大海的一角。贝鲁特就在塞浦路斯东南方仅60英里处；从塞浦路斯向北可以看见安纳托利亚白雪皑皑的群山。塞浦路斯太大、太肥沃、太唾手可得，所有人都曾垂涎此地，并留下他们的印迹。亚述人、波斯人、腓尼基人都曾来到这里，复又离去。当地说希腊语的居民因为长期受拜占庭统治，已经改宗东正教。阿拉伯人统治塞浦路斯达三个世纪，伊斯兰教从未忘记对它的主张。十字军从西方来到这里，将它变为一个市场和基督教圣战的集结地，在棕榈丛中建造了哥特式教堂，将内陆的首府尼科西亚变成了一个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语言的人们相聚的场所，法马古斯塔港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威尼斯人在1489年凭借诡计夺得这个岛屿时，圣战的潮流已经逆转了方向，土耳其人已经快要成为地中海东部的主人。

几乎从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的最初，它就名列奥斯曼帝国征服目标的清单。威尼斯人向苏丹称臣纳贡，向他的维齐尔们大肆贿赂，以保持自己的中立。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不光彩的绥靖政策，一年年向志得意满

的土耳其人手中塞金币。总的来讲，这种政策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比维持作战舰队要便宜（此时舰队已经年久失修），但别无退路。它让伊斯坦布尔方面相信，威尼斯共和国已经被和平软化，永远不会奋起战斗。

从短期看，绥靖政策是值得的。塞浦路斯向威尼斯母邦源源不断地输送财富：中央平原的粮食、南岸的食盐、烈酒、糖和棉花（后者被称为“黄金的植物”，由种植园上的农奴耕种）。威尼斯控制塞浦路斯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对待它和对克里特一样恶劣。在威尼斯艺术家的形象描述中，海神尼普顿从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螺中把这些海上殖民地的财富倾倒在威尼斯的膝上。这些财富被用于建筑和艺术，瘴气弥漫的潟湖上仿佛升起了海市蜃楼。石头教堂、提香^[2]的绘画和圣马可广场的笙箫、富丽堂皇的宫殿、皎洁月光下的大运河，这些全都是靠划桨商船从地中海东部运回的财富支付的。

贸易是一边倒的。威尼斯从塞浦路斯获取财富，但不给它任何回报。塞浦路斯的希腊农民遭到压迫蹂躏，威尼斯人对他们的统治极度腐败，征收了恶毒的苛捐杂税。希腊平民的赤贫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塞浦路斯的全部居民都是威尼斯人的奴隶，”曾访问塞浦路斯的马丁·冯·鲍姆加登^[3]在1508年写道，“他们全部收益或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要上缴官府……此外每年还有各种苛捐杂税，穷苦的老百姓遭到了极度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几乎不能维持生计。”^[4]1516年，政府为了征集现金，提议可以让2.6万名奴隶中有财力承担的人赎买自己的自由，结果只有一个人能凑得齐所需的50杜卡特。此外，共和国还将塞浦路斯岛视为流放地，将危险分子驱逐到此地，这当然也不能改善岛上的情况。杀人犯和政治异见者被流放到法马古斯塔，导致当地人口暴增。总的来讲，统治者是紧张不安的：塞浦路斯人是不不会像马耳他人那样，忠心耿耿地为主子作战的。他们溜过海峡，向苏丹求助。16世纪60年代，两个塞浦路斯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向苏莱曼呈上书信称，岛上的农奴会欢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伊斯坦布尔的威尼斯间谍贿赂了索科卢，让他把

这两人交给他们。于是这两个人就失踪了，但这也不能让威尼斯宽心。16世纪60年代，民间的动乱和不祥的预兆愈演愈烈：1562年，有人计划发动农民起义；还有猛烈的风暴、严重的饥荒、瘟疫、地震和抢夺粮食的暴乱（这些迹象都被解释为上帝发出的警告），以及对土耳其人入侵的持续不断的恐惧，尽管威尼斯在1567年和土耳其签订了新和约。

塞利姆二世一直对塞浦路斯很感兴趣。早在1550年，威尼斯元老院就得到警告，假如塞利姆继承皇位，将会发生战争。到16世纪60年代末期，巩固皇威的需求和战略上的考虑都敦促塞利姆二世尽快消灭离奥斯曼帝国海岸如此之近的这个威尼斯殖民地。塞利姆二世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只有获得辉煌的胜利，这位望之不似人君、缺少领袖魅力的苏丹才能维持军队的忠心。当时，奥斯曼帝国的伟大建筑师希南^[5]准备在埃迪尔内建造新的清真寺群，但按照传统习俗，苏丹的清真寺必须用异教徒的钱修建。这笔经费只能来自征服战争。他在统治早期也曾向东方进攻，试图开疆拓土，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现在他必须重返地中海。同时，威尼斯的这个岛屿的确也是个战略上的问题。它位于前往麦加朝圣的航道和通往埃及的贸易路线上，伊斯坦布尔依赖这些航道获得东方的财富，而且威尼斯当局也没能有效地清剿这一地区的基督徒海盗。圣约翰骑士团仍然是个特别的威胁。塞浦路斯位于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的中心，给帝国带来了很大麻烦。1569年，海盗劫持了运送埃及财务大臣的船只，于是塞利姆二世下定了决心：必须占领塞浦路斯。

在这项决策的背后，是奥斯曼帝国宫廷的权力斗争。塞利姆二世的宠臣包括拉拉·穆斯塔法帕夏（苏丹幼年时的教师）和皮雅利帕夏，这两人都急于在个人的挫折之后重新夺得军事荣誉，并削弱首席大臣的影响力。进攻塞浦路斯的行动有可能将欧洲团结起来，因此索科卢·穆罕默德对此持谨慎态度，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春风得意，但他没办法阻止苏丹。他自己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外交手段从威尼斯人手中获得塞浦路斯。



索科卢·穆罕默德，首席大臣

因为威尼斯和帝国缔结了和约，如果要开战，必须从大穆夫提^[6]那里征询宗教上的意见：撕毁与异教徒的协议是否合法。穆夫提果然从阿拉伯人占领塞浦路斯的历史中找到了可以遵循的先例，并指出，为伊斯兰教夺回这些地区是塞利姆二世的义务。这是土耳其人在16世纪破坏的唯一一项协定。从一开始，塞浦路斯战役就带有特别的圣战意味。

1570年3月28日，苏丹的特使库巴特将宣战书呈交威尼斯当局，但此时它的大体内容已经世人皆知，威尼斯人已经拟定了一个答复。甚至

在库巴特发言之前，威尼斯执政官的游行队伍已经举起了红色的战旗。他们沉默地聆听奥斯曼帝国耳熟能详的专横辞令：

塞利姆二世，奥斯曼帝国苏丹、土耳其人的皇帝、万王之王、众君之君、真主的影子、人间乐园与耶路撒冷的主人，向威尼斯君主致意：我们要求你等主动交出塞浦路斯，否则我们将动用武力。切勿激怒我们的恐怖之剑，因为我们将与你们开展最残酷的战争；也不要妄自以为凭借你们的财富就能安享太平，因为我们将使你们的财富如潮水一般一去不复返。好自为之，切记切记。^[7]

土耳其人的直接威胁是针对威尼斯的财富的，从这可以看出，土耳其人，或者说索科卢，对威尼斯人是多么了若指掌。但这一次，威尼斯元老院非常坚决，以195对5的绝对多数（这也是前所未有的）选择了开战。为了防止库巴特遭到暴民的袭击，他们不得不让他从后门溜走。

虽然来了这么一记晴天霹雳，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绝非心血来潮。1568年对塞浦路斯的“访问”表明，他们已经为此筹划了多年。这显然是奥斯曼帝国最终彻底控制地中海东部的宏图大业的一部分。除了侦察之外，他们还进行了仔细计算、小心筹划，并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相配合。不管索科卢个人意愿如何，他都在攻打塞浦路斯战役的筹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先是和匈牙利与也门议和，然后对基督教欧洲进行了迷惑和欺骗，谎称土耳其许诺援助摩里斯科人的叛乱，完全是为了转移身在遥远的马德里的腓力二世的注意力。土耳其人还向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提出缔结新约的提议，目的是让基督教世界陷入外交混乱。威尼斯人则被鼓励去贿赂索科卢这个“威尼斯的朋友”。索科卢煽风点火，让威尼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略无比恐惧，然后在最后时刻提出，要以和平手段把塞浦路斯拿走。索科卢推断，威尼斯离塞浦路斯路途遥远，就算真的敢迎战，也无力展开足够强大的防御；最关键的是，欧洲仍然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团结抗敌。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思维里一直害怕欧洲人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两百年的经验表明，基督教世界乱七八糟，无力一

致对外，因此索科卢有理由期望让威尼斯自己乖乖投降。他赌的这一把很有把握，然而却失败了。1570年初的时候，没人能够预测，塞浦路斯战争和摩里斯科人的叛乱——地中海两端发生的事件——能够引发一个连锁反应，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们也没预想到，教皇庇护五世弥赛亚般的个人魅力，或者奥地利的堂胡安的勇猛无畏，或者法马古斯塔事件的急速发展，能够给予基督徒们一种共同的斗志。

早在库巴特发出富有戏剧性的最后通牒之前，威尼斯人已经开始向基督教欧洲发出提议，并再次提出了神圣联盟的问题，尽管这么做并不是很明智。3月10日，威尼斯执政官给他在马德里的腓力二世宫廷的大使写了一封圆滑而虚伪的信：“西班牙国王陛下的军队应当与我们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土耳其人的狂怒和强力。我们很乐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渴望普世的福祉，我们还希望，上帝已将仁慈的目光投向基督教世界，并愿意在此时压制异教徒的放肆。”^[8]问题在于，没人信任威尼斯的“真诚”；甚至在威尼斯人提出这个建议时，人们仍然在怀疑，他们是否还在和索科卢协商。他们的确在这么做。如果土耳其人撤回了威胁，那么里亚尔托^[9]的商人们会迅速把基督教世界的福祉忘个一干二净，继续和异教徒做生意。腓力二世无疑还能回忆起圣艾尔摩堡陷落之时威尼斯人的欢呼雀跃，因此对援助威尼斯毫无兴趣。事实上，如果奥斯曼帝国集中兵力对付塞浦路斯，西班牙将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去收复突尼斯，并巩固地中海西部。

但是大家都没有考虑到教皇。塞浦路斯危机正好带来了庇护五世等待良久的重新建立神圣联盟的机遇。他激情满怀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他立刻命令教廷为这项事业提供桨帆船，慷慨解囊的速度让习惯了前任教皇的一毛不拔的人们目瞪口呆。“圣父证明了我们卡斯蒂利亚一句谚语的准确性，”西班牙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便秘的人往往会因为腹泻丧命。”^[10]

庇护五世派遣西班牙教士路易斯·德·托里斯去拜见腓力二世，用强有力的论据劝说国王同意联合行动。“很明显，土耳其人与威尼斯人发生争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土耳其人认为后者孤立无援，无望与陛下结盟，因为陛下正忙于对付格拉纳达的摩尔人。”^[11]索科卢的确是这么想的；这种想法不无根据，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腓力二世对神圣联盟的整个构想满腹狐疑，而且他天性谨慎，也不是能够迅速做出决断的人。他是个服从上帝意志的执政者，身着肃穆的黑衣，亲自阅读所有文件，以专制手段统治国家，满腹疑虑，前思后想，从来不能快速下决心，也从不会过早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是世界上最精于不露声色、装模作样的人之一，”法国大使抱怨道，“他比任何其他国王都更擅长伪装和隐蔽自己的意图……一直隐藏到时机有利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12]

塞利姆二世会把国家大事分配给臣子，腓力二世却事必躬亲，亲自斟酌所有的细节，指挥每一次行动。他的决策出了名的缓慢。“如果我们必须等待死亡，”他的大臣们开玩笑说，“但愿它是从西班牙来的，因为那样它永远到不了。”^[13]

但托里斯抵达马德里的时候是一个关键时刻，起初似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此时镇压摩里斯科人的战争正处于高潮，腓力二世在科尔多瓦督战。西班牙充满了宗教狂热，腓力二世也深深地担忧，土耳其人可能在援助叛军。在情绪激昂的气氛下，空间的距离似乎缩短了，腓力二世感到，此时只有直接向奥斯曼帝国发出挑战，才能解决他的国内问题，并彻底解决地中海的安全问题。托里斯还带来了教皇的许诺——教廷将提供大笔资金。基督徒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金钱问题。托里斯在仅仅两天之内就得到了答复。天主教国王原则上同意加入神圣联盟，但盟约的具体条件必须仔细斟酌，腓力二世谨慎的天性很快又占了上风。在此期间，在教廷即刻付款的期望的鼓励下，他承诺“立即”发出援兵，以

便“取悦教皇，并时刻满足基督教世界的需求”^[14]。他将派遣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他曾在杰尔巴岛战役中不光彩地幸存下来）率领一支桨帆船舰队，驶往意大利南部。多年以来，这是基督教世界首次团结一致，共同抵挡奥斯曼帝国的洪流。

这支援军将由三个部分组成。在教廷提供金钱以及参战者均可得到赦罪的许诺的刺激下，威尼斯、教皇国和西班牙把它们舰队合而为一，共同援救塞浦路斯。三国的军队各有自己的指挥官。威尼斯人在圣马可广场举行了一个典型威尼斯式的盛大典礼，将指挥权授予吉罗拉莫·扎内。他于1570年3月30日率领一支桨帆船先遣舰队离开了威尼斯的潟湖。多里亚是整个行动中经验最丰富的航海家，他将指挥西班牙的桨帆船舰队。全军的总司令由教皇亲自挑选。他的选择其实是个政治上的妥协。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是意大利人，但同时是西班牙国王的封臣。教皇希望科隆纳能够让双方满意，并把腓力二世吸引到联盟中来。但问题是，科隆纳是个外交官和陆军将领，并非有经验的海军指挥官。西班牙阵营里有人私下里对他大加嘲讽，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戏称，自己的妹妹对舰船的了解和科隆纳一样多。起初腓力二世只是勉强同意这个任命，并且为科隆纳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接受任命而颇感恼火。他提醒科隆纳，目前为止，联盟还只是纸上谈兵。但庇护五世固执己见。7月15日，腓力二世写信给科隆纳，对他的被任命表示满意。

这些友好辞令的背后是高度的互相猜忌和虽然没有言明却十分严重的目标分歧。1570年的这次远征并没有明确的条件，是在相互不信任的气氛下开展的。唯一维系联盟的就是教皇的意志和资助。腓力二世没有兴趣为了威尼斯人的利益去援救塞浦路斯，但他欢迎教皇的资助，并希望将这次远征的目标改为北非；天生的谨慎以及杰尔巴岛的灾难决定了他给多里亚的秘密指令的内容。小心重建起来的舰队假如损失掉，西班牙将再次暴露在北非海盗的虎口下。他绝不愿意为了奸诈的威尼斯人而拿自己的舰队冒险，毕竟威尼斯人完全有可能在最后关头和苏丹做笔交

易。威尼斯人则对热那亚人，尤其是多里亚家族高度不信任，特别是在1538年的普雷韦扎惨败之后。而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对教皇钦点的海军统帅科隆纳都没有任何信任。他们都私下里命令各自的海军将领，要他们自行决断，仅在科隆纳的指令与他们的经验相符的时候才听他的。腓力二世给多里亚的命令的言辞特别模棱两可，包含了这样的指示：“你应服从桨帆船舰队指挥官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你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应当不断提醒科隆纳，将你对所有事务的意见告知于他。”^[15]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对于我们的桨帆船舰队的状态，你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不幸都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巨大损害。”腓力二世现在给多里亚的命令其实和他在马耳他战役期间给堂加西亚·德·托莱多的是一模一样的：尽量避免与敌人舰队交战。据说多里亚的兄弟曾提出打赌，“和敌人舰队不会发生任何交锋，因为乔万尼·安德烈亚得到了国王陛下的命令，在今年不要与敌交手”^[16]。这和多里亚自己在这场冒险中的特殊地位是很合拍的：他既是王家舰队的司令官，也是个私人承办商。有12艘桨帆船是他的私人财产，在此役中借给腓力二世。他绝不会拿自己的财产随便冒险。

联军舰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航了。整个行动的筹划稀里糊涂、漏洞百出，而且发动得太晚。威尼斯人已经安享了三十年和平，战备工作必须努力赶上。他们建造新船和改造旧船的速度令人咂舌。6月，他们的造船厂交付了127艘轻型桨帆船和11艘重型桨帆船，但寻找可靠的人力资源和以往一样是个大难题。糟糕的海况和船上的恶劣条件让扎内的部队进一步迅速减员。他正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扎拉^[17]等待科隆纳和多里亚，这时他的桨手当中爆发了斑疹伤寒。不少人患病和死去。他奉命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然后前往科孚岛，但形势继续恶化。无所事事让舰队士气低落；从希腊诸岛屿招募的新桨手也有不少染病死去。盟友迟迟不到，火冒三丈的威尼斯元老院于是在7月底命令扎内率领兵力锐减的舰队继续前进，开往克里特。



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

与此同时，多里亚正在进行惯常的艰苦准备工作，在意大利南部集结军队，并等待腓力二世严格但自相矛盾的命令。国王又变成了谨小慎微的老样子，他其实并没有承诺让他的舰队与威尼斯人会合，而只是承诺将舰队派往意大利。花了不少工夫才把局势澄清，腓力二世终于向多里亚发出了命令，但命令的文字非常含糊，以至于多里亚向他的岳父抱怨称：“国王命令我，并希望我为他效力、揣摩他的心思。但他的信我读得越多，就越看不懂……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前进，但必须缓慢地前进……”^[18]他就是这么做的，在意大利南部海岸磨磨蹭蹭，慢腾腾地开往奥特朗托^[19]，与科隆纳指挥下的教皇国桨帆船舰队会合。科隆纳已经在那里等了他十五天，现在又不得不忍受多里亚对海军礼仪玩弄手脚。多里亚没有按照惯例去拜见总司令，最后科隆纳只得亲自登上热

那亚人的旗舰。多里亚告诉他，自己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全国王陛下
的舰队”^[20]，而且他至迟到9月底就会离开联合舰队。

最后，科隆纳和多里亚于8月22日起航前往克里特，与威尼斯人会
合。科隆纳后来颇为悔恨地说：“乔万尼·安德烈亚害怕被敌人发现，不
敢靠岸，几乎无法在克里特登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与威尼斯舰队会
师了。”^[21]

但这已经太晚了。土耳其人的行动筹划得非常仔细，出航也很早。
皮雅利在4月底率领80艘桨帆船从伊斯坦布尔起航；陆军总司令拉拉·穆
斯塔法在二十天后出发；骑兵和近卫军部队行军穿过安纳托利亚，来到
位于菲尼凯（在安纳托利亚南岸，距离塞浦路斯150英里）的集结点。
到7月20日，土耳其军队已经有6万~8万人在塞浦路斯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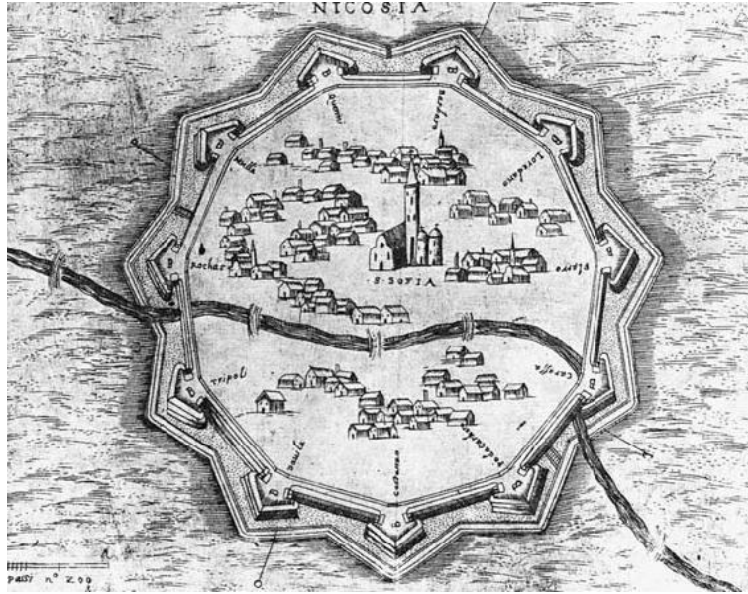
这次行动和马耳他战役类似，但规模要大得多。土耳其人的目标有
两个：位于岛屿中心的首府尼科西亚和东海岸的戒备森严的港口城市法
马古斯塔——“塞浦路斯的眼睛”^[22]。威尼斯人的精明强干的指挥官阿斯
托雷·巴廖尼推测土耳其人会先攻打法马古斯塔。皮雅利果然又一次主
张先占领一个安全的港口。但拉拉·穆斯塔法还记得姆迪纳的教训，与
他同名的另一位穆斯塔法帕夏在马耳他吃了后院起火的亏。他深知，
绝不能毫不提防地将尼科西亚留在自己的后方。

拉拉·穆斯塔法是苏丹亲信圈子里的一员。他的荣誉性名字“拉
拉”的意思是“监护人”，因为他曾经是塞利姆二世幼年时期的监护人和
教师。他是索科卢·穆罕默德的死敌，后者私下里对整个行动都不认
可。取胜对穆斯塔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和征战马耳他的穆斯塔法将军
（与他同名）一样，他在敌人的坚决抵抗前也会暴跳如雷，也常常会做
出极其残酷的事情。这种暴烈性格对奥斯曼帝国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与比尔古的骑士们不同，威尼斯人对他们的塞浦路斯要塞群的防御

至少有过一些深谋远虑。尼科西亚位于岛上大平原（一块30英里长的开阔地，尘土漫天，平坦得就像台球桌）的中心，在暑热中熠熠生辉。冷酷务实的威尼斯人利用开阔的地形，轻松地摧毁了欧洲最美丽和最富有国际色彩的城市之一的核心。在16世纪60年代，他们炸毁了一些宫殿和教堂，驱逐了成千上万的居民，拆毁了岛上最珍贵的建筑——附带王家陵墓的圣多梅尼科修道院，以便修建防御工事。在修道院的原址上，他们建造了一座高度对称的星形堡垒，它周长三英里，是严格遵循一本意大利城防工程学手册修建的。它有一些弱点——部分棱堡的外壁是泥炭，而不是石料，但到此参观的专家都认为它是“最优秀和最科学的建筑”^[23]。1570年夏天，堡垒内储存了可用两年的给养。如果防守得力，它可以固守很长时间。

问题在于，如果要对尼科西亚城的完整周界处处把守，需要2万人之多。该城有5.6万居民，其中只有1.2万人能够作战，很多人还是未经训练的希腊新兵。安杰罗·卡莱皮奥神父对此役做了令人震惊的第一手报告，他对这些人冷淡地评论道：政府“既没有火枪，也没有刀剑可以发放给他们，没有火绳枪，没有铠甲……其中很多士兵足够勇敢，但很多士兵的训练严重不足，开枪的时候会烧掉自己的胡须”^[24]。有效的防御还需要一位精明强干的指挥官，威尼斯在这方面很不幸。岛上最有经验的将领都离开了人世；剩下的最优秀的军官阿斯托雷·巴廖尼则待在法马古斯塔。于是尼科西亚的指挥权灾难性地落到了尼科洛·丹多洛手中。“但愿上帝把他也招走！”^[25]卡莱皮奥愤恨地写道。丹多洛优柔寡断、毫无领袖魅力，对他人的意见嗤之以鼻，而且智商着实不高。在整个攻防战期间，由于他的愚蠢，他麾下训练有素的威尼斯军官和当地希腊骑兵的最大努力都未能发挥作用。



尼科西亚：“最完美且最科学的结构。”

他几乎把所有工作都搞砸了。拉拉·穆斯塔法登陆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让他自己也吃惊不小。丹多洛命令他的骑兵不得出击。威尼斯元老院已经批准塞浦路斯政府释放他们的希腊农奴，临时抱佛脚地希望借此赢得他们的好感。但这道命令根本没有落实。土耳其人从一开始就对当地居民特别宽厚仁慈。“他们只有从穆斯塔法那里才能得到自由，”[\[26\]](#)卡莱皮奥记载道。土耳其人很轻松地将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和他们的意大利主子分化开，赢得了前者的支持。没有设防的莱夫卡拉村向土耳其人投降后，尼科西亚派出一支部队，将村民全部屠杀。后来威尼斯人请求边远村庄支援时，后者不理不睬，这是丝毫不奇怪的。

拉拉·穆斯塔法不受丝毫阻挡地开往尼科西亚，迅速建立了炮台，并挖掘堑壕，接近敌人。丹多洛毫无作为，禁止部队出击，还将火药储存起来，不准动用，打击了官兵的积极性。卡莱皮奥后来因为亲人的惨死和自己被囚禁而十分悲愤，不禁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都急于出动骑兵去骚扰敌人，阻止他们用马匹向前线运送木柴，但丹多洛禁止我们出击。甚至当一些最为大胆敌人接近我们的壕沟，劈砍桥梁和棱堡外壁，并在墙壁上钻孔时，副总督（丹多洛）仍然命令，如

果只有一两个敌人，就不准开枪，只有在敌人数量达到十个以上时才可以射击。他说否则他没法向圣马可交代。于是敌人得以肆意破坏我们的城墙和棱堡，而我，以及其他很多人都亲耳听见丹多洛傲慢地命令和威胁我们的炮手和他们的长官，不得浪费火药。火药发放极少，非常吝啬，仿佛丹多洛害怕伤害到敌人。而敌人持续地猛烈射击，试图夺去我们的性命。甚至已经下发的火药，副总督也想囤积起来，所以很多人都开始认为，他是个叛徒。皮萨尼先生多次询问他，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士兵积极地防御。皮萨尼说：“大人，我们应当清扫壕沟，把敌人逐出，阻止他们用铁铲和鹤嘴镐破坏我们的城墙、把它们拆毁。”丹多洛先生听了这话，差点和皮萨尼扭打起来。丹多洛的回答是，我们的棱堡坚如山岳，敌人奈何不得。^[27]

在尼科西亚城内，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威尼斯人之间横眉冷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也矛盾重重。丹多洛远没有拉·瓦莱特那样的才华和魅力，无法弥合这些矛盾。“本应有慈善博爱的地方，我却一点也找不到。”卡莱皮奥哀叹道。他用两头骡子把食物和葡萄酒送给前线士兵，“希望借此刺激富人和显贵们也能支援前线……但很少有人效仿我”。^[28]贵族军官开始在暮色降临时离开防御工事，回家睡觉，这让普通士兵怨声载道。

8月15日，决定性的时刻降临了。颇有号召力的帕福斯^[29]主教终于说服丹多洛，批准发动一次突袭，以破坏奥斯曼帝国的火炮。这次行动酿成了一场灾难。有些纪律性很差的希腊兵开始抢劫敌人营地，然后丹多洛又禁止骑兵出击去支持这次行动。由威尼斯职业军人组成的骨干部队惨遭全歼。

拉拉·穆斯塔法多次恩威并施，企图说服尼科西亚投降。到8月30日，他已经非常确信，基督徒的救援舰队不会来了。他再一次试图劝降对方，但威尼斯人在浓郁爱国主义情绪的驱动下，拒绝让步。贾科莫伯爵声若洪钟地庄严宣布：“在此危急关头，所有人都能从我们的光辉行为和我们的鲜血看出，我们是多么忠诚；我们宁愿死于剑锋，也不愿卖主求荣。”^[30]被奴役的希腊人可能没有这么热情，但大家都还清楚地记

得马耳他的例子。远方山峰上的烽火点燃时，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跑进堡垒，大声嘲笑土耳其人，提醒他们五年前在比尔古城下遭遇的失败。边远地区的政府当局命令点燃烽火，以鼓舞民众的士气，尽管他们知道，援军还没有到。为了防备群众的愤怒攻击，丹多洛给自己安排了武装侍卫。

在尼科西亚攻防战进入最后的绝望阶段时，在350英里外的克里特，联军舰队仍然在悲剧性地互相争吵和欺骗。8月30日，西班牙和教皇国的舰队终于在克里特北岸的苏达湾与扎内会师。扎内的舰队因为疫病已经损失了约2万人，他正在周边各个岛屿上搜刮人力。基督教方面现在有了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205艘战船，而土耳其人只有150艘——但他们仍然既没有明确的行动方案，也没有清晰的指挥体系。9月1日，科隆纳在他的旗舰上召开了作战会议。这次会议持续了十三天之久。多里亚对威尼斯舰队的状况大为不满，并指责扎内隐瞒了舰队实力的真相。原来，在检阅舰队的时候，扎内把他的所有船只都停在港内，让士兵们从一艘船赶到另一艘船，接受检阅，以免另外两名将领发现他的舰队已经严重减员。多里亚认为，现在进攻塞浦路斯已经为时过晚，并且直截了当地宣称，他绝不会允许威尼斯“用我的货物赢得荣耀”^[31]。他要求威尼斯人支付20万杜卡特作为押金，以防他私人所有的桨帆船在行动中损失掉。威尼斯人拒绝了这个要求，坚持要立刻驰援塞浦路斯。尼科西亚还在坚守；扎内已经接到了命令，他必须开往塞浦路斯，歼灭奥斯曼舰队；他们必须努力尝试。多里亚仍然反对救援塞浦路斯。扎内写信给威尼斯，描绘了多里亚顽固不化、拒不合作的态度，“尽管他假装愿意抗敌，其实根本没这个打算，一直在给我们制造麻烦”^[32]。联军派遣了更多间谍去查明塞浦路斯岛上的形势。随着时间一分分流逝，联军的意志力也越来越薄弱，科隆纳愈发焦急地要取得一些成果，不管什么样的成果都行。最终在9月17日夜间，整个舰队起锚出航，准备进攻罗得岛，袭击土耳其人的后院。

与此同时，皮雅利派遣了间谍去刺探基督徒舰队的意图。乐于相助的克里特人告诉他，基督徒舰队进退两难，不大可能取得任何成果。于是皮雅利从他的桨帆船舰队抽调了1.6万人去参加拉拉·穆斯塔法的最后总攻。9月9日黎明，他们逼近了尼科西亚城，准备一举将它拿下。穆斯塔法帕夏许诺，最先杀进城的人将得到重赏。

奥斯曼人集中进攻四个地点。第一次进攻的可怕场面把缺乏经验的希腊士兵吓得几乎当场抱头鼠窜，主要靠威尼斯人才抵挡住敌人潮水般的猛攻。城内到处敲响警钟，召唤人们到城墙上去。卡莱皮奥遇见了帕福斯主教，后者“身穿胸甲……命令我帮助他穿上臂甲、戴上头盔，然后加入了他的部下”^[33]。他们抵挡土耳其人达两个钟头，但“我们的人被斩成肉泥，掩蔽处的小小壕沟内堆满了死尸”^[34]。卡莱皮奥目睹守军被一个一个击毙：“副主教被一发火枪子弹打死；贝尔纳多·博拉尼大人也倒了下去，在死尸堆里躺了一阵子，但后来被救起，回到了城门处。尼科洛·欣克利提克面部负伤，不得不撤退；他的兄弟杰罗尼莫也受伤撤退。他们的兄弟托马斯·维斯孔蒂不幸战死。帕拉佐上校当场死亡，总督隆科姆负伤后被送回自己家里，在那里死去；简单地说，在两个小时的持续激战后，几乎所有人都牺牲了。”^[35]仍然坚守在前沿的守军也陷入了混乱和狂怒。一座棱堡的主炮手在火药耗尽后直言不讳地咒骂他的野战指挥官：“你们这些恶狗，既是上帝的敌人，也是你们自己和国家的死敌。你们难道看不见，敌人占了上风？我们为什么没有火药，好把他们轰出去？我有火药轰击他们侧翼的时候，他们就没法前进。让魔鬼把你们都带走吧。火药难道被我们吃了吗？炮弹难道被我们吞下去了吗？你们替圣马可节约火药，非让我们全完蛋不可。”^[36]但此时丹多洛已经没了踪影。他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岗位，逃回了宫殿。

奥斯曼人汹涌地冲杀进城，街上展开混战，“毫无秩序可言”^[37]。一大群希腊神父在他们的教堂外被杀死。卡莱皮奥和另一名神父试图重整溃败的希腊兵：“我们举起一支大十字架，竭尽全力地劝说他们……虽

然我们花了两个钟头对他们高声疾呼，但几乎一点用处没有。”有些士兵试图从城墙的炮眼溜走；其他人打开了城门，想从那里逃之夭夭。“很多人被土耳其骑兵砍杀，还有一些人被俘虏，只有少数人成功逃走。”^[38]

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宫殿周围，守军集结起来，准备做最后抵抗。此时有些威尼斯人更想杀丹多洛，而不是土耳其人。一名叫安德烈亚·佩萨罗的贵族找到了丹多洛，想把他砍倒。佩萨罗高呼“叛徒在这里！”^[39]举起了自己的剑，但被丹多洛的保镖打倒。丹多洛想安排有组织的投降，但这都是枉费心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的人也被杀死在气势汹汹的铁流中。最后一群幸存者一步一步地且战且退，在宫殿的上层房间坚持了一段时间，把不少土耳其人从窗户里扔下去，但他们最后也都被斩尽杀绝。丹多洛穿上了自己的鲜红色天鹅绒长袍，希望敌人会对他这个大人物高抬贵手。但土耳其人仍然将他斩首。“这时，”卡莱皮奥记述称，“一个醉醺醺的希腊人在宫殿上方扯起了土耳其旗帜，把圣马可旗帜撕下。”^[40]

最后，枪炮停止轰鸣，激战的嘈杂声渐渐平息，“但这个变化非常悲伤凄惨”^[41]。人们能听得见的只有妇女儿童（他们将遭到土耳其人的奴役）被从家人身边抢走时的呼天抢地。卡莱皮奥描绘了一些集体和个人的悲惨场面：“胜利者砍去了很多老妪的头颅；很多已经投降的老妇人在被驱赶的途中被砍死，土耳其人借此证明自己刀剑的锋利……死者中包括卢多维科·波多查托罗和我的母亲卢克蕾西亚·卡莱皮亚，她抱着自己的女仆时被砍了头。”^[42]尼科西亚被占领的第二天，俘虏和抢劫来的财物被变卖转手。据说，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还没有过数量如此惊人的战利品。

拉拉·穆斯塔法派遣了一名威尼斯战俘前往塞浦路斯北岸的凯里尼亚。这名战俘身披枷锁，马鞍上系着两个人头。拉拉·穆斯塔法还将丹

多洛的脑袋盛在盘子里，送给法马古斯塔的指挥官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

9月21日晚，基督教舰队正在奥斯曼帝国海岸附近躲避风暴，这时侦察船送回了他们害怕的消息：尼科西亚陷落了。次日，在科隆纳旗舰的舰楼甲板上，基督徒救援行动上演了最后一幕。大多数指挥官主张返航；扎内虽然很不甘心，但最后不得不同意。舰队就这么灰头土脸地返航了，但仍然不时爆发争吵。多里亚希望尽快离开整个舰队，带领自己的船只单独快速返回，因为适合航海的季节已经接近尾声，而他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船只的安全。至少在这方面，他的判断很明智。10月初，舰队遭遇了暴风。13艘桨帆船在克里特外海倾覆，但多里亚或许航海本领更高强，他没有损失一艘船。桨帆船舰队中再次爆发了伤寒。科隆纳的舰队被闪电击伤，又有一些船只沉没。到当年年底，科隆纳和多里亚将各执一词，对行动的惨败做出自己的解释。教皇垂头丧气，威尼斯元老院则瞠目结舌。扎内整个人一蹶不振，将在囹圄中了却残生；而对这次奇耻大辱同样负有责任的腓力二世却将多里亚提升为将军。

在塞浦路斯，身披镣铐、马鞍上系着人头的被俘军官一路叮叮当地来到凯里尼亚要塞，该处的威尼斯守军旋即投降。但在法马古斯塔，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厚葬了丹多洛的首级，给拉拉·穆斯塔法发去了义正词严的答复：“我看到了你的信，也收到了尼科西亚副总督的头颅。我郑重相告，尽管你们轻松地占领了尼科西亚城，但要攻打法马古斯塔城，你们将血流成河。蒙上帝保佑，我们会让你们忙得不可开交，永远会后悔曾经在此地扎营。”^[43]

奥斯曼军队继续前进，将法马古斯塔围了个水泄不通。拉拉·穆斯塔法还将战利品和从尼科西亚抓获的年轻男女俘虏中的佼佼者送到了海边。这些俘虏被装上索科卢的1艘大帆船和另外2艘船只，作为进献给塞

利姆二世的礼物。10月3日，在法马古斯塔外海，这艘大帆船的弹药库发生了爆炸，3艘船都粉身碎骨，爆炸的冲击波还撼动了法马古斯塔的城墙。关于爆炸的原因，有个传说流传至今：一位意大利贵妇人的女儿不肯受辱，因此选择了与敌人同归于尽。

[1]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32

[2] 原名蒂齐亚诺·韦切利奥（1488/1490～1576），意大利著名画家，曾活跃于威尼斯。他创作了很多以基督教和希腊罗马神话为题材的杰作，包括具革新意义的《圣母升天》。他的《酒神与阿里阿德涅》带有异教式的放纵，为文艺复兴艺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提香因刻画内心入微的肖像而大受欢迎，包括意大利主要贵族、宗教人物、皇帝查理五世的肖像。他以《欧罗巴被劫》达到才华的巅峰，这是他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所绘的几件作品之一。

[3] 当时的德意志旅行者，曾经游历埃及、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著作中曾提及他。

[4] Hill, Sir George, *A History of Cyprus, volume III: The Frankish period, 1432-1571*, Cambridge, 1972, p.798

[5] 科查·米马尔·希南（约1489/1490～1588）是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及穆拉德三世的首席建筑师及工程师。他在五十年间负责监督及建造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建筑物。超过三百座建筑物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最杰出的作品是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最为著名的则是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清真寺。他被视为奥斯曼建筑古典时期最伟大的建筑师，人们常将他与同时代的西方建筑师米开朗琪罗做比较。

[6]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的权威，负责就个人或法官所提出的询问提出意见。穆夫提通常必须精通《古兰经》、圣训、经注以及判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穆夫提是伊斯兰国家的法学权威，总管律法和教义方面的所有事务。随着伊斯兰国家现代法律的发展，穆夫提的作用日益减小。如今，穆夫提的职权仅限于遗产继承、结婚、离婚等民事案件。

[7] Hill, Sir George, *A History of Cyprus, volume III: The Frankish period, 1432-1571*, Cambridge, 1972, p.888

[8]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55

[9] 威尼斯城的一个区域，是威尼斯金融和商业中心。

[10] Parker, Geoffrey, *Philip II*, London, 1979, p.110

[11]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83

[12] Parker, Geoffrey,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London, 1998, p.33

[13] Parker, Geoffrey,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London, 1998, p.65

[14]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130

[15]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175

[16]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73

[17] 今称扎达尔，是克罗地亚的第五大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沿岸，曾是达尔马提亚王国的首都。

[18]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133

[19] 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与阿尔巴尼亚隔海相望。

[20]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78

[21]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78

[22] Hill, Sir George, *A History of Cyprus, volume III: The Frankish period, 1432-1571*, Cambridge, 1972, p.861

[23] Hill, Sir George, *A History of Cyprus, volume III: The Frankish period, 1432-1571*, Cambridge, 1972, p.849

[24]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29

[25]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28

[26]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32

[27]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p.133-4

[28]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36

[29] 塞浦路斯岛西南部港口城市，距首都尼科西亚约100公里。帕福斯海滨附近的海滩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的诞生地。圣保罗曾在公元1世纪的第一次布道旅行中拜访帕福斯城。

[30]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33

[31]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153

[32] Hill, Sir George, *A History of Cyprus, volume III: The Frankish period, 1432-1571*, Cambridge, 1972, p.922

[33]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38

[34]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38

[35]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38

[36]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38

[37]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39

[38]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40

[39]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40

[40]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40

[41]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40

[42]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p.140

[43]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p.167-70

17.法马古斯塔

1571年1月～7月

1570～1571年冬天，疾风苦雨敲打着威尼斯城的潟湖。天气非常恶劣，粮价极高，舰队破败不堪。桨帆船舰队里还流行着斑疹伤寒，船上的神父们害怕传染，放任病人不做临终忏悔就死去。威尼斯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维持舰队的经费奇缺，但共和国政府害怕水手和士兵一哄而散，因此不敢解散舰队。

1570年的惨败究竟是谁的错，城内仍然在争论不休。一本题为《威尼斯执政委员会在针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在决策和管理上犯下的突出错误》的小册子公开谴责政府当局的幼稚、判断错误和用人不当。小册子的作者认为“尼科西亚的陷落、5.6万人死亡或被俘，300多门火炮和除了法马古斯塔城之外几乎整个岛屿的损失”^[1]全都是政府的责任。尼科西亚的可耻陷落似乎是共和国走下坡路过程中的一个新篇章。现在法马古斯塔也命悬一线。“只有上帝知道，法马古斯塔能不能抵挡住土耳其军队，长期坚守下去。”^[2]法国红衣主教德·朗布耶在给查理九世的信中如此写道。威尼斯人也普遍持同样的意见。在威尼斯以东500英里的埃迪尔内，塞利姆二世已经在准备新的战役；在尼科西亚战役带来丰厚战利品之后，志愿者蜂拥而来，投入新战役。

教皇心烦意乱。他本人责怪多里亚不肯“更有效地支援威尼斯人”^[3]，导致了行动的失败。在罗马，新年伊始就发生了非常不吉利的自然灾害，城内人心惶惶。1月3日，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圣彼得大教堂的钟楼被雷电击中，造成了严重破坏。更糟糕的是，关于正式组建神圣联盟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冬季的烂泥，止步不前。

1570年7月，这些谈判刚启动的时候似乎前景相当光明。当时，腓

力二世和威尼斯双方的代表在罗马城磋商，会谈由教皇亲自主持。起初，双方就联盟的针对对象和成本问题发生了争执。西班牙人希望联盟的宗旨是泛泛地反对所有异端分子和异教徒；威尼斯人无意与低地国家的新教徒开战，坚持在条约中只使用“土耳其人”的字眼。教皇的谈判代表提议以1537年的联盟为蓝本，以此为基础安排新的联盟。到9月，似乎所有的主要议题都得到了讨论，但后来西班牙代表返回了马德里，因此会谈不得不暂时停止。到10月，腓力二世虽然仍然有所保留，但已经准备在条约上签字；这时威尼斯人却吹毛求疵起来；他们换了谈判代表，并要求从头开始，逐条重新讨论。谈判就这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几个月，其间发生了不少钩心斗角和歪曲争吵。对充满基督教热情的庇护五世来说，这就像是把一大群闹哄哄的鹅赶进圈里。

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现了导致远征失败的各种因素：阴谋诡计、秘而不宣的私念、互不信任、目标互相矛盾。天主教国王腓力二世希望攫取作为基督教世界世俗领袖来领导联盟的威望；他的战略利益范围最东只到西西里；事实上，如果塞浦路斯陷落，还能削弱威尼斯的力量，这对西班牙是有利的。他希望领导联盟来防守地中海西部，并收复突尼斯；另外他还对金钱兴趣浓厚。教皇的金钱诱惑对西班牙参加联盟起到了关键作用。威尼斯人要求发动进攻，以保住塞浦路斯，而根本不曾考虑过突尼斯。而西班牙和威尼斯双方私下里都对庇护五世的愿景——联盟的最终目标将是收复圣地——惊恐不已。

1537年的联盟给威尼斯人留下了糟糕的记忆，于是他们玩起了一个复杂的两面派游戏。虽然他们坚决不肯承认，但他们在与西班牙和教皇协商的同时，甚至在签订盟约之后，还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与索科卢谈判，希望结束战争。威尼斯在伊斯坦布尔的代表马尔科·安东尼奥·巴尔巴罗虽然表面上在战争期间被软禁在寓所，但其实一直和首席大臣过从甚密。威尼斯共和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用和苏丹缔约来威胁神圣联盟，以迫使对方让步；同时在土耳其人面前也如法炮制。“毫无疑

问，”一位颇具洞察力的红衣主教在谈判期间写道，“如果苏丹能给这些威尼斯权贵某种和解，而且联盟不能尽快确立的话，威尼斯人就会接受苏丹的条件，哪怕这意味着将塞浦路斯拱手让给苏丹。”^[4]事实上，威尼斯人正在努力与索科卢协商，希望能保住法马古斯塔，尽管土耳其人正在做攻打该城的准备。首席大臣也在下他自己的一盘冷酷无情的权力政治棋。他并不希望进攻塞浦路斯。但现在战役已经在进行中了，所以他下定决心，决不能让他在国务会议的死敌——拉拉·穆斯塔法和皮雅利——获得军事荣誉，而让他自己黯然失色。如果他能通过外交手段从威尼斯人手中获得法马古斯塔，他还有机会挫败这两个政敌。

法马古斯塔被希腊人称为“陷入沙子的城市”，它是威尼斯海洋帝国最东端的前哨。面向大海的城门上屹立着石刻的圣马可雄狮，它的眼睛在灿烂阳光下一眨不眨地凝视远方。法马古斯塔的旗帜在海风中沙沙作响，俯视着棕榈树丛、十字军的小教堂和圣尼古拉教堂——这座奇思妙想的哥特式教堂以兰斯^[5]教堂为蓝本，却坐落在热带的海岸上。

在拉拉·穆斯塔法兵临城下的前一年，威尼斯人在此地构建了大量防御工事。法马古斯塔城外周长2英里，近似菱形，给穆斯塔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堡，同时也是岛上最坚固和规模最大的城堡，”^[6]曾于1553年到访的英格兰人约翰·洛克如此评价。法马古斯塔有5座城门、15座棱堡、很深的干壕沟；城墙高达50英尺，厚达15英尺；而且周边地势很低，瘴气弥漫，任何军队都无法在此久留。穆斯塔法急切希望速战速决。

1570年9月底，拉拉·穆斯塔法一俟抵达法马古斯塔，就努力劝威尼斯人投降。他在城墙前展示了死者头颅和活着的俘虏，并伪造了威尼斯政府写给在伊斯坦布尔的大使、要求布拉加丁投降的书信。从一开始，他得到的就是坚定不移的答复。法马古斯塔的指挥官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和倒霉的丹多洛一样，出身威尼斯豪门，但他是个比丹多洛坚

毅得多的爱国者。法马古斯塔防务的安排和尼科西亚完全不同。守军内部纪律严明；当局按时向士兵发饷；粮食供应有条不紊，而且非常公平。根据威尼斯洋溢着爱国主义的史料，“只要还有1德拉克马^[7]的食物，布拉加丁就将把它分给大家；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仍然尽力体恤官兵”^[8]。虽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土耳其人有8万人，守军只有8000人，但守军仍然士气高涨。希腊平民和他们的神父们全心全意地参与到防御战中。布拉加丁明智地将实际军事指挥权留给颇能鼓舞人心的阿斯托雷·巴廖尼，因为后者受到士兵们的爱戴。

冬天的战事杂乱无章地过去了。奥斯曼舰队返回了大陆上的安全港口，拉拉·穆斯塔法在等待春天到来。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些突袭和小规模战斗，以及荷马史诗般的一对一单挑（巴廖尼自己就参加了这样的单挑），因此这段时间并不沉闷无聊。全城人都在城墙上观看单挑，并指责土耳其人作弊，因为他们伤害基督徒的马匹，被打败的时候还不肯束手就擒，而是逃跑。为了让单挑比赛更刺激些，巴廖尼悬出了赏格：杀死对手的赏金只有2杜卡特，但把对方打下马的赏金有5杜卡特。

在不是那么激烈的围城战期间，威尼斯对敌人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相当猛烈的军事打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1571年1月，共和国政府任命精力充沛的马尔科·奎里尼为在克里特的桨帆船舰队的指挥官。这位新司令发现土耳其舰队在冬季撤离了作战海域，在法马古斯塔外海只留下了少量舰船，以支援陆军。他决定发动一场勇猛大胆、风险极高而且不合时令的作战，并选择了在斋月开始的时间。1月16日，他率领十几艘桨帆船和4艘高侧舷的帆船起航，帆船上载有1700名士兵，目标是增援法马古斯塔。在冬季的大海上，他向东航行，花了十天时间就抵达了法马古斯塔。4艘帆船接近港口时被奥斯曼桨帆船舰队发现，但奎里尼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自己的桨帆船群躲在敌人视线之外，将土耳其舰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将3艘敌舰轰得粉身碎骨，然后将自己的帆船拖进港口，令守军欢呼雀跃。在三周内，奎里尼率领舰队在塞浦

路斯岛周围大显身手，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和港口设施，俘虏敌人的商船，大大地鼓舞了布拉加丁部下的斗志。

奎里尼离去的那天夜里，布拉加丁和巴廖尼准备了一次伏击。他们命令任何人不得在次日早晨出现在城墙上，然后给他们的大炮装填了葡萄弹和链弹，火绳枪也装好子弹，骑兵则在城门后就绪。黎明时分，土耳其人抬头去看一片沉寂的城墙，那里没有任何动静，威尼斯战船也没了踪影。他们爬出战壕，城墙上仍然没有任何迹象。他们开始认为，威尼斯守军已经和奎里尼一起乘船撤走了。这个消息被报告到穆斯塔法那里，随后全军开始前进。土耳其军队进入射程时，威尼斯人鸣响号炮，然后城墙上射下倾盆大雨般的枪弹和炮弹，把土耳其士兵成片打倒在地，然后骑兵又猛冲出来，大肆砍杀。

奎里尼离去时许诺将带来更强大的援军；据说他还给布拉加丁留下了一船前往麦加的朝圣者，用作人质，尽管这种说法的细节后来颇有争议。这些可怜的人质将在后来的战事中起到重要作用。

奎里尼的“拜访”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威尼斯仍然很有实力。奥斯曼帝国指挥层对此颇感震惊，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导致了影响更大的后果。塞利姆二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十分震怒和不安；作为信士的长官，保障朝圣道路的畅通是一个关键使命。他处决了名义上应对此事负责的希俄斯总督，以儆效尤。皮雅利保住了性命，但丢掉了职位。政敌的失势对索科卢来说是个胜利。海军的指挥权被交给了第五维齐尔——穆安津扎德·阿里，又称阿里帕夏，他的海战经验远远没有皮雅利丰富，对索科卢来说也是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有人推测，阿里帕夏被任命为海军司令，是因为索科卢暗地里推波助澜。索科卢这是在故意破坏军事行动，因为战役的胜利可能会削弱他自己的地位。不管动机如何，这个新任命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威尼斯人再次发动救援，土耳其人打破了常规。为了保卫塞浦路斯，他们出航的时间比通常

要早得多。

2月初，20艘桨帆船被派去监视克里特；3月21日，阿里帕夏也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了。舰队出航较早，因此作战季节不可避免地会十分漫长。新官上任的海军司令从伊斯坦布尔出航时，口袋里揣着一套前所未有的命令。原则上，土耳其人对大海战没有多少兴趣。他们一般是用船只运送部队，并支援两栖作战，打击敌人的港口和岛屿；马耳他和罗得岛战役是奥斯曼海军运用的典型例证。从这个角度看，阿里帕夏接到的指令是非同寻常的。他的任务是“寻找并即刻进攻异教徒舰队，以挽救我们的宗教和国家的荣誉”^[9]。这些指令的来源是索科卢，还是鲁莽的苏丹本人，我们无从得知。这个决策将决定历史的走向。

在罗马，谈判仍在进行。3月，西班牙试图将联盟的主要使命改为进攻突尼斯，但庇护五世固执己见——远征的方向必须是东方——并严格控制给予西班牙的经济补助。各方受邀在条约上签字时，威尼斯人突然不做任何解释就中断了谈判，回去和索科卢商谈；法马古斯塔形势越来越危急的时候，威尼斯主和派的呼声越来越高。教皇为此怆然泪下；看来他的全部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但此时索科卢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了；庇护五世还派遣科隆纳去把威尼斯人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1571年5月，在整整十个月的激烈争吵和拉锯战之后，神圣联盟的最终条款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1571年5月25日，三方在梵蒂冈的孔奇斯托罗厅签订了这个历史性的盟约。一周后，罗马城的大街小巷举行了盛大的公众庆祝活动；为此庆祝活动特别铸造的钱币被撒向群众，“作为喜悦和快乐的标志”^[10]。6月7日，在威尼斯，当局在人山人海的群众面前公布了盟约；圣马可大教堂内举行了弥撒，执政官亲自走在肃穆的宗教游行队伍中。意大利全境激动不已，充满了期待。庇护五世振奋人心的话语也折射了群众的普遍情绪，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创造了历史。据一位目击者称，教

皇“用生动而充满仁爱的言辞感谢伟大的上帝。在他的教皇任期内，上帝将恩典赋予基督教世界，让天主教君主们团结一心，共同对抗公敌”^[11]。

盟约的条件让各方都得到了一些好处。这并不是个临时性的联盟，而是——借用盟约文件的庄严表述——恒久的联盟、持久的圣战，就像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一样。它既是进攻性的，也具有防御性；征讨的对象不仅仅是土耳其苏丹，还有他在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附庸国。这一条对腓力二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联盟的经费安排也做了具体规定：西班牙支付一半费用，威尼斯负责1/3，教廷则提供1/6。短期目标也确定了：他们将立即以200艘桨帆船和相应的部队发动一次远征，收复塞浦路斯和圣地。至于收复圣地的使命，威尼斯和西班牙都一定不会遵守。

这是庇护五世在外交上的一个辉煌成就。他的十五位前任都没能办到的事情，似乎被他解决了。长期以来，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击退异教徒一直是教皇们最热衷的任务之一。庇护五世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坚持不懈以及金钱的诱惑，完成了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尽管盟约的文字信誓旦旦，很多深明世故的人还是颇为疑虑。1月，腓力二世预言说：“如果联盟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相信它能有任何益处^[12]。”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个预言，盟约墨迹未干，西班牙就打算食言。庇护五世不得不再次用撤回资助作为威胁，强迫西班牙回到联盟中来。还有很多人对联盟也毫无信心。“盟约在纸上很好看……但永远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成果，”^[13]法国红衣主教德·朗布耶在谈判期间说道。后来也没什么迹象能让他改变这个看法。伊斯坦布尔方面也希望神圣联盟这次也会像1570年的远征一样自行瓦解。

联盟能够维持下去，主要是由于两个重要因素。首先，体现在基督教联军统帅的人选——奥地利的堂胡安，即腓力二世的异母弟。其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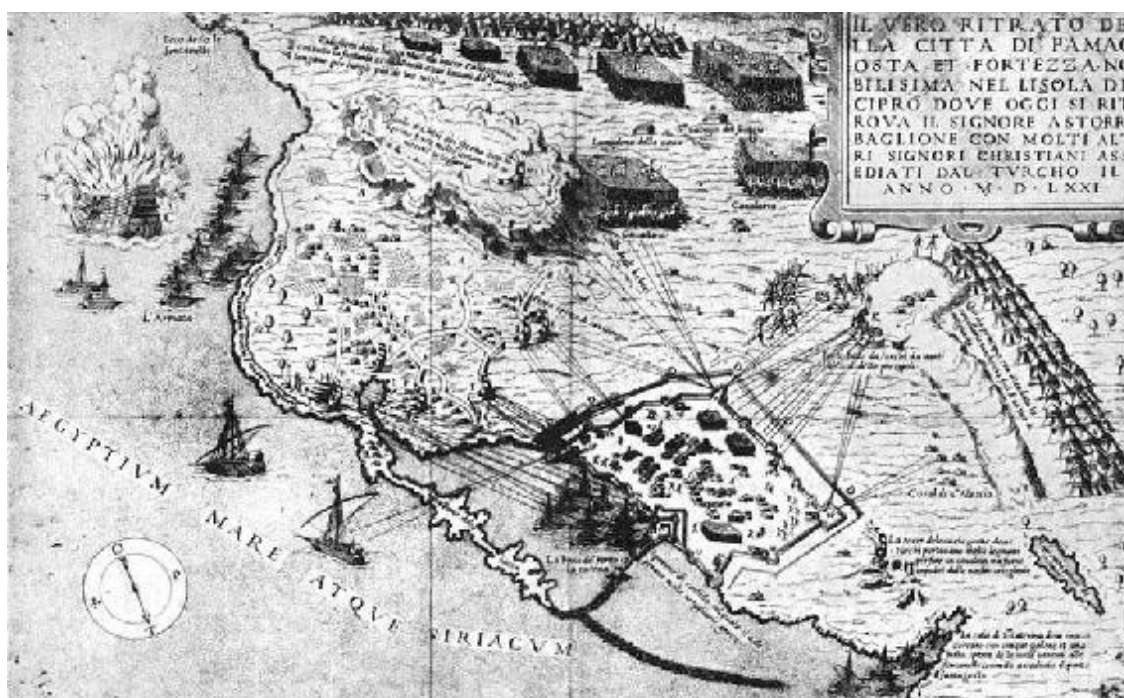
就在谈判代表们在盟约上签字、群众欢呼雀跃的时候，法马古斯塔攻防战在流血漂橹的惨景中落幕了。

春季，拉拉·穆斯塔法得到了更多生力部队。塞浦路斯离奥斯曼帝国海岸只有咫尺之遥，不管有多少士兵死亡，兵力补充总是非常轻松的。关于尼科西亚丰厚战利品的消息不胫而走，拉拉·穆斯塔法宣称（这么广而告之或许不太明智），法马古斯塔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战利品。冒险家和非正规军蜂拥加入攻城战。到4月，他已经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多达约10万人。奥斯曼人吹嘘道，苏丹派来了兵力如此雄厚的大军，如果每个士兵都往壕沟里丢一只鞋，壕沟就会被填满。关键在于，这支大军的很大一部分是坑道工兵，只装备了鹤嘴镐和铁铲。城内守军则包括4000名威尼斯步兵和同样数量的希腊人。

4月中旬，拉拉·穆斯塔法做好了正式攻城的准备。布拉加丁清点了自己数量有限的粮食，认为别无他法，必须将非战斗人员驱逐出城。5000名老人和儿童领到了一天的口粮，被从一个侧门带出城去。任何冷酷无情的攻城将领都会占这个便宜。公元前52年，尤利乌斯·恺撒在攻打维钦托利^[14]的要塞时，就任凭被夹在罗马军团和高卢军队之间的高卢妇孺饿死。1537年，巴巴罗萨则将出城的平民赶回城墙处。喜怒无常的拉拉·穆斯塔法却宽大为怀，允许平民返回自己的村庄。这个举措既仁慈又精明，保证了土耳其军队对希腊平民的善意。

布拉加丁决心效法马耳他防御战，但法马古斯塔和马耳他差别甚大。法马古斯塔离最近的基督教国家有1400英里之遥，地质条件也与马耳他不同。比尔古和森格莱阿是建在坚固岩石上的，挖掘堑壕需要超人的努力。“陷入沙子的城市”则被沙滩包围，开挖地道是非常容易的，尽管需要不断用木料支撑地道。4月底，拉拉·穆斯塔法麾下的庞大劳工队伍开始挖掘堑壕，逼近城市。基督徒嘲讽土耳其人像农民一样拿着鹤嘴镐和铁铲打仗，但土耳其人的坑道作业非常高效。庞大的堑壕网络弯曲

迂回地逼近壕沟，而且堑壕很深，骑兵可以在里面走动，而只有矛尖会露出地表。堑壕如此之多，以至于目击者声称全军都可以驻扎在里面。奥斯曼军营周围搭建了高高的泥土胸墙，只有帐篷的顶端露出来；另外建造了正面宽达50英尺的土木堡垒，其墙壁用橡木梁柱和成袋的棉花加固。如果这些堡垒被炮火摧毁，很快又能重建起来。射击平台被堆砌得比法马古斯塔城墙还高，平台上安放了重炮。



被包围的法马古斯塔

守军为了他们的小小共和国的荣誉而奋战，就像圣约翰骑士团一样充满斗志。巴廖尼组织了突袭和伏击，杀死敌人的坑道工兵，向敌人战壕内投掷火药，在沙地里布设带有涂毒铁钉的木板，摧毁敌人的炮台，杀死了数量惊人的土耳其士兵。守军的坚忍不拔令奥斯曼帝国高层瞠目结舌、忧心忡忡。士兵们在写给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人的信中说，法马古斯塔的守军都是巨人。5月22日，拉拉·穆斯塔法再次送信给布拉加丁，劝他投降，得到的回答是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圣马可万岁！”^[15]土耳其人的某次劝降遭到了更激烈的拒绝。威尼斯人急切盼望援军到达。布拉加

丁让土耳其使节告诉他的主子，威尼斯舰队抵达的时候，“我将策马驱赶你们，让你们把投进壕沟的泥土全部背走”^[16]。布拉加丁的言辞绝非明智。

最终，双方兵力的悬殊体现了出来。5月初，神圣联盟各方准备在罗马签字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大炮开始猛轰法马古斯塔，一天天对城内房屋进行狂轰滥炸，以打击市民的斗志；同时猛击城墙，企图将它摧毁。虽然守军勇敢地抢修城墙，但城墙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逐渐摧毁了。土耳其人通过坑道作业和爆破将三角堡和棱堡的正面炸塌。6月21日，土耳其人打开了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先后发动六次猛攻，渐渐将守军力量消耗殆尽。城内的食物和火药供应越来越少。“葡萄酒喝完了，”威尼斯工程师涅斯托尔·马丁嫩戈写道，“无论鲜肉、咸肉还是奶酪都无处可寻，除非用天价购买。我们吃马肉、驴肉和猫肉，除此之外只有面包和豆子，饮料只有兑水的醋，而就连这些食物也日渐减少。”^[17]7月19日，深受群众爱戴、被认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利马索尔^[18]主教在自己桌前被火绳枪打死。希腊平民此前忠诚地支持威尼斯主子，但现在他们受够了。他们念念不忘尼科西亚的悲惨结局，向布拉加丁请愿，希望投降。在大教堂内举行了一场热情洋溢的弥撒之后，布拉加丁恳求平民再给他十五天时间。他们同意了，但土耳其人也知道，这场战役即将结束。7月23日，被守军的无谓抵抗激怒的拉拉·穆斯塔法把一封直言不讳的书信射进了城，再次效法苏莱曼在罗得岛的做法，劝说巴廖尼投降：

我，穆斯塔法帕夏，希望你们的高贵将军阿斯托雷明白，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你们必须投降，因为我知道，你们别无生存的机会，既没有火药，也没有兵员来继续抵抗。如果你们体面地投降，可以保留财物，我们将把你们送往基督教国家。否则，我们将用利剑征服你们的城市，将你们斩尽杀绝！好自为之！^[19]

^[1]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90

[2]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99

[3]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93

[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09

[5] 法国东北部城市，位于巴黎东北偏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市中心还存有古罗马时期的遗迹。兰斯在法国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历代法国国王加冕的地方，前后一共有16位国王在此接受主教加冕。

[6] Hill, Sir George, *A History of Cyprus, volume III: The Frankish period, 1432-1571*, Cambridge, 1972, p.857

[7] 古希腊的货币和重量单位。后来亚美尼亚、奥斯曼帝国等国家也用过这个单位。1德拉克马大约有3~4克。

[8]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999

[9] 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Istanbul, 1993, pp.187-9

[10]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15

[11]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15

[12] Parker, Geoffrey, *Philip II*, London, 1979, p.110

[13]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092

[14] 维钦托利（? ~前46），高卢阿维尔尼部落的首领。公元前52年，维钦托利领导高卢人反对恺撒，用游击战来骚扰恺撒的补给线，成功地守住了戈高维亚山寨，随即乘胜向罗马军队发起进攻，结果失败。他后来被围困在阿莱西亚城堡，被

迫投降。他被戴上镣铐解往罗马，在为恺撒举行的凯旋式中示众，六年后遭处决。

[15]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13

[16] Morris, Jan, *The Venetian Empire: A Sea Voyage*, London, 1980, p.110

[17]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32

[18] 塞浦路斯第二大城市，位于塞浦路斯岛南岸。

[1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32

18.基督的将军

1571年5月～8月

拉拉·穆斯塔法准备法马古斯塔的最后总攻之时，神圣联盟也开始为海上远征做准备。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所有港口——巴塞罗那、热那亚、那不勒斯、墨西拿，士兵、物资和舰船正在做艰难的集结。地中海西部忙得不可开交、乱作一团：协调不力、准备不足，而且为时太晚。在西班牙的威尼斯大使目睹这些准备工作，怒火中烧而又束手无策：“我发现，在海战方面，所有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要花费很长时间，甚至阻挠起航。他们的桨和帆没有到位，或者没有足够数量的烤炉来制作饼干，或者缺少十四棵大树来制作桅杆，很多时候舰队的战备根本就是止步不前。”^[1]这一派混乱景象与奥斯曼帝国军事机器的中央集权和协调有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奥斯曼帝国的作战计划是预先制定好的，计划的执行则得到不可违抗的苏丹御旨的保障。在前一年，卡拉曼^[2]总督在集结部队以参加塞浦路斯战役的时候比期限晚了十天，就被免职。土耳其人制定了对抗基督教威胁的作战计划，并于1571年春天严格执行。海军司令阿里帕夏在3月奔赴塞浦路斯；另一支舰队在第二维齐尔——佩尔特夫帕夏指挥下于5月初离开了伊斯坦布尔；第三维齐尔——艾哈迈德帕夏于4月底率领一支陆军部队西征，以威胁威尼斯的亚得里亚海岸；乌卢奇·阿里则从黎波里起航东进。这场战役的目标将不仅仅是征服塞浦路斯，而是将战火烧到亚得里亚海中心，甚至占领威尼斯或者更西的地区。“苏丹的统治必须扩张到罗马，”^[3]索科卢如此告知威尼斯人。到5月底，阿里和佩尔特夫判断法马古斯塔的攻城战已经快结束了，于是将他们的舰队合二为一，开始扫荡威尼斯治下的克里特。

威尼斯人迫切需要扭转战局。他们的桨帆船舰队在新任司令官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率领下于4月底抵达了科孚岛。在前一年扎内指挥下的

可耻表现之后，威尼斯人现在把他们的事业托付给了一位强悍的勇士。韦尼尔已经75岁高龄，看上去像是威尼斯建筑底座上石刻的暴怒雄狮，是个声名远播的爱国者。他虽然并非航海家，却是个坚决刚毅的人，充满激情、行事果断，而且脾气火爆。塞浦路斯受难的消息让他按捺不住，他多次试图劝服他的军官们，自己单独出击、援救法马古斯塔，而不是等待支吾搪塞的西班牙人，但没有成功。大家认为威尼斯单独出击的风险太大，舰队的力量还不足，因此别无他法，只能坐等。联军开始慢慢地在西西里北岸的墨西拿（事先约定的集结地）汇集。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尽管在前一年遭遇惨败，但庇护五世仍然坚持任命他为教皇国桨帆船舰队的司令。科隆纳于5月来到了那不勒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西班牙舰队和整个联军的最高统帅的抵达。

最高统帅的人选由腓力二世决定。他的第一个提名是永远谨小慎微的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教皇当即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认为1570年的失败全怪多里亚；而且威尼斯人对多里亚非常憎恶。腓力二世的第二个提名是他年轻的异母弟——奥地利的堂胡安，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这是个绝佳的选择。

堂胡安时年二十二岁，相貌英俊、闯劲十足，聪明勇敢而富有骑士风度，雄心勃勃，对荣耀充满渴望，秉性和他的异母兄——谨慎的腓力二世截然相反。他在镇压摩里斯科人反叛的战争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尽管腓力二世认为他过于鲁莽和热衷冒险。堂胡安曾亲临前线，头盔被火绳枪子弹击中，这令腓力二世颇为震怒。“你必须珍重自己，我也必须好好保护你，因为你有更伟大的事业要做，”^[4]他在信中责备道。在1571年，堂胡安是腓力二世唯一的继承人。因此他决心不能让弟弟在战争中冒险。为了遏制他的冲动，同时也为了给他提供航海方面的精明建议（因为堂胡安没有海战经验），国王给他安排了一群经验丰富的谋臣，包括小心谨慎的多里亚、路易斯·德·雷克森斯以及一位有经验的航海家——圣克鲁斯侯爵阿尔瓦罗·德·巴桑（尽管巴桑的天性更

有可能支持积极进取的行动）。腓力二世坚持要求，必须在这三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和敌人交锋。国王认为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发生交战的风险。他认为自己可以依赖多里亚投否决票。



堂胡安

这些束缚让年轻的亲王颇为恼火。由于他的特殊出身，他对荣誉的渴望是无止境的。私生子的身份使他与在宫廷的地位格格不入，而腓力二世不遗余力地对这个极受欢迎的年轻人进行漫不经心的怠慢。他拒绝授予堂胡安“殿下”的称号，而只允许称他为“阁下”；在繁文缛节的时代，这种微妙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堂胡安或许是腓力二世显而易见的继承人，但目前国王还不打算确立他的王室地位。更糟糕的是，国王还把堂胡安必须得到三位谋臣一致同意才能采取行动的指令告诉了堂胡安的下属，而不是堂胡安本人，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作为统帅的地位。堂胡安写给兄长的长信中隐藏着受到伤害的痛苦：“我谦卑和恭敬地大胆直言，假如陛下愿意直接与我交流……而不是把我降到与陛下众多仆人同

样的地位——良心可鉴，我并不应当受到如此对待——对我来说将是无比荣幸和有益。”^[5]堂胡安渴望得到光荣和认可，以及最终得到自己的王冠。现在围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奉命阻止他取得任何成果的老迈之辈，他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6月初，堂胡安准备离开马德里的时候，教皇在西班牙的使节了解到他急切希望摆脱这些枷锁的心情，对他颇为赞赏。“他是个渴望荣耀的亲王，如果机遇来临，他不会甘受为他提供建议的议事会的限制；他不会只注重保全桨帆船舰队，而是更热衷于夺得光辉和荣耀。”^[6]

1200英里之外，即将与堂胡安对抗的奥斯曼舰队司令正在准备劫掠克里特。乍一看去，穆安津扎德·阿里帕夏（“穆安津扎德”的意思是“穆安津的儿子”）与堂胡安简直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堂胡安是欧洲王室的私生子，而阿里出身贫寒。他的父亲是奥斯曼帝国旧都埃迪尔内（伊斯坦布尔以西140英里处）的穆安津，即召唤群众祈祷的人。在能者为先的奥斯曼帝国晋升体系中，阿里现在已经攀升到了第四维齐尔的高位，又被任命为位高权重的海军司令，也就是伟大的海雷丁·巴巴罗萨曾经占据的职位。阿里受到民众的赞扬：“他勇敢而慷慨，天性高贵，热爱知识和艺术；他言辞得当，笃信宗教，生活纯洁，无可指摘。”^[7]但和堂胡安一样，他也多多少少是个局外人。按照常规，苏丹的精英统治阶层往往来自改宗的基督徒，尤其是在孩提时代就被俘虏和改宗的人。这些人的一切都来自苏丹的恩典，在苏丹的宫廷中长大成人。索科卢是个波斯尼亚人；皮雅利幼年时被从匈牙利战场抢到土耳其。阿里是个正儿八经的土耳其人，这反倒是不寻常的。“出身外地行省，并在那里长大，他被苏丹宫廷的显贵视为外来闯入者。闯入统治集团被认为是个错误。”^[8]因此他不属于统治精英。和堂胡安一样，他也需要证明自己。他雄心勃勃，一心要在苏丹面前取得成功；他也勇敢到了鲁莽的程度，而且同样具有极强的荣誉感，认为撤退是懦弱的行为。

关键在于，堂胡安和阿里都没有多少海战经验。迄今为止，争夺地

中海的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发生大规模海战，这并非偶然。甚至普雷韦扎战役也只算小规模冲突。那些以高超本领驾驭脆弱的桨帆船舰队的航海家——海雷丁·巴巴罗萨、图尔古特、乌卢奇·阿里、安德烈亚·多里亚及其侄孙乔万尼·安德烈亚、皮雅利和堂加西亚都是些极其小心谨慎的人。这么小心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理解大海的状况和它的反复无常；海风突然平息或者风力加大、不明智地在岸边行驶、战术优势的稍微丧失，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灾难。长期经验表明，造成胜利和惨败之间差别的往往是极小的因素；因此他们对风险的评估非常谨慎。正在集结史上最强大桨帆船舰队的这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这样的经验，他们都急于寻找对方，决一死战。阿里执行他的命令，目的就是决战决胜。这些因素必然导致一场激战。

在基督徒方面，很多有经验的观察家都深感怀疑，如此辛苦地集结舰船、兵员和物资，最后能不能取得什么成果，尤其是这次行动是由西班牙人指挥的。堂胡安前注意大利的旅途远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于6月6日离开马德里，花了十二天才到达巴塞罗那，然后在那里等待了足足一个月，准备工作才就绪。“我国朝廷的原罪是，从来不能火速行事，及时完成任务，”^[9]路易斯·德·雷克森斯在巴塞罗那唉声叹气地观看着准备工作的缓慢进行，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如此写道。终于，在7月20日，堂胡安登上了他的富丽堂皇的桨帆船“国王”号，在群众的欢呼和礼炮声中起航。旅途中的每一步，他都被欣喜若狂的欢迎队伍、庞大的人群、喜庆的灯火、烟花爆竹、庆祝活动、访问修道院和教堂礼拜耽搁了不少时间。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位风流倜傥的年轻亲王，留住他，宴请他。这不像是开往前线的行军，倒像是王室巡游，而且还感染了宗教和圣战的狂热情绪，似乎沿途的每个港口——尼斯、热那亚、奇维塔韦基亚、那不勒斯和墨西拿都是苦路^[10]的必经之地。

在热那亚，多里亚家族举办假面舞会，盛情款待堂胡安，就好像当年招待他的父亲查理五世一样。“看到堂胡安跳舞时的活泼和优雅，大

家都又惊又喜。”^[11]大家对堂胡安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案，就像王室活动的记载一样。那不勒斯不甘落后，为年轻的亲王举办了一场奢华的欢迎盛会。关于他行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南欧，他的每次登陆都更加激发了人们的热情期待和圣战热情。8月9日，这位基督的将军抵达那不勒斯，当地人向罗马发送的一份激动万分的公报描绘了他抵达该城的盛况：“今天23时，奥地利的堂胡安进入城内，令市民兴高采烈。格朗韦勒红衣主教^[12]亲自前往港口的防波堤迎接他，让后者亲吻他的右手。这位亲王皮肤白皙，头发金黄，胡须稀疏，相貌英俊，中等身材。他策马入城，身边有多名身穿带有深蓝色流苏的黄色天鹅绒号衣的侍从和仆人伺候。”^[13]次日，他乘坐红衣主教的马车，在欢呼的群众的夹道欢迎下从港口前往宫殿。他身穿华丽的金红两色华服，车后跟随着长长一队贵族。在每个港口，船队都接上了更多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士兵，他们都是腓力二世国王的人马。



MEDAL STRUCK IN HONOUR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HOLY BANNER OF THE LEAGUE.

堂胡安接受神圣联盟的大纛

教皇派遣格朗韦勒红衣主教前往那不勒斯，为年轻的统帅举行庄严而堂皇的祝圣仪式。教皇选择格朗韦勒，颇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在联盟谈判期间，格朗韦勒一直是个头号刺儿头，持续不断地吹毛求疵，而且故意踌躇拖延，给谈判制造了不少麻烦。有一次，庇护五世被他气得火冒三丈，把他赶出了会议室。8月14日，在圣克拉拉教堂举行的隆重仪式中，格朗韦勒向堂胡安授予了象征神圣联盟统帅地位的全副器具。堂

胡安跪在主祭坛前，接受了他的将军权杖以及一面20英尺高的巨型蓝色大纛（蓝色是天堂的颜色）。这是教皇的礼物，上面精心绘制了耶稣受难的图景和连在一起的联盟三方的纹章。“幸运的亲王，”格朗韦勒声如洪钟地说道，“请接纳这些真正信仰的标志物，愿它们保佑你，打败我们的亵渎神灵的敌人，取得一场光荣的胜利。愿你的手能够打击敌人的傲慢。”^[14]西班牙士兵高举着大纛，在那不勒斯街道上游行，然后隆重地将它悬挂在“国王”号的主桅上。

四个月前，在伊斯坦布尔也举行了一场类似的盛大仪式。塞利姆二世向阿里帕夏授予了一面相似的燕尾旗，但比堂胡安的旗帜更大。阿里帕夏的旗帜是鲜绿色的——那是伊斯兰教天堂的颜色——上面完美无缺地绣有真主的九十九个尊名和称号，一共重复了28900次。现在，这面旗帜被悬挂在正在亚得里亚海航行的“苏丹娜”号的桅顶，在秋季阳光下熠熠生辉。双方的旗帜都是雄图霸业的标志物，也象征着神授的胜利。

得到祝圣的基督教旗帜也标志了联盟的第一个目标——解救法马古斯塔，但此时战火已经蔓延到了更近的地方。7月和8月初，阿里帕夏的舰队在威尼斯的海洋帝国横冲直撞，大肆破坏。土耳其人沿着克里特西进，绕过希腊海岸，一举成为亚得里亚海的统治者。他们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北部海岸的一连串驻防据点——乌尔齐尼、安蒂瓦里和布德瓦^[15]，同时陆军也发动了协调有力的钳形攻势。韦尼尔为了避免被包围，不得不放弃在科孚岛的基地，把威尼斯舰队开往西面的墨西拿，改在那里等待西班牙舰队。威尼斯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屏障；消息一天天变得更糟糕。7月底，经验丰富的海盗乌卢奇·阿里和卡拉·霍加（绰号“黑神父”，因为他是个被逐出教门的意大利修士）几乎一直打到了威尼斯城下。他们的舰船已经进入了肉眼可以看见威尼斯城的距离。卡拉·霍加率领的一支奥斯曼分舰队对圣马可盆地进行了短期的封锁。威尼斯城在一片恐慌中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他们在城市周围的小岛上构建了工事，架起了大炮。奥斯曼帝国的新月确实已经近在咫尺。

在遥远的法马古斯塔，攻城战进入了最后一幕。拉拉·穆斯塔法的劝降遭到了激烈抵制。布拉加丁自己也万分痛苦：“你们肯定知道，我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不准投降，否则就要被处死。”“原谅我，”他呼喊道，“我不能这么做。”^[16]巴廖尼竭力劝说他；同时土耳其人发动了两次惩罚性的进攻，布拉加丁才回心转意。到7月31日，法马古斯塔城已经奄奄一息。最后的一些猫也被吃掉了；意大利人中只有900人还活着，其中400人是伤员。幸存者无不精疲力竭、神经饱受炮击的折磨，而且饥肠辘辘。城里的很多美丽建筑都成了瓦砾堆。法马古斯塔市民为他们的忠诚付出了惨重代价。海平线上没有救援船只的影子。巴廖尼向布拉加丁保证说：“我们在城防中已经竭尽全力，无论如何都不算失败……我凭绅士的荣誉起誓，城市已经陷落。敌人再发动一次进攻的时候，我们将无力抵挡，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已经所剩无几，而是因为火药严重不足，只剩五桶半。”^[17]法马古斯塔遭到了长达68天的炮击，迫使奥斯曼帝国消耗了15万发炮弹，伤亡和患病的奥斯曼士兵多达约6万人。布拉加丁终于放弃了。8月1日，在城墙下的互相连通的地道内，威尼斯坑道工兵向土耳其工兵递交了一封给帕夏的信。城墙上也升起了白旗。

拉拉·穆斯塔法慷慨的投降条件说明，守军给土耳其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赢得了后者的尊敬。所有意大利人都被允许军旗招展地离开塞浦路斯岛，奥斯曼帝国的船只将运载他们安全前往克里特。希腊平民如果希望离开，可以自由离去；如果愿意留下，将享受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意大利人想把他们的全部火炮都带走，但穆斯塔法只准他们带走5门。关于投降的条件，不同文献有一个很小的差别，但这却是个很重要的差别。所有威尼斯方面的文献都认可，除了若干不重要的细节外，以上就是穆斯塔法同意的给予安全通行的条件。但后来穆斯塔法帕夏向史学家阿里·埃芬迪（他也参加了这场战役）讲述了他自己的版本。根据穆斯塔法的说法，安全通行还有一个条件：威尼斯人还扣押了50名奎里尼在1月份俘虏的朝圣者，双方同意，这些朝圣者应当被交还给土耳其人。由于对投降条件的分歧，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8月5日，威尼斯人开始登上土耳其船只。“一直到此时，土耳其人和我们剩余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友好，互相没有猜忌，因为他们在言辞和行为上都对我们以礼相待，”^[18]涅斯托尔·马丁嫩戈如此写道，尽管在此时，奥斯曼士兵已经违反了约定，进入城市，开始抢劫。士兵们先前已经得到了丰厚战利品的许诺，现在想约束他们或许已经很困难。

晚祷时分，装船工作基本完成，布拉加丁将城门钥匙送交拉拉·穆斯塔法。这位骄傲的威尼斯贵族是在盛大的排场中离开法马古斯塔的，有人说他更像是胜利者，而不是败军之将。他身着鲜红色长袍，在号手引领下庄严地缓步前行。他的头顶上遮盖着鲜红色的华盖，以象征他的职位。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巴廖尼和其他指挥官，以及一支贴身卫队，一共大约300人。他们昂首挺胸，在奥斯曼军中前进。奥斯曼人虽然对他们大加嘲讽，但还是将他们隆重地安全引领到穆斯塔法的营帐。指挥官们把佩剑留在门槛处，走进营帐。穆斯塔法从椅子上起身，以手势示意他们在覆盖着鲜红色天鹅绒的凳子上坐下。他们按照礼仪亲吻了帕夏的手，布拉加丁开始正式宣读投降书：“有鉴于上帝已经决定，这个王国将归属最光荣伟大的苏丹，我特此呈上城门钥匙，按照我们已经缔结的协议，正式投降。”^[19]就在这个威尼斯人特别脆弱的时刻，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双方约定的有条件投降完全取决于互信。不知是由于布拉加丁显而易见的傲慢，还是他先前对穆斯塔法的嘲讽，或是帕夏对威尼斯人的无谓抵抗导致他损失了至少6万人而愤怒，或者还是因为他需要向部下解释为什么事先许诺的战利品都没戏了，或许是因为人质被杀而义愤填膺，他是当场发作还是事先预谋，我们都无从得知。但布拉加丁询问是否可以自由离去时，双方大吵起来。

根据奥斯曼帝国方面的记载，争吵的开端是，穆斯塔法要求一名威尼斯贵族留下作为人质，以保障土耳其船只能够从威尼斯治下的克里特

安全返回。布拉加丁愤怒地咒骂他：“一个贵族都不给你，一条狗都不给你！”^[20]穆斯塔法发了火，询问被扣作人质的朝圣者现在何处。根据阿里·埃芬迪的记载，布拉加丁承认，在签订和约之后，他们对人质进行了拷打，然后把他们处决了：“我本人没有权力控制那些穆斯林俘虏。投降那天，威尼斯人和当地人的酋长把他们杀死了。我把在我那里的俘虏也处决了。”

“那么，”帕夏说道，“你们违背了和约。”^[21]

还有其他事情火上浇油：守军销毁了大量棉花和弹药，这些如今拿不到手的战利品或许是帕夏的不满的潜台词，布拉加丁言语和行为的傲慢也让征服者无法忍受。

威尼斯人的记载却不是这样。按照他们的说法，奎里尼在1月就已经把大部分穆斯林俘虏带走了；只有6名俘虏被留下，而且都逃跑了，或者说，布拉加丁对这些人的命运并不知情。“我难道不知道，”穆斯塔法愤怒地回答，“你把他们都杀害了吗？”他愤怒地在营帐内踱来踱去，把满腔怒火都一股脑发泄了出来：“告诉我，你这恶狗，你们根本没有力量守城，为什么还要死撑着？你们为什么不在一个月前就投降，而让我损失了8万精兵？”^[22]他要求留下1名人质，以保证他的船只能够从克里特安全返回。布拉加丁回答，和约里没有这样的条款。“把他们捆起来！”^[23]帕夏喊道。

一瞬间，威尼斯人被推推搡搡地押出营帐，准备接受死刑。刽子手们大步走上前，强迫布拉加丁把脖子伸长两三次。这时拉拉·穆斯塔法有了个新主意。他决定先把布拉加丁留着，只是命令把他的耳朵和鼻子砍掉。这是对普通罪犯的处罚。巴廖尼抗议说，帕夏违背了诺言；他和其他指挥官被处决在营帐前。根据威尼斯人的记载，穆斯塔法随后把巴廖尼的头颅展示给全军将士：“看看法马古斯塔伟大捍卫者的脑袋吧，就是他摧毁了我大军的一半，给我造成这么大麻烦。”^[24]华丽的营帐前

堆积了350颗头颅。

布拉加丁的结局来得缓慢又痛苦。他被一直留到8月17日（星期五）。他头部的伤口已经化脓，伤痛让他神志不清。在祈祷后，他被押着在全城游街，周围锣鼓喧天，陪伴他的只有忠心耿耿的仆人安德烈亚，他为了侍奉主人到最后一刻，接受了改信伊斯兰教。土耳其人还记得布拉加丁先前对帕夏的嘲讽，于是强迫他背着装满泥土的麻袋沿着城墙走，每次经过帕夏身边时都亲吻地面。土耳其人挖苦地劝他改信伊斯兰教。威尼斯的圣徒传记家记录了布拉加丁圣人一般的回答：“我是基督徒，无论生死，都是基督徒。我希望我的灵魂会得救。我的身体属于你们，随便你们怎么折磨它吧。”^[25]传记家可能夸大了恐怖效果，以打动读者，但布拉加丁遭受了残酷折磨这一点是无疑的。这是仪式性的羞辱。半死不活的布拉加丁被捆在一把椅子上，一直升到一艘桨帆船的桅杆上，然后又浸到海里，整个舰队都在观看和嘲讽他：“看看你们的舰队来了没有；看啊，伟大的基督徒，看看援军来救法马古斯塔了吗？”^[26]然后他被押到圣尼古拉教堂（现在被改为清真寺）旁边的广场上，剥去衣服。最终结果他性命的刽子手是个犹太人，威尼斯方面永远不会原谅这一点。布拉加丁被捆在一根来自萨拉米斯的古代石柱（它被保存至今）上，被活活地剥去皮肤。刽子手剥到他的腰部时，他已经断了气。

土耳其人在他的皮里塞上稻草，然后给它穿上总司令的鲜红色长袍，打起红色华盖，放到一头母牛背上，游街示众。后来这个可怕的假人被送到黎凡特^[27]海岸各地示众，最后被送到伊斯坦布尔，献给塞利姆二世。

这出残酷的戏剧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鼓掌支持。据说索科卢大为震惊。或许他明白，这种暴行就像圣艾尔摩堡大屠杀一样，只会让敌人斗志更坚定。或者他看出了拉拉·穆斯塔法这么做的深

层动机。拉拉·穆斯塔法用刽子手的屠刀彻底打破了他的竞争对手用和平手段劝降的企图；索科卢的外交使阻止威尼斯共和国与西班牙结盟成为必要。所有这些现在可能都无法实现了。布拉加丁给了威尼斯人一位烈士，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他没有白死：奥斯曼帝国在法马古斯塔花费了太多时间，损失也太大，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和威尼斯的战争。用布拉加丁的皮肤做成的假人现在悬挂在一艘土耳其桨帆船的桁端，它还有新的角色要扮演。

[1] Parker, Geoffrey,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London, 1998, p.72

[2] 土耳其南部的一个行省，其首府也叫卡拉曼。

[3]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61

[4]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156

[5] Petrie, Sir Charles, *Don Juan of Austria*, London, 1967, p.135

[6]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208

[7]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p.310-1

[8]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311

[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21

[10] 指天主教的一种模仿耶稣受难过程的宗教活动，也称之为“拜苦路”，主要进行于四旬期间。

[11]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356

[12] 安托万·佩勒诺·德·格朗韦勒（1517～1586），出身于勃艮第贵族家庭，其

父曾担任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首相。他本人也是帝国最重要的大臣和外交家之一，对当时的欧洲政治影响极大。同时他是个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与提香等艺术大师过从甚密。

[13]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24

[14]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359

[15] 三地今皆属黑山共和国。其中，安蒂瓦里今称“巴尔”。

[16]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34

[17]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34

[18]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38

[1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39

[20]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346

[21] Gazioğlu, Ahmet C., *The Turks in Cyprus: 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 London, 1990, p.65

[22] Hill, Sir George, *A History of Cyprus, volume III: The Frankish period, 1432-1571*, Cambridge, 1972, p.1029

[23]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40

[2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30

[25]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42

[26]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32

[27]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其指代并不精确。它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Levant）一字即“东方”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黎凡特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将印度洋的香料等货物运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从黎凡特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

19.着魔的毒蛇

1571年8月22日～10月7日

8月22日，堂胡安抵达墨西拿，此时基督教舰队还不知晓法马古斯塔的最终命运。在墨西拿，堂胡安再次受到隆重欢迎和盛情款待。堂胡安登陆后走到一座饰有纹章的凯旋拱门下，墨西拿人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向他呈礼物——一匹配有银鞍具的骏马。房屋都悬挂了旗帜、欢庆文字条幅和基督得胜的图像。夜间，全城灯火通明。基督教地中海的全部力量似乎都聚集在了这里。200艘战船在港口锚地随波轻摇；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士兵在狭窄街道上摩肩接踵；还有成千上万的桨手被锁在船上休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将领们齐聚一堂，为基督之名战斗，这对庇护五世来说是个特别的胜利：罗姆加和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也加入了远征队伍；此外还有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教皇国桨帆船舰队的科隆纳、经验丰富的西班牙海军将领巴桑、曾援救马耳他的独眼阿斯卡尼奥、脾气火爆的威尼斯人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前一年袭扰塞浦路斯并给土耳其人带来很大麻烦的马尔科·奎里尼，以及来自克里特和亚得里亚海的部队。这是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一般的国际盛会，也是对基督教世界决心的考验。“感谢上帝，我们都到了，”科隆纳写道，“我们每个人的价值都将得到检验。”^[1]

在这个基督教世界精诚团结的华丽表面之下，各方其实仍然在气势汹汹地互相争吵，各自心怀鬼胎。在整个海岸地区，意大利和西班牙士兵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士兵们在那不勒斯大街上发生械斗，在墨西拿又打得不可开交，有士兵因此丧生。为了恢复秩序，军官们不得不绞死几个士兵作为替罪羊。指挥官们互相嫉妒和猜忌。威尼斯人嘲笑多里亚“形似海盗”，对他恨之入骨。暴躁易怒的威尼斯指挥官韦尼尔对一次又一次耽搁非常不耐烦，暴跳如雷。他怀疑西班牙人不肯积极应战，因

此不大愿意听从堂胡安调遣。所有人都不信任威尼斯人，后者带来了大量舰船，兵员却很少。圣约翰骑士团几乎是威尼斯不共戴天的死敌，尤其是最近有一名骑士由于伪造威尼斯货币而被处决，更增强了他们对威尼斯的忌恨。同时，很多士兵由于军饷不足而满腹怨言。总而言之，普雷韦扎战役、救援马耳他行动和前一年命途多舛的援救塞浦路斯行动中曾经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摩擦在1571年的远征中再次浮现。奥斯曼帝国方面推测基督教的事业会像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上演的那样失败，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这个推测错误，风险将会很大；因此伊斯坦布尔方面也相当焦虑。

在号角齐鸣和庆祝活动背后，8月底的关键问题其实很简单：是否冒险与敌交战。适合航海的季节已经快结束了，敌人势力很猖獗。众将分歧严重。有些人急于证明自己，比如科隆纳仍在为前一年的失败而愤愤不平；韦尼尔和威尼斯人急于开战；而且西班牙海军将领巴桑也富有进取精神。亲王本人肩负着教皇的重大期望。在教皇授予的所有礼物和为他举办的庆祝活动中，有一件礼物最有分量。庇护五世派遣潘纳主教作为他的特别使节前往墨西拿，向堂胡安许诺，如果他能取胜，他将得到一顶属于自己的王冠。但在另一方面，西班牙人的主流意见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多里亚接到了国王的御旨，不得拿西班牙舰队冒险；雷克森斯受命对堂胡安进行限制；承担了远征大部分费用的腓力二世的谨慎思维也在背后施加着影响。

各方面都向堂胡安提出自己的意见，试图说服他，其中有些意见特别有帮助。阿尔瓦公爵^[2]从遥远的佛兰德写来书信，敦促他好好管理部下：“阁下在士兵面前应当永远以欢欣的面貌示人，因为众所周知，士兵们对此非常重视；阁下还应当轮流表扬各国的队伍。特别重要的是，要让士兵们知道，阁下特别重视军饷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时候要及时发饷；如果条件不允许，也要发布命令，在出海时向士兵发放足额的口粮，并保证给养的高质量，并让士兵们明白，这是由于阁下的命令和勤

奋工作才办成的。如果不能办成，要让士兵们知道，阁下对此深感遗憾，并惩戒责任人。”^[3]堂胡安严格遵循了这条建议，逐渐成熟起来。8月3日，在拉斯佩齐亚，由于军饷未能及时发放，发生了军队哗变，他亲自出马，许诺将发放军饷，平息了事端。同时，西班牙人也努力抑制他们的年轻统帅的满腔热情。甚至堂加西亚·德·托莱多（他在马耳他战役后退休）也有建议给他。

年迈的堂加西亚正在200英里之外的比萨附近的温泉治疗自己的痛风病。他是地中海战史的活字典。查理五世于1535年在突尼斯取胜时，他就在这场；八年后，他目睹了查理五世的舰队在阿尔及尔覆灭；后来他又援救了马耳他。最重要的是，他还记得1538年普雷韦扎战役（那是三十年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交锋，当时巴巴罗萨挫败了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教训。他给年轻的堂胡安写了很多信，提了很多谨慎的建议。他理解海战的风险、海军联盟的问题以及土耳其人目前在海上享有的物质和心理上的优势：“如果我是全军统帅，在缺少来自佛兰德的8000名或是9000名有经验士兵的情况下，我是不愿意拿国王陛下的舰队冒险的，因为一旦失败——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样的灾难——后果将不堪设想，任何胜利都无法弥补。同时切记，我们的舰队属于不同的主人，有时对某位主人有益的事情对其他人并没有好处。而敌人的舰队只有一个主人，上下一心，目标一致且忠心不二，曾在普雷韦扎战斗的人都理解这种团结一致的价值。在心理方面，土耳其人占了威尼斯人的上风；我相信，甚至对我们，土耳其人也有心理上的优势。”^[4]

西班牙人如此谨慎是因为，在此前的五十年中，西班牙在海上连续遭到了多次失败。普雷韦扎和杰尔巴岛的教训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思维。堂加西亚一再强调，务必小心谨慎。“为了上帝的爱，”堂加西亚又写信给雷克森斯，“仔细斟酌，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大业，如果出错，将会带来多么可怕的损害，”然后又强调关于西班牙策略的复杂秘密，“由于诸多有力的理由，最好不要让威尼斯人知道，避免交锋是多么有利于国

王陛下的利益，以及为什么会如此。我请您将此信读给堂胡安听，然后立即销毁。”^[5]西班牙朝廷已经下定决心，为了保住天主教国王的颜面，必须出征；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此次远征必须失败。

但从堂胡安向堂加西亚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上看，他个人的倾向已经非常清楚。他询问这位老将，如果他要作战，应当如何组织舰队？如何使用火炮？在何时下令开火？堂加西亚的建议（其中有些没能及时送抵堂胡安处）非常具体，都是从他积累了半个世纪的海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两军正面对抗的海战是非常罕见的，而且都没有目前筹划的规模那么庞大，但是少数几个这样的战例是很有启发性的。他建议堂胡安从以往的战例中吸取教训：“您应当特别注意，切勿将所有舰船组成一个编队，因为数量如此庞大的舰队肯定会陷入混乱，导致有些舰船阻挡其他舰船，就像普雷韦扎战役中那样。您必须将舰队分成三个编队，两翼应当部署您最信任和得力的桨帆船，翼端应有特别优秀的船长指挥，并确保各个编队之间保留足够的空间，好让舰船转弯和活动，而不至于阻碍其他分队的行动。巴巴罗萨在普雷韦扎就是这样调遣的。”^[6]

这些建议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何时开火，堂加西亚的建议具体到了可怕的程度，鲜明地体现出了当时海战的残酷现实。射击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每一炮都必须发挥效力：“在现实中，要想进行两轮射击而不造成巨大混乱，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像骑兵一样向敌人猛冲，在极近的距离用火绳枪射击，要近到能够让敌人的鲜血喷到你身上……我常听精明强干的船长们说，船首冲角折断（即与敌舰碰撞）的声音和炮声应当是同时的，或者尽可能接近。”^[7]他提倡的是抵近射击。

9月初，舰船继续集结，堂胡安决定召开一次作战会议，以决定行动计划。让所有高级军官都参加会议显然是明智之举；考虑到各派别的钩心斗角，堂胡安决定光明正大地行事。9月10日，七十名高级军官聚

集在“国王”号上，参加了这场决定命运的会议。堂胡安提出了两个方案：寻找敌人与之交战；或者按照堂加西亚的建议，“不去主动求战，而是让敌人来找我们，并抓住每一次机遇迫使敌人这么做”^[8]。毫不奇怪，大家又产生了分歧。教皇国舰队和威尼斯人主张立即进攻；多里亚和西班牙舰队主张小心谨慎。堂胡安直言不讳地宣布，他打算发动进攻，决战决胜；这个提议在投票中得到一致通过。

事后看来，虽然腓力二世努力束缚舰队的主动性，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基督徒成功地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现在返航将会是不可承受的耻辱。堂胡安还宣示众人，如果西班牙舰队不肯参战，他将率领教皇国和威尼斯舰队单独行动。前一年战败的刺激、教皇在宗教方面的巨大期待、欢呼的群众、招展的旗帜和庆祝活动、堂胡安闯劲十足的宣示，都推动了远征继续进行，正如当时的一位观察者所说，“就像毒蛇被魔咒迷住一样”^[9]。在其他人的无声压力下，多里亚和雷克森斯也投票主张积极行动。“并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同意作战，但都因为畏惧耻辱而被迫做出了这样的选择，”^[10]萨伏依^[11]桨帆船舰队的司令官如此写道。

多里亚仍然记着腓力二世的御旨，希望能够避免作战。会议决定，抵达科孚岛后再确定最终的目标。现在还有时间来阻止寻求交战的冲动，但舰队在墨西拿以东继续前进，使得堂胡安的决策越来越难推翻。

大军群情激昂。官兵们蜂拥来到教堂，接受圣餐；教皇使节祝福了远征舰队。9月16日清晨，堂胡安匆匆写了一封给堂加西亚的最后的信，内容让这位老人收到信后在蒸气浴中也会打寒战。堂胡安宣布，他将出航追击敌人。“尽管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敌人舰队的规模比联盟舰队大，”他写道，“但舰船和兵员质量上并不比我军优秀。我信任天父上帝，因为我们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我已决定出击，寻找敌人。今晚我将出发——愿上帝为此欢悦——前往科孚岛，然后从那里出发，驶往

敌人舰队的所在地。我拥有208艘桨帆船、2.6万士兵、6艘加莱赛战船和24艘其他类型船只。我坚信，如果我们能遇到敌人，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胜利。”^[12]身着红袍的教皇使节站在墨西拿的防波堤上，祝福了旌旗招展的庞大舰队。大小舰船驶过防波堤，进入外海。

舰队沿着意大利海岸航行的时候，关于奥斯曼舰队的问题显得愈发紧急。敌人究竟在哪里，状况又如何？敌人有多少船只？意图是什么？可靠的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堂胡安派遣马耳他骑士希尔·德·安德拉达率领4艘快速桨帆船作为前驱和侦察部队，搜集情报。三天后，安德拉达带回了令人担忧的消息：土耳其人进攻了科孚岛，然后又返回了普雷韦扎。大家担心，奥斯曼舰队或许正在分散，准备过冬。那天夜里，整个舰队的全体官兵扫视着夜空和黑暗的大海，目睹了一个天体现象，士气大振。一颗极其耀眼的流星划过夜空，爆炸分裂为三团烈火，拖出长长的轨迹。大家认为这是个吉兆。但是随后天气恶劣起来；一连几天，舰队在暴风骤雨中艰难行进，风雨遮蔽了海平线，令舰船举步维艰。

安德拉达的情报是部分正确的。土耳其舰队在一场极其成功的战役后撤出了亚得里亚海。他们占领了一些重要的堡垒，夺得大批战利品。他们劫掠科孚岛达十一天，但在神圣联盟离开墨西拿的时候撤退了，转向南方，前往位于勒班陀（位于科林斯湾入口处）的基地，在那里观察战局，并等待伊斯坦布尔的命令。

这是一个长得超乎寻常的作战季节。阿里帕夏的舰队自3月起就一直在海上；桨帆船的船体现在沾满了海草，需要清洗；船员们也很疲惫。在亚得里亚海的劫掠虽然取得了戏剧性的成功，但也让舰队精疲力竭。大家普遍感到，现在季节已过，时间已经太晚，不适合任何大规模海上行动。在船上一连待了几个月的士兵们要求离舰上岸，或者干脆逃走，加入了艾哈迈德帕夏的陆军部队。另外，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家都坚信基督教舰队会因为内部纷争而自行解体，或者撤退过冬。

土耳其人也在做他们自己的情报搜集工作，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个辉煌的成功，尽管基督徒对此还一无所知。9月初的一天夜里，基督教舰队正停泊在墨西拿港口，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麾下的教皇国舰船全都覆盖了黑布，以哀悼科隆纳女儿的去世。一艘黑色桨帆船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停泊的舰船中间的航道上驶过，钻来钻去。这艘船属于一位出身意大利的海盗卡拉·霍加，他正在清点敌人舰船的数量。他还带回了堂胡安的作战计划，那可能是从间谍手中获得的，也有可能是从大量印发的大开本公报上获得的。他完全知晓基督徒计划如何组织舰队，以及开往科孚岛的意图，尽管他还不清楚，基督徒抵达科孚岛之后打算干什么。

但问题在于，卡拉·霍加数错了。他错过了停在内港的整整一支威尼斯桨帆船分队，共60艘。因此他数出来的总数只有140艘。堂胡安实际上拥有208艘战船。阿里看到基督教舰队虽然数量处于劣势但仍然准备进攻，十分困惑，但还是派遣快速三桅船将消息送到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堂胡安在细雨中看到了科孚岛的群山，也听到了同样不可靠的情报。一些通过战俘交换从敌人舰队返回的威尼斯人声称，土耳其人拥有160艘桨帆船，而缺少士兵；另外乌卢奇·阿里已经离开了舰队。事实上，土耳其人有约300艘战船，乌卢奇·阿里离开是为了把战利品送到莫东，现在已经返回了。几天后，在舰队主力前方侦察的希尔·德·安德拉达询问了一些希腊渔民，他们似乎证实，敌人的兵力的确有所削弱。渔民们向安德拉达保证，基督徒必胜无疑。这些希腊人刚刚把同样的乐观消息告诉阿里帕夏的探子。双方都低估了对方的实力。情报的失误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到9月27日，基督教舰队已经在科孚岛港口下锚。现在是做最后决断的时候了：寻找敌人交战，还是暂停行动。威尼斯人看到他们的科孚岛的惨状，心情更加阴沉。奥斯曼帝国陆军的某些部队因为不能攻克敌人的要塞，又为漫长的作战而恼火，进行了放纵的施暴，并亵渎破坏了

基督教神龛，这让意大利人的圣战热情高涨起来。多里亚和一些西班牙军官再次告诫堂胡安不要冒险，何况作战季节已经太晚了。他们建议劫掠阿尔巴尼亚海岸，以挽回颜面，然后撤军过冬。但堂胡安和威尼斯人岿然不动，坚持要寻找敌人舰队。

次日，在遥远的马德里，腓力二世写了一封信给堂胡安，命令他在西西里过冬，来年再战。而在罗马，教皇在通过祈祷敦促堂胡安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教皇每周斋戒三次，每天花很多时间祈祷，”^[13]西班牙红衣主教苏尼加写道。9月29日，安德拉达的侦察兵报告称，整个奥斯曼舰队都在勒班陀。在希腊西南角外海，克里特的威尼斯总督派出的一艘快速三桅船正携带着法马古斯塔陷落的噩耗匆匆北上。

10月初，神圣联盟舰队抵达了希腊海岸的伊古迈尼察。堂胡安对舰队作了最后一次检阅。桨帆船被拆去了非必需的设备，准备作战，并进行了精确的调动。每名船长都完全掌握了作战计划。堂胡安在舰队中穿过，仔细地查看舰船的状况。他经过的时候，士兵们鸣枪敬礼。礼节性的鸣枪其实也挺危险：自舰队离开墨西哥以来，已有二十人被误击身亡。

与此同时，阿里帕夏收到了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一连串命令。从前线指挥官到帝国中心有十五至二十天的路程，但从奥斯曼帝国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塞利姆二世，或者说是索科卢，正试图对战役的指挥施加控制。从帝都发来的一连串命令对舰队调动、粮食供应和部队集结都做了指示。索科卢和塞利姆二世显然认识到，舰队已经筋疲力尽，人力补充也很成问题。但8月19日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若敌人舰队出现，你和乌卢奇·阿里应当互相配合，与敌交锋，凭借你们的全部勇气和智慧战胜敌人。”^[14]另一道在战役结束后才发出的命令甚至更加坚决：“现在我命令，你在获得可靠敌情后，应当进攻异教徒舰队，完全信任安拉和他的先知。”^[15]索科卢和他的主子，究竟谁应当为这些不寻常的命令负

责，已经不可能说清楚。这些命令完全束缚了前线将领的手脚，让他没有随机应变的空间。甚至连苏莱曼发给身处马耳他的穆斯塔法的那些电闪雷鸣般的命令也不会对作战的细节加以规定。或许苏丹和他的维齐尔不相信基督徒会冒险求战，或者他们认为基督徒的斗志会瓦解；或者苏丹受到最终征服塞浦路斯的鼓舞和圣战热情的刺激，过于自信。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命令阿里帕夏与敌交战。

到9月底，阿里抵达了勒班陀，这是一个设防要塞，土耳其人称之为伊尼巴图，位于普雷韦扎以南仅50英里处，地理位置和普雷韦扎很相似。当年巴巴罗萨以普雷韦扎为基地，打败了多里亚。和在普雷韦扎的巴巴罗萨一样，阿里帕夏的阵地几乎无懈可击。勒班陀是个防御工事固若金汤、周围有坚固城墙的港口，位于科林斯湾入口处。海峡入口的两侧都有岸炮把守；用奥斯曼帝国航海家皮里雷斯的话说，一只鸟也没法从海峡飞过。无论如何，由于风向的缘故，从外界直接攻击港内的舰队将难于上青天。阿里可以安坐在港内，等待敌人在外海耗尽力量的，然后随意发动进攻，或者根本不与敌人交手。他有急迫的理由避免交战：他的舰船需要修理；很多骑兵相信作战季节已经结束，于是各自回家了。很难相信敌人居然会在10月初冒险进攻；另外，所有俘虏都说，基督教军队内部分歧严重。阿里打算静观其变。

10月2日下午4时，基督教舰队里被压抑下去的紧张情绪突然间爆发了出来。此时，舰队位于希腊本土的伊古迈尼察（与科孚岛隔海相望），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宿怨激发了。由于威尼斯桨帆船舰队缺少兵员，司令官韦尼尔在别人的劝说下满心不乐意地允许西班牙士兵登上他的舰船。从一开始，两个民族的士兵间就产生了冲突。“这些人他们的饼干被运送上船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困难，还不得不忍受这些士兵的很多傲慢言行”^[16]，韦尼尔在后来的自我辩护中写道。10月2日早上，作为战备状况检查的一部分，多里亚被派去视察威尼斯桨帆船舰队。脾气火爆的韦尼尔直截了当地不允许备受威尼斯人憎恨的热那亚人

The top map, titled "COLFO DI LEPANTO", is a detailed historical map of the Gulf of Lepanto. It shows the coastline of the Gulf, with several islands and cities labeled. The islands of Lefkada, Velezia, and Paxos are prominent. The city of Lepanto is shown on the northern shore, and the city of Velezia is on the eastern shore. The map also shows the city of Paxos on the southern shore. The Gulf is filled with numerous small sailing ships, indicating a busy maritime area. The map is oriented with North at the top.

The bottom map, titled "PARTE DI LIVA D'IA", is another historical map of the Gulf of Lepanto. It shows the Gulf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highlighting the islands of Lefkada, Paxos, and Antipaxos. The city of Lepanto is shown on the northern shore, and the city of Paxos is on the southern shore. The map also shows the city of Antipaxos on the southern shore. The Gulf is filled with numerous small sailing ships, indicating a busy maritime area. The map is oriented with North at the top.

韦尼尔还在因为和多里亚的会面而怒气冲冲，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4名士兵和他的宪兵指挥官登上那艘战船，逮捕闹事的人。这次哗变的领导者穆西奥·阿尔提克齐上尉用火绳枪火力来迎接前来逮捕他的人。宪兵指挥官胸部被子弹击穿；两名士兵被丢进大海。韦尼尔暴跳如雷。

韦尼尔还在因为和多里亚的会面而怒气冲冲，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4名士兵和他的宪兵指挥官登上那艘战船，逮捕闹事的人。这次哗变的领导者穆西奥·阿尔提克齐上尉用火绳枪火力来迎接前来逮捕他的人。宪兵指挥官胸部被子弹击穿；两名士兵被丢进大海。韦尼尔暴跳如

雷，命令其他战船接近“罗希姆诺战士”号，准备把它轰成碎片。一艘西班牙战船提出愿意干预，这让他狂怒起来。“凭基督圣血起誓，”老人咆哮道，“少管闲事，除非你想要我把你的桨帆船打沉，让你的士兵全都淹死。不要你的帮忙，我也能管教好这些野狗。”^[17]

他命令一队火绳枪兵登上“罗希姆诺战士”号，逮捕元凶，并将其押送到他的船上。然后他命令将阿尔提克齐和另外三人绞死在桅杆上。这时，那艘西班牙战船的船长已经把情况报告给了堂胡安，他现在可以看见四具尸体挂在韦尼尔的旗舰桅杆上。堂胡安对韦尼尔未经许可擅自处决西班牙军人非常恼火。他威胁说要当场把韦尼尔绞死。多里亚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建议返回墨西哥，丢下这些威尼斯人。威尼斯和西班牙的桨帆船都给大炮装填了火药，炮手手执引火烛，随时准备轰击对方。两支桨帆船舰队紧张地僵持对峙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大家的怒火都逐渐平息，恢复了理智。堂胡安宣布，他再也不跟韦尼尔打交道；从此以后，他只通过韦尼尔的副手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与威尼斯人交流。这个事件险些让整个远征垮台，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奥斯曼帝国高层耳边。俘虏向阿里和佩尔特夫报告称，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险些对掐起来，这让土耳其人更加相信，数量占劣势而且内部矛盾重重的基督教舰队不会作战。他们更有可能对阿尔巴尼亚海岸象征性地劫掠一番，然后撤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布拉加丁的阴灵再次登台。冷静下来之后，神圣联盟舰队沿着希腊海岸继续南下。在比安科角，堂胡安命令对作战队形进行排演；各编队排好阵势，正面宽达5英里。每个编队的旗帜颜色不同。10月4日，他们抵达了凯法利尼亚岛，在那里发现一艘孤零零的三桅船从南方抢风改变航向。那是从克里特出发、传递法马古斯塔陷落消息的船。令人震惊的消息对整个舰队产生了突然而极具感染力的影响。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为威尼斯报仇雪恨的欲望上，矛盾立即平息了。当然，其实整个远征的目标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因为既然法马古斯塔已经无法援救，那么行动的表面目的就没了。堂胡安在“国王”号上

又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西班牙人再次恳求取消毫无意义的行动，但现在已经太晚了。威尼斯指挥官们高声疾呼，要求报仇雪恨。猛冲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了。舰队在暴风骤雨中继续前进。到10月6日晚上，舰队驶往帕特雷湾入口处的库尔佐拉里斯诸岛，目的是引诱土耳其人出来交锋。

在40英里之外的勒班陀城堡，土耳其人在召开最后的作战会议。所有的关键指挥官都在场：阿里帕夏、佩尔特夫帕夏、经验丰富的海盗乌卢奇·阿里和卡拉·霍加、巴巴罗萨的两个儿子（穆罕默德和哈桑），以及亚历山大港总督舒鲁奇·穆罕默德。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基督徒在墨西拿和科孚岛的会议如出一辙：打还是不打？而且也同样混杂着小心谨慎和大胆冒险的因素。刚从又一次侦察行动中返回的卡拉·霍加宣称，基督徒最多有150艘桨帆船。但有紧迫的原因敦促土耳其人不要冒险求战：季节已经太晚了；士兵们非常疲惫，很多人已经开了小差；而且他们在勒班陀的位置易守难攻。

关于会上众将的观点，说法不一，但佩尔特夫帕夏似乎是主张谨慎一派的代表。他是个“天性悲观”^[18]的人，当众指出，有些船只缺少船员。几乎可以肯定，乌卢奇·阿里也主张小心为上。这个饱经风霜的老海盗手上伤痕累累，那是他的划桨奴隶某次暴动给他留下的纪念。他是会议室里经验最丰富的航海家，时年五十二岁，曾在图尔古特身边学习海战。他非常勇敢和残酷，令基督徒心惊胆寒。前一年，他狠揍了马耳他骑士团^[19]的桨帆船舰队一把，让他们羞愧难当。就像所有掌握了生存艺术的海盗一样，他评估风险时也非常小心。乌卢奇不大可能投票主张作战。他们的论据是非常清楚的：“缺少兵员是个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最好留在勒班陀港，只有在异教徒主动上门的时候才和他们交战。”^[20]其他人，比如哈桑帕夏则主张积极作战，理由是基督徒内部矛盾重重，而且数量上处于劣势。

阿里帕夏用虚张声势的言辞作了最终裁决。“我们每艘船缺少5到10个桨手，那又有什么关系？”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如果上天的真主意愿如此，我们就会毫发无损。”但他如此慷慨陈词，也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命令让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根据史学家波切维的记载，阿里随后说道：“我不断收到伊斯坦布尔的威胁命令，我为自己的地位和生命担忧。”^[21]听了这话，其他指挥官没办法再反对他了。最后，大家决定离开锚地，主动迎战。于是他们各自去准备船只。



乌卢奇·阿里

10月6日黄昏时，天气转晴。当晚天气非常晴好。“上帝给了我们晴朗的天空和平静的大海，在春季天气最好时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天空和大

海，”^[22]基督徒们回忆道。第二天，即10月7日（星期天）的凌晨2点，他们的舰队正驶向帕特雷湾。在勒班陀港内，船锚的铁链被叮当作响地收起；奥斯曼帝国战船一艘艘地穿过海湾入口，离开了岸基大炮的保护。

^[1]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377

^[2] 指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阿尔瓦三世公爵（1507～1582），西班牙贵族、军人和政治家。他是国王腓力二世最信任的将领。他曾随查理五世参加意大利战争，战功卓著。1567年，他被任命为尼德兰总督，镇压尼德兰独立运动。阿尔瓦在尼德兰实行恐怖政策，他的血腥统治反而加剧了尼德兰人的反抗，以致腓力二世不得不于1573年将他召回。

^[3]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 Madrid, 1843, p.275

^[4]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 Madrid, 1843, p.8

^[5]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211

^[6]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 Madrid, 1843, pp.13-14

^[7]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 Madrid, 1843, p.25

^[8]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215

^[9]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224

^[10]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239

[11]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当时萨伏依公国也是神圣联盟的成员国。

[12]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385

[13]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224

[14]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80

[15] 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Istanbul, 1993, pp.188-9

[16]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235

[17]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p.137

[18]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350

[19] 即圣约翰医院骑士团。

[20]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350

[21]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350

[22]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247

20.“决一死战！”

1571年10月7日黎明至中午

黎明。东风。一个晴朗的秋日。

基督教舰队位于库尔佐拉里斯群岛附近，这是一系列很小的岛屿，守卫着帕特雷湾和通往勒班陀的海峡的北面。堂胡安派遣侦察兵上岸，登上山峰，在晨光中窥探前方的海域。与此同时，打头阵那艘船的瞭望哨发现东方海平线上出现了船帆。开始是两叶船帆，然后是四叶，再后是六叶。很快，他们就看见了一支“如同森林一般”^[1]的庞大舰队，从海平线上滚滚席卷而来。目前还不能判断敌人舰船的数量。堂胡安发出了作战信号：升起了一面绿旗，鸣响了号炮。他麾下的战船一艘艘在小岛群中驶过，冲进海湾，欢呼声在整个舰队回响。

破晓时分，阿里帕夏的舰队还在基督教舰队的15英里之外，他能看见对方舰船在岛群中穿过。太阳在他背后升起，风向对他有利，舰船行驶很轻松。起初他只看到了很少船只，似乎印证了卡拉·霍加关于神圣联盟舰队数量占劣势的报告。基督徒舰队似乎在驶向西方。阿里立即推断，敌人企图逃向外海。他改变了舰队的航向，偏向西南方，以阻止数量占劣势的敌人逃走。桨帆船群在鼓点声中奋力前进时，船员们心中充满了一种期待感。“我们感到欢欣鼓舞，”一名奥斯曼水手后来回忆道，“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舰队必胜。”^[2]

但士兵们也感到了一丝不安。舰队离开勒班陀的时候，一大群不吉利的黑乌鸦呱呱叫着从空中飞过；而且阿里知道，他的船员并非自信满怀。并不是所有人都热情期待海战；为了凑足人数，他不得不从勒班陀周边地区拉了不少壮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远方的基督徒舰队似乎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并非要逃跑，而是在分散队形、摆开阵势。阿里的第

一印象错了；基督徒的船只比他设想的要多。卡拉·霍加数错了。阿里咒骂着命令再次更改航向。

阿里第一次改变航向的时候，基督教舰队也相应地做出了反应，他们也误以为土耳其人企图逃跑。随后他们也发现土耳其舰队的规模比自己预想的要大，而且敌人并没有逃跑，而是准备迎战，于是他们再次调整了对策。随着时间逐渐流逝，两支庞大舰队在海面上展开阵势。大家意识到，这将是多么恢宏的一场碰撞。在宽达4英里的正面上，两支大舰队正在封闭的海上竞技场中互相接近。这场战役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想。约14万人（包括士兵、桨手和船员）搭乘约600艘船只（地中海的所有桨帆船的70%以上），互相虎视眈眈。不安变成了疑虑。两个阵营都有人為自己眼前的景象暗自胆寒。

奥斯曼帝国陆军的司令官佩尔特夫帕夏试图劝说阿里佯作撤退，驶入逐渐变窄的海湾，以进入勒班陀岸炮的射程。海军司令接到的命令和他自己的荣誉感都不允许这么做。他回答说，他绝不会允许苏丹的战船哪怕仅仅是“佯作”逃跑。

基督教阵营内也有同样的担忧。随着瞭望哨的不断观察，现在越来越清楚，土耳其人的战船比他们多。甚至头发斑白的威尼斯老将韦尼尔也一下子沉默了。堂胡安觉得必须在“国王”号上再开一次会议。他询问罗姆加的意见。这位骑士毫不含糊，用手指着环绕在“国王”号周围的庞大的基督教舰队，说道：“阁下，我认为，如果令尊，也就是皇帝陛下当年曾经看到这样一支舰队归他统领，一定会奋勇直前，不当上君士坦丁堡皇帝就决不罢休。他也一定会轻松得胜。”

“您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作战，罗姆加先生？”堂胡安再次询问。

“是的，阁下！”

“很好，那我们就决一死战！”^[3]

还记着腓力二世的谨慎指令的人们还企图撤退，但已经太晚了。堂胡安决心已下。“先生们，”他转向聚集在他舱室内的人们，“现在不是讨论的时间，而是战斗的时候！”^[4]

两支舰队都开始展开作战队形。堂胡安的计划早在9月初就已经制订完毕，并做了仔细的排演。他的计划遵循的是堂加西亚在某封信中献上的良策：将全军分为三个编队。中军由乘坐“国王”号的堂胡安亲自指挥，得到韦尼尔和科隆纳的紧密支持，一共有62艘桨帆船。左翼由威尼斯人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统领，拥有57艘桨帆船。右翼是多里亚麾下的53艘桨帆船。第四个编队，即预备队，由久经战阵的西班牙航海家阿尔瓦罗·德·巴桑指挥，共有30艘桨帆船。巴桑的任务是，一旦任何一个编队的战线瓦解，他就要立即驰援那里。

堂胡安的政策是将各国的战船混编，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某个国家的舰队叛变，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他们的凝聚力。他这么做也是吸取了普雷韦扎战役的教训。但各个地方的混编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扮演不同的角色。左翼的57艘桨帆船中有41艘是较轻型、机动性更强的威尼斯桨帆船，它们的任务是紧贴海岸线航行和作战，这也是堂加西亚的建议，因为“如果在敌国境内作战，应当尽可能接近陆地，好让敌人士兵更容易逃离自己的桨帆船”^[5]。较重型的西班牙桨帆船主要在中军和右翼，那里的战斗可能更激烈。

基督徒战船顶着大风，艰难地排兵布阵。在右翼的多里亚的桨帆船群为了占据自己的指定位置，不得不行驶很远的路程。安排阵形是非常困难的，操作起来相当缓慢。“总是没办法让轻型桨帆船排成整齐队形，”韦尼尔回忆道，“这给我带来了很大麻烦。”^[6]基督教舰队花了三个小时才排好阵势。

由于风向有利，阿里帕夏的舰队排起阵形来要容易一些，但总的来讲也和对方差不多。海军司令乘坐旗舰“苏丹娜”号，占据中军，和“国王”号呈一条对角线；他的右翼指挥官是亚历山大港总督舒鲁奇·穆罕默德；左翼由乌卢奇·阿里统领，正对着多里亚。两支舰队转来转去的时候，热那亚海军统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兵力远逊于敌人。乌卢奇·阿里拥有67艘桨帆船群和27艘小型划桨船，排成两条战线；多里亚只有53艘。兵力悬殊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堂胡安努力将战船排成一条直线，土耳其人则更喜欢新月阵形。它既有伊斯兰新月的象征意义，也具有战术价值。双方都对桨帆船作战的残酷现实心知肚明。桨帆船的全部进攻能力都集中在它的船首。它的3或5门指向前方的船首炮的左右回旋度很小，射界很狭窄，而且船首是船上唯一一个能够聚集大量士兵的地方。常规的战术是用大炮、火绳枪和箭矢扫射敌船的甲板，然后用带冲角的小桥撞击敌船，让士兵们通过小桥登上敌船甲板。桨帆船的船体只是个脆弱的外壳，很容易被冲击或者炮弹摧毁。如果侧舷或者船尾遭到另一艘桨帆船的攻击，就只能坐以待毙。阿里的新月阵形的目的是从侧翼包抄并合围数量较少的敌人，然后通过近距离混战打乱敌人的阵形；机动性更强的穆斯林船只比较容易从侧舷攻击敌人，将其消灭。

对双方来说，维持阵形正面的完整连贯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堂胡安的桨帆船更笨重一些，因此对他来讲，互相支援的原则事关生死。邻近的两艘桨帆船之间必须保持一百步的距离，因为这个距离足够远，两船的桨不会相撞，但又足够近，可以阻止敌人硬插进来。同时，由于相同的原因，各艘桨帆船必须保持队形，不能脱队。如果向前冲得太远，容易被敌人分割包围和消灭。如果太落后，就容易让敌人插进来，造成混乱。一旦阵形上出现漏洞，作战就变成了听天由命的危险游戏。但要在宽达4英里的正面上维持这项原则，需要极其高超的本领。从高空俯视，布阵的效果是很清楚的。基督教舰队的阵形就像只手风琴一样不断

伸缩，各艘舰船以最中间的“国王”号为基准调整自己位置的时候，整个阵形的正面呈一条蜿蜒的曲线，前后波动。

阿里帕夏也面临着保持队形的问题。他的新月阵形两端的尖角位置过于超前，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如果得不到支援，它们可能会迅速被敌人歼灭。由于舰队过于庞大，而且每艘船不断调整自己位置造成的延误使得队形很难保持连贯。他感到新月阵形太难安排，于是改为一条直线，同样也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苏丹娜”号在中军，作为队形的基准），这和对手是一样的。任何一艘船都不得超出其他船只，否则其船长将受死刑。两支舰队在努力保持队形的同时缓慢地互相接近了。

基督教舰队的机动性比较差，但在火力方面得到了弥补。西班牙的西欧式桨帆船比土耳其桨帆船更重，攻击力也更强。平均而言，基督教战船的火炮数量是对方的两倍；如果使用得当，它们能够给敌人带来沉重打击。两军间的距离越来越短，阿里的瞭望哨可以看到，基督教舰队的中军满是西班牙的重型桨帆船。如果土耳其舰队不用两翼来扰乱和包抄对方中军的话，这些重型桨帆船能够重创土耳其舰队的中军。阿里开始感到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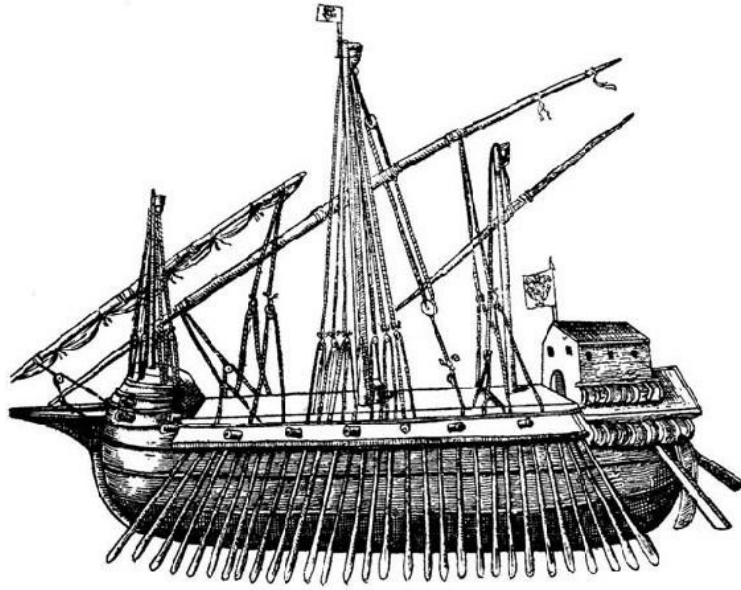
而且基督徒做了一些发明创造。根据多里亚的建议，堂胡安命令他的指挥官拆除船首的冲角。这些冲角主要是起到装饰作用，实际意义不大；拆掉冲角之后，船首炮可以压低炮口，这样就能在近距离轰击敌人。两军之间最后100码的距离只是一瞬间的时间，炮手们来不及重新装填，因此只有一次射击机会。堂胡安决心遵照堂加西亚的建议：勇敢地坚持到两军相接的最后一分钟，也就是敌人已经冲杀到眼前的时候才开炮。他不希望己方的炮弹从敌人头顶上呼啸而过，那样就完全不能造成任何杀伤。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在船侧铺上大网，以阻挠和迟滞企图登船的敌人。

但是，给正在隆隆前进的舰队带来了最激进革新的是威尼斯人。他

们牢牢记住了他们的重型武装大帆船1538年在普雷韦扎的突出表现，并将这个经验用于后来的作战。当年，威尼斯的大帆船给巴巴罗萨的桨帆船群带来了沉重打击，在一整天时间内坚守阵地，打退了对方。威尼斯人在造船厂拼命苦干、准备迎战时，在桨帆船厂棚里找到了6艘涂着樟脑油停在在那里的大型划桨商船（这是一种笨重的划桨船，曾用于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但这些贸易现在都已经搞不下去了）的船体。威尼斯人将这种船称为“加莱赛船”。他们将这些船体翻新改造，配备多门火炮，并加装了防护性的上层结构。10月7日早晨，若干桨帆船在艰苦地将这些浮动炮台拖往阵前。威尼斯人这么做有着明确的目的。

这是星期天的早上。在遥远的罗马，庇护五世正在主持一场热忱的弥撒，为基督教的胜利祈祷。在马德里，腓力二世在各次礼拜仪式之间争分夺秒地处理朝政、签署文件，并向他的庞大帝国的各个地区发送备忘录。塞利姆二世正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前往位于埃迪尔内的宫廷。苏丹的这次出行像往常一样，排场极其豪华：一大群衣着鲜亮、甲冑叮当作响的骑兵和头戴羽饰的近卫军、侍从、书记员、官吏、驯犬员、御厨和受宠的后宫佳丽，前呼后拥，好不热闹。但这次出行遇到了不吉利的预兆。塞利姆二世的头巾两次滑落，他的坐骑也摔倒了。一个人急忙上前帮助他，但不慎触及了苏丹的身体，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因此不得不将他绞死。

在帕特雷湾，上午九点钟左右，自黎明以来一直劲吹的东风逐渐平息。大海平静得如同一面镜子。从堂胡安背后吹来的只有轻微的西风。奥斯曼舰队立即落帆。基督教舰队的桨手们轻松了一些。大家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这是上帝送来的西风。



威尼斯人的桨帆船

庇护五世对神圣联盟的事业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舰队离港时的基督教旗帜、礼拜仪式和教皇的祝福给这次远征赋予了十字军东征一般的极大宗教热情。教皇曾要求堂胡安确保他的士兵们“在桨帆船舰队要过基督徒的高尚生活，不准赌博或者口出恶言”^[7]。雷克森斯对此只能私下里保留意见。“我们尽力而为吧，”他嘟囔着瞅了瞅那些粗莽的西班牙步兵和被锁在划桨长凳上的基督徒败类们。在墨西拿当着教皇使节的面的时候，堂胡安将几名说脏话渎神的士兵绞死，以鞭策士兵们言行要高尚。道德目标对整个远征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每艘船上都有神父；数千套念珠被分发给士兵们；每天都举行礼拜仪式。此时，所有人都能看到平静的海面上敌人舰队在黑压压地逼近。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基督教舰队弥漫在一种清醒严肃的宗教热诚和恐惧之中。每艘船都做了弥撒，神父们提醒大家，懦夫是不能上天堂的。官兵们做了忏悔。随后，战鼓敲响，号角齐鸣，人们高呼：“胜利！耶稣基督万岁！”^[8]

队形渐渐展开，堂胡安从“国王”号富丽堂皇的艉楼上走下。他的铠甲在秋日阳光下光华夺目；他手持十字架，转移到一艘轻型的快速三桅船上，沿着阵形巡视，鼓舞官兵们的斗志。他经过塞巴斯蒂亚诺·韦尼

尔所在战船的船尾时，这位脾气火爆的老人向他致意。他们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决定命运的决战上，前嫌尽弃。

堂胡安用言语鼓舞每个国家的官兵。他敦促威尼斯人为布拉加丁报仇雪恨；对西班牙人，他提醒大家的宗教义务：“孩子们，我们在此地要么胜利，要么牺牲，皆由天定。不要让亵渎神明的敌人问我们：‘你们的上帝在何处？’为上帝的圣名而战，无论死亡还是胜利，你们都将永垂不朽。”^[9]他视察了两艘缓缓从阵形中穿过的加莱赛战船，敦促他们尽快就位。他向所有基督徒奴隶许诺，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就给他们自由，并命令打开所有奴隶身上的锁链。事实上，这个诺言是注定不能兑现的，因为他只能决定西班牙船只上奴隶的命运。至于穆斯林奴隶，除了身披枷锁之外，还额外戴上了手铐，为的是防止他们在战斗中造反。如果船只沉没，被锁在船上的奴隶将死无葬身之地。

所有官兵都在做最后的准备。军械匠们在基督徒桨手群中穿梭，打开镣铐，并分发刀剑。过道上堆积了武器、葡萄酒和面包；神父们好言抚慰大家；火绳枪兵们检查他们的火药和延时引信。曾参加镇压摩里斯科人战争的西班牙老兵们磨尖他们的长枪枪头，戴上钢盔。指挥官们穿上胸甲，戴上头盔，掀起头盔面甲，感受海风，但也闻到船上的臭气。外科医生们铺开他们的医疗器械，用手指试试锯子是否足够锋利。成千上万的划桨奴隶在监工的皮鞭脆响和持续鼓点的督促下努力划桨。他们背对敌人，划动桨叶。舰船稳步向敌人冲去。

基督教舰队的成千上万人员中有一些人的名字流传至今。佛罗伦萨音乐家奥雷利奥·谢蒂因为犯下杀妻的罪行，已经在桨帆船上做了十二年的划桨奴隶。在“女侯爵”号上有个叫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志愿兵，他时年二十四岁，书卷气十足，一贫如洗。战役这天早上，他发了高烧，但还是爬下床来，蹒跚地走到自己的岗位，去指挥一小队士兵。另外一名病号，“圣乔治”号上的马丁·穆尼奥斯军士也发了高烧，躺在甲

板下方的舱室内。英格兰海盗和佣兵托马斯·斯蒂克利爵士（他可能是亨利八世的私生子）指挥3艘西班牙战船。罗姆加没有和马耳他骑士团的桨帆船在一起，而是和科隆纳一起待在后者的旗舰，这个安排后来救了罗姆加一命。安东尼奥和安布罗焦·布拉加丁是法马古斯塔的烈士的亲戚，他们指挥着两艘加莱赛战船，在前线焦急地等待着，按捺不住要报仇。在堂胡安的旗舰上有一个面容特别鲜嫩的西班牙火绳枪兵，叫作“舞女马利亚”，她是有名的弗拉明戈舞女，女扮男装参加了远征，为的是陪伴自己的情人。

5英里之外，穆斯林也在做准备工作。阿里的舰队成分也很复杂，包括来自伊斯坦布尔和加里波利的帝国分舰队，以及乘坐小型划桨船的阿尔及利亚海盗和来自其他地方的海盗。所有的重要指挥官全部到场：滨海诸行省（罗得岛、叙利亚、纳夫普利翁和的黎波里）的总督、巴巴罗萨的两个儿子哈桑和穆罕默德、伊斯坦布尔军工厂的指挥官、意大利海盗卡拉·霍加，以及身在左翼的乌卢奇·阿里。各个派系之间显然有些小摩擦，虔诚的穆斯林和“牙缝里还塞着猪肉”^[10]的秉信机会主义的叛教者之间貌合神离，本领高强的海盗船长和苏丹的高官互相看不顺眼。阿里帕夏的计划是让他右翼（指挥官是舒鲁奇·穆罕默德）的桨帆船群猛地冲向希腊海岸；这些桨帆船吃水较浅，而且船员们对近海非常熟悉，所以阿里坚信他们一定能智胜对面的威尼斯人，从侧翼包抄他们。他命令骑兵部队在岸上就位，如果威尼斯人企图靠岸逃跑，就将其歼灭。乌卢奇·阿里对这个战术极为担忧。这个计划是个精心算计的赌博。如果事与愿违，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穆斯林可能会受到靠岸逃跑的诱惑。乌卢奇·阿里更愿意在开阔海域作战，那样的话更容易进行侧翼攻击。

穆斯林舰队搭载的火炮和火绳枪兵比敌人少，但是有很多弓箭手，他们的射速远远超过对手的火器。在西班牙火枪兵装填弹药的时间内，弓箭手可以将他射死三十次。弓箭手没有甲冑，他们的船只也没有加装

木制胸墙以抵御持续炮火。他们的目标是做到快速和敏捷。

在伊玛目的召唤下，穆斯林履行了净礼仪式，匍匐在地，向真主祈祷。他们拉紧弓，将箭头浸在毒药内。甲板上涂抹了油脂和黄油，身披重甲的欧洲人如果登船，就很难站稳，而往往光脚作战的穆斯林仍然能够健步如飞。基督徒划桨奴隶被禁止在敌人接近时抬头，否则将被处死，这是因为害怕打乱划桨的节奏；两军混战时，奴隶们将躲在长凳下。但阿里是个荣誉感极强、慷慨大方的统帅。堂胡安给他的穆斯林奴隶增加了手铐，阿里帕夏却给他的基督徒奴隶许下了一个诺言。他用西班牙语向他们说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今天为我尽忠效劳，以此报答我为你们做的事情。如果我打赢了，你们都将获得自由；如果基督徒获胜，那是真主给你们们的。”^[11]他是完全有能力兑现这个诺言的。阿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三岁，都和他一起在船上。他们被转移到另外一艘船上时，他向他们喊话，提醒他们应尽的职责。“您给我们的面包和盐都是蒙福的。”^[12]他们庄重地答道。这是孝道的体现，令人感动。然后他们就离去了。

阿里现在可以看到基督教舰队前方的威尼斯加莱赛战船因为没有风而静止不动。这让他颇为困惑和担忧。奥斯曼帝国官兵普遍对装有重炮的大型船只心存畏惧。他们曾从俘虏那里听说过这些船，但俘虏的口供称，它们船首和船尾一共只有3门火炮。他们完全无法想象，威尼斯人有怎样的企图。

两军相隔4英里的时候，船体鲜红的“苏丹娜”号发射了一枚空包弹，向“国王”号挑战。堂胡安发射了一枚实弹，作为回答。阿里命令他的舵手穆罕默德径直开向“国王”号。绿色的伊斯兰大旗（其珍贵程度远胜伊斯兰圣战的所有其他标志，上面饰有29000个互相缠绕的真主尊名）被高高升起，旗上的绿色和金色丝线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此时的阳光对穆斯林来说有些炫目。

在基督教舰队，堂胡安也安排了充满宗教意味的仪式。讯号传达出去之后，每艘船上都升起了十字架；“国王”号则升起了教皇馈赠的饰有耶稣受难像的天蓝色大纛。堂胡安身穿光辉夺目的铠甲跪在船首，恳求基督教的上帝赐给他胜利。成千上万的士兵也跪了下去。身穿褐色或黑色长袍的修士们将十字架举向太阳，向官兵们抛洒圣水，喃喃地发出恕罪的祷词。然后，官兵们站起身来，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高呼他们的主保圣人的名字：“圣马可！圣斯提法诺！圣乔治！为了圣雅各和西班牙，冲啊！必胜！必胜！”号角嘹亮地响起；频率较低的咚咚鼓点持续不断地敲响。穆斯林战船上也吹响了唢呐，敲起了铙钹，士兵们高呼真主之名，吟唱着《古兰经》的诗节，大声向基督徒呼喊，要他们上来“像被淹死的母鸡一样”^[13]受死。曾在热那亚受到嘉许的堂胡安一时心血来潮，“在青春热血的激发下，在横笛伴奏下在炮台上跳了一曲嘉雅舞^[14]”^[15]，尽管这样做非常不理智。

根据威尼斯人吉罗拉莫·狄多的记载，此时双方还有时间去欣赏这恐怖的盛景。“两支舰队向对方疾驰，那景象颇为骇人；我们的士兵的头盔和胸甲熠熠生辉，金属盾牌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其他武器也在阳光下很是耀眼，出鞘利剑的光芒甚至在远处也让人眼花缭乱……敌人也是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同样让我们这边心生畏惧；同时那金色的灯笼和五颜六色、光辉灿烂的诸多旗帜也让我们惊异而且蔚为壮观。”^[16]

4艘加莱赛战船位于基督教舰队主力前方1/3英里处，现已就绪，互相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拉开了阵势。右翼还有2艘有些落后，刚刚赶到前沿。威尼斯炮手们手持已经点燃的引火线蹲伏着，观察着快速逼近的280艘穆斯林桨帆船。火绳枪兵们摸索着他们的念珠，喃喃地祈祷。大家的心脏狂跳。他们在巨大的嘈杂声中做好准备。两军相隔150码时，命令下达了。火柴被伸到大炮火门处。此时离正午还差一点点。

一连串明亮的闪光，一声雷霆般的巨响，然后是遮天蔽日的浓烟。这么近的距离，大炮是不可能打不中的。铁制球形炮弹呼啸着冲进前进的船只群中。在这巨大的冲击力下，有些土耳其桨帆船当场被炸得四分五裂。“3艘桨帆船瞬间就这么沉没了，着实可怕，”^[17]狄多如此记载道。巨大的混乱让奥斯曼舰队暂时停止了前进。很多舰船互相撞击，或者在拼命努力停住。“苏丹娜”号的一只船尾灯笼被炸飞了。加莱赛船转了90度，准备进行第二轮射击。阿里命令加快划桨速度，尽可能快速地从敌人炮口下冲过去。奥斯曼阵线改变了方向，打开了一些缺口，以便避开基督徒的浮动炮台。侧舷面对基督徒的船只这时遭到了火绳枪的射击。一艘船的舵手被击毙，整船就摇摇摆摆、不停旋转。然后一排戴头巾的士兵被一排子弹从侧面打倒。加莱赛战船又转了45度。“真主保佑我们安全逃出！”^[18]阿里大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线遭到重创，变得七零八落、漏洞百出。一些土耳其战船从炮口下驶过，向基督教舰队的主阵线开炮，但是射得太高。堂胡安在等待土耳其人接近。基督徒战船的冲角已经拆除，能够以较低平的弹道射击。阿里的战船继续逼近的时候，基督徒的大炮咆哮起来，每名指挥官都自行选择射击时机。西风将黑烟吹向穆斯林那边，妨碍了他们的瞄准。在两军短兵相接之前，阿里的战船就已经有1/3被击沉或重创。“海面上已经漂满了士兵、桁端、桨叶、木桶和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仅仅6艘加莱赛战船居然能够造成如此大的杀伤，真是不可思议。”^[19]

^[1]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254

^[2]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20

^[3] Brântome, P.de Bourdeille, Seigneur de, *Oeuvres complètes*, ed.L.Lalanne, vol.3, Paris, 1864, p.125

^[4]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255

[5]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 Madrid, 1843, p.9

[6]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23

[7] Beeching, Jack, *The Galleys at Lepanto*, London, 1982, p.197

[8]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27

[9]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407

[10]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258

[11]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410

[12]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258

[13]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p.145

[14] 16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舞蹈和音乐，舞步非常复杂。

[15]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29

[16] Caetani, O., and Diedo, G.,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1571*, Palermo, 1995, p.202

[17] Caetani, O., and Diedo, G.,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1571*, Palermo, 1995, p.134

[18]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266

[1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56

21.火海

1571年10月7日中午至日落

此时，靠近海岸的地方已经爆发了激战。奥斯曼舰队的右翼在舒鲁奇·穆罕默德指挥下及时避开，躲过了加莱赛战船的毁灭性打击。现在他们试图从侧翼包抄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统领的由威尼斯人为主导的左翼。舒鲁奇打算善加利用海岸浅水区的狭窄走廊，他知道威尼斯人的重型战船是不敢靠近那里的。“舒鲁奇和卡拉·阿里赶在了其他奥斯曼桨帆船的前面，迅猛地冲向我们的阵线，”狄多记载道，“他们接近海岸，带领他们编队最前方的若干战船进入了浅水区。他们很熟悉这里的航道，知道浅滩上方的海水究竟有多深。他们后面跟着四五艘桨帆船，打算从背后攻击我军左翼。”^[1]

威尼斯人还没反应过来，舒鲁奇的这些桨帆船已经绕过了巴尔巴里戈战线的末端，正从两面夹攻最外层的位置暴露的基督教战船。如果有更多土耳其战船从侧翼包抄了巴尔巴里戈的侧翼，形势就很严峻了，他会遭到背后攻击。巴尔巴里戈用自己的旗舰挡住敌人，随即被一场火雨吞没了。箭雨呼啸而来，他的船尾灯笼被射得像刺猬一样。土耳其人试图消灭对方侧翼外围的时候，最前方的基督教桨帆船遭到猛攻，甲板被火绳枪火力一通横扫，指挥官和高级军官们被逐个击倒。巴尔巴里戈的旗舰英勇奋战了一个钟头，双方步兵激烈争夺它的甲板。巴尔巴里戈戴着头盔面甲，发出的命令完全被战斗的嘈杂声淹没。他不够谨慎地抬起面甲，叫喊着说，哪怕被打死也要把命令传出去。几分钟后，一支箭射中了他的眼睛。他被抬到甲板下方的舱室，就在那里死去。争夺旗舰的战斗愈发激烈，巴尔巴里戈的侄子乔万尼·孔塔里尼率领自己的桨帆船前来援助，但自己也不幸阵亡。

舒鲁奇似乎已经快要得手，但威尼斯人一心要报仇雪恨，斗志高昂。他们的很多船只来自克里特、达尔马提亚海岸和诸岛屿，这些地方在夏天的时候都遭到了阿里帕夏的劫掠。他们拼死苦战，毫无顾忌。战局渐渐开始转向。基督教预备队的桨帆船上前支援，并从后方调来援兵登上遭到打击的舰船。一艘奥斯曼桨帆船上的基督徒奴隶逃脱了控制，向他们的穆斯林主子大打出手，挥舞着铁链狠揍他们。一艘加莱赛战船缓缓驶向岸边，开始猛轰奥斯曼舰船。舒鲁奇的旗舰遭到冲撞，舵被打掉，后来又被打出大洞，开始下沉。它被灌满了海水，停在浅水区动弹不得。身穿华丽衣服的舒鲁奇被威尼斯人从海里捞起时已经半死不活。他身负重伤，痛苦无比，威尼斯人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当场将他斩首。舒鲁奇的整个分队都跟着旗舰驶向海岸，现在都被压制在了那里。“在一片混乱中，”狄多写道，“我们的很多桨帆船，尤其是那些离中军最近的战船……秩序井然地转向左侧，包围仍在负隅顽抗的土耳其舰船。我军通过这个机敏的行动将它们包围在那里，就像把它们困在一个港口中。”^[2]奥斯曼舰队的右翼被困住了。

现在，乌卢奇最大的担忧成为现实。一些穆斯林受到了近在咫尺的陆地的诱惑，放弃了战斗。他们乱七八糟地争相逃向海岸。舰船互相碰撞；人们跳下海去，在深水和浅水区挣扎或者淹死。后面的人利用同胞的尸体作为桥梁，逃向陆地。威尼斯人大开杀戒，不肯饶恕任何敌人。他们放下小艇，高呼着“法马古斯塔！法马古斯塔！”追杀敌人。一个暴跳如雷的士兵找不到别的武器，就抓起一根木棒，插进一名敌人的嘴里，将他按倒在海滩上。“这是场令人震惊的残杀，”^[3]狄多写道。在混乱中，威尼斯船只上的一群基督徒划桨奴隶（根据堂胡安的命令，他们的镣铐已经被打开）感到夺得自由的时刻已经到了，而不愿去等待堂胡安兑现诺言。他们手执士兵们分发的武器，跳上海岸，后来在希腊山区落草为寇。

午后不久，两支舰队的中军（都是重型战船）也短兵相接了。名字

取得花里胡哨的威尼斯和西班牙桨帆船（比如“雄人鱼”号、“骑海豚的幸运女神”号、“金字塔”号、“轮子和毒蛇”号、“树干”号、“朱迪斯”号，以及数不胜数的圣徒名字）冲杀进了土耳其舰队。土耳其的舰船来自伊斯坦布尔、罗得岛、黑海、加里波利和内格罗蓬特^[4]，其指挥官包括：贝克塔西·穆斯塔法、德利·切列比、哈只·阿迦、科斯·阿里、皮雅利·奥斯曼、卡拉雷斯，还有其他几十人。150艘全副武装的桨帆船厮杀起来。

此前，基督教舰船是缓缓地驶向敌人，力图保持队形。土耳其舰队则被加莱赛战船发出的暴风骤雨般的火力打得七零八落，但仍然迅猛地冲向对方，快速掠过平静的海面，三角帆向后倾斜，火炮不时轰鸣着。双方的主要将领都聚集在战斗的中心：在奥斯曼舰队方面，阿里帕夏在“苏丹娜”号上，他的右边是陆军司令官佩尔特夫帕夏的战船；阿里的左边是内格罗蓬特总督穆罕默德贝伊以及阿里的两个儿子乘坐的战船；还有巴巴罗萨的儿子哈桑帕夏以及其他一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堂胡安稳坐在“国王”号的艏楼上，一侧的教皇国旗舰上坐着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和罗姆加，另一侧则是韦尼尔。腓力二世如果看到堂胡安如此冒险，一定会无比震惊。堂胡安身穿光辉熠熠的盔甲、手执利剑，站在绘有耶稣受难像的大纛前，身形非常明显和暴露。别人劝他回到舱内，都被他拒绝。阿里也穿着同样鲜艳夺目的长袍站在艏楼上，手里拿着一张弓。这两位统帅都在冒极大的风险，与当年堂加西亚向拉·瓦莱特提出的明智警告——“在战争中，领袖的死亡常常导致灾难和溃败”^[5]——背道而驰。

两艘旗舰接近时，“苏丹娜”号的船首炮开始射击。一枚炮弹打穿了“国王”号的前侧平台，打倒了最前方的一批桨手。另外两发炮弹没有命中。“国王”号的船首冲角已经拆去，大炮的射击弹道可以更低。它一直等到敌舰进入抵近距离才开火，“我们所有的炮弹都给敌人造成了极大损伤，”^[6]“狮鹫”号上的奥诺拉托·卡埃塔尼如此记述道。“苏丹娜”号

似乎直取威尼斯旗舰，但在最后一刻转舵，径直撞上了“国王”号，两船的船首互抵。“苏丹娜”号的船首冲角就像身体直竖起来的海怪的口鼻一样一直插到“国王”号的前排桨座，把不少桨手当场撞成肉泥。两艘战船被这冲击力震得各自后退一步，但仍然缠在一起，索具和船柱已经互相缠绕，一片狼藉。

整个战线上都发生了类似的猛烈冲撞。科隆纳指挥教皇国旗舰去支援“国王”号，自己却被佩尔特夫帕夏的战船撞上，原地旋转，然后一头撞上了“苏丹娜”号侧舷，这时又有另一艘奥斯曼桨帆船撞上了科隆纳的船尾。在另一侧，韦尼尔也向前推进，但立刻被卷入了另一场混战。基督徒的战线已经被打出了缺口，海面上双方战船激烈厮杀，乱作一团。

这场战役的幸存者后来对电光火石的激战中的一样东西记得最清楚：震耳欲聋的噪音。“开始时，大炮的咆哮如此震耳，”卡埃塔尼写道，“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或描述的。”^[7]在火山爆发般的大炮巨响背后还有其他声音：像连续不断的手枪射击一般的船桨折断的脆响、互相冲撞的船只破裂时发出的震响、火绳枪的噼啪射击声、羽箭的恐怖呼啸、痛苦的喊叫、疯狂的叫嚷、尸体坠入海中的溅水声。浓烟遮天蔽日；舰船在烟雾中蹒跚而行，偶尔被阳光照亮，似乎不知从何方杀出，撕咬着对方的侧舷。到处是混乱和噪音：“火绳枪子弹和羽箭的致命风暴四处肆虐。大海似乎被枪口焰、火喇叭、火罐和其他武器发出的持续火焰点燃了。有时是3艘桨帆船对4艘，有时是4艘与6艘交锋，有时是6艘围攻1艘。不论是敌人还是基督徒，所有人都极其凶残地战斗，一心想致对方于死地。已经有很多土耳其人和基督徒登上了对方的桨帆船，用短兵器在近距离肉搏，很少有人还活着。双手剑、弯刀、铁制钉头锤、匕首、战斧、长剑、弓箭、火绳枪和火攻武器全都大显神通，杀人无数。除了那些被各种武器杀死的人之外，还有很多人虽然躲过了这些武器，却在跳海后被淹死。大海已经被鲜血染红，海水变得非常浑浊。”^[8]



火海

“国王”号和“苏丹娜”号这两艘旗舰在最初的猛撞之后，双方的士兵都试图登上对方战船。“国王”号搭载着400名来自撒丁岛的火绳枪兵，战士的总人数达800名，他们摩肩接踵地挤在一起，每个人的活动空间不超过2英尺。阿里则有200名火绳枪兵和100名弓手。在两船相接的最初一刻，“一大群土耳其士兵非常勇敢地跳上了‘国王’号，同时‘国王’号上也有很多士兵跳上了‘苏丹娜’号”^[9]。根据传说，舞女马利亚就在最早手执利剑登上敌船的那群士兵中。甲板上爆发了近距离白刃战。被铁链锁住的桨手们试图躲在狭窄的长凳下，同时武装士兵们在中央甲板上奔走，铠甲叮当作响。穆斯林很快就被从“国王”号上逐出；西班牙士兵则一直冲杀到“苏丹娜”号的主桅才被挡住。“苏丹娜”号错综复杂的胡桃木甲板很快就被油脂和污血覆盖，士兵们就在这污秽中砍杀敌人，或者倒地毙命。每艘船都从它后方的其他桨帆船那里得到援兵。在船首厮杀的士兵倒地死去的同时，援兵就从船尾的梯子上爬上来增援。在这么近的距离，投射武器是致命的。一个身披胸甲和背甲的人也会被一支箭刺穿，或者被一发子弹击毙。“国王”号上的堂贝尔纳迪诺·德·卡德尼亚斯

的胸甲部位被一支旋转火枪的子弹击中，子弹虽然没有击穿胸甲，但冲击力仍然很大，他不久之后就死去了。伊斯兰的绿色大旗被打出了很多弹孔，但基督徒也被打退了。

双方都明白，旗舰是战役的关键所在。士兵们在桅杆处匆匆搭建了障碍物，以抵挡敌人的登船士兵，于是争夺舰船的战斗变得很像狭窄街道上的巷战。士兵们非常密集，常常有一大群人被同时打死。更多援兵从后方赶来。“苏丹娜”号射来的箭雨呼啸而至，插入“国王”号甲板的速度如此之快，看上去好像箭是从甲板上长出来的。据一位目击者说，基督教船只上插满了箭，活像豪猪。两艘旗舰的战斗局势发生了逆转，现在土耳其人蜂拥冲上了“国王”号。在这场混战中，有人看见堂胡安的宠物狻猊把桅杆上的箭拔出，将它们咬断，然后把它们扔进大海。

“国王”号的两侧和整个战线上，战斗极其激烈。韦尼尔试图去援助旗舰，撞击了“苏丹娜”号的中段船体，但自己被从两侧包围。预备队的两艘威尼斯桨帆船及时赶到，才救了他的命。这两艘桨帆船的船长都已经阵亡。巴桑的桨帆船预备队之前待在战线后方，准备随时援救危急地点，现在也开始大规模加入战斗，以阻止战局恶化。科隆纳打退了穆罕默德贝伊的桨帆船（阿里的两个儿子就在这艘船上）。在战线另一端，海盗卡拉·霍加和卡拉·德利的桨帆船群企图猛攻“狮鹫”号。卡拉·霍加带领他的人马冲杀在前，但火绳枪开始大显神通。“詹巴蒂斯塔·孔图西奥用火绳枪将卡拉·霍加打倒，然后一枪一枪地射击，一直打到活着的土耳其人不超过6个。”^[10]西班牙长枪兵在阿尔普哈拉的操练中掌握了战术，在近距离的杀伤力是惊人的。他们登上敌船之后就横扫甲板，将反抗的敌人戳死，或者把他们推进大海。奥雷利奥·谢蒂记载了和他一起被释放的基督徒奴隶在战斗中的极大勇气：“基督徒奴隶们告诉自己‘今天我们要么战死，要么赢得自由。’跳上敌船，杀死了很多土耳其人。”^[11]

“苏丹娜”号和“国王”号上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冲上敌船的第二波基督徒士兵也被击退，但奥斯曼舰队的火力在逐渐减弱。堂胡安手执双手重剑，亲自从船首作战，腿上被匕首刺伤。在旁边的桨帆船的舰楼上，八十岁高龄^[12]的韦尼尔没有戴头盔，站在自己的舰楼甲板上，用劲弩快速向戴头巾的敌人射击，他的部下不断为他重装弩箭。

巴桑的援兵开始扭转局势，重型加莱赛战船又枪炮齐鸣地加入了混战。佩尔特夫帕夏所在战船的舵被打掉；他跳下大船，来到一艘划桨小船上，小船的桨手是个叛教者，他用意大利语高呼：“不要开枪！我们是基督徒！”^[13]就这样把佩尔特夫救走了。佩尔特夫溜走的时候大声咒骂阿里的鲁莽。基督徒战船在包围“苏丹娜”号，并切断了增援阿里帕夏旗舰的援兵来源。帕夏的儿子们拼命要去援助父亲，但也被打退了。科隆纳和罗姆加俘虏了一艘桨帆船，然后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下面干什么？”科隆纳问道，“再俘虏一艘桨帆船，还是去援助‘国王’号？”^[14]罗姆加亲自操纵舵柄，将战船转向“苏丹娜”号的右侧。韦尼尔正从另一侧逼近“苏丹娜”号，用火炮横扫后者的甲板。“我的桨帆船用大炮、火绳枪和羽箭猛烈射击，打得帕夏旗舰上的土耳其人没办法从舰楼走到船首，”^[15]他如此记述道。第三波基督徒士兵冲上了“苏丹娜”号的甲板；土耳其人在舰楼甲板上临时搭建的障碍物后做最后抵抗。最后的防御工事被炸飞的时候，阿里帕夏仍然在猛烈地射箭。为了躲避火雨，很多人跳入大海。

关于阿里的最后时刻，有十几种不同的说法，赋予了这位帕夏不同程度的英雄主义精神。最可能的情况是，这位海军司令身穿鲜艳的长袍，非常暴露，被火绳枪击倒了。一名西班牙士兵砍下了他的头颅，将它挑在矛尖上高高举起。人们高呼“胜利了”！神圣联盟的旗帜被升上了“苏丹娜”号的桅顶。堂胡安跳上“苏丹娜”号的甲板，但意识到战斗已经结束，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旗舰。“苏丹娜”号上的抵抗瓦解了。士兵

们将阿里的头颅献给堂胡安。据说堂胡安看到自己的对手被如此粗鲁地斩首，非常愤怒，命令将这个头颅投入大海。西班牙士兵们在做最后的扫荡。

奥斯曼舰队中军的抵抗开始崩溃。阿里的儿子们在穆罕默德贝伊的旗舰上被俘虏；其他人则举手投降或者逃跑。根据卡埃塔尼的记载，“国王”号和“苏丹娜”号的甲板都变成了一堆废墟：“‘国王’号上死者极多。”^[16]“苏丹娜”号在平静的海面上徘徊，船员几乎全部死亡，“甲板上到处是戴着头巾的首级在滚来滚去，似乎和战前的阵容一样数量惊人”^[17]。

但对奥斯曼人来说，战役还没有输掉。在两支舰队的中军激战的同时，还有可能夺得胜利。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和乌卢奇·阿里在朝向外海的侧翼上进行一番猫鼠游戏。在中军开始交锋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仍在寻找合适的位置。

在基督教舰队中，多里亚是个颇有争议、受到猜忌的人。他消极避战，只关心自己的桨帆船舰队，而且根深蒂固地谨小慎微。堂胡安眺望南方的激战时，不禁对多里亚越来越担忧。从中军的角度看，多里亚偏离中军太远，过于接近外海，似乎在逃避战斗。堂胡安派了一艘三桅船去把多里亚召回。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多里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自己位置的危险性，因此在拼命努力避免被敌人抓住。乌卢奇·阿里的船比他多；多里亚的舰队极有可能被侧翼包抄。如果奥斯曼人能够在外围跑在他的前面，就有可能转到他背后，对他造成重创。乌卢奇·阿里的编队越来越偏向南方，将多里亚也带向南边，于是在基督教舰队中军和右翼之间出现了一个宽达1000英尺的缺口。有些威尼斯战船害怕多里亚叛变，转了回来，打乱了多里亚的战线。乌卢奇·阿里“驾驭桨帆船的技艺精湛，就像好骑手操控训练有素的骏马一样”^[18]，显然是有所图谋。一声尖利的

哨响，他的编队的部分战船掉转船头，开向那个缺口，从内侧包抄了多里亚。热那亚海军统领输掉了这一轮。他还没反应过来，土耳其人已经进逼基督教中军的侧翼。

乌卢奇·阿里的这一招着实精彩，迅速就扭转了战局。乌卢奇制造了对奥斯曼人更有利的那种小规模混战局面，而不是更有利于基督徒发挥火力优势的大编队正面对抗。现在海风从乌卢奇背后吹来，他和他的海盗们抓住了一些处于严重劣势、互相分散的基督教船只。他前方是多里亚那一翼的威尼斯桨帆船，它们位置孤立、队形混乱；然后是一小群西西里桨帆船，以及3艘带有熟悉的红底白十字旗帜的战船，那是乌卢奇最痛恨的敌人，圣约翰骑士团的马耳他桨帆船。这些基督教船只的数量处于绝对劣势，而且船员已经在前面的战斗中精疲力竭。现在的兵力对比是三比一，四比一甚至五比一。乌卢奇“对这些船只大肆屠戮”^[19]。7艘阿尔及利亚战船围攻马耳他桨帆船群，用暴风骤雨般的子弹和羽箭猛击它们。身披重甲但是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骑士们死战到底。西班牙骑士杰罗尼莫·拉米雷斯像圣塞巴斯蒂安^[20]一样浑身插满了箭，仍在拼死战斗，阻挡登船的敌人，直到阵亡。分队指挥官彼得罗·朱斯蒂尼亚尼长老身中五箭，被敌人俘虏，此时这艘船上已经只有他一个活人。西西里桨帆船群赶来救援，但当即也陷入了烈火的风暴。“佛罗伦萨”号被1艘桨帆船和6艘小型划桨海盗船打垮；船上所有士兵和基督徒奴隶都被杀死。“圣乔治”号上，一排被锁在桨座上的奴隶都已经倒毙，士兵们全部战死，船长也被两发子弹打死。热那亚旗舰（指挥官是大卫·因佩里亚莱）和5艘威尼斯桨帆船上都没有一个幸存者。萨伏依旗舰则沉默地漂浮在水面上，船上没有留下一个活人能讲述这艘船的命运。

遭到攻击的基督徒船只上发生了一些大无畏的壮举，几乎到了鲁莽的程度。年轻的帕尔马亲王独自一人登上了一艘奥斯曼桨帆船，把敌人船员一直打到主桅处，并且在战斗中活了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在遭到攻击的“圣乔治”号上，因为发高烧而躺在舱内的西班牙军士

马丁·穆尼奥斯听到自己头顶上敌人的奔跑声，立刻从病床上跳起，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他手执利剑扑向敌人，杀死4人，将其他敌人打退，最后倒在了一条插满羽箭的划桨长凳上。他一条腿已经被砍断，还呼唤战友“诸君都要这般努力”^[21]。在“少女”号上，费德里科·韦努斯塔的手榴弹发生爆炸，将他的一只手炸残。他命令一名划桨奴隶将他的残手砍掉。被这名奴隶拒绝后，他自己砍断了残手，然后走到厨房，让伙夫将一只死鸡捆扎在流血的残肢上，然后重新加入战斗，呼喊着想用自己的右手为左手报仇。一名士兵的眼睛被箭射中，自己将箭连同眼球都拔了出来，在脸上扎了一根布条，然后继续战斗。士兵们在甲板上与敌人扭打着，把他们推下海，或者抱着敌人一起投入被血染红的大海，同归于尽。“统领世界的基督”号被敌人包围和击败，船员们将自己的船炸毁，把包围他们的众多奥斯曼桨帆船也一起摧毁。

尽管基督徒拼死抵抗，但乌卢奇·阿里还是在基督教战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一边前进一边搜集战利品。他把堆满死尸的马耳他旗舰拖走，准备作为战利品献给苏丹。如果他早一点得手的话，很有可能挽救整个战局，但是奥斯曼舰队中军已经在崩溃，乌卢奇·阿里的机遇正在飘走。多里亚重整旗鼓，从一侧进攻乌卢奇·阿里的队伍；科隆纳、韦尼尔和堂胡安把他们的桨帆船群调过来，从另一侧对抗。诡计多端的海盗显然不打算为一场已经失败的事业献身；他砍断了拖曳马耳他旗舰的缆绳，把负了伤的朱斯蒂尼亚尼留下记述这个故事，但谨慎地将该舰的旗帜拿走，作为战利品。他带领14艘桨帆船转向北方，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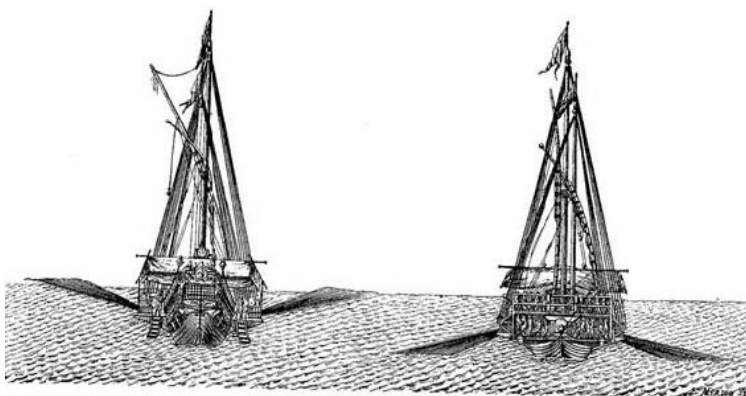
基督教战船开始扫荡战场，并大肆劫掠。战场是一幅毁天灭地般的悲惨景象。8英里的海面上，很多摇摆不定的船只正在燃烧；还有一些船只的船员已经全部死亡，就像鬼船一样漂浮着。幸存的穆斯林无比英勇地死战到底。有的时刻充满了诡异的喜剧性。有些土耳其战船拒绝投降，投射武器用完后就捡起柠檬和橘子，将它们投向敌人。狄多记载道：“基督徒出于鄙夷和嘲弄，将这些水果扔了回去。这种互投水果的

战斗似乎在战役快结束时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让大家捧腹大笑。”^[22]其他地方，士兵们仍在水中挣扎和搏斗，紧紧抓住梁柱，有不少人被淹死。史学家也很难将这场宏大的残杀付诸笔端。“激战持续了四个小时，如此血腥和恐怖，大海和烈火似乎融为一体，很多土耳其桨帆船一直燃烧到水面。海面被血染红，到处覆盖着摩尔人的衣服、头巾、箭筒、箭、弓、盾牌、桨、箱子、盒子和其他战利品。海上还漂浮着很多人，既有基督徒也有土耳其人，有的已经死亡，有的负了伤，有的身体残缺不全，还有些垂死的人还不肯向命运屈服，仍在最后的痛苦中挣扎，他们的力量和从伤口流出的血一起消逝。鲜血如此之多，海面完全被染红。尽管这景象非常悲惨，我们的人对敌人没有一丝怜悯……尽管他们哀求饶命，还是被火绳枪打死，或者被长枪戳死。”^[23]劫掠的规模非常大。基督徒乘坐划桨小船，将死尸从水里捞出，把财物抢走。“士兵、水手和犯人们兴高采烈地抢劫，一直抢到天黑。战利品极多，因为土耳其桨帆船舰队携带了大量金银和华丽饰品，尤其是帕夏们的船只。”^[24]奥雷利奥·谢蒂抓了两个摩尔人俘虏，希望能够凭借这个功劳获得自由。等待他的将是失望。

这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毁灭场面，就像是描绘世界末日的圣经画作。甚至精疲力竭的胜利者也被自己造成的恐怖残杀震惊了。他们目击了一场大规模的杀戮。四个小时之内，有4万人死亡，近100艘船只被摧毁，另外神圣联盟还俘虏了137艘穆斯林船只。奥斯曼帝国有2.5万人死亡，只有3500人被生俘，穆斯林船只上的1.2万名基督徒奴隶被释放。白海的大决战让早期现代世界的人们瞥见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是什么样。直到1915年的卢斯战役^[25]，勒班陀海战的死伤规模才被超越。“这事非常奇怪，又有诸多的方方面面，”吉罗拉莫·狄多写道，“似乎人们脱离了自己的肉身，来到了另一个世界。”^[26]

这一天的悲伤尾声快要降临了。血腥的海水夹杂着战斗留下的乱七八糟的残骸，在黄昏的日光中更显得鲜红。燃烧的船体在黑暗中闪着

光，发出浓烟，最终被彻底烧毁。风力加强了。根据奥雷利奥·谢蒂的记述，基督教船只几乎无法离开，“因为海面上漂满了死尸”。他们离去的时候，水中仍然传来凄惨的呼号，在人们耳边回荡。“虽然水中的很多基督徒还没有死亡，但没人愿意援救他们。”^[27]胜利者在希腊海岸寻找安全锚地的时候，一场风暴席卷了海面，将残骸吹散，似乎大海在用一只大手将战场抹去。



从船尾角度看的桨帆船

奥斯曼帝国史学家波切维为这场战役抒写了自己的悼词。“我亲自去观看了战役爆发的那个可悲的地方……伊斯兰土地上从未有过这样灾难性的战争，自从诺亚发明船只以来，全世界的五洲四海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例子。180艘船只落入敌手，以及大量火炮、火枪、其他战争物资、划桨奴隶和伊斯兰战士。其他的所有损失都是成比例的。最小的船里也有120人。这样算来，损失的总人数在2万左右。”^[28]波切维低估了土耳其的损失数字。

塞万提斯在这场战役中胸部中了两弹，左手永久性致残。他总结了基督徒的情绪：“过去、当今和未来最辉煌的伟业。”^[29]

^[1]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p.46

^[2]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p.150

[3]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p.150

[4] 即希腊的优卑亚岛，是希腊仅次于克里特岛的第二大岛。威尼斯人将这个岛称为“内格罗蓬特”，这个名字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黑桥”。

[5] Bosio, G.,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3, Rome, 1594—1602, p.499

[6] Caetani, O., and Diedo, G.,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1571*, Palermo, 1995, p.134

[7] Caetani, O., and Diedo, G.,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1571*, Palermo, 1995, p.134

[8]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273

[9] Caetani, O., and Diedo, G.,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1571*, Palermo, 1995, p.207

[10] Caetani, O., and Diedo, G.,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1571*, Palermo, 1995, p.135

[11] Scetti, Aurelio, *The Journal of Aurelio Scetti: A Florentine Galley Slave at Lepanto (1565-1577)*, trans.Luigi Monga, Tempe, Arizona, 2004, p.121

[12] 原文如此，韦尼尔生于1496年，此时应当是七十五岁。

[13]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279

[14] Brântome, P.de Bourdeille, Seigneur de, *Oeuvres complètes*, ed.L.Lalanne, vol.3, Paris, 1864, p.126

[15]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36

[16]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35

[17]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35

[18]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38

[19]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38

[20] 圣塞巴斯蒂安（? ~288）是基督教圣人和殉道者，据说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期间被杀。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他常被描绘成双臂被捆绑，被乱箭射死。他受到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崇敬。

[21]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422

[22]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pp.156-7

[23]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p.255-6

[24]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p.157

[25] 1915年9~10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在法国北部的卢斯（今称洛桑戈埃勒）发起大规模攻势，在此役中首次使用毒气。英军伤亡5万人，德军伤亡2.5万。

[26] Caetani, O., and Diedo, G.,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1571*, Palermo, 1995, p.212

[27] Scetti, Aurelio, *The Journal of Aurelio Scetti: A Florentine Galley Slave at Lepanto (1565-1577)*, trans.Luigi Monga, Tempe, Arizona, 2004, p.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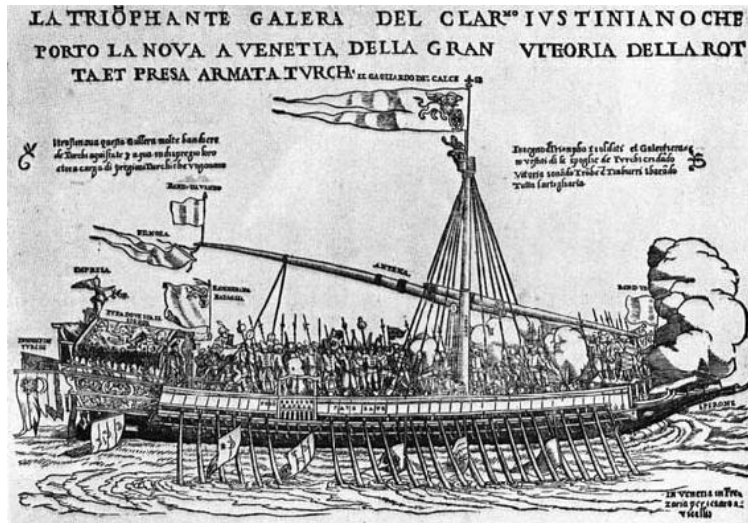
[28]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pp.351-2

[29] Cervantes, Miguel de,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Glasgow, 1871, p.76

22.其他的海洋

1572～1580年

10月19日上午11时，一艘孤零零的桨帆船驶入了威尼斯的潟湖。惊恐情绪在站在圣马可广场水边的人群中迅速扩散。这艘船的船员似乎是土耳其人，但它仍然自信地前进。它接近的时候，人们看清了船尾拖曳的奥斯曼帝国旗帜；然后船首鸣响了欢庆胜利的礼炮。勒班陀战役得胜的捷报传遍了全城。威尼斯人参战冒的风险最大，经历的由悲到喜的情绪转折也最大。他们曾目睹奥斯曼帝国战船逼近他们的潟湖、洗劫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曾损失了塞浦路斯，忍受了布拉加丁的恐怖命运。威尼斯长期压抑的情绪爆发了出来，长舒了一口气。钟声敲响，篝火点燃，教堂举行了礼拜仪式。大街上，陌生人之间也互相拥抱。商店店主们在门上贴了“为庆祝土耳其人之死而歇业”的告示，停业了一周。当局打开了债务人监狱的大门，释放因欠债而坐牢的人，并允许人们戴狂欢节面具，尽管这并不是狂欢节的季节。人们在横笛伴奏下在火炬光亮中跳舞。描绘威尼斯得胜的华美的游行花车以及一长串身披枷锁的战俘在圣马可广场上经过。据说甚至连小偷们也歇业庆祝了。里亚尔托的所有商店都装饰了土耳其地毯、旗帜和弯刀。从刚朵拉小舟的座位上仰视桥梁，可以看到两个栩栩如生的戴头巾的脑袋互相注视着，看上去似乎是刚砍下来的。奥斯曼商人躲在自己的库房内，等待城市平静下来。两个月后，在一次非同以往的圣战热情的爆发中，威尼斯人记起了虐杀布拉加丁的那个犹太屠夫，于是将威尼斯领土内的所有犹太人全都驱逐出境。



将消息传到威尼斯

战争的各个主角对捷报的反应是不同的。根据传说，喜讯传来之前教皇就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消息。据说在阿里帕夏在甲板上倒下的那一刻，教皇打开窗户，努力去辨认一个声响，然后转向室内的其他人，说道：“上帝与你们同在；现在不是处理事务的时间，而是向上帝感恩的时刻，因为此刻我们的舰队得胜了。”^[1]为了这个结局，没有人比教皇更努力。使者送来捷报时，这位老人当场跪下，老泪纵横地感谢上帝，然后对庆祝礼炮挥霍了太多火药而哀叹。对于庇护五世来说，他一生的使命完成了。“现在，我主，”他喃喃地说道，“你可以将你的仆人带走，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赎。”^[2]消息传到马德里的时候，腓力二世正在教堂内。他的反应就像苏莱曼在杰尔巴岛战役之后一样冷淡。“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表情没有变，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他的仪态完全和之前一模一样，并且保持那个样子，直到晚祷歌声停息。”^[3]然后他庄严地命令吟唱《感恩赞》。

勒班陀是欧洲的特拉法尔加^[4]，是让整个基督教欧洲欢欣鼓舞的重大事件。甚至远至信奉新教的伦敦和信奉路德宗的瑞典，人们都在欢庆这场胜利。堂胡安一跃成为时代的英雄，无数诗歌、戏剧和报纸的主角。教廷宣布，从今往后，10月7日将成为玫瑰圣母纪念日。苏格兰国

王詹姆斯六世^[5]为纪念此役，写下了长达1100行的拉丁文打油诗。土耳其战争理所当然地成了英格兰戏剧家的主题，奥赛罗就是从与“公敌奥斯曼帝国”^[6]作战的塞浦路斯前线归来的。在意大利，当时最伟大的画家们开始创作不朽的名作。在提香的画作上，腓力二世将自己新生的儿子举向带翅膀的胜利女神，同时一个被缚的俘虏跪在他脚下，头巾滚落到地上，远景是土耳其桨帆船群在爆炸。丁托列托^[7]描绘了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只见后者身着黑甲，神情凶狠，两腮长满胡须，手里紧握权杖，背景也是海战场面。瓦萨里^[8]、维琴蒂诺^[9]和委罗内塞^[10]创作了巨幅海战图，描绘了混战场面：硝烟滚滚，烈火熊熊，很多人在水中挣扎，全都被基督教天堂的光柱照亮。在基督教欧洲各地，从西班牙到亚得里亚海，到处都举行了礼拜仪式，胜利者举行游行，被俘的土耳其人被游街示众，群众欣喜得落泪，缴获的奥斯曼帝国器具被作为战利品赠送。阿里帕夏的绿色大旗被悬挂在马德里的王宫；还有一面奥斯曼旗帜被悬挂在比萨的教堂；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红砖教堂内展示了奥斯曼战船的船首雕像和船尾灯笼，并点燃了蜡烛，纪念他们的桨帆船在舰队左翼立下的战功。

在欢欣鼓舞的背后，也有一些小小的颇具骑士风度的义举。据说阿里帕夏的死亡让堂胡安感到非常难过；他认为这位海军统帅是一位值得尊敬对手。但造成如此大规模残杀的恰恰正是这两位宅心仁厚、具有强烈荣誉感的统帅，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1573年5月，堂胡安收到了塞利姆二世的外甥女（阿里帕夏的女儿）的一封信，恳求将他的两个哥哥释放。其中一人已经在被俘期间死亡；另外一人则被堂胡安送回。堂胡安还返还了她的礼物，并附上一封感人的书信。“您可以确信不疑，”他写道，“如果在其他战役中您的兄弟或者您的其他亲人被我俘虏，我都会同样高兴地给他们自由，并完全听从您的心愿。”^[11]苏丹本人对此做了回复：“诸行省的征服者、摧毁大军的勇者、陆地和海洋的强有力君主”致信堂胡安，“具有独特美德（勇敢）的统帅……您的美德，最慷慨的胡安，注定是统领天下、永远幸运的奥斯曼皇室长期以来

从基督徒那里受到的最大伤害的唯一原因。我并不因此而愤怒，而是欣然向您送上礼物。”^[12]

但其他人更为冷酷。威尼斯人深知，海上霸权的决定因素不是船只，而是人。让教皇惊恐万状的是，威尼斯人向韦尼尔发出紧急命令，要求他“秘密地，用您认为最稳妥的方法”^[13]杀死他俘虏的全部有经验的奥斯曼水手，并要求西班牙如法炮制。他们希望用这种手段将土耳其人的海军决定性地打垮，并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海军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了。”^[14]

后来，威尼斯人发现，坚忍不拔的土耳其人并没有因为这场惨败而一蹶不振。战役结束的两天之后，阿里的十七岁儿子穆罕默德就体现出了土耳其人的不屈不挠。在战俘营中，他遇见了一个正在哭泣的基督徒男孩。那是贝尔纳迪诺·德·卡德尼亚斯（他在“国王”号的船首负了致命伤）的儿子。“他为什么哭泣？”穆罕默德问道。他得知原因后，答道：“就这么点事？我失去了父亲，还失去了我的财富、祖国和自由，但我一滴眼泪也不会流。”^[15]

惨败的消息送抵时，塞利姆二世正在埃迪尔内。根据史学家赛兰尼克^[16]的记载，塞利姆二世起初极为悲痛，一连三天没有睡觉，也没有用膳。人们在清真寺内祈祷，伊斯坦布尔大街上的畏惧几乎已经到了恐慌的边缘。人们害怕，现在舰队被摧毁了，敌人会从海上进攻伊斯坦布尔。这对苏丹来说是个危机时刻，但他在索科卢沉稳的指导下果断做出了回应。塞利姆二世匆匆赶回了伊斯坦布尔；他在索科卢陪伴下骑马穿过街道，似乎稳住了局势。

土耳其人开始使用一个委婉语来指称这次惨败：“分散舰队之战”。乌卢奇·阿里在最初的报告中试图粉饰太平，称舰队只是被打散了，而没有被歼灭。“敌人的损失并不比您的小，”^[17]他在给苏丹的信中写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之后，这种说法仍然被接受了，就

像查理五世不得不接受在阿尔及尔的海难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塞利姆二世宣称，“事已至此，也是真主的旨意。”^[18]索科卢给佩尔特夫帕夏（他是少数全身而退的将领之一，尽管丢掉了官职）的信中也是这么写的。“真主以这种方式显示了他的旨意，就像在命运之镜中显现的那样……我们坚信，全能的真主会给信仰的敌人带来形形色色的耻辱。”^[19]他们定的调子是：这是一个挫折，而不是灾难。他们甚至试图从真主的惩罚中找到积极因素，引用了《古兰经》的一个诗节：“但你或许会憎恨对你有益的东西。”^[20]在苏丹的国度，人们完全无法对战败的内在原因进行清楚的分析。所有的罪责都被推给了已经死去的阿里帕夏，这位“战前不曾指挥过一艘划桨船”^[21]的海军司令。战败的真正原因——苏丹试图从远离前线的伊斯坦布尔控制所有细节、软弱苏丹的朝廷内各派系的争权夺利、任命阿里帕夏的背后动机——仍然被隐藏起来。索科卢本人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可疑的，但战后的危机只是让他显示出了自己的高超本领，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他快速而高效地采取措施，控制局面；他向希腊各行省的总督发出了大量命令，并索取信息。乌卢奇·阿里被任命为事实上的海军司令，因为能够争夺这一地位的其他竞争者都已经命丧黄泉。

乌卢奇·阿里返回伊斯坦布尔之前已经在沿途拼凑了82艘桨帆船，以壮大声势，并升起了马耳他骑士团的旗帜，作为战利品。这个排场取悦了塞利姆二世，让乌卢奇·阿里不仅躲过了死刑，还确定了他的海军司令的地位，另外还给他赢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此后他就被称为“克里奇·阿里”，“克里奇”的意思是利剑。马耳他骑士团的旗帜被悬挂在圣索菲亚清真寺，作为胜利的象征。奥斯曼帝国政府现在处于索科卢无可争议的控制之下，立即开始大干特干起来。1571~1572年冬季，帝国造船厂得到扩建，完全重建了整个舰队，这个努力可以与海雷丁的伟业媲美。克里奇表示担忧，也许无法对船只进行适当的装配，索科卢给了他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帕夏，整个帝国的财富和力量都为你服务，如果需要的话，完全可以给你提供白银的船锚、丝绸的缆绳和锦缎的船

帆。不管你的舰队需要什么，只消提出来。”^[22]1572年春季，克里奇率领134艘战船大举出动；他们甚至还自己建造了8艘加莱赛战船，尽管他们一直没有掌握操纵它们的技术。舰队的重建如此神速，索科卢对威尼斯大使嘲讽了两国在塞浦路斯和勒班陀的相对损失：“我们从你们手中夺得塞浦路斯，就像砍掉了你们一只胳膊；你们打败了我们的舰队，就像割掉了我们的胡须。胳膊被砍掉就再也长不出来；胡须被剃掉却长得更快。”^[23]

神圣联盟几乎马上就开始土崩瓦解。它意识到了巩固胜利的重要性，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关于战利品的分配，各方发生了矛盾。次年春天，庇护五世去世了，没看到他的基督教事业的逐渐崩溃，也算是万幸。在1572年的作战季节，腓力二世把他的舰队留在墨西拿，让堂胡安无所事事地干等，因为他希望进攻北非，而不是在东方继续作战。尽管如此，科隆纳和威尼斯人还是派遣了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到希腊西海岸对抗土耳其人。但狡猾的克里奇绝不会让自己被敌人抓住，做了阿里帕夏当初应当做的事情：把舰船停在安全的锚地，让敌人白费力气。1573年，堂胡安至少是开往马格里布，收复了突尼斯，但此时威尼斯已经支撑不下去了。1573年3月，威尼斯人和塞利姆二世单独媾和，以非常不利的条件向苏丹割地赔款。腓力二世听到这消息时，“嘴唇充满讽刺意味地动了一动”^[24]。然后他暗自微笑。他就这么轻松地摆脱了神圣联盟的开支负担，以及惹是生非的威尼斯人，而且联盟的解体完全不会怪罪到他头上来。火冒三丈的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将威尼斯大使从房间里赶了出去。1574年，甚至堂胡安在突尼斯的胜利也成了泡影。克里奇·阿里率领一支比勒班陀战役中双方都更强大的舰队，开往马格里布，把突尼斯夺了回去。他携带战俘，礼炮齐鸣地返回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在海上称霸的旧时光似乎又回来了。土耳其人在北非的势力非常强大；塞利姆二世对白海的统治权似乎完全恢复了。

现在，勒班陀战役曾在欧洲激起的热情已经大体被遗忘了，教皇于

1965年将当年缴获的奥斯曼帝国旗帜返还伊斯坦布尔。有些现代史学家倾向于把这场战役的意义看得不是那么重要。当年被认为是决定争夺世界中心的战争走向的经典海战现在已经不再被视为一场重大战役，甚至没有1500年前在同一片海域发生的亚克兴角战役^[25]那样重要，因为后者决定了罗马帝国的控制权；勒班陀的意义也比不上萨拉米斯海战^[26]，因为萨拉米斯海战打断了波斯向希腊的进军。在现代，勒班陀战役被认为是“没了下文的胜利”，在基督教方面是个侥幸的成功，在奥斯曼帝国则被认为是很快就克服了的小挫折。就像当年的战场一样，勒班陀战役似乎已经被时间和大海吞噬了。

但这种观点低估了16世纪中叶基督教世界的恐惧心态，以及暂时胜利在物质和心理上带来的影响。1573年8月，克里奇·阿里远征突尼斯凯旋，进入金角湾时旌旗招展，将俘虏示众，鸣响礼炮向苏丹致意，夜间这座伟大城市的海岸被一圈火炬照得通亮。站在岸边观看这盛景的人绝不会想到，勒班陀已经敲响了奥斯曼帝国海上胜利的丧钟，也不会想到，克里奇将是海雷丁之后的最后一位伟大海盗。1580年，腓力二世与苏丹签订了和约，一下子就给两个帝国争夺地中海的宏伟战争画上了句号。和约是用人们熟知的奥斯曼帝国公文的庄严言辞写成的，在威严风度上没有向任何人让步：

您的大使目前在我们的皇宫，向我们的皇帝和皇室司法部门呈送了一份请愿书。我们伟业中心的崇高门槛，我们的权力无限的帝国宫廷的确是大权在握的苏丹们的圣殿，也是本时代统治者的要塞。

贵方呈送了表达友谊和爱意的请愿书。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以及臣民的富足和安宁生活，您希望与我们的伟大皇帝缔结友谊。为了安排和平之架构，并设定协议的条件，我们秉持正义的帝国协定对以下事务做如下规定.....

在贵方诚恳坦率地向我方皇帝请愿之后，贵方所有在陆地和海上行丑恶之事的非正规部队和海盗应立即停止敌对活动，不得伤害受我方保护领土之臣民。贵方必须对这些非正规部队和海盗予以取缔，加以控制.....

贵方应坚持不懈地信守诺言，诚实行事，尊重停战协定的条件。我方也绝不会造成任何违背停战协定的事件。不论我方在海上的海军指挥官，我方的义勇船主（海盗）或者位于受我方保护领土之上的我方指挥官，都将接到我们的命令（这个命令受到全世界服从），你们的国家和来自你们国家的商人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和损失。

我们的伟大幸福的皇帝确已决定，现今应是繁荣昌盛的年代。同样，如果贵方的目标确实是和平和繁荣，以及达成协议、获得安全，请立即派遣人员到我们带来幸运的皇宫，告知贵方观点。我们的帝国协定将以此为基础制订。[\[27\]](#)

这读起来像是在宣布奥斯曼帝国取得了胜利；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帝国肯定是没有输。此时腓力二世的王室已经拖欠了大量债务，他的注意力也被分散到西方和北方——征服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正在提议中的对新教英格兰的入侵。与土耳其的和约确认将在地中海上在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之间设置一条固定的疆界。占领塞浦路斯之后，土耳其人几乎已经完全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尽管克里特还在威尼斯控制下。马耳他的失败和勒班陀的灾难打破了奥斯曼帝国进军罗马的希望。突尼斯被土耳其收复后，西班牙清楚地认识到，北非已经稳稳当当地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查理五世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梦想早已是明日黄花。在1580年，十字军东征的梦想彻底粉碎了；大型桨帆船的时代也画上了句号。两个海洋帝国打成了僵局。

但假如当初基督教世界没能赢得勒班陀战役，就必然会把整个地中海都输掉。战役结束一年之后，年迈的堂加西亚·德·托莱多还在为勒班陀战役的巨大风险而面色煞白。堂胡安在那场战役中着实是孤注一掷。堂加西亚知道，假如战役失败，将给基督教地中海的海岸地区带来灾难，尽管战役的结局很辉煌，但胜利实在是侥幸所致。如果战役失败，又没了可供防御作战的舰队，地中海的所有主要岛屿——马耳他、克里特、巴利阿里群岛都将迅速落入敌手，这些岛屿是威尼斯的最后一道防线；然后，土耳其人就能够以这些岛屿为跳板，进攻意大利腹地，一直

打到罗马，也就是苏莱曼的最终目标。如果舒鲁奇·穆罕默德成功地消灭了威尼斯那一翼，如果重武装的加莱赛战船没能打乱阿里帕夏的中军，或者乌卢奇·阿里能够早一个小时穿透多里亚的战线，南欧的版图将与今天大相径庭。马耳他战役对奥斯曼人的遏制和勒班陀的胜利阻断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中心的扩张。1565~1571年的事件决定了现代地中海世界的疆域。

奥斯曼人虽然对这次失败不以为然，但损害已经是既成事实。自1402年蒙古征服者帖木儿在安卡拉打败土耳其军队以来，这是奥斯曼帝国蒙受的第一次军事灾难。基督教欧洲在心理上有了很大收获。在此之前，基督教世界根深蒂固地自认为军事上技不如人，因此习惯于对每次失败都听天由命。1571年秋季的热情爆发表明人们开始相信，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倾斜。塞万提斯借堂吉珂德之口表达出勒班陀的几个小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那一天.....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如此幸福，因为全世界都了解到，以前他们相信土耳其人在海上不可战胜，是多大的错误。”^[28]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争夺世界中心的战争不是以罗得岛战役发端，也不是以勒班陀战役结束的，但在1520~1580年，宗教热忱和帝国霸业合二为一，使得这场战争达到了可怕的强度，战争的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两个迥然不同时期的巅峰。这场战争的风格既是原始的，也是现代的：既有荷马史诗的青铜时代的人性本能的残暴，也有火炮武器的巨大破坏力。这一时期，查理五世和苏莱曼都相信他们在角逐全球的统治权。勒班陀战役及其后续事件却表明，即便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地中海也不值得去争斗了。用桨帆船无法轻松地赢得被密集陆地包围的地中海，不管可用的资源是多么取之不尽。双方都为了一份让人难以捉摸的奖品而加入一场极其昂贵的军备竞赛。这场战争严重消耗了双方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其惨烈程度是双方都不愿意承认的。塞浦路斯和勒班陀两场战役让土耳其人损失了超过8万名士兵；虽然土耳其人口众多，但技艺娴熟的

战士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达克斯主教目睹土耳其人自豪地成功重建的舰队时，并没有感到印象深刻：“我看见一支舰队离开这个港口，舰船全是新建的，用新鲜木材制成，桨手都是之前从未握过桨的新人，船上的火炮都是匆匆铸造而成的，好几门火炮是用被腐蚀和破烂的原料制成的，向导和水手都还是学徒，士兵们还因为上次战役而心惊胆寒……”^[29]就像西班牙人在杰尔巴岛战役之后的教训一样，海战的特殊条件使得专业人员显得特别重要，很难替换。1580年之后，土耳其渐渐对海上冒险失去了兴趣；奥斯曼舰队停泊在金角湾的平静水域，木制船体逐渐腐烂。巴巴罗萨的光辉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双方都很快遇到了经济困难。1575年，腓力二世拖欠了债务；1585年之后的岁月里，伊斯兰世界也受到了财政危机的困扰。花费巨大的海战和勒班陀战役之后重建舰队的庞大开支使得苏丹的帝国不得不大幅度增税。同时，美洲输入的大量金银开始以人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破坏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土耳其人有足够的资源在战争经济中超过任何竞争者，但无力保护自己的稳定、传统、自给自足的世界去抵御现代社会的更险恶的影响。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应对欧洲的物价上涨和黄金大量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1566年，也就是马耳他战役后的那一年，开罗的黄金铸币厂——奥斯曼帝国的唯一一所铸币厂——用来源有限的非洲黄金铸造货币，将金币贬值了30%。西班牙里亚尔银币成了奥斯曼帝国境内最受欢迎的货币，奥斯曼人根本无法铸造出与它等值的货币。发放给士兵们的银币越来越薄，当时一位奥斯曼帝国历史学家称，它们“薄得就像杏树叶，像露水珠一样毫无价值”^[30]。这些现象的冲击带来了物价上涨、物资短缺和本地制造业的逐渐衰败。基督教欧洲的出价更高，生产成本更低，于是将奥斯曼帝国的原材料和金银逐渐吸走。从16世纪末开始，全球化力量开始隐秘地摧残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力量基础。伊斯兰教世界与西方的关系都呈现出这样的模式。

1580年的和约承认了两个帝国和两个世界间的僵局。从这时起，横

贯整个地中海、从伊斯坦布尔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对角线状的疆界固定了下来。两个竞争者都把目光转向其他方向。土耳其人与波斯作战，再一次去迎接匈牙利和多瑙河的挑战；腓力二世则投入了大西洋的较量。吞并葡萄牙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西方，并颇具象征意义地将宫廷迁到里斯本，以面对一片更广阔的大海。他自己的勒班陀还没有到来——西班牙无敌舰队在布列颠海岸遭遇的海难，这次惨败也是由于西班牙人出航时间太晚的痼疾造成的。1580年之后的岁月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在地中海脱离了战斗，前者转向内部事务，后者则开始向外探索。

力量开始远离地中海。官僚机构过于集权化、坚信君权神授的土耳其人和哈布斯堡家族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出发的新教徒水手在积极进取的中产阶级资助下，乘坐坚固的帆船，开始从新大陆获取财富。桨帆船称霸的地中海变成了一潭死水，被新的帝国霸业绕过。地图绘制师皮里雷斯的生与死象征着奥斯曼帝国彻底丧失了转向外界和探索世界的机遇。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位姓名不详的地图绘制师在16世纪80年代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清晰地阐明了通往西印度群岛的新航线将带来的威胁：“这真是奇哉怪也，令人哀恸：一群肮脏的异教徒居然变得如此强大，可以从西方航向东方，抵御暴风和海上的灾害；而距印度的路程只有他们一半的奥斯曼帝国居然没有做任何征服印度的努力，尽管通往印度的航行能够带来数不胜数的好处，带回美好的财物和精美得无法描述、难以解释的奢侈品。”^[31]最终，西班牙也在全球竞争中落败了。

1580年之后的岁月里，海盗们也抛弃了苏丹的事业，开始自行在马格里布的荒芜海岸沿线杀人越货。地中海还将面临两百年的海盗肆虐，几百万白奴将在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的奴隶市场上出售。一直到1815年，也就是滑铁卢战役的那一年，还有158人被海盗从撒丁岛劫走；最终解除海盗威胁的是来自新大陆的美国人。威尼斯和土耳其被永远封锁在没有潮涌的地中海上，继续争夺希腊海岸，一直到1719年。但世界霸

权早已转移到了别处。

[1]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443

[2] Pastor, Louis, *Histoire des Papes*, vols.17-18, Paris, 1935, vol.18, p.298

[3]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 Madrid, 1843, p.258

[4] 指1805年10月21日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爆发的大海战：霍雷肖·纳尔逊指挥的英国海军彻底击败拿破仑的法国海军。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锐尽丧，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巩固。

[5] 他在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死后继承了英格兰王位，称詹姆斯一世。

[6] *Othello*, Act I, Scene 3, line 50

[7]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的画家，和提香、委罗内塞并称为威尼斯画派的“三杰”。

[8] 乔尔乔·瓦萨里（1511～157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和建筑师，以传记《艺苑名人传》留名后世。他在美术史研究上的建树大于他的创作，所著《艺苑名人传》长达百万言，书中第一次正式使用“文艺复兴”一词，并提出可按14、15、16世纪划分美术发展的阶段，对后来的艺术理论研究影响很大。

[9] 安德里亚·维琴蒂诺（1542～1617），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画家，曾与丁托列托合作。

[10] 保罗·委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

[11] Petrie, Sir Charles, *Don Juan of Austria*, London, 1967, p.192

[12]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270

[13]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51

[1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68

[15]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428

[16] 穆斯塔法·赛兰尼克（? ~1600），奥斯曼帝国史学家，他的著作描绘了1563~1599年的奥斯曼帝国。

[17]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69

[18] 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Istanbul, 1993, p.190

[19]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p.182

[20] Hess, Andrew,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Place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57, Oxford, 1972, p.62

[21] Yildirim, Onur,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Impact on Otto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Mediterraneo in Armi*, ed.R.Cancila, Palermo, 2007, p.534

[22]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75

[23]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p.469

[2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93

[25] 公元前31年9月2日，在希腊亚克兴角附近的伊奥尼亚海域，马克·安东尼与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为一方，屋大维为另一方，展开争夺罗马霸权的决战。屋大维获得胜利，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统治者。

[26] 萨拉米斯海战发生在公元前480年，是希波战争的转折点。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湾大败波斯海军，从而赢得自马拉松战役以来雅典对波斯的又一次辉煌胜利，也奠定了此后一个世纪内雅典的海上霸权。

[27] Hess, Andrew,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Place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57, Oxford, 1972, p.64

[28] Cervantes, Miguel de,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Glasgow, 1871, p.138

[2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4, Philadelphia, 1984, p.1091

[30]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p.1195

[31] Soucek, Svat, *Piri Reis and Turkish Mapmaking After Columbus: The Khalili Por-tolan Atlas*, London, 1996, p.102

尾声：遗迹

1568年7月，在马耳他夏季的酷热中，让·德·拉·瓦莱特在树林里放鹰打猎一天之后骑马回家，在途中突发严重的中风。这位粗犷的老战士坚持了几周，在这段时间里释放了家中的奴隶，宽恕了他的敌人，将自己的灵魂完全托付给上帝。他的棺木被抬过比尔古（在攻防战结束后被改名为维洛里奥萨）的街道时，人们沉默地目送他离去。他的棺木被抬上一艘黑色桨帆船，运过港口。他被安葬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首都瓦莱塔（建在土耳其人曾经架设大炮的希伯拉斯山和圣艾尔摩堡的遗址之上）的胜利圣母教堂。他的墓冢装饰着一句拉丁文墓志铭，是由他的英格兰秘书奥利弗·斯塔基爵士撰写的：“享有永久荣誉的拉·瓦莱特在此长眠。他是惩罚非洲和亚洲的鞭子，欧洲的盾牌，他以神圣的武器驱逐野蛮人。他建立了这座蒙福的城市，是在此地安息的第一人。”^[1]

在他之后，大海战的其他参与者也逐个退场。1574年，塞利姆二世显然是因为尝试戒酒而头晕目眩，在浴室中失足摔死。失势的索科卢于1578年被刺死。乌卢奇·阿里于1587年死在一个希腊女奴怀中。乔万尼·安德烈亚·多里亚一直活到1606年，一直被人们怀疑在勒班陀战役中有懦夫行为。腓力二世的最后一份备忘录写于1598年。在意大利的一个平静角落，克雷焦镇的市政档案记录了这么一条：“1589年12月12日，弗朗西斯科·巴尔比·迪·克雷焦，一个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流浪诗人，一个始终被人们迫害、与幸运无缘的人，永远离开了他的家乡。”^[2]巴尔比曾参加了马耳他战役，并将自己的亲眼所见记录下来，献给了“最尊贵的奥地利的堂胡安大人”^[3]。他的著作是马耳他战役的重

要史料来源。

命运最凄惨的是堂胡安。他是如此渴望光荣和一顶自己的王冠。虽然他获得了勒班陀的胜利，谨慎的腓力二世也没给他多少赞誉。国王束缚了他的雄心，掐灭了他的梦想。最后，国王派遣他去佛兰德镇压荷兰人的起义。曾在甲板上跳嘉雅舞的风流倜傥的亲王于1578年在佛兰德染上了伤寒，再加上心灰意冷，最终离世。其他任何人的人生轨迹都没有他那么令人瞠目结舌，如同彗星一般耀眼地划过勒班陀的夜空，然后消失在了黑暗的大海。勒班陀战役仅仅两个月后，他对自己的命运做了悲哀的描述：“我的时间花在了建造空中楼阁上。但最后，所有的楼阁，和我自己，都随风消散。”^[4]用这句话作为这个血腥暴力的世纪里所有开拓帝国霸业的梦想家的墓志铭，倒是非常贴切。

地中海海岸到处是为纪念这些人和事而留下的遗迹。它们构成了美丽的背景，吸引了游客。威尼斯诸多要塞的阴森可怖的大门矗立依旧，门上的圣马可雄狮仍在警惕地注视远方。意大利南部海岬上还有瞭望塔的残迹。马耳他的巨大棱堡保留至今。被海盗劫去所有居民的小海湾上的荒村在松树荫下化为尘土。海岬岸边留存着生锈的大炮和堆放整齐的石弹。还有用来停放桨帆船的带穹顶的巨大船场。巴巴罗萨长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宏伟陵墓中，他的阴魂从那里能够观看油轮驶往黑海。塞浦路斯的财富被塞利姆二世用来建造埃迪尔内壮美的清真寺尖塔。图尔古特雷斯的家乡是土耳其海岸上的一个港口，它被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而卡拉布里亚的勒卡斯泰拉的人们已经原谅了叛教者乌卢奇·阿里，为他建了一座雕像。苏莱曼的陵墓就在他建造的宏伟的苏莱曼清真寺旁边，这座清真寺俯视金角湾和造船厂的地点。为了纪念法马古斯塔的烈士布拉加丁，威尼斯的圣约翰和圣保罗教堂内展出了一幅描绘他被剥皮的恐怖壁画。他的皮则回到了家乡。1580年，有人从伊斯坦布尔将它偷走，它现在就保存在布拉加丁纪念碑后方的墙壁中。

当时的印刷品和绘画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些人参与的战争的可怕强度。在图画中，大群奥斯曼近卫军士兵站在基督教堡垒前的堑壕内，他们的军帽上的鸵鸟羽饰像蛇的信子一样摇摆；身穿紧身上衣的基督教守军头戴钢盔、肩扛火绳枪；大炮轰鸣；烟柱装点了天空；舰队在海上互相冲撞，紧紧卡在一起，桅杆像森林一般，天空仿佛世界末日降临；快要淹死的人拼命喘气和挥手。但造就这一切的桨帆船——它们卸载士兵，袭击海岸，在震耳欲聋的鼓点和喇叭声中以新月队形前进——却很少成为艺术再现的对象，只在博物馆里留下了一些零星的战利品：带有阿拉伯文或者拉丁文写就的神名的褪色旗帜、船尾灯笼、武器和服装。这些船只全都被大海吞没了。



[1] Bradford, Ernie, *The Shield and the Sword: The Knights of St. John*, London 1972, p.173

[2]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 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7

[3]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 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p.5

[4]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p.260

鸣谢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读写能力的逐渐普及，我们对16世纪地中海的历史颇为了解。15世纪地中海世界的重大事件——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仅有少量简短的记述流传下来，而关于马耳他攻防战和勒班陀战役，以及本书描述的所有主要事件和人物，却有着为数众多、细节生动的史书、个人记述、小册子、歌谣、印刷品和报纸。它们用西欧的所有语言写成，供热衷猎奇的大众阅读。除了印刷材料的大爆发之外，还有几百万份备忘录、信件、秘密报告以及外交讯息对当时的事件进行记述，由这些事件的主要人物口述，然后由马德里、罗马、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的专业书记机关记录，并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传播。例如，有人指出，没有任何人阅读过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留下的全部信件。这位君主坐在他的书斋写字台前统治半个世界达四十二年之久，有时一个月里就能写下1200封信。考虑到文献的汗牛充栋，像本书这样简短而概括的著作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历代的学者，是他们贡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英勇地开掘了浩瀚文献的世界。我认为特别有价值的著作包括：16世纪地中海史学的开拓者Fernand Braudel的著作；Kenneth Setton妙不可言的四卷本《教廷与黎凡特》（*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它是原始材料的宝库；以及Ismail Danişmend的研究成果。在时代更近的学者中，我特别感激Stephen Spiteri，他的简明扼要的著作《大围攻》（*The Great Siege*）是1565年马耳他战役的所有资料的终极来源。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浮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人名地名的拼写形式。各种语言中对本书故事主人公名字的说法是大相径庭的。很多人物在故事

进程中改了名字（这一点特别让人糊涂），或者有多个绰号。奥斯曼人常常有重名，比如，在六年之间就有两位穆斯塔法统领苏丹的陆军。我尽可能把人名地名表达得清楚明晰，而不至于太冗长。在勒班陀（土耳其语称之为伊尼巴图）的奥斯曼海军司令的名字应当是穆安津扎德·阿里，但为了简便起见，我一直称他为阿里帕夏。总的来讲，我一般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即用人物的名字在他自己语言中的形式。例如，在马耳他死去的那个海盗在基督教方面的资料中一般被称为德拉古特。我使用了他的土耳其名字——图尔古特。另外，我把土耳其语的名字音译成了英语，以方便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比如Suluç变成了Shuluch（舒鲁奇），Oruç变成了Oruch（奥鲁奇），Çavus变成了Chaush（侍从官）。但我必须承认，我的音译只是大体接近土耳其语的发音，不算非常精确。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很多个人和组织给了我极大的帮助。首先要感谢Jonathan Jao和兰登书屋团队的热情支持和高度的专业素养。然后要感谢我的代理Andrew Lownie。在关于圣约翰骑士团及马耳他攻防战的方方面面，我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了位于伦敦克拉肯维尔（Clerkenwell）的圣约翰骑士团图书馆（www.sja.org.uk），这个极其优秀的图书馆对我帮助很大。我要感谢那里的图书馆员Pamela Willis。我要第二次向Stephen Spiteri博士道谢。他不仅在《大围攻》中准确地解释了三角堡的外形，还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他制作的圣艾尔摩堡的重建图。我要特别赞扬他的网站（www.fortress-explorer.org）上关于马耳他防御工事的各种资料。

很多朋友和旁观者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这个项目。Stan Ginn的建议使得本书的结构缺陷得到很大弥补。Elizabeth Manners和Stephen Scoffham审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John Dyson从伊斯坦布尔获取了很多书籍。Jan Crowley、Christopher Trillo、Annamaria Ferro和Andrew Kirby帮助我翻译资料。Henrietta Naish鼓励我有始有终，把全书

完成。Deborah Marshall-Warren在比尔古的广场上坐下喝咖啡，却被我驱赶着去寻找原始资料。对这些朋友，我都心怀感激。我还要再一次感谢Jan。不管身体健康还是不适，她都一直支持我从事写作这项奇怪的事业。这项事业的某些部分或许还可以忍受——比如游览威尼斯潟湖、马耳他的旖旎风光以及法马古斯塔的城墙——但在近距离观看写作的过程却是非常烦人的事情。最后，我要向我已经过世的父亲乔治·克劳利致敬。他对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地中海都非常熟悉。在我十岁的时候，他向我介绍了马耳他。要不是当初第一次瞥见地中海的那个神奇瞬间，这本书绝不会问世。

译名对照表

Acre 阿卡

Aguilar,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阿吉拉尔

Ahmet Pasha 艾哈迈德帕夏

Akbar 阿克巴

Alexandria 亚历山大港

Alhambra Palace 阿兰布拉宫

Ali Efendi 阿里·埃芬迪

Ali Pasha 阿里帕夏

Ali Portuch Bey 阿里·博尔图齐·贝伊

Ali the Karaman 卡拉曼人阿里（“刀疤脸”）

Alpujarras 阿尔普哈拉

Alticozzi, Muzio 穆西奥·阿尔提克齐

Amaral, Andrea D' 安德里亚·达玛拉尔

Anastagi, Vincenzo 温琴佐·阿纳斯塔吉

Andrada, Gil de 希尔·德·安德拉达

Andrea, Giovanni 乔万尼·安德烈亚

Antivari 安蒂瓦里

Apulia 阿普利亚

Atahualpa 阿塔瓦尔帕

Attanto, Josefi 约瑟菲·阿唐托

Aydin the Ligurian 利古里亚人艾登（“魔鬼猎手”）

Baglioni, Astorre 阿斯托雷·巴廖尼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Barbarigo, Agostino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

Barbaro, Marc'Antonio 马尔科·安东尼奥·巴尔巴罗

Barbarossa, Hayreddin (Hizir) 海雷丁·巴巴罗萨（赫兹尔）

Barbarossa, Oruch 巴巴罗萨·奥鲁奇

Barbary Coast 巴巴利海岸

basilisk 蜥炮

Baumgarten, Martin von 马丁·冯·鲍姆加登

Bazán, Álvaro de, Marquis of Santa Cruz阿尔瓦罗·德·巴桑，圣克鲁斯侯爵

Ben Davud, Mehmet (Philip Lascaris) 穆罕默德·本·达伍德（菲利普·拉斯卡里斯）

Beyazit贝亚兹德

Birgu比尔古

Bodrum/St Peter the Liberator博德鲁姆/“解放者圣彼得”要塞

Bollani, Bernardo贝尔纳多·博拉尼

bombard射石炮

Bône博恩

Bosio, Giacomo贾科莫·博西奥

Bosphorus博斯普鲁斯海峡

Bougie/Béjaïa贝贾亚

Bragadin, Marco Antonio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

brigantine双桅帆船

Budva布德瓦

Busbecq, Ogier Ghiselin de奥吉耶·吉斯林·德·比斯贝克

Caetani, Onorato奥诺拉托·卡埃塔尼

Calabria卡拉布里亚

Calepia, Lucretia卢克蕾西亚·卡莱皮亚

Calepio, Angelo安杰罗·卡莱皮奥

Candelissa坎德利萨

Cape Bianco比安科角

Cardenas, Don Bernardino de堂贝尔纳迪诺·德·卡德尼亚斯

Cassibile/Casibile卡西比莱

Castile卡斯蒂利亚

Cavalier骑士塔

caravel卡拉维尔帆船

carrack克拉克大帆船

Castile卡斯蒂利亚

Cervantes, Miguel de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Cetraro切特拉罗

Charles V查理五世（神圣罗马皇帝）

Charles IX查理九世（法国国王）

Civitavecchia奇维塔韦基亚

Colonna, Marc'Antonio 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

Comares, Marquis of 马雷斯侯爵

Comino 科米诺岛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ntarini, Bartolomeo 巴尔托洛梅奥·孔塔里尼

Contusio, Giambattista 詹巴蒂斯塔·孔图西奥

Corfu 科孚岛

Corgna, Ascanio della 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尼亚

Corinth, Gulf of 科林斯湾

Coron/Koroni 科罗尼

Corradino 科拉迪诺

Correggio, Francisco Balbi di 弗朗西斯科·巴尔比·迪·科雷焦

Cortés, Hernán 埃尔南·科尔特斯

Crac des Chevaliers 骑士堡

Curzolaris 库尔佐拉里斯

Dandolo, Nicolas 尼科洛·丹多洛

Dax 达克斯

De Rambouillet德·朗布耶

Deli Chelebi德利·切列比

Diedo, Girolamo吉罗拉莫·狄多

Djerba杰尔巴

Dodecanese多德卡尼斯群岛

Don Constantino堂康斯坦丁诺

Don Garcia Fernandez de la Piazza堂加西亚·费尔南德斯·德·拉·普拉萨

Doria, Andrea安德烈亚·多里亚

Doria, Giannetto詹奈托·多里亚

Du Chastelet杜·沙斯特莱

Dulcigno乌尔齐尼

Edirne埃迪尔内

Eguerras艾格拉斯

Elie the Corsican科西嘉人埃利

Elizabeth I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女王）

Espinosa埃斯皮诺萨

Famagusta法马古斯塔

Ferdinand I斐迪南一世（神圣罗马皇帝）

Finike菲尼凯

Forli, Pedro de佩德罗·德·福尔利

Formentera福门特拉岛

Fort Caroline卡洛琳堡

Fort St Angelo圣安杰洛堡

Fortuyn, Ramon拉蒙·福尔廷

Franche-Comté弗朗什-孔泰

Fran11ois I弗朗索瓦一世（英语：Francis I）

fustes弗斯特战船

Galata加拉塔

galleass加莱赛战船

Galleon盖伦帆船

Galley桨帆船

Gallipoli加里波利

Garcia de Toledo, Don堂加西亚·德·托莱多（即García Álvarez de Toledo, 4th Marquis of Villafranca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比耶尔索自由镇四世侯爵）

Giglio吉廖岛

Giovio, Paolo保罗·乔维奥

Girolamo of Gravina格拉维纳的吉罗拉莫

Giustiniani, Pietro彼得罗·朱斯蒂尼亚尼

Golden Horn 金角湾

Gomenizza伊古迈尼察

Gonzaga, Julia, Countess of Fondi丰迪伯爵夫人朱莉娅·贡扎戈

Goya, Francisco弗朗西斯科·戈雅

Gozo戈佐岛

Granada格拉纳达

Grand Harbour大港

Granvelle, Antoine Perrenot de安托万·佩勒诺·德·格朗韦勒

Gregory XIII格列高利十三世（教皇）

Haëdo, Diego迭戈·阿埃多

Habsburgs哈布斯堡家族

Haji Aga哈只·阿迦

Hattin哈丁

Henry II亨利二世

Henry VIII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

Huma胡玛

Hürrem/Roxelana许蕾姆/罗克塞拉娜

Ibn Khaldun伊本·赫勒敦

Ibrahim Pasha易卜拉欣帕夏

İbrahim Peçevi易卜拉欣·波切维

Imperiale, David大卫·因佩里亚莱

Ischia伊斯基亚岛

Ismail I伊斯玛仪一世

Ivan the Terrible伊凡雷帝

Janissary土耳其近卫军

Juan, Don堂胡安

Katip Chelebi卡迪布·切莱比

Kara Deli卡拉·德利

Kara Hodja卡拉·霍加

Kefalonia凯法利尼亚

Knights Hospitaller/Knights of St John/Order of St John圣约翰骑士团/
医院骑士团

Köszeg克塞格

Kubat库巴特

Kyrenia凯里尼亚

La Bailadora, Maria舞女马利亚

La Cerda, Juan de胡安·德·拉·塞尔达

La Gardampe拉·加登普

La Goletta拉格莱塔

La Rivière拉·里维埃

La Spezia拉斯佩齐亚

La Valette, Jean Parisot de让·帕里索·德·拉·瓦莱特

Lala Mustapha Pasha拉拉·穆斯塔法帕夏

Lanfreducci,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兰弗雷杜齐

Lefkara莱夫卡拉

Lemessos利马索尔

Leo X利奥十世

Lepanto勒班陀

Lesbos莱斯波斯岛

Lipari利帕里岛

L'Isle-Adam, Philippe Villiers de 菲利普·维里耶·德·李尔—亚当

López de Gómara,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

Maghreb马格里布

Mahon 马翁

Majorca马略卡岛

Malaspina, Vespasiano 韦斯帕夏诺·马拉皮斯纳

Mansell, Henry 亨利·曼赛尔

Marsa 马尔萨

Marsamxett 马萨姆谢特

Marsaxlokk 马尔萨什洛克

Martinengo, Nestor 涅斯托尔·马丁嫩戈

Mas, Colonel 马斯上校

Maurand, Jérôme 热罗姆·莫朗

Mdina 姆迪纳

Medrano 梅德拉诺

Mehmet II穆罕默德二世

Mehmet Bey穆罕默德贝伊

Mellieħa梅列哈

Mezquita, Pedro佩德罗·梅斯基塔

Mihrmah/Mihrimah米赫里马赫

Minorca梅诺卡岛

Miranda米兰达

Modon莫东

Mohács莫哈奇

Moncada, Hugo de乌戈·德·蒙卡达

Monemvasia莫奈姆瓦夏

Monserrat, Melchior de梅尔希奥·德·蒙塞拉特

(Al) Morez莫雷兹

Morgan Joseph约瑟夫·摩根

Morisco摩里斯科人

Müezzinzade Ali Pasha穆安津扎德·阿里帕夏

Muley Hasan穆莱·哈桑

Muñatones, Andreas 安德雷亚斯·穆尼亚东内斯

Muñoz, Martin 马丁·穆尼奥斯

Murat III 穆拉德三世

Mustapha, Bektashi 贝克塔西·穆斯塔法

Mustapha, Mehmet Ben 穆罕默德·本·穆斯塔法

Mustapha Pasha 穆斯塔法帕夏

Naplion 纳夫普利翁

Negroponte 内格罗蓬特

Nicosia 尼科西亚

Oran 奥兰

Otranto 奥特朗托

pallandaries 平底船

Palma 帕尔马（位于马略卡岛）

Paphos 帕福斯

Parmigianino, Francesco 弗兰西斯科·帕尔米贾尼诺

Patmos 帕特摩斯岛

Patras, Gulf of 帕特雷湾

Pecchevi, Ibrahim易卜拉欣·波切维

Penna潘纳

peñón岛屿要塞

Peñon de Veléz贝莱斯岛屿要塞

Peretti, Bartolome巴尔托洛梅·佩蕾蒂

Pertev Pasha佩尔特夫帕夏

Pesaro, Andrea安德烈亚·佩萨罗

Petromol佩特罗莫尔

Philip II腓力二世（西班牙国王）

Piri Pasha/Piri Reis/Hac Ahmed Muhiddin Piri 皮里帕夏/皮里雷斯/哈只·艾哈迈德·穆哈德因·皮里

Pius V/Michele Ghisleri庇护五世/米凯莱·吉斯莱里

Piyale Pasha皮雅利帕夏

Pizarro, Francisco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Podochatoro, Lodovico卢多维科·波多查托罗

Pommerols, Gabriel de加布里埃·德·波莫罗

Port'Ercole埃尔科莱港

Portuondo, Rodrigo de罗德里戈·德·波图翁多

Potosi波托西

Preveza普雷韦扎湾

Ptolemy托勒密

Puche, Lorenzo洛伦佐·普奇

Querini, Marco马尔科·奎里尼

Rambouillet, Cardinal De德·朗布耶红衣主教

Ramirez, Geronimo杰罗尼莫·拉米雷斯

ravelin三角堡

reconquista 光复运动

Requesens, Luis de路易斯·德·雷克森斯

Rethymno罗希姆诺

Rhodes罗得岛

Rialto里亚尔托

Robert of Eboli埃博利的罗伯特

Roberts, Sir Nicholas尼古拉斯·罗伯茨爵士

Robles, Marshal de马沙尔·德·罗夫莱斯

Romegas罗姆加

Saint Angelo圣安杰洛堡

Saint Elmo圣艾尔摩堡

Saint Michael圣米迦勒堡

Sala del Concistoro孔奇斯托罗厅

Salah Reis萨拉赫船长

Salazar, Don堂萨拉萨尔

Salerno萨莱诺

Salonica萨洛尼卡

Salvago, Raffael拉斐尔·萨尔瓦戈

San Lucido圣卢奇多

Sande, Don Álvaro de堂阿尔瓦罗·德·桑德

Sandoval, Prudencio de普鲁登希奥·德·桑多瓦尔

Sangorgio, Federico费德里克·桑乔其奥

Sanoguera, Francisco de弗朗西斯科·德·萨诺盖拉

Santa Margarita圣玛格丽特

Santorini圣托里尼岛

Sanuto, Marino (the Younger) 小马里诺·萨努多

Scetti, Aurelio奥雷利奥·谢蒂

Schepper, Cornelius de科尔内留斯·德·斯赫博尔

Sciberras希伯拉斯

Selim I塞利姆一世

Senglea森格莱阿

serpentine蛇炮

Shuluch Mehmet舒鲁奇·穆罕默德

Sinân, Koca Mi'mâr科查·米马尔·希南

Sinclitico, Nicolo尼科洛·欣克利提克

Skiathos斯基亚索斯岛

Skopelos斯科派洛斯岛

Skyros斯基罗斯岛

Sokollu Mehmed Pasha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

Soli Aga索利阿迦

Souda Bay苏达湾

Sperlunga斯佩尔隆加

St James圣雅各

Starkey, Sir Oliver 奥利弗·斯塔基爵士

Stromboli 斯特龙博利岛

Stukeley, Thomas 托马斯·斯蒂克利

Suleiman I 苏莱曼一世

Szigetvár 锡盖特堡

Tadini, Gabrielle 加布里埃利·塔蒂尼

Telamona 特拉莫纳

Tinos 蒂诺斯岛

Tintoretto 丁托列托

Tlemcen 特莱姆森

Toledo, García Álvarez de 加西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

Topkapi Palace 托普卡帕宫

Torres, Luis de 路易斯·德·托里斯

Trivulzio, Teodoro 特奥多罗·特里武尔奇奥（元帅）

Roxelana 罗克塞拉娜，即Hürrem 许蕾姆

Talamone 塔拉莫内

Toulon 土伦

Trapani特拉帕尼

Trivulzio, Teodoro特奥多罗·特里武尔奇奥

Turgut/Dragut图尔古特/德拉古特

Uluch Ali/Uluç Ali乌卢奇·阿里

Valencia巴伦西亚

Valetta瓦莱塔

Valois, House of瓦卢瓦王室

Vargas, Martin de马丁·德·巴尔加斯

Venier, Sebastiano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

Venusta, Federico费德里科·韦努斯塔

Vermeyen, Jan扬·维尔摩恩

Villaviciosa比利亚维西奥萨

Visconti, Thomas托马斯·维斯孔蒂

Vlissingen弗利辛恩

Volcanello武尔卡奈罗岛

Zane, Girolamo吉罗拉莫·扎内

Zara扎拉

参考文献

Achard, Paul, *La Vie Extraordinaire des Frères Barberousse*, Paris, 1939

Anderson, R.C.,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 1952

Attard, Joseph, *The Knights of Malta, Malta*, 1992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Ernie Bradford, London, 2003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Henry Alexander Balbi, Copenhagen, 1961

Barkan, Omer Lutfi, “L’Empire Ottoman face au monde chrétien au lendemain de Lépante” in Benzoni

Beeching, Jack, *The Galleys at Lepanto*, London, 1982

Belachemi, Jean-Louis, *Nous les Frères Barberousse, corsaires et rois d’Alger*, Paris, 1984

Benzoni, Gino, *Il Mediterraneo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500 alla luce di Lepanto*, Florence, 1974

Bicheno, Hugh,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4

Bonello, G., “An Overlooked Eyewitness’s Account of the Great Siege” in *Melitensium Amor, Festschrifi in Honour of Dun Gwann Azzopardi*, ed.T Cords, T.Freller, and L.Bugeja, pp.133—48, Malta, 2002

Bosio, G, , *Dell’istoria della sacra religione et illustrissimia militia di San Giovanni Gierosolimitano*, vols.2 and 3, Rome, 1594—1602

Bostan, Idris, *Kürekli ve relkenli Osmanh Gemileri*, Istanbul, 2005

Bourbon, J.de, “A brief relation of the siege and taking of the city of Rhodes”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by Richard Hakluyt, vol.5, Glasgow, 1904

Bradford, Ernie, *The Great Siege: Malta 1565*, London, 1999

Bradford, Ernle, *Mediterranean: Portrait of a Sea*, London, 1970

Bradford, Ernie, *The Shield and the Sword: The Knights of St.John*, London 1972

Bradford, Ernie, *The Sultan’s Admiral: The Life of Barbarossa*, London, 1969

Brandi, Karl, *The Emperor Charles V*, London, 1949

Brântome, P.de Bourdeille, Seigneur de, *Oeuvres complètes*,
ed.L.Lalanne, vol.3, Paris, 1864

Braudel, Fernand, “Bilan d’une bataille, ” in Benzoni

Braudel, Fern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Siân Reynolds, 2 vols., Berkeley, 1995

Bridge, Antony,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Scourge of Heaven*,
London, 1983

Brockman, Eric, *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
1969

Brummett, Palmira, *Ottoman Seapower and Levantin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Albany, 1994

Büyüktuğrul, Afif, “Preveze Deniz Muharebesine ilişkin gerçekler”
Beleten, vol.37, 1973

Caccin, P., and Angelo M., *Basilica of Saints John and Paul*,
Venice, 2004

Caetani, O., and Diedo, G.,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1571*,
Palermo, 1995

Caoursin, Will, and Afendy, Rhodgia,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sh
War with the Rhodians, Venetians, Egyptians, Persians and Other
Nations*, London, 1683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Cassar, George, ed. *The Great Siege 1565*, Malta, 2005

Cassola, A., *The 1565 Ottoman Malta Campaign Register*, Malta, 1988

Cassola, 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Malta, 1995

Cervantes, Miguel de,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Glasgow, 1871

Cirni, A.K, *Commentari d'Anton Francesco Czirni, Corso, ne quale se describe la Guerra ultima di Francia, la celebratione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il Soccorso d'Orano, l'Impresa del Pignone, e l'Historia dell'Assedio di Malta*, Rome, 1567

Clot, André,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e*, trans.Matthew J.Reisz, London, 2005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3, Madrid, 1843

Crowley, Roger,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2005

Danişmend, I.H., *Izahlı Osmanlı tarihi kronolojisi*, vol.2 Istanbul, 1948

Davis, R.C.,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London, 2003

Deny, Jean, and Laroche, Jane, “L’expédition en Provence de l’armée de Mer du Sultan Suleyman sous le Commandement de l’admiral Hayreddin Pacha, dit Barberousse (1543-1544)” *Turcica*, vol.1, Paris, 1969

Elliot, J.H.,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1990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1 vols., Leiden, 1960

Excerpta Cypria: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Cyprus, trans.Claude Delaval Cob-ham, Cambridge, 1908

Fernandez Duro, Cesareo, *Armada Española desde la Union de los Reims de Castilla y de Aragon*, vol.2, Madrid, 1896

Finkel, Caroline,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23*, London, 2005

Finlay, Robert, “Prophecy and Politics in Istanbul: Charles V, Sultan Suleyman, and the Habsburg Embassy of 1533-1534” *Th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1998, vol.2

Fisher, Alan, “The Life and Family of Süleyman I” in *Süleyma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Fisher, Sir Godfrey, *Barbary Legend: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rica, 1415-1830*, Oxford, 1957

Fontanus, J., *De Bello Rhodio*, Rome, 1524

Friedman, Ellen G., *Spanish Captives in North Africa in the Early Modern Age*, London, 1983

Galea, J,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from a Turkish Point of View”
Melita His-torica IV Malta, 1965

Gazioğlu, Ahmet C., *The Turks in Cyprus: 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 London, 1990

Gentil de Vendosme, P., *Le Siège de Malte par les Turcs en 1565*, Paris, 1910

Ghiselin de Busbecq, Ogier, *The Turkish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Imperial Ambassador at Constantinople*, trans.Edward Seymour Forster, Oxford, 1927

Glete, Jan, *Warfare at Sea 1500-1650*, London, 2000

Goffman, Daniel,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02

Grove, A.T., and Rackham, Oliver, *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 An Ecological History*, London, 2001

Guglielmotti, P.Alberto, *Storia della Marina Pontificia*, vol.5, Rome, 1887

Guilmartin, John Francis, *Galleons and Galleys*, London, 2002
Guilmartin, John Francis, *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74

Guilmartin, John, “The Tactics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Clarified” at www.angelfire.com/ga4/guilmartin.com

Güleryüz, Ahmet, *Kadırgadan Kalyona Osmanlıda relken*,
Istanbul, 2004

Haëdo, Diego de, *Histoire des Rois d'Alger*, trans.H.de Grammont,
Saint-Denis, 1998

Hammer-Purgstall, J.,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vols.4—6,
Paris, 1836

Heers, Jacques, *The Barbary Corsairs: 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 1480-1580*, London, 2003

Hess, Andrew,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Place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57, Oxford, 1972

Hess, Andrew, “The Evolution of the Ottoman Seaborne Empire in
the Age of Oceanic Discoveries, 1453—152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 no.7 (December 1970)

Hess, Andrew, *The Forgotten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bero-African Frontier*, Chicago, 1978

Hess, Andrew, “The Ottoman Conquest of Egypt (1517)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 (1973)

Hill, Sir George, *A History of Cyprus, volume III: The Frankish
period, 1432-1571*, Cambridge, 1972

Housley, Norman, *The Later Crusades 1274-1571*, Oxford, 1992

Imber, Colin, “The Navy of Suleyman the Magnificent” in *Archivum*

Ottomanicum, VI (1980)

Imber, Col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tructure of Power*, Basingstoke, 2002
Inalcık, Halil, “Lepanto in the Ottoman Documents” in Benzoni

Inalcık, Halil,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1973

Inalcık, Halil, and Camal Kafadar, *Süleymân the Second and His Time*, Istanbul, 1993

Islam Ansiklopedisi, 28 vols., Istanbul, 1988

Jurien de La Gravière, Jean Pierre, *Doria et Barberousse*, Paris, 1886

Jurien de La Gravière, Jean Pierre, *La Guerre de Chypre et la Bataille de Lépante*, 2, vols., Paris, 1888

Jurien de La Gravière, Jean Pierre, *Les Chevaliers de Malte et la Marine de Philippe II*, 2 vols., Paris, 1887

Kamen, Henry, *Philip of Spain*, London, 1997

Kâtip Ç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J.Mitchell, London, 1831

Kunt, Metin, and Christine Woodhead, eds.,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and His Age*, Harlow, 1995

Lane, Frederic C.,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1973

Lesure, M., *Lépante, la Cris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72

Longworth, Philip, *The Rise and Fall of Venice*, London, 1974

López de Gómara, Francisco, *Cronica de los Barbarrojas*, in *Memorial Historico Español: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Opusculos y Antigüedades*, vol.6, Madrid, 1853

Luttrell, Anthony, *The Hospitallers of Rhodes and Their Mediterranean World*, Aldershot, 1992

Lynch, John, *Spain Under the Hapsburgs, vol 1: Empire and Absolutism 1516-1598*, Oxford, 1964

Mallett, M.E., and Hale, J.R.,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 Venice, c.1400 to 1617*, Cambridge, 1984

Mallia-Milanes, Victor, *Venice and Hospitaller Malta, 1530-1798: Aspects of a Relationship*, Malta 1992

Mantran, Robert, “L'écho de la bataille de Lépante a Constantinople” in Benzoni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aris, 1901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vols.3 and 4, New York, 1962

Merriman, Roger Bigelow,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520-156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44

- Morris, Jan, *The Venetian Empire: A Sea Voyage*, London, 1980
- Mulgan, Catherine, *The Renaissance Monarchies, 1469-1558*, Cambridge, 1998
- Necipoğlu, Gülru, “Ottoman-Hapsburg-Papal Rivalry” in *Süleyman I and His Time*, ed.Halil Inalcik and Cemal Kafadar, Istanbul, 1993
- Norwich, John Julius, *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 1982
- Parker, Geoffrey,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 London, 1998
- Parker, Geoffrey, *Philip II* , London, 1979
- Pastor, Louis, *Histoire des Papes*, vols.17-18, Paris, 1935
- Peçevi, Ibrahim, *Peçevi Tarihi*, vol.1, Ankara, 1981
- Petit, Édouard, *André Doria: un amiral condottiere au XVIe siècle (1466-1560)* , Paris, 1887
- Petrie, Sir Charles, *Don Juan of Austria*, London, 1967
- Phillips, Carla Rahn, “Navi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 *Naval Policy and Strategy in the Mediterrane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d.John B.Hattendorf, London, 2000
- Piri Reis, *Kitab-ı bahriye*, vols.1 and 2, ed.Ertuğrul Zekai Ökte, Ankara, 1988
- Porter, Whitworth, *The Knights of Malta*, 2 vols., London, 1883
- Prescott, W.H.,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Philip the Second, King of*

Spain, 3 vols., Boston, 1855—58

Pryor, John H.,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 1988

Rosell, Cayetano, *Historia del Combate Naval de Lepanto*, Madrid, 1853

Rossi, E., *Assedio e Conquista di Rodi nel 1522 secondo le relazioni edite e inedite de Turchi*, Rome, 1927

Sandoval, Fray Prudencio de, *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vols.2-4, Madrid, 1956

Scetti, Aurelio, *The Journal of Aurelio Scetti: A Florentine Galley Slave at Lepanto (1565-1577)*, trans.Luigi Monga, Tempe, Arizona, 200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s.2-4, Philadelphia, 1984

Seyyd Murad, *La Vita e la Storia di Ariadeno Barbarossa*, ed.G.Bonaffini, Palermo, 1993

Shaw, Stanford,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1, Cambridge, 1976

Sire, H.J.A., *The Knights of Malta*, London, 1994

Soucek, Svat, *Piri Reis and Turkish Mapmaking After Columbus: The Khalili Por-tolan Atlas*, London, 1996

Soucek, Svat, “The Rise of the Barbarossas in North Africa” in *Archivum Ot-tomanicum* 3, 1971

Spiteri, Stephen C., *The Great Siege: Knights vs.Turks MDLXV—Anatomy of a Hospitaller Victory*, Malta, 2005

Stirling-Maxwell, Sir William, *Don John of Austria*, vol.1, London, 1883

Testa, Carmel, *Romegas*, Malta, 2002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Tracy, James D.,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bridge, 2002

Turan, Şerafettin, “Lala Mustafa Paşa hakkında notlar” *Beletin* 22, 1958

Uzunçarşılı, İsmail Hakkı, *Osmanlı Tarihi, Vols.2 and 3*, Ankara, 1988

Vargas-Hidalgo, Rafael, *Guerra y diplomacia en el Mediterraneo: Correspondencia inédita de Felipe II con Andrea Doria y Juan Andrea Doria*, Madrid, 2002

Yildirim, Onur,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Its Impact on Otto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Mediterraneo in Armi*, ed.R.Cancila, Palermo, 2007

Zanon, Luigi Gigio, *La Galea Veneziana*, Venice, 2004

译后记

《1453》是我和“甲骨文”合作的第一本书。我也就这样走进了克劳利的海洋世界。

我陆续翻译了他的四本历史著作《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这于我而言是一段愉快的旅程。克劳利的作品不是学术前沿，也没有高深的理论，却是精彩绝伦的叙述史，也是大众读者了解历史的绝佳窗口。

对我来讲，翻译是非常难得的深度学习的机会。人都有惰性，读书的时候，不太明白的地方经常就略过了，不影响理解大意就行。翻译却不容许偷懒，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完全弄懂。要对读者负责，首先得对自己负责。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相继出版之后，得到许多读者的热情支持，同时也有许多读者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借这次精装版推出的机会，我重新审视和修改了自己的译文。修改历时近半年，我刻意做得很慢。首先是知识性错误的修正，比如将阿提拉的部族称为“匈奴”是不妥的，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改为“匈人”；其次，修正了少量译名，希望能在“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再次，修正了地图标示的一些瑕疵和少量错别字及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最后，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也是修改最多的，是删去冗字，

提高密度，希望做到更精炼。当然，新版本最终需要的是读者的检验。我衷心希望，在过去的四年里我的水平有所提高；新版本会是一个更好的版本，是给克劳利先生的一份新礼物，也是给读者朋友的新礼物。

最后衷心感谢“甲骨文”品牌直接参与克劳利作品编辑出版的编辑们，没有他们的悉心帮助与辛勤工作，这几本书在中国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陆大鹏

2017年7月，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
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精装珍藏版）

ISBN 978-7-5201-0792-1

I.①海... II.①罗...②陆... III.①地中海-海战-研究-中世纪
IV.①E19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1703号

海洋帝国

——地中海大决战

著者/（英）罗杰·克劳利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冯立君

责任编辑/段其刚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5.625 插页：1 字数：323千字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792-1

著作权合同 登记号/图字01-2017-5948号

定价/258.00元（全三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简介 /

陆大鹏，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武士女王》《恺撒：巨人的一生》《奥古斯都》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纽约时报》年度畅销图书

《经济学人》年度图书

在整个欧洲史中，没有任何故事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个世界争夺地中海的较量更令人热血沸腾……本书是讲述这个故事的经典之作。

——《华尔街日报》

克劳利的洞见极其精妙，描写波澜起伏。很少有一本书能如此鞭策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的评判。克劳利的《海洋帝国》是关于一个被人低估、常被忽视的主题的诚实记载，是一本罕见的奇书。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大手笔！准确捕捉了争夺世界中心的激烈斗争的宗教狂热、残暴和大浩劫。

——《科克斯书评》（星级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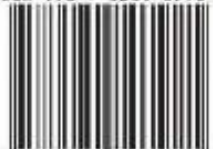
《海洋帝国》确立了克劳利地中海历史大师的地位……他渊博而引人入胜地描绘了奥斯曼海盗和十字军航海家，他对这些人的理解就像他们对海潮的精通一样。

——《文学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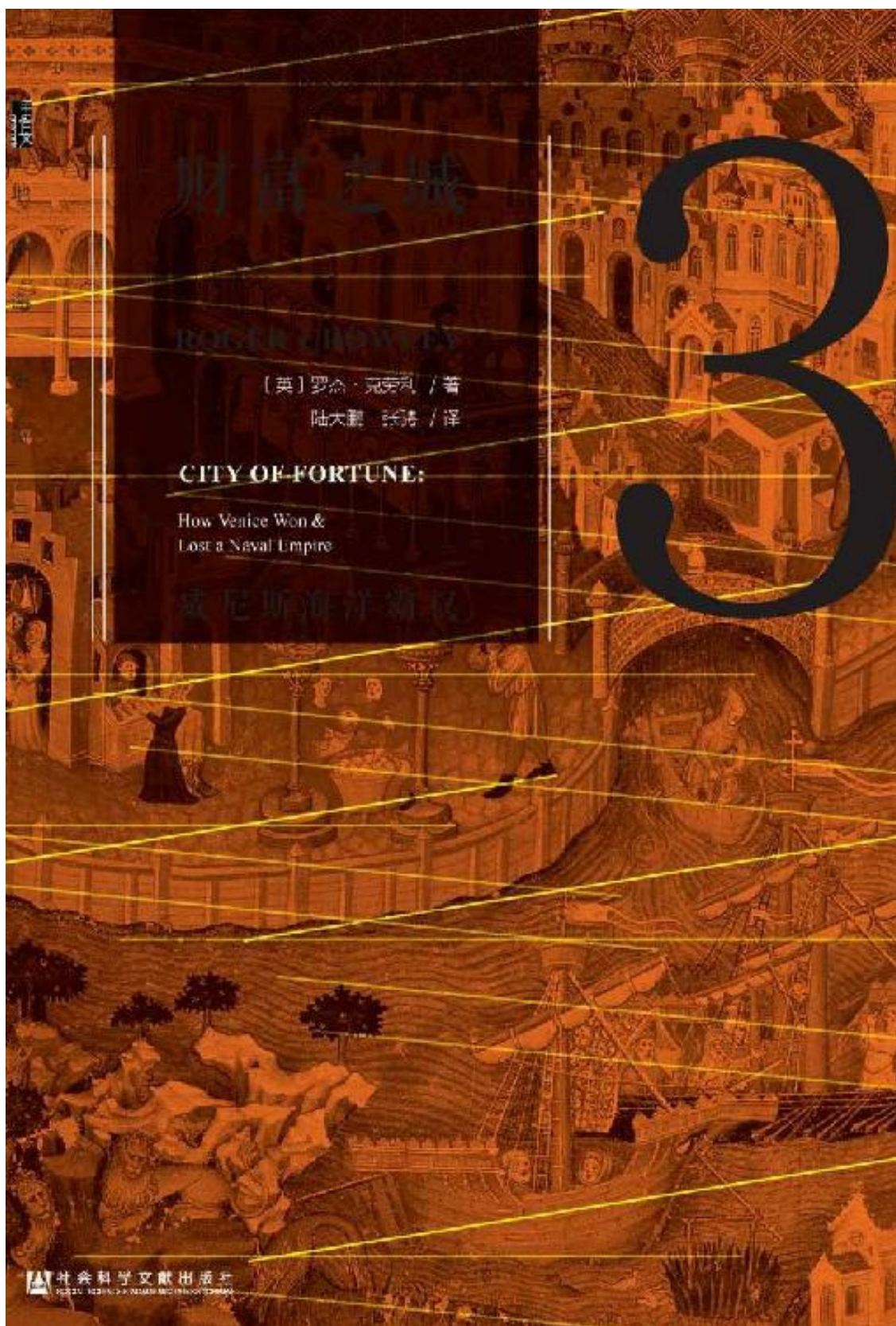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0792-1



9 787520 107921 >

定价：258.00 元（全三册）



财富之城

ROGER CROWLEY

【英】罗杰·克劳利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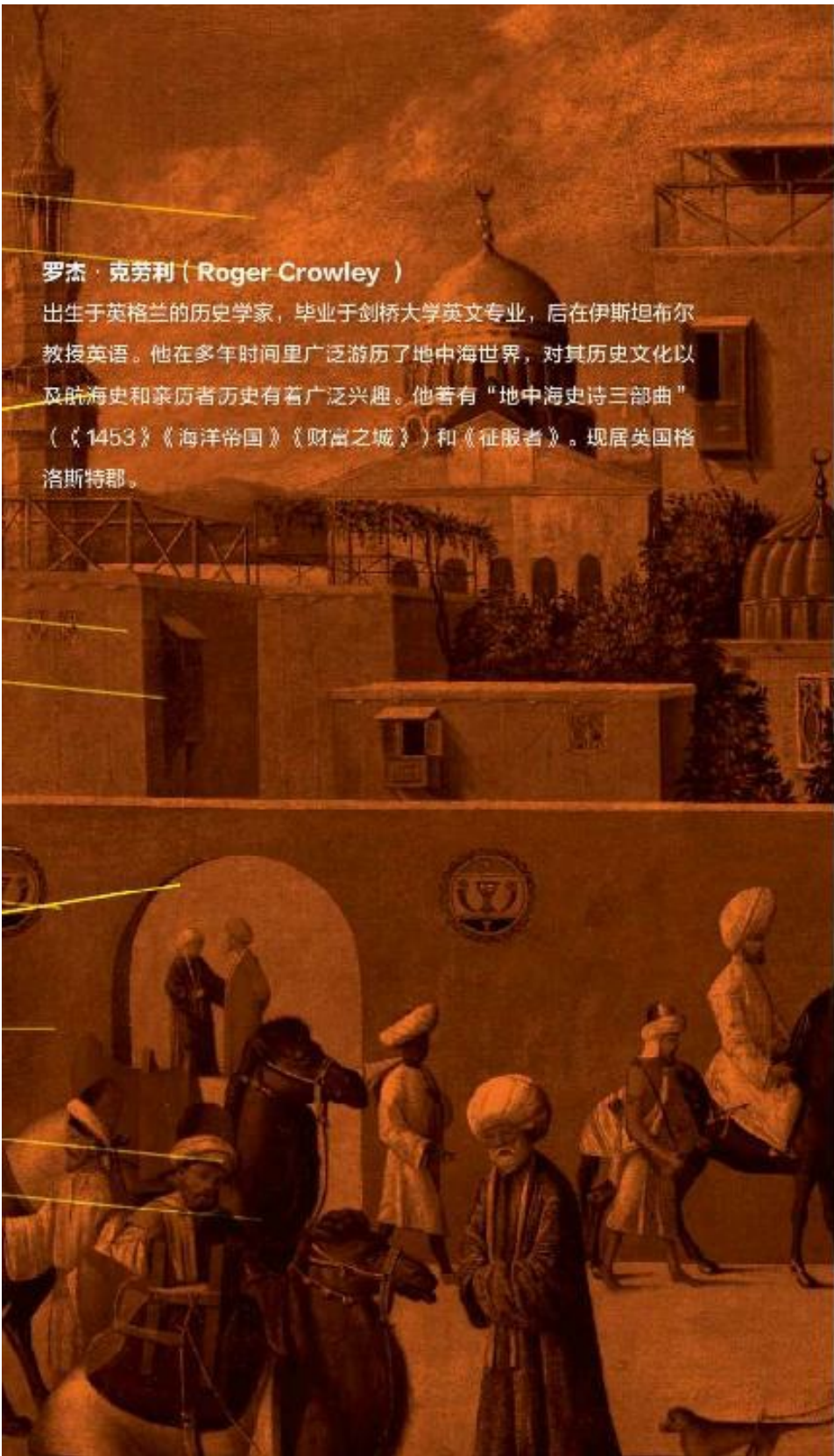
陆大鹏 张涛 / 译

CITY OF FORTUNE:

How Venice Won &
Lost a Naval Empire

威尼斯海洋霸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罗杰·克劳利 (Roger Crowley)

出生于英格兰的历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专业，后在伊斯坦布尔教授英语。他在多年时间里广泛游历了地中海世界，对其历史文化以及航海史和亲历者历史有着广泛兴趣。他著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和《征服者》。现居英国格洛斯特郡。

CITY OF FORTUNE: HOW VENICE WON AND LOST A NAVAL
EMPIRE

AUTHOR: ROGER CROW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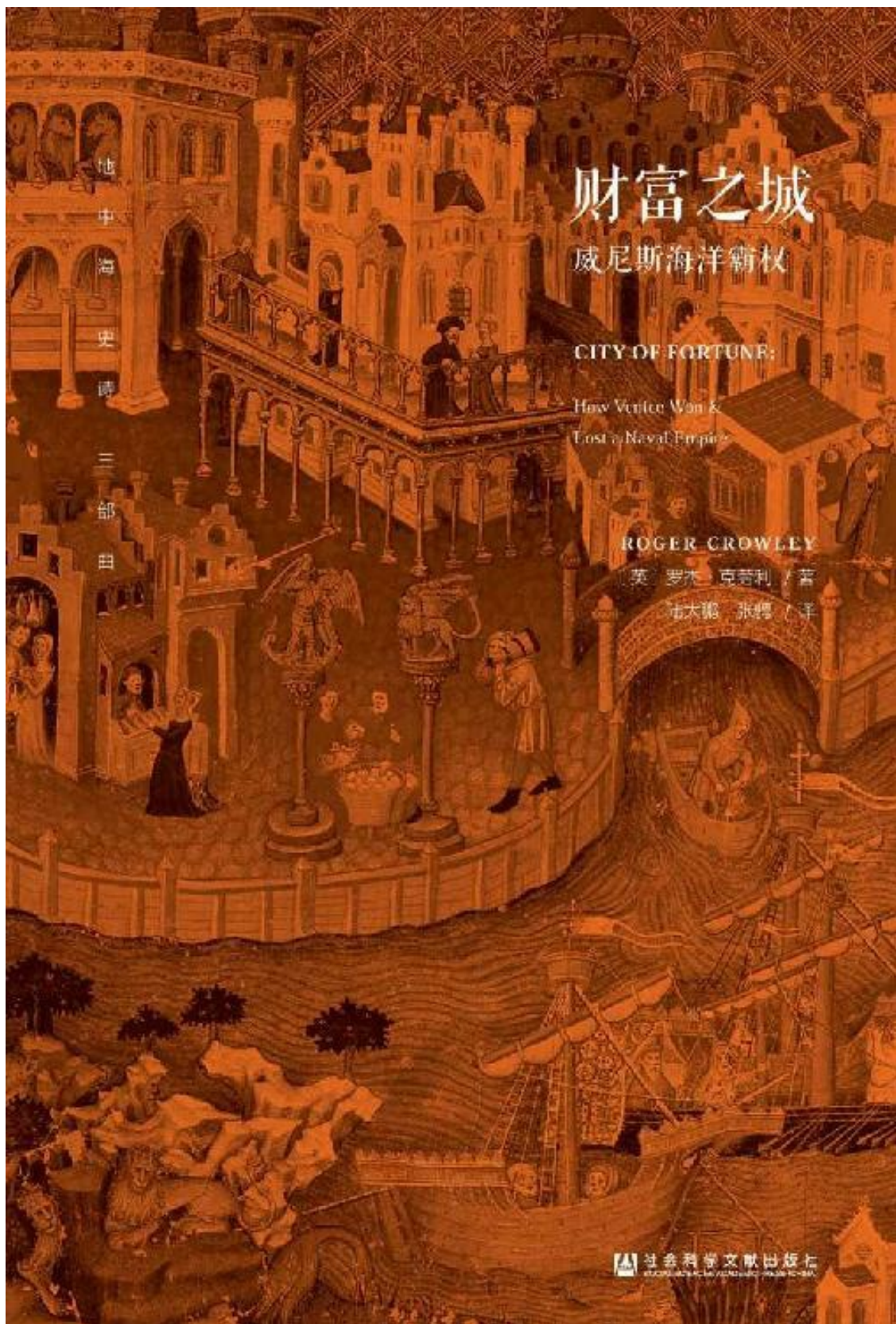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11 BY ROGER CROW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LOWNIE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地中海史博三部曲

财富之城

威尼斯海洋霸权

CITY OF FORTUNE:

How Venice Won &
Lost a Naval Empire

ROGER CROWLEY

英 罗杰·克劳利 / 著
陆大鹏 张娜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执政官宫殿，莫罗和圣马可湾，海平线上是遮蔽威尼斯的利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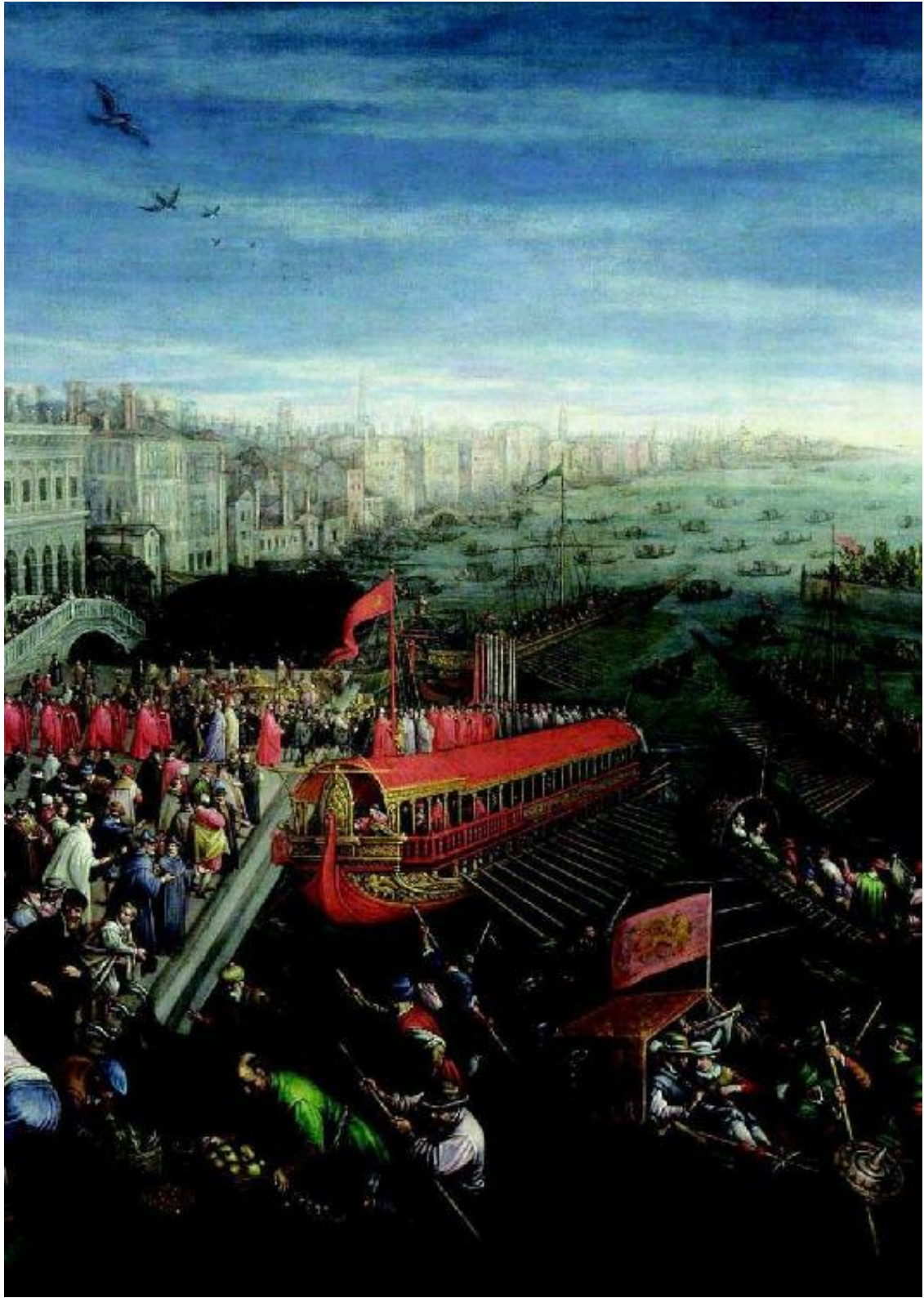
1204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历史上标志性的一刻，近四百年后由丁托列托绘制。



启程：乘客准备登上高侧舷的柯克船，这是威尼斯贸易的主要运载工具



归来：一艘快捷、细长而非常低矮的威尼斯军用桨帆船驶入港口。桨手们在卷起船帆。



耶稣升天节仪式。执政官登上金船。圣马可湾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



威尼斯，黄金之城。君士坦丁堡的青铜骏马被骄傲地展示于世人面前。商人们运来货物，进行交易。图的底部，马可·波罗启程前往远方。



兵工厂——“战争车间”的大门



兵工厂的木匠制作龙骨和桅杆、铺设船上的木板。完工的船体被干燥储存在后面的工棚内。



威尼斯海洋帝国的领地。罗维纽（今克罗地亚的罗维纽），威尼斯城的微型复制品，威尼斯据守此地达五百年。



莫东要塞（今希腊南部的迈索尼），共和国的“眼睛”，无价之宝。



在克里特岛干地亚（今伊拉克利翁）的海上要塞，守护着港口。



威尼斯帝国的标志——圣马可雄狮，在塞浦路斯岛法马古斯塔的海墙上。



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大马士革的马穆鲁克总督接见威尼斯大使



宗奇奥海战：洛雷丹和德·阿默的战船与巨大的奥斯曼战船（中）搏斗，烈火将它们全部吞没。

插图说明

- 1.圣马可湾
- 2.1204年占领君士坦丁堡，雅各布·丁托列托绘
- 3.维托雷·卡尔帕乔1498年所作的《埃特里乌斯与乌苏拉的会面及朝觐者的启程》细部
- 4.维托雷·卡尔帕乔约1490～1495年作的圣乌苏拉组图之一《大使返回英格兰宫廷》细部
- 5.斯基亚沃尼街、耶稣升天节和执政官乘坐金船启程，莱安德罗·巴萨诺·达尔·蓬特绘
- 6.15世纪的手稿：马可·波罗和父亲及叔叔从威尼斯前往忽必烈的宫廷
- 7.兵工厂的大门
- 8.木匠在威尼斯兵工厂建造船只
- 9.位于克罗地亚伊斯的利亚半岛的罗维纽
- 10.希腊南部，威尼斯人的要塞莫东（迈索尼）
- 11.威尼斯人在克里特岛干地亚（今伊拉克利翁）的港口要塞

12.位于塞浦路斯岛法马古斯塔的圣马可雄狮

13.詹蒂利·贝利尼流派的画作：威尼斯大使在大马士革的觐见

14.1499年，描绘宗奇奥海战的木刻画

彩图得到了如下人士和机构的授权：

Roger Crowley (1, 7, 12) , Palazzo Ducale, Venice, Italy/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2) , Galleria list of illustrations dell' Accademia, Venice, Italy/Cameraphoto Arte Venezia/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3) , akg-images/Cameraphoto (4) , The Art Archive/Academia BB AA S Fernando Madrid/Collection Dagli Orti (5) , IAM/akg/World History (6) , The Art Archive/ Private Collection/Gianni Dagli Orti (8) , Igor Karasi/Shutterstock Images (9) , Andreas G. Karelias/Shutterstock Images (10) , John Copland/ Shutterstock Images (11) , akg-images/Erich Lessing (13)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4)

《星期日电讯报》年度最佳图书 《金融时报》隆重推荐图书

关于威尼斯航海帝国的一部流畅的历史著作.....精彩的历史.....克劳利精心挑选和引用目击者的历史记述文献，给他生动流畅的叙述增加了额外的力度。

——博伊德·汤金，《独立报》

如今的威尼斯城处处可见往昔霸权的遗迹，罗杰·克劳利生动鲜明地重塑了它的残暴和辉煌，令人血脉贲张。

——薇拉·赖恩，《爱尔兰时报》年度好书

克劳利是一位神奇、思路明晰而令人着迷的作家，擅长描写围城战和军事行动，但同样擅长剖析威尼斯经济力量的实质。

——克里斯托弗·西尔维斯特，《每日邮报》

克劳利之前的几本书以晓畅和自信而著称，证明克劳利是目前最优秀的叙述历史学家之一。《财富之城》符合同样的高水准.....克劳利的叙述精练而激动人心。

——迈克尔·普罗杰，《金融时报》

可读性极强，知识极其渊博.....令人不忍释卷。

——亚历克斯·赛里尔，《爱尔兰观察家报》罗杰·克劳利以华兹华斯般的同情心记述了威尼斯昔日光荣的巅峰时刻，又加上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识和感染力极强的热情。

——威廉·麦克尼尔，《华尔街日报》

对威尼斯城的叙述，可读性极佳……娱乐性和知识性都很强，非常适合在地中海航行度假时阅读。

——约翰·乌尔，《乡村生活》

英国历史学家克劳利对威尼斯做了惊心动魄的叙述……一部激动人心的政治和军事史。

——《科克斯书评》

一部令人血脉贲张的传统风格的叙述，强调政治、战争和伟人。

——《出版商周刊》

通俗易懂，行文流畅，令人眼界大开——随身带着它吧！

——斯特拉·蒂里亚德，《每日电讯报》

威尼斯帝国的兴盛和衰落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故事，克劳利是这个故事的完美记录者。

——迈克尔·普洛格，《金融时报》

关于威尼斯如何在地中海东部开创了自己的海洋帝国，以及土耳其人如何一步步蚕食它的扣人心弦的故事。

——诺埃尔·马尔科姆，《星期日电讯报》年度最佳书

从1000到1500年，一段长达五个世纪威尼斯的绚丽、华美乐章。

——伊恩·芬利森，《泰晤士报》

克劳利用生动传神的笔调使海洋战争和围城战跃然纸上。

——《纽约时报》

充满趣味性而又细节丰富，同时技术娴熟地描绘了诸多生动的角色……克劳利的《财富之城》让阅读始终充满乐趣。

——克里斯托弗·哈特，《星期日泰晤士报》

从节奏、风格和流畅度上来说，这是一部描写其主题的绝佳作品。罗杰·克劳利的风格无可挑剔，再辅以其对威尼斯人的动机的完整把握——商业上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驱使着威尼斯人横穿瞬息万变的地中海。

——乔纳森·凯特斯，《文学评论》

威尼斯人在陆地上没有立足之地，也无法从事农耕。他们不得不从海上进口所有生活必需品。通过贸易，他们积累了如此惊人的财富。

——拉奥尼科斯·哈尔科孔蒂利斯，15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

中文版序

《1453》《海洋帝国》和《财富之城》这三本书互相关联，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部曲，叙述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读者可以从其中任意一本读起。这三本书涵盖的时间达四个世纪之久，从1200年到1600年，这是不同文明和互相竞争的各大帝国为了领土、宗教信仰和贸易控制而激烈地冲突的年代。这场冲突的参与者包括拜占庭帝国（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继承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们复兴了伊斯兰“圣战”的精神），以及西班牙的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朝。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从一个泥泞的潟湖崛起为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城市，宛如今人叹为观止的海市蜃楼，从水中呼啸而起。威尼斯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当年和今天一样，在异邦人眼中非同寻常、精彩纷呈。

在这个时期，各国为争夺地中海爆发了激烈战争。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各族群——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北非人和法兰西人——认为自己是在为争夺世界中心而战。但与真正的大洋相比，地中海其实是很小的。各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只有投石之遥，于是大海成了一个封闭的竞技场，大规模的厮杀就在这里上演。在这个年代，火药武器开始彻底地改变战争的面貌。大海是史诗般攻城战、血腥海战、海盗行径、人口劫掠、“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圣战”的场所，也是利润丰厚的贸易和思想交流的途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漫长而残酷的竞争从本三部曲涵盖的时期开始，将大海分裂为两个迥然不同的区域，双方沿着海上疆界进行了激烈较量。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9·11”事件之后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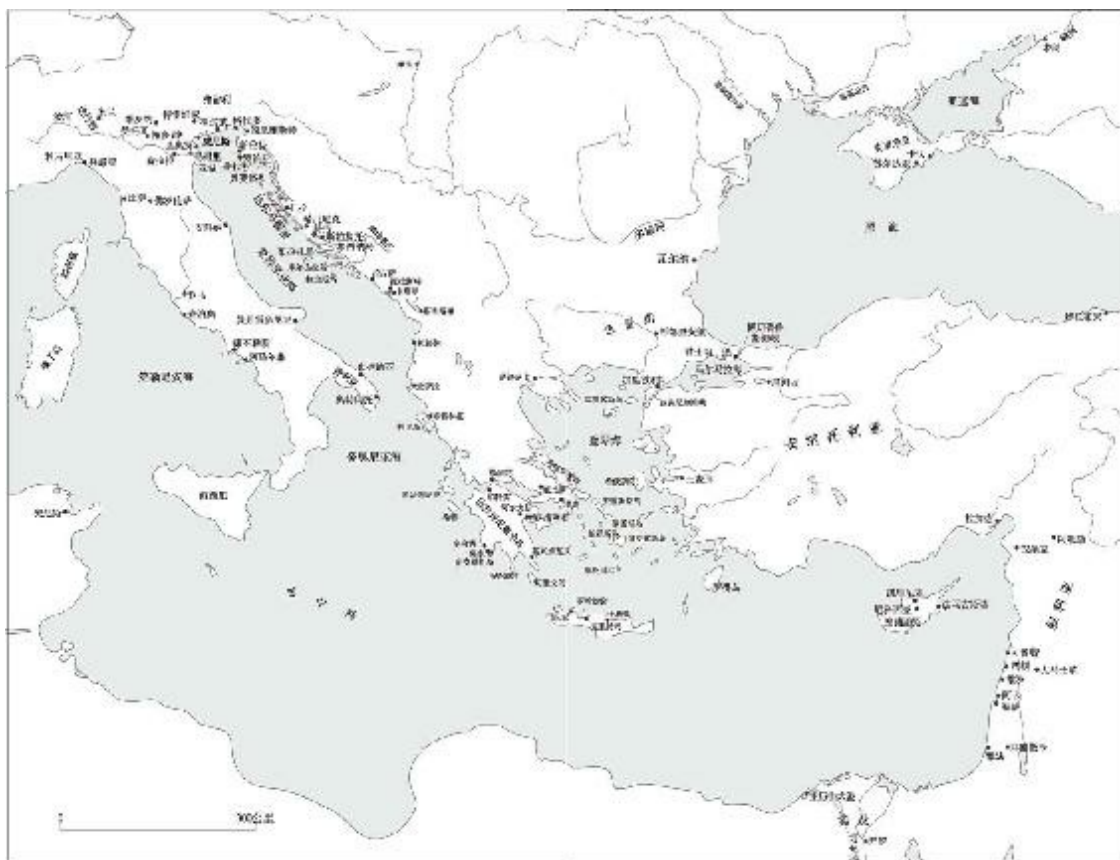
幸运的是，大量关于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目击资料留存至今，尤其是从大约1500年开始，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刺激了文字材料的爆炸式增长，所以我们得以感同身受地重温这段历史。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我们常常能够近距离观察当时的事件，审视那时的人们如何生活、死亡、战斗、从事贸易，以及礼拜上苍。我尽可能地引用当时人们自己的话，让他们为自己发言。

这三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场所”。在地中海地区，我们在游览威尼斯、伊斯坦布尔，或者克里特、西西里和塞浦路斯等大岛屿的时候，仍然能够触及过去。许多纪念建筑、城堡、宫殿和遗址依然完好。借用伟大的地中海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这片大海耐心地为我们重演过去的景象，将其放置在蓝天之下、厚土之上，我们能亲眼看见这天与地，它们如同很久以前一样。只消集中注意力思考片刻或者瞬间的白日梦，这个过去就栩栩如生地回来了。”^[1]我希望这三部曲能够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地中海历史以及那里发生的事件（它们至今影响着我们的世界）的重要意义，对其产生兴趣。

罗杰·克劳利

^[1]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 trans.Sian Reynolds, London,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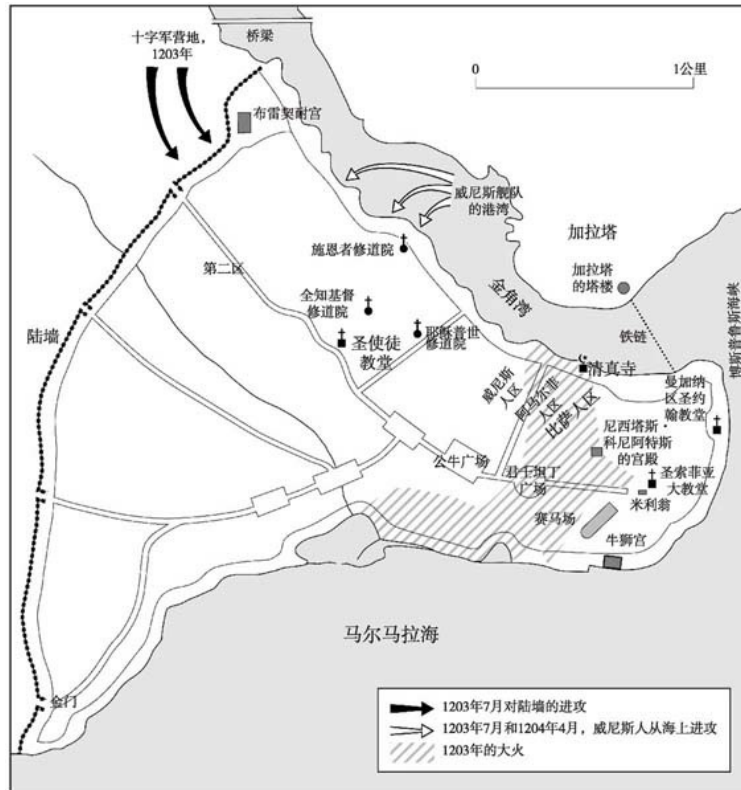
- [序幕：起航](#)
- [第一部 机遇：商人十字军](#)
 - [1.达尔马提亚领主](#)
 - [2.失明的执政官](#)
 - [3.三万四千马克](#)
 - [4.“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
 - [5.兵临城下](#)
 - [6.四位皇帝](#)
 - [7.“地狱的造孽”](#)
- [第二部 崛起：海洋的君主](#)
 - [8.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
 - [9.需求与供给](#)
 - [10.“在敌人的血盆大口中”](#)
 - [11.圣提多之旗](#)
 - [12.驯服圣马可](#)
 - [13.战斗到底](#)
 - [14.海洋帝国](#)
 - [15.“如同泉中水”](#)
 - [16.尼普顿之城](#)
- [第三部 月食：升起的月亮](#)
 - [17.玻璃球](#)
 - [18.基督教世界之盾](#)
 - [19.“如果内格罗蓬特沦陷”](#)
 - [20.火的金字塔](#)
 - [21.扼住威尼斯的咽喉](#)
- [结语：归程](#)
- [引文来源与参考文献](#)
- [鸣谢](#)
- [古今地名对照](#)
- [译名对照表](#)
- [译后记](#)



意大利与地中海东部，1000～1500年



1379年12月～1380年6月，基奥贾攻防战



1203~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君士坦丁堡

序幕：起航

1363年4月9日深夜，诗人及学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正伏案给一位朋友写信。这位文学大师的宅邸是威尼斯共和国馈赠的，气势恢宏，位于海滨，俯瞰圣马可湾。因此，他不用出门便可洞悉整个城市港口的喧嚣。彼特拉克写着信，竟打起盹儿来。突然，他被惊醒了。

外面一片漆黑。风雨交加。我有点累了……忽然听见水手的呼喊声。我之前有过这样的体验，因此知晓这喊声的含义，于是迅速起身，爬到房顶，这里可以纵览港口。天哪，太不可思议了！这景象既感人、奇妙、令人恐惧又振奋人心。港口的大理石码头处停泊着一些过冬的帆船，这些船和威尼斯城慷慨为我提供的房子差不多大，桅杆和广场的角楼一样高。恰在此刻，天空层云密布，星光模糊，疾风劲吹，墙面晃动，大海在怒吼、咆哮，最大的帆船起航了……

假如你亲眼所见，你肯定不会认为那是一艘船，而是游移在海面上的一座巨山。由于载货极重，船身很大一部分已浸入海水。这艘船朝顿河方向航行，因为我们的船在黑海最远也只能驶到顿河。但是对船上很大一部分人来说，顿河不是终点。他们会下船，继续前进，一直穿越恒河和高加索^[1]，抵达印度，然后继续前往最遥远的中国和东方的大洋。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人萌生了对财富的无尽欲望？我承认，我很同情这些不幸的人。我理解，为什么诗人总是用“悲惨”来形容水手的生活。^[2]



威尼斯的象征

彼特拉克不喜乘船，却对如此宏大的事业颇感敬畏。身为人文主义诗人，他亦对如此壮举背后的物质主义动机感到不安。对威尼斯人来说，这样的起航简直是家常便饭。在这样一个人人都会划船荡桨的城市里，登船起航——从陆地向海洋的跨越——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如同抬脚跨过自家门槛那般轻松。摆渡横跨大运河；刚朵拉小舟划向穆拉诺岛和托尔切洛岛；在诡异的潟湖^[3]中乘夜色漂流；全副武装的舰队在喧天号角声中开赴战场；按照季节定期驶向亚历山大港或贝鲁特的大型桨帆商船队——这些都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深刻且周而复始的体验。“起航”能够很好地诠释这座城市的生活，被艺术家们不厌其烦地呈现：在圣马可教堂的镶嵌画上，一艘船载着圣徒骸骨，扬帆去往威尼斯；卡尔帕乔^[4]画笔下的圣乌苏拉踩着踏板走上小划船，岸边待航的是一艘高侧舷的商船；加纳莱托^[5]捕捉到在威尼斯欢快起航的画面。

船只在出海前会举行盛大的仪式。所有船员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圣母和圣马可。水手们还会去利多的圣尼古拉教堂做最后的祷告，因为圣尼古拉也是他们钟爱和信赖的主保圣人。重大的航海活动之前都有宗教仪式，并按惯例为航船赐福。人群聚集在岸边，然后绳索被解开。15世纪前往圣地的朝觐者菲利克斯·法布里的起航发生在“晚餐之前；所有朝觐者登船待发，三张船帆顺风扬起，锣鼓喧天，号角争鸣，我们起航驶向外海”。^[6]一旦离开利多——即遮蔽潟湖内各岛屿的沙洲——船只就会进入外海，驶进另一个世界。

起航、冒险、利益、荣誉，这些是威尼斯人生活的指南。航海是他们周而复始的生活。近一千年里，他们没有别的生活方式。大海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机遇，决定他们的命运；隐蔽的水道和艰险的滩涂是天然的屏障，因此在浅浅的潟湖中很安全，没有入侵者能够进入这个地方。大海像裹在威尼斯人身上的长袍一样，纵使不能将他们与世隔绝，也能保护他们免遭亚得里亚海汹涌波涛的冲击。威尼斯方言将大海的性别由阳性（mare）改成了阴性（mar），威尼斯人在耶稣升天节这天和大海“成婚”。这是一种占有——“新娘”以及她所有的嫁妆成为“丈夫”的财产，但这也是一种安抚。海洋充满了危险与未知。它可能而且也的确摧毁过船只，引来敌人，也时不时漫过堤坝，威胁地势较低的城市。航海活动也可能因为箭矢、涨潮或者疾病而终止；裹尸布中的死者被坠上石头，投入浅海之中。人类与大海的关系是漫长、紧张而充满矛盾的；直到15世纪，威尼斯人才开始严肃认真地考虑，他们是否应该与陆地而非大海交好。威尼斯人原先不过是意大利北部流速缓慢的内陆河上捕捉鳗鱼的渔夫、采盐工人和驳船船夫，后来却崛起成为商业巨子和金币铸造者。这座脆弱的城市生存于纤弱的橡木桩之上，如同海市蜃楼，而大海给了它难以计量的财富，将之塑造成无与伦比的海洋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威尼斯影响了整个世界。

本书讲述的便是这个帝国，也就是威尼斯方言所谓的“海洋帝国”的雄起，也描写了它所创造的商业财富。十字军东征为其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提供了机会。威尼斯人紧紧抓住这次机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他们成了地中海东部的主宰者，并将自己的城市昵称为“宗主国”；当大海转而敌对他们时，他们打了一场令他们精疲力竭的后卫战，拼搏到最后一刻。当彼特拉克望向窗外时，威尼斯人建立起的帝国已经十分强大。这是一个奇异的帝国，它是由许多岛屿、港口以及战略要塞拼凑而成的，并且它们的组合仅仅是为了给航船提供港口、向威尼斯母邦输送货物。这个帝国的建立，是一个包含了勇气、欺骗、运气、坚持、机会主义以及周期性灾难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贸易的传奇。威尼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了进行买卖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国家。威尼斯人是地地道道的商人；他们以科学的精确性评估风险、计算收益和利润。绣着金红色狮子的圣马可旗帜在船的桅杆上飘扬，就像公司的标志一样富有象征性。商业是他们的创世神话，也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因此遭到很多更眷恋陆地的邻国的诟病。1343年，威尼斯请求教皇允许它与伊斯兰国家进行商业往来，这是对威尼斯城的存在理由和焦虑感的最佳描摹：

蒙上帝洪恩，在世界各地，商人通过辛勤劳动在陆地和海上开辟了航道，创造了财富，我们的城市因此得以茁壮成长。^[7]这就是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生活，因为没有了商业，我们不知道将如何生存。因此，我们在思想上必须十分警惕，并且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努力，以保证如此之多的财富和珍宝不会消失。

这晦暗的结尾反映了威尼斯人灵魂深处的狂躁忧郁。这座城市的财富不依赖任何触手可及的实物——它没有大片土地，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农产品，也没有很多人口。威尼斯脚下实际上没有坚固的土壤。威尼斯的生存依赖于脆弱的生态平衡。威尼斯可能是史上第一个事实上的经济体，它的生命力却让外界大惑不解。它从不收获粮食，而只获取黄金。威尼斯人始终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一旦他们的贸易路线被切断，整座宏伟的经济大厦就会瞬间崩塌。

起航的船只总会淡出视野、微缩成一个点，在码头送行的人也终会回归日常生活。水手重拾手头的工作；码头装卸工人举起大捆货物，或者滚动木桶；刚朵拉船夫继续划桨；教士们匆忙赶往下一场礼拜；穿黑袍的元老们继续处置国家大事；小偷带着赃物匆忙离开。船只乘风破浪，驶入亚得里亚海。

彼特拉克注视着，一直到什么都看不见。“当我再也看不到消失在黑暗中的船只时，便重新拿起笔，颇有感触，极受震动。”^[8]

但是，开创海洋帝国宏图霸业的，并非起航远去，而是一次抵达。一百六十年前，也就是1201年大斋节时，六名法兰西骑士乘坐划桨船穿过潟湖，来到了威尼斯。他们是为了十字军东征而来的。



[1] 原文如此，应为“一直穿越高加索和恒河”（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Petrarca, Francesco, *Lettere seni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vol. 1, trans. Giuseppe Francassetti, Florence, 1869, pp. 110-11

[3] 潟湖是一种因为海湾被沙洲所封闭而演变成的湖泊，所以一般都在海边。这些湖本来都是海湾，后来在海湾的出海口由于泥沙沉积，形成了沙洲，从而将海湾与海洋分隔，遂成为湖泊。

[4] 维托雷·卡尔帕乔（约1465～1525/1526），威尼斯画派的艺术家，曾师从真蒂莱·贝利尼。卡尔帕乔最有名的作品是关于圣乌苏拉传奇的九幅画作。他画风保守，受当时文艺复兴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影响很小。

[5] 即乔万尼·安东尼奥·卡纳尔（1697～1768），意大利画家，在英语世界通称加纳莱托。他的画作以描绘18世纪的威尼斯风光主题而闻名。他记录了大运河边的人家与作坊、赛舟会、圣马可广场的耶稣升天节庆典、一次雷击后圣马可广场钟楼维修的情形等城市景象。在一组奇想图中，他重组熟悉的威尼斯场景，创作出一座他想象的城市。他传神地捕捉了石头、水面的日光翳影，为后人留下了当时威尼斯日常生活的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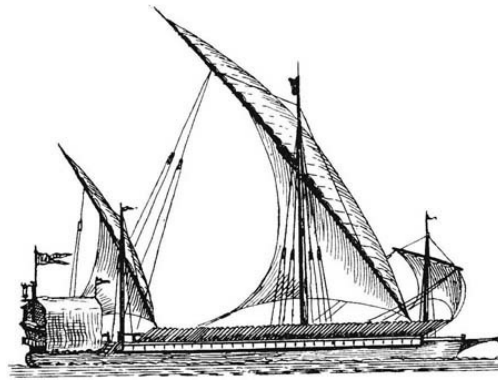
[6] Prescott, H. F. *Jerusalem Journey: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4, p. 56

[7] Howard, Deborah, *Venice and the East*, London, 2000, p. 15

[8] Petrarca, Francesco, *Lettere seni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vol. 1, trans. Giuseppe Francassetti, Florence, 1869, p. 111

第一部 机遇：商人十字军

1000～1204



1.达尔马提亚领主

1000~1198

亚得里亚海形似意大利版图，是一条逐渐变窄的水道，长约480英里，宽约100英里。其最南端，也就是亚得里亚海经科孚岛流入爱奥尼亚海的地方，宽度最小。在亚得里亚海的最北端，巨大而弯曲的海湾被命名为威尼斯湾，那里的海水呈现出不同寻常的蓝绿色。波河从遥远的阿尔卑斯山裹挟而来的沉积物在此堆积，形成了一大片壮观的潟湖和沼泽。这些冰川沉积物的数量十分庞大，以至于波河三角洲每年都会向海洋进逼15英尺。古老的亚得里亚港（亚得里亚海便得名于它）现在已经处于内陆，离海岸足有14英里之遥。

由于地质构造的缘故，亚得里亚海的两条海岸线截然不同。它西侧的意大利海岸是弯曲和低洼的沙滩，这样的地理条件不能形成优良的港口，却为潜在的侵略者提供了理想的登陆场。向东航行，航船将会碰到石灰岩。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海岸线的直线距离只有400英里，却犬牙交错地分布着许多避风港湾、锯齿状缺口、近海岛屿、礁石和浅滩，构成了全长2000英里、错综复杂的海岸。这里是天然的锚地，可以庇护一整支舰队或提供绝佳的伏击地点。在海岸的东侧，有的地段是沿海平原，再往东就是白色的石灰岩山脉；在有的地段，海岸东侧直接就是绵延群山，这些山脉将大海与巴尔干内陆隔开。亚得里亚海是两个世界的边界。

几千年来——从青铜时代早期到葡萄牙人绕过非洲——亚得里亚海这条断层线一直是连接中欧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高速公路，也是世界贸易的门户。载有来自阿拉伯、德意志、意大利、黑海、印度以及远东的货物的航船时常经过遮风挡雨的达尔马提亚海岸。许多世纪里，它们将

波罗的海的琥珀运送到图坦卡蒙^[1]的墓室；将蓝色的釉陶珠从迈锡尼运送到巨石阵；将康沃尔的锡送到黎凡特^[2]的熔炉；把马六甲的香料送到法兰西宫廷；把科茨沃尔德^[3]的羊毛运送到开罗商人手里。木材、奴隶、棉花、铜、武器、种子都经过这些海岸往来运送，各种各样的故事、发明以及思想也在往返航行中得到传播。“真是令人惊讶！”13世纪的一位阿拉伯旅行者在谈及莱茵河上的城市时说道，“这个地方在遥远的西方，却能找到一些本应只能在远东发现的香料——胡椒、姜、丁香、甘松、闭鞘姜和高良姜，这些商品在这里都有大量存货。”^[4]这些香料是途经亚得里亚海来到莱茵河畔的。亚得里亚海是数百条主干航线汇聚的地方。商人们用成群的骡子运货，从不列颠和北海南下到莱茵河，沿着常有人涉足的道路穿过条顿森林，越过阿尔卑斯山口，到达威尼斯湾北端，同时这里也是东方货物登陆的地方。在这里，商品被转运，港口也因此繁荣起来。最先兴起的是希腊人的城市亚得里亚，然后是罗马的阿奎莱亚，最后轮到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地理位置意味着一切：亚得里亚城被淤积的泥沙淹没；位于海岸平原上的阿奎莱亚在452年被匈人王阿提拉夷为平地；而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在这之后繁荣起来，是因为它处于敌人难以到达的位置。威尼斯那些低洼的泥泞小岛分布在瘴气弥漫的潟湖里，这些岛与大陆被几英里的浅水分隔开来。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将会成为世界贸易的转运站和世界文明的阐释者，亚得里亚海则是它的通行证。

从一开始，威尼斯人就与众不同。关于他们的最早史料是523年拜占庭使臣卡西奥多鲁斯的描述。他的描绘颇具田园风光，暗示着威尼斯人独特、独立而民主的生活方式：

你们拥有许多船……生活得像海鸟，四海为家。你们的房舍所在的土地完全依赖柳条和栅栏来维系。你们却毫不犹豫地用这脆弱的壁垒来对抗狂野的大海。你们的人民拥有一笔巨大的财富——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渔业资源；你们之间没有贫富差距；你们的食物是一样的，你们的房子也很相似。世界其他地方充斥着嫉妒，而你们却不会这样。你们将所有精力都

花在盐田上，你们的繁荣源自那里，让你们有能力去购买你们缺少的商品。尽管可能有的人对黄金的需求很小，但没人会不需要食盐。^[5]

威尼斯人已经成为其他人需求的供货商和运输商。他们的城市从水中拔地而起，像用魔法从沼泽中变出来的一样，建立在深陷烂泥的橡木桩构成的地基之上，似乎岌岌可危。这座城市在大海的变幻无常面前显得十分脆弱。除了潟湖的鲷鱼和鳗鱼以及盐场之外，这座城市什么都不生产——没有小麦和木材，肉类也很稀少。若是发生饥荒，这座城市将极其脆弱；它仅有的技能便是航海和运输货物，所以船只的质量极为重要。

威尼斯在成为世界奇观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它的社会结构很是神秘，它的策略也备受猜忌。没有土地，就没有封建制度，也就没有骑士与农奴间的严格区分。没有农业，金钱变成了交换手段。他们的贵族是巨商富贾，指挥舰队，计算利润精确到格罗索^[6]。生活的艰难使人们因为爱国之情而精诚团结，这种团结要求自律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平——就像一艘船的全体船员不分贵贱都要面对大海的危险一样。

地理位置、人民生计、政治组织以及宗教隶属使得威尼斯独一无二。威尼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陆地和海洋，东方与西方，但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它在成长的早期臣服于君士坦丁堡的说希腊语的皇帝，并且它的艺术、礼仪和贸易都源自拜占庭世界。然而，威尼斯人同时也是拉丁人和天主教徒，名义上臣服于被拜占庭视为“敌基督”的罗马教皇。威尼斯努力在两种对立势力之间维持自身的自由。威尼斯人也不断公然藐视教皇的权威。作为回应，教皇对整个威尼斯施以绝罚。威尼斯人反对暴政，建立了一个由执政官领导的共和国。执政官的权力受到很多制约：他不能从外国人那里收受价值超过一壶草药的礼物。威尼斯人不能容忍野心勃勃的贵族和落败的海军将领，这些人要么被放逐，要么被处死。威尼斯人还发明了一种投票机制来遏制腐败，这种投票机制

和潟湖中的航道一样复杂。

他们与外界关系的基调很早就已经建立起来。威尼斯人希望能在任何可以获取利润的地方公平地交易。这是他们的信条和教义，他们视其为特例，为之辩护。这让人们普遍觉得威尼斯人不值得信任。“他们说了很多，为自己辩护……但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7]在14世纪，一位教士目睹威尼斯共和国想方设法摆脱又一项条约之后如此说道（尽管他肯定很清楚地记得每个细节），“我只记得，他们自称是一个特例，既不属于教会，也不属于皇帝；既不属于海洋，也不属于大陆。”早在9世纪，威尼斯人就因为贩卖武器给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而与拜占庭皇帝和教皇发生了矛盾。约828年，教皇宣布禁止基督徒与伊斯兰世界开展贸易。威尼斯人自称遵守此项禁令，却成功地在穆斯林海关官员眼皮底下，把圣马可的遗骸藏在一桶猪肉里，从亚历山大港里偷了出来。他们标准的借口是商业需求：“因为有了商业，我们不知道将如何生存。”^[8]威尼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了经济目的而组成的国家。

到10世纪，他们已经在波河河畔帕维亚城的重要集市出售来自东方的珍稀货物：俄罗斯的貂皮、叙利亚的紫布、君士坦丁堡的丝绸。一位僧侣编年史家曾看到，查理曼大帝的侍从们身着从威尼斯商人手中购得的东方服饰，在他们的映衬下，查理曼大帝的衣饰看起来非常灰暗单调（尤其受到这位教士品头论足的是一件带有飞鸟图案的彩色衣服，在僧侣眼中，它显然是可憎的外国奢侈品）。威尼斯人还向穆斯林出售木材和奴隶——在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之前，这些奴隶都是斯拉夫人。威尼斯此时占据了亚得里亚海北端的有利位置，并且成了贸易中心。在千年之交的公元1000年耶稣升天节，威尼斯执政官彼得罗二世·奥西奥罗——“几乎超越威尼斯古代史上所有执政官”的伟人——起航远征。^[9]他将引领共和国走向财富、权力和海上荣耀。

在新时代的开端，这座城市处于危险和机遇之间，处境十分微妙。

在那时，威尼斯还不像后来那样密密麻麻地坐落着金碧辉煌的石质建筑，但已经拥有大量人口。在大运河的“S”形河弯处，富丽堂皇的宫殿还未兴建。充满奇迹、浮华和罪孽，以狂欢节面具和公共景观闻名的威尼斯城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才会出现。此时的威尼斯岸边还只有低矮的木屋、码头和仓库。威尼斯与其说是一个整体，不如说是由一系列相互分离的岛屿组成。各教区的定居点之间有若干未经排水处理的沼泽和空地，人们在那里种植蔬菜，养猪和牛，种植葡萄。后世气势恢宏的圣马可大教堂的前身——一座朴素的教堂——在前不久的政治动乱（这场风波导致一位执政官死在教堂门廊上）中被严重烧毁，后来得到修葺。教堂前的广场在当年还只是碾压过的泥土地面，有一条运河从中穿过，部分地域还是果园。曾去过叙利亚和埃及的远洋船只拥挤地停泊在这座城市的商业中心——里亚尔托。到处都能见到船桅从屋顶上高高伸出的景象。

天才的奥西奥罗心里很明白，威尼斯的发展，甚至它的生存，都要依靠潟湖以外更广阔的水域。他已经和君士坦丁堡签订了十分有利的贸易协定。而且，令热衷于宗教圣战的基督教世界憎恶的是，他又派遣大使去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与伊斯兰世界签订类似的协定。威尼斯的未来发展寄托在亚历山大港、叙利亚、君士坦丁堡以及北非的巴巴利^[10]海岸，在那里有更文明、更发达的社会，能够提供香料、丝绸、棉花和玻璃——威尼斯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将这些奢侈品转卖到意大利北部以及中欧。威尼斯水手们遇到的难题是，从亚得里亚海南下的航行很不安全。威尼斯的本土水域——威尼斯湾在其控制之中，但亚得里亚海中部海域是危险的无人地带，时常有克罗地亚海盗出没。自8世纪以来，这些斯拉夫定居者便从巴尔干北部来到这里，在亚得里亚海东侧的达尔马提亚海岸盘踞下来。这是海盗肆虐的理想海域。吃水较浅的克罗地亚船只可以从岛屿巢穴和小海湾中猛地杀出，劫掠通过海峡的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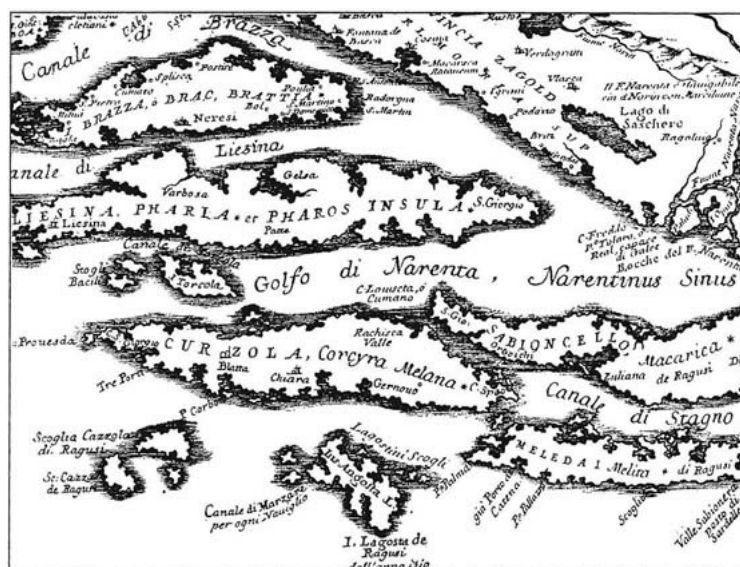
威尼斯与这些海盗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威尼斯在这

样的斗争中得到的只有战败和羞辱。一位执政官在指挥一次惩罚性远征时丧生；随后威尼斯人选择怯懦地支付贡金，以求能安全到达外海。现在，克罗地亚人开始向亚得里亚海更北方海岸的古老罗马城镇积极拓展自己的势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奥西奥罗提出了一项清晰明了的战略，这将是威尼斯共和国数百年历史中一贯的政策基石。威尼斯人必须能够自由通行亚得里亚海，否则他们将永远被封锁在本土海域。这位执政官拒绝再向海盗进贡，并准备组建一支庞大的舰队，以迫使海盗屈服。

奥西奥罗出征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这种仪式后来成为威尼斯历史的一大鲜明标志。一大群人聚集在城堡区圣彼得教堂（邻近今天的兵工厂）举行弥撒仪式。主教向执政官献上一面象征胜利的旗帜。那面旗帜上也许第一次描绘了圣马可的雄狮——在红色的背景上，金色雄狮作跃立状并扬起前爪，头戴王冠，背生双翼，两爪之间是一部打开的福音书，向世人宣示自己的和平善意，但同时也时刻准备着战斗。执政官和他的军队起程，乘着强劲的西风驶出了潟湖，进入波涛汹涌中的亚得里亚海。他们仅仅在格拉多稍事停留，以便接受当地主教的祝福，随后驶向亚得里亚海东端的伊斯的利亚半岛。

奥西奥罗的远征几乎可以算作后来威尼斯政策的模板：精明的外交手段，再加上恰到好处的武力。舰队南下，经过一系列滨海城市——从帕伦佐到普拉，从奥赛洛到扎拉，市民和主教们纷纷赶来向执政官表忠心，并用圣物为他祝福。也有人在摇摆不定，斟酌着威尼斯和斯拉夫人哪一方更不能得罪。奥西奥罗炫耀武力，让这些骑墙派拿定主意。克罗地亚人看到即将发生的战争不利于自己，于是想收买奥西奥罗。奥西奥罗心意已决，但海岸地形不利于他，他的任务变得愈发困难。海盗的大本营固若金汤，隐藏在沼泽丛生的纳伦塔河三角洲上，不在威尼斯舰队的有效攻击范围之内。三座岛屿——莱西纳、库尔佐拉和拉戈斯塔构成了海盗大本营的天然屏障，岛上坚若磐石的城堡是摆在威尼斯远征军面前的一道难关。

借助从当地人那里得到的情报，威尼斯人成功伏击了一艘载有纳伦塔贵族（他们之前在意大利海岸做生意，刚刚返回）的船只，并扣押他们为人质，迫使三角洲口的克罗地亚人投降。克罗地亚人发誓不再向威尼斯索要每年的贡金，并保证不再骚扰共和国的船只。只有近海的三个岛屿还在负隅顽抗。威尼斯人将其逐一孤立起来，并在它们的港口抛锚停泊。库尔佐拉遭到了猛烈攻击。而“常依靠武力将威尼斯商船洗劫一空”的拉戈斯塔的抵抗更顽强，当地人相信自己的岩石要塞是坚不可摧的。^[11]威尼斯人以毁天灭地的气势从城下发起冲击。在遭遇挫折之后，威尼斯人派出一支队伍从城堡背面的陡峭小径发起进攻，占领了掌握着要塞水源的塔楼。守军全面溃败。抵抗者被铐上锁链带走，海盗巢穴被捣毁了。



纳伦塔河及其屏障岛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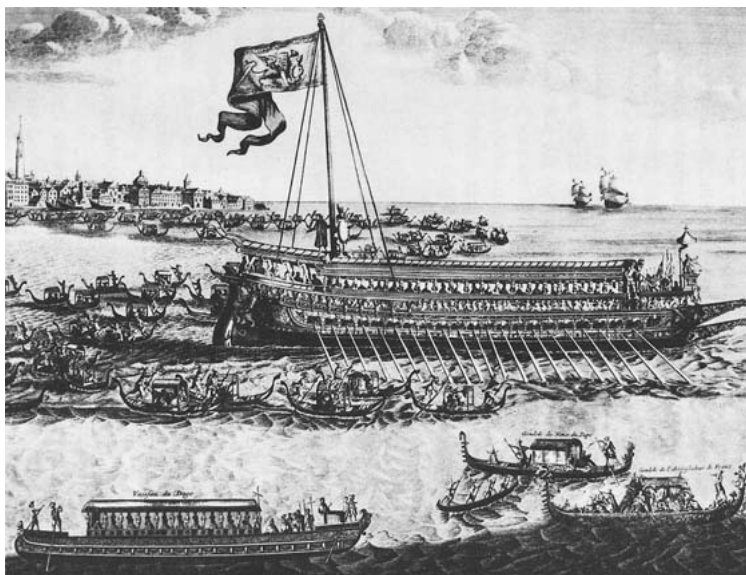
凭借这强大武力的震慑，奥西奥罗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威尼斯人的意图。为了防止任何臣属城市忘记最近发出的誓言，他又原路返回，向那些港口胆战心惊的人民炫耀自己的武力，将俘虏和缴获的战旗游街展示。“随后，他又再次经过上述城镇，最终光荣凯旋，回到威尼斯。”^[12]从此以后，执政官及其继任者们有了一个新的头衔——达尔马提亚领

主。

如果说有一个时刻标志着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崛起，那一定是这一刻——执政官凯旋潟湖。打败纳伦塔海盗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威尼斯人对亚得里亚海进行实际控制的开端，这种格局成为威尼斯共和国存在的数个世纪里不言自明的公理。亚得里亚海必须是威尼斯人的海；威尼斯方言将亚得里亚海称为“我们的房子”，而它的大门钥匙便是达尔马提亚海岸。主宰达尔马提亚并不容易。连续几个世纪，几乎一直到共和国寿终正寝，威尼斯花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抵抗来自各大帝国的侵略、清剿海盗和镇压惹是生非的臣属。达尔马提亚的城市——特别是扎拉——反复争取独立，但只有拉古萨（今称杜布罗夫尼克）获得了成功。自此以后，在亚得里亚海的中心区域，再也没有任何海上力量能和威尼斯抗衡。亚得里亚海将受到这座胃口越来越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威尼斯城的人口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后就达到了八万。岁月流逝，亚得里亚海的石灰岩海岸成了威尼斯的谷仓和葡萄园；大运河河畔文艺复兴式宫殿的正面将用伊斯的利的大理石建成；达尔马提亚的松木被用来建造桨帆船，而达尔马提亚的水手们将驾驶这些船，离开位于东海岸的威尼斯海军基地。锯齿状的石灰岩海岸变成几乎可以被视为潟湖的延伸。

威尼斯共和国像拜占庭一样，具有将重大胜利转化为爱国主义庆典的才能。从此以后，共和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来纪念奥西奥罗的胜利。每年的耶稣升天节，威尼斯人会参加前往潟湖湖口的仪式性航行。起初，这种仪式相对比较简朴：教士穿着斗篷式长袍和礼服，登上一艘用金色布料装饰的平底船，驶向利多，即保护威尼斯免受亚得里亚海侵袭的长沙洲。他们带着一瓶圣水、盐和橄榄枝，来到潟湖的出海口——圣尼古拉（水手的主保圣人）岛。他们在湖水与海水交汇处等待执政官乘坐庆典专用桨帆船——威尼斯人称之为“金船”——驾临。站在颠簸摇曳的船上，教士们宣读一段简短但真挚的祷文：“哦，主啊！请

赐福于我们，以及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让大海始终平静安宁。”^[13]然后，他们走向金船，用橄榄枝将圣水洒到执政官及其跟随者身上，并把余下的圣水倒入海中。



金船与耶稣升天节仪式

后来，耶稣升天节的这种仪式变得非常复杂和隆重。但在千禧年伊始，它只是一种简单的祈福，用于恳求免遭风暴或海盗的伤害。它的基础是季节性航海仪式，像海神尼普顿和波塞冬^[14]一样古老。这种微缩版的航行展现了威尼斯的全部意义。潟湖内是安全、宁静和有保障的；在它如迷宫般危险的浅水航道里，所有的潜在敌人都会寸步难行、葬身水底。潟湖之外充满了机遇，但同时也危机四伏。利多是两个世界——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安全世界和危险世界——的边界；在威尼斯人的创设神话里，圣马可突遇狂风，在潟湖里找到了避难所。但对威尼斯人来说，远航却是绕不开的。大海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泉，也是他们的死亡之谷，耶稣升天节仪式便是对这种协定的认可。

此会受到月相的特别影响。在一些特定的时期，来自非洲的西洛可风^[17]将水流推向威尼斯湾，风向相反的布拉风则穿越匈牙利大草原，阻挡着水流，于是潟湖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在人们的记忆中，1106年1月末的事件让他们见识到了大海的威力。人们记得，当时从南方吹来的西洛可风有不同寻常的力量，天气酷热到让人抓狂的地步，日复一日地消耗着人和动物的体力。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大风暴一触即发。房屋的墙壁开始渗水；大海开始呻吟，空气中弥漫着中性电荷的怪味；鸟儿惊慌失措地乱飞、发出尖叫；鳗鱼跳出水面，似乎想逃跑。当风暴最终降临时，轰鸣的雷声似乎要震碎房屋，暴雨倾盆而下，敲打着潟湖。海水翻腾升涌，吞没了利多，从潟湖的入海口涌入，淹没了整个城市。大风暴摧毁了房屋、商品和存粮，淹死了动物，在小小的农田上播撒下令作物无法生长的海盐。整整一个岛屿——古镇马拉莫科消失了，只有落潮时才能在浑水中依稀看到它鬼魅般的地基。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火灾，木质的房屋化为灰烬。大火越过运河，烧毁了二十四座教堂，摧毁了这座城市的主要部分。“威尼斯的核心被撼动了，”编年史家安德烈亚·丹多洛^[18]记载道。^[19]威尼斯的物质基础十分脆弱；它对大自然的瞬息万变已经习以为常。正是在与自然力量对抗的过程中，人们感到了自己的脆弱，于是奉上祭品，寻求庇护。

执政官接纳“达尔马提亚领主”的新头衔，标志着地中海东部的海权势力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四百年里，亚得里亚海一直被罗马统治；之后又有六百年时间，这片海和威尼斯都被罗马帝国的说希腊语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所统治。到公元1000年，拜占庭的力量逐渐衰弱，威尼斯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取而代之。在扎拉、斯帕拉托、伊斯的利亚和特劳的小型石制主教座堂的祷词中，威尼斯执政官的名字紧随着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名字，但这纯粹只是一种仪式性的做法。山高皇帝远，他的权威延伸不到科孚岛以北大部分地区、亚得里亚海的入口以及意大利海岸。达尔马提亚的主人实际上是威尼斯人。拜占庭势力不断削弱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使得威尼斯的地位逐渐上升，由

臣属发展为平等合作的伙伴，并最终在悲剧的情形下篡夺了拜占庭海域的控制权。达尔马提亚海岸领主们蓄势待发，冉冉升起。

拜占庭和威尼斯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且纷繁异常，由于双方世界观的互相抵触和情绪的喜怒无常，两者摩擦不断。然而，威尼斯始终仰赖着拜占庭，因为它是世间的伟大都市，是通往东方的门户。通过金角湾的仓库，流通着更广阔世界的财富：俄罗斯的皮草、蜡、奴隶和鱼子酱，印度和中国产的香料、象牙、瓷器、丝绸、宝石以及黄金。拜占庭的工匠用这些材料打造出精美器物，既有宗教圣器，也有凡俗物事，有圣物箱、镶嵌画、镂刻绿宝石的圣餐杯和光彩夺目的丝绸服饰——这一切也塑造了威尼斯的品位。于1094年重建的气势恢宏的圣马可大教堂是由希腊建筑师设计的，以伫立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为模板；工匠模仿圣索菲亚大教堂镶嵌画的风格，以岩石为材料，重述了圣马可的传说；金匠和珐琅工匠制作了“金布圣坛”，即由黄金打造的祭坛装饰品，这是拜占庭的虔诚和艺术的完美表达。威尼斯码头上的香料气味来自千里之外金角湾的货栈。君士坦丁堡是威尼斯的露天市场，威尼斯商贾云集于此，或是赚钱，或是赔钱。作为皇帝的忠诚子民，威尼斯商人手中最珍贵的财富就是在皇帝的土地上经商的权力。皇帝也用贸易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遏制这些傲慢自大的臣民。991年，奥西奥罗为威尼斯争取到了宝贵的贸易权，条件是在亚得里亚海支持拜占庭皇帝。二十五年后，双方发生争吵，皇帝愤怒地收回了贸易权。

威尼斯与拜占庭对商业的态度不同，这是二者间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从一开始，威尼斯人就不考虑道德的商人心态，他们自认为能用任何东西与任何人做买卖，这让虔诚的拜占庭人颇为震惊。820年前后，皇帝愤怒地指责威尼斯运送战争物资（木材、金属和奴隶）给他的敌人——开罗的苏丹。但在11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拜占庭帝国这个在地中海经久不衰的强权开始衰落，权力天平开始向有利于威尼斯的方向倾斜。11世纪80年代，威尼斯人在亚得里亚海保卫拜占庭帝国的安全，抵

抗企图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强大的诺曼军队。威尼斯人为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拜占庭皇家的一场恢宏仪式中，皇帝在一份文件上加盖了他的金印，这将永远改变地中海的历史。他授权威尼斯商人在他所辖的领土范围内自由贸易，并免缴赋税。该条约具体指出了威尼斯人可自由贸易的许多城市和港口：雅典、萨洛尼卡、底比斯、安条克、以弗所、希俄斯岛、优卑亚岛；希腊南部海岸线上的主要海港，如莫东和科罗尼——对威尼斯桨帆船来说，这都是珍贵的海上补给站——以及最为关键的君士坦丁堡本身。

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被允许在紧挨金角湾的位置占据一个极佳地点。这里有三个码头、一座教堂和一家面包房、一些商店和用于存储货物的仓库。虽然名义上依旧臣属于皇帝，但威尼斯人实际上在这个世间最富有的城市的心脏地带，在极端优惠的条件下，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和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只有在君士坦丁堡的粮仓——黑海，贪婪的威尼斯商人才被禁止入内。拜占庭的法令庄严而晦涩，其字里行间悄然回荡着威尼斯人日思夜想的那个美妙的希腊词语：垄断。威尼斯海上贸易的竞争对手——热那亚、比萨和阿马尔菲，如今已经完全处于下风，它们在这座城市的存在几乎无足轻重。

1082年的《金玺诏书》是为威尼斯打开东方贸易这个宝库的黄金钥匙。威尼斯商人蜂拥前往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些人则开始渗透到东方海岸的大小港口。到12世纪下半叶，威尼斯商人在地中海东部随处可见。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到1.2万人。年复一年，拜占庭的贸易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入他们手中。他们不仅给欧洲大陆的狂热市场输送商品，还充当中介，不停地在黎凡特诸港口穿梭买卖。他们的商船在东方海域开展三角贸易，将希腊的橄榄油运到君士坦丁堡，在亚历山大港买入亚麻制品，经由阿卡出售给十字军国家；途经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士麦那和萨洛尼卡。在尼罗河口的古城——亚历山大港，他们买入香料，出售奴隶，并在同一时期巧妙地游走于拜占庭和十字军与他们

的敌人——埃及法蒂玛王朝之间。随着时间流逝，威尼斯一点点将其触角伸入东方的商埠；它的财富见证了一个新的富商阶层的崛起。威尼斯历史上的许多名门望族都在这个经济繁荣的世纪开始崛起。这预示着威尼斯开始主宰商贸。

财富令威尼斯人傲慢，也招致其他人的怨恨。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记载道：“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把君士坦丁堡当作他们自己的城市，又从这里出发，遍布整个帝国。”^[20]这些话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常见的仇外心理和在经济上对移民的恐惧。在城市的街道上，头戴帽子、胡须剃得一干二净的意大利暴发户，无论行为举止还是衣着打扮都格外刺眼。他们受到的指责很多：他们的举动像是外国公民，而不是帝国的忠诚子民；他们从朝廷分配给他们的住地出发，扩张地盘，在城里到处购置地产；他们和希腊女人同居或结婚，并教唆她们放弃东正教信仰；他们偷窃圣徒的遗物；他们富有、傲慢、不羁、粗野，无法无天。另一位拜占庭作家气急败坏地说：“威尼斯人荒淫无德，庸俗不堪……无法让人信赖，有航海民族的全部粗鄙特质。”^[21]萨洛尼卡的一名主教称他们为“沼泽的青蛙”。^[22]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越来越不得人心，但他们又似乎无处不在。

在12世纪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问题上，拜占庭人和他们离经叛道的臣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摇摆不定，爱恨交织：拜占庭难以忍受威尼斯人，却又离不开他们。拜占庭仍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对他们来说，土地所有权比庸俗的商业更让人感到自豪。于是贸易渐渐落到了潟湖居民的手中，拜占庭海军的实力也每况愈下；拜占庭在海上防御方面越来越依赖威尼斯。

帝国针对这些肆意妄为的外国人的政策飘忽不定。皇帝的撒手锏便是对贸易权的控制。一个多世纪以来，拜占庭人反复尝试离间威尼斯与其商业上的竞争对手——比萨和热那亚的关系，以期在经济上摆脱威尼

斯的控制。1111年，比萨人也得到了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权；四十五年后，热那亚取得了同样的权利。这三个对手在君士坦丁堡都获得了减税优惠、商业区和码头。这三个意大利共和国在君士坦丁堡进行了激烈竞争，假以时日，这种竞争就会引发全面的贸易战争。1176年，当西班牙犹太人“图德拉的本雅明”来到这座城市时，他看到的是“一座动荡不安的城市；世界各地的人通过海路和陆路到这里做生意”。^[23]城市因为竞争而成为一座让人恐惧的封闭竞技场。互相竞争的族群拥挤地居住在金角湾沿岸互相毗邻的飞地，常爆发歹毒的争执。威尼斯人认为自己的垄断地位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是他们在上一个世纪打败了诺曼人而赢得的，因此不肯让其他人染指；而历代皇帝逐渐撤销威尼斯人的垄断贸易权，或优待其对手的做法，让威尼斯人深感不满。在希腊统治者眼中，意大利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麻烦。拜占庭人以贵族的傲慢如此描述意大利人：“这个种族的特点是缺乏教养，这和我们高贵的秩序观格格不入。”^[24]1171年，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扣留并羁押了帝国境内所有威尼斯人，多年后才将他们释放。二十年后，这场危机才得以化解，但苦涩的记忆让彼此失去了信任。1190年，威尼斯商人再次获准进入君士坦丁堡，但两个民族间曾经的特殊关系早已烟消云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皇于1198年夏天号召再次举兵东征。

^[1] 图坦卡蒙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一位法老（约前1334～前1325或前1323年在位）。图坦卡蒙为现代人广为熟知是因为他位于帝王谷的坟墓在三千年的时间内从未被盗，直到1922年才被英国人哈瓦德·卡特发现，挖掘出近五千件珍贵陪葬品，震惊了西方世界。由于有几个最早进入坟墓的人早死，被媒体大肆渲染成“法老的诅咒”，图坦卡蒙的名字在西方更为家喻户晓。

^[2]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代并不精确，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Levant）是“东方”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

[3] 科茨沃尔德是英格兰中南部一地区，跨越牛津郡、格洛斯特郡等地，历史悠久，在中古时期已经因羊毛相关的商业活动而发展。

[4] Hodgson, F. C., *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01, p. 169

[5] Hodgson, F. C., *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01, pp. 176-7

[6] 格罗索是威尼斯于1193年（恩里科·丹多洛担任执政官时期）开始铸造发行的一种银币，起初一个格罗索重2.18克，含98.5%纯银，后来币值有所浮动。

[7] Hodgson, F. C., *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01, p. 178

[8] Norwich, John Julius, *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 1982, p. 55

[9] Comnena, Anna, *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 trans. E. R. A. Sewter, London, 1969, p. 132

[10] 欧洲人称之为巴巴利而阿拉伯人称之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

[11] Hodgson, F. C., *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01, pp. 176-7

[12] Hodgson, F. C., *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01, p. 178

[13] Norwich, John Julius, *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 1982, p. 55

[14] 尼普顿是罗马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大致相当。

[15] 布拉风是亚得里亚海、希腊、土耳其等地的一种北风或东北风。“布拉”这个名字与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玻瑞阿斯有关系。

[16] Comnena, Anna, *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 trans. E. R. A. Sewter, London, 1969, p. 132

[17] 西洛可风是地中海地区的一种风，源自撒哈拉，在北非、南欧地区加强为

飓风。西洛可风会导致干燥炎热的天气，许多人因此患病。

[18] 安德烈亚·丹多洛（1306～1354）年轻时攻读历史学和法律，曾是法学教授，后当选为执政官。他是丹多洛家族出过的四位执政官中的最后一位。他撰写了两部史书，题材分别是威尼斯历史和克罗地亚历史。

[19] Dandolo, Andrea, *Chronica per Externum Descripta*,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12, part 1, Bologna, 1923, p. 225

[20] Lamma, P., ‘Venezia nel giudizio delle fonti Bizantine dal X al XII secol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74, 1960, pp. 477-8

[21] Nicol, Donald M.,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 1992, vi

[22] Lamma, P., ‘Venezia nel giudizio delle fonti Bizantine dal X al XII secol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74, 1960, p. 479

[23] Ciggaar, Krijnie, *Western Travellers to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96, p. 235

[24] Angold, Michael, *The Fourth Crusade: Event and Context*, Harlow, 2003, p. 45

2.失明的执政官

1198～1201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慷慨激昂的鼓动中拉开帷幕：

在耶路撒冷领土遭到无情的摧毁之后，在基督徒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之后，在基督曾经站立的土地——上帝，我们的天父，于纪元之前在人间中土展开救赎的地方——遭到令人扼腕的入侵之后……使徒宗座（教皇）为如此巨大的灾难所导致的不幸而感到焦虑不安……他大声呼喊，犹如喇叭一般提高声响，渴望唤起信徒们为基督的事业而战，为受难救主遭受的侮辱而复仇……为此，我的孩子们，拿出刚毅之精神，举起信仰之盾，戴上救赎之盔，不迷信数量与蛮力，而相信上帝的力量。^[1]

1198年8月，教皇英诺森三世向基督教世界的军事力量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此时距十字军成功攻克耶路撒冷，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而且这是一个凶险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间，整个十字军东征事业在逐渐走向崩溃。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187年，萨拉丁在哈丁击败了一支十字军^[2]，并夺回了圣城。无论是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他在叙利亚的一条河中溺死）还是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都没能收复耶路撒冷。之后，十字军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海岸上的几个定居点，如推罗港和阿卡港。只有教皇才可能让十字军东征的事业起死回生。

英诺森三世时年三十七岁，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意志坚定而又脚踏实地，是一位宗教修辞学大师，还是一位高明的法学家。他所号召的，既是一次军事冒险，又是在逐渐世俗化的世界里的一次道德重构的运动，也是重树教会权威的新事业。从一开始，他就明确表示，他的意图并不仅仅限于发动十字军运动，英诺森三世还要以教皇使节为代理人，亲自指挥东征。一名教皇使节被派去煽动法兰西北部的武士领主，另一名使节——红衣主教索弗雷多则去威尼斯，寻求船只的支援。一个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经验让军事策划者们明白：通往叙利亚的陆路充满艰难险阻，而拜占庭人对大批武装士兵通过他们的领土充满戒心。其他的航海共和国——比萨和热那亚正在打仗，因此只有威尼斯拥有将整支军队运送到东方的技术和资源。

威尼斯人的即刻回应令人吃惊。他们派出自己的使节回访罗马，作为措施的第一步，请求教皇解除业已颁布的禁止与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埃及进行贸易的命令。共和国的请求从一开始就彰显了信仰与世俗需求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将困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全程。共和国的请求也体现了威尼斯人身份的特性。威尼斯使节据理力争，认为他们城市的情况与众不同。它没有农业；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贸易，而贸易禁运（威尼斯人严格遵守教皇的禁令）令其元气大伤。使节们可能也曾低声抱怨，比萨和热那亚无视教皇的命令，仍然继续与穆斯林进行贸易。但英诺森三世对威尼斯的辩解不以为然。这座城市长久以来一直和虔诚的基督教事业对着干。最终，他措辞严谨地许可威尼斯人与穆斯林进行贸易，但明令禁止任何军事物资的交易，并将其一一列举出来，“（我们）以逐出教门作为惩罚，禁止你们以出售、赠予或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向撒拉森人提供铁、麻、尖锐器具、易燃物、武器、桨帆船、帆船或木材”，并以法学家的敏锐，补充上这样一句，以防止狡猾的威尼斯人钻法律的空子：“无论是成品或者半成品。”

但愿我们的妥协能让你们得到强烈的感化，从而向耶路撒冷地区提供援助，并确保你们不会以欺骗手段违反教廷的命令。汝等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因为任何胆敢尝试悖逆自己的良心去逃避此法令的人，毋庸置疑会遭受上帝的严厉惩罚。^[3]

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绝罚的威胁太过严厉，英诺森三世完全不信任威尼斯，但实际上，除了做出一点让步，他别无选择，因为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可以提供船只。

因此，当六名法兰西骑士于1201年大斋节的第一周抵达威尼斯时，执政官对他们此行的目的大概已经了然于心。他们来自香槟、布雷、佛兰德、埃诺和布卢瓦，是法兰西和低地国家强大的十字军伯爵们的使节。他们随身携带着已经加盖印章的特许令，拥有谈判的全权，目标是与威尼斯签订海上运输的协定。其中有一个叫作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4]的人，来自香槟，是经历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老将，有极其丰富的征召十字军的经验。维尔阿杜安的记述将成为随后发生的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尽管他的说法非常缺乏客观公正性。

在任命执政官时，威尼斯的长期传统是挑选高龄而经验丰富的人，但十字军代表们前来拜见的这个人不管怎么说都非常特别。恩里科·丹多洛是豪门贵胄，他的家族涌现过许多律师、商人和教士。他们和过去一个世纪里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有交集，为共和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曾参与12世纪中期对城市教会和国家机构进行的改革，也参与了威尼斯的十字军冒险。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丹多洛家族的男性成员都智慧过人、精力旺盛而且长寿。1201年，恩里科已年过九旬，而且他已完全失明了。

没有人知道恩里科长什么样子；但因为有许多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恩里科画像，所以现在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样一个男人——高高瘦瘦，留着白胡子，有一双威严却看不见的眼睛，带着为威尼斯效力的坚定决心，在威尼斯一个世纪的繁荣上升期里长期处于威尼斯生活的中心，因而经验丰富，极其睿智。但这种形象并没有实际的证据。关于他的性格，当代人的印象和后人的评判存在严重的分歧，就像人们对威尼斯本身的看法也有天壤之别一样。在他的朋友看来，丹多洛是一个缩影，映射着共和国的机敏和良好政府。在法兰西骑士克莱里的罗贝尔看来，他是“最可敬和最睿智的人”^[5]；佩里修道院院长马丁认为，丹多洛“以活跃的智慧弥补了失明的缺陷”；法兰西贵族圣波勒的于格称他“性格审慎，在做艰难决定时谨慎又明智”。^[6]维尔阿杜安后来对他十分了解，

称他“非常睿智、勇敢，且充满活力”^[7]。希腊编年史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8]并不熟识丹多洛，对他的评价非常负面，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对拜占庭人极其奸诈，充满敌意，既狡猾又傲慢；他自称智者中的智者，对荣耀的欲望超过了所有人。”^[9]围绕着丹多洛，逐渐出现了很多神话。这些神话描绘了这个人，但更重要的是，界定了威尼斯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敌人对威尼斯的看法。

丹多洛注定要跻身高位，但在12世纪70年代中期，他的视力开始渐渐衰退。1174年，他在文件上的签名看上去清晰有力，非常整齐。而1176年的一份文件上的签名就显露出了他的视力问题。一句这样的拉丁语文字——“我，恩里科·丹多洛，法官，亲笔在此签名”^[10]——向右下方倾斜，表明他难以把握纸上的空间关系，他每写一个字母都要猜测前一个字母的具体位置，而他的猜测越来越不准确。看来丹多洛的视力正在慢慢下降，后来完全失明。最终，根据威尼斯的一道法令，丹多洛不能再签署文件，只能在受认可的证人在旁的时候留下自己的记号。

丹多洛失明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原因一直是各种各样猜测的对象，也被认为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很多事件的关键原因。有传言说，在1172年的拜占庭人质危机中，丹多洛也在君士坦丁堡，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下令用玻璃亮瞎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没有受外伤，但他什么也看不见了”^[11]。有人认为，这就是执政官对拜占庭人抱有深仇大恨的缘由。另一个版本的传言是，丹多洛在君士坦丁堡街头的一次斗殴中失去了视力。这个故事五花八门的诸多版本让中世纪世界在考量丹多洛的生涯时颇感困惑。有人认为，他的失明是假装的，或者没有完全失明，因为他的眼睛被证实仍然明亮清晰，否则丹多洛怎么能够带领威尼斯人民度过战争与平时时期呢？相反，也有传言认为，他很善于掩饰自己盲目的缺点，这正好证明了此人的奸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丹多洛在1172年并没有失明，他在两年之后的签名仍然很正常，他也不曾说自己失明是由于1172年的事件。他后来给出的唯一的解释是，他因为头部受打击而

失去了视力。

不管他失明的原因如何，这丝毫未影响他清晰的判断和充沛的精力。1192年，丹多洛当选执政官，发出了执政官的就职宣誓：“全心全意为威尼斯人民的荣誉和利益效劳，绝不欺瞒。”^[12]尽管威尼斯在政府机制上一向保守，从来不会仰慕青春的活力，但让这个盲人坐上执政官的宝座，仍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他可能被看作一个过渡人选。鉴于他年事已高，选民可能觉得他的任期将会很短暂。没有任何人能够猜到，他执政竟长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里，他会改变威尼斯的未来。人们也没想到：十字军骑士的到来竟会成为导火索。

丹多洛热忱地欢迎骑士们，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凭证文书，认可了他们的权威之后，便开始谈判。议题是在一系列会议中渐渐展开的。据维尔阿杜安说，他们先“在执政官的宫殿——它非常精致而华丽——向执政官和他的议事会表明了来意”^[13]。骑士们对宫殿的恢宏和盲眼执政官的高贵肃然起敬。“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和值得尊敬的人。”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来威尼斯，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在威尼斯找到比任何其他港口都要多的船只”^[14]，然后他们概述了运输需求——人员和马匹的数量，给养和他们需要船只与给养的时长。丹多洛显然对使者们概述的行动规模大吃一惊，尽管我们不清楚使者们的规划详尽到什么程度。威尼斯人花了一周的时间对这项任务进行了评估。然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们以经验丰富的工匠报价时的仔细和精准列举了自己收受酬金后将提供的服务：

我们将建造运送马匹的船只，来承载4500匹马和9000名侍从；4500名骑士和2万名步兵将乘船行进；我们还将为人员和马匹提供九个月的给养。这是我们能提供的最低限度的服务，运费是每匹马4马克^[15]，每个人2马克。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的有效期是，从十字军从威尼斯港口出发为上帝和基督教世界效力——不管去往何方——的那一刻开始，为期一年。上述费用总计94000马克。我们将另外免费提供50艘武装桨帆船，前提是只要我们的联盟还在，以及我们将得到所有战利品——无论是领土还是金钱，陆

地还是海洋——的一半。现在请你们商议，决定是否愿意以及能否继续交易。^[16]

这样的人均费用不算过分。1190年，热那亚向法兰西提出的报价与之类似，但94000马克的总金额太过庞大——这相当于法兰西一年的财政收入。从威尼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遇，也有相当大的风险隐患。它要求整个威尼斯经济全神贯注，集中力量于此事业，达两年之久：第一年做准备工作——造船、后勤安排、招募人手、食品采购；而在第二年，威尼斯男性人口的非常大一部分将被投入此事业，全部船只都将投入其中。威尼斯将承接的是中世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业合同；这意味着，在合同期内，所有其他交易活动都将停止；威尼斯将投入自己的全副家当，因此任何阶段的失败对这座城市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难怪丹多洛要仔细研究对方的授权委托书，认真撰写合同，并索取战争收益的一半。他们从时间和金钱两个维度进行了仔细的权衡。威尼斯人是经验丰富的商人；他们擅长签订合同，而且他们相信契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契约是威尼斯生活的金本位：它的关键参数是数量、价格和交付日期。在里亚尔托的交易年度里，这样的讨价还价每天都在进行，但从来没有达到这种规模。十字军代表只经过一夜的考虑，就非常爽快地同意了方案，执政官可能会感到惊讶。使者们对威尼斯免费提供50艘桨帆船尤其满意。此举大有深意。而合同中貌似无关紧要的一句“不管去往何方”同样也意味深长。

执政官一直在努力促成这门交易，但威尼斯自诩为一个公社，在理论上所有人都有权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发表意见。而此事关系整个国家的未来，因此必须得到广泛的认可。维尔阿杜安记录了威尼斯民主的运作过程。执政官必须说服越来越多的人群：首先是四十人的大议事会，然后是两百人的公社代表。最后，丹多洛将广大普通公民召集到圣马可教堂。据维尔阿杜安记载，一万人聚集在教堂前，等待着重大消息。维尔阿杜安称圣马可教堂为“世间可能存在的最美丽的教堂”^[17]，他显然和其

他人一样受到了这里气氛的感染。烟雾缭绕而黯淡的教堂在暗光和镶嵌画圣人像的金光下，熠熠生辉，如同海蚀洞一般。丹多洛用“他的智慧和理性的力量——两者都非常健全和锐利”^[18]上演了一出气氛逐渐高涨的戏剧。首先，他要求“举行弥撒，向圣灵祷告，祈求上帝指引大家对使节们提出的请求做出正确回应”^[19]。然后，六名使节进入教堂大门，沿着侧廊走进来。这几个法兰西人无疑身披饰有鲜红色十字的罩袍，这引起了众人极大的兴趣。人们伸长脖子，互相推搡着，争先一睹这些外国人的风采。清了清嗓子，维尔阿杜安向他的听众做了一次极具说服力的演讲：



圣马可教堂内部

诸位大人，全法兰西最强大、最有势力的诸侯委派我们至此。他们恳求你们怜悯耶路撒冷，圣城现已被土耳其人奴役。为了上帝的爱，请你们帮助他们为耶稣受辱而复仇的远征。为此，法兰西诸侯选择了你们，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和你们一样强大，我们受命前来伏拜，恳请你们出征，怜悯海外的圣地，否则我们就长拜不起。^[20]

这位元帅^[21]极力奉承威尼斯人对自己海上力量的自豪感和他们的宗教热忱，好像是上帝亲自请求他们来完成这次伟大的行动。六名使节都涕泗横流地拜倒在地。这是一次直达中世纪灵魂的情感核心的诉求。

一声雷鸣般的呐喊扫过整个教堂，沿着中殿，攀着廊台直达令人头晕目眩的高高穹顶。众人“异口同声、高举双手呼喊道：‘我们同意！我们同意！’”丹多洛随后被扶到讲道台上，用他失明的眼睛感受到了这一刻，并敲定了协议：“诸位大人，看上帝授予你们何等荣耀！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都表示不屑，单单只请求你们的帮助，请求你们执行如此重大的使命——拯救我主！”^[22]这诱惑不可抗拒。

次日，在隆重的典礼上，后人所谓的《威尼斯条约》正式签订并加盖大印。执政官“将自己的条约文本给了他们……热泪盈眶，以圣人遗物起誓，将忠诚地遵守条约中的所有条款”。^[23]使节们也做了相应的承诺，派人向教皇英诺森三世报告，随后离开威尼斯，为十字军东征做准备。条约规定，十字军将在次年（即1202年）6月24日，也就是圣约翰节那一天集结完毕，舰队在那时也会整装待发。

尽管群众热烈地赞同，但威尼斯人天生谨慎，其商业精神培养出了精明的判断力，不会沉溺于心血来潮，而且丹多洛是一个审慎的领导者。但只要做一番仔细的风险评估，就会发现，《威尼斯条约》是一个拿整个国家的经济冒险的高风险项目。无论是需要的人员和船只的数量，还是条约规定的金钱，数字都是非常惊人的。丹多洛可能已年过九十，也许时日无多。他本人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个项目。他承担的风险太大。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在暮年如此豪赌呢？

答案在于威尼斯人的性格——这性格里有世俗和宗教因素的奇特融合——以及条约本身。威尼斯不断从历史的先例中获取智慧，以此让这艘国家之船平稳航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威尼斯的兴盛与十字军东征有紧密联系。威尼斯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1123年再次参加。从两次战争中，他们都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利益；1122年，他们得到了推罗城的三分之一，在免税贸易的基础上从威尼斯潟湖直接统治那里——这标志着威尼斯海外帝国的起点，也是在一系列其他港口的立足点。

在断断续续的圣战期间，这些巴勒斯坦港口给意大利各个共和国提供了能够买到远东商品的新机会。他们发现，自己与延伸到万里之外中国的古代贸易路线网联系在了一起。威尼斯在黎凡特境内就能接触到财富与奢华的世界。在黎凡特，高超的制造技艺和农业技术已经繁荣了数百年。的黎波里^[24]以丝织业闻名；推罗出名的商品有很多，如鲜亮透明的玻璃、犹太工匠在大桶里染制出的紫色和红色的织物、甘蔗、柠檬、橙子、无花果、扁桃、橄榄和芝麻。在阿卡港，人们可以买到产自伏尔加河的药用大黄、西藏的麝香、肉桂、胡椒、肉豆蔻、丁香、芦荟、樟脑、印度和非洲的象牙，以及阿拉伯海枣；在贝鲁特能买到靛蓝染料、熏香、珍珠和木材。

明亮的黎凡特之光使欧洲人体验到了世界的五彩缤纷和香气袭人。对货物、服饰、食物和口味的全新品味在十字军诸王国流行，商船把这些新潮的东西带到了日渐富裕的欧洲。相反，威尼斯和它的竞争对手也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补给；他们为耶路撒冷（还有其在埃及的敌人）带来了战争必需品——武器、金属、木材和马匹，以及其他在外国海岸维持殖民生活的必需品；他们还满载着急于目睹圣地的朝觐者。对威尼斯商人来说，十字军东征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加深了对跨越文化鸿沟进行贸易的认识。假以时日，这些知识会使他们成为世界的诠释者。

前几次十字军远征都成了威尼斯漫长荣耀史上的胜利篇章，铭刻在国民的记忆中。这些都增强了威尼斯的自豪感，提高了它的期望值。威尼斯素来注视着东方升起的太阳：为了贸易和战利品，为了能装点城市的物品，为了偷窃基督教圣徒的遗骸，为了获得财富和军事荣誉的可能性，尤其也是为了赎罪。威尼斯与东方的联系是美学性、宗教性和商业性的。归来的商船队设定了人们的期待：在圣马可湾卸载的货物必然能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富有、高贵和神圣。一百年前，一位执政官规定，作为爱国者的义务，所有从东方归来的商人必须带回古物、大理石或雕

刻，来装饰新建的圣马可大教堂。1123年成功的远征让共和国对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取商业利益有了很高期望。在新的《威尼斯条约》中，仅仅是海运合同一项就能让威尼斯人受益颇多，而分享一半战利品则可能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财富。

少年时的丹多洛或许曾目睹十字军舰队出征时的宗教狂热与民族热情，听到他幼时的执政官慷慨激昂的宣言，歌颂着十字军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荣耀：

威尼斯人，此次远征之后，你们的名字将获得怎样的不朽荣耀和璀璨光辉！上帝将给你们怎样的奖赏！你们将赢得欧洲和亚洲的赞誉。圣马可的大纛将在遥远的土地上飘扬。新的利润和新的伟大机遇将降临这座最高贵的城市……在宗教的神圣热情鼓舞下，为全欧洲的榜样所振奋，请你们赶紧拿起武器，想一想无上的荣誉和奖励，想一想你们的胜利——上天佑助你们！^[25]

丹多洛执意参加此次东征，也有其他的个人原因。他的家庭有十字军传统；也许仿效祖先的愿望已经在他内心深处引起了共鸣。而且他年事已高，对自己灵魂归宿的关注或许也是重要因素。十字军东征最有利的鼓励条件就是，参与者的罪孽将得到救赎。民族的、个人的、精神的和家族的动机都促使他签署这份条约。

这位失明但洞察力敏锐的执政官显然已经窥见命运的关键时刻，似乎威尼斯历史此前的一切都是为了等待这次非同寻常的机遇。但其实条约的核心部分隐藏着一些猫腻，令威尼斯人更加兴趣盎然。条约用含糊的言辞鼓舞广大群众“怜悯海外的圣地”^[26]，但除了法兰西和伦巴第的少数条约签署方和十字军领主之外，没有人知道，此次东征的最初目的地并非圣地。目标其实是埃及。维尔阿杜安在他的编年史中承认：“我们召开了秘密的闭门会议，决定去埃及，因为在开罗我们能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摧毁土耳其的力量，但我们对外仅仅宣称要去往海外。”^[27]

这样做是出于充分的战略考虑。精明的军事策略家很早就认识到，埃及的财富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穆斯林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萨拉丁的胜利正是建立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丰富资源的基础上。正如狮心王理查所认识到的，“通往耶路撒冷的钥匙在开罗”^[28]。问题是，这种迂回曲折地收复圣城的方式不大可能激起民众的拥护。虔诚的信徒期待的是在耶稣曾经立足的地方英勇战斗并获得救赎，而不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集市切断伊斯兰世界的补给线。

但对威尼斯人来说，这提供了进一步发展商业的机会。埃及是黎凡特最富庶的国家，也是油水很足的香料商路的又一个天然入口。这里的收益比推罗港和阿卡港能提供的更加丰厚。“无论此地缺乏的是珍珠、香料、东方珍宝，还是外国货，都可以从两个印度获得：示巴^[29]、阿拉伯半岛、两个埃塞俄比亚，以及波斯和其他邻近的国度。”^[30]推罗的纪尧姆^[31]在二十年前写道：“东西方的人蜂拥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是两个世界的公共集市。”事实上，尽管最近得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许可，威尼斯在埃及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热那亚和比萨在与埃及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丹多洛曾去过亚历山大港；他对这个地方的财富和防御的薄弱有亲身体会，这座城市在情感上对威尼斯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圣马可正是在这里死去；也是从这里，威尼斯商人偷走了他的骸骨。从本质上讲，在埃及取得一场胜利并得到全部收益的一半，威尼斯收获的财富将会远远超过之前所有的商业成功。威尼斯可以一下子掌握地中海东部商贸的很大一部分，并可以一劳永逸地挫败它的海上对手。免税的垄断贸易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其潜在的高回报显然值得为此去冒险，这也是威尼斯人愿意自己出钱投入50艘桨帆战船的原因。威尼斯的桨帆船不是用来在巴勒斯坦海岸打海战的，而是要顺着水浅而芦苇丛生的尼罗河三角洲，对开罗发动攻击。

这个秘密议程只不过是《威尼斯条约》诸多令人担忧的因素之一，此条约注定要对东征产生负面影响。时间的问题也让人不安。威尼斯人

签署的是为期九个月（从1202年6月24日圣约翰节开始）的有期限的海运合同。最关键的问题是金钱。很可能最终议定的价格降到了85000马克，但这仍然是天文数字。即使人均运费是合理的，但维尔阿杜安预计的33000名十字军也实在太多了。维尔阿杜安对估算十字军的兵力颇有经验，但他仅仅用了一夜时间就接受了执政官的条件，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严重误判了能征集的十字军人数；他也没能认识到，他作为十字军代表签署了条约，但被他代表的那些人并不受到条约的约束：他们没有义务从威尼斯出发。从一开始，此次东征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英诺森三世试图通过征税来筹集资金，但失败了。六个代表连首付款2000马克都没有，还是在里亚尔托借的钱。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但《威尼斯条约》已经包含了灾祸的种子，最终致使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最具争议的事件。

维尔阿杜安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隘道回国了。法兰西、佛兰德和意大利北部的十字军——拜占庭人称之为法兰克人——发出誓言，拟定遗嘱，披上罩袍，开始辛苦地为出征做起了漫长的准备；在潟湖，威尼斯人着手准备组建其历史上最庞大的舰队。

[1] *Die Register Innocenz'III*, ed O.Hageneder and A. Haidacher, vol. 1, Graz, 1964, pp. 499-501

[2] 哈丁是位于巴勒斯坦的城市。1187年7月4日（十字军东征时期），阿拉伯人的著名统帅萨拉丁在此大破基督教军队，耶路撒冷国王以及圣殿骑士团团长被俘。基督教军队作战时向来携带的圣物真十字架落入穆斯林手中。

[3] *Patrologia Latina*, ed. J. P. Migne, vol 214, col. 493, Paris, 1849-55

[4] 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1160～约1212），法国骑士与史学家。他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目睹了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他的著作《征服君士坦丁堡》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法文散文作品。他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

[5] Madden, T., *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 2003, p. 118

[6]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 209

[7] Madden, T., *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 2003, p. 118

[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约1155～1215或1216），拜占庭史学家，著有记载1118～1207年拜占庭历史的著作，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对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记述。

[9]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85

[10] Madden, T., *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 2003, p. 65

[11] Madden, T., *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 2003, p. 64

[12] Madden, T., *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 2003, p. 96

[1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5

[14]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3

[15] 马克起初是流行于西欧的重量单位，专用于测量金银，1马克最初相当于8盎司（249克），但在中世纪不断有所浮动。

[1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p. 17-19

[1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9

[18]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Caroline Smith, London, 2008, p. 10

[1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9

[20]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9

[21] 即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他享有“香槟省元帅”的封号。

[22]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21

[2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21

[24] 注意不是利比亚城市的黎波里，而是黎巴嫩的一座城市。

[25]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21

[2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23

[2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23

[28]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 Venice, 1912-21, vol. 2, pp. 36-7

[29] 示巴是《圣经·旧约》和《古兰经》中提到的一个南方王国，具体位置可能在现今的厄立特里亚沿岸或也门南部，也可能是一个跨亚非大陆的王国。示巴在古代亚述人、希腊人及罗马人的作品中都有提及，约在公元前1200年立国，于公元3世纪因气候变化和内战等因素而灭亡。

[30]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 Venice, 1912-21, vol. 2, pp. 36-7

[31] 推罗的纪尧姆（约1130~1186）是耶路撒冷王国的高级教士和编年史家。他出身于耶路撒冷王国上层阶级，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在欧洲的大学接受教育，1165年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受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之命出使拜占庭帝国。纪尧姆在成为国王的儿子——未来的国王鲍德温四世——的家庭教师后，发现后者患有麻风病。阿马尔里克一世死后，纪尧姆担任王国中两个最高级职务——书记长及推罗大主教。纪尧姆以耶路撒冷王国史书作者的身份闻名，用优美的拉丁文撰写编年史，称为《大海彼岸的历史往事》或《耶路撒冷历史》。这部作品在他死后很快就被翻译成法文，随后又被译为多种不同的语言。这是现存唯一一部12世纪耶路撒冷人所写的同时代当地历史，他被视为十字军中最伟大的编年史作家，以及中世纪最好的作

家之一。

3.三万四千马克

1201~1202

此次行动的规模令威尼斯以往任何一次海上远征都黯然失色。丹多洛不得不暂停其他一切商业活动，并召回在海外的商船。所有威尼斯人都投入到了准备工作之中。他们有十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光是造船及船体整修就是一项宏大工程，需要大量木材、沥青、大麻、绳索、帆布，以及制造铁钉、铁锚和其他设备所需的铁。为了获取这些资源，人们遍寻整个意大利。大量冷杉和落叶松木在汇入潟湖的河流上漂向威尼斯；橡木和松木则来自威尼托^[1]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建于1104年的兵工厂是这项工程的工业中心，但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在分散于潟湖群岛各处的私人船坞内进行的。空气中充斥着锤击声、锯木声、斧头的撞击声、铰子的锉磨声；大锅里煮的沥青冒着泡翻滚着；熔铁炉映着红光；制绳工人放出数百码长的扭曲麻绳；各种材料经过加工、劈砍、缝制、锻造，被制成桨、滑轮、桅杆、帆和锚。在龙骨的基础上，船体逐渐成形；也有的船只是由旧船重新装配或改造而成的。在兵工厂中，人们在制造战争器械。投石机和攻城塔都可拆卸，以便运输。



威尼斯的造船业

十字军东征需要不同类型的船只。4500名骑士和2万名步兵将乘坐圆船，即高侧舷的帆船。这种圆船配有艏楼和艉楼，尺寸不一：有一些极其庞大的供贵族乘坐的豪华船只；有十字军标准的运输船，甲板下可挤进600人；也有较小的船只。4500匹马将被装运在150艘特别改装过的桨帆船里，船侧或船首装有铰链式的门，以便马匹能够被赶进船舱；可以用吊索拴住马匹，以抵御海浪的颠簸。在航行过程中，这些门都位于吃水线以下，所以人们必须保证船身的缝隙堵塞严实，以防漏水；但船靠岸后，门可以迅速打开，让全副武装的骑士自如地冲杀出来，对毫无准备的敌人发出致命一击。威尼斯人可能总共需要450艘船来运送军队及辎重。此外还有威尼斯人自行投入的50艘桨帆船，而且还需要招募操纵舰船的水手和桨手。要想运送33000人横渡地中海东部，需要3万名技术娴熟的水手——这大概占了威尼斯成年人口的一半，或者也可以从达尔马提亚海滨城市招收海员。虽然很多人自愿加入十字军，但这远远不够。城市的每个教区都进行强制性的抽签——如果抽到的蜡球里装着纸条，那就要去为共和国服役。

为这样一支庞大舰队提供补给同样需要极其艰苦的努力。威尼斯人精细地计算了每个人一年的口粮：377千克面包与面粉，2000千克谷物和豆类，300升葡萄酒。为十字军提供的给养累计起来数额庞大。威尼斯人在自己的农业腹地搜罗粮食；并从各地区中心——博洛尼亚、克雷莫纳、伊莫拉、法恩扎搜集小麦，在威尼斯的烤炉里经过两次烘焙，制成耐久的航海饼干，这是航行时水手的主食。威尼斯并不是食物的唯一来源地。威尼斯的筹划者无疑也打算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南下时获得新的补给，但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仍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这一切工作都有开支。许多木匠师傅、敛缝工人、制绳工、制帆工、铁匠、厨师、驳船船夫为了舰队的准备工作付出了长达一年的不懈努力。为了支付他们的薪酬，威尼斯造币厂不得不生产额外的格罗索

（一种小银币）。实际上，共和国所有工作都是在赊账的基础上完成的，所有人都急切地等待着合同履行、得到报酬。

到1202年初夏，威尼斯人已经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足以将33000人运送1400英里、横跨地中海东部，并配备了足够的供给，能够满足这支舰队一年所需。“威尼斯人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合同义务，甚至做得更多。”^[2]维尔阿杜安承认，“他们建造的舰队是如此宏伟巨大，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曾见过更好的。”^[3]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这都是威尼斯人集体组织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威尼斯国家工作高效的见证，这种高效将为威尼斯共和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完全可以按照预定出发日期（1202年6月24日，圣约翰节）起航，但十字军本身的协调却很糟糕，一再拖延。十字军原定于复活节（1202年4月6日）离家出发，但很多人直至圣灵降临节（6月2日）还没有动身。士兵们在各自领主的率领下，打着自己的旗号，零零散散地抵达威尼斯。而整个十字军东征的领袖——蒙费拉的博尼法斯——直到8月15日才抵达威尼斯潟湖。但在6月初，形势就已经很明显——在威尼斯集结的十字军人数远远少于合同规定的33000人，威尼斯人为他们准备的庞大舰队一下子显得不必要了。一些人为了方便或是省钱，选择了其他路线，从马赛或阿普利亚^[4]出发，前往圣地。又或许是他们听到了小道消息——威尼斯舰队的真正意图是攻打埃及，而非解放耶路撒冷。维尔阿杜安强烈谴责了那些没有按约定出现在威尼斯的人：“这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人，对集结在威尼斯的大军的危险远征心存畏惧。”^[5]但真相并非如此：维尔阿杜安和他上级的十字军领主们在人数统计上犯了巨大错误；而且即便是那些集结起来的十字军，也并不受到他签订的条约约束，并没有义务选择前往威尼斯的较远的陆路。维尔阿杜安写道：“到达威尼斯的军人远远不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6]

威尼斯城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安置这些十字军，而当局对这些武装士兵停留在拥挤的城区也深感忧虑。他们让十字军驻扎在荒凉的沙洲——圣尼古拉岛上，这是几个利多中最长的一个，如今被简单地称为“利多”。克莱里的罗贝尔回忆道：“于是，朝觐者们去了那里，搭建帐篷，尽可能安顿下来。”^[7]罗贝尔是一名来自法兰西的落魄骑士，他写下了记述此次东征的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不像维尔阿杜安一样从贵族的视角，而是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写。

十字军继续零零散散地到来，规定的出发日期来了又过去了，丹多洛的不满日益加深。十字军的士气因一些高级别人物的到来而间或高涨起来：佛兰德的鲍德温于6月底率军抵达，布卢瓦伯爵路易随后也率军赶到；7月22日，教皇使节——卡普阿的彼得抵达威尼斯，为东征事业提供宗教上的支持。但目前军队的规模与合同规定仍然相差甚远。直至7月，仍然只有一万两千名军人。就连维尔阿杜安也承认：“事实上，威尼斯人提供了大量船只、桨帆船与战马运输船，足以容纳现有人数的三倍。”^[8]

如果说这对十字军领主们来说是一个尴尬的局面，那么对威尼斯来说则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共和国已将整个经济押注到这次交易中，而对丹多洛而言，这将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曾作为中间人为十字军鼓吹、用花言巧语说服威尼斯人民接受这次合作。像其他所有威尼斯商人一样，丹多洛坚信契约的神圣性。而这一次的契约尤其必须得到尊重。据克莱里的罗贝尔记载，丹多洛对十字军领主们很是恼火：

“诸位大人，你们对我们竟如此不公！我和我的人民与贵方大使刚刚签订协约，我就命令所有商人立即停止贸易，投入到舰队的准备工作中。一年半多以来，我们全身心投入此项工作，没有任何收益。他们为此损失了很多，为此我和我的人民希望你们能偿还欠债。否则你们将无法离开这座小岛，我们也将停止给你们供给食物与饮水，直到你们清偿欠款。”伯爵们和十字军战士听到执政官这番话，感到十分焦虑和慌张。^[9]

我们不知道，丹多洛拒绝为十字军提供饮食的威胁是否真实。克莱里的罗贝尔又说：“执政官是个伟大而可敬的人，他并未切断他们的饮食供给。”^[10]但被长期困在利多上的许多普通士兵的生活越来越不舒服。他们在岛上实际上等同于囚犯，忍受着阳光炙热的烘烤，踢起长长海滩上的沙子聊以自慰，望着这一边亚得里亚海的碧水清波，而另一边，威尼斯在潟湖里灯红酒绿，在远处诱惑着他们，折磨着他们。一位显然对威尼斯没有好感的编年史家记载道：

在这里，他们搭好帐篷，从6月1日等到了10月1日。1罗马升的粮食能卖到50苏勒德斯^[11]。威尼斯人频繁下令，不许任何朝觐者离开这个岛屿。结果，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沦为威尼斯人的俘虏，方方面面都受到控制。而且，一种极度恐慌的气氛在普通士兵中逐渐蔓延开来。^[12]

他们虔诚地聚集于此，原本是为了获得灵魂的救赎，现在却发觉自己已被基督徒伙伴背叛了。这实在说不过去。日益恶化的愤恨之情后来会以更触手可及的方式重现。疾病横行，后果是“没有足够的活人来埋葬死者”。^[13]并且，或许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如此满腔热血地希冀的航行的目的地根本就不是圣地。对穷人而言，此次东征不过是当权者和富人缔结的又一次毫无诚信的交易。威尼斯已经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当教皇使节——卡普阿的彼得到达威尼斯后，他解除了十字军中穷人、病人和妇女的圣战誓言，允许他们回家。还有很多人干脆已经当了逃兵。卡普阿的彼得作为教皇代表来到威尼斯，以教皇的权威发言，代表教皇的良心，以“妙不可言”的布道鼓舞信众，但他始终无力解决最根本的问题。^[14]十字军无法支付欠款；威尼斯人又不可能免除其债务。这两方面不可调和的矛盾碰撞在一起，将会给此次东征带来持续不断、疲于奔命地处置危机的气氛，其后果在当时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

双方紧张地僵持着。威尼斯人怒火中烧。领导十字军东征的诸侯因自己未能遵守合约而感到羞愧。他们努力敦促每个人支付自己的旅费：

骑士每人4马克，步兵每人1马克。每一次十字军东征都受到缺乏现金的困扰，这一次也不例外。很多人已经支付过，便拒绝再交钱；有些人则根本付不起。欠款的数额依旧十分巨大。利多的夏日骄阳似火，十字军内部也为下一步如何打算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些人想要离开，然后另寻他途前往圣地。也有人为了获得灵魂的救赎，准备倾其所有。十字军面临着分裂的尴尬局面。贵族领导者们努力以身作则，交出他们的贵重财物，并在里亚尔托借钱。维尔阿杜安自我辩护道：“你应该看看那些被送到执政官宫殿以偿付债务的精美金银器皿。”^[15]即使这样，还存在34000马克，也就是9吨白银的缺口。他们告诉执政官，他们再也筹不到更多钱了。

对威尼斯和丹多洛而言，当前的形势非常严峻。是执政官亲自商定了这次交易，他必须出面解决危机。丹多洛不得不先后向大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报告了目前的形势。大家的情绪很恶劣；整个城市都投身于这项交易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面对破产的危险，人民很是愤怒。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季节就不适宜出航了，这次远征可能也不得不宣告失败。更要命的是：威尼斯目前还供养着12000名日渐焦躁不安的武装人员。丹多洛凭借他九十岁高龄的智慧以及威尼斯历史上的前车之鉴，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威尼斯人可以收下已获得的51000马克，放弃东征计划。但这会让他们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落下骂名：“从此，我们将永远被视为流氓和骗子。”^[16]第二，他们可以暂时搁置索要债款的事，他本人主张这么做：“不如这样，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用最早一批征服的收益来偿还欠我们的36000马克^[17]，我们就带他们出海。”^[18]威尼斯人都同意了第二个办法，到9月初，他们向十字军发出了这样的提议。

.....他们（十字军）都非常高兴，拜倒在他（丹多洛）脚下，忠顺地承诺一切听从执政官的建议。那天晚上，所有人都陷入了狂欢之中，最穷的人也张灯结彩，他们把点燃的火把绑在长矛上，伸向空中以示庆祝，还在帐篷内点亮灯火，整个营地都被火光环绕。^[19]

从威尼斯看去，利多灯火通明。

大约在9月8日（星期天）的圣母日，大批威尼斯人、十字军和朝觐者聚集在圣马可教堂，举行弥撒。在礼拜仪式之前，丹多洛登上讲道台，发表了一段动情的演讲：

诸位大人，你们的盟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你们要去完成的是前所未有的神圣使命。我只是个年老体衰的人，身体残缺，需要休息，但我看到，没有比我——你们的领主——更合适的人来领导你们。如果你们允许我加入十字军，并将领导你们的重任交给我，并愿意让我的儿子来接替我的位置、保卫这座城市，我愿意与你们一同前往，和朝觐者们共存亡！

人群欢呼雀跃，表示赞同。每个人都大喊道：“我们请求你们，看在上帝的份上，答应吧！”^[20]这个年逾九十、双目失明的老执政官，无疑时日无多，竟志愿加入十字军，令群众热泪盈眶。“人们都被这位高贵的老人感动了，其实他只要愿意，本可在家安度晚年。况且他虽然眼球无损，但已经看不见了。”维尔阿杜安回忆道。丹多洛从讲道台走下，在别人引领下，潸然泪下地登上高高的祭坛，在那里跪下，并让人在他的执政官尖角帽^[21]——一种象征执政官地位的大棉帽——上绣上了十字，“因为他希望人们都能看到”^[22]。这对威尼斯人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他们纷纷加入十字军队伍……朝觐者们看到执政官亲自加入十字军，喜不自胜、万分感动，”^[23]维尔阿杜安写道，“因为他非常睿智，享有盛誉。”年迈的执政官一下子就占据了十字军运动的中心位置。最后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舰队预计于航海季节的末尾出发。



执政官尖角帽

但这一次，真相远不止虔诚的朝觐者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威尼斯人表面上温和地同意暂缓收缴欠款，一直等到“上帝允许我们一同得胜”^[24]，但他们实际上与十字军领导人缔结了新的秘密协定。根据这些密约，此次东征将会逐渐地露出真面目。为了弥补暂缓收缴债务所带来的损失，并确保威尼斯一定能够得到具体的收益，丹多洛做了一番非线性思考，向十字军领导层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要求。这个要求与威尼斯对亚得里亚海地缘政治，尤其是达尔马提亚海沿岸城市扎拉的迷恋有联系。威尼斯对这片海域的主宰，以及它对贸易和关税的控制，一直令达尔马提亚人心怀不满。扎拉这座“坐落于海滨……非常富裕的城市”^[25]一直对威尼斯的控制耿耿于怀，自公元1000年彼得罗二世·奥西奥罗执政官的远征以来一直在谋求独立。1181年，他们又一次摆脱了威尼斯的束缚，与匈牙利国王签署了保护条约。这种局面屡次重演。威尼斯人认为扎拉人背弃了封建效忠誓言；更可恶的是，他们竟然还与威尼斯共和国的海上对手比萨人眉来眼去。丹多洛很可能原本就打算在率领舰队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途中教训不服管教的扎拉人，但在闭门会议中，他只是告诉十字军领主们，此时要航向东方，已经太晚了；如果十字军能帮忙攻打扎拉，那么威尼斯人民就更容易接受将还款日期后延。为了避免此次东征彻底失败，他们同意了。

从神学角度看，这个决定非常不妥。十字军东征的第一站竟然是另

一座基督教（而且是天主教）城市。更糟糕的是，扎拉的新宗主——匈牙利国王埃默里克自己也是十字军。也就是说，两支十字军要互相残杀。的确，埃默里克没有任何要真正动身出征的意思；威尼斯人认为，埃默里克加入十字军东征的目的主要是向罗马教皇寻求保护，免遭类似的报复。即便如此，攻打扎拉仍然算得上是弥天大罪。此外，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埃默里克的提醒下已经向丹多洛发出了严正警告：“无论如何，不得侵犯这位国王的领土！”^[26]没有关系。丹多洛不准教皇使节卡普阿的彼得作为教皇的代言人随同舰队出征，堵住了他的嘴，同时继续准备舰队。颇有些可怜的彼得祝福了十字军，同时保留了自己对其目标的意见，匆匆返回罗马。英诺森三世准备了一封警告信。他之前对奸诈的威尼斯人的担忧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在正在集结的十字军内部，风声也走漏了：第一个攻打目标将是一座基督教城市。十字军名义上的领导者——蒙费拉的博尼法斯礼貌地谢绝参加第一阶段任务：他显然不想卷入威尼斯的帝国主义计划；但整个十字军东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要么进攻扎拉，要么就会土崩瓦解。

准备工作现在加速进行。10月初，攻城器械、武器、食品、成桶的葡萄酒和水被艰辛地用人力或绞车搬运，或者被滚到船上；骑士们的战马打着响鼻，被牵上运马船的装载斜坡，然后被哄骗着拴上吊索，这种吊索能够让战马随着海浪的颠簸而摇摆，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然后舱门“就像封木桶般被密封起来，因为在外海航行时，整扇舱门都将会浸泡在海平面以下”。^[27]数千名步兵，许多还是从未出过海的，都挤在运兵船黑暗幽闭的船舱中；威尼斯桨手们在桨帆船上各就各位；盲眼的丹多洛被领上执政官的豪华战船；水手们收起铁锚，扬起风帆，解开绳索。威尼斯的历史与其历次伟大的海上冒险密不可分，但很少有能超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宏伟规模。^[28]在威尼斯共和国崛起成为大帝国的过程中，此次远征的贡献最大。它标志着威尼斯拥有了整个地中海盆地无可匹敌的海上力量。

对于没有航海经验的骑士们来说，眼前这壮观的场面让他们深感震撼，因此他们不吝溢美之词。维尔阿杜安断言：“世上任何港口都不曾有如此雄壮的舰队起航。我们可以说，森林般的樯橹覆盖了海面，闪闪发光，仿佛熊熊烈火。”^[29]克莱里的罗贝尔回忆：“这是自创世以来最壮丽的景观。”数百艘舰船在潟湖扬帆，它们的大小旌旗在微风中轻扬。在群集的大舰队中鹤立鸡群的是一些形似城堡的巨型帆船，配有高高的艏楼和艉楼，如同高塔一般耸立在海面上。每艘巨型帆船上都悬挂着熠熠生辉的盾牌和飘扬的旗帜，标示了它承载的那位十字军领主的身份，象征着他们的辉煌和封建权力。其中一些舰船的名字流传至今：“天堂”号和“朝觐者”号分别载着苏瓦松主教和特鲁瓦主教，还有“紫罗兰”号和“雄鹰”号。这些船只的高度将在接下来的事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字军战士们挤在一层层甲板上，他们罩袍上的十字架标示着他们的国籍，佛兰德人的十字架是绿色的，法兰西人的十字架则是红色的。威尼斯人的桨帆船舰队由执政官旗舰领航，这艘旗舰被涂成醒目的朱红色，丹多洛端坐在同样是朱红色的华盖下，“他面前有四只银喇叭和铙钹奏着洪亮的声响”。^[30]各种齐奏的声响充满了整个海域。“一百对银、铜制成的喇叭齐鸣，宣示舰队起航”^[31]，响彻整个海面，大鼓、小鼓和其他乐器轰鸣着，鼓乐喧天；鲜艳的旌旗在咸咸的海风中飘扬；桨帆船的木桨敲碎波浪；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站在艏楼上，带领整个舰队高唱十字军的赞美诗“求造物主圣神降临”。“每一个人，无论身份高低贵贱，无一例外，都感情洋溢、欢欣鼓舞地挥泪。”^[32]在这胜利的喧嚣和压抑已久、终得释放的宗教情感中，十字军舰队驶出潟湖湖口，经过圣尼古拉教堂和利多（许多个月以来，利多一直是十字军的牢狱）的其他外围海角，进入亚得里亚海。

然而，辉煌的喧嚣中也夹杂着不和谐音。“紫罗兰”号在出航时沉没了；有些人出于宗教原因对攻击基督教城市扎拉深感质疑；而远在罗马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时刻准备对那些胆敢攻击扎拉的十字军施以绝罚。同时，34000马克的债务依旧悬而未决，就像悬挂在高高桅杆上的信天翁

[33]一样，在舰队绕过希腊海岸的全程中，始终困扰着此次远征。

[1] 威尼托是意大利东北部一地区，威尼斯是其主要城市之一。

[2]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41

[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41

[4] 阿普利亚（拉丁文古名），或称普利亚（现代意大利语的名字），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大区，东邻亚得里亚海，东南面临爱奥尼亚海，南面则邻近奥特朗托海峡及塔兰托湾。该区南部知名的萨伦托半岛，组成了意大利“皮靴”脚后跟的一部分。

[5]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35

[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39

[7]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6

[8]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41

[9]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9

[10]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9

[11] 罗马升为古罗马和中世纪的体积与容积计量单位，关于其具体数值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约0.59升。苏勒德斯是罗马帝国晚期的一种金币，1苏勒德斯等于4.5克，后常被用作黄金的重量单位。

[12]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14

[13]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08

[14]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14

[15]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43

[16]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20

[17] 原文如此。

[18]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p. 20-1

[19]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p. 21-2

[20]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p. 45-47

[21]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47

[22]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47

[2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47

[24]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47

[25]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45

[26] Phillips, Jonathan,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4, p. 111

[27]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96

[28]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Caroline Smith, London, 2008, p. 177

[2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51

[30]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24

[31]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23

[32]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24

[33] 典出英国著名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一名水手杀死信天翁，导致他所在的航船遭到风浪袭击。为了赎罪，他将死去的信天翁挂在自己脖子上，备受折磨。此处挂在桅杆上的信天翁比喻莫大的负担和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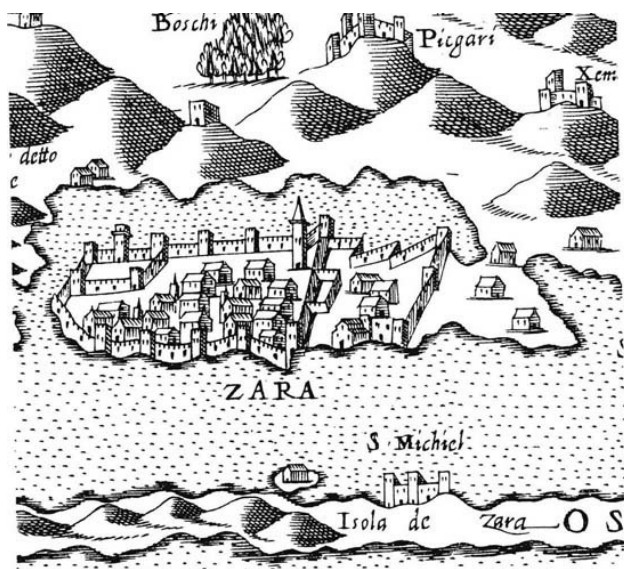
4.“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1]

1202年10月～1203年6月

威尼斯人打算利用这支恢宏的舰队在沿途重新确立自己在亚得里亚海北部的帝国权威，教训不服管教的城市，震慑海盗，并征募水手。威尼斯人将此次远征视作巩固自己封建权益的合法措施，但在利多苦等多时因而倍感挫折、囊中羞涩的许多十字军战士已经认为这一切与他们的圣战誓约背道而驰。“他们强迫的里雅斯特和穆格拉俯首称臣，”^[2]在舰队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南下途中，一位无名的编年史家直言不讳地写道，“他们强迫整个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沃尼亚

（Slavonia）^[3]向他们进贡。他们驶入扎拉，当初的‘圣战誓约’已然变成泡影。圣马丁节这一天，他们进入了扎拉的港口。”威尼斯人的残酷无情并不总是得到良好的接受。

舰队突破了封锁港口的铁链，长驱直入，将数千人送上岸。运输船的舱门被撬开；眩晕而丧失方向感的马匹被蒙着眼睛，牵到陆地上；人们将投石机和攻城塔卸下船，并重新组装；十字军在城门外搭建了许多帐篷，旗帜迎风飘扬。扎拉人从城堞上看到这不祥的景象，感觉大事不妙，于是决定投降。



扎拉及其港口

舰队到达两天后，扎拉人派出代表团去执政官的深红色营帐，向他提出和谈条件。整个扎拉事件完全是威尼斯的事情。但是丹多洛要么是谨慎起见，要么是为了让扎拉人如坐针毡，宣称自己必须先与法兰西诸侯会商，否则不能接受扎拉的投降。他这么一招让扎拉代表团急得上蹿下跳。

对丹多洛来说不幸，而对扎拉而言更倒霉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一艘从意大利抵达扎拉的船带来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禁令。信的原件遗失了，但其内容后来被明确地重述如下：

在此封信中，我们严令禁止你们和威尼斯人侵犯基督徒的土地……胆敢违背此禁令者将被逐出教会，同时也无法得到（教皇）给十字军的宽恕。^[4]

这非常严重。十字军战士们参加东征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如今却面临绝罚的威胁。这封信就像一枚手榴弹，被投入远征军原本就不稳固的联盟中，激发了所有潜在的紧张情绪。以强大的西蒙·德·孟福尔^[5]为首的一群持异议的法兰西骑士始终认为，攻击扎拉是对十字军誓

言的背叛。当丹多洛正在与一些十字军领主商量扎拉的投降事宜时，德·孟福尔等人去拜访了在执政官营帐等候的扎拉代表团。他们告诉扎拉人，法兰西人不会参与攻打这座城市，“只要你们能抵挡住威尼斯人的攻击，你们就安全了”。^[6]为了确保扎拉人知晓这一情况，另一名骑士对着城墙大喊这一消息。扎拉代表团听到这个承诺，大受鼓舞，回到扎拉，准备抵抗。与此同时，丹多洛与其他大多数领导人达成了一致，决定接受扎拉的投降，他们都回到了他的营帐。扎拉人此刻已经无影无踪，等待他们的是沃城修道院院长。他可能手持着英诺森三世的信函，戏剧性地走上前来，代表着教皇的权威，高声宣布：“诸位大人，我以罗马教皇之名，禁止你们攻击这座城市；因为这是一座基督教城市，而你们都是朝觐者。”^[7]一场激烈的争吵立即爆发了。丹多洛怒火中烧，向十字军领导人发难：“诸位大人，我按照协议安排了这座城市的投降，你们却把它从我手中抢走了，尽管你们曾保证要帮助我们征服这座城市。现在我请求你们征服它！”^[8]此外，据克莱里的罗贝尔记载，他并不打算对教皇让步：“诸位大人，你们应当知道，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向扎拉人复仇，就算是教皇也不能阻止我！”^[9]更为拘谨的十字军领袖们发现，他们身处遭受绝罚和背弃世俗契约的两难境地。他们羞愧难当，同时也为德·孟福尔的行为感到震惊，最终觉得别无选择，只得兑现向威尼斯事业做出的承诺——尚未偿清的债务与此次交易直接关联。要不然，东征就会走向崩溃。带着沉重的心情，他们同意了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大人，不管别人怎么反对，我们会帮您拿下这座城市。”^[10]不幸的扎拉人本想和平地投降，现在却遭到排山倒海的攻击。他们把十字架挂在城墙上，以唤起十字军的良心，但这徒劳无益。十字军将巨大的投石机推到前线，轰击城墙；坑道工兵开始在城墙下挖掘地道。五天内扎拉就沦陷了。扎拉人以丧权辱国的条件来求和。除了处决一些重要人物之外，威尼斯人并没有伤害扎拉人民的性命；平民被逐出城市，胜利者“毫不留情地将这座城市洗劫一空”。^[11]

此时已是11月中旬，丹多洛告诉十字军，此刻已不宜出航，但可以

在达尔马提亚海岸舒适地过冬，十字军最好等到来年春天。这个提议很合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却使得十字军东征陷入了新的危机。普通军人们觉得自己又一次遭到了无耻的剥削，他们责怪威尼斯。他们曾在利多过着被监禁一样的日子，被领入歧途去攻打基督教城市，一贫如洗，备受蒙蔽。时间一天天过去，十字军与威尼斯的合同只有一年，而他们离圣地却仍然那么遥远，更不用说埃及了。洗劫扎拉的战利品大多被领主们瓜分一空。“贵族们把城市的财物据为己有，而穷苦士兵什么也没得到，”^[12]一位亲眼见证的无名人士如此写道，他显然十分同情普通士兵的遭遇，“穷人在饥饿赤贫中过得无比艰辛。”十字军还欠着34000马克的债务。

洗劫扎拉不久之后，由于人们积怨太深，爆发了动乱。

三天后，临近晚祷时，军中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大灾祸。^[13]威尼斯人与法兰西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激烈冲突。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拿起武器，暴力冲突非常激烈，几乎每条街道上都有人用剑、矛、弩、枪厮杀，死伤枕藉。

指挥官们花了很大力气才重新掌控了局面。整个十字军东征事业危在旦夕。

普通十字军战士们不知道的是，由于攻打扎拉，他们已经遭到绝罚。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会魂飞魄散。为了应对危机，十字军的主教们发挥了创新思维，向全军施加赦免，撤销了绝罚令，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权力。1202~1203年冬天，全军将士就在达尔马提亚消磨时间，相处还算融洽，他们在等待新的航海季节。然而他们全然不知的是，他们的不朽灵魂仍然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法兰克诸侯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火速赶往罗马道歉，努力解决问题。威尼斯人坚决拒绝加入道歉的行列。威尼斯人认为，扎拉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暂缓收缴34000马克债款的协议就是建立在占领扎拉的基础之上，只要这笔债务还没有

还清，整个威尼斯共和国的立场就至关重要。

在这个代表团起程去罗马之前，关于扎拉的消息已经传到英诺森三世那里，他起草了怒气冲天的回复，其开头非常简练：“诸位伯爵、男爵及所有十字军战士，我不向你们做任何问候。”^[14]然后措辞愈发激烈。他一系列严厉的词句如同攻城器械有规律的沉重撞击声，狠狠地谴责了十字军的“极其恶劣的行径”：^[15]

你们支起帐篷来攻城。你们挖壕沟，从四面八方包围这座城市。你们破坏城墙，导致许多人流血伤亡。当扎拉公民们想要屈服于你们及威尼斯人的统治时……他们在城墙上高挂起十字架。但你们却……严重地伤害受难的耶稣基督，攻打了这座城市，屠戮其人民，并用凶残的武力强迫他们投降。^[16]

十字军的代表团抵达罗马后，英诺森三世提醒了这些心里有愧、垂头丧气的代表，随军主教们给出的赦免根本是不合法的。他要求十字军悔改，并归还战利品。但他最严厉的谴责是针对威尼斯人的，“他们当着你们的面捣毁了这座城市的围墙，掳掠教堂，摧毁房屋，而你们却与他们分赃”。^[17]英诺森三世引用《圣经》中遭强盗打劫的人的典故^[18]，将威尼斯人定性为诱导十字军走上歧途的强盗。英诺森三世还强调，不许再伤害扎拉。威尼斯人对此命令置若罔闻。但与此同时，英诺森三世知道十字军所遭受的苦难，而且他个人也不愿意看到十字军运动土崩瓦解，于是又设立了一些规定来为大家免罪，但坚决不为威尼斯人免罪。代表团带回去的教皇回信明确表示，十字军仍然处于被绝罚的状态，而且其中的一些规定，例如归还战利品，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于是十字军高层又一次隐瞒了教皇回信的内容，而是告诉将士们，他们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赦免。可见教皇对十字军的控制显然非常有限。

这个罪孽的世界满是陷阱，英诺森三世对其抱有深深的担忧。但如果他认为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推动整个东征事业的那些力量——对灵魂解放的渴求、欠

威尼斯的债务、资金的匮乏、秘密协定、普通士兵一再遭受蒙蔽、十字军始终面临瓦解的威胁、海运合同的有效期一天天过去——将会促使事件发生另一个超乎寻常的转变。战事走向即将发生巨大转变。1203年1月1日，德意志国王——士瓦本的腓力的使臣抵达扎拉。他们向十字军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建议，供其斟酌。这个建议涉及了拜占庭此前的整个复杂故事，以及它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紧张关系。就像其他许多困扰着、推动着此次十字军东征的秘密交易一样，一些主要的骑士已经知道了它的内容。

直截了当地说，大使们的来意如下：他们代表腓力的妻弟——亚历克赛·安格洛斯而来；安格洛斯是一位年轻的拜占庭贵族，他请求十字军帮他夺回被他伯父篡夺的合法皇位。安格洛斯的父亲伊萨克二世被自己的兄长（亚历克赛三世）废黜并戳瞎了双目。事实上，按照严格的继承法，年轻的安格洛斯并没有皇位继承权，但法兰西骑士们未必懂得拜占庭帝国继承法的微妙之处。大使们到来的时机极佳，说明他们非常熟悉十字军当前的窘境。他们提出的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提议，既把行动提升到基督教道德的高度，又以现金作为诱惑：

既然你们为了上帝、合法权益和正义而战，理应尽其所能去帮助那些合法继承权遭到侵犯的人。安格洛斯给你们的报酬将会极其丰厚，其他任何人都给不出这样的条件，他还会大力支持你们去征服海外的土地。[\[19\]](#)

首先，如果上帝允许你们帮助安格洛斯夺回皇位，他将令整个拜占庭帝国臣服于罗马（二者原本是一家，后来产生了隔阂）。其次，他知道，你们为了东征事业已经倾尽所有、囊中羞涩，他将会给贵族及普通士兵一共20万银马克。并且他将亲自带领1万人追随你们前往埃及……他会在埃及征战一年，此后在他有生之年，他将出资在圣地供养500名骑士。

这些条件极其慷慨，似乎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罗马教廷可以达到其最魂牵梦萦的目标之一：让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臣服于罗马；十字军不仅可以轻松地偿还债务，还可以得到征服和守卫圣地所需的军事资

源。据说教皇会欢迎这样一次行动。而且简直是手到擒来：在君士坦丁堡不乏安格洛斯的支持者，他们会打开城门，欢迎十字军将他们从暴君亚历克赛三世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臣们说话的腔调就像巧舌如簧的推销员提议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样：“诸位大人，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拥有谈判的全权。你们应当明白，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过这么优厚的价码。谁若是拒绝这样的条件，一定是没有征服的胃口。”^[20]

他们说的有些东西是意淫，有些干脆就是扯谎。事实上，安格洛斯在前一年秋天就曾带着此计划的大纲去拜见教皇英诺森三世，但遭到了回绝。英诺森三世也已经警告过十字军不准参与这样的计划——这将是另一次对基督教国家的攻击——“免得他们（十字军）屠戮基督徒，污了他们的手，犯下违逆上帝意志的罪行”，并且他也将此信内容告知了拜占庭皇帝。^[21]亚历克赛·安格洛斯年轻无知、野心勃勃且十分愚蠢。他许下的都是不明智的空头承诺，专门挑十字军领主们想听的讲。但核心圈子里的一些法兰克诸侯已经知晓此计划，并且跃跃欲试。整个东征运动的领导者——蒙费拉的博尼法斯对拜占庭皇帝早有私人怨恨。后来英诺森三世将随后发生的事情的罪责全部推到威尼斯人身上，但这其实不是威尼斯人的主意。我们不能确定，丹多洛是否在此前就知道十字军要进攻拜占庭的计划；他很有可能对其做了冷静的评估。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内部事务，他一定比法兰西贵族们知道得多，他对年轻的安格洛斯也没有什么信心。而对安格洛斯来说，以他的名义提出的条约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次日，在扎拉，一个由世俗与宗教领袖组成的小范围议事会商讨了在出征圣地途中是否进攻第二座基督教城市的问题。激烈的争吵又一次爆发，整个十字军运动再一次面临瓦解。各方分歧极大，难以弥合。沃城修道院院长再次强烈谴责，“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同意对基督徒开战”^[22]；而另一方面，也有人非常务实地表示赞同：军队缺乏资金，而且还背负着巨额债务，向拜占庭开战将为东征提供足够的财力和人

力。“你们应当知道，只有通过埃及或希腊（拜占庭）才能收复海外的圣地，如果浪费此次机会，我们定会追悔莫及。”^[23]丹多洛一定做了仔细权衡：攻打君士坦丁堡能够轻松地收回欠款，在君士坦丁堡有一位亲近威尼斯的皇帝也非常有价值，但威尼斯人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威尼斯共和国目前在君士坦丁堡生意兴隆，如果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失败，那么居住在那里的威尼斯商人将沦为人质。但说到底，最终促使十字军定夺的还是他们的贫困。没有金钱和粮草，十字军运动将会失败；丹多洛推断，如果能够轻松地扶植安格洛斯登基，“我们就有比较合理的借口去那里，获取给养和其他物资……然后我们就有能力去海外（耶路撒冷或埃及）”。^[24]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支持进攻君士坦丁堡。根据敌视威尼斯的史料，他如此决定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得到安格洛斯许诺的钱财（威尼斯这个民族特别贪财），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威尼斯人）的城市在强大海军的支持下，正在霸占那整个海域”。^[25]这是根据后来实际发生的事件做出的回顾性评判。

最终，法兰西诸侯的强大势力集团在博尼法斯领导下，力排众议，投票决定接受安格洛斯的提议。双方很快便在执政官的住处签署条约，并加盖印玺。亚历克赛将在复活节前两周到达。条约是拼凑起来的，可能在十字军起航很久之前就已经得到大致的认可。贵族领主们走到哪里，他们麾下的普通十字军就跟到哪里。于是，威尼斯人出航了。维尔阿杜安不得不承认：“本书只能作证，法兰西人的派系中只有十二人宣誓，其他人不肯。”^[26]他承认此次出征备受争议：“军中分歧严重……人心纷乱，一些人想要解散军队，另一些又尽力团结。”不少人脱离了十字军。许多普通士兵“齐聚在一起，结成盟约，发誓绝不去攻打拜占庭”。^[27]一些高级骑士同样反感，也脱离了军队。一些人失望地返回家中，一些人又辟新路直接前往圣地。500人死于船只失事。另一支队伍遭到达尔马提亚农民的袭击和屠戮。“就这样，军队的规模日益缩小。”^[28]

英诺森三世此时还不知道十字军犯下了新一轮罪行——而且比先前更加丑恶——还在像之前那样威胁要将冥顽不灵的威尼斯人逐出教会，但他对十字军的控制力在日渐衰弱。十字军领袖们又一次隐瞒了教皇的信件。就在舰队准备出海南航时，他们向教皇发送了一份缺乏诚意的道歉信。他们知道，等教皇回信的时候，他们早已经身在远方，耳不听为净。他们居然还虚伪地解释道：英诺森三世本人一定宁愿让他们隐瞒信件，也不愿意看到十字军瓦解。“我们坚信，”他们写道，“您也会乐于见到.....舰队仍然团结，而不是因为看到您的信而分崩离析。”^[29]两年后，丹多洛终于道歉时，也用了同样的借口。

4月20日，舰队主力运载着所有装备、马匹和人员，起航前往科孚岛。到此时，不知悔改的威尼斯人已经将扎拉夷为平地：“摧毁了扎拉的城墙、塔楼、宫殿和其他所有建筑。”^[30]只有教堂得以幸免。威尼斯人决心要确保这座不服管教的城市将来再也没有兴风作浪的能耐。丹多洛和蒙费拉的博尼法斯仍然留在扎拉，等待着年轻的皇位觊觎者亚历克赛。他在五天后——圣马可节这一天到达了（这个日期也是精心选择的），“得到了仍在此地的威尼斯人热情洋溢的欢迎”。^[31]随后，他们一起登上桨帆船，追随已出发的舰队前往科孚岛。

十字军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它急缺金钱，却只能通过令人不齿的手段赚钱），年轻的皇位觊觎者的到来令虔诚的信徒倍感憎恶。在科孚岛，主要的法兰克贵族起初以尊崇皇室的礼仪伺候亚历克赛，“欢迎他，庄重而奢华地对待他。这个年轻人看到这些出身高贵的人如此尊崇他，又有这样一支军队拥护他，不禁喜不自胜。然后侯爵^[32]走上前来，将他领到营帐内”。据圣波勒伯爵记载，在营帐内，安格洛斯采取了一系列道德绑架的举措：“他涕泗横流、双膝下跪，像乞讨者那般恳求我们陪他去攻打君士坦丁堡。”^[33]但这一策略却失败了。据圣波勒伯爵说，“这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和人们强烈的反感。大家认为应该尽快去阿卡，只有不超过十人主张去君士坦丁堡”。^[34]克莱里的罗贝尔更是直

言不讳地表达了普通士兵的观点：“呸！我们去君士坦丁堡干什么？我们要去朝觐……我们的舰队只会跟随我们一年时间，现在半年都过去了。”^[35]

争论不休之下，一大群持反对意见的法兰克领主离开了军营，在一段距离之外的山谷里驻扎下来。十字军高层惊慌失措。据维尔阿杜安记载，“他们万分沮丧，说道：‘诸位大人，我们的处境十分悲惨：如果这些人离开我们……我们的军队就散了。’”^[36]十字军眼看就要彻底完蛋，为了挽救危局，他们孤注一掷，快马加鞭，前去乞求那些反对者重新考虑。双方会面时，气氛非常紧张。双方都下了马，小心翼翼地走向对方，内心充满了不确定。这时，

贵族们都跪在他们脚边，哭着请求他们答应不要离开，否则就长跪不起。而这些反对者看到这个场景都十分感动，看到他们的领主、亲人和朋友都跪下了，他们也流下了泪水。^[37]

这个非同寻常的公关手段奏效了。反对者们被这充溢的感情呼吁所征服，同意继续前进，但提出了严格的条件。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与威尼斯人船只的租约时日无多了。反对者们只肯在君士坦丁堡待到9月29日。这些领导者们不得不发誓，会在那个日子的两周前准备船只，送这些反对派去圣地。他们于5月24日起航离开科孚岛。素来喜欢把万事都描绘得光鲜灿烂的维尔阿杜安写道：

这一天天气晴朗，微风和煦，他们扬帆远航……从未见过如此良辰美景。这支舰队似乎注定要开疆拓土，因为目力所及范围内檣橹如同森林，尽是船帆和大小舰船，大家心潮澎湃。^[38]

十字军运动总算逃过一劫。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在科孚岛的停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亚历克赛曾保证，拜占庭人会承认他的合法地位，君士坦丁堡会敞开大门迎接

他，而东正教会也将臣服于罗马的权威。但是，在科孚岛没有任何迹象能够预示这样的结果。拜占庭臣民们对现任皇帝很忠心，紧闭城门，并轰击停泊在港内的威尼斯舰队，迫使其撤退。至于宗教分裂，科孚岛的东正教大主教在宴请天主教兄弟时表示，他不认为罗马的权威在东正教之上，更何况杀害基督的就是罗马士兵。

而在罗马，英诺森三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现在才知道，在洗劫扎拉后，十字军正在前往君士坦丁堡。6月20日，他写下了又一封言辞激烈的谴责信：“我已经明令禁止你们侵略或进犯基督徒的土地，否则将对你等施以绝罚……我也曾警告你们，不要轻率地违反禁令。”^[39]为了表达他对十字军可能变本加厉地犯罪的极端厌恶，他动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比喻：“忏悔者故态复萌、再次作奸犯科，如同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40]这封信清楚地表明，英诺森三世认为威尼斯人应该为此事负责。他将丹多洛比作《出埃及记》里的法老，“假装情非得已，戴着虔诚的面纱”，对待十字军就像法老奴役以色列的子民一样。丹多洛是“我们的伟大丰收的敌人”，就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英诺森三世命令十字军领袖们将绝罚信给威尼斯人看，“这样他们就找不到理由来为自己的罪责开脱”。同时，他也在纠结这个棘手的神学问题：十字军战士在船上应当如何与已经被绝罚的威尼斯人共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晦涩而令人震惊：十字军可以同威尼斯人一起前往圣地，到了那里之后“若情势有利，你们可以抓住机会，镇压他们的罪恶”。^[41]这话的实际意思是，十字军可以合法地将威尼斯人消灭。

但舰队中的所有人，不管是自愿还是为了其他什么原因，都已经聚在一起，而且现在要改变计划也太晚了。就在英诺森三世落笔写信的时候，舰队在有利的海风吹拂下，稳步驶向达达尼尔海峡。四天后，即1203年6月24日，十字军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仰望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城墙，不禁目瞪口呆。英诺森三世已经完全无力控制事态。在随后的月份里，他悲哀地承认：“世界就像潮水，时有涨落；人们无

可避免地随波逐流，做不到停止不前。”^[42]他所运用的关于大海的比喻很有说服力。

[1] 典出《旧约·箴言》，26：11。有点像中国俗语“狗改不了吃屎”。

[2]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p. 214-215

[3] 斯洛沃尼亚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区，位于今天克罗地亚的东部，其北面是德拉瓦河，南面是萨瓦河，东面是多瑙河。

[4]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97

[5] 这位西蒙·德·孟福尔是法兰西的孟福尔—拉莫里领主，同时是英格兰的第五代莱斯特伯爵。他的幼子非常有名，也叫西蒙·德·孟福尔，后成为第六代莱斯特伯爵，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妹夫、著名权臣和反对派领袖，开启了英国议会的先河。

[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55

[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57

[8]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57

[9]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27

[10]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57

[11]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15

[12]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15

[1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59

[14]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41

[15]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41

[16] *Patrologia Latina*, ed. J. P. Migne, vol 214, cols. 117B-1179, Paris, 1849-55

[17]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44

[18] 即著名的“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典出《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37节中耶稣讲的寓言：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但不闻不问。唯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路过，不顾隔阂，动了慈心照应他。

[1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63

[20]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63

[21] *Patrologia Latina*, ed. J. P. Migne, vol 214, col. 1123, Paris, 1849-55

[22]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63

[2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65

[24] Phillips, Jonathan,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4, p. 131

[25] Phillips, Jonathan,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4, p. 132

[2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67

[27]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16

[28]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67

[29]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59

[30]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53

[31]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53

[32] 指蒙费拉的博尼法斯。此时他的头衔是蒙费拉侯爵。

[33]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66

[34]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 204

[35]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 204

[36]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p. 67-8

[3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77

[38]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79

[3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p. 79-81

[40]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63

[41]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62

[42]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64

5.兵临城下

1203年6月～8月

1203年6月23日某时，君士坦丁堡的人们从海墙远眺，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支庞大的威尼斯舰队，满载1万名基督教十字军，从西方沿博斯普鲁斯海峡逼近，意在废黜他们的皇帝。许多人既困惑又震惊，几乎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观看这一海上奇景的人群中，有一位拜占庭宫廷的贵族编年史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他准备开始回忆此事时激动不已。“到目前为止，本书的记述过程都是平稳而轻松的，”他在书中写道，“但现在，说实话，我真不知该如何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1]

科尼阿特斯对现任皇帝亚历克赛三世的批评非常严厉，这位皇帝废黜了自己的弟弟伊萨克二世，戳瞎了后者的双目，现在亚历克赛三世的侄子要回来争夺皇位了。“一个连羊群都无法领导的人”可能是科尼阿特斯对亚历克赛三世最温和的评价了。^[2]这位皇帝很懒散，终日寻欢作乐，志得意满且不喜战争，不过他也可能轻信了英诺森三世的信函。英诺森三世曾保证，西方人被禁止侵犯拜占庭，这种侵略恶行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不管怎么说，拜占庭人几乎毫无防御准备。谋臣们强烈敦促皇帝采取防范措施以应对即将兴起的风暴，但皇帝置若罔闻。^[3]拜占庭海军名存实亡——海军司令已经把铁锚、帆和索具都卖掉了。皇帝不情愿地“开始修整已经虫蛀朽烂的小船，总共不到20艘”。^[4]他寄希望于巩固的城墙和他的陆军。君士坦丁堡占据着中世纪最有利的防御位置：城市呈三角形，周长13英里，两面环海，另一面由强大的三层城墙保护着，八百年来从未被攻破过。至于兵力，他指挥着约3万军队——这是十字军兵力的三倍，而且还有城中相当数量平民的支持。

舰队中许多威尼斯人对屹立在船首左侧的君士坦丁堡的轮廓很熟

悉；而不谙水性的十字军第一次看它的城墙，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君士坦丁堡的规模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它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以它为中心的帝国尽管已经萎缩不少，但仍然控制着地中海东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从科孚岛到罗得岛，从克里特岛到黑海沿岸、小亚细亚大部 and 希腊大陆。城市人口40万~50万；而威尼斯和巴黎都只有约6万人口。从海上，十字军可以看到，在海墙之内是一座繁华的都市，宏伟的房屋鳞次栉比，最恢宏的要数圣索菲亚大教堂，它那庄严的穹顶就像一位希腊作家所描述的那般，仿佛悬浮在空中。

欧洲编年史家们努力寻找合适的比喻来形容君士坦丁堡的庞大规模。英格兰的一位教区编年史家“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向他的读者保证：“它的人口比从约克城到泰晤士河的人口还要多。”^[5]每个亲眼看到君士坦丁堡的人都感到震撼、敬畏，以及越来越强烈的恐惧。维尔阿杜安宣称：“他们久久地凝视君士坦丁堡，难以相信世上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城市。”^[6]



从海上看君士坦丁堡

他们看到了环绕城市的高墙巨塔、富丽堂皇的宫殿、高耸的教堂。城内教堂数量极多，若非亲眼所见，人们根本不会相信。这座城市的规模堪称无与伦比。再勇敢的人看到这样宏伟的景观，都不禁战战兢兢。

他们现在还不能完全了解，君士坦丁堡城内有些什么：大理石、宽阔的街道、镶嵌画、圣像、神圣的金器、宝库、从古典世界掳掠来的古代雕像、神圣的遗迹以及不可替代的图书馆。他们也难以彻底了解这座城市的阴暗面：通往金角湾的山丘上有木制房屋挤作一团的贫民窟，备受践踏的城市无产阶级在这里艰难度日，遭到贫穷和暴乱的摧残。中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就像古罗马一样，民众和党派争斗不休，大熔炉般的城市被迷信、长期冲突和动荡的皇朝更迭所困扰。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民对东正教信仰忠心耿耿，极端敌视与其竞争的罗马教会。君士坦丁堡市民喜欢给自己的狗取名为“罗马教皇”，以示鄙夷：怎么可能像安格洛斯许诺的那样，轻易臣服于他们厌恶至极的罗马教会呢？

威尼斯人对形势更加熟悉；城内或许有多达1万威尼斯人在做生意，他们不会轻敌。丹多洛是一位睿智的顾问，他与十字军领主分享了自己的知识：“诸位大人，我比你们更了解这片土地的情况，因为我曾来过这里。你们肩负的是史上最艰巨、最危险的使命。所以你们务必小心行事。”^[7]6月24日，也就是他们首次目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天，整个舰队航行到了城墙下。这天刚好是施洗者约翰的宗教节日，舰队以盛大的排场列队前进，旌旗招展，船舷悬挂盾牌，好不威风。甲板上，士兵们紧张地磨砺他们的武器。他们距离这座城市是如此之近，以至于可以看见城墙上的人群。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向希腊船只放箭。

他们在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的亚洲海岸安营扎寨，搜寻粮草，满怀信心地等待安格洛斯的支持者出来迎接解放者。但没有一人前来。反倒是皇帝派来使节宣称，他“非常疑惑，你们为何来到他的帝国……因为他是基督徒，你们也是基督徒，而且他很清楚，你们是去解放海外圣

地的”。^[8]这位使节是个意大利人，他向十字军提供粮食和金钱，敦促他们尽快离开，同样也带来了皇帝的威胁：“如果他打算杀害你们，你们就会遭到毁灭。”

十字军高层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是好，越来越焦躁。根本没人欢迎他们，这令他们紧张不安。又是丹多洛前来献计。到此时，通过在城内做生意的威尼斯人，他应当很好地把握了真实情况。为了打破僵局，他建议驶近城墙，向市民展示安格洛斯，并解释安格洛斯此行是为了将人民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十艘桨帆船打着休战的旗号出发了。年轻的皇子和丹多洛、博尼法斯一起，乘坐第一艘船。他们在离城墙非常近的地方划来划去，好让从上方城堞处仔细观察的人都看得见他。传令官用希腊语隔着海面喊道：“看看你们真正的君主！我们到此不是要伤害你们，而是保卫你们！”^[9]起先，人群很安静，然后有人大喊道：“我们不认他是我们的君主；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10]在得知他是前任皇帝伊萨克二世的儿子后，又有人反驳道，他们对他一无所知。为了强调这个回答，拜占庭人放了一轮锋利的箭簇。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十字军的傀儡。“我们都惊呆了，”圣波勒的于格记述道。^[11]十字军全都对安格洛斯当初为他们描绘的轻松得手的前景信以为真。但如果他们在科孚岛时稍微多注意一下安格洛斯得到的回应，今时今日就不会那么意外了。安格洛斯是西方人的傀儡，他许诺屈服于罗马，希腊人不愿与他扯上任何关系。安格洛斯显然处于威尼斯人的羽翼庇护下，而拜占庭人憎恶威尼斯人，这更让拜占庭人对他没有好感。“于是他们返回营地，回到各自的驻地。”^[12]这真是令人沮丧的一刻。十字军现在知道，如果他们想要钱财和战士以收复圣墓，就必须凭借武力杀进城去。耶路撒冷突然变得那么遥远。他们开始备战。十字军也第一次开始冷眼睥睨那个给大家许下很多空头支票的小子。科尼阿特斯极其厌恶地评价安格洛斯为“虽已成年，但头脑还是个娃娃”。^[13]

此次失败尝试的次日，即7月4日，星期天，十字军诸侯举行了庄严

的弥撒，聚集起来，制定计划。丹多洛对这座城市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一次在选择策略的过程中可能又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座城市的港口位于有遮蔽的金角湾内，金角湾其实是城市东翼的一条狭长小海湾。威尼斯人的定居点就在这一线海岸上；那一段城墙最薄弱。为了保护这个港口，拜占庭人用铁链封锁了金角湾的出入口，铁链的一端在城墙上，另一端在加拉塔的塔楼上。加拉塔位于金角湾对岸的海岬上，周围是犹太人定居点。大家决定，第一步就是登陆到加拉塔附近的郊区，攻占塔楼，破坏铁链，之后舰队才能驶进金角湾。十字军受到的时间压力很大，因为他们的补给已经不多了。当夜，士兵们作了告解，写下遗嘱，“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意愿何时会降临到他们身上”。^[14]十字军的计划是对有防御的海岸实施两栖攻击，不少人对此抱有疑虑和担忧；据克莱里的罗贝尔回忆，“人们对能否在君士坦丁堡登陆抱有怀疑”。^[15]他们将“登上自己的船只，用武力夺取那土地，生死在此一搏”。

紧张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战马披挂完毕，装上马鞍，被牵着走上斜坡，回到运马船内，骑士们与战马在一起。战士们系牢头盔，备好弩弓。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日出后不久。在丹多洛指挥下，威尼斯桨帆船出动了，拖曳着运输船，渡过水流湍急的博斯普鲁斯水域，以开辟安全通道。他们前方是满载弓箭手和弩手的三桅帆船，任务是扫荡海岸。攻势展开的同时，一百只“白银或青铜的”喇叭齐鸣，战鼓也隆隆轰鸣。克莱里的罗贝尔说：“好像整个海面都挤满了船只。”^[16]皇帝的军队在海边严阵以待，准备将他们赶回海里。舰队靠近岸边，一时间万箭齐发，将守军逼退。戴着面甲的骑士水花四溅地冲过浅滩；弓箭手紧随其后，时而奔跑，时而放箭；在他们背后，运马船的坡道被放下，骑士们雷鸣般纵马从船舱中冲出，长枪蓄势待发，丝绸旗帜迎风飘扬。也许就是大群骑士猛然从船舱中杀出的景象打破了希腊人的斗志。骑士们将长枪放低，准备发动一次集体冲锋。正如一位拜占庭作家令人难忘的描述，其势头足以“攻破巴比伦的城墙”。^[17]“上帝保佑”，皇帝的士兵们“撤退了，我们即便射箭也打不到敌人”。^[18]希腊人

原本以逸待劳，处于有利位置，滩头的争夺战本应像诺曼底战役那样激烈，但是他们却温顺地放弃了自己的阵地。这对皇帝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

亚历克赛三世仍然占据着加拉塔的塔楼——这是控制铁链和金角湾的关键——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次日早上，“九点十分”，希腊人发动了一次反攻。^[19]他们冲出塔楼，袭击岸边的十字军；与此同时，第二支拜占庭部队乘船渡过金角湾前来参战。起初十字军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便重整旗鼓，击退了敌人。希腊人企图逃回塔中，但没有来得及紧闭塔楼大门。十字军迅速占领了塔楼。现在入侵者掌握了操纵铁链的绞盘车。威尼斯的大型帆船之一“雄鹰”号把握住这个机遇，借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劲风，冲破铁链，攻进了金角湾。聚集在铁链处的羸弱不堪的拜占庭船队被冲杀进来的威尼斯桨帆船驱散或击沉。现在威尼斯舰队驶入了拜占庭的内港，与皇帝只有咫尺之遥，令他如坐针毡。四天后，十字军继续逼近。军队在金角湾东岸北上，并试图通过城墙东北角对面的小桥。希腊人又有一个机会来击退敌人了；他们破坏了小桥，但是却不能阻止十字军将其修复并顺利通行。“没有一个人从城里出来阻止他们，这令人大感意外，因为城内人数是我军兵力的两百倍。”^[20]十字军在布雷契耐宫对面的一座山上安营扎寨。布雷契耐宫是皇帝最喜爱的宫殿，位于宏伟的城墙下。皇帝和他的敌人能清楚地看到彼此。圣波勒的于格说：“我们之间距离很近，我们的箭都能射到皇宫的屋顶、射进下方的窗户，希腊人的箭也能射到我们的帐篷。”^[21]

亚历克赛三世终于从他的懒散或自满中清醒过来，开始更坚决地袭扰入侵者。他不分昼夜地发动试探性的小规模袭击，以检验十字军的决心；维尔阿杜安回忆道：“他们（十字军）一刻都不得安生。”^[22]他们“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天内，全军要进入备战状态六到七次。他们睡觉、休息或吃饭时都要全副武装”。一种新的绝望在十字军营地中弥漫开。九个月前勇敢地出征去收复圣地的这支军队，如今却陷入了难以

想象的窘境：被困在一座基督教城市之外，要么厮杀，要么丧命。他们的阵地位于君士坦丁堡东北角，从那里可以看出此次任务非常艰难。在西方，连绵不断的三道陆墙随着地形起伏，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内外城墙上，一连串塔楼犬牙交错，它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一个七岁男孩能够把一个苹果从一座塔楼投掷到另一座”。^[23]“前景黯淡，令人胆寒；君士坦丁堡的陆墙长达3里格^[24]，而十字军全军只能攻打其中一座城门……在任何一座城市，都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被这么少的人围攻的事情。”^[25]

饥饿驱使十字军前进。除了对金钱的渴望，对食物的需求也是十字军东征运动的长久主题。他们只剩三周的供给了，又与希腊人相持不下，行动受限。“他们去搜寻食物时不能离开营地超过弩箭射程四倍的距离，面粉和咸肉也极少……除非杀了战马，否则没有鲜肉可以食用。”^[26]据贵族圣波勒的于格回忆道，“我已经绝望了，只能用罩袍来换面包，但我尽全力保住了我的战马和武器。”^[27]时间一天天过去，不断考验着大家的决心。他们亟须决定性地解决问题。

丹多洛希望全军乘船越过金角湾攻城。金角湾沿岸只有一道城墙，而且是最低的，仅35英尺高。他的计划是从最高的船只的桅杆上放下“精巧奇特的工具”——临时建造的飞桥，将其搭到城墙上，让士兵借此登上墙头、涌入城市。^[28]威尼斯人善于制造和操纵这样的精巧工具，并且惯于在颠簸的甲板上方30英尺的半空中发动攻击。这些都是水手的必要技能。而习惯于陆上作战的骑士们一想到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的半空中作战，不禁脸色煞白，试图找借口逃脱；他们将在布雷契耐宫附近用撞城槌和云梯攻打陆墙。最后大家同意，在城市的东北角海陆两路同时展开进攻。

准备几天之后，7月17日，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做好了全面攻打一座基督教城市的准备。飞桥是用帆船的桁端制成的，连接起来，并铺上

木板，其宽度足以让三人并肩前行。飞桥覆盖着兽皮和帆布，以保护己方士兵免遭敌人投射武器的伤害，并架设在最大的运输船上。如果克莱里的罗贝尔的话可信，那么整架飞桥长100英尺，并且利用复杂的滑轮系统升到桅杆顶端。威尼斯人还在船首装上投石机，用柳条制成的笼状升降机将弩手送到顶端。挤满弓箭手的甲板上铺着牛皮，以抵御恐怖的“希腊火”——利用特殊装置喷射的燃烧的石油。维尔阿杜安记载道：“他们的进攻组织有序。”^[29]在陆墙处，法兰克人也集结了云梯、撞城槌、挖掘坑道的装备以及自己的重型投石机，准备配合威尼斯海军的进攻。

那天早上，十字军水陆并进。丹多洛的舰队一字排开，齐头并进，战线长度“足有弩弓射程的三倍”。^[30]战船缓缓驶过平静的金角湾，向海墙射出暴风骤雨般的石弹和弩箭。拜占庭人也发出了类似的冰雹般的投射武器，扫射着甲板，敲击着覆盖起来的飞桥。庞大的帆船——“雄鹰”号、“朝觐者”号、“圣莫尼加”号冲到海墙下，飞桥撞击到城堞上，“双方士兵用利剑和长枪血战起来”。^[31]号角声、隆隆鼓声、钢铁撞击声、石弩投掷的石弹的捶击声、士兵们的呼喊和惨叫声，这些声响不绝于耳，振聋发聩。“战斗的轰鸣嘈杂仿佛让陆地和大海都震动了。”^[32]

在陆墙处，十字军架起云梯，尝试强行登城。据维尔阿杜安记载，“进攻非常有力，组织有序，势头猛烈”，但他们遭遇了皇帝的精锐部队——瓦良格卫队^[33]的顽强抵抗。瓦良格卫队的成员是肩披长发、手舞利斧的丹麦人和英格兰人。^[34]最终，15名十字军登上了城墙，与守军发生激烈的肉搏战，但无法再进一步；他们被从壁垒击退了；两人被俘，“很多士兵负伤；诸侯极其焦虑不安”，于是攻势猛地停下了。^[35]关键的是，威尼斯人的进攻也开始力不从心。低矮脆弱的桨帆船看到城墙上射来暴雨般的投射武器，拒绝跟着运输船上前。战斗僵持不下。

就在这时，执政官发出了关键的干预，这或许是威尼斯共和国航海

史上最重要的举动。用维尔阿杜安的赞美之词来说就是，年老眼盲的丹多洛“全副武装，毅然站在船首，他面前飘扬的是圣马可的大旗”。^[36]他一定可以清楚地听到耳畔的战斗嘈杂——尖叫哭喊声、箭矢和其他投射武器的呼啸和撞击声；我们不确定他能否感到威尼斯人正显出颓势；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其他人向他汇报了战况。他显然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执政官专断地命令他的桨帆船立即前进，将他送上岸，“否则他就重重惩罚他们”。^[37]朱红色的桨帆船在希腊人投射武器的瓢泼大雨中冲上岸去；它着陆后，圣马可的旗帜被送到陆地上；其他船上的人见此都羞愧难当，跟了上去。

除了描绘圣马可的骨骸被运到威尼斯的镶嵌画之外，这是威尼斯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一幕：盲眼的执政官笔直地屹立在船首，他的船停靠在咄咄逼人的城墙下，圣马可的金红两色雄狮大旗在风中招展。周围是激烈的厮杀，但这位睿智而高龄的商人十字军却丝毫不为所动，催促他的舰队继续前进。这一刻的记忆将不断得到重新讲述，数百年来令威尼斯人胸中充溢尚武的爱国主义激情；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人们将追溯这一幕，将其颂扬为古老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最高典范，而共和国的财富正是建立在此种英雄主义之上。四百年后，丁托列托^[38]受雇在执政官宫殿的议事厅重现这一幕，他的画作尽管包含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细节，但非常生动细致。后来的威尼斯人都明白此事意味着什么，丹多洛的举动，借助此刻尚无人能预见的一系列事件，推动了威尼斯崛起成为地中海帝国的霸业。那一天，法兰西人在陆地上战败，如果威尼斯人在海上也失利，整个远征就可能崩溃。

但事实并非如此。盲眼执政官的英雄举动令威尼斯人深感羞愧，划动桨帆船猛冲到滩头；攻击再次展开；之后，金红相间的圣马可旗飘扬在一座塔楼上，可能是飞桥上的十字军插上去的。威尼斯人准备用撞城槌攻击城墙。守军突然被压倒，撤退了。城门洞开，威尼斯人长驱直入。很快，他们就控制了25或30座塔楼，相当于金角湾沿岸海墙的四分

之一。他们开始向山上推进，穿过遍布木制房屋的狭窄街道，掠夺珍贵的战马和其他战利品。

现在，亚历克赛三世终于从对己方防御的自满中惊醒过来，这么多天以来，他一直“作为一个旁观者”，消极地从布雷契耐宫的窗户观望战局。^[39]现在威尼斯人已经进城了，他必须采取措施了。他派出瓦良格卫队去驱逐入侵者。威尼斯人没有能力应对反攻，于是退回了刚刚占领的塔楼中。威尼斯人急于获得一个立足点，绝望之下，一边撤退一边开始纵火，用烈火阻挡步步紧逼的希腊军队。7月天气还很炎热，金角湾上吹来劲风，火势开始蔓延到城市东北角的低矮山坡，横扫拥挤的街道，“居民们被火烧得四处逃窜”。^[40]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燃烧的爆裂声和不祥的烟柱。火墙随着飘忽不定的风，向着不可预知的方向前进。“从布雷契耐山到施恩者修道院，大火吞噬了一切，”科尼阿特斯回忆道，“熊熊大火一直席卷到第二区。”^[41]次日，火势终于止步于通往布雷契耐宫的陡峭山坡，此时市区125英亩的地域已经化为灰烬，约2万人无家可归。留下的是一大片烧得漆黑的开阔地，这是城市心脏的丑陋伤痕。对科尼阿特斯而言，“那天满目疮痍，哀鸿遍野；要哭诉这场恐怖的火灾，真需要河流般的泪水”。^[42]他还从未目睹过兵燹对他挚爱的城市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

在烈火肆虐的同时，威尼斯人借机巩固了自己的阵地，机智的丹多洛立即开始将俘获的战马运到法兰西人的营地。攻打海墙的胜利给陆墙下沮丧的十字军带来了新的斗志。在城内，皇帝寝食难安。君士坦丁堡正在熊熊燃烧。人民的不满通过喃喃低语传到他的耳边：他们的家园已经被烧毁；威尼斯人控制了城墙。据科尼阿特斯说，亚历克赛三世看到，愤怒的群众毫无顾忌地诅咒他、辱骂他。^[43]气氛十分紧张，皇帝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了。

亚历克赛三世集结了他的军队，出城与平原上的十字军对抗。当十

十字军看见敌军拥出城来排兵布阵时，被这盛景惊得呆若木鸡。十字军的兵力远少于敌人。“这么多的人出城应战，”维尔阿杜安记述道，“多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出动了。”^[44]亚历克赛三世虽然占据了兵力优势，但他的目标仅仅是战术性质的，而且非常有限：给陆地上的十字军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威尼斯人撤离目前正占据着的海墙。拜占庭人对西方的重骑兵很是忌惮，没有必要在开阔地带与敌人正面对垒。如果他们能将威尼斯人驱逐出去，城墙仍然足以拖垮十字军的士气。

陆墙处十字军的处境十分危急。他们在城墙下被打退，粮草短缺，连日作战，被持续出现的佯攻和警报拖得十分疲劳，现在必须奋勇作战，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他们迅速在己方营地（围有栅栏）前集结部队：一排排的弓箭手和弩手，然后是已经失去战马的骑士，然后是拥有战马的骑士。每一匹战马的“全副披挂之上都覆盖着光彩夺目的纹章或丝绸”。^[45]十字军队形齐整地列阵，纪律森严，被再三严令，不得脱离队伍或鲁莽地冲锋。但他们前方的景象令人心惊胆寒。拜占庭军队如此庞大，以至于“如果他们冲到乡间与希腊人交战，希腊人兵力如此雄壮，仿佛要将他们吞没”。^[46]绝望之下，十字军让所有仆人、厨子和随军人员都上阵了，让他们裹着被褥和鞍布当铠甲，用锅作头盔，挥舞着厨具、硬头锤和杵准备作战。这是拙劣地模仿军队的荒诞景象，仿佛勃鲁盖尔^[47]画笔下的武装农民的丑陋场景。这些人受命警戒城墙方向。

两军尝试性地逼近对方，都保持着良好的队形。帝国宫廷的贵妇们从城墙和皇宫窗户观战，就像赛马场的观众一样。亚历克赛三世展示武力的做法在海墙处取得了他所预期的效果。丹多洛声称“要与朝覲者们共存亡”，命令威尼斯人撤离海墙，乘船前往用栅栏围起来的十字军营地，赶去支援。^[48]

与此同时，十字军被引向前方，离防守营地的队伍越来越远。这时有人向十字军首领鲍德温报告，一旦战斗打响，营地将孤立无援。于是

他下令撤退。但是他的命令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根据骑士的法则，撤退就是耻辱。一群骑士违抗他的命令，继续推进。一时间，十字军队伍陷入了混乱；如果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拜占庭将军指挥，一定能抓住机会，趁乱对十字军发动猛击。但皇帝没有把握住机会，他的军队就在小山谷（两军之间就只隔着这座山谷）的一侧观望等待。待在鲍德温身边的士兵看着那些继续前进的骑士，感到很羞愧，他们恳求他撤销命令：“大人，您若是不前进，就是给自己带来耻辱；您一定知道，如果您不继续前进的话，我们就不会侍奉在您身边了。”^[49]鲍德温只得宣布继续进军。两军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皇帝的弩手可以直接射击我军，而同时我军的弓箭手也能攻击皇帝的人马”。^[50]场面僵持不下、万分紧张。

这时，兵力远胜于对方的拜占庭军队却开始撤退了。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十字军的作战决心让怯战的皇帝畏缩，还是因为他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将威尼斯人驱逐出城。无论如何，临阵撤军是一场严重的公关灾难，使他丧失了自己人民的信任。他的士兵撤退时，敌军就在他们身后比较安全的距离外挥舞着长矛，紧紧跟着。从高耸的城墙看去，拜占庭军队就像是怯战败退的懦夫。科尼阿特斯写道：“他丢人现眼、丧尽威风，夹着尾巴回来了，空长了他人志气。”^[51]

而对十字军而言，这更像是解脱，而非胜利。感谢上帝，敌人莫名其妙地放了他们一马。面对强大的希腊军队，他们一直神经紧绷，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现在总算幸运地逃过一劫。“最勇敢的人也承认，这次死里逃生让他松了一口气。”他们回到军营，“脱下盔甲，因为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吃喝得很少，因为补给已所剩不多”。^[52]普遍的情绪更像是得救的轻松，而不是胜利后的得意扬扬。

他们不知道的是，整个城市正在从内部瓦解。拜占庭军队在城墙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可耻地撤退；烧焦的房屋；民众私下里的窃窃私

语；皇宫内权贵们低语着改换门庭——这一切令归来的皇帝惴惴不安地意识到，他的政权已然岌岌可危。他是弄瞎了自己的弟弟伊萨克二世才登上皇位的；而伊萨克二世之所以能够登基，是由于暴民在大街上将前任皇帝安德罗尼库斯^[53]倒挂着吊死，以此泄愤。舆论对皇帝很不利。科尼阿特斯严厉地评判道：“他所做的一切似乎就是为了毁掉这座城市。”^[54]皇帝决定潜逃。当夜，亚历克赛三世收拾了大量黄金和珍贵的皇室饰物，然后逃之夭夭。皇位突然间空缺出来，宫内的不同贵族派别陷入了混乱。惊慌失措之下，他们把盲人伊萨克二世从修道院接了回来，拥护他重新登上皇位，并准备与十字军谈判。拜占庭人将消息送到金角湾对岸的十字军营地：伊萨克二世希望和自己的儿子亚历克赛·安格洛斯联系。

十字军在营地听到这消息，也是十分惊愕。维尔阿杜安觉得，这是上帝在证明他们事业的正义性。“听啊，我主在喜悦时给了我们多么伟大的奇迹！”^[55]突然间，好像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第二天，即7月18日，十字军派出四位使节——两个威尼斯人和两个法兰西人（维尔阿杜安也在其中）前去皇宫与新皇帝谈判。为防止拜占庭人有诈，他们将安格洛斯仍然留在军营内。使节们经过两侧由瓦良格卫队守护的道路，前往布雷契耐宫。进入宫内，他们都被眼前富丽堂皇的景象惊呆了。盲眼皇帝身穿华服，坐在宝座上；周围簇拥着许多高贵领主及贵妇，个个“衣饰华美，异彩纷呈”。^[56]使节们也许是被震慑住了，也许是对聚集于此的人群有所警惕，提出要与伊萨克二世单独商谈。然后，在皇帝及其少数亲信面前，他们概述了他的儿子于前一年12月在扎拉承诺过的条件。据维尔阿杜安的描述，“这个愚蠢的年轻人，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与这些执拗的西方人签订的协议让伊萨克二世无比惊讶。^[57]亚历克赛·安格洛斯在金钱方面的承诺太离谱：20万银马克；为征讨圣地的十字军提供一年的供给；派遣1万拜占庭军队参加圣战；还要终身供养500名骑士在圣地作战。最糟糕的是，他还许诺要将东正教会置于罗马教皇的统治下。民众一旦知晓此事，暴动在所难免。伊萨克二世直言不

讳地告诉他们：“我觉得这协议无法执行。”^[58]使节们不肯妥协。伊萨克左右为难，最终只能让步，发出誓言，并签订条约。使节们兴高采烈地返回军营；亚历克赛·安格洛斯欢天喜地，与父亲团聚。8月1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隆重典礼上，安格洛斯被加冕为父亲的共治皇帝，史称亚历克赛四世。

十字军的所有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在皇帝的要求下，十字军撤退到了金角湾对岸，得到了充足的粮食补给。他们支持的人如今坐在拜占庭宝座上。拜占庭皇帝承诺为十字军提供足够的资源，以继续朝觐的征途；他们现在总算可以自信地写信回家，希望教皇能够宽恕他们的累累罪行。“我们是在耶稣的帮助下完成他的事业的，”圣波勒伯爵自我辩护道，“让东正教会承认自己是罗马教会的女儿。”^[59]这真是痴心妄想。

圣波勒伯爵极力赞扬恩里科·丹多洛扮演的角色：“威尼斯执政官性格审慎，在做艰难决定时十分明智，我们对他赞不绝口。”^[60]若是没有丹多洛，整个远征也许早就在宏伟的城墙下瓦解了。现在威尼斯人在海上的努力眼看就能收到回报了。他们从亚历克赛四世那里得到了8.6万马克，欠款已全部收回；其他十字军也都得到了报偿。似乎这位新皇帝会履行他曾许诺的一切。十字军被允许自由参观这座他们曾经费尽心力要洗劫的城市。他们对它的富庶、雕像、珍贵装饰物和神圣遗迹（虔诚的朝觐者们崇拜的对象）艳羡不已。他们的羡慕是宗教方面的，也是世俗的。这座城市比他们在欧洲见过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富庶得多。西方人大为震惊，也垂涎欲滴。

生死大战之后，虽然一派节日气氛，但仍然存在紧张的情绪。君士坦丁堡仍然焦虑不安、难以抚慰、反复无常。在远离通衢大道和豪华建筑的地方，希腊无产阶级还在棚户区艰难度日；他们的态度难以预测，而且对十字军给他们造成的负担极其怨恨。要是他们知道新皇帝许诺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一定会揭竿而起。科尼阿特斯将这种情绪比拟为壶

里即将沸腾的热水。他们对西方人的仇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而西方人也认为“希腊人尽是奸佞小人”。科尼阿特斯后来说：“他们对我们过度的仇恨，以及我们与他们的严重分歧，使得双方之间没有丝毫人性的情意。”^[61]法兰西人要求摧毁一段城墙，以防止进城参观的人被拜占庭人扣押。而他们极不信任伊萨克二世，因为他在二十年前曾试图与萨拉丁结盟，一起反对十字军。从他们的营地越过金角湾海面眺望300码，甚至可以看到一座清真寺，那时建在海墙外不远处，供定居当地的一小群穆斯林使用。这简直就是挑衅。

时间一天天流逝。尽管已经先交了一笔钱，但亚历克赛四世和伊萨克二世的麻烦越来越大。十字军与威尼斯人的合同将于9月29日到期。十字军需要立即出发。亚历克赛四世没有自己的势力；他需要这些不得民心的十字军的支持；他知道，拜占庭许多皇帝的统治都非常短暂，而且非常凄惨；他也知道，十字军一旦离开，他就完蛋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威尼斯人和十字军领主们：“你们必须明白，由于你们的缘故，希腊人恨我；如果你们现在抛弃我，我一定会再度失去这个国家，他们也一定会杀了我。”^[62]同时，他在财务上也陷入了困难；为了支付巨额债务，他做了一些注定会让人民愈发憎恶他的事情。“他褻渎了神圣之物，”科尼阿特斯怒吼道，“他抢劫了圣殿；毫无羞耻地从教堂中抢走神圣器物，将其融化成金银来支付给敌人。”^[63]拜占庭人长久以来对意大利各航海共和国已经有许多了解，在他们看来，西方人对金钱的贪欲就像是可怕的嗜酒狂：“他们渴望从黄金之河中饮了又饮，就好像被毒蛇咬了，干渴得无法抑制。”^[64]

面对着危急形势和现金短缺，亚历克赛四世就像一个赌徒，风险愈大，反而愈发加大赌注。他向十字军提出了新的建议：如果十字军能多待六个月——也就是到1204年3月29日，这段时间就足够他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兑现自己的财务承诺了；何况此时已经过了航海季节，无法出航，最好在君士坦丁堡过冬；他将承担十字军在此期间的所有开支，承

担威尼斯舰队的费用直至1204年9月（这是整整一年时间），并让自己的舰队和陆军跟随十字军一起东征。这对亚历克赛四世而言是一场危险的赌博，而十字军领袖们也很难向备受愚弄和利用的将士们推销这个计划，而且士兵们此时还处在幸福的无知当中，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绝罚了。

不足为奇的是，士兵们愤怒地咆哮起来。他们喊道：“遵守承诺，给我们船去叙利亚！”^[65]领主们费了很大一番口舌，使出了不少花招，才说动将士们。他们还要在这里待到春天，“威尼斯人保证，他们的舰队将继续为十字军提供服务，从米迦勒节（9月底）开始为期一年”。^[66]丹多洛为此要价10万马克。亚历克赛四世继续将教堂里的黄金器具熔化，“以满足拉丁人的贪欲”。^[67]同时，执政官写了一封花言巧语的信，向教皇解释洗劫扎拉的事件，希望教皇能够收回绝罚令。

壶里的水持续升温。亚历克赛四世开始巡视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领地，以巩固他的政权，十字军的部分单位陪同他前往，并为此收缴丰厚的军饷。就在此时，壶里的水终于沸腾了！

[1]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82

[2]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as, Detroit, 1984, p. 294

[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84

[4]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88

[5]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85

[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85

[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p. 85-7

[8]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95

[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95

[10]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97

[11]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67

[12]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 205

[1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97

[14]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0587

[15]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01

[16]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93

[17]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93

[18] Phillips, Jonathan,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4, p. 182

[19]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 205

[20]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05

[21]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07

[22]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 206

[2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09-11

[24] 里格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古老的长度单位，在英语世界通常定义为3英里（约4.828公里，适用于陆地上），即大约等同一个人步行一小时的距离，或定义为3海里（约5.556公里，适用于海上）。

[25] Crowley, Roger, *Constantinople: The Last Great Siege*, London, 2005, p. 81

[2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09

[2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09

[28]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 203

[29]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64

[30]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09

[31]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15

[32]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15

[33] 瓦良格卫队是10~14世纪拜占庭军队的精锐单位，是皇帝的卫队。其成员主要是日耳曼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来自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瓦良格”是希腊人和东斯拉夫对维京人的称呼。

[34]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15

[35]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13

[3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13

[3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15

[38] 丁托列托（1518~1594）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的画家，和提香、委罗内塞并称为威尼斯画派的“三杰”。

[3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15

[40]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91

[41]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92

[42]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92

[4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92

[44]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93

[45]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66

[46]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p. 104-5

[47] 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画家，以风景画和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画作闻名，被称为“农夫勃鲁盖尔”。他的两个儿子和多位后

人均是著名画家。

[48]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19

[4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21

[50]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09

[51]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09

[52]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93

[53] 即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科穆宁（约1118～1185；在位：1183～1185），科穆宁皇朝的末代皇帝，他的两个孙子建立了特拉布宗帝国。安德罗尼库斯一世是位精明强干的名将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传奇式的风流情圣和残酷的暴君。

[54]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21

[55]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93

[5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21

[5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25

[58]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97

[5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27

[60]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 209

[61]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 209

[62]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12

[6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31

[64]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598

[65]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03

[6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p. 133-5

[6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226

6.四位皇帝

1203年8月～1204年4月

在十字军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期间，许多意大利商人仍留在城中。丹多洛攻打海墙时，阿马尔菲和比萨的公民都忠诚地与他们的希腊邻居并肩作战。威尼斯商人们则大都闭门不出。希腊人查看此次攻击造成的损失，发现成百上千的房屋被烧毁，而一个不得民心的皇帝被推上宝座，一段城墙被拆毁，这是变本加厉地羞辱他们骄傲的城市，于是他们在愤怒中爆发了。意大利商人的住地在金角湾附近，他们的码头和仓库也在那里。8月18日，一群希腊暴民袭击了备受仇恨的意大利人。他们针对的是威尼斯人，但这种横冲直撞的报复很快变得不加选择，所有意大利人都遭了殃。暴徒洗劫了所有的商人住所，把奸诈的威尼斯人连同忠于拜占庭的外国人一并驱逐出去。科尼阿特斯很是沮丧地记录道：“不仅阿马尔菲人……还有已经把君士坦丁堡当作家园的比萨人，都对这邪恶且鲁莽的暴行深感厌恶。”^[1]比萨人与威尼斯人一直互相看不顺眼，但希腊人的暴徒行径给了他们一个合作的理由。他们聚集在十字军营地，共谋复仇。

次日，由威尼斯商人、比萨商人和佛兰德十字军自发组成的队伍强行征用了一些渔船，渡过了金角湾。商人和十字军的目标可能是不同的。十字军受到诱惑，想去抢劫海边向他们挑衅的清真寺，而被驱逐的商人一心要报复。当穆斯林呼救时，希腊人冲出城外击退入侵者。一些威尼斯人和比萨人冲过敞开的城门，攻击他们先前的希腊邻居的产业，“然后他们分散至不同地方，纵火焚烧房屋”。^[2]这正是漫长而干燥的夏日的鼎盛期，北风劲吹，低矮山坡上密密匝匝的木屋开始被烧得噼啪作响。风助火势，大火开始推进上山，直逼城市中心。

火灾是君士坦丁堡的常见隐患，但根据科尼阿特斯说，与这次相比，“其他的火灾不过是小火星而已”。^[3]一面火墙“飞也似的升腾而起，其高度令人难以置信”；大火跃过缺口，冲过街巷，随着风向变化而转向，在数百码的正面上推进，无法预测地改变方向，让某些地方得以幸免，然后又猛地转回来。夜幕降临后，火星被旋风裹挟着，被炽热的上升气流吸向天空，“仿佛来自地狱的火球扶摇直上，火焰吞噬了好一段距离之外的建筑物”。火线分裂又聚合，“像烈火的河流一样蜿蜒前行……逐步推进，越过外墙，破坏墙外的房屋”。

在黑暗中，十字军在金角湾对岸心惊胆战地目睹了城市山丘被烈火勾勒出的长长的、隆起的剪影。维尔阿杜安看着“宏伟教堂和富丽的宫殿熔化坍塌了，宽阔的商业街道也被火焰吞噬”。^[4]这声响震耳欲聋。房屋如蜡烛芯一般燃烧着，最终爆炸；大理石粉碎了，铁块冒着泡，慢慢熔化，发出水烧开的嘶嘶声。科尼阿特斯在这场大火中损失了许多财产，他目击了大火摧毁了城市的一些古老而雄伟的公共场所。

柱廊倒塌了，广场上最美丽的建筑倾颓了，最高的柱子像柴火一样被烧着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对抗火的狂怒……朝向米利翁的房屋……轰然倒地……多姆尼诺斯的柱廊化为灰烬……君士坦丁堡广场以及这座城市南北界限之间的一切都被摧毁了。^[5]

大火曾舔舐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门廊，却又奇迹般地转到了一边。

整座城市被“巨大的深渊，如同火焰之河”分隔开。^[6]在烈火的逼迫下，人们尽力将自己的贵重物品转移到安全地带，却发现“火势蜿蜒扩展，曲折行进，分向各个方向烧去，最后又绕回起点，已经被转移的物品也被烧毁……城市大多数居民的财产就此付之一炬”。^[7]飘在空中的余烬被吸到海面上，点燃了一艘经过的船。延续三天的大火重创了君士坦丁堡的市区中心。零星的小火则持续了很多天，那些郁积灰烬的深坑有时会出人意料地突然再次燃起。从大海的一边到另一边，城市居民虽

然可能实际死亡人数并不多，但他们悲痛地发现，自己的家园已被一条烧焦冒烟的毁灭地带一分为二。科尼阿特斯以一声哀哭表达了人们此刻的心情：“呜呼哀哉！最辉煌、最美丽的宫殿，装满美丽的物事和最灿烂的财富，令世人震惊——却已不复存在！”^[8]城市的400英亩土地化为灰烬，包括科尼阿特斯在内的10万人痛失家园。

从营地目睹这一切，十字军们惊得目瞪口呆。维尔阿杜安不诚实而心虚地声称：“无人知道是谁放的火。”^[9]其他人却诚实多了；佛兰德的鲍德温的宫廷诗人后来坦诚地说：“他和我们一样，都对这场烧毁教堂和宫殿的大火负有责任。”^[10]而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很清楚是谁制造了这一惨剧。几乎所有仍然居住在城内的西方人都逃去了十字军营地。不管是歹徒从中作梗，还是背信弃义的恶行，还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8月19日至21日的事件造成了日后无法越过的鸿沟。十字军东征的冒险就像蜿蜒的烈火一样，摧毁了它周围的一切。对威尼斯人来说，漫漫的海上冒险似乎看不到尽头。他们准备过冬，将船只拉出水，停靠在金角湾海岸，观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1月初，亚历克赛四世结束了巡视色雷斯的旅行，返回都城。他的此次征途相对来讲还算成功。他征服了一些忠于前任皇帝的城市，并对其处以罚金。归途中，他受到了符合皇帝身份的欢迎；当他接近城门时，民众和十字军领主都骑马出城迎接他。拉丁人注意到，他的举止发生了变化：他更加自信了，或如维尔阿杜安所说，“皇帝开始对十字军诸侯和曾经给过他巨大帮助的人表现出轻慢的态度。”^[11]他减缓了向十字军付款的速度。同时，他的父亲，即共治皇帝伊萨克二世，被迫退居二线。现在公告上都先提及亚历克赛四世的名字。恼羞成怒的老皇帝开始诽谤自己的儿子，声称“他与堕落之徒为伍，他打他们的屁股，也被他们打屁股，以此为乐”。^[12]这个瞎眼的老人陷入了迷信的陷阱，被僧侣们阿谀奉承的预言所控制。他越发害怕人民暴动；在他身边预言家的建议下，他命令将城市中最伟大的图腾雕像——一座巨型青铜像，描绘

的是一头鬃毛直竖的野猪——移出赛马场，放置在皇宫外，以为这样能“抑制疯狂的民愤”。^[13]

伊萨克二世的不祥预感没有错，尽管他的神秘主义的防卫远远不够。君士坦丁堡正陷入一片混乱。“低俗民众中的酗酒之徒”^[14]（这是贵族科尼阿特斯对他们的傲慢评价），同样受迷信驱使，狂怒地冲到君士坦丁堡广场，将一尊美丽的雅典娜青铜像砸成碎片，“因为这些愚蠢的暴民认为雅典娜偏袒西方军队”。^[15]同时，亚历克赛四世继续熔化教堂里的贵重器物，并加紧向贵族征税，以付钱给十字军。如科尼阿特斯所言，“钱都像扔给了狗一样”。^[16]

但这还不够。冬天刚过了一半，资金就快枯竭了。而在皇宫的阴影中，还有一个人等着加入这场权力的游戏：亚历克赛·杜卡斯，一般被称作穆尔策弗卢斯，意思是“阴暗的”，因为他的眉毛连在一起，似乎垂到了眼睛上。他是一个长期参与宫廷阴谋诡计的贵族。他野心勃勃，无所畏惧，并且坚决反对迎合西方人。他曾因图谋反对亚历克赛三世而被关入监狱，因此亚历克赛四世把他释放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寒冬一天天过去，十字军变得越来越胡搅蛮缠，穆尔策弗卢斯成了反西方派的领袖，这个派别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当蒙费拉的博尼法斯直接向亚历克赛四世索要到期的款项时，穆尔策弗卢斯的反对态度很是强硬：“陛下，您已经给他们太多了。不要再给他们分文了！您给了他们那么多钱，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抵押了。让他们走开，然后把他们赶出您的土地。”^[17]最终，所有付款都停止了，但亚历克赛四世却还在实行缓兵之计。他继续向十字军营地提供粮食。他在走一条极其危险的钢丝，但局势已开始不受他控制。12月1日，城墙附近又爆发了一起敌对西方人的群众暴乱，同时威尼斯船只也遭到了攻击。希腊人现在认识到，这些船正是万事的关键；只要摧毁了舰队，十字军就会被困住，变得脆弱。

在金角湾对岸，金钱的缺乏已经显露出了明显迹象。丹多洛与十字军首领们召开了一次峰会；他们决定下最后通牒。六位显要人士，其中三位十字军领主和三个威尼斯人，被派去皇宫，向皇帝传达一条直言不讳的消息。“就这样，使节们骑上马，佩好剑，一同前往布雷契耐宫。”^[18]这不是一件美差。到宫门口，他们下了马，通过由瓦良格卫兵守卫的过道，进入大厅。他们看到父子两位皇帝正坐在华贵的宝座上，周围簇拥着“很多达官显贵，看上去像是一位富有君主的宫廷”。^[19]

使节们毫无畏惧，说明了来意。对作为封建领主的十字军而言，不按约定付款是有悖荣誉的事情；对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威尼斯人而言，皇帝已经破坏了契约。他们开诚布公。有意思的是，他们只和亚历克赛四世交谈：“你和你父亲都曾向我们发誓，会遵守你做出的承诺——我们手头有契约。但你却没有像你该做的那样履行契约。”^[20]他们强烈要求对方尊重合约：“如果你照办，十字军会很满意；否则，从今往后，你将不再是十字军的领主或朋友……现在你应该很清楚我们的要求了，如何行事，悉听尊便。”

对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说的话再平实不过，但在希腊人看来，“这种挑衅的话令他们震惊和气愤。他们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厚颜无耻，竟敢在君士坦丁堡皇帝自己的大厅内公然反抗他”。^[21]大厅内当即发生了骚动，出现了极端敌意的迹象，有人伸手去摸剑柄，有人呼喊咒骂。使节们看到情况不妙，立即掉头，迅速逃到大门处。他们骑马逃走，明显感到松了一口气，庆幸能够逃过一劫。双方关系决定性地破裂了：如果十字军还想得到前往圣地所需的资金，那么就只能用武力去抢。“于是，”维尔阿杜安记载道，“战争开始了。”^[22]

但事情没这么容易结束。拥有九十年丰富阅历的丹多洛决定再向亚历克赛四世呼吁一次，希望他善良的一面能够占上风。他派遣信使去皇宫，说想要在港口与皇帝见面。丹多洛乘一艘桨帆船过去，另有三船武

装士兵跟着保护他。亚历克赛四世骑马到了岸边。执政官直言不讳地说道：“亚历克赛，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难道忘了，是我们救你于苦难之中，让你做了君主，加冕你为皇帝？你难道不该遵守约定，难道能无动于衷吗？”^[23]皇帝的回答却很让人失望。执政官怒火中烧。“不行？你这个卑鄙的小子，”他吐了口唾沫，“我们既然能把从粪堆里拖出来，就能把你丢回去。我要向你挑战。你做好心理准备，从现在起，我会动用我拥有的一切力量去追杀你，直到你彻底毁灭！”说完这些话，执政官就返回了军营。

起初，金角湾海滨时不时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但希腊人知道十字军的弱点在哪里。他们持续监视着十字军的船只。大约在12月中旬，希腊人夜袭了威尼斯舰队。他们准备了一些火船，满载干木材和油。劲风吹过金角湾，希腊人点燃了火船，切断系船的绳索，于是“风驱使着火船快速冲向舰队”。^[24]多亏威尼斯人脑筋灵光，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他们迅速登上自己的船只，操纵它们远离那些忽明忽暗的火船。1204年1月1日夜，天气又一次有利于火攻，希腊人故技重施。大风再次吹向威尼斯舰队；希腊人总共动用了十七艘装满木材、麻、桶和沥青的大船。深夜，他们将各艘船用铁链系住，点燃了船只，看着它们熊熊燃烧着冲过港口。喇叭响起第一声后，威尼斯人紧急奔向各自的岗位，起锚开船，对付那些正在接近的火船。“火苗蹿得如此之高，”维尔阿杜安记载道，“仿佛整个世界都燃烧起来了。”^[25]现在是考验威尼斯人航海技能的时候了。

一大帮希腊人冲到岸边，谩骂他们憎恨的意大利人，“他们的喊叫如此响亮，仿佛整片陆地和大海都震动了”。^[26]一些人爬上了划桨船，向正在开动的威尼斯船只射箭。威尼斯人毫无惧色，小心翼翼地靠近燃烧着的火攻船队，用抓钩咬住了这些船，“在敌人眼皮底下，用蛮力将火船拖离港口”^[27]，然后将其释放，那些火船就被博斯普鲁斯海峡湍急的水流卷向远方，消失在夜色里。维尔阿杜安承认，如果没有威尼斯人

的高超本领，“如果整个舰队都付诸一炬，十字军就会失去一切，因为他们无论从陆地还是海洋都无法离开”。^[28]

尽管希腊人发动了这些坚决的袭击，亚历克赛四世从不亲临前线。皇帝仍然试图平衡这两股对抗的势力。他担心，如果城中的人民转而反对他，他可能需要再次投靠十字军。同样，十字军也需要他活着：因为在前一年春天的科孚岛，他们是与亚历克赛四世签订的条约。但亚历克赛四世自己的臣民都能够明显觉察到，他在骑墙观望。

城中居民至少是勇敢的，他们要求皇帝像他们一样忠诚，用自己的力量同军队一起抵抗敌人，除非他只是嘴上说说忠于拜占庭，心里其实是向着拉丁人的。^[29]但他的故作姿态毫无意义，因为亚历克赛四世没有勇气拿起武器与拉丁人作战。

另外，目睹这一切的科尼阿特斯表达了贵族对民变的恐惧：“心怀不满的民众像被狂风击打的广阔大海，企图犯上作乱。”^[30]

在这个权力真空期，眉毛浓密的穆尔策弗卢斯开始登上舞台，以爱国热情积极鼓舞人们保卫城市，“渴望号令天下，得到公民们的支持”。^[31]1月7日，穆尔策弗卢斯率军对城墙外的可恨入侵者发动了一次攻击，“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32]希腊人被打退了，穆尔策弗卢斯的战马失足跌倒，幸亏一队弓箭手救了他的性命。但这次努力表明了他保卫城市的决心。此时，亚历克赛四世似乎乐于坐在城墙后，观望这一切；而威尼斯人用桨帆船掳掠金角湾沿岸，并纵火攻击城市。现在，火攻是最受憎恶的作战手段。十字军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惩戒性袭击，蹂躏了周边乡村，大肆抢掠。群众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开水壶开始“放出怒斥两位皇帝的蒸汽”。^[33]

1月25日，一群人大吵大闹地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在教堂配有镶嵌画的穹顶下，他们逼迫元老院和教士集合开会，要求任命一位新皇

帝。科尼阿特斯是在场的显要人物之一。贵族们被这暴力民主的突然爆发吓得怔住了，犹豫不决。他们拒绝任命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没有人愿意被提名，“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任何被提名的人第二天就会被当成一只羊，被牵出去屠宰掉”。^[34]近期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些昙花一现的皇帝，他们的统治就像蜻蜓华而不实的生活，夕阳西下就消散了。而暴动的民众拒绝在得到一个候选人之前离开教堂。最后他们抓住一个倒霉的年轻贵族，尼古拉斯·卡纳博斯，把他带到教堂加冕，宣布他是皇帝，并将他扣押在那里。此时已是1月27日。整个城市陷入了派系斗争的混乱中。卡纳博斯在教堂内，盲人伊萨克二世已经在死亡边缘徘徊，穆尔策弗卢斯又蠢蠢欲动。亚历克赛四世做了科尼阿特斯曾预言他会做的事。他亮出了最后一张牌：召十字军进宫来保全他的皇位。这一天，佛兰德的鲍德温前来与他商议。

穆尔策弗卢斯知道亚历克赛四世在做这些叛国行径。他知道时机到了。他秘密地一个接一个联络宫内的权贵。他用新的地位收买了太监总管；然后他集合了瓦良格卫队，“告诉他们皇帝的打算，说服他们做出对拜占庭人有利的选择”。^[35]最后，他去处置亚历克赛四世。

据科尼阿特斯记载，1月27日深夜，穆尔策弗卢斯闯入皇帝寝殿，告诉他，瓦良格卫队聚集在门外，“准备把他撕得粉碎”，因为他与可恶的拉丁人交好。^[36]万分惊恐、疑惑、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的亚历克赛四世乞求他的帮助。穆尔策弗卢斯用一件长袍裹着皇帝作为伪装，引他通过一扇很少用的门，走向“安全地点”，而皇帝此刻还喋喋不休、可怜兮兮地满口道谢。之后，穆尔策弗卢斯用链子锁住亚历克赛四世的腿，将他扔进了“最恐怖的监狱”。^[37]穆尔策弗卢斯穿戴上皇室宝器华服，被推举为皇帝。在乱七八糟的混乱局面中，这座城市现在拥有了四位皇帝：盲人伊萨克二世、狱中的亚历克赛四世·安格洛斯、皇宫里的亚历克赛五世·穆尔策弗卢斯，以及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暴民的玩物卡纳博斯。伟大帝国光辉灿烂的威仪已经颜面丧尽。穆尔策弗卢斯迅速采取行动，

收拾乱局。当瓦良格卫队冲进圣索菲亚大教堂时，那些拥护卡纳博斯的人作鸟兽散。2月2日，这位无辜的年轻贵族（他显然是一个正直而有才能的人）被拉去斩首。5日，亚历克赛五世·穆尔策弗卢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正式加冕，尽享惯常的荣光。而盲人伊萨克二世得知这场宫廷政变后惊恐万状，很合时宜地死掉了。或者，他很可能是被勒死的。

对于城墙外的人来说，政变的消息最终证明了拜占庭人的奸诈阴谋：穆尔策弗卢斯根本就算不上合法的皇帝，而是个篡位者，而且还是个嗜血暴君。根据更为耸人听闻的记述，他俘获三个威尼斯人后，将这些人用铁钩挂着，活活烤死。“我们的人目睹了这惨状。无论是祈祷，还是金钱，都不能救下这些人的性命，让他们逃脱这恐怖的惨死。”^[38]更实际的一点是，他切断了十字军的粮食供给。政权的变更使十字军回到了物资短缺的困窘状态。“又一次，”一份史料这样记载道，“我们的队伍中食物奇缺，吃掉了很多马匹。”^[39]克莱里的罗贝尔记载道：“军营里的物价如此之高，六分之一桶葡萄酒卖到12苏、14苏，有时甚至卖到15苏；一只母鸡要20苏，一个鸡蛋则要两分钱。”^[40]为了获取给养，十字军又一次开始了大范围的掳掠。他们攻击了黑海边上的菲利亚城，带着战利品和牛群于2月5日返回。此时，穆尔策弗卢斯率军去截击他们。他之所以得到拜占庭民众支持，就是因为他发誓要尽快将拉丁人赶下海。他带去了帝国的旗帜和一幅珍贵的圣母像，这幅圣像是城市中最受人膜拜的圣物之一，据说能够创造奇迹，保佑拜占庭军队常胜不败。在一场激烈的冲突中，希腊人被迫撤退，圣像被十字军掠走了。穆尔策弗卢斯却回城宣布自己打了胜仗。有人问到圣像和旗帜的下落，他却推脱说，出于安全考虑，把它们收了起来。第二天，为了羞辱这位暴发户皇帝，威尼斯人把缴获的旗帜和圣物放上一艘桨帆船，在城墙下驶来驶去，向城内人展示战利品，用以嘲笑皇帝。当希腊人看到这一幕后，就去质问他们的新皇帝。穆尔策弗卢斯仍然态度坚决：“不要沮丧，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切实地为自己复仇。”^[41]他已经被逼至死角，走投无路了。

一天后，即2月7日，穆尔策弗卢斯尝试了另一种策略。他派遣信使去十字军营地，请求在金角湾某处谈判。丹多洛再次亲自乘船前去，而一群骑兵绕过金角湾顶端，到谈判地点提供额外的安保。穆尔策弗卢斯骑马来见执政官。十字军如今毫无顾忌地对这个人畅所欲言，按照佛兰德的鲍德温的说法，此人“将自己的主公关进监狱，篡夺皇位，此种行径完全无视了誓言、君臣天伦和契约的神圣性，而即便是异教徒也对这些东西万分珍视”。^[42]丹多洛的要求非常直截了当：把亚历克赛四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支付十字军5000镑金子，并宣誓服从罗马教皇。对这位反西方的新皇帝而言，这些条件当然是“带有惩罚性，不可能接受的”。^[43]正当他们聚精会神地谈判，“把其他的想法都抛在一边”时，十字军骑兵突然从高处冲下，袭击皇帝。^[44]他们纵马狂奔，逼近皇帝，而皇帝迅速调转马头，侥幸逃脱，但他的一些随从被俘了。十字军的这个阴险计谋让科尼阿特斯和希腊人对他们的成见更深，即“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而双方之间的严重分歧使得我们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45]

第二天，拜占庭人进行了报复。穆尔策弗卢斯从与丹多洛的会面中得到一个结论：只要亚历克赛四世活着一天，他就能为讨厌的入侵者提供一个兴风作浪的借口，而且他对自己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威胁。据科尼阿特斯记载，2月8日，穆尔策弗卢斯去看了被铁链锁在地牢中的亚历克赛四世两次，逼迫他服毒。亚历克赛四世拒绝喝下毒药。据不是很可靠的鲍德温说，随后穆尔策弗卢斯亲手扼杀了亚历克赛四世，“并且他残忍至极，在亚历克赛四世垂死之际还亲手用铁钩撕扯出他的肋部和肋骨”。^[46]拉丁人素来热衷于对君士坦丁堡历史的血腥做夸张的描绘。科尼阿特斯的描述没有那么恐怖，但从神学角度更让人胆寒：穆尔策弗卢斯“将亚历克赛四世勒死，掐断了他的生命之线，可以说是将他的灵魂从狭窄的通道挤捏出去，落入了通往地狱的陷坑。亚历克赛四世享国六个月零八天”。^[47]但考虑到那个时期的动荡，他的统治时间算是比较长的了。

穆尔策弗卢斯对外宣布亚历克赛四世已死，并厚葬了他。十字军当然不会上当。有人将宣称穆尔策弗卢斯是杀人凶手的信件缚在箭上，从城里将箭射到了十字军营地内。对有些人来说，亚历克赛四世的死不值一提：“哀悼亚历克赛四世的人都该受诅咒。”^[48]十字军只想获得资源，继续东征。但是亚历克赛四世的死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穆尔策弗卢斯命令十字军立即起程，撤出他的地盘，否则“就把他们杀光”。^[49]现在威尼斯人对收回他们航海的成本已经不抱希望了，圣地也显得越来越遥远。整场东征一直危机重重；1204年春天出现了又一次惊人的转折。他们的时间很紧：到3月，士兵们的耐心将会耗尽；他们坚持要求出发去叙利亚。他们若是返回意大利，必将蒙受至死方休的巨大耻辱；而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进攻圣地；粮食即将告罄；唯一的办法就是奋力向前：“我们的人认识到，自己一出海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但也不能在陆地上多作逗留，因为粮食和补给即将耗尽，于是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50]他们必须攻陷君士坦丁堡。

这在神学上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攻打扎拉是一宗罪，那么攻打君士坦丁堡就罪大恶极了。其实十字军的每位首领都知道教皇最后的禁令：即便希腊人不愿服从罗马天主教会，教皇也绝对禁止以此为理由去攻击同为基督徒的希腊人：“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准以希腊人不服从罗马教廷为借口，鲁莽地占领或掠夺希腊人的土地。”^[51]而现在他们正有此意。

丹多洛、十字军诸侯和主教们又一次紧急磋商，来应对危机。他们的计划是对十字军誓言的进一步歪曲，需要道德上的辩护。穆尔策弗卢斯给了他们一个理由，教士们恭顺地表示赞同：穆尔策弗卢斯这样的谋杀犯根本没有权利占有土地，那些认同他的罪行的人则是同案犯。此外，最重要的是，希腊人不肯服从罗马教会。教士们说道：“因此，我告诉你们，这场战争是正义而合理的，如果你们能够坚定信念、攻下这片土地，并将它置于罗马教会的统治下，那么你们当中作过告解的人死

后将得到宽恕，这宽恕与教皇亲自授予的赎罪具有同等效力。”^[52]简而言之，攻占这座城市也可看作是兑现了十字军的誓言。通过这个花招，君士坦丁堡变成了耶路撒冷。这当然是弥天大谎，但人们接受了，因为他们除了接受别无他法。始终热衷于粉饰事实的维尔阿杜安说道：“你们应该知道，这对诸侯和朝觐者们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53]十字军又一次准备攻打这座城市。

[1]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02

[2]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00

[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p. 600-1

[4]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39

[5]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p. 600-2

[6]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02

[7]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04

[8]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02

[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1

[10] Madden, T., ‘The Fires of the Fourth Crusade in Constantinople, 1203-1204: a Damage Assessment’,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84/85, 1992, p. 77

[11]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3

[12]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05

- [1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05
- [14]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05
- [15]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p. 607
- [16]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p. 607
- [17]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08
- [18]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28
- [1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3
- [20]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5
- [21]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5
- [22]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5
- [2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5
- [24]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30
- [25]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31
- [2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p. 147-149
- [2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9

[28]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9

[2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49

[30]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608

[31]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608

[32]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608

[3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608

[34]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07

[35]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07

[36] Phillips, Jonathan,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4, p. 308

[37]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02

[38]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02

[39]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302

[40]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302

[41]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32

[42]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47

[43]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103

[44]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15

[45]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15

[46]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15

[47]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105

[48]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309

[49]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35

[50]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35

[51]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34

[52] Queller, Donald E., and Madden, Thomas F.,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Philadelphia, 1997, p. 174

[53]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53

7.“地狱的造孽”

1204年4月

十个月前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告诉双方，尽管陆墙无懈可击，但金角湾沿岸的海墙低矮而脆弱，更不必说威尼斯人还拥有高超的航海技能。战局如同昔日战事的重演，对威尼斯人而言，一切仿佛置身梦境。

双方军队各自做着相应准备。威尼斯人准备好桨帆船，重新建造飞桥和船载投石机。法兰克人推出了自己的攻城器械和有轮子的遮蔽板，这些设备使得士兵们能够相对安全地在城墙脚下搞破坏，而不必害怕来自头顶上的轰击。这一次，武器装备有所改良。威尼斯人在自己船只上方遮盖了木制框架，配以葡萄藤制的网，“这样投石机就不能破坏或击沉船只”。^[1]他们还将船体用浸过醋的兽皮遮挡好，以减少带火的箭和燃烧弹使船体起火的风险。他们还在船上安装了用来喷射希腊火的虹吸管。

但穆尔策弗卢斯也分析了低矮海墙的问题，设计出了一种灵巧的防御方式。在常规的城垛和塔楼之上，希腊人现在建造了许多诡异的木质结构，其高度极大，有时甚至有七层楼那么高，每一层都摇摇晃晃地悬空在外，就像中世纪大街上空拥挤的奇异楼房。突出悬空的结构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试图从下方爬梯登城的人将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更糟糕的是，这些木塔的底板设有暗门，守军可以用暴风骤雨般的石块、滚油和投射武器扫射下方的敌人。维尔阿杜安声称：“从来不曾有过防御如此巩固的城市。”^[2]新皇帝的准备十分周密。塔楼用浸透的兽皮保护起来；所有门道都被砖块封死，穆尔策弗卢斯在全知基督修道院前方的山丘上设立了指挥部，那是一座朱红色营帐。从那里，他可以全景式地洞察下方的战场。

在差不多整个大斋节期间，人们都在狂热地备战；金角湾两岸充斥着锤击声、敲打声、铁匠铁砧上的磨剑声、为船体填缝的声响，以及在威尼斯舰船上安装复杂上层结构的声音。3月，十字军首领们聚集起来商议，为得胜的情况设定一套基本规则：如果打赢了，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必须事先决定如何分配战利品，以及如何安排这座城市的未来；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们知道，中世纪的围城战在眼看就要取胜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派系纷争的混乱。《三月条约》规定了战利品的分配制度：威尼斯人将得到战利品的四分之三，直到拜占庭人欠他们的15万马克债务清偿；此后，战利品将平均分配；将由六个威尼斯人和六个法兰克人组成议事会，推选一位新皇帝；十字军将在君士坦丁堡再待上一年。条约还有一个条款，对欧洲的封建骑士来说无关痛痒，但对来自潟湖的威尼斯商人却很重要：被选定的新皇帝必须禁止其臣民与任何同威尼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从事贸易。这就能让威尼斯人将其海上竞争者——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排挤出拜占庭境内的商贸。这是个潜在的金矿。

为了强调纪律，十字军的每个人都被要求以圣徒遗骸的名义庄严宣誓，会将价值超过5苏的战利品上交，“不得对妇女施暴或撕开她们的衣服，任何胆敢这么做的人将会被处死……除非出于自卫，不得伤害任何僧侣、神职人员或教士；不得抢劫教堂或修道院”。^[3]这些话虽然虔诚，但只是空谈而已。士兵们已经在城外待了十一个月。他们饥肠辘辘而怒火中烧；他们是被迫停留在这里的；他们已经目睹这座城市的巨大财富；他们知道，按照惯例，攻陷一座城市后他们将得到什么样的奖赏。

到4月初，万事俱备。4月8日（星期四，距复活节还有十天）夜间，士兵们作了告解，登上战船；战马也被运上船；舰队一字排开。桨帆船散布在运输船之间。配有高耸艏楼和艉楼的大型帆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临近黎明，舰队起锚出航，驶过金角湾，这个距离只有几百码远。这场面非同寻常：舰队以一英里长的正面徐徐前进，桅杆上伸出

奇形怪状的飞桥，“天平的倾斜的横杆”。^[4]大船上各位领主的旗帜随风飘扬，一如他们九个月前离开潟湖时那般骄傲。领主们悬赏鼓励士兵登城。从甲板上，士兵们可以看到希腊人筑造的悬空的木制上层结构，

每个上面都有大量士兵……每两座塔楼之间设立一台投石机……在最高一层，伸出了抵御我们的平台，平台每一侧都有壁垒，平台顶部的高度略小于从地面向空中射箭所能达到的高度。^[5]

十字军可以看到，在城墙后方的山坡上，穆尔策弗卢斯在营帐前指挥，“他命令部下吹响银喇叭，敲响战鼓，很是喧闹”。^[6]十字军船只接近岸边，放慢航速，小心靠岸。士兵们开始上岸，水花四溅地跑过浅滩，在浸过醋的遮蔽物的掩护下，将云梯和撞城槌搬运到城墙下。

迎接他们的是万箭齐发，“巨大的石块……砸到了法兰西人的攻城器械上……石头砸向攻城器械，把它们压成碎片，将其全部摧毁，以至于没人敢待在攻城器械旁”。^[7]威尼斯人企图把飞桥驾到城垛上，却发现很难够得着高高的上层结构，而且强劲的逆风不断地将他们的船只推离海岸，船只很难停稳，况且守军组织有序，武器储备也很充足。进攻开始变得松懈；船只被风吹得步步倒退，无法援助已经登陆的士兵；最后，十字军发出讯号，命令撤退。城墙上传来嘲笑声和倒彩声，锣鼓喧天；为了炫耀胜利、嘲讽十字军，一些守军竟然登上最高的平台，“脱掉马裤，屁股对着十字军”。^[8]十字军绝望地撤退了，他们相信上帝在庇佑着这座城市。

当晚，在一座教堂里，十字军领主与威尼斯人苦闷地商讨下一步如何是好。问题是风向不利，士气也不高。进攻金角湾外海墙的提议曾遭到丹多洛的反对，他很清楚那一带的海流太强了。维尔阿杜安记载道：“要知道，还有些人希望借着海流或风力，乘船顺着海峡南下，他们不在乎会抵达哪里，只要能离开此地、继续行进。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深陷险境。”^[9]对于那些不满十字军运动被强迫走到这一步的人，这

位编年史家继续斥责他们是懦夫。

为了鼓舞士气，一贯乐于出手相助的教士们决心从神学角度对城内的基督徒进行攻击诽谤。4月11日，棕枝主日这一天，全军将士都受命参加礼拜，领头的布道者向每一个民族的士兵宣讲了相同的信息，“他们告诉士兵们，希腊人杀害了他们的合法君主，是比犹太人还要邪恶的民族……大家不应害怕攻击希腊人，因为希腊人是上帝的敌人”。^[10]这种信息利用了那个时代各种偏见的主题。士兵们受命忏悔。为了在短期内做出虔诚的良好姿态，所有妓女被逐出了军营。十字军修理了船只，并重新为其配备武器，准备于次日，即4月12日发起新一轮进攻。

为了第二轮攻势，他们调整了自己的装备。很明显，单靠一艘船来放出飞桥、进攻塔楼，是行不通的：守军可以集中兵力于一个点，发挥局部兵力优势。所以现在十字军决定，将高侧舷的帆船（这是唯一一种高度够得着塔楼的船只）成对地连接起来，这样飞桥就能像双爪一样从两侧抓住同一座塔楼。于是，十字军将船只锁在一起。舰队又一次驶过金角湾，投入震耳欲聋的战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穆尔策弗卢斯在营帐前调兵遣将。喇叭和战鼓奏响了；人们呼喊；投石机也准备就绪——海滨很快陷入噪声的风暴之中。据维尔阿杜安说，“声音响得好像地面都在颤抖”。^[11]箭矢嗖嗖地从水面上掠过；威尼斯船只上安装的虹吸管喷射出一波波希腊火；城墙上的六十台投石机投射出巨大的石块，“石头大得一个人根本搬不动”。^[12]随着攻击的角度发生变化，穆尔策弗卢斯从山上对士兵们发号施令：“快，到这边！到那边！”^[13]双方的防御措施都运作得很好。城墙上的木制上层结构覆盖着用醋泡过的兽皮，所以希腊火没什么作用；船上的藤网也抵住了巨石砸向船的冲力。战况和前一天一样难解难分。突然，风向转为北风，使巨型帆船更加靠近岸边。其中两艘被锁在一起的帆船，“天堂”号和“朝觐者”号猛冲上前，它们的飞桥从两侧合攻一座塔楼。“朝觐者”号最先成功靠上塔楼。一名威尼斯士兵走过离地面60英尺高咯咯作响的走道，跳上塔楼。这一

举动堪称绝境中的壮举，但他随后被赶来的瓦良格卫队砍成肉酱。

飞桥在海浪颠簸之下，脱离了塔楼，然后又一次靠了上去。这一次，法兰西士兵杜尔布瓦兹的安德烈冒死跳了过去。他险些没抓住城堞，拼命匍匐着爬进了塔楼。当他还趴在地上时，一群希腊人拿着剑和斧头冲过去攻击他。这些人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但安德烈的铠甲比威尼斯人的好。他幸存了下来。令攻击他的人震惊的是，他站起身来，抽出利剑。希腊人为这超自然的“复活”惊惧不已，立马掉头逃到了下一层。下一层的人看到战友们狼狈逃窜，也被恐慌传染了。整个塔楼里的守军很快都跑光了。其他十字军跟着安德烈，冲到城墙上。他们成功控制了一座塔楼，并把飞桥固定在了上面。但由于船只的颠簸，飞桥仍然不断摇晃和后退。它眼看着就要把整个木制上层结构拉垮。飞桥被解开了，来之不易的立足点的一小群士兵被切断了。在战线的另一段，另一艘船也攻占了一座塔楼，但两座塔楼上的十字军被有效地孤立了，他们两侧的塔楼上还有密密麻麻的敌人。战斗到了关键时刻。

但是，飘扬在这两座塔楼上的旗帜给正在登陆前岸的十字军注入了新的勇气。另一位法兰西骑士，亚眠的彼得决定去对付城墙。他看到一扇被砖块封死的小门，便带领一队人，试图打开它。克莱里的罗贝尔和他的兄弟——武僧阿罗姆也在其中。他们用盾牌护头，蹲伏在墙脚。暴雨般密集的投射武器向他们袭来：弩箭、沥青罐、石块和希腊火猛击着他们的盾牌，在盾牌掩护下的人们“用斧头、利剑、木棍、铁棒和鹤嘴锄拼命砍门，直到他们凿出一个大洞”。^[14]从洞中他们可以瞥见一大群敌人在里面严阵以待。他们有了片刻的迟疑。爬过这个大洞，必死无疑。没有一个十字军战士敢于继续前进。

看到大家的犹豫，武僧阿罗姆冲上前去，自愿打头阵。罗贝尔确信自己的兄弟是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于是拦着他。阿罗姆从兄弟身边挤过，四肢匍匐，开始爬过大洞，罗贝尔则试图抓住他的脚，把他拖回

来。不管怎样，阿罗姆蠕动着、踢打着，挣脱了兄弟的手，爬到了城墙另一边，遭到雨点般的投石攻击。他蹒跚着站起来，举起剑，继续前进。仅仅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是宗教热情带来的勇气），又一次扭转了局势。守军调头逃跑。阿罗姆回头向城墙外的十字军喊道：“诸位大人，大胆地进来吧！我看到他们害怕地撤退了。他们开始逃跑了！”^[15]七十个人爬了进来。恐慌在守军中蔓延。守军开始撤退，使得城墙的很大一部分及其后方区域无人把守。穆尔策弗卢斯从山上看到守军的崩溃，越来越焦虑，努力以喇叭和战鼓来重整部队。

新皇帝纵使有万般过错，也绝不是个懦夫。他纵马长驱直下，很可能是独自前往。亚眠的彼得命令部下坚守原地：“诸位大人，现在就是证明你们的时刻了。皇帝来了。任何人都不准后退！”^[16]穆尔策弗卢斯放缓步伐，停了下来。无人支援他，于是他转了方向，先回营帐处集结他的兵力。入侵者摧毁了下一道门；人潮开始涌入；马匹被卸下船；骑士们纵马飞奔，闯入敞开的大门。海墙失守了。

同时，亚眠的彼得向山上推进。穆尔策弗卢斯放弃了他的指挥部，沿着城市街道，逃往两英里外的牛狮宫^[17]。科尼阿特斯对自己同胞的行为大发哀叹：“这成千上万的懦夫，拥有居高临下的地利，却被仅仅一个敌人赶出了他们理应守卫的工事。”^[18]另一边的克莱里的罗贝尔记载道：“就这样，彼得大人缴获了被穆尔策弗卢斯丢弃的帐篷、箱笼和财宝。”^[19]屠戮开始了：“死伤枕藉，无法计数。”^[20]整个下午，十字军洗劫了周边区域；在更北面，难民们开始涌出陆墙，往城外逃窜。

夜幕降临时，十字军停手了，“他们因战斗和杀戮而筋疲力尽”。^[21]他们对前路还是充满警惕：在拥挤曲折的街道上，拜占庭士兵和居民可能负隅顽抗，死守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从屋顶上向他们发射箭矢、投掷火罐，迫使十字军陷入一场可能持续一个月之久的游击战。于是，十字军将全部士兵运到城墙外扎营，派遣一些部队去控制红色营

帐，并包围了防御巩固的布雷契耐皇宫。没人知道，这迷宫般的城市里正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城中四十万居民会作何反应，但如果他们坚持不投降，也不战斗的话，那就等到风向合适时，用火把他们逼出来。他们现在知道，城市在大火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当晚，金角湾附近焦躁不安的士兵先发制人地纵火，又烧毁了25英亩的住宅区。

君士坦丁堡中心陷入了一片混乱。人们要么在绝望中漫无目的地游荡，要么把财产转移或埋起来，抑或离开城市，穿过宽阔的平原向北逃跑。穆尔策弗卢斯东奔西走，想劝人们留下坚守，但无济于事。一连串接踵而至的灾难——连日来的攻击、毁灭性的火灾、连续多位短命皇帝在血腥暴力中更迭，这一切让民众对现任皇帝失去了信心。根据科尼阿特斯的说法，穆尔策弗卢斯“害怕自己一旦被俘，会被填入拉丁人的血盆大口”，于是放弃了皇宫，登上一艘渔船，逃离了城市。^[22]希腊乡间又多了一位潜逃在外的皇帝，他的统治只持续了两个月零十六天。科尼阿特斯对具体日期记载得很详细。又一次，君士坦丁堡像“在风雨中飘摇的船只”，失去了指挥它的船长。^[23]

统治集团的残余部分挣扎着承受每一次新的打击。他们匆忙地尝试另立新君。4月13日，帝国政府的残部和教士们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推选继任者。候选人是两位平分秋色的青年，“都谦逊有礼、擅长军事”。^[24]最后只有抽签来决定新皇，但获胜者君士坦丁·拉斯卡里斯却拒绝受封。如果抵抗是徒劳的，他就不准备当皇帝。教堂外，瓦良格卫队正在米利翁附近待命。米利翁是金色的里程碑，是一座华丽的拱门，上面立有君士坦丁大帝的雕像。米利翁是拜占庭的中心，帝国全境的距离计算均以此地为基准。按照传统，瓦良格卫队手持战斧站在那儿，等待着新皇帝下令。

拉斯卡里斯开始得并不顺利。他对聚集在城市古老中心的人群发表了长篇大论，“劝诱大家抵抗……但没人听他的话”。^[25]瓦良格卫队要求

加薪，才肯继续战斗。拉斯卡里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出发了，但是并未完成使命。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远远弱于敌人，所以当“全副武装的拉丁军队出现时，他们立即作鸟兽散，各自逃命”。^[26]拉斯卡里斯已经认识到，一切都是徒劳。君士坦丁堡所有短命皇帝中最短命的一位的统治时间仅有几个小时。这位“皇帝”在穆尔策弗卢斯出逃几个小时之后进入皇宫，然后效仿了他：他乘船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逃往小亚细亚，拜占庭将在那里存活下来，来日再战^[27]。

在金角湾海边，十字军度过了困惑的一天。他们紧张地为即将开始的艰苦巷战做准备。但他们遇到了从圣索菲亚教堂下来、前往他们营地的宗教游行队伍。在一些瓦良格卫兵的陪伴下，教士们“遵照仪式和宗教游行的惯例”，带着圣像和圣物，还带着一大群人。^[28]在这座内战风波不断的城市中，这是一个惯有的程序：迎接新皇帝、废黜旧皇帝。他们解释说，穆尔策弗卢斯已经逃跑了。他们是来迎接博尼法斯成为新皇帝的——迎接他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

这是一个悲剧性误会的时刻。对拜占庭人而言，这是习以为常的政权变更。对法兰克人来说，这是可怜兮兮的投降。根据《三月条约》，皇帝的人选还需要决定。而此刻的十字军是一支丑恶、狂暴、绝望的军队，不到两天前，士兵们还接受了教士的宣讲，说希腊人都是奸佞歹徒，比杀害基督的犹太人还要坏，连狗都不如。

十字军开始进入市中心。这一切都是真的：无人抵抗；没有号角声，也没有军人吵吵嚷嚷地向他们挑衅。他们很快发现，“前方道路畅通无阻，一切都唾手可得。狭窄的街道空荡荡的，十字路口也没设障碍，他们无须担心遭到攻击”。^[29]他们惊愕地发现“没有人抵抗他们”。平民百姓站在街道两边，“拿着十字架和基督圣像，迎接他们”。^[30]这样恭顺、凄惨、轻信、绝望的仪式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十字军根本不为所动：“看到这样的情景，他们的行为举止没有丝毫变化，脸上没

有一丝微笑，他们严酷狂怒的表情也没有被这意想不到的景象所软化。”^[31]他们洗劫了旁观者，先是抢劫对方的大车，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掳掠。

到了这一刻，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的编年史发出了痛心的哭喊：“啊！城市，城市，所有城市的眼睛……你从天主手中，饮了他的狂怒的苦酒吗？”^[32]在接下来三天内，他目睹了世界上最美丽城市遭受的蹂躏，一千年基督教历史的毁灭，以及平民遭受的奸杀抢掠。他的记述常常转化为一曲难以言表的哀歌，还原了他对这场大悲剧的目击，描摹了一系列生动的惨景。他简直不知从何说起：“我该先叙述这些谋杀犯的哪些行为，又以哪些暴行结尾呢？”^[33]

在拜占庭人看来，君士坦丁堡是人间天堂的神圣美景，是展示给肉体凡胎的神圣景象，是一幅巨大的圣像。对十字军而言，君士坦丁堡是个等待被掠夺的宝库。前一年秋天，十字军作为游客参观了君士坦丁堡，看到了此地非比寻常的财富。经济欠发达的西欧的武士阶层成员瞥见这样惊人的财富，不禁目瞪口呆。克莱里的罗贝尔就是大受震撼的人之一：“这座城市的修女院、僧院、修道院和宫殿中聚集了如此之多的财富，有如此辉煌璀璨的美景，如果有人向你描述它们的仅仅百分之一，他一定会被当成骗子，你也不会相信他。”^[34]现在，一切都听凭他们发落。

十字军的两位领袖博尼法斯和鲍德温匆匆控制了最精美的战利品——无比奢华的牛狮宫和布雷契耐宫。这两座皇宫“如此富丽堂皇，如此光辉灿烂，以至于无人能够向你言说”，十字军的代表团曾经多次在这里为拜占庭宫廷的财富而震撼。^[35]在其他地方，十字军任意劫掠。他们将攻城之前许下的誓言抛在脑后，盯上了教堂和富人的大宅。希腊人的记述生动形象而痛苦万分：

然后，街道、广场、两层楼房、三层楼房、神圣的场所、修道院、男

女僧院、神圣的教堂（甚至上帝的大教堂）、皇宫，全部挤满了敌军，有狂暴的剑士，杀气腾腾，身披铁甲，手执长矛，有拿剑的，有拿长枪的，有弓箭手，有骑兵。^[36]

他们闯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开始大肆抢劫。高高的祭坛长14英尺，“价值连城，无法估算”，其表面“由碾碎的黄金珠宝镶嵌而成，”^[37]“各式各样的珍贵材料熠熠生辉，被打造成具有超凡之美的珍品，震撼了所有人”。^[38]这祭坛被劈成了碎片。由纯银细柱支撑的华盖被拽下来，打碎了。每一盏白银枝形吊灯都由一根“男人的手臂那么粗”的链子悬挂；^[39]柱子“嵌满碧玉、斑岩或其他宝石”；银质的祭坛围栏、黄金香炉和献祭礼器；“还有讲坛，一件美妙的艺术品，大门……正面是纯金的”，全被劈砍成利于运输的小块。十字军用斧头、撬棍和剑劈砍、撬动、挖掘。士兵们搜寻教堂的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值钱物品。十字军对僧人们毒刑拷打，威逼他们说出财物的存放地点；有的僧人为了保护圣像或圣物，被恣意杀死；女人被强暴，男人被屠杀。

在希腊人看来，这些以上帝之名到来的十字军胸中充溢着一种可怕的疯狂。

他们像刻耳柏洛斯^[40]那样狂吠，像卡戎^[41]那样呼吸，掠夺神圣的处所，践踏神圣的器物，在圣物上狂奔乱跑，将基督、圣母和我主上帝喜爱的圣徒们的肖像丢到地上，口出恶言、亵渎神灵，从母亲手中抢夺孩童，从孩童身边夺走母亲，在神圣的教堂肆意凌辱少女，既不怕上帝的愤怒，也不畏惧人的报复。^[42]

十字军将骡子和驴驱赶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去装运战利品，但它们在光滑的地面（五彩斑斓的古老大理石）上站不稳，纷纷滑倒。遭遇了这种困难，掠夺者对这些牲畜举刀相向，大肆砍杀。血流满地，牲畜的肠子被刺穿，屎尿横流，地板更加打滑难行。一个显然没被驱逐出营地的妓女被送到牧首的宝座上，“开始唱一首可悲的歌谣，跳来跳去，转

个不停”。^[43]

十字军对教堂的抢劫往往还打着宗教事业的旗号。佩里修道院院长马丁得知，全能之主修道院的教堂内藏有一些价值非凡的圣物。他带着自己的神甫匆忙赶去，闯入圣器收藏室——存放最神圣器物的地方——在那儿遇到了一个蓄着长长白胡子的老者。马丁喊道：“过来，没信仰的老东西，快把你守卫的更好的圣物给我看。否则立刻杀了你！”^[44]僧人颤抖着指给他看一只铁箱子，里面尽是珍宝，“对他来讲，胜过希腊的全部财富”。“修道院长贪婪地匆匆将双手伸进箱子，因为他之前已经做好了打劫的准备，于是和他的牧师一起，褻渎神明地用抢来的圣物塞满了自己僧衣的口袋。”两人的袍子里都塞满了宗教珍宝，摇摇晃晃地走回自己的船只，将那个老僧人也带了过去。“我们运气不错……感谢上帝。”修道院长就这样简洁地回答询问他的过路人。

大量非同寻常的东正教珍宝最终被运回了意大利和法兰西的修道院，其中包括：神圣裹尸布^[45]、圣母玛利亚的头发、圣保罗的胫骨、荆棘冠冕^[46]的碎片、圣雅各的头骨。编年史家的记述中详细列举了这诸多圣物。丹多洛为威尼斯抢到了真十字架^[47]的一块碎片、一些基督圣血、圣乔治的臂骨，还有圣约翰头骨的一部分。拜占庭教会的许多伟大圣像和珍贵的宗教器物在洗劫中神秘失踪，可能被只想要贵金属的人打碎了。在圣使徒教堂（君士坦丁大帝和所有其他皇帝都安葬于此），十字军抢劫了整整一夜，“抢走了教堂内尚存的所有黄金饰物、珍珠以及各种光芒四射、珍贵和坚不可摧的宝石”；^[48]他们撬开墓穴，看到了查士丁尼大帝（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造者，已经长眠近七百年）的遗骸面容。在密闭的墓穴内，他的遗体尚未腐烂。他们都把这情景看成一场奇迹，但还是扒走了尸体上值钱的财物。到处都发生了可怕的虐待恶行：

他们屠杀新生儿，杀死谨慎的妇人，剥光年长妇女的衣服，强暴老
姬；他们毒打僧侣，拳脚相向，踢打他们的腹部；恶狠狠地鞭笞他们可敬

的身体。神圣的祭坛上血流成河，就在上帝的羔羊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的地方，许多人像绵羊一样被拖去宰杀了。在神圣的墓穴上，这些卑鄙的人杀了很多无辜者。这些肩上配有上帝的十字架的人，就是这样“尊崇”神圣的物事的。[\[49\]](#)

屠杀奸淫的场面令人震惊：

无论是在宽阔的大道，还是拥挤的巷子，没有人能够逃脱这场劫难；教堂里到处是哭喊声、悲叹和乞求声；男人痛苦的呻吟，女人们的尖叫，受害者被砍成肉泥，淫褻的行为，平民被卖为奴隶，家庭骨肉分离，贵族和德高望重的老人遭到可耻的虐待，人们哭成一团，富人被洗劫一空。[\[50\]](#)

“暴行就这样继续着”，科尼阿特斯愤怒地咆哮道，“广场上、角落里、寺庙里、地窖中，到处都是惨象。”[\[51\]](#)他说：“我整个头都痛苦不堪。”[\[52\]](#)他最后讥讽地将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与十七年前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时对平民的仁慈作了对比：“他们（萨拉丁军队）允许所有人带着自己的财物离开，只要求每人交几个金币的赎金……基督的敌人就是这样宽宏大量地对待拉丁异教徒。”[\[53\]](#)

只有几个短暂片刻可以见到人性的怜悯。正在洗劫曼加纳区圣约翰教堂的十字军看到笼罩在圣人光辉中的约翰·梅萨里特斯，大受震撼，不禁停下手中的活计。梅萨里特斯是一位蓄着长须的苦修者，他告诉十字军，他一无所有，不惧任何窃贼。在他面前，十字军沉默了。他被带到率军的男爵面前，席地而坐。男爵请他上座，并跪倒在他脚下。他那超凡脱俗的圣洁令诺曼武士们肃然起敬。据他的兄弟不无讽刺的记述，“他就像古代的圣人一样，被偷窃成性的、吃人的喜鹊们养活”。[\[54\]](#)

科尼阿特斯自己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也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宽待。他的宫殿在前一年灾难性的大火中焚毁了。十字军洗劫全城时，他居住在比较卑微的房子里。“我的房子，门廊很低，因其拥挤的位置难以被发现，隐匿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55\]](#)尽管他很厌恶威尼斯入侵者，

但这位优雅的贵族与一些侨居城内的外国人显然有不错的私交。大多数外国人在总攻前就逃走了，但科尼阿特斯把一位威尼斯商人和他的妻子收留并保护在家中。当十字军终于找上门时，这位叫多梅尼科的商人表现得非常冷静。穿上盔甲后，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入侵的意大利人。他制止了所有洗劫房子的举动，声称这里的一切已经属于他。入侵者们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尤其是那些“无论脾气还是外貌都与他人不同的法兰西人”。^[56]多梅尼科知道自己抵抗不了多久，又担心家中妇人们的安全，于是将她们安置到另一个威尼斯人家里。之后危险又临，多梅尼科再次将妇人们转移。仆人们也各自逃命。

骄傲的拜占庭贵族发现自己已经沦为普通难民。被仆人所抛弃，“我们只能把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扛在肩头，把一个还没有断奶的男婴抱在怀里；我们不得不这样穿过街道”。^[57]多梅尼科机智地把他们假作俘虏，拖拽而行。科尼阿特斯意识到，现在必须得离开了。4月17日，也就是围城结束后第五天，一小群贵族开始了他们危险的逃亡，试图步行通过主干道，前往3英里外的黄金门。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来伪装自己；隐藏了自己大主教身份的牧首带领他们前进。那天刮着风，天气又潮湿。科尼阿特斯的夫人挺着大肚子，而随行的年轻女眷不乏有姿色者，对四处闲逛抢劫的法兰西士兵来说是很大的诱惑。男人们把这些女孩保护在队伍中间，“就像一个羊圈那样”，还告诉她们用泥涂脸，来伪装自己的容貌。^[58]“我们就像一队蚂蚁那样走过街道，”科尼阿特斯说。^[59]他们经过一座教堂之前，一切都很顺利。这时突然“一个好色而无耻的野蛮人”冲进队伍里，抓走了一位法官的女儿。^[60]年老的法官体弱多病，试着去追赶，却踉跄着倒在泥地里。他起身不得，请求科尼阿特斯去救他的女儿。

科尼阿特斯冒死开始行动。“我立刻转身，去追那个绑架犯。”^[61]他饱含泪水，恳求过路士兵的怜悯和帮助。他甚至抓住一些士兵的手，说服他们一同前往。整个队伍以及一群士兵跟着绑架犯来到了他的住所。

此人已经将女孩禁锢，锁住了门。他向众人挑衅。在那里，科尼阿特斯发表了沉痛的演讲，直指那个图谋强奸的歹徒，以振聋发聩的声音让他召集来的十字军汗颜。他提醒十字军，别忘记他们对上帝的誓言，呼吁他们想想自己的家人和基督的教诲。他的演讲竟然奏效了。他突破了语言的障碍，成功激起了士兵们的义愤，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众人威胁要将这个恶棍当场绞死。他恼怒地把女孩放走。女孩的老父亲喜极而泣。

就这样，这群贵族难民终于穿过了黄金门。在那里，他们转身回望连绵起伏的陆墙，它历经八百年仍然完好无缺，现在却无力阻止这场浩劫。一时间，科尼阿特斯百感交集：“我扑倒在地，深深地诅咒这城墙，因为它完全不受战争的影响，它不会哭，也没有坍塌，就这么麻木不仁地矗立在那儿。”^[62]

紧接下来，君士坦丁堡见证了一场放荡而荒诞的狂欢。正如科尼阿特斯所说，“这些吃牛肉的拉丁人”在街上横冲直撞，“野蛮而下流”，拙劣地模仿着拜占庭人的着装和习俗。^[63]他们穿上希腊长袍来“嘲笑我们，将妇女的头饰放在马头上，将挂在妇女背后的白色饰带套在牲畜的口鼻上”，把样式独特的希腊帽子戴在马头上，骑着马，把抢来的女人放在马鞍上招摇过市。^[64]其他人，“手执书记员的芦苇笔和墨水瓶，模仿写字的样子，嘲讽我们是书记员”。在高雅的科尼阿特斯看来，这些人极其野蛮，终日饮酒啖肉，吞食着佳肴和他们自己的恶心、粗糙而刺鼻的食物——“大锅烧煮的牛脊肉；大块猪肉掺着豆酱，放在淹泡的蒜泥和臭烘烘的大蒜里一起煮”。^[65]

除了这样的放荡恶行之外，十字军还大规模地破坏了延续一千年的帝国和宗教艺术。破城之后，征服者为了获取贵金属和铜（用来铸造钱币），将大量精美的金属雕像投进了熔炉，其中很多在4世纪君士坦丁堡建城时就已经算是历史悠久了，是君士坦丁大帝从罗马和希腊世界的各个角落搜集来的。用科尼阿特斯的话说，破坏是无穷无尽的，“就像

一条没有尽头的延长线”。^[66]十字军用锤子和斧子砍倒了赫拉的青铜巨像，它是如此巨大，用了四头牛才将它的头部运走。他们还从公牛广场的基座上拆毁了一尊巨大的骑手像，“他伸出右手，指向驾着战车的太阳……手掌中握着一个铜球”。^[67]所有这些雕像都被熔化，铸成了钱币。

史料中很少提及威尼斯人在这场奸淫抢掠中扮演的角色，尽管有一位德意志编年史家或许是为了将罪责推给其他人，声称被驱逐出城的意大利商人，特别是威尼斯人，为了报复，屠杀了平民。科尼阿特斯极其憎恶丹多洛，认为他是个奸诈的骗子，该对这场浩劫负责。但科尼阿特斯指责法兰西十字军是洗劫他所挚爱城市的最凶恶的劫犯。并且，他和家人的平安要归功于一位威尼斯商人的勇气。威尼斯人至少在抢劫艺术品时更有眼光。

所有人都曾庄严宣誓，要将战利品集中起来，然后根据明确协商的规则公平地分配。佛兰德的鲍德温写道：“抢到了不计其数的马匹、金银、昂贵挂毯、宝石，以及一切值钱的东西。”^[68]很多财物都没有上交。据克莱里的罗贝尔说，穷人们又一次被耍了。但威尼斯得到了根据协议属于他们的15万马克，还得到了额外的10万给他们自己分享。从物质角度看，丹多洛的赌博似乎得到了回报。

需要另立新皇时，九十高龄的丹多洛谢绝参选。在他看来，除了他年事已高之外，一个威尼斯人的当选也将会备受争议。当时有两名候选人：鲍德温伯爵和博尼法斯侯爵。威尼斯人可能支持鲍德温，因为博尼法斯与热那亚人走得近。威尼斯人的首要考虑是他们在地中海东部商贸利益的稳定，但十字军建立的拉丁帝国从一开始就摇摇欲坠：它内困于封建领主们无休止的争吵，外制于拜占庭人和毗邻的保加利亚人的压力。此次东征的大多数主要人物都没有好下场。穆尔策弗卢斯虽逃出了城市，却在流亡过程中，被同样在流亡的亚历克赛三世奸诈地弄瞎了

[69]；再次被十字军俘获后，穆尔策弗卢斯被处以特殊的死刑，据说这是丹多洛的主意。“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我会给他应得的崇高处罚！”[70]他被带到高耸的狄奥多西圆柱前，从基座通过内部的楼梯被连戳带刺地赶上顶部的高台；虽然瞎了，他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在围观群众的期待下，他被推了下去。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第一任皇帝鲍德温在保加利亚的一座山谷里缓缓地痛苦死去，他的四肢都被从关节处砍掉了。而他的对手博尼法斯也在保加利亚人的一场伏击中被杀，他的头骨被作为礼物送给保加利亚沙皇。

盲眼的执政官则活了下来，一生精明世故。1205年春天，他冷静地指挥一支险些被保加利亚人包围的十字军安全撤退。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独特的洞察力和审慎的态度赞叹不已。他非凡的判断力数次拯救十字军运动于危难。据维尔阿杜安说，他终其一生都“极其睿智，值得尊敬而且充满活力”。即便是深深厌恶他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也给了他某种间接的致意。根据契约，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要待到1205年3月。一些威尼斯人留下来，占据城市中他们应得的部分，但随着期限即将到来，更多的人准备启程回家。丹多洛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便请求教皇解除他的十字军誓言，允许他返回家乡。英诺森三世笑到了最后，坚持让这位老执政官留在军中，继续向着如今已经不可能到达的圣地前进。教皇带着平稳的语气，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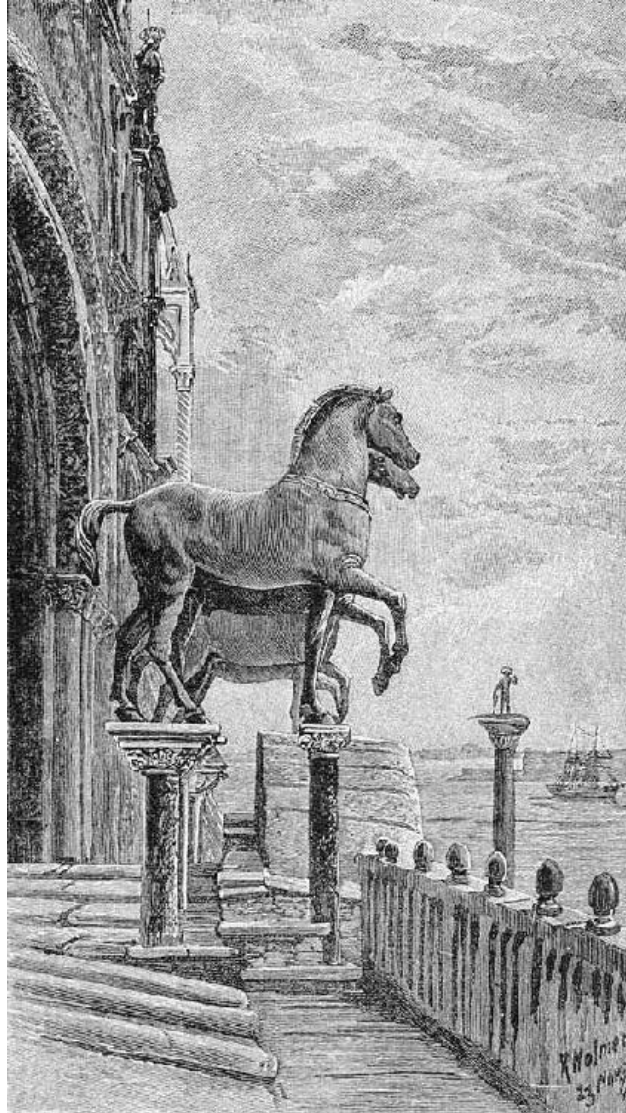
我们深知，你诚实可靠的慎重、与生俱来的敏锐，还有你绵密周到的成熟，在未来将会对我们的军队作出极大贡献。更何况，之前提到的皇帝[71]和十字军对你大加赞赏，颂扬你的热情与关怀他人。所有人中，他们最信任的就是你。现在你已完成自己的复仇，若不为耶稣基督所受的伤害而复仇的话，我们将受到责难。因此我们暂不考虑批准你的还乡请求。

对英诺森三世而言，压丹多洛一头实在快意。不过，他最后于1205年1月解除了对丹多洛的绝罚。丹多洛最后客死他乡，离潟湖有万里之遥。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死在了君士坦丁堡。1205年5月，他咽下了

最后一口气，被葬在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他的遗骸在那里保存了两百五十年，直到又一场浩劫撼动了这座帝都^[72]。

十字军让拜占庭归顺天主教会，英诺森三世曾一度盛赞他们的功绩。丹多洛死后两个月，英诺森三世才得知城市沦陷时发生的一切。他极其严厉地谴责了十字军，认定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苦难的典范，地狱的造孽。”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灾难性事件，是这个时代的丑闻，威尼斯人被认定是同谋。此事让教皇更加深了这样的想法：毫无愧意地与伊斯兰世界做生意的威尼斯商人十字军是基督的敌人。威尼斯人背负这样的标签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对威尼斯而言，此事却是个出乎意料的绝好机遇。他们在1203年秋季出发，旌旗招展，准备去征服埃及。大海却将他们带到了未能预知的目的地。对于他们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保持缄默。关于这场原本打算取道开罗攻占耶路撒冷、最后却出现在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东征，同时代的威尼斯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1204年10月1日，拜占庭帝国正式被胜利者们瓜分了。商人十字军带着丰富的战利品、大理石和圣物从君士坦丁堡返回。不像法兰克十字军那样只知道劈砍和熔铸，威尼斯人像鉴赏家一样，将艺术瑰宝完好无缺地带回家，去装点美化他们的城市。除了圣徒（包括圣露西、圣阿加莎、圣西蒙、阿纳斯塔修斯、殉道者保罗）遗骸，他们还运走了骨灰盒、圣像、镶嵌珠宝的宝物、雕像、大理石柱和浮雕。其中很多被用来装饰圣马可大教堂；一对古青铜门被安装在教堂入口；一座罗马雕像被用来组成圣狄奥多^[73]的身躯，他的鳄鱼被放置在附近两根柱子之一的顶部；据说，丹多洛亲自从赛马场选择了四尊镀青铜的骏马像，它们虽然静止不动，却富有戏剧张力，鼻孔张大，扬起前蹄。这些青铜骏马与威尼斯的雄狮一起，成了共和国的标志，象征着骄傲、威权与自由。丹多洛确保让威尼斯人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中唯一没有向新皇帝宣誓效忠的；他们避开了封建义务整个结构。



战利品

1204年的劫掠之后，精美的战利品被运送到威尼斯的码头。除了战利品，威尼斯还得到了其他一些东西。一夜之间，威尼斯变成了一个帝国。于1202年秋出征的所有人中，威尼斯共和国获得的收益最为丰厚。丹多洛利用这次机会，为潟湖的居民赢得了非同寻常的利益。

^[1]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50

[2]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59

[3]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49

[4]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as, Detroit, 1984, p. 312

[5]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103

[6]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51

[7]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52

[8]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53

[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63

[10]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55

[11]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65

[12]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57

[13]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57

[14]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63

[15]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p. 164-5

[16]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66

[17] 这座宫殿前面曾经有一座小港，其入口处立有公牛和雄狮雕像，因此得名。

[18]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13

[19]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67

[20]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67

[21]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67

[22]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18

[2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19

[24]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19

[25]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19

[26]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19

[27] 君士坦丁·拉斯卡里斯的弟弟狄奥多·拉斯卡里斯与其一起逃往小亚细亚。君士坦丁死后，狄奥多以尼西亚为中心，建立了尼西亚帝国，宣称继承拜占庭正统。1261年，尼西亚帝国的摄政米海尔·帕里奥洛格斯光复君士坦丁堡，自立为皇帝（史称米海尔八世），重建拜占庭帝国，详见下文。帕里奥洛格斯皇朝是拜占庭的最后一个皇朝。

[28]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20

[29]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171

[30]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20

[31]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20

[32]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p. 624-5

[3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20

[34]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p. 194-5

[35]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81

[36] Brand, Charles, M.,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Cambridge, 1968, p. 269

[37]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p. 183

[38]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21

[39] Clari, Robert 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Edgar Holmes McNeal, New York, 1966, p. 106

[40] 刻耳柏洛斯，字面意思为“黑暗中的恶魔”，是希腊神话中看守冥界入口的恶犬。赫西俄德在《神谱》中说此犬有五十个头，而后来的一些艺术作品则大多表现它有三个头，可能是为了便于雕刻。

[41] 卡戎是希腊神话中冥王哈得斯的船夫，负责将死者渡过冥河。

[42] Brand, Charles, M.,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Cambridge, 1968, p. 269

[4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21

[44] Phillips, Jonathan,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4, p. 201

[45] 传说中耶稣受难后曾安置他遗体的裹尸布，是一块印有男人面容及全身正反两面痕迹的麻布，约长4.4米、宽1.1米，保存在意大利都灵主教座堂。这究竟是不是耶稣的遗物，当然有极大争议。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它只不过是中世纪时伪造的“艺术作品”，甚至推测是达·芬奇照相实验作品，并指出头像即为达·芬奇。梵蒂冈对于这块殓布是否真正包裹过耶稣的遗体，保持非常慎重的立场。

[46] 根据《圣经》，耶稣受难前，罗马士兵“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阿”，以折磨和嘲讽他。

[47] 即钉死耶稣的十字架。

[48]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57

[49] Brand, Charles, M.,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Cambridge, 1968, p. 269

[50]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22

[51]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22

[52] Choniates, Niketa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p. 315

[5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24

[54] Brand, Charles, M.,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Cambridge, 1968, p. 268

[55]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35

[56]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36

[57]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37

[58]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38

[59]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37

[60]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38

[61]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38

[62]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40

[63]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642

[64]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p. 353

[65] Phillips, Jonathan,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4, p. 268

[66]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in English), p. 226

[67]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Caroline Smith, London, 2008, p. 97

[68] Madden, T., *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 2003, p. 179

[69] 穆尔策弗卢斯与亚历克赛三世的女儿是情人关系。这对亡命鸳鸯逃到亚历克赛三世那里之后，后者允许他们结婚，但不久之后就戳瞎穆尔策弗卢斯双目。

[70]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166

[71] 指鲍德温。

[72] 145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克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奥斯曼军队打开了备受拜占庭人仇恨的威尼斯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的墓穴，没有找到财宝，就将丹多洛的骨骸扔到了大街上，任凭野狗啃咬。

[73] 即阿马西亚的狄奥多，原为罗马军队中的士兵，306年因信奉基督教、反对异教而被处死。在圣马可的遗骸被运到威尼斯之前，圣狄奥多是威尼斯的主保圣人。他也是十字军的主保圣人。其雕像旁的鳄鱼雕像指代的是《圣经》中的恶龙。

第二部 崛起：海洋的君主

1204～1500



8. 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

1204~1250

1204年10月对拜占庭的瓜分使得威尼斯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海洋帝国的继承者。一下子，这座城市从一个商业国家一跃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威尼斯号令天下，从亚得里亚海顶端到黑海，横穿爱琴海和克里特岛周边海域，无人不从。在此过程中，威尼斯的自称从“公社”（潟湖本土居民的共同体）逐渐演变为“共和国”、“最尊贵的共和国”、“宗主国”。它是一个势力强大的主权国家，用威尼斯人引以为豪的说法，“凡水流经之地”皆为威尼斯的疆域。

在纸面上，威尼斯人得到了整个希腊西部、科孚岛、爱奥尼亚群岛、爱琴海上一系列基地和岛屿、具有战略意义的加里波利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最珍贵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八分之三，包括其码头和兵工厂，这是他们商业财富的基石。在与十字军领主们谈判时，威尼斯人已经对地中海东部了如指掌，这是其他人都不拥有的知识。他们与拜占庭帝国做生意已经有几百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此，当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封建领主们在希腊大陆的贫瘠土壤上建设微不足道的封邑时，威尼斯人索要的是足以控制战略性航道的港口、商埠和海军基地。他们要求的领地距海岸均不超过几英里。通过压榨贫苦的希腊农民是发不了财的，威尼斯人要的是控制航线，好让东方的货物进入威尼斯大运河河畔的市场。威尼斯后来将自己的海外领地称为“海洋帝国”。除了两个特例之外，威尼斯的海洋帝国从来就没有占据过大面积土地——威尼斯的人口太少，想要实现太过困难——而是类似于大英帝国的各个中转站，是由许多港口和基地组成的松散网络。威尼斯创造了自己的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亚丁^[1]，并且像英格兰一样，依靠海军力量将这些财产维系起来。

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建立几乎是个意外。它并不打算将共和国的价值理念灌输给“愚昧的”土著居民；它对这些被迫屈服的臣民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它绝对不希望这些人获得威尼斯公民的权利。威尼斯海洋帝国是由一座商人的城市建立的，其基本理念是完全商业化的。1204年瓜分拜占庭的受益者们建立了一系列带有怪异的封建名称的王国——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萨洛尼卡王国、伊庇鲁斯君主国、雅典和底比斯公国、优卑亚三头统治国、阿开亚亲王国、布多尼察侯国和萨罗纳侯国，不胜枚举。威尼斯人却以完全不同的头衔称呼自己：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2]的骄傲领主。这个称呼源于威尼斯商人仔细的习惯，就像在天平上计算商品一样，总共占到拜占庭帝国的八分之三。精明实在、脚踏实地的威尼斯人思考问题时常用分数：他们将自己的城市分成六个部分，将船只的资金成本二十四等分，并将贸易投资三等分。圣马可旗升起的地方，海港墙上和城堡大门上刻着他的雄狮的地方，都是“为了威尼斯的荣誉与利润”而存在。而且，强调的重点总是在利润上。

威尼斯的海洋帝国保障了其商船队的安全，并有效地防止了外国强权势力和其他海上对手心血来潮的侵犯。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条约中得到了在地中海东部中心地区的贸易控制权，这种控制的力度无与伦比。一下子，威尼斯就将其竞争对手——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完全排除在整个商业区之外。

理论上，拜占庭已经被整齐地划分为不同主权的独立部分，但这仅仅体现在纸面上，就像中世纪的教皇们在粗糙地图上划分的非洲版图一样。实际上的划分极为混乱。希腊帝国的崩溃将地中海东部的世界切割成为数众多的碎片。它使得该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没有人能够预见其后果——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颇具讽刺意味，它原本旨在打退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但反而有助于伊斯兰的西进。拜占庭颠覆的最直接后果并非有序的分配，而是疯狂地抢夺土地。这片海域成了“狂野东方”，冒险家、雇佣兵和海盗从勃艮第、伦巴第和加泰罗尼亚各港口纷至沓来。对年轻

无畏的人来说，这是基督教世界最后的边疆。众多小小的君主国在希腊的群岛和平原上涌现出来，每个都有自己的荒凉城堡，与其邻国发生小规模战争，互相仇杀屠戮。希腊的各个拉丁王国的历史就是混乱的杀戮和中世纪战争的故事。它们中很少有长时间存续的。王朝奠定后，仅仅几代人的时间就发生政权更迭，如同小雨洒在希腊干涸的土地上。它们都遭到拜占庭尽管协调乏力但持续不断的抵抗。

威尼斯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希腊并不是传说中的黄金国。真正的财富来源于亚历山大港、贝鲁特、阿卡 and 君士坦丁堡的香料市场。他们不动声色地静观封建骑士与雇佣兵们互相砍杀，自己则小心地执行着巩固霸业的政策。威尼斯人对自己得到的许多领土根本就漠不关心。除了一些港口之外，他们没有去占据希腊西部，也没有在加里波利——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要冲——驻军，这有些费解。威尼斯对阿德里安堡不感兴趣，于是它被分给了别人。

威尼斯人一直盯着大海，但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遗产而战，热那亚冒险家和封建领主们一直对其纠缠不休，这让威尼斯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威尼斯得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孚岛，它是亚得里亚海南部出入口岛链的重要一环。但为了保障科孚岛的安全，威尼斯人必须先把一个热那亚海盗头子驱逐出去。然而五年之后，威尼斯又失去了科孚岛。1205年，威尼斯人从十字军领主蒙费拉的博尼法斯那里，以5000金杜卡特^[3]的价格买下了克里特岛，然后花了四年时间驱逐另一个热那亚海盗头子——渔夫亨利。威尼斯人从海盗手中夺得了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的两个战略港口——莫东和科罗尼；并且在希腊东海岸狭长的优卑亚岛上站稳了脚跟，威尼斯人称它为内格罗蓬特（意思是“黑桥”）。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威尼斯人占领或租借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南海岸和广阔爱琴海上的一连串岛屿。威尼斯人的殖民体系就是这样，以一系列港口、要塞和岛屿建立起来。威尼斯效仿拜占庭人，将整个地理区域称为罗马帝国，并把它分成两个区域：下罗马，包括伯罗

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和内格罗蓬特；上罗马，包括更北面的土地和海洋，沿着达达尼尔海峡一直到君士坦丁堡。更北面是黑海，那里是有待探索的新区域。



莫东

威尼斯殖民体系的关键所在是双胞胎港口——莫东和科罗尼（这两个港口在威尼斯的文件中经常连起来使用，以至于几乎成了单一概念）、克里特和内格罗蓬特。这三个基地组成的三角构成了威尼斯海洋帝国的战略轴心，在几个世纪里，威尼斯人为守住它们不惜死战到底。莫东和科罗尼相距20英里，是威尼斯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它对于威尼斯共和国的海上基础设施来说至关重要，因而被称作“共和国之眼”。威尼斯人声称，“它们是如此重要，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不惜代价去维护它们”。^[4]它们是伟大的海上高速公路的关键踏脚石，也是威尼斯的雷达站。对里亚尔托的商人来说，商业信息像现金一样，极其珍贵；所有从黎凡特返回的商船都有义务在莫东和科罗尼停留，报告关于海盗、战争和香料价格的信息。

莫东周围环绕的港湾“能够容纳最大型的船只”，要塞上方有圣马可的旗帜随风飘扬、风车转动。^[5]高塔厚墙形成的堡垒有效地阻挡了内地的敌对势力，提供兵工厂、船舶修理设施以及仓储服务。官方文件称其

为“我们所有前往黎凡特的桨帆船和其他船只的避风港和特别庇护所”。^[6]在这里，船只可以修理桅杆，更换船锚，雇佣水手；获取淡水 and 转运货物；购买肉类、面包和西瓜；还可以去瞻仰圣亚他那修^[7]的头骨，去品尝当地特产——经过树脂处理的葡萄酒。一位过路的朝觐者抱怨说：“这种酒非常烈，闻上去还有沥青的味道，因此是喝不醉的。”^[8]商船队在前往东方的途中在莫东和科罗尼中途停留时，这些港口就俨然成了集市。桨手们只要手里有一点商品，都可以开一个摊点，碰碰运气。莫东和科罗尼是威尼斯主宰的海域的中转站。从这里出发，有一条向东的航线。桨帆船可以从这里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尖钉形的海岬，途经险象环生的马塔潘角——这里的航道曾经极其危险，是通往地狱的入口——前往内格罗蓬特，最后抵达君士坦丁堡。另一条更关键的主要航线是向南，途经贫瘠的中转岛屿切里戈和切里戈托，前往克里特岛——威尼斯殖民体系的轴心。

1204年后威尼斯占据的各海军基地、港口、贸易口岸和岛屿组成了一个商业与航海网络，维持着它的贸易活动。这些领地承担的赋税虽然很重，但威尼斯人对其的统治一般并不严苛。然而，克里特岛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座巨大的岛屿长90英里，横跨爱琴海南端，就像一道石灰岩屏障，成为非洲海岸与欧洲之间的缓冲地带。它其实更像一个完整的世界，而非单一岛屿。岛上有一系列环境严酷的独立区域，由三座巨大的山脉分隔开，纵横交错地遍布深谷、高原、肥沃平原和数以千计的山洞。克里特岛是希腊世界的原始神祇宙斯和克洛诺斯^[9]的诞生地。这片荒野的土地充斥着土匪与埋伏的危险。威尼斯占领它，就像蛇吞象一样困难。克里特的人口是威尼斯的五倍。克里特人民富有独立精神，完全忠于东正教信仰和拜占庭帝国，而威尼斯是导致拜占庭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威尼斯买下克里特岛没有花多少钱，然而保有它却要付出鲜血与金钱的巨大代价。

从一开始，威尼斯人就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他们花了十几年时间，

通过军事手段，才终于将热那亚人从克里特驱逐出去，丹多洛的儿子拉涅里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丧生。随后，威尼斯开始对克里特实施军事殖民。威尼斯意图以自己为原型，将克里特重塑为一个放大版的威尼斯，将克里特也划分为六个区，就像威尼斯城那样；然后邀请本土不同区的人来到克里特岛，在其相对应的区定居。一波波殖民者离开自己的故乡，想去这个新世界碰碰运气。他们将在克里特得到土地，作为回报，他们需要服兵役。于是，大量人口从威尼斯本土流出。13世纪，有1万威尼斯人定居克里特岛，而威尼斯总人口从来没超过10万人。共和国的许多贵族世家，例如丹多洛、奎里尼、巴尔巴里戈、科纳等家族，都有成员在克里特定居。然而，岛上威尼斯人的数量始终远远少于本土希腊人。

克里特是威尼斯的成熟殖民地，为了牢牢控制它，共和国经历了二十七次叛乱和两个世纪的武装斗争。每一波新的移民都引发一场新的叛乱，叛乱领导人是被剥夺了地产的克里特大地主家族。威尼斯人从本质上讲还是城市居民，他们固守着北方沿海的三座主要城市：干地亚（即现代的伊拉克利翁），这是威尼斯人在克里特岛势力的中心；以及西边的莱蒂莫和干尼亚。威尼斯人以一连串军事要塞控制乡村，对乡村的统治很不稳定。而在斯法基亚和白山，生活着以劫掠为生、高唱英雄歌谣的武士氏族，在这些地方，威尼斯的法令不起任何作用。威尼斯的统治是严厉而冷漠的。克里特岛由一位受共和国指派的公爵直接统治，他要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共和国元老院负责。威尼斯人极其残暴地掠夺克里特，压榨农民，为母城提供粮食和葡萄酒，并镇压东正教会。拜占庭民族精神在东正教会的教士中最为旺盛，跨越爱琴海传播。威尼斯人害怕这种精神的传播，于是禁止岛外的任何教士登岛。共和国坚定不移地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在克里特政府中任职的人必须是“我们的血肉同胞”^[10]；威尼斯的档案中随处可见他们对被土著同化的恐惧。若有威尼斯人皈依东正教，他的土地会当即被没收。殖民者喜欢引用圣保罗对克里特人的斥责：“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11]在威尼斯统治下

的四百五十年中，克里特农民始终备受践踏、一贫如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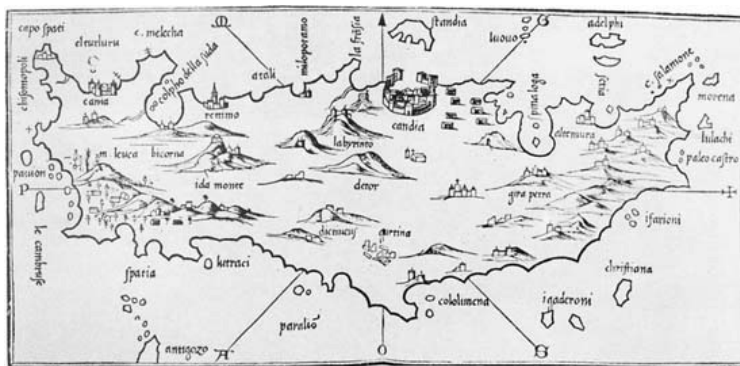
克里特人被肆意征税，权利被随便剥夺。他们一次又一次奋起反抗。1211、1222、1228和1262年的起义仅仅拉开了序幕；1272~1333年，在克里特封建领主——库尔塔特齐斯家族和卡莱尔吉斯家族——的领导下，大规模的民族起义风起云涌，有时威尼斯几乎丧失了对克里特的控制。1275年，克里特公爵遭埋伏身亡；1276年，干地亚遭到围攻；次年，梅萨拉平原（克里特的肥沃新月地带）爆发了多次血腥的激战；1319年，斯法基亚的山民屠杀了威尼斯的驻军；卡莱尔吉斯家族因为一支桨帆船舰队被征收赋税揭竿而起。

威尼斯人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进行军事镇压，间或开出一些未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他们的报复行动迅速而残酷；他们烧毁村庄，洗劫修道院；将叛军斩首，毒刑拷打嫌疑犯，将妇女和儿童押往威尼斯，令家庭骨肉分离。14世纪40年代，威尼斯人最终抓获叛军首领利奥·卡莱尔吉斯，按威尼斯的方式（“今夜，将罪犯带到奥尔法诺运河，缚住他的双手，让他驮着重物，一名执法官员将他投入水中，任其毁灭。”^[12]），将他装在麻袋里，投入了大海。共和国的殖民政策坚定不移。

即使是这样，克里特人的反抗似乎无法铲除。有很多次，克里特人几乎推翻了威尼斯的统治，仅仅是因为克里特人的氏族宿怨，威尼斯人才仍然维系着殖民统治。相同的地区掀起叛乱，遭到镇压和洗劫，随后再一次反叛，周而复始。武士文化在许多世纪里延续下来，始终没有中断。相同的村庄后来将被土耳其人又一次烧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未能逃脱此命运。截至1348年，威尼斯镇压克里特人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百四十年。最惊人的大叛乱还在后头。

在克里特维持殖民统治的代价太高了。元老院抱怨道：“克里特人奸诈的叛乱垄断了威尼斯的资产和资源。”^[13]尽管元老院语无伦次地抱

怨自己付出的代价，并寻找替代方案，却始终舍不得放弃克里特。克里特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如果说莫东和科罗尼是共和国之眼，那么克里特就是它的中心，是“帝国的力量和勇气之源泉”，是海洋帝国的神经中枢，是“共和国最重要的财产之一”。^[14]官方档案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溢美之词。雕刻在克里特的城门和港口墙上的威尼斯雄狮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神气。从执政官的宫殿去往克里特岛的航行需要二十五天，相当于1900年从孟买到大英帝国的伦敦的路程，但在潟湖居民的想象中，距离就像被压缩了一样。克里特岛看起来变大了。在威尼斯统治克里特的数百年中，绘制有误的克里特地图一直流传下来，其轮廓狭长，东端略微上扬；里亚尔托交易市场上关于克里特的信息对商业行情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威尼斯人的克里特岛地图

克里特岛位于威尼斯共和国两条重要的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一条是通往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航线，另一条是通往叙利亚和埃及香料市场的航线。它是为圣地各个十字军港口提供补给的后备站；是商品仓储和转运的场所；为过往的商用桨帆船提供维修补给；在战时，为整个爱琴海的海军作战提供支持。前往圣地的朝觐者因为晕船而昏昏沉沉，可以在这里登陆，暂时缓解在海上的不适。商人们在这里贩卖丝绸和辣椒，逃避时断时续的禁止与异教徒贸易的教皇禁令；人们交换信息，讨价还价。1381年，威尼斯本土禁止了奴隶贸易，克里特便成为共和国奴

隶贸易的非法场所。在干地亚和卡尼亚的巨大的、带有桶形穹顶的桨帆船棚子里，克里特公爵领地维持着自己的舰队，以警戒沿海地带，防范海盗，其船员是被强征入伍的克里特农民。干地亚就是威尼斯世界的忠实复制品，在公爵宫殿对面、隔着主广场，也有一座圣马可教堂，也有方济各会修道院、凉廊以及紧贴着城墙的犹太区。在缓缓下坡、通往港口的主干道上，始终可以看得见大海，拍打防浪堤的北风有时掀起灰蒙蒙的惊涛骇浪，有时大海则十分平静。在这里，思乡的市民和焦虑的商人可以观看船只笨拙地转弯，从干地亚港口狭窄的入口驶入，也可以看到它们起航去往塞浦路斯、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港，尤其是驶向君士坦丁堡。

在威尼斯的贸易地图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上主干道至关重要。这条航道途经克里特岛，经过爱琴海中部星罗棋布的岛屿，即爱琴海群岛，它们就像点缀在海洋表面的岩石碎片。这个岛屿群的中心是基克拉泽斯群岛，希腊人称之为“环”，它围绕着提洛岛。提洛岛曾经是古希腊世界的宗教中心，如今则是海盗的港湾，他们从这座岛上的圣湖中取水。这些岛屿互相之间仅仅隔着几英里的平静海面，组成了一些独立王国。纳克索斯岛面积较大，且有丰富的淡水资源，以其肥沃的山谷而著称，是其中最具有前景的一个；其次是火山岛圣托里尼；米洛斯岛最著名的是黑曜石；塞里福斯岛是爱琴海最优秀的港口，岛上有丰富的铁矿，因此常常使得过往船只的指南针失灵；还有海盗盘踞的安德罗斯岛。

1204年的条约让威尼斯得到了所有这些岛屿，但威尼斯既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占领这些岛屿，它们也不能给威尼斯带来多少经济利益，因此威尼斯没有将其视为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岛屿既小又多，不可能向其派驻军队，但也不能对其放任自流。它们的港湾提供了可以躲避风暴、获取淡水、停泊船只的场所；如果威尼斯人没有占领这些岛屿，那么就意味着会受到海盗的威胁，并且通往北方的航道也不安全。仔细进行了代价和收益分析后，共和国最终向私人开放了这些岛屿。大

约1205年，恩里科·丹多洛的外甥马尔科·萨努多辞掉了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官职位，装备了八艘桨帆船，在其他雄心勃勃的贵族的支持下，航向基克拉泽斯群岛，去开拓自己的天地。他下定决心，不成功便成仁，这次出征不是为了威尼斯共和国的荣誉，而是为了他自己的事业。他发现，纳克索斯岛（爱琴海中部的宝石）的城堡被热那亚海盗占据了。他决心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烧毁了自己的船只，将海盗围困了五周，最后终于驱逐了他们，然后自封为纳克索斯公爵。十年之内，基克拉泽斯群岛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袖珍王国，成了一群贵族冒险家的财产，他们渴望个人荣耀，而威尼斯对这种想法往往不是很认可。老执政官的侄子马里诺·丹多洛占据了安德罗斯岛；吉西兄弟占有蒂诺斯岛和米科诺斯岛；巴罗奇家族统治着圣托里尼岛。一些领地被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分配出去：马尔科·韦尼尔被授予基西拉岛（意大利人称之为切里戈岛），是因为他的姓氏与爱神维纳斯相似，而切里戈岛传说是维纳斯的出生地。每一个领地的主人都使用从希腊神庙抢来的材料建造城堡，在门上雕刻他们的纹章，维持自己的微型海军以互相厮杀，修建天主教堂，引进威尼斯教士来吟唱拉丁赞美诗。

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多元化世界在爱琴海中部悄然形成了。大部分希腊人忠于他们的东正教信仰，但对于新领主一般保持着容忍的态度；因为威尼斯冒险家们至少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防范在这一海域活动猖獗的海盗。尽管爱琴海群岛的开放引发了“淘金热”，这些岛屿其实奇缺黄金。

威尼斯治下的爱琴海地区的传奇是多彩而暴力的，在有些地方也出奇地持久。纳克索斯公爵领地一直维持到1566年；而群岛中最北端的蒂诺斯岛直到1715年还忠于威尼斯。然而，威尼斯会发现，这些近似海盗的公爵领地并非总是符合威尼斯的利益。纳克索斯的征服者马尔科·萨努多是一位如痴似狂的冒险家，不断寻找机遇，从中牟利。他帮助威尼斯共和国镇压克里特岛的一次叛乱，但是没有得到回报，于是改变阵

营，帮助克里特叛军，直到他被赶回纳克索斯。然而他并没有被吓住，悍然攻击士麦那。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他被尼西亚的皇帝俘虏了。他魅力无穷，不仅逃脱牢狱之灾，还娶到了尼西亚皇帝的妹妹^[15]。占据附近的米科诺斯岛的吉西兄弟至少对威尼斯共和国是忠诚的。在圣马可节，他们在岛上的教堂里点起一支巨大的蜡烛，歌颂这位圣徒。更多的时候，群岛上的公爵们指挥着他们的微型舰队，驶过夏季的海面，开展小型战争。基克拉泽斯群岛此起彼伏地爆发了许多私人恩怨的战争，这里的领主们有的好争吵，有的奸诈，有的则癫狂。一些岛屿由克里特的主地主遥控；安德罗斯岛的统治者居住在威尼斯城的一座宫殿里；塞里福斯岛的君主是无比凶残的尼科洛·阿道尔多，他常邀请岛上尊贵的居民共进晚餐，向其勒索钱财。若他们不肯就范，就会被从城堡的窗户丢下去。民怨沸腾时，威尼斯被迫进行干预。阿道尔多被永久性逐出塞里福斯，并在威尼斯的一座监狱里苦熬了一段时间。但威尼斯在这些事情上倾向于采取务实的态度：阿道尔多被虔诚地安葬在城市中他出资建造的教堂内；统治纳克索斯的最后一位萨努多家族成员被篡位者杀害，但这位篡位者对共和国更有利，因此共和国对这起谋杀假装不知道。共和国也不会拒绝直接干预。当纳克索斯公爵领地的一位女继承人爱上一位热那亚贵族时，她被劫持到克里特，然后被“说服”，嫁给了一位更合适的威尼斯领主。这种通过代理人进行占领的策略存在弊端——威尼斯后来被迫对许多这样的地方进行直接管理——但爱琴海群岛的小领主们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海盗的干扰，并保证商船队通过群岛时能够免遭伏击。

最重要的故事发生在君士坦丁堡。1203年夏天，当威尼斯的舰队取道达达尼尔海峡北上、举目凝视城市的海墙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且虎视眈眈的敌城。1204年之后，这里成了威尼斯人的第二故乡。威尼斯教士在遍布镶嵌画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唱着拉丁赞美诗；威尼斯的船舶安全地停泊在位于金角湾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码头边，将货物卸至免税仓库。当年威尼斯共和国与昔日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和比萨——时不时地发生争执，拜占庭皇帝们机警地关注着发生的一切；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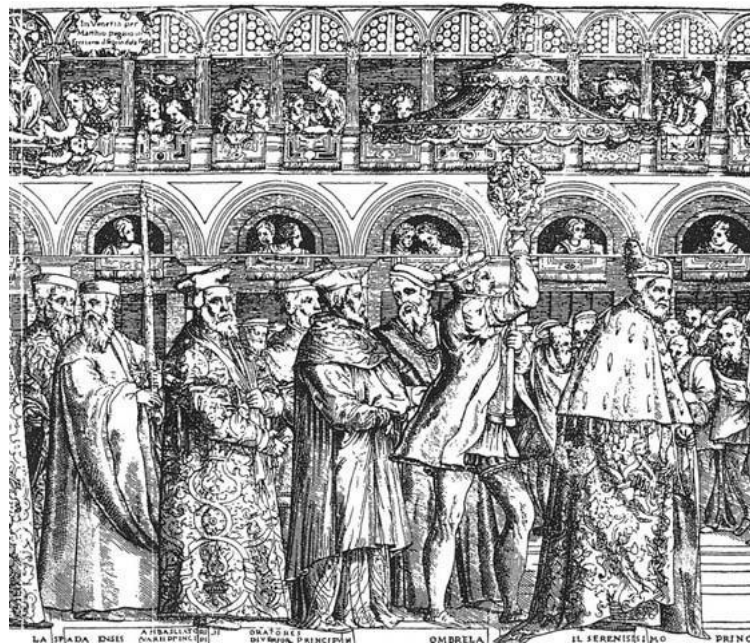
今，热那亚和比萨被禁止参与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活动。此外，威尼斯的航船第一次可以自由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寻找与远东接触的新路途。成千上万的威尼斯人涌入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居住和经商。君士坦丁堡的吸引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有一任执政官——曾任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殖民地市政官的雅各布·蒂耶波洛——提议将威尼斯中央政府迁至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曾经是拜占庭帝国微不足道的一颗卫星，如今却漫不经心地打算取而代之。遍布地中海东部各地的诸多殖民地和海军基地也逐渐得到巩固（尽管这巩固的过程充满艰辛），有希望让地中海成为威尼斯的内湖。威尼斯的商人随处可见。蒂耶波洛与亚历山大港、贝鲁特、阿勒颇和罗得岛签订了通商协定。他制定了连贯一致的政策，划定了大政方针的方向，这种努力的方向将会持续数百年。威尼斯的目标万变不离其宗，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用最有利的条件，保障贸易的机遇。但达到目标的手段极其灵活，有无限可能。威尼斯人是与生俱来的机会主义者，哪里有赚钱的机会，他们就航行去哪里。

威尼斯人的命运取决于东方，取决于东方的香料、丝绸、大理石柱和镶嵌有宝石的圣像。东方的财富也流回威尼斯，不仅以真金白银的形式存在于大运河畔金碧辉煌宫殿的底层仓库内，在城市的面貌上也可见一斑。13世纪装饰圣马可教堂的镶嵌画家们塑造的是《圣经》时代的黎凡特世界。他们在画中重塑了亚历山大港的灯塔、缰绳带着流苏的骆驼和带领约瑟^[16]去往埃及的商人。威尼斯城的宏伟建筑也开始流行一种东方韵味。

到1253年，雷涅罗·泽诺就任威尼斯执政官时，庆祝复活节用的是光辉灿烂的拜占庭礼仪。执政官从自己的宫殿出来，在肃穆的队伍护送下，来到圣马可教堂。他前面有八个人开道，举着绘有圣马可仪容的丝绸和金线旗帜；然后是两个少女，一位拿着执政官的椅子，另一位拿着椅子的金色靠垫；六位乐师拿着银喇叭，两位乐师手持纯银的钹；一名教士拿着一个金银制成、镶有宝石的巨大十字架，另一名教士手持一部

华丽的福音书；二十二名圣马可教堂的神甫身着金色法衣，唱着圣歌紧随其后；然后是执政官本人，走在金丝布制成的华盖下，城市的大主教和将要唱弥撒的教士陪在他身旁。在世人眼中，执政官像拜占庭皇帝一样富丽堂皇，身穿金丝编织的衣服，头戴镶嵌宝石的金冠，手持一支巨大的蜡烛；执政官身后是一名手捧执政官宝剑的贵族，最后是所有其他贵族和显赫人士。

这支游行队伍沿着教堂的正面走过，经过斑岩柱廊（这些石柱是从十字军治下的阿卡得来，以及从君士坦丁堡抢夺来的）。此情此景，仿佛威尼斯不仅偷走了君士坦丁堡的大理石、圣像和石柱，还窃得了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威仪、它对隆重礼仪的酷爱，乃至它的灵魂。圣马可教堂内光线黯淡，如同在海面之下。威尼斯人庆祝复活节的言辞将神圣与世俗、复活的基督与威尼斯海洋帝国联系了起来。“基督得胜！”人们呼喊道，“基督为王！基督显权能！愿我们的领主雷涅罗·泽诺，威尼斯、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的高贵执政官，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的领主，得到救赎、荣誉、长寿和胜利！哦，圣马可佑助他！”^[17]



一位执政官的游行

1204年的事件增强了威尼斯的自我意识。小小的共和国开始沉溺于帝国的光辉威严，似乎在春季运河粼粼波光的反射下，威尼斯正在转变为一个新的君士坦丁堡。

每到复活节，威尼斯人都举行这样的仪式，以颂扬他们的海洋帝国；在几周之后的耶稣升天节，威尼斯人则要宣示自己对大海本身的主权。公元1000年，执政官奥西奥罗从威尼斯的潟湖起航时，这样的仪式还只是简单的祈福。1204年之后，仪式越来越复杂和绚丽，表达了威尼斯对自己与大海的神秘结合的理解。身穿白鼬皮衣、头戴尖角帽（象征共和国的威严）的执政官在自己宫殿前的码头上，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登上他的庆典专用船。没有什么比这艘“金船”更能体现威尼斯的海权骄傲了。这艘宏伟的双层甲板船用镀金装饰得富丽堂皇，绘有狮子纹章和海中生物，用深红色华盖遮蔽着，需要168人划船。它从码头出发了！金色的船桨拍打着潟湖的水流。在船首，象征公正的装饰人像高举着天平和宝剑。圣马可的燕尾旗在桅顶迎风招展。礼炮齐鸣，管乐震天，鼓声连绵不绝。在一大群刚朵拉和帆船的陪伴下，金船向亚得里亚海的海口驶去。此时，主教说出仪式性的祈祷词：“哦，主啊！请赐福于我们，以及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让大海始终平静安宁。”^[18]然后，执政官从自己手上摘下一枚黄金做成的结婚戒指，将它扔进大海，并说出历史悠久的语句：“哦，大海，我们与你结下姻缘，以示对你真正的、永久的主宰。”^[19]

不管辞藻有多华丽，威尼斯人对其加以神化的大海，以及它所蕴含的财富，并不是能够轻松赢得的。热那亚备受威尼斯的排挤，无法轻易进入富庶的贸易地区，于是持续不断地骚扰威尼斯。为了对付他们的海上竞争对手，热那亚人发动了一场非正式的海盗战争。雷涅罗·泽诺执政官参加复活节庄严游行的三年前，在叙利亚海岸的十字军港口阿卡发生了一起事件：一名热那亚公民被一个威尼斯人杀死了。三年后，蒙古人洗劫了巴格达。在这些互无关联的事件之后，两个航海共和国将陷入

一场长久的争夺地中海贸易的斗争。这场斗争使两国暴富，也将它们推向毁灭的边缘。斗争的竞技场从亚洲草原延伸到黎凡特的港口，囊括黑海、尼罗河三角洲、亚得里亚海、巴利阿里群岛和希腊沿海地区。争吵甚至波及遥远的伦敦和布鲁日的街道。地中海东部的所有民族都被卷入到这个旋涡中：拜占庭人、匈牙利人、互相竞争的意大利城邦、达尔马提亚沿岸城镇、埃及的马穆鲁克人^[20]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全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自卫，卷入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殊死搏斗。这场战争将持续一百五十年。

^[1] 今天的也门共和国的经济中心和重要国际港口，自古为东西方贸易重要港口。历史上曾被阿克苏姆、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等占领。1839年，英国占领亚丁，作为其控制红海的重要支撑港口。

^[2] 指拜占庭帝国。拜占庭人一直以罗马帝国自居，尽管他们主要是希腊血统。

^[3]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威尼斯杜卡特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与接受。

^[4] Thiriet, F.,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age*, Paris, 1959, p. 250

^[5]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192

^[6] Miller, William, *Latins in the Levant: 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 1204—1566*, Cambridge, 1908, p. 40

^[7] 圣亚他那修（约296～373）是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东方教会的教父、三位一体论的主要捍卫者，在世时是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主教，对《尼西亚信经》和基督教正统教义的奠定贡献极大。

^[8]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380

^[9] 克洛诺斯是第一代十二提坦神的领袖，也是提坦中最年轻的。他是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盖娅的儿子。他推翻了父亲乌拉诺斯的残暴统治，领导了希腊

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直到他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

[10] McKee, Sally, 'The Revolt of St Tito in Fourteenth-century Venetian Crete: a Reassessment',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 no. 2, Dec, 1994, p. 180

[11] *Titus 1: 12*

[12] Hodgson, F. C., *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1204-1400, London, 1910, p. 237

[13]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vol. 1, p. 145

[14] Thiriet, F.,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age*, Paris, 1959, p.145

[15] 据说，尼西亚帝国的开国皇帝狄奥多·拉斯卡里斯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马尔科·萨努多。也有史学家反对这一说法。

[16] 《圣经·旧约》的重要人物，是亚伯拉罕的曾孙、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得到父亲格外宠爱，哥哥们嫉恨他，便将他合谋卖往埃及为奴。约瑟在埃及官员波提乏手下做管家，波提乏对约瑟十分信任，把全家的家务事都交给了他。后来由于约瑟其长相十分俊美，波提乏的妻子欲勾引约瑟，约瑟不从，反被波提乏妻子陷害，最后入狱。他又因成功为法老解梦，得到释放，成为埃及的高官及首席王室顾问。

[17]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45

[18]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 Venice, 1912-21, vol. 2, p. 281

[19] Norwich, John Julius, *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 1982, p. 55

[20] 马穆鲁克王朝在约1250~1517年统治埃及和叙利亚。“马穆鲁克”是阿拉伯语，意为“奴隶”。自9世纪起，伊斯兰世界就已开始起用奴隶军人。奴隶军人往往利用军队篡夺统治权。马穆鲁克将领在阿尤布王朝苏丹萨利赫·阿尤布（1240~1249年在位）去世后夺取王位。1258年，马穆鲁克王朝恢复哈里发的地位，并保护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残余的十字军被赶出地中海东部沿岸，而蒙古人也被赶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上，他们在史书撰写及建筑方面成就辉煌。最后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打败。

9.需求与供给

1250～1291

威尼斯与热那亚：最尊贵的威尼斯，最自豪的热那亚。这两个航海共和国好似彼此的镜像，甚至他们的名字都互相呼应。热那亚位于意大利西侧，与威尼斯的位置对称，和威尼斯一样，也在自己海湾的顶端，是一个天然的由海洋向陆地的转运点。从热那亚可以便捷地进入波河上游流域、米兰和都灵的富裕市场，以及通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法兰西的道路。热那亚同样依赖于大海。热那亚坐落于群山之中，有丰富的造船木材的储备，但没有肥沃的农垦内陆，因此把地中海视为摆脱贫困和监禁的出口。它有一个很好的避风港口，还有比疟疾肆虐的潟湖更好的气候条件。热那亚水手和威尼斯水手一样顽强，他们的商人也一样唯利是图。和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对手一样，热那亚人有进取心、务实而冷酷无情。

但在政治气质上，热那亚与威尼斯迥然不同。威尼斯的地理环境岌岌可危，若是要防止岛屿被淹没或潟湖淤积，人们必须精诚团结，所以威尼斯人接受政府的管控，通过公社型企业运作；而热那亚人的个人主义色彩强烈，偏爱私人企业。对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没有好感的外界人士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区别。佛罗伦萨人弗朗哥·萨凯蒂做了一个对两个民族都大加贬抑的比喻，把热那亚人比作驴：

驴的天性是：当许多头驴在一起时，其中一头被打了，所有驴都会散开，到处逃窜，他们就是这么卑劣……威尼斯人类似猪，被称为“威尼斯猪”，他们真的有猪的天性，因为当众多的猪被关在一起时，其中一只被打，所有的猪都会聚拢，并冲向殴打它的人；这就是威尼斯人的天性。[\[1\]](#)



热那亚

正是由于性格上的这些差异，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激烈的贸易竞争。

热那亚和威尼斯有相同的目标：抢占市场份额，垄断市场。但热那亚的手段与威尼斯不同。从一开始，热那亚的海外殖民地绝大部分都是私有的。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热那亚舰队的风头压倒了更为谨慎的威尼斯人，并在新的十字军王国获得特惠贸易权。这支舰队就是私人业主组建起来的。勇敢无畏、不惧风险的热那亚人比威尼斯人更早投身于冒险，也更快地接纳新技术。给国际贸易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许多商业创新和实践创新最早就是热那亚人采纳的。黄金货币、航海图、保险合同、船尾舵的使用、公共机械钟的引入——热那亚要比威尼斯人早几十年使用这些东西。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热那亚在黎凡特的贸易有了先行一步的优势，还开创了一条前往佛兰德的利润丰厚的航海路线，这比威尼斯早了五十年。虽然马可·波罗名满天下，但热那亚比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对手更早、更深入地进入了东方。热那亚面向西方的大西洋，因此能感知地中海盆地之外的更多可能性，也能够更好地获得远洋

航海技术。早在1291年，一对热那亚兄弟便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寻找前往印度的航线。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的是一位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多弗·哥伦布，也不足为奇。无畏、创造性思维、敢于冒险、有创新精神，这些是个人主义的热那亚天才的标志。

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首要目标之一是找到一群新的可供奴役的人，这也是非常有热那亚特色的。热那亚性格包含活力四射的个人主义，但也有黑暗的一面。意大利的两个航海共和国无情的物质主义及其“对财富的贪得无厌”（这是彼特拉克的评价）令虔诚的中世纪世界震惊而反感。两者都因为和伊斯兰世界做生意而常遭教皇谴责；拜占庭人憎恶他们，穆斯林鄙视他们。教皇庇护二世认为威尼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比鱼高不了多少；叙利亚阿拉伯人认为“威尼斯人”和“混蛋”是同义词。但热那亚的声誉还要更差一点。“除了钱什么都不爱的残忍之徒”，这是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的简练评判。^[2]热那亚人是狂热的奴隶贩子，热那亚比中世纪欧洲其他任何城市都拥有更多的奴隶。热那亚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常陷入混乱的暴力冲突；城市的内政被反复的派系斗争搞得支离破碎，内讧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经常恳求外来者来治理他们的城市；谨小慎微的威尼斯人对这个政治混乱的活生生教训感到极为恐惧。在公海，热那亚人以海盗行径和私掠活动而臭名昭著。对热那亚来说，战争和海盗行为之间仅有一线之隔。

和威尼斯人一样，热那亚人也是走遍天下；到14世纪初，从不列颠到孟买，到处都可以看到热那亚商人的身影，他们建立商埠，用骆驼和骡队运送货物，将香料装进商船，买卖小麦、丝绸和谷物。“热那亚人如此之多，”一位爱国的热那亚诗人写道，“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无论他们去哪里或待在哪里，都会把那里变成一个新的热那亚。”^[3]到1250年，热那亚非常繁荣昌盛；它的人口增长到约5万人，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尽管数量一直没有威尼斯的多。热那亚和威尼斯激烈地争夺世界范围内的商品。

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斗争，以及和另一个对手比萨的较量，是早期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机遇引发的。所有意大利航海共和国都渴望成为垄断商人，热衷于赶走竞争者，单独获得与黎凡特当地领主开展贸易的排他专有权。爱争吵的意大利商人在黎凡特的定居点常常互相紧邻，像小型堡垒一样戒备森严，对当地人来说，这些意大利人是讨厌的客人。这种情况在君士坦丁堡最为严重，来自不同共和国的意大利商人们互相争斗不休，以至于拜占庭皇帝诅咒他们的住所遭瘟疫，并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意大利人全部驱逐。

1204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给了威尼斯主导地位。一下子，热那亚人被从东方一些最富裕的市场驱逐出来。威尼斯控制了爱琴海，取得了在黑海的第一个立足点，赢得了克里特岛，最重要的，它成了君士坦丁堡的主人之一。对热那亚人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挫折。热那亚海盗们尽可能到处袭扰得胜的威尼斯人；渔夫亨利大胆地攫取克里特岛；热那亚海盗开始系统地劫掠威尼斯商船队，以这种方式向威尼斯开战。1204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威尼斯巨大的财富增长让地中海其他国家红了眼。在叙利亚海岸的十字军港口阿卡，这种情绪激发了公开战争。

阿卡是一座有城墙环绕的人口稠密的城镇，周围有环形的港口，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城内的聚居区毗邻。为了抢占利润丰厚的与伊斯兰国家的贸易，他们展开了激烈竞争。对热那亚来说，阿卡以及邻近的港口推罗是一个心脏地带：他们在威尼斯之前就在此有了立足之地，他们指望在这里进行垄断性控制，用以平衡威尼斯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这里弥漫着激烈的商业竞争气氛。1250年，发生在阿卡的一起意外事件导致了一场暴乱；暴乱演变为一场战斗，战斗最终挑起了一场蔓延到整个地中海东部的战争。

起因都是小事，但十分复杂。人们就两个商业区之间由双方共享的

一座教堂发生了纠纷；一名热那亚水手驾着一艘船出现在港口，特别提防海盗的威尼斯人认为那艘船是从他们手中偷走的赃物；两名市民之间的私人争吵酿成冲突，导致其中的热那亚人被打死。紧张情绪升温到一定程度后，炸药桶爆炸了。一群热那亚暴民冲到海港，洗劫了威尼斯船只，然后掠夺了他们的街区，屠杀了里边的居民。

当消息传回威尼斯，执政官要求热那亚人赔偿。热那亚人不肯赔偿，于是威尼斯人装备了32艘武装桨帆船，在洛伦佐·蒂耶波洛（一位前任执政官的儿子）指挥下驶往黎凡特。1255年，蒂耶波洛的舰队抵达阿卡，撞毁了热那亚人在港湾入口设置的铁链，烧毁了热那亚人的桨帆船。随后，威尼斯舰队袭击了附近的要塞推罗，对热那亚人又一次大加羞辱，俘虏了热那亚的海军司令，抓获了300名热那亚公民，将他们用铁链锁上，运回阿卡。这座城市成了街头暴力的熔炉，变得四分五裂，将居住于此的各民族居民都卷入冲突中。双方都使用重型攻城武器轰击对手的防御工事。威尼斯人从克里特派出了更多船只。“战争每天都很残酷和艰苦，”威尼斯编年史家马蒂诺·达·卡纳尔记载道。^[4]当消息——他们的公民在阿卡被披枷带锁地游街——传到热那亚时，爱国的愤怒倾泻而出：“人们呼吁对威尼斯复仇，要让世人永志难忘。妇女们对丈夫说：‘把我们的嫁妆拿去，用来复仇吧。’”^[5]双方都投入了更多的战船和兵力，但威尼斯人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向前逼近，占领了那座有争议的教堂和城镇里一个关键的山头。热那亚人被迫退回他们的集市区。这是一场痛苦而缓慢的对抗，预示着即将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在热那亚和威尼斯本土，双方都在招兵买马。1257年，热那亚派出了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拥有40艘桨帆船和4艘圆船，由新任海军司令罗索·德拉·图尔卡指挥。威尼斯人听到风声后，派出了实力与之相当的舰队，指挥官是保罗·法列罗。6月，德拉·图尔卡的舰队出现在叙利亚海岸，鼓舞了被围困的热那亚人的士气。从他们所在区域的一座高塔上，热那亚人悬挂了他们所有盟友的旗帜，发出胜利的喧哗，高声辱骂下方

的威尼斯人；用威尼斯编年史家多彩的（和带有偏见的）说法，热那亚人呼喊道：“奴隶们，你们全都要完蛋啦！.....这座城市将是你们的死地，快逃跑吧。基督教的精英来了！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上，明天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末日！”^[6]

德拉·图尔卡的舰队逼近阿卡，准备决战。当舰队接近时，他们将帆降低，把锚抛下，以此威胁港口。风太大，以至于威尼斯船只无法出击。夜色降临，城内的热那亚人“用蜡烛和火炬将城市照得亮如白昼.....他们胆量大增，营造出巨大的声势，大吹大擂，即使是最普通最温和的人都变得像雄狮一般。他们就这样不断地威胁威尼斯人”。^[7]

次日黎明，双方都为不可避免的海战做好了准备。威尼斯指挥官尝试用唱福音赞美诗的方式来鼓舞士气。“他们唱完之后，吃了一点东西，接着开始起锚，并高声呐喊，‘为我们祈祷，求我主耶稣基督和威尼斯的圣马可保佑！’接着，他们开始向前划船。”^[8]在城镇里，热那亚驻军冲了出来，与威尼斯驻当地的管理者及其部下对抗。当两支舰队接近的时候，“圣马可！”和“圣乔治！”^[9]的呼喊在海面上此起彼伏，威尼斯的金狮旗和热那亚的白底红十字旗在风中飞舞，“海上的战役宏大而超乎寻常，异常激烈和残酷”。^[10]热那亚舰队的规模比威尼斯的稍大，但威尼斯从阿卡的多种族混居的居民中雇用了额外的人手。这是众多海战中的第一次，最后以威尼斯的辉煌胜利告终。热那亚人跳进了海里，或者驾船调头逃窜；威尼斯俘获了25艘桨帆船，杀死或俘虏1700名热那亚人。眼见着自己的舰队被消灭，热那亚驻军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从推罗沿着海岸前来援助热那亚人的十字军骑士腓力·德·孟福尔看到热那亚人怯懦投降的场面，愤怒地调头返回，并且骂道：“热那亚人只会吹牛，就像海鸥，一头扎进海里淹死了。他们的骄傲荡然无存了。”^[11]热那亚人降下他们塔楼上的旗帜，投降了。他们被逐出阿卡；他们的塔楼被夷为平地；身披枷锁的战俘被拉到圣马可广场游街，并被囚禁在执政官宫殿的地牢里。直到教皇说情，这些人才被释放。威尼斯人将他们的

敌人立在阿卡的聚居区的一个斑岩墩柱作为纪念品带走，安放在圣马可广场上一座教堂的角落。后来这个墩柱被称为宣令石，用来宣读共和国的法律，叛徒被砍下的头颅也被摆放在那里示众（后来一位游客抱怨道：“这些死人头恶臭难当，令人厌恶。”^[12]）。

阿卡的这次战役为热那亚和威尼斯的一系列漫长战争定下了基调——本是利益之争，但爱国狂热和出于本能的彼此厌恶让它延续下去。这次战败让热那亚相当受挫，但它没有屈服。它仅仅改变了攻击的方向；它决定采取外交手段，攻击威尼斯海洋霸权在东方的中心——君士坦丁堡。

从一开始，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就一直处于疲软的状态：长期缺乏人力、资金，被充满愤恨和未同化的希腊人包围。到13世纪中期，它到了关键的时刻。拉丁帝国的皇帝鲍德温二世仅仅只能控制城市本身。他囊中羞涩，以至于将宫殿屋顶的黄铜和城市里最珍贵的圣物——荆棘冠冕——抵押给了威尼斯商人，商人转手把它们卖给了法兰西国王。只有把君士坦丁堡视作第二故乡和价值极大的贸易基地的威尼斯人，才全心全意地努力维持鲍德温二世的统治；威尼斯舰队在金角湾的永久驻扎就是拉丁帝国存活的最好保障。在60英里以外、大海对岸的亚洲，拜占庭的流亡皇帝米海尔八世还在湖畔城镇尼西亚韬光养晦。1260年秋天，一个热那亚代表团出人意料地前去拜访了他。

热那亚人带来了一个提议。他们愿意为皇帝提供舰队，用于光复君士坦丁堡。对米海尔八世来说，这有如天意。他知道鲍德温二世的地位是多么岌岌可危；他也知道，如果不能遏制住威尼斯海军，他就很难将拉丁人驱逐出去。协议就这样敲定了。热那亚人承诺提供50艘战船，其运作成本（热那亚人要价很高）由米海尔八世提供，目标是收复君士坦丁堡。作为回报，热那亚人将取代威尼斯人，获得他们的竞争对手目前在城市里享有的一切——全部免税贸易特权、土地以及商业基础设施，

包括码头和仓库。他们还将获准在爱琴海的一系列关键贸易地点，如萨洛尼卡和士麦那，建立自由贸易和自治殖民地；热那亚还将成为威尼斯最宝贵的殖民地——克里特和内格罗蓬特——的合法拥有者。米海尔八世十分希望达成这笔交易，因此他额外提供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权：进入黑海开展商业活动的权利，这是此前拜占庭一直谨慎地将意大利商人排除在外的领域。也就是说，热那亚将在地中海东部彻底取代威尼斯。

《尼姆菲翁条约》于1261年7月10日在小亚细亚海岸签订，为热那亚开辟了帝国扩张的新前景，同时也开辟了威尼斯—热那亚海上战争的第二战场。

十五天后，大业就完成了，热那亚人没有放一枪一炮。1261年7月25日，威尼斯舰队取道博斯普鲁斯海峡，攻击一个拜占庭据点；与此同时，米海尔八世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去勘察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这个小分队得到内部消息，找到了一条地下通道和城墙上一个可攀爬的地点。因此，趁着鲍德温二世在城市另一头的宫殿内酣睡，一队人马已经悄悄溜进城内，将吃惊的守卫从城墙上扔了下去，打开了城门。变局太过突然和迅速，鲍德温二世匆忙逃到一艘威尼斯商船上，连皇冠和权杖都没来得及带走。当威尼斯舰队匆匆赶回金角湾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整个殖民地都着了火，他们的家人和同胞拥挤在海边，就像被烟熏出巢的蜜蜂，伸长了手臂挥舞着求救。大约3000人被救走。世代居住在城里的难民们目睹着他们的生计和财富在海边被付之一炬，大声呼喊着想向他们曾经的家园道别。在严重超载的船只到达内格罗蓬特之前，船上的很多人已经死于缺水或饥饿。消息传回威尼斯时，人们既吃惊又沮丧。威尼斯已经支撑拉丁帝国五十年之久；这个损失在商业上是灾难性的，而可恶的对手突然拥有的优先权无疑让这次大祸的损失翻倍。热那亚人一步一步摧毁了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总部，并将其石料运回家乡作为战利品，为圣乔治建造了一座新的教堂以扬其威。国家间的这种嘲讽是很重要的。

海上连绵的消耗战持续了九年。威尼斯人虽然在正面交锋中取胜，但无法阻止热那亚海盗对自己商船队的骚扰掠夺。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使威尼斯感觉很挫败，并且骚扰无穷无尽、难以根除。威尼斯喜欢开展明确的、短暂和猛烈的战争，打完仗后迅速地回到生意照常的状态；对于一座依赖海洋的城市，泛滥的海盗行为非常危险，有足够的潜力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第一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背后有一个深刻的真理：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资源，通过传统的作战方法赢得海洋霸权，这个过程只会让双方精疲力竭。1270年，和平终于到来，但这样的和平更像是强加在不共戴天的一对仇家身上的暂时休战。战火重新燃起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然而在海上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想法却一直非常强烈：1284年，热那亚就是这样一劳永逸地将比萨打得一蹶不振。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决战仍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难以达成的目标。

1261年夏季，当威尼斯难民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颠簸的海面上回望他们熊熊燃烧的殖民地时，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君士坦丁堡了。共和国的宏图霸业和商业扩张似乎就要戛然而止了，它做好准备，去抵挡拜占庭和热那亚人的猛烈反击。热那亚商人急忙回到君士坦丁堡，接管了对手的地盘，并且开始探索在黑海开辟新商贸特许区。

然而，威尼斯人最恐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尽管米海尔八世在爱琴海投入了一大群私掠海盗，但威尼斯的势力根基雄厚，岿然不动。一些小的岛屿慢慢丢掉了。克里特、莫东—科罗尼和内格罗蓬特还牢牢地掌握在威尼斯人手中。热那亚人很快变得和之前的威尼斯人一样不受欢迎；拜占庭人又一次开始傲慢地谴责意大利商人的自负和贪婪。拜占庭人普遍认为意大利是“一块居住着极端傲慢和愚蠢的野蛮人的异国土地”。更糟糕的是，热那亚人企图在君士坦丁堡重建一个不同的拉丁帝国，不幸阴谋败露。这次轮到热那亚人被暂时流放了，之后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只能待在城外。热那亚人在金角湾对岸的郊区加拉塔得到了自己的聚居区；与此同时，在1268年，威尼斯人得以重返君士坦丁

堡，重新获得了交易权和平等进入黑海的权利。拜占庭将这两个惹是生非的共和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势力分隔开，从中挑拨离间，利用其中一方来打压另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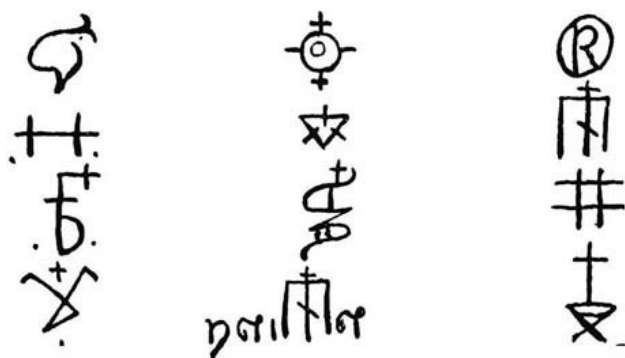
这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外交策略，但它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1261年拜占庭与热那亚人签订的《尼姆菲翁条约》将为一场灾难埋下伏笔。拜占庭公开承认自己需要意大利人的海军支持，允许热那亚人在加拉塔建立一个自治的、设防的居住地，并开放黑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于是将拜占庭的关键特权拱手让出，导致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日渐衰败。二十年后，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为了削减开支，干脆解散了拜占庭舰队。从这以后，威尼斯和热那亚在海上篡夺了拜占庭的领海、港口、海峡、粮食供给以及战略盟国。两个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加拉塔城墙下、黑海以及金角湾海岸进行，而拜占庭皇帝只能躲在城墙后眼睁睁地看着，或者被当作棋盘上的小卒，被拖进战争。两个航海共和国之间的敌意成了君士坦丁堡城内最大的隐患，一直延续到它作为基督教城市的最后一天；同时两国的冲突也使得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区另一支新兴力量的隐秘发展——突厥诸部落正在穿过小亚细亚大陆西进。

这座城市的赛马场上有一根非常有名的石柱，它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一千一百年前这座城市初创时树立的。即使在那时，这根石柱也算很古老。它曾屹立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中，被视为象征希腊自由的纪念碑，纪念前479年希腊人在普拉蒂亚击败波斯人的战役；传说它是由阵亡波斯人的盾牌铸造而成的。三条互相缠绕的巨蛇组成了纹理交错的石柱，其顶端是引人注目的蛇头，由抛光过的青铜精雕细琢而成。1261年以后，相互交织的巨蛇可能代表了纠缠而不是自由，拜占庭帝国的蛇头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绝望地交织在一起，从此以后，拜占庭再也不能独善其身。

在拜占庭帝国的水域和海岸展开的角逐有极高的风险。威尼斯和热那亚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到13世纪，欧洲处在一个漫长繁荣期的中段，意大利各航海共和国享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条件去从中获利。在古典时期和1200年之间，西方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万。到了1300年，仅仅在意大利就有九座城市的人口超过5万。巴黎的人口在一个世纪内从2万人膨胀到20万人；在1320年，佛罗伦萨有12万人，威尼斯有10万人，包括来自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移民。意大利北部的人口非常稠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直到1348年初的一个不祥的时刻，一艘来自黑海的不为人知的船停泊在圣马可湾，在彼特拉克的宅邸附近。一直到18世纪，人口始终没有超过上述数字。

意大利的中心城市，比如米兰、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不管如何榨取波河流域的农业资源，还是无法自给自足。就像古罗马一样，这些不断扩张的大城市的发展依赖从海外进口粮食。热那亚和威尼斯现在控制了粮食的供给。威尼斯土地稀少，完全依靠进口生存，对粮食供应有无人企及的深刻理解。它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座城市一样拥挤；到1300年，差不多所有的可用土地都已经被用于建设；岛屿之间由大桥连接。饥饿，和海洋的威胁一样，是始终存在的。威尼斯政府各种理事机构的档案显示出，他们对粮食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在国家的档案资料里，粮食的订单、价格、数量，供给的减少和增加虽然枯燥乏味，却至关重要。粮食关乎城市的安宁，而经过两次烘焙、可以长期保存的航海饼干是给商用桨帆船队和海军舰队提供能量的主要碳水化合物，没有它，国家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威尼斯有一个专门管理粮食的官衙（其他日常必需品也都有相应的管理部门），其活动受到严格监管，犹如国家安全的大事。粮食管理官衙每个月都要向执政官汇报城里粮食的储量，因为粮食需要精确控制（存粮量需要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如果储量太低，民众就会感到匮乏；如果储量太高，粮食的价格会下降，给公社造成损失）。1260年之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人口都不可避免地膨胀起来，它

们争夺粮食的战火一直蔓延到拜占庭世界的海域。在其他食品类商品方面——油、酒、盐、鱼，作为关键的中间商，威尼斯和热那亚有大好的机会盈利，家门口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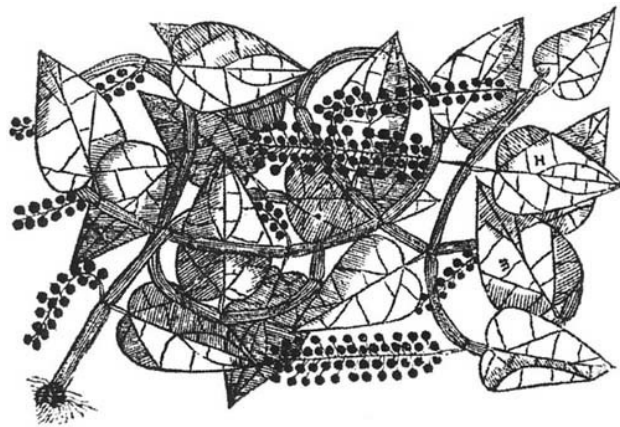


威尼斯商人用来标记商品的一些符号

粮食是一桩大生意，奢侈品则是另一门重要贸易。13世纪见证了一次商业革命，让永不满足的意大利商业城市稳定地积累起了财富。流通中的货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人们由实物支付转为现金支付；更多的人去投资而不是囤积货物；合法的贷款业务出现了；国际银行业务诞生了；信贷和汇票业务出现了；复式记账法和新形式的企业组织问世了。新型交易手段的发明促进了贸易规模的空前发展。尽管25%的城市人口在贫困中挣扎，各宫廷、教士和欧洲城市化过程中壮大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对远方的奢侈品以及相应的支付方式的需求。威尼斯人的生意不仅仅涉及日常必需品，也涉及奢侈性消费品。这种贸易的上游是比西方富裕得多、产出也更多的东方。

对香料的爱好最为确切地概括了消费主义的发展。香料对食物储存并无助益（只有盐有这个功能），但被中世纪的人们归类为香料的种类繁多的食品——胡椒、姜、小豆蔻、丁香、肉桂、糖以及其他数十种——能让菜肴更加美味可口，而且可以增添烹调的趣味，并展示财富。越过圣战的重重障碍，十字军东征让欧洲人品尝到了东方的精致食物。香料是世界贸易的第一种表现，也是其理想的商品。香料重量小，价值

高，体积小，几乎不会变质；它可以用骆驼和船只长途运输，可以用小袋重新包装，然后几乎可以无限期地贮存。在漫长供应链的最西端，地中海地区的各民族对于这些东西是在哪里以及如何生长一无所知——马可·波罗是第一个亲眼看到印度人培育胡椒，并留下记述的欧洲人——但他们清楚地知道，香料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岛上陆，所有香料贸易都必须经过穆斯林中间商。香料的运输路线可能随远东国家的兴衰而改变，但在13世纪，巴勒斯坦逐渐萎缩的十字军王国的港口是通往地中海的关键经销点。正因为此，威尼斯和热那亚在阿卡进行了异常激烈的竞争。热那亚人被逐出阿卡之后，热那亚商人将其商业殖民中心转向阿卡以北40英里以外的推罗。当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一个接一个地攻破十字军在巴勒斯坦的城堡时，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也同时在尼罗河三角洲和马穆鲁克王朝做生意。马穆鲁克王朝对十字军的反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个共和国的命运，也导致两国的竞争转入了新的方向。



胡椒

1291年4月，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阿什拉夫·哈利勒的雄壮大军兵临阿卡城下，他决心最终消灭伊斯兰土地上的异教徒。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艰苦圣战后，穆斯林带着杀光所有基督徒的坚定决心前来。阿什拉夫为此役做好了准备，从开罗带来一大批投石机和其他攻城武器，其中有两台巨型投石机，被命名为“凯旋”和“狂怒”，这对十字军来说可是阴

森森的名字；另外还有一组叫作“黑牛”的高效的小型投石机。阿卡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有4万人口，这些人来自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所有欧洲国家——法兰西人、英格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军事修会（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以及有商业头脑的威尼斯人和比萨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阿卡的常住居民。4月6日，投石机开始向高耸的中世纪城墙投掷巨大的石块，苏丹的工程师们也开始系统地在城墙下挖掘坑道，效率之高令人胆寒。在基督教内部众多派系数个世纪的争斗后，绝望给了他们勇气和凝聚力，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守城。

威尼斯人和比萨人作战都十分勇敢；他们建造和运用自己的投石机的效果很卓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时间的轰击使他们的防御工事逐渐损坏。停战协商的提议被不肯议和的苏丹回绝了。他记得前一年城里穆斯林商人遭屠杀的惨象，下令继续推进。5月18日，星期五，他发布了对受损的城市发动最后总攻的命令。伴随着箭矢在空中掠过的嗖嗖声、岩石的碎裂声、响彻云霄的鼓声和刺耳的喇叭声，马穆鲁克军队强行入城，开始屠杀市民。最后时刻的阿卡凄惨而肮脏。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几乎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阿卡所有的妇女儿童，年长的和年轻的，富有的和贫穷的，挤满了港口，而穆斯林士兵踏着被毫无区分地屠戮的死人，稳步逼近。在海边，文明的秩序崩塌了。威尼斯商人呈上黄金，请求一条生路，但是没有足够的船带他们逃离。超载的划艇倾覆沉没，船上的人全部溺死；强者控制了船只，向哀求救命的居民索要赎金。无情的加泰罗尼亚冒险家罗杰·德·弗洛尔控制了一艘圣殿骑士团的桨帆船，从城市里的贵妇那里敲诈宝石、珍珠和大袋黄金，一天暴富。而那些付不起钱的人只能在海岸边等死，或者沦为奴隶。阿卡沦陷后，苏丹有条不紊地将它变为废墟。剩下的基督教据点——推罗、西顿、贝鲁特和海法都接二连三地被攻破或投降。穆斯林烧毁了整个海岸地区，以防止基督徒返回。他们将这些城市夷为平地。十字军在圣地的据点维持了两个世纪，现在终于被连根拔起。

对基督教欧洲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计划重新组织十字军，并开始互相谩骂指责。罗马教皇深知，是谁为马穆鲁克王朝提供了军事物资。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中始终处于一个暧昧的位置。当“凯旋”和“愤怒”向阿卡的城墙投掷巨石时，意大利商人正忙着在亚历山大港购买丝绸、香料、亚麻和棉花，并出售意大利新型织布机加工好的羊毛商品、来自俄罗斯草原的皮草，以及其他更有争议、直接影响战争进程的商品。铁和木材是军事原料，阿什拉夫的巨型投石机可能是用基督徒船只装运的木料建造的；令教皇感到更加不安的是，冲破阿卡城门的许多穆斯林军人是奴隶兵，原本是基督徒船只从黑海运来卖给伊斯兰世界的。1302年，教皇博尼法斯八世颁令禁止与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马穆鲁克王朝开展商业活动，这个法令逐步挤压着各个航海共和国。某些特定的商品是被明确禁止交易的，违者将被逐出教会。一些军事物资的贸易还在非法地进行；单纯商业上的香料和布料交易当然在继续，然而教皇也越来越强硬。人们越来越迫切地感到，需要绕开伊斯兰世界，去获取原产自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奢侈品，如香料、珍珠和加工过的丝绸等。为了应对新局势，一些雄心勃勃的热那亚人武装了两艘桨帆船，向大西洋航行而去，这就发生在阿卡陷落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条绕过阿拉伯中间商（和威尼斯人）的路线，直接从印度获取香料。这次冒险比后世成功的探索早了两百年；他们从此杳无音信。但在地中海盆地内，阿卡的陷落重新调整了热那亚和威尼斯竞争的压力，使得双方的战场发生了转移。自此以后，战场转移到北方，变为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的争夺。

[1] Kedar, Benjamin,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1976, p. 9

[2] Kedar, Benjamin,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1976, p. 10

[3] Epstein, Steven, A., *Genoa and the Genoese, 958-1528*, Chapel Hill,

1996, p. 166

[4] Canal, Martino da, *Les Estoires de Venue*, Florence, 1972, p. 165

[5] Canal, Martino da, *Les Estoires de Venue*, Florence, 1972, pp. 166-7

[6] Canal, Martino da, *Les Estoires de Venue*, Florence, 1972, p. 171

[7] Canal, Martino da, *Les Estoires de Venue*, Florence, 1972, p. 173

[8] Canal, Martino da, *Les Estoires de Venue*, Florence, 1972, p. 173

[9] 圣乔治是热那亚共和国的主保圣人。有意思的是，英格兰的主保圣人也是圣乔治。因此热那亚和英格兰的旗帜都是圣乔治的白底红十字旗。

[10] Canal, Martino da, *Les Estoires de Venue*, Florence, 1972, p. 173

[11] Canal, Martino da, *Les Estoires de Venue*, Florence, 1972, p. 175

[12] Fenlon, Iain, *Piazza San Marco*, Boston, 2009, p. 53

10.“在敌人的血盆大口中”

1291～1348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水道之一，长17英里，连接地中海和黑海。这条狭窄的海上走廊在高耸的群山之间蜿蜒，形成于最后一个冰川时代，当时被陆地封堵的黑海冲破了大自然的限制。这条海峡被特殊的水文力量控制着。强有力的水流推动着含盐量较低的黑海水以每小时5海里的速度南下，而在海面以下40米的地方，有一股方向相反的激流，推动密度更大、含盐量更高的海水北上，流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因此，尽管海面上的水流是南下的，撒下网的渔船可能被拖向北方。在鱼类繁殖的夏末，数以百万计的鱼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北迁徙。鱼如此之多，按照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说法，在金角湾的人可以徒手捕捉到鲑鱼和大鲱鱼，或者不慌不忙地从海边房屋的窗户里撒网捕鱼。博斯普鲁斯的冬天是雾和雪的世界；冰冷的风从俄罗斯大草原吹来；偶尔出现的冰山撞击着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正如后来的法兰西旅行家皮埃尔·吉勒^[1]指出的那样，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是这座城市存在的理由——“（博斯普鲁斯海峡）用一把钥匙开启和封闭两个世界、两片大海。”^[2]13世纪末，由于阿卡的丧失和尼罗河三角洲露天市场的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了热那亚和威尼斯角逐的中心，它开启的便是第二个世界，即黑海。

古希腊人说黑海令人愉悦，希望借此安抚它激烈的狂风和阴险的深渊，但黑海有一颗黑暗的心。在海面以下200米的区域，海水突然一片死寂。这里的深海封锁着世界上最大的有毒硫化氢聚集物，一点氧气也没有。因为是死水，木头得以完好地保存。海床上遍布着数千年间无数次海难留下的鬼魂般的沉船，船体尚未腐烂，但锚、钉子、武器、铁链等铁制品已经被有毒的海水吞噬干净。威尼斯人称它为“更伟大的海”，

十分惧怕它。爱琴海的中心有可供落脚的岛屿、为航船提供躲避风暴的锚地，而黑海的中心是一片空白。因此，大多数海运都倾向于慢慢沿着黑海的边缘行进，或者从它最狭窄的地方快速通过。

黑海的开阔海域是一块不毛之地，但它的北岸却是惊人的沿海大陆架，在那里，四个大型河口三角洲将数百万吨富含营养的沉淀物送入大海。一直到现代，在多瑙河的河口，鸟类栖息的芦苇湿地和沼泽中仍然富含海洋生物。鲑鱼和尺寸有小型鲸鱼那么大的鲟鱼到此地产卵。近海的浅滩中鱼类资源丰富，包括鳀鱼、鲱鱼、牙鳕和大菱鲆。多瑙河、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和顿河的鱼群大量繁衍于黑海东北角的支流亚速海，养育了君士坦丁堡人上千年。鱼子酱是穷人的食物，而迁徙洄游的鲑鱼对于拜占庭人民的生活十分重要，因此在拜占庭的钱币上有它的形象。在各个河口湾沿岸，人们用盐腌鱼、用烟熏鱼，将其装进桶里，之后用船运到西方，供养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世界最庞大的人口。15世纪，西班牙旅行家佩罗·塔富尔^[3]到达黑海，观察了鱼子酱打包的情景：“他们把鱼卵装入桶里，然后输送到全世界。”^[4]在更北方，平坦的乌克兰大草原的黑土地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粮仓，同时也提供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对欧洲人来说，黑海沿岸是文明的边疆；其外广阔的大草原是野蛮游牧民族的领地。在那里，标记距离的只有古代斯基泰人^[5]的坟堆，坟墓里埋葬着陪葬的奴隶、女人、马匹和黄金。早期的旅游者在这里不仅会感受到永无休止的草原风的吹打和身体上的寒冷，精神上也会很不舒服。早期的草原旅行者鲁不鲁乞^[6]写道：“我现在到了一个新的世界。”^[7]两个世纪以后，佩罗·塔富尔对这里颇感失望。他发现这里“十分寒冷，船只被冻在港口内。这里的人充满兽性并且畸形，我欣然放弃了继续游览下去的欲望，回到了希腊”。^[8]

但就是在这里，在不祥的黑海边、背后是广阔草原的地方，希腊人

自迈锡尼文明时期就开始定居，并与游牧民做生意。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拜占庭都紧紧封闭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果没有黑海提供的粮食，君士坦丁堡将不能生存；意大利人被禁止进入黑海。1204年，君士坦丁堡遭到的洗劫打破了这种闭关状态。威尼斯人开始畅通无阻地探索“更伟大的海”。1206年，威尼斯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苏尔达亚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贸易站，开始与当地酋长们有贸易上的往来。起初，他们对草原居民的凶暴以及不稳定倍感失望，但就在同一年，在2000英里以外的东方，发生了一个改变世界贸易路线的事件。部族领袖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将“生活在毛毡帐篷中的人”，即蒙古大草原上彼此交战的各部落，凝聚成一支团结的力量，驰骋穿过欧亚大草原，去征服西方。仅仅三十年内，蒙古人以闪电战的形式从中国打到了匈牙利平原和巴勒斯坦边境。浩劫过后——数百万波斯农民死亡，巴格达以及幼发拉底河地区的伟大穆斯林城市惨遭洗劫，赫拉特^[9]、莫斯科和克拉科夫被烧毁——欧亚世界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和平。蒙古人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其国土从中国向西延伸5000英里；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开放；商埠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蒙古治下的和平环境里，旅行者可以横穿蓝色的地平线，而不需要畏惧土匪以及苛捐杂税。蒙古大汗们也急切希望与西方接触。从大约1260年开始，一条大道直通亚洲的心脏，为横贯大陆的贸易往来创造了新的契机。欧洲商人受到了无法抵御的诱惑，去绕过阿拉伯中间商，直接从遥远的东方获得奢侈品。

黑海是这些航线的西方终点。如果走陆路，骆驼商队从一个客栈走到另一个，缓慢地从中亚向西前进；如果走海路，爪哇和摩鹿加群岛^[10]的香料需要绕过印度，到达波斯湾，走陆路到达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或者继续西行到达地中海的拉加佐^[11]。以伏尔加河畔萨莱^[12]为都城的金帐汗国^[13]（蒙古人在西方的汗国）对黑海的小国君主们施加着和平的压力。突然间，一扇大门被打开了，并将敞开一个世纪之久。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欧洲商人通过这条道路前往东方。1260年，波罗家族的马费奥和尼科洛带着给萨莱的金帐汗国可汗的珠宝，从苏尔达亚出发

了；二十年后，马可·波罗将追随他们的足迹。由于阿卡的沦陷，以及教皇禁止与伊斯兰世界开展贸易，黑海取而代之，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是从波罗的海到中国的一系列长途贸易路线的轴心，同时也成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业竞争的焦点。这成为一个对中世纪欧洲既有利又有害的机遇。

热那亚迅速取得了优势。1261年，拉丁帝国灭亡后，热那亚人获准进入黑海。威尼斯则被排挤在外。热那亚积极地进入新的区域，在黑海沿岸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定居点。他们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设立了大本营，这提供了与金帐汗国可汗进行密切联系的机会。热那亚人很快控制了多瑙河河口的粮食贸易；他们与希腊小国特拉布宗达成协议，经由那里，从陆路直接到达重要的蒙古市场——大不里士^[14]。热那亚的位置十分理想：它的安全基地设在与君士坦丁堡只有金角湾一水之隔的加拉塔，凭借这个优势，它奋力获得商业垄断。突然之间，威尼斯也开始迎头追赶。威尼斯人十分渴望黑海地区的粮食，开始努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1291年阿卡沦陷，教皇禁止与伊斯兰地区开展贸易，于是这场游戏的赌注加大了；1324年，教皇实施了更为严苛的彻底禁令，赌注再次翻倍。在五十年间——从13世纪90年代到1345年——黑海的市场成了全世界的货栈。两个共和国都马上意识到，赌注到底是什么。热那亚致力于维持它的商业垄断，威尼斯则在寻找机会进入游戏。

随着其地区机会的减少，黑海地区的商业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微不足道的事件，比如两支彼此是竞争对手的武装商船队不凑巧的相遇、一句辱骂、一次海上斗殴或鄙夷对方、提出经济要求的外交信函，就足以引发冲突。第二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于1294年爆发，持续了五年，并且和第一次战争的战局完全相反。在这次战争中，热那亚虽然赢得了正面交锋的海战，但商业上遭受了十分沉重的打击。这次交战包括随机性强、混乱而机会主义的海盗劫掠行动，波及两国进行商业竞争的所有地区，从北非一直蔓延到黑海。双方都去攻击对手的商业资产。热那亚洗

劫了克里特岛上的干尼亚；威尼斯烧毁了在法马古斯塔^[15]和突尼斯的热那亚船只。在君士坦丁堡，热那亚人把威尼斯的市政官扔出窗外，大量屠杀威尼斯商人，一位同时代人记录道：“大家不得不到处开挖极深的巨大壕沟来埋葬死尸”。^[16]当消息传回威尼斯，人们呼喊道：“血战到底！”威尼斯政府派遣鲁杰罗·莫罗西尼（他的绰号令人胆寒，叫作“残酷之爪”）率领一支舰队攻击热那亚的殖民地加拉塔。加拉塔的居民害怕地躲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后，把拜占庭人拖进了战争。一支威尼斯舰队驶入黑海，洗劫了卡法，但是由于停留太久，被冰雪困住，动弹不得。一支热那亚的小型舰队一直杀到威尼斯的潟湖，攻击了马拉莫科镇；威尼斯私掠海盗多梅尼科·斯基亚沃进军热那亚港口，据说他在热那亚城的防波堤上铸造了金杜卡特，作为对热那亚人的侮辱。这场战争已经超越了战术上的理智，参战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教皇尝试加以仲裁，甚至提出自掏腰包支付威尼斯要求热那亚偿付的一半费用，然而威尼斯人已经丧失理智，拒绝了教皇。

双方都有能力承担巨大的成本，派遣强大的舰队。1295年，热那亚派出了165艘桨帆船和3.5万人，这是一场虽然宏伟壮观但没有实际意义的作秀。要到三百年后，地中海上才将再次出现如此雄壮的海军力量，但是威尼斯人选择避其锋芒，于是这支庞大舰队不得不溜回家乡。1298年，双方最终在亚得里亚海的库尔佐拉岛相遇，170艘桨帆船参加了这场战役。这是两个共和国打过的最大规模的海战。这一次，热那亚大获全胜：威尼斯的95艘桨帆船仅存12艘，5000人被俘。威尼斯海军司令安德烈亚·丹多洛不愿被俘受辱、披枷带锁地在热那亚游街，于是一头撞向一艘热那亚船只的舷缘，当场死亡。然而，这也是一场没有价值的胜利。许多热那亚人战死在库尔佐拉岛，因此凯旋的海军司令兰巴·多里亚踏上热那亚的海岸时，迎接他的是沉默——没有欢呼的人群，没有教堂的钟声。人们只是悼念战死的亲人。而威尼斯人得到了身后名。在被押到热那亚的威尼斯俘虏中，有一位富有的商人，他自费装备了一艘桨帆船。威尼斯人讥讽他为“百万”，即一百万个故事的讲述者。身为富

人，他被舒适地安顿下来，与另外一个同为战俘的罗曼司作家——比萨的鲁斯蒂谦成了好朋友。当马可·波罗开始讲故事时，鲁斯蒂谦发现了一个商机，因此拿起笔，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马可·波罗有足够的时间讲述自己通过蒙古的大道到达中国的经历。遥远东方的黄金、香料、丝绸、风俗，以及所有夸张离奇的故事，让欧洲人非常着迷。

库尔佐拉之战一年之后，双方不情愿地来到谈判桌前。1299年的《米兰和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黑海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黑海沿岸寻找粮食和原材料，以及中亚的贸易路线的问题，使得非正式战争愈发激烈。威尼斯人不辞劳苦地建造自己的据点；热那亚人努力将其挤走。凭借外交手段和过人的耐心，威尼斯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在克里米亚半岛，两个共和国隔着40英里，遥相对峙；威尼斯人在苏尔达亚，而热那亚人占据着更强大的商业中心——卡法。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热那亚人对卡法有绝对的控制权；这座城市固若金汤，港口壮丽，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7]形容这里的港口时说：“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港口之一，大约可以容纳大大小小两百艘战船或商船。”^[18]热那亚人努力遏制威尼斯人在苏尔达亚的崛起。1326年，苏尔达亚被不受蒙古人控制的当地鞑靼贵族洗劫一空，于是被放弃了。在黑海南岸，两个共和国在特拉布宗的竞争更加直接，这里是通往东方的第二条路线（从这里经由陆路到达波斯湾和大不里士）的西端。在这里，和阿卡一样，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得到这个小国的希腊皇帝的允许，各自占有设防的聚居区，互相毗邻，抱着深仇大恨，虎视眈眈。

威尼斯致力于增加对黑海北岸的压力。1332年，威尼斯大使尼科洛·朱斯蒂尼安旅行穿过冬季的草原，到达位于萨莱的蒙古宫廷，求见金帐汗国的可汗。觐见蒙古霸主是一件令人心惊胆寒的事情：威尼斯国家档案中悲伤地记录道，很少有人自告奋勇承担这一使命。可汗信仰伊斯兰教，伊本·白图泰称他为“尊贵的苏丹，穆罕默德·月即别汗”^{[19][20]}：

他极其强大，威仪非凡，地位崇高，是战胜真主之敌的胜者……他拥

有广阔的土地和伟大的城市……（他接见宾客）在一座叫作金殿的装饰宏伟的亭阁里……它用覆盖金箔的木材建造，亭阁的中心摆着一张镀银包裹的椅子，椅子腿用纯银打造，椅脚镶有珍贵的宝石。苏丹就坐在这王座之上。

在可汗面前鞠躬后，朱斯蒂尼安提出了他的请求。他此行的目的是请求可汗允许威尼斯在亚速海（亚速海是黑海东北角的一个很小且水很浅的海域，形状仿佛黑海的微型复制品）边的塔纳建立一个贸易殖民地，并请求授予该殖民地一些商业特权。



塔纳和亚速海，后世的印刷图

在这里，顿河经由一个宽阔的三角洲湿地流入大海。威尼斯希望以此为基地，有效地参与同俄罗斯和东方的贸易。塔纳的地理位置很优越，正好位于蒙古西方汗国的核心位置，可以很方便地向北去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或走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航线，并且它也是横跨亚洲的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从塔纳到中国的道路都十分安全，”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佩戈洛蒂在几年之后撰写的经商手册中向读者做了这样的保证。^[21] 蒙古人对于和西方人通商并非没有兴趣，因此大汗同意了朱斯蒂尼安的请求。1333年是猴年^[22]，可汗授予威尼斯人河边湿地的一块地皮，允许他们建造石头房子、一座教堂、仓库以及围栏。

在很多方面，塔纳的地理位置都比热那亚人的强大据点卡法（在克里米亚半岛的突出海岬上，位于塔纳以西250英里处）更优越。热那亚也在塔纳占据了一块地盘，但是仅仅把它作为强大的商贸中心卡法的辅助设施。热那亚绝不想看到威尼斯人在这里建立据点。威尼斯人在利用这次新的机会时，也有独特的优势。亚速海的地形对威尼斯人来说很熟悉——一个大河入海形成的湖，平均深度8米，其水道以及隐藏的浅滩使航行十分困难；对于居住在潟湖的威尼斯人来说，他们的吃水较浅的桨帆船要比吃水更深的热那亚船更容易进入塔纳。据佛罗伦萨编年史家马泰奥·维拉尼记载：“热那亚人的桨帆船很难像进入卡法的贸易点一样进入塔纳，而经由陆路在卡法获得香料和其他商品，比在塔纳要昂贵并且困难许多。”^[23]从一开始，塔纳就是热那亚人的肉中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私有垄断区的侵犯。把威尼斯人从“更伟大的海”的北岸驱逐出去，成了热那亚的一项大政方针。“禁止前往塔纳”是他们外交政策的箴言。^[24]威尼斯的回应也非常强硬。根据条约，黑海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他们决定按照1350年执政官所宣称的那样，“以最高的热情、全部的力量，维护进入黑海的自由”。^[25]这种利益冲突将会引发两场新的血腥战争。

在塔纳，威尼斯的一小群骨干商人安顿下来，经营跨越俄罗斯草原的内陆贸易，以及与远东地区进行的奢侈品交易。马可·波罗前往太平洋沿岸的漫长旅途花了十五年，他有资格看不起黑海，觉得它近得仿佛就在威尼斯门口。“我们没有和你们说过黑海，或者它周围的地区，尽管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探索，”他写道，“重复别人每天说的话是索然无味的。因为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探索这片海域，在这里航行——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比萨人——每个人都知道，在这里会发现什么。”^[26]但对常驻塔纳的威尼斯领事和商人们而言，这里是威尼斯世界的最外层边缘。它犹如一个流放之地。有文化的威尼斯人在一个又一个冬天看着冲积而成的海洋结上了冰，便穿上白鼬皮衣，眯着眼看着狂风从千里之外裹挟而来的暴雪，心里可能会思念远方威尼斯的万家灯火在

运河里的倒影。

从威尼斯海洋帝国之外传来的商业报告中，丝丝乡愁流露在字里行间。大型商船队每年春天从母城威尼斯出发，抵达塔纳，在此做短暂停留后，又消失在大海上，这个往返旅程需要三个月。塔纳的居民留在广阔的草原，每天看着自己的定居点之外游牧民的漫长队伍从地平线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正如商人吉奥索法特·巴尔巴罗记载的：

首先是（数以百计的）马群。其后紧跟着一群骆驼和牛，在它们之后又是一群小牲口。游牧队伍走了六天才全部通过。在我们视野所及的地方，到处是人，后面跟着牲口……到了晚上，我们已经看得厌倦了。^[27]

威尼斯在国外土地建立起来的通商站点都长期缺乏安全感。他们必须小心地制定外交政策或者赠送奢华的礼物，来安抚当地统治者的心血来潮，或者在当地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修建壁垒保护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塔纳那样依赖当地人的善意。热那亚在卡法的定居点是一座被双层高墙环绕的要塞，而威尼斯的塔纳在最初岁月里除了薄弱的木栅栏以外，没有任何防御工事。它依靠的是金帐汗国的稳定。威尼斯元老院认为塔纳处于岌岌可危的位置，“在世界的极限边缘，在敌人的血盆大口中”。^[28]因此，威尼斯人如履薄冰。他们在塔纳的定居点离讨厌的热那亚人很近；他们的团体非常小，而且一连几个月被困在定居点内，以至于威尼斯破例授予其他欧洲商人威尼斯公民的身份。但在威尼斯本土，塔纳被构想得很生动。国家兵工厂内的制绳厂使用黑海的大麻纤维生产绳索，于是被命名为“塔纳”工厂。彼特拉克在安全的书斋内想象的也是塔纳，他观看船只起航奔向顿河河口，感受着这股强大的商业力量驱使着威尼斯人走向那偏远之地。

驱动他们如此卖命的是可能得到的回报，也就是那种令学者彼特拉克十分困惑的“对财富贪得无厌的渴望”。^[29]在塔纳，威尼斯人既可以获取来自远东的量轻便携、价值高的奢侈品，也可以得到来自内陆草原的

大宗商品和食品：来自中国和里海的宝石与丝绸；来自俄罗斯森林的动物毛皮、香甜的蜜蜡和蜂蜜；来自亚速海的木材、食盐、粮食和各式各样的鱼干或咸鱼。作为回报，他们运回发展中的欧洲工业国家的制成品：意大利、法兰西和布鲁日的加工过的羊毛制品；德意志的武器和铁器；波罗的海的琥珀和葡萄酒。在隔海相望的特拉布宗，他们可以获取原材料——铜和铝，来自红海的珍珠，从东印度群岛进口的姜、胡椒和肉桂。在所有这些交易中，贸易逆差极大——亚洲能够卖出的商品比中世纪欧洲羽翼初生的工业能够提供的要多很多。因此欧洲人不得不用98%的纯银条支付；欧洲储备的大量白银流入了亚洲的中心地带。

威尼斯商人还开始经营另一种高利润的商品，尽管威尼斯在这方面的贸易总是被热那亚超越。卡法和塔纳都是活跃的奴隶贸易中心。蒙古人扫荡内陆，掳掠“俄罗斯人、明格列尔人^[30]、高加索人、切尔卡西亚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基督教世界的其他民族”。^[31]不同族群的质量被仔细地区分开来，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如果买卖鞑靼人（蒙古人明令禁止贩卖鞑靼人，这种事情造成了许多麻烦），“价钱要高出三分之一，因为完全可以确定，鞑靼人非常忠诚，不会背叛主人”；马可·波罗就带回了一名鞑靼奴隶。^[32]一般来说，奴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买卖：男孩十几岁就会被贩卖（可以榨取最多的劳动力），女孩被贩卖时年纪要大一点。一些奴隶被运回威尼斯，成为家仆或性奴，另外一些被运到克里特的奴隶种植园。时至今日，克里特岛上一些村庄的名字，例如“奴隶村”和“俄罗斯村”仍然记录着这种贸易的起源和传统。或者，威尼斯人不顾教皇的明令禁止，开展非法贸易，将奴隶卖给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伊斯兰军队当兵。克里特岛上的干地亚就是这种秘密贸易的一个中心，“商品”的最终目的地通常是秘密的。来自黑海地区的绝大多数奴隶在名义上是基督徒。

佩德罗·塔富尔记录了15世纪奴隶市场上的景象：

买卖是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的。卖家让奴隶不管男女都脱光衣服，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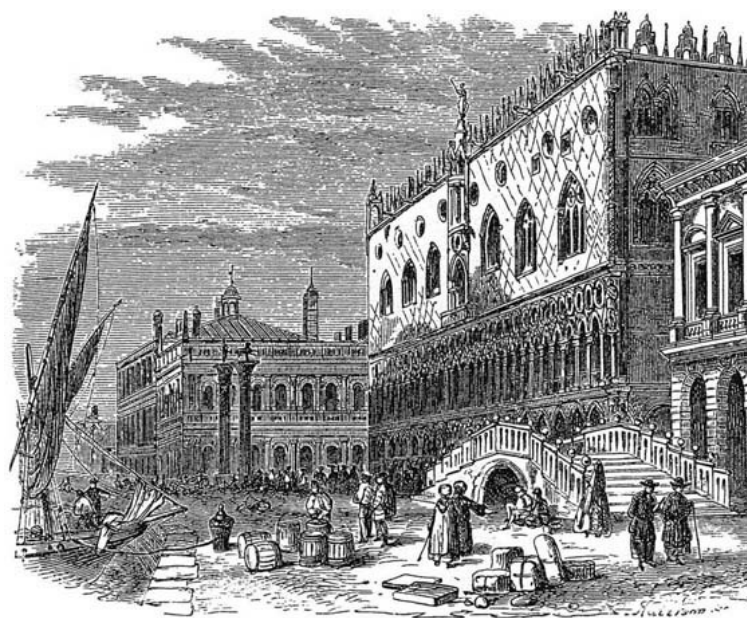
们披上毛毡斗篷，标出价钱。之后，卖家扔掉奴隶们的斗篷，让他们走来走去，以证明他们没有生理缺陷。卖家必须保证，如果奴隶在六十天内死于疫病，就归还支付的价款。^[33]

有时父母竟出卖自己的孩子，塔富尔对此颇感愤怒，但他也买了“两名女奴和一名男奴，他们还在科尔多瓦侍奉我，他们还有了孩子”。^[34]尽管奴隶只占黑海贸易额的一小部分，但也存在整船进行人口买卖的现象，可以比拟日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情形。

对于威尼斯共和国，塔纳有重要意义。“从塔纳和更伟大的海，”一部威尼斯史料写道，“我们的商人赚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利润，因为这里是所有货物的源泉。”^[35]一时间，威尼斯商人几乎可以垄断与中国的贸易。塔纳商队的运作和4000英里之外从伦敦和佛兰德返回的商船队的运作节奏精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商船队可以将波罗的海的琥珀和佛兰德的布料运到黑海，然后为威尼斯冬季市场带来稀缺的东方货物。来自东方的异国产品提高了威尼斯的声誉，将它塑造成一个可以买到任何商品的世界市场。外国商人大量涌入威尼斯，这种局面至少持续了一百年，其中德意志人居多，他们带来金属——银、铜——以及成衣，以换取这些东方货物。

在13和14世纪长期繁荣的过程中，威尼斯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到1300年，所有独立的小岛都由桥梁连接起来，成为一座清晰可见的城市，城里人口稠密。原先是泥土地面的街道和广场逐渐被铺砌上石子；岩石取代木材，成为主要建材。一条铺着鹅卵石的道路连接起威尼斯的权力核心——里亚尔托和圣马可广场。越来越富裕的贵族阶层沿着大运河建造起惊人的哥特式宫殿，并采用了旅行商人在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接触到的伊斯兰装饰元素。新的教堂拔地而起，它们的砖砌钟楼装点着地平线。1325年，国家兵工厂得到扩建，以满足海上贸易与国防的日渐增长的需求。十五年后，威尼斯人开始着手将执政官宫殿改建为威尼斯哥特建筑的杰作。这是一座精美的建筑，用窗花格的交织线条进行装

饰，其美丽与轻盈仿佛展示着威尼斯国家的宁静、优雅、明智与稳定。在圣马可教堂的正面，拜占庭式的普通砖块被丰富而充满奇思妙想的大理石和镶嵌画取代，其中利用了从君士坦丁堡和东方掠夺来的材料，顶部用圆顶和东方元素装饰，令观看者几乎以为自己身处开罗和巴格达。大约在1260年，人们用绞盘把君士坦丁堡赛马场的骏马像拉到这儿的凉廊，宣示着这座城市新生的自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威尼斯开始变得令人心醉神迷。



威尼斯的哥特式建筑：执政官宫殿

与此同时，在黑海地区，塔纳的威尼斯人开始逐渐领先于卡法的热那亚人。国家档案的记载表明了政府对塔纳商埠的密切关注。1333年，设立一个殖民地的请求被批准后，威尼斯政府立刻派去了一名领事，此人“被允许经商”——这是政府的一个不寻常的让步——“并有一名律师、四名仆人和四匹马为他服务”。^[36]1340年，他被派去寻找其他居住地，原因是目前距离热那亚人太近，经常发生冲突；为了这个目的，威尼斯政府派遣大使去请求月即别可汗。后来，这位领事被禁止经商，作为补偿，他的薪水增加了。威尼斯商人的举动往往会引起担忧。1343年

夏天，“很多威尼斯商人以欺骗手段逃避可汗征收的赋税。这给殖民地带来了风险。因此，从此以后，领事必须坚持要求所有的商人发誓守法纳税”。^[37]然后，精心准备的礼物被送给可汗。后来，政府给领事的一封信件写道：“威尼斯人必须停止对外国商人的商品征税，因为这样会激怒鞑靼政府，最后危害威尼斯人的利益。”^[38]蒙古人的宽容可能一瞬间就会变成仇外，这让威尼斯本土的当权者很担忧。

尽管威尼斯元老院小心地维护，塔纳脆弱的平衡还是崩塌了。1341年，月即别可汗去世了。他在位长达三十一年，是蒙古汗国最长也最稳定的统治时期。威尼斯迅速分析了当前的危险：“月即别可汗的去世使塔纳的商埠处境十分艰难；领事将会挑选十二名商人，仔细分析新形势，并向新可汗致以敬意。”^[39]由于一位商人毫无纪律性的莽撞，威尼斯政府堪称典范的外交政策马上就瓦解了，这样的情况在威尼斯商业据点经常发生。在有限的空间里，爱争吵的老对手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又展开了争斗，其间有人员死亡，这惹恼了当地的鞑靼管理者，毕竟他们无法区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偷税漏税、进贡的礼物不足、不守规矩的外国人的傲慢。1343年9月，威尼斯人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因为他们全副武装的桨帆船舰队驶入了顿河河口。一起个人的争执引发了暴力冲突。哈只·奥马尔是当地一个有地位的鞑靼人，在纠纷中打了一个叫作安德廖洛·奇夫兰诺的威尼斯人。奇夫兰诺蓄意进行了报复：他在夜间伏击了哈只·奥马尔，将他及其多位家人杀害。威尼斯社区惊恐万状，做好准备，想把尸体送回去，并支付巨额赔偿金。首先，他们请求热那亚人在这次危机中与他们一致对外。但热那亚人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攻击并洗劫了鞑靼人，随后乘船撤走了，留下威尼斯人独自承担后果。在紧接着发生的暴力冲突中，六十个威尼斯人丧命。新即位的可汗札尼别袭击并洗劫了塔纳，毁坏了所有商品，抓了一些威尼斯商人作为人质。幸存者乘船逃到热那亚领地卡法，祈求庇护。至此，西欧与亚洲世界的联系都集中到了热那亚的这个要塞。

塔纳的危机仍在蔓延。如果说札尼别是被威尼斯人惹怒，那么他更讨厌卡法的热那亚人，因为卡法已经成了不受可汗控制的殖民地，随意对其他国家的商人征税。札尼别决心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消灭所有意大利人。他率领大军进攻卡法。这使得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罕见地站在了同一战线。威尼斯人从热那亚人那里得到了免税的特权，于是双方在城市令人生畏的防御工事后面并肩作战。在1343年整个寒冷的冬季，蒙古军队轰击着城墙，但是热那亚有制海的优势。1344年2月，一支舰队解除了卡法遭受的围困。蒙古人撤退了，留下1.5万具尸骨。过了一年，札尼别又回来，下定决心要驱逐热那亚人。

两个互相竞争的共和国达成协议，在蒙古人领地内实施联合的贸易禁运。1344年，元老院禁止“与札尼别统治的所有区域，包括卡法在内，开展商业活动”。^[40]当局在里亚尔托的台阶上宣读了这道法令，以便所有人都确切地理解这个消息，违者将会面临巨额罚款，同时被没收一半货物。与此同时，在得到热那亚人同意后，他们派遣安抚大使返回萨莱，尝试解决危机，但只是徒劳。鞑靼人的回应是从城墙上射下的箭矢，以及投石机调整张力的咯吱声和轰鸣声。对卡法的围困一直持续到1346年。

到14世纪40年代，黑海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货栈。对卡法的持续围攻以及塔纳的毁灭，使得商业活动如同冬天海上的结冰一般停滞了。地中海盆地各个饥饿的城市都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在地中海东部出现了饥荒，拜占庭缺少小麦、盐和鱼；威尼斯也缺乏小麦，而且奢侈品价格疯涨：在全欧洲，丝绸和香料价格翻倍增长。这些影响使黑海显得更为重要，两个共和国在这里的竞争异常激烈。丰厚的利润回报使商人们可以承受在草原边缘进行贸易活动的千难万险。再加上教皇仍然禁止与马穆鲁克王朝通商，世界贸易几乎止步不前。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失去了向东方出口制成品的渠道。1344年，威尼斯人痛苦地向教皇提出请求：

如今……与塔纳和黑海的贸易完全丧失或被封闭了。我们的商人已经

习惯于从那些地区获得丰厚利润与财富，因为它是我们进口和出口货物的通道。如今，我们的商人不知何去何从，无法就业。[\[41\]](#)

教皇开始慢慢放松禁令，允许与埃及和叙利亚通商；这是将香料贸易慢慢转回地中海盆地的开端。

但卡法的攻防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城外的鞑靼人开始死去。仅有的当时的记载这样写道：

疾病将整个鞑靼军队击倒了。每天都有数千人死去……一旦他们身上出现了疾病的症状，他们马上就会死去，症状是腹股沟和腋窝内体液凝结，随后是腐臭的热病。所有的医疗建议和救助都是徒劳。鞑靼人在可怕灾难和致命疾病的打击下筋疲力尽、惊慌失措、士气涣散；他们意识到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将死尸装在投石机中，投掷到卡法城内，这样敌人就会被恐怖的恶臭消灭。成堆的尸首被投掷到城里，基督徒们没法躲藏、逃跑或避开这些死尸，他们尽量把尸体扔到海里。空气很快被污染了，饮用水也因腐烂的尸体而变得有毒。[\[42\]](#)

虽然这个事件不大可能是传播黑死病的唯一途径，但它很快就被商船传播到西方。1347年，在黑海航行的八艘热那亚船只中，只有四艘安全返回；其他船上的船员都死了，船也销声匿迹。12月，瘟疫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大约1348年1月，黑死病传到威尼斯，差不多同时，发生了一系列凶险的地震，震得教堂的钟不停地轰响，大运河的水也泛滥成灾。到3月，瘟疫席卷了整个威尼斯；5月，由于天气转热，疫情已经无法控制。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口比这里更稠密。它面临着一场灾难。根据威尼斯编年史家洛伦佐·德·莫纳西斯的记载，这场瘟疫的严重程度史无前例：

疫情十分猛烈，死尸遍布广场、门廊、墓地和所有神圣场所。夜间，许多尸体被埋在公共街道上，有的被埋在自家地板下；许多人没有做告解就死掉了；尸体在被抛弃的房子里腐烂……父亲、儿子、兄弟、邻居和朋友为保命互相抛弃……医生为了躲避疫病，不给任何人看病，逃离病人……同样的恐惧萦绕在神甫和教士的心头……关于这场危机，没有人能

理智地思考……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坟墓。[\[43\]](#)

必须由政府出资，将尸体运出城外，运输工具是特制的趸船，它可以在城市里行驶，将尸体从废弃的房屋里拖出来，将它们带到……城市之外的岛屿上，扔进长且宽的坑里堆积起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挖这些大坑。在趸船上和坑里的许多人尚有呼吸，后来死于窒息；同时，大多数划船的桨手也染上了瘟疫。珍贵的家具、金钱、黄金白银被留在废弃的屋子里，却没有贼去偷——死气沉沉的氛围或者说是恐惧，影响着每个人；一旦染上瘟疫，存活的时间不超过七小时；怀孕的女人也逃脱不了：许多孕妇的胎儿连同她们的内脏一起被排出体外。男人、女人、老人与青年遇上瘟疫都会丧命。一户有一人染上了瘟疫，全家将无一幸免。

整个1348年的夏天，悬挂着黑布的趸船缓慢地在充满恶臭的运河中行驶。可怕的哭号声响起：“死人！死人！”惩罚性的强制法令要求每户人家抬出自家的死尸。为了努力降低死亡率，政府颁布了非常措施。一个特别的卫生议事会被组织起来；有可能携带瘟疫的船只被烧毁；所有贸易活动暂停；葡萄酒销售被禁止；酒馆歇业；由于缺乏看守，犯人被释放出来。里亚尔托、码头、繁忙的运河此时全部沉寂下来。威尼斯陷入一片阴霾。在潟湖的偏远岛屿上，死尸被运往大坑埋掉。一层土，然后是一层死尸，然后又是一层土。“就像千层面一样”，一位佛罗伦萨作家作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比喻。[\[44\]](#)

瘟疫自行消退时，威尼斯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死亡；贵族家庭减少了五十户。不夸张地说，活人确实是在死人堆上行走。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毫无提防的渔民踏上潟湖深处某些荒岛时，还会踩到当年被匆忙掩埋的黑死病患者留下的白骨。黑死病彻底改变了威尼斯商人的精神面貌。在一百五十年间，威尼斯乘着欧洲繁荣的浪潮，财富增长，人口大增，以敢于冒险的乐观精神为标志的海上探险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

是，泛滥的物质主义、航线的扩张、穿越广阔地区的商业联系，不仅带回了丝绸、香料、象牙、珍珠、粮食和鱼，也从亚洲内陆带回了酿成瘟疫的芽孢杆菌。意大利的各航海共和国被指责为将瘟疫带到欧洲的罪魁祸首；瘟疫的后果则是他们的贪欲和罪孽遭到的神罚。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加布里埃莱·德·穆西斯想象了商人与上帝的对话，发出了指控：

“热那亚，招供你所犯下的罪行吧……威尼斯，托斯卡纳和整个意大利，说说你们都做了什么。”^[45]

“我们，热那亚和威尼斯，揭示了上帝的审判。不幸的是，我们航向自己的城市，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呜呼，我们随身携带着死亡的飞镖，当我们的亲人拥抱和亲吻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被迫从口中传播病毒。”

截至1350年底，作为黑海贸易的一个副产品，欧洲人口减少了大概一半。在地中海盆地的有些地方，死亡率可能高达75%。黑死病让整个大陆接受了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终结了过去中世纪公社的模式。威尼斯受物质主义驱使，这让彼特拉克很不舒服，但威尼斯成了多重新世界、新身份认同以及新思维模式的先驱。之后，意大利的重商主义思想渐渐衰退。财富和贸易的光明前景带上了淡淡的忧伤。“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确定，也没有什么比死亡来临的时刻更不确定”成了流行的说法。^[46]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规避风险，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害怕财富会突然消失；用一句老套的话说，海洋的财富使得人们越来越谨小慎微。从此以后，威尼斯一直密切关注着欧洲瘟疫的情况。

然而，对黑海的争夺仍在继续。双方都违反了贸易禁运的协定。1347年，威尼斯人公然破坏与热那亚的协定，从札尼别那里获得了在塔纳经商的新特权。热那亚的信条是“不允许任何船只航行到塔纳”，于是准备进行报复。热那亚骄傲地宣称：威尼斯人只有得到他们的许可，方能航行进入黑海。新的战争无法避免。双方都被新的战争差不多拖到了毁灭的边缘。

[1] 皮埃尔·吉勒（1490～1555），法国自然科学家、翻译家和测绘学家。他曾游历地中海和东方，1544～1547年曾在君士坦丁堡寻找古代手稿。

[2] Freely, John, *The Bosphorus*, Istanbul, 1993, p. 1

[3] 又名佩德罗·塔富尔（约1410～1484），西班牙旅行家和作家。他在1436～1439年间游历了欧亚非三大洲，到过摩洛哥、耶路撒冷、拜占庭、特拉布宗、埃及、罗得岛等地，并撰写了游记。

[4]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p. 135

[5] 斯基泰人，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4世纪在亚欧草原中部广袤地区活动的伊朗语族游牧民族，其居住地从今日俄罗斯平原一直到中国的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沙漠，是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善于养马，据信骑术与奶酪等皆出于其发明。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威胁西亚近七十年，其骑兵驰骋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大肆劫掠；其后逐渐衰落，分为众多部落。5世纪中期随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阿提拉王入侵欧洲，一度抵达巴黎近郊的阿兰人，即为其中之一部。斯基泰人没有文字，但善于冶金打造饰物，留下许多金器至今。

[6] 即吕布鲁克的威廉（约1220～约1293），佛兰德方济各会教士，1252年受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帝国，抵达哈拉和林，并见到蒙古大汗蒙哥。著有《鲁不鲁乞东游记》。他的游记和马可·波罗的游记，及其他西方人的一些著作，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

[7] Ascherson, Neal, *Black Sea*, London, 1995, p. 54

[8]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p. 137

[9] 赫拉特为中亚古城，在阿富汗西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11～13世纪发展成为中西亚的金属品制造业中心，尤以镶金银的铜器闻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10] 摩鹿加群岛位于今天印尼的苏拉威西岛东面、新几内亚西面以及帝汶北面，是马来群岛的组成部分。中国和欧洲传统上称为香料群岛者，多指这个群岛。

[11] 今土耳其城市尤穆尔塔勒克。

[12] 萨莱是波斯语，意思是“宫殿”，是金帐汗国首都，有新旧两个，旧萨莱又叫拔都萨莱，在阿斯特拉罕以北120公里处，新萨莱在旧萨莱以东85公里处，今天的伏尔加格勒附近。

[13] 即钦察汗国，1242～1502年，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建立于蒙古帝国西北部，后来突厥化，位于今天哈萨克咸海和里海周边，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至多瑙河），由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及其后裔统治，盛极一时，长期统治俄罗斯，后分裂为许多汗国。

[14] 在今天伊朗的西北部，中国古称桃里寺。

[15] 塞浦路斯岛上的港口城市。

[16]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458

[17] 伊本·白图泰（1304～1368/1369），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他曾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受过传统的伊斯兰法律和文学教育。1325年到麦加朝觐后，他决定尽可能地走访世界各地，而且发誓“不走回头路”。他用了二十七年时间漫游非洲、亚洲和欧洲各地，总旅程长达12万公里。在返回后，他口述撰写了回忆录《游记》，该书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著作之一。

[18] Ibn Battuta,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AD 1325-54*, trans H. A. R. Gibb, vol. 1, London, 1986, p. 147

[19] 穆罕默德·月即别（1282～1341），又译乌兹别克汗，是钦察汗国第九代汗王，也是钦察汗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1312～1341年在位）。乌孜别克/乌孜别克族即由他而得名。在他治下，钦察汗国完成伊斯兰化。

[20] Ibn Battuta,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AD 1325-54*, trans H. A. R. Gibb, vol. 1, London, 1986, p. 148

[21] Pegolotti, Francesco, *La practica della mercatura*, ed. Allan Evans, New York, 1970, p. 20

[22] 原文如此，按照中国历法，1333年是鸡年。

[23] Karpov, Sergei P., ‘Venezia e Genova: rivalita e collaborazione a Trebisonda e Tana. Secoli XIII-XV’, *Genova, Venezia, il Levante nei secoli XII—XIV*, ed. Gherardo Ortali and Dino Puncuk, Venice, 2001, p. 258

[24] Papacostea, Țerban, ‘Quod non iretur ad Tanam: un aspect fondamental de la politique génoise dans la Mer Noire au XIVe siècle’, *Revue des é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vol. 17, no. 2, 1979, p. 201

[25] Karpov, Sergei P., ‘Venezia e Genova: rivalita e collaborazione a Trebisonda e Tana. Secoli XIII-XV’, *Genova, Venezia, il Levante nei secoli XII—XIV*, ed. Gherardo Ortali and Dino Puncuk, Venice, 2001, p. 258

[26] Polo, Marco, *The Travels*, trans. Ronald Latham, London, 1958, p. 344

[27] King, Charles,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Oxford, 2005, p. 90

[28] Karpov, Sergei P., ‘Venezia e Genova: rivalita e collaborazione a Trebisonda e Tana. Secoli XIII-XV’, *Genova, Venezia, il Levante nei secoli XII—XIV*, ed. Gherardo Ortali and Dino Puncuk, Venice, 2001, p. 257

[29] Petrarca, Francesco, *Lettere seni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vol. 1, trans. Giuseppe Francassetti, Florence, 1869, p. 111

[30] 格鲁吉亚人的一支。

[31]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p. 133

[32]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p. 133

[33]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p. 133

[34]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p. 133

[35] Papacostea, Țerban, ‘Quod non iretur ad Tanam: un aspect fondamental de la politique génoise dans la Mer Noire au XIVe siècle’, *Revue des é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vol. 17, no. 2, 1979, p. 205

[36]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8

[37]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53

[3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171

[39]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49

[40]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54

[41] Martin, Lillian Ray, *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Venetian Ships and Boats*, London, 2001, p. 136

[42] De'Mussi, Gabriele, 'La peste dell, anno 1348', ed. and trans. A.G. Tononi, *Giornale Ligustico de Archeologia, Storia e Letteratura*, vol. 11, Genoa, 1884, p. 145

[43]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p. 314-5

[44] Spufford, Peter, *Power and Profit: the Merchant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2003, p. 292

[45] De'Mussi, Gabriele, 'La peste dell, anno 1348', ed. and trans. A.G. Tononi, *Giornale Ligustico de Archeologia, Storia e Letteratura*, vol. 11, Genoa, 1884, p. 146

[46] Kedar, Benjamin,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1976, p. 84

11.圣提多之旗

1348～1368

黑海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瘟疫没有起到任何缓解作用，只是削减了可用的人力资源和双方的海军实力。丧失三分之二人口不到一年之后，热那亚和威尼斯又一次兵戎相见。在此之后，他们的争夺目标又回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里是控制通往中亚市场通道的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再次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的海墙，此地是威尼斯航海冒险事业中一次又一次扮演了关键角色。

到14世纪40年代末，很显然，重建的拜占庭帝国始终未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创伤中恢复。拜占庭饱受内战困扰，无力抵挡土耳其人横穿安纳托利亚土地步步紧逼的骚扰，完全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海上边疆，因此君士坦丁堡对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掠夺厮杀毫无办法。这两个共和国操纵拜占庭内政，推举傀儡皇帝，支持城市内部权力斗争的不同派系。在这方面，热那亚更胜一筹。他们的贸易城镇加拉塔戒备森严，拥有自己的设防港口，距离君士坦丁堡仅一水之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他们扼住了希腊皇帝的咽喉。君士坦丁堡要获取黑海的小麦，完全依赖于热那亚船只，并且君士坦丁堡贸易的大部分已被加拉塔夺取。到1350年，加拉塔的海关税收入达到了君士坦丁堡的七倍。君士坦丁堡纪念柱上缠绕的蛇变成了寄生虫，威胁要毁灭寄主的身躯。君士坦丁堡无奈地发现自己已被卷入两个城市争夺商业霸主地位的战争。战争无情地推进到君士坦丁堡的门前。

热那亚的行动肆无忌惮。1348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攻击；次年，当拜占庭试图建立一支新舰队时，热那亚将其全歼于金角湾，他们大摇大摆地抢夺了小亚细亚沿岸的拜占庭战略基地；1350年，他们占

领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一座城堡，完全控制了进入黑海的通道。当热那亚在卡法扣押威尼斯船只的时候，两国的战争便无法避免了。

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于1350年开始，在大多数方面都与之前的两次没什么差别。这是一场混乱、覆盖面广、带着刻骨仇恨的海上战争，包含“打了就跑”的战术、海盗行为、对基地和海岛的掠夺袭扰，以及海上的正面交锋。这次战争与前面几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舰队的规模。黑死病严重破坏了两座城市的人力资源，水手遭受了尤其严重的影响。1294年，威尼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集结了约70艘桨帆船；而在1350年，它仅仅勉强凑齐了35艘桨帆船的桨手。普通公民对航海生活的态度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虽小但很重要的变化。瘟疫使幸存者生活富裕起来，他们继承了大量财富，劳动力的缺失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各阶层之间出现了分裂。在一代人之后，这种分裂在舰队事务中将变得更加富有戏剧性。普通海员开始觉得，他们和贵族指挥官承担的风险和享受的生活条件完全不同。每到征兵时，便有人抱怨，船长吃的是好面包，而桨手们只能食用难以消化的黍类。因此，很多被征召的人宁愿从希腊和达尔马提亚海岸雇用殖民地居民来代替自己服役。公民间的团结、纪律以及同甘共苦精神开始败落，并对威尼斯的海权带来了长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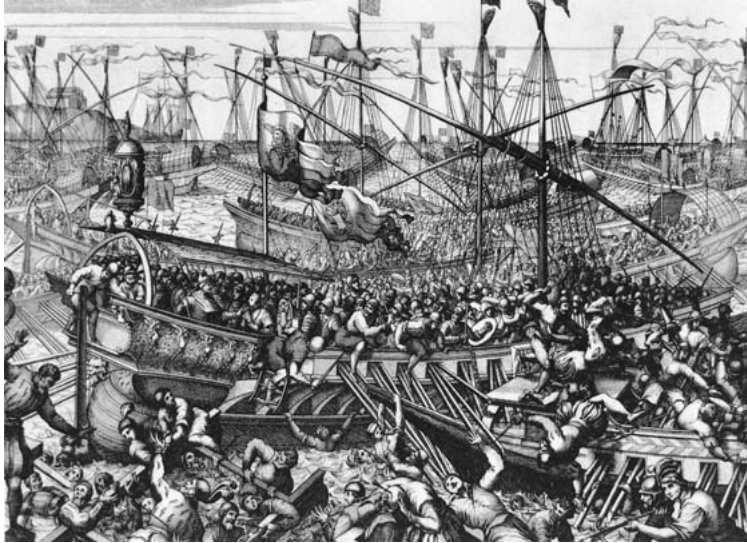
但是，虽然舰队的规模缩小了，两个城市间的竞争却变得更加惨烈。战端每一次再开，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便更加憎恨彼此。1352年，两个海上强国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进行了一场战役，它是威尼斯经历过的最险恶的战役之一，被世代铭记于心。

1351年，威尼斯与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签署协议，目的是将热那亚逐出博斯普鲁斯海峡，消除其对黑海的绝对控制。为了弥补缩小的舰队规模，威尼斯人得到了远在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的支持。阿拉贡国王有自己的理由去攻击热那亚人。他提供了30艘加泰罗尼亚^[1]桨帆船，其中有12艘是威尼斯自己出钱装备的。威尼斯舰队的指挥权落到了最有经验

的海军将领尼科洛·皮萨尼的手上。他和热那亚舰队的指挥官帕加尼诺·多里亚（一个航海贵族世家的后裔）可谓棋逢对手，两个家族的敌对将世代相传。最初几个月进行的是小规模交锋，在此期间，双方一直没有能够正面对垒。有一次，皮萨尼的舰队处于兵力劣势，被赶到了内格罗蓬特，他宁愿在港口凿沉自己的桨帆船，也不肯冒险出战。多里亚只得撤退，之后皮萨尼将自己的船只打捞起来，重新起航。

1352年初，威尼斯、拜占庭和加泰罗尼亚联合舰队终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堵住了他们的敌人。2月13日（星期一），双方舰队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准备战斗。一百五十年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形下，第四次十字军曾在这里向君士坦丁堡发动了第一次攻击。下午，两支舰队终于接近了，此时正值隆冬，冷得刺骨，狂风大作，海面被强劲的南风吹得波涛汹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激流与风向相反，掀起惊涛骇浪。

这种情形下很难驾驭船只。再过几个小时天就黑了。考虑到这些情况，皮萨尼认为推迟至明天再战是明智的做法，但加泰罗尼亚的舰队司令坚信他们可以轻松取胜。他手握利剑，宣布自己要出战，并下令吹响了进攻的号角。皮萨尼别无选择，只得跟随他前进。正当他们收起船锚时，风速陡增，海面上形成了一个个城堡那么高的波峰和令人头晕目眩的波谷。此时想要有序地攻击热那亚桨帆船，是绝对不可能的。多里亚将他的战船撤到一个有遮蔽的小海湾的入口处，而联军的战船被狂风吹得从热那亚船边飞速驶过，无法与其交战；于是他们又艰难地调转船头，桨手们拼命划桨，做第二次尝试。



桨帆船战争

现在，上百艘战船挤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仅1英里宽的狭窄地带。船只进进退退，双方均无法组织好战线，但都尝试接敌作战。海峡内挤满了船只，这些船一会儿相互碰撞，一会儿又被风力推上岸。与其说这是一场海战，倒不如说是一系列混乱的小规模厮杀——5艘、6艘或7艘船组成的小群体在狂风中盲目地相互攻击。夜幕突然降临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战斗场面变得更加混乱了。战士们甚至无法分清敌我。威尼斯战船上的士兵试图登上友军战船厮杀；热那亚人向自己一方的船只放箭；有人从船上落水；桨帆船的操舵装置失灵；战船碰撞时，船桨被砸碎；失去舵的船只顺着水流四处漂荡。一旦一艘船着了火，它便像火绒一样在狂风中熊熊燃烧，随后被狂风吹向黑暗的远方，只留下闪闪的火光。狂风，刺骨的寒气，木料破裂声，混乱的叫喊声，在甲板上蹒跚而行却仍拼命厮杀的战士，被骇人的疯狂驱使着：这看上去有如地狱。此时的战场上不再有任何战略或者控制可言。结果只能靠运气决定。纠缠在一起的船只撞向海岸；船员们跳上岸，继续互相攻击刺杀，因此在有的地方，海战变成了陆战。7艘加泰罗尼亚桨帆船上的海员逃跑了；希腊人也许更加明智，几乎没有参与战斗，直接退回了金角湾。战士们带着狂怒，奋战到死，他们所杀的同伴和敌人几乎一样多。

天破晓了，眼前的场景一片混乱。空船漂浮在水面上，或支离破碎地躺在岸边；海面上到处漂浮着死尸、桅杆和战斗产生的碎屑。没人能看出哪一方胜利了，于是双方都宣称自己得胜了。双方都伤亡惨重。从加拉塔来的方济各会修士试图安排一次俘虏交换。当他们拜访威尼斯舰队时，发现俘虏数量极少，于是他们决定不再回去，以免当热那亚人了解到自己的损失后会立即屠杀他们抓到的战俘。

但在此役之后，热那亚占了上风。威尼斯和加泰罗尼亚舰队撤退了，无力继续攻击加拉塔。而此时热那亚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奥尔汗那里得到了军事援助。拜占庭人只好和热那亚签署了和约，根据其条款，希腊船只未经热那亚许可不得进入黑海。此外，热那亚对加拉塔的所有权得到了确认，他们加强了加拉塔的防御，将其作为自己有主权的殖民地。拜占庭正被慢慢扼杀，不仅是被贪婪的航海共和国扼杀，还被正在步步紧逼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掐住了脖子。对威尼斯而言，此役的战略后果非常严重。他们从博斯普鲁斯战役中学到的是，若在通向黑海的路途上没有一个战略后备基地，他们将永远无法对远东贸易施加任何协调一致的压力。他们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小小的忒涅多斯岛，它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极具战略价值。

在热那亚也没有多少欢庆气氛。“这次胜利没有任何周年纪念活动，”热那亚编年史家写道，“执政官也没有按照惯例去教堂感谢上帝；或许，因为有很多英勇的热那亚战士在这场战役中牺牲，所以人们最好还是忘记那天的胜利。”^[2]

战争继续进行，向西推进。双方互有胜负，两个共和国的情绪也跌宕起伏，轮流从疯狂的喜悦转向绝望的边缘，就像是广袤大海上波浪的颠簸。随着舰队规模的缩小和人力资源的减少，海战失利的影响显得越发突出。皮萨尼和阿拉贡人在撒丁岛外歼灭了一支热那亚桨帆船舰队，这在热那亚城内引发了戏剧性的反应。人们在街上号啕大哭；热那亚的

财富和粮食来源被切断了，屈辱、饥饿和卑微的投降似乎就在眼前。公民们只能诉诸铤而走险的方法。他们自愿投降于威尼斯在陆地上的竞争对手——强大的米兰领主乔万尼·维斯孔蒂，把他当作保护盾。威尼斯唾手可得的胜利被夺走了。维斯孔蒂派遣彼特拉克（此时是维斯孔蒂宫廷的一名外交官）去向威尼斯人示好。运用他的全副文学技巧，彼特拉克阿谀奉承地呼吁“两个最强大的民族，两座最繁华的城市，意大利的两只眼睛”议和。^[3]他还指出，威尼斯人的过度自信可能会遭到惩罚：“幸运的骰子是暧昧不清的。如果一只眼睛熄灭了，那另外一只也必将变暗。要想针对这样一个敌人获取一场不流血的大胜，一定要小心，这或许预示着一种愚蠢和荒谬的自负！”

彼特拉克的警告被置之不理。威尼斯执政官安德烈亚·丹多洛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热那亚人的目的是夺取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我们的自由；他们恣意干涉我们的权益，迫使我们拿起武器反抗……我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必须开战，只有这样才可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这比我们的生命更加可贵。后会有期。^[4]

彼特拉克对这个商业共和国的粗鲁回答很是不满：“我的话，或者甚至是西塞罗的话，也没有一句能够传进顽固地封闭的耳朵，也无法触及固执的心。”^[5]他又一次警告骨肉相残的危险：“不要自欺欺人了，如果意大利解体了，那么威尼斯也将垮掉，因为威尼斯是意大利的一部分。”^[6]威尼斯不愿苟同，它认为自己和意大利大陆有本质区别，尽管此时它已经深深卷入大陆事务，只不过它自己不肯承认而已。

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幸运之骰的确开始倾向另一方，现在轮到威尼斯害怕了。热那亚人建造了一支新的舰队，多里亚在隆哥港（在萨皮恩扎岛上，靠近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莫东）大败皮萨尼。这是威尼斯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严重灾难。威尼斯损失了所有桨帆船。6000人，而

且是威尼斯的航海精英，惨遭俘虏，同时丢失了数额巨大的战利品。尼科洛·皮萨尼和他的儿子韦托尔以及一队水手逃到了莫东。皮萨尼被剥夺了一切公职，心灰意冷地度过了余生。韦托尔被无罪释放，但隆哥港战役的失败就像一个黑暗的污点，一直伴随着这个家族，并且在二十五年之后重新笼罩了威尼斯潟湖。执政官安德烈亚·丹多洛在这场灾难两个月前去世。彼特拉克被证明是正确的，他沾沾自喜地说：“他（安德烈亚·丹多洛）这样死了也好，不用看到自己的祖国蒙受如此屈辱，以及我一定会写给他的更严厉的信函。”^[7]

但与热那亚不同的是，军事失利在威尼斯并没有引发内乱，也没有发生宪法的崩溃，尽管在几个月后，丹多洛的继任者马里诺·法列罗政变未遂被处死。1355年6月，米兰公爵强行要求两个互相厮杀的共和国缔结和约，这让威尼斯松了一口气，却使热那亚大怒。实际上，这项和约仅仅是一次暂时的停火。双方同意三年内均不进入亚速海。对威尼斯而言，这是短期的挫折，因为他们现在无法使用塔纳，但热那亚欢迎这个规定，因为它在卡法的主宰地位业已恢复。威尼斯人怀着热切的期望，等待1358年6月的到来；同时它与北半球所有贸易国家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包括金帐汗国的大汗、佛兰德、埃及和突尼斯。

战争的结果尚不明确，双方似乎都瞥见了取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然而最终的胜利果实却被好管闲事的米兰公爵夺走了。双方都深入对方的水域，并将敌人逼迫到毁灭边缘。二十五年后，同样的战争将会再次上演，拥有和上次一样的战术、胜负逆转、希望、恐惧，作战的海域也相同，但是后果更加严重。下一次将是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在梵蒂冈，一提到两个航海共和国的争斗不休，大家就扼腕叹息。历届教皇一再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尝试，却总是由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争斗而作罢，因为只有它们才拥有运输部队所需的资源。外人明白，威尼斯自己也强烈感觉到：在这些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的间歇，以及在拜占

庭垮台的空隙里，奥斯曼土耳其人正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1354年11月，热那亚人运送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这是他们，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做过的最糟糕的一桩买卖。他们的收费是每人一杜卡特。这个价码很不错，但实际上是一桩可怕的交易。土耳其人在加里波利站稳脚跟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将他们驱逐出去。他们将永久性留在欧洲，成为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政治乱局中的第四条蛇。

这些战争对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影响很深。在竞争对手的压力下，共和国为了维护其海上航道和海上防御，从其殖民地索取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威尼斯的所有前哨阵地（由共和国中央政府直接统辖）都感受到了宗主国施加的沉重压力，特别是在财政方面。威尼斯人掌控着一套完整的税收制度，参照先前拜占庭的税赋模式，对其加以改良，以近似偏执的仔细对执行过程进行审查。他们对住房、土地所有和牲畜征收直接税。间接税的征收对象包括：油和酒类的销售；奶酪和铁的出口；动物毛皮、咸鱼、船只停泊（根据功能和吨位收费不同）；甚至在克里特境内的葡萄酒运输；其他形形色色的货物和经济功能。还有为修建防御工事而以实物形式征收的赋税、提供警卫的徭役、提供饲料和柴火等，这些负担对克里特的城镇居民来说特别讨厌。国家对核心食品的垄断收购，尤其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小麦，令地主阶层怨声载道。还有一些特别征税，用来应付军事突发事件和海盗的袭击。圣马可的旗帜飘到哪里，共和国的经济需求就出现在哪里。税收的重负无情地压在所有殖民地人民的肩上。威尼斯公民、土著居民、外国人、教士和俗人、农民和城镇居民全都要缴税，犹太人承担的赋税尤其沉重。



帝国的图像：威尼斯对克里特的主宰

克里特岛受到的税收压迫最为严重。这个岛屿是海洋帝国的神经中枢。去往东方的所有商业和航海活动都要经过克里特的港口。它位于十字军东征和海上战争的最前线。它生产的小麦对潟湖来说至关重要。克里特负责装备桨帆船，为其提供人力，为共和国的海军及士兵和桨手们提供两次烘焙的饼干。1344年，威尼斯参加了一次前往士麦那的十字军东征，去攻击土耳其人，正是克里特岛为此次行动买单。共和国以折扣价垄断了克里特岛的小麦。此外，管理这个岛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从小亚细亚海岸出发的土耳其海盗越来越猖獗，威尼斯必须为克里特提供军事保护、防御工事和桨帆船巡逻。干地亚的城墙多次被地震摧毁，并且其至关重要的人造海港和防波堤也持续遭到海浪的侵袭。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而克里特岛不得不支付这些费用。随着时光流逝，克里特居民对遥远母邦的赋税要求越来越不满。满腹怨言的人不仅包括经常造反的希腊人，也包括他们的威尼斯地主，即共和国的封臣们，他们在岛上定居已有许多代。1363年夏天，这种不满情绪使威尼斯的帝国霸业陷入动荡之中。

1363年7月21日，威尼斯国家档案记录了十人议事会——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之一——的一项判决。这项判决是针对马尔科·图拉尼奥的，他曾“允许一名军械士去帕多瓦做他的买卖，即制造弩弓。这项举措严重损害了威尼斯的利益，因此十人议事会判处图拉尼奥终身流放克里特岛”。^[8]帕多瓦是敌对威尼斯的城市，而威尼斯当局对具有专门军事或工业技能的工匠的叛逃特别重视。制盐工人或玻璃工人若是叛逃敌国，一旦被抓获，将被砍掉右手，如果是女性，则被割掉嘴唇和鼻子，或者被追捕和暗杀。然而三个月后，国家档案记载道，图拉尼奥仍然在威尼斯。对他的处罚已经被搁置。在这三个月里，一场巨大的灾变动摇了威尼斯帝国的统治。

8月8日，克里特岛上的威尼斯封臣们了解到，元老院有意引进一个

新的税种，以维护和清洁干地亚港。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封臣们强烈反对，他们觉得实施这项税收纯粹是为了商船队（这些商船队途经克里特岛前往埃及和叙利亚海岸）的利益，与他们自己无关。他们在干地亚聚集，要求向威尼斯执政官直接上诉。克里特公爵莱奥纳尔多·丹多洛拒绝让步，坚持必须征税。他派遣传令官向整个城市宣布这一点，尤其是去圣提多（克里特岛的主保圣人）教堂宣讲，因为那里是主要反对派的云集之地。公爵发出的信息直截了当：必须缴纳税款，违者将被没收财产或处决。载有约500名水手的19艘威尼斯舰船停在港口；有人建议丹多洛号召这些人夺取中央广场的控制权，并驱散示威者。但他拒绝了，担心这样做会火上浇油。于是水手们留在港口。

但丹多洛的敕令没有吓倒地主们。次日，他们聚集在中央广场，在心怀不满的市民、仆役和士兵的支持下，试图袭击公爵的宫殿。宫殿大门岿然不动。里面的公爵虽然极其固执，却十分勇敢，他命令将门打开。他命令封臣们退散，否则死路一条。地主的领袖之一蒂托·韦尼尔恼羞成怒，大叫道：“该死的人是你，你这叛徒！”^[9]丹多洛的勇气救了他自己的性命。另外几名抗议者挺身而出保护他，但在天黑时，丹多洛与其他几名忠于威尼斯的权贵都被抗议者扣押了。

一周之内，叛军为独立的克里特岛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由威尼斯地主马尔科·格拉代尼戈担任总督和行政总长，同时设立了四名顾问和一个二十人组成的议事会来辅佐他。一百五十年来，克里特人曾多次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威尼斯宗主，但1363年的叛乱暴露了共和国的帝国霸业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此前所有的叛乱都是由被剥夺财产的希腊地主发动的。而这一次不同。这是威尼斯殖民者的第一次叛乱。叛乱者包括共和国历史上一些最辉煌的名门望族的成员，如格拉代尼戈、韦尼尔、格里马尔迪、奎里尼和丹多洛等贵族世家，这些家族在共和国扩张的上升期曾涌现出许多执政官、行政官员、海军将领和巨商富贾。共和国一直奉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将臣属民族和威尼斯殖民者与执政者分隔

开，对威尼斯公民施加许多限制条款和禁令。它信奉种族的纯洁性，最害怕的就是民族同化。用那句历史悠久的说辞，无论威尼斯居民身处多么遥远的地方——塔纳、伦敦、亚历山大港、君士坦丁堡、布鲁日、里斯本或干地亚——他们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即集体事业的忠诚爱国的参与者，正是这样的事业构建了最尊贵的圣马可共和国，而它的核心永远是潟湖。

但在克里特岛，在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威尼斯殖民者在这里居住了许多代，上述的这种与土著泾渭分明的冷漠超然已经软化。殖民者除了自己的威尼斯方言之外也说希腊语，有些人和主要的希腊氏族通婚，有些人开始倾向于具有神秘美感的东正教仪式。克里特岛开始征服他们的征服者了。据强烈敌视克里特的威尼斯编年史家德·莫纳西斯记载，叛乱者做了讨论，以决定在新独立的克里特岛上空悬挂何种旗帜，此次辩论定下了整个叛乱的基调：

8月13日，叛军在宫殿内讨论了升起圣马可还是圣提多旗帜的问题。人群涌进广场，高喊：“圣提多万岁！”于是他们决定，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均应悬挂带有圣提多形象的旗帜，并公开在所有地方张挂此旗帜。^[10]

此事件后来被称为“圣提多叛乱”。它标志着克里特岛居民产生了一种对独立的向往。但在其开端，也出现了不祥的预兆。“这一天，圣提多的旗帜在人群的呐喊声中被升上了钟楼顶部，但旗帜是倒挂的，圣像的脚比头高。这不祥的预兆使许多有信仰的人感到害怕。”^[11]

尽管有这样的凶兆，“光辉的总督兼行政总长马尔科·格拉代尼戈政府及其议事会”仍高度乐观地开始运作。^[12]威尼斯封臣们向希腊人民求助。希腊人被准许进入执政议事会，并且之前对希腊东正教神职任命的限制也被解除。

向西60英里，在威尼斯控制的海港小镇干尼亚，人们没有立即推翻

共和政府的统治。这里的总督是韦托尔·皮萨尼。高贵的皮萨尼家族长期为威尼斯效劳，既赢得过荣耀，也曾蒙受耻辱。韦托尔的父亲尼科洛在此前与热那亚的战争中打过胜仗，也失败过，自隆哥港的灾难之后，便被永久地剥夺公职。韦托尔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船长和海军指挥官，但现在境况也不乐观。前一年在威尼斯，他在大街上手握利剑，企图谋杀一位行政长官，被当街逮捕。他被罚款200金杜卡特，还被褫夺了干地亚总督的好职位。作为干尼亚总督，韦托尔开始重整旗鼓。他对当地威尼斯人的管理似乎很有一套。他们拒绝背叛圣马可。韦托尔因此写信给威尼斯说：“这一区域的地主们仍然忠于祖国，并抵制干地亚叛军的所有呼吁。”^[13]后来叛军袭击了干尼亚小镇，皮萨尼和其他所有威尼斯政府人员一起被囚禁了。但这一事件说明他是一个能够赢得他人忠诚的人。十八年后，这位傲气十足、情绪多变的船长将成为威尼斯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克里特岛都落入了叛军手中。圣提多旗帜在塔楼和船舶的桅杆上飘扬。为了加强军事防御，以抵抗威尼斯的镇压，叛军的议事会做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决定，即将监狱中的一些犯人释放，条件是六个月的无偿兵役。德·莫纳西斯毫不客气地将这些犯人描述为“杀人犯、小偷、土匪、强盗和其他犯有深重罪孽之徒”。^[14]这使革命形势增添了一个不稳定因素。有些封臣开始怀疑反叛祖国是否明智；一位名叫雅各布·穆达佐的地主公开表示反对叛乱。他的房子被烧毁了。几天后，他的独生子当街遇袭身亡。被说服放下武器休战的威尼斯水手被抢劫并囚禁；威尼斯舰队的3艘桨帆船及其全体船员和桨手被扣押。一位叫作扎拉的乔万尼的商船主放弃了他的船只，乘小艇逃到了莫东。消息从那里很快传到了亚得里亚海。9月11日，威尼斯元老院意识到，他们的主要殖民地——“帝国的枢纽”已全面处于叛乱状态。

对此威尼斯仍感到难以置信。当天，执政官概述了将对封臣们做出的呼吁：

在悲伤和惊讶中，我们得知了干地亚的叛乱；这令人难以置信。封臣们与我们同属一个集体，源于同一血脉。只要能让他们回归当初的和谐，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们将派一名大使去了解民愤的起源，并采取适当措施。执政官恳求他亲爱的子民们听从教导，重新归顺。^[15]

次日，元老院指定了一个代表团，赋予其精确的十二项任务和更深层次的秘密指示：不得泄露任何有关元老院意图的信息。同时，威尼斯在为战争做准备。代表团在干地亚登岸时，就应当意识到，他们高人一等的态度不会受到欢迎。大使们在武装护卫下，从港口沿着300码长的山坡大道走到公爵的宫殿。当他们走过时，群众从平坦的屋顶探出头，在使团的头顶上咒骂他们，“让大使们非常恐惧”。^[16]调整好情绪后，他们对叛军议事会传达了圆滑的说辞，搬出了老生常谈的一套：他们明白，孩子可能会生父母的气……但是毕竟血脉相连，孩子终究还是会回到父母的管制下……浪子回头仍可以被原谅……执政官满怀慈悲……等等。在武装人员的包围下，而且暴民的咒骂还在他们耳边回荡，代表团一行匆匆退回到了自己的船上，落荒而逃。

威尼斯被克里特岛事务的真实状况震撼了。对威尼斯的殖民利益来说，此次危机与同热那亚的战事一样严重。失去克里特岛意味着海洋帝国将面临潜在的灾难。丧失了枢纽，整个帝国霸业都将垮掉。两种可能的结果困扰着他们：一是热那亚人可能会觉得克里特岛的叛乱有利于他们，而且叛军也正在寻求热那亚的援助；二是叛乱可能会扩散到整个爱琴海，并触发所有说希腊语的威尼斯领地起来造反。第二点很快成了现实。10月20日，元老院了解到，“叛军已派出代表前往科罗尼和莫东，以及内格罗蓬特，鼓励当地居民加入他们”。^[17]起初看起来仅仅是很小范围的问题，现在已发展成了重大危机。

威尼斯共和国的行政机关进入紧急状态。威尼斯政府以前自称“公社”，现在越来越经常用“宗主国”的宏伟概念来指代自己，这暗示着它统治着广袤的领域。共和国政府的反应坚决而毫不含糊：“宗主国

不能放弃克里特岛，它是威尼斯海洋帝国的枢纽。我们将组织一次远征，将其再次征服。”^[18]一连串简明的命令从执政官的宫殿发了出去。第一步是封锁克里特岛，使其与外界隔绝。一系列发给负责日常信息传播的议事会的简练备忘录设定好了计划。在10月8日：

议事会将向外国政府通知威尼斯政府针对克里特叛军的计划：1.威尼斯决定使用在其力量范围的一切手段夺回克里特岛；2.远征正在准备中；3.我们请求外国政府命令他们的臣民与叛军断绝一切联系，尤其是商业联系。^[19]

国家档案的记载充满紧张气氛和急迫感。使臣和信差们乘船前往罗德岛、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科罗尼、莫东和内格罗蓬特，最重要的是前去觐见教皇。教皇正希望威尼斯人能支持十字军东征的新计划。他们还派出特使前往热那亚，并相信教皇也将以天主教团结的名义迫使他们的对手不要插手克里特叛乱。此外，10艘桨帆船奉命封锁克里特岛，将其与外界隔离。在科罗尼和莫东，人们被禁止购买已被运往当地的克里特商品。威尼斯要将克里特岛扼死。

共和国高效地着手准备武装平叛。它公开宣称：“我们将尽快攻打并征服克里特岛。”^[20]它匆忙到处寻找一名合适的雇佣兵统领来指挥陆军。威尼斯自己素来只组织过海上远征，所有陆战是根据法律外包的。一位候选人，加莱奥托·马拉泰斯塔因为费用层面的考虑而被否决。“他自命不凡的各种要求非常过分，”元老院抱怨道。^[21]他们最终雇用了一位高素质的维罗纳军人卢基诺·达尔·韦尔梅来执行平叛任务，并组织了一支专业化的军队：2000名步兵、来自波西米亚的工兵、土耳其骑兵、500名英格兰雇佣兵、攻城武器、32艘桨帆船（包括运马船）、12艘满载补给物资和攻城器械的圆船。威尼斯早已习惯接受别人的雇用，运载其他国家的军队横渡地中海东部。组建和运送自己的军队的代价十分昂贵。有人抱怨道：“背信弃义的克里特叛乱严重损害了威尼斯的商品和资源。”^[22]但共和国下定决心要尽快给予叛军沉重的打击。即便如此，

准备舰队仍花费了八个月时间。1364年3月28日，达尔·韦尔梅宣誓就职，并在精心筹划的仪式上从执政官手中接受了战旗。4月10日，在利多接受隆重的检阅后，舰队起航。5月6日，舰队已经停泊在干地亚以西6英里的一个小海湾内。

在达尔·韦尔梅的军队登岸很久之前，有关威尼斯舰队的消息就已经使叛军六神无主。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威尼斯人开始重新思考。叛军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出现了杀气腾腾的分裂：城市对乡村，威尼斯人对希腊人，天主教徒对东正教徒。格拉代尼戈氏族的一名成员莱奥纳尔多皈依了东正教。作为新信徒，他的宗教热情特别疯狂，与一名叫作米勒特斯的希腊僧人勾结，阴谋刺杀动摇不定的人。后来他们的计划扩大至杀死所有生活在城墙安全保护范围之外的威尼斯地主。米勒特斯准备了一个“长刀之夜”^[23]，目标是意大利人居住的孤立农场和乡间宅邸。德·莫纳西斯对这一波新的恐怖活动做了生动的描述：

为了避免别人怀疑他的阴谋，米勒特斯和他先前最亲密的朋友安德烈亚斯·科纳待在一起……在位于普索诺皮拉的房子。夜幕降临，米勒特斯和同党冲进屋子里。安德烈亚斯吓坏了，对他说：“我的朋友，你们这是想干什么？”米勒特斯回答道：“杀你！”……安德烈亚斯说：“你真的堕落到要犯下这样的弥天大罪，要杀害你家庭的朋友和恩人吗？”他回答说：“我必须这么做。我们之间虽然有友谊，但更重要的是宗教、自由以及将你们这些异端分子逐出这个岛屿，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说完这些，他们杀害了他。^[24]

同样的场景在整个克里特岛的乡村重复上演着：敲门声，惊讶的喘息声，然后是突如其来的袭击。“那天晚上直到次日凌晨，他们杀害了加布里埃莱·维纳里奥（他死在位于伊尼的家中）、马里诺·帕斯夸利戈、劳伦蒂奥·帕斯夸利戈、劳伦蒂奥·奎里诺、马尔科和尼科洛·穆达佐、雅各布和彼得罗·穆达佐……”^[25]受害者的名单很长。威尼斯的克里特岛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在干地亚、莱蒂莫和干尼亚的城墙之外居住已经十分不安全。叛乱眼看就要失控。受希腊爱国主义和新形成的暴民

军队的搅动，干地亚陷入了混乱。一群暴民试图强攻监狱，并杀死被关押在那里的克里特公爵和威尼斯水手。市政府制止了这些暴民。就连叛乱领袖马尔科·格拉代尼戈也被事态的发展震惊了。叛军决定，僧人米勒特斯这样的盟友太过危险，还是没有他比较好。米勒特斯被诱骗到干地亚附近的一座修道院，被抓获并从公爵宫殿的房顶扔了下去，反复无常的暴民用剑将他结果。

随着有关威尼斯舰队的消息增多，以及叛军对希腊人越来越恐惧，宫殿内部的争论愈发激烈。威尼斯人和干地亚的希腊市民都害怕会激起农民起义——被压迫了几个世纪的下层人民的反抗。为了控制已经不在他们掌握范围内的叛乱，他们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为了遏制希腊人的叛乱，应使克里特岛属于一个外国宗主，即热那亚。”^[26]在许多威尼斯领主看来，这样的背叛实在太过分了。有些人被互相抵触的情感驱动，提议现在向威尼斯政府恳求宽恕。马尔科·格拉代尼戈是提议者之一，他被召回公爵宫殿商议大事——这其实是一个埋伏。25个年轻男子已藏在宫殿的小教堂内。格拉代尼戈被杀害了。其他所有反对向热那亚臣服的人也被围捕并监禁。议事会里满是增添进来的希腊成员，投票通过了。一艘挂有圣提多旗帜的桨帆船起航前往热那亚，但有8名持反对意见的人士偷偷向威尼斯通风报信，发出警示：威尼斯的竞争对手即将被邀请加入这场混战。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1364年5月6日或7日，达尔·韦尔梅的舰队在干地亚以西几英里处停靠，他的军队开始登陆。他们眼前的地形崎岖坎坷，障碍重重，被河流和峡谷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有一些狭窄的道路通向城市。在这一地带，叛军早已设下埋伏。达尔·韦尔梅先派遣一支100人的先遣队去侦察地形。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索，很快便遭到伏击，全军覆灭。当主力部队从后面赶上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幕。据热衷于渲染希腊人暴行的德·莫纳西斯描述，叛军“将尸体的生殖器割下，塞进他们嘴里；切下他们的舌头，塞进他

们的肛门。这一暴行大大激怒了意大利人”。^[27]双方都集结人马，想要掌控山口隘道，但很显然，叛军的乌合之众终究不是专业化军队的对手，这些职业军人曾参加过意大利北部各城市间的战争，久经考验，并且他们现在一心想要替他们的战友报仇。叛军很快溃散。很多人被打死或被俘；其余的则逃到了山区。几个小时内，达尔·韦尔梅的军队便洗劫了干地亚郊区；没过多久，全市投降。悔过的官员将城门钥匙交给达尔·韦尔梅。莱蒂莫和干尼亚也迅速投降。叛乱的始作俑者之一蒂托·韦尼尔躲进山区，加入了希腊人卡莱尔吉斯氏族。圣提多叛乱就像之前突然爆发那样，如今骤然瓦解。它的旗帜被撕下；圣马可的雄狮旗又一次飘扬在公爵宫殿上空。在干地亚的主广场上，处决开始了。

6月4日，消息传到了威尼斯。捷报抵达的情形被彼特拉克写进了一封令人难忘的信里：

大约是中午时分.....我碰巧站在窗前，眺望广袤的大海.....突然出现了一艘他们称为桨帆船的长船，它通体装饰着绿叶，正划桨进入港口.....水手和一些年轻男子，头顶绿叶编织的冠冕，面带欢笑，在船首挥舞着旗帜.....最高塔楼上的瞭望员发出讯号，宣示有船抵达，全市人民都自发跑过来，急切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船足够近，能够看清细节时，我们看到敌人的旗帜被拖在船尾。毫无疑问，这艘船是来报捷的.....当得知这一消息时，执政官洛伦佐.....和所有人，在城市各地衷心感谢上帝，尤其是在圣马可教堂，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教堂。^[28]

全城都充满了欢庆的气氛。大家都知道，克里特岛有多么重要。它是整个殖民和商业系统的枢纽，而威尼斯的贸易和财富正依存于此。为了感恩胜利，威尼斯举行了礼拜仪式，组织了游行队伍，并做出了一些慷慨的举动。罪犯得到赦免；贫穷的女仆得到金钱赏赐，用来做嫁妆；据德·莫纳西斯记载，整个城市沉浸于一连数日的欢庆仪式和盛大娱乐活动。彼特拉克观看了在圣马可广场举行的竞技和比武大赛，他和执政官一起坐在教堂的凉廊内，华盖遮蔽着他们的座位，四匹骏马的雕像就屹立在他背后的上方：

它们似乎在嘶鸣，在狂抓着地面，栩栩如生.....下方人山人海，找不到一个空隙.....庞大的广场、教堂、塔楼、屋顶、门廊和窗户都挤满了观众，人们摩肩接踵.....在我们右方.....是一座木制舞台，坐着四百位最艳丽的贵妇，都是美丽与高贵的鲜花。[\[29\]](#)



收复克里特之后的庆祝活动

甚至还有一群到访的英格兰贵族也在现场，观看了这些活动。

伴随胜利而来的还有惩罚。元老院决心在其统治领域内彻底消灭敌党。惩罚的手段五花八门：酷刑折磨至死或斩首；拆散亲人；驱逐出境，不仅是逐出克里特岛，而且逐出“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土地、爱琴海公爵领地、罗得岛圣约翰骑士团的领地以及土耳其人的领地”。威尼斯试图抹掉格拉代尼戈和韦尼尔等家族在克里特的支系于档案中留下的所有痕迹。为了满足国内群众观看复仇的需求，一些犯人披枷戴锁地押回威尼斯。帕拉迪诺·佩尔马里诺被斩断双手，然后被吊在双柱之间，以儆效尤。

庆祝和杀鸡给猴看的惩罚都为时过早。克里特岛上的各城镇已重新归顺威尼斯；在乡村，叛乱的余烬不停地迸发出火花，难以杜绝。在克里特西部山区，威尼斯叛军的一小群余党，包括叛乱始作俑者蒂托·韦尼尔，与希腊人卡莱尔吉斯氏族联手，在好斗农民的支持下，继续开展游击战，反抗威尼斯政府。他们袭击孤立的农场，杀害其所有者，焚烧

他们的葡萄园，毁坏设防区域。威尼斯地主被迫退回城镇中，而乡村成了暴动和危险的区域；威尼斯的小队士兵遭到伏击，被全部消灭。为了彻底了断此事，威尼斯不得不增派越来越多的士兵，并不断调换军事指挥官。这是一场肮脏而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四年，最终威尼斯依靠残忍和毅力赢得了战争。威尼斯人施行焦土政策，并悬赏鼓励平民交出叛军。饥饿的希腊农民开始与政府合作，交出抓获的叛军和他们的妻儿，以及成袋的血淋淋的首级。随着支持他们的农民越来越少，叛军被迫躲进克里特山区的隐秘处。1368年春天，蒂托·韦尼尔和卡莱尔吉斯兄弟在西南部最偏远的要塞——安诺波利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威尼斯指挥官耐心地追踪他们，而当地平民出卖了他们。在崎岖山坡的一个洞穴内，克里特叛军度过了他们的最后时刻。虽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乔治·卡莱尔吉斯仍坚持不懈地向威尼斯士兵射箭，但他的兄弟意识到，再作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他做出了象征着战败的举动，折断了自己的弓，说已经不需要它了。韦尼尔耳朵受伤，跌跌撞撞地出来投降。当他索要绷带时，有人回答说：“你的伤不需要治疗，它完全无法治愈。”^[30]韦尼尔意识到对方的意思是什么，只是点点头。不久之后，在干地亚的公共广场，他被斩首了。

克里特岛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终于回归和平。此后，那里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叛乱。威尼斯的雄狮旗将在干地亚的公爵宫殿上空再飘扬三百年；共和国用铁的手腕牢牢控制着它。那些曾经是叛乱中心的地区，如东部肥沃的拉西锡高原和斯法基亚山脉的安诺波利，都被刻意化为沙漠。政府以死亡相威胁，禁止在这些地区从事农耕。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个世纪。

在这一切的动荡中，热那亚始终袖手旁观。叛军的桨帆船于1364年到达热那亚并乞求援助，但遭到了拒绝。威尼斯已经派遣使者来请求联合对抗叛军；热那亚抵制住了诱惑，可能更多是因为教皇要求天主教徒团结一致，而不是因为两个对手间出现了积极的合作精神。威尼斯和热

那亚之间只是暂时的停火。克里特叛军最终投降五年之后，战争再一次爆发了。

[1] 此时加泰罗尼亚是阿拉贡王国的一部分，在今天的西班牙的东北角。

[2] Norwich, John Julius, *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 1982, p. 218

[3]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588

[4]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589

[5] Norwich, John Julius, *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 1982, p. 221

[6]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592

[7] Norwich, John Julius, *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 1982, p. 223

[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56

[9]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73

[10]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75

[11]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75

[12] McKee, Sally, 'The Revolt of St Tito in Fourteenth-century Venetian Crete: a Reassessment',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 no. 2, Dec, 1994, p. 178

[13]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60

[14]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72

[15]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56

[16]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76

[17]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62

[1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64

[19]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62

[20]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63

[21]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65

[22]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62

[23] “长刀之夜”原指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纳粹政权对冲锋队的清算。希特勒因无法控制冲锋队的街头暴力并视之为对其权力的威胁，故欲除去冲锋队及其领导人恩斯特·罗姆。他还想安抚害怕及厌恶冲锋队的国防军高层，特别是由于罗姆企图将国防军纳入自己领导的冲锋队之下。至少有85人死于清算，不过最后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几百人，超过1000名反对者被逮捕。此次行动加强并巩固了国防军对希特勒的支持。

[24]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79

[25]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79

[26]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80

[27]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83

[28]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83, Petrarca, Francesco, *Episto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ed. Ugo Dotti, Turin, 1978, p. 341

[29]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343

[30]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p. 192

12.驯服圣马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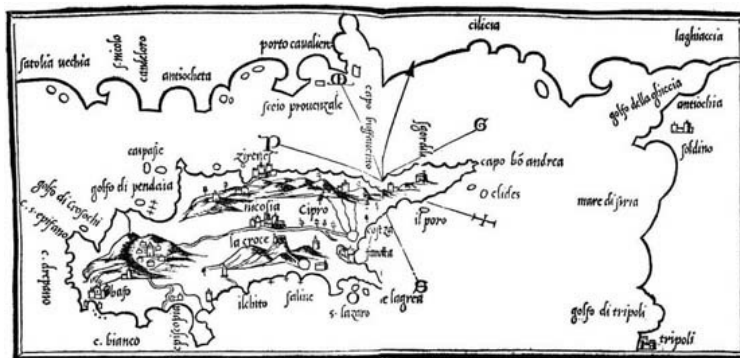
1372～1379

新一轮战争的导火索与之前历次战争十分相似，透着不祥的气息：两国商人在一个外国港口互相竞争，然后是一番口舌，随后发生肢体冲突和斗殴，最后竟发展为屠杀。区别在于结果不同——之前的历次战争均以勉强停战为结局，这一次是死战到底。在14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里，双方均努力给对方致命一击。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基奥贾战争”，两国商业竞争的所有咽喉要地均被波及，包括黎凡特沿岸、黑海、希腊沿海，以及风波不断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水道，但最终决战发生在威尼斯潟湖内。

矛盾激化的地点是法马古斯塔港。塞浦路斯由一个日渐衰落的法兰西十字军家族——吕西尼昂王朝统治，是两个共和国的一个贸易枢纽。威尼斯在此拥有棉花和糖料作物的重要商业利益，并且该岛是商品交换的市场，同时也是前往黎凡特路线上的中转站。法马古斯塔坐落于棕榈树群之间，紧挨波光粼粼的大海，距离贝鲁特仅60英里。在这里，在吕西尼昂王朝新君彼得二世的加冕典礼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矛盾突然爆发了。原因出在鸡毛蒜皮的次序问题上。当国王被引领着前往教堂时，威尼斯人抓住了御马的缰绳；在随后的宴会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领事为了争夺国王右侧的贵宾位置争吵起来。热那亚人开始向他们的死敌投掷面包和肉，但他们还携带了隐藏着的剑。塞浦路斯人攻击热那亚人，将他们的领事扔出窗外，然后袭击热那亚聚居区，将其洗劫一空。对热那亚人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侮辱。次年，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攻击了塞浦路斯岛，并将其占领。

威尼斯人没有被驱逐出塞浦路斯，但这次事件使气氛紧张起来。这

使他们在战略上十分令人忧虑。他们面临着被排挤出重要贸易区域的危险。这种感觉又因君士坦丁堡的事件而加深，在那里，两个意大利共和国疯狂地插手干预争夺拜占庭皇位的无休止斗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分别拥立不同的皇帝：威尼斯支持约翰五世·帕里奥洛格斯；热那亚人支持约翰五世的儿子安德罗尼库斯。



塞浦路斯

双方都为了一己私利而冷酷无情地行事。威尼斯尤其渴望维持自己进入黑海的权利，而热那亚对黑海仍占统治地位。1370年，当约翰五世访问威尼斯时，威尼斯人因他未偿清一笔债务而将他扣押了一年。六年后，威尼斯人以恫吓的方式向约翰五世索要忒涅多斯岛（否则就派遣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以此换取被他们扣留的皇室珠宝。忒涅多斯岛是与小亚细亚海岸相望的一个小岩石岛，具有关键的战略意义：它距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口12英里，是通向君士坦丁堡及更北方的关键要冲。因此，它“对所有希望航向黑海，及塔纳和特拉布宗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门户”。^[1]威尼斯共和国想要以此来遏制热那亚的海上交通。

皇帝将忒涅多斯岛拱手相让。热那亚的回应同样迅速。他们废黜了约翰五世，让他的儿子当皇帝，并要求收回忒涅多斯岛。然而，当他们派遣舰队去取回自己的战利品时，却遭遇了直截了当的拒绝。忒涅多斯岛的希腊居民拥护威尼斯人，不肯服从热那亚，并将热那亚入侵者驱逐出岛。安德罗尼库斯逮捕了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市政官。威尼斯要

求释放他们的官员，并恢复约翰五世（他正在城墙附近一个阴暗地牢里苟延残喘）的皇位。1378年4月24日，威尼斯共和国宣战了。

受黑死病的长期影响，双方能够出动的舰队的规模都比较小。令冲突升级的是，两个海上对手各自都拥有了一些陆地上的盟友。威尼斯越来越多地参与意大利各城邦复杂的权力政治。威尼斯共和国第一次不仅拥有海外属地，还拥有了面积不大的陆上属地，即在意大利本土的一些土地，以特雷维索城（位于威尼斯城以北16英里处）为中心。从特雷维索的周边地区，即所谓特雷维尼亚诺，威尼斯可以获得至关重要的粮食供应。粮食经布伦塔河运往南方，在基奥贾镇附近进入威尼斯潟湖。波河、布伦塔河和阿迪杰河这三条大河从遥远的阿尔卑斯山带来了淤积物，形成了威尼斯潟湖。这三条大河在基奥贾镇这个战略要地注入大海。这些水道，再加上互相连接的运河网络，构成了通往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贸易主干道，威尼斯对这些水道严加防守。威尼斯共和国能够对意大利北部施加老虎钳一般的强大经济压力，控制盐的供应，征收水上交通的费用，以垄断的条件用平底小船将自己的商品运往水域的上游。相较于与其临近的地区，威尼斯太强大、太富裕、太骄傲了。威尼斯西面的邻居是帕多瓦，东面是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立足不稳因而紧张不安的匈牙利国王。如果说威尼斯让其他国家仰慕，那么它同时也让人心生嫉妒和恐惧。热那亚、帕多瓦和匈牙利之间的往来书信表达了他们深切的不安：“如果（威尼斯）被允许在意大利大陆站稳脚跟，就如同他们在海上一样，很快他们将成为整个伦巴第的主人，最后，成为整个意大利的主人。”^[2]热那亚、帕多瓦领主弗朗切斯科·卡拉拉和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一世签署协议，从陆地和海上将威尼斯包围，“以此羞辱威尼斯和它的盟友们”。^[3]

这个联盟为热那亚提供了新的战略选择。如今不仅可以通过陆战扼杀通往威尼斯的重要内河交通，还可以利用拉约什一世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各港口，特别是扎拉，为热那亚舰队提供近距离袭击威尼斯的基

地。这对威尼斯的威胁是相当大的。威尼斯也联合了自己的盟军。塞浦路斯国王仅仅能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的未来岳父——米兰公爵所提供的援助。

除了开展一场新的海上战争的花销之外，威尼斯共和国现在还不得不增加保护其陆地领土的开支。根据传统的做法，为了陆战，威尼斯为寻找一位有才干的雇佣兵首领而在意大利四处搜寻。这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雇佣兵的表现总是个变量。雇佣兵总是要价昂贵，而不可靠；“不团结，野心勃勃，纪律涣散，不忠实，在朋友面前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胆小如鼠；他们既不敬畏神灵，又不忠实对人……在和平时人们被雇佣兵抢劫，在战时被敌人抢劫”。^[4]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雇佣兵给威尼斯造成了很多麻烦。威尼斯希望请到最好的雇佣兵统领——英格兰人约翰·霍克伍德爵士，意大利人称其为乔万尼·阿库托（“锋利的”）。他的名声很是血腥，因为他总是超额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一年前在切塞纳，他下令屠杀了5000人。然而对于目前囊中羞涩的威尼斯人来说，雇用霍克伍德太昂贵了，而且他与帕多瓦领主关系过于紧密。他们最后选择了贾科莫·德·卡瓦利，每月费用为700杜卡特。

陆战还将引进新的技术。两年前，威尼斯人在一次攻城战中第一次使用了火药武器。大炮在意大利是一件新玩意儿。“一种铁制的伟大工具，”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描述它，“整个身管是中空的，向其填入黑火药——由硫黄、硝石和焦炭制成，然后在火药上方装填石弹。通过火门点燃火药后，石弹便被巨大的力量推射出去。”^[5]巨型射石炮是铸铁制成的带有箍的长管，可靠性极差，每天只能发射一发石弹。它们将在随后的战事中发挥作用。

宣战之前的日子里，威尼斯政府选择了两位海军指挥官，他们是威尼斯历史上履历最为丰富多彩的两位冒险家。1378年4月22日，在圣马

可教堂举行的盛大典礼上，七十二岁高龄的执政官安德烈亚·孔塔里尼授予韦托尔·皮萨尼海军总司令的职衔。执政官将威尼斯的战旗交至皮萨尼手中，宣布：

上帝赋予你神圣的使命，用你的勇气来捍卫这个共和国，并向那些胆敢侮辱它、侵害它安全的人复仇。共和国的安全源自我们先辈的美德。我们将这面胜利的、令人敬畏的战旗授予你，你的义务便是带着它凯旋，不得玷污它的荣誉。[\[6\]](#)

皮萨尼家族十分清楚，在为共和国服务时，命运是变幻无常的。二十年前隆哥港的灾难发生时，韦托尔一直在他父亲的身边。韦托尔自己也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直言不讳、勇敢无畏、爱国、敏感易怒、脾气暴躁，是一位身先士卒的海军指挥官。他是一位极其优秀的领导者，深受船员们爱戴，其他贵族却非常厌恶他。除了曾经受过谋杀未遂的指控之外，他在1364年担任克里特总督时还曾殴打过一位同僚官员。但他的军事经验极其丰富，无与伦比。后来的事实证明，任命他为海军总司令是一个饱受争议但非常聪明的选择。

同时，共和国还任命了另一位贵族冒险家——卡洛·泽诺，用威尼斯方言的读法是“泽恩”。四十五岁的泽诺已经在威尼斯海洋帝国全境经历过无数次非同寻常的冒险。父亲战死沙场，他成了一名孤儿。他与一位教皇结交，先后当过学者、音乐家、神甫、赌徒、雇佣兵，也曾结过婚。在帕多瓦学习时，他曾遭遇劫匪，差一点命丧黄泉。几年后在帕特雷，他又差点被活埋：在遭到土耳其军队围攻的战斗中，他身受重伤，别人以为他已经阵亡，用裹尸布将他裹起来，放进棺材。就在准备钉棺盖时，有人发现他还有生命的迹象。根据泽诺家族不可靠的回忆录记载，泽诺曾在君士坦丁堡用一根绳子爬进监狱，企图营救被囚禁的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但皇帝不肯抛下同样被囚禁、无法救出的儿子们。泽诺在忒涅多斯岛保卫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大众认为泽诺是坚不可摧的。威尼斯老百姓将皮萨尼称作“父亲”，将泽诺称为“不可征服者”。他

受命率领18艘桨帆船前往地中海东部，去担任内格罗蓬特总督，并尽可能地破坏热那亚航运。就这样，威尼斯的海上安全被托付给了这两位半神话的贵族冒险家。

威尼斯毫不犹豫地准备作战。米兰公爵的封臣们从陆路逼近热那亚，而皮萨尼沿着意大利西海岸北上，洗劫海港，散布恐惧。5月末，他在安济奥外海遇见一支热那亚舰队，将其击溃。消息传至热那亚，造成了一片恐慌：皮萨尼随时可能杀到无人防卫的热那亚海港护墙下；米兰士兵正在劫掠热那亚的乡村。热那亚发生了动乱（这种动乱周期性爆发，困扰着这个国家），导致执政官被废黜，并选出了新人替代他。但皮萨尼觉得自己的舰队规模太小，不能够进一步维持早期的胜利，于是再次转身向东，回到亚得里亚海。整个夏天，他在海上活动范围广泛，盲目地追踪猎杀小群热那亚海盗，炮击法马古斯塔，护送普利亚来的运粮船队，并根据威尼斯战争委员会发出的神经质的、常常自相矛盾的命令采取相应行动。

大规模战争越来越近了。到6月，已有5000名匈牙利士兵绕过威尼斯湾，与帕多瓦领主弗朗切斯科会合；7月初，他们开始攻打潟湖岸边的梅斯特雷，此地距威尼斯仅10英里。但他们没能攻下梅斯特雷；威尼斯守军兵力远少于敌人，但坚守住了。据编年史家记载，威尼斯人在他们的城墙上安置了蜂箱，这使得侵略者放弃了最后的攻击。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以少胜多的胜利，威尼斯市民知道，只要敌军的势力局限于陆地上，便不足为虑，因为潟湖可以保护他们。但他们得到消息，热那亚派出了一支新的舰队（由卢西亚诺·多里亚指挥），于是不得不三思。

在这期间，皮萨尼在达尔马提亚海岸马不停蹄地追踪敌军。他炮轰了扎拉，但该城防备森严，难以攻下；他又南下，去攻打匈牙利的其他基地。皮萨尼猛攻卡塔罗港，“像一位普通船长一样”在最前线厮杀。^[7]战利品由所有船员共享，就是这样的做法让皮萨尼赢得了部下的绝对忠

诚。此时，威尼斯政府下达给皮萨尼的命令日益迫切：阻止多里亚进入亚得里亚海，最重要的是阻止其到达扎拉，因为他一旦到了那里，就与匈牙利人建立了直接联系，而且拥有了一个距潟湖仅150英里的基地。不知疲倦的皮萨尼将其舰队部署于西西里岛的海峡，准备在意大利半岛的最南端拦截多里亚的舰队。他上当了，热那亚舰队悄悄绕过了岛屿的南端。皮萨尼又折回，试图猜测多里亚下一步会做什么，并在整个亚得里亚海海口搜集情报。他们多次瞥见多里亚，却始终未能将其抓获。整个秋季，双方都在进行猫捉老鼠式的追踪和反追踪，皮萨尼一直将自己的舰队摆在热那亚舰队和扎拉之间，再次回去炮击扎拉，洗劫了希贝尼克港，最后终于将多里亚堵在了戒备森严的特劳港，但多里亚坚守不出，不肯应战。皮萨尼强攻特劳未果，且损失惨重。多里亚下定决心死守不出，等待时机。皮萨尼再次北上，炮轰扎拉。



特劳



希贝尼克

一年的艰苦航海结束了。船只已在海上行驶了九个月。尽管皮萨尼的领导鼓舞人心，但舰队的士兵们仍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无法与行踪诡秘的敌人决战，并且因为多次尝试而精疲力竭；士气处于低潮期。皮萨尼请求允许返回潟湖，但遭到拒绝。战争委员会急切盼望将多里亚舰队驱逐出去，担心他仍可能悄悄杀向潟湖，联合匈牙利军队，海陆并进，以钳形攻势包围威尼斯城。皮萨尼奉命在普拉过冬，以守卫威尼斯内湾。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1378~1379年之交的冬天格外寒冷。暴雪不断，霜冻刺骨，来自匈牙利草原的持续不断的寒风使得环境十分恶劣。饥饿、疾病、寒冷和疲劳使船员人数越来越少；很多人由于冻伤而失去了手脚；士兵和弩手们逃走；桨手们在严寒中受尽折磨。大家恳求起锚航行，而不是坐以待毙。仅仅是出于对皮萨尼的忠诚，舰队才保持了人员大体上齐整。海军司令将病员送回威尼斯，同时再次请求允许他返航。他的请求再一次被拒绝了。一方面，威尼斯当局害怕敌人舰队；另一方面，仇视皮萨尼的贵族们执意要继续折磨这位蒙受极大苦难的指挥官。威尼斯城的粮食供给越来越紧张；在1月份最难熬的日子里，皮萨尼奉命跨越亚得里亚海，前往普利亚，护送供应威尼斯的粮食。现在所有人的期望都落在了他的肩上。执政官亲自写信，恳求他继续坚持下

去。热那亚的陆上盟友们一步步地掐断了威尼斯的主要补给线。特雷维索城遭到了围攻。皮萨尼备好桨帆船，再次从普拉起航。疾病、死亡和逃兵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到2月初，他可用的桨帆船从36艘减少到了12艘。

2月，尽管有人强烈反对，皮萨尼还是再次当选海军总司令；另外，政府指派了两名新专员——卡洛·泽诺和米凯莱·斯泰诺协助他。他们带来了皮萨尼急需的粮食和12艘桨帆船，其中一些船是私人建造和购买的。整个春季，重整旗鼓的舰队遵照一系列互相抵触的命令，采取了行动：他们再次攻击在特劳的多里亚，护送粮食，破坏达尔马提亚海岸。捉迷藏的游戏继续进行；热那亚人只肯参加小规模交战。他们的目的是阻截威尼斯的粮食供应。在一次战斗中，皮萨尼腹部中了一箭，但多里亚逃走了。来自陆地上的消息越来越糟糕：特雷维索快守不住了；帕多瓦军队加强了对内河交通的控制。为了削弱敌人的控制力，泽诺奉命带着一队桨帆船去劫掠热那亚周边的海岸。威尼斯人这么做是希望围魏救赵，转移战场，迫使多里亚的舰队撤退。

从短期来看，这并没有带来什么改观。多里亚在自己选择的时机还未到来之前，一直拒绝交锋；皮萨尼的舰队问题重重，他接到的命令又太多，因此没有足够的力量采取行动。1379年5月7日，多里亚的舰队突然出现在普拉外海的航道上，而此时威尼斯舰队又一次暴发了疫病。威尼斯人完全措手不及。多里亚的舰队排好阵型，嘲讽地要求敌军出来战斗。在威尼斯舰队经过几个月无果的搜寻、白白浪费了力气后，热那亚人现在的挑衅几乎无法抗拒：“士兵和船员们就像被链条锁起来的獒犬一样，气喘吁吁地想去撕咬任何一个经过的人，大声疾呼，要求出战；船长和专员们也主张出战。”^[8]

这给总司令带来了道德上的压力：不出战将是对威尼斯旗帜的蔑视。皮萨尼既谨慎又多疑。他几乎可以肯定，他拥有的船只数量少于敌

人，且状况不佳；他们躲在一个安全的港湾，并且泽诺身在远方。他清醒地记得在隆哥港的失利（那就是听取了不周全意见的后果），因此争辩说，应当韬光养晦，等待泽诺回来。保全舰队是最重要的事情。舰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有人怒气冲冲地吵嚷，互相辱骂、咆哮。最后，米凯莱·斯泰诺大肆嘲讽皮萨尼，超越了他忍耐的极限：“皮萨尼想要避战，不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是由于胆小。”^[9]皮萨尼怒火中烧，伸手去摸他的剑柄。为保全个人荣誉，他做出了让步，决定出海。命令一出，船只立刻整装待发，缆索被解开。他呼喊着威尼斯的战斗口号：“热爱圣马可的人，跟我来！”^[10]下令进攻。

卢西亚诺·多里亚已经埋伏好了。他在战场外隐藏了10艘桨帆船。他的舰队主力在意气风发的威尼斯舰队进逼下步步后退，将敌人引出海，然后敏捷地转身迎战，同时隐藏的10艘桨帆船从侧翼和背后袭击威尼斯人。“我们的将士，吃惊又害怕，一下子从勇敢无畏变得惊恐万状，”威尼斯人的报告如此清醒地记载道。^[11]恐慌导致威尼斯舰队溃不成军。其中一位曾经渴望战斗的专员布拉加迪诺如今魂飞魄散，在躲避包围他的敌船的轰击时落水。12名经验丰富的船长战死或溺死；5名船长被俘。威尼斯舰队七零八落，虽仍在交战，但已经快要狼狈逃窜。卢西亚诺·多里亚过度自信地掀起自己头盔的面甲，喊道：“敌人已经被打败；我们离全胜只有一步之遥！”^[12]一位威尼斯船长趁着混乱猛冲向前，刺中了多里亚的咽喉。多里亚当场死亡，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是小小的安慰。皮萨尼试图集合残余的桨帆船，但为时已晚。看到他们都溜走了，甚至斯泰诺都逃跑了，皮萨尼放弃了实力悬殊的战斗，也跟着逃走了。5艘船逃到了北方30英里处的沿海城镇帕伦佐。

5月9日，热那亚的新任指挥官写信给帕多瓦，总结了胜利的情况：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赢得了战役——仅花费一个半小时……敌军21艘桨帆船中，我们俘虏了15艘及其贵族船长，还缴获3艘载满粮食和腌肉的运输船；我们俘虏了2400人……除去这些俘虏，我们相信敌方另有七八百

人死亡，或战死，或溺水身亡。[\[13\]](#)

5月11日，帕多瓦领主弗朗切斯科和帕多瓦全体人民参加了前往教堂的游行，“歌颂并感谢上帝，保佑我们战胜了威尼斯人……到处欢天喜地，城市里大摆盛宴，教堂钟声齐鸣，在夜里，开阔地和整个地区都灯火通明”。[\[14\]](#)

皮萨尼肩负着向政府报告失利的沉重责任。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一艘船被派回威尼斯，另一艘被派往黎凡特的各殖民地。战败的噩耗令整座城市呆若木鸡。有诧异，有震惊，也有恐惧。人们为失去亲人而哭泣，也为城市即将面临的危险而伤心。现在，没有舰队可以保护城市了。许多本领最高超的船长和训练有素的水手要么被热那亚俘虏，要么已经丧命；皮萨尼的舰队已几乎全军覆没；泽诺的舰队还在遥远的外海某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一场公共灾难即将降临，而一些贵族对皮萨尼家族抱有宿怨。潟湖霎时间寒气逼人。政府向帕伦佐发出命令，逮捕皮萨尼，罪名是“在短短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之内……丢掉了共和国海军的中坚力量，丢掉了海上的自由、航海、商业、公共税收和公民的信任……”[\[15\]](#)

7月7日，戴着手铐脚镣的皮萨尼叮当作响地被押解到圣马可广场的码头。大家对他的态度各不相同——普通老百姓示以安慰，而贵族对他只有恶意。仍戴着镣铐，他吃力地爬上宫殿的台阶，去向执政官和元老院解释。但他的政敌们不给他这个机会。他被投入了国家监狱的黑暗中。检察官开始对他进行审判。他们要求判皮萨尼死刑——这是针对临阵脱逃的指挥官的强制性刑罚；他应当在双柱间被斩首，“以此给公民们警示”。[\[16\]](#)元老院否决了判处死刑的提议——皮萨尼只是缺乏坚定性，并不缺乏勇气：原先是斯泰诺煽动出战，之后也是他带头逃跑的。刑罚最后被减轻为监禁六个月，五年不得担任公职。这令贵族们颇感满意，却激起了士兵和普通市民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很快将激发公开的

反抗。

当皮萨尼在地牢里受折磨时，热那亚人正一步步逼近。彼得罗·多里亚接替了阵亡的卢西亚诺·多里亚。他带着48艘桨帆船，收复了之前被皮萨尼夺取的所有达尔马提亚城市；他向北进军，进入威尼斯湾，收复了距威尼斯仅75英里的罗维纽、格拉多和考尔莱等城镇。8月初，多里亚在圣尼古拉岛外海现身，劫获了一艘载有埃及棉花的商船，威尼斯市民眼睁睁看着，却束手无策。他沿着利多南下航行，袭击了保护潟湖的各沙洲沿岸的其他居民点，离去时将圣马可的旗帜拖在船尾。这是对威尼斯的公开而强有力的羞辱。多里亚不仅清楚地证明，威尼斯如今连自己本土水域都无法保护，还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即一旦热那亚掌握了制海权，就可以用饥饿迫使威尼斯屈服。6月25日，多里亚俘获了两艘来自普利亚的运粮船，而匈牙利人和帕多瓦人正在扼杀通往威尼斯的内河交通。潟湖似乎也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热那亚人还对威尼斯外围水道进行了勘测，测量了水深。

整个城市笼罩在民族存亡于旦夕的气氛中。皮萨尼的竞争对手——塔代奥·朱斯蒂尼安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部队和指挥官被分配到不同防区。潟湖的两个入口被锁链封锁起来。坚固的帆船下锚停泊，作为浮动堡垒。利多沿岸建起了堡垒、木塔、栅栏和工事。贾科莫·德·卡瓦利的雇佣兵（价格非常昂贵），其中包括一队喜欢吵架的英格兰人，驻扎在那儿，进行防御。战争委员会在执政官宫殿全天候待命，并且设置了一个警备系统，从利多的圣尼古拉教堂钟声辐射开来，一旦观察到热那亚舰队，各教区的教堂便会敲响警钟，召集武装民兵到圣马可广场集合，爱国公民们将在这里做最后的抵抗。另外，威尼斯人还采取了与六百年前类似紧急状况下相同的措施：他们拆除了潟湖内标示可通航水道的所有木桩，让潟湖重新变成原始的迷宫，水面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向敌人警示水下的危险。

在准备军事防御的同时，共和国也使出了外交手腕。有没有办法破坏帕多瓦、热那亚和匈牙利的三国同盟？帕多瓦是一个满腹仇恨的新敌人，但匈牙利正为本国其他事情头疼，可能会脱离同盟。威尼斯大使急忙赶到布达。匈牙利人的反应却令人泄气：匈牙利人感到，这是彻底打垮威尼斯共和国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要求巨额赔款——50万杜卡特，另外还要每年10万杜卡特的贡金，割让的里雅斯特，并要求威尼斯执政官及其继任者成为匈牙利王室的附庸。为了羞辱他们，匈牙利人“热心助人地”提出，如果威尼斯人暂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金，也可以将六七个城镇（包括潟湖岸边的特雷维索和梅斯特雷）和执政官镶嵌宝石的官帽（一个自由共和国的终极象征）作为预付款。“这些要求完全不正当，”大使回答道，“我们不可能接受。”^[17]如果要在屈辱和死亡中做出抉择，那么共和国将战斗到底。一艘船奉命去寻找泽诺的舰队，并把它带回来。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泽诺在哪儿。

8月6日，圣尼古拉教堂的大钟开始发出不祥的鸣响。海平线上出现了一支六艘船的小舰队，悬挂着红白两色的热那亚旗帜。塔代奥·朱斯蒂尼安决定派出与敌人数量相当的战船迎战入侵者。双方战船接近时，威尼斯人发现一名男子正朝着他们的方向游过来。他叫希罗尼莫·萨巴迪亚，是一名在普拉被俘的威尼斯水手。他从一艘行驶的热那亚船上跳水，来警告他的同胞们不要前进。这6艘热那亚桨帆船只是诱饵，在海平面远方还有47艘桨帆船严阵以待。如今威尼斯人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样的爱国主义壮举之上。朱斯蒂尼安机敏地调转船头；封锁的铁链被升起；他驶回了潟湖。

从各个利多之间进入潟湖有三个主要入口；其中两个已被铁链和停在那里的帆船封锁；第三个入口位于潟湖的最南端，是基奥贾的出入口，仍然开放。彼得罗·多里亚就打算从这里进攻。基奥贾岛是威尼斯的一个缩影，有自己的利多保护它免受广阔大海的侵袭，二者之间有一座木桥连接。在这个利多上还有另一个居民点，被称为小基奥贾。再往

南面还有比较大的布朗多罗村。基奥贾对威尼斯来说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它控制着布伦塔河与阿迪杰河的河口，威尼斯就是通过这两条河的水道与意大利中部联系，但这两条河一天天落入正稳步推进的匈牙利和帕多瓦军队手中。帕多瓦人已准备了100艘全副武装的驳船，为他们下游的海军盟友运送给养。

多里亚希望，通过夺取基奥贾，他既能与前进中的陆军取得联系，又能建立一个基地，最终消灭威尼斯共和国。基奥贾坐落在潟湖边，遍布沼泽、盐田、芦苇地、沙洲、狭窄运河与秘密水道。威尼斯与热那亚一个世纪的海战就将在这里一决胜负。威尼斯人总是把自己的世界想象得极其巨大，如今它却只能困守几平方英里的沼泽地。

威尼斯人决心坚守基奥贾。他们武装了布伦塔河沿岸和潟湖岸边的一系列孤立的外围堡垒、水磨坊和塔楼。基奥贾的镇长——彼得罗·埃莫用岩石堵住了布伦塔河的通道。帕多瓦人顽强地克服了一切障碍。凭借大量的人力资源，他们将驳船拖上陆地，开凿新的运河以绕过障碍物，摧毁了一个个孤立堡垒。到8月初，他们占领了布伦塔河口具有战略意义的拜贝塔楼。此地离基奥贾只有4英里。他们在这里建造了控制运河通道和水道的堡垒，并击退小型武装船只的多次反击。只有一个要塞还没有被攻下，即潟湖最边缘的盐床城堡。基奥贾事实上已经被切断了，但威尼斯人对此地的浅水航道烂熟于心：“夜间，许多小船在威尼斯和基奥贾之间偷偷穿梭来往，通过狭窄的水道前往盐床城堡，送去信件和建议。”^[18]

8月8日，帕多瓦士兵及其武装补给船来到布朗多罗村，与停泊在那里锚地的多里亚舰队会合，还运来了数千士兵和大批粮食，将来还会从帕多瓦顺流而下运来更多兵员和物资。此时反威尼斯联军拥有2.4万人。基奥贾的威尼斯守军总共大概有3500人（基奥贾总人口为1.2万），其中许多人负责守卫连接基奥贾岛与其利多（小基奥贾）的桥头

堡。热那亚军队在利多登陆，卸下了他们的攻城器械——投石机和射石炮。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小基奥贾；守卫基奥贾水道的武装帆船被烧毁了。8月12日，他们开始进攻桥头堡。守卫桥头堡的是一座巩固的堡垒。在四天的战斗中，热那亚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16日，急于取得突破的热那亚人宣布，任何能够烧毁该桥的人将获得150杜卡特的赏金。据热那亚编年史家记载，有一个人自告奋勇：

一名热那亚士兵立即脱下他的盔甲，钻进一艘装有稻草和火药的小船，开始向桥划去。接近桥的时候，他点燃稻草，跳入水中，并将小船推向桥……于是桥被火焰吞没了。威尼斯人再也守不住桥梁，就放弃了它。^[19]

匆忙之中他们没能升起他们身后的吊桥。“我们用火焰追击（威尼斯人），而且他们的损失很大，我们一直追到基奥贾的广场上。破坏很严重……广场的地面被基督徒的血液和对威尼斯人凶狠残忍的大屠杀染红。”^[20]

此役中有860名威尼斯人丧生；4000人被俘；妇女儿童蜷缩在教堂里。多里亚将他的桨帆船舰队带进了潟湖内部的安全锚地。热那亚人如今在离威尼斯只有投石之遥的地方有了一个安全的立足点，通过伦巴第水道与威尼斯城直接相连。这是一条深水主干道，纵贯潟湖，即使是吃水很深的热那亚桨帆船也可以直达威尼斯。多里亚距离圣马可广场仅12英里。圣乔治旗帜在基奥贾广场上飘扬；基奥贾的执政官宫殿上方升起了帕多瓦领主的旌旗；邻近的塔上飘着匈牙利旗帜。帕多瓦领主弗朗切斯科·卡拉拉胜利入城，被热那亚士兵以齐肩的高度抬到主广场，士兵们高呼“卡拉拉！卡拉拉！”^[21]他们对更丰厚的战利品垂涎欲滴，期待着将威尼斯洗劫一空，就像当年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那样。

消息于午夜传到威尼斯。钟楼开始回荡响亮的钟声；很快所有的教区都响起警钟。人们全副武装地跑到圣马可广场，了解基奥贾失陷的情

况。人群中有恐惧和惊慌，有哭泣和混乱的叫喊，人们担心热那亚舰队随时都可能通过伦巴第水道，冲到威尼斯来。市民们预料将遭到不可避免的抢劫，便将细软埋藏起来。其他人则更加坚定，宣称“只要剩下的人能够驾驶一艘桨帆船，或者能够使用武器，国家就永远不会亡！”^[22]渐渐地，老执政官以镇定的言辞和坚定的面容安抚了惊慌的人群。第二天，他派出三位大使，前往基奥贾，向敌人求和。一段冗长的演讲过后，他们递给多里亚一张纸，上面列出了他们提议的和平条件。纸上什么都没有写。只要让威尼斯保持自由，热那亚可以提出任何条件。但多里亚的目的是彻底消灭这个讨厌的对手。他的回答十分傲慢：“在我们把马勒套在你们圣马可教堂门廊的马头上之前，不会有和平……然后，才可以有和平。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国家的目标。”^[23]之后，提到被俘虏的热那亚人，他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不要他们。把他们锁好了，因为过几天我便会过来，把他们全都救走。”威尼斯将不得不战斗到最后一息。

城内敲响了钟声，传唤公民集会去听取热那亚人的回复。政府向聚集的人群直言不讳地阐明了他们目前的困境。一年前，热那亚在安济奥海战中的失利几乎将整座城市四分五裂。威尼斯此刻将面临类似的考验，考验它的品格、爱国主义和阶级团结。群众的情绪起初是坚决的。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坐以待毙：“让我们武装自己；让我们给兵工厂里的所有桨帆船配上武器和装备；让我们前进；为保卫我们的国家而牺牲，总好过坐等着匮乏而死。”^[24]每个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国家将实行普遍兵役制。行政长官和政府官员的薪水被停发；新的爱国主义国债开始认购；企业和商贸被抛弃；房地产价格跌至先前的四分之一。为了让他们的青铜马（是从君士坦丁堡抢来的）能够继续不受羁绊地在威尼斯湿润的空气里腾跃，整个城市都动员了起来。在圣尼古拉岛上，人们匆匆建起紧急防御工事；城市周围的浅水区树立起一圈木栅栏；武装小船奉命日夜巡逻各运河；信号系统被重新规定。兵工厂日夜开工，整修之前封存的桨帆船。

然而，这番在圣马可旗帜下团结一心、抵御外辱的爱国景象背后，其实隐藏着危险的裂痕。在需要为国牺牲的危急时刻，群众对贵族阶层令人无法忍受的傲慢怒不可遏。人民希望领导者能和他们共同承担相同的条件和危险。船员们宣称，除非贵族们一同前往，否则他们不愿意去防守圣尼古拉岛上新开挖的战壕。塔代奥·朱斯蒂尼安被任命为城防总司令，这几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群众显然非常讨厌他；他们只愿意接受一个人。“你要我们上桨帆船，”圣马可广场上呼声高涨，“那就让皮萨尼船长带领我们！我们要求释放皮萨尼！”^[25]人群越发壮大，反对的呼声越发高涨。根据民间流传的传记，皮萨尼在监狱里听到了群众的呼声。他把头靠近铁窗，高呼：“圣马可万岁！”^[26]人群以嘶哑的吼声做出回应。在牢房楼上的元老院会议厅里正进行着一场惊慌失措的辩论。群众将梯子搭在窗外，有节奏地敲打着会议室的门，持续不断地呼喊：“韦托尔·皮萨尼！韦托尔·皮萨尼！”^[27]元老们彻底惊慌了，最终屈服：皮萨尼将被释放。令人神经紧绷的一天终于结束，得知自己获释的消息时，皮萨尼只是平静地说，他宁愿在牢里度过这个夜晚，进行祈祷和冥想。明天再出狱也不迟。

8月19日黎明，威尼斯历史上最难忘的场景之一上演了。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皮萨尼走出监狱，重获自由。桨帆船水手们将他扛在肩膀上，抬上宫殿的台阶。大家纷纷爬上窗台和胸墙，争相一睹这位豪杰的英姿，他们举起双手指向天空，大声呼喊地庆祝。皮萨尼被送到执政官面前。他们马上就和解了，并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皮萨尼谨慎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谦逊地承诺效忠于共和国。之后，他再次被人群扛到肩膀上，抬回他的宅邸。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但同时也是危险的。仅仅二十四年前，一位执政官因为企图政变而被斩首，而皮萨尼也对个人崇拜表现出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回家路上，他被一位老水手拦下了，这位水手向前一步并高声呼喊：“现在是时候夺取城市的政权，为你自己复仇了。看

哪，所有人都愿意为你效力；只要你做出决定，所有人都愿意在这时刻拥护你为君王！”^[28]皮萨尼转身重重地给了老水手一拳。他提高了声音，喊道，“让所有祝福我的人不要再说‘皮萨尼万岁！’——而应该说，‘圣马可万岁！’”

事实上，元老院为民众的反抗而感到十分恼怒，在授予皮萨尼荣誉时非常吝啬，而群众起初没有理解这一点。皮萨尼并未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而仅仅是利多的防御指挥官。水手们被命令仍听命于讨厌的塔代奥·朱斯蒂尼安。这一消息传开后，民众又一次掀起了反抗的浪潮。他们扔下手中的旗帜，并宣布，他们宁愿被砍成肉泥，也不愿服从塔代奥。20日，元老院再次做出了让步。皮萨尼被任命为城防总司令。在圣马可教堂举行的激动人心的就职仪式上，他表示誓死效忠共和国。



圣马可广场的码头。在双柱前的水边，搭起了招募士兵的长凳

皮萨尼的任命正式生效后，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次日，按照惯例，招募台被设立在双柱旁边；书记员记录的速度都比不上志愿者报名的速度。各种各样的人都报名参军：艺术家和刀匠，裁缝和药剂师。缺乏技能的新兵在朱代卡运河接受划船训练；石匠们飞速地在圣尼古拉岛建起

石质堡垒；30艘被封存的桨帆船重新装配完毕；栅栏和铁链环绕城市，并封锁运河；城市每个防区责任到人。防御工事日夜都有人守备。许多人还为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的积蓄，妇女们献出自己的首饰，以购买食物和支付军饷。

这一切准备都不算早。8月24日，在黑暗中，多里亚发动了双管齐下的攻击。一支军队试图在圣尼古拉岛登陆。第二支部队乘着一大群轻舟，攻击保护城市南海岸的栅栏。两次攻击均被打退，但守军被迫放弃了利多沿岸的其他城镇。多里亚在马拉莫科建立了大本营，从那里他可以炮轰潟湖南部的岛屿。从圣马可教堂的钟楼上可以看到红白两色的旗帜。

威尼斯对外的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现在只剩下一条陆路通道，通过它可以接收物资补给。大海已被严密封锁。但是，战局有了一点变化。多里亚错过了一次机会。若在基奥贾陷落后，他便立即猛攻威尼斯，那么这座城市肯定早已投降了。他短暂的犹豫让皮萨尼有机会重整旗鼓，多里亚24日的失败也给了威尼斯一线希望。帕多瓦领主因为多里亚未能乘胜追击、一举得胜而恼怒，礼节性地将他的部队撤走，去攻打特雷维索。多里亚决定进行消耗战。他要将威尼斯活活饿死。随着冬天慢慢来临，他将部下从利多撤回基奥贾。威尼斯城内的供给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绝望之下，有人竟建议放弃这座城市，全体移民克里特岛或内格罗蓬特。这提议立即遭到了拒绝。爱国的威尼斯人宣称：“他们宁愿葬身于城市废墟之下，也不愿意放弃城市。”^[29]

^[1] Thiriet, F., ‘Venise et l’occupation de Ténédos au XIVe siècle’,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vol. 65, no. 1, 1953, p. 220

^[2]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26

^[3]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660

[4] Machiavelli, Niccolò, *The Prince*, trans. W. K. Marriott, London, 1958, p. 66

[5]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662

[6]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668

[7]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93

[8]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56

[9]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63

[10]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65

[11]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67

[12]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69

[13] Gatari, Galeazzo e Bartolomeo, *Cronaca Carrarese: 1318-1407,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7, part 1, Bologna, 1909, p. 169

[14] Gatari, Galeazzo e Bartolomeo, *Cronaca Carrarese: 1318-1407,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7, part 1, Bologna, 1909, p. 169

[15]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77

[16]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82

[17]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 Venice, 1912-21, vol. 3, pp. 272-3

[18]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49

[19] Gatari, Galeazzo e Bartolomeo, *Cronaca Carrarese: 1318-1407*,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7, part 1, Bologna, 1909, p. 177

[20] Gatari, Galeazzo e Bartolomeo, *Cronaca Carrarese: 1318-1407*,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7, part 1, Bologna, 1909, p. 177

[21] Gatari, Galeazzo e Bartolomeo, *Cronaca Carrarese: 1318-1407*,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7, part 1, Bologna, 1909, p. 177

[22]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682

[23]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52

[24]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p. 682-3

[25]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93

[26]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96

[27]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196

[28]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p. 206-7

[29]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688

13.战斗到底

1379年秋～1380年6月

缓慢地，无情地，威尼斯正在被渐渐榨干，因为“热那亚人将它紧紧封锁，无论从海上，还是从伦巴第方向的陆上”。^[1]随着秋色渐深，小麦、葡萄酒、肉类以及奶酪的价格飙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威尼斯人尝试获取给养，却遭遇大祸：11艘在海岸远处装载粮食的轻型桨帆船被敌人拦住并摧毁。威尼斯人不分昼夜、神经紧绷地守护栅栏，等待教堂钟声的响起，在逐渐恶化的天气条件下坚守利多的战壕，这一切都开始消磨他们的力量和意志。与此同时，热那亚人持续收到沿着帕多瓦河顺流而下的丰富给养。但在基奥贾沦陷激发的民愤之后，威尼斯贵族也意识到，他们最好关注穷人的苦难，这样做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人们被告知，“所有受饥饿所迫的人，到贵族的住所去；在那里，你将会找到朋友和兄弟，他们会与你分享最后一面包皮！”^[2]贵族与平民间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团结。

唯一的救援希望就是泽诺的归来，但他依然在远方。11月，人们得知，他目前在克里特岛外海，在之前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从意大利海岸到金角湾的广阔海域劫掠热那亚人的船只。又一艘船被匆匆派去召他回来。知道了他的下落，让人们有了些许期盼。

皮萨尼的水手们试图毁坏多里亚的补给链。他们运用自己对内层潟湖、小海湾、秘密航道、沙洲和芦苇滩的知识，拦截在布伦塔河顺流而下的补给船。基奥贾城内有威尼斯人的探子，在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下，威尼斯人组织了由小船组成的若干小组，探测浅滩，黎明或黄昏时潜伏起来，袭击没有防备的为热那亚人输送粮食与葡萄酒的商船。在盐床城堡（遭到围攻的威尼斯前哨阵地，靠近基奥贾）附近，威尼斯人伏

击了许多敌军补给船，迫使帕多瓦人为补给船提供武装护卫，也使得商人们不愿意冒险为热那亚人运输给养。威尼斯小船相对于吃水较深的热那亚桨帆船也有较大优势，再加上热那亚人不熟悉这里的水道，如果遇到浅水或者迷路，容易搁浅。威尼斯人密切关注着热那亚船只的行动，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诱捕那些孤立的桨帆船，就如同猎人围猎大象一般。他们在夜间停靠在苇丛中，利用雾幕和夜色的掩护，突袭笨重而难以机动的敌人；派弓箭手小分队登陆，在茂密树林掩护下射击；点燃芦苇丛，扰乱敌人；抄小路阻截他们的猎物；在骤然响起的喇叭与鼓声中，出其不意地乘小船疾驰而出。这些游击战术开始摧残敌人的神经，令其风声鹤唳。威尼斯人包围并摧毁了一艘敌人桨帆船——“萨沃纳人”号，并俘虏了其贵族船长，一时间士气大振。

这是一个很小的胜利，对士气的鼓舞却很大。为了扩大战果，皮萨尼试图伏击3艘准备去炮击盐床城堡的桨帆船，然而，敌船发现了芦苇丛后威尼斯士兵的旗帜，计划失败了。热那亚桨帆船火速倒退，冒着两岸射来的箭雨和石弹，溜走了。皮萨尼也曾有过严重的挫败。在日渐增强的好奇心驱使下，他试图侦察基奥贾的防御工事，结果在战斗中损失了10条小船和30人，包括执政官的侄子。但在密切观察敌人阵地和潟湖出入口后，他确信一次大胆的袭击有成功的可能。两军兵力悬殊。敌人拥有3万人、50艘桨帆船、七八百条小船、充足的粮食供应，而且木材、火药、羽箭、弩箭一应俱全。但他们也有一个隐蔽的弱点，皮萨尼确信敌人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个短处。

在深秋的一天，他向执政官和战争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采取积极的行动。整座城市已经快走投无路了。泽诺下落不明；人们因缺乏希望和食物短缺而萎靡不振；与其让他们的士气日渐低落，不如让他们血洒战场。威尼斯聘请的陆军将领贾科莫·德·卡瓦利支持皮萨尼的计划。元老院接受了提议。也许是仍未忘记水手们在会议厅大门外的呐喊，他们发布了一条不寻常的法令，以动员精神委顿的爱国群众。一百

年来，威尼斯贵族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平民无法获得贵族身份。现在，元老院发布一则公告：在共和国最危急的紧要关头，做出最杰出贡献的50位公民将被授予贵族身份。

于是，金钱、资源以及善意源源不断地流入，在短期内对人们起到了激励作用。装配桨帆船的工作在兵工厂里紧锣密鼓地进行；大运河里，划桨技术不熟练的志愿者们在接受训练。但形势仍然万分危急。饥寒交迫促使人们聚集于广场之上，人心惶惶，悲痛流涕。泽诺何时归来？人们担心，任何延误都将对这座城市的意志力造成致命打击。等待下落不明的泽诺舰队是不切实际的，同时从基奥贾那里传来消息：热那亚人和帕多瓦人为战利品的瓜分吵得不可开交，这表明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老执政官宣布，他将亲自担任舰队总司令，由皮萨尼担任副总司令，一同率军出战。

强制的命令被发布出去：所有桨手和士兵务必于12月21日中午前登船，违者一律处决。执政官安德烈亚·孔塔里尼把人们集合在广场上的圣马可旗帜下；人们在教堂里做晚祷，接着舰队在华丽的排场下准备起航。威尼斯舰队共有34艘桨帆船（船长都是贵族）、60艘三桅帆船、400艘小船和2艘大型柯克船^[3]（是笨重的商船，但对行动的胜利至关重要）。现在是冬至日（白昼最短的一天）晚上八点，已是严冬，但夜色澄澈温和，海面静如明镜，只有微风习习。孔塔里尼一声令下，雄壮的威尼斯战旗便迎风招展。静静地，粗重的缆绳被解开，舰队出发了。舰队被划分为三部分。处于先锋位置的是皮萨尼的14艘桨帆船和2艘柯克船；后卫是10艘桨帆船；执政官则占据了中心位置，拥有必需的装备和经验较丰富的士兵。

皮萨尼的计划简单但风险极大。他曾密切观察热那亚人的出出进进；他们已经变得洋洋自得。多里亚相信威尼斯已是他囊中之物，现在不需要多少力气就能把饥肠辘辘的敌人的残余力量榨干。基奥贾有三个

出海口。其中两个位于它的利多的两端，直接通向大海；第三个就是伦巴第水道，在基奥贾岛背后，流经潟湖。皮萨尼的想法是封锁这三个出口，把敌人围困其中。围城军就会反过来被包围。

在漫漫黑夜的笼罩下，舰队逐渐推进，敌人毫无察觉。一段时间以内，浓雾模糊了一切，引起了暂时的惊慌，接着就像它突如其来一样，一切又变得明朗了起来。到十点钟，他们已经抵达基奥贾外海，即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没有敌船，没有干扰，也没有敌军守卫。12月22日黎明时分，威尼斯桨帆船开始将士兵送上基奥贾的利多。4800名士兵以及一些木匠和挖掘战壕的工人登陆了。与此同时，皮萨尼指挥柯克船驶向伦巴第水道的入口。

在利多上，威尼斯人开始修建防御堡垒。木匠发出的声响惊动了躺在沙丘的一小队帕多瓦士兵，战斗随即打响。匈牙利和帕多瓦军队从布朗多罗村推进。其余的从基奥贾过桥，蜂拥而至，热那亚的舰队也开始炮击。威尼斯人被打退了，试图撤退到船上，但惨遭屠戮。当他们逃跑时，有600人被杀、溺亡或被俘。威尼斯人的堡垒被迅速摧毁，但同时，趁敌人的注意力完全被战斗吸引时，威尼斯人的两艘柯克船被牵引就位——一艘靠近岸边，另一艘阻塞了主航道。第一艘遭到轰击，沉没了；一些热那亚人游向第二艘柯克船，将其点燃。它烧到了吃水线，最后也沉到了海里。“为了这带有欺骗性的胜利，热那亚人欢呼雀跃，却不曾觉察到真正的危险。他们就这样喜气洋洋地返回了基奥贾。”多里亚充斥着成功的自满。“威尼斯人在一天内所做的，我可以在一小时内毁灭，”他自以为是地评论道。^[4]但他对敌人的战术安排和己方士兵的行动带来的意外影响一无所知。无论如何，沉没的柯克船已经有效地堵住了航道。威尼斯执政官又带来了两艘满载岩石、大理石和大磨盘的柯克船，将这些东西倒入沉船中，然后用铁链缠绕。它们现在变成了无法移动的障碍物。

24日，威尼斯舰队南下去封锁基奥贾南端的出海口——布朗多罗村。又有两艘柯克船被拖到那里。多里亚意识到自己被逐渐包围，但为时已晚。他派出了桨帆船，去摧毁威尼斯人的特别任务部队，并用布朗多罗的地面炮台轰击威尼斯人，但威尼斯人再次设法沉下了船只，并以树干、船桅和铁链巩固了这障碍物。冒着猛烈炮火，威尼斯工程师们开始在弗索内（在布朗多罗的对面）岸边建造一座堡垒，称为洛瓦堡。到12月29日，工程即将完成。在圣诞节，或是圣诞节次日，皮萨尼绕利多航行，成功封锁了伦巴第水道，完成了他的任务。基奥贾如今被包围了；它唯一的对外通道是通过河流与意大利中部联系。

热那亚人的航道被一个接一个地封闭，焦虑和绝望的情绪开始弥漫在他们当中。对他们来说，打破封锁是至关重要的。而对封锁基奥贾的威尼斯人而言，尽管他们先前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士气仍旧岌岌可危。在背风的海岸，他们的桨帆船必须日日夜夜保持警惕。在弗索内和佩莱斯特里纳岛（与基奥贾邻近）尖端的战壕内，威尼斯人遭到持续轰炸。粮食依旧短缺；寒冷的天气导致士气低沉。很多人是平民志愿者，是工匠、商人和工人，而不是习惯于战事波折的军人。威廉·库克领导下的英格兰雇佣兵怨声载道。执政官力图以身作则，拔剑起誓：除非占领了基奥贾，否则他绝不回威尼斯。即便如此，威尼斯内部依旧发生了分裂。泽诺杳无音信。士兵们想回到威尼斯。到12月29日，他们的苦难到达了极点：食物匮乏，寒气逼人，遭到敌人持续轰击，不得不涉水通过冬季运河，他们到了崩溃边缘。危险、劳累、缺乏睡眠、死亡，以及现在令人生厌的潟湖——喃喃的抱怨声变得越来越不祥。许多人想要完全放弃威尼斯，航行到海外领地，去内格罗蓬特或克里特岛。皮萨尼试图鼓舞部队：如果他们都离开，胜利的机会将一去不复返。他争辩说，援军就快到了；泽诺在驰援赶到。最终，执政官和他的副将与反对派达成了协议。如果泽诺在1月1日还没回来，他们将解除对基奥贾的围困，返回威尼斯。现在仅剩48个小时来拯救威尼斯。人人皆知，多里亚也在等待进一步的海军增援。

30日和31日在寒冷和痛苦的等待中度过了。1月1日的黎明到来了。对威尼斯人来说，这可不是新一年重要的开端——在他们的日历里，新年是3月1日——但他们仍然心急如焚地迎接这一天。借着冬季微弱的曙光，可以看到南方的海平线上出现了15张船帆。由于距离太远，很难确定飘扬的旗帜属于哪一方——圣马可的雄狮还是圣乔治的十字架。热那亚人从基奥贾的塔楼观察，威尼斯人则从他们的船只和战壕中眺望。焦急万分且满腹忧虑，皮萨尼派遣小船前去侦察。进入目力可及的距离后，他们可以看到，圣马可的旗帜飘扬在桅杆顶端。来船正是泽诺，他结束了在地中海东部的劫掠行动，给热那亚的商业以沉重打击，如今返回了。他已经在海上堵截了输送给多里亚的援军和给养，捕获了70艘船，包括一艘满载极其贵重货物的商船——如今被他拖在一艘桨帆船后。这是战局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战争风云中一个深刻的心理变化。

面对威尼斯的增援海军，热那亚人日渐绝望，拼命挣扎，寻求出路。城镇的两个出海口位于布朗多罗和基奥贾航道，分别由泽诺和皮萨尼把守。他们需要日夜维持一队桨帆船驻守，来对付热那亚人可能的突围。冬季天气极其恶劣；吹向陆地的大风和急流不断地威胁着要将威尼斯船只冲到敌方海岸。一天傍晚，西洛可风从南方劲吹，再加上海流湍急，泽诺的旗舰被扯离停泊处，冲向了热那亚人的堡垒。泽诺旗舰瞬间深陷枪林弹雨；泽诺本人也被箭射中了喉咙。船只在海浪中翻腾，慢慢地漂向死神的血盆大口。船员们在狂轰滥炸中畏缩不前，央求他们负伤的指挥官降旗投降。坚不可摧的泽诺绝不肯投降。他把箭从自己的喉咙里拔出，然后大声命令一名水手带着牵引绳游回系泊处。他大声训斥，让船员们陷入沉默，然后跑过甲板，从一个敞开的舱门摔了下去，背部重重着地，失去了知觉。泽诺头部的伤口流血不止，鲜血几乎使他窒息；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他昏昏沉沉地苏醒，爬了起来。他活了下来，继续战斗。

考虑到环境的恶劣以及布朗多罗水道的狭窄，威尼斯人最终决定只留两艘桨帆船守卫，如果有需要，就吹响喇叭；其余的舰船在一英里外的海岸停泊，可以听到喇叭的警报声。目睹了这一切，在1月5日的晚上，多里亚做了一次坚决的努力，尝试将障碍物移开。3艘配备大抓钩和粗壮缆绳的热那亚桨帆船列队前进到水道入口处。他们的目标是将沉船、船柱和树干从出口拖拽出来。第一艘热那亚桨帆船抵达入口处时，最前方的威尼斯桨帆船吹响了军号，开始攻击。威尼斯人设法登上了第一艘敌船，但随后赶到的两艘热那亚船勾连着他们的手，并将缆绳另一端送到运河岸上，那里的一大群人将这艘无助的威尼斯桨帆船拖进了布朗多罗港，其他威尼斯船只没来得及救援它。第二艘威尼斯桨帆船被一排箭逼退，无计可施。热那亚人胜利地将战利品拖进自己的港口，船上的许多威尼斯人自己跳河溺亡了。泽诺来得太晚了。

就这样，在潟湖边缘的狭窄水道和沼泽地，双方你来我往地激战。热那亚不断尝试寻找突破钢铁包围圈的出路；威尼斯人则努力把包围圈收紧。第二天，匈牙利军队对基奥贾水道发动了一次坚决的突袭。但他们被击退了。在热那亚，战局的突然逆转引起了不安。1月20日，他们派遣了一支由20艘桨帆船组成的新舰队，由马泰奥·马鲁弗指挥；然而就像泽诺一样，这位热那亚舰队司令的视野不局限于一处，他跨越海洋，俘虏威尼斯的粮船，洗劫港口。遥遥四个月之后，他才到达基奥贾。

威尼斯封闭了基奥贾的出口，但未能阻止敌人通过内河为被围城镇提供给养。威尼斯人自己也迫切需要补给。他们派遣3艘桨帆船溯波河而上，载着一队士兵，去收复具有战略意义的拉雷多城堡，它控制着前往费拉拉城的河道。一旦拿下拉雷多，就可以从河上输送人员和物资到威尼斯。随着共和国包围了基奥贾的消息传播开，商人们开始冒险向城市供应葡萄酒、奶酪和谷物。物价仍然很高，但希望也增加了。

威尼斯人借助两门巨型射石炮摧毁了拉雷多要塞。其中一门射石炮叫作“特雷维萨娜”，可发射重达195磅的石弹，而略小的“维多利亚”可发射120磅的石弹。这两门原始的铸铁大炮（炮管捆绑着铁箍，以防炸膛）被运到布朗多罗对面的堡垒处，拆卸下船。威尼斯人的做法是在晚上装填炮弹（将一发巨大的石弹推入膛是一个漫长过程）然后在破晓时分发射，那时热那亚人仍集中在布朗多罗。在这“唤醒服务”的同时，还用投石机猛轰敌人。众所周知，射石炮的精度很差，但在合理射程内，对大型静态目标的命中率还是相当高的。1月22日上午，“特雷维萨娜”取得了重大成功。它的巨大石弹击中了布朗多罗的钟楼。一大块砖石坠落到广场上，杀死了彼得罗·多里亚和他的侄子。“在极度的哀伤与悲痛中，尸体被运到基奥贾，以盐腌保存，以便将来运回热那亚安葬。”^[5]次日，在炮击中坠落的砖石又杀死了20人。一座被热那亚军队占据的修道院遭到炮轰，导致更多人丧生。加斯帕雷·斯皮诺拉接替了多里亚，但威尼斯人一天天加强了压力：“在威尼斯射石炮和投石机的持续轰击下，热那亚人的桨帆船和补给船都无法离港。”^[6]威尼斯人意识到，战局开始改变方向了。他们将自己的资源动员到了极限，抢在敌人援军抵达之前，于2月初雇用了5000名米兰和英格兰雇佣兵，来巩固他们先前取得的优势。现在轮到热那亚人焦急地向海面张望、等待救援舰队了；他们还可以从上游的帕多瓦获得补给，但他们插翅难飞。因为无法突破海上封锁，他们开始挖掘一条穿过布朗多罗岛、通往大海的运河。他们打算在运河竣工后，趁夜色将桨帆船偷偷驶向扎拉，获取补给。

两个航海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在意大利各地再次引起不安，教皇又一次开始了周期性的尝试，希望交战双方能够议和。威尼斯表示有意议和（战争的结局还很难说得清），但与匈牙利、帕多瓦和热那亚三国同盟谈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热那亚人在利多上挖掘的逃生水道令威尼斯非常焦虑。他们决定攻

击布朗多罗，以消除这个威胁。2月18日，泽诺被任命为共和国陆军总司令，奉命占领布朗多罗村，并夺取位于修道院的敌军指挥部。他手下有1.5万人听候调遣。次日黎明前，桨帆船和部队集合时，计划有了改变。新的目标是攻打小基奥贾的塔楼和堡垒（它们控制着通往基奥贾本身的桥头堡），以阻止敌军援兵通过。在桥头堡的战斗很快变得颇为激烈。一大队热那亚士兵从布朗多罗村向前推进；更多士兵从基奥贾赶来；这两拨人马都被威尼斯军队击退。热那亚人四处逃窜。一些人通过芦苇滩逃跑，蹚水渡过运河或被淹死；更多人惊慌之下调头，顺着桥逃回去了。太多的人涌上木桥，以至于它崩裂倒塌了。

在运河的深处，在桥面上，1000多人在炮轰之下身亡或被俘；很多人跳入水中，四散逃命。其中一些人溺亡，其他人则在石块的轰击之下死的死，伤的伤。在木桥倒塌时仍在桥上的那些士兵，因为身披重甲，很快沉没到了水底；那些竭力从运河游出来的人刚一上岸，就被雨点般的石块砸死.....如果不是木桥支撑不住，威尼斯人在那些逃兵之后，可能已经进入基奥贾并重新掌控它，就像他们当初失去基奥贾那样。^[7]

热那亚人的士气发生了突然的、灾难性的崩溃。据说，此役之后，“想买全副铠甲的人只消花几个铜板，就能从剥死人甲冑的人手中买到一套，想买多少套都可以”。^[8]这场灾难后，布朗多罗村摇摇欲坠。热那亚人用桨帆船将他们的射石炮运到基奥贾。次日天亮前两小时，他们将修道院付之一炬，焚毁了自己的攻城武器，然后乘桨帆船离开——一些人前往基奥贾，但许多帕多瓦人完全放弃了攻城。威尼斯人不费一枪一弹便收复了布朗多罗。皮萨尼设法救下了热那亚人试图烧毁但未成功的两艘桨帆船“以及许多三桅帆船、小船和热那亚人慌乱中遗弃的其他东西”。^[9]泽诺在与基奥贾仅有一条运河之隔的地方扎营，运来了射石炮和投石机，“不分昼夜地向基奥贾镇投掷巨大的石块，摧毁了许多房屋，死伤无数”。^[10]一位目击者写道：“我记得，我们的桨帆船有时非常接近基奥贾，向那里投掷了不计其数的石块。”^[11]

在这个关键时刻，威尼斯人却犹豫不决起来，就像攻防战早期的多里亚那样。“大家普遍认为，如果威尼斯人在当时立刻攻击的话，就能拿下基奥贾；但他们没有冒这个险。”^[12]就像热那亚人之前那样，他们选择了用饥饿迫使敌人屈服，紧紧地钳制基奥贾通往帕多瓦的陆路和水路，“就算一封信或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能从基奥贾送到帕多瓦；热那亚人插翅难逃，将会消耗完他们的物资”。^[13]热那亚人在桥上溃败时，威尼斯人没有乘胜追击，这在基奥贾镇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它实际上振奋了热那亚人的士气。他们驱逐了镇内的威尼斯妇女儿童，以尽可能久地维持补给，并固守待援。这场较量持续了整个春天。帕多瓦领主继续攻打威尼斯的关键城市——特雷维索；在曼弗雷多尼亚海岸，缓缓逼近的热那亚救援舰队俘虏了一整支威尼斯运粮船队；一个装扮成德意志人的威尼斯间谍身份暴露，遭受严刑后供出了共和国的作战计划。教皇继续施压，致力于和平。

现在，基奥贾的希望都寄托在热那亚的海上援军和帕多瓦领主身上。尽管威尼斯人竭力封锁，补给物资仍旧能设法顺流而下，运抵基奥贾。在一次大胆的行动中，当河水涨满时，40艘满载粮食、武器和火药的驳船漂浮着顺流而下。他们强行突破了一道薄弱的河上防线，成功抵达了基奥贾。威尼斯人的回应是用栅栏阻断了所有能抵达基奥贾的水道，并将他们的武装船只数量翻了一番。当热那亚补给船试图返回时，遭到了威尼斯人猛烈的抵抗，不得不退回基奥贾。基奥贾背后的沼泽地和水道变成了两栖作战的战场：乘船的士兵在河上对战；步兵在运河中挣扎前进；有人埋伏在莎草丛中。热那亚人占据着一系列设防的水磨坊，这都成了威尼斯人攻击的目标。4月22日，威尼斯人猛攻一座磨坊，但被逐退，“这场胜利让磨坊里的人欢天喜地，他们点燃了火把，基奥贾的人因此知道发生了什么”。^[14]次日，战斗继续进行。威尼斯人再次攻击磨坊，而热那亚人从基奥贾派遣了80艘船去破坏栅栏、重新打开通向帕多瓦的水路。收到关于热那亚人举动的警报后，威尼斯人暂停了对磨坊的攻击；在芦苇的掩护下，他们偷偷潜行，伏击了热那亚人的

突围队伍，“随着狂野的叫喊，石弹和羽箭横飞，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5]热那亚船员们丢弃了船只，通过芦苇滩和干涸的航道逃跑。仅有6艘小船得以逃脱。对于热那亚，这是不吉利的一天：4月23日是圣乔治的宗教节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补给品能够到达被包围的基奥贾。

尽管热那亚人实施了不少成功的反击，但基奥贾承受的压力却始终没有缓解。威尼斯人意识到，战争正在接近尾声。老执政官的四个冬季月份都是在佩莱斯特里纳岛的临时营地度过的，他于4月22日写信给战争委员会，说自己年迈体衰，请求允许他返回威尼斯城。威尼斯人对待国家公仆如同对待敌人般不屈不挠，礼貌地拒绝了他。孔塔里尼被誉为国家大业的“生命之血、安全和士气的保障”。^[16]于是他留在了攻防战前线。对于可憎的敌人，威尼斯人更不会做任何让步。基奥贾内部的补给已经告急。热那亚人和他们的盟友之间存在分歧，他们中的许多人想放下武器离开。威尼斯人直截了当地宣告：任何逃出基奥贾小镇的人若是被他们抓住，都将被绞死。他们要在热那亚救援舰队出现前，用最快速度饿死基奥贾镇里的人。基奥贾镇内，弹药即将耗尽。守军被迫吃老鼠、猫、螃蟹和海藻。从粗劣的贮水池里打上来的水又脏又臭。他们焦虑地盯着大海，但什么都没看到。

绝望的谈判接踵而至。基奥贾镇守军同意投降，条件是允许他们自由离去。威尼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并且有固定的最后期限——过了这最后期限，所有被抓获的人都将处以绞刑。最后期限过去了。热那亚人仍一直眺望大海，盼望着救兵的出现。6月6日，“上午九点”，马鲁弗的舰队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17]热那亚人攀上了房顶，哭着喊着，挥舞着旗帜。热那亚舰队司令开了一炮，挑衅皮萨尼出战，但遭到了拒绝。马鲁弗每天都这样向对方挑衅。最终，皮萨尼率军出战，将热那亚舰队驱赶到了几英里外的海岸。在屋顶上，守军们带着难言之痛，眼睁睁看着圣乔治旗帜慢慢离去。

基奥贾的枪炮早已停火。弹药已经耗尽，守军已奄奄一息。威尼斯和热那亚军官们开始隔墙谈判。教皇使节再一次试图安排休战，但威尼斯人表示拒绝。马鲁弗于6月15日从扎拉再次赶来，并带来了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但他的桨帆船又一次只能在基奥贾外海转悠。守军决定孤注一掷，强行突围。他们用手边各种可用的木材——板条箱、床、房屋木料——临时建造了一批船。他们还向马鲁弗发去一条消息，让他派送船只前往利多救援。突围行动无望地失败了；拼凑起来的船只被运河里的栅栏阻挡住，遭到拦截、俘虏，或被击沉。马鲁弗撤军了。6月17日，热那亚释放了战俘，并派出三位大使前往泽诺的营地。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逃出生天的努力，企图与雇佣军部队单独做一笔交易：他们可以让出基奥贾，任凭雇佣兵劫掠，以此换取安全撤离的自由。既然俘虏已经全部归还，威尼斯也需要允许雇佣兵洗劫基奥贾，来安抚他们。一名不听话的雇佣兵统领被威尼斯人绞死在双柱之间，以管束雇佣兵队伍。

6月21日，热那亚人的代表团前往威尼斯执政官的营地，被迫接受无条件投降。次日，指挥官斯皮诺拉最后一次升起圣乔治旗帜；无计可施的热那亚舰队再一次出现了。斯皮诺拉命令降下旗帜，作为投降的信号。马鲁弗以烟雾信号做出回应，恳求守军再坚持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他们明白，基奥贾的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心灰意冷地回到了港口。”^[18]

6月24日，威尼斯执政官来到支离破碎的小镇；经历了十个月的占领后，圣马可旗帜又一次在基奥贾上空升起；面容憔悴、眼神恍惚、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半死不活的守军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投降。胜利者仔细地对战俘分类；他们以一种特殊的发音习惯，将帕多瓦人、匈牙利人、雇佣军与热那亚人区分开。他们要求俘虏们读出单词“capra”（山羊），热那亚人只能用自己的方言读作“craipa”。4000名热那亚人被赶到了临时搭建的战俘营，很多人死在那里；那些可以正确读出“capra”的人

则被释放了。

1380年6月30日，执政官终于获准重返威尼斯。他乘坐专门为此场合装扮一新的金船进入城市。100名俘虏桨手划着金船，后面紧跟着17艘垂头丧气的热那亚桨帆船，它们的旗帜被拖在水里，以示战败的羞辱。当初前来驯服圣马可的雄壮舰队如今只剩下这些残兵败将。在皮萨尼陪同下，在一大群小船的环绕下，金船在声声钟鸣、阵阵炮响和胜利的雷鸣般欢呼中凯旋。兴高采烈的人群如此拥挤，执政官的队伍几乎无法从人群中挤出一条道路走向圣马可教堂，在那儿将为威尼斯的胜利举行庄严的感恩弥撒。

对威尼斯人来说，还发生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6个星期以后，在跨越亚得里亚海追击马鲁弗舰队残部时，皮萨尼牺牲了。在海上连续作战两年多之后，他于8月15日在曼弗雷多尼亚死于伤口感染和高烧。威尼斯人民悲恸欲绝。从来没有一位威尼斯海军将领受到人民如此的爱戴和如此深切的哀悼。他一直受到人们的欢呼拥戴，直至最后也如此；他的葬礼队伍在前往圣安东尼教堂时引发了人民的集体悲恸。一队水手穿过拥挤的人群，抢走了棺材，高呼：“我们是圣安东尼的孩子，我们要将英勇的船长送到他身边！”^[19]

但是，次年于都灵签署的和约对威尼斯来说不算胜利，而只是避免了失败。威尼斯收复了在特雷维尼亚诺的陆地领土，但达尔马提亚海岸仍然在匈牙利手中。威尼斯恢复了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但再次被逐出亚速海。两个共和国之间的竞争又如同以前一样继续下去。曾引发了整个冲突的忒涅多斯岛几乎被人遗忘，现已被非军事化。它的堡垒被拆毁，其希腊居民被强行迁往克里特岛。唯一从这样的解决方法中得益的是土耳其人，他们现在使用废弃的忒涅多斯海港作为海盗行动的基地。

威尼斯比热那亚坚持得更久，不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更强，而更多得益于其体制的巩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以及人民对圣马可旗帜的忠

诚。遭受了基奥贾的屈辱后，热那亚便崩溃了。五年内连续罢免了十名执政官；1394年，热那亚投靠了法兰西国王。对威尼斯来说，这样的投降是不可想象的。它宁愿自己沉入潟湖也不会投降。到16世纪，当委罗内塞^[20]为执政官宫殿增添一幅凯旋的油画时，基奥贾战役的意义便更加清晰了。作为几乎是灾难性失败的反弹，威尼斯最终赢得了争夺地中海贸易的竞争。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敌意仍然没有消除，但热那亚的竞争力逐步衰退了。



皮萨尼墓地的塑像

对两个共和国来说，这场战争在远方还产生了其他的后果，就像远处海面上酝酿的风暴一样。历次热那亚—威尼斯战争阻碍了教皇遏制日渐增长的奥斯曼人威胁的计划。到1362年，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已经包围了君士坦丁堡；1371年，他们打垮了塞尔维亚人；到14世纪末，其领土从多瑙河一直延伸至幼发拉底河。

[1]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61

[2]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689

[3] 柯克船是最早于10世纪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种单桅帆船，汉萨同盟在北欧的海上贸易中大量使用这种船只。

[4]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 277

[5]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00

[6]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00

[7]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05

[8]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05

[9]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06

[10]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p. 106-7

[11]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702

[12]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07

[13]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07

[14]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13

[15]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14

[16]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1 vols, London, 1858, p. 703

[17]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17

[18]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p. 124

[19]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pp. 357-8

[20] 保罗·委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他出生于维罗纳，原名保罗·卡利亚里，父亲是一名石匠，他因为出生地而获得“委罗内塞”（意思是“维罗纳人”）绰号，并以此而闻名。他和提香、丁托列托并称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的“三杰”。

14.海洋帝国

1381~1425

威尼斯被潟湖内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几乎拖得精疲力竭。两年里，所有的贸易都停止了。舰队被毁，国库空虚，连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也在1381年条约中正式转交给了匈牙利。与热那亚的战争、瘟疫、克里特的叛乱和教皇的贸易禁令让威尼斯人在14世纪举步维艰。但是，共和国还是挺了过来。在基奥贾战争之后，这座城市飞速地恢复了元气，令人瞩目。在1381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威尼斯海洋帝国经历了一段意气风发的殖民扩张，将其带上了海上繁荣和帝国霸业的巅峰。威尼斯再次让世界刮目相看。

15世纪初，地中海东部是一大群星罗棋布、如同镶嵌画的小国和互相争斗的利益集团。拜占庭帝国持续地衰落；匈牙利国王们渐渐失去了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土耳其人则在向西扩张，取代匈牙利人；机会主义的加泰罗尼亚人曾是地中海东部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如今开始撤退。在其他地方，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以及一些冒险家和海盗，掌握着一连串岛屿、港口和要塞。随着匈牙利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减弱，而奥斯曼人又步步紧逼，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许多曾经殊死抵抗威尼斯统治的小城市，如今开始寻求威尼斯的庇佑。当奥斯曼人因内战而方寸大乱时，威尼斯共和国愈发繁荣。从1380年到1420年，威尼斯的领土面积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人口也差不多翻了一番。这些新吞并的土地多半在意大利本土，但使得威尼斯巩固其海上霸主和世界贸易轴心地位的，是它的海洋帝国实力的增强。

威尼斯吞并新土地的手段十分灵活：耐心的外交手段兼施以短暂而激烈的武力。1204年之后，威尼斯一口气鲸吞了一个帝国，但1380年后

的新领土是一点一点蚕食而来的。威尼斯派出大使去保证一个希腊港口或一个达尔马提亚岛屿的安全；距离自己地产很远的地主也许会被说服，将自己的地产卖给威尼斯政府，换取现金；几艘武装桨帆船可能足以说服一位身处困境的加泰罗尼亚冒险家，是时候回家了，或是在克罗地亚的某个港口操纵派系斗争；一位犹豫不决的威尼斯女继承人可能会被“鼓励”嫁给一位合适的威尼斯领主，或将她的财产直接捐给共和国。如果说威尼斯的手段是耐心而五花八门的，其核心的政治理念却是惊人地恒久不变：为了威尼斯的荣耀和利益，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优良的要塞、港口以及防御地带。1441年，元老院就像一家公司制定战略计划一样宣布：“我们在海事方面的方针，考虑的是我们的共和国，是保护我们的城市和商业。”^[1]

有些时候，一些城市自愿投入威尼斯的怀抱，以摆脱来自奥斯曼人或热那亚的压力。针对每一项申请，威尼斯都会做精细的成本效益分析，就像商人查验货物。这座城市有没有一个安全的港口？有没有良好的水源给船只提供补给？有可供农耕的内地吗？人民是否恭顺？城市的防御如何？是否控制一条战略海峡？再从反面想想，如果此地被敌国占了的话，会给威尼斯造成多大损失？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卡塔罗足足申请了六次才被威尼斯共和国接纳。而帕特雷则申请了七次。每一次，威尼斯元老们都严肃地听完陈述，然后摇头否决。当涉及全盘买入时，威尼斯会等待价格跌落。1408年，匈牙利的拉迪斯劳开价30万弗罗林^[2]，想把自己对达尔马提亚的权利主张卖给威尼斯。就在随后的一年，当达尔马提亚各城市掀起叛乱反抗匈牙利时，威尼斯仅花费10万弗罗林就买下了这些城市。有些时候，威尼斯会威逼利诱双管齐下地完成买卖；软硬兼施也是一种手段。通过耐心等待、讨价还价、恐吓威胁以及赤裸裸的武力，威尼斯扩张了自己的海洋帝国。

威尼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沿海诸多红屋顶的港口、翠绿岛屿和微型城市收入囊中：希贝尼克和布拉扎，特

劳和斯帕拉托，以及莱西纳岛和库尔佐拉岛，这两座岛屿以造船业和优秀水手而闻名，被誉为“像晶莹的珠宝般澄净闪亮”。^[3]控制这一切的关键在扎拉，威尼斯为了维持对它的统治已经奋战了四百年。现在扎拉高呼着“圣马可万岁！”心甘情愿地归顺威尼斯。^[4]为安全起见，威尼斯政府将扎拉那些爱惹是生非的贵族世家迁往威尼斯城，然后派他们去别的沿海城市当官。威尼斯执政官又一次可以自称“达尔马提亚领主”了。只有拉古萨高傲地保持独立，始终不受威尼斯控制。

这条海岸线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威尼斯桨帆船舰队可以在这片海岸有遮蔽的水道航行。这里的一连串岛屿可以保护船只，帮助它们抵御亚得里亚海变幻无常的狂风——西洛可风、布拉风和密史脱拉风^[5]，并让船只在这里的安全港口停泊。共和国的船只将用达尔马提亚的松木打造，桨手和水手也有很多是达尔马提亚人。人力和木材一样重要，只要共和国存在一天，亚得里亚海东岸居民的航海技能都将由其支配。

如果说扎拉对威尼斯来说很重要，那么科孚岛就更是如此了。1386年，威尼斯从那不勒斯国王那里用3万杜卡特买下了这座岛屿。当地人民非常愿意接受威尼斯的统治，“因为时代动荡不安，人事反复无常”。^[6]科孚岛是一系列基地组成的链条中的最后一环。1203年，十字军在科孚岛停留时，维尔阿杜安说这个岛“非常富裕丰饶”。^[7]它在威尼斯历史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威尼斯人对它很有感情。11世纪，威尼斯在科孚岛与诺曼人展开海战，损失了数千人；他们在1204年得到该岛，占有时间不长便又失去了。科孚岛位于亚得里亚海的出入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可以监视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东西向贸易。在海峡的对面，威尼斯得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杜拉佐港——它拥有充裕的水资源和大片葱翠的森林——以及仅10英里之外的布特林托^[8]。这三个基地互为犄角，控制着阿尔巴尼亚海岸以及通向威尼斯的海上航线。



科孚岛的要塞

青翠多山、冬季降雨充沛的科孚岛成了威尼斯航海系统的指挥中心和威尼斯人中意的任职地。他们称之为“我们的大门”，在此永久设立了一支桨帆船舰队，停泊在安全港口内，听候“海湾统领”的调遣。在危险之际，海湾统领要听从海军总司令的指挥，总司令驾到时战旗挥舞、号角齐鸣。所有经过的威尼斯船只都被强制性要求在科孚岛停留四个小时来交换信息。当看到这壮阔岛屿的轮廓一点点从平静的大海里浮现时，水手们很是激动，因为它预示着威尼斯城已经不远了。科孚岛为水手们提供淡水和娱乐。这里的妓女以两个特点出名，一是她们的美貌，二是她们携带的“法兰西病”^[9]。虔诚而虚弱的水手在归途中会将船停靠在科孚岛以北海岸的卡西奥皮圣母神龛，为平安的旅行感恩。

在帝国扩张的这一波新浪潮中，科孚岛以南的爱奥尼亚群岛也被吞并：青翠的圣莫拉、崎岖的凯法利尼亚和意大利歌谣所称赞的“桑特，黎凡特的鲜花”。勒班陀是位于科林斯湾内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对奥斯曼人而言也具有潜在的诱惑。威尼斯政府派遣海湾统领率领5艘桨帆船前往，命令他要么强攻，要么将勒班陀买下。勒班陀的阿尔巴尼亚领主得到了两个选择：要么被斩首，要么交出勒班陀以换取每年1500杜卡特的年金。他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老实地离开了。

对新领地的占领像淘金热一样，延伸到整个希腊沿海地区。威尼斯在1414年买下了宗奇奥，这是靠近莫东的一座防御完善的港口；通过贿赂，威尼斯获得了位于阿尔戈斯湾的纳夫普利翁和阿尔戈斯；1423年，

萨洛尼卡乞求威尼斯保护它，以抵御土耳其人。阿提卡内陆地区主动臣服于威尼斯。但威尼斯元老院非常精明，知道共和国人力不足，而且对封建领地和头衔不感兴趣（毕竟希腊土地贫瘠，出产极少），因此拒绝接纳阿提卡。对于他们而言，唯一重要的，只有大海。

再往南，贫瘠的基克拉泽斯群岛（1204年以后被分配给威尼斯的私掠者）日渐成了一个问题。这里的统治者有的狡诈，有的残暴，甚至疯癫，共和国与他们之间有不少冲突。土耳其、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海盗也时常劫掠基克拉泽斯，拐卖岛上的人口，因而使这片海域非常危险。早在1326年，一位编年史家就写道：“尤其是土耳其人在这些岛屿肆虐……如果没有援助，它们便会易主。”^[10]15世纪初，佛罗伦萨教士布翁戴尔蒙蒂在爱琴海待了四年时间，带着“极度的恐惧和焦虑”旅行。^[11]他发现基克拉泽斯群岛凄凉得令人难以置信。纳克索斯岛和锡夫诺斯岛缺少男性人口；塞里福斯用他的话说，“除了灾难什么也没有”，那里的人民过着牲口一般的生活。^[12]在伊奥斯岛，每到晚上，人们全部退入城堡，以防海盗劫掠。蒂诺斯岛的居民则打算干脆放弃他们的岛。爱琴海期盼着威尼斯共和国的保护，“觉得天下没有比威尼斯的统治更公正和更好的了”。^[13]共和国便开始重新接纳这些岛屿，但是与以往一样，它的手段是十分务实的。

威尼斯在第二波殖民扩张中建立起的帝国是靠强劲的海军实力维系的。在它价值无量的三角基地——莫东—科罗尼、克里特岛和内格罗蓬特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科孚岛。但在更遥远的地方，威尼斯海洋帝国的疆界非常灵活，不断发生变化，就像钢丝网一样强韧而形状并不固定。威尼斯人始终生活在变幻无常的世事中，他们的许多领地也是来了又去，一如大海潮起又潮落。他们一度占据着希腊大陆上一百个地点；爱琴海大多数岛屿都经过威尼斯人的手。有些虽然从他们手中溜走过，但后来又重新获得了。对有些领地的占有则非常短暂。威尼斯断断续续地占据莫奈姆瓦夏礁岩（形似微型的直布罗陀）一个世纪之久，威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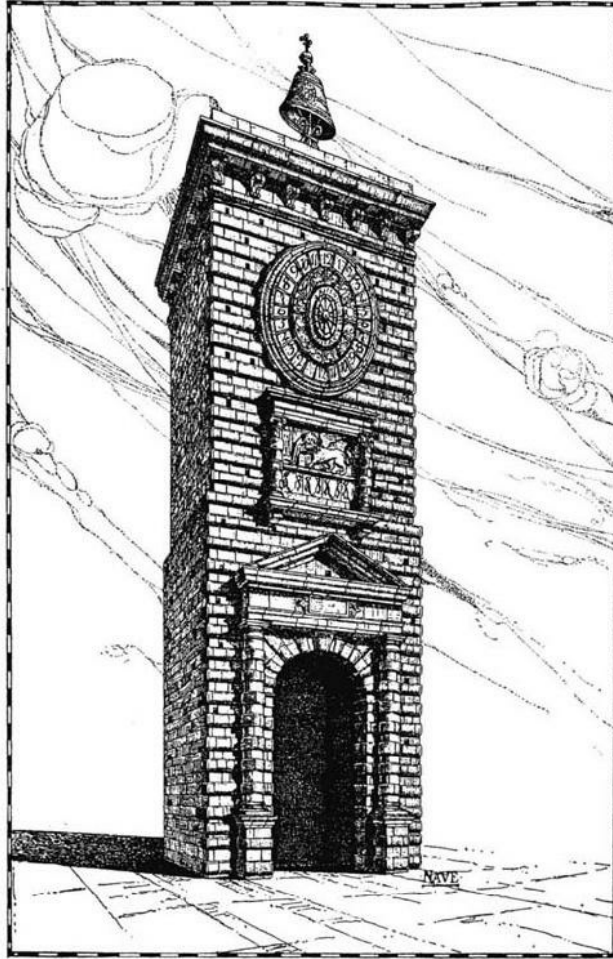
人在雅典也进进出出。14世纪90年代，当西班牙冒险家抢走帕提农神庙大门上的银片时，威尼斯人静观其变，后来自己统治雅典六年。五十年之后，雅典请求威尼斯接纳它，但那时已经太迟了。

黑海北岸的塔纳最能印证殖民事业的逆转。1348年，威尼斯被蒙古人逐出塔纳。1350年，一个商业定居点在那里恢复了，并维持了半个世纪。但塔纳过于偏远，信息很难传达到威尼斯本土。桨帆船舰队每年都会到那儿一趟，之后便消失在海的边缘。这个据点一沉寂就是好几个月。当安德烈亚·朱斯蒂尼安奉命于1396年抵达塔纳时，他震惊地发现，那儿什么也没有：没有人，没有房屋，只有定居点烧焦的废墟，以及顿河上诡异的鸟鸣。在前一年，蒙古的帖木儿大帝袭击塔纳，将整个定居点夷为平地。1397年，朱斯蒂尼安向塔纳当地的鞑靼领主请求允许建造一个新的设防定居点。威尼斯人在塔纳从头再来。塔纳就是这么重要。

但在地中海东部的中心地带，威尼斯实行着效率极高、无与伦比的帝国主义统治。在这整个地区，只要是圣马可旗帜飞扬的地方，就能看到威尼斯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的宣传象征物：港口的墙上、要塞和碉堡昏暗的大门上方雕刻着雄狮，向潜在的敌人咆哮，向朋友示好；闪亮的圆形杜卡特金币上，是执政官跪在圣徒前的图案，威尼斯金币的纯度和可靠性胜过了所有对手；威尼斯海军舰队定期巡航扫荡，商船队无比雄壮；身着黑衣的威尼斯商人操着方言为货物标价；各种仪式庆典和宗教节日的庆祝活动无比盛大隆重；威尼斯的建筑物彰显帝国气派。威尼斯人无所不在。

威尼斯城跨越海洋输出自己的形象。干地亚被称为“威尼斯人在黎凡特的另一座城市”，也就是威尼斯第二。^[14]它复制了威尼斯的建设和权力象征。干地亚也有自己的圣马可广场，它对面是圣马可教堂，教堂的钟楼上悬挂着圣马可的旗帜，就像威尼斯的钟楼一样，在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时都会鸣钟。还有公爵府邸和供商品交易和谈判的凉廊，都像

极了威尼斯。公爵府邸旁的两根立柱是用来绞死犯人的，仿照威尼斯的滨水双柱，提醒公民和臣民们，堪称楷模的威尼斯司法是全世界通行的。干地亚是威尼斯国家的缩小复制版：用来为批发货物称重的办公室使用的是威尼斯的砝码和计量标准，有处理刑法和商业法的官衙，有克里特行政机关的接待室和分部，都和威尼斯执政官的宫殿差不多。旅途中的商人若是不注意，会真以为他们看到了威尼斯的幻影在黎凡特的明亮空气中闪闪发光，仿佛卡尔帕乔在埃及海岸重绘出了威尼斯，又仿佛英属印度土地上建起了一座英国教堂。外乡来的旅行者谈及了这种光线的把戏。西班牙旅行者塔富尔写道：“当一个人来到威尼斯的任何领地，哪怕是在天涯海角，也会觉得他身在威尼斯。”^[15]当他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库尔佐拉停留时，发现甚至当地人也跟随着威尼斯的潮流：“男人们在公共场合的穿戴像极了威尼斯人，他们几乎都会说意大利语。”^[16]君士坦丁堡、贝鲁特、阿卡、推罗和内格罗蓬特都一度拥有自己的圣马可教堂。



帝国的纪念碑：莱蒂莫的钟楼

这样的特点让旅行商人和殖民地官员们感到，他们占据着自己的世界；他们驱散思乡之情，向他们的臣民——不管他们说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还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彰显威尼斯的权势。威尼斯庆典中的宗教仪式元素也加强了这种权势。精心安排的正式庆典被详细地复制在15世纪的油画上，也被输出到各个殖民地。克里特岛的每一位新公爵上任时都会在号角齐鸣中，在一顶红丝绸伞下从他的桨帆船上踏步而出，在城市的海门与前任公爵会面，然后在前呼后拥之下，严肃地行进在通往大教堂的主干道上，在教堂涂抹上圣水和香。这种仪式是高度标准化的，严格按照规程办事，展现了威尼斯的荣光。庄严的游行，圣马可和诸位主保圣徒的旗帜，殖民地臣民向共和国发出的忠诚、恭顺与效

力的誓言，在基督教历法中重大宗教节日时为颂扬公爵而吟唱的赞美诗——这些仪式融合了世俗和宗教的力量，来夸耀威尼斯的显赫，激起人们的敬畏。朝覲者彼得罗·卡索拉教士见证了1494年克里特岛政权交接的仪式，这场仪式“如此壮观，我仿佛置身于威尼斯的盛大节日”。^[17]

殖民地的行政机构等级森严，每一级别都有精心管理的薪酬、特权与责任，以及一长串冗长而差别细微的不同头衔。最高层（也是殖民地系统中最有权力的职位）是克里特公爵；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殖民地的市政官的薪俸与克里特公爵相同，是每年1000杜卡特，这是为了彰显君士坦丁堡的重要地位。科孚岛和内格罗蓬特也分别由一位市政官管辖；莫东和科罗尼分别由一位“代理城主”管理，而阿尔戈斯和纳夫普利翁则分别由一位市长管理。蒂诺斯岛、米科诺斯岛以及克里特岛的一些城镇则由镇长管理；在外国领土——如塔纳和萨洛尼卡——上建立的定居点由领事负责管辖。这些殖民地行政长官是从威尼斯贵族阶层非自愿地选举产生的，被选中者必须在相应职务上为国效力，若拒绝则会受到惩罚。在这些带有头衔的大官下面，是一级级公务员：顾问和财务主管、殖民地兵工厂的将军、公证人、书记员和法官，所有人都宣誓为威尼斯的荣耀与利益工作，他们各自有特定的权利和职责，并受到一定限制。

这些国家官员虽然威风凛凛，但他们的行动自由却受到仔细的限制。每个人都能感到来自威尼斯的向心力；即便是在距离威尼斯3个月航程的塔纳，领事都被重重的规定束缚着。威尼斯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每件事都被潟湖（威尼斯）统治、支配和管理着，并且用无尽的细致的法令条款精确地把握。爱国主义情怀深深地刻印在每个威尼斯人的灵魂中；所有殖民者都来自潟湖的那几平方英里的范围；他们都被期待着以毫不动摇的爱国主义为共和国效劳。共和国执着于其公民的种族纯正。它害怕自己的公民被殖民地土著同化，尤其是在1363年克里特岛的叛乱之后。共和国的法令中满是规定种族纯洁的条款。公民身份几乎从不授予外邦人，而种族的界限是被严格监控的。异族通婚和皈依希腊东

正教是被人鄙夷的事情，而在克里特，则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高级的殖民官员两年一轮换，以免他们被当地的环境污染，中央也尽全力去维持文化的差异。在莫东，威尼斯人被禁止蓄须；威尼斯公民被要求将胡须剃干净，和胡须蓬乱的希腊人区别开。

官员服务的条件受到明确界定。总督职务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规定，他们随从中行政官员的人数、他们用来维持威望和日常使用所需的仆人和马匹数量（国家对一位总督能够拥有马匹的数量有着精确的要求，既不能少也不能多）、他们享有的金钱津贴和他们权力的界限都有规定。总督们被禁止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不得带家属赴任，并受到严格誓言的约束。共和国对个人影响力的增长保持警惕——这个最为铁面无情的国家非常讨厌个人的野心——对腐败则是零容忍。1396年，乔万尼·博恩被派往干地亚管理财政。他不仅要发出惯常的捍卫威尼斯荣誉的誓言，还有责任将属于国家的货物以最高价出租，一年一度向公爵及其顾问事无巨细地汇报他在前一年处理的和注意到的所有事务；并且不得接受任何服务和礼物；他和他的雇员被禁止从事任何商业活动，还被禁止在干地亚或以干地亚为圆心、半径3威尼斯里范围内宴请任何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拉丁人。

在威尼斯体制中，连执政官本人都被严禁从外国人手里收受任何贵重礼物。上述这些禁令都是习以为常的。威尼斯体制的宗旨就是持续的监管和集体负责制。任何官员都不得单独行动。要打开干地亚财务室的房门，需要三把钥匙，分别由三个不同的财务官保管。克里特岛公爵需要三名顾问的书面同意，才能批准一项决议。所有的事情都是建立在书面文件的基础之上。在执政官宫殿深处，大群文书人员辛勤工作，抄写并发送元老院的各项法令到海洋帝国各个角落去。各个地方政府也有这样的文书团队，做着类似的工作。每一个威尼斯殖民地都有自己的公证人、抄写员和储存文件的地方。所有的决定、交易、贸易契约、遗嘱、法令和判词都被记载下来，形成数百万条目，就像商人无穷无尽的分

账本一样，这些共同组成了国家的历史记忆。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有案可查。每件事都被记录在案。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时，它存放文件的卷宗架长达45英里。

这些文件见证了帝国体制详尽的中央管理。那是一段不停地与腐败、裙带关系、贿赂和偶尔发生的叛国行为做斗争的历史。“国家的荣誉需要所有行政官员都出色”是它的箴言。^[18]官员们频繁地被告诫不得从事贸易活动，说明违反此项禁令的人很多，情形也五花八门，政府对此种行为也顽强地追踪制裁。殖民地的各级官员都有很多机会去体验威尼斯审计的严谨和无情。司法正义是耐心、铁面无私而冷酷无情的。没有人能够避开审查。对公爵的审查就像对铁匠的调查一样客观公正。审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国家监察官们会定期展开调查。当这些身穿黑袍的官员走过船只的跳板、踏上内格罗蓬特或干地亚土地并开始问问题或查账时，最趾高气扬的殖民地权贵也会心急如焚。监察官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在1369年5月的档案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监察官的职责除了审查低级官员之外，



海洋帝国的监察官

他们在黎凡特的任务还包括调查总督们有损国家利益的不端行为；若遭到指控，总督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回答问讯，即便这牵涉他们的工作。监察官有权前往他们认为有必要去的任何地方；他们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威尼斯式的限制条件），监察官应当尽可能节约差旅费。若有官员罪行特别严重，监察官认为他不会自愿回到威尼斯接受审判，那么监察官可以在与当地总督商议之后，直接逮捕有罪官员，并强行将其押回威尼斯。[\[19\]](#)

账目将得到细查，检举得到倾听，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被没收和研读。监察官回到威尼斯后将有一年的时间去公布自己的调查结果、传唤

更多证人和弹劾罪人。令人眼花缭乱的是，监察官自己也受到监督审查，他们一般三人一同行动，被禁止从事贸易、接受礼物，甚至不可以单独居住。海洋帝国是个多疑的国家。

从威尼斯城到克里特岛要一个月，到内格罗蓬特需要六周，到塔纳需要三个月，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威尼斯国家伸长的手臂。有时它真的能触及极远的距离。1447年春天，元老院收到秘密报告，称克里特公爵本人——安德烈亚·多纳托正与米兰雇佣兵统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20]秘密勾结，并收受贿赂。逮捕多纳托的命令简短而残酷：

致桨帆船船长贝内代托·达·莱杰，任务是逮捕公爵：

1.应以最快速度前往干地亚，中途禁止停靠。

2.抵达干地亚后，停在海湾内，不得登陆。不得允许任何人上岸，也不准任何人上船。

3.派遣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去见安德烈亚·多纳托，请他到船上协商。

4.约见多纳托的借口是获取关于黎凡特局势的信息，船长假装自己即将去土耳其觐见苏丹。

5.多纳托上船后，贝内代托应立即扣押他，告知他必须去威尼斯一趟，但不用告诉他原因。

6.离开干地亚之前，贝内代托应将托付给他的信送给克里特海军统领和顾问们。

7.若多纳托拒绝或不能上船，莱杰船长应将另一封预先备好的信送给克里特海军统领和顾问们，这样公爵肯定得来。

8.多纳托上船后，桨帆船立刻前往威尼斯……（船长）会将其带到拷问室。

9.在航行中，禁止任何人与犯人交谈；如果途中必须靠岸的话，多纳托不得以任何理由上岸。^[21]

达·莱杰奉命带给顾问的密令是：“若安德烈亚·多纳托拒绝登船，那么船长和顾问们必须动用武力；他们应逮捕公爵，将他押送到船上，立刻前往威尼斯。”^[22]达·莱杰以破纪录的速度到达克里特岛，将公爵劫走，迅速将他送回威尼斯，进行拷问。来去只用了四十五天，创了一项新纪录。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

威尼斯政府坚持不懈地与其官员的渎职行为做斗争；档案中到处是振聋发聩的谴责、问讯、罚款、弹劾，以及拷问犯人的命令。许多条目的开头都是“严令禁止……”，接下来紧跟着不厌其烦的禁令——不得雇用亲属、变卖公共财产、从事贸易活动等。“太多的市政官、总督和领事得到了好处、金钱贿赂和形形色色的豁免。这是不可容忍的，这些行为是严厉禁止的。”^[23]一位克里特公爵因粮食欺诈罪行而遭到传讯；莫东—科罗尼的一位官员犯下了敲诈罪；一位官员因未赴任而被罚款；另一位官员因为一笔钱款的丢失而被召回；莫东的代理城主弗朗切斯科·达·普留利遭到逮捕并被免职——投票决定是否用刑时，13票赞成，5票反对，5票弃权。当然，对共和国的忠诚也会得到认可和奖赏。

威尼斯将它坚定不移的法律制度贯彻到海洋帝国的每个角落。总督们被告诫，对所有人秉公执法，无论对威尼斯殖民者还是土著臣民皆如此。当地人、犹太人和其他常住外国人，都受到同样的管理。从当时的标准来看，威尼斯共和国有强烈的正义感，它的司法相当客观公正。

威尼斯人是彻头彻尾的律师，以极强的逻辑运作着他们的体制。谋杀分为多个等级。杀人分为一般（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又细分为八个子类别，从正当防卫到意外、故意、伏击、背叛和暗杀；法官被要求尽可能透彻地确定作案动机（国家的秘密行动当然不受这种司法限制：1415年7月的档案记载着买凶暗杀匈牙利国王的提议。暗杀者“希望隐姓埋名”。^[24]如果发现布鲁奈佐·德拉·斯卡拉在国王随行队伍里，就将他一同杀掉。此提议被接受了）。共和国确实采用了恐怖的惩罚手段；他

们使用刑讯来获取真相或至少迫使犯人招供，用刑的严厉程度取决于国家利益。1368年1月，一个名叫盖斯图斯·德·博埃米亚的人被带到干地亚公爵法庭，原因是偷窃国库钱财。法庭对其严惩，以儆效尤：斩去他的右手，令其当众坦白罪行，最后在他偷盗的金库前将他绞死。第二年，克里特人埃玛努埃尔·西奥罗吉特因为放走了一名叛军俘虏，被砍掉了一只手，戳瞎了双眼。托马·比安科因为说了大逆不道、有损威尼斯荣誉的话，被割掉了舌头，接着是入狱和无期流放。^[25]

威尼斯的司法也具有极高的道德性：1419年1月，一个叫“内格罗蓬特的斯塔马蒂”的屠夫及其共犯“干地亚的安东尼奥”因为强暴一名男童而被处死；四个月之后，尼科洛·佐尔齐因为相同的罪行被活活烧死。死刑是以执政官的名义执行的，目的是教化民众。干地亚的刑场在两根石柱之间，这是模仿威尼斯城圣马可广场的双柱。威尼斯的刑罚制度虽然严酷，但做出裁决时也可能有细微的考虑。未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和智力有缺陷者可以免除死刑，即使是在暗杀类的案件中。精神病人被监禁起来，并打上烙印，以示众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威尼斯上诉；证人可以被召回母城；案件封存几年后可以重审；即使是在威尼斯国家里被边缘化的犹太人，在法律面前也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司法工作运转缓慢，但极其重视正当程序。1380年，当威尼斯舰队停靠在莫东时，一个名叫乔万尼诺·萨林贝内的人被指控杀害了莫里托·罗索。对萨林贝内的审判被认为“严重失当，因为事件本身的情况复杂，而且最重要的是缺少证人”。四年之后，这起案件被重审，高层命令对“城市夜间警察队伍的军官进行新的审查”。

在威尼斯司法体制中，案件可以撤销，可以考虑情有可原的情况而从轻发落，也可以根据上诉团体的投票来推翻之前的判决。1415年3月，“内格罗蓬特的犹太人”莫迪凯·德雷梅德戈被处罚款，但随后判决被撤销了，因为“陪审团无权处置犹太人”。^[26]同一年，纳夫普利翁的马泰奥在担任公职期间出租国家财产，被处罚金，判决后来也被撤销

了，因为“现已查明，马泰奥在进行此项交易时已经辞去公职”。^[27]潘塔莱奥内·巴尔博受到的判决——十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被认为“过于严酷，毕竟他一辈子为共和国效劳，忠贞不贰”；^[28]克里特岛人贾科莫·阿帕诺梅里蒂强奸了一名女子并拒绝娶她，被判罚款或入狱两年，后来得到了从轻发落。“上诉法官们重新审查了此案，鉴于男孩的年轻与贫穷，如果他愿意立即娶这个女孩，便会免除所有处罚。”^[29]

因为共和国境内天主教徒、犹太人和东正教徒混居，所以共和国非常重视保持社会的平衡。威尼斯海洋帝国本质上是一个世俗社会。它没有令其他民族皈依的计划，也没有传播天主教信仰的政策——除了偶尔为了得到教皇的支持、获得某种利益而传教之外。威尼斯镇压克里特岛上的东正教会，是因为害怕泛希腊的、民族主义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宗教狂热；在其他地方，威尼斯的宗教政策是较为宽容的。在恭顺服帖的科孚岛，威尼斯规定，希腊人“享有信仰自由，只要他们不公开表示反对共和国或拉丁信仰”。^[30]跟随着威尼斯的扩张而前进的天主教僧侣修会的过度狂热却令威尼斯警觉，有时甚至是震惊。1420年8月从干地亚传来报告：“夜巡队不得不逮捕4名方济各会修士，他们拿着十字架，全身一丝不挂，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这种行为令人生厌。”^[31]方济各会修士们威胁到了威尼斯海外领地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平衡。任何形式的民众骚动都令政府紧张。两年后，执政官直接写信给克里特岛行政机关：

有时我收到一些关于拉丁教会某些教士不端行为的丑闻报告；此种行为在克里特岛尤为危险；我刚得知，某些教士的宣讲……对共和国大为不利；丑闻影响到了岛上的威尼斯人；当局应立刻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制裁这群教士，恢复克里特岛的和平安定。^[32]

威尼斯内心深处希望维持臣民间的平衡：和平和安宁，荣耀和利益——这些理想总是两两相伴。

只要在安全稳定的允许范围内，共和国可以做到宽容仁慈，但经济

的压力无处不在。各殖民地是经济剥削的对象，苛捐杂税不停，最沉重的负担压在犹太人身上。在金钱方面，无人能够逃避宗主国的压榨。中央政府无穷无尽地征税。他们几乎完全不关心这些税钱在地方上是怎么征收来的，而各地方的人民也无权决定这些税金的用途。国家像精明的商人般掌控着钱财，积攒得越多越好，开销越少越好。资源掠夺是一个核心问题。

威尼斯从它的海洋帝国各地搜罗食物、人力和原材料——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的水手、克里特岛的小麦和硬奶酪（水手的主食之一）、葡萄酒、蜡、木材和蜂蜜。对潟湖一带饥饿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些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克里特岛在基奥贾战争中是重要的补给来源。在严格的条件下，所有物资被直接运回潟湖，即使是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要通过威尼斯城周转，而且货物只能用威尼斯船只装运。货物受到一丝不苟的检查，违者被处以大笔罚金；每一次有船只登陆，在海关都有一笔税金要进入国库。关键货物——盐和小麦——的价格标准是由国家强制性规定的，克里特地主们对此很不满，因为如果在自由市场上交易的话，他们能赚得更多。国家档案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压迫性的制度如何运作。宗主国决定何时、何地、何种货物能以何种价格被运过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威尼斯坚持要求各地使用他们规定的度量衡，并迫使殖民地臣民使用威尼斯货币。杜卡特金币像武装桨帆船一样，成为威尼斯实力的强大象征。

中央的这些控制手段的效果十分明显。希腊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工业发展迟缓（除了克里特的造船业），当地企业家阶级的发展空间受到压制。威尼斯集中力量在其主要领地开发农业。但它的国土并不是很理想：海洋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是多山、贫瘠、缺水以及被干燥热风影响的土地，但在克里特、科孚岛和内格罗蓬特的肥沃山谷里，威尼斯政府努力发展水利、保持土壤肥力。在前一个世纪因为叛乱而被放弃的拉西锡高原重新得到开垦耕种。当弗朗切斯科·巴西利卡塔在1630

年访问那里时，这样描述道：“那是一块美丽的、平坦的地区，几乎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33]

海洋帝国农业的发展总是受到人力短缺的阻碍。人们从田间消失。瘟疫、饥荒和恶劣生存环境下一向的高死亡率造成了很大影响：被压迫的农民不停试图逃避威尼斯的剥削统治；奴隶逃跑；海盗拐卖整片地区的人口。人口的不断流失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1348年，共和国政府哀叹道：“克里特岛爆发了凄惨的疫病，死者甚众，十室九空，必须采取措施来增加人口。尤其需要让逃跑的债务人恢复信心，这样他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地主们缺少劳动力。”^[34]到14世纪末，黑海的奴隶被贩卖到克里特，在类似种植园的体制下耕种土地。一直以来，希腊本土的农民就过着艰苦的生活；在威尼斯人的殖民统治下，他们的日子也不轻松。威尼斯统治者对农村的劳动力重视不够；这些劳动力在他们眼里就和木材或钢铁一般，仅仅是资源而已，无须大惊小怪。后来，一些更有同情心的观察者来到克里特岛，被他们看到的一切震惊了。威尼斯四百年的统治没有为它的臣民带来多少进步。“克里特人民的赤贫令人难以想象，”17世纪的一位观察者这样描述道，“世界上一定极少有人像他们一样处于此等水深火热之中。”^[35]而威尼斯为克里特人提供的，仅仅是一些基本的防备海盗袭扰的安全措施。

殖民地的行政工作就是持续不断的监督管理，中央政府从遥远的潟湖对其进行遥控。国家档案的详尽细节足以证明威尼斯对整个海洋帝国的高度重视。档案中数以百万计的条目呈现出政府高度关注的对象。其中包括对桨帆船舰队的精确指示——何时起航，靠岸多久，可以贩卖哪些东西，还有为鼓励运输克里特小麦而给出的优惠价格、贸易许可、用来维修城墙的税费、对腐败和街头斗殴的记述，以及关于土耳其海盗和海难的记载。人们惋惜损失，也责任到人、追查到底。人们无穷无尽、不屈不挠地要求得到赔偿。在政府望远镜般的观察下，事无巨细，统统由书记员们（他们在执政官宫殿深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辛苦工作）记录

在案：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桩谋杀案；在基克拉泽斯群岛发现了一艘热那亚私掠船；100名弩手奉命前往克里特岛；必须为桨帆船准备4700袋航海饼干；内格罗蓬特的财务官工作过于忙碌；一位勇敢的桨帆船船长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克里特公爵的遗孀偷窃了属于国家的两个金杯子和一块地毯。

“利益与荣耀”是贯穿庞大而详尽的威尼斯殖民事业的两条亘古不变的主线。如果说利益是最终的驱动力的话，那么共和国的荣耀则是为一个个殖民地命名，像商人清点自己宝箱里的金杜卡特一样骄傲地点数着殖民地。威尼斯授予这些殖民地一些高贵浮夸的称号，来强调它们在帝国结构中的重要性——“我们城市的右手”“共和国的眼睛”——仿佛它们是威尼斯身体的一部分。对威尼斯人而言，威尼斯绝不仅仅是有限的几平方英里的狭窄潟湖，而是生动地想象出的一个极其庞大的空间，延伸到“凡水流经之地”，就好像从圣马可教堂的钟楼上就能清楚地看到科孚岛、科罗尼、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爱奥尼亚群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一般，这些城市就像是点缀在丝绸般海洋上的一颗颗钻石。对于威尼斯人来说，海洋帝国受到了伤害，就好像他们自己受了伤；领地丧失就像被截肢一般。

海洋帝国是威尼斯独一无二的创造物。如果说它沿用了拜占庭的税收制度，那么在其他所有方面，它的管理无不映射着威尼斯自身的形象。这个帝国代表着欧洲第一次充分发展的殖民扩张的实验。它用海上霸权维系各个殖民地，对臣民的福祉大体上漠不关心，高度中央集权，对殖民地进行经济剥削。这预示了欧洲将来的殖民活动。威尼斯对这个殖民帝国的付出也许多于它从税收、粮食和葡萄酒中直接获取的利益，但最终这都是值得的。除了粮食作物和税收之外，殖民地为威尼斯提供了跨越地中海东部的一块块垫脚石、用来保护舰队的海军基地、桨帆船的停靠点、储存货物的仓库货栈，以及在艰难时期可供遮风挡雨的落脚点。这第二轮殖民扩张使得威尼斯可以做一件新的事情：它一度主宰了

世界贸易。

[1] O'Connell, Monique, *Men of Empire. Power and Negotiation in Venice's Maritime State*, Baltimore, 2009, p.22

[2] 拉迪斯劳（1377~1414），那不勒斯国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西西里国王等，1390年以后自称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绰号宽宏者。他的父亲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三世也是匈牙利国王（称查理二世），因此拉迪斯劳对匈牙利有一定的继承权。当时实际统治匈牙利的是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弗罗林，金币名，1252年首先在佛罗伦萨铸造，后来欧洲许多国家均有仿造，币值不等。

[3]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377

[4] O'Connell, Monique, *Men of Empire. Power and Negotiation in Venice's Maritime State*, Baltimore, 2009, p. 28

[5] 地中海北岸的一种干冷西风或北风，从法国南部起源。“密史脱拉”是法国南方奥克语的朗格多克方言，意思是“主人的”。

[6] Miller, William,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 1921, p. 202

[7]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p. 75

[8] 原文如此，杜拉佐和布特林托之间的距离实际约270公里，即约170英里。

[9] 指梅毒。这种性病在欧洲第一次有据可查的暴发是在1494或1495年，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当时正是意大利战争期间。法兰西军队将它传播至欧洲其他地方，因此称为“法兰西病”。

[10] Miller, William, *Latins in the Levant: 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 1204—1566*, Cambridge, 1908, p. 588

[11] Miller, William, *Latins in the Levant: 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 1204—1566*, Cambridge, 1908, p. 588

[12] Miller, William, *Latins in the Levant: 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 1204—*

1566, Cambridge, 1908, p. 599

[13] Miller, William, *Latins in the Levant: 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 1204—1566*, Cambridge, 1908, p. 365

[14] Georgopoulou, Maria, *Venice's Mediterranean Colonies: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Cambridge, 2001, p. 74

[15]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227

[16]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p. 327

[17]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318

[1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36

[19]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43

[20] 弗朗切斯科一世·斯福尔扎（1401～1466）是一位意大利雇佣兵首领、米兰公爵，也是斯福尔扎家族在米兰统治的开创者。弗朗切斯科的宫廷是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弗朗切斯科是欧洲第一个以权力平衡为基础确立外交政策的统治者，也是第一个将外交扩展至意大利半岛之外的意大利统治者。

[21]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181

[22]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181

[23]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44

[24]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135

[25]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60

[26]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135

[27]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p. 135-6

[2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64

[29]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p. 154-5

[30] Miller, William,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 1921, p. 209

[31]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144

[32]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147

[33] Buonsanti, Michele and Galla, Alberta, *Candia Venezia: Venetian Itineraries Through Crete*, Heraklion, (undated) , p. 94

[34]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16

[35] Detorakis, Theocharis E., *History of Crete*, trans, John C. Davis, Heraklion, 1994, p. 196

15.“如同泉中水”

1425～1500

15世纪，开往亚历山大港的商用桨帆船在看得到陆地很久之前，便能远远地感觉到海岸。尼罗河溢出的淤泥使得离岸很远的海面也变得混浊；离岸25～30英里时，船上的瞭望员就能看到破败倾颓的法罗斯灯塔，那是古典世界留存的最后奇观，然后可以看见花岗岩的庞培石柱^[1]从海平线上耸立；最后，这座城市从晨雾中颤抖着显现出来，大理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边缘点缀着棕榈树，犹如一幅东方的图景。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当然也取决于接近角度——航船可能会驶过一群被冲到海里的河马身侧，或迎上一股燥热的沙漠风。

这艘船很快就会被陆地上的人发现。港口塔楼上的信号旗会通知港口官员乘小船前来调查接近的船只，询问它从哪里来，装载了什么货物，有多少乘客和船员。在小船的甲板上，官员们会携带一个鸟笼。当得到必要信息后，官员便会放飞两只信鸽——一只飞往亚历山大港的埃米尔身边，另一只带有马穆鲁克苏丹本人的徽标，将信送往南方110英里外的开罗，送交苏丹本人。随后，船只获准进入港口，但舵和帆要交给港口当局代管，乘客们则被海关官员彻底地搜身，“一直搜到我们的赤膊”，看看有没有私藏杜卡特或宝石，商品也要卸载查看之后存放到保税仓库。^[2]停靠费和税费缴过之后，船上的人才可以下船，通过拥挤的街道来到为基督徒访客准备的安全住宿地。亚历山大港是开启新世界的大门。

威尼斯人对登上亚历山大港土地已有数百年经验。据说，在828年，两个雄心勃勃的威尼斯商人从这里偷走了圣马可的遗骸；在中世纪，来到这座城市的朝觐者会去参观圣马可被乱石打死的那条宽阔街

道，以及在他殉教和被埋葬的地点建起的教堂。亚历山大港和埃及紧紧地吸引着威尼斯人无尽的想象；它们的主题元素出现在圣马可教堂的镶嵌画上——棕榈树和骆驼、沙漠和贝都因人的帐篷、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及法罗斯灯塔，用碧绿和金黄、宝石红和湛蓝来诠释。亚历山大港不仅在宗教上很重要——《圣经》在这里被译为希腊语，而且是像君士坦丁堡一样的贸易中心。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的船队从干地亚向东航行，去冒险，去赢利。但这旅程常常因为十字军东征、教皇禁令以及更东方的贸易路线的改变而中断。威尼斯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3]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关系总是很紧张，但潜在的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1396年，安德烈亚·朱斯蒂尼安凝望着黑海北岸凄凉的塔纳城废墟时，来自远东的贸易大潮正在改变方向。一百年来，蒙古人治下横跨亚洲的大道和波斯的市场将货物流引向了北方。到14世纪末，蒙古帝国已经支离破碎；在中国，蒙古人的统治被明朝取代，明朝闭关锁国，不再对外部世界开放。香料贸易恢复了原来的南方路线，印度的单桅三角帆船将货物转运到阿拉伯海岸的吉达，从那里通过小型沿海船只运过红海，在西奈半岛登陆后换为骆驼运输。西班牙人佩罗·塔富尔自称曾走过这条路线，据他说：“骆驼太多，我根本就数不出有多少，驮着从印度来的香料、珍珠、宝石、黄金、香水、亚麻、鹦鹉和猫。”^[4]

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向北流入叙利亚城市大马士革和贝鲁特。但大部分货物的终点是开罗，商品在那里会被装上平底船，顺着尼罗河驶向亚历山大港，那里是与异教徒世界联系的桥头堡。基奥贾战争结束后，威尼斯人将其商业活动集中于亚历山大港，并击败了它的对手们，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耐心、精明的商业头脑和过人的组织能力。在1381年与热那亚缔结和约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共和国微调了它商业体制中所有独特的机制，取得了东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威尼斯独特的集体进取精神、航海业的突飞猛进，以及商业和金融技术上的繁荣——这些因素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威尼斯的兴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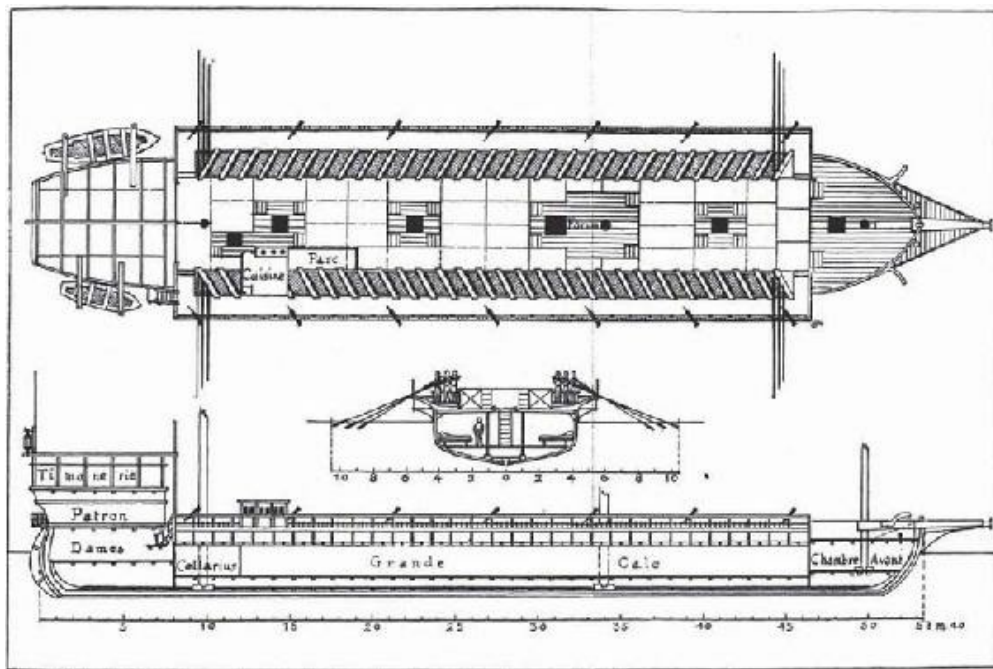
贸易对于威尼斯人来说是深入骨髓的；威尼斯的英雄便是商人，威尼斯为自己构建的神话也着重强调了这种价值观。威尼斯的史学家描摹出了一个往昔的贸易黄金时代，“在那时，所有威尼斯人，无论是穷是富，他们的财产都在增加……海上没有盗贼，威尼斯人将货物运到威尼斯，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商人都云集威尼斯，购买所有种类的货物，运回他们自己国家”。^[5]威尼斯的标志性时刻是用商业的眼光去衡量的。编年史家马蒂诺·达·卡纳尔描写了1204年丹多洛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最后鼓舞士气的讲话，他将宗教和商业利润视为合为一体的价值：“勇敢地去吧，在耶稣基督和我主圣马可的帮助下，凭借你们自身的力量，明天你们就会拥有这座城市，你们都会发大财！”^[6]威尼斯人的创设神话就是，他们生来就有权利去追逐利润。

到中世纪，意大利的各个商业共和国已经摆脱神学的桎梏，不再视做生意为可耻之事。基督不再是将兑换银钱之人逐出圣殿的先知^[7]，而是被视作一位商人；在威尼斯人的世界观里，海盗行为才是商业犯罪，高利贷不算罪过。利润是一种美德。1346年，一位来自封建制的、重视地产的佛罗伦萨的访客惊讶地说：“威尼斯人人都是生意人。”^[8]执政官们做生意，工匠、妇女、仆人、教士——只要是手上有点钱的人，都可以拿钱来投资；船上的桨手和水手在他们的长凳下私藏小批货物，运到外国港口售卖。只有殖民地官员在任期内被禁止从事商业活动。威尼斯城里没有商业行会，这座城市自身就是一个商业行会，政治和经济已经高度地无缝融合了。2000名威尼斯贵族（他们组成的元老院实际掌管着国家）就是威尼斯的富商巨贾。这座城市表现出的具有现代性的人类行为发展方式令外邦人惊愕不已，甚至是警觉。这座城市的纯粹是非常突出和醒目的，似乎它展现着一种全新的现象：“看起来好像……人类的全部贸易力量都集中在那里。”^[9]彼特罗·卡索拉记载道。日记家吉罗拉莫·普留利则直言不讳地写道：“共和国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钱。”^[10]

威尼斯是一个合资企业，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它的立法毫不动摇地维护其人民的经济利益，而这个立法体制也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完善。从14世纪开始，威尼斯发展出了一种海外贸易的模式，贸易由集体组织，并由国家严格控制，目标始终是赢得经济战争：“要改善和提高我们城市的条件，最好的途径是尽一切努力、把握一切机会，将我们城市的商品运到这里，在这里采购，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因为国家和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无穷。”^[11]通过运用制海权，威尼斯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市场。一个世纪的航海革命——从航海图和罗盘的发展，到新的操舵系统和船舶设计——带来了新的机遇。从14世纪初开始，船只无论在夏天还是冬天，都可以行驶于波涛汹涌、距离不长的地中海。一种更大的商用桨帆船被制造出来，主要靠风帆航行，进出港口和逆流航行时用桨，可以承载更多货物，还缩短了航行时间。13世纪90年代，一艘桨帆船可以在甲板下运载150吨货物；而到了14世纪50年代，载货量达到了250吨。这种“重型桨帆船”对人力的需求很大。一艘这样的船一般需要200多名船员，包括180名有战斗力的桨手和20名专业弩手，以抵御海盗。但这种船相对来说速度很快，高度灵活，非常适合安全地运输贵重货物。除桨帆船之外，还有柯克船和克拉克帆船^[12]，它们是高侧舷的帆船，只需要少量船员即可航行，主要被用来运送大宗物资，如小麦、木材、棉花和盐。帆船为威尼斯提供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资，而创利主要靠桨帆船。

商用桨帆船在兵工厂制造，是国家财产，每年通过拍卖承包给私人。这是为了让国家和人民都从商业活动中获益，防止出现那种摧残了热那亚的两败俱伤的内部竞争。这个体制里的每个细节都被严密监控着。竞标获胜的财团的组织者必须是2000名贵族中的一员，他的家庭必须是被记录在黄金之书里的，也就是记录在案的贵族，但真正从事航行的船长则是国家雇员，负责航船的安全返航。船员的数目和薪水等级、船只携带的武器装备、运价、即将运送的商品、停靠的口岸、航行时间、目的地以及停靠时间都要遵循严格规定。海事立法非常复杂而精

确，触犯后的刑罚也很重。桨帆船按照固定的航线行进，就像有时刻表的服务一样，在14世纪初规定的详细路线时间表整整使用了两个世纪。在14世纪末，有四条航线：分别通向亚历山大港、贝鲁特、君士坦丁堡和黑海，以及前往伦敦和布鲁日的艰苦的大西洋远途航线（一趟来回需要五个月之久）。一个世纪后，四条航线变成了七条，停靠地中海所有重要港口。1418年之后，威尼斯还垄断了运送朝觐者的市场。每年有两艘桨帆船前往雅法，送满船的虔诚游客去瞻仰圣地景观，这门生意利润可观。在15世纪，威尼斯桨帆船载着贵重商品纵横四海，柯克船则负责运输大宗商品。



商用桨帆船。它的中部舱室被改为宿舍，供前往圣地的朝圣者游客使用

威尼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它紧抓几个世纪以来商业活动的供需规律，并以无以匹敌的效率去遵守这种规律。秘诀在于规律性。威尼斯商人对于时间是非常敏感的。圣马可广场和里亚尔托的大钟固定了工作日的模式。从更大范围来看，每年的航行模式由季节规律控制，而这种季节规律在欧洲之外遥远的地方发生作用。印度大陆规律性极强的季风推

动着一系列有规律的、循环的贸易活动，好比一台巨型机器里互相咬合的齿轮一般，这些贸易将货物和黄金从中国一路运送到北海。每年9月，在季风平息之后，航船从印度出发，乘着秋风西进，将东方的香料和货物运往阿拉伯半岛。这些货物随后得到转运，于10月抵达亚历山大港和叙利亚的市场。威尼斯商船队会于8月末或9月初出发前往亚历山大港，其具体时间由元老院严格控制，一个月后抵达，正好赶上东方的货物运抵亚历山大港。前往贝鲁特的威尼斯商船队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停靠时间也都是严格设定好的——在贝鲁特通常停留28天，亚历山大港是20天——并且很严格地执行。商船队在12月中旬返程，也会有一个月以内的变动范围，避开冬季航程可能的危险。在大雪漫山的时节，重型桨帆船会驶回威尼斯，以便与另一个规律性贸易活动对接。德意志商人穿着皮衣和长靴，从乌尔姆和纽伦堡出发，赶着驮兽，跨过布伦纳山口，前往威尼斯的冬季集市。去往佛兰德的远途航行的起程和抵达也会与这些集市、鲟鱼捕捞季节和塔纳丝绸商队的活动时间对接。

威尼斯人理解，可靠的交货时间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外国商人就有信心，知道威尼斯会有值得购买的商品，值得他们在严冬穿越布伦纳山口过来购买。威尼斯将自己发展成了各国商人的最佳选择。个人从每一次贸易中获利，国家则对所有货物的进出抽税获利。“我们的桨帆船绝不能耽误时间”就是威尼斯人的公理。^[13]

这个系统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兵工厂装配船只可能会有延误，风向可能不利，海盗的威胁始终存在，桨帆船前往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产生政治动乱。往返行程大致可以合理预测：贝鲁特往返一趟需要三个月，布鲁日往返一趟需要五个月。如果遇上意外，时间就难以控制了。塔纳航线来回行程最短是131天，最长是284天；1429年，前往佛兰德的桨帆船在3月8日起航，后来在国外越冬，直到第二年2月25日才回到威尼斯潟湖。在归途延误的情况下，货物几乎总是会被封存，这样当商人来威尼斯参加正常时间的商贸会时，就能确定有很大一批库存的商品可

供购买。顾客的满意是关键。

每条航路都遵照自己一定的规律，威尼斯将这些周期性的航运活动称为“穆达”，这个词有丰富的含义。“穆达”既指香料采购和交易的季节，也指运送香料的商船队。形形色色的“穆达”在威尼斯城市生活中扮演着激动人心的角色。在穆达起航之前，整座城市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在炎热的夏季，兵工厂加班加点，为去往黎凡特的航行做准备；当出发时间将近时，水边总是喧闹非凡。四处开始准备招募船员；商品、粮食、木桨和航海用具都包装好，运到停靠在岸边的桨帆船上。圣马可教堂或利多上的圣尼古拉教堂（水手们钟爱这座教堂）将为航行祈福。起航时，将会有大量群众欢送，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这场航行承载着他们的财富。1498年，德意志朝觐者菲利克斯·法布里乘坐一艘朝觐桨帆船起航时，船上装点着五颜六色的旗帜，一派节日气氛：

桨帆船装饰好后，船员们准备出发了，因为我们顺风，旗帜被高高吹起。起锚时，水手们喧哗着将它拉到甲板上，升起帆桁，展开主帆，然后从海中吊起桨帆船的小艇；所有的工作都异常辛苦，大家都大声地喊着号子，直到桨帆船脱离锚地，船帆展开，被风吹得鼓起，我们欢呼雀跃地离开陆地：号角手吹着号角，好像我们要去参加一场战斗，船上的奴隶大声喊叫着，所有朝觐者一起唱道：“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出发。”……因为顺风且风力很强，船开得很快，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只能看到蓝天和大海了。[\[14\]](#)

对威尼斯人而言，航船出发的仪式和跨过潟湖的门槛、进入大海是公众生活中的关键时刻，对外来者也是一样。大家既激动，也满怀恐惧和担忧。有人写下遗嘱。船上的有些人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商用桨帆船经常会带着一些年轻的贵族，他们作为弩手被招募上船，也作为学徒学习贸易技能和熟悉航海生活。对许多这些“艄楼贵族”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出海体验。15世纪末，当安德烈亚·萨努多准备他第一次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旅行时，他的哥哥贝内代托给了他许多

忠告，例如行为举止的注意事项、应当有哪些期望、应当避免什么东西。这些内容涉及范围极广，从船上的生活（尊敬船长，只和神甫玩双陆棋，怎样应对晕船）到港口生活的危险——不要碰干地亚的妓女：“她们染有法兰西病。”^[15]还有在亚历山大港不要吃鹌鹑。

关于外国，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商业上，都有很多要学的东西。安德烈亚被建议跟随在当地的威尼斯代理人：“一直跟着他们，学会去识别所有种类的香料和药品，这对你会非常有用。”^[16]对于商人而言，信息和现金一样重要，尤其是在异地用不熟悉的度量衡和货币、通过翻译来进行交易时。有人撰写了实用指南，提供旅行商人关心的各种贸易信息，这种指南传播极广。其中涉及当地的货币兑换、度量衡、香料的质量、如何防止被骗等。其中的一本《卡纳尔琐记》描述了在外国做生意时的困难重重。比如，它对在突尼斯做生意提供了如下的有益信息：

这里的货币种类很多。有两种金币，一种叫多普拉，值5个拜占特^[17]，而1个拜占特值10个米亚雷希，所以1个多普拉值50个米亚雷希。另一种金币叫作马萨穆提纳，值半个多普拉，所以2个马萨穆提纳值1个多普拉，1个马萨穆提纳值2.5个拜占特。所以一个马萨穆提纳值25个米亚雷希。^[18]

当地的度量衡也一样烦琐，特别是和狡诈的小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商人打交道时：

小麦和大麦的销售是按照一种叫“玛泽帕尼”的单位计重的。由于亚美尼亚人作祟，没有人能准确说出这种计量单位到下个月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计量单位能与其换算，而且“玛泽帕尼”会根据亚美尼亚商人的心情随意增减，所以他们能牟取暴利。^[19]

在交易中需要大量的实用信息：一桶或一捆狐狸皮毛、鱼、席子、木块、长枪和核桃的具体单品数量，来自英格兰城市斯坦福的布料是按照什么方式称重的，亚历山大港的橄榄油以及内格罗蓬特的紫色染料的

计重法与威尼斯度量衡的换算方式，往突尼斯走私金子的好处，如何避免受骗，如何鉴别香料。乳香粉可能掺了大理石粉；肉豆蔻应该是“又大又硬的……用针刺穿它的外壳，如果往外溢水就是好的；否则一文不值……桂皮片……摇晃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20]商人必须反应机敏，要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出色的计算能力（有培训这方面技能的商业课程）。长途航海跋涉之后，他通过跳板上岸时可能因为晕船而东倒西歪，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然要保持敏锐的头脑。

对所有威尼斯人来说（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老手），最终的目的地，无论是贝鲁特或塔纳，亚历山大港或布鲁日，都不是他们控制的土地。他们是在反复无常的外国势力的容忍之下做生意的。仇外、敲诈、欺骗、政治动荡和经济竞争都使得威尼斯商人的生活极不安全，即便是在基督徒的土地上也是如此。威尼斯在伦敦的聚居区可能遭到洗劫，15世纪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威尼斯商人冒险家受到的最严峻挑战发生在穆斯林的黎凡特。双方的交易跨越了宗教信仰的鸿沟，由于互相猜忌和十字军东征的历史问题，造成了许多摩擦冲突。安德烈亚·萨努多从海上第一次遥遥望见亚历山大港时，一定觉得它很美丽，但实际上这是一座日益衰落的城市。菲利克斯·法布里在1498年记载道：“每天都会有房子倒塌，宏伟城墙之内是凄凉的废墟。”^[21]如此破败的原因是1365年基督徒对这座城市的洗劫^[22]——当年威尼斯强烈反对这次远征，但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苏丹也因此事怪罪威尼斯。贸易过程十分紧张，双方互相猜疑，但谁也离不开这种贸易。在中世纪黎凡特的海岸上，威尼斯发展出了第一种有效的世界贸易活动。

在亚历山大港、阿勒颇、大马士革或贝鲁特的欧洲商人生活在层层戒备之中。除了他们的领事和一小群长住居民之外，他们一般被禁止在其聚居区——为了他们的安全而提供的一个很大的有围墙的住宅区——之外生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聚居区，其中包括宿舍、仓库、厨房、面包房、澡堂、一座小教堂，往往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可以蓄养有

异国情调的动物。在15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港的阿拉贡人在自己的花园里养鸵鸟和豹子（用铁链拴起来）。开罗的苏丹为外国商人提供这些聚居区，作为一项服务。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这些能够给他带来丰厚利润的客户，以免他们遭到群众的袭击，同时也是为了控制这些外国商人。聚居区通往外界的大门钥匙由一名穆斯林保管；夜间和星期五的祈祷期间，外国商人被锁在他们的聚居区内。在聚居区里面，他们可以过着类似外交使团的生活；他们可以喝酒（有时到访的穆斯林客人也会偷偷和他们一起喝酒），甚至还有更糟的事情。当法布里参观威尼斯人聚居区时，他惊讶地发现，有一头猪在院子里哼哼。威尼斯人出于蔑视养了这头猪，但为此他们给了苏丹一大笔钱，“否则撒拉森人不会允许这只猪出现在这里，甚至更糟的是，会因为这头猪把整个房子给拆了”。^[23]互相的挑衅行为时有发生。

基督徒商人们从聚居区出发，在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走上亚历山大港的街道，去购买和出售货物。协商总是很艰难，时不时夹杂着谩骂。交易开始时，他们要欢迎海关官员；结束时要送别他们。这些官员动辄克扣金钱，收双倍税费或者没收货物。对鲜红色布料和克里特奶酪，海关盯得尤其严。香料交易是一个令人焦虑的过程。香料的质量鉴定可能会非常棘手，据一位商人描述，威尼斯人一般大宗购买香料，“无法分拣和挑选……货物从印度来时是什么样，就只能照什么样买下。在我们购买之前，他们也不准我们提前看货”。^[24]双方都需要交易，但这是一场边缘政策^[25]的博弈。埃及商人知道威尼斯“穆达”的时间表是固定的（威尼斯元老院在这方面的法令是强制性的），所以可以等到威尼斯商船起航前的最后一天才把价格定下来，这样买家就没有时间讨价还价了，不然就要空手而归了。交易可能要一直到最后一刻才能敲定。法布里目睹了一次香料交易的最后转运。巨大的麻袋躺在岸边，大约有5英尺宽，15英尺长，被拥挤和急切的人群注视着。香料已经被检查、称重过，而且已经通关。桨帆船就在海岸边停泊。水手们划着长艇，将货物运到船上。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

在聚居区，在撒拉森官员的面前，尽管所有的麻袋刚刚被装满和称重过，并且在大门处检查过了，但当它们正要被送上船去时，撒拉森人却命令将麻袋里的所有货物倒在地上，让他们看清，被运走的是什么东西。周围挤满了人，当麻袋.....被倒空时，许多人在这里到处乱窜，一大群穷人一拥而上，有妇女和男孩，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哄抢着他们能抓到的一切东西，还在沙子里搜寻散落的姜、丁香、肉桂和肉豆蔻。^[26]

另一方面，威尼斯人是坚忍不拔的对手，而且深谙贸易心理学。当法布里和他同行的朝觐者带着一个生病的男孩，与威尼斯船长协商返回威尼斯的路费时，发现船长们“比撒拉森人或阿拉伯人索取的价格更严苛，更不通情理。有些船长收每一位朝觐者50杜卡特，当我们就这个价格僵持时，另一个傲慢的船长说，少于100杜卡特他不接受”。^[27]男孩死在了港口。商人可能会狡猾奸诈，擅长在海关官员眼皮底下走私宝石和黄金，往往贪污、逃税和在谈好价格后出尔反尔，如果不是严厉的威尼斯法律对其加以约束，情况还会更糟糕。

然而，在外国的土地上，竞争往往是不平等的。尽管存在贸易协定，苏丹仍可能武断地定价。1419年，亚历山大港的胡椒价格被强行定在每单位150~160第纳尔，而市场价仅为100第纳尔。开罗有时会对来往的商人实行强买强卖。在叙利亚，威尼斯人的遭遇往往更惨。他们在贝鲁特登陆，前往大马士革购买货物。返回时，他们可能遭到袭击，或者赶骆驼和驴子的人可能偷走他们的部分货物。面对盗窃、谩骂和贪婪敲诈的压力，威尼斯人的耐心经常超越极限。1407年，在一次斗殴之后，所有在大马士革的欧洲人都被监禁；1410年，他们遭到棍棒殴打的刑罚。威尼斯领事常常前往大马士革，一再恳求释放威尼斯公民，或要求对方履行商定的交易条款。大马士革的官员可能会对他表示理解，也可能根本不以为意。当一位领事威胁将从亚历山大港撤出所有威尼斯商人时，苏丹回应说：“你们威尼斯人，以及其他所有基督徒的能量，我认为.....也抵不上一双旧鞋子。”^[28]这句话包含了虚张声势的成分——马穆鲁克王朝需要欧洲黄金的流入——但谩骂仍在继续。有时威尼斯领

事本人也会遭到殴打和监禁。

遭受了种种困扰之后，一些贸易国决定报复。热那亚人劫掠了叙利亚海岸；1426年，一支加泰罗尼亚舰队攻击了亚历山大港。威尼斯人与这些武装侵略划清界限，但他们毕竟是基督徒，所以会被穆斯林揪住，为之付出代价。1434年，所有威尼斯人被逐出叙利亚和埃及，损失高达23.5万杜卡特。他们的策略是耐心和无尽的外交。当他们的商人被囚禁时，他们将长期遭受折磨的领事派往开罗交涉；当货物被盗时，他们索取赔偿；当香料中掺杂的垃圾太多时，他们使用筛子；局势太过紧张时，他们准备将整个社区撤离。短时期内，他们完全暂停桨帆船的航运业务。15世纪30年代，他们与贪婪的拜巴尔苏丹进行了长期而紧张的博弈，拜巴尔苏丹在所有香料的出口上实行了一揽子定价的垄断政策，还企图强行规定必须使用他本国的黄金货币进行交易。威尼斯人挫败了苏丹的企图。在纯度和可靠性上，威尼斯杜卡特都优于它的竞争者。在双方斗争的表象之下，有一个暗藏的真相：不得民心的马穆鲁克统治者需要丰厚的税金来支撑自己的统治，对贸易的需求丝毫不亚于威尼斯。威尼斯人也从来没有动用过武力。当热那亚派出武装桨帆船时，威尼斯则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外交官。

在与黎凡特权贵们无休止的交涉过程中，共和国运用了从拜占庭人那里学会的高超的外交技能。在它与伊斯兰世界漫长而复杂的关系中，这种外交技能对威尼斯助益极大。他们预先备好给苏丹的贿金，用奢侈的礼物和庄严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排场来讨好他。1508年，威尼斯大使在大马士革得到当地统治者的接见。这个场景被再现在油画中，极其生动形象地捕捉了这种外交活动中富含异国情调的仪式。威尼斯领事身穿红色托加袍，以彰显最尊贵共和国的全副威仪，他向端坐在高台上的马穆鲁克总督呈上文书，周围是一大群戴着圆锥形红头巾、穿着五颜六色丝绸长袍的穆斯林显贵。背景中有清真寺、超现实的天空和生动的树木，以及黑奴和动物（猴子、骆驼和鹿）代表着那些令威尼斯人心醉神迷的

东方景象。这是一个给人的感官留下深刻印象的世界：有香蕉的美味（“精美得无法形容”^[29]），有长颈鹿，有美丽的马穆鲁克花园。当这位领事彼得罗·泽恩后来因与波斯人密谋而被囚禁时，一个更加华丽的威尼斯代表团被派去拜见开罗的苏丹。

这段记录读起来就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威尼斯人随行带着八名号角手，他们身穿鲜红衣服，吹着响亮的号角，宣告大使的到来，但是他们的隆重排场与觐见苏丹时的场景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我们爬上楼梯，走进一间最为华丽的房间——比我们威名赫赫的威尼斯政府的接见厅还要美丽。地上是斑岩、蛇纹石、大理石和其他价值连城的石头构成的镶嵌画，镶嵌画上还铺着地毯。高台和镶板上面满是雕刻和镀金；窗花是青铜而不是铁的。苏丹坐在这个房间里，旁边是种有橘子树的小花园。^[30]

新任大使多梅尼科·特雷维桑用一大批珍贵的礼物换来了泽恩的释放，这些都是精挑细选、适合马穆鲁克人口味的礼物：50件色彩鲜艳的长袍，材料为真丝、绸缎和金线织物；75件黑貂毛皮；400件貂皮；50块“每块重80磅”的奶酪。^[31]

礼物固然非常丰厚，内在的外交原则却是耐心和不屈不挠：威尼斯人坚持要求严格遵守协议；永不放弃索赔，无论索赔的金额多么小；绝不坐视自己的公民被囚禁而不管；与其他国家的不端行为保持距离——加泰罗尼亚人的海盗行径、热那亚人的咄咄逼人、圣约翰骑士团的圣战；以严格的纪律管束自己的公民。商人被严格禁止在埃及除亚历山大港以外的地方购买商品，不得赊账，不得与穆斯林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任何威尼斯人欠债潜逃，都会极大地影响整个贸易社区的安全和声誉。不同于奉行个人主义的热那亚人，威尼斯商人都来自相同的狭小广场和教区，因此集体意识很强，非常团结。他们把钱共同存入一个保险基金，马穆鲁克官员对整个威尼斯社区的敲诈或财政处罚而产生的费用将由基金成员共同承担。就像佛罗伦萨布道者以挖苦的方式所形容的，他

们“像猪一样”^[32]聚集在一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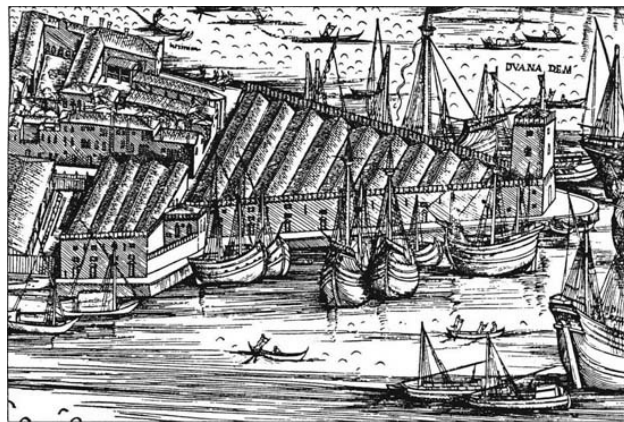
在黎凡特做生意让人筋疲力尽，并且风险巨大——苏丹一次专断的心血来潮，商人就可能倾家荡产。贸易过程需要持续的监督和无尽的元老院辩论，让人如履薄冰。这常让人灰心沮丧，而且始终很不稳定。当彼得罗·迪耶多于1489年出使外邦时，他的报告里体现出了极端的悲伤。“有这么多的障碍挡在客商面前，他们可怜极了……我觉得，在这个国家，装腔作势多，善始善终少……除非他们找到办法来补救在亚历山大港的错误和敲诈，不然我们应当放弃这个国家。”^[33]迪耶多和他的许多同胞一样，再也没有回国。他在开罗去世。

但外交手段是有用的。威尼斯人的自律、诚信和诉诸理智而非武力，赢得了开罗宫廷勉强的尊敬，但也使得威尼斯被大多数基督教国家视为马穆鲁克王朝的朋友，遭到睥睨。15世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威尼斯人慢慢拉开了与对手的距离。他们周期性极强的桨帆船航线推动了商业的运转。“穆达”在亚历山大港受到埃及人的欢迎，返航时受到德意志人的欢迎。到1417年，威尼斯已成为地中海东部最重要的贸易国；而在15世纪末，他们已经彻底打败了竞争对手。在1487年，亚历山大港只剩下三个外国人聚居区，两个是威尼斯的，一个是热那亚的；其他国家已经从这场竞争中撤出。威尼斯击败了热那亚，主要的决胜地不是基奥贾，而是旷日持久、看似波澜不惊的贸易战的发生地黎凡特。利润非常丰厚：在里亚尔托转售给外国商人时，棉花的利润可达80%，香料的利润达到60%。

从黎凡特运回香料的冬季船队快要抵达威尼斯城时，会有快速小艇先回来报告。人们在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上可以最先看到船队，教堂欢迎的钟声便会如雷鸣般隆隆响起。不同的穆达船队的回归——从贝鲁特返航的运输棉花的柯克船，从郎格多克、布鲁日、亚历山大港或黑海来的商用桨帆船——被安排在宗教游行、宗教节日和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之

间，也是一年中的重大事件。从亚历山大港回来的穆达船队会在12月15日到2月15日之间抵达，它的到来将激发一连串繁忙的商业活动。成群小船前去迎接桨帆船的归来；所有货物必须在海关大楼（dogana da mar）处登陆，也就是伸入圣马可湾的那个海岬上。“dogana”这个词是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阿拉伯舶来品，就像海关内的货物一样。所有的货包在没有缴纳进口税并加盖海关印章之前都不能上岸（税率为3%~5%），其中舞弊现象很多。

纵观几百年的港口生活，圣马可湾是一个相当混乱又丰富多彩的海事活动的舞台。威尼斯人把它当作一台工业机器，外界则惊叹不已。圆材和桅杆、索具和船桨、一桶桶一包包的货物堆放在码头上，船只和商品的喧嚣被艺术家重现在威尼斯的全景图中，15世纪的木刻画细节丰富，18世纪加纳莱托的海景画则鲜明艳丽。威尼斯是航船的世界。喜爱精确数字的卡索拉教士试图清点船只的数量，从刚朵拉开始，但还是放弃了，尽管他已经排除了“那些长途航行的桨帆船和远洋船，因为它们数不胜数……没有一座城市能在船只的数量和港口的宏伟程度上和威尼斯相提并论”。[\[34\]](#)



海关大楼

交税和通关之后，货物被装上驳船，经过大运河运往里亚尔托，或通过富商宫殿的水门，卸到宫殿底层把守严密的仓库里。里亚尔托位于

大运河宽阔的S型拐弯的中点，是整个商业系统的中心。在15世纪，里亚尔托的木桥是大运河上唯一的渡口。这里是威尼斯的第二海关大楼，所有通过意大利内河运输的货物，或者用马匹运过阿尔卑斯山的货物，都要经过这里。这个汇集点成了世界贸易的轴心和转盘。用日记家马里诺·萨努多的话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

这里丰富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似乎都在这里卸下、买卖，或重新包装、装船并销往别处。里亚尔托好比阿勒颇、大马士革或中世纪巴格达的投影，是世界的露天市场。有专门卸载大宗商品——油、煤、铁、酒——的码头；存放面粉和木材的仓库；不计其数的货捆、桶和麻袋装着五花八门的商品——地毯、丝绸、生姜、乳香、皮草、水果、棉花、胡椒、玻璃、鱼、花卉；熙熙攘攘的人群让这里显得生气勃勃；水面挤满驳船和刚朵拉，码头到处是船夫、商人、香料检查员、搬运工、海关官员、外国商人、盗贼、扒手、妓女和朝觐者；码头上，人们嘈杂地装卸货物，喊叫，抬起重物，小偷小摸，总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里是欧洲的集市，是威尼斯创立神话的历史地点。据传说，威尼斯城于421年3月25日（星期五）正午时分创立，最初奠基地点在里亚尔多圣雅各教堂的位置，这座商人的教堂据说也在同年于此修建。教堂墙壁上的铭文告诫人们永守正直、公平交易：“在此圣殿周围，让商人们秉承公正法律，计量准确，严守承诺。”教堂旁的广场是国际贸易的中心，“这座城市的所有贸易，或者说是全世界的贸易，都在这里开展”。^[35]国家的宣告在这里公布。在这里，银行家坐在长桌旁，在他们的账目上存款和支付，通过汇票从一个客户到另一个客户进行数量相当大的资金转移，无须动用现金；在这里，公债被发布，每日香料的价格被编纂起来，整理成表格，分发到许多商人手中，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商人。不像零售市场的喧哗吵闹，这里的一切都静悄悄地完成，这也体现了威尼斯的荣耀：“没有喧哗，没有噪音……没有讨论……没有辱

骂.....没有争议。”^[36]在凉廊的对面，挂有一幅世界地图，似乎在确认，可以在此纵横捭阖地经营贸易；还有一座钟“显示所有在里亚尔托的著名广场做生意的不同国家的时间”。^[37]里亚尔托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如果在这里被除名，等于结束了自己的贸易生涯。



木桥左侧就是里亚尔托。右侧有字的房屋是德意志人聚居区

从这个中心，所有使得威尼斯成为世界集市的贸易、活动和交换辐射出去。里亚尔托的大桥上张贴着穆达航线的消息和桨帆船拍卖的信息。拍卖由一名拍卖师主持，他站在长凳上，并燃烧蜡烛计时。在运河对岸，共和国将德意志商人安置在他们自己的聚居区内，并对其进行小心仔细的管理，差不多像马穆鲁克王朝管理威尼斯人一样；周围的街道则进行一些专业活动——海运保险、金匠服务、珠宝买卖。物质财富上绝对的繁荣、显而易见的丰饶富庶让来访者，如朝觐者彼得罗·卡索拉，心醉神迷。卡索拉觉得里亚尔托大桥周边地区“难以估量.....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聚集于此”。^[38]他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希望能尽览全景。商品的数量、色泽、尺寸、品种都让他赞叹不已。他用令人眼花缭乱、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容词记录了自己的印象：

别处按磅和盎司售卖的（货物），在这里都是按桶和麻袋（一麻袋容积为1莫焦^[39]）.....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布——挂毯、锦缎和不同设计的挂饰，形形色色的地毯，各种颜色和质地的毛丝混纺织物，各式各样的

丝绸；到处都是装满香料、杂货和药品的仓库，还有这么多美丽的白蜡！
这些东西让看过的人惊叹，完全无法准确地向没有看过的人描述出来。^[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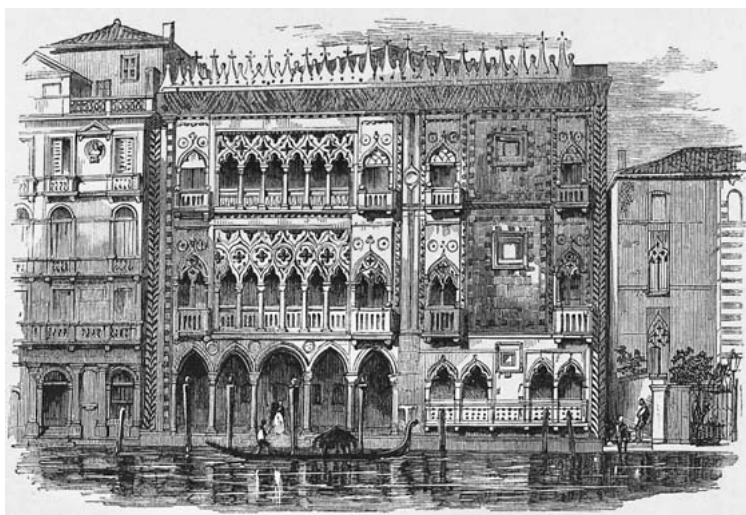
里亚尔托感官上的丰富给外来者以巨大的冲击。

在这里，威尼斯控制着从莱茵河谷到黎凡特的贸易轴心，影响了从瑞典到中国的贸易，运输着整个世界的货物：印度胡椒被运往英格兰和佛兰德；科茨沃尔德的羊毛织物和俄罗斯皮毛被卖给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叙利亚棉花被运到德意志市民手中；中国丝绸被穿到美第奇家族银行家的情妇身上，塞浦路斯的糖成为他们餐桌上的调味料；穆拉诺岛^[41]的玻璃被做成阿勒颇清真寺的灯；斯洛伐克的铜；纸张、锡和鱼干。在威尼斯，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甚至连从帝王谷出土的磨成粉的木乃伊，也可以作为药材销售。一切都以里亚尔托为轴心，再由穆达运送到另一个港口，或横跨潟湖、通过中欧的内河和道路运输。而对于每一宗进口和出口，共和国都要征税。“这里的财富如同泉中水一样流淌。”^[42]卡索拉写道。事实上，威尼斯唯一缺的就是合适的饮用水。“虽然嘴边就是水，但人们经常受到干渴的折磨。”^[43]

在14世纪60年代，彼特拉克曾惊叹，威尼斯人的贸易横跨广袤的世界。“我们的葡萄酒闪耀在不列颠人的杯子里，”他写道，“我们的蜂蜜取悦着俄罗斯人的味蕾。虽然难以置信，但我们森林里的木材被运送给埃及人和希腊人。从这里出发，油、亚麻和藏红花被我们的船运到叙利亚、亚美尼亚、阿拉伯和波斯，并将各种商品带回来。”^[44]这位伟人已经掌握了威尼斯人贸易的天才所在，不过他诗意地艺术化了一些细节（比如蜂蜜实际上是从俄罗斯进口的）。一个世纪后，这一进程已修成正果。到处都是威尼斯商人。他们采购、销售、议价、谈判，对利润贪得无厌，一心一意又冷酷无情，抓住一切机会赚取黄金。他们甚至垄断了神圣骸骨的市场。他们盗窃圣徒的遗骨——可疑的泛黄的头骨、手骨、整具尸体或切开的部分（前臂、脚、手指、头发）——以及一些跟基督生平有关的物件，用来提高城市本身的地位，并增加了在有利可图

的朝觐者旅游贸易中的潜力。828年圣马可遗骸被偷到威尼斯之后，又有一连串圣徒骸骨被偷到那里，其中许多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掳得的，这使得威尼斯成为虔诚基督徒钟爱的一个停留地。威尼斯收藏的所谓圣徒骸骨极其丰富，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拥有什么东西了：1971年，美国学者肯尼斯·塞顿在圣乔治·马焦雷教堂的一个壁橱里发现了圣乔治的头骨。

在视觉上，威尼斯城已然成为奇观。沿着大运河顺流而下，途经大富商的豪华宅邸，比如覆盖着金叶子、在阳光里熠熠生辉的黄金宫，犹如观看了一出令人惊艳的由活动、色彩与光线构成的戏剧。“我看到，400吨级船舶从运河旁房屋前通过，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街道了，”法兰西人菲利普·德·科米纳^[45]写道。^[46]人们在圣马可教堂参加弥撒，或者见证威尼斯一年中诸多盛大典礼，如耶稣升天节庆祝活动、执政官的就职典礼、海军总司令的任命仪式，喇叭齐鸣，红金两色的旗帜随风飞舞，战俘被游街，战利品得到公开展示；各行会、神职人员和威尼斯共和国的所有官方机构在圣马可广场周围庄严肃穆地游行——如此戏剧化的表演似乎在印证，这是一个蒙受独特神恩的国家。“我还从未见过一座城市如此高奏凯歌，”德·科米纳写道。一切都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



黄金宫

吉奥索法特·巴尔巴罗的旅行最有力地证明了彼特拉克对威尼斯物质主义的论断。巴尔巴罗是一名商人和外交官，他带着120名劳工从塔纳出发，去探索草原上的一座斯基泰坟堆，寻找财宝。1447年，他在冰冻的河上乘雪橇前行，但“发现地面非常坚硬，我们不得不放弃计划”。^[47]第二年，他再次前往。他的工人在坟堆里挖了一个深深的开口。他们失望地发现，这里只有一些黍壳、鲤鱼鳞片和一些手工艺品的残片：“用砖做成的、橙子那么大的珠子，表面用玻璃覆盖……还有一个银质大口水罐的半个把手，水罐顶端有一个蝰蛇的头。”他们再次被天气打败。巴尔巴罗的人这次挖到了一堆垃圾上边。离他们的发掘点只有几百码的地方，是一位斯基泰公主的墓室，那里埋藏着丰富的珠宝，足以点燃威尼斯人对东方黄金的最狂野梦想。这个墓室直到1988年才被发现。

^[1] 庞培石柱是位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古罗马胜利纪念柱，被错误地认为是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庞培时期建立的，实际上是297年为纪念戴克里先皇帝成功镇压亚历山大港一次叛乱而建造的，高26.85米，是最高的独立石柱之一。

^[2]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199

^[3] 法蒂玛王朝于909年~1171年统治埃及，中国史籍称之为绿衣大食，得名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后被大臣和将领萨拉丁以政变推翻，被阿尤布王朝取代。阿尤布王朝则被本文中的马穆鲁克王朝推翻。

^[4]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192

^[5] Kedar, Benjamin,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1976, p. 75

^[6] Kedar, Benjamin,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1976, pp. 74-5

[7] 即《圣经·新约》中耶稣洁净圣殿的典故，见“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当时圣殿的祭司允许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子做买卖；又因圣殿不收希腊和罗马的钱币，犹太人缴纳殿税或奉献，须用指定的希伯来钱币，故有兑换银钱的人，为那些外来朝觐者提供方便。买卖是在圣殿的范围内进行，神圣之地因而被玷污；占用外邦人的院子，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神的权利；祭司和商人勾结串通，祭司给予商人各种方便，而商人高价剥削，然后共分暴利。耶稣大力谴责这些利欲熏心的商业行为。

[8] Kedar, Benjamin,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1976, p. 57

[9]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129

[10] Tenenti, Alberto, ‘The Sense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Venetian World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Renaissance Venice*, ed. J. R. Hale, London, 1973, p. 22

[11] Lane, Frederic C., *Andrea Barbarigo, Merchant of Venice 1418-1449*, Baltimore, 1944, p. 83

[12] 克拉克帆船是15世纪盛行于地中海的一种三桅或四桅帆船。它的特征是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大斜桅。克拉克帆船体型较大，稳定性好，是欧洲史上第一种可用作远洋航行的船只。

[13] St?ckly, Doris, *La Système de l’incanto des galées du marché à Venise*, Leiden, 1995, p. v

[14]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p. 167-8

[15] Howard, Deborah, *Venice and the East*, London, 2000, p. 18

[16] Howard, Deborah, *Venice and the East*, London, 2000, p. 19

[17] 拜占庭帝国的一种货币。

[18] Dotson, John E., *Merchant Culture in Fourteenth Century Venice: the*

Zibaldone da Canal, New York, 1994, p. 83

[19] Dotson, John E., *Merchant Culture in Fourteenth Century Venice: the Zibaldone da Canal*, New York, 1994, p. 12

[20] Dotson, John E., *Merchant Culture in Fourteenth Century Venice: the Zibaldone da Canal*, New York, 1994, pp. 127-8

[21]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209

[22] 即所谓“亚历山大港的十字军东征”，1365年10月，塞浦路斯国王彼得一世与医院骑士团攻克并洗劫了亚历山大港，大肆屠杀、破坏和掳掠，但因为无法守住城市，很快撤退了。威尼斯事实上为彼得一世提供了船只和其他支持。

[23] Constable, Olivia Remie, *Housing the Stranger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Lodging, Trade, and Travel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2004, p. 275

[24]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196

[25] 所谓边缘政策，是指（一般在国际政治中）将危险的政策推到极限（如战争的边缘）也不肯让步，从而获利的政策。

[26]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192

[27]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212

[28]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196

[29] Pagani, Zaccaria,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in *Le Voyage d’Outre-mer (égypte, Mont Sinay, Palestine) de Jean Thénau: Suivi de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 1884, p. 178

[30] Pagani, Zaccaria,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es du Soudan d'égypte', in *Le Voyage d'Outre-mer (égypte, Mont Sinay, Palestine) de Jean Thénault: Suivi de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 1884, p. 188

[31] Pagani, Zaccaria,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es du Soudan d'égypte', in *Le Voyage d'Outre-mer (égypte, Mont Sinay, Palestine) de Jean Thénault: Suivi de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 1884, p. 187

[32] Kedar, Benjamin,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1976, p. 9

[33] Curatola, Giovanni, 'Venetian Merchants and Travellers',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ed. Anthony Hirst and Michael Silk, Aldershot, 2004, p. 192

[34]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p. 141-2

[35] Crouzet-Pavan, Elisabeth, *Venice Triumphant: the Horizons of a Myth*, trans. Lydia G. Cochrane, Baltimore, 1999, p. 159

[36] Crouzet-Pavan, Elisabeth, *Venice Triumphant: the Horizons of a Myth*, trans. Lydia G. Cochrane, Baltimore, 1999, p. 159

[37] Howard, Deborah, *Venice and the East*, London, 2000, p. 119

[38]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129

[39] 1莫焦相当于1蒲式耳，约合36.4升。

[40]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129

[41] 穆拉诺在威尼斯以北约1.6公里处，名义上是岛，其实是群岛，岛与岛之间由桥梁连接，形同一岛。穆拉诺的玻璃制造业称雄欧洲几个世纪。由于穆拉诺玻璃大受欢迎，穆拉诺的玻璃工匠很快成为穆拉诺岛上的显赫公民。在14世纪以前，玻璃工匠被允许佩剑，并享有豁免权，他们的女儿可以嫁入威尼斯豪门。穆拉诺的玻

璃师傅对威尼斯如此重要，以至于被禁止离开威尼斯共和国，但仍然有人冒险迁往英国和荷兰等国落户。

[42]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129

[43]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132

[44] Petrarca, Francesco, *Lettere seni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vol. 1, trans. Giuseppe Francassetti, Florence, 1869, p. 110

[45] 菲利普·德·科米纳（1447～1511），勃艮第和法兰西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他的回忆录是15世纪欧洲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

[46] Commynes, Philippe de, *The Memoirs of Philippe de Commines*, trans. Andrew Scoble, vol. 1, London, 1855, p. 169

[47] Barbara, Josafa and Contarini, Ambrogio, *Travels to Tana and Persia*, trans. William Thomas, London, 1873, pp. 6-8

16.尼普顿之城

1500年时的景象

1500年，也就是奥西奥罗执政官开始自己的征服之旅的整整五百年之后，威尼斯艺术家雅各布·德·巴尔巴里出版了一幅巨大而令人惊叹的地图，长近3米。地图的视角有所倾斜，是俯瞰威尼斯城的。在飞机发明以前，人类还无法鸟瞰威尼斯全景。从1000英尺高空俯视的视角，巴尔巴里从容地以详尽的、自然主义的细节还原出了这座城市。这幅木刻全景图基于从城市多个钟楼所做的细致勘察。它展示了城市的一切：教堂、广场、水道、执政官宫殿、圣马可广场和里亚尔托、海关大楼和德意志人聚居区、慵懒的大运河S形曲线，以及运河中心位置的木桥。

尽管地图很详细，但不太真实。德·巴尔巴里扭曲了一些透视构图，以着重强调着这个地方的海洋景观，以至于它像极了一只张大嘴的海豚，其形状鲜明的尾巴落在最东端。就像这座城市的视觉宣传物——它的建筑和旗帜、精细的典礼、宗教节日和节庆活动——一样，这幅地图是一个大有深意的发明。德·巴尔巴里笔下的威尼斯是一个船舶之城，在举行海事繁荣的庆典。在吉祥的周年庆典中，它歌颂着威尼斯从泥泞沼泽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城市的伟大历程。这座城市似乎是永生不死的，似乎不会受到光阴流逝的影响。图中几乎看不见什么人，也没有喧闹和繁忙的贸易。它展示着不需要人为努力的财富。

潟湖十分平静，只有微风轻轻拂过。这风是天使的呼吸，推动船队走向繁荣。像水壶一样圆滚滚的帆船停在锚地，粗缆紧绷，时刻准备出发：有些帆船的索具和风帆已经装配完毕，有些拆掉了桅杆，其他的停放在干船坞，或是倾斜摆放着；后倾的流线型桨帆船停靠在帆船旁边；在象征着威尼斯与海洋姻缘的金船上，正义之神手持长剑，屹立在船

首；一艘商船在大运河上被拖走。在这些远洋船只周围，一群小船在木刻画上激起了阵阵涟漪。威尼斯人划船的各种风格一一在列：一场四人快艇的划船比赛；两人划桨的平底的潟湖小艇；单人撑竿的刚朵拉；还有小型帆船，就像带有鸟嘴的腓尼基商船，载有潟湖蔬菜园的产品。大陆被置于边缘，仿佛并不重要。

地图上有吉祥的神祇守卫。在地图的最上方，威尼斯的守护神墨丘利，即贸易之神，大手一挥，宣告着：“我，墨丘利，最为垂青此地，佑护它的商业繁荣。”^[1]下方标示着意义重大的年份：1500年。但地图中心的海神尼普顿才是最引人注目的神。肌肉强健的尼普顿骑着有鳞片和拱鼻的海豚；他的三叉戟高举朝天，宣示着：“我，尼普顿，居于此，守护着这片海洋和这个海港。”^[2]这是海权大国的胜利宣言。在德·巴尔巴里的图画中，这座城市处在鼎盛时期。



尼普顿之城

船只绘制得相当仔细，朝觐者彼得罗·卡索拉无法清点船只的总数。这些船只是威尼斯的生命线。这座城市买卖、建造、消耗，或制造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用船运来的——鱼、盐、大理石、武器、橡木栅

栏、掳掠来的圣物，以及古老的黄金；德·巴尔巴里用的木版，贝利尼^[3]的绘画颜料；用来冶炼并打造成船锚和钉子的矿石、为大运河河畔宫殿准备的伊斯的利亚石材、水果、小麦、肉类，用来做桨的木材和制绳用的麻；到访的商人、朝觐者、皇帝、教皇和瘟疫。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如此痴迷于经营航海业务。男性中有一大部分人以此为生；所有等级和阶层的人都参与其中，从贵族船主到最低贱的桨手。1423年，执政官托马索·莫切尼戈在临终前发表演说，历数了共和国的航海资源，尽管有些地方可能有些夸大：“在这座城市里有3000艘载重较小的船只，配备17000名水手；300艘大船，配备8000名水手；常备45艘桨帆船，以保护商业，雇用了11000名水手、3000名木匠和3000名敛缝工人。”^[4]

在德·巴尔巴里的地图上，最醒目的建筑便是有围墙环绕的巨大的国家兵工厂，位于“海豚”的尾部。三百多年来，为了满足共和国的航海需求，兵工厂在不断扩建。在1500年，兵工厂占地60英亩，环绕着50英尺高的全封闭砖墙，墙顶端砌有城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基地。它能够以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匹敌的速度和质量建造、武装并交付80艘桨帆船。这座“战争车间”负责制造威尼斯国家所有的航海装备。^[5]它拥有干船坞和湿船坞、用于建造和储存桨帆船的工棚、木匠工坊、制造绳索和船帆的工厂、熔炉、火药厂、木材仓库和用于存放造船过程中所有组件和相关装备的仓库。



兵工厂

通过不断改良，威尼斯人已经很接近流水线生产。这在中世纪国家组织动员资源的局限下，已经是最高水平。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专业化和质量控制。技能分工至关重要，从在遥远森林里种植树木和选择木材的林业人员，到专业的造船工匠、锯木工人、木匠、敛缝工人、铁匠、织绳工和制帆工人，再到跑腿搬运的普通劳工，每个团队的工作都受到严格检查。威尼斯人深知，大海是个铁面无情的法官，无时无刻不在腐蚀着铁和锚索，考验着接缝，撕碎帆布和索具。严格的规定保证了材料的质量。每个纺线机的卷线轴都做好了标记，这样每个个体的工作都能被确认识别；每一位麻绳制造工人的线轴都有标识，以识别它出自何人之手；每根绳子出厂时，便被附上一个彩色的标签，说明它的正确用途。共和国对每一个生产环节的严格监管和高度关注，反映了它对航海生活的深刻理解。若是造船时偷工减料，船只、船员和船上价值数千杜卡特的商品都可能毁于一旦。尽管常常使用神话般的言辞，威尼斯实际上是极其实事求是的。这是一个木材、铁、绳子、风帆、舵和桨组成的共和国。它宣称：“制绳业是船舶安全的保证，同样也是水手和资本的安全保障。”国家提出无条件的要求；敛缝工人需要对断裂的连接处负责，木工则需对崩断的桅杆负责。如果工作不达标，就可能被解雇。

兵工厂是威尼斯物质上也是心理上的核心。圣马可广场钟楼每天敲响“木匠钟”，宣告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全城人听到这钟声，就知道“工厂”在运作。兵工厂的工人在劳动人民中算得上是贵族阶层。他们享有特权，和权力中心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受到一组选举产生的贵族的监督，享有把新执政官扛在自己肩上走过广场的权利；他们在国家庆典游行队伍中有自己的位置；兵工厂的司令去世后，他的遗体会由工头们抬进圣马可教堂，并在空中举起两次，一次是表示他承担这份责任，又一次则是表明他履行了他的责任。造船匠的技能和秘密知识往往一代一代流传下去，他们是威尼斯一直小心守护的瑰宝。

兵工厂让这座城市的形象多了几分钢铁意志和军事上的强悍。兵工厂的城堞将世界隔绝在外，夜间有警卫巡逻，每隔一小时互相呼唤提醒；在兵工厂威严的大门上方，圣马可雄狮爪中握着的福音书没有打开以宣示和平，而是紧紧闭合的：兵工厂的雄狮时刻准备着战争。这个地方的工业令参观者叹为观止。1494年，彼得罗·卡索拉到访时在军械仓库里看到“盖起来的和没盖起来的胸甲、剑、弩，大小不一的箭、头盔、火绳枪和其他火器”；每一个用于储备桨帆船的棚屋都有20个单元：

每一个单元内只有一艘桨帆船，但体积很大；在兵工厂的一个部分里，有一大群高级工匠和普通工人，他们专门建造桨帆船或其他各种船只.....也有一些高级工匠专门制造弩、弓和大小各异的箭.....在一个室内工坊，有十二名高级工匠，每个都带着自己的工人，负责自己的熔炉；他们的工作是不断制造船锚和各种铁器.....还有一个大而宽敞的房间，有很多妇女专门制作风帆.....还有一台漂亮的机械，可以将任何重型桨帆船或者其他船轻易抬出水面。

他还看到了称为“塔纳”的制绳厂，这是一座狭窄的大厅，有1000英尺长，“太长了，以至于我从一端几乎看不到另一端”。^[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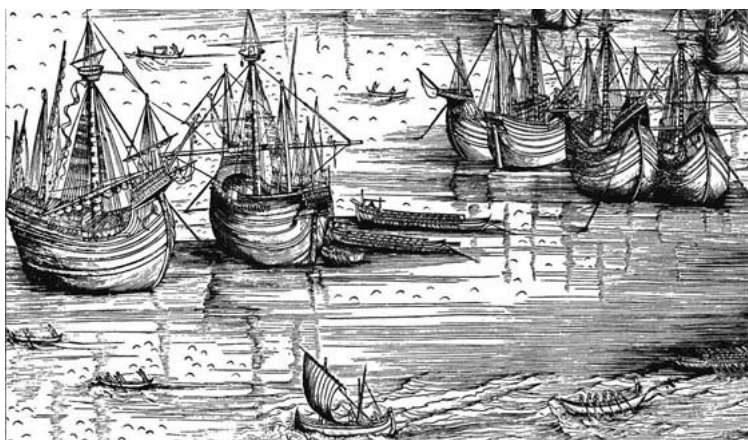
兵工厂的工作原则是实时管理、以需定供；桨帆船的所有部件以模块的形式储藏在干燥仓库里，战时可以迅速将其组装起来。井然有序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保证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一支桨帆船舰队，兵工厂可能随时储备着5000个划桨长凳和脚撑、5000支桨、300具帆、100套桅杆和船舵、索具、沥青、锚，武器、火药和舰队快速部署所需的器物。1436年夏天，西班牙旅行家佩罗·塔富尔目睹了威尼斯兵工厂快速建造一队桨帆船的过程：船体一个接一个地下水，数组木工安装船舵和桅杆。塔富尔然后观察着每一艘桨帆船通过装配线的情景：

航道两边的兵工厂房屋的窗户都打开着，一艘小艇拖着一艘桨帆船出来，人们从窗户把东西送出来，有绳索、面包、武器、弩炮、臼炮，桨帆船需要的所有东西都这样从两边的窗户里送出来，当桨帆船到达航道尽头

时，所有需要的人都上船了，连同全套船桨，它从一头到另一头都已装配完毕。以这种方式，在三点到九点之间，十艘全副武装的桨帆船就准备就绪了。^[7]

兵工厂不仅制造战船，也生产国有的走定期穆达航线的商用桨帆船。在威尼斯，航运是二元的，威尼斯人深谙二者择一之精髓。有桨帆船和帆船；军用桨帆船和商用桨帆船；私人船只和国有船只；武装船和非武装船——战船和商船之间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对立关系，因为商船也可以用于作战，所有船只都携带一定数量的武器。更准确地说，武装船指的是在出发时携带全套人员、重甲、火绳枪和训练有素的弩手的船只，非武装船则没有这样的全套配备。国家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管理。

《航海法》在1255年首次颁布，并不断完善。关于装卸货、船员人数、携带的武器数量、船长和其他船上官员的责任和义务、需要支付的税费和纷争的处理，都有相应的法律条款。



圣马可湾内的圆船和桨帆船

每艘船都有明确规定的载重量，在15世纪是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承重线标在船侧，这是载重吃水线的前身。出发前，船只接受检查，以确保它的载重是合法的，以及载有适合其规模的船员和必备数量的武器。这样的规定可以根据情况随时微调；1310年的法律规定船只必须携带更多武器，于是允许它们可以多吃水1英寸；从1291年开始，船

员必须以帽子取代原先的兜帽，作为头部的防具；当大型帆船开始用机械手段（如螺丝和杠杆）压缩体积大、重量轻的货物（如棉花）时，出现了专门的立法，以防此种手段对货物和船体造成损害。根据《航海法》，手工装船和工具装船被区分开来，根据船龄规定机械装船的载重量上限。

海上贸易和海洋帝国自身一样，通过管理、持续的监督和法律手段，受到政策贯彻始终的经营。威尼斯体制的这些标志——外国人对它的良好秩序和正义感颇为仰慕——渗透于他们海事管理的全部工作中。威尼斯海上贸易的经营管理与整个国家的典型运作很类似，由执政官和执政官议事会密切关注。一系列选举产生的官员对国有和私营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组织和处罚：他们检查船员，核查货物，收取税款和货运手续费，划定额定负载，并且处理托运人、船主及船员之间的法律纠纷。

国营航线由国家最高层官员——大议事会（威尼斯的中央管理机构）选举产生的官员来组织。这些官员被称为“贤者”，他们根据持续不断的情报（主题是战争威胁、目的地的政治稳定性、市场情况、粮食储备和海盗猖獗程度）来筹划下一年的穆达航线。他们的职权范围很广。他们可以规定舰队规模、路线、停靠码头、停靠时间、所运货物和运费率。运输高价值货物（布料、现金、金银块或香料）时，以及运送国家要人、大使和外国显贵时的条件极其严格。任何承揽海运业务的财团都不得拒绝商户运输合法货物的要求。即使船只已经出租，一旦发生战争，国家仍可以强制性征用船只和船员。国家任命自己的官员为舰长，即船队的航海和军事领导人，负责保护共和国的财产和公民的生命安全。每一位船员，哪怕是最低级的桨手，都要宣誓遵守合约。

在兵工厂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监管、安全措施和质量控制，以及针对人性弱点、欺诈、剥削和贪婪的立法，都是长期航海积累出的经验。

在海上，只需一次风向变化，利润就能变成急转直下的亏损，安全就能变成极度的危险。戏剧性的失败最能让威尼斯体制为之战栗。1516年春天，一艘叫作“马尼亚”号的船龄较老的商用桨帆船被安排去跑亚历山大港的航线。从3月到7月，它一直在兵工厂接受船体检查。检查人员一致认为，该船很危险；它需要维修，但转租此船的财团不愿花维修的钱，而且他们不想错过香料集市的时间。兵工厂当局最终准许了它的航行，开出了空头支票：在亚得里亚海的普拉港对其进行维修。“马尼亚”号经过了普拉，却没有维修。它载着一系列货物，包括一批铜条，是否超重不得而知。船上大约有200名船员。

12月22日，在距塞浦路斯250英里的海上，“马尼亚”号遭遇了一场风暴，船身开始进水。它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跌跌撞撞，铜条冲开了固定物，散落在船舱内；次日黎明时，船断成了三截。人们奋力抢夺救生艇，小艇一下就超载了。一些幸运的船员爬上了小艇，而其他人则被已上小艇的人拔剑强行制止。后来的人跌回海里溺亡。在这死亡之筏上挤着83人。他们用麻袋、桅杆和桨做成了舵和粗糙的帆，试图航行到塞浦路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惊涛骇浪的海上剧烈颠簸，“浪头高得像圣马可教堂”。^[8]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淡水。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死于饥饿、干渴和寒冷。他们喝自己的尿，吃掉了身上的衬衫；他们开始产生幻觉：他们看到圣徒手持明亮的蜡烛，划过天空。文明崩溃了。一封从塞浦路斯发出的信含糊地解释道：“有可能，一些人减轻了别人的饥饿。他们已经决意杀死小船的文书，因为他年轻、肥胖而且肉嫩多汁，然后喝他的血。”在第八天，他们发现了陆地，但他们身体过于虚弱，没办法选择一个安全登陆点。有人在海浪里淹死；有人跪伏着爬到岸上。原先的83人中，只有50人存活。“一个姓索兰佐的青年活了下来，”报告称，“但他命悬一线、生命垂危。还有船主、高贵的维琴佐·马尼奥也活了下来，但病入膏肓，命不久矣……其他的幸存者中有人将逃生的小艇奉献给真十字架，有人会赤脚步行去一处朝觐，其他人去另一处。他们全都发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这封信的

作者得出了冷静的结论：

这是件极其悲惨的事情。航海造成了太多巨大的危险，全都跟人们对金钱的贪得无厌息息相关。我将如何回家，我现在也说不准。今天早上，我又一次向圣灵和圣母祈祷，因为在看过这艘驶往亚历山大港的桨帆船的残骸后，我非常害怕乘坐旧桨帆船航行。

尽管德·巴尔巴里赞颂尼普顿，但威尼斯人对大海总是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大海是他们存在的基石，也是他们的命定之处。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从威尼斯一直到克里特岛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海，但它也是极度危险、无边无际和难以安抚的。16世纪经验丰富的船长克里斯托福罗·达·卡纳尔写道，大海是“一个看起来无边无际，又令人胆寒的区域”。^[9]如果耶稣升天节仪式是威尼斯人占有大海的宣示，那么它的潜台词就是恐惧。风暴、海难、海盗和战争依旧是基本的事实。多少个世纪以来，桨帆船上的生活特别困难，也日渐不受欢迎。大家同心同德的观念越来越破碎。随着船员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贵族阶层财富和权力的日见增长，桨手（不管天气多么糟糕，他们都必须坐在狭窄的长凳上划桨）的地位逐渐下降。他们食用葡萄酒、奶酪、粗面包、航海饼干和蔬菜汤来维持生存。随着航海技术的革命，冬季航行越来越常见，桨手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例如，皮萨尼的水手们由于冻伤和营养不良，死于严寒。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不过每个桨手都可以携带一个袋子或箱子上船，所以他们可以自己做点生意来挣点钱。

在军用桨帆船上，备受尊重的船长——例如韦托尔·皮萨尼和一个世纪后的特立独行的贝内代托·佩萨罗——知道桨手需要什么才能生存。说得过去的饮食、不至于在环境最恶劣的冬季挨冻、有获取战利品的机会，这些会赢得桨手们持久的忠诚。如果指挥官愿意与桨手们分享自己的食物和战斗的风险，和他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桨手们会为指挥官赴汤蹈火。正是桨帆船的水手们猛锤议事会的大门，要求释放皮萨尼，后来又索要他的棺材；面对那些冷淡倨傲的贵族，水手们偶尔也会

罢工。他们希望获得同志友谊、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命运。他们对圣马可怀着无限的忠诚；当1499年威尼斯海权面临终极挑战时，辜负国家的绝不是那些坐在长凳上的普通水手。

到15世纪末，桨手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底层。商用桨帆船上的许多桨手是属于船长的债务奴隶，尽管他们很少被锁起来。由于黑死病使得威尼斯人口减少，越来越多的水手来自殖民地。达尔马提亚和希腊的沿海地区是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地。1494年，德意志朝觐者菲利克斯·法布里仔细观察了前往圣地的桨帆船上桨手的生存状况：

他们人数很多，都是大个子；但他们要承担的体力劳动只适合驴来做，他们经常被咆哮、拳脚相向和咒骂。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残酷的事情，他们做牛做马，被殴打得比牲口还要厉害。他们经常被迫脱下自己的外套和衬衫，光着上身工作，好让工头的鞭子能直接打到他们身上、胳膊上、肩膀上。这些桨帆船奴隶大部分是船长买下的奴隶，或者是地位低下的人、囚犯，以及出逃的人。如果害怕他们逃跑，就用铁链将他们锁在长凳上。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悲惨生活，他们有气无力地工作，没有目的，除非有人站在他们头上呵斥他们。他们吃着最劣质的食物，始终睡在他们划桨的长凳上。无论白天和黑夜，他们总是露天工作，当有暴风雨来临时，他们便处在海浪正中间。当他们不工作时，就坐着玩纸牌和骰子，赌真金白银，嘴里不时冒出一些脏话和对神灵的亵渎.....[\[10\]](#)

这位善良的修士对桨手们的脏话赌咒最为烦恼。一艘商用桨帆船的船长对他的朝觐者乘客应尽的合同义务之一，便是保护他们免遭水手的伤害。

不安全感是深植于航海生活的；任何与不明身份船只的相遇都可能引发惊慌失措。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桨帆船会倒退着进入一个外国港口，弩手们蓄势待发，桨手们做好准备，只听哨子声响，便立即驾船撤离。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在地中海始终是个严重问题的海盗行径泛滥成灾，对航海造成了巨大影响。1300年之后，四处劫掠的加泰罗尼亚海盗、被驱逐的热那亚派系、希腊人、西西里人、安茹人，以及越来越

多以小亚细亚海岸为基地的土耳其人，将地中海变成了海盗的乐园。1301年，威尼斯的所有船只都被命令增加武装防御；1310年，国营桨帆船不得不将自己船员中弩手的比例提高到20%。所有船员都应当能够战斗，并且也会配备武器；法律规定，船只必须配备若干数量的板甲。在穆达系统中，商用桨帆船在战舰的护卫下航行，可以确保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保护。穆达桨帆船的船员人数较多，约200人，对所有海盗（除了一整队热那亚军用桨帆船之外）都能起到震慑作用。单独航行的私人帆船更可能在经过一个小海湾时成为潜伏在附近的海盗的目标。对威尼斯而言，海盗行径是最可恶的犯罪，是对贸易和法治的公然侮辱。共和国希望自己的海上暴力活动都由国家来组织，私人不要掺和。政府档案中记载了数千起抢劫案，或是对货物的非法充公，以及因此导致的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这些国家的公民犯下了海盗罪行，威尼斯要求这些国家对此负责，扣押其船只等），但在海上常常是适者生存。

海军舰队和商用桨帆船共同承担清剿海盗的责任。对抗是血腥的，处罚也是严酷的。被抓获的海盗将在他们自己的甲板上被砍成肉泥，或被吊死在他们自己的桅杆上，然后他们的船会被烧毁。威尼斯海外领地的基督徒海盗面临着尤其残忍的惩罚，但在1501年，一个令人憎恶的土耳其海盗的命运让最铁石心肠的威尼斯人都为之胆寒。海军总司令贝内代托·佩萨罗写信叙述了这个海盗的命运。

土耳其海盗艾里奇在从巴巴利返回的途中偶然在米洛斯岛登陆。他的船在一次风暴期间在岛上搁浅。船上有132名土耳其人。他和另外32人被生擒。其余的人被淹死，或者被岛上的人杀死了，但我们还是设法抓住了他。12月9日，我们将艾里奇绑在一支长桨上，活活烤熟了。他在极大的痛苦中挣扎了三个小时，最终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还将海盗领航员、大副和一名来自科孚岛的背叛了自己信仰的桨手插死在尖木桩上。我们用箭射伤另一个，然后将他溺死……海盗艾里奇在和平时期给我们的航运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11\]](#)

佩萨罗进一步解释说，之所以对艾里奇下这样的狠手，是为了给一

位遭受类似痛苦的威尼斯贵族复仇。

对意气风发的威尼斯桨帆船指挥官来说，捕捉海盗几乎可以被称为一种运动了。1519年2月，祖安·安东尼奥·塔亚皮拉写信给弟弟，讲述了自己最近的战功：

那是在圣保罗的宗教节日，也就是上个月25日。在黎明时，我看见
了“发罗拉^[12]的摩尔人”的弗斯特船（一种小型桨帆船）。在离杜拉佐不到
1里的地方，我冲了上去。那船逃回了杜拉佐的背风处。它逃跑时，我朝它
开了两炮，不过都没打中。当我看到它已经到了城墙边，就调转船头，按
照自己的路线去往科孚岛。但他们（海盗）想为他们在塞斯塔角被摧毁的
另一艘船报仇，就往船上装了他们觉得足够多的勇士，开始追赶我的船。
我看到他们追来，便让我的船做好准备，向外海方向撤退5里。在那里，双
方互相攻击，战斗非常激烈，持续了七八个小时，我把他们全部杀掉了。
死者中有“摩尔人”和弗斯特船的4位其他指挥官……我的桨帆船上7人死
亡，93人受伤，但只有3人是致命伤，其中包括我的主炮手，我（出于怜
悯）了结了他的性命。其他人的伤也很重。他们会失去眼睛或者变成瘸
腿，但我们希望他们能活下去。我只在大腿上有一个长矛刺出的伤口，虽
然那是实打实的一次重击，但我只受了点轻伤。但我很满意的是，在最后一
次进攻中，他们跳上了我的船头，我亲手宰了两个人——就在那时他们
用长矛刺中了我。我缴获了海盗的响板、战鼓和旗帜，还得到了“摩尔
人”的首级，我按照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把它高高挂在我的船头。^[13]

作为比腐烂的头颅更长久的纪念，塔亚皮拉特意嘱咐弟弟“为我制
作一幅底色为黄色和蓝色的旗帜，三等分，点缀着土耳其头巾，把它做
得大大的，并在第一时间送到科孚岛，这样我就能在5月1日的游行中使
用这面旗帜”。他当然要大肆宣传自己的这次胜利。

乘船旅行是许多威尼斯人每天司空见惯的事情，太熟悉以至于不需
要做任何详细说明。对中世纪末期威尼斯航海生活留下最生动记录的，
往往是外国人，特别是那些不谙水性、初次乘船前往圣地的朝觐者们，
比如德意志僧人菲力克斯·法布里和佛罗伦萨人彼得罗·卡索拉。法布里
好奇心非常强，经历过两次这样的旅行，记录了所有遇到的危险和船上

的情绪波动。

威尼斯有去往圣地的定期航运服务，用的是改装过的商用桨帆船。威尼斯当局想维持好的名声，也知道贵族船长们寡廉鲜耻的天性，所以非常重视对圣地航线的监管。它提供了一种航线套餐服务，包含沿路的饮食和雅法与耶路撒冷之间的交通。此种服务要签合法的契约。即便如此，每次单程也要花五六个星期，依然是一种炼狱——有时则是向地狱的一瞥。朝觐者们被安置在主甲板下方缺乏照明的长舱室里，每个人睡在一个18英寸宽的空间里，舱底往上散发出阵阵恶臭，头顶上的厨房渗下的油烟更是令人窒息。在夜里，甲板之下恶臭难当，再加上同行乘客的哭喊和呻吟、船只摇晃的陌生动作、打翻的夜壶传出的呕吐物和尿的骚臭味、争吵、斗殴、臭虫和跳蚤，一位英格兰朝觐者称其为“简直是邪恶的，炙烤般炎热，恶臭刺鼻”。^[14]

风暴到来的时候，是非常突然且惊天动地的。1494年6月，卡索拉乘坐的桨帆船在达尔马提亚海岸遭遇狂暴的海浪，被往西冲出了70英里，到了意大利的边缘。在漆黑一片的隔舱里，朝觐者们被从一边甩向另一边；他们能感觉到船被“暴怒的海洋扭曲着”，船板嘎吱作响，呻吟阵阵，“仿佛随时可能断裂”。^[15]海水透过舱口灌进来，将可怜的朝觐者们全身浸湿。尖叫声非常惨烈：“仿佛所有在地狱受折磨的灵魂就在这里。”^[16]卡索拉对当时的一个情景回忆道：

死亡对我们穷追不舍，大海是那么的狂躁，所有人都抛弃了生的希望；我再说一遍，是所有人……夜间，巨浪拍打着船身，艙楼都被海浪淹没了……整艘桨帆船都被水浸透……水从天空和海洋而来；四面八方尽是水。每个人嘴里都喊着“耶稣”和“怜悯我”，尤其是当巨大的海浪冲向桨帆船，带着恐怖的力量，在那个时刻，所有人都似乎要葬身海底。^[17]

桨手们全身都湿透了，他们乞求到甲板下面去。留在甲板上以稳定船只的人整个暴露在如山高的骇浪里；三个舵手在艙楼甲板的水中挣扎，才能勉强操舵。

法布里热衷于见证万事万物，有时他在观看狂暴大海时体验到一种几乎是审美的愉悦。“海水比其他地方的水来得更激烈，更喧嚣，也更美妙。在风暴期间，我或坐或站在上层甲板，观看接连不断的惊人阵风和令人恐惧的巨浪，把这当作一种乐趣。”晚上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科孚岛以北不远处，法布里的桨帆船遭遇了狂风。

天还黑着，看不见星星；我们转到迎风面时，一阵极其恐怖的风暴降临了，海洋和天空都被撼动了。无比狂暴的风将我们高高抛起，闪电劈下，雷鸣震耳欲聋……船的两边都降下了可怕的雷霆，海上的很多地方看起来就像燃起了大火……猛烈的风持续撞击着桨帆船，用海水淹没它，从船的两侧不断地冲击着船身，犹如巨石从山上滚下，直接砸向了木质船身。[\[18\]](#)

暴风冲击船的巨响“犹如磨盘被直接砸向了船身……如此凶猛的风不停地折腾着桨帆船起起伏伏，让它左右摇晃、四处飘移，人们根本没办法躺在自己的卧铺上，更不用说坐着了，站着就更不可能了”。朝觐者的甲板陷入一片混乱。

我们不得不紧紧抱住船舱正中心的柱子，它们支撑着上层结构；或者整个人蹲伏起来，用双臂和双手紧紧抱住我们的箱子，让我们保持相对静止；有时候，又大又重的箱子会整个翻过来，紧紧抱住它的那个人也会随之翻倒。

在黑暗中，物品从舱壁上飞落，重重地砸下来；海水灌进舱口，“整艘船上没有不被打湿的东西；我们的床和所有的东西都被浸透了，我们的面包和饼干都被海水泡坏了”。木头的咯吱作响让所有人呆若木鸡。“在风暴中，没有什么声音比船的嘎吱声更让我害怕了，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家觉得，船一定是哪里坏了”。此时就是对兵工厂质量控制程序的终极考验。

甲板上的情况更恐怖。主帆被撕成了碎片，桁端“弯得像一张弓……我们的桅杆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噪音，帆桁也同样如此；整艘船所

有的连接处似乎都要裂成碎片了”。^[19]船只的管理陷入了一片混乱。

桨帆船奴隶和其他水手东奔西跑，竭尽全力地大声呼喊，仿佛他们马上就要被剑刺死；一些人顺着侧支索爬上了帆桁，试图将帆降下来；下方甲板上的一些人四处乱跑，试图抓住布面；一些人将绳索穿过滑轮，用卷帆索收拢船帆。

在这张皇失措、六神无主、电闪雷鸣之际，一个鬼影突然出现，让船员们惊呆了。一束固定的光——几乎可以肯定是“圣艾尔摩之火”^[20]——在船头徘徊。“从那里，它慢慢地移动，从船头到船尾，然后在船尾消失。这光是一线火焰，大概有一腕尺^[21]宽。”^[22]风暴肆虐的过程中，人们大感震惊和敬畏，甲板上的所有人“停止了自己手边的活计，停止了喧闹和呼喊，双膝跪下，高举双手向着天空，用低沉的声音祈祷着‘神灵！神灵！神灵！’”这被认为是上帝恩典的迹象。风暴仍在咆哮，“这之后，桨帆船奴隶们继续他们惯常的工作……并且以欢快的号子配合着工作”。

法布里的船在这场风暴中幸存下来，三天之后，它面临着另一场灾难。随着夜幕降临，达尔马提亚海岸的风焕然一新，船在“一座险峻的山脚下颠簸……当我们靠近山脚并试图将船头迎向风时，风浪如此剧烈，船失控了，船头径直冲向岸边，狠狠地撞向陡峭的岩石”。^[23]一瞬间，船上的纪律就荡然无存了；桨手们“开始到处乱跑，准备逃命”。下方隔舱内传来呼喊：“各位大人，快到甲板上来！船已破损，正在下沉！”每个人都跑到船尾，混乱不堪；升降梯上一声巨响，救生艇已经被放下了，“船长带着他的弟弟、弟媳和他自己的追随者，想要抢先逃跑”。法布里听过许多关于海难的故事，知道“马尼亚”号惨剧并非绝仅有。“上了救生艇的人会拔出自己的剑和匕首，阻止其他人上船……落水者抓住救生艇的桨和侧舷，手指和整只手都被救生艇上的人砍断了。但是，”法布里接着写道，“这一次上帝又救了我们；混乱平息了下来，船在岩石旁停了下来，帆收了起来，并抛下了船锚。”

当船被拖向海岸背风处时，船上所有人的性命都依赖缆绳和船锚的质量。船只会携带许多锚，它们会受到极限的考验。1516年，多梅尼科·特雷维桑乘坐一艘桨帆船去觐见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当他的船在伯罗奔尼撒外海时，“刮起了猛烈的西洛可风，尽管已经落锚，船只用坚固的缆绳固定在岸边，而且我们把锚的数量增加到18只，但我们仍然害怕船锚脱落、缆绳崩断、我们的桨帆船被抛向礁石”。[\[24\]](#)

船只配有极长的缆绳——卡索拉所在的船有一根525英尺长的缆绳——但什么也无法对抗变幻莫测的大海。船锚未能抓住海底而是在海底缓慢地拖动的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以及在眼前耸立的海岸，能让最坚强的水手都心惊胆寒；水手们将最重的锚称为“希望之锚”：它是最后的依靠。法布里沮丧地看到他们最大的锚缓缓落下，却没能固定住船身；水手们花费了很大力气，将船锚又缓缓收回，换了另一处落锚点。

船锚又是跟着桨帆船走，就像犁跟在拉着它的马后面一样。我们又把它拉上来，第三次下锚，这一次它抓在了一块岩石上；但当桨帆船停了下来，慢慢放出缆绳、左右摇摆着转向时，锚爪从岩石上脱钩了，又开始拖动，但突然之间，遇上了另一块岩石，锚在那里紧紧地固定住了。我们就这样在那里停靠了一整夜……船长、所有官员和桨帆船奴隶都彻夜无眠，每时每刻等待着自己和我们的死亡。[\[25\]](#)

有时生存真的取决于一时的侥幸。

几乎同样可怕的是完全无风的情况，船一动不动地在烈日下枯坐，大海平静得“像一杯水”。[\[26\]](#)“所有的风都停了，大海哑了，周遭无比平静，”法布里记述道，

除了真正的海难，这比任何危险都更让人痛苦……所有东西都腐烂、发霉、发臭；水开始发臭，酒变得无法饮用；肉，即使是已经干燥和烟熏过的，也长满蛆虫；无数苍蝇、蚊子、跳蚤、虱子、蠕虫、小鼠和大鼠突然就出现了。此外，船上所有人在高温之下变得懒惰、困乏和邈邈，在忧郁、恼怒和嫉妒的情绪下变得焦躁不安，并受到其他类似不良情绪的困

扰。我很少看到船上有人因风暴而丧命，但我见过很多人在这样无风的窘境中患病、死亡。

还拥有净水的船员们把它卖得比酒还贵，“尽管这水微温、发白，颜色也不对劲”。^[27]任何桨帆船都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靠岸补充淡水，不可能长期连续航行，所以这种无风状况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法布里已经口渴到产生幻觉，仿佛回到了他的家乡乌尔姆，“我会立刻到布劳博伊伦，在湖边坐下，消解我的干渴”。^[28]

晕船、酷热、寒冷、污秽的环境、糟糕的饮食、睡眠不足、船只颠簸都会让人付出惨重的代价。法布里的桨帆船变成了“一所挤满可怜病号的医院”。^[29]死亡突然降临，频频出现。不适应航海生活的朝觐者容易染病，死于高烧或痢疾；由于寒冷或海上事故，水手们死在自己的长凳上。法布里眼睁睁地看着一位贵族朝觐者“凄惨地死去”。

我们用床单裹住他的遗体，用石块压重，然后哭泣着将遗体投入海中。在这之后的第三天，另一个已经神志不清的骑士，恐怖地尖叫着、在无比的痛苦中离世了。我们用小船把他的遗体运到岸边掩埋了。^[30]

不久之后，“当船上的指挥官们正在处理风帆和调整桨帆船时，突然间，一个木块从桅顶掉下来，砸中了我们最好的指挥官，他当场毙命……桨帆船上的恸哭之声不绝于耳……船上也根本没人能取代他的位置”。^[31]当他们登陆时，法布里不止一次在长凳上发现溺死的划桨奴隶。海上的安葬仪式取决于死者的身份和地位。普通桨手连一块裹尸布都没有；在一阵简短的祷告过后，他们“赤裸着身子被扔下船，任由海里的动物吞食”；^[32]而威尼斯驻亚历山大港的领事安德烈亚·卡布拉尔在返乡途中逝世后，他的尸体被除去内脏、做了防腐处理，放在朝觐者甲板下的压舱沙里，成了这次可怕的归乡途中厄运的象征。

在航行途中，朝觐者们看到了人世间所有的奇迹，经历了最严重的危险。卡索拉看到水龙卷风“像一根巨柱”^[33]，从大海里吸出了大量的

水；他还经历了干地亚一次地震的余波，许多船只在港内互相碰撞，“好像它们全都会撞成碎片一样”^[34]，并且将海水翻搅成一种奇怪的颜色；他经过了圣托里尼，据说那里的海湾深不见底，船长曾在那里见证过一次火山喷发，目睹一座“漆黑如煤”^[35]的岛屿从深渊自然地上升形成。法布里的船差一点就被科孚岛附近的一处旋涡吸了下去，在罗得岛海岸被当作土耳其海盗船，并且差点撞上一支去往意大利的土耳其入侵舰队。在这一切之中，经历了无风困境和风浪颠簸、晕船和对海盗的恐惧，他们可以间或在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各港口登陆，在漫长的劳顿之后放松一下，并得到食物和新鲜饮用水。

朝觐者有充足的机会去观察海上的生活是多么艰辛。他们看到了桨手们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依据口哨的号令工作，做每一件事都行色匆匆、大呼小叫，“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候总是叫喊”。^[36]水手们起锚、降低和升起风帆、快速安置索具、在高空吊着摇晃、汗流浹背地划桨以操纵船只逆风进入一个安全的港口时，旅客们要学会不挡着他们的路，否则就可能被撞得跌落海中。水手们发出“西班牙誓言”，可怕到让虔诚的朝觐者目瞪口呆；水手忍受着寒冷酷热、逆风造成的无数延误，只能得到片刻的放松——登陆或者享用一桶酒。所有海员都很迷信；他们不喜欢他们船上载着来自约旦河的圣水，也不喜欢偷来的圣人遗骸和埃及木乃伊；溺死的尸体是不吉利的；舱中装着的尸体注定会带来灾难——航行中的所有不幸均可归因于此。他们恳求一大批圣徒来保佑他们的航行，用意大利语说祈祷词，而不是拉丁语。在冬季，希腊沿岸海域变得狂躁，水手们说那是大天使米迦勒在扇动他的翅膀；在11月末和12月初的恶劣天气里，他们向圣白芭蕾、圣则济利亚、圣克雷芒、圣凯瑟琳和圣安得烈祷告；12月6日，他们向圣尼古拉祈祷，两天后向圣母玛利亚求援；他们很警惕美人鱼，因为她们的歌声是致命的，但是她们很容易被扔进海里的空瓶子分散注意力，因为美人鱼喜欢玩这些瓶子。在每一个港口，他们从箱子和麻袋里拿出少量商品，来试试运气。

不管天气好坏，法布里日日夜夜都坐在甲板上，密切关注着船上复杂的生活。他把海上生活比作修道院生活。在干地亚，他观看了在水下修理船舵的过程：

船工脱得只剩下内裤，随身带着一把锤子、钉子和钳子，跳进海中，下潜到船舵损坏的地方，然后开始在水下工作，拔出钉子，之后敲入新的钉子。过了很久，修理完毕后，他又从海中浮出，从船舷爬到船上我们站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他如何在水下呼吸，并且在咸水中待那么久，我百思不得其解。[\[37\]](#)

他向水手讨教如何借助波特兰海图[\[38\]](#)导航，并近距离观察领航员如何通过“海水的颜色、海豚及飞鱼聚集和移动的行为、燃烧形成的烟、舱底污水的气味、夜间缆绳的发光和船桨插进海中的闪光”来判断天气。在黑夜里，他经常避开臭气熏天的朝觐者宿舍，坐在船侧的木头上，双脚悬空，朝向大海，手里紧握着绳索。海上虽然有风暴和无风的危险，但也有喜悦和美丽的瞬间，大海像丝绸一样泛着涟漪，起伏不定，水面上明月皎洁，领航员看着星辰和指南针，

旁边总有一盏灯在夜间长明……领航员一直盯着指南针，吟唱着一首悦耳的曲子……船静静航行着，没有犹豫……一切都那么平静，只有领航员盯着指南针，舵手还掌着舵，还有人在祷告感恩……持续地迎接微风，赞美上帝、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圣徒，互相应答，只要一直风平浪静，就不会安静下来。[\[39\]](#)

法布里和卡索拉在去往雅法的途中停靠的几乎全是威尼斯港口。他们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南下，绕过科罗尼和莫东，经过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他们驶进的所有港口，都有圣马可的旗帜在咸咸的海风中飘扬。他们目睹了威尼斯海洋帝国宏伟的运作。他们观察到了威尼斯海军舰队悄无声息潜行的威慑、国家盛典、殖民地高官、旗帜和喇叭声。他们看到海洋产出的触手可及的硕果在威尼斯的仓库高高地堆起。对外邦人来说，德·巴尔巴里地图上的威尼斯似乎就是繁荣的极致了。但这是最后

一代能够如此自由地航行的朝觐者。就在尼普顿的三叉戟耀武扬威地高高举起的同时，威尼斯海洋帝国却在悄悄走向衰落。七十年来，阴影慢慢爬过了这片阳光明媚的大海。这其中有社会因素（海上生活的艰苦就是其中之一），威尼斯雄狮的爪子现在牢牢地抓着干燥的陆地；陆地上的生意开始越来越多地消耗共和国的资源。但最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在不可阻挡地步步紧逼，在威尼斯的海上霸权到达顶峰之时，威胁要解除威尼斯和海洋之间的婚姻。

[1] Translation from the De'Barbari map

[2] Translation from the De'Barbari map

[3] 此处指的是乔瓦尼·贝利尼（1430～1516），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艺术家。他的父亲雅各布·贝利尼和兄弟真蒂莱·贝利尼都是著名画家。他的姐夫安德烈亚·曼泰尼亚也是大画家，所以他的早期作品受到曼泰尼亚作品的影响。新颖的笔法和神韵的气质是他后期画作的特色。贝利尼家族出了很多艺术家，乔瓦尼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4]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2 vols, London, 1858, p. 32

[5] Lane, Frederic C., *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1934, p. 270

[6]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p. 139-40

[7]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p. 170

[8]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4 vols, cols, 24-30, Venice 1879-1903

[9] Tenenti, Alberto, 'Il senso del mare', *Storia di Venezia*, vol. 12, Rome, 1991, p. 8

[10]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47

[11] Sanudo (or Sanuto) ,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4 vols, , cols 205-6, Venice 1879-1903

[12] 发罗拉是阿尔巴尼亚的重要海港城市，曾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是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古城。

[13] Sanudo (or Sanuto) ,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8 vols, cols. 282-3, Venice 1879-1903

[14] Prescott, H. F. *Jerusalem Journey: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4, p. 53

[15]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182

[16]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324

[17]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37

[18]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p. 37-8

[19]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38

[20] 圣艾尔摩之火是一种自古以来就被海员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常发生于雷雨 中，在桅杆顶端之类的尖状物上，产生如火焰般的蓝白色闪光。它其实是一种冷光 现象，是由于雷雨中强大的电场造成场内空气离子化所致。

[21] 腕尺是一个古老的长度单位，以人的手肘到中指顶端的距离为准。在中世 纪及近代世界各地都使用“腕尺”这个单位，但长度不完全一样（45~55厘米）。

[22]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p. 42-3

[23]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43

[24] Pagani, Zaccaria,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in *Le Voyage d'Outre-mer (égypte, Mont Sinay, Palestine) de Jean Thenaud: Suivi de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 1884, p. 162

[25]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p. 43-4

[26]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331

[27]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29

[28]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30

[29]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24

[30]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26

[31]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27

[32] Prescott, H. F. *Jerusalem Journey: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4, p. 236

[33]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322

[34]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199

[35]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311

[36]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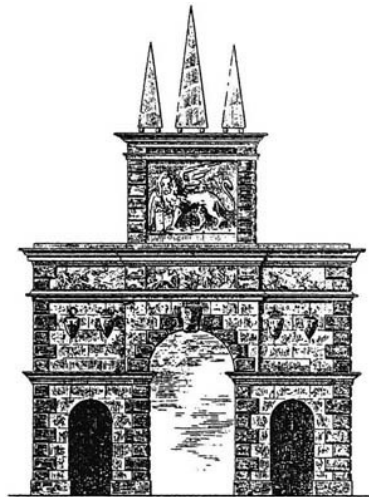
[37]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 33

[38] 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是写实地描绘港口和海岸线的航海图。自13世纪开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制作这种航海图，并视其为本国的机密。它们描绘了大西洋与印度洋海岸线。这些资料对于航海事业起步较晚的英国和荷兰而言是具有无上价值的珍宝。portolan源自意大利语的形容词portolano，意思是“和港口或海湾相关”。

[39]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pp. 134-5

第三部 月食：升起月亮

1400～1503



17.玻璃球

1400～1453

1416年6月1日，威尼斯人第一次在海上与一支奥斯曼舰队交锋。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彼得罗·洛雷丹奉命前往位于加里波利半岛的奥斯曼港口，讨论不久前内格罗蓬特遭到袭掠的事情。他写了一封信给执政官和共和国政府，叙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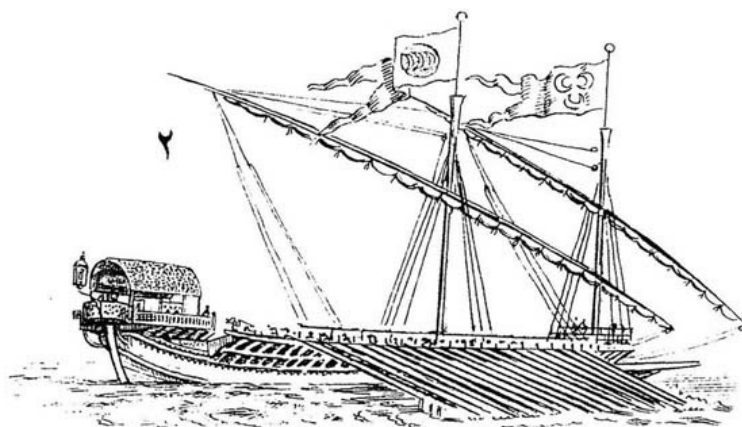
那是黎明时分。当他靠近港口时，发出的谈判信号却被误以为是恶意攻击。领头的船遭到了一阵箭雨的攻击。没过多久，遭遇战升级成一场大规模战役。

作为指挥官，我向敌人打头阵的那艘桨帆船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敌船的抵抗非常顽强，船上有很多勇敢的土耳其人，打起仗来像恶龙。但感谢上帝，我最终战胜了这艘敌船，并且杀掉了很多土耳其人。这是一场艰难而激烈的战斗，因为敌军其他桨帆船咬住我的左侧船首，朝我射出了非常多的箭。我当然能感受到这压力。我的左脸颊眼睛下方中箭，刺穿了我的脸颊和鼻子。另一支射穿了我的左手……但我凶猛地战斗，逼退了这些桨帆船，俘获了最前面那艘，在它上面插上了我们的旗帜。之后快速调转船头……我用（我的桨帆船上的）冲角撞击了一艘轻型桨帆船，砍倒了很多土耳其人，打败了这艘船，让我的部下登船，升起了我方的旗帜。

土耳其人的反抗异常顽强，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因为他们船上的水手都是土耳其的精锐。但蒙上帝的恩泽和圣马可的支援，我们打得敌人整个舰队抱头鼠窜。很多人跳入了海中。战斗从拂晓开始，一直打到上午八点。我们俘获了他们的6艘桨帆船和所有船员，以及9艘轻型桨帆船。船上的土耳其人全部被杀死，包括他们的指挥官……他的所有侄子和其他许多重要的指挥官……

此次战斗之后，我们驶过加里波利半岛，用如雨的箭和飞弹攻击岸上的人，挑衅他们出来应战……但没人有这样的勇气。看到这情况……我们行驶到加里波利半岛外海1里处，好让我们的伤员得到医疗和休整。^[1]

此役的后续事件同样凶残。洛雷丹顺着海岸南下50英里，到达忒涅多斯岛，将自己俘虏的奥斯曼船只上的所有非土耳其人全部处决，以儆效尤。“在俘虏当中，”洛雷丹写道，“有一个叫乔治·卡莱尔吉斯^[2]的反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叛贼，伤势严重。我很荣幸有机会手刃逆贼，在我自己的舰楼甲板上将他斩杀。这个惩罚就是对其他坏基督徒的警告，让他们不敢为异教徒效力。”^[3]还有许多俘虏被钉死在尖木桩上。“那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拜占庭历史学家杜卡斯写道：“整个海岸沿线，一根根不吉祥的木桩上挂满了死人，像一串串葡萄。”^[4]那些被奥斯曼人强迫为其服务的人则被释放了。



一艘奥斯曼桨帆船

在威尼斯与奥斯曼人的第一次交战中，洛雷丹几乎摧毁奥斯曼海军以及让它得以快速重建的手段。威尼斯人很清楚，奥斯曼人的海军力量来自何方。土耳其舰队里很多名义上的土耳其人实际上是信基督教的海盗、水手和领航员——没了这些航海专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苏丹海军根本无法运转。共和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是坚定不移的：只要扼杀技术人才的供给，奥斯曼海军的实力就会萎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这般无情地屠杀敌方水手。洛雷丹写道：“我们现在可以说，在这片海域，土耳其人的实力将在很长时间内萎靡不振。”^[5]在随后五十年内，没有一支规模较大的奥斯曼舰队出海。

加里波利的这场意外爆发的战役使得威尼斯人对自己的制海权颇为自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威尼斯桨帆船的指挥官认为，“他们（奥斯曼人）需要四五艘桨帆船才能与我们的一艘抗衡”。^[6]威尼斯人常被指责不是好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与穆斯林做生意），于是他们用此次胜利向南欧的权贵证明，他们是“基督徒抵抗异教徒的唯一支柱和希望”。^[7]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乱局中，奥斯曼人快速而悄无声息地横穿小亚细亚西进，因而他们的扩张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被欧洲人注意到。他们介入了拜占庭内战以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竞争。他们趁乱牟利，在14世纪50年代，加入了热那亚的阵营。热那亚的船只载着奥斯曼人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将他们送到加里波利半岛，他们从此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奥斯曼人加快速度，攻入保加利亚和色雷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将拜占庭皇帝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到1410年，杜卡斯声称，在欧洲定居的土耳其人比在小亚细亚的还要多。仿佛君士坦丁堡赛马场的柱子上长出了第四条蛇，它像巨蟒一般束缚着所有的竞争对手，要将它们慢慢扼杀。基督教欧洲受困于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宗教分裂等问题，没有能够及时做出反应。连续多位教皇逐渐意识到“土耳其人”的威胁，但由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敌意、威尼斯和热那亚无休止的战争，他们只能扼腕叹息，却无计可施。没有各航海共和国的海军资源支持，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在梵蒂冈的接待厅就胎死腹中了。

威尼斯对这股蓬勃发展的力量保持着警惕。到14世纪40年代，他们就对“土耳其人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忧心忡忡。^[8]“土耳其人实际上已经消灭了罗马帝国（爱琴海）的岛屿。由于几乎没有其他基督教国家与之抗衡，他们正在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意图攻击克里特。”威尼斯在1204年制造的权力真空现在正在被填充起来。共和国的政策与热那亚人相反，是永远不和奥斯曼帝国缔结军事联盟，但威尼斯也不能反对它。由于总是被其他战争和贸易利益牵绊，并且担心不稳定的十字军联盟可能让他们暴露于危险之中，威尼斯人选择观望、等待。1396年，法兰西和匈牙利联合组成一支十字军去讨伐奥斯曼人，威尼斯人在一旁怀疑地

观望，这次东征果然命途多舛；威尼斯人对此次东征的唯一贡献是一定程度的海军支援——十字军在尼科波利斯战役惨败之后，威尼斯人从多瑙河沿岸营救了一小群幸存者。对于保卫基督教世界的呼吁，威尼斯人的回应千篇一律：他们没有能力单独行动。但每次教皇提出理想化的十字军东征计划时，威尼斯人都会婉言谢绝。

到1400年，奥斯曼帝国已经扩张到了威尼斯海洋帝国和贸易区域的边缘。在巴尔干安营扎寨的奥斯曼人实际上是多民族多文化的，但威尼斯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将其称为“土耳其人”，将奥斯曼苏丹称为“大土耳其苏丹”。在各自的狮子和新月大旗下，这两个帝国是两股完全相对的势力：基督徒和穆斯林；注重贸易的航海商人和地位高低取决于地产多少的陆地武士；珍视自由、不带个人好恶的共和国和被单单一个人的专制和心血来潮掌控的苏丹国。威尼斯人很快意识到，奥斯曼人 and 不思进取的马穆鲁克王朝极不相同，前者咄咄逼人、不安分、热衷于领土扩张，他们的帝国建立在持续扩张的基础上，其帝国霸业和宗教使命互相交织、被奉为天定，即不断开疆拓土，扩大穆斯林国度和奥斯曼领地。土耳其人孜孜不倦的坚持注定会将威尼斯逼到极限。“我们与土耳其人的关系依然非常不顺利，”后来一位被派驻苏丹宫廷的威尼斯大使根据自己的多年经验评论道，“因为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总是消耗你的力量，抢劫你，总是希望事情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9]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威尼斯那样，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和资源去理解奥斯曼人。威尼斯渐渐对奥斯曼人的语言、心理、宗教、技术、仪式和习俗有了非常深刻的把握；威尼斯人对每一位继任苏丹的个性进行实用性的分析，以趋利避害。除了威尼斯人，没有人能如此完美地理解外交活动的细节，或者能够用如此娴熟的技巧进行大使之间的博弈。对于威尼斯来说，外交的价值永远都比得上一整队桨帆船，但成本却少得多。

早在1360年，共和国便派遣大使去恭贺苏丹穆拉德一世在阿德里安

堡^[10]定都。奥斯曼人占据了阿德里安堡，等于是完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威尼斯人很快就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冷酷固执的对手。1387年，威尼斯大使们前往穆拉德一世的宫廷，去抗议奥斯曼人对内格罗蓬特的洗劫，随行携带着礼物：银质的盆和水壶、长袍、一件配有珍珠纽扣的毛皮大衣和两只分别叫帕萨拉夸和法尔孔的大狗。狗很受欢迎；穆拉德一世立即要求威尼斯人献上相应的母狗来配种。但是，他没有释放威尼斯人请求他放掉的俘虏，而且威尼斯元老院随后收到了令人惊恐的来信，宣称其大使已经承诺，共和国将自费派遣一支军队来支持奥斯曼人。大使并没有做这样的承诺。游戏的规则很复杂，并且需要从头学起。随着奥斯曼人把巴尔干地区和希腊大陆变为自己的附庸，威尼斯需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依赖于希腊的谷物。它既不能放弃其作为基督教世界捍卫者的身份，也不能被视为“土耳其人的帮凶”。^[11]威尼斯人务实、玩世不恭，性格中充满矛盾——相对于冠冕堂皇的事业，他们更关注贸易——所以需要和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外交手段是至关重要的。后来有人说：“与土耳其人谈判就像玩玻璃球，当对方猛力将球抛过来时，你不能猛烈地把它扔回去，也不能让它落到地上，因为这两种方法都会让它摔得粉碎。”^[12]

威尼斯人后来培养了自己的奥斯曼语言学家，但在15世纪，威尼斯人与奥斯曼帝国谈判时依赖翻译，以希腊语为媒介。他们琢磨清楚了应当向谁行贿，为什么行贿，以及什么时候行贿。他们知道杜卡特金币的吸引力，于是预先准备好具体数额的贿金；他们专业地评估奥斯曼使臣赠送的礼物，并赠送与之价值相当的回礼；他们根据每次外交使命的重要性匹配相应的排场。他们极其关注每一位苏丹的逝世；因为吃不准苏丹的哪个儿子可以最终赢得皇位，他们事先准备多份委托书和贺信，每封信上写着不同的皇位候选人的名字——或者姓名留白，让大使到时填写。他们在威胁和承诺两者之间仔细思量，保持着平衡。在奥斯曼内战期间，他们遵循拜占庭人的做法，支持觊觎皇位者，以增加混乱。他们拉拢小亚细亚地区与奥斯曼帝国竞争的其他突厥王朝，与其结盟，试图

从东西两边挤压奥斯曼人。他们见风使舵，一边以金钱诱惑，一边以武力相威胁。

这从来都不容易。随着奥斯曼帝国加强对希腊的控制，萨洛尼卡人在1423年主动归顺威尼斯；萨洛尼卡的港口是战略和商业中心，非常有价值。元老院“收到此提议，备感喜悦，承诺要保护、滋养和繁荣这座城市，将它变成第二个威尼斯”。^[13]然而苏丹穆拉德二世坚持萨洛尼卡是属于他的，要求威尼斯归还。一连七年时间，威尼斯向萨洛尼卡投入了大量粮食和防御资源，同时努力与苏丹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苏丹拒绝协商。威尼斯人表示愿意交纳贡金，但被苏丹拒绝。威尼斯人派遣大使，大使被苏丹关进监狱。威尼斯派遣舰队去封锁达达尼尔海峡，苏丹只是耸耸肩。他们增加了贡金的额度，还是遭到了拒绝。他们攻击了加里波利半岛；同时继续对萨洛尼卡投资。他们与奥斯曼帝国在小亚细亚的竞争对手卡拉曼王朝结成同盟；穆拉德二世苏丹派海盗去劫掠希腊的海岸。

年复一年，威尼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来回切换，一直对奥斯曼帝国旁敲侧击。但苏丹的意志毫不动摇：

这座城市（萨洛尼卡）是我的遗产，是我的祖父巴耶济德一世亲手从希腊人手中夺过来。所以，如果说希腊人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我不义。但你们这群来自意大利的拉丁人，和世界的这个部分有什么关系？要么你们自己离开；如果不离开，我很快就来。^[14]

1430年，他果然御驾亲征萨洛尼卡。威尼斯人且战且退，打回港口，之后就撤离了，让希腊人自生自灭。一位编年史家称，就算这座城市被地震和海啸毁坏，也不会更糟了。奥斯曼帝国又吞并了希腊的另一部分。

次年，威尼斯主动求和，向穆拉德二世朝贡。奥斯曼帝国正式保证不攻击威尼斯海洋帝国本身，但仍然继续西进，进逼希腊西海岸和阿尔

巴尼亚南部，兵临亚得里亚海的门户。肇事者不明的海盗掠夺仍在持续。这是奥斯曼帝国的惯用手段：先发动不领朝廷军饷的非正规军越过边界袭掠外邦，为日后的征服打前站。在海上，尽管威尼斯的海洋霸权不受威胁，但土耳其人唆使的海盗依然是个麻烦。从萨洛尼卡沿海岸而下的下一个基地内格罗蓬特成了令人担忧的焦点。这个岛与希腊大陆只有一条狭窄的海峡相隔，之间由一座桥连接。元老院禁止岛民去大陆收割庄稼，并命令一个18人的分遣队日夜看守大桥。

元老院档案记录着这许多微小的破坏行为。一年又一年，劫掠、军队调动、海盗肆虐和绑架的传闻甚嚣尘上。这是1449年关于内格罗蓬特的记录：“在过去的三年里，这个岛一直深受土耳其人的抢掠之苦，他们掳掠牲畜，然后声称他们是以苏丹之子的名义与威尼斯共和国作战，这都是土耳其非正规军根深蒂固的劫掠恶习，尽管威尼斯与苏丹在表面上是和平共处的。”^[15]威尼斯人派了另一位大使去抗议。次年，这些岛屿遭受的苦难得到了审视：“土耳其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在袭掠那些岛屿；在蒂诺斯岛，30人被绑架和贩卖为奴，渔船被抢走，牛、驴和骡子被宰杀或掳走——没有船只和牲口，蒂诺斯人无法劳动，他们无奈只能吃掉他们剩下的牲畜。”^[16]很多这样的攻击是由对威尼斯帝国心怀不满的臣民主导实施的。早在1400年，就有记载指出：“许多克里特岛民……逃向土耳其人的土地，自愿在土耳其船只上服务；他们很熟悉港口和威尼斯领土的情况。他们为土耳其人带路，帮助他们烧杀抢掠。”^[17]像乔治·卡莱尔吉斯那样的人，一旦被威尼斯桨帆船长抓住，就会被钉死在尖木桩上，或者在自己的甲板上被砍成肉酱。

15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缓慢却无情的扩张引发了新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号召。对威尼斯来说，这需要对风险和回报做一番细致评估。教皇、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利用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争端造成的混乱，决定做出新的努力，将奥斯曼人赶出欧洲。威尼斯人对此东征抱着极端现实的态度。他们表示愿意帮助十字军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以阻止奥斯

曼军队从亚洲赶往欧洲，条件是十字军必须为船只提供现金报酬，并且一旦得胜，必须将萨洛尼卡和加里波利半岛交给威尼斯。关于战略上的先决条件，威尼斯人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太晚收到资金，就不可能及时派遣桨帆船到达海峡，那样土耳其人就可以从亚洲进入欧洲，基督徒就注定失败。”^[18]为了这件事，共和国和教皇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双方长期以来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又一次浮出水面。教皇指责威尼斯的表现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威尼斯人做出了暴跳如雷的回应：“威尼斯共和国为了捍卫基督教世界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教廷的这些指责极不公正，令人悲叹……威尼斯的荣誉遭到了诽谤。”^[19]最终，威尼斯不情愿地准备了船只，但钱没有到账。“让教皇付账是一个荣誉问题……他的行为是纯粹的忘恩负义！”^[20]威尼斯人咆哮道。教皇与威尼斯的关系从此开始愈发恶化：“尤金四世假称，威尼斯欠了罗马教廷的债。这显然不是事实：恰恰相反，教皇欠了共和国的债。”^[21]商人心态与虔诚而不谙世事的红衣主教们之间的鸿沟依然不可逾越。威尼斯人没有忘记教廷未偿清的债务。十年后，在更悲剧的情形下，这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事实证明，威尼斯的顾虑很有道理。此次十字军东征搞得一塌糊涂，威尼斯未能及时封锁海峡，奥斯曼军队乘坐热那亚商人提供的船只，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据传言，威尼斯的一些私人船主也参加了运送奥斯曼军队的行动。在黑海附近的瓦尔纳，十字军惨遭全歼。这一次再也没有威尼斯舰队去营救幸存者了。土耳其人留下了一个由头骨堆成的金字塔。这是西方世界将土耳其人赶出欧洲的最后一次尝试。

绞索在君士坦丁堡的脖子上越勒越紧。1451年，穆拉德二世驾崩，威尼斯仍旧十分谨慎地审时度势。7月8日，元老院派遣了一名大使向新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示好并吊唁他的亡父；第二天，大使又奉命出发，去君士坦丁堡觐见内外交困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也就是穆罕默德二世的新对手。一天之后，元老院又指示另一位大使与穆罕默德二

世在小亚细亚的敌人——卡拉曼君主[\[22\]](#)取得联系。威尼斯派遣桨帆船出动，以确保达达尼尔海峡的畅通。威尼斯人可以说是四面下注、左右逢源。

登基后的第二天，穆罕默德二世就命人将他年幼的同父异母弟弟杀死在浴室中。威尼斯人对时局极其敏感，迅速地嗅到了风向的改变。穆拉德二世在执政末期已经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了。二十一岁的苏丹既雄心勃勃又聪明过人。他渴望征战，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到1452年2月，威尼斯潟湖从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大使那里得到警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陆地和海洋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毫无疑问意图攻打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如果无人前来援救希腊人，这座城市必将沦陷。威尼斯英勇无畏的帮助将是弥足珍贵的。”[\[23\]](#)到了秋天，大使再次回来，更加绝望地求援。他们恳求威尼斯人拯救君士坦丁堡。元老们踌躇不决，骑墙观望，对大使再三搪塞。威尼斯人借口自己在意大利本土的战争十分紧迫，让拜占庭人去找教皇和佛罗伦萨人，但作为让步，准许向拜占庭出口胸甲和火药。威尼斯人不停地游说各方，希望多国联合对抗奥斯曼帝国：“教廷和其他基督教国家务必精诚团结。”[\[24\]](#)

1452年夏天，穆罕默德二世忙着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造一座城堡，目的是封闭通往黑海的水道。奥斯曼人将这座新建筑命名为“割喉堡”。威尼斯对这情况了如指掌。间谍向威尼斯发去了详细的建筑布局草图；布局图前景中非常显眼的位置上，是一排展开的大型射石炮，任何不肯停下来的船都将被击沉。在割喉堡竣工的前一天，元老院报告称：“君士坦丁堡现已完全被穆罕默德二世的部队和船只包围。”[\[25\]](#)威尼斯人相应地加强了他们的海军部署，但仍没有明确表态。元老院中有人提议放弃君士坦丁堡、任其自生自灭。此提议没有通过，但足以证明威尼斯人的犹豫不决。

威尼斯很快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封锁造成的影响有了切肤之痛。11月

26日，一艘从黑海向君士坦丁堡运送给养的威尼斯商用桨帆船被割喉堡的大炮击沉。船员设法登陆，但被俘虏，并被押解到阿德里安堡的苏丹面前。威尼斯大使抵达奥斯曼宫廷为这些水手求情的时候，他们被斩首后的尸体已经在城墙外地面上腐烂了。船长安东尼奥·里佐被穿刺在尖木桩上。

在1453年最初的几个月，欧洲外交渠道的交流仍旧尖锐、自我辩护而毫无建树。威尼斯人告知教皇、匈牙利国王和阿拉贡国王，“威尼斯正在积极准备，并请求他们立即与共和国联手；否则，君士坦丁堡将会沦陷。”^[26]梵蒂冈打算派遣5艘桨帆船去援救君士坦丁堡，期待威尼斯能有所表示。但威尼斯没有忘记瓦尔纳战役时教廷欠下的债务，不肯赔账。4月10日，元老院这样回应道：“对于他们的意向，我们非常欣喜，但我们不会忘记，教皇尤金四世在1444年不断延迟支付船只费用的令人不快的行为。”^[27]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内部问题尽数浮现。5月初，威尼斯出于自身考虑开始准备桨帆船，但下达了自相矛盾而谨慎的命令：前往君士坦丁堡，“前提是，航线不至于过度危险……不得在海峡内交战……但应参加君士坦丁堡的防御”。^[28]同时，在穆罕默德二世宫廷的威尼斯大使奉命强调“威尼斯的和平倾向；共和国虽然派遣了几艘桨帆船到君士坦丁堡，但这纯粹是为了护送黑海的桨帆船和保护威尼斯的利益；大使必须尽力引导苏丹和君士坦丁十一世达成和平协议”。^[29]

但这一切都为时过晚。4月6日，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庞大的军队和令人胆寒的火炮，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安营扎寨；12日下午1时，一支规模相当大的舰队从加里波利穿过海峡而来。这是四十年来奥斯曼人首次对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发出有组织的挑战。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看到这支舰队带着“迫切的呼喊、响板和手鼓的喧嚣”快速驶来，不禁目瞪口呆。^[30]穆罕默德二世是后勤和作战协调的大师。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不从海上封锁君士坦丁堡，就永远攻不下这座城市。在加里波利半岛，苏丹已经着手建设一支相当强大的海军，这令威尼斯人震惊惶恐，

因为它挑战了威尼斯的海上霸权。威尼斯人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了土耳其人掌控范围之广、可调动资源之多，他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利用臣民的技术和军事技能的能力之强。

如果说共和国的反应是迟缓且矛盾的，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居民则在他们的市政官吉罗拉莫·米诺托领导下，和他们在金角湾的桨帆船水手们一起，为了保卫拜占庭帝国陷入困境的残余部分而英勇作战。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局面的讽刺意味：两百五十年前，威尼斯前来掠夺这座城市，而如今，威尼斯的公民却和希腊人肩并肩守卫城墙、保护横跨金角湾的铁链，击退前来围攻、旨在征服的侵略军——而威尼斯人参与的1204年十字军东征恰恰帮助了奥斯曼人的西进。正如爱国的日记家尼科洛·巴尔巴罗所说，他们“怀着为世界荣耀而战的心情”挖掘战壕；^[31]他们沿着城墙举着圣马可旗帜游行，鼓舞守军的士气，“为了对上帝和共和国的爱”；^[32]他们把自己的船只停在铁链附近，击退敌人的舰队，从陆地和海上发动攻击，防守布雷契耐宫，无比英勇地战斗。在威尼斯的历史传说中，威尼斯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源远流长而又充满矛盾，威尼斯人对它的感情深厚而真挚。在1453年，他们为了丹多洛遗骨和共和国的利益与荣誉而战。正是威尼斯水手假扮成土耳其人，乘着一艘轻型帆船溜出包围圈，去观察是否有救援舰队的迹象。经过三个星期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搜寻，他们意识到，不会有任何援助到来了。此刻的形势很明朗：返回君士坦丁堡，就是拿生命冒险。按照典型的威尼斯的习惯，船员采取了民主投票。多数人的决定是“必须返回君士坦丁堡，不管它在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的手中，不管我们此行是生是死”。^[33]君士坦丁十一世对他们的归来很是感激，但听闻并无援军赶来的消息，不禁失声痛哭。

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的摩擦一直持续到最后。有些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并肩作战，双方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的状态；而在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热那亚殖民地保持着惴惴不安的中立，暗中同时帮助双方，也遭到

双方的斥责。在4月中旬，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的关系到达了最低点。奥斯曼舰队虽然自吹自擂，但表现并不理想。它未能截获教皇派来的4艘热那亚补给运输船，也无法打破由威尼斯舰队守卫的封锁金角湾的铁链。沮丧之下，穆罕默德二世在一夜之间将70艘船经由陆地运送到了金角湾岸边。当奥斯曼战船在4月21日上午水花四溅地进入金角湾时，守军目瞪口呆。威尼斯对自己海军实力的自信遭到了进一步打击；巴尔巴罗记述道：“我们被迫在海上昼夜守备，对土耳其人万分畏惧。”^[34]威尼斯人计划对这支停泊在金角湾的敌人舰队发动夜袭，不料走漏了风声，几乎可以肯定是热那亚人发出信号向奥斯曼人通风报信；打头阵的桨帆船被炮火击沉，幸存者游向岸边，被敌人俘虏。第二天，穆罕默德二世将40名威尼斯水手钉死在尖木桩上，并展示给君士坦丁堡全城人看。受刑者的战友们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们最后的痛苦挣扎，指着他们老对手（热那亚人）说：“是（加拉塔的）可恶的热那亚人背叛了我们，他们是背弃基督教信仰的逆贼，是为了向土耳其苏丹讨好！”^[35]

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支持拜占庭，一直到最后。圣马可的雄狮旗和拜占庭的双头鹰旗在布雷契耐宫并排飞扬。在奥斯曼人总攻的前一天，“所有自称是威尼斯人的人都去陆墙，为了我们对上帝的爱，为了基督教信仰的荣誉。希望大家全都坚守岗位，视死如归”。^[36]他们的确这样做了。1453年5月29日，在激烈战斗之后，城墙终于被突破，君士坦丁堡沦陷了。巴尔巴罗记述道：“当他们的旗帜升起，而我们的旗帜被砍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攻破了，并且再没有重新夺回来的希望。”^[37]少数人侥幸逃回他们的桨帆船，起航逃走，经过了漂浮着尸体的海面，那些尸体“如同运河中漂浮的西瓜”。^[38]威尼斯的幸存者自豪地列出了死者的名单，“他们中有些人被淹死，有些人在敌人的炮击中牺牲，或者在战斗中捐躯”。^[39]米诺托被俘获并斩首；62名贵族和他一起被处死；一些船由于人手不足，几乎无法升起船帆，仅仅由于穆罕默德二世的新海军纪律涣散、擅离职守、上岸参加抢劫，这些威尼斯幸存者才得以逃脱。

1453年6月29日夜，一艘快速单桅帆船把消息送到了威尼斯。据目击者称，它在满怀期望人群的注视下进入大运河，来到里亚尔托大桥：

所有人都在他们的窗前和阳台边等待，在希望和恐惧之间挣扎，想知道这艘船究竟带来了什么消息，君士坦丁堡城和爱琴海地区的桨帆船到底命运如何，他们的父亲、儿子和兄弟是死是活。帆船驶来时，有人喊，君士坦丁堡已经沦陷，六岁以上的人全部惨遭屠戮。顷刻间，到处传来大声而绝望的恸哭和呻吟，所有人捶胸顿足、捶打手掌，为了死去的父亲、儿子或兄弟，或者为了他们的财产，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和脸颊。^[40]

得知这个消息时，元老院震惊得陷入沉默。尽管威尼斯已经对其余欧洲国家发出了警示，但威尼斯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不敢相信，这座已经完整屹立了一千一百年的基督教城市就这样不复存在了。在巴尔巴罗看来，正是由于威尼斯人的盲目，土耳其人才夺下了君士坦丁堡。“我们的元老们不相信，土耳其人有能力组织一支舰队前来攻打君士坦丁堡。”^[41]这是对未来的一大警示。

惊魂甫定，这座商人之城就表现得像以往一样务实，派遣使者去拜见穆罕默德二世，向他的胜利表示祝贺，并以合理的条件签订了新的贸易特权条约。

^[1]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 Venice, 1912-21, vol. 4, pp. 71-3

^[2] 与本书第十一章“圣提多之旗”中的乔治·卡莱尔吉斯不是同一个人。

^[3]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 Venice, 1912-21, vol. 4, p. 73

^[4] Antoniadis, Sophia, ‘Le récit du combat naval de Gallipoli chez Zancaruolo en comparaison avec le texte d’Antoine Morosini et les historiens grecs du XVe siècle’ in *Venezia e l’Oriente fra tardo Medioevo e Rinascimento*, ed. A. Pertusi, Rome, 1966, p. 277

[5]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 Venice, 1912-21, vol. 4, p. 73

[6]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40

[7] Antoniadis, Sophia, 'Le récit du combat naval de Gallipoli chez Zancaruolo en comparaison avec le texte d'Antoine Morosini et les historiens grecs du XVe siècle' in *Venezia e l'Oriente fra tardo Medioevo e Rinascimento*, ed. A. Pertusi, Rome, 1966, p. 269

[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1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195

[9] Tenenti, Alberto, 'Venezia e la pirateria nel Levante: 1300-1460',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vol. 1, p. 10

[10] 它的土耳其语名字是“埃迪尔内”。

[11] *Venice and the Islam World, 828-1797*, ed. Stefano Carboni, New York, 2007, p.92

[12] Coco, Carla, *Venezia levantina*, Venice, 1993, p. 8

[13] Miller, William,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 1921, p. 280

[14] Miller, William,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 1921, p. 280

[15]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149

[16]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p. 182-3

[17]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84

[18]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02

[19]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02

[20]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20

[21]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24

[22] 卡拉曼王朝是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国家，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南部，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卡拉曼省。该国的统治者称号为“卡拉曼贝伊”，一度具有独立地位，1468年（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时）被奥斯曼帝国吞并。本节故事发生的时候，在位的卡拉曼贝伊是易卜拉欣二世（在位：1424～1464）。

[23]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73

[24]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80

[25]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79

[26]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82

[27]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84

[28]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89

[29]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86

[3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vol. 1, p. 15

[31] Barbaro, Nicolo,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 24

[32] Barbaro, Nicolo,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 23

[33]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vol. 1, pp. 26-7

[34]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vol. 1, p. 19

[35]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p. 20

[36]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 50

[37]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 66

[38]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 36

[39]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p. 36

[4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 Milan, 1976, xxxiii

[41] Barbaro, Nicolo,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 78

18.基督教世界之盾

1453～1464

君士坦丁堡陷落几年之后，一个叫贾科莫·德·兰古斯琪的威尼斯人拜访了这座城市，对年轻苏丹（共和国不得不与他打交道）的外貌、性格和野心做了分析。德·兰古斯琪的描述令人战栗但十分敏锐：

统治者苏丹穆罕默德贝伊是个二十六岁的青年……身材强健，体格魁梧，精通武艺，令人生畏的相貌难以让人心生敬意，很少有笑意，极其小心谨慎，非常慷慨大方，执行自己的计划时无比执拗，在所有事业中都大胆无畏，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渴望荣耀。每天他都让一个叫“安科纳的齐里亚科”^[1]的人和其他意大利人朗读罗马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著作给他听……他会说三种语言：土耳其语、希腊语和斯拉夫语。他努力学习意大利的地理……了解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居于何处，以及欧洲有多少王国。他拥有一副欧洲地图，上面标注了各个国家和省份。他最热衷和喜爱学习的就是世界地理和军事。他渴望统领天下；他审时度势，非常精明。我们基督徒要对付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宣布，他将从东方进军西方，就像西方人曾经向东方进军一样。他说，世界上应当只有一个帝国、一种信仰和一位君主。^[2]

德·兰古斯琪生动鲜明的描述被证实很有先见之明。它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位新苏丹的个性：聪明、冷漠、愚狭、城府极深、雄心勃勃，并且让人感到深深的畏惧。穆罕默德二世是自然力量的化身，冷酷无情、百折不挠、喜怒无常，有时暴怒起来杀人如麻，有时却慈悲为怀。他将亚历山大大帝视作偶像，力图逆转世界征服的大潮。他对地图和军事技术（主要由意大利籍顾问提供）的兴趣纯粹是出于战略考量。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知识必须是实用性的。一切必须有利于他的征伐大业。他的目标是加冕成为罗马的恺撒。

在他三十年的统治时期内，穆罕默德二世穷兵黩武，几乎持续不断

地南征北战，他亲自领导了十九次战役。直到他疲惫的士兵们拒绝继续战斗，他才暂停。他挥金如土，导致货币贬值、国库空虚。他过着没有节制的个人生活——沉迷于饕餮、酒精、女色和战争，到了后期，痛风甚至让他肿胀毁容。在他统治下，大约80万人死于非命。在他晚年，第二个威尼斯人描绘了他的形象，这个人就是画家真蒂莱·贝利尼。在这两个威尼斯人的记录相隔的这段时间里，穆罕默德二世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军事和外交能力以毫不留情、濒临极限的严酷考验。

尽管威尼斯获得了和平贸易的条件，但它并没有盲目乐观。现在的共和国身处前线。威尼斯海洋帝国在希腊海岸和爱琴海群岛周围延伸数千英里，与拜占庭帝国的残余部分直接接壤，而这部分疆域也一直是穆罕默德二世所觊觎的。威尼斯人此前对奥斯曼帝国的手段已有所了解，知道战争的边界总是模糊不清的。奥斯曼帝国总是先驱使“身份不明”的骑兵不断蚕食边疆地带，拖垮敌人的力量，然后公开发动战争；我行我素的海盗则洗劫各岛屿。威尼斯元老院一直这样申明：“我们与奥斯曼帝国总是处于交战状态，所以和平始终无法得到保障。”威尼斯随即开始重新巩固它的殖民地和岛屿。

君士坦丁堡沦陷的余震波及了整个欧洲。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内部立即感受到了此事件的影响。一波波希腊移民准备在奥斯曼帝国入侵之前逃跑。据记载，“希腊教士和地主源源不断地来到科孚岛”。^[3]这一现象在克里特岛表现得尤为突出。难民的到来引发了新的暴动，希腊人希望在远离土耳其人势力范围的地方建立一个拜占庭核心基地。威尼斯当局对希腊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警惕，采取惯用的残暴手段应对：严刑拷打、判处死刑、流放他乡和利用告密者，很快扑灭了暴动的火焰。但共和国在每个角落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海洋帝国的管理覆盖面广、一刻不停息，令当局焦虑不安。当时的档案显示，这一地区麻烦不断：一个向苏丹发送密文信件的人被抓获，他在信中请求苏丹派桨帆船到克里特岛；在叛乱被先发制人地镇压下去之后，一名双重间谍请求威尼斯当

局保护；新移民被逐出克里特岛；克里特岛的财务官在海难中失踪；来自莱蒂莫的犹太人约瑟夫·德·迈尔被指控对威尼斯的荣誉大不敬；“事情还没搞清楚，要给他上刑。”^[4]克里特岛未有片刻安宁，麻烦重重。岛上居民素来无法无天，土耳其人更是加大了不安定的因素。1454年4月的一份档案指出：“许多由于谋杀或其他罪名被流放的克里特岛人住在山区。这些人是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也是将来在军队里很有用的人。如果收到此法令的时候，还未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达成和平协议，当局必须宣布大赦。”^[5]克里特生活的背景始终无法改变：贫困、粮食歉收、瘟疫、苛政、强征到令人憎恶的桨帆船上服役。拉西锡高原和斯法基亚被强制荒漠化一百年之久，1463年，共和国终于重新允许人民在这些地区开垦耕作。

当局也必须对瘟疫提高警惕，详查最新瘟疫病例的消息，并寻找瘟疫的源头。1458年9月，他们发出警告，一艘来自内格罗蓬特的船即将抵港靠岸，“瘟疫已经导致船上书记和四分之一水手死亡”。^[6]1461年6月有报道称：“一名德意志商人在三天内死去，其他人也得了重病。被传染的风险很大。所有从希腊、阿尔巴尼亚或波斯尼亚过来的乘客都被禁止上岸。其他方面，最好切断与安科纳的所有联系。瘟疫威胁到了威尼斯。”^[7]但1453年之后威尼斯海洋帝国的档案中最多的还是连续不断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严重警报。穆罕默德二世的侵略步伐不断向前推进。他征服了塞尔维亚，并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挺进，那里是拜占庭最后的军事要塞。到1460年，几乎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都被穆罕默德二世收入囊中。只剩下有战略地位的威尼斯港口，包括莫东、科罗尼和内格罗蓬特等重要殖民地，还没有被奥斯曼帝国吞并。

“奸诈的土耳其人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做好战斗准备”成了威尼斯人的口号。^[8]国家忙于向各个战略枢纽分发炮弹、火药和船桨，忙于建造桨帆船和招兵买马；忙于补给航海所需的饼干，忙于紧急征集石匠和用于修复防御工事的建筑材料，还忙着指示海军司令跟踪奥斯曼舰队，“但

只能在远处谨慎地进行”。^[9]共和国的所有珍贵领地似乎一瞬间都变得无比脆弱。据记载，“很有必要防卫克里特岛，最近的报告显示，那里缺乏武器。桨帆船的船主们必须赶在1462年3月末之前，往那里运送500副铁胸甲”。^[10]莫东港也安装了射石炮。

没有哪个地方比内格罗蓬特更让元老院担心了。1453年之后，希腊东海岸外的这个长带形岛屿成了共和国的前沿阵地。内格罗蓬特具有关键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军事、行政中心，还是桨帆船基地和商业枢纽。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六周内，内格罗蓬特居民便要求为他们派遣一位军事工程师和若干石匠。到了这一年底，形势变得很明朗，“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已经把内格罗蓬特摆在了最前线，土耳其人想拿下它……也正是因为它的至关重要，必须采取重大措施来巩固这座城市”。^[11]在内格罗蓬特城墙外，奥斯曼土匪继续抢夺粮食。1458年8月，元老院给内格罗蓬特送来了“4门射石炮、600支火枪、150桶供射石炮使用的火药、100桶供火枪使用的火药，以及长矛和弩”。^[12]土耳其人开始到处加倍地蹂躏希腊乡村。1461年1月传来了这样的报告：

来自海湾统领和莫东—科罗尼当局的信息很清楚地表明：苏丹企图占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他是威尼斯的死敌。土耳其人就在威尼斯领土的边界，相当自由地越界袭掠，造成破坏、抢夺奴隶；他们刚刚攻克了一座离莫东很近的城堡。^[13]

在15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共和国高度紧张、神经紧绷，时刻观望着苏丹下一步会怎么做。1462年10月的报告写道：“虽然土耳其舰队解除了武装，但是没人能对穆罕默德二世的意图掉以轻心。”^[14]无论他走到哪儿，都留下许多关于他残酷暴行的故事。据说男人被锯成两半，妇女和儿童被屠杀。有时，甚至协商投降的安全保障也会毫无价值。但有时，穆罕默德二世又有可能出乎意料地开恩。1461年，他打到了科罗尼和莫东城墙外；一些居民举着停战的旗帜出城，他不予理会，杀了他们。1458年9月初，他和平占领了雅典，出于对古老希腊文化的

尊重，出人意料地宽恕了这座城市的居民。此后，他率领1000骑兵，“友好地”造访了内格罗蓬特。当地人魂飞魄散，以为自己大限将至。他们带着丰盛礼物出城迎接苏丹。他骑马跨过了连接这个岛屿和希腊大陆的桥梁，查看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警告。这种访问都是有目的的。1452年，穆罕默德二世曾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坐了三天，亲自评估它的防御工事。威尼斯继续储备火药、加深壕沟和加固城墙。



内格罗蓬特（左）与希腊大陆之间由一座吊桥相连，桥的中间有一座堡垒

穆罕默德二世毫不停歇地鲸吞东西方的土地——1461年占领黑海南岸，1462年攻克瓦拉几亚（穿刺公弗拉德^[15]的领地），1463年吞并波斯尼亚，而威尼斯共和国则继续玩弄着外交手段。玩玻璃球的游戏变得越来越危险，就像和一只吃人巨怪玩耍。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聚居区的市政官是威尼斯政府整个系统最重要、待遇最丰厚却最不值得羡慕的职位。市政官同时是领事、商业代理和派驻奥斯曼宫廷的大使，其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在帝国境内，威尼斯人能够尽可能平稳地进行商业活动。正是因为威尼斯人担心丢掉在穆罕默德二世领地内利润丰厚的生意，才如此谨小慎微。市政官的职位要求他们必须耐心而且判断准确。苏丹的臣民向威尼斯领地开展了非官方的掠夺、盗窃和侵犯，市政官为了这些事情需要不厌其烦地向苏丹抗议和进言。元老院不断就上述事件

要求市政官向苏丹抗议。在苏丹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装饰一新的宫殿中拜见他，就如同马穆鲁克王朝的仪式一样隆重，但更让人心惊胆战。每一位市政官都不会忘记吉罗拉莫·米诺托的命运，他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被斩首。所以说，市政官见风使舵，净拣穆罕默德二世喜欢听的话说，不足为奇。但元老院对市政官的要求也很严苛。1456年，市政官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被拖到元老院讯问，罪名是“为了一些被合法监禁于内格罗蓬特的土耳其人与苏丹谈判，损害了共和国的荣誉”。^[16]他遭受的惩罚是：一年监禁，巨额罚款，褫夺所有荣誉，永远不得担任公职。

在这场游戏中，双方都缺乏诚意。穆罕默德二世一直对威尼斯虎视眈眈。他的宫廷有一些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人，他们都很乐意向苏丹报告关于他们的竞争对手威尼斯的情况。他们助长了穆罕默德贪婪的战略胃口。据说，“穆罕默德二世希望准确地知道，威尼斯的位置在哪里、离陆地到底有多远、怎样才能通过水路和陆路攻进威尼斯”。^[17]苏丹得到的建议已经足够详细，以至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轻易架设一座桥梁，连接马格拉（在大陆上）和威尼斯，以便军队通过。”对于一个在1453年曾将70艘桨帆船在陆上拖行3英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在他的想象中，世界在他手中，就像握着一只熟透的苹果。穆罕默德二世已经自诩为两海（黑海和地中海）之王，这样的傲慢令威尼斯人尤其感到不快。

在双方表面上客气的外交话语之下，进行着一场阴影里的战争，这也是几个世纪里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关系的一大特征：密信、间谍和贿赂，情报收集和假情报扩散，酷刑、暗杀及破坏——这些手段在国家政策中都发挥了作用。奥斯曼人在威尼斯境内雇用了许多间谍，建立了有效的情报网络，而威尼斯也有类似的部署。对每个商人来说，为自己的国家刺探情报是义不容辞的爱国责任。威尼斯政府一掷千金地贿赂具有战略意义的显要人物。犹太人作为没有利益纠葛的中间商，由于没有特

定的国籍或爱国主义的约束，被认为是特别有前途的间谍，但也相应地被认定为潜在的叛徒。元老院寻求通过非正式的途径与解决方案来影响苏丹。1456年，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市政官接到指示，若能就伊姆布罗斯岛和利姆诺斯岛与穆罕默德二世达成令人满意的谈判结果，应以1000杜卡特的巨款酬谢苏丹的犹太御医“贾科莫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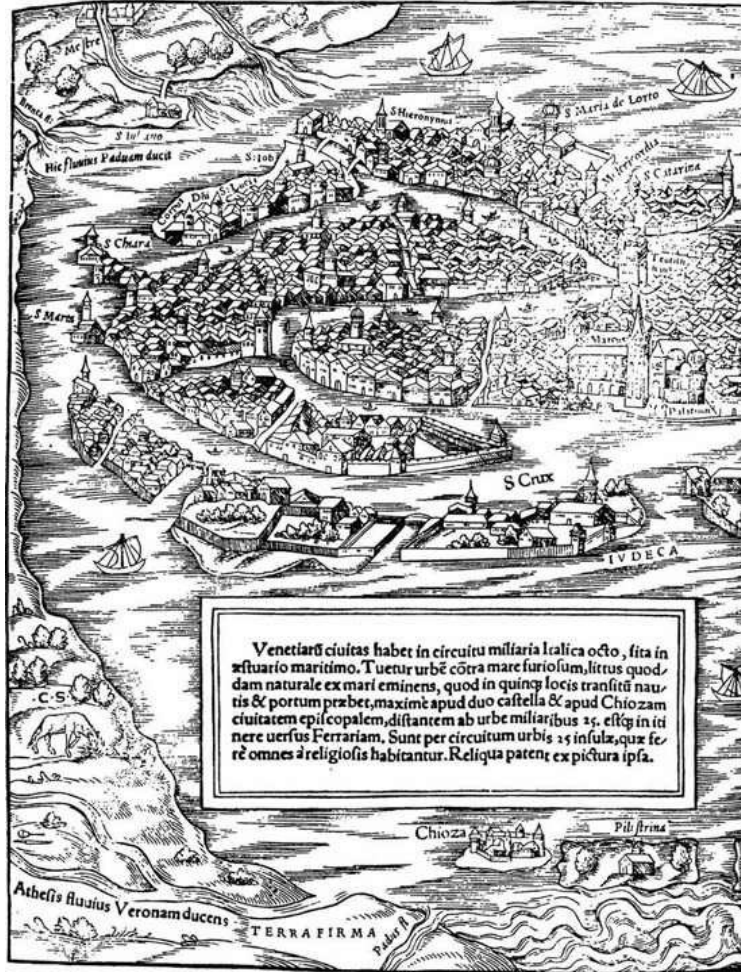
同年，威尼斯人还开始密谋暗杀穆罕默德二世。他们接受了“犹太人N”提出的刺杀穆罕默德二世的建议，“表示满意……因为他的死不仅对共和国，对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大为有利……一切必须暗中行事。必须万分谨慎，必须没有目击者，没有书面证据留存”。^[18]此次刺杀并未成功，但共和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动这个念头。1463年，多明我会教士“N”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提议，被认为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计划”^[19]，一旦成功，值得给此人1万金杜卡特的酬金，以及每年1000杜卡特的津贴。1456~1479年，威尼斯十人议事会授权了十四次毒杀穆罕默德二世的行动，具体执行人员千奇百怪，包括一名达尔马提亚水手、一名佛罗伦萨贵族、一名阿尔巴尼亚理发师，以及一个来自克拉科夫的波兰人。这其中最有可能得手的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御医，就是之前提到的贾科莫，他可能是一个双重间谍，也有可能就是“犹太人N”。这些暗杀的计划显然没有获得成功（尽管穆罕默德二世的实际死因仍然笼罩在迷雾中），但共和国乐此不疲。用一个小药瓶干掉穆罕默德二世仍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

整个南欧因为穆罕默德二世的持续推进而大受震撼。奥斯曼人步步紧逼，一会儿踏破波斯尼亚，一会儿又在距离意大利仅60英里的阿尔巴尼亚海岸建立基地。恐怖的前景吓坏了教皇。借助丰富的想象力，他仿佛看到戴头巾的骑兵从阿庇乌斯大道^[20]杀向罗马。穆罕默德二世，“撒旦、地狱和死亡之子”^[21]，离得越来越近。未来的教皇庇护二世恐惧得喘不过气来，他这样写道：“现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着我们。现在土耳其人俯瞰我们的脑袋，黑海已经对我们封闭，我们再也无法进入顿河流

域。现在瓦拉几亚人必须臣服于土耳其人。接下来，苏丹的敕令将传到匈牙利，然后传到德意志。与此同时，我们内部却兄弟阋于墙，互相争斗和仇恨。”^[22]

1453年以后，奥斯曼人的严重威胁一直充斥着连续多位教皇的脑海，而威尼斯始终在向意大利其他地方宣传这种危险局势。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威尼斯人当即发出了一份直率的报告：“我们极其担心威尼斯人在爱琴海地区的财产……如果这些地区沦陷，那么就没人可以阻挡奥斯曼人登陆阿普利亚……我们邀请教皇向基督教君主们宣扬团结，敦促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奥斯曼人。”^[23]教皇高声疾呼，呼吁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但庇护二世本人也承认，基督教国家间的争斗和仇恨始终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威尼斯发出这些呼吁的时候，正与米兰和佛罗伦萨连番恶战，而且威尼斯与伊斯兰世界有历史久而可疑的关系。意大利四分五裂，由许多在商业和领土上互相竞争的对手组成。威尼斯努力将自己展现为前线国家——基督教世界的盾牌，其他国家却认为他们太过傲慢、富裕、自私自利，是异教徒的朋友。

意大利的外交气氛很恶劣，各方都极度虚伪。威尼斯只关心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贸易利益，并且更稳固地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它大肆宣扬自己基督教捍卫者的身份，但只是利用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威尼斯的对手们同样难辞其咎。意大利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曾在某时期准备和苏丹做交易。佛罗伦萨人希望取代威尼斯，成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拥有优先权的商人；安科纳人向君士坦丁堡输送战争物资；后来，那不勒斯国王表示愿意为穆罕默德二世开放港口。威尼斯的对手们做梦都希望威尼斯的巨额财富在孤身苦战中消耗殆尽。



在潟湖保护下的威尼斯被视为基督教欧洲的最后一道防线

教皇庇护二世本人是一个十字军东征的狂热者，他抱着不合时宜的想法，认为基督徒会像古时一样，响应教皇慷慨陈词的号召，加入十字军，为了夺回君士坦丁堡的神圣使命，自发捐献钱财、资源和人力。在异想天开之中，他甚至起草信件，劝诫穆罕默德二世皈依基督教。教皇相对于他的时代落后了数百年。在1201年已经很困难的事情在15世纪60年代更是完全不可能了。欧洲太过民族主义，太分裂，过于功利而且太世俗化。1461年，威尼斯人拦截了画家马泰奥·德·帕斯蒂乘坐的船，他从里米尼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为苏丹画肖像。他们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一部《军事论》——关于军事策略和作战器械的现代专著，以及一张详细的亚得里亚海地图。他此行是遵从了里米尼领主西吉斯蒙多·马拉泰

斯塔的命令，而马拉泰斯塔人称“里米尼恶狼”，是意大利最狡诈、最令人生畏的雇佣兵领袖（意大利政治瞬息万变，恶狼将在三年后为威尼斯效力）。

威尼斯下定决心，只有在其他所有国家都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情况下，它才会加入进来。只要基督教国家的团结还不能最终确定，元老院就禁止在其境内宣扬十字军东征。毕竟有太多奸细随时准备向君士坦丁堡报告，威尼斯人破坏了“和平”协约。1463年6月，波斯尼亚沦陷之时，威尼斯执政官就警告可恨的佛罗伦萨人：如果没有顽强的抵抗，穆罕默德二世将“几乎直接推进到意大利的大门口”。^[24]但佛罗伦萨人充耳不闻。此刻的共和国已经忍无可忍，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孤军奋战，要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海洋帝国被蚕食。7月，投票表决以微弱多数决定，威尼斯将投入战斗。威尼斯人立刻对庇护二世的倡议重新表示了兴趣。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在圣马可广场积极宣扬十字军东征，这是威尼斯历史的重演。元老院熟知威尼斯的历史，决定让年迈的执政官克里斯托福罗·莫罗效仿当年丹多洛的壮举，在自己的尖角帽上佩戴十字架。然而，除了同样年迈，莫罗和他这位知名的前辈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所以礼貌地拒绝了。元老院直言不讳地表示：“对我们来说，我们土地的荣誉和福祉比你的个人安危更重要。”^[25]执政官和其他人一样，可能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

在其他地方，十字军东征的建议仍然不受欢迎。在博洛尼亚，教皇强征的什一税被称为“纯粹的抢劫”^[26]；此次冒险被广泛认为不过是威尼斯人的帝国主义计划。佛罗伦萨大使拼命反对它：

圣父^[27]，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您向土耳其人发动战争，是为了强迫整个意大利臣服于威尼斯人吗？一旦把土耳其人赶走，我们在希腊赢得的一切都将属于威尼斯人，而在此之后，他们肯定会把爪子伸向意大利其他地方。^[28]

威尼斯针对这样的说法予以猛烈的反驳，详细列举了自己五十年来对土耳其人侵略的历次抵抗（尽管其中有些是虚构捏造的）：

某些人在罗马发出的指控令我们无法忍受：共和国始终尽职尽责。

（大使）应强调，在1416年，我们在加里波利获得胜利，土耳其舰队几乎被全歼；但其他基督教国家只是在一旁喝彩，没有对威尼斯的号召做任何回应；1423年，我们占领了萨洛尼卡……付出了难以置信的巨大努力，付出了高昂的费用，保护它长达七年，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1444～1445年，威尼斯武装了自己的桨帆船，并在整个冬天保持战备状态，但教皇并没有兑现承诺，支付舰队的开支。教皇不应该听信这些诽谤者的恶意中伤，而应该考虑到，奥斯曼帝国正在压榨威尼斯的所有财产：威尼斯的情况和其他基督教国家截然不同……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付出的努力能和威尼斯相提并论。^[29]

庇护二世明白，威尼斯在自私自利地寻求保护自己的帝国霸业，但是和1201年的英诺森三世一样，他需要威尼斯人支持他的十字军东征计划，于是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我们承认，威尼斯人和其他肉体凡胎一样，是贪得无厌的……（但是）如果威尼斯得胜，基督也会得胜，这对我们已经足够了。”^[30]但私下里，他对威尼斯人的评价极低。在他的著作《评述集》里有这样一段，在印刷版本里被删掉了：

生意人对宗教毫不在乎，一个守财奴的民族也不会花钱为宗教事业复仇。只要他们的钱财安全无虞，那么他们就不认为受辱有什么不好。正是对权力的贪婪和难填的欲壑，才让威尼斯人舍得这样装备部队，并承受这样的代价……他们支出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们跟随着自己的天性，他们的目标就是贸易和交换。^[31]

两百五十年前的英诺森三世完全可能写下这样的话。

但在战略上，威尼斯是正确的：如果共和国的海外领地被削弱，穆罕默德二世将会进攻意大利。威尼斯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奥斯曼人。然而他们扮演的角色可能有些矛盾，因为他们是基督教世界唯一的海上防线。十六年后，意大利半岛在危急中将会想起这个事实。

此次十字军东征计划始终未能真正落实。庇护二世是个糟糕的组织者，擅长慷慨陈词，却不懂得战争的实际筹划。1464年夏天，只有一群乌合之众出现在了安科纳的十字军召集点。打算亲自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庇护二世看到这景象，越发绝望。8月12日，24艘威尼斯桨帆船带着他们满心不情愿的执政官来到安科纳，此时的庇护二世已经是个垂死之人。他不得不让人抬到主教宫殿的窗口，才看得到圣马可的雄狮旗向着明亮的海湾飘扬。三天后，他便与世长辞。这次冒险极不光彩地失败了。他垂死的那些日子象征着十字军东征梦想的死亡。克里斯托福罗·莫罗乘船回家了，无疑庆幸自己躲过一劫，但威尼斯注定要在很长时间内单打独斗。佛罗伦萨人、米兰人和那不勒斯国王隔岸观火，在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冷漠地观战。

[1] 也叫齐里亚科·德·皮齐科利（1391~1453/1455），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和考古学家，被称为“现代考古学之父”。他在南欧和近东（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游历极广，研究各地的古代遗迹，后来整理成书。1422年奥斯曼帝国攻打君士坦丁堡期间，他曾为奥斯曼人效力。

[2]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 112

[3]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34

[4]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11

[5]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97

[6]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16

[7]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27

[8]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46

[9]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36

[10]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36

[11]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193

[12]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21

[13]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22

[14]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35

[15] 即瓦拉几亚大公弗拉德三世·采佩什（1431～1476），即后世传说中“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

[16]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39

[17]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12

[18] Clot, André, *Mehmed II, le conquérant de Byzance*, Paris, 1990, pp. 134-5

[19]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10

[20] 阿庇乌斯大道是古罗马时期一条把罗马及意大利东南部阿普利亚的港口布林迪西连接起来的古道，得名自开始兴建此工程的罗马监察官和演说家“盲人”阿庇乌斯·克劳狄·凯库斯（前340～前273）。

[21]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p. 240

[22]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150

[23]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150

[24]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189-90

[25]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 225

[26] Norwich, John Julius, *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 1982, p. 345

[27] 指教皇。

[28]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246

[2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246

[30]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p. 221

[31] Setton, Kenneth M., 'Saint Georges Head, ' *Speculum*, vol. 48, no. 1, 1973, p. 246

19.“如果内格罗蓬特沦陷”

1464～1489

战争的开端颇为振奋人心。威尼斯人成功地攻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但战争很快变得难以为继。“里米尼恶狼”指挥的雇佣军部队很不可靠。当然，鉴于威尼斯没有及时支付酬劳，他们表现出不可靠也就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了。威尼斯桨帆船控制着海洋，但它在陆战中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而奥斯曼舰队对1416年的大败心有余悸，拒绝出战。打仗是件烧钱的事：到1465年，战争开支高达每年70万杜卡特。十年后，这个数字翻了将近一倍。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威尼斯人处境凄惨。市政官死在君士坦丁堡狱中；被俘的士兵和定居的商人被当众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扔在路上，任其腐烂。威尼斯人在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活动几乎绝迹，商业公司纷纷倒闭。威尼斯人在伯罗奔尼撒的进攻被阻挡住，随后被打退。骁勇善战的海军司令韦托尔·卡佩洛也无法阻止敌人夺回西海岸的帕特雷。帕特雷失守对他打击很大：卡佩洛是主战派的领袖。帕特雷失陷以后，他就再没有笑过；1467年3月，他在内格罗蓬特死于心脏病后，威尼斯人的斗志已大不如前。在这一年7月，穆罕默德二世离阿尔巴尼亚海岸的威尼斯港口杜拉佐已经仅有5英里。此刻，只有60英里宽的亚得里亚海将奥斯曼军队与意大利海岸的布林迪西分隔开。一船一船的贫困难民开始抵达布林迪西。在那不勒斯，人尽皆知，穆罕默德二世“恨极了威尼斯共和国，如果他能在阿尔巴尼亚那个地区找到一个合适港口，势必将战火烧到威尼斯领土”。^[1]到1469年，奥斯曼劫掠者已经打到了相当靠近威尼斯的伊斯的利亚半岛。穆罕默德二世在潟湖上架桥的计划看来完全可能实现。

共和国时而顽强抵抗，时而努力和谈，时而与穆罕默德二世在小亚细亚的伊斯兰竞争对手进行外交沟通，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来结束这场漫长的战争。战争有时暂停，有时再度开始，取决于穆罕默德的战略考量和他的健康状况。当他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逐鹿亚洲或黑海时，威尼斯就能暂时松一口气。而他的归来总是不祥的。间歇性发作的病态肥胖会影响这位苏丹的健康，他不能骑马，在托普卡帕宫闭门谢客，于是征战就会暂停。

穆罕默德二世在外交游戏中表现得技艺娴熟。他宫廷内的佛罗伦萨和热那亚顾问以及间谍为他提供了大量情报，所以他对意大利政治了如指掌。他玩弄威尼斯人的希望于股掌之间，鼓励他们的大使，然后撒手不管，接收了礼物之后重新板着一副沉默的面孔，周期性地争取时间重组军队，或者提出明知对方会拒绝的和平条件。不时有来历不明的使者来到威尼斯的前哨阵地，释放一些“和谈不是不可能”的信号。之后，这些使者又销声匿迹。穆罕默德二世试探威尼斯人的决心，考验他们的厌战情绪，并散布虚假信息，让元老院费劲地甄别一条又一条信息。在战略上，他讳莫如深，让间谍们揣摩他每个新的作战季节的目标。每个人都知道，他很有戒心，极有城府。据说，曾经有人询问穆罕默德二世关于未来一场战役的情况，他答道：“请君谨记，假如我的一根胡须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就会把它拔下来，丢进火焰。”^[2]里亚尔托变成了谣言的战场。

威尼斯人很快掌握了他的处事方法。1470年考虑一个新的和平提议时，元老院这样决定：

我们很清楚，这是土耳其苏丹惯用的狡猾伎俩。考虑到目前的情况，我们坚信，对他不应当报以任何信任……但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和他一样装模作样，迎合他玩这场游戏。^[3]

威尼斯的势力如日中天，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也持续繁荣。但战

争造成了极大破坏。由于拜占庭和黑海地区的贸易被彻底扼杀，战争的恶果更加严重。“目前的情况”始终是，与疆域更广、资源更雄厚的奥斯曼帝国相比，共和国总是屈居下风。

到15世纪60年代末，在外交圈里，警报声此起彼伏，日渐紧迫。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所有生活在被奥斯曼帝国不断侵蚀的边疆的人——承受着死亡和苦难。威尼斯向教皇申请物质援助、圣战什一税和支持，“因为一旦苏丹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海岸（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样的灾难），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攻打意大利，意大利随时会覆灭”。^[4]

1467年，韦托尔·卡佩洛在内格罗蓬特去世后，威尼斯任命了一位新的海军司令——雅各布·洛雷丹。从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情报显示，穆罕默德二世迟早要进攻内格罗蓬特——“我们在东方领地的屏障和堡垒”。^[5]当务之急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座岛屿。共和国为内格罗蓬特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督，对他发出了这样的指令。他是尼科洛·达·卡纳尔博士，此前曾任驻梵蒂冈大使。作为保障措施，共和国给达·卡纳尔发出了另外一套命令：

上帝保佑，若海军总司令突然病倒或感到不适，以至于不能坚持执行使命，又或者他不幸死去，我们命令你.....立刻接管桨帆船舰队指挥权.....履行其职责.....直到总司令恢复健康。^[6]

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决定。达·卡纳尔是个学识渊博的律师，是曾经被委任为威尼斯舰队指挥官的人当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然而，他不是皮萨尼或卡洛·泽诺。很不幸，当穆罕默德二世果真发起攻击时，正是达·卡纳尔在指挥威尼斯舰队。

1469年2月，希俄斯岛上的一名威尼斯商人——皮耶罗·多尔芬向共和国提供了重大情报。他的情报非常具体：

12月初，我们从加拉塔得知，土耳其人已经开始筹备一支舰队，并召集陆军。苏丹已经亲自驾临君士坦丁堡，不顾瘟疫的危险，安排相关事宜……他准备建一座桥，把军队从大陆调遣至内格罗蓬特岛。^[7]

他继续列举了相应的战备情况：奥斯曼人为了制作航海饼干，调集大量面粉，导致民间面粉短缺，街头甚至发生了骚乱；为了制造火药，准备了大量木炭；60名船只敛缝工人已被派往加里波利的兵工厂；成千上万的人被动员起来；火炮被运往萨洛尼卡。他重申了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的关于内格罗蓬特的情况：“整个国家的安全系于此城。如果内格罗蓬特沦陷，黎凡特的其他所有地区都将陷入危险。”^[8]

1469年3月8日，律师兼海军将领尼科洛·达·卡纳尔被委任为海军总司令：

我们通过信件和其他途径得知，土耳其人——基督之名最残忍的敌人，正在筹建强大的舰队和陆军，意图攻打我们的城市内格罗蓬特……由于事态紧急，我们命令你以最快的速度航行……赶到莫东和内格罗蓬特，凭借你惯常的审慎、勇猛和上帝的仁慈，迎战很可能已经在那里等待我们的危险敌人。^[9]

1469年和1470年，耸人听闻的消息甚嚣尘上。据夸张的估计，苏丹麾下拥有十万大军和350艘舰船，这是一股潮水般宏大的军事力量。威尼斯已经因为七年的战争而元气大伤，拼命做着绝望的准备。“我们不仅从各个源头挤出资金，甚至从我们的血管里挤出血液来援助内格罗蓬特，以免（在内格罗蓬特的）所有基督徒遭到屠戮和灾难。”^[10]共和国一次又一次强调，内格罗蓬特的损失对意大利沿海地区意味着什么，以及联合行动的必要性，但一切都无济于事。1470年春，威尼斯处于最高警戒状态。兵工厂的两名高官奉命住进工厂，日夜赶工，第三名高官则被派去采购舰队的给养。2000人乘坐10艘圆船，运载着火药和500名雇佣步兵，前去增援内格罗蓬特。6月3日，一支奥斯曼舰队从加里波利起航了。

一队威尼斯桨帆船在爱琴海北部发现了这支奥斯曼舰队。桨帆船指挥官杰罗尼莫·隆哥被他看到的情景深深震慑了：

我已经看到了土耳其舰队，如果上帝不怜悯我们，它注定要毁灭基督教世界.....我们长久以来辛苦得到的一切，将在几天之内丧失殆尽.....起初我判断敌军有300艘船，现在觉得有接近400艘.....大海就像一片森林；这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情景真的很壮观。虽然和我们有差距，但他们的桨划得也算是又快又好。不过，帆和其他的一切都比我们的好。我认为他们的人数也比我们多。[\[11\]](#)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他火急火燎地继续说道，并对敌人的大炮和其他装备做了评估。

我可以发誓，保守估计，整个舰队从头到尾超过6英里长。我估计，要在海上对付这么庞大的舰队，我们至少需要100艘上好的桨帆船。即使有了这么多桨帆船，我也不知道究竟会鹿死谁手。要确保胜利，必须还要有70艘轻型桨帆船、15艘重型桨帆船、10艘1000桶[\[12\]](#)的帆船，这些船都必须装备精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展现自己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投入舰船、士兵、粮食和金钱；否则，内格罗蓬特将岌岌可危，我们在黎凡特的帝国，一直到伊斯的利亚，都将沦陷。

隆哥在预测整个海洋帝国的土崩瓦解。亚得里亚海本身将会陷入可怕的危险之中：伊斯的利亚就在威尼斯的门口，只有一夜航程的距离。

在威尼斯，政府要求大家举行公共祈祷。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大陆的人们终于觉察到了危险。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战败会是什么后果。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写道：“土耳其海军很快将兵临布林迪西，然后是不勒斯，然后是罗马。威尼斯人被打败之后，土耳其人将会统治大海，就像他们已经主宰了陆地一样。”[\[13\]](#)教皇保罗倡议全意大利都做祷告。7月8日，一支红衣主教的忏悔队伍赤着脚从梵蒂冈步行到圣彼得大教堂；一位土耳其人受了洗礼，给大家鼓劲；每个人都被告诫去祷告；参加战斗或者为战争捐资的人得到了免罪符。尽管对方舰队阵势庞大，而

且隆哥的话透出事态危急，但加里波利半岛海战的记忆令威尼斯人十分自信。它的海上霸主地位从来没有在战斗中受到过挑战。

内格罗蓬特，意思是“黑桥”，是威尼斯人给希腊的优卑亚岛及岛上主要城镇取的名字。在地中海的地质史上，这个岛算是个畸形的特例。它紧靠希腊东海岸，以至于根本不能称为一座岛，而是一块长条形的土地，与大陆交互错落。一个被海水淹没的山谷，即尤里普斯海峡，将内格罗蓬特与大陆分隔开。尤里普斯海峡也算海洋世界中的一个微型奇观。狭窄的海峡像水锤泵一样，以一系列潮涌将海水冲过，一天十四次，来回各七次。在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岛与大陆之间的海面仅有50码宽，水流湍急，如同磨坊水车驱动的水流。威尼斯人的城镇就建在此处，在古希腊居民点哈尔基斯的遗址之上。它像一个迷你版的意大利城邦，防御非常巩固，令人印象深刻，拥有一个港口和一座连接大陆的桥。桥中间有设防的塔楼和双吊桥，可以把入侵者拒之门外。



内格罗蓬特与希腊大陆之间由尤里普斯海峡隔开。奥斯曼人在黑桥右侧建造了自己的桥梁。达·卡纳尔的舰队从北面驶来，也就是在桥的左侧。

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这个岛屿的战略重要性不可估量。它的人口不多，或许连3000人都不到，但它是威尼斯在爱琴海北部的中心。根据当时一份赞扬内格罗蓬特的文献记载：“这个地方聚集着富豪和大商人.....所以非常繁荣昌盛。”^[14]

6月8日前后，奥斯曼舰队抵达内格罗蓬特，在城市的下游停泊，把人员和火炮送上岸。和几个月前的情报预测的一样，土耳其人立即开始建造自己的横跨海峡的舟桥，位置在黑桥以南。此时黑桥上的吊桥已经被升起，停止使用了。守军不知情的是，这支奥斯曼海军不过是钳形攻势的一翼而已。6月15日，一支大军出现在对岸大陆的地平线上，由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指挥。威尼斯人的言语挑衅和咒骂戛然而止。苏丹的出现为整个军事行动增加了分量，没有十足把握，他是不会御驾亲征的。他在山脊上勒马驻留，花了两个小时俯瞰下方的全景：狭窄的海峡；中间建有堡垒的堤道；然后是远处有护城河环绕的城市，外墙上刻着圣马可的雄狮，塔楼上飞扬着雄狮旗；他自己的舰队停泊着。精细完美的协同是穆罕默德二世的作战风格。他的目标是在威尼斯舰队做出反应之前，发动闪电战，将内格罗蓬特一举打垮。

他的大约两万人的军队走下山坡，来到尤里普斯海峡岸边，身后跟着长长的骆驼和骡子队，搬运着攻城军队需要的全部辎重。他穿过浮桥，支起了营帐，开始调兵遣将，紧紧包围这座城市。按照惯例，劝降的喊声飞过城墙：如果主动投降，所有居民都不会受到伤害；他们十年内不需要上缴任何赋税；“任何拥有一栋别墅的贵族，将获得两栋别墅。如果尊贵的市政官和指挥官想留在这里，他们将被任命为领主；如果不想留在这里，苏丹也会在君士坦丁堡给予他们莫大的荣耀。”^[15]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明白，没有哪个威尼斯总督在乖乖投降之后还能活着回到家乡。

守军的反应十分激烈。市政官保罗·埃里佐明白，达·卡纳尔的舰队正在驰援的路上。他宣布，内格罗蓬特是威尼斯的领土，不会改变。他承诺在两周之内烧光苏丹的舰队，将他的营帐连根拔起，之后他又邀请苏丹“去吃猪肉，并且和我们在壕沟相会”。^[16]这样的侮辱被翻译出来之后，穆罕默德二世眯起眼睛，决心不让岛上任何人活着离开。

随后发生的是君士坦丁堡攻防战的一场微型重演，非常残忍而血腥。穆罕默德二世带来了21门重型射石炮，日夜不间断地轰击这个城镇高耸的中世纪城墙，令城内的人魂飞魄散，逐渐将他们的堡垒化为废墟。威尼斯的大炮也赢得了一些胜利，摧毁了敌人的一些火炮，打死敌人炮兵。但是，奥斯曼军队的强大火力排山倒海。燃烧弹和白炮袭击了城市的中心地带，迫使心惊胆寒的居民躲避在外墙的背风处，“因为炮弹大多击中的是城市中心”。^[17]“火炮数量极多，而且由于炮火持续不断，”这次围城战的一名幸存者焦万—玛利亚·安焦莱洛写道，“炮火从正面和两翼猛轰城市，我们的很多人死于非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工事进行系统性修理。”^[18]土耳其人缓慢移动他们的云梯，不停向前挖掘战壕，突入了外墙的瓦砾堆。6月29日，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高亢的喇叭声和极有节奏感的低沉鼓声，穆罕默德二世命令发起总攻。守军打退了这次进攻，但伤亡惨重。

很快，市政官不得不同时对付城外连续的攻击和城内的“第五纵队”。守军的一支关键力量是500名雇佣步兵，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从达尔马提亚海岸招募来的，指挥官是托马索·斯基亚沃。有人发现，斯基亚沃曾派特使前往奥斯曼军营。政府秘密侦破了这个阴谋，逮捕并拷打了他的同伙，揪出了一个间谍和阴谋网络，这一网络已运作多年，而且一直渗透进了威尼斯城。穆罕默德二世在威尼斯国家机关安插了潜伏很深的间谍。在严刑逼供下，斯基亚沃的弟弟吐露了一项计划，即在土耳其人发动下一次进攻的时候，里应外合，放他们进城。他被秘密处死了。

现在，市政官必须对付斯基亚沃本人。与斯基亚沃的较量必须极度隐蔽，因为这个叛徒手握重兵。埃里佐召他前往城镇的行政中心——凉廊，讨论防御的细节问题。斯基亚沃显然已经生疑，带着大批全副武装的部下来到了中心广场。进入凉廊后，市政官热烈而友好的态度让他放下了警惕。经过一段冗长的讨论，斯基亚沃命令他此番带来的随从原地解散，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斯基亚沃转身时，12个隐蔽在一旁的人冲

了上来，将他打倒。他的尸体随后被倒挂在广场上。

而此时，穆罕默德二世对这个变故仍然一无所知。他还在等待一个事先商量的信号，即某座堡垒将不作抵抗、举手投降。市政官设下了陷阱。信号旗照常升起；据一位编年史家称，当奥斯曼人冲向前时，他们“像猪一样”惨遭屠戮。^[19]

事后，城内当局开始处死叛国案的其他主谋，但整个事件还是导致城内人心不稳、士气低沉。街上一片哗然，市民和一些克里特人与达尔马提亚雇佣兵相互攻击。当局不得不处死越来越多的斯拉夫雇佣兵。随着人力逐渐减少，街头公告员在街上走动，命令十岁及以上的男孩前往兵工厂。500名少年被选中，快速接受了手枪射击训练，并被派去守护城墙。他们每杀一个土耳其人，奖励两个阿斯普尔^[20]。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市政官每晚会发给这些男孩共300~500阿斯普尔。”^[21]土耳其人的又一次总攻宣告失败。

奥斯曼人继续轰击城墙，每天都造成人员伤亡。但埃里佐知道，如果他能再坚持一点时间，达·卡纳尔的援军就会抵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穆罕默德二世变得越来越焦虑。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他把船只拖上岸，在黑桥的另一侧建造了第二座桥，用来抵挡威尼斯人从北方沿海峡而下的援兵。他加强了对城内的轰炸，昼夜不间断地狂轰城墙并组织进攻，以消耗守军的力量。他还不时散布消息，承诺饶投降守军不死。7月11日上午，在连续三天的猛烈炮击之后，穆罕默德二世打算发动致命的最后一击，可是他却突然被迫停下了进攻的步伐。

奥斯曼警戒哨突然发现，威尼斯舰队从尤里普斯海峡的北端呼啸而来。威尼斯人有71艘船，虽然没有隆哥建议的100艘那么多，但仍是一支相当雄厚的力量。它包括52艘强悍的武装桨帆船和一艘令土耳其人非常忌惮的重型桨帆船。威尼斯海军顺风顺水，气势汹汹地穿过海峡。穆罕默德二世的阵地一下子变得极其脆弱。威尼斯舰队只需摧毁浮桥，就

能切断奥斯曼人撤退的路线，并且把他们的孤军困在岛上。据说，穆罕默德二世意识到他的计划即将破灭之后，留下了无力而伤心的眼泪；他骑上马，准备逃离这个岛。城堡护墙上的守军斗志高涨。援兵到来看上去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再过一个小时，奥斯曼人的桥梁将被摧毁。

这时，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威尼斯舰队停下了，在上游抛锚，静坐观望起来。

海军总司令尼科洛·达·卡纳尔是一名学者兼律师，而不能算是一名航海家。他更习惯于仔细权衡各种法律抉择，而不善于果断行动。在那一刻，律师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担心自己的船只抵挡不住炮火，也应付不了湍急未知的水流。他命令舰队停下来。他手下的船长们敦促他前进，却遭到拒绝。两名克里特人请求借着劲风和潮涌的力量，驾驶重型桨帆船攻击第一座浮桥。有些水手的亲眷就在城内，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生死存亡之战。最终，达·卡纳尔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个建议。桨帆船开始行进，但在途中，达·卡纳尔又改了主意。他用信号炮命令桨帆船回撤。

在城墙上，守军目睹了这一切——起初带着得救的欢愉，后来变成不敢相信，最后变成了恐惧。他们向静止不动的救援舰队发出了越来越绝望的信号——火炬被点燃又被熄灭，圣马可的旗帜被升高又降下。最后，据安焦莱洛说，“一个真人大小的耶稣受难像被树立了起来，高高举起，面向我们的舰队，就是希望舰队的指挥官可怜可怜我们，以他们能够想象的方式救救我们”。^[22]但这一切无济于事。达·卡纳尔把他的舰队开到上游，并在那里停泊。安焦莱洛回忆道：“我们的精神崩溃了，几乎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23]一些人诅咒道：“愿上帝宽恕那些不能履行职责的人！”^[24]

穆罕默德二世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由于战局的突然转变，他立即宣布，第二天一早全军尽数出动，发动总攻。他亲自骑马巡视营地，承诺

士兵们，所有在城内抢夺的财物都归他们所有。之后他派遣了大量手枪兵去保护上游的桥梁，防止达·卡纳尔舰队突袭。在黎明前黑暗的几个小时里，在惯常的战鼓和喇叭的喧嚣中，他命令他最不可靠的部队（“乌合之众”）率先进，去损耗对方的防御力量。当他们倒下时，正规军便践踏着尸体，猛冲上去。城内所有人，不管男人、妇女还是儿童，都参加了最后的抵抗，在狭窄的巷道内设置路障。当敌军一步一步、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逼近时，他们向敌人泼洒滚水、生石灰和沸腾的沥青。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敌人已经攻到了中央广场。在桥上的堡垒处，守军升起一面黑旗，作为最后绝望中的求援。达·卡纳尔回应得太少，也太迟了。他只是三心二意地对浮桥发起了进攻。当水手们看到奥斯曼旗帜在城墙上飘动的时候，海军司令居然解开船锚撤退了，留下绝望的民众独自面对可怕的命运。城防司令阿尔维斯·卡尔博被杀死在圣马可教堂，财务官安德烈亚·扎内则死在圣巴斯蒂亚诺教堂。街道上死尸成堆。穆罕默德二世想起了关于猪肉的侮辱。他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不抓俘虏，全部处死。投降者被当场屠杀。其他人则被刻意带到圣使徒教堂处决。死者的首级被堆在主教宅邸门外。穆罕默德二世仍然怒不可遏。他下令，任何为了私利藏匿俘虏的士兵将和俘虏一起被斩首。相应地，他命令对桨帆船进行了搜查。

试图跨过大桥逃跑的人太多了，以至于桥体轰然倒塌，反将他们投入大海。处于桥中间位置的要塞难以接近，仍在坚持抵抗。最终，守军同意投降，奥斯曼人承诺饶他们不死。当穆罕默德二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愤怒地训斥做出此承诺的帕夏：“如果你说了（饶恕他们生命）这样的话，那么你一定忘记了我的誓言。”^[25]最终，所有人都被处决。在一些文献里，据称市政官在桥上的人群里，而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同意不砍他的人头。他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市政官没有被砍头，而是被夹在两块木板之间，然后被锯成了两截。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市政官在城墙上就已经阵亡了。苏丹实施了可怕的报复。苏丹对曾经非常有效地射杀其麾下士兵的男孩们特别恼火，他命人将所有十岁及以上的男性幸

存者，共计约800人，带到面前。他们的手都被绑在背后，被迫跪成了一个圈，之后被一一斩首，死尸也成了一个圈。尸体被扔进大海，幸存的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

尽管穆罕默德二世发出了屠城誓言，但仍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其中就有焦万—玛利亚·安焦莱洛，他被掳走并卖为奴隶。还有一个叫雅各布·达拉·卡斯泰拉纳的僧人可能成功地伪装了自己。他的简短叙述中以自传形式结尾：“我，雅各布·达拉·卡斯泰拉纳兄弟^[26]，目睹了这所有事件，有幸逃出了小岛，因为我会讲土耳其语和希腊语。”^[27]

威尼斯舰队毫无成效地追踪敌人的船队回到加里波利半岛，然后带着耻辱回国了。

从内格罗蓬特传来的噩耗比十七年前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消息更令人心碎。一开始都只是谣言。7月31日，一名失事船只上的水手带着勒班陀总督的湿漉漉的信出现了：敌人的海岸线上出现了火光，这是敌人已经取胜的不祥征兆。^[28]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元老院目瞪口呆。

共和国议事会的成员们回家途中经过圣马可广场，被很多想知道事态究竟如何的人拦住。他们拒绝回答，默默走开，仿佛被吓坏了一般低垂着头。整座城市因此充满了惊慌和沮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件。有人开始传言，说内格罗蓬特沦陷了。消息在全城不脛而走。威尼斯人的叹息和哀痛无法用言语表达。

钟声响彻整座城市；忏悔的游行在广场进行；布道者们哀叹着基督徒的罪孽。米兰大使写道：“整座城市魂飞魄散，居民都伤心欲绝。”^[29]内格罗蓬特的沦陷是帝国衰落的第一个征兆，让人感觉像是末日的开端。编年史家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写道：“现在，伟大的威尼斯受挫了，我们的自豪感被摧毁殆尽。”^[30]在那一刻，有远见的人们预测到，海洋帝国将日渐没落。借助新问世的威尼斯印刷机，内格罗蓬特沦陷的

惊人消息传遍了意大利。

元老院试图保持镇定。它传达给意大利各邦的信息是坚决果断的：

我们既没有被这样的损失击垮，也没有在精神上瓦解，相反，我们变得更加斗志昂扬，决心迎接这巨大的危险，增强海军实力，派遣新的驻军，以便加强和维护我们在东方的其他领地，也是为了援助其他生活受到无情敌人威胁的基督徒。^[31]

但元老院很快就开始更加绝望地请求援助、团结、金钱和人力。执政官给米兰公爵写信称：“整个意大利和所有基督教国家同一条船上。任何一条海岸线、任何一个行省、意大利的任何一个部分，无论它的地理位置多偏远、多隐蔽，都不比其他地方安全。”^[32]教皇又再次鼓吹十字军东征，但这次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每一个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与穆罕默德二世订立协约。达·卡纳尔也逃过了死刑判决。元老院承认，大错一早就已经铸下——他们本不该任命达·卡纳尔为海军总司令。他被永久放逐到距离威尼斯30英里的一座尘土飞扬的城镇——波尔托格鲁阿罗。对于这个“生来就该读书，而不该做一名水手”的精英律师来说，这个地方简直和黑海一样遥远。^[33]但是错误地任命他的教训并没有被世人牢记：一代人以后，这样的错误又再次被重复。

威尼斯孤军作战，渐渐丧失了很多领土。在战争初期获得的大多数堡垒一去不复返；科罗尼、莫东和勒班陀坚持下来，因为它们能从海路获得源源不断的补给。和谈来了又去，与意大利各邦、匈牙利和波兰的联盟都毫无建树。1473年，穆罕默德二世战胜了乌尊哈桑^[34]——威尼斯在波斯边疆的盟友，随后便将全部注意力转向威尼斯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地。1475年，他终于消灭了黑海地区的热那亚和威尼斯殖民地。到1477年，形势已经变得十分严峻。

在威尼斯不断走下坡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胜利。1472年初，新任海军总司令彼得罗·莫切尼戈遇到了一个名叫安东内洛的西西里人。

安东内洛向莫切尼戈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位年轻人在内格罗蓬特沦陷之后成为奥斯曼人的奴隶。他志愿去破坏位于加里波利半岛的兵工厂。莫切尼戈同意了他的提议，并且提供给他一条小船、6名志愿者、数桶火药、硫黄、松节油和大量橙子。他们将其他材料隐藏在水果下面，在达达尼尔海峡航行，并于2月20日夜间到达加里波利半岛。安东内洛深知，兵工厂防卫松懈。他们爬上岸，每个人肩扛一袋火药，用钳子打开锁，潜入弹药库中。他们把火药放置在帆、武器和索具当中，在地上播撒出一些火药，然后从外面点火引爆。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火药在随船运输过程中已经受潮。最终，他们成功地点燃了大量沥青和油脂。夜色中，火光冲天。土耳其人赶来之际，安东内洛又开始焚烧敌人的桨帆船，然后乘小船逃走。

在撤退途中，破坏者们遭遇了一场灾难。一包火药点燃了他们的小船。他们设法划回岸边，凿沉了小船，但被抓住并被带到愤怒的穆罕默德二世面前。安东内洛直到最后都无所畏惧。他没有遭到酷刑就坦然承认了所做的事情，勇敢地直面“世界的灾星”，并宣称：

有了伟大的精神力量，任何人都会这么做，因为（苏丹的）存在是世界的灾祸，他劫掠了所有邻国君主，对所有人背信弃义，甚至企图消灭基督之名。这也是他（安东内洛）做这一切的动机。

穆罕默德二世对这必死之人表现出的勇敢的反应很典型。“苏丹耐心并赞赏地听完他的话，然后命令将他斩首。”^[35]大火在加里波利半岛燃烧了十天。它几乎摧毁了兵工厂，造成了数十万杜卡特的损失。

在其他地方，威尼斯坚持战斗，遏制奥斯曼帝国的强劲势头。安东尼奥·洛雷丹，一位老派的威尼斯指挥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塔里要塞打了一场充满英雄气概的防御战。1478年，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督战，攻打令他烦恼而具有战略意义的斯库塔里，威尼斯人又一次进行了慷慨英勇的抵抗。但是，战争的代价也不断上升。截

至15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的军事开支上升到125万杜卡特。威尼斯被战争拖垮，士气低落；和平的前景让人们一次次心生希望，却又一次次梦碎。不断有传言说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死了，但谣言总是被苏丹新的侵略行动粉碎。年复一年，苏丹集结了一批又一批军队，其目标无法预测。而威尼斯人的精神趋近崩溃。他们在海上仍然享有战略优势，却始终无法抓住奥斯曼人进行正面对垒。也许，到了现在，失败的后果已经不堪设想，所以没有一位指挥官敢冒险出战。像莫切尼戈一样，他们宁愿选择偷袭破坏，也不愿意进行海战。

奥斯曼人不断逼近。1477年，奥斯曼非正规军骑兵进入弗留利平原^[36]，大肆掠夺和杀戮，烧毁房屋、森林、农作物和农场。俘虏被带回，献给了苏丹。这些袭击令威尼斯城居民大为恐慌。在圣马可广场钟楼的顶部，威尼斯人可以看到潟湖30英里以外的一条行进中的火焰线。穆罕默德二世对战争的欲望似乎无法满足。第二年，威尼斯人同意和他达成和平协议，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命令再次对弗留利发动攻击，并且亲自率军围攻斯库塔里。那不勒斯国王向穆罕默德二世提供港口，好让他最终击垮威尼斯共和国。在君士坦丁堡，苏丹正派人模仿威尼斯无懈可击的货币，铸造金杜卡特。这些金币带有“苏丹穆罕默德，穆拉德汗之子，他的胜利光芒万丈！”的铭文，金币背面的字样则宣示了凌驾四海的皇权：“黄金的铸造者、陆地和海洋之上权力与胜利的王者。”^[37]

威尼斯的坚持已经到达了极限。它苦战到了绝望的境地。悲观情绪和瘟疫在城市的每一条死水河中蔓延。弗留利被烧的景象吓坏了群众。此前，威尼斯人过于自豪，不愿屈尊就任何不合理的条件进行谈判。而现在，威尼斯人几乎愿意全盘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为了和平，他们愿意放弃大国尊严。元老院派出了他们最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克里特岛人乔万尼·达里奥，全权负责谈判，他的权限几乎不受任何节制。元老院对他的唯一要求是，尽可能地维护威尼斯的商业利益，而其他的一切差不多都可以让步。穆罕默德二世开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威尼斯人曾英勇

保卫的斯库塔里被放弃了，内格罗蓬特一去不复返，共和国在战争中夺得的所有领土又回到了土耳其人手中。1479年后，共和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控制着26座堡垒，而奥斯曼帝国拥有50座。此外，他们一次性向苏丹赔款10万金杜卡特，并且每年还需支付1万金杜卡特，以获取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权。威尼斯市政官又重新前往君士坦丁堡，与他同行的是画家真蒂莱·贝利尼。作为和约的一部分，贝利尼将会装饰穆罕默德二世的宫殿，并为这位征服者绘制肖像。

威尼斯总算松了口气，也已经疲惫不堪。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六年。威尼斯人把它看作他们历史中的一个特殊事件，将它称为“漫长战争”。但他们搞错了，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序曲，一场初期的小冲突。

他们孤军奋战，没有从基督教欧洲获得任何援助或贷款。第二年，穆罕默德做出了威尼斯人已经预测到的举动：他派遣了一支侵略军进入意大利。威尼斯舰队受命跟踪奥斯曼舰队，但不进行任何干涉；威尼斯外交官们奉命对自己观察到的奥斯曼帝国的准备工作缄口不语。这支奥斯曼舰队攻击并洗劫了奥特朗托城，屠杀了该城市民，并在祭坛前杀死了当地的主教。这次直插基督教心脏的进攻，离罗马只有300英里，令人惊愕不已。恐怖气氛触手可及，指责之声四起。曾不时扮演基督教世界之盾角色的威尼斯，如今却因为坐视奥斯曼帝国胡作非为而遭到口诛笔伐。之后，有人宣称，“此事因威尼斯共和国而起”。^[38]威尼斯人被其他基督徒连声痛斥，指责他们毫不作为，甚至串通敌人。法兰西人怒吼道：“（威尼斯人是）将人血视为货物的奸商，基督教信仰的叛徒。”^[39]但是威尼斯人独自奋战了十六年，自然不会听取任何人的训斥，更再也不会考虑基督教联盟的事情。他们为了与奥斯曼帝国议和，已经付出了大量金钱和鲜血的代价。实际上，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的领主已经被更强大的力量挤到了中立的位置。1481年5月19日，一名使节到达威尼斯，宣布了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讯，整个城市陷入狂欢的海洋。没有人比威尼斯人更欢乐。“雄鹰死了！”^[40]的喊声响彻整座城市。教堂的钟声铿

锵作响；人们举行得到救赎的礼拜仪式，大街上灯火通明以示庆祝。奥特朗托的滩头阵地被抛在脑后，反复无常的十字军东征的概念也不再被人们提起。

与此同时，虽然困难重重，但威尼斯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正处于巅峰。威尼斯人非常勤勉地搜集关于贸易条件和政治动荡（可能扰乱香料贸易）的商业情报，但是，世界贸易中还是有一些事情逃过了他们的火眼金睛。在1487年的穆达时节，威尼斯香料交易商在亚历山大港购买姜和胡椒。在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两名摩洛哥商人因为高烧而奄奄一息。城市的总督认定他们时日无多，因而行使相关权力，没收了这两个人的财产。然而这两人竟然奇迹般地痊愈，要求归还他们的财物，并起程前往开罗。

事实上，他们既不是摩洛哥人也不是商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佩罗·达·科维良和阿方索·德·派瓦，而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葡萄牙间谍。因为操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们被里斯本派去探索通往印度的香料路线。在过去七十年里，葡萄牙航海家们已经渐渐熟悉了非洲西海岸，他们在海角上留下石制十字架，来标记他们的航海所到之处，同时也鼓励后来者继续前行。第二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他将其命名为好望角——但是没有能够继续前进。他的船员拒绝前进，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从世界的边缘跌落。两个间谍则尽己所能，寻找跨越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通往印度的航线。他们的任务要秘密进行，不仅要避开阿拉伯人的眼线——因为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也要避免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西班牙国王知道，因为他们与葡萄牙人存在利益竞争。葡萄牙人想赢得这场竞争，不再求助于阿拉伯和威尼斯中间商，直接从原产地印度购买大宗香料。

在两年时间里，科维良伪装成一名阿拉伯商人，纵横印度洋，在印度各港口和非洲海岸之间穿梭往返，了解季风、洋流、港口和香料集市

的分布格局，并把他的发现记录在一个秘密图表上。他回到开罗的时候，派瓦已经死了，死因不明。1490年，科维良把他的图表和报告交给了到开罗来找他的犹太间谍。科维良这个间谍高手再也没有回国。他沉迷于旅行，伪装成一个穆斯林朝觐者去了麦加，然后又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王国。但在那里，国王却不允许他离开。三十年后，一个葡萄牙使团发现科维良还活着，而且像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一样生活。但他搜集的情报回到了里斯本，填补了葡萄牙航海家地图上至关重要的空白。

[1]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 260

[2] Crowley, Roger, *Constantinople: The Last Great Siege*, London, 2005, p. 145

[3]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306

[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289

[5]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286

[6]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286

[7]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47

[8]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47

[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p. 292-3

[10]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299

[11]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p. 49-52

[12] 古时常用船只能够容纳木桶的数量来衡量船的尺寸，类似于今天说某船能够搭载多少个集装箱。1000桶约合600吨。

[13] Meserve, Margaret, ‘News from Negroponte: Politics, Popular Opin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Italian Press’,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9, no. 2, Summer 2006, p. 441

[14]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15

[15] Rizzardo, Giacomo, *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at Veneziani*, Venice, 1844, p. 227

[16] Rizzardo, Giacomo, *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at Veneziani*, Venice, 1844, p. 227

[17]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11

[1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13

[19] Miller, William, *Latins in the Levant: 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 1204—1566*, Cambridge, 1908, p. 475

[20] 拜占庭等国的一种金币，单数称“阿斯普隆”，复数称“阿斯普尔”。

[21] Rizzardo, Giacomo, *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at Veneziani*, Venice, 1844, p. 15

[22]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pp. 24-5

[23]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angiolello.net>, 2006, p. 25

[24] *Mehmed II the Conqueror and the Fall of the Franco-Byzantine Levant to the Ottoman Turks: some Western Views and Testimonies*, ed. and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Tempe, 2007, p. 241

[25] Rizzardo, Giacomo, *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at Veneziani*, Venice, 1844, p. 20

[26] “兄弟”是修道会和教会属下的骑士团成员互相之间的称呼，因为他们情同手足。

[27] *Mehmed II the Conqueror and the Fall of the Franco-Byzantine Levant to the Ottoman Turks: some Western Views and Testimonies*, ed. and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Tempe, 2007, p. 259

[28]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58

[29] Meserve, Margaret, ‘News from Negroponte: Politics, Popular Opin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Italian Press’,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9, no. 2, Summer 2006, p. 450

[30]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p. 58-9

[31]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300

[32] Meserve, Margaret, ‘News from Negroponte: Politics, Popular Opin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Italian Press’,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9, no. 2, Summer 2006, pp. 452-3

[33]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 275

[34] 乌尊哈桑（1423～1478），土库曼白羊王朝的苏丹。他统治着今天的伊朗西部，以及伊拉克、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

[35]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86

[36] 在意大利东北部。

[37]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 367

[38]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344

[39]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343

[40]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 408

20.火的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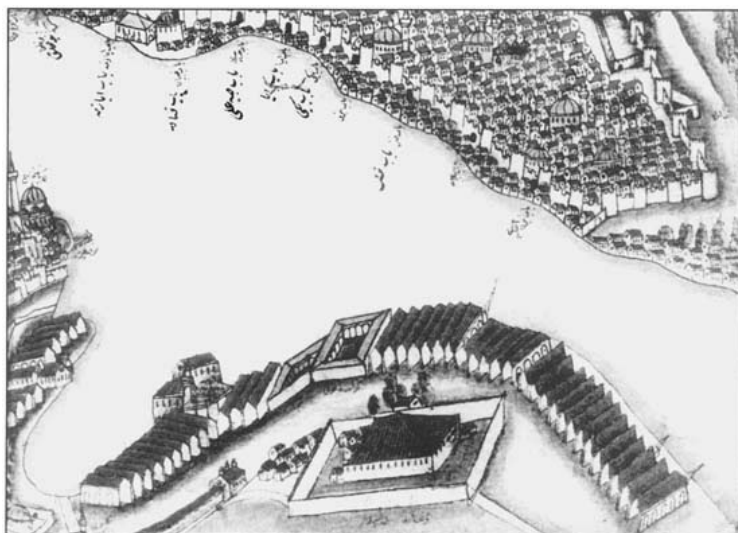
1498～1499

1498年10月31日，安德烈亚·格里蒂从君士坦丁堡写信给威尼斯的扎卡里亚·迪·弗雷斯基：“生意和投资的情况，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现在没有新的信息；如果价格下跌，我会通知你。”^[1]四十一岁的格里蒂是一位威尼斯粮食贸易商，在君士坦丁堡根基牢固。他也是一个间谍，以加密或隐藏消息的形式将情报发回给元老院，收件人则是虚构的业务合作伙伴。威尼斯方面轻松地解读了这一信息：“苏丹在继续集结舰队。”^[2]

在穆罕默德二世去世之后的近二十年内，威尼斯与奥斯曼人维持着和平。在1481年继承皇位的巴耶济德二世最初承诺为基督教欧洲创造一个更宁静的时代。巴耶济德二世被称为“苏非派”；他对宗教很是虔诚，甚至表现得很神秘，对诗歌和冥想的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基督徒邻居的关系都很融洽。他甚至免除了威尼斯每年需要缴纳的1万杜卡特贡金。在此期间，共和国于1489年得到了塞浦路斯^[3]，觉得这大大弥补了内格罗蓬特的损失。

但巴耶济德二世的按兵不动，有完全世俗的原因。由于他的父亲对战争的强烈欲望，他即位时国库空虚，军队也精疲力竭，并且他害怕有人以他流亡的弟弟杰姆的名义发动一场战争，夺走他的皇位。杰姆被扣留在欧洲宫廷，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有用的人质。在这些限制之下，新苏丹知道，在爱琴海还有未竟的事业：只要威尼斯在希腊仍有立足之处，奥斯曼边境就不完整。1495年杰姆去世，巴耶济德二世在敌视威尼斯的佛罗伦萨人和米兰人鼓动下，认为是时候将威尼斯共和国从希腊赶出去了。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完成的。

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隐瞒得住的。对安德烈亚·格里蒂来说，毫不夸张地讲，证据都在他眼前。君士坦丁堡被占领之后，所有欧洲人被禁止在那里居住。他们改为居住在老的热那亚定居点加拉塔的山上，与君士坦丁堡之间隔着金角湾，即城市的深水港。格里蒂可以俯瞰还没有完全被高墙环绕起来的新兵工厂，可以看到准备工作在进行：人员和材料的到达，锤子和锯子发出的声音，沥青的沸腾声和持续不断的牛车的声响。



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兵工厂

格里蒂从1494年开始为威尼斯元老院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细情报。进入1499年之后，情报变得越来越精确——他估算了土耳其人的进攻时间表和目标，情报的传递也变得更加危险。1498年11月9日，他写道：“海盗俘虏了一艘载货量200桶的船”^[4]，意思是“苏丹正在准备200艘船”；在20日这天，他表示自己说不准奥斯曼人的目的。1499年2月16日，他用暗语写道：“它将在6月出发……水陆并进的强大力量，人数还不清楚，去向也不明了。”^[5]3月28日，他用暗语说，他因为债务在狱中服刑，但是希望在6月被释放，意思是“敌人舰队将于6月出发”。通过陆路寄信是很危险的。格里蒂的方法是让信使沿着古罗马道路前往杜拉佐港，然后渡海前往科孚岛。这些信使一旦被抓获，必死无疑。1498年10

月，科孚岛市政官报告了两名给格里蒂送回信的信使的下场。有人发现，第一名信使被埋在沿途一个村庄的粪堆里；第二名信使则是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立刻被逮捕。他现在正派遣第三个信使。1月，格里蒂回信说，“因为风险太大，将不再通过陆地送信”。^[6]

双方都在准备战争的同时宣扬和平。在君士坦丁堡，官方散布消息，称正在准备一支舰队，以清剿海盗。威尼斯人没有上当；如果单纯是为了维持治安，这支舰队的实力也太过强大了。格里蒂指出：“他们花钱如流水。钱款还没有申请，就已经支付完毕。这是明显的信号。”^[7]然而，没有人能确定奥斯曼人的目标。五花八门的理论、间谍报告和迹象从大海彼岸的情报站大量涌入威尼斯，这是些模糊而不祥的杂音。谎言数不胜数。4月，最新的威尼斯大使抵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日记家吉罗拉莫·普留利记载道：“苏丹史无前例地热情款待了这位威尼斯大使，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大使受到过这样的礼遇。苏丹还承诺，永远不会背弃与威尼斯的和平条约……但威尼斯人深思熟虑后，决意绝不相信这样的承诺。”^[8]但正在准备中的行动是不是针对威尼斯的呢？罗得岛和黑海都可能有危险。甚至有传言说，打击的目标可能是穆斯林的马穆鲁克王朝：5月，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港发来信件称，大量土耳其骑兵出现在叙利亚边境。这些情报最终证明是无用的，这只不过是护送苏丹的母亲去麦加的卫队罢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庞大的陆军正在集结。有人担心扎拉；也有人猜测，目标是科孚岛；弗留利居民也做好了抵抗袭击的准备。

1499年注定是威尼斯历史上充满灾难的一年。这从两位威尼斯元老逐月记录的日记中可见一斑：银行家和商人吉罗拉莫·普留利，他对共和国的财政状况高度关注；马里诺·萨努多，他长达四十年的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威尼斯的生活。还有一位记录者则是桨帆船指挥官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他是唯一在前线记载时事的人。

他们记录了一连串恶性事件。这一年开年不利，然后开始走下坡路。威尼斯深陷大陆事务的泥潭，国库吃紧。2月初，加尔佐尼家族和里佐兄弟的银行破产了。5月，里波马诺银行倒闭；第二天，当阿尔维斯·皮萨尼银行开门营业时，“伴随着巨大的吼声，一大群人跑到银行去取钱”。^[9]里亚尔托处于动荡之中。普留利觉得这个现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威尼斯现在像大出血一样损失大笔金钱，现在那里没有钱了。因为第一家宣布破产的银行是所有银行里最著名的，有最高的可信度，所以整个城市里，信心几乎荡然无存。^[10]

在这种气氛中，奥斯曼威胁的流言甚嚣尘上，甚至脚踏实地的威尼斯人也开始受到迷信的影响。在普利亚，人们观察到一场秃鹫和乌鸦之间的空战；据马利皮耶罗说：“人们捡到了14只死鸟，但秃鹫比乌鸦多。上帝保佑，但愿这……不是预兆着，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要发生什么邪恶的事情！”^[11]更多的恶兆接踵而来。有消息称奥斯曼舰队日渐壮大。威尼斯在3月选出了一位新的海军总司令。在圣马可教堂举行的为战旗赐福的仪式上，新任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把总司令的权杖拿反了。老人们回忆着其他这样的例子和它们导致的灾难。

格里马尼是一位巨富，是名利场的老手，并且政治野心很重。他在叙利亚和埃及的香料市场上发了大财。他的精明简直是个传奇。据普留利说：“泥土和污垢经他触摸后，就变成了黄金。”^[12]据说，在里亚尔托，人们试图搞清楚他在做什么买卖，然后跟着学，就像模仿一位成功的股票交易商一样。格里马尼已经证明自己在战斗中足够勇敢，但他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也不知道如何调遣大舰队。在1499年初几个月的银行业危机中，他精明地提出自费武装10艘桨帆船，并向国家贷款1.6万杜卡特（以国家食盐贸易的收入为抵押），以此获得了海军总司令的职位。毫无疑问，他把这个位置当成登上执政官宝座的踏脚石。他在执政官宫殿前方的码头（称为“莫罗”）摆开了招募士兵的长

凳，拉开了花哨的表演排场，用普留利的话说，是“极尽浮华”。^[13]他身着鲜红色华服，站在五堆闪闪发光的金币（共3万杜卡特）前，仿佛在宣传他点石成金的本领，邀请群众参军入伍。不管采用了什么方法，格里马尼在组织舰队上非常成功。尽管存在人员和金钱短缺、水手间暴发瘟疫和梅毒等一系列问题，到7月他在莫东集结了威尼斯史上最庞大的海军力量。格里马尼被吹嘘为“又一个恺撒和亚历山大”。^[14]

然而这些安排里还是能找到裂纹。共和国有权征用国营商用桨帆船，为战争服务。6月，所有这些已经被拍卖给各财团、用于前往亚历山大港和黎凡特的穆达航线的桨帆船被强行征用，他们的投标人被授予船长的头衔和薪水。投标人们对这一做法十分不爽。这表明，国家大事和自私自利的贵族寡头的商业利益之间已经出现了冲突。对圣马可旗帜的爱国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不服从国家命令的下场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不愿意为国效力的投标人将被驱逐出威尼斯五年，罚款500杜卡特。但仍然有不服从的人。普留利相信（或许他是在事后回忆的，所以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威尼斯当时正在被引向灾难。“我虽然怀疑，但觉得在这座光荣而尊贵的城市里，我们的贵族歪曲正义，我们的城市将会因为罪孽而遭受一些伤害和损失，威尼斯将被带到悬崖的边缘。”^[15]整个夏天，所有商业活动暂停，黎凡特的货物（姜、棉花、胡椒）价格开始飙升。海军防御的需求使得城市的商业系统压力陡增。

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消息愈发令人沮丧。普留利写道：“土耳其人的力量强大而令人恐惧，雄霸陆地和海洋。”^[16]6月，君士坦丁堡城内所有威尼斯商人被逮捕，他们的货物也被没收。按照惯例，威尼斯潟湖的各教区举行了忏悔的宗教仪式。与此同时，格里蒂的好运已经耗尽。一名走陆路的信使携带着未加密的信件，遭到拦截，并被处以绞刑；另一个在去往勒班陀的途中被处以刺刑。消息传到城内，格里蒂被逮捕，他很快被关进波斯普鲁斯海峡边的一个黑暗地牢里，性命堪忧。

据报告，土耳其舰队于6月25日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同时一支庞大的陆军正向希腊推进。毫无疑问，土耳其人企图发动某种钳形攻势。当奥斯曼舰队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时，许多被强征来的希腊水手逃跑了。很快，格里马尼了解到，敌军行动的目标要么是科孚岛，要么是科林斯湾入口处具有战略意义的小港勒班陀。8月初，奥斯曼陆军出现在勒班陀城外，于是敌人的目标和战术就一下子明朗了。勒班陀的城墙固若金汤，从希腊山区运送大炮是行不通的。奥斯曼舰队的任务是运送大炮，而威尼斯舰队的目标则是阻止他们。同一天，元老院得知，格里蒂还活着。

6月间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舰队在准备之时，正是海军战术发生变革的时期。传统意义上的海战是桨帆船之间的较量，但到了15世纪晚期，人们开始试验，将“圆船”——使用风帆动力、高船舷的帆船，被称为克拉克大帆船，传统上用于商业——投入作战。奥斯曼人建造了两艘这种类型的巨型帆船。像奥斯曼造船厂中大多数创新一样，这些船很有可能是仿照威尼斯的蓝本改造而来的，而且出自一名叛逃的造船匠（名为詹尼）之手，“他在威尼斯看过造船的过程，在那里学到了这方面的技艺”。^[17]这些帆船拥有高耸的艏楼和艉楼，以及尖塔状的桅杆瞭望台，按照当时的标准是非常巨大的。据奥斯曼编年史家哈只·哈利法^[18]记载：“每艘船长70腕尺，宽30腕尺。桅杆是好几棵树叠加在一起的高度……主桅楼能够承载40名穿盔甲的士兵，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地用弓箭和火枪射击。”^[19]这些船是不同类型船只混血的产物，是船舶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除了风帆之外，它们还有24支巨大的船桨，9个人划一支桨。它们体积巨大——估计排水量为1800吨——可以装载1000名士兵，并且第一次可以携带大量火炮，从侧舷的炮门射击。奥斯曼人相信，他们的两艘有护身符作用的巨舰遇到威尼斯桨帆船，一定所向披靡。

巴耶济德二世在海军发展上做得很是细致全面：他所做的不仅仅是

建造船只。他网罗航海的专业人才，从爱琴海招募穆斯林海盗到他的海军司令部：这些私掠海盗以圣战的名义四处劫掠基督教船只，无论对实际的船只操作还是公开海战都非常精通。正在缓缓绕过希腊南部海岸的庞大舰队中有两位经验丰富的海盗船长——凯末尔雷斯^[20]和布拉克雷斯，他们因为经常袭击威尼斯船只而臭名远扬。专业人士的加入增加了苏丹的信心，他调动舰队向西进入爱奥尼亚海——威尼斯本土水域的门槛。

奥斯曼舰队虽然规模宏大，但质量参差不齐。一共有大约260艘船，包括60艘轻型桨帆船、2艘硕大无朋的圆船、18艘较小的圆船、3艘重型桨帆船、30艘福斯特战船（小型桨帆船）和一大群小船。重型桨帆船和圆船除了载着水手和桨手，还装载着大量近卫军——苏丹自己的精锐部队。巨大的圆船每艘装载了1000名士兵。这支大舰队一共约有3.5万人。

格里马尼的舰队就小得多，一共有95艘船，是桨帆船和圆船的混合，包括2艘他们自己的千吨级的克拉克帆船，船上载着火炮和士兵。威尼斯人前不久曾运用成队的克拉克帆船来追捕海盗，但他们从未召集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桨帆船和帆船的混合舰队。格里马尼大约有2.5万人。尽管双方在舰队规模上有差距，他还是志在必得。他从希腊水手那里得知，他手下的重型船只——克拉克帆船和重型桨帆船——比敌人多，有能力粉碎对手的防线。因此他写信给元老院说：“诸位大人明鉴，蒙上帝洪恩，我们的舰队将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21]

7月末，在希腊的西南角，格里马尼在莫东和科罗尼之间发现了奥斯曼舰队的踪迹，并且开始跟踪它，伺机攻击。世界上最大的两支海军——共计350艘船和6万名士兵——沿着海岸并列前行。局势很快就明朗了：土耳其人对海战没什么兴趣，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大炮送到勒班陀；他们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紧贴着海岸线航行，以至于一些船只搁浅，希

腊船员弃船逃走。7月24日，奥斯曼舰队司令将他的舰队驶进萨皮恩扎岛上的隆哥港躲避。那是威尼斯历史上的一个伤心之地。正是在这里，尼科洛·皮萨尼——韦托尔·皮萨尼的父亲，在一百五十年前被热那亚人击溃。

在威尼斯，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普留利感到，这个世界处于不祥的骚动之中：“目前在世界各地发生着剧变和战争的动荡，许多大国也在行动之中：威尼斯人对阵土耳其人，法兰西国王和威尼斯对阵米兰，神圣罗马皇帝对阵瑞士，奥尔西尼家族^[22]在罗马对阵科隆内西家族，（马穆鲁克）苏丹反对自己的人民。”^[23]8月8日，他从另一个来源获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传言，就像世界远端的地震传来的沉闷的震动。从开罗寄出、在亚历山大港中转的信件称：“来自印度的人声称，属于葡萄牙国王的三艘卡拉维尔帆船^[24]已经抵达亚丁和印度的卡利卡特，它们是被派去寻找香料群岛的，指挥官是哥伦布。”^[25]其中两艘船已经遇难，而第三艘船因为逆流一直无法返回，船上人员被迫改走陆路，取道开罗。“这消息如果是真的，将对我影响很大；但我并不相信。”

与此同时，格里马尼一直在等待奥斯曼舰队从萨皮恩扎继续推进。当奥斯曼舰队出动时，他驾船出海，继续一个又一个海岬地跟踪它们，像猫捉老鼠的游戏一般。在炎热的夏日，希腊海岸边中午就不再起风，海军总司令不得不等待一股持续的向岸风来袭击他的猎物。1499年8月12日上午，机会似乎来了，奥斯曼人离开了威尼斯人所谓的宗奇奥海湾，撞上了一股强劲的向岸风。

格里马尼的目标已经进入了他的视线；列成长长一排的敌军舰队在他面前的开阔水域分散开，而且处于下风处。在指挥舰队时，他遇到了一些特殊的困难——风帆动力的大帆船、重型商用桨帆船和轻而快的军用桨帆船的组合很是让人头疼——但他还是按照惯例排兵布阵：重型战船（帆船和重型桨帆船）作为先锋来撕裂敌人的阵线，较轻的快速桨帆

船紧随其后，等到敌人被打散时出击。他给指挥官们下达了明确的书面指示，前进时“要保持足够的间距，避免挤在一起或折断船桨，尽量保持良好秩序”。^[26]他明确表示，在战斗中谁要是敢争抢战利品，将被处以绞刑；任何怯战避敌的指挥官也会被绞死。在开战前，这是标准的命令，但格里马尼也许听到了一些风声：被征用商船的老板们对他有怨言。他的命令是否清晰明确，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认为他的命令“充满漏洞”^[27]；阿尔维斯·马尔切洛是所有圆船的指挥官，心里有鬼，因此宣称这些命令在最后一刻被混乱地改变了。不管真相如何，格里马尼刚刚升起十字架，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打破了他的镇静：一队小船在其指挥官安德烈亚·洛雷丹——一位实战经验丰富的航海家，很受水手们欢迎——带领下，不请自来。

洛雷丹这么做实际上违反了军纪。他擅离科孚岛的岗位，想去分享战场的荣耀。格里马尼对攻击被扰乱很是恼火，而且也因为被抢了风头而恼羞成怒。他责备洛雷丹不听命令，但还是决定让他指挥名为“潘多拉”号的圆船，与另一艘圆船（指挥官为奥尔本·德·阿默）一同冲锋。这两艘是舰队里最大的船，每艘排水量约1200吨。洛雷丹此行也有个人恩怨要了解。他花了很多时间抓捕海盗凯末尔雷斯；现在他相信自己的猎物就在眼前，而且指挥着詹尼制造的最大的那艘帆船；而事实上这艘船的船长是另一个海盗首领——布拉克雷斯。威尼斯水手们看着自己的大帆船逼近敌人那艘1800吨的无敌浮动堡垒时，“洛雷丹！洛雷丹！”的呐喊响彻整个舰队。

随后发生的是海战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是特拉法尔加海战^[28]的预演。随着三艘庞然大物接近，双方都打开了舷侧的炮口，用猛烈的轰击展现了火炮的强大威力：近距离下大炮发出的震天怒吼、浓烟和闪烁的火光让在其他船上观看的人魂飞魄散。在盾牌的保护下，数百名士兵聚集在甲板上，发射出暴雪般的子弹和箭矢；在40英尺高的桅

杆瞭望台上，在圣马可的雄狮旗和奥斯曼新月旗下，双方士兵在半空中互相攻击，或向下方的甲板投掷木桶、标枪和石块；一大群奥斯曼轻型桨帆船围攻基督教圆船高耸而坚固的木质船身。人们奋力攀上船沿，却跌回海里。绝望的落水者在船只残骸中露出头来。

相比之下，威尼斯其他的一线指挥官却几乎没有前进。基督教舰队的先锋似乎被他们眼前的骇人景象吓倒了，踌躇不前。圆船的指挥官阿尔维斯·马尔切洛俘虏了一艘奥斯曼轻型船之后就撤退了，不过马尔切洛后来自吹自擂，把自己的表现大大渲染了一番。只有一艘重型桨帆船在英勇的船长维琴佐·波拉尼带领下加入了激战。这艘船遭到一大群奥斯曼桨帆船的袭击，鏖战了两个小时。在浓烟和混乱中，“每个人都认为它输定了；一面土耳其旗帜已经在船上升起，但这艘船顽强抵抗，消灭了很多土耳其人……上帝开恩，送来了一阵风；它顺势扬起了帆，从土耳其舰队的手掌心逃了出来……被烧伤，而且残破不堪；”^[29]马利皮耶罗继续写道，“而且如果其他重型桨帆船和圆船跟着它冲上去，我们早已经把奥斯曼舰队击溃了。”

其他桨帆船和克拉克帆船几乎没有一艘冲上去与敌人交锋。没有人理会格里马尼疯狂的喇叭召唤，指挥体系坍塌了。命令发出之后无人执行甚至遭到抵触，格里马尼没有身先士卒，而许多更有经验的船长被堵在了后方。后面的桨帆船上的桨手大喊着“攻击！攻击！”^[30]，敦促重型船舰前进。但这没能激起任何反应，于是“绞死他们！”^[31]的喊声响彻水面。只有8艘船参加了战斗。大多数是从科孚岛过来的轻型船，很容易被炮火击伤。有一艘船很快就沉没了，这进一步压制了战斗的热情。当波拉尼的船出现时，船被烧焦，严重受损，但奇迹般地没有沉没，其他重型桨帆船随后跟着它开到了上风处。

与此同时，“潘多拉”号和奥尔本的船继续和布拉克雷斯的克拉克帆船缠斗。三艘船撞在了一起，船上的人们开始了船和船、人与人之间的

近身肉搏。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威尼斯人似乎开始占上风；他们用锁链钩住了敌人，准备登船。接下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三艘船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这时奥斯曼战船上燃起了大火。要么是偶然，要么是刻意自毁——因为布拉克雷斯受到极大压力，已经接近绝望——奥斯曼战船上的火药仓爆炸了。火焰爬上了索具，烧着了收拢的船帆，把前桅楼上的士兵活生生地烤熟了。熏黑的残破的桅杆折断了，坠落到甲板上。下面的人要么在他们站立的地方立刻被火焰吞没，要么赶紧跳海逃生。其他船上的人们注视着这活生生的火的金字塔，呆若木鸡、心惊胆寒。这是一个新的层级的海上灾难。

但土耳其人表现得很镇定。当他们载有1000精兵、坚不可摧的战舰就在他们面前熊熊燃烧时，他们的轻型桨帆船和快速帆船迅速地东奔西走，从残骸中营救自己的士兵，杀死落水的敌军。基督教一方则只是呆呆地看着。洛雷丹和布拉克雷斯消失在火海中。据传说，洛雷丹临死时还举着圣马可的旗帜。更令人痛心的是，没有人为解救幸存者付出过一丝努力。另一艘克拉克帆船的船长德·阿默，逃离了他燃烧着的船，乘坐小船离开，但被抓住并杀死。马利皮耶罗悲伤地写道：“土耳其人用长船和双桅帆船营救他们自己的人，屠杀我们的士兵，因为我们这一方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怜悯之心……所以给我们的共和国和基督教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和伤害。”^[32]

事实就是如此。宗奇奥之战中，威尼斯人并没有被敌人打败，而是被自己打败了。威尼斯错过了阻止奥斯曼帝国扩张的机会。在心理上，8月12日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懦弱、优柔寡断、混乱、不愿为圣马可旗帜捐躯：宗奇奥的惨败对威尼斯人的航海灵魂留下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伤痕。内格罗蓬特的灾难可以归因于一次糟糕的任命，或者单个指挥官的能力不足；而在宗奇奥的崩溃则是系统性的。它显示出威尼斯整个体制的裂痕。元老院大体上为了金钱利益，重蹈覆辙，任命了一个毫无经验的人。但是责任不全在格里马尼身上。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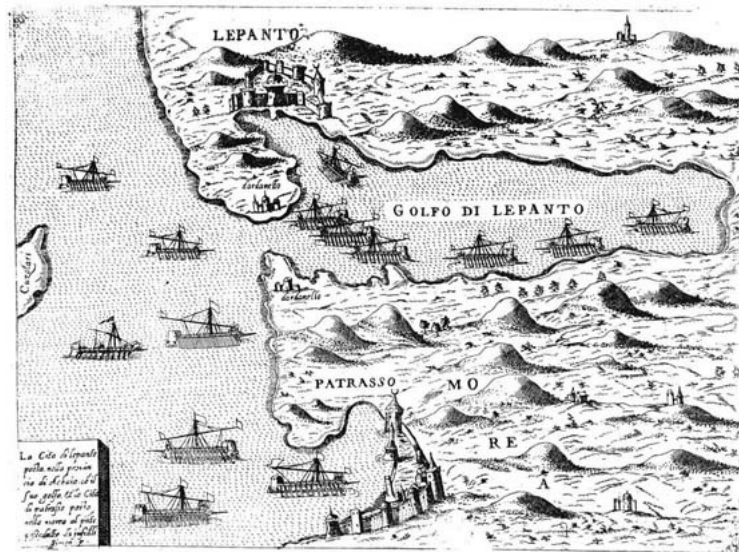
要指挥官们手里还拿着无烟火药的时候，已经感到可怕的耻辱。他们开始起草报告。

所有这些报告都包含着条件句，比如“如果其他人做了（或没有做）某事，我们早已赢得了一场光荣的胜利”。格里马尼的报告是通过他的神甫发来的。他指责道，失败的原因是商用桨帆船的贵族船长们的不作为态度和集体的胆怯：“除了维琴佐·波拉尼以外的所有商用桨帆船闻风而退，不肯参战.....整个舰队高声疾呼‘绞死他们！绞死他们！’.....上帝知道，他们活该被绞死，但那样的话就必须处死我们舰队中五分之四的人。”^[33]他对商船的贵族老板们的谴责尤其激烈：“我不会隐藏真相.....贵族们自始至终争执不休，毁了我们国家的就是这些人。”

阿尔维斯·马尔切洛写了一份自吹自擂的报告，指责了命令的混乱，并将自己扮演的角色做了戏剧加工：他独自冲入混战，被敌人包围。“在枪林弹雨中，我将一艘敌船击沉，船上人员全部丧生；另一艘船来到了我的侧舷；我的一些士兵跳上敌船甲板，斩杀了很多土耳其人。最后我放火烧毁了那条船。”^[34]最后，巨大的石弹击碎了他的船舱，砸伤了他的腿，他的同伴不断在他身旁倒下，于是他不得不撤退。其他人则对他的所谓壮举严加指责。“他进去就又出来了，自称俘虏了一艘船，”神甫这样嘀咕着。^[35]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是此役中少数声誉没有受损的人之一，他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格里马尼的指挥混乱。普通水手们相信，格里马尼完全是出于嫉妒，把洛雷丹推向了绝路。

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威尼斯舰队撤退到了外海；遍体鳞伤的奥斯曼舰队沿着海岸缓慢地向勒班陀港前进，陆军部队在岸上跟随着它，为其提供保护。战役还在继续，但威尼斯已经士气全无，这次失败的代价被证明是极其高昂的。他们还发动了几次无效的进攻，希望把敌人引诱到开阔水域；火船闯进了敌方舰队，几艘桨帆船被击沉，但奥斯曼舰队大

体上完好无损。在科林斯湾的入口处，奥斯曼舰队不得不冒险进入开阔海域，驶入勒班陀。这是威尼斯人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次，有一支法兰西的小型舰队伴随他们。只有少数几艘勇敢的战船向土耳其人发起了进攻，击沉了8艘桨帆船，但其余的船显然还对宗奇奥之战的熊熊烈火心有余悸，不敢闯入重炮轰击的火网。法兰西人看到如此混乱的形势，同样拒绝参战。他们对威尼斯人的安排做出的评价也极具羞辱性：“（法兰西人）看到我们的舰队毫无纪律可言，说我们的舰队很壮丽，但他们不指望我们的舰队能做任何有用的事情。”^[36]机会稍纵即逝。马利皮耶罗再次扼腕叹息道：“如果我们所有其他的桨帆船都参与袭击，我们一定会打败奥斯曼舰队。这就像上帝是上帝一样肯定。”^[37]结果，大部分的奥斯曼战船绕过最后一个海岬，进入了勒班陀港。在海上，威尼斯人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果。马利皮耶罗回忆说：“舰队里的很多好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们说总司令就是一个叛徒，没有精神去尽力履行他的职责。”^[38]



勒班陀

在城里，四面楚歌的守军已经打退了奥斯曼军队的几次进攻，并期盼着西边海平线上出现风帆。当他们看到威尼斯舰队驶近时，欢呼着敲

响了教堂的钟。随着船越来越近，令他们魂飞魄散的是，船上的旗帜不是狮子，而是新月。当他们得知这些船只携带着攻城炮的时候，勒班陀迅速投降了。

格里马尼没有绞死任何人，也没有斥责任何贵族指挥官。

[1]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235, Venice 1879-1903

[2]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235, Venice 1879-1903

[3] 塞浦路斯吕西尼昂王朝的末代君主詹姆斯二世于1473年驾崩，此后威尼斯便控制了塞浦路斯，以詹姆斯二世的遗孀凯瑟琳为傀儡。1489年，威尼斯强迫凯瑟琳退位，正式吞并塞浦路斯。

[4]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58 vols, col. 292, Venice 1879-1903

[5]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58 vols, col. 372, Venice 1879-1903

[6]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58 vols, col. 542, Venice 1879-1903

[7]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58 vols, col. 541, Venice 1879-1903

[8]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19

[9]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23

[10]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11

[11]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66

[12]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pp. 102-3

[13]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18

[14]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30

[15]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36

[16]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41

[17] Katip ?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 J. Mitchell, London, 1831 Kinnamos, John, *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 trans. Charles M. Brand, New York, 1976, p. 20

[18] 哈只·哈利法（1609～1657），即卡迪布·切莱比。“哈只”是对曾经去过麦加圣地的朝觐者的尊称。他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的名著《真理的平衡》包含对伊斯兰教法、伦理和神学的研究，比较开明和宽容，常常批评伊斯兰宗教当局的狭隘。该书对研究16和17世纪奥斯曼社会的发展很有帮助。

[19] Katip ?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 J. Mitchell, London, 1831 Kinnamos, John, *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 trans. Charles M. Brand, New York, 1976, p. 19

[20] “雷斯”原意是“船长”，后来变为对海军高级将领的尊称。

[21]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72

[22] 奥尔西尼家族是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族，在中古时期的意大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皆有强大的影响力。家族成员包括切莱斯廷三世、尼古拉三世、本笃十三世三位教皇，三十四位红衣主教，为数甚多的雇佣军首领以及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及宗教人士。

[23]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61

[24] 卡拉维尔帆船是15世纪盛行的一种三桅帆船，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普遍用它来进行海上探险。

[25]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53

[26]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74

[27]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75

[28] 特拉法尔加海战是1805年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与英国的一场海战。拿破仑计划进军英国本土，为牵制住强大的英国海军，拿破仑派海军中将维尔纳夫率领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与英国海军周旋。1805年10月21日，双方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外海相遇，战斗持续5小时。由于英军指挥、战术及训练皆胜一筹，法西联合舰队遭受决定性打击，主帅维尔纳夫以及21艘战舰被俘，但英军主帅霍雷肖·纳尔逊海军中将也在战斗中阵亡。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锐尽丧，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巩固。

[29]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76

[30]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77

[31]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1234, Venice 1879-1903

[32]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77

[33]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1233-4, Venice 1879-1903

[34]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1258,

Venice 1879-1903

[35] Sanudo (or Sanuto) ,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2 vols, col. 1233,
Venice 1879-1903

[36]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79

[37]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79

[38]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12

21.扼住威尼斯的咽喉

1500～1503

在威尼斯，勒班陀的沦陷可谓是惊天丑闻。后续调查和审讯一片混乱，各方互相指责。人们都把矛头指向了安东尼奥·格里马尼和他的家族。格里马尼宫殿遭到大量暴民围困；殿内财产都被匆匆转移到附近一座修道院中保管；一名忠心耿耿的阿拉伯奴隶遭到攻击，横尸街头；格里马尼的宫殿和商店都被涂鸦。街头顽童们高喊：“安东尼奥·格里马尼，毁掉了基督教世界的人……威尼斯的叛徒，但愿你和你的儿子被狗吃掉。”^[1]家族的其他成员因为太害怕而不敢在元老院露面。

格里马尼回到威尼斯已经是四个月之后的事情。他被强硬地告知，如果他乘着自己的旗舰驶入圣马可湾，将被当场处死。他只得乘上小船，和所有一败涂地的海军指挥官一样，身披枷锁，狼狈而归，场面之戏剧性，不亚于当年皮萨尼兵败的惨状。而这天恰好是11月2日，万灵节^[2]。

和皮萨尼不同，当格里马尼在夜幕中跌跌撞撞地走下甲板时，没有同情他的祝福者出现在道路两旁。没有人像他一样，在公众心目中陨落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普留利曾说这位海军将领“就如同伟大的亚历山大、著名的汉尼拔或者是了不起的尤利乌斯·恺撒”，而如今人们都说，他一看到敌人就立马变成了废物。^[3]这正是世事无常之所在，人们见证了“这位将军从炙手可热到一蹶不振……须臾之间，时过境迁”。他身披枷锁，在儿子的搀扶下走到执政官宫殿，一路叮当作响，不得不由四名仆人抬他前往会议室。尽管天色已晚，当他被宣布关进潮湿的地牢时，还是有2000人在一片死寂中见证了这一刻。

接下来的诉讼很是苦涩漫长。满腔怒火的控方要求将他处以极刑，

称他是“国家的灾难、共和国的叛徒、国家的敌人、导致勒班陀沦陷的渎职指挥官、腰缠万贯却满腹虚荣的家伙”。他们用格里马尼曾经担任过的诸多光荣公职——“桨帆船指挥官、亚历山大港护航队指挥官、食盐管理官、陆地上的贤者、拉文纳总督、十人议事会的领导人、公社的律师，海军总司令”——来对比他此刻的丑态：身陷囹圄，因饥寒而患病。公诉词以鼓点般的激烈言辞结束：“他的墓碑上将会这样写道：这里埋葬着一个在圣马可广场被处决的人。”^[4]对财富的斥责在威尼斯人的公共生活中有了新的定义。富裕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现在它却成了道德上的一个污点。摆放在征兵长凳前大肆炫耀的大堆黄金如今也变成了麻烦。在这一切背后，是统治阶级核心内部的矛盾和派系斗争。有人要把格里马尼家族赶出商业圈。

格里马尼辩称，他的命令没有得到遵守；贵族船主们消极避战，指挥官们因为懦弱和不服从而临阵脱逃。其他人也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阿尔维斯·马尔切洛尽管极力为自己辩解，但终究还是难辞其咎；马利皮耶罗认为，格里马尼的错不是懦弱而是缺乏经验：他组织舰队不力，而且他升起十字架不符合常规——升起他在圣马可广场得到的战旗才是船长们习惯的进攻讯号。可以确定的是，格里马尼没有训斥作战不力的贵族指挥官们，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得罪那些能够在未来支持他政治前途的人。最后人们达成了共识：责任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格里马尼最后没有被判死刑。他被驱逐出威尼斯，并向在战争中有成员牺牲的贵族家庭支付高额赔偿费。

战局差不多还是像以前一样糟糕。新指挥官走马上任，却无力扭转大局。占领了勒班陀之后，奥斯曼帝国在爱奥尼亚海边缘就有了一个用于海军作战的安全的前沿基地。在这段紧张的时期，列奥纳多·达·芬奇来到威尼斯，作为军事工程师，为威尼斯效力。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奇特的城市防卫计划，比如以竹子作为呼吸管的猪皮潜水服，以及潜艇的草图。不过，他的创意最终没有付诸实践（两年后，他为苏丹巴耶济德二

世拟定了建造横跨金角湾的单拱桥的建议书）。

威尼斯元老院更关注当前的局势。在1500年的头几个月，人们越来越为科罗尼和莫东的安全担心。当年7月，一位新的指挥官吉罗拉莫·孔塔里尼在同一片海域，带着桨帆船、圆船和商船的混合舰队重演了宗奇奥之战。当他们全线进攻时，风停了，圆船无法继续战斗，四艘重型桨帆船撤退，两艘船被敌方俘虏。孔塔里尼的船被打得伤痕累累，渐渐下沉，被迫选择撤退。指责声再次不绝于耳。

巴耶济德二世接着亲自带领人马，来到了莫东城墙脚下。他带来了大量火炮和从孔塔里尼手中缴获的战船旗帜，来打击守军的士气。从城镇里，总督发出了简短而绝望的消息，来描述他们所处的困境：城墙之外的乡间漫山遍野尽是帐篷……日夜不停的炮击……三分之一的人或死或伤……其他人也都坐以待毙……火药所剩无几。在外海，贵族船主们害怕奥斯曼舰队，又一次拒绝战斗。只有一名叫祖阿姆·马利皮耶罗的船长带着4艘桨帆船穿过封锁线，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5]这样超群的勇敢得到了回应，“顷刻间，桨帆船水手们高喊着，他们自愿和他一起牺牲，愿驾船冲锋”。普留利在安全距离之外苦涩地记录道：“其他人缺乏精神和勇气，都留在了舰队中。”马利皮耶罗的几艘桨帆船英勇地刺穿了奥斯曼舰队的封锁，进入莫东的小型环港。精疲力竭的守军看见救援来到，丢弃了他们的岗位，开始跑向船只。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8月29日晚上八点，消息像往常一样传到了威尼斯：一艘轻型快速帆船借助风势，驶入了圣马可湾。这一天正好是圣约翰被斩首的那一天，是基督教日历中象征厄运的一天。当莫东沦陷的消息传到十人议事会金碧辉煌的大厅时，这些平日里威风凛凛地领导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要们大哭起来。莫东甚至比内格罗蓬特更加重要。它的重要性既是感情上的，也是商业上的。损失掉的不仅仅是6000人、150门大炮和

12艘桨帆船。莫东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遗产，是威尼斯最早的殖民霸业的一部分，它可以说是威尼斯海洋帝国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普留利说：“他们仿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航海能力丧失了，因为莫东是所有船只、所有航行的中转港口和交通枢纽。”当苏丹出现在距莫东20英里的科罗尼城下时，威尼斯人觉得大势已去，科罗尼不战而降。共和国的双目已经被戳瞎了。对于商人普留利来说，这是预测到厄运的一瞬间：“如果威尼斯人不能从事航海，他们的维生手段将逐渐丧失，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化为乌有。”^[6]

在这个噩耗传来的前夜，共和国又选出了一位新的海军总司令。没有人自愿出任这个职位；所有被提名的人用年老、疾病等理由回绝。如今，这个职位实在声名狼藉，而人们对土耳其舰队的恐惧竟如此严重。最终，人们推选了贝内代托·佩萨罗（民间称他为“伦敦的佩萨罗”），他也愿意接受这个职位。佩萨罗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指挥官，他苛刻、坚定，对贵族阶级的政治毫无兴趣，而且非常冷酷无情。他七十岁了，却依然包养着好几个情妇。普留利谴责他“这么大年纪了，真是为老不尊”。^[7]其实，佩萨罗很像皮萨尼和泽诺那个更加强硬年代的人——他是水手中的水手，既能得到水手的尊重和爱戴，也能让船长们心生畏惧。鉴于先前的失败，他被赋予了极大权力：“不需要征求威尼斯的同意，可以处死任何不服从指挥的人，不管他们是高官、船长还是桨帆船指挥官。”^[8]这样的话早已经变得形同虚设，人们也不再相信这些话，但佩萨罗偏偏很认真。和皮萨尼一样，这个年迈的风流浪子理解普通水手的心态：他允许水手掳掠财物，极大地提升了士气，同样自己也大发横财。他屡建战功；他扫荡希腊海岸，摧毁了奥斯曼人的造船成果，恢复了威尼斯对一些爱奥尼亚岛屿的控制，阻止敌人进一步巩固其海权地位。他无所畏惧、不偏不倚。两位贵族下属，其中一个执政官的亲戚，不战而降，将堡垒拱手让人，他直接处死了这两个人。他捕获了土耳其海盗艾里奇之后，把他活活烤死。他保障了亚得里亚海的安全，有效地控制住了爱奥尼亚海，因此到1500年底，大型桨帆船去往亚

历山大和贝鲁特的航线得以恢复。但是，他最终没能够扭转奥斯曼征服的大潮。

1503年，威尼斯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和巴耶济德二世签署了屈辱的和平条约，巴耶济德二世牢牢掌控了他赢得的一切。很快，威尼斯人在海上遇到奥斯曼船只时，会降下旗帜，默默承认自己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尽管骄傲的威尼斯人在公开场合不肯这样承认。从现在开始，与他们强大的穆斯林邻居合作将成为威尼斯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变真理，这座城市将逐渐打造一个陆地帝国。

1500年5月9日，和过去五百年里的每一个耶稣升天节一样，庆典活动在威尼斯如期举办，精心设计的庆典表达了这座城市与海洋的神秘联姻。像往常一样，执政官穿上他的全副华服宝器，乘着金船起航，将一枚金戒指扔到大海深处，来象征这联姻。同一年，德·巴尔巴利刻画的胜利的航海之城的图片在威尼斯的印刷机上大量印制。这些故事听起来很美，但随着16世纪的到来，实情有些不同。海洋不再平静，威尼斯与海洋的婚姻也不再一帆风顺。在早些时候，君士坦丁堡已经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真相。当一位威尼斯大使来到巴耶济德二世的宫廷，希望促成一项和平协议时，他被告知待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维齐尔^[9]直截了当地说：“到目前为止，是你们和大海结婚，从现在开始轮到我們了，我们的海比你们更多。”^[10]

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和约标志着海军力量上的重大转变。从今以后，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单独与奥斯曼人一较高下。奥斯曼人只花了五十年时间，就战胜了地中海经验最丰富的海军，并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势力对地中海东半部的统治。然而，在这期间，他们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海上优势，他们打的海战数量有限，而且没有一场决定性的海战胜利。但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济德二世都把握住了在封闭海域作战的一个基本原理：没有必要主宰大海，陆地才是最重要的。依靠强大的

陆军和舰队开展两栖登陆作战，他们扫荡了桨帆船所依赖的诸多战略基地（因为桨帆船需要频繁靠岸补充给养和淡水）。现在奥斯曼人在亚得里亚海的边缘站住了脚，为进一步向西进犯威尼斯的其他重要岛屿做好了准备。五十年来，威尼斯曾警示并恳求过教皇、其他意大利城邦、法兰西国王和任何有可能倾听的人，希望他们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危险：“上帝保佑，一旦苏丹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海岸，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阻挡他了。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进入意大利，消灭基督教世界”。^[11]巴耶济德二世除了苏丹的通常头衔之外，还得到了一个新头衔：“所有海洋王国的领主，包括罗马人的国度、小亚细亚和爱琴海。”^[12]从今以后，欧洲商船未经许可几乎不能在地中海东部航行。只有少数几个大岛——科孚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罗得岛——还在基督徒手中。

宗奇奥海战中火球的景象仍然在威尼斯人的想象中燃烧。一幅非常精彩的木刻画定格了火苗刚刚开始升腾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时刻，威尼斯海军的自信降到了冰点。威尼斯人已经被火药的爆炸威力和对手的强大吓破了胆，而他们自己的指挥体系也逐渐从内部瓦解。说到底，与其说是兵力不如敌人，还不如说是意志的失败、不肯为国捐躯。桨帆船指挥官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毫不留情地分析道：“如果当时我们的舰队更大，混乱就会更大。这发生的一切都源于我们缺少对基督教和我们的国家的爱、缺少勇气、缺少纪律、缺少自豪感。”^[13]普留利在总结1501年夏天战事时说：“这次与土耳其人的交战意义极其重大；这不仅在于一座城市或者堡垒的得失，还在于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他指的是威尼斯的海洋帝国本身，以及流经它的水道的那些财富。^[14]

宗奇奥之战还留下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影响。巨型帆船毁灭的惨烈景象让双方都不敢继续往这个方向做实验。从此以后，地中海的战争变得循规蹈矩；规模越来越大的桨帆船舰队猛冲向对方，等到靠近的时候用轻型火炮射击，然后尝试通过白刃战打败对方。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

首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英格兰和荷兰，开始运用风力驱动、配备重型火炮的盖伦帆船^[15]。它们将创建庞大无比的世界帝国，而这在被陆地包围的地中海是无法想象的。

最初的迹象发生在宗奇奥海战不久之后。普留利搞错了名字，但记对了事迹：不是哥伦布，而是瓦斯科·达伽马，于1499年9月从印度绕行好望角回到欧洲。威尼斯共和国派遣一名大使到里斯本宫廷调查；直到1501年7月，他的报告才送回威尼斯。事实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潟湖。可怕的预感笼罩了这座城市。对于特别热衷自然地理的威尼斯人来说，这个发现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普留利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大段的悲观预测。这是一个奇迹，是当时最不可思议的、最重大的消息：

以我的智慧，无法理解这一切。收到此消息的时候，整个城市的人.....都目瞪口呆，最聪明的人都认为，这是他们听过的最坏的消息。他们明白，威尼斯取得如今的名声与财富，靠的就是海上贸易，靠的是买进大量的香料，再倒卖给来自各地的外国人。从这些外国人那里，从贸易中，威尼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现在，印度的香料可以通过新航路直接输送到里斯本，匈牙利人、德意志人、佛兰德人和法兰西人都能去那里购买，而且价格更便宜。因为发往威尼斯的香料经过叙利亚和苏丹的领土，要面对层层关卡与高额课税，当香料到达威尼斯时，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原来只值1杜卡特的货物涨到了1.7甚至2杜卡特。而这条海上航线并没有这些障碍，所以葡萄牙人能给出更低的价格。^[16]

减掉了成百上千的小中间商，抛弃了贪婪而善变的马穆鲁克人，批量采购，直接运输：在威尼斯商人看来，葡萄牙人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也有一些相反的声音，一些人指出了这条航线的缺点：

葡萄牙国王不会继续使用去往卡利卡特的新航路，因为他派出的13艘卡拉维尔帆船只有6艘安全返回；损失大于收益；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踏上这一漫长而危险航程的水手少之又少。^[17]

但普留利很确定：“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在威尼斯，各种香料的价格都会锐减，因为知道了这个消息的老买家会选择不买。”^[18]在结尾处，他就自己的行文冗长向未来的读者道了歉：“这些新事实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烦躁不安，没有控制住自己。”

普留利和其他很多威尼斯人，富有远见地预测到了一个系统的终结，一个模式的转变：不仅仅是威尼斯，整个长途贸易的网络都注定要没落。所有自古兴盛的古老商路和蓬勃发展的沿线城市突然成了一潭死水，开罗、黑海、大马士革、贝鲁特、巴格达、士麦那、红海诸港口、黎凡特的各大都市，甚至君士坦丁堡本身，全都面临着被盖伦帆船逐出世界贸易圈的威胁。地中海会被绕过，亚得里亚海将不再是通向任何地方的重要通道，像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这样的重要集散地也将陷入衰退。

葡萄牙人幸灾乐祸，给威尼斯人伤口上撒盐。葡萄牙国王邀请威尼斯商人到里斯本购买他们的香料；他们再也不需要和反复无常的异教徒做生意。一些人的确被吸引到了，但是共和国已经深陷黎凡特的投资泥沼，不能轻易脱身，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进货，他们在黎凡特的商人就会成为苏丹出气的靶子。而从地中海东岸派自己的船前往印度又不现实。威尼斯的整个商业模式一下子显得过时了。

新模式的效果几乎立竿见影。1502年，去往贝鲁特的桨帆船仅仅运回来四大包胡椒；在威尼斯，物价已达到高峰；德意志人的订单缩水；许多人前往里斯本。1502年，共和国派遣了一个秘密使团前往开罗，指出当前的危机。打破葡萄牙人的海上威胁势在必行。威尼斯使节表示愿意提供财政支持，提议挖通一条从地中海到红海的运河。但丧失民心的马穆鲁克王朝也处于衰退之中。它已经无法阻挡入侵者了。1500年，马穆鲁克王朝的编年史家伊本·伊亚斯记录了一个非凡的事件。开罗城外的香脂花园，从远古时期就开始存在，出产一种功效神奇的油，深受威

尼斯人推崇。这门贸易象征着几个世纪以来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古老商业关系。然而这一年，香脂树集体枯萎，就此绝种。十七年之后，奥斯曼人在开罗城门前吊死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末代统治者。

一个名叫托梅·皮莱资^[19]的葡萄牙探险家兴高采烈地讲述了这些对威尼斯产生的影响。1511年，葡萄牙人征服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即香料群岛的市场。他这样写道：“谁是马六甲海峡的主人，谁就掐住了威尼斯的咽喉。”^[20]它带来的压力看似缓慢而不均，但葡萄牙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将最终消灭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普留利的担忧在日后会显得很有道理，而奥斯曼帝国同时也将有条不紊地蚕食威尼斯的海洋帝国。

德·巴尔巴里的地图带有对古典世界的指涉，已经包含了怀旧的印记。它们暗示了一种怀旧的情绪，将曾经强势而雄健的海洋帝国变成了外强中干的花瓶。它们也许反映了威尼斯社会的内在结构变化。周期性爆发的瘟疫意味着这座城市的人口无法实现自我增长，只能依赖移民，而来到威尼斯的许多意大利人对航海生活一窍不通。这一问题在基奥贾战争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志愿参军的公民需要先接受划船训练。1201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的男性大多数是海员；而到1500年，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海员。在耶稣升天节仪式中表现出的那份对大海的感情依赖将会持续到共和国灭亡，但是到了1500年，威尼斯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陆地；不到四年后，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在意大利爆发^[21]，敌人再次逼近潟湖边缘。造船业面临危机，国家更加注重工业。曾经标志着威尼斯命运的爱国团结精神已经出现裂痕：相当一部分统治精英表现出，尽管他们仍然渴望弥补海上贸易失去的利润，但他们不准备为了海上贸易所依赖的基地和航道而浴血奋战。那些在15世纪发迹的人们，不再送他们的儿子去海上当见习水手和弓弩手。越来越多的富人更愿意投资陆地上的房产，拥有一座门上有纹章的乡间别墅。这些是贵族阶层受尊重的标志，是所有白手起家的人都会向往的东西。

又是敏锐而深感悔恨的普留利察觉到了这一潮流，并且意识到，它所暗示的是荣耀的衰退。他在1505年写道：“如今，威尼斯人更倾向于陆地，而不是大海——大海是他们所有荣耀、财富和荣誉的古老根源，因为陆地比大海更具吸引力，更令人愉悦。”^[22]

彼得罗·卡索拉在1494年写道：“我不认为有任何城市可以和在海上建立的威尼斯比肩。”^[23]15世纪末，外界曾试图解读这个地方的意义所在，却发现这里不能和他们已知的世界相提并论，因而处处遇到悖论。威尼斯物产贫瘠，却显得很富庶；这里财富横流，但饮用水却很缺乏；无比强大却又很脆弱；没有封建制度，但却监管严格。它的公民节制、务实，经常玩世不恭，但他们却打造出了一座梦幻城市。哥特式的拱门、伊斯兰式的圆顶和拜占庭式的镶嵌画让人仿若同时造访布鲁日、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威尼斯自成一派。它是唯一一座在古罗马时代结束之后才兴起的意大利城市，它的居民通过盗窃和借鉴，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古典”文化；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创立神话，并且借鉴了希腊世界的神祇。

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第一座虚拟城市：一个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离岸保税仓库——现代化程度令人震惊。正如普留利所说，这座城市停留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现金的帝国。名为杜卡特的小小金币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元，杜卡特金币上的图案是历任执政官在圣马可面前跪拜。它在去往印度的路上都能得到尊重。印度人把杜卡特金币上模糊的图案解释为一位印度教神明和他的配偶。共和国对财政管理的高度关注领先同时代几百年。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政府政策完全配合经济目标的国家。它的商人阶层和政治阶层之间没有隔阂。威尼斯是一个由企业家运行，并且服务于企业家的共和国，并据此进行管理。权力的三大中心——执政官宫殿、里亚尔托和兵工厂，分别是政府、贸易和军事的所在地，由同一个统治集团管理。威尼斯人比任何人都更早地了解到一系列基本的商业规则：供应和需求的原则；对消费者选择、稳定货币、

准时交货、理性的法律和税收的需求；长期有效、控制得力的政策。它用一种新型英雄取代了中世纪骑士：商人。在圣马可的徽章里，所有这些品质都得到了体现。外界无法对威尼斯的崛起做出充分的解释。于是，他们对这座城市自己编织和推销的神话深信不疑：这份伟大纯属命中注定。像所有的长期繁荣景象一样，他们坚信此番盛世必将长驻。



杜卡特金币

正是海上冒险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而在这个过程中，威尼斯改变了世界。它不是单独作用，而是作为原动力，作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靠着无与伦比的效率，共和国刺激了对物质的需求，并促进了商品的远途交易，以满足这种需求。威尼斯作为中央核心，使得欧洲与东方两个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在东西半球之间输送商品，促进崭新的品味的产生和选择概念的形成。威尼斯是不同世界的中间人和诠释者。费利克斯·法布里在描述他的航行时写道：“我通过一面双面镜看了世界。”^[24]威尼斯是第一个与伊斯兰世界不断积极互动的欧洲国家。它把东方的味道、思想和影响，以及某种浪漫的东方主义，带到了欧洲世界。视觉理念、材料、食品、文学主题和词语，通过威尼斯的海关关卡得到传播。

这样的交流有决定性的影响。潟湖的商人也加快了中东伊斯兰世界经济力量的下滑和西方世界的崛起。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曾使黎凡特富庶一时的产业——肥皂、玻璃、丝绸、纸和糖制造业——要么被共和国篡夺，要么被其海运体系瓦解。威尼斯商人从购买叙利亚玻璃转为进口其关键原材料——叙利亚沙漠的苏打灰，直到穆拉诺岛优质的玻璃被出

口到马穆鲁克王朝的宫殿。肥皂和造纸业也遵循着同样的趋势。糖的生产则从叙利亚转移到了塞浦路斯，在那里，威尼斯企业家运用更高效的生产流程，满足西方市场的需求。商用桨帆船帮助欧洲产业利用新技术，比如水力和自动纺轮，来削弱黎凡特的竞争对手，促使他们陷入持续衰弱。每艘从威尼斯出发向东航行的货船都逐渐改变着力量的平衡。对东方商品的支付手段从银条变成了易货——这是对西方人来说越来越有利的付款方式。

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功能既是维护海上贸易通畅，也是以自己的力量创造财富。这是欧洲的第一次全面的殖民冒险。除了少数例外——比如达尔马提亚人受到的待遇肯定比希腊人的好一些——这个殖民系统是剥削成性、冷漠无情的。它为后继者——特别是荷兰和英格兰提供了一个榜样，那就是小国也可以通过航海来称霸全球。但它也是留给世人的一个教训，即通过海权维系的遥远殖民地是很脆弱的。威尼斯的商业模式突然变得过时，其供应链显得脆弱不堪。最终，威尼斯很难保卫自己的海洋帝国，就像英国无法保住自己的北美殖民地一样。航海帝国的没落和它的崛起一样极富戏剧性：到1505年，普留利已经在为威尼斯起草墓志铭了。

[1] Sanudo (or Sanuto),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3 vols, col. 5, Venice 1879-1903

[2] 天主教用作纪念亲人的瞻礼日。

[3]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167

[4] Doumerc, B., 'An Exemplary Maritime Republic: Venice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in *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ed. John B. Hattendorf and Richard W. Unger, Woodbridge, 2003, p. 662

[5]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

Bologna, 1921, p. 30

[6]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 Bologna, 1921, p. 45

[7]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 Bologna, 1921, p. 287

[8]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 Bologna, 1921, p. 20

[9] 维齐尔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执行一切与臣民有关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尔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

[10]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95

[11]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289

[12]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p. 289

[13]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p. 179

[14]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 Bologna, 1921, p. 30

[15] 盖伦帆船是至少有两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在16~18世纪期间被欧洲多国采用。它可以说是卡拉维尔帆船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船身坚固，可用作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比克拉克帆船便宜，生产3艘克拉克帆船的成本可以生产5艘盖伦帆船。盖伦帆船被制造出来的年代，正好是西欧各国争相建立海上强权的大航海时代。所以，盖伦帆船的面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

[16]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 Bologna, 1921, p. 156

[17]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 Bologna, 1921, p. 156

[18]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 Bologna, 1921, pp. 155-7

[19] 托梅·皮莱资（1465? ~1524或1540），葡萄牙药剂师、作家、航海家。他是首批到达东南亚的欧洲人之一，也是中国明朝以来，葡萄牙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首位进入中国的使者，时为明代正德年间。1517年，他与假马六甲使者、翻译火者亚三随船来到广州近海，向明朝政府要求建立关系。1518年，他获准在广州登陆，不久抵达南京，经贿赂宠臣江彬后获得正在南巡的明武宗的接见，然后随武宗来到北京。1521年，武宗驾崩，中葡爆发屯门海战，皮莱资被明世宗下令押解到广州听候处置。嘉靖三年（1524）5月，皮莱资因病死于广州监狱，也有些记载说他在江苏住到1540年并死于那里。

[20] Lunde, Paul,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Saudi Aramco World*, vol. 56, no. 4

[21] 即所谓“意大利战争”，又称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是1494~1559年一系列战争的总称，参战国包括多数意大利城邦、教皇国、西欧各主要国家（法兰西、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英格兰与苏格兰）以及奥斯曼帝国。战争起源于米兰公国与那不勒斯王国间的纠纷，随后迅速转变为各参战国间争夺权力与领土的军事冲突。

[22] Tenenti, Alberto, 'The Sense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Venetian World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Renaissance Venice*, ed. J. R. Hale, London, 1973, p. 31

[23]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p. 125

[24]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261

结语：归程

在伊拉克利翁以西几英里的沿海大道上，可以望见一座从海面上突出的岩石。如果你跨过公路，沿着岩石底部周围的小路前进，会经过一座拱门和拱形隧道，来到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纵览爱琴海的广阔景色。克里特人把这个地方叫作帕雷欧卡斯特洛，意思是“旧堡垒”。它最初由热那亚人在1206年建造，后来威尼斯人将其开发，用于守卫从海上接近干地亚的通道。这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在它的外围边缘，石堡向着山崖底部的方向急转直下；微风夹杂着百里香的芬芳；涛声阵阵；拱形弹药库的遗迹；一座地下教堂。从远方望去，现代的伊拉克利翁城就像从一片蓝色海湾中蔓延而生。

1669年夏天，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漫长的围城战之后，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同意投降，放弃了威尼斯对克里特的统治。二十一年来，威尼斯一直为了帝国的中心奋力与奥斯曼人抗争，但结果正如普留利所言。它的殖民地终将一个接一个地惨遭吞并。在统治了不足半个世纪以后，塞浦路斯在1570年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威尼斯在爱琴海最北端的岛屿——蒂诺斯岛支撑到了1715年；截至此时，其余的殖民地均已沦陷，贸易也不复存在。到16世纪20年代，穆达航线开始衰败。不久，最后一批桨帆船在泰晤士河下锚。海盗开始纵横四海。



1648～1669年的干地亚攻防战

唯有威尼斯本土领海得以保全。世纪轮回，奥斯曼帝国屡屡进军科孚岛，但是亚得里亚海的门户固若金汤。而拿破仑最终入侵圣马可广场，烧毁了执政官的金船，用大车把青铜骏马运回了巴黎，悲伤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蔓延开来。在派拉斯特^[1]，总督用威尼斯方言发表了满怀深情的演讲，把圣马可旗帜埋葬在祭坛之下，人们纷纷潸然泪下。

威尼斯海洋帝国的遗迹散落在大海之上；数以百计的哨塔与堡垒摇摇欲坠；令人肃然起敬的干地亚和法马古斯塔防御工事、布局精巧的堡垒和深壕最终没有敌过奥斯曼帝国的大炮；在勒班陀、凯里尼亚和干尼亚，整洁的港口紧紧环绕着美丽的海湾。教堂、钟楼、军火库和码头；数不清的威尼斯雄狮或纤瘦颀长，或敦实矮胖，或有翼或无翼，或粗暴或凶狠，或愤怒或惊诧，守卫着海港的城墙，屹立在大门之上，从优雅的喷泉口中喷出水来。在遥远的顿河河口，考古学家还能从俄罗斯土地中发掘出胸甲、弩箭和穆拉诺玻璃，但总的来说，威尼斯帝国霸业留下的痕迹实在少得可怜，令人惊异。海洋帝国总是飘忽不定，和威尼斯本身相仿，注定变幻无常。港口得到了又失去，它在海外领地终究扎根不深。克里特岛上，不只一处倒塌的房屋门楣上刻着一条拉丁文箴言：“尘世皆云烟。”就好像他们在内心深处都已参透，军号、舰船和枪

炮的喧嚣终究只是虚幻。

几个世纪里，成千上万的威尼斯人走上了这个舞台——商人、水手、殖民者、士兵和官员。这主要是男性的世界，但也不乏家庭生活。和丹多洛一样，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到威尼斯，他们或死于战争和瘟疫，或葬身大海，或客死异国他乡。但威尼斯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对它的臣民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困守亚历山大港聚居区的商人，观察着蒙古草原的领事，划着桨的桨手——对于所有人来说，这座城市显得如此突出。他们归心似箭——船终于再次驶经利多，感受着大海不同的悸动，看那熟悉的天际线上，一抹苍白缥缈的光明冉冉升起。

在码头上，人们或随意或专注地望着迫近的船只。在船首的水手离岸足够近、可以呼喊之前，岸上的人们焦急地竖起耳朵，心急如焚、惴惴不安地等待喜讯或是噩耗——是某人的丈夫或儿子葬身大海，还是某笔买卖大获成功；是哀恸，还是喜悦。登陆的一刻交织了一切悲欢离合。人们带回的既有黄金和香料，也有瘟疫和悲伤。败军之将身披枷锁而来，迎接凯旋之师的则是号角与礼炮，缴获的敌国军旗被拖在水中，圣马可的旗帜随风飘扬。奥德拉弗·法列罗^[2]走下甲板时带来了圣司提反^[3]的遗骨。皮萨尼的遗体被保存在食盐之中带回国。安东尼奥·格里马尼背负着宗奇奥之战的羞辱生存了下来，最终成为一位执政官；间谍格里蒂后来也登上执政官宝座。马可·波罗瞪圆了眼睛推开自家大门，就像尤利西斯回家一样，没人能认出他来。费利克斯·法布里在1480年跟随着一艘香料商船回来了，因为严寒，途中必须用桨敲碎运河中的坚冰。他在圣诞节之后的夜里到达威尼斯。那天夜空晴朗明亮，从甲板上眺望，白雪皑皑的多洛米蒂山脉的峰峦在巨大的月亮下忽隐忽现。那夜无人入睡。黎明来到时，乘客可以看到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钟楼金顶，在屋顶的加百列天使像正在欢迎他们回家。威尼斯的所有大钟都为船队的回归敲响。船只被横幅和旗帜装饰着；桨手们开始唱歌，并按照习俗，把自己被盐和风暴腐蚀的旧衣服扔到船舷外。“然后我们支付了旅费和

小费，”法布里写道，

打赏了照顾过我们的仆役，向桨帆船上的每个人——无论是贵族和仆人——都说了再见，我们把所有行李搬进一艘小船，自己也爬了上去……虽然我们很高兴终于从这令人不安的监狱里解放了出来，但因为我们和桨手以及其他人在长久航行中培养的情谊，我们的欢乐中夹杂着些许悲伤。^[4]



^[1] 今属黑山共和国。

^[2] 奥德拉弗·法列罗（卒于1117），威尼斯第三十四任执政官。他执政时从匈牙利手中夺回了扎拉和希贝尼克，还远征叙利亚，掳掠大量圣物。他建立了后世的兵工厂的核心部分。最后他在扎拉与匈牙利人交战时阵亡。

^[3] 圣司提反是基督教会首位殉道者。

^[4] Prescott, H. F.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p. 253

引文来源与参考文献

The bibliography contains all the sources quoted in the book.

The sources for the quotations can be found at
www.faber.co.uk/work/cityoffortune under the resources section.

ORIGINAL SOURCES

Andrea, Alfred J.,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 Leiden, 2008
Angiolello, Giovan-Maria, *Memoir*, trans. Pierre A. Mackay, at <http://angiolello.net>, 2006

Barbara, Josafa and Contarini, Ambrogio, *Travels to Tana and Persia*, trans. William Thomas, London, 1873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in English)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Canal, Martino da, *Les Estoires de Venue*, Florence, 1972

Casati, Luigi, *La guerra di Chioggia e la pace di Torino, saggio storico con documenti inediti*, Florence, 1866

Casola, Pietro, *Canon Pietro Cupola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in*

the Year 1494, ed. and trans. M. Margaret Newett, Manchester, 1907

Cassiodorus, *Variaum libri XII*, Letter 24, at
www.documentacatholicaomnia.eu, 2006

Chinazzi, Daniele, *Cronaca della guerra di Chioggia*, Milan, 1864

Choniates, Niketas, *Imperii Graeci Historia*, Geneva, 1593; (in English)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1984

Clari, Robert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Pierre Chariot, Paris, 1939; (in English)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Edgar Holmes McNeal, New York, 1966

Commynes, Philippe de, *The Memoirs of Philippe de Commynes*, trans. Andrew Scoble, vol. 1, London, 1855

Comnena, Anna, *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 trans. E. R. A. Sewter, London, 1969

Dandolo, Andrea, *Chronica per Externum Descripta*,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12, part 1, Bologna, 1923

De Caresinis, Raphaynus, *Raphayni de Caresinis Chronica 1343-1388*,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2, part 2, Bologna, 1923

De Monads, Laurentius (Lorenzo) , *Chronicon de Rebus Venetis*, ed. F. Cornelius, Venice, 1758

De'Mussi, Gabriele, 'La peste dell, anno 1348', ed. and trans. A.G. Tononi, *Giornale Ligustico de Archeologia, Storia e Letteratura*, vol.

11, Genoa, 1884

Délibérations des assemblées Vénitiennes concernant la Rontanie, 2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71

Die Register Innocenz'III, ed O.Hageneder and A. Haidacher, vol. 1, Graz, 1964

Dotson, John E., *Merchant Culture in Fourteenth Century Venice: the Zibaldone da Canal*, New York, 1994

Fabri, Felix, *The Book of the Wanderings of Brother Felix Fabri*, trans. A. Stewart, vol. 1, London, 1892

Gatari, Galeazzo e Bartolomeo, *Cronaca Carrarese: 1318-1407*,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7, part 1, Bologna, 1909

Gunther of Pairis,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The Hy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 of Gunther of Paris*, by Alfred J. Andrea, Philadelphia, 1997

Ibn Battuta,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AD 1325-54*, trans H. A. R. Gibb, vol. 1, London, 1986

Katip ?elebi, *The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Wars of the Turks*, trans. J. Mitchell, London, 1831 Kinnamos, John, *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 trans. Charles M. Brand, New York, 1976

Locatelli, Antonio, *Memorie che possono servire a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Venice, 1767

Machiavelli, Niccolò, *The Prince*, trans. W. K. Marriott, London,

1958

Malipiero, D., 'Annali veneti, 1457-1500', ed. T. Gar and A. Sagred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vol. 7, Florence, 1843

Mehmed II the Conqueror and the Fall of the Franco-Byzantine Levant to the Ottoman Turks: some Western Views and Testimonies, ed. and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Tempe, 2007

Pagani, Zaccaria,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es du Soudan d'égypte', in *Le Voyage d'Outre-mer (égypte, Mont Sinay, Palestine) de Jean Thenaud: Suivi de la relation de l'ambassade de Domenico Trevisan auprès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 1884

Patrologia Latina, ed. J. P. Migne, vols. 214-215, Paris, 1849-55

Pegolotti, Francesco, *La practica della mercatura*, ed. Allan Evans, New York, 197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 Milan, 1976

Petrarca, Francesco, *Episto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ed. Ugo Dotti, Turin, 1978

—, *Lettere senile di Francesco Petrarca*, vol. 1, trans. Giuseppe Francassetti, Florence, 1869

Pokorny, R., ed., 'Zwei unedierte Briefe aus der Frühzeit des Latcinischen Kaiserreichs von Konstantinopel', *Byzantion*, vol. 55, 1985

Polo, Marco, *The Travels*, trans. Ronald Latham, London, 1958

Priuli, G., 'I diarii', ed. A. Segr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4, part 3, 2 vols, Bologna, 1921

Raccolta degli storici italiani dal cinquecento al milleinquecento, in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new edition, 35 vols, ed. L. A. Muratori, Bologna, 1904-42

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umanie, 3 vols, ed. and trans. F. Thiriet, Paris, 1961

Rizzardo, Giacomo, *La presa di Negroponte fatta dai Turchi at Veneziani*, Venice, 1844

Sanudo (or Sanuto) , Marin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58 vols, Venice 1879-1903

—, *Venice, Città Excelentissima: Selections from the Renaissance Diaries of Marin Sanuto*, ed. and trans. Patricia H. Labalme, Laura Sanguineti White and Linda L. Carroll, Baltimore, 2008

Stella, Georgius et Iohannus, 'Annales Genuenses',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17, part 2, Bologna, 1975

Tafur, Pero,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ed. and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1926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 *La Conquete de Constantinople*, trans. émile Bouchet, Paris, 1891; (in English)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Caroline Smith, London, 2008

William, Archbishop of Tyre, *A History of Deeds done beyond the Sea*, vol. 1, trans. Emily Atwater Babcock, New York, 1943

MODERN WORKS

Angold, Michael, *The Fourth Crusade: Event and Context*, Harlow, 2003

Antoniadis, Sophia, 'Le récit du combat naval de Gallipoli chez Zancaruolo en comparaison avec le texte d'Antoine Morosini et les historiens grecs du XVe siècle' in *Venezia e l'Oriente fra tardo Medioevo e Rinascimento*, ed. A. Pertusi, Rome, 1966

Arbel, B., 'Colonie d'oltremare', *Storia di Venezia*, vol. 5, Rome, 1996

Ascherson, Neal, *Black Sea*, London, 1995

Ashtor, Eliyahu, 'L'Apogée du commerce Vénitien au Levant: un nouvel essai d'explication', in *Venezia, centro di mediazione tra Oriente e Occidente (secoli XV-XVI) : aspetti e problemi*, vol. 1

—, *Levant Tr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rinceton, 1983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Balard, M., 'La lotta contro Genova', *Storia di Venezia*, vol. 3, Rome, 1997

Berindei, Mihnea and O'Riordan, Giustiniana Migliardi, 'Venise et

la horde d'Or, fin XIIIe-début XIVe siècl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 29, 1988

Borsari, Silvano, 'I Veneziani delle colonie', *Storia di Venezia*, vol. 3, Rome, 1997

Brand, Charles, M.,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Cambridge, 1968

Bratianu, Georges I., *La Mer Noire: des origines à la conquête Ottomane*, Munich, 1969

Brown, Horatio F., 'The 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40, 1920

Brown, Patricia Fortini, *Venetian Narrative Painting in the Age of Carpaccio*, New Haven, 1988

Buonsanti, Michele and Galla, Alberta, *Candia Venezia: Venetian Itineraries Through Crete*, Heraklion, (undated)

Campbell, Caroline and Chong, Alan (eds), *Bellini and the East*, London, 2006

Cessi, R., *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e il problema adriatico*, Naples, 1953

——,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vols 1 and 2, Milan, 1968

Cessi, R. and Alberti, A., *Rialto: l'isolay il ponte, il mercato*, Bologna, 1934

Chareyron, Nicole, *Pilgrims to Jerusalem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W. Donald Wilson, New York, 2005

Ciggaar, Krijnie, *Western Travellers to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96

Clot, André, *Mehmed II, le conquérant de Byzance*, Paris, 1990

Coco, Carla, *Venezia levantina*, Venice, 1993

Constable, Olivia Remie, *Housing the Stranger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Lodging, Trade, and Travel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2004

Crouzet-Pavan, Elisabeth, *Venice Triumphant: the Horizons of a Myth*, trans. Lydia G. Cochrane, Baltimore, 1999

Crowley, Roger, *Constantinople: The Last Great Siege*, London, 2005

Curatola, Giovanni, 'Venetian Merchants and Travellers',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ed. Anthony Hirst and Michael Silk, Aldershot, 2004

Davis, James C., 'Shipping and Spying in the Early Career of a Venetian Doge, 1496-1502', *Studi veneziani*, vol. 16, 1974

Detorakis, Theocharis E., *History of Crete*, trans, John C. Davis, Heraklion, 1994

Dotson, John, 'Fleet Operations in the First Genoese-Venetian war, 1264-1266', *Viat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vol. 30, 1999

—, ‘Foundations of Venetian Naval Strategy from Pietro II Orseolo to the Battle of Zonchio’, *Viat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vol. 32, 2001

—, ‘Venice, Genoa and Control of the Sea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ed. John B. Hattendorf and Richard W. Unger, Woodbridge, 2003

Doumerc, B., ‘An Exemplary Maritime Republic: Venice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in *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ed. John B. Hattendorf and Richard W. Unger, Woodbridge, 2003

—, ‘De l’Incompétence à la trahison: les commandants de galères Vénitiens face aux Turcs (1499-1500)’, *Felonie, Trahison, Reniements aux Moyen Age*, Montpellier, 1997

—, ‘Il dominio del mare’, *Storia di Venezia*, vol. 4, Rome, 1996

—, ‘La difesa dell’impero’, *Storia di Venezia*, vol. 3, Rome, 1997

Duby, Georges and Lobrichon, Guy, *History of Venice in Painting*, New York, 2007

Dursteler, Eric R., ‘The Bailo in Constantinople; Crisis and Career in Venice’s Early Modern Diplomatic Corps’,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6, no. 2, 2001

Epstein, Steven, A., *Genoa and the Genoese, 958-1528*, Chapel Hill, 1996

Fabris, Antonio, 'From Adrianople to Constantinople: Venetian-Ottoman Diplomatic Missions, 1360-1453',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 no. 2, 1992

Fenlon, Iain, *Piazza San Marco*, Boston, 2009

Forbes-Boyd, Eric, *Aegean Quest*, London, 1970

Freedman, Paul, *Out of the East: Spices and the Medieval Imagination*, New Haven, 2008

Freely, John, *The Bosphorus*, Istanbul, 1993

Freeman, Charles, *The Horses of St Mark's*, London, 2004

Geary, Patrick J., *Furta Sacra: Theft of Relic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Princeton, 1978

Georgopoulou, Maria, *Venice's Mediterranean Colonies: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Cambridge, 2001

Gertwagen, Ruthy, 'The Contribution of Venice's colonies to its Naval Warfar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t www.storiamediterranea.it (undated)

Gill, Joseph, 'Franks, Venetians and Pope Innocent III 1201-1203', *Studi veneziani*, vol. 12, Florence, 1971

Goy, Richard, *Chioggia and the Villages of the Lagoon*, Cambridge, 1985

Gullino, G., 'Le frontiere navali', *Storia di Venezia*, vol. 4,

Rome, 1996

Hale, J. R., ed., *Renaissance Venice*, London, 1973

Hall, Richard,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1996

Harris, Jonathan,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London, 2003

Hazlitt, William Carew, *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2 vols, London, 1858

Heyd, W.,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Age*, 2 vols, Leipzig, 1936

Hodgkinson, Harry, *The Adriatic Sea*, London, 1955

Hodgson, F. C., *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01

—, *Venic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1204-1400*, London, 1910

Horrox, R., *The Black Death*, Manchester, 1994

Howard, Deborah,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Venice*, New Haven, 2002

—, *Venice and the East*, London, 2000

—, 'Venice as a Dolphin: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Jacopo de'Barbaris View', *Artibus et Historiae*, vol. 35, 1997

Imber, Colin,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0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Basingstoke, 2002

Karpov, Sergei P., 'Génois et Byzantins face à la crise de Tana 1343, d'après les documents d'archives inédits', *Byzantinische Forschungen*, vol. 22, 1996

—, *La navigazione veneziana nel Mar Nero XIII—XV secoli*, Ravenna, 2000

—, 'Venezia e Genova: rivalità e collaborazione a Trebisonda e Tana. Secoli XIII-XV', *Genova, Venezia, il Levante nei secoli XII—XIV*, ed. Gherardo Ortali and Dino Puncuk, Venice, 2001

Katele, Irene B., 'Piracy and the Venetian State: the Dilemma of Maritime Defens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Speculum*, vol. 63, no. 4, 1988

Keay, John, *The Spice Trade*, London, 2006

Kedar, Benjamin,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1976

King, Charles,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Oxford, 2005

Krekic, B., 'Venezia e l'Adriatico', in *Storia di Venezia*, vol. 3, Rome, 1997

Lamma, P., 'Venezia nel giudizio delle fonti Bizantine dal X al XII secol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74, 1960

Lane, Frederic C., *Andrea Barbarigo, Merchant of Venice 1418-*

1449, Baltimore, 1944

—, ‘Naval Actions and Fleet Organization, 1499-1502’, *Renaissance Venice*, ed. J. R. Hale, London, 1973

—, *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1934

—, *Venice and History*, Baltimore, 1966

—,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1973

Lazzarini, Vittorio, ‘Aneddoti della vita di Vettor Pisani’, *Archivio Veneto*, series 5, 1945

Lock, Peter, *The Franks in the Aegean: 1204—1500*, London, 1995

Lunde, Paul,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Saudi Aramco World*, vol. 56, no. 4

—, ‘Monsoons, Mude and Gold’, *Saudi Aramco World*, vol. 56, no. 4

Luzzatto, G., *Storia economica di Venezia dall’XI al XVI secolo*, Venice, 1961

MacKay, Pierre A., ‘Notes on the sources. The Manuscript, Contemporary Sources, Maps and Views of Negroponte’, at [http: //angiolello.net](http://angiolello.net), 2006

Mackintosh-Smith, Tim, *Travels with a Tangerine*, London, 2002

Madden, T., *Enrico Dandolo and the Rise of Venice*, Baltimore, 2003

—, ‘The Fires of the Fourth Crusade in Constantinople, 1203-1204: a Damage Assessment’,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84/85, 1992

—, ‘Venice and Constantinople in 1171 and 1172: Enrico Dandolo's Attitude towards Byzantium’,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 1993

Madden, T. and Queller, Donald E., ‘Some Further Arguments in Defense of the Venetians on the Fourth Crusade’, *Byzantion*, vol. 62, 1992

Martin, Lillian Ray, *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Venetian Ships and Boats*, London, 2001

Martin, Michael Edward, *The Venetians in the Black Sea 1204—1453*,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89

McKee, Sally, ‘The Revolt of St Tito in Fourteenth-century Venetian Crete: a Reassessment’,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 no. 2, Dec, 1994

—, *Uncommon Dominion: Venetian Crete and the Myth of Ethnic Purity*, Philadelphia, 2000

McNeill, William H., *Venice: the Hinge of Europe, 1081-1797*, Chicago, 1974

Meserve, Margaret, ‘News from Negroponte: Politics, Popular

Opin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Italian Press',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9, no. 2, Summer 2006

Miller, William,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 1921

——, *Latins in the Levant: 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 1204—1566*, Cambridge, 1908

Mollat, Michel, Braunstein, Philippe and Hocquet, Jean Claude, 'Reflexions sur l'expansion Vénitienne en Méditerranée',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vol. 1, Florence, 1974

Morris, Jan, *The Venetian Empire: A Sea Voyage*, London, 1990

Muir, Edward, *Civic Ritual in Renaissance Venice*, Princeton, 1981

Nicol, Donald M.,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 1992

Norwich, John Julius, *Byzantium*, vols 2 and 3, London, 1991 and 1995

—, *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 1982

Nystazupoulou Pelekidis, Marie, 'Venise et la Mer Noire du XIe au XVe siècle',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Florence, 1974

O'Connell, Monique, *Men of Empire. Power and Negotiation in Venice's Maritime State*, Baltimore, 2009

Papacostea, ?erban, 'Quod non iretur ad Tanam: un aspect fondamental de la politique génoise dans la Mer Noire au XIVE

siècle', *Revue des e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vol. 17, no. 2, 1979

Phillips, Jonathan,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4

Prawer, Joshua,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European Colonialism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72

Prescott, H. F. *Jerusalem Journey: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4

—,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Quarta Crociata: Venezia, Bisanzio, Impero Latino, ed. Gherardo Ortalli, Giorgio Ravegnani and Peter Schreiner, Venice, 2004

Queller, Donald E., and Madden, Thomas F.,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Philadelphia, 1997

Romanin, S.,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10 vols, Venice, 1912-21

Rose, Susan, 'Venetians, Genoese and Turks: the Mediterranean 1300-1500', at [http: //ottomanmilitary.devhub.com](http://ottomanmilitary.devhub.com), 2010

Runciman, Steve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3 vols, London, 1990

Schlumberger, Gustave, *La Prise de Saint-Jean-D'Acre en l'an 1291 par l'armée du Soudan d'égypte*, Paris, 1914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 2, Philadelphia, 1978

—, 'Saint Georges Head', *Speculum*, vol. 48, no. 1, 1973

Sorbelli, Albano, 'La lotta tra Genova e Venezia per il dominio del Mediterraneo 1350-1355', *Memorie delle Reale Accademia della Scienza dell'Istituto di Bologna*, series 1, vol. 5, Bologna, 1910-11

Spufford, Peter, *Power and Profit: the Merchant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2003

Stœckly, Doris, *La Système de l'incanto des galées du marché à Venise*, Leiden, 1995

Storia di Venezia, 12 vols, Rome, 1991-7

Tadic, J., 'Venezia e la costa orientale dell'Adriatico fino al secolo XV',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vol. 1

Tenenti, Alberto, 'Il senso del mare', *Storia di Venezia*, vol. 12, Rome, 1991

—, 'Le temporali calamità', in *Storia di Venezia*, vol. 3, Rome, 1997

—, 'The Sense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Venetian World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Renaissance Venice*, ed. J. R. Hale, London, 1973

—, 'Venezia e la pirateria nel Levante: 1300-1460',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vol. 1

Thiriet, F.,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age*, Paris, 1959

—, ‘Venise et l’occupation de Ténédos au XIVE siècle’, *Mélanges d’archeologie et d’histoire*, vol. 65, no. 1, 1953

Thubron, Colin, *The Seafarers: Venetians*, London, 2004

Tucci, Ugo, ‘La spedizione marittima’, *Venezia, Bisanzioy Impero Latino*, ed. Gherardo Ortalli, Giorgio Ravegnani and Peter Schreiner, Venice, 2006

—, ‘Tra Venezia e mondo turco: i mercanti’, *Venezia e i Turchi, Scontri e confronti di due civiltà*, ed. Anna Della Valle, Milan, 1985

Veneziay centro di mediazione tra Oriente e Occidente, secoli XV-XVI: aspetti e problemi, 2 vols, ed. Hans-Georg Beck, Manoussos Manoussacas and Agostino Pertusi, Florence, 1977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2 vols, ed. Agostino Pertusi, Florence, 1973-4

Venezia e I Turchi: Scontri e Confronti di Due Civilita, ed. A. Tenenti, Milan, 1985

Venice and the Islam World, 828-1797, ed. Stefano Carboni, New York, 2007

Verlinden, Charles, ‘Venezia e il commercio degli schiavi provenienti dalle coste orientali del Mediterraneo’, *Venezia e il Levante fino al secolo XV*, vol. 1

Wolff, Anne, ‘Merchants, Pilgrims, Naturalists: Alexandria

through European Eyes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ed. Anthony Hirst and Michael Silk,
Aldershot, 2004

Zanon, Luigi Gigio, *La galea veneziana*, Venice, 2004

鸣谢

感谢Julian Loose及Faber出版社团队对本书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为本书倾力付出、确保结果尽善尽美的Kate Ward及我的代理人Andrew Lownie。感谢Ron Morton及Jim Green的仔细审读和意见，他们的帮助价值极大。Stephen Scoffham更是提醒了我，马六甲曾一度扼住威尼斯的咽喉。谢谢Ron和Rita Morton在我游历威尼斯海洋帝国时帮助我在雅典安顿，还有Jan更是对我这本书的完成付出了许多。

我愿借此向以下作者及出版社表达我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作品中的材料：

Dr Pierre A. MacKay发表在www.angiolello.net的*The Memoir of Giovan—Maria Angiolello*。

Alfred J. Andrea的*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Fourth Crusade*（2008年出版）中Brill的文章节选。

古今地名对照

本书中使用的一些地名遵照该历史时期中威尼斯人和其他民族对其的称呼。后面对应的是这些地方在现代的名称

Acre, Akko (Israel) 阿卡, 阿卡 (以色列)

Adrianople, Edirne (Turkey) 阿德里安堡, 埃迪尔内 (土耳其)

Brazza, The island of Brac (Croatia) 布拉扎岛, 布拉奇岛 (克罗地亚)

Butrinto, Butrint (Albania) 布特林托, 布特林特 (阿尔巴尼亚)

Caffa, Feodosiya on the Crimean peninsula (Ukraine) 卡法, 费奥多西亚 (乌克兰, 在克里米亚半岛)

Candia, Heraklion (Crete) 干地亚, 伊拉克利翁 (克里特岛。威尼斯人也将整个克里特岛称为干地亚)

Canea, Chania or Hania (Crete) 干尼亚, 干尼亚 (克里特岛)

Cattaro, Kotor (Montenegro) 卡塔罗, 科托尔 (黑山)

Cerigo, The island of Kythira (Greece) 切里戈岛, 基西拉岛 (希腊)

Cerigotto, The island of Antikythira (Greece) 切里戈托岛, 安迪基西拉岛 (希腊)

Coron, Koroni (Greece) 科罗尼, 科罗尼 (希腊)

Curzola, The island of Korčula (Croatia) 库尔佐拉岛, 科尔丘拉岛 (克罗地亚)

Durazzo, Durrës (Albania) 杜拉佐, 都拉斯 (阿尔巴尼亚)

Jaffa, Now part of Tel Aviv: Tel Aviv-Yafo (Israel) 雅法, 雅法 (如今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雅法市的一部分)

Lagosta, The island of Lastovo (Croatia) 拉戈斯塔, 拉斯托沃岛 (克罗地亚)

Lajazzo, Yumurtalik near Adana (Turkey) 拉加佐, 尤穆尔塔勒克 (土耳其, 在阿达纳附近)

Lepanto, Nafaktos (Greece) 勒班陀, 纳夫帕克托斯 (希腊)

Lesina, The island of Hvar (Croatia) 莱西纳岛, 赫瓦尔岛 (克罗地亚)

Modon, Methoni (Greece) 莫东, 迈索尼 (希腊)

Naplion, Naflio or Navplion (Greece) 纳夫普利翁, 纳夫普利翁 (希腊)

Narenta River, Neretva River (Croatia) 纳伦塔河, 内雷特瓦河 (克罗地亚)

Negroponte, Island of Euboea, and its main town Halkida (or Chalkis) 内格罗蓬特, 威尼斯人所说的“内格罗蓬特”既指整个优卑亚 (在希腊东海岸), 也指岛上的主要城镇哈尔基斯

Nicopolis, Nikopol (Bulgaria) 尼科波利斯, 尼科波利斯 (保加利亚)

Ossero, Osor on the island of Cres (Croatia) 奥赛洛, 奥赛尔 (克罗地亚, 茨雷斯岛上)

Parenzo, Pore? (Croatia) 帕伦佐, 波雷奇 (克罗地亚)

Pola, Pula (Croatia) 普拉, 普拉 (克罗地亚)

Porto Longo, Harbour on the island of Sapienza (Greece) 隆哥港, 萨皮恩扎岛上的港口 (希腊)

Ragusa, Dubrovnik (Croatia) 拉古萨, 杜布罗夫尼克 (克罗地亚)

Retimo, Rethimno (Crete) 莱蒂莫, 罗希姆诺 (克里特)

Rovigno, Rovinj (Croatia) 罗维纽, 罗维尼 (克罗地亚)

Salonica, Thessaloniki (Greece) 萨洛尼卡, 塞萨洛尼基 (希腊)

Santa Maura, The island of Lefkadtha or Lefkas (Greece) 圣莫拉岛, 莱夫卡斯岛 (希腊)

Saray 萨莱, 金帐汗国都城, 现已消失, 原在伏尔加河上, 可能在阿斯特拉罕附近的谢利特连诺耶

Scutari, Shkoder (Albania) 斯库塔里, 斯库台 (阿尔巴尼亚)

Sebenico, Šibenik (Croatia) 希贝尼克, 希贝尼克 (克罗地亚)

Sidon, Saida (Lebanon) 西顿, 赛达 (黎巴嫩)

Smyrna, İzmir (Turkey) 士麦那, 伊兹密尔 (土耳其)

Soldaia, Sudak on the Crimean Peninsula (Ukraine) 苏尔达亚, 苏达克 (乌克兰, 在克里米亚半岛)

Spalato, Split (Croatia) 斯帕拉托, 斯普利特 (克罗地亚)

Tana, Azov on the sea of Azov (Ukraine) 塔纳, 亚速海上的亚速 (俄罗斯)

Tenedos, The island of Bozcaada at the mouth of the Dardanelles (Turkey) 忒涅多斯岛, 博兹贾岛 (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 土耳其)

Trau, Trogir (Croatia) 特劳, 特罗吉尔 (克罗地亚)

Trebizond, Trabzon (Turkey) 特拉布宗, 特拉布宗 (土耳其)

Tripoli, Trablous (Lebanon) 的黎波里, 的黎波里 (黎巴嫩)

Tyre, Sour (Lebanon) 推罗, 苏尔 (黎巴嫩)

Zante, The island of

Zakynthos (Greece) 桑特, 扎金索斯岛 (希腊)

Zara, Zadar (Croatia) 扎拉, 扎达尔 (克罗地亚)

Zonchio, Later Navarino, the bay of Pylos (Greece) 宗奇奥, 纳瓦里诺, 皮洛斯湾 (希腊)

译名对照表

Acre 阿卡

Adoldo, Nicolo, 尼科洛·阿道尔多

Adrianople 阿德里安堡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Aegean Sea 爱琴海

Aleaumes of Clari 克莱里的阿罗姆

Aleppo 阿勒颇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ria 亚历山大港

Alexius III Angelus, Emperor 亚历克赛三世·安格洛斯，皇帝

Alexius IV Angelus, Emperor 亚历克赛四世·安格洛斯，皇帝

Alexius V Ducas (Murtzuphlus), Emperor 亚历克赛五世·杜卡斯
(穆尔策弗卢斯)，皇帝

Amalfi阿马尔菲

Andrew of Durboise杜尔布瓦兹的安德烈

Andronicus I, Emperor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皇帝

Andronicus II Palaeologus, Emperor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帕里奥洛格斯，皇帝

Andronicus IV Palaeologus, Emperor安德罗尼库斯四世·帕里奥洛格斯，皇帝

Andros安德罗斯

Angiolello, Giovan-Maria焦万—玛利亚·安焦莱洛

Antonello (Sicilian) 安东内洛（西西里人）

Antonio of Candia干地亚的安东尼奥

Anzio, sea battle (1378) 安济奥海战（1378年）

Apanomeriti, Giacomo, 贾科莫·阿帕诺梅里蒂

Argos, 阿尔戈斯

Ascension Day耶稣升天节

Al-Ashraf Khalil, Sultan阿什拉夫·哈利勒，苏丹

Athens雅典

Azov, Sea of亚速海

Baghdad 巴格达

Baldwin II, Emperor 鲍德温二世, 皇帝

Baldwin of Flanders 佛兰德的鲍德温

Barbari, Jacopo de' 雅各布·德·巴尔巴里

Barbarigo family 巴尔巴里戈家族

Barbaro, Giosafat 吉奥索法特·巴尔巴罗

Barbaro, Nicolo 尼科洛·巴尔巴罗

Barbo, Pantaleone 潘塔莱奥内·巴尔博

Barozzi family 巴罗奇家族

Basilicata, Francesco 弗朗切斯科·巴西利卡塔

Baybars, Sultan 拜巴尔, 苏丹

Bayezit, II, Sulta 巴耶济德二世, 苏丹

Beirut 贝鲁特

Bellini, Gentile 真蒂莱·贝利尼

Bellini, Giovanni 乔万尼·贝利尼

Bessarion, Cardinal 贝萨里翁, 红衣主教

Bianco, Toma 托马·比安科

Bon, Giovanni 乔万尼·博恩

Boniface VIII, Pope 博尼法斯八世，教皇

Boniface of Montferrat 蒙费拉的博尼法斯

Bosnia 波斯尼亚

Bosphorus 博斯普鲁斯海峡

Bragadino, commissioner 布拉加迪诺，专员

Brazza 布拉扎岛

Brenner Pass 布伦纳山口

Brondolo 布朗多罗村

Bruges 布鲁日

Bucintoro 金船

Buondelmonti (Florentine priest) 布翁戴尔蒙蒂，佛罗伦萨教士

Burak Reis 布拉克雷斯

Butrinto 布特林托

Cabral, Andrea 安德烈亚·卡布拉尔

Caffa 卡法

Cairo 开罗

Calbo, Alvise阿尔维斯·卡尔博

Callergis, Giorgio (Cretan rebel 1368) 乔治·卡莱尔吉斯 (1368年的克里特反叛者)

Callergis, Giorgio (Cretan rebel 1416) 乔治·卡莱尔吉斯 (1416年的克里特反叛者)

Callergis, Leo利奥·卡莱尔吉斯

Callergis family卡莱尔吉斯家族

Canal, Cristoforo da, 克里斯托福罗·达·卡纳尔

Canaletto加纳莱托

Candia干地亚

Cassiodorus卡西奥多鲁斯

Catalans加泰罗尼亚人

Cattaro卡塔罗

Cavalli, Giacomo de贾科莫·德·卡瓦利

Chioggia基奥贾

Choniates, Niketas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

Chortatzis family库尔塔特齐斯家族

Civrano, Andriolo安德廖洛·奇夫兰诺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ommynes, duke of 科米纳公爵

Constantine the Great, Emperor 君士坦丁大帝，皇帝

Constantine Lascaris, Emperor 君士坦丁·拉斯卡里斯，皇帝

Constantine XI Palaeologus, Emperor 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格斯，皇帝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ntarini, Andrea, Doge 安德烈亚·孔塔里尼，执政官

Contarini, Girolamo 吉罗拉莫·孔塔里尼

Cook, William (Il Coqquo) 威廉·库克

Corfu 科孚岛

Corner, Andreas, 安德烈亚斯·科纳

Corner famil 科纳家族

Coron 科罗尼

Covilha, Pero da 佩罗·达·科维良

Crete 克里特岛

Croats 克罗地亚人

Curzola, island of 库尔佐拉岛

Cyclades基克拉泽斯群岛

Cyprus塞浦路斯

da Canal, Martino马蒂诺·达·卡纳尔

da Canal, Nicolo尼科洛·达·卡纳尔

da Gama, Vasco瓦斯科·达伽马

da Legge, Benedetto贝内代托·达·莱杰

da Priuli,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达·普留利

dal Verme, Luchino卢基诺·达尔·韦尔梅

Dalmatia, Dalmatian coast达尔马提亚，达尔马提亚海岸

Damascus大马士革

Dandolo, Andrea, admiral安德烈亚·丹多洛，海军将领

Dandolo, Andrea, chronicler and Doge, 安德烈亚·丹多洛，编年史家和执政官

Dandolo, Enrico, Doge恩里科·丹多洛，执政官

Dandolo, Leonardo, duke莱奥纳尔多·丹多洛，公爵

Dandolo, Marino马里诺·丹多洛

Dandolo, Ranieri拉涅里·丹多洛

Dardanelles达达尼尔海峡

Dario, Giovanni 乔万尼·达里奥

d'Armer, Alban 奥尔本·德·阿默

della Scala, Brunello 布鲁奈佐·德拉·斯卡拉

della Turca, Rosso 罗索·德拉·图尔卡

Delmedego, Mordechai 莫迪凯·德雷梅德戈

Delos 提洛岛

Dias, Bartolomeu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Diedo, Pietro 彼得罗·迪耶多

Dolfin, Piero 皮耶罗·多尔芬

Domenico the merchant 多梅尼科（商人）

Donato, Andrea 安德烈亚·多纳托

Doria, Lamba 兰巴·多里亚

Doria, Luciano 卢西亚诺·多里亚

Doria, Paganino 帕加尼诺·多里亚

Doria, Pietro 彼得罗·多里亚

Ducas (historian) 杜卡斯（历史学家）

Ducat 杜卡特

Durazzo, 236杜拉佐

Emico of Hungary匈牙利的埃默里克

Emo, Pietro彼得罗·埃莫

Erichi (pirate) 艾里奇 (海盗)

Erizzo, Paolo保罗·埃里佐

Eugene IV, Pope尤金四世, 教皇

Fabri, Felix费利克斯·法布里

Faliero, Ordelafo奥德拉弗·法列罗

Faliero, Marino, Doge马里诺·法列罗, 执政官

Faliero, Paolo保罗·法列罗

Famagusta法马古斯塔

Fatimid dynasty法蒂玛王朝

Florence, Florentines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人

fondaci (residential complexes) 外国人聚居区

Freschi, Zacharia di扎卡里亚·迪·弗雷斯基

Friuli弗留利

Gabriele de Mussis加布里埃莱·德·穆西斯

Galata加拉塔

Gallipoli加里波利

Garzoni family加尔佐尼家族

Genghis Khan (Temuchin) 成吉思汗 (铁木真)

Genoa, Genoese热那亚, 热那亚人

Gestus de Boemia盖斯图斯·德·博埃米亚

Ghisi family吉西家族

Gianni (shipwright) 詹尼 (造船匠)

Gilles, Pierre皮埃尔·吉勒

Giovanni of Zara扎拉的乔万尼

Giustinian, Andrea安德烈亚·朱斯蒂尼安

Giustinian, Nicolo尼科洛·朱斯蒂尼安

Giustinian, Taddeo塔代奥·朱斯蒂尼安

Golden Bull (1082) 《金玺诏书》 (1082年)

Gradenigo, Leonardo莱奥纳尔多·格拉代尼戈

Gradenigo, Marco马尔科·格拉代尼戈

Gradenigo family格拉代尼戈家族

Greece希腊

Greek fire希腊火

Grimaldi family格里马尔迪家族

Grimani, Antonio安东尼奥·格里马尼

Grimani family格里马尼家族

Gritti, Andrea安德烈亚·格里蒂

Haifa海法

Hawkwood, Sir John约翰·霍克伍德爵士

Henry the Fisherman渔夫亨利

Horace贺拉斯

Hospitallers医院骑士团

Hugh of Saint-Pol圣波勒的于格

Hungary匈牙利

Ibn Battuta伊本·白图泰

Ibn Iyas伊本·伊亚斯

Innocent III, Pope英诺森三世，教皇

Ionian islands爱奥尼亚群岛

Isaac II Angelus, Emperor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 皇帝

Jacopo della Castellana雅各布·达拉·卡斯泰拉纳

Jaffa, 雅法

Jews犹太人

John V Palaeologus, Emperor约翰五世·帕里奥洛格斯, 皇帝

John Mesarites约翰·梅萨里特斯

Julius Caesar, 尤利乌斯·恺撒

Justinian, Emperor, 查士丁尼, 皇帝

Kemal Reis凯末尔雷斯

Khalifeh, Haji哈只·哈利法

Kythera基西拉

Ladislav of Hungary匈牙利的拉迪斯劳

Lagosta, island of拉戈斯塔岛

Languschi, Giacomo de'贾科莫·德·兰古斯琪

Leonardo da Vinci列奥纳多·达·芬奇

Lepanto勒班陀

Lesina, island of, 莱西纳岛

Lidi利多

Lipomano, bank of里波马诺银行

London伦敦

Longo, Geronimo杰罗尼莫·隆哥

Loredan, Andrea安德烈亚·洛雷丹

Loredan, Antonio, 安东尼奥·洛雷丹

Loredan, Jacopo雅各布·洛雷丹

Loredan, Pietro彼得罗·洛雷丹

Loredo, fortress拉雷多要塞

Lorenzo de Monacis洛伦佐·德·莫纳西斯

Louis, Count of Blois布卢瓦伯爵路易

Louis, king of Hungary拉约什一世，匈牙利国王

Machiavelli, Nicolo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Magna (merchant galley) “马尼亚”号，商用桨帆船

Magno, Vincenzo维琴佐·马尼奥

Malamocco马拉莫科

Malatesta, Galeotto加莱奥托·马拉泰斯塔

Malatesta, Sigismondo (the Wolf of Rimini) 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 (里米尼恶狼)

Malipiero, Domenico 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

Malipiero, Zuam, 祖阿姆·马利皮耶罗

Manuel I, Emperor 曼努埃尔一世, 皇帝

Marcello, Alvise 阿尔维斯·马尔切洛

Marcello, Bartolomeo 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

March Pact (1204) 《三月条约》 (1204年)

Mark, St 圣马可

Martin, Abbot of Pairis 马丁, 佩里修道院长

Maruffo, Matteo 马泰奥·马鲁弗

Matteo of Naplion 纳夫普利翁的马泰奥

Mayr, Joseph de 约瑟夫·德·迈尔

Mehmet II, Sultan 穆罕默德二世, 苏丹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Mestre 梅斯特雷

Michael VIII, Emperor 米海尔八世, 皇帝

Milan, Peace of (1299) 《米兰和约》 (1299年)

Milletus, Greek monk米勒特斯（希腊僧人）

Milos米洛斯岛

Minotto, Girolamo吉罗拉莫·米诺托

Mocenigo, Pietro彼得罗·莫切尼戈

Mocenigo, Tommaso, Doge托马索·莫切尼戈，执政官

Modon莫东

Monemvasia莫奈姆瓦夏

Mongols蒙古人

Moro, Cristoforo, Doge克里斯托福罗·莫罗，执政官

Morosini,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

Morosini, Ruggiero (Malabranca) 鲁杰罗·莫罗西尼（残酷之爪）

muda (convoy) 穆达（商船队）

Mudazzo, Jacobo雅各布·穆达佐

Mugla穆格拉

Murat I, Sultan穆拉德一世，苏丹

Murat II, Sultan穆拉德二世，苏丹

Mykonos米科诺斯岛

Naplion纳夫普利翁

Napoleon拿破仑

Narenta River纳伦塔河

Naxos纳克索斯岛

Negroponte内格罗蓬特

Nicholas Kannavos尼古拉斯·卡纳博斯

Nicopolis, battle of (1396) 尼科波利斯战役 (1396年)

Nymphaion, Treaty of (1261) 《尼姆菲翁条约》 (1261年)

Omar, Haji哈只·奥马尔

Orfano canal奥尔法诺运河

Orhan, Sultan奥尔汗, 苏丹

Orseolo, Pietro II, Doge彼得罗二世·奥西奥罗, 执政官

Otranto奥特朗托

Paiva, Afonso de阿方索·德·派瓦

Pandora (round ship) “潘多拉”号

Pasti, Matteo de'马泰奥·德·帕斯蒂

Patras帕特雷

Paul II, Pope保罗二世，教皇

Pegolotti,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佩戈洛蒂

Peloponnese伯罗奔尼撒半岛

Permarino, Paladino帕拉迪诺·佩尔马里诺

Pesaro, Benedetto贝内代托·佩萨罗

Peter II, king of Cyprus彼得二世，塞浦路斯国王

Peter of Amiens亚眠的彼得

Petrarch,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

Philip de Montfort腓力·德·孟福尔

Philip of Swabia, king of Germany士瓦本的腓力德意志国王

Pietra del Bando宣令石

Pires, Tome托梅·皮莱资

Pisa, Pisans比萨，比萨人

Pisani, Alvise阿尔维斯·皮萨尼

Pisani, Nicolo尼科洛·皮萨尼

Pisani, Vettor韦托尔·皮萨尼

Pius II, Pope庇护二世，教皇

Polani, Vincenzo 韦托尔·皮萨尼

Polo, Marco 马可·波罗

Polo, Maffeo 马费奥·波罗

Polo, Nicolo 尼科洛·波罗

Porto Longo 隆哥港

Priuli, Girolamo 吉罗拉莫·普留利

provveditori (auditors) 监察官

Puglia 普利亚

Querini family 奎里尼家族

Ragusa 拉古萨

Ralph of Coggeshall 科吉舍尔的拉尔夫

Retimo 莱蒂莫

Rhodes 罗得岛

Richard the Lionheart 狮心王理查

Rizo brothers 里佐兄弟

Robert of Clari 克莱里的罗贝尔

Roger de Flor 罗杰·德·弗洛尔

Rosso, Moreto莫里托·罗索

Rustichello da Pisa比萨的鲁斯蒂谦

Sabadia, Hieronimo希罗尼莫·萨巴迪亚

Sacchetti, Franco, 希罗尼莫·萨巴迪亚

Saladin萨拉丁

Salimbene, Giovannino乔万尼诺·萨林贝内

Salonica萨洛尼卡

Salt Beds, Castle of the盐床城堡

Santorini圣托里尼

Sanudo, Andrea安德烈亚·萨努多

Sanudo, Marco马尔科·萨努多

Sanudo, Marino马里诺·萨努多

Sanudo family萨努多家族

Schiavo, Domenico多梅尼科·斯基亚沃

Schiavo, Tommaso托马索·斯基亚沃

Scutari斯库塔里

Sebenico希贝尼克

Senza耶稣升天节仪式

Seriphos塞里福斯岛

Setton, Kenneth肯尼斯·塞顿

Sforza,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

Sidon西顿

Simon de Montfort西蒙·德·孟福尔

Siphnos锡夫诺斯岛

Smyrna士麦那

Soffredo, Cardinal索弗雷多，红衣主教

Soldaia苏尔达亚

Spalato斯帕拉托

Spinola, Gaspare加斯帕雷·斯皮诺拉

Stamati of Negroponte内格罗蓬特的斯塔马蒂

Steno, Michele米凯莱·斯泰诺

Strabo斯特拉波

Tafur, Pero佩罗·塔富尔

Taiapiera, Zuan Antonio祖安·安东尼奥·塔亚皮拉

Tamburlaine帖木儿

Tana塔纳

Templars圣殿骑士团

Tenedos忒涅多斯岛

Theologite, Emanuel埃玛努埃尔·西奥罗吉特

Tiepolo, Jacopo, Doge雅各布·蒂耶波洛，执政官

Tiepolo, Lorenzo洛伦佐·蒂耶波洛

Tinos蒂诺斯岛

Tintoretto丁托列托

Titus, St圣提多

Trau特劳

Treaty of Venice 《威尼斯条约》

Trebizond特拉布宗

Trevisan, Domenico多梅尼科·特雷维桑

Treviso特雷维索

Trieste的里雅斯特

Tripoli的黎波里

Tudela, Benjamin图德拉的本雅明

Tunis突尼斯

Turin, Treaty of (1381) 《都灵条约》 (1381年)

Turlanio, Marco马尔科·图拉尼奥

Tyre推罗

Uzbeg Khan, Sultan月即别汗, 苏丹

Uzun Hassan乌尊哈桑

Varangian Guard瓦良格卫队

Vaux, abbot of沃城修道院长

Tana (rope-making factory), 塔纳 (制绳厂)

Venier, Marco马尔科·韦尼尔

Venier, Tito蒂托·韦尼尔

Venier family韦尼尔家族

Veronese委罗内塞

Villehardouin, Geoffroi de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

Villani, Matteo马泰奥·维拉尼

Visconti, Giovanni乔万尼·维斯孔蒂

Vlad the Impaler 穿刺公弗拉德

William of Roubruck 鲁不鲁乞（吕布鲁克的威廉）

William of Tyre 推罗的纪尧姆

Zane, Andrea 安德烈亚·扎内

Zanibek Khan 札尼别克汗

Zara 扎拉

Zen, Pietro 彼得罗·泽恩

Zeno, Carlo 卡洛·泽诺

Zeno, Renier, Doge 雷涅罗·泽诺

Zibaldone da Canal 《卡纳尔琐记》

Zonchio 宗奇奥

Zorzi, Nicolo 尼科洛·佐尔齐

译后记

《1453》是我和“甲骨文”合作的第一本书。我也就这样走进了克劳利的海洋世界。

我陆续翻译了他的四本历史著作《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这于我而言是一段愉快的旅程。克劳利的作品不是学术前沿，也没有高深的理论，却是精彩绝伦的叙述史，也是大众读者了解历史的绝佳窗口。

对我来讲，翻译是非常难得的深度学习的机会。人都有惰性，读书的时候，不太明白的地方经常就略过了，不影响理解大意就行。翻译却不容许偷懒，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完全弄懂。要对读者负责，首先得对自己负责。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相继出版之后，得到许多读者的热情支持，同时也有许多读者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借这次精装版推出的机会，我重新审视和修改了自己的译文。修改历时近半年，我刻意做得很慢。首先是知识性错误的修正，比如将阿提拉的部族称为“匈奴”是不妥的，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改为“匈人”；其次，修正了少量译名，希望能在“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再次，修正了地图标示的一些瑕疵和少量错别字及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最后，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也是修改最多的，是删去冗字，

提高密度，希望做到更精炼。当然，新版本最终需要的是读者的检验。我衷心希望，在过去的四年里我的水平有所提高；新版本会是一个更好的版本，是给克劳利先生的一份新礼物，也是给读者朋友的新礼物。

最后衷心感谢“甲骨文”品牌直接参与克劳利作品编辑出版的编辑们，没有他们的悉心帮助与辛勤工作，这几本书在中国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陆大鹏

2017年7月，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
著；陆大鹏，张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精装珍藏版）

ISBN 978-7-5201-0792-1

I.①财... II.①罗... ②陆... ③张... III.①威尼斯共和国-历史
IV.①K5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1702号

财富之城

——威尼斯海洋霸权

著者/〔英〕罗杰·克劳利

译者/陆大鹏 张骋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冯立君

责任编辑/段其刚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6.75 插页：0.625 字数：351千字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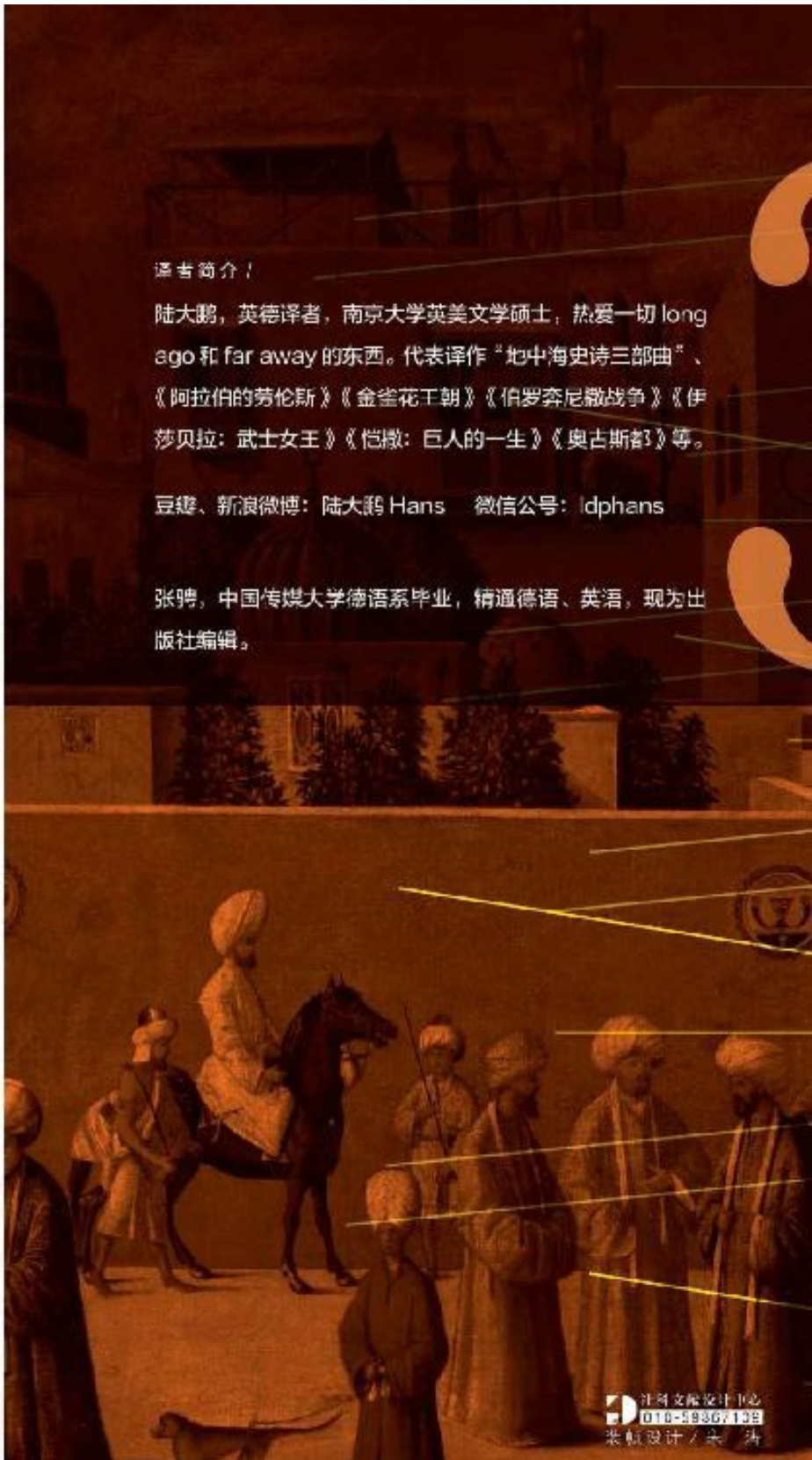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201-0792-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7-5949号

定价/258.00元（全三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简介 /

陆大鹏，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武士女王》《恺撒：巨人的一生》《奥古斯都》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张骋，中国传媒大学德语系毕业，精通德语、英语，现为出版社编辑。

《星期日电讯报》年度图书

《金融时报》隆重推荐

罗杰·克劳利以华兹华斯般的同情心记述了威尼斯昔日光荣的巅峰时刻，又加上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识和感染力极强的热情。

——威廉·麦克尼尔，《华尔街日报》

克劳利用生动传神的笔调使海洋战争和围城战跃然纸上。

——《纽约时报》

威尼斯帝国的兴盛和衰落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故事，克劳利是这个故事的完美记录者。

——《金融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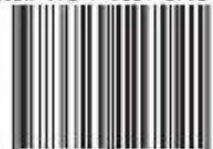
英国历史学家克劳利对威尼斯做了惊心动魄的叙述……一部激动人心的政治和军事史。

——《科克斯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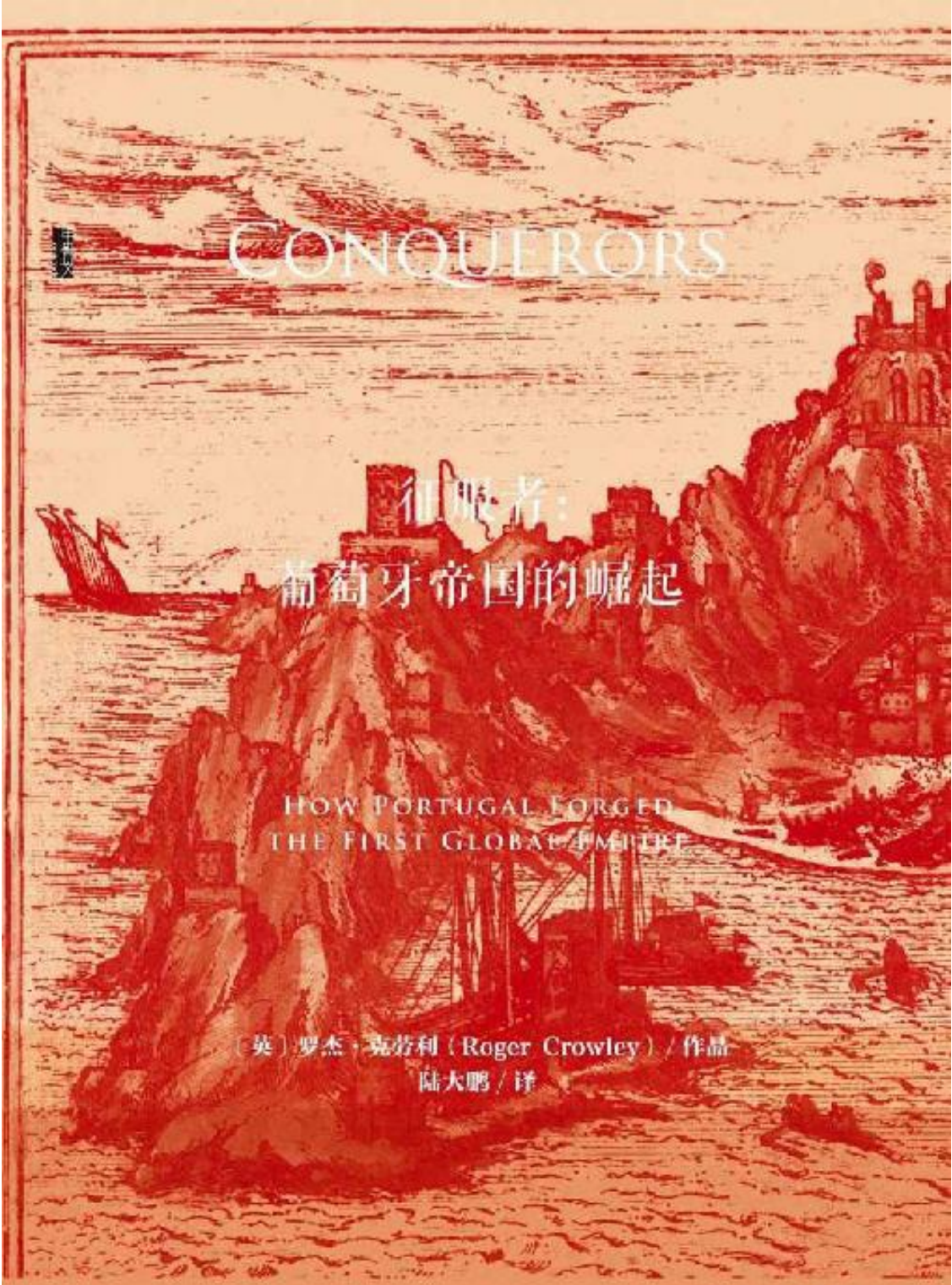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0792-1



9 787520 107921 >

定价：258.00 元（全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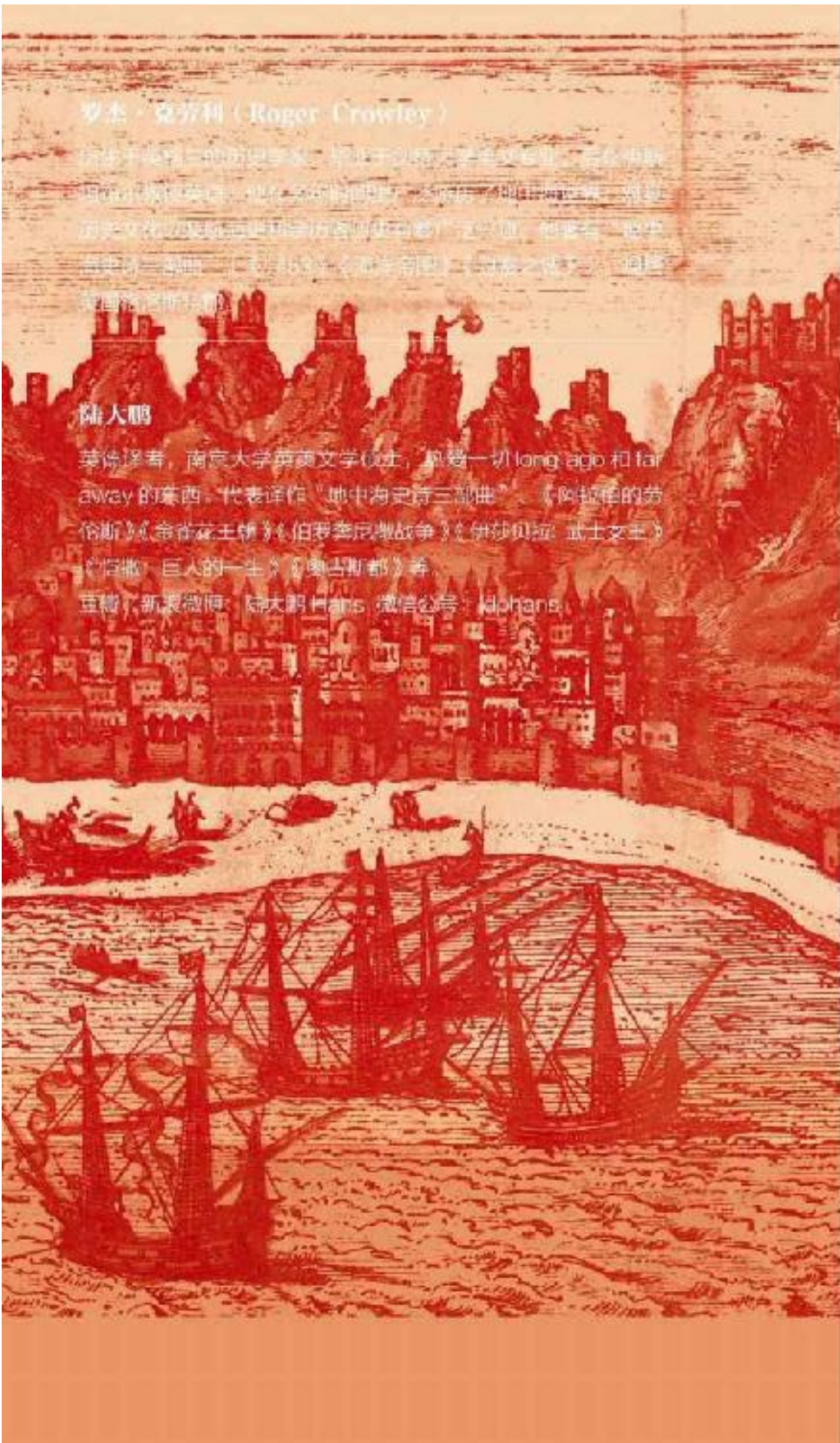
CONQUERORS

征服者： 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HOW PORTUGAL FORGED
THE FIRST GLOBAL EMPIRE

〔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 作品
陆大鹏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RESS BEIJING



罗杰·克劳利 (Roger Crowley)

毕业于牛津的历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专业，曾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在2006年出版了《1571：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大战》一书，因其对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历史都有广泛涉猎，他被誉为“地中海史第一通晓”。《1571：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大战》一书曾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

陆大鹏

英语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long ago和far away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帝雀森王传》《伯罗奔尼撒战争》《伊沙贝拉：武士女王》《恺撒：巨人的一生》《奥古斯都》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Hans，微信公号：HansHans

征服者：葡萄牙 帝国的崛起

[英] 罗杰·克劳利 作品

Roger Crowley

陆大鹏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威尼斯的僧侣兼地图师毛罗修士创作的这幅地图是非凡的艺术品，也囊括了当时最尖端的地理知识。地图用上南下北的方式呈现世界，右上方显示非洲是一块大陆，可经由海路绕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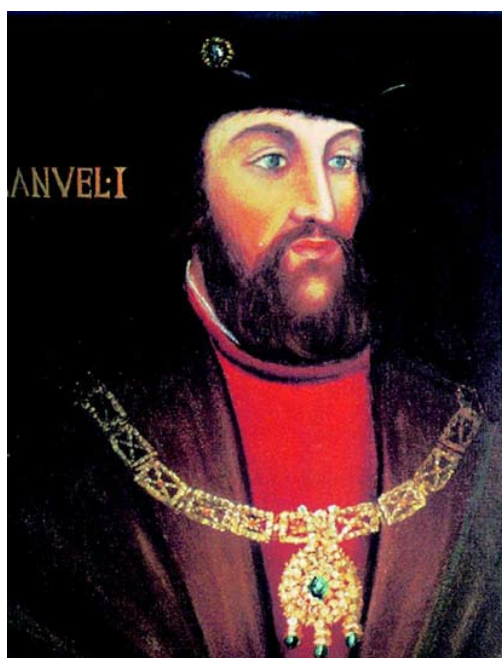
“航海家恩里克”王子是葡萄牙海外探险与殖民事业早期的主要推动者与赞助者



葡萄牙画家**António Manuel da Fonseca**（1796～1890年）创作的**瓦斯科·达伽马肖像**
油画，约1838年



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



葡萄牙国王“幸运的”曼努埃尔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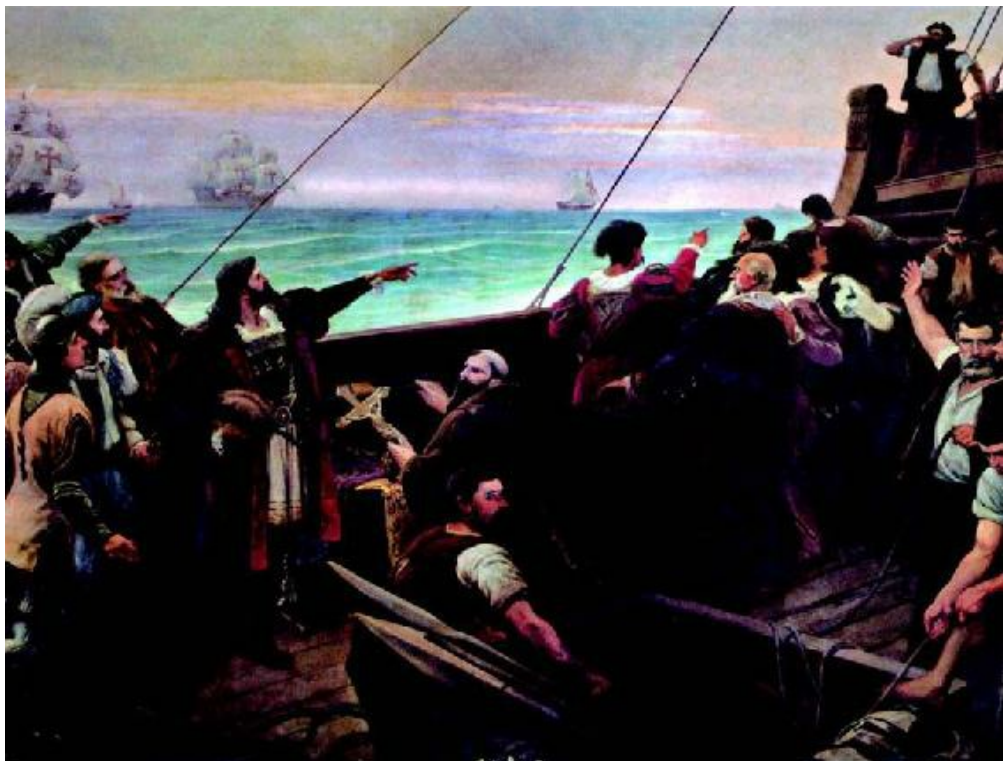
日本人描绘的“南蛮时期”葡萄牙船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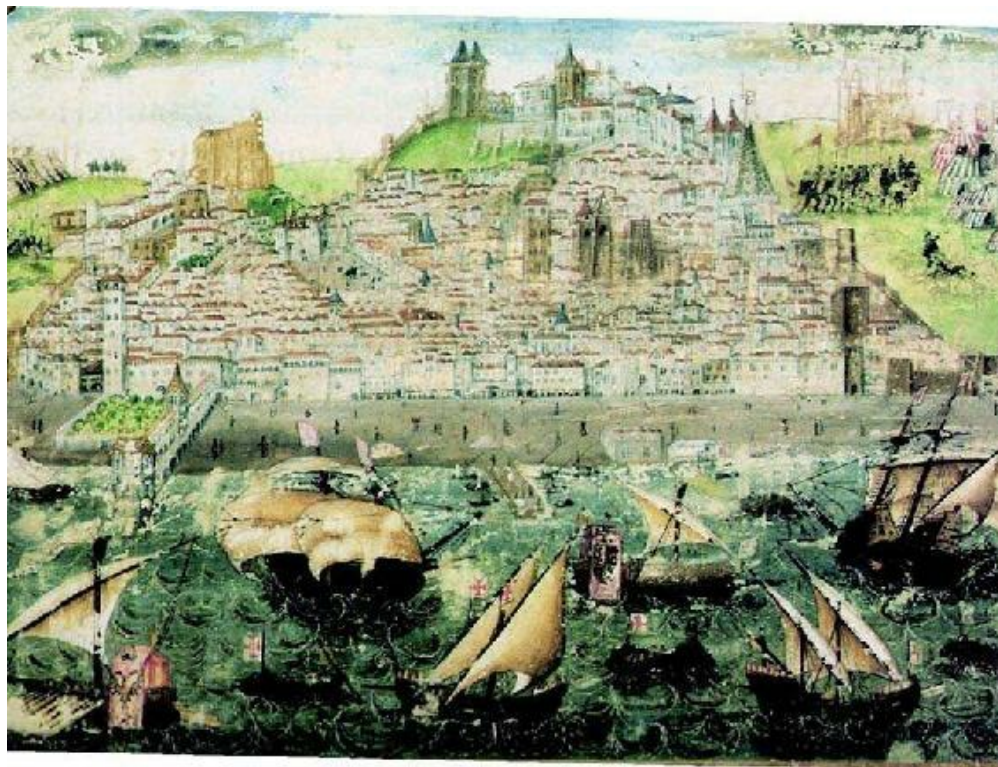
霍尔木兹是古时的战略要冲



达伽马从里斯本启程前往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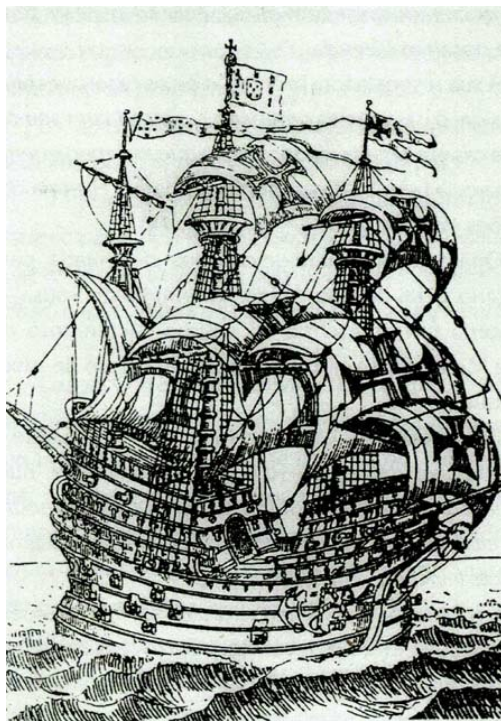


卡布拉尔（中间偏左，手指远方者）于**1500年4月22日**首次发现巴西大陆



现存最早的里斯本图景（约**1500~1510年**），存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一世编年史》

葡萄牙第二次远航印度的舰队，即**1500**年的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舰队



“海洋之花”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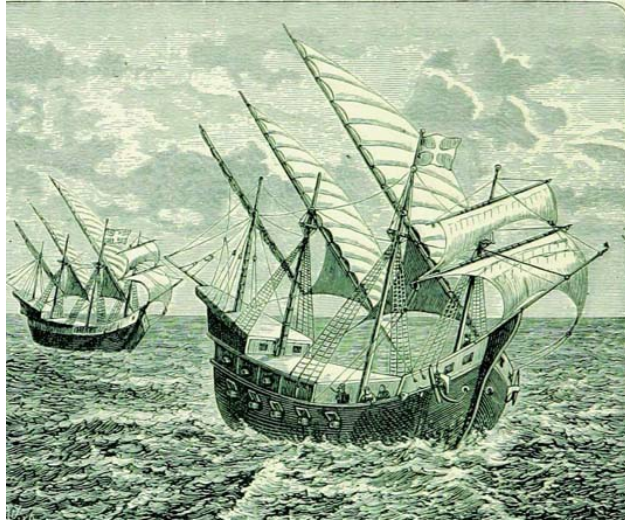
葡萄牙地图绘制师**Lázaro Luis**于**1563**年制作的西非地图。图中表现的是埃尔米纳城堡，在今天的加纳



1565年制作的一幅地图中的一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这种船比卡拉维尔帆船大，但比后来的盖伦帆船小。哥伦布、达伽马和卡布拉尔时代的航海经常使用克拉克帆船



在本书之后的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马拉巴尔海岸的科钦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在前往好望角的途中



杜阿尔特·帕谢科最终战胜扎莫林



1578年，在摩洛哥北部的“三王战役”中，葡萄牙（左侧）大败



Oscar Pereira da Silva（1865～1939年）笔下的卡布拉尔在巴西的真十字架之地首次登陆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肖像



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肖像



葡萄牙画家**Veloso Salgado**（1864～1945年）笔下的扎莫林坐在宝座上



里斯本与塔霍河，**1572**年。有盖伦帆船、克拉克帆船、桨帆船、圆形的卡拉维尔帆

船等



17世纪时日本描绘葡萄牙人的画



达伽马抵达卡利卡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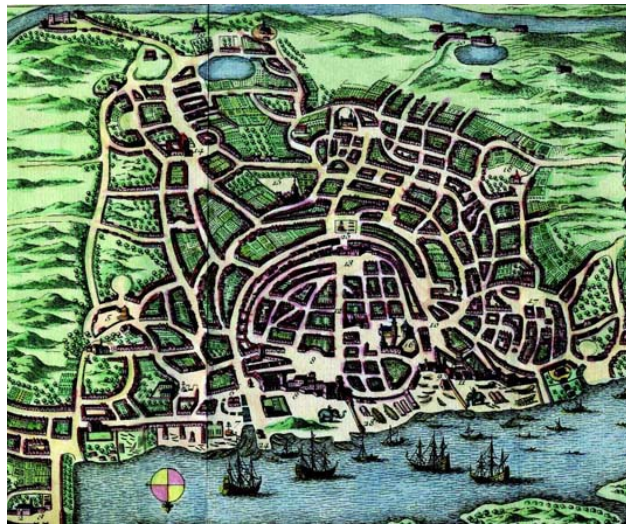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肖像



路易斯·瓦斯·德·卡蒙伊斯，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



佛兰芒艺术家**Theodore de Bry**（1528～1598年）于约1592年创作的雕版画《从里斯本出发去巴西、东印度群岛和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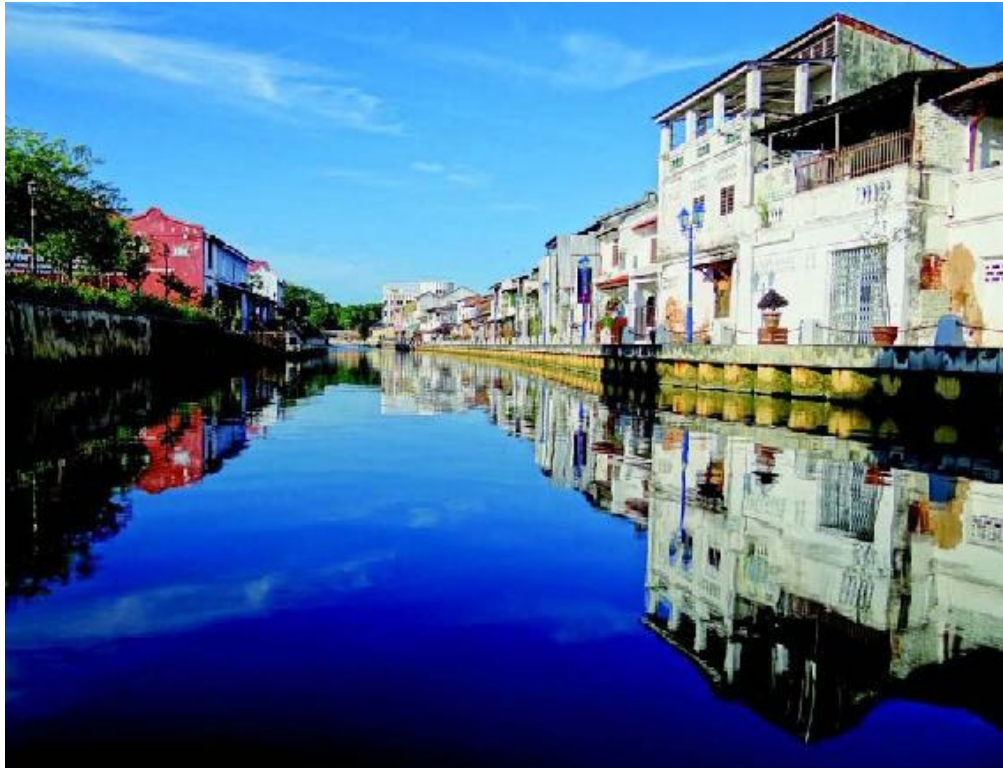
葡萄牙人打败阿迪尔沙阿的军队，征服果阿城。此图描绘了葡萄牙人占据果阿城后的城市景象



葡萄牙画家**Jorge Colaço**（1864～1942年）在波尔图的圣本笃车站创作的瓷砖画，表现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在休达战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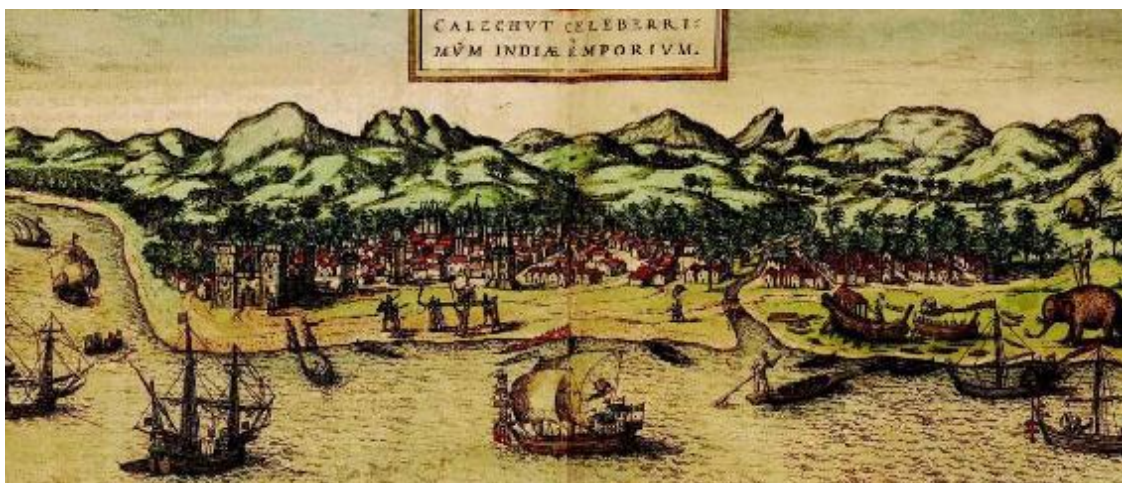
科钦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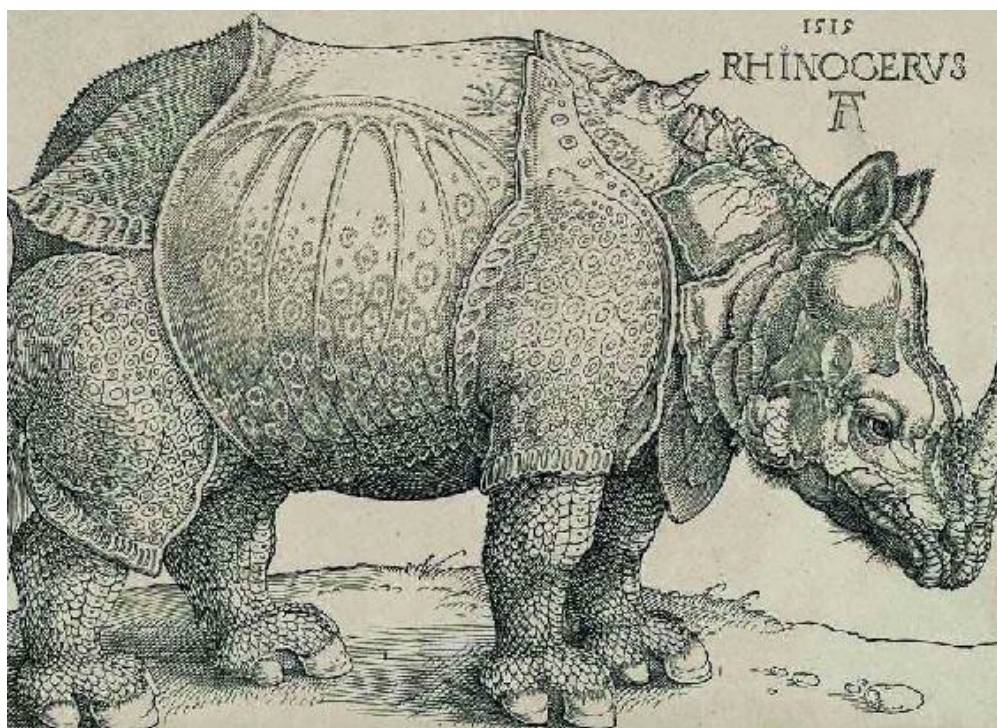
今日的马六甲河



坎纳诺尔的葡萄牙人要塞



十六七世纪德意志人Georg Braun与Frans Hogenberg的地图集*Civitates Orbis Terrarum*中的科泽科德，1572年



丢勒的木刻画犀牛



葡萄牙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



葡萄牙人征服印度时期的士兵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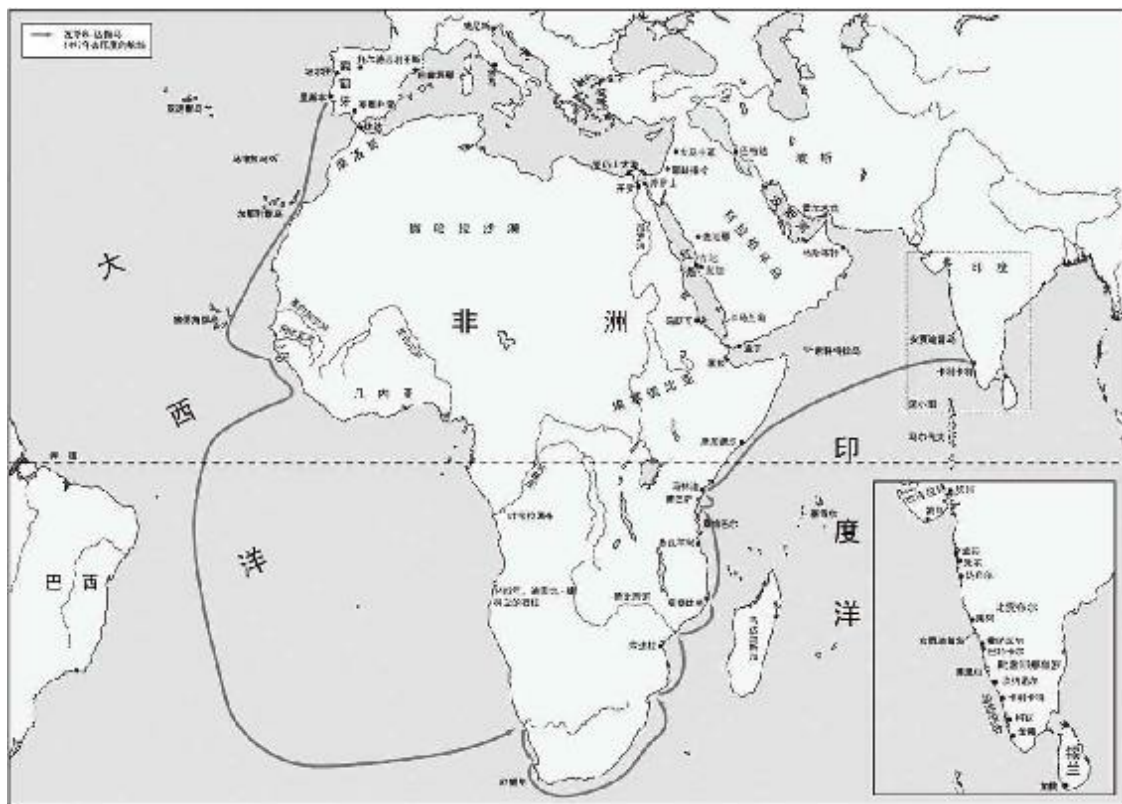


一门后装回旋炮，可能是在印度果阿铸造的。口径**95**毫米，身管**2880**毫米。它被出口到日本，在织田信长时代使用过

有界限的海^[1]，或许属于希腊或罗马；

没有界限的海，属于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2]



从葡萄牙到印度，约1500年



从印度到中国，约1500年

[1] ‘Padrão’, Pessoa, p.59。

[2]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年），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人物和葡萄牙语的最伟大诗人之一，代表作有《惶然录》。他还从英语和法语翻译文学作品。（本书所有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 [序章：欧洲的船头](#)
- [第一部 侦察：通往印度之路 1483～1499年](#)
 - [1 印度计划](#)
 - [2 竞赛](#)
 - [3 瓦斯科·达伽马](#)
 - [4 “让魔鬼把你抓走！”](#)
 - [5 扎莫林](#)
- [第二部 竞争：垄断与圣战 1500～1510年](#)
 - [6 卡布拉尔](#)
 - [7 “米里”号的命运](#)
 - [8 狂怒与复仇](#)
 - [9 立足点](#)
 - [10 印度王国](#)
 - [11 巴比伦大淫妇](#)
 - [12 “恐怖的人”](#)
 - [13 朱尔的三日](#)
 - [14 “法兰克人的狂怒”](#)
 - [15 第乌](#)
- [第三部 征服：海上雄狮 1510～1520年](#)
 - [16 扎莫林的大门](#)
 - [17 “葡萄牙人咬住的，永远不会松口”](#)
 - [18 雨季的囚徒](#)
 - [19 恐怖的手段](#)
 - [20 太阳的眼睛](#)
 - [21 蜡的子弹](#)
 - [22 “全世界的财富，尽在您的掌握”](#)
 - [23 最后的航行](#)
- [尾声：“他们从不在一处停留”](#)
- [致谢](#)
- [参考文献](#)
- [译名对照表](#)

序章：欧洲的船头

1414年9月20日，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头长颈鹿正在接近北京的皇宫。^[1]据欣喜若狂的宫廷诗人沈度说，人们伸长脖颈，去瞥一眼这“麋身马蹄，肉角黦黦，文采焜耀，红云紫雾”^[2]的稀罕动物。长颈鹿显然对人无害：“趾不践物，游必择土……舒舒徐徐，动循矩度……群臣欢庆，争先快睹。”^[3]一个专职照管这动物的孟加拉人牵着长颈鹿前进。它是遥远的东非沿海的马林迪^[4]苏丹进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当时的一幅绘画描摹了这娇美的动物。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怪异也最壮观的远航之一带回的稀罕战利品。15世纪初的三十年里，建立不久的明朝的永乐皇帝派遣了一系列庞大的船队，跨越西方的大洋，以彰显天朝国威。

这些船队规模极大。第一支船队于1405年起航，包括约二百五十艘船，运载两万八千人。船队中央是所谓的“宝船”，即拥有多层甲板和九根桅杆、长440英尺的平底船，并配有创新的水密浮力舱。宝船周围有一大群辅助船只，如运马船、给养船、运兵船、战船和运水船。各船之间通过旗帜、灯笼和鼓点来交流。除了领航员、水手、士兵和辅助工匠外，有译员随行，以便与西方的蛮夷交流，还有负责记载这些航行的史官。船队携带着足够维持一年的粮食，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恩惠。他们还带着指南针和星盘（黑檀木雕刻而成）从马来西亚驶往斯里兰卡，径直穿越印度洋的心脏。宝船被称为星槎^[5]，意思是足以远航至银河。史书记载：“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

衢.....”^{[6][7]}船队司令是一名叫作郑和的穆斯林，他的祖父曾到麦加朝觐^[8]，他本人则享有“三宝太监”的光荣头衔。

这些远航于永乐皇帝在位期间进行了六次，在1431~1433年还有一次。它们是航海的史诗。每一次远航都耗时两三年，纵横印度洋，曾远至婆罗洲和桑给巴尔岛。尽管这些船队有足够的力量清剿海盗、废黜君主或运载货物以开展贸易，但它们不是军事冒险，也没有经济目的，而是精心安排的软实力展示。星槎的远航是非暴力手段，目标是向印度和东非的沿海国家彰显中国的强大实力。他们没有尝试对所到之地实施军事占领，也没有阻挠自由贸易体系。他们是来给予而不是索取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当时的一份碑铭称：“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9][10]}印度洋周边各国大感敬畏，派遣使者与中国船队一同返回，向永乐皇帝称臣纳贡，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对其表达景仰之情。他们奉献给皇帝的珠宝、钻石、象牙和稀奇动物，无非是象征性的姿态，表示承认中国的优越。史书记载：“际天极地，罔不臣妾。”^{[11][12]}此处指的是印度洋世界，不过中国人对印度洋之外的情况也有不少了解。当欧洲人在思索地中海之外的天际、各大洋如何互相连接，以及非洲大陆可能是什么形状时，中国人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些知识。他们于14世纪时绘制的地图将非洲大陆描绘为一个锐角三角形，其中心有一个大湖，另有多条河流向北流淌。

长颈鹿送抵北京之后的那一年，在2.1万海里之外，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力量正在接近非洲海岸。1415年8月，一支葡萄牙船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攻打了摩洛哥的穆斯林港口休达，这是整个地中海最固若金汤、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塞。休达的陷落令欧洲为之震惊。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人口仅有一百万。它的国王们太穷，以至于无力自行铸造金币。渔业和自给农业是经济支柱，但这个穷国却雄心勃勃。若昂一世国王，绰号“私生子若昂”，于1385年夺取王位，建立了阿维斯王朝，并抵御邻国卡斯蒂利亚，捍卫葡萄牙的独立。攻打休达的目的是，用一场融

合中世纪骑士精神和十字军圣战热情的军事行动，消耗掉贵族阶层躁动不安的旺盛精力。葡萄牙人是来用异教徒的血洗手的。他们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自己的使命。三天的洗劫和屠杀将曾被描述为“非洲各城市之花.....它的门户与钥匙”^[13]的休达城化为废墟。这场惊人的战役让欧洲的竞争对手们知道，葡萄牙王国虽小，却自信满怀、精力充沛，而且正在大举出动。

若昂一世的三个儿子，杜阿尔特、佩德罗和恩里克在休达的一天激战之后获得骑士资格。8月24日，在城市的清真寺（根据仪式，用盐净化，并更名为“非洲圣母教堂”）内，他们被父亲封为骑士。对三位年轻王子来说，这是命运的一个重要瞬间。在休达，葡萄牙人第一次瞥见了非洲和东方的财富。这座城市是从塞内加尔河跨越撒哈拉沙漠输送黄金的商队的目的地，也是伊斯兰世界与东印度的香料贸易的最西端贸易站。葡萄牙编年史家写道，全世界的商旅云集于此，他们来自“埃塞俄比亚、亚历山大港、叙利亚、巴巴利^[14]和亚述.....同样有居住在幼发拉底河另一端的东方人，和来自东印度的人.....以及来自轴线另一端的许多其他国度和我们不曾见识其土地的人”^[15]。亲眼见到休达库存的胡椒、丁香和肉桂的基督教征服者们为了寻找埋藏的财宝，恣意销毁了这些香料。他们洗劫了据说有两万四千名商人经营的商铺，横冲直撞地闯入富商那铺着华丽地毯的豪宅，奔入拥有美丽穹顶和铺设地砖的地下蓄水池。“与休达的房屋相比，我们的可怜房子简直像猪圈。”^[16]一位目击者写道。就是在这里，恩里克首先体会到，假如能绕过伊斯兰世界的屏障，沿着非洲海岸南下，并抵达“轴线的另一端”^[17]，将会获得怎样的财富。休达是葡萄牙扩张的开端，也是一个崭新世界的门槛。

天命和幸运使得葡萄牙被排除在繁忙的地中海贸易与思想交流之外。葡萄牙位于欧洲的边缘，文艺复兴的外围，只能羡慕地看着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的财富。这些城市垄断了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如香料、丝绸和珍珠）市场。它们从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等伊斯兰城市获取这

些东方奢侈品，然后以垄断高价卖到欧洲。葡萄牙虽然不能染指地中海贸易，却面向大洋。

在海港拉古什以西20英里处，葡萄牙海岸线的末端是一片怪石嶙峋的海岬，俯瞰大西洋。这就是圣文森特角。这里是欧洲的船首，是欧洲大陆的最西南角。在中世纪时，欧洲人对世界的有把握的认知以此为界。从悬崖上眺望，人们能看到一大片汪洋，并感受到劲吹的海风。海平线向西弯曲，一直延伸到太阳西沉、落入未知黑夜的地方。数千年来，伊比利亚半岛边缘的居民从这条海岸线举目远眺，注视那虚空。天气恶劣时，卷浪长涌，以令人胆寒的猛烈气势锤击峭壁，浪花的顶端随着大洋的长距离节律而颠簸起伏。

阿拉伯人对世界的知识很丰富，但也只到直布罗陀海峡以西不远处为止。他们称这片大海为“黑暗碧海”：神秘、恐怖，可能无边无际。自古以来，这片大海就是无穷无尽的猜测的对象。罗马人知道加那利群岛的存在，那是摩洛哥海岸的一系列破碎岩石。罗马人称它为“幸运群岛”，并从那里开始测量经度，向东推移。往南方去，非洲渐渐消失在传说中，人们对其面积和末端一无所知。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绘制于纸莎草纸和精制皮纸之上的地图里，世界一般被描绘为圆盘状，被海洋环绕。美洲还无人知晓，地球的末端被无法逾越的黑暗之水的障碍分隔。古典时期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对中世纪的影响极其深远，他相信印度洋是封闭的，从欧洲无法走海路进入印度洋。但对葡萄牙人来说，从圣文森特角看到的景象就是他们的机遇。就是在这一线海岸，通过漫长的捕鱼和航行训练期，他们学习到在广阔海洋航行的技艺，以及大西洋风的奥秘。这些知识将赋予他们无与伦比的主宰地位。在休达战役之后，他们开始运用这些知识，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最终决定尝试通过海路抵达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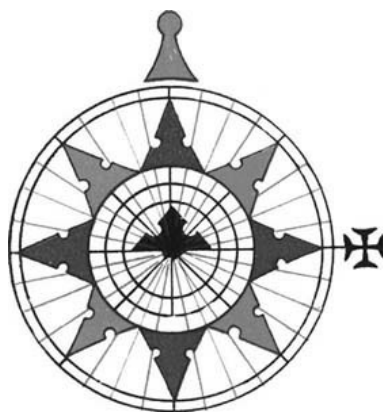
针对北非穆斯林的圣战将与葡萄牙的航海冒险紧密交织。阿维斯王

族于1415年在休达开始崛起，一百六十三年后在休达附近灭亡^[18]，它的发展轨迹是一条对称的弧线。在此期间，葡萄牙人在全世界快速推进，越走越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抵达印度，1500年抵达巴西，1514年来到中国，1543年登陆日本。葡萄牙航海家费尔南·德·麦哲伦帮助西班牙人在1518年之后的岁月里完成首次环球航行。休达战役是所有这些行动的出发点；它是为了发泄宗教、商业和民族主义的激情而秘密筹备的，动力则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仇恨。在远征北非的“圣战”中，好几代葡萄牙征服者首次尝到战火的滋味。在这里，他们学习到，军事扩张的胃口和条件反射式的暴力能够威吓印度洋的各民族，让人数不多的入侵者也能获得极大的影响力。15世纪时，葡萄牙全国人口差不多只相当于南京这么一座中国城市的人口，但它的船队的威慑力远远超过郑和的大船队。

明朝震撼人心的下西洋船队就像登月行动一样先进，代价也同样高昂。每一次航行要消耗全国年赋税收入的一半，而且留下的影响极小，就像月球尘土中的脚印一样。1433年，在第七次下西洋的远航途中，郑和去世了，地点可能是印度海岸的卡利卡特。他的葬礼极可能是海葬。在他身故后，星槎再也没有出海过。中国的政治潮流发生了变化：皇帝们加固长城，闭关锁国。远洋航海被禁止，所有航海档案资料被销毁。1500年，法律规定，建造超过两根桅杆的船只，将被处以极刑。五十年后，寸板不得下海。星槎的技术和郑和的遗体一起，消失在印度洋的波涛中；它们留下了一个等待填充的权力真空。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海岸时，当地人只能告诉他一些模糊不清的故事，讲到蓄着奇怪胡须的神秘访客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船曾经拜访他们的海岸。郑和的远航只留下一座重要的纪念碑：用汉语、泰米尔语和阿拉伯语写的纪念碑铭，分别向佛祖、湿婆和安拉表达感激和赞颂：“比者遗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19]这是非常大方的宗教宽容姿态。碑铭竖立在锡兰（今斯里兰卡）西南角附近的加勒，中国船队在那里转向印度西海岸，然后进入阿拉伯海。

葡萄牙人的到来没有这样的祝福，也不像中国船队那样威武雄壮。郑和的一艘平底船就可以容纳达伽马的那几艘小船和约一百五十名船员。达伽马向一位印度国王呈上的礼物寒酸得可怜，国王甚至拒绝查看。但是，葡萄牙人用自己船帆上的红色十字和船上的铜炮宣示了自己的意图。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葡萄牙人先发制人地开炮，并且再也不会离开。征服是一项滚滚前进的国家大业，一年年地巩固他们的地位，直到他们扎下根来，当地人无法驱逐他们。

加勒的纪念碑至今尚存。它的顶端雕刻着两条中国龙，正在争夺世界。但首先将两大洋连接起来并为世界经济打下基础的，是来自原始欧洲的葡萄牙水手。他们的成就在今天已经大体上被忽视。这是一部范围广泛的史诗，涉及航海、贸易，以及技术、金钱与十字军圣战、政治外交与间谍活动、海战与海难、忍耐、蛮勇和极端暴力。其核心是震撼人心的大约三十年，那就是本书的主题。在这三十年里，少数葡萄牙人在几名非同一般的帝国建设者的领导下，企图摧毁伊斯兰世界，控制整个印度洋和世界贸易。在此过程中，他们建立了一个影响力遍布全球的航海帝国，开启了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瓦斯科·达伽马时代的历史开启了西方扩张的五百年，释放出了如今正塑造我们世界的全球化力量。



[1] 长颈鹿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确是在1414年，但并非来自马林迪，而是榜葛刺

（今孟加拉一带）的贡品（当然应当是榜葛刺从长颈鹿原产地非洲获得的），可能与郑和无关。当时中国人认为长颈鹿就是麒麟。翰林院修撰沈度写了一篇《瑞应麒麟颂》，宫廷画师画下麒麟图像，将《瑞应麒麟颂》抄在图上。马林迪的长颈鹿于1415年送抵中国，可能与郑和有关。永乐帝朱棣于1402年在南京登基，不久之后开始经营北京，修建宫殿，开展各种工程，1420年正式迁都北京。迁都之前，首都虽然还是南京，但北京被作为陪都，地位大大提升。另外，1414年（永乐十二年）和1415年，永乐帝巡幸北京，在北京一直待到1420年，所以接见长颈鹿时他应当在北京。

[2] Sheriff, Abdul. *Dhow Cultures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2010, p.309.

[3] Hall, Richard. *Empires of the Monsoon*. London, 1996, p.84.

[4] 中国古代史料称之为“麻林”。

[5] 费信以通事（翻译）之职，四次随郑和等出使海外诸国，著有《星槎胜览》，采辑二十余年历览风土人物，图写而成，其中称郑和的船只为“星槎”。

[6] 出自《天妃灵应之记》碑，又称《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俗称“郑和碑”。大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寄泊福建长乐以等候季风开洋，镌嵌《天妃灵应之记》碑于南山宫殿中。全文共1177字，记述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年），郑和统率远洋舰队百余艘，以先进的航海技术七次下西洋的经历。

[7] Hall, Richard. *Empires of the Monsoon*. London, 1996, p.81.

[8] 郑和的祖父和父亲曾去麦加朝觐，因此获得“哈只”（对去过麦加圣地的朝觐者的尊称）的称号。

[9] 出自《天妃灵应之记》碑。

[10] Ferguson, Niall.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2011, p.32.

[11] 出自《天妃灵应之记》碑。

[12] Sheriff, Abdul. *Dhow Cultures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2010, p.297.

[13] Diffie, Bailey W., and George D. Wini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Minneapolis, 1977, p.53.

[14] 欧洲人称为巴巴利而阿拉伯人称为马格里布的地区，即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

[15] Diffie, Bailey W., and George D. Win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Minneapolis, 1977, p.53.

[16] Rogerson, Barnaby. *The Last Crusaders: East, West and the Battle for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London, 2010, p.287.

[17] Diffie, Bailey W., and George D. Win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Minneapolis, 1977, p.53.

[18] 1578年，在摩洛哥北部的“三王战役”中，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及其盟友，被废黜的摩洛哥苏丹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二世）与摩洛哥苏丹马利克一世交战，葡军惨败，塞巴斯蒂昂丧命。葡萄牙迅速衰落，1581年被西班牙吞并。

[19] <http://www.ceylontoday.lk/64-75733-news-detail-galles-fascinating-museums.html>.

第一部 侦察：通往印度之路 1483～1499年



1 印度计划

1483～1486年

南纬13°25'7"，东经12°32'0"

1483年8月，在今天的安哥拉海岸的一处海岬，一群饱经风霜的水手将一根石柱竖立起来。石柱高5.5英尺，顶端有一个铁制十字架，用熔化的铅固定在石柱的一个槽内。圆柱形石柱的顶端被做成立方体，其表面雕刻着一个盾形纹章和一句葡萄牙语铭文：

自创世起第6681年，自我主耶稣基督降生以来第1482年，最高贵、卓越和强大的君主，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派遣他的宫廷绅士迪奥戈·康，发现了这片土地，并竖立这些石柱。[\[1\]](#)



这根石柱标志着迪奥戈·康沿着西非海岸南下之旅的终点。它于**1486年1月**被竖立在纳米比亚的十字架角，后来在**1893年**被运往柏林

这座纪念碑，相对于庞大的非洲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痕迹，但标志着欧洲探险家在地中海沿海之外向南前进最远的极限。它既是宣示占有的不谦逊的举措，也是向南传递的接力棒，象征着葡萄牙人一个海岬又一个海岬，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寻找通往印度的海路。它宣示了自己关涉时间、归属和宗教使命的神话。康奉御旨南下的途中，竖立了一连串这样的石碑。它们可能是于一年前在里斯本附近林木青翠的辛特拉山区雕刻的，所以时间有点错误。它们被一艘在海浪中颠簸的卡拉维尔帆船^[2]运载了4000海里。它们自有深切的用意，如同即将参加登月探险

的飞船带着美国国旗一样。康从这根石柱的所在地向南眺望，海岸似乎在向东弯曲。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非洲的末端。通往印度的道路已经在视野之内了。

如同“阿波罗”号登月探险，这个时刻背后是数十载的努力。在休达战役之后，恩里克王子（他永垂青史，享有“航海家恩里克”的美名）开始出资赞助沿着非洲海岸南下的探险活动，以寻找奴隶、黄金和香料。一年又一年，一个又一个海岬，葡萄牙航海船沿着西非向西南方倾斜的突出部，艰难跋涉，小心翼翼地用铅垂线测量水深，始终对浅滩和礁石（大海越过它们，掀起惊涛骇浪）保持警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渐摸清了非洲大陆的形态：毛里塔尼亚的荒芜沙漠，他们所称的几内亚（意思是“黑人的土地”）地区植被繁茂葱茏的热带海岸，以及非洲赤道地区（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奔流大河。在恩里克的领导下，葡萄牙人一边进行探索、袭掠和贸易，一边也调查研究当地民族学情况并绘制地图。他们所发现的每一个海角和海湾都被标记在海图上，用基督教圣徒的名字或当地明显的特征或事件来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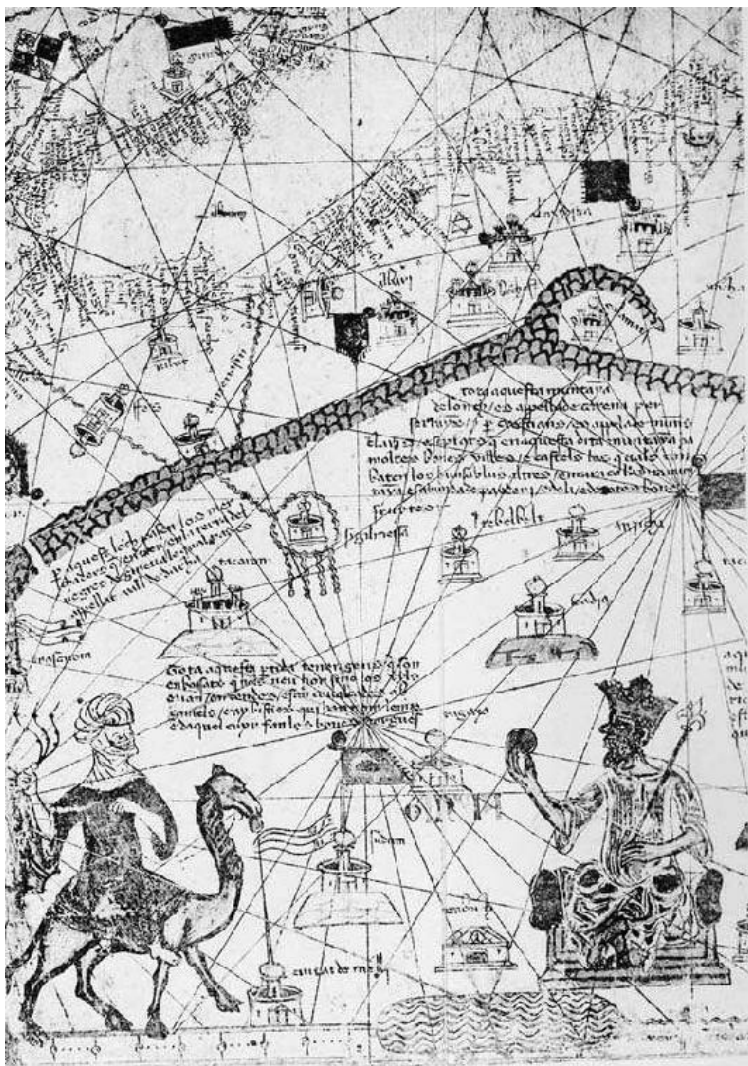
这些探险的规模都不大。只有两三艘船，由恩里克宫廷的一名绅士指挥，不过航海和船上的管理工作则由一名经验丰富、通常默默无闻的领航员负责。每艘船都载有一些士兵，他们会在接近未知海岸的时候端着弩弓严阵以待。这些船只，即卡拉维尔帆船，是葡萄牙人对之前旧船型（可能源自阿拉伯世界）的改良。它们配有三角帆，因此可以抢风航行，这在退离几内亚海岸时非常有帮助；而且它们吃水浅，非常适合探索海湾上游。它们尺寸虽小（长不到80英尺，宽20英尺），但非常适合进行探险活动。不过，它们的船舱空间很小，能携带的给养不多，所以长途航海是极大的考验。

恩里克的动机是很复杂的。葡萄牙是个贫穷小国，被排挤在欧洲事务之外，被强大的邻国卡斯蒂利亚包围和压制。在休达，葡萄牙人瞥见

了另一个世界。恩里克及其后继者希望获得非洲的黄金资源，掳掠奴隶和香料。马略卡岛的犹太地图师绘制的中世纪地图对他产生了影响。在这些地图上，闪闪发光的河流通往传说中曼萨·穆萨（“万王之王”）的王国，他在14世纪初统治着马里王国，控制着传奇的塞内加尔河的金矿。地图显示，有些河流纵横穿越整个大陆，并且与尼罗河相连。这让人胸中不禁燃起希望，或许可以通过非洲大陆的内部水道穿过非洲内陆。

葡萄牙王室向教皇建议开展这样的航行计划，将其描绘为十字军圣战，与伊斯兰世界的继续斗争。早在邻国卡斯蒂利亚之前许久，葡萄牙人就已成功地将阿拉伯人从自己的领土驱逐出去，并建立了一种早熟的民族认同。但是，他们对圣战的胃口还很大。阿维斯王族以天主教君主的身分，作为基督的战士，在欧洲舞台寻求合法性以及与列强平起平坐。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欧洲人觉得自己越来越受到咄咄逼人的伊斯兰世界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阿维斯王族从教皇那里获得了精神和财政上的妥协，并且得到授权，以基督的名义占有他们探索的陌生土地。罗马发布的十字军圣战的命令是“入侵、搜索、捕获、战胜和征服所有撒拉森人^[3]和形形色色的异教徒，以及基督的其他敌人……并将其永久奴役”。^[4]

他们也受到了建功立业的欲望的驱动。恩里克及其兄弟有一半英格兰血统，他们的母亲是兰开斯特的菲利帕，即爱德华三世的孙女。他们的表兄是亨利五世，阿金库尔战役^[5]的胜利者。骑士精神的气氛受到他们的盎格鲁-诺曼祖先和中世纪传奇故事的渲染，在葡萄牙宫廷影响极大，给躁动不安的葡萄牙贵族注入了一种干劲十足、富有活力的骄傲而鲁莽的勇气和对荣耀的渴望，再加上十字军圣战的热情。这群贵族，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显贵”（fidalgo），字面意思是“大人物的儿子”，遵照一种荣誉法则来生活、战斗和死亡，而且这种法则将伴随葡萄牙人走遍世界。



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绘制于马略卡岛）细部，图中曼萨·穆萨拿着金块，北方是神话中的黄金河、北非海岸与西班牙南部

在非洲计划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积极进取的基督教梦想：绕过伊斯兰世界，因为它阻挡了从欧洲通往耶路撒冷和东方财富的道路。有些地图上描绘了一位威风凛凛、富有帝王威仪的人物，身穿红袍，头戴主教冠，宝座是亮闪闪的黄金。那就是传说中的基督教祭司王约翰。他的神话可以上溯到中世纪早期。欧洲人相信，有一位非常强大的基督教君主，他居住在伊斯兰世界构成的障碍之外远方的某地。西方基督教世界或许可以与他联手，消灭异教徒。这个神话源自旅行者的故事、文学虚构（12世纪有人捏造了一封所谓的来自这位伟大国王的书信）和模

糊的知识（即认为欧洲之外存在基督徒）。中亚有聂斯脱利派^[6]，东印度有圣多马的追随者^[7]，埃塞俄比亚高原有一个古老的基督教王国。传说祭司王约翰统率着庞大的军队，富得流油。据14世纪时的一份史料记载，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强大，也更富裕，拥有不计其数的金银和宝石”。^[8]他的宫殿的屋顶和内壁都由金砖砌成，他麾下军队的兵器也是金的。到15世纪时，祭司王约翰的形象被认为就是埃塞俄比亚某些真实的基督教国王。有地图表明，通过穿越非洲中心的河流，就可以抵达他的王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海市蜃楼将会对葡萄牙人的想象力和战略构成极大的吸引力。

地图；旅行者的故事；关于深入非洲心脏的大河的混乱图像；关于黄金的不可思议的传闻；关于强大的基督教统治者的传说，欧洲人或许可以与他们结盟，共同反对伊斯兰世界：这些旋涡般的半真半假的故事、异想天开和错误的地理知识，渗入了葡萄牙人的世界观。就是这些东西，引诱他们沿着非洲海岸不断南下，寻找黄金河或能够带他们到祭司王约翰那里的河流。在满怀探索精神的葡萄牙水手眼中，每一个海湾、每一条河流似乎都充满了希望。但沿海岸南下的推进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让登陆充满危险，与当地人的关系也总是高度紧张的。他们在河流入海口遇到过硕大无朋的潟湖、蜿蜒曲折的红树林沼泽地，当然也有浓雾、无风天气以及猛烈的赤道暴雨。热病让水手们损失惨重。在几内亚湾，当地反复无常的风向和从东向西的强劲海流严重阻碍了葡萄牙人的前进步伐，但在很长时间里，向东延伸的海岸线激励着他们继续前进。渐渐地，他们产生了一种信念，即他们正在一点一点接近非洲最南端，通往印度财富的道路或许是海路而非内河。但非洲大陆的面积相当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五十倍，它的形状和规模让他们困扰和迷惑了差不多八十年。

绕过伊斯兰世界对欧洲的遏制的想法，既是经济方面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为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民族直接开展商贸，寻找黄金或

许还有香料的来源——受到马里国王控制着大量黄金的印象的驱策——是一种莫大的诱惑。与祭司王约翰及其神秘的军队连成一片，从伊斯兰世界背后发起攻击，同样也很有吸引力。恩里克去世后，葡萄牙人的努力松懈了一段时间，直到15世纪70年代恩里克的侄孙若昂王子再度推动航海探险事业。1481年，若昂登基为王^[9]之后，非洲计划得到了新的推动力。

若昂二世黑须、长脸，身材挺拔健壮，表情有些忧郁，加之“风度非常严肃和不怒而威，所有人都一下子看到他的人君之风”，^[10]他“惯于号令天下，任何人都不能对他发号施令”。^[11]他或许是现代早期最有意思的欧洲君主。对葡萄牙人来说，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称号是“完美君王”。他的竞争对手伊莎贝拉（卡斯蒂利亚女王，后来成为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的女王）给了他最终极的嘉许。她简单地将他称为“那个男子汉”^[12]。若昂二世专注于“建立伟大功勋的深切欲望”，^[13]他着手去做的第一件伟大功业就是探索非洲。在登基后，他启动了长达五年的由国家出资的大规模探索活动，并希望达成两个目标：找到通往东印度的道路，以及找到传说中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他把这些任务托付给了在西非海岸竖立许多石柱的迪奥戈·康。



若昂二世，“完美君王”

然而，到15世纪80年代时，里斯本的码头区在流传其他的理论，称前往东印度或许还有另一条路。里斯本城是探索的前沿，是测试关于世

界的各种观念的实验室。在欧洲各地，天文学家、科学家、地图师和商人都指望从葡萄牙获得关于非洲形状的最新信息。犹太数学家、热那亚商人和德意志地图师被吸引到葡萄牙熙熙攘攘的街巷，从塔霍河的入海口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洋，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就从那里返回，运回黑奴、色彩鲜艳的鹦鹉、胡椒和手绘地图。若昂二世对航海的兴趣引发了一个科学委员会的问世，该委员会将利用所有这些知识资源。有一位知识分子是若泽·维齐尔尼奥，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犹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亚伯拉罕·萨库托的弟子；还有德意志人马丁·倍海姆，此人后来发明了地球仪的原型。为了科学探索，这两人都乘坐葡萄牙船只，以便观测太阳。

1483年夏季，康在一点一点地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摸索的同时，热那亚冒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班牙人称他为克里斯托瓦尔·科隆）来到里斯本宫廷，提出了抵达东印度的一种新方案。若昂二世已经知道他的方案了。十年前，他收到了著名的佛罗伦萨数学家和宇宙学家保罗·托斯卡内利的一封信和一张地图。托斯卡内利提出，“从此地前往印度，即香料国度，有一条海路；这条海路的距离比通过几内亚要短”。^[14]他的推断是，因为地球是圆球形的，所以无论往东还是往西航行，都有可能抵达东印度，而向西航行的距离更短。除了此时尚无人知晓的美洲的“无形”障碍之外，托斯卡内利还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对地球的圆周长估算过低。然而，在该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国家争夺世界的竞赛越演越烈，所以这封信和这张地图注定要成为重要的因素。哥伦布知道托斯卡内利的信的内容，或者拥有这封信的一个副本。现在他大胆地求见若昂二世，要求国王给他足够的资源，尝试一下。国王十分开明。他将极度自信的哥伦布的提议转交给他的学者与数学家委员会斟酌，并等待康归来。

康于次年，即1484年4月初返回了里斯本，带回了关于非洲海岸向东延伸的报告。若昂二世仔细地询问了他的探险家，对结果非常满意，

赏赐给他一大笔年金，并封他为贵族，允许他使用国王的纹章。康选择的纹章图案是两根石柱，顶端有十字架。对若昂二世来说，东印度已经近在咫尺，显然只要再来一次远航就足够了。

康的报告意味着，哥伦布的希望破碎了。他的谈吐风格和数学计算都被认为是错误的。若昂二世的委员会判断，哥伦布在托斯卡内利的基础上错上加错，严重低估了地球的尺寸：按照他对去往东印度距离的估算，他把地球的尺寸缩小了25%。而他那种自信满怀、不容置疑的傲慢模样也让人难以忍受，再加上他大言不惭地要求赏赐，更是让人不悦。“因为国王看到哥伦布夸夸其谈，并且非常傲慢地吹嘘自己的本领，并且对日本岛（的位置）完全是异想天开，所以对他没有多少信任，”^[15]葡萄牙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记载道，“于是他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国王，前往西班牙，在那里兜售他的计划。”哥伦布开始游说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利用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的竞争关系，来鼓吹自己的宏图大略。

与此同时，若昂二世对成功自信满怀。1485年5月或6月，康在马丁·倍海姆的陪伴下，携带着更多石柱再度出航，打算将石柱竖立在非洲的最南端。几个月后，葡萄牙国王向全世界宣布，他的水手已经接近了最终的突破。11月，他的演说家瓦斯科·费尔南德斯·德·卢塞纳起草了国王给新教皇英诺森八世的书信，其中充满了民族主义宣传和圣战的浮夸言辞。他谈到了祭司王约翰以及

阿拉伯海周边那些居住在亚洲的王国和民族，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但它们极有可能虔诚地信奉我们救世主的神圣宗教。如果最渊博的地理学家的阐述是正确的，那么葡萄牙航海家距离这些王国和民族已经只有几天的航程了。我们的人探索了非洲海岸的大部分，在去年接近了普拉苏斯海岬（非洲的最南端），阿拉伯海就从那里开始。从里斯本出发，4500英里的范围内，我们探索了所有河流、海岸和港口，最为一丝不苟地观察了海洋、陆地和星辰。在探索该地区之后，我们将发现数额巨大的财富和无上的荣光，它们属于所有基督徒，尤其属于您，我们的圣父。^[16]

卢塞纳随后引用了《诗篇》第72章：“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17]这里的大河指的是约旦河，而在若昂二世越来越膨胀的全球视野中，它完全也可以代表塔霍河。

然而，就在卢塞纳慷慨陈词的同时，国王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数千英里之外，康发现，海岸线向东延伸只是个幻觉，那只不过是一个大海湾，海岸线很快又继续向南延伸，似乎无穷无尽。这年秋季，他在南方160英里处的一个海岬竖立了又一根石柱；海岸的景致逐渐从热带森林变成低矮荒芜的沙丘、稀疏的植被和半荒漠。1486年1月，康的耐力到了极限，此时他抵达了现代纳米比亚的一个地方，他称之为“十字架角”。他在那里竖立了他的最后一根石柱，周围是一大群海豹在黑色礁石上晒太阳。非洲似乎会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康在这个时刻从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要么在归途中丧命，要么返回了里斯本，但若昂二世因为自己公开鼓吹的胜利化为泡影而恼羞成怒，对康大肆羞辱，让他从此默默无闻。

不管康的最终命运如何，他为地图增添了新的1450英里海岸线。葡萄牙人似乎不知疲倦，吃苦耐劳，而且愿意驱使自己奔向已知世界的边缘，乘坐他们那灵敏的卡拉维尔帆船翻越惊涛骇浪，或者探索西非的奔流大川，以寻找那捉摸不定的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以及通向尼罗河的内陆航道。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他们死于船只倾覆、疟疾、毒箭和孤寂，留下了少量痕迹，否则历史会将他们彻底遗忘。



叶拉拉瀑布岩壁上的主要铭文

康奋斗过程的最震撼人心的纪念物，位于刚果河上游的叶拉拉瀑布。乘帆船或划桨船抵达此处的人，必然要从海口逆流而上100英里，途经红树林沼泽和植被茂密的河岸。随着他们的前进，水流也越来越强劲，直到他们抵达一处怪石嶙峋的峡谷，看见声若雷霆的瀑布，巨大的激流就这样从非洲的心脏喷涌而出。他们的船只再也不能前进，于是他们丢下船，攀爬岩石，前进了10英里，希望找到可供通航的上游水道，但接连不断的湍流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在那高高耸立于震耳欲聋的激流之上的岩壁的表面，他们留下了一幅雕刻，这是另一种类型的纪念碑。他们刻下了若昂二世国王的纹章、十字架和几句话：“伟大的君主，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国王的船只抵达此地，水手有迪奥戈·康、佩德罗·阿内斯、佩德罗·达·科斯塔、阿尔瓦罗·皮里斯、佩罗·埃斯科拉·A.....”右下角是另一个人刻下的其他姓名：“若昂·德·圣地亚哥、迪奥戈·皮涅罗、贡萨洛·阿尔瓦雷斯，病号有若昂·阿尔瓦雷斯.....”^[18]另一个地方则只刻下了一个教名：“安塔姆”（“安东尼”之意）。

所有这些铭文都断裂了，刻下这些文字的具体情况也模糊不清，仿佛极地探险家日记的最后一段。铭文显示了船长们的名字——迪奥戈·康和其他刻在十字架旁边的人名——但这些指挥官可能并不曾真正到场。康可能是派人进行了一次探索，以检查刚果河的适航性；第二批名字可能就是真正执行任务的人。两批铭文都不完整，仿佛在同时被打断

了。显然有人患病或死亡，可能是因疟疾而死。他们是因为太虚弱而无力继续铭刻了吗？他们是在岩石上雕刻的时候遭到了突然袭击吗？不寻常的是，铭文没有留下日期，也没有当时的史料记载此次探险。直到探险家于1911年发现这些铭文，世人才知晓此事。

葡萄牙人的观念——存在横跨非洲的水道或陆路——受到古代地理学家推测的鼓舞，以及中世纪地图师带有黄金的书页的诱惑，所以生生不息，延续许久。这些信念——西非的大河与尼罗河相连；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就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而他们错误估计了非洲大陆的整个宽度——使得葡萄牙人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坚持不懈而满腹困惑地努力。若昂二世派遣了多个代表团，走陆路去搜寻信息和黄金，建立葡萄牙的威望。葡萄牙人还开展了多次类似刚果河探索的行动。卡拉维尔帆船在塞内加尔河逆流而上500英里，但止步于费卢的激流。一次类似的内河探险在冈比亚的巴拉昆达瀑布受阻，若昂二世派遣工程师去摧毁河床的岩石，但任务太过艰巨，他们未能成功。与此同时，王室的仆人和侍从徒步进入内陆。小群探险家穿越了毛里塔尼亚沙漠，抵达瓦丹^[19]和廷巴克图^[20]；他们来到齐洛夫人和图库洛尔人的国度；他们来到尼日尔河上游他们称为曼迪·曼萨的曼丁哥人国王那里。有些探险家带回了关于王国和贸易路线的报告，有些人则彻底消失了。

但若昂二世既不畏惧冈比亚和刚果的顽固激流，也不怕依然持续延伸的非洲海岸，更不用担心找不到半神话的基督教国王的国度。他那印度计划的规模、一贯性和坚忍不拔，一直令人惊叹。1486年，当他的地理学家委员会在里斯本更加专注地审视歪曲事实的世界地图时，哥伦布则正在游说西班牙君主支持他的西进路线，若昂二世国王只是加强了他的努力。同年，“发现”（descobrimento）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葡萄牙文书写材料中。

^[1] <http://www.socgeografialisboa.pt/en/coleccoes/areas->

geograficas/portugal/2009/08/05/padrao-de-santo-agostinho.

[2] 卡拉维尔帆船是15世纪时盛行的一种三桅帆船，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普遍用它来进行海上探险。

[3] 这是基督教世界对阿拉伯人的称呼。

[4] The Bull *Romanus Pontifex* (Nicholas V) , 8 January 1455, in <http://www.nativeweb.org/pages/legal/indig-romanus-pontifex.html>.

[5] 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10月25日，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在英王亨利五世的率领下，以步兵弓箭手为主力的英军在法国的阿金库尔击溃了由大批贵族骑士组成的法军，为随后在1419年收复整个诺曼底奠定了基础。这场战役成了英国长弓手最辉煌的胜利，在战争史上影响深远。此役还成为后世大量文艺影视作品的主题，包括莎士比亚的名剧《亨利五世》。

[6] 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早期的一个异端派别，得名自其倡导者聂斯脱利（386～450年，曾任君士坦丁堡牧首），认为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开（后来的正统基督教认为耶稣只有一个性，神性与人性是融合的）。聂斯脱利派在罗马帝国遭到镇压，后传入波斯和东方。聂斯脱利派是唐代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一个基督教派别，汉译名称为景教。

[7] 圣多马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据说在罗马帝国范围之外传福音，于公元52年抵达印度，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组织。

[8] Russell, Peter.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A Life*. New Haven, 2000, p.122.

[9] 史称若昂二世。

[10] Fonseca, Luí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 2005, p.179.

[11] Fonseca, Luí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 2005, p.181.

[12] 原文是El Hombre，字面意思是“那个男人”。也有的说法称，伊莎贝拉女王憎恶若昂二世残暴，所以鄙夷地称他为“那个男人”，而不说他的名字。

[13] Fonseca, Luí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 2005, p.181.

[14] letter from Toscanelli to Fernam Martins, canon of Lisbon, 25 June 1474, in http://cartographic-images.net/Cartographic/Images/252_Toscanellis_World_Map.html.

[15] Garcia, José Manuel. *D.João II vs. Colombo*. Vila do Conde, 2012, p.67.

[16] Garcia, José Manuel. *D.João II vs. Colombo*. Vila do Conde, 2012, p.69.

[17] Psalm 72: 8.

[18] Winius, George D., ed. *Portugal, the Pathfinder: Journeys from the Medieval Toward the Modern World, 1300-c. 1600*. Madison, 1995, p.97.

[19] 瓦丹位于今天毛里塔尼亚中部，如今是世界文化遗产地。

[20] 廷巴克图位于今天的马里共和国（西非），12世纪兴起，一度是重要的贸易城市，非常繁华，在其黄金时代有许多伊斯兰学者居住于此，因此成为非洲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中心。

2 竞赛

1486~1495年

里斯本的圣乔治城堡坐落于一个崎岖的海岬之上，视野极佳，可以远眺塔霍河。城堡收藏的宝物包括一张豪华版的世界地图。它是若昂二世国王的父亲阿方索五世三十年前聘请威尼斯的一位僧侣地图师绘制的，目的是囊括当时最尖端的地理知识。

毛罗修士创作了一幅非同小可的艺术品，极其详尽，饰有金叶、波浪起伏的蔚蓝大海和带有锯齿形城堞的城市的图像，熠熠生辉。它就像一张巨大的圆盾，宽10英尺，根据阿拉伯传统，上南下北。它展示了任何欧洲人制作的地图都不曾表现的东西：它将非洲描绘为一块独立的大陆，其南部有一个海角，他称之为迪亚布角。尽管非洲的形状被严重扭曲，而且很多细节因为若昂二世时期的发现已经显得过时，但毛罗修士努力根据他掌握的证据来创作。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关系历史悠久，因此威尼斯是关于欧洲之外世界的信息与旅行者故事的交换中心。

除了图像，地图还配有数百条用红色或蓝色墨水写的文字评论，信息主要来自马可·波罗的耳闻目睹，一位名叫尼科洛·达·孔蒂^[1]的15世纪旅行家的记述，以及“葡萄牙人执行或筹划的所有新发现的信息”。^[2]“很多人认为，并且写道，海洋并没有环绕我们整个可居住的陆地和南方的温带，”毛罗在他的地图上写道，“但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撑相反的观点，尤其是葡萄牙人的证据，他们的国王派遣他们乘坐卡拉维尔帆船，去亲眼查看真相。”他特别提到香料群岛和印度洋各港口（葡萄牙人特别对其感兴趣），并直截了当地反对托勒密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印度洋是一片封闭的海洋。毛罗相信存在一条从欧洲通往东印度的海路，他给出的证据包括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对这样一次航行的记

载，以及一个关于中国平底帆船环绕非洲航行的故事（可能是孔蒂讲述的）。

毛罗修士的地图以视觉形式表达了葡萄牙人寻找通往东印度海路的雄心壮志。它也突出了欧洲人是多么无知。世界从来不曾如此分裂过。欧洲人在中世纪与东方的接触比罗马帝国时期少得多。马可·波罗曾徒步和骑马，取道蒙古人控制下的丝绸之路，然后乘坐中国平底帆船渡过印度洋。他的记述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因为到15世纪时，欧洲与东方的几乎所有直接联系都被切断了。蒙古帝国已经土崩瓦解，远途陆路贸易路线由此消失；在中国，新朝代明朝在宝船的伟大远航之后，产生了仇外心理，封闭了自己的边境。除了孔蒂的报告之外，欧洲人对东方的几乎所有知识都还是差不多两百年前留下的。伊斯兰世界把基督教欧洲封堵起来。奥斯曼人攻入了欧洲，封锁了欧洲去往东方的陆路。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3]控制着令人垂涎的东方财富，通过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以高额垄断价格兜售东方商品。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从马穆鲁克王朝那里购买香料、丝绸和珍珠，但对于这些东方奢侈品的来源，只有一些含混不清的传言。

康企图绕过非洲之举的失败并没有让若昂二世灰心丧气，他继续坚持。他探索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不会轻易排除任何可能性。两名僧人奉他的御旨，在地中海各地搜寻关于东方祭司王约翰的信息。关于哥伦布提议的西进路线，若昂二世也下了赌注。他雇用一名叫作费尔南·德·乌尔默的佛兰芒冒险家，授权他自费率领两艘卡拉维尔帆船向西航行四十天，允许他占据他发现的任何土地，王室提成其全部收入的10%。也就是说，国王认为西进路线主要是推测，可能性不大，但他又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于是将这项冒险事业承包给了私人。看起来乌尔默似乎没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两名僧人也因为不懂阿拉伯语，在耶路撒冷被拦回来。若昂二世无所畏惧，继续努力尝试。

国王在自己身边聚集了新一代的忠心耿耿且才华横溢的航海家、水手与冒险家。他选拔这些人的时候看重的是才华，而不是出身地位。他呼吁这些人做一次最后的冲刺。1486年，他精神百倍地筹划了三路并进的计划，去解决印度问题并找到祭司王约翰。他打算在问题的两端同时下手。一路是集中力量于非洲西海岸，超越康立下的石柱，继续南进，努力绕过非洲；沿途，探险队将派遣会说葡萄牙语的非洲土著深入内陆去打探传奇基督教国王的消息。同时，为了弥补从陆路前往东方计划的失败，他招募会说阿拉伯语的人，进入东印度腹地，去打听香料产地、基督教国王和通往印度洋的可能航线。

1486年10月，也就是康（或者他的船只）回国不久之后，若昂二世任命宫廷的一名骑士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去指挥沿着非洲海岸的下次远航。大约在同一时期，他为从陆路去往印度洋的探险选择了新人。

他为此次行动招募到的人是佩罗·达·科维良。此人大约四十岁，出身低微，却是一位机智敏锐、多才多艺的探险家，剑术高超，是葡萄牙国王的忠实仆人，也是一名间谍。除了葡萄牙语，他的卡斯蒂利亚语说得也很流利。更弥足珍贵的是，他还懂阿拉伯语，这可能是从西班牙的阿拉伯居民那里学来的。他曾在西班牙为若昂二世执行秘密任务，并与摩洛哥的非斯^[4]国王展开秘密谈判。如今若昂二世将一项大胆的任务托付给科维良和另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人，阿方索·德·派瓦。

1487年春，在迪亚士准备船只的时候，科维良和派瓦听取了丹吉尔^[5]主教和两名犹太数学家（是拒绝哥伦布提议的委员会的成员）的介绍报告。两位探险家得到了一张中东和印度洋的航海图，这可能是欧洲内部关于地中海之外世界的最好的猜测，或许大幅度参考了毛罗修士的作品。5月7日，他们在里斯本城外的圣塔伦宫最后一次秘密觐见了国王，领取了信用状，以便支付去往亚历山大港的海路旅费。此次会议在场的人当中有国王的堂弟，十八岁的贝雅公爵堂曼努埃尔，对他来说，

此次冒险将会有着重大意义。这年夏天，他们从巴塞罗那乘船去往基督徒统治下的罗德岛，在那里买了一批蜂蜜，以便在阿拉伯世界假扮商人。从罗德岛，他们又坐船去了亚历山大港，那里是伊斯兰世界的门户。

在里斯本，迪亚士正在为自己沿着西非海岸的远航做最后的准备。他得到了两艘属于王室的卡拉维尔帆船，另外由于航程遥远，而卡拉维尔帆船的载货量有限，他们还带上了一艘横帆补给船，“以便运载更多给养，之前多次就是因为缺少给养，探险船返航时吃了极大苦头”。^[6] 迪亚士效仿康，也在船上运载了一些石柱，以便标示航行的每个阶段。迪亚士本人是经验极其丰富的航海家，他的部下也是当时最优秀的水手，其中有佩罗·德·阿伦克尔，此人注定要在印度冒险中发挥关键作用。若昂二世国王显然对阿伦克尔评价极高，称他“凭借其经验和航海本领，理应得到荣誉、恩宠和奖赏”。^[7] 补给船的领航员是若昂·德·圣地亚哥，他的名字被记载在叶拉拉瀑布的岩壁上，他对追踪康的远航极点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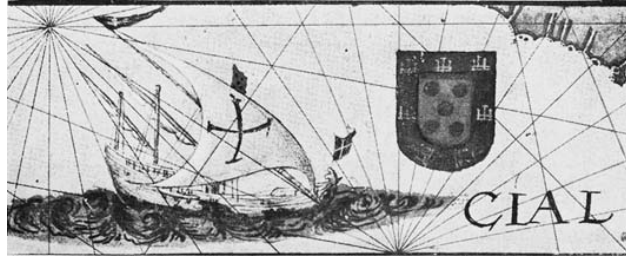
这支小型船队于1487年7月底或8月初从塔霍河起航。这将是人类地理大发现历史上最重要的航行之一，也是最神秘莫测的航行之一。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及此事，仿佛葡萄牙编年史家故意对其视而不见。只有一些地图和书页边缘留下了一些零星记录，编年史里也有少量零散的信息。此次航行的细节、规模和成就还要再等待六十年，才由16世纪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来记载。虽然迪亚士远航任务的具体细节已经佚失，但我们可以重建其大体情况：首先从康的最后足迹继续南下，追寻那捉摸不定的普拉苏斯海岬，即非洲的最南端。然后，派遣人员沿着海岸搜寻通往祭司王约翰国度的陆路或水路通道。这将与派瓦和科维良的探险相配合，为葡萄牙朝廷确立坚定不移且连贯一致的战略，去破解亚洲之谜。

为了这个目的，迪亚士船队带着六名非洲人，两男四女，都是康在某次旅途中绑架的，并向其传授葡萄牙语。据若昂·德·巴罗斯记载：“国王命令将他们留在沿海各地，给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并分发黄金、白银和香料。”^[8]目的是“让这些非洲人进入村庄，告诉当地人，他的王国是多么辉煌壮丽，他是多么富有，他的船只在沿着这片海岸航行，并且他在寻找印度，尤其是一位叫作祭司王约翰的国王”。葡萄牙人特意选择女性来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她们不会在部落纠纷中被杀死。

在亚历山大港，科维良和派瓦这两名间谍发了高烧，奄奄一息。

迪亚士沿着西非海岸南下，途经康的最后一根石柱，沿途用圣徒瞻礼日给他发现的海角与海湾取名，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他的旅程所取得的每个进展的日期：圣马塔湾（12月8日）、圣多美（12月21日）、圣维多利亚（12月23日）。到圣诞节时，他们抵达了一处他们称之为“圣克里斯托弗湾”的海湾。此时，他们出海已经四个月了，顶着海岸沿线的西南风蜿蜒前进，海流则涌向北方。他们一定在途中的不同地方放下了那些不幸的使者，不过其中一人已经在途中死去，其他人的情况则没有留下记载。此时，他们决定，将补给船以及九名水手留在纳米比亚海岸，待另外两艘船返回时再与补给船会合。

随后几天内，两艘卡拉维尔帆船经过了一片丘陵起伏的荒凉海岸。这时，水手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大约在南纬29度的某处海面，他们放弃了针对逆风与逆流的消耗战，而是远离海岸，将帆降到半桅，向西驶入了苍茫大海，尽管这与他们向东航行的目的相反。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是水手们预先设计的方案，也可能是灵机一动的天才之举，因为他们之前从几内亚海岸返航时（他们向西航行，远离非洲海岸，绕一大圈进入大西洋中部，然后借助西风，向东返回葡萄牙）已经了解到大西洋风的特点。或许，他们推断，这种规律在南大西洋同样有效。不管他们的逻辑如何，这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



卡拉维尔帆船适合探险，但在长途航行中显得过于拥挤

一连十三天，将近1000英里，船帆降到半桅的卡拉维尔帆船驶入茫茫大洋。他们进入南温带之后，天气变得酷寒。有水手死亡。在大约南纬38度的海面上，他们的直觉产生了效果。风向越发多变。西风将他们的船只吹向东方，他们希望并期待会抵达他们想象中仍然由北向南无尽延伸的长长的非洲海岸。他们继续行驶了几天。海平线上没有出现陆地的踪影。他们决定改为向北航行，希望能找到陆地。将近1月底时，他们看到了高耸的山岭。1488年2月3日，他们登陆了，并将这个地点命名为牧牛人湾^[9]。他们在开阔海域已经航行了将近四周。他们绕的一大圈已经让他们错过了好望角和厄加勒斯角，即非洲的最南端，也就是大西洋和印度洋融为一体的地方。

此次登陆的情形高度紧张。他们看到大群的牛，守护牛群的人“头发似羊毛，就像几内亚人”。^[10]他们无法与这些牧牛人交流。九年后，领航员佩罗·德·阿伦克尔故地重游，回忆了当年的情形。葡萄牙人将礼物堆到海滩上，当地人却逃之夭夭。此地显然有泉水，但“迪亚士在靠近海滩的地方取水时，当地人企图阻止他。他们从一座小山上向他投掷石头，于是他用弩弓杀死了其中一人”。^[11]

在此次冲突之后，葡萄牙人继续航行200英里，海岸线毋庸置疑地折向东北方。他们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一定已经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海水变得更温暖，但海浪的颠簸起伏给他们造成了沉重打击。3月12日，他们抵达了一处海湾，在那里竖立了最后一根石柱。此时，精疲力竭的水手们“开始异口同声地喃喃抱怨，要求不再继续前进，说给

养已经濒临耗尽，他们需要返回补给船（载有给养物资）那里。此时他们距离补给船已经非常遥远，他们可能还没到那里就已经全死了”。^[12]迪亚士希望继续前进，但国王给他的指示是，在大事上，他必须征询其他官员的意见。他们同意继续航行三天。他们遇到了一条河，给它取名为因方特河^[13]，随后便调头返航。迪亚士显然大失所望，但服从了民主决议。在六十年后写作的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称，迪亚士在开始原路返回的时候，依依不舍地回头望去：“他离开自己在那里竖立的石柱时，感到莫大的悲伤和极深切的情感，仿佛他在向一个被终身流放的儿子道别；他记起了他和所有部下曾面对的巨大危险，他们走了多远才到这一步，然而上帝却没有把最主要的奖赏给他。”^[14]“他看见了印度的土地，”另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但不能进入，就像摩西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一样。”^{[15][16]}但这些都只是后辈的想象。

在里斯本，若昂二世国王一边等待迪亚士或科维良的消息，一边在多方下注。他不能彻底排除西进路线的可行性，并且深切地认识到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竞争越来越激烈。3月20日，他向哥伦布颁发安全通行证，允许他返回里斯本。哥伦布之所以需要通行证才能回到葡萄牙，是因为他在葡萄牙负有债务。与此同时，在亚历山大港，患热病的科维良和派瓦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他们乘船溯尼罗河而上，来到开罗，接着跟随一支商队跨越沙漠抵达红海之滨，然后乘船来到红海出入口处的亚丁。两人在此分道扬镳，派瓦将择路去往埃塞俄比亚，他相信那里就是祭司王约翰的王国，而科维良则将前往印度。

现在，迪亚士率领船只向西返航，首次发现了好望角。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明确无误地证明，非洲大陆是有尽头的，这就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托勒密地理学的一大重要信条。根据巴罗斯的记载，迪亚士及其伙伴将这个地方命名为风暴角，而若昂二世国王将其改为好望角，“因为它承诺了印度的发现，我们为此渴望了那么久，追寻了那么多年”。^[17]在迪亚士离开好望角的时候，背后吹来对他有利的劲风。

补给船上的人被困在纳米比亚的沙漠海岸达九个月之久，凄凉地等待那或许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卡拉维尔帆船。1488年7月24日，当两艘卡拉维尔帆船返回到补给船那里时，补给船上原先的九人已经只剩下三人了。其他人都在与当地人的贸易中发生的纠纷中被杀。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自己的兄弟佩罗可能就死在这里。幸存者之一，补给船的文书费尔南·科拉索因为患病而羸弱不堪，目睹卡拉维尔帆船出现的景象，“重逢自己的伙伴，竟喜极而亡”。^[18]补给船已经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他们将补给船上的物资搬到卡拉维尔帆船上，将停在沙滩上的补给船付之一炬，然后踏上了归途。饱经风霜的两艘卡拉维尔帆船于1488年12月再次驶入塔霍河。迪亚士此次旅途耗时十六个月，发现了1260英里新的海岸线，并首次绕过了非洲。

我们知道他的返回，是因为此时仍然滞留里斯本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一本书的边缘写下了一条著名的记录。当迪亚士向国王汇报的时候，哥伦布显然也在场：

他写道，1488年12月，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三艘（原文如此）卡拉维尔帆船的指挥官，抵达了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派遣他去几内亚探索；他报告称，他在此前已经抵达的极限之外又航行了600里格^[19]，向南行驶450里格，然后向北150里格，一直抵达一个他称为好望角的地方；我们估计这个海角位于阿吉辛巴，根据星盘判断，它应当在南纬45度，距离里斯本3100里格；迪亚士在海图上描绘和描述了每一里格的路程，以便向国王汇报；汇报的全过程，我都在场。^[20]

哥伦布提及的纬度成为历史学界激烈争议的主题。但似乎没有疑问的是，当国王及其宇宙学家们研究迪亚士远航的细节（它们将很快被当时的地图吸收）时，哥伦布的确在场。迪亚士取得了两项伟大突破。他明确地证明，非洲是一块大陆，与印度有海路相通，因此推翻了托勒密地理学的一些准则；他天才地先向西深入大西洋的航行，解开了季风之谜的最后一部分，其告诉人们，抵达印度的办法不是紧贴着非洲海岸缓缓前进，而是绕一个大弧线，先进入茫茫大西洋，然后信赖可靠的西风

会将船只吹过非洲大陆的最南端。这是葡萄牙水手六十年艰辛努力的巅峰，但听取迪亚士汇报的人们未必理解这项成就的意义。空欢喜那么多次之后，他们或许比以往更谨慎了。迪亚士没有得到奖赏和荣誉，也没有宣布发现陆地的公告，仿佛人们还不能相信迪亚士揭示的真相：更温暖的海洋，以及海岸线的弯曲。人们仍然坚守古典地理学的残余部分，仍然相信，非洲的最南端还没有被发现。次年，一份新的演讲（内容与之前向教皇做的报告几乎雷同）宣布：“每一天，我们都在努力抵达那些海岬……以及尼罗河的泥沙，我们通过那里可以抵达印度洋，然后从那里去往野蛮人的海湾，后者就是无尽财富的源泉。”^[21]迪亚士远航的价值要到九年之后才能为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而哥伦布感觉到，若昂二世对他的兴趣已经消失了。于是他返回了西班牙，去游说西班牙朝廷。

在遥远的印度洋，科维良还在旅行。这年秋季，他搭乘一艘经商的阿拉伯三角帆船，穿越印度洋，来到了卡利卡特（今天的科泽科德），那是香料贸易的中心和从更东方来的大部分远途贸易的终点。1488年年初，他可能已经到了果阿，然后乘船北上，来到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这里是印度洋的另一个中心。他在印度洋来回穿梭，搜集并秘密记录关于航道、风向、海流、港口和政治的信息，搭乘一艘船从东非海岸出发，抵达遥远南方的索法拉，那里与马达加斯加岛只有一海之隔，是阿拉伯人在印度洋南部向南航行的极限。他在努力研究从海路绕过非洲的可行性，以及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的信息。1490年或1491年年初他返回开罗的时候，他已经几乎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四年。他已经侦察了印度洋的主要贸易航线，能够为国王提供详尽的报告。

回到开罗后，他得知派瓦已经在去往埃塞俄比亚途中的某地去世了。在此期间，若昂二世还派出了两名犹太人，一位拉比和一位鞋匠，去寻找他那两名杳无音讯的间谍。两名犹太人想方设法在喧嚣的开罗找到并认出了科维良，将国王的书信交给他。国王命令他在“目睹并了解伟大祭司王约翰之后”^[22]返回里斯本。科维良写了一封长信给国王，由

鞋匠送回。在信中，他详尽记述了自己曾看到和了解到的所有信息，涉及印度洋的贸易与航行，并补充道，若昂二世那些“频繁出入几内亚的卡拉维尔帆船，可通过四处航行并寻找马达加斯加岛和索法拉海岸的方式，轻松地进入那些东方海洋，抵达卡利卡特海岸，因为海路是贯通的”。[\[23\]](#)

此时科维良似乎已经沉迷于漫游，一心向往远方。他决定完成派瓦的工作，但对若昂二世的命令做了宽泛的理解。他陪同那位拉比来到亚丁和霍尔木兹，然后乔装打扮，游览了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然后前往埃塞俄比亚高原。他成为第一个见到他们所谓的祭司王约翰（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皇帝）的葡萄牙人。当时的皇帝埃斯肯德隆重欢迎他，但不肯放他走。三十年后，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埃塞俄比亚找到了他，他向探险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一直留在埃塞俄比亚，直到去世。

迪亚士和科维良的冒险实际上已经摸清了通往东印度的可能海路。印度计划业已完成，不过我们不清楚科维良的报告是何时被送到国王那里的，甚至不能确定他的报告最终有没有被呈给国王。我们也不知道，葡萄牙朝廷对迪亚士的成就保持沉默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在此期间，一名埃塞俄比亚神父被教皇派到里斯本。若昂二世让他送递一封写给祭司王约翰的信，表达了“他与祭司王约翰缔结友谊的意愿，以及他如何探索了整个非洲海岸和埃塞俄比亚”。[\[24\]](#)这种措辞可能说明他已经收到了科维良的消息。到15世纪90年代初时，若昂二世可能已经掌握了做最后冲刺，进入印度洋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所需的全部信息。

然而，他无所作为。在停顿了八年之后，葡萄牙才重新拾起此前几十年探索的努力。迪亚士回国后的岁月里，若昂二世遇到了许多麻烦。15世纪80年代末，他在摩洛哥卷入了一场激战，毕竟宗教圣战始终是葡萄牙国王的责任。他患上了肾病（最终因此丧命），并且接二连三地遭

遇噩运。1491年，他的独生子和继承人阿方索在骑马时出事故死亡。1492年，西班牙开始驱逐犹太人，很多犹太人逃往葡萄牙，这虽然给葡萄牙带去了一大批勤劳而受过教育的人才，但也需要小心处置。

次年又来了一次沉重打击：1493年3月3日，一艘破破烂烂的船挣扎着驶入里斯本附近的赖斯特罗港，这里是从海外返回的船只的传统锚地。但是，这艘船不是葡萄牙的。哥伦布回来了，带回了消息。他在葡萄牙的竞争对手西班牙赞助下，乘坐“圣马利亚”号找到了所谓的“东印度”，实际上是今天的巴哈马、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哥伦布的谎言极多，编造和粉饰了自己的过去，很不可靠。我们不知道他是被猛烈的风暴偶然吹入塔霍河的，还是故意来拜访并羞辱曾经拒绝他的葡萄牙国王的。等候与他会面的人是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就是他的远航使得哥伦布丧失了葡萄牙朝廷的赞助。哥伦布自称抵达了靠近日本的岛屿，据他说自己随后得到了若昂二世的盛大欢迎。

葡萄牙方面的资料对此保持沉默。哥伦布的傲慢狂妄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葡萄牙宫廷看到，哥伦布“趾高气扬，在讲述自己的旅程时不断夸大其词，极大地夸张了自己此次航行获取的金银与财富”，^[25]并指责国王对他缺乏信任。若昂二世看到哥伦布作为证据带来的土著人质（从外貌看他们显然不是非洲人），大受震动；这些土著看上去的确更像他想象中的东印度居民，但没人说得准这个自吹自擂的热那亚人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国王的谋臣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不动声色地把哥伦布杀掉，西班牙的发现就将湮灭。若昂二世否决了该提议，因为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外交上也很糟糕，毕竟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高度紧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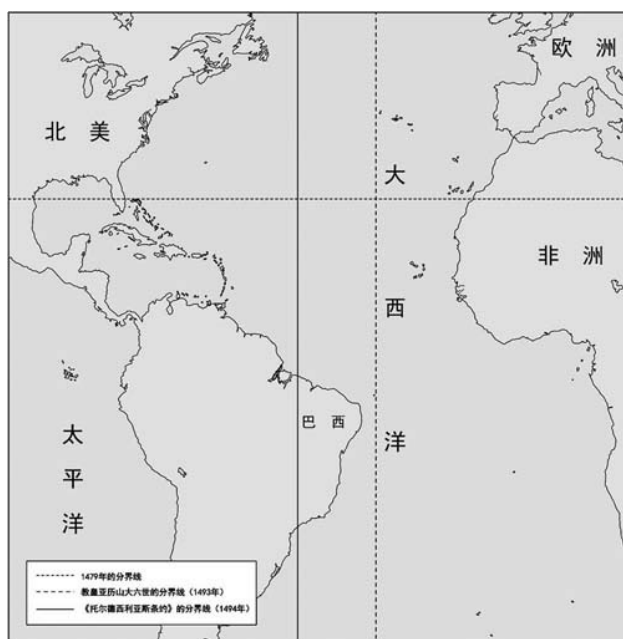
他决定，迅速给正在塞维利亚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声称哥伦布侵犯了葡萄牙领土。1479年，为了结束之前的一场战争，两国同意在大西洋划一条水平边界，规定双方专有的探索范围，

并得到了教皇的批准。若昂二世相信，哥伦布发现的土地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于是准备派遣自己的探险队。西班牙人向西班牙裔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博吉亚）求助，后者支持西班牙人，将大西洋的很大一部分判给了西班牙，剥夺了葡萄牙人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海域。突然间，葡萄牙人在大西洋的霸权受到了威胁，他们可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几十年的投资化为泡影。若昂二世以战争相威胁。两国决定绕过教皇，当面协商，以避免一场大规模的外交冲突。

在西班牙中部平原的古老小镇托尔德西利亚斯，两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议，为瓜分世界而讨价还价。他们简单地“从北极到南极”^[26]画了一条直线，将大西洋一分为二；这条线以东属于葡萄牙，以西属于西班牙。若昂二世和他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的团队可能经验更丰富，本领也更强，迫使西班牙将这条线从原先的位置（即教皇之前批准的那条线）向西移动了1000多英里，到达葡萄牙所占的佛得角群岛与哥伦布发现的加勒比群岛（他认为那是亚洲海岸的一部分）之间。如此一来，《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就将尚未被发现的巴西海岸纳入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因为我们没办法准确地确定托尔德西利亚斯子午线的经度，所以关于这条线的具体位置存在激烈争议。这场争吵一直持续到1777年。

如1492年发现美洲一样，这项条约本身也标志着中世纪末期的一个关键时刻。尽管《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后来得到了庇护三世教皇的批准，但瓜分世界的权利已经不在教廷的掌控之下。科学家们根据世俗国家的利益，做了计算和分割。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处于探索发现的最前沿，实际上已经将欧洲之外的所有土地变成了两国政治斗争的空间，这令其他国家的君主感到好笑。一些年后，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讥讽道：“让我看看亚当的遗嘱里有没有这么写。”^[27]但在1500年时，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进入大西洋，或者有足够的经验去挑战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位先驱。而哥伦布在奔向东印度的竞赛中无意识地驶入了一个死胡同，被美洲大陆挡住。只有葡萄牙人拥有足够的

知识，能够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海路，将世界连为一体。葡萄牙人拥有一个机遇，而他们的西班牙竞争者却丧失了这个机遇。



瓜分世界：葡萄牙与西班牙争夺大西洋之外新发现土地的竞争将导致一系列持续的争端。若昂二世国王说得对，哥伦布的确侵犯了**1479**年边界以南的葡萄牙势力范围。教皇的解决方案对西班牙非常有利。在**1493**年的一连串教皇诏书中，他规定，以南北两极之间、亚速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处的子午线为界。于是，西班牙人有权占据这条子午线以西的所有土地，远至印度，而葡萄牙从这条线向东航行似乎得不到多少东西。若昂二世不能接受印度被排除在葡萄牙势力范围之外。在托尔德西利亚斯，这条线被向西推移了**170**里格，囊括了此时尚未被发现的巴西海岸。葡萄牙还重新获得了这条线以东的未发现土地的权益。**1521**年，当西班牙人向西航行抵达摩鹿加群岛[28]时，《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在世界的远端引发了更多争议，因为葡萄牙人早在**1512**年就通过向东航行抵达了这里。

尽管哥伦布的吹嘘让若昂二世大受震动，他还是修订了自己的印度计划，准备发动新的远征。但这一次太晚了。**1495**年，若昂二世驾崩，据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得知消息时喃喃地说：“那个人死了。”她曾希望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若昂二世的儿子阿方索，但阿方索已经去世了。王位被传给了年轻的贝雅公爵堂曼努埃尔[29]，他曾听取派瓦与科维良临行前接受的报告。机缘巧合之下，曼努埃尔一世继承了王位、积累了八

年的探索经验以及最后冲向印度的跳板，他甚至还能够获得建造船只所需的木材。若昂二世在葡萄牙历史上的绰号是“完美君王”，而曼努埃尔一世则注定要成为“幸运的国王”。

[1] 尼科洛·达·孔蒂（1395～1469年），意大利商人与旅行家，生于威尼斯的基奥贾，曾旅行至印度和东南亚，可能去过中国南部。他于1419年离开威尼斯，在大马士革居住，学习阿拉伯语，熟悉了伊斯兰文化，后来以穆斯林商人的身份，去过亚洲很多地方。

[2] Kimble, George. “Portuguese Policy and Its Influence on Fifteenth-Century Cartography.” *Geographical Review*, 23, no.4 (October 1933), p.658.

[3] 马穆鲁克王朝在约1250～1517年统治埃及和叙利亚。“马穆鲁克”是阿拉伯语，意为“奴隶”。自9世纪起，伊斯兰世界就已开始起用奴隶军人。奴隶军人往往利用军队篡夺统治权。马穆鲁克将领在阿尤布王朝苏丹萨利赫·阿尤布（1240～1249年在位）去世后夺取王位。1258年，马穆鲁克王朝恢复哈里发的地位，并保护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残余的十字军被赶出地中海东部沿岸，而蒙古人也被赶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上，他们在史书撰写及建筑方面成就辉煌。他们最后被奥斯曼帝国打败。

[4] 非斯是今天摩洛哥的第二大城市，一度是首都，也指摩洛哥北部地区。在本书涉及的时代，非斯王国指的是统治摩洛哥的柏柏尔人的马林王朝，其首都就是非斯城。

[5] 丹吉尔在今天摩洛哥北部，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入口处的北非一侧，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6] Fonseca, Luí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 2005, p.105.

[7] Fonseca, Luí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 2005, p.105.

[8] Fonseca, Luí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 2005, p.106.

[9] 今称贻贝湾（音译为莫塞尔湾），属于南非。

[10]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187.

[11] Ravenstein, E. G., 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10.

[12]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187.

[13] 得名自迪亚士舰队中的一名船长若昂·因方特。这条河在今天的南非境内，现称大鱼河。

[14]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187.

[15] 摩西不能进入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见《旧约·申命记》32：48～52。

[16] Peres, Damião.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êses*. Coimbra, 1960, p.300.

[17]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190.

[18]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191.

[19] 里格这个长度单位曾在英国和拉美等地流行，原意是一个人步行一小时的距离。自中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里格的长度不一。西班牙古时的里格也有浮动，曾被官方规定为合4180米。葡萄牙的里格有4444.44米、5555.56米和6172.4米等多种标准。

[20] Ravenstein, E.G. *The Voyages of Diogo Cão and Bartholomeu Dias, 1482-88*. England, 2010, p.20.

[21] ‘La configuration cartographique du continent africain avant et après le voyage de Bartolomeu Dias’, in Randles, W.G.L. *Geography, Cartography and Nautical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Discoveries*. Farnham, 2000, p.115.

[22] Ficalho, Conde de. *Viagens de Pero da Covilha*. Lisbon, 1988, p.107.

[23] Ficalho, Conde de. *Viagens de Pero da Covilha*. Lisbon, 1988, p.108.

[24] Diffie, Bailey W., and George D. Wini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Minneapolis, 1977, p.165.

[25] Fonseca, Luí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 1999, pp.120-121.

[26] Davenport, Frances Gardiner, ed. *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 to 1648*. Washington, D.C., 1917, p.90.

[27] Fuentes, Carlos. *The Buried Mirror: Reflecting on Spain and the New World*. New York, 1999, p.159.

[28] 摩鹿加群岛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东面、新几内亚西面以及帝汶北面，是马来群岛的组部分。中国和欧洲传统上称为香料群岛的地方，多指这个群岛。

[29] 从此处开始，称曼努埃尔一世。

3 瓦斯科·达伽马

1495年10月～1498年3月

新国王继承了葡萄牙阿维斯王朝根深蒂固的救世主般的命运。他出生于耶稣圣体节，获得的教名是非常光辉的“曼努埃尔”，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认为自己获得王位，自有神秘不可测的天意。他二十六岁，圆脸，胳膊长得不合比例，一直垂到膝盖处，让他看上去有点像猿猴。他能够登上宝座，实在是出人意料：六个人先后死亡或被流放，包括若昂二世之子阿方索神秘的骑马事故和曼努埃尔一世自己的兄长迪奥戈被若昂二世杀害，才让他继承大统。他认为自己成为君主，是因为上帝选择了他。

15世纪末，基督降生一千五百周年快到的时候，全欧洲的人都感到世界末日仿佛要降临了。伊比利亚半岛尤其如此，穆斯林和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被认为是一个预兆。在这种气氛下，曼努埃尔一世相信，并且其他人也鼓励他相信，他必然要成就伟大的事业：消灭伊斯兰教，将基督教传播至全球，并且由一位世界君主来统治天下。“西欧的所有君主当中，”航海家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写道，“上帝只选择了陛下。”^[1]蕞尔小国葡萄牙完全可能成就不世功勋，因为《圣经》里面写道：“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2][3]}



曼努埃尔一世国王是一位世界性君主，最上方的箴言为“仰仗天堂的上帝，与人间的你”。他的一侧是王室纹章，上有五个盾形徽章，右侧是浑天仪，它象征着葡萄牙探索世界的远航

印度计划在若昂二世统治末期有所松懈，而在曼努埃尔一世登基后成为他梦想实现的途径。曼努埃尔一世相信，他继承了自己叔祖“航海家”恩里克的衣钵。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基督教欧洲越来越觉得自己受到封堵压制。曼努埃尔一世的目标是绕过伊斯兰世界，与祭司王约翰和传说在印度的基督徒群体会合，控制香料贸易，并摧毁开罗的马穆鲁克苏丹的财富。在他登基后的最初几个月，他就已经开始酝酿一个雄心勃勃的地理战略设想，假以时日，它将会让葡萄牙人称霸全球。这个计划是以十字军圣战的精神设计的，但也有物质的层面：不仅要马穆鲁克王朝手中攫取贸易，还要取代威尼斯人，成为东方奢侈品的贸易中心。所以，他的计划既是帝国主义的，也是宗教和经济的。就是抱着这样的精神，曼努埃尔一世开始集合人马，向东印度进发。由于他们缺少详细的知识，所以东印度只是一个定义含糊的空间，在欧洲人的想象里可能囊括整个印度洋和所有种植香料的地方。

不过，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大家全心全意的支持。1495年12月，也就是曼努埃尔一世登基几周之后，他召开会议商讨此事。贵族阶层强烈反对。他们曾受到若昂二世国王的欺压，并且认为这样长途的冒险没有

什么光荣，且风险巨大，而在咫尺之外的摩洛哥开展圣战能够轻松得到报偿。曼努埃尔一世在统治期间有时会显得优柔寡断和踌躇不决，但他有时也非常专断。他宣称自己继承了探索新土地的责任，并运用自己神圣的使命感去压倒一切反对意见。

对于那些认为探索印度的远航太困难的人，他用压倒性理由反驳道，他的事业自有上帝佑助，上帝会保卫葡萄牙王国的福祉。最后，国王决定继续探索。后来在埃什特雷莫什时，他任命自己宫廷的绅士瓦斯科·达伽马为指挥官，率领船队向印度进发。^[4]

起初，瓦斯科·达伽马似乎仅仅是第二人选。曼努埃尔一世原先打算让瓦斯科的兄长保罗去，但他称病辞谢，不过后来还是同意在瓦斯科的指挥下参加远航。瓦斯科·达伽马“是单身汉，足够成熟坚强，能够承受此种远航的艰辛”，^[5]此时也才三十多岁。我们不清楚他职业生涯早期的状况和他的履历，也不知道国王为何选择他。1496年之前的史料里很少提及他。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航海知识。他来自海港城市锡尼什（在里斯本以南）的小贵族家庭，可能曾在摩洛哥沿海从事海盗活动。他的生活以及后来的经历，都像哥伦布一样，被笼罩在神话中。他显然脾气火爆。在得到国王任命的时候，他正受到起诉，罪名是滋事斗殴。在后来的远航过程中，他的执拗个性将会展露无遗。他遵循十字军的传统，极度仇恨伊斯兰世界；他吃苦耐劳，能够坚持不懈地忍受航海生活的艰辛；但非常关键的是，他对外交的微妙方面非常不耐烦，后来被描述为“行动果决勇敢，发号施令严苛，发怒时令人胆寒”。^[6]国王之所以挑选达伽马，可能主要是让他指挥水手、与东方的未知君王谈判，而不是因为他擅长航海。



瓦斯科·达伽马

到15世纪90年代时，沿着非洲海岸的探索已经将里斯本化为一座生机盎然而满怀期望的都市。珍奇的外国货物——香料、奴隶、鹦鹉和糖——被卸载到塔霍河平缓的河岸上，让人憧憬那防波堤之外的新世界。到1500年时，里斯本人口中可能有15%是几内亚黑人。这里的奴隶数量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里斯本充满异国情调，活力四射，五彩缤纷而目标明确。“（里斯本）规模超过纽伦堡，人口也比它多得多。”1494年造访里斯本的德意志博学之士希罗尼穆斯·闵采尔如此写道。^[7]这座城市是关于宇宙学和航海术，世界之形态与如何将之绘制下来的新思潮的最前沿。1492年，犹太人被从西班牙驱逐出境。一些犹太人，其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或商人，为里斯本增加了更多活力。尽管他们在葡萄牙受到的欢迎也很短暂，但还是给葡萄牙带来了大量宝贵的知识。难民包括犹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亚伯拉罕·萨库托，他发明的航海星盘和记录天体位置的图表书籍后来将给航海技术带来一场革命。

对于闵采尔来说，里斯本是一座遍布奇观的城市。在这里，他能看到一座雄伟的犹太会堂，其中悬挂十架巨大的枝形吊灯，每架枝形吊灯可容纳五十或六十支蜡烛；在一座教堂内，一具鳄鱼尸体被当作战利品，陈列在唱诗区内；一只鹈鹕的喙，一条剑鱼巨大的锯齿状长嘴；在加那利群岛海岸收集来的神秘的巨型藤条（哥伦布也发现过这种藤条，并将其带回，作为遥远西方土地存在的证据）。他还有机会看到“一张巨大的、制作极其精美的黄金地图，直径为十四个手掌的长度”。^[8]这就是毛罗修士在1459年制作的地图，在里斯本的一座城堡内展出。闵采尔可以邂逅一些水手，他们会给他讲述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存与逃亡的故事；他可以与一群德意志铸炮工匠和炮手交谈，这些人享有葡萄牙国王的极大尊重。

这座港口所出售商品的丰富程度也令他惊讶：大堆的燕麦、核桃、柠檬和杏仁，以及数量惊人的沙丁鱼、金枪鱼正准备出口至地中海世界的各个角落。他拜访了管理从新世界进口的商品的官衙，在那里看到了非洲产出的商品：突尼斯的染色布料、地毯、金属盆、铜锅、彩色玻璃珠，以及来自几内亚海岸的大量火辣的胡椒，“他们给了我们很多这种胡椒”^[9]，还有象牙与黑奴。

闵采尔所目睹的，不仅仅是远方那富有异国情调的世界，还有造船业、航海物资供给与军械厂的工业基础设施，正是它们赋予了葡萄牙强大的航海实力。他看到

一座硕大无朋的工坊，拥有许多熔炉，人们在那里制造船锚、火炮等物件，以及航海所需的一应器具。熔炉周围有那么多皮肤被熏黑的工人，我们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武尔坎^[10]的独眼巨人中间。后来我们看到，另外四座建筑物里有不计其数的巨大而精致的火炮，还有投掷武器、标枪、盾牌、胸甲、臼炮、手枪、弓、长枪——全都制作精良，数量极大……还有数不胜数的铅、黄铜、硝石与硫黄！^[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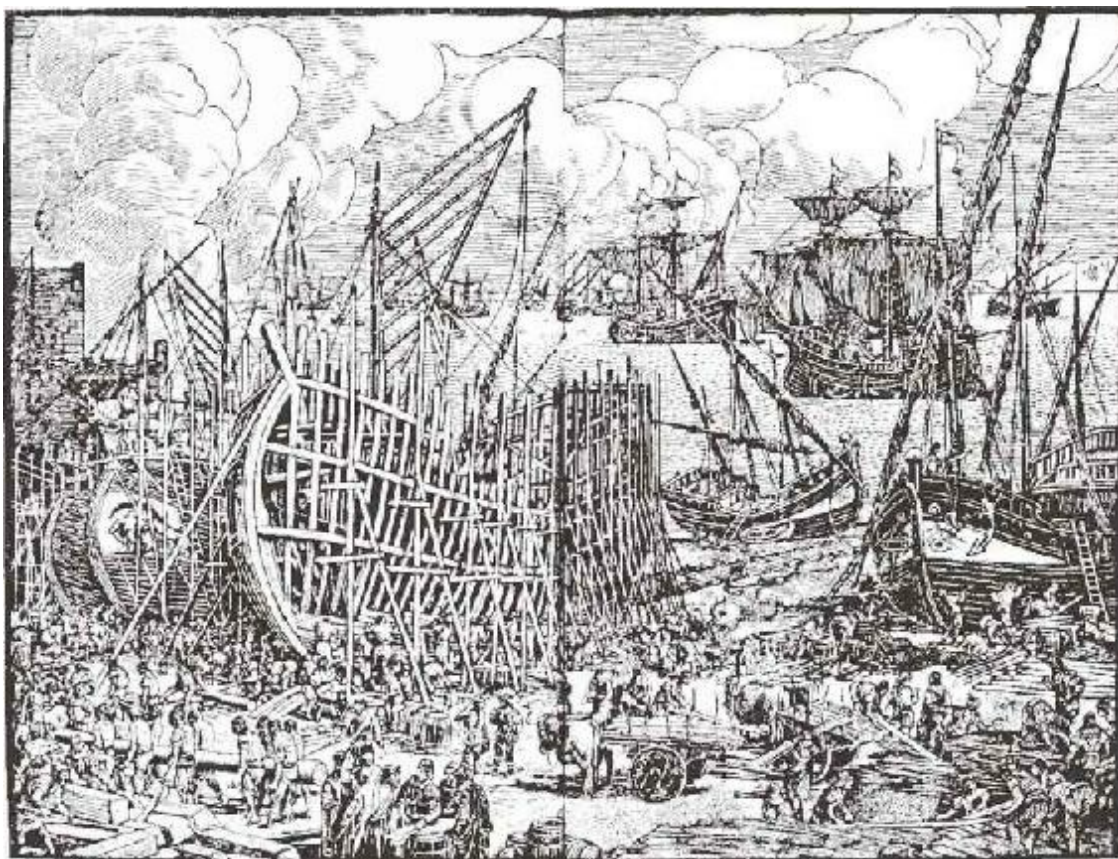
精力充沛的若昂二世国王已经拥有生产优质铜炮的能力，并掌握了

在海上有效运用火炮的技术。他是个热衷于求索、充满好奇心的人，兴趣非常广泛，包括船载火炮的试验。他曾在卡拉维尔帆船上安装大型射石炮，并进行试射，以确定如何在处于颠簸之中的船甲板上最有效地运用射石炮。解决方案是，让火炮在吃水线高度水平射击，若是炮位更高，炮弹就可能掠过目标上方。在有的情况下，如果能将火炮设置在船首足够低的位置，炮弹就可能在水面打水漂，增加射程。葡萄牙人还研发了后装回旋炮^[12]，即后膛装填的炮身可旋转的轻型火炮，可以将其安装在小艇上，与传统的前装火炮相比，它的优势是射速更快，每小时可发射20枚炮弹。葡萄牙人在火炮方面的优势（他们雇用了德意志与佛兰芒铸炮工匠和炮手，更加大了这种优势）将在随后的事件中发挥清晰可辨的作用。

达伽马筹划的远航规模不大，但做了精心准备。它建立在几十年来逐渐获取并积攒的知识的基础上。许多年来为大西洋航行而积累的关于船舶设计、航海与物资供给的全部技术与知识，都被应用于建造两艘坚固的船只。曼努埃尔一世在这项造船工程中运用了才华横溢的新一代人的实践经验。卡拉维尔帆船是葡萄牙人海上探索的主要工具，非常适合在热带河流逆流而上，并逆风沿着非洲海岸前进，但非常不适合在广阔大洋的漫长航行。迪亚士绕过好望角的航行已经揭示了卡拉维尔帆船在操作上的局限：他的水手因为补给匮乏，不愿继续前进。

迪亚士奉命设计并监督建造两艘坚固的克拉克帆船^[13]，以执行此次远航任务。需求是很明确的：它们必须足够坚固，足以承受南大西洋的惊涛骇浪；足够宽敞，能够比卡拉维尔帆船的颠簸甲板更适合船员的住宿和补给；足够小，能够在浅滩和港口顺利活动。在岸边建造的新船的骨架周围搭满了木制脚手架，船体矮胖，船舷很高，有一座艙楼和三座桅杆；但它们的吃水很浅，尺寸也不算很大。它们长约80英尺，每艘重量大约为100吨至120吨。它们配的是方帆，所以在逆风时会比较笨拙；但是，它们船体非常坚固，以便抵挡未知海洋不可预测的汹涌波

涛。另外还建造了一艘补给船，并计划在好望角附近将其拆解。



在里斯本船坞建造克拉克帆船，图右部有一艘卡拉维尔帆船停在海滩

为了建造这几艘船、为其配备物资、招募水手并支付薪水，朝廷可谓不惜血本。航海家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回忆道：

造船的是最优秀的师傅和工匠，用的是强韧的钉子和木料，每艘船配备三套帆和锚，其他的索具和设备则准备了三四套。盛葡萄酒、水、醋和油的木桶都用许多道铁圈加固。准备的面包、葡萄酒、面粉、肉、蔬菜、医药、武器与弹药，数量都超过这样的航行所需的定量。葡萄牙最顶尖、技术水平最高的领航员与水手奉命参加此次航行，他们得到许多恩宠，而且领到的薪水也高于其他国家的任何海员。在此次远航的几艘船上花费的金钱极多，我就不详细说了，免得大家不相信我。[\[14\]](#)

从船坞跳板被推上船的木桶里盛放着足够维持三年的食物。达伽马

为此次冒险获取了2000金克鲁扎多^[15]酬金，这是一大笔钱；他的哥哥保罗也得到了同样的数额。水手们的薪金被提高，并预支了一部分，以维持其家人的生计。这或许是因为大家认识到，其中很多人将永远回不来了。事无巨细，全都一丝不苟地办理。船只携带了当时最好的航海辅助设备：除了测深铅锤和沙漏、星盘和最新的地图，或许还有亚伯拉罕·萨库托前不久才印制的根据太阳高度测算纬度的表格的副本。二十门火炮被运上船，既有大型射石炮，也有较小的后装回旋炮，另外还装载了大量火药（密封起来，以免被海上的潮湿空气损害）和炮弹。对于熟练技工，如木匠、填塞船缝的工人、铁匠和制桶工人，每个工种都招募两人，以防一个技工死亡后便无人从事相关的工作。探险队里有会说班图语和阿拉伯语的译员；有乐师为水手号子领唱，以及演奏庆典音乐；有炮手、武士和本领高强的水手，再加上一群地位低微的“甲板小厮”。这些小厮包括非洲奴隶、孤儿、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犯人，被招来从事体力劳动，如拖曳绳索、起锚和起帆、抽干舱底污水。犯人是死不足惜的廉价劳动力，他们被专门从监狱释放，参加远航。到了无书面记载、可能对探险队抱有敌意的海岸之后，他们将被第一批送上岸去打探消息。另外还有神父负责引领祷告，并为死者举行海葬，为其灵魂祈祷。

远航船队一共有四艘船。其中两艘为克拉克帆船，名字分别是“圣加百列”号和“圣拉斐尔”号，它们都是大天使的名字，是根据若昂二世国王去世前的一个誓言取的。还有一艘卡拉维尔帆船“贝里奥”号，以及一艘200吨的补给船。达伽马招募了一些他认识的水手，以及他能够信赖的亲戚，以减少这个紧密小团体在远航时发生内讧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他的哥哥保罗（担任“圣拉斐尔”号的船长），以及他的两个堂兄弟。他的领航员和高级船员都是当时经验最丰富的人，如佩罗·德·阿伦克尔和尼古拉·科艾略（他曾与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一起绕过好望角），以及迪亚士的弟弟迪奥戈。还有一位是名字被镌刻在叶拉拉瀑布岩壁上的领航员佩罗·埃斯科巴尔，他曾与迪奥戈·康一同航行。巴尔托洛梅乌·迪

亚士也计划参加远航的第一阶段，乘坐其中一艘船前往几内亚海岸。

此次远航是向未知世界的一次试探，规模不大，但成本很高。葡萄牙朝廷用来自几内亚海岸的黄金为其提供资金，另外还有一笔意外之财也被用于此次远航。1496年，为了与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公主结婚，曼努埃尔一世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将葡萄牙境内不愿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这些犹太人的家财和货物被政府没收，成为意想不到的资金来源。

远航准备就绪的时候，已是1497年仲夏。船帆被画上了圣战者基督骑士团^[16]的红十字，木桶被滚上船，重炮被绞车安放就位，船员们集合起来。小船队离开了造船厂，停泊在赖斯特罗（里斯本下游的一个渔村）的海滩。在酷暑时节，曼努埃尔一世返回了位于新蒙特穆尔（距离海岸约60英里）的山顶城堡。瓦斯科·达伽马及船长们去往那里，接受航行指示和国王的仪式祝福。达伽马在国王面前跪下，隆重地接受了此次远航的指挥权。国王还赐予他一面饰有基督骑士团红十字的丝绸旗帜。国王向他发布了命令：在印度一座名叫卡利卡特的城市寻找基督徒国王，他应向其呈送一封用阿拉伯文和葡萄牙文写的书信；建立关于香料和“古代作家们交口称颂的，后来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国家因此兴盛的那些丰富物产”^[17]的贸易关系。还有一封信是写给祭司王约翰的。达伽马的使命既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十字军圣战的意味和商业竞争相互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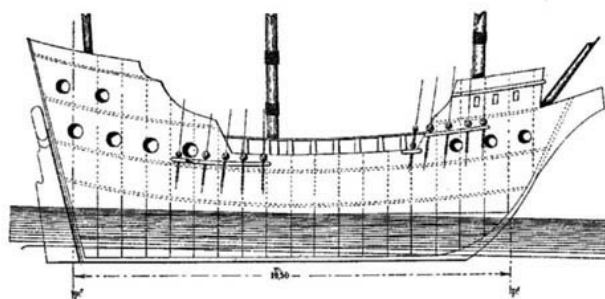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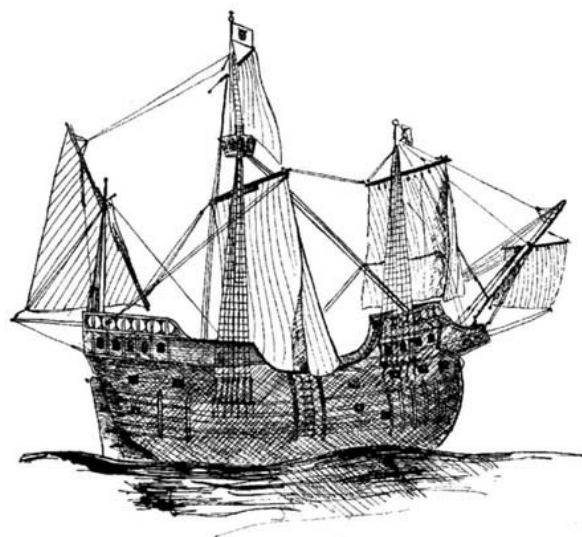
自航海家恩里克的时代以来，里斯本城墙之外塔霍河畔的小村赖斯特罗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们启程的传统出发点。它坡度平缓的海滩为宗教仪式和起航那热情洋溢的庆典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对出发的人来说，这是洒泪的地方；对于回家的人，则是喜悦的场所。”^[18]在赖斯特罗之上的山丘，恩里克的小教堂俯瞰着向西注入广阔大海的塔霍河，这座教堂是奉献给“伯利恒的圣马利亚”的，为的是向起航的水手们送去圣

餐。在起航的酷热前夜，全体船员（148～166人）在那里守夜和祈祷。

1497年7月8日，星期六，寻找“隐藏了许多世纪”^[19]的印度的行动开始了。这一天是圣母玛利亚的瞻礼日，宫廷占星家为船队出发选择了这个吉日。一个月前，教皇授权曼努埃尔一世永久占有从异教徒手中征服的土地，条件是没有其他基督徒国王已经对其提出主权声明。人们从里斯本蜂拥而出，为亲友送行。达伽马率领部下进行了一次虔诚的游行，从小教堂走到海滩，由基督骑士团的神父和僧侣组织。水手们身穿无袖上衣，手捧点燃的蜡烛。神父们紧随其后，吟唱连祷，人们呼喊应答。游行队伍走到水边时，人群陷入沉默。所有人都跪下告解，并根据教皇诏书接受恕罪。恩里克从教皇那里得到了这份诏书，为所有“因探索和征服”^[20]而死的人免罪。若昂·德·巴罗斯记载道：“此次仪式中，所有人都落了泪。”^[21]

然后，水手们乘小艇来到大船上。在节奏感很强的钹声中，船帆升起，小艇被推开，达伽马的旗舰“圣加百列”号升起了王旗。水手们向天举起拳头，吟唱着传统的呼唤：“一帆风顺！”在口哨声中，小船队在风力驱使下开动了，由两艘克拉克帆船引领，它们的船首载着大天使加百列和拉斐尔的木刻像，涂色非常美丽。人们涉水前行，隔着越来越远的距离，再望自己的亲友最后一眼。^[22]“就这样，一群人转身眺望陆地，另一群人望着大海，同样涕泗横流，思虑着那漫长的旅途。他们保持这个姿态，直到航船远离了港口。”船队顺塔霍河而下，直到经过河口，开始第一次感受到大洋的刺激。

在“圣拉斐尔”号上，有一个人（我们始终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他的身份）正在准备记录此次航程。这位不知名的作者骤然地开始了他言辞简练的日记（这是随后事件的唯一一份亲历者记述）：



艺术家对“圣加百列”号的复原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149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了四艘船去发现，以及寻找香料。

我们于1497年7月8日，星期六，离开赖斯特罗。愿天主允许我们为了他完成此次旅行。阿门！[\[23\]](#)

他们的目标之一——“寻找香料”是明确的，但奇怪的是，发现（descobrir）是个不及物动词，后面没有说要发现的对象是什么。这暗示了，在很大程度上，此行是一次奔向未知世界的盲目之旅。

他们借助有利的风向，沿非洲海岸南下，不到一周就看到了加那利群岛。考虑到天气可能变坏，达伽马下令，假如各船分散了，那么就在

南面1000英里处的佛得角群岛集合。次日夜间，“圣拉斐尔”号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第二天雾散之后，“圣拉斐尔”号的船员发现另外三艘船已经无影无踪。它只得独自继续航行。7月22日，“圣拉斐尔”号发现了佛得角群岛外围的零星岛屿，看到了其他船只。但这一次，“圣加百列”号连同其指挥官都失踪了。其余三艘船的水手大感挫折，加之遇上风平浪静，船只因无风而受困四天之久。7月26日，“圣加百列”号终于露面，大家长舒了一口气。“当晚我们与他们联系上了。为了表达喜悦的心情，我们多次开炮并吹响喇叭。”^[24]远航的早期，大家都十分紧张。他们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停留了一周，修理桅杆，补充了肉食、木材和尽可能多的淡水（盛放在木桶内），为远洋航行做准备。

“8月3日，星期四，我们向东进发。”^[25]不知名的日记作者这样记载道。事实上，他们即将展开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先例、仅有极其含糊记载的行动。在佛得角群岛以南约700英里、南纬约7度处，“圣加百列”号及其他船只没有沿着已经很熟悉的非洲海岸进入几内亚的赤道无风带，而是转舵朝向西南，绕了很大一段弧线，深入大西洋的心脏。陆地已经消失。很快，快速进入未知海域的船队仿佛就被茫茫大洋“吞没”了。船帆在咸湿的海风中噼啪作响。

达伽马的航程遵循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九年前发现的貌似违反直觉但非常有效的路途：要想绕过非洲，需要先绕个大弯，向西进入大洋，然后转身向东，借助西风，从好望角外海驶过。而“圣加百列”号的航行方法把迪亚士的做法放大了许多倍。很显然，到15世纪末时，葡萄牙航海家一定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南大西洋风的运作模式，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了解到大西洋西南部分的风向知识的。有人提出，在迪亚士返航之后，葡萄牙人还开展了一些秘密的探索之旅，但这目前还只是推测。葡萄牙人的自信——将船只驶入大洋深处，依赖太阳位置来判断方位——一定来源于其他方面。

如果达伽马的这趟旅程让船员们也胆战心惊，那本不动声色的日记没有显露出来。8月22日，他们看到了类似鹭的鸟向东南偏南飞翔，“仿佛在前往陆地”，^[26]但此时他们离开海岸已经有800里格，即超过2000英里。他们根据日历中的圣徒瞻礼日来维持自己对时间流逝的把握，除此之外他们的世界就是一片空荡荡的海与天、太阳与风。再过两个月，日记作者才看到了一些值得记录的东西，能够表明他们并非迷失在虚空之中：“10月27日，星期五，圣西门和圣犹大瞻礼日的前一天，我们看到了许多鲸鱼。”^[27]

甚至在水手们操舵转向西南之前，航船也感受到了大海的重压。在圣地亚哥以南600英里处，“圣加百列”号的主桁端断裂，“我们以船首迎风，利用前桅帆保持船身静止，降下主帆，就这样过了两天一夜”。^[28]船员的坚韧一定受到了极限考验。所有人轮流值班，每班四个小时，不分昼夜；船上的小厮用沙漏计时，时间到了的时候，就呼喊：“换班了，时间到了！”^[29]无须技能的体力劳动，如抽出船底污水、升帆、拖曳绳索、擦洗甲板，由犯人和身无分文的穷人承担。船员的饮食很不均衡，包括饼干、肉类、油和醋、豆类和咸鱼，如果能捕获新鲜的鱼，就吃鲜鱼。随着时光的流逝，所有食物最终都变质毁坏，饼干被虫蛀，老鼠也饥肠辘辘。不过海船一般会带猫，有时是鼬，以对付老鼠。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一天吃一顿热饭，饭菜是在沙箱上烹饪的。食物不会短缺，但饮用水会变得匮乏。随着旅程继续，船上储藏的淡水会越来越污浊并变臭，必须兑醋进去。木桶内的淡水用完后，就灌入海水，以维持船身的平衡。

船上的贵族是船长和领航员，他们的金项链上挂着哨子，身穿黑色天鹅绒斗篷，以表明他们的官职。他们在自己的私人舱房内吃睡，其他人则根据自己的地位，安顿在不同地方。有经验的水手住在艏楼，武士住在舰桥下。夜间舱内空气混浊恶臭，而犯人和弃儿们更可怜。船只驶离赤道进入比较寒冷的海域时，他们只能睡在甲板上，裹着羊皮或油布

瑟瑟发抖。所有人都穿着因为沾了盐而硬挺的衣服，躺在稻草垫上睡觉。如果天气湿润，他们的衣服永远干不了。如果水手死亡，他们的油布毯子将会作为他们的裹尸布，陪他们坠入深海。他们往木桶里排泄，如果海况平稳，就直接向船外拉屎屙尿。没有人洗澡。每天的生活就是呼喊换班、按时吃饭、紧急维修的任务，以及清晨和夜间定时的祈祷。在暴风骤雨来袭的日子里，水手们高高地攀爬在索具上，俯瞰着颠簸狂暴的大海，调整风帆、收放或者调节沉重的帆布，感受风雨的击打。船只状况良好、海况稳定的时候，水手们也会娱乐。他们被禁止打牌赌博，因为这很容易造成麻烦。他们可以钓鱼、补觉、读书（如果他们识字的话），按照笛子或鼓点唱歌跳舞，或者聆听神父朗读圣徒传记。在圣徒瞻礼日，船员们可能在甲板上组织宗教游行。举行弥撒的时候，不分发圣餐，以免圣餐杯倾倒，亵渎了圣饼与酒。乐师的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娱乐，以维持士气。

水手们越来越憔悴、干渴，因为晕船而羸弱。无法适应航海生活的人纷纷死于痢疾和高烧。虽然餐食中起初加入了水果干、洋葱或豆类，以促进水手的健康，但这些食物日渐腐败，无法入口。渐渐地，在不经意间，所有船员都慢慢地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水手病”。若没有充足的维生素C，68天后人体就会出现症状；84天后，开始有人死亡；111天后，坏血病就能消灭整条船上的船员。对达伽马的部下来说，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流逝。

虽然遭到了大海的沉重打击——赤道的酷热，温度逐渐下降，南方海域的惊涛骇浪——船队还是继续前进，平均每天能前进约45英里。在大约南纬20度的海上，水手们感受到了风向的变化，于是转向东南方，开始东进，希望能绕过好望角。11月4日，星期六，言简意赅的日记作者又一次提笔记录，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他们前头的旅程：“测深为110英寻^[30]。9点，我们看到了陆地。然后各船靠拢。我们换上喜庆的衣服，鸣炮向总司令致敬，并以大小旗帜装点我们的航船。”^[31]这些简洁的话

语背后掩饰着压抑已久的激烈情感。他们已经连续93天看不见陆地，在开阔海域航行了约4500英里，并坚持了下来。这是了不得的航海成绩。哥伦布抵达巴哈马的航行仅持续了37天。

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到好望角，而是在好望角西北125英里处的一个开阔海湾登陆。利用此次登陆，他们一丝不苟地维修了船只：清洗船体，修补船帆和桁端。他们还狩猎以获取肉类，并补充淡水。他们第一次得以组装和使用星盘（在颠簸的甲板上无法使用星盘），记录了准确的纬度。他们与土著的会面气氛紧张。据日记作者说，这些土著“肤色黄褐”。^[32]他还吃惊地发现，“土著那数量极多的狗与葡萄牙的狗相似，吠声也差不多”。葡萄牙人俘虏了一名土著男子，将他带到船上，给他食物。但是，译员也无法理解这些土著的语言。日记记载道：“他们讲话的时候，好像在打嗝。”^[33]这些土著是科伊科伊人，西南非洲的游牧民族。后来欧洲人称其为霍屯督人，这个名字是模仿他们说话的声音。起初双方的交流还是友好的。日记作者得到了“一只他们戴在阴茎上的壳子”。^[34]但双方最后发生了冲突，达伽马被土著用矛打成轻伤。“之所以发生所有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鄙夷这些人，认为他们没有斗志，没有能力从事暴力，因此我们登陆的时候没有携带武器。”^[35]这或许是此次远征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葡萄牙人登陆时总是小心戒备，并全副武装。他们常常受到一丁点儿的刺激就射击。

在暴风骤雨中，他们花了六天，尝试了多次才成功绕过好望角。再度登陆牧牛人湾（此时已经更名为圣布莱斯，迪亚士九年前到过此地）时，他们大肆炫耀武力：身穿胸甲，弩弓蓄势待发，长艇上的回旋炮随时待命，以便让前来观看他们的土著知道“我们有能力伤害他们，尽管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愿”。^[36]这些会面进行的时候，双方互相无法理解，就像之前葡萄牙人沿着西非海岸航行期间与土著的多次接触一样。但也有一些时刻，双方逾越了文化与语言的鸿沟，体现出了人性的温暖。在这里，他们开始将补给船上的物资搬运到其他船上，然后将补给船烧毁

在海滩上。

12月2日，一大群土著，约二百人，来到海滩上。

他们带来了十几头牛和四五只羊。我们一看到他们，就上岸了。然后，他们开始吹奏四五根笛子，有的是高音，有的是低音，构成了悦耳的和声，尽管我们没想到这些黑人懂得演奏音乐。他们按照黑人的风格跳舞。总司令随后命令吹响喇叭。我们在小船上跳起舞来，总司令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也跳了起来。[\[37\]](#)

一时间，非洲人与欧洲人在节奏和韵律中联合起来。但是，双方的互相猜疑并没有消散。几天后，葡萄牙人因为害怕遭到埋伏，从船上用他们的后装回旋炮开炮，驱散了土著牧民。葡萄牙人乘船驶走的时候，回望海湾，看到的最后一幅景象是科伊科伊人拆毁他们不久前竖立的石柱与十字架。为了泄愤，葡萄牙人一边航行，一边用大炮轰击一群海豹和不会飞的企鹅。

小船队因为未能尽快绕过好望角而付出了沉重代价。由于风暴，船队暂时分散了。12月15日，他们顶着强劲的逆流，艰难驶过了迪亚士的最后一根石柱。到20日时，他们又被海流冲回了那里。迪亚士的部下当初就是在此处拒绝前进的。幸亏从船尾方向刮起了非常猛烈的风，达伽马的船只才脱离了这处海岸迷宫，得以继续前进。“此后，上帝就仁慈地允许我们前进！”日记作者大感快慰地写道，“愿上帝保佑，一直是这个样子！”[\[38\]](#)

绕过非洲的艰难航行对人员和船只都造成了很大损害。“圣拉斐尔”号的主桅在接近顶端的地方破裂了，然后又损失了一只锚。饮用水越来越少。现在每人的饮水配给只剩1/3升，而且他们烧饭用的是海水，所以更加干渴。坏血病开始在船员当中肆虐。他们急需登陆，进行休整。

1498年1月11日，他们抵达了一条小河。他们立刻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聚集到海滩上观看的人身材魁梧，与科伊科伊人迥然不同。他们并不畏惧葡萄牙人，而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这些陌生的白人。这些人是班图人，葡萄牙人的译员能够和他们交流。葡萄牙人补充了淡水，但不能久留，因为风向对他们有利。1月22日，他们抵达了一处低矮而林木葱茏的海岸和一条比之前看到的大得多的河流的三角洲，水中潜伏着鳄鱼和河马。皮肤黝黑、身材挺拔的人们乘着独木舟前来，与他们会见和做生意，不过有些土著在葡萄牙人的日记中被描述为“非常傲慢……看不上我们给他们的东西”。^[39]

此时坏血病的肆虐已经非常严重，许多船员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们的手脚和腿肿胀得可怕；他们的牙龈满是血污、腐败发臭，并且覆盖了牙齿，仿佛将牙齿吞噬了，以至于他们无法进食。他们的口臭变得令人无法容忍。然后，开始有船员死亡。保罗·达伽马不断用自己的药品抚慰和治疗病人与垂死者，但挽救了整支探险队的不是保罗的治疗，也不是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是当地的健康空气，而是因为赞比西河两岸长满了水果。

他们在庞大的三角洲下锚，逗留了一个月，将船体倾侧后进行清扫、堵缝和修理，维修“圣拉斐尔”号的桅杆，补充淡水，并从风浪颠簸的摧残中恢复元气。他们再次起航之前，竖立了一根奉献给圣拉斐尔的石柱，并将赞比西河命名为“吉兆河”。从空气、更温暖的气候和当地土著较高的文明程度中，葡萄牙人感受到了一种期许。航海七个月后，他们已经抵达了印度洋的门槛。

2月24日，船队出发，现在进入了莫桑比克海峡，即东非海岸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的开阔海峡。此处海域的漩涡和湍流可能对航船造成严重威胁。天气越来越热；海天一色，尽是鲜亮的碧蓝；陆地一面的景致则是绿树白沙与碎浪。为了避免在沙洲上搁浅，他们只在白天航行，夜

间停船落锚。他们的航行一帆风顺，直到3月2日发现了一处大海湾。较轻型的卡拉维尔帆船“贝里奥”号在测深时认错了水道，一段时间内在一处沙洲搁浅。在领航员科艾略努力驾船脱离沙洲时，他们看到一群人乘坐独木舟在铜喇叭的乐声中，从邻近一座小岛驶来。“他们邀请我们进入海湾深处，说如果我们愿意，他们可以引领我们入港。其中一些人登上了我们的船，品尝了我们的饮食，吃饱喝足之后离去了。”^[40]他们得知，这个港口叫作莫桑比克，他们交流的语言是阿拉伯语。他们已经来到伊斯兰世界。此时，他们复杂的任务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

^[1] Oliviera e Costa, João Paulo. *D. Manuel 1*. Rio de Mouro, 2005, p.176.

^[2]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20: 16。

^[3] Matthew 19: 30.

^[4]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p.269-270.

^[5] Góis, Damião de. *Cró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 Manuel*. Vol. 1. Coimbra, 1926, p.49.

^[6]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7, p.101.

^[7] Vasconcelos, Basílio de, ed. *Itinerário do Dr. Jerónimo Münzer*. Coimbra, 1931, p.27.

^[8] Vasconcelos, Basílio de, ed. *Itinerário do Dr. Jerónimo Münzer*. Coimbra, 1931, p.22.

^[9] Vasconcelos, Basílio de, ed. *Itinerário do Dr. Jerónimo Münzer*. Coimbra, 1931, p.27.

^[10] 武尔坎为罗马神话中的火神与工匠神。

^[11] Vasconcelos, Basílio de, ed. *Itinerário do Dr. Jerónimo Münzer*. Coimbra, 1931, p.27.

[12] 传入中国（明朝）后，被中国人称为“佛郎机炮”。佛郎机是明代对葡萄牙、西班牙的统称。

[13] 克拉克帆船是15世纪时盛行于地中海的一种三桅或四桅帆船。它的特征是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大斜桅。克拉克帆船体型较大，稳定性好，是欧洲历史上第一种可用作远洋航行的船只。

[14] Pereira, Duarte Pacheco. *Esmeraldo de Situ Orbi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H.T. Kimble. London, 1937, p.166.

[15] “克鲁扎多”在葡萄牙语中的字面意思是“十字军战士”，是葡萄牙古时金币或银币的名称，面值和价值差别很大。巴西的货币也曾用这个名字。

[16] 1312年，圣殿骑士团遭到教皇克雷芒五世（受到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怂恿）镇压。葡萄牙国王迪尼什一世保护了葡萄牙境内的圣殿骑士团组织，后来将其改建为“基督骑士团”。

[17]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273.

[18]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278.

[19]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276.

[20]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278.

[21]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278.

[22]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1, Lisbon, 1778, p.279.

[23]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1.

[2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

[2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

[26]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

[27]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

[28]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

[29] Disney, Anthony, and Emily Booth, eds. *Vasco da Gama and the Linking of Europe and Asia*. Delhi, 2000, p.89.

[30] 英寻为测水深的单位，1英寻合6英尺或1.8288米。

[3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

[32]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p.5-6.

[33]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7, p.111.

[3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

[3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8.

[36]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12.

[37]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11.

[38]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16.

[39]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20.

[40]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22.

4 “让魔鬼把你抓走！”

1498年3～5月

数千英里之外，在里斯本的圣乔治宫，墙上悬挂的毛罗修士绘制的圆形地图展示着它自己版本的世界形态。这幅地图上的非洲被严重扭曲，印度不像是个清晰的次大陆，而是巨大的圆形亚洲被撕裂的一角。地图的大部分注释和地名来自15世纪威尼斯旅行家尼科洛·达·孔蒂的漫游和讲述。但这幅地图清楚地表明了葡萄牙人需要跨越的印度洋，以及沿海城市卡利卡特。孔蒂说，卡利卡特是印度贸易的核心。地图上，“卡利卡特”下方写着诱惑人的图释——“胡椒产地”。据说，间谍佩罗·达·科维良在消失于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之前，在开罗转发了一封信，里面记录了他前往印度的任务的详情。这应当能给葡萄牙人许多信息，帮助他们了解他们将要驶入的那个世界。但至今我们都不清楚，科维良的信有没有被送回里斯本，更不知道若昂二世国王有没有将其中的信息传递出去。而达伽马在远航时，脑子里有怎样的秘密指示、地图、目的地或地理学知识，是记载他的航行的那位不知名日记作者所不知道的。达伽马似乎携带着一封信，收信人是非常含糊的卡利卡特的“印度的基督徒国王”。这封信是用阿拉伯语写的，表明葡萄牙人知道印度洋地区有许多穆斯林。除此之外，从此后发生的事情来判断，葡萄牙人对这个世界——它的气候规律，历史悠久的贸易网络，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复杂的文化关系，商业与政治传统——知之甚少。他们犯下了许多错误，产生了许多误解，而这些错误和误解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印度洋的面积是地中海的三十倍，形状像一个巨大的字母M，印度就是M中间的V。印度洋的西面是阿拉伯半岛的炽热海岸和东非斯瓦希里的漫长海岸；东侧是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澳大利亚西部的末端将印度洋与太平洋隔开；南面是南极那冰冷而狂暴的海流。在风帆时代，印

度洋一切航行的时机与贸易路线都由规律性很强的季风所决定。季风是地球气象的最宏伟戏剧之一，根据它季节性的周而复始，就像一套互相啮合的齿轮一样，人们得以将货物运过这片大洋。印度洋西部传统的海船是阿拉伯三角帆船，这是一个大类的名称，包括样式与类型不同的配有三角帆的瘦长型船只，尺寸和设计根据地区不同有所差别，从5吨至15吨的沿海船只到数百吨的远洋航船不等，后者比达伽马的克拉克帆船雄伟得多。历史上的阿拉伯三角帆船是用椰子外壳纤维制成的绳索固定起来的，而不用钉子。

与哥伦布不同，葡萄牙人闯入的并非沉寂的海域。数千年来，印度洋一直是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将货物运过遥远的距离，从广州到开罗，从缅甸到巴格达，其借助了一个由诸多贸易体系、航海风格、文化类型与宗教信仰，以及一系列中心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这些中心包括：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它比威尼斯更大，是来自中国与更遥远的香料群岛的商品的集散地；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它是胡椒市场；霍尔木兹，它是通往波斯湾与巴格达的门户；亚丁，它是红海的出入口和通往开罗的路径，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洋沿岸还有其他数十座小城邦。印度洋输送着来自非洲的黄金、黑奴和红树枝干，阿拉伯半岛的熏香和海枣，欧洲的金银，波斯的骏马，埃及的鸦片，中国的瓷器，锡兰的战象，孟加拉的大米，苏门答腊岛的硫黄，摩鹿加群岛的肉豆蔻，德干高原的钻石，以及古吉拉特的棉布。在印度洋，没人能够形成垄断，因为它太庞大、太复杂，所以亚洲大陆的各个强国把海洋留给商人。印度洋有小规模的海盗，但没有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武装船队，也几乎没有领海的概念；曾经的海上超级大国——明朝的星槎船队一度前进，又后退了。印度洋是一个硕大无朋而相对安定的自由贸易区：全世界财富的一半以上要通过它的海域，流过一个被许多玩家瓜分的商业联邦。有人说：“神把大海给了大家。”^[1]

这就是辛巴达的世界。它的主要商人群体中大部分人是穆斯林，他

们零散地分布在印度洋周边，从东非栽种棕榈树的海滩，到东印度的香料群岛。在印度洋，伊斯兰教不是通过武力传播的，而是由传教者和商人乘坐阿拉伯三角帆船，播撒到各地。这是一个多种族的世界，贸易依赖于社会与文化的交往、远途移民，以及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的信徒和当地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一定程度的互相协调合作。印度洋世界比葡萄牙人起初能够理解的要丰富得多、层次更多，也更复杂。决定葡萄牙人思维的，是他们在非洲西海岸发展起来的垄断贸易权，以及在摩洛哥开展的圣战。他们似乎不知道印度教的存在，而他们受到遏制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咄咄逼人地发动进攻：他们随时准备绑架人质，点燃了的蜡烛始终在射石炮的点火孔附近待命。他们带着船上高射速的火炮闯入印度洋。他们是来自印度洋世界固有规则之外的闯入者。最致命的是，他们在印度洋遇到的那些船只都没有可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防护。

达伽马的船队在接近莫桑比克城时，当即发现此地与他们见识过的非洲大不相同。这里的房屋整洁优美，屋顶覆盖茅草；他们能够瞥见宣礼塔和木制清真寺。那里的人们显然是穆斯林商人，衣着华丽，身披丝绸镶边、带有黄金刺绣的长袍。他们是说阿拉伯语的城市居民，葡萄牙人的译员可以和他们交流。葡萄牙人通常都受到友好的欢迎。“当地人立即踌躇满志地登上我们的船，仿佛他们早就与我们熟识，并与我们亲切地交谈。”^[2]葡萄牙人第一次听到了他们前来寻觅的那个世界的音讯。通过译员，他们得知了“白穆斯林”（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人）的贸易情况；港内有四艘“白穆斯林”的船只，运来了“黄金、白银、丁香、胡椒、姜和银戒指……珍珠、珠宝和红宝石”。不知名的日记作者以怀疑的语气（他不肯轻信也是情有可原的）补充道：“在我们即将前往的地方，这些货物很多……宝石、珍珠和香料极其丰富，根本不需要去购买，只要收集来放到篮子里就是了。”^[3]这种令人陶醉的财富的诱惑对葡萄牙人而言是极大的鼓舞。他们还得知，沿岸地区居住着大量基督徒，并且“祭司王约翰的住地离这里不远；他统治着沿海的许多城市，那些城市的居民都是巨商富贾，拥有自己的大船”。^[4]不管翻译过程当

中出了多少错误和遗漏，“我们兴高采烈，恳求上帝赐予我们健康，好让我们亲眼看见我们如此憧憬的东西”。^[5]

葡萄牙人渐渐意识到，当地人把他们也当成了穆斯林商人。起初，当地的苏丹秉持友好的精神，登上葡萄牙船只。尽管达伽马努力摆开排场（这应当不是很轻松，因为他的船和人员的外表都很寒酸），但当苏丹看到葡萄牙人呈上的礼物的质量时，他还是大失所望。葡萄牙人显然不知道这个新世界有多富庶，所以从里斯本起航时只带了一些用于取悦西非酋长的小玩意儿：铜铃铛和铜盆、珊瑚、帽子和朴素的衣服。苏丹想要的是鲜红色的布匹。既然这些怪异而憔悴的水手无法证明自己是商人或显贵人物，那么他们的身份和目的就招致了怀疑。苏丹起初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因此热切希望一睹他们著名的弓和《古兰经》。达伽马不得不逢场作戏，谎称他们来自邻近土耳其的一个国家，而没有带《古兰经》来是因为害怕神圣的经书在海上损失掉；不过，他为苏丹演示了弩弓的射击，并请其参观一套甲胄，“苏丹对这些大感满意，并非常惊讶”。^[6]

葡萄牙人已经了解到，海岸是多么险象环生——“贝里奥”号在入港时不慎搁浅——而他们前方的海域也遍布浅滩。达伽马请求苏丹派一名领航员帮助他们。苏丹派了两名，并索要黄金作为酬劳。达伽马对穆斯林的意图抱有根深蒂固的猜疑，于是坚持要求其中一名领航员始终留在葡萄牙人的船上。东道主的心里狐疑渐增，双方交流的气氛很快压抑起来。3月10日，星期六，葡萄牙人的船只离开城镇，来到3英里外的一个岛屿上，秘密举行弥撒。这时，船上的一名当地领航员逃走了。达伽马派了两艘小船去追捕他，但小船遇到了六艘来自岛屿的武装船只，被命令返回莫桑比克城。到此时，基督徒可能觉得自己的伪装被揭穿了。他们把手边仅剩的一名当地领航员五花大绑以防止他逃跑，然后用射石炮驱散了穆斯林。上路的时候到了。

然而，天公不作美，他们无法起航。风向转了。他们被迫返回岛屿。苏丹努力议和，但遭到拒绝。随后十天，大家神经紧绷。岛上的水有咸味，葡萄牙人开始缺少淡水。他们不得不于3月22日返回莫桑比克港。午夜时分，他们企图偷偷登陆以补充淡水，把剩余的那名领航员也带了去。此人要么是找不到泉水，要么是不愿意找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试了一次，发现泉水有二十人守卫。他们用射石炮轰击守军，将其驱散。争夺淡水的战斗在继续。次日，他们发现泉眼处仍然有人把守，这一次守军搭建了木栅来掩护自己。葡萄牙人炮击了这个地点三个钟头，直到守军逃走。3月25日，炮击的持续威胁使得当地居民都闭门不出。葡萄牙人取了淡水，从一艘小艇抓了几名人质，最后向城镇放了几炮，这才离去。

葡萄牙人倍感挫折，于是做出咄咄逼人的反应，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船长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猜疑心越来越重，渴望得到可靠的给养和一个基督教港口的友好欢迎。但是，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

北上的航程十分缓慢，他们被逆风往相反的方向推。因为不信任扣押来的领航员，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试探水深，以躲避沙洲和浅滩。他们错过了基尔瓦港（他们相信那里有许多基督徒），认为是领航员欺骗他们，于是狠狠地鞭打他。“圣拉斐尔”号不慎搁浅，他们最后终于抵达蒙巴萨港。这一天是棕枝主日^[7]。“我们欣喜地在此地落锚，”日记作者写道，“因为我们相信次日一定能够登陆，与基督徒一同听弥撒。据说这里的基督徒有自己的聚居区，与摩尔人^[8]隔开。”^[9]与基督徒待在一起的想法令人宽慰，难以磨灭。

在蒙巴萨登陆的情形与之前相似。当地苏丹起初很欢迎他们。葡萄牙人试探性地派了两人（可能是犯人）上岸，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第一次遇见了“基督徒”，“他们给他们（葡萄牙人）看一张纸，那是他们膜拜的对象，纸上画着圣灵的草图”。^[10]葡萄牙人早期最根深蒂

固、几乎滑稽可笑的一个误解就是，拥有自己神祇形象的印度教徒（葡萄牙人对其几乎一无所知）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离经叛道的派系。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的时候，希望能找到背离正统的基督徒。这些当地人拿着拟人化的图像，葡萄牙人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基督徒。

苏丹给他们送去了一些香料样品，以开始贸易活动。不过，葡萄牙人的恶名可能已经传播到了此地。当地人的欢迎让葡萄牙人放松了警惕，小船队准备在当地人的引导下入港，但这时“圣加百列”号开始漂移，撞上了另一艘船。在混乱中，船上的当地领航员惊慌失措，可能是因为害怕受罚，跳入海中，被当地小艇接走了。现在葡萄牙人惊恐张皇起来。当夜，他们严刑拷打两名人质，向其皮肤泼滚油，使其“供认”当地人已经下令要俘虏葡萄牙船只，以报复他们炮击莫桑比克的行为。“第二次上刑的时候，其中一名穆斯林虽然双手被缚住，但还是跳海了；上午，另一人也效仿他而去。”^[11]他们显然宁愿冒被淹死的风险，也不愿承受酷刑。

将近午夜时，船上的瞭望哨发现，月光下海面上波光粼粼，似乎有一群金枪鱼游过。其实那是有人在静悄悄地向船只游来。在接近“贝里奥”号后，他们开始割断缆绳；其他人则爬上船，爬到索具上，但“看到自己暴露，就静悄悄地滑下去，逃走了”。^[12]4月13日上午，船队再次起航，前往沿海以北70英里处的马林迪，寻觅更好的运气和可靠的领航员。佚名日记作者的记述表明，病人的恢复情况不错，“因为这里的气候非常宜人”。^[13]当然，病人恢复的原因更可能是他们食用的大量柑橘中的维生素C。即便如此，远征也举步维艰。水手们起锚时因为筋疲力尽，无力将锚升起，不得不割断绳索，将一只锚留在了海底。他们在沿着海岸北上时，遇见了两艘小船，“立刻追击它们，打算俘获其中一艘，因为我们需要一名能够将我们带到目的地的领航员”。^[14]一艘小船逃走了，但他们捕获了另一艘。小船上的全部十七名乘客，包括一名地位显赫的老人及其夫人，都选择跳海，而不是被海盗活捉。但他们被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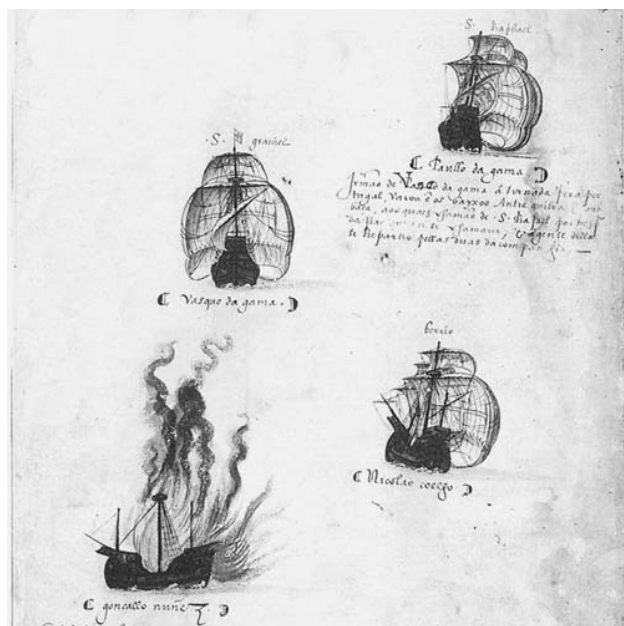
了上来，葡萄牙人还从小船上获得了“金银和大量粮食，以及其他物资”。^[15]葡萄牙人认为印度洋世界对他们抱有敌意，所以到此时已经将捕捉人质当作惯用策略。

4月14日晚，他们抵达了马林迪。这里的房屋高耸，墙壁刷着白石灰，有许多窗户，坐落在肥沃田野与葱翠的景致之间。日记作者或许被思乡之情打动，说这里让他想起了塔霍河畔的一座城镇。次日便是复活节星期日。没有人前来查看这些奇怪的船只。他们的坏名声已经传开了。谨慎起见，达伽马让他俘获的老人登上城镇前方的一处沙洲，作为中间人，并等待当地人来营救他。当地苏丹的最初反应与葡萄牙人前两次登陆遇到的情况类似。老人带回了消息，苏丹“很乐意与他（达伽马）议和……并自愿将他国家的所有出产，不管是领航员还是其他什么，全都奉献给总司令”。^[16]达伽马带领船队接近了城镇，但还是拉开一段距离，努力判明局势。他拒绝了让他上岸的邀请，说“他的主人不准他上岸”。^[17]双方在小划艇上谈判，但交流还是很友好的。苏丹送来了羊和香料。他询问葡萄牙国王的名字，以便记录下来，并表示希望给葡萄牙国王派去一名大使，或送去一封信。

达伽马斟酌这些言辞，放松了自己的警戒，释放了小船上的人质，以表达善意。葡萄牙人有所不知的是，他们其实是在学习印度洋政治外交的第一课。苏丹在寻找盟友，以对抗海岸南北两面的穆斯林贸易竞争对手。基督徒闯入者后来渐渐学会如何利用当地不同宗教的纷争，建立联盟，分而治之。双方举行了彬彬有礼的庆典仪式，由一大片海域将他们安全地分隔开。苏丹“大为满意，乘船绕我们的船只行驶。我们鸣礼炮向他致敬”。^[18]双方都派遣使者互相拜访，葡萄牙人派犯人上岸试探。苏丹端坐在海滩上一座青铜宝座之上，在乐师的奏乐声中，命令他的骑兵沿着沙滩举行模拟战斗的表演。达伽马拒绝了多次请他上岸拜访苏丹老父亲的请求。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百般振奋地得知，四艘印度基督徒的船只前不久抵达了马林迪。不久之后，这些“基督徒”便来到葡萄牙人的船上。葡萄牙人向他们展示一幅受难的基督及其母亲的图画，“他们匍匐在地。我们在那里时，他们就在画像前祈祷，并奉献丁香、胡椒和其他物品”。^[19]这些“基督徒”的船只显然配有大炮和火药。夜间，他们发射火箭并鸣放礼炮，照亮了夜空，以此向基督徒朋友致敬。他们的呼喊“基督！基督！”振聋发聩。^[20]他们还借助不流畅的阿拉伯语，向达伽马发出警示，不要上岸，也不要信任穆斯林。他们和葡萄牙人见过的基督徒都不一样。达伽马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印度人皮肤黄褐，穿的衣服很少，蓄着长胡须和长头发，并且把胡须与头发编成辫子。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吃牛肉。”^[21]这可能是个文化上的误会。让葡萄牙人期待了许久的所谓基督徒可能其实喊的是：“黑天！黑天！”^[22]

葡萄牙人在马林迪受到的接待颇有些节庆气氛。“我们在这座城镇前方停泊了九天。在此期间，我们举行宴会、模拟战斗表演和音乐演出。”^[23]但达伽马急于找到一名领航员，于是他又抓了一次人质，这才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领航员。苏丹派遣了一名“基督徒”，此人愿意带领葡萄牙远征队跨越重洋，去往他们渴望的目的地。这个人更可能是一名来自古吉拉特的穆斯林，拥有一幅印度洋西海岸的航海图，并且熟悉四分仪，懂得观测天文。五百年后，阿拉伯三角帆船的船长们还会咒骂这个穆斯林领航员，因为就是他最早向法兰克人，即欧洲人泄露了印度洋航海的秘密。



达伽马的小舰队，绕过好望角后，补给船被焚毁

4月24日，季风的风向转为对他们有利，于是他们驾船出海，前往“一座名叫卡利卡特的城市”。^[24]日记中的说法表明，至少其作者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盲目地闯入印度洋的整支远征队可能对自己的目的地都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一路顺风，横穿新海域的航行惊人地迅速。他们的航向是东北方。4月29日，他们宽慰地发现，自从进入大西洋南部以来就看不到的北极星再次出现在夜空中。5月18日，星期五，离开陆地仅仅23天，在开阔海域航行2300英里之后，他们看到了崇山峻岭。次日，瓢泼大雨猛击他们的甲板，使得能见度大幅下降。猛烈的闪电划破了天空。他们目睹的是季风的前奏。风暴平息之后，领航员认出了海岸：“他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卡利卡特以北，这里就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25]雨停之后，他们第一次观察到了印度：昏暗的阴影中，高高的山峰屹立着。这是西高止山脉，与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几乎平行。他们能看得见林木繁茂的山坡、一块狭窄的平原，以及拍击白沙滩的波浪。

葡萄牙人目睹这景象，一定百感交集。309天之前，在赖斯特罗，

他们曾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涉水走进海中，为他们送行。他们航行了1.2万英里，已经损失了不少人。而在他们的远航之前，葡萄牙人还经历了更漫长的旅程，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恩里克王子最早的一批探索之旅，沿着非洲海岸的艰难南下，探索河流，损失许多船只，以及航海和死亡的许多代人。葡萄牙人第一次模糊地看到印度，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时刻。达伽马结束了欧洲的孤立。大西洋不再是一道屏障，而变成了一条将两个半球连接起来的通衢大道。这是全球汇聚的漫长过程中一个标志性时刻，但佚名作者写下的这本日记并没有体会到自己的重大成就，而稍晚的葡萄牙史料对此也只有一些含糊的暗示：瓦斯科·达伽马慷慨地赏赐了领航员，呼吁水手们祷告，并“感谢上帝，是他把他们安全送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地”。^[26]

他们抵达的时刻正是雨季的开端，此时一般不会有船只造访这片海岸。岸上的人们立刻对葡萄牙人产生了极大兴趣，这既是因为他们的船只很新颖，与在印度洋航行的任何船只都不同，也是因为他们到来的时机不符合常规。四艘小船赶来查看这些陌生的访客，并向他们指出一段距离之外的卡利卡特。次日，这些小船返回了岸边。达伽马派了一名犯人与这些当地人一同上岸，这个犯人名叫若昂·努涅斯，是个改宗犹太人，命中注定他要执行葡萄牙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登陆。

海滩上的人们误以为他是穆斯林，将他带到两名突尼斯商人那里，后者会说一些卡斯蒂利亚语和热那亚方言。双方会面之时，都大吃一惊。努涅斯发现对方用属于他自己的大陆的语言向他说道：“让魔鬼把你抓走！谁带你来的？”^[27]

长久的期待没有迎来高潮，反而一下子泄了气。在这个瞬间，世界一定都大失所望。葡萄牙人绕过了半个世界，却发现对方用和他们的母语差不多的语言说话。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联邦，从直布罗陀的大门到中国海域，比葡萄牙人目前能够理解的要广大得多。

努涅斯相当沉着和机智地答道：“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这可能是对曼努埃尔一世所发布航行指示的相当好的描述了。突尼斯人同样感到难以置信。他们无法理解，葡萄牙人怎么可能做这样的航行，目的又是什么：“卡斯蒂利亚国王、法兰西国王或者威尼斯共和国政府为什么不派人来？”^[28]

努涅斯大力捍卫葡萄牙的尊严，回答说，因为葡萄牙国王不允许他们。两名突尼斯商人带他到他们的府邸，请他品尝精美食品——小麦面包和蜂蜜，然后热情洋溢地陪他回到船边。其中一人刚爬上船，就高呼道：“好运气！好运气！好多红宝石！好多绿宝石！你们应当好好感谢神，因为他把你们带到拥有这些财富的国度来！”^[29]“我们听了这话，大感震惊，所以虽然听到了他的话，但还是不敢相信。”佚名日记作者写道，“在距离葡萄牙这么遥远的地方，居然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话。”^[30]

与友好穆斯林的会面可能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仿佛葡萄牙人在透过望远镜的错误一端，端详着自己的世界。无知和孤立的是欧洲，而不是他们跌跌撞撞地闯入的这片大海。并且，他们真是超乎寻常的幸运。其中一个突尼斯人，被称为孟塞德（可能是伊本·塔伊布），将帮助他们理解这个新世界。此人对葡萄牙有些怀念之情，他于若昂二世在位期间曾经看到葡萄牙船只在北非海岸经商。他为葡萄牙人介绍和指引了卡利卡特那极其复杂的礼仪与风俗习惯，这种帮助是极其宝贵的。他告诉他们，这座城市由一位国王统治，即扎莫林^[31]，意思是“海王”，他会“非常高兴地接待将军（达伽马），因为后者是一位外国君主派来的使者；如果将军航行的目的是与卡利卡特建立贸易联系，并且如果将军为了这个目的带来了恰当的商品，扎莫林会更加喜悦。因为扎莫林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对贸易征收的关税”。^[32]

卡利卡特虽然没有天然良港，但凭借其统治者治国有方和对商人公

正的美誉，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马拉巴尔沿海香料贸易的主要中心。15世纪的一位访客写道：“不管一艘船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要在卡利卡特停泊，都会受到不偏不倚的公正待遇，被征收的关税与其他船只并无二致。”^[33]这里有一个规模相当大、根基很深的穆斯林贸易社区，被称为玛皮拉人，他们是穆斯林水手与低种姓的印度人的后代，也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旅（即所谓的“麦加商人”）。所有人都与高种姓的印度教统治者和睦相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这两个群体之间互惠互利。中国人在一次大航海过程中注意到了卡利卡特的这种互惠关系。编年史家马欢写道：“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34][35]}葡萄牙人则注定要扰乱这种和谐共存的关系。

扎莫林一般与其他高种姓的印度教徒一起生活在距离城市有一段距离的一处宫殿内。他在卡利卡特城内也有一处宅邸，居高临下，可以从那里俯瞰港口，查看船只穿梭来往，并征收税赋。他通常也在这里接见外国商人与使者。达伽马此时还在城外，于是派了两名犯人当使节，和孟塞德一起去拜见扎莫林。

扎莫林立刻给出了友好欢迎的答复：他向使者赠送了礼物，表示自己愿意会见这些奇怪的访客，并带领随从返回城内。他还提供了一名领航员，引导葡萄牙人的船只去一段距离之外的更好的锚地，那是一座安全的港口，葡萄牙人把那个定居点称为班达里^[36]。达伽马同意转移自己的船只，但根据自己在非洲海岸的经验，他非常谨慎，不肯径直驶入领航员指示的锚地。葡萄牙人在这个新世界活动的时候，猜疑和误读对方动机是家常便饭。

在船上，几位船长就下一步该如何做展开了激烈争论。他们已经以最大的恶意揣摩伊斯兰商人了。多数意见是，让总司令亲自上岸的风险太大。他们相信，即使当地大多数居民是基督徒，城内穆斯林商人在商业和宗教上也对基督徒抱有敌意，所以不能让总司令亲自上岸。达伽马

在一次演讲（可能是编年史家虚构的）中坚持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已经以国王使臣的身份来到了印度。他必须亲自去谈判，哪怕拿他自己的生命冒险。他打算带少数人同去，并只作短暂停留：“我不打算在岸上待很久，那样就会给穆斯林机会，搞阴谋诡计反对我。我计划只和国王谈话，三天后返回。”^[37]其他人必须留在海上，由他的兄弟指挥。每天要派一艘武装小艇接近岸边，与岸上保持联络；如果他不幸遇害，其他人应当立刻起航离开。

5月28日（星期一）上午，也就是他们抵达卡利卡特一周之后，达伽马带领十三人出发了。队伍当中包括译员和佚名日记作者，所以能够记录下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我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日记作者写道，“将射石炮搬运到我们的的小船上，还带上了喇叭与许多旗帜。”^[38]一方面，他们尽量摆排场；另一方面，他们又做好武装防御的准备。饱经风霜的水手们还因为船只的颠簸而步伐不稳，就这样踏上了印度次大陆的土地（它“隐匿了那么多年”）。他们尽其所能地摆出威武雄壮的姿态，在喇叭声中登陆。19世纪画家将以浪漫化的笔法描摹这个场景。

扎莫林的总督以截然相反的风格迎接他们。对步履蹒跚的水手们来说，岸上欢迎委员会的景象一定让他们大为警觉：一大群人，有的蓄着大胡子和长发，戴着金光闪闪的耳钉耳环，许多人上身赤裸，手里利剑出鞘。这些人是“奈尔”，即印度教一个武士种姓的成员，自青年时代便宣誓捍卫自己的国王，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葡萄牙人误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于是迎接的场面似乎很友好。一顶配有雨伞的轿子（专供权贵使用的交通工具）已经在等候达伽马。六名轿夫轮班将轿子抬在肩膀上，快步前进。其余人只能尽快跟上。卡利卡特离海滩有一段距离，他们沿途吸引了大群人围观。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一座房屋停留，吃了带有大量黄油的米饭和非常香甜可口的蒸鱼。达伽马非常警惕，或者已经感到心焦，拒绝用餐；总督及其随员到邻近一座房屋用餐。他们之所以分开吃饭，可能是因为种姓制度的要求。

然后，他们登上两艘束缚在一起的船，驶过一条河。两岸有许多棕榈树，他们身后有一大群其他船只跟随，河岸上也有人在观看。河岸沙滩上停放着大船。“他们全都出来看我们，”日记作者写道，“我们下船后，总司令又一次坐上轿子。”^[39]随着他们接近城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女人抱着孩子从屋里出来，跟着他们在路上走。在人群层层包围之下，日记作者似乎感到浑身不自在，还有点晕头转向。他东张西望，努力观察周围的一切：这些人的外貌十分陌生，他们“面色黄褐”，^[40]与葡萄牙人见过的非洲人十分不同；男人们有的脸剃得干干净净，有的蓄着大胡子；女人们按照他的看法“全都矮小丑陋”^[41]，但佩戴着沉甸甸的金项链和金手镯，脚趾上也戴着镶嵌宝石的趾环（或叫脚戒），似乎炫耀着东印度的财富。一般来讲，他看到的人“十分友好，显然性情温和”，^[42]但最让他惊愕的是此地人口极多。

他们进城后，被带到“一座大教堂……像修道院一样大，全是石质建筑，表面覆盖砖瓦”。^[43]这其实是一座印度教神庙，但这段记述里没有迹象表明它并非某个非正统的基督教派别的教堂。神庙外有两根石柱，可能是湿婆神的林伽。走进神庙，他们看到中央有一座圣所小堂，门是青铜的，“圣所内有一幅小圣像，他们说是圣母像”。^[44]我们不知道在翻译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多少误会：葡萄牙人可能需要用阿拉伯语交流，由一名懂阿拉伯语的当地人将其翻译成马拉雅拉姆语，即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语言。达伽马跪下祈祷；祭司们洒了圣水，“给了我们一些白土，这个国家的基督徒惯于将白土涂抹在自己身上”；^[45]达伽马把他拿到的白土搁到了一边。他们离开的时候，日记作者注意到，墙壁上的圣徒戴着冠冕，“形态各异，口中的牙齿伸出一寸长，而且有四五支胳膊”。^[46]

走出神庙来到大街上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山人海，让他们根本无法行进。他们不得不暂时躲在一座房屋内，然后唤来卫兵，敲锣打鼓、吹奏喇叭和笛子并鸣枪，这才清出道路。为了围观这些异乡来客，

人群挤到了屋顶上。他们抵达宫殿的时候，差不多已是黄昏。“我们走过了四扇门，每一次都要拼命挤进去，对围观人群推推搡搡。”^[47]入口处有人因为拥挤而受伤。最后，他们终于来到国王的觐见厅，“那是一座宏伟的大厅，周边是一排排高高的座位，就像我们的剧场里一样，地板上铺着一张绿天鹅绒的地毯，墙壁上悬挂着五光十色的丝绸织物”。^[48]端坐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他们航行1.2万英里来寻找的那位基督徒国王了。

[1] Sheriff, Abdul. *Dhow Cultures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2010, p.314.

[2]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19.

[3]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23.

[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24.

[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24.

[6]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21.

[7] 棕枝主日是庆祝耶稣胜利进入耶路撒冷的节日，日期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根据基督教多个教派的传统，信徒在这一天要手捧棕榈枝，举行宗教游行，以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群众在他面前抛撒棕榈枝。在有些国家，因为难以获得棕榈枝，也可以用本土其他树的树枝代替。

[8] 在中世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等地的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称为“摩尔人”。摩尔人并非一个单独民族，而是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等。“摩尔人”也被用来泛指穆斯林。

[9]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5.

[10]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6.

[1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7.

[12]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7.

[13]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9.

[1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9.

[1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39.

[16]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1.

[17]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2.

[18]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2.

[19]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5.

[20]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5.

[2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5.

[22] 黑天是印度教诸神中最广受崇拜的一位神祇，被视为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是诸神之首。许多关于黑天的神话主要源自《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在艺术上，黑天通常被描述为蓝黑色皮肤、身缠腰布、头戴孔雀羽毛王冠。他代表极

具魅力的情人，因而常以在一群女性爱慕者簇拥下吹笛的牧人形象出现。

[23]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6.

[2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6.

[2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8.

[26]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5.

[27] *Roteiro da Viagem Que em Descobrimento da India pelo Cabo da Boa Esperança Fez Dom Vasco da Gama em 1497*. Porto, 1838, pp.50-51.

[28] *Roteiro da Viagem Que em Descobrimento da India pelo Cabo da Boa Esperança Fez Dom Vasco da Gama em 1497*. Porto, 1838, p.51.

[29] Subrahmanyam, 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1997, p.129.

[30] Subrahmanyam, 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1997, p.129.

[31] 注意，扎莫林是卡利卡特君主的头衔，不是名字。

[32]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2.

[33] Subrahmanyam, 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1997, p.104.

[34] 出自马欢的《瀛涯胜览》，其中称卡利卡特为“古里国”。

[35] Sheriff, Abdul. *Dhow Cultures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2010, p.188.

[36] 班达里，古港名。故址在今印度西南岸科泽科德附近。

[37]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4.

[38]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1.

[39]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2.

[40]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9.

[4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49.

[42]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0.

[43]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2.

[4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3.

[4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4.

[46]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5.

[47]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6.

[48]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8.

5 扎莫林

1498年5月～1499年8月

对葡萄牙人来说，第一次见到一位印度教君主，是令人难忘的体验：

国王肤色棕褐，身材魁梧，已经上了年纪。他头戴一顶饰有宝石和珍珠的帽子或冠冕，耳朵上戴着同样的珠宝。他身穿精致的棉布上衣，纽扣是很大的珍珠，纽扣孔周边是金线。他腰部围着一张白色棉布，只到他的膝盖；他的手指和脚趾都戴着许多镶嵌美丽宝石的金戒指。他的手臂和腿上戴着许多金镯子。^[1]

扎莫林按照东方人的风俗，悠闲地斜倚在一张绿色天鹅绒卧榻上，嚼着槟榔，将其渣子吐到一个很大的痰盂里。“国王右侧立着一个金盆，尺寸很大，足以让一个人环抱；金盆内盛着草药。另外还有很多银罐。卧榻上方的华盖是全部镀金的。”^[2]

孟塞德显然已经教导达伽马如何以恰当的仪态回答国王的致意：不可以走得太近，讲话时要把手挡在自己嘴巴前方。客人们得到了水果和饮水的招待。他们被要求从一个水罐里喝水，但不可以用嘴唇接触水罐，于是“有些人把水倒到自己喉咙里，咳嗽起来；其他人把水泼洒到自己脸上和衣服上，把国王逗乐了”。^[3]在人头攒动的觐见厅，葡萄牙人在文化上处于劣势，出了洋相，这可能刺伤了达伽马的自尊心。

国王要求他向聚集在此的人们讲话，达伽马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请求与国王单独谈话。于是双方来到一个内室，只有译员在场。达伽马大肆吹嘘了自己的使命：他们苦苦寻找印度已经六十年，如今代表葡萄牙国王（“形形色色海量财富的主人”^[4]）终于来到了印度，以寻找基督教国王。他承诺次日把曼努埃尔一世的书信呈送给扎莫林。这说明，达伽

马认为扎莫林是基督徒。

此时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根据惯例，扎莫林问他们愿意与基督徒（其实是印度教徒）还是与穆斯林一起住宿。达伽马谨慎地请求让他的人单独住宿。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夜色中，大雨倾盆而下，拍打着街道。他又坐上有雨伞遮盖的轿子；他们在蜿蜒曲折的街道上行进，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轿子走的速度很慢，达伽马不耐烦地抱怨起来。他们暂时在房屋内避雨，但继续与东方人交涉。当地人请他骑马，但没有马鞍，于是他拒绝了。他可能一直坐着轿子，直到抵达他们的住宿地。葡萄牙水手已经把他的床送来了，还送来了准备给国王的礼物。眼花缭乱的漫长一天结束了，给葡萄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陌生的仪式、激起浓烈气味的季风暴雨。他们可能还习惯于航船鬼魅般的颠簸起伏，很快就因精疲力竭而熟睡过去了。

葡萄牙人在扎莫林那里建立的公信力迅速烟消云散。他们在里斯本置办的礼物遭到了莫桑比克和马林迪的鄙夷，如今在扎莫林的王国更是遭到唾弃。次日早上，达伽马收齐了准备送进宫的礼物：十二块带条纹的布、四顶鲜红色兜帽、六顶帽子、四串珊瑚、六个洗手盆、一盒糖、两箱蜂蜜和两箱油。这些东西是用来取悦一位非洲酋长的，而不是印度洋那富庶的贸易文化中的一位权贵。总督捧腹大笑：“来自麦加，或者印度其他地区的最穷的商贩，拿出来的东西也比这多……如果他（达伽马）想送礼，应当送黄金做的东西。”^[5]他直截了当地拒绝把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送到海王那里。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达伽马反驳道：“他不是商贩，而是一位大使……如果葡萄牙国王命令他再次来印度，一定会托付给他贵重得多的礼物。”^[6]一些穆斯林商人到场，进一步鄙视了这些可怜兮兮的礼物。

达伽马要求亲自到国王那里解释。对方告诉他，这样是可以的，但

要稍等一会儿再带他进宫。他焦躁不安地等着。没有人回来找他。在幕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穆斯林商人感到这些基督徒新来者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他们可能得到了消息，这些基督徒的手段咄咄逼人，还炮轰了斯瓦希里海岸。卡利卡特固然是笑迎天下客的开放的贸易城市，但穆斯林商人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有证据表明，几十年前，穆斯林就是将中国商人逐出卡利卡特的主要推动力量。穆斯林商人可能觐见了扎莫林，向他提出，达伽马说得好听是个骗子，更有可能是位海盗。葡萄牙人后来相信，穆斯林要求扎莫林将达伽马处死。达伽马等了一整天，怒火中烧。但是，他的伙伴们不像他那样无法放松心情。“至于我们其他人，”日记作者写道，“我们消遣时光，在喇叭伴奏下载歌载舞，玩得非常开心。”^[7]

第二天早上，他们被带回到王宫，在那里又等了四个钟头。达伽马现在已经怒不可遏，他觉得这是扎莫林刻意怠慢他。最后，终于传来消息，国王只接见总司令和另外两人。大家都觉得“这种分隔不是好兆头”。^[8]达伽马带着他的秘书和译员，在武装人员的护卫下，走进了大门。

第二次觐见国王的气氛冰冷而令人费解。扎莫林问达伽马，前一天为什么没有进宫。他无法理解这些陌生人的动机（如果他们不是来经商的），于是连珠炮一般提问，大意是：如果达伽马来自一个富饶国家，为什么没有带礼物来？他之前提到的书信在哪里？达伽马不得不随机应变，答道，他之所以没有带礼物来是因为这是一场探索之旅；将来会有更多旅行，并带来丰厚礼物。他至少手头有葡萄牙国王的书信。扎莫林又一次试探那神秘礼物的问题：“他（达伽马）探索的目标是什么：宝石还是人？”^[9]扎莫林还讥讽地问道：“如果他（达伽马）是来找人的，那么为什么两手空空地前来？”显然已经有人告诉扎莫林，葡萄牙船上有一尊圣母玛利亚的金像。达伽马答道：“那不是金的。”圣母像可能是镀金的木头制成的。达伽马顽强地捍卫自己，补充道：“即便圣母像是

金的，他（达伽马）也不愿意与它分离，因为圣母指引他跨越了大洋，还会引导他安全回到自己的国家。”^[10]当要宣读葡萄牙国王书信的阿拉伯文版本时，达伽马不信任穆斯林将其翻译成马拉雅拉姆语；为他翻译的那个“基督徒”男孩虽然会说阿拉伯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却不识字，无法阅读这两种文字。书信最终被翻译出来之后，扎莫林得到了一些抚慰。达伽马至少证明了自己作为葡萄牙国王使臣的身份。最后是关于商品的问题：他可以回到船上，驾船靠岸，并尽可能地卖掉商品。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扎莫林。

在返回大船的路上，紧张气氛、不确定性和猜忌愈演愈烈。达伽马可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又一次拒绝骑马，要求坐轿子。季风暴雨猛烈地敲击街道。佚名作者和伙伴们跟在轿子后面，在瓢泼大雨中迷了路。他们抵达班达里时已经精疲力竭，追上了正在一座客栈避雨的总司令。到此时，达伽马的心情又恶劣起来。他要求提供一艘小船，送他们回大船上。总督非常明事理地答道，现在天已经黑了，要找到停泊在距离岸边一段距离的大船可能比较困难。达伽马与总督两人之间的互相敌视越来越严重。一行人十分疲惫；总督给他们提供饮食，“我们吃了饭，尽管这一整天我们都因站着而疲惫不堪”。^[11]

次日早上，达伽马又一次要求提供小船。总督说，因为雨季天气恶劣，请葡萄牙人把大船开到距离岸边更近的地方，这样比较方便。葡萄牙人害怕这是城内穆斯林设下的陷阱，总督则怀疑这些陌生的访客可能企图不缴纳入境税就离开。“总司令说，如果他命令大船接近岸边，他的兄弟可能会以为他被俘虏了，是在强迫之下发出这道命令的，于是就会扬帆起航，返回葡萄牙。”^[12]他要求回到“和他一样都是基督徒”^[13]的扎莫林那里，向他投诉。总督同意了，但随后就派遣全副武装的卫队把守房门，“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出门，但凡出去都有几名卫兵跟随”。^[14]总督要求，如果葡萄牙人的大船要留在岸边，就应当交出舵和帆，以确保他们不会溜走。达伽马拒绝了。他宣称，他们这样会被饿

死。总督的回答是：“如果我们（葡萄牙人）饿死，也得忍着。”双方高度紧张，僵持不下。

在这争执期间，达伽马设法派了一个人溜去与停在岸边的一艘葡萄牙小艇会合，让其“传令到大船上去，把大船开到安全的地方”。^[15]这艘小艇遭到当地船只的追击，但成功地返回了船队。达伽马一行人等于是成了人质，他们感染了一定程度的被迫害妄想症。达伽马担心如果船只入港，“就很容易被俘获，之后他们就会先杀掉他，然后杀掉我们其他人，因为我们已经被他们牢牢掌控了”。^[16]

日记记载了这一天里葡萄牙人越来越严重的恐惧，但也表现出他们及时行乐的能力。

这一天，我们都心急如焚。夜间，包围我们的人比以往更多了，他们不准我们在大院子里行走，而是把我们关在一个小小的铺地砖的庭院里，一大群人围着我们。估计第二天我们很可能被分隔开，或者我们会遭到伤害，因为我们注意到，狱卒对我们非常恼怒。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用从村里找到的食材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这一夜，看守我们的人有一百多个，全都装备剑、双刃战斧、盾牌和弓箭。其中一些人在睡觉，其他人则在看守，夜间轮流值班。^[17]

这些葡萄牙人担心，这可能是他们在人间的最后一夜了。

第二天早上，整个问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据日记作者说，囚禁他们的人回来了，“比之前和气了一些”。^[18]国王的要求是：如果葡萄牙人将自己的货物运上岸，就可以离开。他们解释了怒气冲冲的达伽马所不理解的东西：“本国的惯例是，每艘船抵达之后，应当立刻将它运来的货物送上岸，船员也应当立刻上岸，在货物卖完之前不能回到船上。”^[19]达伽马立刻发送消息给他的兄弟，要求送“一些东西”（但不是全部货物）来。部分货物被运上岸。两名葡萄牙水手被留下销售这些货物，人质则被释放回自己的大船。“我们欢呼雀跃，感谢上帝从这些头

脑比野兽强不了多少的人手里拯救了我们。”^[20]

扎莫林或许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些陌生访客：他们不像是他了解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商人，但显然是一位强大国王派来的。扎莫林非常注重商贸，他的财富就来源于到他的开放港口做生意的各国商船，所以他不愿意丢掉潜在的商机。穆斯林商人无疑敌视这些异教徒闯入者。我们不确定穆斯林商人有没有密谋杀害葡萄牙人，但他们对葡萄牙人的敌视可能既有商业的也有宗教的因素。葡萄牙人是满怀戒心地来到印度海岸的。他们在北非打了几十年的圣战，平素一贯的策略是：保持警惕、极具侵略性地抓捕人质、武器随时待命，以及在基督徒和穆斯林当中二选一。他们似乎当真没有考虑到印度教的存在。葡萄牙人这种简单化的、焦躁的心态，与复杂的印度洋世界格格不入。在这里，印度教徒、穆斯林、犹太人，甚至印度基督徒，都融入了一个多种族的贸易圈。

最终，葡萄牙人的部分货物被送上岸（没有按照当地的惯例送来全部货物），放在班达里海港的一处房屋内展出。国王派遣了一些商人来查看这些商品。他们对葡萄牙人出售的商品嗤之以鼻。“他们往地上啐唾沫，说：‘葡萄牙！葡萄牙！’”^[21]达伽马向国王抱怨，并询问他是否可以将商品运到卡利卡特城内。为了表达善意，扎莫林命令总督将葡萄牙人的商品运到城内，由扎莫林承担运费。日记作者表达了葡萄牙人始终如一的猜忌心和常常误解对方意图的倾向：“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对我们不利。因为有人向国王报告，我们是贼，到处偷窃。”^[22]

即便如此，现在葡萄牙人有了机会去参与卡利卡特城的商贸活动，尽管他们参与的规模很有限。水手们带来了少量属于他们私人的商品，有“手镯、衣服、新衬衫和其他物件”，^[23]他们被允许三人一组，轮流上岸。他们大多对自己的生意大失所望。制作精良的衬衫只能卖出相当于在葡萄牙国内十分之一的价钱，他们的其他商品也是这样。但是，他们

买回了少量香料和宝石。随后几周内，他们逐渐开始摸清马拉巴尔社会的不同层级。在通往卡利卡特的道路沿途，他们接触到低种姓的渔民（“基督徒”），这些渔民非常欢迎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受邀“吃饭睡觉”。^[24]“睡觉”可能是个隐晦的说法，指的是马拉巴尔女人乐于“献身”。人们带着孩子登上葡萄牙船只，用鱼交换面包。来拜访的人非常多，“有时直到天黑我们才能把他们全打发走”。这些人显然穷困潦倒。他们从正在修理船帆的船员手里偷走饼干，“让他们没有东西吃”。达伽马的政策是，只要有成年人或儿童上船，就给他们食物，“以赢得他们的好感，让他们说我们的好话，而不是坏话”。^[25]

对文化好奇心很重的葡萄牙人开始观察当地社会的分层，并且学得很快。这几周的非正式交易让他们得以瞥见印度洋贸易的机制与节律，以及供给网络的概况。他们记下了这些信息，留待将来参考。卡利卡特本身就是姜、胡椒和肉桂的主要产地，不过质量更好的肉桂来自“一个叫作锡兰的岛屿，在向南八天的航程之外”。丁香产自“一个称为马六甲的岛屿”。^[26]“麦加商船”（即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船，从那里到卡利卡特有五十天的航程）可以将香料运往红海，然后通过一系列转运，先抵达开罗，然后顺着尼罗河运往亚历山大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桨帆船从亚历山大港运载香料。他们注意到了这项贸易中的所有制衡与壁垒：不充足的转运能力，前往开罗道路上的盗匪横行，需要向埃及苏丹缴纳的高额税费。葡萄牙一心要扰乱这条复杂的供给链。

7月和8月是卡利卡特的贸易淡季，因为时间太早，季风还不能把阿拉伯三角帆船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吹来。但葡萄牙访客一定观察到存储妥当、等候阿拉伯三角帆船的各色商品，闻到把潮湿空气熏染得香喷喷的香料气味，并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和漆器，以及黄铜、加工过的金属、硫黄和宝石。葡萄牙人的生意很萧条，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他们还听到了一些故事，可以上溯到许多年前，那时候有神秘的访

客到此，他们“像德意志人一样留着长发，除了嘴巴周围不蓄须”。那些人显然是带着宏大的技术资源前来的。

他们登陆的时候穿着胸甲，戴着有面甲的头盔，并携带一种附在长矛之上的兵器。他们的船只装备了射石炮，尺寸比我们使用的短小些。他们一度每两年来一次，每次都带来二十或二十五艘船。他们没有说明自己是什么民族，也没有说给卡利卡特城带来了什么货物，只是他们的货物包括非常精美的亚麻布衣服和铜器。他们往自己船上装载香料。他们的船像西班牙船一样，配有四根桅杆。[\[27\]](#)

这个故事含糊不清，但说的肯定是中国明朝派来的庞大的星槎船队。它们早已经消失，在印度洋留下了有待填充的权力真空。不过，和海上所有的漂泊者一样，他们也留下了自己的基因。卡利卡特和马拉巴尔沿海居民有一点儿中国血统。

8月初，达伽马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在此地的生意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他可能急于抢在一大群阿拉伯船只抵达之前离开，也是为了抢在风向变得对起航不利之前。但问题是，他那远征队的行动与印度洋的气象规律严重地不吻合。

好在至少做了一点生意，达伽马受到鼓舞，决定尝试在城里留下葡萄牙的永久性商业基地。他给扎莫林送去礼物，告知后者他打算离开，但要留一些人在当地继续从事贸易。同时，他要求扎莫林派使者（或人质）跟随他的船只返回葡萄牙。作为自己的礼物的报偿，他向扎莫林索要几袋香料，“如果他（扎莫林）希望的话，他（达伽马）可以付钱购买这些香料”。[\[28\]](#)

葡萄牙人与扎莫林的交流又变得很冰冷。达伽马的信使迪奥戈·迪亚士等了四天，才被带到扎莫林面前。扎莫林对达伽马的礼物不屑一顾，说达伽马理应将这些礼物送到他的大臣手中。接着，扎莫林要求葡萄牙人缴纳贸易税，“然后就可以离去；这是本国的规矩，也是来到本

国的人必须遵守的规矩”。^[29]迪亚士说，他会回去向达伽马禀报。但是，迪亚士和他带来的商品都被武装人员扣押在宫内。扎莫林禁止任何船只接近葡萄牙船只，他显然在担心葡萄牙人不交税就开溜。

双方的关系又一次恶化了。达伽马没有明白，所有商人都必须缴纳港口税，而他们留在岸上的可怜兮兮的商品甚至都不能算作抵押品。他对扎莫林举动的解读是，这位“基督徒国王”受到了穆斯林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的蛊惑；穆斯林告诉扎莫林，“我们是一群贼，如果我们航行到他的国家，就不会有商船从麦加来……也不会有商船从其他地方到卡利卡特……他从和葡萄牙人的贸易中得不到任何利润，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还要掳掠他的财富，他的国家会因此垮掉”。^[30]这种战略上的基本推断被后来的事件证明是正确的，尽管葡萄牙人的担忧——穆斯林“向国王送去丰厚的贿赂，要他抓捕并杀死我们”——可能是多余的。在这期间，达伽马一直都得到他们第一次登陆时遇到的两名突尼斯人的建议和辅佐。两名突尼斯人大力帮助葡萄牙人，去理解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

与此同时，被扣押的迪亚士等人向船队偷偷送去了消息，称他们被扣为人质了。达伽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而扎莫林的人不知道他已经知道，所以他能够设计一个秘密行动计划。8月15日，一艘小船划到葡萄牙船队那里，小船上的人要向葡萄牙人出售宝石。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来试探葡萄牙人的情绪的。达伽马没有流露出他知道迪亚士等人被扣押；他给在岸上的迪奥戈·迪亚士写了一封信，仿佛一切正常。看到葡萄牙人没有恶意，更多商人来拜访葡萄牙船只：“我们欢迎了他们所有人，并给他们食物。”^[31]19日，有二十五人来到葡萄牙船上，包括“六名显贵”^[32]（高种姓的印度教徒）。达伽马抓住机会，迅速将其中十八人绑架，以此为筹码，要求释放他的部下。23日，他虚张声势地说自己要起航返回葡萄牙，行驶到距离海岸12英里处，在那里等待。次日，他又回来了，停泊在可以看到城市的海域。

随后是气氛高度紧张的谈判。一艘小船前来，提议用迪亚士换回印度人质。达伽马始终满腹狐疑，认为他的部下已经遇害，对方只是在争取时间，“等待麦加的船只来俘获我们”。^[33]于是他表现得非常强势，威胁称如果不释放他的部下，他就炮击城市，并将人质斩首。他又一次虚张声势地沿着海岸驶走。

卡利卡特城内的人们显然大感震惊。扎莫林命令把迪亚士带来，努力解决棘手的难题。他提议用迪亚士换回葡萄牙船上的人质，并通过两次翻译——先从马拉雅拉姆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然后从阿拉伯语翻译成葡萄牙语——向迪亚士口述了一封给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书信。这封信是由迪亚士“按照该国的风俗”^[34]用铁笔写在棕榈叶上的，大意是：“您宫廷的绅士瓦斯科·达伽马来到了我国，我很高兴。我国盛产肉桂、丁香、姜、胡椒和宝石。我请你们用黄金、白银、珊瑚和鲜红色布匹来交换。”^[35]扎莫林可能是在为将来与葡萄牙的贸易打基础。他还允许葡萄牙人竖立一根石柱，这是表达葡萄牙人意图的不祥的“名片”。

在海上，讨价还价还在继续。迪亚士被带来，在一艘划桨船上交换人质，因为跟随而来的印度人都不敢踏上“圣拉斐尔”号。石柱被绞车搬运到小船上，十二名^[36]印度人质中的六名被释放。至于剩余六名人质，达伽马承诺：“如果次日他的商品被归还，他就释放他们。”^[37]第二天，来了一位出乎意料的客人。突尼斯人孟塞德恳求上船。因为他帮助不受欢迎的葡萄牙人，已经遭到了当地人的仇视，他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后来，七艘小船运载着商品和很多人来了。之前的约定是用人质换取这些商品，但达伽马食言了。他专横跋扈地决定放弃这些商品，把人质运回葡萄牙。他离开之前抛下一句话：“好自为之，因为他（达伽马）希望很快就重返卡利卡特，那时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贼。”^[38]达伽马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于是我们扬帆起航，返回葡萄牙，为了我们伟大的发现而欢呼雀跃。”^[39]日记作者心满意足地写道。

他们已经结下了冤仇。扎莫林对葡萄牙人的誓言怒火中烧，派遣一大队船去追击。8月30日，葡萄牙船只因为海上无风而动弹不得，被卡利卡特人追上了。“大约七十艘船接近我们.....船上挤满了身穿用红布制成的某种胸甲的人。”^[40]在对方进入大炮射程后，葡萄牙人的射石炮轰鸣起来。双方激战了一个半小时，后来“出现了暴风雨，把我们吹向外海；他们奈何不得我们，便调头返回了，而我们继续按照自己的航线前进”。这是印度洋上葡萄牙人与当地人之间许多场海战中的第一场。

葡萄牙船队深入大洋之前，还要经历一些纠葛。船只状态不佳，而且需要淡水。他们沿着海岸非常缓慢地航行，寻找水源，从当地渔民那里受到友好的接待，用物品交换食物，并收割了一些生长在岸边的野肉桂。9月15日，他们在一座岛上竖立了他们的第三根石柱。几天后，他们在一些淡水资源丰富的小岛登陆。从当地印度人那里，他们误将这个群岛的名字听成了安贾迪普。

这一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9月22日，他们遭到了来自卡利卡特的一支小船队的第二次攻击，但葡萄牙人的炮火将打头阵的敌船严重击伤，其他敌船闻风而逃。葡萄牙船只的存在引起了当地人持续的兴趣和猜疑，达伽马发现在沿海地区越来越不舒服。随后两天，有小船作为代表驶来，船上的人挥舞着表示友好的旗帜。达伽马鸣炮示警，将其打退。到葡萄牙船上拜访的人带来的消息互相矛盾。又有人友好地前来拜访葡萄牙人，还带来甘蔗作为礼物，但也被打退了。葡萄牙人越来越相信，当地人的好奇通常掩饰着某种歹毒用心。当地渔民警示他们，来“友好拜访”他们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狄摩吉的当地的著名海盜，他将在葡萄牙人后来的故事里扮演重要角色。

葡萄牙人将“贝里奥”号拖曳到海滩，在将船倾侧后进行清扫和修理时，又有客人来访。这是个衣冠楚楚的人，会说威尼斯方言，称达伽马为朋友。他有个故事要告诉葡萄牙人。他是个基督徒，后来被俘虏，被

强迫改信伊斯兰教，“不过内心始终是个基督徒”。^[41]他现在为一位富裕的领主效力，领主派他送来消息：“我们（葡萄牙人）可以在他的国度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包括船只和给养。如果我们打算永久留下，他也会很高兴。”起初，这人说的话还头头是道，但渐渐地，葡萄牙人发现他“高谈阔论，谈及的事情极多，有时还自相矛盾”。

与此同时，保罗·达伽马询问与这个人一起前来的印度人，以确认此人的身份：“他们说他是海盗，曾经来攻击我们。”^[42]这个神秘的威尼斯人被擒获并遭到殴打。在接受“询问”三四次之后，他吐露了与之前不同的故事。他承认有越来越多的船只集合起来，准备攻击葡萄牙船队。但除此之外，他不肯招供更多。

是时候离开了。沿海地区已经太危险，葡萄牙人难以对付。很快就会有穆斯林商船从阿拉伯半岛驶来，而安贾迪普岛是个常用的补充淡水的中转站。葡萄牙船只除了“圣拉斐尔”号之外，都已经清洗修理完毕。他们也装载了淡水。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他们把大量的肉桂运上了大船。达伽马曾俘获一艘船，船长愿意以高价赎回自己的船只，但达伽马鄙夷地拒绝了。他“说这船不卖。因为它属于敌人，他宁可把它烧掉”。^[43]这种顽固不化预示着后来局势的发展走向。

10月5日，葡萄牙船队出海了，把那个神秘的威尼斯间谍也一并带上。他或许会有用。现在他们没有领航员，而懂得季风知识的人是绝对不会在这个时节起航向西的。他们可能没有别的选择，但我们不知道达伽马当时是否认识到，这将是可怕的弥天大错。他们离开印度600英里之后，“那个威尼斯人”终于招供，不过他是一点一点地把真相吐出来的。他的确是一位富裕领主的爪牙，那就是果阿的苏丹。他的使命是来评估苏丹是否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借助海盗，去俘获葡萄牙船只，将其用于讨伐自己的邻国。达伽马就这样对印度西部的政治有了一点有趣的认识，后来他会把这知识派上用场；他也注意到了果阿的重要

性。随着旅行的继续，威尼斯人吐露的故事越来越出人意料。他原本是波兰犹太人，在欧洲受到反犹迫害，后来浪迹天涯，曾用过多个假身份。在此次旅程中，他获得了一个新身份：抵达葡萄牙时，他已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更名为加斯帕尔·达伽马。

穿越印度洋的返航渐渐化为噩梦。佚名作者日记里的细节很含糊，只是短暂地提及“常常因无风受困，或遇到暴风”。^[44]但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到他们在印度洋受困三个月的惨状：令人沮丧的逆风把他们往回推；更恐怖的是无风的平静，船只一连几天在颜色如同熔化锌的海面上动弹不得；毫无怜悯之心的月亮照耀夜空；人们为争夺护墙或纹丝不动的帆投下的一点点荫凉而争吵，受到饥渴的折磨，呼唤圣徒援救他们；饼干里爬出虫子；储藏的淡水变得恶臭。为了防止船只的木料开裂从而导致船只无法航行，他们必须不断向木板泼水。

令人畏惧的坏血病的症状又出现了：“我们所有人又一次患上了牙龈的毛病，牙龈覆盖了牙齿，让人无法进食。他们的腿和身体其余部分也肿胀起来，肿胀的面积越来越大，直到受苦受难的病人死亡。”^[45]高种姓的印度教人质因为被婆罗门教律法禁止在海上进食，所以可能是第一批死亡的。一具又一具死尸在喃喃祷告声中，被推过船舷，扑通一声坠入大海。活人也步履蹒跚。“我们有三十个人就是这样死的。在这之前，已经死了三十个人。每艘船上只剩七八个人能够操纵船只。”“我们濒临绝境，所有纪律的约束都消失了。”日记作者守口如瓶，但实际上很可能发生了哗变。显然有人希望返回印度，甚至有人阴谋夺取船只的控制权。指挥官们原则上同意，假如刮起西风，就掉头返回。佚名作者写道，再过两周，他们就要全完蛋了。

在人们的绝望接近巅峰时，突然刮起了有利的东风，把他们吹向西方，一连六天。1499年1月2日，遍体鳞伤的葡萄牙船队看到了非洲海岸。他们从非洲航行到印度只花了二十三天，返回却花了九十三天。季

风的奥秘是要吃很大的苦头才能学到的。

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南下，途经穆斯林港口摩加迪沙。达伽马对马拉巴尔海岸穆斯林的怨气还没有消，于是无端炮击摩加迪沙，然后继续前进。破破烂烂的葡萄牙船只于1月7日抵达马林迪，又一次受到热烈欢迎。他们获取了橘子，“我们的病人非常渴望这种水果”，^[46]但对很多病人来说，已经为时太晚。葡萄牙人与马林迪的苏丹关系比较友好，交换了礼物，其中有一只赠给曼努埃尔一世的象牙。葡萄牙人在此竖立了一根石柱，并将一名年轻穆斯林带上船，他“希望和我们一起去葡萄牙”。^[47]他们继续航行，绕过了不友好的蒙巴萨。1月13日，形势很明显，他们人手不够，无法驾驶全部三艘船。“圣拉斐尔”号没有在印度海岸接受清洁修理，被虫蛀的情况最严重。他们将“圣拉斐尔”号上的所有物资和雅致的红金两色大天使拉斐尔雕像搬到其他船上，然后在沙滩上把“圣拉斐尔”号付之一炬。在桑给巴尔岛，他们与当地苏丹做了和平的接触，然后在莫桑比克附近的圣乔治岛停留，举行弥撒，竖立最后一根石柱，但“大雨倾盆，我们没有办法点火来熔化用于固定十字架的铅，所以石柱上没有十字架”。^[48]

在凉意渐深的风的驱动下，他们于3月3日来到圣布莱斯湾，在此逗留，然后于20日绕过好望角，不过“有时简直冻得要死……继续前进，渴望回家”。^[49]4月25日，在西非海岸冈比亚河入海口的浅滩附近，佚名作者的记录突然中断了，情况不明。航行的最后一段被记录在其他史料中。在一次暴风雨中，“贝里奥”号和“圣加百列”号失散了。但此时达伽马有了更深的烦恼，他的兄长保罗奄奄一息。在圣地亚哥岛，他把“圣加百列”号交给领航员若昂·德·萨掌管，雇了一艘卡拉维尔帆船，匆匆将保罗送往亚速群岛的特塞拉岛。“贝里奥”号带着消息驶入了塔霍河口，于1499年7月10日在里斯本附近的卡斯凯什靠岸。“圣加百列”号不久之后也赶到了。忠心耿耿地陪着弟弟参加此次史诗般远航的保罗在抵达特塞拉的第二天便去世了，随后被安葬在那里。正在服丧的瓦斯科可能直

到8月底才返回里斯本。他在贝伦圣母小教堂与僧侣待了九天，为兄长哀悼，随后才在9月初胜利进入里斯本。

这是一次史诗般的远航；他们离家一年，行驶了2.4万英里。这是一桩伟大业绩，彰显了他们的忍耐力、勇气与极好的运气。他们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船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亡。他们不懂得季风的规律，能够幸存，实属幸运。他们原本完全有可能在印度洋因坏血病和恶劣天气而全军覆没，只剩下幽灵般的空船在空荡荡的大海上漂流。

达伽马得到了群情激昂的热烈欢迎。国王封赏他土地与金钱，提升他为更高级别的贵族，并赐给他“东印度海军司令”的荣誉头衔。曼努埃尔一世命令在全国各地举行宗教游行和弥撒。他拥有搞好公共关系的天赋，着手向教廷与欧洲各国朝廷宣扬葡萄牙的辉煌成功。他暗自窃喜地通知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他的船队“确实抵达并发现了印度”，还带回了大量“肉桂、丁香、姜、肉豆蔻和胡椒……以及许多精美宝石，如红宝石等”。^[50]他还虚伪地说：“我知道，两位陛下听闻此事，必定心花怒放、满心欢喜。”他当然知道，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肯定不会开心。他写信给教皇亚历山大·博吉亚及其红衣主教们，大肆宣扬发现了信奉基督教的印度：“教皇与各位大人一定要公开地表达喜悦，并向上帝感恩。”^[51]而关于印度世界的许多信息来源于改宗犹太人加斯帕尔·达伽马的事实，被认为是一个迹象，表明“上帝的旨意和意愿是让葡萄牙成为一个大国，因为葡萄牙发现了一大奥秘，为上帝做出了贡献，并提升了神圣的信仰”。^[52]曼努埃尔一世认为这是天命所在。



达伽马获得贵族地位后的纹章

葡萄牙人发现印度的商业意义火速传遍欧洲。达伽马的第一艘船在里斯本靠岸时，就已经有窃窃私语传到了威尼斯。8月8日，威尼斯日记作者吉罗拉莫·普留利记载了一条来自开罗的传闻：“属于葡萄牙国王的三艘卡拉维尔帆船已经抵达亚丁和印度的卡利卡特，它们是被派去寻找香料群岛的，指挥官是哥伦布……这消息如果是真的，将对我影响很大；但我并不相信。”^[53]在里斯本，意大利商人很快开始从回国的水手那里收集第一手信息，以证实此次远航的真实性以及指挥官的真实身份。大家立刻认识到，东印度的财富就在欧洲人触手可及的范围内，这必将带来商业上的优势，并威胁欧洲的既得利益集团。佛罗伦萨人吉罗拉莫·塞尔尼基指出，当前通过红海的商路的税赋和运输成本使得东方

商品的购买价格为原来的六倍。

商品价格的大部分都是用来支付陆运费、船运费和给苏丹的税赋的。所以，如果走达伽马的新航路，就能砍掉所有这些成本与中间商。所以，我相信，苏丹、这些国王和穆斯林会在此事上不遗余力地阻挠葡萄牙国王。若国王.....继续这样操作，在比萨销售香料的价格就能比在开罗低廉很多，因为能通过里斯本以便宜得多的价格获取香料。^[54]

结果就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将丧失他们对香料贸易的垄断。“我丝毫不怀疑，他们会竭尽全力地摧毁葡萄牙人的努力。”

瓦斯科·达伽马的远航令所有人惊讶。它给欧洲的世界地名词典增加了1800个新地名，并揭示了关于东印度的新信息宝库。它很快将迫使全球很大范围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基督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进行全新的战略筹划，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商业冲突与战争。对曼努埃尔一世来说，他的自信心因此大涨。他现有的头衔是“大海此岸的葡萄牙与阿尔加维^[55]国王，大海彼岸的非洲之王，几内亚领主”，如今又加上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与印度的征服、航海与贸易之王”。这是对贸易垄断权的大胆主张，也表达了葡萄牙的意图：大海应当是有主人的。甚至在达伽马返回之前，国王就已经在为下一次远航铺设龙骨、建造新船了。与此同时，他下令对达伽马远航的所有航海图严格保密，泄露机密者一律处死。知识就是财富和权力。

^[1]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8.

^[2]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6.

^[3]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9.

^[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58.

[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0.

[6]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p.60-61.

[7]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1.

[8]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2.

[9]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2.

[10]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2.

[1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4.

[12]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5.

[13]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5.

[1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5.

[1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6.

[16]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6.

[17]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p.66-67.

[18]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7.

[19]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7.

[20]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7.

[2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8.

[22]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8.

[23]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9.

[2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9.

[2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69.

[26]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7.

[27]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131.

[28]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0.

[29]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1.

[30]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p.71-72.

[3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2.

[32]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2.

[33]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3.

[3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p.74-75.

[3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5.

[36] 上文说一共是十八名人质。

[37]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5.

[38]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6.

[39]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6.

[40]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77.

[4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84.

[42]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85.

[43]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85.

[44]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87.

[45]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87.

[46]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89.

[47]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90.

[48]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92.

[49]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93.

[50]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114.

[5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114.

[52] Subrahmanyam, 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1997, p.162.

[53] Priuli, G. *Diarii*. Edited by A. Segre. In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4, part 3. Città di Castello, 1921-34, p.153.

[54]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182.

[55] “阿尔加维”源自阿拉伯语，本意为“西方”，是今天葡萄牙大陆部分最南端的地区。13世纪中期，在“收复失地运动”中，葡萄牙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阿尔加维。

第二部 竞争：垄断与圣战 1500～1510年



6 卡布拉尔

1500年3月～1501年10月

达伽马回国仅仅六个月后，一支比先前庞大得多的船队准备就绪，即将从贝伦^[1]海岸起航：十三艘船、一千二百人，以及佛罗伦萨与热那亚银行家注入的资本。船队跃跃欲试，准备去捕捉东印度的机遇。曼努埃尔一世有时优柔寡断，容易受人影响，有时一意孤行，但1500年时回荡着弥赛亚的预兆，欧洲的目光投向了里斯本。这支新船队，在总司令——贵族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的领导下，是对达伽马前番成绩的快速乘胜追击，旨在赢得物质的优势，以及凭借一场十字军圣战，赢得天主教世界的仰慕。

卡布拉尔的远征标志着葡萄牙人的活动从侦察转为商贸，又转为征服。在16世纪的最初五年里，曼努埃尔一世将派出许多支船队，规模越来越大，一共八十一艘船（有的船只参加了不止一次远航），意图在争夺印度洋永久性立足点的生死斗争中确保胜利。这是全国的极大努力，动员了全部可动用的人力、造船、物资供给，以及抢在西班牙人做出反应之前把握和利用机遇的战略眼光。在此过程中，葡萄牙人让欧洲和东印度的各民族都大吃一惊。

卡布拉尔得以将达伽马远航获取的全部知识付诸实践。出发的时间不再由宫廷占星家计算的良辰吉日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季风的规律。路线是按照1497年远航采纳的向西的绕圈，然后利用领航员和船长们的经验，如曾与达伽马一同远航的佩罗·埃斯科巴尔、尼古拉·科艾略，以及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本人。卡布拉尔的船队带了一些说马拉雅拉姆语且已经学会葡萄牙语的印度人。他们的目的是砍掉说阿拉伯语的中间商。改宗犹太人加斯帕尔·达伽马也在船上，他懂得马拉巴尔海岸错综

复杂的政治形势。另一名改宗犹太人约翰先生（曼努埃尔一世的御医）以天文学家的身份随同船队出海，任务是研究南半球的星相，以为将来的航海提供便利。葡萄牙人过去在卡利卡特只能拿得出让人尴尬的不值钱的礼物，出了大丑。卡布拉尔这次携带了贵重礼物，希望能吸引扎莫林。葡萄牙人似乎仍然坚持相信扎莫林是一位基督徒国王，尽管是不太正统的基督徒。于是，根据教皇的旨意，一个方济各会修士代表团也伴随此次远航，去纠正扎莫林的错误，以便“印度人.....能更全面地接受我们的信仰的指导，能够接受我们的教义，得到相关的教诲，正确地侍奉上帝，救赎他们的灵魂”。^[2]

商业方面的使命同样重要。船队带上了在卡利卡特开设贸易站所需的人员、文书资源和商品。他们吸取了上一次远航的教训，精心准备了有可能吸引马拉巴尔印度人的商品，包括珊瑚、黄铜、朱红色染料、水银、精制和粗制布匹、天鹅绒、五颜六色的绸缎与锦缎，以及金币。一位经验极其丰富、会说阿拉伯语的商人艾雷斯·科雷亚负责领导商业活动，有一群文书人员支持他，帮助记录资料和记账。这些识文断字的下属人员，如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他写下了第一部描述巴西的著作），记述了关于随后一年里葡萄牙人事迹的一些最扣人心弦，有时也催人泪下的故事。

卡布拉尔本人并非海员，而是一位外交官。他接到了一套精心准备的指令，其中一部分是达伽马设计的，旨在平息达伽马在卡利卡特闹出的风波，以便与“基督徒”扎莫林建立安宁且利润丰厚的关系。卡布拉尔掌握的信息比他的前任丰富得多，可以随时参考这份许多页的指令文书，其中规定了在遇到形形色色情况时的各种选择。它还指示他对有可能制造麻烦的敌人要实施强制性的、专横的行动。

1500年3月9日，船队从贝伦出发，按照惯例举行了隆重庆典。人们举行了悔罪弥撒，对王旗（上有五个圆圈，象征着基督身上的伤）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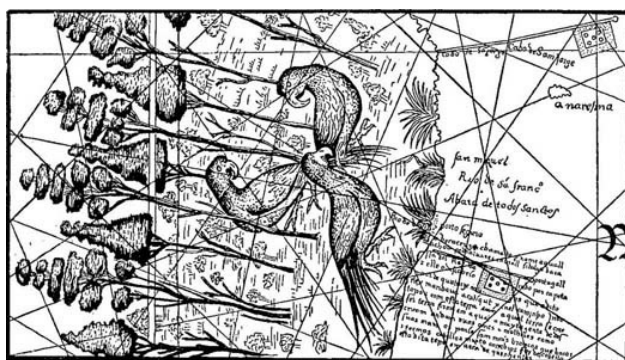
圣。这一次，曼努埃尔一世驾临现场，将王旗交给卡布拉尔。然后，修士们引领着游行队伍，“国王陪他们走到海滩。里斯本全城人都聚集在海滩上，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送行”。^[3]他们看向在赖斯特罗外海停泊的克拉克帆船，那里的小艇解开了缆绳，大船的船帆展开。曼努埃尔一世乘船陪同远航船队来到塔霍河口。在那里，远航船只感受到大海的冲击，调头转向南方。

他们利用达伽马的经验，选择了更直接的路线。天气晴朗，他们穿过佛得角群岛时没有停留。海况良好，却突然有一艘船失踪，这令人费解，也是个不祥的征兆。他们奉命按照前一次远航的做法，向西绕一个大圈：“背后有风吹来之后，他们转向南方。如果一定要改变航向，就改为西南方。遇到微风之后，他们应当绕一个圆圈，直到好望角出现在正东方。”^[4]他们的圆圈一定比上次更大，因为在4月21日时，他们看到西方“首先出现一座高山，直插云霄，呈圆形，它的南面是较低的土地和平原，有很大的树林”。^[5]

这次登陆出乎意料，也很安宁。当地居民赤裸身子，与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遇到的部落迥然不同：“这些人皮肤暗黑，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不知羞耻。他们的头发很长，还会把胡须拔掉。他们的眼皮和眉毛上画着黑白蓝红的图案。他们的下唇被穿刺过。”^[6]葡萄牙人注意到“当地女人也全身赤裸，没有羞耻感。她们身材很美，头发很长”。葡萄牙人第一次看到了吊床——“像织布机一样搭起来的床”。^[7]当地人似乎很温顺。他们在葡萄牙风笛音乐伴奏下翩翩起舞，模仿葡萄牙人在热带海滩举行的弥撒的动作，并且很容易受惊，“就像在吃食的麻雀一样”。^[8]对传教者来说，当地人似乎是大有希望的目标。

他们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真十字架之地”。这里有丰富的淡水和水果，以及奇异的动物。他们吃了海牛肉，“它大得像桶，脑袋像猪，眼睛小，没有牙齿，耳朵有人的胳膊那么长”。^[9]他们看到了一些五彩缤

纷的鹦鹉，“有的像母鸡一样大；还有其他非常美丽的鸟儿”。^[10]一艘船被派回葡萄牙，去报告曼努埃尔一世，发现了这片新土地。这艘船还带回了天文学家约翰先生的一封信，内有他对南半球星辰的观察结果，并坦率地描述了用新式天文观测器材和纬度表观测的困难：“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在海上测量任何一颗星的高度，因为我花费了很大力气，但不管船是多么稳，误差还是有四五度，所以除非在陆地上，没有办法做得到。”^[11]文书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也送回一封信给曼努埃尔一世，记述了他对这个新世界的所有奇观及居住在此的图皮南巴人的细致观察，文笔十分优美。这就是巴西历史的开端，卡米尼亚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一点的。5月2日，九天的贸易和物资补给之后，他们将两名犯人留在岸上，又起航了。“这两人开始哭泣，但当地人安慰他们，表达对他们的同情。”^[12]



一幅著名的葡萄牙世界地图（坎迪诺平面球形图）复制品的局部，约**1501**年被人从葡萄牙偷偷带走。其细部第一次展现了巴西海岸，以及“大如母鸡”的鹦鹉

卡布拉尔船队为了远远绕过好望角，比达伽马向南走得更远。5月12日，他们观察到一颗彗星“拖着特别长的尾巴，飞往阿拉伯半岛的方向”，^[13]一周之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十二天之后，灾难降临了。24日，他们进入了南大西洋的高压带。风稳稳地从背后吹来，但他们迎头撞上了一阵狂风。这场狂风的猛烈程度与方向都让他们措手不及：“它来得太突然，我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帆已经被从桅杆刮落了。”一瞬间，“四艘船倾覆沉没，船上人员全部丧生，我们没

有任何办法援救他们”。^[14]被大海吞噬的人包括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他葬身波涛的地点就是十二年前他第一个绕过的好望角外海。船队残部分散成三群，被风暴驱赶着漂流了二十天，一直没有升帆。

船队只剩下遍体鳞伤的七艘船，终于于6月20日在莫桑比克重新集合。第八艘船由迪奥戈·迪亚士（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的兄弟）指挥，第一次看到了马达加斯加岛，但没有找到船队主力，最终蹒跚返回了里斯本。卡布拉尔船队在东非海岸受到的待遇比达伽马好不了多少。莫桑比克的苏丹现在对葡萄牙大炮很是害怕，至少表现得比较顺从一些。葡萄牙人得以在此补充淡水，并找到了领航员，前往海岸最重要的贸易城市基尔瓦。那里的苏丹虽然欢迎了他们，但并无热情。与卡利卡特的穆斯林一样，他也不需要外国闯入者来侵犯他的商业领地。葡萄牙人完全绕过了蒙巴萨。直到抵达马林迪，他们才受到欢迎。水手们又一次患上“口腔疾病”，“吃了橘子就能治得好”。^[15]他们还雇用了一名领航员，准备渡海前往印度。

抵达安贾迪普群岛（卡利卡特以北400英里处）之后，卡布拉尔所接受指示的要旨才显得明晰起来。这些岛屿是前往卡利卡特的船只常去获取补给和淡水的中转站。瓦斯科·达伽马曾在此检修船只并补充给养。卡布拉尔如法炮制。他也知道，从红海来的阿拉伯船只（葡萄牙人称之为麦加船只）也会经过安贾迪普群岛。卡布拉尔的任务是竭尽全力与扎莫林建立友好关系，但在扎莫林的领土之外，卡布拉尔还奉命破坏阿拉伯航运：

如果你在海上遇到上述的麦加穆斯林的船只，必须尽可能地将其俘获，扣押其商品、财产和船上的穆斯林，以增进你的收益。攻击他们，尽可能损害他们，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是我们的不共戴天之敌。^[16]

卡布拉尔奉命将这些命令也告知扎莫林。葡萄牙人此时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火炮具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将在远距离炮击阿拉伯船只，而

不是近距离交战。需要活捉领航员和船长，因为这些人是有价值的；关于如何处置普通乘客的命令则比较含糊。在最坏的情况下，“你应将所有穆斯林乘客转移到缴获的状态最差的一艘船上，让他们全都上船，然后击沉或烧毁其他所有缴获的船只”。^[17]对于这些指示，可以有很宽泛的解读。它实际上是两极化的：一方面要与“基督徒”扎莫林建立友好的贸易关系，并热烈欢迎卡利卡特港内的穆斯林商人（“为其提供饮食与其他各方面的良好待遇”^[18]）；另一方面又要在驶离扎莫林的海岸之后，对他的穆斯林臣民开展侵略性的全面战争。这些指示为葡萄牙人此后在印度洋的行动确立了基调，并触发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事件。卡布拉尔在安贾迪普群岛守株待兔十五天，等待袭击阿拉伯船只，然而没有一艘船露面。后来他驶向卡利卡特，或许遵照吹毛求疵的指示下锚停泊：“各船队形紧密，井然有序，以旗帜装饰，尽可能美化。”^[19]

达伽马离去之后，老扎莫林已经驾崩；如今是他的侄儿统治王国，但葡萄牙人与新国王的关系并不比之前轻松。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教会了葡萄牙语的那些马拉巴尔人没有办法承担译员的任务，因为他们全都出身低种姓，不可以出现在御前。葡萄牙人和上一次一样，首先咄咄逼人地抓捕人质。卡布拉尔受到严格指令，在采取抓人质的预防措施之前，不得登陆。焦躁的谈判和僵持了好几天之后，才安排好了总司令的登陆。卡布拉尔严格执行自己接到的命令，而扎莫林因为高种姓印度教徒在海上被扣押的情况而烦恼，因为根据印度教的禁忌，高种姓印度教徒在海上不可以吃喝，也不可以睡觉。有些人质企图游泳逃走，被关押在甲板之下；扎莫林也囚禁了卡布拉尔的一些部下，作为报复。

卡布拉尔接到并执行的所有指示都带有针对印度人的专横跋扈的语调。葡萄牙人相信，他们是得到教皇的批准而来的，是奉行上帝的意志来控制印度贸易的。卡布拉尔在觐见厅向扎莫林呈上贵重精美礼物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同为基督徒国王的扎莫林的友善之意，尽管尽是些虚伪的溢美之词，但他还提出了强硬的要求。他要求扎莫林为达伽马当初留

下的货物提供补偿，为葡萄牙人提供优惠的关税待遇、价格低廉的香料、安全的贸易站，并对葡萄牙人豁免当地的一项普遍规矩，即商人死后，其商品变为当地统治者的财产。卡布拉尔希望扎莫林明白，葡萄牙人必须对离开了扎莫林国土的穆斯林开展圣战，“因为我们继承了圣战事业”。^[20]他还要求扎莫林驱逐在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因为这是他身为基督徒国王的义务”。^[21]作为回报，扎莫林将得到“目前为止他从穆斯林那里获得的全部利润，以及比那多得多的收益”。另外，方济各会修士将纠正他在信仰教义方面的不幸谬误，“以正确地侍奉上帝，救赎他们的灵魂”。^[22]葡萄牙人仍然完全没有理解印度洋世界文化与宗教的现实。

接下来的两个半月内，双方笨拙地谈判、僵持，卡布拉尔佯装要拂袖而去（达伽马也曾运用这个策略），最后终于达成了商贸协定。扎莫林同意建立一个贸易站，由艾雷斯·科雷亚领导。双方都心怀猜忌，葡萄牙人无法直接用马拉雅拉姆语沟通一直是个严重问题。科雷亚只懂阿拉伯语，所以他们与扎莫林的所有沟通都必须借助穆斯林中间人。科雷亚信任这些穆斯林为他翻译，但穆斯林敌视葡萄牙人在卡利卡特的存在，所以科雷亚这么做可能是个错误。

葡萄牙人虚张声势地炫耀自己的武力，可能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扎莫林希望从更南方的科钦港口的一位商人那里获得一头珍贵的战象。他提议买下战象，遭到了耻笑。一艘船载着战象和其他货物经过了卡利卡特海岸，于是扎莫林要求葡萄牙人帮忙去俘虏该船。卡布拉尔只派遣了一艘卡拉维尔帆船“圣彼得”号，由佩罗·德·阿泰德指挥。起初扎莫林对这么微薄的力量表示鄙夷，因为船上只有七十人，但卡布拉尔为这艘卡拉维尔帆船装备了一门大型射石炮。印度人的三角帆船武装精良，载有三百人，但阿泰德沿着海岸紧追不放。三角帆船上的穆斯林看到这艘小小的卡拉维尔帆船在自己雄伟的大船旁追击，不禁捧腹大笑。然而，卡拉维尔帆船开始射出致命的炮火，严重击伤三角帆船的船体，

打死船上许多人。这艘船最终投降，被带回卡利卡特，好几头战象被交给扎莫林，还为此举行了隆重庆典。有一头大象在交战中死亡，葡萄牙水手们把它吃掉了。葡萄牙人的这次武力展示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也让扎莫林开始畏惧他们，因为葡萄牙人有能力强迫他人。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在缓慢地往自己船上装载香料。在卡利卡特待了三个月之后，只有两艘船被装满。阿拉伯商人显然在以某种方式阻挠他们的工作，而阿拉伯商人自己的船则满载香料秘密地离开了。卡布拉尔发出抱怨，扎莫林被夹在两股互相竞争的力量之间，为了安抚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于是允许前者扣押任何偷偷离开的穆斯林船只。又一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卡布拉尔就动用武力去扣押穆斯林商船。

他起初可能还有点犹豫，不敢做出这种挑衅的举动，但被科雷亚催促和说服了。而科雷亚是被穆斯林权贵狡诈地说服的，这些穆斯林权贵的秘密动机是在城内挑起事端。果然，他们得逞了。原本就紧张的气氛在葡萄牙人没收穆斯林商船货物的时候引爆了冲突。扎莫林的立场如何，外人无法判断。城市街道上开始聚集一群暴民，冲向葡萄牙贸易站。一位佚名的目击者记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城里有大约七十个船上的人（即葡萄牙人），手执利剑和盾牌，企图抵抗暴民的攻击。这些暴民“数不胜数，拿着长矛、剑、盾和弓箭”。葡萄牙人被打退到房屋内，房屋周围有“高度相当于骑在马背上的人”的围墙。他们成功地强行封闭了大门，并从墙上用弩弓射击暴民，他们有七八张弩弓，杀死了不少人。他们还从屋顶上升起一面旗帜，以此为信号，向船队求救。

此时卡布拉尔身患重病，不能亲自到场，而是派遣配有回旋炮的长艇，企图驱散群众，但无济于事。穆斯林群众开始摧毁被包围的建筑的外墙，“一个小时之内把外墙全部拆除了”。^[23]守军被困在建筑里面，只能从窗户里向外射击。贸易站靠近海边，所以科雷亚认为继续死守是没

有意义的。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杀出重围，奔向岸边，希望长艇能赶来援救。他们冲出了房屋，大多数人逃到了海边。但让他们沮丧的是，长艇没有过来救他们，因为海况很差，长艇的水手不敢在惊涛骇浪中靠岸。武装暴民逼近过来。科雷亚被砍倒在地，“死者还有五十多人”，包括巴西的第一位编年史家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和好几位方济各会修士，他们是“印度的第一批基督徒殉道者”。二十人走入海水，包括那位不知名的叙述者，“全都身负重伤”，“几乎溺死”，被拉上长艇，以及科雷亚的十一岁儿子安东尼奥。

卡布拉尔因为患病而虚弱无力，希望扎莫林立即为没有保护他的定居点而道歉。他等了一天，但扎莫林并没有道歉的意思。扎莫林显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卡布拉尔认为扎莫林的沉默是因为心怀歹意，他也相信扎莫林正在备战。二十四小时后，卡布拉尔开始报复。他命令俘获港内的十艘阿拉伯船只，屠杀船上的所有人。岸上的市民目睹这惨状，不禁毛骨悚然。

就这样，我们屠杀了五六百人，抓获躲藏在船舱内的二三十人，缴获舱内的商品；就这样，我们掳掠了这些船只，抢走了船上的货物。其中一艘船载着三头大象，我们把它们都杀掉吃肉，然后烧毁了全部九艘空船。[\[24\]](#)

卡布拉尔还不肯罢休。夜幕降临之后，他把自己的船只带到靠近海岸的地方，将火炮准备就绪。拂晓时分，他对卡利卡特进行了猛烈炮击。岸上有一些小型火炮开始还击，但葡萄牙人的炮火如排山倒海般猛烈。整整一天，炮弹雨点般落入城镇，摧毁了许多建筑，包括一些属于国王的房屋，并打死了他的一名显贵人士。扎莫林匆匆逃离城市，卡布拉尔也驾船离开，途中俘获并烧毁了另外两艘船，并沿着海岸线南下100英里，来到科钦城（今天的柯枝）。他得到的命令是，假如与扎莫林的谈判破产，就去拜访科钦。葡萄牙人与卡利卡特关系的最终破裂让双方都蒙受了损失并且怒火中烧。对卡利卡特城的炮击是当地人永远不

能原谅的，而贸易站的葡萄牙人遭到屠杀，也是一桩大仇。这是为了印度洋的贸易与信仰而发生的漫长战争的第一炮。

卡布拉尔掌握的关于科钦城的信息可能来自加斯帕尔·达伽马。葡萄牙人知道，这座城市的君主是扎莫林的附庸，热切希望摆脱卡利卡特的桎梏，所以会欢迎新来者并与其结盟。葡萄牙人果然受到了热烈欢迎。双方交换了人质；每天都要交换两名高种姓印度教徒和两名葡萄牙人质，因为前者不能在海上进食或睡觉，所以人质是轮换的。两周后，卡布拉尔的船只装满了香料，他还同意在当地建立一个小的永久性贸易站。葡萄牙人还对马拉巴尔海岸有了更多了解。沿海的其他港口，如坎纳诺尔（今坎努尔）和奎隆都派来了使者，邀请其去做生意，并寻求结盟，共同反对扎莫林。也是在科钦，葡萄牙人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印度基督徒。从附近的克兰加努尔（今科东格阿尔卢尔）来了两名神父，约瑟和马太。他们来到葡萄牙船上，为这次会面欣喜若狂。这对葡萄牙人来说是一大宽慰，但他们也终于幡然醒悟，原来印度并非基督徒主宰的国度。他们开始真正了解到作为异教的印度教的存在与性质。两位神父告诉他们，在印度遵从圣多马教诲的基督徒远远不占多数，而是一个遭到异教徒围攻的少数派，沿海地区的几乎全部贸易都被穆斯林把持着。

在卡利卡特，扎莫林复仇心切。卡布拉尔得到消息，有一支拥有八十艘船的船队即将起航，准备在他返回的路上拦截他。科钦的国王提议派海军掩护他，但卡布拉尔对自己的火炮高度信任，谢绝了。他几乎旋即出海，丢下了在贸易站的人，还把两名印度人质也带走了。这两名可怜的人质在海上既不能吃，也不能喝。过了三天，连哄带骗，“他们才吃饭，带着极大的忧伤和悲痛”。^[25]葡萄牙人对当地文化的漠视给他们与科钦的联盟关系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十三年后，科钦国王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一封投诉信里还回忆了此事，说他对葡萄牙人忠心耿耿，他们却忘恩负义。

卡布拉尔无须动武。他的船只武备强大，而扎莫林的船只害怕葡萄牙大炮，只敢在一段距离之外跟随，天黑之后就跟丢了。在更北方的沿海，坎纳诺尔国王恳求卡布拉尔停船并装载香料。他这么做既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葡萄牙人炮击，也是真心希望与葡萄牙结盟反对卡利卡特。卡布拉尔的船队在此做了短暂停留，然后起航，穿越印度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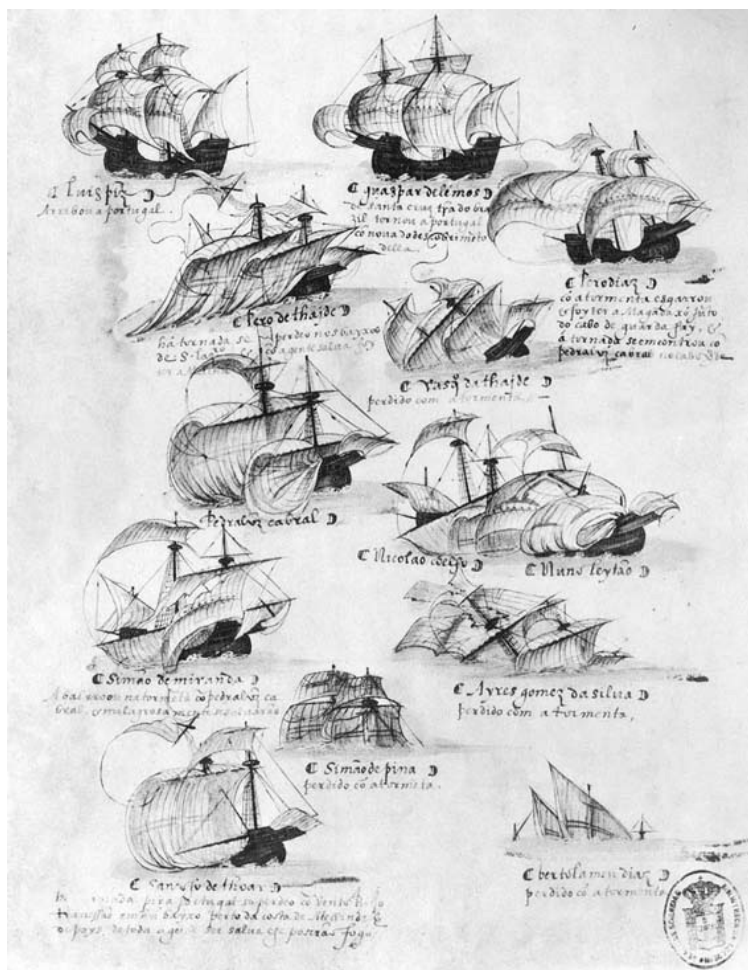
在漫漫归途中，船队是分成若干小组逐次前进的。在马林迪，他们遇到了一场商业灾难。由于操作鲁莽，一艘满载香料的船损失掉了；“船上的货物损失殆尽，水手们虽然逃得性命，但只剩下身上的衬衫。”^[26]为了防止船上的货物被穆斯林拿走，他们放火焚烧船只残骸，但莫桑比克的潜水员还是打捞了一些火炮，后来用这些火炮对付葡萄牙人。

在里斯本，曼努埃尔一世相信，他赠给扎莫林的贵重礼物一定能确保友好地解决问题，因此已经派出了下一批远征队。3月，卡布拉尔的船只在艰难驶向好望角时，一支仅有四艘船的小型商船队在若昂·达·诺瓦指挥下离开了塔霍河。因为航程特别遥远，一支船队起航之后，要过整整两年时间才能返回，并将自己吸取的经验传授给下一支船队，使其能够顺利出发。一切都取决于季风的规律。每一年的船队都盲目地行进，与穿过大西洋返航的前一支船队失之交臂，并根据两年前汲取到的信息继续前进。不过，葡萄牙人已经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以缓解这些问题。诺瓦抵达好望角附近的圣布莱斯湾时，发现一棵树上挂着一只鞋，里面有一封信，告诉了他卡利卡特的真实局势。于是他绕过了卡利卡特，在坎纳诺尔和科钦装载香料，并且凭借葡萄牙火炮的优势，又一次从扎莫林船只的追击之下全身而退。

1501年夏季，卡布拉尔的船队分几批返回了里斯本。回家途中他也开展了一些探险活动，获取了一些新知识。他探索了非洲黄金贸易的重要中心——索法拉港。迪奥戈·迪亚士探索了红海入口。曼努埃尔一世

已经在设计那个方向的战略。在红海入口周边的探险非常艰难。葡萄牙人发现那里的环境极度干旱，不适合人类居住，酷热似熔炉。大多数参加此次探险的水手都丢了性命，“于是那艘船回来的时候，只剩六人，并且大多患病，他们除了下雨天在船上收集的雨水之外，没有任何淡水喝”。^[27]所有这些信息都让葡萄牙人编纂的地图内容越发丰富起来，他们将这些地图秘密藏好，留待将来使用。

国内的人们热切地期待他们返回里斯本。出发的十三艘船只有七艘返回了，其中五艘满载香料，两艘是空的。其余六艘都已经在海上损失掉了。教堂的钟声响起，朝廷命令全国举行宗教游行。葡萄牙朝廷对卡布拉尔的远航评价不一。有势力很强的一派认为代价太大，距离太遥远。曼努埃尔一世对此次远航做了很多投资，虽然返回的船只带来了不错的利润，但损失了这么多人的生命，确实令人不安。对西方土地（巴西）的发现被认为很有趣，但并不重要。卡布拉尔未能够确保在卡利卡特的活动有一个和平的结局，卡利卡特的葡萄牙贸易站也被摧毁，而且现在更有确凿证据表明，印度海岸的绝大多数人民及其统治者并非基督徒，这更让人感到忧虑。



卡布拉尔远航的代价：六艘船遭遇海难

然而，曼努埃尔一世确保将正面的消息大肆传扬到全欧洲。对此关注最密切的是威尼斯人。这个航海共和国到15世纪末之前几乎已经垄断了欧洲的香料贸易，对它来讲，香料贸易就是生命线。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东端四面受敌的环境中想方设法与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维持关系，确保他们的船只每年能在亚历山大港购买并装运香料。葡萄牙人成功地绕过了这些中间商的消息令威尼斯人瞠目结舌。这威胁到了威尼斯城的生存，因此急需调查。警觉的意大利人阿尔贝托·坎蒂诺对里斯本做了细致观察，他给费拉拉方面写信道，葡萄牙国王“已经告诉威尼斯大使，如果他的事业像大家相信的那样进展不顺利，他就干脆彻底放弃”。^[28]威尼斯人或许在希冀和期望葡萄牙国王打退堂鼓。更务实的人则表达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甚至近乎恐惧。葡萄牙远航船队返回里斯本的时候，威尼斯大使“克里特人”就在城里。他报告的细节令人不安。“他们带回了大量香料，价格低得我都不敢说……如果葡萄牙继续这样的远航……葡萄牙国王就可以自称金钱之王，因为所有人都会跑到葡萄牙去购买香料。”^[29]曼努埃尔一世请“克里特人”一起来庆祝香料船队的返回，“于是我强作笑颜，遵从礼节”。^[30]威尼斯人肯定宁愿吃锯末，也不肯庆祝葡萄牙人的成功。

在威尼斯，日记作者吉罗拉莫·普留利预言道，假如葡萄牙人能从供货源头直接购买香料、绕过伊斯兰国家的中间商，威尼斯的末日就到了。他写道：“这些新事实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烦躁不安，没能够控制住自己。”^[31]曼努埃尔一世志得意满地幸灾乐祸。他向“克里特人”提议道：“我应当写信给阁下，告诉您，从此刻起，你们应当派遣船只从葡萄牙购买香料了。”^[32]威尼斯与葡萄牙之间的秘密商战就这样打响了。在这场战争中，信息是重中之重。“完全没有办法搞到那次远航的航海图，”威尼斯间谍报告称，“葡萄牙国王宣布，谁要是泄露航海图，格杀勿论。”^[33]

不过，卡布拉尔远航船队遭受的严重损失也打击了曼努埃尔一世的公信力。他现在知道了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真实局势——那里的基督徒极少，整个贸易被穆斯林商人把控——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他告诉“克里特人”，“他会禁止马穆鲁克苏丹从印度获取香料”。^[34]他要继续推进。

葡萄牙人在卡利卡特蒙受了损失，必须做出回应。在卡布拉尔返回之后，葡萄牙的印度战略发生了变化。事实表明，扎莫林是个异教徒，他唾弃葡萄牙人奉上的贵重礼物，摧毁了卡布拉尔的贸易站，杀害了卡布拉尔的部下。在葡萄牙人看来，扎莫林显然被麦加的穆斯林牢牢掌控。从此，葡萄牙人需要动用武力，去争夺东印度的贸易。同时，富有

战斗精神的基督教世界必须复仇。八十年后一部由穆斯林写下的关于葡萄牙人进犯印度洋的著作哀叹地指出，卡布拉尔的远航标志着和平转向战争。从这时起，“十字架的信仰者”^[35]开始“侵犯穆斯林的产业，压制他们的商贸”。^[36]卡布拉尔拒绝第二次前往印度，于是曼努埃尔一世再次起用瓦斯科·达伽马。

^[1] 贝伦就是葡萄牙语的“伯利恒”。它是里斯本的一个教区。

^[2]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70.

^[3]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155.

^[4]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67.

^[5]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7.

^[6]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59.

^[7]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59.

^[8]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22.

^[9]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60.

^[10]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59.

^[11]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39.

[12]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60.

[13]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61.

[14]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61.

[15]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65.

[16]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80.

[17]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84.

[18]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69.

[19]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261.

[20]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80.

[21]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81.

[22]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70.

[23]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84.

[24]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85.

[25]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87.

[26]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89.

[27]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91.

[28] Subrahmanyam, 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1997, p.184.

[29]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23.

[30]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32.

[31] Priuli, G. *Diarii*. Edited by A. Segre. In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4, part 3. Città di Castello, 1921-34, p.157.

[32]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22.

[33]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23.

[34]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trans. W.B.Greenlee, London 1938, p.122.

[35] Zayn al-Dīn ‘Abd al-’Azīz. *Tohfut-ul-Mujahideen*. Translated by M.J. Rowlandson. London, 1883, p.7.

[36] Zayn al-Dīn ‘Abd al-’Azīz. *Tohfut-ul-Mujahideen*. Translated by M.J. Rowlandson. London, 1883, p.79.

7 “米里”号的命运

1502年2~10月

曼努埃尔一世相信，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商贸活动需要有咄咄逼人的行动，于是他准备了一支规模超过以往的船队，在1502年春时从塔霍河起航。到此时，去往东方的远航已经制度化，是一年一度的了。这一次有二十艘船出发，分成两队，由达伽马担任总司令。他的舅舅维森特·索德雷也一同前往，此人有另外的任务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达伽马从朝廷接到的书面指示未能留存至今，但我们可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做出推断。他的任务应当是：为葡萄牙人被杀害向卡利卡特的扎莫林索取赔偿；落实他自己的要求，即驱逐穆斯林商人；扩展与马拉巴尔海岸敌视扎莫林的国王们的贸易协定；葡萄牙人通过在科钦与坎纳诺尔建立贸易站，在印度已经有了小小的立足点，现在要扩大这些立足点。葡萄牙人自信印度洋没有任何武装力量能够与自己的炮火匹敌，所以这即便不是赤裸裸的战争，也是炮舰外交的政策。

从曼努埃尔一世给索德雷的指示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船队如此大的规模必将产生的影响和曼努埃尔一世的雄心壮志。索德雷的任务是“守卫红海的出入口，确保麦加穆斯林的船只既不能进入红海，也不能从红海出来，因为麦加穆斯林最仇恨我们，对我们进入印度的行动阻挠也最厉害；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香料，而香料取道开罗和亚历山大港进入欧洲的那些地区”。^[1]葡萄牙的地缘政治计划的规模在扩大，也在更进一步。维森特及其兄弟布朗斯（也参加了此次远航）虽然是达伽马的舅舅，但年龄与他差不多。舅甥三人是一起长大的，可能曾在摩洛哥外海一同从事海盗活动。他们同样都是不忌惮动用暴力的人。达伽马还招募了他的堂弟埃斯特旺。这次远航将是他所在家族的事业。

根据已经形成的惯例，新船队出发前举行了宗教仪式。在里斯本肃穆的十字军大教堂举行的弥撒上，达伽马被正式授予东印度海军司令的头衔，并披挂了象征帝国霸业与战争的装束。他身披深红色绸缎斗篷，戴着银项链，右手拿着出鞘利剑，左手拿着王旗，跪在国王面前。国王将一枚戒指戴到他的手指上。

1502年2月10日，在祷告声中，船队的大部分船只从赖斯特罗起航，水手亲属的泪花消逝在风中。第二批五艘船在埃斯特旺·达伽马指挥下于4月1日出发。与之前相比大大扩充的远航队伍中包括一些观察员，他们将作为目击者，记录第一手资料。有些记述者是佚名的，有些则留下了自己的姓名。这些人中有一位葡萄牙文书，名叫托梅·洛佩斯，以及一位意大利商业代理人，马泰奥·达·贝尔加莫。他们都在埃斯特旺的船队里，记载了此次远航的进展，其间，葡萄牙在印度洋的目标从和平贸易变成了武装侵略。

卡布拉尔的船队在南方大洋曾几乎全军覆灭，所以水手们如今对远航抱有畏惧之心。托梅·洛佩斯可能是个旱鸭子，对航海没有多少经验，他描绘了他们经历的天气变化。从马德拉岛——“该地区气候宜人，不热也不冷”——船队前往佛得角群岛，然后折向西南方，进入开阔海域。到了赤道附近，天气开始变得酷热难当，“无论白天黑夜，没有一丝凉意”。然后，夜空中不再出现北极星，炎热渐渐消退。接近好望角时，“天气变得极端寒冷；我们越接近那里，就越冷，我们也更难保护自己。为了御寒，我们用自己的衣服裹住身躯，吃喝很多”。^[2]白昼越来越短，缩减到八个半小时，黑夜则长达十五个半小时。6月7日，洛佩斯所在的船于黑暗中突然遭遇暴风雨。船队被打散了。“只有两艘船还待在一起，‘茹利娅’号 and 我们的船……第三次刮起狂风的时候，风力太猛，我们三角帆的帆桁从中间断了，‘茹利娅’号的主桅也断了……山峰一般的海水向我们席卷而来——这景象让人呆若木鸡……”^[3]横扫甲板的惊涛骇浪使得“茹利娅”号开始进水。水手们拼命抽水，使船只维

持浮力，同时发誓赌咒，并抽签决定，假如他们能够幸存，哪些人要去朝圣感恩。他们几乎被冻僵，浑身湿透，等待风暴平息。9日，天气好转了：“我们把衣服挂出去晒干，但太阳没有给我们多少热量，我们还没有暖暖身子，就又被无数的浪头打湿了。而且还大雨如注，更是增加了我们的痛苦。”^[4]在这段危险的航程中，达伽马的部下向海水中投掷圣物，期望能够安全渡过难关。这一次，所有船只都得以幸存，但在葡萄牙与东方之间往返的旅程始终是对忍耐力的极大考验，始终要承担沉船或倾覆的风险。

葡萄牙人既想在非洲东海岸经商，又想在那里建立安全稳固的立足点，作为中转站，以让在横渡大西洋的艰难旅程中被打散的船队能够重新集结和补充给养。达伽马第一次远航的时候与莫桑比克和蒙巴萨的谈判非常紧张，双方互相猜忌，所以他显然决心采纳更强硬的路线。达伽马对东方外交习惯的微妙和冗长非常不耐烦，同时坚信欧洲的大炮能够让当地人肃然起敬。他还意识到，季风是一种执拗而不可能改变的力量：季风不等人。如果当地人不迅速地服从他，他就要动武强迫他们。

他先拜访了索法拉和莫桑比克。像以往一样，双方互相猜疑，于是交换了人质，葡萄牙人携带可以隐藏的武器登陆，总算以比较友好的气氛购买了一些黄金。但他的主要目标是基尔瓦，即海岸的关键贸易港口，之前它对卡布拉尔的接待很冷淡。达伽马率领全部二十艘船到达基尔瓦，旌旗招展，并用射石炮发出一轮齐射，以宣扬葡萄牙王室的辉煌与强力。他给苏丹送去了一封简短强硬的短信，要求觐见他。但答复是，苏丹患病，不能接见他。达伽马立刻把自己的船只带到海岸，摆开极具威胁性的阵势，派遣三百五十人携带火枪、乘坐配有回旋炮的长艇登陆。“他不想见我，”总司令本人记述道，“还对我们非常不礼貌，于是我带领所有部下，全副武装，决心消灭他，乘船来到他的宅邸前，将船首靠岸，用比他更不礼貌的口吻要求他出来。于是他同意了，来到我面前。”^[5]

根据编年史家加斯帕尔·科雷亚绘声绘色的记载，总司令通过翻译，训斥了这位倒霉的统治者：

我是我的国王的奴仆，你在这里看到的所有人和那些在船上的人，都会服从我的命令。你要知道，只要我愿意，就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你的整个城市化为灰烬。如果我想要屠戮你的人民，他们全都会被烧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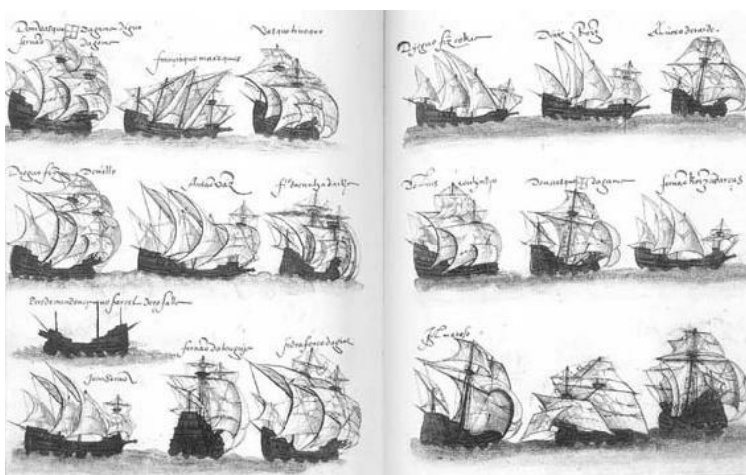
他继续说，他“会扭住苏丹的耳朵，把他拖到海滩，用铁锁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带走，将他在印度各地展出，让所有人都看到，不愿意服从葡萄牙国王是什么下场”。^[6]

达伽马要求获得贸易权，并要求苏丹向葡萄牙国王每年缴纳大笔贡赋。不幸的苏丹必须升起葡萄牙王旗，以表示臣服于葡萄牙国王的宗主权。这是为了彻头彻尾地羞辱苏丹。贡赋则分两批支付，第一批在隆重典礼中交付，用托梅·洛佩斯的话说，“鼓乐喧天，大家欢呼雀跃”（他这么说可能带有讽刺意味），海滩上一大群妇女呼喊“葡萄牙！葡萄牙！”^[7]她们这样呼喊，可能是出于畏惧，而不是喜悦。斯瓦希里沿海地区都感受到了葡萄牙炮舰外交赤裸裸的威胁。7月27日，达伽马继续驶往马林迪，当地苏丹是他的老友，热情（不过有些紧张）地接待了他。

这一次跨越印度洋的航行平安无事。8月20日，整支船队抵达安贾迪普群岛，他们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袭掠了附近的一些港口，包括霍纳瓦尔和巴特卡尔。根据科雷亚的记载，达伽马直截了当地向此地缩手缩脚的国王宣布：“这是我的主公葡萄牙国王的船队，他是海洋、世界与这片海岸的君王。”^[8]船队从安贾迪普群岛继续南下。9月初，船队抵达德里山，此地是一块突出的海岬，周围有一片掩护它的潟湖，位置在坎纳诺尔以北。这是沿着马拉巴尔海岸经商的商船遇到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中转港口，来自红海的香料商船普遍在此暂时停留，以补充淡水、木材和食物。达伽马的二十艘船和数千人就在潟湖内停船落锚。据

托梅·洛佩斯记载，坏血病又一次对水手们施以沉重打击。他们为病人搭起帐篷。虽然得到了大量橘子，很多病人已经病入膏肓，最终有六十或七十人死亡。其他病人身上则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症状。他们两腿之间长出了瘤子，这可能是热带寄生虫造成的，不过显然并不致命。

德里山顶峰的海拔为900英尺，是一个居高临下之地，从顶峰可以俯瞰周边，并筹划海上的伏击作战。达伽马和他的索德雷亲戚年轻时可能在摩洛哥沿海从事过类似的行动。他们的任务是扼杀印度与红海之间的穆斯林贸易，但也要为卡利卡特大屠杀复仇。很多人无疑也热切希望为自己捞一笔油水。1502年9月29日，机会来了。一艘阿拉伯三角帆船出现在北方。达伽马率领一队船只出海，射石炮严阵以待。



转向征服：达伽马第二次远航的舰队规模是第一次的六倍

好几位目击者记述了随后发生的战斗。意大利商业代理人马泰奥·达·贝尔加莫大感震惊，在写给自己雇主的信中语焉不详。“我们没有参加。葡萄牙人告诉我们，这不关我们的事，”他写道，“而且此事的一些细节，此时此地还不方便透露。”^[9]葡萄牙文书托梅·洛佩斯就没有这么沉默寡言了。他可能是第一个对葡萄牙人征服印度洋的手段与心态加以批评审视的人。

这艘船叫作“米里”号。它刚从红海返回，船上载着约二百四十名男子和一些妇女儿童，其中很多人刚参加完在麦加的朝觐。这艘船显然有武装，载有一些火炮。乘客中有一些富裕的卡利卡特商人，其中一人是马穆鲁克苏丹在卡利卡特的代理商朱哈尔·法基，他是一位颇有地位的富商，拥有好几艘船。

达伽马或许感到意外，“米里”号未做抵抗便投降了。马拉巴尔海岸沿线有一些得到严格遵守的规矩。如果在某些海域遭到当地海盗拦截，只需要付一笔买路钱就可以了。商人们腰缠万贯，自信可以用金钱换得安全通行。法基首先提议了一个价码。他表示愿意出资修理一艘葡萄牙船只损坏的桅杆，并在卡利卡特为所有葡萄牙人提供香料。达伽马拒绝了。这位商人又试了一次：他愿意把自己、诸多妻子之一和一个侄子作为人质交给葡萄牙人，随后给达伽马的四艘最大的船装满香料。这个条件显然比刚才提高了很多。人质将留在葡萄牙船上。他的另外一个侄子会上岸去安排交易。另外，他还保证促成在卡利卡特被扣押的葡萄牙货物都物归原主，并在卡利卡特和葡萄牙之间确立友好关系。这等于是邀请葡萄牙人参与香料贸易。如果过了十五或二十天，这些承诺还没有兑现，总司令就可以任意处置人质。达伽马依然不为所动。他命令法基告诉商人们，交出手头现有的所有财产。法基越来越感到震惊，他带着尊严答道：“我指挥这艘船的时候，他们都服从我的命令。现在你是主子，你自己告诉他们！”

据洛佩斯记载，商人们“没有受刑”，交出了自己愿意交出的财物，显然船上还藏有大量财物。根据某些记载，葡萄牙船长们对达伽马颇有些讥讽，因为他顽固不化，既不肯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也不愿意彻底洗劫商船。洛佩斯显然十分震惊。达伽马秉承某种怪异的原则，不肯直截了当地去抢劫，真是不可理喻：“想一想船上留着的那些珠宝和其他贵重财物！那成罐的油、黄油、蜂蜜和其他商品！”[\[10\]](#)

达伽马有其他的计划。让“米里”号乘客难以置信的是（或许葡萄牙船队的许多人，出于不同的原因，也无法相信），“米里”号被拆除了舵与索具，然后被长艇拖曳到一段距离之外。葡萄牙炮手登上“米里”号，安放火药，然后将其点燃。穆斯林将被活活烧死。

“米里”号上的人们现在意识到事态严重，精神百倍地想办法自救。他们设法扑灭了火，并搜罗出能找得到的所有武器、投射兵器和石块。他们决心战斗到底。葡萄牙长艇返回，准备重新点火，但遭到“米里”号上男女乘客一阵冰雹般的射击。长艇被迫后退。他们企图炮击丧失了活动能力的“米里”号，但长艇上的火炮是很轻型的那种，无法对大船造成严重的损害。即便在很远的地方，葡萄牙人也能看得到“米里”号上的妇女捧着珠宝和其他贵重财物，恳求总司令饶命。托梅·洛佩斯写道，有些人举着自己的小孩子，“我们明白他们是在恳求开恩”。他的记述语调越来越心烦意乱，对达伽马的暴行也越来越无法理解。“男人们打着手势，表示他们愿意付一大笔赎金……毫无疑问，他们愿意交出的钱足以赎回所有被囚禁在非斯的基督徒，还会剩下极多的财富给我们的国王陛下。”^[11]达伽马躲在船上，透过一个观测孔，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米里”号上，乘客们开始用床垫、围栏和能找得到的一切东西来构筑壁垒。他们决心死战到底，即便牺牲，也要让敌人付出惨重代价。

一连五天，丧失活动能力的“米里”号在酷热难当的海上漂流。洛佩斯所在的船跟随着它，船尾拖曳着另一条缴获的穆斯林船只。第五天，他们奉命消灭“米里”号。“我们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洛佩斯写道，“今天是10月3日，星期一，我将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2]

他所在的船逼近“米里”号，来到它的侧舷。一门大炮于抵近距离在“米里”号甲板上轰出一个大洞，但葡萄牙人严重低估了对方的抵抗意志。“米里”号用抓钩抓住了他们的船，“事出突然，非常迅猛，我们都

没有时间从战斗平台上抛掷一块石头”。战局旋即逆转。葡萄牙人遭到突然袭击，吃了大亏。“我们当中许多人没有携带武器，因为我们以为对方手无寸铁。”^[13]他们不得不匆匆将甲板下方舱室里被囚禁的穆斯林俘虏锁起来，然后去面对“米里”号的猛烈攻击。“米里”号船体更高，向葡萄牙船只甲板倾泻出暴风雨般的投射武器，以至于炮手无法接近自己的炮位。葡萄牙水手用弩弓打倒了一些攻击者，但有四十名水手在长艇上。他们人手不够，不得不退缩：“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人在敞开的甲板上露面，就会遭到二十或三十块石头的袭击，有时还有箭射来。”^[14]

两艘船缠斗起来。激战持续了一整天。穆斯林打得非常疯狂，不畏惧任何伤痛；“他们凶猛地向我们扑来，这真是非同寻常的奇景。我们打死打伤很多人，但他们丝毫不犹豫，似乎感觉不到自己身上的伤痛。”^[15]洛佩斯看到自己周围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我们全都负伤了。”^[16]十四或十五名葡萄牙水手被堵在艏楼内，成群的穆斯林企图猛攻进去。大多数葡萄牙人放弃了自己的岗位，逃向甲板下方。只有洛佩斯和船长乔万尼·博纳格拉齐亚还留在上层，为自己的生命而奋战。博纳格拉齐亚不知从何处找到一块胸甲来保护自己，此时胸甲已经在石块的正射打击下凹陷变形，系带也脱落了。一名敌人冲到他面前，胸甲却从他身上滑落了。博纳格拉齐亚在战斗嘈杂中转过身来，喊道：“文书托梅·洛佩斯，大家都走了，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17]

是时候逃走了。两人放弃了岗位，把艏楼让给了“米里”号乘客。“他们高声呼喊，仿佛已经战胜了我们。”穆斯林还占领了艏楼。集合起来支援船长和文书的水手们看到形势已经绝望，于是跳入大海，被小艇救起。“我们的船上已经只剩几个人了，几乎全都负了伤。”^[18]更多人从“米里”号跳到葡萄牙船上以替换伤员，不过有几个人不慎坠海淹死了。船上剩余的葡萄牙人被包围在艏楼下方的甲板处，尽可能地躲避敌人的投射武器。“他们打死了我们的一个人，打伤了另外两三人。我们很难保护自己、抵御石块的袭击，尽管船帆对我们有一定的掩护作

用。”^[19]

对葡萄牙人来说惨败已经近在眼前，这时他们的敏锐思维救了他们。另一艘克拉克帆船“若亚”号驶向“米里”号，佯装要强行登船。战局又逆转了。穆斯林攻击者为自己的船担心。他们匆匆逃回“米里”号，解开抓住葡萄牙船只的抓钩。精疲力竭的葡萄牙幸存者于是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欣慰。

“米里”号乘客的奋起自卫失败了。他们的末日降临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达伽马率领六七艘最大的船，紧跟着因为没有舵而在广阔海域漂流的“米里”号。风浪很大，无法强行登船，所以“米里”号的死期被推迟了很久，这最后的垂死挣扎十分恐怖。随后的四天四夜，葡萄牙人追踪自己的猎物，向其开炮，但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第五天早上，有人从“米里”号游泳过来，带来了一个提议。他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愿意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在“米里”号上，好让葡萄牙人把它拉近并烧毁。他还告诉葡萄牙人，“米里”号上已经没有战利品可以掳掠了；所有贵重物品、货物和食物都已经被投入大海，免得落入葡萄牙人手中。洛佩斯对穆斯林的斗志和勇气做了最后的致敬：“战斗期间，我们有时看到中箭的人自己把箭拔出来，扔回我们的方向，并继续战斗，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负伤。”^[20]“就这样，”他严厉地谴责道，“在许多场战斗之后，总司令残酷无情地烧毁了那艘船，把船上的人全部活活烧死了。”^[21]

据说，在“米里”号沉没之前，达伽马从船上救起了一名驼背的领航员和大约二十名儿童，并命令他们皈依基督教。

“米里”号缓缓走向末日的恐怖命运令后世的许多葡萄牙评论者震惊而困惑，尤其是印度历史学家更视其为从海上侵犯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开始信号。这是两个自给自足、互相无法理解的世界之间的第一次暴力碰

撞。“这是闻所未闻的，”一位穆斯林统治者曾说，“竟然要禁止别人在大海上航行。”^[22]尽管葡萄牙人被定性为海盗，达伽马的动机——并非为了掳掠财物而在海上大开杀戒——也实在令人费解。他可能相信要以恐怖手段震慑敌人，并且他的这种信念过于极端。但是，这样想的人不是只有他一个。葡萄牙人来自一个充满激烈竞争、根深蒂固仇恨的环境，并且在那个环境里的人们致力于将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航海和火炮。他们来到印度洋的时候，对伊斯兰世界的观念非常狭隘，因为其是在摩洛哥海岸与穆斯林冲突的条件下获得的。1494年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瓜分世界的两大伊比利亚强国受到历史与环境的塑造，只相信垄断贸易和十字军圣战的责任。

在马拉巴尔海岸，“米里”号事件不会被遗忘，更不会被原谅。数百年间，人们对它铭记不忘。有一句西班牙谚语说，严重的罪孽会投下很长的阴影。但是，达伽马的暴力活动才刚刚开头。他已经热血沸腾。

^[1] Subrahmanyam, 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1997, p.190.

^[2]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p.203-204.

^[3]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05.

^[4]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05.

^[5] Subrahmanyam, 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1997, p.202.

^[6]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enry Stanley. London, 1879, pp.295-296.

^[7]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

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17.

[8]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290.

[9]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330.

[10]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25.

[11]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26.

[12]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27.

[13]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27.

[14]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28.

[15]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28.

[16]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29.

[17]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29.

[18]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29.

[19]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p.229-230.

[20]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31.

[21]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31.

[22] Sheriff, Abdul. *Dhow Cultures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2010, p.314.

8 狂怒与复仇

1502年10～12月

达伽马驶向坎纳诺尔，这个港口名义上对葡萄牙友好，并且设有一个小型葡萄牙贸易站。到此时，暴躁易怒的总司令对外邦人的一切意图都满腹狐疑，因此极难安抚。他拒绝上岸去拜见当地国王。于是双方以一种尴尬的方式会面，坎纳诺尔国王站在伸向大海的一个小平台上，达伽马站在一艘船的艏楼上。不过双方都大张旗鼓，摆开隆重的排场。在微妙的外交对话和交换礼物之后，双方很快围绕贸易条件出现了问题。国王无法讨论这些条件；关于香料贸易的谈判必须去找城里的商人，而这些商人是穆斯林。

达伽马不能够，也不愿意去理解马拉巴尔沿岸各地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印度教精英统治集团掌握政治权力，但经济活动由他们的穆斯林臣民把持。被派来与达伽马谈判的穆斯林商人索要高价，因为葡萄牙人的商品质量一般，不值得他们购买。这样的回应令达伽马大发雷霆。他问道，坎纳诺尔国王为什么要派这些穆斯林来见他，“因为国王心知肚明，穆斯林自古仇恨基督徒，是我们最凶残的敌人”。^[1]看来国王并不珍视与他的友谊。既然国王不肯与他打交道，他打算于次日清晨将已经装上船的少量香料也退回去。

在这次争吵当中，葡萄牙在坎纳诺尔的代理商派伊·罗德里格斯赶来，努力平息事态。达伽马命令他立刻离开这座城镇。罗德里格斯面无惧色：他不是总司令的下属，所以不必听从他，而且手里还有商品要出售，有工作要处置。这样的对抗让达伽马越发暴跳如雷。他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临走前还警告坎纳诺尔国王：如果当地的葡萄牙基督徒受到任何伤害，“他的卡菲尔^[2]一定会付出代价”。^[3]整个沿海地区都要被达

伽马疏远了，而且他走的时候还故意鼓乐喧天、礼炮齐鸣。

他沿着海岸南下，奔向卡利卡特，刻意寻找麻烦。途中，他炮击了一座向坎纳诺尔称臣纳贡的小港口，并俘获了一船穆斯林。坎纳诺尔国王送了一封认输服软的信去安抚总司令，称即便葡萄牙人杀死了他的“卡菲尔”，他也不会撕毁与葡萄牙国王的和约，而是向他报告一切事态。达伽马读了信，心情并没有好转，因为这封信显然是派伊·罗德里格斯写的。

然而，卡利卡特人此时已经知晓了“米里”号惨剧，扎莫林陷入了深思。葡萄牙人显然不是偶然到马拉巴尔海岸来做客的。他们每年都来。他们想方设法去俘虏船只。如果他们在印度建立了陆地基地，那么这些不受欢迎的外来客造成的威胁将大大增加。就连上一年来的四艘船也证明葡萄牙人完全不怕印度人的武装抵抗，而这一年的葡萄牙舰队规模极大。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法兰克人的问题，但考虑到他们拥有技术优势，要做到这个并不容易。

扎莫林做了两件事。达伽马还在坎纳诺尔企图确立和平的时候，扎莫林给他写了一封信。他表示，自己对基督徒的态度是纯粹的友谊。他愿意为葡萄牙人留在卡利卡特的货物提供补偿。至于之前的屠杀惨案，这是不能用金钱来表达或补偿的，而且因为葡萄牙人在麦加商船和其他船只上杀了更多人，双方的血债肯定算是扯平了。他提议双方搁置过去的纠纷，既往不咎，从头开始；他的语气极其温和克制。

然而，他给自己那犯上作乱的附庸科钦国王写了一封腔调迥然不同的信，强调双方急需合作，并敏锐地分析了他们共同的处境：“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如果他们不采纳这个办法，就必然全部垮台，被葡萄牙征服。在印度的整个马拉巴尔海岸，任何人都不能向葡萄牙人提供任何香料，价钱再高也不行。”^[4]不幸的是，科钦国王仍然反抗卡利卡特。正是当地政治上的这些裂痕，最终将毁掉他们所有人。他答道：“他与葡

葡萄牙人处于和平状态.....不打算以其他方式行事。”并且他把这封信拿给在他城内的葡萄牙人看，后者则将信发给了达伽马。所以，总司令收到了扎莫林的两封信。他的看法没有变：印度人都是两面三刀的奸佞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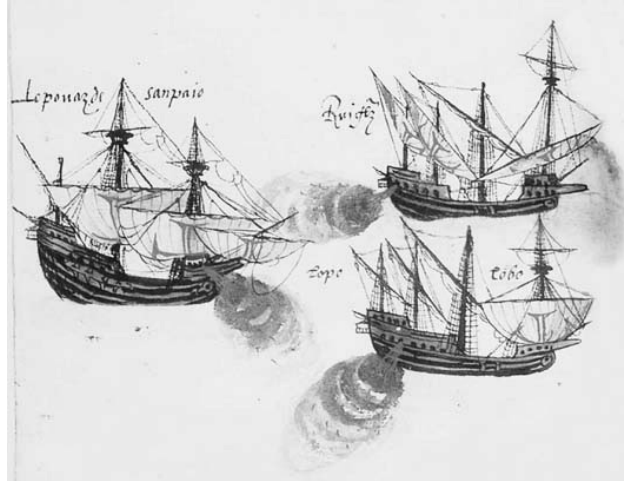
10月26日，总司令在接近卡利卡特的时候，把两名穆斯林俘虏吊死在自己的桅杆上。根据从“米里”号掳来的儿童的“证词”（这些儿童指出，这两人在前一年的屠杀中杀死了卡布拉尔的部下），达伽马处死了这两人。次日，同样根据儿童的“证词”，第三名俘虏被指控曾从葡萄牙贸易站偷窃，被用长矛戳死。29日，船队在离卡利卡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落锚。“我们只能看到卡利卡特的一小部分，它坐落在一座平坦的山谷之内，有非常高大的棕榈树。”^[5]托梅·洛佩斯如此写道。扎莫林派来了一个代表团，重申了之前在信里提议的条件。达伽马不肯让步。他要求扎莫林对葡萄牙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做全面的赔偿，驱逐所有穆斯林，“不管是商人还是永久居民。否则他不愿意和，也不愿意与他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自从世界开端以来，穆斯林是基督徒的敌人，基督徒是穆斯林的敌人.....并且此后不准任何来自麦加的船只到他的港口或在那里经商”。^[6]扎莫林是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的，达伽马也一定知道。扎莫林做了尽可能温和抚慰的回答。他希望和平，但穆斯林自古以来就在卡利卡特，城里有四五千户穆斯林；他们的人民诚实守信，忠心耿耿，为他做了许多宝贵的服务。

达伽马宣称扎莫林的答复是对他的侮辱，于是扣押了信使。这一天，双方不断交换消息，脾气都越来越坏，双边关系越发恶化。在这期间，一些渔民以为已经议和成功，便驾船出海。葡萄牙人抓住了他们，然后扣押了一艘满载食物的大型阿拉伯三角帆船。扎莫林胸中燃起怒火。葡萄牙人的行径悍然违反了大洋的精神。“基督徒更喜欢在海上偷窃和侵略，而不是贸易.....他（扎莫林）的港口始终是开放的，”他继续说，“所以总司令绝不可以阻挠或驱赶麦加穆斯林。”^[7]如果达伽马接

受这些条件，扎莫林“会做出相应举动.....如果不接受，他（达伽马）必须立刻离开他（扎莫林）的港口，不要再停留在那里；他（达伽马）无权停留，也无权在印度的整个马拉巴尔海岸的任何港口停泊”。达伽马在回复里对当地文化做了嘲讽：他的主公（葡萄牙国王）能从棕榈树里制造出一位同样优秀的国王；扎莫林竟敢命令葡萄牙人离开，唯一的后果就是，今天扎莫林不能享受咀嚼槟榔叶的乐趣了。他要求扎莫林于次日中午前给出恰当的回复，否则后果自负。

当晚，达伽马命令自己的所有船只逼近城市；它们都稳稳地下锚停泊，船首向前，以减小目标，抵御扎莫林的炮击。天黑时，他们看到一大群人出现在海滩上，拿着灯笼。他们劳动了一整夜，为自己的火炮挖掘堑壕和炮位。“黎明时分，”洛佩斯回忆道，“我们看到许多人走向海滩。”达伽马命令各船更加靠近岸边，准备就绪。然后，他发布了更进一步的命令。如果到下午一点时扎莫林还没有给出答复，他就要把穆斯林俘虏吊死在桅杆上，并把许多印度渔民吊死在桁端，“把他们吊得高高的，让所有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最后还是没有答复。“于是有三十四人被绞死。”^[8]

海滩上很快人山人海，他们惊恐万状地看着桅杆上的死尸，无疑在努力辨认自己的亲戚。在他们恐惧地举头仰望的时候，葡萄牙船只用重炮向人群开了两炮，将人群驱散。所有其他火炮也轰鸣起来，抛掷出“持续不断的暴风雨般的铁弹和石弹，杀人无数”。^[9]洛佩斯看到人们扑倒在沙滩上，然后逃跑，或者“像蛇一样匍匐逃走；看到他们在哭喊，我们高声讥笑他们。海滩很快就肃清了”。^[10]印度人企图还击，但他们的射石炮效力很差，“他们的射击精度极差，而且填弹速度极慢”。葡萄牙人的重型炮弹落在印度炮位附近时，印度炮手抱头鼠窜。炮击持续到晚上，一刻不停，在木屋上打出窟窿，炸倒棕榈树，“震耳欲聋，仿佛棕榈树是被斧子砍倒的。有时我们还能看到城里遭到轰击的地方有人在逃窜”。^[11]



葡萄牙大炮的威力在印度洋无可匹敌

达伽马还不愿善罢甘休。夜间，为了加快破坏速度和增加恐怖气氛，他命令将吊在桁端的死尸全都取下来，砍掉首级和手足，将躯干扔进大海。那些残肢被堆放在一条渔船内。达伽马写了一封信，命人将其翻译成马拉雅拉姆语，然后用一支箭把信钉在渔船的船首。然后，他们把渔船拖曳到岸边。信的内容是：

我来到这座港口，是为了买卖商品，收购你们的产出。这就是贵国的产出。我现在给你们送上这份礼物。这也是送给你们的国王的。如果你想和我们友善，就必须为在此港掳走的我国商品付账。你们还强迫我们开炮，所以还要为我们消耗的火药与炮弹买单。如果你们这么做，我们立刻就成为你们的朋友。[\[12\]](#)

死尸被冲刷上了岸。人们小心翼翼地来到海滩，检查渔船和那封很显眼的信。达伽马命令停止炮击，好让当地人理解他的提议。洛佩斯观察了随后发生的事件。他们看到渔船里的东西后，

脸色大变，这表明局势很严重。他们伤心欲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些人跑过来，但看到那些首级，又跑开了。也有人拿走了一些首级，手里提着它们走开。我们距离他们很近，能看得很清楚。这一夜我们无人入眠，因为岸上传来呼天抢地的哀哭，被海水冲上岸的死尸周围也有人在吟唱。整整一夜，他们一直在借助蜡烛和灯笼的光亮修补塹壕，因为

他们担心我们放火烧城。^[13]

拂晓时分，全部十八艘葡萄牙船的大炮再次轰鸣起来。靠近海边的房屋已经化为废墟。这一次，大炮射击的仰角比较大，瞄准了较远处的权贵与富人的豪宅。城镇似乎空荡荡的。达伽马如果愿意，或许可以洗劫全城。他可能还在希望用炮火迫使扎莫林屈服。炮击行为持续了一上午。重型射石炮向城内发射了400枚炮弹。当地一些船只企图营救一艘被葡萄牙人俘获的阿拉伯三角帆船，但为时已晚，被打得匆匆撤退。

次日，达伽马驶向科钦，一路展开血腥报复，留下六艘克拉克帆船和一艘卡拉维尔帆船由维森特·索德雷指挥，继续从海路封锁卡利卡特。葡萄牙人至少能够指望科钦的一些支持。科钦国王是葡萄牙人最长期的盟友，长远来看他的忠诚大体上没有得到葡萄牙人的感谢和报答，但因为渴望脱离卡利卡特的枷锁，所以一定会热情欢迎葡萄牙人。

不过，整个马拉巴尔海岸都对葡萄牙人凶暴的到访感到不安，印度国王们与其穆斯林商人臣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在科钦也导致了摩擦。装载香料的工作时断时续，双方没有谈好价钱，商人在关键时刻故意拖延。“有时他们为香料索要更高的价钱，”洛佩斯记载道，“有时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商品。因为他们每天都提出新要求，有时会突然停止往我们的船上运送香料。就这样，他们迫使总司令天天上岸……他们与他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之后，就继续装运，然后又突然停手。”^[14]达伽马或许也认识到，自己的暴躁必须有个限度，万万不能疏远了他唯一一个真正的盟友，并且在科钦的生意至少能让他在当地获取一些当地人的建议。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学到了关于印度次大陆的更多知识。他们听到了关于锡兰的故事，“那是一座富饶而庞大的岛屿，位于300里格之外，那里有崇山峻岭，种植大量肉桂，出产宝石和许多珍珠”。^[15]这很有诱惑力，于是葡萄牙人在自己预定将来探索的地点清单上添加了锡兰。邻近港口的印度基督徒，即圣多马的追随者，兴致勃勃地赶来见他

们，向曼努埃尔一世臣服，并帮助他们装运香料。

索德雷对卡利卡特的海上封锁给城内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扎莫林还在想办法解决葡萄牙问题。他试图通过直接与间接的途径组建一个反对外来者的统一战线，去抵御他们那令人生畏的火力和侵略。他的策略是打一场消耗战：努力延缓与达伽马的代理商的香料贸易谈判，让葡萄牙人停留过久，被季风困在印度。科钦的穆斯林商人的拖延战术也是这个用意。但卡利卡特港口被封锁，无法从事其他贸易，所以必须另谋他策。

扎莫林又试了另外一个办法。他派了一名婆罗门，给达伽马送去新的和平建议。达伽马肃然起敬，因为婆罗门是印度的高级祭司，是崇高种姓的成员。通过这位使者，扎莫林提议补偿葡萄牙人的损失，并签订新的友好条约。达伽马倾向于严肃对待这名使者，尽管此人的故事的某些细节有点儿不对劲。这位婆罗门自己也想来见葡萄牙人，并请求将他拥有的香料也运到葡萄牙船上。婆罗门和其他一些人质与达伽马一同返回卡利卡特。到了卡利卡特，婆罗门被允许上岸，留下他的儿子们在船上，并承诺会回来。然而，他没有再露面。另一个人前来，请求达伽马派遣“一位绅士”登陆，去接收扎莫林欠他们的钱。达伽马听到“绅士”这个词，大发雷霆。他要求使者通知国王，就连他船上最低贱的小厮，他也不会派去。他不欠国王什么东西。如果扎莫林有东西要给他，那就自己搬到船队这里好了。扎莫林送来了安抚人心的答复：到第二天结束时，一切都能处理好。但到了晚上，总司令的耐心快要枯竭了。

热带的黑夜降临到卡利卡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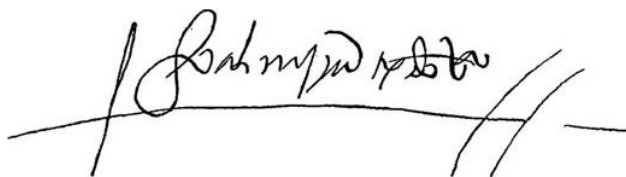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达伽马船上的瞭望哨看到一艘渔船离开了港口。当它接近的时候，他们发现它其实是两艘连接在一起的船。达伽马被唤醒。他迅速穿上衣服，来到甲板上，认为国王在兑现诺言。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观察到七十至八十艘船在悄无声息地

出海。瞭望哨在一段时间内坚持认为那是一群渔船。当第一轮炮弹袭来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印度船上的射石炮鸣响了，火球掠过水面，在葡萄牙旗舰上打出窟窿。很快，印度船就包围了葡萄牙旗舰。任何人只要出现在甲板上，都会遭到箭雨袭击。葡萄牙人从桅杆顶端向下投掷石块，但攻击者离葡萄牙船的距离极近，火力极猛，让葡萄牙炮手无法操纵自己的火炮。达伽马所在的克拉克帆船的尾部还系着一艘缴获的阿拉伯三角帆船。印度人向这艘三角帆船放火，希望大火能蔓延到克拉克帆船上。葡萄牙人切断了连接两艘船的绳索。更多小船蜂拥而来，它们都配有轻型射石炮和弓箭。葡萄牙人别无办法，只能割断缆绳，弃锚逃跑。但达伽马的旗舰为了防止敌人在黑暗中砍断系锚的缆绳，使用的是一根特别坚固的铁链。水手们不得不在敌人的猛烈火力之下艰难地砍断铁链，旗舰才能开动。然而弃锚之后，海上风平浪静，于是旗舰停在原地纹丝不动，随后遭到暴风骤雨般的投射武器袭击。

挽救达伽马旗舰的，是偶然事件。维森特·索德雷的小船队——一艘克拉克帆船和两艘卡拉维尔帆船——出人意料地从坎纳诺尔赶来了。大海一片平静，所以大船不得不靠划桨缓缓移动，驶向一大群不断开炮的小船。攻击者终于撤退了，“有的缺了胳膊，有的少了腿，也有的人被炮火击毙”。[\[16\]](#)

疑心很重的达伽马因为自己被诱骗进了陷阱而怒火中烧。他又一次将人质吊死在卡拉维尔帆船的桁端，并在海边向敌人展示，随后又将死尸丢进一艘当地小船中并将小船送到岸边，还附带了一封更狂暴的书信：“哦，你这可怜虫，你让我来，我就来了。你已经竭尽全力，若是你有更大的力量，一定会做得更多。你理应受到惩罚，我必然会惩罚你。等我回来，我就会报偿你，不过不是用金钱。”[\[17\]](#)



瓦斯科·达伽马的签名

[1]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34.

[2] “卡菲尔”原是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称呼，即异教徒。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葡萄牙人用这个词称呼非穆斯林黑人。

[3]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35.

[4]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39.

[5]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41.

[6]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42.

[7]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43.

[8]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45.

[9]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2, Lisbon, 1778, pp.56-57.

[10]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45.

[11]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46.

[\[12\]](#)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46.

[\[13\]](#)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47.

[\[14\]](#)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61.

[\[15\]](#)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56.

[\[16\]](#)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67.

[\[17\]](#)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ed. and trans. Paul Teyssier and Paul Valentin, Paris, 1995, p.268.

9 立足点

1502年12月～1505年

1503年2月，达伽马起航返回里斯本，在印度海岸留下了两个脆弱的立足点，即分别位于坎纳诺尔和科钦的贸易站。卡利卡特的扎莫林怒气冲天，备受羞辱，另外还因为科钦苏丹拒不配合他铲除葡萄牙海盗而格外愤怒。很显然，与这些外来入侵者是不可能进行和平谈判的。葡萄牙人的到访越来越有规律，这很令人不安。每次季风快结束时，他们的船只就返回印度了，有时是一小群，有时规模雄壮，炫耀武力。他们用旗帜和炮声宣布自己的驾临。他们来了之后，放肆地索要香料，并提出驱逐根深蒂固的穆斯林群体的无理要求。他们向印度教文化的禁忌挑衅，大加威胁，并肆无忌惮地犯下常规的战争法则所不允许的暴行。

葡萄牙人现在开始努力在马拉巴尔海岸建立一种通行证制度，向过往船只收缴买路钱。他们发放安全通行证，以保障对他们友好的势力的船只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对贸易征收的一种赋税。后来，他们要求所有商船仅在葡萄牙控制的港口从事商贸活动，并且还要缴纳高额的进口与出口关税。通行证上的印章带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图像，这标志着印度洋世界的一个极端变革。欧洲人来了之后，大海不再是自由贸易区。通行证制度给印度洋世界引入了一个陌生的概念——领海，即由武装力量和葡萄牙的野心（主宰大海）控制的政治化的海洋空间。

如今，全世界都认识到了葡萄牙对印度洋贸易构成威胁的全部意义。1502年12月，忧心忡忡的威尼斯人组建了一个“卡利卡特委员会”，专门请求开罗的苏丹采取行动。威尼斯驻开罗大使贝内代托·萨努多奉命“快速找到秘密的补救办法”。^[1]此次行动需要最高度的谨慎。威尼斯人这是要帮助穆斯林去反对他们的基督徒兄弟，一旦泄露出去，必将成

为大丑闻，所以威尼斯在开罗的外交活动极其微妙，需要严格保密。萨努多的使命是很明确的：向苏丹强调葡萄牙封锁他的香料贸易路线造成的威胁，敦促他向扎莫林施加压力，驱逐入侵者，并降低通过埃及的香料贸易的关税，以便与葡萄牙竞争。最后一点显然对威尼斯人特别重要。

在开罗，苏丹阿什拉夫·坎苏·加乌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关注——民变、贝都因部落族民对通往麦加与麦地那朝觐路线的威胁，以及空荡荡的国库。但葡萄牙人突然出现在印度洋，既让他不安，也让他匪夷所思。“法兰克人的大胆没有边际，”编年史家伊本·伊亚斯对葡萄牙人越来越多的侵犯行为评价道，

据说法兰克人已经成功地在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堤坝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在分隔中国海（此处指印度洋）与地中海的一座山上打出来的。法兰克人在努力扩大这个缺口，以便让他们的船只进入红海。这些海盗活动的来源就是这样的。^[2]

在马穆鲁克王朝治下的开罗那如天方夜谭一般的世界里，这样的奇思异想不断流传。苏丹对威尼斯人的建议置之不理。他对降低关税、减少自己收入的设想当然不予理睬，但葡萄牙人的暴行越演越烈。苏丹是麦加与麦地那两处圣地的监护人，是信众的捍卫者。葡萄牙人对红海的封锁影响到了他的收入，而朝觐者的自由和保护广大穆斯林的义务则事关他的合法性。“米里”号的命运影响深远。1502年冬季，达伽马还在科钦的时候，发生了第二起类似的暴行。这意味着，苏丹迟早要处置葡萄牙问题。

达伽马的舅舅维森特·索德雷留在印度，巡视更北方的马拉巴尔海岸。他在坎纳诺尔（葡萄牙与其比较友好）外海的时候，收到了坎纳诺尔国王的信，请求他扣押属于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商人的船只，此人刚刚离开坎纳诺尔，却没有缴纳赋税。索德雷和他的外甥一样酷爱暴力。如

果坎纳诺尔国王愿意的话，他会烧掉这名穆斯林商人的船只。国王并没有这个打算，只要迫使商人交税就可以了。这位商人名叫马伊玛玛·马拉卡尔，他在索德雷逼迫下返回港口，怒气冲冲地交了税，然后离开，并诅咒坎纳诺尔国王和葡萄牙国王。

坎纳诺尔国王发出抱怨，索德雷决定代行法律，惩治马拉卡尔。索德雷剥光了马拉卡尔的衣服，将他捆在桅杆上，毒打他，并对他施加了一种侮辱性的暴行。葡萄牙人在摩洛哥时经常这样侮辱穆斯林，即往对方嘴里灌粪便。索德雷还增加了一种花样。他往马拉卡尔嘴里塞了一根短棍，将他双手缚在背后，然后把一块腌猪肉塞进他的嘴里。遭到虐待的马拉卡尔愿意交出一大笔钱，以免受这样的侮辱。索德雷的答复与达伽马回答企图用金钱赎买自由的“米里”号乘客的话类似：“货物可以用钱来买，但国王和大贵族的荣誉不卖。”^[3] 马拉卡尔在印度洋贸易世界中是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这场奇耻大辱令他满腔怒火，寻求复仇。1504年，他亲自来到开罗，将葡萄牙人的亵渎恶行汇报给信众的捍卫者——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并要求对这些可恶的异教徒采取行动。

在马拉巴尔海岸，扎莫林也渴望复仇。他完全明白，假如葡萄牙在各个香料王国扎下根来，那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达伽马在不可阻挡的季风吹拂下返航之后，扎莫林一定会攻打科钦，惩罚它的统治者，并摧毁葡萄牙人羽翼初生的贸易站。因此，维森特·索德雷的小船队奉命保卫这个定居点，并支持科钦统治者。但索德雷还有一个任务是封锁红海，消灭在红海与卡利卡特之间来往的穆斯林船只。这后一项任务意味着可能获得丰富的战利品，因此更受他偏爱。在他的兄弟布朗斯的怂恿与帮助下，索德雷无视科钦国王和葡萄牙贸易站的哀求，航向北方，去捞油水。他那明目张胆的不顾自己同胞死活的行为，遭到了抗议。两名船长放弃了自己的指挥岗位，宁愿留在遭到围攻的科钦贸易站。

索德雷走后，扎莫林迅速行动。他率领一支大军开往科钦，发了一封语气专横的信给科钦国王，指出“接纳严重伤害我们的基督徒”的恶果，要求他交出城内的基督徒。如若不从，扎莫林“决心进入你的国度，将其摧毁，抓住基督徒，俘获他们的所有财物”。^[4]

这电闪雷鸣般的严厉通牒遭到了拒绝。科钦国王已经决定与基督徒并肩作战，无论生死，都要坚守自己的决定。葡萄牙人将这种坚定理解为高尚的骑士风度。然而从长远来看，科钦国王得到的回报少得可怜。扎莫林可能更为切实地描述了与外来者同流合污的后果，但科钦国王不改初心。他派遣自己的侄子和继承人纳拉扬率领军队去抵抗扎莫林，不惜战死沙场。纳拉扬起初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扎莫林贿赂他的部下，使那些人对纳拉扬不满，最终将其刺杀。科钦国土被扎莫林占领。根据印度教军事种姓的律法，两百名科钦幸存者宣誓要遵照仪式的要求慷慨赴死。他们剃掉了全部毛发，冲向卡利卡特，见人就杀，直到全部阵亡。

但纳拉扬为国王和葡萄牙人争取到了时间。他们撤离科钦，逃到外海岛屿威平。扎莫林将科钦城付之一炬，但无法接近威平岛，因为雨季快到了。倾盆大雨和惊涛骇浪开始拍击马拉巴尔海岸，扎莫林率军撤回了卡利卡特，在科钦只留下少量驻军。他发誓要在8月回来，消灭所有敢于抵抗的人。葡萄牙人在印度的立足点命悬一线，但科钦国王相信葡萄牙船只只会按照航海季节的规律回来。与此同时，索德雷兄弟一心掳掠从红海来的穆斯林船只，却遭遇海难，被困在一个小岛上。维森特不幸溺死，他那不得人心的兄弟布朗斯幸存下来，但随后可能被自己的部下杀死了。在虔诚的编年史家看来，这纯属罪有应得：“这两兄弟犯下了弥天大罪，之所以丧命，是因为他们没有援助科钦国王，并且抛下自己的葡萄牙同胞，让他们单独面对极大的危险。”^[5]

索德雷兄弟现在帮不上忙，一小群葡萄牙人和科钦国王及其亲信就被困在威平岛，等待救援。1503年9月初，他们的信念得到了回报，两

艘船从里斯本赶来，这是本年度香料航运的第一批船只，指挥官是弗朗西斯科·德·阿尔布开克。两周之后，又有四艘船紧跟着抵达威平岛。这第二批船带来了葡萄牙历史上最才华横溢的指挥官中的两位。

第二批船的指挥官是弗朗西斯科的堂兄弟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他注定要不可逆转地改变印度洋的历史轨迹，塑造和震撼世界。1503年时，他可能已经四十多岁了，长期为王室效力，拥有极其丰富的军事经验。他的相貌颇为引人注目，清瘦，鹰钩鼻，眼睛显得非常精明，蓄着垂到腰间的已经有些斑白的胡子。他曾在意大利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交战，在北非对抗阿拉伯人，在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人厮杀。在摩洛哥，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兄弟在身旁战死；他曾与还是年轻王子的若昂二世并肩作战。和达伽马一样，他吸纳了葡萄牙贵族的荣誉法则，包括对伊斯兰教的根深蒂固的仇恨与不可撼动的对复仇和惩罚敌人的信念。他没有结过婚，但有一个私生子。他对王室忠心耿耿，清廉诚实，不可腐蚀，对自己的才干——无论是驾船航海、指挥陆海军、建造要塞还是治理帝国——自信满怀。“如果陛下把十几个王国托付于我，我也懂得如何以最高的谨慎、理智和知识来治理。”他曾这样告诉起初对他不是很信任的曼努埃尔一世，“这不是因为我拥有什么特殊的才华，而是因为我在这些工作上的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已经到了成熟的年纪，懂得是非曲直。”^[6]他总是行色匆匆，拥有魔鬼般充沛的精力，绝不容忍傻瓜。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阿方索，但他和曼努埃尔一世一样，拥有领袖魅力、使命感和建立世界帝国的雄心壮志。他显然相信，自己大展宏图的时机已经到了。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

与他同来的一位船长，是同样精明强干的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此人是航海家、领袖、战术天才、地理学家、实验科学家、博学之士和数学家。佩雷拉是奉命在1494年敲定《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的学者之一。巴西被正式发现之前，他可能已经秘密去过那里。他写下了第一部描述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能力的论著；他把经度计算到非常精确的程度，在当时无人可比；他记载了印度洋的海潮规律，并善加利用这门知识。史诗作者卡蒙伊斯后来歌颂他为葡萄牙的阿喀琉斯，“一手拿笔，一手持剑”。[\[7\]](#)

曼努埃尔一世没有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两个阿尔布开克中的任何一人，他俩的关系迅速恶化。竞争意识非常强的阿方索抢先从里斯本出发，但他的船队遭遇风暴，损失了一艘商船。他原本就心情恶劣，抵达印度时更是发现弗朗西斯科先到一步，并且还因已经打退扎莫林在科钦的驻军以及把科钦国王扶回王位而春风得意；此外，后者也把城内现有的胡椒都装载到了自己船上。

出人意料的局势让堂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糟糕。曼努埃尔一世

给他们的命令仅仅是购买香料并返回。然而，他们发现贸易站受到威胁，负责保护贸易站的索德雷兄弟已经死亡，并且扎莫林一定会率军返回，彻底消灭贸易站。常驻科钦的葡萄牙代理商及其伙伴表示，如果没有巩固的要塞和驻军保护他们，他们是不会留下的。因此，阿尔布开克堂兄弟必须偏离曼努埃尔一世的书面指示。弗朗西斯科已经说服满心不情愿的科钦国王，给葡萄牙人一块地，并提供木料与人力，以建造要塞。这座要塞的选址是科钦所在的长条形半岛的尖端，守卫着一个大型内层潟湖的出海口和腹地的河流网路与城镇。

建造一座木制要塞的工程匆匆进行。“每艘船都为其装备贡献自己的力量。”乔万尼·达·恩波利如此写道。他是一个年轻的托斯卡纳人，以商业代理的身份参与了此次远航。不到一个月时间，要塞就竣工了。它很原始，布局为方形，外层是土木筑成的壁垒，中间有一座粗糙的石质主楼。用恩波利的话说，这座要塞“固若金汤……周围有很深的壕沟与护城河，有强大的驻军，工事完备”。^[8]它标志着葡萄牙人帝国主义冒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是他们在印度土地上的第一个稳固的立足点。1503年11月1日，万圣节，为了庆祝要塞在这个吉利的日子竣工，葡萄牙人尽其所能地举行了庆典。他们穿上自己最光鲜的衣服，壁垒上旗帜招展，举行了肃穆的弥撒。科钦国王身穿华服，乘坐大象，在武士簇拥下赶来庆贺，并参观这座完工的建筑。

阿尔布开克堂兄弟小心地在印度盟友面前掩饰自己的内部分歧，但他俩之间的气氛仍然是非常恶毒的。为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吵起来——香料分配的比例，建筑工程的进展速度，甚至要塞的名字。一名修士对他们的纷争感到不安，被传来仲裁。弗朗西斯科希望给要塞取名为阿尔布开克要塞。阿方索热衷于曼努埃尔一世的弥赛亚风格的王权思想，希望用国王的名字给要塞命名。最终阿方索胜利了，但他的狂妄放纵、咄咄逼人的竞争意识和焦躁的情绪有时会影响他的判断，并且这已经成为他的领导风格的标志。

葡萄牙人与扎莫林的武装冲突时断时续。双方同意了一项玩世不恭的停战协定。葡萄牙人在马拉巴尔海岸搜罗胡椒，准备返回里斯本，而扎莫林则在筹划一次新的攻势。葡萄牙人很快撕毁了停战协定，无缘无故地攻击了一支运送香料的船队，于是战争再度爆发。然而，扎莫林在等待时机。他知道，由于季风的铁律，1504年年初，葡萄牙大部分船只必然会载着香料回国。葡萄牙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在卡利卡特，扎莫林开始集结一支新的军队，准备一劳永逸地将葡萄牙人逐出。

1504年1月，阿尔布开克堂兄弟出发的日子迫在眉睫。东风很快就会停息。曼努埃尔一世曾命令整个船队必须一同航行，但后来船队没有这样出发。在坎纳诺尔，弗朗西斯科还在慢悠悠地装载香料，阿方索却不肯再等了。1月27日，他扬帆起航，留下自己的堂兄弟吊儿郎当。弗朗西斯科最终于2月5日起航。他们只留下微弱兵力守卫曼努埃尔要塞和科钦王国：九十人和三艘小船，由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指挥。这九十人都是自愿留下的。在乘船返航的人看来，留下的人必死无疑。踏上归途的人们目睹马拉巴尔海岸消失的时候，一边画十字，一边喃喃地说：“上帝保佑杜阿尔特·帕谢科及其部下的灵魂。”^[9]科钦国王看到自己的盟友承诺的留守兵力如此脆弱，目瞪口呆。还要再过八个月，才会有援兵从地球的另一端赶来。

阿方索船队的归途很典型，经历了印度冒险的所有持久不变的艰难险阻：风暴、逆风、补给匮乏、惊人的命运逆转。托斯卡纳人乔万尼·达·恩波利留下了一份生动的记载，描写了这次噩梦般的旅程，船队在几内亚外海因为无风而被困五十四天之久：

淡水几乎耗尽……没有葡萄酒，船上也没有其他给养；船帆和其他东西都磨损了，人们开始接二连三地病倒。五天后，我们从船舷抛下了七十六具尸体。我们船上只剩下九人……我们彻底绝望了。由于虫蛀，船体损坏，船在渐渐下沉；除了上帝的援助，我们没有得救的希望……非常糟糕，我找不到言辞来描述。^[10]

他们最终返回里斯本的时候，已然命悬一线。

风向不利于我们。我们带来的黑人刚刚感受到冷风，就开始纷纷死亡。就在即将进港的时候，我们又遇到逆风，几乎沉船。我们的状态极度糟糕，如果在海上再多待半天，一定会在河口沉没。^[11]

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弗朗西斯科的船队于2月5日从坎纳诺尔出发，后来就杳无音讯了，他的船队可能在南方大洋的某处消失在波涛之中。国王最终听到的，是阿方索对自己成绩的报告。

在印度，扎莫林于1504年3月开始进军科钦。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约有五万人，兵员来自他自己的领地和臣服于他的附庸城市，包括一大群奈尔（马拉巴尔海岸的军事种姓）武士，得到卡利卡特的穆斯林群体支持，还携带了所需的辎重与器具：三百头战象、火炮和约二百艘用来包围科钦港的战船。科钦国王判断自己身陷绝境。他恳求葡萄牙人借助有利风向，到阿拉伯半岛海岸过冬，而不是毫无意义地白白丢掉性命；他自己将谦卑地向卡利卡特的主人投降。

然而，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是来打仗的。他完全明白此时关系重大，形势危急：如果他丧失了科钦，那么其他对葡萄牙友好的港口也将屈服于卡利卡特。葡萄牙在印度的整个事业就彻底完蛋了。当两个阿尔布开克还在印度的时候，佩雷拉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与扎莫林军队作战，他曾研究科钦的地形地貌。科钦位于海边一个长条形半岛之上，背后有一个潟湖。该地区遍布滩涂、岛屿和受潮汐影响的周围长满棕榈树的浅滩，因此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也正是伏击战的理想战场。佩雷拉不肯后退。

他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应。他告诉科钦国王，他会打败扎莫林，“如果情势需要，我们会为您效力至死”。^[12]科钦将是最后决战的战场，是葡萄牙的温泉关。佩雷拉至多只有一百五十人和五艘船（一艘克

拉克帆船、两艘卡拉维尔帆船和两艘比较大的长艇）。科钦人名义上可以集结八千人，但究竟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项不得民心的事业而战，是存疑的。国王觉得佩雷拉发疯了。但1504年秋季一支葡萄牙救援船队抵达科钦的时候，发现佩雷拉及其大部分部下都还活着，而扎莫林丢人现眼地撤退了。

佩雷拉赢得了一场精彩的战略胜利。他认识到，科钦坐落在一座半岛之上，周围遍布咸水溪流和水道，因此要从陆地一侧接近科钦，就必须通过少数几个浅滩，而这几个浅滩受潮汐影响，有时会被海水淹没。佩雷拉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方法研究潮汐与月相关系的人。通过细致观察，他得以预测到每个浅滩在何时可以通行，于是可以调动他的寥寥几艘船和士兵，去迎战敌人。他命人在各浅滩安插了削尖的木桩，将木桩用铁链锁起来，构成一道栅栏，露出水面。他的船只则铺设了厚厚的木板，作为木制装甲。扎莫林的军事行动在战术上非常死板，漏洞极多。每一次当他通过狭窄的浅滩发动进攻时，葡萄牙人的强大火力都会把涉水前进、企图在木栅栏上砍出缺口的奈尔士兵打成碎片。佩雷拉成功地鼓舞了科钦人的士气。奈尔士兵遇到一群在水稻田里劳作的低种姓农民，农民们挥舞着锄头和铁锹攻击他们。奈尔士兵害怕被低种姓的人污染，抱头鼠窜。在四个月里，扎莫林发动了七次大攻势，全都失败了。作战和霍乱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他丧失了斗志。1504年7月，他终于撤退。由于严重丧失威望，他不得不退位，隐遁到宗教生活中，由他的侄子继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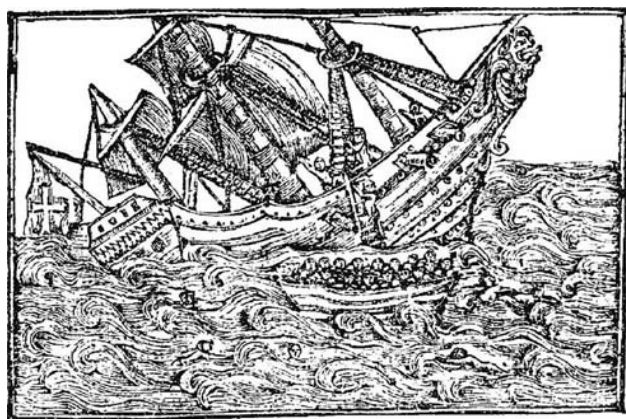
1504年秋季援救科钦的葡萄牙船队规模很大：十四艘克拉克帆船，包括五艘新建的大船。它们带来了大量士兵、水手和强大的火力。扎莫林惨败的消息传遍了马拉巴尔海岸，葡萄牙新船队的抵达对各贸易城市及其统治者施加了很大影响。葡萄牙人显然是不可战胜的；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他们；葡萄牙船队抵达科钦时，扎莫林的另一个臣属——塔努尔国王向葡萄牙宣誓效忠。麦加穆斯林的情绪越来越阴暗。印度海岸的贸

易港口一个接一个地对他们关闭了大门。

葡萄牙人坚定顽强的对抗、他们军事行动的凶悍猛烈、船队的灵活机动、火力的优势和他们对战斗的酷爱，似乎构成了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不仅在马拉巴尔海岸，在东非棕榈树环绕的沙滩，开罗和吉达的旅行商人都大感沮丧。到1504年年末时，一大群穆斯林商人对时事悲观失望，决定拖家带口，带着商品货物返回埃及。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洛佩斯船队追上了这群穆斯林船只，可能杀死了两千名穆斯林。这是对扎莫林及其阿拉伯盟友的最后打击。“此次失败之后，国王感到自己被毁掉了；从此以后，美好往昔不再来，因为他已经损失惨重，而摩尔人都离开了卡利卡特；因为那里暴发了饥谨，人口逐渐流失。”^[13]卡利卡特的辉煌时代快要落幕了。进入1505年之际，葡萄牙人自信满怀，将要永久占领马拉巴尔海岸。曼努埃尔一世筹划下一次远航时已经在考虑这一点了。

印度洋传统贸易体系遭受的破坏产生了深远影响，让越来越广泛的圈子都能感同身受。威尼斯人原指望漫长的距离、疾病和海难能够消灭葡萄牙的香料贸易路线。每年3月，葡萄牙船队从塔霍河口出发，前往印度，来回2.4万英里。这是非同小可的航海壮举。但它造成的消耗损失也极大。远航船只从赖斯特罗海滩起航，岸上的人们目送它们离去时以泪洗面，不是没有道理的。从1497年达伽马首航到1504年，共有5500人去往印度，其中1800人，也就是35%^[14]，没能回来。损失的人员大多死于海难。不过，远航的回报极其丰厚。瓦斯科·达伽马首航的收益就相当于投资的60倍。据计算，扣除成本，王室每年从香料贸易中获得100万克鲁扎多的利润，这是天文数字的巨款。里斯本码头上香料的气味吸引了大量满心渴望的新人投入冒险。很多人一穷二白，不怕任何风险。葡萄牙匮乏自然资源，处于欧洲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外围。所以，东方的诱惑是葡萄牙人无法抵御的。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称曼努埃尔一世为“杂货商国王”，以此嘲讽一个以贸易为生的小国君主的庸俗自

负，但其中也有羡慕的意味。在中世纪欧洲，葡萄牙王室的经商行为就像航海本身一样，是一大创新。葡萄牙国王是王室商人资本家，通过垄断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



葡萄牙人对海难有许多想象

有了这个金钱的源泉，曼努埃尔一世得以重塑里斯本的形象。1500年，他命人在塔霍河两岸开辟空间，准备营造一座巨大的新王宫，要俯瞰塔霍河，让国王能观看东印度的财富滚滚而来。河畔宫殿既是帝国辉煌的表达，也是商业活动的中心，这两方面由王室的身份联系起来。王宫旁设有作为基础设施的行政管理部门：印度事务院，海关大楼，管理木料和奴隶进口及与佛兰德贸易的官衙，王家铸币厂以及兵工厂。在新世纪之初，里斯本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不断运动的世界，欧洲最富活力的中心之一，充盈着金钱与能量，并由王室将里斯本经营成一门价格垄断的生意。商业与技术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葡萄牙人的航海技能无与伦比，但该国缺少富有商业精神的中产阶级。除了铸炮工匠和炮手之外，葡萄牙还需要拥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经纪人在东印度买卖货物。在里斯本和全欧洲，葡萄牙需要经销商、零售商、银行家和拥有精明商业头脑的投资者。它从佛罗伦萨、热那亚、博洛尼亚、安特卫普、纽伦堡和布鲁日吸引了一大批人才。

1503~1504年，富可敌国的富格尔家族^[15]在里斯本开设银行，人

们认为这标志着威尼斯在欧洲享有的香料贸易中心的声誉遭受到了严重威胁。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威尼斯的竞争对手们幸灾乐祸，喜不自禁。普留利希望葡萄牙贸易会在好望角的礁石上撞个粉碎，但这希望过于乐观了。1504年2月，威尼斯元老院忧伤肃穆地听取了关于达伽马第二次远航往欧洲带回大量香料的报告。与此形成对照，在亚历山大港的威尼斯商人极难获得香料。威尼斯人不知道的是，个中原因与葡萄牙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是由于马穆鲁克王朝的内乱。



16世纪的里斯本和塔霍河

1504年春，威尼斯的卡利卡特委员会决定再次开展秘密行动，暗中打击葡萄牙的地位。威尼斯人派遣了两名使者。莱奥纳尔多·达·卡马瑟奉命前往葡萄牙，继续调查该国香料贸易的情况。他将假扮为商人，用密码发回报告，尽可能搜集关于葡萄牙整个香料贸易活动的信息。同时，弗朗切斯科·泰尔迪假扮成首饰商人，前往开罗，再次敦促苏丹，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破坏葡萄牙在东印度的行动。卡利卡特委员会在执政官宫殿内会商，设想了一些更疯狂的计划。能不能说服苏丹，在苏伊士开掘一条运河？这样就可以降低前往欧洲的运输成本。没有证据表明，威尼斯人曾将运河的设想呈送给加乌里，但泰尔迪奉命向他指出，很多威尼斯商人急于到里斯本购买香料，曼努埃尔一世还厚颜无耻地邀请他们去里斯本；威尼斯政府当然希望固守老的贸易盟约，但如果.....泰尔迪要给出许多言犹未尽的暗示，让加乌里明白，威尼斯有可能寻求

其他路径。事实上，双方有着共同利益，却只能越过互相猜疑的鸿沟，摸索着相互交流。

在卡马瑟与泰尔迪从威尼斯动身之前，印度洋传来的义愤填膺的怒吼已经迫使开罗的苏丹采取行动。他决定以更强硬的手段试探威尼斯的支持和基督徒的决心。1504年3月，他让方济各会修士毛罗送回赤裸裸的威胁：让葡萄牙人撤离印度洋，否则他就摧毁耶路撒冷的圣地。威尼斯人在4月接待毛罗的时候，对此的态度模棱两可。他们不敢支持苏丹的立场；他们假模假式地请求苏丹不要这样做，但通过暗示和迂回的措辞表达了同情。泰尔迪奉命通知苏丹，威尼斯没有办法公开支持他，而且基督教各国应当不大可能有办法保卫耶路撒冷。威尼斯人迅速将这受欢迎的使者送到教皇那里，就像传递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也匆匆将这吓人的威胁传递给曼努埃尔一世，先是通过书信，然后把使者毛罗修士送到了葡萄牙朝廷。修士直到第二年夏季，即1505年6月才抵达里斯本，曼努埃尔一世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回应。消息送抵之后，它对葡萄牙造成了决定性影响，不过不是苏丹想要的那种。

卡马瑟在葡萄牙的间谍活动出师不利。他还没抵达里斯本，就被揭露了身份。出卖他的是威尼斯人的竞争对手——佛罗伦萨人。据他后来的说法，他被投入一座“恐怖的监狱”。^[16]他被带到国王面前，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竟然逃脱，花了两年时间为威尼斯政府搜集珍贵的情报。但是，曼努埃尔一世对外国人的刺探越来越警惕。卡马瑟抵达里斯本一个月之后，曼努埃尔一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禁止制作地球仪或复制地图。他这是为了保住葡萄牙辛辛苦苦得来的优势，防止外人刺探。

在越来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葡萄牙人肯定对威尼斯人的评价越来越差。葡萄牙人相信，1504年帮助扎莫林的两名铸炮工匠是威尼斯派去的。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航海共和国似乎没有在国家层面上为开罗提供

技术援助，但肯定有一些威尼斯商人愿意给亚历山大港送去铜条（用来铸造大炮等），并且鼓舞阿拉伯人的决心。地中海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水手、工匠、炮手、技术专家、弃儿和犯人，其中有些可能来自靠近非洲海岸的威尼斯殖民地，如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他们愿意向任何能出钱的人兜售自己的技能。到1505年时，其中一些人来到了开罗。阿拉伯世界内部缓缓聚集的压力很快就需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1] Weinstein, Donald. *Ambassador from Venice: Pietro Pasqualigo in Lisbon, 1501*. Minneapolis, 1960, p.77.

[2]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106.

[3]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308.

[4] Subrahmanyam, 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1997, p.349.

[5]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116.

[6]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4.

[7] Camões, Luís Vaz de. *The Lusíads*. Translated by Landeg White. Oxford, 1997, p.154.

[8]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142.

[9]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15.

[10]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p.144-145.

[11]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p.144-145.

[12]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138.

[13]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203.

[14] 原文如此，应为约33%。

[15] 富格尔家族是德意志商业和银行业大亨，曾统治15～16世纪的欧洲工商业。家族的创立者汉斯·富格尔（1348～1409年）是奥格斯堡的织工。在他的孙子乌尔里希（1441～1510年）、格奥尔格（1453～1506年），特别是雅各布（1459～1525年）的经营下，公司开展国际贸易，包括香料和奴隶贸易，并通过开采铜矿和银矿获得大量财富。富格尔家族给予各国国王和皇帝贷款，并参与教皇免罪符的贩售，使家族在欧洲政治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而招致马丁·路德的批评。查理五世因得到富格尔家族的财力支持，得以当选神圣罗马皇帝。16世纪后，富格尔家族逐渐衰落，但三个有爵位的支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

[16] Weinstein, Donald. *Ambassador from Venice: Pietro Pasqualigo in Lisbon, 1501*. Minneapolis, 1960, p.81.

10 印度王国

1505年2~8月

1505年2月27日，里斯本出现了一道言辞浮夸的帝国敕令。一次向所有参与印度事业的人士的讲话说道：

堂曼努埃尔，蒙上帝洪恩，大海此岸的葡萄牙与阿尔加维国王，大海彼岸的非洲之王，几内亚领主，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与贸易之王，我命令在印度建造的各要塞的指挥官、法官、代理商……我派遣加入此船队的船长、贵族、骑士、士绅、大副、领航员、行政长官、水手、炮手、武士、各级军官与一概人等，郑重宣布……

随后的清单里列举了从高到低各个级别的人员。然后是实质性的话：“以此授权书为证，我无比信任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任命他为上述整个船队与上述印度的总司令，任期三年。”^[1]

关于在印度的冒险是否明智，朝廷已有过多次辩论，有人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意见。大量的生命损失，扎莫林的负隅顽抗，卡利卡特的屠杀，在更靠近本土的摩洛哥开展圣战的更高贵的选择，对其他君主的嫉妒的担忧——这一切都导致曼努埃尔一世的计划遭到了强烈抵制。但到1505年时，国王在一群理论家与谋臣的支持下，确信自己的命运就是继续执行印度计划。2月27日宣言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战略，一种大胆的长期计划，它的基础是激动人心的雄心壮志：通过武力，在印度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帝国，并控制整个印度洋的贸易。他选择这个时机发布宣言，不是偶然的。曼努埃尔一世知道毛罗修士正从教廷赶来，想要表达对耶路撒冷的担忧。所以，他可能想抢在这个不受欢迎的信使抵达之前采取行动。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国际形势对葡萄牙非常有利：意大利深陷于战火；威尼斯人在与奥斯曼帝国交战，无暇他顾；马穆鲁克政权似乎在持续衰落；西班牙卷入欧洲事务。一个重大机遇出现了，一个命运

攸关的时刻降临了。曼努埃尔一世也认识到，通讯联络上的延迟意味着想从里斯本遥控印度事务，是不切实际的。尽管他天生缺乏安全感且疑心很重，但还是必须下放权力，选拔一名代表，将指挥权交给他掌管足够长的时间，以便有效地落实计划。



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

他选择的那个肩负重任的人，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仅仅是国王的第二人选。他起初提名的是特里斯唐·达·库尼亚，但这位经验丰富的航海家突然瞎了，其可能是由于缺乏某种维生素。尽管他后来恢复了视力，但他的失明被认为是上帝给出的征兆。阿尔梅达将是第一位领导印度远征的高级贵族。他大约五十五岁，在军事、外交和航海方面都有丰富经验，但他还拥有一种品质，正是曼努埃尔一世在选拔人才以托付国家大事时乐于看到的。阿尔梅达清正廉洁，不可腐蚀，对财富的诱惑无动于衷，秉性温良，是个没有家庭羁绊的鳏夫，虔诚，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多年来，印度的诱惑就是能让人发大财，而阿尔梅达没有索德雷那样的贪婪胃口。他更珍视头衔而不是大包的香料，并且他还懂得如何作战。

阿尔梅达将不仅仅是船队的总司令。他还获得了副王的崇高头衔，名义上拥有代理国王的行政权。一周后，国王在颁布给他的指示里具体规定了他的权责范围。指示长达101页，文字密密麻麻，包括143条，分成许多章节，既体现了国王指示的极其详尽，也让人感受到国王宏大的野心。

阿尔梅达的任务是，绕过好望角之后，控制斯瓦希里海岸。他的目标是索法拉港（黄金贸易的关键）和基尔瓦港。国王推荐的策略是打着友善的旗号前去，然后向城镇发动突然袭击，囚禁所有穆斯林商人，俘获其财产。随后在斯瓦希里海岸建造要塞，控制黄金来源，因为在马拉巴尔海岸购买香料需要黄金。这将是一场打着和平旗号的战争。然后，他必须径直穿越印度洋，再建造四座要塞，分别位于作为中转站的安贾迪普岛，使其成为支援基地和补给中心，以及坎纳诺尔、奎隆和科钦。

接着他需要北上，在红海出入口或其附近、接近祭司王约翰王国的地方建造另一座要塞，以扼杀苏丹的香料贸易，确保“整个印度断绝与除了我们之外任何人做生意的念想”。^[2]两艘战船将长期在远至非洲之角的非洲海岸巡逻。

指示随后谈及棘手的卡利卡特问题。新的扎莫林和前任一样敌视葡萄牙，必须想办法对付他。如果扎莫林同意驱逐所有穆斯林，阿尔梅达应与他议和；如果他不同意，“就向他开战，用一切手段，尽你最大力量，从海陆两路攻击，彻底消灭他”。^[3]

不能忽视任何战略要点。封锁红海之后，他将要派遣一支船队去往其他的伊斯兰城邦与王国：朱尔、坎贝、波斯湾出入口的霍尔木兹。阿尔梅达应当要求这些国家向葡萄牙国王年年纳贡；命令它们切断与开罗和红海的穆斯林商人的一切商贸联系；途中要俘获所有穆斯林船只。为了给上述行动提供资金，他必须确保每年的香料商船能迅速装满货物，并快速返航。

了远航。研究和记载纬度信息成为国家大业。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这样的人用观察得来的第一手知识取代古人的智慧，秉承了文艺复兴的探索精神。关于新世界的信息被送回一个中心，即里斯本的印度事务院。在那里，所有信息都在王室的直接管理下被记录在案，以便帮助下一轮航行。这种反馈与适应的体制迅捷而高效。

曼努埃尔一世依赖一小群谋臣来给阿尔梅达编纂指示。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位是加斯帕尔，即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远航时绑架的那个冒充威尼斯人的波兰犹太人。他深入地参与了葡萄牙最初十年的探索，作为专家和译员具有极大价值。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经常根据时机与环境的需求改换身份和名字，以适应自己的主公。他起初的名字是加斯帕尔·达伽马，后来在曼努埃尔一世面前可能自称加斯帕尔·达·印度。在即将开始的远航中，他自称加斯帕尔·德·阿尔梅达，“以表达对副王的敬爱”。^[5]他总是投其所好，说自己的新雇主想听的话，但他的确见多识广，似乎对印度洋非常熟悉，足迹遍天下。正是他最早向科钦发出和平建议，他可能还去过锡兰、马六甲和苏门答腊岛。他也理解红海的重大战略意义。就是这方面的信息，渗入了曼努埃尔一世1505年宏伟计划的方方面面。

加斯帕尔曾主张葡萄牙人应直接掐住穆斯林的咽喉，先攻打亚丁，封锁红海，扼杀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然后迫使扎莫林成为葡萄牙的附庸，而不是在马拉巴尔海岸辛辛苦苦地建造许多要塞，因为后一种策略必然要消耗大量金钱与生命。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修建要塞的战略是否正确，一直是激烈争论的主题。曼努埃尔一世吸纳了加斯帕尔的计划，但不是按照他建议的顺序来操作。他更愿意先在印度土地上建造一些巩固的基地，作为扼杀穆斯林贸易的平台。

国王身边的其他人鼓励他以越来越宏大的方式解读印度洋发生的惊人事件。其中有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拉贡的玛丽亚，她坚信曼努埃尔一世

的命运是天命所系。他的重要谋臣杜阿尔特·加尔旺以及后来成为曼努埃尔一世梦想的主要执行者与建筑师的那个人——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也是这么想的。

在这个小圈子的建议下，国王确定了给阿尔梅达的指示，为远征做好了准备。这支船队非常庞大，共有二十一艘船，是仅仅八年前达伽马所率领的船只数量的七倍。一代出类拔萃、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担任船长，其中有若昂·达·诺瓦和费尔南·德·麦哲伦（就是在接下来的那个十年内首度进行环球航行的那个麦哲伦）。阿尔梅达的儿子，英俊潇洒的洛伦索也参加了，他是“一位高贵的绅士……比任何人都更强健，兵器样样精通”。^[6]

共有一千五百人参加此次远航，这些人等级和背景五花八门，仿佛葡萄牙社会的一个缩影被派到海外建设一个新的葡萄牙国家。他们当中有贵族绅士，也有弃儿和社会最底层成员——改宗犹太人、黑人、奴隶、罪犯，以及一些外国冒险家和商人。所有人都是志愿者。他们被选中，不仅是要去驾船航行和战斗，还要用自己的技能建立一个新国家。他们当中有鞋匠、木匠、神父、行政长官、法官和医生，还有不少德意志和佛兰芒炮手。有三艘由私人出资的船，德意志和佛罗伦萨银行家与商业资本家注入了巨资。加斯帕尔和另一名威尼斯译员一同出发。甚至有一些女人扮成男人，偷偷上了船。她们的名字很快出现在花名册上：伊莎贝拉·佩雷拉、利亚诺尔、布兰达和伊内斯·罗德里格斯。

这可以说是葡萄牙的“五月花”号，目标是到一个新世界定居。船队载着为要塞和船只准备的火炮，用来交易的商品——铅、铜、银、蜡、珊瑚，用于建造要塞的预制件，如窗框、加工过的石料，用于建造小船的木材，以及一大批其他建材与工具。他们是来永久定居的。

1505年3月23日，在里斯本大教堂举行的弥撒仪式反映了此次特殊远航的重大意义。编年史家加斯帕尔·科雷亚留下了对此次戏剧性事件

的精彩记述。仪式结束后，国王向总司令授旗，旗帜是“白色锦缎，饰有红色丝绸织的基督十字，旗帜边缘是金色的，缀有金色流苏和一枚金星”。国王通过一扇帘子走出来，授予这面旗帜，它“带有真十字架的标志”，将其交给他的副王，并做了长长的祝福演说，还告诫副王要成就伟大事业，“让许多异教徒与民族皈依”。阿尔梅达和所有贵族与船长跪下亲吻国王的手。然后是通往水边的盛大游行，“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印度总督与副王”和他的船长们骑行，其他人徒步。阿尔梅达非常伟岸英武，身穿精美外衣，头戴黑色缎帽，骑着一匹装饰华美的骡子，“身材中等，仪态威严，略微秃顶，但气度非凡，前后各有八十名武士扛着镀金的戟”，^[7]这些武士穿着灰色鞋子、黑天鹅绒上衣，配有镀金宝剑，穿着白色紧身裤，手捧红色缎帽，卫队长骑着马，手执象征权威的节杖。曼努埃尔一世就是这样夸耀自己的使命与命运的。

队伍肃穆地在蜿蜒曲折的街道前进，走向水边。科雷亚应当没有亲眼看见这盛景，但他无疑添油加醋，把它描绘得非常生动鲜活：阿尔梅达的儿子洛伦索也身穿锦衣华服，举着旗帜；船长和贵族们个个衣着光鲜；国王、王后和宫廷的其他贵妇从窗口观看游行队伍。副王第一个登船，船上旌旗招展。雷鸣般的礼炮之后，水手们起锚，船只驶向赖斯特罗，在那里的贝伦圣母圣龕要接受又一次祝福。他们最终于3月25日出发，这一天非常吉利，是圣母领报日^[8]。

这支远征船队照例要经受一些损失和磨难。一艘克拉克帆船“贝拉”号漏水沉没了，但沉得很慢，船员得以逃生，并将贵重物品转移。经过巴西的时候，在大约南纬40度的海面上，船队遭遇暴风和大雪。阿尔梅达的旗舰损失了两人；船队被吹散。6月底，在绕过好望角的时候，阿尔梅达根据国王的指示，凶猛而狡猾地袭击了斯瓦希里海岸。6月22日，他们抵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基尔瓦岛。航海三个月后，这座岛屿是一处令他们欣喜的景致——青翠欲滴的棕榈树丛间，可以看得见刷白石灰、屋顶覆盖茅草的房舍。在“圣拉斐尔”号的德意志文书汉斯·迈

尔看来，这是一处郁郁葱葱、闲适丰饶之地。此地的红土“非常肥沃，和几内亚一样，种了许多玉米”。围着整齐篱笆的菜园里的青草长到人那么高，这里也出产大量食物：“黄油、蜂蜜和蜂蜡……树上有蜂巢……甜橙、酸橙、萝卜、小洋葱。”橘类水果特别受到患有坏血病的水手的欢迎。这地方并非热得无法忍受；丰富的草料把牲畜养得肥肥的；鱼很多，抵达的船只周围有鲸鱼在嬉戏。基尔瓦是一座繁荣的小城，有约四千居民，建有多座带穹顶的清真寺，“其中一座很像科尔多瓦的清真寺”。据迈尔说，此地的穆斯林商人“吃得很好，蓄着大胡子，看上去很吓人”。^[9]港口海滩上停放着足有50吨重（相当于一艘卡拉维尔帆船的重量）的阿拉伯三角帆船，它们是用椰子纤维绳索固定起来的。农田由黑奴耕种。基尔瓦与斯瓦希里海岸各地、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古吉拉特各邦都有贸易往来，经营索法拉黄金、棉布、昂贵香水、熏香、白银和宝石。这里是印度洋自给自足的贸易网络的关键一环，足有几百年历史。它即将感受到一个来自陌生世界的闯入者的全副力量。

其实，目前在任的基尔瓦苏丹是一个不得民心的篡位者，他对葡萄牙人粗暴的外交手段已经有所领略。1502年，瓦斯科·达伽马就曾威胁把他拖到印度各地展出，就像用链子牵着一只狗一样。他不得不屈服于葡萄牙王室，升起葡萄牙旗帜，并年年纳贡。阿尔梅达抵达的时候，他已经有两年没有纳贡了，葡萄牙旗帜也不见了踪影。达伽马到访的时候，他曾称病拒不去面见这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这一次，他宣称有客人要接待，不方便去见阿尔梅达。他给阿尔梅达送去食物，企图以此安抚他。

副王并不满意，于次日将船只摆好阵势，射石炮随时待命。然后他以全副排场登陆，要求觐见苏丹。这一次苏丹派来五名大臣，并承诺要缴纳贡金。阿尔梅达的耐心耗尽了。他扣押了使者，准备攻打城镇。24日黎明，他发动了进攻。副王本人第一个上岸，将葡萄牙旗帜插在海滩上。他身先士卒的本能也暗示了他的鲁莽个性。洗劫这座富裕城镇的渴

望让士兵们精神百倍。结果，胜利轻松得让大家吃惊。葡萄牙人刚刚展示武力，苏丹就带领许多居民逃之夭夭。葡萄牙人抵达王宫时，只看到一个人从一扇窗探出身子，挥舞葡萄牙旗帜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并喊道：“葡萄牙！葡萄牙！”^[10]士兵们用斧子砍倒宫门，但苏丹已经卷着他的金银财宝逃走了。方济各会修士在一栋显眼的建筑上竖立了十字架，开始吟唱《感恩赞》。

在其他地方，葡萄牙士兵将城镇洗劫一空。他们搜集了大量战利品，不过没有根据上级指示来分配。士兵们是来为自己捞油水的，不是为了国王发财。曼努埃尔一世后来表示对此役的收益不满意。次日，即7月25日，是圣雅各的瞻礼日，而圣雅各是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的主保圣人。他们开始建造葡萄牙在印度洋的第一座石质要塞，建材取自被拆毁的房屋。只花了十五天，要塞就竣工了。他们在要塞安顿了驻军，并举行隆重典礼，把苏丹的竞争对手，一名富商，扶植到王座上。一顶预定给科钦国王的金冠被暂时戴在他头上。他宣誓对葡萄牙永远忠诚，并且每年向葡萄牙国王纳贡，这两方面同样重要。然后，他穿上华丽的鲜红色金线长袍，骑着一匹“按照葡萄牙方式备鞍的马，在许多衣着华丽的穆斯林簇拥下，在全城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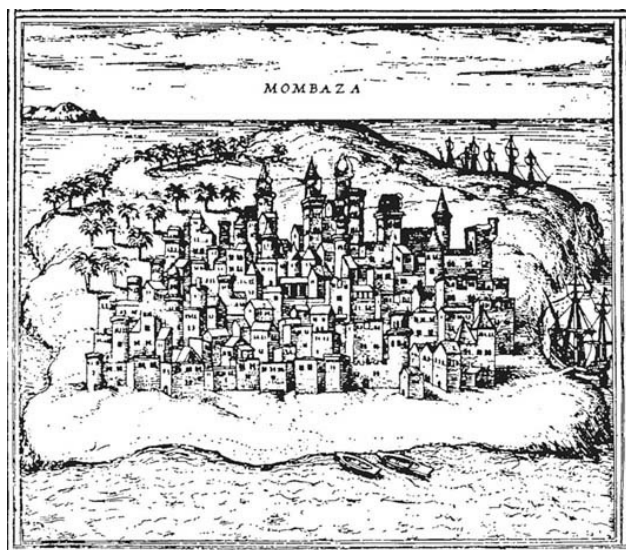
译员加斯帕尔作为传令官走在他前面，向可能不知就里的老百姓解释道：“这是你们的国王，你们要服从他，亲吻他的脚。他会永远忠于我们的主公，葡萄牙国王。”^[11]阿尔梅达欣喜地给葡萄牙国王写信称：“陛下，基尔瓦拥有据我所知世界上最好的港口和最美丽的土地……我们在这里修建一座要塞……它和法兰西国王能够期望的一样强大。”他还表示：“在我有生之年，陛下一定能够成为东方世界的皇帝，东方世界比西方伟大得多。”^[12]

扶植了傀儡之后，身为工作狂的副王需要匆匆赶往下一个目标，他的目标清单很长。他派了两艘船去巡逻非洲之角，并安排封锁索法拉，

同时等待里斯本派出新一批船只，去迫使索法拉投降，以在那里建造第二座要塞。

根据国王的指示，阿尔梅达此时应当直接横渡印度洋，但他已经表现出自作主张、自行决断的倾向。他打算攻击蒙巴萨群岛，让更多沿岸城镇臣服于葡萄牙。蒙巴萨的苏丹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抵抗葡萄牙人，而且蒙巴萨城是阿拉伯贸易的一个强大中心。蒙巴萨城的两座港口得到岛屿的掩护，条件比斯瓦希里海岸的其他港口都优越，是一个难对付的目标。苏丹知道讨厌的葡萄牙人会定期返回，所以已经加强了防御，建造了一座堡垒并部署了一些火炮。这些火炮是四年前达伽马船队损失的那艘船上的，被潜水员打捞了起来。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葡萄牙叛徒水手教会了蒙巴萨人如何操纵火炮。

当阿尔梅达船队逼近蒙巴萨岛时，这些大炮开始射击，命中了一艘葡萄牙船。但是，蒙巴萨人的成功转瞬即逝。葡萄牙人还击时，一发炮弹幸运地击中了堡垒的弹药库。穆斯林炮手仓皇逃离一片狼藉的炮兵阵地。阿尔梅达派人上岸，要求苏丹和平地臣服于葡萄牙国王，但得到的回复是一通葡萄牙语的滔滔不绝的咒骂，说他们是猪狗、吃猪肉的恶棍.....蒙巴萨可不是基尔瓦，不是坐以待毙的小鸡。那名叛徒说得起劲，列举了他们即将面对的可怕障碍：四千名战士，包括五百名赤胆忠心的黑人弓箭手，城内还有更多火炮，另有两千人正在赶来支援。苏丹准备为保卫蒙巴萨打一场全面战争，阿尔梅达则更加坚决要将它拿下。



蒙巴萨岛

蒙巴萨城和基尔瓦相似，但规模更大也更宏伟。人口稠密的市中心是典型的阿拉伯露天市场，包括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小巷、死胡同和通道。有雄伟的石屋，有些是三层楼，但其他很多房屋是芦苇顶的木屋。阿尔梅达觉得这是个机会。他决定火攻蒙巴萨城，然后将其洗劫一空。一支葡萄牙队伍上岸，向房屋投掷火药罐。大火迅速蔓延，没过多久，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就燃起熊熊大火。据编年史记载，

大火横扫全城，持续燃烧了整个下午和随后的整夜。这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仿佛全城都着火了。大火造成的破坏极其严重，木屋被夷为平地，石头和砖瓦建的房屋也着火坍塌。大量财富就随着这些房屋，毁灭在大火之中。[\[13\]](#)

次日黎明前，大火还没有熄灭，阿尔梅达的军队从四面同时发动了进攻。他们遇到了顽强抵抗，很快陷入激烈的巷战之中。这些小巷极窄，两个人无法并肩行走。当地居民不分男女，都从阳台和屋顶向他们投掷石块和砖瓦，射箭和投射标枪，势头很猛，“我们的人没有时间用火枪射击”。[\[14\]](#)葡萄牙人被迫躲在墙后，从一个掩蔽处跳到另一个。

阿尔梅达已经认出了王宫，他的部下一边战斗，一边逼近王宫，一

条街一条街地推进。斯瓦希里人在绝望的防御战中将狂野的大象驱赶到敌人当中，但这无济于事。攻击者接近王宫的时候，看到一大群衣着华丽的人匆匆逃走。那是苏丹及其亲信在逃跑。葡萄牙人冲进王宫，但发现里面空空荡荡。方济各会修士又一次竖立了十字架，并升起葡萄牙旗帜，同时呐喊：“葡萄牙！”

随后，抢劫开始了。一扇又一扇门被撞开，室内的物品和人都被掳到船上。蒙巴萨是斯瓦希里海岸的主要贸易中心，战利品相当丰厚，包括“大量十分精美的衣物，有丝绸和金线的，有地毯、鞍褥，尤其是一张无与伦比的精美地毯，后来它和许多其他贵重物品一起被送给了葡萄牙国王”。^[15]为了防止士兵将财物占为己有，阿尔梅达尽量循序渐进地抢劫，加强对士兵的管理。每位船长都被分配了一个专门供他抢劫的区域；所有战利品都被搬走并分类整理，根据御旨分配下去：发现战利品的人将获得其价值的二十分之一。但在实践中，要想约束大肆掳掠的士兵是很难的。广大士兵远涉重洋来到东印度，不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也不是出于对国王的忠诚，而主要是为了自己发财。后来，曼努埃尔一世得知，假如要惩罚在蒙巴萨私藏战利品的人，那么阿尔梅达的军队就要损失大部分兵力了。一方面是普通士兵与贵族的私欲，另一方面是副王执行御旨的职责。在葡萄牙殖民冒险的几百年间，这两方面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正直而廉洁的阿尔梅达看到士兵们明目张胆地违抗御旨，颇为愤怒，但他也没有办法阻止。

在距离城市有炮弹射程那么远的一片棕榈树林的掩护下，苏丹及其亲信观看着蒙巴萨遭到洗劫和焚烧。葡萄牙人精疲力竭，无法继续追击。和往常一样，双方的伤亡数字完全不成比例。街巷和房屋里躺着七百具穆斯林尸体。葡萄牙方面有五人死亡，不过伤员比较多。他们抓了两百名俘虏，“其中不少是肤色较白、容貌姣好的女人，还有很多十五岁及以下的女孩”。^[16]

次日，苏丹认识到抵抗毫无意义，急于避免基尔瓦统治者的命运，于是给阿尔梅达送去了一个极大的银碟，作为和平的示意，并献城投降。为了表达善意，阿尔梅达释放了很多俘虏，并承诺保护所有返回城市的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苏丹缴纳了高额贡金，以后要每年纳贡，并签订了一项和约，有效期为“只要日月尚存”。^[17]8月23日，阿尔梅达离开了斯瓦希里海岸，留下一片血迹。延续了许多世纪的贸易体制如今在炮轰之下，屈服于葡萄牙了。

受到极大伤害的苏丹给他的老对手——马林迪国王写了一封言辞悲戚的信：

真主保佑你，萨义德·阿里。我要告诉你，一位强大的领主经过了这里，四处纵火。他残酷地强行闯入我的城市，没有饶恕任何人的生命，不论男女老少……不仅人被杀死和焚烧，就连天上的鸟儿也坠落到地面。在这座城市里，死人的恶臭迎面而来，让我不敢进城。没有人能够描述或估算出他们所掳走的不计其数的财富。^[18]

^[1]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260.

^[2]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96.

^[3]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96.

^[4] Rodrigues, J.N., and T. Devezas. *1509. Famalicão*, 2008, p.212.

^[5] Rodrigues, J.N., and T. Devezas. *1509. Famalicão*, 2008, p.175.

^[6]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13.

^[7]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p.533-534.

[8] 圣母领报日是基督教纪念大天使加百列告诉圣母玛利亚她将生下上帝之子的节日。

[9] Albuquerque, Luís de, 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 eds. *Grandes Viagens Marítimas*. Lisbon, 1989, p.84.

[10] Albuquerque, Luís de, 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 eds. *Grandes Viagens Marítimas*. Lisbon, 1989, p.82.

[11]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215.

[12]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311.

[13]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221.

[14]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223.

[15] Hall, Richard. *Empires of the Monsoon*. London, 1996, p.207.

[16]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226.

[17]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26.

[18] Hall, Richard. *Empires of the Monsoon*. London, 1996, p.207.

11 巴比伦大淫妇^[1]

1505年6～12月

阿尔梅达的使命已经算是雄心勃勃了，而在里斯本，曼努埃尔一世关于印度洋的战略思考还在继续发展演变。他的宫廷原本就感染了强烈的弥赛亚式使命感，如今更甚。他的亲密谋臣鼓励他相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注定要成就不世功勋。人们解读了很多迹象，从他的名字，从他当上国王的超乎寻常的境况，从比他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六个人的先后死亡，从如潮水般涌入里斯本码头的财富，从地理探索的快速进展，大家都感到这是命中注定。曼努埃尔一世第一次尝试就成功抵达了应许之地印度，而他的好几位前任花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才绕过非洲。这被认为是上帝的奇迹，表明一个和平与上帝得胜的新时代在降临，或许时间的尽头在加速到来。葡萄牙纹章的五个点，形似基督身负的五处伤；葡萄牙朝廷迫害犹太人，以净化国家为理由强迫犹太人改宗或将其驱逐出境。这都表达了一种狂热的信念：葡萄牙人现在是新的上帝选民，肩负着上帝赋予的伟大使命。船队每一次从东印度满载而归，葡萄牙的目标就变得更恢宏。

具体地讲，葡萄牙的目标是彻底打垮伊斯兰世界。曼努埃尔一世的亲信们从圣约翰的《启示录》中找到了隐秘的指涉。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被认为是巴比伦大淫妇，必须要打倒。葡萄牙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圣战是葡萄牙人的使命，“葡萄牙王室的神圣性，建立在殉道者的鲜血之上，并通过这些殉道者，延伸到世界的末端”。^[2]如今，葡萄牙人要在庞大的战线上奉行自己的信念。曼努埃尔一世的亲信鼓励他采纳皇帝的称号。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在关于葡萄牙地理大发现的书中称他为“恺撒·曼努埃尔”。

1505年6月初，曼努埃尔一世派人给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做了报告。从这份报告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葡萄牙野心的弥赛亚式意味和广泛程度，以及对曼努埃尔一世战略的暗示：

因此，基督徒们可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伊斯兰的全部奸诈和异端邪说都将被斩草除根，基督的圣墓.....长久以来遭受这些恶狗的践踏和毁坏.....将恢复它原初的自由。这样，基督教信仰将传遍全世界。为了让这种前景更容易成为现实，我们已经在百般努力，希望能与最重要也最强大的基督徒（祭司王约翰）结为盟好，派遣使者去他那里，与他接触，提议给他最大的帮助。

曼努埃尔一世的大使越讲越眉飞色舞，最后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修辞夸耀，邀请教皇去把握世界：

请接受您的葡萄牙。不仅是葡萄牙，还有非洲的很大一部分。请接受埃塞俄比亚和广袤无垠的印度。请接受印度洋本身。请接受东方的臣服。您的前任无法了解东方。这项荣誉专属于您。您已经非常伟大，通过上帝的仁慈，将变得更加伟大。^[3]

阿尔梅达奉命去建设一个印度国家，而教皇将享有这片广袤土地之上的宗教权威。曼努埃尔一世的雄心壮志远远不是他给阿尔梅达的指示能够满足的。向教皇报告的仅仅一周之后，毛罗修士带着苏丹的威胁（摧毁圣地）终于抵达里斯本，而曼努埃尔一世的野心也昭然若揭。苏丹的威胁造成的后果与他的期望截然相反。曼努埃尔一世丝毫不畏惧苏丹的敲诈。他派毛罗返回罗马，给苏丹送去一封毫不妥协的回信，威胁道，假如圣地遭到破坏，他将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他追溯了葡萄牙的圣战历史；他发誓要彻底消灭异教徒。他自称得到了上帝佑助。这个威胁似乎具体体现了里斯本的一个明确计划：不仅要消灭马穆鲁克王朝，还要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失落的圣地。曼努埃尔一世秘密派遣大使去见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和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邀请他们参加一次海上十字军东征，渡过地中海，前往圣地。没人回应——尽管只有马克西米

利安一世表示了支持——但曼努埃尔一世仍然面不改色。

1505年之后，这种宏大的计划主宰葡萄牙人的思维达十五年之久。计划的设计者是葡萄牙朝廷内部的一个小团体，他们面对商界的坚决反对、其他君主的嫉妒和马穆鲁克苏丹的敌视，为自己的计划严格保密。计划的灵感虽然来自中世纪的末世论（关于神圣天意与世界末日），其战略却建立在对已知世界的最前沿知识的基础上，规模席卷全球。阿尔梅达接到的指示已经体现了国王的部分计划：首先从经济上扼杀马穆鲁克王朝，然后通过红海直接攻击他们。宏伟的新计划涉及一个从两面发动的钳形攻势。曼努埃尔一世提议从地中海发动海路的十字军东征，同时集中力量攻击摩洛哥的穆斯林势力。

他的政策的基石便是消灭伊斯兰集团，印度是达成此目标的攻击跳板，而非目标本身。甚至在摧毁伊斯兰世界之后，可以放弃通往印度的海路。基督徒占领红海地区之后，便可以生意照旧，从更安全和更短的红海商路获取东方财富。财富的通货膨胀泡沫鼓励国王去做黄粱美梦。7月，教皇批准曼努埃尔一世收缴两年的十字军税，并赦免所有参与十字军东征的人的罪孽。尽管曼努埃尔一世严格控制对这些思想的公开表达，但他似乎在渴望弥赛亚式基督教国家的皇帝头衔，而这个帝国的建设者将是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

与此同时，威尼斯间谍卡马瑟守候在里斯本码头区，随着每一支船队的起航和返航，兢兢业业地搜集关于葡萄牙远航队所带来的财富的确凿信息。尽管曼努埃尔一世对这些信息加以严密封锁，卡马瑟还是获得了详细得惊人的情报。“我看到了印度航线的航海图，”他向威尼斯国内报告道，“上面显示了葡萄牙人从事贸易和发现的所有地方。”^[4]他冷静地记录了葡萄牙船队编成、吨位、出海货物、船长、挫折与海难、带回来香料的数量、航行时间、香料销售的安排与售价，以及关于基础设施和政府的大量信息。1505年7月22日，他目睹葡萄牙一年一度的香料船

队（这一次是十艘船）驶入里斯本，仔细地记下了肉豆蔻衣、樟脑、姜和肉桂与“价值4000杜卡特^[5]的珍珠”。^[6]他得知，上一年12月，葡萄牙人在潘塔拉伊尼取得一场辉煌胜利，摧毁了十七艘穆斯林商船，“连船带香料一同被烧毁了，都是运往麦加的货物……难以置信的损失……二十二名葡萄牙人死亡，七八十人负伤”。^[7]但关于此次远航的规模，卡马瑟的报告却比较混乱：“航程持续了十八个月，去印度的航程是五个月，然后花三个半月装船，六个半月返回。他们原本应当早些回来，但因为船只状况不好，在莫桑比克耽搁了十二天……第一艘船的全程是二十四个月零八天。”

拥有精明商业头脑的威尼斯人能够准确把握在里斯本卸载的香料的巨大数量。他们曾热切地希望，去往印度的漫长海路是不切实际的，但葡萄牙人航行的事业不屈不挠。一年又一年，葡萄牙人的远航像节拍器一样有规律，舰队起航又返回。卡马瑟不抱任何幻想，他深知威尼斯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

我认为，要说葡萄牙人无法航行到印度，因此这门生意做不下去，是大错特错的。这已经变成了一门定期的、稳定的生意，葡萄牙国王无疑会完全主宰大海，因为印度人显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航海贸易，也无力抵抗这位尊贵国王的航运或火炮。印度人的船很弱……不带火炮，因为他们目前没有船载火炮。^[8]

对威尼斯人来说，唯一的办法是再次尝试秘密地催促马穆鲁克苏丹采取行动。1505年8月，在阿尔梅达洗劫蒙巴萨的时候，威尼斯人又派遣了一位使者阿尔维斯·萨谷迪诺去开罗：“单独与苏丹谈话，不能有任何见证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确定，苏丹已经采取坚定的措施……在卡利卡特方面，我们给你充分的自由，可以提出任何恰当的提议。”为了让苏丹明白，他和威尼斯都遭受着急迫威胁，萨谷迪诺要给苏丹看“一封刚刚从葡萄牙来的信，内容有关于大宗香料运抵葡萄牙”。^[9]这封信无疑是卡马瑟写的。

在开罗，高声疾呼地反对葡萄牙的不止威尼斯人一家，而且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葡萄牙人烧毁穆斯林船只，对穆斯林商人施以暴力，阻碍朝觐，麦加本身受到威胁：伊斯兰世界的怒火在熊熊燃烧。阿拉伯编年史家详细记载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对穆斯林的虐待：

.....阻挠他们的旅程，尤其是去麦加的旅程；毁坏他们的财产；烧毁他们的房屋与清真寺；俘获他们的船只；破坏和脚踩他们的档案与文书.....还杀戮去麦加的朝觐者.....公开咒骂真主的使者.....用沉重的枷锁束缚他们.....用拖鞋殴打他们，用火折磨他们.....简而言之，在对待穆斯林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仁慈之心！[\[10\]](#)

除了伊斯兰教遭到侵犯，马穆鲁克苏丹的税源也受到威胁，因此他必然要和威尼斯人联手。

在身处开罗那香气袭人的御花园和繁文缛节的典礼之中的人看来，印度洋似乎很遥远。7月，苏丹准备迎娶一位新妻子。“为了迎接她的驾临，举行了奢华的庆典。”编年史家记载道。

她乘坐饰有金线刺绣的轿子。阳伞和有花鸟图案的华盖遮蔽着她的头顶；她经过的地方，侍从撒出小的金币或银币。新房门前铺开了丝绸地毯，一直铺到柱廊大厅。公主们走在新娘前方，直到她在高台之上落座。苏丹专门为她修缮了柱廊大厅，并以新颖的方式进行了装潢。[\[11\]](#)

8月，“根据惯例”，举行了一条灌溉水渠的落成典礼，以应对“有福的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涨水。苏丹还“像平素一样，大摆排场地”[\[12\]](#)纪念了先知的诞辰。

但对于远方传来的坏消息，苏丹再也不能充耳不闻了。9月，他检阅了军队，准备组建三支远征军，其中两支将去镇压阿拉伯半岛的内乱，第三支则奉命“抵抗法兰克人对印度海岸的侵犯。大量兵员被动员起来，武器装备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13\]](#)11月4日，军队做好了开拔的准备。士兵们领取了给养和预支了四个月的饷银。大部分士兵来自

北非，也有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和许多连队的黑人弓箭手。这是一支混编的伊斯兰雇佣军，葡萄牙人称其为鲁姆人^[14]。一些砖瓦匠、木匠和其他工匠随军行动，准备加固吉达的防御，并为其建造城墙。大家担心葡萄牙人会袭击麦加和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大军开始向红海港口苏伊士进发。

为此次远征所做的技术准备工作至今仍然是个谜。马穆鲁克王朝并非海军强国，而是像寄生虫一样，依赖印度洋穆斯林商人的私营贸易产生的税金而生存。马穆鲁克王朝没有舰队，而且长期匮乏造船所需的木材。他们只能千辛万苦地从黎巴嫩的地中海沿岸进口木材，通过尼罗河运往开罗，然后用骆驼或大车运过80英里沙漠，来到苏伊士。获取铸炮所需的金属，同样也是个难题。但马穆鲁克王朝在集中木材和金属，准备打一场大战役。在这一年，曼努埃尔一世从罗德岛得到了警示。圣约翰骑士团驻扎在罗德岛，其中一名骑士，葡萄牙人安德烈·多·阿马拉尔，不断向里斯本报告关于马穆鲁克王朝的信息。

葡萄牙人后来宣称，苏伊士造船厂建造船只所用的木材是由威尼斯人砍伐、加工和供应的，而且威尼斯官员还去监管造船工程。1517年，葡萄牙派驻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宫廷的大使向威尼斯大使发出了这项指控，但遭到毫不含糊的否认。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其他地方也遇到了麻烦。威尼斯人认为价格比战争更好的武器。“让葡萄牙放弃去往印度远航的最妥当、最快捷的办法是，”统治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后来收到了这样的报告，“降低香料价格，让威尼斯的香料比里斯本更便宜。”^[15]他们多次尝试请苏丹削减关税，从而降低香料价格，但都失败了。不过，威尼斯的一些私营商人可能为马穆鲁克王朝提供了铸炮用的铜条，他们素来是这样干的。也有一些来自威尼斯领地的自由工匠，如造船匠和铸炮工匠，在苏伊士和开罗制造欧洲风格的船只与火炮。

苏丹集结的军队被认为足以完成其任务。1505年冬季，一千一百人

开往苏伊士，由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侯赛因·穆斯里夫（库尔德人）指挥。他们登上了集结完毕的舰队（包括六艘欧洲设计风格的克拉克帆船和六艘桨帆船），开始沿着红海南下，前往吉达。他们掌握的最新情报表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拥有四艘船，只有一座要塞，位于科钦。在1505年夏季阿尔梅达抵达之前，这情报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没过多久，它就过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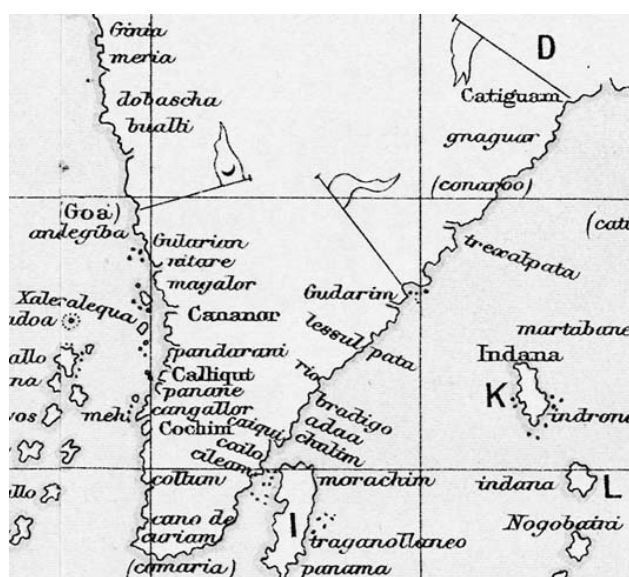
8月27日，阿尔梅达第一次看到了马拉巴尔海岸。汉斯·迈尔记载道：“山峰高耸入云，树木非常高大，青翠欲滴得令人难以置信。”^[16]葡萄牙人在印度海岸仍然只有脆弱的立足点，仅仅是一些印度权贵顶着穆斯林商贸精英集团的压力准许他们开设的贸易站，以及位于科钦的木制要塞。全靠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的天才，科钦的要塞才死里逃生。阿尔梅达的政府所在地其实就是他的船甲板。他命令以闪电般的速度建造一系列设防基地，以巩固立足点；若有可能，要借助和平的联盟；若不可能，就诉诸武力。

根据国王的指示，他首先在无人居住的安贾迪普岛登陆。这个岛被认为是葡萄牙人的一个重要的撤退基地，也是伏击穆斯林船只的瞭望哨。不到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建造了一座要塞的雏形。然后他向南前进，拜访了霍纳瓦尔。这是他的计划上没有的。为了一船马匹，阿尔梅达与当地国王发生了争吵，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冲突。阿尔梅达的进军过程主要是短促的激战。在这样的一次战斗中，霍纳瓦尔城的一部分被摧毁，一些属于狄摩吉（马拉巴尔海岸臭名昭著的海盗，瓦斯科·达伽马七年前与他打过照面）的船只被付之一炬。此次进攻的指挥官是阿尔梅达的儿子洛伦索，他很快就因为进攻特别凶猛而赢得了“魔鬼”的绰号。这一次，他差一点被敌人切断退路和丧命。阿尔梅达自己的脚上也中了一箭。这个箭伤让他“更多是愤怒，而不是疼痛”，^[17]但猛冲猛打的荣誉法则就是会造成风险，这将对葡萄牙人的整个事业造成影响。后来，霍纳瓦尔国王向葡萄牙人求和，承诺年年纳贡。狄摩吉则加入了葡萄牙阵

营，此事的影响非常深远。一座座城市被攻破并熊熊燃烧，一艘艘船被击沉，这些消息借着季风迅速传开，令整个大洋屈膝投降。

曼努埃尔一世曾敦促阿尔梅达尽快赶往科钦，以保障冬季返航的船只装满香料，并且明确指示他不要在途中的坎纳诺尔（葡萄牙人在那里有一座贸易站）浪费时间。副王没有遵从御旨，这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得到风声，葡萄牙在坎纳诺尔的商业利益受到了穆斯林商人（他们为自己的生意担忧）的威胁。他在坎纳诺尔停留了八天，雷厉风行，接见了强大的纳辛哈的印度教国王的使节，然后受到坎纳诺尔国王的欢迎。纳辛哈国王愿意把沿海港口交给阿尔梅达使用，并提议把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曼努埃尔一世。汉斯·迈尔对印度教仪式的景观和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感到困惑。

（坎纳诺尔国王）命令在一颗棕榈树下挂起一些装饰物，然后在一队随从的护送下前来。他带来了三千名手执利剑、匕首和长矛的武士与弓箭手，以及喇叭手与笛手。从坎纳诺尔到王宫的距离是2里格，路两边有村庄。他抵达棕榈树下的帐篷时，身后已经有六千多人。在帐篷内，摆放着一张卧榻，上面有两个软垫。他穿着一件齐膝的精致棉布长袍，系着腰带，头戴一顶丝绸帽子，就像加利西亚帽。他的侍从捧着一顶金冠，肯定有8马克^[18]重。^[19]



1502年的印度地图，图中包括斯里兰卡和一系列半神话的岛屿

国王或许知晓这些西方人一路烧杀抢掠留下的废墟与血迹，决定抗拒穆斯林群体对他施加的压力。他允许葡萄牙人加固他们的贸易站，还为其提供了石料。阿尔梅达停留的时间不长，等到贸易站的地基打好之后就继续航行，留了一百五十人和一些火炮在坎纳诺尔，去巩固据点并建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建筑，它很快就将受到一场围城战的考验。

到11月1日万圣节时，阿尔梅达已经在科钦了。这座城市是曼努埃尔一世印度计划的重中之重。它也是葡萄牙在印度的唯一一个可靠盟友。阿尔梅达抵达的时候，发现老国王特里马姆帕拉已经隐遁，专注于宗教。根据王位继承法，继位的是他的侄子南贝多拉，但有人对此不服，正在兴风作浪。阿尔梅达举行了一场隆重典礼，动用了大象、喇叭、游行，并向南贝多拉奉上一顶金冠和贵重礼物。他仿佛变戏法一般，把合法的王权“授予”了南贝多拉。南贝多拉“从曼努埃尔一世国王手中接受了这一切。曼努埃尔一世是西方最伟大的国王、东方海洋之王、南贝多拉加冕礼的主人，也是科钦所有统治者的主公”。^[20]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打磨这样的战略已经有五十年了。阿尔梅达乘胜追击，狡猾地要求将目前的木制要塞改为石制，“作为副王的司令部和官邸，从今往后所有前来组织征服和本地贸易的总督都将以此为基地，以便让葡萄牙王国的船只到此地装载货物，而不去马拉巴尔海岸的其他任何港口”。^[21]国王有些不情愿，因为根据传统，石制建筑是国王与婆罗门专享的特权，但他还是同意了。阿尔梅达说服他的理由之一是，他承诺将要塞钥匙交给国王，以显示国王才是要塞的主人。但马拉巴尔海岸的统治者将会发现，法兰克人有了坚固的城墙，并在坚固的炮台安放大炮之后，就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将他们赶走了。

然而，据历史学家巴罗斯记载，阿尔梅达劝服国王的言辞或许包含了另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方面。他宣称：“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从事这些探索的主要意图是，与这些地区的王室沟通交流，以发展贸易。这种活动

源自人类的需求，依赖于通过互相交流而构建的友谊。”^[22]阿尔梅达颇有先见之明地认识到了远途贸易——从瓦斯科·达伽马开始的全球化的脱缰野马——的起源和益处。

1505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506年，阿尔梅达忙得不可开交，仿佛他面前的机遇随时可能因为马拉巴尔海岸权贵的变卦而骤然消逝，而且他必须完成葡萄牙国王交给他的紧迫任务。曼努埃尔一世给他布置了许多任务，其中两项被他视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财富与安全，即在科钦给香料商船装满香料，并在科钦与坎纳诺尔建造要塞。他的勤奋与精力充沛堪称楷模。据他的秘书说，一艘船装货的时候，“副王持续不断地小心处置。他总是亲自到场，监督香料的过秤，哪怕夜间亦如此”。^[23]他的目标是遏制无处不在的欺诈，因为香料的分量可能给得不足，或者香料口袋会“偶然”崩裂，落出的香料可能会被人顺手牵羊。对于科钦要塞的建造，他同样兢兢业业：“每天天亮前两个小时，有时是三个小时，他就起床了，与砖瓦匠一同工作……一直辛苦到日落之后两个小时。”

阿尔梅达忙碌于方方面面，监督着修理船只、建立医院和建造帝国行政机构的基础设施。他身边有一名财务监管人员、一名行政秘书、一名负责司法的巡视官，还有商业经纪人与船长。他那小小的宫廷就是一个工作组，包括神父、火炬手、喇叭手、保镖和仆人。每座要塞有一名指挥官、一名有商贸经验的经纪人和一群辅助人员，后者包括仓库管理员、文书、秘书长、警长、法庭官员、税吏、主持葬礼的人和遗嘱公证人。医院、房舍、小礼拜堂和教堂拔地而起。常驻的海军由他的儿子洛伦索指挥，负责保障海上安全。

阿尔梅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行政管理者，也是王室利益不可腐蚀的守护者，对诚实、纪律和公平交易极其重视。他让回国的香料船队送回一丝不苟的账簿，上面记录了帝国体制的管理情况。他曾在给国王的信中不无夸张地写道：“请陛下放心，任何人想进入科钦城，都必须得到

我的批准，让我知情。连一个雷阿尔^[24]也不会失窃.....此地大小事务就像在葡萄牙一样，全在掌控之中，且井井有条。”^[25]他持续不断地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做斗争。攻占基尔瓦之后，葡萄牙人掳得大量商品和金银，他为自己留下的只有一支箭，作为此次胜利的纪念品。他给国王写信称：“我得到的报偿，就是能够这样为陛下服务，我的行为就为此见证。”^[26]作为副王，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占有大量胡椒，但他总是只拿一点点。他坚定不移地捍卫普通水手与士兵的利益，他们为了建设印度帝国而受苦受难，甚至丧命，而薪水却总是被拖欠。

1505年冬季，当年的香料商船在科钦迅速装货之后，分几批返航了。九艘商船抵达了里斯本，只有一艘，即虽然庞大却船龄很大的“海洋之花”号，因为漏水而不得不在莫桑比克过冬。丰厚的回报证明了东印度商业运作的高效和有序，阿尔梅达始终认为这是整个殖民事业的核心。威尼斯人卡马瑟目睹香料商船陆续返航，详细地报告了其货物，“是我从商船文书的账簿看来的”，^[27]还描述了里斯本方面经营这些商品的越来越高的水平：“所有货物都在印度事务院卸载，这是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新建的海关大楼。每艘船有自己的仓库。海关大楼内有二十间这样的仓库，所有胡椒在那里井然有序地存放。”^[28]卡马瑟估计，阿尔梅达在1505～1506年冬季送回的货物价值“肯定非常高”。^[29]据他估算，足有35000担^[30]香料，这是国际贸易中前所未见的巨额数字，后来一直到1517年才打破了这个纪录。

1505年12月，在给曼努埃尔一世写信的时候，阿尔梅达可以回顾自己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了。在奔波忙碌了四个月之后，副王为葡萄牙在印度的永久存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现在向曼努埃尔一世建议，不仅要采纳“航海之王”的头衔，还应当使用更为恢宏的称号：

在我看来，陛下应当采用“东印度皇帝”的称号.....因为基尔瓦和蒙巴萨的国王.....以及马林迪和摩加迪沙国王.....都认您为主公，自称是您的臣属.....而在印度海岸，您要有许多安宁的王家要塞，任何船只要横穿大

海，都必须得到您的保护。巴特卡尔和霍纳瓦尔向我承诺，要向陛下臣服，向陛下纳贡.....所以陛下采纳皇帝的头衔，是理所应当、实至名归的。^[31]

与此同时，阿尔梅达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国王交给他的全部任务。他给曼努埃尔一世写信解释道，因为他自己把建造要塞和输送香料视为头等要务，“我决定今年不去红海，尽管这是全世界我最渴望做的事情”。^[32]他解释说，自己必须建成要塞并保障其安全，并且需要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及时地为商船装货。不过，扎莫林仍然是一个留待解决的问题。

这封信于次年中期被送抵里斯本，国王收到信后命令在全国举行弥撒和宗教游行，并考虑制作一系列纪念性壁毯，以纪念促成印度帝国建成的那些伟大事件：基尔瓦国王的加冕、占领蒙巴萨、在马拉巴尔海岸建造要塞。这些壁毯是自我宣扬的恢宏手段。教皇也在考虑赐予他“基督教国王”的头衔。在此期间，曼努埃尔一世的雄心壮志还在继续膨胀。1506年5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班牙与葡萄牙竞争的代理人，在巴利亚多利德去世，死前仍然坚信自己抵达了东印度。

^[1] “巴比伦大淫妇”的说法出自《新约·启示录》第17和18章，基督教用它来比喻邪恶的力量。

^[2] Aubin, Jean, ed. *La Découverte, le Portugal et l'Europe*. Paris, 1990, p.70.

^[3]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33.

^[4] Ca'Masser, 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 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ppendice, vol.2, 1845, p.31.

^[5]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威尼斯杜卡特一度受到众多国家的认可与接受，类似今天的美元和

欧元。

[6] Ca'Masser, 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 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ppendice, vol.2, 1845, p.20.

[7] Ca'Masser, 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 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ppendice, vol.2, 1845, p.21.

[8] Ca'Masser, 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 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ppendice, vol.2, 1845, p.32.

[9] Aubin, Jean, ed. *Le Latin et l'astrolabe: Recherches sur le Portugal de la Renaissance, Son Expansion en Asie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3 vols. Lisbon, 1996-2006, p.455.

[10] Zayn al-Dīn ‘Abd al-’Azīz. *Tohfut-ul-Mujahideen*. Translated by M.J. Rowlandson. London, 1883, pp.105-107.

[11]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77.

[12]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78.

[13]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79.

[14] 鲁姆的说法源自希腊语，意思是罗马人，最早指的是拜占庭帝国，因为拜占庭自称罗马人，“拜占庭”的名字是后来的学者的说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伊斯兰世界用这个词来指代不同的意思，如拜占庭帝国、生活在近东的希腊人、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居民、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甚至整个地中海东部等。16世纪的葡萄牙人将他们在印度洋遇到的马穆鲁克或奥斯曼人称为鲁姆人。

[15] Aubin, Jean, ed. *Le Latin et l'astrolabe: Recherches sur le Portugal de la Renaissance, Son Expansion en Asie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3 vols. Lisbon, 1996-2006, p.458.

[16] Albuquerque, Luís de, 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 eds. *Grandes Viagens Marítimas*. Lisbon, 1989, p.89.

[17]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2, Lisbon, 1778, p.273.

[18] 马克起初是流行于西欧的重量单位，专用于测量金银，1马克最初相当于8盎司（249克），但在中世纪时会不断浮动。

[19] Albuquerque, Luís de, 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 eds. *Grandes Viagens Marítimas*. Lisbon, 1989, p.90.

[20]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2, Lisbon, 1778, p.357.

[21]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2, Lisbon, 1778, pp.356-357.

[22]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 part 2, Lisbon, 1778, pp.353-354.

[23]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40.

[24] 雷阿尔是旧时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国的货币单位。葡萄牙使用雷阿尔的时期是约1430～1911年。

[25]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44.

[26]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75.

[27] Ca'Masser, 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 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ppendice, vol.2, 1845, p.23.

[28] Ca'Masser, 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 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ppendice, vol.2, 1845, p.29.

[29]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33.

[30] 担（Quintal）是西方旧时的重量单位，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葡萄牙的1担约合58.75千克。

[31]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317.

[32]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313.

12 “恐怖的人”

1506年1月～1508年1月

在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辛勤劳作以建设一个有利可图的印度帝国的同时，里斯本的曼努埃尔一世对海外事业的指挥结构有了新想法。国王几乎完全无法想象世界另一端的情况。与印度的通信耗时甚久，所以他对印度事务的管理充满了矛盾。他给阿尔梅达的指示过于细致、喋喋不休，但他疑心很重，而且容易受到妒火中烧的廷臣小圈子的压力与影响。曼努埃尔一世没有眼力，不能区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和庸碌无能、贪赃枉法、自私自利之辈。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在1503年冬季单枪匹马地挽救了葡萄牙在科钦的事业，然而他回国后渐渐湮灭在史册中。在收到阿尔梅达的第一份工作汇报之前，曼努埃尔一世就已经决定了取代他的新人选。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和曼努埃尔一世一样，相信后者奉天承运，命中注定要涤荡印度洋的伊斯兰教，并收复耶路撒冷。阿尔布开克还向国王鼓吹，让他更加相信自己的伟大使命。阿尔布开克将成为国王选定的工具。

1506年2月27日，也就是曼努埃尔一世公开表达对阿尔梅达百般信任的整整一年之后，新人阿尔布开克签署了一份秘密文件：

我，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郑重宣布，我已经当面向我主国王陛下宣誓，在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回国或死亡之前，绝不向任何人泄露关于印度总督职位（目前由阿尔梅达担任）的御旨。在此御旨生效、我成为印度总督之前，我要对此文件严格保密，不向任何人泄露。^[1]

曼努埃尔一世已经任命他在差不多三年后接替阿尔梅达，头衔为总督，地位比副王要低。但在规定的時間之前，此项任命必须保密。在此期间，曼努埃尔一世写信给阿尔梅达，通知他，阿尔布开克将在原先仅

由副王一人管辖的印度洋西半部分执行公务。权责的重叠必然在将来的岁月导致混乱与敌意。与此同时，在归国船长们的冷嘲热讽和宫中敌视阿尔梅达的大臣们的影响下，曼努埃尔一世对阿尔梅达的语气越来越严厉。

1506年春季的香料舰队将包括十五艘船，由特里斯唐·达·库尼亚统一指挥。其中九艘由他直接掌管，另外六艘是阿尔布开克的。整支舰队的计划是进入印度洋，在索科特拉岛建立一个基地。索科特拉岛是红海出入口附近的一个岛屿，据信由基督徒控制，因此是一个理想的基地，有助于消灭去往埃及和中东的穆斯林市场的伊斯兰航运。

在16世纪初，里斯本是一个生机勃勃、喧嚣嘈杂而风云激荡的地方。东印度的财富滚滚涌入塔霍河两岸的码头，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商旅、买卖人、水手和冒险家在香料气息和奢侈品的吸引下，纷纷抵达“新威尼斯”。里斯本码头区的大部分布局雄壮恢宏，以反映“杂货商国王”的雄心壮志，但这也是一座污秽肮脏、充溢着歇斯底里般狂热的城市。1506年1月，城里暴发瘟疫，其可能是由塔霍河上的航船传播进来的。很快，城里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死亡，国王考虑撤离城市。4月，他将宫廷迁往90英里之外的阿布兰特什。气氛高度紧张；为恳求上帝解救万民于瘟疫，人们举行弥撒；带兜帽的悔罪者在大街上行进。招募足够的水手到舰队去变得困难。没有人愿意和来自里斯本的人同船出航。



里斯本码头

预定的起航日子——4月5日快到了，舰队按惯例在贝伦举行出发前的仪式。为了补足人手，阿尔布开克不得不吸收监狱里的犯人，这为此次远航增添了更多的爆炸性因素。水手们桀骜不驯，难以管教。阿尔布开克后来宣称，他的舰队里发生的打架斗殴比萨拉曼卡全城还多。船员们是一群无法无天的狂徒，对穆斯林恨之入骨，并且对凶残的海盗活动有经验，阿尔布开克很难驾驭他们。在预计出发的那天，阿尔布开克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他的领航员，经验丰富的若昂·迪亚士·德·索利斯，没了踪影。索利斯偏偏在这个时候谋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越境逃到了西班牙。阿尔布开克从来不会低估自己的才能，决定亲自领航。“我相信，我能像舰队里最优秀的领航员一样，把我的船开到印度。”^[2]起航两周后，里斯本出了大事。新基督徒（近期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曾被允许留在城内，现在却被指控犯有异端罪并散播了瘟疫。歇斯底里的暴民在方济各会僧侣的率领下，在大街小巷里攻击改宗犹太人。有两千人因此次迫害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而丧生，直到后来才恢复了公共秩序。

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是亲戚，但此次远航并不比1503年阿尔布开克与其堂兄弟弗朗西斯科的那次更为友善和谐。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摩擦不断。阿尔布开克虽然是库尼亚的下属，但一贯自负，而且近期又得到

了国王的秘密任命，所以越发飞扬跋扈，不肯向任何人低头。从葡萄牙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他们此次的任务在商业上是一次灾难。舰队遭遇风暴，几乎原路返回非洲海岸；库尼亚冲动地希望探索新发现的马达加斯加岛，耽搁了不少时间；途中掳掠索马里海岸，又花了不少时间。原本六个月就应当完成的任务，最后花了十六个月。他们的第一个正式目标索科特拉岛名义上属于基督徒，实际上却是一组穆斯林要塞，必须用武力攻打。结果发现，索科特拉岛没有任何战略价值，无助于对红海出入口的巡逻，也没有给养能够维持新的驻军。在这期间，库尼亚错过了1506年去印度海岸装载香料的航行季节。

在其他地方，1505年出征的马穆鲁克王朝远征军以同样悠闲的速度缓缓行进。指挥官侯赛因·穆斯里夫显然不着急与法兰克人打仗，而且他的远征军在途中还有多项任务要执行。他的第一要务是加强吉达的防御工事，他也是吉达的总督。他需要监督建造强大的防御工事，以防葡萄牙人攻击。里斯本方面正在提议的攻打麦加的计划让马穆鲁克王朝提高了警惕，因此穆斯里夫的远征军整个1506年都待在红海。此外，他还要镇压一些犯上作乱的贝都因人。直到第二年5月，吉达的防御工事才竣工。

最初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很大损耗。穆斯里夫原先有十二艘船，由于逃兵和战损，1507年8月抵达亚丁时已经只剩六艘。印度洋的坏消息仍然不断传到开罗。“近来，法兰克人狗胆包天，不知深浅，”编年史家伊本·伊亚斯写道，“他们有二十多艘船敢于在红海游弋，袭击从印度来的商船，伏击船队，杀人越货，所以很大一部分进口都停止了。如今在埃及很难搞到头巾和平纹细布。”^[3]但埃及方面坚信，只要以圣战精神鼓舞起一次泛伊斯兰联盟，再加上扎莫林的帮助，就足以消灭入侵者。

与此同时，阿尔梅达舰队继续破坏马拉巴尔海岸的穆斯林商贸，于是阿拉伯半岛的商人将他们的船派往其他香料市场。越来越多的阿拉伯

商船向南去往低矮的马尔代夫环礁，在那里获取食物与淡水，然后继续前往锡兰。阿尔梅达派遣他的儿子去切断马尔代夫航线，但领航员们迷路了。海流将洛伦索的船只带到了锡兰，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在锡兰登陆，与当地人缔结了条约，并竖立了十字架。

然而，副王的前景越来越黯淡。曼努埃尔一世的全部扩张主义计划都取决于在马拉巴尔海岸维持一个稳定的基地，而这不仅依赖于训练有素的海军力量及其无坚不摧的铜炮，还依赖于威望。所以，必须让各城邦觉得与法兰克人做生意有利可图。1506年，印度各城邦对葡萄牙的信心在动摇。

在安贾迪普岛上的要塞竣工几个月后，葡萄牙人发现建造它是个错误。不管他们去哪里，都会侵犯当地原本固有的利益。安贾迪普岛是比贾布尔苏丹的势力范围，他的船只强迫过往商船到他的达布尔港去缴纳关税。他不打算容忍葡萄牙人的擅自闯入。雨季开始时，比贾布尔苏丹发动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攻势，由一名葡萄牙叛徒领导，围攻安贾迪普要塞。三艘葡萄牙船只被烧毁，这时消息传来说洛伦索即将赶来救援，于是比贾布尔军队撤退，但要塞显然是守不下去了。因为它距离敌国比贾布尔太近，而且奇缺自然资源。这年年末，阿尔梅达没有禀报曼努埃尔一世便自行决定放弃并拆毁安贾迪普岛的要塞。此举是对国王的宏图大略是否明智提出的质疑，后来对阿尔梅达自己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这让穆斯林商人感到，驱逐葡萄牙人并非不可能。

随后又发生了两次沉重打击。葡萄牙人给印度洋事务带来了程度前所未有的两极化与军事化。他们向忠于自己的人——后来包括一些玛皮拉商人，即在马拉巴尔海岸，尤其是在科钦与坎纳诺尔的本土穆斯林——提供保护，发放通行证。他们假定印度洋将成为葡萄牙的专有领地。就是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洛伦索在1506年年末护送一些船只北上，驶往朱尔港。他在中途停下，以便去拆除安贾迪普岛的要塞，于是

在敌视葡萄牙的达布尔附近停泊。一些穆斯林商人自称是友好港口的居民，登上他的船，向他求助。他们满载货物的船只从科钦和坎纳诺尔驶来，现在停泊在达布尔港口，而一大群麦加船只后来也停到了那里。现在，达布尔方面正图谋掳掠葡萄牙盟友的船只，这些到访的商人于是恳求洛伦索尽快发动进攻。

洛伦索决心作战，但根据他父亲的指示，他在决定开战之前必须召集船长们商议。在当晚的会议上，船长们以六对四的多数票反对采取行动：他们担心这次求援是个圈套，他们不熟悉达布尔所在的河口，说不定进去就出不来了，何况他们本来就肩负着护送船只去朱尔的任务。船长们的决定可能是出于谨小慎微，也可能是出于对洛伦索的恶意：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不肯服从副王那才二十五岁的儿子的号令。洛伦索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谨慎起见，首先把反对派的意见都记录在案，并让他们签字。然而，船上的骑士和水手们却求战心切，摩拳擦掌，渴望得到战利品，因此对上级的决定非常愤怒。

随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葡萄牙盟友的商船遭到达布尔人的抢劫，船员被杀。卡利卡特船只经过坎纳诺尔的要塞时，射出嘲讽的炮火。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逃避战斗。他们拒绝保护盟友的船只，这在马拉巴尔各个亲葡萄牙的港口造成了恶劣影响。阿尔梅达被此消息震惊了。他对所有船长，包括他儿子，实行军法审判。曾投票反对参战的人被囚禁、降职和送回葡萄牙。洛伦索的命运如何，悬而未决。

达布尔事件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概括了此事对船长和指挥官们造成的后果：“在决定战和的时候.....为了建立荣耀的功业，即便危险，也绝不应该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而拒绝作战。”^[4]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就不可能做到审慎了。任何人都不敢拒绝作战，不管决定有多鲁莽，否则就会被指控怯懦。他们必须做出最显著

的英勇行为。葡萄牙贵族的荣誉法则强调近距离肉搏战，而不赞同远距离炮击。

1506年冬季，比达布尔事件更严重的损失降临到忠于葡萄牙的当地商人身上。特里斯唐·达·库尼亚舰队未能如期抵达。自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到访印度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没有来自里斯本的舰队来购买香料。坎纳诺尔和科钦港口储存了大量商品，却卖不出去。商人们开始后悔与法兰克人订立的专有贸易条约，并渴望回到过去那种与麦加的稳定可靠的贸易。

坎纳诺尔尤其不满。当地的穆斯林群体看到葡萄牙要塞的成长，大感沮丧，并且非常理解它们的意义。商人们也担心他们与波斯湾的利润丰厚的马匹贸易很快会消失。葡萄牙人开始掳掠从霍尔木兹来的商船，商人们已经损失了一船昂贵的大象，其是被洛伦索在攻打奎隆期间摧毁的。洛伦索向马尔代夫和锡兰方向的试探让商人们更加不安。新来者的野心似乎没有边界。商人们开始为所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忧心忡忡。在坎纳诺尔城内，葡萄牙还开始扰乱社会等级制度，并蔑视当地风俗。低种姓的女人与要塞驻军勾勾搭搭；出现异族混居的社区，那里的人皈依基督教，令穆斯林大为怨恨。而新来者爱吃红肉，有时会杀牛，更是增加了他们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紧张气氛。坎纳诺尔统治者给曼努埃尔一世写了不止一封信以表达自己的担忧，担心“葡萄牙人友谊的蜜糖会化为毒药”。^[5]

1507年4月，坎纳诺尔统治者去世，扎莫林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坎纳诺尔王座上安插了一个比较亲近他的人。就在这时，一些死尸被海水冲刷到海滩上，其中有一位显赫穆斯林商人的侄子。一名葡萄牙船长被指控为凶手，他曾拦截一艘当地商船，宣称该船的通行证是伪造的（尽管上面有阿尔梅达的驻军指挥官的签名），并屠杀了船员。他用帆布裹住尸体，以确保它们会沉底，然后才将其抛入海中，但潮水松动了

帆布，把尸体送到了哀哭流泪的亲戚面前。

此事激起了马拉巴尔地区的广泛起义。一万八千名武士集合到坎纳诺尔城，扎莫林送来二十四门炮。葡萄牙要塞位于一座海岬之上，于是被切断了陆路通道，而从海上的补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印度洋，季风决定万事万物的规律：船只何时起航；战争何时开展；葡萄牙的香料舰队应当何时抵达，又应当何时离开。若是错过了一个关键时刻，就会浪费好几个月时间。葡萄牙的对手很快认识到，依赖海洋力量的敌人在风暴到来后就会很脆弱，于是他们相应地选择了攻击的时机。4月，天气开始变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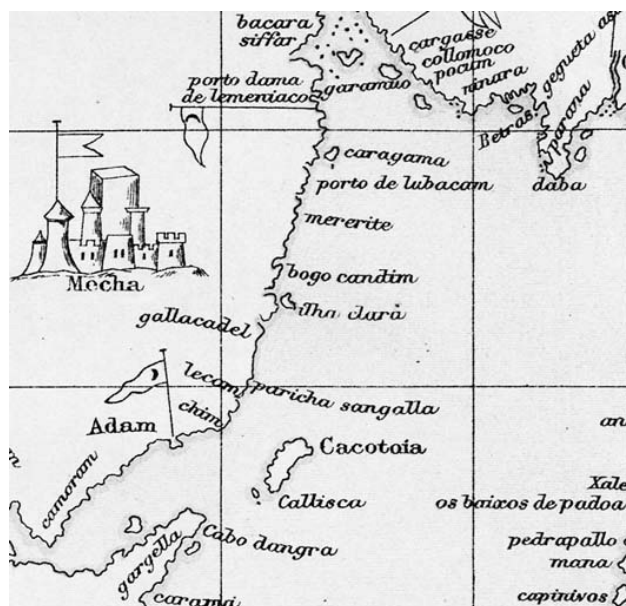
耶稣受难节这天，坎纳诺尔遭到攻击的消息传到了科钦。阿尔梅达意识到时间很紧迫，于是一分钟也没有浪费。他在城内四处奔走，呼吁人们拿出粮食和武器。教堂内正在上演一部神秘剧^[6]，打扮成守卫基督坟墓的罗马百夫长的演员不得不当场交出自己的胫甲和胸甲。此时正是涨潮时节，洛伦索带着搜罗到的所有物资和人员，起航奔向坎纳诺尔。他将一些人员和物资送上岸，但风力越来越猛，他不得不起航返回科钦。坎纳诺尔要塞的指挥官洛伦索·德·布里托和约四百名士兵就这样被季风切断，不得不独自抵挡敌人的猛烈攻击。8月，当攻防战还在进行时，已经占领荒凉的索科特拉岛并驻军的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分道扬镳：库尼亚率领香料舰队去印度，比原计划晚了一年；阿尔布开克则负责在阿拉伯海巡逻。这个月底，库尼亚的船只营救了饥肠辘辘的坎纳诺尔驻军，终于打破了当地的反葡萄牙联盟。

库尼亚和阿尔布开克在索科特拉岛道别时，关系已经冷若冰霜。阿尔布开克焦躁而狂怒。他只有六艘饱受虫蛀的船只，装备破烂，给养紧缺，而且也只有四百人。作为最后的鄙夷，库尼亚还带走了所有的喇叭。在外国港口展示自己的权威与力量时，非常需要喇叭；在战斗中重整战阵时也需要喇叭。阿尔布开克不仅要为自己的船员提供粮食，还要

为留在索科特拉岛的营养不良的驻军提供给养。

曼努埃尔一世在给阿尔梅达的一封信中设定了阿尔布开克的任务，即“守卫红海出入口，俘获穆斯林运输船，控制这些船上能找得到的所有珍贵货物，在有利的地方订立条约，如塞拉^[7]、巴尔巴拉^[8]和亚丁，还要去霍尔木兹，并尽可能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9]所以，阿尔布开克的行动范围非常广袤，从红海沿着阿拉伯半岛，跨越波斯湾一直到印度西北部。他以自己的方式对国王的指示做了非常宽泛的解读。

尽管缺少人员和物资、船只破败、武器不足，尽管曼努埃尔一世信中的命令似乎要求使用和平手段，阿尔布开克还是率领他那群嗜血如命的水手，开始在阿拉伯半岛沿岸开展了一场闪电战。今日阿曼那荒芜海岸上的小港口背后就是阿拉伯半岛广袤无垠的大沙漠，但这些港口非常繁荣富裕，让人颇感意外。它们出口海枣、食盐和鱼类，并向印度大陆的军阀们出售贵重马匹，以此为业。



当时地图上划定的阿尔布开克的行动范围，红海入口附近可见索科特拉岛（**Cacotoia**），还有亚丁以东的阿拉伯半岛沿海，及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

在这里，短短几周内，阿尔布开克就在葡萄牙征服者当中立下了与众不同的威名，流传青史的名号是“恐怖的人”。他那群破破烂烂的船，旗帜招展，驶入阿曼的各个贸易港口，勒令当地人臣服于葡萄牙王室。由于没有喇叭，水手们奉命在船只接近港口时大声呼喊，发出好战的喧哗。阿尔布开克在后甲板摆开架势，要求当地人上来拜见他，企图以此种方式震慑和吓唬当地人。当地谢赫^[10]的不幸使者登上葡萄牙船只，看到的是精心设计的景象：总司令身穿灰色天鹅绒衣服，头戴灰色天鹅绒帽子，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肩披鲜红色斗篷，端坐在一张雕刻精美的椅子上，周围簇拥着衣着尽可能光鲜的船长，周遭装饰着精美的挂毯。每一位指挥官都拿着出鞘利剑，这清楚地传达了他们的信息：当地人不投降就开战。阿尔布开克没有时间按照东方外交惯例去闲聊打趣。他不收礼物，而是告诉使者，他不会从那些可能即将成为敌人的人那里收受礼物。他长须飘飘，面容严峻不动摇，企图以这副威风派头吓倒对方。在这些精心安排的场景中，有很大的心理上虚张声势的成分。他的兵力远远少于对方，而且离家千万里，却用威风凛凛的仪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时他坚持让部下每天穿不同的衣服，以欺骗访客，让对方高估他手下的人数。

阿曼沿海的有些港口迅速屈服了，其他的则选择抵抗，于是遭到洗劫。来自里斯本的罪犯水手成群结队地拥入这些港口，烧杀抢掠。惩一儆百的恐怖暴力是一种战争武器，用来软化海岸其他地区的抵抗。就这样，一连串小港口陷入了火海。在每个港口，葡萄牙人都摧毁清真寺；马斯喀特是沿海地区的贸易中心，“一座非常雅致的城镇，有非常美丽的房屋”，^[11]遭到的破坏特别野蛮。葡萄牙船上的炮手们摧毁支撑清真寺的柱子，“这是一座非常宏伟而美丽的建筑，大部分是用雕刻精美的木料建造的，上半部分是灰泥砌的”，最后轰然坍塌。阿尔布开克以为在清真寺里搞破坏的葡萄牙人都死了，但“感谢上帝”，编年史家写道，“他们毫发未伤地出来了，身上连一处擦伤都没有……我们的人吓坏了，看到幸存者，都向上帝感恩，感谢他创造了这个奇迹，并纵火焚

毁清真寺。它荡然无存，没有留下任何遗迹”。^[12]这样彰显天意的奇迹令阿尔布开克的神圣使命感越发膨胀。在古赖亚特港，搜罗了自己需要的所有补给物资之后，“他命令将港口焚毁……大火熊熊，没有一座房屋、建筑留存，那里的清真寺是我们见过的最美丽的建筑之一，也化为了灰烬”。^[13]阿尔布开克致力于散播自己的恐怖威名：“他命令将俘获的穆斯林的耳朵与鼻子割掉，并将他们送到霍尔木兹，以证明他们的受辱。”^[14]

阿尔布开克的放纵不羁变得越来越明显，不仅是针对倒霉的阿曼人，就连对自己的船长也非常刚愎自用。按照惯例，总司令会与各位船长商议，常常会接受全体的投票结果，但聪明、暴躁且对自己的才干无比自信的阿尔布开克不懂得这样的策略，也没有合作精神。在阿曼远征开始时，他名义上向各位船长知会了此事，但随着一周周过去，他与船长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9月中旬，他们进入了波斯湾，距离他们接受的关键任务——封锁红海出入口——越来越遥远。在阿尔布开克脑子里，沿着阿拉伯半岛沿海的远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岛屿城市霍尔木兹，是外海的一小块受赤日炙烤的礁石，那片海岸是波斯与印度洋之间贸易的轴心。霍尔木兹是一座富得流油的贸易城市，伟大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那里时，看到“这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拥有绝妙的露天市场”和雄伟优美的房屋。中国的星槎船队到访此地时，发现这里“民富裕厚”^[15]。霍尔木兹控制着有名的波斯湾珍珠养殖地，并向印度大陆互相争斗不休的各大帝国出口大量优质的阿拉伯骏马，后者在这方面欲壑难填。“如果世界是一枚戒指，那么霍尔木兹就是戒指上的宝石。”^[16]一句波斯谚语如是说。阿尔布开克很清楚这座城市的美名和战略价值。

曼努埃尔一世给他的指示是“订立条约”，^[17]似乎没有让他侵略霍尔木兹。阿尔布开克抵达时，霍尔木兹港内挤满了商船，他按照自己惯常的手段行事。他拒绝了国王使者送来的所有礼物；他的答复非常简单，

要么成为葡萄牙王室的附庸，要么城市将被摧毁。霍尔木兹主要的维齐尔^[18]瓦加·阿塔得出结论，阿尔布开克只有六艘船，竟敢如此嚣张，实在是满脑子幻想。然而1507年9月27日，在雷霆般的轰鸣中，葡萄牙的铜炮又一次凭借优势火力击败了数量多得多的穆斯林舰队。维齐尔迅速求和，接受曼努埃尔一世为主公，并同意缴纳一笔沉重的岁贡。

阿尔布开克认为此次胜利是上帝的功劳。后来，他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提及

天主创造的伟大奇迹.....战役结束三天后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见证了这一奇迹.....一大群穆斯林的尸体，超过九百具，漂浮在海面上，其中大多数人身上、胳膊上和腿上都有许多箭，尽管我这里并没有弓箭手，也没有箭。这些死尸身上有大量黄金和属于贵族的镂刻白银与宝石的剑。我们的人乘小船搜罗这些战利品，花了八天时间，获得了大量财富。^[19]

其实这些穆斯林是被友军误伤的，但在阿尔布开克看来，仿佛曼努埃尔一世在印度洋的神圣使命得到了证实，送来了胜利与利润。

阿尔布开克在霍尔木兹的工作还不算完，他坚持要求获得在当地建造要塞的权利。此时，他与船长们的关系也到了一个危急关头。船长们觉得在霍尔木兹建造要塞没有意义：这不是他们的任务；真正的任务，即封锁红海，被阿尔布开克抛在脑后；索科特拉岛急需粮食补给；霍尔木兹已经臣服于葡萄牙王室；更何况，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驻防一座新要塞。船长和水手们也渴望返回红海出入口，他们相信在那里可以掳掠到宝贵的战利品。但是，阿尔布开克对他们的抱怨置之不理，他甚至坚持要求船长们参加建造要塞的体力劳动。这将是团队的工作。因为工程是在当地百姓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所以高级别的船长和贵族们觉得这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

有四位船长渐渐觉得，总司令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严苛地执行军纪的人，不肯聆听正当的反对意见。如果他是在代表曼努埃尔一世执行一项

宏大的战略计划，国王的书面命令里并没有这么写，而且他未能赢得指挥官们的支持。他的外表令人生畏，他的火爆脾气令人心惊胆战地畏缩，似乎他决心凭借自己的人格力量来征服穆斯林的海洋。四位领头的船长，包括经验丰富的若昂·达·诺瓦，相信阿尔布开克是危险分子，说不定已经疯了。他们遭到阿尔布开克的辱骂，于是写了一封投诉信：

先生，我们以书面形式告知您（因为我们不敢口头通知），您素来对我们厉声呵斥，口出恶言。虽然您经常告诉我们，国王没有要求您与我们商议，但兹事体大，我们觉得有必要向您提出建议。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应当受到惩罚。[\[20\]](#)

1507年11月，阿尔布开克收到第一封信，将其撕成了碎片。船长们送来第二封时，他看都不看就把信折叠起来，放在要塞正在建造的一处门廊的一块石头下。

当有四人叛逃到霍尔木兹并皈依伊斯兰教，而维齐尔瓦加·阿塔拒绝将他们交出时，阿尔布开克大发雷霆。“我当时完全失控了。”他后来向阿尔梅达吐露心迹。他命令在岸上的船长们“杀死所有活的东西。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服从了命令，但对自己的任务非常不开心。他们上了岸……只杀死了两名老人，但良心不安，不能继续杀人。于是他们杀了四五头牲口，在遇到更多当地人时，就告诉他们赶紧逃走”。据编年史家记载，他们相信总司令“受了诅咒，要下地狱，魔鬼在他心里”。[\[21\]](#)

尽管部下反对，阿尔布开克继续对霍尔木兹开展全面战争。他给水井下毒，开始炮击城墙。“船长们陷入绝望……坚持不懈地抗议……阿尔布开克全然不在乎。他们不愿意服从一名癫狂的总司令的命令，他甚至不配指挥一艘小划艇，更不要说一支舰队了。”[\[22\]](#)阿尔布开克对部下的抗命不遵怒火中烧，有一次“抓住若昂·达·诺瓦的胸口，与他扭打，若昂开始大呼小叫，称阿尔布开克无端伤害和攻击他”。据编年史家记载，“他们看到自己的抱怨对总司令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于是商议决

定起航前往印度”。^[23]1508年1月中旬，他们抛下阿尔布开克，自行起航前往科钦，向副王报告他们版本的故事。阿尔布开克暴跳如雷。他现在只剩下两艘船，于是不得不放弃对霍尔木兹的围攻。他驶回索科特拉岛，去救援正在挨饿的守军。

葡萄牙人未能在红海巡逻，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缓缓前进的马穆鲁克舰队于1507年8月抵达亚丁。阿尔布开克9月间袭击阿曼海岸的时候，马穆鲁克舰队从他背后驶过了阿拉伯海，来到古吉拉特的港口第乌。葡萄牙人对此一无所知。

^[1]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19.

^[2]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1.

^[3]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106.

^[4]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I, part 1, Lisbon, 1778, p.61.

^[5]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88, p.81.

^[6] 神秘剧（Mystery play）是中世纪欧洲最早期的戏剧形式之一，一般讲述圣经故事，有伴唱。

^[7] 塞拉是今天索马里的一座港口城市。

^[8] 巴尔巴拉是今天索马里北部的一个沿海地区，意思是“柏柏尔人之地”。

^[9]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92.

^[10] 谢赫（Sheikh）是阿拉伯语中常见的尊称，指“部落长老”“伊斯兰教教长”“智慧的男子”等，通常是超过四十岁且博学的人。在阿拉伯半岛，谢赫是部落首领的头衔之一。

[11] Albuquerque, Afonso de [1500-80] ,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 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 1 vols, London, 1875-84, p.83.

[12] Albuquerque, Afonso de [1500-80] ,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 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 1 vols, London, 1875-84, p.82.

[13] Albuquerque, Afonso de [1500-80] ,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 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 1 vols, London, 1875-84, p.83.

[14] Albuquerque, Afonso de [1500-80] ,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 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 1 vols, London, 1875-84, p.83.

[15] 出自《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一十四。

[16] Sheriff, Abdul. *Dhow Cultures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2010, p.184.

[17]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92.

[18] 维齐尔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执行一切与臣民有关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尔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

[19] Earle, T.F., and John Villiers, ed. and trans. *Albuquerque, Caesar of the East: Selected Texts by Afonso de Albuquerque and His Son*. Warminster, 1990, p.56.

[20] Albuquerque, Afonso de [1500-80] ,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 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 1 vols, London, 1875-84, p.169.

[21]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94.

[22]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95.

[23]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95.

13 朱尔的三日

1508年3月

沿着印度西海岸，洛伦索·德·阿尔梅达忙个不停，不断开展航海活动。1507年12月底，本年度的香料舰队返航了，他又奉命执行护航任务。1508年1月，他沿马拉巴尔海岸北上，护送一支来自科钦的商船队。途中，他抓住机遇，烧毁了一些阿拉伯商船，并破坏了忠于扎莫林的港口。对这位年轻的指挥官来说，达布尔还是个伤心之地。他这一次逼近达布尔，促使当地人迅速投降并立刻纳贡。2月，商船队及护航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桨帆船和卡拉维尔帆船抵达了最终目的地，朱尔的贸易站，它位于一条河流入海口的弯曲处。

适合航海的季节快结束了。不久雨季就会来临，大海不再能通行，葡萄牙人期望可以在科钦过冬，在无事可做的几个月里休养生息并修理船只。水手们很疲惫；洛伦索之前负的伤还没有痊愈；船舱内满是在沿海地区掳掠来的战利品；气温也在升高。与此同时，他们负责护送的科钦商人在懒洋洋地慢慢做生意。一个月过去了。3月到了。地势低洼的朱尔潮湿得让人难以忍受。葡萄牙人无事可做，终日饮酒，与舞女嬉戏，变得懒散怠惰。洛伦索束手无策，倍感挫折。他知道，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的舰队很快将加入他们。

在他们等待科钦商人结束装船的时候，洛伦索耳边听到了一些含混不清的传闻：一支埃及舰队即将赶来；它曾在古吉拉特的关键港口之一第乌停靠，就在坎贝湾对岸200英里处；这支舰队要来向法兰克人开展圣战；舰队的士兵是白人（可能是土耳其人），并且斗志昂扬、装备精良且拥有火炮。这些传闻的来源五花八门：来自朱尔当地人，来自一名从第乌来拜见洛伦索的德高望重的婆罗门，以及最后来自副王本人。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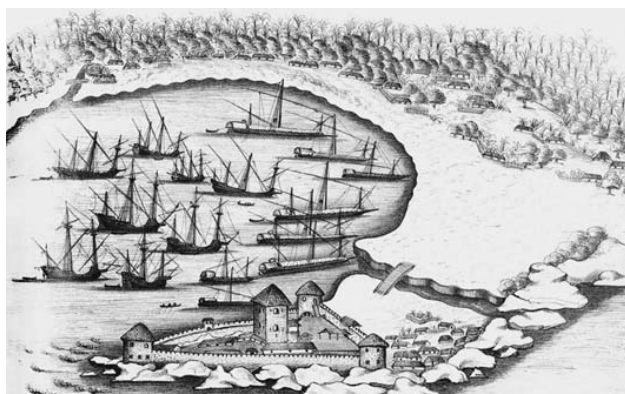
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显然相信并不存在值得担忧的严重威胁，他只派来了一艘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葡萄牙人目前为止遇到的任何舰队能够抵御葡萄牙的炮火，即便是在葡萄牙船只远远少于敌人的时候。洛伦索对这些报告并不在意。

事实上，动作迟缓的埃及舰队早在六个月前就抵达了第乌，此前经历了漫长而蜿蜒曲折的航行，消耗和损失相当大。由于拖欠军饷，有不少士兵逃亡；两艘船哗变；四分之一的士兵于途中在阿拉伯半岛的战斗中阵亡；在第乌，侯赛因·穆斯里夫得到了当地总督马利克·阿亚兹相当谨慎的接待。阿亚兹是个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原先是来自高加索的奴隶兵，在古吉拉特的穆斯林苏丹统治下崛起到高位，第乌差不多算是他的私人封地，拥有自己的弗斯特船（一种小型的桨帆船）舰队。阿亚兹精明、务实，并且极其狡黠，对海上的力量对比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与外界的贸易，包括出口棉花和头巾（这些商品已经不能运往埃及），被葡萄牙人的封锁搞瘫痪了。要想在第乌维持独立，他需要在两大难以对付的强大力量——在印度洋势力越来越强的葡萄牙人和决心消灭葡萄牙势力的穆斯林——之间灵活机动。现在他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即尽管知道法兰克人迟早会来“拜访”他，但如果他不参与圣战，就会遭到强大的宗主——古吉拉特苏丹的毁灭。他已经尝试与副王秘密谈判，但知道自己必须小心翼翼。

侯赛因进入这个地区，带来了明确的战略计划和圣战呼吁。回应他的人当中有马伊玛玛·马拉卡尔，即1503年被维森特·索德雷羞辱的那位阿拉伯商人。马拉卡尔在开罗奔走呼号，为扎莫林鼓吹，努力推动苏丹打造一个反对可恶的基督徒闯入者的泛伊斯兰统一战线。他带着一艘自费装配的大船和三百名士兵（其中不少是来自他自己所在部落的本领高强的弓箭手）来到了第乌。他们宣誓要为信仰复仇，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船也配备了不错的火炮和弹药。

埃及人在朱尔有间谍，所以掌握的情报要比由于酷热而无精打采的葡萄牙人丰富得多。他们知道洛伦索的兵力多么微薄，他有三艘小型克拉克帆船、三艘卡拉维尔帆船和两艘桨帆船，约五百人。侯赛因的目标是发动突然袭击，将洛伦索的队伍彻底消灭，然后对付正在封锁卡利卡特的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在雨季到来前切断位于科钦和坎纳诺尔的要塞的联系。现在他要求阿亚兹支持他。第乌总督别无选择，只得做出热情洋溢的样子。加上阿亚兹的小舰队之后，侯赛因一共有四十五艘船，包括四十艘弗斯特船和桨帆船，以及苏伊士的欧洲造船匠建造的一艘盖伦帆船^[1]和四艘克拉克帆船。这将是争夺印度洋权力与贸易的一次决定性大摊牌。

3月的某个星期五——星期五是穆斯林常选择发动战役的日子。在朱尔，葡萄牙人在昆达利卡河两岸消磨时光。科钦商人的船还在河北岸的朱尔城旁边装货。葡萄牙船只零零落落地停泊在河面上。洛伦索的旗舰“圣米迦勒”号和他经验丰富的副将佩罗·巴雷托的“圣安东尼奥”号停泊在河中央。其他船只更靠近南岸，船首指向陆地。很多水手在岸上，洛伦索正与其他贵族投掷长矛取乐。



在印度沿海的航海活动中，葡萄牙人既用桨帆船，也用帆船

临近中午时分，微风拂面，瞭望哨看到海上出现了五艘欧洲的克拉克帆船。他们以为这是等待了许久的阿尔布开克舰队，兴高采烈地欢迎

它们。人们放松身心、饶有兴趣地停下观看五艘船接近，但一名老兵更仔细地观察了那些船的索具。他向自己的侍从喊道：“我们现在要武装起来，我们全都要！”他命令侍从取来他的胸甲，开始迅速穿上胸甲。站在周围的其他人嘲笑他。“这些开过来的阿尔布开克船只，”他反驳道，“帆上没有十字架。他们升的是穆罕默德的旗帜……先生们，我向上帝祈祷，愿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是傻瓜，今天落日时你们还能嘲笑我。”^[2]

那些船驶入了河口。在克拉克帆船后面有六艘秩序井然的桨帆船在前进。现在所有人都能看到，那些船上飘扬着红白两色的旗帜和画有黑色新月的三角旗。这景象非常壮观，武士们头戴绚丽的头巾，甲冑外面披着色彩鲜艳的丝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如此大张旗鼓地驶入河口，奏响许多喇叭，再加上他们武器的光辉，令人胆寒。我们的人终于认识到，这些新来者是鲁姆人”。^[3]他们是来打仗的。

葡萄牙舰队发生了恐慌。士兵们匆匆奔向划艇，以便返回停在岸边的大船。他们披挂铠甲，抓起剑、头盔和火枪。未做好发射准备的火炮被推出来；桨手们疯狂地努力将桨帆船调转过来，以便将船首炮对准敌人。一时间到处是呼喊和咆哮，命令和相反的命令。侯赛因在河口暂停，等候阿亚兹那慢吞吞的弗斯特船，所以葡萄牙人有时间摆开阵势，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纪律性。第乌总督假称遇到了某些困难，将自己的船停在河口外，以便坐山观虎斗，然后见机行事。侯赛因无所畏惧地继续推进，从脆弱的科钦商用桨帆船旁驶过，未发一炮，逼近“圣米迦勒”号和“圣安东尼奥”号，这两艘船距离其他葡萄牙船很远，停在河中央，非常孤立。侯赛因的打算是以第一轮猛击摧毁洛伦索的旗舰。

双方之间的距离在缩短，穆斯林战船上两门炮从侧舷开火。一发铁弹丸击穿了“圣米迦勒”号船体，但无人死亡；“圣米迦勒”号从船首到船尾整个晃动起来。这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第一次遭到炮击。穆斯林弓

箭手用他们短而柔韧的土耳其弓射出嗡嗡作响的“阵雨般”的箭矢，每分钟能射出二十支箭。^[4]“圣米迦勒”号的桅杆上扎满了箭；船上一百人当中有三十人中箭负伤。但葡萄牙武士用激流般的弩箭和火枪枪弹还击，船上炮手有足够的时间为大炮做好射击准备，并开炮还击。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双方船只都被浓烟笼罩，后又重新浮现。“圣米迦勒”号的八发炮弹击中了挤满四百名战士的穆斯林战船。网兜也无法减弱这轮大炮齐射的威力，炮弹从队形紧密的士兵队伍中呼啸冲过，击碎铠甲，打得血肉横飞。碎木片更是造成了更严重的杀伤。甲板上一片狼藉。侯赛因原想尝试强行登上敌船，后来改变了主意。借助朝向陆地的微风和潮水，他从葡萄牙克拉克帆船（现在得到了两艘桨帆船的支援）旁驶过，然后停泊在河对岸上游处，其他穆斯林战船也跟了上来。

洛伦索看到侯赛因旗舰遭到损伤，决定乘胜追击。这就需要用划艇将打头阵的克拉克帆船拖曳着驶向敌船，但他没有用桨帆船提供支援，所以这个动作执行得很笨拙。侯赛因派遣自己的桨帆船上前，向脆弱的拖曳划艇射出毁天灭地的火网，它们不得不后撤。洛伦索的进攻只得放弃。

高度紧张的一天结束了。两支舰队在小小的战场纠缠着，分别停在两岸，之间距离仅有500码。科钦商船还停在城镇前方的河边，没有受到骚扰。双方都在医治自己的伤员，清点损失。侯赛因的战船损失惨重，伤亡数字高得惊人，他的火药也所剩无几。夜幕降临时，葡萄牙船长们乘小艇来到“圣米迦勒”号上开会商议。因为没有外界消息，他们举棋不定。他们决定派遣巴尔塔扎尔（译员加斯帕尔·德·阿尔梅达的儿子，懂多种语言）上岸，去朱尔打探消息。他得知，侯赛因在等待马利克·阿亚兹赶来，以便发动新的进攻；在此期间，他也在努力笼络当地人。目前当地人保持着谨慎的中立，等着看局势如何发展。

天亮之后，洛伦索可以看到侯赛因将其战船摆成了紧密的防御阵

形。它们靠岸摆开阵势，用铁链锁起来，船首指向河流，互相之间还用跳板连接，以便在战斗中快速地从一艘船向另一艘调动兵力。这简直是战术上的自杀。他的克拉克帆船在这种阵形下将无法运用侧舷的射石炮，也逃脱不了。侯赛因把他的舰队从一支进攻性力量变成了蜷缩在一起的营地，等待阿亚兹的支援。但是，阿亚兹还在外海闲荡。在此期间，侯赛因的舰队就是瓮中之鳖。

侯赛因不知道的是，他的对手的思维同样不正常。第二天早上在“圣米迦勒”号上召开军事会议时，敌人舰队的意图昭然若揭，葡萄牙人决定发动进攻。他们需要吹向陆地的风，而这种风要到中午才会刮起来。眼下他们有两个战略选项：要么炮击埃及船只，要么猛攻上去。

在一份可能是由编年史家捏造的演讲中，洛伦索的主炮手，德意志人米歇尔·阿尔瑙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不要拿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士兵去冒险，因为你们想要的，能够以安全的手段得到，只有我和我的伙伴们会遇险。”如果洛伦索同意把克拉克帆船调动到他指定的位置，洛伦索的部下都可以离船上岸暂避，阿尔瑙的炮手可以在夜幕降临之前击沉敌人的整支舰队，“如果办不到……你可以下令砍掉我的双手”。

在达布尔怯战的阴影还笼罩着聚集在船舱内的所有人。洛伦索需要重建威望和公信力。炮击虽然是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但在葡萄牙贵族的荣誉法则里却几乎是与怯懦联系在一起的。获得荣耀的途径是个人的英勇、肉搏战和掠夺战利品。于是，按照科雷亚从后见之明来看的记载，“他们渴望荣誉和财富……对德意志人的建议不予理睬。他们决定登上敌船厮杀，用剑来赢得荣誉”。^[5]副将佩罗·巴雷托比较冷静，可能支持阿尔瑙，但他们的意见被推翻了。会议决定采取肉搏战，尽管那正中侯赛因的下怀。

虽然鲁姆人的舰队已经遭到重创，但葡萄牙人的任务仍然不简单。

鲁姆人的克拉克帆船比洛伦索的船大得多，也高得多，可以从甲板上倾泻投射武器。而且操纵帆船接近敌船以便近距离攻击是很困难的，因为风向多变难测，潮水和涡流也难以驾驭。葡萄牙人拟定了进攻计划。“圣米迦勒”号和“圣安东尼奥”号将两面夹击侯赛因的旗舰。其他葡萄牙船只则与穆斯林战线的其他部分交战，将其牵制住，以阻止它们向侯赛因旗舰输送援兵。葡萄牙的轻型卡拉维尔帆船和桨帆船负责攻击敌人的桨帆船。

星期六下午早些时候，借助潮涌和海风，葡萄牙船只起锚，开始向河流上游行驶。打头阵的“圣米迦勒”号接近目标时，又遭遇暴风雨般的箭矢袭击。葡萄牙人为了避免损坏可能很珍贵的战利品，没有让自己的大炮火力全开。尽管侯赛因那身形较高的战船嗖嗖地不断射箭，“圣米迦勒”号还是逼近了，一直开到距离敌船只有10码或15码的位置，但这时葡萄牙人的进攻计划突然垮了。风向变了，然后完全停息。船只在潮涌控制下漂走。惯性足以驱动“圣米迦勒”号继续向前，与敌人旗舰搏斗，而“圣安东尼奥”号落在后面。但侯赛因把握住机会，成功执行了一次超乎寻常的机动。他的水手放松了船首锚的缆绳，而收紧船尾锚的缆绳（另一端系在岸上），所以船向岸边后退，避开了葡萄牙船只进攻的路线。“圣米迦勒”号的舵无法纠正航向。它漂移着从目标一旁驶过。

“圣米迦勒”号的副水手长本能地决定落锚，以防止船只从目标旁滑过，而跟在后面的葡萄牙船只都类似地被迫放线落锚，以防撞上前面的船只。进攻于是停顿了。葡萄牙船只凌乱地停在河中央，一动不动。洛伦索对这突然的混乱暴跳如雷，从甲板上跑过，手持利剑，要杀掉搞砸了整个进攻行动的肇事者。副水手长考虑了自己的选择，觉得还是更害怕洛伦索的惩罚，于是跳水逃生游上了岸，不过后来还是被杀掉了。

对洛伦索的船员们来说，形势现在非常危急。“圣米迦勒”号已经下锚，懒洋洋地在潮水中摆动，距离敌船只有咫尺之遥，而敌船能够从更

高的位置上用投射武器攻击它。若没有精良甲冑就暴露自己的身形，显得很不明智。主炮手米歇尔·阿尔瑙躲避着敌人的火力，又一次提议扭转船身，以侧舷面向敌人，如此他就可以在抵近距离把埃及船只轰得粉身碎骨。但是，洛伦索不肯在未夺得战利品且丧失荣誉的情况下离开战场。敌人的投射武器继续扫射“圣米迦勒”号的甲板。葡萄牙水手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洛伦索蛮勇鲁莽地坚持在敞开的甲板上发号施令。他成了一个很明显的目标。第一支箭仅仅从他身旁掠过，第二支箭则命中了他的面部。他血如泉涌，终于命令起锚，逃离箭雨。“圣米迦勒”号和“圣安东尼奥”号向下游撤退，在敌人弓箭射程之外停船。

与此同时，两艘葡萄牙桨帆船和一艘轻型卡拉维尔帆船因为能够在减缓的风中活动，所以运气比较好。它们从丧失机动力的克拉克帆船旁经过，攻击停泊在战线较远处的埃及桨帆船。它们逼近敌船时，同样遭到箭雨袭击；桨帆船上没有防护的划桨奴隶纷纷中箭，直到倒在自己的桨上，但葡萄牙人的进攻所向披靡，撞向停泊着的敌船。葡萄牙武士们得到链甲、钢胸甲和头盔的良好防护，横冲直撞地攻上敌船，横扫甲板，践踏被锁在桨位上的桨手，风卷残云般砍倒敌兵，用长枪、戟和巨大的双手重剑将敌人推下水。这群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葡萄牙武士的进攻是不可阻挡的；每艘穆斯林战船都化为屠宰场，甲板上血流成河，走路都容易滑倒。穆斯林士兵或战死在自己的岗位，或跳船逃命，或通过跳板逃到邻近的其他桨帆船上。每艘桨帆船都被扫荡干净之后，葡萄牙人继续追杀抱头鼠窜的敌人，从跳板紧追不舍。跳入大海的穆斯林则被乘坐划艇的葡萄牙人猎杀，穆斯林逃往岸边的道路又被一艘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切断了。泅渡逃命的穆斯林四面受敌，就像落入圈套的金枪鱼，被小艇上的葡萄牙人残酷地杀死。这是一场屠杀。

四艘被抛弃的穆斯林桨帆船被当作战利品拖走，而“圣米迦勒”号和“圣安东尼奥”号开始在一段距离之外炮击埃及的克拉克帆船，瞄准它们的索具。一发炮弹幸运地击落一艘敌船的桅杆瞭望台，杀死了上面的

所有人员。其他船的桅杆顶端的战斗平台被抛弃了。为圣战而丧命的人当中包括马伊玛玛·马拉卡尔，他一度站在艏楼甲板，用《古兰经》的诗句鼓舞士兵。

穆斯林桨帆船上的水手遭到屠戮，克拉克帆船的船员又被葡萄牙炮火打得抬不起头，并且被战友们遭到的灭顶之灾而震惊，于是战局似乎转为对洛伦索有利。他受到这鼓舞，又一次考虑攻击侯赛因的旗舰，想在这一天大获全胜。在“圣米迦勒”号上，大家又为下一步如何是好而激烈争论起来。此时没有风。洛伦索希望用小艇拖曳大船，再次尝试进攻。船长们非常不愿意这么做：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很多人负了伤，包括洛伦索自己；天色已晚；若遭到敌人顽抗，必将导致灾难。阿尔璘又一次提议从安全距离用炮火击沉敌船。洛伦索仍然固执己见。他希望，也需要向父亲送去战利品，而不是眼睁睁看着敌船沉没。虽然船长们可以用多数票压服洛伦索，但达布尔事件之后他们可能也不愿意这么做了。当他们还在争执不休时，局势又发生了逆转。

此时差不多已是薄暮时分。他们向外海眺望，看到一线轻型桨帆船进入了河口。那是马利克·阿亚兹和他的三十四艘弗斯特船。在观望和煎熬了一整天之后，第乌总督得出了结论，他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了：若在伊斯兰事业中被人指控故意耽搁或怯懦，会危害他自己的地位。鲁姆人的舰队响起了一阵阵欢呼。他们指手画脚地宣称要将葡萄牙人吊死，而大部分人是穆斯林的朱尔当地居民之前也持观望态度，现在则公开表达自己热切希望伊斯兰舰队获胜。他们来到海滩上，向疲惫不堪的敌人射箭。“圣米迦勒”号上的作战会议不得不再一次重新考虑。此时，他们在河口面对三股敌人。停泊在城镇附近的科钦桨帆船在当天的战斗中被双方遗忘，而葡萄牙人应对其安全负责，这些科钦桨帆船的处境此时越来越危险。

阿亚兹的前进非常谨慎。他没有形成横队以支援侯赛因，而是在河

流南岸附近摆开阵势，也就是这一天早上葡萄牙人占据的位置。他对正在演化的局势仍然持谨慎态度。他尝试派遣三艘船与侯赛因取得联系，但洛伦索把它们打退了。直到天黑之后，阿亚兹才与侯赛因见上面。侯赛因需要火药和炮弹，因为他急缺这些物资。他还要训斥阿亚兹，因为后者在这一天激战结束、死了两百多人之后才姗姗来迟。

葡萄牙舰队里的气氛很严肃。在这一天的跌宕起伏、攻击与撤退之后，大家筋疲力尽，火药也剩下不多了。穆斯林的胜利欢呼在黑暗中隔着河面传来。负伤的洛伦索发起高烧，不得不卧床。侍奉他的医生们给他放血。

在“圣米迦勒”号上，船长们还在激烈地争论。他们确信无疑，天亮之后，终于装满货物的科钦桨帆船会受到严重威胁。若是它们损失掉，对负责保护它们的葡萄牙人来说是奇耻大辱，会进一步损害葡萄牙的公信力。务实的解决方案是乘夜色借助夜风溜走。暂时担任总指挥的佩罗·巴雷托激烈反对逃走，另一位船长佩罗·康持同样的意见，他说：“因为他们的罪孽要求他们逃跑，那么至少不要表现出逃跑的意图，免得葡萄牙人在印度丢尽颜面。如果马拉巴尔商船先离开，然后他们（葡萄牙人）在黎明时离开，那么敌人就不能说他们（葡萄牙人）是因为怯战而逃离战场。”^[6]所以，这仍然是荣誉的问题。他们哄骗其他人同意于拂晓起航，并将俘获的穆斯林桨帆船拖在身后，以此羞辱敌人。

午夜时分，在月光下，科钦商船开始静悄悄地溜出停泊地，借助风力驶向外海。天快亮时，葡萄牙人也偷偷跟了上去。没有口哨声，没有呼喊。他们开始起锚，或者割断缆绳，把锚留在海底。这种策略被顽固不化的巴雷托搞砸了，他不肯如此灰头土脸地撤退。他大张旗鼓地爬上一艘小艇，拉起大船的锚。敌人立刻发现了他的动作，开火射击。收回锚之后，他又登上自己的大船。洛伦索的伤势有所恢复。他要求“圣米迦勒”号最后一个撤离，并决心效仿巴雷托的蛮勇，亲自监督起锚。

此时，侯赛因已经让他麾下两艘毫发未伤的克拉克帆船起锚。阿亚兹认为葡萄牙人在逃离战场，于是终于决定现在是表现自己“英勇”的时候了，同样也让自己的弗斯特船做好战斗准备。洛伦索正在小艇内起锚。在他背后，大船的大副看到天色越来越亮，敌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不禁魂飞魄散。他砍断了系锚的缆绳，让洛伦索一段时间内被困在小艇之上。

穆斯林借助退潮，在河中顺流而下，追击敌人。大多数葡萄牙船只能够击退对方，逃离河口。但“圣米迦勒”号落在后面，而且因为拖曳着一艘缴获的桨帆船，动作比较迟缓。所以，“圣米迦勒”号是最容易被命中，也最有吸引力的目标。侯赛因集中力量，希望一举击沉敌人的旗舰。而“圣米迦勒”号的船长没有跟随撤退的战友，而是将船转向远岸，以便与敌人的舰队拉开距离。

阿亚兹的弗斯特船的轻型射石炮尝试轰击“圣米迦勒”号的舵，以剥夺其行动能力。一发石弹击中了靠近吃水线的船尾部，击穿了一块木板。葡萄牙船上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的全副注意力集中于打退不断撕咬的弗斯特船和侯赛因的两艘克拉克帆船。“圣米迦勒”号继续航行，海水缓缓渗入舱内的贵重货物中。水手们还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船越来越笨重，反应越来越迟缓。这时风停了。“圣米迦勒”号一下子完全被潮水掌控，而潮水涌向南岸，当地渔民在南岸的水中安插了木桩，以便停泊他们的渔船。“圣米迦勒”号随波逐流，被困在这些障碍物当中，因为漏水而越来越沉重的船身使得它动弹不得。水手们努力操控船只移动，但无济于事。一艘葡萄牙桨帆船（船长是帕约·德·索萨）尝试拖曳“圣米迦勒”号，也失败了。一些水手奉命上岸，用斧子砍掉那些碍事的木桩。但“圣米迦勒”号舱内进的水使得它越来越稳固地卡在木桩之间；现在船身的倾斜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甲板倾斜，船首上扬。

一时间，大家无法理解问题所在。船首的倾斜态势非常明显之后，

他们才确认船尾在漏水。洛伦索派遣领航员下船舱调查。在黑暗中，领航员惊恐万状地发现了真相：舱内满是海水和大米，晃来晃去。他回去报告的时候面如土色。他们没有办法舀水，舱内的水太深了，而且大米会阻碍水泵的工作，此外身体健全、能够操作水泵的人手也不够。所以，此船实际上是完蛋了。领航员结束报告之后，“回到舱内，他们说他们活活吓死了”。^[7]洛伦索命令切断缆绳，放开俘获的桨帆船。阿亚兹意识到“圣米迦勒”号是一头受伤的困兽，于是开始用自己的弗斯特船包围它，而侯赛因的两艘克拉克帆船也逼近了。

帕约·德·索萨仍然打算用他的桨帆船营救指挥官的旗舰。根据当事人后来的记载，到此时，葡萄牙舰队开始感受到恐惧，有的水手主张继续战斗，有的人则打算逃走。桨帆船上的很多人已经负伤，“圣米迦勒”号纹丝不动，敌人步步紧逼。有的水手后来说，在帕约·德·索萨的桨帆船尝试拖曳“圣米迦勒”号的时候，拖曳绳索崩断了。真相更可能是有人割断了绳索。桨帆船被潮水带往下游。索萨企图调转船头，再试一次，但他的部下做不到，或者不愿意了。其他葡萄牙船只疯狂地努力回身去营救陷入困境的旗舰，但它们已经到了下游很远的地方，有心无力。

阿亚兹和侯赛因感到，杀戮时刻到了。重量越来越大的海水使得倾斜的“圣米迦勒”号下沉得越来越厉害。穆斯林的弗斯特船和克拉克帆船忙碌地向它射出箭雨。对葡萄牙贵族来说，当务之急是将洛伦索活着救走，因为“他能不能活下去，关系到葡萄牙的荣誉”。^[8]他们命令水手长准备放下小艇，并集合起能够划桨的一群人。但是，洛伦索不肯逃走，他要留下来死战到底。他的部下坚持要带他走，他用戟威胁他们。

海水还在灌入船体；现在船上只有约三十个身体健全的人。洛伦索把还能站立的人分成三组，每组一名组长，努力保卫“圣米迦勒”号。三个小组分别在船尾、主桅和艏楼处。水手长精神崩溃了。他解下小艇，

借着潮水来到“圣安东尼奥”号，向忠诚的佩罗·巴雷托撒谎，说他是奉命来求救的。巴雷托的帆船在逆流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办法移动；他爬上小艇，命令水手长去找最近的桨帆船“圣克里斯托弗”号，它至少还有机会用人力划船，返回受困的旗舰那里。他哀求“圣克里斯托弗”号的船长迪奥戈·皮雷斯尽力而为，告诉他“洛伦索能否活命，取决于他”。^[9]皮雷斯开始努力鼓舞船上的划桨奴隶行动起来，但他们精疲力竭，不肯行动。在绝望和狂怒之下，巴雷托开始用剑砍杀划桨奴隶。他杀死了七人，然后承认这样也不是办法。他转向自由身的葡萄牙人，他们同样“不愿意划船回去”。^[10]他尝试强迫他们坐到桨位上去，但没有任何希望。他别无办法，只能回到自己船上，希望风向转变，或许能把“圣米迦勒”号推走。每一分钟的流逝都越加表明，这需要一个奇迹才行。

“圣米迦勒”号上仿佛人间地狱。穆斯林的弗斯特船发射的箭狠狠插入动弹不得的船体；云团般的箭呼啸着从空中掠过。浓密的硝烟遮蔽了越来越无力自卫的帆船。甲板倾斜的角度已经很大了，船上的有些火炮已经被淹没。随着船体不断渗水，船上的火药也失效了。守军打退了敌人一次或两次登船的企图。他们“奋勇拼杀，就像是渴望在临死前报仇雪恨的人”，^[11]但在他们周围，“圣米迦勒”号正逐渐死亡。甲板上面一片狼藉，满是尸体和垂死挣扎的人，飞落的人头和腿，木板上的血像小溪一样流着。到处都是犬牙交错的碎木片、绳索、被抛弃的武器，以及呼喊声和惨叫声。

身材魁梧的洛伦索身穿鲜亮的铠甲，身形非常明显，是一个不可能错过的目标。一门轻炮的炮弹在他大腿处切断了他的腿，顿时血如泉涌，且止不住。他还有意识，尽管生命在迅速流失。他请求把他扶到桅杆脚下的一张椅子上。不久之后，另一发炮弹击碎了他的胸膛，夺去了他的性命。他的仆人洛伦索·弗莱雷俯身在阵亡的指挥官身上，号啕大哭，随后被打死在他身旁。船上还活着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船是守不住

了。他们急于阻止洛伦索的尸体被敌人当作战利品抢走、剥皮、塞入稻草并拿到伊斯兰世界各地游行展出——那将是葡萄牙人无法容忍的——于是他们把洛伦索及其忠仆的尸体拉进了淹水的船舱。

葡萄牙人坚持奋战，已经不能站立的人也硬撑着，坚定不移地握着剑。穆斯林之前是在一段距离之外炮击“圣米迦勒”号，现在他们逼近了。他们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企图登船，仍然被击退。阿亚兹那边死伤惨重。第六次进攻的时候，“圣米迦勒”号已经化为屠戮场。葡萄牙人已经没有还击的火力了。穆斯林欢呼胜利，跳上敌船，包围了幸存者。征服过后，穆斯林迅速转向抢劫。胜利者热切地想看看从正在沉没的船上还能挽救什么金银财宝。他们用剑威逼一些俘虏走在前面，共有一百人走下了淹水的船舱，寻找战利品。因为人太多，下层甲板坍塌了；黑暗中他们坠入海水，全都溺死了。

最后的十八名葡萄牙人几乎全都带伤，被穆斯林俘虏。还有最后抵抗的一幕。来自波尔图的水手安德烈·费尔南德斯爬上桅杆瞭望台，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企图将他从倾覆的船顶端驱赶下来，就是不肯下来。他在那里待了两天，向下方的人投掷石块，辱骂他们。最后阿亚兹承诺允许他安全地离开，这才把勇敢的水手哄骗下来。

侯赛因的两艘克拉克帆船离开了“圣米迦勒”号残骸，开始追击停泊在河口附近观战的其他葡萄牙船只。其中一些船只割断缆绳，可耻地逃走了，向南逃往科钦。但佩罗·巴雷托岿然不动，展开风帆，准备作战。埃及战船后退了。

阿亚兹未能生擒洛伦索，大失所望；他还希望能找到洛伦索的尸体。但这位勇士的尸体在沉重板甲的拖拽下，已经消失了，可能从船底的某个窟窿里坠入了朱尔河，始终没有找到。“堂洛伦索就这样牺牲了，”编年史家卡斯塔涅达写道，“八十名葡萄牙人与他一起阵亡，其中有若昂·罗德里格斯·帕桑尼亚、若热·帕桑尼亚、安东尼奥·德·圣帕约、

随船代理商迪奥戈·维利乌和佩罗·巴雷托的一个兄弟，其他人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了。”^[12]

荣誉、光荣、恐惧、对战利品的贪婪和噩运，酿成了此次大祸。如果葡萄牙人听从主炮手的意见，完全可以在远距离用炮火消灭整支埃及舰队，但这不是葡萄牙人的战斗风格。剩余的人驾船撤离，几乎都没有损伤。他们在朱尔可能损失了两百人。杀死副王的儿子，给开罗的苏丹和伊斯兰世界的勇气增添了极大威望。几个月后，战胜“肆虐印度洋的欧洲人”的喜讯传到开罗，人们欣喜若狂。“苏丹大喜过望，命令连续三天击鼓庆祝。”伊本·伊亚斯记载道，“侯赛因要求提供援军，以彻底消灭残存的欧洲人力量。”^[13]

侯赛因肯定需要更多生力部队。他在朱尔的胜利总的来讲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14]。他原先的总兵力应当不超过八百人，这一役却损失了六七百人。他的部队也开始畏惧欧洲人大炮的威力。至于阿亚兹，他拒绝将十九名葡萄牙俘虏交给埃及指挥官。他善待这些俘虏，确保他们的伤得到医治，并把他们展示给贵宾。他很睿智和谨慎，知道此役还不算完，还会有更多的后续。这些俘虏就是他将来讨价还价的筹码。

逃到科钦的葡萄牙船只不得不面对副王的暴怒和悲痛。让他们更加困惑的是，有三艘大船跟在他们后面。直到这三艘船接近，他们才看到桅杆上飘着葡萄牙旗帜。这些船就是掀起哗变、反抗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的三位船长的座驾，此时正在前往科钦，要陈述他们的冤屈。

^[1] 盖伦帆船是至少有两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在16~18世纪被欧洲多国采用。它可以说是卡拉维尔帆船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船身坚固，可用作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比克拉克帆船低，生产三艘克拉克帆船的成本可以生产五艘盖伦帆船。盖伦帆船被制造出来的年代，正好是西欧各国争相建立海上强权的大航海时代。所以，盖伦帆船的面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

^[2]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p.754-

755.

[3]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90.

[4]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90.

[5]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p.757-759.

[6]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95.

[7]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96.

[8]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97.

[9]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98.

[10]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98.

[11]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98.

[12]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399.

[13]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138.

[14] 前280年和前279年，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击败罗马军队，但自己也损失惨重。有人向他祝贺胜利，他说，这样的胜利再来一次，他就要完蛋了。从此“皮洛士式胜利”指空虚无意义的胜利，虽然名义上取胜，但差不多等同于失败。

14 “法兰克人的狂怒”

1508年3~12月

和朱尔战役幸存者一同返回科钦的那些哗变水手，把暴跳如雷的阿尔布开克丢在了霍尔木兹。他只有两艘船；他不得不丢人现眼地放弃攻打霍尔木兹的战役，返回索科特拉岛，营救那里嗷嗷待哺的驻军。他于8月返回霍尔木兹，希望最终攻下城市，但发现自己那未完工要塞被武装起来反对他，而街道也被封锁了。他不得不第二次撤军。

1508年中期，印度洋上不断有书信穿梭往来，还有一些报告被送回里斯本。阿尔布开克怒气冲冲地写信给阿尔梅达（在1508年年底之前，阿尔梅达仍然是他的上级）：

若不是这些人抛下我，十五天内霍尔木兹必然投降……我无法想象，他们受了什么冤枉，竟然要离开我！如果他们说我虐待他们，那么我恳求阁下把他们的指控以书面形式记录在案……然而，他们的罪孽是赦免不了的，竟然在战时弃我于不顾……不管阁下给他们何种惩罚，都是他们罪有应得！^[1]

阿尔梅达在一封信里责备了阿尔布开克，不过始终没有发出这封信。他在信里可能表达了对洛伦索战死的悲愤，并指责阿尔布开克未能拦截马穆鲁克舰队的罪过。“先生，我要提醒你，国王陛下派遣你的主要任务是守卫红海出口，以便阻止印度香料运抵那里。而你在霍尔木兹逗留，完全改变了形势，丢弃了红海出口。”^[2]

阿尔布开克聪明、无畏、清廉，而且是战略大师，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国王最忠实的仆人，但曼努埃尔一世太迟钝，不能完全理解他。阿尔布开克冷傲、自负、执拗而有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让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1508年下半年，部分葡萄牙人从霍尔木兹叛逃的事件在

葡萄牙控制的印度洋引发了分歧，让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评判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并导致葡萄牙人的内斗。霍尔木兹事件透露出阿尔布开克作为领导者常常笨拙而孤立。作为征服者，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强悍，但霍尔木兹事件对他造成了损害。他发誓在攻克霍尔木兹之前绝不剃须。这是他非报不可的仇之一。

在科钦，胡须也是个大问题。在葡萄牙贵族当中，胡须是男性气概、地位和军事力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葡萄牙征服者的肖像一般都表现他们以几乎相同的姿态傲然屹立：双手叉腰，身穿黑色天鹅绒，袖子上饰有彩色丝绸，肖像的背景上有他们的纹章和头衔，胡须浓密，威风凛凛，如同战神玛尔斯。若昂·达·诺瓦的胡须遭到阿尔布开克的撕扯，前者对此义愤填膺，庄重地用一张纸包着被撕下的胡须去拜见副王，作为阿尔布开克侮辱他的证据。这些胡须对同情达·诺瓦的贵族们造成了很大影响。

阿尔梅达没有处罚从阿尔布开克那里叛逃的船长们，而是将其吸纳进自己的舰队。（对阿尔布开克来说）更糟糕的是，阿尔梅达还写信给霍尔木兹的瓦加·阿塔，为阿尔布开克的行为道歉。维齐尔幸灾乐祸地把这封信拿给阿尔布开克看，让后者瞠目结舌。但在1508年时，阿尔梅达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朱尔的灾难和儿子的牺牲对副王造成了极大震动。在战略层面上，他认识到鲁姆人在这片海域的存在威胁到了葡萄牙殖民事业的根本。在个人层面上，他也必须为洛伦索复仇。据记载，他曾说：“吃掉小鸡的人要么把公鸡也吃掉，要么就得付出代价。”^[3]

新的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持续了差不多九个月时间。首先是雨季，然后是重要性压倒一切的为本年度香料舰队装满货物的任务耽搁了他的军事计划。朱尔的噩耗伤害了阿尔梅达，而曼努埃尔一世越来越冰冷的语调对他更是加倍的伤害。副王已经失去了主公的信任。国王在1507年的书信里包含了一长串对阿尔梅达的指责和专横跋扈的命令，它们都建

基于敌视阿尔梅达的船长和嫉妒他的廷臣的谗言。阿尔梅达被指控越权行事、管理不善、未能控制马六甲、未能及时向国王汇报。阿尔布开克在副王管辖范围内的独立行动对后者也是沉重的打击。1508年，他还得知，自己将在年底被阿尔布开克取代。曼努埃尔一世战略计划的扩展，以及在时间和距离上的延迟，使得在里斯本的国王的优先目标与阿尔梅达对其的理解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1508年年底，副王清楚地认识到，歼灭鲁姆舰队是他的头等大事，也是他任期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机会。到12月时，他已经在科钦集结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包括十八艘船和一千二百人。其中包括阿尔布开克要求他处罚的那些反叛阿尔布开克的船长。

在出征前夕，阿尔梅达给国王写了一封长信。副王相信自己可能是在写下最后遗嘱，他在其中既表达了个人的哀恸、为自己行为的辩护，逐条反驳了自己遭到的指控，并表达歉意，也宣示自己已经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这是一个被工作与职责拖垮的人的遗嘱。印度对人的磨损非常厉害。酷热的气候、腐败、离家万里、周围敌人的虎视眈眈，这些都是葡萄牙殖民事业中的消耗性因素：

致最尊贵与强大的国王，我的主人，

我非常想给陛下写信，因为我必须触及那些伤害我灵魂的事情，我决心要让这些事情留下记录，不管我本人的命运如何.....按照上帝的意愿，我的儿子死了，这也是我罪有应得。威尼斯人和苏丹的穆斯林杀害了他.....因此，本地的穆斯林满怀希望，自信能得到大力帮助。我认为，今年无法避免与他们发生一次较量，这也是我最渴望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在上帝佑助下，将穆斯林彻底从这片海域驱逐，让他们再也不能回到这片土地。如果我能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残年，而对上帝有所贡献，那么我就能得到我渴求的一切：与我的儿子团聚。上帝仁慈地把他带到了天堂。那么我们将为上帝，为陛下视死如归。^[4]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Francisco de Almeida', with a stylized, flowing script.

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的签名

在阿尔梅达为此次冒险所做的解释中，有一种严峻的警示：“从马六甲到霍尔木兹的穆斯林人口多于非斯和突尼斯王国，而且所有这些穆斯林都敌视我们。”^[5]他于1508年12月8日在自己的舱室内写完了这封信。阿尔梅达的思绪非常清晰。他已经为最后的战斗做好了准备，这场战斗将决定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命运，而他愿意为此献出生命。

他正准备将这封信封印，这时传来报告，发现有船只在接近海岸。阿尔梅达的舰队起航出港，前去迎战。接近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些船只升起的是葡萄牙旗帜。原来是阿尔布开克终于来到科钦了，准备开始他的总督任期。他几乎在海上连续航行了将近两年半。他的旗舰“西尔内”号被虫蛀得千疮百孔，船舱内已经有鱼在游动。需要三十人不分昼夜持续不断地抽水，才能使它维持浮力。

两位指挥官之间进行了一次非常尴尬的会面。起初双方还算客气。阿尔布开克礼貌地要求接管东印度的管辖权。阿尔梅达指出，自己的任期直到次年1月才结束，而且他正在准备起航作战。根据某些记载，阿尔布开克主动提议由他率领舰队，代替阿尔梅达完成任务；而根据其他记载，阿尔布开克谢绝了阿尔梅达让他参加远征的邀请，因为他精疲力竭，更愿意留在科钦。或许阿尔布开克不愿意与那些曾在霍尔木兹反叛他的船长们一同行动。次日清晨，阿尔梅达的舰队扬帆起航，去猎杀埃及舰队。

恐怖与复仇，是一场对力量的考验。阿尔梅达沿着印度西海岸北上，驱动他的既有私人的仇怨，即为死去的儿子复仇；也有战略的考

量，即他深知与伊斯兰力量的最终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迫在眉睫。曾有人指控副王在解读曼努埃尔一世的命令时过于谨慎，而他如今拒绝将印度的管辖权交给阿尔布开克，等于是公开违抗御旨。他坚信要保障葡萄牙事业的安全，就必须与埃及舰队摊牌，与此同时他也在渴望复仇。他已经决定亲自执法，不管自己回到里斯本之后会受到怎样的责难。

穆斯林在朱尔的“胜利”让人们大受鼓舞，希望能将葡萄牙人逐出印度洋。扎莫林打算派遣船只与目前在第乌的埃及舰队会师，以便最终彻底铲除可恶的入侵者。然而，埃及人领导的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关系高度紧张。侯赛因知道，葡萄牙人卷土重来只是时间问题，他对形势发展并不乐观。他曾在近距离体验欧洲人的炮火。他的舰队在朱尔损失惨重；他缺少人手，也没有足够的金钱给他们发饷。他与马利克·阿亚兹的联盟也不融洽。侯赛因绝不能撤退，回国去面对苏丹的怒火。他能做的，只有希望得到增援。他热切希望杀死被阿亚兹扣押的葡萄牙俘虏，将其剥皮并塞满稻草，送回开罗，以证明自己的成功。但阿亚兹不听他的，他严密守卫着俘虏，考虑如何操纵局势。他被夹在伊斯兰世界的狂热和伊斯兰之敌的凶悍中间。

葡萄牙人的实力展示很快就要开始了。得到近期从里斯本来的增援之后，阿尔梅达目前拥有自中国人退出印度洋以来这片大洋上最精锐的舰队。而且副王情绪恶劣，沿着海岸北上时，他勒令所经过的各个小小的贸易国家投降，并为他的水手提供粮食。到1508年12月底时，他已经来到达布尔，也就是洛伦索两年前未能攻击从而酿成大祸的地方。阿尔梅达怀疑达布尔与埃及舰队串通一气。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率领战船进入河口，小心翼翼地探索前进的航道，一心要报仇雪恨。

达布尔是一座富裕的穆斯林商贸港口，得到双层木墙的良好防护，木墙前方有一条壕沟，城内还有性能不错的火炮。此时港口内停泊着四

艘古吉拉特商船，这令阿尔梅达越发愤怒。在发动攻击前夕，副王召集了船长们，做了激情洋溢的战前动员。葡萄牙人的兵力与他们眼中的敌人相比极少，所以似乎他们有理由动用极端手段。阿尔梅达提醒船长们，他们不仅要占领城市，还要“给你们对抗的敌人心里灌输极大的恐惧，让他们魂飞魄散。你们知道，现在他们因为我儿子和其他人的死而洋洋得意、不可一世”。^[6]

船长们严格执行了这些命令。12月31日黎明，舰队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然后从港口两端同时发起登陆进攻。壕沟前方守军的抵抗被葡萄牙人的钳形攻势粉碎了。木墙陷落，守军抱头鼠窜，葡萄牙人穷追不舍。他们武装到了牙齿，而且身穿板甲，不怕弓箭，如狼似虎地杀入城镇。随后发生的惨剧是欧洲征服史上的黑暗日子，令葡萄牙人在印度土地上遭到诅咒。

市民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向四面八方逃窜。葡萄牙人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目标就是不留活口。一名印度贵妇乘轿逃跑，被掀翻在地，与轿夫一起被杀死；小孩子被从心惊胆寒的母亲怀里抢走，被抓住脚，脑袋甩向墙壁。男女老少、漫游的圣牛和流浪狗，全都被砍倒。“最后，城里没有一个活口。”^[7]古吉拉特商船被焚毁。在有些地方，当地人的抵抗非常勇敢，但徒劳无益。这一天结束的时候，阿尔梅达将部下重新集结在一座清真寺里，并控制了街道。次日，他允许士兵恣意掳掠。士兵们分成二十人一组，把抢到的财物送到岸边。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阿尔梅达开始担心，假如当地居民重整旗鼓，那么混乱地抢劫和醉醺醺的葡萄牙人将无法应付。他秘密命人在城里纵火。藏在地下室里的人被活活烧死，拴在棚子里的牲口也葬身火海。妇女儿童哭喊着逃离燃烧的房屋，但副王派遣士兵将他们砍倒。全城一片狼藉：牛的哞哞声，王宫马厩内着火的马匹的嘶鸣，人的哭喊，烧着的肉散发的味道，城内很大一部分财富化为灰烬。大火熄灭后，掳掠者在灰烬里翻检，探视仍然躺着死尸的地窖，并四处搜寻，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贵重的

东西。

阿尔梅达仅仅在摧毁沿岸居民点时才上岸，并于1509年1月5日率全军再次登船出发。穆斯林死者数量无人计算，但应当很多，葡萄牙人的伤亡微不足道。他们抵达朱尔后，阿尔梅达专横跋扈地勒令当地人准备贡金，等他击败穆斯林舰队之后回来收缴。他们发现马希姆岛（在孟买附近）空无一人。当地人已经逃走了；达布尔惨案的消息风驰电掣般传遍了整个沿海地带。这场屠杀和达伽马摧毁“米里”号一样，成为让印度人长久铭记、难以原谅的暴行。在烈焰滚滚的海岸，人们开始使用一种新的咒骂方式：“愿法兰克人的狂怒落到你头上！”^[8]

阿尔梅达继续航向第乌，一心要追踪并歼灭埃及舰队。他手里有一封马利克·阿亚兹的信。阿亚兹正与侯赛因一同准备迎战葡萄牙人，但他三心二意。在这封信里，阿亚兹寻求与副王交好，并保证称，在朱尔被俘的葡萄牙人都在他手中，且得到了善待。信里还告知了马穆鲁克舰队的部署情况等有用信息。阿亚兹又在两面下注。

如果阿亚兹在得知达布尔命运之后对自己的前景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他也很快收到了阿尔梅达的回信。阿尔梅达的口吻正式、礼貌，但咄咄逼人：

我，副王，向你，最尊贵的马利克·阿亚兹致意，并告诉你，我正率领我的骑士赶往你的城市，去寻找那些在朱尔与我的部下对抗并杀害我儿子之后躲藏在第乌的人。我带着上帝的希望前来，将要向那些人及他们的帮凶复仇。如果我找不到他们，那么你的城市也不会幸免。你在朱尔给了我的敌人那么大的帮助，你和你的城市都将付出一切代价。我如此通知你，以便我抵达的时候你能知晓我的意图。我已经在路上了。我目前在孟买岛，送信人会证明这一点。^[9]

^[1]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70.

^[2]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193.

[3] Rodrigues, J.N., and T. Devezas. *1509. Famalicão*, 2008, p.242.

[4]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p.897-898.

[5]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898.

[6]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28.

[7]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30.

[8]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30.

[9]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927.

15 第乌

1509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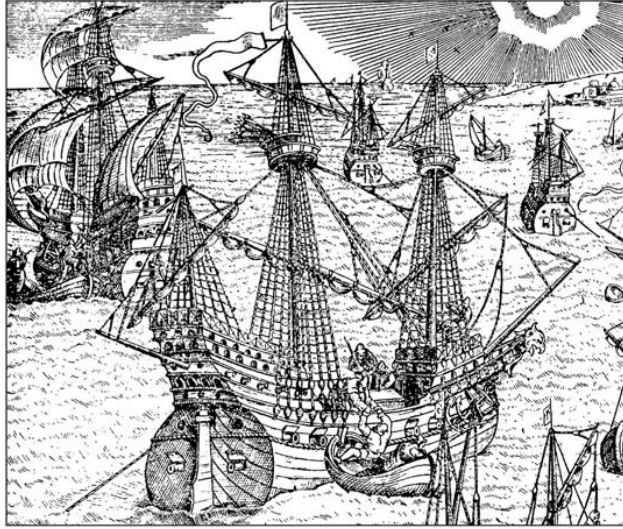
1509年2月2日，葡萄牙舰队逼近了第乌。穆斯林方面的战术讨论中满是犹豫和互相猜忌。穆斯林舰队力量包括：马穆鲁克王朝的六艘克拉克帆船和六艘桨帆船；四艘古吉拉特的克拉克帆船；阿亚兹的弗斯特船，现在数量下降到三十艘；可能还有七十艘来自卡利卡特的轻型船只。他们一共有四千到五千人。船只都停泊在第乌所在的河口内，地形类似朱尔。关于如何迎敌，穆斯林之间意见不一。

侯赛因希望早一点主动发动进攻，在葡萄牙人经历了漫长航行，还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就在外海与其交战。阿亚兹觉得这是埃及人的借口，真实目的是在情况不妙时开溜，他相信埃及人一定会借机逃之夭夭的，从而把他自己丢下来面对糟糕的后果。所以，他坚持在河里作战，如此一来既能得到岸炮的保护，还可能得到居民的支持，那样他自己也会有机会从陆路逃跑。他拒绝让自己的或卡利卡特的船只出海。阿尔梅达的威胁还在他耳边回荡，他觉得最好不要亲身涉险，便说自己在别处有紧急要务，必须处理。侯赛因旋即识破他的虚张声势，于是率领自己的战船出海，并命令阿亚兹的克拉克帆船也出海。阿亚兹被信使叫回城中，然后命令自己的船回到河上。双方陷入僵局。两位指挥官就像被捆在一起的蚂蚱，但互不信任。侯赛因在外海与葡萄牙人进行了一番毫无结果的远距离炮战之后，不得不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选择在河上作战。阿亚兹不得不参加战斗，和上次一样，他希望只是作秀一番，佯装战斗，从而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参与和损失。他原本可以用铁链封锁港口，彻底阻止葡萄牙战船进来，它们一定会被迫调头。他没有这么做，可能是另有玄机：他的盘算是，如果他封锁港口，就可能被阿尔梅达认为是敌对行动，那么他迟早要倒霉；他可能还觉得，讨厌的马穆鲁克舰队若是被

消灭了，对他是有好处的，他可以设法与副王达成和解。

这些可疑的两面三刀让穆斯林舰队又一次采取了防御姿态，就像在朱尔那样。克拉克帆船成对地停泊在岸边，排成横队，船首指向敌人的方向；先是侯赛因的六艘克拉克帆船，接着是桨帆船，然后是古吉拉特的克拉克帆船。来自卡利卡特的弗斯特船和轻型划桨船停泊在上游较远处，打算在葡萄牙人与穆斯林的大船交锋时从敌人背后发动袭击。岸炮将为舰队提供掩护火力。他们估计敌人会重复在朱尔的那种战术，认为渴望荣誉的葡萄牙人会选择近距离厮杀，而不是远距离炮击。

阿尔梅达的船上也在进行战术讨论。副王强调此役是葡萄牙事业的关键时刻——“不必怀疑，只要征服了这支舰队，我们就能征服整个印度”^[1]——并且葡萄牙人在印度的生死存亡在此一战。他希望得到亲自攻击侯赛因旗舰的光荣，但他的船长们不同意。考虑到洛伦索的死亡，他们坚决反对阿尔梅达这样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更好的办法是让他在旗舰“海洋之花”号上指挥全局，让其他人来发动第一轮攻击。这是他们从朱尔惨败学到了一些经验教训的第一个迹象。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完善了自己的战术。炮火将在此役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们将把自己最好的弓箭手和神枪手安排到桅杆瞭望台上；做好紧急情况的应急措施，如准备好用来填堵漏洞的材料和用来灭火的水，以及有关的操作人员；然后才向之前那样发动进攻。克拉克帆船将负责缠住穆斯林的克拉克帆船，桨帆船与敌人的桨帆船缠斗。强大的“海洋之花”号将成为一个浮动炮台，但上面不会有步兵。船上的少量水手和炮手将猛轰敌船，并挡住穆斯林划桨船从后方发动的反击。德意志主炮手在朱尔的一些经验教训已经被葡萄牙人吸收了。



葡萄牙人的克拉克帆船，配有大量火炮和大型战斗平台

1509年2月3日，黎明时分。舰队等待微风和潮水，以便进入很浅的河道。副王给每位船长送去了消息：

先生们，鲁姆人不会出来，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做。所以，请大家回想耶稣的受难，提高警惕，等待我的信号。海风开始吹拂的时候，我会发出信号，然后我们一起前进，给他们送上“午饭”。最重要的是，我建议大家要格外小心.....请大家警惕火灾，以免穆斯林点燃自己的船，然后用火船来冲撞你们的船，或者把你们的船的锚索砍断，将船拖到岸边。[\[2\]](#)

两个小时之后，起风了。一艘轻型巡航舰从战船队列前驶过。经过每一艘战船时，都有一人从巡航舰中登上该船，向聚集起来的全体船员宣读副王的宣告。阿尔梅达为全神贯注的听众准备的是一份慷慨陈词、动人心扉的演讲，充满了使命感和圣战的神圣感：

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印度副王，以最尊贵、最伟大的我主曼努埃尔一世国王陛下的名义。我向所有读到本文的人宣布.....此时此刻，我在第乌的沙洲，率领我拥有的全部武装力量，向埃及苏丹派来的舰队开战。这支舰队是从麦加来的，图谋攻击和损害基督教信仰，并反对我主国王陛下的王国。

他随后慷慨激昂地概述了自己儿子在朱尔的牺牲，坎纳诺尔和科钦遭到的攻击，以及卡利卡特国王的敌意。据说，卡利卡特国王“已经下令派遣一支庞大舰队来攻击我们”。他强调了局势的危险，以及“阻止这莫大危险的需求，因为如果不惩罚和消灭这些敌人，必然酿成大祸”。^[3]阿尔梅达想要的不仅是战胜敌人，还要彻底消灭敌人而在此役中牺牲的葡萄牙人将成为烈士。虽然没有史料记载穆斯林船上的战前动员，但他们极可能也呼吁士兵为真主而牺牲自我。

葡萄牙传令官在队列前行进，还奉命向每艘船上的水手宣布阿尔梅达的承诺，即胜利之后将如何奖赏大家，骑士将被擢升到更高级的贵族，犯人的刑罚将被一笔勾销。如果有奴隶阵亡，他们的主人将得到补偿；如果奴隶活下来，将重获自由。一旦打赢这场战役，所有人都可以任意掳掠财物。

风力渐强，士兵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海洋之花”号鸣响大炮，宣示进军。穆斯林阵营也在热火朝天地备战。船上挂起了网，以阻挠敌人登船，并利于己方向下面的进攻者射箭。船舷披挂着厚厚的木板，以提供额外的防护。船体在水线之上的部分挂着打湿的棉花包，以减缓敌人炮弹的冲击力。

葡萄牙人遵照传统，发出“圣地亚哥！”的呐喊，然后展开他们的旗帜。喇叭齐鸣，战鼓擂响，战船驶入河道。舰队经过时，岸上和河对岸一个小岛上的穆斯林大炮做好了准备。阿尔梅达挑选了自己最旧的一艘船“圣灵”号去打头阵，一边前进一边测深，并承受敌人的第一波攻击。“圣灵”号两面遭到炮击，“弹丸横飞，仿佛碎石的暴雨”，^[4]甲板遭到火力横扫。十人死于炮击，但舰队通过狭窄的河口继续前进，一艘一艘地逼近了他们选定的目标。

前方克拉克帆船的主要目标是穆斯林的旗舰，因为旗舰永远是海战的关键。这一次葡萄牙人决定更明智地运用他们的火炮。“圣灵”号接近

敌人之后稳住阵脚，在近距离向停泊着的敌方克拉克帆船开火。侯赛因旁边的船被直接命中，船舷被打出一个大窟窿。这艘船不断倾斜，最后倾覆沉没了，大多数船员溺死。攻击者发出欢呼声。葡萄牙战船两船一组，迅速逼近敌方旗舰。在战线另一端，战斗也打响了，克拉克帆船对决克拉克帆船，桨帆船缠斗桨帆船。在上游，阿亚兹的弗斯特船在等待机会，欲从背后包抄敌人。



第乌

双方战船混战成一团，响起乱七八糟的呼啸轰鸣。穆斯林船只落锚，等待敌人的冲击；葡萄牙船只以侧舷对准敌人，在近距离开炮，然后与敌人厮杀；埃及人竭尽全力地还击。太阳被硝烟遮蔽，“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家什么都看不清”。^[5]根据编年史家的记载，这简直是世界末日的景象。大炮的轰鸣“令人魂飞魄散，似乎是魔鬼，而不是人类的造物”。^[6]“不计其数的箭矢”^[7]从浓烟中呼啸而过；鼓舞的呐喊声呼唤着神的名字，有基督徒的上帝，也有穆斯林的真主，还有圣徒的名字。伤员和垂死挣扎者的惨叫“响彻云霄，仿佛今天就是最后审判日”。^[8]由于水流湍急、风力强劲，准确地捕捉目标变得很困难；有些船猛地径直撞上它们选定的对手，颤抖不停；有的船从敌船身侧擦过，被水流冲走；有的战船完全错过了敌人，被带往上游，暂时脱离了战斗。侯赛因的克拉克帆船上显然有本领高强的炮手和上乘的火炮，其中很多炮手是叛变的欧洲人。但他们的战船静止不动，而且船首指向敌人，所以火炮的射界有限，而且经验丰富的战士比葡萄牙人少得多。

阿尔梅达的战船上，登船小组在艏楼待命，准备在与敌船相撞的那一瞬间纵身一跃。到时他们将抛出抓钩，把己方与敌船连接起来，然后由奴隶把敌船拉近。冲撞的震撼力是爆炸性的。“圣灵”号虽然在河道里中了许多弹，还是冲向侯赛因的旗舰，即最关键的目标和整个战役的核心。抓钩甚至还没有抓牢，葡萄牙士兵们就跳上敌船，在甲板上杀出一条血路。在他们头顶上，攀附在网兜上的马穆鲁克弓箭手向他们发出暴雨般的箭矢；然后，“圣灵”号的船长努诺·瓦斯·佩雷拉率领第二支队伍冲上敌船。侯赛因的旗舰似乎马上就要失陷，但在浓烟与混战中，战局逆转往往能骤然发生。另一艘埃及的克拉克帆船在系锚允许的范围内左冲右突，开始从另一侧攻击“圣灵”号，使它像三明治的肉馅一样被夹在两艘埃及战船之间。攻击立刻转变为防御。葡萄牙人被迫放弃唾手可得的战利品，转而保卫自己的战船。在激烈的战斗中，努诺·瓦斯因为穿着板甲而感到酷热难当，于是掀起了护喉甲，想喘口气，结果中了一箭。他负了致命伤，被抬到甲板下方的船舱内。对争夺穆斯林旗舰的战斗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葡萄牙人动摇了。然后第二艘船，“伟大国王”号从另一侧撞上了侯赛因的旗舰，新一波士兵冲上船，拆掉了网兜，把攀着网兜的弓箭手困在里面。主动权再次易手。

在克拉克帆船的战线全线都爆发了类似的战斗；葡萄牙战船开炮之后就蛮勇地冲向敌人。小型战船“孔塞桑”号企图派兵登上另一艘高侧舷的穆斯林克拉克帆船；二十二人成功冲上敌船，包括船长佩罗·康。但“孔塞桑”号被水流从敌船一侧冲走，于是那二十二人就被困在敌船上孤立无援，面对数量远远多于他们的敌人。康企图通过一个舷窗从侧翼包抄攻击者，但他从舷窗一露头就被斩首。其余二十一人在艏楼拼命抵抗，直到其他葡萄牙战船发动新的进攻，他们才得救。“圣约翰”号向另一艘马穆鲁克战船冲去，十几人等待登船，发誓要跳上敌船并同生共死。“圣约翰”号撞上了目标，力度极猛，以至于反弹回来，偏向一边。在纵身跳船的一瞬间，只有五人成功登船，但很快就被大批敌人包围；三人中箭身亡，另外两人躲到屏障之后的船舱，坚守不出。他们虽然因

中箭和被碎木片击伤而失血，但一直坚持战斗，杀死了八名企图驱逐他们的敌人，最后这艘船被葡萄牙人占领，两人才得救，但那时他们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参加此役的许多葡萄牙人当中，有两人的名字永载史册：安东尼奥·卡瓦略和戈梅斯·“谢拉·丁埃罗”。但他们的敌人的名字，我们一无所知。训练有素的马穆鲁克步兵身穿灵活的链甲，头戴插着红羽饰，附有护喉甲、护鼻甲的敞开式头盔，比身披重甲的欧洲人敏捷轻快得多。马穆鲁克士兵打得非常勇敢，但他们的人数较少，而且阿亚兹对他们充满恶意，巴不得他们全都死掉，或者离开他的领土。此外，他们的战船受制于侯赛因的战术，大炮火力也不如葡萄牙人。和他们并肩作战的是黑皮肤的努比亚人、阿比西尼亚人和“本领高强、射击精度极高的”^[9]土库曼弓箭手。在高悬于海面之上的桅杆战斗平台之间的战斗中，这些弓箭手的威力令对手胆寒。葡萄牙人不得不在木制屏障后面躲避嗖嗖射来的箭矢。这些箭插入桅杆，像豪猪刺一样，或者一次又一次射入人体。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阿尔梅达的部下有三分之一都负了箭伤。在桅杆瞭望台上的葡萄牙人顶多只能匆匆地冲出屏障，向敌船甲板投掷石块，然后再迅速掩蔽。

马穆鲁克士兵的斗志和弓箭手的高超本领还不够。阿亚兹的很多部下不是职业军人，而且诱惑力极强的安全地带——城市大门，就在咫尺之外。侯赛因英勇地努力挽救自己的旗舰时，阿亚兹仍然在岸上，在安全距离之外坐山观虎斗。浓烟有时遮蔽战场，有时暂时消散，将战场展现出来。就连这硝烟也对葡萄牙人有利，因为风把烟吹向穆斯林阵线，给他们的敌人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机会。

在上游，双方的桨帆船也展开了鏖战。葡萄牙人的迅猛炮火扫荡了两艘穆斯林桨帆船；葡萄牙人登上了它们，用船上的火炮对付其余穆斯林船只。最终，炮弹射入了侧舷低矮的埃及船只（它们被钉死在岸边，

只有船首炮能够发挥战斗力)的两侧，杀死了被锁在桨位上的奴隶。穆斯林船员抛弃了战船，逃往陆地。

在河道中央，副王身穿精美的链甲和做工绝佳的头盔与胸甲，在“海洋之花”号上观察战况。“海洋之花”号是葡萄牙舰队中最大也最雄壮威武的一艘船，有三层甲板，配备了重炮，但此时船龄已经有八年，颇有些老迈了。船体漏水，需要不断修理。在战役打响时，它的十八门炮从侧舷向古吉拉特的克拉克帆船发出排山倒海般的轰击。大炮的震动猛烈地撼动了这艘400吨重的战船，使得它的船体上的木板接缝开始松动。沉没的危险突然间暴露出来，令大家十分担忧。一旦旗舰沉没，可能会使得局势逆转。它在此役中生存下来，被归功于神圣的奇迹。实际上这是因为接缝里的粗麻屑遇水膨胀，堵住了漏水的空洞，从而将其封闭，所以船能维持浮力，无须抽水。

激战正酣时，阿亚兹终于被迫命令弗斯特船和轻型阿拉伯三角帆船的指挥官，独眼龙“狡猾的”西迪·阿里从葡萄牙人背后袭击他们。但“海洋之花”号选择目前的战位，恰恰就是为了应付这个威胁。西迪·阿里的舰队以作战的速度疯狂地划桨前进，企图迅速从葡萄牙旗舰旁冲过，但逆风和逆流减慢了它们行进的速度。它们在与“海洋之花”号位置齐平时，变成了极易命中的活靶子。当它们划过时，三枚重型炮弹射来，粉碎了最前线，并将船只轰得粉身碎骨，并将船员掀入水中；紧密的队伍乱作一团。跟在后面的船没办法绕开前面船只的残骸，撞了上去；接着又是三枚炮弹，命中了全体敌船。穆斯林的进攻顷刻间土崩瓦解。最后面的船只拼命倒退，以躲避更多的灾祸；一些比较勇敢的船员判断自己能在葡萄牙人下一轮炮火之前猛冲过去，于是继续划桨前进，但葡萄牙炮手填弹的速度让他们大吃一惊。侯赛因计划的核心部分就这样崩溃了。

穆斯林打得非常英勇，但他们缺少训练有素的战士，再加上葡萄牙

人的专业化军事素养，以及他们火炮的强大威力，都使得战役的结果没了悬念。穆斯林的船只一艘接一艘地被俘获或被抛弃。侯赛因的旗舰最终投降，不过那时侯赛因已经乘坐小艇逃之夭夭了。其他船上的一些士兵不会游泳，于是砍断了船首锚的缆绳，企图把自己的船拉回到岸边。葡萄牙人又派遣小船去屠戮在水中挣扎的人，于是“大海被死者的鲜血染红了”。^[10]一些轻快的卡利卡特三角帆船成功逃到外海，沿着马拉巴尔海岸南下去传播这凄惨的消息，而古吉拉特的克拉克帆船中最大的一艘，即一艘重约600吨的双层甲板战船，上面有四百名船员，则坚持战斗了一整天。它被拉到离岸很近的地方，所以葡萄牙船只无法接近它并派兵登船，而且这艘船的船体非常结实。整支葡萄牙舰队炮击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它击沉。它虽然沉底了，但上层建筑仍然露出水面。船员得以逃到陆地上。

这一天结束的时候，阿尔梅达巡视各船，拥抱船长们，询问伤员的情况。次日清晨，葡萄牙人在旗舰上举行了典礼，喇叭齐鸣，然后清点损失数字。葡萄牙死者为三十人至一百人，伤员可能有三百人，主要是被碎片和箭打伤的。不过，对葡萄牙人而言，这是大获全胜。埃及舰队全军覆灭，它的所有船只都被击沉、俘虏或焚毁。除了侯赛因和与他一同逃跑的二十二人之外，鲁姆人活下来的极少。根据葡萄牙史料记载，有一千三百名古吉拉特人战死，卡利卡特人的死亡数字不详。敌人的三艘克拉克帆船，包括旗舰，以及两艘桨帆船、六百门炮，被葡萄牙舰队接收。对穆斯林而言，这是一场毁灭性的失败。

这天上午，一艘飘着白旗的小型弗斯特船赶来了。阿亚兹一直到最后都非常小心谨慎。他迅速送回了他在朱尔战役之后精心照料的葡萄牙战俘，让他们全都穿着华贵的丝绸衣服，并送给他们塞满黄金的钱包。他提议让第乌无条件投降，并臣服于葡萄牙国王，然后给葡萄牙舰队呈上丰厚的礼物。

阿尔梅达并不想要第乌；他觉得自己现有的兵力不足以防御这座港口。他要求曾资助埃及舰队的穆斯林商人赔款，并为自己的儿子复仇。他得到了赔款。洛伦索死后，副王再也不是能够讲道理的人了；他残酷无情、虐待狂一般的报复玷污了他的名誉。他强迫阿亚兹交出其在城内庇护的所有鲁姆人，这些人将落到五花八门的恐怖下场。阿亚兹顺从了他。有些鲁姆人被砍掉手脚，然后在一个大柴堆上被活活烧死；有的被捆在大炮炮口，被炸得粉身碎骨；或者被放到俘获的船只上，然后船只被葡萄牙人的大炮击沉；有的鲁姆人则被强迫互相杀戮。城门上悬挂着血淋淋的死人肢体，“因为那些杀害他儿子的穆斯林曾从这城门进进出出”。^[11]有的俘虏则被他关押在船上。法兰克人的狂怒将被铭记许久。伊斯兰世界对此的态度是斯多葛式的哀恸：“这些可憎的入侵者，胜利地驾船离去，因为这是最伟大的真主的旨意，他的意志是无可争议的，任何人都不能违逆他的旨意。”^[12]

阿尔梅达在返回科钦的途中就像他来时一样，一路烧杀抢掠，震慑和恫吓当地居民。经过海港时，葡萄牙人用大炮射出首级和被砍断的手。在坎纳诺尔，葡萄牙水手折磨俘虏，将其吊死在桅杆上；阿尔梅达在震天的喇叭声中凯旋科钦时，桁端挂着更多死尸。马穆鲁克苏丹的王旗被送到葡萄牙，悬挂在位于托马尔的基督骑士团修道院。第乌战役的结局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的影响非常深远。马穆鲁克苏丹的公信力被一劳永逸地彻底打破，穆斯林将葡萄牙逐出印度洋的希望也彻底破碎了。法兰克人将在印度洋常驻下去。

阿尔梅达在科钦登陆以庆祝自己的胜利时，阿尔布开克已经在海滩上等候。他是来为阿尔梅达鼓掌喝彩的，但也是来接过指挥权的。阿尔梅达从他身旁走过，不理睬他。他拒绝交出自己的职位，说此时季节已晚，他不能起航回国，而且根据国王的命令，他的任期要到他起航为止。在这背后，是葡萄牙人因为霍尔木兹的反叛者和阿尔布开克的恶名而产生的严重分歧。阿尔布开克遭到指控，有人说他心态恶劣，道德败

坏，不适合治理印度。他的一名敌人做证道：“在我看来，如今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对印度的威胁，比土耳其人的威胁大得多！”^[13]人们威胁道，宁愿离开印度，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人们起草了起诉书，指控他管理不善。9月，阿尔梅达命令他离开科钦；他的房屋被要塞的大象拆毁，而送他去坎纳诺尔的船也被虫蛀得厉害，阿尔布开克觉得他们是故意要害死自己。在坎纳诺尔，他实际上是被囚禁了起来，尽管当地的葡萄牙管理层基本上同情他。阿尔布开克似乎非常克制地忍耐了这险恶局势；他脾气暴躁，但并不记仇，很容易原谅别人。他曾羞辱若昂·达·诺瓦的胡须，导致后者反叛。这一年年底，若昂·达·诺瓦在贫困中死去，是阿尔布开克支付了他的葬礼费用。

11月，本年度的香料舰队（指挥官是年轻但自视甚高的堂费尔南多·科蒂尼奥，葡萄牙的最高军务官^[14]，拥有国王授予的全权）抵达坎纳诺尔时，问题才得到解决。科蒂尼奥把阿尔布开克带回科钦，要求阿尔梅达交权。阿尔布开克终于接管了对印度的管辖权，这让他的许多部下大感警惕。次日，阿尔梅达从印度启程，一去不复返，去里斯本面对国王的不悦。

一位占卜师曾预言，阿尔梅达不会活着通过好望角；在海上，他起草了遗嘱。他留下一些钱用来施舍囚犯，赠给国王一颗大钻石，给仆人留下金钱，赐予奴隶自由。1510年3月，他的船平安无事地绕过了好望角，然后在桌湾^[15]停泊以补充木材、淡水和给养。在这里，葡萄牙人企图偷走科伊科伊人的一些牛，可能还想绑架他们的儿童，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毫无意义且鲜为人知的冲突，阿尔梅达因此丧命。葡萄牙人一定是遭到了突袭。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这都是一场大灾难。五十人在冲突中死亡，包括十几位船长和高级贵族，简直相当于在第乌战役中牺牲的船长与贵族的数量。

据说阿尔梅达的墓志铭被安放在葡萄牙的一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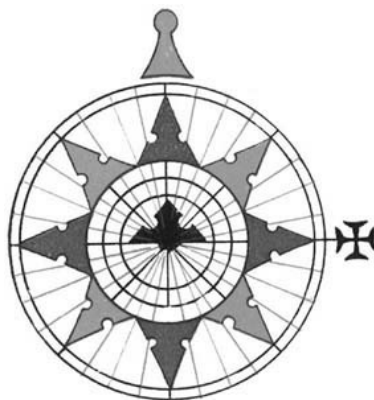
此处安息着

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

印度副王

他从不说谎，也从不逃跑。[\[16\]](#)

但他的遗骨仍然留在非洲海岸一个匆匆挖掘的墓穴中。



[\[1\]](#)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35.

[\[2\]](#) Monteiro, Saturnino. *Portuguese Sea Battles*. Vol. 1, *The First World Sea Power, 1139-1521*. Lisbon, 2013, pp.264-265.

[\[3\]](#)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p.937-938.

[\[4\]](#)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p.437-438.

[\[5\]](#)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p.940-941.

[\[6\]](#)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37.

[7]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437.

[8]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941.

[9]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943.

[10]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943.

[11]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952.

[12] Zayn al-Dīn ‘Abd al-’Azīz. *Tohfut-ul-Mujahideen*. Translated by M.J. Rowlandson. London, 1883, p.44.

[13]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79.

[14] 最高军务官（marshal）这个词源自古诺曼法语，最初的意思是马夫或马厩管理人，在中世纪早期指的是王室的近卫队长，负责王室内廷的安保，后来演化为高级军事指挥官。

[15] 桌湾是今天南非开普敦附近面向大西洋的一个海湾，得名自附近的桌山，距离好望角不远。

[16]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p.208.

第三部 征服：海上雄狮 1510～1520年



16 扎莫林的大门

1510年1月

如果阿尔布开克觉得阿尔梅达走后他就可以施展拳脚，以印度总督的身份自由地行使职权，那就大错特错了。堂费尔南多·科蒂尼奥是他的亲戚，但也是葡萄牙的最高军务官，是目前到访东印度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也是宫中颇为得宠的权贵。他向阿尔布开克传达了国王的压倒一切的命令，即消灭卡利卡特（此时卡利卡特仍然是葡萄牙的眼中钉肉中刺，刺伤了葡萄牙国王的虚荣心）。科蒂尼奥带来了一支大舰队，并得到授权，可以独立于总督行事，而总督被要求辅助他。

这将是科蒂尼奥的舞台。最高军务官年轻气盛、刚愎自用，对别人的建议置之不理，渴望荣耀，体态肥胖。他曾承诺返回国王身边时要带回此次行动的一件纪念品。在卡利卡特的海滩之上，扎莫林拥有一座装饰华丽的亭子，称为色拉姆，“用雕刻精美的木料制成”，他常到此享受宜人的海风。色拉姆还拥有神话般美丽的门，饰有“金银板制成的动物、鸟类图案”。^[1]这个充满异国情调、令人垂涎的美丽物品，在葡萄牙宫廷被吹嘘得无以复加。科蒂尼奥一心要做出的英雄业绩的战利品就是色拉姆。他此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次军事化的旅游。他要向印度通们展示，如何一举解决卡利卡特问题。

有理由认为此时是攻击扎莫林的良机。科钦的间谍告诉最高军务官，扎莫林疾病缠身，并且不在城内；到访卡利卡特的商船在前往阿拉伯半岛之前停泊在岸边，十分容易遭受攻击。若是摧毁了这些商船，扎莫林的税收将遭到沉重打击，因为税收是他唯一的财富来源。在讨论计划的作战会议上，阿尔布开克将信将疑。私下里，按照他的秉性，他很讨厌与别人联合行动。他认为，卡利卡特目前与科钦处于和平状态，这

对葡萄牙的胡椒贸易非常有利。而且他比最高军务官更了解战术上的困难。卡利卡特没有自己的港口，它前方的海滩不适合登陆作战。激流沿着它的海滩冲刷，大海可能会波涛翻滚。科蒂尼奥严厉地提醒他道：“作战会议不能违背国王御旨。只能决定如何组织进攻。没有别的目的。”^[2]他还向在场的所有船长发出了庄重的呼吁，这种呼吁既可能造就葡萄牙英雄气概最辉煌的时刻，也可能酿成最严重的灾难。他的呼吁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除了上帝的爱，就是荣誉。”^[3]“荣誉”这个词始终回荡在葡萄牙人征服、抵抗和失败的所有岁月。阿尔布开克的意见被否决了。

在马拉巴尔海岸，军事行动极少能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扎莫林很快得知一支大舰队停泊在科钦，并猜到了它的意图。他派遣一名使者去求和，提出了他能提出的最好条件。阿尔布开克对这项和平建议表示同情，而且有很好的理由去信任这位使者，但他还是坦率地承认，使者来得太晚了。使者不敢带着坏消息返回卡利卡特，选择了留在葡萄牙人那里。1509年12月的最后一天，舰队起航了。约有二十艘船和一千六百人，另有二十艘来自科钦的小船载着熟悉卡利卡特海况的水手，以帮助葡萄牙人登陆。

到1510年1月2日傍晚时，葡萄牙舰队已经在卡利卡特城外海滨随波摇曳。他们面前就是卡利卡特城，一长串沙滩上散布着一些渔民的茅草小屋；更远方是商店和库房，然后是棕榈树之间的粉刷白石灰的商人住宅、贵族的木制和石制宅邸、清真寺尖塔以及印度教神庙的屋顶。卡利卡特城扩展到很广大的地域，没有明显可见的防御工事；它是高墙之间小巷的迷宫，在逐渐升高的地域蜿蜒曲折，延伸到西高止山脚下，扎莫林的宫殿就在那里，距离海边约3英里。



从海上看卡利卡特，其背景是西高止山

卡利卡特人对入侵者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国王不在城内期间指定了一位摄政者，此人集结了他能召集到的所有奈尔战士以及弓箭手和全部火炮；最高军务官垂涎的目标色拉姆距离海边只有一支箭射程的距离，现在那里筑起了工事，部署了一些射石炮，它后方的房屋内还驻扎了一些士兵，准备保卫色拉姆。

葡萄牙船长们聚集在最高军务官的舱室，筹划进攻。他们将兵分两路登陆。阿尔布开克率领“印度人”（即土著部队）在色拉姆以南上岸，科蒂尼奥率领“葡萄牙人”在色拉姆以北登陆。然后两支部队以钳形攻势夹击色拉姆，两位指挥官将享有带着旗帜首先踏上陆地的荣誉。任何人不准触碰色拉姆的大门，因为那将是献给曼努埃尔一世的礼物。接着他们要攻打城门，猛烈攻打卡利卡特。

士兵们等候了一夜，厉兵秣马，从神父那里接受恕罪，将灵魂托付于上帝。在战前准备的仪式中，大家也普遍抱有贪婪的期望。他们相信这座城市富得流油，轻松获得战利品的期望令他们胃口大开。黎明前两个小时，科蒂尼奥在船上点亮了信号烽火；士兵们爬上长艇，划桨向岸边进发。皎洁的月光照耀着他们面前的陆地、棕榈树丛中的房屋、神庙的铜屋顶和清真寺的尖塔。阿尔布开克的部队约有六百人，在靠近色拉姆的地方上岸，秩序井然。他们继续逼近色拉姆。但最高军务官的部队被海流冲到了较远的地方，登陆的地点距离目标有一段路程。

阿尔布开克理应等待科蒂尼奥，但他的士兵急于掳掠战利品，争先恐后，阿尔布开克也节制不了他们。纪律于是涣散了。为了防止陷入进一步的混乱，阿尔布开克命令吹响军号，发出“圣地亚哥！”的呐喊，宣布发动全面进攻。奈尔战士呼喊着重从色拉姆附近的房屋中冲杀出来，双方展开激战。从海滩之上的制高点，卡利卡特人的大炮向海滩开火，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但这些炮手经验不足，打得太高。葡萄牙人无情地端着长矛向前推进；他们猛攻敌人的工事，杀死了一些敌人，其他奈尔战士调头跑回房屋当中。与此同时，一些葡萄牙人在用斧子拆卸那著名的门。他们把它抬到海滩，然后装上了大船。为防止士兵在最高军务官到来之前冲进城中，以及预防敌人发动突然反扑，阿尔布开克在街道入口处安置了岗哨。

最高军务官在海滩姗姗来迟。他听得见喊杀声和炮声，看到燃烧的房屋的大火。当他抵达时，色拉姆的大门已经没了影子。科蒂尼奥暴跳如雷。他只能相信，阿尔布开克夺走了理应属于他的胜利，攫取了他的光荣。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总督。阿尔布开克努力好言相劝，大谈光辉与荣誉：“你是第一位率领士兵在卡利卡特登陆并进城的将领，你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色拉姆的大门已经在我们的船上了。”^[4]科蒂尼奥听了这话，气得浑身发抖。“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是什么东西？”他啐了一口，“你的话全是放屁……”^[5]“荣誉属于你……我不想要任何荣誉。如果要我去和那些像山羊一样逃窜的小野人打仗，我倒会觉得丢人。”^[6]他在暴怒之下命令将那著名的大门投入大海，然后脱掉头盔，把自己的头盔、盾和长枪都交给侍从，从侍从手里拿了一顶红帽子和一根木棍。他唤来译员加斯帕尔·德·阿尔梅达，命令其指示去王宫的道路。他说要从王宫夺走其他的大门，赢得更伟大的荣誉，比某些人在海滩上从他那里偷走的荣誉要大得多。“我主国王陛下会知道，我仅仅戴了一顶帽子，手里拿着木棍，就杀向王宫……在这闻名遐迩的卡利卡特，除了小黑人之外什么都没有。”^[7]

据编年史家加斯帕尔·科雷亚的描写，在这个关头，阿尔布开克倚靠着自己的长枪，盾牌丢落在脚边，身边围着许多士兵，并努力与最高军务官讲道理。现在，他感到大事不妙。部队很疲惫，被怒火冲昏头脑的科蒂尼奥完全不知道自己提议的是什么。阿尔布开克向科蒂尼奥恳求道：

愿上帝保佑你。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你走那条路，那些赤身露体的小黑人，虽然现在像山羊一样逃窜，但很快就会变成恐怖的商贩，他们的货物会让你付出惨重代价。我恳求你，千万不要走那条路。……从这里到王宫的路很远，路况极差，只能一字纵队前进，你会遇到极大的麻烦。你到了王宫的时候，一定已经筋疲力尽，会发现那里有许多斗志昂扬、装备精良的小黑人。我说的是实话。我真心实意地劝你，拜托千万不要去。^[8]

“我偏要去。”最高军务官鄙夷地说，“你回船上吧。你可以走了，可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心满意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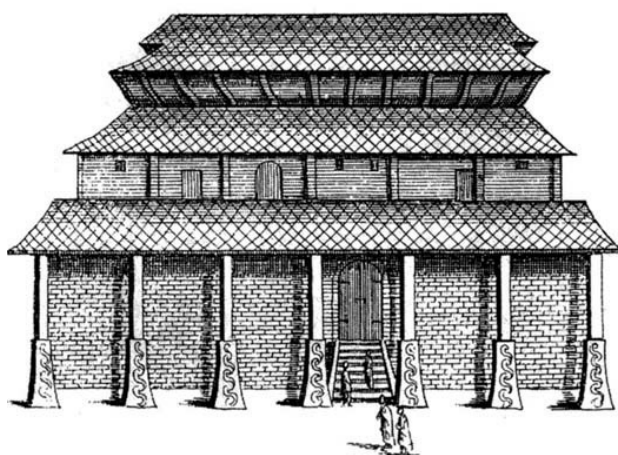
他准备前进，一名骑士举着旗帜打头阵，加斯帕尔·德·阿尔梅达带路。他们还拖着一辆炮车，车上载着一门轻型回旋炮以及火药和炮弹。“士兵们渴望从王宫掳掠金银财宝，跟着最高军务官前进，”阿尔布开克带着自己的部下返回海滩并说道，“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今天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意志。你们看到的那些去攻打王宫的人中的很多人，不会回来了。”^[9]他为停在沙滩上的长艇安排了岗哨，确保它们随时待命，并能够运送伤员。他带领剩余的士兵（因为很多人跟随最高军务官去了），烧毁了在海边停靠的阿拉伯三角帆船和轻型帆船。他在为最糟糕的结局做准备。

最高军务官和他带领的四百人现在径直开往王宫，距离约为3英里。道路极其狭窄，两侧是高高的石墙，石墙背后是棕榈树丛中的房屋。他们只能排成一字长蛇阵，蜿蜒前进。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小黑人”看到他们就纷纷逃窜，似乎不愿意打仗。最高军务官的士兵一边前进，一边烧毁空荡荡的房屋。西高止山吹来的风将浓烟吹到他

们的路上，所以队伍后方的人被浓烟和大火的热力呛得喘不过气来。很快似乎整座城市都燃起了熊熊大火。很多人于是掉头返回。阿尔布开克原想率领自己的部队以良好秩序跟进，但发现道路很难走。

最高军务官及其部下继续推进。他们抵达了一个大广场，周围有比较豪华的属于贵族的宅邸。在这里，他们遭遇了一大群武器精良、做好抵抗准备的奈尔战士。战斗于是激烈起来。葡萄牙人扫清了广场，但贵族蒙受了一些损失。“利苏阿尔特·帕谢科喉咙中箭倒下，安东尼奥·达·科斯塔被砍了脑袋。”^[10]很多人腿部中箭，因为腿部没有板甲防护。有些人往船的方向逃跑，发现道路上塞满了双方的死尸。指挥印度人反抗的摄政者也阵亡了。

最高军务官继续前进，抵达王宫外门。在这里，他的部队又一次遇到一大群敌人。葡萄牙人迎头撞上了暴风雪般的箭矢。激战之后，他们成功击退了守军，冲进王宫庭院。那里“有一座大院子，周围建有许多亭台楼阁，它们的大门都装饰华美，表面贴着精工黄铜与黄金片，阳台也建造得极其精美”。^[11]



扎莫林的木制宫殿

于是，掳掠开始了。门锁被斧子砍碎。这简直是阿拉丁的藏宝洞：装满丝绸与金线华服的箱子、产自阿拉伯半岛的丝绒和锦缎、饰有黄金

的木制圣物箱。葡萄牙贵族让仆人把掳掠来的财宝堆积起来，疯狂地争先恐后地掳掠，并严加守卫自己抢来的东西。为了方便地抢劫战利品，他们把长枪丢在室外。一百名士兵奉命看守大门，指挥官是鲁伊·弗莱雷，他“一只眼是斜的”。^[12]这些人自己不能参加抢劫，非常嫉妒，于是抢劫战友。洗劫宫殿的人收集的成堆财宝被堆放在庭院内，无人看管，于是弗莱雷和二十名同伴竭尽全力扫荡别人的那些赃物，并将其运回船上。抢劫持续了两个钟头。上午的时间不断流逝，天气也越来越热。

抢劫的人毫无防备。摄政者阵亡的消息，以及三颗葡萄牙人首级被送到了扎莫林那里，他此时正在城市外围撤退。他暴跳如雷，命令进行报复。奈尔战士重整旗鼓，开始强行杀入王宫，闯过残余的葡萄牙警戒线。此时对财宝的贪欲冲昏了葡萄牙人的头脑，让他们无视危险。他们冲入一扇门，发现里面有成箱的金币，于是“他们把箱子搬到外面，各人尽可能守卫自己的那一份”。^[13]这个房间内还有第二扇门，但从里面锁上了，门上金光闪闪，极富诱惑力。据译员加斯帕尔的说法，这是国王的宝库。士兵们陶醉于宝库内可能有的财富，向门猛撞，并用长枪的一端打门。然而门却纹丝不动。

宫外有四百名奈尔战士奉扎莫林的命令集合起来，决心为摄政者复仇，甘愿血洒沙场。阿尔布开克率领他自己的一队士兵赶来增援的时候，箭雨开始密集地落下。他肃清了宫门外的一片地域，命令秘书加斯帕尔·佩雷拉进宫去警示科蒂尼奥，形势十分危急。佩雷拉努力让最高军务官明白形势：现在外面有很多敌人，而且越来越多。撤退的时间到了：“他应当满足于自己的行动，因为已经算很了不起了……他兵力不足，所有人都扛着战利品走了。撤回海边的道路漫长而艰难；此时已经是正午了，天气非常炎热。”^[14]

科蒂尼奥充耳不闻，对那扇不肯动摇的门执迷不悟。他发回给阿尔

布开克的唯一口信是：“他来的时候没有和阿尔布开克同来，回去的时候也不和他同去。”^[15]阿尔布开克派人守卫外门，以阻止更多葡萄牙人被诱入死亡陷阱。他亲自去劝说最高军务官：“以国王的名义，我们请求你撤退，我们在这里一分钟都不能待了。我们若是不走，全都死路一条。你来的那条路已经陷入火海，我们要撤退会非常困难。”^[16]最高军务官到最后一刻都极度傲慢自负：他不情愿地同意撤退，但就像洛伦索在朱尔战役中那样，他坚持要最后一个离开，以宣扬自己的英勇；此外，他还要把王宫烧毁。他们撤退了，阿尔布开克及其部下在前方开路，然后是科蒂尼奥的部下，最后是最高军务官本人和他的炮手。炮手们用回旋炮开火，一时间迫使奈尔战士暂时退却，没有沿着街道追来。

他们又来到狭窄的街道上，其宽只有半支长矛的长度。奈尔战士更换了攻击的方向。他们攀上高墙和制高点，用箭矢、石块与标枪猛击和骚扰葡萄牙人，然后用石头和树干来堵塞街道，拦住他们的去路。很快，葡萄牙人就没办法把回旋炮运过这些障碍物了，只得将回旋炮抛弃。印度人再也不怕了，潮涌般冲回到小巷，向掉队的葡萄牙士兵猛扑，用葡萄牙人抢劫时丢弃在宫门外的长枪攻击他们。

肥胖而疲惫的科蒂尼奥用盾牌自卫，两侧有一群葡萄牙贵族守卫。小巷在荫凉里，但天气酷热，所以在这狭小的地方，他们的板甲反而对他们不利。葡萄牙人笨拙地用剑刺杀，被敌人轻松地跳跃躲避。撤退的葡萄牙队伍不得不一边走一边脱掉笨重的铠甲，同时遭到攻击和骚扰。小巷变宽汇入一条大街后，形势更加恶化。另一群印度武士在这里守株待兔，这一次有足够的空间包围最高军务官一行人。科蒂尼奥勇敢地面对敌人的进攻，但遭到背后袭击。他的脚后跟被砍断，跌倒在地。印度人发出胜利欢呼。其他葡萄牙人努力想把肥胖的科蒂尼奥扶起来，但在拥挤的空间里就是办不到。他们被打退，勇敢地且战且退：挥舞双手重剑的瓦斯科·达·席尔瓦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永载史册，成为英雄，“他们全都建功立业，奋勇拼杀，直到累得无力举起胳膊，全部捐躯，他们的

首级被和王旗一起高举起来”。

阿尔布开克的位置距离后卫有火枪射程那么远，更接近海滩，他也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麻烦，遭到敌人弓箭手的猛烈射击。但是，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足够多的士兵。他想等待最高军务官，但消息传来，科蒂尼奥在战斗中倒下了。他打算回去救援，但很少有人愿意同去：“没人想回去。”^[17]旋即他遇到了一群逃跑的葡萄牙士兵，随后是追杀而来的欢呼胜利的印度武士。葡萄牙士兵们干脆丢下武器，潮水般逃向海滩，把阿尔布开克和四五十人丢在后面去面对敌人，并努力阻止全面崩溃。阿尔布开克在巨大的压力下撤退，左臂中箭，箭头刺入骨头，拔不出来。几分钟后，他的脖子又被飞镖击中，护喉甲被刺穿。然后一发子弹击中他的前胸，他跌倒在地的时候还在呼唤瓜达卢佩圣母的保佑。有人喊叫说他死了，他附近的人开始惊慌失措。奈尔战士逼近过来，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但阿尔布开克自己认为发生了奇迹，因为命中他前胸的子弹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大部分葡萄牙士兵逃走了，但四人将他抬到一面盾牌上，奔向海滩，而第二群士兵以紧密队形跟在后面，阻止了彻底的灾难。海滩上的指挥官开始将伤员摆渡运往大船；他们还从长艇用后装回旋炮射击，威慑追兵，这让那些通过街道逃往海滩的葡萄牙人鼓起信心，让他们知道海滩就在不远处。后来，大炮也开火了。葡萄牙贵族一直到最后关头还要证明自己的超强战斗力，其中两人，安东尼奥·德·诺罗尼亚和迪奥戈·费尔南德斯·德·贝雅率领三百人返回城市。他们迎面遇到一大群土著男女（他们以为葡萄牙人全都死了），残酷无情地将其尽数屠戮。有些土著逃往海滩，让等待登船的葡萄牙人又鸡飞狗跳起来。他们以为这些冲过来的当地人是追兵，于是很多葡萄牙人不听战友的呼喊，跳入大海，拼命游向大船，不幸溺死。

夜幕降临了。海滩上只剩下两名船长，他们一直到最后还在争夺最

后一个撤离的荣誉。最终迪奥戈·费尔南德斯和安东尼奥同时登船，以捍卫自己宝贵的荣誉。舰队在卡利卡特停留了两天，医治伤员，并将死者丢下船。阿尔布开克则恢复了元气，撰写了报告。

双方都伤亡惨重。最高军务官的光荣冒险让葡萄牙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一千八百人^[18]中有三百人阵亡，“其中七十人是贵族”——编年史家总是认真地记下贵族死者的姓名——还有四百人负伤，“其中很多人后来伤重不治死亡，或永久性残疾”^[19]。从鲁伊·弗莱雷的二十多人的命运，我们可以瞥见那些掳掠王宫的葡萄牙人的损失情况。斜眼的弗莱雷原本奉命守卫大门，却玩忽职守，带人去掳掠财物。“他们全死了，只有一名奴隶身负重伤，逃到了小船处，报告了最高军务官的最后命运。”^[20]有些人则下落不明，包括加斯帕尔·德·阿尔梅达。这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译员曾见到瓦斯科·达伽马，后来为曼努埃尔一世提供了大量关于印度洋的信息。他可能在这一天阵亡了，此后史料中就再也没见到他的名字。

卡利卡特人的损失更严重。扎莫林拿到了最高军务官的首级和旗帜，但这很难弥补他的损失。卡利卡特人损失极大，城市被毁，王宫被付之一炬，而且他的财源依赖的商船也毁于一旦。他为此役的后果忧心忡忡。他确保为最高军务官举行了体面的葬礼，立下了刻字的墓碑，将其旗帜悬挂在墓碑之上。这是为了应付葡萄牙人必然施加的报复。至于阿尔布开克，他的左臂自此残废，但他一直纪念帮助自己逃生的奇迹。打倒他的那颗子弹被一名仆人取出，并和一笔钱一起送到阿尔加维的瓜达卢佩圣母圣龕。子弹被放到圣母像前，钱则用来在那里点一盏“长明灯”。^[21]

此役对总督来说毕竟还有一个亮点。最高军务官的船只除了三艘返回葡萄牙之外，全都属于他了。现在他拥有了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部署，他也有相应的计划。次日，他给国王写信，

汇报近期的所有事态，但对卡利卡特的惨败只字未提。返回葡萄牙的人可以解释那事，他对此的沉默是意味深长的。卡利卡特本身仍然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年之后，他将找到解决扎莫林的办法，其比军事行动简单得多，也几乎没有流血，但没有光辉或荣誉可言。在此之前，他仔细思考了纪律败坏的教训。葡萄牙人过于强调个人英勇，对战术组织的重视不够，过于贪恋战利品（战利品是对军饷长期被拖欠的一种补偿），因此一支军队容易迅速蜕化成随时可能溃散的乌合之众。

[1]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p.6-7.

[2]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9.

[3]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9.

[4]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6.

[5]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501.

[6]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6.

[7]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7.

[8]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7.

[9]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8.

[10]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9.

[11]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9.

[12]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9.

[13]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9.

[14]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1.

[15]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1.

[16]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2.

[17]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3.

[18] 前文说葡萄牙远征队共计一千六百人。另外两百人可能是为葡萄牙效力的印度人。

[19]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5.

[20]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5.

[21]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505.

17 “葡萄牙人咬住的，永远不会松口”

1510年1～6月

没人知道阿尔布开克何时以及为何决定进攻果阿，但在卡利卡特惨败的几周之后，他就酝酿出了一个计划，让葡萄牙人发动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持续了近三年的鏖战将给印度洋的力量平衡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返回科钦的时候身负重伤。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1510年1月，医生一度担心保不住他的性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的痊愈快得惊人。阿尔布开克是一个非常有紧迫感的人，受到消灭伊斯兰世界的梦想的感召（曼努埃尔一世也有这个梦想），仿佛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看到葡萄牙人在印度消耗和损失得极快。令人衰弱的气候、水土不服、痢疾和疟疾的打击，都榨干了人的精力，缩短了寿命。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填塞船缝的工人和木匠与当地女人鬼混，再加上在炎热天气里劳作，不到一年时间就耗尽了元气。”^[1]在科钦，他开始狂热地履行自己作为总督的职责，整修舰队以便为新战役做准备，组织给养，鞭策执行公务时怠惰的人，并给国王写报告。阿尔梅达给国王的汇报非常简略，而阿尔布开克花费了大量笔墨。他已经得出结论，始终缺乏安全感的曼努埃尔一世事无巨细都要了解，而以自我为中心的阿尔布开克需要为一切做辩护和解释。

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印度的大小事务，或者我自己的想法，我全都向陛下报告，绝无遗漏，只除了我自己的罪孽。”^[2]随后五年内，他为曼努埃尔一世提供了潮涌般的细节、解释、辩护和推荐，涉及印度的方方面面。不分昼夜，他向饱受磨难的秘书们口述，累计有数十万字。无论是骑马的时候，坐在桌前或在船上，还是在凌晨，他们都要

记录下他的话。他在自己的膝盖上为书信、命令和请愿书签字，并一式多份发出。这些文字是在匆忙中写下的，文风非常莽撞、焦躁和急迫，常常突然转换主题，并且始终贯彻着激情澎湃的自我意识。

他那倒霉的书记员之一加斯帕尔·科雷亚不仅为记录和抄写总督的书信而磨破了手指，还百忙之中找到时间，撰写了他自己的简洁明快、生动精彩的编年史，记载了这一套旋风般忙碌的活动。阿尔布开克似乎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他一方面能够构建宏伟的地缘战略计划，另一方面也能不知疲倦地关注细节。在派遣使者去见毗奢耶那伽罗^[3]的国王时，他还会询问一头受伤大象的脚掌，考虑用椰子壳制作包装材料，准备给当地权贵的礼物，监督装货上船和医院的工作。他知道，虽然葡萄牙人是海洋的主宰，但他们在印度沿海仅仅在坎纳诺尔和科钦拥有脆弱的立足点。他要在卡利卡特和霍尔木兹报仇雪恨，还要完成国王交付的任务。阿尔梅达尚未完成的任务清单很长：消灭卡利卡特、占领霍尔木兹、封锁红海、控制马六甲（香料贸易的最南端的中心），以及探索更远方的海洋。除此之外，还有仅有宫中内层圈子知晓的曼努埃尔一世的最终使命：消灭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收复耶路撒冷。

曼努埃尔一世总是害怕把大权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已经决定在印度洋建立三个自治政府。名义上，阿尔布开克仅管辖中央部分，即从古吉拉特到锡兰的印度西海岸。非洲、红海和波斯湾沿岸地区是杜阿尔特·德·莱莫斯的辖区。在锡兰之外，迪奥戈·洛佩斯·德·塞凯拉负责马六甲和更远方的大洋。这种分权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另外两位指挥官都没有足够的船只来进行有效的活动。阿尔布开克不仅认清了这种分权的毫无意义，还相信没有人的才干能与他相提并论。渐渐地，他想尽办法把另外两位指挥官的船只搞到自己手下，将其纳入一支联合舰队，而没有经过国王的同意。这样做虽然能有效地部署军事资源，但也让他在印度和国内宫廷树敌颇多，这些政敌会攻击他的举措，并向国王进献谗言，诽谤他的意图。

同样不受欢迎的另一项措施是军事上的整顿重组。卡利卡特的惨败已经凸显了葡萄牙人战术的缺陷。葡萄牙贵族的军事法则珍视个人英雄主义，但对战术重视不够；重视掳掠战利品，而不是达成战略目标。武士们通过个人的效忠关系和经济纽带与他们的贵族领袖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服从一位最高指挥官的调度。胜利是通过个人英勇的壮举而获得的，而非理性的运筹帷幄。葡萄牙人作战的勇猛令印度洋各民族震惊，但他们的手段过于中世纪，过于混乱，往往是自杀式的。洛伦索·德·阿尔梅达就是出于这种精神，才在朱尔拒绝炮击埃及舰队，科蒂尼奥也是因此戴着帽子、拿着手杖就杀向卡利卡特。编年史里随处可见英勇战死的葡萄牙贵族那备受歌颂的英名。然而，尽管怯懦是对葡萄牙贵族的最严重的玷污，而仅仅是拒绝作战的一丝传闻就让洛伦索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很显然的事实是，纪律涣散的部队在压力之下会崩溃瓦解。

阿尔布开克固然对曼努埃尔一世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弥赛亚思想心醉，但和国王一样，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场军事变革正在席卷欧洲。在15世纪末的意大利战争中，成群结队的瑞士雇佣兵以一个组织有序的群体接受行军与作战的训练，给战术带来了革命。训练有素的士兵排成纵队，手执长枪和戟，能够势不可当地击溃呈密集队形的敌人。阿尔布开克以狂热的充沛精力，开始重组和训练他的士兵，学习新的战术与纪律。在科钦，他组建了第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从卡利卡特返回不久之后，他就写信给曼努埃尔一世，要求送来一队按照瑞士方法训练的士兵和军官，以用来训练印度人。同时，他也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操作。他把士兵正式地编成若干队，教导他们以整齐队形行军和使用长枪。每个“瑞士”队伍都有自己的军士、旗手、笛手和文书，每个月都能领到军饷。为了提高这种新的“团”架构的地位，阿尔布开克自己有时也肩扛长枪，与士兵们一同行军。

从卡利卡特返回后的一个月內，他就率领一支恢复了元气的舰队，再度沿着印度海岸北上。他手头有二十三艘船、一千六百名葡萄牙士兵

与水手，还有从马拉巴尔海岸招募的二百二十名土著士兵，以及三千名“作战奴隶”。这些奴隶负责运送辎重和给养，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参战。不过，此次远征的最初目的似乎并不明确。有传闻称，马穆鲁克苏丹正在苏伊士筹备一支新舰队，要为第乌的惨败复仇。但阿尔布开克不动声色，没有宣布自己的意图。1510年2月13日，他在德里山停泊，向指挥官们解释，他接到了国王的书信，国王命令他去霍尔木兹。他还提及了红海受到威胁的消息，并漫不经心地提到了果阿，这座城市以前从来没有出现在葡萄牙人的计划中。四天后，令几乎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此行的任务居然就是攻占果阿。

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情是，曾烦扰瓦斯科·达伽马的印度海盗狄摩吉来到舰队里拜访。狄摩吉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在阿尔梅达时代与欧洲人合作，现在来拜见阿尔布开克并提出了一个建议。尽管此事貌似偶然，但可能其实是事先约好的。狄摩吉的使者早在1月就拜访过阿尔布开克。他俩很可能早就秘密安排好了此次会面。狄摩吉带来了一个事前精心准备过的故事。



阿尔布开克时期的果阿

果阿城坐落于两条大河之间的肥沃岛屿之上，是印度西海岸战略位置最重要的贸易站。它位于争夺印度次大陆南部核心的两大帝国的边界：北面是穆斯林的比贾布尔王国，南面是它的竞争对手，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王公们。这两大王朝激烈地争夺果阿。在过去三十年里，该城已经三次易手。它的特殊价值与财富，源自它在马匹贸易中发挥的作

用。果阿从霍尔木兹、波斯和阿拉伯半岛进口马匹，而对两国的边境战争来说，马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在热带气候中，马很容易死亡，而且不能成功地繁育，所以需要不断补充新的马。果阿还有其他的优势。它拥有一座绝佳的深水港，不受季风的影响。该地区的土地特别肥沃，城市所在的岛屿，即提瓦迪岛或果阿岛，能够允许所有商品顺利进出，并在海关高效地收取关税。作为一个岛屿，它也意味着可以进行有效的防御。

狄摩吉有紧迫的理由去催促葡萄牙人在这个时间进攻果阿。马拉巴尔海岸的各城市都有穆斯林居民，但统治者是印度教徒。而在果阿，目前大多数居民是印度教徒，而统治者是穆斯林，非常不得人心。印度教徒被迫缴纳苛捐杂税。一群鲁姆战士的存在更加剧了当地的骚动，这些人是从第乌战役逃出的残兵败将，在这里鱼肉百姓。对阿尔布开克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这些鲁姆人有复仇的计划。他们在模仿葡萄牙人的设计，建造了不少克拉克帆船，可能还得到了欧洲叛徒的帮助。他们也请求马穆鲁克苏丹送来更多的援助。事实上，果阿正在成为穆斯林反攻法兰克人的基地。

狄摩吉强调，此时是进攻的最佳时机。比贾布尔的苏丹刚刚驾崩，他那年轻的儿子阿迪尔沙阿^[4]远离城市，正在镇压叛乱。果阿岛上的守军不多。另外，比贾布尔因为几乎常年与毗奢耶那伽罗交战而受到牵制。城内会有人支持葡萄牙的接管，狄摩吉可以亲自去安排此事。他对果阿城、它的地形地貌与进入道路了如指掌。他与当地印度教徒群体的领袖有亲戚关系，这些领袖也会欢迎葡萄牙人将他们从穆斯林手中解放。海盗的具体动机可能很难揣测，但他已经证明自己是葡萄牙人的忠诚盟友，他的间谍网络显然很广。阿尔布开克倾向于相信他。果阿也符合他自己那建立一个印度帝国的蓝图。只有占据了土地，才能让葡萄牙的印度事业稳固无虞。果阿的战略位置非常有利于控制香料贸易，而垄断了马匹贸易之后也能让葡萄牙人干预南印度错综复杂的军事与政治博

奔。果阿很容易防守，而且葡萄牙人与印度教徒也没有宗教争端。

攻占果阿就像狄摩吉说的那样轻松，不过要守住它就困难得多了。这位印度海盗集合了他自己的两千人马，帮助葡萄牙人的行动。2月15日或16日，阿尔布开克派遣侦察船进入曼杜比河的河口去测深。水深足够，他那最大型的克拉克帆船也可以行驶。他们准备从海陆两路发动钳形攻势。狄摩吉的人占领并拆毁了陆地一侧的一处炮兵阵地。阿尔布开克的外甥攻击了河口岛上的另一座炮台。在短暂而激烈的战斗之后，防御土崩瓦解，当地指挥官撤入城内。与此同时，狄摩吉已经渗透进城。城内出来两名代表，与葡萄牙人相见，提出要和平地投降。阿尔布开克向民众发布宣告，对居住于此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施行全面的宗教宽容，并减税。他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将鲁姆人和阿迪尔沙阿的雇佣兵驱逐出去。这些人乱哄哄地逃离了城市。

3月1日，总督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大张旗鼓地正式占领果阿。新训练的士兵集合在码头上，长枪的枪尖闪闪发光。阿尔布开克身穿精美铠甲，踏上陆地，受到八名果阿显赫公民的屈膝迎接。他们向他献上了城门钥匙。他骑着一匹配有镶银马鞍的骏马入城，两侧群众大声呼喊，专业的乐队演奏鼓点和笛子，一名修士高举镶嵌着宝石的十字架，基督骑士团的旗帜（白底红十字）宣示了基督的得胜。

从阿尔布开克涉足果阿岛开始，他就将其视为葡萄牙的永久产业。他的一举一动也都是遵循这个精神的。他以严格的纪律约束部下，不准掳掠，不准向人民施加暴力、抢劫或强奸，因为这些人民如今是曼努埃尔一世的子民。在随后的岁月里，面对超乎寻常的挫折和激烈的批评，总督将一如既往地、顽强地坚持这种立场。

他们仔细探查了全城。王宫中拥有大广场、香气扑鼻的花园和精美的木制亭台楼阁，像卡利卡特王宫一样辉煌。他们在御厩发现了一百五十匹阿拉伯骏马和一百头大象。狄摩吉的报告，即鲁姆人在果阿备战，

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船坞内有大型克拉克帆船正在建造，兵工厂里也堆满了军用物资——大炮、火药和剑，还有用于制造大型航海远征所需一切装备的锻炉与器械。总督命令将未完工的船完成，以充实他自己的舰队。

阿尔布开克开始热情洋溢地建设葡萄牙的果阿。这是葡萄牙在亚洲获得的第一处领土。为宣示它的永久性，两周内他就命令建造一家铸币厂，“以铸造新货币，在国王陛下的新国度为他效劳”。^[5]此事体现出了他对当地局势的敏感。城市的显贵人物很快就来找他，谈及果阿没有自己的货币，而货币是重振贸易的必备条件。新的主要货币是克鲁扎多或曼努埃尔，这是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币，一面的图案是十字架，另一面是浑天仪，即葡萄牙国王的象征。金币重量为4.56克，遵照果阿的标准，比葡萄牙的类似金币重一点。为宣布新货币的发行，它们被装在银盆里在大街小巷展示，鼓乐喧天，笛声悠扬，小丑、舞者和传令官陪同，用葡萄牙语和当地语言宣布：“这是我主国王陛下的新货币，他命令在果阿及其领地流通此种货币。”^[6]

阿尔布开克对新货币的细节极其关注，这体现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他是一位务实而思维灵活的行政管理者，对当地条件高度敏感，能够在新的框架内思考新的解决方案；但同时他也盲目自信，自负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因此造成了许多问题。辅币的正面有字母A，“以显示铸币的人”，^[7]这很有争议。就是这种傲慢的举动，让他的政敌有了嚼舌根的材料，并为在葡萄牙的谣言火上浇油，称总督要把果阿变成自己的私家采邑。

殖民地管理工作的最初阶段肯定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不犯错误。起初狄摩吉被任命为收税的长官，这注定要招致两个居民群体的不满，于是不得不更改他的职权范围。另外，尽管阿尔布开克承诺宗教宽容，他对“萨蒂”，即寡妇殉夫自焚的习俗感到憎恶，明令禁止。他的基

督教使命感及其执拗的性格也使得他草草下令处死了一些引发骚乱的人。

在这期间，来了两名使者，一名来自沙阿伊斯玛仪一世^[8]，即波斯的什叶派统治者，另一名来自阿尔布开克的老对手，霍尔木兹的瓦加·阿塔。他们都是来找阿迪尔沙阿，求他帮忙对付葡萄牙人的。他们发现阿迪尔沙阿已经没了踪影，而阿尔布开克盘踞在果阿，于是大感困惑。但阿尔布开克看出与伊斯玛仪一世合作是一个战略机遇，因为后者是逊尼派马穆鲁克王朝的死敌。他提议与伊斯玛仪一世联合行动。葡萄牙人将从地中海和红海攻击马穆鲁克王朝，沙阿则从东方发动进攻。“如果上帝应允，这项盟约能够缔结，你就能够以全部力量攻打开罗和苏丹的土地，而我主国王陛下可以进军耶路撒冷，从另一侧征服整个国家。”^[9]这就是实现曼努埃尔一世梦想的机会。阿尔布开克派了一位使者去见沙阿，送去了这个建议，还给霍尔木兹的傀儡国王送去了一封好言安抚的书信，建议双方都既往不咎。被选为使者的倒霉蛋鲁伊·戈梅斯未能抵达波斯，而是在霍尔木兹被瓦加·阿塔毒死了。

总督在果阿的行动表现出极大的紧迫性。他深知这座城市的防御不足，而且年轻的阿迪尔沙阿迟早会卷土重来，索要他那宝贵的贸易港口。因为缺少石灰，没有办法制作砂浆，所以修理城防工事的工程受到很大困扰。他们不得不用石块和泥浆来重建城墙。他知道时间紧迫，于是派遣许多组劳工不分昼夜地轮流加紧施工，巩固防御，以应对可能的进攻。总督日夜都在工地上督促。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果阿。但到4月时，葡萄牙人的情绪开始焦躁不安。很多葡萄牙贵族并不赞同总督的设想。雨季快到了，远方传来消息，阿迪尔沙阿正在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由于阿尔布开克的严刑峻法，葡萄牙人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有些恶化，他的一些船长开始私下里渴望返回科钦。如果不能尽快离开，就会被瓢泼大雨困住，不得不等待一个漫长的季节，甚至可能遭到围攻。很显然，敌人最喜欢的策略就是等待暴雨和糟糕的海况将葡萄牙人孤立，

使其无法得到外界援助。阿尔布开克毫不动摇：果阿属于并将永远属于葡萄牙。

事实上，到4月时，阿迪尔沙阿就成功镇压了他国内的叛乱。阿尔布开克不知道的是，阿迪尔沙阿还和敌国毗奢耶那伽罗达成了停战协定。他已经准备好利用雨季困住葡萄牙人了。这个月，他派遣将领帕卢德汗率领一支大军（据说有四万人，言过其实了），而且是来自伊朗和中亚的训练有素的武士，去驱逐入侵者。这支军队抵达曼杜比河沿岸时，迅速击溃了狄摩吉匆匆拼凑的部队。隔着狭窄的溪流和充斥鳄鱼的大河，果阿岛上的守军已经看得到一支大军的帐篷和旌旗了。很显然，果阿岛的整个周长约18英里，将会把阿尔布开克的兵力分散得很稀薄，他们不得不守卫所有的沼泽渡口，因为在退潮时那些地方可以供敌军通行。帕卢德汗越过潟湖发动了一系列佯攻和试探性攻击，让葡萄牙指挥官们大为警觉、神经紧绷。他还给果阿城内的穆斯林偷偷送信。城里的人于是开始逃跑，并加入伊斯兰军队。帕卢德汗在等待天气进一步恶化。

一天，守军在紧张不安地凝视着分隔两军的狭窄小溪对面时，看到一个人走到水边，挥舞白旗。他用葡萄牙语喊道：“葡萄牙的大人们，请派人来与我谈话，传达我给总督送来的消息。”^[10]一艘小艇被派出。此人自称是葡萄牙人，名叫若昂·马沙多，请求安全护送他去见阿尔布开克。

马沙多是十年前被留在斯瓦希里海岸的一名犯人，此时为阿迪尔沙阿效力，但他似乎对自己的同胞还有一些好感。他带来了有价值的建议。他传达的消息很简单。帕卢德汗的军队很快会得到阿迪尔沙阿本人的增援。雨季即将到来。葡萄牙人应当在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之前离开岛屿；还要把沙阿的驻军逃跑时被留下的女眷和孩子归还苏丹。沙阿希望与总督保持友好关系。作为回报，他将给总督提供另一个滨海的地

点，以建造一座要塞。

这包含威胁、利诱和劝说对方理智行事的言辞。阿尔布开克对其不予理睬，他不愿意和对方谈条件。他骄傲地回答道：“葡萄牙人咬住的，永远不会松口。”^[11]他也不会归还“任何儿童或妇女，他要把这些妇女留下当作葡萄牙人的新娘，并希望她们成为基督徒”。^[12]阿尔布开克固执己见的谈判风格让大家很是震惊，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的答复被送到帕卢德汗耳边时，这位将军“瞠目结舌，因为他知道总督手下的人极少”。^[13]他回到自己的营帐，命令建造大型木筏，即将许多独木舟捆绑连接而成的平台，以运送军队过河。

阿尔布开克执拗地固守自己的帝国霸业愿景，不肯听别人的意见。他相信自己能坚守熬过雨季，一直到8月从里斯本来的下一支舰队抵达。他还不知道，阿迪尔沙阿与毗奢耶那伽罗的停战意味着阿迪尔沙阿后院安全无虞，可以放开手对付葡萄牙人。阿尔布开克还对自己部下越来越严重的不满情绪充耳不闻。敌人不断越过小溪发动袭击，令葡萄牙人神经紧绷，没有作战的时候还要被阿尔布开克督促加快修建城墙。越过水道，他们可以看到敌军是多么雄壮。酷热消耗了人的体力，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许多葡萄牙贵族和士兵越来越闷闷不乐，越来越不理解阿尔布开克。就连狄摩吉也和丝毫不肯让步的阿尔布开克争吵起来。大雨开始倾盆而下，海上开始波涛汹涌，葡萄牙人感到自己落入了陷阱。总督越来越孤立，就像在霍尔木兹的时候一样。他依赖于一小群对他本人忠心耿耿的贵族，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外甥，年轻的安东尼奥·德·诺罗尼亚，他雄心勃勃且英勇无畏。然而，果阿的居民，不管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在盘算自己的机遇，觉得或许投靠城外的军队会比较好。

帕卢德汗得知葡萄牙指挥官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厉害，于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发动总攻。5月10日或11日夜，大雨瓢泼，劲风抽打着棕榈树，当时正是退潮时间，渡口很容易通行，成群的木筏被推过河

流的浅水。在夜间的混战中，葡萄牙人和当地马拉巴尔人的混合部队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两支队伍之间缺乏凝聚力。他们迅速溃败，张皇失措地逃窜，竟然丢弃了大炮。很快，葡萄牙人被打退进城。一些土著部队叛变。城里的穆斯林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新主人。阿尔布开克拼命想控制局面，城内爆发了激烈巷战。

没过多久，葡萄牙人被围困在城堡内。一连二十天，总督敦促部下顽强抵抗，持续不断地巡视各个指挥部，一边骑行一边吃饭，但用泥浆黏合、匆匆建起的城墙不可避免地坍塌了。市民的反叛在蔓延。很显然，他没有足够多的兵力无限期地防守下去。阿迪尔沙阿也驾临前线。从城墙上，葡萄牙人能看得见海洋一般的帐篷和蓝红两色的旗帜，“他们的所有帐篷之上都飘扬着旗帜，他们恐怖的呼喊打碎了我们士兵的斗志”。^[14]越来越多的指挥官请求趁着还有机会赶紧撤退，但活着逃出果阿港、回到安全的科钦的希望一天天渺茫。总督在其亲信支持下，顽固地坚信城市是可以守下去的，阿迪尔沙阿需要回去和毗奢耶那伽罗交战。直到若昂·马沙多得知阿迪尔沙阿与毗奢耶那伽罗的停战协定，又一次赶来警示阿尔布开克，称帕卢德汗军队正在计划烧毁他的船只，而且在河道里击沉了一艘船以封堵葡萄牙人的逃跑路线时，阿尔布开克才意识到局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他计划于5月31日夜间冲出被围的城堡。葡萄牙人高度保密地进行出逃的准备。出逃的那个午夜有钟敲响。船只做好出航的准备。一群精锐的指挥官将负责掩护撤往码头的部队。有人建议放火烧毁全城，被阿尔布开克否决。他发誓要重返果阿并将其占为己有。除此之外，他铁面无情。他命令狄摩吉杀死他们扣押的所有穆斯林，不分男女老少，不留活口。大炮被钉死火门，马匹被屠宰，以防资敌。兵工厂和军用物资也被烧毁。

狄摩吉开始执行他的残酷任务。他欺骗穆斯林，让一小群一小群穆

斯林男子去接受总督的视察，然后将他们杀死在大街上。但狄摩吉并没有赶尽杀绝，他把很多妇女儿童锁在一处房屋内。对那些最美丽的女人，他剥去她们的珠宝首饰，让她们女扮男装，藏匿在自己的船上。尽管葡萄牙人的撤退很秘密，但敌人还是很快就捕捉到风声。阿迪尔沙阿的士兵潮水般拥入城门。阿尔布开克设计了一项最后的策略以延缓敌人的前进。他把胡椒和铜条撒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于是他们纷纷停下来掳掠这些贵重物品，从而放慢了追击的脚步。其他人看到自己的亲戚被屠杀在大街上时，不禁呆若木鸡。虽然有阿尔布开克的这个计谋，但葡萄牙人在撤往码头的过程中还是一路激战。后卫部队疯狂拼杀，才确保船只得以撤离。葡萄牙舰队驶入河中，发现被敌人击沉的船只未能堵住河道。可能除了总督之外，所有人都因为得以逃生而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1]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1.

[2]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103.

[3] 毗奢耶那伽罗（字面意思为“胜利城”）帝国（1336~1646年），位于印度南部，是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印度教帝国，1565年被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苏丹国大败后逐渐衰败。

[4] 波斯文中，“沙阿”意为“国王”。

[5]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76.

[6]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77.

[7]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118.

[8] 伊斯玛仪一世（1487~1524年），伊朗萨非王朝的创立者、沙阿（1502~1524年在位）。他率领萨法维耶教团（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一个宗教组织）统一了伊朗。他建立的萨非王朝将延续两百多年，是波斯/伊朗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鼎盛时期统治着今天的伊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大部、伊拉克、

科威特、叙利亚部分地区、土耳其部分地区等。

[9]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119.

[10]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85.

[11]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87.

[12]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528.

[13]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528.

[14]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540.

18 雨季的囚徒

1510年6~8月

在敌人的箭雨中，他们顺流而下。背后传来阿迪尔沙阿的军号声，那是在庆祝收复城市，其中也混杂有穆斯林发现自己男性亲属被当街屠杀、妻子女儿被掳走的哀号。葡萄牙舰队在曼杜比河河口附近下锚。在战略要地帕纳吉要塞的俯视下，曼杜比河河面逐渐变宽。

他们撤退得太晚了。此时已是6月初，雨季大张旗鼓地驾临了。暴雨敲打着船只，劲风透过弯腰的棕榈树猛吹。河水猛涨，船头和船尾都必须束缚好，才能防止它们在激流中扭曲变形。船上，高级指挥官们激烈地争论，下一步能否脱离河口并航海到安贾迪普岛。船长们的情绪非常乖戾。他们责怪阿尔布开克本人酿成了大祸，他们应当早点撤退。他们要求逃出这陷阱。领航员们同样固执地说，现在已经办不到了。阿尔布开克最终同意拿一艘船（船长是费尔南·佩雷斯）冒险，尝试通过河口的沙坑。然而，激流将他的船冲刷到了浅滩上。在惊涛骇浪拍击下，这艘船沉没了，不过水手们得以逃生，而且从残骸上回收了火炮。另一位船长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尝试冲出河口，但遭到拦截，被革职。葡萄牙人被大河困住了，可能要一直被困到8月。这是一个独特而严峻的艰难形势。

他们就这样停泊在河流正中的时候，一艘小艇打着白旗驶来。阿迪尔沙阿又派若昂·马沙多来谈判，表面上是来提出议和条件，实际上沙阿是在争取时间。他担心入侵者会猛攻并占领帕纳吉要塞，于是希望将他们牵制住足够长的时间，等他自己来控制帕纳吉要塞。然而，阿尔布开克的答复简练而严厉：“果阿属于他的主公，葡萄牙国王。除非沙阿改变主意，将果阿及其领土全部奉还，否则没有什么和平可谈。”^[1]

阿尔布开克的狂妄无礼让沙阿大感震惊。阿尔布开克四面受敌，动弹不得，吃了败仗，面临饥荒，居然还敢专横跋扈地提条件。沙阿口中说出的最文明的咒骂是：“魔鬼的儿子！”^[2]他又试了一次，让马沙多和两座城市显要人物一同返回，并提出新的建议：他不能放弃果阿，但可以把达布尔和整个霍尔木兹马匹贸易的税收赠给阿尔布开克。阿尔布开克粗暴地命令使者离去：在归还果阿之前，没什么好讲的。这是一场新较量的开端，既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在假装谈判期间，阿迪尔已经向帕纳吉要塞派驻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并在木制堡垒里部署了火炮。另外一个炮兵阵地被部署在对面的大陆上。在中游那岌岌可危的位置上，葡萄牙人被两个炮兵阵地夹在中间，能看得到两个阵地上旌旗招展，也能听到敌人的呼喊和他们战鼓与军号的奏乐。葡萄牙人落入了陷阱，两边各有一张血盆大口。

葡萄牙人受到了五花八门的磨难。首先是炮击：他们的船只遭到两岸炮火的夹击。不过，由于舰船船体非常坚固，而沙阿的火炮口径较小，未给葡萄牙船只造成很大损伤，但不分昼夜、持续不断的炮火让葡萄牙人感到一种恐怖的不安全感，饱受折磨。阿尔布开克的旗舰“海洋之花”号因为悬挂司令旗而容易识别，是最显眼的目标，有时一天能中弹五十发。登上舰桥或桅杆瞭望台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了减轻敌人炮火的威胁，他们不得不经常改变船只的位置，这也是困难和危险的工作。他们没有尝试还击。最好是节约火药，准备以后的战斗。水手们被困在甲板之下，大雨持续不断地敲击他们头顶的木板，他们开始生病了。

后来，在6月的某个时间，大雨停了。天气一连晴朗了十五天，于是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缺乏饮用水。现在没有雨水可供收集，曼杜比河河水太咸，无法入口。酷热榨干了人的体力，大家开始气喘吁吁。阿迪尔守卫着河流周围的所有水源，静静等候。他相信自己只要围困住敌人足够长的时间，就能粉碎入侵者。对葡萄牙舰队来说唯一的安慰是，狄

摩吉不断援助他们。他熟悉地形，还能提供情报。在此人的帮助下，葡萄牙人发动一次突袭，去丛林中的一处山泉取水。为了小小的回报，他们经历了激烈战斗：“我们吃尽苦头，终于给六十或七十个木桶装满水，但我们的大桶都没有办法装水，因为我们有很多人负伤。”^[3]根据另一份记述，“一滴水要用三滴血来换”。^[4]

出乎意料的好天气使得部分葡萄牙人又一次大声鼓噪，要求尝试强行突围。船长们不断纠缠阿尔布开克，要求他起锚并再次尝试。阿尔布开克和领航员们以佩雷斯的船所遭噩运为例，固执己见。和在霍尔木兹的时候一样，总司令的顽固引发了人们缓缓燃烧的怨恨怒火。人们普遍相信，是一个偏执狂的疯子把他们强留在这里，他为了自己的骄傲，不惜让大家都丢掉性命：“出于顽固，他自己要死，还要大家都跟着陪葬。”^[5]

大雨再次降临，海况又变得糟糕，这证明之前若是强行突围，可能会以灾难告终。雨水也让大家的干渴消失了。他们可以用船上的木桶贮存雨水，而顺流而下的河水现在也足够淡，可以饮用了，只要他们先把河水放置一两日，让泥沙沉淀。但饥饿又开始打击大家的士气和体力。给养所剩无几，阿尔布开克施行了严格的口粮配给制度。他把储藏室严密封锁，只有他本人签字，才能打开。每人每天领到四盎司饼干。从河里能捕到少量鱼，但仅供病人食用。与此同时，狄摩吉尽其所能地搜寻食物，并派他的人乘坐小船偷偷上岸。在大船上，水手们猎杀老鼠。那些拥有储物箱的人剥掉箱子外层的皮革，将其煮熟吃掉。“普通水手忍受不住饥饿，倍感绝望，就如此果腹。”^[6]科雷亚这么说是暗示贵族不会受到这样的苦难，但没有记载说贵族是否和普通水手吃同样的东西。有人到总督面前哀求一点食物，而仓库管理员尤其遭斥责。船长们指责阿尔布开克让他们遭受这样的折磨：“如果没有在此地过冬——他们也曾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们一定能避免这样的苦难……他发了疯，把他们都留在那里。”^[7]人们因为恐惧而面色阴沉。淫雨绵绵，炮火昼夜不

停，热带的酷暑有如地狱，人们浑身湿透，衣衫破烂，大汗淋漓，越来越被病态的恐惧控制：他们全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开始有人开小差了。三人从船上跳海，游到岸边。阿迪尔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给他们好吃好喝，并盘问他们关于葡萄牙普通水手心怀不满与急缺口粮的情况。船长们不得不一边警惕被难对付的敌人占据的河岸，一边监视自己的部下。

对阿尔布开克来说，生死存亡在此一战。葡萄牙在印度殖民政府的所有主要人物，都被困在曼杜比河上的大雨中，敌人的炮弹不时坠落，水手和船长们越来越凶地咒骂他，斥责他造成了粮食匮乏、他的顽固不化、他的执迷不悟和虚荣。他拥有的，只剩下对明确的战略视野的信念、鼓舞士兵的言辞和严酷的纪律。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严峻的危急时刻。在霍尔木兹，他没能让部下追随他。在科钦，他遭到了大家的不信任投票。他自己制订的果阿计划也面临灾难。在他最黑暗的时刻，他“躲在舱房闭门不出，举头望天，不断祈祷”。^[8]只有一小群人完全支持总督。阿尔布开克的外甥安东尼奥·德·诺罗尼亚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狂暴的总督和越来越焦躁不安的船长们之间扮演一个安抚、软化的缓冲性角色。

在果阿的王宫，阿迪尔沙阿仔细地倾听葡萄牙叛徒描述的敌军窘境。这些人或许过于热忱地在新主子面前表现，净捡新主人想听的说，因此他打算验证一下这些话。他设计了一种新策略来战胜冥顽不灵的敌人。6月的某个时间（具体日期不详），一艘满载食物（成袋大米、鸡肉、无花果和蔬菜）的船打着白旗，接近“海洋之花”号。葡萄牙人派了一艘小艇去探明来意，并得知沙阿希望以光荣的方式赢得战争，而不是用饥饿迫使敌人屈服。阿尔布开克让使者在河当中等待，安排了自己的策略，以回应敌人的心理战。他命令将一只木桶锯成两截，盛满葡萄酒；日渐减少的饼干也被从仓库中取出，放在桶里展示。一群水手

奉命在甲板上嬉戏，载歌载舞。使者最终被允许登船，目睹了这丰饶而欢乐的景象，阿尔布开克已经准备好了强硬的言辞：把你们的食物拿走，我们有的是吃的；若不归还果阿，就没有和平可谈。阿迪尔沙阿或许因此认为葡萄牙叛徒的话是假的，或许他看穿了阿尔布开克在这场考验双方神经的较量中的把戏。阿尔布开克的部下看到敌人把给养运走时，可能偷偷发出了最恶毒的咒骂。炮火继续嘲弄他们，扰乱他们的神经。

阿尔布开克知道，阿迪尔沙阿不会在果阿久留。在他国内，他还有其他的威胁要应对，其他的职责要履行。阿尔布开克寄希望于沙阿先放弃。在此期间，为了鼓舞士气，他提议发动一次袭击，摧毁敌人的岸炮。葡萄牙贵族们的情绪非常低沉，不肯同意。恼怒之下，他决定不管不顾，直接进攻：“我是你们的总督。上帝保佑，我要举着王旗在帕纳吉岸边登陆……上船之后，我会命令奏响狄摩吉的军号。你们来不来，随便你们。”^[9]他们全都选择了加入。

要发动一次两栖登陆作战，狄摩吉的浅水内河船只是至关重要的。黎明前，葡萄牙人袭击了帕纳吉城堡外的炮兵阵地，击溃猝不及防的守军，掳走了大炮和一些食物。河对岸的大炮也被消灭了。直到晚上，阿迪尔才派援兵来反击，但此时他的敌人早已安全地回到船上了。

阿迪尔原以为能用饥饿迫使葡萄牙人屈服，但葡萄牙人对帕纳吉的攻击挫伤了他的傲气。现在他必须发动进攻了。在果阿港，他命令秘密地准备一大批木筏，以便向敌人的舰队发动火攻。但这个秘密是不可能保守的。居功至伟的狄摩吉总是能够派遣间谍上岸去搜寻情报。阿尔布开克决定运用自己小船上的轻型火炮，展开先发制人的打击。虽然遇到抵抗，但他的奇袭基本上是成功的。阿迪尔的木筏被葡萄牙炮火炸得粉碎。安东尼奥·德·诺罗尼亚杀得兴起，看到敌人的一艘桨帆船停在岸边，抵御不住这种诱惑，企图将其俘获并拖走。他的膝盖不幸中箭，不

得不撤退。在这片海域的战斗中，腿伤是葡萄牙人的大难题，而且常常是致命伤，要么是因为箭射中了静脉或动脉，要么是因为感染和缺乏医药。诺罗尼亚负伤后卧床不起，三天后便死去了。外甥的死对阿尔布开克影响很深。诺罗尼亚曾是总督与心怀不满的船长们之间的调解人；总督还曾安排，假如他自己死亡，由诺罗尼亚接替他。他努力封锁消息，不让阿迪尔沙阿知道诺罗尼亚的死，但敌人还是知道了。

在曼杜比河的浮动囚牢内，艰苦无聊的日子在继续：无休止的雨，食物匮乏，以及身体越来越虚弱的人们。对阿尔布开克来说唯一的亮点是，消息传来，阿迪尔与毗奢耶那伽罗的停战结束了。沙阿需要到别处去。这给了阿尔布开克很大的鼓舞，以去继续坚守，但仍然不断有水手逃亡。果阿的战斗八天之后，一个叫若昂·罗芒的人游到岸边，带来了葡萄牙船上困境的最新消息：诺罗尼亚死了，水手们疾病缠身，快要饿死，在战斗中负伤的人得不到任何医治。接着有更多人叛逃。五人、十人，然后是十五人，趁夜色从船舷逃跑，游到岸上。船上的士气在动摇，但阿迪尔沙阿急需和平。这演化成了一场意志的对决。

沙阿又一次尝试夺回主动权。他派来了更多的和谈使者。阿尔布开克对这些访客的来来去去厌烦了。他怀疑他们的动机，因为他们的到访磨损葡萄牙人的斗志、拖垮他们的抵抗力。另外，沙阿还给叛徒罗芒配了一匹马。他身穿阿拉伯服装出现在岸上，显然吃饱喝足，用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更好的命运来嘲弄葡萄牙水手。阿尔布开克又一次拒绝讲和，但这一次葡萄牙贵族要求他至少听一听对方的提议。他同意了，但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逃兵问题。

双方同意于次日交换俘虏。阿迪尔沙阿派他的摄政者（城内地位最显要的贵族）来谈判。使者带来了一大群骑兵，刻意搞得很隆重，以炫耀自己的实力。岸边搭起一座黑色缎子的帐篷，摄政者带着必备的译员、骑兵和步兵在那里等候葡萄牙的谈判代表。阿尔布开克派去了他的

审计员佩罗·德·爱尔博伊姆，后者在葡萄牙驻印度殖民当局中是一位重要人物。德·爱尔博伊姆负责把阿迪尔的摄政者带到他的船上，同时狄摩吉的一艘船载着一名神射手若昂·德·奥埃拉斯，后者带着一张弩弓。在鼓声中，他们乘小船接近了岸边，看到那些衣着光鲜的叛徒在人群中，骑着马。其中就有罗芒，他穿着丝绸长袍，手执长枪和盾牌，嘲弄着葡萄牙人。奥埃拉斯在小船船头的桨手前方蹲伏，小船接近了沙滩。现在他们可以听得清罗芒的话了。他在辱骂总督和其他所有人，让他们去吃屎。德·爱尔博伊姆一声令下，弩手站直身子，瞄准射击。这支箭正中罗芒，击穿了他的身体，将他击倒在地，当场死亡。沙滩上的人惊得目瞪口呆，然后发出怒吼，指责葡萄牙人破坏停战。葡萄牙人解释说，叛徒在辱骂总督，这是他能允许的，所以不要再让叛徒出现了。

摄政者终于上船，他也对谈判的简短感到吃惊。他按照东方外交的风格，以溢美之词向对方问候，提议把果阿城外的一个拥有良港、适合建造要塞的地点送给葡萄牙人，还附上5万克鲁扎多金币的现金，而且只有一个条件。他要求葡萄牙人交出狄摩吉。阿尔布开克叹了口气，给出了简练而严厉的回答：阿迪尔必须交出果阿，否则免谈；阿尔布开克绝不会交出狄摩吉。他粗暴无礼地将目瞪口呆的摄政者赶下船，临别时还说，除非送来果阿的城门钥匙，否则不要再派使者来了。

阿迪尔沙阿知道尝试与这样一个藐视所有规则的人谈判是毫无意义的，于是放弃了。弩手因为这一次的精彩表现而得到10克鲁扎多的赏金，但这未能震慑逃兵。夜间仍然有人逃走。双方陷入僵局。舰队停留在河上。葡萄牙贵族的心怀不满骤然爆发成公开的反叛，具体的情形非常怪异。

之前果阿城被穆斯林占领的时候，狄摩吉把一些穆斯林妇女和女童，其中一些人来自后宫，偷偷掳走了。现在有人提议，用这些俘虏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阿尔布开克震惊了。他已经忘了这些俘虏的存在。

他询问狄摩吉，她们现在何处，为什么没有报告他。狄摩吉支支吾吾：她们已经被交给了船长们，分给大家，并且“其中很多人已经皈依基督教”。^[10]总督看到部下互相勾结、隐瞒此事，并且让女人留在船上会多么严重地影响纪律，更不要说不道德的行为了，于是不禁大怒。他要求狄摩吉把这些女人交出来。他继续深挖此事，得知其中一些女人已经“嫁给”了舰队的水手，不肯与她们的情人分离。他做了务实的选择，而且害怕水手制造麻烦，于是简单地将这些“婚姻”合法化，尽管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这让他的随军神父非常不满，神父宣称这种做法不符合教会法。“那么就遵守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的法律吧。”^[11]阿尔布开克专横地答道。

还有一些来自穆斯林后宫的妇女和女童并没有皈依基督教，其中包括比较美丽的那些人。她们不肯与普通水手发生关系，而是受到了一些年轻葡萄牙贵族的注意。阿尔布开克将这些女人转移到“海洋之花”号上，将其锁在船尾的一个舱室，由一名太监看押。这让一些葡萄牙贵族非常恼火，因为他们的玩乐就这样被强行打断了。太监很快向总督报告了一些可疑的动静。他确信有人在夜间想方设法进入舱室，不过他说不准具体是谁。阿尔布开克派了一艘小艇监视。随后几夜，小艇上的哨兵观察到，有时是一人，有时是三人，从附近的“玫瑰”号游过来。一个人偷偷爬上船舵，有一个舱门不知何故已打开，借此他溜进了“后宫”。哨兵认出他是一个叫作鲁伊·迪亚士的年轻贵族。

阿尔布开克找来他的两名最亲近的谋士。他暴跳如雷，因为就在整个舰队遭到攻打的困难时期，竟有人背着他，偷偷摸摸、不服从纪律、不遵守道德，在他的旗舰上搞这些桃色勾当。他们同意，“因为在这样的时期，在这样的地方，如此放肆地与穆斯林女人同寝，是罪大恶极”，^[12]而这只能有一个惩罚：迪亚士应当被处以绞刑。

鲁伊·迪亚士正与“玫瑰”号的船长若热·福加萨下棋，这时有人用力

抓住了他的肩膀：“以国王的名义，跟我们来！”^[13]一群士兵将迪亚士押到艙楼甲板，在他脖子上套了绞索，准备把他吊起来。哗变就在这时爆发了。福加萨大步向前，割断绞索，并大喊起来，有人要绞死鲁伊·迪亚士。贵族船长们的所有不满情绪一下子沸腾了。消息不胫而走：总督在没有恰当解释的情况下，就要处死高贵的鲁伊·迪亚士。舰队骚乱起来。一群葡萄牙贵族登上小艇，升起旗帜，沿着舰队的战线航行，煽动叛乱。整个舰队开始处于大规模哗变的边缘。在岸上观察的穆斯林欢呼起来，对着越来越严重的骚乱大呼小叫。

与此同时，押解迪亚士的士兵的长官向“海洋之花”号呼喊，他的犯人被劫走了。阿尔布开克暴跳如雷，登上一艘小艇，亲自去直面哗变者。叛乱是对总司令至高无上权力的挑战。他们抱怨他以“专横跋扈的权力，在没有与船长们商议的情况下”^[14]，就要绞死迪亚士。而且更糟糕的是，处决贵族的方法照例应当是斩首，而绞刑是对待平民犯人的；他要绞死迪亚士，这是对贵族礼节的严重藐视。阿尔布开克对他们的话一概充耳不闻，将叛乱的头目逮捕并铐起来，然后将迪亚士吊死在“玫瑰”号桅杆上，杀一儆百。

这次叛乱是几个月以来的紧张与困难酿成的恶果，鲁伊·迪亚士的处决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阿尔布开克名誉的一个污点。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固执己见，专断跋扈，不肯听别人的意见。安东尼奥·德·诺罗尼亚曾对他那粗暴的领导风格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但诺罗尼亚已经不在人世。此事是霍尔木兹事件的重演。他不能够理智地领导部下，这已经让他臭名昭著。阿尔布开克虽然暴躁易怒，但也很快就能悔改。他努力与四名被囚禁的叛乱头目修复关系，因为在舰队的生存斗争中，这四个人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在霍尔木兹一样，他们拒绝与他合作。迪亚士之死将始终困扰阿尔布开克，直到他去世为止。

阿尔布开克知道阿迪尔沙阿急需离开，因为他有别的战争要打。角

力在继续。8月到了，天气开始好转，雨停了。从曼杜比河那讨厌的囚牢逃脱的可能性在增加。阿尔布开克命令狄摩吉去搜寻给养然后回来，继续坚持，等待阿迪尔沙阿的耐心耗尽。但他的部下再也忍受不了，他们哀求起航离去。他不情愿地让步了。“于是，8月15日，即圣母蒙召升天日^[15]，趁着吉利的风，总督率领整个舰队从河流出发，前往安贾迪普岛。”^[16]他们在曼杜比河被困了七十七天，始终忍受着暴雨、饥饿和火炮轰击。忍耐这些困难并生存下来，已经差不多可以算一次胜利了。然而，对阿尔布开克来说，果阿的事情还不算完。就像霍尔木兹事件之后一样，他发誓要重返果阿并定要得胜。他这个愿望实现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1]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98.

[2]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98.

[3]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00.

[4] Rodrigues, Vítor Luís Gaspar, and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Conquista de Goa, 1510-1512*. Lisbon, 2008, p.43.

[5]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00.

[6]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00.

[7]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555.

[8]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556.

[9]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03.

[10]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14.

[11]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15.

[12]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16.

[13]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16.

[14]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563.

[15] 根据天主教教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结束今世生活之后，灵魂和肉身一同被上升到天堂。天主教、东正教、东方正统教会和部分圣公会团体承认这个神学观点，天主教将其作为正式教义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新教教派则强烈反对这个神学观点。

[16]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20.

19 恐怖的手段

1510年8~12月

在安贾迪普岛，阿尔布开克意外地遇见了一支拥有四艘船的小舰队，正要开往遥远的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指挥官是迪奥戈·门德斯·德·瓦斯康塞洛斯。曼努埃尔一世漫不经心地命令这支微薄的力量去征服马六甲。这支舰队的部分资金是佛罗伦萨投资者提供的，他们的代表包括乔万尼·达·恩波利，此人曾与阿尔布开克一同参加之前的一次远航。恩波利发现总督“因为在果阿遭受的失败而非常不悦，对其他许多事情也很恼火”。^[1]

恩波利那保存至今的记述，可能是两年后他在巴西海岸因无风受困且身患坏血病期间写下的，语调非常尖酸和暴躁。恩波利写道，阿尔布开克对果阿十分痴迷，一心要东山再起，尽快将其收复。他需要尽其所能地搜罗兵力，包括预定前往马六甲的船只。而且有鉴于在曼杜比河上受的灾祸，他需要用狡黠的策略来赢得指挥官们的同意。他认识到果阿岛的潜力，也担心鲁姆舰队会卷土重来，将其变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基地进而损害葡萄牙的利益。他强调，即将有一支鲁姆舰队杀来。在恩波利看来，埃及人的威胁已经变成了一场虚假战争^[2]：“关于鲁姆人的消息和之前许多年传播的一样，但我们始终无法知道真相.....目前对这种消息不能当真，因为穆斯林人说的话不能信。”^[3]私下里，他指控阿尔布开克在第乌的马利克·阿亚兹帮助下伪造信件，作为埃及舰队即将到来的证据。

不管真相如何，阿尔布开克很快就劝诱、威逼和哄骗他的舰队，以及要预定前往马六甲的船只，发动了一场新的战役。考虑到科钦和坎纳诺尔的葡萄牙人都不太愿意再去攻打果阿，他能办成这事，也算很厉害

了。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的狄摩吉传来消息，阿迪尔沙阿已经离开了果阿，与毗奢耶那伽罗打一场新的战争。这真是天赐良机。阿尔布开克花了两个月时间整修舰队，并为其囤积给养。10月10日，在科钦的一次会议上，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船长们：谁愿意跟随他，就一起走；不愿意去的人，就向国王解释好了。他摆平果阿的事情之后，会迅速处置马六甲和红海的问题。他又一次凭借自己的个人威势和恫吓，称心遂愿了。迪奥戈·门德斯·德·瓦斯康塞洛斯和满心不情愿的佛罗伦萨人不得不同意暂缓开往马六甲。就连鲁伊·迪亚士事件中的哗变者，虽然更愿意留在监狱里，但也被释放，加入了舰队。16日，阿尔布开克给国王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举措辩护，并又一次解释了他为什么坚持要拿下果阿：“陛下会看到，假如陛下拥有了果阿，会把整个印度扰乱……沿海没有比果阿更好、更安全的地点了，因为它是一个岛屿。假如丢掉了整个印度，还能以果阿为基地，将其收复。”^[4]这一次不仅仅是征服果阿就算完了，他还打算彻底消灭果阿的穆斯林。

次日，他率领十九艘船和一千六百人扬帆起航。到11月24日时，舰队已经返回了曼杜比河口。葡萄牙人渐渐获得了许多盟友。因为印度沿海地区四分五裂，各小国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所以他们成功把一些小国拉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据说霍纳瓦尔的苏丹派来了一万五千名陆军士兵。狄摩吉征集了四千人，并提供六十艘小船。但阿迪尔沙阿在果阿也留下了防御力量。他部署了八千人的驻军，主要是来自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的经验丰富的雇佣兵，葡萄牙人称之为白土耳其人，还有一些懂得铸炮技术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叛教者。

阿尔布开克决定不再等待，于是在11月25日，即圣凯瑟琳瞻礼日，兵分三路，从两个方向攻打果阿城。随后发生的，不是他一直努力灌输的纪律严明、井然有序的军事战术的胜利，而是葡萄牙人传统的狂暴鲁莽的战法的胜利。士兵们高呼“圣凯瑟琳！圣地亚哥！”冲过城下的壁垒。一名士兵将自己的兵器插入正在被守军关闭的城门的门缝里面，阻

止城门关闭。在另外一个地段，一名叫弗拉迪克·费尔南德斯的身手敏捷的小个子将长矛插入墙缝，借力跳上胸墙，站在那里挥舞一面旗帜，呐喊道：“葡萄牙！葡萄牙！胜利！”

守军闻风丧胆，未能关闭城门。葡萄牙人将门推开，潮水般一拥而入。守军后撤时，遭到从另一扇门冲进来的其他葡萄牙士兵的冲杀。战斗非常血腥。葡萄牙编年史家记载了一些疯狂的蛮勇行为。最早杀入城的人之一，曼努埃尔·德·拉塞尔达，眼睛下方被一支带倒刺的箭射中，插得极深，拔不出来。他折断了箭杆，血淋淋的脸上还插着半截箭，继续厮杀。另外一个人，热罗尼莫·德·利马一直奋战到伤重而瘫倒在地。他的兄弟若昂发现了他，想陪在奄奄一息的热罗尼莫身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抚慰他。垂死的人抬眼看着兄弟，指责他在战斗中停顿。据某一种版本的记载，他说道：“兄弟，继续杀去吧！我要走自己的路了。”^[5]若昂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

穆斯林的抵抗土崩瓦解。他们企图通过浅滩逃离城市，很多人因此溺亡。成功通过浅滩的人则遇上了葡萄牙的印度教徒盟军。“他们从渡口和山上过来支援我，”阿尔布开克后来写道，“他们斩杀了所有从果阿逃走的穆斯林，不留一个活口。”^[6]仅仅花了四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

阿尔布开克关闭了城门，以阻止自己的士兵不知节制地猛追敌人。然后，他准许士兵洗劫和屠戮全城。这是一场血腥的惨剧。他要清剿城内的所有穆斯林。阿尔布开克后来向国王描述了自己的行动，丝毫没有悔意。

天主帮助我们成就了伟大的事业，因为他希望我们成就一桩丰功伟绩，甚至超过我们所祈祷和希冀的……我烧毁了这座城市，将其居民尽数屠戮。我们的人一连屠杀了四天，一刻不曾停歇……只要我们能去的地方，没有饶恕一个穆斯林的性命。我们把他们驱赶进清真寺，把清真寺点燃。我命令不准杀害任何印度教徒农民或婆罗门。我们估计，穆斯林男女

死者的人数为六千。陛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7]

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葡萄牙叛徒，他曾在曼杜比河的战斗期间游到岸边投敌。佛罗伦萨商人皮耶罗·斯特罗齐写道：“没人能逃得性命。不分男女，甚至孕妇和婴儿，都被赶尽杀绝。”^[8]死尸被喂给鳄鱼。恩波利回忆道：“屠杀的规模极大，以至于河里满是污血和死人，一周之后，潮水把死尸冲刷到岸边。”^[9]显然鳄鱼也没能吃光所有的尸体。

阿尔布开克向曼努埃尔一世描述此事时用的词是“清洗”。他这是要杀一儆百。“这种恐怖的手段，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写道，“我没有留下一座墓碑或伊斯兰建筑。”^[10]事实上，他不可能把城内所有人都杀光的。一些“皮肤白皙、容貌姣好的”^[11]穆斯林妇女被留下，后来被嫁出去。根据各方面的记载，葡萄牙人对果阿的洗劫都是声势浩大的。斯特罗齐目睹葡萄牙人掳走的东方财富，简直眼花缭乱。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那里能找得到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既有黄金，也有珠宝……我觉得东方人除了打仗之外，在不计其数的方面都比我们优越。”他最后表达了懊恼，不过还是觉得自己运气不错：“我没能参加抢劫，因为我负伤了。不过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中的不是毒箭。”^[12]

圣凯瑟琳瞻礼日快结束的时候，阿尔布开克亲自问候得胜的指挥官们，并感谢他们的辛劳。“很多人受封为骑士，”恩波利记载道，“包括我自己。”但这并没有软化他对总督的敌视态度。“当骑士比当商人好”，^[13]他补充道，想起了葡萄牙贵族对商业活动的相对轻视。第一批欢迎阿尔布开克入城的人当中包括曼努埃尔·德·拉塞尔达。他骑着一匹装饰华美的骏马，那是他从自己杀死的一名穆斯林手中夺来的。他面颊上仍然插着断箭，浑身是血，“阿尔布开克看到他面部带箭，铠甲上尽是血，于是上前拥抱他，吻了他的面颊，说道：‘你就像受难的圣塞巴斯蒂安^[14]一样光荣。’”^[15]德·拉塞尔达的形象成了葡萄牙传奇的一部分。

果阿失陷于一小群葡萄牙人之手，令印度各大帝国瞠目结舌。阿尔布开克的惊人之举迫使印度人重新考量战略。遥远的国度派来使者，向阿尔布开克献礼致敬，并评估和思考葡萄牙人的征服意味着什么。

关于如何维持和保障这个新的帝国，阿尔布开克有一些新颖的想法。他知道葡萄牙人的人数是多么少，他们的死亡率是多么高，而且缺少妇女。他立刻开始推行异族通婚的政策，鼓励葡萄牙平民（士兵、石匠、木匠）与当地女人结婚。与葡萄牙人通婚的当地女性一般是低种姓的印度教徒，她们接受了洗礼，得到馈赠作为嫁妆。与印度人通婚的葡萄牙男人被称为“卡萨多”^[16]，也会得到经济补助，以奖励他们迎娶当地女人。收复果阿的两个月之内，他就安排了两百门这样的婚事。他努力建立一个忠于葡萄牙的当地的基督教化群体，这种政策很务实。但阿尔布开克在另一方面也很开明，他对果阿女性的福祉表达了关切。他努力禁止寡妇殉夫，并授予女性财产权。他的婚姻政策遭到了愤慨的基督教士和政府官员的大力反对，但启动了创建一个持久的印度-葡萄牙社会的过程。

与此同时，被意外改变行程的迪奥戈·门德斯·德·瓦斯康塞洛斯，毕竟肩负着占领马六甲的御旨，已经在焦躁地渴望起航了。很显然，他的四艘船若是没有援助，不大可能取得什么成绩。阿尔布开克在8月时收到了鲁伊·德·阿劳若的一封信。阿劳若是在前一次去往马六甲的远航中被当地人扣押的六十名葡萄牙人质之一。阿劳若的信语调绝望：“我们等候您的驾临……愿上帝保佑，让您能在五个月内抵达，否则我们就全都活不了。”他在信中提供了大量关于马六甲政治和军力的信息。马六甲城很大，不过防御并不稳固，但“即便未必真的需要这么多兵力，阁下也必须率领全部力量到此，以期在陆地与海洋震慑敌人”。^[17]1511年4月，阿尔布开克起航，开始了一次新的征服。他在果阿只停留了四个月。

阿尔布开克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一年，葡萄牙人对马穆鲁克王朝还施加了另一次沉重打击，地点是地中海。8月，一队军用桨帆船在安德烈·多·阿马拉尔（罗德岛上圣约翰骑士团的一名葡萄牙骑士）的率领下，拦截并消灭了一队从黎巴嫩向埃及运送木材的船只。这些木材是用来建造一支新舰队以为第乌的失败报仇雪恨的。马穆鲁克王朝完全依赖于从地中海东部进口木材。没了木材，他们就束手无策了。这次灾难让他们的海军实力倒退了许多年。

[1]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183.

[2] “虚假战争”的典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到次年5月德国入侵西欧之间，在法德边境上，双方虽然已经互相宣战，但都按兵不动。又称“静坐战”。

[3]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185.

[4]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

[5]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50.

[6]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7.

[7]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7-8.

[8]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2, p.189.

[9]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189.

[10]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2,

p.188.

[11]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2, p.190.

[12]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2, p.189.

[13]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189.

[14] 圣塞巴斯蒂安为基督教的殉道烈士，卒于约288年，据说死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期间。他一般被描绘为被捆在树上，身上中箭。

[15]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p.153-154.

[16] 意思是“已婚男人”。

[17]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2, p.193.

20 太阳的眼睛

1511年4~11月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第一个十年里，对他们来讲，时间的流逝既快又慢。里斯本与印度之间的通信肯定是曲折而艰难的，王室的一道命令从发布到接到回复起码需要一年。但葡萄牙人的学习能力和取得的成绩是超乎寻常的：地理、文化与语言知识的搜集整理，地图的绘制和对政治微妙之处的理解，都以惊人的高速进行，因此从1510年的角度看，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远航几乎已成为传说。他那些饱经风霜的船只于1499年回国时，带去了来自远方的关于马六甲的道听途说：若风向有利，马六甲距离卡利卡特“四十天航程……所有丁香出产于那里。那个国度有许多大鹦鹉，羽毛火红”。^[1]到1505年时，国王已经在漫不经心地命令阿尔梅达探索新的海域：“发现”锡兰、中国、马六甲和“目前尚不了解的其他地区”，^[2]并在新发现的土地上竖立石柱。浑身精力用不完的葡萄牙人永远在贪婪地渴求新的视野。

一年后的1506年，马六甲成了葡萄牙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阿尔梅达奉命立刻前往该海域，只在马拉巴尔海岸保留少量兵力。促使国王突然发布此项命令的，是折磨他良久的对竞争的畏惧：有消息传来，“一支卡斯蒂利亚舰队……准备在这一年夏季出航，去搜寻马六甲”。^[3]

《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的不确定性也困扰着国王。1494年设定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势力范围的分界线环绕整个地球，卡斯蒂利亚人相信马六甲属于他们在地球另一边的势力范围。哥伦布也坚信他发现了通往东方的直接航路，所以里斯本方面非常担心西班牙人或许能向西航行而抵达马六甲。这似乎是一场直截了当的竞争。阿尔梅达只派遣两个人登上一艘商船，去寻找马六甲，不过这艘船始终未能抵达那里。副王认为自己是不可能亲自去的，因为他在马拉巴尔海岸的脆弱立足点受到了威胁。曼

努埃尔一世认为阿尔梅达是在故意拖延，于是在1508年派了一支小舰队直接从里斯本出发，去马六甲建立一个贸易站。这支远征队命途多舛，其幸存者如今被马六甲苏丹扣押，他们的书信在恳求阿尔布开克过来援救。

同时，葡萄牙人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马六甲城的价值。它坐落于马来半岛西海岸，地理位置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控制着去往印度的海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六甲就从一个贫困的小渔村发展成世界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马六甲非常伟大和富庶，其价值难以估量，”葡萄牙商人托梅·皮莱资^[4]写道，“马六甲是一座为商业而生的城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更适合商贸；雨季在这里终结，兴旺的事业在这里萌芽。马六甲居于熙熙攘攘的商业活动的中间，方圆1000里格之内所有不同民族的商业贸易都要通过马六甲。”^[5]它将印度洋和西方所有地区的贸易与南海和太平洋的商贸连接起来。中国的平底商船撤离印度西海岸之后，马六甲就成了它们的目的地。他们称之为“太阳的眼睛”。它是地球上最为国际化的城市。按照皮莱资的说法，在马六甲可以听到八十四种语言。他列举了欧洲之外的众多商贸民族：商旅来自开罗、霍尔木兹、果阿、柬埔寨、帝汶、锡兰、爪哇岛、中国和文莱。就连鹦鹉也会说多种语言。马六甲经营羊毛织物、威尼斯的玻璃和铁器、阿拉伯半岛的鸦片和香水、波斯湾的珍珠、中国的瓷器、班达群岛的肉豆蔻、孟加拉的布匹和摩鹿加群岛的香料。马六甲比里斯本更大，人口和威尼斯差不多，有超过十二万人。“毫无疑问，马六甲非常重要，利润丰厚，所以我觉得它在世界上没有可以与它媲美的对手。”^[6]皮莱资如此写道。统治马六甲的是一位穆斯林苏丹。曼努埃尔一世急切想要的，不仅是营救人质，还有马六甲的财富。

该地区的主要势力是爪哇岛和古吉拉特的穆斯林。马六甲距离阿拉伯半岛太远，所以阿拉伯的三角帆船无法在一个雨季内抵达。古吉拉特商人是来自印度洋西部的贸易中间商，对马六甲苏丹最有影响力。就像

在卡利卡特一样，古吉拉特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与他们竞争，于是说服苏丹，摧毁了葡萄牙贸易站，抓了人质。

阿劳若的求救信为阿尔布开克提供了大量关于马六甲城的信息。他遵照阿劳若的建议，率领自己能够召集的全部力量出征，目标是震慑住敌人。他带来了十八艘船，其中十二艘是克拉克帆船。人手的问题比较大。他只有七百名葡萄牙人和三百名马拉巴尔士兵，却要对付可能非常庞大的土著军队，而且这还是一次极其大胆的远距离攻击。他必须航行1500英里，跨过印度洋东部，假如遇到困难，很难找到歇脚点。途中阿尔布开克损失了一些船只，而且他自己的旗舰“海洋之花”号的船龄已经有九年，适航性越来越差。

舰队遵循阿劳若的建议，一路烧杀抢掠，散播恐怖，俘虏穆斯林船只，咄咄逼人地访问苏门答腊岛沿海的臣属于马六甲的小邦。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片全新的海洋。看不见印度洋西部的阿拉伯三角帆船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平底船，它们是四桅帆船，坚固，高侧舷，“用非常厚的木板建成，与我们的船差别很大”。他们有很多机会对这些平底船感到好奇。他们遇见了一艘比雄伟的“海洋之花”号还要高大的平底船，“简直和城堡一样固若金汤，因为它有三四层重叠的甲板，所以炮火也奈何不了它”。^[7]它抵挡葡萄牙人的大炮一连两天。直到他们用炮火打飞了它的舵，它丧失了机动力后才不得不投降。“因为平底船很高，他们下船时走过的跳板的倾角有20度。”^[8]

乔万尼·达·恩波利也被阿尔布开克拖进了此次远征。他不情愿地奉命上岸，向敌视葡萄牙人的苏门答腊岛王公们发出和平建议。这个佛罗伦萨人抱怨道：“阿尔布开克仿佛对我的死活完全不在乎。”7月1日前后的某个时间，舰队抵达了马六甲，“在城市前方停船，我们没有开炮，放下船锚，等待当地国王派使者来岸边见我们”。据恩波利说，这座城市“离海岸非常近，房屋鳞次栉比，人口稠密，延伸足有3里格长，非常

美丽”。城市沿着海岸延伸。低洼的沼泽地带、棕榈叶屋顶的房屋之间偶尔可见清真寺尖塔。一条河穿城而过，注入大海，入海口有一座坚固的桥梁，将城市一分为二。

马六甲完全依赖贸易而生存；它的背后是疟疾肆虐的热带雨林，是老虎和鳄鱼的巢穴。当地属于热带气候，令人难以忍受的湿热会榨干身穿铠甲的人的生命力。港口船只云集。恩波利写道：“帆船与平底船之间，大约有一百张帆，还有大量划艇与具有三十或四十支桨的舢板。”他还评论称：“港口很美观，并且不怕任何风.....可以容纳两千艘满载货物的船.....因为水最浅的地方也有4英寻。”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平底船，载着“白人，和我们一样，穿着打扮是德意志风格，穿着法兰西式靴子和鞋子”。^[9]中国人和印度教徒商人似乎都很友好。



地势低洼的马六甲城被河流分成两个部分，加斯帕尔·科雷亚在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并建造要塞不久后绘制了这幅图

苏丹和总督之间发生了一场高度紧张的僵持。苏丹穆罕默德希望先签订和平协议，以保障船只的安全通航（因为他的财富依赖于商船），然后才肯交出被扣押的葡萄牙人质。阿尔布开克要求先归还人质。于是，双方僵持不下。苏丹在古吉拉特和爪哇穆斯林的辅佐下，企图玩弄季风的计谋，即故意拖慢谈判，等待天气迫使葡萄牙人离开。同时，他也派人密切监视入侵者。他知道葡萄牙人的人数是多么少，于是准备防御工作。

阿尔布开克不耐烦了。7月中旬，他炮击城市，烧毁了海边的一些房屋以及古吉拉特的平底船。苏丹匆匆回到谈判桌前。他给人质穿上华丽衣服，将其释放。阿尔布开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允许葡萄牙人建立贸易站和一座防御要塞，并重金赔偿葡萄牙人蒙受的损失。他可能估计到对方最终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在积极备战。阿劳若和中国人从城里泄露出来的大量信息对阿尔布开克帮助极大。苏丹名义上拥有两万名士兵、二十头战象，还有大炮与弓箭手。实际上这些数字并不让人肃然起敬。他的大炮质量很差，缺少火药和训练有素的炮手，而且实际上拥有武器、能够作战的士兵只有约四千人。苏丹继续支吾搪塞，并在桥梁两端建造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他用铁制尖钉保护海滩，并用稻草盖住这些尖钉，还准备了成袋的火药。

阿劳若敦促总督立刻行动，不要浪费时间。时间拖得越久，敌人的防御就越牢固。在惯例的作战会议上，阿尔布开克敦促指挥官们支持他的计划，并理解此役的全部意义：他们需要在此地建造一个贸易站，因为马六甲“是东印度群岛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位于所有利润丰厚的商贸活动的中心和终端”。^[10]要建造贸易站，就需要一座坚固的要塞，他对此非常坚持。大家似乎达成了一致意见。

他们精心准备攻势。马六甲的关键是河上的那座桥梁。占领了桥梁，城市就被切割成两块了。于是阿尔布开克兵分两路，一路在河流西岸登陆，那里有一座清真寺，王宫也在那里；另一路由总督亲自指挥，在东岸登陆，城市的主要部分在那一侧。两路军队将在桥梁处会合。中国人表示愿意帮忙，但阿尔布开克决定不让他们参加战斗，而是请他们提供运输船，协助他的部队登陆。7月24日（圣雅各瞻礼日）黎明前两个小时，攻势发动了。他们向海滩抛掷宽阔的木板，以保护士兵在接近敌人的防御工事时免遭尖钉和火药的伤害。马六甲人的炮火基本上没有杀伤力。葡萄牙人身披重甲，但遭到了箭雨袭击。敌人还有一种用吹管吹出来的短而薄的飞镖，上面涂有某种鱼的毒液。如果毒素进入血液，

伤者几天内必死无疑。

阿尔布开克的士兵快速推进，争夺桥梁的战斗很激烈。在另一路，葡萄牙人终于冲过了防御工事，苏丹决定亲临战场、身先士卒。他的二十头战象横冲直撞地在大街上走来，将阻拦它们去路的所有东西都撞得粉碎，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弓箭手从城堡内向入侵者射出箭矢，象夫催动战象前进，战象的长牙上还挂着剑。苏丹乘坐大象亲自带队。面对这恐怖的景象，葡萄牙人开始撤退。只有两人坚守，用长枪对抗苏丹乘坐的那头狂暴的大象。一个葡萄牙人用长枪戳它的眼睛，另一个刺它的肚子。受伤的大象因剧痛而狂躁，怒吼起来，转过身，用鼻子抓住象夫，将他摔死在地上。跟在后面的大象乱作一团，喇叭声响彻云霄。苏丹从自己大象的背上溜下逃走，但战象队伍的冲锋被阻住了。象群乱哄哄地散开，丢下一些被踩成肉饼的尸体。

浓烟滚滚，杀声震天，飞镖呼啸，葡萄牙人高呼“圣雅各！”终于冲上了桥梁。此时已经到了正午，太阳升到了最高点。披着板甲、饿着肚子厮杀了几个小时后，葡萄牙人因为潮热的天气而精疲力竭。阿尔布开克命令用船帆搭建凉棚，但士兵们已经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他们没有精力去修建防御工事，以巩固好不容易得来的桥梁。阿尔布开克单方面决定撤退，令正在渴望掳掠战利品的指挥官们大怒。为了在挫折面前鼓舞士气，他派遣了一些小队去烧毁苏丹的部分建筑和清真寺。他们遇见一座金碧辉煌の木亭，它被承载在一辆巨型战车上，战车有三十个轮子，每个轮子都有一个房间那么高。这座移动亭子本来是用于苏丹的女儿和邻国君主的婚礼游行的，“上面挂着丝绸织物，外面挂着旗帜。它被付之一炬”。^[11]对葡萄牙人的战略失败来讲，这至少算是一点安慰。桥梁被放弃了。葡萄牙人掳走了七十二门炮，带走了自己的伤员。“中了毒镖的人几乎全都死了，唯一的幸存者是费尔南戈梅斯·德·莱莫斯，他中毒镖之后，迅速用滚烫的猪油烫伤口。除了感谢上帝之外，这种疗法是挽救他生命的第二功臣。”^[12]

战斗出现了一个不确定的间歇。苏丹宣称自己大感困惑，因为他明明已经释放了人质，却横遭攻打。他提议和谈。他这是在争取时间，等待天气变化。葡萄牙人的失败给了他新的自信。他重建防御工事——围栏、海滩上的陷阱（如今在铁制尖钉上涂了毒药），并在城内建造了障碍物。然而，阿尔布开克已经拿自己的雪白美髯起誓，一定要对马六甲复仇，决不放弃。

对葡萄牙人来说，问题仍然是掌控城市入口的那座高高的桥梁，现在那里的防御比之前厉害多了。解决的办法是居高临下地攻击它。阿尔布开克可能记起了在马六甲海峡与平底船进行的持续两天的难忘战斗，那次战斗表明平底船是多么坚固。于是他强征了港内的一艘爪哇四桅平底船，装上许多大炮，交给安东尼奥·德·阿布雷乌指挥，然后把它拖曳到桥梁处。这艘船吃水很深，所以只能在涨潮时驶近桥梁；最后，它搁浅在一个可俯瞰桥梁的沙洲上。平底船处于守军的火力射界之内，遭到了猛烈炮击，但它安然无恙。守军从河流上游放下来装满木材、沥青和油的木筏，企图火攻平底船。葡萄牙人乘小船，用带有铁制尖端的长鱼叉将火攻木筏拨开。阿布雷乌面部中了一枚火枪子弹，牙齿被打碎，舌头的一部分被打掉，但当阿尔布开克命令别人接替阿布雷乌时，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并宣称“只要他还有脚能走路，有一部分舌头能发布命令，只要他还有一丝气息，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岗位交给任何人”。^[13]阿布雷乌留在平底船上，准备炮击桥梁。

阿尔布开克为第二次攻势做的准备比上一次考虑得更周全。他除了准备大量弩弓外，还预备了木桶、鹤嘴锄、铁锹和斧子，以便在攻下桥梁之后迅速建立防御工事；他准备了大量木栅栏，以便保护推进的士兵免遭火枪和毒镖袭击；他还准备了大量木板，铺设在布有陷阱的沙滩上。万事俱备。他允许中国人带着礼物和祝福起航离去。8月9日，他传唤所有船长和贵族，召开了又一次会议。

很显然，许多人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和总督单方面做出撤退决定之后嘟嘟囔囔。马六甲吹管毒镖着实令人胆寒，而在热带的酷暑中建造一座要塞的想法也不吸引人。葡萄牙贵族始终觉得建造要塞的任务对他们来说太低贱了。他们更愿意掳掠一番然后返航。根据不同的记载，阿尔布开克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他介绍了对印度洋的整个战略计划。如果扼杀红海的穆斯林贸易是最终目标，那么马六甲，“所有利润丰厚的商品与贸易的中心和终端”，^[14]是战略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它是“所有香料、药品和全世界财富的来源……通过它输送到麦加的胡椒比途经卡利卡特的多得多”。^[15]占领了马六甲，就扼住了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威尼斯的咽喉，阻挡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谁是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掐住了威尼斯的咽喉。”^[16]这是托梅·皮莱资的话。

阿尔布开克准确地把握了印度洋贸易的神经中枢，以及马六甲为什么重要。他努力让葡萄牙贵族们放心，不管葡萄牙人的数量多么少，他们可以占领并公正地统辖马六甲，可以借助当地的盟友来守住它。阿尔布开克不是要洗劫一座城市，而是在建设一个帝国。他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没有一座要塞，是守不住马六甲的。他直视指挥官们，希望能够确定他们会致力于要塞的建筑工程。他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如果不能用一座要塞守住这个地方，那么我就不打算派遣士兵上岸去占领它。不管能掳到多少战利品，我也不会拿一个人的生命冒险，因为我觉得那样不符合我主国王陛下的利益。”^[17]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呼吁，将帝国霸业与圣战狂热、骑士的责任感、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倾听他的指挥官们的脑子里一定在觊觎马六甲的“黄金城墙”，^[18]但阿尔布开克一定要他们都承诺参与建造要塞，才同意继续作战。他凭借强大的个人意志力，终于得胜。葡萄牙贵族或许寄希望于马六甲缺少石料因此无法建造要塞，宣称自己“为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愿意建造一座要塞”，还鲁莽地说，“如果需要的话，就建造两座”。^[19]阿尔布开克为了保护自己，明智地把大家的表态记录在案并妥善保管。

1511年8月10日，涨潮了。他们希望潮水能把拥有城堞的平底船从搁浅的沙洲松动出来，把它送到离那座战略桥梁更近的位置。他们准备用一千多名葡萄牙人和两百名马拉巴尔人征服一座拥有十二万人口的城市。这可能是葡萄牙人执行过的最为纪律严明、精心筹划的军事冒险。阿尔布开克对攻打卡利卡特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还记得科蒂尼奥的悲惨结局。他担心如果士兵们突破了海滩上的防御工事并占领了桥梁，他们脑子里幻想的金银财宝会诱使他们狂热地一口气冲进这座陌生城市中错综复杂的小巷，在那里因为沉重板甲的拖累和令人窒息的酷热，被敌人轻松地消灭和屠杀。

他们吸取了第一次攻打马六甲失败的教训：不要把士兵分成若干群；占领桥头堡，掘壕据守并巩固阵地；维持补给线，以确保不会被敌人打退。这一次他们打得非常精彩。平底船俯视桥梁，向没有任何防护的马六甲和爪哇士兵倾泻火力。西路部队的登陆非常高效和迅捷；在木栅和木板的保护下，他们冲过敌人的防御工事，打得苏丹的士兵抱头鼠窜。葡萄牙人高效地将建筑材料送上岸，并在桥梁两端建造了牢固的防御阵地。苏丹的士兵现在被分割成两群。葡萄牙人占领了桥东端的一座清真寺；苏丹军队的战象发动了又一次猛攻，但被打退。葡萄牙大船上的火炮向城内轰击，以震慑敌人的援兵。葡萄牙人掘壕据守，在清真寺附近的两座房屋内设防，并在屋顶上部署了一群火炮。

酷热令人头昏脑涨。阿尔布开克又用帆布搭建了凉棚，以保护部下免遭毒日的炙烤；运送饮食的补给线足以满足部队的需求，士兵轮流休息和上阵。如果苏丹觉得自己可以把葡萄牙人诱骗进伏击圈，那就大错特错了。阿尔布开克明令禁止士兵擅自入城，违者格杀勿论。他决心一点一点稳步前进，尤其是要尽可能减少伤亡——毕竟葡萄牙人本来就很少——并约束士兵们掳掠财物的狂热。几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在陆地上坚守，”恩波利写道，“我们披坚执锐至少二十天，不分昼夜地守护岗位，因为敌人会随时从陆海两面发动进攻，他们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

烦。”^[20]马六甲人的进攻渐渐减少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阿尔布开克向士兵灌输的军事纪律开始大显神威。

他调遣训练有素的队伍去有条不紊地肃清敌人的抵抗据点。葡萄牙士兵组成六排的方阵，举起长枪，枪尖向外，整齐地开进城市，奉命始终保持队形，并在熟悉街道的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前进。这些重装步兵方阵在军号、战鼓与“圣地亚哥！”的呐喊声中前进，战斗力极强，杀戮极其高效。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要饶恕任何穆斯林、他们的妻子儿女的性命，不管在何处找到他们”。方阵在城市各处扫荡，戳刺着、践踏。苏丹的士兵“从未见过长枪”，^[21]掉头就跑。八九天后，训练有素的葡萄牙士兵就将城市彻底肃清了。苏丹及其亲眷、侍从和大象撤进了丛林。葡萄牙贵族不喜欢这种战法，站在一旁观战。至此，葡萄牙人已经牢牢控制了城市。

葡萄牙士兵们忍受了酷热、持续攻击、吹管毒镖引发的恐惧和总督那铁一般的纪律，如今渴望得到奖赏：把这座神话般的东方集市洗劫一空。阿尔布开克承认他们有这个权利，但他希望保住一座有生命力的城市，而不是将其化为冒黑烟的废墟。他对抢劫的过程做了严格的约束。他们只被允许抢劫一天。葡萄牙人与印度教徒、爪哇人和缅甸人是盟友关系，所以不准抢劫他们的住宅。这些民族的主要居住区悬挂了旗帜以标明身份。不准焚烧任何房屋。不准动苏丹的宫殿，因为那里的一切都属于葡萄牙王室。所有人都得到了公平的机会。在胜利之后的抢劫狂潮中，水手一般是输家，这一次他们得到了优先挑选战利品的权利。每一支队伍听到号声之后必须返回。他们扛着自己能拿得动的所有财物蹒跚回到岸边时，总督要求他们带着自己的战利品留在原地，然后派遣下一群士兵进城抢劫，直到夜幕降临。他们在商人住宅的地下室里搞到了大量财宝。

在狂奔而去搜寻财宝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决定什么带走，什么留

下。对葡萄牙人来说，马六甲是“天方夜谭”般的宝库，充溢着远东的财富。他们借此瞥见了印度以东的情况，也让马拉巴尔海岸的财富显得黯然失色。恩波利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相信我，这里富得流油，有非常了不起的东西，有宏伟的高墙环绕的都市，有各色商品和财富的贸易，有五花八门的风俗和生活方式。我们欧洲简直不值一提；在东方，印度算是最差最穷的地方。”^[22]

夕阳西下，坠入西方的海峡。马六甲的大街小巷丢满了形形色色让人称奇的商品：珠宝，成罐的麝香，塞满锦缎、丝绸、塔夫绸和樟脑的箱子。“有的房间装满檀香木，都不值得搬走”，^[23]还有珍稀的中国青花瓷，因为易碎和笨重，不值得去搬运。金条、成罐的金粉、香水和罕见的宝石，是更受青睐的战利品。大量铁炮被掳走，其中一些可能是扎莫林送给马六甲的。阿尔布开克命令一些士兵从苏丹宫殿搜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以便送给葡萄牙国王。而总督本人对自己的身后事和现世生活同样关注，掳走了六只青铜狮子，以装饰自己的墓穴。随后宫殿被付之一炬。

区区数百名葡萄牙人，乘坐漏水的破船，竟然轻松占领了拥有庞大人口的马六甲，这是一桩异乎寻常的壮举，是凸显了莫大勇气和狂妄自信的冒险事业。何况敌人数量极多，且拥有自己的火药武器。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此役完全可以与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的那些非对称的胜利媲美。但正如阿尔布开克预想的，守住这座城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葡萄牙军官和士兵们大发横财，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们请求总督返回印度，让舰队将来有机会再来马六甲。阿尔布开克无疑已经预想到部下会有这种想法。他指出，他手里握着他们宣誓参加要塞建设工程的保证书，并宣布，如果他们“擅自离开城市，而没有以国王的名义控制和保障它……我就活该丢脑袋、灵魂下地狱……不要说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全部欢欢喜喜地工作，建造要塞，并且越快越好”。^[24]阿尔布开

克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巩固葡萄牙在马六甲的据点，抢在雨季之前离开，担心果阿出事——这些因素都催动他拼命工作。

持怀疑态度的人对修建要塞不热情，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证明，在城市中心的河边建造一座要塞，是另一种人间地狱。恩波利素来不会低估困难，他如此记述道：“总司令和一些部下白天匆匆赶工，夜间点着火把施工，用木板建造了一座要塞，用很多沉重的原木围绕着它，部署了许多火炮，在一个月內将其打造得非常牢固。”这是一个持续加固的过程：“要塞足够坚固之后，我们着手用石料建造另一座要塞。”参加工程的人肯定感到失望，因为总督拆除清真寺和房屋，掳来了足够多的石料。

用我们的后背把石料背到工地非常困难，所有人都是劳工、砌砖工和石匠.....在无法忍受的酷热（因为此地位于赤道以北2度）中，我们一边劳动，一边始终携带武器。地势很低，沼泽丛生，有野兽出没，所以臭气熏天，空气非常不卫生。除了大米，我们没有任何吃的，于是我们全都病了.....没有一个人不曾患上恐怖的热病，于是指挥官的兵营里有死尸停放两三天，因为找不到人手掩埋尸体。我在10月初病倒，一连发烧五十天，病势沉重，以至于我昏迷不醒。[\[25\]](#)

瘴气弥漫的环境、糟糕的饮食和疟疾打倒了许多葡萄牙人，以至于工程几乎无法继续下去。他们只得依赖当地劳工将工程继续推进。阿尔布开克也染上热病，寒战不止，但仍继续监督建设工程。

要塞工程、对反击的担忧和严重的疫病拖住了阿尔布开克的手脚。1511年年底，他必须决定是离开，还是在马六甲再滞留一年。阿尔布开克留下三百人和八艘船（配备了两百名船员）驻守马六甲。剩余三艘船，“海洋之花”号、“恩绍布雷加斯”号和“特林达迪”号将返回印度，运回大部分财宝。他还让十五人乘坐一艘俘获的平底船，由爪哇奴隶驾船。

“海洋之花”号是葡萄牙舰队中最宝贵的战船之一。它排水量400吨，是史上最大的克拉克帆船；装备四十门炮（分别在三层甲板上），拥有高耸的艏楼和艉楼；相对于印度洋上的阿拉伯三角帆船而言，它非常威武雄壮，是一座能向所有方向射击的浮动要塞。在第乌战役期间，它一天之内向埃及舰队发射了600枚炮弹，但它尺寸太大，在困难的情况下难以操纵，而且船龄太老了。前往印度的葡萄牙船只的平均寿命可能是四年；漫长旅途的煎熬和凿船虫的破坏会在很短时间内把坚固的木板化为木浆。到1512年时，“海洋之花”号已经在海上航行十年了。它漏水严重，需要持续不断地修补和抽水。阿尔布开克希望把它修葺一番，勉强支撑到科钦，然后在那里大修。但大家的共识是，这艘船已经成了一个死亡陷阱。离开马六甲的很多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乘坐这艘船，只有总督坚定不移的自信让一些船员放下心来。因为它尺寸最大，所以运载了大部分财宝和很多伤病员，以及一些准备送给葡萄牙王后的奴隶。

恩波利乘坐“特林达迪”号，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做了第一手记录。“就这样，我们出航了，在非常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航行，因为即便我们于12月20日从马六甲出发去印度，也算很晚了。”他们实际的出发日期比这还晚一个月。出海六天后，这支小舰队遭遇了风暴。

凌晨三点左右，我们听到雷鸣般的巨响……我们的船进水4英寻。我们立刻落锚……风力极强，向海岸的方向猛吹。天亮之后，我们周围四五里格的范围尽是惊涛骇浪，因为我们在一个浅水区的中央。总司令的船位于水最浅的地方；一片巨浪猛击它的艏楼，把十六人卷入大海，全都淹死了。

“海洋之花”号深陷危境，严重漏水，而且因为载货太多、进入船体的水越来越重而难以动弹。为了熬过这场风暴，它必须落锚，但漏水太快，用水泵抽水也无济于事。据恩波利记载：“又是一片巨浪击中船体，打落了舵，于是它转向一侧，搁浅了。它立刻灌满了水，船员们集合到艏楼甲板，站在那里等候上帝的裁决。”^[26]

弃船的时间到了。阿尔布开克命令将一些桅杆砍倒并捆绑起来，做成简易木筏。伤病员被送上一艘小艇，其他成员乘坐一艘划艇转移到木筏上。阿尔布开克腰间系着绳索，绳子另一端系在“海洋之花”号上。他亲自操纵小艇，来回接送船员，直到全体葡萄牙人都离开“海洋之花”号。他到最后的危急关头仍然严格执行纪律，命令所有人离船时只能穿着上衣和马裤；谁要是想拿走财物，就留下和船一起沉掉好了。至于奴隶，就自求多福吧。奴隶们跳海逃生，不会游泳的人就淹死了。有些奴隶抓住了木筏，但葡萄牙人用长枪逼迫他们，不准他们登上木筏，免得超重。在海上，生存始终是最重要的。在他们背后，“海洋之花”号断成两截，艏楼甲板和主桅还露出水面。小艇和木筏漂流了一夜，“他们的心跳到嗓子眼里，哀求上帝怜悯，直到黎明时分，风力减缓，大海略微平静了一些”。[\[27\]](#)

在黑夜的混乱中，更前方的“恩绍布雷加斯”号测了水深，决定挽救自己要紧，于是驶离“海洋之花”号的残骸。平底船上的奴隶抓住机会，杀死了葡萄牙主人，驾船逃走了，还带走了一大批贵重货物。只有“特林达迪”号比较接近海难地点，能够援救，但它也自身难保。据恩波利记载：“船已经触碰到海底，于是我们不得不扔掉甲板上的所有设备、火炮和部分香料，把我们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上帝，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的办法。跳海逃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海域非常广袤。”[\[28\]](#)曙光初现，大海渐渐平静，他们辨认出了木筏，筏子上的人临时拼凑了一面旗帜，扎在长矛上，作为信号。

幸存者被救到“特林达迪”号上。“船上.....大约有两百人，我们没有足够的饮食供给这么多人.....上船的人太多.....让我们陷入了混乱。”尽管缺乏口粮，阿尔布开克因为担心自己不在期间科钦和果阿出事，心急火燎地想要赶回去，因此拒绝靠岸获取给养，“说印度急需他回去，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恩波利的话可信，总督的固执让驶往科钦的航行仿佛噩梦。“我们缺吃少喝，生活极其困难；我们每人每天只

能领取6盎司腐烂的饼干和一小口水……大家高声疾呼地抱怨……总司令躲在自己舱房中，闭门不出，没有人见得到他。”^[29]为了减少需要吃饭的人数，葡萄牙人趁着一些穆斯林俘虏睡觉的时候将其扔进大海。就这样，他们“抵达了科钦，船上拼命抽水，水手半死不活”，^[30]除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了。据一份史料记载，阿尔布开克保住了暹罗国王赠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一项王冠、一把金剑和一枚红宝石戒指。

他们抛下的“海洋之花”号只有上层建筑还在苏门答腊岛礁石丛中露出水面，而从马六甲王宫掳来的全部财宝和其他财富，已经葬身大海。科雷亚在一份罕见的回忆性材料中写道：“我听他说，他们在马六甲国王的宫里找到一张四条腿的桌子，上面镶嵌了价值7万克鲁扎多的宝石。”^[31]随“海洋之花”号一同损失的“黄金与首饰的价值超过在印度任何地方损失的财富，将来也不会有这么多金银珠宝了”。^[32]这一切都在深渊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包括原打算献给葡萄牙国王和王后的宝石与金条。美丽的奴隶被溺死，阿尔布开克为自己的墓地准备的青铜狮子也坠入海底。此外，葬身大海的还有一件对葡萄牙人——他们不断努力更多地理解和主宰世界——来说同样宝贵的东西。那是一幅神奇的世界地图，只有一小部分留存至今。阿尔布开克向国王哀叹了这幅地图的损失：

一名爪哇领航员绘制的伟大地图，记录了好望角、葡萄牙和巴西的土地、红海和波斯湾、香料群岛、中国人（包括台湾人）的航行路线，附有罗盘方位线和他们的船只走过的航线，以及这些互相接壤的王国的内部情况。陛下，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东西，陛下若是看到一定会大悦。地名是用爪哇文写的。我这里有一个爪哇人，懂得读写爪哇文。我将这份地图的残片……陛下能从中看到中国人（包括台湾人）是从何而来，以及您的船只要去香料群岛必须走哪些航线；哪里有金矿分布；爪哇岛和班达群岛，即肉豆蔻和肉豆蔻衣的产地在何方；暹罗王国的位置；以及中国人航海的范围，他们返回何地，以及他们航行的最远边界。地图的主要部分在“海洋之花”号上损失掉了。^[33]

但阿尔布开克已经在利用新开辟的桥头堡马六甲，去寻找和探索这片海域了。他派遣使团到勃固（缅甸）、暹罗（泰国）和苏门答腊岛；他的一支探险队于1512年拜访了香料群岛，并绘制了地图；葡萄牙船只向更东方航行，于1513年和1515年在中国的广东登陆，寻求与明朝通商。他把世界的各个最遥远的末端连接起来，完成了曼努埃尔一世交给他的所有任务。

对葡萄牙人来说不幸的是，这些勇敢的探索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之所以攻打马六甲，部分理由是为了挫败西班牙人在远东的野心。然而，此次行动反而给西班牙人提供了开拓远东所需的人才、信息和地图。在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当中有费尔南·德·麦哲伦。他从战利品中大发横财，带着一名苏门答腊奴隶返回了葡萄牙，给他洗礼并取名为恩里克。麦哲伦后来与曼努埃尔一世发生争吵，叛逃到西班牙，把恩里克也带去了，还带走了葡萄牙人绘制的香料群岛的地图以及一位曾去过那里的朋友的详细书信。几年之后，他为西班牙效力，在第一次环球航行中利用了这些资源。恩里克是价值不可估量的译员，这种知识帮助葡萄牙的竞争对手将东印度的香料群岛据为己有。

[1] Ravenstein, 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p.100.

[2] Rodrigues, Vítor Luís Gaspar, and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Conquista de Malaca, 1511*. Lisbon, 2011, p.17.

[3] Rodrigues, Vítor Luís Gaspar, and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Conquista de Malaca, 1511*. Lisbon, 2011, p.18.

[4] 托梅·皮莱资（1465？～1524或1540年），葡萄牙药剂师、作家、航海家。他是首批到达东南亚的欧洲人之一，也是中国明朝以来，葡萄牙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首位进入中国的使者，时间为明代正德年间。1517年，他与假马六甲使者、翻译火者亚三随船来到广州近海，向明朝政府要求建立关系。1518年，他获准在广州登陆，不久抵达南京，经贿赂宠臣江彬后获得正在南巡的明武宗的接见，然后随武宗

来到北京。1521年，武宗驾崩，中葡爆发屯门海战，皮莱资被明世宗下令押解到广州听候处置。嘉靖三年（1524）5月，皮莱资因病死于广州监狱，也有些记载说他在江苏住到1540年并死于江苏。

[5] Pires, Tomé.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2 vol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rmando Cortesão. London, 1944, p.286.

[6] Pires, Tomé.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2 vol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rmando Cortesão. London, 1944, p.285.

[7]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195.

[8]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18.

[9]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195.

[10]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34.

[11]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634.

[12] Albuquerque, Afonso de [1500-80],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 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 3 vols, London, 1875-84, p.73.

[13]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638.

[14]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Í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34.

[15]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639.

[16] Crowley, Roger. *City of Fortune*. London, 2011, p.374.

[17]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640.

[18]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640.

- [19]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34.
- [20]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197.
- [21]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44.
- [22]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196.
- [23]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46.
- [24]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49.
- [25]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p.199-200.
- [26]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p.199-200, p.200.
- [27]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69.
- [28]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201.
- [29]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p.202.
- [30]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70.
- [31]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47.
- [32]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269.
- [33]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148-149.

21 蜡的子弹

1512年4月～1513年1月

阿尔布开克回到科钦，仿佛一个死而复生的人，只穿着一件灰色上衣和一条马裤。他的抵达并不让人感到喜悦。自1508年霍尔木兹的反叛者抵达科钦以来，此地就变成了反对总督的一个强大派系的中心。每一支返航里斯本的舰队都携带着例数总督出格行为的告御状的信。“那些希望攻击陛下伟业的人，”阿尔布开克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写道，“宣称我已经死了，和整个舰队一起完蛋了。”^[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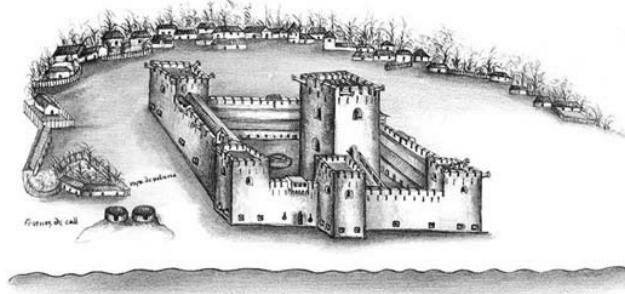
貌似坚不可摧的总督登陆之后发现，他不在印度期间，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和昏庸无能的现象非常猖獗。他的命令没有得到遵守；他任命的人遭到藐视；与当地女人结婚的葡萄牙人遭到绝罚；有人盗窃公共财产并逃亡；纪律严重涣散。随后几个月里，他连珠炮一般给国王发去了两万字的言辞激烈的书信，在其中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控制大洋。他自称经验丰富，所以在这个话题上享有权威：“我已经五十岁了，在您之前曾侍奉两位国王，目睹他们的作为。”^[2]这话可不是当前的国王爱听的。

这封信揭示了这位积极行动的帝国建设者的形象：恼怒、直言不讳、激情澎湃，并且似乎无所不知。有的时候他极其直率，严厉斥责葡萄牙贵族的不守纪律（他们“觉得可以随心所欲……对我的决定置若罔闻”）。他批评国王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浪费资源，“却抛弃了印度”。^[3]他还对自己缺少人手、物资和金钱而愤怒，更不要说船只的朽烂，并对这些坏消息造成的后果感到愤恨：“陛下知道我遭受的忽视和困窘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吗？我不得不攻打马六甲两次，果阿两次，进攻霍尔木兹两次，并乘坐木筏在海上航行，以便补救您的事业、履行我的

使命。”^[4]

有时他的语调简直就是粗鲁，但他始终忠心耿耿，提出许多逆耳忠言，并且在国王面前谦卑到了奇怪的地步，尽管无比自信但受到一种罪孽感的折磨。无论多么细枝末节的事情，他都要向国王汇报。他要给马六甲送去滑轮，及作为教士法衣的“两件精美长袍”；他需要教堂的管风琴和中型弥撒书；需要“劳动力以挖掘壕沟和建造围墙”，^[5]需要石匠去建造要塞和在马六甲修建水车磨坊，“那里涨潮时有很强的水流”；需要木匠，还需要熟悉瑞士战术的军官来训练他的部队。他为有些教士企图颠覆他的异族通婚政策而烦恼，并写道：“在科钦，我找到了一箱书，可以教孩子识字。我觉得陛下送来这些书不是为了让它们烂在箱子里，所以我命令此地一名与当地女人结婚的葡萄牙人教导小男孩读书写字。”他评论道：“这些孩子非常聪慧，很快就学会了老师教的东西。他们全都是基督徒。”^[6]他最大的要求是送来更多人。他始终在清点计算手头可用的人力，人总是太少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写道：“我再一次要说，如果您想在印度避免战争，并与此地的所有国王保持和平关系，就必须送来大量的部队和优良的武器。”^[7]

在阿尔布开克给曼努埃尔一世的潮水般的书信中，他概述了自己独当一面、仅用数千人在努力建设的帝国的方方面面——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这位绝顶聪明、饱受磨难的殖民地长官重述了主宰印度洋的铁律：“陛下，请信赖优秀的要塞。”^[8]“只要有葡萄牙士兵头戴钢盔地站在城堞上，不管哪个国王还是领主都无法轻松地夺走那些要塞^[9]……这里的地方只要有陛下的一座坚固要塞来控制，只要被我们占领下来，就能一直维持到审判日。”^[10]将坚固的要塞连接起来以控制战略要冲，就能让葡萄牙人完全主宰印度洋。他对自己的主要军事建筑师托马斯·费尔南德斯赞不绝口。



“信任优良的要塞”：阿尔布开克的军事建筑师托马斯·费尔南德斯在印度沿海建造了一个由诸多坚固要塞组成的网络，其有能力抵御长时间围攻

在此过程中，阿尔布开克在巩固帝国霸业的一个革命性理念。葡萄牙人始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人数多么少，他们早期的许多征服都是面对数量远远多于他们的敌人而以少胜多的。他们迅速放弃了占领大片领土的想法。他们发展出来的原则是掌握灵活机动的海权，同时控制易守难攻的沿海要塞与基地网络。掌握制海权，他们在要塞建造、航海、地图绘制和炮术方面的技术专长，他们的海上机动性和在广袤海域协调配合的能力，他们的坚忍不拔和持续努力（几十年间，葡萄牙人不断在造船、获取知识和人力资源方面不惜血本地投资）——这一切都促成了一种新形式的跨越远距离的海上帝国的缔造，使其有能力在极远距离控制贸易和资源。它赋予葡萄牙人的雄心壮志以全球视野。

但如果我们更细致地观察，印度殖民事业往往显得出乎意料的摇摇欲坠，依赖超乎寻常的个人积极性。“陛下，”阿尔布开克在给国王的一封信中写道，“建造要塞需要规划，而我们在印度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的舰队出航时，只携带一点大米和椰子，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武器，如果有武器的话……我们需要的装备，还在里斯本的库房里。”^[11]这是一个身处一线的人感到的绝望，阿尔布开克拼命拉扯遥远的上级的衣袖，渴望上级能聆听他的诉求——“陛下万万不可忽视我所说的话！”^[12]——并且还知道有人在他作对，向国王进献恶毒的谗言。关于他即将被撤换的传闻一直在流传。“我担心陛下不想在我待在

印度时支持这项事业，是因为我的新旧罪孽，”他写道，“我遭到打压，得不到陛下的信赖。”^[13]他最担心的是，在工作完成之前，自己就被扫地出门。印度是阿尔布开克毕生的事业。

与建造要塞的政策紧密相连的，是他与所有前任总司令的共识，即必须以残酷的暴力杀一儆百：

陛下，我告诉您，在印度最关键的事情是：如果您希望在这里得到爱戴和畏惧，就必须全力报复……印度人看到马六甲和果阿遭受的残酷报复，看到扎莫林的宫殿和宅邸、穆斯林的清真寺与船只被焚毁，受到极大震撼。我说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在印度事务中树立了极大的公信力，受到莫大敬畏。^[14]

他清楚地知道国王想要的是什么。要想“消灭麦加、吉达和开罗的贸易”，^[15]就需要“将这些贸易中心从穆斯林手中夺走”。^[16]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已耽搁许久的进入红海的作战。在书信中没有明言，但双方都理解的是，这将是彻底摧毁马穆鲁克王朝的跳板，并且根据曼努埃尔一世的圣战愿景，也是收复耶路撒冷的前奏。

向穆斯林势力中心发动最后攻势的基石仍然是果阿。果阿是阿尔布开克念念不忘、魂牵梦萦的地方。他的政敌三番五次地主张拆除在果阿的要塞，而他一次又一次地为这个岛屿辩护。“强有力地支持果阿，陛下就会得到它的所有领土……它一定会变得安宁祥和，为您做出极大贡献。”^[17]“陛下若是能看得到果阿的重要性，我们对它的占领如何粉碎了穆斯林的痴心妄想、平定了印度，我会非常高兴。”^[18]也的确需要阿尔布开克这样一个具有战略天赋和极度自信的人，才能清楚地看到果阿的价值。

事实上，在阿尔布开克写这封信的时候，果阿又一次遭到围攻。他在马六甲期间对果阿的安全心急火燎，果然是有道理的。他之前关于维护果阿岛防御的指令遭到忽视。阿迪尔沙阿派遣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卷

土重来，要夺回原属于他的领土。他的军队强行通过了渡口，并在岛上具有战略价值的贝纳斯塔里姆渡口建造了自己的一座相当强大的要塞。随后他们以这座要塞为基地，攻打果阿城，将其围得水泄不通。所以，阿尔布开克必须再次推迟去往红海的远征，先保障果阿的安全。

这一次，阿尔布开克没有匆忙行事。雨季将会严重阻碍援救果阿的行动。从马六甲战役返回的幸存者精疲力竭。战争、死亡大大削减了他的兵力，而且他还不得不留下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和不少船只驻守马六甲，所以他手头的力量不足以有效地驰援果阿。他需要等待本年度的香料舰队从里斯本赶来。在此期间，阿尔布开克寄希望于果阿要塞能够坚守住。“上帝佑护，”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只要不发生内部叛乱，就不必害怕攻打您的要塞的穆斯林。”^[19]

在初期的绝望之后，果阿的葡萄牙守军的斗志在1512年夏季有所改善。阿迪尔沙阿的叛教者译员若昂·马沙多渴望恢复自己出生时的信仰，倒戈到葡萄牙人那边，令葡萄牙人士气大涨。马沙多的变节非常悲惨。他有一个穆斯林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秘密地让他们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从穆斯林阵营溜走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他只能带走自己的妻子。为了不让孩子在穆斯林手中当异教徒，他把孩子溺死，好让他们直接升天堂。马沙多只带来了不多的人手，但他知晓沙阿的将领们的秘密计划，非常熟悉他们的战术，并且也知道他们的资源情况和要塞的弱点。消息传到果阿的葡萄牙要塞，说总督还活着，这进一步鼓舞了大家的士气。由清真寺改建的教堂响彻钟声，守军写信给总督，宣称他们能够守住，但他需要率领强大的兵力前来援救。

8月中旬，从里斯本来的舰队抵达科钦。它没有像阿尔布开克的政敌期望的那样送来新任总督，而是给阿尔布开克提供了他急需的大量援兵和装备：十二艘船和一千五百名装备精良的士兵。他欣喜若狂：“似乎陛下现在要给予印度应有的重视了。”^[20]令他尤其高兴的是，曼努埃

尔一世答复了他要求派遣训练有素的军官的请示。曼努埃尔一世送来了两名军官、意大利战争中瑞士战术的老兵、连队士官、三百支长矛、五十支弩弓和一批火枪。在这些军官的指导下，葡萄牙人组建了一支八百人的部队，分成三十二个排。一丝不苟的操练开始了。士兵们定期举行射击训练，射术最好的人能得到赏金。他们还接受队伍的机动训练，以便能够作为一个有效的单位进行协调熟练的动作，而不是乱哄哄地各自为战。最妙的是，这些士兵如今接受阿尔布开克的直接指挥。

雨季结束了，总督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他坚信自己能够驱逐穆斯林军队，尽管敌我双方的兵力依旧悬殊。红海在召唤他。他打算尽快夺回果阿，然后运用这支强大的新军队，在两个雨季之间至少封锁住红海的咽喉。

1512年10月底，阿尔布开克抵达果阿。11月底，战役就结束了。他大胆地猛冲猛打，首先摧毁河里的防御木栅，将贝纳斯塔里姆与大陆分隔。然后他从那里进入果阿城，攻击沙阿的军队。在一场短暂而激烈的野战和攻城战（葡萄牙人在城外炮击城墙）之后，沙阿的将军升起了白旗。

葡萄牙军官们像以往一样，打得十分蛮勇莽撞。河上的战斗尤其激烈。贝纳斯塔里姆要塞守军从城墙上用精准的炮火扫荡河面，轰击葡萄牙船只（有用椰子纤维制作的软垫提供防护）。雷鸣般的炮声让人短暂失聪。就连阿尔布开克也不得不斥责一些船长毫无必要的冒险。“我常批评他们过于鲁莽地亲身涉险，拿自己的身体和性命冒险……他们会走到船楼上，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有时我看到他们对安全防范置若罔闻，非常痛心。”^[21]但他自己也总是身先士卒，从不躲避战斗的危险。穆斯林要塞射出的一枚炮弹命中了他的小船，打死了两名桨手。敌人以为阿尔布开克也死了，于是欢呼胜利。这时阿尔布开克站了起来，向敌人要塞展示自己，证明他们的错误。他奇迹般的生还令他的敌人和朋友

都相信，他一定是刀枪不入。在最后炮击贝纳斯塔里姆时，他又一次亲临最前线，审视部队的部署。敌军炮手发现了他，瞄准他射击。与他不和的葡萄牙贵族迪奥戈·门德斯·德·瓦斯康塞洛斯建议他掩蔽。这一次阿尔布开克听取了别人的建议，躲到一块岩石背后。随后一枚炮弹击中了他旁边的一个人，鲜血溅了他一身。

葡萄牙贵族希望遵照自己的荣誉法则不顾一切地奋勇拼杀，但阿尔布开克对兵力有着自己的战略部署。这两方面在战术上的分歧不断造成麻烦。贵族们渴望挥舞巨大的双手重剑，进行英雄的单挑对决，赢得战利品、扬名立威，而总督要的是将组织有序的部队运用于连贯协调的战术。他那些训练有素的部队发挥了极大杀伤力。由长枪兵、弓箭手和火枪手组成的密集队伍以良好秩序在战场上运动，在正面对垒中将队形松散的穆斯林散兵逼退到城墙下。葡萄牙人组成了“秩序井然的方阵……队形紧密，长枪黑压压地伸出，举着八面团旗，战鼓齐鸣、吹奏笛子”。他们以密集队形缓缓前进，“用许多火枪不断射击，枪是这一年从葡萄牙运来的”。^[22]阿尔布开克预见到了未来的战争形式，但它不受贵族们的欢迎。由炮火而不是攀爬城墙来决定战局，严重地违反了中世纪军事文化的精神。很多葡萄牙人希望猛冲进城、大肆洗劫，而不顾这种战术可能造成的无谓伤亡。阿尔布开克抵制住了这些人的坚决反对，与敌人进行投降谈判。根据协定，所有穆斯林及其家眷均可安全撤离。其他的一切——火炮、马匹、武器，必须留下。穆斯林将被安全地送过河，但只能带走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只有一个问题：沙阿的军队里有一些葡萄牙和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叛教者，这些人必须被交出来。穆斯林将军非常不愿意交出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阿尔布开克同意饶恕这些叛教者。

穆斯林安全撤离了，没有受到伤害。阿尔布开克信守了关于叛教者的诺言：他饶了他们的性命。但仅此而已。这些俘虏被关在囚笼里一连三天。大家讥笑他们，向他们扔泥土，拔掉他们的胡须，以示羞辱。第

二天，叛教者的鼻子和耳朵被割掉；第三天，他们的右手以及左手拇指被砍断。然后，他们的伤口被包扎起来。很多人死了，幸存者则“非常耐心地忍辱负重”，说“他们的严重罪孽理应受到更严酷的惩罚”。^[23]阿尔布开克不断演化的战术如同外科手术，节约人力和时间，但受到了很多人的憎恶。他的敌人散播谣言，称他接受了敌人的一大笔贿赂，因此纵虎归山，让敌人逃走，将来还能再战。事实上，阿尔布开克相信自己无须杀掉所有敌人。他认识到，贝纳斯塔里姆是整个果阿岛的关键所在。他重建了贝纳斯塔里姆的要塞，重组了其他所有渡口的防御，将岛屿严密地封锁起来。葡萄牙部队继续操练。他知道，果阿已经永久性地成为葡萄牙王室的财产了。现在，只有科钦和坎纳诺尔的那些反对他的派系才能够危害果阿。

第二次击败阿迪尔沙阿之后，葡萄牙在亚洲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在1510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占领果阿的时候，一位科钦商人就宣称：“总督转动了钥匙，把印度进献给他的国王。”^[24]他说的“印度”指的是东印度的沿海贸易。葡萄牙人的微弱力量当然不足以直接威胁印度次大陆的主要强国比贾布尔和毗奢耶那伽罗，但葡萄牙人如今成了印度政治的一个参与者。阿尔布开克天才地认识到了果阿的战略意义，它是两个互相争斗的强国之间的裂纹线，是比卡利卡特或科钦优越得多的商业枢纽。最关键的是，他如今控制了波斯的马匹贸易。从霍尔木兹运来马匹的船只被他的战船引导到果阿，商人及其珍贵的货物都得到了极好的待遇。每年有一千匹马通过果阿岛；葡萄牙王室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约为300%至500%。

阿尔布开克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第一个在亚洲建立帝国霸业的欧洲人。他那雪白的长须和令人生畏的严峻面容，使得印度洋各地的人对他产生了一种迷信的敬畏。在马拉巴尔海岸，他们把当地的一种鱼命名为“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并将其用于魔法咒语。他的孟加拉敌人诅咒他是“印度巨犬”。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理解印度洋错综复杂的

商业和帝国竞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什叶派与逊尼派、马穆鲁克王朝和波斯人、毗奢耶那伽罗和比贾布尔、霍尔木兹和坎贝、卡利卡特和科钦之间的争斗，以及第乌的马利克·阿亚兹狡黠的生存策略。阿尔布开克带着精明敏锐投入了这场政治游戏，分而治之，利用其中一派去对付另外一派，同时保持冷静，不抱幻想。他不信任协定和友谊的保证，因此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清楚地介绍了印度洋外交的现实：

陛下的目标是控制他们的贸易，并摧毁麦加贸易，那么他们竭尽全力去阻止您，您还会感到震惊吗？……陛下觉得可以用好言相劝、和平提议和保护来留住他们……但唯一让他们尊重的，就是暴力。我率领一支舰队抵达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查清楚我有多少人、什么样的武器。如果他们判断无法战胜我们，就和和气气地接待我们，诚实守信地与我们做生意。如果他们觉得我们很弱，就拖延搪塞，准备做出我们无法预测的反应。若是没有军事支持，我们不能和任何国王或领主建立盟约。[\[25\]](#)

所有人都不得不应对新的现实：葡萄牙的势力将在亚洲长久存在。1512年年底，各国使臣蜂拥来到果阿，向葡萄牙人致敬邀宠。阿尔布开克渐渐认清了穆斯林在印度洋的广泛分布，并务实地认识到是不可能将其全部消灭的。为了消灭马穆鲁克王朝，他也开始巧妙地寻求与敌视马穆鲁克王朝的伊斯兰权贵合作。毗奢耶那伽罗和比贾布尔都非常需要马匹贸易，他就借此操纵它们。他与古吉拉特的穆斯林苏丹建立了关系，并派遣另一位使者，米格尔·费雷拉，去拜见波斯的沙阿伊斯玛仪一世；这位使者比他的前任幸运。扎莫林似乎终于接受了葡萄牙人将在印度长久盘踞的现实，送来了和平建议，并允许他们建造一座要塞。阿尔布开克接受了，但也在制订其他计划。他在第乌的老对手马利克·阿亚兹特别热切地希望知道他的意图。阿尔布开克请求阿亚兹的主公——坎贝苏丹，允许他在第乌建造一座要塞。阿亚兹热切地希望坎贝苏丹不会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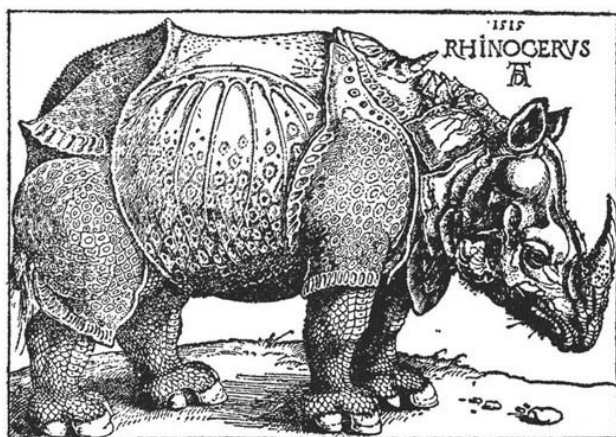
阿亚兹的使者遭到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恫吓。重返基督教的前叛教者若昂·马沙多把这个倒霉的家伙带去参观了被葡萄牙炮火打得七零八落

的贝纳斯塔里姆防御工事，带他去看马匹贸易那令人惊叹的马厩设施、军械库和仓房，以及那些造成巨大破坏的重型射石炮，还邀请他把自己戴头巾的脑袋伸进炮管，去亲身体会一下它们是多么庞大。最后，使者被穿上一件钢制胸甲，领到一面墙前，让一名士兵用火枪瞄准他的胸膛。一声枪响，使者觉得自己的末日到了。但子弹在胸甲上弹开，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阿尔布开克向浑身战栗的使者解释称，葡萄牙的铠甲是防弹的，并请他把这件胸甲带回去给他的主公，作为证据。阿尔布开克的这一套动作，都是为了震慑对方。毫无疑问，假如马利克·阿亚兹亲自穿上胸甲做同样的实验（阿尔布开克可能想到了这一点），他肯定会被杀死，因为向使者射出的子弹是用蜡做的假货。

对于正在求和的扎莫林，阿尔布开克有更玩世不恭的解决方案。他向扎莫林的兄弟（比较亲葡萄牙）提议，或许一次简单的下毒就能澄清问题。扎莫林果然死了。他的继承者成了葡萄牙的傀儡。总督得以写信报告曼努埃尔一世，他终于“掐住了这头山羊的喉咙”。^[26]卡利卡特的问题就这样几乎不流血地解决了。后来，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落后的穷乡僻壤，它原先欣欣向荣的贸易全都转移到了果阿。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曾积极支持葡萄牙人的两座港口头上，即坎纳诺尔和科钦。所以，从长远来看，支持搞垄断的帝国主义者是没有好下场的。

在此期间，一名埃塞俄比亚使者来到了果阿。这是一个形迹可疑的角色，名叫马太，是埃塞俄比亚太后艾莱妮派来的。他代表少年国王（也就是葡萄牙人寻觅了许久的祭司王约翰），送来了一封信和真十字架的一块碎片。这个事件让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也有人怀疑马太是个骗子。埃塞俄比亚人提议与葡萄牙人结盟，以粉碎埃塞俄比亚以北的穆斯林势力；他们甚至提议了一个计划，将尼罗河（它浇灌着埃及肥沃的三角洲地带）上游改道。这个恢宏的计划对阿尔布开克很有吸引力，他相信马太真的是埃塞俄比亚使者，并让他随同香料舰队于这年冬季返回曼努埃尔一世那里。马太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热情接待。阿尔布开克似

乎万事如意，一切顺利。



丢勒绘制的曼努埃尔一世的犀牛图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给曼努埃尔一世送去了两只罕见的动物，一头白色大象（科钦国王的礼物）和一头同样珍稀的白色犀牛（坎贝苏丹的礼物）。这是自古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看到的第一头活的犀牛。这两只动物在里斯本引发了轰动。大象被游街展示。人们还特地建造了一个围场，让这两头野兽打斗，请国王观看。但大象感觉到对手厉害，恐惧地逃开。1514年，曼努埃尔一世决定举行一次公开的盛大活动，以彰显他的统治的强盛，并宣扬对印度的伟大征服。他让自己的使者特里斯唐·达·库尼亚将大象送给教皇。一百四十人的队伍，包括一些印度人，带着一大群的野兽——许多豹子和鹦鹉，以及一头黑豹，来到了罗马。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大象由象夫牵着，背上承载一座白银的“城堡”，里面装着赠给教皇的贵重礼物。这头大象被取名为汉诺，典故是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大象。

在教皇面前，汉诺三次鞠躬，并向神圣教会的红衣主教们喷洒了一桶水，让他们感到好玩但也窘迫。汉诺立刻成为大明星，艺术家们为它画像，诗人们为它写诗，有一幅现已佚失的壁画描绘的就是它。它还是一份耸人听闻的讽刺小册子《大象汉诺的最后遗嘱》的主题。它被养在一座专门建造的房舍内，参加了许多游行，深得教皇宠爱。不幸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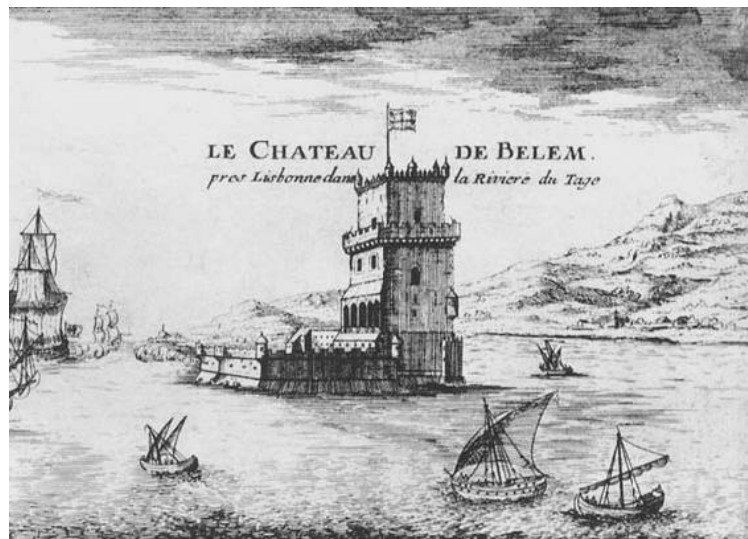
汉诺的饮食安排不太好，它来到罗马两年后，因吃了含有金粉的泻药而死去，享年七岁。汉诺临终前，哀恸的利奥十世陪伴在它身侧，并为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曼努埃尔一世给教皇的另一件礼物犀牛更倒霉。它戴着一个绿色天鹅绒项圈，从里斯本坐船出发。1515年，它乘坐的船在热那亚沿海失事沉没。犀牛因为被锁着，溺死了，后来被冲刷到海岸上。它的皮被剥下，送回里斯本，做成了标本。阿尔布雷希特·丢勒读到了一封描绘这头犀牛的信，可能还看到了一幅素描。他没有亲眼看过这头犀牛，但为它制作了那幅著名的图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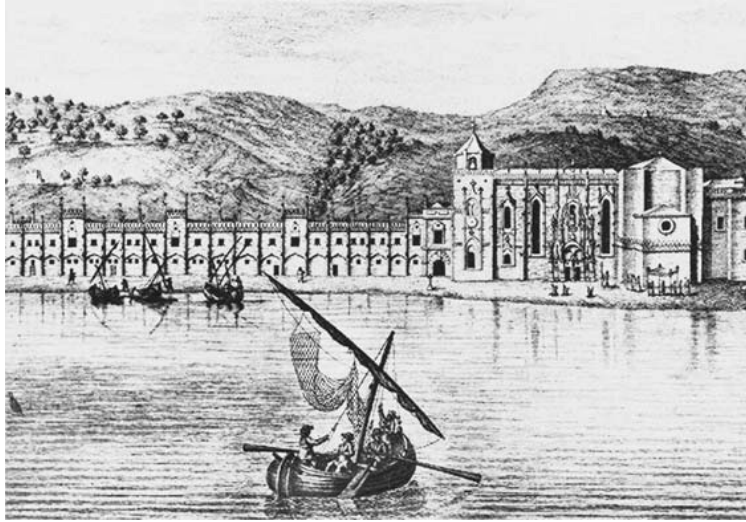
财富如潮水般涌入里斯本，一派神话气象。金钱很少回流到印度（阿尔布开克常常抱怨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曼努埃尔一世非常懂得如何花钱。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商品都在里斯本待价而沽，如象牙制品和刷漆的木器、中国瓷器和东方地毯、来自佛兰德的挂毯、意大利的天鹅绒。这是一座五光十色的城市，如同淘金热一般人口暴涨，许多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汇聚于此。有吉卜赛人和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也有黑奴，他们抵达里斯本时的惨状令人发指，“挤在船舱内，一次有二十五人、三十人或四十人，营养不良，背靠背地用铁链锁起来”。^[27]新的奢侈品狂热席卷全城。黑人家奴变得司空见惯；大量涌入的糖对人们的口味造成了革命性影响。里斯本是经久不息的奇妙景观上演的剧场，吉卜赛音乐和非洲人举行宗教游行时异国情调的歌舞给城市增添了活力。在这里，人们能目睹国王带着五头印度大象游行，“大象走在他前面，再往前是一头犀牛，相隔较远，人们看不见它；国王前方是一匹披着精美的波斯织物的骏马，马后面是一名波斯猎人，牵着一头美洲豹，是霍尔木兹国王送来的”。^[28]

曼努埃尔一世于1500年之后启动的建筑工程的风格与宏伟规模，反映了塔霍河两岸的东方情调。最雄心勃勃的建筑是贝伦的雄伟修道院，

它邻近船只起航前往东方的出发地——赖斯特罗海滩。热罗尼莫修道院长300码，那里的僧侣奉命为水手的灵魂祈祷。这座修道院既是曼努埃尔一世王朝的恰如其分的万神殿，也是对他统治时期发现新世界的伟业的歌颂。建造修道院的经费来自胡椒贸易的巨额收入，它那哥特式中世纪结构之上有一大群雕塑，从石质建筑表面凸出，像印度教神庙的装饰一样华丽奔放。曼努埃尔一世风格的装饰非同一般，出现在大量教堂、城堡和宫殿中，从穹顶、窗格和屋顶上如雨后春笋般长出，描摹了航海与东印度发现的象征符号。在曼努埃尔一世的纹章（航海所用的浑天仪）周围，簇拥着石质船锚和锚链、扭曲缠绕的缆绳、珊瑚与海藻、海贝、珍珠和富有异国情调的叶子。



贝伦塔



热罗尼莫修道院

建筑上这些繁茂植物的形象，让人想起一片热带雨林，或印度洋里包裹着植物的某个海底洞穴。这些符号不断出现在石质雕塑中，再加上特色鲜明的基督骑士团的十字架，令人思索东印度冒险的回报与新奇。在赖斯特罗外海，曼努埃尔一世命令建造了一座防御要塞，即贝伦塔，它既是一座军事要塞，也是一座奇思妙想的建筑，傲然屹立于海水之中，装饰着上述图案。半球形瞭望塔就像被绳索勒住的带有一道道凸痕的菠萝，城堞上绘有基督骑士团的纹章盾。石雕工匠还制作了白色犀牛的头像，它将长着尖角的口鼻伸向大海，表达了对葡萄牙人成就的赞叹和惊讶。

1513年冬季，在果阿，曼努埃尔一世的得力干将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正在准备对印度洋做最后的包围，即进入红海。

[1]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98.

[2]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1.

[3]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24-25.

[4]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7.

[5]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57.

[6]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41.

[7]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35.

[8]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31.

[9]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59.

[10]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53.

[11]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1.

[12]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44.

[13]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3.

[14]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49-50.

[15]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49-50.

[16]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2.

[17]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59-60.

[18]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62.

[19]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59.

[20]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199.

[21]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02.

[22]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304.

[23]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07.

[24]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2, p.191.

[25]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2, pp.220-221.

[26] Rodrigues, J.N., and T. Devezas. *1509. Famalicão*, 2008, p.269.

[27] *Lisboa Quinhentista, a Imagem e a Vida da Cidade*. Lisbon, 1983, p.17.

[28] *Lisboa Quinhentista, a Imagem e a Vida da Cidade*. Lisbon, 1983, p.22.

22 “全世界的财富，尽在您的掌握”

1513年2～7月

为了征服红海，葡萄牙人已经等待多年。早在1505年，阿尔梅达统治时就强调了红海的重要性。再过八年，葡萄牙人才做好远征红海的准备。到1513年年初，果阿要塞已经固若金汤；扎莫林被毒死了；阿尔布开克已经保障了印度沿海地区的和平安定，心满意足；最关键一击的时刻到了。

此举表面上的目标是最终切断马穆鲁克王朝伸向东方的补给线，扼杀其香料贸易，同时消灭威尼斯的香料贸易。而在这个目标背后，隐藏着弥赛亚的幻梦：战胜伊斯兰世界，收复耶路撒冷，让曼努埃尔一世成为王中之王。阿比西尼亚使者前不久的抵达让葡萄牙人更加期望与祭司王约翰的军队联手，消灭“巴比伦大淫妇”。这些深层次的目标，即便在葡萄牙朝廷也是很有争议的话题。总督于1513年2月从果阿起航时，对这些深层次目标秘而不宣。普通士兵与水手尽管笃信宗教，但更感兴趣的是掳掠战利品的物质机遇，而不是人间的基督教天国王朝的胜利。

红海是一道1400英里长的深深的口子，将阿拉伯半岛与非洲大陆分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它水很浅，缺少淡水资源，有众多低矮小岛和隐蔽的浅滩，因此航行颇为危险。沙漠的热风捶打着它，而且它受到印度洋气象节律的影响，不过印度洋的雨水不会降落到它这里。只有在特定的季节，人们才能进入红海。没有当地领航员的帮助，外来船只无法在红海航行。所以，必须俘虏或强迫一些当地领航员。曼德海峡，即“泪之门”，是一个潜在陷阱的半张开的上下颌。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热气腾腾的熔炉，几乎没有一滴水。进入红海之后，葡萄牙人就可以进入伊斯兰世界的古老腹地。从那里到吉达只有650海里，到苏伊士是

1350海里。从苏伊士穿越沙漠到开罗只需三天，从吉达到麦地那（先知的遗体就长眠在那里）则需要九天。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们感到自己正在驶向敌基督的神庙。数个世纪的圣战热情正鞭策着他们。

阿尔布开克的第一个目标是设防港口亚丁，在“泪之门”之外110英里处。攻占亚丁之后，它可以为葡萄牙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基地，以便做最后的推进。亚丁的谢赫和开罗的苏丹关系并不融洽，但由于葡萄牙人扰乱了原先的香料贸易，亚丁已经成为红海的阿拉伯三角帆船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1513年4月22日，总督的舰队已经在亚丁港外随波摇曳。亚丁就在他们面前，位于一座已经熄灭的火山口之内，周围环绕着九座令人生畏、寸草不生的紫红色岩石山峰，每座山峰顶端都有一座要塞。亚丁实际上坐落于沙漠之中，阿尔布开克后来描述它道：“周围尽是赤裸裸的岩石，不生树木和草，两三年也没有一滴雨。”^[1]城镇面向大海的一面建有一线长长的高墙，上面只有一扇门，但有许多塔楼。他们能看得见，在这城墙之内有清真寺尖塔，高耸的灰白色房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还有谢赫宫殿那雄壮的立方体结构。而城镇的另一面也有一线防御工事。当时的欧洲人不确定亚丁是不是坐落在一个岛上，后来的探索才确定它与大陆之间有一条堤道相连。在他们左侧，一个往外伸出的海岬之上建有要塞，部署着不少大炮。港口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湾，里面停满了船只。“我们的克拉克帆船很大.....所以只能停在港口之外。”阿尔布开克如此写道。

这一天是耶稣受难节。天气已经酷热难当。在耶稣受难这一天抵达，对葡萄牙人来说既是鼓舞也是刺激。他们发动圣战的热情高涨。“士兵们已经摩拳擦掌，全副武装，热切渴望战斗。”^[2]阿尔布开克在后来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一封解释性长信中如此写道。谢赫不在城里，但城市总督阿米尔·米尔赞礼貌地派遣了一名信使去询问访客有何贵

干。阿尔布开克开门见山，他说自己要去吉达和苏伊士消灭马穆鲁克舰队。他拒绝接受当地总督送来的食品，“因为我的习惯是，不接受尚未与我们缔结和约的国家和君主的礼物”。^[3]他要求阿米尔“打开城门，允许我们的旗帜和士兵进入”。阿米尔提议亲自前来谈判。阿尔布开克说，那没有意义。于是，士兵们开始磨刀霍霍。

阿尔布开克知道兵贵神速，必须在周边沙漠的援兵抵达亚丁之前将其攻下。更重要的是，由于亚丁气候严酷，他的机遇窗口期很短。他们已经遇到了红海最关键的战略问题：“在我看来，由于缺水，如果我们占领了城市却没有控制通往城后山区的大门，我们的全部努力就白费了，因为到时我们将不得不从船上获得给养。”没有辩论，没有犹豫，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计划，从事后来看，他承认这个计划差不多等于是没有计划。“我们唯一的计划就是枕戈达旦，以精神和行动为陛下效劳。我们达成一致，从两个地方发动进攻，并将部队分为三路。”除此之外，由于复活节的吉利时节，他们坚信“天主一定会为我们提供一切”。葡萄牙贵族及其武士和训练有素的民兵之间存在竞争，所以必须把这两拨人分开。两个群体都领到了梯子。“我们带来了撞城槌、撬棍、铁铲和锹，并用火药炸毁了一段城墙。”黎明前两个小时，军号响起。士兵们登上小船，划到岸边。“黎明时分的城市，以及旭日东升的景象，真是令人心中油然而生敬畏。”总督的秘书之一科雷亚如此记载道。他不仅留下了对此役的记载，还绘制了亚丁地图，“它沿着海岸延伸，形似一个弯曲的海湾，小船只有在涨潮时才能接近，城墙高耸，令人生畏，有许多圆形塔楼”。^[4]



加斯帕尔·科雷亚绘，葡萄牙人进攻亚丁

葡萄牙人的进攻出师不利。小船停泊在浅滩上，距离海滩有弩弓射程那么远。士兵们不得不在相当远的距离涉水上岸；指挥官们浑身湿透；火枪手的火药被浪潮弄湿。葡萄牙贵族们没有把他们的部下整好队列。他们渴望个人的荣耀，为了争夺第一个登上敌城的荣誉，争先恐后地攀爬梯子。“这让我非常伤心，”阿尔布开克后来写道，“因为他们尽到了作为骑士的义务，却忽视了留在城墙脚下的队形混乱的士兵。”城墙很高，梯子的长度不够，所以爬到梯子顶端的人不得不艰难地爬上胸墙。第一批登上城头的是两个葡萄牙贵族，名叫加西亚·德·索萨和若热·达·西尔韦拉，还有一个抗旗子的侍从。在他们下方，一大群人闹哄哄地企图跟上去，但梯子顶端的耽搁使得梯子上出现了堵塞；进攻很快陷入混乱。阿尔布开克描述了“训练有素部队的梯子，一次可以将一百人送到城墙顶端”，现在开始晃动。“我看到梯子上的人重量极大，于是命令戟兵去支撑梯子……他们用自己的戟在梯子两侧支撑它，但梯子还是倒了下来，把戟压断，将戟兵砸成重伤。”^[5]

此时穆斯林守军察觉到了敌人的凌乱，隧重整旗鼓，顽强抵抗，向城墙下的人投掷石块和射箭。葡萄牙人尝试撞开主城门，但失败了。城门被封堵得严严实实的。最后，葡萄牙人用火药在城墙上炸出一个洞。现在需要一个人身先士卒。现场的指挥官堂加西亚·德·诺罗尼亚是阿尔布开克的外甥，但他未能起到表率作用。后来的审判表明，他之所以没有带头冲锋陷阵，若不是因为怯懦，就是由于嫉妒：“他拒绝冲进去，

是因为嫉妒第一个登城的加西亚·德·索萨，所以如果占领了城市，索萨会得到全部荣耀……诺罗尼亚不肯进去，其他人也不肯。如果他们勇敢地冲进去，就能一口气占领城市。”^[6]这一天将会出现一系列“如果”。

城墙下鸡飞狗跳，领导乏力。总督和堂加西亚·德·诺罗尼亚正忙于指挥士兵修复梯子。这工作非常关键，却是低微的体力劳动。已经登上城墙的一些人感到没有后续支援，决定撤退。他们没有梯子可以爬下来，于是城下的葡萄牙士兵向上方投掷绳子，帮助他们逃跑。与此同时，一小群葡萄牙士兵，包括加西亚·德·索萨和若热·达·西尔韦拉，躲在一座塔楼内，拼命战斗。一贯无比自信的阿尔布开克这一次承认自己犹豫不决了：“我不知道应当鼓舞军官、骑士和贵族们（他们爬回了地面）和正在城墙脚下督战的堂加西亚，还是去援助城墙顶上的人。由于这番踌躇，我们损失了一些人。”^[7]

在遭到敌人围攻的塔楼内，葡萄牙士兵遭到越来越猛烈的箭矢和长枪的袭击。若热·达·西尔韦拉瞥见总督的身形，向下喊道：“大人，帮助我们，否则我们就全都死了！”^[8]阿尔布开克在嘈杂中回答道：“我帮不了你们。用绳子爬下来吧！”有些人成功地沿绳索爬下来，其他人冒险跳墙，还有人则拒绝逃跑。有一个葡萄牙人坐到胸墙上，俯视城下，画了个十字，然后跳下来。结果他跌断了一条腿，几天之后伤重而亡。一名来自某艘船上的炮手比较幸运，他一手握着弩弓，跳下城来，大难不死。加西亚·德·索萨拒绝逃跑。“我可不是用绳子逃命的人！”^[9]他喊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勇敢。没过多久，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脑袋，他死了。很快，穆斯林士兵就占领了塔楼，将葡萄牙人的首级插在长枪上，向下挥舞。葡萄牙人只得撤退。

阿尔布开克只得尽力收拾残局。他们撤退时，收走了倒塌的梯子的碎片，“免得它们被当作我军溃败的证据”。^[10]据编年史家记载，总督“看到失败得如此凌乱而凄惨，大感震惊，哑口无言”。^[11]

军中的气氛十分压抑。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他们寄希望于上帝的佑助，却一败涂地。士兵们渴望再试一次，打算把他们的重炮送上岸，把城墙轰出一个窟窿，但阿尔布开克知道有利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缺水的问题非常急迫，东风快要结束了。如果他们现在不撤退，就会身陷绝境，既不能攻入红海，也不能跨越印度洋返回。

攻打亚丁的失败是一个挫折，但在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挫折。阿尔布开克在给国王的信中尽力粉饰这次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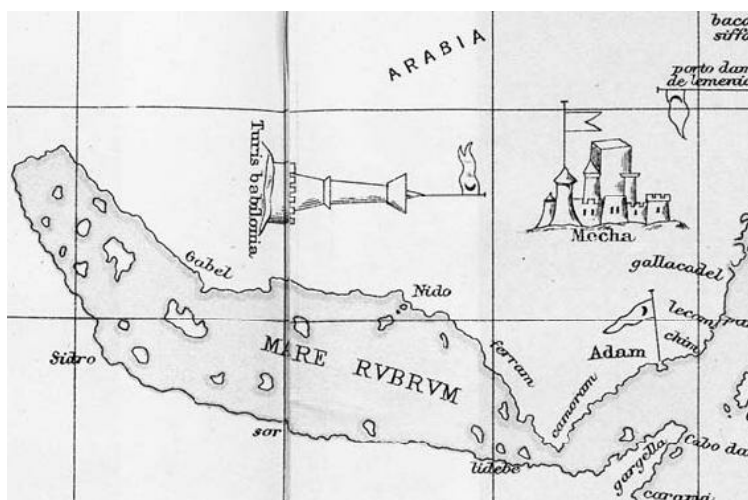
关于亚丁的行动，我可以向陛下报告，这是陛下能够想象的最激烈、最快速的战斗……为陛下效力的愿望让士兵们加倍努力，由于在那一天希望为陛下建功立业的人太多，压垮了梯子。^[12]

他责怪梯子，并又一次怪罪骑士们缺乏纪律性。他很有策略地批评了堂加西亚，“关于他那一天的行为，我不敢多说我个人的意见，因为他是我的外甥”。^[13]阿尔布开克是个诚实的人，所以他也怪罪自己：“我相信，如果我事先对亚丁进行侦察，就不会在那个地点发动进攻。”^[14]说到底，他没有隐瞒事实：此次进攻的筹划很不稳妥，执行也很糟糕。

即便如此，舰队继续航向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决策并不受人欢迎。领航员和船长们希望在雨季开始之前返回印度。他们可不想困在红海，因为红海的条件恶劣是臭名远扬的。就像当年在霍尔木兹一样，一些人窃窃私语，说领导他们的是个疯子，要把他们带到没吃没喝的地方去；“他们相信自己必死无疑。”^[15]阿尔布开克对所有这些反对意见置若罔闻：他只不过是在服从国王的命令而已。他没有透露更深层次的计划：如果天气允许，就驶过整个红海，到苏伊士去歼灭马穆鲁克苏丹的舰队。

到4月底时，他们进入了狭窄的红海，据总督的秘书科雷亚说：“水道只有火炮射程那么宽。”^[16]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基督徒第一次

深入伊斯兰世界心脏的海洋，而且也接近了红海西岸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他们相信那就是祭司王约翰的王国。“我们航行到水道入口处，”阿尔布开克记载道，“尽我们所能地大摆排场，礼炮齐鸣，奏响军号，旌旗招展。”^[17]对总督来说，这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最终征服的门槛。获取领航员的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他们俘虏了一艘过路的阿拉伯三角帆船，派二十人躲藏在甲板下方，把船开到一个港口，等当地领航员上船，然后将其扣押。



在阿尔布开克入侵红海之前，葡萄牙人绘制的红海地图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过已经标注了卡马兰岛（**Camoram**）

他们在红海北上，“始终看得见祭司王约翰的土地和阿拉伯半岛的海岸”。^[18]据科雷亚记载，两岸的风景都非常凄凉：“没有风暴，只有猛烈的热风……两岸的土地都非常干旱贫瘠，没有一丝绿色，群山巍峨。”^[19]艰险难走的浅滩太多，意味着他们只能在白天航行，手里拿着铅垂线随时准备测深，夜间落锚停船。由于一名领航员的错误，一艘船险些搁浅。阿尔布开克实施了威慑策略，就是这种策略让印度海岸的人们对法兰克人噤若寒蝉。经过的船只都被葡萄牙人俘虏并抢走给养。不幸的穆斯林船员被砍掉双手、鼻子和耳朵，并被送上岸，去宣传葡萄牙的恐怖和威严。然后，被俘的船只会被付之一炬。

阿尔布开克的第一个目标是遍布黄沙的低矮岛屿卡马兰岛，位于红海入口以北200英里处，靠近阿拉伯半岛，这是整个海岸唯一的淡水来源。他在那里补充淡水之后，急于继续进军吉达，但风向已经开始变得难以捉摸。随后刮起了西风，他无法继续前进了。当东风刮起的时候，阿尔布开克命令他的船只匆忙离开锚地。后来又变成西风。一连二十一天，他的舰队停泊在大海中央，等待机会继续北上。在此期间，他的部下焦躁不安。淡水用完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卡马兰岛。“他们就停留在那里，”科雷亚写道，“度过了5月、6月和7月。没有下一滴雨。”^[20]他们等于是被困在了那里，只有山羊和骆驼给他们做伴。他们待在长着红树的沼泽和黄沙满地的灌木丛中，在毒日头下，靠吃山羊和骆驼以及从海里捕鱼度日。阿尔布开克无比乐观，派遣小型卡拉维尔帆船去侦察，俘虏过路船只，并盘问这些倒霉的船员，以获取信息。让他那些备受折磨的部下惊恐的是，他命令石匠试验制造石灰。他们报告称，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找到了大量合适的岩石，房屋、清真寺和古建筑也能提供许多石料……这是世界上修建要塞的最理想地点，还拥有最好的设施，”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不受风力影响的港口……水源充足……有大量优质鱼类。”^[21]大家呆若木鸡，害怕他又会下令修建一座要塞。

阿尔布开克向里斯本宫廷汇报的时候，把这个岛屿描绘成世界上最卫生的地方。事实截然相反。他从卡马兰岛出发去吉达的时候，官兵们又一次高声反对他的这个决定，称“他要把他们全带上死路”。^[22]与他给国王的乐观报告相反的是，大量葡萄牙人在此死亡。岛上显然缺少口粮，而且他们被无情地驱使着拼命劳作，去修理船只。一种神秘的流行病开始夺取他们的生命：“发烧仅仅两三轮，并且胸口剧痛之后，一种未知疾病，胸腔郁结血块，夺去很多人的生命。死者超过五百人（总共有一千七百人），几乎所有土著士兵都死了，死于辛劳和糟糕的饮食。”^[23]不过，他给国王的报告里丝毫没有提及这次疫病。

阿尔布开克相信上帝给了他神圣的使命，而夜空中的一个奇观更加强了他的这种信念。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

当我们停泊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祭司王约翰国度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符号，形似十字架，非常耀眼，一朵云飘在它上方。云在接近十字架的时候，分散成无数碎片，没有接触到十字架，也没有遮掩它的光辉。船上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奇迹，许多人跪下，接受上帝的旨意。还有很多人虔诚地流下了眼泪。^[24]

阿尔布开克努力劝服领航员和船长们，要求他们顶风渡海去西岸，但他们不肯挪动。

在横遭赤日炙烤的沙丘中度过的这几个月里，阿尔布开克继续撰写一份关于红海的详细报告，并将其发回里斯本。他尽可能地搜集关于红海的所有信息，涉及气候、地理、航海、港口、政治和部落从属关系。他派遣卡拉维尔帆船去调查珍珠养殖场，询问关于祭司王约翰富饶金矿的情况，最终得出了结论（让他的部下长舒了一口气），红海西岸的马萨瓦比他目前所在的岛屿更适合建造要塞，因为“马萨瓦背后的海岸就是祭司王约翰的土地”。^[25]葡萄牙人对祭司王约翰这个半神话的基督徒的信仰还很强烈。他告诉曼努埃尔一世：“现在我掌握了关于红海方方面面的完整信息。”^[26]

葡萄牙人持续不断的情报搜集活动有很多种形式。总是有一些人愿意冒险，不管有多危险。秉承佩罗·达·科维良（若昂二世国王派往印度的间谍）的精神，一个叫费尔南·迪亚士的人志愿执行了一些长途的间谍任务。迪亚士可能是个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也可能是葡萄牙人，被摩洛哥人俘虏，在直布罗陀被囚禁了很长时间。不过，相关的史料不太明确。无论如何，他精通阿拉伯语，对伊斯兰教仪式、祈祷和《古兰经》经文非常熟悉。他提出，他可以前往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海岸，然后取道吉达、麦加和苏伊士去开罗，在亚历山大港搭乘威尼斯船只，带着给国王的情报返回葡萄牙。他的掩护身份将是一名逃亡奴隶。于是，葡

葡萄牙人给他的腿加了脚镣，用一条独木舟将他送到大陆。他的衣服里缝了宝石，以便沿途出售，作为活动经费。他安然无恙地返回了葡萄牙，向曼努埃尔一世做了报告。迪亚士后来返回了印度，并显然又长期在红海搜集情报。科雷亚认识他，说他“死时非常贫寒”。^[27]

阿尔布开克特别希望获取关于苏伊士（位于红海北端）和马穆鲁克舰队构成的情报。根据他认为可靠的信息来源，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证实了他多年来的猜测，即马穆鲁克舰队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马穆鲁克海军在第乌惨败，然后是圣约翰骑士团截获了从黎巴嫩运往埃及的木料，所以苏丹的海军力量遭到了致命打击。他宣称苏伊士已经是一片废墟，那里只有十五艘小型帆船。

侯赛因离开印度之后，马穆鲁克王朝对海战的热情消退了，没有再建造任何船只。他们在苏伊士只有三十人守卫那些船只，抵御时而发生的阿拉伯人的袭击……他们每天早上向船只洒水，以防止木板被晒裂。那里没有克拉克帆船，没有木材、木匠、桅杆或船帆。^[28]

事实上，每年都吵得沸沸扬扬的伊斯兰舰队大举入侵的传闻只不过是异想天开。

阿尔布开克按照他一贯的表达习惯，吹嘘葡萄牙人向红海的试探给敌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我可以向陛下保证，红海由于我们的入侵而心惊胆寒、空空荡荡，没有一艘船或独木舟在红海之中航行，就连鸟儿也不敢在那里着陆。”^[29]他的分析结论是，如今吉达和麦加粮食匮乏，苏丹的政权摇摇欲坠。

他的话有些夸大其词，但总的来讲，他的评估惊人地准确。葡萄牙人向红海的进犯令伊斯兰世界瞠目结舌。在亚丁遭到攻击后，当地谢赫派遣迅捷的竞赛用骆驼，将消息送到阿拉伯半岛的吉达和麦加。麦加驻军开往吉达，做好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准备。另一峰骆驼将消息从麦加送往开罗，只花了九天时间。到5月23日时，葡萄牙人的入侵已经

尽人皆知。开罗城内一片张皇失措，苏丹呆若木鸡，星期五的祈祷中也添加了特殊的内容。苏丹匆匆在赛马场集合了一支部队：“他们身穿链甲，头戴钢盔，背着弯刀。出征名单上有三百人……苏丹的一队马穆鲁克士兵奉命驻扎到苏伊士，开始造船。”^[30]6月中旬，苏丹命令军工厂总指挥及其部下护送火炮到苏伊士，但“没有饷银”。

开罗编年史家伊本·伊亚斯记载了此项备战计划的瓦解。没有人真的离开城市。6月15日，部队再次集合到赛马场，但拒绝出动：“除非领到一笔奖金，否则我们不走。我们不想在沙漠里饿死渴死。”^[31]苏丹大发雷霆，当即离开操练场。事实上，马穆鲁克政权的确在崩溃边缘。苏丹担心城内发生叛乱。到9月时，伊亚斯报告称局势没有变化，红海传来的消息却更糟了。他记载道：“欧洲人放肆地阻碍红海贸易，扣押货船；他们占领了卡马兰岛，这是通往印度道路上的一个关键中转站。”^[32]从1514年到1515年，一个月一个月地流逝，马穆鲁克王朝的瘫痪状态没有任何好转，一方面是葡萄牙人的侵袭，另一方面是圣约翰骑士团的海上封锁。“去年一年，没有任何船只抵达亚历山大港的港口；没有任何货物运抵吉达，因为欧洲海盗在印度洋恣意游弋；上一次有货物在吉达上岸，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1515年7月，身处吉达的第乌战役指挥官侯赛因还在哀求苏丹“尽快派来增援部队，免得欧洲人占领整个印度海岸，并且他担心吉达遭到攻击……苏丹在各地都遇到麻烦”。^[33]直到1515年8月，一些士兵因为“身体过于羸弱或患有性病”^[34]而被剔除，才有说得过去的部队出发前往苏伊士。

阿尔布开克对局势的概括非常精彩。他相信存在一个机遇，可以有效地将红海一分为二；红海不存在有能力抵抗葡萄牙人的舰队；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已经洞开，只要集中努力一次，马穆鲁克王朝必然灭亡：“苏丹的处境非常糟糕。他的兵力极少，他自己不会离开开罗，也不会出征作战，更不会离开自己的要塞。沙阿伊斯玛仪一世在他门前虎视眈眈，冷酷无情地打击他。”^[35]

在这年12月发出的一封长信的结尾，他向曼努埃尔一世呈现了一个清晰而狂热的战略愿景，并向其展示了最终战利品的前景：

.....在我看来，如果陛下在红海拥有强大的力量，那么全世界的财富，尽在您的掌握，因为祭司王约翰的所有黄金都将属于您，数额之大，我都不敢计数。可以用这黄金去收购印度的香料和商品.....我冒昧地向陛下如此讲述，是因为我亲眼看过恒河两岸的印度，我观察到，天主在佑助您，将印度交给您。自陛下占领果阿和马六甲并命令我们进入红海、寻找苏丹舰队和切断通往吉达与麦加的航路以来，印度风平浪静，安宁稳定.....陛下若能摧毁邪恶的王座，并涤荡其全副污秽丑恶，对上帝将是莫大贡献。[\[36\]](#)

这话并不是非常隐晦，实际指的是摧毁麦加和麦地那及先知穆罕默德的遗骸。这个计划如此大胆，只有曼努埃尔一世的一小群意识形态专家知晓内情。葡萄牙人将在祭司王约翰的协助下完成这项事业。

我得知，祭司王约翰也渴望摧毁麦加城。他相信，如果陛下提供船只，他就能派遣大量骑兵、步兵和大象前来.....穆斯林自己也相信，祭司王约翰的战马和大象将在麦加的圣地吃草.....上帝会给陛下的这番事业佑助。具体执行的将是您的船只、您的军官和您的士兵，因为渡海需要两天一夜的时间。[\[37\]](#)



德意志地图师马丁·瓦尔德西米勒于**1516**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将曼努埃尔一世呈现为海洋的君王

阿尔布开克在设想弹丸之地的葡萄牙能够控制世界中心，曼努埃尔一世或许能成为最伟大的基督教国王，并解释了如何实现这样的愿景。他将在亚丁和马萨瓦建造要塞，巩固立足点，在那里驻扎舰队，但不会尝试深入阿拉伯半岛腹地；他将与祭司王约翰会师，然后“陛下的舰队可以直捣苏伊士，从那里到开罗仅需三天时间。这会在首都造成震荡，因为苏丹不像您被误导去相信的那样强大……我们会暂且搁置印度的事务。果阿会保障您在印度的基业安宁和平”。^[38]阿尔布开克的战略绕过了半个地球：东印度不再是他的目标，而是行动基地。他最终的使命是消灭伊斯兰世界、收复耶路撒冷。^[39]

但是，他必须等待。到7月中旬时，风向变了，雨季结束了。返回印度的时间到了。途中，他又一次逼近亚丁，炮轰城市，并研究出了来年如何截断其水源、将其一举攻下的方法。

[1]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17.

[2]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168.

[3]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169-171.

[4]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337.

[5]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173-174.

[6]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752.

[7]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177.

[8]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342.

[9]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343.

[10]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755.

[11]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755.

[12]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179.

[13]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174.

[14]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17.

[15]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758.

[16]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1 vols. Lisbon, 1860, p.758.

[17]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182.

[18]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183.

[19]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p.345-346.

[20]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347.

[21]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194-195.

[22]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761.

[23]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348.

[24]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190.

[25]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222-223.

[26]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01.

[27] Correia (or Corrêa) ,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348.

[28]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197-198.

[29]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192.

[30]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289.

[31]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291.

[32]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335.

[33]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356.

[34]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p.424.

[35]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25.

[36]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p.221-222.

[37]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01.

[38]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24.

[39]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p.223.

23 最后的航行

1513年7月～1515年11月

“陛下竟怪罪我，怪罪我，怪罪我！”^[1]

每年9月，香料舰队抵达果阿的时候，都会捎来葡萄牙的书信。回信则随舰队于次年1月或2月送抵葡萄牙。这种协调非常差的通信很容易造成误会和错误观念。曼努埃尔一世对阿尔布开克未能完成一些任务而越来越狂躁。在遥远的里斯本，他觉得这些任务再简单不过了。必须封锁红海，必须迅速运送香料，必须给士兵支付军饷。“按时领到足额薪水的水手会心满意足，心甘情愿地留在船上效力，”他以说教的口吻告诉阿尔布开克，“因此我要求给水手及时发放足够的饷银，让他们满意……但我要嘱咐你，饷银应当来自其他人的腰包（战利品），而不是我的国库。”^[2]总督对这一点尤其不满意，因为他始终没有足够的金钱或人力去实现国王的雄心壮志。对阿尔布开克来说更不妙的是，国王漫不经心地质疑果阿的价值。但对总督来说幸运的是，他麾下的指挥官们在投票表决中坚决支持他守住这个岛屿。而且曼努埃尔一世朝三暮四，经常心血来潮地改变主意，这非常让人恼火。“陛下知道吗？您的政策每年一变。”^[3]阿尔布开克在信中倍感挫折地写道。但反对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他很容易树敌，他的政敌在每年的邮件中都发回自己的报告。在亚丁城下的失败传回朝廷之后，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

他原打算于1514年1月重返亚丁，但未能如愿，原因很简单，他缺少适航性强的船只。有一艘船在从亚丁返回果阿的途中沉没；他缺少训练有素的木匠和码头工人，无法对破损船只进行修理，因为整修回国的香料舰队的工作始终是最优先的。在“海洋之花”号失事之后，阿尔布开克航行时总是有点心惊胆战，这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描述得很生

动：“一只手捂着我的胡须，另一只手放在水泵上。”^[4]他必须等到9月才能得到支援。

然而，他不得不在果阿待了一整年，建设殖民地，以及与印度次大陆的权贵们谈判。为了给一再耽搁的亚丁战役做准备，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他储存了大量火药与炮弹，监督兵器（尤其是长枪）的生产、航海饼干的烘焙和攻城器械的制造。在攀爬亚丁城墙的可耻失败之后，他特别重视制造许多非常坚固的梯子（并且长度足够抵达城墙顶端）。阿尔布开克热切希望增加火枪手的数量。他在果阿、科钦和坎纳诺尔发布消息，悬赏鼓励人们主动报名接受火枪手训练。每个月的星期天和第一个星期六，进行射击训练，凡命中靶子的人将得到一个克鲁扎多的奖励。方阵步兵每个月操练两次，反复练习瑞士战术；他们的长枪存放在军械库内，得到严密看护，因为有些反对这种新潮战术的贵族威胁要将长枪折断。每个星期日下午，阿尔布开克亲自带领骑兵练习袭掠作战，并熟悉穆斯林风格的马鞍。一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在火把照明下返回马厩。

阿尔布开克兢兢业业，事无巨细都要关照，不知疲倦地劳作。秘书加斯帕尔·科雷亚记载了他的日常：“总督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卫兵听弥撒，然后独自骑马出行，手里只拿一根手杖，头戴草帽。他带着戟兵巡视海岸和城墙，检查正在进行的施工，亲自观察大小事务，并发号施令。”倒霉的科雷亚忍不住补充提到他自己：“他的四个秘书，都是国王的忠仆，跟随他，手拿纸和墨，记录他口述的命令和指示。他一边骑马，一边在马背上签署这些文件。正在撰写本书的加斯帕尔·科雷亚，即我本人，就曾担任他的秘书，这样跟随他办公。”^[5]“我接到请愿的时候，”阿尔布开克在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自豪地（他有理由这样自豪）写道，“就当场给出答复。”^[6]

阿尔布开克是帝国主义的梦想家，决心在印度洋为葡萄牙开拓千秋基业。他是务实的人，监督着城市的物质防御——城墙是用干泥黏合

的，在雨季容易受损，必须不断维修。他也是严峻的道德家，努力创建一种持久、公正的社会秩序。他深知，他的部下虽然英勇无畏而且能够自觉地做出自我牺牲的壮举，但也不服管教、暴戾和贪婪，所以他必须持续地予以监督。他写道：“我在场的时候，一切顺利；但我刚转过身去，每个人就都遵照自己的天性。”^[7]他不知疲倦地反腐，并纠正葡萄牙人对当地人的不公行为。他知道，赢得民心 and 成功的军事行动同样重要。他非常清楚，必须及时且足额地给士兵、水手与官员支付薪水，否则他们必然会贪污腐化和鱼肉百姓。葡萄牙的美名是至关重要的，他担心，就像坎纳诺尔国王说的那样，“蜜糖变成毒药”。^[8]他努力保护当地女性免受性暴力，同时积极推动异族通婚政策。他禁止任何形式的赌博，只允许玩象棋和跳棋；他把行为不端的人送到桨帆船上划桨，作为惩罚；把爱争吵、不守纪律的人随同香料舰队送回里斯本。他每个月定期施舍和赈济孤儿与丧父的孩子，并雇一名教师去教他们读书识字，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这项工作有着很浓的社会工程的意味。

阿尔布开克貌似一个严酷的独裁者，但也有欢乐的时光。在果阿王宫的典礼大厅，他每天晚上都会坐下来，在喇叭声中与四百人一同用餐。每个星期天，果阿土著部队在王宫前方，在他们本土乐器的伴奏下表演。从锡兰运来的二十四头大象在总督面前游行，并在象夫的指挥下向他致敬。宴会期间，舞女在火把照明下载歌载舞。阿尔布开克内心里酷爱印度的景观、音乐和五光十色，他变得越来越本土化了。

印度大陆的强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因为他们处于印度大陆各帝国利益的边缘，但也对其严加监视。阿尔布开克以娴熟的技巧，与印度次大陆和更广袤的大洋的权贵们玩着外交游戏，纵横捭阖。毗奢耶那伽罗统治者派来的使臣被邀请参观葡萄牙军队的表演。葡萄牙方阵步兵在城市的街道武装游行，从使臣面前走过。使臣观看这盛大的阅兵，一连两个小时，一排排士兵列队行进，手执长枪，在笛子声和鼓声中如潮水般涌过。对这个使臣来说，所有欧洲人的相貌无疑都是一样的。他震惊

地发现，葡萄牙兵力有一万多人。

在其他地方，阿尔布开克忙着管理葡萄牙统治下的马拉巴尔海岸的大小事务。虽然他不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但他粗暴直率的风格招致了很多敌意。他对代理商们的才干和品德非常鄙夷，曾玩世不恭地说：“他们不知道如何从市场上买到价值10雷阿尔的面包……陛下还不如忍受佛罗伦萨商人揩油，因为他们是天生的生意人，懂得生意经。”^[9]反对他治理方式的小集团，尤其是在科钦的那一伙人，不遗余力地向曼努埃尔一世抹黑阿尔布开克。发回里斯本的每一包邮件都包含对阿尔布开克的激烈指责：总督是个危险的疯子、奴隶贩子、腐败的受贿者，正在中饱私囊，盗窃国王的财产。阿尔布开克知道自己遭到的攻击。他对曼努埃尔一世报告称：“这些人抓不到把柄的时候，就自己捏造。”他截获了一些写给国王的指控他的书信，肯定感到自己处境危险。他宣称，这些信的内容“让我大为灰心丧气……让我的白头发增多了一倍”。^[10]最后他与反对派领导人安东尼奥·雷亚尔、洛伦索·莫雷诺、迪奥戈·佩雷拉和加斯帕尔·佩雷拉当面对质，将其中一些人随同香料舰队送回了里斯本。这个措施适得其反。

压制放纵不羁和满腹嫉妒的葡萄牙贵族、查处贪腐官员、努力应付国王那过多且朝三暮四的要求、任务太重而手中资源太少——阿尔布开克的力量也被逼到了极限。1514年年末的几个里，在科钦，有人行刺他，这让他大感震惊。一个叫若昂·德尔加多的人，勇敢且鲁莽，因强奸一名当地女子而被关入监牢。他说服了一名在地牢上方的厨房工作的穆斯林奴隶，给总督的一道鸡蛋菜肴下毒。阿尔布开克得以幸存，但此事让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他说：“他已经只是一袋稻草，每天都在奔向坟墓，时日无多；但他必须等待，不想死于毒药。”^[11]下毒的奴隶认罪后，德尔加多被带到总督面前。德尔加多反正已经死路一条，无所畏惧，以惊人的坦率说，如果阿尔布开克知道他的敌人想害死他，那么或许还不知道他认为自己的朋友的人当中，有多少其实是敌人。德尔加

多被判有罪，被处以绞刑、开膛和斩首，但始终没有查明是谁在狱中向他提供了毒药。

1515年年初，新的远征已经准备就绪。计划是占领亚丁，进入红海，在红海西岸的马萨瓦建造一座要塞，然后进军吉达。阿尔布开克很清楚曼努埃尔一世的命令和指示，但后来远征未能成行。霍尔木兹事务打乱了他的计划。这座建造于岛屿之上的城市虽然向葡萄牙国王称臣纳贡，但对阿尔布开克来说仍然是需要解决的未竟事业。当初在1507年时，他攻打霍尔木兹失败，不得不撤退。霍尔木兹是印度洋的枢纽之一，是波斯湾贸易和马匹出口的轴心，但它的政局紊乱而动荡。它名义上的统治者是一个傀儡孩童国王，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首相及其氏族手中，他们常常用下毒或刺瞎双目的手段换掉国王。霍尔木兹有一群被废黜的前任国王，并且都已经瞎了，实际掌权的是各位维齐尔。

与总督在1507年打交道的那位维齐尔，瓦加·阿塔已经去世。他死后，发生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宫廷革命。当时的年轻国王被新维齐尔赖斯·努尔丁杀害了，努尔丁随后又废黜了另一个傀儡统治者图兰沙阿。后来，赖斯·努尔丁又被一个更残忍的亲戚赖斯·艾哈迈德排挤出去。艾哈迈德很可能是在波斯沙阿的保护下篡位的。这种可能性让葡萄牙人的位置岌岌可危。阿尔布开克由此决定，霍尔木兹比亚丁更重要，必须优先处置。

1515年2月，阿尔布开克率领舰队离开了果阿。他抵达阿拉伯半岛的马斯喀特（此时是葡萄牙忠顺的附庸）时，从当地谢赫那里得到了关于霍尔木兹局势的更详细报告。在赖斯·艾哈迈德的淫威之下，国王和维齐尔都为自己的性命而战战兢兢。艾哈迈德给城里带来了四百名波斯弓箭手。阿尔布开克匆匆赶路。他于3月的某个夜晚抵达霍尔木兹，给了这座城市一个严峻的致意：军号齐鸣，然后是火炮齐射，石弹掠过屋顶，令人胆战心惊。据科雷亚记载，炮火非常猛烈，“仿佛船只都着了

火”。^[12]赖斯·艾哈迈德显然已经有所戒备：通往海滩的街道被路障封锁，并部署了火炮。

黎明时分，城镇居民可以看到葡萄牙舰队在晨曦之下闪闪发光：旗帜飘扬，甲板上挤满手执长枪和矛的士兵。由于波斯湾的酷热，葡萄牙人没有穿甲胄，而是将其悬挂在索具上，熠熠生辉。一艘小船接近了舰队，送来一个身穿葡萄牙服装的人。他接近时喊道：“上帝保佑总督大人、船只和水手们！”^[13]这个人原来是米格尔·费雷拉，他出使波斯回来了。他带着波斯沙阿派遣的一名使者来到霍尔木兹，这名使者正在等待拜见阿尔布开克。费雷拉详细汇报了他的出使经过。他在霍尔木兹待了两个月，所以能够详细解释城内局势。葡萄牙舰队抵达后，赖斯·艾哈迈德一夜之间就释放了维齐尔赖斯·努尔丁，后者已经是个老人。艾哈迈德在静观其变。与此同时，作为国王的图兰沙阿仍然随时可能被刺瞎或处死；艾哈迈德将他囚禁在深宫，受到严密监视。

葡萄牙舰队威胁到了艾哈迈德的计划，而对可怜兮兮的图兰沙阿来说，阿尔布开克似乎是他唯一的希望：“除非他把自己交给总督，否则死路一条。”^[14]艾哈迈德希望诱惑阿尔布开克上岸，趁其不备将其俘获并杀死。总督以果断和狡黠处置着这个一触即发的微妙局势。费雷拉及其犹太译员提供的内部消息也很有帮助。国王在艾哈迈德的授意下表示，阿尔布开克旅途奔波，不妨上岸休息。他谢绝了，并说自己非常习惯于海上生活，在岸上反倒不舒服，但他的指挥官们可以上岸，不知国王是否可以在岸边提供一些房屋供他们暂住？艾哈迈德企图阻挠，但国王在绝境之中突然迸发出一种独立精神，同意了。于是，葡萄牙人在岸上获取了一个巩固的阵地，由自己的士兵守卫。阿尔布开克不肯以任何方式承认艾哈迈德的权威，他只愿意和国王或他的维齐尔交流。在葡萄牙人控制的安全房屋里，在避开酷热的凉爽地窖内，总督单独会见了年轻的国王，并向其施加影响。他说服了国王开放街道。他先劝说维齐尔，然后劝说国王本人，请求允许建造一座要塞。赖斯·努尔丁虽然收

了贵重礼物，但仍然支支吾吾，因为葡萄牙人要求的地点距离王宫太近，很不方便。阿尔布开克告诉国王，他需要在岸边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接见波斯使者，并且他绝无歹心。图兰沙阿为了摆脱恶毒的赖斯·艾哈迈德、赢得自由，于是同意了。

阿尔布开克不需要更多的批准了。他的动作很快。在一个忙得发疯的夜晚，他悄悄把一大群人和事先在果阿制作好的建材（木料、用来盛沙子的篮子和保护性屏障）运上岸，然后建造了一座临时基地，由火炮保护，并升起旗帜。这座基地“不必害怕任何力量，完全守得住”。^[15]基地俯瞰王宫，并堵住了从城镇到海滩的道路。葡萄牙人得到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第二天早上，市民一觉醒来，不禁大吃一惊。赖斯·艾哈迈德对他的傀儡大发脾气，说“自己宁愿把财宝都交给总督，也不愿意城市被占领”。^[16]这话是对可能结局的准确评估。但图兰沙阿非常坚决，他认为葡萄牙人是抱着和平善意而来的，否则城市早就被毁坏了。对艾哈迈德来说，当务之急是杀掉阿尔布开克。

除了具有战略价值之外，葡萄牙人的临时基地还成了大摆排场接待波斯沙阿大使的场所。与波斯的什叶派君主结盟，是阿尔布开克的权力政治的一个关键部分，也是预防赖斯·艾哈迈德作梗的保障。他准备了一个展现葡萄牙辉煌的场地。为了接见波斯大使，葡萄牙人搭建了一座有三级台阶的高台，背后是精美的壁毯，地上还铺着地毯。在约定的那天上午，阿尔布开克在这里等候大使。他坐在一张带有美丽镶嵌装饰的椅子上，威风凛凛，穿着黑色天鹅绒服装，胸前有闪闪发光的金色十字，他的雪白美髯非常显眼。在他背后，指挥官们也衣着光鲜，腰佩利剑，再往后是他们的侍从，手里捧着帽子，拿着主人的长枪和盾牌。道路两侧是土著士兵（果阿人和马拉巴尔人），他们呐喊着，敲打铙钹。他自己的葡萄牙士兵则携带旗帜、竖笛、横笛和战鼓。大使前方有人送

来他所带的礼物——脖子上套着项圈的黑豹、配有精美鞍具的骏马等。两人一排的队伍，手捧四百件精美织物、绿松石、金碗、精致链甲、镶嵌宝石的匕首，还有来自沙阿本人的礼物：一件非常奢华的长袍。然后是大使本人，他带来了沙阿的信，其写在一片金叶子上，塞在他的硕大头巾里。城里的显贵听到呐喊声和奏乐，也走过来了。停泊于外海的舰队也旌旗招展，射出雷鸣般的礼炮。

大使走近时，阿尔布开克端坐着一动不动。他仅仅招招右手，示意大使上前。在精细的礼节之后，用葡萄牙文写的书信（不过仍然是穆斯林外交的那种浮夸风格）被高声朗读。它认可了阿尔布开克的地位和声望：“发号施令的伟大领主，总督们和弥赛亚宗教伟人们的脊梁，强大的武士，强悍而慷慨的海上雄狮，我对你十分敬重。这就像黎明曙光一样确实，像麝香气味一般明白无误！”^[17]信里承诺与葡萄牙人缔结友谊，并请求借用一些优秀的炮手。

阿尔布开克彬彬有礼地收下了礼物，但他本人没有从中获益。他只是把那件华美的长袍在自己肩膀上披了一下，宣称自己不能将它穿上身，因为它是给君王的服饰。他把最精美的礼物送给了里斯本的王后，把猎豹送给霍尔木兹国王，将剩余财宝分给指挥官们。他看到那些没有得到赏赐的人以及广大官兵的嫉妒，于是决定普遍地发放赏金，但他自己不打算掏腰包。他看到图兰沙阿越来越绝望，除了给他送去猎豹，还提出了一个建议，请国王把税收的钱借他10万塞拉分^[18]。国王同意了。这笔钱是赖斯·艾哈迈德亲自送来的。他是来查看葡萄牙人虚实的。在喇叭乐声中，这笔巨款被摆放在葡萄牙营地入口处的一张桌子上，非常高调地分发给士兵。群众呆呆地盯着。这笔钱还不够，于是阿尔布开克索要更多金钱。国王送来了消息：艾哈迈德打算送礼物给总督，并借机刺杀他。阿尔布开克答复称，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制订了自己的应对计划。

他决定邀请各方——国王、艾哈迈德和努尔丁到海滩的一处房屋商谈。每一方可以来八个人。武装部队必须等在屋外。会议时间是4月18日。阿尔布开克秘密地在邻近的营地安排了一大群士兵。船上的大炮也做好了射击准备，随时待命。

参加会议的人都不准携带武器，但与会者没人做到这点。阿尔布开克的七名军官带来了长袍作为礼物，内藏匕首。阿尔布开克也藏了一件兵器。这些匕首是用来戳刺的。赖斯·艾哈迈德第一个到场。他踌躇满志地走进庭院，身侧公开佩带利剑，腰带上携带匕首，还带了刀子和一把小斧子。阿尔布开克通过译员责备道：“已经约好了都不带武器，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19]艾哈迈德答道，这是他的日常习惯。他转过身，丢掉了一些武器，但还保留着一些。此时国王和努尔丁也到了，他们进门之后，门就被锁上了。

艾哈迈德转身做了一个手势，随后一瞬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阿尔布开克抓住他的胳膊，抽出自己的匕首，向军官们喊道：“抓住他！”两人扭打起来。艾哈迈德一只手扭住总督的领子，企图用另一只手抓住对方的匕首。他落了空，企图抽出自己的剑，但太晚了。葡萄牙军官们猛扑过去，拔出兵器攻击他，戳得太猛，以至于误伤了自己人。艾哈迈德当场倒地死去。国王事先知道葡萄牙人的计划，但他以为艾哈迈德仅仅会被俘虏并押往葡萄牙。年轻的国王看到地上的死尸，吓坏了，以为自己的末日也到了。他企图逃跑，但门还锁着。在外面，艾哈迈德的部下喊道，他们的主人全都被杀了。于是，他们开始撞门。

阿尔布开克早就做了精心准备。葡萄牙方阵步兵开进街道，用手中握住的长枪逼退群众。国王浑身战栗地等待末日的时候，阿尔布开克拉着他的手，好言安抚，给他穿上丝绸华服，将他带到阳台上展示给民众。艾哈迈德的支持者固守王宫。最后，葡萄牙人许诺允许他们安全撤离，他们这才离开宫殿并出城。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霍尔木兹全城大

摆筵席。图兰沙阿被隆重地送回宫殿，总督还发表了鼓舞他的演说：

图兰苏丹陛下，您是霍尔木兹王国的主人和君王……只要上帝给您生命，您就永远是君王，不会有任何人胆敢攫取王位。我将运用指挥我的葡萄牙国王的全部力量辅佐陛下。他是您的挚友，所以我将亲近您的朋友，敌视您的敌人。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全副武装地在这里过夜，保卫您。[\[20\]](#)

这是一场完美的政变。图兰事实上成了葡萄牙人的傀儡，只不过他不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了彻底掌控全城，阿尔布开克悄无声息地破除了最后的障碍。但凡他要钱，就总能得到。他在国王的脑子里灌输了新的不安全感：无法保证艾哈迈德的支持者全都已经走了；国王在前往清真寺的时候，很容易被敌人从一处阳台或窗户用箭射死；最好解除全城所有人的武装；从今往后，葡萄牙人将提供完全的保护。阿尔布开克的这些计划果然都实现了。他越来越夸大其词，暗示有传闻称鲁姆人将有一支新舰队要开来。如果国王把他的火炮都交给葡萄牙人，他们就能更好地保卫霍尔木兹。之前，霍尔木兹的火炮被刻意埋了起来，以免落入葡萄牙人手中。国王和努尔丁对阿尔布开克的这个建议目瞪口呆。他们唯一的答复就是没有办法把火炮挖掘出来。阿尔布开克答道，没关系，不麻烦，他的水手可以去挖。在克服了更多的抵抗之后，葡萄牙人搞到了一百四十门炮。葡萄牙人的司法（名义上司法权由国王掌控）是非常严酷的。阿尔布开克在市场上搭建了颈手枷，用于惩罚和处决犯人，并将其展示给国王看。四名葡萄牙水手被引诱当了逃兵并皈依伊斯兰教，以换取荣华富贵。阿尔布开克抓到了这四人，将其手足捆绑起来，在城镇前方的小船上活活烧死。这是为了杀一儆百：“穆斯林看到总督不遗余力地去抓捕这些人并予以惩戒，无不胆战心惊。”[\[21\]](#)

国王还被要求出资在葡萄牙人的旧营地原址建造一座石质要塞，这是葡萄牙完全控制霍尔木兹的最后一步。阿尔布开克说，国王出这笔钱，只不过是偿还当初瓦加·阿塔欠葡萄牙人的债而已。

在阿尔布开克的建筑大师托马斯·费尔南德斯领导下，要塞工程的组织工作极其精细。他们从邻近一个岛屿运来石料，从大陆的窑运来砂浆。所有人——葡萄牙人、他们的印度士兵以及当地穆斯林，都对这项工程肃然起敬。三百人参加施工，分成十二组，每天有两组上工，劳动两天休息三天。5月3日，阿尔布开克和指挥官们为要塞正式奠基，在祈祷声中用锄头开挖壕沟。三天后，阿尔布开克肩膀上披着一块布，亲自搬运地基的第一块石头，在地上放了五个金币，然后将石头压在上面。

工程在炎炎赤日下不断推进。选址有问题。要塞位于海边，距离海水很近，地基的一部分必须在水下用防水水泥建造。葡萄牙人更愿意在夜间借助火把和月光劳动，但疲劳、热病和脱水让他们损失惨重。人群中暴发了痢疾，开始有人死亡。阿尔布开克对医生们非常恼火，因为他们挽救不了病员，要价还很高。“你们拿着医生的报酬，却对这种病一无所知，让为我主国王陛下效劳的人白白死掉。”他咆哮道，“很好，我来告诉你们，他们为什么会死。”他强迫医生们在毒日头下艰难地搬运石头，让他们体会一下劳动的辛苦。医生们最终被释放后，他又训斥他们：“现在我已经教训过你们了，从今往后你们应当能够治愈他们的病，把你们轻轻松松拿到的钱分一点给病人。我是以朋友的身份给你们善意的忠告，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们坐在桨帆船上划桨。”^[22]

总督始终亲临一线，鼓舞士气。他睡眠极少，饮食极少，很少离开要塞工地。他走出工地的时候，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想看看他的人。他们走到要塞大门，亲吻他的手。他在印度洋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他被誉为海上雄狮，“主持公道，统领海洋和陆地”。^[23]波斯湾和更远地区的邻国君王寻求他的友谊。波斯统治者称他为“首领中的首领、众多指挥官的指挥官、幸运的雄狮、印度的总司令和总督”。^[24]其他统治者送来画家，“为他绘制肖像”。^[25]对阿尔布开克来说，这是他一生的巅峰时刻。“取得此项成绩之后，”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我们就平定了整个印度，除了红海和亚丁。占领了霍尔木兹，让我们能够非常接近亚

丁，并且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在印度的威望。”^[26]他设想快速攻入红海，在马萨瓦建造要塞，控制珍珠养殖场，扼住伊斯兰世界和马穆鲁克苏丹国的咽喉。完全控制印度洋似乎指日可待。但在8月时，他不幸染上了痢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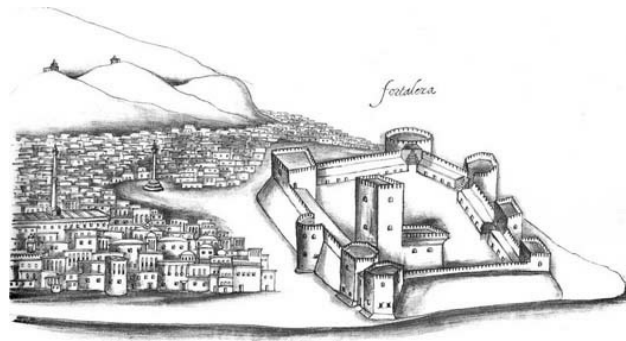
阿尔布开克在印度洋已经南征北战九年。为了建设曼努埃尔一世的帝国，他持续不断地辛劳，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在这期间，他忍耐着长期航海、战争、阴谋和酷热。他曾在卡利卡特负伤，在苏门答腊岛遭遇海难，在坎纳诺尔被囚禁，在果阿被下毒。他也在曼杜比河的雨季中被围困了三个月。他曾谈判、威吓、劝诱和杀戮。在外界看来，他似乎刀枪不入。子弹和长矛不曾打倒他；炮弹曾从他耳边呼啸而过；在贝纳斯塔里姆，他在小船里站直身子嘲讽穆斯林炮手。但是，他已经年近花甲。有机会在近距离观察他的人，如他的秘书加斯帕尔·科雷亚，会发现“他垂垂老矣，身体非常羸弱”。如今，在霍尔木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中，在碧蓝大海与耀眼的日光之下，在寸草不生的岩石上，他奄奄一息。

在他身边有一个名叫尼古劳·德·费雷拉的人，他之前作为霍尔木兹使者去了里斯本，现在回来了。阿尔布开克问他，自己在朝廷的地位如何。费雷拉或许是想粉饰实情，于是说国王非常看重阿尔布开克，所以希望他回到自己身边，在印度事务方面辅佐他。老人悲哀地答道：“在葡萄牙，没有一项荣誉能和当印度总督相比。在葡萄牙，工作累了可以休息。但我的残躯病体能休养多久？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还有什么比在这些劳作中度过残年更美好的事情？这些工作让我感到自己还活着。”^[27]印度是他毕生的冒险，他希望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有些日子，他闭门不出。除了亲信侍从，他谁也不见。有人说他已经死了，遗体被藏了起来。要塞工程松懈下来。阿尔布开克从俯瞰要塞的窗户露面，向指挥官们讲话，让他们能看得到自己。9月，他做了告

解，召唤指挥官们到自己身边。他轮流握住每一个人的手，要求对方宣誓，服从他指定为继承者的人。他们的誓言于当月26日被记录在案。被指定为要塞指挥官的佩罗·德·阿尔布开克是他的一个亲戚，这个人接管了要塞工程。

但在11月时，阿尔布开克还活着。他不肯离开，在看到霍尔木兹的要塞竣工之前也不肯瞑目。石质要塞虽然还不完整，但已经是一座可以防御的建筑，部署了霍尔木兹国王的火炮。医生们相信海上的环境对他会有益处。11月8日，他登上“玫瑰”号，这艘船对他来说有很多回忆。五年前，他曾在这艘船的桁端绞死了鲁伊·迪亚士。他命令船长在午睡时间起锚出航，此时整个霍尔木兹都沉浸在午后的酷热中。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向大家辞别。“玫瑰”号停泊在外海，他给图兰沙阿送去了最后的道别和道歉。国王的回信充满悲哀，他希望在阿尔布开克启程之前再见他一面：“看到您离去，我抑制不住眼泪，我觉得这应当是永别了。”“玫瑰”号和另外三艘船一同起航了。“随着夜幕降临，它们驶向印度。”^[28]



加斯帕尔·科雷亚绘，阿尔布开克在霍尔木兹的要塞

船上的亲密朋友们努力劝慰阿尔布开克，但他满腹忧愁，担心自己死前会被剥夺总督职位。跨越坎贝湾时，他们俘虏了一艘小型阿拉伯三角帆船，讯问了它的船长。有消息称，一位新总督带来了许多船只和军官；新总督在果阿待了一个月，现在去科钦了；但是，不知道他姓甚名

谁。对奄奄一息的阿尔布开克而言，这是沉重的打击。

随后传来更糟糕的消息。在达布尔外海，他们遇到一艘葡萄牙船。船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曾在阿尔布开克于印度的这么多年里多次与他打交道：佛罗伦萨商人乔万尼·达·恩波利。他与阿尔布开克颇有芥蒂。我们不清楚他俩之间究竟有什么纠葛，但根据一份记载，恩波利“秘密地告诉了阿尔布开克一些坏消息，这些话对他的健康而言简直是毒药，扰乱了他内心的宁静……加速了他的死亡”。^[29]或许恩波利恶毒地强调了阿尔布开克在国王眼中的垮台。垂死的阿尔布开克得知了他的继任者的名字洛波·苏亚雷斯·德·阿尔贝加里亚，以及他的舰队中一些被任命到印度殖民地关键位置上的人选。这些得势的新人大多是他的敌人，其中包括迪奥戈·佩雷拉，他曾将佩雷拉赶回葡萄牙。阿尔布开克转向朋友迪奥戈·费尔南德斯，说道：“你对这怎么看？被我赶回国的人、被我批评的人如今得到了荣誉和封赏，这对我来说真是‘喜讯’啊。在国王眼里，我的罪过还不知道有多大。我因为爱护士卒，在国王面前遭到谴责；我因为爱戴国王，而遭到奸佞小人的构陷。”^[30]得到这番消息之后，他就丧失了生存的意志。他命令将自己船上的王旗降下：他已经没有权力了。

1515年12月6日，他给国王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陛下，这封信不是我亲笔写的，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时日无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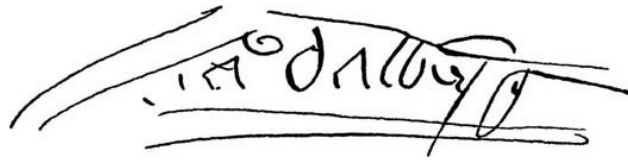
陛下，我留下了一个儿子，继承我的衣钵。我的所有财产，反正不多，都传给他。但我凭借自己的效劳而理应得到的回报，我也留给他。这回报是非常大的。印度的繁荣昌盛就是我的证词，也会为他说话。印度和我们已经占领的所有主要据点，我都留给陛下。唯一的困难是未能非常巩固地封锁红海。这是陛下给我的使命……我完全信赖陛下和王后。我恳求两位陛下推进我的未竟事业，因为我是在为您效力的过程中去世的，我理应得到您的支持……我亲吻您的双手……

写于海上，1515年12月6日^[31]

然后是他歪歪扭扭的亲笔签名：

陛下的仆人，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Afonso de Albuquerque'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on a light background and is the central focus of the image.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的签名

他希望能活着再看到果阿，并让人给他穿上圣雅各骑士团的罩袍（他是这个军事修会的成员），并穿着这罩袍下葬。他立了遗嘱。其中让留一笔钱给鲁伊·迪亚士的灵魂举办九十场弥撒，当初他在一怒之下绞死了迪亚士；他要求将在果阿奇迹般从身旁掠过而没有伤到他的那枚炮弹镀银，并随其他礼物一起送往阿尔加维的瓜达卢佩圣母教堂。12月15日黎明前，他们看到果阿的时候，他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城里的高级教士前来为他举行临终涂油礼，一名医生帮他喝了一点葡萄牙红酒。他们驶入曼杜比河的时候，微弱的曙光泼洒到西高止山上，他挣扎着起身，被扶到舷窗旁，最后看一眼他设想成为自己的帝国首都的地方。随后他就再也不能说话了。在火把照耀下，他的遗体被用棺材架抬到岸上。果阿全城人民都前来观看海上雄狮被抬到教堂。本地果阿人和葡萄牙人一样哀哭。树丛中有猴子在发出吱吱的叫声。清晨的炊烟冉冉升起。

1516年3月20日。在前一年度的香料舰队将阿尔布开克的死讯送回印度之前。曼努埃尔一世写了一封信：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我的朋友！

我们从威尼斯得到消息，苏丹的舰队去了印度。既然是这样，尽管我之前命令你回国，但现在请你务必留在印度！根据我对你和你的服务的经

验，以及天主总是赋予你的胜利，我觉得你在印度，会让我非常安心……我完全依赖你。如果你能执行我的这些指示，我会非常宽慰，仿佛我能亲自处理这些事务！^[32]

对阿尔布开克来说，这封信来得太迟；对曼努埃尔一世伟大的圣战梦想而言，也太迟了。阿尔布开克死后，葡萄牙的圣战事业一蹶不振。

[1]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42.

[2]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46.

[3]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45.

[4]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32.

[5]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p.364-365.

[6]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47.

[7]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32.

[8]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88, p.81.

[9]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43.

[10]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2, p.243.

[11]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398.

[12]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08.

[13]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09.

[14]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20.

[15]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22.

- [16]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23.
- [17]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71.
- [18] 塞拉分是一种金币。
- [19]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31.
- [20]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36.
- [21]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38.
- [22]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p.440-441.
- [23]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857.
- [24]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81.
- [25]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 1979, p.858.
- [26]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80.
- [27]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52.
- [28]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56.
- [29]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 II, part 2, Lisbon, 1778, p.491.
- [30]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p.458.
- [31]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96.
- [32]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99.

尾声：“他们从不在一处停留”

我们知道这个就足够了：地球隐藏的一半已经被揭示出来，葡萄牙人在赤道以南越走越远。因此，之前我们不了解的海岸将很快可以通行，因为人们互相效仿，去劳作和冒险。

——安杰拉的彼得·马特^[1]（1493）^[2]

1520年10月19日夜，一支小小的葡萄牙探险队被带到埃塞俄比亚高原的一座装饰华丽的营帐内。在一座石钟的鸣响中，他们跪在地上等候并观察四周。一面帐幕被缓缓拉开，一个人端坐在高高的奢华宝座上，用看不见的细线悬挂的蓝布遮挡着他的面容。钟声奏响，最后一层屏障被短暂地降下，允许葡萄牙人一睹这位神秘人物，正是他给葡萄牙人的航海冒险提供了那么大的动力：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国王达维特二世，葡萄牙人称之为祭司王约翰，他们相信他会帮助葡萄牙实现曼努埃尔一世的圣战梦想。葡萄牙人期盼这次会面，已经有差不多一个世纪了，而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渴望的时间则更久：

我们看到祭司王约翰坐在六级台阶的华丽高台上。他头戴一顶金银的高高冠冕……手里拿着一个银十字架……祭司王约翰身穿精美的锦缎长袍、宽袖的丝绸衬衣……他的膝盖以下穿着一件华丽的织物，铺得很开，就像主教的裙裾，他端坐的姿态就像他们在墙上画的圣父……从年龄、面貌和身材看，他还很年轻，皮肤不是很黑……身高中等，颇为优雅，他们说年纪为二十三岁。他看上去的确像是这个年纪，圆脸庞，大眼睛，鼻子中段很高，开始蓄须。他威风凛凛，仪表堂堂，的确符合他的崇高身份。我们与他的距离大约有两支长枪那么远。^[3]



16世纪葡萄牙地图上的祭司王约翰的国度

找到祭司王约翰的消息于次年春季传到曼努埃尔一世耳边，他立刻给教皇发去一封贺喜信。1521年6月，国王公开宣布，摧毁麦加和收复耶路撒冷已经指日可待。但真相并非如此。曼努埃尔一世目前还不知道，达维特二世个人的仪表虽然令人肃然起敬，却不是中世纪地图上描绘的战无不胜的强大君王。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埃塞俄比亚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没有能力进攻伊斯兰世界；恰恰相反，他们被穆斯林敌人团团围住。达维特二世于1540年战死，四百名葡萄牙志愿者发动了一次英雄主义的远征，拼死奋战，才挽救了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正如祭司王约翰的真实面目被逐渐揭示，葡萄牙地理大发现的第一个世纪里，通过对地理、气候、自然史和文化的经验主义的观察，中世纪关于世界的许多其他神话，以及古代权威的智慧（如关于狗头人和能吞得下大象的鸟）也被相继揭穿和破除。正是这种观察拉开了现代早期的大幕。

曼努埃尔一世于1521年12月驾崩。尽管当时没有人意识到，但他的圣战计划其实早在多年前，阿尔布开克未能攻克亚丁城墙时（梯子破裂的声响如同致命的手枪声）就开始破灭了。总督后来被解职并去世，圣战梦想就更加难以为继了。接替他的先后有三个笨拙而怯懦的人，没有一个拥有他那样的战略天赋。洛波·苏亚雷斯·德·阿尔贝加里亚拥有一支

庞大的舰队，然而当亚丁的谢赫主动提议让葡萄牙人在亚丁建造一座要塞时，他竟拒绝了，因为他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后来，他进攻吉达又遭遇了惨败。若昂·德·巴罗斯对这次失败的评价是：“史上最悲惨、最凄凉的悲剧，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一支庞大舰队未经一战就逃之夭夭。”^[4]阿尔贝加里亚还做了更糟糕的事情。他开了历史的倒车，废除了训练有素的职业化方阵步兵，而选择葡萄牙贵族的蛮勇战术；他放松了对私人贸易的禁令（这道禁令是阿尔布开克与他在印度的政敌的矛盾核心），而偏袒海盗一般的船长们的派系私利。腐败和滥用职权现象于是越来越猖獗。

曼努埃尔一世的宏伟计划还遭到了其他打击。1515年，他在摩洛哥的军队，即攻打伊斯兰世界的钳形攻势的第二支力量，遭到惨败。他的王后玛丽亚是他的圣战梦想的最狂热支持者，于1517年去世。同一年，马穆鲁克王朝灭亡了。奥斯曼苏丹“恐怖的”塞利姆一世击溃了马穆鲁克王朝的军队，将马穆鲁克王朝末代苏丹吊死在开罗城门上。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将面对一个更强悍的穆斯林对手。

曼努埃尔一世非常幸运，曾拥有阿尔梅达和阿尔布开克这两位清正廉洁、忠心耿耿的指挥官，尤其阿尔布开克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和极富远见的帝国建设者之一。阿尔布开克手中的人力始终只有几千，只有临时拼凑的资源、虫蛀的船只，却凭借令人瞠目结舌的雄心壮志，赠给曼努埃尔一世一个印度洋帝国，其由一系列要塞的网络支撑。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令全世界大感意外。欧洲竞技场上没有人预想到，这个处于欧洲边缘的蕞尔小国，竟能向东方做一个大跳跃，将东西半球连接起来，并建设起第一个全球性殖民帝国。当达伽马第一次在卡利卡特登陆的时候，“卡斯蒂利亚国王、法兰西国王或者威尼斯共和国政府为什么不派人来？”^[5]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只有葡萄牙能够做到：答案在于葡萄牙积累了数十载相关的知识，并且在欧洲的船头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在这期间，探索发现成了国家政策。

曼努埃尔一世驾崩后，印度不再是消灭伊斯兰世界的跳板，而重新变成殖民冒险的最终目的。16世纪，葡萄牙人经历了数十年的血腥战争，保卫自己在印度占据的领地，抵抗奥斯曼帝国领导的持续进攻，这些进攻对阿尔布开克的要塞政策发起了极大的挑战，将其几乎逼到了崩溃边缘。少量葡萄牙士兵经常面对远远多于他们的敌人，却能顽强战斗并以少胜多。1570~1571年，印度多国联合向果阿和朱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也在城墙下溃散。印度人无法将法兰克人逐出。果阿，“东方的罗马”，证明了阿尔布开克战略设想的伟大。在随后的四百年里，它始终是葡萄牙殖民地，是一种了不起的多种族文化的家园。

渐渐地，奥斯曼帝国施加的压力使得葡萄牙人再也无力对红海实施经济封锁。从今往后，开罗和里斯本将分享香料贸易。葡萄牙人也有效地扩大了市场：在16世纪，欧洲人的香料消费增加了一倍。对葡萄牙的海外领地来说，在印度洋和更遥远海域的贸易变得与葡萄牙本土的贸易同样重要。葡萄牙的扩张越来越被民间商人控制，延伸到马六甲以东更远的地方，一直到香料群岛、中国和日本。

和所有的帝国主义冒险一样，历史对葡萄牙殖民霸业的评判也是褒贬不一。阿尔布开克虽然凶悍，却始终坚持一种理想主义的正义感。他对葡萄牙人冒险的风险与后果心知肚明。勘察霍尔木兹城墙时，他宣称：

.....只要有正义支撑，不要压迫人民，这些城墙就足够了。但如果葡萄牙人在这些地区不再信守诺言和维持人道，那么骄傲就会掀翻我们最坚实的城墙。葡萄牙是个穷国，穷人贪得无厌的时候，就会变成压迫者。印度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担心有一天，我们今天作为武士的名望会消逝，那时所有人都只说我们是贪婪的暴君。[\[6\]](#)

当时的扎莫林和后来的许多印度历史学家都将葡萄牙人的暴力入侵视为海盗行径。马来西亚政府仿制了“海洋之花”号，作为历史教训。它的入口处有一块铭牌：“这艘船运载的货物包括殖民者于1511年征服马

六甲之后从本国掳掠的宝藏。感谢上天，这艘船于1512年1月26日在返回欧洲途中在马六甲海峡沉没。”^[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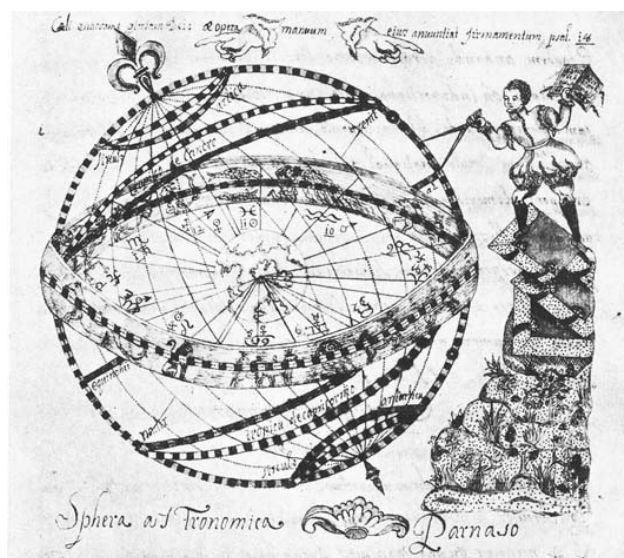
尽管亚洲人对法兰克人入侵之前的梦幻时光有着怀旧憧憬，但在法兰克人到来之前，这个庞大而大体上安宁的贸易区是一片封闭的海域。葡萄牙人用青铜大炮和强大的舰队既打破了这个自给自足的体系，也将世界连接起来。他们是全球化和科学发现时代的先驱。他们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士兵奔波到世界各地。他们来到长崎^[8]和澳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和不丹的山峦。他们跋涉在青藏高原，还沿着亚马孙河逆流而上。他们一边旅行，一边绘制地图，学习语言，“一手拿剑，一手拿笔”，^[9]记载自己的发现。路易斯·瓦斯·德·卡蒙伊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为探索的英雄主义谱写了一个神话，而他本人身上也彰显出葡萄牙冒险家有时非常疯狂的品质。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游历最广的诗人。他在摩洛哥失去了一只眼睛，因为一次斗剑而被放逐到东方，在果阿一贫如洗，在湄公河三角洲失事沉船。他的中国情人不幸淹死，而他把自己的史诗手稿举在头顶上，游到岸边。卡蒙伊斯如此描述葡萄牙探险家们：“如果世界更大，他们也会发现它。”^[10]

葡萄牙的强盛只维持了一个世纪多一点，但取得了辉煌成就：它缔造了一种新型的、形式灵活的帝国，以机动的海权为基础，并创造了欧洲殖民扩张的模式。荷兰人和英国人将紧随其后。

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启动了无穷尽的全球交往，既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他们把火器和面包带到日本，把星盘和四季豆^[11]引入中国，把非洲奴隶运往美洲，运送茶叶去英格兰，运送胡椒去新大陆，运送中国丝绸和印度药品去全欧洲，还把一头大象送给教皇。世界各地的众多民族第一次可以互相观察、互相惊叹和描述。在日本画家的笔下，陌生的欧洲来客身穿硕大的气球般鼓胀的长裤，头戴五彩缤纷的帽子。僧伽罗人对葡萄牙人普遍的充沛精力和饮食习惯大感困惑，描述他们

为“非常白皙和美丽的民族，戴铁帽子，穿铁靴子，从不在一处停留。他们吃一种白色石头，喝血”。^[12]这样的形象、印象和贸易交换为全球的文化、食品、植物、艺术、历史、语言和基因留下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还开始了西方主宰世界的五百年。这个时期直到今天才开始逆转。在葡萄牙人之后，多层集装箱船在各大洋穿梭来往，从东方运回制成品。中国也正在印度洋和非洲的心脏展现新形式的软实力。

在今天的贝伦，瓦斯科·达伽马的陵墓和粗暴的阿尔布开克的雕像附近，也就是葡萄牙人起航的那片海岸，坐落着一间广受尊敬的蛋糕店/咖啡屋：老贝伦糕饼店。它或许是葡萄牙全球冒险的正面影响的纪念碑。人们蜂拥前来品尝它的风味食品“贝伦糕饼”，即甜蛋奶沙司果馅饼，烤成褐色，撒着肉桂，再配以黑如焦油的咖啡。肉桂、糖、咖啡：全世界的口味最初就是随着航船，在这里登陆的。



^[1] 安杰拉的彼得·马特（1457～1526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西班牙历史学家与人文主义学者。他记载了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历史，其著作是关于新大陆地理和历史的珍贵资料来源。他还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儿女们的教师。

^[2] Boorstin, Daniel J. *The Discoverers*. New York, 1986, p.145.

[3] Alvares, Francisco. *Narrative of the Portuguese Embassy to Abyssinia During the Years 1520-1527*.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ord Stanley of Alderley. London, 1881, pp.202-203.

[4] Rodrigues, J.N., and T. Devezas. *1509. Famalicão*, 2008, p.284.

[5] *Roteiro da Viagem Que em Descobrimento da India pelo Cabo da Boa Esperança Fez Dom Vasco da Gama em 1497*. Porto, 1838, p.51.

[6]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p.286.

[7] Rodrigues, J.N., and T. Devezas. *1509. Famalicão*, 2008, p.329.

[8] 1543年，第一批欧洲人，主要是葡萄牙探险家、军人和传教士，来到日本长崎。在1543~1614年的所谓“南蛮时代”，长崎成为葡萄牙和西方影响日本的中心。

[9] Camões, Luís Vaz de. *The Lusíads*. Translated by Landeg White. Oxford, 1997, p.154.

[10] Pyne, Stephen J. “Seeking Newer Worlds: An Historical Context for Space Exploration.” www.history.nasa.gov/SP-2006-4702/chapters/chapter1.pdf, pp.18-19.

[11] 根据《中国蔬菜作物图鉴》（方智远、张武男主编，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四季豆（或称菜豆、芸豆、豆角等，英文俗名Green bean或snap bean等，学名Phaseolus vulgaris L.）原产地为中南美洲，16世纪传入旧大陆，16世纪末传入中国。

[12] Suckling, Horatio John. *Ceylon: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 London, 1876, p.280.

致谢

撰写葡萄牙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对我来说是一次精彩的个人冒险，我对许多帮助我前进的个人与组织感激不尽。

首先感谢Pascal Monteiro de Barros，他给我写来一封电邮，促使本书诞生。他向我建议写作这样一本书，又始终支持我的工作。然后还要感谢Patrick Monteiro de Barros。他们两位在里斯本为我打开了一些大门，向我表达了许多善意，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我还不够睿智，没有遵从他们的全部建议。无论在所有远航开始的那座城市，还是在英国，他们都对我帮助极大。我要感谢Mary-Anne Stillwell d’Avillez和Isabel Stillwell及其家人。感谢Isabel Cruz Almeida亲自带我参观了热罗尼莫修道院。João Lúcio da Costa Lopes给了我登上“真十字架”号卡拉维尔帆船的机会。José Vilas Boas Tavares将军和Bossa Dionísio将军帮助我读到葡萄牙海军博物馆图书馆里面的珍本书。Pedro de Avillez借给我一些宝贵的书籍供阅读。Ricardo Noronha帮助我翻译。我要感谢葡萄牙圣灵银行历史中心的Carlos Damas。以下这些人士热情招待了我，我和他们进行了有趣的谈话：Francisco de Bragança van Uden及其客人，Eduardo Costa Duarte及其客人（他们向我介绍了本书开头部分佩索阿的诗句），Francisco Andrade，Francisco Duarte Lobo de Vasconcellos和José Duarte Lobo de Vasconcellos，Joaquim Luiz Gomes和Alison Luiz Gomes，Manuel de Melo Pinto Ribeiro以及Francisco Magalhães Carneiro。

我还要感谢Stan、Tom Ginn、Ron Morton审读并评论手稿。感谢

Julian Loose、Kate Ward和Eleanor Rees费心修改和制作本书。我感谢Andrew Lownie，以及一贯地感激Jan。此外，还有许多没有包括在上述名单中的人，他们也给了我启发与想法。我无法当面一一致谢，在此道歉。

最后，我要感谢作者基金会与作者协会赞助了本书的写作。

参考文献

第一手资料

Albuquerque, Afonso de. *Cartas para El-Rei D. Manuel I*. 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 Lisbon, 1942.

Albuquerque, Afonso de [1500-80] .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 Translated by Walter de Gray Birch. 4 vols. London, 1875-84.

Albuquerque, Luís de, 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 eds. *Grandes Viagens Marítimas*. Lisbon, 1989.

Alvares, Francisco. *Narrative of the Portuguese Embassy to Abyssinia During the Years 1520-1527*.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ord Stanley of Alderley. London, 1881.

———. *The Prester John of the Indi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F. Buckingham and G.W.B. Huntingford. Vol. 2. Cambridge, 1961.

Azurara, Gomes Eannes de. *The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arles Raymond Beazley and Edgar Prestage. 2 vols. London, 1896 and 1899.

Barbosa, Duarte.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Translated by Mansel

Longworth Danes. London, 1918.

Barros, João de. *Da Ásia*. Décadas I - II. Lisbon, 1778.

Cadamosto, Alvise. *The Voyages of Cadamost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 R. Crone. London, 1937.

Ca'Masser, Leonardo da. "Relazione di Leonardo da Ca'Masser, alla Serenissima Republics di Venezia Sopra il Commercio dei Portoghesi nell'India."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ppendice, vol.2, 1845.

Camões, Luís Vaz de. *The Lusíads*. Translated by Landeg White. Oxford, 1997.

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2 vols. Porto, 1979.

Correia (or Corrêa), Gaspar. *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enry Stanley. London, 1879.

———.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860.

Davenport, Frances Gardiner, ed. *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 to 1648*. Washington, D.C., 1917.

Earle, T.F., and John Villiers, ed. and trans. *Albuquerque, Caesar of the East: Selected Texts by Afonso de Albuquerque and His Son*. Warminster, 1990.

Góis, Damião de. *Cró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 Manuel*. Vol. 1.

Coimbra, 1926.

———. *Lisbon in the Renaissance*. Translated by Jeffrey S. Ruth. New York, 1996.

Greenlee, W. B., trans. *The Voyage of Pedro Á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London, 1938.

Ibn Iya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ston Wiet. Paris, 1955.

Major, R. H., ed. and trans. *Ind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857.

Pereira, Duarte Pacheco. *Esmeraldo de Situ Orbi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H.T. Kimble. London, 1937.

Pires, Tomé.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2 vol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rmando Cortesão. London, 1944.

Priuli, G. *Diarii*. Edited by A. Segre. In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24, part 3. Città di Castello, 1921-34.

Ravenstein, E. G., 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7-99*. London, 1898.

Roteiro da Viagem Que em Descobrimento da India pelo Cabo da Boa Esperança Fez Dom Vasco da Gama em 1497. Porto, 1838.

Teyssier, Paul, and Paul Valentin, ed. and trans. *Voyages de Vasco de Gama: Relations des Expéditions de 1497-1499 et 1502-1503*. Paris, 1995.

Vasconcelos, Basílio de, ed. *Itinerário do Dr. Jerónimo Münzer*. Coimbra, 1931.

Zayn al-Dīn ‘Abd al-’Azīz. *Tohfut-ul-Mujahideen*. Translated by M.J. Rowlandson. London, 1883.

现代研究

Albuquerque, Luís de, and 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 eds. *Dicionário de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2 vols. Lisbon, 1994.

Aubin, Jean, ed. *La Découverte, le Portugal et l'Europe*. Paris, 1990.

———. *Le Latin et l'astrolabe: Recherches sur le Portugal de la Renaissance, Son Expansion en Asie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3 vols. Lisbon, 1996-2006.

Axelson, Eric. *The Portuguese in South-East Africa, 1488-1600*. Johannesburg, 1973.

Baião, António, Hernani Cidade, and Manuel Múriàs, eds. *História da Expansão Portuguesa no Mundo*. Lisbon, 1937.

Baldrige, Cates. *Prisoners of Prester John: The Portuguese Mission to Ethiopia in Search of the Mythical King, 1520-1526*. Jefferson, 2012.

Bedini, Silvano A. *The Pope's Elephant*. Manchester, 1997.

Blake, John W. *European Beginnings in West Africa, 1454-1578*.

London, 1937.

Boorstin, Daniel J. *The Discoverers*. New York, 1986.

Bouchon, Geneviève. *Albuquerque: Le Lion des Mers d'Asie*. Paris, 1992.

———. *Inde Découverte, Inde Retrouvée, 1498-1630*. Lisbon, 1999.

———. *Regent of the Sea*. Translated by Louise Shackley. Delhi, 1988.

———. *Vasco de Gama*. Paris, 1997.

Boxer, C.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1969.

Campos, José Moreira. *Da Fantasia à Realidade: Afonso d'Albuquerque*. Lisbon, 1953.

Casale, Giancarlo. *The Ottoman Age of Exploration*. Oxford, 2010.

Catz, Rebecca.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Portuguese, 1476-98*. Westport, 1993.

Chandeigne, Michel, ed. *Lisbonne Hors les Murs, 1415-1580: L'Invention du Monde par les Navigateurs Portugais*. Paris, 1990.

Cliff, Nigel. *Holy War*. New York, 2011.

Costa, A.F. de. *As Portas da Índia em 1484*. Lisbon, 1935.

Coutinho, Gago. *A Nàutica dos Descobrimentos*. Lisbon, 1969.

Couto, Djanirah, and Rui Manuel Loureiro. *Ormuz 1507 e 1622: Conquista e Perda*. Lisbon, 2007.

Crowley, Roger. *City of Fortune*. London, 2011.

Danvers, Frederick Charles.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Vol. 1. London, 1966.

Delumeau, Jean. "L'Escatologie de Manuel le Fortuné." *Journal des Savants*, no.1 (1995) : pp. 179-86.

Diffie, Bailey W., and George D. Wini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Minneapolis, 1977.

Disney, Anthony, and Emily Booth, eds. *Vasco da Gama and the Linking of Europe and Asia*. Delhi, 2000.

Domingues, Francisco Contente. *Navios e Viagens*. Lisbon, 2008.

Donkin, R.A.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Moluccas and the Trade in Spices up to the Arrival of the Europeans*. Philadelphia, 2003.

Ferguson, Niall.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2011.

Fernández-Armesto, Felipe. *Columbus*. Oxford, 1991.

———. *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Oxford, 2006.

Ficalho, Conde de. *Viagens de Pero da Covilha*. Lisbon, 1988.

Fonseca, Luís Adão da. *The Discove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Ocean*. Lisbon, 1999.

———. *D. João II*. Rio de Mouro, 2005.

Frater, Alexander. *Chasing the Monsoon*. London, 1990.

Fuentes, Carlos. *The Buried Mirror: Reflecting on Spain and the New World*. New York, 1999.

Garcia, José Manuel. *D.João II vs. Colombo*. Vila do Conde, 2012.

Gracias, Fátima da Silva. *Kaleidoscope of Women in Goa, 1510-1961*. Delhi, 1996.

Granzotto, Gianni. *Christopher Columbus: The Dream and the Obsession*. London, 1986.

Hall, Richard. *Empires of the Monsoon*. London, 1996.

Jack, Malcolm. *Lisbon: City of the Sea*. London, 2007.

Kimble, George. "Portuguese Policy and Its Influence on Fifteenth-Century Cartography." *Geographical Review*, 23, no.4 (October 1933) .

Kronl, Michael. *The Taste of Conquest*. New York, 2007.

Lisboa Quinhentista, a Imagem e a Vida da Cidade. Lisbon, 1983.

Magalhães, Joaquim Romero. *The Portugues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isbon, 1998.

Marques, A.H. de Oliviera. *History of Portugal*. Vol. 1. New York, 1972.

Monteiro, Saturnino. *Portuguese Sea Battles*. Vol. 1, *The First World*

Sea Power, 1139-1521. Lisbon, 2013.

Newitt, M. *A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 1400-1668*. London, 2005.

Noonan, 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 1989.

Oliviera e Costa, João Paulo. *D. Manuel 1*. Rio de Mouro, 2005.

Page, Martin. *The First Global Village: How Portugal Changed the World*. Lisbon, 2002.

Panikkar, K.M.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1953.

———. *Malabar and the Portuguese*. Bombay, 1929.

Parry, J.H.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London, 1966.

Pearson, M.N. *Coastal Western India: Studies from the Portuguese Records*. Delhi, 1981.

———.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Part 1, vol. 1,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Cambridge, 1987.

Pereira, José António Rodrigues. *Marinha Portuguesa: Nove Séculos de História*. Lisbon, 2010.

Pereira, Paulo. *Torre de Belém*. London, 2005.

Peres, Damião.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êses*. Coimbra, 1960.

Pessoa, Fernando. *Mensagem*. Lisbon, 1945.

Pissara, José Virgílio Amaral. *Chaul e Diu: O Domínio do Índico*. Lisbon, 2002.

Pyne, Stephen J. "Seeking Newer Worlds: An Historical Context for Space Exploration." www.history.nasa.gov/SP-2006-4702/chapters/chapter1.pdf.

Ramos, Rui, et al. *História de Portugal*. Lisbon, 2009.

Randles, W.G.L. *Geography, Cartography and Nautical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Discoveries*. Farnham, 2000.

Ravenstein, E.G. *The Voyages of Diogo Cão and Bartholomeu Dias, 1482-88*. England, 2010.

Rodrigues, J.N., and T. Devezas. *1509*. Famalicão, 2008.

———. *Pioneers of Globalization—Why Portugal Surprised the World*. Famalicão, 2007.

Rodrigues, Vítor Luís. "As Companhias de Ordenança n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 1510-1580." In *Oceanos—Indo Portuguesmente*, no.19/20, 212-18. Lisbon: CNCDP, 1994.

Rodrigues, Vítor Luís Gaspar, and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Conquista de Goa, 1510-1512*. Lisbon, 2008.

———. *Conquista de Malaca, 1511*. Lisbon, 2011.

Rogerson, Barnaby. *The Last Crusaders: East, West and the Battle*

for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London, 2010.

Russell, Peter.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A Life*. New Haven, 2000.

Sanceau, Elaine. *Indies Adventure*. London, 1936.

———. *The Perfect Prince*. Porto, 1959.

Santos, José Loureiro dos. *Ceuta 1415: A Conquista*. Lisbon, 2004.

Sheriff, Abdul. *Dhow Cultures of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2010.

Silva, Joaquim Candeias. *O Fundador do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D. Francisco de Almeida*. Lisbon, 1996.

Subrahmanyam, Sanjay. *The Career and Legend of Vasco da Gama*. Cambridge, 1997.

———.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1993.

Suckling, Horatio John. *Ceylon: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 London, 1876.

Teixeira, André. *Fortalezas: 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 Lisbon, 2008.

Thomaz, Luís Felipe. *De Ceuta a Timor*. Lisbon, 1994.

Thompson, William R., ed. *Great Power Rivalries*. Columbia, 1999.

Villiers, Alan. *Sons of Sindbad*. London, 1940.

Weinstein, Donald. *Ambassador from Venice: Pietro Pasqualigo in Lisbon, 1501*. Minneapolis, 1960.

Whiteway, R.S. *The Rise of Portuguese Power in India, 1497-1550*. London, 1899.

Winius, George D., ed. *Portugal, the Pathfinder: Journeys from the Medieval Toward the Modern World, 1300-c. 1600*. Madison, 1995.

译名对照表

Abrantes阿布兰特什

Abreu, António de安东尼奥·德·阿布雷乌

Aden亚丁

Adil Shah阿迪尔沙阿

Afonso V of Portugal阿方索五世，葡萄牙国王

Ahmed, Rais赖斯·艾哈迈德

Albergaria, Lopo Soares de洛波·苏亚雷斯·德·阿尔贝加里亚

Albuquerque, Afonso de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

Albuquerque, Francisco de弗朗西斯科·德·阿尔布开克

Alenquer, Pêro de佩罗·德·阿伦克尔

Algarve阿尔加维

Ali, Sidi西迪·阿里

Almeida, Dom Francisco d'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

Almeida, Gaspar de加斯帕尔·德·阿尔梅达

Almeida, Lourenço d'洛伦索·德·阿尔梅达

Alpoym, Pêro佩罗·德·爱尔博伊姆

Amaral, André do安德烈·多·阿马拉尔

Anjediva安贾迪普岛

Antiga Confeitaria de Belêm老贝伦糕饼店

António Dom堂安东尼奥

Araujo, Ruy de鲁伊·德·阿劳若

Arnau, Michel米歇尔·阿尔瑙

Ata, Hwaga瓦加·阿塔

Ataíde, Pêro de佩罗·德·阿泰德

Avis, house of阿维斯王朝

Ayaz, Malik马利克·阿亚兹

Bab el Mandeb strait曼德海峡，“泪之门”

Baghdad巴格达

Bahamas巴哈马

Bandas班达群岛

Barbara巴尔巴拉

Barreto, Pêro佩罗·巴雷托

Barros, João de若昂·德·巴罗斯

Bay of the Cowherds牧牛人湾

Bedouins贝都因人

Behaim, Martin马丁·倍海姆

Bela“贝拉”号

Belêm贝伦

Benastarim贝纳斯塔里姆

Bengal孟加拉

berços后装回旋炮

Bergamo, Matteo da马泰奥·达·贝尔加莫

Bérrio“贝里奥”号

Bharkal巴特卡尔

Bhutan不丹

Bijapur比贾布尔

Bologna博洛尼亚

Branda布兰达

Brazil巴西

Brito, Lourenço de洛伦索·德·布里托

Bruges布鲁日

Brunei文莱

Buonagrazia, Giovanni乔万尼·博纳格拉齐亚

Burma缅甸

Cabral, Pedro Álvares,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

Cairo开罗

Calicut卡利卡特

Ca'Masser, Leonardo da莱奥纳尔多·达·卡马瑟

Cambay坎贝

Cambodia柬埔寨

Caminha, Pêro Vaz de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

Camões, Luís Vaz de路易斯·瓦斯·德·卡蒙伊斯

Camoram (Kamaran) 卡马兰岛

Canary Islands加那利群岛

Cannanore (Kannur) 坎纳诺尔

Cantino, Alberto 阿尔贝托·坎蒂诺

Cantino Planisphere 坎蒂诺平面球形图

Cão, Diogo 迪奥戈·康

Cão, Pêro 佩罗·康

Cape Agulhas 厄加勒斯角

Cape Cross 十字架角

Cape Diab 迪亚布角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Cape St.Vincent 圣文森特角

Cape Verde Islands 佛得角群岛

Caribbean 加勒比海

cartazes 通行证

Carvalho, António 安东尼奥·卡瓦略

Castanheda (Chronicler) 卡斯塔涅达 (编年史家)

Castile 卡斯蒂利亚

Castle of St.George 圣乔治城堡

Catalan Atlas加泰罗尼亚地图

Central Asia中亚

Cerame色拉姆

Ceuta休达

Ceylon锡兰

Chaul朱尔

Cirne“西尔内”号

Cochin科钦

Coelho, Nicholas尼古拉·科艾略

Colaço, Fernão费尔南·科拉索

Columbus, Chirstopher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ommittee of the Ten十人委员会

Conceição“孔塞桑”号

Congo River刚果河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

Conti, Niccolò de'尼科洛·达·孔蒂

Corrêa, Ayres艾雷斯·科雷亚

Correia, Gaspar加斯帕尔·科雷亚

Costa, António da安东尼奥·达·科斯塔

Coutinho, Fernando (marshal) 费尔南多·科蒂尼奥 (最高军务官)

Covilhã, Pêro da佩罗·达·科维良

Cranganore (Kodungallur) 克兰加努尔 (科东格阿尔卢尔)

Crete克里特岛

Cretico“克里特人”

cruzado克鲁扎多

Cuba古巴

Cunha, Tristão da特里斯唐·达·库尼亚

Customs House海关大楼

Cyprus塞浦路斯岛

Dabul达布尔

d'Alpoym, Pêro佩罗·德·爱尔博伊姆

Damascus大马士革

D'anghiera, Peter Martyr安杰拉的彼得·马特

Dawit II, King of Ethiopia达维特二世, 埃塞俄比亚国王

Deccan Plateau德干高原

Delgado, João若昂·德尔加多

Deli, Mount德里山

dhow阿拉伯三角帆船

Dias, Bartolomeu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Dias, Diogo迪奥戈·迪亚士

Dias, Fernão费尔南·迪亚士

Dias, Pêro佩罗·迪亚士

Dias, Ruy鲁伊·迪亚士

Dias, de Solis, João若昂·迪亚士·德·索利斯

Dinheiro (Gomes Cheira) 戈梅斯·“谢拉·丁埃罗”

Diogo迪奥戈

Diu第乌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国

Duarte, Prince杜阿尔特王子

Dürer, Albrecht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East Africa东非

Edward III, King of England爱德华三世，英格兰国王

Egypt埃及

Eleni艾莱妮

Empoli, Giovanni da乔万尼·达·恩波利

Emxobregas“恩绍布雷加斯”号

England英格兰

Escobar, Pêro佩罗·埃斯科巴尔

Eskender埃斯肯德

Ethiopia埃塞俄比亚

Faqih, Jauhar al-朱哈尔·法基

Ferdinand II of Aragon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

Fernandes, Fradique弗拉迪克·费尔南德斯

Fernandes, Tomás托马斯·费尔南德斯

Fernandes, de Beja, Diogo迪奥戈·费尔南德斯·德·贝雅

Fernandez, André安德烈·费尔南德斯

Ferrara, duke of费拉拉公爵

Ferreira, Miguel米格尔·费雷拉

Ferreira, Nicolau de尼古劳·德·费雷拉

Fez非斯

fidalgos显贵

Flanders佛兰德

Florence佛罗伦萨

Fogaça, Jorge若热·福加萨

Formosa福摩萨

Fort Manuel曼努埃尔要塞

Fortunate Islands幸运群岛

Francis I of France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Franciscans方济各会

Freire, Lourenço洛伦索·弗莱雷

Freire, Ruy鲁伊·弗莱雷

Frol de la Mar“海洋之花”号

Fuggers富格尔家族

Galle加勒

Galvão, Duarte杜阿尔特·加尔旺

Gama, Balthazar da巴尔塔扎尔·达伽马

Gama, Estêvão埃斯特旺·达伽马

Gama, Paulo da保罗·达伽马

Gambia River冈比亚河

Genoa热那亚

Germany德意志

Ghats高止山脉

Ghawri, Al-Ashraf Qansuh al- (sultan) 阿什拉夫·坎苏·加乌里, 苏丹

Gibraltar直布罗陀

Goa果阿

Gomes, Ruy鲁伊·戈梅斯

Guinea几内亚

Gujarat古吉拉特

Gulf of Guinea几内亚湾

Gulf of St.Christopher圣克里斯托弗湾

Gulf of St.Marta圣马塔湾

Haiti海地

Hajj哈只

Hannibal汉尼拔

Hanno (elephant) 汉诺 (大象)

Henrique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航海家恩里克王子

Henry V, King of England亨利五世, 英格兰国王

Henry VII, King of England亨利七世, 英格兰国王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亨利八世, 英格兰国王

Honavar霍纳瓦尔

Hottentots (Khoikhoi) 霍屯督人 (科伊科伊人)

Hussain Musrif侯赛因·穆斯里夫

Ibn Battuta伊本·白图泰

Ibn Iyas伊本·伊亚斯

Ibn Tayyib伊本·塔伊布

India House印度事务院

Indies西印度群岛

Innocent VIII, Pope英诺森八世, 教皇

Iran伊朗

Isabella, Princess of Asturias伊莎贝拉，阿斯图里亚斯亲王

Isabella, Queen of Castille伊莎贝拉，卡斯蒂利亚女王

Ismail, Shah伊斯玛仪，沙阿

Italy意大利

Japan日本

Java爪哇

Jeddah吉达

Jerónimos Monastery热罗尼莫修道院

Jerusalem耶路撒冷

João I, King of Portugal若昂一世，葡萄牙国王

João II, King of Portugal若昂二世，葡萄牙国王

Joia“若亚”号

Jolof齐洛夫人

Julia“茹利娅”号

Julius II, Pope尤利乌斯二世，教皇

Kamaran卡马兰岛

Kannur, see Cannanore (Kannur) 坎努尔，见坎纳诺尔

Khan, Palud帕卢德汗

Kilwa基尔瓦岛

Knights of St.John圣约翰骑士团

Kundalika River昆达利卡河

Lacerda, Manuel de曼努埃尔·德·拉塞尔达

Lagos拉古什

Land of the True Cross真十字架之地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the Elephant Hanno, The 《大象汉诺的最后遗嘱》

Lebanon黎巴嫩

Lemos, Duarte de杜阿尔特·德·莱莫斯

Leo X, Pope利奥十世，教皇

Lianor利亚诺尔

Lima, Jerónimo de热罗尼莫·德·利马

Lima, João de若昂·德·利马

Lisbon里斯本

Lopes, Tomé托梅·洛佩斯

Lopes de Sequeira, Diogo迪奥戈·洛佩斯·德·塞凯拉

Louis XII, King of France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

Lucena, Vasco Fernandes de 瓦斯科·费尔南德斯·德·卢塞纳

Lusíads, The (Camões)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卡蒙伊斯)

Macao 澳门

Machado, João 若昂·马沙多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Madeira 马德拉岛

Magellan (Fernão de Magalhães) 费尔南·德·麦哲伦

Mahim 马希姆岛

Ma Huan 马欢

Majorca 马略卡岛

Malabar Coast 马拉巴尔海岸

Malacca 马六甲

Malay Peninsula 马来半岛

Maldives 马尔代夫

Mali 马里

Malindi 马林迪

Mamluk dynasty 马穆鲁克王朝

Mandi Mansa 曼迪·曼萨

Mandovi River 曼杜比河

Mansa, Musa 曼萨·穆萨

Manuel I, King of Portugal 曼努埃尔一世，葡萄牙国王

Mappilas 玛皮拉人

Marakkar, Mayimama 马伊玛玛·马拉卡尔

Maria of Aragon 阿拉贡的玛丽亚

Mars (god) 玛尔斯 (神)

Massawa 马萨瓦

Mathias, Father 马太神父

Mauretania 毛里塔尼亚

Mauro, Fra 毛罗修士

Maximilian, Holy Roman Emperor 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Mayr, Hans 汉斯·迈尔

Mecca 麦加

Medina 麦地那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merdimboca往嘴里灌粪便

Miri“米里”号

Mirzan, Amir阿米尔·米尔赞

Mogadishu摩加迪沙

Mohamed, Sultan穆罕默德苏丹

Moluccas摩鹿加群岛

Mombasa蒙巴萨

Monçaide孟塞德

Mongol Empire蒙古帝国

Moors摩尔人

Moreno, Lourenço洛伦索·莫雷诺

Morocco摩洛哥

Mount Deli德里山

Mozambique莫桑比克

Mozambique Channel莫桑比克海峡

Muhammad穆罕默德

Mumbai孟买

Münzer, 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闵采尔

Muscat马斯喀特

Nagasaki长崎

Nambeadora南贝多拉

Namibia纳米比亚

Narayan纳拉扬

Narsingha纳辛哈

Nayars奈尔

Nestorians聂斯脱利派

Niger River尼日尔河

Nile River尼罗河

Noronha, António de安东尼奥·德·诺罗尼亚

North Africa北非

Nova, João de若昂·达·诺瓦

Nunes, João若昂·努涅斯

Nuremberg纽伦堡

Nuruddin, Rais赖斯·努尔丁

Oman阿曼

Order of Christ基督骑士团

Order of St.John on Rhodes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

Ormuz霍尔木兹

Ottoman Empire奥斯曼帝国

Our Lady of Africa非洲圣母

Our Lady of Guadalupe瓜达卢佩圣母

Pacanha, João Rodrigues若昂·罗德里格斯·帕桑尼亚

Pacanha, Jorge若热·帕桑尼亚

Pacheco, Lisuarte利苏阿尔特·帕谢科

Paiva, Afonso de阿方索·德·派瓦

Pandarani班达里

Pangim帕纳吉

Panthalayini潘塔拉伊尼

Payo, António de São安东尼奥·德·圣帕约

Pedro, Prince佩德罗王子

Pegu勃固

Pereira, Diogo迪奥戈·佩雷拉

Pereira, Duarte Pacheco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

Pereira, Gaspar加斯帕尔·佩雷拉

Pereira, Isabella伊莎贝拉·佩雷拉

Pereira, Nuno Vaz努诺·瓦斯·佩雷拉

Peres, Fernão费尔南·佩雷斯

Persian Gulf波斯湾

Pessoa, Fernando费尔南多·佩索阿

Philippa of Lancaster兰开斯特的菲利普

Pires, Tomé托梅·皮莱资

Pirez, Diogo迪奥戈·皮雷斯

Pius III, Pope庇护三世，教皇

Polo, Marco马可·波罗

Portugal葡萄牙

Prassus Promontory普拉苏斯海岬

Priuli, Girolamo吉罗拉莫·普留利

Ptolemy托勒密

Quilon奎隆

Qurayat古赖亚特

Real, António安东尼奥·雷亚尔

Red Sea红海

Rei Grande“伟大国王”号

Restelo, Portugal赖斯特罗，葡萄牙

Rhodes罗德岛

Rio Infante因方特河

River of Gold黄金河

Riverside Palace河畔宫殿

River Tejo塔霍河

Rodrigues, Ines伊内斯·罗德里格斯

Rodrigues, Pai派伊·罗德里格斯

Romão, João若昂·罗芒

Rumes鲁姆人

Sagudino, Alvise阿尔维斯·萨谷迪诺

St.Brás圣布莱斯

St.George圣乔治

St.Tomé圣多美

St.Victoria圣维多利亚

Samudri扎莫林

Santa Maria“圣马利亚”号

Santiago圣地亚哥

Santiago, João de若昂·德·圣地亚哥

Santo Espirito“圣灵”号

Sanuto, Benedetto贝内代托·萨努多

São António“圣安东尼奥”号

São Cristóvão“圣克里斯托弗”号

São Gabriel“圣加百列”号

São João“圣约翰”号

São Miguel“圣米迦勒”号

São Pedro“圣彼得”号

São Rafael“圣拉斐尔”号

Selim “the Grim” “恐怖的”塞利姆一世

Senegal River塞内加尔河

Sernigi, Girolamo吉罗拉莫·塞尔尼基

Shen Du沈度

Shias什叶派

Siam暹罗

Silva, Vasco da瓦斯科·达·席尔瓦

Silveira, Jorge da若热·达·西尔韦拉

Sintra, Portugal辛特拉，葡萄牙

Socotra索科特拉岛

Sodré, Brás布朗斯·索德雷

Sodré, Vicente维森特·索德雷

Sofala索法拉

Souse, Garcia de加西亚·德·索萨

Souse, Payo de帕约·德·索萨

Spain西班牙

Spice islands香料群岛

Sri Lanka斯里兰卡

Star rafts星槎

Strabo斯特拉波

Strait of Gibraltar直布罗陀海峡

Straits of Malacca马六甲海峡

Strozzi, Piero皮耶罗·斯特罗齐

Suez苏伊士

Sumatra苏门答腊

Sunnis逊尼派

Swahili coast斯瓦希里海岸

Table Bay桌湾

Tanur塔努尔

Tejo塔霍河

Teldi, Francesco弗朗切斯科·泰尔迪

Thomas, Saint圣多马

Timbuktu廷巴克图

Timoji狄摩吉

Timor帝汶

Tiwadi提瓦迪岛

Tokolor图库洛尔人

Tordesillas, Treaty of 《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

Toscanelli, Paolo保罗·托斯卡内利

Trimumpara特里马姆帕拉

Trinidad“特林达迪”号

Tristão da Cunha特里斯唐·达·库尼亚

Tupinamba图皮南巴人

Turan Shah图兰沙阿

Ulmo, Fernão de费尔南·德·乌尔默

Vasconcelos, Diogo Mendes de迪奥戈·门德斯·德·瓦斯康塞洛斯

Velho, Diogo迪奥戈·维利乌

Vijayanagar毗奢耶那伽罗

Vizinho, José若泽·维齐尔尼奥

Vypin威平岛

Wadan瓦丹

Waldseemüller, Martin 马丁·瓦尔德西米勒

Western Ghats 西高止山脉

Yellala Falls 叶拉拉瀑布

Zacuto, Abraham 亚伯拉罕·萨库托

Zambezi River 赞比西河

Zanzibar 桑给巴尔

Zeila 塞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
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

书名原文：Conquerors: How Portugal Forged the First Global Empire

ISBN 978-7-5097-9594-1

I.①征... II.①罗...②陆... III.①葡萄牙-近代史-研究 IV.①K5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6643号

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著者/（英）罗杰·克劳利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冯立君

责任编辑/张金勇 李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5.125 插页：1 字数：312千字

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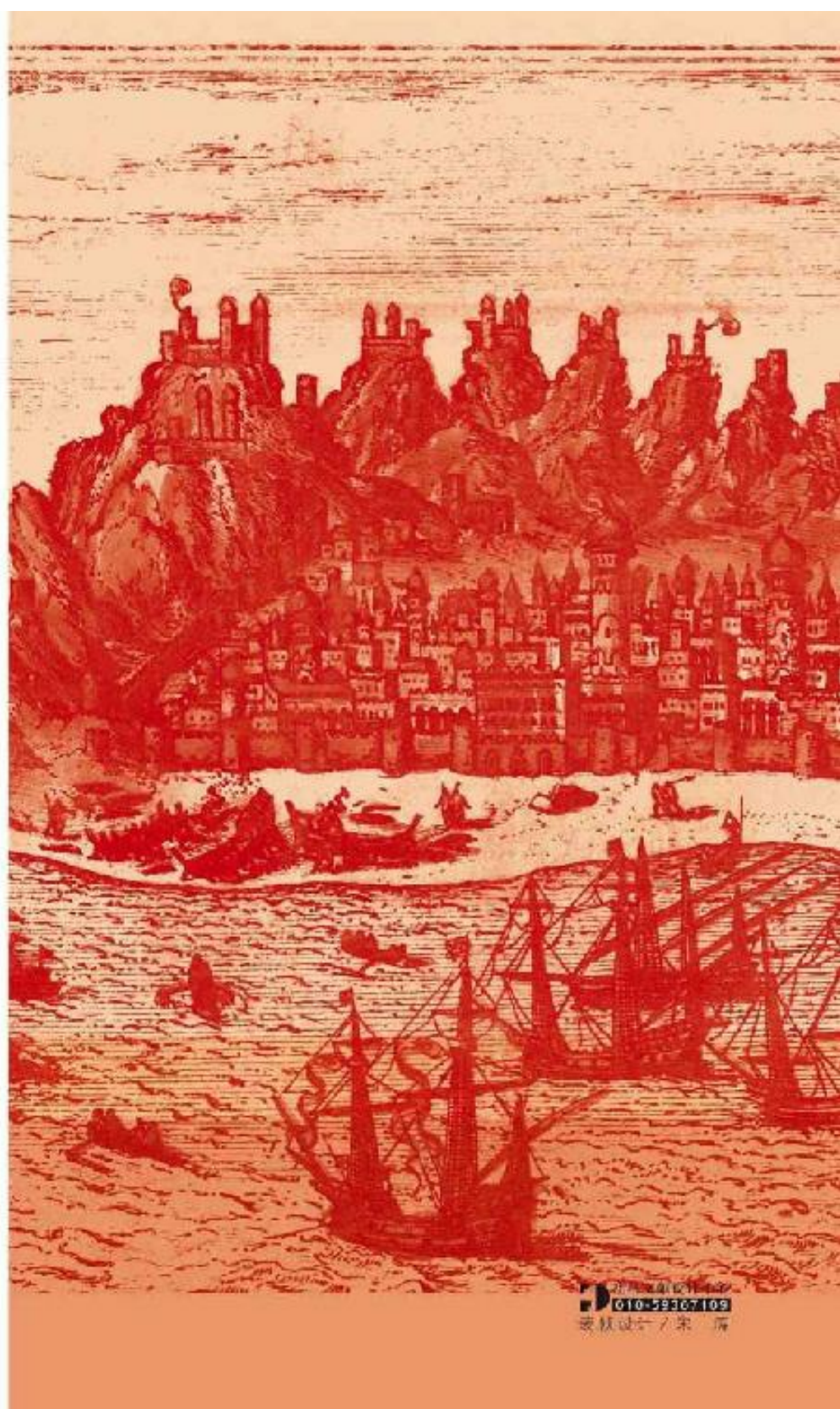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097-9594-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5241号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扣人心弦的叙述中，克劳利记载了葡萄牙从一个“穷困、边缘的”国家崛起成为欧洲强国的可怕、凶残的历史，葡萄牙与西班牙和威尼斯竞争，争夺香料贸易。

——《科克斯书评》

克劳利之前著作的读者对这个关于海战、陆战和海难的刺激故事一定不会失望。克劳利很好地为葡萄牙的重要性做了辩护，它建立了第一个全球帝国。

——《每日电讯报》

快马裹蹄、可读性极强的叙述，涉及迪亚士和达伽马的航行、阿尔梅达和阿尔布开克的战役与征服……克劳利对事件的详细还原建立在对编年史家如巴罗斯和科雷亚的作品的细读之上，他们的作品是用骑士编年史的传统来写的。

——《今日历史》

在他之前的关于十五六世纪基督徒和奥斯曼帝国争夺地中海的研究里，克劳利已经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才华，能将令人手不释卷的叙述与细致到位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同时还能将人性与地缘政治平衡。在本书里，这种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讲述的故事惊心动魄，但并不是每一位历史学家都能把这个故事讲得这么精彩。

——迈克尔·普罗杰，《金融时报》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9594-1



9 787509 795941 >

定价：69.00元